

国际政治精品文库 精选套装

(共11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

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

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谁是美国人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国富国穷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战略 远见

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
洪漫 于卉芹 何卫宁◎译

版权信息

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
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2

书名原文：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ISBN 978-7-5166-5052-3

I.①战... II.①兹.....②洪.....③于.....④何... III.①国际政治-研究 IV.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723号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衰落中的西方

- 1.全球大国的出现
- 2.亚洲崛起与全球权力分散
- 3.全球政治觉醒的影响

第二章 美国梦的消逝

- 1.同一个美国梦
- 2.走出自我蒙蔽
- 3.美国尚存的实力
- 4.美国漫长的帝国主义战争

第三章 美国之后的世界：到2025年不是中国而是混沌

- 1.美国之后的斗争
- 2.地缘政治上最濒危的国家和地区
- 3.睦邻关系的终结
- 4.非共同的全球公共品

第四章 2025年之后：新的地缘政治平衡

- 1.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动荡
- 2.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
- 3.既稳定又协作的新东方

结论 美国的双重角色

布热津斯基是现实主义者，但并非悲观主义者，他为所有关注美国在国内外未来的人提供了一部深思熟虑，并且一如既往发人深省和极合时宜的必读之作。

——罗伯特·盖茨美国国防部前部长

布热津斯基的最新著作反映出他对复杂历史问题进行抽丝剥茧的天分，及其倡导长期解决方案的实力。

——吉米·卡特美国第39任总统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宝贵的屈指可数的杰出战略家之一，他令人信服地为我们描述了未来越来越混乱的世界图景，为美国提供了应对政策。简洁、锋利、睿智。

——莱斯利·盖尔布美国外交学会名誉退休主席

这是一部见解深刻、发人深省和促人奋进的分析之作，所有关注全球稳定和发展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吉姆·沃尔芬森世界银行前行长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最睿智的政治家和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之一，此书对关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公开辩论做出了又一个重大贡献。他的这部新著是必读之作。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

布热津斯基把理论与无可匹敌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对未来进行了发人深省、引人瞩目的描述，同时还配上了令人信服的导航图。

——小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

这部必读之作清晰生动地分析了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

——约翰·克里美国参议员

布热津斯基学识渊博，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前线奋战多年，他在此书中提供了成功规划和行动的全面蓝图。

——理查德·卢格美国参议员

前言

当今世界相互影响和依存。事关人类生存的各种问题破天荒地第一次开始令传统国际冲突的重要性相形见绌。不幸的是，主要大国尚未采取全球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人类福祉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全新挑战——包括环境、气候、社会经济、营养和人口等。没有基本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实现必要的全球合作的任何努力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诚然，全球力量分布的不断变化与人民大众的政治觉醒，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加剧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波动。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以及其他新兴大国——例如俄罗斯、印度、巴西——围绕资源、安全保障和经济优势等相互竞争，发生误判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在此情况下，为在全球舞台上开展建设性合作，并满足越来越躁动不安的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渴望，美国必须谋求奠定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基础。

有鉴于此，本书寻求回答四个主要问题：

1.全球力量分布由西向东转移会带来哪些影响，而人类政治觉醒的新现实又如何影响力量分布的转移？

2.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为何衰落，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衰落有什么具体表现？美国如何浪费了冷战和平结束所提供的独特全球机遇？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在恢复活力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必须重新确定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方向，以重振美国的全球作用？

3.倘若美国真的走向衰落，不再占据全球超群地位，这可能会带来哪些地缘政治影响？这一衰落几乎立即影响到的地缘政治受害方是谁？这对21世纪全球性问题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到2025年能否承担起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4.展望2025年之后，重新崛起的美国应如何界定其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怎样才能与传统上的欧洲盟国一起寻求与土耳其和俄罗斯保持接触，以构建一个更大和更加生机勃勃的西方？同时，美国怎样才能平衡其在东方的两个战略目标，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在亚洲的建设性作用既不应完全以中国为中心，也不应卷入亚洲的危险纠葛？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本书认为，今后美国仍将在世界上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由于全球力量分布的不断变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冲突，美国更加有必要避免退缩到一种无知和闭关自守的心态，或者沉溺于自以为是的文化享乐主义之中。这样的美国可能会使不断演变的、重心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世界，面临越来越黯淡的地缘政治前景。世界所需要的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社会具有吸引力，强大而且负责任，具有战略意识，在国际上受尊重，以及在与新的东方保持全球接触方面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美国。

形成这样一个胸怀全球的美国的可能性有多大？今天，美国对历史抱有的情绪是不安的。美国行将衰落的历史必然性，是知识界的时髦观念。然而，这种间或出现的悲观情绪既不新奇，也不会自我实现。二战结束后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就连这种看法也没有阻止对美国长远未来感到不安的阶段的出现。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人对自己在和平竞争和战略性武器两方面的前景感到忧虑。而尼克松时代美国未能在越南取得有意义的胜利时，苏联领导人也自信地预测美国的灭亡，而对历史感到悲观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则寻求缓和美苏关系，以换取维持四分五裂的欧洲的现状。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更有韧性，而苏联体系则最终崩溃。

到1991年，在苏联阵营与苏联自身先后解体后，只剩下美国卓然而立，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不仅20世纪，甚至21世纪看来也注定是美国世纪。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两位总统均信心十足地如此断言。对于他们的看法，学术界也以这样大胆的预测做出了响应：就

有关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的相对优越性的理论论战而言，冷战的结束实际上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不仅被宣布为决定性的，而且被宣布为板上钉钉的。由于自由民主制度最初是在西方繁荣发展的，所以暗含的论断是，从此以后，西方将成为全世界的定义标准。

然而，这种超级乐观的情绪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始于克林顿时代并在小布什总统当政期间延续的自我满足和取消管制的风气，在世纪之交导致了一次股市泡沫破灭，并在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导致了一场全面的金融崩溃。小布什总统任期中代价高昂的单边主义导致了中东长达10年的战争，以及总体而言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脱轨。2008年的金融风暴几乎使一场灾难性的经济萧条加速到来，从而促使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突然认识到自己在未受管制的贪婪面前的系统性弱点。此外，在一些亚洲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令人费解地混合在一起，但显示出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能力。这反过来促使人们对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地位的前途，表现出新的不安情绪。

实际上，濒临解体的苏联和21世纪初的美国有若干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政府体系日益陷于瘫痪，不能认真地实行政策调整，所以苏联实际上把过大比例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到与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军事对抗之中，从而使自己陷于破产。而10年之久的征服阿富汗的努力带来的额外代价，又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不出所料，它没有能力维持与美国在尖端技术部门中的竞争，因而进一步落后；苏联经济栽了跟头，与西方相比，社会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执政的共产党阶层对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严重麻木不仁，同时假惺惺地掩盖自己的特权生活方式；最后，在对外事务中，它变得越来越自我孤立，与自己一度的主要欧亚大陆盟国中国之间，也形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敌对关系。

这些类似的情况即使言过其实，但也强化了美国必须自我革新、追求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政治远景的必要性。这种远景要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所构成的挑战。只有一个生机勃勃、具有战略头脑的

美国才能与即将统一的欧洲共同促成一个更大和更有生命力的西方，使西方能够成为崛起中且日益自信的东方的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否则，地缘政治上陷于分裂、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就可能会陷入一种历史性衰败，令人回想起19世纪中国令人耻辱的无能局面。与此同时，东方则可能会受到诱惑而重蹈20世纪欧洲自我毁灭的相互角力的覆辙。

简言之，全球力量危机是诸多因素累积作用的后果。这些因素包括：世界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动态转移；全球政治觉醒的骚动不安的现象加速出现；美国从199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以来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欠佳表现。上述情况对一些濒危国家的生存、全球公共领域的安全以及全球总体稳定，构成了严峻的长期风险。本书旨在勾勒出直到2025年以后所需要的战略远景。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2011年3月

第一章 衰落中的西方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占世界总产出比重达到峰值时的50%的水平。

——摘自《大棋局》的《结论》一章本书作者，1997年

西方对世界的长时间政治统治几十年来一直在减弱。然而，虽然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尝试“集体自杀”，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短暂时间里，西方看似能够历史性地重振雄风。冷战以苏联的解体告终，这一和平结局标志着美国迅速崛起为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的最后一步。这个在国际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加上其政治上表现积极、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伙伴——欧盟，似乎不仅能重振西方的全球卓越地位，也能为美国自身确立一种建设性的全球角色。

20年后，很少有人认为，在美国的卓越全球地位似乎岌岌可危时，欧盟会很快成为一个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全球参与方。因为总体而言，西方目前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减弱，其持久的政治遗产因此也无法保证。曾经有一段时间，虽然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国际和平以及更多令人无忧的社会契约，的确看似会成为西方为人类留下的不朽遗产。然而，全球力量分布基本格局的转变，全球政治觉醒的新现象对这种力量的运用所带来的影响，再加上近期美国外交政策举措和美国体系的生命力所受怀疑日益增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三方面的因素日积月累，越来越令人们怀疑西方这项更有希望的遗产能否保持下去。

1.全球大国的出现

在全球居支配地位的大国的概念，是近年来的一项历史发展。千年来，人们居住在与外界隔绝的社区，并没有意识到有更远的邻居存在。迁徙和与外人的偶发冲突是在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环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遥远的地方有“他人”存在的早期模糊意识渗透进人类的意识，只不过是近80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发生的事情。这种渗透的途径，最初是远征探险和为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绘制地图，后来则是殖民和大规模迁徙。最终，这些知识导致了帝国对抗，从而又带来了两次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破坏性战争，此后又引发了全球整体性的冷战对抗。近年来，太空探测更加深了人们对地球相对之“小”的新认识，夜间从外太空拍摄的图片，展示了城市化的人类所在的灯火通明的聚集区——尤其是通常所说的西方，与更暗、技术较不发达但人口越来越稠密的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生动对照。

位于北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国家是最先开始自觉地、积极地探索整个世界的国家。它们的驱动力来自强有力的组合因素：航海技术进步，对传教的热情，君王和个人对荣耀的憧憬，以及不折不扣的物质贪欲。它们在近500年的时间里控制了远离本国陆上大本营的领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当初领先一步。西方的地理范围由此扩大了——早先通过征服，后来通过殖民定居，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扩展至西半球。葡萄牙和西班牙占领了南美，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如法炮制。南北美洲摆脱欧洲统治最终获得政治独立后，欧洲移民大规模涌入西半球。与此同时，西欧大西洋沿岸的临海国家也将触角伸向了印度和太平洋，统治了今天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以教导者的角色存在，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和中东，占领了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加勒比海的几十个岛屿。



地图1.1 夜间的地球

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和政治扩张的结合使得北大西洋地区的欧洲国家在全球许多地区占据政治支配地位（在这方面，它们的帝国版图与更早期的，但从本质上来说与外界隔绝且领土相连的区域帝国根本不同——例如罗马、波斯、莫卧儿、蒙古、中国或印加帝国。每个帝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世界其他地区知之甚少）。从17世纪到19世纪，沙俄大规模扩张其陆上帝国，但它同样只吞并了临近区域，除了在一段短暂时间内吞并阿拉斯加外。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和东南欧地区的扩张也是如此。

版图最辽阔时期的各大帝国

1. 大英帝国（1920年）	3400万平方公里
2. 蒙古帝国（1309年）	2400万平方公里
3. 俄罗斯帝国(1905年)	2300万平方公里
4. 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1920年)	1500万平方公里
5. 中国满清王朝(1800年)	1500万平方公里
6. 西班牙帝国(1800年)	1400万平方公里
7. 倭马亚王朝（720年）	1100万平方公里
8. 中国元朝（1320年）	1100万平方公里
9. 阿巴思王朝(750年)	1100万平方公里
10. 葡萄牙帝国(1815年)	1040万平方公里
11.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480年)	800万平方公里
12. 罗马帝国(117年)	650万平方公里

但在大西洋沿岸的欧洲海上强国实施全球扩张的同时，它们之间的长时间冲突，削弱了其相对于欧洲大陆和北美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16、17世纪低地国家 [\[1\]](#) 和德国省份的长时间战争所带来的物质和战略成本，耗尽了伊比利亚人的力量，与此同时，在17世纪末，面对英国在海上以及邻国法国在陆上的势力增强，荷兰的卓越地位开始衰落。到18世纪中叶硝烟散去时，在对帝国统治地位的争夺中，英国和法国成为仅存的竞争者。

19世纪，它们对殖民地的跨洋争夺扩展为对欧洲本身的支配地位的争夺，20世纪初又演变为反对一个崛起的欧洲陆上大国——德国——的联盟，德国并非出于巧合也参加了全球殖民竞争。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受到严重破坏，陷于分裂，士气低落。的确，在1945年后，一个欧亚陆上大国苏联成功成为欧洲的地理中心，似乎准备着像约700年前的蒙古帝国那样进一步向西扩张。

与此同时，在北大西洋对岸，美国在19世纪幸运地隔绝于欧洲各国围绕欧洲大陆和更大范围的帝国疆域而进行的毁灭性的对抗之外，一直致力于发展工业和军事实力。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参与了两次世

界大战，在遏制德国力量在欧洲的优势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美国避免了自己陷入那些冲突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和伤亡。而且，美国在二战结束时令人羡慕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状况为其带来了一种新的地位——全球卓越地位。因此，随后的美苏冷战促使重新定义的横跨大西洋的西方出现，这个西方依靠美国，因此也受美国支配。

美国以及独立的西欧残余国家——以遏制苏联的共同目标以及相似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意识形态取向为纽带联系在一起——成为重新界定的大西洋世界的地缘政治核心，出于防守目的，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面对横跨欧亚的中苏集团如何谋求生存上。随着跨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创立，这一纽带在安全领域得以制度化，而力图加速战后复苏的西欧，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走向了经济一体化，这个组织后来演变为欧盟。但相对于苏联而言仍十分脆弱的西欧，几乎正式成为美国的保护领地，也非正式地成为其经济金融属地。

然而，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是这个跨大西洋的处于守势的西方突然成为在全球居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在东欧苏联集团两年前分裂之后的1991年，苏联解体，其原因包括如下几个因素：社会疲倦、政治无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失败、西方军事遏制与和平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成功外交政策。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延续半个世纪的欧洲分裂的结束。从全球意义上说，它也突出了欧盟自身作为主要的金融和经济（可能甚至是军事/政治）力量。因此，正走向一体化的欧洲仍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联系紧密——那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以及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最富有的经济体，21世纪前夕的大西洋西方似乎做好准备，迎接一个西方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新时代。

这一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金融和经济框架已然存在。即使在冷战期间，由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经济的非凡活力，它们相对于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苏联，拥有明显的金融和经济优势。因此，尽管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但这些大西洋国家成功地通过一个正在形成的合作性国际组织框架——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再到联合国本身，使其在全球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制度化，从而似乎强化了一种令其卓越地位可以持续存在的全球框架。

西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这段时期也有所提升。西方将其颇具吸引力的人权和政治自由的远景投射到了中欧和东欧，从而使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守势。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和西方世界发现自己与人类尊严、自由和繁荣等在全球颇具吸引力的原则普遍联系在了一起。



地图1.2 北约成员国（2010年）

然而，虽然西方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大于以往，但其地理控制范围在二战刚结束时实际上缩小了。西方帝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力量大大削弱，而新获得支配地位的美国拒绝继承其欧洲盟友的帝国遗产。罗斯福总统并未隐藏自己的想法：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欧洲解放的承诺并不包括恢复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或葡萄牙的殖民帝国。

然而，对殖民主义的坚决反对，并未妨碍罗斯福决心为美国在关键中东产油国赢得有利可图地位的贪婪的美国政策。1943年，罗斯福总统指着一幅中东地图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波斯的石油是你们的。我们共享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那是我们的。”^[1] 美国随后就开始了对这一地区费心费力的政治参与。

欧洲帝国的终结更多的是其殖民对象越来越不安于现状的结果。民族解放成为它们的斗争口号，而苏联的意识形态甚至还有军事支持，使得镇压的代价非常高昂。新的政治现实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老牌殖民帝国的解体不可避免。

英国在尚未面临迫使其撤出的压力之前，就明智地从印度撤出，后来又从中东撤出，但英国留下的宗教与种族暴力，导致了印度的巨大人类悲剧，和到了今天仍在困扰西方的棘手的中东地区巴以政治冲突。在美国的鼓励下，英国随后半自愿地撤出了在非洲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选择留下来斗争——但他们失败了。法国亦然，它先在越南，后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两场血腥的殖民战争，均以失败告终。葡萄牙在压力之下撤出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西方国家的地理范围因此缩小了，但与此同时，其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提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全球影响扩大了。

与此同时，因受冷战之雾遮蔽，公众并未意识到，一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分布方面的更基本的转变也在发生。最终，这带来了国际体系中的一种新权力等级，作为2007年底的金融危机的后果，这种权力等级第一次更加明显地展示出来。这场危机说明，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现在不仅需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是整个西方的力量，而且需要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没资格参与全球金融经济决策的国家的力量。

上述新现实得到实际的认可是在2008年。来自亚非拉的新成员加入了八国集团，该集团此前一直是排外的、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金融决策者俱乐部。这一集团将此前狭小的圈子转变为在全球更具代表

性的二十国集团。这一转变的象征是，2009年在美国举行的首届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最重要的领导角色分别由美国和中国扮演。

这些事件的累积效果是，使得一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不言自明：全球力量和经济活力的重心因而会相应地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确，经济史学家提醒我们，实际上，亚洲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份额，在大约18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遥遥领先。直到1800年，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总额中仍约占60%，相形之下欧洲只占30%。1750年仅印度的份额就占25%[根据印度前财长贾斯旺特·辛格（Jaswant Singh）提供的数据]，与美国目前的份额相近。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猛增的工业创新和渐趋成熟的金融体系所支撑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亚洲在全球的份额急剧下跌。例如，到1900年，在英国的长期帝国统治之下，印度的份额缩小到仅为1.6%。

在中国与在印度一样，英国帝国主义紧随英国商人而来。后者通过购买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而积累了高额货币赤字，他们试图依靠向中国进口商出售鸦片进行补救。随后，北京禁止进口鸦片并限制外国商人入境的迟来努力，引发了两次武装干涉，第一次是英国的干涉，第二次是英法的干涉，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速衰落。

中国和印度曾拥有卓越的经济地位。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令一些人认为，亚洲当前的经济崛起，从根本上说是回归了久远之前曾持续很长时间的常态。但很重要的一点值得注意，亚洲早期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优势，是在世界各地基本上相互隔绝、经济往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所涉及的贸易主要以易货为基础，商品主要在少数几个港口（尤其是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行交易或由定期缓慢经过丝绸之路的商队运送。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全球经济当时并不存在。

因此，亚洲过去那种虽然从数据上看令人印象深刻但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向外投射。15世纪初，中国走上了大力推行闭关

锁国政策的道路，而在更早的时期，中国甚至也没有利用其商业船队和海军的技术优势，来确立自己的政治影响范围。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拥有巨额财富，但缺少政治凝聚力或对外野心。的确，亚洲政治力量向西投射的唯一重要例子发生在蒙古人成吉思汗执政时期，他领导的那些马背上的武士开拓了庞大的欧亚帝国。然而，他们是从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很低的国家奔驰出去的，这也证明了在当时军事实力并不会因为经济衰弱而受阻。

2. 亚洲崛起与全球权力分散

日本、中国和印度三个亚洲大国向着全球卓越地位的崛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权力排序，而且凸显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分散。这些亚洲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参与方，是二战后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因为它们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利用本国的人口优势。在1905年俄日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在短暂时间内崛起为重要的军事力量，无可否认，这是亚洲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最早迹象。然而，在取得这场意外胜利后不久，日本开始奉行军国主义，但它于1945年的战争中被美国彻底击败，对军国主义的追求就此结束。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宣称要将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随后日本从二战的巨大破坏中复苏，其经济增长标志着亚洲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是亚洲未来前景的第一次重要预告。

稳定的和平式民主，国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接受，民众对重建受创的国家经济的决心，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创造了一种有利环境。以高储蓄率、中等工资水平、对高科技的有意专注和通过积极促进出口所带来的外资流入为基础，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5年的5000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2万亿美元。^[2] 不久后，日本的经济成就，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以及更民主的印度纷纷模仿的榜样。

在20世纪中叶，较为自鸣得意的美国民众最初对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角色几乎并未注意。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美国

公众的忧虑突然集中到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拥有一部和平主义宪法，并且是美国的坚定盟友，所以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并未刺激美国公众舆论。对美国公众舆论构成刺激的，是日本的电子产品以及随后的汽车产品明显控制了美国国内市场。大众传媒对日本购买关键美国工业资产（以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资产：例如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所进行的危言耸听的报道，进一步激起了美国的多疑症。美国人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和贸易大国，甚至是美国在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全球卓越地位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威胁。日本作为新“超级大国”成了夸张的媒体报道和煽动性的国会言论中令人胆颤的、被广泛引用的口号。面对“升起的太阳”，美国行将衰落，这样的学说为普遍存在的民众忧虑提供了学术依据。这种忧虑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失去的十年”后才消退。

虽然对日本获得全球经济支配地位的担忧并无多少道理，但日本在二战后的复苏令西方觉醒，使其意识到亚洲扮演重要经济政治角色的潜力。该地区的经济成功，尤其是韩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试图建立出口驱动型经济的类似努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到2010年，曾经贫穷的韩国的总统能自信地宣称，他的国家做好了在全球经济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准备；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首尔甚至在2010年主办了一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同时，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成为经济成功和社会发展的鲜活例子，它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增长率，大大高于西欧经济体在二战后复苏时期的增长率。

但这些只不过是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力量排序方面最剧烈变化的前奏，21世纪头十年，中国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大国的前列。这一崛起的根基可追溯到几十年前，从100多年前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发起的对国家维新的探索开始，到几十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达到顶峰。虽然毛泽东倡导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具有破坏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多年中阻碍了中国的崛起，但1978年邓小平大胆推行改革，使中国对外“开放”，使其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经济增长轨道，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起飞由此开始。中国的崛起不仅标志着西方“一家独大”的终结，也标志着全球权力中心的相应东移。

中国国内政策的重新定向，恰逢重大的地缘政治调整，即中国与苏联分裂。中苏的日渐疏远和日益加剧的敌对，在20世纪60年代公开化。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拉拢中国加入对抗莫斯科的共同阵线的独特机遇，1972年总统尼克松首次对这一机遇进行了探索，后来1978年总统卡特令其开花结果。在随后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再面临潜在的苏联威胁，得以将资源集中用于国内发展，中国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堪比西方在上世纪的情形。虽然西藏和新疆所带来的内部民族挑战仍旧存在，1989年发生了重大国内政治动乱，也存在着带来痛苦社会影响的城乡发展不平等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然而，这些最终也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地缘政治担忧。有关中国“拥有”美国的口号，重演着早些时候有关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购买美国工业资产和房地产的喧嚣。到2010年，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超级大国，这种过度反应令人想起早些时候日本的例子。

促使全球权力分布格局日渐东移的另一个因素是，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近年来走上世界舞台。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也是一个抱有全球野心的国家。当今的印度是民主自治、社会严重不公、经济活力和普遍政治腐败的复杂混合体。因此，它作为世界事务中一支力量的政治崛起落后于中国。印度因共担所谓的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角色而备受瞩目，这些国家都反对冷战，包括古巴和南斯拉夫 [2] 等一批中立，但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国家。印度与中国在1962年的短暂军事冲突以印度失败告终，这次冲突只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印度1965年和1971年与巴基斯坦两场战争的军事胜利得到弥补。总的说来，直到不久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看待世界事务时抱有强烈道德观念，但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力国家。

由于两方面重要变化的影响，这种看法开始改变。这两方面重要变化包括印度分别于1974和1998年公然测试了自己的核设施和核武器，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快速增长。印度的自由化改革——包括放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管制、支持私有化——正在将一个乏力笨重的准社会主义经济体，变为一个以服务和高科技为基础的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从而使印度走上了与日本和中国相似的出口驱动型

增长轨道。虽然印度的国内弱点（从宗教、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到受教育比例低、社会严重不平等、农村不安定以及基础设施陈旧）仍旧存在，但到2010年，一些人甚至将人口开始超过中国的印度，视为挑战中国正在形成的亚洲政治支配地位的潜在对手。

提升印度在全球影响力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远景，和印度在地区内的地位至高无上的信念，驱动着印度的政治精英。美印关系在21世纪头十年逐渐得到改善，这进一步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声望，满足了它的野心。然而，正在酝酿的印巴冲突，仍是导致印度无法将精力集中于更大地缘政治抱负的重要因素，这一冲突包括一场印巴为在阿富汗获得更大影响力而展开的“代理人”竞争。因此，印度的外交政策精英认为印度不仅是中国的手，而且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之一，并没有认清现实。

尽管如此，中国作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者，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富有的日本作为美国的太平洋盟友出现在国际舞台，这些不仅大大改变了全球权力排序，而且凸显了权力的分散。这会带来一些重大风险。这些亚洲大国目前没有（过去也没有）像冷战期间的大西洋联盟那样在地区范围内结盟。它们是竞争对手，因此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欧洲大西洋大国在殖民时期与后来的陆上争夺时期的情形相似，这些国家在那个时期为获得地缘政治优势而进行的争夺，最终以一战和二战所带来的破坏告终。这种新的亚洲竞争有时可能威胁地区稳定，这一挑战因为亚洲大国人口众多并且其中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可能带来更大的破坏。

无可否认，从前欧洲大国的跨洋帝国竞争，与目前亚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存在一项根本区别。亚洲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并不争夺海外帝国，但对欧洲来说，对海外帝国的争夺使“远距离碰撞”升级为大国冲突。亚洲国家之间的地区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亚太地区内部。然而，这些冲突即使仅限于本地区范围（例如岛屿、海上航线或水域问题方面的冲突），也会波及整个全球经济。

当前权力分散的更直接风险是一种可能很不稳定的全球等级制

度。美国仍占据显赫地位，但因为其国内外挑战的复杂性，美国领导角色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来越在全世界受到质疑。然而，从传统意义权力的每一个重要的有形方面（军事、技术、经济和金融）而言，美国仍无可匹敌。美国拥有规模最大的国民经济，最大的金融影响力，最先进的技术，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军事预算，能迅速部署在国外、实际上也能部署在全球的武装力量。这一现实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仍是目前国际生活中的现实。

欧盟可以努力成为世界第二，但这需要一个外交政策统一和防御能力共享的更有力的政治联盟。但对西方而言不幸的是，冷战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为欧洲“联盟”并未带来真正的联盟，而是名不副实；实际上，这个名称早该彻底改变。早先规模更小的西欧“共同体”，比后来几乎包括整个欧洲的规模更大的“联盟”在政治上更为团结，后者的团结借助的是部分国家采用共同货币，但却没有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中央政治权威或共同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欧盟是一个主要的全球参与方；它的人口和对外贸易远超美国。然而，欧洲仍然只能在半统一的西方当中，通过其与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联系，更具体的是通过北约的联系，充当美国的低级地缘政治伙伴。欧盟本来可以将全球权力与全球体系的有关方面相结合，但自它们的帝国最终崩溃以来，欧洲大国选择将代价更高昂的维持全球安全的任务留给美国，以利用它们的资源来创造一种由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从摇篮到提前退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资金来自无关经济增长的日益庞大的公共债务。

因此，欧盟在全球舞台上不是一支主要的独立力量，虽然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拥有残留的全球地位。英国和法国自1945年以来就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同那些国家一样，它们也拥有核武器。然而，英国仍对欧洲统一保持警惕，而法国则对自己的更大的全球意图不甚确定。德国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出口能力与中国不相上下，但仍不愿在欧洲以外承担军事责任。因此，虽然欧盟作为一个集体目前有很多弱点，但这些欧洲国家却也只有作为这个更大“联盟”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全球影响力。

相比之下，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清楚的国家利益驱动下做出果断政治决策的能力，相对而言不受那些有可能削弱其力量的国外承诺的牵绊，其军事潜力逐渐提升，再加上全世界都认为它不久将挑战美国至高无上的全球地位，这些因素都表明，中国理应在当前的国际等级体系中居于仅次于美国的位置。中国越来越自信的表现是，中国的国家媒体频繁间接地提到，世界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与美国争夺全球支配地位的竞争对手，虽然中国面临仍未解决的国内遗留问题：城乡不平等，以及民众可能会对绝对政治权威十分痛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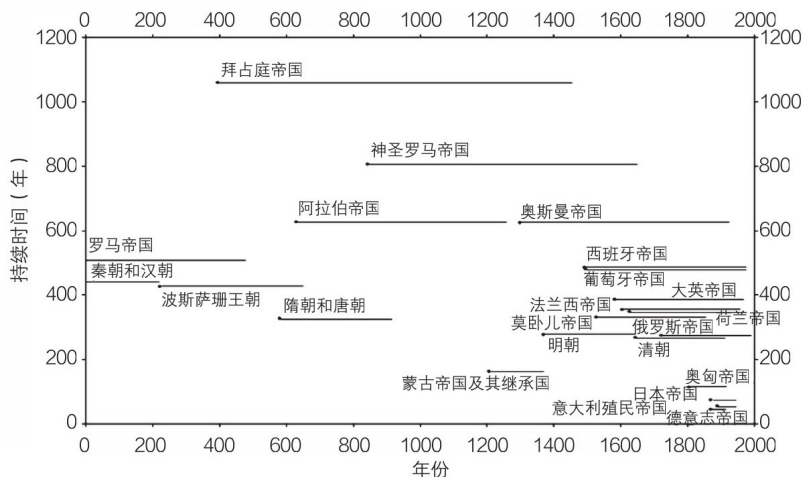
除前两名之外，其他大国的排序无法做到准确。然而，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以及欧盟的非正式领袖：英国、德国和法国，一定榜上有名。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排在前列，这主要是因为该国石油和天然气丰富，并且仍是仅次于美国的核大国，虽然其军事力量因国内经济、政治和人口阻碍因素而被削弱，且该国东西两面都面临经济实力远超自己的邻国。如果没有核武器或一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就不会高居全球地缘政治权力金字塔的上部。在经济上，俄罗斯远远落后于日本。如果日本做出寻求更积极国际角色的战略选择，它的地位就会超过俄罗斯，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方。印度在地区内果断自信，在全球雄心勃勃，它新近跻身人们所设想的榜单上的前列，但其步伐因为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近邻的战略对抗及其各种社会和人口弱点而受到阻碍。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已经要求在二十国集团内参与全球经济决策，渴望分别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扮演地区领导角色。

前文已经指出，当前全球精英的上述构成情况，代表了国际权力分布由西向东的历史性转移以及在世界四个不同地区的分散。从积极意义上说，欧洲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已经结束。这些新的权力现实更能代表世界的多样性。一个排外的西方俱乐部——由英国、法国或美国支配——可以聚集在维也纳会议、凡尔赛会议或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分享全球权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考虑到当前更多样的、地理上更分散的10个主要国家之间根植于历史的对抗和地区竞争持续存在，这一新事态也凸显出整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一些挑战甚至可能关乎人类存亡——越来越多

时，在全球决策中达成一致更加困难。

新的主要国家榜单最终能保持多久，目前还远不能确定。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仅在1910年到2010年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权力等级序列发生的重大改变不少于五次，除第四次外，这些改变都表明了西方全球卓越地位的分裂性衰落。第一次，在一战前夕，英法两帝国支配全球，与之前不久被正在崛起的日本击败的遭到削弱的沙俄结盟。雄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得到衰弱的奥匈帝国和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支持，在欧洲内部对英法构成了挑战。工业上充满活力的美国虽然一开始处于中立地位，但最后对英法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第二次，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英国似乎在全球出类拔萃，虽然美国显然正在崛起。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迅速重新武装起来并且修正主义思想日益浓厚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已经在谋划改变现状。第三次，欧洲因二战而遭到破坏，二战随后又导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长达40年的冷战，这两个国家的力量都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第四次，苏联最终在冷战中“战败”，从而带来了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支配世界事务的短暂单极局面。第五次，到2010年，包括日益壮大的亚洲国家在内的一种更复杂的新权力格局，伴随着美国仍旧占据的支配地位，正在明显地形成。

表1.1 逐渐缩短的帝国寿命



这些权力转移发生频率之高，标志着全球权力分布格局变化的历史性加速。在20世纪之前，一个主要国家的全球卓越地位能维持100年左右。但随着自觉的政治激进主义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政治形势更加多变，全球卓越地位也更加难以维系。西方在整个20世纪仍在全球占据优势的事实，不应该掩盖另一项事实，那就是西方内部的冲突破坏了其曾经拥有的支配地位。

的确，直至今日，美国当前的国际领导地位能否持久无法确定，欧洲在世界事务的中心角色的终结以及欧洲在政治上的无能，俄罗斯对自己无力扮演的全球领导角色的怀念，人们对中国不久可能登上全球至高无上地位的推测，印度对成为世界大国的急切渴望及其国内外弱点，以及日本仍旧不愿将其全球经济影响力转变为政治上的咄咄逼人姿态，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反映了一种现实：全球领导阶层基础更广泛但更缺少凝聚力。

3.全球政治觉醒的影响

在全世界范围内，此前曾一直在政治上表现消极或者受到压制的群体，正经历着一轮政治觉醒。这一动荡现象的出现，加剧了正在发生的全球权力分散。最近几年，中东欧和阿拉伯世界接连发生政治觉

醒，原因之一是，由即时视频沟通工具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各地互联互通、互相依存；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欠发达国家近年来年轻人的数量迅速膨胀，而这一人群包括容易动员、政治上躁动不安的大学生和衣食无着落的失业者。上述两类人群都仇恨富人阶层与统治者的特权腐败。这种对权威与特权的愤恨，释放出了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动乱的民粹主义激情。

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涉及全球范围，影响极大，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在过往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不仅居住在相互分割的地域内，而且还处在政治麻木的状态。大部分地区的多数人既没有政治意识，也很少采取政治行动。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关注点是，在身体和物质遭剥夺的情况下活下去。一方面，社会传统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稳定性，有时也让他们面对艰辛命运时能够集体性地进行自我心灵安慰；另一方面，宗教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慰藉。那时，政治权威是遥不可及的，经常被看作是神意的延伸，并因世袭制而合法化。当时的高层权力争夺主要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而相邻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又主要是针对地盘或者物质财产，起因主要是出自本能的族群间仇恨或者宗教信仰差异。只有与统治者最为接近的小部分特权阶层，才可能有政治对话、政治观点和政治诉求。

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一个参与政治活动、努力争夺政治权力的阶层在社会结构的顶端渐渐出现。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古代中国，皇宫里的朝臣和官员都秘密结党，当然不同的党派关注的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宫廷阴谋。随着社会的演进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群进入了政治对话中：拥有土地的农村贵族、城市及郊区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知识界的有限的精英阶层。然而，除了偶尔发生的主要是释放无政府主义愤怒的暴乱之外——如农民起义——绝大多数人参与不到政治，而且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包容性强，但地理上相对局限的政治觉醒是法国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爆发，起源于社会底层的动乱以及来自上层的群体传播。革命发生的背景是，传统的君主制由政治上先进但内部分裂的贵族，以及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天主教会所维系。这一权力结构

受到了政治上先进、诉求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挑战，他们在主要的城区煽动民众；君主制还受到了愈发意识到自己所受剥削的农民阶层的挑战。此后，由印刷业推动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宣传，很快将社会仇恨转化为革命的政治理想，而极具政治感染力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当时政治理想的体现。

由此引发的政治暴动，使得集体性的、自觉的国家认同感在法国全国范围内瞬间激发起来。拿破仑在1789年革命之后取得的军事胜利，既源于他的军事才能，同样也源于政治上已经觉醒的法国民众基于认同感的集体狂热。那种狂热迅速在欧洲传播，首先是推动了拿破仑的胜利，此后这种狂热的反弹（激发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激情）也导致拿破仑的失败。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德国，也包括意大利、波兰，很快还波及匈牙利，都陷入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上自觉的政治觉醒浪潮中。当时，遥远的、开放的、处于后贵族时代的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表现出了革命性稍弱但政治上更加鼓舞人心的人文主义的民主理念。对此，政治自觉程度更高的欧洲人颇为着迷。

然而，将近一个世纪后，欧洲在由其自身充满矛盾的民粹主义而激发的战争中受到伤害。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大众的政治觉醒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英国与法国殖民帝国的士兵征战海外后回到祖国，对政治、种族与宗教认同以及自身经济穷困状况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此同时，西方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西方的理念也由此得到传播，这使得欧洲殖民地的本土民众中的上等阶层，产生了极具吸引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

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真纳、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加纳的恩克鲁玛、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等，都是自己先经历了政治觉醒，此后逐渐具备了领导民众的政治号召力，最终领导各自国民实现民族解放。日本在进入20世纪时突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一员，这也刺激了中国的政治觉醒，而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欧洲列强的屈辱统治。在20世纪早期，孙中山在亲身观察日本自发的西方式现代化之后，开始了

自己对振兴中华的追求；此时，另一位中国青年邓小平正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在遥远的巴黎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难忘的一刻发生在1978年，当时我来到北京，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结成事实上的美中同盟以对抗苏联而暗中开始努力。在我同邓小平进行了极为敏感的、小范围的谈判后，邓小平邀请我参加一个私人晚宴，这出乎我的意料。当时在紫禁城中，我们坐在一个能俯瞰小湖的亭子里。我向邓小平询问他的政治观点的演进过程，于是他开始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们谈到了他在非常年轻的学生时代跨越重洋的经历，从中国中部先乘船到达沿海，然后转乘轮船，起程前往在上世纪20年代看起来非常遥远的巴黎。起程时，他觉得就像踏上了一个遥远的未知旅程。邓小平对我说，他到了法国后，极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同法国相比有多么落后；他还讲述了他是如何在意识到中华民族备受屈辱之后，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拯救民族的捷径。就在那时，他的民族仇恨、政治觉醒以及意识形态合为一体，并影响了他日后相继参加的两次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告别中国屈辱历史的革命，以及后来他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领导的开创中国未来的革命。就在这一难忘的会谈过去还不到一年的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令人惊喜地来到我在华盛顿郊区的家里参加晚宴。

在那两个世纪，大众传播技术革命与文化知识的普及，尤其是集聚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个人的政治觉醒转变成大众现象。19世纪，手册宣传以及定期发行的报纸的出现，开始提升民众要求政治变革的欲望。随着社会的中上层群体渐渐养成了定期读报的习惯，他们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国家事务的政治讨论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20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的出现使得政治演讲能够传播到全国范围（想想希特勒的例子），同时也让民众对那些即使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也有了更加生动的感受，由此将政治上被动、处于半隔离状态的人们，暴露在接连不断的政治喧嚣中。

最近兴起的全球电视、互联网等，让原本隔离的人群同整个世界相联，也增强了政治活动人士接触、调动数百万人的政治忠诚与热情的能力。20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将政治动荡转变为世界范围内学习街头战术的过程，原本相互孤立、地理位置上相互远离的

政治派别，由此可以相互借鉴战术。尼泊尔的政治口号很快传播到玻利维亚，就像伊朗的颜色头巾被泰国借鉴一样；萨拉热窝悲惨遭遇的视频传到加沙，以及突尼斯的城市游击战术传播到开罗——这一切迅速在全球范围内的电视和电脑屏幕上播出。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经历迅速传播，促进了针对民众的政治煽动。

在一些国家出现了“青年膨胀”（youth bulges）的现象，即超出正常比例的年轻人群体，在获得文化和经济认同方面困难重重，而传播技术的革命使得这一群体更加“不安分”。这一群体通常受教育程度良好但没有工作，由此带来的挫败感和孤立感使得他们成为军事组织招募的理想对象。根据国际人口行动组织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1970年至1999年间发生的民事冲突中有80%的事件都有“青年膨胀”群体的身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与更大范围内的阿拉伯世界中，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都有大量的青年人口，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无法吸收这些人，因此他们很容易产生不满和好战情绪。正是在从埃及以东到中国以西的这一地区，加速的政治觉醒最有可能引发动乱。该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因年轻人众多而生成的“火药桶”。与此类似的危险的人口结构因素，在刚果、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也广泛存在。

今天的年轻一代对政治觉醒尤其敏感，因为互联网和手机将他们从相对封闭的本地政治现实中解放出来。而且他们还是最倾向于进行武力斗争的政治群体。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数量众多的大学生事实上很符合马克思提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工业化早期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不安分、充满仇恨的工人阶层，他们很容易接受意识形态煽动和革命动员。通过大众传媒而进行的政治口号宣传，可以将他们通常处于萌芽状态的情绪，转化为简单而又专一的行动计划与指南。越是能将他们的情绪与特定具体的仇恨和感受深切的热情联系起来，就越能在政治上动员他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关于民主、法治或宗教容忍的抽象口号反而更不容易引起共鸣。在一些情况下，带有摩尼教[3]色彩的宣传更具感染力，这些宣传集中关注民众在受到种族、民族或宗教等方面的屈辱后的具体反应，1979年的伊朗就是一个例子。这

种宣传更好地反映了年轻人的感受，并将他们对报应甚至报复的渴望合法化。

2011年前几个月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的民众起义，极为生动地展现了加速的政治觉醒可能带来的巨大后果。此轮政治觉醒的特点是，不满的“青年膨胀”群体与日益发达的大众传播技术共同作用。这些起义的根源是年轻人对腐败、不负责任的国家领导阶层的不满。当地人对失业、政治权利被剥夺、长期施行的“紧急”法律等的不满，为爆发起义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几十年来一直能够安稳统治的领导人，突然间面对着从帝国统治时期结束以来一直都在孕育的政治觉醒。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但已觉醒的青年群体，再加上传播技术的革命，已经成为本世纪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现实。

初期阶段的政治觉醒最为急躁和暴力。这一激情由历史上长期压抑的自我正当性所激发。此外，初期的政治觉醒的特点在于，聚焦于民族、种族、宗教的认同，尤其是因反对备受厌恶的外国势力而产生的认同，而抽象的政治概念则不在此列。因此，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起初是由反对拿破仑的征服而催生的。19世纪，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晚期的政治动乱，起初表现为反抗外敌的愤怒，在20世纪前半段演变为扩张主义与军国主义。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义和团起义为起点，此后演变成民族主义革命与内战。

在当今的后殖民时代，新的政治觉醒群体有一种共同的历史背景——穷困、长期受外国统治、没有自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这些都归咎为西方统治的结果。对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国的殖民主义依然生动的记忆，激发他们把反对殖民主义的“尖刀”挥向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即使是那些痴迷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众多年轻穆斯林，也极为仇恨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入侵和对以色列的支持，他们将之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进而使自己处于穷困状态的主要根源之一 [4]。

有人在二战后对上述现象进行了一个前瞻性分析，结论是：“当

今的文化非西方主义的共同且基本的要素是对西方世界强烈不满。”

[3] 塞内加尔诗人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在其诗歌《秃鹰》中写道：

在那些日子，
当文明一脚踹在我们的脸上，
当圣水拍打到我们杂乱的眉毛上，
秃鹰在它们尖爪的阴影里构建，
沾满血的保卫纪念碑……

这首诗体现了后殖民地区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如果针对西方的此类情绪发展成新兴国家里政治觉醒民众的共同思维，那么西方在21世纪初满怀希望地宣扬的良性的民主价值观，就将与历史擦肩而过。

全球政治觉醒带来的另外两个间接结果也值得注意。首先，全球政治觉醒意味着，西方国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技术领先的远征部队，对政治上被动、装备落后、各自为战的当地民众进行相对廉价的、一边倒的军事行动。19世纪，在中非国家抗击英国人、高加索抗击俄罗斯人、印第安人抗击美国人的战斗中，本土人同组织精良、装备先进的入侵者的伤亡比例为100比1。而政治觉醒的来临在当地人中间激发了更加强烈的共同使命感，大大提升了外国统治的成本。最近几十年里，斗志昂扬、坚持不懈、运用非传统战术的越南人、阿尔及利亚人、车臣 [5] 人、阿富汗人对外国统治的民众抵抗（“人民战争”），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意志与毅力的战斗中，技术先进的一方不一定取胜。

其次，政治觉醒的大规模传播，使以前竞争性世界政治中尚未出现过的一个维度，变得尤为重要，这个维度就是全球的体系性对抗。工业化时代开始前，以强大财政为后盾的军事实力（武器、组织、斗志、训练、战术领导力）是寻求统治地位的核心与决定因素，当时只

需一场决定性的陆地或海洋战役就能解决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民众评判出的相对社会表现，已成为国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公元1800年之前，人们并不关注互为对手的法国与英国或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更不用说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比较性社会统计数据——当时也无法得到这些数据。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比较对塑造公众认可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地位而言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那些头号“主角”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以及如今的中国和美国。对不同社会条件的辨别意识现在十分平常。国际新闻和信息可迅速、大量地获取，众多社会和经济指标可为人们所用，地理上相隔遥远的经济体和证券交易所之间日益增加的互动，对电视和互联网的普遍依赖，这一切都促使人们不断对各主要社会体系的实际表现和未来承诺进行比较性评估。主要对手之间的体制竞争，目前不断受到审视。全世界当前都认为，这场竞争的未来结果尤其取决于美中两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相对表现——人们对其仔细衡量并且甚至提前几十年就进行预测。

由此带来的广泛效果是，以下几个因素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塑造世界：民众情绪的互动、集体观点，以及有关人类主观上不再愿意屈服于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特定地区所拥有的客观力量的矛盾叙述。因此，西方并未终结，但其全球优势地位终结了。这反过来强化了西方的未来角色对美国、美国的国内活力及其外交政策的历史适切性的主要依赖。美国体系在国内的运作情况如何以及美国在国外表现如何将决定西方在新的客观和主观全球背景下的位置和角色。这两个问题如今都还没有答案，它们的最终建设性解决是美国当前的独特历史责任。

因此，如果美国想继续扮演建设性的全球角色，那么美国体系的持续吸引力——至为关键的建国宗旨、经济模式的活力，以及民众和政府的良好愿望——至关重要。美国只有向世界表明其社会体系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才能恢复其历史势头，尤其是面对着对第三世界国家吸引力日渐增加的中国时，更是如此。例如，相较于英国，当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将自己树立为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无可争辩的冠军时，美

国就成了那些寻求通过自由企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青睐的另一种选择。一个被其他国家视为正处于历史巅峰的国家，要想维护本国利益就没那么困难了。在这个新世纪，除美国的意识形态之外，尚未有其他明显的选择。虽然如此，但如果人们普遍将美国体系视为不实用的模式，那么中国的持续成功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陷于危险。美国的历史性衰落会削弱欧洲的政治自信和国际影响力，欧洲将独自面对一个可能更加动荡的世界。欧盟面对人口老龄化、增长放缓、超过美国的公共债务等问题，并且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缺少作为一支主要力量采取行动的共同的“欧洲”雄心，所以，欧洲未必有能力取代美国曾经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或美国的全球性角色。

因此，欧洲对其他地区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模范。欧洲过于富有，令世界上的穷国感到遥不可及，欧洲吸引移民，但无法鼓励其他地区仿效。它在国际安全方面过于被动，缺少阻止美国采取已加剧全球分裂——尤其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分裂——的政策所需的影响力。欧洲过于自满，从其表现来看，似乎其中心政治任务就是成为世界上最舒适的养老地。它太难以改变，担心多种文化带来的多样性。因此，当世界权力等级体系缺少连贯性和对未来的共同远景时，地缘政治上的西方国家中，有半数不再积极确保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全球动荡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可能成为西方意料之外的遗产。

有些悖论意味的是，这使得美国的自我复兴比以往更加关键。

本章注释：

[1] 彼得·诺兰（Peter Nolan）《十字路口》（伦敦，2009年）。还参见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石油战争》（纽约，1993年）

[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1年4月26日

[3] 唐纳德·J.帕查拉（Donald J.Puchala），《国际关系中的理

论与历史》一书中的第8章“种族与国际关系”（1994年）

第二章 美国梦的消逝

不论好坏与否，美国都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它的多种族民主一直是全世界政治觉醒的大众所向往、嫉妒，有时甚至是敌视的对象。这一基本现实引出了几个关键问题：美国制度仍是值得全世界学习的典范吗？政治觉醒的大众是否认为美国的今天将是自己的美好明天？他们是否把美国视为世界事务的积极影响者？美国对国际事务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取决于全世界如何看待其社会制度和全球地位。因此，一旦美国国内的不利现实和国际上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令其丧失传统权威，那么其国际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因此，即使拥有先天与历史两方面的强大实力，美国也必须克服国内的巨大挑战，调整有失偏颇的外交政策方向，以重新赢得世界的赞赏，重振其制度优越性。

1. 同一个美国梦

多少年来，“美国梦”令无数人心驰神往，吸引着他们奔向美国的海岸。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那些志向远大的人，不仅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并希望继续寻求高等教育的人，还包括希望挣脱不发达国家贫困奴役的人，这一切绝非偶然。很多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企业家仍然认为，他们在美国会比在自己国家获得更多的事业发展机会。那些更年轻的移民则希望能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因为获得美国的高等学历可以提升他们在本国和国外的就业机会。每年，近百万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因为机会的诱惑而选择留下来。还有那些有时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到美国从事低技术工作的中美洲穷人，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个选择使他们从此脱离了那些没有勇气踏上这条危险旅程的人还在过着的生活。对这些梦想者而言，美国仍然是通向更美好人生的最具吸引力的捷径。而美国也成为这些个人梦想的最终受益者。

美国的吸引力经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它把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两大激励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结合到一起。理想主义表达的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它崇尚先人后己的精神，并要求对人类天性中的高尚品质给予社会政治上的尊重。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把握住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通过构建政治制度，维护了有关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等公认的基本前提（尽管没有废除奴隶制是其不光彩的一面）。政治理想主义从此得以制度化。与此同时，美国幅员辽阔而且从未经历过封建社会，因此，这个疆域广袤的新生国家给那些渴望个人解放和发财致富的人，提供了令他们向往的物质机会。在公民权利与创业精神两个方面，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当时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

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双重吸引力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的特色。美国还吸引了大西洋彼岸那些渴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够践行美国独立战争精神的人。不管是法国的拉斐特 [6] 大将，波兰的柯希丘什科 [7]，还是19世纪中期匈牙利的科苏特 [8]，他们个人对美国的贡献，都让一种值得学习的新的社会模式在欧洲得到广泛认同。托克维尔 [9] 剖析美国新式民主的著作和马克·吐温笔下充满西部风情的自由生活，加深了欧洲人对这种新社会模式的向往之情。

然而，如果不是这个年轻的国家里有数不清的发财机会，上述因素都不足以吸引移民群体急切地涌入美国。免费的土地和没有封建地主的制度召唤着他们。廉价的移民劳动力推动着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移民们在写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讲述着自己如何成功拥抱美国梦，不过这些描述往往过于夸张。天哪！一些人来到美国之后痛苦地发现，这里的马路居然不是“用金子铺成的”。

没有重大的外部威胁，偏安一隅的安全感（与大洋彼岸当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意识的觉醒，以及广袤边疆的发财机会，给这种新式生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画上了等号。另一个原本极其麻烦的问题也因此被掩盖，甚至合法化：印第安人不断遭到驱逐，最终近乎灭绝（183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

案》，这是第一个将种族清洗合法化的案例）；奴隶制依然存在，美国黑人长期遭受社会歧视与种族隔离。但是，美国人对外宣称的现实却大体上是一个理想化的版本，不仅美国人对这种自我形象津津乐道，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这种形象也得到广泛认同。

直到进入20世纪几十年之后，人们才开始看清美国的真实面目，在此之前，只有美国的南方邻居对这种所谓的美好形象嗤之以鼻。在墨西哥眼中，年轻的美国是另一番模样：一个实行扩张主义和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强国，无情地追逐物质利益，为满足国际野心而奉行帝国主义路线，假惺惺的民主热情。虽然墨西哥本国的历史也不是那么无可指责，但这个国家对美国的憎恶都是基于历史事实。美国的强大牺牲了墨西哥的利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主义架势和领土野心，与它那极富魅力的国际形象并不是那么相符。很快，在不断的扩张中，美国把国旗插到了夏威夷王国，几十年后，甚至插到了太平洋对岸的菲律宾（美国直到二战后才从那里撤出）。古巴和中美洲的一些地方，也有过类似于墨西哥的与美国实力碰撞的经历。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比较复杂。南美的一些国家起初对美国敢于反抗欧洲殖民者统治十分钦佩，一些国家还向美国学习，制定美国式宪法。但是，反对欧洲插手西半球事务的“门罗主义”，却并未赢得广泛而明确的认同，一些南美人怀疑美国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一己私利。政治和文化的对抗多了起来，特别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活跃人士。两个具有地区野心的南美国家——庇隆 [10] 时期的阿根廷和瓦加斯 [11] 时期的巴西——在20世纪对美国的地区霸权公然发起挑战。与美国相距较远、政治觉醒也较晚的亚洲国家，此时也隐约感受到美国巨大物质成就的吸引力，但它们并不像欧洲那样，在思想上感到兴奋，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共鸣。

美国的全球声望在20世纪两次达到顶峰。第一次是一战刚刚结束时，第二次则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新国际地位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中得到体现，该计划与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政治的参与者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一战中的强大军事干预，和在民族自决新原则指导下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过程中

发挥的突出作用，标志着一个具有独特思想和物质吸引力的强国已经屹立于国际舞台上。即使在美国对外来移民关闭大门之后，这种吸引力也从未消失。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开始改变国际事务的基本模式。

然而，仅仅10年之后，“大萧条”便对美国制度的内在缺陷发出警示信号，美国的全球吸引力也随之突然下降。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导致的大范围失业和社会问题，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缺陷和不平等性，说明美国缺少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网（欧洲当时刚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验）。然而，美国大地充满机会的神话依然深入人心，这主要是因为纳粹德国对欧洲和美国公开信奉的共同价值观构成了直接挑战。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很快就成了欧洲的救命稻草。《大西洋宪章》总结了那些受到威胁的共同价值，并在事实上承认，这些价值能否存在下去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实力。美国也成为那些希望躲避纳粹统治和战争灾祸，同时又对共产主义的日益传播心存恐惧的欧洲移民的主要避难所。与早期移民不同，这些新移民中受过良好教育者的比例较高，因此，他们给美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马上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与苏联的制度性对抗。这位新对手不仅是全球霸权的有力竞争者，还为人类追求美好未来提供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备选道路。西方的“大萧条”，加上苏联在二战后逐渐成为地缘政治赢家——20世纪40年代末，莫斯科几乎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使苏联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苏联式的粗糙、做作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梦所代表的精神展开竞争。

在革命之初，新生的苏联就宣称自己正在创造世界上第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充满信心的苏联，开始有计划地迈入以所谓的平均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创新时代，进步的苏联领导人把这些原则强行制度化。服务于理性唯物主义的高压理想主义，成了富有感染力的乌托邦药方。

尽管苏联模式动用了恐吓、强制劳动、大规模流放和国家杀戮等手段，但它依然打动了那些对接连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心有余悸、政治意识萌芽初现的人们。它吸引着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在“大萧条”中对工业进步失去信心的贫困阶层，那些反殖民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亚洲和非洲大众，尤其是那些试图从一百年来的起义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激进学者。甚至就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刚刚爆发，俄国尚处于社会匮乏状态和内战中，共产主义试验刚刚起步之时，一些来到这里的外国学者就成为苏联的忠实追随者，这不免让人想起历史上的美国。异想天开的美国左翼政治作家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19年短暂访问俄国后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已经去过未来世界，那里看起来很不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信仰成为广泛美化苏联试验以及对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无动于衷甚至为其辩护的指导思想。不管是让-保罗·萨特 [12] 还是基姆·菲尔比 [13]，不管是圣公宗 [14] 牧师还是贵格会 [15] 传教士，抑或是亚非反殖民主义政客，甚至包括曾访问苏联集中营的美国副总统（当时别人向他介绍说这是一个社会康复中心），在这些人看来，苏联对未来的这种认真而“理性”的建设相对于美国的自发式发展而言是一种进步。这种想法在当时那个“社会设计”第一次看上去似乎行得通的年代，开始具备广泛的号召力。

关于苏联即将实现社会平等、全体就业和全民医疗的说法，也欺骗性地增加了苏联制度的吸引力。此外，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与美国的太空军备竞赛的第一阶段获得巨大成功，而且苏联当时已经掌握了核武器，这一切似乎预示着苏联在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竞争中必将获胜。事实上，就连苏联领导人也公开做出过这样的预测，他们宣称，苏联经济将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美国。

美国制度受到的第一次挑战，在25年后突然宣告结束，此时差不多恰好是克里姆林宫预计苏联制度将称霸全球的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中一部分源于苏联外交政策失误，一部分源于国内意识形态失效、官僚政治盛行和社会经济停滞，加上东欧政治动荡加剧和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苏联解体揭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苏联声称自己的制度具有优越性，外国的支持者们也齐声赞同这一点；事实却证明，这些所谓的优越性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上

都是谎言。这一巨大的失败之前一直被统治精英口中具有学术吸引力的“科学的”社会管理掩盖，统治者一边实施极权统治，一边可笑地掩饰着自己的特权。随着这种统治土崩瓦解，人们发现，四分五裂的苏联政治制度下掩盖的是一个发展滞后、穷困潦倒的社会。事实上，苏联只在一个方面对美国构成了威胁，那就是军事力量。就这样，美国在20世纪再次确立了无可匹敌的地位。

1991年之后有一段时间，美国的胜利看上去似乎将维持很久，美国在当时没有什么敌人，全世界都唯其马首是瞻，历史的脚步在这一刻似乎停了下来。制度上的挑战看来已经结束，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领导人开始像落败的竞争者苏联那样信心十足地宣告，21世纪还将是美国的世纪。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1月20日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定下基调：“在这本世纪最后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让我们放眼下个世纪，看看我们即将遇到的挑战……在21世纪之初……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小布什做出了更为响亮的呼应，“上帝选中我们的国家，历史赋予了我们担当世界典范的使命”（2000年8月28日）。

然而，不久之后，中国令人吃惊地跻身世界大国之列，20世纪80年代因日本经济崛起而产生的国家焦虑再次出现。与此同时，美国在21世纪前10年逐渐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的活力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越来越难以确定。“9·11”事件之后，目标不清晰的“反恐战争”和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的单边战争，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在全世界，甚至一些盟友中普遍失助。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全世界对美国保持长期经济领导力的信心，与此同时，危机还揭示了美国制度中社会公正和商业道德两个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但是，就在这场金融危机和伴随危机出现的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的同时，华尔街贪得无厌、不计后果的投机行为被揭发，他们的行为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生产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理念格格不入。但这也无法完全抹黑美国因为成功地将政治理想主义融入经济物质主义，而在其他国家心中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形象。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危机发生后仅仅那么短时间内，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美国国

会的一次演讲（2009年11月3日）中热情洋溢地说她“渴望”投身于“美国梦”。她说，美国梦就是“每个人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和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她用坚定的口气继续说道：“没有什么比美国制度中国有的自由的力量更能启发我，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激励我，没有什么比它令我更感充实。”

然而，默克尔的发言中却暗含着一种警告：一旦美国模式的特殊形象衰落，这对西方将意味着什么，美国其实早在2008年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尚未近距离接触美国时，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民主西方的捍卫者姿态出现时，当它被视为对抗苏联极权主义必不可少的砝码，特别是当它成为冷战当之无愧的胜利者时，美国的形象才最令人肃然起敬。

但是，在美国称霸世界的全新历史环境下，它的国内问题再也躲不过近距离的审视。人们不再普遍地把美国理想化，而是开始对它有了更深入的看法。因此，全世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尽管很多以实现“美国梦”为个人理想和抱负的人依然寄希望于它——正被这些严峻的现实挑战困扰：滚雪球般的国家债务、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物质主义至上的铺张文化、为贪婪投机大开方便之门的金融制度和两极分化的政治制度。

2.走出自我蒙蔽

美国人必须明白，我们的国际实力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如今，在任何时候想要正确预判美国的全球前景，都必须首先考虑国家能否慎重决定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这需要美国人对国家目前的问题和尚存的全球影响力保持清楚的认识。在进行旨在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和维护国内基本价值的必要改革之前，必须首先对美国进行一次头脑清醒的评价。

以下是美国正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六方面问题：

首先是美国日益庞大、最终不可持续的国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

室2010年8月发布的《预算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美国的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约为60%，这是一个麻烦的数字，但还不至于因此就把美国归入全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行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日本债务与GDP之比高达115%，尽管持有这些国债的大多是日本人；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与GDP之比约为100%。然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由此引发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将带来长期的重大挑战。布鲁金斯学会在2010年4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基于多种假设条件对美国未来的债务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奥巴马政府目前的预算水平，可能使美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2025年超过二战后曾创下的108.6%的最高水平。由于满足这个支出计划需要大幅加税，而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打算，那么现实必然是：国家债台高筑，将使美国在面对主要债权国（如中国）时更显脆弱，威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削弱美国作为世界杰出经济榜样的影响力，并进而导致它在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领导地位下降，国内发展的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为必要的战争筹款的能力，将严重受限。

罗杰·奥尔特曼 [16] 和理查德·哈斯 [17] 这两位经验丰富的公共政策支持者在2010年发表于《外交》杂志的题为《美国的肆意挥霍与美国实力》的文章中，对美国的悲观前景用悲观的字句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2020年之后的财政展望犹如世界末日……美国正在迅速走向历史拐点：要么行动起来整顿财政秩序，并重建那些决定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因素；要么就等着承受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后果。”如果美国继续拖延下去，不能拿出一个减少开支和增加收入双管齐下的严肃的改革方案，那么，它很有可能重蹈那些因财政危机而衰败的大国的覆辙，例如古罗马帝国和20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

第二，不健全的金融制度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它存在两个弱点：首先，它的高风险和不顾后果的扩张行为，是一颗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定时炸弹，不仅威胁着美国，也威胁着全球经济。其次，它造成的道德风险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困局，从而引发了国内的愤怒情绪并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吸引力。美国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无度、失衡和不计后果的投资——美国国会不负责任地放松管制和鼓励购房贷款助长

了这一苗头，贪婪的华尔街投机者则是幕后推手——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紧随其后的经济衰退，使数百万人遭受经济打击。 [18]

令情况更糟糕的是，银行和对冲基金里的金融投机者，实际上脱离了股东的控制，他们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没有给经济创新或创造就业带来任何实际好处。2008年的危机还揭露了处于金融制度最顶层的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人）之间惊人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2009年公布的一篇论文讨论稿，金融行业的工资与私人经济其他部门的工资之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超过1.7——这是自二战之前以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通过实施简单而有效的监管来改革金融制度，提高透明度，改善可问责性，同时促进总体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第三，伴随着社会流动性受阻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长期威胁着社会共识和民主稳定性，而这两者是支撑美国有效外交政策的基本条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失衡现象不断加剧：1980年，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6.5%，而最底层4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4.4%；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扩大，两个数字分别变为21.5%与12%。除了年收入外，家庭拥有的总财富额的对比更加悬殊：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竟然拥有33.8%的社会净财富，而下层50%的美国家庭只拥有2.5%的社会净财富。

这一趋势使美国在全世界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的两项排名中均名列前茅，也让美国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见表2.1和表2.2）。如果能保持美国梦精神所倡导的社会流动性，这种收入不平等还有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但是，过去几十年，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实际上陷入停滞。表2.1中引用了基尼系数这项反映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该指标近年来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几大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问题最严重的行列，与中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收入不平等比美国更严重的只有巴西这个发展中大国。

表2.1 收入差距

(不平等程度从高到低排列)

	年份	基尼系数
巴西	2005	56.7
美国	2007	45.0
俄罗斯	2009	42.2
中国	2007	41.5
日本	2008	37.6
印度尼西亚	2009	37.0
印度	2004	36.8
英国	2005	34.0
法国	2008	32.7
意大利	2006	32.0
欧盟	2009	30.4
德国	2006	27.0

资料来源：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

此外，最近关于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这片“机会之地”的总体经济流动性，实际上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更严重的是，在目前的美国，收入向上的流动性低于一些欧洲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公共教育体系的低效。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每个中小学学生获得的人均教育投资在发达国家中居首位，但是学生的很多项考试成绩却是最差的。这种状况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本未得到开发，从而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导致美国制度的全球吸引力下降。

表2.2 社会财富分配

	年份，单位	最富裕的10%	最贫穷的50%
美国	2001，家庭	69.8%	2.8%
英国	2000，成人	56.0%	5.0%
日本	1999，户	39.3%	13.9%
意大利	2000，户	48.5%	7.0%（最贫穷的40%）
印度尼西亚	1997，户	65.4%	5.1%
印度	2002-2003，户	52.9%	8.1%
德国	1998，户	44.4%	3.9%
法国	1994，人	61.0%	无数据
中国	2002，人	41.4%	14.4%
加拿大	1999，家庭单位	53.0%	6.0%
澳大利亚	2002，户	45.0%	9.0%

资料来源：联合国大学报告，2008年2月。

第四个难题是美国日渐老化的国家基础设施。就在中国不断兴建新机场和新公路，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都拥有了先进的高速铁路时，美国这些方面的设施却全部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上。光是中国就有高速火车和近5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但美国至今还没有这样的设施。北京和上海的机场不论外观还是运作效率都要领先华盛顿和纽约好几十年，美国的这两个地方越来越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味道了，这真是令人尴尬。中国发生的一些极具代表性的21世纪结构创新事例，说明它正在赶超美国（虽然它的农村和小城镇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事实的象征意义十分深远。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2009年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了评估，结论是，美国的基础设施总体得分为最低的D；其中航空基础设施得分为D，铁路C-，公路D-，能源D+。城市更新十分缓慢，很多城市的公共住房条件恶化，甚至首都也是如此，该情况就是缺乏社会关注的鲜明体现。只要坐上从纽约到华盛顿的火车（在速度缓慢、摇摇晃摆的美国“阿塞拉号”“高速”列车上）就可以感受到美国基础设施的落后，从车厢窗户看出去，很难想象这就是那个在几乎整个20世纪都以社会

创新为标签的国家。

可靠的基础设施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活力。在历史上，判断某个大国的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的状况与独创性——不管是罗马人的公路和灌渠还是英国的铁路。而上述的美国基础设施现状，与其说它代表着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倒不如说它代表着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更为贴切。如果美国的基础设施继续老化，其经济生产活动必然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年代更是如此。当今世界，美国与中国的制度竞争很可能愈演愈烈，基础设施老化可能成为美国衰落的标志和征兆。

美国的第五个难题是公众缺乏对世界的了解。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人对基本的世界地理、时事甚至重要历史事件的了解少得惊人，出现这种状况与公共教育体制的缺陷是分不开的。200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8-24岁的青年中，加拿大、法国、日本、墨西哥和瑞典的青年能从地图上找出美国的人的比例，高于美国的同龄人。2006年的一份针对美国青年人的调查发现，63%的人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75%的人找不到伊朗，88%的人找不到阿富汗——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以高昂的代价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参与。在历史知识方面，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高年级大学生知道北约当初成立的目的是对抗苏联的扩张，30%的美国成年人列举不出美国在二战时的两个交战国。此外，美国公众对这几类知识的了解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国家地理》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调查中比较了瑞典、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年轻人对时事和地理知识的熟悉程度，结果美国排名倒数第二，只超过了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它的邻国墨西哥。

公众可直接获取的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世界的报道太少，这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无知。除了五家主流报纸之外，地方媒体和各家电视台的国际时事报道少之又少，除了轰动性或灾难性事件的特别报道。长此以往，这种普遍性的无知可能导致公众面对煽动时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担忧，尤其是涉及恐怖袭击时更是如此。政府因此更有可能制定一

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外交政策。总而言之，公众的无知导致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更受欢迎的，是把问题简单化的极端主义观点，利益游说集团也在背后兴风作浪；而不是对冷战后复杂的国际现实的多样化理解。

与这个方面相关的第六个问题是，内部对立日趋严重、党派性越来越强的政治制度。政治妥协越来越遥不可及，部分原因是媒体（特别是电视）、广播谈话节目和政治博客中越来越多地充斥着针锋相对的政党辩论，而不明真相的公众更容易受到摩尼教式的煽动。因此，政治瘫痪常常阻碍必要的改革措施（例如减少赤字）的推行。这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给人以没有能力处理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的印象。而且，美国目前这种严重依赖竞选资金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容易被资金充足，但只服务于小部分人利益的国内外游说集团利用，这些集团可以利用现有的政治体系，牺牲国家利益来推行它们的目标。最为严重的是，兰德公司的一项认真的研究说：“想扭转由政治两极化这样深刻和广泛的原因所导致的过程，即使有办法也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的国家在今后很长的时期都将面对左翼与右翼政治战争持续不断的局面。”^[1]

以上六个问题为那些认定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衰落的人提供了论据。这些问题还导致美国制度在相对繁荣的欧洲所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父爱式体制面前黯然失色。近些年来，很多人开始认为欧洲模式——欧盟的金融与贸易双重实力令欧洲的国际地位在近几十年里大大提升——比美国模式更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然而，仔细研究后便会发现，美国的上述问题显然有一些在欧洲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很可能影响欧洲的长期活力。例如，希腊和爱尔兰在2010年先后陷入债务危机，危机随后的蔓延表明，欧洲经济制度中的父爱式体制和高福利有可能难以为继，最终将威胁欧洲的偿付能力。英国执政的保守党最近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采取紧缩措施，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尽管美国号称是“机会之地”，但欧洲的社会平等和流动性程度确实高于美国。欧洲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

铁路等注重环保的公共交通设施，比美国那些年久失修的机场、火车站、公路和桥梁要先进得多。欧洲人对地理知识和国际时事的了解也更多，不会轻易被扩散恐惧心理者利用（尽管存在一些边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右翼政党），也因此不容易在国际上被人牵着鼻子走。

另外，中国常被视为未来的潮流。然而，考虑到中国的社会发展滞后和政治体制特殊，它还不能取代美国，成为更加繁荣、现代和民主的榜样。但是，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并且不出现大的经济或社会危机，它可能会在全球政治影响力甚至最终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以打破平均主义和追求物质财富为动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一些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模式，在这些国家，发展滞后、人口危机、民族紧张，甚至殖民主义遗毒共同导致了社会长期贫穷落后。对这部分人来说，民主还是专制是一个次要问题。可以想象，民主的和发展的印度，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但是印度还需要克服文盲、饥饿、贫困和基础设施落后等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它目前还不具备与中国竞争的实力。

美国的资产负债表

负债	资产
国家债务	总体经济实力
有缺陷的金融制度	创新潜力
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	人口活力
越来越陈旧的基础设施	民众响应力
公众的无知	地理基础
政治对立	民主的吸引力

3.美国尚存的实力

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总结了影响美国制度全球竞争力这一重要命题的加分与减分项目：可预见的未来（例如未来20年）仍将在很大程度

上由美国来塑造。如果美国能充分利用六个方面的重要实力，即总体经济实力、创新潜力、人口活力、民众响应能力、地理基础和民主吸引力，那么它就有能力纠正那些摆在眼前的问题。当下流行的对美国制度的解构主义理解，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的衰落并不是注定的。

表2.3 各国GDP占世界的份额（%）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美国	27.26	26.18	26.76	28.31	26.30
欧洲*	35.92	33.77	31.70	31.92	28.30
中国*	0.78	1.00	1.80	3.72	7.43
印度	0.87	0.82	1.07	1.40	2.26
俄罗斯*	4.27	4.09	3.84	1.50	1.86
日本	9.84	10.68	11.88	10.25	8.74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研究所、美国农业部国际宏观经济数据集（2010年12月22日更新）。

*欧洲2000年与2010年的数据包含欧盟27个成员国，其他时间的数据仅指“欧盟15国”；俄罗斯在1970年、1980年和1990年的数据，指的是苏联的数据，2000年与2010年的数据则是俄罗斯联邦的数据；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目前已经超过日本，但美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尚未来得及反映这一点，因为中国经济在2010年末、2011年初超过日本。

第一项重要资产是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美国仍然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最大的国家经济体。只有欧洲的整体经济规模略胜美国一筹。但即使如此，西欧模式也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决定未来趋势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尽管亚洲经济迅速增长，但美国几十年来在全球GDP中一直占据可观的比例（见表2.3）。美国2010年的GDP超过1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5%左右。但作为与美国经济规模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中国，它的GDP还不到6万亿美

元，占世界总量的9%。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预测，美国的GDP将从2010年时的比欧盟少1.48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2050年比欧盟多12.03万亿美元的水平；人均GDP则将从2010年比欧盟多12723美元的水平，增长到2050年比欧盟多32266美元的水平。

根据目前的预测，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的确将在本世纪某个时间超过美国，这主要依赖其庞大的人口基础。卡内基基金会预计这个时间可能在2030年左右。出于类似的原因，印度在未来40年内也将进入全球GDP排行榜前列，虽然速度赶不上中国。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人均GDP都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见表2.4）。因此，不论中国、印度还是欧洲，都无法在总体经济规模和人均GDP两方面的综合意义上，超越美国的经济优势。这种经济优势——假设美国能够同时利用其他几项资产——能够让美国保持其全球经济影响力和制度吸引力，以及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吸纳效应。

决定美国经济成就的部分因素来自它的第二项资产：创业文化和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为它带来的非凡的技术创新能力。美国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排在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之后的全球第四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对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排名中，美国仅次于韩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二。

表2.4 GDP与人均GDP预测

GDP（按2005年市场汇率计算；非购买力平价法）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1) 2010年GDP（万亿美元）	13.15	14.63	3.64	4.54	0.88	1.13
2) 2025年GDP（万亿美元）	19.48	19.10	16.12	5.56	2.01	3.80
3) 2030年GDP（万亿美元）	22.26	20.34	21.48	5.79	2.49	5.33
4) 2050年GDP（万亿美元）	38.65	26.62	46.27	6.22	4.30	15.38
5) 2010年人均GDP（美元）	42372	29649	2699	35815	6328	966
6) 2025年人均GDP（美元）	54503	38320	11096	47163	15714	2722
7) 2030年人均GDP（美元）	59592	40901	14696	50965	20039	3648
8) 2050年人均GDP（美元）	88029	55763	32486	66361	39350	9287

资料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50年的世界秩序》，2010年2月。

此外，对社会活力等其他一些“软性”因素的对比评价显示，美国在一些用于衡量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定性指标方面的排名仍然较高（见表2.5）。多少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并没有排在首位；但在短期内更重要的是，全球领导者舞台的主要竞争者在大多数项目上的得分都低于美国。这一点印证了后文将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在近期内，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同时施展其软实力和硬实力从而成功取代美国。

表2.5 对美国与新兴大国的定性评估*

经济指标平均排名情况

企业家精神、经济竞争力和物流绩效指数世界平均排名

国别	世界平均排名
美国	第7名
中国	第31名
印度	第50名
巴西	第51名
俄罗斯	第71名

社会和政治指标平均排名情况

腐败、人类发展、教育和新闻自由指数世界平均排名

国别	世界平均排名
美国	第20名
中国	第75名
印度	第110名
巴西	第111名
俄罗斯	第112名

*这两个表说明了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经济、社

会和政治发展水平几方面国际指标的世界平均排名情况。虽然美国在经济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几个对其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的大国，但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任何一项指标上都未能排在第一位。这两个表格说明，虽然全球实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还没有一个新兴大国表现出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所具备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对全球优秀大学的排名，名列前十位的大学中有八所是美国大学，前二十名的大学中有十七所美国大学。这些优秀的大学不仅为美国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帮助美国在开拓未来产品和产业的过程中维持经济，甚至是军事优势。在全世界的高级研究人员、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或经济潜力而纷纷移民美国的基础上，这些大学进一步增加了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美国人应该看到，他们的高等教育优势对于国家的内部活力、国际声望和全球影响力是多么重要。

美国的第三个优势是相对强大的人口基础，特别是与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相比。美国拥有3.18亿的庞大人口，这是全球实力的一个先天资源。此外，美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存在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甚至人口减少的问题。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4.03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21.6%。与此同时，欧盟的人口将从4.97亿减少到2050年的4.93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将占28.7%。日本的情况更加可怕：该国人口将从2010年的1.27亿减少到2050年的1.01亿，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7.8%（见表2.6）。

出现这种有利差距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吸引和消化移民的能力，尽管这个问题近来引发了国内的不安。美国目前的净移民率为4.25‰，而德国为2.19‰、英国为2.15‰、法国为1.47‰、俄罗斯为0.28‰、中国为-0.34‰。这种吸引和消化外来移民的能力，既巩固了美国的人口基础，又有利于提升长期经济前景和国际吸引力。如果美国向反移民和排外倾向低头，那么，对美国的活力、繁荣和前途具有重要意义的灯塔效应将遭到削弱。

表2.6 总人口与老龄化预测

总人口（百万）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1) 2010年	317.64	497.53	1354.15	127.00	140.37	1166.08
2) 2025年	358.74	506.22	1453.14	120.79	132.35	1431.27
3) 2030年	369.98	505.62	1462.47	117.42	128.86	1484.60
4) 2050年	403.93	493.86	1417.05	101.66	116.10	1613.80

资料来源：联合国预测，采用中等生育率假设，欧盟指欧盟27国。

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1) 2010年占总人口比重	13.0%	17.5%	8.2%	22.6%	12.9%	4.9%
2) 2025年占总人口比重	18.1%	22.0%	13.4%	29.7%	17.7%	7.3%
3) 2030年占总人口比重	19.8%	23.8%	15.9%	30.8%	19.4%	8.4%
4) 2050年占总人口比重	21.6%	28.7%	23.3%	37.8%	23.4%	13.7%
5) 目前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78.11	78.67	73.47	82.12	66.03	66.09

资料来源：（1-4）联合国预测，采用中等生育率假设，欧盟指欧盟27国；（5）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

第四项资产是美国的民众响应能力。美国民主政治的形式决定了它的反应速度较慢，但当所面对的危险情况能够激发全民采取行动时，社会也能够被动员起来。战争期间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记住珍珠港”成为一句可以调动全民族积极性、让美国爆发战争能量的口号。登月竞赛一旦引起民众的关注，立即刺激了大量技术创新的产生。美国目前的困境迫切需要类似的努力，而它肩负的一些挑战，恰好可以让一些社会建设目标成为调动社会积极性的现成关注点。如果陈旧落后的基础设施遭遇袭击，那么这显然可以引起民众关注。为应对全球变暖而建设一个绿色的美国，也可以成为一个吸引民众注意力的目标。如果美国总统能够唤起民众的普遍支持，那么美国的物质财富和创业才能就可以被投入到紧迫的复兴事业中去。

第五，与一些大国不同，美国拥有安全、自然资源丰富、战略位置优越、国土面积广阔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基础，其民族凝聚力强，不存在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美国周边也不受具有领土野心的邻国的威

胁。它的北方是一位友好邻邦，与美国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不过说实话，这个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做得比美国好。加拿大宽阔的地理纵深也提高了美国的安全性。美国地大物博，从农业资源到能源的储藏都十分丰富，这些资源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特别是阿拉斯加地区——尚未加以开发。美国位于世界最重要的两大洋——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这为美国提供了安全屏障，同时，美国的海岸线是它进行海上贸易和在必要时跨海作战的跳板。总而言之，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同时拥有这么多永久的条件和有利的机会所形成的优势。

美国的第六大资产是它一直与一系列价值挂钩——人权、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经济机会——这些价值受到其国民的普遍认可，让美国的国际地位多年来不断提升。美国长久以来受益于意识形态优势，在近来又凭借这种优势成为冷战的胜利者。然而，冷战结束后，这种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2003年出兵伊拉克以及随后的暴行遭到国际上的普遍反对。尽管如此，美国基本上还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民主国家。例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美国在2007年的受欢迎程度达到1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对美国有好感的人只占29%，即使在德国等一些盟国中，对美国有好感的人也只有30%。然而，这些数字在2010年有所反弹，美国取得了59%的印尼人的好感，而德国人对美国有好感者的比例也上升到63%。

因此，利用国内的传统价值恢复美国积极的国际形象，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这些价值过去一直是，今后也应当是美国的一项资产，尤其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比时，更加明显。这两个国家还没有资格宣称其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普遍号召力（尽管苏联在与美国进行制度较量时曾徒劳地做过这样的尝试），这一点有利于美国保持其长期优势。虽然大多数国家不喜欢美国的单边外交政策行动，但很多国家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迅速衰落和孤立主义般的撤退，无益于未来全球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稳定扩展。

以上六项基本资产为紧迫的历史性复兴提供了强大跳板。但在实现复兴的过程中，更艰难的是纠正那些显而易见的、可能造成严重后

果的体制缺陷。每一种重大风险或缺陷都必然有办法补救，如何去补救早已成为国内的热门话题。美国前景所受到的威胁，并不是一些神秘的历史决定因素，而是一直缺少政治意愿和民族共识。

美国人现在普遍认识到，为了使国家在今后维持国内繁荣和建设性的国际地位，现在必须进行一些关键的改革，例如全面的金融改革和实现长期财政平衡。成功清除美国中等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有助于改善美国的长期经济前景，这是因为中等教育质量上的改善，有助于纠正以上提到的几方面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差距、社会流动性低和公众知识匮乏的问题。平衡预算、金融改革和解决收入差距，都需要社会在激励、税收和监管方面采取一些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折中措施。为国家振兴而做出共同的社会牺牲，只有这样的观念才能把各阶层紧密团结在一起。

最后，美国若想成功实现自我进步，就必须彻底重塑社会文化的重心，即美国人如何定义自己的理想和“国家梦”的道德成分。物质利益的获取是否大大脱离了便利、舒适和自我满足这些对美好生活的终极定义？耐心而坚持不懈地进行国内改革，能否把美国变成一个建立在充满效率、活力和创新力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文化、学术和精神上更进步的智慧型社会？不幸的是，可能只有当公众痛苦地认识到，美国倘若继续沿着追求国内铺张生活的道路走下去，会导致在国际上破产进而陷入危机时，他们才会开始反思美好生活的真正定义。

接下来几年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如果政治对立和党派偏见继续影响公共政策，如果他们阻挠全社会共同承担民族复兴的成本，如果他们无视收入差距扩大的危险趋势，如果他们忽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名次可能受到威胁的事实，那么对美国衰落的悲观预测就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结论。但这并非不可避免。考虑到美国目前的实力和它在面对挑战时有能力动员全国力量来应对，情况不一定会如此。在“大萧条”之后、二战期间以及冷战中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应对过类似情况，这一次美国也一样可以做到。

4.美国漫长的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说2007年的失败给美国人上了重要的一课，让他们知道必须对美国的一些基本制度要素、国内价值和社会政策进行严肃反思，那么“9·11”这个日期也该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美国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冷战和平结束、美国获得地缘政治胜利这一重大机遇。

人们如今很容易忘记长达45年的冷战曾是多么地惊心动魄。热战在当时有可能一触即发，斩首行动可以在几分钟内消灭美国领导人，或者在几小时内把美国或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冷战的稳定完全建立在一种脆弱的相互遏制之上，而这种遏制又完全取决于几个很可能犯错的人的理智。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称霸全球。它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经济制度受到全世界肯定，并成为其他国家积极学习的榜样。它的国际地位无人可及。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不再基于共同的恐惧，而是基于对泛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在这个扩大的共同体中，欧洲将加速向真正的政治一体化迈进。在远东，美国最亲密的亚洲盟友——日本——逐渐赢得国际声望。对日本成为“超级大国”后可能接管美国资产的担忧渐渐平息。1978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中国甚至在1980年与美国一同在阿富汗问题上反对苏联。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更加积极，甚至还沾沾自喜地认为，中国国内的落后将导致它在很长时期里都无法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

美国因此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引擎、政治模范、社会灯塔和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凭借这种实力，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几乎在第一时间把伊拉克赶出了刚刚被它占领的科威特，此战的成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中国的妥协和叙利亚的参与，当然还有传统盟友的合作。但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里却没有抓住机会解开巴以冲突这道难题。自1967年战争后，中东问题实际上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由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决定的。然而，除了卡特总统成功推动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外，美国在大多数时间都在扮演一个消极角色，甚至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称霸全球期间也依然如此。1995年，

主张务实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遭一名反对和平进程的以色列人刺杀，此后，美国直到克林顿8年总统任期的最后半年，才又开始尝试推动恢复巴以和谈，但它的消极努力还是无果而终。

很快就到了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发动的越来越暴力的袭击，在这一天上演了最惨烈的一幕。美国对这次惨剧的反应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出兵阿富汗，目的不仅是摧毁“基地”组织和推翻为其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还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随后，在2002年初，他支持以色列总理沙龙（也就是小布什所说的那个“热爱和平的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向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宣战。第三，在2003年初春，他以十分牵强的理由入侵伊拉克，声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并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行动加深了中东人对美国的敌意，提升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并且把美国拖进了两场无休无止的战争。

截至2010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已跨入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战争行列。第一场战争发动于纽约遭受恐怖袭击数周后，这次恐怖袭击是美国的敌人对美国社会发动的、造成最严重平民伤亡的一次袭击，它促使美国做出了旨在摧毁“基地”组织网络和推翻为犯罪者提供庇护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决定，这次行动得到了公众的支持。第二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2003年初出兵伊拉克，这次行动在国际上只得到了政治上对美国言听计从的英国首相和以色列的支持，美国的大部分盟友都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美国总统公开为这次行动辩护，毫无依据地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些武器在几个月内集体蒸发，在美国占领后的伊拉克也从未发现任何相关证据。由于小布什总统对这场战争投入了全部的热情，阿富汗战争在近七年的时间里相对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涉及美国的重要战争的持续时间

（截至2011年3月，以月为单位计算，带*号的为美国主动发起的战争）

阿富汗战争*	112
越南战争	102
独立战争	100
伊拉克战争*	96
南北战争	48
第二次世界大战	45
朝鲜战争	37
美英战争（1812）	32
菲律宾起义	30
美墨战争	21
第一次世界大战	20
美西战争	3
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	2

这两场战争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在敌方领土上进行的远征军事行动。小布什政府在两次战争中都无视复杂的文化环境，没有认识到深刻的民族仇恨会导致冲突中的冲突，忽视了危险而不安分的地区邻国（特别是涉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存在和尚未解决的领土争议，所有这些因素都令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变得极其复杂，并加重了地区反美情绪。尽管美国的干涉行动不免让人想起19世纪对原始分裂部落的帝国主义远征，但在大众政治觉醒的新时期，向觉醒的平民主义开战将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美国也已经痛苦地体会到这一点。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透明化的时代，想不择手段取胜已经行不通；尽管苏联入侵阿富汗，并让数百万人沦为难民，但它依然没有取得完全意义上的胜利。

然而，就像西方历史上的远征行动一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对美国本土造成太大影响，当然除了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之外。尽管这两场战争加起来消耗了上千亿美元的军费，超过除二战之外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费用的总和，但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它

们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不仅如此，小布什政府一直克制着没有通过加税补贴战争，而是通过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的借款的方式维持军费开支，其中包括从其他国家借款。从社会角度来说，由于上战场和牺牲都是自愿行为——这一点与之前的越战和朝鲜战争不同——这也有利于减轻社会层面的个人战争创伤。

回顾两场战争的过程，阿富汗战争数年来一直未像伊拉克战争那样受到关注。不仅如此，小布什政府还刻意渲染恐怖主义威胁，以此为由把推翻萨达姆的战争列为首要任务，却无视伊拉克向来反对“基地”组织的主张，无视“基地”组织也一直仇视萨达姆政权的事实。暗示二者与“伊斯兰圣战”这个醒目词组有联系并以“反恐”为美国的军事反应正名，这更有利于煽动美国人对“9·11”事件制造者甚至其他伊斯兰组织的愤怒情绪。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说，美国上空将笼罩“蘑菇云”。此后，这种言论常常被方便地用来煽动公众去反对某个新出现的强大目标。这让公众的恐惧心理达到顶峰，也让那些敢于质疑白宫发动伊拉克战争真实动机的人处于被动状态。

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进行的煽动可以成为强大的工具，它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从长期来看将使美国付出国内和国外的双重代价。它的害处从那些臭名昭著的伊拉克虐囚案件（受害者还包括一些伊拉克高级军官）中可见一斑。在那种把敌人妖魔化的氛围下，这些人理所应当地成了体罚的对象。美国的大众传媒——包括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也加剧了这种情绪在公众中的蔓延，那些带有阿拉伯人相貌特征的演员扮演的全都是反面角色。这些煽动性宣传导致美国人对美国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后裔的歧视加重。这类歧视行动多种多样，既包括种族归纳 [19]，也包括美国境内的大量阿拉伯慈善机构遭到指控，等等。“反恐战争”渐渐呈现种族性和宗教性，抹黑了美国的民主形象，而在“9·11”事件发生一年半后做出的对伊拉克开战的决定，变成了一次代价高昂的错误行动。

事情原本不应如此，也能够不如此。首先，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和不应发生的。在小布什眼里，它的重要性很快就超过了早先为了

反击从阿富汗发动袭击的“基地”组织而发动的更合情合理的军事行动。这导致阿富汗冲突越拖越久、伤亡越来越重。由于巴基斯坦也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其中，战争最终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第二，在更早以前，美国就不应该在苏联撤兵后忽视阿富汗。这个国家当时四分五裂，亟须经济援助以重获稳定。但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对此视而不见。最终，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于20世纪90年代填补了这个真空，当时的巴基斯坦企图通过此举赢得对印度的地缘战略优势。不久后，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容身之处，再之后的事情已经载入史册。“9·11”事件后，美国除了强硬回击之外已别无选择。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美国也应当制定一个全面战略，把“基地”组织的宗教极端恐怖分子与主流穆斯林区别开来。这样的战略，正如本人当时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应当一边积极打破现有的恐怖活动网络（在这一点上，小布什政府应该受到表扬），一边像10多年前成功结成反萨达姆的政治联盟那样进行广泛和长期的政治努力，以削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为目的，鼓励穆斯林世界的温和派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划清界限。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可能需要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严肃承诺，而小布什和他的幕僚们对这一主张极其反感。

结果，与20世纪最后十年的情形相比，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急剧下降，美国总统和国家逐渐丧失威信，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安全的自我认同感也严重减少。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认为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9·11”事件的过度反应，这是一次自私而动机可疑的单边行动。在阿富汗，美国的盟友虽然加入了打击“基地”组织的联合行动，但它们的支持也从犹豫不决发展到步步退缩。参与阿富汗战争的北约盟友先于美国人意识到，小布什把打击“基地”组织与建设一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阿富汗混为一谈，这不论从表述上还是目的上，都自相矛盾。

事实上，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长期坚定介入，在外国胁迫下匆忙进行的、与数百年来形成的强大宗教传统相矛盾的现代化改革就不可

能长久。而这种干涉很可能引爆新的抵抗，更何况阿富汗约有1400万普什图族人 [20]（约占人口的40%），巴基斯坦也有约2800万普什图族人（约占人口的15%），这更有可能让旧的冲突变成新的冲突，导致战争从地域到人数都升级到难以控制的局面。

上述情况的警示，关系到美国不久的未来。除了在阿富汗，甚至伊拉克尚未完成的工作外，美国在人口众多、局势不稳的苏伊士以东和新疆以西的大片地区仍要面对三大可能继续恶化的地缘政治难题：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兴起；美国与伊朗可能发生直接冲突；无法促使巴以达成公平的和平协议，可能导致政治上觉醒的中东对美国的敌意普遍加深。

同时，除一些盟友口头支持和名义上的地区伙伴偶尔的支持姿态外，美国的基本战略依然无人喝彩。不仅美国的盟友正在悄悄从阿富汗撤退，阿富汗周边的三个地区大国也对美国持谨慎的消极态度，虽然它们自身也可能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的威胁。它们表面上对美国的关切表现出同情和合作，例如，俄罗斯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一些后勤援助；中国有保留地支持制裁伊朗；印度则多多少少地向阿富汗提供一些经济援助。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战略决策者们无疑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国在本地区的纠缠不清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引向了美国的安全，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衡量，这对依然敌视美国的俄罗斯、谨慎崛起的中国和患有地区焦虑症的印度都有利。不管是在本地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它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都将随着美国全球地位的逐渐下降而增强。

因此，美国公众和国会都必须充分领悟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除了国内的政治对立从内部加速美国衰退外，不对现实的国家利益加以精心考虑的外交政策，也将在未来20年里令美国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阿富汗的战火可能蔓延到巴基斯坦，美国与伊朗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巴以也可能再起纷争，从而把美国拖进无休止的地区冲突之中，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伊斯兰世界，届时将普遍对美国产生敌对情绪。美国将再无可能像20年前一样承担起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国的角色。

如前文所述，美国仍然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国家复兴，但这必须动员全民的意志。美国还必须克服近年来的外交政策所导致的自我孤立和影响力下降等因素。鉴于美国与其他所有潜在对手间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悬殊，若能及时坚决推行国家改革并调整战略远景，那么美国仍然可以在很长的时期里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但是，完全否认美国的前景远没有这么乐观，则是轻率的逃避主义的表现。关于美国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衰落，存在三种基本的情景。最极端的情况可能是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令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陷入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经济萧条。美国在2007年危机中千钧一发的殷鉴告诉我们，这种最可怕的情况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果在这期间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升级并造成严重后果，那么这场灾难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会终结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多少令人安慰的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前提是发生全球性剧变，包括金融崩溃、世界范围内爆发失业潮、政治危机、弱小国家破产、全世界政治上觉醒和社会上受挫的民众不断暴动。

相对于发生这种具有历史剧变性质的衰落，美国修正其对内对外政策的可能性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07年提供了一个尽管痛苦但却十分珍贵的警示。尽管如此，另外两种关于美国衰落的“中间的”情景，让未来看上去远没那么乐观。基本现实是这样的：美国正在同时受到因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不力而造成的制度落后，和多年来错误地脱离后帝国主义时期的现实所造成的外交政策方向错误两方面威胁。同时，美国潜在的对手（特别是在亚洲某些地区）正在逐步成长为21世纪的现代化国家。不久之后，这两方面威胁的某种共同作用，将给美国的国内价值和海外利益造成致命打击。

因此，一种更有可能出现的“中间的”后果是，美国国内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动荡，其间伴随着生活质量、国家基础设施、经济竞争力和社会福利的不断下降，当然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对外交政策进行一些亡羊补牢的调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近年来不受欢迎的干涉主义倾向所造成的高成本与高风险。即使如此，国内的持续萧条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促使其他大国开始出

于维护本国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目的，加紧谋求新的安排——虽然这有可能是徒劳的。

反过来，美国有可能在国内有所成就而在国外失败。因此，另一种“中间的”但同样悲观的结果可能是，虽然美国的国内情况有一定改善，但在国外却继续从事那些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海外军事行动，甚至将这些行动扩大化（例如在巴基斯坦或伊朗），那么国内情况的好转将不能带来积极的国际影响。非但得不到他国的合作与支持反而会令美国四处树敌的外交政策种下的恶果，是无法由国内的成就来弥补的。如果资源被浪费在那些削弱国力的错误的海外行动上，就不可能取得全面意义上的国内成功。

不管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美国继续担任全球领导者的能力都会逐步地甚至终结性地衰落。不论国内不景气还是国外持续失败，都将逐渐消耗美国的活力，令美国社会渐渐意志消沉，降低它的社会吸引力和全球威信。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或许到2025年，在发生全球性动荡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将失去它自封的“21世纪主宰者”的头衔。但届时争夺这个位置的又会是谁呢？

本章注释：

[1] 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分裂之屋》（弗吉尼亚州阿灵顿，2010年），第17页。

第三章 美国之后的世界：到2025年不是中国而是混沌

如果美国步履蹒跚，世界就不大可能由单一的卓越后继者主宰，比如中国。美国体系倘若突然发生大规模危机，就会产生迅速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如果美国不断走向日益严重的衰落，与/或无休止地扩大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就不大可能会有一个有效的全球接班者“加冕”，甚至在2025年之前都是如此。届时不会有一个单一大国准备扮演苏联1991年解体后全世界期望美国扮演的那种角色。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一段漫长的时期，全球和地区力量纷纷进行缺乏决定意义、有时混乱无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取得辉煌胜利的大赢家，而输家却要得多得多。国际形势捉摸不定，甚至可能给全球福祉带来致命的危险。下面分析了这个极为不祥的“如果”造成的影响。尽管这个“如果”肯定不是预先设定的。

1.美国之后的斗争

由于缺少一个公认领袖所引致的不确定性，所以很有可能加剧竞争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激励自私自利的行为。因此，国际合作更有可能减少，而一些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将谋求促进排外的区域性安排，作为替代性的稳定框架。长久以来相互竞争的对手或许会更加公开地角逐地区优势地位，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力量分布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随着新的大国联盟的崛起，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或许发现自身陷入严重危境。对民主的促进，或许让位于对加强国家安全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建立在独裁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大杂烩”的基础之上。“全球公共品”可能因各方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而受到损害，或者因各方狭隘地关注眼前的国家关切而造成掠夺性开发。

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受到日益上升、较贫穷但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排在最前列——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国家要求重新安排目前向西方倾斜的既有的投票权分配方式。二十国集团中的一些国家已经指责这一分配方式不公平。所提出的要求显而易见，即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成员国的实际人口，而不是根据实际财政贡献来进行分配。这样一种要求，是在世界上新近政治上觉醒的民族之间的混乱和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提出的，可能会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作为迈向国际民主化（尽管它们内部并没有实现民主化）的第一步。不久以后，迄今历时70年、从未受触动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们独享否决权）制度，可能被广泛视为不合乎法律。

即使美国的衰落趋势是以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现，日本、印度、俄罗斯等排在世界第二层级权力序列的国家和一些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在评估美国衰落对其各自国家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后美国争斗的可能性，或许已在悄悄地塑造主要强国的高官们的规划议程，即使他们尚未制定实际政策。日本人由于害怕咄咄逼人的中国称霸亚洲大陆，可能已在考虑加强与欧洲的联系。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很可能正在考虑，一旦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印日双方就会加强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的合作。俄罗斯对美国捉摸不定的前景可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甚至幸灾乐祸，它几乎肯定会把目光投向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国家，把它们作为自己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第一步的目标。欧洲尚无凝聚力，它很有可能受到几个方向的拉力：德国和意大利会由于商业利益投靠俄罗斯，法国和无保障的中欧会赞成在政治上加强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英国会倾向于操纵欧盟内部的力量平衡，同时与衰落的美国保持其特殊关系。其他国家可能会更快地采取行动，开辟自己在本地区的势力范围：土耳其将在旧奥斯曼帝国地区，巴西将在南半球，诸如此类。

然而，上述这些国家都不具备或者不大可能具备必要的经济、金融、技术和军事等综合力量，使得它们甚至连继承美国角色的考虑都没有。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将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是迎合中国，还是与印度结盟联手对抗中国。俄罗斯仍不能忍受其帝国崩塌

的现实，对中国大步流星般的现代化忧心忡忡，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是属于欧洲还是属于欧亚。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将通过与中国的竞争得以显现。欧洲有待于在政治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与此同时它仍然怡然自得地依赖着美国的力量。如果美国的力量衰落，那么让这些国家携手付出努力，为了集体的稳定而甘愿做出牺牲是不大可能的。

所有国家——像个人一样——都被继承而来的倾向（它们的传统地缘政治倾向和历史感）驱使。国家间的能力差别就在于能否区分耐心的雄心与轻率的自欺欺人的能力。为思考21世纪上半叶全球力量等级发生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不妨提醒自己想想20世纪两个焦躁不安的自欺欺人行为的极端例子所导致的国家灾难，这是很有益处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的狂妄自大。这种狂妄不仅使他大大高估了德国的全球领导能力，而且还促使他做出了两个令其再无重新控制欧洲大陆的机会的个人战略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在已经占领了欧洲大陆但仍在与英国交战时攻打苏联；第二个决定是，在与苏联和英国打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对美国宣战。

第二个事例虽然不太剧烈，但是也关乎全球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正式宣布，这个国家预计会于80年代在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方面超越美国（它的“斯普特尼克”^[21]成就令其雄心勃勃的声明备受瞩目）。由于极度高估自己的经济实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与美国展开积极的军备竞赛。在这种竞赛中，苏联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GNP）限制了它实际能够支撑的全球政治及军事延伸的范围。在这两个方面，苏联灾难性地把摊子铺得过大。1979年，苏联又由于失算而做出入侵阿富汗这一灾难性的决定。后果更是雪上加霜。10年后，精疲力竭的苏联不复存在，苏联集团分崩离析。

而今，没有哪个国家相当于纳粹德国或者苏联。在当前的全球主要大国的序列中，没有哪一个展示出20世纪妄图获得全球性力量的臭名昭著的国家那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迄今没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或者军事上准备摆出全球领袖的架势；也没有任何国家被赋予一

种不久之前仍与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模糊但却重要的合法性。没有哪个国家声称（在希特勒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歇斯底里”地声称）代表着一种以历史决定论作为明证的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约而同地被说成最有希望的美国未来的后继者，它有令人敬畏的帝国历史以及慎重而耐心的战略传统，这两点对它极其成功的几千年悠久历史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慎重地接受现有的国际体系，尽管它并不认为流行的等级体系恒久不变。它认识到，自己的成功并不依赖于该体系的戏剧性崩溃，而依赖于该体系的力量循序渐进的重新分布。中国谋求增大影响力，渴望国际上的尊重，并且仍然对自己的“百年耻辱”怀恨在心，但它对未来越来越感到自信。与那些20世纪渴望全球权力但失败的国家不同，中国此时此刻的国际态势既非革命性，又非救世主，亦非摩尼教特征。

此外，基本的现实是，中国尚未做好在世界上扮演美国的全部角色的准备，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就连中国的领导人都屡次强调，按照有关发展、财富和力量的每一个重要尺度衡量，中国今后几十年仍将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等重要人均指标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欧洲和日本（见表3.1）。

中国因此似乎理解美国全球卓越地位的迅速衰落将带来全球危机，从而最终破坏中国自己的福祉，损害其长期前景。中国在美国福祉上下注投资的事实，比任何言辞都更清楚地表明，中国认同这个看法。这是因为中国的行动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慎重且耐心是中国帝国DNA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也雄心勃勃、骄傲自豪，清醒地意识到其独特历史只是其命运的序幕。难怪一位精明的中国公众人物不久前对一位到访的美国人真诚地说：“然而，请不要让美国太快地衰落……”他显然断定，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都不可避免。

表3.1 人口-年龄-GDP对比

总人口规模（百万）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1)2010年人口	317.64	497.53	1354.15	127.00
2)2025年人口	358.74	506.22	1453.14	120.79
3)2030年人口	369.98	505.62	1462.47	117.42
4)2050年人口	403.93	493.86	1417.05	101.66

资料来源：联合国预测，采用中等生育率假设，欧盟指欧盟27国。

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1)2010年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	13.0%	17.5%	8.2%	22.6%
2)2025年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	18.1%	22.0%	13.4%	29.7%
3)2030年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	19.8%	23.8%	15.9%	30.8%
4)2050年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	21.6%	28.7%	23.3%	37.8%
5)当前的预期寿命（岁数）	78.11	78.67	73.47	82.12

资料来源：（1-4）联合国预测，采用中等生育率假设，欧盟指欧盟27国；（5）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

GDP（2005年；非购买力平价法）	美国	欧盟	中国	日本
1)2010年GDP（万亿美元）	13.15	24.63	3.64	4.54
2)2025年GDP（万亿美元）	19.48	19.10	16.12	5.56
3)2030年GDP（万亿美元）	22.26	20.34	21.48	5.79
4)2050年GDP（万亿美元）	38.65	26.62	46.27	6.22
5)2010年人均GDP（美元）	42372	29649	2699	35815
6)2025年人均GDP（美元）	54503	38320	11096	47163
7)2030年人均GDP（美元）	59592	40901	14696	50965
8)2050年人均GDP（美元）	88029	55763	32486	66361

资料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50年的世界秩序》，

2010年2月。

因此，中国领导人一直比较谨慎，在对外公开宣称寻求世界领导地位方面保持克制。总的来说，他们仍然遵循邓小平的著名格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种谨慎的姿态还恰恰与中国古代孙武的战略指导不谋而合。孙武令人信服地主张：“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国对于美国国内问题和对外政策所持的官方态度，显然令人想起这一战略指导。北京的历史信心，与其精于算计的审慎和长远野心密切相关。

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虽然国内成就非凡，但是迄今并没有谋求推广其经验。它不再像毛泽东执政时期那样，提出野心勃勃的概念，即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经验，对全人类而言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有效性；它也没有提出其社会形态具有所谓的更高道德标准的教条主义说法。相反，它的全球名片强调了一个非常单调乏味但却实用并广受羡慕的主题：中国引人瞩目的GDP年度增长率。这个吸引人的信息赋予中国重大竞争优势，特别是在拉美和欠发达的非洲，更是如此。因为中国谋求扩大投资，但又不会竭力主张政治改革（例如，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70亿美元，增幅高达1000%）。

除了要把中国的观点和传统做法考虑在内之外，还必须要留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自己的内部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挥之不去的潜在不确定性。政治上，这个国家从以前的激进形式（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演变成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到目前为止，这一新形式一直展现着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它的社会基础可能证明是不堪一击的。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提升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这一点再也不能掩公众耳目。全国各大城市的新中产阶层不仅积累了财富，而且还可以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全球信息。这种接触的确刺激了新的政治和社会期望。它还使得人们不满于目前政治权利所受到的限制，也使得一些人甚至愿意冒险被视为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

随着中产阶级开始渴望更自由的政治对话，能够更加开放地提出社会批评，能够更加直接地进入国家决策圈，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尤其具有潜在的庞大响应群体。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在人数多得多的工人，甚至是人数更多的农民之中浮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刚刚开始意识到，与腰包越来越鼓的新中产阶级相比，他们的报酬有多低。人数更多的真正一贫如洗的农民阶层（其中一些人是半失业的数亿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自由流动，寻找服务性工作）刚刚开始形成自己的抱负，希望在中国的国家财富中分得更大一杯羹。

因此，中国很有可能加大对国内稳定的关注。如果一场严重的国内政治或者社会危机再次上演，可能会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损害，令过去30年来无可否认的成就付之东流。这一考量很有可能让中国领导人仍然倾向于慎重考虑中国在全球序列中迅速上升的时间表。然而，他们还必须把中国精英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考虑在内，尤其是直面美国的时候。事实上，到了21世纪头十年结束之际，半官方的中国评论员开始更公开地质疑全球现状的总体历史合法性。中国的一些国际时事评论员甚至开始推测中国模式普适性这一教条主义说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正如有位评论员所指出的那样：

今天国际机制的失灵是以“美国方式”为主的西方方式的失灵，更深层的是西方文化的失灵。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扮演好发展中大国角色的同时，中国应主动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和谐”理念。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一种新的世界理论的诞生。“和谐”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理论表述方式，应该把公平、共赢、共同发展这些理念传递给世界。 [1]

在公开批评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方面，中国评论员时常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因此，另一位中国外交事务评论员断言：

美国的“单极”野心虽然因金融危机而严重受挫，但它并未认同多极化，而是极力延续其世界霸权，力图不择手段地维护其“首要”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加速崛起与大国地位相应提升，中美在国力“排行

榜”中的先后次序将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彼此“排位”之争恐难免……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的弊端，美国对此加大了在国际上“围堵”与贬损“中国模式”的图谋，中美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分歧可能进一步“放大”。^[2]

特别是自从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美国制度和美国在全球态势的批评变得越来越频繁和直截了当。中国指责美国加速了2007年金融危机的到来，并且未能认识到中国在推动国际上集体应对这场危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媒体也越来越严厉地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利益感觉迟钝，并且在2010年插手中国与其亚洲邻国之间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一些评论员甚至指责美国试图包围中国。

这样的反应不仅反映出中国方面越来越膨胀的历史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可能很容易就变成过度自信），还反映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个强大且潜在的爆炸性力量。虽然深深植根于历史自豪感，但它也受到对不太久远的耻辱的怨恨的驱使。它可能受到当权者的引导和利用。事实上，在国内发生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可以成为用来维持政治现状的社会凝聚力的权宜之计的源泉。

不过，到了某个阶段，更加咄咄逼人的中国民族主义可能抬头，所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国际利益受损。中国若是采取民族主义，妄自尊大，炫耀其崛起的实力，就会无意之中促成一个强大的区域联盟与之抗衡。事实上，如果美国在全球图腾柱上的位置空出来，中国的重要邻国——印度、日本及俄罗斯——都不会准备承认中国继承该位置的权利。中国的邻国或许最终别无选择，但它们几乎肯定会首先采取行动反对中国的这类上升。它们甚至可能会倾向于从式微的美国那里寻求支持，以抵消过分张狂的中国势力。由此引发的地区争夺将非常激烈，尤其是考虑到中国邻国也存在类似的民族主义倾向，更是如此。

即使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组成的仅仅是一个非正式的反华联盟，也会对中国产生严重的地缘政治影响。与美国有利的地理位置不一

样，中国可能在战略包围面前十分脆弱。日本挡住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去路，俄罗斯把中国跟欧洲分隔开来，印度俯瞰着与其同名的大洋，横亘于中国通向中东的主要通道上。迄今，中国领导人自我描述的“和平崛起的中国”一直在亚洲交朋友，甚至是找到从属国，但是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可能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孤立。

亚洲随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国际关系非常紧张的阶段。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以危险的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中印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在南亚如此，在整个亚洲也是如此。印度战略家公开谈到，大印度在从伊朗到泰国的地区占据主宰地位。印度还自我定位于在军事上控制印度洋；其海上和空中力量计划显然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如同印度按照政治意图指引，在毗邻的孟加拉国和缅甸建立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强势地位而付出努力一样。印度参与这两个国家的港口设施建设增强了印度最终寻求控制印度洋海上通道的能力。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关系，以及中国为赶上印度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存在而付出的努力，不仅反映出中国一个更大的战略设计，还反映出中国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意图：避开一个反复无常的强大邻国，保护其通过印度洋到达中东的海上通途。中国人一直探索在巴基斯坦西南部邻近伊朗、伸进印度洋的瓜德尔港（Gwadar）建造一个大型设施，并用公路或者管道与中国连接起来的可能性。在缅甸，印度一直在改建实兑港（Sittwe），以获得一个捷径到达它在地缘政治上难以接近的东北部，而中国人一直在皎漂港（Kyauk Phru）投资，可能从那里铺设一条通往中国的管道，从而减轻中国对经由马六甲海峡的长得多的通道的依赖。中国在这些重大地缘政治努力方面，对缅甸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一直占据较大的分量。

地图3.1 对中国大陆的“包围”

与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海军竞争，印中两国日益上升的全球地位，这一切都可能引发危险的军备竞赛，或者更糟糕的是引发真正的冲突。幸运的是，迄今两国领导人都表明，他们认识到，小规模战争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而这两个核大国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则会摧毁一切。

然而，即使是一些边界事件都可能激起中国人和/或者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政治上是难以控制的。在这方面，印度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它的政治制度没那么集权，印度公众对中巴合作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比起中国群众的反印情绪，印度大众更容易掀起反华情绪。此外，印度媒体越来越明确地宣扬中国对印度安全构成的潜在地缘政治威胁，这反映出印度对中国更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更有效率的经济、更高的全球地位的不满。因此，印度面向其说英语的精英阶层的第二大英语日报，以这样的方式对其读者阐释前面提到的印中在南亚的相互对立：

中国精心策划的备战动机剑指何方？.....中国在巴基斯坦极为敏感的地方建设瓜德尔港，逐步控制海上通道并且监视印度.....在巴基斯坦的隐蔽和公开的支持下，中国成功地在海陆方面抵消印度的影响.....此外，中国还在缅甸建造港口、石油管道和公路，此举的意图非同小可。还有，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Hambentota）也是在中国帮助下建造的，而它实际上是印度陆地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在实施其精心策划的“珍珠链战略”，目的是在印度洋对印度形成包围圈。 [3]

事实上，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崛起不利于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崛起，这将是历史的讽刺。但是，中国崛起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一直是其清晰的成就，其精心安排的国际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让外界有所放心。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似乎认识到，全球跌入后美国时代的争夺后，中国的长期雄心还可能成为牺牲品。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中国高层领导人如何谋划，不管是否出现上升的民族主义不耐烦的某些症状，中国上升到全球卓越地位遇到的障碍，看上去可能的确比美国当初崛起时遇到的障碍多得多。如果中国

明显急躁地追逐这一目标，那么它遭遇的积极反对会比美国在上升期间遭遇的反对更大。中国没有美国在20世纪初起飞阶段享有的地理和历史环境政治优势。与美国在20世纪最后十年崛起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目前崛起所发生的背景不仅包括与其他区域大国的较劲，而且它的崛起还高度依赖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然而，后美国时代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如果相互的争夺却使得各国倾向于在短期内强力争夺国家利益，那么国际经济体系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2. 地缘政治上最濒危的国家和地区

在当今世界，与主要区域性强国毗邻的若干较弱小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有赖于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所支撑的国际格局（即使美国对其中一些国家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处于这种危险境地的国家和地区在如今的地缘政治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最濒危物种”。其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它们强大的邻国看来，就是美国对其现有或者声称的地区势力范围进行可憎的侵略的象征。因此，随着美国全球地位下降，区域性强国对这些较弱小国家和地区颐指气使的诱惑将会相应增大。

虽然现有的主要区域性大国可能不满美国的角色，但避免造成国际体系本身崩溃的连锁反应符合它们的利益。在2008年与格鲁吉亚因奥塞梯（Ossertia）和阿布哈兹（Abkhazia）发生短暂冲突时，俄罗斯正是忌惮于这种连锁反应的可能性，才没有摧毁格鲁吉亚。俄罗斯意识到其军事行动持续下去可能会破坏东西方的总体关系，或许导致与美国发生某种形式的对抗。考虑到自身的相对弱点与常规部队的欠佳表现，俄罗斯决定中止可能会得不偿失的胜利，在领土问题上小有斩获后便结束了冲突。不过，倘若美国由于内部和/或者外部原因而严重衰落，这种内在的克制几乎会自动减弱。量变累积的结果是，全球将在广大范围内呈现以弱肉强食为特点的现实局面。

下面列出部分较脆弱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并附有简单评论（其顺序既无关脆弱程度，也无关地缘政治方面的可能性）。

格鲁吉亚

美国的衰落将使格鲁吉亚完全陷入一种容易受到俄罗斯的政治恐吓和军事侵略的脆弱境地。目前，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主权，赞同该国寻求加入北约。1991年以来，美国已经向格鲁吉亚提供了3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0亿美元是在2008年俄格战争以后提供的。上述做法强调了美国官方的说法：“美国不承认势力范围。”^[4]

美国的衰落显然将会影响到这种总体承诺的可信度。美国的能力——尤其是对北约施加影响，使之保持坚定立场的能力——因此受到局限。不论美俄关系处于何种局面，只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减弱，这种局限本身就可能会刺激俄罗斯重新夺回其旧有势力范围的欲望。另外一个刺激克里姆林宫的因素将是，普京对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抱有的个人仇恨越来越强烈。把萨卡什维利赶下台成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一直挥之不去的想法。

进一步刺激俄罗斯的一个事实可能是，美国支持建立经由格鲁吉亚向欧洲供应能源的南部走廊，尤其是现有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aku-Tbilisi-Ceyhan）石油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aku-Tbilisi-Erzurum）天然气管道，后一条管道最终将通过土耳其抵达欧洲。如果美国与格鲁吉亚的关系被切断，俄罗斯将通过重新获得对通往欧洲的能源路线近乎垄断的地位，收获庞大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

格鲁吉亚对俄罗斯的从属地位，将有可能对阿塞拜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阿塞拜疆是南部走廊的关键供应方，对欧洲能源多样化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多样化格局间接限制了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如果美国衰落，尤其是如果俄罗斯因为控制格鲁吉亚的努力奏效而更加大胆的话，俄方最有可能动用其更大的行动自由来恫吓阿塞拜疆。在这种情况下，阿塞拜疆不会愿意去对抗重振雄风的俄罗斯。欧洲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被迫去适应俄罗斯的政治议程。

中国台湾

自1972年以来，美国已正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个中国”这一基本条件，该条件在1972年、1979年和1982年三次中美联合公报中均已列出。同时，美国坚持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都不得以武力改变现状。和平“现状”一直是美国台海政策的根基，因为同时与实力日增的中国大陆和越来越民主、经济日益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台湾保持关系，既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有利于美国在远东的商业利益。

美国持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所援引的理由是，这是1979年美中邦交关系正常化时认可的维持现状的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之前，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对保护台湾自治十分必要。中国大陆反对这一立场，以主权为由保留了动用武力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寻求两岸和解。近年来，台湾和中国大陆一直在改善关系，双方于2010年夏季以相对平等的条款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美国的衰落显然会增大台湾的脆弱性。台北的决策者既不能无视中国大陆的直接压力，又会受到经济上成功的中国大陆的绝对吸引。这种情况至少可能加快海峡两岸统一的时间表，但是会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不平等条款实现统一。如果美国的衰落同时对美日间的战略联系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大陆可能会加紧对台湾施压，以诉诸武力威胁台湾，从而实现美国早在1972年接受的“一个中国”的政治现状。这个方面的威胁如果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就可能会引发日韩两国对美国现有承诺的可靠性的信心危机。

韩国

美国与韩国1953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自那时以来，美国一直是韩国安全的保证者。此外，韩国引入瞩目的经济腾飞和民主政治制度一直是美国介入韩国的成功例证。但多年来，朝韩关系多次出现摩擦。每一次，韩国都指望美国伸出援手，

这凸显了韩国的国土安全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

朝鲜也已改变其军事战略，强调基于其研制的短程弹道导弹、远程火炮和核武器对韩国发动不对称战争的可能性。韩国有抵御朝鲜常规进攻的手段，但是要遏制和防范朝鲜的全面进攻，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的衰落将使韩国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么接受中国的区域性优势，进一步依靠中国扮演东亚安全保证者的角色，要么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对朝鲜或者中国的担心，寻求同日本建立更加牢固，但是历来不得民心的关系。然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后盾，日本是否愿意勇敢面对中国，非常值得怀疑。因此，如果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承诺变得不那么可靠，韩国本身可能会面临军事或政治威胁。

白俄罗斯

苏联解体20年后，白俄罗斯仍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出口商品中有三分之一销往俄罗斯，而它的能源需求几乎全部依赖俄罗斯。此外，白俄罗斯96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说俄语。白俄罗斯是1991年才作为民族国家宣告独立的，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有多深厚尚未得到检验。这些都是莫斯科在白俄罗斯的影响力得以维持的因素。例如，在2009年，俄军在白俄罗斯举行了代号为“扎帕德”（Zapad）（即西方）的大规模军演（白俄罗斯也参与其中）。在演习中，俄军击退了假想的西方进攻，以模拟俄罗斯对一个毗邻的西方（即北约）国家的首都发动核攻击达到高潮。

尽管如此，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依赖关系并非没有冲突。虽然普京公开施压，但白俄罗斯尚未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2008年的俄格冲突之后俄罗斯建立的“国家”）。与此同时，正如卢卡申科总统17年的统治所展示出的那样，白俄罗斯的民主没有进展，从而妨碍了与西方建立实质性关系。波兰、瑞典和立陶宛一直在想方设法在白俄罗斯与欧盟间建立某些民间联系，但进展非常有限。

因此，美国的明显衰落会给俄罗斯提供一个重新吸收白俄罗斯的

几乎零风险的机会：至多动用最低限度的武力，所损失的仅仅是其作为负责的地区大国的声望，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代价。与格鲁吉亚不一样的是，白俄罗斯既没有西方的武器，也没有得到西方的政治同情。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盟不大可能会做出反应，而一些西欧国家将很有可能对白俄罗斯的请求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充分意识到胆大妄为的俄罗斯带来的危险的中欧国家，或许要求北约共同做出反应，但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它们不太可能联手做出强有力的集体反应。

乌克兰

如果俄罗斯不费太大成本、轻而易举地吸收乌克兰，就会危及乌克兰作为真正主权国家的未来。乌克兰自1991年获得独立以来，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容易紧张，就像它与西方的关系容易摇摆不定一样。俄罗斯曾多次利用能源作为政治工具，试图胁迫乌克兰采取对俄罗斯有利的政策。在2005年、2007年和2009年，由于价格问题和乌克兰未偿付能源债务，俄罗斯要么威胁停止，要么确实停止了向乌克兰提供石油和天然气。2010年夏季，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受到压力，被迫将俄罗斯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基地的租赁期再延长25年，以换取俄罗斯以优惠价格向乌提供能源。

乌克兰是个重要的欧洲国家，拥有4500万人口，工业强劲，农业极具生产潜力。与俄结盟既能令后者富足起来，也表明俄罗斯朝恢复其帝国势力范围（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对此抱有强烈的怀旧情结）迈出一大步。因此，克里姆林宫很有可能继续迫使乌克兰加入与俄罗斯的“共同经济区”，通过俄罗斯公司的并购逐渐剥夺乌克兰对自己主要工业资产的控制。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悄悄付出努力，渗透到乌克兰的安全机构和军事指挥部门，以削弱乌克兰在必要时保护其主权的能力。

最终，假定美国衰落的话，欧洲对俄罗斯吸收白俄罗斯做出被动反应，更别提俄罗斯早些时候成功地动用武力恫吓格鲁吉亚了，这些

都会诱使俄罗斯领导人在某些时候尝试更公开的重新统一行动。但这将是非常复杂的任务，或许需要动用武力，最起码在乌克兰内部人为制造经济危机，使得与经济上更具韧性的俄罗斯正式结盟更对乌克兰人的胃口。俄罗斯仍会继续冒险挑起姗姗来迟的民族主义反应，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讲乌克兰语的西部和中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会赢得更年轻一代人——无论是主要讲乌克兰语还是讲俄语的人——更深刻的情感认同。他们越来越认为乌克兰的国家地位是正常的，是其身份的一部分。因此，时间或许不利于基辅对莫斯科的顺从，但是没有耐心的俄罗斯为达这一目的而施加的压力，以及西方的漠不关心可能令欧盟周边产生潜在的爆炸性局势。

阿富汗

阿富汗在苏联发动的长达9年的极其残酷的战争中饱受蹂躏，在苏联撤出后被西方忽视了10年，靠巴基斯坦的帮助攫取大权的中世纪风格的塔利班统治者管理无方。在小布什执政期间，阿富汗又经历美国历时7年的三心二意的军事行动，和断断续续的经济援助。如今，这个国家已经满目疮痍，失业率高达4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全球第219位，除了非法的毒品贸易，它几乎没有经济产出。只有15%~20%的阿富汗人用上了电。

厌战或者美国衰落的先期影响而导致的美军迅速撤离，极有可能使得阿富汗四分五裂，邻近国家会在阿富汗争夺影响力。如果喀布尔没有一个有效和稳定的政府，这个国家就会被相互对立的军阀主宰。巴基斯坦和印度就会在阿富汗更加争先恐后地争夺影响力——伊朗大概也会插手。结果，印巴之间最起码会爆发一场间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伊朗将很有可能试图利用巴印的对立谋求自身的优势。印度和伊朗都担心，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影响力的提升将会严重影响地区力量平衡。从印度的角度来看，这会增强巴基斯坦的好战立场。此外，鉴于阿富汗存在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土库曼族等重要族区，毗邻的中亚国家可能还会更多地参与地区力量博弈。介入阿富汗

的力量越多，爆发更大区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次，即使在美国目前计划撤军之际阿富汗成立一个地位稳固的政府（或多或少拥有中央控制力），但接下来如果未能维持美国发起的国际参与，就很有可能令民族和宗教狂热死灰复燃。塔利班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帮助下再度崛起为阿富汗的重大破坏力量，并且/或者阿富汗可能会陷入部落军阀割据一方的状态。然后，阿富汗可能在国际毒品交易市场上更加活跃，甚至可能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庇护所。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拥有21世纪的核武器，并且靠一支20世纪末的专业化军队来维持团结。但是，尽管巴基斯坦拥有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城市人满为患，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是前现代社会，过着乡村生活，地区和部落特性明显。他们共同拥有伊斯兰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推动巴基斯坦在英国撤离印度时实现了独立。接下来与印度的冲突体现了巴基斯坦的独立国家身份感，而克什米尔问题加剧了印巴之间不可调和的强烈反感情绪。

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稳定是其最大的弱点。美国力量的衰落将削弱美国帮助巴基斯坦维持统一和促进发展的能力。巴基斯坦随后可能变成一个由军方治理的国家，或者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或者军事统治和伊斯兰统治兼而有之的国家，又或者是一个根本没有中央政府的“国家”。最坏的情况是，巴基斯坦演变成核军阀主义的变体，或者变成类似伊朗的好斗的、反西方的伊斯兰政府。后一种情况可能反过来影响中亚，带来令俄罗斯和中国忧心忡忡的更普遍的地区动荡。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的衰落还将增大中国对南亚的安全关切，并且可能会加大印度削弱巴基斯坦的欲望。中国将更有可能利用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任何冲突，因此有可能会令地区动荡加剧。最终，该地区是能够维持不稳定的和平，还是出现更广泛的冲突，将几乎完全取决于印度和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克制自己利用巴基斯坦的动荡而获取

地区优势地位的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冲动。

以色列与大中东

除了马上就濒危的特定国家，还需要考虑下面这种更一般的可能性：美国的衰落会引发破坏整个中东地区政治稳定的结构性变化。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仍然容易遭受不同程度的内部民粹主义、社会骚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压力，2011年初的种种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美国的衰落真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仍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发生，到那时仍未能实施双方都接受的两国解决方案，就会进一步给该地区的政治气氛火上浇油。以色列遭受的地区敌意将会加剧。

可以合理地假设，美国的明显式微会在某个时候诱使该地区力量较强的国家，尤其是伊朗或者以色列，为可以预料的危险预埋伏笔。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小心翼翼的战术优势争夺都可能会引发当地的暴力事件——比如说，伊朗支持下的哈马斯或者真主党对抗以色列——而这些随后可能升级到范围更广、流血更多的军事对抗和新起义的爆发。诸如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软弱的实体然后将会付出尤其高昂的平民死亡代价。更糟的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打击和反击行动之下，这种冲突可能会升级至恐怖的程度。

后一种形势上的变化反过来可能会把美国拖入与伊朗的直接对抗。出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到那时可能还有巴基斯坦战争）的厌倦，美国因而不会将常规战作为有利的选项，美国大概会依靠其制空权对伊朗，尤其是对其核设施，造成强大的战略破坏。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将给伊朗的民族主义注入持久不消的反美情绪，同时使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进一步交融。中东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也将被大幅度煽动起来，从而有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明显地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得经济利益，从伊斯兰情绪集中于美国身上而获得政治利益，因为这样穆斯林的不满就会从俄罗斯身上转移开来。土耳其或许变得更加同情伊斯兰的受难感，而中国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

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以色列的长期生存可能会岌岌可危。这一点与有些人持有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陷入敌对关系将有利于以色列长期安全的观点背道而驰。以色列拥有军事实力和民族意愿来击退自身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也可以压制住巴勒斯坦人。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慷慨支持更多地源于道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源于真正的战略一致性，因此可能变得不那么可靠。随着美国的衰退，虽然美国公众仍然支持以色列，但美国退出该地区的倾向可能变大，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或许会把该地区的动荡归咎到美国头上。随着阿拉伯大众政治上的觉醒更倾向于开展长期暴力行为（“人民战争”），以色列可能会被国际上看作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正如以色列副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2010年发出的不祥警告那样。那么，以色列的长远前景将令人心存疑虑。

美国支持下的海湾国家的脆弱性很有可能会加剧。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减退，以及伊朗继续扩张其军力并致力于增大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在2003年美国入侵前还是抵制伊朗扩张的壁垒），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部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很有可能会增大。它们或许不得不在安全方面谋求新的、更有效的保护者。中国是一个明显的候选者，从经济角度考虑也是潜在的候选者，因此会极大地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就在35年前，美国从与中东四个最重要国家——伊朗、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的强劲关系中受益匪浅。因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安全无忧。而今，美国对这四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的影响力都大大减弱。美国和伊朗陷入敌对关系；美国对中东地区政策的变化也遭到沙特的批评；土耳其因为自身的地区雄心得不到美国理解而感到失望；埃及对与以色列的关系抱有越来越大的怀疑，从而在美国优先考虑的事项上与美国产生分歧。简言之，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明显恶化。美国的衰落将令这一地位宣告终结。

美国在国际上不知不觉地陷入衰落，甚至陷入严重的危机，对国际恐怖活动的规模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这点与其对特别脆弱的国家影响不同。大多数恐怖主义行动一直都是国内的，而不是国际性的。无

论是在意大利（1978年一年内就发生了大约2000起恐怖活动），还是在当今的巴基斯坦（恐怖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每年高达好几百人，暗杀高层事件如家常便饭），国内恐怖主义的源头和所针对的目标，都是内部政局的产物。自从政治恐怖主义在19世纪末的俄国和法国作为一种重要的现象首次出现至今，一百多年来都是如此。以印度为例，其恐怖活动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几乎毫无关联。因此，美国力量的骤然下降不会影响恐怖活动的规模。由于大多数国内恐怖活动植根于激进的地方或区域政治紧张局势，唯有改变地方局势方能影响到这类恐怖活动的规模。

美国只是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才成为真正的国际恐怖活动的目标。国际恐怖主义的抬头与民粹主义激情有关联。而民粹主义，尤其是某些伊斯兰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是由于政治觉醒而壮大起来的。美国之所以成为恐怖主义目标，是因为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把他们的强烈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把美国当作伊斯兰教的敌人和新殖民主义“大撒旦”。本·拉登在为其2001年的宗教饬令辩解时把美国当作撒旦的化身，正是这一饬令引致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基地”组织以美国为目标的另一个理由是，声称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部署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亵渎了伊斯兰教圣地。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指出，本·拉登在“9·11”前后发表了24次重大演讲，其中有20次引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为“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暴力行动辩解。

极端伊斯兰狂热分子对美国持有的摩尼教观点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灵感。因此，美国的衰落无助于劝阻这些组织，但也不会增强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的理念中，缺少其他诸如哈马斯和真主党等国内根基深厚的组织所具有的明确政治内涵。因此，要说这种宗教恐怖主义能够获得伊斯兰世界目前动荡局面的控制权，是值得怀疑的。即使获得这样的控制权，宗教恐怖主义也更有可能导致自相残杀的斗争，而不是对外部国家的任何统一行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从巴枯宁 [22] 到本·拉登的岁月里，恐怖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其政治目标，也没有成功地取代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恐怖主义只能加剧国际动荡，但不会决定其实质性内涵。

此外，上述讨论指向如下更具一般意义的结论：

首先，一旦美国不愿或无力保护它过去出于国家利益或原则性考虑认为值得其介入的国家，现有的国际体系将会失去阻止冲突发生的能力。再者，一旦国际上普遍意识到这一新现状，迈向地区冲突的倾向就可能滋长蔓延，较强的国家在对待较弱小的邻国时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和平受到的严重威胁，很有可能源于地区强国倾向于与其弱小得多的邻国清算地缘政治或者种族问题。美国力量的衰落将为这种诉诸武力的行为创造广阔的空间，而动武者只需承担相对而言非常小的短期代价。

其次，之前若干局势表明冷战的余毒未消。它们证明了美国错失良机，没有巩固俄罗斯附近的和平安全地带，进而围绕安全问题与俄罗斯开展更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或许能够在北约扩大时达成北约——俄罗斯条约，从而促进更持久的东西方和解，同时帮助巩固俄罗斯萌芽初现的民主。^[5]或许，西方的这种倡议会断然遭到拒绝，然而它却从未被尝试过。相反，在2001年之后，美国忙于“反恐战争”，忙着为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争取支持，最终伤及了更大的地缘战略设计。与此同时，俄罗斯集中精力建立更高压的极权统治，致力于恢复自身在苏联集团领地的影响力。

第三，东亚和南亚将是“后美国”世界国际冲突中最脆弱的地区。中国和印度都崛起为全球大国，拥有全球野心，促使地区力量分布发生改变，同时它们之间的明显对立正在带来无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步履蹒跚，即使中印两国避免发生重大冲突，较弱小的国家也都有可能被迫在一个越来越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做出地缘政治选择。同时，中国受到来自内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推走美国在亚洲的力量；而东亚和东南亚对中国潜在扩张野心的担忧与日俱增。朝鲜在其内部政治格局的背景下公开宣称谋求核武器的事实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国家的政治格局既难解读，又危险得无法预测。对谋划单方面诉诸武力的国家而言，美国的衰落会减弱其动武时通常必须考虑在内的外部约束力。简言之，美国的衰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冲突的频率上升，范围和强度增大。

3.睦邻关系的终结

美国仅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国家接壤。虽然这两个都是好邻居，但是一旦美国衰落，墨西哥由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动荡给美国构成的风险要严重得多。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共享宽广但基本上平静的边界，而美墨边境虽然要小得多，但充斥着暴力、种族紧张局势、毒品和军火贸易、非法移民和政治妖魔化等。并且，虽然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而言差不多，但约有15%的墨西哥劳动力在美国境内工作，墨西哥人口低于贫困线的比例是加拿大的两倍多。再者，墨西哥的国内政局更不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历来波折更多。因此，虽然美国的衰落会对加拿大造成负面影响，墨西哥却很有可能陷入混乱的国内危机，从而给美墨关系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近几十年来，美国和墨西哥成功地构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积极关系。然而，它们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因多年来墨西哥人口大量移民美国而形成人口关联，以及因跨境毒品贸易而共同受到安全威胁，这一切使得两国关系更复杂，也更容易受到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美国人往往视墨西哥的相对稳定为理所当然，认为它对美国的战略地位乃至整个西半球的安全几乎不会构成直接威胁。美墨关系的严重恶化及其后果因此会对美国公众构成痛苦的冲击。美国公众总体而言还没有意识到，墨西哥与美国以往形成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墨美关系历来既争吵不休，又携手合作。当墨西哥饱受内部暴力和政治动荡之苦时，美国既担心墨西哥的局势会波及 its 领土范围，但也利用机会趁虚而入，从这个较弱的邻国手中获取领土。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通常就会与美国发生冲突。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前后矛盾、有时候自私自利地应用门罗主义，发动扩张战争，在1848年把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西南部据为己有，这些领土占当时墨西哥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50%。在墨西哥革命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又不得人心地侵占了韦拉克鲁斯（Veracruz）。另一方面，美墨两国（以及加拿大）携手合作，创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迄今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区。

两个世纪以来时好时坏的墨美关系提醒人们，管理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内在困难有多大。双方国内都有担忧之情，墨西哥政局不稳，美国定期咄咄逼人地展示武力，这些常常压制了本应该蓬勃发展的伙伴关系。它们地理上的相邻关系只是令这些问题复杂化，这种情况使得经济和安全合作对国家成功来说十分必要。但是政治动荡和文化恐惧抑制了睦邻友好关系。因此，伴随着间歇性的大妥协和尖锐矛盾的时期，如何维持建设性的墨美伙伴关系，对两国领导人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美国和墨西哥共享文化和个人联系，也拥有共同的经济和安全关切，所有这一切使得地区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利。美国的经济韧性和政治安定迄今也缓解了经济依赖、移民和毒品贸易等敏感问题构成的诸多挑战。然而，实力的下降会损害美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健康与良好的判断力，上述难题会因此而更加棘手。美国在陷入衰落时，民族主义情绪会更加高涨，会采取更多的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认同，对国土安全会采取更加偏执的态度，更不愿意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而牺牲自己的资源。因此，与墨西哥的稳定合作将只能得到民众较少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国内政治将很可能变得更具保护主义色彩，更像欧洲大国在一战结束后所做的那样。美国将不大可能创建机构（如拟议中的北美开发银行），通过共同出资的倡议来帮助促进地区——尤其是墨西哥——的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提供补贴来扶持强大的国内团体，从而损害墨西哥的出口。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地位，通常有助于防止美国的贸易政策受到保护主义导向的国内利益的影响。

由此带来的后果将严重破坏墨西哥经济，造成的社会和政治余震，将令墨美关系中移民和毒品贸易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个问题都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紧张的，有时候十分勉强的合作的目标。美国公正对待墨西哥移民以及承诺帮助墨西哥打击毒品贸易，对维持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走向衰落的美国的国内和地区前景，几乎肯定会增大美国妖魔化墨西哥移民的可能性，并且加深美国对墨西哥打击其贩毒集团意愿的怀疑。美国将很有

可能致力于在这些问题上寻求更加强制性的解决方案（即阻隔或者驱逐移民，在边界集结或者部署军队）。这将破坏睦邻友好的政策，并且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对抗。

墨西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是墨美两国经济和政局之间鲜明差异的结果。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差异导致了大量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因此到了2009年，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数量约为1150万。^[6] 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数估计达到660万。^[7] 美国的墨西哥裔总人口现在为3100万左右，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0%，其中大多数仍然与他们在墨西哥的家人联系紧密。可想而知，墨西哥公民和墨西哥政府本身对生活在美国的移民状况颇为关切。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2010年出台严格的移民法，目的是加大对非法移民的起诉和遣返，此举激怒了许多墨西哥人。虽然奥巴马总统谴责了这项议案，但它仍然使得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正面评价一落千丈。根据皮尤世界民情调查机构2010年的调查结果，受访的墨西哥人仅有44%对美国有好感，而在亚利桑那州推行这一法律之前，这个比例为62%。

美国对墨西哥移民采取更强制的态度和更高压的政策，将加剧墨西哥人的仇恨情绪，从而对美墨整体伙伴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将边界安全视为国土安全必不可少的议题；对恐怖分子从墨西哥越界进入美国的可能性的担忧，增强了美国民众彻底封锁边界的呼声。美国为加强边界安全决定构建一个隔离墙/围栏将其与墨西哥隔离开来，这刺激了墨西哥的反美情绪。它令人不愉快地想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造的隔离墙或者德国的柏林墙。美国的国际地位下降之后，很有可能变得对美墨边界漏洞百出以及由此造成的移民潮更加感到不安，因此会继续采取类似的政策，使得这两个邻国的关系呈现危险的螺旋式下降。

毒品贸易的问题早已引起美墨双方的严重关切，敌意增大会破坏美墨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合作能力。美国为根除哥伦比亚毒品贸易付出的努力获得了高度成功，墨西哥则日益接过哥伦比亚的角色，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可卡因中有90%现在从墨西哥过境。这一新现实令墨西哥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比如在华雷斯（Juarez），并且波及美国。虽

然美国和墨西哥都把打击跨境毒品贸易当作政策重点，但实际情况表明这个问题难以解决。与此相关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腐败成风。据估计，2006年以来，大约6000名墨西哥人死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2009年有535名墨西哥警官殉职。^[8] 总之，这给墨西哥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美国的执法部门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如果美国衰落，财政和军事资源缩减，政策变得更加单边，战胜毒品贸易就难上加难了。如果墨西哥反美情绪因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和严厉的移民法而日益高涨，目前强劲的北南伙伴关系将不复存在，墨西哥政府接下来就会改变其与美国全心全意合作的政策导向，美国任何缉毒努力的效力都会遭到削弱。此外，缺少美国支持的墨西哥政府将发现根本不可能战胜贩毒集团，墨西哥的政治格局因此会容易受到政治压力，以美国的安全为代价与毒枭达成妥协。这将使墨西哥重现2000年将权力从革命制度党移交给一个公开、多党民主制之前的局面。墨西哥重现这种状态将进一步刺激美国国内的反墨倾向。

美墨伙伴关系下降可能引发地区乃至国际上的重新调整。墨西哥民主价值观、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的减弱，再加上贩毒集团势力扩张的危险，将会限制墨西哥成为地区领袖、领导具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议题的能力。到头来，美国衰落的最终影响可能是：墨西哥更软弱、不太稳定、经济乏力、更加反美，无法与巴西建设性地角逐合作性的区域领导地位，也无法帮助促进中美洲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可能开始在后美国的西半球区域政治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作为其缓慢角逐更大全球影响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和拉美开始大手笔投资。比如，巴西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在能源和技术方面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并不表明中国将谋求主宰该地区，但它通过帮助更多公开反美的政府发展经济，可以明显地从美国区域力量的减弱中受益。

从长远来看，衰落的美国与受国内问题困扰的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恶化。这可能会导致一个特别不祥的现象的出现：民族情绪引导的墨西哥政治会出现一个重大问题——以历史为依据，由边界争端

事件触发领土要求。当初为了与西半球最强大、后来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建立更互惠的关系，墨西哥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客观状况，自我麻醉地美化了向美国出让领土的历史记忆。但是如果墨西哥指望不上力量削弱的美国，那么始于跨境毒品贸易所触发的事件，可能轻而易举就升级为武装冲突。人们甚至可以想象，会发生打着“收复”历史上属于墨西哥的领土的旗号发动越境袭击，历史上有过这种盗匪行径摇身变成爱国主义事业的先例。另外一个现成的借口可能是，美国的反移民情绪等同于种族歧视，因此需要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反过来会带来这样一个论调，即在前墨西哥领土上生存着许多墨西哥人，需要把领土自决的问题提出来。

对这些问题的猜测今天读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与现状无关，但是地缘政治现实将在美国衰落的情况下显著改变。这很可能会涉及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曾经敌对但是近来变得友好的关系。倘若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美国拥有的地缘政治上安全、没有邻里冲突的地理位置——在前面第二章里曾把它列为美国的重大资产之一——就将成为过去。

4. 非共同的全球公共品

世界上所有国家共享的全球公共品，可以被归结为两类主要的全球关切：战略公共品和环境公共品。战略公共品包括海洋、天空、外太空和网络空间，以及涉及全球防扩散的核领域。环境公共品包括对水资源、北极和全球气候变化加以管理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在这些领域，美国依赖于所拥有的近乎全球性的霸权地位，近年来有机会塑造人们所说的“新世界秩序”。然而，美国虽然参与其中，并且美国的领导地位对改革和保护全球公共品而言必不可少，但美国并非总是处于行进的最前沿。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美国试图构建一个首先对自身发展有利的世界，尽管在20世纪，美国的动机比之前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动机更理想化。

而今，世界上的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正在这个全球管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加不可或缺的作用。单靠美欧共识或

者美俄共识无法有效制订公共品规则。这些新的参与者正在崛起（虽然速度缓慢），使得在确保和改革全球公共品方面组建更大的共识团体成为必然。然而，要应对新旧挑战，美国的参与和协同领导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战略公共品将很有可能是受全球力量模式变化影响最大的领域，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能力和积极性逐步增大，二是美国的卓越地位有可能衰落。海上、天空、外太空和网络空间对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来说都至关重要，而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大部分都占据支配地位。然而，在未来的几年里，随着其他主要大国的实力和国家野心的扩大，全球总体力量的分散，这些领域会变得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

由于对战略公共品的控制取决于物质优势，因此随着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的增长，这些国家必然会挑战美国无所不在的地位，以期取代美国成为地区权力掮客。这种竞争可能很容易在战略公共品方面导致误判、管理效率下降，或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竞争。举例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周边水域有领土争端。中国重点发展海军力量，旨在阻止美国进入南海和东海，从而捍卫这些主权要求、巩固其区域地位。另外，俄罗斯近来也决定把海军作为其军力发展的最优先领域，大大提高了太平洋舰队的经费。印度也继续在印度洋扩充海军力量。

未来保持战略公共品的稳定，关键是在美国实力尚存的时候，逐步达成全球共识，公正且和平地分配职责。例如，和平的海洋体系是业已全球化的经济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空域和海洋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对国际贸易具有影响力。因此，即使是在区域力量不断发生演变的情况下，公平分配管理职责的可能性也非常大。然而，在短期内，当这种体系刚刚兴起时，一个国家很有可能会错误估计自己相对于邻国的实力，或者不惜以更大范围的国际社会的代价来占据上风。这可能导致严重冲突，尤其是在有关国家竭力在争议水域下面谋取更多能源的时候。

既然世界当下事实上依赖美国来管理和防止海上冲突，美国的衰落将给这种战略公共品带来危险的后果。尽管美国的衰退不大可能会使其海军力量严重受限（因为它对美国的核心利益至关重要），走下坡路的美国可能没有能力或者干脆不愿意阻止太平洋或者印度洋这两个尤其令人担忧的区域的海上纠纷升级。

同样，由于新兴大国的能力日益增强，目前由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外太空领域的活动正在增多。太空方面两个最紧迫的问题是太空垃圾和太空武器增多，全球太空活动的激增令这两个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在2007年成功发射了一颗反卫星导弹，摧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从而给低地球轨道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垃圾，增大了关于中国使外太空军事化的意图的不确定性。

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外太空实体追踪系统，并且因此拥有保护自己的一些资产的能力，但管制太空活动的规则需要更新，以反映冷战后的状况，确保太空的平静，禁止像中国在2007年那样的行动。但是，如果美国在衰落之下不得不削减自己的太空能力，或者更有可能的情景是，美国在衰落之中允许其他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把太空视为其技术的测试场地，预示着它们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启动新的战略竞争，那么“最后的疆域”可能会令人感到不祥地动荡不安。

互联网现在已变成外太空过去的样子：商贸、通信、探索和力量投射无边无际。军方、商界和政府机构都同样地依赖自由、安全的网络空间来成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维持互联网自由的同时确保信息安全是个严重挑战，尤其考虑到互联网管理分散、日新月异的特点，更是如此。像在海洋一样，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力量对于互联网的公正监管和自由必不可少，因为美国目前通过总部在加利福尼亚的私有非营利实体——“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控制着大多数网络空间的准入和监管。美国对互联网的霸权控制所招致的全球憎恨情绪，再加上网络间谍的滋扰和网络战的严重威胁，令管理这一战略公共品的艰巨任务进一步复杂化。

虽然这一体系让互联网能够运转，但却不能阻止个别国家限制其公民上网，尽管美国把公开反对这种限制作为工作重点。因此，如果没有强大的美国，新兴大国将利用缺少政治限制的空当，图谋改变互联网的工作特点，以便更有效地限制（甚至包括其国界以外的）互联网的潜力。

此外，控制全球核扩散对国际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连年来，美国一直最强烈地呼吁将核扩散降至最低限度，甚至为自己设定了让世界没有核武器的目标。另外，美国向害怕其拥有核武器的特定的无核武器邻国提供安全保障，给它们撑起美国的保护伞。由于美国是拥有最先进核武器的最大国家，并且由于其全球地位有赖于其核保护伞提供的稳定状态，核不扩散领域的领导职责就落在美国的肩膀上。在这一领域，全世界仍然指望美国能够超越所有其他各方而承担领导责任。

伊朗如今致力于拥有核力量，再加上美国未来可能发生的衰落，这凸显了21世纪核扩散的潜在危险：不扩散制度渐行渐远，新兴国家加大扩散，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延伸核保护伞，地区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恐怖组织更有可能窃取核材料等。

美国衰落会引发美国核保护伞公信力的信任危机，从而对核领域造成最深刻的影响。诸如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土耳其，甚至是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依赖美国延伸核威慑力。如果它们看到美国缓慢退出某些地区，由于形势所迫而收回承诺的保障，或者即使它们由于美国衰落造成的金融、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而对美国维持保障失去信心，那么它们就会到别处求得安全。“别处的”安全只可能有两个来源：自己的核武器或者另一个国家——最有可能是俄罗斯、中国或者印度——延伸的威慑。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目前有核武器国家的野心，新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增加，或者美国力量的可靠性下降而感到受到威胁，它们就将发展自己的核能力。对于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大国，鉴于其广泛的民用核工业、经济上的成功以及技术的尖端性，

它们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既容易，又相当迅速。此外，由于朝鲜和伊朗拥有核能力的潜在可能性，美国在波斯湾或者东亚的盟国可能会打造它们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鉴于朝鲜越来越飘忽不定，六方会谈毫无成果，人们对伊朗狂妄自大的能力抱有不信任，式微的美国的核保护伞所提供的担保，可能无法阻挡一些小国之间发生区域核军备竞赛。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中国和印度今天在核领域维持最小威慑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负责任的姿态，核武器越来越多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迫使这两个国家重新评估和升级它们的姿态。事实上，它们以及俄罗斯甚至可能变得倾向于向各自的依附国延伸核保证。这不仅可能预示着这三个野心勃勃的大国之间再度展开地区核军备竞赛，而且还可能在竞争性的核威慑驱动下，在欧亚创造新的和对立的势力范围。

因此，美国的衰落将加速核领域的剧变。众多可能结果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形包括：美国不牢靠的盟国增大核扩散，和/或新兴亚洲大国之间展开军备竞赛。这种核扩散的连锁效应会破坏核领域的透明管理，增大国家间的角力、误判，最终甚至可能发生国际核恐怖活动。

除了上述所说，本世纪全球将面临一系列物理环境显著变化所构成的新地缘政治挑战。管理不断变化的环境公共品——淡水日益短缺、北极的开放、全球变暖——需要全球共识和共同牺牲。单靠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足以确保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将减弱在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达成合作协定的可能性。美国退离世界警察的角色可能会给新兴大国创造更大的机会，让它们能够进一步利用环境公共品而谋求自身的经济收益，增大资源引发的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亚洲。

后一种情形有可能发生，尤其是考虑到许多国家水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时更是如此。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数据，由于全球水需求量每20年增加一倍，到2025年，超过28亿的人口将生活在要么缺水要么供水紧张的地区。^[9] 虽然南半球受到水资源短缺可能性的威胁，但国家间的冲突作为跨界水资源稀缺的地缘政治后果，最

有可能在中亚、南亚、中东和非洲东北部发生。在这些地区，有限的水资源多国共享，而各自政局瞬息万变。政治不稳定和资源稀缺的结合就成了凶险的地缘政治组合。

诸如土耳其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和水需求增大，以及对立的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不稳定和 resource 稀缺，两者之间相碰撞可能会加剧水冲突的威胁。水资源短缺也将考验中国的内部稳定，因为其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不断扩张的工业园区共同作用，既增大了对水的需求，又减少了稳定水源的供应。在南亚，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永无止境，再加上过度拥挤和巴基斯坦内部危机加重，可能使得《印度河用水条约》岌岌可危，特别是因为这条河流发源于长期备受争议的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而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动荡在不断加剧。至关重要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从中印争议地区穿流而过，该地区仍然需要高度关注。随着美国霸权消失和区域竞争加剧，水等自然资源方面的争端有可能演变成全面的冲突。

缓慢融化的北极也将改变重要资源方面的国际竞争形势。随着人类越来越容易接近北极，五个北极沿岸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丹麦和挪威——可能迅速宣称对北极的石油、天然气和金属拥有主权。这一关于北极的动向有可能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尤其对俄罗斯有好处。正如记者弗拉基米尔·拉久欣（Vladimir Radyuhin）在其名为《北极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从进入北极方面获得的收益最多，但同时会成为其他四个北极沿岸国家在遥远北极的遏制目标，而这四个国家全都是北约成员。既然现在几乎没有关于北极的协议存在，那么这一新的大博弈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谁最先采取行动，谁的理由最多。2010年夏天，俄罗斯的首艘超级油轮从欧洲通过北海航行到亚洲。^[10]

俄罗斯在北极的土地和资源潜力巨大。其在北极圈内的领土面积为3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印度的国土面积，俄罗斯天然气总产量的91%，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的80%，海上油气储量中的90%，还有大量的金属储藏，均来自该地区。^[11] 俄罗斯也在试图增加其领土主权，声称其大陆架不断深入到北极，这将让俄罗斯有资格将其专属经

济区再延伸150英里，从而再增加120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的领土。俄罗斯的首次尝试遭到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拒绝，但它计划在2013年重新申请。俄罗斯认为北极是其北部边境的真正延伸。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的一份战略文件中声称，到2020年时，北极将成为俄罗斯“主要的战略资源基地”。^[12]

虽然欧洲和俄罗斯最近就欧洲的安全结构举行了和解性的峰会，但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给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美国本身一直对北极维持着强烈的主权要求，并且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继续在该地区巡逻。这一点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得到了增强。当时他发布了一个国家安全指令，规定美国应该“保持美国军事和民用船只和飞机经由北极地区通达全球的移动性”。美国衰落的可能性可以令俄罗斯更大胆，更加有力地维护其对北极的控制以及通过能源政治对欧洲的控制，不过这在大部分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2012年总统选举后的政治取向。所有五个北极沿岸国家，都将受益于一个和平且合作的北极协议——类似于挪威与俄罗斯2010年在巴伦支海峡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以及这一协议将提供的地缘政治稳定。然而，在对能源的控制仍然是俄罗斯唯一的最优先点的背景下，政治环境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是环境公共品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最大的潜在地缘政治影响。科学家和决策者都预测，如果在下一个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两度以上，就会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动植物种类将迅速灭绝，大规模的生态系统可能崩溃，人类迁徙可能会增长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全球经济发展可能会遭到直截了当的逆转。地理变化、被迫迁移，以及全球经济因为常年的地区安全挑战而萎缩，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一个复杂性和冲突难以管理的地缘政治现实，尤其是在人口稠密、政治上不稳定的亚洲地区，如东北亚和南亚。此外，任何抑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合法行动都将需要前所未有的自我牺牲和国际合作。美国虽然的确十分重视气候变化，但它缺乏长期战略和政治承诺，这一点从其拒绝批准1997年的《京都协定书》、气候变化议案在国会一再遭挫中可见一斑。这就阻止了其他国家参与全球协议。

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为20%，仅次于中国。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能源需求在全球都排在头号位置。因此，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获得其他国家合作方面必不可少，而且在切实地抑制气候变化方面，也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包括欧盟和巴西，试图对碳排放和能源利用方面进行国内改革，并致力于追求可再生能源。就连中国都把减排作为一个目标，而它一直不让美国忽视这一事实。但目前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有能力领导一个全球倡议。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首脑峰会上承诺，美国将致力于能源和碳排放改革，但美国国内日益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和美国经济蛮横的复苏行为，不大可能激发这个国家在昂贵的能源问题上取得进展。

对任何有关管理气候变化的讨论而言，中国都至关重要，其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1%。在中国开发其西部地区并且在其民众体验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这一比例只会继续攀升。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的强硬态度，凸显了美国衰落的潜在危险：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和意愿接受环境公共品方面的全球总管的职责。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依赖碳基能源，印度的碳排放量相对较低，中国目前不愿承担全球责任，鉴于这些情况，只有活力十足的美国才能够在气候变化方面起到领导作用。要实现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延续基本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就迫切需要对全球公共品——海洋、太空、网络空间、核扩散、水安全、北极和环境本身——进行保护和诚信管理。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潜在缺乏建设性的、有影响力的美国的领导会削弱全球公共品的基本共同性。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建设性的、有强大影响的美国领导力的潜在缺失，会对全球公共品所必需的团结造成致命的损害。

美国的衰退会导致全球不安全，威胁一些脆弱的国家，导致与北美邻国的关系陷入更大的困境，使合作管理全球公共品更加困难，但这些均不构成美国全球称霸的论据。事实上，21世纪，政治上自我张扬的全球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力量的分散而造成的全球战略复杂性，使得这种霸权成为遥不可及的东西。但在这个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下，谋划新的、及时的战略远景的美国，对于帮助世界避免危险地陷入国际动荡之中至关重要。

本章注释：

[1] 《中国未来的全球立场》，《望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9日

[2] 《中美竞争与合作交织》，《望新闻周刊》，2010年2月7日

[3] 《中国扩大的战争游戏》，《印度斯坦时报》，2010年8月25日

[4]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第比利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2010年7月6日

[5] 本文作者在《欧洲的计划》一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外交》杂志，1995年1月

[6] 《墨西哥移民：来了多少人？走了多少人？》，皮尤西裔研究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报告，2009年7月22日

[7] 《美国境内未经批准的移民人口估计数字：2009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统计局，2010年1月，详见网址：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publications/ois_ill_pe_2009.pdf

[8] 克莱尔·里班多·希勒克（Clare Ribando Seelke）、马克·P.沙利文（Mark P.Sullivan）和琼·S.贝泰尔（June S.Beittel）：《墨美关系：国会的问题》，国会研究处，2010年2月3日

[9] 《全球水危机》，美国国际开发署，2007年1月18日

[10] 弗拉基米尔·拉久欣，《北极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印度教徒报》，2010年10月30日，详见网站：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article857542.ece.

[11] G.P.格莱斯比 (G.P.Glasby) 和尤尔·瓦泰霍夫斯基 (Yu L.Voytekhevsky) , 《北极俄罗斯：矿物和矿产资源》 , 《生化新闻》 , no.140 (2009年7月)

[12] 拉久欣 , 《北极的战略价值》

第四章 2025年之后：新的地缘政治平衡

美国必须下决心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才能在几十年后仍维持其全球地位，这几件事做成功了，美国不仅能克服社会经济衰退的倾向，还能在迄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陆板块欧亚大陆上塑造出崭新而稳定的地缘政治平衡。

所以，美国未来的关键，依然掌握在美国人民的手中。美国不仅要大幅改善国内状况，还要根据21世纪的客观和主观状况去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美国必须采取国家行动加强公众对美国的全球境况的理解，使公众看到美国的全球境况正在发生改变，并充满了潜在的危险。本书前面讨论过，美国的固有优势仍然允许美国维持慎重乐观的态度，完全可以拒绝接受那种认为美国必然衰败、肯定会变得无足轻重的预测。但是，美国公众对美国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是无知的，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勇敢、自上而下地加以解决。

民主制度是美国最伟大的优势之一，但也是导致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美国开国元勋所设计的宪法，大部分决策只能是渐进式的。所以，真正的全面决策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社会境况发生剧烈改变（譬如严重的金融危机或外部入侵威胁），和/或者立场坚定的国家领导有说服力的讲演能够产生社会共识。在美国，只有总统才有引起全国共鸣的力量，所以美国总统必须推动国家复兴。

奥巴马在竞选时和担任美国总统后，曾经做过几次非常精彩的演讲。他的演讲既坦率又富于历史意义，其内容涉及了欧洲人、中东人、穆斯林和亚洲人，他指出美国必须调整与他们的关系。特别是在布拉格和开罗的讲话，提高了全世界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期待。根据国际民意调查的结果，奥巴马的形象和言辞立刻给几乎全世界留下了积极印象。但是，有几点重要内容，他没能坦白地告诉美国人

民：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这种角色改变的后果是什么，新角色的任务是什么。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唯利是图的大众媒体，利用美国公众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无知，大肆宣传公众的恐惧，从而给喜欢搞煽动的小布什政府长达8年的时间，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十字军”国家。从此，“反恐战争”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代名词，而几乎整个美国都忘记去建立一个在不断演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争取美国长期利益的战略。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影响，美国对21世纪的新挑战毫无心理准备。

美国及其领袖需要理解眼前这种崭新的战略环境，这样才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做出相应的调整，使美国的全球角色得以复兴。本书将在后面讨论正在演化中的地缘政治条件，并提出一个适合目前局势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远景概况。

1.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动荡

欧亚大陆，不仅是最直接威胁美国全球地位的外交政策的发源地，也是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稳定性构成长期挑战的发源地。直接威胁当前来自一个固定的区域：埃及苏伊士运河以东，中国新疆以西，俄罗斯以南的苏联垮台后在高加索一带形成的新中亚国家。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稳定性带来较长期挑战的是全球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欧洲向亚洲转移，可能甚至是从美国向中国转移），这个过程此时仍在进行中，其后果目前很难预料。

与世界上其他强国相比，美国介入欧亚大陆的事务比较深，陷入了一系列的冲突之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有几个地区性强国，可能比美国更容易受到该地区动荡不安局势的影响，譬如印度、俄罗斯、中国，可是这几个国家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参加任何美国在该地区痛苦的（时常显得笨拙的）行动，而美国原意无非是想防止该地区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升级。

任何解决阿富汗冲突的建设性方案，最终都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喀布尔政府需要与各反对派别达成政治和解，二是需要与有能力为阿富汗稳定做贡献的主要邻国形成一个地区性框架。前面讨论过，美军在阿富汗大规模长期驻扎，既不能解决苏联入侵该国带来的悲剧，也不可能给予该地区稳定。与此类似，伊朗正在建设中的核设施引发了地区性挑战，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的军事打击都无法消除这一挑战。这样的军事打击，只能把伊朗的民族主义与好斗的宗教极端主义融合在一起，使该地区处于长期的冲突之中，从而导致中东至今仍然亲西方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出现高度不稳定的局面。长期来看，伊朗也应该被纳入地区性融合的过程之中。

不管怎样，美国仍然能够遏制拥有核力量的伊朗。即使伊朗显然掌握了核武器，美国也能为整个中东在受到核打击时提供有效的保护伞。因此，如果伊朗没有与国际社会达成可以接受的和解，不能令人信服地保证其核计划绝不包含秘密核武成分，那么美国就可以向世界公开宣布，只要伊朗威胁其中东邻国，就等于是在威胁美国。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伊朗确实朝着拥有核武器的目标迈进，美国就应该谋求获得其他几个核大国的承诺，共同强制执行联合国解除伊朗核武器的决议，在必要时采取武力措施。但是，必须强调一点：这是集体强制行为，一定要把俄罗斯和中国纳入其中。美国可以单独向该地区提供核保护伞，但千万不要单独动武，或只与以色列一起动武，因为这将再一次使美国孤立地陷入一场较广泛、最终自我毁灭的冲突之中。

与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具有等同重要性的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建设性地解决这一冲突与美国利益攸关。这场冲突毒化了中东的氛围，激化穆斯林的极端倾向，直接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能积极地破解这场冲突，将大大有助于中东局势稳定下来。否则，不仅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将受损，而且以色列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里的命运也将会令人担忧。

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地缘政治问题是美国地缘政治议程中最迫切的

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因为它们潜在的结果对美国的影响是最迫切的。除上述危机以外，全球力量的分布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改变，这预示着历史性的需要——美国为了使欧亚大陆变得更加稳定和富于合作，必须追求一个长期的战略远景。在目前这一阶段，只有美国有能力保护整个欧亚大陆的平衡。如果没有美国，这块政治上如今变得非常活跃的巨型大陆将会充满越来越危险的冲突。唉，欧洲过分关注自己。俄罗斯仍然留恋不久前的过去。中国只顾走向自己的未来。印度既羡慕又嫉妒中国。

如此更长远的地缘政治战略必须把欧亚大陆看作一个整体。巨大的欧亚大陆是世界事务的中央舞台，因为在这块大陆上存在着不同的地缘政治动机、政治权力、经济动能，它们之间相互竞争。^[23] 美国自1991年后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为曾经支配欧亚大陆的中苏集团消失了，欧亚大陆上出现了权力真空。所以，美国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协助欧亚大陆发展新型的国际政治结构。但是，这个机会被浪费了。如今美国必须在一个困难得多的境况下去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欧亚大陆完成了一次漂移。欧洲在政治上变得不是更统一，而是更不统一。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俄罗斯依然滞留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前途未卜。在东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增强了，这个已经深受历史性的敌意折磨的地区产生了一份新的焦虑。为了保证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美国必须塑造出相应的政策去应对欧亚大陆两侧出现的挑战。

在西方，欧盟没能利用“欧洲一体化和自由化”这一机遇期实现欧洲真正的统一和自由。货币联盟不等于真正的政治统一，因为几个资源和责任不等的国家根本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跨国统一。目前的经济困难在2007年后逐渐扩大，欧洲南部尤其如此，当初大家都期望欧洲能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巨人，这个期望越来越渺茫。从前，欧洲是西方的中心，可现在却成了西方的外围，因为美国才是西方真正的中心。

然而，美国主导的西方，看似统一但仍有隐患。一方面，欧盟的成员国缺少真正的跨越国界的政治身份，自然就更不用说在全球扮演统一角色了。另一方面，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裂痕也很容易伤害到欧盟的统一。英国一方面紧紧追随美国，另一方面又谋求在欧盟内部拥有特殊地位。法国一直都在嫉妒德国在欧盟内部的地位不断上升，所以不时地提出请求，要与美国、俄罗斯或者德国分享领袖地位。此外，法国还一直在谋求做那个不伦不类的“地中海联盟”^[24]的领袖。德国越来越喜欢玩俾斯麦当年玩的德俄特殊关系的把戏，这不可避免地使中欧国家感到惊恐，恳求与美国加强安全联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不愿承担严肃的责任，甚至不愿承担以北约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责任。不过，欧洲人有其他方面的关切，欧洲社会日渐老龄化的人口和年轻人关心社会保障的程度要甚于关心国家安全。所以，美国变得越来越需要独立地担负起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同时美国还要打消欧洲人的疑虑，答应保留“欧洲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边界。但是，这些边界是可以被逾越的，因为德国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正在形成之中，德国的商业精英简直无法抵御俄罗斯现代化的商业利益的吸引（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很感兴趣）。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不仅希望获得特殊的商业利益，还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所以欧盟面临着因地缘政治引发的分裂，而且分裂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上述情况尤其令人感到既遗憾又担忧，因为建立欧盟的计划是一件极具潜力的事，东欧的民主化和社会变革都有赖于欧盟。欧盟扩大后，中欧国家进入欧盟（冷战时被称为东欧），该地区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基础改革，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兰，波兰对毗邻的国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是个有吸引力的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榜样作用将会对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变革产生真正的推动力。如果欧洲在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得再积极一些，同时美国也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又有共同的长远目标的指导，那么土耳其和俄罗斯会愿意加入更广大而有活力的西方社会。

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长期的远景和战略。但是，这两

者今天的欧洲和美国都不具备。可是，在地理上异常遥远的韩国却发生了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2010年秋，韩国的一家主要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敏锐地对欧洲的自我放纵提出了批评，这篇文章坦率地说：

当然，突然指责欧洲变成了一潭政治死水是错误的。但是，欧洲人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欧洲按照当前趋势发展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欧洲需要清楚地定义自己的利益和责任是什么。在这个世纪里，欧洲将面临大量的不利因素，所以欧洲需要心里有目标。此外，欧洲不仅需要明确指导欧洲行动的道德标准，还需要明确人们很想知道的欧洲领袖的道德标准。 [1]

“欧洲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地缘政治问题与欧洲及其地理上的东方的前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欧洲和美国对这个问题有同样的关切。欧洲扩大后的东部边境应该在哪里？西面的边境呢？在加入扩大后的西方后，土耳其和俄罗斯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相反，如果土耳其和俄罗斯由于欧洲人的偏见和美国人的反对而被排除在欧洲或者说西方之外，欧洲和美国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

在土耳其，其正在进行但尚未完成的变革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以欧洲为样板。1921年，“青年土耳其”运动的领袖阿塔图尔克（Ataturk）（穆斯塔法·凯末尔）宣布，他要把土耳其种族从四分五裂的奥斯曼帝国转化为一个欧洲式的现代世俗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转变为民主化进程，这个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土耳其想更加明确地成为统一的欧洲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人的鼓励下，土耳其人就形成了加入欧洲的雄心，并在1987年提出加入欧盟的正式申请。欧盟对此做出了反应，于2005年正式开始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虽然最近有几个欧盟成员国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表现出犹豫的态度——法国和德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但是，具有真正西方式民主政治形式的土耳其，加入欧盟确实存在地缘政治的现实意义，如果土耳其不仅是北约成员国，而且还能牢固地成为西方的一部分，那么土耳其就能为欧洲屏蔽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

在短期内，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会比较多。但是，从长远来看，欧洲与俄罗斯建立类似与土耳其的关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与俄罗斯进行长远的战略协作变得具有历史迫切性。应当承认，苏联垮台后20多年来，俄罗斯至今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总是怀念过去的时光，在某些方面过于嚣张。俄罗斯全力打造“共同经济空间”（在克里姆林宫庇护下），其覆盖范围包括苏联的地区，这自然引发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的警惕。俄罗斯精英中的主要人物，依然努力冲淡与大西洋彼岸的种种联系，始终对中欧国家想融入欧盟和北约不满，甚至担忧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会对其矿藏富饶、人口稀少的远东地区有所图谋。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明确采用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则更加公开地表达想融入当代西方的意愿。有一个问题已经在俄罗斯上流社会阶层蔓延开来，那就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关系是怎样的”。甚至克里姆林宫内一些思想顽固的政治精英也加入其中。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只有彻底地改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许才符合俄罗斯生死攸关的长期利益。

几乎同时，欧亚大陆的东半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亚洲变得越来越活跃，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不是个好征兆，因为如果不加以谨慎的限制，亚洲就会让人预兆不祥地回想起在过去200年里冲突不断的西方。中国的雄心开始逐渐更公开地显露出来，民族主义的自信正在逐渐撕碎官方小心谨慎维护的低调、国家现代化和历史耐心的面纱。目前中国与日本、印度正在竞争地区卓越地位，不过竞争的基本性质仍然属于外交和经济层面。但是，中国有能力——并且或许有意愿使用武力，这一点在进行地缘政治判断时变得越来越值得关注。中国和印度一旦使用武力，结果将特别可怕，因为双方都有核武器，而且另一个有核国家巴基斯坦也将身陷其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崛起的新东方就会变得非常动荡，如同过去的西方。

正如我们早先评述过的那样，欧亚大陆的东部正在崛起，其西南

区域危机四伏。这个区域被称为“世界的巴尔干”^[2]，地理上包含中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是唯一在该区域用兵的外部势力，这里的冲突有蔓延至中亚的可能性，因为俄罗斯北高加索穆斯林居住区的暴力冲突已经愈演愈烈。中亚地区有不少新建立的国家，每个都有可能爆发内乱，因而倍感不安，这些国家都想与外部世界增加联系，谋求既不被俄罗斯控制，也不被中国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欧亚大陆在政治上已经觉醒，但缺少共同的政治框架，其地缘政治的稳定性令人怀疑。

一百年前，开拓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哈罗德·麦金德尔（Harold Mackinder）把欧亚大陆称为关键的“世界之岛”，并且推断说，“谁能统治这个世界之岛，谁就能摆布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三位手操战争机器的残忍主人几乎“统治”了这个世界之岛。成吉思汗依靠惊人的军事才能，几乎实现了这个宏图伟业，但他征服“世界之岛”的历程在中亚的边缘处停顿下来。他无法解决路途遥远、兵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不久薄弱的蒙古帝国外延就被最初被蒙古人征服了的人口同化了。

希特勒在征服了欧洲之后，沿着与成吉思汗相反的方向施展宏图，但他获得了与成吉思汗类似的结果。如果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同时，日本能从东面进攻苏联，希特勒就有取胜的可能性。然而，希特勒失败了，苏联军队攻入位于欧洲中心的堑壕密布的柏林西部。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的胜利后，斯大林建立起中苏联盟。斯大林利用该联盟企图把美国赶出朝鲜，这时的斯大林几乎实现了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然而，西方建立起北约，东方的中苏同盟关系在斯大林死后陷入痛苦的纷争之中，至此共产主义阵营统治“世界之岛”的可能性迅速烟消云散了。

考虑到亚洲最近变得十分动荡，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政治上也觉醒了，这样的现状意味着没人能实现麦金德尔的断言——“谁能统治这个世界之岛，谁就能摆布世界”。由于美国已经浪费了20年的时间，所以美国在处理欧亚大陆新的权力现状时必须更加敏感和反应迅速。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它都无法单枪匹马地统治世界，特别是

如今实际上涌现出许多新的地区性的强国。所以，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努力必须是谨慎、长期和及时的，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一种广泛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包容西方老牌强国，还要包容东方的新兴强国。

从本质上来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与欧亚大陆各方交往的核心是要在塑造一个更加有活力、更加广大的西方的同时，还要向崛起中的欧亚大陆东部提供帮助，平息各种不安和对抗。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要求美国在未来数十年里采取不懈的努力，通过欧盟、北约这样的机制，将土耳其、俄罗斯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由于西方已经包括了欧盟和美国，所以美国的努力还应该力求使土耳其和俄罗斯发生变革。如果美国的努力可以稳步推进，并且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实效，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欧洲形成一种战略目标意识，这是欧洲目前最需要的，因为欧洲正面临着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源自欧洲正滑入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而且还源自因地缘政治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分裂局面。与此同时，美国与亚洲的战略对接应该经过仔细的调整，目的是要培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还必须谨慎地调和与中国与美国盟友日本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和美国友好的重要国家的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亚洲各国就会陷入相互敌对之中，或者陷入对中国的恐惧之中，这种状态不仅会损害亚洲在世界事务中的潜在地位，还会破坏地区稳定。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把长远的地缘政治远景转化为一个既符合历史规律又在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战略，通过实施这个战略，一方面促使西方实现具有现实意义的复兴，另一方面利用一个更广泛的合作框架促进东方的稳定。

2.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

本书前面讨论过“衰落中的西方”和“美国梦的消逝”这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并非历史的必然结果。美国的实力是有可能恢复的。如果美国和欧洲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进行如此长远的努力需要一个明确的出发点，那就是要承认历史现实——今日的欧洲仍是未竟的事业。除非西

方采取行动，否则现实不会改变。西方必须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谨慎，然后平等地去拥抱土耳其，同时还要与俄罗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对接。如此扩大的西方，就可以帮助欧亚大陆在演变过程中仍能维持稳定，同时使西方重现其历史上的辉煌。

那条分割欧洲与俄罗斯、土耳其之间的界线是抽象的地理概念。布格河（分割波兰和白俄罗斯）不是东欧地理和文化的界线，普鲁特河（分割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也不是，那瓦河（分割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仍然不是。位于俄罗斯腹地的乌拉尔山脉常被地理书籍看作欧亚之间的界线，但它仍然不能划分出欧洲和亚洲。把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欧亚的分界线甚至更没什么意义，这条海峡把地中海和黑海连接在一起，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被说成位于“欧洲”，但位于航道另一边的市区被说成位于“亚洲”。^[25]

有关欧洲文化边界的传统概念更加误导人。根据生活方式、建筑风格和社会习俗，俄罗斯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比喀山（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更加欧洲，但喀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面数千英里之外的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位于安那托利亚平原上，从地理上来说属于亚洲，却跟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欧洲城市，尽管埃里温在安卡拉的东面500多英里之处，却被认为属于欧洲。

至今，俄罗斯和土耳其都不被视为欧洲国家，而且土耳其被视为更不欧洲。做出这个判断的标准，既不是地理因素，也不是生活习俗因素，而是一种很难精确地加以定义的矛盾心理，其目的就是要规定西方在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特征和文化特征：不仅包括一些宗教信仰、哲学原理（特别是有关个人圣洁方面的原理），还包括了被广泛接受的公民权利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必须明确地铭刻在民主国家宪法的法律条文之中。虽然俄罗斯人认同这些概念，但俄罗斯的政治体系没能够反映出来。土耳其人在实践中能满足大部分要求。这两个国家都宣称它们已经在文化和社会上都属于欧洲了。它们都尽量贬低自己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异常有特点的所谓“东方专制统治”。土耳其人指出，土耳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通过制度安排把宗教和国家管

理分割开来，并且土耳其变得越来越民主。俄罗斯人强调了几点，彼得大帝当时已经有意把俄国进行了欧化，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次偏离正轨，俄罗斯的东正教是欧洲人基督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然如此，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是两种在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帝国的继承人，各自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融入欧洲。这两个国家都有辉煌过去，它们的辉煌与欧洲的不同，而且基本上是在对抗欧洲的时候获得的。两者都经历过沉重的失败。在19世纪，土耳其被打上“欧洲病夫”的标签。在20世纪，俄罗斯两次被视作“欧洲病夫”，第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第二次是在苏联共产主义崩塌之后。两者都否定了各自的帝国背景，但不能彻底抹除各自的地缘政治野心，或者说无法抹除各自内心的历史意识，因为它们都执意要重新定义自己的未来。

在20世纪，土耳其的变革比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更成功一些。凯末尔在1924年（三年前，土耳其宣布自己不再是帝国）突然对土耳其进行大规模的变革，这场变革非常成功。土耳其断绝了与阿拉伯——伊斯兰的联系，突然（几乎是一夜之间）用西方式的字母文字取代了阿拉伯文字，而且还从政府机构中铲除了宗教元素，甚至改变了对人们的着装要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它意志坚定地定义为在世俗的国家里逐步打造了日益民主化的进程。

土耳其与俄罗斯不同，它没有陷入摩尼教式的内部凶杀之中，也没有堕落为极权主义国家。凯末尔具有一种神秘的民族主义野心，这在年轻、热情洋溢的土耳其青年中很有感染力，但他的野心不是依靠野蛮、致命的恐怖来维系的。土耳其没有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土耳其人从来不夸口说自己在国内的做法是普世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从结果上看，土耳其人的社会实践没有苏联式的全球野心，却在国内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土耳其的方式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土耳其成功地摆脱了帝国式的野心，把国民的热情转移到投身社会现代化上。凯末尔有一种历史性

的远见，在他的远见之中，目的和手段是平衡的。他坚定地宣传自己的远见，所以土耳其才避免了斯大林主义的倾向，斯大林主义包含了太多的列宁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和普遍主义。凯末尔的远见还帮助土耳其人顺利地适应了丧失帝国地位后的失落感，这与俄罗斯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俄罗斯，有一部分社会精英仍然怀念着不久前才丧失的多民族帝国。

在过去20年里，土耳其平稳地推进宪政民主制度，而且运作良好。土耳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土耳其想加入欧盟。欧盟在数十年前就邀请土耳其加入，但提出的特定条件是，土耳其必须满足欧洲的民主标准。不过，土耳其平稳地推进民主这个事实，还反映出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土耳其人逐渐地把民主看做自己的生活方式。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仍然脆弱，尤其是它目前还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但是，土耳其军方已经可以做到默许自己不喜欢的选举结果和宪法修改，这表明了土耳其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在民主方面，土耳其显然领先于俄罗斯。

继续世俗化将会对土耳其的民主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土耳其的世俗化是凯末尔在1924年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迫推行的。所以，许多欧洲人以及甚至一些土耳其人现在害怕最近几十年来民主化进程加速后会出现不良后果。政治开放度高了，极端的宗教示威活动有可能会重新抬头，这些示威活动会要求把宗教置于社会事务的首位，甚至要求把宗教身份置于国家身份之顶。不过，至少到今天还没有出现这类的不良情况。有迹象表明，土耳其的民主制度逐渐稳固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吸引力会减弱。例如，根据一所土耳其大学的民意调查，1999年至2009年间，伊斯兰教教法的公众支持率从25%下降到10%左右。如果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能变得更密切，土耳其社会将变得更能接受世俗政府。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土耳其已经与西方（特别是欧洲）有广泛的联系，而且都是在非常重要的方面。从北约创立之日起，土耳其就是该组织坚定的成员，比一些欧洲成员国更愿意在实际战斗中帮助北约。土耳其有北约第二大的常规军队。土耳其在冷战期间与美国维持

着既全面又敏感的防卫联系。多年来，土耳其花费了大量的艰苦努力，对民法和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与欧美的标准匹配。所以，从某些重要的方面看，土耳其已经成为欧洲非正式的延伸，自然这个说法对西方也成立。这已经是事实，只是还没有被法律认可而已。

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土耳其是个基本上实现了世俗化的国家，而且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并且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原有疆土上取得优势地位。土耳其的新外交政策，深受具有地缘政治思维的外交部长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lu）（“战略深度”这个概念出自他的手笔）的影响。这个外交政策有个前提，土耳其应该是奥斯曼帝国原疆土所对应地区的地区性强国，该地区包括黎凡特、北非、美索不达米亚。提出这个外交政策的动机不是基于宗教考虑，而是基于历史性的地缘政治。达乌特奥卢有个合理的假设，他认为与邻国的关系和睦比敌对好。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达乌特奥卢提出一项计划，考虑到土耳其目前是世界排名第17的经济体，土耳其应该能利用这样的社会经济实力重建土耳其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关系，这些关系在20世纪曾因为凯末尔的以世俗化为中心的政策和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被削弱。

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在原奥斯曼帝国疆土之外出现了新的独立的中亚，该地区基本上拥有土耳其文化传统，正在向土耳其招手示好。对这个蕴藏着大量能源但仍然属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如果土耳其能在该地区扩张商业和文化影响，就能帮助该地区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从而变得更加世俗化和民主化。有一点值得评述一下，俄罗斯企图垄断中亚的能源输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土耳其能增强在该地区的作用，并借助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协助，就可以帮助欧洲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获得从里海一直到中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土耳其迈向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步伐越来越有希望。当然，土耳其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仍然显得缓慢，譬如新闻自由、教育、人类发展（见表4.1）。如果土耳其人感到自己永远被欧洲拒绝在外，那么土耳其人已经培养出来的爱国自信将会变成长期的反对西方的敌意。在

欧洲内部，有各种力量反对土耳其加入欧洲的热切愿望，尤以法国和德国为甚。反对的原因是个很不确切的信念，它们觉得土耳其是异质文化，象征着入侵，而不是伙伴关系。85年前，土耳其人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以欧洲为榜样转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如今，土耳其人变得非常愤慨，因为他们至今仍然被欧洲排斥在外。如果土耳其的民主实践失败，那么土耳其就可能转身变成一个好斗的伊斯兰政体，或者变成某种形式的非民主军事政权的附庸。如果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发生了，那么土耳其不仅不会保护欧洲不受中东问题和狂热的侵害，而且会把这些挑战放大，再通过巴尔干输送入欧洲。

万一美国和欧洲未来仍然无法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真正和平，并且/或者美国陷入与伊朗的直接冲突之中，局势可能会变得很危险。对前一种情况而言，结果将是中东极端主义倾向加剧，这将间接导致土耳其对西方的态度恶化；后一种情况将恶化土耳其的安全局势，如果冲突引发库尔德人的暴动，继而引发伊拉克的不稳定，那就会给土耳其的安全带来特殊威胁。土耳其人会变得非常愤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仅遭到西方漠视，而且还受到危害。

表4.1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全球表现排名和全球人口统计排名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全球表现排名

指标	土耳其名次	名次在土耳其前后的国家	俄罗斯名次	名次在俄罗斯前后的国家
政治自由度 ¹	某种程度的自由		不自由	
新闻自由 ²	101	与阿尔巴尼亚等3个国家在同一组	174	也门173，刚果175
国家贸易的后勤供给 ³	39	斯洛伐克38，沙特阿拉伯40	94	格鲁吉亚93，坦桑尼亚95
人类发展 ⁴	79	秘鲁78，厄瓜多尔80	71	阿尔巴尼亚70，马其顿72
教育 ⁵	109	沙特阿拉伯108，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10	42	瑞士41，比利时43
环保表现 ⁶	77	亚美尼亚76，伊朗78	69	埃及68，阿根廷70
经济竞争力 ⁷	61	斯洛伐克60，斯里兰卡与马来西	63	斯里兰卡62，乌拉圭64
政府腐败认知度 ⁸	56	亚和纳米比亚在同组62	154	也门146，刚果共和国164 (有9个国家与俄罗斯同组)
创业精神 ⁹	43	南非42，墨西哥44	57	泰国56，突尼斯58

释注

1. 《自由度》，美国众议院全球自由度报告20102. 《自由度》，

美国众议院全球自由度报告2009

- 3.世界银行后勤供给表现指数（LPI）2010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2009
- 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育指数20096.环境表现指数（EPI）2010
- 7.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2010-20118.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CPI）2010
- 9.阿克斯-斯兹伯全球创业发展指数（GEDI）2010

土耳其和俄罗斯全球人口统计排名¹⁰

人口指标	土耳其的名次	数字	俄罗斯的名次	数字
人口	17	77804122	9	139390205
人口增长率	97	1.272%	222	-0.465%
出生率	107	每千人18.28	176	每千人11.11
死亡率	164（低）	每千人6.1	7（高）	每千人16.04
寿命	126	72.23	161	66.16
生育率	115	每个妇女2.18	200	每个妇女1.41
艾滋病流行率	155（低）	少于0.1%	52（高）	1.1%
艾滋病人	无数据	无数据	13	940000
艾滋病死亡率	无数据	无数据	13	每年40000

注释

10.根据美国中情局发布的《世界概况》2010年的估计值。

土耳其与欧洲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有可能变异出敌意，这将是一种政治倒退，宗教激进势力就会复活，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便会终止。最坏的情况是发生类似于伊朗在1978年爆发的推翻伊朗王朝的事件，上述的分离状态甚至有可能毁坏凯末尔的传奇。这样的结果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都是不幸的，根本理由有三个：第一，土耳其

的国内民主化进程和不断扩大的现代化向世界证明，民主化和现代化与伊斯兰传统并不矛盾。这个证明，对伊斯兰世界和全球的稳定性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第二，土耳其承诺与其中东邻国保持合作关系，该地区在历史上是土耳其的领地。土耳其的这种承诺与西方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是一致的。第三，土耳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世俗化，同时仍然信奉伊斯兰教。如果土耳其利用领土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与奥斯曼帝国原有疆土上的人们交往，与苏联垮台后出现的中亚国家交往，那么这样的土耳其，不仅能够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吸引力，还能增强地区的稳定性。这不仅对它自身有利，而且对欧洲和俄罗斯都有利。

与土耳其不同，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是矛盾的。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宣称他们想与欧盟、北约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但他们不愿为此马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计划缺少重点，改革的前途依然不确定。尽管如此，对美国人、欧洲人和俄罗斯人来说，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是必需的，这种关系的根基是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观。未来的20年对俄罗斯来说非常关键，因为俄罗斯将决定是否与西方发展更大的协作关系，当然也要包括真正的政治关系。

俄罗斯以历史作为根据认为自己太强大了，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但它想长期统治欧洲又显得太弱。有一点值得注意，俄罗斯至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军事胜利有两个：一是沙皇亚历山大于1815年胜利进军巴黎，二是斯大林于1945年年中在波茨坦举办庆祝晚宴。这两次伟大的胜利，更多的是因为敌人的愚蠢，而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政治才能取得的永久成功。如果拿破仑没在1812年进攻俄国，就没人知道俄国是否能在1815年挺进巴黎。在沙皇亚历山大实现凯旋之后不到50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从海上远道而来的英法远征舰队打败。又过了50年，到了1905年，俄国在远东被日本陆军和海军击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被德国彻底击败，而德国那时要在双线持久作战。斯大林在20世纪中期的胜利是因为希特勒的愚蠢，这才使苏联控制了东欧，深入到了欧洲腹地。这次胜利之后的50年里，苏联控制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与美国进行的冷战过程中解体了，

俄罗斯帝国本身也随之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现代的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帝国，由于俄罗斯地广人稀的疆土上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这个国家命中注定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从历史的角度看，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国际竞争者，没有展示出像英国那样精巧的外交，达不到像美国那样既喜好民主又富于商业才干，做不到像中国那样既自制又有历史自信。俄罗斯没能理顺国家政策，所以就无法很好地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非凡的地理空间、突出的社会人才，以至于社会发展不平稳，无法为世界树立社会发展的典范。相反，俄罗斯往往是在爆发出一阵狂欢和救世主般的自恃之后陷入消极的阴暗。

此外，虽然俄罗斯因其广袤的疆土自动成了一个大国，但人们的生活条件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符。俄罗斯社会的债务水平很高，人民生活水平一般，全球普遍认识到俄罗斯的这种形象，没人相信俄罗斯有能力实现其国际雄心。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死亡率很高，人口是负增长，这是社会管理失败的证据。俄罗斯男性酗酒严重，道德败坏，导致寿命相对较短。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南部边界上，出现了伊斯兰骚乱，那里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俄罗斯空旷的东部边疆有邻居中国，中国人口稠密，而且越来越强大，这肯定会与俄罗斯那种大国特有的傲慢相碰撞，俄罗斯几乎无法掩盖自己对中国的焦虑。

在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有几项很领先，俄罗斯的国土排名第一，人口第九，核武器第二。但是从整体看，俄罗斯的排名比土耳其要差，只能排在世界排名的中间位置上。在寿命和人口增长方面，俄罗斯的排名之低令人不安。综合来看，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排名呈现出一些矛盾的现象。这两个国家在某些方面是发达工业国家，但在另一些方面有待发展。俄罗斯的政治体系是不民主的，腐败成风，这使俄罗斯处于劣势。俄罗斯有很多严重问题，譬如人口危机、政治腐败、早就过时的资源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社会发展迟滞。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俄罗斯真正地实现其雄心。俄罗斯有雄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罗斯人非常有才华。不过，俄罗

斯的人才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前面的表格（表4.1）补充说明了一个道理，土耳其和俄罗斯如果能与欧盟建立起真正的变革性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将会受益。借助与美国的联系，欧盟有能力以自信的方式接触东方。

此外，俄罗斯还有一个特殊问题。俄罗斯一直顽固地漠视法治原则，这也许是俄罗斯与西方进行明智的交往中最大的障碍。如果不给予法律制度上的最高权力，虽然俄罗斯可以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形式，但只不过是肤浅的模仿而已。这样的法律现实助长了腐败和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俄罗斯的传统，因为俄罗斯历史上一直要求社会服从国家。

还有一个因素使情况变得复杂。目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精英有一种与土耳其人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取向，这种取向是矛盾的，在某些方面带有逃避现实的色彩。目前，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对待北约这个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俄罗斯没有明确表达希望通过取得北约的正式资格，从而最终成为其经济、政治、安保体系的成员的热切愿望。实际上，在俄罗斯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中，存在着多种有关俄罗斯全球地位的解释。许多俄罗斯富豪（特别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富豪）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式的社会，因为这样他们能获得经济好处。但是，许多政治精英希望俄罗斯能迫使美国离开欧洲，从而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甚至希望俄罗斯成为与美国对等的世界强国。还有一些俄罗斯人似乎沉醉于几个迷人的概念，譬如“欧亚主义”“斯拉夫联盟”“俄中反西方同盟”。

信奉“欧亚主义”的俄罗斯人，被俄罗斯巨大的地理疆界迷惑，认为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欧亚国家，严格来说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命中注定要与美国和中国平起平坐。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巨大的跨欧亚国土实际上是渺无人烟的旷野，仍然处于未开发的状态，他们的战略只是幻想而已。把这个概念稍微改动一下就形成了“俄中同盟”的概念，其实质就是与美国对抗，但它依然是个逃避现实的概念。事实有可能让许多俄罗斯人感到痛苦，即使中国真的愿意，该同盟中的俄罗斯也只能扮演次要角色，而且很可能要丧失国土

给中国。

仍然有一些俄罗斯人怀抱着斯拉夫联盟的梦想，在这个联盟中，克里姆林宫是庇护者，参加国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前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地盘上享有“特权”。这些人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民族主义实际上有很高的传染性，它在乌克兰青年和白俄罗斯青年中间特别流行，因为他们刚享受到主权国家的地位。那种建议与具有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想法，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俄罗斯所谓的经济好处只是个虚构，根本无法压制住拥有独立民族和独立政治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如果俄罗斯施压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斯拉夫联盟”，就有可能使俄罗斯陷入与邻国的长期矛盾之中。

最后，莫斯科与西方之间还有一个影响关系的障碍，那就是俄罗斯对斯大林时代暧昧的态度。德国已经在历史上彻底否定了纳粹。但是，俄罗斯与德国不同。虽然俄罗斯也曾正式谴责那些历史上直接对血腥罪行负责的人，但依然尊敬这些人。列宁的遗体依然被保护在可以俯瞰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之中供人瞻仰。斯大林的骨灰被安放在附近克里姆林宫的墙中（如果在柏林为希特勒做点儿类似的事，那将会破坏德国的民主信誉）。在俄罗斯官方的历史书中，有个问题很含糊，那就是不明确地指控列宁和斯大林的政权。俄罗斯官方不愿意彻底地与丑恶的苏联旧时代决裂。这一点反映在普京对这个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上。普京本人对苏联的伟大有一种怀旧之情。这样的态度已经阻碍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也阻碍了俄罗斯与大多数西方邻国改善关系。

如果俄罗斯变得孤立无援，被有意地排除在更宏大的民主变革框架之外，那么俄罗斯将再次变成冲突的策源地，甚至变成邻国的安全威胁。^[26] 俄罗斯面临着许多问题：领导层缺少实力和意志去推进现代化；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发展缓慢（只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水平能与西方相比）；因为中国的实力不断增长而心神不安；怨恨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范围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对自己广袤富饶的领土感到无比自豪，另一方面对远东地区的人口减少和普遍的人口危机感到焦

虑；对境内的穆斯林在文化上和宗教上变得越来越离异感到惊扰。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俄罗斯一直都不能为自己定义一个稳定的角色，使俄罗斯在雄心和实际能力之间达成真正的平衡。

在短期内，思想僵化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是阻止俄罗斯人接近西方的障碍。这些精英都来自国家执法机关，怀念着过去的帝国时代，在公众场合总是谈论民族主义话题。实际上，普京就是一个典型。普京很有可能在2012年取代梅德韦杰夫成为俄罗斯总统，如果他不能再次当选总统，他也会去限制梅德韦杰夫雄心勃勃的民主抱负。普京非常坦白地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现代化的看法，他认为俄罗斯所需要的现代化是俄罗斯和欧洲的联合项目，其目标应该是赶走美国人，而不是民主化。为了吸引德国的商业兴趣，普京亲自于2010年11月15日在《南德意志报》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从里斯本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经济共同体》。与梅德韦杰夫强调民主化不同，普京在文章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或者说德国介入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为了欧洲人能获得利润，不应该把俄罗斯政治的西方化作为先决条件。

俄罗斯急迫希望解决国内问题，但这有赖于俄罗斯如何做出抉择。像本书已经评述过的那样，未来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决定性的；对一个更有活力的大西方的前途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但不是直接的。非常不幸，普京的远景是一种倒退，因为它包含了好斗的民族主义、对美国赢得冷战不加掩饰的敌意、期待恢复现代性和超级大国地位（他希望欧洲资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想塑造出的国家非常类似于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性质是高度独裁的政府（但不是极权主义的政府），在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意识形态是不加掩饰的、夸张的狂热爱国主义。

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要求俄罗斯谨慎行事，所以俄罗斯需要谨慎地挑选谁来公开宣布外交政策，甚至与北约改善关系的政策都需要专人宣布。私下与莫斯科的“智库”机构交谈证实了这一点。这类改善关系的倡议都有一个合理的假设，那就是任何在这个方向上的举动实际上都是为了推进俄罗斯企图使北约瘫痪这个老目标。软弱的欧洲会比

较容易被拆散，欧洲的内部纷争给俄罗斯传统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一些欧洲人（通常是德国和意大利商业圈的人士）认为，立刻扩大北约把俄罗斯包括进来将是获利的捷径。这种说法是在误导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俄罗斯目前的政治是独裁和腐败的，俄罗斯军事热衷于搞阴谋诡计。如果允许俄罗斯以这种状态进入北约，那么北约这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就会解散。如果允许俄罗斯对宪法不进行大幅度改革就能进入欧盟，上述结论同样成立。俄罗斯必须像土耳其那样努力去满足欧洲的民主化标准。西欧的商人（可能还有退出政坛的政客）急于从俄罗斯的资源中获利，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会蜂拥进入俄罗斯，根本不顾及对发展长期关系非常重要的共同价值观。这样做很可能实现不了真正的密切关系。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俄罗斯的上层社会，为了俄罗斯的长久未来，正在酝酿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进行重新定位。俄罗斯社会发展缓慢，落后的现实不断折磨着俄罗斯的西化论者，这些人主要来自莫斯科的智库和大众媒体。在莫斯科，这类智库和大众媒体的数目越来越多。有关俄罗斯落后的意识在四处蔓延，这增加了俄罗斯人思变的心理。俄罗斯未来很可能接受一个历史性的远景，但这个远景在战略上是慎重的，即在接触西方时要从长计议。

2009年年末，普京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出人意料地变成“现代化＝民主化”这个政治流派的最突出的代言人，这意味着类似的观点在不断进化的俄罗斯政治派别频谱中的合法性正在提高。此前，这类观点只限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当中。这件事表明各种观点开始渗入俄罗斯的最上层。即使普京最终再次成为总统，或者梅德韦杰夫停止在政界坚持他的观点，但是，俄罗斯总统能宣布西方式的俄罗斯现代化必须先民主化这件事（他强烈提倡），仍是俄罗斯政治进化中的里程碑。2010年10月，我与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私下交换了意见，他当时说得更加坦率。

在今日的俄罗斯，主要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中，显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远景。这些人中不仅有知识分子，

还有越来越数多的数以千计的从西方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那些去过西方旅行的数百万人，以及越来越多的与西方做生意的企业家。另一方面，俄罗斯当今的大众媒体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当做标准向听众传递，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电视台，包括大众消遣类的和严肃类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一点，日报本来是非意识形态的，如今却报道有关美国的新闻，这伤害了帝国的自尊，所以日报经常被批评是在歪曲事实。

2009年9月10日，俄罗斯总统的官方网站向公众发布了梅德韦杰夫的宣言，其题目是“俄罗斯前进！”。该宣言严厉批评了俄罗斯的弱点，大胆地要求进行改革。该宣言的部分内容十分精彩，很值得引用：

我们当前的经济仍然反映出苏联体系的弊端：它基本上漠视个人的需要……腐败永恒地折磨着俄罗斯，其起始的时间已经变得无法追忆。时至今日，这种腐蚀都是因为过度的政府行为侵入经济和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两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彼得大帝（帝国）和苏联的现代化进程，释放出毁灭、羞辱的力量，致使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死亡……只有我们自己的民主努力，才能给予我们权利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负有责任，我们是成功的。民主是需要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需要保护。他们需要受到保护，避免受到腐败引发的暴政、不自由、不公正的侵害……怀旧不应该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方针，我们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俄罗斯的现代化（你可以想象得出，当梅德韦杰夫在谈及外交政策使用“怀旧”这个词时，他是在暗指谁）。

俄罗斯人最终应该做出抉择，是否要利用与西方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毗邻的优势，以及俄罗斯人常谈到的对美国的好感，谨慎地把俄罗斯的现代化过程与真正的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的知识精英越来越意识到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依存的；俄罗斯的商业精英则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这应该算是个迟到的认识；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正越来越担忧落后于东方新浮现的巨人。我们在前面谈到了许多有关俄罗斯的负面问题，俄罗斯人对这些问题也逐渐形成了共识，所以这说明我们应该对俄罗斯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虽然俄罗斯仍然面临着国内政治动荡的问题，但俄罗斯的未来

将会变得比较稳定，东西方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密。

因此，如果说欧洲在没有形成与俄罗斯广泛而深入的关系的情况下，欧洲不能算是完成了使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俄罗斯在没有与西方（特别是欧洲）实现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前途是不安全的，其现代化的身份和民主的地位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俄罗斯不试图与西方建立起信任关系，不逐步调整自己去适应西方，俄罗斯很可能就会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其外部雄心会遇到过多的阻力，以至于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所以，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9月的宣言不仅是对他的国民及时和彻底的警告，它还给出了俄罗斯唯一的选择：“我们目前的国内生产能力、金融能力、技术能力还不足以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次质的飞跃。我们需要从欧洲、美国、亚洲获得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这些国家需要俄罗斯提供的机会。我们对和睦的关系，对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非常感兴趣。”

俄罗斯政治现代化激发出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最好的协作希望。如果要想有真正的协作，西方也需要付出努力。西方要维系跨大西洋的统一，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要追求一项具有特点的长期政策，特点之一是战略意图清楚，其二就是要与俄罗斯实现历史性的交往。战略意图清楚，意味着必须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要保证俄罗斯只能是在加强西方，而不是在分裂西方。历史性交往意味着西方在与俄罗斯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是耐心不懈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关系。西方的政策不仅应该充满战略思维，还应该具有历史性的谨慎，它必须坚持一条重要原则，只有欧洲与美国联手，才能充满信心地向东方进发去拥抱俄罗斯，实现具有历史约束性的关系。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宪政民主制度，从而保证双方不仅能在外部利益上和谐一致，而且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需要逐步实现普世的民主标准（通过梅德韦杰夫说的“相互渗透”）。为此，俄罗斯需要逐步深入改革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布局。从外部看，这样做有助于稳定地扩展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为了催化俄罗斯内部的变革，我们应该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覆盖整个欧洲的旅行自由，最终允许人们只要有合法的经济利益就能自由定居。这些是

与我们要加深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联系的目标相一致的。

为了推测俄罗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融入西方，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世界地缘政治在过去40年发生的剧烈演变，还要考虑到我们的时代有个特征，那就是历史的进程急剧加速了（表4.2简要总结了自1970年至2010年这40年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变化）。

表4.2 历史突变的不可预测性，1970~2010年

	大西洋同盟	苏联（俄罗斯）	中国
约1970~1980年	同盟只覆盖欧洲一半的国家；欧洲担忧苏联的军备扩张；美国陷入越南泥潭，后来只好放弃。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68）；大规模战略扩张，威胁超过美国；宣布期待到1980年时超过强大的美国经济。	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政治骚乱；制造业约占美国的9%。
约1980~1990年	伊朗亲美王朝被推翻；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形成不明说的反苏联盟。	苏联入侵阿富汗；准备入侵波兰，压垮团结工会；经济发展放缓，推行经济重建计划。	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协助美国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
约1990~2000年	冷战后美国变成唯一超级大国；德国统一；欧洲共同体变成欧盟；北约扩展到中欧。	团结工会获得波兰政权；苏联垮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俄罗斯面对社会危机试验民主。	把经济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实现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改革。
约2000~2010年	美国发动“9·11反恐战争”；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欧盟扩张到中欧；西方遭受大规模金融危机；美国由于债务问题和经济变缓进入系统性的危机。	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普京恢复独裁性的国家权力；谋求成为能源大国；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易受全球趋势影响的弊端，社会发展停滞。	进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2.5亿中产阶级。

在俄罗斯和西方要发展更正式、更有约束力的关系的过程中，其确切的本质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演化时间，所以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只能是猜测而已。我们需要尽可能地使这个过程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层面同时平稳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出现这样的场景：双方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法律和宪法越来越相似；北约和俄罗斯军队进行联合军演；在大西方的框架下发展新的政策协调机构。这些都将使俄罗斯更加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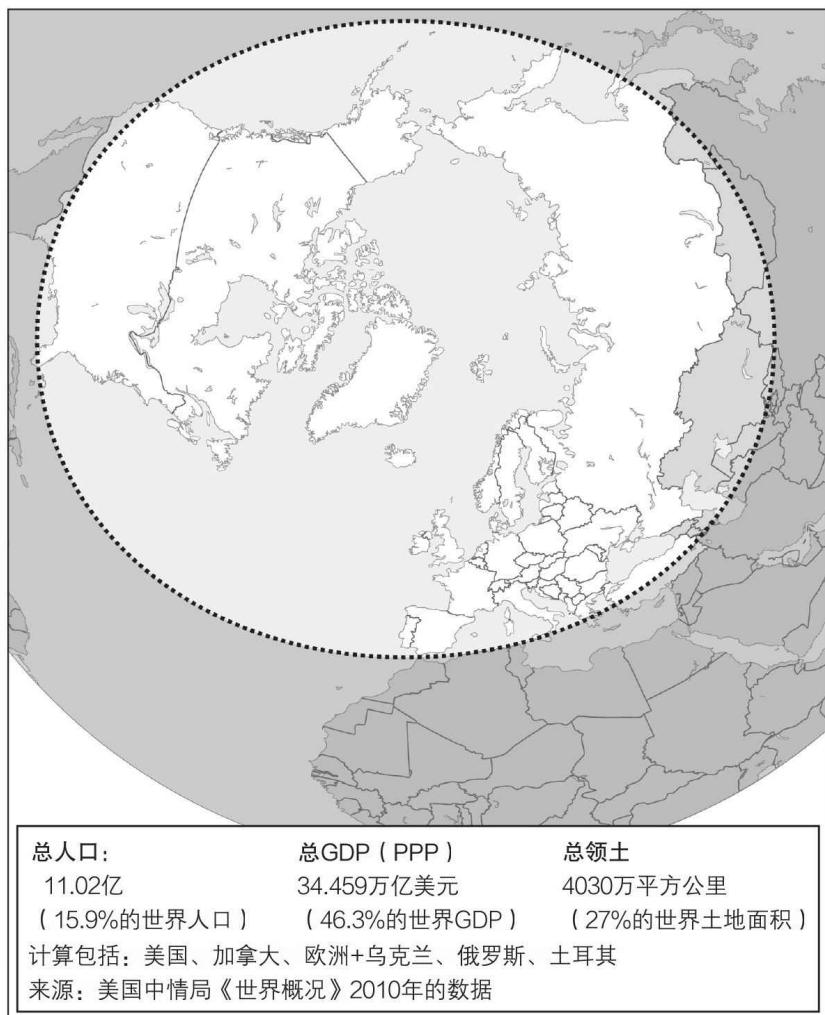
即使俄罗斯不是欧盟正式成员，美国、欧洲、俄罗斯（从温哥华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正在浮现之中，为了形成共同政策，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正式的协商框架。由于俄罗斯向西的倾向很可能会有乌克兰的类似倾向相伴随着（乌克兰有时甚至

领先），所以把这样的协商机构（也许同时可以把欧洲议会）安排在基辅[古代公国基辅罗斯（Kyivan Rus）的首都，几千年前就与西方有皇室之间的联系]。基辅的位置在东欧，土耳其的正北方，此处象征着西方生命力的复兴，表明西方领土在扩大。

展望2025年以后的世界，西方扩大布局并非没有可能。到那时土耳其也许已经获得欧盟的完整的成员资格。如果土耳其仍然有一些条件无法满足欧盟的要求，也许可以让土耳其进入一个过渡阶段。由于欧洲和美国拥有一个理智的、在战略上谨慎的大西方远景作为指导，所以使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过程，即使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也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2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西方和俄罗斯能形成真正有约束力的协作关系。最理想的情况是俄罗斯既加入欧盟也加入北约，条件是俄罗斯确实开展真正全面的基于法律的民主变革，这种变革同时还要满足欧盟和北约的标准。

对有关各方来说，这才是双赢的结果。这个实现过程将伴随着历史的、社会变革的、现代化的压力。对土耳其和更具体而言的俄罗斯来说，这样它们就能落实在民主世界里的位置。对乌克兰来说，这意味着国家独立。今天的欧洲，未来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新机会和新冒险。在广袤的空间和新创业机会的吸引下，欧洲的年轻人会迎接挑战“向东出发”，去东北面的西伯利亚或者东面的安纳托利亚。投入向东的运动之中，人们会感到毫无约束，周围充满了新挑战，这能提升欧洲目前的远景，眼前的欧洲人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保障上。跨越欧亚大陆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将会鼓励人们去远处移民，来自西方的人流会给俄罗斯远东人口下降的地区带去经济和人口复兴。只需几年的时间，越来越融入世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会变成一个仍然属于俄罗斯的欧洲城市。

地图4.1 2025年之后的世界：大西方——全球稳定的核心



欧洲人的地盘扩大后，就能做到以多种方式包容土耳其和俄罗斯，如果此时欧洲仍然与美国有盟约，那么欧洲实际上就成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竞争者。扩大了西方，由于有共同的空间和原则，就会处于比较好的位置去应对欧亚大陆某些地区出现的宗教不宽容、政治狂热、崛起的民族主义敌意，因为大西方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但是，西方变大、变得更有活力后，不能仅满足于恢复对西方民

主价值的历史信心。欧洲和美国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努力把土耳其和俄罗斯正式地融入一个更大规模的协商制度之中，协商的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真正的民主承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和耐性；对俄罗斯来说，其过程将会更加复杂和困难，所以必须要保持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无论如何这都算是一个巨大的步骤，因为这块大陆在20世纪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场所，曾经爆发过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以最有组织的形式表达出人类相互残杀的残酷本性。考虑到历史的变化速度正在加快，在过去40年里全球政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见表4.2），那么我们希望在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实现对西方的地缘政治进行扩大的远景实际上是一种过度谨慎的预见。

3.既稳定又协作的新东方

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如果真是这样，大灾难将降临到这个和平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必须优先获得解答，因为猛一看就能发现今日的亚洲与昨天的欧洲有令人惊讶的相似。

20世纪初，欧洲处于全球影响力的顶峰，可是仅用30年就把自己彻底毁灭了。欧洲猛然跌落是有原因的，德国崛起了，变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过分自信，欧洲当时的体系很难容纳下德国。在今天的新亚洲，中国的崛起引发的挑战很像当年的德国。法国怨恨1870年被普鲁士打败的事，反对德国的崛起，对德国保持着警惕。现在的印度与当年的法国相似。英国虽然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但在欧洲大陆很有影响力。当时英国没有介入欧洲事务，但肯定很关心局势的发展。在这方面，现在的日本使人想起当年的英国。最后，俄罗斯被牵扯进来，这一点虽然是放在最后说，但并非最不重要。当年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而俄罗斯在这一点上反对德国，这种对立在1914年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了1939年，苏联与德国共谋作恶，又引发了欧洲第二轮的自我毁灭。今日的俄罗斯，因中国而焦虑，赞同印度抗衡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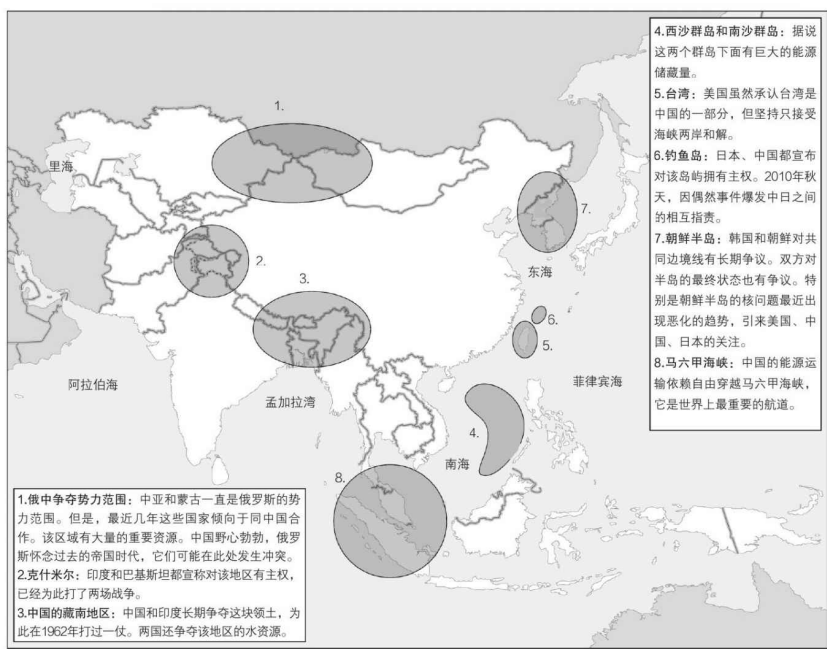
导致欧洲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政治体制无法同时处理两类挑战：一是新帝国崛起引发的挑战，二是中欧的民粹主义者的狂热野心引发的挑战，这种挑战后来变得越来越强烈（欧洲的政治体制，是在一个世纪之前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经几个大帝国讨价还价后确定下来的）。当今的世界，欧洲不再是中心，亚洲地区的稳定问题显然对全球的安危至关重要。问题不仅是中国在国际上攀爬上卓越的地位，还有其他问题也需要考虑，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拥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把东南亚几个中等国家累积起来也不可小觑。把亚洲国家放在一起统计，虽然这些国家的数字并不一致，但亚洲代表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4.7%，全球人口的54%。

此外，本书在第一部分中曾经评述过，很大一部分亚洲人口的政治热情已经觉醒了。亚洲政治觉醒的本质是民族主义或宗教，这两者同时又为觉醒提供能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难以割舍的反西方情绪（因亚洲各国的历史经历不同，所以程度有所不同）。这些反西方情绪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主题，每段情绪都在说西方的某个部分要对过去的虐待行为负责。简言之，东方并不统一，从政治、宗教、文化、种族的角度看，东方比那个犹豫着不愿统一的西方要更加多样化。东方的政治觉醒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它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至今犹新。从整体上看，东方人都很骄傲，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但东方人口基数巨大，大多数人仍然很贫困，住在非常拥挤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活条件。许多东方国家相互敌对。东方的民粹主义者的热情非常不稳定，而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使人想起一个半世纪前的欧洲。

亚洲的民族主义，特别是被宗教热情鼓噪的时候，会对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威胁。它们威胁着民主制度的稳定，当它们被各国间的敏感事件触发后，潜在的热情就会爆发。民族主义者会被政治口号点燃，他们释放出来的热情能产生相当大的压力，连地区的威权政府都不能阻碍。还存在一种更坏的情况，东方只有少数几个民主体系，它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民族主义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它们与公众保持一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有些冲突可能来自地区的权力争夺，中国和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争夺水资源或者边境既是借口又是导火索。有些冲突来自有争议的领土纠纷，这类冲突可能变成爆炸性的政治事件，释放出猛烈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仇恨，如果发展到极点，双方就能威胁对方的存亡。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这类冲突的典型。有些冲突来自绵延的历史敌意，比如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有些冲突是内部不稳定的副产品和高层误判的结果，显然我们可以想到朝鲜对韩国的态度。有些冲突源自海洋权益的争夺，比如中国和日本，再比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另外，衰败的俄罗斯没能成功地实现西方化和现代化，可能会怨恨越来越成功的中国扩张进入蒙古和中亚新国家获取自然资源。

地图4.2 潜在的亚洲冲突



中美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国际紧张状况，因为双方都无法适应政经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之间显然存在着经济竞争和持续的金融争端，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出现突发事件，譬如台湾改变现状、美国海

军出现在中国领海附近、朝鲜半岛的冲突。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核武器对这些地区角力的影响。新东方已经有三个公然的核武器大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第四个不那么明显的国家是朝鲜，它不断采取威胁的姿态，自命为一个核武器大国。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不明确，日本就有能力很快变成一个核武器大国。在新亚洲的西南部边缘，伊朗也许已经在制造核武器了。缺少较大型集体安全框架的亚洲（今天的欧洲就有）面对如此多的潜在冲突，外加动荡不安的民族主义激情，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某个特定时刻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其严重程度可能会等同于或超过欧洲在上世纪经历过的恐怖灾难，尤其是核武器被派上用场的话。

但是，尽管亚洲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但那种认为新东方肯定会爆发破坏性的国际战争的说法显得牵强附会。尽管亚洲与20世纪的欧洲的相似性似乎很明显，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21世纪全球的情况全变了，而亚洲各国间的交往历史也很独特。

第一，地缘政治现状不同。20世纪初的欧洲当时是世界的权力中心。亚洲目前还不是，至少不是世界军事力量的中心。这意味着，亚洲领袖在考虑打仗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考虑外部势力有可能进行干预。例如，如果印度和中国爆发真正的大战（不是边境线上的小冲突），俄罗斯几乎肯定会决定给予印度某种帮助，因为这样才能削弱中国。美国担忧亚洲会出现一个决定性的统治者，所以这种忧虑或许会左右美国的应对政策。为了避免胜负向一方倾斜，美国很可能会努力降低交战双方的战略目标、战争的范围和强度。

亚洲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一旦开战将会有潜在的强大外部敌手出现，也许这就是亚洲各国军费开支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相对较低的部分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是2%，印度是3%，日本是1%，美国是4.6%）。即使中国和印度开战，从它们的军费、相对中等水平的核武器这两点，我们就能推测出，双方都没有在认真考虑使用武力去解决双方现有的或潜在的冲突，它们只是警惕

对方而已。

第二，当代亚洲的繁荣建立在全球相互依存商业网络上，这不仅制约了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也产生了许多供各国自我满足、实现雄心抱负的机会，譬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鼓励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压制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肯定能体会到这个道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大幅改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获得了国际上的突出地位和非凡的金融地位。而且有此经历的国家不止中国一家。其他越来越成功的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和东盟集团），正在从相互依存商业网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不理智的民族主义。亚洲21世纪里的中产阶级与世界是互通互联的，而20世纪的欧洲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些亚洲人爱到海外学习，经常旅行，到处都有商业联系，有共同的职业理想，利用互联网实现跨国的密切关系，所以这些使他们难以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反而能帮助他们意识到相互依存的利益。

第三，应该认识到欧洲和亚洲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几个世纪前，“东亚最重要的国家——日本、朝鲜、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都是通过中国这个中心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它们有共同的原则、标准、惯例去校准相互的交往……在欧洲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是个特例，而不是惯例……与欧洲截然不同……东亚国家的和平几乎没有中断，不是100年的和平，而是300年。”^[3]

最后，在21世纪里，威胁亚洲安全的因素与在20世纪里威胁欧洲的不同。在后者所处的情况中，推动国家打仗的大部分原因是民族主义驱动的领土野心，那时的想法是领土越多，实力越大，国家地位就越高。这种野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它代表一个国家为生存所需要的空间。在当代亚洲，导致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多样性和种族忠诚热情，而不是谋求外部领土的野心。确实，除了巴基斯坦害怕印度之外，大多数东南亚和西南亚国家的军事指挥官最担心的不是邻国的领土要求，而是如何维护国家稳定。

人口众多的印度是最重要的例子，可能引发印度陷入混乱的是两个潜在的内部矛盾：极度的贫富差距，其差距之大超过中国；印度社会里有大量操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的种族。中国的汉族占总人口的91.5%。与中国不同，印度最大的种族占总人口的70%，这意味着大约有3亿人是少数民族。就印度的宗教而言，印度教教徒有9亿5000万人，穆斯林近1亿6000万人，锡克教徒约2200万人，其余人信奉更多种的宗教。不到一半的印度人使用印地语。此外，印度有读写能力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惊人地低，大多数妇女目不识丁。农村的骚乱程度不断上升。尽管四处蔓延的暴力活动已经存在十余年了，但依然没有得到遏制。

印度还没能证明其政治制度是能正常运作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度”。证明的标准应该是所有印度人口都在政治上觉醒了，并且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考虑到印度公众的文盲率非常高，特权阶层和富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凡，印度现有的“民主”过程与英国19世纪后半叶的贵族“民主”非常相似，当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当成分复杂的公众变得有政治觉悟和判断力后，现行的体制是否有效才能被测试出来。到了那个时候，宗教和语言差异可能会威胁印度的内部凝聚力。如果印度人失去控制，已经受到部落骚乱挑战的邻国巴基斯坦也可以成为较广泛区域暴力的地缘政治焦点。

在这样充满了潜在冲突的背景中，维护亚洲稳定需要美国发挥一部分作用，这部分作用要看美国如何应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两个相互叠加的三角形。第一个三角形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第二个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在这个三角形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前一个三角形中，巴基斯坦可能既是主要的冲突点，也是突发不稳定的根源。在第二个三角形中，朝鲜半岛（朝鲜和韩国）和/或者台湾都可能是不稳定的焦点。

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关键方，有能力改变力量平衡，并影响最终的结果。在这里，我们要明确指出美国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不直接军事介入亚洲对立大国间的冲突。无论是印巴战争，或是把中国牵扯进来的印巴战争，甚至是印中战争也会发生，其结局对美国利益

构成的伤害要小于美国扩军去亚洲大陆打仗构成的伤害。后一种情况将导致亚洲爆发一系列的种族和宗教冲突。

上述原则显然不适合与美国已经有条约义务的日本和韩国，美国在这两个国家已经有驻军。另一方面，虽然说美国不介入亚洲国家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关心冲突的可能的结果。美国肯定应该利用其国际影响力防止战争爆发，一旦战争爆发，美国要提供帮助遏制战争蔓延，并且还要防止战局出现一边倒的结果。但是，美国的这种努力应该要求其他强国也参与进来，原因是亚洲的大规模地区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肯定会有一些相关国家希望美国介入，而自己在旁边坐收渔利。所以，美国不能单独承担防止危机、遏制危机、压制更好战一方的全部责任。

第一个三角形牵扯到亚洲首席地位的争夺。中国和印度已经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已经起飞；其正式的民主制度及其未来的活力可能是取代中国模式的一个候选者，这一点对民主的美国有特殊意义。中国已经在经济实力领域世界排名第二，不久之后其军事实力很可能真的就是世界第二了（在有些方面可能已经做到了），中国是正在迅速上升的全球强国。所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竞争和敌对的关系，而巴基斯坦是地区冲突的焦点。

在印度这一边，不受管制的印度媒体和印度战略讨论会，总是相对肆无忌惮地表达对中国的敌意，这等于是在向中印之间已有的矛盾和国家间相互敌意上火上浇油。这些媒体和战略讨论会总是把中国视作威胁，大部分时候从本质上而言是领土威胁。在印度，出版物经常提及中国1962年通过武力占领有争议的边境。中国正在努力介入缅甸的政治、经济建设，还介入巴基斯坦的印度洋港口建设。这些被用来向印度公众展示为一种谋求包围印度的战略策略。中国大众媒体在报道这些事的时候比较小心谨慎，有意把印度描绘成一个不重要的竞争对手，这又进一步燃起印度人的负面情绪。

中国人对印度的这种高傲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超级的社会

经济表现。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比印度高出许多，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也先进得多，中国人口的文化水平也相当高，种族和语言的种类却比较少（见表4.3）。

无论如何，双方都受到自己的主观情绪和地缘政治局势的束缚。印度人嫉妒中国人在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飞跃。中国人轻视印度的落后（在社会层面上，这表现为文化水平的不对称）和缺少纪律。印度人害怕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紧密关系；中国人觉得印度有能力阻止中国通过印度洋到达中东和非洲。双方除了在外交仪式上不断承诺和平外，极少会听到有影响力的人私下倡导相互包容，所以中印彼此的轻视挥之不去，并且越来越严重。

表4.3 中国和印度的全球综合表现排名，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指标

中国和印度的全球综合表现排名

变量	中国排名	中国排名前后的国家	印度排名	印度排名前后的国家
国际贸易物流 ¹	27	捷克26，南非28	47	塞浦路斯46，阿根廷48
人类发展 ²	89	多米尼加88，萨尔瓦多90	119	佛得角118，东帝汶120
教育 ³	97	马来西亚96，苏里南98	145	科摩罗144，喀麦隆146
环境表现 ⁴	121	马达加斯加120，卡塔尔122	123	卡塔尔122，也门124
经济竞争力 ⁵	27	马来西亚26，文莱28	51	马耳他50，匈牙利52
政府腐败认知度 ⁶	78	保加利亚73，摩洛哥85 (5个与中国同组，包括希腊)	87	摩洛哥85，波黑91 (阿尔巴尼亚， 牙买加，利比里亚与印度同组)
创业 ⁷	40	秘鲁39，哥伦比亚41	53	巴拿马52，巴西54

- 1.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2010
-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2009
-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育指数2009
- 4.环境表现指数（EPI）2010
- 5.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2010-2011
- 6.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CPI）2010
- 7.阿克斯-斯兹伯全球创业发展指数（GEDI）2010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指标⁸

指标	中国名次	数字	印度名次	数字
寿命	94	74.51	160	66.46
男性识字率	-	95.7%	-	73.4%
女性识字率	-	87.6% (2007)	-	47.8% (2001)
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人口比例 ⁹	-	15.9% (2008)	-	41.6% (2008)
工业生产增长率	4	9.9%	8	9.3%
投资 (固定资产)	1	GDP的46.3%	13	GDP的32.4%
研发投入 (2010) ¹⁰	-	GDP的1.4% (支出1414亿美元)	-	GDP的0.9% (支出333亿美元)
高速公路里程	-	65000公里	-	200公里

8.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2009年、2010年的数据。

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0年。表格5.多维贫困指数。

10.2011年《全球研发基金预测》。《巴特勒研发杂志》，2010年12月。

面对这种敌对关系，美国的角色应该是谨慎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的政策要小心谨慎，尤其是在处理与印度的同盟关系时，但不应该让别人以为美国漠视印度有朝一日取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可能性。印度的未来很有希望。如果印度能成功地把可持续发展和更广泛的民主结合在一起，那么印度的未来就更加有希望了。所以，美国有理由与印度保持热忱的关系，但这不应该意味着美国要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因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引发别人的批评。美国不应该暗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打击中国。

美国政策圈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提倡建立正式的美印同盟，目的是针对中国，但实际上也针对巴基斯坦。有鉴于此，有必要做一项明确的声明，表明任何这类政策都是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样的政策会增加美国陷入更漫长、更痛苦的亚洲冲突的可能性。2011年，美国不明智地决定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系统，但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此外美国还帮助印度改进其核计划，中国人因此而视美国为敌人，因为美国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在中国决定把美国看做

敌人之前，就已经把中国看做敌人了。

此外，美印同盟免费给俄罗斯好处，却未能让俄罗斯投桃报李。实际上，建立这样的同盟，能从两个方面损害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期利益：第一是减少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从而减弱了俄罗斯想接近西方的意愿。第二是吸引俄罗斯利用美国把注意力分散到更广泛的冲突的时机保证俄罗斯在中亚、中欧的帝国主义利益更加夯实。那个想实现更有活力、更大的西方的愿望从而变得更加遥远。

最后，美印同盟很可能会加强穆斯林的反美恐怖主义，因为他们会推断该同盟明显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如果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在印度的领土上爆发暴力冲突，这种情况会变得更严重。在伊斯兰世界里，居住在西南亚或者中亚又或者中东的穆斯林，看到美印同盟，内心的同情就会被唤起，他们将支持对美国人发动恐怖袭击。简言之，针对第一个三角形，比较明智的策略是有节制的同盟，不让美国军事介入亚洲该地区。

第二个三角形的轮廓不太清晰，这个三角形涉及中国、日本、韩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东南亚地区。更总体而言，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中国能否在亚洲大陆充当主导性的强国，也涉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日本是美国在远东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盟友。虽然日本主动限制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日本有可能因担心中国崛起而取消对军事实力的限制。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最近才超过日本。韩国是个经济发展很快的强国，美国与它维持着长时间的盟友关系。一旦韩国与其疏远的北方亲戚朝鲜发生冲突，韩国就会依赖美国出面阻止。东南亚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正式，该地区有强大的地区伙伴关系（东盟），但东盟害怕中国实力的增长。有一点更加重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形成，相互的敌意会带来伤害。可是，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

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戛然而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

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当然中国的年度增长率或许会逐渐下降。

无可否认，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因为国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而受到负面影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有可能逆转中国的发展势头。此外，由于社会差距扩大，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紧张。这种局面可能会产生政治不安定。中国目前有大约3亿新中产阶级可能会要求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像是苏联整体垮台前的征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和地位都在上升，这已经是现实，未来美国需要去适应这个现实。否则，美国只好去妖魔化中国，或者异想天开地幻想中国要破产。

更大的危险有可能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危险源，它不太像是个经济危险，倒很像是个社会政治危险。这种危险的表现形式是中国领导人的素质逐渐下降，这样的变化初期是很难被人们察觉到的，或许人们可以从中国民族主义激烈程度的上升中察觉到。上述两种情况可能单独发生，也有可能是一起发生，总之，这种危险会导致中国采取有损自己国家雄心的政策，并且/或者还有可能破坏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平稳改革事业。

自文化大革命至今，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谨慎的作风。邓小平具有远见卓识，他下决心让中国走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道路。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交接十分平稳，原因是中国有固定的领导人交接程序。中国领导人努力预见问题，甚至一起研究外国有关经验，希望解决国内政策要取得成功而避免不了的混乱（他们的一个做法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定期召集会议，花费一整天的时间研究国内外主要问题，从而汲取国外和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一次研究学习会议的内容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他们学习了国外诸帝国的兴衰历史，而美国是他们研究的最新例子）。

中国当前这一代领导人本人不是革命者或开创者，他们所熟悉的

政治舞台是前人早就建立好的，而且主要的国家政策也已经被前人从长远角度出发设定好了。管理体系的稳定性似乎对他们来说是唯一进行有效管理的牢固基础。但是，在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环境下，要拥有政治前途，从众、谨慎和逢迎上司常常比个人勇气和主动性更重要。长此以往，如果政治领导层建立在人事政策的架构之中，从而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对人才和创新抱有敌意，那么这样的政治领导层能否保持活力是令人怀疑的。腐朽可能呈现。如果官方宣称的正统与政治上觉醒了的民众的多样化期待有了差异，政治体制的稳定可能会遭到破坏。

然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公众的不满不大可能通过大规模探求民主来宣泄，而是更有可能通过社会民怨或者民族主义激情来宣泄。中国政府只是更注意前者，并且为此做了准备。官方规划者直言不讳地总结出可能引发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的五大原因：（1）贫富悬殊，（2）城市骚乱和不满，（3）腐败之风，（4）失业，（5）社会信用缺失。^[4]

如果让民族主义激情兴旺起来，实际上更难处理。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呈上升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政府仍然建议谨慎地定义中国的地位和历史目标，但到2009年时，越来越多的严肃的中国媒体充满必胜信心地炫耀中国的显赫、经济威力、不断上升的全球地位。民粹主义激情在未来很有可能会突然爆发，这一点从最近中日之间发生的事件中可见一斑。中日在有争议的水域里发生一件相对较小的偶然事件，这导致中国民众怒火爆发，发动示威宣泄怒火。台湾问题同样可能在某个时候激起公众对美国的好斗情绪。

事实上，中国的前途有个矛盾，在中国向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一个智勇双全并能谨慎地将社会压力转化为社会参与的领袖更有可能成功，相反那种只知道放纵民族情绪的懦弱领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一旦政权变得既软弱又平庸，就会对维护政治团结以及自己手中的权力感兴趣，对这样的政权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加激进、更加极端民族主义。如果一个领导层害怕丢失手中的权力和前景，倾向于去支持民族主义浪潮，他们就有可能

会破坏中国长期以来在内政和外交之间维持的精巧平衡，该平衡一方面要求提升国内的雄心，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慎重的态度。

一个高度民族主义和高度集中的中国可能会处于自我封闭之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再会羡慕中国的现代化，美国公众也会泛起残存的反华情绪，也许还携带着含蓄的种族歧视。这时，在那些越来越害怕中国野心的亚洲国家中，会出现一种极度反华的政治压力。它将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近邻。当前喜欢与住在隔壁的经济巨人进行合作的近邻们，将变得渴望获得外部保证（美国是首选），去抵御它们眼中的已经被民族主义和野心唤醒的中国。

几十年前，美国就在协定承诺的基础上在日本和韩国驻军，所以北京对待其邻国的态度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宽泛地讲，虽然中国希望崛起，但其战略目标仍然是谨慎的，似乎中国的主要目标有如下六个：

1.把对中国地缘政治包围的潜在危害降到最低，可能的危害包括：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的防卫联系；中国通过马六甲海峡从海上去往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容易受到阻挠；没有一条穿越俄罗斯和/或者中亚国家从陆路去往欧洲的经济上可行的通道；

2.在新兴的东亚联盟（包括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谋取有利的地位，并且在已经存在的东盟中实现同样的目标，同时尽可能排除美国的加入或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

3.支援巴基斯坦，使之成为制衡印度的力量，并通过巴基斯坦建立一条通往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安全通道；

4.在对中亚和蒙古的经济影响力方面取得对俄罗斯的重大优势，从而中国可以从比非洲和拉丁美洲更近的区域满足其对自然资源的部分需求；

5.坚持通过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去解决内战遗留下的台湾问题；

6.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中谋求有利的经济地位以及间接的政治影响力，从而保证原材料、矿物、农产品、能源的供应，与此同时保证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当地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在全球获得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

上述六个战略目标混合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些中国战略家称之为“大周边战略”。但这些目标还反映了中国对自己应有权利的传统观念，那就是中国应该有权主导地区性事务，也许最终还应该有权主导全球性事务。与苏联不同，这些目标不是源自普遍的意识形态渴望。然而，这些目标的确反映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外界推测的欲望（至少眼下中国对这一欲望是遮遮掩掩的），那就是再次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甚至是取代美国。诚然，中国精明的外交举动已经引起他国的注意，中国的外交口号是“和谐世界”，这个口号开始吸引欠发达地区的政治想象力。有许多人不满“衰退中的美国梦”带给他们的前途，因而渴望在未来能获得一个与自己更相关的前途，而中国正好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正在升起的“中国梦”。

中国人这六个目标中的每一个，既可以灵活且耐心地去实现，也可以激进地去实现，究竟何种方式，要看中国是否想破坏美国在东方的地位。例如，中国可以让日本和韩国成为东亚同盟的成员，并且接受美国的介入。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诱使朝鲜半岛在中国的保护下实现统一，使日本脱离美国成为中立国（与其他例子类似）。从本质上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高昂，上述目标就会被吸收在一系列迁就融合的举动之中（主要是跟美国）。但是，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唤醒了，中国就会全神贯注地与美国进行对抗，那么中国就会以好斗的方式去实现上述目标。

究竟中国会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美国如何对待上升中的中国，二是中国如何演化。美中两国的智慧和品质，很可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酷的考验，双方的赌注都将会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对美国人来说，当前的任务是要分辨出两种情况，中国的哪些野心由于威胁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不能被接受；中国的哪些目标反映了新的历史性地缘政治现实，因而是美国应该包容的，虽

然美国可能会不情愿，但至少没有损害美国的利益。实际上，美国需要平静地分析在哪些地方与中国发生冲突不值得，而何时必须划清界线让中国人自己认识到越线对他们不利，并且/或者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建设性的主要伙伴，但美国不会不计代价。

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但是，不管中国答应与否，美国如果能够维持自身在远东强大的地缘政治存在（以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持续关系为根基），那么美中全面全球伙伴关系的前景反而实际上会增强。美国维持在远东的地位，总体而言将是对中国亚洲邻国（包括本书未明确提及的国家）的一种鼓励，因为它们就可以利用美国在亚洲的金融机构和经济设施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存在，在强大中国的阴影中去和平但是抱有更大信心地保持自身的独立。

日本是美国发展稳定的美中伙伴关系的关键同盟者。美国与日本的联系表明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就好像美国与英国的联系表明美国是大西洋国家一样。这两组联系使美国能分别实现与欧洲和中国的灵活可变的伙伴关系。在上述大框架下实现的中日关系的不断和解符合美国的主要利益。美国应该保持在日本的存在，特别是要维持两国之间的防卫联系，这有助于中日和解。如果美国和中国真的是在谋求加深和扩展双方的合作，美日关系更应该如此。

与此同时，如果日本能在国际上更加活跃、军事上能力更强，日本就能为全球稳定做出更多积极贡献。一些杰出的日本人已经催促日本加入新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受到美国的青睐，其目标是在环太平洋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专家指责这是针对东亚共同体的阴谋）。日本固然缺少威胁中国的实力，但日本可以为国际维和提供更多帮助，并且采取总体而言与其重要经济地位匹配的行动。中日在一些潜在的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岛屿上有矛盾，双方都宣布拥有主权，如果该问题遵从现有的国际斡旋和仲裁判决，应该是能比较容易化解的。

只要仍然受到潜在威胁，并且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韩国就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美国的防卫承诺以及美国继续在日本的有效存在的承诺。日本和韩国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在历史上的敌意，韩日两国并没能形成任何密切的军事合作，而实际上它们的军事合作对双方都有利。韩国拥有的保护越多，朝鲜就越不会发动出人意料的袭击。最终朝鲜半岛会在合适的时刻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也许能在分阶段的统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真能实现朝鲜半岛统一，作为对中国援助下的民族统一的交换，韩国也许会决定重新评估局势，降低与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联系程度，但主要是降低与日本的军事联系水平。

美国需要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发展更密切的政治和商业联系，并且维持与菲律宾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加强亚洲对美国的支持，使美国加入正在扩展之中的区域性国家间合作体系。这些国家在与美国建立上述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兴趣，有助于让中国更加理解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并不是为了包围中国，而是在花费精力建立更大规模的合作网络，该网络将间接帮助塑造美中双边全球伙伴关系。

在美国和中国谋求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大局下，有三个美中之间的敏感问题必须和平地加以解决：第一个需要短期内解决，第二个要在近几年内解决，第三个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和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条件是美国和中国在比较广泛的亚洲地区能继续发展双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第一个敏感问题是美国在中国领海边缘进行军事侦察的问题（离海岸线6海里），以及美国海军在国际水域进行巡航时部分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军事活动在中国人眼里是挑衅行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国在美国领海进行类似的活动，美国公众毫无疑问也会被激怒。此外，空中侦察构成了发生冲撞的严重风险。

要解决这些问题，美中双方要采取一些调整措施。不过，这些问题可以在更加系统化的层次上加以解决，这就涉及越来越引发争议的

第二个问题，即两国的军备扩张的问题。目前，美国的国防预算和武器计划比中国的明显大多了，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正在打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对全球有军事承诺。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反应基本上是地区性的，但中国的反应确实不仅直接引起了美国的安全顾虑，也影响了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所以，两国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努力，在较长期军事计划方面达成协议，这种相互保证对维持任何长期美中伙伴关系来说都是必需的，这样做也会使日本和韩国感到放心。没有这样的相互包容，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双方难以克服的障碍，不仅会逐渐破坏已有的合作，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军备竞赛。

第三个地缘政治问题是最为困难的，但前两个问题的进展将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的未来地位。美国不再把台湾看作主权国家，同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美国和中国实现长期包容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美国向分离出去的台湾出售武器肯定会引发北京的不满。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长期方针，采取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找到一种富有灵活性的方式，实现了统一，但是会保持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甚至各自保留军队（因此，它应该被重新定义为“一国多制”）。

自从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主权之后，香港的“一国两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受到了检验。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香港，但包括民主体制在内的香港自治证明行得通。考虑到中国的地位不断上升，如果统一的基础是更加灵活的“一国多制”不必包括解放军进入台湾岛，那么台湾想无限期地拒绝统一就是值得怀疑的。显然，台湾是个政治性问题，具有道德敏感性，中国和美国是否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包容性协议有赖于双方关系的性质。从短期看，解决前两个问题将最有可能消除地缘政治的根源。从较长期看，如果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双方会产生严重的分歧，尤其是美国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已经接受了大陆和台湾都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

像先前评述过的那样，最终双方的内部条件起决定性作用。只有恢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技术进步再次充满了能量，再次拾回历史乐

观主义，克服严重的政治僵局，美国才有更多的信心去调整自己适应崛起的中国。这种状态下的美国很可能有一个更清晰的世界观，肯定较少地用摩尼教的观点看世界，更愿意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其政治地位。

同样，中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中国近200年来的历史是动荡和分裂的。中国当代的稳定发展期只有30年的历史。中国在19世纪是分裂和衰败的，遭到了外国军事力量的暴力入侵，不得不做出屈辱性的“让步”。中国在20世纪苏醒了，连续争斗了几乎一个世纪。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都失败了。此后时期的自我毁灭不亚于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只是邓小平才成功做到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未能做到的事情：让中国走上了一条至今依然还算成功的内部变革的道路，变革同时促进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国家的雄心。

即使中国的国内变革继续保持成功，中国很可能也不会在未来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比如说到2030年）实现许多西方人期待的：出现一个基于中产阶级的类似欧美的宪政民主制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维持国家统一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接触更大的外部世界，利用互联网扩展交往，不平等地提高生活水平。面对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出现两种基本情况，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第一种情况是很危险的，本书在前面讨论过：中国现代化之后变成一个过于自信、没有耐心、总是有必胜信念的、好斗的民族主义国家，解放军是权力的和行动的源头。这样的中国不仅对外部世界，对自己也是危险的。

第二种情况是所谓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儒家中国，这样的中国不同于20世纪欧洲的沙文主义国家，不会在国际上造成太大的麻烦。中国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许多诸如生命、等级、权威的哲学概念。社会“和谐”的想法，指的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的统一局面，该想法据说是源自一个一般性的哲学共识，领导阶层通过精英选择，而不是政治争论产生，制定政策要基于事实，而不是教条。这样的想法源自中国漫长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不断引述一个短语“实事求是”，这应该是反映了儒家的学说。

中国的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这会给社会凝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可能会威胁儒家的“和谐”概念。中国官员也公开承认社会不平等增加了社会风险，还有数亿人仍然没有从当前的变革中获益。这也使得应对国内“和谐”构成的内部风险比投射全球主义更重要。

无论如何，和谐的想法是中国越来越希望向外界谨慎传递的信息。中国在国际上不把自己描绘成搞阶级斗争的人，也不向世界输出最终的世界革命（苏联这样做）。中国总是把自己与儒家的过去和佛教渊源相联系。从外部特征看，中国主要的对外交流机制是数百个位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中国政府推动建立“孔子学院”的态度非常积极，以法国的法语联盟和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为模式进行运作。除了让外国人了解儒家学说，中国还公开承认自己的佛教传统（与邻国共享）。在现实生活里传递这样的信息，并不能告诉人们中国的国际企图和战略。但是，这个信息所强调的“和平崛起”、全球和谐的理念，至少让人们可以与中国谈论其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问题。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情况，很难想象中国能永远不许外部世界的压力传入内部，而外部世界却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中国孤立自己的代价会是巨大的。中国在发展，发展的结果正在积聚：中国已经涌现出非常了解国际情况的中产阶级；无数的中国人去海外学习；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不可避免地把民主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尊严的方式；在如今的交互通信的世界里，即使是最坚定的精英也无法让社会处于意识形态封闭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也会加入民主的主流之中。

事实上，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会变成相对来说中年化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日本——日本有22%的人口的年龄在65岁以上，预测表明中国在本世纪中期这个比例将达到25%。该情况也证明了一个假说的合理性，那就是在一个年轻人爆炸式增长的社会里，人口特征是不会很快发生改变的。很明显，当中国社会变得中年化和中产阶级化后，中国很可能会演化出一个多元的社会制度，因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正常的，是朝着更加细致的政治风气进步，是与中国的传统相匹配的。

在这样历史性演化的背景下，美国在新东方的地缘政治角色与直接介入西方扩大化有本质的不同。在西方，美国是必不可少的动力源，因为美国要激励地缘政治革新，甚至参与直接的领土扩大。在亚洲，美国要合作性地参与到一个多边体系之中，谨慎地支持印度的发展，稳固地与日本和韩国联系在一起，耐心地与中国扩大双边合作和全球合作，这样美国就会变成最好的平衡支点，从而维护新亚洲在崛起过程中的稳定。

本章注释：

[1] 《欧洲最后的机会》，韩国《朝鲜时报》，2010年10月13日

[2] 关于这一概念的充分解释，参见本书作者2004年的另一著作《大抉择》

[3] 乔万尼·阿里吉，《亚洲·史密斯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伦敦，2007年）

[4] 《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成执政最大挑战》，《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4月21日

结论 美国的双重角色

人类第一个千年的前500年，大约距离现在1500年前，在欧洲比较文明的地区有两个共存的帝国统治，一个是西罗马帝国，另一个是东罗马帝国。罗马城差不多一直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可是到处劫掠的野蛮人围攻了这座城市。罗马的军队长期驻扎在远方规模庞大、巨资建造的要塞，因此罗马在政治上处于过度扩张的状态。到了5世纪中叶，罗马已经接近崩溃。与此同时，基督徒和异教徒互不相让，处于分裂状态下，社会团结被破坏了，沉重的税负和腐败使经济失去了活力。公元476年，罗慕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野蛮人击败，垂死的西罗马帝国正式崩塌了。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东罗马帝国——很快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展示出更强劲的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同时在外交上和安全政策上也比较成功。罗马陷落后，拜占庭帝国又兴旺发达了几个世纪。这个帝国收复了西罗马帝国失去的一些土地，继续生存下去。拜占庭帝国在后期也处于各种矛盾之中。15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推翻了拜占庭帝国。

这个有趣的历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21世纪世界动态的对照。罗马在5世纪中叶的苦难没有破坏拜占庭帝国的发展前景，因为那时的世界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各部分之间在地理、政治和经济上都是相互隔离的。一个帝国的兴衰不能立刻且直接改变另一个帝国的前景。今天，迅捷的通信和即时的金融交易使距离变得没有意义。在当今世界上，那些在经济、金融和军事上最发达的国家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我们这个时代与1500年前非常不同，密切相连的东西方之间要么相互合作，要么相互破坏。

所以，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的主要挑战和地缘政治上的迫切使命有三个：一是要恢复自己的活力，二是要扩大西方的地盘并使之更加生机勃勃，三是要在东方维持各国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建设性地包容中国在全球地位的崛起、预防全球混乱。如果美国不能实现复

兴，它就不能促进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处于稳定平衡之中，那么，关乎人类福祉和最终生存的重大问题就会被搁置下来。如果美国不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计划，西方的衰落就会加快，同时触发东方变得更不稳定。在亚洲，各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竞争最激烈的是中国、印度、日本，这些竞争关系会导致地区的紧张局势，最终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敌对，直至两败俱伤。

然而，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扩大西方，使之成为世界上最稳定、最民主的地区，美国就有能力把实力与原则相结合。扩大了西方是个谋求合作的大西方，这个大西方的地盘将从北美一直延伸到欧洲，然后再进入欧亚大陆拥抱俄罗斯和土耳其，接着跨越地理距离到达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日本，然后是韩国。如此广阔的延伸，肯定能增强西方核心原则对其他文化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在未来几十年里逐渐在世界各地出现多种形式的民主政治文化。

与此同时，美国应该继续与东方合作，东方正处于经济上活跃、金融上有影响力的时期，但充满了潜在的矛盾。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在广泛的问题上相互包容，那么亚洲保持稳定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实际情况可能就是如此，特别是如果美国能一方面使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的盟友日本和解，另一方面减轻中国和印度之间越来越大的敌意。这些并行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漠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亚洲远不止中国一个国家。美国对东方的政策必须考虑到一点，即要谋求亚洲的稳定平衡，不能只局限于和北京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关系。这样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所以，美国为了能有效地在欧亚大陆的西面和东面发挥作用，必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在西面，美国必须推动和维护更大程度、更广泛的统一；在东面，美国必须平衡和协调主要大国的关系。这两个角色都必不可少，而且可以相互支撑。但是，美国为了有资质和能力把这场大戏演成功，就需要向世界展示美国有意愿在国内进行革新。美国应该把注意力从令人生疑的预计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不变的统计学假说，转移到强化国家实力的其他领域，譬如创新、教育、武力和外交的平衡能力、政治领袖的素质、民主生活方式

的吸引力。

对想成为西方复兴的推动者和保证者的美国来说，有几件事要做到：拉近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距离；继续履行对北约的承诺；美国和欧洲要仔细地展开扩大西方的步骤，也许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拥抱土耳其和真正民主化的俄罗斯。美国必须鼓励欧盟进一步统一欧洲，为保障欧盟在地缘政治上发挥作用，美国要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继续保持积极的姿态，同时推动欧洲增加其自身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英国、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主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要继续下去，并且还要拓宽。此外，德国、法国、波兰针对东欧政策的磋商机制需要加强并且扩大，这对欧盟东扩具有关键意义。美国是欧盟计划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激励源，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加，新兴的但仍然脆弱的欧盟可能会支离破碎。

为了在维护西方统一的条件下实现与俄罗斯的战略对接，法国、德国、波兰形成的“魏玛三角形（Weimar Triangle）”，可以在推进和巩固至今为止仍然孱弱的波兰与俄罗斯的和解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不仅能加强波兰的安全感，还能再次向俄罗斯保证与波兰的和解有更大的欧洲背景。只有这样做，俄罗斯和波兰的和解才是全面的。由于德国和波兰的和解已经完成了，这两个和解将为欧洲的稳定做出贡献。但是，为了使波兰与俄罗斯的和解是有效和持久的，必须把和解的层次从政府扩大到民间，展开广泛的面对面接触和大量的教育活动。只在政府之间进行迁就融合，而不植根于民间，那么和解的效果不会长久。1939年，纳粹德国政权和苏俄斯大林的政权曾展开规模宏大的和解活动，但仅过了两年它们之间就爆发了战争。

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和德国的友谊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扮演了历史性角色），后来在民间和文化层面上成功地推广开来。甚至法国和德国对相关历史叙述都变得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就为真正友好的邻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两国和平同盟的基础就变得稳固了。波兰与俄罗斯的和解，要按照一模一样的过程进行，和解进程加快后，

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国际效果。此外，波兰不仅能在欧洲向俄罗斯打开大门上发挥关键性作用，还能鼓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沿着同样的方向采取各自的行动，从而增加俄罗斯跟进的兴趣。令人期待的西方扩大的历史性进程必须有战略作为指引，同时要保证基础是牢固的。该进程背后还要有更大的大西洋同盟的支持，在大西洋同盟中，波兰与德国有着真正的伙伴关系，而德国和法国的友谊又密切联系。

上述计划需要美国和欧洲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在战略上要谨慎从事。俄罗斯自身要进化，以满足欧盟的标准。但是，从长远看，俄罗斯不愿丧失这个机会，特别是在土耳其和欧盟在解决目前障碍方面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看，俄罗斯公众中有一大部分人已经在加入欧盟方面采取了比俄罗斯政府更加积极的态度。2011年初，德国的国际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在俄罗斯做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23%的俄罗斯人感觉俄罗斯在2年内应该成为欧美的一员，16%的人认为应该在未来2~5年内，9%的人认为应该在未来5~10年，6%的人认为应该在更长远的未来。另一方面，有28%的人感到不肯定，只有18%的人坚决反对。虽然这么多俄罗斯人倾向于加入欧盟，但俄罗斯公众一般不清楚欧盟成员国的确切标准特征。俄罗斯加入欧盟最可能的情况可能与土耳其类似，准许过程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停止，然后又突然开始，很可能是按阶段递进的，其中需要一些过渡期的安排。然而，此时去绘制西方扩大化后的具体结构蓝图恐怕为时太早。

然而，如果美国不去促进更加统一的西方，可怕的后果可能接踵而至。欧洲人历史上的怨恨可能会重新冒头，新的利益冲突会产生，短视的竞争伙伴可能会成型。俄罗斯可以利用其能源资产分裂西方，西方的分裂使俄罗斯变得大胆，肯定会谋求迅速吞并乌克兰，俄罗斯的帝国野心也会再次苏醒，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混乱。由于欧洲处于被动状态，个别欧洲国家为了谋求更大的商业机会，可能会去迁就俄罗斯。你可以想象得出一种情况，俄罗斯与德国或者意大利建立起特殊关系，为的是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由于欧盟内部纷争加剧，走向崩溃，英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变得与美国更加贴近。法国和英国也会拉近距离，并怀疑地观察着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则绝望地请求

美国提供额外安全保证。这样的结局不是一个新的更加有活力的西方，而是不断走向分裂的西方。如此发展，西方只能变得更加短视。

另一方面，分裂的西方不会有信心与中国在全球进行整体竞争。中国至今没有宣称，指导中国获得成功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国也很小心地不让意识形态作为与关键国家建立关系的核心点，原因是美国发现国家之间进行妥协时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与俄罗斯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美国和中国都比较明智地拥护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概念。美国确实经常批评中国侵犯人权，但美国很小心地不去污辱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但是，即使在这样敌对情绪不高的环境里，与中国的竞争也是难免的。一个扩大了、恢复了活力的西方，将会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因为西方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证明西方的发展模式更适合满足政治上觉醒了的大众。

但是，如果焦虑的美国和过度自信的中国滑入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敌对之中，双方很有可能会开始进行互相破坏的意识形态战争。美国可能会争辩说，中国的成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福利。中国人将把美国的说法解读为，这是一种企图破坏，甚至是分裂中国制度的行为。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面前会越来越把自己说成是在拒绝西方霸权，把西方描绘成贪婪的弱肉强食者，借以从意识形态上吸引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早就对西方（近来美国变成目标）充满敌意的历史描述深信不疑。所以，美国和中国应该用智慧去获得自己的利益，共同对意识形态进行自我抑制比较符合双方的利益。双方应该抵御攻击对方的快感，不应该把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普遍化，不应该相互妖魔化对方。

为了亚洲的长期稳定，美国要扮演平衡者和调解者的角色。美国应该避免直接军事介入亚洲，尽量谋求在远东关键国家之间实现和解，最突出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日本。在新东方，指导美国政策的最根本性的原则必须是：只有当那些与美国有军事部署长期国际协定的国家受到敌对攻击时，美国才能在亚洲大陆用兵。

从本质上看，美国在亚洲扮演地区稳定平衡者的角色，应该复制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间在欧洲事务上扮演的角色。美国能够并且应该帮助亚洲摆脱争夺地区统治者的竞争，方法是仲裁矛盾，弥补潜在竞争对手之间的实力差异。为此，美国应该尊重中国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维护远东大陆稳定的特殊角色。与中国针对地区稳定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不仅有助于减少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还可以减少中国和日本之间，或者中国和印度之间，甚至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对待中亚国家和资源方面上的误判。所以，美国在亚洲的平衡作用最终对中国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认识到，一个不属于亚洲的大国不能把稳定强加给亚洲（朝鲜战争无果、越南战争失败、无缘无故发动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久拖未决的阿富汗冲突），至少不能全由美国直接使用武力去强加。美国确实在努力地维护亚洲的稳定，但常常弄巧成拙，近年来重复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美国正在重现欧洲在20世纪的悲剧。如果美国积极与印度（或与其他亚洲大陆国家）塑造一个反华同盟，或者积极促进日本反华军事化，其结果会是危险的相互怨恨。亚洲21世纪的地缘政治平衡，应该是建立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并在国家之间形成建设性的关系，不应该让不属于亚洲的强国介入建立一些分裂地区的军事同盟。

所以，当美国在东方扮演平衡者和调解者角色的时候，需要一个基本指导原则，那就是除了对日本和韩国的承诺之外，美国不应该被拖入在亚洲大陆强国爆发的战争。事实上，这类战争使参战国日益衰弱，美国重要的利益是不受这类战争威胁的。但至于日本和韩国，美国已经在二战后的50多年来一直与它们密不可分。如果日本和韩国开始怀疑与美国签署长期协定的耐久性，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和自信将会受到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也会同时削弱。此外，日本是个海上岛国，从这一点看，美国与它在远东主要盟友日本的关系有点儿像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冷战不确定岁月中美国与英国的关系。韩国目前处于和朝鲜对峙的状态，是美国与日本关系的延伸。如果美国不能可靠地履行协定保护这两个国家，美国在远东的长期利益将会受到损害。然而，美国可以发挥建设性作

用，促使各方小心行事，从而避免为保护日本或者韩国而去打高代价的战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以通过政治、外交、经济援助手段使地区各国实力达到平衡。美国这样做，既可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又可以对亚洲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在东方的和解者角色尤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促进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和解方面。美国可以通过美日关系去促进中国和日本和解，这应该是进一步发展美日中合作三角形关系的联合努力的跳板。中国的地区实力增长后，各方都会有战略担忧，这个美日中合作三角形关系为消除人们对中国的担忧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基础。以欧洲为例，如果没有法国和德国的逐步和解，就没有德国和波兰的和解，也就没有非正式的德法波安全协调机制，那么最终就没有欧洲的稳定。所以，培养深刻的中日关系是源于慎重考虑的，特别是要在社会层次上和文化层次上。这同样是东亚更稳定的出发点。

在这个三角形关系中，中国与日本和解将加强和巩固更加全面的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人知道美国对日本的承诺是坚定的，知道美国和日本的联系是深刻和真实的，知道日本的安全直接依靠美国。日本人也知道，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对双方都是毁灭性的。所以，美国与中国对接，能从侧面对日本的安全和福祉有帮助。考虑到这种动态关系，中国不会把美国支持日本的安全看作威胁。同样，尽管美国和中国追求更紧密的、更加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几乎形成非正式的地缘政治的“G-2”关系，但日本也不会把这看作威胁。深入发展这个三角形关系，还能减少日本对人民币最终升格为世界第三大货币的担忧，这样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份额，从而减轻美国对中国未来角色的焦虑。

简言之，美国应该在亚洲发挥积极的作用，不仅要促进地区稳定，还要进一步创造条件使中美关系和平地、合作地演变，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经济全球伙伴关系。确实，中美关系也许会变成一场严峻的能力考验，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最有动力的欧亚大陆需要一起把中国的国内成功与亚洲的地区稳定结合在一起。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受到挑战的时候，有能力应对紧急局面。但是，21世纪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挑战。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变得在政治上觉醒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不停地忙碌着。这个世界还经历着全球实力扩散的过程，东方正在迅速崛起几个野心勃勃的强者。所以，今天的世界不愿被一个强国支配，即使这个强国像美国那样在军事和经济上极具影响力。但是，既然美国还不是罗马帝国，中国也还不是拜占庭帝国，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就最终不仅依靠美国自我复兴的能力，还依靠美国明智地采取行动，在亟待复兴的西方扮演推动者和保证者的角色，在新崛起的东方扮演平衡者和调解者的角色。

[1] Low Countries，特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2] 南斯拉夫，1929-2003年建立于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现已解体。

[3] 摩尼教（Manichean），又称作牟尼教、明教，是一个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为西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有着非黑即白的世界观。

[4] 2010年的一份皮尤调查结果显示，在土耳其、埃及、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17%、17%、21%、52%、17%。该调查还显示，当被问及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或“相当程度上”考虑到受访者所在国家的利益时，土耳其、埃及、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的受访者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分别为9%、15%、26%、19%、22%。

2008年一份针对西方人自私与傲慢形象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对象中，81%的印度尼西亚人、73%的约旦人、69%的土耳其人、67%的英国穆斯林、63%的埃及人、57%的德国穆斯林、56%的尼日利亚人、54%的巴基斯坦人、51%的法国穆斯林、50%的西班牙穆斯林将西方人同“自私”联系在一起。该调查还显示，受访对象中，74%的尼日利亚人、72%的印度尼西亚人、67%的土耳其人、64%的英国穆斯林、53%的巴基斯坦人、49%的埃及人、48%的约旦人、48%的德国穆斯林、45%的法国穆斯林、43%的西班牙穆斯林人将西方人同“傲慢”联系在一起。

[5] 车臣，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并非独立国家。

[6] Lafayette，法国将领、政治家。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支援美国独立事业，后参加法国革命。

[7] Kosciuszko，1794年波兰民族起义的领袖。

[8] Kossuth，1849年匈牙利共和国元首。

[9] Alexis de Tocqueville，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10] Juan Domingo Perón，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

[11] 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193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两次出任巴西总统。

[12] Jean-Paul Sartre，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译注

[13] Harold Adrian Russell“Kim”Philby，苏联在冷战时期潜伏在英国的间谍，暗中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克格勃效力，提供情报。

[14] Anglicanism, 又称圣公会、安立甘宗、英国国教派, 过去属于天主教(大公教会)中的一个教派, 而目前属于英国(严格地说是英格兰)的国教。圣公宗的教义以圣经为教义基础, 在持守传统教义的同时, 主张在具体解释上兼容各家之说, 在天主教和其他新教宗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

[15] Quaker, 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

[16] Roger Charles Altman, 克林顿政府副财政部长、银行家。

[17] Richard Nathan Haass,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和前国务卿克林·鲍威尔的幕僚。

[18]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华尔街的终结》(纽约: 企鹅出版社, 2010)一书中提供了以下具有说服力的数据, 说明了美国人自己制造的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二十国集团的平均赤字水平从1%增至8%(第294页)。

截至2009年, 美国的国债水平达到人均2.4万美元——其中2500美元是欠中国的债务(第294页)。

美国的国家财富总量从64万亿美元减至51万亿美元(第284页)。

美国的失业率达10.2%(第284页)。

美国的就业岗位减少了800万个(第284页)。

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的案例, 从2005年的每月7.4万个增至2008年夏天的每月28万个, 到了2009年7月甚至达到36万个之多(第147、283页)。

2009年, 银行以每周3家的速度在倒闭(第282页)。

2009年春, 1500万户美国家庭的住房贷款额超过了他们的房屋市值(第282页)。

GDP一度下降3.8%——这是自二战军事行动结束后GDP下降最严重的一次(第282页)。

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第282页)。

股市下跌57%——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跌幅(第281页)。

[19] racial profiling, 又译种族脸谱化, 指执法机关在判断某一类特定犯罪或违法行为的嫌疑人身份时, 将种族或族群特征列入考虑范围, 进而可能导致在破案过程中更多地怀疑某一族群的作案嫌疑。20世纪末期, 此种做法由于执法机关可能滥用职权而在美国引发了公众的争议。也有民权活动家提议反对警察在破案时进行种族归纳。

[20] Pashtuns, 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的主要穆斯林民族。

[21] “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是苏联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22] Mikhail Bakunin, 1814年生于俄国, 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 是在俄国倡导恐怖主义的著名人物。他与马克思的分歧, 导致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发生分裂。

[23]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另一本书《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 中对欧亚大陆的描述依然正确：“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欧亚大陆拥有约75%的世界人口。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的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主导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

[24] 地中海联盟(*Mediterranean Union*)，由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导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该组织由欧盟成员国和地中海沿岸的非欧盟成员国组成。萨科齐成立该组织的原目的在于扭转土耳其致力加入欧盟的目标，但在土耳其获得保证此组织将不是取代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折中方案后，土耳其接受邀请参与该组织。地中海联盟于2008年7月13日在法国巴黎由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正式宣告地中海联盟成立。

[25] 菲利普·约翰·冯·斯特赫伯格(*Philip Johan van Strahlberg*)，瑞典地理学家，他曾早在1700年左右旅行穿越了俄国，他写了一本名为《东北欧和亚洲的历史地理描述》的书，使欧亚分界线这一说法广为人知(*London: W. Innys and R. Manby, 1738*)。

[26] 2007年春末，爱沙尼亚在拆除了首都一处苏军的雕塑后，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攻击来源不明。2009年，俄罗斯在西部边境展开一次大规模军演，代号“西方”，军演模拟对西方入侵者进行反击(未说明是谁)，军演的高潮是对西方邻国实施核打击(也未说明是谁)。尽管俄罗斯和中国经常相互示好，但俄罗斯于2010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展开一次大规模军演，代号“东方”的军演模拟一支敌军威胁俄罗斯远东的领土完整。

珍珠港事件彻底使美国卷入二战，
是导致后来日本和轴心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

一本书了解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的决策幕后

前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研究员堀田江理作品

《柯克斯书评》年度最佳非小说类书籍

日本 1941

导向深渊的决策

[日] 堀田江理(Eiji Hotta)◎著
马文博◎译

新华出版社

版权信息

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日）堀田江理著；马文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5

书名原文：Japan1941：Countdown to Infamy

ISBN 978-7-5166-5103-2

I.①日... II.①堀.....②马... III.①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研究 IV.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6983号

目录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第一章 战争传闻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第八章 “朱诺见”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尾声 新的开始

主要人物

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中文版序

1941年12月，日本决定进攻美国及其盟友，本书把焦点集中在日本作出这一灾难性决定之前的8个月。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当时，日本企划院估计美国的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也本可以避免这一对决。除了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关注，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日本与中国以及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关系。

中国对于1941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战结束前，对日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顽强而难以制服的对手，日本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却从来无法将中国打败。正如每位中国读者所知，日本自1931年起开始对中国东北积极进行军事扩张，自1937年7月起，日本为了征服中国大陆而开启残酷的战争。1940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尽管日本在军事上占上风，但中国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资源的日本铤而走险，侵入东南亚，这冒着卷入一场新战争的风险，但自相矛盾的是，这样做日本才能继续与中国无休止地打下去。

当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不如意与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没有必然联系，但日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控制中国的确影响到日本最高领导人的政策判断。到1941年秋，美国要求日军从中国撤出，这成为阻碍美日外交谈判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华盛顿对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说，在美日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去掉哈姆雷特这一角色一样”。但东京的领导人不同意这样认为。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官方解释是，日本被美国这一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实施的惩罚性经济制裁措施逼上了绝路，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看

法说明，日本领导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多年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进一步挺进印度支那才招致了制裁。日本还为发动战争寻找正当理由，认为发动战争是为了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其他地区（而与此同时却在攻打中国的亚洲同胞）。日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自己是在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声叫嚣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这种歪曲事实的观点。许多日本人仍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是防御性质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这场毫无意义又损失惨重的战争，他们的内心会难以承受，而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就会感到轻松得多。

然而，正如本书再三论证的那样，日本拥有选择权。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开高层会议，探讨战争以外的选项，这说明日本领导层心里清楚，与西方开战将无法获胜，因此应该避免这样做。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出面阻止日本的黠武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正是日本已为战争作好了全面准备。虽然不论在政府还是军方，日本的决策过程称不上独裁，但基于共识建立的政府阻碍了有意义的直接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参战在内的重大决定的责任分摊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导人之间，最终由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来批准，而天皇本应被视为凌驾于政治之上。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通过对个别领导人的详细剖析，包括近卫文麿、松冈洋右、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我所寻求的不是原谅，而是剖析悲剧人物的弱点与缺陷。

显然，一场战争不会无缘无故打起来。日本说到底就是一个侵略者，首先入侵中国，其次是亚太其他地区，日本主动发动袭击，早就在该地区践行各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入侵，盲目否认这些事实没有意义。同时，我们应该从更加广泛的历史角度审视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及令人忧虑的中日关系。虽然当今两国关系紧张，但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敌对并不总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即使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后，日本精英阶层仍然崇拜中国文明的辉煌，他们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熟知程度与他们掌握西

方语言的才能一样突出。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也将日本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典范。所以在1905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国民党前身（中国同盟会）的地点是在东京，这一点也不偶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两国能够相互学习、互惠互利的地方还有很多。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曾总结说，历史“是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这种对话必须不断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挑战、修改并重新注入活力，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理解。显然，让历史问题政治化来解决短期问题不会改变历史及书写历史的宏观进程。我希望在这一持续性对话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最后非常感谢新华出版社和译者马文博将本书带给中国读者。

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1941年12月8日清晨，雾，大和民族被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惊醒。7点刚过，日本人得知，该国“黎明前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和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彼时日本已成功袭击了珍珠港。第一批战机于日本当地时间凌晨1：30起飞，清晨5：30完成了这次突袭。上午11：30，日本袭击美国瓦胡岛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确切消息传到日本，整个国家都为之振奋。稍后不久，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日本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和中国香港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实际上，日本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比太平洋行动早了近2小时）。整个这一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6小时常规节目外，为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日本听众特意增加了12小时的特别新闻报道。

由于时差原因，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部队袭击夏威夷时仍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在这次袭击中，日本击沉或损毁了大量美国军舰、飞机及其他军事设施。袭击中丧生及后来伤重不治者共计2400人。日本在发动这次毁灭性袭击前并没有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更没有对美宣战，这让日本声名狼藉。但12月8日当天，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战术细节并不在意，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欢呼雀跃。

日本派飞机偷袭珍珠港时，该国正深陷经济和政治动荡。由于国家不断加强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一种无助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从日本1937年年中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伊始，日本民众曾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很快赢得这场战争。然而，尽管不断传来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的消息，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并不打算放弃。与拿破仑的军队当年在俄国的情况类似，日本军队过于深入艰苦而陌生的中国腹地，难以有效展开军事行动。尽管日本媒体继续大力鼓吹沙文主义，但民众私下却开始质疑，为什么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是前外相、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

(Nomura Kichisaburo) 1941年年初被派往华盛顿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孤立局面。但随后并没有传来好消息，这让日本民众颇为担忧。许多人知道美国对日本一系列举动相当不满，例如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先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与南部等。美国似乎决心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打击日本，除非两国能很快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现短缺，尤其是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由于在中国的战事久拖不决，精壮男子都进入军队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留在农村的人为部队生产更多粮食的压力更大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即使东京最高档的餐厅也只能供应廉价进口大米和土豆，这种大米口感干涩，被当地人讥笑为“老鼠屎”。1941年4月以后，在曾经充满现代生活便利的6大都市，当地居民只有通过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大米。到1941年12月，这一配给制度涵盖了99%的日本民众。对于一个国产大米在国民饮食中占据近乎神圣地位的国家，这如同一场灾难。

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阴郁。曾身穿艳丽和服或新潮西服、流连于影院与舞厅的时尚男女们现在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小说家永井荷风 (Nagai Kafu) 对这些变化深感愤慨。这位年迈随性的都市生活记录者曾经认为，纽约中国城的鸦片烟馆、巴黎蒙马特的咖啡馆和旧日东京的市井街区都是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的地方。他又瘦又高，看起来并不过度讲究衣着，但实际上他既了解也十分在意时尚——这是他出身富裕家庭的结果。但即使以他独特的审美观来判断，他也觉得日本人变得过于不在乎外表了。1940年秋，这位年届六旬的作家在日记中抱怨道：

东京市中心的街景已面目全非。仅仅半年前还热闹繁华的街头，如今却变得安静而毫无生机。晚上6点左右，这儿如往常一样挤满了通勤族，但看看这些都市男女穿的什么衣服啊！说这些人变得没有光彩都是客气了，他们显得老态而土气。女人们似乎也不再注重外表，不费心打扮了。夜晚的街道漆黑一片，人们不得不加紧回家的脚步。那些拼命挤进火车的人相互推挤，一个个看起来与难民无异。

暗淡的都市生活说明，从1940年夏天开始提倡全国节俭的宣传运动完全奏效了，日军在中国战事的拖延是主要推动因素。光“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和“奢侈是敌人”这样的标语牌子就有1500个，悬挂在东京各地（不过也有人在“奢侈是敌人”中间插入一个假名变成“奢侈是极好的 [1] ”）。

妇女爱国社团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主导着这场节俭运动。这些看似正经的妇女以警觉的目光搜寻并告诫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递给她们一张写有“请自重”的卡片。那些烫着头发，戴着戒指，涂抹指甲油、口红，或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也成了攻击目标，因为她们被看作“腐朽”“个人主义”西式生活的拥护者。这种迫害运动有时也会遇到激烈抵抗。曾有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地哭喊：“我受不了！”还有一位“化了妆”的年轻男子趾高气扬地走上街头，对这些爱国的时尚督察员挑衅地说：“你们不打算让我说点什么吗？”但这些反抗行为都只是个例而已。

曾贩卖梦想的百货商场也受到严格监视。每个商场都被要求执行“每名顾客限购一件商品”的政策，以抑制与节俭倡议相抵触的过度消费行为。1935年，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开始让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免费在商场柜台为顾客讲解化妆技巧，其美容润肤霜的销量在两年内提高了23倍。但随着中国战事的深入，“战时爱心包”取代化妆品成为资生堂最畅销的产品。装有小零食、手帕、铅笔和笔记本的爱心包被送往前线士兵手里，以示家中亲人的精神支持。

1940年10月31日夜晩，每个舞厅都挤满了最后肆意疯狂的男男女女，因为第二天所有的舞厅和爵士乐表演都将变为非法（这些活动也被认为有损人们的道德，会危害公共秩序）。《朝日新闻》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形容这些拥挤在舞池中央的人就像“刚下锅的小马铃薯，总是彼此碰撞”。事实上，从1938年年中开始，只有职业女舞者才被允许在舞厅跳舞，由于被迫加入各种妇女社团，这些女舞者的人数已减少了一半。妇女社团竞相抢夺新会员，让她们从事更加“体面”（也更加清贫）的工作，例如打字员和工厂工人。但在1940年10月31日夜晩，即使乐队的告别曲——《友谊地久天长》已演奏完毕，人们仍

不愿离开舞池，仿佛在用一种微小、无力的方式抗拒着即将笼罩日本的漫漫长夜。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改变了一切。成功袭击珍珠港让过去两年日本陷入僵局而产生的暗淡情绪几乎顷刻间转变为狂欢，大多数日本人为此欢欣鼓舞。一男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他还只是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在东京开了家收音机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大排长队，人们等待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预计政府将发布更多特别公告。他此前从未见过父亲一天之中做了那么多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一天，日本人固有的矜持荡然无存。大街上，陌生人相互道贺。东京市中心皇宫外的广场上，人们在地上跪拜，感谢天皇对国家的神圣领导。永井荷风当晚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冷静地观察到，“一个家伙以颤抖的声音发表着演讲”，他显然无法抑制对当日新闻的兴奋之情。这种公开表露的情绪与过去数年政府精心安排的各种胜利庆典形成鲜明对比，政府曾希望借助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中国绵延战事的支持。

日本文人也无法摆脱珍珠港魔咒。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Saito Mokichi）是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Ito Sei）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的确，日俄战争也始于1904年2月8日日本对亚瑟港（Port Arthur）（译者注：旅顺港）俄罗斯军舰的突袭，两天后日本才正式对俄宣战。最终，日本赢得了那场战争。

即使之前不赞成在亚洲扩张的日本人也对日本与西方的交战感到兴奋。在过去10年，日本一再表示要逐步将亚洲从西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不赞成日本扩张的人立刻接受了这种官方立场。而在此之前，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中国与亚洲同胞作战的这种自相矛盾不断折磨着这群人。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表示，他和他的朋友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斗而战。

尽管日本在12月8日充满欢庆情绪，但仍然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表示怀疑，甚至担忧。人们私下的情感也常常与公开表露的兴奋有很大不同。许多人只是厌倦了战争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束缚，还有人十分担心他们的爱人可能必须奔赴战场。

在距离东京东北约70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9岁男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的母亲在屋外焦急地等候他，母亲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流下的不是欢快的泪水，而是担心其他6个儿子的安危。假如这场战争与中日间的战争一样长久，那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也可能被带走。村子里各家各户深深的哀伤与电台传来的欢快声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让小男孩印象深刻。

少数对西方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人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深知日本资源有限，确信日本最终会失败。一位在名古屋三菱重工工作的年轻人仍然记得，那日在工作中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后，他产生一种混合着兴奋与害怕的奇怪感觉。尽管他对成功袭击珍珠港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担忧日本的前途。他所在的制造“零式”战机的工厂也将在几年后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他的同事大多被炸死了，而他侥幸捡了条命。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欢愉气氛里，表达上述种种关切可能会以不够爱国的罪名遭到逮捕。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军事胜利让大多数日本人变得狂热，使他们至少暂时忘记了等待他们的艰难时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珍珠港事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声音从容而坚定：“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罗斯福的阁僚们最初要求总统向国会陈述日本过往在国际上的种种劣迹。但罗斯福最后决定发表仅500字的讲话，以便

将他的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他表示，日本发动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

罗斯福总统通过这一策略成功在国内激起针对日本的强烈情绪。曾在参加欧战问题上与罗斯福争执多年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再反对，罗斯福对日宣战的提案立刻获得国会批准，只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反战主义者、共和党议员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投了反对票。从这一历史时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国人的心里，并在热门歌曲《铭记珍珠港》那强有力的口号中不断强化。这首在珍珠港事发10天内录制的歌曲这样激励着美国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我们将要上战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正如当年的阿拉莫……让我们铭记珍珠港，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遭受日本袭击之前，夏威夷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就如同另外一个国家。讽刺的是，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占到夏威夷总人口的将近40%。如今，位于平静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已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永恒不变的核心。

珍珠港事件也改变了战争其他方的命运。蒋介石听闻珍珠港遇袭后顿时非常兴奋。有消息说他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玛利亚》并跳起了舞（蒋介石当时已皈依循道公会）。英国数月来的独自作战也终于结束了。温斯顿·丘吉尔在与美国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共进晚餐时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向他告知美国遇袭的情况。丘吉尔说，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怀着解救与感恩之情入眠”。4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这又让丘吉尔松了口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影院和戏院临时取消了当晚的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首相东条英机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爱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被正式禁播。当晚，观众们听到的不是美国影星吉米·斯图尔特的声音，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声音。

东条英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秃顶中年男人，除了他的胡子外，没

有什么显著特征。他夸张的龅牙形象只存在于西方漫画中，但他的确不像一位让自己的国家与最强大敌人伍的那种政治领袖。他朗诵着《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他的嗓音毫无特点，发音矫情得就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尽管大日本帝国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能使日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但美国不肯做出丝毫让步。非但如此，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作出让步，包括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抛弃（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并废除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即使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仍然坚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美国至今仍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颜面扫地，无法完成“支那事变”（译者注：全面侵华战争）开创的事业，而且日本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东条英机片面地解释了袭击珍珠港的原因，强调日本主动发起的战争只是出于“自卫”。他如实表达了日本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更大认同的渴望，所有这些可粗略概括为“反西方主义”。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浓重的演讲，而他没讲的内容更值得关注。

日本领导层对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许多人对他们的决定仍然极度怀疑，犹豫不决。诚然，正如东条的一句名言所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里提及的清水寺是位于京都的佛教寺院，以突出悬崖外的平台而闻名。人们常引述这句话作为东条英机鲁莽冒险主义的象征。外界认为他是盲目将日本推向战争的军事独裁者，但他在决策时也犹豫不决，尤其在发动珍珠港袭击前的两个月。在政府关于是否开战的最后讨论中，东条从始至终都清楚日本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时，他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虽然一些日本领导人对胜利抱有希望，但没有人对日本的最终胜利信心满满。东条的前任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e Fumimaro）没有军队背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他陆续担任日本首相长达近3年。近卫文麿鲁莽而极权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近卫明确反对与西方开战。他的女婿兼助手细川护贞（Hosokawa Morisada）说，近卫听闻日本对西方开战的消息后，他惊讶地仅说了这么一句话：“究竟怎么回事！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这（日本的有利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

与近卫文麿不同，小说家伊藤整无法接触到政治或战略信息，但他的直觉却是对的。12月22日，在他兴奋地将珍珠港事件比作日俄战争的两个星期后，伊藤整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他们至今只宣布在登陆马来亚和菲律宾时损失了两艘船只。难道日本军队在此之后再没有其他任何损失了吗？还是他们规定不允许公布我方的损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会感到非常担忧。

无论对于战争走向有着怎样的担忧，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不仅为了日本，更是为了全亚洲的解放。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一项有意义的事业献身，而不是相反。

的确，随着西方列强在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相继被日本击败，日本开始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名噪一时。这个共荣圈内几乎所有国家当时仍属于西方殖民地，包括缅甸、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以及菲律宾（但日本入侵时菲律宾不再是殖民地）。因此日本占领军可以借机宣称他们解放了受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帮助他们完成社会重建，融入日本领导下的多元文化、经济和政治集团。尽管披着教化使命的外衣，但“大东亚共荣圈”首先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服务，意在加强对东南亚和东亚大量资源的控制，以帮助日本继续战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需求将愈加紧迫。

由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惨败，日本帝国海军势如破竹的胜势结束了。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与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是同一团队。但这一次，日本损失了289架飞机和4艘航母，以及海军花费数年培养的优秀飞行员，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中途岛战役证明，日本在珍珠港并未把敌人真正摧毁。

1941年12月7日，在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的指挥下，日本飞行员的确完成了打击8艘美军战列舰的首要目标，其中击沉4艘、摧毁4艘。但南云忠一的部队却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比如储油罐和弹药库躲过了一劫，修理厂也没有遭到袭击，这让绝大多数受损战舰很快得到修复，甚至还提升了性能。遭到日本袭击的8艘战舰中，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彻底毁了。更重要的是，袭击发生时美军航母并不在珍珠港，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大捷埋下伏笔。

中途岛战役后，日本的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本人肯定不了解他们国家的失败，这一点伊藤整已经在1941年12月的日记中质疑过。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开始感觉到国家对战事正逐渐失去控制，他们的忍饥挨饿就是佐证之一。由于可供分配的食品太少，食品配给体系开始失灵。领取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而蔬菜、海产品等新鲜食品早已杳无踪迹。一位40多岁的女人在日记里写道：“配给商品并不意味着你能免费得到它们。你要花钱购买每一样东西，但你仍然受到乞丐般的待遇。这真让人恼火！”

营养不良问题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变得更加突出。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只能提供约1400卡路里的能量（一个140磅的成年男性每天需要2400卡路里）。政府号召国民通过“创造性”方式获取食物，例如在黑市上进行买卖，自己种植蔬菜，以及用稻草、锯屑或稻谷壳为原料来烤制“面包”。

到1944年年末，日本本土的生活已变得异常艰难，包括东京、大阪、神户、仙台、名古屋和横滨等主要城市都在美军地毯式轰炸下化为焦土。1945年3月10日凌晨，美军B-29轰炸机给东京造成毁灭性的

打击，东京老城大部分地区化为火海。被邻居尖叫声惊醒的永井荷风匆忙收拾好日记本和手稿，拎着公文包逃出屋外。他穿过翻滚的浓烟，最终到达一座小山上的空地。但他突然想要亲眼看看自己居住了26年的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在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下，他开始往回走。他的房子曾奇迹般逃过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大火，他希望这一次也能发生奇迹。他躲在树木和电线杆背后以避免正指引人们离开危险区的警察，永井设法来到了他家附近，但最终仍被浓浓黑烟挡住了去路。他抬头看见天空突然蹿出的火苗，确信他家楼上的书房着火了。他曾声称对任何人都鲜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却对“失去那些书籍感到痛心疾首”。

永井荷风和他的日记幸存了下来，但许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不清楚具体数字，但据估计当晚遇难人数超过10万人。至此，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珍珠港及其带来的解救众生的快感不过是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

倘若一个人试图向外界解释自己国家不光彩的历史，他往往会被某些浅薄的评论家贴上“狡辩”的标签。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通过回顾珍珠港事件前8个月的历史，我绝对不是想为日本的行为辩护。相反，日本领导人必须为发动这场本可避免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承担最终责任。倘若更加理智，更具耐心，这场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

诚然，我们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控诉前人的罪行，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不去分析发动这场不负责任战争的原因和方式。相反，这一巨大历史疑团迫切需要破解。经过时间的涤荡，彻底抛开情感影响后，人们才能更清晰地审视这段群情激奋的历史时期。

不幸的是，清晰审视历史事件并不容易，日本这一重大决定的背后有众多复杂而矛盾的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无论是出于体制还是个人原因，都极力避免彼此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说话绕弯，让相关历史记录的解读变得尤为困难。对多数军方领导人而言，任何软弱的迹象都是不能流露的，因此，即使他们对战争心存异议，也不可能公开而坚决地反对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人在不同

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下，时而支持开战，时而又加以反对。例如，一些人在政府与军方高层的联络会议上支持战争，又在私下避免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他人所获悉。大家都期待其他人能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记录的缺乏也构成一个重大难题。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Sugiyama Hajime）保留的一份名为《杉山备忘录》的笔记集为了解日本高层会议讨论的议题提供了宝贵线索。这些文件能够保存下来实属偶然，多亏一位下级官员的敏锐直觉，他确信这些文件具有历史价值，所以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命令将其销毁，而是将文件保存在自家地下室的铁皮油桶中。但这些备忘录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备忘录的记录方式混乱，前后不一致。每次会议后，杉山元会向他的高级参谋通报会议内容，这主要依赖于他的笔记和记忆力，其中一位参谋负责记录杉山所讲的内容。当然也不是每个词都记录了下来，记录本身也缺少必要描述，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会议室内的气氛，这更增添了日本重大决定是平白无故做出的这种诡异感受。备忘录的语言时而生硬时而流畅，语言的正式程度也不尽相同，人们很难揣摩真正的语气，更不用说词语间的细微差别。即使是准确无误的记录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些会议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的确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日本领导人在数次官方会议后，刻意作出与西方开战的决定。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侵略者，所以他们更多选择鲁莽而抛弃理性，不情愿却又颇具挑衅地将国家推向战争轨道。从东条英机12月8日的讲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委屈”，即日本因为外部势力毫不讲情面才被迫卷入战争，包括美国的经济制裁、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刻意误读，以及来自更广泛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领导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承受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不计代价地发动战争，要么为了避免战争而将日本多年的战利品拱手让人。日本领导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极端处境正是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一手造成的。随着日本领导人在外交上做出更多误判，他们开始讨论一场不切实际的战

争，同时虚假地宣称自己为此已准备就绪，所以他们在国内外事务中已没有多少可选项，日本就像卡在漏斗的底部一样。这些领导人一定认为，战争这个选项是打破束缚最快捷也最可靠的途径。悲哀的是，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他们为何没能预料到后果？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日本自身。不过，日本及其在1941年所处的环境倒的确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纷乱岁月的产物，那时整个世界都经历着重大变革。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野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人们尝试各种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防止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建立国际联盟、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1922年）、签署《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这些措施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事务的解决，使大小国家朝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但许多国家感觉自己被这一更加民主、高度理想化的新秩序所欺骗。

典型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在领土扩张、实现国家荣耀、壮大军队、通过征服实现自给自足等帝国主义梦想的驱使下，德国发动了一战，最后失败了，被解除了武装。德国将一战后一系列和平协议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主义运动视为战争胜利方企图削弱德国的阴谋，因此德国更加渴望实现最初的野心，这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巧妙地逐步脱离国际联盟，重整军备，再度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把矛头对准奥地利。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大国为了保住和平而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选择牺牲当时中欧唯一存在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西方国家认识到希特勒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并不断抬高价码时，一切为时已晚。到1940年年中，西欧大部分土地已尽数落入纳粹入侵者手中。这样令人沮丧的经历势必会在1941年影响到西方对纳粹盟友日本的想法。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割让和临时统治权。一时间，许多日本人兴奋地拥护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也有人感到不满。持异议者认为，在当时国际体系下“掌权”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私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阻止日本变得真正强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不断萧条的经济让日本面临严峻

的社会问题，所以抵制西方的观点甚嚣尘上。

当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从极右到极左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例如西班牙和法国）。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把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并过度强调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其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进而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激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是日本大家庭仁慈的首领。许多日本人声称，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对内军事化来实现完整。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实现过去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目标已不再可行。

中下级别的年轻军官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大声指责“掌权”国家在大萧条后结成经济团体，对日本商品征收高关税，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展现的经济和军事自信视为对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国内也有特定的敌人。西化的大资本家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团体因支持自由民主而备受指责，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比如暗杀）的对象。虽然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成功营造出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

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所面临的许多或真实或假想的困难，其历史根源都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部世界敞开国门的时代。结束闭关锁国、德川幕府倒台以及之后建立了现代日本，这一系列事件与世界权力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同时发生。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本性，以及中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瓦解都让日本相信，实力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同样在这一时期，不加辨别的各种思潮迅速发展。新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至上论，所有这些都不断强化世界的种族主义观念。尽管日本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肤色，但此时的日本就像一个模范学生，不断加强国力、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快实现工业化，以期

赶上西方的脚步。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日本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成为强国并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军事化，它还需要遵守规则并赢得国际尊重，因此日本需要确保一个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1895年战胜中国清朝后，日本天皇告诫国民：“勿随意轻视其他国家，不要因胜利而自我膨胀，傲慢自大，这会让日本失去其他强国的尊重……我们尤其不能侮辱他国，不能因为胜利而盲目自大，这将使友邦失去对日本的信任。”但这种谦逊到20世纪30年代已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故意忽视。由于日本作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加之历史上遭遇西方不公平待遇而积累的怨恨，日本变得更加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决心（还有常常伴随的好运气）渡过各种国内外危机。这种自信最终驱使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北方，加剧与中国的冲突。基于同样的自信，日本还谋求夺取东南亚的资源，以支持中日战争的持续，直到取得满意的结果，并以此摆脱对外界的经济依赖，于是日本朝着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方向迈出第一步。而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使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殖民地，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胆大妄为。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自以为是地鼓吹对外扩张，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政策失误，也没能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对中国、朝鲜和中国台湾推行的严苛的帝国主义政策。尽管存在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但日本仍然坚信该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日本决策者1941年对国家命运进行抉择时，近乎狂妄的自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官方关于被迫与西方开战的表态折射出长期的历史记忆对其心态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何这场近乎自杀的战争在1941年12月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民众接受。但归根结底，被压抑的负面情绪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领导人普遍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发动战争。

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是日本战后最卓越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反思这一问题时写道：

失败的可能性让人发抖，但（日本领导人）仍然用手蒙住双眼决意向前。假如我们问：“他们想要开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假如我们问：“他们希望避免战争吗？”答案还是肯定的。虽然想要开战，但他们又试图避免战争；虽然想要避免，但又故意选择了走向战争的道路。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政府分裂并不是什么好事。根据宪法，军队可以越过民选政府直接向天皇“进谏”，这一特权通常被称为“最高指挥官的独立性”。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出现两个外交政策完全相反的政府。更糟的是，这两个“政府”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根深蒂固。此外，日本陆军与海军总是不和，每支部队内部在政治倾向、世界观、派系及战略取向方面都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对手也不同。考虑到这些分歧，日本领导人能够同意发动一场无人真正知道如何取胜的战争着实令人意外。

在整个1941年，日本文化固有的对团结的偏好（即使是最浅层的团结）妨碍了该国在关键节点上对国家前途进行坦诚探讨。日语的长处在于谈论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语义细微差别并给对方留有余地，但这种语言不善于阐明想法或引发公开辩论。然而，尽管这些结构、文化、社会甚至语言因素有助于解释事情的真相，但它们不是政治谈判的借口。

一场重大的国家赌博是对日本开战决定最贴切的理解。虽然社会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孤注一掷，但他们最终决定跳入火海是有意为之的。日本认为与希特勒交战的欧洲人无法守护亚洲殖民地，日本军方规划部门的战略家于是大胆推行侵略方案，并让他们的长官相信，决策时间拖得越长，日本可获取的用于战争的资源就越少，美国也将获得更多时间为两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准备。日本认为从地缘角度

看，日美两国必须决定谁来领导亚太地区。假如冲突在所难免，那何不自己掌握时间？客观来说，这是一个通过获取新领土来为战争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的鲁莽战略，这正是古罗马言简意赅的名言“以战养战”所表达的道理。当然，仍有许多日本领导人并不认为与美国爆发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人直到最后阶段仍未完全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实现和解。但没有人愿意为日本错失赢得战略优势的机遇承担责任。

激进冒险的准则是：机会越小，收获越大。日本在近代的两场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受此鼓舞，日本领导人认为，日本总有打赢这场冲动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并不过多考虑该如何取胜。他们既有绝望的心态，又有赌徒般异乎寻常的兴奋感。尤其当他们只关注于短期前景时，这种兴奋感就更加强烈。但无论日本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如何，这场战争太草率了。日本获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完全依赖于不受日本控制的外部条件（除了日本人的意志力外），比如美国很快求和或纳粹德国征服欧洲这样一厢情愿的局面。就像日本领导人宣称被推入战争一样，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还将以某种方式被推向和平。可以这样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领导日本的是一群“赫尔曼”式的人物。赫尔曼是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颠覆性主角，他穷困潦倒，却默默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笔，最后丧失理智。

关于日本开战决定最讽刺的是，如果没有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领导人甚至不敢想象进行如此大的一场赌博。但山本五十六本质上却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作为头脑冷静的政治家，山本在1941年9月底警告日本参谋本部说：“不应进行一场获胜希望如此渺茫的战争。”虽然这位日本最见多识广的指挥官清楚，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战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珍珠港战略。

人们有权在赌桌上挥霍自己的钱财，但日本的国家赌博却在威胁本国人民的生命，而对于那些遭受日本袭击与侵略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受到生命威胁。将如此重大的决定归结为“不可避免”是绝对不够的。驱使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人究竟是谁？背后的原因究竟是

什么？

第一章 战争传闻

瘦高、留着小胡子的近卫文麿公爵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近卫现在成了日本首相，却忧心忡忡。在官方照片中很少能见到近卫的笑容，却时常见他陷入沉思。1941年春天，有太多事让他心情沉重。

自1940年秋开始，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更为紧张的新阶段。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军抵达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让罗斯福政府警觉。日本认为，占领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相关政策的一种应对措施。首先，美国自1938年年中起，对日本所有飞机进口实施“道义禁运”；其次，美国1940年1月又终止了实施30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工业材料的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另外，1940年5月珍珠港被指定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忧虑。而美国上述举措是对日本从侵略中国开始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应。

此外，纳粹德国在欧洲不断扩大的优势也给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主义注入了更多动力。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日本攫取战略物资的时机看似成熟。由于美国的封锁政策，日本缺乏战略物资。日本还想通过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英美两国援助蒋介石的主要运输线，进而结束中日战争。

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尽管占领行动表面上是根据与法国殖民政府签订的防御条约执行的（在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欧洲殖民者仍掌握政权，尽管他们的祖国已被纳粹占领），但日本的行动显然体现了在更大范围控制东南亚的野心。这也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性措施的原因。美国立刻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美进出口银行向蒋介石政府追加了5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美国还对日本实施金属材料禁运，极大限制了日本的金属生产。

美国对日本做出针对性回应后，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德国派遣特使赴东京直接与近卫政府进行协商，绕过坚决反对这一联盟的日本驻德大使。由于征服英国的希望日渐渺茫，德国越发感到焦虑，因而急切想与日本走得更近。德国空军在1940年7月至10月不列颠空战中未取得成果，无法实现入侵英国的计划。德国希望通过与日本和意大利结盟来威慑美国，尽可能减小美国参加欧战的可能性。与此类似，日本也将法西斯联盟看作实力制衡的一种方式。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支持迅速签署结盟协议，认为这将显著增加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为宣扬三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发行了一张题为“三个好朋友”的明信片。在这张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卡片上，来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卡片顶部，是一排希特勒、近卫文麿和墨索里尼的小照片。近卫文麿的照片居中，他看起来有些愚蠢。他帽子上的白色羽毛装饰大概借鉴了19世纪西方法庭的正式装扮，但显得不合时宜。而他的小下巴和茫然的眼神让他显得虚弱又不真实。

这张卡片实际上创作于数年前，用以纪念《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最初由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年底签订，意大利于一年之后加入。尽管人们很容易将1940年建立的新轴心国联盟看作这一旧联络机制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无意成为一个法西斯联盟，日本外务省曾试图劝说波兰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协定，但没有成功；而当时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担任武官的大岛裕志（Oshima Hiroshi）却成功吸引纳粹德国加入这一协定。大岛裕志早年在德国留学，与纳粹关系极为密切，他先后于1938年至1939年以及1940年年底担任过日本驻德大使。此后，只要东京上层决策圈出现建立轴心军事联盟的提议，日本海军省就坚决反对，因为担心这将诱发日本与美英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外，日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颇感忧虑（此时正值日本和苏联在“满洲国”附近的边界开战）。在这份条约的秘密协定中，苏德两国同意共同瓜分波兰，并将波罗的海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撼动

了日本早前与德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接替近卫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对此颇感震惊。平沼在下台时说：“欧洲的事情太复杂、太奇怪了。”

随着德国1940年春季后在欧洲节节胜利，要求巩固日德关系的呼声再次浮现。1940年秋，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吉田善吾（Yoshida Zengo）仍然认为，结成法西斯同盟是个错误，他因强烈反对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心脏病发入院（也有人怀疑吉田入院的原因是自杀未遂），这使他不得不在德国特使抵达东京前辞职。没有吉田善吾的阻挡，再加上海军中仰慕德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首创的闪电战所取得的成功），海军同意支持《三国同盟条约》，只要该条约明确表示日本不因此条约而自动卷入德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海军还因此得到更多预算的承诺）。日本外交自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941年年初，关于战争的传闻开始在日本外交界流传。不断恶化的美日关系促使美国开始撤回驻日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东京的一家美国学校被迫宣布关闭；与此同时，一家主要出版商出版了一本预测并分析日美假想战争的书（获胜方自然是日本），这本书在一个月内售出了5.3万本。

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英国传统上对日态度一直在务实与安抚间游走。1939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与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Craigie）爵士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既不主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但也不给予法理上的承认。该协定签署一年后的1940年7月，英国对日本做出让步，同意关闭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重要补给线。但日本对印度支那北部的占领最终促使英国放弃绥靖政策。1940年12月，英国同意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并重开滇缅公路。加之苏联在北方的威胁，日本从1941年开始要面对更多的敌人，这是日本没有想到的。

对日本民众来说，1941年是食品和燃料愈加短缺的一年。酷爱享

乐的永井荷风因久居美法两国而“无肉不欢”，他总是愿意把钱花在美食上。但此时他开始面临大问题。他在1941年春天抱怨道：“与半年前相比，肉类和蔬菜的质量都急剧下降。”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数月后，他又写道：“我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买不到，大伙都感到很忧虑。”在繁华的银座地区，有一家以出售高档水果而闻名的商店（例如用精美的美纹纸包装的鲜亮苹果，以及分装在木盒中单独出售的香瓜等），但这家商店现在除了一些桃子外也没有东西可卖。至于永井日思夜想的肉，他写道：“牛肉已不见了踪影。”同时，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军用，日本国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饭、取暖；甚至公共汽车也依靠木炭提供动力，这些资源也开始变得短缺。

与使用替代燃料的车辆一样，日本外交也失去了动力。1940年12月14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称呼后者为“亲爱的弗兰克”，他在信中绝望地写道：

想必您之前已看过我的一些电报。在那些电报以及这封信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呈现当前日本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摸索着来获取信息，因为日本也常常处于一种“右手不知左手在干什么”的状况。日本人所谓的“新结构”（近卫文麿的中央集权计划，更为人知的名称是“新体制运动”。该计划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一团糟，政府内部的持续争吵与分歧空前激烈。打着正义的口号一步步向极权主义迈进，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我们曾了解并喜爱的日本了。

格鲁认为美国不得不“阻止日本的中央集权计划”。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如何阻止。

与此同时，美国加入欧洲战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美英两国的规划人员聚集在华盛顿（所谓的美英对话），讨论未来的共同战略。同年3月，《租借法案》的签署终结了美国不干涉主义的借口。这一法案允许美国向同盟国提供军需物资，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尽管罗斯福总统仍面临《中立法案》及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美国对同盟国越来越多的支持也激化了美日关系恶化。即使日本政府缓慢向东南亚殖民地推进，在欧洲结交饱受争议的朋友，与美国及其盟友交恶，但近卫文麿无意让日本与西方开战。近卫领导下的日本仍在努力从中国战场脱身（日本委婉地将这场战争称为“中国事变”，部分原因是日本从未正式向中国宣战，同时也因为日本并未料到战事会持续数年之久）。日本已无力发动另一场战争，这是日本军界与政界高层官员的共识。毕竟他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将是日本无法企及的。1940年，日本93%的石油来自美国。

1941年1月，近卫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吉泽健吉（Yoshizawa Kenkichi）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重启与荷兰当局的谈判，期望不用动武就能确保另一个可替代的石油进口来源。同年2月，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抵达华盛顿就任日本驻美大使。时年62岁的野村笑容可掬，长得颇像个大号泰迪熊。本已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野村被说服承担这一重大使命。与大多数他这一辈的海军同僚一样，他伴随着英日同盟的黄金岁月长大，野村对英、美两国友好，反对开战。野村与罗斯福是旧相识，因此他被认为担任驻美大使的最佳人选。

然而，所有的领导人都清楚，近卫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不在荷属东印度或美国，而在中国。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三军统帅蒋介石从这里发起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为避免针对战备物资的国际制裁，中日双方都未正式将这场事实上的惨烈冲突称为战争。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后被称为“流氓国家”的日本也因这场冲突更加臭名远扬。由于在第一任期内错过了结束中日冲突的机会，当近卫于1940年7月再次就任首相时，他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近卫文麿1937年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首次就任首相。尽管并未经过民选（日本首相传统上由天皇根据有权势的政治寡头们的推荐来任命。这些建立现代日本的政治寡头在人事安排上权力巨大。后来，首相的提名权落到最后一位健在的政治寡头西园寺公望公爵及其高级助手的手中。近卫就是由西园寺提名担任首相的），但似乎整个日本都

希望这位45岁的近卫能成为该国领导人。日本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将天皇崇拜作为国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近卫的出身与年纪都为其公众形象加分。他拥有最高贵的头衔，血统可追溯到显赫的藤原（Fujiwara）家族。藤原家族起源于7世纪，家族成员一度作为摄政王统治日本，并把女儿嫁入皇室。

近卫文麿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普通政客。虽然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他曾在乡间散步时哼唱一首俗气的流行情歌《我想念你》），但他已习惯了骄奢的生活。在他首次被任命为首相时，对食物的极度挑剔曾引起广泛议论。大家都听说过他曾在盛大的政治晚宴中婉拒了最新鲜、最精心准备的生鱼片（人们猜想，近卫可能觉得相对于他的高雅品位，生鱼片太过粗糙了）。为他服务的艺妓会将切好的生鱼片放入一碗沸水中，就像涮火锅一样，然后用勺子（或筷子）喂给他吃。

近卫就任首相前夜，报纸在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半开玩笑地说，他品尝草莓的方式也十分挑剔（事实上，近卫只用消过毒的水来清洗草莓），草莓是他最喜爱的水果。近卫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承认过这些癖好，他解释说，他不吃生食是因为他的胃不好。这种癖好不但没有让近卫显得过于软弱而不足以领导国家，相反增加了他的贵族神秘感和政治魅力。在对近卫满怀崇敬之情的民众看来，近卫不可能犯错。

近卫的名望或许源自这些表层印象，但日本民众的确期盼近卫文麿的任命能够带来变革。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几乎在举国欢呼中就任日本最高政治领导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萧条，经历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还有可能面临以激进改革为名而发动的军事叛乱。近卫的内阁人选立刻让一些机敏的观察家感到失望。由于近卫让上届政府的陆军、海军和法务大臣继续留任，一位专栏作家说，他的选择辜负了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这位专栏作家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前任政府的）一味妥协纵容，我们应该感到警惕。”尽管主要政党在前一年春天获得压倒性胜利，迫使上届政府下台，但近卫拒绝让主要政党成员进入他的内阁。近卫内阁仅有的两名具有党派背景的阁僚来自一个亲军方且支持极权主义的新政党。没有迹象显示，近卫想要复兴日本

千疮百孔的议会制，尽管这一制度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迎来黄金时期。近卫对多党制的厌恶显而易见，但他的个人魅力使日本民众看不到其中潜伏的危险。

近卫就职仅一个月后，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他的政治立场却更加强硬。1937年7月7日夜晩，中国和日本军队爆发小规模冲突，确切起因仍十分具有争议性。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小群日本军人在永定河岸边进行空枪演练（日军根据1901年签署的国际条约驻扎于此地，该条约是在美欧列强为平息义和团运动入侵中国后而签订的）。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日本士兵听见他们的空枪演练遭到很可能来自中国军队的实弹还击。更让他们慌张的是，日军随后在点名时发现其中一名士兵失踪。日本人要求搜查附近村镇，这不在他们通常的控制范围内，因而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随后双方发生口角，开始召集部队。失踪的日本士兵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大概是去附近解手，但这已无关紧要了。中日军队间的小规模冲突很快演变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由于当晚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城外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附近，这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曾记录过这座桥的美丽，因此这一事件在西方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事件”。

刚开始，近卫因忙于国内事务而无暇顾及发生在国外的小规模冲突。他同时还忙着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军官请求赦免，这些军官因前一年发动军事政变并险些取得成功而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近卫的这些努力不仅反映了他对极右翼势力的支持程度，也显示出尽管多次出访海外，但他对外部世界仍一无所知。现在，中国的形势需要他的关注。

充满个人魅力的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曾在1931年策划日本入侵“满洲”，他认为应当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因为更大的敌人苏联潜伏在北方。然而，一些东京和驻扎在中国的官员认为，日本正在错失给蒋介石致命一击的天赐良机，苏联国内正因斯大林的大清洗而陷入混乱，假如日本试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不太可能干预。最终，认为日本还未准备好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观点占了上风，与中国的休战协定也于7月11日夜晩达成。如同前一年许多类

似的小冲突一样，中日双方的此次对抗似乎也被控制在地区冲突的级别。

然而，就在休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近卫以保护冲突地区的日本国民为由，推动了一项向中国华北地区增兵的计划。这一计划暴露了近卫迫切希望收买军中强硬派的意图，强硬派向来对避免战争的安抚政策感到不满。增兵计划很容易被视为战争动员，近卫文麿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尽管双方达成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撤出中国，也不意味着日本怀有扩张目标。

近卫主动在东京展开魅力攻势，为他的中国政策争取支持。7月11日晚间，他在官邸召集议员、金融界和媒体人士，宣布其增兵计划，并号召他们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进行全国动员。第二天的报纸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目的称为“为了充分让（中国人）感到后悔”，而中日两国签署休战协定的新闻要么被搁置角落，要么干脆被忽略。

近卫努力在外人眼中表现出很强硬，包括对蒋介石、政府同僚、参谋本部以及本国民众，他积极将国家上下团结在一起，他深知个人名望是其最大的武器。他并不希望（也可能没有料到）将与中国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认为仅仅通过虚张声势和强硬表态就足以加强日本的地位。他时常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表讲话（近卫于1936年起担任NHK总裁，一直到他1945年12月自杀身亡）。套用当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的话说：“当战争打响后，他指挥日本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这一休战协定到7月20日蒋介石正式批准时已名存实亡。随着战争范围和强度的升级（日本轰炸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中国其他主要城市），近卫却责怪其他人，尤其是军中好战分子，而这些人既无名也不曾露面。1937年夏天，他对日本陆军中校池田纯久（Ikeda Sumihisa）说，冲突是“年轻的陆军军官发动的”。池田纯久曾因对中日战争持反对意见而从中国被调回，他对此回应说：

公爵先生，恐怕不是军队，而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看看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尽管您的政府之前采取避免事态升

级的政策（在您通过言行鼓励那些渴望战争的军官，并赋予他们权力后），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近卫继续采用自相矛盾的政策来实现政治调解，他只想避免国内起冲突。1938年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沦陷，随之发生大规模杀戮、抢掠和强奸，近卫此时错误地认为战争胜利在望，并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傲慢、最强硬的一次讲话。不过，与强硬的措辞相比，近卫尖细的嗓音却阴柔得让人不安。近卫指责“（国民党的）侵略行径让日本帝国忍无可忍”，日本不会与蒋介石接触。大日本帝国“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让（蒋介石政权）付出代价”。但这一傲慢的声明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的暴行以及1937年8月以后对中国多个地区的轰炸不仅缺乏人道，也是自取灭亡。他们没有迫使中国求和，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同时加强了外界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德国轰炸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及随后的相互指责仍让西方记忆犹新。中国战场正成为泥潭，接连胜利使日本得以占领特定的“点”（城市）和“线”（铁路和交通干线）。但国民党部队撤得越远，日本人占领并驻守这些“点”和“线”的难度也就越大。日本人力资源有限，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也有限。蒋介石的临时盟友中国共产党从北方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他们迅速消失，让日本占领城镇和村庄，但日本人离开后又再度出现（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进行抵抗和战斗。共产党人在战时保存实力的做法将有助于他们日后战胜国民党）。

近卫不知该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结果他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一方面同意向中国增兵，主动增加军费预算，签署法律在国内进行更密集战争动员；另一方面他仍寻求与蒋介石直接接触，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每当有和平的希望时，近卫要么满足军队强硬派的期望，要么犹豫不决，或直接做出错误判断。例如，1937年12月初，日本即将攻陷南京时，蒋介石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转达愿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意愿，而近卫拒绝了中国的主动示好。

很显然，外交事务从来都不是近卫的强项，但他极其擅长让其身

边的人觉得他们获得了聆听与关注。他独有、招牌式的伶俐口齿使他能有效应对各种政治派别，并在日本政治最动荡的年代游刃有余地拓展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许这正是他们家族存活下来的原因。但这一特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近卫曾谈道：“我既没有明显的敌人，也没有明显的盟友。一个人即使有5个敌人，他也能在政治上依靠5个真正的盟友。但（我所拥有的）10个盟友，却可能随时变成10个敌人。”

近卫的这种孤立感很可能源于他复杂的成长历程。他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母亲在他出生仅一周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很快再娶，第二任妻子是近卫母亲的妹妹，此后两人育有数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同父异母这么简单。近卫的父亲41岁去世后，近卫或许是这个古老家族最尊贵但绝非最富有的成员。12岁的近卫继承了家族的宅邸，以及他父亲生前政治活动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年幼的公爵感觉遭到了遗弃，终日郁郁寡欢。在同为藤原家族后裔的西园寺公望侯爵（Marquis Saionji Kinmochi）（后来获封公爵）的帮助下，近卫家族才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

近卫读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西园寺，但两人并没有立刻熟络起来。年轻的近卫公爵那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他对西园寺坚持称他为“阁下”感到不快。事实上，两人有许多的共同点。外表上，两人都身形修长，无论是身着昂贵的西装还是不菲的和服，都显得得体、好看。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兼具头脑与野心，相对于两人的家庭背景，这一点很难得。近卫大学毕业步入政坛后，两人越发紧密。西园寺很乐见拥有这样一个聪明的门徒。

务实的西园寺反对神化天皇，但认为天皇对于现代日本的团结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多余而繁复宫廷礼制的创立者要么是无所事事的旧贵族，要么是（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期间）品位差劲的新贵族。然而，尽管不认同赋予等级制度过度的重要性，但西园寺深知在具有等级观念的日本拥有一个贵族头衔的好处，关键是知道如何从这个头衔中谋利。他认为比他年轻40岁的近卫文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里取胜。

遗憾的是，西园寺没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自己年轻的门生。出生于1849年的西园寺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深受19世纪的欧洲影响，他曾作为学生在巴黎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并与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成为朋友。曾与西园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克里孟梭后来成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在十几岁时萌发了政治意识。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王室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政治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最终导致1868年的明治维新。西园寺此后的人生原则就是既要在激烈的政治变化中生存下来，又不牺牲自己。

近卫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分溺爱，所以他与西园寺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对政治哲学充满热情的学生，近卫的学术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似乎从未对他有过吸引力）。近卫深信日本应该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变得更加伟大。他沉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日本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近卫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占据类似的特权地位。他的这一刻板观念在他首次出国之旅后进一步得到巩固。1919年，时年27岁的近卫文麿仍是政坛新人，他陪同西园寺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他感到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而请求西园寺带上他。

近卫发现前往巴黎对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有利。当时，近卫正因情人菊（Kiku）怀上他的孩子而心绪不宁。这个名叫菊的女人原来是一名艺妓，近卫把她从京都带到东京。近卫最初需要她的陪伴以短暂逃离他的家庭。为他延绵子嗣的任务是他妻子的工作，这一点她做得很好。近卫知道，菊怀上的这个孩子将取代自己在菊心中的位置，因此两人也就没有继续维持情人关系的必要了。菊被送回了故乡。在变卖一些家传宝物筹措旅费后，近卫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近卫对巴黎和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呼吁反对英美和平框架》的文章，刊登在一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尽管他并未全盘否定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立一个政府间组织的理念，但他对国际联盟说教式的激进主张深表怀疑。他坚称英美两国制定的战后新秩序与两国宣称的促进民主与和平毫无关系。

相反，他认为这一新秩序反映了英美渴望继续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以加强自己的优势和国际地位。

近卫认为，他的同胞之所以青睐自由国际主义提案，是因为他们感情用事，太容易被“公正”“人性”这样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他以黄种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告诫日本读者要清醒认识到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现实。他说：

这些国家欢迎白人移民，但抵制黄种人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日本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多年愤怒与沮丧的根源。仅仅由于我们的肤色，白人就阻止我们获得工作、租赁房屋和土地。我们有时甚至无法投宿旅店，除非我们有白人做担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糟透了。

近卫这篇情感强烈的文章本来是只为日本国内读者准备的，却被传到外界。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受到位于上海的《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批评，近卫被冠以激进分子的恶名。西园寺认为这篇文章轻率而带有挑衅性，在外交场合也欠妥，对于一个即将随官方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成员来说，这样做不合时宜，西园寺表达了自己的不悦。但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及泛亚洲主义者孙中山在上海邀请近卫共进餐，两人在亚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近卫在巴黎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间秘密会议。他远远地观察着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观察着与会者的肤色构成。由于每个代表团席位有限，近卫无法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设法通过拥有记者证旁听了会议，却在之后被西园寺斥责为有失尊严。近卫还因在公园里摘花而被西园寺责备为“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更让西园寺感到震惊的是，他在无意中听见近卫轻率地调侃着如何与海关官员交谈来摆脱麻烦。

对于近卫这名参议院（日本议会两院之一）新成员来说，此次行程为他开启了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使他得以获得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来认识外交是如何运作的。当他离开代表团独自游历欧洲时，最令

他着迷的是英格兰可爱的花园。他还访问了美国，但他的首次异域冒险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信念，即一战后的各种协议是强加于战败方以维持现状的迦太基式和平。虽然日本是获胜方，但他认为日本人也是失败者。他认为由于白人的歧视，日本将种族平等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宪章的努力才以失败告终。

在返回日本后不久，近卫出版了小册子，记录他西方之行的印象。他思索着日本如何能不用摇尾乞怜即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评论美国因移民问题而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时，近卫写道：

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都厌恶有色人种。这是明摆的事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中。我个人在伦敦感受到的种族压迫比巴黎更多，而这种压迫感最甚的地方还属纽约。

但就是在这个始终鄙视英美种族主义的男人的带领下，日本20年后与纳粹德国（这一所有欧洲政权中最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结为联盟，这真是讽刺至极。

年轻的近卫继续探讨中国对美国公关的成功，哀叹日本在促进民族大业方面的相对失败。他阐述了中国旅美学生如何比日本学生更有效地推销（并唤起美国学生同情）自己的国家。奇怪的是，近卫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日本高调反抗英美不公正待遇的亚洲伙伴。相反，他认为中国想要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以赢得西方尊重和承认，是对日本具有威胁的对手。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超过日本，近卫倡议日本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归根结底，近卫更多的是一名大日本主义者，而非亚洲民族主义者。与许多沙文主义者类似，近卫对伟大的追求往往伴随着深深的不安和孤立感。

于是，近卫有意栽培长子文隆（Fumitaka）进入政界，将他送入一所名叫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的美国私立预科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美国精英层中日本利益的实际支持者。近卫对那些质疑他把儿子送往美国的右翼朋友说，在国外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日本精神，而日本国内的大学则常常将学生的日本精神损耗殆尽。他还表示，国外生活更容易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近卫

将儿子送往美国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他大多数同为贵族出身的助手和朋友都毕业于英美顶级名校。他们具备的社交与语言能力，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更大特权世界的一分子。由于父亲早逝，近卫本人在成长阶段并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他很可能内心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近卫公开反对英美的立场。近卫对中国的态度也毫无疑问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钦佩中国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近卫热衷于宣称日本深受掠夺成性的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害。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一点都不新鲜，但他成功地在公开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又不至显得过度激进和危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因此，日本国内外的评论家常常看不清近卫的真面目；由于他与西园寺公爵貌似亲密的关系，近卫有时甚至被错误地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在西园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这位从前的门生在外交政策上的挑衅言论日益感到失望和忧虑。1937年春天，近卫在女儿婚礼前夜的化装舞会上身着纳粹制服，以类似希特勒的形象示人。这无助于缓和他与西园寺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粗略来看，这不过是贵族阶级的消遣方式。但这样做却让西园寺勃然大怒，于是，近卫在公开表达对纳粹主义的溢美之情方面有所收敛。然而，近卫后来的大多数政策仍然表现出对法西斯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偏好，尤其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称颂的“欧洲新秩序”。这一理念认为，在一个广泛文明的复兴过程中，优等民族注定要领导其他民族，这与近卫亚洲“应以日本为中心”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正是近卫1938年年底宣布意欲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原因。

但他此前政策带来的损害无法被轻易消除。近卫在1938年1月拒绝与蒋介石接触的表态惹恼了这位国民党领导人，阻断了两国未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西园寺私下对他的孙子说：

日本不得不把蒋介石作为合法的谈判对手……中日甲午战争谈判时的中方代表李鸿章同样在日本声名不佳，但他是当时的唯一人选。

因此，我们要接受现实，认清中国在谁的掌控之下，并与这个人进行谈判。

近卫对蒋介石缺乏耐心，所以他倾向于支持日本需要迅速击败中国的看法。

同时，在近卫任内，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久拖不决，日益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有效开展国内动员，日本政府于1937年秋设立企划院，专门负责资源调配。这为《国家总动员法》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部法律最终于1938年4月生效。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该法律赋予国家绝对权力以管控行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法律将日本的半战时经济彻底转变为战时经济，极大减少了原材料向市场的流动，为最后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在微观层面上偏离了其初衷。作家永井荷风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善良的面包店店主因为给员工发奖金而被处以巨额罚款。他哀叹道：“为什么有人会因付出太多而受到惩罚？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这件事充分表明，国家监控无孔不入，人们很容易因为错误的原因遭受惩罚。

由于中日间的战争，日本中心权力的基本结构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后来证明，这种变化是极其重要的。1937年11月，近卫创立了政府与军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国际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联络会议旨在帮助领导人克服政府与军方间的分歧，实现政策统一。联席会议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期间召开次数更为频繁，1941年7月前，会议地点一直在首相官邸；而在近卫第三次就任首相后，会议地点也挪到日本皇宫。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近卫当权期间，国民党出现了另一个亲日政权。近卫支持这个由汪精卫领导的政权，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最大对手。与强硬、务实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是一个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于1938年12月逃离国民党新首都重庆，经历诸多挫折（包括侥幸逃脱暗杀）后，汪精卫政权最终于1940年春在南京宣告成立。促使汪精卫这一举动的既有爱国主义，也有狼子野心，而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谈判伙伴。于是在1940年11月底，日本与德、意两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两个月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布承认汪精卫为中国新领导人。他或许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承认汪精卫政权，毕竟他是近卫一手扶持的。但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时机却糟糕透顶。当时，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已名誉扫地（而且，日本并未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交给汪精卫，而是继续保留了一系列附庸政权，包括“满洲国”、台湾、华北和内蒙古。这削弱了汪精卫在中国的声望）。近卫再一次证明了他任外交事务方面的无能。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日军继续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但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就像是经典黑色喜剧《无止境前行》（*限りなき前進*）中患上妄想症的主人公。这部影片根据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编写的故事拍摄而成，并于1937年中日冲突爆发不久后放映。在影片中，52岁的德丸（Tokumaru）在为公司效力大半辈子后遭到解雇。此前不久，德丸还以为会获得晋升，并开始建造一栋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房屋。现在，沮丧将德丸推向崩溃边缘，他无法再分清妄想与现实，妄想着自己得到了提拔，开始以一位大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公司，这让他的家人和以前的同事相当尴尬。就这样，德丸得以在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无止境前行”。

日本的中国情结也在1941年影响了该国的政治选择。在日本的历史长河中，该国引入（常常通过朝鲜）并融合了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包括文字、儒家思想以及佛教。日本历史上对中国心存敬畏，但作为地理位置孤立的岛国，日本社会也容易与中国保持距离感。但到19世纪40年代，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威胁面前显露出彻头彻尾的无能与软弱。这个顷刻间走向衰败，沉溺于鸦片的国度不再是日本追寻的典范。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经过相对平静的两个半世纪后，日本被迫摒弃自我封闭——闭关锁国限制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衰落意味着，它无法再成为日本的缓冲带，日本不得不独自面对西方列强。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沙皇俄国似乎渴望向日本和中国北方扩张。

作为列强游戏中的绝对新手，日本不得不迅速学习游戏规则。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掌握游戏规则，正是归功于一群有才华和远见的年轻人，这群人缔造了现代日本。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令人惊叹地在西方帝国主义精英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日本从未真正完全融入该俱乐部。西奥多·罗斯福的评论（或者说一种恭维）可以解释其中原因，他将日本称为“荣誉白种人”。日本常常陷入不自信与多疑的状态，既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却又孤立无助。

日本的敏感有时不过是妄想症般的过度反应。但有些时候，日本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受到怠慢，甚至排挤。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权在最初几十年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废除之前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美国的条约直到1911年才失效。这些通过舰炮外交强加于日本的条约剥夺了日本商业与法律主权，迫使日本在多个港口开放对外贸易，实施固定的低关税，并使在日居住的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

甚至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也因西方的介入黯然失色。这场中日两国在1894年至1895年因朝鲜而爆发的战争最终以《马关条约》的签署而终结。条约将福尔摩沙岛（今中国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由于辽东半岛的大连和亚瑟港（中国旅顺）作为中国东北门户的战略位置，辽东半岛成为各大国（尤其是毗邻的俄国和日本）竞相争夺的目标。《马关条约》公之于众后，俄国、法国和德国（在英美两国的默认下）成功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残酷现实。三年后，俄国在这个垂涎已久的半岛获得租赁权。

日本并未就此止步，它继续坚定地追求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更

大范围的领土扩张以及更强大的军队。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开战并获得胜利，其帝国主义美梦终于成真，日本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喝彩，尤其是英美两国。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在1910年被完全吞并。日本还获得俄国此前在“满洲”南部的铁路和矿产权利。日本从俄罗斯帝国手中收回辽东半岛的租赁权，获得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土地，萨哈林岛位于日本北方，长期生活着日本原著民阿伊努人。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改革派人士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崛起，他们纷纷涌向日本，学习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日本人利用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维护国家独立，许多中国人对此颇为推崇，其中就包括孙中山，他将日本视为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一些日本人也对孙中山的事业予以支持，例如利用自身财富资助孙中山民族主义运动的日本影业大亨梅屋庄吉（Umeya Shokichi），他与其他资助孙中山的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有利于整个亚洲未来的发展。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磨公爵（Prince Konoe Atsumaro）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日联盟。在他担任参议员期间，他于1898年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同种文字协会”（the Same Character Society）的文化组织。该组织成员认为，中日两国应该互相帮助，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人种上属于近亲，并共用相同的文字体系。该组织最著名的项目是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学院，毕业生后来纷纷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政治、外交、新闻和经济领域的专家。

尽管在各个民间层面存在加强中日关系的努力，但在国家层面，日本处理对华关系时始终坚持强硬的帝国主义方式。清王朝1912年的土崩瓦解引发中国国内外势力的终极竞争，各方都想进一步控制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占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通过讨价还价、强迫、威胁，以及偶尔使用的武力和政治暗杀（最著名的例子是1928年日本关东军对军阀张作霖的暗杀）等手段获得了各种特权。

1915年，日本显露出对中国更大的野心。日本企图利用中华民国严重的国内危机，并趁欧洲爆发战争之机，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

的“二十一条”，此后不久袁世凯想要自我加冕为拿破仑式的皇帝。刚刚在山东击败德国的日本要求继承前者在该区域的特权，日本还要求将南满铁路区域的租借期延长至21世纪（这一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的区域，其租期本应于1923年到期），以及任命日本人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这几条把中国几乎变成日本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对此进行抵制，日本只好作罢。最终，这段插曲演变为一场公关灾难。日本只是巩固了它已经拥有的权利，却激怒了作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守护者的美国。一些日本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意味着美国否认自己的“门罗主义”，使美国得以介入日本的后院，阻挠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当然，日本的要求激怒了中国。日本对中国山东的领土主张获得巴黎和会支持，以奖励日本在对德战争中加入正义的一方，这进一步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强度大、范围广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在1919年反日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顶点。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利益关切变得尽人皆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最终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同意将山东归还中国。这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一次耻辱的让步）。大体上的外交事件就是这些。

一切皆因石原莞尔大佐策划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而改变。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日本租借铁路区以保护该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利益的关东军士兵炸毁铁路路轨，并宣称是中国抗日人士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对当地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袭击，并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性格古怪但充满号召力的军官石原莞尔几年前曾提出了一个终极战争理论。他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他成为日本为中日间的战争以及最后的太平洋战争进行军备建设的关键人物（尽管石原本人并不赞成中日战争）。石原一直将东西方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认为这种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日本与美国之间，但也可能是日本与苏联之间。这种美化日本英雄主义命运的花言巧语将影响到许多陆军和海军中的普通战略规划人员。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夕，石原担心，蒋介石特有的民族主义自信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在西方日益得到认可已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问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此后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动北伐，以期统一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与共产党闹翻，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发动屠杀，这导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发生短暂分裂，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正是汪精卫。然而，尽管遭遇一系列挫折，北伐仍然在1928年全年继续推进。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与派来保卫日本国民的日军发生冲突。到1931年，蒋介石已被成功塑造为整个中国的名义领导人，尽管他屡遭军阀盟友及共产党的挑战。日本确信，蒋介石正日益倚重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并同时疏远日本，对日措辞强硬。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蒋介石在短时间内获得西方支持代表一种背叛，这与维持中国分裂以让所有大国从中受益的帝国主义长期策略背道而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还高度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崛起。此时，苏联正开展“五年计划”以加强自身经济，同时又在紧邻日本北方的远东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石原莞尔及其部下超越职权范围，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入侵。虽然他们的鲁莽行动让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感到意外，但也不排除行动策划者受到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别领导支持的可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伊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和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等官员希望控制事态。然而，在极端爱国主义媒体的煽动下，石原的冒险行为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公众被各种赞扬野战军勇气和弘扬国家自豪感的新闻报道所包围。主要的几家报纸彼此竞争，纷纷登载日本每一步战略行动的独家照片，突然井喷的发行量让这些报纸获利颇丰。记者也被派往战区，发回一系列吸引眼球的报道，诸如“我国陆军英勇地从长春向吉林挺进”“帝国陆军攻陷齐齐哈尔、伟大精神穿透云霄”等。

此时，这些报纸做出了一项影响力深远的政治选择：自我审查。尽管私下通过一些陆军军官得知，所谓中国精心策划的爆炸不过是个幌子，但所有主流报纸都选择封锁这一消息。他们从未向读者透露这

个虚假的借口，他们还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关东军的声明，不断炮制号称“揭露‘满洲事变’真相”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还配有照片，展示了遭到毁坏的铁路路基，以及一个据称应为此事负责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实际上，这名中国士兵是被日本人杀害后放置在铁路旁边的）。

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看似明确的民意支持，迫使若槻政府在9月24日勉强批准了军事行动。这样一种模式就被确定下来：极其被动的政府同意军事入侵，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纵容这种侵略行为。由于无法控制军方，若槻于当年12月辞职，继任者是反对党党首犬养毅（Inukai Tsuyoshi）。

到1932年2月，日军已控制了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卫戍部队在没有获得正式许可的情况下即可占领中国部分地区，这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标志着迈向政治孤立的重要一步，即使很少有日本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东军扶持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但国际谴责也随之而来。同年5月15日，一伙年轻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军校学员闯入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行刺者对犬养毅温和的对华立场颇为不满，害怕他可能放弃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在国际联盟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都堪称这一国际组织的模范成员，但日本却在1933年3月因“满洲国”问题宣布放弃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

不过，由于双方的现实利益，中日关系并未完全瘫痪。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始终在更加慎重、甚至友好的中国政策与军方压力下形成的强硬政策之间摇摆。而蒋介石忙于在中国其他地区巩固自己的控制力，尤其忙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与建立“苏维埃共

和国”的共产党进行战斗，他似乎也愿意暂时忽略“满洲国”这一棘手问题。毫无疑问，蒋介石竭力避免在中国北方与日本爆发重大冲突。关东军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它首先将日本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以西的热河省（这一地区1933年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进一步扩展至附近的河北和察哈尔（今属内蒙古）地区。在中日两国1933年和1935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国民党接受了耻辱性条款，包括从华北部分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国民党组织撤出“满洲国”周边地区以及在河北东部和察哈尔建立亲日自治政府等。

在国内，日本社会努力从全球大萧条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而民众的忧虑与不安却日益加重。在这种惨淡氛围下，部分青年军官在1936年2月6日发动了一场几近成功的政变，他们在投降前杀害了数位政府关键人物。此次刺杀行动的头号目标西园寺公爵逃过一劫。广田弘毅（Hirota Koki）内阁于3月9日成立，但他得以就任首相是因为近卫文麿公爵由于身体原因婉拒了这一职位（近卫不愿意对同情反叛军官的势力进行清洗，他本人希望与这些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后来他试图赦免这些遭起诉的军官，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广田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要求扩充军备为与中国、苏联及西方大国之间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制定了进军东南亚的计划。中国立刻感受到日本的政策变化，这也是造成马可·波罗桥（卢沟桥）紧张气氛的原因。在没有事先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日军人数在1936年增长至原来的3倍，达到将近6000人。

中国国内局势此时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的扩张愿望与蒋介石领导强大而统一中国的野心已无法继续共存。由于之前对日本不断妥协让步，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宣传面前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共产党称蒋介石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不惜出卖中国同胞的国家叛徒，迫使蒋介石重新思考与日本的协议。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年轻的张学良将军（被日本人刺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所劫持。张学良想让蒋介石与共产党一道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为了维持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蒋介石决定，再也不能看起来对日软弱了。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与日军一样，将击败（中国或苏联

的)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变化又进一步促使日本军方强硬派推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尤其在中国北方),以维持日本现有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越来越多的男性(包括那些年近四旬的人)被派往战区。1873年颁布的《义务征兵条例》在1927年被适用范围更广的《兵役法》所取代,后者一直实施到1945年。在这一新体系下,陆军征召入伍的新兵将服现役两年,并在随后大约15年的时间里成为预备役。而在海军现役和预备役的时限分别为3年和9年。随着中日战争升级,为了“大批量生产”战士,军方放宽了健康与体质要求(例如,最低身高要求由1.55米降至1.5米)。许多迫切想要逃避兵役的人佯装身体有残疾或疾病。一些人在体格检查前喝下超大瓶的酱油,以期造成暂时性的肝脏或心脏衰竭迹象,也有人通过服用泻药减去大量体重。但无论如何,征兵还在继续。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由1935年的大约20%提高到1937年的23%,并在1939年进一步提高至47%。

一个名叫潮津吉次郎(Ushiotsu Kichijiro)的士兵(由于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士兵,让我们暂且叫他大兵潮津)刚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他所在部队在扬子江(长江)河口登陆前,这个来自京都的小店老板从未听过枪声。他也从未闻过将他绊倒的一具中国士兵腐尸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恶臭,这具臭气熏天的死尸上布满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苍蝇,而苍蝇发出的巨大嗡嗡声让他无法相信它们仅仅只是昆虫。已过而立之年的潮津对自己的新身份毫无准备。

大兵潮津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一座城市执行巡逻任务,检查房屋内是否还有人。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主动接近他。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女孩自愿将他领到了自己的床上。女孩不顾一切的绝望姿态让他

让感到惊讶和难过，他完全知道，要是其他人早就顺势占了便宜（日本最终决定设立“慰安妇”，也就是从朝鲜半岛及其他地方强制征召的性奴隶。其主要目的是对日本士兵的欲望加以些许控制）。

还有一次，潮津见到一个刚生产完的年轻中国妇女蹒跚走出她的屋子以躲避枪战。她最后为流弹所杀，手中还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连脐带都没来得及剪断。同样让人难以忘却的是，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抛入河中，在他们挣扎求生时将其射杀，鲜血把河水染红，潮津却只能无力地看着。

1937年10月末，潮津听到传闻说，日本与国民党的谈判陷入僵局，他感到很沮丧，担心这场预期中迅速而简单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在前往南京的危险路途中，潮津又惊又喜地遇到自己的哥哥，他在潮津离开后也被征召入伍。潮津不敢相信一个36岁的人也需要入伍服役，这更加证明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顺利。

更糟的见闻还在后头。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进入沦陷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潮津再一次被熟悉的尸臭所笼罩。南京挹江门堆满了尸体，这里是恐慌的中国士兵与南京市民1937年12月12日逃离南京的必经之路。潮津的部队不得不绕过堆积如山的尸体，一些尸体像纸片一样被人践踏。潮津默念着佛经前行。

日本军队突然扩军，招募像潮津这样的业余兵，这意味着中日战争为职业军人的快速晋升提供了重要机会。士官通常负责监督那些不上进和不合格的新兵，所以职业军人变得更加重要，也推动了日本社会进一步军事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若干“爱国妇女协会”的出现，这些组织请求志愿者捐款支持“千针腰带”，一种由1000名不同的妇女缝制带有刺绣装饰的腰带，据称可以防弹。这些腰带被送往中国战场以示支持。令穿戴这种腰带的人失望的是，这种腰带成了虱子的温床。

日本因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与中国的战争又让日本失去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中日战争爆发整整一年前的1936年7月，东京赢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日本人为了这一荣誉曾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日本将作为第一个主办奥运会的非西方国家，这是现代日本

最为重要的国家项目之一。运动场馆的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但到1938年，要求日本放弃主办权的国际压力不断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暗示将抵制这届奥运会。

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军方担心其资源需求无法满足，因而建议与奥运会有关的工程只使用木材和石料。曾为东京奥运会摇旗呐喊的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却异常沉默。1938年6月末，近卫内阁对战争目的以外使用的工业材料设置了限额，这实际上终结了日本的奥运梦，东京将不得不继续等待24年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奥运荣耀。

讽刺的是，在国际社会舆论对日本日趋强硬的同时，日本除军事实力以外，其他各个方面的自信心都在不断膨胀。在193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师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36岁建筑师坂仓准三（Sakakura Junzo）以日式凉亭作品赢得了最高奖项。8月，东京骄傲地主办了世界教育社团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第七次双年会。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吸引了48个国家的3000名与会者。之后是“神风”战机。当这一双座战机1937年4月6日飞离东京时，欧洲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架飞机的24岁飞行员饭沼正明（Inuma Masaaki）与36岁飞机工程师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所要经受的挑战。欧洲和北美飞行员统治着长距离飞行纪录，日本在这项迷人而极其危险的领域完全是个未知数。这架日本飞机表面上前去庆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5月12日的加冕典礼，并对欧洲数个国家的首都进行友好访问。但实际上，这是《朝日新闻》仿效欧洲报社，通过雇用飞行员进行自我推广的宣传噱头（当然也是为了收集新闻）。

“神风”热潮不再是一家公司的广告宣传，因为整个日本都在关注这两名飞行员的伟绩。由三菱公司为军事侦察目的制造的测试飞机被吹捧为“完全”国产，进一步煽动了这股爱国热（实际上，飞机所用的金属和所需要的汽油都来自其他国家。冢越贤尔还具有一半英国血统）。“神风”是从《朝日新闻》读者提供的大约50万个名称中挑选出来的。4月1日举行的命名仪式由皇后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

(Imperial Prince Higashikuni Naruhiko) 主持，这更让这架飞机的成功成为国家骄傲。

许多开始对此不以为然的西方媒体也被这架飞机所吸引。飞机4月8日离开卡拉奇飞入地中海上空时，欧洲开始屏息以待，1937年4月9日，“神风”出现在伦敦以南的克罗伊登（Croydon）上空。飞机盘旋了数圈，似乎是要取悦4000名欢呼的群众，包括300名充满喜悦与自豪感的日本人。下午3点30分，飞机完美着陆。两名飞行员从东京飞抵伦敦，创造了51小时19分23秒的长距离飞行世界纪录，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99.2公里。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飞行员好不容易从‘神风’走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欢呼和‘万岁’。人们给他们戴上花环，如潮水一般同他们握手并道贺。”两名飞行员又在法国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了荣誉奖章，其中包括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4月16日，正打算在欧洲开启小提琴演奏事业的神童諏访根自子（Suwa Nejiko）和日本驻比利时大使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以及他的家人）一道，在布鲁塞尔为两名飞行员献上了鲜花。

与“神风”飞行员不同，小提琴演奏家諏访已经体会过巨大民族期望感所带来的压力。她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很长时间里都是日本人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尽管如此，当她见到这两位飞行员时，她的表现也同其他17岁的倾慕者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两人如此梦幻！尤其饭沼正明先生是那么英俊……我可以尽情地看着他！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布鲁塞尔机场的这一短暂相遇就像是对青春美丽和活力的定格，它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展现了日本本可以拥有的景象，而最终这一切美好却很快离日本远去。

为了庆祝“神风”飞机的成功，自豪的赞助商在193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致英国民众的一则留言。留言称：“当前国际关系的狂风暴雨将危及未来的世界和平，此次飞行将有助于营造和平与友好的氛围。”要真是这样该多好。但不幸的是，近卫的领导将辜负“神风”飞机所创造的功绩。

近卫强烈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败，于是1938年春天时，他开始让助手知晓他准备辞职的打算，但正式辞职的决定却一直拖到1939年1月。近卫总是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其实他并不清楚哪一边才是正确的。他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信念与职责之间挣扎，当日本深陷中国泥潭时，近卫却选择抛弃自己的祖国。民众仍然被告知，日本在中国所向披靡，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近卫的辞职颇为不解。而对中国战争成就的怀疑也悄然蔓延开来。

近卫1940年7月复出前的三个短命内阁都没能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与此同时，德国自1939年9月以来取得的军事成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思维。当时，荷兰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英法军队也由敦刻尔克撤离欧洲大陆，所以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殖民地似乎唾手可得。这诱使一些战略家相信，日本应该从东南亚积聚足够资源，以便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占优势。他们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取胜，那么依仗西方国家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将不得不求和，因此对日本来说，确保与德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就任首相，他的前任首相米内光政海军上将（Admiral Yonai Mitsumasa）不愿与纳粹结盟。身体虚弱的西园寺公爵拒绝支持近卫的任命，两人的关系已无可补救，并维持在这种状态，直到当年11月西园寺离世。

受到德国这个近卫本不屑一顾的国家鼓舞，近卫开始第二次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希望结束与中国的战争，推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他想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取代议会政治，依靠右派和左派的支持者发起“新体制运动”，但他如何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不得而知。最初，近卫的顾问、秘密共产党员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建议创建全新的地方协会和议会制度，以确保中央政府的稳固。但政府官僚设法保住了现有的政府结构，避免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被破坏。近卫的人事选择反映出他想取悦每个人的倾向，但他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日本成立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它的一些纲领遵循法西斯主义理念，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育）加以控制。

这一新团体推行的一项匪夷所思的计划是，“重新定义‘大政翼赞会’式的美女”。该团体成立后不久便就这一议题召开了由内科医生、舞蹈家、艺术家和人种学家共同参与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称，完美的女性应该强健而魁梧，同时具有宽大的臀部。与过去偏爱的苗条美女不同，这些臀部宽大的美女被认为更有可能生育大量强壮的小孩，所以她们值得赞美。

1940年秋强制建立的社区协会将在数年内改变日本的日常生活。内务省让平均每12个家庭组成一个组，成为国家动员时最小、最基本的单元，这些团体将履行诸多爱国义务，例如组织消防分队（以便在遭遇空袭时保护国家）、参与爱国集会以及分发配给物资等。

社区协会的代表轮流排长队购买配给物资，然后他们将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仔细对物资进行分配。一位妇女在日记中抱怨道，一旦接到分发中心的通知（随机通知），相关负责人必须“停下手上的一切事务，丢下煮了一半的米饭或用宝贵供给燃料烧热的宝贵洗澡水，冲向分发中心”。邻里间相互警惕和嫉妒让公平分配的任务成为一场噩梦。即使唯一可争的只有萎蔫的莴苣叶，人们也要为此大打出手。

由于邻居之间相互监督，所以这些所谓的社区协会大多与睦邻友好等词汇毫不沾边。相互监视制度的基础是相互猜疑与恐惧。因残酷迫害政治犯而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在每个社区协会中都有眼线，这也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警察部门成立于1911年，其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加强，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被视为维持日本政体的威胁。中日间的战争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特别高等警察”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打击目标，致使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

尽管社会发生这些变化，近卫在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却与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辙：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他总是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犹豫不决，却又在需要谨慎小心时行事冲动。他令人担忧的一个倾向是喜欢迎合周遭最响亮的声音。为应对美国对日本工业原料进口越来越

越多的限制，近卫内阁在1940年批准了日军在东南亚确保更稳固根基的提案。作为这一政策变化的直接后果，日本自9月23日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日从此针锋相对。

日本在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紧张局势。近卫及其新任外相认为，日本加入法西斯联盟将对美国形成遏制，并将开启更加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谈判。前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Ishii Kikujiro）及枢密院其他成员对近卫与德意两国结盟持怀疑态度。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会议上，石井当面向天皇及枢密院其他成员表达了他的严重关切。他谈到俾斯麦对结盟的看法：“国际上的联盟关系就像一头驴与其骑手的关系，德国应永远争当那个骑手。”考虑到意大利毕竟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但石井并没能劝阻近卫，后者当天早些时候向枢密院顾问表示：“必须向美国发起挑战，这样美国才不会低估日本……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我的政府也决心要处理好一切。”

近卫在10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延续了他的傲慢姿态，他说：“我认为假如美国能试着理解日本的意图，并试着积极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这将对美国更有好处。假如美国有意误解日、德、意三国的真正意图……继续其挑衅行径，我们除了开战别无选择。”但他的虚张声势没有奏效，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外交突破。近卫面临他所谓的“最糟糕情况”——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

近卫在1941年春天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日本政府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中日战争胜利的遥遥无期（日本甚至无法体面地撤出中国）。近卫后悔与法西斯结盟的决定，但仍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尽管军方强硬派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竭力主张对美开战，但近卫身边的幕僚却认识到，这样一场战争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对于许多军方领导来说，一个未曾言明的问题是如何保全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名誉。军方不情愿向蒋介石或美国做出让步，也许一些焦躁的军官需要得到安抚。帝国海军和陆

军总是为了更多荣誉和拨款相互竞争，两军都不想看起来是较弱的一方（请记住，获得更多预算海军最终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方并不是唯一存在内部分歧的机构。外务省主要分裂为亲德派与亲英美派。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Shiratori Toshio）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内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

日本宪法对于天皇的模糊定位也让形势更加复杂。尽管裕仁天皇日益沦为一种象征性角色，成为这个家族式国家的神圣族长，但他仍然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动荡时期，裕仁天皇在普通日本人眼中变得更加神圣（这也是掌权者想要努力确保的）。1940年11月10日，几乎有5万人聚集在帝国皇宫前，参加近卫首相主持的庆典，庆祝日本皇室据信有2600年的统治。庆典还通过广播进行直播，日本各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民众很早就接到通知，要放弃一切休假计划，并被鼓励前往各地著名的神社朝圣。许多人欣然前往，只求从日常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而铺张的娱乐活动被明令禁止，这是日子艰难的又一佐证。

庆典成功提升了天皇的地位，而对皇室作为神圣庄严的准宗教机构的强调也削弱了君主的世俗权力。这意味着近卫无法期待太多来自天皇的公开帮助，以引导日本驶离错误的轨道。近卫出身于日本最显赫的家族，拥有足以比肩天皇的社会地位，他本可以坦率地与裕仁天皇讨论政治问题。但自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Kido Koichi）阻碍了与天皇的直接沟通。近卫政府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技巧行事，所以他备感焦虑，常常禁不住要溜出办公室，投入他喜爱艺妓的怀抱。1941年4月18日，好消息终于从美国传来。自2月中旬担任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向外务省发回一封电报，概述了所谓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这份粗略的计划包括日美同意承认（伪）“满洲国”，同意蒋介石与汪精卫政府合并以结束中日战争，并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不管怎样，该草案让矛盾方聚拢到谈判桌前成为可能。

美国的友好姿态足以让副外相大桥忠一（Ohashi Chuichi）感到高兴。他读到这封电报后激动地大喊：“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都将因此而好转！”裕仁天皇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木户4月21日的记录，裕仁天皇对近卫说：“美国总统主动愿意详谈，这真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终重要的还是保持耐心与坚持不懈，你觉得呢？”言辞间仿佛和平即将到来。在当晚核心决策人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军方领导人也对此感到欣喜。日美试图和解的前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刚刚决定暂缓前一年制定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两军的共同决议说，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原则上必须通过外交方式（获得）”，日军应避免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挺进。

与裕仁天皇猜测罗斯福“愿意详谈”相反，《日美谅解协定草案》事实上只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希望避免战争的“业余外交家”的产物。1940年11月25日，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总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传教会）的两名天主教神父詹姆斯·爱德华·沃尔什主教（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和詹姆斯·M·德劳特神父（Father James M. Drought）抵达日本，开启了两国和解行动。在日本的一个月里，他们凭借一些华尔街重要人物的介绍信得以拜会日本政治、商业和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近卫内阁的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在这些会面中，两位牧师阐明了改善美日关系的重要意义。当被问及他们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本质时，两人却含糊其词，不愿透露更多。

两人回到美国后联系了罗斯福总统的邮政部长弗兰克·C·沃克（Frank C. Walker）。在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的安排下，两人于1941年1月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日本领导人渴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总统随后继续通过沃克及两位牧师寻求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两位牧师最终拿出《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他们的日本朋友（其身份后续再详述）对草案进行了修改。

在4月18日的联络会议上，大多数日本高层官员希望立即对美国的友好姿态做出回应。然而副外相大桥忠一却认为，必须等4天后他

的上级松冈洋右外相从欧洲返回后，才能向美国发出肯定答复。大桥的观点最终得到认可，这也将成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1941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俄罗斯草原上寒风凛冽，日本外相却欣喜若狂。“红矢号”（Red Arrow）行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奢华的头等车厢配备有会客厅和私人洗手间，车厢里的松冈洋右正沉浸在他最大的外交成就中。1941年4月13日，他刚刚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出于好客，约瑟夫·斯大林没少招待他伏特加和鱼子酱。松冈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脸越来越红。

当松冈3月12日启程前往欧洲时，日本国内领导人心里都没底。此次行程的本来目的是庆祝《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但日本没有捞到什么外交实惠。许多同僚抱怨，这位极度虚荣又浮夸的外相只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认为，松冈远道而来既无必要，又无价值，日本外相的工作应该只是从东京总部指挥驻守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

松冈在柏林见到了希特勒，受到了隆重接待。日耳曼严格刻板的接待方式给松冈的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随他一起来访的有外务省官员、军官和记者。柏林火车站所有站台都装点上了“卐”字旗和旭日旗。松冈的火车一抵达，迎接他的就是击鼓声和“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的欢呼声。松冈洋右打开车窗，向穿着整齐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做出回应，他抬起右臂行纳粹礼。这手势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就好像他是经过多年训练、追求舞台效果的歌舞伎演员。只是，在这样的纳粹欢迎下，他泛红的脸颊暴露了内心的狂喜。松冈在罗马也受到墨索里尼和教皇的热情接待，但意大利的接待与德国不能比。

松冈认为，他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是给祖国带去的最好纪念品。这将加强《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四国谅解协议”（用他的话叫做“欧亚大陆同盟”），与自由主义的英美联盟进行对峙。他早就构想过这一同盟关系。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

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

松冈喜欢惊世骇俗，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核心。如果说近卫是忧郁的哈姆雷特，那么松冈就是堂·吉珂德，患有严重的狂妄自大症。再次借用日本戏剧术语打个比方，松冈是歌舞伎演员，他夸大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为了刺激观众的感官；而近卫是能剧演员，没有太多动作，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具后，留待他人来解读。

松冈戴着眼镜，留着胡子，中等个子，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让他与众不同。最让他满足的事情就是连续数小时高谈自己的外交政策哲学，最好在一种酒精的刺激下。他珍惜每一次高谈阔论的机会，只要对方愿意（或出于礼貌）聆听。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

与许多日本人不同，松冈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谦逊。1940年夏，他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想要成为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令近卫印象深刻的是，松冈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推销，这种能力可以利用在谋求日本利益上。他认为，松冈是日本迫切需要的一种发言人。松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重组了外务省，这让他在外务省不受待见，但他本人也不在乎。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但近卫很快认识到，松冈的过度神经质常常让他的手下忧心忡忡。有人猜测，他过于活跃因为吸食了可卡因，据传言，松冈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了这种毒品。近卫文麿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甚至连首相职务都是送到他手上的，但松冈前行的每一步都经过了奋斗。松冈洋右生于1880年，比近卫还早11年，出生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做海上贸易，

曾一度很富有。由于父亲投资失败欠下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松冈家的财产迅速消耗殆尽。所以松冈13岁时前往美国西海岸投奔一位做生意的亲戚。

在美国，松冈被美国家庭收养，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英文名叫弗兰克，是个有抱负的小孩。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各种零工，包括在餐厅打工，在农场帮忙，做过楼管、铁路工，甚至充当过牧师主持婚礼。不论多么辛苦，美国都是松冈洋右逃避家庭贫困的避风港，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他渐渐爱上这里，尽管他受到严重的种族和社会歧视，这些赤裸裸、无可否认的歧视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正是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一名循道宗信徒（他在临死前几小时皈依了天主教）。他在俄勒冈大学以班上第二名的身份毕业，拿到法学学位，他还自学了日本法律。他不仅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还惊叹于他的扑克牌技巧，这无疑对他的外交生涯有所帮助。

由于母亲病重，松冈洋右1902年回到日本。此时他已22岁，在美国度过了影响他一生的9年时光。虽然他担任外相后对美国咄咄逼人，但他却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他50多岁时重返当年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故土时，在“美国母亲”伊莎贝尔·邓巴·贝弗里奇的墓地立碑种树，这位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引导他的循道宗教信仰。

1904年，年轻的松冈以优异成绩通过外务省考试（在进入考试的130人中只有7人通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这样的职业选择让他刚好躲过日俄战争期间被征入军队服役。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任职，在俄国也短暂工作过。他后来总爱吹嘘自己在俄国被许多美女诱惑，但其实，相比玩弄女人，他似乎更爱喝酒。

松冈善于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这绝对是多边会议上的宝贵技能，所以他在1919年作为日方发言人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正是在巴黎和会上首次见到近卫文麿，见识到世界权力顶峰的样子。他不想只做一名官员，所以他在1921年41岁时离开外务省。他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这是一家半私营企业，拥有许多分支，涉及

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他的事业如火如荼，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1930年，他成功参选进入众议院，成为保守党立宪政友会的一员。

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松冈洋右开始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虽然他本身没有鼓吹军事占领“满洲”，但他支持对“满洲”的接管。他一直敦促日本对华强硬，这基于地区安全考虑，担心苏联从北部挺进。作为一名“满洲”通，他坚持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开始腾飞。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多后的1933年2月24日，在日内瓦湖西岸由豪华酒店改造的威尔逊宫，松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威尔逊宫阿拉伯纹饰的天花板绘有金色树叶，5个波西米亚大吊灯将大厅点亮。来自40多个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在这里静静地聆听松冈洋右庄严宣读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作为《国际联盟盟约》5大倡议国之一，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把日本推上国际孤立道路的重要一步。

国际联盟刚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由英国人李顿爵士领导的一个独立调查团被派往远东调查“满洲事变”，调查团撰写了报告书，并于1932年9月向国际联盟提交。报告书建议日本撤走部队，恢复中国行使主权。松冈拒绝接受这一结论。

松冈是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他怀疑东京最后一刻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否是一项共识，该决定基于日本不愿失去对“满洲国”的控制。东京的领导人认为，只要日本仍然在国际联盟，日本就很可能成为惩罚性经济制裁的受害者（正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受到的制裁）。他们认为这种制裁很不光彩，而日本政府通过离开这一国际组织可以避免遭受制裁。对于一向在乎国际舆论的现代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极端而短视的应对策略。

松冈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小离开国际联盟的损失，他再次试图解释日本的处境。站在讲台上的松冈抛弃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大声

呼喊道：“读一读历史吧！我们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满洲”，我们一手缔造了‘满洲’的今天……日本从始至终一直都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他反对国际社会对“满洲”的接管，他说：“美国人会放弃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吗？英国会把主权交给埃及吗？”演讲完毕，他向自己的代表团挥手，代表团成员全体离席。

这无疑是国际联盟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合众通讯社记者从日内瓦发出的报道称：“代表团由衣冠楚楚的松冈洋右率领……看起来沉重而坚决。”代表团离开时，“拥挤的过道里混杂着嘘声和掌声”。

虽然《李顿调查团报告》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谴责，但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认可日本对该地区发展所作的贡献。尽管世界主要大国满口主权、自立、平等、和平，强调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但毕竟这些国家仍占有大片殖民地，单独挑出日本说事会让自己名誉受损。所以当松冈洋右的代表团以这种戏剧化方式离席时，国联大会确实大感意外。

松冈能够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此次国际联盟特别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了解中国东北。他本要说服国际社会接受“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宣称这将促进亚洲种族和谐、现代化城市规划、广袤农田的开拓，让国际舆论有利于日本。1932年12月8日，松冈一抵达日内瓦就即兴做了一番奇怪的演讲，他总是喜欢这样做。他在演讲中为“满洲国”辩护说：“当前，没有人看到‘满洲国’的重要意义。但世界最终会承认，日本是正确的。”他继续以他典型的夸张口气说：“日本即将像耶稣一样被钉上十字架。正如他后来在欧洲社会获得救赎，日本也将获得救赎。”松冈洋右的发言持续了将近90分钟。他受到观众的起立鼓掌，但大家更可能是为了这一冗长演讲的结束而鼓掌，而不是为了演讲内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向来是国际联盟自1920年成立以来的模范成员，日本向国联派出最能干的官员，捐出大量款项，主要原因是日本认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正迅速成为20世纪外交的惯例。让日

本失望的是，尽管做出最大努力，日本很快被称为沉默的伙伴，因为日本代表往往不爱交谈。许多人对松冈这位话多的全权代表感到惊讶，对松冈大加赞扬，说日本终于从“无声默片”转变成“有声电影”。

《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最后投票结果让松冈非常失望，他此前两个月所做的公关工作完全没有奏效。他和他的团队驻扎在日内瓦湖边的大都会酒店夜以继日地工作，进行各方游说，包括放映关于“满洲国”的宣传纪录片。松冈的助手回忆道，虽然他的上司很固执，又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渴望得到关注，但在这些辛苦工作中，他仍然对手下体贴、关切。这名助手还透露，松冈洋右在酒店房间里长时间地准备自己的“即兴”演讲。

松冈宣布日本决意退出国际联盟时，对听众说：

日本政府现在不得不作出结论，日本和国际联盟其他成员在实现远东和平的方式上看法不同。日本政府认为，在中日分歧问题上，日本与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但日本政府仍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远东地区和平，保持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友好关系。

松冈洋右从国际大会上贸然退场，成为日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孔之一。大肆鼓吹极端爱国主义来增加销量的日本各大报纸率先将松冈塑造成不畏西方及其走狗欺凌的伟人。国内的狂热反应确实让他惊讶，但他很快开始享受这一英雄归来的角色。他现在成了羽翼丰满、受人爱戴的当红政客。为了利用这一声名，他在1933年12月辞去众议院职务，离开立宪政友会。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走遍日本各地，进行了184场演讲，听众共计7万人，宣传他所谓的政党解消联盟。他开始把巨幅旭日旗放置在讲台后方，这逐渐成为展示爱国忠心的做法。

1933年12月的一天，东京日本青年中心里挤满了听众，松冈谈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罪恶，宣布了日本议会体制的死亡，他说：“我不认为政党政治是实现宪政政府的唯一方式……政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至此，他的政治信条转向法西斯主义。但与近卫一样，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是有限度的，也是肤浅的。松冈当然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感到惊叹，但他显然无法接受带有种族歧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亚洲人被列为次等地位。松冈没能预见纳粹大屠杀，但他其实也表现出对纳粹政策的不满。1935年8月至1939年2月，他再次在“满铁”工作。他担任“满铁”总裁时，驻扎在哈尔滨的樋口季一郎少将请他帮了一个忙。樋口季一郎在波兰和德国见识并遭受过歧视，所以他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犹太人的困境。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樋口季一郎公开表示，犹太人被赶出欧洲前应被给予一块国土。1938年3月，樋口季一郎听说，一群逃出德国的犹太人被阻挡在“满洲国”外，所以他寻求松冈的帮助。松冈派他公司的火车将这些难民安全送往上海，他们因此逃脱迫害。

松冈渴望成为强大而具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有能力像法西斯独裁者那样搅动全国，这解释了他对轴心国感到着迷的原因。但他认为，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取得相对的力量优势。而他对轴心国野心的肤浅理解也再次解释了，为何他根本不理解英美对纳粹，以及日本与纳粹结盟而感到厌恶的极端程度。

1941年4月13日，微醺的松冈洋右在穿行苏联的“红矢号”列车上说：“年轻人们，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的就是多。”他其实只是对30多岁的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一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松冈借着酒劲教导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条约》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而是为了维持和平！”

松冈强调，他受到力量的引导。他崇拜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后者利用自己的能力让各大国长期保持均势，并在维也纳会议上成功对拿破仑战争做出了结。但时代变了。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各自分支彼此对抗。西园寺公一认为，松冈洋右不认真对待政权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将是十分危险的错误。

完全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西园寺公一总是与养父西园寺公望关

系紧密。他不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或国务卿赫尔会因为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而被迫与日本妥协。在一次酒席上，西园寺公一对松冈说，日本不应该与轴心国过于接近。西园寺公一知道，近卫后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所以他希望松冈也能看清，该条约是一种外交负担。“你必须支持近卫公爵。”西园寺公一说。松冈洋右回答道：“是的，是的，我在支持公爵大人。我甚至表示一旦他组建内阁，我愿意当他的秘书……不过公一君，外交可需要专业知识啊，我比你更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

随着列车的行进，松冈越来越确信，日本首相的位置唾手可得。酒精的确让他变得自大，但同样迷惑他的还有对斯大林的记忆。几小时前，松冈的火车即将离开车站时，斯大林带着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冒着莫斯科的浓雾亲自为松冈送行——鉴于斯大林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政要，此举实属罕见。斯大林说：“你看，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斯大林没有按照习惯考虑一下就同意与松冈洋右签署协定。日本代表团从柏林返回的途中抵达莫斯科时，德国袭击了南斯拉夫，这让斯大林感到焦虑，或许也让他高估了日本与纳粹的关系。对于斯大林来说，与日本签署中立协议很划算，协议确保了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又不用向日本割让土地。由于松冈访问柏林时暗示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斯大林认为苏联西部边境也不会受到德国袭击，至少暂时不会。斯大林确实感到焦虑。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空旷的办公室，日本和苏联代表相继在外交文书上签字，这时，穿着标志性深灰立领大衣、没有佩戴任何奖章的斯大林慢步走来，手里拿着一根烟。他走向墙边的餐桌，开始检查并摆放玻璃杯和餐具，好像他是这栋庄严大楼里的男管家。后来的一切都进展顺利。

斯大林和松冈在车站相拥道别时，两人都喝多了，显得很亢奋。酒劲过去许久后，松冈仍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他与近卫日益紧张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有些缓和。近卫听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后说：“松冈洋右是个能人！”

日本民众习惯于接受广播和报纸所营造的基调，他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欢欣鼓舞。《朝日新闻》4月23日称赞松冈“使《三国同盟条约》得以新生”，在日本与西方快要爆发战争时确保了日本的和平。美国和英国都不敢挑衅日本了，因为苏联已清楚地表示，不会被同盟国利用。在松冈最受欢迎的时候，他的肖像照甚至卖得比当红影星都要好，包括“满洲国”影星李香兰（李香兰其实是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与松冈洋右的长子秘密约会）。

4月22日，松冈洋右英雄凯旋般回到日本，4天前，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用电报传回《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摘要。虽然来自美国的消息让人意外，但松冈却很得意，因为他错误地推断自己促成了美国突然的外交谈判意愿，认为他拉拢苏联的均势策略立即奏效了。

松冈洋右在莫斯科三次会见了美国驻俄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想要试探罗斯福是否会鉴于“新形势”而与他谈判。一位随行记者说，松冈握有吸引罗斯福的计划：松冈将与蒋介石会谈，之后两人再飞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罗斯福、蒋介石和松冈洋右届时将同意长城以北地区实现中立、日本从中国撤军、“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然后签署中日、美日互不侵犯条约。松冈在与近卫通电话时得知美方愿意接触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大连等待乘坐飞机回国，松冈兴奋地对他的秘书说：“接下来我们将飞往美国！”松冈的狂妄自大症可见一斑。他最后知晓《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真正起因后，感到自己被抢了风头。他不允许日方任何人（包括野村大使）采取重大外交行动，这份草案建议近卫文磨与罗斯福在夏威夷会晤，而不是他与罗斯福进行会晤，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会威胁到他的权威，也会夺走他受关注的地位。

松冈回到东京的当天晚上，内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对美国的回应。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内阁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和首先得知该谅解草案的副外相大桥忠一。松冈决心要破坏这次会议。这本应是属于他的时刻。他开场先吹嘘了欧洲之行取得的成果，当讨论到美方的草案时，松冈向与会者怒吼道，野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还说，作为德国的盟友，保持忠

诚和坦诚很重要。鉴于此，他认为日本必须向德国汇报谅解草案的内容。他坚信，这份草案包含“70%的险恶用心和30%的善意”。他没有做出决定，以疲倦和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会场。

松冈洋右离开后，大桥忠一说，松冈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对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很快对美国做出答复。但包括军方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更愿意与美国尽早接触。近卫总显得既冷漠又迟疑，他以发烧为由离场返回住处。

由于等不到指示，在华盛顿的日方谈判人员4月29日向松冈致电，但没有结果。野村感到沮丧和失望；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谈判，因为这份谅解草案尤其符合松冈的核心外交思想，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野村频繁出入美国国务卿所在的卡尔顿酒店，不断为日方的延误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

罗斯福和赫尔并不认为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希望避免战争。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这一草案开启与日本的官方交流，然而日本方面却不太清楚这份文件与白宫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双方业余外交人员发起的。

日方最主要的调停者是47岁的银行家井川忠雄（Ikawa Tadao），他曾与近卫文麿一同上学，几年前为近卫公爵建立了一个智囊团。井川曾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驻纽约总领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许多关系。此前，他安排两位美国牧师访问东京时见到了日本领导人。在这两位牧师访日期间，他决定也参与到这项和平计划中。

井川彬彬有礼、外形俊朗，他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也让他流露出轻浮傲慢的气质，让包括松冈在内的许多人信不过。他也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从牧师那里一听说罗斯福同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井川立即以私人身份前往纽约，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与美国前妻的纠纷。他在1941年2月27日抵达纽约。

由于井川忠雄并不属于外务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很冷淡。但他还是设法取得了大使的信任。才上任不久还有点像个局外人的野村大使一开始不信任井川，松冈告诫过他要远离此人，但这位银行家3月8日安排了在国务卿住所的一次秘密会面，把野村大使介绍给了赫尔后，野村开始对他另眼相看。随着42岁岩畔豪雄（Iwakuro Hideo）大佐的到来，美日“非正式会谈”（美国人这么叫）很快开始。

牧师最初拟定的草案在岩畔豪雄与野村大使、使馆武官和一名专家的商议下进行了大幅修改。日方研究草案的小组在其他使馆工作人员回家后聚集在使馆地下室里商议，讨论出一份冗长的文件，其要点可以归结为：

1.美国和日本承认，两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将共同致力于该地区的和平，达成友好谅解。

2.日本承认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是为了防止欧洲战事扩大。日军只有在德国受到非战争第三方的主动攻击时才履行其军事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只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3.美国总统将劝告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讲和，为此，美国总统和日本政府同意：（a）中国独立；（b）日军基于中日条约撤军；（c）不吞并中国领土；（d）没有赔款；（e）中国重启门户开放政策；（f）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府实现合并；（g）日本克制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h）承认“满洲国”。

4.美国和日本都停止以恐吓目的向太平洋地区部署空军和海军力量。

5.两国政府恢复《美日通商航海条约》。

6.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包括东南亚）获取利益不能依靠武力，只能通过和平方式。作为交换，美国将确保日本的资源获得，包括石油、橡胶、锡和镍。

7.为了太平洋政治稳定，美国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侵入，双方确保菲律宾的独立，美国确保日本移民受到平等对待，没有歧视。

4月16日，赫尔询问野村日本是否愿意基于这份日本修改的文件与美国谈判，这份文件“包含的许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赫尔还表示，文件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添加新的、单独条款。野村在汇报与赫尔会面的电报中没能阐明这份谅解草案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岩畔豪雄后来承认，这是野村的助理、公使衔参赞若杉要（Wakasugi Kaname）故意选择的措辞。若杉认为，强调美国的渴望而忽略日本对文件的修改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野村向东京派发的电报清楚表明，美国政府希望进一步修改协议。收到电报后过于兴奋的副外相大桥忠一可能没能看到美方的这一条件，所以给日本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拿出了一份满足日本要求的提案，但美国其实没有做出这么多让步。

松冈洋右认识到，他的同事庆祝得太早了。他丢掉野村发来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要求查看英文原文。5月初，他私下向一位外务省官员抱怨说，来自美国的谅解草案让人大跌眼镜，因为：

很显然，这不是美国的文件，而是日本人写的。所有人，包括近卫公爵，似乎都认为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我们只需给美国一个肯定答复。多么愚蠢啊！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开始谈判，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中日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将无法取得满意结果……如果谈判失败，军方将有理由发动战争。我知道我是对的。

松冈洋右是对的，事情并不像开始看上去那么乐观。但他并没有将草案本身看作展示日本谈判意愿的机会，而是出于褊狭和怨恨做出了过激反应。在5月3日政府与军方的联络会议上，终于走出自我封闭的松冈拿出一份“5·12计划”（野村吉三郎于5月12日将该计划交给赫尔），这也可以称为“松冈计划”，据说是对《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阐释，但内容却相差甚远。其中最明显的改动是关于欧洲战争的未

来：

美国和日本政府将实现世界和平作为其共同目标；两国因此应当共同努力，不但要防止欧洲战争的扩大，也要帮助欧洲迅速实现和平。

松冈想要促成欧洲和平的理想（在他渴望成为“伟人”的推动下）看起来很高洁，但他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罗斯福政府根本不愿意与纳粹政权谈判。另外，一个深陷中国战争泥潭的国家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结束战争？日本的这一最新提案删除了所有与中国和谈的条件，大概松冈不想被具体条款所限制。他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与日本讲和，美国应该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援。日本既想不受牵制，又想获得帮助。松冈答应确保菲律宾独立的条件是，菲律宾要“永久保持中立”，并且“日本人移民美国应受到友好对待——与其他国民平等，不能歧视”。《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说：“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活动应当以和平方式开展，不能诉诸武力。”这种表述受到“松冈计划”的攻击，因为它“既不合适，也很多余”，因为“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已在多个场合的各种发言中清楚表达了日本政府的和平政策”。删除这些文字意味着日本不愿放弃在东南亚的军事选项。罗斯福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松冈不妥协的态度甚至让日本军方感到惊讶。松冈想要所有人知道，他只能以掌权者的身份（或者看起来像掌权者）参加谈判。他一直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最有价值的品质。

虽然松冈和近卫的性格迥然不同，但两人惊人的相似点是，他们都想看到一个强硬的日本。当年22岁的松冈刚从美国回到日本时，他对自己从前的老师说：“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轻视。”然后他描述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狭窄过道相遇的假想情景：

美国人并不会因为你向他鞠躬并礼貌相让而感谢你。他其实会鄙视你，认为你太容易对付了。如果你朝他脸上来一拳，他才会尊敬你，认为你和他地位平等。日本外交官应该从现在起注意这一点（美国人的性格）。

“松冈计划”让赫尔更加讨厌这位日本外相。赫尔和野村为此达成了奇特的默契。5月11日赫尔收到“松冈计划”的前一天，赫尔向野村抱怨信任日本外相“行动和大话”的难度，赫尔注意到，“（大使）不但没有反驳我的话，我还觉得他其实赞同我对松冈的评论”。从野村处获得日本最新方案后，赫尔发现“不诉诸武力”的段落被删去了，他嘀咕道：“所以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保证不向南挺进。”赫尔指的是日本挺进东南亚，以取得战略制高点。

美国从一开始就建议，这一非官方的《美日谅解协定草案》应当成为推动两国对话的起点。但松冈洋右认为，除非美国首先接受日本的一些要求，否则日本无法开始谈判。他相信，日本因为强硬而赢得美国的尊重。实际上，日本正在浪费一个对该国极为有利的谈判机会。

此时，美国仍然准备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比如，赫尔表示愿意与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接受他的“四项原则”：（1）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及领土完整；（2）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予以支持；（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继续保持太平洋现状，但这一现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但在与野村的私下交谈中，赫尔表示，第四条原则不会影响“满洲国”，而是适用于达成总体协议后的未来。对于美方的回应，松冈却设定了无法撤回的前提条件。松冈非要坚持保留日本向南使用武力的权力，他在军方自己都愿意妥协的问题上小题大做，这是没有必要的。日本陆军尤其想要停止进一步军事冒险，因此之前，1939年5月至9月，日本陆军与苏联军队为了“满洲国”和蒙古国的边界纠纷在诺门罕（Nomonhan）进行了惨烈的战争。现在，一个曾逃避服兵役的文官却指挥军队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近卫透露，他曾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松冈欧洲之行的归来，以便讨论《美日谅解协定草案》的有关事宜。他不想因为没有通知这一最新进展而惹怒极度敏感的松冈洋右。但松冈拒绝与他一道回去，坚持认为外务大臣的首要任务是向皇宫鞠躬致意。近卫对松冈冷若冰霜的态度感到震惊，他放弃了两人同乘一辆车的想法。近卫后来表示，这件事让两人之间的裂痕加深。

虽然对松冈越来越不满意，但近卫仍然让他主管日本的外交，即使冒着疏远美国的危险。近卫只是不想与外务大臣起争执。松冈不断对其他官员说，关于大洋彼岸的这个不友好的大国，他比其他人懂得更多。没人能够反驳他。参谋本部一位陆军军官后来回忆道：“松冈惯常的做法是直接把自己的提议拿到联络会议上，不论如何强迫该提议获得通过。其实他的做法相当令人赞叹。”日本的政治文化完全不欢迎惊喜，提前打报告是通常的惯例，而松冈洋右是唯一的特例。日本有句老话叫“移植树木前先将根部周围挖开”（译者注：引申义为事前讲明、打好铺垫），但这句话不符合松冈的办事风格。

与之相反，喜欢幕后秘密做事的近卫已经在为除掉他的外务大臣做着准备。松冈可不是普通对手，近卫公爵深知，在日本悠久的历史斗争传统中，松冈的倒台必须经过精心策划，这是近卫公爵天生就擅长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卫还需要一些时间，而日本其实等不起更长的时间了。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1882年是日本军事史上关键的一年，因为日本新生的现代政府颁布了一份官方文件。

新年第四天，现代日本第一位天皇、29岁的睦仁（明治天皇）在日本皇宫铺着红地毯的大厅里，拿着这份文件。与这个新兴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天皇和少数随从栖身的宫殿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从前的宫殿几年前被烧毁了，现在仍在建设中。睦仁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站在只适合这种盛大场合的由金缕布铺设的讲台后面，笔直得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体操运动员。这一西方式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是一个传统日式火盆，放置于他的身后，以温暖天皇陛下的臀部。

以当时的标准，睦仁1.68米的身高算是高大的（在他的统治时期，包含肉类和奶类的西式饮食引入日本，从此日本人的身高迅速提高）。他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双眼炯炯有神，还留着浓密的黑胡子。讲台的另一边站着陆军大臣大山岩（Oyama Iwao）。这个矮胖的男人比睦仁大10岁，他俩的共同弱点是对西方美食没有抵抗力，尤其喜爱牛排和法国红酒。大山岩被同辈人戏称为“小蛤蟆”，他总是穿着深色普鲁士制服（这种制服及其他制度安排都是模仿普鲁士军队的）。他接受这一皇家文件的时刻到了，大山岩毕恭毕敬地伸出双臂，向天皇深深鞠躬。天皇颁布了对军人的训令《军人勅谕》，文件按照礼仪从天皇手中递给下属手中。该仪式既是做给外界看，也是做给国内群众看的。它清楚地表明，日本在认真开启现代化步伐，对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很不满。

一些西方观察家对日本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努力不屑一顾。最著名的就是曾做过水手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他在《菊子夫人》中对日本人进行了冷嘲热讽，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

描述了法国海军军官与一位日本女性一段短暂的权宜婚姻，后来激发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他的另一部不太有名的作品《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描述的是鹿鸣馆的一个夜晚，东京的鹿鸣馆是可以举办舞会的两层楼建筑，1883年年底落成，用于招待外国宾客。洛蒂这样形容日本新兴的绅士和他们不合体的西装：“带尾巴的西装，甚至我们穿上都很难看，他们穿上多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来，他们都有点像猴子。”

作为容易讨女性喜爱的男子，洛蒂对异性的描述稍微留了情面：

噢！还有这些女人！……年轻未婚的女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们的母亲在墙边一字站开，就像挂毯一样。仔细观察，她们真是令人惊讶。她们哪里不对？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精确形容：也许她们戴的耳环要么太多，要么不够；她们位置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抑或是她们没有穿束身内衣。但她们的外在并不粗俗，她们的手小小的，穿的衣服是从巴黎直接进口的……不，她们的确很奇怪，一切都很奇怪——她们是这样不真实，细细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走路内八字。

颁布《军人勅谕》后，鹿鸣馆盛大而不自然的舞会就开始了，这已经是日本国家工程的一部分，为了展现其现代化的一面。由年轻的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的鹿鸣馆既不完全像西方建筑，也不是东方建筑，初衷就是用于召开盛大的宴会。但对这一奇特景象感到震惊的不光是盛气凌人的洛蒂一人，日本人也觉得不自在。许多女性出于礼节或害羞不愿意跳舞，所以在这些舞会上，男子的数量远远多于女子。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爱国人士为了现代日本而跳舞。性格古怪却喜欢作乐的大仓喜八郎是帝国饭店和鹿鸣馆的创办人之一，他描述了一天晚上在舞场上的一对奇怪组合：

两人均为男性，其中一人像相扑一样壮硕，另一人极为瘦小。这两人非常认真地跳着舞，但因为对比太明显，他们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大家都想弄清楚两人的身份。仔细一看，壮硕的男子原来是陆军大臣大山岩，而瘦小的那位是东京府知事……在这个场合下，大山岩

穿着正规的西式军服，而他的舞伴穿着日本和服，他们都在认真地跳舞，尽管两人并不擅长。

对于日本来说，所谓的鹿鸣馆时代就是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

《军人敕谕》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开始，再加上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谕》，这些文件定义了现代日本民族性和明治政府的性质。《军人敕谕》不只是军队的行为准则，也是天皇对军人的命令，即使在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军人也要培养和保持日本核心精神。《军人敕谕》开宗明义，强调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军队由职业军人和强制服役3年的入伍士兵组成，强制服役制度从1873年开始实施。军人必须将忠节、礼义、武勇、信义、质素这五德作为指导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节，强调军人对天皇（而不是对任何民选政府）的绝对忠诚。《军人敕谕》开篇写道“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接着：

故即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夫保卫国家，维持国权，既唯兵力是赖，则当明兵力之消长，既为国运盛衰之所系，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慎勿丧失节操，而徒受无耻之污名可也。

尽管这样说，政府和武装部队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很难定义。

大约8年后开始实施的《明治宪法》也没有说清楚，没有规定军队要响应政府的号召。这给半个世纪后的右翼政客和极端主义官员留有余地，他们可以通过向天皇提“建议”来执行不同的政策，利用天皇这位最高统帅的独立性。因此，1882年颁布的皇家法令可以被视为日本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倾向并最终发动对珍珠港袭击的潜在因素之一。

一开始，《军人敕谕》立即起到加强日本新军的作用。法令由当时的军队领导和学者专家共同起草，最著名的人物包括“皇家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法令首要目的是减轻一些人对“新兴、开放”日本的不满情绪。1882年，一些被剥夺权力的武士仍然对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

的新政权感到不满。这些失去社会特权的武士对新国家怀恨在心，渴望恢复旧制度。

除了这些，新政府还有许多理由让人不满。受改革派思潮影响的人，尤其是武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并不彻底。19世纪70年代，这种情绪演化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渗透至各个社会经济阶层。受到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让·雅克·卢梭等自由主义哲人著作的影响，民主人士抨击新政权寡头统治的倾向，要求制定宪法，成立民选的立法机构。他们还开拓进取，呼吁保障社会福利与人权，包括妇女和一些遭受社会歧视人群的个人权利。

到1880年，民权运动变得更有威力，有时甚至具有颠覆性。与所有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政府一样，日本新政权一开始也采取镇压手段，但作用有限。政府随后展示出令人惊讶的灵活性，采取不同的策略，承认民权运动的成就，并在1881年承诺10年内开设国会。

不久《军人敕谕》颁布时，民主活动人士对天皇要求的绝对忠诚与服从并不高兴。1882年颁布的这一法令其实是脆弱的，日本皇室可以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的皇室，但天皇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在现代日本诞生之前，德川幕府的大将军显然更像是日本领导人。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一直是将军的任务，天皇沦为配角，把权力下放给军事统治者。1603年，大将军德川家康从血腥权力争斗中胜出，他的家族从此统治日本超过250年。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体系得以建立，以防止内部叛乱。德川幕府的统治者谨防外国思想和影响力的渗透，他们认为最具威胁的是基督教。虽然中国人和朝鲜人仍然可以进入日本，但德川幕府只允许少数（所有西方人中传教士最少的）荷兰商人在长崎湾建立小型贸易站。

值得赞扬的是，日本皇室展现出对变革时代的适应力。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天皇仅仅保留了神道教守护者的地位，而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依靠天皇帝自己的世俗权力合法化，所以皇室才经历了某种复兴。

通过授权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天皇也恢复了拥有天赐的最高而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这种共生关系有点类似一些欧洲君主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

明治维新时期的年轻改革派取代德川幕府后，他们也寻求天皇的庇佑，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把15岁的睦仁推上日本作为现代大国重生的核心位置。天皇1868年1月宣布重新“直接”统治日本。一年后，皇室从一直所在的京都迁往东京江户城，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刚刚从这里搬走。睦仁的前15年一直生活在幕后，但现在，不论是公共区域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有他的肖像。

统治初期，睦仁在全国到处巡游（前10年巡游了271次），为了建立他与臣民的联系，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拥有皇帝。来日本传授西方医学的德国内科医生埃尔温·贝尔兹（Erwin von B.lz）在1880年的日记中写道，让人担忧的是，“民众对其统治者毫无兴趣”。人们被强制要求庆祝睦仁的生日，“只有当警察要求时，各家各户才会装点旗帜，如果没有要求，他们能不做就不做”。

颁布《军人勅谕》的睦仁是一位现代皇帝，他的穿着、行为和言谈都不再是那个京都穿着和服的少年。天皇的西式服装和胡子被赞誉为文明、现代和开化的标志，受到普通男子的争相模仿。为了证明对新事物的渴望，日本很快开始推行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寿喜烧（日式牛肉锅）很快成为受大众欢迎的国菜。

虽然日本第一位现代皇帝要面临各种矛盾，但睦仁从容不迫地适应着新角色的转变。天皇本应代表古老与神圣，但他也体现出一位现代西化的君主特征。1889年的明治宪法让神道教成为准国教，而睦仁成为其最高领袖。明治政府的创始人仔细研究了西方列强，他们发现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精神支柱，他们认为神道教也可以起到相同作用。他们也看到，世俗政府是议会制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日本应该效仿现代欧洲理念，做到政教分离。因此，睦仁的地位必须是象征性的。宪法规定，天皇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凌驾于政治之上。但相互矛盾的是，天皇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把天皇神化为日本国

家政治体的核心是推动现代日本民族认同的有效方式。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对天皇的盲目崇拜中。但在1882年，明治新政府和天皇的地位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一个没有精神和现实根基的政府。明治维新带来了需要抚慰的感情伤痕和需要填补的制度缺口。

明治维新始于1866年，日本南部两个藩属地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了军事联盟。这两个藩属地由于历史上对抗过德川幕府而被贬为二线藩，它们向来对幕府不满。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的一系列政治失误让这两个藩中有抱负的武士最终抓住了机会。由于与英国的关系，萨摩藩掌握了现代战争技术（虽然从1867年开始德川幕府也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取得天皇的支持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部队逐渐北上，击败幕府军。1868~1869年的内战——戊辰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藩的权力。

来自胜利一方的下级年轻武士开始统治新政府，后来被授予贵族爵位。权力来之不易，种种好处让一些人开始腐败，但更多的人奋发努力，发挥才干，遵守纪律，并充满创造力，他们渴望日本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

陆军大臣大山岩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萨摩藩，是所谓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的表亲，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体格健壮，性格简单却充满魅力。大山岩就是这场战争以及日本寻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分子。他对1863年萨英战争（只是小规模战争）中英国展现的军事技术印象深刻。因此，他开始潜心研究西方枪支（面向未来的萨摩藩决定与英国签署协议）。

大山岩与天皇军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明治政府初期帮助镇压叛乱，随后前往欧洲加深对西方军火技术的了解。19世纪70年代初期，他见证了普法战争，并在日内瓦学习，进行战略研究。由于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出色指挥能力，大山岩先后担任了陆军大臣和内大臣，被授予公爵。

美国没有参与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小战争，但一些紧密、重要、常

常属于私人性质的联系让两国未来的对抗不可避免。新日本的先锋理念其实非常美国化。

颁布《军人勅谕》的1882年夏，纽约州波基普西市一所大学的礼堂讲台上站着一位高挑纤瘦的鹅蛋脸美女，她是少数几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她叫山川捨松（Yamakawa Sutematsu），是瓦萨学院（Vassar）学生中的佼佼者。她担任班主席，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几个最有威望社团的成员。她就像一位完美的西方女性，但在她柔弱优雅的外表和完美无瑕的举止下是一颗钢铁之心。她是第一位拿到文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

明治政府成功进行社会改造，一些项目受到美国的友好帮助，而从11岁开始在美国生活的山川捨松就是社会改造项目的产物。她是政府资助送去美国培养的5名日本女性之一，培养目标是要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模范，这一想法最初由来自武士家庭的黑田清隆（Kuroda Kiyotaka）提出，他当时负责北海道的开发。1871年访问美国时，黑田对美国女性印象深刻，尤其令他刮目相看的是，这些吃苦耐劳的女性与男人一起开荒。黑田认为，美国西部开发是男女共同开荒拓土，而作为妻子、母亲甚至苦劳力的日本女性也应在日本成为强国的道路上尽一份力。

山川家是古老有名望的武士家族，效力于会津藩藩主。在内战中，会津藩与其他北方藩属地一样支持衰落的德川幕府，因而被贴上皇室敌人的标签。1868年8月，在最后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中，会津藩被敌人包围，8岁的山川捨松与会津藩的男男女女一起进行抵抗。她负责防止会津藩城堡被炸，给没有引爆的炮弹盖上床垫。这些炮弹是萨摩藩的部队发射的，其首领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大山岩。

南方部队受到英国的技术支持，在这些部队的攻击面前，北方叛军无力抵抗。会津藩失陷后，山川家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才能再次取得社会地位。教育是最好的方式，通常也是恢复地位的唯一方式。当时，政府呼吁大家申请留学，敦促年轻人去西方学习知识。许多没落家庭的年轻人接受了挑战。虽然没有多少家庭愿

意把女儿送去那么远的地方，期限又很漫长，但绝望的山川家决定把女儿送走。

山川捨松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位牧师家里，伦纳德·培根牧师主张废除奴隶制。山川捨松与牧师的14个小孩一同长大，先在当地学校上学，后来进入瓦萨学院。她最好的朋友是牧师最小的女儿艾丽斯·梅布尔，许多年后，艾丽斯·梅布尔还帮助日本建立了一所女子大学。与其他一些受到同化，甚至快要忘记母语的日本学生不同，山川捨松决心要维持自己的日语能力，她每天都坚持给家里写信。

1882年初夏，山川捨松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允许她前往美国学习的日本新政府，有设法洗脱叛军罪名的家人，有把她当亲人一样对待的培根一家，也有把她培养成独立思考女性的瓦萨学院。她渴望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

经过11年的国外生活，1882年年底回到祖国的山川捨松感到失望，因为对于明治时代妇女能干的工作来说，她学历过高，资质过剩。之后她嫁给了明治政府里最有权势的一个人——大山岩。大山岩的原配已经过世，他比山川捨松大18岁。大山岩就是击败山川家族藩属地的将军，这种联姻是当初无法想象的。婚后，她开办了一些慈善和教育机构。

大山公爵与留学生新娘的故事展示出，个人努力、勤勉、野心和创新能够克服分裂日本的历史伤痕。这种团结正是被日本未来的敌人美国所激发的。在世界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年代，日本和美国都是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新兴大国。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每个帝国由军事力量控制”，然而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世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一体性”，推动一体化的因素有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运动及大众传媒（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造出来）。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日本将美国视为导师。“赶超西方”是日本不断强调的目标。通常，这里的西方指的是美国，而不是旧欧洲。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大山岩谨记《军人勅谕》，避免沾染太多政

治权力，他只想做一名军人。大山一家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都很成功，成为明治时代权势集团核心。他的儿子后来迎娶了近卫的妹妹，大山家与旧时代贵族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明治创新精神逐渐消失在旧秩序的新版本中。

明治时代结束于1912年，那年睦仁天皇逝世，他在位45年（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多一年）。日本最早是亚洲外围一个偏远的封建国家，却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日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机构、高效的铁路系统和邮政系统。明治时代最大的骄傲是其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日军先后在这场战争中击败中国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明治时代末期，新兴的日本却越来越像个老牌强国，或至少是老牌强国的惊人模仿者。而激发明治维新的美国先锋理念和个人进取精神却越来越像是日本帝国主义光辉前景的威胁，是日本成为亚太地区领头羊的障碍。

在睦仁天皇的儿子嘉仁的统治下，日本充满积极创造力。这一时期见证了日本缺陷与活力并存的议会制蓬勃发展。日本在海外也确立了新兴大国的身份。大正民主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开始了（大正时代即嘉仁天皇从1912年至1926年的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包括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人的生活也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尤其在城市，更多的人喜欢花一点钱去舞厅、咖啡馆、百货商场、剧院和电影院里享受生活。正如一位诗人观察到，文明的标志体现在每个人都有能力在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唉，可惜嘉仁并不适合这一时期的领导角色。他既缺乏个人魅力也没有好的体力，在他强势的父亲眼里，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皇位继承人。他是自动成为天皇的，他所有的哥哥都过早夭折了。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越来越差。1921年，他身边的官员都认为，嘉仁的天皇角色过于被动，他的儿子裕仁应当尽快继承王位。

鉴于未来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裕仁在1921年3月至9月访问了欧洲，他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他在“香取”（Katori）

号战舰上学习西方餐桌礼仪，还练习打高尔夫球。此前没有哪位日本皇太子访问过欧洲。裕仁在旅途中度过了20岁生日，他回国后成了一名英国狂热者。他在英国受到热情接待，部分原因是两国1902年以平等身份缔结了同盟关系。日本一部纪录片骄傲地宣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皇太子的照顾是“父亲般的关怀”。戴着眼镜的皇太子看起来有些内敛，但他内心其实很兴奋，展现了少年天生的好奇心。

裕仁行程的亮点之一是前往珀思郡阿索尔伯爵的布莱尔城堡。皇太子确实被这位苏格兰贵族的简朴生活所打动。在一次以欢迎裕仁为名的舞会结尾，领地里的普通下等人纷纷涌向舞池。据称伯爵对这些人说：“让我来展示真正的苏格兰舞蹈。”于是他和妻子一起加入人群，与佃农手拉手。裕仁的心情从震惊转为欣赏，他意识到只要贵族和富人过着简单的生活，就不用担心阶级斗争。除了养成每天吃传统英式早餐的习惯外，裕仁似乎被英国王室“统而不治”的理念深深吸引，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到日本后，由于他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裕仁开始摄政，代替天皇行使权力，成为实际君主。裕仁同时成为日本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在《军人勅谕》颁布40年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已成长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裕仁在军事问题上具有强烈的个人观点。欧洲之行加深了他对战争恐怖的认识。在苏格兰高地钓完三文鱼后，他被带到弗兰德斯（Flanders）最著名的伊普尔（Ypres）战场。一战已经结束3年了，但这片荒凉的战场上仍然散落着战争遗物，几十万青年人在伊普尔血战中丧生。碎弹壳和子弹到处都是，这似乎是周围景致中的永恒部分。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1914年的著名诗作《致倒下的战士》中写道：“他们永远不会变老，当我们活着的人们都已老朽。年华不能使他们厌倦，岁月也不会让他们愧疚。”让皇太子为之动容的不仅是年轻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缅怀。充当导游的一名比利时军官在给裕仁做讲解时突然情绪失控，裕仁后来得知，这名军官的儿子正是死在这片战场，他也流下了眼泪。

裕仁对君主制的看法以及对战争的嫌恶很快受到挑战。1923年年底，一名年轻的非政府主义革命者试图行刺他（1932年又有一名韩国独立主义者试图行刺他）。裕仁本想通过亲民来博得大众喜爱，他的信心受到打击。由于神圣最高统帅的身份与统而不治的想法充满矛盾，裕仁的天皇身份与个人责任的界定也愈加复杂。他掌管政府和军队，可以选择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但他一般不会这样做。在一战结束后的短暂平静期，裕仁的表现与任何本质上孤独而焦虑的人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登上王位做准备，他要捍卫从明治时代开始积累的成果，明治天皇是他崇拜的祖父。1926年12月，47岁的嘉仁驾崩，裕仁正式成为日本天皇。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1921年10月，裕仁刚从欧洲回到日本不久，日本陆军的一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革命始于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德国黑森林风景如画的温泉小城巴登—巴登，陆军士官学校1904届的3名同学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小畑敏四郎（Obata Toshiro）和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秘密在这里会合。此三人均30多岁，在陆军仕途顺利，因公务原因在欧洲停留，但他们看起来都不强壮。瘦小的体格和圆形眼镜都透露出，他们更喜欢书本而非严格的户外训练，更别说打仗了。陆军开始像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机构，这三人因其出色的学历和政治素质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第二天，常驻德国的陆军士官学校1905届毕业生东条英机也加入了他们。

他们专门避开外界视线，秘密发誓要对帝国陆军进行改革。4人同意铲除陆军内部的地方派系，对人事和军事体系进行大幅重组，并建立总动员体制。在未来10年，这4位军官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受到提拔，大范围的改革也在稳步进行，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帮助陆军壮大和团结——以便让日本更加强大。

明治时代的内战和快速发展所留下的伤疤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陆军。1921年，明治时代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现代日本陆军两位奠基人之一的山县有朋公爵现在已经80多岁，但仍然活跃在政坛。大家都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任何长州藩派系以外的人就休想进入陆军领导层。山县有朋派系对陆军的控制其实越来越弱，更多派系外的人进入了最高指挥层。但山县有朋派系的影响力仍然让在巴登—巴登密谈的军官感到忧虑，他们都不属于长州藩。

东条英机的父亲就是派系争斗的受害者，他来自19世纪60年代与长州藩——萨摩藩联盟作战的一个北方叛乱藩属地。即使东条的父亲以第一名身份从陆军大学校毕业，他的仕途也未有任何起色。东条非常

理解父亲的不得志，决心要报复那些当权者，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如此不公平。

1922年年初，就在黑森林会面仅几个月后，山县公爵去世了，于是长州藩掌控陆军的问题也解决了。但陆军的风气变得更加严格和刻板。在贤能主义推动下，学校成绩受到空前重视，这对巴登—巴登会面的4位军官非常有利，他们都成绩突出，尤其是永田铁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永田很快要领导陆军的趋势越发明显。小畑敏四郎并不十分乐见永田的晋升。虽然两人对陆军需要改革的意见一致，但双方对改革应以何种形式进行有很大分歧。小畑是“皇道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其创立者是夸夸其谈的极端民主主义者荒木贞夫和他的盟友真崎甚三郎。该派系的追随者往往会成为满腹牢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赞同使用极端和恐怖主义方式。在他们看来，理想中的日本应该团结在天皇的神圣权威下，天皇在军队的帮助下履行引导日本的职责。他们认为，新日本必须摆脱政治腐败和派系的影响。他们把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困境归咎于当前政权。

永田代表另一个改良主义集团，通常被称为“统制派”，该派系没有正式的创始人，反对“皇道派”的人大多属于这一派系。永田不喜欢加入任何派系政治，他所想象的未来日本是一个以陆军为核心、具有高度国防效率的民族国家，一个重组为高效战争机器、为全面战争作好准备的国家。“统制派”非常务实、理智、不择手段。在其他部门也有永田铁山的支持者，他们也想在效率方面“重新包装”日本。另外，这些所谓的“新官僚”在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担任首相时都支持他的“新秩序运动”。

与之相反的是，“皇道派”倾向于感情用事，认可传统主义价值观，将军队看作日本武士精神的守卫者。他们认为日本社会过于腐败，无法救赎，只能重建。但两个派系均同意让日本的政治生活军事化，不论哪个派系胜出，日本都必将拥有一支渴望干涉政治的陆军，完全不顾1882年的皇家敕谕。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另外两个巴登-巴登盟友冈村宁次和东

条英机的帮助下，永田依靠圆滑和结盟战胜了许多挫折，他显然已脱颖而出。1934年年初，永田被任命为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他完全有权力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包括人事改革。他的梦想在1935年8月12日突然破灭了，一人突然闯入他在陆军省装饰华丽的办公室，用一把武士刀对他砍去，毫无防备的永田头部中了一刀，背部两刀，最后是喉部，他倒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上。

杀手是40多岁的相泽三郎（Aizawa Saburo）中佐，永田的一些人事安排影响了“皇道派”高层领导，包括荒木贞夫，这让相泽十分气愤。永田终年51岁，正值事业高峰期。讽刺的是，相泽强行闯入时，永田正在开会，讨论如何控制怀有极端思想的军官寻衅滋事。在对相泽的审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同情。他最后被判有罪，执行死刑，但这起刺杀事件以及凶手所获得的声援的确令人震惊。

暴力仍在持续，以1936年2月26日的军事政变达到高潮。受“皇道派”影响的青年将校（他们自称是独立的派阀）信奉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他们发起这次政变。在大雪覆盖的东京，他们带着将近1500名士兵杀害了数名政府重要人物，包括大藏大臣和内大臣。许多参加这次政变的士兵并没有太多政治化倾向，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相信革命能为改变现状提供机会的是反叛军官，而不是士兵。早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前，日本的农村就已变得一贫如洗，年轻女子和儿童被卖给做肮脏交易的中间商，随后又被送往城里的妓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下层士兵正是贫困的不幸受害者，军官可以轻易利用这些士兵的不满情绪。

策划政变的反叛军官称，他们不想自己取得政治控制权，而是要把天皇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腐败影响中解救出来，认为自己的手段合理合法。其实，主要政变策划人想要拥立裕仁的长弟秩父宫亲王（Prince Chichibu）成为他们的新领导人。秩父宫亲王也是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广泛拥戴。

裕仁天皇展现出以往不多见的魄力，他立即对这一政变予以谴责。这种夜间发动袭击的懦弱行为让他既震惊又愤怒，那些手无寸铁

的七八十岁老人被害时还穿着睡衣。奇怪的是，在天皇不同寻常地公开进行谴责后，民众却再次对凶手表示同情。与刺杀永田铁山的凶手一样，这些行凶者得到称赞，因为他们据称想要把天皇和日本从错误路线中拯救出来，其动机是纯粹而无私的。主要策划者虽被处决，却被视为烈士。“皇道派”的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该事件结束后，陆军再也没有制造更多的恐怖事件。

尽管发生这么多流血冲突，但在派系争斗中没有明显的胜者。此外，陆军领导层还将被迫背负一枚炸弹（对下属可能造反的担忧），它可能随时爆炸。接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英机需要控制青年将校的暴力急躁情绪。他的政治立场更加复杂，因为他愿永远做天皇忠实的仆人，不会因为他的对手“皇道派”信奉天皇崇拜就立即反对这一信念。他成长于军人家庭，从小就被教育成为一名军人，是《军人敕谕》的极端产物。他总是喜欢说：“军人每天的24小时，包括吃饭在内，都是在为天皇效忠。”用东条自己话说：“天皇不是人，是神。”

东条为自己的崇高原则感到骄傲。他很勤劳，知道如何坚持不懈。他小时候并不注重学习，但有一次被一群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后，他决定在考试成绩上打败他们，后来完全做到了。他追求平等主义，鄙视裙带关系，他更喜欢与下属吃一样的饭菜。他对细节的过分关注几乎要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他有笔记强迫症，要同时在3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琐事，他还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不用任何助手帮忙，这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东条既不邪恶也不腐败，但他小肚鸡肠，敏感易怒。他对批评声非常敏感，会严惩那些胆敢激怒他的人，并且睚眦必报。他在家对儿子十分严厉，但对女儿却很溺爱。他不吸烟，很少喝酒，也没传出过什么绯闻。他显然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他非常能干。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守纪律和效忠天皇，他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1940年7月，自动代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利用他的显要地位，这位天皇永远忠诚的

仆人对他的官兵发布了一份教育文件。1941年1月8日，几乎在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的60年后，东条发布了《战阵训》，详述了士兵的理想品行，意在灌输和激发他孜孜以求的自律品质。《战阵训》最受人诟病的一条就是“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把被俘前自杀作为一种命令，即将造成惨痛的后果。尽管日本严重缺纸，但《战阵训》还是印刷成册，发给每个士兵。普通民众也可以买到东条英机背诵《战阵训》的留声机唱片。

在东条发布《战阵训》的两天前，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四个自由”国情咨文演讲，诺曼·洛克威尔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作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成为永恒的经典。罗斯福提倡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都应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摆脱穷苦自由和免于惊恐的自由。他的演讲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阐明了美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其公民的安全，而不是去危害和牺牲自己的公民。另外罗斯福总统认为，个人自由，即便在美国国土之外，也不能受到威胁。

但在日本，这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象征）思想完全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表现。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盛冈（Morika）一所男子预备学校。盛冈是东条英机家族的藩属地，过去以高度创造力和自由文化著称，诞生过多位文坛巨匠。据一位该校的成功申请者称，1941年3月，只有12岁的他参加了为期3天的入学考试，考试题目包括“《教育敕语》何年颁布”“《教育敕语》中说‘我臣民，克忠克孝’是什么意思”“你能想出其他类似的口号吗”，这些问题显示，创造性思维只能限定在当下时局中。

考官的问题越来越深入，体现出对经济困局和与西方爆发战争的担忧，问题包括“距中国事变爆发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供奉战争烈士的神社叫什么名字”“哪些国家在阻碍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哪两个欧洲国家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想要从荷属东印度购买什么资源”。

考试的另一个部分意在考察候选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节俭”“你在每天生活中如何做到节俭”“使用灯罩如何能

够节约能源”“你知道日本全国储蓄目标的具体数字吗”。

这个男孩通过了考试，但他很快就会失望，因为这所学校带有某种荣誉感的特制校服不能再穿了，一项全国着装规定要求所有人必须穿着沉闷的卡其布衣服，类似军服的卡其布让所有学生都看起来像个小士兵。在第二学年，预备学校曾经严格的课程设置也发生了大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师被迫去服兵役，学生们不再在教室学习，而是去种田和参加军训，等待未来某一天，他们也会为天皇走上战场。

日本陆军向来很自信，因为它扮演了明治维新主发动机的角色。海军的发展相对较慢，但如果没有海军，日本发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根本无法想象。海军兵学校1876年建立时，日本还没有一艘战舰。1888年，海军建立了培养未来军官的学校，而陆军早在6年前就建立了培养精英的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的学生规模也更小，但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后，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差距在缩小，日本海军不但从英国获得了战舰，还学到了造船和战略知识。

1905年5月28日，日俄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奠定了日本的最终胜利，沙皇俄国当时正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海军渴望已久的光辉时刻。当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不同寻常的活动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机敏的外交官发现，他就是25岁的松冈洋右，松冈及时发出警告，造成俄军丧失大量舰船（包括8艘战舰）和5000多条生命，迫使对方求和。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缅因州朴茨茅斯附近的基特里（Kittery）签署和约。罗斯福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日本也需要这一和约，因为日本已欠下巨额战争贷款，没有能力再打下去了。和约条款却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愤慨，尤其对日本放弃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感到不满。许多人不太清楚日本政府到底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负担有多重，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领导人的这一外交举措。在这样令人失望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外相松冈洋右受到民众欢迎，因为他在谈判中展现的可靠和精明务

实令人眼前一亮。日本后来不切实际地期待美国充当中日战争的调停人，其根源也可能在于美国总统的此次调停，但关于中日战争的解决方案却成为日美两国1941年和解谈判的绊脚石。

虽然民众对《朴茨茅斯和约》感到不满，但日本胜利的消息却让许多人提振了信心。渊田美津雄（Fuchida Mitsuo）是后来带领帝国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轰炸机飞行员，他的飞机在偷袭成功时发出著名的电报“虎！虎！虎！”1905年，渊田只有3岁，但整个他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对胜利感到兴奋，也渴望穿上海军军装。打败俄国给日本留下的丰厚遗产远超过未来日本制造的战机。这场战争被吹捧为有色人种在现代大型战争中第一次打败白人。日本的胜利破坏了西方人天生的种族优越感，也在世界范围殖民地内激发了反殖民抗争的愿望。这一事件影响到当时还是少年的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回忆道：“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每天都盼望从报纸上获得更多消息。我买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读了其中的一些……我满脑都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象着印度以及亚洲摆脱欧洲的奴役。”

日本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该国的物质实力与文化进步。帝国海军给士兵提供大量富有营养的大麦，可以防止折磨许多俄军士兵的维生素B缺乏症。（大麦还常被认为是海军比陆军表现好的原因之一，陆军士兵吃精加工的大米）。到日俄战争时，日本的识字率高达75%，超过任何西方国家，极大促进了士兵的训练。武装部队可以印发说明手册来教士兵使用复杂的武器，而俄国士兵据说一半以上都不识字。日本坚持履行了1889年《海牙公约》的精神，确保以人道主义对待囚犯，在日本的大约7万名俄国战俘受到有尊严对待，关押条件也相对较好，这让国际社会震惊。

从此，日本海军开始全面升级与壮大，而海军和陆军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两军都要争取更多资金和更多荣誉。陆军担心1905年以后的俄国会采取报复，认为日本北部受到最大威胁。而让海军愈加担忧的是美国。美国似乎渴望扩大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控制了关岛，并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控制了菲律宾。不管怎样，日俄战争都开始让天皇的陆军与海军平起平坐。

“日进”（Nisshin）号巡洋舰上一位21岁的海军少尉候补生为日本的海上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对马海峡海战中，他被派到这艘巡洋舰的船头位置，不幸被流弹击中，下半身着了火。他的右大腿被炸了个大洞，左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炸掉。他在长崎海军医院休养了160天，伤口感染时，医生建议他截掉左胳膊。他说：“我拒绝截肢，因为我怀着成为海军士兵上战场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要赌一次！”他赌对了，最后获得了康复，也没有失去胳膊。但这并不是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后一次赌博，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策划人。

山本一生中都将战争伤疤视为荣誉勋章。他非常在意残疾所带来的不便，尽力不要落在后面，不要让他人觉得他需要特殊照顾。当他第一次跟儿子玩抛接球游戏时，他只有3只手指的左手总是接不住球。但在他的坚持练习下，他很快能用左手从任何角度接住球。他保持了良好的状态，能以轻盈灵巧的步伐爬上一艘战舰。许多人认为，山本是帝国海军历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从某种程度来看，他走在一条典型的精英晋升之路，就像东条一样。此二人都生于1884年，进入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高等军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两人都来自过去北方“叛乱”藩属地的武士家庭，他们一出生就活在家族没落的不满中，需要证明自己是新日本国有一员。

作为勤劳工作的奖励，他们二人均被派往国外常驻——山本前往美国，东条前往德国。他们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更让他们确信，军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20世纪20年代，山本尤其意识到海军空中能力的重要性。虽然山本从未接受过飞行员训练，但他在发展海军航空部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形成他日后太平洋战略的支柱。

但两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与东条不同的是，山本是一个开朗、风趣的人。即使50多岁，他仍然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爱问问题的小男孩，对他来说，世界仍然充满新奇。山本不戴眼镜也不留胡子，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更让他显得年轻。唯一体现他年龄特征的是额头上越来越深的皱纹和越来越白的头发。许多人认为他所散发出

来的特质与自信非常迷人。他身高只有约1.57米，但他匀称的身材和自信的举止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另外，与中规中矩的东条不同，山本喜欢赌博。众所周知，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和桥牌，即使在战舰执行任务时也照打不误（松冈洋右外相也以善于打扑克而闻名）。他曾开玩笑说，退休后要住在摩纳哥，可以玩轮盘赌。据说他有一次在蒙特卡洛因为赢得太多而被赌场拒之门外。山本善于虚张声势，常常能巧妙隐藏自己最大的弱点。与其他赌场高手一样，他在时机来临时敢于冒险。他认为赌博是成人的标志，据称他曾表示：“不赌博的男人不是真男人。”

山本认为，生命最终就是一系列简单选择，而选项最终都能归结为生与死。他随时准备献出生命，这样才能活得完整。他要求下属也随时为死亡做准备。他年轻时受的重伤对他影响深远，他认为士兵对这个世界的个人牵挂越少越好，尤其是在前线打仗的士兵。所以他建议年轻军官晚婚（他34岁才结婚，40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山本并没有视死亡如儿戏。在他总是随身携带的黑皮记事本里，他记录了所有在他指挥下送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每当恰巧访问有阵亡士兵的社区，他都会走进阵亡士兵家中，在祭坛前祈祷，有时甚至控制不住地哭起来。

山本崇拜美国。他于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大学学习，1926年至1928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他看到美国人跟他一样充满活力。在与国内的通信中，山本描述了在美国的生活，寄回了在美国各地旅游时的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和风景。每当日本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时，他就会建议他们去读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他认为自己与林肯很像，都是靠自力更生的草民（山本家明治维新后一落千丈，家境贫寒）。他还崇拜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或许也十分崇拜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后者也是一位克服自身身体残疾、意志力坚强的人。

山本充满活力的美国生活正值两次大战之间自由国际主义的鼎盛时期。如何与他国和平共处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心中的重大问题。许多国际和政府间组织兴起，比如威尔逊总统力主建立的国际联盟。但一

方面是打仗或者至少是准备开战的军人职责，另一方面是实现无硝烟世界的理想，一个人如何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穿军装的男人们必须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比如山本就经常代表海军出席国际裁军大会。在缔造热爱和平的世界中，日本渐渐成为一名领导者。

山本作为海军顾问参加了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举行的伦敦海军会议，日本的国际主义受到挑战，但获得认可。当时的首相是来自立宪民政党的滨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他是一位深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举止高雅，头发长得像鬃毛，这让他赢得一个绰号“狮子宰相”。他誓言要保卫日本的国际声名，在许多国家深陷大萧条困境而无力关心国际事务时，让日本成为国际上具有正义和协作精神的一员。滨口决心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概述了海军交战规则，详细规定了各主要海上强国军舰数量的限制。与会方进一步完善了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提议将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比从5:5:3调整为10:10:7。

由于增加了日本的份额，日本海军省支持签署这一协议。但海军军令部清楚滨口的强硬领导风格，担心他会削弱军方权力，所以竭尽全力进行反对。在右翼、反对党立宪政友会和枢密院保守派的支持下，军令部斤斤计较地说，伦敦海军会议提议的目标比预期少0.4%（山本当时还没有认同裁军的信条，他也支持军令部的观点）。滨口知道军队最高统帅裕仁天皇支持他的政策，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枢密院反对我们也没有关系。我打算请求天皇批准，我绝不会妥协。”9月19日，枢密院做出让步。10月27日，英国首相、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共同通过广播宣布了正式决定。这是一种史无前例、非常成功的宣传，在一个艰难时刻展现了国际合作与善意。

然而，滨口任内日本议会政治的强势没有持续多久。与强硬派结合的立宪政友会利用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指责滨口侵犯了“统帅权独立”。对此抨击最厉害的议员是来自政友会的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o），他在战后帮助建立了自由民主党，并在1954年至1956年出任首相。鸠山一郎1930年春天时表示，武装限制不符合海军省规定，他坚持认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在这些问题上必须享

有特殊政治权力。为了取得政治优势，鸠山不但没限制军队以加强政党政治基础，反而帮助破坏议会政治。

此后，政党政治迅速衰落。1930年晚些时候，随着不满情绪加剧，首相滨口被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开枪打伤，枪手对《伦敦海军条约》的签署极为不满。鸠山一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受伤的首相参加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接受质询。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大会，是日本议会政治迄今为止的最低点。致力于推翻执政党的政友会成员扰乱国会，在滨口没能出席会议时对代理首相进行人身攻击。滨口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参加了1931年3月的国会，他决心推动社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涉及工会和农田租赁，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低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

他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他无法忍受穿皮鞋的疼痛），曾经结实强壮的滨口现在却异常消瘦，他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回答着问题。反对党大喊“大点声”“滚出去死吧”。参加了10次这样的会议后，滨口终于在4月决定辞职，4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日本影响深远的改革努力也无疾而终。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不安与动荡在日本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填补了民主改革失败所留下的空白。作为盲目军国主义的反对者，自由派和温和派人士不断遭到刺杀身亡。袭击的目标甚至包括军方人士，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1935年夏天永田铁山的被刺身亡。这些暴力事件造成大范围恐慌。1931年9月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关东军指挥官宣称，占领行动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但是出于大公无私，而且没有回旋余地。与议员鸠山一郎一样，这些指挥官以“统帅权独立”的不可侵犯性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滨口的继任者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首相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紧急事件。“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说：“如果在危机发生几天后内阁辞职……如果政府发布抗议声明并以同样的精神处理事件，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的尊严、日本的

国际地位、经济和政党政治，都能得到挽救。”相反，日本政府犹豫不决了将近3个月，“即使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东北的形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

1936年，永野修身（Nagano Osami）成为海军大臣（海军省最高官员；山本五十六是他的次官）。永野正在谢顶，目光令人生畏，他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黑帮老大。他的学习和晋升道路特别让人羡慕，也比山本更快一步，他在哈佛留过学，也参加过各种国际大会。他以班里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这几乎可以保证一个光明前程。但他是一位不讨人喜欢的领导，缺少山本的号召力和个人魅力。他常常在办公室打盹，被称为“打瞌睡的将军”。记者在他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休息是因为他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妻子（前三个已经过世）。

海军大将米内光政（Yonai Mitsumasa）从1937年4月至1939年8月担任海军大臣，对于山本来说，米内是更容易相处的长官。1940年年初，米内光政成为首相，《时代》杂志这样描述他的外貌：

他的外号“白象”听着令人生畏……这指的是他的身材。他的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他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这更加映衬出皮肤的白皙。他看起来刚毅而睿智。

这比日本陆军给他的评价要好听得多了，后者将他称为“金鱼大臣”——虽然好看，但根本不适合担任政府重要角色。

陆军低估了米内的政治能力。他在3届不同的内阁中担任过海军大臣。政治上的误判他也有份，尤其他一开始支持近卫对蒋介石实行强硬政策。但后来日本政府内大多数人越来越亲德，米内却成为日本与法西斯结盟的坚定反对者。在1939年8月召开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大藏大臣问米内：如果日本因为与法西斯国家结盟而被迫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战线作战，结果会怎样？这种战争势必会在海上打，因此米内的回答至关重要。他说，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抗英美联盟。米内极力阻止日本加入这一不合时宜的联盟，至少能阻挡一时是一时，裕仁天皇也不禁对

他说：“多亏了海军，我国才得以挽救。”但米内非常清楚，他的反对声恐将威胁到他的性命。1941年的日本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和直言不讳。

尽管一些海军官员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但也不能说，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在判断日本相对实力时比陆军更为谨慎和理性。米内和他的坚定盟友山本五十六以及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Inoue Shigeyoshi）渐渐沦为少数派。作为米内光政的得力助手，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很快意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肤浅与危险。井上在德国读过《我的奋斗》，他知道这本书对日本的蔑视，但这一部分却在日本翻译版中被删掉了。但米内及其同盟要对抗的不仅是陆军，还有海军内部的纳粹崇拜者，随着希特勒闪电战的成功和对轴心国联盟的推动，海军中的纳粹崇拜者越来越多。

海军中将冈敬纯（Oka Takazumi）后来成为海军军务局局长，并在1940年秋提拔主战的石川信吾（Ishikawa shingo）成为课长。石川相信，轴心国联盟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威吓英国来结束对华战争，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日本就能迫使英国为日本和中国进行调解。米内、山本和井上对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与轴心国结盟肯定要招致与英国以及美国的战争。冈敬纯强调说：“美国历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站在日薄西山的英国这一边，与强大的德意日联盟抗衡。”

随后两派的争论日益激烈，米内越来越担心他副手的安全。1939年8月，在米内的强烈建议下，坚持想要留在海军省的山本被任命为海军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官。讽刺的是，米内本想让山本担任军职来保护他，但也让他没有机会反对政府的主战政策，他后来不得不制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井上也被调往远离东京政坛的其他位置。1940年1月开始担任首相的米内仍然反对与轴心国结盟，据说裕仁天皇十分器重米内。然而，米内的地位很快下滑。1940年6月，受纳粹在欧洲胜利的鼓舞，近卫及其他亲轴心国政策的支持者（多数来自陆军）开始破坏米内内阁。陆军大臣畑俊六从内阁辞职，而陆军拒绝推荐新的陆军大臣，陆军的不合作意味着内阁必须解散。于是当年7月，近卫文

磨第二次出任首相，随他一同上台的还有与众不同的外相松冈洋右。

海军大臣吉田善吾一度追随米内的脚步，反对加入轴心国。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40年9月被及川古志郎（Oikawa Koshiro）取代。及川看起来很随和，留着灰白色的寸头和浓密的胡须，但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让他看起来茫然而不自信。虽然及川同情亲英美的米内光政等人，但他总是保持沉默，这在关键性的政治讨论中常常是无益的。他来自日本北方，沉默在那里是受推崇的品质。外人常常开玩笑说，这是北方极度严寒把嘴冻住的结果。及川将这一家乡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甚至怀疑他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但不愿发言，还认为政治不关海军的事，许多海军官兵都有这种想法。他个人不喜欢对抗，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争论。及川认为，米内1939年以来对轴心国结盟的强烈反对是不可想象的举动。所以及川在1940年秋并不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也不足为奇。他不会疏远近卫文磨和松冈洋右，更不会疏远海军中支持这一条约的人，以及整个陆军。

1941年4月，海军必须推选接替即将退役的伏见宫博恭王（Fushimi Hiroyasu）出任军令部总长，并由裕仁天皇任命。对于海军中不想日本与西方为敌的人，这是一个重新找回自己声音的好机会。伏见宫博恭王曾在德国留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海军拥有至高权力。作为老派的军人，他坚信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威望与所拥有的战舰数量直接成正比（因此军令部1930年反对滨口雄幸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这意味着伏见宫博恭王及其支持者[他们由于因循守旧的思想常被称为“中队集团”（Squadron Group）]完全不能赞同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因为这三人在呼吁与其他大国和解（并同时发展新技术，比如空军力量）。

让人失望的是，尽管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人极力为提名米内光政获得提名进行游说，但及川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的将军”来接替伏见宫博恭王。这也符合伏见宫博恭王的意见，他在海军中的资历加上皇族血统使他成为一位无法违抗的长者，至少及川这样认为。当山本听到他从前的上司永野修身被任命的消息后，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

差得远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山本五十六不看好永野还说明，他似乎接受了一场他曾公开反对的战争，尽管他还继续反对战争，但他同时想要进行策划。诚然，山本有其冷静谨慎的一面，他相信日本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但如果必须为之一战，他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指挥战争。他可以尽量为战争做最好的准备，而他最好的努力最后换来了最好的战略效果，这是一个没有人想过的大胆计划，完全是一个赌徒在没有胜算时的选择。山本知道，如果日本想要有一线获胜希望，就必须在一开始占据上风，这样美国才“有可能”被骗上谈判桌。

1941年1月27日，在东京听到“战争传闻”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给赫尔写了一封信，他表示使馆工作人员“从多方渠道（包括一位日本消息人士）听说，日本军队计划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袭”。格鲁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很荒诞”，事实的确如此。但山本决心要让这荒诞的一幕变为现实。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尤其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山本就在专心研究日本的太平洋战略。一般的战略无法满足他，而他不同寻常的战略也将需要寻求不同寻常的支持。

1941年2月初，第一航空部队参谋、海军少佐源田实（Genda Minoru）正在一艘停靠在鹿儿岛志布志湾附近的航母上，36岁的源田实身手敏捷，是海军中的明星飞行员。他曾带领一支特技飞行队，在全国各地为庆典活动进行表演，让海军航空队受到热捧。在这个特别的冬日里，他被第十一航空部队长官大西泷治郎少将召唤，于是他在日本南部海军基地鹿屋离舰上岸。两人在大西办公室的沙发落座，大西长官从他胸前口袋里不经意地掏出一封信。大西对他说：“你不妨看看这个。”源田实瞥了一眼信封背面，他惊讶地看到山本五十六的签名，山本书法娴熟人尽皆知。源田实回忆，山本在信中说：

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也许被迫要与美国开战。如果日本与美国打仗，我们就要拿出最极端的战术……依靠我们第一和第二航空部队的全部力量，我们必须设法给美国在夏威夷的舰队一记重击，这样美国才能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向西太平洋进发（日本在该区域将面临

其他敌人，比如荷兰和英国）。我们的目标将是一群美国战舰……这不容易实现，但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项计划，我将亲自指挥航空部队。我想让你仔细研究该计划的可行性。

自从美国1908年在夏威夷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以来，日本海军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受到美国袭击。1940年5月，美国指定珍珠港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这更加深了日本的担忧。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日美战争将是一边倒局面，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日本海军的战略必须是纯防御性质，日本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空中打击和潜艇来阻止美国海军前进。山本五十六显然不这么认为。

读完山本五十六的信后，源田实一时语塞，他仅蹦出一句：“了不起的想法！”当他讶异地抬起头时，大西对他说：“那么……我想让你看看这一计划是否可行。”虽然这让源田实万分惊讶，但也勾起了他的兴趣。

该计划最明显的障碍就是如何对敌军舰船发动鱼雷袭击。普通航空鱼雷需要下沉10米才能重新调整深度。由于珍珠港水浅，只有12米深，估计许多鱼雷将直接栽进水底，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让航母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目标区域也很困难。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不容易。1941年4月初，在源田实读到山本五十六信件的两个个月后，大西泷治郎递交了进攻计划。该计划远超山本的预想，它排除了航空鱼雷的使用，转而利用俯冲轰炸和水平轰炸（后者由横向飞行的飞机发动，需要通过准确计算才能打击到目标区域，所以常常不够精准）。山本回应说，如果现有的鱼雷不能奏效，那就去改进鱼雷和提高飞行员技能来使之奏效。而大西坚持认为他的方案可行。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由于松冈洋右所谓的“闪电外交”，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以及苏联缔结的新联盟关系本应能迅速而和平地解决日本在海外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中日战争和日美紧张的外交关系。但日本没那种运气。松冈5月12日给美方答复后的几周内，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太平洋这边没什么动静，但欧洲战事正酣。

南斯拉夫沦陷后，雅典4月27日也在德军的进攻下沦陷，在英联邦部队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和国王乔治二世逃往克里特岛，但又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尽管德国也损失惨重）。5月底，希腊领导人撤离到埃及，但埃及也不是长久之地。1941年2月开始，新成立的德国远征军“非洲军团”在“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开赴利比亚，援助准备占领北非的意大利。

与此同时，英伦三岛继续遭到轰炸；先是贝尔法斯特、赫尔，然后是利物浦，这座城市5月初曾连续7个夜晚遭遇空袭。但这将是德国猛烈轰炸英国的尾声了，因为希特勒的注意力将转向东方。

1941年6月22日，一个炎热的周日，外务大臣松冈正在东京接待汪精卫，邀请他来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剧场的建筑是日本本土主义者对前一世“鹿鸣馆”的颠覆，它故意保持传统建筑式样，包括日式城堡使用的石板瓦房顶，这座混凝土建筑于1925年才完工，据称能容纳2700人，似乎是故意炫耀日本的现代化成就。

日本最近越来越没什么可炫耀的了。1941年4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资源集中原则，钢铁工业被“整合”到钢铁控制协会。其他大型工业也开始合并，让国家拥有更大权力进行资源分配和定价。因此，公民私自使用金属是严厉禁止的，即使是校服上的金属扣也要被没收，并换成玻璃扣。在5月的男孩节，最受欢迎的玩具是飞机、坦

克和头盔，但这些玩具都是木头、竹子和塑料制成的。

“歌舞伎座”的周日下午场演出吸引了东京最具权势的人物，他们穿着得体而华丽的衣服，庆祝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成立。整个演出过程中，松冈的秘书加濑俊一坐立不安，他特别想搞清楚当天早些时候听到的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他从座位上溜出溜进，为了从地下换衣间打电话给外务省。最终，在第一幕结束时的掌声中，他给松冈递了一张字条，确定德国在当天上午对苏联发动了袭击。

松冈估计到德国某一时刻会进攻苏联，他甚至这样表示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Oshima Hiroshi）不断发回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但松冈对这些报告表示怀疑，他相信自己会直接从德国人口中得到这一消息。所以松冈此时大吃一惊。

希特勒曾说过：“整个世界都将屏住呼吸，不做评论。”纳粹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让希特勒的预言成真。的确，在这一决定命运的一天，世界大多数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斯大林则完全震惊了。他再三忽视德国调兵的警告，相信1939年8月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译者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暂时让他的国家安全。我们知道，斯大林认为德国在英国那边的战事还没有了结，不会再发动战争形成两线作战。德国突袭苏联时，斯大林正在索契的黑海别墅附近钓鱼。消息传到他的船上时，他静静地收回鱼竿，说了一句：“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啊？”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及日本其他领导人认为，日本是德国最忠诚的伙伴。现在他们面临一个两难局面。近卫首相派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前去打探东条对这一消息的看法。已退役的陆军中将铃木担任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1937年设立的企划院负责统一和监管资源调动的政策。随着对华战争的深入，企划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铃木将在评估日本与西方开战可行性上扮演关键角色。他对比他年长几岁的东条毕恭毕敬地说，近卫认为，德国进攻苏联为日本抛弃《三国同盟条约》提供了令人欣喜的机遇，采取更加中立的外交立场对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相处十分重要。听到这番话，东条气得大

叫：“你真觉得我们能违背人性不顾法律，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其实，德国已经违背了日本士兵奉为主臬的忠诚原则。1882年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但东条就是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

生于普鲁士的奥托·D·托利舒斯（Otto D Tolischus）在《纽约时报》工作，他曾获得过普利策奖。1940年3月，他被纳粹德国驱逐，后来在东京从事报道，1941年6月22日他写道：“德国与苏联爆发战争……日本官方集体失声，唯一的官方回应就是无可奉告。”

“巴巴罗萨”行动迫使松冈接受，他的四国外交势必要崩溃，但早在这一天之前，松冈就已经在近卫内阁中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松冈和近卫由于《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产生的矛盾越深，松冈对日本首相位置的觊觎之心就越大，他对内阁的批评也越发公开，尽管此时他仍是内阁成员之一。他自以为获得了天皇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想法。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对此裕仁天皇表示：“松冈可能被希特勒收买了。”

1941年5月3日召开的联络会议是他欧洲之行结束后的首场重要会议。松冈极力鼓吹着他的新计划——日本进攻新加坡，回避了日方该如何就谅解草案答复美国这一更加重要的议题。赫尔曼·戈林曾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宴会招待了松冈，戈林和希特勒都敦促日本进攻在新加坡的英军，从而帮助德国这边的战争。松冈对他们说：“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这样做。”回到日本后，松冈坚持强调新加坡必须立即拿下。听到这一提议后，参谋总长杉山元十分震惊。欧洲之行前，杉山元就已告诉松冈进攻新加坡是不可能的。另外，他也不认可松冈对德国很快独霸欧洲的信心。杉山指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准备入侵英国，在北非建立了诸多基地（即使这样），他们也没能成功。”松冈说：“德国说能在两个月拿下苏联。”但他并不清楚德国的计划。“新加坡也不会是什么问题。”他说。

松冈对自己的提议遭到反对并不担心，他在5月8日的联络会议上再次提出新加坡问题。他强调说，时机和速度至关重要。“罗斯福渴

望（在欧洲）参战。你看，他是个大赌棍。”松冈坚持认为，在新加坡战胜英国将让美国重新考虑是否与日本直接对抗，他说：“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前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美国就会改变主意，不去参战。（但）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后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那么美国就会继续战斗到底（并与日本开战）……一旦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将被拖延，世界文明将遭受毁灭。”他对在场的内阁大臣和高级军官说：“如果战争要持续10年……日本该怎么办？”

没有人作声。松冈相信，他能再次让自己的提议强行获得通过，自从前一年夏天开始担任外相以来，他已屡试不爽。他当天前往皇宫，向天皇汇报自己的想法。松冈向来认为，日本可以不使用武力，而仅依靠娴熟的外交就能变得更加强大，现在他却开始鼓动直接军事对抗。裕仁天皇对此大吃一惊，特地召见近卫询问，后者向天皇保证，松冈并不代表政府其他人的观点。

松冈对美国国家性格的误解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执着地认为，只有挑衅才能赢得美国尊重。他太过依赖边缘政策，不知道该何时收手。而政府中没人对他加以限制，这让太平洋两岸的外交僵局变得更糟。我们知道，赫尔5月12日收到了“松冈计划”，但此后一个月没有任何回应。松冈5月3日曾给华盛顿传达了一条大胆的口头声明（一种口头外交声明，但通常也以文字形式递交），他以自己典型的戏剧化风格声称，美国加入欧战将招致灾祸。他表示，日本无意退出《三国同盟条约》。野村大使负责传达这些信息，尽管赫尔已经从破解的情报信息中知晓此事。

松冈命令野村提出一个日美中立条约，赫尔当即予以否决（“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他认为这并不实际，也与当前问题并不相关。松冈的许多举动都带有这些特点。早在华盛顿决定以《日美谅解协定条约》与东京接触的4月16日，赫尔对野村说，他对此前几天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并不十分担心，因为：

我一向认为，苏联的政策是不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所以我觉得这份

书面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而已。

美国并不急于与日本达成中立条约。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基于“1941年年初获得的消息，政府从可靠线人处得知，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美国甚至“私下把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大使”。这将改变一切，包括美日关系。

美国之所以不着急回复“松冈计划”，正是因为美国料到，德苏开战后，日本将更有可能对美国做出让步。6月21日，美国对日本的回应几乎与“巴巴罗萨”行动消息同时到来。与松冈的挑衅语气一样，美国也变得明显强硬了。美方在4月谅解草案里提到过承认“满洲国”，这曾让日本领导人感到欣喜，现在却一字不提了。华盛顿现在强调，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是其首要任务，美国和日本都不应觊觎该地区领土。美国因此断然拒绝日本在东南亚动武的权力，而“松冈计划”强调的正是动武权力。

总之，美国在回应中表示，亚太地区应基于贸易自由和机会平等原则。这一理想状态也反映出赫尔的基本世界观。他来自田纳西州，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律师，自1933年起出任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他总是批评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影响全球经济健康状态的保护主义和各种经济集团。赫尔毫不让步的表态浇灭了日本的希望。当然，协定草案本来也不是美国政府起草的。

赫尔的回复还包括一条口头声明，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该声明显然是针对松冈洋右的。虽然声明称赞日本大使及其手下的敬业精神，但赫尔也抱怨道：

一些位高权重的日本领导人坚持的路线竟然是寻求对纳粹德国及其侵略政策的支持，而他们唯一愿与美国达成的谅解是，如果美国因为自卫政策而卷入欧战，那么日本将站在希特勒这一边……只要这种领导人坚持这种官方态度，并以此来影响日本民意，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只有通过当下讨论的这份协议才能奠定一种基础，我们才能沿着想要的路线取得实质结果。

这是对松冈5月3日自负言论的强烈谴责，松冈当时说，无论如何日本都将坚持《三国同盟条约》。赫尔的声明还说：“我国政府必须等待更加明确的信号，即日本政府整体上想要寻求和平路线，但现在还没有收到这种信号。”这其实是要求换掉松冈。1933年松冈从日内瓦回国前见过罗斯福和赫尔。据说他让罗斯福立即感到厌烦。自我膨胀的松冈很可能无法体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感觉。虽然他思维很快，善于使用言语和姿势来制造效果，但他不能理解他人，他的行为常常难以预测，所以他并不适合这样一个需要耐心、斟酌和技巧的政治岗位。他极其缺乏自知和自我约束。1941年4月他在梵蒂冈对教皇庇护十二世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爱有我多，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而在莫斯科，他竟教导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这让斯大林惊讶不已。

松冈曾经一度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完全控制权突然不见了。但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传来时，他迅速试图挽回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虽然他感到自己在政府中没有支持者，但他并不在乎，他直接请求天皇立即下令攻打斯大林。裕仁天皇震惊了：不久前松冈还在倡导进攻新加坡，现在他又说，日本应该进攻北方的苏联（对此，松冈厚颜无耻的借口是“英雄总能果断改变主意。我之前同意南进，但现在我想转向北方”）。根据《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并没有义务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中，但松冈似乎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事。后来松冈在与苏联驻日本大使康斯坦丁·斯梅塔宁（Constantin Smetanin）会见时宣布，《三国同盟条约》优先于《苏日中立条约》，这让斯梅塔宁吓得脸色发白。

近卫发现松冈在直接呼吁对苏开战后，他感到无比尴尬。第二天他前往皇宫，为自己外相的所作所为做解释。近卫再次向天皇保证，远征苏联是松冈一厢情愿的想象。“巴巴罗萨”行动让松冈更加孤立。

作家永井荷风并不了解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国内的真正形势和外交挑战，但他清楚日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他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创作自由越来越被限制。他为巴黎陷落感到惋惜，并用红色墨水在日记中为巴黎陷落一周年做了记号。第二天，1941年6月

15日，受风寒而卧床休养的永井在家读书，他读到18世纪以批评社会而闻名的一位作家的话（译者注：原文只给出作家的名字叫Kicho，但无法查到具体人）。这位作家晚年时，曾有年轻人问他，为何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所畏惧。他严肃地说：“在每日生活中表现得彬彬有礼、矜持一点也没什么，但一旦拿起笔，你就不能再拘谨了。”他承认，家人和朋友多年来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担心他的写作很容易被认为是攻击当局，可能会因此入狱。他很高兴自己最后坚持了信念，总是记录下在周围观察到的事实。

以上是从永井在日记中摘录的段落，这让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羞愧”。1941年年初，有人从他已发表的一篇作品中发现，永井多年来都有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担心受到迫害，“一天晚上我熬夜从日记中剪掉了（对当局）批评和抱怨的话。我出门时将日记藏在鞋柜里以防万一”。受到鼓舞的永井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懦弱行为。他宣称未来的历史学家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关于他对日本的政治观点是真实、发自内心且毫无畏惧的想法（至少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

日军一开始入侵中国国土时，日本宣称是去“教训不守规矩的中国”。但战争意外拖延后，（政府）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称之为“圣战”——完全空洞的词语。现在日本政府想要向东南亚扩张……试图利用英国军队在欧洲的困境。无知的士兵和残忍的策划者都负有责任，人们本质上并不会为这一发展感到愉悦。

永井认为，人们因为害怕迫害而不去抗议，但他知道，仅仅是害怕不足以说明过去10年日本发生的一切。他指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人试图宣扬忠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来获得好处”。所以他得出结论：“日本人本质上都是乐天派，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招惹太多麻烦，也没什么崇高理想。”对于这些冷漠的国民来说，“不论是当前（军国主义）还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变革都没有什么意义。

6月20日，宣泄完情绪的第五天（也是“巴巴罗萨”行动的两天前），永井又抱怨糟糕的政治形势对人们读写方式的负面影响，读书

和写作是他最在乎的两件事。新杂志《意大利朋友》主动寄给他的一封信推销信激怒了他，东京帝国大学校报的来信也让他不满，学生们用毫无礼貌甚至蛮横的语气要求他做出贡献。他说：“最近的人们啊……我觉得很遗憾，像我们这样一个傲慢的国家，竟然去统治我们的邻国。噢，美国人，你们为什么现在不站起来，教训这个野蛮国家？”

尽管日本对未来的方向摇摆不定，但“巴巴罗萨”行动过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盟关系迅速发生重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认为，苏联现在的命运与这些国家息息相关。6月22日晚，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广播前，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次演说也在美国播出。“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一开场讲道。他随后列举了此前3次重大转折点——法国的陷落、纳粹试图对英国的入侵和1941年年初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以援助同盟国，而第四个转折点就是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丘吉尔夸张地描述着德国的突袭，他说：“德国炸弹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对英国的入侵只是暂时停歇，袭击苏联是希特勒的策略，以便他能够“更大规模地重施故技”，征服西半球。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决定帮助苏联——尽管与美国相比，英国也做不了什么重大贡献。

丘吉尔知道，罗斯福很难让美国国内的反对者（孤立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接受美国对苏联支持的必要性。虽然他也知道“没有权力指挥美国”，但丘吉尔仍然强调：“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罗斯福也有同样想法，希望鼓励和支持苏联抵抗，但他也清楚，他必须谨慎应对新形势。他已经感觉到，美国势必要前往欧洲参战，但他知道眼下时机还未到。他完全清楚，请求国会批准开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他这一届政府的政治失败。他身边的军方代表，包括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都催促他立即采取打击德国的战略行动，向大西洋派遣战舰，他们预计，德国几个月内就能击

败苏联。罗斯福也想加强其打击轴心国的政策，但不包括开战。

作为一系列举措的第一步（从斯大林角度来看，这一步微不足道），美国决定解除1939年年末苏联入侵芬兰后，美国冻结苏联的4000万美元资金。罗斯福6月24日解冻了这笔资金。美国还成立专门负责苏联所需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军备费用大约为5000万美元。罗斯福让苏联购买这笔军需品，不能赊账，而政府各个部门又不情愿处理这么一大笔订单，所以1941年夏天美国对苏联的实际援助并没有很多，斯大林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再撑几个月。

欧洲脆弱的形势更让罗斯福政府想极力避免太平洋战争。四国联盟瓦解了，华盛顿估计东京将重新考虑其谈判立场。德国进攻苏联当天，野村吉三郎拜访了赫尔，赫尔问他：“德国对苏宣战难道不会影响形势，好让日本政府更容易（撇清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

日本当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在国际法中，如果出现不可预知的形势骤变，各方达成的协议就没有约束力。“巴巴罗萨”行动符合这一条。如果日本当时与轴心国分道扬镳，那么美国（以及苏联）将会相信，日本与西方的谈判意愿是真诚的，德国没有主导日本的扩张政策。近卫立即派信使铃木贞一拜访东条，这证明近卫首相渴望纠正错误路线，想与美国拉近关系（他后来还宣称召集过个别大臣参加小规模会议，但没有关于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而联络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这一话题）。

松冈和东条都阻挡了他，而本应亲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也不站在他这一边。木户完全不考虑《三国同盟条约》对美日关系造成的损害，他愚蠢地对裕仁天皇说，日本坚持做希特勒的朋友很重要，因为美国重视国际条约。实际上，木户不想让天皇站在任何一边，希望天皇和皇室不要影响重大政策的转变。最后，近卫只好选择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不想与这些人对抗。前一年秋天他还是《三国同盟条约》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他可能觉得，如果这么快就抛弃这一盟约，他会丧失自己的政治信誉。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1941年6月23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德国驻东京记者理查德·佐尔格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情报命令：“汇报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的立场。”40多岁的佐尔格身材高大，面容棱角分明，很有魅力，他是苏联在日本安插的间谍。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巴库，母亲是俄国人，他大部分时间在柏林长大，一战时加入德国部队，但他在这场战争中负伤（让他成为跛子），于是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接到命令几天后，苏联政府又要求他“汇报（日本）陆军向我边界调遣的信息”。莫斯科现在急切盼望他的情报一定让他觉得很可笑，因为此前他发回一系列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警报都被斯大林当作耳旁风。

1933年秋，佐尔格抵达日本。他曾总结说，他的任务就是：

密切关注日本对苏联的政策……确定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是给我以及我的团队下达的最重要任务……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在日本的全部目的。

佐尔格似乎在日本很自在。他住在普通的两层房屋里，家里堆满历史书籍以及他在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人们常能看到他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他很随和，很快就成为东京德国人圈中受欢迎的人。他能够赢得重要人物的信任，尤其是当时德国驻日本使馆专员、1938年晋升为德国驻日大使的欧根·奥特（Eugen Ott）。这就是为什么佐尔格能够提前知道“巴巴罗萨”行动的准确日期。

奥特如此信任佐尔格，甚至允许这位记者在德国大使馆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佐尔格在这间办公室编辑每日新闻摘要（并与奥特太太发生关系）。佐尔格富有成效地招募新成员，组建他的间谍网络，团队包括至少13名男性和3名女性，但这些人很少与佐尔格保持直接和长期联系。间谍网络成员有曾在莫斯科读过书的普鲁士无线电通信工程师马克思·克劳森，在克罗地亚长大的塞尔维亚犹太人、为法国和

南斯拉夫报纸撰稿的布兰科·德武凯利奇（Branko de Vukelic），来自冲绳、从小在加利福尼亚接受训练的画家宫城与德（Miyagi Yotoku），以及近卫文麿的顾问、十分了解中国的著名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尾崎胖乎乎的脸庞和善良的眼神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放下防备。他是佐尔格网络中最重要的人物。生于1901年的尾崎主要在殖民地台湾长大，他的父亲是派驻中国台湾的记者，后来他回到东京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1928年至1933年常驻上海工作。

尾崎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历对他意识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回忆说，他与台湾的中国人亲密接触，在“每天生活的每个细节中”认识到殖民帝国主义下由“统治者统治”的权力体系，这是他普通童年生活中唯一“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看到即使像他父亲这样好脾气的人，有时也会变成傲慢的殖民者，斥退想讨要更多钱的人力车夫，这让他很难过。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更加强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他尤其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并为日本和中国提供了和平共处、为相同目标进行合作的道路。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以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激进言论著称（她也是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年轻的记者尾崎1930年年初在上海见到了佐尔格。佐尔格当时正为莫斯科调查中国国情及共产主义的发展，他向尾崎请教日本在华活动的实质。佐尔格描述，他们俩的关系“不论在私人层面还是工作方面都完美契合”，尾崎1932年离开中国回到东京，这是佐尔格调查中国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尾崎说：“这些人（史沫特莱和佐尔格）的意识形态坚定，拥有崇高的准则，在工作中既投入又能干。如果他们有丝毫自私的动机，或者存心想要利用我的话，我早就会拒绝他们，与之分道扬镳了。”

在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上，1934年尾崎秀实在日本见到佐尔格并

同意与他合作就并不让人意外了。尾崎有个条件，他不会收取任何金钱上的酬劳。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具有分析能力、学者气质（佐尔格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热情、爱交际的性格，这让两人既能成为优秀的记者，又是娴熟的特工人员。

在日本，佐尔格利用自己纳粹党的身份隐藏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心，但偶尔他也会犯错。1939年9月4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他差一点露馅了。佐尔格从德国通讯社（DNB）的办公室出来后，碰到法国哈瓦斯通讯社（Havas）东京分社的社长罗伯特·吉兰。吉兰一看见这位“纳粹”记者就开始数落：“我爷爷与德国人打过仗，但当时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输了。我爸爸1914年也与德国人打过仗，那是因为德国攻打我们。你似乎对这两场与法国的战争不怎么满意。那么好吧，我们将跟你打第三次仗，这一次我们将把你彻底击败。我们将把希特勒轧成粉末，把你们全都炸死。你等着瞧吧，德国将成为一片废墟。”听完这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同行发表的长篇大论后，佐尔格却热情邀请他共进午餐。两人吃饭时，佐尔格对他说：“我跟你一样厌恶这场战争……我也参加过一战。我曾相信世界会迎来和平。希特勒出现后，我曾以为他会给德国带来新秩序，给欧洲带来和平，但我知道自己错了。”犹豫了一下后，他又补充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是吧？”

没有尾崎的佐尔格发挥不了作用。他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无法在日本有效开展活动，他的日语口语能力还停留在基础阶段。（他的俄语能力也很有限，他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大多靠英语和德语）。尾崎作为政治分析家和时事评论家（尤其关于中日关系）常常很忙碌。他为《朝日新闻》报道的重点正是中日关系，他还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智库进行研究工作。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升级，他也成了知名公众人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军方和警察，都想听听他的看法。他还是近卫首相政策顾问团“昭和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单靠这一职位他就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加入了所谓的“早餐俱乐部”。

这一封闭式俱乐部每月举办两次聚会，每次都在早上8点，会员

们交流信息，讨论时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令人生畏。近卫并不是俱乐部聚会的常客，但其他成员都以自己成为近卫的心腹而感到自豪。大多数会员来自日本特权阶层，他们有的30多岁，有的40岁出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英美接受过精英教育。这些人包括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Ushiba Tomohiko）、西园寺公爵之孙（陪同松冈洋右乘坐“红矢号”列车出访欧洲的）西园寺公一、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Kazami Akira）、国际问题记者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犬养毅首相的第三子——小说家犬养健、明治元老松方正义之子松方三郎（Matsukata Saburo）。

也许因为出身高贵，俱乐部成员觉得没有必要在近卫面前保留意见，也正因为如此，近卫也特别看重这一圈人。尾崎与西园寺公一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对中国的深刻见解，所以他也被纳入该俱乐部。1936年，尾崎与西园寺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相识。西园寺对尾崎的激进主义思想丝毫不了解。实际上，尾崎甚至对他妻子也隐瞒这一面，但他在其他方面却对她百依百顺。

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几乎每天都要小聚一下。他们很自然会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两人都深知日本的政治正偏离正轨，中日战争应该马上结束。尾崎后来表示，他“十分真诚”地结识这些人，并利用他们获取信息，这是“出于对国家当前危机的共同关心”。

“巴巴罗萨”行动后，共产主义间谍需要弄清楚日本是否有意进攻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松冈认为日本应当进攻苏联，他甚至让德国人相信，日本即将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这让苏联感到焦虑。由于松冈仅依靠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从柏林发回的片面报告，所以他深信德国最终会获胜。攻打苏联既能让日本扩张领土，又能向纳粹方面表达忠心。他认为，日本所处形势类似于1940年6月的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正是在德国胜利在望时决定进攻法国。但松冈的新政策倾向具有严重问题：他的“北进”建议没有伴随任何实质性战略规划，除他以外的日本领导层也没人愿意与苏联开战。

尽管日本陆军向来提防北方，把苏联视为主要对手，但陆军丝毫

不愿意支持松冈的理由很充分：日本陆军没有能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作战的重装坦克，苏联对日本的优势已在1939年诺门罕边境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在中国和苏联打仗。1941年6月，陆军决定与海军一道推动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的计划。

军方强调，在适当的“外交”压力下，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很可能将以和平方式向日本转交控制权，毕竟仅在过去10个月，日本就已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还通过裹挟武力威胁的外交手段帮助解决了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争端（对前者有利）。通过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日本不但能够建立更靠近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战略根据地，还能获取更多大米、锡和橡胶，让日本短期内有能力与中国作战，长远来看还能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以便在未来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另外，荷属东印度还有可能被日本的存在所震慑，从而最终同意向日本提供更多石油。所以军方认为，印度支那以南并不需要派兵攻打。

松冈对此坚决反对。他错误地相信，德国将迅速消灭苏联（包括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这样认为），他还认为，如果日本决定占领更多法属殖民地，将可能遭到英美方面的严厉报复，这样做将过分表露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野心，让美国警觉。他的担心是对的。1941年6月底，到底是攻打北方（苏联）还是向南挺进成为东京的决策重心。不同的派系和决策机制让东京的决策过程充满辩论，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东京的政策制定产生持续影响。

大体上，日本战略构想都是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做出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提出战略建议，作为内阁一部分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有时也会提出建议。在后两个部门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其次是陆军次官和海军次官，然后是各个局长（军务局、人事局、法务局、整备局、会计局等）和各个课长（局的下属处室）。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是最高指挥官，其次是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然后是各个部长（作战部、情报部、动员部等）和各个课长。战略设想很少是最高官员做出的，而是陆海军下设的局级、课级部门做出

的。由于这些团体都为自己利益着想，出台新政策是十分复杂的过程。

比如，如果参谋本部下的某个部门或某个课室提出一项建议，它首先需要获得其他部级和课级领导的认可、修改和批准，然后才能拿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合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通常是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同时，陆军省的局级和课级领导也会被征询意见，如果意见相合，他们会共同征求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和外务省同意，这些部门都有错综复杂的下属分支。如果能够确保获得外务省和海军方面的支持，参谋总长才会正式代表最高统帅部在联络会议上向内阁提交方案。

这种费劲的基础工作由中级军官完成，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参与过最高官员召开的联络会议。他们被贴切地称为“幕僚”，字面意思是“帘幕后的官员”。在过去，“幕”在解释权力时有两层意思。其中一个指代政治，是政府的同义词，比如“幕府”（幕后政权）；另一个指代战略，暗指野战营地中大本营使用的临时帘幕，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大本营讨论战略。在战前的日本，幕僚既承担与不同方面讨论和联络等政治任务，也参加制定战略这样的实际工作。由于幕僚在主导日本政策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个名称总是唤起一种战争发动者的形象，他们以对上级辅佐和建议之名秘密炮制黷武政策。

1941年初夏，日本最具影响力的3位幕僚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Muto Akira）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他们都在50岁左右。武藤章和冈敬纯常常合作促成陆海军之间达成共识，而田中新一独立行动，他那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了末日气息，他所领导的作战部最为激进。

田中不断倡导对华强硬。对他来说，在华取得完全胜利是唯一选项，而日本领导人近来展现出与美国谈判的意愿是一种耻辱。他认为不开战与投降这种懦弱行为没有区别，还不如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后再失去一切。虽然他在参谋本部只是三把手，但由于他信念坚定和性格

强势，他即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政策决断权。

田中常常对他所认为的武藤章的妥协主义倾向感到恼火（但其实，武藤章很难算是一个温和派）。田中看到武藤章在军务局的下属佐藤贤了（Sato Kenryo）更有培养前途，佐藤也是陆相东条的心腹之一，40多岁，若干年前曾在国会上强烈支持《国家总动员法》而闻名全国，当时他被议员们的质问激怒了，大喊一声“住嘴”，随即夺门而出。民主进程显然不合佐藤的口味。

海军也有自己的鹰派中层官员。最典型的要数海军省军务局下一个40多岁的课长，名叫石川信吾。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以笔名写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叫《日本的危机》（这没有经过海军同意，足以被海军开除）。他在书中警告说，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意控制东方，他敦促日本在美国威胁迫近之际，开展“全国性运动以确保生存权”。他认为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西方阻止日本崛起的一种阴谋活动。与制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样，石川利用这本有争议的著作去影响年轻官兵，让海军中的许多亲英派变成纳粹同情者。他的狂热向来让高层警觉，他的外号叫“不规弹”，所以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与关键职位无缘。而在1940年秋，强烈鼓吹日本轴心国联盟的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不顾人事局的反对，任命石川信吾为军务局主管军备的课长。

石川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同事组成了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正是这个“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推动了日本海军的主战立场。他与田中新一一样，都相信不应回避与美国的战争，而要勇敢面对。在他看来，日本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就意味着日本要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石川甚至希望战争打到印度支那境界外，他想要征服英属马来亚。石川后来夸耀地说：“我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人。”

可以说这些幕僚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时刻关注扩大战略优势和领土的机会。但日本在1941年年中的

问题在于，备战成为唯一的重心，而日本缺少全面的国家政策来指导备战。上层决策者任由下层军官带动，下层军官的权力本应受到限制，但决策者现在却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们煽动性的言论。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毫不脸红地解释说：“因为底下官员最了解情况，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50年后，当年在陆军省成功起草多项提议的石井秋穗（Ishii Akiho）回忆，在珍珠港事件前关键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曾经手握重权，他说：“尽管我们很愚蠢，但只要积极主动，我们就能左右一项重大政策。当然，我们的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修改，但（我们的声音）是重要的……所以我罪孽深重。”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但还有必要强调的是，1941年6月，军方高层领导人或政策制定部门的幕僚并不认为田中新一、石川信吾及其他好战分子过于激进。这些决策人也支持向印度支那南部挺进，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风险小回报高的机遇，在其他国家忙于应付欧洲战事之际，东南亚的权力真空必须加以利用。虽然松冈洋右呼吁日本在德国战胜苏联前应立即向北进发，但这些幕僚却认为，日本在南边的机遇转瞬即逝。这就是日本关键时刻南北争辩的背景，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日本的国际地位。

6月24日，海军和陆军取得共识，日本应当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陆军是否进攻苏联待定，取决于是否出现有利时机——比如苏联将部队从远东大规模调往欧洲前线。近卫很快对该计划予以认可，这也是他想利用政策目标的转变除掉松冈的权宜之计。不久前近卫还依靠松冈的强势来引领政府，现在，失望的近卫开始依靠军方来打压松冈，而他以前正是通过松冈来制约和控制军方的。隐含政治目的的南进计划必须经过联络会议同意才能执行。

联络会议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各方领导人会直接而毫不客气地抛

出具体问题。提议总有遭到否决的可能性，所有人都认为松冈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海军和陆军最高指挥官把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也带到会议上壮大声势，他们声称这些次长是专家，掌握具体细节。（对于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Tsukada Osamu）来说，专家的称号名不副实，据说他对一位手下说：“我看不懂数据，我把这些交给你了。”）松冈必须接受挑战。近卫将这次联络会议定在6月25日举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松冈表现得格外顺从。他没做太多争辩就同意了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提议。他说：“该计划需要迅速行动。既然决定了，我们就执行下去吧。”按照流程，当天下午将召开内阁会议（对联合会议的决定加以认可，成为正式的政府决策），然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将觐见天皇，告知他这一计划。联络会议的讨论焦点转到日本的苏联政策时，松冈再次要求进攻苏联。

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吃一惊，他回应道：

外务大臣是在宣扬激进政策，但陆军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有当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形势同时对我国有利时，我们才能进攻苏联……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匆忙进攻苏联，美国可能会与苏联联手。

杉山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入侵印度支那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松冈却极力要求对苏联保持“威慑力”，他无论如何要成为南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最后领导人不情愿地宣布将再次召开联络会议解决这一分歧。

第二天，6月26日，松冈呼吁军方对德国盟友拿出点诚意，他再次极力要求立即进攻北方。参谋次长冢田攻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我不懂政治，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有理由不去（同德国）商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冢田的观点，但他不能轻易做出同意占领印度支那的决定。6月23日东条曾与陆军燃料部门的一位官员谈话，此人建议他说，日本获取石油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东条英机勃然大怒，他反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偷？”他对陆军研发人员拿着充足的经费却没能发明出人造石油感到愤怒。他说：“我无法向天皇陛下汇报说：‘恐怕

我们不得不沦为小偷。””

在他狭窄的视野里，东条没能认识到，政治决定能够威胁到日本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以为是的道义原则，同意向印度支那进发。虽然6月26日的联络会议也无果而终，但这场内讧开始对松冈产生不良影响，在会议结束时他一反常态，变得语无伦次，他表示自己“大体上”同意军方的计划，但“从根本上”并不认可。他提出第二天再做解释。

新的一天，新的会议。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松冈试图收回自己对入侵印度支那的草率同意，他说他总体上理解进攻印度支那的战略逻辑，但他觉得这犯了根本性政治错误，因为此举将刺激同盟国进行报复。只有当纳粹确立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后（他认为很快就会实现），入侵印度支那南部才更加可行。对于杉山元此前表示的美苏可能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松冈也不屑一顾，他说，美国向来恨透了苏联。

的确，苏联向来不是国际社会受欢迎的成员。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既是他的总体方案，也是被斯大林对波兰、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野心所驱使。芬兰拒绝向苏联割让领土并因此在1939年遭到苏联进攻时，西方舆论支持芬兰，于是苏联成为唯一一个被国际联盟开除的成员国。这些都是事实，但联络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指出，美国与英国一样，相比苏联更憎恨纳粹德国。

松冈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会议上继续做着不懈努力。他一度威胁：“我对未来的预言向来灵验，我预计南进将带来巨大灾难。”武藤章并不同意。松冈眼看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于是退让一步：“为何不推迟6个月？如果最高统帅部和首相本人都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这么做，那我也不能反对他们的意见，我本人对此已经表示赞同。”

松冈少有的示软似乎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建议参谋总长杉山元将计划推迟6个月。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也小声建议参谋次长冢田攻考虑推迟计划。但冢田不会轻易被说服。他公开

对上司杉山元进行劝阻，敦促他坚持原计划。杉山元照做了，于是近卫对南进计划表示赞同。大藏大臣和商工大臣本来能够帮助领导人以更加实际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们6月30日开始才参加联络会议，一切都太迟了。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或者用东条英机的话说，成为窃贼）获得正式批准。御前会议很少召开，通常预示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与会人员包括主要内阁大臣、内阁书记官长（chief cabinet secretary）、企划院（cabinet planning board）总裁、枢密院议长（Privy Council）、参谋总长和次长、军令部总长和次长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军务局局长（陆军军务局局长因身体原因缺席7月2日的会议）。所有人都着正装，不是军服就是燕尾服。

裕仁天皇曾经说：“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除了会议名称）。”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

7月2日的会议是日本袭击美国前召开的4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里举行，这座宫殿体现了东西方审美的结合，天花板挂着水晶大吊灯，墙壁用绣满日本传统花纹的紫色丝绸装饰。长方形的会议桌上铺着格子图案的丝布。这些颜色组合营造出一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常在最好的和服设计中看到这一点。

这次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枢密院议长原嘉道（Hara Yoshimichi）质疑向印度支那南部进发的决定。这些官员必须天皇面前证明他们对其决定深思熟虑过，这一会议不是审视和重新考虑的场所。在7月2日的会议上，原嘉道对占领印度支那政策的通过感到害怕，该政策纲要说：“大日本帝国不会逃避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这句话最早出现在6月初的军方草案中，随后在政策制定的不

同阶段，这句话一度被删除，后来又被加上。这句话完全是说给松冈听的，他曾说过：“前去（占领）泰国或印度支那需要有与英美决一死战的决心，由于缺少这份决心，我不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强行通过占领计划，其倡导者需要向松冈展现他们的决心。

“不会逃避”的决心并没有经过军方的深思熟虑。陆军的田中新一和海军的石川信吾等强硬派战略家愿意与松冈针锋相对，军方绝大多数人却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海军次官泽本赖雄（Sawamoto Yorio）事后回忆道：

我对此很震惊，并询问了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但考虑到陆军向来对北方的兴趣……我们必须充分表达意见，以免机遇从（向来想要南进的）海军手中溜走。我还询问了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Toyoda Teijiro）海军大将的意见，他安慰我说：“别担心，及川大臣不想要（战争）。”

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不但意味着与外务大臣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70多岁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敏锐感受到好战言论中轻率的一面，他向与会者抛出一系列关于与西方开战决心的问题。他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具有法律背景，他的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人所共知，因此他赞同松冈进攻苏联而非法属印度支那的看法。现在他根据常识判断来提出质疑，他对与会者说：

我们必须谨慎出兵……让印度支那听从我们号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动用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看起来像是“入侵”……你们说不会逃避与英美的战斗……但你们如何将这一决心与（没有为此做准备的）现实保持一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和美国会做出回应……如果（新政策）促使两国联手（对付）日本该怎么办？我想得到明确答案。

东条承认，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松冈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其他官员向原嘉道保证，占领过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不会使用武力。松冈并不相信，那天他一度退让说，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庄严肃穆的正式场合，即使松冈也不愿计划白白流产。谈判桌远端的裕仁天皇默默地聆听着。

日本领导层反复强调其挺进计划的本质是和平、非胁迫的。前一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北部时，尽管东京也承诺进行和平过渡，但鲁莽的日本士兵主动向不愿离开的法国部队射击。日本与法国当局达成协议前已有几百人死亡。这一事件加深了日本在西方人眼里的无赖印象，这也正是原嘉道担心的地方。

每次原嘉道谈到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问题时，他总是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军方领导人不愿意在御前会议上深度讨论这一问题。杉山元对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了总结，他说：

我们十分有必要执行这一计划，以对付英美（经济孤立日本的）阴谋。如果德国（统治欧洲的）计划遭遇挫败，当然可以预见，美国会（与日本）开战。但德国现在胜利在望。（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盟友），我想美国人不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当然我们必须以和平方式完成占领。我们想一直推进到泰国，但那样就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会惹来大麻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开展这一计划。

原嘉道这下放心了。他说尽管该计划措辞大胆，但日本应当避免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只要在座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有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并限定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世界就不会说三道四，更不会与日本开战。

裕仁天皇对占领印度支那感到不安。他在6月25日拿到这份计划时表示：“鉴于国际法准则，这一计划让我疑惑。”但由于其他人的自信（并为了打压天皇并不信任的松冈），裕仁心中的疑虑没有大到想要阻止该计划的程度。近卫首相则保持缄默。最后天皇召唤官员时，

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议是理查德·佐尔格的转折点。尽管松冈的再三保证让德国驻日使馆相信，日本将参加对苏战争，但佐尔格仍然表示怀疑。他后来回忆说：

对于日本局势，尾崎秀实在御前会议前观察到，近卫首相和他的文职内阁成员不想与苏联开战，海军也不想发生战争。陆军内部有强烈的参战意愿，但他们更倾向于暂时观察形势……只有外相松冈赞成日本撕毁他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

松冈亲自告知奥特大使御前会议的决定，这也是佐尔格获得消息的来源。佐尔格注意到：

松冈外相的信息包含御前会议决议的两个要点，分别是：（1）在北方，日本将增加军力，为进攻苏联做好一切准备。（2）在南方，日本将主动向前推进……奥特大使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一点，因此他认为日本将向北增加部队……他认为这一调动意味着日本与苏联战争的开始。

尾崎“则把重心放在第二点”，他认为日本只会进攻法属印度支那。佐尔格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于是向莫斯科汇报说：

各方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日本军事入侵西贡（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不变。另外，只有红军被摧毁时，日本才会考虑军事入侵苏联。

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认真考虑了佐尔格的情报，并认可他的结论。但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改变主意，日本似乎是德国的坚定盟友。这种怀疑让苏联与美国更加靠近。

御前会议结束几天后，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将舰队指挥官召集至东京。他们被告知日本的决定，包括不惧战争的决定，这些指挥官惊呆了。“我们真的为空中战争做好准备了吗？”山本五十六问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问题的答案。第二舰队指挥官古贺峰一（Koga Mineichi）大发雷霆，他说：“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同意这一重大

决定？万一战争真打起来怎么办？你不能只对我们说，‘好吧，你们上阵打仗吧’，我们赢不了！”

支持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表现得事不关己，他回答说：“我能怎么说？这是政府的决定。”

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7月2日，日本通过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决议，这一过程的迅速和乐观程度说明，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近卫文麿的内阁书记官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宣布：“鉴于当前形势，政府近来作出一项重大政策决定。”向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送的供内部传阅的占领计划已被美国在一周之内破解。罗斯福对日本不愿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却对日本愿意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挺进感到震惊。他7月1日对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控制大西洋局势对我们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我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两边周旋——太平洋上每出现一点状况就意味着大西洋上少了几艘军舰”。

日本领导人喜欢激进言论，似乎认为与美国搞外交都是次要的。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计划”的回复近3周后，近卫主持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的对美政策。所有人都觉得美国回复日本的内容和语气都强硬得有些离谱，美方提出的新要求显得盛气凌人，这触碰到该国根深蒂固的敏感神经，日本向来因为自己起步较晚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人而感到自卑。松冈洋右认为，华盛顿的回应是一种挑衅，其对外政策近乎是一种种族主义。

可以想象，松冈对赫尔要求撤换他感到焦虑。他说：

赫尔的声明欺人太甚。野村吉三郎作为我的心腹竟敢将这一声明传给我。干涉他国内政，比方说要求重组内阁，这令人大跌眼镜，尤其是竟敢这样对待像日本这样的世界大国。

松冈再三强调他对赫尔和野村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整个交涉“方式”的不满。他对所有相关者感到恼火——尤其是几米开外默默坐着的近卫。

松冈在两天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仍然宣泄着愤怒之情。他说：“赫尔的口头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其内容太令人震惊了……这更加确定美国看不起日本，把日本当附庸国或其领土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是外务大臣就不能接受这一声明。”他提议中止与美国的谈判，这让最保守、最反美的与会者都感到意外。

沉默了一会儿后，杉山元说话了，这位参谋总长客气地表示“虽然我与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军方当前在南北面临重大时刻，再经不起与美国为敌了。抛开个人感受，“谈论与美国完全断交并不合适，我们应当为谈判留有余地”。

内务大臣平沼骐一郎在杉山元之后开始发言。73岁的平沼身材消瘦，戴着眼镜，表情冷漠，儒雅且自信，这些特征有点像伍德罗·威尔逊。他是一位沙文主义者，强调亚洲至上，认为日本注定要带领亚洲走向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1939年他曾短暂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他赞同近卫的一些右翼观点。但他并不像近卫那样欣赏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他反对近卫的法西斯政治倾向，包括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

这一天，平沼不同寻常的健谈说明他对与西方对抗的前景深感忧虑。他说：

当前，大日本帝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开战，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爆发战争）战事可能会持续50年甚至上百年。外务大臣也再三提及“八纮一字”所代表的大日本精神。根据这一精神，我们最好避免战争。日本既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但只要我们坚持理念，我们就能消灭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美国也许不能理解，但避免战争是日本应当遵循的路线。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引导美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外务大臣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没必要与你争辩。就算外务大臣坚持认为罗斯福在引领自己的人民朝战争方向走，而他的人民跟着他，但这些人中也有反对战争的……正如外务大臣所说，抨击一下

（赫尔的口头声明）也没什么。但即使希望渺茫，我们也不能试一试（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吗？

平沼诚挚的恳请让松冈别无选择，只好表示只要美国收回对他的批评，他愿意继续谈判。东条英机说：“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将和平坚持到底。我知道这有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看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及川古志郎说：“海军内部认为，国务卿赫尔希望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开战，所以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现在这些军方领导人似乎又反对御前会议刚刚通过的不畏惧与英美开战的决定。显然，这些人没有开战的决心，松冈也不例外，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诞。松冈只想通过威胁中止美日和谈来展现强硬和决心，希望借此恢复他的威望，但他打错算盘了。他对东条及其他军官说：“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据说，松冈甚至因为军方对美国的妥协态度而骂他们是“傻瓜”。他说，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守军人本分做好作战就行。松冈的这番言论势必激怒了军方，引来他们的反感。

与自相矛盾相伴的是讽刺。没有人意识到，日本决定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其实距离与美国断交已经更近了一步。当然，松冈看到了这层风险，他比其他人都更了解美国，所以威胁要彻底抛弃和谈。就连领导层中最保守的平沼骐一郎和东条英机都忍不住敦促他不要鲁莽。

的确，松冈此前强调过，日本有动用武力保卫东南亚利益的权利，他从欧洲回来后也呼吁立即进攻新加坡，协助德国的战争发展。其他领导人似乎很难理解，此前支持、现在又反对南进的两种态度在松冈洋右心中其实有明显区别。他认为日本进攻新加坡将是迅速而有针对性的威慑，但进驻印度支那将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但矛盾的是，为了能够打赢更大规模的战争，日本需要冒这个险。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日本领导层继续暴露着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肤浅认识，他们讨论的焦点是给美国答复的时机，而不是内容。杉山元

建议，日本应该推迟答复，一直到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完成后。日本将在两天后的7月14日与维希法国展开谈判。杉山元说，给美国支持和介入法属印度支那的机会将是一个错误，如果进驻进展顺利，美国即使不喜欢日本的举动，但也不会为了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和平”过渡而大动干戈。当然，杉山元并不知道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计划。

日本领导人目光短视，充满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总是提到日本的崇高道德典范、日本精神的优越性、日本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外交和经济困局。在他们的想法里，这些目标并不矛盾——只要目标保持抽象就行。这形成了一种错觉，即日本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联络会议渐近结束时，永野修身对外务大臣说：“松冈，如果你说不论我们怎么回复，美国人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那为什么不按你说的做呢？”他指的是松冈应该拒绝这一提议，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并以此断绝与美国的关系？还是日本不用等待占领印度支那就给美国答复？永野没有说清楚。不论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这一问招来了海军省冈敬纯的不满。对于这位海军首领刚刚的言论，冈敬纯说：“我知道不论希望多么渺茫，我们都应该进一步努力。但是阁下，您现在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努力。”永野于是承认，他的意见应当被忽视，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7月12日紧绷的联络会议在这种奇怪的不安气氛中结束，唯一取得的共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不应给美国任何答复。近卫继续沉默地坐在一旁。

7月14日，尽管身体不适，但松冈还是起草了日本给美国的第二份答复。基于军方和政府的共识，答复内容与7月12日讨论的计划没什么改变。这份答复声称，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联盟瓦解后，日本不会示弱，日本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美国要敦促蒋介石与日本和解，并且不能介入日中谈判。

松冈想先拒绝接受赫尔的口头声明（用冗长篇幅指责赫尔的行

为），几天后再将日本对美国的完整答复交给美国。近卫及其他人觉得，单单驳回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导致两国“非正式交流”的中断，他们想将抗议和答复同时送达。松冈还是将对赫尔的抗议发送给了野村吉三郎，但没有那么长篇大论的批评。7月15日，松冈又把答复美国的草案发给德国批准。近卫气得发狂，他终于做出了迅速决断。他要结束松冈的个人表演。

7月16日，近卫重新担任日本首相以及松冈开始担任外相快要满一年之际，第二次近卫内阁集体辞职。松冈并不愿意辞职，而一个遭遇政治失败的大臣（就像松冈7月2日所经历的）通常想要辞职。根据《明治宪法》，近卫不能开除大臣，因此只能通过这一迂回方式除掉松冈。由于身体原因，松冈没有参加做出辞职决定的紧急内阁会议。近卫立即重新组阁，除了更换外务大臣外，其他人的职位不变。新内阁从7月18日起正式取代旧内阁。

许多人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但他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前往他的办公室。有记者让他评价此刻的心态，松冈创作了一首自我贬低的俳句，提到他标志性的光头。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咳嗽，他说：“下雨天赶路的秃子摔倒在路旁。”

日本民众不知道松冈被解职的具体原因，他们感到很困惑。松冈外交生涯中展现出来的自信和能干让许多民众为之钦佩。他是一位公共关系领域的天才，天生就知道在公众眼里应当说什么和做什么，所以日本人民爱戴他。可以理解的是，一些人错误地猜测，松冈被撤掉说明日本与苏联即将开战。小说家野上弥生子在她的日记中猜测，近卫很可能想要立即进攻苏联，但松冈无法接受，因为“松冈先生与斯大林那么亲密”。永井荷风则一如既往更具有洞察力，他的观察是，这一变化是政府内部权力争斗的结果，不代表外交政策会有重大转变。他在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内阁重组感觉像一个圈套。”

对于7月这样的月份来说，7月18日这一天太不寻常：气温过低，风太大了。永井看到田野里的叶子被耙成堆在燃烧，他恍惚觉得已是深秋了。他的思绪飘向一战，他正在读一本莱昂·布卢瓦（Leon

Bloy) 的战争日记《卑微者之门》。他说，不用为家人和朋友的安危牵挂是多么幸运啊。“尽管大米口感奇差，白糖也不足，但我们能靠这些活着。毕竟这比无缘无故被关监牢强。”在当前政治气氛中，每天都有人无罪却被投入监狱。永井在日记中提到他越来越不自由了，但他决心要捍卫这最后一点自由。

松冈下台后不久，西园寺公一看望了他。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务大臣彻底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可能由于他幼年患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他从欧洲回来后体重减轻了近30磅。他的住所过去总是充满各种谄媚者和政治掮客，现在却突然冷清了，房子本身还曾经住过一位贵族。在差不多两小时的会面中，西园寺公一用威士忌安慰着他。仅仅担任外相12个月，松冈却让日本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中，而他显然知道如何避免这场危机。由于推行边缘政策，他对日本国际地位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人更深。

走了一位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松冈洋右，来了一位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但这位在牛津留过学的海军军官不是干外交的料。虽然他的自信近乎自命不凡，但缺少外交经验。他的确在军方有需要的人脉，包括海军老兵野村大使。他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商工大臣，这让他深知日本物质匮乏的劣势，他本可以让其他人相信，在太平洋开战是不明智的。然而从丰田的过往表现来看，相比在日本政坛的未来发展，他对保住自己的地位更感兴趣。1940年秋，作为海军次官的丰田积极推动《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主要原因是海军将能获得更多经费。

在华盛顿的野村感到乐观。但他高估了近卫的政治意愿，本以为松冈的离开将为外交政策的转变铺路，认为日本会退出轴心国联盟，暂缓入侵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感到乐观。德国进攻苏联那天，《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战争可能将导致日本出台新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与轴心国决裂，还将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这种希望很快破灭。到7月18日，美国已经成功推测出日本政策不会发生改变。而日本领导人似乎认为，单靠重组内阁就足以恢复日本在美国眼里的可信度。日本新外相已经在胁迫维希法国政

府交出对印度支那南部的控制权。法国拒绝后，丰田威胁说，日本乐意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法国最终在7月22日妥协，接受日本的“和平”占领。这让日本获得了该地区的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港口。

罗斯福政府很快获知日本与法国的协议（再次感谢密码破译人员），代理国务卿（赫尔生病了）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7月23日向野村转达了美日谈判终结的决定。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也纷纷效仿。美国随后建立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陆军，以保卫菲律宾。还有人提议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对新加坡岌岌可危的地位感到担忧。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日本正式宣布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拜访了丰田，他以反常的激动语气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大加反对，他说：“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包围日本。这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方法。”

日本虽然大感意外，但仍然保持自欺欺人的态度。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在皇宫而非首相官邸举行，大概为了更加私密），丰田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将是“大麻烦”。陆军参谋本部的会议记录上写道，野村在报告中“歇斯底里地”警告美国会报复，丰田的担忧是对这些报告的过度反应。第二天的会议记录的主旨依旧：“我们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不采取新的举动，他们就不会实施（石油）禁运。”

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与石川信吾一样，在起草向南扩张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多年后回顾当时的形势说：

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美国会对我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如此生气。我们本以为扩张到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有什么麻烦。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没有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外务省的意见。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确信这一点……实在是无法原谅。

反复提醒日本政府警惕美国反应的野村现在必须将损害降到最低程度。7月24日，罗斯福冻结日本资产的这一天，野村下午5点在椭圆

形办公室见到了这位美国总统。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和副国务卿韦尔斯也在场。韦尔斯做了会议记录。罗斯福对焦虑的日本大使说，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希特勒主导的。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野村对此坚决否认。罗斯福暗示，如果日本试图用武力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将进一步制裁，甚至发动战争。

野村回应说，他本人也反对日本最近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罗斯福提到，他很高兴得知丰田曾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也许让罗斯福看到希望，也许日本向南扩张的计划会被取消。据韦尔斯的记录，罗斯福做出了一项大胆提议：

如果日本政府放弃军事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在占领步骤已经实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愿意撤军，美国总统将向日本政府保证，他将尽一切可能让中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政府联合发布一项郑重声明，宣布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要做出相同的承诺。

这是美国做出的最大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该地区能向美国提供锡、橡胶及其他重要原材料。另外，罗斯福想尽一切可能让日本与希特勒政权划清界限。由于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向英国（现在又加上苏联）提供最大帮助，他必须确保太平洋的和平，所以需要一些变通。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很显然没有将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与对华战争这一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也说明罗斯福渴望他的提议能对日本具有吸引力。

这一提议打动了野村，在韦尔斯眼里，野村似乎并不看好该提议能够获得通过。野村暗示，只有强势的领导人才能扭转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说，美国认为日本很显然受到来自纳粹政权的压力，他很担心日本政府看不到希特勒一心要吞并世界的野心。但野村否认日本的执迷不悟是受德国影响，他表示将立即将总统的提议传达给日本政府。

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尽管60岁了，但他仍然精神抖擞。1932年来到东京前，他分别担任过美国驻丹麦、瑞士和土耳其大使。

他在日本的职位对他意义重大，因为他娶了马休·佩里的侄孙女，佩里正是当年强迫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政策的美国海军准将。已经在日本生活8年的格鲁对该国产生了特殊情感，他也是东京上流社会的常客。

格鲁来自波士顿名门世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与罗斯福和韦尔斯一样都毕业于格罗顿中学，然后去哈佛深造。他们都彼此了解，格鲁立即理解总统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这将带来某种突破。

罗斯福与野村会面的两天后，格鲁收到相关报告。他立即在7月27日上午拜访了丰田，“以便不要遗漏任何可能促成日本接受美国总统提议的因素”。美国大使积极主动，他敏锐地意识到速度很重要，确信双方都不想开战。考虑到这一提议的实质，他相信日本领导人一看到其内容就会长出一口气。他对此坚信不疑。

令格鲁意外的是，日本外相丝毫不知道这位美国大使在说什么。丰田专门离开房间去核查是否从野村处收到这一信息。答案是没有。有可能外务省亲轴心国的成员故意扣下了这一信息，抑或是因为办事不力。野村已向东京汇报过两次他与罗斯福的会面：在7月24日当天以及7月27日。

格鲁自然很震惊。没有想到他反而需要向丰田解释罗斯福提议的要点。丰田的第一反应至多只能用不热情来形容。他说，很遗憾总统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民意已经因为美国冻结日本资产而变得充满敌意。他不认为日本政府会转变自己的路线。

丰田对格鲁说的话只对了一半。的确，日本媒体已经开始使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词语——这些字母分别代表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并耸人听闻地描述日本的经济困境，不断提高调门。在非民主社会，这种迎合当局、危言耸听式的报道并不稀奇。但令人有点意外的是，在罗斯福的提议面前，丰田竟然不去研究让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表示将把提议拿去与其他领导人进行讨论，最终结果会通知美方。

格鲁清楚，罗斯福做出的这种让步对美国来说并不容易。他试图让丰田相信，扭转日本政策将意味着更美好的未来。格鲁私下以非官方的身份甚至暗示，倘若日本同意总统的提议，日本资产会获得解冻。他对丰田说，他“完全理解‘颜面’问题势必会成为一种阻碍”。但他表示：

丰田眼下面对着一个不受周遭因素影响的机会，他可以发挥高超的领导才能，做出正确选择，该决定不但能让他从当前紧张的局势中松一口气……还可能让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格鲁对这位外务大臣的判断失误了。这种恭维或许对松冈有用，但丰田喜欢在他熟知的世界里打安全牌。格鲁还严重低估了日本错综复杂的领导关系所带来的障碍。至少从现存的记录来看，罗斯福的提议甚至从未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似乎近卫决定将这一异常敏感的提议限制在政府最高层内部流通。

近卫后来宣称，他不同意罗斯福的提议是因为时机不对，他无端批评野村没有尽早及时汇报。如果非要说野村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他没能足够强调该提议的重要性。从美方角度来看，野村在一开始也没能强调赫尔“四项原则”的重要性。野村应该在美日谈判伊始就对国内说清楚，如果日本政府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美问题怀有一丝诚意的话，日本就应该认真对待赫尔提出的这几点原则。历史学家认为，野村是谈判的好手，却是糟糕的传话者。也许真是这样吧。但人们也必须考虑到，当时通信手段（主要靠电报）的特点决定，迅速而有效地交流很困难。

近卫表示，收到罗斯福提议后，他已尽力寻找同意该提议的方法。他说自己考虑过“100种不同的方向”。但关于这些努力的记录已经不存在了。近卫肯定与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臣及川和陆军大臣东条会晤过。不难想象，一开始反对“窃取”印度支那南部的东条依照自己的原则拒绝改变南进政策：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经过了天皇批准，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

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有一点晚，但近卫也并不急于抓住机遇。

近卫内阁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像格鲁希望的那样不受颜面问题和内部争斗的影响，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

日本领导人坐视外交危机升级。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此却毫不知情。在席卷全国的募捐宣传活动中，人们被逼着购买国家人寿保险。到7月中旬，据称5000万份保险已经卖出（日本人口大约7300万），筹集到100亿日元（几乎是该国194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笔钱大部分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以资助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用血汗钱真心支持的政府却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如此廉价，甚至一文不值。

7月28日，日本正式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新加坡也处于日本的威胁范围。不费吹灰之力的占领让一些军人开始口出狂言，尽管他们此前宣称，自己并不觊觎印度支那半岛以外的地区。在7月最后一天，永野修身前往皇宫觐见裕仁天皇，他手里拿着新的作战计划。这位军令部总长对裕仁说，我们应当避免与美国开战，他强烈反对《三国同盟条约》，认为该条约妨碍了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但他没有建议日本撕毁《三国同盟条约》（也许他认为这是与他本人或最高统帅部无关的政治决定）。相反，永野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我们两年就能用完存量。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在18个月内用尽存量。”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机会最大化，永野的结论竟然是，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进攻”。

“我们能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我们在日本海（对俄国）的胜利？”裕仁问道。

永野回答说：“我连获胜都不能肯定，更别提在日本海取得的那种巨大胜利。”

裕仁惊呼：“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战争啊！”

第八章 “朱诺见”

石井花子（Ishii Hanako）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和圆圆的脸蛋，在认识理查德·佐尔格的5年里，她从未见到她的男人这样消沉。6月末的一天晚上，花子走进他的书房（一间简朴而舒适的房间，窗户上暗红色的窗帘将房间与外界隔开），看到他躺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只手搭在额头上。花子坐到他身边，惊讶地发现他的眼角挂着泪水。佐尔格将头埋在花子的大腿上失控地哭起来。“你，你怎么哭了？”花子问道。她抱着他，轻拍他的背，不知道还能怎样安慰他。

花子身材娇小，看起来比她29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虽然算不上绝代佳人，但她却具有孩童般的无邪之美。就算浓妆艳抹，她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天真气质。高大、蓝眼睛的佐尔格比她大15岁，但他历经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让两人的年龄差距更加明显。佐尔格为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而痛哭。

佐尔格在银座“金色莱茵”酒馆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花子。他们从1936年夏天开始就在一起了，但两人分开住。花子知道佐尔格很累，她觉得这种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累。佐尔格失控的这一天在花子的记忆中停留了很久。

佐尔格的双重身份让他精疲力尽。作为德国人，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出发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他全身心投入的共产主义理想本应跨越“微不足道的”国家界限，但随着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深入，他越发觉得自己正是为这些他所鄙夷的界限区别所困。佐尔格相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接近于“共产国际”或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这在斯大林苏维埃化（或俄罗斯化）的莫斯科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佐尔格几乎所有理想化、信奉列宁主义信条的密友都在过去几年遭到斯大林的清洗。他对东京的同事布兰科·德武凯利奇说，他确信如果被召回莫斯科，自己将有去无回。

佐尔格开始酗酒。花子常常在佐尔格的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耐心等待她的爱人回来，佐尔格总是喝醉了很晚才回家。德国对苏联开火的这一天，德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看见佐尔格在帝国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佐尔格想要吸引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及酒吧其他人的注意，但没有人对这个东拉西扯的醉鬼感兴趣。他用英语呼喊，希特勒这个杂种违背了与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名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很有同情心，他在楼上帮佐尔格订了间房间，并塞给他足够过夜的钱。佐尔格没被告发，这很走运。

纳粹入侵苏联后，正如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猜到的那样，日本将所有北进计划无限期推迟了，而将南方视为其战略重点。但一些观察家对此仍有怀疑，因为日本皇家决议中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德苏战争带来的局势变化给日本帝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将动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秘密为对苏战争做准备。”但这其实只是为陆军挽回颜面的条款，陆军对海军吹嘘与英美开战而感到不快。

为了与海军步调一致，也为了全面备战，7月7日陆军开始进行重大军事调动，准备在8月中旬将85万士兵和大量装备运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局面是苏联将部队从远东调往欧洲前线，这样对日本的防备将减弱。陆军的新计划被称为“特别展示”，但单从其规模看，这更像是一种战前军事部署。尾崎后来回忆到，这一变化让他再次怀疑日本与苏联的战争还是要打。德国希望如此。当然斯大林一想到两面夹攻的前景就惊恐万分。随着德国长驱直入，快要接近莫斯科时，苏联方面迫切想要知道日本的计划。佐尔格和尾崎将会很忙碌。

由于陆军的最新政策，1938年3月从中国前线回到日本的大兵潮津在7月中旬又被派往中国增援，他现在已经35岁了。他听到的解释是，这次征兵只是临时性的（意思是即使已经服役多年回到老家的人也会再次入伍）。1937年夏，潮津第一次派往中国前，国家为他们举行了大型送别会，而这一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一想到再次离开家他就感到万念俱灰，但他知道自己只能将店铺关门，与亲友道别，去军队报到。他倒希望自己体检不合格，但他出色地通过各项考核，很快在“满洲”开始第二次毫无道理的服役。

由于东京对印度支那中立提议没有作出回复，美国从8月1日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能算是美国国会讨论的“完全”禁运，而是与日本的石油贸易将需要更加严格的许可限制，但日本还是能够购买不能用于飞机使用的低规格石油。像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和财长小亨利·摩根索这样的鹰派人士充分利用许可程序的烦琐，国务院、财政部和司法部通过合作，确保了与日本的石油交易无法达成。7月底美国冻结日本财产时赫尔还在生病，他在9月初才完全了解到石油禁运的举措。

在日本与美国的危机陡然加剧之际，近卫文麿（mí）的缺点更加凸显。他有了更多不作为的借口，尤其在他感到走投无路时。他现在受到资深外交官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的逼迫，有田曾在4个不同内阁担任外相，包括第一次近卫内阁。他8月1日致信说，近卫不应该在日本与美国谈判之际允许日军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有田很少对英美强国妥协，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责备。

石油禁运开始后的8月3日，近卫答复有田说：

认为（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不会招致严重后果的想法是一个错误……（但除掉松冈洋右后的）新内阁组建时，（开往印度支那的）海军舰船已经抵达海南岛，这就好像是射出去的箭，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他说，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干预”。

此时扭转日本的南进计划真的太迟了吗？从一般意义上讲，阻碍撤销战争决定（尤其是一场你要输的战争）的最大因素，就是为已经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找个正当理由。例如，2006年6月美国参议院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分歧严重，民主党认为，这场战争已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但共和党政府认为，任何形式的撤军都相当于承认失败，共和党强调，拥有“信念的勇气”继续战斗至关重要，这样“那2500多名阵亡将士的血才不会白流”。同样的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末建议日本从中国撤军时也不绝于耳。

然而到8月初，从印度支那撤军仍然是可能的，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与前一年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不同，南部的占领过程没有受到当地抵抗。既然日军进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那么日本政府本可以宣布撤军，因为其确保没有大国势力（包括法国）可以染指中立印度支那的目标已经实现。近卫内阁本可以将帮助亚洲国家“去殖民化”作为一种政治胜利。但近卫可没有这么伟大。

由于日本领导人没能抓住接受美国提议的机会，8月1日开始实施的石油禁运成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和平”占领却受到如此严惩太不公平，感到既惊讶又愤怒，一些人真正开始考虑与美国打一仗。在陆军省军务局工作的石井秋穗回忆道：“‘战争’这个词出现在7月2日的政策文件中主要是为了提高士气。”但仅仅一个月后，他说：“这个词（战争）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感到必须要作出非黑即白的选择。”

美国石油禁运的消息让民众看到，日美两国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媒体继续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描述，不断宣称最大的恶霸美国决心要孤立日本。为了让日本打造“东亚共荣圈”合理化，《读卖新闻》8月中旬刊登了一系列介绍东南亚文化的文章，主要从殖民地历史角度加以探讨。

一位分析人士读道：“近来，日本被所谓ABCD阵营包围的趋势日益明显。”

太平洋的和平再次被（西方）经济压迫、敲诈和恶意宣传所威胁。这些无端的威慑手段不断阻碍我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丰功伟绩，还显露出（西方的）极端贪婪。所有（西方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形成一个马蹄形，从缅甸到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群岛、澳大利亚、萨摩亚、夏威夷和关岛，都在东亚国家的势力范围。但这些地方都遭到白人蹂躏……我们现在必须正视5个世纪以来的白人入侵，勇于面对现实。

这种论调和分析人士的偏见比比皆是。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被

描述为勤奋、干净、富有同情心和敏感。“他们同我们日本人非常像，但他们缺少经济头脑和政治抱负，经济上被外来的中国人控制，政治上又无法摆脱英国和荷兰的镣铐。”菲律宾人由于吸收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所以遭到贬低：

这个岛上88%的居民是混种，是当地人与西班牙人或美国人的结合，他们信奉基督教。他们是一群自负、美国化的人，就会跳舞和爵士乐。他们有一点白人血统就如此骄傲，认为自己比日本人地位高。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一切照搬美国。

这些媒体报道并没有将美国所谓的不公正对待日本与日本自身的傲慢和常常对邻国的惊人之举平衡看待。但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人们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甚至感到内疚。作为小道消息的收集者，永井荷风有一天记录了一位年轻人在中国的作战经历：

在汉口，这位年轻人和战友闯入一名医生家里，他家有漂亮的女儿。医生和他的妻子哀求日本士兵不要碰他们的女儿，愿意奉上所有金银财宝。但士兵拒绝他们的请求，当着他们的面强奸了两个女孩，最后把所有人绑在一起，活活投入井里。

这位年轻人后来回到日本的母亲和妻子身边。这两个女人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她们心烦意乱、闷闷不乐，但不愿告诉他原因。

几个月之后，在妻子出门后，母亲向他坦白了一切：他不在家的一天夜里，家里闯进了盗贼，母亲和妻子被盗贼绑起来并遭到强暴。

年轻人疯了，开始到处讲述他的故事，包括在汉口的罪行。他被军警收押，很快被转移到东京以外的精神病院，与其他三四千战争制造的“疯子”关在一起。

罗斯福开始怀疑，日本是否真对太平洋达成和平方案感兴趣。7月26日，罗斯福给他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写信，霍普金斯曾推动加强美国对同盟国援助的《租借法案》的通过，他此时正在伦敦，准备前往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罗斯福说，关于印度支那的提议，他还

没有从日本“收到答复”。虽然他也预计，东京“很可能会拒绝”，但他知道美国政府“至少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作出了进一步努力”。罗斯福想要给日本回应的机会，为了与此精神保持一致，美国对中国发生的一起严重外交事件进行了低调回应。7月30日，日本差点儿误将一艘美国炮艇炸沉，这艘停泊在重庆的“图图伊拉”号炮艇长期负责在长江上巡逻，当时它无法开赴下游。日军不断轰炸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希望迫使蒋介石投降。当时炸弹落到这艘炮艇上，炸毁了引擎，但没有美国人在事件中伤亡。日本立即为此事道歉，单靠野村转达的歉意就平复了美国的怒火。美国仍在等待日本对罗斯福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地回应。

答复拖了很久终于来了。日本直到8月6日才声称，只有中国战事得以解决，日本才会从印度支那撤军。与1941年春天起日本对美国的所有回应一样，日本都要求美国帮助在中日之间调停，但日本强调其“特殊地区地位”不容妥协。日本不但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还再次将中日战争这一长期问题与印度支那占领这一紧迫问题相提并论，而这正是罗斯福想要极力避免的。日本虽然承诺不会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但在慕尼黑绥靖政策破产后，罗斯福当然觉得日本的保证不可信。

两天后，近卫要求与美国总统会面。这一元首会晤的提议来自近卫的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包括“早餐俱乐部”成员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牛场友彦，他们希望与华盛顿和解。他们认为，一场远离东京的国际会议将从物理上隔绝军方强硬派，不论最高首脑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些人都不容置喙。此举还意在给军国主义者留情面，因为峰会上的一切决定都与他们无关。这场会晤还将给近卫提供一个弥补一切过错的机会。

日本尝试过这一策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批准《伦敦海军条约》时，该条约的威望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帮助了滨口。尽管近卫不论在行动还是思想上的连贯、胆识和原则都远不及滨口，但他似乎也意识到，直接会见罗斯福这种极端策略对于挽救急速下落的趋势很有必要。他认为局势还有挽救的余地，尽管他已经向有田八郎提出了辞职

意愿。

然而，近卫提议会见的时机和方式都毫不恰当，令人难以理解。8月4日，近卫政府拒绝罗斯福提议的前两天，近卫向陆军和海军大臣告知想要与美方进行高层会晤的打算。尽管表面上强硬，但军方内部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南进计划是形势上的误判。虽然这一错误不会怪罪到任何领导人身上，但如果外交上能够安排妥帖的话，他们愿意退让一步。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开战的海军当即同意近卫的提议。

陆相东条英机的支持分量更重。据近卫称（近卫的个人记录都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是对他有利的好事），东条在一份署名文件中表示，他不会反对近卫会见罗斯福，“只要首相大人前去会见时心里完全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结果”。东条还说，如果会晤没有任何成果，近卫应当继续领导政府进行备战。东条给这位最喜欢打退堂鼓的首相将了一军，确保在日本与西方开战时，近卫能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东条的霸道语气惊吓到近卫，大概因为如此，近卫才将此记录在案，以作为他在自己的内阁里被人逼迫的证据。而海军和陆军已经同意近卫进行高层会晤的提议，所以日本本来可以以后再拒绝美方的提议。但日本选择先拒绝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然后再要求高层接触。从美方角度看，现在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美国人看到，他们超乎寻常的慷慨让步已遭到日本的断然拒绝，丝毫没有引起日方的兴趣。

8月8日，美方对近卫的提议作出答复。赫尔对野村说，日本近来对美国的答复葬送了首脑会议的机会。罗斯福政府认为，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显露无疑，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当时美国还在等待东京的答复。外相丰田没有机会提及近卫所考虑的让步细节，他指示野村向美方转告，日本此前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答复其实并非“无法改变”，“着眼于世界和平的大局，近卫首相希望与美国总统交心”。野村无法立即传达这一信息，因为罗斯福总统此刻正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线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

这一年夏天，在加拿大取景的电影《北纬49度》（49th

Parallel)正在最后的制作中。阵容强大的演员名单中包括劳伦斯·奥利弗和莱斯利·霍华德，这部杰出的电影讲述了一艘德国潜艇搁浅在加拿大海湾的故事。北纬49度划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对于德国船员来说，这是一个参战国和一个准备参战国的界限，他们从加拿大向美加边界逃跑，想要逃到当时仍然中立的美国，这样他们才不会被逮捕。绝望中的德国船员偷盗、杀人，让加拿大人感到恐惧。通过提出德国人登陆北美海岸的可能性，这部电影想要说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不应只被视为欧洲的事。不论怎样，战争都很可能通过北大西洋向美国国土蔓延。影片制作人包括英国人迈克尔·鲍威尔和逃往英国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他们呼吁美国及时参战。丘吉尔会见罗斯福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8月9日至12日，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并排停靠在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这里成为历史性的英美首脑会晤的地点。虽然罗斯福还没准备好给丘吉尔一个具体承诺，但最近欧洲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更加现实地考虑美国参加欧战事宜。在国内，《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1940年8月通过的《选征兵役与训练法》让美国陆军最多可以征募90万士兵服役一年。如果新的修正案得以通过，这一征兵限制将被取消，陆军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保留这些士兵，并派往西半球以外。参议院8月7日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但众议院势必会进行阻挠，其结果将极大影响美国的战争准备。

尽管罗斯福骨子里不喜欢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会谈期间建立了私人友谊。他们联合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详细确定了同盟国战斗的目标以及战后世界的安排。两国领导人都保证要支持斯大林抗击纳粹进攻。他们被斯大林乐观态度所感染。罗斯福此前派遣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霍普金斯返回途中，与丘吉尔首相一起前来参加两国首脑会晤。这成为同盟国抵抗希特勒的关键节点。尽管华盛顿战略专家一开始预测德国将迅速获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坚持不懈的韧劲。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而《租借法案》也将从1941年11月开始扩大到苏联，这本是罗斯福一开始不情愿看到的。

在纽芬兰会谈期间，罗斯福还作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批准美国武装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从9月16日开始执行。苏德战争刚爆发时，罗斯福的鹰派军事顾问就曾极力要求美国在大西洋进行武装护送。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对此表示赞同，尽管他承认此举“势必将使我们卷入战争”。虽然丘吉尔没有得到美国明确参战的肯定答复，但罗斯福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时间问题，这已经是谨慎的罗斯福所能承诺的极限。不过，两国领导人仍然愿意探寻与日本的外交解决途径，甚至同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给日本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

在会晤的最后一天中，罗斯福得知众议院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这对于参战动员是不可或缺的。

最终，野村在8月17日见到了罗斯福。刚从普拉森舍湾归来的美国总统同意在一个周日接见这位焦虑的大使。赫尔透露说，野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来自日本政府的指示，野村非常认真地强调说，日本“渴望保持两国的和平关系”，并且：

近卫公爵对待保持两国和平关系的态度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愿意在我们两国之间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间点会见总统阁下，双方本着和平的精神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罗斯福则以更加空泛的词语进行回复：

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奉行其政策或计划，即对邻国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军事控制，美国政府将不得不立即采取一切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卫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措辞严厉，但罗斯福并没有拒绝与日本高层会晤的提议。他说，日本提议的会晤地点夏威夷对他来说太远了，他建议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他向来不排斥一个观点，即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究成效，又能风度翩翩。他已经在与丘吉尔的会晤中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近卫再次有理由相信，他仍有机会避免一场灾难性战争。

佐尔格将日本陆军向北部调兵的消息告诉了莫斯科。但陆军的调动明显放缓，在8月中旬的截止日期前并没有按照计划完成。实际上，参谋本部8月9日已经决定不准备攻打苏联，至少不在1941年进攻。德国对苏联还没有出现必胜的前景，理智的战略家都不会建议在西伯利亚冬天很快来临前开战。到8月的下半月时，连德国驻东京使馆都认为日本攻打苏联的可能性非常低。

整个夏天，大兵潮津都在日本中部的基地等待调遣。8月24日，一艘小型运输船搭载他及其他士兵从大阪出发，经朝鲜抵达中国。他们于9月初抵达“满洲”北部。他们大多是新兵，所以潮津作为老兵，开始负责监督他们的密集训练，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敌人是谁。这些士兵忍受着饥饿，苛刻的体能训练让饥饿感更加强烈。绝望的士兵只好时不时去当地农田偷一些蔬菜。

日本国内的物资也不富余，但当权者还是能勉强度日。尾崎秀实8月末的一天与他的好友西园寺公一会面，他们在尾崎工作的南满铁路大楼顶层的亚洲餐厅吃饭，这栋气派的混凝土建筑于1936年完工，似乎是要彰显日本在“满洲”项目的成就。席间尾崎问道：“似乎他们决定了？”近卫的特别助手西园寺答道：“是的，他们决定不打了。”

尾崎向佐尔格汇报说，日军正式放弃了北进计划，佐尔格脸上露出喜悦和宽慰的神情。西园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向苏联透露了一条重大信息。如果不是出于对佐尔格发自东京情报的信任，斯大林可能不会决定将部队调往西线，他向来对日本向北方派兵（大兵潮津也在其中）感到多疑，当然这一点也无从求证了。如果不是坚信日本不会袭击，苏联就不可能反攻，尤其当时美国并没有立即予以援助。后来西园寺也发现自己的无心之语竟然帮助了间谍活动。

在这些天里，西园寺一心帮助近卫安排与罗斯福的会见。西园寺与他的贵族朋友清楚，与西方开战必输无疑。耶鲁毕业的记者松本重治也同意西园寺的看法，松本也是明治时代显赫家族的直接后裔。近卫曾向他吐露心声：“在日本对华关系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近卫首相只对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展现脆弱的一面，他遗憾地说道：

我太惭愧了，没脸面对我的祖辈。我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我要不惜一起代价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还有一丝可能的话，我还想改善日中关系。我想尽力而为，你愿意帮我吗？

在1941年8月26日的联络会议上，近卫准备向罗斯福传达的信息获得了批准，这条信息说：

两国一开始的非正式接触在7月中断之前，无论在精神还是内容上都符合当时形势。但继续这种对话，并且两国政府首脑认可其结论，并不符合当前迅速变化形势的需求，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紧急事件。因此，我认为两国首脑急需先见一面，从广泛角度讨论日美之间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重要问题，探寻挽救形势的可能性。如果需要的话，会见结束后，一些细节的调整可以留给两国有能力的官员去协商。这就是我当前提议的目的。我真诚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被完全理解，并得到阁下的积极回应。鉴于此次会晤的性质，我希望会谈能够尽快举行。

野村8月28日将这条信息转达给罗斯福。他称赞了该信息“语气和精神”，并再次建议将会见地点设在朱诺。对野村来说，会见地点无关紧要。这位日本大使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罗斯福明确告诉他，近卫首相的提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罗斯福说他“非常抱有希望”，“非常渴望与近卫首相谈上三四天”。

野村当晚拜访了赫尔，对他安排了自己与总统的会见表示感谢。他说朱诺与其他任何地点都一样合适，因为从日本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尽快会面。他还描述了日方可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大约20人，分别有5人来自外务省、陆军、海军和日本驻华盛顿使馆。”他表示，9月21日至25日将是合适的时间，近卫首相将比罗斯福总统提前5天出发，这样两国领导人将能同时抵达。

野村的热情很快就被浇灭。赫尔不是特别赞同两国首脑会晤。他间接暗示最近“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这些问题造成拖延，并以日本说一套做一套而告终”。他当然是在说印度支那。他认为，举行高层会晤前，他必须要求日本在威胁两国关系的最紧迫问题上作

出明确承诺，包括日本的轴心国联盟问题、对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地区的增兵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奉行不歧视原则。

努力保持冷静的野村说，他觉得中国问题最难在会谈前达成基本共识，建议将该问题留待会谈时讨论。赫尔明确回应说，美国参加会谈是因为日本的积极姿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把中国看作一个贸易国家，充分挖掘其5亿人口的潜力。”这也是罗斯福所赞同的。赫尔再次表示：“双方在举行会谈前，应该对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先达成原则性共识。会议的目的将是对这些原则性共识予以正式批准。这难道不是更让人安心吗？”野村觉得几分钟前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议现在变得遥不可及。

近卫仍然相信会举行首脑峰会。8月29日，他和支持者聚集在富士山脚下的一处度假胜地，按照赫尔的要求起草会前协议。刚从美国回来的银行家井川忠雄和开启美日非正式接触的德劳特神父也赶到现场给予精神支持。8月的最后3天，这些人聚集在以银质茶具和法国菜闻名的高档酒店富士屋，夜以继日地忙着起草协议，他们偶尔打一两杆高尔夫球作为高强度工作的调剂。

在协议起草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变得最为棘手。一个是日本应当“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这将成为日本第一次明确承诺撤军。另一个是如果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日本的判断不应基于在《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义务。这意味着向美国保证，日本不会自动参战。起草者必须在吸引美国和不伤害日军领导人面子之间小心拿捏，近卫也积极参与文件的修改。最终，起草者认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

这份草案必须经过9月3日的联络会议批准后，近卫才能正式交给美方。西园寺做了必要的铺垫工作，将建议转达给海军和陆军方面领导人，他们最终表示同意。现在该轮到近卫做他最不擅长的事了，那就是直面争议，坚持己见。他必须清楚，归根到底，与罗斯福在朱诺会见才是最重要的。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1941年8月27日上午，“总力战研究所”的一群研究生聚集在日本首相的官邸。当时的气氛有些压抑，甚至令人沮丧，夏末的阵阵细雨更凸显了这一感受。在大吊灯照亮的大厅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与内阁面对面交流，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第二天依然如此。他们拿出一份冗长的报告。经过过去6周对一系列数据的仔细研究并模拟各种外交和战略形势后，该研究小组作出结论：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很可能在初期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拖入僵持战，日本将看到自己的资源不断消耗并最终用光。

这些作出预测的研究者在进入“总力战研究所”前已有约10年的专业经验。该研究所于1941年4月成立，有点儿模仿英国的帝国国防大学，为军官和政府领导人提供一年密集训练。这一精英教育机构意在培养日本未来在军方和政界的领袖。

该研究所创立者的崇高志向并没有实现。每个部门都将最优秀的候选人送进来，所以学员都是在职公务员中的精英。尽管研究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最佳地段，但建筑本身足以让新来的学员心里一凉。这座两层棚屋与周围政府典雅的红砖建筑格格不入，许多新人以为他们遭到了贬低。

学员们都喜欢第一任院长饭村穰中将。他为人和蔼，语言能力很强，会讲流利的法语和俄语。他曾在土耳其的一所陆军学院讲课，并将许多战略文件翻译成日语。他亲和的性格吸引到许多有趣的人来学院做讲座，其中包括佐尔格的间谍同伙尾崎秀实。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仍然对突然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本想做一些高端研究，结果却在进行基础体能锻炼，上一些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的课程。

因此，1941年6月20日开始的日本中部之旅让学员们得以透透气。他们访问了山本五十六所在的伊势湾，登上了海军旗舰“长门”号和另一艘军舰“日向”号，两艘军舰都装备有海军最先进的技术，学员们还获准观摩了演习。一切都进展顺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军舰的性能，其模拟发射的鱼雷在完全黑暗的环境能精准袭击目标，这着实令人惊讶。

演习过后，山本想听听这些来宾的意见。他询问了来自朝鲜总督府办公室的日笠博雄，他谦恭地回答说：“长官，我对反潜能力印象深刻，您的轰炸战略也很出色，但我觉得空中打击能力有些弱。”

日笠说得很对。其他军官可能会被这位年轻文职官员的无礼所激怒，但山本奖励了他一瓶威士忌，那时威士忌在日本是个不错的奖品。山本对日笠的直言不讳感到高兴，他认为日本精英普遍缺乏这种能力。的确，这些巨大海军舰船并非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山本对此非常认可。

学员们随着舰队一直开到日本南部的志布志湾（附近还有锦江湾，其形状酷似珍珠港）。这时，广播传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这一变化再加上随后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决定突然让研究人员的工作紧迫起来。

他们返回后开始进行模拟演习。每个学员都扮演一个假想国家（以日本为模型）的一名内阁成员，并且要参加一场假想战争（假想敌是美国）。演习从7月12日开始，距离松冈外相参加他最后一次联络会议并不遥远。

对于这场全面战争，内阁需要制定各种政策，包括军事战略、外交、意识形态和经济。指导他们的教官指出，这些政策需要适应国内外局势预计未来两年内的变化，政策步骤必须细化到月份。学员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去模拟实际情况，他们使用日本各个政府部门的真实数据。最后，这场战争不再像是假想的，而是会真实发生的。

模拟演习一开始，日本差点儿要与美国宣战，由于美国和英国政

府对日本的全面禁运，日本经济被完全孤立，不得不进一步挺进东南亚，用武力获取资源。

学员们对教官提供的这一假设前提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深入东南亚（最有可能的国家就是荷属东印度）将让日本必然与西方开战，连通过外交阻止战争的机会都没有。大多数人预计，日本能够占有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但敌军在菲律宾驻扎的舰队将很快对日本船只发动全面进攻，让石油无法被运走，获取印尼石油的目标无法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将被迫挑起与美国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日本负担不起的。许多学员甚至在这次模拟演习前就坚定地认为，这场战争毫无胜算，不应该发动。

这些研究员将模拟演习的报告呈献给近卫内阁后，东条英机不停地做着笔记，他以前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生。报告最后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这场战争赢不了。东条的脸煞白，似乎是他最不祥的预感得到了印证。但他不应对报告的结论感到意外。陆军省自己的战争经济研究办公室综合参谋本部驻纽约情报人员发回的报告称，日本的工业力量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只要看看东京市中心的建筑你就能感受到日本的物质状况是多么贫乏。自4月以来，所有明治时代的铸铁装饰栏杆和大门都被拆掉了。东京府厅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了，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作1900磅废铁用于制造武器。

当然，那些红砖楼还在，但其木质围栏让人担忧。在东京这样的街景下，“总力战研究所”的棚屋并不显得很寒酸。很难想象，仅仅几年前，这座同样的城市还成功赢得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时，东条不愿接受这一悲观情绪，他评价说，研究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但该研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它毕竟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年打俄国时也没有想过会赢，但我们的确赢了”。他极力粉饰着刚刚呈献给他的残酷事实，他说：“你们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我也不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理论。”他最后坚决要求研究小组不能将这一结论传出去。

东条是寄希望于日本突然发现油田吗？他难道忘了日本此前90%的石油来自美国吗？他指望合成石油会突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吗？他预计天灾会再次帮助日本，就像13世纪的台风阻止了蒙古人的入侵？抑或是他指望战士能展现出过人的斗志和抵抗力，坚信自己继续作战的能力？来自陆军的堀场一雄教官对学员们说：“美国所缺乏的是大和精神，这是我国最伟大的财富。”他指的是一种据称是天生的特性，让日本人成为独特、有抵抗力、守纪律和勤劳的民族。这种玄乎其玄的独特性论调几乎是民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

模拟演习时，自始至终都强烈反对战争的是海军省的志村少佐，他以优异成绩从海军大学校毕业，毕业论文论述全面战争。他曾对教官说：“就算日本人发挥大和精神，但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精神，只看到自己忽视对方是不对的。”

大和精神当然有其短板。8月中旬，东京的污水系统出现严重问题，缺少燃油是其直接原因。据估计，东京100多万家庭平均每天产生31.5万加仑排泄物。冲水马桶还没有普及，大多数排泄物需要运往农村地区用于堆肥。平时都靠机动车辆运输，现在燃油短缺，这些300多名挑粪工必须借助人力车和船。很显然，这种服务的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东京的公共福利部门被各种投诉淹没，对官僚不作为而怨声载道的市民开始直接呼吁市长夫人出面。8月16日，一篇题为《如何处置粪便》的文章出现在《国民新闻》报纸上，解释了市政府为此召集了紧急会议，但没有拿出确切解决方案。

另外，市长夫人并不是这些不幸的市民可以寻求帮助的最佳人选，因为市长大久保留次郎（Okubu Tomejiro）根本不担心东京的污水问题。他曾是内务省的官僚，担任过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课课长，在20世纪20年代带领内务省对共产主义者（或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进行大规模迫害。永井荷风说，据传言大久保曾敲诈文学杂志《中央公论》，声称可以起诉该杂志诽谤，并勒索了5000日元（作为对比，东京郊区一所公立小学管理员每月收入145日元）。

9月3日，野村大使收到美方关于近卫要求会晤的官方答复。罗斯

福与赫尔的口气一样，他说如果没有事先谈好，没有需要在解决的问题上达成谅解的话，他不同意会见，尽管他仍然对会晤持积极态度。这也可能是一个缓兵之计（有人从罗斯福在普拉森舍湾对丘吉尔说的话中推断，他想再“哄”日本3个月），但这一点无法确定。但近卫也得到安慰，因为罗斯福说：“我十分渴望与您合作，努力让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在现实中得到实践。”

虽然两人领导的国家有本质不同，但近卫和罗斯福却有相当多的性格相似点。两人都不喜欢当面起争执，也讨厌被意见完全不合的顾问所包围。近卫身边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罗斯福身边既有干涉主义者，又有欧洲恐惧者。这两位出身高贵的领导人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藏起来，即使在内阁会议上也不表露，别人很难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最基本的世界观却惊人的相似。

然而，罗斯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即使在争论面前，即使在统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思想时（他不得不反复修改），他坚持了自己出色的直觉判断，清楚什么具有政治可行性，并小心而坚决地贯彻它。近卫要对付的国内形势很敏感，但罗斯福也一样，他必须说服国会，考虑民意，游走于各种限制之间。很可惜，近卫缺乏罗斯福的坚持力和对事物轻重缓急的判断力，出身贵族更让他愿意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他人。《纽约时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准确抓住了近卫缺乏坚持力却具有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他在1941年8月3日在这位日本首相的新闻人物介绍中写道：“作为日本第二显赫家族的首长，近卫不屑于追求个人野心，担任首相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升迁，而是一种贬职。”尽管他总是让支持者失望，但他仍能受到爱戴，因为他散发出的气质让人们必须保护、帮助和支持他——他就像日本的另一位天皇。

近卫认为，他必须听从于国内的强硬派，这是他与军方达成的一种默契。军方仍然制定作战计划，口气强硬，但也允许首相出国会见罗斯福。近卫相信，他将在会晤中永久性阻止战争趋势。军方幕僚也认可他，期待他与罗斯福直接会面时能达成某种全面协议，以避免

战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的一位军官在8月29日的记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矛盾心理：

一位驻美武官告诉我们，美国总统以极高的热情对待近卫首相的提议。似乎在夏威夷的会面真要发生了。一旦实现，我们认为与美国的对话就不会中断……这意味着我们在第一步（心理上）正向美国屈服……我们的帝国未来还要退让好几步，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要打一场持久战。

即使那些鼓吹开战的军人也知道，仅靠逞能无法让日本获胜。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位课长佐藤贤了说：“在华盛顿的这帮蠢货！如果美国人同意不带任何条件会见近卫，那一切都将对他们有利。”

佐藤的手下石井秋穗被秘密任命为陪同近卫前往朱诺的代表团成员，此时美方甚至都没有确定邀请他们见面。石井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顺序是：近卫会见罗斯福、近卫表达日本军方已经认可的条件、罗斯福拒绝接受这些条件、近卫将美方的意见传回国内、军方动怒、天皇介入并批评陆军的强硬、两国最后达成和平协议（包括日军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

8月末和9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战争和峰会的准备并行不悖地进行着。这一天然的矛盾性似乎并没有让人觉得不妥。相反，这种双管齐下才被视为全面的准备。

在9月3日的联络会议上（罗斯福告诉野村无法安排会见的这一天），日本领导层对8月底开始制定的一份联合军事计划取得共识，该计划对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进行了充实。修改后的计划叫作《帝国国策实行要领》，该计划虽然同意日本与美国继续谈判，但如果谈判在10月初这一最后期限前没有成果，日本就将开战。

参谋本部的开战支持者认为，战争必须在年内打响，这样才能赶在敌军积蓄力量前先发制人，此时南部的季风季节尚未来临，而北部严寒的冬季也让苏联无法发动进攻。军令部总长永野说：“帝国的每

一种物资都在不断消耗。”最好在帝国仍有能力发起有效进攻时开战，因此留给外交解决问题的时间很紧迫。

这一通过的决议从字面上看是强烈主战的，但仔细研读后会发现，决议只是军国主义者的强硬外衣。他们完全意识到要作出让步，包括撤军，但制定并通过这一针对美国的逐步作战计划，最高军方指挥官才能挽回颜面，在作出巨大的外交妥协时仍能不失士气。

但也不是所有军方领导人都认可这一计划，尤其是在确定最后期限方面。该计划的措辞甚至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说明军方感到不安。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不想严格界定外交失败，他想以后再讨论。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近卫与罗斯福会面时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包括向泰国调兵。他说他对阻止陆军向印度支那运送物资一事无能为力。这让东条感到惊讶，他说：“但这样做将暴露我们的（备战）意图。”杉山说：“那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大多数人相信，很快就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次联络会议也讨论了外交途径。

近卫本来要在8月底的会议上拿出他在富士屋酒店的朋友所起草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大体意愿，以便讨好美国。但近卫从未公布这份计划。外务省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于是近卫就放弃了他的计划。制定近卫计划的背后推动者西园寺公一要求他作出解释。近卫咕哝道：“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应当先与他们（外务省）协调好。”然后就躲到自己办公室去了。近卫觉得，外务省的计划中已经包含足够吸引罗斯福来谈判的让步条件，所以为何要小题大做呢？

近卫再一次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他甚至在自己召集的联络会议上都无法坚持自己的计划，太平洋的和平竟要系于这个男人身上！与此同时，备战仍在继续。

第二天，外务省的计划用电报发给华盛顿的野村。该计划提议和平解决南太平洋的紧张局势、推行不歧视的贸易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获取地区资源方面保持合作以及解冻日本资产。计划还说，一旦中日达成协议，日本将立即从中国撤出。这一点与近卫的计划不同，近卫

的计划承诺，日本从中国撤出，不附加任何条件。罗斯福政府9月6日收到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提议。

在外交陷入困境时，东京的军事调动严格按照计划执行。9月5日下午，近卫前往皇宫拜访了裕仁天皇，向他解释了9月3日达成共识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提到了外交努力将从10月初停止，他还表示第二天将召开御前会议，让天皇批准这一计划。裕仁对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份“要领”更像是作战计划，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裕仁很快理解。这份计划可以被归结为3点，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是：

- 1.日本帝国不会避免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并将进行备战。

- 2.备战的同时，日本帝国将在一份附属文件（见下文）的指导下，尽力通过外交努力与美国和英国和解。

- 3.如果外交努力在10月初仍没有结果，日本帝国将在10月底发动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战争。

第二点提到的附属文件包含日本的外交要求以及作出让步的底线，与会前协议是独立的。日本的条件包括美国不干涉日本与中国的战争解决方案，要求重新关闭西方向蒋介石运输重要物资的滇缅公路。作为回报，日本承诺不会利用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向南军事挺进的基地。只要苏联保持中立，日本就不会对其动武。另外，日本不会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或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拥有的外交影响力越小，其顽固的一面就越凸显。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近卫将对罗斯福作出更多妥协来避免战争。

裕仁一直感到不安。他确切地感受到这一指导谈判的方针更多强调的是战争，他对此提出异议。他要求近卫修改条款，把外交努力列为日本的头等大事。近卫说这不可能，大概他觉得为了与罗斯福会见他只能妥协这么多。近卫是在违抗充满疑虑的天皇，他在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也违抗过天皇，总是尽量避免过多干政的裕仁当时并没有充分反对近卫。但这一次，天皇的态度更加坚决。他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不清楚日本的备战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他问为什

么要瞒着他？近卫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建议裕仁召见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和战略人员来更好地解释具体形势。他似乎是说，政治在这一重大抉择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这一抉择恰是近卫自己的政府所作出的。

永野和杉山被立即召唤入宫。7月底，永野曾拿着一份战争计划进入皇宫，尽管他当时表示不确定日本会赢。裕仁当时对这份计划感到很不安，他与海军大臣及川商量更换永野一事，但后来没有了下文。现在，仅仅5周后，永野带着一份升级版的计划又回到皇宫。

裕仁受到压力时会展现他果敢的一面（但很少发生），他向军方抛出尖锐的问题，近卫在一旁听着。他对军方说，战争和外交不能同时进行，外交必须优先。他询问日本在南部的战争预计要持续多久。

杉山：陛下，我们准备在3个月内完成在东南亚的任务。

裕仁：中国事变发生时，你担任陆军大臣。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战争将在大约1个月内结束。但漫长的4年过去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杉山：中国有广阔的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最初设想完成计划。

裕仁：如果你说中国有广阔的腹地，那太平洋岂不更广阔。你基于什么得出3个月的结论？

感到极其尴尬的杉山无言以对，他低着头掩饰自己的脸红。

无法忍受这一幕的永野出来解围。尽管陆海军总是相互竞争，但这两位总长关系不错，因为永野显然地位更高。代表最高统帅部的永野说：

如果把今日的日美关系比作一个病人，那这位病人急需手术治疗。如果不动手术坐视不管，病人将逐渐衰弱。并不是说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而是我们必须在仍有70%至80%（手术成功）的希望时作

出决定。统帅部期待外交谈判能取得成果，但一旦失败，恐怕我们必须拿出足够勇气来实施手术。

裕仁天皇试图接受战争，但他很难将永野预计的获胜概率与他之前承认没有胜利希望的表述结合起来。他向永野抛出了不久前刚刚问过的同一个问题：“我们能获胜吗？你能说我们一定会赢吗？”对此，永野回答道：“我不能保证‘一定’，因为这既基于人力，也基于神力。”他强调，战争不是统帅部的首选，但鉴于当前面临的危机，日本不得不为战争做准备。“如果（通过战争）能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的话，我们就必须一试。”他说。

于是裕仁最后问道：“那么我再问你：最高统帅部想要从今天起将更多重心放在外交上，我这样理解对吗？”陆海军两位总长予以肯定。

40岁的天皇凭直觉感受到，主战言论站不住脚，比他年长的两位主战军官极其不负责任，他的皇家批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裕仁能够觉察出该计划的鲁莽性正是因为他身处东京奇怪的决策过程之外。作为日本爱好和平的大家长，他想要避免战争的本能与他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责任相冲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必须保证日本通过军事准备来确保生存，于是，这一点最终占了上风，他默许了战争计划。

近卫在天皇发问时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才意识到所做决定的重大程度。第二天再次来到皇宫参加御前会议时，他的恐慌越来越深。近卫希望天皇能把御前会议的方向引向和平，他请求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木户幸一帮忙。

御前会议上午10点整准时开始。与往常一样，与会人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另外还有陆海军总长、次长、军务局局长、内阁书记官长和企划院总裁。代表天皇发问的又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

原嘉道问两位总长，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到底是军事战略还是外

交，这似乎是裕仁论调的翻版。两人都没有作答，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坐在长桌远端金色屏风前的裕仁本应保持缄默，但此时，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开口说话了：“原嘉道议长刚才的问题提得很合适。很遗憾两位总长没有能力回答。”他随后从胸部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是他已故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由于他对两位总长的问话不能令人满意，而近卫当天早上又要求天皇进行干预，裕仁于是带来这首诗。他开始朗诵：

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这首和平主义者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诵读这首诗来表达他对新计划的严重不安，以及对日本避免战争的渴望。至少，这是他想间接向听众表达的意思。但朗诵诗歌却创造出一种古怪的氛围和被动抵抗的无奈。天皇就是日本的象征，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外力，日本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但该国更想得到和平。这一和平主义诗歌并没有让裕仁摆脱自己的责任，他仍然批准了这一计划。

我们不禁设想，如果裕仁的反战态度更明确一些或拒绝批准这一计划将会怎样。与其朗读诗歌引来诸多猜疑，他为何不干脆坚持不开战？有可能谨慎的木户当天上午在转达近卫想要天皇干预的愿望时，建议裕仁不要确切表露政治态度，他担心天皇会为将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木户和裕仁都认为皇室不应过多干政，这是让裕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天皇的性格：他过于温顺，无法阻挡走向战争的洪流，历史上也没有天皇否决的先例（明治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天皇不能否决，所以他理论上可以否决——关键要看裕仁自己）。在神圣与世俗角色之间如履薄冰的天皇只好念了这首诗。

当天晚上，天皇批准10月初为最后期限后，近卫秘密邀请格鲁大使来到一位朋友家做客，陪伴近卫参加晚宴的有“早餐俱乐部”成员牛场友彦，他英语流利。在场的还有生于大阪的美国使馆官员尤金·杜曼。近卫的艺妓情人负责端茶倒水。

之所以安排秘密会面，是因为8月15日，近卫内阁中的资深政治

家平沼骐一郎在家遭到极右翼刺客袭击。尽管身中六枪，包括头部中枪，平沼奇迹般幸存下来，即将完全康复。他因为与格鲁关系过近，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而成为目标。这件事让近卫心惊胆战。

在3小时的会面中，近卫试图向格鲁表达想见罗斯福的愿望。之后，格鲁向美国总统发回一份长篇报告，总结了这次会面并转达了近卫的希望，即“他想亲自向总统阁下作出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说明将是对野村大将通过外交途径所转达信息的补充与澄清”。理论上讲，近卫仍有与美国达成外交共识的机会，但时间紧迫，因为主战派刚刚跨越了一道障碍，赢得了天皇的同意。

虽然军方的意见也有分歧，对仓促应战的可行性没有把握，但军方已受困于自己的好战言论中。既然具体期限已经确定，日本的仓促备战就有了内在动力。

相比之下，“总力战研究所”模拟内阁所作出的选择更多基于对相对实力的分析。的确，研究人员并不清楚日本仍有多少石油，但在其他方面的评估中，日本都无法赢得与美国的战争。近卫及其内阁大臣不可能对这一结论视而不见。1941年夏末，模拟政府认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现实政府眼中却几乎是非打不可的。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日益叫嚣备战的必要性。为了延缓战争趋势，近卫安排东条与东久迩宫稔彦王会面。东久迩是一位自由主义亲王，他年少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尤其是在法国。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人。由于他也是一位陆军大将，他对东条的劝导可能会得到认真考虑。东久迩还是裕仁天皇的叔叔，属于皇族，这加强了他说服力。东条对皇家的态度近乎奴颜婢膝，似乎是想为祖上曾与皇家对抗来赎罪。

近卫对时机的把握又很拙劣。两人的会见安排在御前会议后的第二天，前一天天皇刚刚批准10月初作为外交努力的最后期限，不然就在10月末开战，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东条坚持开战的决定，除非天皇收回成命。据说东条向下属描述裕仁诵读和平诗时流下了眼泪，但他不认为天皇是在反对战争。对他来说，这首诗代表皇家对军方战胜困难的鼓励。

东条决心要走在为他铺好的道路上，如果必要的话，他要拖着整个国家跟他一起走。他对东久迩说：“美国最终想要日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英美阵营。”但即使日本放弃法西斯道路，加入同盟国，“英美一旦打完德国后，一定会袭击日本”。

虽然东条的西方威胁论纯属猜测，但他的恐慌是确实存在的，且一直萦绕不散。他相信自由主义的西方只有对日本有企图，并且想要支配亚洲时才会对调停日中战争感兴趣。国务卿赫尔喜欢宣扬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但他认为鉴于美国拥有更大的野心，赫尔的话不可信。东条还强调说，考虑到“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灵”，日本不可能从中国撤军。东条是在重复军方内普遍存在的看法。但他不是普通军人，他是陆军大臣，直接对内阁负责。他一味沉浸在军人的效忠职责中，拒绝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失去了理智。东条最大的特质就是极其

专注于他所认为正确和正直的目标上。东久迩能否像近卫希望的那样改变他的顽固态度？

东久迩身材纤瘦，气质阴柔，他的小下巴是日本贵族的特征。他相貌较好，与其他陆军官僚不同的是，他不蓄胡子。这位有国际视野的53岁亲王拥有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他一开口就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对东条说，日本的形势让他想起法国政治家马歇尔·贝当和乔治·克列孟梭曾对他说过话。两人都表示美国最终想要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很容易判断出，开战是地缘政治的必然结果，目的是争夺对亚洲的控制权。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由于物质相对匮乏将败于美国。日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尽量减少损失。然后，东久迩严正表示：既然天皇和首相都想与罗斯福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的东条应当顺从上级意思。如果他无法执行非抵抗政策，他就应当辞职。

东条对东久迩的话完全不感到惊讶，这一定是近卫的意思，近卫认为东条爱惹是生非，但又不想直接与东条起争执。东条回应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注定要灭亡。如果日本现在冒险一搏，日本还有二分之一的获胜概率（如果从战争非胜即败的角度看才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当然，冒险一搏比不抵抗灭亡的选项更好。东条的冲动显然战胜了理智，他对东久迩说，他无意停止备战。

9月8日和9日，参谋总长杉山元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想知道，日本与西方开战后，苏联与“满洲国”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杉山向他保证，冬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发生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部队派向北方。但冬天不会永远持续，日本也承受不起将中国的部队派去攻打苏联（杉山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说完不到10天，日本陆军就发动了长沙战役，以控制中国的中南地区，但日军受到中国的猛烈抵抗）。再发起一场战争难以想象，裕仁本可以提出异议，但他反而对杉山说，他理解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似乎裕仁认为这是理论上的演习，与政治现实无关。或许他仍在指望近卫与罗斯福的会面。

陆军先后6次（5次在9月，1次在10月3日）宣布成立临时部队以

及向南调动的计划。日本伞兵部队开始加紧训练，该部队是征服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关键。日本伞兵部队一年前才刚刚组建，组建过程依靠对美国陆军空降部队照片的模仿。伞兵部队在游乐场的自由落体塔接受训练，别人以为他们是享受娱乐活动的大学生。这些伞兵2月底首次实现空降。

海军也在加紧备战。9月11日至20日，一场模拟向南侵略的演习在海军大学校展开。9月16日还进行了袭击夏威夷的桌面演练，但军令部认为该计划过于危险，不切实际，最终放弃了计划。

日本武装部队大肆宣扬战略家和领导人的好战言论时，美国差点儿在冰岛开战。德国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根据《联合条款》，位于大西洋重要航线上的冰岛属于丹麦附属国。英国在1940年5月向冰岛派兵，加拿大也派出援助部队。丘吉尔希望，美国将能接管冰岛的国防。1941年春，罗斯福同意如果美国加入欧战就承担保卫冰岛的责任。德国入侵苏联后，虽然罗斯福的强硬派顾问呼吁立即向欧洲地区派兵，但罗斯福一直很谨慎。1941年7月7日，在冰岛政府的请求下，罗斯福同意派出44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小心地绕开《选征兵役与训练法》，派遣职业士兵而非应征入伍者——后者不允许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服役。这样他就避免了与公众作对，履行了他此前的承诺，即这些“孩子”不会参与外国战争。后来，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罗斯福同意美国军事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这一系列举动与日本息息相关。由于美国关注于西大西洋，所以在1941年春，美国开始愿意与东京达成某种和平，这将确保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即将与纳粹的战争。当然，日本浪费了这一机会。

1941年9月4日，冰岛海岸线外的水域成为德国与美国上演不宣而战的舞台。载有军方人员及邮件的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Greer）于上午8点40分抵达冰岛时，一架英国轰炸机发出警告说，有德国潜艇在附近潜伏。英国飞机发射了4枚深水炸弹，但没有击中目标，由于燃油快要耗尽，英国飞机决定返航。没有接到任何出击命令的“格里尔”号决定追赶德国潜艇，而不是回基地待命。德国潜艇已暴露了3小时，它的电池可能耗尽了，所以急着要浮出水面。它此时

距离美国军舰不足330英尺（译者注：约100米），并发射一枚鱼雷，但也没有击中目标。“格里尔”号发射了8枚深水炸弹，但没能给潜艇带来太大伤害。德国潜艇又向美国军舰发射第二枚鱼雷，但也打偏了。双方于是停止了这次近距离接触，经过约10小时的追逐，两艘舰艇均安然无恙。

“格里尔”号事件是美国第一次与德国发生交锋。在9月11日的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一插曲调动民意反对希特勒，强力推销他决心要打的战争。他并没有指出，首先发射深水炸弹的是一架英国飞机，让美国的行为成为对德国发射鱼雷的自卫。他也没有提到“格里尔”号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坚持复仇（这些细节直到一个月后一参议院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才得以明确）。但罗斯福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纳粹政权的憎恶。他以夸张的语调对美国民众说：“这纯属海盗行为——法律和道德上的海盗行为。这不是纳粹德国对美国的第一次海盗行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袭击总会招来更多袭击。”

罗斯福还讲述了此前几个月美国船只和巴拿马船只疑似遭受德国袭击的事例，他因此警告说，这些不是单独个案，而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说，这些都是藐视国际法律的行为，证明纳粹故意要阻碍航海自由，想要独自控制和支配这些海域。他还说：

纳粹控制海洋的企图只是纳粹现在对西半球密谋的一部分——这些计划都朝着相同的目的。希特勒的前哨——既包括公开身份的特工也包括安插在我们周围的奸细——已经努力帮他在“新世界”建立根据地和桥头堡，他一旦控制了海洋就能利用这些基地。但他对“新世界”的阴谋诡计和蓄意破坏都逃不过美国政府的法眼。阴谋后面还是阴谋……袭击“格里尔”号绝不是北大西洋的局部军事行动，也不仅是两国斗争中的个体事件。德国想要永久建立一个基于武力、恐怖和杀戮的世界体系，“格里尔”号事件就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坚定一步。

罗斯福对美国人民说，发照会及其他“一般外交惯例”不再对德国有用。为了维护提供战争物资以击败希特勒的方针，为了确保美国在公海航运的自由，美国必须毫不迟疑地袭击纳粹潜艇及入侵者。他们

是“大西洋的响尾蛇”，“当你看到随时准备进攻的响尾蛇，你不能等它先袭击你”。“积极防御”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美国舰船可以在对美国自卫至关重要的水域袭击德国潜艇。另外，至关重要的水域由美国政府界定。罗斯福还借这一机会介绍了允许美国在大西洋对同盟国船只护航的新计划，这是他在普拉森舍湾批准的，将于5天后开始生效。

罗斯福再次展现了他的演讲天赋。这次“炉边谈话”后，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支持他在大西洋针对德国的政策。然而，正如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敏锐地向丘吉尔汇报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不要插手欧洲战争，尽管他们认可总统的大西洋新政和击败希特勒的愿望。

对美国一些战略家来说，战争的前景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在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的要求下，由阿尔波特·魏德迈少校领导的中层军官1941年7月开始制定大范围战争计划，也就是“胜利计划”，完成于9月25日。该计划对作战所必需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规模进行了评估，并对击败轴心国提出战术指导方针。很快该计划就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时在这群计划制定者眼中，德国仍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们敦促美国领导人尽量控制日本。

日本政府应当考虑到，是否有一天美国会认为日美之间也不再需要“发照会”，这一天是否会很快降临，该如何防止这一恶化趋势。与其相反的是，日本却在为自己的“积极防御”计划做准备。

从佐尔格处得知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在整个9月从远东向莫斯科调集了20个师。斯大林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德国了。他最终将远东的部队砍了一半，苏联西线的形势将逐步好转。

这更应该让日本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日本留在法西斯阵营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势，日本的战略计划仍然基于这一理念，但参谋本部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抵抗能力出奇的强。另外，日本虽然并不认可真正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日本领导人也不愿摆脱轴心国同盟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盲目坚信德国坚不

可摧的错误。因此，从联盟角度看，日本仍然属于法西斯政权，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机会越来越小。

9月10日，野村在著名的华德曼公园酒店的新住处会见了赫尔，这座酒店是为了纪念一战结束而建，共有1000间客房，戒备森严。他询问赫尔如何看待日本的最新提议（外务省的计划）。赫尔表示，这一提议“缩小了此前谅解的精神与范围”，而双方此前的谈话中“对整个太平洋地区达成了更广泛、更开明的谅解”。简言之，该提议是进一步倒退。

这一明显倒退更加剧了赫尔对近卫的怀疑，他认为近卫的政权地位不稳，无法作出重大让步。这次会面让野村更坚定地认为，东京必须在任何高层会见前作出切实的让步。他尤其警告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对美国很重要。但东京的领导人对此很难接受。

日美谈判伊始，日本部队在中国的存在就注定是个问题，但其重要性后来才在美国人眼中变得越发明显。要是在5月，赫尔肯定会对日本军事占领中国更加纵容（至少私下里更加纵容）。银行家兼业余外交家井川忠雄曾经表示，赫尔甚至建议过将日本军事占领中国的表面目的从“反共产主义”改为“维和”。这种更改将让日本能够继续占领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海南岛。

1941年夏天的一系列变化——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不顾罗斯福提议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日本坚持留在法西斯阵营以及美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似乎打消了美国想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国不能被牺牲掉。日美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像（用萨姆纳·韦尔斯的话说）“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不要哈姆雷特角色一样”。如果近卫递交他的密友所起草的提议，承诺“日本‘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所有地区撤军”，事情的结果将有很大不同。这件事只能归咎于近卫自己。

赫尔拒绝日本的提议后，9月20日的联络会议又通过了一份准备递交美国的提议。这份修改提议的基本轮廓与9月6日的版本一模一样，强调了美国需要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调停，但又不能干涉日

本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解冻日本资产和恢复贸易；而日本不会涉足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

新提议对中国实现和平开出更多条件，语气上也更加强硬，说明参谋本部的影响力日益盖过外务省。野村认为这份新提议没有任何一点有助于他的谈判。这件事说明他对东京的影响力有限，也证明近卫的勇气有限。

野村尤其对日本开出的其中一个条件表示担忧。东京方面继续坚持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合并。美国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一条。野村觉得，任何为日本在亚洲利益的申辩只会起反作用，让美国更加警惕。他向东京发回一条电报说：“我不认为这一提议能被接受。”但他的警告再次遭到忽视。

对于幕僚过分干预这份外交文件的起草，军方至少有一人感到震惊。陆军省军务局的石井秋穗后来抱怨说：“参谋本部应该是只负责国家的防御和军事动员的机构，为何要对一份外交文件吹毛求疵？我不理解。”

即使袒护军方的外相丰田贞次郎也承认，9月20日的新提议对美国没有吸引力。但他仍然将这一提议转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作为参考，这份材料于9月27日传到了美国国务院。

近卫和罗斯福会晤的准备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西园寺公一也不知所措。近卫首相任命他做顾问，大概是因为对他无条件地信赖。作为回报，西园寺为近卫非常卖命，帮助近卫起草了他没能拿出来的提议。几周前西园寺还对这一提议感到兴奋，现在兴奋感早已散去。西园寺感受到近卫的脾气反复无常，常常优柔寡断，但他仍然相信近卫由衷希望与罗斯福会面。

9月下旬，西园寺接到好友尾崎秀实的电话，尾崎刚刚从“满洲国”巡讲两周后归来。对这位记者兼间谍来说，过去的这个夏天十分忙碌。当晚，西园寺与尾崎共进晚餐，交换了对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看法。尾崎对前景完全不看好，认为美国并不信任当前的日本领导层。

他说，美国不可能认真考虑日本的提议，包括高层会晤的提议。西园寺告诉他，在近卫的要求下，他参与了一份新提议的起草工作，希望仍能挽回局面。

9月24日，尾崎又邀请西园寺在上次用餐的地方喝一杯。夏季还迟迟没有过去，两人点了啤酒（与日本大多数人不同，他们俩仍能享受啤酒。根据东京的配给制，从1941年4月开始，每户人家每6个月只能购买2至4瓶啤酒）。他们选择在私人隔间见面，尽管两人并不搞什么秘密活动。西园寺带来了他们在富士山脚下起草的提议，也就是近卫没能拿出的提议。尾崎并没有要求查看，但西园寺与他最好的朋友分享这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尾崎从头读到尾却一言不发。他随后推掉了西园寺安排的与其他朋友一起用餐的活动，并先行告辞了，很可能是去找佐尔格汇报情况。这次会面也让西园寺日后受到间谍指控时多加了一道罪名。

第二天开始是晴天，温暖舒适，气温一直是20多摄氏度，但一到下午就下起雨来，气温骤降。这一天的联络会议更增添了近卫心中的愁云。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共同提出，抛弃10月初这一模糊的最后期限，设定中止外交的具体日期。他们说：

开战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战术需要。因此，最后认定日美外交谈判的成败之前，我们一天都浪费不起。我们必须最迟在10月15日前选择外交还是战争。

由于两位总长提出更加确切的要求，近卫开始感到恐慌，尽管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谢绝继续加入军方安排的午餐会，而是带着主要内阁成员回到了首相官邸。他向外务、陆军和海军大臣询问：“10月15日的期限会不会太苛刻？”这一问题其实是针对陆军大臣东条的，在立即备战方面，东条与陆海军总长看法一致。东条轻蔑地对他说，御前会议已对这一问题早有定论——10月初是野村在华盛顿任务的中止。

善于隐藏内心想法的近卫不容易让人读懂。但这次联络会议后，他的变化很明显。负责记录的战争指导办公室的官员第二天表

示：“表面上看，昨天军部的要求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但实际不然。近卫首相的心中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卫不想伤害表面和气的做法让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这带来了后果。他最终认识到，美国不会与他会谈。恐慌之际，他立即出于本能作出反应：自保。

他第二天私下与木户幸一会面时谈到自己准备引退。两人是学习院（Peers Academy）的同学，可以说他们从小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近卫抱怨道：“如果军方坚持10月15日是开战的最后期限，我没有任何信心，我只能考虑辞职。”木户说：

是你召集9月6日的御前会议。你不能将问题搁置，一走了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何不提议重新考虑这一决议？在与军方交锋前你不能这样说。以这种方式留下烂摊子是不负责任的。

木户的劝诫让近卫没有选择辞职。他逃往古都镰仓的一处别墅，虽然距离首都仅30英里（48公里），但却被群山和海洋隔绝开，他在这里一直待到了10月2日。

由于首相离开东京，外相丰田只好独自游说，争取促成近卫和罗斯福的会面。但他没能听取野村的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策，并拿出更诱人的方案，相反，丰田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一份我们之前看过到的修改提议。他想当然地认为，格鲁大使与罗斯福是老朋友，所以更有影响力。丰田希望格鲁能做一些幕后帮助。丰田打开新的外交渠道，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与白宫的交流更有效果，但这样做实际上让野村颜面扫地。

丰田9月27日请求格鲁向华盛顿方面解释东京决策层的复杂体系，为近卫及其懦弱寻找借口。他暗示，东京拿出的“官方”提议并不代表近卫在朱诺不会作出更多妥协。

9月29日，格鲁向罗斯福发回一份冗长的11点报告，他强调说：“日本政府不可能对未来作出确切保证，无法作出更多承诺。”其中一个原因是：

前外相松冈在7月下台后，向德国驻日大使详细讲述了美日谈判在7月以前的发展状况。由于松冈的许多支持者仍在外务省，这些人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向德国和日本极端分子透露任何有损于内阁的信息。虽然一些基本原则已暂时被日本政府接受，但日本未来的目标及政策走向……太虚太模糊，可以理解为他们更愿意模棱两可而不是澄清日本政府愿意作出的承诺。

因此，格鲁建议美国应该相信近卫的诚意并同意会谈。他谨慎地推测说：

我认为相比前期的交流，近卫可能会直接给罗斯福总统更多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格鲁进一步强调，美国应当奉行渐进主义方式。丰田曾表示，“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建设性妥协，尽量去改变日本的想法和观点，这与美国当前的努力保持一致”。格鲁对此表示赞同。

外交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把当前的危机作为决定下一步棋的参考。美国政府里有人认为，格鲁所鼓励的“建设性妥协”就是某种绥靖政策。不论日本的形势与1938年秋天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有多么大的不同，慕尼黑会议的惨痛教训仍然历历在目。虽然丰田成功地将近卫内阁的处境进行粉饰，说日本政府被亲松冈和亲德派人士所支配，但他也只能责怪他的前任。不管有没有松冈洋右，日本都无法避免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它毕竟也是轴心国的一员。格鲁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可惜的是，近卫没有良好的业绩来让华盛顿相信他值得信任。虽然近卫和丰田不断表示，近卫如果能去朱诺，就一定会带来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惊讶的妥协方案，但美国政府仍然表示怀疑。

1919年年初，近卫声讨巴黎和会英美独裁的爱国主义文章让他首次引起西方关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担任首相，对战争升级负有责任，包括对日本在中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暴行（尤其在南京）负责。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正式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他

还推动了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美国继续故意误解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真正意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战争。”近卫却认为，这些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不会影响他的可信性，他毕竟是一位公爵。他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让近卫感到失望的9月25日联络会议还让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极其担忧。的确，为了推翻松冈洋右，向来十分谨慎、不轻易发言的及川竟然鼓吹：“海军有信心与英国和美国开战。”松冈回应说：“如果你连打英国和美国都不怕，再加上一个苏联又有何难？”及川没有体会到松冈的挖苦语气，他只能老实地回答：“你难道看不见苏联的加入意味着我们多了一个敌人吗？”就在他俩这次交锋的整整3个月后，及川真的要面对同时对抗这3个国家的可能性。

值得赞扬的是，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当陆海军总长想要将10月15日定为外交努力的截止日期时，及川公开表示反对，这一点近卫都做不到。虽然他无法阻挡战争趋势，但他也希望让趋势变缓。自争论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时就态度强硬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显然对及川的阻挠很不满。他狂热地相信日本天生的伟大，坚信日本必打不可的战争不需要基于理性的战略思想，而是基于“我们神圣大地的正义精神”。虽然许多日本人（既包括军官也包括文职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接受“日本命中注定”这类伪宗教命题，但冢田的狂热令人惊讶。联络会议后，冢田对下属抱怨说，东条应当敦促及川不要胡闹，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备战——似乎及川是唯一没有理智的人。但冢田也承认，如果海军不愿意，日本就无法与美国开战。

陆军中不是所有人都像冢田一样，一心想要战争。陆军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战争感到迟疑，尤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人。由于军务局负责陆军内的资源调配，与参谋本部一起制定陆军政策的总体基调，所以军务局局长是陆军省的三把手（仅次于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9月29日，军务局成员聚集在局长武藤章的办公室里，他们将详细讨论未来可能发展的局面。他们的口吻差不多。陆军无法公开向华盛顿低头——尤其是从中国撤军，但在武藤的心里，战争是更糟糕的选项。他

说：“最可能的结果恐怕还是要开战。但你看，一旦擦枪起火就可能让日本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我就是不能下决心开战，我不想要战争，既然天皇也表示不想要战争（通过朗诵诗歌），我更不想要了。”武藤曾在1937年极力支持与中国开战，但他现在认识到，这是日本的一次“误判”。他心里清楚，如果再来一次战争，日本将彻底毁灭。

当天，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向军令部总长永野发出警告。虽然在过去10个月里，他一直在精心策划给美国致命一击，但山本仍然认为，赢一两场战争并不能确保在长期拉锯战中胜出。因此他对永野说：

我们的军演显示，南部应能在4个月左右拿下，但至少损失60架飞机。当然在真实战争中损失的数量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充足够的飞机来继续作战……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

山本当然想要向世界证明，他有能力取得这一巨大胜利，这是他赌徒的一面。但一个更加理智的山本向永野建议：

我想补充一点……显然日美战争势必要拖延。只要日本占上风，美国是不会放弃的。战争将持续好几年。另外，日本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将受到损耗，补充资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将一贫如洗。

他得出一个经典的结论：“胜算如此渺茫的战争不应该开始。”

这位海军指挥官的犹豫说明，参谋本部推动的战争与日本的战略现实是脱节的。军方的战争意愿不代表一致意见。近卫希望利用意见上的分歧。10月1日傍晚，近卫召见海军大臣及川来他所躲藏的镰仓别墅。近卫问他对确定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说：

阁下，您已表示坚决反对战争。（但不开战）将意味着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以便维持正常关系……如果您下决心走这条路，海军将支持您到底，陆军也会这样做。

近卫显然很高兴，他对及川说，这下他终于放心了。

及川随后在东京拜访军令部总长永野，据海军次官泽本赖雄表示，永野同意支持避免战争的决定，这说明永野在联络会议上的强硬表态不能被当真。及川总是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前景感到胆怯，他一定支持近卫和永野的缓和态度，他也感到松了一口气。来自海军的外相丰田也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很后悔御前会议草率地定下了外交截止日期。现在，近卫感到自己拥有足够勇气了，他从自我放逐的状态中走出来，回到东京。

10月2日上午9点，野村大使被赫尔召唤到他的公寓。赫尔交给他一份声明，呼吁日本接受美国国务卿提出的“四项原则”：（1）尊重双方及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不扰乱太平洋地区现状，除非太平洋地区现状通过和平方式发生变化。赫尔还要求日本向美国毫不含糊地阐明关于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想法。至于日本与轴心国的联盟，赫尔说：“日本政府最好作进一步研究，看看自己还有哪些立场可以作出澄清。”赫尔断然表示，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前不会进行双边高层会晤。他再三提醒野村，美国政府认为“临时拼凑的协议不能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形势”。为了尽量减少负面舆论，美国需要“确保双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能取得成果”。

当被问及对这份文件有何看法时，野村一开始表示，日本政府可能会很失望。赫尔的“四项原则”是在要求日本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日本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无法做到。美国毕竟还是想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美国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1911年才作废）、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结盟以及针对有色人种的政策都让美国自诩的道德高标准看起来异常伪善。

日本很难从中国撤出所有部队。因为苏联紧挨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认为，日本撤军的迹象将引来苏联的进攻——这一担心在4年后得到印证。

野村认为，最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是举行峰会，让双方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他对赫尔说，日本政府对高层会晤的态度是认真和诚挚的，鉴于日本的国内形势，日本政府很难在会前作出什么承诺。野村强调说，近卫内阁仍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保守团体上台的可能性非常小。野村极力解释近卫出于性格原因不愿直接与反对者起争执，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领导力——荒谬的是，正是他不愿起争执的性格特点让他坐上首相宝座，并保持了很长时间。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是野村与赫尔交涉不成功后的首个会议，气氛很沉闷。野村用电报传回了与赫尔的谈话内容，但在会前还没有被完全翻译出来，所以无法讨论细节。与会领导人只好表达了自己的大体看法。参谋总长杉山元告诫，抛弃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不应被推迟。他说：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能很快下决心并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今天决定，但我们必须（很快）决定。

杉山话音刚落，军令部总长永野紧接着说道：“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

当然，永野两天前对及川说过，他更愿意避免与西方军事对抗。永野善于说两面话，但其实所有日本领导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在公开和私下角色之间转换，并不觉得不妥。另外，这种两面性的说话习惯（日语里叫作“本音”和“建前”，即真心话和场面话）常常被视为一种为了避免尴尬的美德。一旦永野代表指挥部讲话，需要体现日本战略兴趣时，他就拿出霸道、几乎像是恶棍的一面。在联络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声援的情况下，及川的反战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及川能够理解永野作为军令部总长说这些场面话的重要性，另外及川也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他不会公开指责永野。联络会议逐渐沦为一场为了面子而维护面子的可悲闹剧。他们关注的重点完全偏了，日本的国家命运被放在次要位置。

这天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及川的发言，他可能一直保持沉默。1946

年1月，及川在一次前海军官员参加的圆桌讨论会上说，他认为首相当时应主动把政府的政策从战争中拉出来。他认为近卫想把政策转向的责任完全推给海军，这让他感到警觉，所以比平时更加沉默。及川对世界毫不了解，见识短浅，他不愿承担避免战争的过错，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及川不是唯一自我欺骗的人，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

在1946年的这次圆桌讨论会上，海军次官泽本对及川面临的棘手形势表示同情。他说，在1941年秋，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仗。”这将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另外，军方领导人不顾日本利益而只想着自己和本部门的利益，这种做法着实有点儿过火。

圆桌会议上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成美不接受这种战后解释，他直接向及川发问：“海军本应全力阻止陆军（做出战争决定）。相反，我们最后失去了一切，包括陆军和海军。你为什么不做（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他进一步逼问：“你是说你之所以不反对战争是因为近卫应当表示反对吗？”及川无力地辩解道：“连首相都不能阻止（强硬派），海军如何能够做到？”

井上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他本可以辞职，海军可以拒绝任命新大臣（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海军大将中挑选），这样海军就能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利用这一策略，这说明不论战后解释些什么，战前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或勇气）阻止一场注定要给日本带来灾难的战争。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时间拖得越久，拒绝战争所需要的勇气就越大。10月5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举行高层会议，他们同意，首相应当在10月6日会见陆军大臣，以“讨论（日美外交）谈判期限的延长和我方（对美）条件的放宽”。海军次官泽本一开始建议，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参加这一会议，但及川不愿意参与，大概他不想被视为开战的唯一反对者。

及川的恐惧不无道理。参谋本部现在误以为近卫支持开战选项，因为他没有对此表达强烈反对。陆军的中层战略研究人员也在为战争

做准备，他们抨击海军的迟疑不决。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5日的记录透露了他们的感受：

首相似乎决定开战。他今晚要与主要内阁成员单独举行会议。我们参谋本部都感到很高兴，觉得松了口气。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海军大臣。

近卫当晚见到东条，试图说服他放弃战争。他们的见面地点是东京西郊近卫最喜欢的别墅“荻外庄”（Tekigaiso），这里能看到富士山。近卫很喜欢在这里举行私人政治活动。然而，这次会面自始至终都是东条的表演，他说：“美国要求我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无条件接受‘四项原则’，并结束军事占领，日本无法忍受所有这些条件。”

近卫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从中国）撤军。为什么不能原则上同意撤军，但以保护资源的名义保留一些部队？”

东条说：“这种做法叫作阴谋诡计。”

感到恼怒的近卫换了一种策略。“让我们想想御前会议的气氛吧。”他说。他指的是裕仁天皇当时读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犹豫。近卫问东条与英国开战能否避免让美国卷入其中。这一想法是海军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充分暴露了他们内心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东条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他说，“经过大量研究”，最高统帅部有了明确答案，“从海军战略角度看，分别作战无法实现”。

10月6日，陆军和海军分别举行会议，但没有讨论日本的备战问题。杉山当晚会见东条，他表示反对向美国妥协，要求政府坚持10月15日这一外交最后期限。两人同意参谋本部应当“坚决”制止海军阻挠战争的努力。

海军的高层会议由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总长、次长和海军军务局局长参加。永野首先听取了关于上次会议的汇报，因为他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虽然海军领导人都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仍

然在前一天达成了广泛共识，即“与美国开战很愚蠢”。另外，海军还“原则上”同意日军“从和平与稳定得到保证的中国部分地区逐步撤出”。这当然会激怒陆军。据海军次官泽本的描述：

及川说：“那么，不如我斗胆去与陆军争吵吧？”似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又想让军令部总长（永野）对他进行鼓励。永野对此回应：“我认为这样做不明智。”这一下子打消了他的决定，为了作出这一决定他曾拿出巨大勇气，永野的话还立即浇灭了高涨的（反战）士气。

及川性格的弱点显而易见。他的前任吉田善吾因为生病而主动请辞，而及川又从来不树敌，所以他当上了海军大臣。永野稍微提出异议，及川就不再有勇气反对开战，毕竟他一开始就不敢与陆军正面交锋。另外也没有人支持和鼓励他。

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6日的记录总结道：

陆军和海军仍然意见不合。陆军认为（外交）没有希望。海军仍然相信有希望。海军认为，如果陆军重新考虑军事占领（以及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的）问题，那就还有希望。我们不禁要问海军军令部（说这些废话时）到底在想什么。仅仅在前天的联络会议上，（永野）还宣称没有“讨论”的时间了。但现在为何会这样？……海军真是个谜……一个人很难不（对海军的意见）感到生气……（海军中有人）预计将损失巨型战舰……（还有人）琢磨，是否能够避免攻打菲律宾（以避免美国干预的风险）。在这个时候，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自私的海军想要废除御前会议作出的神圣决定。难以置信！海军多么不负责任啊！多么不可靠！实际上海军在摧毁我们的国家！

虽然很难判断这位参谋的意见在整个陆军中有多大代表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海军在联络会议上勇于承认日军现状的是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他说：

从战舰的损失角度看，（据信）开战后第一年就将有140万吨的舰船沉没。联合舰队对战争进行的模拟演习显示，战争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我（对这场战争）没有信心。

10月7日，陆军大臣终于与海军大臣进行了会面。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说：“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我必须说出来。当前的经济并不正常，当前的外交状态也一样……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应当是杀出一条血路。”他随后与及川单独会谈。他强调说，陆军不会允许日本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他还表示，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或立即撤军都是不可能的。

及川建议，陆军应当重新考虑其强硬的姿态。他指出，美国10月2日的提议并没有看起来严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仍有希望。东条专门问到，对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海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及川回应道：“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我们的战争决心没有改变。”也许对及川来说，“战争决心”并不一定意味着开战。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含糊且危险的态度，因为东条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东条不肯让及川好过，他继续逼问，倘若真的开战，海军大臣有信心赢吗？及川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本音”（真心话）：“恐怕我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拖上几年，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我说的话不要传出去。”

东条一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倡导者，此时却突然态度软化。他对及川说：“如果海军没有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当然这需要我们接受自己的责任。”这意味着内阁中有责任的大臣都必须辞职。

不论多么尴尬和不自在，海军和陆军大臣终于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尽管9月初仓促作出了决定，但日本（尤其是海军）并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与此同时，军令部总长永野却继续逞口头之勇。我们已经见识了及川的胆小和谨慎，而永野当天会见参谋总长杉山时，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但即便如此，永野偶尔也忍不住透露自己的疑虑：

永野：我不认为外交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外务大臣认为仍有希望，我愿意继续谈判……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决心，即在10月15日作出是战是和的决定。（同时）我们必须留心，不要错过任何战略机遇……（我们谈判的同时必须备战，因为）我们需要保持战斗能力，万一（政府领导人）哪天对我们说：“我们在外交方面已经尽力了，但没有成功，现在该你们登场了。”……

杉山：但我可以认为海军对战争没有信心吗？

永野：什么？对战争没有信心？这不是事实。当然，我们从未说过一定会胜。我也对天皇说过这些，但我想强调，现在还有获胜的机会。对于未来，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物质实力和精神力量的结合。如果你支持海军大臣的看法，那么这种态度将质疑一切军事准备的需求……至于开不开战的最后期限，海军不介意将其延长一点……但陆军似乎不这样认为，是吗？你们似乎已整装待发。

杉山：不是，我们也非常谨慎……

永野：天皇9月6日可是同意了这一决议……现在我们向印度支那南部的增兵不能犹豫。

杉山：我完全同意。

这天晚上，近卫再次在“荻外庄”会见东条。及川坚持让近卫单独会见他。近卫提出，如果日本能够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但时间由实际情况决定，那么外交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东条回应说：“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近卫再次指出，撤军问题是阻碍和平的主要障碍，他说：

在“四项原则”中，我们应该接受机会平等的原则。当然，由于一衣带水的关系，我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我相信美国将会对此予以承认。至于《三国同盟条约》，书面保证（日本退出该条约）将很困难，但我有信心在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时能想出解决方案。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军事占领了。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不要称之为军事占领

呢？如果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绊脚石，你会怎样处理？我们不能一边同意撤军，一边寻找维持实际军事占领的方式吗？

东条表示，总体问题比近卫想的要复杂得多。东条认为，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区利益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外，在所有问题都没定下来时（包括两国高层会晤），他拒绝让陆军主动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对此，近卫只能说：“军人对战争的想法太草率。”

东条坚持认为，9月6日的决议是不可违背的，10月15日的最后期限必须得到遵守。东条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近卫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负责的话，跳下深渊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我要为一个已经存在2600年的国家着想，为数亿日本人着想，肩负如此重任，我无法这样做”。

在他强硬的外表下，东条内心也疑虑重重。第二天，及川前去拜访东条，看看他与近卫谈得如何。东条说：“我们在中国事变中已经失去了数万人。（从中国）撤军似乎是无法接受的选项。”表情痛苦的他继续说道：“但如果我们与美国开战，我们将再失去数万人。我正在考虑撤军，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

东条对那些死在中国的人念念不忘，但最为讽刺的是，在中国的高级指挥官却强烈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开战。10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Hata Shunroku）派一名手下到东京传话。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耗尽，因此应当接受美国的要求并永久性解决与中国的战争问题。东条完全理解中日战争中的阵亡士兵让日本感到沉重。他后来的举动不断证明，死去的人对他来说比活着的人更重要。

赫尔在战后评价东条说，他“相当愚蠢”，“小心眼、古板、想法偏狭”。这其实是不准确的。1941年秋的东条内心十分纠结，其原因很复杂。作为职业军人，他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由于他处理问题的刻板方式以及心中的信条，他无法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最糟的是，东条（以及大多数军人）似乎不太理解国际谅解条约的作用，其实这些临时达成的谅解并没有涉及具体细节。他或许无法摆脱自己严

谨的军事生活习惯。

10月12日是近卫的50岁生日，但却没有庆祝气氛。这位随时准备辞职的首相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为外交争取时间，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叫来了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铃木与近卫和东条的关系都很亲近。在这种小范围会议上，近卫觉得自己更有机会改变形势。

下午两点，近卫在“荻外庄”华美的接待室召开了这次会议。虽然“荻外庄”是传统日式风格的建筑，但接待室的风格却融合了多种元素：中式家具、巨大的窗户和门，以及繁复图案装饰的天花板。近卫对与会者说：“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式。我对这样的战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必须开战，那这一决定必须由一个对此有信心的人来做。”

及川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否开战完全由近卫决定。他说：“我们现在站在外交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开战，（海军）也无所谓。”

及川的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发表自己的真正看法，他把决定权单单交给近卫也是不对的。根据宪法，首相没有决定战争的单独特权——这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由于日本对抗西方的行动主要依赖于海军，所以及川基于现实的反对意见将会很有分量。井上成美5年后指出，及川当时有能力也有义务质疑内阁的战争决定，有必要的話，他甚至可以辞职。但及川不想让自己及整个海军蒙受耻辱，他再次选择不去冒这个险，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及川认为自己能够逃避责任，因为他坚信近卫将作出这一重大抉择。这次会议召开前一晚的半夜12点半，两个人突然来到海军大臣官邸拜访，及川穿着睡裤接见了他们。他们一位是近卫派来的密使、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Tomita Kenji），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说，他希望海军能够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会难堪。

及川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对富田说，这纯属“政治”问题。他说：

我们能不能开战不是军方说了算。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应由政府作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军方就必须支持，不论这场战争将多么困难。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重复这一观点，作为海军大臣，我将永远支持首相作出的任何决定……近卫首相必须自己主动表示，他希望（外交）谈判继续，并且（停止备战）。

及川在会上把皮球又踢给了近卫，他认为海军已经把放弃宣战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近卫。他在镰仓的秘密会面时对近卫说过，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这也是近卫在最后一刻派富田去见及川的原因，他想争取海军将直接干预的明确承诺。这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剧中严重缺失的是勇气。

近卫没有办法将责任推给及川后，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让与会者质疑御前会议的决定。外相丰田是唯一进行深刻反思的人。他承认这是一个集体“失误”，敦促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他说：“请允许我不留情面地坦白说一句，我认为御前会议的决定是草率的。我们甚至在收到相关文件的仅仅两天后（并且只经过了一次联络会议的讨论）就作出了决定。”

这时东条对近卫感到很恼火。他对近卫大喊：“什么叫你没有信心？你难道不是应该在我们制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时就提出来吗？”东条强调，政府应当坚持9月6日的决议，因为这是已经决定好的事。他仍一如既往地对他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丝毫没有显露最近在及川面前流露过的那种内心纠结。他展示的是他的公众面孔，他的“建前”。他厉声道：“这太冒失了！”尽管天皇没有确切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一“皇家”决议对东条至关重要，现在改变这项决定为时已晚。

这就是著名的“荻外庄五相会议”，让人记住的不是会议成果，而是会议的毫无建树。距离10月15日只剩3天了。

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1941年1月11日，作为对《国家总动员法》的补充，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报纸及其他媒体的规定。诸如，军事、外交和财政政策等敏感话题不能再见诸报端或公开谈论，对于其他有可能影响国内动员的社会题材也有详细规定，这些题材包括资源短缺、天气预报（因为可能具有战略敏感性）、家庭问题（比如，丈夫在中国打仗，而妻子背地里通奸）。这些规定更加限制了报纸的报道，但其实日本的新闻自由已经很久都不存在了。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自从“满洲事变”开始，主流报纸都毫不避讳地支持政府政策，依靠煽动爱国主义来竞争发行量。日本入侵“满洲”时，军人与记者主动相互结交，随着越来越多的记者被派往前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客观报道原则已被抛弃。中日战争爆发后，媒体坚持有选择性的报道政策，集中报道日本的胜利。到1941年，日本媒体已经无法摆脱自己与军方危险的联系。

在官方政策的发布方面，日本国家广播电台NHK总是抢先报纸一步。1938年5月的一天，NHK首次从江苏徐州现场直播了一场战役。广播员兴奋的声音传遍整个日本，他将眼前发生的一切称为“一场巨大胜利”。其实，敌军很快撤退了，根本没有多少抵抗，但听众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们听到的是：“徐州攻破了！徐州攻破了！亲爱的国内听众们，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胜利的喜悦仍然在等着我们。在我说话的同时，我们伟大的搜索歼灭行动仍在继续。所以请大家回家去，今晚要整晚守候消息，为日本最伟大的胜利祈祷！”在这种煽动下，许多人前往靖国神社，排长队进行午夜祈祷。这相当于为1941年12月8日早上更加煽动性的广播报道进行了彩排。

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像NHK或报纸那样进行一边倒式的宣传。那些吸引中高端读者、通常每月发行的杂志除了刊登政治评论外，还包括

文学作品。但现在，这些杂志的日子很不好过。杂志发行人收到一份自由派撰稿人名单，他们的文章被禁止刊登。杂志还需递交一份订户名单，以及即将出版期刊的详细提纲，以征得政府新闻部门批准。儿童杂志也不例外。1941年秋，一种男孩刊物上连载10年的漫画故事戛然而止，让日本少儿读者感到失望。这个深受欢迎的故事讲述了流浪狗士兵野良犬的冒险活动，它被认为是对军方的不敬，但并非故事本身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而是因为故事里的士兵全都是动物。

缺少纸张这一现实问题也是出版业面临的难题，迫使许多杂志倒闭（西园寺公一编辑的一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摄影杂志在1941年年初也停止发行了）。但有些杂志似乎经营得很好。一天，永井荷风惊讶地发现几家新杂志在打广告。他说：“多么奇怪啊！不是说让我们节约用纸吗？为什么现在发行新杂志？”这些杂志都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名字。

以表演美式时事讽刺剧而声名大噪的女子剧团“宝冢”也面临巨大压力，她们要演出更多爱国题材的剧目。1941年秋，她们的主要剧目是《天空之母》，这台音乐剧讲述了身为飞行员的丈夫和儿子在离家期间，妇女们保卫家园的故事。

但即使在这种严格审查的气氛下，日本人对美国的某种钟爱程度并没有减退，也没有受到约束。10月初，一年一度的美式橄榄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电影院里仍然能放映美国电影，但次数比以前少多了。这一切持续不了多久了。

理查德·佐尔格是银座一家高级餐厅的常客。10月4日，佐尔格选择在这里庆祝他46岁生日。餐厅老板奥古斯特·洛迈尔曾经是一名德国战俘，在一战期间的德日青岛战役中被俘。他曾专门学过做香肠，成功开了一家熟食店，当时这些各种各样的加工肉食品在日本仍很少见。如果不是一战，这位来自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村小伙根本不可能来到日本，更别提在这里开一家餐厅了。如果佐尔格不是因为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也不会投向共产主义，并成为苏联的间谍。现在，佐

尔格感到战争临近了。

佐尔格和花子在酒吧喝鸡尾酒时，他发现了私人侦探。日本警方跟踪外国记者并不罕见，但这天晚上，这些侦探的存在的确让他感到惊慌。他拉着花子来到后面的桌子，他小声对花子说，日本很快将要突袭美国。

“但野村大使是个能干的人。”花子争辩道，似乎她认为外交途径最终能解决问题。爱好文学、生性浪漫的花子可能对紧张的政治局势缺乏了解，她并不清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形势有多糟。但她对野村的信心也反映出大多数日本人一厢情愿的乐观。

佐尔格对花子说：“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很富足，日本永远赢不了。如果日本开战，失败在所难免。”佐尔格高兴地看到，日美关系恶化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他尽其所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天早些时候，他向莫斯科发出一条语气肯定的信息：“如果美国10月中旬不做出任何妥协，日本将会袭击美国，然后是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苏联不再是日本战略计划中的敌人。经过8年，佐尔格感到自己的任务终于结束了。他决定询问莫斯科方面自己是否能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

晚饭后，佐尔格前往德国使馆会见“朋友”，包括大使奥特，并继续庆祝自己的生日。花子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了。

形势对近卫来说不能更糟了。他把日本带入了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东条的挑战，于是他在寻找自我脱身的方法。我们不能责怪罗斯福政府不相信近卫，因为近卫总是无法树立自己的权威。两国高层会晤或许会给和平带来一线希望，但美国不愿会晤也是可以理解的。

距离外交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东条在内阁会议前见到了近卫。近卫最后一次劝说东条接受撤军。也许近卫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他表现出异常的坦率。他说：

我对中国事变负有最大责任。经过了4年，日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我的确无法同意再开启一场前景未卜的战争。我建议我们同意美国的撤军要求，避免日本与美国交火。我们确实需要结束日中战争……日本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为了取得巨大飞跃，我们有时必须（向更强的一方）妥协，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和加强我国国力。

东条毫不脸红地说：“我认为首相大人的意见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弱点。但你看不到美国也有自身的弱点吗？”东条已经下定决心，撤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这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让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在随后的内阁会议上，东条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发表演讲。他的语气和用词都故作刻板，这种正式语体的发言反而有效地表达了陆军大臣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终结近卫领导权的决心。他的发言如下：

恕我直言，对于外相自4月以来为恢复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我必须说我方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外交，我们必须确保谈判成功……陆军的行动基于9月4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该决定是每位内阁大臣深思熟虑的结果。该决定要求：“如果外交谈判到10月初仍然无果，如果我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将决定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今天是10月14日。我们约定在10月初，但现在已经14日了！……以10月底为底线的陆军正在调集几十万部队，并且我们正在从中国和“满洲”调集士兵……现在，他们正在转移！如果外交取得突破……我们就停止（部队）转移。希望各位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走。

会后，东条前往皇宫去见内大臣木户。他希望为自己公开反对近卫寻求支持，并要求近卫辞职。东条表示，海军领导也坚称他们没有

改变9月6日的决定，尽管及川持有保留意见。东条和木户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确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会议决议的牵绊。木户表示，陆军和海军必须停止争吵，同心协力。东条则放下刚刚矫揉造作的腔调，直接说道：“已经决定的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指责（谁该为9月6日的决定负责）了。”他认为，此时是考虑实际可行性的时间。

这天下午，东条前往参谋本部杉山元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与木户的谈话。他仍然在抱怨及川关于海军备战的态度前后口径不一。东条说：“海军大臣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的讲话让人觉得他没有任何信心。如果海军不愿意（开战），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

最后成了这样的局面：海军不会表示自己想不开战，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表达海军的不情愿，因为陆军应该完全理解海军的犹豫。如果按照外交妥协，日本开始撤军，陆军将成为大众羞辱的主要对象，所以陆军责怪海军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只有海军反对，陆军才会被迫表示自己无法进攻。

东条认为，重新开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束近卫内阁。这天晚上，他让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带着他的口信去见近卫，要求近卫下决心辞职。铃木解释说，由于海军对战争前景缺乏信心，而9月6日的决议又必须遵守，所以东条认为，正确的程序是曾经作出该决议的内阁承认自身错误后辞职。东条推荐反战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下一任首相，讽刺的是，东久迩最近刚刚责备东条不支持外交努力，并以近卫的名义要求他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挑选东久迩也透露出东条内心对战争选项的放弃，这一变化令人惊讶。东条认为，只有带有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初的皇家决定。

东条的决定让忠于皇室的内大臣木户震惊。自从西园寺公望1940年去世后，木户对首相人选的选择拥有很大影响力。对木户来说，皇室永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信条基于一种循环论证，即皇室就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木户不想让天皇的叔叔参与政治，尤其在这一敏感时刻。

木户身材矮小，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侍臣，总是很正式地穿着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他躲在天皇的背影中，就像操控木偶的人。日本皇室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重大转变，以满足现代日本的需求，木户以自己身为皇室守卫者而自豪。他的祖父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是长州藩武士，也是明治时代元老，帮助了日本天皇的集权。常言道“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木户幸一侯爵正好是第三代，他清楚什么才是最好的政治体系。

虽然人们认为木户对天皇产生了自由主义影响，但他摆脱不了自己的右倾本性（毕竟他支持近卫1940年让日本集权化的“新体制运动”）。或许他只是在介意自己并非“真正”的贵族，像近卫或西园寺他们都能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贵族血统。无论出身贵贱，他已经成了皇室看门人，他不会允许东久迩出任日本首相。

尽管局势动荡，近卫“早餐俱乐部”的顾问仍然坚持聚会。10月15日，俱乐部成员聚在一家餐馆吃午餐，他们品尝着烤鳗鱼——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当下。尾崎秀实显然还没来。其他人决定不等他了，于是开始用餐，这时近卫的秘书岸道三（Kishi Dozo）突然冲进包房大喊：“我得到可怕的消息，尾崎被捕了，据说他被指控为间谍。”

在逮捕画家宫城与德前，日本警方并不知道佐尔格国际间谍网的存在。来自冲绳的宫城在加利福尼亚度过青年时代，他在艺术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日本，他不属于佐尔格集团的核心成员。另外一名日本籍美国共产党员在与佐尔格团队无关的一次秘密行动中被牵连，由于宫城与他有关系，所以10月10日宫城也被逮捕。宫城试图从二层审讯室跳窗自杀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坦白了一切，包括为佐尔格集团工作，这最终导致尾崎被捕。

近卫身边著名的知识分子竟然是共产主义间谍的消息让近卫及其他人大感震惊。（由于媒体审查制度，尾崎的间谍活动直到1942年6月才被公之于众。）近卫无法承受不可避免的批评声，10月16日，近

卫辞去首相职务。

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他不愿意承担取消9月6日决定的责任，也不想任内面对与美国开战的前景。无论近卫及其支持者如何为他开脱，如何为他的绝望处境争取理解，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贵族血统和学术背景并没有成为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近卫的重新上台是因为他不爱表露心迹，他常常赞同并不十分支持的提议，他希望所有问题都能以缓和的方式暗中解决，他不必弄脏自己的手。

近卫的政治倾向不断在左右之间摇摆，表面上是为了团结日本。在过去日本国际危机加深的4年中，近卫担任首相将近3年。这段时间，日本没有打赢中国，战斗趋于白热化；而日本明明打不过西方，与西方开战却成为“官方”政策选项，得到了皇室批准。

内阁更替计划属于最高机密，而日本帝国的其他臣民感受到的是日本紧迫的现实。厚生省开始宣传“爱国婚姻”活动，以支持中日战争。10月9日，约50名官员、学者、医护人员和教育学家聚集在厚生省会议厅，用整个下午讨论未来的目标。最后他们同意，日本需要降低初婚平均年龄，男子降低3岁，女子降低4岁；夫妻应鼓励生育5个以上的孩子；取消封建时代的婚姻门第观念；婚礼从简，以节约开支。

在这天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晚婚趋势（尤其是女性的晚婚趋势）算是最严重的挑战。10月10日，《朝日新闻》关于这次会议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一起结婚吧！》，著名女性医生和活动人士竹内茂代（Takeuchi Shigeyo）在文章中指出：

父母往往对女儿过度保护……在女儿毕业后，他们总是把女儿留在身边生活几年，培养其家务能力，比如，插花、缝纫和持家。但这种能力应该在上学的同时就应培养，这样女儿一毕业就能结婚。学校在家政方面的教育也不要只教西式烹饪。首先，教师必须认识到，教会学生烹饪经济而又有营养的蔬菜膳食至关重要。

不需要专家评论我们就能感受到，日本的传统社会机构（尤其在婚姻方面）正在危机面前迅速解体。10月初的一天，永井荷风与一位老人聊着当前的一些变化。这位老人说，日俄战争期间，人们不能给不认识的士兵寄送爱心包裹。而现在，由于邻居协会的成立，寄送爱心包裹成为强制性义务，人们必须在每一个寄往中国的包裹中夹带一封精神鼓励信（百货商店里的爱心包裹热销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包裹是家庭与前线最直接的联系，也是爱国的象征。9月，一个夸张的故事获得了全国文学比赛一等奖，故事讲述了一名死在战场上的士兵紧紧抓着皇宫大院里的鹅卵石，这些石头是通过爱心包裹寄给他的）。

在学校，给军人写信也受到积极鼓励，年轻的女学生有时与她父母不认识的士兵通信。这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单相思、纠缠和永远无法相见的爱恋（当然，除非这名士兵活着从战场回来）。士兵其实和少女一样脆弱，一些女性则利用这种新型社会关系。酒吧小姐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女性都纷纷给战场上的士兵写信，为了增加未来的潜在客户。永井向来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妇女群体，她们的求生本能令他印象深刻。

10月17日下午，东条接到来自皇宫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这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召唤。东条以为他会因为促成近卫内阁倒台而受到责备。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的佐藤贤了说：“大人，您逼得近卫公爵走投无路……（因为）您说过，如果从中国撤军您就会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于是天皇陛下要责怪您了。”

东条说：“我不敢与天皇陛下争执，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最终决定。”

东条清楚，作为陆军大臣，他自己也是失败的近卫内阁的重要一员。为了正大光明地取消9月6日的天皇决议，参与决议制定的内阁必须全体辞职。东条已经开始搬离陆军大臣官邸，把自己的东西陆续运至东京郊区的私人住宅。

虽然心情沉重，但他作好了一切准备，东条在下午5点见到裕

仁。得知天皇要提名他作为日本下一任首相时，东条完全震惊了。提名者通常要回答：“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这一任命。”但东条连这么一句话都忘了。裕仁打破了这一尴尬的沉默，他说：“我们给你一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当然，这样说其实也是例行公事。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前一天，近卫及全体内阁成员刚刚辞职，第二天，资深政治元老就立即开会讨论首相人选。这种会议在将近10年前也召开过，当时执掌现代日本的明治元老们相继去世。参加讨论的大多数历任首相，他们要帮助皇室挑选下一任首相。木户在会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统一陆军和海军的政策，重新审视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从这一点来看，我推荐陆相东条为下一任首相。”其他人大感意外。

据木户说，没有人对此公开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以毒攻毒”。因为东条曾坚持认为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所以木户觉得，最好让他来承担改变这一决议的艰巨任务。但东条始终忠于军队，现在让上届内阁中最好战的人担任下一任首相以避免战争，这种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另外，带来麻烦的御前会议决定是内阁和军方联合作出的。如果内阁必须为此负责的话，那么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也应该承认错误，但木户并没有要求杉山和永野辞职。

与木户所说的全体一致同意东条的任命不同的是，一些老资辈在10月17日会议上推荐东久迩或另一位来自陆军的宇垣一成（Ugaki Kazushige）担任下一任首相。然而，他们都没有像木户那样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木户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极度信任木户的天皇也认可了东条的任命。“没有磨难就不会有收获，不是吗？”天皇对木户说。这句话其实来自一句中国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也许指的是日本的军事司令部，这里充满了狂躁、嗜血的战争狂人；虎子则是对日本和平解决与美国危机的隐喻。

为了确保陆军和海军对突然任命东条的真正原因没有怀疑，木户还召唤了及川来到皇宫，他对及川和东条说：

我知道你（东条）刚刚听到了天皇关于陆军和海军需要合作的表态。我必须强调，天皇希望你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不要受到9月6日决议的牵绊。你必须深入、广泛地考虑国内外形势。天皇希望你能作出谨慎的选择。

离开皇宫后，东条让司机首先送他到明治神宫，然后前往东乡神社[为了纪念日俄战争英雄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他击败了沙皇的波罗的海舰队]，最后抵达靖国神社（供奉在过去的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在一小时左右访问东京3处神社后，东条回到陆军大臣官邸。他被任命首相的消息已经传到他的手下耳中，他们纷纷表示祝贺。但这位日本新首相并没有心情庆祝，他认识到自己现在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这天晚上，他严格下令陆军中不准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宣布这里完全是他的私人空间。他开始四处打电话，为了确定各个内阁成员。他任命自己为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然后任命曾担任日本驻苏联大使的资深外交家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出任外相。

60岁的东乡留着胡子，满头白发。他娶了一位德国妻子，曾经想要研究德国文学。他不喜欢纳粹主义，他在1937年至1938年只短暂担任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关系不好。东乡既不亲美也不亲德，是个纯粹的日本爱国者。他将自己的爱国信条写在袖子上，也许他认为无论自己在事业上多么成功，他仍然容易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他出生于九州岛西南端的鹿儿岛，本名朴茂德，先祖是在16世纪末被掠到日本的朝鲜陶工，他们家数代人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朴茂德5岁那年将家族姓氏改为东乡（纠正一个普遍误区，他与“东方纳尔逊”东乡平八郎没有血缘关系）。

整体来看，比起前任丰田，东乡的确是更加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家，他的外交技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东乡也有自己的考虑。午夜前，他前去见东条，问问这位未来的首相是否准备作出巨大让步以避免战争。强硬的东条对这位狡猾外交官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同了，“我同意再次审视形势”。重新审视意味着陆军作出

让步，包括撤出已经调集的部队，这样才能给新外相更多外交谈判空间。有了这一保证后，东条和东乡这种意想不到的组合成立了。

新大藏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候选人也想得到东条避免与美开战的保证。贺屋兴宣（Kaya Okinori）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答应管理国家经济。而一向反战的岛田繁太郎（Shimada Shigetaro）经过多次劝说后最终也同意出任海相。

就在10月17日这一天，理查德·佐尔格清晨6点从熟睡中惊醒，他隐约听到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佐尔格有一次骑摩托车时遭遇交通事故，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与警察斋藤熟络起来。现在斋藤正在喊他：“佐尔格先生！我是警察局的斋藤。我来找您有事。”

佐尔格开门后，迎接他的是用德语表达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我是检察官，根据这一逮捕令，我们现在要正式逮捕你！”佐尔格被十来个日本警察包围，他被戴上手铐。他的间谍同伙德武凯利奇和克劳森也在当天被捕。佐尔格已经在为永远离开日本作准备。

即使传来更多外国间谍的落网消息，西园寺公一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切。他不肯相信尾崎受到的每一项指控，认为他的朋友与佐尔格没有关联。西园寺对自己说，尾崎的被捕一定与近卫内阁的倒台有关，他认为尾崎是某种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西园寺认为东条是最不可能让日本避免战争的人，他在东条就任的第一天前去拜访他。西园寺说：“我有三点要谈：第一，你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第二，你必须尽快与中国和解；第三，你必须争取日美谈判取得成果。”东条极其镇定。天皇已经把他神圣国家的领导权授予了东条，而东条的祖上曾在戊辰战争中与朝廷对抗过，所以他能走到今天的确不容易。东条对西园寺冷淡而有礼貌地说：“西园寺先生，感谢你的建议，我的秘书从今往后会与你保持联系。”

不到一年，西园寺公一的祖父西园寺公望仍然在世，他是日本在天皇以下第二受崇敬的人。尽管近卫能力有限，但填补西园寺公望空

位的本来就是近卫，结果西园寺公望的这位门生倒台了，连带着他的孙子。不久前，东条曾向近卫抱怨说，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已被关押的尾崎秀实等“早餐俱乐部”成员不应该干涉日本的政治决定。近卫当时为自己的朋友辩护，东条只好作罢。现在的局面已经变了。

东条开始一项爱好，他在早上散步时检查普通民众的垃圾箱。这样做的本意是想宣传他努力确保配给工作的公正公平，保证人民吃得饱并且吃得好（东条在寻找“吃得好”的证据，比如鱼骨头）。一些日本人对这位首相如此重视细节表示赞赏，但大多数人却感到反感，并给他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垃圾堆首相。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从10月23日至30日，东条一次又一次地召开联络会议，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此前没有讨论的基本问题成为这些会议的焦点，包括全面战争的可行性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可能影响。与此前会议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参加了联络会议，战争的经济后果最终进入了讨论范围。很显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仍然强烈要求备战。

在10月末困难重重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对欧战、日中战争、日美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与德国的盟友关系进行了评估。10月23日，在东条上任后的首个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对德国必将获胜的推断提出质疑。他直言不讳地说：

由于德国攻打苏联，英国得到一些喘息时间。明年，（德国战胜英国的）概率将会是对半开。而到后年，英国的获胜概率将更大。德国将会尽早求和，但日本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能指望这种和平。

实际上，东乡认为德国不可能与英国达成和解。海军军令部认为，德国可能在陆地上会遭遇英国的强烈抵抗，但德国在空中和海上将占据优势。陆军一位代表说：“（德国入侵英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这种言论很难有助于开展有意义的讨论。正是这种思想滋生了负面论断，比如“日本打赢美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此前表示“没有时间讨论”的永野重复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最初设定的）10月份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开这种形势研究会议？每一小时我们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很紧迫，你必须立即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开战。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表示赞同。他说：“我们已经拖了一个月，不能再花四五天研究了。快点决定吧！”

正如我们所见，东条的立场现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在陆军大臣（意味着他仍属于现役军人）、首相和内务大臣的角色之间挣扎。为了安抚两位总长，东条说：“我的确理解军方要求迅速作出决定的强烈理由。”但他表示：“本届内阁包括一些新面孔，比如海军、大藏和外务大臣，（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弄清（关键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为最终决定）负责。”

军方坚持认为备战仍将继续，因为时间和能源正在耗尽，贺屋则坚持自己的立场。52岁的贺屋算是重要内阁成员中比较年轻的，但他的外表显得老成。实际上，他与东乡有几分相像，都是方脸，头发向后梳，留着浓密的胡子。但东乡更瘦更有风度，而贺屋比较胖，时常面部肌肉抽搐。

贺屋可不容轻视。作为大藏省的官员，他在国家预算局磨炼了专业知识，还作为大藏省的代表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国际裁军会议。虽然他有一个民族主义的父亲和强硬派的母亲，贺屋早年却坚信国际条约的作用，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1929年，在伦敦海军会议的准备阶段，贺屋与代表海军参加会议的山本五十六发生争吵，山本当时并不支持裁军。然而在30年代，他和山本的政治观念却相互靠近。贺屋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他很有野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成功将日本经济打造成战时体制，他还支持近卫加强集权的“新体制运动”。另一方面，山本却越来越接受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批评近卫的极权主义倾向。

不论他持什么政治观点，贺屋都不会赞成一场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在10月末的联络会议上，贺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用一种我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吗？”

我要问的问题有：如果我们开战，我国的物资形势将会怎样？假如我们不开战，并按照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又会怎样？我们与美国外交谈判失败了该怎么办？……这些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

预算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一旦物资的供需关系明确后（也就是确定日本要走哪条路，能利用的资源有多少），预算问题也就解决了。

贺屋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尤其对于那些把战前观点基于一些想当然假设的人，比如，他们认为德国将继续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太平洋爆发战争后，日本仍有能力确保从东南亚运输足够的物资。如果这些假设条件没有实现该怎么办？

对身处十字路口的日本来说，10月23日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这是东条重新审视战争的第一天。在日本的主动提议下，早前自由国际主义的象征《北太平洋海豹保护条约》

（North Pacific Fur Seal Convention）在这一天宣告终结。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1911年签署的这一协议对捕杀海豹进行了限制。但对连自己国民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的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去关怀海豹的命运的确要求太高了。日本渴望成为世界模范公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10月24日和25日的联络会议上，军令部仍然认为，与美国最初的几场战役能够获胜，但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但普遍的观点是，敌人无法单靠武力征服，还需要外交力量。讽刺与矛盾比比皆是：由于外交目前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日本要开战；而一旦开战，日本又要立即重新开展外交来结束战争，因为日本没有足够资源打持久战。日本希望美国主动提出外交解决方案，所以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要足够震慑，美国才会求和。

但倘若美国拒绝屈服呢？山本已经警告过永野，这种可能性更大。万一像英国抵抗希特勒一样，日本的军事进攻让美国更坚决呢？这些联络会议的记录里找不到对这些不安问题的回答，甚至辩论。

不论怎样表述，这些主战派的理由都是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似乎日本已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被抛到一边，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没有对预计将要损失的军舰数量进行讨论。众所周知，交战国损失军舰将立即影响其作战和运输能力，尤其在以海战为主的情况下。但对战时损失的估计多少有些歪曲。为10月底的

联络会议准备最新数据的陆军省资源办公室主管中原重俊（音译）第一次看到海军对损失的评估时大感意外。他认为，如果损失这么大，日本根本无法开战。第二天海军拿出新的评估。这些数据让两位总长都很满意，成为军方要求开战的基本出发点。该数据显示，战争前3年，平均每年预计损失的战舰为70万吨；而3年之内，日本完全有能力弥补损失（相比之下，联合舰队9月作出的预测为140万吨，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果不其然，开战后的3年里，日本战舰的损失远超其造船能力，缺口达400万吨）。

新的数据简直就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但两位总长对数据的可信度并不怀疑。相反，永野利用这些数据为海军谋利，丝毫不在意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日本输了，海军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永野宣称：

为了海军能够打持久战，海军实力的补充至关重要，所以战略资源的获得就异常重要。为了保持我们在东南亚关键地区的优势，海军将需要1000架轰炸机、1000架战机以及1000架飞机来保卫这些地区。

永野没有考虑到日本补充损失的现实能力，包括精锐飞行员的损失，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海军一直在小规模训练精锐飞行员，而美国却有能力的培养大批能达到作战水准的飞行员，并能生产出几十万架飞机。显然战争拖得越长，美国的相对优势就越大。这些现实问题似乎并没有困扰永野，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

贺屋没有那么无所谓。在10月27日的会议上，他试图将大家的关注点拉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轮到铃木发言时，他立即对日本糟糕的物资形势表示认可，他说：

日本没有建立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每年都需要应对物资分配……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物资形势。对于1942年，我们预计物资供应将只有今年的90%……这意味着我们将消耗掉现在所有储备。

铃木说，从物资上看，日本很难维持一场战争，但他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战争。他本可以利用手中的数据对此进行有力的回击。1940年，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根据调查，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这些差距即使是钢厂的初级工都知道。铃木的数据更加具体，这些数据本身就足以让大多数领导人面对现实。然而，铃木却没有公布这些数据。多年以后，当铃木93岁时，他解释了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似乎他们已经决定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但在我内心，我不想开战。”

最初，铃木被视为东条重新考虑9月6日决定的关键人物，近卫下台前曾亲自要求他留任。但铃木很快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政策转变，于是选择站在主流意见的一边。他本人偏袒陆军（他是一位退役将领），他不喜欢别人暗中指望他来挑明战争赢不了，从而解救陆军。铃木在战后的访谈中说：“最终应当由海军来决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还是要靠海军来打。但海军没有明确表示不想开战！”

所以铃木回避了贺屋的问题，只是解释了日本如何确保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他说：

（在民间消费方面），如果我们总是预留出300万吨运力，那么就能维持当前水平的国力。然而，为了保持这300万吨，我们将必须于1942年生产40万吨轮船，在1943年生产60万吨轮船。海军大臣岛田（在前一次会议中）已经表示，这些数字砍掉一半才比较现实……因此，维持目前的水平很困难。

这些推测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没人能够保证运输军用和民用货物的海上航路能够畅通无阻。军令部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护航计划来减小航运的损失。

尽管贺屋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东条也是出于好意组织大家辩论，但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参谋本部对10月27日的会议记录总结

道：“（1）首相似乎没有改变（开战的）主意；（2）海军大臣仍然模棱两可，但大多数时候（对战争）持有消极态度；（3）总体来看，海军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4）外务大臣直接而明确（反对战争），他看起来很自信。”（这一天，东乡的具体发言没有被记录在案，但其判断是对的。在最后的这些会议中，东乡令人钦佩地对战争大加反对。）

海军大臣岛田加入东条内阁的条件就是东条要尽量避免战争。他本应比他的前任及川更加反对战争，但10月27日他与海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的私下会面似乎动摇了他的意志。这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66岁老兵对岛田说：“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不然我们将失去一个机会。”与其他短视的决策人一样，岛田也相信海军应该在仍然有力量的时候开战，对美突袭后达成外交协议就不难了。虽然伏见亲王1941年春天就从军令部总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在海军广受欢迎，非常具有影响力（尽管此前裕仁天皇建议撤换军令部总长永野，但永野受到伏见亲王的保护，这大概是他能保住位子的最大原因）。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在这一天的记录中写道：

会议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我们讨论的同时，宝贵的战略机会正在被浪费，作为军方指挥部成员，我们对此感到很遗憾。此时，我们首先需要下定决心。然后我们才应该评估国力，引导日本备战。然而，当前的形势是无休止的争论，在“能不能开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这样不会有任何成果。

毫无逻辑的是，7月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不畏惧战争”的决议又被看作日本外交政策中不可违背的原则。9月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又给这一决议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开战的势头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抵挡。

10月28日的会议讨论了将与美国的战争推迟到1942年3月。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认为，坐观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将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美国专注于欧洲的战争，而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会更好。这种武断看法的依据是，美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与其盲目认定德国会继续支配欧洲，不如看看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者，这

样才对日本有利。

尽管军方的战争贩子们公开承认推迟开战对日本有利，但他们认为战略难题仍然存在：日本等得越久，其自身的物资形势就会越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了。他们在会议上宣布：“战争开始的时间必须设在11月。10月31日前，我们必须下决心开战。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等待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对海军是致命的。”东条无法坚持住立场，他向两位总长为自己考虑这么久而道歉。仅仅经过一次会议，推迟开战的选项就被搁置了。

10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开战后的物资可行性，最后才谈到与美国外交和解的前景。在物资方面，贺屋此前提出，他需要了解“在开战和不开战的情况下，日本物资供求关系的具体数字”。铃木再一次代表企划院进行阐述。他预计开战一年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为7万吨。日本届时将很难维持下去。然而，铃木的结论却是，这场战争很困难，但也不是不能打。

贺屋试图让大家理性对待战争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不想惹事、自我保护、复杂的体制再加上失去理性的信念，这些都在发挥着作用。现在该轮到东乡发问了。

如果贺屋无法从物资角度让其他人看到主战派观点的不堪一击，那东乡也许能从外交角度试一试。当然，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首先，东乡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使日本要作出巨大让步（包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但外交努力仍应被放在首位，因为这些牺牲换回和平是值得的。

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声称，这种妥协将让日本看起来是一个三流国家，成为西方容易欺负的对象。东乡则公开而大胆地要求从中国撤军。他强调说：“只有撤军我们的经济才不会崩溃，越早这样做越好。”他的这一态度引起参谋本部的强烈不满，东条只好提出一个折中提议：如果日本能自己掌握撤退的期限，日本就同意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撤出。

于是这引发了关于撤军期限的离奇讨论，各方提出能够接受的时间限制，有人建议25年，也有人建议99年。东条说，5年才是更加现实、能用于谈判的选项，这又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他们最后决定，如果美国要求具体期限，日本将提出在25年内从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而驻扎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将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的两年内撤走。至于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将在当地“恢复和平”以及“日中战争问题解决”之后撤走。对东乡来说，这样的共识也聊胜于无。

10月30日，与会者还决定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于美国提出来的条件，大多数官员认为不应该将赫尔的“四项原则”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但他们也知道，日本对美国已经作出的表态无法收回。他们认为，做比说更重要，向贸易自由方向的态度转变无法一夜之间完成，正如人们不会立即抛弃自己的穿着，而转向更加时尚的风格。这种想法占绝大多数，说明1941年的日本领导人从总体上看并不善于国际谈判。他们没能认识到，在外交谈判中，说往往比做更重要——至少承诺总在行动之前。

东乡说，政府需要暗示日本能够原则上接受“四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避免武装冲突的意愿。东条在参谋本部与东乡外相之间寻找折中点，建议日本坚持让美国先对世界其他地区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然后再要求日本在中国的执行。同时，日本不再要求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殊地区利益。

总体外交路线（《甲案》）就这样制定了。该计划包括有期限的撤军；世界其他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后，中国再开始实行自由贸易；维持《三国同盟条约》。但日本没能直接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东乡的坚持显示，军事妥协是可以实现的，而上一届内阁太容易对军方让步了。不过，东乡仍然感到不安，因为他深知好的外交谈判不能与紧急备战同时进行，他对还对海军没有帮助他对抗强硬派感到意外。他说：

我料想到陆军将走强硬路线，但我本来期待海军的态度能够更加缓和，我的各种努力都基于海军会站在我这一边来考虑的。然而，我

在联络会议上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包括撤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相当强硬。

东乡没有受到海军帮助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军大臣岛田在与伏见亲王会面后决定支持备战。岛田向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吐露：“如果因为我以海军大臣的身份横加阻拦，从而葬送战争机遇的话，我将无法原谅自己。”东乡并不清楚岛田心意已变，他试图通过海军中的其他老资辈来赢得对他的支持，他们资历深（包括前首相和前海军大臣），思想更加开放，但最后都徒劳无果。

讽刺的是，似乎只有永野赞同东乡想要重振日本外交的努力。当讨论一度卡在是否在中国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时候，永野突然问道：“为什么反对呢？为什么不同意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为什么不能展现我们的宽宏大量？”他也许想要确保外交方面还有机会，这样仍可以避免战争，而不需要让海军（或者他本人）看起来像是想要退缩。

在10月30日会议的最后，东条内阁中最反战的两名大臣贺屋和东乡已经精疲力尽了。在一周时间里，这些上层官员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东条本着一丝不苟的官僚作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想要讨论所有问题，但其实，并非所有的选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坦诚探讨。

日本的命运即将在11月1日决定。

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11月1日上午7点30分，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碰面，东条对战争的疑虑越来越大。东条试图劝说杉山重新考虑其主战立场，他说一会儿将要召开的联络会议需要讨论3项政策选择：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以及继续外交谈判，但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东条说：“我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他表示，日本不会对美国作出任何不必要的外交妥协。

前一天晚上，东条与主要内阁成员进行了协商，包括岛田、东乡、贺屋和铃木。东条对杉山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都同意第三条路线。”东条和杉山都知道，东乡支持第一种方案，但可能也会接受第三种。东条建议杉山也选择第三种方案。

岛田的意图很明显，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的日志中写道：“正如料想的那样，海军（大臣）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能打仗。’”该日志充满嫉妒和愤恨（陆军和海军毕竟是对手），但从日志来看，陆军并没有认识到，不顾一切地开战是自私的行为，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杉山元的最大担忧仍然是海军不需要承诺打仗就能争取到大量军事资源，这即使事后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东条说：“我们已经开始从日本和中国调集20万部队（为东南亚的战争做准备），相比其他地区需要发动的战役，我们认为眼下的调动最为重要。如果我们把士兵们派去南海，但最后没有发动战争就把他们召回，这将打击他们的士气。”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开战理由。杉山表示，参谋本部要求：（1）放弃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想法；（2）决定开战；（3）开战日设在12月初；（4）确定最终战略；（5）开展（欺骗式）外交，以帮助军方占据战争有利地位。

东条回应说：“我不会试图改变军方的意见。然而，我认为这很难让天皇陛下接受。”讽刺的是，东条期待天皇所做的事也正是天皇希望东条去做的——阻止战争贩子。

这一天的联络会议在上午9点召开，也就是在东条与杉山单独会面后。会议持续了17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如果发生战争，海军、陆军和企划院将如何分配资源。最后的提议是，在1942年，海军将得到110万吨普通钢铁，陆军得到79万吨，而企划院得到260万吨用于国内需求。受到打击的杉山对岛田说：“如果你获得这么多钢铁，你总该下定决心（开战）了吧？”海军大臣只是点了点头。经过数小时讨论，各方默默达成一致，这一分配方案也就这样确定了。

东条开始引向关键话题——日本开不开战？他以自己的刻板方式首先回顾了之前给杉山概括的3种方案：不开战、开战和外交与战争齐头并进。与此前类似的是，贺屋又开始提出了质疑。他不厌其烦地问海军领导人：“如果我们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日本不挑起战争，美国3年后还有可能攻打日本吗？”

海军大将永野回答说：“（立即开战的）获胜概率很难确定。”他认为是五五开。

关于美国袭击日本的可能性，贺屋说：“我不确定日本是否有能力赢一场海战。”

永野说，日本现在开战比等待3年后再开战要有利得多，“因为持续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需要的基础”在这里指的是东南亚的资源。

贺屋说：“如果到了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但永野似乎对此不敢确定。另外，我质疑美国会攻打我们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开战太不明智了。”

与东条此前的判断不同的是，贺屋坚决反对开战。东乡也表

示：“我不认为美国舰队会开到我们的海岸。现在开战没有必要。”

永野说：“常言道，‘无恃其不攻’，未来还不确定，我们不能高枕无忧。3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的舰队也会扩大。”

永野引用了《孙子兵法》，但却是对这句话的曲解。孙子强调的是作好全面准备，甚至包括遭到可能的袭击（《孙子兵法》并不赞成挑起本可以避免的危险战争，甚至警告不要因为恼羞成怒而发动战争，鼓励不以武力制服敌人，而以非暴力方式达到政治目的。总之，《孙子兵法》强调全面了解敌人的实力后再最终发动战争）。贺屋说：“那么，你认为我们何时开战才能赢呢？”永野要么没有注意到要故意忽视贺屋话中的反讽语气，他坚决地说道：“现在！开战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东条认为铃木肯定支持继续外交，但他错了。铃木对战争态度冷漠，他后来表示自己其实反对战争，但当时感到很压抑。铃木最终还是支持了开战，他说：“贺屋担心没有足够的军备物资作保障，认为我们可能会在1941年和1942年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必担心，如果我们开战，局势将在1943年开始好转。”这是军方此前对他说过的话。前几次会议上，铃木还在提醒日本没有“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现在铃木却支持战争，这的确令人意外。

一想到外交作为掩饰备战的工具，贺屋和东乡就感到作呕。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Ito Seiichi）表示反对，他说：“海军认为，还可以继续开展外交到11月20日。”而参谋次长冢田攻则认为这一期限太宽泛了，他说：“陆军认为，可以（开展外交）至11月13日，但多一天我们都不同意！”

东乡打断他们说：“外交从本质来看需要许多日日夜夜才能达到目标。作为外务大臣，我无法在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时开展外交工作。我需要确保有足够时间和所需的条件来完成任务。当然，战争必须避免。”东乡询问自己有多少时间进行真正的外交，这引发了他与参谋次长的下列对话：

冢田：我们坚持认为，外交不应该干涉战略。我们不愿意让变幻莫测的外交形势决定和影响我们的战略计划，所以我们要求11月13日作为外交的最后期限。

东乡：11月13日，这太不像话了！海军说11月20日。

冢田：为战略行动做准备就是“战略行为”……11月13日将是展开“战略行为”前的最后一天。

冢田认为，即使不宣布开战，为了备战而调兵遣将也一定会招致与敌军的冲突。因此备战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就意味着要开战。这是一个牵强的理由，永野评论道：“小冲突只能算是地区冲突，与战争不是一回事。”东条和东乡清楚地表明，外交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尽力取得成果。冢田只好同意，但他表示，外交期限也要严肃认真地履行。他说：“11月13日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天过后，任何举动都将是对最高指挥部的冒犯。”

随着天色渐渐变暗，会议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见屋外蟋蟀的叫声，时不时又会爆发一阵争吵。由于无法就外交期限达成一致，他们决定休会20分钟，在这段时间，参谋本部叫来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军令部也召唤了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最后军方同意将外交最后期限定于11月30日。

在休会期间，协助东乡的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Yamamoto Kumaichi）在走廊碰到永野。永野拍了拍他的背问：“外务省决定自己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了吗？如果是这样，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了，你觉得如何？”大吃一惊的山本只是重复了东乡的看法，即现有的条件不足以赢得外交成果。

永野突然意见松动说明，尽管他外表强硬，但他其实是这些人当中最摇摆不定的。在过去几次会议中，他暗示过希望给外交一个机会。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隐藏心中的不安。更糟糕的是，永野对他最近批准的一项进攻计划根本毫无概念。前几个月，海军大将山本五

十六一直在制定他的进攻计划，协助他的是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Onishi Takijiro）和海军少佐源田实。他还依赖快50岁的军官黑岛龟人（Kuroshima Kameto），黑岛强烈要求海军积极进攻的计划甚至影响到了永野。

1893年，黑岛生于广岛一家贫穷的石匠家庭，他从小失去了父亲，从3岁起由叔叔和婶婶养大。他喜欢独来独往，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完成夜校的学习后，他先是被海军兵学校录取，后来又进入顶尖的海军大学校学习。对一个社会底层的孤儿来说，他没接受过什么正式教育，成长期又适逢日俄战争后海军蒸蒸日上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能进入海军大学校无异于梦想成真。而让人们记住他的，是他在战略研究中不同寻常的提议。

大概是在山本五十六的要求下，当时还是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的岛田推荐黑岛进入战术决策层。1939年10月，缺乏资历的黑岛被任命为山本的参谋。从通常的挑选标准看，黑岛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高挑、纤瘦，面容憔悴，由于他极其恪守自律，同事都称他为甘地。但他的一些习惯一定会让圣雄甘地感到战栗。他几乎从不洗澡，不停地抽烟，不论他走到哪里，烟灰就弹到哪里。为了集中精神，他会全身赤裸地把自己锁在一个漆黑、充满焚香的屋子里，一连数日。一旦灵感降临，他会迅速写出自己的计划，就像着了魔一般。

这种古怪的行为本应严重影响黑岛的前途，但山本似乎一点儿也不以为意。实际上，黑岛的古怪反而让山本觉得，他是一位奇才。山本看到，黑岛是唯一胆敢反对他的人，黑岛有时提出的建议是山本从未想到过的，黑岛是唯一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山本认为，虽然自己有许多优秀的参谋，但这些人总是给他同一问题的相同答案，这让他感到失望。在制定太平洋特别行动计划时，他总是听到各种忠告，以及他的方案在技术和后勤方面无法做到的理由，这让他感到厌烦。然而黑岛却决心帮助山本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大西和源田帮助提供技术层面的细节，在他们的协助下，黑岛完成了袭击夏威夷的最终计划。这一行动打破了常规，是一场赌博，因

此风险巨大。正如前文谈到的，行动最大的障碍是在珍珠港浅水区发射航空鱼雷进攻的可行性。但到1941年秋，这些鱼雷得到了改进，鱼雷发动攻击前需要下沉的深度大为缩小，所以不太可能直接栽进海床。飞行员经过良好的训练，能够以极低的高度进行飞行，这也将防止鱼雷沉入水中太深。从9月开始，飞行员就在日本南部鹿儿岛锦江湾（Kinko Bay）附近进行训练，这里与珍珠港地形相似。10月，训练强度被加大，这些飞行员都不知道如此辛苦训练的真正目的。

当夏威夷计划递交东京批准时，军令部对此强烈反对。该计划需要出动日本大部分的海军力量，包括（10艘中的）6艘航母（而更多的航母还在建造中）。日本只能放下东南亚计划，将需要的航空力量转向太平洋方面，海军可能会面临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风险。海军大学校9月的模拟演习更证实了军令部的担心，这份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山本不会让步。黑岛前往东京不遗余力地为这一计划进行游说。他甚至使用威胁手段，声称如果不批准夏威夷袭击计划，山本及其所有支持者将准备辞职。永野不想失去山本，于是他在10月20日不情愿地同意了这项计划，此时东条正在进行组阁。在这次特殊的行动中，永野完全依赖于山本的指挥能力。即使他仍然怀疑山本鲁莽计划的可行性，但他无法寻求其他战略家的帮助。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联络会议上叫嚣开战的永野会突然恳求外务省的帮助。相比之下，想要阻止战争才加入东条内阁的海军大臣岛田却下定了开战决心。

在休息后重新召开的会议上，东条向军方问道：“最后期限为什么不能延长到12月1日？我们不能给外交努力更多时间吗？”冢田尴尬地说：“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都不行。这是不可能的！”海军大臣无趣地问了一句：“你说11月30日，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时间？你当然会给我们整整24小时吧？”冢田冷冷地说：“是的，午夜12点前都可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难以阻挡了。

讨论于是转向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上。东乡知道《甲案》是不足以吸引美国的。所以，他让外务省11月1日上午拿来了《乙案》，希望

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余地。东乡起草了这份计划，协助他的是资深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和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这两人都渴望避免战争。当天晚上10点，这份备选方案被拿到桌上讨论，此时这一天的会议已经进行了13小时了。该计划规定，日本和美国都不能向南太平洋派驻军队，两国应相互合作确保从荷属东印度获取需要的资源，还应把两国贸易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美国要承诺向日本供应石油。

而军方需要作出的最大妥协写在另一张纸上。计划明确表示，日本将立即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转移至北部。日本还承诺，如果整个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得以确保，日本将完全从印度支那撤出。如果需要，未来还可以对全球贸易不歧视原则和《三国同盟条约》等问题进行探讨。东乡试图通过《乙案》将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排除在谈判桌外，至少暂时不讨论这一问题，并设法将日美外交关系恢复到7月之前的形势，那时罗斯福政府还想要与东京达成一种交易，美国想把战略精力集中在大西洋，同时对太平洋进行控制。

对于无条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强硬派的冢田和杉山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冢田和东乡为此又展开激烈争论。东乡说：“总体来看，我认为我们目前处理谈判问题的方式走偏了。我们应当降低我们的条件，先解决东南亚问题，然后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他知道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他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是日本唯一能够做到的具体行动。

冢田说：“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因为）如果我们撤出，美国将会进驻。届时美国就能随时对我们进行干预。”他不认为日美贸易关系会得到恢复，因为“美国不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即使从印度支那撤军）日本也不会获得石油”。他断言：“半年后，开战的最佳机会将离我们远去。”

最后，各方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即对《乙案》增加一条要求：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东乡打算，如果美国拒绝日本的

要求，他再把最后这一条去掉。但重新涉及中国撤军问题，并把它与东南亚问题混在一起，这非但没有简化东条的外交计划，还变得更不易于操作。

虽然加上了这条折中的要求，冢田仍然对从印度支那撤军感到强烈不满。他要求完全放弃《乙案》，呼吁东乡“尽量接受《甲案》”。而东乡也同样坚持己见，不愿意妥协。紧张的会议气氛迫使东条宣布再休会10分钟。

休息期间，陆军方面试图接受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撤回到北部的《乙案》，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对这一让步条件感到震惊，但大家都认识到，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最终还是会阻碍《乙案》的成功。让参谋本部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花更多时间讨论《乙案》的同时，日本发起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却转瞬即逝。最后，冢田勉强接受了《乙案》，或许他认为，这样做日本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

最终，史上耗时最久的联络会议以达成一份初步计划告终。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被定在12月初，相关的战略准备也将着手开始进行。如果在12月1日零点前与美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军事准备将无条件停止。现在东乡手上握有《甲案》和《乙案》，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贺屋和东乡都从本质上不认可开战理由，他们不明白为何其他与会者不能感同身受。

这次会议的结束时间是11月2日凌晨1点30分。

东乡并不需要同意这一临时决议。他和大藏大臣贺屋，以及任何一位内阁大臣都有权否决这一决议，形成“内阁内不合”。根据明治宪法，内阁大臣都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意味着首相不能直接开除大臣。（实际上，在首相的要求下，大臣通常会辞职，但这也不是一定的，近卫和松冈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大臣执意否决一项决议，随后又拒绝辞职，这将导致整个内阁的垮台。另一个破坏决议的方法是一位内阁大臣自己直接辞职，这将造成整个内阁的立即倒台，但这样做会严重损害内阁声誉。1941年11月初，选择任何一种方式都意味着公然让军方难堪，因为这样做将对已经进行中的备战工作是一个打击。这

次会议结束后，东乡开始考虑辞职，这是表达抗议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显然军方中的强硬派人士也担心这种可能性。

东乡寻求前首相广田弘毅的建议，广田也曾在4届不同内阁中担任过外务大臣。极其谨慎的广田让他不要辞职，因为他的职位有可能被一位主战派人士填充。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辞职，东乡将能拖延战争计划。广田认为，东乡还是最好继续与美国开展外交，东乡于是决定留任。

11月2日中午，东乡对东条说，他将按照前一天的决议行事。贺屋也接受了这一初步决议。东条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他表示，如果美国对《甲案》或《乙案》表现出任何兴趣，他都将设法作出更多妥协。东条向东乡保证，不论备战进行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军事活动将立即停止。东乡则表示，如果日本无法通过外交来避免战争，他将会辞职。东乡和贺屋都渐渐接受了这一不可想象的决定。

当天下午5点，永野和杉山向天皇呈交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为了保密，该计划并没有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让天皇为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作好准备。呈交的战术细节包括山本袭击夏威夷的计划，袭击事件定在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根据预测，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合适，凌晨时月光明朗，有助于日本在破晓发动进攻。

裕仁露出难过的神情，他重申自己倾向于外交途径。他还就一些战术细节问题向两位总长表达质疑，他最后退让一步说：“也许，继续为军事行动作准备是无法避免的。”另外，日本计划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东南亚战役，裕仁对东南亚地区的天气表示关心。（他问道：“你说过季风将妨碍我们的部队登陆……那我们能登陆吗？”……“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虽然裕仁仍然对外交抱有希望，但他也似乎渐渐接受了即将开战的想法。毕竟所有人都看到，开战能让日本对自己的未来握有掌控权，主动采取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吧？

11月4日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天皇及其军事顾问（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出席了会议。对于外交与备战齐头并进的最新联络会议决议，没有人表示反对。如果12月1日零点前日本无法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这将意味着开战。主持会议的东条似乎变了一个人。尽管他才对东乡保证过要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但他现在宣布，战争是必然的，也是一件好事。这是他在天皇和军方重量级人物出席的正式场合中的面孔，他所扮演的是英勇的军人，而不是内心纠结的政治领导人。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小日本’的状态，我们将玷污日本2600年的辉煌历史。”

11月5日，明治时代的典雅宫殿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今年第三次御前会议在这里上演，会议将批准此前联络会议的决定。在天皇面前，东乡开始阐述日本外交的前景。他的任务是完全而明确地支持即将受到天皇批准的计划。他收起了反战言论，开始拿出反殖民主义借口，声称日本即将开启拯救亚洲的伟大计划。他承诺自己不但致力于日本的生存，还有整个亚洲的生存，这样他就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支持他曾强烈反对的战争找到理由。东乡本来是在决策层中最勇敢、最理性的领导人，现在却与其他人看起来无异，把战争推向了不可避免的边缘。4月以来一直没能与美国达成谅解的责任被推向大洋彼岸。东乡认为，日本是个被压迫的国家，他说：

罗斯福总统利用了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似乎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它帮助英国，用经济政策压迫日本。自从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们一直就日美关系正常化进行非正式谈判。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来坦诚，从一开始就本着公正的态度进行谈判，希望给东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

他数落了日本如何耐心谈判但其努力（包括9月底递交了新提议）却付之东流。他说：“如果事情按照现在这样发展，谈判恐怕不太可能很快取得成果。”他的这一言论并没有如实反映内心深处的声音，这种场面话也说明，东乡已经没有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最高决策层中，他曾经比任何人的反战力度都要大。

虽然所有领导人都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罗斯福总统天生就是有魅力的政治家，1941年11月17日上午，他对两位日本客人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其中一位客人是野村大使，他在过去半年是白宫的常客。另一位算是稀客：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来栖比野村矮得多（野村与他的许多美国同事一样高），但来栖却更加沉静。55岁的来栖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他穿着合体的西装，留着细密的胡子，戴着银边眼镜，他对记者打招呼时彬彬有礼，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优雅。但正是因为他无可挑剔的举止，来栖看起来有点儿距离，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很冷漠。来栖是东条政府派到美国的特使，他两天前才刚刚抵达华盛顿。

实际上，来栖最新的职责从11月3日晚就开始了。他这一天过得愉快而劳累，白天他陪着儿子逛了博物馆，在东京老城区走了走，他的儿子是陆军的航空工程师。半夜，附近警察局来人把他叫醒，警察说：“请立即前往外相官邸。”来栖家里的电话线出了故障所以才派警察来通知他。来栖本来以为他被召唤是因为自己的反战言论，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赶到东乡的官邸后，他看见外相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聚集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所有人都神色凝重。

东乡首先概述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非正式谈判的进程，指出当前形势需要立即改善。为此，野村大使需要一名在国际谈判中富有经验的得力干将。作为首位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1919年，他阻止了一项议案的通过，该议案让日本有权强占该国开发的农业地产。虽然来栖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仍然是最佳人选。外务省问他是否愿意前往华盛顿。

东条从近卫手中接手政府事务后，野村要求回国，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他再一次遭到了拒绝。我们可以想象野村有多绝望，他几乎

是一个人在与美国政府周旋，而即使在美国使馆里他都被视为局外人。如果他知道留给外交努力的期限如此短的话，他或许会崩溃。他并不知道东京已经对开战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讨论、决定、重审和最后批准。随着新的截止日期被设定在11月末，东京已经没有更换野村的时间了，只好派人去协助这位过度劳累的大使。

派遣来栖的官方解释是野村英语能力有限；其实，东乡对野村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高。他在后来写道“在这一危急时刻，我们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所以东乡要“向他发送非常详细的指导，比如关于条约样式，这些是大使不擅长的地方”。东乡甚至觉得，连这些充满详细指导的电报也不足以弥补野村的差距。

在与东乡的半夜会面中，来栖还获知《甲案》和《乙案》的内容，这些方案将在未来几周内向美方提出。来栖2点左右回到家中，他让家人感到震惊，因为他宣布自己即将启程前往美国。

在之后的20小时里，来栖努力熟悉着日本与美国自春天以来的所有“非正式会谈”。他翻阅着文件，与外务省知情人士会面。他知道两国的会谈在开始阶段进展顺利。他也明显看到，转折点出现在7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美洲局的山本熊一再次向来栖保证，如果来栖哪怕看到谈判取得成功的一线希望，他都会尽一切可能劝说军方放弃战争。山本相信事情会好转，因为永野曾对他说过，“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

第二天晚上，来栖即将启程前拜访了东条，他们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在来栖看来，东条首相显得比较放松，东条没有穿他平时穿的卡其色军服，而是换上了一件和服，但仍然属于比较正式的和服。东条说，他已经将来栖的特别任命上报给了天皇。他还预测，“与美国谈判的成功概率为30%”。但他认为还有时间，他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开战，美国的舆论也显然反对战争。东条说，美国缺乏橡胶和锡等自然资源，所以不太可能与日本开战，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他们从东南亚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

“请尽全力达成协议。”东条说。但让来栖失望的是，东条还补充

了一句：“日本无法同意撤军。”如果作出这一妥协，东条将没脸面对所有在战争中为天皇捐躯的英灵。这是东条惯常的底线，也是第3次近卫内阁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的障碍。然而，东条在这一问题上也不是像他表述的那样强硬而固执。他在最近的联络会议上帮助东乡取得了军国主义者的一些让步：《甲案》至少承诺有期限地从中国撤出；《乙案》则承诺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以此作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的第一步。尽管东条仍会提到那些逝者的英灵，但他的确在撤军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让步，或许他理解该问题的重要性。

来栖认为东条过于乐观。他说自己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艰巨任务，是因为他相信，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的事情。他不是为了活人而非死人服务。来栖问道：“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你能顶住反对声而支持外交行动吗？”东条回答：“是的，我当然能做到。”来栖很快认识到当前形势的微妙：虽然东条作为军人无法公开答应有辱军方的让步条件，但实际上，只要来栖与美国方面保持谈判，东条就做好接受妥协的准备。这让来栖看到了希望。

结束会谈前，东条漠然地对来栖说，谈判不能拖过11月末。东乡并没有向来栖提到这一期限。在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来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障碍是时间限制。

尽管来栖的能力和经验丰富，但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他并不是一个好选项。对外部世界来说，来栖永远是那个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人们从照片中看到他就站在希特勒旁边。那是德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尽管他反对签署该条约，但1940年秋天作为驻德大使的来栖身不由己。来栖从来都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他拒绝了好几次。他本来准备在比利时的任期结束后就退休了（他1936年至1939年担任日本驻比利时大使）。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并不断升级。他利用自己的大使身份出面请求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帮助调解冲突。他知道日本不但没有什么清晰的战争计划，还缺乏一位得力的领导。用他的话说，造成战事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事实拖着走，没有长远解决方案”。更糟糕的是，“陆军和海军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每个人都“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

来栖从来没有想到事态竟能如此迅速地恶化，1937年4月，他和家人以及一群兴高采烈的观众还在布鲁塞尔机场欢迎破纪录的“神风”飞机。来栖1939年接受驻柏林大使的任命时，他希望能够防止日本的外交进一步偏离轨道。在德国期间，他继续寻求德国的介入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但正当一切看似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时，近卫内阁认可了汪精卫政府，从而永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德国与日本官员之间的交流很快就避开了来栖。希特勒政府认为，单靠来栖不足以吸引日本，最后《三国联盟条约》是一位德国特使在访问东京时与松冈洋右仓促达成的。尽管如此，由于来栖在照片中与希特勒并排站在一起，他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栖十分厌恶这张照片以及他在德国的所有经历，于是他要求卸任，最终在1941年2月，他被允许离开柏林。回到日本后，他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他拒绝一切政府任命，包括加入东条内阁的邀请。解决日美分歧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本质上是亲英美的。他的父亲是成功的实业家，帮助了横滨国际港的发展，也许因为这样，对商业自由主义的崇尚渗透在他的血液里。在日本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横滨港一直是认识世界的窗口，也造就了像来栖这样理智、务实的人。

来栖为了美国和日本的未来着想还出于个人原因，他娶了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姑娘（女方的父母是英国人）。来栖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两个对他家庭意义重大的国家开战。这势必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参谋本部甚至有人说，他们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坠毁。带着这种恶意诅咒，来栖11月7日清晨动身前往台湾。

来栖的路途漫长，所以在11月中旬前，野村仍需要单兵作战。东乡向野村概述了《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写道：“眼下的谈判是我们孤注一掷的尝试，是我们最后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达成妥协，那么很遗憾，谈判和两国关系都将中断。”虽然真正的截止时间是12月1日的零点，但野村却被告知，必须在11月25日前达成协议。野村还不知道东乡在《乙案》中争取到了多么大的军方妥协——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东乡认为，如果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他可以在谈判的最后一刻打出这张牌以取得最大效果。

野村尽早采取行动。11月7日，他去见国务卿赫尔，向他递交了《甲案》。赫尔已经从情报部门获知了《甲案》的内容，但他告诉野村大使，他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罗斯福。总统没有直接提到《甲案》，但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他和野村、赫尔“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仅花了6个月”，保持更久的耐心是必要的。在他看来，权宜之计“不仅是暂时的协议，而且是考虑实际现状的协议”。野村离开后，他推测总统开始在考虑与日本达成临时妥协，不再要求日本进行全面彻底的政策改变以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

从美国角度看，罗斯福一心想要参加欧战，所以想要在另外一边形成威慑，让日本不敢进攻。美国一点也不着急，但野村等不及了。为了在东京下达的最后期限前取得具体成果，他需要罗斯福对《甲案》条款给出最终答复，于是他11月12日再次要求总统给出答复。公使衔参赞若杉要第二天会见了副国务卿约瑟夫·巴兰坦，他说：“（日本）民众正变得失去耐心，甚至绝望。”这是个巨大的谎言，把日本描述为信息开放的民主国家，似乎公众对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了如指掌。

若杉对巴兰坦说，既然野村大使11月10日已亲自将东京的方案呈交给总统，日本认为两国的谈判本质上是正式的谈判。但巴兰坦却说，美国政府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仍然处于非正式的探索阶段”。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政府在需要时还将与中国及其他有关各方会谈，在此之后日美之间才算进入“谈判阶段”。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拍发电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在一两个月草率了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从全局上审视整个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路线。”由于最后期限日益临近，这一非常合理的观点其实有点儿答非所问，这让东乡感到恼火，但他在内心深处也知道，野村是对的。

11月15日，野村和若杉来到赫尔的住处，野村得到一份口头声明

以及关于美日经济政策和贸易机会均等联合声明草案。赫尔没有同意日本的观点，即机会均等政策在中国实施前应先在世界其他地区实施。赫尔解释说：“（日本不能指望）美国对其司法管辖权以外的歧视性做法承担责任，或者向美国提出只有征得其他政府同意才能实现的条件。”但他至少认可了《甲案》中的一项具体条款。若杉询问了美国是否对其他问题也能迅速作出答复，而野村询问了两国现在是否算是跨过“非正式会谈”阶段而进入了正式谈判（因为这对东京意义重大）。赫尔均给出否定答案，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地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只能通过这种试探性对话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赫尔认为，只有美国与英国、中国和荷兰协商后，他才能将“之后的过程称为谈判”。赫尔反问到，如果这些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提前打招呼就与日本就牵涉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他该如何向这些朋友交代？最后，赫尔也鼓励地说，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展现和平意图，双方“就能像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

11月16日，东乡对野村取消最后期限的要求给予回复。东乡写道：“很遗憾，由于各种现实因素，我们不能等到看清世界格局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迅速在谈判中达成和解，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前一天，来栖终于抵达华盛顿。在东京，东乡向他详细交代了向白宫递交《乙案》（如果《甲案》被否决）的不同版本，两个方案的条款略有不同。《乙案》3个版本中的第一个版本是11月5日御前会议上达成的，包括：（1）不再向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地区进军；（2）在确保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两国商业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在这一版本中，日本准备从印度支那撤军、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上让步以及为《三国同盟条约》辩护等内容仅被列为“附加说明”。

在第二个版本中，前4项条款没有变化，后3项“附加说明”变成正式条款（分别列为5~7条）。这些新条款也有不同的限定条件，以“附加说明”的方式列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条件是：如果美国

和日本能达成协议，日本将愿意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立即撤往北部。

东乡认为第三个版本对美国最有吸引力，这一版本的第5条（不是以“附加说明”的形势）明确表示，日本准备“将现有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转移到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于是对来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他与野村利用这些差异达到最大的效果。除了这些方案，他们两人拥有的外交自由度几乎为零。

来栖离开东京前造访了美国使馆，他想感谢约瑟夫·格鲁为他安排了横跨大洋的远程飞机。“你带着新的提案吗？”格鲁显然有些急切地问道。格鲁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在夏天试图说服美国政府给近卫文麿一个机会。格鲁当时表示，虽然不能在纸面上提前达成确切协议，但近卫肯定会亲自带来有利于美国的让步条件。而来栖的回答却是“不”。可以明显看出格鲁很失望，他祝来栖好运。

来栖不确定美国政府是否会相信他。他不但签署过《三国同盟条约》，尽管这是不情愿的，而且他不具有内阁成员的重要地位。他能否让美国人相信，日本领导层的确希望避免军事冲突？《乙案》的不同版本足以达成这一目标吗？

11月17日，在赫尔的带领下，来栖与野村从赫尔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走向白宫，来栖第一次见到罗斯福。会面的气氛虽然不算轻松，但也不是特别紧张。会谈结束后，来栖认为美国愿意继续这种“对话”。他对罗斯福说，他的到来不是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找共识所作出的更多努力。在阐述日本观点时，来栖请求总统从日本“思维框架”看问题。于是罗斯福说了一句“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这句话尤其引起日本人的共鸣。罗斯福其实是重复将近30年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对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捨巳（Chinda Sutemi）说过的话。珍田为美国带来了樱树，种在波托马克河的岸边。但对日本人来说，珍田的名字还与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外国人土地法》联

系起来，他当时公开对这一主要针对日本移民的法律表示反对，法律规定不符合入籍条件的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1870年的《入籍法》规定，所有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群体不符合入籍条件）。珍田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抗议，但没有取得满意结果，加州的法律后来发展为1924年的《移民法》，其中包括排除亚洲人的法案。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这些规定体现了美国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歧视。这些排外措施推动日本人走向其他地区，间接促进了日本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扩张。尽管日美外交关系多年来屡经波折，但日本政府在与美国交往时总是能从布莱恩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些许安慰。罗斯福此时引用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来栖。

罗斯福似乎对来栖的努力报以热情的回应。他在中国问题上立场更为缓和，宣称他能够从日本角度理解立即撤军的敏感性和后勤方面的困难。他说自己愿意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介绍人”。在两国和解过程中，美国既不会“调停”，更不会“干涉”，而只是把双方拉到谈判桌前，这正是日本所要求的。

截至目前，一切顺利。来栖察觉到，除了中国撤军问题外，罗斯福认为最棘手的就是日本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他现在开始转向这一问题。来栖承认，日本很难自己脱离这一条约，至少不能作出正式表态，但如果日本能与美国达成“普遍谅解”，它的光辉必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其成为一纸空文。与希特勒签署该条约的人作出这样的表态让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美国领导人一时难以接受。赫尔此时介入，对来栖刚刚说的话表示强烈反对。

会谈结束后，来栖觉得总体上很成功。野村也对来栖的社交和语言能力感到放心。于是他们向东京传达美国释放善意的信号，但这种乐观态度在大洋彼岸并不被看好。赫尔在写会议总结时抑制不住自己的不满。日本不能正式放弃轴心国联盟让他无法接受。他鄙视来栖“为了绕过《三国同盟条约》而给出貌似合理的解释”。

约瑟夫·格鲁总是很热切，他试图从日本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交流。赫尔虽然展现了充分的耐心，但他更倾向于听取国务院中的对日

强硬派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意见。赫尔在前一次与野村的会议中说，他很难“让我国人民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相信，日本想要走和平道路”，毕竟，日本仍然“与过去2000年来这个星球上最暴力的狂徒结盟”。如果美国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而日本同时对德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那么赫尔会觉得自己受到谴责。

由于赫尔对纳粹及其“朋友”深恶痛绝，所以他一直对来栖这一特别使者表示怀疑。来栖与罗斯福会面后，赫尔立即邀请他继续就《三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但来栖拒绝了，后来他为这一决定后悔不已，尽管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为何当时要拒绝赫尔。也许他觉得自己需要一天的准备时间，或者他要等待东乡的具体指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经历长距离旅途后感到十分疲倦，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从这天起，赫尔对来栖形成了永久性的判断，赫尔在会议备忘录中写道：

总之，日本大使和来栖特使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来栖特使总在强调两国不应产生严重分歧，必须找到解决当前局势的方法。他提到首相东条虽然来自军方，但却非常渴望为了和平作出改变……总统总是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陷入争论，尤其在两国之间的3个主要分歧点上（贸易机会均等、中国撤军、《三国同盟条约》问题）。这次会议并没有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赫尔在1948年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来栖）是个骗子。”

美国有越来越多关于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的报道，这让来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11月17日东条在国会的演讲对来栖刚刚开始的任务带来负面效应，因为这次演讲被广泛传播。这是东条首次在“议会”上的发言，并被拍摄下来（日本第2次近卫内阁成立“大政翼赞会”后，日本的议会制度不复存在）。NHK播放了这次演讲，第二天作为新闻电影向公众发行。东条效仿纳粹的宣传方式，主动通过音视频媒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虽然东条说，日本的政治形势现在“十分关键”，但这次演讲的内

容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新内容。东条在演讲中指出，形势并没有好转，因为日本仍然遭到那些无法理解日本和平愿望的国家欺凌。他对在中国作战的士兵表示感谢，并向全国保证，蒋介石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形势不稳定，日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日本北方边境的安全。至于南方，东条强调说，日本被迫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因为“英国、美国和荷兰加大了针对日本的排外经济政策”，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是对抗这些政策的“防御措施”，日本的做法却“受到这些国家的质疑和猜测，它们于是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形成事实上的全面制裁”。东条认为，这种做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相当于挑起武装冲突”。

东条对国民说，政府仍然在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为了日本、亚洲和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整个国家需要团结一心。最后他对日本国民的动员努力表示感谢，对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英灵”表示崇敬。

东条的发言结束后，议会正式批准了一项新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军费。1941年11月18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引述了这项政策的内容：

尽快解决东亚问题，确保东亚国家永续共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是日本帝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政策。政府必须解决当前危重的形势，妥善处理国内外问题，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不能犯任何错误。

东条的演讲并没有让日本人过于担忧，这种强烈的措辞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失去了效果。但演讲成功地让东条的声音第一次传遍全国。他那种有距离感、正式语体的讲话方式让日本人感到颇为熟悉，甚至学校里的孩子都开始模仿他。

这一被广泛宣传的演讲对美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没有发出和平主义言论的领导人，虽然包括东条在内的大小官员都声称想要和平，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并公然进行战争威胁。托利舒斯认为，东条和东乡在国会中所作的发言“明确显示，日本和美国的最终对决不远了”。虽然东乡表示达成和解也绝非不可能，但托利舒斯

观察到，“国外及此间外交人员普遍的观点是，（这些演讲）对日本宣称想要实现的太平洋地区和平无所助益”。

11月19日，托利舒斯发回另一篇报道，引述了岛田俊雄（Shimada Toshio）的演讲。这位前农业大臣说，“傲慢的美国领导人想要称霸世界，他们甚至通过帮助英国来对欧洲进行干预，这些人心中有一颗太平洋毒瘤”，当前的决定对治疗毒瘤至关重要，日本应当用大刀切掉毒瘤，继续日本的“正义之战”。他还表示，“让有关方面理解我们还有其他方式”。

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已决定开战，但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人离开。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的数量却在增加，并在1940年6月达到超过1000人的高峰。但到了1941年11月，仅有200名美国人离开日本，是在过去30年中最少的。

来栖要在华盛顿洗刷的负面形象不止他一个。

尽管美德关系紧张，但美国一直在避免与希特勒开战。“格里尔”号事件后，美国驱逐舰“奇尔尼”（Kearny）号10月17日在冰岛海域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造成11人死亡。虽然从罗斯福当时的表态来看，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接下来并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10月30日，美国再次遭受打击，德国潜艇在爱尔兰以西1000公里处袭击了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造成115人死亡。罗斯福总统又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实际上，罗斯福对这起事件的回应很慎重，这让人意外。他非常重视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反战者的意见，认为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动员工作，而在太平洋方面，美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

“鲁本·詹姆斯”号事件后，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废除《中立法》部分条款的决议，众议院在11月13日也通过了该决议。两院通过决议的票数都很接近（参议院为50票赞同、37票反对；众议院为212票赞同、194票反对），这也说明罗斯福的谨慎不无道理。美国现在能够武装商船，携带任何货物前往战区。美国议员最终移除了阻碍美国向大西洋进发的法律屏障，与此同时，太平洋方面也蠢蠢欲动。占领法属印

度支那的日军数量增加了，于是英美两国也加强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防御，东南亚地区的气氛令人不安。

日本新的调兵计划再一次直接影响到大兵潮津的命运。我们前面看到，1941年夏天他被征召入伍，为进攻苏联作准备，但最后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于是在“满洲”北部负责训练新兵，一直到初秋。10月末，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满洲”地区的大城市哈尔滨，开始连续40天从事艰苦的建设工作，他们建造军事地堡。这项工作给他的左腿造成轻度残疾。11月中旬，他们突然接到撤离哈尔滨的命令。潮津和他的伙伴带着轻松的心情上路，他们认为自己的“临时服役期”终于结束了，现在正在回家的归途中。他们在整整3天的火车行程中都兴高采烈。

当他们抵达大连后，这股兴奋劲立刻被浇灭。他们被命令换上夏装，每人发了用蚊帐做成的面罩和手套。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但显然不是回家。他们与其他部队一起登上一艘大船，在海上，他们靠少量米饭和海藻生存，这很难填饱肚子。随着船的航行，他们感到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这艘船最后终于停了。有人说他们在台湾海峡。士兵们爬上甲板，他们惊讶地看到一个壮观的日本海军舰队。所有舰船加满油后便一起出发。在战机和军舰的护航下，这些士兵感到很安全。气温越来越高，他们又饿又渴，潮津还是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向南部调兵只是日本进攻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1月7日，军令部发布了第一份调动命令。11月10日，海军挑选出10名水兵，他们将协助珍珠港空袭，发动潜艇袭击。参加这项特别任务的是5艘小型潜艇，每艘潜艇由两名水手操作，携带两枚鱼雷。这些鱼雷的射程有限，所以水手一旦进入珍珠港的范围，他们活下去的概率微乎其微。山本五十六向来不赞成以自己手下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战略方案，但在制定该计划的年轻军官的坚持下，山本最终妥协——但条件是，这些军官必须继续研究潜艇安全返航的可能方式，并承诺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安全返航。

一项有效的自杀任务就这样制定了。这也反映了整个战争决定的

根本逻辑：只要有一丝成功希望，就值得冒险搏一把。11月18日，完成最后一次演习后，6艘航母驶向日本最北部岛链上的单冠湾（Hitokappu），舰队将最终从这里向珍珠港进发。之所以从这里出发是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船只发现。54岁的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负责指挥第一航空舰队。这位老派的舰队指挥官可以说没有任何航空作战经验，他的任命完全依仗自己的资历。

同一天在华盛顿，野村和来栖与赫尔会面。对于日本留在法西斯集团问题，赫尔与前几天一样强硬。他说自己不能理解为何日本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对日本外交官说，只要日本还是法西斯盟友，他不知道“如何能够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他说，美国会“尽力走得更远，但不会超过某一点”。他不会在他所认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上作出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日美达成的条约会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无法立即掉头，只能慢慢、一点点地转动”。

接下来，野村向华盛顿打出他最大的一张王牌。野村向赫尔暗示，日本可以将军队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样两国可以“回到7月以前的状态……回到（美国）实施资产冻结前”。野村的这张王牌是东乡从军方那里争取到的，来栖可能提前告诉了他。

赫尔却对野村的提议无动于衷。他担心日本可能只是将撤退的部队转移至其他地区，他说美国政府很难撤销对日禁运，除非美国“相信日本的确走在和平道路，并已经放弃了侵略目标”。野村强调说，日本人民已经厌倦了在中国的战争，他向美国政府保证，日本想要向和平迈出切实的第一步，日本的态度是诚挚的。

野村提议，与其寻找（甚至很快实现）一个全面、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计划，双方应先缓和局势。他向美方表示，日本非常认真地在寻找权宜之计。赫尔最终有所松动，他说自己将与英国和荷兰方面就日本的最新提议进行商谈。用赫尔之前的话说，这是从“试探性对话”向“正式会谈”转变的标志。两位日本外交官突然看到了希望。

与赫尔会面后，来栖立即向东京发送了信息。他自信地写到，他和野村都认为，华盛顿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单单由于另一方不能立即同意日本的条件就采取鲁莽、不可挽回的行动是愚蠢的。来栖还在信息中强调，罗斯福和赫尔更加坚定地要求日本与德国断绝关系。虽然日本恐怕无法立即放弃联盟条约，但他觉得日本必须明确表态，将逐渐与希特勒划清界限。来栖说，鉴于留给谈判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应当继续基于野村的最新提议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便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附加的条件越多，两国政府进行有效谈判就越困难。他最后写到，他和野村想要在11月22日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与总统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

在之后的两天，一切都似乎有所好转。两位日本外交官不断收到罗斯福政府正在认真考虑野村提议的消息。11月19日上午，曾经开启美日两国“非正式会谈”的沃尔什神父来到日本使馆拜访来栖。他与罗斯福的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关系密切，沃克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沃尔什神父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沃尔什对来栖即将完成任务表示祝贺，他说美国很可能会接受野村的提议。

受到鼓舞的野村和来栖当天晚上再次拜访赫尔。赫尔的确看起来很乐观，他说达成这一共识“或许可以稳住日本领导人，并将民意拉回到和平轨道”，但他也承认，转变民意“需要时间”。两国政府的代表终于开始有了共同语言，似乎很快将要向其共同目标迈进切实的一步。

11月20日东乡向野村发来的电报让这一希望瞬间破灭。东乡感到很愤怒，因为野村没有按照他精心布置的指令行事，而是擅作主张。由于东乡还没有收到美国关于《甲案》的答复，所以他没有授权华盛顿谈判人员拿出《乙案》。东乡说，野村没有权力将从印度支那撤军问题与《乙案》其他条款分隔开，使之成为一项单独提议。

东乡之所以发怒，还可以解释为他看不上这位非职业外交官的鲁莽行为。东乡有些高傲，认为与美国的谈判是他的事，而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只是执行他命令的人。在东乡看来，野村的行为说明自己忘

记了“执行命令的职责”，给对手承诺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东乡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知道军方不可能单方面同意撤军（军方尤其想要看到交换条件，比如以有利的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许东乡只是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东乡都决心要撤销野村的提议，而不是进一步争取军方让步，即使东条曾承诺过会支持他。

东乡对华盛顿的外交官说：“这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野村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令人遗憾”。东乡指挥他递交日本的“最终提议”，也就是《乙案》的一个版本，其中包括：（1）不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2）在开发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贸易关系恢复至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5）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中国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野村试图让两国外交互动起来的努力失败了。东乡表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美国（对《乙案》）的同意，我们将只能接受谈判破裂的结果。”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毫无疑问，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但东京给自己强加的谈判期限让等待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对于老练的外交官也一样。来栖焦急地等待着赫尔对最近递交的《乙案》答复，他11月21日来到赫尔的公寓，现在该轮到他的鲁莽一回了。

来栖递给赫尔一封草拟的信件，信件承诺如果美国参加欧洲，日本的行动将不受制于《三国同盟条约》。这完全是一项私下提议，但也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现有立场。其实，来栖只是抄写了东乡11月20日发出的指令内容中的一段，该指令告诉他如何解释日本政府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东乡不让他立即作出指令上的表态，必须要等达成协议后。

东乡不想让他所说过的关于日本脱离法西斯联盟的话落入美国手中，如果美日谈判破裂，他害怕美国政府会将这些话宣扬出去，来挑拨德日关系。但来栖不理解为何这样重要的信息要对美国有所隐瞒，他强烈地感觉到，东京现在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将可能扭转谈判形势。来栖推测，如果当年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现在能够以书面形式保证日本已“从实质上”放弃了《三国同盟条约》，这将对美国很有说服力。于是，他向赫尔递交了他的私人信件：

阁下完全清楚，本人正是在我国政府的命令下签署该条约的人。我很乐于作出以下表态，相信它将有助于消除以前的错误印象。

毋庸置疑，该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侵犯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

此外，条约第三条规定，日本能够独立自由地解释其义务范围，不受到条约其他方解释的约束。我想强调，我国政府并未被这一条约绑定，不会参与任何第三方的侵略行动。

我国政府绝不会听从任何外国势力的命令而把日本人民送入战争，只有为了保证安全、保护国民不受非正义审判而具有不可逃避的根本必要性时，才会寻求战争手段。

我希望上述表态有助于消除阁下一一直以来的猜疑。我想补充的是，如果两国达成全方面谅解，阁下随时可以公布这封信件。

读到这封信后，赫尔表示想把信件交给另一个人看，并询问来栖他是否可以留下这封信。来栖询问这个人是否是总统，赫尔予以否认。国务卿是想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吗？答案再次是否定的。赫尔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来栖决定冒一次险，将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件留在赫尔手中。

来栖认为，他与赫尔的30分钟会谈是有帮助的。赫尔甚至与他闲聊了一会儿。赫尔对来栖说：“你远道而来，我应当邀请你一同用餐或打高尔夫球，但你知道我们双方都很忙，我觉得打一场高尔夫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我开始相信打高尔夫球与处理国事是矛盾的。”赫尔显得情绪不错，他称赞了来栖处理《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的智慧，并回忆了1933年与日本代表在伦敦经济会议上共事的情景，他一时显露出怀旧之情，甚至对日本想要缔造地区新秩序表示同情。他说自己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想法，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字起得很差。

更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国内强硬派施加了巨大压力和限制，赫尔似乎真正对他与野村的外交努力表示认可。赫尔抱怨说，他自己深知外交总是受制于各种政治压力。赫尔似乎开始对来栖放下戒备，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两人握手道别时，来栖发现赫尔发烧了，他说：“请保重身体。”就这样，来栖打出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但还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

赫尔对此次与来栖单独会面的记录很简短，也让日本颇为失望：

我读了这封信，并询问来栖关于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他说没有什么补充。我说我不认为这会有特别的帮助，于是不予考虑。这就是所有重要的谈话内容。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来找赫尔，他从感冒中恢复过来，又变成平时那位干练的国务卿。他并没有对《乙案》作出答复，相反，他再次对日本的和平意图表示质疑。他对日本夏天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表示谴责，尽管他已经在与野村讨论撤出事宜。他说，日本在春天购买的石油“没有用作普通的民用消费”。他还指出，日本媒体出现越来越多反英美言论。

赫尔不明白，日本国家领导人为何没有以公开宣讲和平的方式来支持这两位外交官，他问到，难道日本领导人现在不能站出来表示日本想要和平吗？尽管世界对日本仍存疑虑，日本也不愿主动争取并维护和平吗？为何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他表示自己更喜欢野村只包含一点的提议而不是东乡的《乙案》。

赫尔指出，日本在提议中阻止美国干涉中国问题显然具有风险。这也证实了野村和来栖一开始的担心，即在日本提议中加入中国问题将阻碍美国帮助调停中日战争。由于《乙案》包含不准干涉中日和解的内容，该提议的前景堪忧。

野村不愿意放弃希望。来自美国的任何回应都代表双方的接触在持续。他认为，只要仍然存有一线希望，右倾的日本政府就不会放弃外交。野村认为，尽管东京已经设置了最后期限，但只要他能争取美国对《乙案》中的一点作出回应，谈判就能继续。所以野村询问赫尔，在日本的提议中，美国哪些点可以接受，哪些想要日本修改。但没有得到回应。赫尔说，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他问日本政府是否可以等待他与其他有关各方代表（荷兰、中国和英国）商量后再答复。野村不想因为逼得太紧而影响关系，所以他同意继续等待。

同一天，野村收到东乡的电报，告诉他11月25日的谈判最后期限被延长至11月29日，但“超过这一期限绝对不行”。之所以延长期限，是因为要考虑到“完成整个（外交）过程需要的等待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日本外交官既要获得美国对日本文件的签署，还要与英国和荷兰交换正式文件。东乡附上了草拟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交换并被有关方签署。其实这很难实现，东乡也清楚，但这样做符合正式程

序。

11月25日晚，赫尔准备好了美国的答复，美方要求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驻军减少至2.5万人。作为交换，美国将解冻日本的资产，与日本恢复经济关系，但仍带有一些限制。这一临时安排的期限是3个月，双方都可以提出延长期限。

无论赫尔多么强硬和正直，不论他对日本及其外交官有什么个人成见，他仍然是一位务实、极其耐心的谈判者。他的新提议显示他寻找折中方案的努力，该计划将让美国有更多时间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并为欧战做准备。但到第二天上午，赫尔决定完全抛弃这一计划。关于这一突然转变有若干解释，其中一个是中国和英国反对美国与日本妥协（荷兰支持赫尔的计划）。根据赫尔在战后的解释，“日本同意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很小，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尤其是中国的士气可能会被浇灭，甚至陷入分裂”。但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无疑是日本向南部调兵的报道，尤其向台湾以南调兵，这让罗斯福政府确定，日本随时准备挑起战争。

当然，两国都已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调兵，这不是什么秘密。罗斯福已经知道东乡11月22日对日本使馆说，11月29日后事物将“以自动方式”发展。基于这一截获的情报，罗斯福11月25日对他的顾问说，日本可能会在12月1日袭击美国，“日本最擅长不宣而战”。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到，核心问题是如何“诱使（日本）开第一枪，但又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伤害”。罗斯福完全意料到日本会采取军事行动，但低估了日本发动致命袭击的能力。日本向南部加强军力的消息也许让他相信，日本即将对英国、荷兰或美国在东南亚目标进行袭击。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对日本在华盛顿谈判的看法一定变得更加强硬——这些人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以欺骗方式争取时间。

在二战刚开始的黑暗时期里，罗斯福认为美国对德国开战很重要。他觉得现在是对付日本的时候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曾谋划让美国

通过与日本开战来进入欧战。既然日本没有加入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德国当然有可能不帮助日本与美国为敌。没人能确定会发生什么。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唤到国务院，他们没有收到美国的暂时提议，而是赫尔起草的另一份文件，正式的名称是《美日协定基本纲要》，史称“赫尔照会”。他要求两位外交官仔细阅读。

该文件第二部分为“美国和日本政府需要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最重要的10点方案。文件提议，美国、日本、英国、中国、荷兰、苏联和泰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平等的贸易通商待遇。

然而，达成一项多边协议并不是日本外交官的目标。东京已经明确表示，想要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一方只需要向另一方提议并获得批准。日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构想庞大的国际和平计划。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让日本外交官更加失望。该文件第3、4、5点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应将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美国和日本政府同意，除临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民国政府外，不能对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予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放弃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内的有关各种权益，以及根据1901年义和团事件议定书（译者注：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各种权利。

双方都清楚，这些条款是短时间内不可能被讨论和通过的。“赫尔照会”反映出，美国向来希望亚洲基于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行发展，“赫尔照会”可能本来是作为美国对日本答复《乙案》的附加条款，但现在作为单独的文件被提交，好像美国还没开战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曾抱怨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而“赫尔照会”更是如此。虽然这一纲要性文件只是初步计划，但赫尔完全清楚，他后来也承认：“我们从没有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一提议。”

日本代表拿走这份文件前，他们试图让赫尔降低美国的要求，这一努力只是徒劳。来栖指出，日本政府无法坐视汪精卫政权的倒台。

赫尔称，汪精卫政府没有能力统一中国，在这个失败的政府身上浪费时间不值得。来栖表示，日本此时无法突然转变外交政策，很难达成多边协议，但赫尔不愿意就此进行讨论。

野村问道，他们是否可以直接与总统交谈，他说罗斯福最近说过，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虽然赫尔很不情愿，但他仍然同意安排会面。来栖表示，他非常担心“这一提议意味着结束”，美国还有可能与日本达成暂时协议吗？答案是否定的。赫尔说他已经尽力了。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日本向南海调兵招致华盛顿的强烈反应。但这一天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以“赤城”号为旗舰）悄悄地从单冠湾出发了。船员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将要袭击的目标。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就连东条都被蒙在鼓里（东条甚至不知道日本舰队已在单冠湾集结）。如果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外交协议，这些军舰将掉头回家。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了。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赫尔照会”并没有规定具体期限，但当这一文件11月27日正午时分抵达日本政府手中时，它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东乡对其内容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我遭到绝望的打击。我试图想象接受所有（这些要求），但我无法强迫自己将它们全部咽下。”他认为，“赫尔照会”直接否定了两国在谈判中已经作出的努力，就好像这些谈判从未发生过。对于陆军中那些不计后果想要开战的人来说，这一照会无异于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没有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了。

多数日本领导人将该照会视为一种挑衅和侮辱，其傲慢的语气和苛刻的要求更加让他们确定，他们遭到了欺凌和羞辱。它还给日本领导人停止内斗、把责任完全踢给美方创造了机会，给日本处于“ABCD包围圈”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美国成了头号恶霸，它让日本民不聊生，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和英国政府进行战争。

当然，日本的这种解读只是片面的。日本强行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时也没有顾及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日本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打消美国对它与德国结盟的担忧，即使“巴巴罗萨”行动给日本提供了断绝联盟关系的绝好机会。东条的公共演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日本是军事独裁国家的印象——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独特的决策过程很难与独裁挂钩，而天皇当初任命东条时正是希望扭转日本的战争方向。总之，设定外交期限完全是日本领导人自己的主意。日本的自欺欺人最终演变为难以抑制的自我怜惜。

东乡的女儿伊势（音译）观察到她父亲的变化。拿到“赫尔照会”前，东乡充满能量；而11月27日后，他看起来十分沮丧。他认为“赫尔照会”不但是对日本政府的侮辱，而且是私人报复行为。他考虑辞职，于是询问其他官员的意见，包括前外相佐藤尚武（Sato

Naotake)。佐藤劝他不要对照会感到绝望，他现在应该寻找解决办法。

知名自由国际主义者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对“赫尔照会”报以一声叹息。这位80岁老者说：“这写得确很过分！”他对美国语气强硬、要求苛刻感到不满。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东乡的任务是避免战争。他通过他的女婿、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东乡传话说：

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之间需要小心拿捏。我非常希望外务大臣处理局势采取行动时不要犯任何错误。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立即遭到破坏，那么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外务大臣也脱不了干系。

吉田对东乡说，无论“赫尔照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算是最后通牒，没有给日本设置时间限制。吉田建议外相通过辞职来表达相反的政治立场。他对东乡说：“如果你辞职，内阁将被迫停转，鲁莽的军方也必须三思。”吉田建议他与格鲁大使会面，但东乡认为这种谈话没什么作用。东乡完全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现在是被华盛顿而不是日本军方误解），他觉得没什么可做的。也许这是他逐渐开始接受御前会议决议的原因，“赫尔照会”只是帮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11月27日，罗斯福和赫尔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了野村和来栖。尽管罗斯福对他最亲密的助手警告过，日本将在12月1日发动袭击，但善于外交的他仍然高兴地对两位日本外交官表示欢迎，掩饰着自己的猜疑。日本外交官落座后，总统给他们发了雪茄，野村道了声谢。总统点燃火柴为野村点烟，由于野村的右眼在中国战场上受伤而失明，所以他努力寻找着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帮他最终点燃了雪茄。现场的气氛十分友好。

开始大家闲聊了罗斯福为什么没有假期，然后总统开始谈到德国。他说，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是盟友，双方都见识了德国无法理解其他国家的心理。来栖明白，总统的这番言论是在间接但毫不避讳地

批评日本选择德国作为盟友。

随后，野村谈到此行的目的，对美国最近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似乎已经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感到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对“日本和平人士支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努力表示感谢。虽然他说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但他认为形势“严峻”，“这一现状应当被认可”。

他继续总结着过去的事件，回顾了4月以来与野村进行的对话，似乎想对双方的谈判做个了结。他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就像让美国政府“洗了冷水澡”，而最近“日本完全向武力征服的方向倾斜，忽视了整个和平谈判及其强调的原则，这种做法和表态”让美国担心自己会再洗一次冷水澡。日本媒体充斥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日本向南部调兵的举动已经暴露，还有传言说，日本即将与中立的泰国达成军事协议。罗斯福强调自己对“不断挑战和平与秩序基本原则的”日本领导人表示失望。他说，如果日本“不幸要效仿希特勒而走上侵略道路”，美国坚信，日本“终将成为失败者”。

作为回应，野村试图让总统念及旧情，他与总统已相识30年，请求总统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会谈开始时的那种融洽气氛已不复存在，美国没有对“赫尔照会”作出重大修改，赫尔断然拒绝了野村的请求。他说：“除非控制政府的那些阻碍和平的人能下定决心，确实要在和平道路上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否则，正如已经显示的那样，谈判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日本外交官离开后，通常对美日谈判细节保持沉默的国务院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纽约时报》11月28日报道：

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昨天似乎已经耗尽，下一步——要么谈判要么开战——完全是东京的决定。总统罗斯福在国务卿赫尔的陪同下与日本外交官举行了45分钟的会谈……日本官员现在正在等待东京对“赫尔照会”的回应，确定该国在远东地区的基本政策立场。会谈前，有报道说日本正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可能要袭击泰国。对于周三晚间交给日本官员的照会，东京高层表现得很平静，说明日本

对这种答复早有预料。

美国政府现在表示，是否开战完全由日本决定，这与东京领导人的看法恰恰相反。

说东京高层对“赫尔照会”表现得很平静并不是事实。双方的判断都有误，但这些误判主要是东京在过去执行外交政策时的善变和不灵活造成的，尤其在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和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罗斯福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战术策划能力，却高估了日本与纳粹政权关系的紧密程度。但归根到底，不论感到多么耻辱而难以接受，避免战争的选择仍然在于日本，而非美国。尽管日本领导人认为自己被逼上绝路，但限制东京作出这一选择的战略期限和官僚主义规则都不是美国制造的。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被误解的一方，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对美国妥协。而实际上日本以《甲案》和《乙案》形式作出的妥协最近才浮出水面，为时已晚。“赫尔照会”现在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走上战争这条可怕的道路，他们心中只有自怜、愤怒和一个赌徒应有的胆量。另一方面，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便同时还要与德国作战。丘吉尔对日本命运的预测是：“他们将被碾成粉末。”

当然，日本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一感觉源自日本对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恐惧。日本很容易将战争看做该国为了亚洲与傲慢西方人的对抗。在大范围文明冲突中，所有西方国家（白人）都是日本的潜在敌人。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与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密切协商，他代表天皇问道：“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必须考虑德英关系和德美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原嘉道并不信任德国，或者是任何“白人”国家。希特勒曾将日本列为二等民族，这让原嘉道感到不安。由于德国没有直接向美国宣战，他担心一旦开战，日本将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说：

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抗情绪与对德国一样吗？相比希特勒，他们是否对日本感到更愤怒？一旦开战，我担心德国、美国 and 英国会达成协议，准备抛下日本。他们对黄种人的憎恨将很快发泄到日本身上，

超过对德国的憎恨。我们必须为这一可能性作好准备……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种族因素，必须确保大日本帝国不会被抛弃，不会被雅利安人所包围。

对于原嘉道来说，“雅利安人”包括所有白人。日本人的许多感受都与肤色息息相关。

但种族自卑和脸皮薄并没有让日本领导人丧失判断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本忍受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当时俄国、德国和法国干涉《马关条约》的签订，以满足其各自帝国主义需求。与民众反应不同的是，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领导的日本政府决定不发动战争，因为打赢的机会渺茫。于是，日本主动退出辽东半岛以避免灾祸，日本领导层作出了谨慎的政策选择，与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大战略目标相符。

而在1941年11月，日本缺乏明治时代那种有能力的领导人。我们很容易从11月29日的午餐会看到这一点：日本几位前首相这一天与天皇共进午餐，讨论“赫尔照会”，虽然他们都不想开战，但大多数人都宁愿直抒己见，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改变既定政策。只有向来反对纳粹的米内光政大胆发言，他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但这种含糊的表态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近卫文麿才真正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意见。他问，日本付诸战争是否真的必要，“我们必须坚持现状吗？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等待艰难时刻过去，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打破僵局呢？”遗憾的是，这种表态来得太晚了，他本可以在7月和9月批准御前会议决议前，发出相同的疑问。日本前首相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来帮助和鼓励天皇迎难而上，利用自己的权威来叫停备战。

午餐会结束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宣布战争计划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日本即将进行的战争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东乡甚至都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打响，他向永野问道：“还有外交争取的时间吗？”这位军令部总长回答：“还有一些时间。”东乡又问：“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火？……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日期），否则我们不能

开展外交。”永野说：“好吧，是12月8日。你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呢？”

在大洋彼岸，没有被自杀式宿命论影响到的野村和来栖认为，现在只有天皇才能够改变日本的行进路线。他们不断听到罗斯福和赫尔抱怨，日本领导人从未公开表示想要和平的愿望。他们也看到，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怀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11月26日，就在收到“赫尔照会”前，来栖主动对东乡说，作为最后一搏，可以要求天皇进行干涉，防止外交谈判崩溃。来栖的打算是，请求罗斯福给天皇去信，表达想要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及美日合作的意愿，天皇届时只需作出同样的回应即可（来栖知道天皇绝不会主动去信）。来栖希望，这样做将让谈判得以继续。

来栖向东乡建议，作为东南亚的长久解决方案，日本应当同意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泰国建立中立区，这将让双方受益，不但可以打消美国对日本南进的怀疑，还可以提前阻止美国在荷兰的同意下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企图。最后他恳请将自己的想法传给内大臣木户，并立刻予以答复。

野村完全同意来栖的计划，但东乡立即表示反对。尽管如此，他仍然与木户进行了协商。木户并不同意，他说“现在并不合适”让天皇参与其中。然而，还有一位皇室成员可能很想让天皇干预局势。11月30日，36岁的海军少将高松宫宣仁亲王来宫里拜访他的哥哥裕仁，他最近被调到了军令部中工作。

这对兄弟有4岁的年龄差，由于要继承皇位，裕仁从小也不跟其他弟弟一起长大，但他们的关系仍很亲密。爱好体育、精力充沛的高松宫宣仁亲王一直被认为是主战派，但这天他对天皇说的话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根据木户的记录，高松宫宣仁亲王对裕仁说：“海军经不起战争。大家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海军想要避免日美开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机会，战争将无法避免。海军将在12月1日为战争进行调动，之后，（战争）就无可阻挡了。”

裕仁向他的弟弟坦白承认，他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天皇才更应该现在采取行动。裕仁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说，他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都已通过的决定，再说也没有天皇执行否决的明确宪法程序。裕仁说：“如果我不同意开战，东条就会辞职，之后将爆发一场大的政变，这样反而引来更多荒唐的开战理由。”当然，他选择不干涉的做法已经让“荒唐的开战理由”占了上风。高松宫宣仁亲王离开后，木户召见东条进宫，以便天皇澄清自己对军事行动存留的任何疑问。东条没有对袭击计划的细节作任何评论，他推荐军令部总长永野和海军大臣岛田来进行进一步阐述，他说：“海军战略是（未来战争中的）一切。”

两位海军军官抵达皇宫。他们重复了海军进行备战的熟悉论调，表示自己只等天皇一声令下。裕仁问道，如果德国不出手帮助日本该怎么办（他已经听到原嘉道关于“雅利安人”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为了平复天皇的心绪，岛田表示，大日本帝国并没有指望德国的任何帮助。

然而，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友开战的出发点是德国取得胜利，或至少德国在欧洲占支配地位。11月15日联络会议通过的“推动对美英荷战争终结计划”说：

我们的目标是立即消灭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地区的基地，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防御，我们应积极促使蒋介石政权的投降，与德国和意大利合作，首先加快英国投降，然后尽力削减美国继续战斗的意志。

德国战败或者德国与同盟国妥协从来都不在日本正式作战计划的考虑范围。

天皇并没有听到多少真心话。他不但没有下决心阻止战争，反而还认为战争的齿轮已经“自动”开始运转，日本必须经历重大手术才能治愈“太平洋肿瘤”。

很巧的是，同一天，日本《报知新闻》报道：“告诉癌症患者一

个重大好消息，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冈田教授发现了所有癌症的治愈方法。”这名教授称，4月以来，他通过注射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的方式治好了十来位病人。这位教授还很谦虚，说这些人的癌症仍有复发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可能性极低。他相信这些人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治愈。

当然，日本并没有这种梦幻般的癌症治愈法。

1941年12月1日，东条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是5个月里的第4次御前会议，会议气氛肃穆。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这次会议是要批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在“讨论”开战事宜时，政府和军方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裕仁天皇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原嘉道询问了关于泰国中立的问题，以及东京对空袭的防备问题，这是出乎意料的，似乎他已经预料到这座城市将遭受毁灭。原嘉道还认为，“赫尔照会”中有几点需要澄清。在他看来，美国要求日军撤出中国似乎并不包括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原嘉道说，如果的确不包括，那么“赫尔照会”是不是并不像开始看到的那么强硬？东乡并不确定，但现在讨论这些细节为时已晚。这次御前会议与前几次一样，只是为了走个形式。

最终，裕仁对决议进行批准：

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圆满）结果。大日本帝国将与美国、英国、荷兰开战。

11月2日，山本五十六从广岛附近岩国（Iwakuni）湾停靠的“长门”号上向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发送无线电信息，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正在开往珍珠港的路上，即将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消息是“登新高山1208”。

日本将在12月8日开战。

尾声 新的开始

1942年6月18日夜，瑞典美国船运公司的“格里普斯霍尔姆”（Gripsholm）号从纽约驶出，船上有一群曾被关押在临时营地的日本公民，其中一处营地位于埃利斯岛。另外，日本政府派的“浅间丸”号从横滨港出发，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从上海出发，它们最终将把来自北美和南美的国民送回家。

被送回来的日本公民中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包括野村和来栖。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的这一天，他们经历了任何外交官可以想象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为了确保在夏威夷军事行动的成功，日本政府将开战的决定完全瞒着这两位外交官。袭击的前几小时他们才接到东京打算断交的通知。

日本使馆的管理低效，致使野村和来栖没能通知白宫日本结束外交的决定。东京命令野村和来栖于下午1点去见赫尔，此时第一枚炸弹还没有落到珍珠港。由于包括14个部分的外交文件在打字时受到耽误，两位日本外交官于2点20分才抵达赫尔的办公室，他们丝毫不知道日本已经袭击了美国。

赫尔才读了几页他的手就开始颤抖。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理解赫尔为何如此生气。他读完全部文件后（这不是他第一次读到这份文件，上午10点罗斯福就拿到了被破译的文件电报），对野村说：

我必须说，在我与你的所有对话中……我从未说过一句假话。所有的会议记录都能为我作证。在我担任公职的50年里，我从未见过一份能充满如此无耻谎言和曲解的文件——其规模如此庞大，今日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地球上竟然有政府能够说出这种谎言。

两位外交官十分困惑，无言以对，他们离开时仍然不清楚自己不知不觉中参与的巨大外交骗局。

由于是周日，野村和来栖抵达美国国务院时没有太多工作人员和记者，但离开时，他们却被大群记者簇拥。他们逃回日本使馆，紧闭铁门，警察需要出面制止愤怒的群众在使馆前聚集。这时他们才得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并且意识到，赫尔在见他们时早就接到了通知。

在动身前往华盛顿上任前，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过他：“小心一点……今天的这一伙人将来在你爬上去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让你的身下抽走梯子。”

太平洋开战后的几个月里，野村、来栖及其他日本国民在临时征用为关押营地的拥挤酒店中等待被遣返（比起其他日本移民以及日裔美国人被关押的拘留所，这里的条件很不错了）。在弗吉尼亚州的温泉酒店，来栖有足够的时间回想，两国在为和平进行最后谈判时到底出了什么错。

虽然两位外交官明白他们的任务紧急，但他们并不清楚（东京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小。11月30日，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用暗语快速地交谈着，东京想要他们为避免战争继续作出努力。因此，野村和来栖在11月29日这一东京规定的最后期限后，仍然亢奋地进行工作，他们在12月1日提出一项建议，让来自两国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最好在火奴鲁鲁。野村提议日本出动重量级人物，希望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能够出席会议。

直到1942年夏天，来栖才终于知晓日本进攻前的10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日本占领的新加坡，“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短暂进行了停留，他无意中听到陆军军官回忆，开战前几天的准备有多么困难，因为军方领导人直到11月26日才决定开战。

这一发现让来栖心灰意冷。军方领导人11月26日决定开战的事实说明，要求他和野村继续开展外交只不过是存心欺骗对方。当然，他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东京即将放弃外交路线，尤其在收到“赫尔照会”后。11月28日，东乡对他们说，他对这份照会的内容感到“遗憾和

惊讶”，他暗示外交谈判可能很快会终结。但东乡当时让他们等待将在3天之内发出的正式命令，而接到谈判终结的命令后再向白宫递交名为《大日本帝国政府观点》的文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表现得很正常。

这份官方文件并没有到来。12月3日，东乡指挥他们继续纠缠美国。东乡的原话是：“我认为，（《乙案》）是克服困难局势向前推进的最好方式，你必须将这一点向美方解释清楚。”东乡称，即使棘手的中国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让来栖和野村重新燃起外交和解的希望。直到12月5日，野村和来栖才要求赫尔重新考虑《乙案》，尽管罗斯福政府发布了“赫尔照会”，但也没有正式否决《乙案》。同一天，罗斯福还向裕仁天皇发送了一封和平电报。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

来栖和野村在珍珠港袭击发生后才递交断交信，这在战后的日本引起了持续几十年的激烈辩论。这迟来的断交信让罗斯福有理由强烈谴责日本的虚情假意，最著名的要数罗斯福的“耻辱日”演讲。日本人的行为强化了总统的开战决心，不但对日本开战，还对日本在欧洲的法西斯同盟开战。有人推测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知晓日本即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但他们坐等日本进攻，以便让美国加入欧战，这激起许多人的想象。

也有人认为，军方故意让日本推迟递交断交信，以确保日本的进攻不会有任何先兆。实际上，使馆人员虽然没能及时准备最后的这份文件，但他们从未挨罚——甚至有些人还在战后获得升迁，这加强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其实，日本发出迟来的消息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既包括使馆准备工作的不力，还有东乡向军方的妥协，以确保进攻计划的成功。山本五十六坚持认为，日本应当提前警告美国日本将发动武力进攻。裕仁也这样认为，他想让日本遵守国际法原则。12月3日，外务省起草了准备递交赫尔的最后备忘录，其中包括日本可能根据《海牙公约》宣战的句子，但东乡将这一部分删掉了。为了军事战略的严格保密，

这种敏感信息故意留待最后一刻才对华盛顿发出。

即使赫尔在珍珠港袭击开始前就收到这份最后文件，这仍然不会减弱日本发动袭击的震惊感（和非法性）。迟来的消息对罗斯福更有利，帮他让美国人团结一心，但罗斯福也表示，偷袭珍珠港并同时用外交作掩护的战略是日本最恶劣的行为。他在12月8日的国会演讲中漂亮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全国民众：

就在日本空军部队已经着手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和同僚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消息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却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攻击的威胁或暗示。

珍珠港事件发生3天后，西波托马克公园里4棵最大最美丽的樱树被人故意砍倒。这些树曾经是美国和日本友谊的象征，两国之间“总有商谈余地”，现在这些树却成了美国强烈仇恨的对象。在“铭记珍珠港”口号的带动下，美国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贩子渴望打响这场战争，以便不要“浇灭士气”。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在里约热内卢装了更多被关押的日本人后，于1942年7月20日抵达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港口洛伦索—马贵斯（马普托）。两天后，插有日本旭日旗的“浅间丸”号和“绿伯爵”号也在这一印度洋港口停靠。战争双方正是在这里进行了国民交换。来自北美和南美大陆的日本国民在这两艘日本派来的船上重新安顿下来。同盟国和轴心国阵营的国民之间没有直接接触。但在港口等待时，野村和来栖都看到对面格鲁大使那高大的身影。来栖立刻回想起1941年11月初他动身前往华盛顿前的晚上，他与格鲁会面的情形。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足以说明，和平早已远去。3人默默地向对方脱帽致敬。

1942年8月20日，载有日本国民的轮船回到来栖的家乡横滨。此时，日本在海上的优势正迅速下滑，均势局面开始被打破。6月4日至7日，大日本帝国海军打了一场近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中途岛战役。当年策划珍珠港袭击的这个人再次制定中途岛战略，希望永久

将美国赶出太平洋。结果日本惨败，失去了8艘航母中的4艘，以及300多名优秀飞行员。此时，日本的军事密码已经被美国破解（而在珍珠港袭击时，只有外交密码被破解）。日本海军从辉煌的顶峰上跌下来只用了6个月。

大多数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搭载海外国民的轮船回到日本时，珍珠港的余热仍未散尽。野村和来栖参加了一系列庆功会，包括宫廷御宴以及与首相共进午餐。似乎日本政府急切想要补偿在外交危机中受尽折磨的日本最高代表，他们成为了美国的公敌。他们被关押期间也是仇恨的目标，有人涂鸦说：“谁是来栖，我要拧断他的脖子！”回到日本后，这些遭受欺凌的人突然之间被抬高到国民英雄的地位。

来栖喜欢将外交比作在沙滩上画画，无论外交官能达成多少协议和盟约，政府政策一旦改变，所有这些都会被水冲走。他的儿子来栖良决定学习工程，而不是走他父亲的老路，他说：“我想为国家繁荣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留下一些持续时间更久的东西，即使只留下一座桥梁。”来栖良并没有机会建造一座桥，1945年2月，这位生于芝加哥、日美混血的试飞员在他父亲无力阻止的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曾驾驶“神风”飞机、在布鲁塞尔受到过来栖欢迎的两位潇洒的飞行员也在战争中阵亡了。年轻一些的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后死于金边（他在飞机跑道上行走时被卷入运动中的螺旋桨，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自杀）。不到两年后，他的飞行搭档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失踪了。1944年10月，日军“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的莱特首次出击，指挥他们的正是珍珠港策划人之一，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神风”飞机自杀式袭击的恶名很快淹没了这两位飞行员曾经创造的成就。

小提琴家諏访根自子（Suwa Nejiko）是来栖家的挚友，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她决定跟着她的俄国导师伯里斯·卡曼斯基继续学习。她是一位天才少女，常常前往德国，与汉斯·克纳佩兹布什以及柏林爱

乐乐团一起演奏。1943年2月，约瑟夫·戈培尔赠给她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后来她被进入欧洲的美军逮捕，关押在美国，最终在1945年12月回到日本，此时日本已是一片废墟。

然而，来栖和野村1942年夏天回到日本时，东京虽然形势困难但仍能维持。两位外交官被迫参加了各种欢迎仪式。有一次，裕仁对日本的处境没有表露任何感受，他只是称赞了他们的敬业精神。高松宫宣仁亲王则更加直率，他对来栖说，很遗憾外交没能占据上风，最后不得不开战了。

在与首相的午餐会上，东条谈到日本政府以及他本人在1941年11月末最终决定开战前的种种顾虑。毫不意外的是，他说政府是被迫选择战争路线的，因为美国从未停止欺压日本。他说，对日本来说，战争从来都不是首要选项。他还表示，如果罗斯福对天皇的来信早3天到，战争或许就能避免（罗斯福的和平信件于日本时间12月7日晚抵达格鲁大使手中，但参谋本部扣押这一信件长达10小时，故意破坏任何最后一刻的努力。裕仁在珍珠港袭击前半小时才读到这封信。实际上，来栖11月26日就提议罗斯福和裕仁天皇交换和平信件，但他当时没能让东乡和木户相信此举的价值）。

虽然东条将战争原因自我解读为美国的强硬，但日本政府的内在根本问题在整个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领导人尽管偶尔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意念、欲望或勇气来阻挡战争洪流。

尤其对军方诸位总长和次长来说，他们呼吁备战比阻止战争更容易。其他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不敢明确对战争说不，而作强硬表态则让军方领导人充满力量和勇气。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让每个领导人觉得，他们不担负个人责任。

从1941年4月至12月，日本领导层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但许多决定一开始并不是要走战争道路。而随着每一步深入，留有的余地越来越少，但这场与西方无法打赢的战争绝非不可避免。尽管可能会丧失明治时代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但日本领导人最终还是走上了毁灭与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目标是让日本在短期内的生存和自我维持的

机会最大化，并长期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亚洲。日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都没有实现，因为这样的计划并不现实。日本对待战争的心态就像赌徒，他们喜欢一开始占据优势的满足感，打算赢了钱就跑，只是在这场游戏里，逃跑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的确，珍珠港袭击被全国称赞为令人惊叹的大胜。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为了缔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光荣而英勇的选择。据说天皇对珍珠港胜利的消息也感到高兴。然而在东南亚，大多数刚刚纳入日本控制下的人民却抗拒日本强加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的占领比西方殖民主义更虚伪，因为日本宣称的崇高理想与其统治规划的混乱形成巨大差别，这通常导致贫穷和残暴。所以人们常说，珍珠港是战术上的巨大胜利，但却是战略上的巨大失误。但它算是战术胜利吗？1941年12月7日，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决定缩短预定袭击，第一波袭击出动的183架飞机中仅损失了9架，只遭遇到零星回击。但在第二波袭击中，167架飞机损失了20架，南云对战机损失数量的上升感到泄气，于是选择放弃。

结果，美国的油轮、机械工厂及其他设施大多完好无损。美国的潜艇和航母也没有损失，珍珠港袭击时美国的航母刚好不在港。另外，珍珠港水浅，受损的军舰比较容易修理，所以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很快就恢复了。

至于在空袭前派小型潜艇自杀式攻击的计划，这些水兵的死除了用作宣传外毫无意义。各大报纸都将他们称为“九军神”（一共派了10人参加潜艇袭击，一人存活并被美军俘虏，但日本普通民众并不知情）。在开战一周年紀念日上，这些人受到国民英雄般的祭拜。

开战一周年的另一个亮点是海军省拍摄的一部电影《夏威夷—马来亚冲海战》，1942年12月3日向公众放映。该片的主角是一名飞行员新兵，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成长为帝国海军的优秀飞行员。这部电影配着雄浑的音乐，它的高潮是日本袭击夏威夷以及马来亚海战，最后以大日本帝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宣战结束。但日本领导人靠珍珠港和马来亚进行的胜利宣传的日子不多了。

大兵潮津十分清楚，宣传电影里描绘的士兵生活与实际的差别相当大。他的漂泊命运仍在持续。1941年12月8日，在不知道目的地的舰船上，他所在的部队得知了日本宣战的消息。这艘舰船驶过印度支那东南的金兰湾，进入湄公河，在西贡加油，最终将士兵带到泰国南部。他们即将与英国打响马来亚战役，他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了下来。

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后，潮津被派往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棉兰维持当地秩序，那里的生活相对平静，日本占领者与当地人民相处和睦。他在这里从未感到饥饿，但他很想家。1942年12月，他听说自己因年龄过大而即将退伍，他非常兴奋，而他的回家之路又是一段生死历险。他乘坐的船总是要躲避鱼雷进攻，当他及其他满心期待回到祖国的士兵在夜间抵达广岛时，由于战时停电，港口四周一片漆黑，他们的船相互碰撞，一些人落入冰冷的水中身亡，而另一些人则被救上岸，潮津就是其中之一。

到1944年年中，日本本土恐遭袭击的预测催生了一项新政策。仍然在东条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宣布，将13座城市的小学生紧急撤离。这些8岁至12岁不等的孩子被疏散至乡村，他们以群居方式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他们通常将就在设施极其简陋、拥挤不堪的寺庙或传统民居里过夜。共有大约80万儿童经历了这次集体疏散，他们忍受着饥饿和思乡之情，过着简朴的日子。这形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报纸和杂志则粉饰着这次疏散，这些媒体说，孩子们享受着乡间新鲜的空气，他们的笑脸见诸报端——虽然都是缺乏营养的脸庞。在一张照片上，一群小男孩在浴室地板上蹲成一圈，每个孩子都在为他前面的孩子搓背。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但他们皮包骨的身体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孩子哪有力量去笑，更何况去搓背。

除了发给他们少量食物外，这些被疏散的孩子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他们首先必须忍受饥饿。这些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画食物。一位妇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松糕、饺子、油酥、甜酥饼、焦糖、大米饼干……我们把这些都画了出来，几乎是你能记住的所有小吃。画

好后我们相互展示，并讨论这些东西实际上有多好吃。”由于抱怨和不满的信件影响士气，所以他们的老师在信件寄出前要检查每一封信。1941年10月实施了国家审查和没收信件制度，即使孩子们的信件也不例外。

杂乱无章的疏散行动是日本对美国威胁的直接反应，美国有可能登陆其本土，尤其在1500英里外的塞班岛失陷后，这种可能性陡然增大。1944年7月7日塞班岛沦陷，5.5万多名日本人（包括平民）死亡（1920年，国际联盟将塞班岛划给日本管理，岛上于是住有日本人，包括归为日本人的台湾人和朝鲜人，1943年其人口为29348人）。南云及其他海军将领命令士兵“像英雄般战死”，成为阻挡美国的“海上堤坝”。南云作出表率，7月6日他在塞班岛失守前自杀。在失去军方保护后，平民也必须作出“最终献身”。许多人选择死亡而不是投降，有时是在残留日本士兵的指挥下，这些士兵要保证不会有人去忍受被俘的耻辱。

这种可怕的爱国忠诚度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胶片形式记录了下来。岛上的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跌跌撞撞地走到火山悬崖的边缘，最后纵身一跃。你能感受到他们向下看时有些许犹豫和短暂恐惧，但坚定的信念让他们克服恐惧，跳了下去，这些天皇的忠实臣民最后通常要喊一声“万岁”！随着美国向前推进，天宁岛、关岛、冲绳也出现了类似的自杀景象。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失败再也瞒不住了。1944年7月18日，日本国民听到塞班岛战败的消息，同时还有东条内阁的辞职消息。7月20日，东条辞职两天后，华尔基利行动（Operation Valkyrie）上演，这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行动。这位狂热的元首仍将继续领导德国，直到他自杀身亡。

没有希特勒的德国立刻会有很大不同，但没有东条的日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导致决定开战的体制和文化缺陷仍然存在，而为了战争已经投入的巨大物资和人员牺牲更让人没有办法轻易结束战争。即使上层领导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他们希望德国或者苏联能

够介入调停），但日本仍然要再等待13个月、更换两任首相、日本主要城市完全被毁、吃了两颗原子弹后，天皇才最终插手，结束了这场没有任何退出计划的战争。日本领导人向来喜欢自保、爱面子的问题最终在1941年让日本作出史上最鲁莽的决定，但类似的问题在1944年和1945年仍在作祟。

另一方面，生活仍在继续，孩子们仍在被疏散。1944年8月22日，大约700名儿童在从冲绳运往鹿儿岛的途中死亡。美国潜艇已经如此接近日本了。疏散计划于1945年3月终止，城市家庭需要自己为子女的安全作出打算。家庭团聚的时间常常是那样短暂，许多被疏散的孩子刚一回到东京就赶上3月10日拂晓发动的东京大空袭，这次空袭也让作家永井荷风的房子化为灰烬。

几乎每一座日本城市都遭到毁灭，不断传来士兵的死亡消息，这让日本人的士气跌至谷底。对忍受疾病、饥饿、躲避燃烧弹的国民来说，生存下去成了首要任务。在炸弹袭击时，一位母亲搂着孩子窒息而亡；乘船逃生的小女孩看到，河面上到处是快要死去的人；人们扒着烧焦的尸体寻找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故事已经司空见惯。举行御前会议的明治皇宫也在1945年5月烧毁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的最后两次御前会议被迫在防空洞内举行。

农村生活相对不那么紧张，但物质也很匮乏。植物的根成为主食，给成长中的孩子提供宝贵的蛋白质和钙。学生们跑到树林里采集松脂来制作汽油（这并不容易成功）。为了生产飞机，所有家庭的金属物品，包括水桶和长柄勺，都必须上交。一名农村孩子推测说：“我们一定要输了，不然政府不至于将穷人家的厨房用具都收走。”但带有宿命论的国民并不抱怨，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似乎是在忍受持续的自然灾害而不是人为灾害。

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一小群人（主要是军官，但也有电影工作者、大学生及其他民众）偶尔能观看英国人在东南亚留下来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日本人对这部将近4小时影片的质量、技术和魅力感到惊叹。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可能击败一个能拍出如此精妙

绝伦电影的国家（另一部留下来的电影是迪士尼公司1937年制作的《白雪公主》，它的质量也远超日本的动画制作水平）。

1945年8月17日，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3天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成为首位（或许也是最后一位）皇族首相。他的任务是要解除武装，将该国交给同盟国占领军，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以及重振人们的士气。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一位演说家，总能以简单而有力的语言进行演讲。9月5日，他在有美国大兵旁听的国会会议上强调说，日本不会抓着战争的起因不放，而是要向前看。他说整个1亿人的国家都有责任，因为大家都需要为此忏悔。这与不久前只剩下竹质长矛和头盔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发言很有作用，尤其在1945年夏末，因为摆在日本人面前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的话还为此后的日本领导人定下了基调，他们选择忽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谁该为发起这场战争负责？这场战争毫无必要的说法难以让日本人接受，毕竟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那么多。但官方故意选择忽略也容易让人们对其他问题进行逃避，比如接受战争罪行和铭记战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忘记自己经历的一切。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恰恰相反，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来接受这段战争历史的许多方面。活到84岁的大兵潮津有足够时间来悄悄反思他的经历。虽然他一生中从未谈起这段往事，但他小心地留下了一份书面记录，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情。

宣称所有日本人都应对战争负责的言论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没有人会受到责备，这也回避并冲淡了日本领导人的责任，正是他们把日本引向战争深渊。近卫公爵在东久迩宫内阁再次成为公众人物，他无疑是东久迩宫稔彦王政策路线的支持者。保守派政治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权，他们乐于接受这种偏袒、不完整处理日本过去的方式。虽然个体民众、学者和记者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坦诚辩论，但很难否认的是，日本官方在本质上一直倾向于忽视这段令人不快的不堪往事。

1952年，《乱世佳人》终于在日本上映了，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日本人十分同情热情、鲁莽、不屈不挠的南方姑娘斯嘉丽，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即使失去了一切也依然意志坚定。她最后一句名言“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在战后日本人心中引起广泛共鸣，他们试着在战争的废墟中寻找光明的未来。这正是日本的选择：带着这一不可思议的过去，蜕变为崭新的国家。

人生潮起潮落，

若能把握机会乘风破浪，必定能马到成功。

若不能把握机会，他们人生的航行就只能受限於浅陋和悲苦之中。

我们正漂流在茫茫大海，

当浪潮涌来时，我们必须把握住它，

否则就会使我们的冒险失败。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主要人物

主要人物

东久迩宫稔彦王：皇室亲王；陆军大将；裕仁天皇的叔叔

裕仁：昭和天皇；1926年至1989年在位

贺屋兴宣：1941年10月起担任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裕仁的心腹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担任首相，是日本国际危机加深时期的领导人

来栖三郎：近卫内阁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的日本驻德大使

松冈洋右：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主导日本的亲轴心国外交，最终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永野修身：海军大将；1941年4月起担任军令部总长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1941年1月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曾担任过外务大臣

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1940年9月起担任近卫内阁海军大臣

西园寺公一：近卫首相政策顾问；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

西园寺公望：公爵；现代日本最后一位元老、最有权力的政治家；曾将近卫视为其门生

岛田繁太郎：1941年10月接替及川担任海军大臣

杉山元：陆军大将；1940年起担任担任参谋总长；第一次近卫内阁（1937～1939）陆军大臣，使中日战争加剧

铃木贞一：企划院总裁；退役陆军军官，受到近卫和东条信任，常常担任二者之间的联络人

高松宫宣仁亲王：皇室亲王；1941年成为军令部成员；裕仁天皇的弟弟

东乡茂德：20世纪30年代末历任驻德国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41年10月起担任外务大臣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近卫内阁陆军大臣；近卫辞职后成为首相

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时任海军次官

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此处及整本书出现的日期均为当地时间）

1853年7月：海军准将马休·佩里敦促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

1854年3月31日：德川幕府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结束闭关锁国体制，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港口。

1868年1月3日：幕府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1882年1月4日：《军人敕谕》颁布，这份军人行为准则将形成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

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颁布。

1890年7月1日：日本首次举行大选。

11月25日：日本两院组成的国会首度召开会议，4天后再次召开会议。

1894年8月1日：日本对满清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4月17日：日本击败中国，签署《马关条约》，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催促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三国干涉还辽），日本5月5日同意交出辽东半岛。

1898年3月27日：俄国成功拿到辽东半岛租借权。

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以平等身份缔结英日同盟。

1904年2月8日：日本在亚瑟港袭击沙皇俄国，两天后才对俄宣

战。

1905年5月27～28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

11月17日：朝鲜成为日本的受保护国。

1906年8月1日：日本成立关东军，以保卫刚从俄国手中夺得的“满洲”。

1910年8月29日：日本吞并朝鲜。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睦仁驾崩，其子嘉仁继位。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前占领德国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地。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但日本压迫中国时没能取得外交特权。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

1922年2月6日：日本签署《九国公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开启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及随后的火灾让东京被毁。

1926年12月25日：嘉仁驾崩，皇太子裕仁继位。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五”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会议开始。

11月4日：由于批准《伦敦海军条约》，首相滨口雄幸遭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身受重伤。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炸毁穆克顿（沈阳）附近的铁轨并嫁祸给中国，随后入侵中国东北。

9月24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批准关东军占领“满洲”吉林省，纵容军方的擅自行动。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宣布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

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发布报告，谴责日本入侵“满洲”。

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占领热河（今河北省北部），这是“满洲国”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日本想在华北建立根据地。

2月24日：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鉴于“李顿报告”获得通过，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

5月31日：日本成功迫使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签署《塘沽协定》，在河北东部靠近“满洲国”边界的地区设定非军事区。

1935年6月：日本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从河北、察哈尔、内蒙古撤出部队，日本得以确保“满洲国”周边的势力范围。

1936年2月26日：青年将校在东京发动政变，差一点成功，但裕仁果断介入平息政变。

12月12日：蒋介石被反日军阀张学良绑架，被迫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磨成为首相。

7月7日：中日双方在北京附近的马可波罗桥擦枪走火，中日战争打响。

12月13日：日军攻陷并洗劫国民党首都南京。

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宣布日本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实施一系列紧急集权措施以开展有效的战争动员。

7月1日：美国开始针对日本，对飞机及零部件实行“道义禁运”。

11月3日：近卫宣布，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目的是要建立“东亚新秩序”。

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辞职。

2月10日：日本开始占领海南岛。

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亲日政权。

5月7日：珍珠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基地。

6月4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工业设备。

6月17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7月22日：近卫第二次担任首相，松冈洋右成为外务大臣。

7月底至8月初：美国对日出口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受到严格管控。

8月1日：松冈用“大东亚共荣圈”来形容政府的野心，日本渴望领导一自给自足的地区集团。

9月23～29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5日：美国加大对蒋介石的财政援助。

9月26日：美国禁止对日本出售钢铁和废铁，从10月16日开始生效。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10月12日：近卫领导下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日本政党政治结束，“新体制运动”开始。

10月31日：舞厅关闭，爵士乐表演在日本成为非法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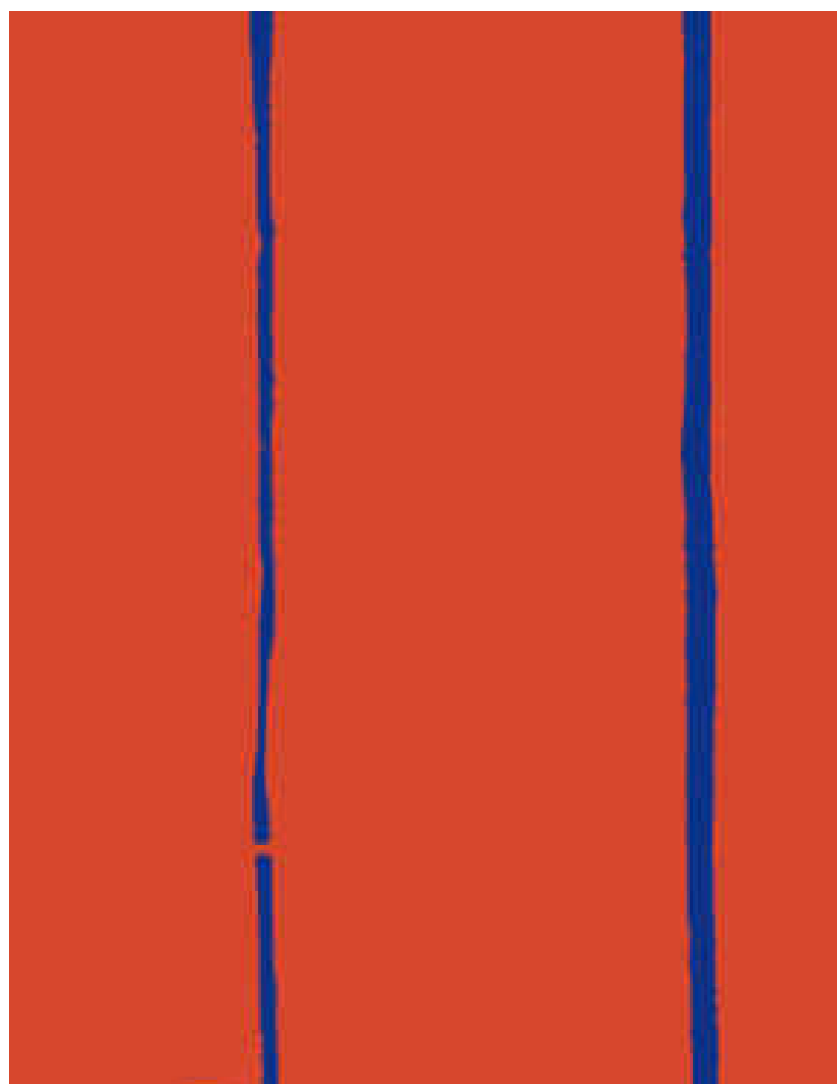
11月10日：全国庆祝日本皇室2600年的统治。

1941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士兵战死沙场，不能被俘，这种美化牺牲的训诫成为日本战时信念的基石。

2月11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抵达华盛顿。

3月12日：松冈启程前往欧洲，会见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1] 编者注：原文为“Zeitaku wa Su-Te Kida”



Samuel P. Huntington

美国政治

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美] 塞繆尔·P. 亨廷顿 著

先萌奇 景伟明 译

AMERICAN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POLITIC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66-3030-3

书名原文: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I.①美... II.①塞... III.①政治 - 研究 - 美国 IV.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7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3748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不协调的政体

“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

共识、对立、多元：美国政治的结构范式

理想与制度

第二章 美利坚信条与国家认同

美国的政治思想

美利坚信条的来源、范围和稳定性

政治理念与民族认同

第三章 鸿沟：美利坚信条与政治权威

共识与不稳定

第四章 对“鸿沟”的应对

美国的认知失调

不同的回应模式

鸿沟与美国政治的风格

第五章 信条激情的政治

美国历史上的信条激情时期

信条激情的氛围

信条冲突：运动与体制

改革及其局限

政治地震与政治重组

第六章 信条激情的源头

信条激情缘何出现？

一般根源：其他社会中的类似现象

一切源头尽在英国革命

美国政治的新教主义

第七章 S&S时期：1960—1975年

50—70年代：变化回应模式

冷漠自满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自欺欺人的插曲和道德主义的激荡

抗议活动的动员

曝光的动力

遗产

改革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

机构重组

权威的滥用与侵蚀

犬儒主义与权威重建

第八章 美国理想与制度的活力

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未来

历史vs进步？

美国vs世界？

权力与自由：美国压迫的神话

序

塞缪尔·亨廷顿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知名和最受推崇的政治学者。他的著述一出，往往是洛阳纸贵，风行全球，不仅改变学术研究的焦点和思路，也影响各国的政策讨论与选择。在他丰富的著作谱系中，本书通常不属于最受关注之列，但在当前的世界政治气氛下却非常具有阅读价值和思考启迪意义。



本书以往没有走到聚光灯下，当然不是由于它的质量，而是归因于它的题材。此书不像《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样，直击世界政治潮流的变化，以全球视野讨论普遍性问题，因而迅速激发热议。它分析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政治，而且在行文当中又不像亨廷顿教授早期的《士兵与国家》或晚期的《我们是谁》一样，直抒胸臆，放言无忌。在本书中，读者看到的是中年亨廷顿——成熟而通达，充分了解政策与社会现实，但仍不失理想与乐观，在不和谐的嘈杂当中寻找稳重的节奏，为常识与共识开拓发声的渠道。这样的亨廷顿，浮躁的阅读心态恐怕欣赏不来。

而对于想深入了解美国、特别是想真正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则是绝对不应错过的。它所书写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美国是WASP文化居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之国，在此之后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占据主流；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和政治家总体而言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和信任，在此之后则受到严厉批评和严格监督，从总统到国会各种政治机构的信誉一落千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相对超脱于国内政治的纷扰，对外战争一度在爱国旗帜下得到不假思索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后外交领域再无特殊待遇，反战反干预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经历了1965—1975年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和反文化（挑战WASP文化传统）两大运动的洗礼，美国才一变而成我们现在习见习闻的样子。美国进步左翼和保守右翼的分野也是从那个时代延续至今，当前大部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争议课题追根溯源也是产生于那个年代。

亨廷顿此书恰是对这个动荡年代的总结和剖析。依据亨廷顿的部分观点，特别是他后期关于世界政治的某些主张，有些学者喜欢把他定义为保守派政治学家。其实亨廷顿终其一生都是民主党人，在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堡垒——哈佛大学任教，在70年代末期与布热津斯基一起加入卡特政府的外交团队工作。他这种中间偏左的政治底色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他不仅客观、忠实地记录60年代的变革诉求和政治争论，而且总体上对发起变革的年青一代持肯定态度。尽管他本人因为对美国政府开展越南战争建言献策——如支持在南越强制推行“战略村”——而受到反战学生的“冲击”，但他仍乐观地评价时代变迁，称60年代“是抗议的时代，也是重申道德的时代，人们激情勃发，无论是好是坏，都在努力去实现美利坚信条的原则与价值”。

二

作为构建分析理论的大师，亨廷顿自然不会满足于对60年代进行就事论事地评估，而是把它置于美国政治历史的视角下，探寻长期的规律性解释。在他看来，60年代的争论与动荡是美国经历的又一次“信条激情时期”。在此之前，美国政治已经出现过三次类似的激情

时期，分别为1770—1780年代的美国革命建国时期、1820—18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时期、1890—1910年代的进步运动时期。在这些时期可以看到普遍社会动员和大众热情参与，看到激烈的争论与冲突，看到政治制度被震撼和重组。在习惯渐变改进的美国，这些特殊时期尤其引人注目，不容忽视。

亨廷顿认为，造成信条激情时期的是美国政治理想与美国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而鸿沟的凸显并不是由于美国人过于务实，而是因为美国人过于理想。普遍公认的是，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哲学并不成熟，政治理论的思辨深度和体系化程度经常受到批评。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政治理想的阐释权并不掌握在学院派知识分子手中，而是通过社会的共识和认同成为大众信念的核心，进而保持空前的信念强度。亨廷顿对美国政治这种理想追求高度推崇，声称“失去自由民主理想，失去为实现自由民主理想而付出的努力，美国就会变成没有存在意义、没有集体认同、没有政治文化甚至没有自己历史的国家”。甚至认为美国人如果放弃政治理想就是放弃民族认同的核心，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美国人。

但是美国式的大众化解读方式，使对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从根本上带有反政府、反权威的特色。民众对既存体制的怀疑根深蒂固，自由的政治理想与半自由的政治体制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美国的政治氛围也就注定不和谐。根据亨廷顿的分析，面对这种紧张关系美国人形成了四种应对模式：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自欺欺人。在四种回应中，只有道德主义选择正视理想与体制现实之间的鸿沟，并努力消除裂痕；其余三种则分别采取否认、忽视、忍受的态度。很明显，亨廷顿更支持道德主义的应对方式，这也是他对60年代的政治风潮给予正面评价的理论依据。

在亨廷顿看来，30年代新政的意义都不能与60年代相比。前者的特征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致力于应对经济问题，而不是满怀激情地重申道德价值。后者才是真正的信条激情期。他描述了60年代的抗

议政治、揭露政治和权威侵蚀现象，但认为纷繁扰攘之后留下了“更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开放的政治”。他承认公众变得世故、政府日益缺乏权威，但对美国随后的政治发展还是抱有充分的期待。

三

一个好的理论假设肯定是既对其关注问题有解释力，又对相关领域及未来变化有分析预测能力。亨廷顿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信条激情周期理论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在本书出版后的35年里，美国政治理想与体制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美国民众的应对方式也不出亨廷顿所料，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年代的犬儒、克林顿年代的自满、小布什年代的自欺欺人，而始终不能缓解认知失调引起的挫败感。奥巴马上台似乎带来了开启道德主义追求的希望，但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和政策视角的局限，他在施政过程中甚至无法复制新政式的革新。

今日重译重读本书，更是实际验证信条激情周期理论的大好时机。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意外获胜，不仅颠覆了之前绝大多数民调结论和媒体的普遍预测，而且使美国各界的体制精英瞠目结舌。那么，短期政治分析忽略的信号，35年前提出的长期历史模型有可能捕捉到吗？在本书终结的第八章，亨廷顿教授自我设问：美国传统的应对理想—现实张力的模式会不会发生变化？他进而提出三种可能的演进路径，其中的第三种情况倒是可以为目前美国的政局提供历史视角的解读——由于美国分裂、虚弱的政府无法令人满意地应对挑战，历史与进步冲突的加剧可能导致越来越强的挫败感，最终可能导致人们强烈要求抛弃虚弱无效的政府，以更具权威性的结构取代之。“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极端主义可能会产生一股追求独裁效率的逆流”。

当然，亨廷顿教授当年提到的只是一种理论可能性，究竟会不会

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兑现、能够兑现到什么程度都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按照本书给出的14条标准，特朗普上台不是第五个信条激情期的开始。在今年选举过程中充斥着对既成体制的不满，但没有诉诸道德义愤，反而是以破坏道德束缚（如政治正确标准）为荣；获胜的一方充分表达对掌权者的敌视，但同样对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等社会改革运动充满轻蔑；政治参与脱离了利益集团的常规路线，通过非传统渠道表达，但是获胜方改革的主旨并非限制权力，选举的结果也很难带来政党政治的重组而是进一步制造社会冲突和对立。亨廷顿在本书中曾经大胆推测，美国的下一个信条激情期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出现。如果重起亨廷顿于地下，他也许会提醒我们：大幕尚未开启，不要被正剧之前的垫场戏迷惑啊。

朱文莉

2016年11月

前言

这本书源于我年轻时的一次窘迫经历。1949年5月，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开头，塞缪尔·H. 比尔（Samuel H. Beer）教授以从容的目光注视着我，问道：“亨廷顿先生，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当时我并未给出自己的答案，但从那以后我便一直为此冥思苦想。这本书就是以美国环境为背景，尝试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一篇扩展的论文，意在启发而非定论。这本书旨在提出思考美国政治的一种方式，强调某些时常被忽视的因素，并提供一个解释的视角，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美国既有如此多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多的政治冲突。

我对美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真正研究始于1973年，当时我得到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研究基金的资助。最初思考的结果形成了一篇论文——《美国政治的范式：超越共识、对立与多元》，刊登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89期（1974年3月）的第1—26页，其中部分内容也被收入本书中。在1977年年初进入政府供职之前，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前两章，但大部分内容是在1978年秋天我返回哈佛大学后写成的。在写作的后一个阶段，我得到了美国企业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和国家事务出版公司（National Affairs, Inc.）的资助。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在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巨大帮助，为我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知识和物质环境方面的支持。

在美国政治发展的课程中，我曾提出本书的部分观点，学生们的质疑和挑战帮助我将这些观点加以改进提炼。还有许多人为了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包括约翰·海涅（John Heine）、肯尼斯·I. 杰斯特（Kenneth I. Juster）、克里斯托弗·勒曼（Christopher Leman）、穆罕默德·曼达尼（Mohmoud Mamdani）、阿瑟·桑德斯（Arthur Sanders）和斯蒂文·R. 维尔（Steven R. Verr）。芭芭拉·塔尔霍尼（Barbara Talhouni）、辛西娅·克努特（Cynthia Knuth）和琳达·科恩（Linda Cohn），他们耐心、专业地逐页打印了全文。艾达·唐纳德（Aida Donald）和奥斯丁·兰尼（Austin Ranney）通读了全稿，给出了认真中肯、兼具批评和鼓励意义的评论。

在此，我向上述提及和未提及的所有相关个人与机构深表谢意，感谢他们为本书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第一章 不协调的政体

“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

即便是上帝也不敢违背习惯的力量。虽然前夜下了一阵雨，1969年6月第二个星期四的黎明还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从晶莹的草地上，从湿漉漉的、摆放整齐的椅子上，水蒸气升腾而起，无声无息地弥漫在校园中，预示着哈佛大学第318期毕业典礼举行这天将是闷热的一天。虽然校方对上帝的合作保持一贯轻松乐观的态度，但那些对神不敬之人颇令人担忧，他们可能不会如此通融。那年春天，美国大学校园的骚乱、抗议和暴力活动达到了新高峰。此前一年，哥伦比亚大学已经陷入混乱，到1969年4月终于轮到哈佛大学——先是学生攻占礼堂，然后是警方清场并搜捕学生，接下来则是集体罢课、教学中断，以及没完没了的游行集会、奔走呼喊，还有学生代表与校方之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经过漫长的协商，校方官员、学生领袖和追求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的极端分子终于在典礼前夜达成协议：毕业典礼的正常流程将被打断，允许民主促进会的革命者向上万名观众进行简短发言。黎明前，一小队年轻强壮的校方人员悄悄越过紧锁的校园大门，随后以先发制人之势包围并占领了宣讲台，以防有人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些防范措施并无必要。在两个小时的毕业典礼中，针对政府和校方权威的公开革命叫板微乎其微。正如一名学生所言，学生民主促进会派出的发言人“搞砸了”，他的发言强硬而乏味，激起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嘘声。只有不到两百名学生用离场的方式表达

了抗议。革命冲动仅限于高年级毕业生向校长内森·普西（Nathan Pusey）挥拳大声抗议。他们的学位服上印着拳头图案，以此纪念那年春天难以从记忆中磨灭的动荡。

与类似行动在美国社会的结局一样，针对当局的革命就这样在哈佛失败了。但是在那一天，学生们向权威发起了严正挑战。这是一次传统的美国式挑战，它来自社会的主流而非边缘，在恰到好处的哈佛风格下以思想而非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来自加州贝弗利山的法学院研究生梅尔登·莱文（Meldon E. Levine）在演讲中对此进行了阐述。“这场抗议是为了什么？”莱文问道。面对校友、教员和家长，代表所有同学发言的他一针见血地给出了答案。这场抗议不是为了颠覆现存制度，也不是为了挑战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认可的价值体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密谋毁掉美国，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坚持你们一直灌输给我们、教育我们遵从的那些理念。你们总是反复告诉我们，信任和勇气是努力的方向，要相信平等、公正是不可侵犯的信条，权威则应当得到理性的引导与正义的调和。我们始终虔诚笃行这些教诲。”莱文告诉台下的父辈，年轻人想要实践前人的原则，你们却在阻碍、挫败他们。“你们给我们制造了幻觉，然后又让我们遏制幻觉。”我们渴望去做你们说的那些正确的事情，但“你们却给我们戴上理想主义者的帽子，告诫我们切莫鲁莽行事。而我们要求的全部，仅仅是允许我们实现那些你们曾滔滔不绝的价值理念”。

代表年轻一代发言的莱文，并没有用欧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非洲民族主义者那一套言辞侮辱顶撞父辈：我们拒绝你们反动的、传统的、腐朽的信仰，我们有自己的激进革命原则。相反，莱文的请求完全是美国式的：年轻一代试图做的，不过是践行年轻和年长者都信奉的理想。正如他在演讲的标题中所总结的，这是“良知的冲突：我们践行你们的原则”。我们质疑你们的战争、镇压和妥协，以及借根本价值之名行无动于衷之实。我们没有宣告一个新真理来挑战旧真理，相反，我们引用前辈的真理来抗议他们背弃真理。背叛者是你

们，不是我们。事实上，你们才是颠覆分子，我们则是忠诚之士，骄傲地重申着被你们遗忘的誓言。

莱文的檄文得到了学生们持久热烈的喝彩，而据记者的报道，大部分校友和家长“表情僵硬而沉默”¹。作为60年代的青年（同时也是1964年伯克利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莱文准确地把握了这动荡十年的精神本质。总体而言，60年代的斗争无关不同政治信仰支持者间的冲突，其精髓在于再次确认传统的美国理想和价值：这是一个将实践与原则，或曰现实与理想、行动与信念相比较的时代。60年代的政治始于静坐抗议、抵制公交车上种族隔离运动和民权进军，聚焦于美国政治生活中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最显著的领域。在约翰逊任期的最后时刻，实践和原则间的差异终于达到政治和道德层面上不可容忍的程度，重振理想的时代也随之进入高潮。这一时期随处可见的是激愤的道德抗议，抗议政治制度和领导者没能依照政治理想行事，持续揭露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主要斗争在两类人之间展开：一类人试图按照理想重塑现实，主张改造过程越快越好；另一类人则愿意无限期容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例如，许多人质疑种族平权的方式和进度，但是没人想从体制上保护种族歧视。许多人不情愿目睹尼克松被弹劾，但没人愿为政府官员的不诚实和虚伪全盘辩护。争议的中心并不在于应当采用何种原则，而在于应当采用哪些方式实践这些原则。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话题，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这条鸿沟的重大意义源自美国政治理想的三个特征。第一是理想的广泛认同。同大部分欧洲社会相比，美国社会一直存在关于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历史上，这些构成了所谓“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的价值和信念是美利坚国家认同的独特源泉。第二是理想的本质内容。相比于其他大多数社会，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反政府、反权威特点。其他意识形态能够赋予既有权威和制

度合法性，美利坚信条却使一切等级制、强制性、权威主义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即便是美国特色的政治机构也不例外。第三是理想的信仰强度。美国人对基本理想的信仰强度随时间和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上的美国社会在信仰狂热和信仰消极两极之间来回摆动。

作为上述三个特征的产物，一条鸿沟始终横亘在美国政治理想与制度、实践之间。历史进程中的鸿沟因时而变，宽窄不一。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客观”现实——美国社会的权力分配——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理想本质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美国理想信仰强度的变化。莱文曾恳求台下听众：“请见证我们（对于你我共同信仰）的热情。”其他时候的美国社会没能达到这种信仰强度；毕业典礼年年如此，唯独这一年有如此激情。因为60年代是抗议的时代，也是重申道德的时代，人们激情勃发，无论是好是坏，都在努力去实现美利坚信条的原则与价值。

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其他历次信条激情时期——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革命时期，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杰克逊时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时期，美利坚信条的价值都会被唤醒，动员人们挑战现有制度与实践。就某种意义而言，理想/制度鸿沟注定了美国人要与一种美国特色的认知失调共生共存。这种认知失调在平时处于蛰伏状态，当信条热情高涨时则会猛醒，向着美国政治的承诺引燃熊熊怒火。

共识、对立、多元：美国政治的结构范式

一直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很少得到相关传统理论和范式的注意。以下三个范式塑造了有关美国政治的主流印象。

通常被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e）的理论强调少数富人和多

数穷人之间的持续冲突。显然除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史学家，该理论还得到了大量其他人的支持，因此称它为美国版的“阶级冲突”理论确实更为妥当。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联邦主义思想家认为，“美国人并未受到上帝的特别恩惠，他们在本质上与其他人一样”。因此，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社会分工也同样会在美国出现。亚当斯说：“所有国家的人民被自然地分为两类——绅士和平民……文明社会中伟大而永恒的区别出现在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用类似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所有共同体都自发地分化出少数和多数群体。”² 从这种观点出发，汉密尔顿同情富人，而亚当斯则对穷人和富人抱有同等深刻的怀疑。19世纪末，进步主义史学家攻击联邦政治，标榜自己和穷人站在一起，同时又保留了美国社会的联邦主义色彩。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为《美国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American Thought）所做的、但最终未使用的那些注释，很好地总结了进步主义范式的实质：

从一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大派别。两派的称呼、口号和策略时常变化反复，但二者的重大分歧却没有变过。一派代表了当代的上层社会——教会、绅士、商人、奴隶主、工厂主。另一派则是平民——农夫、村民、小商人、技工和无产者。前一派一直试图监视、限制人民权力，想把政府牢牢控制在少数人手里，使其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然而平民派则争取扩大人民权力，让政府更多地为多数人的意愿服务，更多地实现民主而非共和理念——只有理解这一分歧，才能理解美国文化的趋势。³

进步主义的解释成为战后美国史学文献的主流观点，直到它被共识理论取代。然而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和激进主义社会学家（如C. 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那里被坚持下来，并在60年代的新左派修正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再度崛起。

进步主义理论的要旨与联邦党人的相似。首先是强调经济利益的

重要性，以此而非理想主义目标作为历史中人的行为动机。其次，认为美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平民和精英为权力和财富而展开的竞争。虽然利益冲突方可能随时间而改变，但冲突本身是持续的。进步主义者明确希望平民派能最终获得胜利，但是他们在理论中并未阐明因何胜利、何时胜利。在遥远未来中那个尚未明确的时刻真正到来之前，美国历史将一直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并且正如路易斯·哈慈（Louis Hartz）所说的，进步主义理论令人欣慰的方面之一是“每个坏蛋恶棍都会遇到降服他们的英雄，每个汉密尔顿都有自己的杰斐逊”⁴。

就许多方面而言，共识理论对美国政治的描绘正好与联邦主义—进步主义形成了对立的两极。根据这一理论，理解美国历史的关键并非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中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地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缺少封建历史，存在大量无主土地，缺乏劳力以及由此导致横向与纵向社会流动机会，较早引入成年男子普选权，洛克式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流行等，美国从未像欧洲那样滋生出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相反，这里出现了使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震惊的“令人愉快的同质性”，还有给托克维尔（Tocqueville）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治与社会平等。结果，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从来没能像在欧洲那样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价值的共识十分普遍，美国政治上的冲突，不过是基本共识框架下有关狭隘的经济与个性问题的争论。

共识理论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得到了经典的阐述。19世纪后期的“爱国”历史学家用更加民族主义化的语言重新阐述了该理论，“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丹尼尔·布尔斯特廷（Daniel Boorstin）、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大卫·波特（David Portt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自觉、清晰的表述，其中以路易斯·哈慈（Louis Hartz）的最为

著名。这一时期共识理论的流行，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与社会革命的失败，描绘了美国人的生活富足与丰富多彩，同时也揭示了作为美国外交关系主要特征的冷战的兴起。

相比于进步主义理论家，共识主义者倾向于在比较环境中考察美国。特别是哈慈，同欧洲的比较是其作品的中心主题。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作为进步主义理论核心的二元对立几乎毫无意义。美国不像欧洲，它既没有封建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关于美国历史的争论几乎全部集中在自由主义的不同版本上。换言之，自由主义的流行，说明美国既没有贵族政治，也没有产生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才是美国社会的主导者。在辩论中，哈慈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方法得出了托克维尔式的结论。然而，由于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和挑战，哈慈眼中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失去了意识形态所需的系统性和清晰性，也没有活力；它变得固化、非理性，绝对主义且疏于思考，时而自相矛盾，时而含糊其词。

第三个理论是多元主义范式，认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其过程理论将政治视为许多小规模利益团体间的斗争，其组织结构理论则强调少数规模较大、组织良好的团体在塑造公共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过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所谓过程，就是假设不同团体参与政治过程的渠道没有受到宪法与政治结构的公开歧视，通过自由政治市场上的团体间公开竞争，在总体上得到最接近真实公共利益的结果。另外，组织结构理论的支持者则通常强调，现存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过程，使得以个人平等为前提的民主制度的诸多主张失去了意义。极端的多元主义可能与阶级冲突理论更加相似。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联邦党人文集》（尤其是第十篇）经典地阐述了多元主义范式。这一范式在20世纪早期由阿瑟·F. 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再次阐述，并在“二战”后重新崛起，成为政治学界解释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理论。多元主义范式在一定程

度上与共识理论相互兼容，因为利益团体之间为特定议题而起的冲突，也可以被理解为发生在基本政治价值的广泛共识框架内部。实际上这两个范式暗示了彼此的存在：二者的不同之处不过是一个强调基础共识，而另一个强调这一共识下特定问题引发的斗争。

这三个理论各有长短。阶级冲突理论准确地指出了美国社会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公。但是它认为贫富差距一直是美国社会政治分裂的首要原因，这是不准确的。尽管美国政治生活有时趋于极化，但却很少（如果有过的话）以贫富作为分裂的两极（罗斯福新政算得上是最显著的例外）。更一般而言，为了把美国政治斗争描述成一个简单二元对立的“三明治”模型，阶级冲突理论确实在描述斗争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时不够客观。对于许多支持该理论的学者而言，阶级冲突论精确描绘的并非美国政治数百年来实然，而是他们自己心中的应然。另外，共识理论正确地承认了欧洲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国内存在的是对于洛克式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政治价值的广泛认同。然而，尤其是在哈慈的论述中，意识形态共识的存在意味着一切重大社会冲突形式的消失。事实上，美国的社会政治冲突与暴力比许多欧洲国家都多。霍夫斯塔特曾一语中的地写道：“无须意识形态冲突，美国人也能打得血流成河。”

5 而共识理论并未对此给出解释。最后是多元主义范式。无论是其过程理论还是组织结构理论，都清楚地描述了美国政治在较长时期中的运作方式。但是相比共识理论，它并没有针对时常裹挟美国政治生活的激情、动荡和道德热情给出更多的解释。

这三个范式的共同特点在于都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政治活动。对美国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并非政治价值、制度、实践或者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是美国社会的本质。这些范式的核心问题在于，从一个共识、两个阶级或许多团体的角度去理解美国社会是否恰当。从这一结构路径可以得到另外两个隐含的意义。

第一，塑造政治的社会结构特征是相对不变的。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18世纪以来，每个理论都一直拥有自己的追随者。共识理论几乎不承认共识发生过改变。阶级冲突理论认为特定的阶级也许会改变（例如从地主对无地者到资本家对工人），但是穷人和富人间的社会分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将一直持续。多元理论用类似的逻辑承认政治过程中特定团体的兴衰变迁，但不认为社会根本的多元特征以及美国政治的团体间互动方式会发生变化。每个范式都对各个历史时期中美国政治的运行提出了解释。没有一种理论能描述政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每个范式的路径在根本上都是静止的。同现在相比，未来的美国政治和社会将有哪些不同？这三个理论的答案基本上是老生常谈。

第二，三个范式都将物质和经济利益视为政治中的支配性力量。阶级冲突理论中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因经济不平等而区分开来，二者围绕着应该保持、扩大还是缩小、消灭这种不平等而产生冲突。多元理论中的利益团体可能是种族性的，但更多地是以经济要素为自身标志，如地区、职业和产业集团。而共识理论的确强调政治价值和理念的重要性，但是也指出这些理念的衰退和扩张都不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反过来，共识也以中产阶级的绝对优势为基础。阶级冲突和多元理论认为美国政治由混乱肮脏的物质利益主宰，相反，共识理论则把这种混乱简化为沉闷的和谐与麻木。

理想与制度

有关美国政治的结构范式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具有局限性。它们几乎完全忽略了政治理念、理想主义、道德动机和信条激情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合众国是源自特定的政治理想，并受到自由平等梦想和承诺的鼓舞。这些政治理想是美利坚国家认同的中心，在塑造美国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多元理论完全忽视了这些理念，阶级冲突理论则将它们简单地视为是敌对

经济阶级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采用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共识理论中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实际上成了没有影响的常量。在三种范式下，要么是富人和穷人为经济“蛋糕”的大小斗争，要么是不同团体间为蛋糕的分配争吵，或者干脆所有人一起尽情享受蛋糕的美味。定义了美利坚民族存在的政治理想和观念可能对于理解美国政治具有关键作用，也可能在塑造美国的政治冲突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这些重要意义似乎被忽视了。结构范式描绘的美国政治没有目标、义愤、激情和承诺，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罪恶。阶级冲突、团体活动（group process）或共识政治能够充分解释20世纪60年代、19世纪90年代、60年代、30年代，尤其是18世纪70年代的政治激情吗？美国政治的结构图就像是没了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没了应许之地的《申命记》。

如果外国人问起“美国政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恐怕无法简单地用纳米尔（Namier）式的派别团体斗争、马克思式的阶级冲突或者自以为是的共识理论给出解释。美国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所有这些，但是还有更多的内容。仅把美国政治视为社会结构的反映，实际上是丧失了政治学中的目的论（这和机械论不同）的维度。对个人、团体和阶级的政治行为方式形成决定性影响的不仅是其对自身短期利益的理解，还有意识形态氛围以及他们普遍认可的政治价值与目的。美国没有欧洲式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其政治生活中灌输的道德激情比欧洲国家更多。桑塔亚那（Santayana）曾经总结道：“整个美国是一个大平原，被一股无所不及的飓风扫荡。”⁶ 共识理论看见了平原的一马平川，却没有看到平坦造成的飓风的狂暴。在美国，意识形态共识是政治冲突的源头，极化更容易因道德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发生，道德改革的政治不仅是利益团体政治的补充，甚至还会代替后者。道德引发的动荡反而使美国免于阶级冲突。恰恰是道德激情的关键角色使美国政治区别于其他社会，这也正是令外国人最难理解的特点。

历史著作并未一直忽视政治理想和价值对于塑造美国政治发展的

重要性，恰恰由于这一原因，这种重要性反而受到了质疑。19世纪的“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经常探讨逐步实现美国理想这一相似的主题。正如霍夫斯塔特所指出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的历史“普世规律”“是上帝安排的过程——自由、公平、人道主义的进步，所有这些都在美国历史得到体现，天意又将其赐予合适的人民和制度……美国历史可以被视为一切历史的完成状态”。⁷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同样的主题，只不过他的看法更加矛盾。两人都认为美国历史是一个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得以逐步实现。

上述观点准确地解释了对价值理想的追求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内容，却没能看到因追求理想而遭遇的失败也是核心经验。实现美国承诺和理想的凯旋图景，往好了说不过是爱国主义的虚妄，往坏了说则是虚伪。美国政治的历史就是好开头与坏结果、希望与失望、改革与反动的循环往复。美国的历史就是许多团体通过实现美国理想努力促进自身利益的历史。然而更重要的是并非其成功，而是其失败；并非实现梦想，而是梦想没有实现，并且永远不会彻底地、令人满意地实现。在美国，总会有人批评制度的杯子是半空的，也会有人豪情万丈地试图用理想主义的甘泉将其倒满。但从根本上讲，尤其是在美国，制度的杯子总是半满的。

承诺和实际之间的鸿沟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内在的、时隐时现的不和谐。安德烈·贝泰耶（André Betéille）认为，在和谐的社会中，既存的秩序和规范的秩序是彼此一致的；而在不和谐的社会中，二者是冲突的。“在和谐的系统，中，不平等不仅在事实上存在，还被认为是合法的。在不和谐的系统，中，虽然不平等在事实上存在，但它也不再具有合法性”。传统印度采用种姓制度，但仍然是和谐的社会，因为其中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合法的。而美国则是不和谐的社会，因为其社会与政治不平等“发生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平等的道德环境中”。⁸

也许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更

为有限，而政治自由则更为广泛。但是美国社会是如此深刻、广泛地信仰平等和自由，反对等级和权威，以至于其规范秩序和既存秩序间的矛盾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传统的印度显然比现代的美国更加不平等，但显然现代的美国也比传统的印度更加不和谐。一个社会政治系统和谐的程度，既取决于其制度结构，也取决于其价值信仰。任何社会都必定存在最低限度的不平等和等级安排。在许多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不平等、等级制和权威的看法至少与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同样重要。由于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的一致认可和信仰，美利坚合众国成了最不和谐的现代政体的典型。

1. *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69, p. 30.

2. John Adams, *Works*, ed. Charles Francis Adams (Boston: Little, Brown, 1850-56), 4:401, 6:185, 9:570. Alexander Hamilton, in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1:299.

3. Quoted in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Knopf, 1968), p. 438.

4.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p. 31.

5. Hofstadter, *Progressive Historians*, p. 461.

6. George Santayana, *Character and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6), p. 129.

7. Hofstadter, *Progressive Historians*, p. 16.

8. André Bételle, *Inequality and Social Change*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p. 15.

第二章 美利坚信条与国家认同

美国的政治思想

社会批判家和政治科学家一直诟病美国政治思想的贫瘠匮乏。总体而言，这一抱怨是合理的：同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理论相对欠发达。美国社会显然没有优秀的政治哲学家和以阶级为基础的、高度系统化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断定政治理念在美国扮演的角色没有在欧洲重要，那就错了。事实上，也许把这个结论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美国的政治思想也许在理论上不够复杂，其社会影响力却更加强大。这些思想是定义国家认同和界定政治权威的关键因素。

自从18世纪美国的民族自觉首次萌发，人们就一直试图界定美利坚国家认同或曰“民族性格”。不同的分析者运用人格特征、社会特征、地理和环境因素、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来解答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加入，也没有必要回顾这一持续中的争论。本书关注的并非民族性格，而是更加具体的、可辨认的、可度量的内容：民族政治价值和信念。本书不关注行为或文化模式、个性特点或心理塑造，只关注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本书的观点如下：

1.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在美国一直存在特定的、可以被

称为“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的政治价值和理念。

2. 美利坚信条得到了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支持。

3. 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条的内容虽然有所改变，但是两百年来其核心内容几乎没有变化。

4. 同欧洲社会相比，美利坚信条一直在，而且仍将在美利坚国家认同中扮演中心角色。

美利坚信条的来源、范围和稳定性

美利坚信条的价值是什么？大量研究以不同方式将其逐条列出，但事实上，所有的分析都包括了相同的核心政治价值：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这些价值彼此相异又相互联系，源头各不相同却最终汇聚在一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思想中彼此强化。

这些理念的核心思想在《独立宣言》中得到了简明扼要的表达。如果把视野放宽，还能发现更多的思想来源。最早的线索是宪政制度，它源于作为人类行为约束的中世纪根本法（Fundamental Law）思想。这一意义上的法律被认为是超越了人为控制，但未超越人类知识的存在。人发现法律，但并不创造法律；无论被视为上帝法、自然法还是习惯法，这种法律都为人的行为提供规范。在17世纪的欧洲，这些传统的法的观念被绝对主权和人的权力（即绝对君主或者最高议会议员的权力）的观点所取代，以便按照统治的需要制定法律。不过正是在同一时期，作为行为限制的根本法的古老理念被输入美洲大陆，并在那里落地生根。

美利坚信条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17世纪的新教教义，它为美国的

政治思想注入了道德主义、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和个人主义的因素。更具体而言，新教教义强调个人良知的优先性，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自发结社的群众的作用，教会内部民主的重要性及其对政体的影响（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以及在合适的时机抛弃宗教机构。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大部分人口信仰不同新教教派的国家。新教价值增强了18世纪的共和与民主潮流，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提供了根本的伦理和道德基础。

除此之外，18世纪还有洛克式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有关自然权利、自由、社会契约、有限政府、社会—政府二元分立的思想。最后，在《独立宣言》中作为有组织社会的基础而提出的平等理念挑战了曾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以等级、地位、世袭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差异是合法的。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所有人在政治上也是平等的，都必须拥有选举统治自己的官员的平等权利。这为19世纪的人民主权和政府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平等思想作为美利坚信条新教内核的重要内容，推动了18世纪末的民主和革命潮流。

宪政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并非美国人所独有。在其他社会中也有人或多或少赞同这些思想。然而没有一个社会能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多的民众拥护这些思想。

人们时常提起所谓的美国“意识形态”。但是在美国人看来，这些理念并未采用逻辑缜密、系统的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形式通常指的是欧洲式的信念体系，例如传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这些理念将目标和价值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没有对不同价值的优先性做出排序，也没有对价值的实现手段加以详细说明。它们还缺少能够将一种意识形态同其他政治思想体系区分开来的关键特征¹。例如同马克思主义相比，其理论更为零散，逻辑上缺少自洽性，思想发展不够充分。有人用美国的“自由传统”概括这些理念。如果必须用一个形容词加以描述，“自由”也并非不妥，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表达这个美国思想混合体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因此，更加准确恰当的办法也许使用复数名词“美国政治众多思想和信念”（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or beliefs），或者只用单数名词“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后者正是贡纳尔·缪达尔（Gunnar Myrdal）等人采用的方式。

美利坚信条缺少必要的理论来建立不同价值间的相互关系，或是处理这些价值在理论层次上的内在冲突，这反映了其非体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当其任何一个价值被极端最大化时，就很容易凸显出这些内在矛盾：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高级法（higher law）与人民主权，自由与平等，个人主义与民主，等等。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会在不同价值间做出排序，但是在美国社会，即便在实践中会产生冲突，所有这些价值也要在信条中共生共存。它们不仅共存于美国社会中，还共存于个体公民的观念中。尽管可能每个人对于矛盾价值间的适当平衡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人会毫不犹豫地某个价值凌驾于其他所有之上。不管一个人有多看重多数表决，多数统治总会在一定范围内因为承认少数派的权力而受到限制。不论一个人有多信仰个人自由，个性的膨胀也不能将政治和道德平等当儿戏。就像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制衡一样，美利坚信条中也有“价值制衡”。罗伯特·麦克洛斯基（Robert McCloskey）写道，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内在连贯、趋向统一的教条，而是一系列可能而且经常逻辑上不一致的理念的聚合物”，这个聚合物“是美国思想的特点……既能同时持有彼此矛盾的信念，又不必费心处理这些信念间的潜在冲突”。²

麦克洛斯基的文字很好地描述了美利坚信条中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在欧洲，一般认为这两个价值存在内在张力。从柏拉图开始，政治理论家们就认为平等的扩张会最终导致自由的毁灭，使社会均质化和等级化，从而给暴君的出现铺平道路。18世纪，自由是贵族阶级价值观，而平等则是中产阶级民主价值；到了19世纪，自由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平等则属于无产阶级。平等的扩大在18世纪压制了庄园主、神职人员和企业的权利、自由和特权，在19世纪则对契约权利和

私人产权构成了限制。托克维尔对美国平等的观点反映出上述欧洲经验。没有哪个美国人会像他一样对平等的扩大感到恐惧，认为这等于敲响自由的丧钟。相反，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观点很好地总结了美国的模式，即“自由和平等是社会制度中头等重要的两样美德，当它们并肩而立时才最为稳固”。³ 在美国的历史上，自由和平等确实并肩前进。它们的发展彼此联结而非彼此反对，所代表的不是敌对社会阶级的政治价值，而是同一个中产阶级内部的对立政治价值。18世纪的自由很快被掺入了19世纪的平等。一般而言，美国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但不同的团体看法不同，而事实上所有的团体都同时高度赞同这两个价值⁴。政治争论的持久主题一直是如何使二者相互协调——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这是机会平等和自由竞争并存的地方。关心自我进步的人一般也关心其他人的进步。丹尼尔·贝尔认为：“自由和平等间的张力在欧洲导致了激烈的哲学争论，在美国却被同时包容二者的个人主义给消除了。”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写道：“自由者的土地最终也会成为平等者的土地。”⁵

有关这些理念的共识有多广泛？托克维尔在其最著名的一段评论中说：“美国人在理应统治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方面完全一致。”他之前和之后的无数外国和本土观察家重复了这个观点。一百年后，缪达尔也说了同样的话：“不论祖先来自何处，属于何种阶级、宗教、信仰和肤色，所有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一套社会伦理和政治信条。”⁶ 到20世纪中期，公共民调数据提供的大量证据再次强化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的有效性。这些数据表明，美国自由民主信条的核心价值赢得了超过75%美国人的支持⁷。美利坚信条的核心价值与原则可以被高度概括为自由、民主、多数统治、少数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平等（尽管不太明显），美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团体都会支持这些内容⁸。如果更为具体地阐述价值体系内容，并将其同特定场合下的实际应用联系起来，人们的支持率就会迅速下降，使分歧看起来比共识更加突出。这时，更加支持信条价值体系的是受教育水平更高、政治上更活跃、在社区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的人⁹。简言

之，那些在政治体系中最活跃的、受益于其中的人群对体系价值的共识也更为广泛。相比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地位高的人不大可能感觉到政治体系的价值与现实之间的重大差异。然而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综合分析所总结的，从整体偏好来看，“美国人对社区和政体层面的基本政治价值有着高度共识”，这一点毫无疑问¹⁰。

其他潜在的替代性政治价值系统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反映出贯穿美国历史的对于美利坚信条价值的共识。一个地方必须拥有一定社会和经济基础，并足以滋养不同于主流政治的信念，才能发展出类似的价值体系。在美国历史中的某个时期，的确存在三个这样的基础：地区、阶级和种族。

发展替代性政治价值的最有意义尝试出现在内战前的美国南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显然与美利坚信条的所有核心价值背道而驰。结果从19世纪30年代起，奴隶制遭到的抨击不断增加，而南方的作家和思想家为了给自己的社会辩护，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清晰、系统的保守主义观点。他们诉诸在历史上被用于为多种不同类型社会体系辩护的古典保守主义观点，努力发展出一套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及言论，用哈慈的话来说，其“反向启蒙运动”（Reactionary Enlightenment）的著作成为了美国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独特一页。对他们而言，保守主义观点是一件武器，能够保卫其社会，抵抗北方日益增长的经济和人口优势，以及废奴主义者不断增强的意识形态攻击。然而他们的实体理论仍然是自相矛盾的。幻想着留住杰斐逊留给他们的遗产，他们在约翰·洛克和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的哲学之间摇摆不定¹¹。最后，当南方社会在内战中被摧毁，他们建立替代性政治理论的尝试也随之失败，很快被遗忘在历史的灰烬中。

内战后的迅速工业化必然导致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这为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社会经济基础，正如当时欧洲社会主义的勃然兴起。社会主义运动未能对大众形成吸引力，这或许是自由民主价值在

美国占据优势地位的最有力证据。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仔细研究过“为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已经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详细地研究过，他们给出的原因各有侧重¹²。缺少封建主义历史使得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能不受阻碍地传播，这反过来又阻止了社会主义获得强大号召力——事实上，“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早期殖民者（尤其是异见分子和清教分离主义者）的本质、充足的无主土地、机会平等以及后来的社会阶层垂直流动，都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农业社会的基本财富形式是土地，大多数农业社会的土地面积是有限且固定不变的，其人民通常因有无土地、土地多少而产生分化。然而在美国，类似的分化难以持久。结果是美国没能建立起农业阶级体系，“自由农社会”成为主流（南方的种植业除外），由此建立起相对富裕和相对流动的模式，该模式历经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而得以幸存，使中产阶级价值标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虽然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立于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但是美国的工业化没能产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社会主义的自觉工人运动。这背后有着一系列原因——此前实现的白人男性选举权、政治制度在总体上的开放性、持续存在的水平/垂直社会流动机会、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多样性和地域分散性、既存的主流自由民主规范和信条价值，等等。其中，强调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信条规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替代品¹³。

自由民主主义替代品的第三个可能社会基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量涌入的贫苦移民，他们来自南欧和东欧，带有农民身份的背景。霍夫斯塔特认为，这些移民带来的观念同美国的主流价值与道德关切明显不同，后者是“建立在美国本土新教政治传统和中产阶级生活基础上的”。至于外来的观念体系，

其基础则包括移民们的欧洲背景，他们对于独立政治行动的陌生，对等级制和权威统治的熟悉，以及因移民而导致的各种迫

切需要。这个体系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源于家庭需要，主要从个人义务的角度理解政治和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忠诚先于对抽象法律和道德的忠诚。移民、“城市老板”和城市政治机器主要以这个观念体系为基础。 14

移民团体和本土团体不同规范之间的互动，成为观察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变迁的一条路径。

移民们的规范在美国政治组织与实践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尤其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城市政治生活最为重大的进展，恰恰是移民及其后代用美国社会的传统规范代替了自己的传统规范。“较低阶层的移民已经并且仍在被快速地吸收进中产阶级。这一过程深刻地影响了选民的观点，因为中产阶级一直持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政治观，新加入中产阶级的成员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接受这些思想……渐渐地，‘新移民’开始要求候选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具有新教精英式的社区服务精神和公德”。 15 后来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政治事件显示出上述分析的洞察力。

美国政治中族群力量重要性的提高，通常随着族群传统政治观念的衰落。美国没有出现持久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的替代物。在这方面，共识范式的基本命题是有效的。然而，共识的内容，以及自由民主聚合物中混合的不同价值，仍然有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20世纪晚期美国的主流政治价值和18世纪晚期的是否基本相同？大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托克维尔的答案）强调了美国价值的延续性：“在美国，有两件事让我们感到惊奇：一是人们的大部分活动有很大的流动性；二是某些原则有很强的固定性。人们在不停地流动，但他们的精神却好像是几乎静止的。一旦一种观点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并扎根于此，那就可以说这块土地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把它根除……” 16

一个多世纪之后，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家的判断基本上证实了托

克维尔的总结。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1958年指出：“虽然时间的流逝产生了些许影响，但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价值体系的核心、独特之处一直非常稳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或是正在出现某些变化，美国价值观的特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五年之后，李普塞特总结道：“（美国）国家价值体系主要内容的延续性多于变化。”劳埃德·弗里（Lloyd Free）和海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于1967年指出，《五月花号公约》、约翰·洛克和《独立宣言》“反映了最近350年以来塑造美国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大多数美国人根本的个人政治信条实质上原封未动”。1972年由唐纳德·迪瓦恩（Donald Devine）主持的一项详细调查，用相似的语言确认了“洛克、麦迪逊以及其他17、18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与当代美国政治价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尽管（这些价值）有所改变，美国政治文化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之下得以未经改变地保存下来，这仍然是引人注意的现象”。¹⁷

美国政治价值观相对缺少变化，也反映在三位著名的欧洲观察家对美国历史上三个不同时间点的主流政治价值的总结中。托克维尔写道：

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密苏里州到大西洋沿岸，依法成立的一切机关的权力都是来自人民。在所有州中，对平等、自由、出版、结社权、陪审制和公职人员的责任，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或者观点。

……像承认全体公民是政治权威一样，英裔美国人也把公认的道理看作是道德权威。而且他们认为，必须由公意来判断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清楚自己的利益，就能走向公正和至善。他们确信，每个人从出生就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人去追求幸福。他们一致相信，人生是可能达到至善的。¹⁸

在托克维尔之后半个世纪，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用极为相似的方式总结了美利坚信条的主要内容：（1）天赋人权；（2）政治权力源自人民；（3）所有政府都要受到法律和人民的限制；（4）地方政府比全国性政府更好；（5）多数人比少数人更具智慧；（6）小政府才是好政府。而在布莱斯之后半个世纪，缪达尔认为美国人都秉持“人道自由主义”的信条，它诞生于启蒙时代，具体表达为“一系列理想——个人拥有根本尊严，所有人在根本上平等，自由、正义以及机会公平的权利不可剥夺”¹⁹。

所有这些都说明美国的基本政治价值几乎没有改变。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点认为美利坚民族性格和美国价值观都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独立思考让位于人云亦云；团体正在取代个人；传统的、清教徒的、道德主义的风尚及其价值，逐渐被更加宽容、相对主义，更强调社会意义而非个人成就的风尚所取代²⁰。如果这个观点是有效的，就说明美国共识的内容发生实质性改变，并且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里，共识沿着代际，可能还有阶级的分界线出现了断裂。

然而，变迁理论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遭到了质疑。首先，那些被变迁理论视为美国社会新现象的态度与价值，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期就被外国观察家很好地描述过²¹。变迁理论把旧东西当成了新东西。其次，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美国政治生活中个人主义和道德激情的再次喷发，其烈度不逊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迁理论认为已经消退的热情在十余年后又出现了。最后，证明个体价值观变化程度的证据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在儿童阅读课本中，有主见的、有成就的意象在19世纪有所增加，随后在20世纪又趋于减少；与此同时，没主见的、随大流的意象变得更多。然而，20世纪前60年对儿童理想的调查（他们最想效仿谁）表明，孩子们的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没有太大变化，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s）也没有任何改变²²。大量证据表明，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存在高度连贯性。美国历史四个不同时期（前内战时代，1865—1897年，1918—1933

年，1933—1940年）的自称以美国特征或价值为主题的出版物表明，“现代观察家提到的美国特质和美国历史早期相关著作的看法之间不存在重大区别”。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等特质在四个时期内均被提及²³。在美国历史的前一百五十年间，总统就职演说的措辞也没什么变化。很显然，在新环境下实践诸如自由和平等这样的价值意味着不同的含义，但是这些价值的核心内容并没有改变²⁴。的确，美利坚信条在持续的应用中得到了重新肯定。

政治理念与民族认同

对大多数人而言，民族认同是长时期历史的产物，需要有共同的祖先、历史、种族背景、语言、文化，一般还要有共同的宗教。因此民族认同具有有机特征。然而美利坚民族却有所不同。美国民族主义是政治的，而不是有机的。美利坚信条的政治理念一直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早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战前三十年，汉诺威王朝的君主就被另一个离本土更近的严重挑战威胁着：1745年，一位自称有权继承王位的斯图亚特家族后裔组织起一支苏格兰军队，打破了英格兰在苏格兰的统治，并攻至距伦敦仅有不足一百二十英里的地方。1745年苏格兰叛乱和1775年北美殖民地叛乱前后相隔只有三十年，却是极为不同的两次叛乱。前一场是牵扯到家族、王朝、民族和宗教的传统冲突，后一场则是围绕政治原则与合法性开展的革命冲突。作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美国人没有把自己与英国亲戚在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差异作为宣布独立的原因。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在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1776年7月4日，它是明确政治原则基础上的自觉政治行动的产物。《独立宣言》宣称：“我们相信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是谁信仰这些真理？美国人。美国人是谁？是信仰这些真理的人。民族认同和政治原则是不可分割的。克罗利指出，美国历史从

最初就被一个理念所启发。因此如同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说的，美国一开始就有一种趋势：“把民族认同描绘成对政治原则的忠诚：平等、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权威……美国人是一个政治民族。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合众国的成立、1787年宪法揭示了这个民族为何存在。”从克雷夫科尔到托克维尔、布萊斯、布罗根（Brogan）、繆达尔，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指出了这个显著的现象。鉴于美国人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他们身为移民的不同来历和时间长短，民族认同几乎没有其他建立的方式。繆达尔认为，美利坚信条确实是“这个伟大而庞杂的民族的结构黏合剂”²⁵。如果没有美利坚信条，美国人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独立战争过后两百年，政治因素仍然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项民调中，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五个国家的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以下问题：“一般而言，你最为自己国家的哪些事物感到骄傲？”85%的美国受访者提及了“美国政府和政治传统——议会、政治自由和民主等内容”。只有46%的英国人、30%的墨西哥人、7%的德国人和3%的印度人提到了政治因素。另外，相比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美国不那么以本国人民的特征、本国的物质和文化贡献为骄傲。他们并不依靠个人、社会、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依靠政治价值和实践，来建立对国家的认同²⁶。美英两国在这方面的差别也许“暗示了美国政体的契约色彩与英国政治生活的有机特征之间的比较，把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是自觉进行的自由民主政治的试验，而不是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这些调查结果说明我们对国家的认同是政治认同。我们所共有的是一套宪法权利体系，在此之上是复杂的文化环境以及广大的私人领域。像英国那样更加有机的社会就无法将不同的生活领域区分开来”。²⁷

因此，合众国的源头在于自觉的政治行动，对特定基本政治原则的确认，以及对这些基础上建立的宪法共识的忠诚。也许可以说是一套政治理念构成了“美国精神”，而在这一意义上，并不存在“英国精

神”“法国精神”“德国精神”或者“日本精神”。这一意义上的美国精神堪比其他意识形态和宗教。列昂·萨姆森（Leon Samson）说：“美国精神之于美国人，不是一项传统或一块领土，不像法国之于法国人或英国之于英国人，它是一个主义——就像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接受这个主义的核心思想，就不是美国人。不列颠信条或法兰西信条是不存在的；法兰西学院担忧的是法语的纯洁性，而不是法国政治思想的纯洁性。诚然，有什么能算是“非法国人的”政治理念？但是对“非美国人的”的政治理念与行动的关注，一直是美国人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霍夫斯塔特一语中的：“我们的国家没有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它自己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可谓是美国的宿命。”²⁸

以政治信条和价值来定义民族使美国从根本上与众不同。从民族和意识形态构成来说，不同的国家可以被分为四个类型。一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和民族构成的一元化为特征。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单一的民族背景下存在几个不同的、历史上一直共存的意识形态。还有的国家——比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则用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聚拢几个不同民族的框架。最后剩下的一类——比如历史上的英国，其特征则可能是意识形态和民族构成两方面的多元性。

美国无法被恰当地放进上述任何一个分类。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美国拥有一个单一、普遍的主导的政治信条（意识形态），但是政治信条和民族的关系却同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国家里，意识形态被灌输进一个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稳固的民族中。用相似但相反的方式，还可以移除某个意识形态而不瓦解民族认同的基础：中国人可以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而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前已经存在若干可被明确识别的，拥有自身语言、文化、传统乃至领土的民族，它们被灌输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创造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存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如果共产主义及其政治上层建筑被移

除，这些民族仍然会存在，在没有新政治结构的情况下，这将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乌兹别克人以及其他政治共同体脱离昔日的苏联创造基础，对南斯拉夫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也是如此。

然而，美国不是由民族，而是由族群构成的（印第安部落除外）。美国的种族脱离民族而存在；种族团体并不寻求单独的民族认同。在建国初期，英国移民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不列颠传统是美国人生活的中心。然而即便在最开始的时候，种族差异也是存在的——由于18世纪“第一次移民潮”的影响，1790年已有40%美国人不具有英国血统²⁹。19世纪中期和19、20世纪之交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民潮不仅使移民人口数量大增，还极大地增加了移民的种族多样性。大批不同背景的移民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成为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三个可能的答案。第一，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虽然不再占绝对多数，但仍然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族群实体，通过被充分吸纳进主流族群的社区与文化，移民可以在心理上成为美国人。然而事实很快表明，这种方式是双方都不想要的。第二，移民通过参与跨种族通婚和文化相互渗透的“种族大熔炉”的过程成为美国人，该过程将产生新的、体现多元移民背景的美国模式。由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族群纽带与认同反而得到加强，因此“种族熔炉”过程将十分缓慢，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也要经历好几代人和数百年时间。第三，对移民来说，成为美国人意味着接受并认同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与制度——这些事物的吸引力曾经是最初移民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种族团体一直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保持着自己的种族认同，但是却转而信仰美国的政治价值、理想和象征。皈依后者考验了一个人到底有多“美国”，这又和种族文化传统的保留并行不悖。原始的、有机的社会联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的，而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却是美国的。归化的美国人与归化的非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说一个人是盎格鲁—意大利人，意味着他有英国和意大利祖先。

说一个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则意味着他有意大利祖先，却持有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并且是美国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有时候，早期移民的后代的确会轻蔑地称呼别人“归化的美国人”，但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人在归化时才更符合美国人的特征。在建立美利坚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界定和维持种族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构件。

美国政治价值和理想主要源于英国，其民族认同却主要由前者而非后者定义。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仍然可以不甚准确地使用“盎格鲁—美国人”概指美国人。一个世纪后，“瓦斯普”（“WASP”）这个名词的诞生，标志着盎格鲁—美国人的地位最终降为众多族群之一，以种族概念而非政治术语定义美国民族认同的尝试也就此终止。结果是美国意识形态与美利坚民族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消失将导致后者的灭亡，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情况。

这种对于政治理念与民族的认同，和西欧的历史经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洲，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意识形态表达并塑造了水平政治单位（社会阶级）的利益，而具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则表达并塑造了垂直政治单位（种族和语言共同体）的利益。在18世纪的欧洲，贵族扮演了独立的政治角色，中产阶级相应地产生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意识和行动，以争取获得相对于贵族的平等地位。斗争过程中，双方都阐述了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后来的工人阶级运动也发展出同样系统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马克思主义。由此，高度发展的阶级分化、互动与斗争，造就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三位一体。

对这三种意识形态的阐述都建立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历史上反对民族国家的保守贵族主义，在1815年维也纳和会上建立了其最重要的制度实体。他们认为，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之间的共同点，要比来自同一个国家的贵族国民与非贵族国民之间的共同点更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扎根于自由贸易和利益和谐论中，发展出自己的

一套国际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则鼓吹国际工人阶级的大联合。由此，三种意识形态在彼此竞争的同时，还共同和民族主义竞争。在对抗民族主义力量的过程中，这些意识形态变得更加系统化、教条化。反过来，为了克服阶级和意识形态分歧，民族主义趋向于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欧洲大部分社会团体都曾有过“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Blum）”的倾向。在阶级冲突更加激烈的法国和德国，民族主义也更加活跃；在阶级冲突更加温和的地方，如英国，也仍然有民族主义的宣言。在政治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可谓横纵裂痕的交错之地，在纵向上沿着民族主义和地域的分野断裂，在横向上则被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呼声撕扯，这两个方向上的竞争使每一类诉求都特别的激烈尖锐。

美国的政治经验中，没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对抗。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彼此强化，然而没有彼此冲突，也意味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对方。意识形态无须为阶级对阶级、阶级对民族国家的斗争发声辩护，因此也就没必要发展出系统全面、观点鲜明的理论。民族主义也同样不需要走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路子，来为祖国高于阶级的观点辩护。布莱斯在其观察中写道，美国的“爱国主义一方面比英国和法国的爱国主义更加强大，因为它很少受到阶级思想感情的破坏，但也因此丧失了攻击性”。³⁰ 同欧洲的民族主义相比，美国民族主义由于主要以政治理念和原则定义自身，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理智”；另一方面，同欧洲的意识形态相比，美利坚信条又不够系统、理智，因为它反映了民族共识，其自身就是美国的民族主义。

由于将特定的政治理想作为民族认同，美国的政治经验比其他国家更为有限。不符合美利坚信条的政治思想和信念，只能停留在美国社会与思想的边缘地带。在西欧等其他国家中，同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下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是很常见的事情。堂·卡米罗（Don Camillo）及其共产主义敌人都是典型的意大利人，谁也不会否认对方身上的意大利特质。相反，在自由民主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

们很少有受到其他类型政府统治的经历。尽管两百年来美国的政治机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个国家仍然只有基于一套政治理念的一部宪法和一种政府体系。其他国家经常目睹一代又一代制度的往复变迁。20世纪的德国人已经有了五套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从1789年到1979年，法国建立了五个共和国，外加其他六套不同的政治体系。甚至是当代英国的宪法体系和意识形态构成，也同18世纪晚期有很大区别。在这些社会中，政治体系不断变迁，民族却一直存在。如果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团结出现了危机，那也是由于种族和次国家运动——例如巴斯克、布列塔尼或者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因为政治系统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

相比之下，美国的种族文化则与民族认同共生共存，后者根植于一套特定的政治思想与制度。汉斯·科恩（Hans Kohn）指出：“美国的宪法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它是美利坚民族的根基命脉，是它的最高象征和存在证明。它紧密地同民族自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二者已经变得不可分割。”³¹ 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脆弱的，它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种族分离主义，而是由于政治理想的幻灭和政治机构的无效。如果摧毁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就等于摧毁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灭亡了美利坚民族，并在事实上将其成员，以及这个民族赖以建立的政治理论，一起推回了自然状态。在其他国家，宪法的废除不会导致民族的灭亡，在美国则不然。

因此，美国认同依赖于真实存在的特定政治理想。卡尔·弗雷德里希（Karl Friedrich）说：“成为美国人是理想；成为法国人则是现实。”³² 美利坚认同以应然的方式定义，法兰西认同则以既存的实然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政治行为指的是法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实际做了什么；美国的政治行为，则是指美国的政治理想认为美国人应该在政治中做什么。除了美国人实际做了什么，还存在一套外在标准来判定什么是美国人。美国人可能采用非美国式的思考方式，美国官员可能牵扯进非美国式的行为，美国政府也可能打一场非美国式的战

争。西德尼·米德（Sidney Mead）认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宗教在本质上是预言式的”，这注定了其人民既高尚伟大，又备受谴责，因为“它的理想和抱负一直在审判过往的劣行，并且提醒人们，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国家的行为，都有一套标准加以评判，指出不足之处”³³。用克罗利的话说，这个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理想国家的承诺”，也正是焦虑和愤怒的源泉。对美国未来的承诺，就是对美国当下的控诉。

1. See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 USSR* (New York: Viking, 1964), pp. 17-24.

2. Robert G. McCloskey, "The American Ideology," in Marian O. Irish, ed., *Continuing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p. 14. See also John Higham, "Hanging Together: Divergent Un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June 1974): 16-17. On the unity of and conflicts among American values, see the systematic survey by Kaspar D. Naegle, "From De Tocqueville to Myrdal: A Research Memorandum on Selected Studies of American Values," Comparative Study of Values, Working Paper no. 1, October 1949, Laboratory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I am grateful to Daniel Bell for making this study available to me.

3. M. Walzer, "In Defense of Equality," *Dissent* 20 (Fall 1973): 408.

4. See, for example, Milton Rokeach,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p. 191-193.

5. Daniel Bell,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Nathan Glazer and Irving Kristol, ed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976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 209.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Macmillan, 1909), p. 11.

6.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1 :409.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Bros , 1944), 1 :3.

7. Donald J. Devin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p. 33, 116, 151, 362.

8. See James W. Prothro and Charles M. Grig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February 1960): 282-286. Herbert McClosky,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June 1964): 365-368. Devine, *Political Culture* , pp. 179-230. Frank R. Westie, "The American Dilemma: An Empirical 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August 1965): 531-532.

9. Prothro and Grig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pp. 285-291. Westie, "The American Dilemma," pp. 530-535. McClosky, "Consensus and Ideology," pp. 364-373. Samuel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3), pp. 26-57. Devine, *Political Culture* , pp. 260-265. For testimony verifying the impact of the McClosky and Prothro-Grigg studies, plus a fairly unpersuasive effort to challenge them, see Joseph V. Femia, "Elites,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Creed," *Political Studies* 27 (March 1979): 1-20.

10. Devine, *Political Culture* , p. 33.

11. See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ch. 6.

12. Fo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is question,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weryn Bialer and Sophia Sluzar, eds.,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pp. 31-149.

13. Leon Samson, "Americanism as Surrogate Socialism," in John H. M. 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Failure of a Dream?*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1974), pp. 426-44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oward a United Front*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5).

14.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Knopf, 1956), p.9.

15. Edward C. Banfield and James Q. Wilson, *City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pp. 329-330.

16.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2:271, 275.

17. Clyde Kluckhohn, "Have There Been Discernible Shifts in American Values during the Past Generation?" in Elting E. Morison, ed., *The American Style*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8), p. 152.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 103. Lloyd A. Free and Hadley Cantril,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American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75-177. Devine, *Political Culture* , p. 65.

18.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1 :409.

19.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London: Macmillan, 1891), 2:417-418. Myrdal, *American Dilemma* , 1:4, 8.

20.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and William F.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Schuster, 1956).

21.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 pp. 101-139. Carl N. Degler, "The Sociologist as Historian: Riesman's *The Lonely Crowd*," *American Quarterly* 15 (Winter 1963) : 483-497.

22. Richard deCharms and Gerald H. Moeller, "Values Expressed in Children's Readers: 1800-1950,"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February 1962): 136-142. Fred I. Greenstein, "New Light on Changing American Values: A Forgotten Body of Survey Data," *Social Forces* 42 (May 1964): 441-450.

23. Lee Coleman, "What Is American? A Study of Alleged American Traits," *Social Forces* 19 (May 1941): 492-499.

24. John McDiarmid,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es-A Study in Verbal Symbol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 (July 1937): 79-82.

25. Croly,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 p. 3. William R. Brock, "Americanism," in Dennis Welland, e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ethuen, 1974), pp. 59, 68. Myrdal, *American Dilemma* , 1 :3.

26.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pp. 64-65.

27. William T. Bluhm,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p. 100.

28. Samson, "Americanism as Surrogate Socialism," p. 426. Richard Hofstadter, quoted in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13.

29. John Higham, "Immigration," and C. Vann Woodward, "The Test of Comparison," in Woodward, ed.,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98-99, 93, 351.

30. Bryce, *American Commonwealth* , 2:652.

31.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 p. 8.

32. Carl J. Friedrich et al., *Problem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ervi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p. 12.

33. Sidney E. Mead, "The N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 *Church History* 36 (September 1967): 275.

第三章 鸿沟：美利坚信条与政治权威

共识与不稳定

有关美国政治的研究经常指出，对于美利坚信条基本内容的广泛共识，证明了美国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这一观点假设价值共识能够转换为对政治制度的支持。人们的确经常假设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建立在对民主价值的广泛认同之上；如果相当一部分公众从根本上反对民主制度，并且支持左、中、右翼的独裁主义运动，那么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在政治权威的正当来源、政教关系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等问题上深刻明显的阶级分野，可能导致民主政治系统的严重不稳定。一提起不稳定，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由这些社会分裂造成的不稳定，并容易认为一切能够缓和极化、弥合分歧，或是创造共识基础的措施，都有助于增强政治稳定性。在一个严重极化的社会，这样的措施或许确实有利于增进稳定。

然而，此类分析通常暗示着，因为争吵意味着不稳定，所以共识能够增强稳定。如果人们都同意民主价值，那么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就多少得到了保证。然而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正如过度的分裂能够导致不稳定，过度的共识也能够导致不稳定。同欧洲相比，美国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冲突相对较少，但是它也有自己的政治不稳定形式，这种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政治共识的内容。

政治价值共识是否会导致政治稳定，取决于这些价值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政治制度、社会实践的关系。如果主导的政治价值使制度和实践合法化、神圣化，政治稳定性就会加强。但是也可以想象，共识的核心理想与价值可能为挑战主流政治制度与实践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后一种正是美国的情况，也是美国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主要国家的政治特征。

广泛的自由民主价值共识，构成了挑战美国政治实践与政治制度权威的基础。共识提供了评价制度的外部标准，并经常对制度做出苛刻的评判。政治制度与实践从来没能符合美利坚信条理想与价值的要求，因此被视为没有合法性。挑战权威的公开程度，取决于人们以何种方式认识制度与实践。有时候，人们认为政治就应该是美国发生的那个样子，对其中所有偏离美利坚信条的情形视而不见。另一些时候人们可能会感到，在实际发生的政治行为与按照美利坚信条规范应该出现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差距。对这种差距的强烈意识，驱使人们要求改革政治系统。让政治现实符合政治原则的努力，就成为美国政治变迁的主要源头。

美国的分裂，不是欧洲那种理念与理念的碰撞，而是理念与现实的碰撞。冲突爆发在两个拥有相同政治原则与信仰的团体之间：一派认为，自身的利益在于立即改变现行制度，使其符合政治原则的要求；另一派虽然接受政治原则的有效性，但认为现存制度仍然与政治原则保持着一致，因此可予以保留。在其他国家，因阶级分化和世界观冲突而导致的分歧也许比美国更加严重，而在美国，将人们团结为一个民族的信仰，竟然还能导致他们的分裂，这的确是美国人的特殊命运。同一个信条，既是民族认同的源泉，又是政治动荡的来源。冲突是共识之子，美国发生的大多数激烈争论，都源自获得压倒性认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美利坚信条的基本理念——平等、自由、个人主义、宪政主义、民主显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意识形态，也不具备任何逻辑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和平等也许会产生矛盾；个人主义也许会背离宪政主义；民主，或曰多数统治，则可能既破坏自由又阻碍平等。正因为美利坚信条是一种非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它能够兼容这些逻辑方面的矛盾。

虽然被哲学家认为缺少统一的逻辑，但在解释社会与政府关系方面，这些理念的确拥有共同的宗旨：构成美利坚信条的不同要素都要求给权力和政府部门施加限制。宪政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基本法限制政府权力。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总结美国革命时指出，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免于政府控制的自由——在权力面前捍卫自由。个人主义的实质，是每个个体依自己良心行事，拥有免于外部限制而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除非限制对于确保其他人也拥有同样权利是必要的。平等主义的实质，是否认一个人有权对他人行使权力。民主的实质，是人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代表的方式控制政府，要求政府官员对公共舆论负责。总之，美利坚信条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反对政府。反对权力，怀疑政府是权力最危险的化身，这就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主题。

对于19世纪后半叶严重的贫富差距，美国人提出所谓“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加以合法化。巨额财富是巨大努力、功劳和风险的回报，直到20世纪，美国人仍然相信这个理论。然而他们从没有为权力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找过合法性理由。因此，虽然美国人可能有“财富的福音”，但他们从来没有——从本质上来说也不可能有——“权力的福音”。恰恰相反，他们拥有的是无处不在的反权力道德观。

1971年秋天，在欢呼的麻省理工学生们面前，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说：“如果我能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中得到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不要相信权威，不要相信总统，不要相信掌权者，

因为即使是在美国，权力也是腐败的。”¹ 无论是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还是后来的“水门事件”录音带，人们都一定能从中得出与埃尔斯伯格相同的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启示，其回声历经两百年的美国历史，仍然不绝于耳。查尔斯·亨德尔（Charles Hendel）认为，“第一代美国人仍然用猜忌的目光审视权力，生怕它披着什么伪装。这种普遍的心态成了美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习性”，并且发展出“一种反对任何形式权威的、不加批判的哲学”，“……自由的、负责的、自治的个人被认为是自给自足的”²。

在美国革命时期，这种态度表现为自由与权力的对抗。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在欧洲，权力为自由颁发许可；在美国，则是自由为权力颁发许可。杰克逊主义者将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加以发展——1826年，约翰·C.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指出，问题“存在于权力和自由之间”。更明确地讲，政府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威胁——即便民主制下的政府也是如此。杰克逊主义的最著名的杂志宣称：“正是在‘政府’一词下面潜藏着微妙的危险。政府是稳固的中央权力，管理、引导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它不仅是恶魔，还是恶魔之母。”³

到了20世纪，反对权力和政府仍然是美国思想的特点。“只要在民意调查中问起美国人对于政府的总体态度，结果肯定是压倒性的负面看法”。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加信任彼此，却更不信任政府。美国的传统，是“对社区和政体高度信任，以及对权威的有限信任”，“……狄更斯，尤其是布莱斯提到的缺少信任是针对政治权威的，而不是针对政体和社区层次的”⁴。

在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没有“国家”（state）的概念，这表明了美国人对权力与政府的反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起源于15、16世纪，成型于后来的绝对主义时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布丹是国家概念的提倡者，是欧洲大陆绝对王权的缔造者。“国家”暗示主权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集权化的政府权威。这一概念从来没能在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那里扎根，他们带来的传统更为古老，它源自中世

纪立宪主义，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以及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等人的著作。17世纪，当英格兰人为了议会主权还是国王主权争执不休的时候，美国人却选择了同时拒绝二者。虽然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激烈地宣称，“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而且必须存在一个最高的、不可抗拒的、绝对的、不受控制的权力，以使主权权利安置其中”，美国人仍然在整个18世纪顽固地坚持相反立场。结果，美国没有受到英国宪法与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功利主义者强调中央集权、理性和效用，反对权力分散、道德和自然权利，可是他们对于美国思想产生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边沁也的确谴责过《独立宣言》，称其是“一堆混乱荒谬思想的大杂烩，其中的理论本应得到证明，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⁵。

只有在19世纪末期，当一些美国学者（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在德国从事研究时，美国政治思想中才出现了“国家”这个概念。不过它只在学术著作中出现，相关解读也是一笔带过。即便在这一时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评论仍然认为，美国“没有国家，也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没有任何明确的国家概念，也给造访美国的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奥地利保守贵族冯·讷布纳男爵（Baron von Hübnér）于1871年访问美国后认为：“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由政府代表的、所有人的自由的限制……你们（美国人）赋予个人的太多，赋予国家的太少。我们在美国目睹的很大一部分丑恶和暴行都源于此。对公共舆论机构的控制太少。你们需要的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权威的控制。”20年后，布莱斯给出了相似的评论：“美国没有国家理论，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国家不过是许多个人的集合。政府只是某些代表和官员而已。”又过了几年，H. G. 威尔斯（H. G. Wells）也给出类似看法，认为美国没有“国家意识”。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声称：“在哪里也找不到像我们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地方，其人民完全地蔑视国家，彻底地使国家涣散。”⁶ 尽管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在20世纪大为增加，人们看待政府权威与政府自治的方

式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政府仍然被视为社会的仆人，作为合法权威实体的国家概念对美国思想而言仍然是陌生的，使欧洲式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概念成为美国传统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自然权利的极端对立面。

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待国家的不同态度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19世纪早期，美国成功地将宗教机构的残余影响逐出政治，建立起政教分离机制。这一进程通常被视作美国人追求宗教自由的证明。这同时也证明美国人要求限制政治权威。欧洲的国家教会在历史上发挥了强化政治权威并赋予后者合法性的功能。在美国，政治权威被剥夺了宗教支持，只得在没有宗教辩护的情况下，独自面对疑心重重的自由主义社会。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待政治权威态度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各自的极端运动的性质上。在欧洲，无论右翼的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还是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支持建立强国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激进分子，不论其在政治光谱上处于何种位置，全都倾向于个人主义、反集权主义、自由主义，支持去集权化和大众统治⁷。他们都希望削弱而非增强政治权威。因此，美国和欧洲的极端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将各自社会中的流行的政治倾向推到极端形态。

美国人对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在他们不断变化的人性观与他们对待权力和权威的态度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反映出这种疑惧的心理。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和宪法建立在加尔文理论和霍布斯哲学的基础上”⁸。这个说法在17、18世纪是很有道理的。清教徒的罪恶感、内疚感同霍布斯的人类利己主义观点相结合，导致了对人性相当黯淡的看法——人们追求自私的经济和权力上的利益，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睿智的治国者设计出制度和程序，在泛滥的私人罪恶中创造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国父们围绕《独立宣言》进行的争论，还有《联邦党人文集》，都直接表达了上述有关人民和社会的基本假设。美国政治与社会思想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制宪会议之后五十年的人性观。人的意象在本质上是罪恶、邪恶、贪婪的，是具有危险本能和

倾向的存在，需要精巧构建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加以控制，然而人性本善的观点取代了人性恶的观点。人的内心开始被看作是善良的，可以变得完美。

也许会有人认为，对于人性本质截然不同的观点，将会导致有关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两种不同理论。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被用来论证有限政府。国父们认为，执掌权力的人会堕落为恶魔，并侵害他人的权利与自由，除非他们被对抗性的权力限制。此后更为乐观的一代政治家虽然提出了对于人性的相反看法，却得出了有关政府的相似结论。因为人的内在本质是善良、理性的，强政府没有必要控制、指导人民——人性本善，所以政府应当弱小。

从不同的前提得出两个相似的结论，这未必是纯粹逻辑的结果。托马斯·霍布斯对人性本质的假设与宪法缔造者们的十分相似，在政治权威的角色方面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和19世纪的民主主义者一样，让·雅各布·卢梭也从人性本善的假设出发，就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与管理范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总之，美国人对政治权威的敌视，使他们无论从何种人性观出发，都更加偏好弱政府而非强政府。

美国人还倾向于用类似的方法理解美利坚信条中两个潜在矛盾的价值——平等与社会流动，将它们与反对权威结合起来。科拉·杜波依斯（Cora Du Bois）指出，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的“美国人对政治权威人物的反感”，“降低了社会地位差别的意义”，使美国人不拘小节、举止随意，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导致了“尊重的平等”。成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某些形式的成功，尤其是那些不依赖等级权威关系而取得的成功，较之其他更受推崇。“向上攀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成功的活动，但是当上升流动超出了平等前提和一致性的核心价值，就趋于狂妄自大……企业主、政治家、教师以及各种‘大人物’，当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意味着权威时，便会遭受众人的鄙视。电影明星和棒球英雄则备受尊重，因为他们没有依仗权力实现成就，而是经过艰苦努力，才在通往名利的路途上飞黄腾达”。⁹ 在比赛中战胜他

人是善，利用权术战胜他人是恶。美国人或许会褒扬有名者，却不会赞美有权者。相似地，那些的确有所成功的“自我成就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国词语），通常“喜欢吹嘘其成就，夸大其出身的卑微，声称其奋斗历程如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说描述的那样，历尽艰辛坎坷”。在欧洲则正好相反，向上流动的人“如果来自较低的阶层，一般更愿意忘掉自己的出身”¹⁰。

对权力的反感导致了对待财富的矛盾态度。美国思想中的“平等”很少被理解成财富和收入方面的经济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像普及免费义务教育这样的重要社会创新，就以机会平等之名获得了合法性。只要是天赋、努力和成就的结果，经济不平等也是合法的。如果被用于社会公益目的，那么巨额财富也是合法的。美国独有的慈善事业传统，实际上就是非自由集中的财富向自由社会的价值规范支付的贡金。更一般而言，如果金钱不被用于购买商品而是换取权力，那么它就是恶魔。当大量积累的财富转变为拥有经济权力、能够统治市场的托拉斯和垄断的时候，它就不再被人们接受。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热衷于反对托拉斯，它瞄准的正是财富转变成权力的节点。同样，经济不平等如果转化成政治不平等，那么前者就是恶魔。结果是美国人多年来花了很大力气去揭露、治理游说和政治献金问题。美国人对“大”的矛盾态度也体现了这种想法。就物品而言，大是一件好事；就组织而言，一旦涉及权力结构，大就变成一件坏事。从历史来看，个人财产意义上的大房子、大汽车和巨额财富一直被认为是好的，而大型财团、大型工会，尤其是大政府，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

在其讨论美国种族关系的经典理论中，缪达尔明确指出，美利坚信条的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坚定信仰与美国社会中黑人的实际遭遇之间，存在着一个“美国困境”。然而他只看到了美国政治理想与制度间存在巨大鸿沟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最严重的那一方面）——这里称之为“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他所谓的“美国困境”之一，实际上就是唯

一的“美国困境”，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困扰。

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形成了对于几乎所有政治制度持久有力的控诉——也包括那些美国独有的制度。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等级制、不平等、专制权力、秘密、欺骗以及既定的上下级关系模式。然而美利坚信条对上述所有政府特征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它完全反对现代政府的高度集权化、官僚化性质，认为这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初衷和传承。

这正是困境所在。美国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利坚信条的基本原则。然而政府永远也无法完美地体现这些原则，因此决定其合法性的实际上是人民对待美利坚信条原则的认真程度。如果民众赋予政府更高合法性的办法是让政治实践更加符合政治原则的要求，那么他们将会削弱政府，而不是增强政府。由于美利坚信条固有的反政府特征，强大的政府必定是非法的，合法的政府必定是弱小的。

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政府一直都比欧洲国家的政府更虚弱。这最初是因为美国不存在需要推翻的封建主义，没有必要集中权力、建立强大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正如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达到了民主阶段而没有经历民主革命，并且……生来平等而不是变得平等”。于是封建主义的缺失消除了建立强大政府的主要消极原因。取代封建主义的是广泛的自由民主价值共识，这又为限制政府提供了额外的积极动机。如果没有这一共识，强政府本来是必然会出现的；然而就像哈慈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制宪者们对美国社会的错误理解，才使其建立的分权制衡政府能够一直存在¹¹。共识的内容使这套制度更加虚弱了。

历史上，强政府的出现是通常为了摧毁传统社会或者打击外部敌人。17世纪是欧洲国家的建构时期，绝对主义的君主一直同时从事这两类活动。美国从一开始就无须应付前一种情况，从建国后初期到20

世纪这段时间也无须严肃应对后一种情况。无须建立强大的政府机构，美国照样能够保持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等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时，强大国家的诸多工具已经被创造出来。然而，这些发展之所以能实现，只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人相对不太关心如何在国内政治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而是更在意保护这些制度免遭外来威胁。到了60年代，美国人转而关注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差距，他们就将那些用于对抗外部敌人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一股脑全抛弃掉。

当然，任何社会的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绝对君主控制着意识形态，理论上统治者权力也不受任何限制，那么政治实践将会构成对统治者权力的实际限制。“非官方”的现实将会偏离“官方”的意识形态。试图缩小二者间差距的努力将增强既有制度的权力和权威，把现实中不完全的绝对主义变成理想中完全的绝对主义，从而通过增强国家力量提升国家合法性。可以将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同美国做个对比。在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让统治合法化，给“为何服从”的问题提供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然而美利坚信条提供的却是限制统治的理由，能从这里获得充分合法性的是那些质疑、抵抗政府的行为，而非服从政府的行为。

政治思想的确在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净化的作用，这是其他社会所没有的。在那些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国家，政府制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同时也有各种各样为其辩护的声音。传统和社会结构为一些机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可以赋予个别制度合法性。一套制度遭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攻击，将导致另一种意识形态以同样的激烈程度为其辩护。然而美国的政治共识基本上是反对政府的。政府、等级制、纪律、秘密、强制，还有压制个人和团体的诉求，在美国，哪里会有人为这些事情正名？就美国人的信仰而言，政府理应是平等主义的、参与式的、开放的、非强

制的，能够对个人和团体的诉求做出反应。可是，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美国政治“言行不一”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民认为政府不应该做那些使之成为政府的事情，而是应该去做一些使之不成为政府的事情。

因此，对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挑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不是舶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本土的美国理想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并没有被根深蒂固的分歧所威胁，而是被深有同感的共识所威胁。不信仰美利坚信条，美国人就不成其为美国人；信仰美利坚信条，美国人就必定要反对他们自己。美国人越是热情地投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信仰中，就越是敌视、嘲讽自己的政治制度。在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作用之下，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与美国政治理想的信仰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

所有社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都存在差距，但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信仰之广、之深。乔治·洛奇（George Lodge）认为，这种“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确实“背离了历史上典型的社会规范”¹²。多年来，众多系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把美国在政治等各方面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几乎毫无例外地表明，美国人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价值的信仰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强烈¹³。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人对上述价值有着更高水平的共识。在共识的实质内容方面，美国也不同于亚洲国家和共产党国家。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支持着国家，连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表述也被统治者控制。在美国，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社会团体对抗统治者常用的武器。主流政治信仰对政府权力和政治制度合法性形成了持久挑战。没有哪个地方的政治权威会像美国这样脆弱。

考虑一下美国与欧洲社会的对比情况。大多数欧洲社会继承了意识形态多元主义，从而产生了阶级间和党派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结果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坚持总会导致与特定政治制度间独特、密切、持续的联系。保守主义者通常支持国王（如果有国王的话）、行政部门、贵族、法庭和立法机构的上议院，传统上也支持官僚制度。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与国会和政党站在一起。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工会、工人阶级政党、普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也支持民选的立法机构。因此，如果某个制度的合法性遭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通常会有另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意识形态为其辩护。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中，共和主义者和左翼一直在挑战行政权力，右翼则为行政权力说话；在对待议会权力时，它们则彼此调换了角色。英国王室或议会如果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保守主义就会站出来维护它们。而倘若美国的某项制度或实践不符合美利坚信条的自由民主规范，它却无法像大部分西欧国家那样，得到来自保守主义、贵族派、马克思主义或者基督教民主主义传统的辩护。在美国只有一个合法性来源，如果严格地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都将是不合法的。面对自由主义共识的压倒性优势，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实践可谓是孤立无援。

欧洲的意识形态多元主义，也意味着欧洲国家的自由、民主、平等规范要比美国更弱，强调等级制和权威的非自由主义、非民主主义规范及其辩护声音更强。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一直在关注这些区别。从克雷夫科尔、托克维尔直到现在，欧洲观察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平等、开放、缺少社会等级、怀疑政治权威、信仰人民主权等方面，将这些视为美国政治不同于欧洲的关键特征。正如马科斯·贝洛夫（Max Beloff）所总结的，在20世纪中期，“就那些不同于西欧和英国的特征而言，美国在本质上仍然是托克维尔笔下的那个美国”¹⁴。同英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拥有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在美国，参与的倾向比服从的倾向更显著，前者一

定程度上支配着后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认为，参与和服从之间的不平衡“来自有关政府和官僚权威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肇始于针对英国君主的疑惧和革命，巩固于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包括司法和官僚部门——服从大众直接控制的趋势”。同样地，对于“个人应该首先对国家尽义务，其次才是关心个人的幸福”这一观点，美国人的赞同率显著低于欧洲人¹⁵。（见表 1）

美欧政治文化的总体差异，也在青年的政治价值与态度中体现出来。

表 1 个人自由与对国家的责任

	美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墨西哥
赞同	25%	38%	41%	48%	92%
不赞同	68%	55%	45%	32%	5%
不清楚及其他	7%	7%	14%	20%	3%

资料来源：Donald J. Devin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193, reporting results of survey included in Almond-Verba study.

a. 受访者需对以下观点做出评判：“个人应当首先承担对于国家的责任，其次才是考虑个人幸福。”

在一项调查美、英、德、意四国青少年对民主制态度的研究中，“美国青少年选择民主选项的最多，选择反民主选项的最少”¹⁶。格林斯坦（Greenstein）和塔罗（Tarrow）考察了美、英、法三国学童对于警察拦停超速的国家首脑车辆这一假设情景的反应。认为国

家首脑应该被处罚（即期望总统与其他公民待遇相同）的美国儿童是英法的两倍，他们更喜欢设想首脑赞扬了警察的行为（即期望总统自己遵守平等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认为“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的人数也是英法的两倍¹⁷。在另一项研究中，美、英、德三国学童被要求挑选出若干价值选项并对其进行排序，这些价值将被用于建立一个虚拟的孤岛社会。美国孩子的“总体趋向”是“平等主义”、追求公共利益、强调“消极自由”，而英国孩子则关注个人利益，德国孩子注重规则和服从¹⁸。

加拿大与美国拥有相互交织的历史，相似的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特征。或许除了澳大利亚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政治与社会价值方面与美国如此接近。然而二者间也存在显著差异¹⁹。加拿大没有美国那种充沛动力去“实现所有人自由正义的美国梦”。因此加拿大政治缺少美国政治的救世主情怀和极端运动；它一直更为宽松、容忍、多元、平淡。美国政治文化兼具乌托邦和实用主义，加拿大则仅仅是实用主义²⁰。

历史上，加拿大人一直比美国人更保守，更讲求集体主义，更支持国家、尊重权威，不像美国人那么热爱平等和个人主义。“加拿大人的政治意识不会固执地认为国家和国家机器是自由的天然敌人，但这种想法在美国人那里十分突出”。²¹人们一般认为，加拿大的民族性格“倾向于官僚主义，反对平等主义，强调集体归属感；而美国人则崇尚平等主义，看重成就，富有企业家精神”。加拿大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主张个人主义、放任自由、反对政府的美国保守主义。和美国相比，加拿大的政治生活有着很强的社团主义倾向，强调顺从的权威，是“准参与型”的政治。从根本上讲，“美国人的社会观是洛克式的、个人主义的，加拿大人则受到美国独立后前往加拿大定居的亲英分子影响，赞同有机集体的观点”。²²从更具一般性的层面来看，美国是“只有一个真实神话的文化”；加拿大则不然，其发展模式建立起的是“英属加拿大多元意识形态的合法性”。²³

与单个欧洲国家的对比，更能凸显美国人对平等和民主价值的追求，以及意识形态同质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区别。从18世纪以来，美英之间就存在明显的不同。尽管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的语言有些夸张，但是仍然明确地表达了英国人对权威问题的主要看法：“我们畏惧上帝，敬畏君主，仰慕议会，服从官员，爱戴神父，尊重贵族。”人们永远不会用恐惧、服从、敬畏、崇敬、尊重甚至仰慕这样的词汇去形容美国人对待权威的态度。伯克同样很好地总结了美国人的观点，他说美国人中有着更加“强烈的自由精神”，“也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民都更加强烈”，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最突出的特征，是民族的标志”。美国人“是那种坚决拒绝在思想和观念上屈从于他人的新教徒……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有与其对立的利益……所有的新教主义，即便是最冷漠、最消极的那些，也是一种异见。但我们北部殖民地最普遍的宗教是抵抗原则的提炼产物：它是异见中的异见，是新教中的新教”。²⁴

在此后数百年中，包括托克维尔和白芝浩（Bagehot）在内的敏锐观察者继续强调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平等与竞争元素，将其与英国普遍的服从、归属的价值进行比较。历史上，服从一直是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思想特征。²⁵ 历史学家A. P. 桑顿（A. P. Thornton）在一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总结到，英国人民“仍然习惯于权威，仍然像一个世纪前白芝浩说的那样容易顺从，虽然他们对权威的本质看得更清楚，虽然中产阶级不时遭到冷嘲热讽”。²⁶ 还有一项研究针对美英两国保险业职员最钦佩的个人品质进行了调查，发现美国的保险业职员更愿意认可“非道德的、开拓性的品质”，英国职员则更喜欢“控制反社会冲动”。美国的青年精英绝大多数持自由主义观点，英国的青年精英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更为多样化。美国人的中心议题总是“在种族、贫困和对外使用国家权力方面没能符合美国理想”。²⁷

美国和英国都是民主多元社会，但是美国还信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英国则讲求等级次序和集体主义。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 发现：“英国政府不像美国政府那样经常遭鄙视，它即便不被信任，也仍然是服从的对象。”英美两国民众对待权威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在政府秘密和个人隐私方面极为不同的处理方法，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期和60年代的曝光时期凸显了这种差别。“从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公共性原则……厌恶政府秘密延续了对贵族统治的不信任”。对比之下，“英国社会接受等级秩序，使政府得以保护其秘密而很少遭到挑战和反感”。²⁸

美国人的心态与历史上德国人曾经流行的心态也有着很大差别。人们一般会将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权威主义当作德国文化的特征。国家及其权威是德国政治实践与理论的中心。与美国的武装力量相比，德国军队的纪律更严，更尊重权威，身份差别更加清晰、重要。亚历克斯·英克尔 (Alex Inkeles) 和丹尼尔·列文森 (Daniel Levinson) 发现：“严格的身份差别会让美国人感觉不舒服，他们将自己视为平等的个体，评价个体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品质，而身份差别有违这种观念。”德国人则表现出“对身份的强烈兴趣”，他们“更适应有着明确身份地位关系的环境”。“相应地，德国军队通常一丝不苟地严守地位差别……权威和纪律极为苛刻严格，因为美国人珍视自我，服从权威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自我羞辱”。²⁹

美德两国儿童间也存在类似的区别。通过将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执政之前德国儿童的状况与美国进行对比，库尔特·勒温 (Kurt Lewin) 发现：“美国少年儿童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程度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小孩子面对大人，学生面对老师时毫不屈膝的态度。同样，大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也更加平等，而在德国似乎大人的管理和小孩子的服从皆属自然。”³⁰ 战后这种差别无疑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消失。1966年至1967年对四国儿童的研究显示，美国学童最喜欢民主的选项，最不喜欢反民主的选项；德国学童则恰恰相反。（英国和意大利学童的情况介于二者之间。）

同样地，德国家长比美国家长更愿意采取所谓“教养行为”，管

理、引导孩子并与之建立联系。对德国儿童，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依赖，更迟地加入半自治的同龄人团体活动，更晚地具备按照自我意愿实现成就的动机”。60年代末的研究发现，德国青少年“对政府有着温顺、依赖的，几乎小孩子一样的态度”，而英美两国的同龄人却不会这样。另一项针对美德两国接近二十岁的青少年人群的研究发现，美国青少年更喜欢追求个人成就，更加坚持自己选择目标的自由，更愿意调整自己的选择以适应团体的规范。德国青少年获得自我意识的方式则是控制自己符合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德国孩子从‘我必须’开始——达到外界期待的标准，而不是美国孩子的‘我想要’。事实上，以‘我想要’为起点对于德国人来说似乎是不可原谅的自私表现。为了整体利益，‘想要’应当被压制。因此他们强调意志力：‘我必须能够做到我应该做的’。”这些区别反映在德国公职人员受尊重的程度比美国同行更高上。³¹

在美国，自由民主规范是否宽容到能够适应有效的政府体系，一直都是个重要的问题。德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则是传统的权威和等级规范能够得到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民主政府体系。政治规范和制度之间的差距过大，使魏玛共和国无法生存下去。和魏玛相比，西德政治制度中的民主色彩较少，政治价值中的权威主义也较少。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人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大部分人口不怎么参与政治，对于政府的官僚输出而非政治输入有一种“服从趋向”，这些情况似乎全部“表明这个政治体系内部尚未形成坚定的民主态度”。“二战”已经结束十八年，仍然可以说，“集体至上、精英主义的价值在西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其他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德国儿童阅读课本的主题同20年代相比没什么显著区别。因此所谓“德国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并成为“和美国人一样好的民主主义者”是错误的——至少就60年代的情况而言是错的。德国人“只有政治上的民主，却没有心理上的民主”。³²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德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

大变化，民主价值得到的支持显著增加。1953年，50%的西德公众支持民主政府体系；1967年，74%的人认为民主对德国而言是最好的政治体系；1972年和1976年，90%的人表示对西德的民主满意。其他研究和调查也支持同样的结论，认为1959年以来“民主和参与的规范”在西德“广为传播”。³³ 德国在政治价值和态度方面的变化主要是由人口代际更替导致的，相比于成长在德意志第一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人，1945年以后进入政治生活的那几代人有着更强的民主价值信仰。70年代初期，卡尔·迪特里希·布拉歇（Karl Dietrich Bracher）认为德国仍然存在“前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环境及行为方式的延续”，另一位学者声称“德国的政治意识中还存在着国家主义思想”。³⁴ 然而，随着年轻一代在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文化中被社会化，这些倾向将持续减弱。

德国政治文化的这些变化减少了美德两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到70年代末，确实可以说德国政治文化在某些方面比美英更接近民主的“公民文化”。民主价值在德国越来越广泛，人们也更加支持德国的政治制度，并为之感到骄傲——至少暂时如此。1959年，只有7%的西德人把政治制度当成他们“最为之骄傲的事物”；1978年，31%的德国公众表示他们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感到尤其自豪。³⁵ 因此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以广泛的民主价值共识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取代了同时包含权威与民主元素的混合政治文化。在这段时期，民主共识使人们支持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为之骄傲。然而这一共识的内部也蕴含着和美国传统类似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德民主制度的出现遭到来自仍然存在的对权威政治价值的强烈支持的挑战。在70年代末，西德的民主政治制度因为过于偏离国内主流的民主政治价值而遭到批判。德国人越来越“喜欢要求政治体系符合其理想……70年代末德国社会最具批判性的人几乎来自相同的群体——青年人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他们是过去三十年不断发展的民主规范的先锋队”。³⁶ 民主共识正在制造德国版的“美国病”——源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认知失调。

法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也许就是其两面性。一方面，法国存在传统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还有尖锐的阶级分歧。另一方面则有法国大革命留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精神遗产。两面性的结果是持续存在的社会分裂，以及时而发生的政治价值极化。李普塞特发现：“法国价值中的集体至上、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促进了阶级政治出现，与此同时，对平等主义、普世主义和成就的强调，又使弱势阶级对自身地位强烈不满。”20世纪60年代对格勒诺布利市（Grenoble）学童的调查，清晰地显示出矛盾的精神遗产在政治态度方面造成的结果——对于“1789年革命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57%的学童给出了正面评价，认为革命不好的孩子也高达30%。³⁷

威廉·舍恩菲尔德（William Schonfeld）将有关法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解释称为“两个法国理论”。在个人层面，它意味着“每个法国人对政治权威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害怕、讨厌、怀疑，试图避免屈从于权威，同时又需要、寻求、依赖于权威”。法国人不情愿用面对面平等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了权威的增强和集中。然而与此同时，权威必须在特定的、明确的限制条件下行事，而且可能会突然崩溃。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两面性的结果既不是民主模式也不是威权模式，而是“有限的威权主义与可能的造反的共存”。³⁸ 在某种意义上，法国传统中的权威因素时刻面对着同样来自传统的革命因素的潜在挑战。至此，美法两国的异同已经十分明显：革命传统的平等主义是美国政治唯一的传统，政府是没有权威传统的。

几乎没有既有研究对美国与南欧、拉美国家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比较。然而这样的对比研究很有可能发现类似美国与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性。据观察，北美最经常担心的是暴政、镇压和滥用权力，阿根廷人——通常也是所有拉美人——则害怕政治失序和无政府状态。美国人因政府过于强大而不安，阿根廷人及其他拉美人则因政府太虚弱而恐惧。有研究考察了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学童对“尊重”概念

的理解，研究的结果支持上述看法。美国人“一直有总体上相对独立的平等交换模式”。墨西哥人的模式则“相当不同”，倾向于“权威主义”。大多数墨西哥人认为尊重意味着服从的积极义务。同大多数美国学生不同，三分之一的墨西哥受访学生认为不论乐意与否，尊重均意味着必须服从受尊敬的人物。另一项研究发现，94%的墨西哥学生赞同“服从、尊重权威是儿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³⁹ 而持相同观点的美国学生比例仅为59%。正如在其他社会中一样，墨西哥人对政治权威关系的态度与对待家庭权威关系的态度类似，认为父亲的绝对权威与他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紧密相关。

因此，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反对权力和权威的美国政治价值，与更加多元化、更重视权威和等级制的西欧国家政治价值有着重大区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德人确实更加支持民主，但是在欧洲，自由、民主和反对政府的价值仍然无法像在美国那样得到真正全体一致的支持。历史上，美国政治实践中的自由和平等也比欧洲更为普遍。然而欧洲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比美国要小，因此欧洲观察家对美国出现的同类问题不太敏感。至少从托克维尔开始，观察家们就只看到了美国流行的自由平等价值，却没有区分规范与实证两个不同维度。除了缪达尔这一醒目的例外，欧洲人一直把关注点放在美欧政治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差别上，却掩盖了美国自身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结果他们虽然观察了美国政治，却没能发现“不协调”这个核心特征。

非西方社会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将个人利益作为动力，任凭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智慧而不进行限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国人则几乎将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手中。前者将自由作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则将奴役作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1835年）

日本人依赖秩序和权威，我们信仰自由与平等，这构成了分立的两极，我们难把作为社会机制的等级制看成是合法的。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心是其上下级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础。

——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年）

美国文化当然会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个人责任和自我实现。中国人则重视社会关联、基本的集体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表明了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

——理查德·H. 所罗门（Richard H. Solomon）（1971年）

西欧的发展特点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多元主义，这是苏联以及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国、日本、印度——所不具备的。其中一些国家的确在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苏联、中国、日本和美国一样，都是“共识”社会，而非欧洲社会。这些非西方社会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共识的内容。日本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从封建的德川时代末期到“二战”后的现代，社会政治组织基本规范仍然得以延续和保留。苏联的革命政党成功地消灭了19世纪末出现的自由主义潮流，并将意识形态同质性强加于人为重新构建的社会。中国革命制造的新型政治文化将革命与传统（儒家）元素结合起来。然而正如上述引文所言，这三个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与价值从根本上不同于美国流行的自由、平等、个人和民主价值。占领美国社会并在欧洲享有一席之地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在非西方社会中要么根本不见踪影，要么只是边缘化或失败的存在。苏联、中国和日本的主要规范都倾向于增强政治权威，美国的规范则强调限制和削弱权威。

苏联的认同主要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语言来界定，这点和美国很像。就抽象内容而言，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美国一样，可以对政治权威发难。毕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意识形态，它包含许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且提出在革命成功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废除国家。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美国和苏联的政治体系十分相

似，因为二者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反对权威和等级，支持社会、经济、政治平等，要求政府融入社会。然而苏联国内存在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者明确要求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党的功能同时包括了意识形态解释和政治统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党的领导；“美国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人民支配。在苏联，意识形态不能被用于对抗政治体系，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规定，控制体系的人也应该控制意识形态。因此，马列主义是维护苏联政治体系的工具，还是统治精英争论政治和政策选项的理论框架，但它不可能成为挑战体系的工具。

没有任何单独的团体或机构垄断美国政治价值与原则的解释权。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些原则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更加敌视现有的权威，因此经常被社会力量用来限制、束缚和削弱政治权威。同样是这个原因，在美国，一个人越是信仰美国理想，就越是批评美国制度的权威结构。而在苏联，一个人越是信仰马列主义，就越是支持苏联制度的权威结构。苏联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在于人民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转而对其抱以冷漠、消极和嘲讽的态度。美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则在于人民强烈地信仰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试图改革制度和实践，选择新的领导。美国的持异见者经常——并且是成功地——诉诸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苏联的持异见者则通常会呼吁反对苏联马列主义价值，要求用宗教的、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规范对其加以修改和补充。

从更为基础的、非自觉的文化层面来看，苏联社会对于权威的规范和心态是从沙俄时代自然演化而来的。伊凡四世曾说，“俄国的统治者不向任何人负责，而是可以一直任意奖赏或惩罚他们的臣民”，这正是昔日俄罗斯的传统。独裁统治，所有人臣服于国家，政治权威集中，必须服从，这些都是俄罗斯政治传统中的持续性因素，它们只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短暂、轻微地挑战过。德·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曾于19世纪30年代观察

到：“可以说，俄国人，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都热衷于奴隶制度。”俄语单词“strakh”的意思是“敬畏权威”，表明共产主义俄国继承了农民俄国的残留。由此，从“双重俄罗斯”——国家是脱离民族、高于民族的存在——这一更为宽泛的模式来看，苏联体系的政治规范和实践的确源于沙皇时代的独裁统治。⁴⁰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服从”是政治信仰的核心元素。这也是苏联儿童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而自律则排在第二位。同美国孩子相比，苏联孩子在大人面前的敌意、叛逆、冒犯和过失要更少。他们“不太喜欢参与反对社会的行为”，自治性也更差。同龄人压力和成年人压力的关系体现了这种区别；在美国一般是前者排斥后者，在苏联则是前者增强后者。⁴¹ 更一般而言，俄国人似乎一直需要权威和秩序，太多的自由将会导致政治上的放任自流和个人主义，从而更加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适。即便是20世纪40年代流亡美国的苏联人，也为美国的言论自由程度所困扰，他们“基本上适应并倾向于集权理念和国家政策领域彻底的独裁专断”。70年代末，一位敏锐的苏联问题观察家给出了相似的表述：“沙皇时代以来就广为接受、根深蒂固的政治价值导致了对中央权威的神秘崇拜，对秩序和统一的渴望，对异见和差异的厌恶，以及对一切思想混乱的恐惧。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看起来混乱又可怕。”⁴²

日本主流的社会与政治规范也十分不同于美国，它更加支持现存权威结构。日本和俄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强调集体主义、国家、等级制，压制个人主义，这使两国截然不同于美国和西方传统。⁴³ 美国和日本彼此间的差异，就像它们各自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差异一样大，两国代表了“世界各国经验中两个极端的理想类型”。美国理想的“个人主义、平等、社会流动性与竞争”在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号召力。“（日本人）讲求团体忠诚、等级依附，这导致了亲密关系、严密合作以及对个人责任荣誉的极端重视。他们既不向普世的神灵负责，也不对自己负责，而是对社会关系和特定的主

公负责。与社会的需求保持一致，用勤奋工作促进社会和谐，这些正是他们最坚实的品质”。⁴⁴

和美国流行的平等主义价值不同，“日本人的生活建立在等级制的社会规范之上”。日本人的组织方式通常是垂直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不是扁平管理的平等者联合。“日本人承认不平等的事实；这是自然而然、天生注定的。”“等级意识”，或者用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话说，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心”，是日本人看待个人间、团体间和国家间关系的方式的突出特征。每个社会单位都必须被置于等级制上下级关系中的某个合适位置。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而言，这是个“找到自己合适位置”的问题。一位敏锐的日本问题观察家指出，日本人的对外关系心理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于“他们倾向于用等级制的眼光和‘高’‘低’这样的语言看待对外关系，就像他们平时看待人际关系一样”。⁴⁵

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相比，日本人更加具有团体倾向，更喜欢认同由不同质的个体组成的单一团队，其中的成员承担了各种各样分散的或相对不够专业化的角色；他们不鼓励从一个团体流动到另一个团体，也不赞成团体内有公开的不一致声音。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竞争与不和谐，因此团体在达成决定之前要在内部进行复杂的磋商讨论。而美国人则很适应公开冲突、多数票决和更加个人主义、更加“独行侠”式的领导风格。⁴⁶

日本人对等级制和集体主义的偏好要大于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权威系统因此得到了增强。杰克逊时期，追求平等的热情席卷美国，令托克维尔感到震惊，同一时代处于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则被分为不同的阶级，诸如商人、工匠和农民等低等阶级的政治角色“局限于忠诚、服从和支持”。“反对滥用权力的革命”是美国在历史上的“标志性形象”。“……从美国建国起，人们就公开关注限制权力的问题。而近两千年的日本历史，要么是无政府斗争和内战，要么是独裁统治，在

这两极之间什么都没有。日本人怎么可能不欢迎独裁？”⁴⁷ 明治维新之后，旧的政治体系被改变了，但尊重、服从权威传统的模式一直存在到20世纪后期。就像中根千枝（Chie Nakane）所描述的：

独裁统治给日本人灌输了顺从、恐惧和敌意的信条。日本人很害怕公开表达对权威的敌视，反而会向权威效忠，并且劝告他人“长衣裹身”“大树纳凉”。日本人的服从是完全的屈服。任何对权威的批评和反对都被视为英雄主义……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造反行为在今天被冠以民主行动的标签。反对者通常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反对；这更接近情感的冲突，而不是理性的抵抗。

48

“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中，自由民主价值在日本得到了支持，特别是年轻人的支持。在1953年的民调中，“如果有一位出色的领导人，那么把事情交给他决定要比在普通公民中进行讨论更好”这一观点得到43%的日本公众的认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占38%。到1973年，只有23%的人赞同这个陈述，而反对者的比例上升到51%。然而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在60年代末，日本人对民主的态度也是矛盾的。1973年，43%的日本公众表示他们对民主持有积极看法，30%表示对自由主义持积极看法，在这两个调查中均有40%—50%的人表示自己的看法要视情况而定。⁴⁹ 从1953年年初到1973年，表示自己的个人行为将遵从传统道德的人的比例略微降低（从41%到36%），而在工作中偏好家长式管理者（81%）和非家长式管理者（13%），以及在儿童教育中偏好“纪律”的（66%）和偏好“自由”的（22%）的公众比例实际上没有变化。60年代初的日本人还为时常举行选举是否会导致政治进步而各执一词、争论不休。⁵⁰ 60年代初日本的主流价值模式被表述为：

其中有很多旧秩序的东西，强调家庭和国家重于个人，纪律、责任和义务重于自由，地位差别重于平等，激进的傲慢重于平等。虽然年轻一代和受到良好教育者正在慢慢转向自由主义

和“民主”信仰，但这种转变不是顺利的，还伴随着种族优越感、等级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的顽固残留。

用短语“尊……，蔑……”（尊重官员，蔑视人民）概括的权威主义思想仍然是日本国民思想的重要内容。⁵¹

强调团体忠诚、等级排位和服从权威的传统价值是日本历史的产物。它们已经，并且将会被外来的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冲击、改变。然而正如中根所警告的，认为这些传统价值会被现代化和工业化塑造的社会淘汰是错误的。的确如此，或许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拿日本这样的社会和美国进行比较，仍然会发现显著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讲，“平等”是一种现代的、民主的价值。在没有贵族主义、封建主义和等级主义传统的美国，平等很快就占据了优势。而在日本和西欧社会，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必须同强调社会身份差别、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传统规范展开竞争。然而现代社会，尤其是大型的工业化、官僚化社会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身份差别、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存在。因此类似日本这样保留了传统价值体系重要内容的现代社会，也许会发现旧价值的新用途。中根认为，日本的垂直组织结构模式的强大力量“源自其集中交流的效率，以及快速高效动员社会成员集体力量的能力”。“这种结构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它支持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⁵² 美国人和受美国影响的日本人将这种组织结构视为封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残留，只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却没能发现其对“现代化利益”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之间同样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社会和日本一样，“站在和美国社会对立的另一极上”。“它依赖一套根本上不同于美国的价值和原则安排。”中国人不像美国人，他们在传统上不会脱离团体而生存，也没有自然权利和自由权利。相反，中国价值观的重点是“个人对社会及其小集体的责任与义务”。⁵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不平等、等级制和专制主义，它

没有选举、参与、代表、权力分立、宗教独立和一般法。另一位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权威应当是专制、严酷甚至残忍的；然而它也被视为精巧的、智慧的，是忠诚的来源”。“权威既使人恐惧、疑虑，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依赖”。⁵⁴ 等级秩序无所不在。费正清（John Fairbank）认为：“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平等关系的先例……中国人观察到的自然秩序是非平等的、等级化的，他们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来自于此。”因此就像白鲁恂（Lucian Pye）说的：“在政治中没有平等，只有上下级。”政府在中国是最重要的。在传统中国，政府是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唯一重要来源。在美国的传统中，财富和地位是由政府之外的渠道获得的，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政府享有的尊严和特权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白鲁恂发现：“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观念——为了维护其他大型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和逻辑必然性，政府权威应当受到制约。”⁵⁵

在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权威是集权化的，国家高于社会，保持着相对于社会的自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官员和百姓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都强调尊重权威，起点就是“百善孝为先”。“历史上没有哪个文化像中国人这样将‘孝’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权威加强了这种趋势。在传统中国，“儒家家庭生活试图向人们灌输尊重权威的意识，这被视为王朝统治稳定的基石”。或者用11世纪中国哲学家的话来讲：“唯有识得尊卑贵贱之关系，方能有序顺调而弗乱。民无治道何以存焉？”⁵⁶

有人认为，中国人对强大权威体系的需求，与他们害怕权威消失导致的混乱与冲突有关。同时，不仅要保持对权威的尊重，还要与它保持距离，以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人相食”，所以政府是必要的，但是“苛政猛于虎”。由此产生了“面对权力消极无为”的传统思想。这种观点意味着“因为面对社会权威而感到焦虑，因此对上级采取迂回态度，极不愿意提出批评，而是违心地顺从掌权者”⁵⁷。对于可能出

现的分歧和冲突，把权力集中起来既有必要，又显得合理。

因此，权威等级、中央集权和强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一个王朝崩溃的时候，这些特权会减弱或者消失。随后就会出现一条中国式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作为信条狂热时期美国政治特征的美国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正好是它的对立面。然而待混乱与战争的插曲结束后，一个新的统治者会夺取政权，宣称自己受命于天，中国政府的现实就会以更加严格的形态重归传统原则。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自19世纪清朝趋于腐朽以来，共产党人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重建起一个强大的权威体系。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毛泽东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有着明显不同。就像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总结的那样，毛泽东主义主张用集体主义反对宗族和村社的特殊主义，用行动主义反对无为主义，用自力更生反对依靠外国，用平等主义反对等级秩序⁵⁸。这些冲突的思想相互交织成具有整体性的政治文化，这一过程迄今仍未完成。另一方面，毛泽东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拒绝赋予政治自由和个人主义任何合法地位，二者都强调强国家，强调社会从属于国家的必要性；并且，虽然二者在诸如权威合法性来源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但是都认为应当尊重权威。

在许多社会中（主要是欧洲社会），若干不同的意识形态能够共存，因此国家不会遭到单一意识形态的攻击。在德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培养起来的民主价值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类似美国的政治理想与既存体制间关系。即便如此，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反国家主义仍然是美国政治文化明显不同于德国的方面。非西方社会单一的政治信仰系统增强了既存秩序的权威。在欧洲，“实然”的安全依赖于诸多不同的“应然”；在俄国和亚洲，唯一的“实然”则通过控制唯一的“应然”保障自身稳固长存。而在美国，一个广为接受的“应然”激烈地打破了“实然”的控制。结果，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与赖以运转的机制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形成了对权威持久而独特的挑战。

1. *Boston Globe* , October 14, 1971, p. 8.

2. Charles H. Hendel,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Authority," in Carl J. Friedrich, ed.,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4-5.

3. Quoted in Rush Welter,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65-166, 172.

4. William Schneider,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Today* 5 (September/October 1978): 10. Donald J. Devin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 102.

5.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 10th ed. (London: A. Strahan, 1787), 1:48-49. John Bowring,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inburgh: n.p., 1843), 1: 154n, 10:63, quoted in Chilton Williamson, "Bentham Looks at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0 (December 1955): 549. On the perpetuation in America of older dispersed forms of government displaced in Europe by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 2.

6. Henry James, *Hawthorn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originally published 1879), p. 34. Baron J. A. Graf von Hilbner, in Richard L. Rapson, ed., *Individualism and Conformity in the American Character*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67), p. 24.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London: Macmillan, 1891), 2:417-418. H. G. Wells, quoted in Esmond Wright, "The End of Innocence," *Political Quarterly* 43 (January 1972): 35. G. K.

Chestert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July 12, 1931, quoted in Leon Samson,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Jonathan Cape & Harrison Smith, 1932), p. 345n.

7. Seymour Martin Upset,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weryn Bialer and Sophia Sluzar, eds.,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pp. 94-97. See also Erwin C. Hargrove, "On Canadia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33 (February, 1967): 107, and, for a general elaboration of this theme, David DeLeon, *The American as Anarchist: Reflections on Indigenous Radic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78).

8. Bryce, *American Commonwealth* , 1 :299.

9. Cora Du Bois, "The Dominant Value Profile of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 (December 1955): 1238.

10. John George Cawelti, *Apostles of the Self-Made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2.

1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2: 108.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pp. 85-86.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 p. 125.

12. George C. Lodge,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New York: Knopf, 1975), p. 15.

13. The one notable exception to this rule is Judith V. Torney, A. N. Oppenheim, and Russell F. Farnen, *Civic Education in Ten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New York: John Wiley, 1975), which

showed teenagers in America to have less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 than those in West Germany, Finland, Ireland, Netherlands, Sweden, Italy, and New Zealand. Only fourteen-year-olds in Israel were more undemocratic in their outlook than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In these comparisons, a Support for Democratic Values score was calculated by averaging scores for Anti-Authoritarianism, Tolerance and Civil Liberties, Support for Women's Rights, and Support for Equality.

14. Max Belof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59), p. 137.

15.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pp. 314-315. Devine, *Political Culture*, p. 193.

16. Jack Dennis, Leon Lindberg, Donald McCrone, and Rodney Stiefbol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o Democratic Orientations in Four Western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 (April 1968): 94.

17. Fred I. Greenstein and Sidney Tarrow,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Children: The Use of a Semi-Projective Technique in Three Nation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0), pp. 520.-529.

18. Judith Gallatin and Joseph Adels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Public Good: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 (July 1970): 240--241.

19.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ch. 7, and Tom Truman, "A Critique of Seymour M. Lipset's Article, 'Value Differences, Absolute or Relative: The EnglishSpeaking Democracies,' "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 (December 1971): 497-525. Truman argues (contra Lipset) that Canadian and American values are closer than Australian and American values, but he also stresses the major differences separating American values from Australian, British, and Canadian values.

20. Hargrove, "On Canadia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p. 107.

21. Edgar Z. Friedenberg, *Deference to Authority: The Case of Canada*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80), p. 17.

22. Robert Presthus, *Elites in the Policy Proces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4-15, 30--39.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pp. 86- 89, 250-252.

23. Gad Horowitz, "Conservat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32 (May 1966): 150.

24.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Chicago: Regnery, 1955), pp. 125-126, and idem, "Speech on Moving Resolutions for Conciliation with the Colonies," in Ross J.S. Hoffman and Paul Levack, eds., *Burke's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49), pp. 69-71.

25.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pp. 213-234. Eric A. Nordlinger, *The Working-Class Tories*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7), ch. 1. R. D. Jessop, "Civility and Traditionalism in English Political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January 1971): 1-24.

26. A. P. Thornton, *The Habit of Authority: Paternalism in British*

Histor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 386.

27. Maurice L. Farber, "English and Americans: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Journal of Psychology* 32 (October 1951): 241-250. Erwin C. Hargrove, "Values and Change: A Comparison of Young *Elites* in England and America," *Political Studies* 17 (September 1969): esp. 343.

28. Edward A.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Glencoe: Free Press, 1956), pp. 37, 48-49.

29. Alex Inkeles and Daniel Levinson, "National Character: The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in Gardner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1954), p. 475.

30. Kurt Lewin, "Some Social-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4 (June 1936): 269.

31. Dennis et a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 95. Edward C. Devereux, Jr., Urie Bronfenbrenner, and George J. Suci, "Patterns of Parent Behavior in the USA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14 (Fall 1962): 488-506. Gallatin and Adelson, "Individual Rights," p. 241. David McClelland, J. F. Sturr, R. H. Knapp, and H. W. Wendt, "Obligations to the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March 1958): 245-255.

32. "Subject orientation " and "firmly democratic attitudes ": Sidney Verba, "Germany: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69.
"Ascriptive elitist values ":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 p. 238.
"Germans fundamentally changed" and "political but not psychological democracy ": David C. McClelland, *The Roots of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64), p. 89.

33. Kendall L. Baker, Russell J. Dalton, and Kai Hildebrandt, *Germany Transform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New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4-25, 287. David P. Conradt, "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p. 234.

34. Kurt Sontheimer,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West Germany*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72), pp. 76, 68-69.

35. Conradt, "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pp. 221, 230. Baker et al., *Germany Transformed* , p. 273.

36. Baker et al., *Germany Transformed* , pp. 69, 288.

37.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 p. 228. Fred I. Greenstein and Sidney G. Tarrow, "The Study of French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oward the Revocation of Paradox," *World Politics* 22 (October 1969): 108.

38. William R. Schonfeld, *Obedience and Revolt: French Behavior toward Authorit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p. 137-142. Stanley Hoffmann, "Paradoxes of the French Political Community," in Hoffmann et al.,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8.

39. Mariano Grondona quoted in Peter Krogh and Wenceslao Bunge, eds., *Argentine-American Foru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1980), pp. 9-10. Robert F. Peck, "A Comparison of the Value Systems of Mexican and American Youth," *Revista Interamericana de Psicología* 1 (March 1967): 46-47. Noel McGinn et al., "Dependency Relations with Parents and Affiliative Responses in Michigan and Guadalajara," *Sociometry* 28 (September 1965): 313. See generally Calman Jay Cohen, "Relations to the Polity: A Study of Mexican Fathers and Sons"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ch. 2.

40. Ivan the Terrible is quoted in B. H. Sumner,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 2nd ed. (London: Duckworth, 1947), p. 67. Marquis de Custine, *Journey of Our Time*, ed. and tr. Phyllis Penn Kohler (New York: Pellegrini & Cudahy, 1951), p. 73. Henry V. Dicks, "Some Notes on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in Cyril E. Black,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641-642. Robert C. Tucker, "The Image of Dual Russia," in Black,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pp. 587-605.

41. Frederick C.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pp. 22ff. Urie Bronfenbrenner, *Two Worlds of Childhood*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70), pp. 9-11, 90-91, and "Response to Pressure from Peers versus Adults among Soviet and American School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 (1967): 199-207.

42. Alex Inkeles and Raymond A.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47-249, 279-280, 392. David K. Shipler, *New York Times* , June 14, 1979, p. 1.

43. See Cyril E. Black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assim, esp. pp. 53, 55, 95, 117, 147ff, 154-155, 159, 264-265, 268, 276, 318-319.

44. Lewis Austin, *Saints and Samurai: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and Japanese Eli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 6, 147.

45. "The social norm": Chie Nakane, *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31. "The fact of inequality ": Masatake Ushiro and George C. Lodge, "On the Japanese Ideology," in Lodge, *New American Ideology* , p. 344.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6), p. 43. "The first element": Hiroshi Kitamura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U.S.-Japanese Relations* ,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no. 28 (Cambridge, Mass.: 1971) , pp. 10-11.

46. Frank Langdon, *Politics in Japa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 74. Austin, *Saints and Samurai* , pp. 129-130, 139-142.

47. Robert E. Ward, "Japan: The Continuity of Modernization," in Pye and Verba, *Political Culture* , p. 34. Austin, *Saints and Samurai* , p. 59.

48. Nakane, *Japanese Society* , p. 103.

49. Tatsuzo Suzuki, *A Study of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Part IV* (Tokyo: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Research 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1969), p. 22. Research 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Fifth Nation-Wide Survey, 1973* (Tokyo: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Economics, 1974), pp. 80-82. Joji Watanuki, "Japan," in 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41.

50. Suzuki,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pp. 6-7. Research Committee,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ifth Survey*, pp. 22, 41, 55. Bradley M.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 69-70.

51. Warren M. Tsuneishi, *Japanese Political Sty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17-21.

52. Nakane, *Japanese Society*, p. 63.

53. Tang Tsou, "The Valu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 27, 30. Richard W. Wilson,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0), pp. 19, 30, 51.

54. George P. J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h. 1.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p. 86.

55. John K. Fairbank, quoted in Wilson, *Learning To Be Chinese*

, p. 53. Py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 pp. 25-26, 77.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2), pp. 177-180.

56. James R.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 30ff. Py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 p. 91. Ch'eng I, quoted in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08.

57.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 pp. 112-113.

58.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 pp. 179-188.

第四章 对“鸿沟”的应对

美国的认知失调

“人们变坏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执政者行使权力或是被统治者习惯于服从，”托克维尔说，“而是因为前者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而后者服从了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¹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所有权力都有非法的嫌疑，并质疑大部分的政府统治行为至少有潜在的剥削性和压迫性，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在美国，恰恰是由于美利坚信条中体现的自由民主价值，领导人腐败、民众堕落的机会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事实上，美国人不得不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自由主义理想和政治现实间之鸿沟，以此实现权力的合法化，让人民接受统治。

在欠发达社会，一旦社会精英中的关键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军人）放弃传统信仰，转而接受现代价值，传统体制就会丧失合法性。在意识形态较复杂的社会，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团体（如工人阶级和土地贵族）的重要性此消彼涨，也会令现存体制丧失合法性。既有制度丧失合法性，是因为主流政治信仰在内容和影响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在美国，既有制度从始至今一直面临着合法性挑战。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造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认知失调问题。

认知失调的正式理论由列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用以解释个体行为，但也有助于解释集体行为出现的问题。该理论的假设认为，个人信仰、态度和认知中的不一致或失调将会造成“心理不适”，并“促使个体试图减少失调，达成认知一致”。个体还会“积极地避免可能导致进一步失调的情况和信息”²。在其他方面，认知失调理论预测，当可观察到的、由外部限制和要求塑造的个体行为与其信念体系不相符时，个体就会改变信念，使之与自身实际行为相符，以减少认知失调。这说明，因为美国人认识到原则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按照认知理论的看法，这种关系对他们是“重要的”），他们会有强烈的倾向去改变自己的信念，使之与自身行为相符，以此来减少认知失调。他们会试图调和、淡化或者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是否是一条解决国民认知失调问题的现实路径呢？

20世纪50年代新英格兰政治科学协会在马萨诸塞州艾默斯特市（Amherst）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参会者包括两位分别代表自由主义和温和派观点的学者。然而会上的明星人物却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威尔莫·肯德尔（Willmore Kendall）教授，当时他是一位优秀的、具有争议的政治理论家，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也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的导师。主办方请肯德尔参会，显然是为了让他在讨论中表达“保守主义”观点。观众和与会人士已经做好了准备，以为会看到他为麦卡锡参议员、联邦调查局、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以及政府压制激进异见分子的行为提供辩护。

肯德尔教授才说了不到两分钟，就表明此前观众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他的意图和思想。一开始，肯德尔就用一番雄辩博学的演讲，阐述了最根本的美国理想——个人权利和正当法律程序，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美国传统的良知与表达自由，以及保护这些权利免受政府侵害的必要性。接下来，他又有力地

证明了近年来传统的原则与自由受到了多么严重的破坏。国会中的政治迫害，对参议员的调查，焚毁禁书，暗杀知名人士，将行使不得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的人列入黑名单，攻击新闻自由，还有政府、大众团体和自封的义务警员的诸多行为，都明显地破坏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美国传统理想。

肯德尔教授认为这种情况显然是无法被容忍的。为了让实践与信仰相符，我们能做些什么？当满怀欣慰的观众们等着肯德尔提出改革建议时，他却停顿了一下。接下来他明确地说到，我们必须摆脱那种18世纪的、陈腐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观念。台下的两百名政治家目瞪口呆，会场内不时传出沮丧的叹息声。在剩下的演讲时间中，学者们噤若寒蝉。

善良的教授们无法相信肯德尔说的话是出自真心实意。可以想象这的确不是真话——他是个很会戏弄观众的演讲者。但是肯德尔的发言在观众中造成的震惊和质疑，充分说明了美国人无法用彻底放弃原有政治价值的办法来消除认知失调。肯德尔给出的选项是典型的认知失调理论的解决方案，但在美国人身上偏偏行不通。如果美国人真能轻松地通过改变或放弃自己的价值来解决问题，那他们就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做不到。美国人的政治理想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既要放弃政治价值，又不改变作为“美国人”的根本意义，不变成“非美国人”，这是他们无法办到的。对一个不切实际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肯德尔选项未尝不可；但是对美国公众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于是，失调与困境仍在。只有信仰美利坚信条的人才是美国人，而信仰信条的美国人就必定要反对自我。

不同的回应模式

美国人应对国民认知失调的方式有哪些？稳定的共识是美国政治价值的特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也一直存在。然而不同团体的美国人对政治价值的信仰程度——美国社会的信条热情——是不同的，对鸿沟的认知程度也是不同的。这两个变量取值的不同导致了表 2 所示的四种主要回应模式。

表 2 美国人对理想/制度间鸿沟的回应模式

理想信仰的程度	对鸿沟的认知水平	
清晰	不清晰	
高	道德主义 (要求消灭鸿沟)	自欺欺人 (否认鸿沟的存在)
低	犬儒主义 (忍受鸿沟的存在)	冷漠自满 (忽视鸿沟的存在)

1.道德主义 (moralism)。如果美国人坚定地相信政治理想，并清楚地感受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存在，他们就会尝试通过改革，从道德上消灭鸿沟，使实践与制度符合原则与信仰的要求。

2.犬儒主义 (cynicism)。如果对政治理想的信仰不够强烈，但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认知很清晰，美国人将诉诸犬儒主义的态度，在冷嘲热讽的同时容忍鸿沟的存在。

3.冷漠自满 (complacency)。如果信仰不是那么坚定，对鸿沟的认知也不甚清晰，美国人会自我感觉良好，企图对问题视而不见，从而忽略鸿沟的存在。

4.自欺欺人 (hypocrisy)。如果美国人强烈地信仰政治理想，又拒绝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他们的选择不是改变现实，而是用爱国主义的虚伪极力改变自己对现实的认知。*

*也许有人会发现，我给这四种反应模式贴的标签都带有消极含义——的确如此。人们可以使用委婉的说法，比如道德而非道德主义，现实主义而非犬儒主义，心

满意足而非冷漠自满，爱国主义而非自欺欺人。但是这些令人愉快的标签模糊了关键的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每种反应模式都不尽如人意，都无法被一大群人长时间地坚持下去。人们想要遮掩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导致的种种问题，而不是将其公之于众。

在不同的时期，社会批评家——包括关心美国社会的外国观察家——都曾经发现过这些典型反应模式中的某一个。事实上，这四种反应模式贯穿了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们彼此互动，既相互增强又相互制衡³。冷漠自满或许是最普遍的反应，但也是最不显眼、最后被发现的一种。其他三种则都在美国文化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例如，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容忍是犬儒式回应的本质，也是美式幽默的主要源头。喜剧源自不协调，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协调的来源也各不相同。有人指出，“差不多所有伟大的英国喜剧都来自阶级差别”。“从《村妇》（The Country Wife）到《小人物日记》（The Diary of a Nobody），从P. G. 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到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从乔叟（Chaucer）到南希·米特福德（Mancy Mitford），作家们都是用直奔阶级结构话题的办法逗乐读者。”⁴ 美国幽默并非来自阶级间的不和谐，而是像路易斯·鲁宾（Louis Rubin）说的那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是美国人经验的核心内容”。这种不一致成了大多数美式幽默的主题，马克·吐温这位最具美国特色的幽默大师在其作品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罗宾继续说道：“除了平凡世界与英雄理想之间的不协调，还有物质现实与精神饥渴……平等理论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实，《独立宣言》与禁酒令，葛底斯堡演说与国民生产总值，《共和国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与金元外交，霍雷肖·阿尔杰的理想与纽约社会名人录——就像美国人生活中发生的那样，在做人的应然和实然之间迸发出大喜大悲。”这就是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所谓的“美国形而上马鞍下面的毛刺”，生活在同一个

屋檐下，还要背负“一个巨大的承诺，一个非常巨大的承诺——《独立宣言》”所导致的问题⁵。在理想的行为准则与实际发生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为嘲笑虚伪的道德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笑料。美国人喜欢“揭穿大话”——“大话”（bunk）本身就是个美国特色的词汇⁶。幽默成为了对付认知失调的一种方式，对美国生活的承诺被转化成“巨大的美国玩笑”。

外国观察家经常指出，自欺欺人是美国文化的特色，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没有理由将其视为最主要的回应模式，但是自欺欺人毫无疑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美国人想让自己相信，美国的政治制度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理想。他们常常把这种信念表达给外国人，导致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喜欢说些虚伪的道德谎言。就像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说的那样，大众的自欺欺人是因为美国人“从感情上坚定地相信一个理念，即政府——所有地方的所有政府——不应妨碍公民的个人生活、个人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⁷。美国人认为自己至少可以相信本国政府和政治体系达到了这个标准。就此而言，自欺欺人——词典上的意思是“虚假伪装的道德优越”——不仅是实践偏离原则的产物，也是坚持不可实现之原则的产物。由此，通过假装不知道生活中存在着权力、不平等、等级秩序和束缚的事实，美国人减轻了认知失调。

一切统治阶层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虚伪的，这一点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中尤为真实。杰克逊时期美国的民主浪潮，使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等作家抓住了虚伪这一美国社会的普遍特征。在民主国家，像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领导人容易“被没完没了地指责为虚伪之徒”，因为他们“给衰落的政治原则和忠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提高了道德与政治期望的水平”，但是又没能“达到他们亲手复活的标准”⁸。美国体制最有名的发言人装腔作势地说些美国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仿佛这不是虔诚的渴望而是描述现实。他们为拥有权力感到羞愧，便觉得需要假装自己没有权力，从而限制

了行使权力的能力。美国人很享受揭穿虚伪者的感觉，但是如果本国领导人没有虚伪之处，他们就会感到不安。美国人民不但要求公众人物具有高尚的情操，而且认为，如果“你的政治宣言显得特别高尚，你在本质上就不是一般的虚伪”⁹。

美国公众人物的确可能因为不够虚伪而被抨击。“水门事件”录音带揭露了尼克松的猥琐病态，还有他粗鄙的现实主义观点，一些政治人物对此作出的反应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参议员鲍勃·派克伍德（Bob Packwood）发现：“尼克松在录音带的副本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美国人民的福祉。其中甚至没有一丁点关于人民利益的陈词滥调。”民主党主席罗伯特·施特劳斯（Robert Strauss）以类似的语气不无动情地抱怨道：“这比我曾经假设的情况还令人难受。我一直试着在录音中寻找对人民和国家的关心。”¹⁰ 尼克松诸多罪状之中，也包括在与助手的私人谈话中没有使用公众面前常见的虚伪话语。

道德主义也同样被认为是美国人的特点。桑塔亚那认为：“美国人很有先知气质，他们用道德指导公共事务，热情又缺乏耐心……他们是讲原则的人，并且喜欢重申这些原则。”¹¹ 其他观察者也注意到道德主义是如何导致了自我批判的倾向，指出这种在欧洲人眼里几乎有违常情的行为正是美国人的鲜明特征。当美国人被指控为虚伪之徒时，缪达尔进行了辩护，坚称美国人致力于揭露道德丑恶：

对于理想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流行的解释认为，美国人其实根本不想践行他们挂在嘴边、写入宪法和法律中的那些理想。许多美国人习惯用随意轻蔑的口吻声称，遵循美利坚信条不过是“表面文章”甚至“自欺欺人”。外国人就更容易如此描述美国人的特征了。

这种解释过于肤浅。首先，真正的伪君子，其罪过都是秘密的；罪人会隐藏自己的错误。与此相反，美国人真诚、强烈地“反对罪恶”，甚至尤其是反对自己的罪恶。美国人会调查自己的错误，将其记录在案，站在房顶大声宣布这些罪状，并且对自

己提出最猛烈的指责，其中也包括虚伪。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发生的政治腐败、有组织犯罪和司法系统崩溃，那么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人民因愤恨而揭短，而是他们敢于公开自己国家的不完美之处。¹²

缪达尔有关美国人热衷于揭露自身罪恶的描述非常真实。但同样真实的是，在不同的时期，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容忍、忽视甚至否认自己的罪恶。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是美国人应对认知失调问题的几种常见方式。而这些方式的作用和重要性则随时代和团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社会既可能采取某一种反应模式，也可能采用若干不同反应模式的混合。不同时期的国内氛围，可能由冷漠自满、自欺欺人、道德主义和犬儒主义这四种回应方式之一主导。经验表明，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可能会产生连锁效应，进而导致随后选择另一种方式。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提供了长期解决认知失调问题的办法。每一种反应都被尝试过一段时间，随后又在寻求摆脱国家困境的无尽过程中被放弃。不同反应间循环模式的逻辑动力学如下。

1. 道德改革（消灭鸿沟）。因为无法通过改变基本原则消灭认知失调，所以必须改变制度和行为。当人们强烈地信仰美国政治价值，清晰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并试图重构制度与实践以体现这些理想时，道德主义的反应就会出现。虔诚的信仰和清晰的认知相结合，为改革提供了道德动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改革的历史总是相同的，它是思想与事实的比较。”¹³ 美国社会主要团体开始高度关注不平等、缺少自由以及权力专断的现实。他们将这些情况戏剧化，将其强加于公众意识，使政策制定者和对此表示关心的公众无法忽视政治生活现实与美国信念之间的矛盾。少数人的义愤引发了更多群众的愤怒。本来已经被接受的制度与实践丧失了

合法性。削减权力、改革体系的要求成为政治日程表的首要任务：现实必须符合理想。在信条激情时期，美国社会潜在的不和谐性质浮出水面。

2. 犬儒主义（容忍鸿沟）。大部分公众的强烈义愤只能维持有限的一段时间。曝光丑恶最初是道德主义揭露虚伪的工具，后来却为犬儒主义反对道德主义提供了辩护。人们认识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对于弥合鸿沟的期待却下降了。那些希望通过阐述信条来改变现实的人发现自己越来越脱离现实，他们本来是揭发虚伪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成了带头虚伪的负面榜样。

改革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消灭丑恶的掌权者就能消灭丑恶。该假设的推论即为重构制度的必要性，结局则是人们意识到这两个假设都不正确。一些改革者断定“系统”本身必须被彻底改变，因此支持变革。另一些人则任凭改革激情消退，转而对鸿沟抱以嘲讽的容忍（至少暂时如此）。消灭鸿沟的激情被无力改变的沮丧取代，道德愤怒被道德无助取代。所有的政客都是恶棍，所有的机构都腐败。正如美式幽默中的角色所表现的那样，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必须被接受，甚至是被欣赏。

3. 冷漠自满（忽视鸿沟）。犬儒主义是忍受认知失调的尝试。但是正如人们没法无限地维持道德激情，他们也没法无限地容忍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认知失调是有害的状态”，并且“相关认知的重要性，以及矛盾认知的相对数量，决定了认知失调的严重程度和紧迫程度”¹⁴。然而，从信条激情到犬儒主义的蜕变涉及道德感的钝化，从犬儒主义到冷漠自满的蜕变则涉及认知能力的钝化。仅仅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就会降低失调认知的重要性。在信条热情低落、鸿沟认知模糊的时期，美国人也许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就像他们多年来对待美国黑人的社会角色一样，但是随后又将这种认知扔进了意识的墙角，就这样不再认真地关注它。就像缪达尔说的，困境是存在的，但是它既不烦扰人们，也

不会让人们热情高涨地想要解决它。认知失调在意识的表面之下躁动地潜伏着，但是没有强大到能够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困扰。无论是美国理想，还是美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都不会引起人们严肃认真的思考。

4. 自欺欺人（否认鸿沟）。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本质，意味着美国人无法一直回避对于国家信条基本价值与原则的确认。然而，在重申这些价值的同时，他们可能仍然不愿意承认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存在。此后他们也许会透过滤镜看待自己。如此看来，美国的制度是开放、民主的；美国是充满机遇的地方，人人平等在这里是生活的事实；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者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它还体现了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宗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扭曲着自己的认知，好让自己看不见恼人的政治制度、权力现实与美利坚信条价值之间的差距。人们把现实当作理想去欢呼，矛盾则被过滤和回避。美国不仅应该是所有人享有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地方，它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地方。

然而到了一定时候，对美国理想的强烈信仰，使人们重新发现了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新的个人与团体开始重申理想，不是用来赞美美国生活，而是用来揭露它。以理想之名对现实的谴责取代了现实与理想的虚假一致。新一波以改革为目标的信条激情蓄势待发。

这一连串不同反应模式的循环是逻辑模型，而不是经验现实的代表。历史并不必然按照逻辑模式来发展。然而，某种程度的不满心理是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不可避免的结果，需要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的某种混合加以缓解。美国历史的特定阶段经常受到其中一种反应模式的影响，某一种反应模式也常常创造有利于其他反应出现的条件。历史不会遵循逻辑模型，但逻辑模型有助于理解历史。

正如不同的反应模式可能主导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团体也可能倾向于不同的反应模式。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显然对人们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美国的教育系统——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层面——向学生灌输美国理想，同时对理想与现实间的不一致轻描淡写。所以小学生对政治系统、政府，特别是总统的看法在总体上是非常积极良好的¹⁵。这些学生受到的教育属于自欺欺人式的回应。这种态度为他们日后作为成年人接受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打下了基础。中学生则更加“现实主义”，并且在某些方面对政治生活抱以更为嘲讽的态度。然而他们的观点和已经离校数年的青壮年人之间仍然存在本质区别。除此之外，和已经读过高中的家长相比，高三学生对政治的嘲讽程度要轻得多。对于那些高中毕业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教育的人，政治生活令人不快的现实被不断揭露，再加上有限的政治效能感，导致他们对政治过程采取了更加愤世嫉俗的态度。那些上了大学的人则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存在，因而更容易转向道德主义。教育系统试图在小孩子面前将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最小化，却使这种差距给大学青年造成的冲击最大化。“社会教导年轻人要绝对遵循社会系统的价值观……矛盾压力导致的妥协在许多成年人看来是正当的，而在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看来却是对基本道德的破坏。年轻人更愿意忠于理想而不是制度。因此，凸显理想与现实间鸿沟的事件经常刺激他们去行动，虽然在没有合适办法的时候，他们也会冷嘲热讽、打退堂鼓”。¹⁶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自我欺骗还是道德主义，热情都会趋于消退；在成年人中，犬儒主义和年龄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¹⁷。

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反应倾向有着更强的塑造作用。已有证据表明了两个重要趋势。首先，虽然美国社会的几乎所有群体都支持美利坚信条基本的自由民主价值，但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处于社会或政治领导位置的人比其他人更愿意支持这些价值。这意味着此类群体承认支持自由民主价值的比例可能高达85%，而不是

65%或70%¹⁸。支持率的差异并不能证明两个团体对信条理想的信仰程度，但的确能说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更支持美利坚信条的价值。而且，相比其他人，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更愿意支持在特定情况中运用自由民主价值¹⁹。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对于自由民主价值更为强烈的信仰和忠诚。总之，有理由相信，地位较高者更可能采取自欺欺人或者道德主义的态度，而地位较低者则倾向于犬儒主义或冷漠自满。

更为显著的证据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第二种团体间的差别。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更低、不担任领导角色的人更容易对政治过程持批判性观点，也更容易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重大差距。而地位更高、职位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则不太容易发现鸿沟的存在。如表 3所示，赫伯特·麦克洛斯基发现，在政治犬儒主义方面，那些曾经担任过政党全国会议代表或候补代表的“政治影响力人物”与普通选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看，对政治表现出强烈嘲讽态度的“影响力人物”只有10.1%，持同样态度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则高达31.3%。²⁰类似地，一项在密歇根州马斯基根（Muskegon）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结论称：“群体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相信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准确描述了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由此可得出推论，群体的收入水平越低，就越认为意识形态的规范与实际层面之间不对称……收入水平较高者倾向于将政治多元主义的规范阐述与实证阐述等同起来，而收入较低者则倾向于否认这种对称性，并主张让二者更为一致。”²¹同样，和白人中产阶级儿童相比，黑人儿童和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贫困儿童对总统偏离理想主义规范的程度有更为严重的判断。²²总之，地位较高者更容易采取自欺欺人或冷漠自满的反应模式，而地位较低者则倾向于采用犬儒主义或道德主义。

将社会经济地位与信条价值的信仰程度、理想/制度间的鸿沟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就能得到更为宏观的一般性结论。

表 3 人们如何看待嘲讽政府和政治的观点

观点	持赞同态度者所占的百分比 (%)	
政治影响力人物 (N = 3020)	一般选民 (N = 1814)	
大部分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	36.3	54.3
本国的两大政党都被富人控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7.9	32.1
选民甚至不知道那些真正操控国家的人是谁	40.2	60.5
法律本应平等地有利于每个人，但实际上几乎完全是“有钱人的法律”	8.4	33.3
在我看来，大部分政治家口是心非	24.7	55.1
政治家的承诺和他当选后的行动之间没有实际联系	21.4	54.0
政治完全由政治大佬们操控	15.6	45.9

资料来源：Herbert McClosky,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June 1964) :370.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比较低者更可能对信条价值有着强烈的信仰，并且更不容易发觉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导致他们更愿意采

取自欺欺人的回应。地位较低者则不太容易对信条有强烈信仰。很多地位较低者可能不太关心政治，没有认识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因此可能选择冷漠自满作为回应。然而当地位低者趋于政治觉醒时，他们就可能转向犬儒主义。

这种群体倾向的模式成为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最虔诚地信仰政治系统价值观的人不太容易发现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差距的人则不太可能有足够的道德热情去做些什么。中上阶层的自欺欺人与工薪阶层、底层的犬儒主义结合起来，使现状永久化。这看起来至少是大部分时期的主要趋势。一些地位较高的人的确对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有着敏感的认识，并且时常试图采取行动。然而他们成功与否，取决于能不能把虚伪者和嘲讽者动员起来支持自己。当发现鸿沟的人具备了道德热情，或者拥有道德热情的人感知到鸿沟的存在时，政治系统内部就会发生变化——在那些对此持负面观点的人看来，这就是政治不稳定。后一种情况通常涉及中上阶层在认知方面的重大变化，它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国政治制度与实践变革的最重要源头。认知水平和信仰强度的变化，都可能给人口中的不同群体造成不同影响。例如在60年代，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对政治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有着清晰的认知。结果，高阶层群体逐渐用道德主义取代了自我欺骗，为广泛的政治制度与实践改革创造了动力。与此同时，低阶层群体的冷漠越来越少，嘲讽越来越多，导致民意调查中政府的民众信任度大幅下降。

如果美国人拒绝对现实视而不见，他们就能在道德主义和犬儒主义之间找到答案。如果美国人坚定地信仰美国理想不动摇，他们就能在道德主义和自欺欺人之间作出选择。道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它意味着缩小或者消灭承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移除美国人认知失调的根源。就这个意义而言，道德主义是美国人最积极的政治回应。然而正如美国历史所表明的，道德主义不仅可以成为美国体制的改革者，也可以成为其毁灭者。亨利·史汀生

（ Henry Stimson ）在其卓越的政治生涯结束之时给出了自己的总结：“我知道的唯一不可饶恕之罪就是犬儒主义。”²³ 作为美国体制的核心人物，史汀生纠结于大众的犬儒主义罪恶，却不承认体制的虚伪罪恶。更重要的是，他也同样未能注意到，道德主义才是美国唯一致命的美德。

鸿沟与美国政治的风格

在美国同时存在着反对权力的道德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导致了所谓“权力悖论”：没有引起注意的权力才是有效的权力，被观察到的权力则是被贬损的权力。美国人有时候以挥霍财富为荣，但从未有人以玩弄权力为荣。合众国权力的设计师必须设计出一种可以感觉到却看不到的权力。权力只有藏在暗处时才是强大的，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会烟消云散。

在美国的政治历史和公共讨论中，权力悖论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总统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制度，两项有关总统权力的研究很好地描述了这一悖论。

首先是理查德·诺伊施塔特（ Richard Neustadt ）极具洞察力的作品，《总统权力》（ Presidential Power ）。该书出版于1960年，其目的是“考察白宫主人的权力问题”。这是“任何政治系统的统治者都会面临的经典问题：如何让统治名副其实”。这对总统而言并非易事。“同样的条件，在形式上增强了总统的领导，却在事实上阻碍了他的领导”。这本书的基本主题相当简单：总统没有多少权力，或者至少他的权力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总统被自己无法直接控制的力量和团体紧紧围住，特别是国会、官僚机构和公共舆论。除了极少数案例，总统没有命令的权力，本质上只有说服的权力。他拥有大量不

同的资源，但其权力却只能用于协商和讨价还价。通过引用杜鲁门总统对其继任者即将面临的挫败的评价，诺伊施塔特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艾森豪威尔）将坐在那儿说：‘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怜的艾克——这可一点儿都不像在陆军。他会非常受挫的。”²⁴ 在1960年，诺伊施塔特描绘的这幅受限制、受束缚、受制衡的总统权力图景是很有说服力的。

十三年后，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其著作《帝王式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中，描绘了一幅十分不同但同样令人信服的图景。他认为，总统的首要地位已经“转变为总统的至高地位”。“宪政总统”已经成了“帝王总统，并威胁要成为革命总统”。总统将国会在内务事务方面的权力据为己有，特别是在外交权力方面。结果，“史无前例地，权力集中于白宫，宪法制约下的总统变成直接诉诸民意的总统”。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总统权力的扩张和滥用”。²⁵

这两本书的读者将会尝试着进行总结，认为50到60年代的总统是虚弱的，而在70年代的十年中其权力则稳步增加，获得了绝对强势地位。不过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都是不靠谱的。在权力悖论的作用下，事实差不多正好与此相反。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标志着总统权力的巅峰；到70年代初期，审查和削弱使总统权力跌至四十年来的谷底。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代表了总统权力的最高水平。²⁶ 总统权力的衰退始于林登·约翰逊，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又像滚雪球一样俯冲，当后者成为第一位被赶出白宫的总统时，总统权力已经跌至最低点。

其他著作已经阐述了总统权力下降的过程和原因。这里想要讨论的是两本有关总统的经典著作如何反映了总统权力的变化。明处的权力是被削弱的权力，暗处的权力则是被增强的权力。60年代诺伊施塔特担心的总统“权力问题”反映出彼时总统权力的无处不在；1973年施莱辛格对总统帝王般的权力有着同样深刻的忧虑，这却体现了总统权力在下降。总之，如果人们都认为总统权力有限，还要接受其他官员

和团体的审查，这本身就表明总统权力是存在的，它得到了支持。相反，如果人们相信总统十分强大，这就说明总统实际上权力有限，或者其权力正在减少（因为美国人讨厌强大的权力）。当事实上的总统权力很强大时，公众从来不认为它强大；当总统权力真的在衰退时，人民却认为它扩张无度。

总统制并非权力悖论的唯一例子。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曾发表了著名的警告，指出“错位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以及“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存在带来的“不利影响”。除了例行公事的掌声，艾森豪威尔的话没能立即引起任何反响。但这席话再及时恰当不过了。不论错位与否，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权力的确在60年代初达到了顶点。艾森豪威尔给出警示之后三天，约翰·F. 肯尼迪搬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后者几乎立即采取行动，大幅提高军事支出——陆军师的数量增加了45%，“北极星”级战略核潜艇的建造增加了50%，“民兵式”弹道导弹的生产能力提高了100%，担负战略值班任务的核武器数量增加了100%。60年代初迎来了战后投资新型武器系统的高潮。一位美国总统警告说军工复合体将导致危险，然而不论是国会、媒体、公共舆论还是学者都对此无动于衷。

十年后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军工复合体的权力明显减少；公众的焦点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国会仔细审查防务开支并时常否决新武器的计划；大量反对军方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抨击国防预算案；以实际货币衡量的军事开支，尤其是用于硬件装备的开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逐年下降；洛克希德（Lockheed）处于破产边缘，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媒体与公共讨论中对军工复合体权力的警告和抨击越来越多，也表明复合体的权力在下降。1961年艾森豪威尔那段贴切却被忽略的评论，虽然已经不符合1971年的实际情况，却屡屡被人拿出来引用。在那几年中，采用诸如“杀人的经济”“五角大楼资本主义”“1970年的美国军国主义”“如何控制军队”“武器文化”“战争生意”“军国主义的美国”等标题的书刊铺天盖地。受欢迎的杂志几乎每期都会揭露军

工企业及其五角大楼军方同盟的阴谋和权力。然而，所有这些针对想象中的军工复合体强横权力的愤怒，恰恰证明复合体的权力被成功削弱了。

在某种程度上，权力悖论一直都是美国独特的政治模式。就像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时候，这个新生的国家猛烈地谴责乔治三世是镇压人民的暴君，同时又证明英王即便作为暴君也无力对付独立运动。纵观美国历史，无论是20世纪初的扒粪者，还是他们生活在60年代的后辈，对权力的曝光一直都是削弱权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不是说所有被认为拥有强大权力并因此受到抨击的个人和机构都必然是虚弱无权的。事实显然不是这么回事。但这的确意味着，如果个人、团体和机构的权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们的权力就会比没有被关注之前更少。在其他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也许会想方设法引起对自身权力的关注。而在美国，对权力的关注会导致怀疑、敌意和愤怒。由于普遍的反权力主义道德，对权力的关注将会导致权力变少，而被隐藏的权力则更加有效。因为相比其他文化，权力概念在美国文化中的合法性更弱，所以就更需要想办法加以掩饰。因此否认拥有权力的事实才能维持权力。然而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有很多机会和压力使权力被公之于众。结果，鉴于权力的可见性就是权力最大的弱点，最有效运转的权力都是被隐瞒的权力，掌握权力的头等大事就是遮掩权力。

在美国社会中隐瞒权力不是件容易事。同其他民主（或者独裁水平较低的）社会相比，美国政治的特点在于其开放性和公共性。政府理所应当是开放的、光明正大的，秘密意味着邪恶。爱德华·希尔斯说，美国的传统就是“极其充分的公共性”。美国人对“国家理性”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并不比“国家”本身更高。美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追求公开性的热情，西欧民主国家常见的保守政府秘密的惯例在这里算不上什么传统”。这使得促进公开性最重要的机构——新闻业在美国获

得了不同于在欧洲的地位。美国人永远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说出“媒体敬畏政府威严”之类的话，因为“在英国，政府和媒体间的权力平衡偏向于政府，而在美国则有利于媒体”²⁷。政府公开是美国的理想之一，它从来没有在美国的现实中被完全实现过，但也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美国政府的公开水平。

在美国，权力不仅比其他国家更加公开，也更容易受到侵蚀。所以掌权者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来隐藏权力，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合法性。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因为权力是可憎的，它才必须被隐瞒；而正因为权力被隐瞒，它才更加可憎。公开性给权力造成了普遍威胁，导致了隐藏权力、为权力说谎的普遍需求。在美国，由于曝光的结果更具毁灭性，保守秘密变得更有必要，也更难实现。因此就像希尔斯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公开性和保密性天然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隐私受到侵犯。英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三者间的某种平衡；在美国，疯狂地追求公开性破坏了隐私权，又导致了对保密性的盲目迷恋。“在英国，秘密没有那么吸引人，因为隐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公开性也没有那么过火”。而美国的特点则是“公开性压倒一切，同时把保密性而非隐私看成救命良方”。²⁸

一个把秘密当成救生圈的社会必定会产生阴谋论。阴谋论的关注对象是秘密权力，它的流行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如果权力明确地集中在绝对君主、魅力型领导人或者共产党政治局手中，换言之，即存在单一、公开的权力来源，那么指向单一的、隐蔽权力来源的阴谋论就没有出现的动机。然而，如果权力广泛分散在大量个人、机构和团体手中，那么很多人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权力分配状态并非真相，在表面的分权之下一定存在隐蔽、集中的权力，最强大的领导人组成的小团体一定在操纵其他人的活动。

第二，在那些将政治视为自利个人和团体间利益争夺过程的社会中，阴谋论不太可能有市场。而在拥有主流道德标准、存在正邪力量

冲突的社会中，阴谋论更容易找到生存的土壤。阴谋论是政治道德主义的逻辑延伸，“如果历史运动的每个阶段完全是正邪意志间的自由选择，那些犯错误的人就不仅仅是错误的，更是罪恶的。所有社会和政治病态都是有意为之的罪恶行径的结果。考虑到此种道德前提，我们还能给出什么别的解释吗？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问道：‘除非相信政府高层正在故意将我们推向灾难，我们还能怎么解释当前的处境呢？’”²⁹

第三，在那些积极看待权力价值的社会中，阴谋论也不太可能流行起来。而在具有强烈反权力道德的社会中，对权力的敌意很可能导致对隐藏权力的疑惧。而且在这样的社会中，秘密的权力可能比公开的权力更加“强大”，因此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为秘密权力可能的存在感到担忧。

权力的分散、政治生活的道德主义内涵以及对权力的普遍敌意，使美国很容易接受阴谋论思想。事实上很多本土和外国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评论道：“美国政治争论的历史有指控阴谋者的传统，人们也的确相信阴谋的存在。”³⁰ 阴谋论是美利坚合众国出生时的助产士：“英语世界弥漫着对于反对自由的巨大阴谋的恐惧，这是美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内容。人们相信这个阴谋滋长了腐败，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不过是其中最明显的一部分。”对阴谋的恐惧深深地扎根于18世纪的美英政治传统中，推动了混合政体理论的发展以及自由—权力二元对立的趋势。北美和英国的辉格党人认为威胁来自内阁的阴谋——这种观点“在美国革命的同情者中几乎普遍存在”，英王乔治三世也同样将叛乱的殖民地居民视为“煽动性的、无正当理由的联合”，是“亡命徒式的阴谋”。³¹ 实现独立后，几乎每个时代、每一代人都相信存在着五花八门威胁共和国命运的秘密权力阴谋——光照派、共济会、天主教、摩门教、银行家、犹太人、共产党，等等。对并不掌握权力的人来说，认为政治生活中存在秘密权力是很自然的想法。因此，在大众运动以及充斥着曝光和改革的信条激

情的运动中，阴谋论的解释都是重要的特征。“人民党人喜欢想象密谋和阴谋会议”。³² 对阴谋的担忧并没有随着人民党人（Populists）一起消失，希尔斯仍然能够在50年代中期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对阴谋的担忧已经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生活的持久特征”。³³

美国人对待权力的普遍态度为阴谋论的盛行创造了现实基础。如果权力的合法性是可疑的，那么它必须被隐藏起来才能发挥效力。不仅如此，隐藏权力的行动本身也必须被隐藏起来。比起那些没有贬损公共权力的国家，在美国阴谋权力的收益反而更多，希望使用权力的人同时也应该共谋将这一事实保密。总而言之，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治搞权力阴谋的动机更强，所以在这里大行其道的权力阴谋论也似乎更有道理。诚然，如果权力的有效运用意味着隐瞒权力的存在，那么只需在逻辑上跳跃一小步就能得到最终结论，即阴谋论的归谬法——证明秘密权力存在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根本没有此类证据。

为了隐藏权力的事实，秘密是必需的；为了粉饰拥有权力的事实，欺骗也是必需的。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延伸：秘密是权力的保护伞，欺骗则是权力的隐身斗篷。欺骗成了政府与公众、政治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关系的天然内容。普通人可能会时不时虚伪一下，而那些领导他们的人却要时刻如此。面对公共舆论，政府部门表现出来的开放与回应态度要比其实际程度更高。政治领导人也必须装作代表民意的样子，虽然实际则未必如此。无论如何尝试规避民主的现实，领导人们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只得屈服于民主的表象。19世纪以来越发高涨的建设民主政府呼声的确在事实上增进了民主，但是也催生了更多虚伪的制度与实践，使政府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民主。对民主政府的要求不仅导致了更多的民主，还导致了更多的欺骗。由于美国人期待的民主程度超出了政府所能达到的范围，后者只能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民主。

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导致的这些结果有助于解释真诚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当理想被严肃对待时，真诚才算是重要问题。就像卢巴雪夫（Rubashov）所描述的那样，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真诚问题也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像在美国一样，那里的政治人物也可能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必须向他人表明对本国理想目标与价值理念的真诚信仰。这是很难做到的，犬儒主义、虚伪和欺骗正源于此。对这些现象普遍性的默认，使人们更加关心真诚问题，从而提高了真诚的价值。

不同的文化对于真诚有着不同的定义。在美国和亚洲文化中，真诚的意思几乎是相反的。对日本人而言，重点在于揣测上级的心思。在中国，真诚就是遵守通行的外部规则：“一个人表现自己‘真诚’的方式不是遵从内心感受，而是对人际关系义务和社会负责。最真诚的时候，就是违背自己的真实想法，按照社会规则行事。”³⁴ 中国和日本都强调个人与同伴、平辈、尊长、团体的关系。这一意义上的真诚其实是团体特征。

而在美国，真诚意味着个人与其自身、与其信仰的关系。它有两个维度。首先是一个人及其思想的坦率与诚实。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在法国文学中，真诚就是“把有关自身的真相讲给自己和他人听”。而在美国社会中，真诚意味着更多。也许真的有人坚信世人都是些虚与委蛇、心胸狭隘之徒，但是美国人一般都不会认为这种人真诚。他们会说他愤世嫉俗，在他们眼里，“真诚的愤世嫉俗者”是个矛盾的词。要是有什么政客说自己就是喜欢权力，喜欢权力带来的操纵主宰他人的机会，美国人也不会说他很真诚。美国文化（按特里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英国文化）的“真诚”根本就不相信会有真心向善这种事情。真诚的含义包括“一心一意忠于职守”。³⁵ 它是真正的道德标尺，是为着正确信仰的奉献。美国人无法想象将希特勒或斯大林称为真诚之人。简言之，美国社会中的真诚就是信仰美国信条的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理想。只有在具备强烈自我欺骗

动机的社会中，人们才会如此关注真诚这一美德。

美国人对真诚的定义使他们经常很难理解外国人。不仅是定义不同，外国文化中的真诚与美国意义上的真诚可能从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指出的，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有党命令的行动都是正当的”，因此“政治目标本身就是最根本的美德，变化了的方针路线所要求的行为与执行路线的个人行为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外交官员还是边境军官都是如此”。苏联官员在贯彻路线时越灵活，在道德上就越正直。而美国人则认为这恰恰是不真诚的证明。“美国人认为正直的根本在于表里如一和真实诚恳，这正是苏联领导人的行为所不具备的，美国人总是愿意用本国标准来评价和看待苏联的行为，在美国意义上说它心口不一、世故心机，毫无正直可言”。³⁶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领导人，在美国人民面前都必须经历真诚测试——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吗？美国人提问时既满怀期待，又疑虑重重，这说明在美国公共生活中想要做到真诚是多么困难。1978年，赞成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译者注）白人政权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访问美国的参议员早川雪（S. I. Hayakawa）表示：“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亲眼看看史密斯。如果他明摆着是个骗子，我们会识破；如果他是个人诚恳的人，我们也会发现。”³⁷ 史密斯对于种族关系的看法为大部分美国人所厌恶，他们不相信这位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的观点。真诚意味着真正地信仰美利坚信条。对于美国的公众人物而言，问题是如何在理想信念和美国制度与实践未能完美实现理想这一认知之间建立起某种协调关系。虚伪，而非其反义词真诚，才是无可避免的。只有那些充满激情的改革者，那些明确、坚定地致力于让制度与实践符合美利坚信条的改革者，其真诚才不会受到公众的质疑。没人会问威廉姆·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否真诚。而对其他人，真诚问题——如何使美国价值信仰与现实认知相协调——是不可避免的。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1 :9.

2.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Co., 1957), p. 3.

3. This has been recognized in passing by. some commentators on the American scene, for example, Robin Williams,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51), p. 425. Ethel M. Alber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Values: A Culture-Historical Approach," *Ethics* 74 (October 1963): 30-31.

4. Ronald Blythe, introduction to *Emma* , by Jane Austen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66) , p. 16.

5. Louis D. Rubin, Jr. , "The Great American Jok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72 (Winter 1973) , pp. 83-87, where the Robert Penn Warren quote appears . Harold J. Laski, *Th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 Viking Press, 1948) , p. 740. See generally Walter Blair and Hamlin Hill , *America's Humor: From Poor Richard to Doonesbur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6. Leon Samson,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 Jonathan Cape and Harrison Smith, 1932) , p. 13 .

7. Irving Kristol, *On the Democratic Idea in America*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2) , p. 130.

8. Judith Shklar, "Let Us Not Be Hypocritical , " *Daedalus* 108 (Summer 1979) : 11 , 14- 16, 24.

9. Kristol , *Democratic Idea* , p . 130 .

10. *New York Times* , May 4, 1974, p . 1 , 24 .

11. George Santayana, *Character and Opinion i n the United States*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Anchor, 1956) , p. 3 .

12.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 Harper & Bros . , 1944) , 1 : 21 .

13. Ralph Waldo Emerson , "Lecture on the Times, " in Emerson, *Prose Works* (Boston : Fields , Osgood & Co. , 1870) , 1 : 149 .

14. Robert B . Zajonc, "Thinking : Cognitive Organization a n d Processes, " i n David L. Sills, 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 Macmillan Co. and Free Press, 1968) , 15 : 618 .

15. For analyses supporting the conclusions summarized i n this paragraph, see : Fred I. Greenstein,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esp. pp. 31 -45 ; 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 ,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 McGraw-Hill , 1969) , esp. pp. 111 - 143 ;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 Niemi, "Patterns of Political Learning, "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8 (Summer 1968) : 463-465 ; and idem,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 to Child,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March 1968) : 169- 184. For the effects of Watergate on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s , see F. Christopher Arterton, "Watergate and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uthority Revisited,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0 (Fall 1975) : 477ff.

16. Seymour Martin Lipset, "Youth and Politics, " in Robert K. Merton and Robert Nisbet, eds . ,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 3rd ed.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 pp. 744-745 .

17. See, f o r example, Robert E. Agger, Marshall N. Goldstein, a n d Stanley A. Pearl , "Political Cynicism :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 *Journal of Politics* 23 (August 1961) : 487-492 , and the data on trust in government for the years 1958-78 colle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in Warren E. Miller, Arthur H. Miller, and Edward J . Schneider,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Data Sourcebook, 1952-1978* (Cambridge, Mass .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 . 269 .

18. See Donald J. Devin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p. 260-265.

19. See James W. Prothro and Charles M. Grig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February 1960): 284-291. Samuel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ch. 2.

20. Herbert McClosky,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June 1964): 371. See also Agger, Goldstein, and Pearl, "Political Cynicism," pp. 477-506.

21. Joan Huber and William H. Form, *Income and Ide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p. 132-133.

22. See Edward S. Greenberg, "Children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December

1969): 471-492, and "Orient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Children to Political Authority Figur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1 (December 1970): 561-571. Dean Jarros, Herbert Hirsch, and Frederick J. Fleron, Jr., "The Malevolent Leade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an American Sub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June 1968): 564-575.

23. 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 p. 672.

24. Richard E.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New York: John Wiley, 1960), pp. vii, 7, 9, 35.

25.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p. viii, 377.

26. For the ways in which Eisenhower did in fact use presidential power, see the revisionist analyses of Fred I. Greenstein, "Eisenhower as an Activist President: A Look at New Evid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4 (Winter 1979-80): 575-599, and George H. Quester, "Was Eisenhower a Geni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 (Fall 1979): 159-179.

27. "Passion for publicity": Francis Rourke, *Secrecy and Public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1), p. ix. "The awe of the press ": Edward A.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6), pp. 51-52.

28. Shils, *Torment of Secrecy* , pp. 53, 57.

29.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New York: Harper&Row, 1970),pp. 13-14.

30.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Knopf, 1956), p. 72.

31.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ix, 153. See also Bernard Baily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p. 136-148.

32.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p. 3-40, and *Age of Reform*, pp. 70-72.

33. Shils, *Torment of Secrecy*, p. 45.

34. Frederick S. Hulse, "Convention and Reality in Japanese Culture," in Bernard S. Silberman, ed., *Japanese Character and Cultur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2), p. 304. 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10-111. See also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p. 15.

35.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57-58.

36. Margaret Mead, *Soviet Attitudes toward Author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1), pp. 38-39.

37. *Boston Herald-American*, October 7, 1978, p. 14.

第五章 信条激情的政治

美国历史上的信条激情时期

面对认知失调问题采取犬儒主义、自欺欺人和冷漠自满等回应方式，不会给政治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造成重大的、直接的影响——尽管显然它们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造成重要的长期影响。这三种回应都不会影响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持久存在。作为第四种可能的选择，道德主义则试图通过让现实符合美利坚信条的价值和理想来消灭鸿沟。因此道德主义在制度与行为方面对政治系统的运行产生了直接影响，它是改变制度和实践的重要尝试。一方面，人们发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坚定地认为它本不应该存在。这两种认知的结合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信条激情越来越强烈，感染了整个国家。新一代人深刻地担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取代了对此更为漠然的老一代人。那些早前相对不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也表现出要求现实符合理想的热情。信条价值开始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觉醒的人民焦虑躁动，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

尽管激情的强度没有随时间展现出有规律的变化，美国历史中还是出现了四个引人注目的信条激情时期：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

步时代以及充斥着抗议、曝光和改革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些时期和美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反复申明传统的美国理想，并且努力让制度与实践符合理想的要求；社会冲突的裂痕跨越了原有的阶级和种族界限；社会力量与政府制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显然这四个时期并非美国政治仅有的变革时期。其特别之处在于制度的重组与改革。美国历史中其他时期发生的重大改革通常与社会经济团体的相对权力有关。这些改革似乎与信条热情时期的改革交替出现。例如在19世纪初期，南部和西部的地主利益集团取代了联邦党人的商业贸易集团，成为联邦政府背后的控制力量。19世纪60年代，南方地主实际上丧失了联邦政府中的权力，北方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力量则应势而起。20世纪30年代，新移民、有组织劳工和城市工薪阶层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变革的焦点在于社会力量的角色和权力，而信条时期变革的焦点则在于政治体制与实践的结构和特征。

四个信条时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将它们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区别开来：

1. 不满情绪普遍存在，权威、等级、专门性和专业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否定。
2. 政治理念被严肃地对待，在当时的社会争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3. 传统美国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平等、民治政府、政府公开——在公共讨论中得到重视。
4. 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普遍愤怒感。
5. 不安、狂热、骚乱和动荡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其程度远远超出利益团体冲突的一般水平。
6. 强烈敌视权力（反对权力的道德），政治的中心议题是“自由

对抗权力”。

7. 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进行的曝光和揭露。

8. 致力于特定改革或“事业”（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禁酒、和平）的运动十分活跃。

9. 新媒体形式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媒体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

10. 政治参与扩大化，通常采取新形式、新渠道表达诉求。

11. 主要的政治分歧跨越了原有的经济阶级分界，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促进变革。

12. 为了限制权力并按照美国理想重塑体制，人们尝试对政治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则仍在继续。

13. 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在根本上重组，其中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政党体系。

14. 流行的思潮以传统理想之名推进改革，它既是向前看的，也是向后看的；既是进步的，也是保守的。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详细阐述上述信条热情时期的一般特征。然而，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同样作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为何美国革命被归入信条激情模式加以研究，罗斯福新政则不适合此类分析？

美国革命总能给理解历史提出独特的问题。和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相比，美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吗？它仅仅是一次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吗？或者，是否可以将其看成是一次特别的起义，因而无法被放入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或国际冲突的宽泛类别之中？上述

解释对于某些研究目标或许是有用的。但是，也可以不必勉强——美国革命既不是单独的历史事件，也不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属于美国历史中独特的、反复出现的一类现象。革命时期是信条热情时期的原型，此后三个时期都是对革命时期主题的重申，是革命时期政治模式与特点的再现。

在申明、实践美国政治价值与理想的历程中，美国革命是最激动人心、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一次努力。1787年国庆日，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费城发表的演说简明地阐述了这个观点：“经常有人把美国革命和美国战争混为一谈。美国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革命还没有。正相反，伟大戏剧第一幕才刚刚结束。”¹ 和其他的重大革命相比，美国革命确实颇具保守色彩。它显然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主张的阶级斗争，没有哪个特定的社会团体被摧毁。但美国革命的确树立了一种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政府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不仅规定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新的合法性标准。这一意义上的美国革命是“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具有创造性的时期”。“此后的一切都建立在革命的成果之上”。² 在美国历史的语境中，革命确实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也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不仅是因为革命自身的直接结果，更因为它是一场伟大历史戏剧的“第一幕”，此后的各幕则以不同方式重复最初的主题与情节。在后来的信条激情时期中，美国人一直尝试通过树立新的目标重演18世纪成功推翻英王统治的情景。

在革命时期，美国政治思想首次在国家基础上得到阐述，并且指导了政治制度的重塑。克里斯托尔认为，美国革命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更加完美地与无人能够挑战的真实‘美国生活方式’保持一致”。反过来，革命的效力则是重塑“政治体制，使之对民意更加负责，更不容易侵蚀公民的个人自由”³。这个目标在后来的信条激情时期得到了重申，尽管效果不甚理想，但还是让政治体制变得更加自由、民主、负责。每个激情时期，人民都为政治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

所刺激，试图改造制度与实践，以缩小甚至消灭这一差距。结果，激情时期的政治变得更加激烈、更为“理想主义”，比利益集团之间功利博弈主导下的政治更具道德热情。因此存在两种美国政治，一种是政治运动、改革事业和信条激情的政治，另一种是利益集团博弈与妥协的政治。18世纪末的英美政治也形成了这方面的对比：英国政治体现的是家族、小集团和利益，然而“纳米尔对观念和原则的诋毁并不适用于美国政治，因为当时美国思想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于18世纪的英国”⁴。

将美国革命看作是美国历史中一系列动荡和变革时期的开端，就能够理解美国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经验在感召力方面有着多么大的差别。无论与其他革命的区别有多大，美国革命都“类似西方历史中的其他重大革命”，因为它具有“广泛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其他革命的意识形态一样，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性质的思想体系”⁵。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共和主义。美国革命宣称，共和主义理想的表述与号召都是普世的，这激励了其他地方的革命，为全世界的激进分子和改革家提供了参考。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美国革命经验的有效性则相对有限。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发现的那样：“现在我们使用的‘革命’概念，其广为接受的内涵来自法国革命，而非美国的历史事件或者美国开国元勋的所作所为，即便是美国人也承认这点……令人悲伤的事实在于，以灾难收场的法国革命塑造了世界历史，以胜利告终的美国革命则不过是一次具有局部重要意义的事件。”⁶ 尽管没有别的社会是按照美国革命的设想构建的，但集中体现了自由共和理想的美国革命还是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美国革命的经验被忽视了。革命的概念、阶段、语言，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在革命环境下行动，首先是由法国革命，随后又由布尔什维克革命阐述的。

道德热情就是信条激情时期和美国政治中其他的变革、停滞和僵持时期之间的区别。然而美国历史上至少有一个时期，虽然发生了公

认的重大改革，却不属于信条激情的类型。这就是罗斯福新政。事实上，新政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

第一，新政的首要目标不是改革政治，而是重现经济繁荣。和大多数信条激情时期不同，20世纪30年代正值经济萧条，当时的压倒性问题是应对国家经济困境。因此在新政的目标排序中，政治改革远远位于经济复苏之后。

第二，应对经济困难的紧迫性意味着重点是如何运用政府权力，而不是如何破坏它。虽然新政宣言对拥有巨额财富的恶人进行了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的抨击，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而不是按照美利坚信条重塑政治经济制度，政府行动是新政的必要手段。信条激情时期的特征之一——反对“大”，虽然在新政期间也很明显，但只占次要位置。当时的主旋律是政府干涉主义甚至集体主义，而非传统的个人主义。正如霍夫斯塔特指出的，新政从来没有对进步时代的两大恶魔——机器与托拉斯——表现出持续的敌意⁷。

第三，新政时期几乎完全没有信条激情时期那种道德主义和新教主义特征。新政的品质包括了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大胆、持续的尝试”，而不是满怀激情地重申道德价值。进步主义的特点是“传播道德真理，提高道德水准”。“而新政时期则完全没有类似的东西，这场后来的运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坦率的思想，即当下发生的是一场经济试验而非道德改革”。⁸的确，道德愤怒更像是保守主义批评家的特征，而非新政本身的特征。传统政治道德在新政的神殿中地位平平。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如马克斯·伦纳尔（Max Lerner）和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强调的是手段、技术、专业知识、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人主义、诚实、正直和道德。信条激情时期的情绪既是进步的，又是保守的，相比之下，新政思想几乎完全以未来为导向。

第四，新政期间的政治分裂是沿着经济阶级的分界线发生的，这

点也许比美国政治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显著。虽然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但穷人还是聚集在民主党的罗斯福联盟下，而包括许多前民主党人的有钱人则纷纷向共和党靠拢。政治的基本分裂模式是水平化的，正好与信条激情时期更为垂直化的分裂相反。

第五，就结果而言，新政的成果是新的、重大的经济政策和项目，在政府与经济系统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净化、开放政府和提高政府民主程度等信条激情时期的举措并不在其中。新政的结果是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和总统权力的提高，它留给下一代的遗产不是政府改革，而是政府扩张。

和新政时期相比，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政治氛围、冲突与改革的形式、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相结合等方面有着极为相似的特点。

信条激情的氛围

普遍、激烈的义愤是信条激情时期政治氛围的特点。此时人民的政治热情高涨，既存的权威结构受到质疑，要求民主与平等的冲动重获生机，继而是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政治变革。在每一个信条激情时期，不同的社会力量都会采用相似的理念和方法，按照美利坚信条的价值重塑政治制度与实践。

不满的氛围 所有信条激情时期都存在对现有事物的普遍愤懑情绪。对权威、等级、专门化、专业化的广泛质疑和否定正是其体现。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以前经常无人在意、不受指责，而现在则于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遭人唾骂。美国人因为不符合信条理想规定的形象而自我痛恨。用R. R. 帕尔默（R.R. Palmer）的话来说，这四个时期都处于一定程度的“革命形势”，即“对司法系统和现有权威合理性的信

心遭到动摇；传统的忠诚被削弱，义务就是强迫，法律等于专断，尊重上级简直就是对人的侮辱；已有的声望是不应得的，合法的财富成了所得不义，政府则被认为是脱离了被统治者且无法代表后者的遥远存在”。帕尔默和贝林认为这番话恰当地描述了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潮流。⁹ 而对于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和20世纪60年代的激情时期，这些描述也几乎同样适用。

爱默生对19世纪30年代的描绘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几次信条激情：“政治方面……异议蔓延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到处是叛逆不从和自立为王。别管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王国，那里的政府既没有控制，也没有干涉。”个人对外部权威的拒绝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无论是民间团体、节庆活动、社区邻里还是家庭环境，都弥漫着同样的怀疑和异议气氛。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能引起没完没了、吹毛求疵的抨击。谁给我买衣服的钱？凭什么账房会计之类的专业劳动就要比码头工人和锯木工挣得多？”所有既存制度都遭到了挑战：“受到新精神威胁的不是某个王国或城镇，不是某项习俗、某条法令、某个职业，也不是哪个男人或女人，而是基督教义、法律制度、商业活动、农业产业、教育系统和科学研究。”¹⁰ 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认为，革命时期的“突出特征是恐惧、狂乱、夸张、热情，以及对社会腐败和失序的普遍感受，从中将诞生一个和谐仁爱的新世界，让美国人成为‘所有宗教与社会道德的楷模’”。与此相似，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发现19世纪20年代“社会十分兴奋躁动”，西奥多·罗斯福则声称他所处时代的特点是“公众思想处于活跃兴奋的状态”。¹¹

每个激情时期都是躁动的时期，伴随着对现行制度和权威的质疑。每个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法性危机，人民尝试解决危机的方式是改造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实践，使之更符合美利坚信条的价值体系。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广泛的自由主义共识，避免了欧洲那种阶级斗争式的革命。正是那些制造了革命形势的力量最终导致了没有革

命的结果。

政治理念与道德激情 政治理念和理想在激情时期被严肃认真地看待。美国革命前夕，整个社会第一次郑重地阐述了平等、自由和人民主权的思想。贝林发现，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殖民地和革命领导人对待政治理念的严肃性，以及按照这些思想改革制度时的深思熟虑”。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1760—1775年的革命是人民思想的革命。“人民在原则、观点、情感方面的激进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以普世民主原则之名挑战并废除了权威。此后的每个信条激情时期都体现出“这些老原则的新觉悟（爱默生语）”。¹²

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含义，以及为了实现它们的制度变革成为公共争论的焦点，但并未产生宏大的、系统的政治理论。四个激情时期的政治理论没能超越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克罗利的水平——这两位都不是能提出原创理论的思想家，但是有着出色的能力，能把人们熟知的理念重新组合以满足时代需要。虽然潘恩没有提出新的政治理念，不过他的确创造了“世俗的革命语言，用新奇的词汇表达出永恒的不满、对基督再临的期盼以及大众传统”。¹³ 人们不会谈论这些时期的政治理论，而是关心政治理念——那些在每个时期都众所周知却又被多次阐述、反复组合的理念。

美国人既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又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在信条激情时期，理想主义的一面占据主导。公共生活强烈地关注着价值、原则、权利和道德。政治理念不是因为智识原因，而是因为道德原因变得重要，义愤引发了信条激情和政治争论。人们急于判断政治上的的是非。美国革命者的思想被“苏醒的道德激情”和“改良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冲动”所控制，“驱使他们抨击统治自己的整个体制的腐朽和专制”。¹⁴ 杰克逊时期也流行着“类似的态度、信念和拒斥行为——一种阐述模糊的、伴随着感情承诺的道德观”。“共同体分享诸多价值观，其中一些价值在特定社会阶段会变得无比重要”。杰克逊时代的

所有人似乎都是“道德论者”。当时的说教“通常是道德禁忌的戒律，而非对社会目标与手段的阐述”。进步党人同样乐于使用“道德而非经济的语言”，“设立不可能达到的标准”，他们受到了“道德绝对主义的荼毒”。西奥多·罗斯福经常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相信美国政治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为道德而战”。¹⁵ 道德、道德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当然是20世纪60年代的标志，它们在一片熙攘嘈杂中见证了所谓“新政治道德”的诞生。

信条激情时期对道德价值的重申是两面性的。被唤醒的价值与理想是传统的，它们的合法性与号召力来自其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存在。重申价值，还意味着坚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传统价值的承诺、希望和梦想。这时候的思想潮流既向后看，也向前看；既传统，又激进。美国革命时期的殖民地人用洛克和18世纪早期辉格党人的思想呼吁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就像哈慈说的那样，“1776年精神”的非凡之处“不是展望未来，而是崇尚过去”。¹⁶ 美国未来的使命就是实现美国过去的价值。杰克逊时代、进步时代的理念，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海报都存在这种矛盾——尽管人们期待实现的前辈理想和当前工业化、全球化造成的制度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一条不断扩大的鸿沟。与其他国家的复兴运动一样，美国的历次信条激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古与未来并存的局面。¹⁷

攻击权力和等级秩序 民主理想在激情时期得到再次确认——主张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治政府，反对等级、特殊化、官僚制度，尤其是反对权力。反对权力是信条激情时期公共舆论的重要主题，时代的关键问题经常被定义为“自由对抗权力”。18世纪70年代的全神贯注于——甚至是沉迷于——权力问题。权力在本质上是邪恶的、腐败的。对美国人来说，权力的特征就是其侵略性，即“向合法边界以外自我扩张的无限趋势”。反对权力和反对特权一并成为了美国革命的主题。革命者相信：

权力即是恶，它也许是必要的，但仍然是必要的恶；权力意

味着无限腐败；权力必须在方方面面受到控制和限制，只要能保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即可。成文宪法，权力分立，权利法案，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边界，限制强迫和开战的权力，都体现出美国革命意识形态对于权力的深刻不信任，这种思想是我们永久的遗产。¹⁸

杰克逊时期也出现了自由与权力的二元对立。例如，“金权作为一种权力遭人鄙视，它用不义之财腐蚀、控制正常的共和秩序”。然而杰克逊时代对权力的猛烈抨击并没有持续下去。“19世纪30年代发生了针对银行的杰克逊战争，19世纪最后二十年出现了人民党—进步党躁动，而在这两场运动之间，没有哪个领导人或哪场运动对私人经济权力的集中提出质疑”。¹⁹ 这种质疑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再次出现，在美国参加“一战”前它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随后趋于沉寂，到了20世纪60年代重又升温。在每次激情时期，自由理想都对权力体制进行了审判，复兴的反权力道德成了政治行动的指南。

在激情时期，被视为自由威胁的权力通常有着不同的具体形式。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威胁自由的是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权力。19世纪30年代的威胁则来自垄断、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经营和干部系统（caucus system）。19、20世纪之交，人们将矛头指向了大机器生产和托拉斯。扒粪者的敌人包括“‘特殊利益’体系’，高高在上、狂妄不已的金融业、富豪统治、工业贵族，以及托拉斯与垄断……大企业是这场全国性腐败浪潮的罪魁祸首”。²⁰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反对的目标变成了行政权力、总统制以及军工复合体。在激情时期，人们把焦点放在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处：帝国权力、金钱权力、奴役权力、企业权力、行政权力，等等。总而言之，每一次信条激情都以大型组织为敌。在极端情况下，对权力和组织的担忧可能变得偏执，认为存在威胁削弱自由社会与政府的阴谋。美国革命期间有对于“邪恶英王阴谋的偏执痴迷”，与此相对应的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共济会妄想与狂热——其攻击目标是“邪恶分子试图控制政治与社会生活

的阴谋指令”——以及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人的说辞和幻想。²¹

破坏、削弱、改革、控制组织性权力，以及将决策过程公开化以便使公众参与其中，这些就是所有信条激情时期的共同目标。杰克逊主义者从事的是“肢解行动——试图破坏危险的联邦权力和企业权力，重建‘民意与自由市场’的健康统治”。²²“肢解行动”恰恰是四个激情时期的结果——破坏现存已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杰克逊主义者“引导对封闭政治集团的不满，以此对抗被他们认为公然篡夺人民权利的干部系统，并且公开声称必须从社会精英和官僚专家手中夺回政府和政治，向民众的参与开放”。²³最初，美国革命粉碎了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权力框架；接下来，劲头十足的人民党人和进步党人试图通过引进初选、市政管理、公共服务和其他制度改革来瓦解政治集团，并利用反托拉斯法和其他形式的政府监管打破企业垄断。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进行了相似的尝试，试图驯服军工复合体、中央情报局和总统对外权力。

除了攻击那些被认为位于权力核心的制度外，激情时期还对权威、等级秩序和特殊化发起了更大的挑战。前一个激情时期的主题会在下一个时期再现。每个时期都强调外行、普通人、公民的能力，反对专家。某种程度上，每个时期都倾向于贬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如地位、工作、知识、职位差别——的意义，强调社会的同质化，强调“消融一切社会差别秩序”的“伟大原则”（用杰克逊主义者的话来讲）。学习专业知识和提供专业学习的机构都受到了批判。军事专业更是抨击者的靶标，军事院校的存在遭到公开质疑。人们以自由之名挑战权力时，也会以平等之名挑战其他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差别。杰克逊主义者的目标——“政治民主，经济机会平等，反对垄断和特权”——在其他三次激情时期也同样广为传播、备受认可。²⁴

政治参与与组织 事业的进步需要参与和组织。信条激情时期的特点正是广泛的政治活动。被动员起来的人民用新的方式展开行动。新形式的志愿社团出现了：通讯委员会、利益协会、新政党、工农组

织，以及不同类型事业的组织。热心公益的志愿协会是美国人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一传统源于缔造新英格兰的持异见新教分子，在革命期间以通讯委员会、自由之子、一分钟人的形式传遍整个殖民地，杰克逊时期激增的五花八门的事业促进组织标志着其正式形成。托克维尔那段被反复引用的评论确实再精准不过：如果有什么公共事务需要处理的话，在法国，政府来做；在英国，当地富贾和贵族来做；而在美国，“肯定有一个相关的协会来做”。“……美国人会因为很多事情组织团体，比如进行娱乐活动，创建神学院，开办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等等。他们也会用这种方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²⁵ 协会的数量和范围让托克维尔感到惊讶，而事实上这正是美国人尝试让制度与实践同信念和价值保持一致的方式。杰克逊时期的各类社团正是伴随着选举权的大规模普及而出现的。

进步时期也同样出现了大量新兴社会运动和社团。这在20世纪初期尤为引人注目，标志着建立志愿社团的第二波浪潮。但是与这一波结社浪潮相伴出现的并不是投票率的进一步提高（因为投票率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很高了，再提高将十分困难），而是争取妇女普选权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黑人和青年人的投票率上升，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也急剧增加，包括示威、抗议、结社、宣传、良心游说以及所谓的公共利益团体，等等。像此前的激情时期一样，60年代也是新型社会组织大量出现的时期，其中还包括聚集了热情信徒的乌托邦社团。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 Lowell）在19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在那些能建立起社区的地方，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唯有常识不是。”²⁶

现代的结社技巧可以追溯至杰克逊时期。正如当时一位观察家颇有嘲讽意味的评论：

不管做什么，都必须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社团，社团的名字还得足够大气；要请一帮社会名流作为会员或者赞助人，这些人

的名单也要足够吓唬人；筹集的第一笔资金被用来任命一名秘书和足够多的助手；要请几个受欢迎的演讲家，让他们在公众面前充当代言人；神通广大的报纸要开足马力宣传；还得制作相关的证书，以供会员签署、提交和宣誓；整个协会的机器都在全速运转，附属协会多如牛毛，无处不在；最后提出来的建议看上去也不错——如此声势浩大，社会哪能抵得住？²⁷

20世纪那些在巴士上宣传种族平等的人士和改革分子，和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是一样的；就才能和行动而言，加里森是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先驱。老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在50年代的观察中写道：“杰克逊时期的改革家如此出色地运用了一百年前改革的组织和宣传手段，以至于后辈们除了利用电影、电台等新技术之外几乎无可超越。”²⁸

建立组织——既是政治参与的表现，也是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手段——是为了缩小理想/制度间的鸿沟。通过归纳总结杰克逊时期和进步时期的经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指出：

急切、迅速地建立社会组织的时期，就是动机的显著性大为增加的时期。理念越重要，组织就越多。结社活动的流行似乎总是伴随着大量社会运动的出现，这一显著事实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例如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反共济会组织和废奴主义组织同时成立，在二者的诸多相似动机中，最为突出的是宗教热情的伟大复兴。1895年到1910年，社会上又兴起了新一轮传播福音真谛的运动，其中许多内容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却依然使用了宗教式的语言：自由铸造银币（free silver）、禁酒、本土主义、扩大普选、社会福音主义、马克思主义、泰勒主义、安居运动，以及数不清的其他运动。²⁹

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证明了这一命题仍然有效：有组织活动是继承美利坚信条的方式之一。

媒体与政治沟通 要削弱权力，就得先揭露权力。在每个信条激情时期，对特权阶层、不平等和腐败事实的揭发都给改革运动提供了动力。每个时期都出现了新的媒体形式，从而加强了改革者向公众传播事实真相和愤怒情绪的能力。

美国革命期间，美国和欧洲“第一次形成了公共舆论，‘公共舆论’这个概念也的确在这一时期出现在几种不同语言中”。这种公共舆论来自“习惯性关注政治事件，以个人或俱乐部身份订阅报纸杂志的一群民众”。“他们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意识到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公共福祉是存在的，它取决于政府政策与启蒙公民的行动”。这些人同时关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事务。“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在内的出版业的巨大进步”为这种关注创造了动力和可能。传播方式的进步成为美国和欧洲“整个革命年代的基本前提之一”。³⁰ 在美国，日益普遍的请愿、抗议、布道、演说、年鉴、传单和报纸，都推动了革命意识的发展。新传播方式中最核心、最独特的就是小册子，这在英国和殖民地是“政治论战最有效的武器”。篇幅灵活、时效性强、一事一议的特点使小册子成为激进革命论调的理想载体。1750年到1776年间出版的号召反抗英国统治的小册子超过了四百本，到1783年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本。“小册子在夹叙夹议的同时表明了革命领导者和支持者的信念、观点、动机和公开目标，它是典型的美国革命文学”。³¹

政治传播的规模和强度在杰克逊时期实现了又一次飞跃。公共学校、图书馆公司、书店和成人教育运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报纸发行量的增长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1800年，美国有242家报纸，总发行量20万份。到1829年，报纸总数超过了1000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³² 新闻业的增长与政党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新闻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开的党派性质），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政治和社会结社的增长有关。托克维尔认为，在政府决策采用分权模式的民主社会中，报刊对于聚拢有志于公益者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社会上存

在“公共社团与报刊之间的必要联系：报刊和社团彼此创造”。19世纪3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同时拥有最多社团和最多报刊的国家……因此新闻报刊行业的权力随着社会上人人平等的推进而增长”。³³

进步时期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此前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的情况相似。如果说小册子和廉价报纸分别是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的特有媒体，那么大众媒体和廉价杂志就是进步党人改革的车轮。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爱德华·斯科利普斯（Edward Scripps）以城市大众的需求为导向，创办了拥有巨大发行量的日报。他们在报纸上提升人的兴趣诉求，用丑闻吊人胃口，将腐败公之于众，在需要的地方创造新闻，“通过机智的、有人情味的精彩报道，将那些一直被新闻报道忽略的事情提升到新闻事件的水平”。杂志行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末发生了“杂志革命”，诸如《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哈泼斯》（Harper's）等发行量有限的、面向上流社会的期刊，被商人而非文学家创办的、拥有巨大发行量的大众杂志所赶超。³⁴ 这些杂志在提高发行量方面借鉴了报纸的特点，《麦克卢尔》（McClure's）、《美国人》（The American）等杂志将曝光名人丑闻作为独有的惯用手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发行量。这些八卦杂志的月发行量超过300万份。如果算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和《妇女家庭》（The Ladies Home），此类杂志的发行量就超过了500万份，而此时美国一共只有2000万个家庭。日报的发行量也同样急剧攀升，在1909年达到了2420万份³⁵。如果没有报纸和杂志行业的发展，政治改革和进步运动很可能不会出现。

20世纪60年代，电视业以相似的方式崛起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反映并塑造了新的政治意识，在全国范围内增强了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新的全国性新闻业也在此时成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等个体报纸，以及《时代》（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等新型杂志为政治观点的表达提供了全国性的舞台，它们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事件和“水门事件”中挑战并重创了联邦政府的民选领导人。这使得诸如“客观”“中立”等新闻行业早期的规范让位于在政治生活中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新规范。

因此，信条激情时期出现的新型大众媒体成为了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挑战者的工具，将后者的观点传播给规模前所未有的公众群体。美国新闻业的政治功能不同于其他国家。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广泛结社与新闻权力之间存在关联。在基本政治价值的广泛共识与新闻业的权力和功能之间也存在关联。在具备共识的社会中，新闻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其具体化，以此评判个人和机构。美国的新闻业几乎从来不和政府产生瓜葛，也从来不开其派性；相反，新闻业是社会性的，或者倾向于此。新闻业在社会中的独特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共识产物的一部分。媒体是自由社会在事实上的牧师：他们是社会根本价值的保管人，揭露并谴责背离根本价值的行为，赋予遵循这些价值的个人与制度合法性。在信条激情时期，媒体除了挑战并揭露权力不平等之外别无他法。

扒粪运动与曝光政治 早在西奥多·罗斯福为其贴上标签之前，扒粪运动就已经是独特的美国式政治活动了。只有在具备基本价值共识的社会中，曝光违背价值体系的事情才会引发政治变革。只有当人们一致同意有关善恶美丑的判断标准时，“扒粪”才是有效的。这使得改革更多地涉及对事实的揭露，而非对价值的争论。就此而言，20世纪初美国的变革努力实际上与同一时期俄国的变革处在两个不同极端。“两国环境的不同通过列宁与斯蒂芬斯（Steffens），以及《火星报》（Iskra）与《麦克卢尔》之间的对比反映出来。布尔什维克使用革命宣言发起进攻，而美国改革者用的则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的信念。”³⁶ 从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于1773

年出版的马萨诸塞州总督哈金森（Thomas Hutchinson）个人书信（这些信件“向愤怒的公众‘证明’了英国政府的行为是故意的，而非源自傲慢、轻视和误判”³⁷），到两百年后《纽约时报》将五角大楼的越战秘密文件公之于众，美国政治——特别是在信条热情时期——一直是曝光的政治，而媒体作为曝光手段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他国家。但是只有道德意识被激发时，曝光才是有用的。

每个信条激情时期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煞费苦心的新政治理论，而在于揭露违背旧政治理论核心原则的新政治事实。美国革命对此作出了最佳诠释。革命时期和后来的激情时期一样，争论政治理念是没有必要的；有必要的仅仅是阐明理念，搞清楚现状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些理念。革命者相信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他们要求的一切不过是“将事实呈现于公正的天地之间”。杰克逊主义的改革者采取了相似方式，对此进行了观察的爱默生认为，改革实际上源自理念与现实间的对比。在随后的世纪之交，人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再次面临了同样的情况，西奥多·罗斯福称其为“扒粪运动”。由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林肯·斯蒂芬斯、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大卫·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及其同行成功发展起来的曝光式新闻践行了布兰代斯的信念，它以事实为依据，为立法改革提供了理由和动力，为促进社会改革的司法行动提供了重要手段。相应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新扒粪者”和新的曝光政治。

在信条激情时期，曝光和揭露行动同时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展开。人们的愤怒最开始可能集中在特定的个人、机构或实践上，但是迅速蔓延并影响了更大范围的民众和组织。20世纪初，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观察中发现：“随着扒粪运动的发展，公共生活的标准开始被用于评价商业活动的某些领域。”虽然“原来只是一场反对政治特权的斗争”，但杰克逊主义运动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很快“将斗争扩展到反对经济特权”。³⁸ 最初对于政治丑恶现象进行曝

光的动机可能很快扩散开来，进而引发对于企业、教会、学校和社团所犯罪恶的关注。

道德标准的纵向升级，模糊了对于公认规范的严重违背和轻微、表面、潜在违背之间的区别。如果无法证明一名公职人员接受了贿赂，那就证明他接受了一件礼物；如果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一名公职人员以权谋私，那就证明在其公共职责与个人私利之间存在潜在冲突。“如果无法依照公认标准从事实中找出道德问题，那就提高道德标准，直到发现问题；并且必须教育公众，使新罪行引发惊悚的程度与旧罪行相当”。³⁹ 真实的诚信水平越高，道德的标准就越高。

最后，不断增强的道德愤怒被道德疲劳和犬儒主义所取代。这一过程在最近三次信条激情中都引起了关注。爱默生在对杰克逊主义改革者的观察中写道：“我们看到的针对制度的批评与攻击清楚地说明，个人在不改变自己的前提下试图改变周围，对于社会是毫无益处的：他可能在特定方面是个庸常的好人，却在其余方面粗浅狭隘；令人生厌的结果通常包括虚伪和浮躁……邪恶的浪潮以相同的方式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制度。”1975年，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以极其相似的口吻，对近十年来道德曝光的一个方面进行了评价：“责任成了时髦的口号，消费主义甚嚣尘上，无论是国会还是公众都不把总统或者任何人的话当回事。但有时候怀疑会走得太远，人们总得相信某些人。”⁴⁰

西奥多·罗斯福曾精辟地论述过曝光政治和道德主义改革的政治后果。他认为“人们面对卑鄙肮脏时不应畏缩不前”。某些场合下，扒粪者的行动可以服务于有益的目标。尽管如此，“如果一个人除了揭丑什么都不做，在有关揭丑的思想、言谈和写作中毫无收敛保留，他很快就会变得既不能帮助社会，也不能推动善举，而只能成为邪恶的最有效力量”。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罗斯福谈道：“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诸多严重的丑恶现象，我们急需与之展开最坚决的斗争。应当无情地抨击曝光每个丑陋之人，不管他是政治家

还是商人，也不管他的丑行发生在政治、商业还是社会生活中。”但同时也需要避免对公共人物的人格“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攻击的风气”。人们必须维持平衡。“揭露犯罪并抓住罪犯；但要记住，即便是针对犯罪，如果采用感情用事、耸人听闻、扭曲事实的方式，对公众思想的伤害会远大于对罪行的打击”。无节制地使用错误方式进行曝光，可能导致公德的败坏以及是非曲直界限的泯灭。“以如此粗鄙激进的方式打击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公认的、强大的丑恶力量，而不加区分地将正直之人卷入其中一并谴责，意味着公德的枯竭。⁴¹ 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要么对公共领域的腐败抱以冷漠的犬儒态度，要么失去甄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信条冲突：运动与体制

在日复一日的运行中，美国政治的冲突逐渐接近多元主义理论提出的麦迪逊模型（Madisonian model）。利益集团政治能够解释大部分情况，但无法解释所有。共识理论错误地低估了美国社会的冲突；进步主义理论则误将阶级分化视作分歧的核心；多元主义理论对美国政治冲突根源的描述则是不恰当的。政治冲突既可能因经济和公共利益而起，也可能因政治观念而起。围绕着美国政治的原则和价值应当如何通过政治制度与实践得到实现，人们大鸣大放，争执不休。美国政治的行为体既包括社会运动分子、改革家，也包括压力集团和院外集团。某些情况下，信条政治是对利益集团政治的补充甚至替代。同后者相比，信条政治是间歇性而非持续性的，偏激情而非实用，重理想而非物质，主张改革而非维持现状，强调是非判断而非收益权衡。信条政治参与者的自利心并不比利益集团政治的参与者更少，但二者的利益是以不同语言界定的。当团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利益集团政治将被信条政治取代：（1）团体以美国价值和原则定义自身目标，因而采用普世话语表达其诉求；（2）团体要求对政治制度与实

践实施结构性变革；（3）以道德激情去实现这些目标与要求。

18世纪70年代、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和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冲突涉及利益集团，但是分歧的深度、关键议题的意义以及参与者的热情都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政治”。与此同时，尽管经济问题在这些冲突中很重要，主要的分裂却并未首先沿着经济阶级的分界线发生。结果，每个时期分裂的本质和原因都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广泛争论。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和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斗争到底具有何种结构？用利益集团或者经济阶级的观点来解释这些分裂是缺乏说服力的。在革命期间，保王党和革命者的阵营中同时出现了富人与穷人、种植园主与商人、小农与小贩。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内部也会发生分裂，富兰克林家族就是最有名的例子。杰克逊时期分歧阵营的构成超越了阶级分野，在为党派和议题而彼此斗争的两派中都能发现农民、工人和企业主的身影。在进步主义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既有支持政治经济改革者，也有反对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学生与属于低收入阶层的黑人联合起来，反对其他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商人以及与之联盟的多数工人阶级。在所有这些信条激情时期，社会分歧的主要裂痕与当时的主要议题有关，这种割裂虽然不完全是纵向的，但也远远不是水平的。

激情时期的改革动力，源自中产阶级与底层的农民或工人阶级成员在利益方面的结合。将这些不同社会经济集团带到一起的原因显然是被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威胁或抛弃。在革命时期，所有导致革命派和保王党分道扬镳的原因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件事：个人和团体是将英帝国体制视为自身利益所在，还是将其未来的权力增长视为对自身的威胁。例如，一些殖民地社会的底层团体将英国的存在看成是对殖民地经济主导集团的制衡，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英国控制殖民地。在杰克逊时期，社会集团与既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不同集团的联合，例如杰克逊主义者试图摧毁、开放和渗透的第

二合众国银行。类似地，将进步党人与其对手区分开来的，正是前者的成员主要来自地方政治经济体制之外的集团。由于不同地方的体制由不同的集团把持，进步党人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彼此不同。⁴² 相似的原理也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跨阶级的社会分裂。每一个激情时期的主要社会分歧都出现在两类人之间：不论何种阶级出身，视自身利益与现存政治经济结构具有直接联系的人，以及同样不论阶级为何，将自身利益与现存结构的开放或瓦解结合起来的人。信条激情时期的分化可能并且确实造成了经济阶级、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甚至家庭内部的分裂。结果，那些尖锐的改革要求总是用自由、民主、反对权力等美利坚信条的语言定义自身。

确认这些“传统”价值主要有两方面目的。首先，它为那些脱离现存体制的、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团体提供了统一的目标、观点和语言。它还划定了改革的范围，以免造成政治联盟的瓦解。拥有更多收入和财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一般会比其他入更虔诚地信仰美利坚信条。而在经济上较少依赖现存秩序的人则不大相信信条。在激情时期，信条的价值主要由中产阶级团体申明。通过重申信条，曾经的中产阶级虚伪分子变成了如今的道德论者，他们还试图动员底层，使之改变麻木无谓的态度。底层民众由此开始重新接受美利坚信条。然而，信条是可以用来挑战既存秩序的唯一意识形态武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变革可以发生，但无法走得太远的原因。中上阶层或许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政治改革，但是在经济上不允许现存的财富与收入分配发生重大变化。另外，贫困阶级也许能在实质性经济变革中获益，但他们缺少实现变革的意识形态动力，而且将他们动员起来采取政治行动的价值诉求恰恰是反对进行重大经济变革的。

其次，申明信条价值不仅能团结改革分子，也让改革阵营的敌人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他们就像贝林描述的革命时期保王党人那样处于意识形态的无武装状态。面对广为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话语下形成的变革诉求，反对者们找不到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信念用以反击。

因此，双方的争论经常变成围绕特定变革手段的相对可行性、变革的时机和速度而展开的争吵。美国政治中最基本的分歧一般可以被定义为“速度问题”。“实质上（这一分歧）发生在两拨人之间：一些人渴望迅速实现美好的理想社会，为此不惜误入歧途；另一些人希望通过缓行、慎行将这种风险最小化，反过来又可能导致错失良机的风险”。

43 在激情时期，那些希望迅速实现变革的人不但在数量上增加了，其实现要求的热情也增长了。主张尽快实现自由主义理想的人和主张采取渐进递增策略应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人爆发了争吵。作为美国激进分子的原型以及“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改革者”——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者，加里森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激进主义”的标签。用他自己的话说，“理论上是逐渐实现，干起来却没完没了”。与加里森同时代的和平阵线改革者威廉·莱德（William Ladd）也说过：“这是无可争议、不言自明的真理——对于所有合乎道德本质的事情，不但应当去做，而且可以被做到。” 44 简言之，不存在任何能为理想与制度间的鸿沟制造合理性的借口。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则代表了与此相反的主张，他和加里森一样反对奴隶制，却坚决反对依靠“兴奋与狂热”推翻这一制度。他认为，“上帝从没有将改变世界的重任委托于激情”。 45

在激情时期，支持变革的人与倾向保持体制现状的人之间开始出现政治分化。因此，反复出现的分裂并未发生在上层与下层阶级或是精英与大众之间，而是在改革派与保守派，或者说“草根派”、社会运动与“建制派”、既存体制之间。保守的建制派是长存的，而改革派则很容易烟消云散，冲突的激烈程度也随双方兴衰而变化。在激情时期，更多的人积极投身于实现理想，他们的参与性更强，热情也更加高涨。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境中，这些改革分子变得“激进化”——远离现存权力结构并对其进行激烈批判，从自由民主的美国理想出发提出改革要求。此时，“良知共同体”不但扩大了规模，也变得更活跃，更专注于特定议题。作为政治生活主要力量崛起的既不是激进左派，也不是激进右派，而是激进的中间派。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所谓的美国

政治的二元对立并未持续存在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反倒是间歇地出现在草根派和建制派之间。

草根派具有多面性。激情时期总会伴随着改革诉求的增加与社会运动的爆发。妇女、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和印第安人）、病人、智力残疾者、消费者乃至罪犯的利益诉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成为了激烈政治行动的主题。正如洛厄尔观察到的，在杰克逊时期，“所有可能形式的精神和物质缺陷都有其福音。连麦麸都有自己的先知……大白话被当成足以让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震惊不已的高论……每个人都负有介入他人生活的‘神圣’使命……每个人都时刻准备好去改造他们自身以外的一切”。⁴⁶ 19世纪30年代就像20世纪60年代一样，社会上出现了无所不包、支持一切美好事物的草根运动，而支持个别美好事业（例如和平、女性权益、民权）的次一级运动则相对较少。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先是在19世纪30年代，继而在20世纪初达到巅峰，并在60年代再次高涨。废奴运动始于19世纪30年代，处于从属地位的争取黑人权利运动始于20世纪的最初十年，民权运动和黑人觉醒则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生活。19世纪二三十年代，疯人院、监狱、医院和孤儿院的设立，证明了可以利用特定制度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即大卫·罗斯曼（David Rothman）所谓的“发现救济院”。20世纪初迎来了新一波制度改革热潮，例如定居救助之家（settlement house）计划。美国“和平运动”的真正源头是1828年美国和平协会（American Peace Society）的建立，这个协会在美西战争后抗议美国攫取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浪潮中崭露头角，并在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运动中以引人注目的形象成功复兴。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在19世纪30年代还是次要角色，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重要社会力量，虽然此后从公众视野消失，但它在60年代以纳德运动（Naderism）及相关运动的形式再次出现。

因此，从一个激情时期到另一个激情时期之间，社会运动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复性：某个时期广受支持的事业在下一个时期会重新出

现。此外，同一个激情时期的不同事业之间还存在高度关联性，某一事业的积极分子一般也会热心参与其他事业。爱默生发现：“在这些运动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参与者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广泛不满。”像托马斯·潘恩、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厄普顿·辛克莱尔和拉尔夫·纳德这样的社会运动家可能会参与所有的运动。除了推进废奴，菲利普斯还“支持一系列社会事业，例如妇女平权、禁酒、爱尔兰独立、公正对待印第安人、废除死刑，以及善待精神疾病患者等”。⁴⁷ 辛克莱尔则积极代表消费者、妇女和劳工权益，要求推进经济平等和公共事业公有制。其他改革家则在集中致力于某一运动的同时表达对其他运动的同情，例如加里森对待妇女平权运动的态度。

阿兰·格兰姆斯（Alan Grimes）有关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讨论很好地描述了不同运动之间的联系。在南北战争之前，妇女平权与反奴隶制运动、禁酒运动存在着密切联系。“19世纪的女权运动就像今天的民权运动一样，不仅支持女性大学就学权、就业权、财产权、离婚后子女监护权等自身团体受益其中的直接改革要求，也支持一系列广泛的变革呼声，例如和平主义、禁酒、废奴、社会福利立法等”。杰克逊时期的这种社会运动间联系在进步主义时期同样存在。“妇女普选权与进步主义，二者的社会伦理基础很容易被联系起来。女性普选权和直接初选、参议院直选、立法提案权、复决、罢免权一样，不仅是改革行动，还是按照流行的社会目标理念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工具”。

⁴⁸ 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同样有着紧密联系。总而言之，特别关注某项变革的个人和团体通常有着普遍的改革主义世界观，这使他们很容易支持形形色色的各类改革诉求。

在美国人的经验中，共识并非政治冲突的解决，而是政治冲突的源头。利益集团政治与共识相兼容，信条政治则是共识的产物。共识破裂时，冲突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共识被激活，民众沉睡的意识开始觉醒，为了在体制的结构与实践实现共识的价值而努力，冲突就会发生。信条政治的冲突涉及的不仅是如何促进那些制造政治分裂的利

益，也包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那些促进团结的普世理想。对基本价值的共识可能是令人非常不安的社会现象，它既能提供挑战现存制度的动机，也能充当政治团体联盟之间相互攻击的武器。美国政治最严重动荡的源头不是共识的缺失，而是对共识的坚持，是让社会重新回到最初原则轨道上的努力——这种旨在摧毁专制特权、肃清经济寡头、消灭腐败官员的行动在中国被称为“净化运动”（Purification Campaigns，即“三反”“五反”运动——编者注）。美国人的两极分化大多源自对待同一政治信仰的严肃程度不同，而不是由于政治信仰相异。他们时常因为如何在政治制度和结构中实现美国理想和原则而产生根本分歧。导致美国人最严重分裂的正是那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

同美国的政治变革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新思想的引进，而是旧思想的重申。诸如马克思主义等新意识形态的出现，仅仅对美国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影响。冲突和变革源自信条激情，源自实现而非挑战主流价值观的努力。美国价值的重申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恰恰是因为其本身含义——呼唤一种传统的、合法的，人们普遍熟悉、广泛接受和支持的意识形态的回归。正如哈慈在提到废奴主义者时所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改革运动实际上没能产生任何原创的政治思想。加里森和菲利普斯并非政治理念的缔造者，甚至连钱宁也不是。”废奴主义者发现他们需要的是激情，而不是哲学，因此“他们以特有的激情联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不加辨别的自我满足情绪”。就像加里森提出的问题：“要论据有什么用，它能证明什么？”⁴⁹ 证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吗？所以奴隶制是个错误？

同西欧国家相比，美国的政治变革一般伴随着新社会运动的涌现，而不是新政治党派权力的崛起。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种对比尤为突出，二者虽然在社会、政治和地理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因为加拿大没有所谓的“加拿大信条”，所以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很少

发动美国式的救世主运动。⁵⁰ 在美国，特定的改革尝试总是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其他国家则很少这样。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在比较美国与欧洲的废奴运动时发现，“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废奴运动简单而尖锐的道德纯粹性，使其具有了与其他类似运动不同的特质”。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比其他国家的废奴主义者更倾向于认为，奴隶制的终结“是一个良心问题”；他们表现出“一直为美国人所独有的抽象特质”。“对他们而言，这是个完完全全的道德问题。”

51

在苏联的政治共识中，也能找到美国式的激进与保守分子斗争。在苏联，一些人以实现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目标为己任，其他人则保持着相对的政治冷漠，并通过毫无意义地重复官方说教来掩饰这种冷漠。表面看来，政治冷漠的苏联人可能和政治冷漠的美国人没太大区别，但二者的冷漠有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美国人对政府的改革漠不关心，苏联人则对政府的要求不闻不问。意识形态积极分子在苏联是局内人，在美国则是局外人——后者不是为了支持而是为了反对体制而战。当苏联人抛弃冷漠态度，就会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不再冷漠的美国人则会被动员起来反对政府。最重要的是，苏共垄断了政治动员的能力。随着革命成为历史，党的积极分子代表政治系统动员民众的能力似乎在逐渐下降。而在美国，社会变革通常刺激不同的社会团体在政治上动员民众，以便改革政治系统。结果，相对不甚成熟的美国自由主义理想具备了循环往复的政治活力——它更易于使用；而更加系统的苏联马列主义则变得刻板僵化、死气沉沉。

改革及其局限

信条激情时期会出现两种主要的政治变革。改革是让政治制度与实践更加符合自由民主价值与原则的有意识尝试。重组则是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间关系模式的重大变化；它不是有意识构建的产物，而是

社会力量兴衰变迁、特定政治制度结构和构成改变的结果。改革与重组的过程紧密相关。改革是政治制度与理想之间关系的变化，重组则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

改革和重组过程的表现形式是美国所特有的。它们都不是意识形态分裂社会的特征。典型的欧洲式政治变革包括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步骤。社会经济变革的结果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继而，新兴社会力量将提出代表自身利益的新型意识形态，以表明其与其他既存社会力量间的利益矛盾。新力量一方面为建立新兴政党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认同“属于”旧力量的特定政府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动荡，新兴力量依靠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的政治机构夺取了权力（或者实现实质性权力分享）。例如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就导致了一系列后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崛起；自由主义政党的发展；支持中产阶级利益的特定政治机构权力的增长（下议院）；支持贵族利益的政党和政治机构（君主制、上议院）权力的衰落。因此，这种变革既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改变，也包括政治机构的更替和变迁。

在美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变化同样会导致具有自觉意识的新兴社会力量崛起。不同在于，美国的新社会力量并未提出新的意识形态，而是满怀激情地重申旧的政治理想和原则。它非但没有推动新政治体制的发展，反而要求按照旧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重塑现存体制。这就是“改革”一词在美国的独特含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特定的“改革”提议都服务于某些特定的团体，并且得到这些团体的热情支持。但是如果认真思考这些提议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必须使用美利坚信条的普世价值语言，故不应仅被视为特定阶层或团体排他性利益的具体化。争取“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不过是死路一条，为“平等权利”斗争却能打开新机遇的大门——不论其过程有多么缓慢坎坷。改革行动的合法性与说服力，取决于改革目标在多大程

度上能够与美利坚信条的主流价值相契合。

理念是政治武器，意识形态是政治变革的使女，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如果不能提出政治理念，不能信仰意识形态，政治变革就不会发生。但是在欧洲，导致20世纪变革的意识形态同导致19世纪变革的意识形态是极为不同的。相比之下，历次信条激情的主题、口号和关注焦点都极为相似。有关改革的争论也是相似的，上一个激情时期的社会力量为支持改革而援引的价值观，会在下一个时期被不同的社会力量再次作为武器使用。

崛起中的社会力量在试图让自身利益与美利坚信条价值保持一致的同时，还希望自身利益与既存政治体制相契合，通过巩固与这些体制的联系来推进自身利益。新兴力量当然可以试着建立新政党，或者创造新的政府机构。诸如此类的行动可能会短暂地有利于促成变革。但新兴社会力量的成功，根本上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现存政党和体制实现自身利益。为此展开的斗争通常会导致社会力量与政治体制间关系的变化，即重组——体制支持者和体制功能的变化。美国政治的制度特征鼓励使用既存体制展开行动——联邦主义、权力分立、结构松散、非集权政党，等等。由此，意识形态一元和政治制度多元在美国的结合所导致的政治变革过程，便完全不同于意识形态分裂的欧洲社会历史上通行的变革模式。

美国的政治变革通常意味着改革，即让政治体制与实践符合主流政治理念与价值。只有具备了意识形态共识这个前提，改革才具有可能性。它源自犹太—基督教的历史传统，源自救赎、复活、革新、重生等宗教思想。有人认为，改革理念本身就是“基督教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产物”，“在前基督教时期不存在真正与之相对应的理念”。早期基督教的改革理念主要指向个人，但并不局限于此。其本质在于“自由、自觉、认为人性可臻完美的理念，以及各种各样、旷日持久、反复不停的努力，以此重申、巩固那些物质精神混沌一体之时便已存于世上的价值”。⁵² 若干个世纪以来，教会内部的改革冲动多有起伏，

但终于在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再次爆发，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当时的清教徒致力于创建新的天国乐土，改革理念也随之在内涵上更加宽泛、激进。然而改革的本质思想仍然是净化和回归最初原则。改革——正如几百年后克罗利在谈论美国政治时所定义的那样——是“道德抗争与觉醒，试图巩固被破坏的法律，恢复美国政治经济体系最初的纯洁与活力”。⁵³

在信条激情的作用下，美国历史中的改革冲动多次达到顶点。例如三次重要的政党改革运动：1820—1840年的杰克逊改革，1890—1920年的进步主义改革，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革。⁵⁴然而同美国革命一样，这几次激情时期的特征不仅是政党改革，还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政治制度与实践改革。除了废除奴隶制这一明显的例外，实际上美国历史中所有的重要政治改革都发生在这三个时期。改革“通常于短暂而集中的时期内密集出现”。⁵⁵

革命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改革时期，它最为伟大，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最为成功，为后来的激情时期提供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模板。革命者们在美国散播了变革的精神。“合众国的设计师们为政治工程添加了新的信仰，它从此牢固地长存于美国文化之中。每个问题都有其解决办法一直是信仰的主旨。面对困难时，即便是行不完美之事，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明白什么是好的制度并将其建立起来，好的政策就一定会自然出现”。正是这种信仰“推动了我们历史上最有力的政治运动”，其中就包括杰克逊主义和进步主义。⁵⁶

当然，革命本身也导致了重要的政治变革，其中最彻底、最重要的便是终结了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建立起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合法性源头的合众国政府。在18世纪政治语境中，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一步，但也是有局限性的一步：美国革命并未包含阶级革命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革命改变了政府，却没有改变社会；虽然具有创新精神、影响深远，但它仅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变革而已。在变革过程

中，“革命者”们还引入了其他相关的革新：废除长子继承制、限制继承权（entail）、免役税以及其他封建主义的残留，实行政教分离，在北方各州废除奴隶制，颁布《权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实行刑法改革，取消对商业企业的某些限制。在种种措施之中，最重要、影响最全面的就是对政治理念与理想进行了热烈、雄辩、博学的阐述，这些理念和理想将继续激励、指引、服务于后几代的政治改革者。

第二次密集改革浪潮发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杰克逊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政府出现了以下变化：实现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政治参与的范围大大扩展；国会议员团趋于衰败，出现了全国性政党，并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政党会议；实行总统选举人（electors）直选，总统成为“民众领袖”；院外游说集团和游说者成为影响政府的新渠道；政务官（elected office）的高度流动性，这在众议院尤为显著；立法机构选举中的全国拉票，使参议员选举实现了部分民主化；强调官职轮换制度，在政府职位分配上采取政党分肥；在全国和地方层次上，包括法官在内，由选举产生的官职数量激增。与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取消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特许权，开放银行系统；通过普通公司法，将开办企业从特权利变为一般性权利；改革并扩大了公共基础教育；监狱、疯人院、孤儿院、感化院等“面对贫困、犯罪、少年犯罪和精神疾病问题时的优先解决方式和首要求助机构”被纷纷建立起来。罗斯曼的评论很好地总结了改革者的方法：“救济机构使其创建者一举两得。它既能够让被救济者康复，其自身的成功又为整个社会的正确行动提供了榜样。这项颇具风险的社会事业背后有一种乌托邦精神——试图改变离经叛道和依赖他人者，以此为其他人树立标杆。”⁵⁷

进步主义时期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托拉斯和政治集团。多项措施被用于遏制大企业和经济集权的危害：第一部反托拉斯法案，设立监管会，为保护消费者立法，以及出台其他旨在限制和规范商业机构行

为的法案。同样，为了限制政治集团的权力，大众控制的手段有所增强：直接初选制、提案权、复决权、罢免权、参议院直选，进一步扩大联邦与地方民选官职的范围，等等。除此之外，改革还引入了公务员系统、科学化管理和企业式方法，通过提高政府考量中的非政治、技术化和绩效成分，限制政治集团的权力集中。在社会改革方面，救济系统再次得到重视。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指出：“贫穷、肮脏和疾病并非19世纪的新鲜事物。”新鲜的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人们越来越相信，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并非源自受难者自身的错误或不可避免之命运，这些痛苦一定能够被减轻”。于是大量新机构——“公民委员会、慈善协会、教会联盟、改革社团”——纷纷涌现出来，其中最独特、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社会服务社（social settlement）。在教育领域，进步运动是“宏伟的人道主义努力的一部分，旨在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令人困惑的新型城市——工业文明中实现美国式生活承诺——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想”。⁵⁸ 进步主义时期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教育领域所做的事情，与杰克逊时期的贺拉斯·曼（Horace Mann）所做的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社会的主要制度再次迎来了各式各样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目标与三次激情时期的十分相似，只不过在目标实现的程度上略逊于前。

改革措施的引入并不等于一定会出现其支持者所中意的结果。洛伊（Theodore Lowi）在对纽约市的经验进行观察时发现：“政党领袖利用新制度实现旧目的太容易了，这一直是改革者的灾难。”⁵⁹ 这种情况的确经常出现。改革者创造的制度和程序很少被废除，其存在得以延续，目的和功能却变了。几乎无一例外，改革者的成就随时间而“扭曲”“蜕变”“腐败”，转而服务于和最初完全不同的目的。这类过程似乎普遍且难以避免。

改革活动可能反过来阻挠改革者目的实现的案例之一就是初选直选制度。在进步主义时期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选制度都是备受欢迎

迎的政党制度改革内容。进步主义时期设立的初选制是为了使提名权不受政党大佬们控制。然而大佬们在投票率较低的初选中动员底层阶级和移民背景支持者的能力比任何人都强，由此使初选成了维持自身权力的工具，用于对抗试图取代自己的中产阶级改革分子。20世纪60年代，初选改革再次获得民众支持，目的是削弱瓦斯普的权力，扩大政治体系中下层阶层和少数族裔的参与。然而这次改革同以前一样收效甚微：在初选中投票的人“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更加关注政治……更愿意对当下社会议题与名人指点一番”⁶⁰。初选制的引入没能在20世纪的前十年加强中产阶级权力，也没能在70年代提高低层阶级的权力。在两个不同的时期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而引入了相同的改革，但是哪一个都没能成功。

如何解释这些看似违反常理的结果？答案与决定投票率的因素有关。很少有人会在初选中投票。投票率取决于组织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在进步运动时期，强有力的政党机器将低收入选民动员起来，挫败了中产阶级改革分子的企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党机器不复存在，使得初选参与情况更能体现社会经济地位，原本被设计用于加强下层阶级政治影响的改革却使中产阶级受益。在上述情况中，改革未能对政治组织和社会阶级的基本现实产生影响，因而是失败的。“从过去到未来，政党改革的最终结果总是让支持者深感失望，令反对者获益颇多，使评论者大跌眼镜。”⁶¹

诸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70年代的竞选财政立法改革本来是要限制金钱对选举的影响，可最后的受益者却是富豪参选人和谋求连任者。用来对付官僚机构的“日落法案”（sunset laws）却赋予机构新的职能，使其有动机寻找强大的支持者。旨在开放政府程序的“阳光法案”（sunshine laws），反而迫使真实的决策过程退回到非正式、没有记录的小圈子密谈与会议。在经济领域，原来被设计用于保护消费者与公众权益的监管机构，却被应由自己管理的企业所俘获。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著名的建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当时

铁路公司的总裁请求他帮助废除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奥尔尼说：“单从铁路公司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废除委员会也非明智之举。委员会对铁路公司是有用的，或者说它可以被变成有用的。它的存在满足了要求政府监管铁路的呼声，同时这种监管又完全有名无实。更何况，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容易用商业和铁路的观点去看问题。这样它就成了铁路公司与民众之间的屏障，能够保护铁路利益免遭仓促鲁莽立法的伤害。聪明的做法不是废除而是利用委员会。”⁶² 社会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用于“改造”贫困者、病人和罪犯的救济院很快被变成了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救济系统因变革的承诺而被建立，使其存续的却是拘留看管的功能。……那些带来最宏伟目标的承诺，反而经常使最糟糕的事情合法化。人们还越来越担心改革流于表面；出于良好动机的计划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⁶³ 前一代人的改革经常在下一代人中间导致特权利益。

这些现象有着清楚的原因。改革者和改革运动政治势头来自强烈的道德热情，但它无法长久持续。改革只是试图弥合政治理想与现实间鸿沟的一种方式而已，过一段时间就会自我耗尽，被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的某种混合模式所取代。洛伊对纽约市改革的分析描述了这一过程的一般模式。“改革的出现意味着人们暂时性地抵制政治系统，并试图在既存秩序中为创新变革建立渠道”。为了拒斥政治系统，改革者“采取了直接参与的形式”。然而，“纽约改革运动中最突出的特征却是其短寿”。改革没能持久，它呈现出循环往复的模式。“每一次改革都以声势浩大、生机勃勃、不可抗拒的面目出现”。但是每一次，运动的内容都过于分散，势头被早早耗尽，而改革体系自身从来没能制度化。⁶⁴ 改革运动的本质是弥合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尝试，上述的循环往复就是这一本质的直接产物。

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变革时期，特别是社会经济创新时期，都伴随着政治系统的集权趋势。美国也是如此。然而在信条激情时期，政治

体系开放、政治参与扩大、权力分散和权力民享成了政治的流行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激情时期强调的不仅是社会经济变革，还有政治变革。

美国政治系统的相对开放性和可渗透性使改革成为可能。此前处于“局外人”地位的政治团体可以被动员、组织起来去参与甚至开创系统内部的革新。改革的目标通常包括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可渗透性和“回应性”。然而从长期来看，恰恰是这些目标的成功实现挫败了改革自身。那些有助于改革并且因改革而增强的政治系统特征，反而使改革的胜利成了暂时的。改革导致的变化是社会团体暂时性动员与联合的产物，改革者创建的制度代表了不同政治利益和目标的集合。当这些利益与目标显著消退时，诞生于改革中的制度就需要对政治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政治系统对于改革采取开放态度，并因为改革而变得更加开放，但是对于反改革的潮流也同样开放。

此外，改革过程本身也蕴含着矛盾。最容易实行的改革一般也是呼声最高的改革，其对象往往是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中对大多数人有利的部分。这样的改革被明确视为有利于“公共利益”。因此，激情时期的公众情绪能够被迅速调动起来实现这些改革。然而，因为缺少组织良好的支持者来维持和保护改革，所以无法确保改革成果被用于实现最初的目标而不是相反。所有人都受益于改革，但没人去捍卫它，因此特殊利益团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扭曲改革成果，使之服务于己。另一方面，这些改革虽然以美利坚信条之名而获得合法性，却首先服务于特定的利益团体，使其更加难以实现最初的目的。改革在不同团体间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权力平衡。与此同时，由于支持者被源源不断地组织起来，此类改革将在长期未来中推动最初目标的实现。而在短期内，服务大众利益的改革最容易实行，也最容易被腐蚀，蜕变为特殊利益的工具。

哈慈精彩地描述了伯克式保守主义（Burkean conservative）在美国的失败。由于缺少封建主义传统、君主制、贵族制、国教教会以

及明确的身份地位差别，美国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只能是自由主义制度。另一方面，进步主义改革分子的失败也能在自由主义共识中找到相似的原因，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保守主义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以自由主义理想为范本；进步主义改革的失败，是因为无论如何努力，美国制度总是无法达到自由主义理想的标准。信条激情时期就是进步主义改革的时期。然而，不公与集权弊病被前一时期的改革消灭后，总能改头换面，在下一时期卷土重来。英王对殖民地的暴政被消灭了，继之而起的是美国银行的商业垄断；银行寡头被打倒后，蓄奴的贵族制又开始膨胀；内战打垮了南方的种植园主势力，却迎来了拥有更多财富与权力的工业财阀。扩张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驯服了商业权力，其自身又成了对自由、平等和民治政府的新威胁。辛克莱尔和斯蒂芬斯等前一代人做过的事情，纳德、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不得不再做一遍。正如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说的那样，对改革者而言，最好的情况也不过就是“既令人欢欣鼓舞，又令人垂头丧气”。⁶⁵ 经过两百年来的四个狂热变革时期，进步主义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变革频繁却进步缓慢的历史。改革总是难以持久，特权总能死灰复燃，民主理想在1976年的实现程度只比1776年高了那么一点点。

政治地震与政治重组

改革冲动是信条激情时期的特点，不同的社会力量都会祭起传统政治理想的大旗，试图让政治制度符合政治理想，以此实现自身利益。然而，某些制度改革可能引起始料未及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激情时期范围最广、持续最久的影响并非进步主义改革，而是与改革相伴相生的政治重组。重组就是主要社会力量与主要政治制度间基本关系的重构。它主要涉及权力、功能、政治制度支持者的变化，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政党的变化。

这一意义上的政治重组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它不仅是政党重组或者沃尔特·迪恩·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所谓的“关键性重组”——“绝大部分美国少数派选民行为导致的重大变化，这将持久地改变选举联盟、选举结果和政策走向”。⁶⁶ 在美国历史中，政党重组和关键性重组的发生是相当规律的，一般在每28年或36年一次的“关键选举”时出现：1800年、1828年、1860年、1896年、1932年。这些选举标志着政党力量以及特定政党与社会力量间联系的重大、长期变化。某些情况下，新生社会力量会成为政治重组的焦点：1800年，代表自耕农利益的民主共和党战胜了代表商业利益的联邦党，1860年工业化的北方打败种植园的南方，1932年城市工薪阶层取代了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集团。上述选举事件标志着不同社会团体及其代表政党间的重大权力转移，但不涉及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之间总体关系的深刻变化——像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主义时期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变化。1828年和1896年的政治重组不仅包括政党与社会力量关系的改变，还包括政治制度在结构、权力和功能方面的改变。在这些案例中，党派重组不过是更广泛的政治重组的部分内容而已。

在这一更加宽广的背景下审视党派重组，有助于解释令20世纪60年代政治分析家倍感困惑的一些事情。如果真的每28年到36年就会发生一次政党重组，那么1960年到1968年间也应该出现一次才对。人们熟知的重组所需前提条件和相关因素在当时都已经出现：政治参与有所增长，出现了超越新政时期党派分歧的新闻话题（民权、越战），第三党运动，不同人口团体（特别是青年人）与党派间联系日趋松动，等等。然而有意义的政党重组并未发生，就像伯恩汉姆说的，这成了政治分析家版的“等待戈多”。⁶⁷ 此前一个半世纪作用于美国政治的规律这一次似乎失灵了。该如何对此作出解释呢？

可能的解释认为，60年代应当出现的不是简单的党派重组，而是更加复杂的政治重组，而后者确实发生了。将这次政治重组同进步主

义和杰克逊时期区分开来的标志，是60年代政治系统中政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结果，角色、权力和支持者方面发生的变化并未给政党造成显著影响。60年代的政治重组之所以不包括重大党派重组，是因为当时政党的力量太过虚弱，正如革命时期的政治重组之所以不包括党派重组，是因为那时还不存在现代组织意义上的政党。换言之，60年代分析家们深感受挫的原因在于他们等待了错误的“戈多”。

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间联系的两个原则导致了信条激情时期政治重组的发生。这些原则反映在18世纪国父们创立的政府框架中，此后几个世纪中政府框架的演进又巩固了这些原则。这两个原则就是支持者多元性和可变性。18世纪对平衡政府（balanced government）目标的关注通常表现为混合政府（mixed government）的概念，即政府的每个部分都应该代表或体现特定社会等级的利益，就像在英国那样——国王代表王室利益，上议院代表贵族利益，下议院则代表绅士、市民和其他有资格参加议会选举的有产者。混合政府理论认为，在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间存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且排他的关系。政治机构的数量和特征体现了社会力量的数量和特征，不同类型社会等级间的平衡则体现为不同政治机构间的平衡。

倘若果真如此，美国政治制度多样性的理由又何在？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在讨论制宪会议中的参议院时曾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英国社会存在三个不同的等级，其政府也存在三套不同的制度。而美国则“只有一个能够在英国找到其对应存在的等级，那就是众议院代表的等级”。“美国人肯定不会尝试建立有三个分支的政府，因为没什么人需要另外两个分支去代表。必须让我们的政府适应它所统治的人民”。⁶⁸ 对于由“单一等级”构成却拥有众多不同利益的社会，一一对应的代表理论所建立的，要么是单一的大共和国，要么是代表不同派别的大量小共和国，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曾指出这点。

然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并没有将政府结构置于代表制的基础上。

除了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和约翰·亚当斯（他没有参加制宪会议）等少数例外，他们并不主张混合政府理论。无论是制宪会议辩论，还是《联邦党人文集》或者其他地方，制宪者都很少明确关注社会力量与正在被创造的政治制度间的关系。他们偶尔提到参议院，认为它将更多地代表小州的利益，成为两院制立法机构中更为保守、谨慎的一支。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由民众直选的众议院更容易受大众激情裹挟。虽然制宪者有时也会提到当时美国社会中的不同利益和团体，但从未建立系统性理论去阐述那些团体将以何种方式在政府机构中被代表。他们大谈不同政府机构的权力分配，但很少提及这些机构对应的支持者。制宪者强调的是“政府的内部结构”，而不是它同社会的外部关系。这种内部结构设计是为了“其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相互间关系保证彼此各司其职”。⁶⁹

在欧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政府机构和政党通常紧密地、排他地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衰退时，就会带着“自己的”政治制度一同退出舞台。在西欧国家，政治机构一般同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美国则有一项政治创新，现代历史上仅有列宁主义政党的创建可与之媲美，那就是制宪者们建立了一套既对社会负责，又独立于社会的、自治的政府体系。各政府机构并不必然地同特定社会力量建立排他性联系，也不必然地同任何社会力量的联合建立永久性联系。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中存在着多元主义和可变性因素，二者在确保政府稳定的同时，还为社会力量提供通向政府的渠道。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支持者的改变，也能体现新兴及衰落的社会力量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的变化。反之，社会力量也面对着通向政府的多个潜在渠道，即便无法通过某个政府机构有效促进自身利益，他们也总是能同其他机构建立起联系。

在美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正式机构和主要政党的支持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团体——农业、商业、工业、劳工集团，宗教、地区和族裔团体，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曾经

介入美国政治的重大争论，如各州权利与联邦权力、国会与总统、司法权力、共和党对民主党，等等。这些团体都曾在争论中变换阵营。政府机构全然不需受到某种特定观点的持续约束，也从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彻底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某个利益团体为了“自己的”政治机构而推行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和理念，日后通常会被其他的利益团体（经常是其竞争对手）所采纳。总统领导权、司法审查、各州权利也许在某个时期是保守派的观点，在下一个时期则会得到自由派的支持。

这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间的关系，给公共问题的争论造成了两方面后果。第一，不同社会力量间的争吵从最初围绕各自支持的政体形式，变成围绕现有政体内部政治机构的各自角色。由此，社会力量间的正面冲突经过制度化渠道的过滤，部分地转变为机构之间的斗争。第二，这场争论的参与者都有必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有所保留，因为他们今日为之奔走呼号的信念，可能明天就成了自己的斗争对象。在几十年来有关总统/国会权力、国家权威/各州权利、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的争论中，有多少美国公共生活的积极分子能够一直支持其中一方而不改换阵营呢？

美国政府的特征之一是制度的高度连续性。1976年的第94届国会和第38任总统之间的关系，似乎同它们的前辈没有太大区别。就这一意义而言，国父们的政治设计非常好：分权制衡使政府的不同分支与层级间的权力划分得以持续。他们所珍视的权力制衡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得以保留，却要归功于开国之初在政治系统中相对被忽视的那部分内容——政治制度与社会力量间的关系。政治制度有能力适应社会力量在利益与影响力方面的变化，使备受重视的权力制衡得以长存。在美国历史中，除了建国早期尚不成熟的联邦党外，没有哪个主要政府机构和政党遭遇了像英国王权、上议院和自由党那样的衰落命运。机构连续性是机构适应性的产物。团体利益不会与任何特定政治机构的利益形成永久的、排他性的联系。二者的关系可能在当时显得

密切而重要，却不过是一场权宜婚姻，是现有政治环境的产物，缺少深刻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根基。共同利益消失之时，双方必定会分道扬镳，另觅伴侣。

制宪者对于政府内部权力制衡的关注，使其远离了混合政府与决策分离的思想，转而拥抱分权制衡理念。混合政府概念认为，在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一对应关系。实际上，该理念的预设不是政府机构自治，而是政府机构被社会力量所俘获。缺少自治意味着政府机构的权力由其所依附的社会力量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作为18世纪英国社会力量的王权、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大致的平衡，这在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间的关系中得以体现。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实际上是社会内部权力平衡的暂时结果。而民主的出现颠覆了社会平衡，在19世纪王室与贵族的衰落过程中，国王和上议院也变成了荣誉性存在，而下议院则获得了至高地位。国王和上议院都无法有效适应社会的变迁。

决策分离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相似的结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属不同政治机构，导致立法部门拥有至高地位，因为立法权力显然高于执行法律和解释法律的权力。如果所有立法权都集中在单一机构手中，那么该机构就会获得明显高于行政与司法部门的地位。为了缓和这一趋势，杰斐逊要求将立法部门分为两个能够相互制衡的机构。这是从纯粹的决策分离向分权制衡迈出的第一步，行政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也能因此分享立法权力。

立宪者的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分权制衡，它是三种平衡政府理论中唯一能够确保政府内部权力平衡的理论。这是通过允许不同政府部门彼此分享权力来实现的。就间接意义而言，政府内部平衡是允许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建立灵活关系的结果。一方面，政府机构不会与任何单一社会力量建立固定、排他的联系（在混合政府理论的假设下则是相反的情况）。另一方面，没有哪个政府机构能够垄断立法权，从而得以控制其他政府机构（在决策分离理论中则是相反的情

况)。分权制衡系统在政府机构间引入竞争，并允许这些机构与社会力量建立可变的关系。

政治制度与社会力量间的联系一直在变化。这并不局限于信条激情时期。政党与社会力量间关系的重组可能在信条激情时期出现，从而成为更普遍意义上政治系统重构的一部分，但是同样可能在激情时期的间隔期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机构的支持者可能以非常规方式发生变化，正如最高法院的“掌门人”从休斯到沃伦的变化。不过，社会力量与政治机构间的支持性联系在激情时期出现的变化通常更多、更快、更具意义。集中发生的关系变化将导致政治系统的重构。革命时期的政治系统与此前大不相同；杰克逊时期的系统则体现了政治机构在权力、功能与支持性联系方面的基础性变化；政治科学家通常把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系统重构称为“1896年体系”，它代表的政治与机构的新型关系模式一直持续到60年代“新美国政治体系”再次出现。

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政治体系相比，美国政治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允许其主要的制度成分进行周期性重构。重构显然与社会力量（阶级、利益集团、地区）的角色变化有关。机构的外在得以保留，因此变化的事实在表面上显得模糊，政治机构独立自主、相互竞争的基本原则却没有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机构在权力、功能、相互关系和支持者等方面已经出现重大变化。政治系统和社会之间的新平衡就这样建立起来。压力和张力沿社会力量板块与政治机构板块之间的断层线蔓延开来，直到引发政治地震，将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然后形成两个板块之间的新均衡。伯恩汉姆认为，这种周期性重组是“美国的革命替代品”。⁷⁰

总而言之，信条激情意味着许多美国人努力回归最初的原则，其特点包括独特的政治分裂模式、巨大的改革努力、政治机构与社会力量的重大重组。如果没有“正常”模式下道德热情的消失，美国的政治系统将无法延续。如果没有激情时期道德热情的喷发，美国的政治系

统就无法实现变革，也无法避免僵化腐朽。有些时候，政治系统需要依靠道德动力来缩小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以便实现长期稳定。就此而言，信条激情时期可谓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美好也最危险的时期。

1. Benjamin Rush, address delivered July 4, 1787, in Philadelphia, in Richard B. Morri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p. 84-85.

2.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1.

3. Irving Kristol,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Successfu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3), p. 12.

4. Gordon S. Woo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J. R. Howe, Jr., ed.,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0), p. 116.

5. Gordon S. Wood, "Republicanism as a Revolutionary Ideology," in Howe, *The Role of Ideology*, p. 83.

6.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3), p. 49.

7.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Knopf, 1956), pp. 308-312.

8. Ibid., pp. 315-318.

9. R. R. 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1 :21. Bernard Bailyn,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 (January 1962): 348.

10. Ralph Waldo Emerson, "Man the Reformer " and "New England Reformers," in Emerson, *Prose Works* (Boston: Fields, Osgood & Co., 1870), 1: 126, 551.

11. Wood, "Rhetoric and Reality," p. 117. Daniel Webster, quoted in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Knopf, 1951), p. 65; Theodore Roosevelt, quoted in Eric Goldman,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New York: Knopf, 1952), p. 187, from Henry F. Pringle,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1), p. 413.

12. Bailyn, "Political Experience," p. 343. John Adams, letter to H. Niles, February 13, 1818, in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New York: AMS Press, 1971), 10:283. Emerson, quoted in Charles A. Madison, *Critics and Crusaders*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48), p. 16.

13.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xv.

14. Bernard Bailyn, "The Central Themes of the Revolution," in Stephen G. Kurtz and James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and New York: W.W. Norton, 1973),p. 17.

15.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6, 158. George E. Mowry, *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1900-191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pp. 100-101, quoted in David Mark Chalmers, 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the Muckrakers* (New York: Arno Press, 1964), p. 112. Hofstadter, *Age of Reform*, p. 15-16. Theodore Roosevelt, quoted in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 226.

16.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pp. 50-51. See also Clinton Rossit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3), pp. 42-51.

17. Walter Dean Burnham, "Revitalization and Decay: Looking toward the Third Century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38 (August 1976): 146-172. On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generally, see Anthony F. C. Wallac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p. 178-199.

18. Bailyn, "Central Themes of the Revolution," pp. 26-27, and *Ideological Origins*, p. 56. See also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p. 18-28.

19. Meyers, *Jacksonian Persuasion*, pp. 16-17. John G. Cawelti, *Apostles of the Self-Made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44-45.

20. Chalmers, *Muckrakers*, p. 106.

21. Wood, "Rhetoric and Reality," p. 117.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 41. Hofstadter, *Age of Reform*, pp. 70-81. See generally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22. Meyers, *Jacksonian Persuasion* , pp. 18-19.

23.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 p. 49.

24. Arthur M. Schlesinger,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 202.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2:114.

26. James Russell Lowell, "Thoreau,"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Russell Lowel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0), 1 :362.

27. Calvin Colton, *Protestant Jesuitis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836), pp. 52-53.

28.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American as Refor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52. Howard Zinn, "Abolitionists, Freedom-Riders, and the Tactics of Agitation," in Martin Duberman, ed., *The Anti-Slavery Vanguar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417-451. James Q. 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pp. 322-323.

29. 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 p. 201.

30. Palmer, *Democratic Revolution* , 1 :243.

31. Rossiter,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p. 10.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 pp. 1-3, 8.

32. Sidney H. Aronson, *Status and Kinship in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0-21.

33.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2: 119-122.

34. Morton Keller,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66.

35. Chalmers, *Muckrakers* , pp. 10-12. Hofstadter, *Age of Reform*, p . 187.

36.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 USS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4), p. 32.

37. Bailyn, "Central Themes," pp. 13-14.

38.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 p. 31.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 p. 66.

39. Bayless Manning, "The Purity Potlatch: Conflict of Interests and Moral Escalation," in Arnold J. Heidenheimer, ed., *Political Corruption: Reading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0),pp. 311-313.

40. Ralph Waldo Emerson, "New England Reformers," in Emerson, *Prose Works* , 1 :554. Hubert H. Humphrey, statement in 1975.

41. Theodore Roosevelt, "The Man with the Muck-Rake," *Putnam's Monthly* 1 (October 1906): 42-47.

42. Martin Shefter, "Party,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ouis Maisel and Joseph Cooper, eds. , *Political Parties: Development and Deca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8), pp. 230ff.

43. James L. Sundquist, *Politics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8), p. 500.

44. Madison, *Critics and Crusaders* , p. 14. Garrison quoted in Schlesinger, *American as Reformer* , p. 109. Ladd quoted in Rush Welter,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34.

45. Schlesinger, *American as Reformer* , pp. 32-33.

46. James Russell Lowell, *The Writings of James Russell Lowell* , 1 :362- 363. For an excellent brief summary of Jacksonian reform movements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 see Walter Hugins, *The Reform Impulse 1825-185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2), pp. 1-22.

47. Emerson, "New England Reformers," p. 549.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 p. 141.

48. Alan P. Grimes, *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en's Suffr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pp. 4-5, 100.

49. Hartz, *Liberal Tradition* , pp. 156-157.

50. Lipset and Raab, *Politics of Unreason* , pp. 20-24. Erwin C. Hargrove, "On Canadia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33 (February 1967) : 107-108.

51. Stanley Elkins,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p. 27.

52. Gerhart B. Ladner, *The Idea of Reform: Its Impact on Christian Thought and Action in the Age of the Fath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p. 2, 9, 35.

53. Ibid., pp. 33-34.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pp. 11-12.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Macmillan, 1909) , p. 144.

54. Austin Ranney, *Curing the Mischiefs of Faction: Party Reform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ch. 1.

55. William J. Crotty,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7) , p. 267.

56. Austin Ranney, " 'The Divine Science': Political Engineering i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 (March 1976) : 147.

57. David J. Rothman, *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 pp. xiii-xiv, xix.

58. Lawrence Crem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New York: Knopf, 1961) , pp. viii, 58-59. See generally David J. Rothman, *Conscience and Convenience: The Asylum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rogressive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

59. Theodore J. Lowi, *At the Pleasure of the Mayor*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4) ,p . 201.

60. Ranney, *Curing the Mischiefs of Faction* , p. 128.

61. Ibid., p. 191.

62. Richard Olney, letter to Charles E. Perkins, December 28, 1892, quoted in Matthew Josephson, *The Politico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8) , p. 526. On how accurate Olney's predictions turned out to be,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Marasmus' of the ICC: The Commission, the Railroad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Yale Law Journal* 61 (April 1952) : 467- 509, and, more generally, Huntington, "Clientelism: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Politics "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1) .

63. Rothman,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 pp. 240, 295.

64. Lowi, *Pleasure of the Mayor* , pp. 184-186. See also Crotty, *Political Reform* , pp. 267ff.

65.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Dover, 1959) , p. 408.

66. Walter Dean Burnham,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1970s: Beyond Party? " in William Nisbet Chambers and Burnham, eds.,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16-317.

67. Walter Dean Burnham, "Revitalization and Decay: Looking toward the Third Century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38 (August 1976) : 147.

68. Charles Pinckney, in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1 : 402ff.

69. James Madison, in 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and Madison, *The Federalist* , no. 51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 p. 336.

70. Burnham, "Revitalization and Decay," p. 149.

第六章 信条激情的源头

信条激情缘何出现？

应当从两个层面考察信条激情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在最一般的层面上，美国政治呈现出持续、均衡的总体模式，伴以间或爆发的激情、道德主义、激烈冲突、改革及政治重组，其原因何在？为什么利益团体政治有时会被信条政治取代？原因在于美国自由主义共识的性质和程度。这种模式与众不同，但并非美国政治所独有。在其他具有意识形态共识的国家中也存在类似的政治模式，美国模式与它们相比的异同之处仍然有待探究。

而在最特殊的层面上，为什么信条激情会以特定的表现形式，在美国历史的特定时刻出现？信条激情的每次爆发都有其特别原因吗？或者说，是否存在某种反复出现的因素，可以被视为信条激情时期的共性？

最后，要探寻信条激情的一般和特殊根源，就必须追溯至其历史源头，分析一般模式及其特殊表现形式的最初原因，而17世纪的英国历史包括了所有这些内容。

一般根源：其他社会中的类似现象

美国政治变革的独特之处包括：（1）周期性，伴随着大约每60年一次的信条激情密集出现；（2）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是重申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价值和信念，使其重获生机；（3）激情时期改革的最高目标，是让美国政治的制度与实践符合自由主义价值的要求。这种形式的变革只会发生在自由民主价值共识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而不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多元主义传统的社会（如西欧国家）。

在非自由主义的单一意识形态社会中，当人们试图缩小当前政治现实与意识形态基本价值之间的差距时，就可能出现和信条激情时期类似的现象。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加强政府权威，使其更加符合专制或极权的意识形态。然而在重大革命缔造的政治系统中，人们有时会试图复兴、重申革命的价值，其中通常包括社会净化、清教主义、群众参与、平等主义，还有对革命原则的忠诚与奉献。在苏联，自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变遭到镇压，官僚集权和党的统治这两个目标就成为了革命的价值所在。在红色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其前25年的统治中尝试定期赋予革命价值新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虽然本质不同，但60年代的信条激情与同时期发生的中国“文革”仍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实际上，本书第五章中给出的信条激情的十四个特征，几乎都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文革”的目标“不是要替代现存权威，而是要净化它”，“文革”的意识形态“与复辟运动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反叛”¹。这种变革模式和儒家思想有着诸多联系。在儒家的思想原则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导致了以政治系统根本价值为名的周期性改革运动。

儒家意识形态具备潜力，既能净化政治系统，也能为其辩

护。儒家思想艰难地同帝国及其官僚体制共存。孔子高尚的道德标准甚至连他自己所处时代的诸侯都无法教化，对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也没有多大作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和政治系统的有效性，源自前者以自身为镜像对后者进行批评的能力。中国历史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某种清教原教旨主义——借助正统思想反对现存制度与实践。和那些信奉儒家思想的前人一样，毛泽东时代的原教旨主义也把有意精简过马列经典作为其理论基础。²

无论是描述美国的信条激情还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清教原教旨主义”这个词都十分恰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也想回归原初的理论，以此推进、净化当前的实践，用重申“传统”（毛泽东主义和革命）的办法来改正错误。就功能而言，共产主义中国的“净化”等于自由主义美国的“改革”。单一意识形态社会无法用改变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实现变革，但是复兴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始价值观可以达到同样目的。在儒家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主义美国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而20世纪初的中国曾经短暂地盛行意识形态多元主义，当时复古思想、共和主义、地区独立和革命运动彼此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复兴实现改革的。

人类学家利用“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这两个概念分析不同的社会。羞耻是一种外部惩罚机制，它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而西方社会更加依赖“作为内部惩罚的罪恶感，或曰‘良心’”。³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罪恶感在传统和现代中国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的权威观点还是强调羞耻感对于塑造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大意义。⁴ 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和美国社会的确是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典型案例。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方式恰恰造就了两个相似的社会。许多社会无论耻感还是罪感意识都很弱，但美国和中国社会则至少受到其中一种意识的强力约束。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公开明确、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时，羞耻和罪恶才能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而美国和中国都符合这一标准。更重要的是，虽然两国社会

选择的控制手段不同，但是对控制手段的依赖程度相同。这一共同特征导致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美国的信条激情。

有学者指出，“从1962至1966年，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同中共政治实践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文革’”。其他社会科学家则直接使用认知失调理论分析“文革”。⁵ 在美国，通常是那些寻求保持、扩大对政府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和利益团体最先发现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存在，并指出这是不道德的、不可忍受的。而在中国，中央的领导才是一切运动的源头，对“传统”价值的再确认、对现存制度的抨击首先来自政治体系的顶层而非底层。正如一位曾经的红卫兵所说，毛泽东“改变自己的看法”，开始谴责那些“墨守成规”的官员。和美国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文革”期间抗议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成员，此前大多同既存体制没什么瓜葛⁶。60年代的信条激情和“文革”都涉及政治参与规模的扩大和参与形式的改变。“文革”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服务于中央领导人目的的运动（至少在其最初阶段是这样），所以这场运动有着明确的起始时间（1965年11月姚文元攻击吴晗），在将近三年后（1968年9月）被正式宣布结束。而美国的信条激情则没有明确的起止时间。

美国的信条激情政治补充甚至替代了正常的利益集团政治。中国也是如此。“文革”政治不同于寻常的政治模式，它不单单是个人和集团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保罗·海内克（Paul Hiniker）问道：“如果仅仅将‘文革’看成是权力斗争，那又如何解释它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狂热呢？”罗德明（Lowell Dittmer）也认为，与其说“文革”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权力斗争，倒不如说它是权力斗争伪装下的革命。对刘少奇的批斗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它实际上是在教育群众，制造革命形势。⁷ 揭老底是“文革”期间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重要的是“低头认罪”的意愿，以及“红卫兵揭露反动分子时的狂热”。大规模的批斗运动既起到整顿社会的作用，同时也是动员大众的手段。⁸ 群众串联的手段和频度大大增加。和60年代的美国一样，“文革”不仅伴随着激烈的语言攻

击和口号批判，还出现了暴力活动。“精英和大众在语言和行为方面都表现得极为粗鄙，这是‘文革’的突出特征之一”。⁹

“文革”中的另一些行为，会让经历过60年代信条激情的美国人感到熟悉。在“文革”的高潮时刻，北京两所主要高校的学生“积极主动地批判、打倒学校的教员、干部和党委”。北京大学的学生宣布：“校长和其他两个头头，在教育界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歧视、反对无产阶级学生，还宣扬所谓教育和学术中立。”此后不久，学生运动就发展成红卫兵运动。“动员起来的红卫兵向权力中心发起了猛烈进攻，他们歇斯底里地号召广大群众采取行动，打倒、粉碎现存体制”。¹⁰“文革”领导者的目标是“粉碎修正主义，永葆革命青春，团结广大群众，重新夺取权力”。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和特殊化。官僚作风和官僚权威遭到“民粹主义、反官僚主义和造反主义”的攻击。当时的革命口号有“精兵简政”“造反有理”“打倒当权派”，它们同60年代美国抗议运动的战斗口号不谋而合。¹¹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说：“贬损、破坏党的地位是整个‘文革’的动力所在。”共产党专政不再等于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文革”结束后，重建共产党耗费了相当的精力。

“文革”揭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特别是对那些参与其中的青年而言。¹²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中共那样的权力和地位，不过美国总统显然更接近这样的角色。从许多方面来看，60年代民主浪潮的“全部动力”就是“贬损、破坏”总统的权威。60年代信条激情对总统造成的冲击和“文革”给中共造成的破坏一样严重。

“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信条激情都强烈地否定诸如专业化、特权化和效率等涉及经济发展和官僚统治的规范。正如史华慈所总结的，毛泽东的思想强调社会和道德相对于经济与技术的优先性，强调

卢梭胜过圣—西蒙。毛泽东在“文革”中表示，他“决心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实现德治，不接受任何非道德基础的‘艺术与科学’进步”。¹³

“文革”中的制度变革，或曰“改革”，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美国信条激情时期的改革。“文革”“减少了中央部委的数量，精简了党中央机构；把地方党政功能合并到革委会框架下；解散、冻结、裁减了部分政治基层组织（传播媒体、旧的群众组织、民主党派）；从整体上削减了官僚规模以限制特权化趋势”。¹⁴ 有人认为，“文革”期间推行的诸多特定改革，如“开门整风，改造教育系统，建立五七干校，革委会中增加基层代表”等，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正试图“让政治系统更好地回应人民的需求，对人民负责”。但是中国人的改革和美国人一样，也难逃讽刺意味的结局。尤其是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¹⁵

研究共产党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几乎都会用“动员”和“巩固”之间的周期性摆动来描述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如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言：“中国人要么在搞政治动员，要么在搞社会巩固。前者强调的是社会变革、大步前进和阶级斗争，后者则注重完善制度、制订计划、和谐协商。”另一位学者发现：“（动员阶段）一般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依赖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巩固阶段则更依赖政府部门、官僚程序和物质激励。”¹⁶ 两个阶段持续的时间通常都很短暂，彼此间的转换也很迅速。一般认为，属于动员阶段的包括社会主义巩固时期（1955—1956）、大跃进时期（1958—1959）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5—1968）。¹⁷ “文革”结束后的情况很像60年代之后的美国——重新强调教育、专业化和经济发展，重建混乱时期中遭到破坏的制度和机构。

中国常常在两种状态之间快速转换，美国的信条激情则有着很长的间隔期。两国在这方面的显著差异是因为权力来源和目标设定者不同。中国的快速转换是由于政治系统顶层的控制，最高领导人有权设定、改变政治的目标——动员、解除动员、再次动员。而在美国，激

情时期的循环往复取决于社会结构、代际更替、社会团体的兴衰及其观念的逐渐变化。

因此，同样的因素，既能导致中共执政初期在两种状态间的频繁转换，也可能反过来降低这种转换的频率。领导人的态度和利益决定了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由领导人说了算。毛泽东强调，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进行一次革命理想和目标的复兴，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每10到15年——也就是每一代人——就应该来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重新点燃革命热情的烈火”。¹⁸ 毛泽东一直质疑官僚机构，拒绝将革命的利益简单地和党的利益画等号。在美国，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仍然充满活力，政治生活中仍然有人不断地致力于实现自由理想，因为任何社会力量都可以为自身利益而对其加以阐述和利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着解释革命价值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人可能会发现这套价值观给自身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少。革命制造了缓和，巩固压倒了动员，党、国家和军队主导了政治。

从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间的定期摆动，到工具理性的价值与方法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这一转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政治系统内部的模糊与紧张。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必须对现代化进程保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现代化被视为社会的积极目标，因为它意味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意味着民族振兴。而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导致了官僚主义、工具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原则的衰朽”。出于各种原因，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优先考虑了“专业主义的目标，寻求建立理性的、高度分化的官僚组织，并在操作层面给予‘专业’官僚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尤其是在工业、行政管理和军事领域”。¹⁹ 相比之下，中国更加强调民粹主义而非专业主义。而类似的运动在苏联可谓闻所未闻，也不可能发生。因此，“文革”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抗历史趋势的一次革命——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特权阶层，甚至是激进地反对现代化本身”。²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导致中国

高等教育全面倒退了至少十年。从根本上讲，一旦革命夺取了权力，革命价值就会阻碍社会发展。

历次重大革命结束后，革命价值与目标往往会逐渐褪色。至少到70年代，中国还会周期性地试图保持革命的活力。美国的政治系统历经两百年历史而仍然保持着重振意识形态的能力。丧失了重申革命价值能力，也就丧失了反抗历史的动力。

信条激情就是美国政治变革的一般形态，针对这一点有着普适的、清晰的解释。但是信条激情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的特定时刻？其中的缘由仍然不甚清晰。可以认为，每次信条激情的出现都有其独特原因。毫无疑问，在每一次激情时期的背后，都有独特的因素赋予其独特的动力与特点。然而在政治道德主义、时代议题、参与热情、改革行动及最终结果等方面，这些时期也有着诸多相同之处。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的原因，导致18世纪70年代、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头十年和20世纪60年代的激情时期产生了某些相似的结果？为何这些时期的美国政治有着相同的特点？为何剧变（政治改革与重组）会集中出现在美国历史的这几个特定时期？

本章并不试图就上述问题给出绝对的答案，但是将讨论三种令人信服的解释，用以说明特定激情时期出现的原因。这些激情时期可以被解释为：（1）集权和滥权现象的客观变化作出的理性回应；（2）（社会、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外部事件引发民众激烈的政治行动；（3）循环往复的变迁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事件会为下一个阶段的出现创造条件。上述解释都不够充分，但将它们结合起来，就一定能解释美国历史特定时刻信条激情的爆发。

广泛、高度地关注权力集中和权力滥用现象，这是信条激情时期

的核心特征。美国人面对权力时与生俱来的潜在不安全感凸显出来，设定了政治议题的内涵和政治发展的模式。因此需要对公共意识、社会情绪和思潮的变迁进行解释。

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显而易见并不必然意味着错误）认为，社会情绪和社会关注的变化，是对权力使用与分布方面的“客观”变化作出的理性反应。这意味着信条激情的目标正是导致它产生的原因。新的权力和权威结构被建立起来；掌权者最终总会滥用权力；自由理想和制度实践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为了改革制度，缩小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信条激情时期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主义特征。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英国实现了在北美殖民地权力的扩张与合理化，还试图进一步强迫殖民地分担帝国的部分开支。因此就像辉格党人说的，美国革命是对英王及其代理人篡夺、滥用权威的理性回应。与此类似，杰克逊主义者不仅批评现存政治系统中的不民主，也激烈地抨击将在未来垄断国家经济的新经济政治权力中心。第二合众国银行“是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庞然大物，甚至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这已是人尽皆知”。“经济方面，它是全国最大的企业，目前还是国内货币与信贷系统的唯一代理人，在商业领域也发挥主导作用。其产品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并间接地依赖国家信用”。第二合众国银行与国家之间的象征性关系更像是“强大的国王与其国家的关系，而非国旗与忠诚感的关系”。²¹ 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工业企业、托拉斯和垄断组织，还有城市政治集团和政治大鳄，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工复合体和“帝王总统”成了“二战”后和冷战背景下的不争事实，它们在国家行政领域拥有的权力之大史无前例。事实上，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滥用现象。

在每一段激情时期之前都出现了权力集中、背离美国信条的“客观”趋势。对这些趋势作出的回应似乎是合理的——揭露集权的丑恶，谴责滥权对美国政治价值的背叛，推动政治改革以行补救。此类“客观”情况也许是信条激情出现的必要条件，但问题在于它是否是

充分条件。那么可否认为，在权力的集中、权威的滥用与要求限制权力和权威的信条激情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因果关系？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

首先，这种观点假设，人们对滥权的愤怒程度准确地反映了权力滥用的真实情况。即便果真如此，也无法找到证据。不过倒是有一些很好的理由表明这种关系可能无法成立。在某一时间点上，被曝光的、有案可查的滥权事件是当时真正的滥权情况的最小值。而不同时期被曝光的滥用事件在数量上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认为权力滥用的真实数量也随之同向波动。但事实并不必然如此，还存在其他两种可能。曝光数量和真实数量的变化可以是相互独立的。唯一的限制在于前者永远不可能高于后者，虽然大规模的控诉和谴责可能给人们造成了正好相反的印象。另一种可能则是曝光数量与真实数量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权力滥用行为的广泛揭露说明了公众对于权力滥用的强烈担忧，这反而会减少滥用。就滥权现象而言，真正的“客观”变化也许并非激情时期到来前一段时间内的增长，而是在这期间及其之后的日趋减少。或者也可以认为，针对滥权的公共道德主义本身就表明当时滥权的真实程度比较低。公共不道德行为的低水平也许恰恰表明，民众对于这类现象保持着高度关注。

更加概括地讲，这里讨论的是一个有关腐败和其他不法行为的经典问题：加倍曝光当前的腐败行为，究竟意味着不法行为的猖獗，还是人们对此类事件的愤恨？例如所谓的“犯罪潮”，就被认为既可能是犯罪行为发生概率变化的产物，也可能是公众集中关注犯罪或者媒体注意力转向犯罪的产物。洛伊也有相似的评论：“腐败是政治道德水平的指数，而意识到腐败可能预示着健康的政治系统。”²² 相比结构松散的个人和集团政治，组织良好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也许会导致更高的腐败曝光率。因此，这些年来纽约市的腐败情况也许看似比亚拉巴马州更严重，而事实上两地腐败现象的绝对水平也许相差无几。²³ 比较而言，政治系统中的变化（比如从利益集团政治向信条政治的转

变)可能在腐败的绝对水平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导致曝光率的升高。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人们对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认知和情绪变化,可能比政治领导人、团体与制度行为的变化更加频繁。在一个既存的共识体系中,权力的事实确实会改变——即便可能有些缓慢;对于权力的关注也会改变,并且通常更快。

其次,美国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义愤。回想一下制宪会议和18世纪90年代期间显露出来的保守商业—寡头效应;19世纪70年代工业和运输业剥削家无休止的、疯狂的腐败和滥权;还有帕尔默搜捕(the Palmer raids)、茶壶山丑闻案(Teapot Dome),以及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主宰下的常态。上述明显背离信条的情况并非完全未被注意或遭到谴责,但很显然它们没有导致信条激情时期的那种道德主义的爆发。对于19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的丑恶现象所引起的反应,克罗利有着准确的观察:“普通的善良美国人不会太把这些丑恶当回事。他一心相信美国生活是一条能够在奔腾不息中自我净化的溪流,改革家和批评者不过是一些试图阻断溪流的虚妄之人。他轻蔑地看待最初那些间歇爆发、毫无成效的抗议活动。在他看来,改革者都是爱管闲事的人,看不惯在政界和商界获取成功的条件。他戏称这些人为‘骑墙派’,然后在选举中照常给自己的政党投票。”²⁴然而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改革的激情便第四次吐苞怒放。

最后,在美国历史中出现道德激情的时刻,作为打击目标的滥权行为却没有出现显著增长。说到这里,最令人困惑的案例当属“19世纪30年代之谜”——为什么在那十年间爆发了包括废奴运动在内的改革运动,在18世纪90年代、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却没有出现?罗纳德·沃尔特(Ronald Walter)认为:“1831年之后,美国人反对奴隶制的情感出现了重大转折。此前的废奴主义接受逐步废除奴隶制的观点,而1831年之后,立即解放奴隶成为其目标,废奴主义的热情驱使男男女女投入了毕生的改革事业中。可是奴隶制并非1831年出

现的新事物——它已经存在了将近两个世纪，也不是在那一年突然变得邪恶的；按照废奴主义者的逻辑，奴隶制从来都是有罪的。”²⁵ 正如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所言：“难道说在19世纪30年代，正直、善良、敏感的人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多？这些改革者的确是一代巨人，但为何他们都在1830年到1840年的十年间集中出现？……我们需要了解为何19世纪30年代有那么多的美国人会倾向于特定类型的改革运动。”²⁶ 显然，不论是奴隶制的邪恶，还是清教良心的存在，抑或二者的结合，都无法充分解释激情时期发生的事情。

进步主义时期也有类似的情况，李普曼发现，民众对于扒粪运动的热情并不是严重腐败和滥权导致的，而是因为公众的态度从“病态地崇拜成功”转为“对成功者的憎恶”：“扒粪者实际上代表了民众想要从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日常琐事中嗅出腐败行为。”为什么稀疏平常的事情会变成腐败行为？李普曼认为，应当从令公众担忧的广泛社会变化中寻找答案，社会变化引发了“新的必要性和新的期待”，因此人们“明显偏袒支持那些提出控诉的人”。腐败水平并未上升，而公众对腐败的容忍能力却下降了。“心情好的丈夫差不多什么都能容忍，至于心情不好的丈夫，会仅仅因为拖鞋放错地方而大发雷霆”。²⁷

20世纪70年代也是同样，“后‘水门事件’时代的道德”对公共官员的行为提出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标准。问题在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官员的“水门式”行为同“水门事件”之前官员行为之间的差异，是否比“水门事件”前后官员道德标准之间的差异更大。在曝光的最初阶段，人们认为，“水门式”的行为不仅严重背离了官员行为的理想典范，也不符合现实中官员行为的常态。然而随着曝光的深入，人们的假设被逐渐推翻。对约翰逊、肯尼迪和罗斯福政府的揭露表明，滥权绝非特定时期、特定党派、特定个人的“专利”。“‘水门’并非开端”不仅是论战小册子的标题，更是对历史真相的陈述。结果，公众对于部分政治家不道德行为的愤慨，逐渐演变成对所有政治家不道德行为的冷漠麻木。

信条激情虽然着眼于削弱过度权力，却未必仅仅因过度权力而起。滥权现象严重之时，社会上也许很少或者没有人进行抗议。在滥权行为并未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却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没有权力滥用现象也同样可以激起义愤，事实上，社会总是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滥权。因此，在信条激情爆发的背后，必然有外生性因素的作用。借用李普曼的比喻，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位丈夫因为拖鞋放错地方而勃然大怒呢？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动荡和抗议运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张力、相对剥夺、独裁者性格、社会的团体结构、资本矛盾，等等。²⁸ 上述理论几乎都想要解释那些吸引了特定人群的特定社会运动的起源。人们决定参与其中时，考虑的并非当前社会的整体状况。虽然某个团体可能具备更强的道德改革倾向，但在信条激情时期整个社会都具有这种倾向。激情时期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社会运动、乌托邦社团和改革组织，而是这些组织的活动和关注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整个社会的主题。因此，导致信条激情的外部因素要比导致特定社会抗议运动的外部因素范围更为广泛、普遍。问题并非改革事业和抗议组织为什么会存在，而是它们为什么能“抓住”大量不同的团体。区区拖鞋琐事，竟会让这么多的一家之主同时发火？

至少有四类外部因素，可能引发不同社会团体对滥权现象的愤怒。

第一，信条激情一般出现在物价总体上升和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民众的关注焦点从日常生计转向政治和道德问题。虽然经济困难造成的动荡也可能引发对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关注和质疑，但美国人担忧经济问题时，通常会选择直击主题、就事论事。经济繁荣造成了相对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为人们关心道德和政治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此外，社会运动作为激情时期的主角，能够跨越阶级分界进行动员，中产阶级是其主要成员，富人和穷人都参与其中。

第二，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或许是信条激情的必要背景条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对称却为激情的大规模爆发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刺激。很多社会科学家认为相对剥夺是抗议、造反和革命的原因。当一个团体认为自身的境遇已经或者将要比期望的情况糟糕时，就会出现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在社会经济快速变迁的时期，原有的社会团体间关系被打破，人们很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当社会动员程度提高时，某种形式的政治行动或社会抗议就会发生——经济发展实现的资源增长跟不上社会动员导致的预期膨胀。²⁹ 这意味着，信条激情时期的新型媒体和政治组织，其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造成该时期的政治生活特征的外部原因。对大部分社会而言，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加强了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历史上，类似情况给欧洲国家造成的政治结果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尖锐冲突，在美国它却意味着传统共识价值的信仰复兴。

第三，特定团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可能刺激其关注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并试图改革政治制度与实践。按托克维尔的说法，虽然繁荣给所有人带来了好处，但也让那些获益相对较少的人心怀愤懑。况且，要是哪个团体想要进入现存体制或提升在体制内的地位，美利坚信条可谓是一件有效且正当的政治武器。如果一个团体已经成功地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却发现政治决策中心将自己排斥在外，它就很有可能扛起信条大旗进行斗争。在相反的情况下，即如果有团体感到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正在下滑，那它也可能诉诸信条政治。大卫·唐纳德和霍夫斯塔特在各自讨论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者和20世纪初进步党人时所使用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一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³⁰ 如果社会变革进程激烈而广泛，导致一些现有团体因当前“权力与尊严分配模式的变化”而感到忧虑，让另一些团体认为自己能够也应该实现某些改革时，信条激情就会出现。在这些情况下，“地位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化政治”——也许有助于理解那些“经济学视角所不足以解释、错误解释，或者根本不沾边的政治行为”。³¹

第四，青年集体显然更倾向于道德主义行为。因此，整个社会沉迷于信条激情的程度可能与青年人的数量及其政治影响力有关，而青年人又会受到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外部事件的影响。诸多历史证据表明，青年人在革命运动和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革命和变革的出现可能同人口中15到30岁人群数量的快速增长有关。³² 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之一正是青年人口的增长。1960年，15—29岁的青年构成了男性总人口的19.5%。197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4%，其增速在人口记录中史无前例。60年代，14—24岁的青年人口绝对增长达1380万人，超过了1960年之前的7年间青年人口的增长总额（1250万人）。

可获得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虽然变动幅度算不上剧烈，但从1880年至1910年，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这一时期还以大学生抗议活动的高涨而著称。³³ 将青年人同政治联系起来的关键人口因素包括青年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于其他人口的规模、相对于前一代青年人的规模。青年人口的增长可能导致其内部互动的增加，而减少他们对于跨年龄团体的参与。因此，“加强同龄人群的社会条件（如某个年龄段的人口突然增加，或者教育年限延长导致延缓参加工作）将导致年龄分层的潜在极化趋势”。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指出某一年龄段人口相对于其前辈的显著增长可能导致“相近年龄瓶颈”，那些已经习惯于青年人口保持在一般水平的机构将无法承受如此迅猛的增幅。这些机构对青年人激增时表现的无能，反而会刺激后者发动社会和政治抗议。³⁴

循环就是变量之间互动的一组有规律重复模式，其中，时间 t_1 互动模式是导致时间 t_2 互动模式的充分必要条件，时间 t_n 互动模式是再次导致时间 t_1 互动模式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循环是有规律重复且内部自足的。在美国历史上，信条激情的大爆发有着相当规律的时间间隔——每六七十年一次。在间隔期，主要经济利益团体在政治权力方

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关案例虽然有限，但已经能够强有力地表明周期性的存在，这种循环模式可能早在美国革命之前就存在了。

前述的四种回应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方式都无法长期作用于大规模人群。诉诸其中一种回应方式将为另一种不同模式的出现创造心理条件：道德主义最终引发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产生冷漠，冷漠导致自我欺骗，自我欺骗则在某个时间点再度点燃道德主义。考虑到信条激情爆发的规律性，再加上不同回应模式的转换逻辑，可以假设美国公众意识过程的循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激情时期的出现。

虽然无法证明四种回应模式间的逻辑顺序就是真实的历史顺序，但美国政治中频繁出现的循环仍然加强了上述假设的有效性。西欧各国的政治以阶级为基础，呈现意识形态多元特征，一般不会具有循环的特征。在现代社会，循环更可能出现在具备高度意识形态共识的后革命社会。根本共识为变革划定了边界，对变革的诉求被限定在边界内，从一极摆动到另一极。正如上文所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直在红卫兵与专家、大众革命与经济发展之间反复摇摆。类似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以来后革命时期的墨西哥，其政治生活自觉地在经济保守派与主张社会激进政策的总统之间交替变化。

作为最典型的共识社会，美国及其政治非常适合用循环理论来解释。美国的政党竞争被看作有规律的循环：举行关键选举，实现政党重组，产生新的多数党（“太阳”）/少数党（“月亮”），建立均衡，随后均衡因现有政党系统无法妥善解决新议题被逐渐破坏，而政党与个人、团体间的联系纽带日趋弱化，最后就是将政治过程带入新一轮循环的关键性或重组性选举。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总结道：“美国政治的总体发展和政党的个体发展遵循着某种循环模式。”

³⁵ 许多观察家也发现，在美国的地方和国家层面也存在着不同的、具有一定联系的改革循环，最高法院也同样在司法能动和司法沉寂之间反复摇摆。³⁶ 小施莱辛格发现，美国政治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潮流平均每16年交替一次，而另一位学者则将总统选举描述成以12年为

一个周期的冲突、良知与和解的循环。³⁷ 相同的逻辑还出现在思想领域，在美国，“价值变迁的历史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倒退的，而是基本上处于循环状态”，这种循环变化既出现在148年跨度的长周期中，也出现在48年跨度的短周期中。弗兰克·L. 克林伯格（Frank L. Klingberg）则在另一项著名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外交史存在内向政策和外向政策的更替循环。³⁸ 还有人认为，在美国社会的垂直流动渠道开放与否这一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长期趋势，相反，顶层领导位置的人选实际上一一直处于“相对短期的大规模循环变化中”。大卫·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将外交和内政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美国公众对于权力和扩张的交替需求导致了改革和战争两种政策的循环反复。³⁹

引用上述理论并不代表对其观点的赞同。这些理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并非因其能高度“适配”过去的历史进程，而在于它们也许能够对美国政治的未来提供合理而精确的预测。小施莱辛格在1939年就曾预测，“二战”之后“自由主义的衰退”将于1962年结束，“误差大概在前后一两年左右”。他还预测美国政治的“下一波保守主义浪潮”将在1978年开始。1973年，内门卫斯（Namenwirth）在其著作中对其48年周期进行分析时指出，对于财富和经济问题的狭隘关注将在1980年达到顶点。50年代的人们担心美国将回归过去的孤立主义路线，克林伯格在其1952年的著作中满怀自信地嘲弄了这种杞人忧天的情绪，而现在看来他的预测十分精准。他还曾预测1940年开始的27年外向时期将于60年代中期结束，现在这个预言也得到了准确的证实。⁴⁰ 甚至连约翰逊总统也没法跳出克林伯格循环。

因此，可以用周期理论准确地理解美国的政治变化，美国公众意识中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自我欺骗的循环能够准确地同美国政治的循环相匹配。

一切源头尽在英国革命

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革命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大规模、有组织地申明美国政治的原则。然而早在六七十年前，即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就曾普遍出现动荡不安的状态。就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殖民地逐渐转变成美国的省。在转变的背后是社会动员引起的不稳定和地位焦虑的迅速上升——“无论已经取得何种社会经济地位，所有殖民者都陷入极度焦虑中，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令人不安的现状和完全未知的未来”。⁴¹ 在当时，新的权力和财富源泉不断涌现，新的移民蜂拥而至，英国政府试图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并使之合理化，而殖民地居民正努力反对这一切。在北部殖民地，英国人试图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以加强国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效果并不理想，自治领最终遭到推翻的结局“令人震惊”。此后，塑造了17世纪秩序的“无所不包的新英格兰思想体系”，“在1690年之后迅速瓦解，到1730年已经销声匿迹”。⁴²

从殖民地到省的转变“给殖民地的民众和制度造成了巨大压力”。“有时这种压力会强大到足以引发叛乱（虽然其中大部分很短命），还会导致濒临革命的非暴力剧烈变革。”⁴³ 殖民地时期发生了18次大规模起义，其中有13次发生在17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其中包括培根起义（Bacon's）、库尔佩珀起义（Culpeper's）、莱斯勒起义（Leisler's）、反安德罗起义（anti-Andros）和库德起义（Coode's）”，这些起义体现了“北美殖民地普遍的反专制情绪”。在那个时代，“人们不甘于眼前的苟且。恐惧和疑虑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唤起，仇恨和愤怒深入每个人的灵魂，哪怕一点琐事也足以引发怀疑和猜忌”。“这一时期的殖民地社会处于动乱之中，对外部强力的回应迅速而激烈……从1676年到1690年，几乎所有殖民地都爆发了叛乱。”⁴⁴

其中几次叛乱与1688年的光荣革命有关，其余的则有着各不相同

的原因。大部分叛乱导致或反映了殖民地权力分配方面的变化——国王与殖民地精英间的权力对比，或者不同精英之间的权力对比。叛乱的目标是“改变詹姆斯一世到詹姆斯二世以来专断的寡头政治所导致的权力和财富的固化分配模式”。随之而来的信条激情时期至少有两个攻击目标：天主教（天主教阴谋的威胁）和奴役（“专制政府”的暴政），这恰恰相悖于英国人传统的权利和自由。1688—1689年间数次叛乱的参与者既有穷人也有富人，而在后来的日子中，革命者既向后看，也向前看。⁴⁵ 在社会动荡和改革尝试的背后，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国人的意识觉醒，他们发现自己与之分离的英国社会结构无法在新大陆重建起来。总而言之，17世纪末的殖民地社会重构和后来激情时期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重组有诸多明显相似之处。理查德·马克斯韦尔·布朗（Richard Maxwell Brown）认为，17世纪的最后几年是“第一次美国革命时期”。⁴⁶

然而这并不是第一次革命。有意思的是，如果从17世纪末开始追溯这个持续了六七十年的主题，将正好把我们带回第一次真正现代革命的开端。沃尔泽（Michael Walzer）认为，“权力、集团和阴谋”的政治是历史的普遍现象，正如利益集团政治也在美国历史中随处可见。然而随着加尔文主义的崛起，政治生活里第一次出现了“政党组织与有序活动、反对与支持改革、激进意识形态与革命”。⁴⁷ 这就是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开端。人们渴望重建政治社会制度，按照理想状态再造社会。

英国革命以更加激进、更为戏剧化、更为颠覆性的方式，为后来出现的美国政治的信条激情树立了范式。革命的起因是1629年至1640年英王试图重建自身及天主教会的权力。国王和国会、天主教和清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和革命领导者约翰·皮姆（John Pym）之间的重重矛盾首先不是经济与社会的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基本法和宗教的问题。“17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引起激烈的反抗，不是因为国王向某个阶级征收了压迫性的

税赋——事实上英国社会的税收负担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轻，而是因为税款的征收方式是专断的、违宪的，其用途被许多纳税人认为是不道德的”。⁴⁸

同信条激情时期的美国一样，17世纪30年代的英国试图使权威合理化、集中化，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增强其控制、指导社会的能力。曾在都铎王朝甚至詹姆士一世时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贵族们发现自己的权力被日益削减，这在接下来的时期中引起了反抗，但促成反抗的条件却源自此前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各阶层在地位、权力和财富方面的差距的逐渐拉大，识字率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扩张，英文版《圣经》的普及，以及受教育劳动力相对于合适工作的过剩。⁴⁹

因此，英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查理一世与劳德大主教加强国王和国会权力的理性反应，也是外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这场革命还有许多其他信条激情时期的特征。由于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和宗教的而非社会和经济的，社会的分裂不是沿着经济阶级的分界，而是沿着宗教、年龄和政治路径的分歧展开的。奥斯汀·伍尔瑞奇（Austin Woolrych）发现：“每一个社会等级、每一种职业都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加入到对立阵营之中。新教不仅是城镇居民的信仰，它已经蔓延至社会的每个阶级。从富裕的骑士到落魄的小地主，很多土地贵族都支持清教，转而皈依者也不限于少数参与商业活动的地主。1640年有五分之一的贵族是清教徒；而在清教阵营的另一端则是大量手工业者和体力劳动者，与其说他们是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的开拓者，倒不如说是受害者。”⁵⁰ 当反抗诉诸武力之时，英国革命和美国的一样，“不仅把地主阶级拦腰斩断、一分为二，还撕裂了家庭，令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有七分之一的贵族家庭因战争而分裂”。⁵¹ 和后来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英国革命中的道德大棒也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教会，其次是宫廷和国王。改革者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用斯蒂芬·马歇尔（Stephen Marshall）的话来说，他们有着基督教启示录式的情怀，渴望“带领我们开辟新天地”；另外，他们又希望恢复传统的权

利和特权。

革命的要旨在于其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激情。这来自清教徒强调的个人良知至上，以及通过与上帝的沟通引导良知走上救赎之路的必要性。清教擅长布道，其牧师“自认为是献身于传播上帝话语的使臣，而不是只会主持圣事的教士”。⁵² 同信条激情时期一样，媒体的影响急剧扩张，还采取了新的传播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是广泛流通的英文《圣经》，以小册子方式传播的布道辞及其他言论，以及由“第一位专业新闻记者”撰写的每周新闻通讯。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指出，清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文化革命，它将激情注入到思想和学说当中。清教的本质是激烈的道德主义。“清教的精髓不是被动地接受任何现成学说教义，而是满怀热情地在生活的各方面实现道德进步，是‘为履行所有使命而进行圣战’”。⁵³ 清教的神学和政治思想未必是特别成熟的，也未必是完全原创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指出，虽然这些思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二手的，但它们背后的激情是独有的”。当信条激情在17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时：

英国的一切都被颠覆、质疑和重新审视。人们对旧的制度、信仰和价值进行拷问，轻易地从一个批评阵营转到另一个，一名50年代的贵格派（Quaker）同当时的平等派（Leveller）、掘地派（Digger）以及浮嚣派（Ranter）之间的共同点要比同一名现代教友派成员更多。

.....那是一个思想上激荡的年代，正如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所言，“旧世界.....像烈火中的羊皮纸一样被付之一炬”。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被质疑的不仅有腐朽的等级社会的价值，连清教徒自己的新价值也遭到怀疑。

.....世界可以被永久性颠覆这一新观念正是17世纪的新奇之处所在。⁵⁴

英国革命以君主制复辟告终。国王、王权、贵族、王室、主教和

国教在英国恢复了其全盛状态。“弥尔顿的先知国度变成了小店主的土地”。⁵⁵ 清教的影响力在革命前就已在各阶层民众中建立起来，革命后却萎缩至仅对社会上范围有限的一小部分人有效。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英国政治宗教传统的反国教传统被卫理会、激进派和工党所继承，但其继承自英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内涵却被隐藏、限制起来，仅仅局限于特定阶级、地区和派别。而美国的清教激进主义则得以广泛传播扩散，成为了新社会信条的核心。英国发生了清教革命，却没能形成清教社会；美国形成了清教社会，却没有发生清教革命。英国社会建立起稳定的阶级分野，美国则拥有引发动荡的社会共识。在这里，“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和山谷之城间的差距，为进一步努力实现英国革命未竟的清教目标创造了新的条件。

清教革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一次独特事件，也是美国历史的原型之一。英国革命的痛苦、兴奋、激情、道德主义和改革意识，都在美国历史的重大时刻多次重现——17世纪末的殖民地动荡、18世纪的美国革命以及此后的历次信条激情时期，等等。清教牧师托马斯·凯斯（Thomas Case）于1641年在下议院布道时这样曾阐述改革精神：

改革应当是普遍的……改革所有领域、所有人和所有职业；改革所有的法庭和地方法官……改革大学，改革城市、改革乡村，改革初级学校，改革安息日（Sabbath），改革圣餐礼，改革对上帝的崇拜……要改革的不仅是我提到的这些……一切非我天父安排的事务都应被连根铲除。⁵⁶

可以将这段话同两百年后爱默生对1841年美国盛行的改革精神的总结相比较：

在世界历史上，改革学说从未像今日这般昌盛。路德宗（Lutherans）、胡特派（Hernhutter）、耶稣会（Jesuits）、僧侣会（Monks）、贵格派、诺克斯（Knox）、卫斯理宗（Welsey）、史威登堡（Swedenborg）、边沁（Bentham）等

派别和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的同时，都会有所保留地尊重某些事物——教会或国家、文学或历史、惯例习俗、集镇、晚餐桌、铸币。但是一声号角过后，所有这些及其他一切东西都被将接受审判——受到了新精神威胁的不是某个国王、城镇，不是某项法律、习俗，也不是某个职业，某一男女众生，而是整个基督教、法律体系、商业系统、教育制度、农业活动和科学事业。 57

托马斯·凯斯的精神、英国革命的清教遗产永远地存留于美国人的思想之中。这些精神特质会周期性重现，每隔一代人就爆发一次，给平日里沉闷、物质化的美国政治生活留下自己的烙印。这时候，美国就从小店主的土地重新变为先知国度。因此，美国政治的源头在于英国清教革命。事实上，这场革命是对美国政治历史的形成最为重要的事件。

美国政治的新教主义

作为17世纪早期决定性的宗教与政治事件，无论是作为美国历史特征的政治宗教混合物，还是构成了美国政治变革动机的道德激情，都以清教革命为源头。美国人不仅是生而平等，因此不必后天争取；而且他们生而为新教徒，故而不必后天皈依。德国神学家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于1853年写到，在美国，“一切都有着清教的源头”。 58 所以美国的新教主义是“建设性的新教主义”，它的目的不是瓦解天主教，而是在一块处女地上建立一个崭新、纯洁的新教社会。清教徒相信这是上帝特意保留未开垦之地，直到他们做好准备用这块土地实现上帝旨意的时候，上帝才让欧洲人发现了它。 59

这也解释了美国宗教团体的多元性和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在殖民地早期，教会和国家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殖民地和教会的增加

阻止了全国性宗教的创立。最终宗教与国家的统一被打破，甚至是马萨诸塞湾的政教合一政府也是如此。到19世纪，美国的圣公会（established church）被政教分离的教会以及持续增加的形形色色的教会、教派、宗派和其他宗教所取代。宗教的多元增长正是新教运动本质的产物。从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到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美国新教主义没能在这期间产生有重大影响的神学家，但它一直在自我更新。自17世纪初以来，美国产生的宗教团体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因为美国社会中新教徒占绝大多数，新教会和宗教运动的出现是因为对先前的教会和运动的异议与反对。“拥有若干不同形式的新教主义，并非针对某种宗教与政治生活秩序的一次性抗议的产物或载体，而是代表着一系列抗议，这些抗议针对的是许多相互联系的基督教信仰秩序，及其相应的政治保证人。”⁶⁰ 每一代人会建立起新的宗教团体，并根据规模大小重新安排不同团体间的次序。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会不是新教徒所要挑战的国家宗教，而是“同其他教派一样是后来者，并总是居于次要地位”。⁶¹

同宗教团体的多元性相对应的是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从18世纪以来，美国宗教活动的广泛性和美国人对宗教信仰的坚持一直吸引着外国观察家的注意，教会成员人数和做礼拜人数的有效数字证实了这点。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基督教对人的灵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⁶² 他的判断在20世纪后半叶仍然正确。虽然统计数字表明，参与宗教的水平和宗教活动的程度（例如做礼拜的人数）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但直到20世纪末也没有显示出美国公众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任何长期衰退的趋势。总体而言，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于同属一个教派的外国信徒，美国人做礼拜的频率更高。在美国，认为宗教信仰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人是其他最发达工业国家的两倍之多。宣称自己信仰神的美国人高达9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比例。（见表4）

表 4 70年代的宗教信仰情况

	认为宗教信仰非 常重要 (%)	信仰神 (%)	相信死后重生 (%)
美国	58	94	71
加拿大	36	98	54
意大利	36	88	46
比利时、荷兰、 卢森堡	26	78	48
澳大利亚	25	80	48
英国	23	76	43
法国	22	72	39
西德	17	65	35
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	17	65	35
日本	14	44	18

资料来源：Surveys in 1974-1975 by Gallup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U.S. countries and in 1978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Gallup) , Princeton Religion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Gallup Organization, Inc.,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ed in Public Opinion 2 (March/ May 1979) : 38-39

- a. 问题：“你的宗教信仰对你的重要程度如何？非常重要，相当需要，不太重要，还是完全不重要？”
- b. 问题：“你相信上帝或者普遍信仰吗？”
- c. 问题：“你相信死后重生吗？你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吗？”

就像有关美利坚信条核心理念的共识一样，美国人在某些重要宗教观念上也存在共识。在各现代国家中，美国人对于宗教信仰的坚定可谓独一无二。原因何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最初新教遗产的本质。教派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教分离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却强化了宗教。作为自愿结社组织的教会和教派别无他法，只得尽可能发动信徒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扩大。大多数新教教派都热衷于积极地布道和劝说他人皈依。它们担负着传教士的使命，旨在引导信徒皈依和重生。“宗教在其自有领域内自由而强大，它满足于这块保留地，当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统治人的内心世界而不借助任何其他帮助时，宗教才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帝国”。⁶³ 而且，新教派的建立意味着教会组织、宗教学说、仪轨和功能几乎可以无限变化，以满足特定种族、社会、经济和地域团体的需求。这使得每个教派都拥有自己的信徒，因此对于教会成员的热情追求就不会演变为同样激烈的排他性竞争。相反，几乎所有教派都认同最根本的新教道德价值与善行，并在自己的布道中强调道德的核心地位，由此导致了令托克维尔惊讶不已的现象——一个教会的牧师时常前往其他教会布道说教。托克维尔发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新教教会的“道德说教从不提及任何宗教教条”。“……不同教派的牧师只讨论道德的共同点，因此不会相互攻击”。⁶⁴ 新教强调道德和善行，而不是神学和教条，因此人们更容易信仰一般性的宗教准则，而不必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深究艰深晦涩的教义或是践行特定的信条。

宗教组织的多元化和宗教信仰的普遍化导致了独特的政教关系。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单一、普遍的教会与多个不同国家共存。许多国家在宗教改革期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教会。而美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这里，一个单一、普遍的国家与多个不同的教会共存。这些教会的宗教目标从一开始就与形成中的美利坚国家的政治目标具有相通之处，并为后者的实现提供了支持。1776年的美国革命者无须反对一个支持既存政治秩序的国家教会。因此他们也不需要像1789年的法国同人那样建立一个世俗宗教。所有的美国人都能皈依一种广义上的宗

教信仰，以至于“甚至美国的无神论者都用宗教信徒的口吻说话”。⁶⁵

宗教组织的多元化和宗教信仰的普遍化产生了三种形式的政治——宗教混合物。

第一，17世纪的新教主义是诸多美利坚信条思想的源头，特别是那些涉及个人良知的根本作用的内容。广义的宗教价值首先被不同的新教派别接受，继而是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犹太教和东正教会，这使其很容易就同民族政治信仰融合在一起。19世纪的美国，“世俗生活弥漫着一种公共的、普世的泛新教意识形态”。“在不干涉个人信仰的前提下，这种泛新教思想既有足够的模糊性去吸引不断增加的犹太和天主教移民，又能在学校课本和公共演说中灌输一种泛化的虔诚心理”。⁶⁶对于民主承诺和个人良知优先地位的强调最能够体现宗教与政治价值的一致性。美国的新教主义是“一种民主的、共和的宗教”，它强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中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从诸如“肮脏政治”（dirty politics）、“慈善之人”（the good man）、“道德问题”（the moral issue）、“心的变革”（change of heart）、“圣战运动”（the crusade）等流行词语就能看出，宗教在美国政治思想和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⁶⁷

第二，缺少专门建立起来的国家宗教，使得广义宗教的诸多思想与符号能够直接与美国的政治行为相融。就像几乎所有的美国教堂都会升起星条旗一样，几乎所有的美国国家仪式与典礼也都会提到上帝。《独立宣言》确保美国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之权利；美国人“在上帝面前”宣誓自己忠于国家，还在货币上声明自己信仰上帝，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说这套制度是上帝的旨意，而公共仪式必定要以某教派牧师的祈祷开头，以另一教派牧师的祝福结尾。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这样，其政治与宗教在制度方面的分离如此彻底坚决，在思想与符号方面的结合又如此紧密。

第三，由于国家认同是由一套政治理想界定的，与之相关的国家

信条和政治实践也具备了某些宗教功能。多元化的教派确保了所有派别都有其特殊性，没有哪一个能够真正成为在尘世实现上帝旨意的工具。在没有国教的情况下，国家及其政治信条承担起世俗宗教的作用。美国人将国家视作“命运的普遍性，就像神学对普世教会的看法那样”，并认为国家是“上帝在历史中从事有意义活动的主要代理人”。

68

结果是国家拥有了诸多教会的特征和功能。正如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所说，美国的确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五十年后的另一位欧洲观察家同样发现：“存在于美国土地之上的不是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教会。”⁶⁹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美利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替代品的同时，也吸收了部分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此同理，它作为国家信条的时候，也成为了国家的世俗宗教。切斯特顿认为，美国“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这一信念“是由《独立宣言》以清楚明白的神学教条提出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就是美国世俗宗教的《圣经》，其根本启示由国父们的言论加以详细阐述和延展。1918年众议院通过的名为“美国人的信条”（American's Creed）的决议，以《圣经》中使徒式的语言，简洁明了地概括了美利坚信条的本质：

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其正义之权力源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它是共和、民主的政府，是由诸多主权州组成的主权国家，是完美的联合、不可分离的整体，它建立的基础，是美国爱国者为之献出生命与幸福的自由、平等、公正和人道原则。因此我相信我有责任热爱国家，支持宪法，遵守法律，尊重国旗，为它抵御一切敌人。

难怪D. W. 布罗根会对20世纪初美国校园中的信条教育感到惊讶：“学校里禁止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但是年幼的男女学童仍然于每日清晨庄严起立，齐齐背诵‘美国人的信条’，这种做法实际上与每天从‘我相信全能的上帝’开始、宣称‘上帝就是一切’是一样的，都是

宗教训练。”⁷⁰ 和其他宗教一样，美国的世俗宗教也有赞美诗、祭祀、先知和烈士。它也有自己的使命：建立“山巅之城”“人间最后的美好希望”（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通过在世上履行“荒原中的使命”（errand in the wilderness）建立“新天新地”（new heaven and new earth）。⁷¹ 西德尼·米德认为，“共和国宗教在本质上是先知性的”，正是这种清教徒的使命感为美国政治的运动提供了源动力。

清教革命给予美国人民的遗产是一种信念，即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要确保正义战胜邪恶，在尘世实现上帝的意志。“这是美国历史中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事实，即美利坚民族实际上是旧约的子民。”⁷² 宗教是道德的源泉，后者一方面要求拯救灵魂，另一方面又要求重建社会。这两个要求都是可能实现而且必要实现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消极地接受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都是不可容忍的。这条鸿沟是邪恶的，允许它存在是在犯罪，用道德行动消灭它是使命的要求。纵观美国历史，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重大努力均采取了宗教与政治复兴的形式——宗教大觉醒和政治信条激情。

清教革命期间的政治和宗教是不可分离的。此后的美国历史中，清教激情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然而，美国政治历史上的四次信条激情同宗教历史学家所谓的四次宗教大觉醒在时间上是重合的，这绝不是个偶然。而且，虽然宗教觉醒和信条激情时期一样没有确切的起止日期，但是每次宗教觉醒都先于信条激情十多年开始，随后与后者在时间上重叠。第一次大觉醒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横扫殖民地；第二次则始于19世纪初，并持续到约1830年；第三次大约开始于1890年，持续到20世纪的前十年；第四次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⁷³ 虽然四次觉醒有所不同，宗教狂热和信条激情的表达却有着相似的特征和源头。正如年代学所显示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改革的激情首先指向个人信仰的变革，然后才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宗教觉醒和信条激情之间的平行关系令人吃惊且引人关注。只有在大批民众此前曾经笃信宗教，而信仰“倒退”又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宗教觉醒和复兴才会发生。宗教觉醒“是宗教的复兴，是旧事重演”。“……觉醒不是将宗教传入某个地区……除非有某种能够首先为复兴提供有意义环境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框架，否则复兴就不会发生”。正如权威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按照我们文化的核心标准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来判断，社会已经过度偏离了那些赋予国家和教会权威的道德与宗教观念”，那么宗教觉醒就会发生。大觉醒为“克服规范与经验、旧信仰与新现实、腐朽的行为模式与新生的行为模式之间的种种矛盾”提供了途径。觉醒导致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激烈“重建”，推动美国人投入“尽快实现天定命运”的斗争。⁷⁴ 第一次大觉醒的动力在于，“公共舆论能够激发潜意识中罪恶感和依附感，年轻人心中的享乐主义冷漠很难与之对抗，而对于那些表面上投身新教，内心的虔诚却趋于俗套的年长者而言，类似的感受又很容易被重新激发”。因此，在出现宗教觉醒的社会中，已经被内化的“宗教规范及权威”同“不符合公认戒律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⁷⁵ 宗教复兴是应对个人层面认知失调的一种方式，使往昔的罪行得到宽恕，让迷途的羔羊重返神的道路。

就此而言，宗教觉醒对个体美国人起到的作用与信条激情对整个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改变大量个体的努力与变革整个社会的努力有着相似的效果。美国革命“作为一次类似于宗教复兴的情感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带有一种“类似于大觉醒的、新教式的革命冲动”。⁷⁶ 为了探究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在美国历史上的真正意义，一位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抗议、校园动荡、城市骚乱的结合”。“所有这些活动对于国家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在一起也许能够接近大觉醒（但肯定不会超过它）”。另一位宗教历史学家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另一次同样深刻地改变了人文环境的大觉醒”。⁷⁷ “在这期间，形成价值、希望、恐惧和世界观的领域显得相当动荡不

安。”⁷⁸

和信条激情时期一样，大觉醒也有着多种多样的起源。关于第一次大觉醒的原因有五种主要解释：社会的快速变迁、意识形态极化、西部扩张、英国影响的增强、阶级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这五种解释可以被归结为“权威与权力结构的变化”⁷⁹。发生经济迅速变革的地区通常也是宗教复兴的中心。例如，东部的康涅狄格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快速增长，其间人们疯狂地追求土地和财富。这导致高度的“个人不稳定”和罪恶感，进而使整个地区成为第一次大觉醒的中心。这次觉醒是新教思想对于“北美殖民地出现的贫富差距，以及令更为纯洁的先前几代人感到陌生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回应。⁸⁰

以伊利运河（Erie Canal）开挖为标志的纽约州西部“炽燃之地”（burned-over district）的经济全面发展，被认为是第二次大觉醒在当地尤为激烈的原因。在那些经济增长趋于平缓稳定，“达到或接近农业经济成熟阶段”的地区，宗教热情最为激烈。⁸¹更广泛而言，第二次大觉醒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社会关系紧张扭曲的产物。“1800年宗教能量的爆发是社会不满和政治意愿的公开表达”。⁸²第三次和第四次觉醒也是紧接着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出现，那时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社会关系紧张，团体地位不稳，人们感到个人行为严重偏离了道德规范。

大觉醒用皈依宗教的办法为人民提供了释放心理压力的渠道。信条激情时期的道德主义是因为回归美利坚信条根本理想的渴望，大觉醒时期的宗教狂热则源于重返《圣经》基本要义的诉求。人们已经在此前将高要求的宗教规范内化于自身，因此当他们的行为偏离规范时，身上的罪恶感就会日益加重。大觉醒的布道者强迫人们直面自己的罪恶和无可逃避的谴责。正如有人在解释第一次觉醒所说的：“面对罪恶是皈依的第一阶段，这使人们感到绝望，但是复兴分子并未弃信众于痛苦中。通过公开指认罪恶之源并加以谴责，布道者帮助信众治愈先前造成的创伤。接受了劝导的信徒相信，只要自己能承认并忏

悔往日罪行，他们就不再是有罪之人。这个过程结束后，重获新生者尽享欢乐幸福，一如最开始他们承受的无限痛苦。”⁸³ 复兴分子认为，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这一过程的感召，因此青年在第一次及此后历次宗教觉醒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⁸⁴ 激情信条时期的“政治激进化”实际上是宗教觉醒中人们虔信皈依经历的世俗版本。

每次大觉醒期间都会出现悟道者和蒙昧者之间的两极分化。第一次大觉醒中长老会新派（New Side）与旧派/当权派（Old Side）之间、公理会新光（New Light）与旧光（Old Light）之间的分裂同样出现在此后的大觉醒中，而信条激情时期也有与之对应的“草根运动”（the Movement）和“建制阶层”（the Establishment）之争。和信条激情类似，宗教觉醒时期各教派的成员出身也是五花八门。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来自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各派别的人都经历了新生”。“事实上新英格兰的每一位会众都受到了触动。”⁸⁵ 分歧跨越了原本的阶级与社会地位的分界。“马克思与比尔德（Beard）的分类方法并不适用于18世纪美国宗教的派别之争，因为大觉醒之后的分歧实际上是智识分歧，它更具有美学性质，而非经济或社会性质……就18世纪的‘大争论’而言，分化美国人的不是收入上的差别，而是审美的品位。”⁸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审美的差别仅与时代相关。正如改革的成功一直有赖于具有坚强个性的改革者，大觉醒的虔信也是出色的复兴分子的功劳：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查尔斯·格兰迪逊·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比利·桑代（Billy Sunday）、葛培理（Billy Graham），这些都是历次宗教觉醒中最杰出的布道家。

和信条激情时期一样，随着新型大众传播与劝导方式的普及与运用，每次大觉醒都会有许多人改变信仰。那些福音派的伟大传道者同时也是大众动员技术的伟大创新者。在18世纪中期以前，宗教只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依赖由牧师、教堂、会众和教区组成的小型社区。而第一次宗教觉醒的标志正是那些巡回布道者，他们让宗教变得更加普

世化、个人化，使其不再是小社区内的活动。⁸⁷ 在随后的18世纪70年代美国革命中，宗教觉醒时期的语言技巧和修辞风格被用于向大众宣传革命诉求。⁸⁸ 第二次大觉醒期间，芬尼等人改进、发展了野营布道的方法，同时运用“积极广告攻势”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参与。19世纪末，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成为第一位大量使用报纸和广告板的复兴分子，他以此组织并训练“引路人、唱诗班、策士和祈祷会领头人”，并发展出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劝募手段。在第四次觉醒中，上述技术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但这一次使千百万美国人受到感召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以葛培理为代表的传道者对于新兴电视传媒的熟练运用。20世纪50年代的大觉醒和电视行业共同蓬勃发展。⁸⁹

群众组织也是宗教觉醒的突出特征。1740年到1760年，新英格兰成立了150个新教会，增加了三万到四万名教会成员。第二次大觉醒期间，卫理会和浸礼会成功的主要原因不是其神学理论或教义，而是对于群众组织、群众动员手段的改进和利用。例如，第二次觉醒在纽约州奥奈达县（Oneida County）的遗产就包括“摩门教、几个基督再生论派别、两种卫斯理宗，还有若干灵修派团体”。⁹⁰ 每一次觉醒都刺激了宗教组织的繁盛。新教派如雨后春笋，老教派则因分裂而更加强大。尼布尔认为，可以将美国新教的发展看成是反对既存体制的连续浪潮，它要让教会的历史成为“众多变革之一”，随着大觉醒中大量新教会的成立而达到顶峰。“改革、再生、觉醒、复兴”的浪潮“反对的不是长者权威，而是接受并固化人类道德与宗教生活的平庸形式”。⁹¹

从理论上讲，个人内心的成功变革可以消除对于有目的的集体社会改革的需求，一些杰出的福音派人士之所以反对社会和政治改革，正是由于这些改革没有将个人灵魂的重生作为目标。⁹² 然而事实上，大觉醒不仅是和信条激情类似，它还是后者的先导，在时间上与之重叠；特别是在信条激情爆发的初期，大觉醒为之贡献了思想、技

术、参与者和激情。在18、19世纪，大觉醒的宗教热情能够很容易地转化为政治改革的热情。就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及政治根源而言，第一次大觉醒中福音派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至少和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主义同等重要。阿兰·海默特（Alan Heimert）认为：“1740年觉醒的殖民地人民想到的无非是独立和反抗。”另一位学者写道：“作为政治运动的美国革命深深根植于四十年前第一次大觉醒的土壤中，因此可以认为革命乃是这场深入广泛的宗教运动的自然产物。”⁹³ 第二次觉醒则被称作是美国人“以宗教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内向的、精神的、福音派的、宗教复兴的第二次美国革命”。⁹⁴ 而以禁酒和废奴运动为标志的杰克逊主义伟大改革浪潮，则是以政治形式进行的宗教运动。宗教复兴主义是整个19世纪社会改革的主要源头。⁹⁵ 但是到了19世纪末，相对于此前宗教与政治激情之间的互动，第三次宗教觉醒同进步主义改革动机之间的联系变弱了。清教伦理是妇女选举权和禁酒运动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改革并未代表不断增长的城市工人的利益。⁹⁶ 个人救赎与社会改革至此分道扬镳。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分离趋势更为明显。在五六十年代的宗教复兴和六七十年代的信条激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以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及组织在民权运动的发展、胜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很明显，第四次觉醒的矛头没有指向位于政治日程表前列的社会与政治改革。葛培理与纳德之间的相似点显而易见，但二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尽管如此，他们都立足于同样的新教道德激情，无法容忍在应然的理想和实然的现状之间存在鸿沟。

自由与平等两种思想在美国的兼容共存，与二者在欧洲的激烈对抗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历史中的宗教与政治、宗教运动与政治改革也相互增强，虽然有着宪政和制度层面的政教分离，但这可能正是相互增强趋势的部分原因所在。清教革命的激情在彼此互动的宗教与政治浪潮中不断重现，这两股浪潮同宗同源，形式类似，动员的群体相

近，造成的结果相同。那些被唤起去变革自己内心的人，同样可以被唤起去改革社会。在大觉醒和信条激情时期，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人和制度都难逃惊涛骇浪的洗礼。美国政治与宗教信念的共同源头既给宗教添加了政治的成分，又为政治灌输了宗教的激情。

1. John Israel,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Ideology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almers Johnson,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 25.

2. Ibid.

3. Milton B. Singer, "Shame Cultures and Guilt Cultures," in Gerhart Piers and Milton B. Singer, *Shame and Guilt: A Psychoanalytic and a Cultural Study*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53), p. 45.

4. See Richard W. Wilson, *The Moral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pp. 20ff. Lowell Dittmer, "Thought Refor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ymbolism of Chines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March 1977): 78-79.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p. 96.

5. 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China Quarterly* 58 (April-May 1974) : 257. Paul J. Riniker,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Chinese Reality: Dissonance under Mao*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7).

6. Dai Hsiao-ai, quoted in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p. 305.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326-328, 340-343.

7. Riniker, *Revolutionary Ideology* , p. 17. Dittmer, *Liu Shao-ch'i* , pp. 305,314.

8. Dittmer, "Thought Reform," pp. 75-78, and *Liu Shao-Ch'i* , p. 297.

9. Alan P. L. Liu,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Clio Press, 1976) , pp. 24ff.

10. George P. J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 9, pp. 26, 29.

11. See Israel, in Johns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 pp, 14-15, 22-24.

12. Benjamin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s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John W. Lewis,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55-156.

13. Ibid., p. 165.

14. James R.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pp. 335-336.

15. Richard M. Pfeffer, "Leaders and Masses," in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March 1973), p. 165. Lucian W. Pye, "Mas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Its Limitations and the Continuity of Culture," in 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 30.

16. Michel Oksenberg, "On Learning from China," in Oksenberg,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 p. 8. Townsend, *Politics in China* , p. 145.

17. For an intricate analysis of political cycles in China, see G. William Skinner and Edwin A. Winckler,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in Amitai Etzioni, ed., *Complex Organization: A Sociological Reader* ,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pp. 410-438. They identify eight two-to-three-year cycles between 1949 and 1969.

18. C. P. FitzGerald, "Mao's Tse-Tung's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June 1974): 800.

19. Richard Baum, "Ideology Redivivus," in Baum, ed., *China in Fer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pp. 70-71. See also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52-253.

20. Richard M. Pfeffer, "The Pursuit of Purity: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aum, ed., *China in Ferment* , p. 207.

21.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8.

22. See Ted R. Gurr, *Rogues, Rebels, and Reformer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Urban Crime and Conflict*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p. 171-172, and, for a classic account of how reporters made a crime wave and how Theodore Roosevelt stopped it, Lincoln Steffens, *Autobiograph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1), pt. 2, ch. 14.

23. Theodore J. Lowi, *At the Pleasure of the Mayor*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4), pp. 182-183.

24.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Macmillan, 1909), p. 141.

25. Ronald G. Walters, "The Erotic South: Civilization and Sexuality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 *American Quarterly* 25 (May 1973): 177.

26. David Donald, *Lincoln Reconsidered: Essays on the Civil War Era* (New York: Knopf, 1959), pp. 22-23.

27.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 pp. 23-27.

28. For leads into this literature, see John Wilso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Michael Useem, *Protest Movements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5). Joseph R. Gusfield, ed., *Protest, Reform, and Revolt: A Reader i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John Wiley, 1970).

29. See Ted R.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2-59.

30. See Donald, *Lincoln Reconsidered* , pp. 19-36, and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Knopf, 1956), pp. 134ff. For critiques of these interpretations, see: Robert A. Skotheim, "A Note on Historical Method: David Donald's 'Toward a Reconsideration of Abolitionist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5 (August 1959): 356-365 ; Richard B. Sherman, "The Status Revolution and Massachusetts Progressive Leadership,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8 (March 1963): 59-65 ; Jack Tager, "Progressives, Conservative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us Revolution," *MidAmerica* 48 (July 1966): 162-175 ; and Robert W. Doherty, "Status Anxiety and American Reform: Some Alternatives," *American Quarterly* 19 (Summer 1967): 329-337. Hofstadter and other scholars also analyzed McCarthyism and other rightist movements of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n terms of status politics. See 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Righ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3). For a stimulating and insightful effort to synthesize several theories on the origins of social upheaval in terms of a cognitive dissonance approach, see James A. Geschwender,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Social Forces* 47 (December 1968): 127-135.

31. Hofstadter, in Bell, *Radical Right* , pp. 98-99.

32. See Herbert Moller, "Youth as a Force in the Modern Worl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0 (April 1968): 237-260.

33.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Youth and Politics," in Robert K. Merton and Robert Nisbet, eds.,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pp. 754ff, and Lipset, in Lipset and Gerald M. Schaflander, *Passion and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p. 125, 133-139, 142-149.

34. Anne Foner, "The Polity," in Matilda White Riley, Marilyn Johnson, and Anne Foner, *Aging and Society* (New York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2), 3:148.

35. William N. Chambers, "Party Development and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in William Chambers and Walter Dean Burnham, eds.,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30. The cyclical evolution of American party . systems has been noted and analyzed in the work of Arthur N. Holcombe, Samuel Lubell, V. O. Key, Jr., Philip Converse, Charles Sellers, and Walter Dean Burnham.

36. Hofstadter, *Age of Reform* , pp. 16ff. Lowi, *At the Pleasure of the Mayor* , ch. 8, "The Reform Cycle. " William J. Crotty,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7), ch. 9, "The Reform Cycle. "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American as Refor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4. Nathan Glazer, "Towards an Imperial Judiciary," in Nathan Glazer and Irving Kristol, ed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976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p. 104- 106. Glazer argued that the historical activism-quietism cycle was giving way to a lasting expansion of the judiciary's role.

37. Arthur M. Schlesinger, Sr., *Paths to the Pres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pp. 89-103. James David Barber, *The Pulse of Politics: Electing Presidents in the Media Age*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38. J. Zvi Namenwirth, "Wheels of Time and the

Interdependence of Value Change i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 (Spring 1973): 649-683, and Namenwirth and Richard C. Bibbee, "Change within or of the System: An Example from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Values," *Quality and Quantity* 10 (June 1976): 145-164.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4 (January 1952): 239-273, and "Cyclical Tren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od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n Charles W. Kegley and Patrick J. McGowan, eds., *Challenges to America: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Sag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Foreign Policy Studies, vol. 4, 1979), pp. 37-55.

39. P. M. G. Harris, "The Social Origins of American Leaders: The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Warren Center for Studies in American History, 1969) 3: 159-346. David McClelland,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ress, 1975), pp. 330-359.

40. Schlesinger, *Paths to the Present* , pp. 96-97. Namenwirth, "Wheels of Time," p. 679. Klingberg, "Historical Alternation," pp. 271-273.

41. Clarence L. Ver Steeg, *The Formative Years: 1607-1763* (New York : Hill and Wang, 1964),pp. 129-130.

42.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51, 172.

43. Ver Steeg, *Formative Years* , p. 149.

44. Richard Maxwell Brown,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Stephen G. Kurtz and James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pp. 86-87. Charles M. Andrews,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Andrews, ed.,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1675-169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p. 4.

45. David S. Lovejoy,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ch. 16.

46. Brown,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87.

47.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

48. 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p. 123.

49. Ibid., pp. 11 Off.

50. Austin Woolrych,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and "Purita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 W. Ives, e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00-1660*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8), pp. 20, 89.

51. Ston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p. 144.

52. Woolrych, "The English Revolution," p. 87.

53. Ston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 pp. 91, 99.

54.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pp. 12, 14, 294.

55. Ibid., p. 306.

56. Thomas Case, quoted in Walzer,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 pp. 10-11.

57. Ralph Waldo Emerson, "Man the Reformer," in Emerson, *Prose Works* , rev. ed. (Boston: Fields, Osgood, 1870) 1: 125-126.

58. William Lee Miller, "American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Attitudes," in James Ward Smith and A. Leland Jamison, eds., *Religiou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84-85. Philip Schaff, *America: A Sketch of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racter*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72. Charles L. Sanford, *The Quest for Paradise: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Moral Imagin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1), p. 74.

59. H. 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1956), pp. 17ff. Sanford, *Quest for Paradise* , pp. 54-55.

60. H. Richard Niebuhr,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ames Ward Smith and A. Leland Jamison, ed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7.

61. Schaff, *America* , p. 72.

6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1: 314.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 140-150.

63.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1 :46.

64. Quoted in Lipset, *First New Nation* , p. 155.

65. Cushing Strout, *The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Political Relig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p. 51-52. Krister Stendhal, quoted in William G. McLoughlin and Robert N. Bellah, eds., *Religion in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p. xv.

66. John Higham, "Hanging Together: Divergent Un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June 1974): 13. See also Conrad Cherry, "Two American Sacred Ceremoni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21 (Winter 1969): 754. Sidney E. Mead, *The Lively Experi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67.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1 : 311. Miller, in Smith and Jamison, *Religious Perspectives* , pp. 105-113.

68. John Edwin Smylie, "National Ethos and the Church," *Theology Today* , October 1963, pp. 313-318, quoted in Cherry, "Two American Sacred Ceremonies," p. 750. On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see also: Robert N.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in McLoughlin and Bellah, *Religion in America*, p p. 3-23; Russell E. Richey and Donald G. Jones, eds.,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assim; Sidney E. Mead, "The 'N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 *Church History* , 36 (September 1967) : 262-283; and Mead, *Lively Experiment* , pp. 1 34ff.

69. G. K. Chesterton, *What I Saw in America* (New York : Dodd, Mead, 1923), pp. 11-12.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2, 1975, p. 1.

70. D. W. Brogan, *The American Character*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59), p. 164.

71. Mead, "The 'N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 " p. 275.

72. Edward M. Bums, *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1. On American millennialism, see also Sanford, *Quest for Paradise*; Niebuhr,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 Strout,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Russel B. Nye, *This Almost Chosen People* (Lansing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 Conrad Cherry, ed., *God's New Israel: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Destiny*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1971).

73. This dating generally follows that of William G. McLoughlin in *Revivals, Awakenings, and Reform: An Essay o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 1607-1977*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For slightly different dates, see his earlier writings : *Modern Revivalism: From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 (New York : Ronald Press, 1959), pp. 7-11, and *Billy Graham: Revivalist in a Secular Age* (New York : Ronald Press, 1960), pp. 7-11.

74. Donald G. Matthew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s an Organizing Process, 1780-1830 : An Hypothesis," *American Quarterly* 21 (Spring 1969) : 25.

75. McLoughlin, *Revivals, Awakenings, and Reform* , pp. 2, 10-11, 23.

76. Strout,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 pp. 42-43.

77. Alan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1, 481. William G. McLoughl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Religious Revival : 'The Millennium in One Country,' " *New England Quarterly* 40 (March 1967) : 99ff.

78. Richard L. Bushman, ed., *The Great Awakening* (New York : Atheneum, 1970), p. xi. Sidney E. Ahlstrom, "National Trauma and Changing Religious Values," *Daedalus* 107 (Winter 1978) : 19-20.

79. McLoughlin, *Revivals, Awakenings, and Reform* , pp. 52-53.

80. Richard L. Bushman, *From Puritan to Yanke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89-192.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 p. 32.

81. Whitney R. Cross,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75-76. For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causes of the awakening in Rochester, see Paul E. 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New York : Hill and Wang, 1978).

82. Matthew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pp. 27, 32, 34.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 p. 534.

83. Bushman, *From Puritan to Yankee* , p. 192.

84. Strout,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 pp. 38-43.

85. Bushman, *Great A wakening* , p. xii. Mead, *Lively Experiment* , pp. 31-34.

86.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 p. 10.

87. William G. McLoughlin, " 'Enthusiasm for Liberty' : The Great Awakening as the Key to the Revolution," in Jack P . Greene and William McLoughlin, *Preachers and Politicians* (Worcester, Mass. :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977), pp. 65-70.

88. Harry S. Stout, "Relig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4 (October 1977) : 519-541.

89. William G. McLoughlin, Jr., *Billy Graham: Revivalist in a Secular Age*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0), pp. 15-18, and *Modern Revivalism: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9) , passim.

90. William Warren Sweet, *Revivalism in America: Its Origin, Growth, and Decline* (New York : Scribners, 1944), p. 31. Matthew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pp. 36--37. Cross, *Burned-Over District* , p. 356.

91. Niebuhr,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pp. 24, 31-32.

92. McLoughlin, *Modern Revivalism* , p. 526.

93. Alan Heimert, quoted in McLoughl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Religious Revival," p. 99. McLoughlin, " 'Enthusiasm for Liberty,' " p. 48. See also Strout,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 ch. 4, and Mead, *Lively Experiment*, p p. 34-35, 52, 61-62.

94. Matthew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p. 35. Robert N. Bellah, *The Broken Covenant* (New York : Seabury Press, 1975), p. 44.

95. Sweet, *Revivalism in America* , pp. 152ff. Timothy L. Smith,

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57). Gilbert Hobbs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New York: D. Appleton Century Co., 1933). John L. Hammond; *The Politics of Benevolence: Revival Religion and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Norwood; N.J.: Ablex, 1979). McClelland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 among religious revivals, reform, and war in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p p. 346--359.

96. See Alan P. Grimes, *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sp. p. 71, and, more generally, Paul Boyer, *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第七章 S&S时期： 1960—1975年

50—70年代：变化回应模式

历史性时代的高潮通常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家能轻松地说出文艺复兴、废奴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在何时达到顶峰。然而时代的起点和终点总是湮没于历史的复杂性、模糊性和渐进性之中。构成美国独立以来第四次信条激情时期的“S&S时期”（era of sixes and sevens, S&S Years）也是如此。^{1*} 这一时期的高潮显然出现于1968年至1971年，但是开头和结尾的时间呢？也许始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某个时间点？结束于70年代中期或晚期的某个时间点？任何特定的起点和终点都只能用于象征性目的。但这种做法仍然有用并且具有潜在启发性，第四次信条激情的象征性起始时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精确地识别出来。

S&S时期始于1960年2月1日，当时四名黑人大学新生走进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的一家伍尔沃斯餐厅，坐在餐台前点了咖啡，在遭到拒绝后选择了静坐抗议。而第四次信条激情的终点差不多正好是十六年之后的1976年1月29日，众议院在那一天以246票对124票通过决议，在白宫对国会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作出澄清之前将不会公布该报告。格林斯伯勒的静坐开启了S&S时期第一幕的政治抗议运动，而众议院的投票标志着主导这一时期尾声的曝光

政治的终结。这一时期起始于美国生活中民主理想和现实行为之间差距最为显著的领域，其最为重大的公共政策成果便是终结了政府对种族歧视的支持。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代的主调在针对几乎所有权威的普遍的、无情的质疑与反对声中得以确立，并随着1974年“国王之死”达到高潮——美国政治的核心权威人物被赶下台，而他刚刚在一年多以前以压倒性优势被民众选入白宫。数月之后，这个时代以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被曝光而告终，在这些机构身上，强调公开和民主的美国价值同保密和欺骗的工作需要存在明显冲突。种族主义遭到废除、总统被迫辞职、情报机构陷入瘫痪，这些强有力的证据表明，S&S时期对于不平等、权威、等级秩序和保密制度的攻击至少取得了部分成效。

从1960年到1976年，美国政治表现出了只有在信条激情早期阶段才有的激烈和情绪化倾向。这期间政治生活的大部分参与者主要采取了道德主义的方式回应理想/现实间的鸿沟。然而，冷漠自满、自欺欺人和犬儒主义同样也有所表现。这些回应模式的相对重要性因时而异，主要取决于人们对理想/现实间的鸿沟的认知水平，以及他们致力于实现美国理想的热情程度。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美国人面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时的反应模式的循环正符合本书之前提出的逻辑。对于政府权威以及旨在解决问题的政府行为的主流态度的变化也同这一进程有关。（见表 5）由此，S&S时期始于冷漠，终于犬儒，而位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强烈的道德主义。信条激情时期的几乎所有特征都得以显现出来，未来的许多年内美国政治系统的运转都将受此影响。

表 5 不同类型的反应模式在S&S时期出现的时间

对待政府行为的 普遍态度	对待政府权威的普遍态度

支持	反对	
支持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	60年代初期
	道德主义	自欺欺人
反对	70年代后期	50年代中后期
	犬儒主义	冷漠自满

冷漠自满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政治冷漠和自我满足是50年代中后期的流行心态。经历了50年代初因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而起的尖锐分歧之后，艾森豪威尔在事实上实现了其目标——“更加宁静和谐、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¹。这一时期的美国人在总体上支持政府权威，但也认为没必要让政府更加强大大积极。心满意足构成了主流氛围。直到50年代末，人们也没能清楚地认识到理想同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实现美国政治价值的强烈意愿。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50年代中期写道，这些价值“源自专属于我们的特定地理和历史事实”。从历史上看，美国人总是“把‘实然’和‘应然’混为一谈”，美国制度中也暗含着美国价值。“在这块新大陆上，能够建设什么为应该建设什么提供了参考标准”。²在布尔斯廷看来，环境、制度和价值都是某种无缝网络的组成部分——美国历史缺少的正是制度与理想之间显著而直接的对比。

在信条激情处于消沉的50年代，对于权力集中和滥用的担忧仍然位于美国民众思想意识的边缘地带。共识主义和组织多元主义两种范式相结合，构成了美国政治的流行形象。多元化大型组织（否决集团）的权力不仅时常给政府行动造成麻烦，还让大肆滥用政府权力成为不可能。50年代还出现了对美国思想传统短暂而显著的反动。令当时的思想家们颇感兴趣的观点认为，大型组织具有善的本质。相比小型商业组织，大型商业组织更加负责、开明，更可能为公共利益采取

行动。小商人也确实比大商人更有可能成为思想狭隘、抱有偏见、贪得无厌之徒或是麦卡锡参议员的拥趸。这种观点不仅接受大型组织的存在，还为其辩护正名，最具名望的辩护人士中有不少曾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李普塞特认为，“大型组织的增长”可能“在实际上导致更为重要的结果——为持久自由创造新源泉，为创新提供新机遇”³。反对大规模组织、大型公司、权力集中和军国主义的观点则被打入了政治光谱中的极左或极右行列。像米尔斯这样的学者可以出版一本雄辩滔滔、激情四射的作品，并将之命名为“权力精英”，但是要等上十年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在此期间，美国人相信共识主义和多元主义，认为它们既是事实，又是价值。

50年代降至低点的政治疏离感反映出冷漠自满的心态。公众对三个用于测量疏离感的关键问题的回应显示，1956年的水平显著低于1952年，而1960年又低于1956年。然而从1960年起这一趋势开始扭转，疏离感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一直在稳定增加⁴。总之，50年代的尾声见证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系统满足感与认同感的顶峰。因此下述事实变得不足为奇——当1960年的美国人被问起对本国的哪个方面最为骄傲时，85%的公众提到了美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

50年代的氛围使知识分子相信，意识形态正在趋于衰退和终结。这种看法最初是由于受到了战后西欧国家复苏的刺激，1955年民主国家知识界和政治界人士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之后，它成为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常识。这次会议使人们发现，左右翼之间的分歧已经缩小，二者具有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在面临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挑战时）。“事实上，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被解决：工人得到了产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保守主义阵营接受了福利国家，民主左派承认全面加强国家权力对自由造成的威胁大于对经济问题的缓解”⁵，结果就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正在从民主政治中消失。具体而言，“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衰落”指的是以下几种情况：

（1）法西斯主义被消灭（因为战败），共产主义（等同于苏联）也

不再作为民主社会的可能选项；（2）在知识分子和公众中间，围绕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选项、政治力量、远大目标和乌托邦理想的讨论日趋式微；（3）民主国家主要党派之间在政策和计划方面的政治差异不断减少；（4）社会经济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正在减弱。

对于持意识形态终结论观点的理论家而言，出现上述情况的基本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经济繁荣的稳定扩张。这显然表明马克思是错误的，繁荣使产业工人阶级更容易作为完全参与者被吸纳进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中，大大增加了中产阶级规模，并且使国家有可能提供竞争性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社会安全与福利。用约翰·肯尼迪的话来讲，结果就是“政治将会从哲学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蜕变为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式和手段”⁶。

鉴于混合经济、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取得的胜利，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支持者或公开或含蓄地表示，他们描述的这股潮流不仅普遍适用于发达工业社会，而且反映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不可逆需求。然而即便如此言之凿凿，意识形态终结论也没能被事实证明。

首先，该理论未能充分考虑美国与欧洲社会在历史发展方面的基本差异。在它被提出的时候，哈茨等学者正在强调美国自由主义共识政治同典型的欧洲阶级意识形态政治之间的区别。由于这些区别，即便是同样的持续经济增长与繁荣，也可能并且确实在不同的地方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富足创造了阶级冲突缓和的基础，减少了主要政党在政策方面的分歧，并且至少暂时地平息了意识形态大争论。而在美国，繁荣没有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欧洲实际上也没有），反而为美国道德主义重新焕发生机创造了经济前提。在美欧两地发生的看似相同的事情，实际上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在欧洲是阶级冲突的长期缓和，在美国则是思想冷漠的短暂流行。

其次，肯尼迪总统曾在1962年宣称，由于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变

迁，以后将不再需要“曾在以往的20世纪历史中经常扰乱这个国家的那种伟大‘激情运动’”⁷。他彻底错了。然而欧洲知识分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终结的失败证明了美国共识的终结、“政治学说的开端”以及这些学说间的冲突——这真是“以偏概全”（“ex unibus plures”）！⁸ 那些被错误地理解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说冲突开端的事情，实际只是政治道德主义的这一美国共识产物的复兴。事关基本价值的美国共识并未在60年代土崩瓦解，而是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道德主义觉醒的影响下，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生活成为美国政治史上鲜明而独特的一页。政治的议程、话语、问题、紧张程度、分歧、参与者、活动形式，全部都带有显著特点。因此，S&S时期的政治和50年代末、70年代末的政治有着很大不同。1960—1976年，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行为量化指数曲线呈马蹄形凸起状，揭示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生活的独特形象。抗议、曝光、改革，这些在平时意义有限、在激情时期却十分常见的行为，成为这十多年的时间中主要的政治活动形式。作为这一时期事态发展的结果，70年代末的政治也显著不同于50年代末的政治。更具体地讲，政治态度的内容、政治制度的结构与权力在S&S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代表了20世纪最后25年美国政治的信条激情留下的持久遗产。

自欺欺人的插曲和道德主义的激荡

50年代末，尤其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引起美国人的觉醒和忧虑后，社会上的冷漠自满心态开始退潮。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60年成立了国家目标委员会（Commission on National Goals），反映出当时要求国家再次努力实现美国价值的呼声。肯尼迪在竞选和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出对美国自由价值越发强烈的关注和承诺。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肯尼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强调在面临苏联威胁之时实现这些价值的重要意义，以及“使国家重获生机”的必要性。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仍然高度支持政府权威，并且强烈赞同政府在国际领域采取积极行动。正是在肯尼迪任内，美国在和平时期的军费增长水平突破了历史纪录。他的就职演说准确描绘了当时的普遍反应，人们几乎完全致力于在海外推进美国价值，而忽视了这些价值在国内社会的实现。除了进展缓慢的民权运动，美国人对国内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几乎视而不见。想要一边鼓动美国人在国际上捍卫自由，一边让他们直击国内面临的自由匮乏与威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一些人在从冷漠自满向道德主义转换的过程中曾出现了短暂而有限的自我欺骗心态。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未经任何迂回，直接从消极分子变成了改革的积极拥护者——60年代初期和平队（Peace Corps）和民权进军的成员都参与了60年代末的反战示威运动。肯尼迪兄弟显然是冷酷实用主义政治的熟练玩家，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能够代表、利用当时美国民众追求更高目标的强烈愿望。正如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1960年看到的那样，这个国家表现出“对于某种未知事物的紧张、不安和渴望，这种事物也许就是道德”⁹。

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惜代价，勇挑重担”以保卫自由的意愿没能成为持久的主题。起初，肯尼迪有意让国内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只在政治利益需要的范围内支持民权运动。但是到了1963年，他开始倾听愤怒的呼声。民权斗争在黑人和白人活动家中引发的道德激情扩散到其他领域，尤以反对美国干预越南战事的运动最令人瞩目。外向型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内向型的道德愤慨所取代。美国政治制度在精英和大众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美国政治似乎与他们之前想象的应然情形截然不同。对权威的尊重急剧下降，同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弥合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呼声越发强烈。重要的政治活跃团体将强烈的道德主义推向了前台。

任何量化手段都无法轻易测量出道德信念的强度，但60年代道德

信念的增强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如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过的，这个时期

见证了美国民主精神的重大复兴……抗议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揭露并纠正不平等的冲动在这块土地上传播。60年代的主题就是杰克逊民主党和扒粪的进步党人的主题，它们都体现了根植于美国传统的思想与信念，但只有60年代才拥有如此强烈的激情。这十年证明了民主理念的生命力。这是民主浪潮汹涌澎湃的十年，是重申民主平等主义的十年。 10

60年代以不亚于此前任何一次信条激情的激烈和狂热程度，重新阐述了平等、民主、自由、个人权利、限制权力等一系列美利坚信条的经典价值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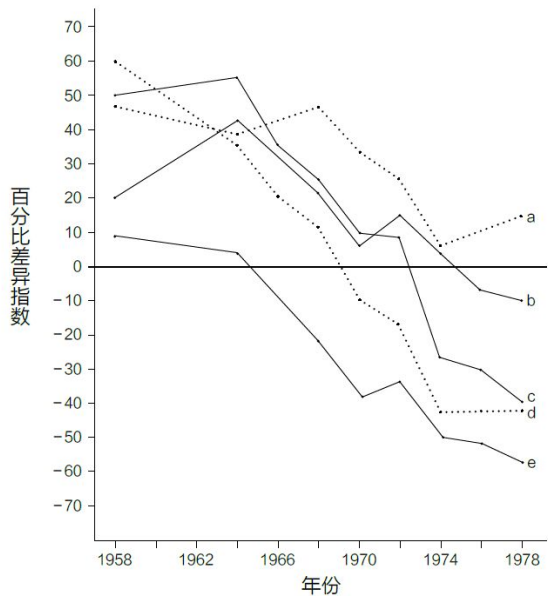


图 1 测量政府信任水平的五个指标的百分比差异指数。对政府表示较高信任程度的人群所占百分比-对政府表示较低信任程度的人群所占百分比 = 百分比差异指数（PDI）。（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in Warren E. Miller, Arthur H. Miller, Edward J. Schneider,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ourcebook, 1952-197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57-259）

- a. “管理政府的人当中有多少是不正直的？几乎没有，不太多，还是相当多？”PDI=“几乎没有”+“不太多”-“相当多”。
- b. “管理政府的人几乎全都是了解自己所做之事的聪明人吗？或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PDI=“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 c. “你经常相信联邦政府能做正确的事情吗？一直相信，大部分时候相信，还是仅仅在某些时候相信？”PDI=“一直相信”+“大部分时候相信”-“有些时候相信或从来不相信”。
- d. “你认为政府是被某些自私的大利益集团控制，还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PDI=“为所有人服务”-“为某些大利益集团服务”。（1958年这个问题的文字表述和其他年份有所差别。）
- e. “你认为政府人员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很多，一些，还是不多？”PDI=“不多”+“一些”-“很多”。

从冷漠自满到投身美利坚信条，伴随这一转变的是美国人对于美国政治系统看法的改变。民意调查显示了这些变化。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图 1显示了人们对五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情况的变化趋势。1964年，64%的公众认为政府运作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29%的人认为政府被某些只顾自己好处的大利益集团操纵。1974年的比例则差不多正好反过来：66%的人认为政府被大利益集团控制，25%的人认为政府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对其他几个问题的回答上，如能否相信政府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政府是否会浪费纳税人的钱、操控政府的是智者还是骗子，等等。对于政府回应公共舆论的情况，人们给出的回答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在1960年，认为“政府官员不太关心像我一样的民众的看法”这一陈述为假的民众比例为73%，相信这是真实情况的只有25%。到了1974年，25%的民众改变了看法——50%的人相信官员不关心他们的想法，持相反观点的则为46%¹¹。

公众观念的变化并不局限于对政府的看法。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

初，人们对美国社会其他诸多机构的信心水平出现断崖式下滑。从1966年到1976年，对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有着“强烈信任”的民众比例从41%跌至11%，对国会的信任率从42%变为9%，最高法院则从51%变为22%。同样在这十年间，人们对其他领域领导人的信任比例同样大幅下跌，其中，医药领域从73%降至42%，高等教育领域从61%到31%，军队从62%到23%，大公司从55%到16%，宗教组织从41%到24%，劳工组织从22%到10%。在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中，只有电视新闻行业的领导人在这十年间获得了上升的民众信任率（从25%到28%）¹²。

更为强烈的自由民主价值信仰，再加上对政府和其他机构日益增长的反感，必然使道德主义和反对权威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愤怒、抗议以及时常由此引发的语言和行为暴力，构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政治音调。政治的议题无关物质分配的多少或者领导人胜任与否，人们关心的是是非对错问题。

经济问题不再位于政治议程表的前列，这正是S&S时期的核心特征之一。从1950年至1959年，认为经济是“当前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民众比例平均为23.6%；从1971年至1972年，平均有21.5%的民众认为经济问题具有关键意义；从1973年到1979年，持相同观点的人猛增至71.7%。然而在1960—1970年期间，只有11.1%的人认为经济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民权、对外政策、越南战争、犯罪和失序、政府诚信等问题取代了经济在民众关切中的优先位置¹³。

信条政治和“常规”政治的区别具体地体现在新左派（New Left）和旧左派（Old Left）的不同上。塑造旧左派的是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他们进行的斗争是传统的，为的是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劳资谈判、就业保障、工资水平、社会保险及相关利益。30年代的主要议题是经济问题，不同阶级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决定了社会分裂线的位置¹⁴。旧左派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马克思和半马克思主义

(semi-Marxist) 的语言塑造了其思想。60年代的新左派则脱离了工人阶级，强调道德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正如学生民主促进会的第一任主席于60年代初宣称的，“革命和粗糙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要么被抛弃，要么被大幅修正”，新左派“源自作为绝对真理的道德价值”。其他早期新左派活动家也同样认为，这场运动必须强调“道德问题而非意识形态”，“新一代激进分子以原初的道德意识形态为标志”¹⁵。更直白地讲，新左派坚定地把在实践中实现美国政治根本价值作为自己的目标。60年代中期的一份学生民主促进会声明认为，“新左派的源头不是意识形态（阶级）冲突，正相反，它来自对主流美国意识形态某些特征的庄严承诺”。“对黑人公民权利的否定导致了新左派的崛起。这种行为和强调机会平等、民主权利的主流话语形成了直接冲突”。¹⁶

新旧左派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关心经济问题的阶级政治和重视道德问题的信条政治之间的区别。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作为当时政治精神主流表现形式的所谓新政治（New Politics）之所以不同于旧政治（Old Politics），就在于前者并未打算简单地借助现存制度来获取物质好处，而是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制度更彻底地实现美国价值。

政治态度的变化更明显地反映在“公众对政治生活进行概念化的方式”当中。在第四次信条激情的高潮时期，人们“更愿意根据政策议题和意识形态选择候选人和政党”，同时也倾向于在政治问题上采取连续的、坚定的立场。结果，在1964年、1968年和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将意识形态作为投票依据的公众比例既高于此前的选举，也高于1976年的选举¹⁷。（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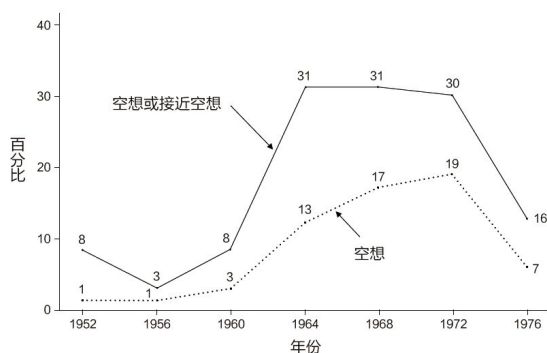


图 2 总统候选人的意识形态评估1952—1976。[资料来源：Norman H. Nie,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7.]

据报道，当被问及70年代初期美国的道德状况时，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回答说：“我们有被它吞噬的危险”¹⁸。他显然低估了事态，我们的确被道德洪流湮没了。但S&S时期的道德主义也具有大众性质。在私人领域和私人行为方面，旧的道德标准遭到挑战和破坏，经常为某些目的而被抛弃、废除。在公共行为领域，旧道德却再次得到伸张，重获生机，被一本正经地用来指导现实。这种道德主义的攻击目标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既存权威。道德的傲慢超越了权力的傲慢，十余年间，政治、商业、教育、宗教以及其他领域的权威都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和削弱。政治聚焦于等级秩序和官僚作风的丑恶——权力专断、回应迟钝、玩弄秘密、欺骗公众，等等¹⁹。结果，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有义务服从那些曾被认为在年龄、等级、地位、专业、品质和天赋等方面高于自己的人。在大多数组织中，纪律开始瓦解，地位差别变得模糊。每个团体都声称拥有平等权利参与与其相关的决策过程（也许还不止是平等参与）。

在美国，权威的基础通常包括组织地位、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合法竞争和民选代表。以等级制、专业能力和财富水平为基础的权威明显有悖于60年代的民主和平等思潮，于是这三种权威都遭到了猛烈抨击。在大学里，缺少必要专业知识的学生开始参与许多重大事项的

决策。政府的等级组织制也被削弱，下级更愿意无视、抨击和挫败上级的意志。总体而言，在政治生活中，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威遭到了挑战，改革措施得以引进，以揭露其影响并加以限制。源自法律和选举的权威不一定违背时代精神，但是只要有所不符，就会同样遭到抨击和限制。法官裁决和立法机构行动的合法性取决于二者在多大程度推进了平等和参与的目标（正如通常所做的那样）。“公民不服从”论认为，对道德不正确的法律采取不服从的态度，这终究是一件道德正确的事情。这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的守法行为取决于法律的内容，而不是法律生效的程序。民选的合法性显然与民主潮流相一致，但即便如此也难免时常被质疑，“绝对”代表的价值被抬高，对选任代表形成了挑战。

在美国，机构的合法性源于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如果人们认为某个机构偏离了这些价值（正如在第四次激情时期那样），那它就是不合法的²⁰。反过来，这种观念也为许多并非传统政治正常内容的行为解除了限制。“没有了纪律，就像琴弦绷断，听吧！刺耳的噪声随之而来！”来自莎士比亚的这句诗简明精炼地总结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政治状况。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68年提醒当选总统尼克松的话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机构（特别是政府机构）具有合法性，这种观念是维系社会团结的黏合剂。当它被削弱时，一切就会土崩瓦解。”²¹ 正是在60年代末，美国陷入了相当程度的混乱无序状态。

抗议活动的动员

和以往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S&S时期政治的特征也是打着改革旗号的抗议和曝光行动。这三种政治活动并非激情时期独有，但此时它们主导了政治生活，而其他活动形式（如政党、选举和利益集团政治等）则呈显著衰颓势。道德愤怒产生的激情驱使人们揭露丑恶、抗

议丑恶、革除丑恶。

政治参与的重大变化，以及主要针对民权问题和越战的抗议动员，成为第四次激情时期的早期阶段特征。在美国，政治参与率和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明显联系，这一点比其他大部分工业化民主国家都突出。这种总体上的联系并未在S&S时期发生改变。然而政治舞台上最活跃人群的构成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60年之前，黑人和青年人是美国社会中最少参与政治的群体。然而，对于美国理想与种族歧视、对外战争等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两个群体比其他人有更敏感的认知。因此60年代这些人的政治参与比率急剧上升，成了政治上最为活跃的群体，仿佛他们就是有良知的美国选民派出的政治奇兵。

1952—1960年的三次总统选举中，美国公众选举参与指数的平均值为13.3；而在1962—1976年的四次大选中，这个数字达到了17.3。这一变化完全是由于黑人选民参与的增加。前三次选举中白人选民的平均参与指数为18.7，后四次则为19.3。相比之下，黑人选民的参与指数从最初的—35.7飙升至后来的7.5²²。黑人政治参与的实际增长水平显然高于其缓慢提升的社会经济地位所预测的水平。在1952年和1956年的选举中，黑人竞选活动远低于根据其教育程度得出的预期水平；在1960—1970年间，前者却远高于后者。白人的竞选活动水平则相对稳定，始终比根据教育水平得出的预期值略高。到60年代末期，黑人的整体政治参与水平已经比以往大为提高，和白人基本持平，而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情况下，黑人往往比白人更具政治积极性。因此可以认为，民权问题凸显导致的群体意识增强是黑人参政率提高的原因²³。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通常会在政治上变得更为积极，直到五十多岁时积极性才开始下降；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变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在将近70岁的时候逐渐丧失参与的热情。26岁以下人群是各年龄组中政治参与度最低的²⁴。但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上述常规被打破了。那些在1965年约为18岁的年轻人在此后的八年间（到1973

年)平均参与了2.1次政治活动,而他们的父母只参与了1.7次。21—29岁的青年在1968年至1972年的选举中明显比那些年长一辈的人(44—64岁)更加活跃。总之,“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青年的确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得出人意料”。“这一时期年轻人的参与率比其他时期都高,他们也比同时期的年长者更积极。这两种模式都颇为反常和意外”。²⁵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各年龄段的自由派也比同年龄的保守派在政治上更为积极。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倾向于自由派,这也促使他们乐于参加政治活动。

人们一般将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看作是政治大鸣大放、大搞运动的时期,大批公民满怀热情地以不同方式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然而,人们在投票这一政治参与的最普遍形式中的表现却不符合这种印象。投票率在50年代显著上升,在60年代达到顶峰,此后直到1980年则持续稳定下降,并在1968—1972年间急剧下跌。如果说60年代是政治行动的十年,那又该如何解释这反常的情况?

60年代政治行动的目的提供了答案。在信条激情时期,政治的首要目标是抗议。政治抗议是通过集体行动表达对特定的条件、政策或官员的反对。它可以是合法的、和平的、分散的,也可以是非法的、暴力的、集中的。抗议既可以采取直接行动的形式,也可以是非暴力不合作;它可以包括会议、示威、座谈、骚乱、纠察队、集体进军、静坐、罢工等各种内容。在某些情况下,投票本身就是抗议的手段,不投票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更为有效、更令人满意的抗议方式。在60年代,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越来越不认可这句话:“投票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对政府运转发表看法的唯一机会。”但是在1952年,20多岁和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同意这种看法的比例几乎相同。一条小小的代沟在1960年出现了,20多岁的人当中有69%认可这个观点,而60岁以上的比例则为78%。到1968年,分歧进一步扩大,持同意看法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例分别为37%和62%²⁶。年轻人、黑人和其他选民丧失了对投票的幻想,转而参与各种其他形式的政治活

动。

结果和以前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在常规渠道之外实现政治参与的策略和领域大为增加。旨在让政治实践符合政治原则的新组织不仅在数量上变得更多，其活动强度也提高了。它们中既有激进和抗议的组织，也有温和的、改革的组织。1972—1973年对83个“公共利益”组织的调查发现，其中52个（63%）是1959年以后成立的²⁷人们还在新的层次上动员起来，参与到那些更具专业色彩、被认为是“非政治”的机构中——学生参加高校决策，股民叫板公司管理，军人要求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力，政府律师组织起来抗议司法部长的决定，牧师宣称反对主教。部分地由于民权运动胜利的刺激作用，但主要还是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美国社会的众多边缘群体，如妇女、印第安人、奇卡诺人、同性恋者、白种人族裔团体等，都在团体意识方面达到了新高度，并以更为激烈的形式从事政治活动。此外，和以往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代表那些无力自助者（儿童、残疾人、精神病人、犯人、动物）的组织开始变得活跃。

美国人好打官司的特点可谓举世皆知。信条激情时期这种倾向有明显增长。从1970年到1976年，联邦法院启动的民权案件从344件增加到5321件，个人反托拉斯诉讼从877件增加到1504件。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尝试用司法程序纠正暴露出来的社会错误。正如一个所谓的公益组织对公民的鼓动：“状告他们！状告国税局（IRS）！状告国会！把联邦机构送上法庭！连总统本人也别放过！你知道你可以的！”²⁸在爱默生看来，S&S时期到处都是“没完没了、费尽心机、发自内心的批评声音”，人们积极地主张并且尝试实现之前被自己忽视的权利。

政治参与不仅在横向上扩展出新的形式和渠道，还在纵向上得以延伸，由草根派和反对现有秩序的运动发起的抗议变得更加激烈。虽然单次抗议的时间有限，特定的抗议表达仍然会集中爆发，在信条激情时期更是如此。而且在自由环境中，抗议可以激发新的抗议，受到刺激的当局可能会采取强制或暴力手段，这种反应本身就被视为对美

利坚信条的破坏，使那些对抗议的最初内容不感兴趣的人也被动员起来。在曝光的政治中，政府企图掩盖丑恶是最吸引人的话题；在抗议的政治中，最吊人胃口的事情则是政府用强力镇压反对丑恶的抗议活动。在上述情况中，当局用违背信条道德的行动加以应对，实际上给更具感召力的抗议创造了条件。在自由社会中，特定议题吸引特定团体，而反对滥用权威则会吸引几乎所有的团体。

在60年代，抗议在动员公共舆论反对种族歧视和越南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静坐示威、自由乘车、民权进军等行动，以及南方各州当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经由大众媒体宣传和曝光后，为60年代中期颁布民权法案积聚了必要的公众支持。抗议策略非常符合媒体曝光的需要，对动员民众反对越战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座谈会、和平进军和示威等活动中也使用了类似方法。这些策略能够同时吸引公众和领导人的注意力，渲染了抗议者们对于信仰的坚定热情。如果不借助于抗议策略，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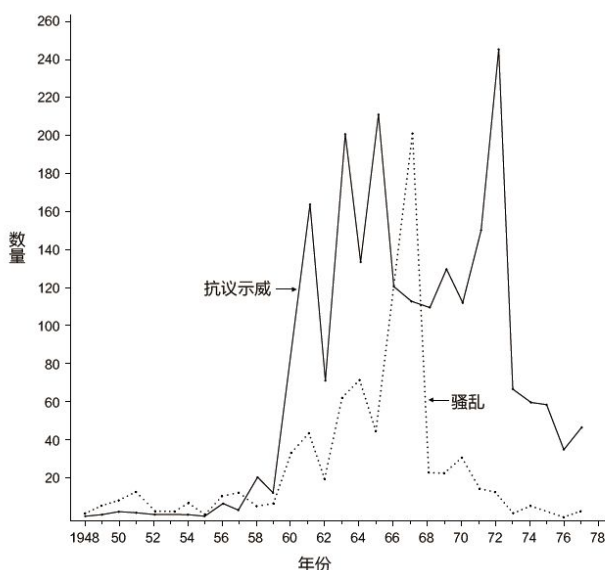


图3 抗议示威与骚乱的频率变化情况，1948—1977。[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in Charles Lewis Taylor and Michael C. Hudson,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88-89, 94-95, and Charles Lewis Taylor and David A. Jodice,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I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981).]

在S&S时期，政治上变得更活跃的人通常也倾向于采取更加激烈的抗议形式。1965年的18岁年轻人在此后的8年间投身抗议示威活动的可能性是他们父母的6倍，他们中六分之一的人会参与其中。黑人也比其他群体更愿意支持作为政治行动的示威活动，其中又以青年人和中产阶级最为积极²⁹。有关50—70年代抗议示威和骚乱事件相对频率的统计数据表明，抗议是S&S时期典型的政治参与形式（见图3）。1948—1959年，美国平均每年发生5次大规模示威；1962—197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44次。从1973年起示威的数量陡然下降，在此后的5年平均每年只有57次。

骚乱数量的变化与此相似：50年代很少，从1960年起急剧增加，1967年以后的5年中又大幅减少至每年22起，到1973年，年均骚乱次数已经跌至个位数。相关数据的曲线勾勒出那个抗议年代的大致轮廓。

许多美国人在信条激情时期投身于抗议浪潮中。然而激烈的抗议正是激进主义政治策略的特征。改革是为了让政治制度与实践符合美国理想与价值的要求。革命则是为了将旧的政治理想和制度一并推翻，并用一套不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那么激进主义又是什么呢？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它意味着改革还是革命？这两极之间似乎没有太多中间地带。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正是美国激进主义的本质。在被问及“你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那些回答“都是”或者“都不是”的人就是美国的左翼激进分子。由于各种原因（见第八章），美国的激进主义同时包含了主张改良和摧毁现存政治系统的人。就策略而言，双方都将抗议作为最主要的手

段。一方面，抗议活动避免将暴力作为首选工具，避免为了暴力而暴力。另一方面，抗议又远远超出了常规政治的陈规。它意味着走出会议室、立法院和投票站，“走上大街”参加大众行动，这些活动本身可能不违法，但包含着潜在违法的可能；或者是违法的非暴力行为，但可能很容易衍生出暴力。

因此，自由派改革分子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可以在动员和组织抗议的过程中走到一起进行合作。抗议有着不断缩短的半衰期。一大群人不可能一直处于高度义愤的状态，因而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应对失衡状态。他们可能会认为抗议已经取得实质上的成功，进而热情消退，感到满足，并寻求通过更加常规的政治行动实现特定的立法目标。他们也可能认为抗议是不成功的，自己的努力难以为继，由此产生犬儒心态。他们也可能反对包括政治理想和制度在内的整个政治系统，转而采取革命行动，试图摧毁、取代之。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学生民主促进会为代表的新左派组织和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为代表的黑人组织都采用激进策略追求改良主义目标。与其他激进派联合组织一样，学生民主促进会的成员“从温和派到毛主义者”无所不有；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公布了激进改革的总体目标，但它仍然没有超出美国激进主义在传统上的广义边界。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直到1964年，新左派实际上仍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相信美国的制度能够被改造，能够体现人尽皆知的政治理想。”³⁰ 然而改良主义在1964年以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1965年，学生民主促进会废除了其章程中的反共内容，向所有左翼分子开放成员资格³¹。其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对官僚集中控制的需求腐蚀了参与式民主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曾在多年前被旧左派视作过时意识形态加以排斥，现在又受到了欢迎。1968年大选之后，由于内部派系斗争造成的严重内耗，促进会开始拒绝和平抗议，转而采取暴力

手段。1969年10月芝加哥“复仇之日”（“Days of Rage”）的暴力抗议活动失败后，“气象员”（the Weathermen）（美国极端左翼组织——译者注）分子将促进会变成了革命组织，并在当年年底转入地下状态。1970年3月，三名气象员分子在纽约西区第十一大街的一幢建筑内自制炸弹时发生爆炸，该事件标志着从抗议到革命转变过程的结束。促进会一直是激进的，但是从休伦港到第十一大街，“激进”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巨大改变。它在早年间是激进的改革组织，希望实现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最后它变成了激进的革命组织，想要摧毁美国的自由制度。但是它无法作为激进的抗议组织持久下去，其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两类——像凯西·布丁（Kathy Boudin）那样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还有汤姆·海登（Tom Hayden）这种参与国会竞选的政客。

在民权运动中带头的抗议组织普遍经历了相似的变质过程。1960—1961年，共有数万人参与了上百场静坐示威活动，要求废除快餐店和其他商业设施内的种族隔离措施；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中，黑人和白人彼此合作，携手并进；25万人参加了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活动。被成功动员起来的大众支持为1964—1965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创造了政治环境，一些南方人粗暴地反对废除种族隔离的呼声，反而使这种动员变得更加容易。实现这些成果后，部分黑人领袖被权势集团的选举和官僚政治吸收进来，“从抗议转向了从政”³²。而其他人则认为民权组织应该向更激进的方向前进。1965—1966年，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改变了路线，用“黑人力”作为新口号，代替了原来的“自由”，对组织内的白人员工实行隔离和驱逐，反对越战，支持抵制征兵。与此同时，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放弃了其非暴力信条，转而支持黑人权力和加强北方的黑人社区组织³³。

从抗议到暴力，从群众基础广泛到支持者寥寥，从源自美利坚信条的理想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革命意识形态的理想，这是组织

转变的一般模式。也许最引人注意的是从共同目标到个体目标的变化，对于“黑人权力”“学生权力”和“工人权力”的要求鲜明地体现了这点。在美国政治中，如果一个团体公开声称获取权力是其目标，就等于承认它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像“黑人权力”这样的口号带有两个负面象征含义。首先，人们在总体上对权力持不信任态度，因此任何声称把权力作为目标的团体都会立刻遭到怀疑。其次，“黑人权力”暗示一个团体获得权力需要以其他团体丧失权力为代价。一个团体如此定义自己的目标将严重地限制其号召力。白人因美利坚信条的感召而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它们没有义务支持黑人权力。在美国社会，争取民权是不可抗拒的结局，夺取权力则是自掘坟墓的开始。

曝光的动力

美国政府一直比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政府更为开放。这是由于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国家”（“state”）。政府的事情就是公众的事情，因此理应受制于公众。这对大部分文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却是美利坚信条的基本内容。宪法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障，媒体对政治领域和政治过程的渗透，英国式“官方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的缺失，都体现了这一观念。结果是美国政府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更为广泛持久地暴露于自己的人民面前。

曝光有两种形式。调查型曝光用于揭露坏事，通常是媒体、国会委员会、执法部门等调查机构针对特定目标专门行动的结果。而监督型曝光则主要是要求公开或允许公开某类特定行为，以此阻止不道德行为。曝光政治通常来自调查型曝光，采取的形式包括阳光法案、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及要求报告游说开支和竞选献金的立法。美国的调查型和监督型曝光比其他国家更普遍。

政治公开性虽然一直存在，但其最高水平出现在信条激情时期。

除一些革命政权对其前任领导人的调查以外，美国政治权威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遭到的大曝光可谓现代史上前所未有。60年代形形色色的自由派、激进派团体和出版机构加强了对政府行动的曝光，尤其是那些涉及对外政策和越战的内容。然而直到1971年，当埃尔斯伯格找到愿意披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报纸时，曝光的伟大时代才真正来临。此后有关越战决策的内容被不断披露出来，1972年夏天又发生了“水门事件”，在此后的两年中，该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媒体的报道热点。（1973年5月到7月，“水门事件”一直是《纽约时报》的每日封面故事，只有三天例外。）³⁴ 牵扯进“水门事件”的庞大关系网被不断揪出，在许多记者看来，这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和大有前途的事业。此时尼克松录音带的内容又被逐渐披露出来，描绘出在任政治领导人漫不经心、陈腐平庸、动机卑鄙、视野狭隘的形象。

1973年秋天，副总统阿格纽由于受到调查和起诉而辞职，这可谓给“水门事件”火上浇油。次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这实际上结束了对“水门事件”的曝光，但这一年的整个秋季，媒体都在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曾被提名为副总统的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神秘外衣被剥了个精光，他的财富、生活方式、政治行动都被公之于众。1974年12月，《纽约时报》踢爆了中情局在国内从事情报活动的事情，接下来的一年，为了揭发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内安全机构的丑闻，媒体、三个政府调查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好事者展开了一系列的竞争与合作。监视活动，暗杀计划，拦截邮件和电报通讯，利用传教士、商人和记者作为特工，支持并资助他国的政党、媒体、政治领导人，制造虚假信息，特工的名字，试图推翻或削弱外国政府——将这些信息大白于天下是一种尤为凶残的美式疯狂，而在那些满腹狐疑的外国官员和公众看来也的确如此。曝光势头在1976年春天有所减弱，但是差不多有5年，政府内部工作和政府官员幕后行为在公众面前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揭露。

大曝光集中在S&S时期的后期。从表面上看，这颇为令人不解。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信条激情时期应该首先揭露不公正和不道德行为。华丽的辞藻被戳破，官员的面具被揭穿，让人们看到美国政治野蛮的、非美国的现状。这将迅速引发大规模抗议，进而导致改革，消除丑恶。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通常是改革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直到信条激情的最后时刻才出现曝光风潮，该如何解释这一明显反常的现象呢？

第一，抗议和改革都可以出现在曝光之前，因为它们的首要敌人——种族歧视和对外战争都是公开存在、显而易见的。费力揭穿这些事情毫无必要，重要的是将相关的事实传播给公众，全国性媒体（尤其是电视）完成了这项工作，给美国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正如在其他信条激情时期一样，媒体在S&S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60年代，这个角色主要属于电视，它将美国南方和南越正在发生的事情即刻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70年代，纸媒成为关键先生，揭露了华盛顿政府官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事实。电讯媒体在传播公共事件的过程中获得了影响力，纸媒则依靠揭露秘密和丑闻。由于前者的作用，早在曝光过程达到高潮之前，抗议和改革运动就能够形成很大的规模，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第二，行政机构是曝光行动理所当然的对象，国会和媒体则是其必需的代理人，只有当前者的权威被削弱而后者的权力被增强时，曝光风潮才会出现。揭露政府丑行的前提是政府权威被削弱，这是由曝光过程的本质决定的。抗议行动需要把反对政治权威的局外人动员起来，曝光则需要借助政治权威内部人的背叛。当政府和其他机构内部的权威与控制开始松弛瓦解，身处其中之人丧失了对领导者的忠诚并质疑其合法性的时候，曝光就具备了可能性。一次引起轰动的曝光行动需要一位埃尔斯伯格或者“深喉”（Deep Throat）的合作，70年代初此类告密者的出现证明了白宫、五角大楼和司法部权威的崩溃。美国政治中的被曝光者是邪恶的，但他未必强大，反而十分虚弱。曝光将丑行的证据公之于众，而曝光行为本身则表明了其虚弱无力，并反

过来加剧了这种虚弱。

历史上，国会委员会和报界有时也会承担调查工作，如军事、情报失误，在政府运转过程中因错误判断、沟通不畅、预见不足、管理混乱或纯粹的愚蠢导致的严重问题和事故，等等。然而这种曝光很少出现在激情时期，因为信条激情的敌人并非领导者无能，而是领导者作恶。曝光指向的是那些明显违反法律或道德标准的行为，如腐败、贿赂、欺骗、谎言、妨碍司法、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敲诈勒索等。在其他时候，负责调查中情局的国会委员会可能会追问，为什么刺杀卢蒙巴和卡斯特罗的行动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在1975年，没有人会对中情局的行动无能感兴趣，人们关心的是它奉命采取的不道德行为。要想出现这种类型的曝光，就必须存在一种普遍的舆论气候，使人们愿意相信领导人的丑恶，并且热衷于挖掘其丑恶。

政府权威虚弱是60年代政治生活的特征，也是70年代曝光政治的必要前提。尼克松就职的时候，他的政治劲敌和潜在敌人比任何前任都多。国会、全国性媒体、东部建制派、联邦官员，还有60年代兴起的抗议和改革组织，都被视为新政府的敌人（事实上的确如此）。评论家约翰·钱赛勒（John Chancellor）在谈到政府与媒体关系时认为，“其他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是爱恨交织，尼克松政府则只有绵绵恨意”。³⁵ 身处联邦行政机构的权力顶端，尼克松及其班子成员在谈及自身孤立脆弱的处境时也是一针见血、感慨良多。那些供职于行政部门的告密者做好了准备与媒体和国会合作，揭露尼克松政府的虚弱。权威受损又刺激了政府滥用权威，进而制造出更多可供爆料的丑闻。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也以相似的方式成为引人注意的攻击目标。1969年，对越战的不满情绪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为1971年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披露以及随后1975年对中情局的调查创造了条件。1975年春天，当美国最终被逐出越南时，国会委员会并未调查美国为何输掉战争，也没有要求文武官员为这一后果承担责任。国会更想追究的不是越战失败，而是官员的丑恶，这就需要寻找一个虚弱的目

标。回顾一下60年代早期就会发现，反对对外干涉的呼声为攻击美国情报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次，选择恰当时机同样尤为关键。

1967年年初，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的一名激进成员发现，中情局对学联的某些国际活动提供了长期资助。随后，三篇揭露相关细节的文章被发表在一份激进的旧金山杂志上，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也报道了中情局通过基金会渠道对其他项目可能提供的资助。然而全国性媒体并未出于自身目的蜂拥报道此事，国会领导人也没有借此大做文章，反而选择了支持中情局的行动。约翰逊总统指派了内阁级别的委员会，负责对中情局的隐蔽资助活动进行秘密调查；国会方面则没有发起任何重大调查³⁶。但是在1974—1975年，对中情局的最初曝光并非来自《壁垒》（Ramparts），而是来自《纽约时报》；国会和媒体蜂拥而至，追踪线索；福特总统任命委员会调查所谓的中情局不当行为，促使参众两院也发起了平行的、竞争的调查活动。调查记者和国会职员的活动让曝光和揭露持续了整整一年。

一旦出现了有利于揭发滥权行为的环境，曝光过程便依据其自身的特征和动力发展。

首先是曝光渠道的多元化。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曝光一般需要三类人的参与：告密者、记者、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最开始，行政部门中的告密者会认为，无论出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考虑，他都应该将一些信息公之于众，以此影响政策的内容或决策者的身份。由于不希望在曝光过程中暴露其身份，告密者一般会在媒体和国会中寻找信得过的代理人，后者将接收这些信息，并保证将其公布。在埃尔斯伯格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中，找曝光渠道的过程花了很长时间。埃尔斯伯格首先寻求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帮助，这毫无疑问是个错误。新闻界人士面对的禁区可能更少，比国会议员更愿意采取迅速行动。大部分情况下，告密者会希望把消息透露给全国性媒体的记者，这样将会引起制定全国性政策的决策者的关注。一旦消息通

过媒体大白于天下，就会有相应的议员对报道中的指控和揭发进行调查。一旦发起国会调查，国会委员会成员就会和参与曝光的记者建立共生关系，相互交换信息和情报，通过尽可能持续的曝光活动推进双方的共同利益。

告密者将滥用权威的证据成功透露给媒体或国会，这将会鼓励有共同目标的人采取相同行动，并刺激另一些告密者对其他目标进行报复。结果，正如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和“水门事件”那样，一旦有记者捷足先登搞个大新闻，其他记者就会竞相追逐——盯住已有线索，追踪新线索，一场看谁的爆料能上明天头版头条的“扒粪大赛”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国会委员会（一般参众两院至少各有一个）也会进行类似的竞争。

其次是曝光目标的多元化。最初的焦点通常集中在一些特定官员的丑行上。然而对他们的曝光过程总会牵扯到其他人。除此之外，曝光还会导致官员采取相应措施掩盖错误——“水门事件”就是如此，这将反过来导致更多的曝光。而且，官员虽然会为恶，但其错误总是能穷尽的，因此曝光机器一旦启动，就会把目标一个接一个榨干吃净。“水门事件”之后，记者们想方设法找到新的“门”——“韩国门”（Korea gate）、“兰斯门”（Lance gate）、“比利门”（Billy gate），等等。针对某些目标的曝光会导致对另一些目标的曝光。尼克松总统滥用权威被揭发后，约翰逊、肯尼迪和罗斯福时期的类似事件也被曝光。成功曝光一个目标的机构会试图在其他目标身上如法炮制——痛击尼克松政府的人后来散布了伯格领导的最高法院的琐碎流言。

再次，正如最后一个例子表明的，曝光过程很快就会产生递减的边际收益，从而使机构的热衷程度迅速下降。“水门事件”造成的冲击，尤其是1974年7月曝光的、导致总统最终辞职的录音带，使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和阿瑟·卢鲍（Arthur Lubow）所谓的“冒烟手枪谬误”（“the smoking gun fallacy”，认为“可以经由以下

过程揭露重要的事实：派出记者，挖掘细微线索，进而发现更大的线索，并最终发现真相”）更加具有说服力³⁷。这种思维倾向来自美式阴谋论——在政治生活的表面之下隐藏着重要的秘密，有必要花力气揭穿层层假象和谎言，揭露官员行为腐败的事实。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调查进行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发现新的重大丑闻。被揭露事实的重要性与揭露它所花费的力气正好成反比。对美利坚信条的严重侵犯——集中财富与权力、滥用权威、破坏司法公正与个人权利、歧视与不公——是很难藏得住的。证据就摆在那里，信条的追随者自然会看见、获取并使用之。然而，致力于揭露新的丑恶的曝光过程一旦被开启，其势头就会由盛转衰。70年代初聚焦于对外战争方面的曝光风潮，到了70年代末却以挖掘健在议员和过世总统的花边新闻为主，这种转变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最后，要先“有料”才能“爆料”，也就是说，秘密越多越好。一定程度而言，某件事实的可信性取决于其秘密性。丑陋的行为将因其保密状态而更加丑陋。结果，有些并非秘密的事情也被说成是秘密，以便煽动公众的愤怒，夸大告密者的功劳——他们不仅是丑恶事实的传播者，还揭露了这些事实的存在。此类案例中最出名的也许就是尼克松政府于1969—1970年对柬埔寨进行的轰炸。总统在1969年3月16日作出了轰炸的决定，两天后美军执行了首次空袭行动。为了不让西哈努克亲王难堪，也为了避免同北越和谈的复杂化，政府没有公开宣布此事。5月9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报道了空袭行动。此后的一周里，新闻杂志和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此事。这次行动持续了一年，其中90%的时间里公众都知道它的存在。然而接下来的一年中，“秘密”轰炸柬埔寨成了对尼克松政府的控诉中最常被提起、最令人愤怒的事情。一个所谓的“秘密”在形成之初就几乎立即被公布，却在此后多年中一直被说成是秘密。^{2*} 这个案例说明，首先，美国政府没有能力保守秘密；其次，对于秘密的渴求驱使曝光者将实际上高度公开的事情也贴上了“秘密”的标签。

曝光机构和曝光目标的多样化并不局限于美国的联邦政府。

全国层面的成功曝光行动将在州和地方层面激起“调查型报道”的新浪潮，地方性和区域性媒体会试图在其覆盖的地区内复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功。这种传导效应有时很快就会出现，当美国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发现了美国公司和外国政府官员之间腐败关系的证据时就是如此。信条激情的揭发和净化效应也将日本首相、意大利总理、荷兰首相的行为公之于众，让他们丢人现眼。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改革美国政治实践的努力也对他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如果单纯依靠这些国家自身的政治过程，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美国政治系统一直面临着公开性的压力。在信条激情时期，这种压力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更为剧烈。曝光过程自有其动力，因此显著不同于抗议和改革运动。S&S时期的曝光潮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当时抗议活动的势头已开始迅速减退。曝光活动极大地揭露了总统、情报和安全机构、外交政策机构、国会、管理部门使用、滥用权威的情况。通过推动某些官员下台并以新人取而代之，曝光也对改革有所贡献。然而，曝光的升级也让主流公众情绪从愤怒的道德主义加快转变为带有偏见的犬儒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曝光敲响了改革和S&S时期的丧钟。

遗产

信条激情的政治——道德主义与抗议、愤怒与曝光、理想与改革——在70年代中期走向终结。像17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一样，美国再次从先知国度变成了小店主的土地。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至少从表面看来，70年代末的政治至和50年代末没有多大区别。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曾以极具洞察力的口吻说过，如果作

家欧文笔下的里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在1957年沉沉睡去，然后在1977年猛然醒来，他将很难相信这个国家已经度过了如此跌宕起伏的10多年时间，其间“总统遇刺，美国陷入越战泥潭，离奇的政治阴谋被揭穿，总统遭到弹劾，人类登上月球，还给火星拍了照片，城市熊熊燃烧，抗议声势浩大”。贝克认为，美国人民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公共情绪的大起大落”，“最初得意扬扬（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继而突感惶恐（肯尼迪遇刺），接着是愤怒（越战泥潭），然后是震惊（‘水门事件’），由此引发的调查曝光活动揭示出的政治腐败之深、之广，在1957年是难以想象的，使得人们的感受最终转变为厌恶”。然而，公共生活似乎最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样子，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卡特总统也进行道德说教，虽然他运用的语法更加准确，但在内容上与前人并无二致。贝克于1977年写道：“那些街道上曾经挤满了热情参与伟大政治辩论的市民，校园中曾经爆发过袖珍革命运动，而今天的公民却和1957年一样，对政治和校园争论毫无兴趣，只是一心琢磨着哪份职业能够带来最舒适的退休生活。”³⁸

然而历史不会回到起点。70年代末的政治明显不同于60年代末，但由于S&S时期的影响，它与50年代末的政治也有重大差别。70年代末的政治态度、实践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信条激情的影响。问题在于，信条激情造成的后果是什么？这些后果影响美国政治的深度和广度如何？

S&S时期最重要的遗产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改革运动在缩小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方面造成的不同影响；政治制度的重组；政治权威的损耗；公众态度的改变。

改革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

和典型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S&S时期的改革也涉及了各种不同

的制度与实践，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均牵涉其中。改革还同公共政策领域有关，如消费者问题和环境问题。但是S&S时期的改革运动主要聚焦于民权、外交—军事政策和政治过程三个领域。那么这些改革的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目标呢？

恐怕无法就此给出精确而有意义的计算结果。然而即便是依靠经验进行估计，也可以得出结论：从改革者的目标来看，改革通常是不彻底的、暂时性的，有时候还会自我挫败。改革取得的成功有多少，主要受到以下四个因素影响：（1）有待消除之丑恶行径的显著程度，践行信条基本价值之改革的急迫程度；（2）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一锤定音、简便易行、不可逆转的决策来实现；（3）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改革的施行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治上行动有力、组织上持久牢固的团体的支持；（4）改革针对的那些行为，是来自美利坚信条影响下的制度与实践，还是由于外部因素（如国际环境、私人企业经济体系的基本规则、不可改变的人类本性）的制约而产生。这些因素使改革在三个最重要的领域中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S&S时期最深入、最激烈的改革莫过于扫除南方各州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的法律。以任何评价社会变革的标准来看，这场运动都是非常成功的。它需要来自政治体系顶端和底端的合作——联邦法院、国会和联邦政府的权威行动，再加上黑人和白人民权分子的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不到10年，南方各州的政治、政府和教育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无可逆转的变革。1965年《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通过之前，拥有投票资格的7个南方州的黑人中，只有29%进行了选民登记，而在白人中相应的数字则为73%。到1972年，选民册上的黑人增加了100万之众：56%的黑人进行了登记，白人则为67%。在全国范围内，1956年有77%的白人声称自己参加了投票，而黑人则只有35%；到了1977年，这组数字变成了73%和65%。50年代中期，全国担任民选官员的黑人只有一两百名；而到了1979年，有差不多4500名黑人当选，虽然大约只占民选官员总数的1%，其中却

包括了17位国会议员，还有底特律、洛杉矶、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等大城市的市长³⁹。

与之类似的是教育领域的变化，黑人与白人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别也显著缩小了。单纯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却并未产生深刻影响，当联邦政府积极地在南方执行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裁决时，巨变才真正发生——布朗案过后十年的1964年，98.2%的南方黑人学童仍然在黑人学校就学；到了1972年，这个数字降至8.7%。而北方学校的去种族隔离进程相对更为缓慢且参差不齐，其中的原因包括现有种族分区居住模式，白人中产阶级迁往市郊居住，地方社区对强制校车计划越发强烈的抵制，以及尼克松政府缺少支持校园去隔离化的热情。然而在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变革并未如前两个领域那样显著。60年代初，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相当于白人的54%，197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2%，越来越多的黑人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找到了薪水更高的工作。然而到70年代末，黑人和白人的经济情况仍然存在实质性差异，这尤其反映在失业率等指标上，居住方面的去隔离化也进展甚微⁴⁰。一位细心的观察家这样总结1978年的形势：“黑人不平等”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然而过去20年的成果已经“使黑人在总体上比从前接近平等地位——无论如何定义平等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黑人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建立起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有效地防止了既得改革成果的倒退与丧失。有人认为，1978年的美国“无法回到60年代之前的样子”，“因为黑人已经高度自觉，反对歧视的民权立法成为政治实践的重要部分，黑人民众已经建立起足够牢固的政治立足点，阻止社会重新回到实际上并无善意的漠视之中”⁴¹。在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中属于缪达尔所谓的“美国困境”的那部分问题，已经在S&S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持久的改善。

在S&S时期，美国社会边缘团体（印第安人、亚洲人、女性、同性恋者）也展开了争取更多平等权利的行动，但其成效不甚清晰。其

中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团体遭到侵犯的情况不像南方黑人的遭遇那样骇人听闻；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些团体的平权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黑人民权运动的步伐前进的，而在这些团体取得与黑人运动相当的成果之前，改革的道德激情就已趋于平息，形势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它在70年代中期差一点被写入宪法，已经得到国会和35个州的批准。但就在此时，反对力量被动员起来，修宪运动陷入僵局。

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的改革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求美国减少对越南的干涉，并最终退出越战。这些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功。1965—1968年，声势越发浩大的抗议活动使反战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在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越战已然成为中心议题。到了1969年，主流民意已经对美国干涉越南持反对态度。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几乎立刻开始减少驻越美军的人数。然而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行动再次激起了大规模抗议浪潮，没过多久就迫使美国同意停战，退出冲突。1973年，国会又通过法案，禁止美国卷入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因此撤销了为支持当年1月达成的停火协议而实施的制裁行动。其次，在改革分子的要求下，从事海外行动的主要政府机构（军队和情报机构）得到的资源投入减少了，其部门自治程度和影响力也趋于下降。“二战”结束以来，国会第一次拒绝批准并大幅减少了主要武器装备项目的资金。扣除物价因素后的计算显示，1969—1975年美国的军事开支呈逐年下降趋势。武装力量的兵力已经少于越战扩军前的数量。情报部门的预算也被大幅削减。情报部门不得进行情报搜集之外目的的行动，除非经由总统批准并呈报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最后，总统的外交权力也被国会中的改革派认为过于强大，因而遭到了限制。《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Act）限制了总统派遣武装力量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还有众多其他措施被用于重新安排行政和立法机构在对外事务领域的权力分配关系。

迫使美国政府撤出越南的行动显然是成功的。无论这些行动本身是否有意于此，它们的确让1975年的北越更加轻松地控制了整个越南。裁减、削弱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行动导致的影响至少持续了10年。然而到了70年代末，出于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本质的理解，加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引起的担忧，使公众和国会对这两个部门的态度发生了剧变。增加军费开支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对军事和情报行动的限制也放松了，原本用于阻止情报机构滥权的所谓“情报特许法案”（“intelligence charter”）也在国会陷入停滞，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一样，成了S&S时期未竟的改革事业。最终，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天平开始缓慢地向后者倾斜。

第三类主要改革针对的是官员选举和政府决策等政治过程。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各州层面上，政党、选举、立法和官僚机构都是主要的改革目标。在这些领域中提出了大量改革建议，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实施，其中包括：取消或放松选举资格限制（选举税、识字测验、年龄要求、居住要求），扩大动议权和公民表决的适用范围，1971年和1974年两个竞选财务法案，改变党内程序以提高党首代表性，以及最主要的——将总统初选的范围从1968年的17个州扩大到1980年的37个州。国会改革的目标是削弱资历体系，扩大国会职员规模，增加在国会内部担任领导职位的机会，加强国会对预算过程的控制，向公众开放国会委员会的会议和听证会，颁布“道德规范”将潜在的利益冲突最小化。至于官僚机构方面，“阳光法案”（其中以1966年和1974年的《信息自由法案》最为著名）试图让官僚机构的运作过程和记录接受公共监督。从总体上看，这些有关选举、政党、立法和执行过程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让政治决策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减少金钱和“特殊利益”的影响，使其面向大众参与和控制开放，让理应对人民负责的决策制定者更好地代表人民。

各项改革实现其支持者目标的程度各不相同。改革的总体情况最好的也只能说是喜忧参半，有时候则是完全事与愿违。选举资格限制

放宽了，随之而来的却是1960—1980年投票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动议权和公民表决是6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到70年代却成了想要削减税收和政府开支的保守主义者的有力武器。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竞选财务法强化了现任官员和富豪的有利地位，并且很可能导致投票率的下降。总统初选的扩大十分有利于在野候选人和艾奥瓦、新罕布什尔两州的选民。改革使政党的全国大会能更好地代表社会的构成成分，却损失了对于党内投票者的代表性。国会权力的分散使其越来越难以通过重大的立法项目，即便旨在推进改革目标的法案也是如此。对国会议员外部劳动收入的限制，反而使外部非劳动收入更加重要——对“阿拉伯骗局”（Abscam）的调查表明，议员们变得更容易被贿赂了。数量增长的国会职员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但是他们对公众负责的意愿并不比行政部门的职员更强烈。公开性的诉求将真正的决策过程撵到了非正式的、缺少记录的渠道中。为了按照信息公开法案的要求回应信息公开请求，政府官僚机构的雇员大大增加，而这些请求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媒体、公共利益团体或一般大众，而是来自商业企业和游说集团。日落法案要求官僚机构承担新的责任，为了维持自身的存续，官僚部门寻找政治支持者的动机更加强烈。

改革派在其他两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退出越战，但是在政治领域并未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功，改革的结果经常有悖于改革的初衷。从改革成就的总体持续性来看，只有废除种族隔离得到了长久保持。这说明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具有反复出现的特性，也证明了汤姆·海登站在70年代末的高点回顾往昔时的困惑与不解：“我们结束了一场战争，赶走了两位总统，在南方废除了种族隔离，还推翻了歧视的藩篱。我们怎么可能成就如此之多，却在最后收获寥寥？”⁴²

机构重组

同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和进步主义时期一样，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政治体制重组涉及了主要政治机构在结构、功能、权力和支持者方面的变化。安东尼·金（Anthony King）及其同事认为，和1960年的政治相比，70年代末期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系统”。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等关键事务上，1960年的系统和1932年、1912年的更相似，而不是1976年的⁴³。关于S&S时期机构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有许多著作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⁴⁴。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机构角色方面的四个变化，这既是因为这些变化涉及了社会的核心政治机构，也是因为它们在S&S时期的变革中具有代表性。四个变化是指媒体和国会的功能与权力有所增加，以及总统和政党的功能与权力相应减少。这并不仅仅是权力的零和再分配。媒体新近获得的重要地位导致了政党的衰落，但导致政党衰落的因素却不只电视行业崛起这一个。同样，国会的武断只是导致总统权势衰落的众多原因之一。

这些变化对政治系统的运作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全局意义。历史上，在将不同利益整合进有效运转的选举与统治联盟的过程中，总统和政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会和媒体则不适合承担此类功能，而更适合扮演批评、调查、监督和制约的角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两个机构权力的上升是70年代初期曝光政治出现的前提。由于机构权力分配发生的这些变化，70年代的美国政治系统难以像60年代那样将不同利益整合进政治联盟，也难以将不同的政策偏好结合起来带入立法程序。

在技术进步、社会潮流和政治需求的作用下，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出现了四方面变化。首先，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真正的全国性媒体，其中以全国性的周刊和报纸为主力，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它们与其他媒体构成了全国性媒体机

构的核心。美国大城市的地方性报纸与市长、当地权威部门之间的那种长期联系，在全国性媒体与总统和全国性权威部门之间也同样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者和全国性媒体联合起来决定了哪些事情可以成为新闻，并为如何报道、理解这些事件提供了模板。其次，电视行业的崛起对于人们如何获取新闻，谁能获取新闻（这点更为重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晚间电视新闻网吸引的观众比纸媒多得多。除此之外，电视镜头也影响了新闻的定义和制作。最初是电视为新闻而生，没过多久就变成了新闻为电视而生。再次，媒体规模的扩大、角色的改变，也影响了相关的就业情况。媒体职业吸引了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那些来自高水平著名文科院校的学生。由此出现了一批更加自信、更具活力的记者，以及更为深刻、更加广泛的新闻报道。最后，前三个变化使媒体角色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从事件的消极观察者、记录者变成了政府的“对手”。相应地，“调查报道”也成了媒体的首要功能，这和进步主义时期的“扒粪”其实是一回事。

上述新情况使S&S时期的媒体获得了比50年代更多的权力。政治专业的学生主要使用两种办法评价权力的多少。第一种是声望法，即在相关人群中抽样，询问他们认为谁拥有权力。另一种是分析竞争性决策，看看哪一方会获胜。无论用哪一种方式，S&S时期的媒体都表现出色。1974—1980年的年度民调显示，数百位美国领袖人士认为媒体具有仅次于白宫的全国政策影响力；1974年，他们很显眼地将媒体放在了白宫前面，将其视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报纸在民调中总能跻身于最有影响力机构的行列，并在1974年达到了最高排位，仅次于电视、白宫和最高法院，位列第四⁴⁵。1966—1973年，公众对大部分机构领导能力的信任度下降了15—3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对电视业和新闻业的信任度却分别上升了16%和1%⁴⁶。

媒体，尤其是电视，通过传播新闻画面，在动员公共舆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了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立法以及60年代末美国从越南的撤出。迈克尔·罗宾逊（Michael Robinson）认为，电

视上播出的南方民权斗争的画面“超乎寻常的生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63年的民意在短短数月内急剧变化——认为民权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的比例从4%暴涨至52%⁴⁷。而在越南问题上，“最强的反战情绪来自电视新闻纪录片的报道”。“我们无法忘记电视中没完没了的美军伤亡画面……可以将越战以前和越战期间媒体对美军战场失败（如巴丹半岛战役、凯瑟琳隘口战役、突出部战役和越战的春节攻势）与战争暴行（这方面在“二战”期间根本没被提及）的报道做一番对比，其中的强烈反差会驱使有心之人去寻求答案。”⁴⁸ 或者正如美国报界资深人士在越战最后一天所观察到的：“也许历史学家将会认为，记者和摄像机才是最后关头的决定因素。它们将战争议题推到人民面前，推到国会和法庭面前，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回了军队。”⁴⁹ 在和尼克松政府最为激烈的对抗中，《纽约时报》和埃尔斯伯格击败了政府，赢得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胜利，而《华盛顿邮报》则成功地将水门大厦案意外引出的丑闻公之于众，最终击垮了白宫。《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简洁有力地指出：“媒体取得了水门大捷。”⁵⁰ 在其他针对机构特权的斗争中（信源保密、提起司法诉讼、诽谤法），媒体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胜利。

六七十年代的人们经常提起政党衰落这个话题，许多有见地的观察家都同意奥斯丁·兰尼（Austin Ranney）的观点，即美国正在接近一种“无政党的政治系统”⁵¹。以前各党派承担的传统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其他的机构和手段所取代，这体现出政党衰落的程度。随着初选体系的扩大，提名公职候选人这一核心功能逐步从政党组织和领袖手中转移出去。包括筹集经费在内的政治竞选活动更多地由候选人的私人组织、专业选战经理人、民意调查机构和政治顾问（可以在一个州为民主党工作，在邻近的另一个州为共和党工作）来承担。直邮组织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占据了关键位置。在总统竞选中，公众资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中，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接触选民，意味着他们不会再花那么多力气发动当地助选人员或尝试利用个人接触争取选民。

政党的第三个功能是指导民众投票。然而在60年代，单次选举中的一致选票（straight-ticket，在一张选票中只需勾选一个政党，就被视为将选票投给所有公职中该党候选人的选票——译者注）数量和历次选举中政党投票的一致性出现了急剧下降。四五十年代的独立选民只占总数的20%—23%，从60年代初起这个数字开始攀升，到了60年代末已经达到37%—38%；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获得选民资格的年轻人中，有45%—50%的人表示自己不是任何大政党的支持者。人们在选择候选人时不再以政党为首要指南。以具体议题为导向的投票显著增加，以政党为导向的投票则减少了。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议题投票有所下降，而政党投票略有回潮⁵²。政党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只不过这份意义远不如50年代那么重要，候选人的个人品质、他们对待具体问题的立场，成为了影响美国人投票趋势的最重要因素。

政党在历史上承担的第四个功能是作为政府选拔政务官的渠道和手段。70年代末的政党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项功能。不论是在州政府还是白宫，政府换届都意味着行政机构的高级职位将面临大换血。然而政党分肥制已经因20世纪初公务员系统的扩张而受侵蚀，“议题网络”在世纪中叶的兴起，又使行政和立法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特定问题专家担任要职，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相关功能⁵³。

最后，政党在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政党的这项功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么重要（威尔逊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个例外）。60年代，两党活跃分子对待公共政策的看法越发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这一变化使政党很难通过建立竞选联盟发挥政治整合功能，而行政部门和国会内部的权力分散状态，也限制了政党制定、实施连贯立法行动的能力。通过修改党团会议的资历制度等方式，政党对于公共政策的形成更加重要，但是这些变化无法有效抵消政党进一步弱化的大趋势。

导致政党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富裕程度，使选民更倾向于根据具体议题以及与议题相关的整体意识形态立

场投下选票。（有钱的）候选人能够利用电视轻松地接触选民，令政党提供的竞选组织和工作人员不再那么重要。六七十年代引进的许多改革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不是有意如此的话）。最后，社会议题复杂性的持续上升需要更多的专家和更高的专业化水平，而政党通常不具备相关能力。

总统的主导地位始于罗斯福新政，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得到强化，S&S时期国会权力的上升是对这一长期现象的自然反应。此外，一批更加年轻、更加自由主义、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具政策导向的议员于五六十年代之交进入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构成的这种变化也导致了其权力的增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自由主义者都把总统看成是开明领导和进步立法的主要来源，而将国会视为由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把持的保守主义堡垒。但无论是印象还是事实，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改变。自由派开始对总统权力感到恐惧，于是想方设法找机会，利用国会推动进步改革。S&S时期的国会成了自由派尝试推动美国政府、社会以及对外政策（这方面最为显著）变革的主要制度渠道。

国会内部的改革，如减少对议员资历的依赖、向年轻议员开放专门委员会的职位、增加小组委员会主席数量等，也有利于国会权力的增强。由此造成的国会内部的分权态势反而增强了国会权力，削弱了个别领袖和小集团操纵国会与总统或其他外部官员达成妥协的能力。S&S时期，国会职员提供了更多帮助，从而大大增强了国会的能力，使其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1972年和1974年分别成立了两个新的国会服务机构——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和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而已有的两个服务机构，即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和总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也进行了大幅扩张。1957—1975年，国会委员会的职员数量增长了两倍，而议员的私人助理数量增长

一倍有余⁵⁴。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国会内部强势集团希望在外交—军事政策方面进行的改革，需要在总统和国会之间重新分配权力，扩大国会对行政机构活动的控制范围。在外交政策领域，国会削减了总统的自由裁量权，迫使行政机构向国会承担更多责任。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曾于50年代说过：“如果国会开始为军事战略立法，那一定是上帝在帮助美国人民。”70年代的国会的确这样做了。1970年，国会设定了将美军地面部队从柬埔寨撤出的最后期限。1973年，它禁止“美国在柬埔寨、老挝、北越和南越的领土、领空和海岸进行的所有作战行动”。也是在这一年，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War Powers Resolution），规定总统可以动用美军作战的若干情况，在需要动武时应立即向国会报告，使用武力的期限非经国会批准不得延长。1975年，为了反对得到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MPLA），政府要求向安哥拉叛军提供秘密援助，遭到国会禁止。1974—1975年，国会在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继续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强加条件，严重影响了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会在处理军事项目和防务预算时表现出新的果断态度，毫不犹豫地对前者的效能作出独立评判，对后者进行大幅削减。

国会还于1974年通过了《预算控制与截留法案》（Budget Control and Impoundment Act），该法案限制了总统对专项资金支出的控制权，还通过新组建的预算委员会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加强了国会从规模和目标方面全面控制政府开支的能力。在同一年，国会要求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及其在总统办公厅（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的代表须经参议院批准方可任命。S&S时期的国会为了控制政府行为还频繁地动用立法否决权。197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从《美国国铁改进法案》（Amtrack Improvement Act）到《对外军售法案》（Foreign

Military Sales Act），国会一共对37部法律行使了否决权，其中大部分法律在此前的10年间已经得到通过。⁵⁵ 其他立法规定则大大扩展了政府需向国会报告的事项范围。与此同时，国会通过对“水门事件”、情报机构活动及其他事件的调查，进一步巩固了对行政部门的控制。

国会还发起了“立法限制总统”的攻势。⁵⁶ 不过，导致这一时期总统权力衰落的原因还有很多。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积极角色的企图遭到了反对，意味着总统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有所下降。政党的衰落也削弱了总统作为党的领袖的重要性，使其无法确保自己能获得再次提名。⁵⁷ 1961—1981年，4年的总统任期成了常态，其间一位总统遇刺，一位被迫辞职，一位宣布放弃连任，还有两位在连任竞选中败北。在任何政治系统中，“长寿”都会导致权力。总统任期通常是短命的，华盛顿的参议员、众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官僚、游说集团和媒体记者却能长期履职，这必然使总统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述，总统的虚弱地位还表现在其与媒体和官僚的关系上。官僚系统不能对命令作出迅速、积极的回应和执行，让S&S时期的每位总统都深感受挫。

一般而言，能够成功组建竞选联盟的人就能当上总统，这在S&S时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总统获得统治国家的手段。选举授予他的是合法性，而不是权力，要想行使权威，二者缺一不可。要想制造权力，就得建立统治联盟，但是由于权力自身在社会中变得更加分散，即便有可能建立联盟，也将会是越来越困难的。总统无力找到合适的手段来实现自己必须成就的事业，因而感到越发无助。约翰逊总统是历史上高票当选的总统之一，他曾仔细思考过获取“媒体……东部人……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他有多重要，因为“没有这些支持，我就绝对没有机会治理国家”。然而他失去了这些支持中的绝大部分。尼克松则根本没有获得支持，在同样以历史上最大优势当选总统后四个月，他恼火地总结道：“面对现实吧，我们根本没有朋

友。”一位资深白宫助理送给年轻新手的建议准确地反映了白宫这种深陷重围的心态：“有件事情你越早明白越好——我们其实困在孤岛上。”最高使命就是“保护总统”，抵抗围绕“孤岛”的敌对势力。70年代末的福特总统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与其说美国总统君临天下，不如说他是四面楚歌。⁵⁸

如前文所述，作为美国新政治系统的主要特征，机构权力出现的四种变化在S&S时期的最后时刻达到了顶点。70年代后期，也许是由于政治影响力的式微，媒体的公共声望有所下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卡特总统终于能够在国会为自己提出的主要外交政策争取到有限的支持——虽然他在国内政策方面显然不够成功。到了80年代初，国会挑战总统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10年前那么强大。虽然共和党尝试重建组织，利用支持全国性政党的联邦资金在国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党在整个70年代仍然继续呈衰落态势。上述权力变化的普遍趋势在80年代初有所退潮，可是远不足以消除1960年以来美国政治发生的基础性变革。总统比以前大为弱势；政党成了昔日奴隶的跟班；国会用制度巩固新夺取的权力；至于媒体，特别是全国性媒体和电视行业，则在塑造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权威的滥用与侵蚀

政治权威就是公共官员对权力的合法使用。导致权威不足的情况有两种。权威的滥用就是公共官员没有采取社会主流观点认为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力，权力的范围超出了合法性的范围。而权力的侵蚀则意味着合法性的范围小于权力的范围，使一些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合法的。权威滥用导致了官员行为的变化，权威侵蚀则意味着社会规范的实质和对规范的遵守发生了变化。这两种形式以不同的方式造成了合法性与权力的分离，使权力的运用摆脱了合法性

的束缚。权威滥用和权威腐蚀还以复杂的方式相互滋长。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现象对任何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发展到极端形态，就会破坏社会的运转。在美国，权威滥用明目张胆，同时也更容易纠正；权威侵蚀虽然不太显眼，却很难对付。

美国的政治权威在S&S时期同时遭遇了这两种情况。联邦政府官员滥用权威的事实在1973年和1974年被大量曝光。可以为位高权重者的罪行拉一份长长的列表：密谋妨碍司法、收取回扣、非法竞选献金、窃取政治对手情报、贿赂、侵犯公民权利……而被指控和被证实犯下这些罪行的官员的名单更是触目惊心：总统、副总统、三位内阁秘书、差不多一打白宫职员、一大堆其他联邦官员……这些记录显示滥权现象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力地证明了滥权行为的恶性循环。

然而相关记录也表明了另外一些事实，证明美国政治系统能够相对有效地处理滥权现象。宪法起草者们的重要动机就是建立一个能够阻止滥权的政府系统，如果发生此类事件，这个政府能够公开事实，提供正确的应对手段，并确保相关责任者受到公正的法律处理。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导致的威胁，麦迪逊曾说过：“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位者的利益必然是与法定权利相联系。”因此才有了权力制衡系统，才有了“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1787年以来，宪法审查大为增强，并实现了制度化；政府也更加依赖民众，至少是更加依赖后者的选票；至于活跃的独立媒体等宪法以外的制约机制，也通过预防和阻止滥权实现了宪法的目标。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其他哪个大国的政府被置于如此之大的监督和制约网络中。在70年代初对滥权的曝光过程中，宪法系统和政治系统精准有效地按照制宪者当初的设想发挥了其功能。

六七十年代的权威不仅被滥用，还遭到了侵蚀，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时候，权威几乎被破坏殆尽。S&S时期，政府官员的行为中被主流观点认为是合法的越来越少。以前被默许的行为，现在却会引起公

愤。民众认为政府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政府的权威因此衰退。权威侵蚀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政府机构和政府领导的信任感下降。政府权威遭遇严重的挑战，公众态度的变化只是其众多症状之一。

可以一厢情愿把权威侵蚀看成是权威滥用的产物，这显然是个宽慰人心的好办法。在某些方面，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确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加速下滑，这毫无疑问与某些政要的不道德行为遭到揭穿有关。但如果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果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权威侵蚀不受权威滥用的影响，后者并非其主要原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领域中的权威侵蚀发生在权威滥用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讲，发生在权威滥用遭到大揭发之前。权威侵蚀早在60年代初就已初露端倪，权威滥用则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被发现。除此之外，质疑权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和政府机构，这是针对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权威发起的总体性挑战——家庭、学校、大学、教会、商业、民间社团、军队等。总之，相比于权威滥用，权威腐蚀出现得更早，缘由也更广。

另外，权威滥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权威腐蚀。首先，公共官员权威的衰退，尤其是他们对于自身权力及合法性的认知变化，可能刺激他们为重建权威而滥用权威。约翰逊和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弥漫着偏执狂的氛围，当时总统及其班子面对着越发强势的国会、怀有敌意的媒体和拒不从命的官僚。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和轰炸柬埔寨的案例中，攻击权威和滥用权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权威的受侵蚀程度不仅导致权威滥用实际程度的加重，还会改变公众对滥权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述，对官员不当行为曝光的增加，实际上并非不当行为数量增加的结果，而是由公众担忧上升导致的。相关的心理学依据表明，公众态度的变化可能比官员行为的变化更为频繁。因此之前没人在意的行为过了几年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方面有个虽小但却颇具代表性的例子。1969年，全国各大媒体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在加州圣克莱蒙特（San Clemente）修建“西部白宫”（Western White House）花费大量公款的事情。当时的大多数人

对此表示认可——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和健康可以不惜代价。然而5年后，媒体又对这项开支进行了“曝光”，认为这是不当使用公共资金为私人牟利。每个人都对如此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感到愤怒。在这期间出现变化的并非官员的行为，而是公众对这些行为的看法。官员行为的变化并未导致愤怒，而是愤怒导致了对官员行为看法的变化。人们转而反对、挑战、质疑政治权威，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权威的滥用。义愤不是曝光的产物，而是曝光的动机——犬儒主义才是曝光的产物。义愤影响了人们的认知，认知又使义愤合法化。因此公众对滥用权威的认识实际上是权威崩溃的结果。

60年代的权威受到了严重侵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严重滥用权威现象的部分事实正来源于此。但是和此前相比，这一时期滥权现象造成的危害程度真的有所不同吗？滥权的诱因和机会因时而不同，但不大可能出现太大变化。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有不当行为，但所有的公共官员都会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刻违反道德和法律规范。可是当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为何一部分官员会遭受曝光、起诉和追究，而另一部分则无人问津、安然无恙？对于包括S&S时期在内的信条激情时期，答案主要不在于官员的行为，而是时代气质，是理想/制度间的鸿沟释放出的道德主义魔鬼主宰了美国人心智的程度。此时的权威只能被道德主义洪流冲垮。美国政治系统为阻止和纠正权威滥用做了精心设计，面对权威侵蚀却颇为无力。

犬儒主义与权威重建

60年代初期道德主义愤怒的高涨，催生了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抗议浪潮。抗议又导致了政治实践的改革，其间还伴随着关键政治机构在权力与功能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推进了曝光政治，进一步揭露了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最后，无休止的曝光破坏了改革的动力，人们适应了现有的行为模式，认识到这是普遍存

在、不可避免的。可以这样概括S&S时期事态的发展逻辑：道德主义导致抗议，抗议显性丑恶导致曝光隐性丑恶，曝光导致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消除抗议和曝光的动机。冷眼相看的社会心态最终为信条激情时期画上了句号。

6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强烈地否定政府，认为它缺少回应能力，不值得信任。这种态度到了70年代末一如既往，甚至比以前更强烈。80年代初，84%的美国公众认为特殊利益者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比人民更多，78%认为贫富差距在拉大，70%认为华盛顿的政客脱离了人民，64%认为自己的想法根本无法影响政府，50%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并不真正关心人民的处境。⁵⁹

60年代，类似的看法还夹杂着愤怒感，人们做出努力，试图改正种种已知的政府缺陷。到了70年代末，对政府的负面看法仍然存在，但采取修正措施的动力却消失了。S&S时期也和其他信条激情时期一样，留下了一批各式各样的组织——公共利益游说集团、环境组织、妇女组织、少数族裔组织，等等。它们在政治意识和活动方面的制度化水平比之前已经存在的组织有所提高。然而到了70年代，这些组织的号召力无论在强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比几年前的巅峰时期有所衰退。愤怒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曝光和改革的冲动开始退潮，政治参与日趋减少，人们对政治的兴趣也逐渐减弱。下面的数字对比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变化：1966年，58%的大学新生认为“紧跟政治时事”对于自己“至关重要”或“非常重要”，而1978年持相似观点的人只有37%。⁶⁰ 美国人民的政治效能感——对于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信心程度——开始滑坡。疏离和冷漠导致了犬儒主义。

到了70年代末，人们不再幻想社会力量能够改革政府，也不再期待政府能够改良社会。吉米·卡特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敏锐地把握了社会心态的这一变化。他一方面强调道德、诚实和正直（迎合公众情绪中残留的道德主义），另一方面主张限制政府行为（反映出日益流行的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卡特声称，这个国家值得拥有“一个

和它的人民一样优秀的政府”（言外之意即政府应当达到人民的要求），然而他同时又暗示自己的政府不会也不能为人民做太多好事。“降低期待”成了当时的基调。

保守主义势头增强，大部分公众反对政府，知识精英持有保守主义反政府观念，这些要素构成了70年代末政治气候的特征。政治向右转首先表现在197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中，当时卡特在民主党内部提名的争夺中击败了自由派对手，而罗纳德·里根则差点把在任的共和党总统挤下台。1978年，自由派候选人在州和地方公职的竞选中再次败北，保守的、反对征税的选民则在好几个州获得了胜利。接下来的1980年，卡特和里根双双在党内初选中胜出，最终卡特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被击败，一批民主党自由派参议员也失去了自己的位子。美国人不仅不信任政府权威，他们还对政府活动采取敌对态度。1959年，当被问及哪个才是“今后国家最大的威胁”时，只有14%的公众选择了“大政府”，41%选择了“大工会”，15%选择了“大企业”。而在1978年，47%的人把这个“殊荣”给了大政府，选择企业和工会的则均为19%。与之相似，1964年只有43%的美国公众认为联邦政府“过于庞大”；到了1976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58%；在1972年和1976年，50%或更多自我认同为自由派、温和派或保守派的人持有上述观点。⁶¹ 总而言之，美利坚信条中隐含的反政府主义在S&S时期走上了公众意识的前台。

S&S时期在公众态度方面留下的直接遗产是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是坚信当下状况无可挽回的固执看法。只要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政府偏离了本应遵从的政治理想，他们就必须以道德激情或犬儒主义作出回应。既然其道德激情已全部于S&S时期耗尽，他们便只能倒向犬儒主义。

然而人类总是需要领导、指引和权威，这种倾向在70年代末逐渐显现出来。政治评论员和社会批判家开始将矛头指向权力分立以及其他旨在分化、限制权力的宪法机制。人们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现任总

统无法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卡特能在1976年当选，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美国人想要一位人格上无可指摘、远离华盛顿肮脏政治的总统，而他正好迎合了这些需求。1980年卡特竞选连任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希望总统不仅要品行优良，还应该足够强势果断。正如1980年的一位年轻国会议员所说，我们一直在“渴望一位领导者”，但是“饥饿的羊群仰望着，却没有得到食物”。⁶²

总统权力被削弱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有些时候变化来得非常快。1975年3月13日，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以“对外事务终究难逃国会干预”为题撰写专栏，表现出对此前10年中总统优势权力的恐惧。18个月之后，他又写了另一篇专栏——“是时候结束‘国会外交政策’了”，清楚地表明了短短数月之内民意的变化。⁶³ 1978年到1979年，舆论更多地表达了对总统虚弱地位的担忧和对总统领导的需求。距离人们朝着“帝王总统”发泄满腔怒火还不到10年，华盛顿的分析家们就已经着手研究总统的“威严”了。⁶⁴ 正如我此前说过的，这些认为总统权力虚弱的论调反而表明总统权力正在东山再起。

上述迹象表明，公众对理想与现实间鸿沟的回应仍处于循环往复的运动中——从不信任政府权威、敌视政府活动的犬儒主义，转变为既认可政府权威，又接受现有水平政府活动的满足情绪。然而公众对待权威态度的变化本身不会导致权威的重建。重建权威不仅需要在主观上呼唤领导，还需要具备实现领导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第一，那些积极反对权威的机构和团体在角色和影响力方面发生变化；第二，地方层面支离破碎的权威结构得到重构。

在S&S时期，媒体权力大为扩张，对政府权威形成了最严重的挑战。在对待政治权威的态度方面，全国性新闻比地方性新闻更具敌意，全国性电视节目比全国性新闻更为苛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国性媒体的从业人员不仅在政策问题上有自由主义倾向，在制度问题上也倾向于反对政府。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认为：“大部分新闻人认为自己并不忠于现存秩序。我认为他们站在人

性一边，而非与政治权威或机构为伍。”⁶⁵ 媒体选择与政府保持敌对关系，也反映出其反权威的态度。罗杰·马德（Roger Mudd）评论道：“媒体已经成了国家的批评者。这意味着无论政治当局多么努力也无法让他们满意。”著名的纸媒记者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对于所有无法立刻彻底完成我们这个时代未竟事业的政府，媒体永远是它们挑剔的反对派。”因此，“没有哪个政府能够让媒体满意”。⁶⁶ 针对媒体给政治机构合法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一位分析家总结出一条“铁律”：“在新闻生产以商业和独立形式进行的国家，最受重视的政府层级（或部门）也将在长期内最受公众鄙视。”⁶⁷

电视灌输给人们的通常是简单的、情绪化的、争议性的内容，它在削弱权威的过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虽然只是在近期才有了不完全的记录，但电视网的新闻的确比纸媒更加‘反建制’，和那些没什么名气的报纸相比更是如此”。⁶⁸ 在S&S时期之初的1963年，主要电视网开始播放半小时的晚间新闻联播，这极大地提升了大众对于电视这一新闻来源的依赖，电视观众的群体规模大为扩张。60年代末，人们更加依赖电视获取新闻，与之相伴的是较低的政治效能感和社会信任感、犬儒主义以及弱化的政党忠诚。到了70年代中期，上述情况在选民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的政治态度实际上已经无关于对电视新闻的依赖。⁶⁹ 媒体——尤其是电视——在S&S时期发挥的全部作用就是削弱政府的合法性。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在1979年发现：“在过去十五年中，普通大众得到的信息造成了一种印象，即这个国家的体制是腐朽的，现代技术正把我们引向死胡同。”⁷⁰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在水门闹剧达到高潮时发问：“我们该如何重建对体制公信力的信心？”⁷¹ 可能的办法之一是《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巨人不要再去削弱美国体制的可信性。这意味着媒体可以重新定义自身角色，从敌对者变成支持者。另一种减少媒体对政

府权威冲击的办法是降低媒体对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力。70年代末的某些迹象表明这条路或许行得通，其中之一就是媒体自身成了争论的对象——1979年，有40%的美国人认为对媒体的既有限制“不够”。

72 法庭在对待媒体权力时也转而采取更具限制性的姿态，否认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天然优先于其他权利，拒绝了媒体在该修正案下享有特殊“受保护地位”的观点，并扩大了诽谤法的适用范围。相对于70年代初的登峰造极，70年代末的媒体权力已经有所衰落。

S&S时期的动荡最为广泛、普遍、根本的后果，在于对整个美国社会权威结构造成的冲击。在参与式民主和平等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任意机构的任意个人给他人发号施令并使其立刻执行的可能性虽然尚存，但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总统更加强势并不会自动导致强势总统的事实。事实上，只有当其他机构的权威得到恢复，高层领袖间复杂的私交和效忠网络得以重构之时，强势总统才会出现。总统要在全美层面上行使领导权，就必须存在可与其在次国家层面上打交道的机构、官僚、社团和地方领导人。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体系，而非仅仅借由向公共舆论发出广泛呼吁，总统才能实现其中意的政策结果。精力充沛、敢于负责的全国领袖需要一个由“小暴君”构成的网络。S&S时期的抗议、曝光、改革和重组活动严重地破坏了这个网络。重新构建类似的网络将会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当网络重构完成时，人民期待的领导和政治系统要求的领导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削弱领导者的可信性，使其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施展身手。

由此，S&S时期留给美国的是更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开放的政治、更为犬儒的公众，以及一个更为缺少权威和效率的政府。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运用权力加以应对的国内外挑战，却始终不愿给权力穿上合法的外衣。

1* 如何称呼这一时期是个棘手的问题。人们经常使用“60年代”这个词，但事实上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也许可以用“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但是又过于拗口。或者，我们可以称其为“抗议时代”“愤怒时代”或者“曝光时代”，但诸如此类称谓只不过抓住了这一时期诸多特征中的一个，并且其他信条激情时期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如果读者接受本书的观点，也可以把1960—1975年简单地称作“第四阶段”。然而，这个短语说的是一场体育比赛的收官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没能给这段时期贴上具有独立意义的标签（与“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时期”等标签相比），仍视其为一系列相似阶段中的一个。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名词以满足上述考量，我选择了“S&S时期”（the era of sixes and sevens），这样既显示了时间范围，又符合时代特点。首先，这个名字的确体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其次，根据《牛津英语词典》，“sixes and sevens”的意思是“产生、存在或无法消除的迷惑、失序或分歧”——对于当时发生的种种，这不失为合理的总结。

2* 1974年的《新共和》杂志专栏作家TRB是故意制造秘密的典型：“1969年3月，尼克松上台刚刚两个月就发动了对中立国家的轰炸。他没有告知国会和公众，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一直如此。对轰炸行动秘而不宣理由是不想让西哈努克亲王难堪，1970年3月西哈努克被政变推翻后，这个理由已经不成立了。然而尼克松作为美军总司令，却继续轰炸柬埔寨，并且精心掩盖，试图对反战运动保守其阴谋的秘密。五角大楼知道，柬埔寨人知道，我们的敌人知道，只有美国人民不知道（《新共和》，1974年9月7日，第2页）。”可是如果美国人读报纸，就显然会知道轰炸行动的存在。这件事表明尼克松总统的批评者想要占尽好处。面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井喷，当局联系了几位新闻人士和下级官员，想要找出泄密源头（但没能成功）。批评者们一边激烈地谴责政府试图封堵信息，一边继续抨击政府进行秘密轰炸——然而，只有在信息没有被泄露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所谓秘密的轰炸。

1. "Eisenhower on the Presidency," interview with Walter Cronkite on CBS television, October 12, 1961, quoted in Emmett John Hughes, *The Ordeal of Power* (New York: Atheneum, 1963), p. 331n.

2. Daniel J. Boorstin, *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9, 161.

3.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 Doubleday & Co., 1960), p. 414. For representative works rationalizing bigness, see : David E. Lilienthal, *Big Business: A New Era*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53); Adolf A. Berle,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1954) ; an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1952). For the roots of this line of thought in the New Deal, see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 Knopf, 1956), pp. 310ff.

4. Philip Converse,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n Angus Campbell and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2), pp. 327ff. James S. House and William M. Mason,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America, 1952- 196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April 1975) : 123ff. See also James D. Wright, *The Dissent of the Governed: Alien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6), ch. 7 .

5. Lipset, *Political Man* , p. 406 . See also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60), esp. pp. 369-375.

6. Address, June 1962, Yale University, quoted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Ideology and No End," *Encounter* 39 (December 1972) : 19.

7. Address, May 1962, New York, N.Y., quoted in Lipset, "Ideology and No End," p. 19.

8. Bernard Crick, "The Strange Death of the American Theory of Consensus," *Political Quarterly* 43 (January-March 1972) : 59.

9. Henry Fairlie, *The Kennedy Promise*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 Co., 1973),p . 19.

1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59-60.

11. Warren E. Miller, Arthur H. Miller, and Edward J. Schneider,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Data Sourcebook, 1952-1978* (Cambridge, Mass .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56---260.

12. Louis Harris, "Confidence in Leadership Down Again," press release, Harris Survey, March 22, 1976.

13. These averages are computed from sixty-six Gallup surveys reported in *The Gallup Opinion Index* , 1950--1979, and distributed as follows : 1950-- 1959, twenty surveys; 1960--1970, nineteen surveys ; 1971-1972, seven surveys ; 1973- 1979, twenty surveys. The question asked was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this country today?"

14. 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Peter Duignan and Alvin Rabushka, e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1980), pp. 72-74.

15. "Revolution" : Al Haber, quoted in Edward J. Bacciocco, Jr., *The New Left in America*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4), pp. 228- 229. "Moral issues" : David Horowitz and Michael Rossman, quoted in Lawrence Lader, *Power on the Left* (New York : Norton, 1979), p. 169.

16.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or the Port Authority Statement," position paper released at SDS-REP con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February 1967, quoted in Bacciocco, *New Left* , p. 229.

17. Norman H. Nie,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65-369. The authors of this study attribute these changes largely to the nature and political appeals of the candidates. It seems not unreasonable to assume, however, that the candidates were themselves responding to the temper of the times with the sort of appeal they thought would mobilize support.

18. Quoted in Paul Seabury, "The Moral Purposes and Philosophical Bas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rbis* 20 (Spring 1976): 13.

19. The following two paragraphs are from my essay, "The United States," in Crozier, Huntington, and Watanuki, *Crisis of Democracy* , pp. 75-76.

20. See Ladd and Lipset in Duignan and Rabushka,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 pp. 65-67, for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on public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21.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letter to Richard Nixon, *New York Times* , March 11, 1970, p. 30, quoted in 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 p. 79.

22. Miller, Miller, and Schneider, *Election Studies Data Sourcebook*, p p. 310, 323. This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dex is a percentage difference index calculated by subtracting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ho neither voted nor engaged in any of five campaign-related activities (talking to people, attending meetings, working for a candidate or party, displaying a bumper sticker or wearing a button, or contributing money) from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ho both voted and engaged in one or more of these activities.

23. 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2), pp. 151-160, 254-255. Anthony M. Orum, "A Reappraisal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Negro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July 1966): 32-46. Marvin E. Olsen,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Blac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August 1970) : 682-697.

24. Verba and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 ch. 9.

25. Paul Allen Beck and M. Kent Jennings, "Political Period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September 1979): 748.

26. Data adapted from Thomas Agnello by Anne Foner, "Age Stratification and Age Conflict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April 1974): 190.

27. Jeffrey M. Berry, *Lobbying for the Peopl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4.

28. *New York Times* , May 18, 1977, pp. A 1, B9 ; Common Cause, 1978 mailing, signed by David Cohen.

29. Beck and Jennings, "Political Period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 739; Miller, Miller, and Schneider, *Election Studies Data Sourcebook*, p . 299.

30. Lader, *Power on the Left* , p. 172.

31. Irwin Unger, *The Movement: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w Left, 1959-1972* (New Turk: Dodd, Mead & Co., 1974), p. 88.

32.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pp. 32-33.

33. Milton Viorst, *Fire in the Stree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pp. 347ff, 369, 375-379. James Q. 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p. 183.

34. Theodore H. White, *Breach of Faith* (New York: AtheneumReader's Digest Press, 1975), p. 234.

35. John Chancellor, quoted in *Newsweek* 81 (January 15, 1973): 42.

36. Cord Meyer, *Facing Re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p. 86-90.

37. Michael Kinsey and Arthur Lubow, "Alger Hiss and the Smoking Gun Fallacy," *Washington Monthly* 7 (October 1975): 52.

38. Russell Baker, "Ready for Slee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77, p. 29.

39. Elliot Zashin, "The Progress of Black Americans in Civil Rights: The Past Two Decades Assessed," *Daedalus* 107 (Winter 1978): 247-250. Miller, Miller, and Schneider, *Election Studies Data Sourcebook, 1952-1978*, p. 317. "Blacks in America: 25 Years of Radical Chang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86 (May 14, 1979): 59.

40. Zashin, "The Progress of Black Americans," pp. 250-255, 260. Richard Freeman,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since 1964," *The Public Interest* 52 (Summer 1978): 52-68. *Washington Post*, April 2, 1978, pp. A1, A18.

41. Zashin, "The Progress of Black Americans," p. 260.

42. *Time* 110 (August 15, 1977): 67.

43. Anthony King, "Introduction " and "The American Polity in the Late 1970s: Building Coalitions in the Sand," in King, ed.,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8), pp. 2, 388.

44. See: King,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Nie, Verba, and Petrocik,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The Third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Huntingt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rozier, Huntington, Watanuki, *Crisis of Democracy*; Nathan Glazer and Irving Kristol, ed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976*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and Everett C. Ladd, Jr., with Charles D. Hadle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78).

45. Se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76 (April 22, 1974): 34; 78 (April 21, 1975): 34; 80 (April 19, 1976): 30; 82 (April 18, 1977): 36; 84 (April 17, 1978): 38; 86 (April 16, 1979): 40; 88 (April 14, 1980): 41.

46. Louis Harris, "Confidence Climbing," press release, Harris Survey, March 14, 1977.

47. Michael Robinson,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1956-1976," *The Public Interest* 48 (Summer 1977): 12-13.

48. Peter B. Clark, "The Opinion Machine: Intellectuals, the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Government," in Harry Clor, ed., *Mas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Chicago: Rand-McNally, 1974), p. 69.

49. James Reston, quoted in Max Kampelman, "The Media," in Harvey C. Mansfield, Jr., ed., *Congress against the President*,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2, no. 1 (New York, 1975), p. 95.

50. Benjamin Bradlee, quoted in Kampelman, "The Media," p. 89; and, in general, Max M. Kampelman, "The Power of the Press: A Problem for Our Democracy," *Policy Review* 6 (Fall 1978): 7-39.

51. Austin Ranney, "The Political Parties: Reform and Decline," in King,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p. 213.

52. Ladd and Hadley, *Transformations* , pp. 320-333. Nie, Verba, and Petrocik,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 passim, but esp. chs. 4, 7-10, and Epilogue.

53. Hugh Heclo, "Issues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 in King,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 pp. 87ff ; and idem, *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 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54. Harrison W. Fox, Jr., and Susan Webb Hammond, "The Growth of Congressional Staffs," in Mansfield, *Congress against the President* , pp. 112-124.

55. See "When Congress Has the Veto," *National Journal* 8 (May 29, 1976): 745.

56. Fred I. Greenste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Modern Presidency," in King,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 pp. 80-82.

57. King, "American Polity," pp. 374-375.

58. Lyndon B. Johnson, quoted in Doris Kearns,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p. 177-178. Richard M. Nixon, March 13, 1973,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 May 5, 1974, p. 40 . Dwight Chapin,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 August 5, 1973, p. 40. Gerald R. Ford, "Imperiled, Not Imperial," *Time* 116 (November 10, 1980): 30.

59. ABC News-Harris Survey, vol. 2, no. 67 (June 2, 1980).

60. "Opinion Roundup," *Public Opinion* 2 (June-July 1979): 32.

61. "Opinion Roundup," *Public Opinion* 1 (November-December

1978): 29. Nie, Verba, and Petrocik,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 pp. 370-371.

62. Quoted in John Cole, "Lament for a Faded Dream," *The Observer*, August 31, 1980, p. 11.

63. Joseph Kraft, *Boston Globe* , March 13, 1975, p. 33, and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25, 1977, p. A19.

64. George F. Will, *Newsweek* 91 (March 6, 1978): 108. High Sidey, *Time* 116 (December 1, 1980): 18.

65. Walter Cronkite, interview, *Playboy* , June 1973, p. 76, quoted in Michael Robinson, "American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n Era of Electronic Journalism : Reflections on the Evening News," in Richard Adler, ed. , *Television as a Social Force: New Approaches to TV Criticism* (Aspen : Praeger, 1975) , p. 123.

66. Roger Mudd, quoted in Kampelman, "The Media," p. 94. Theodore H. White, "America's Two Culture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8 (Winter 1969-70) : 8.

67. Robinson, "American Political Legitimacy," p. 117.

68. Robinson,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pp. 18-19, 35.

69. Ibid. , p. 35.

70. Stanley Rothman, "The Mass Media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 Lipset, *Third Century* , p. 383. Samuel P. Huntington, "Postindustrial Politics : How Benign Will It Be?" *Comparative Politics* 6 (January 1974) : 182-186.

71. Harry Rosenfeld, metropolitan editor of *The Washington Post* , on BBC television, May 7, 1973.

72.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8, 1980, p. A10.

第八章 美国理想与制度的活力

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未来

美国政治理想与价值，即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一直且完全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的。美国的政治制度体现了这些价值，但总是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它们。由此导致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成为紧张和认知失调的持续源头，美国人尝试采用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四种回应模式的不同组合加以缓解。罗伯特·潘恩·沃伦称之为“马鞍下的毛刺”，从18世纪甚至更早开始，除掉“毛刺”的努力就成为美国政治的最重要特征，并定义了其动力与形态。现在的问题则是：在未来的美国政治中，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以及对它的回应还会发挥和以前一样的作用吗？或者说，美国政治的理想、制度以及二者间的关系，是否正在或者可能发生某些变化，致使其未来将明显不同于以往？

存在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理想与制度的关系可能在本质上保持不变；第二，这种关系可能被美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所改变；第三，这种关系可能被美国社会之外的发展和美国的对外活动所改变。美国社会的内部发展或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影响美国政治理想与制度间的关系：政治理想的内容可能改变；政治理想共识的覆盖范围可能改变；美国政治制度可能在本质上更加接近美国理想的要

求，从而缩小二者间的差距；政治制度也可能朝着非自由主义、非民主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方向发生巨变；当然，结果也可能是上述四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

历史vs进步？

历史上，美国人一直试图用信条激情时期的道德努力去改革制度与实践，以此消灭或缩小理想/制度间的鸿沟。这些激情时期具有诸多共同之处，改革的支持者几乎总是未能彻底实现其目标。然而就改革的相对成功而言，不同的时期却有着较大的差别：最初几次激情时期实现的改革目标比后来更为广泛。对于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民主权等目标的肯定，在早期是为了摧毁或修正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后期则是为了消灭或改变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制度。简言之，在早期，历史和（实现美国理想意义上的）进步携手并肩而行；在后期，成就美国理想更多地意味着恢复过去而非实现未来，进步和历史越发背道而驰。

18世纪70年代的革命者是第一批以民族为基础阐述美利坚信条的人，他们在总体上成功影响了美国制度的若干重大变革——推翻英王统治，终结君主制，基于民众同意的政府获得广泛接受，选举权范围得到一定程度扩大，消除了封建行为与特权的残余，用意见政治取代身份政治。就某种程度而言，革命者对其目标的表述是保守的，他们为自己主张的权利辩护时援引了英国人的习惯法和权利。但是从政治理论和政治辩论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权力的阐述与公开宣示却是革命性的事件。

美国意识形态在杰克逊时期还是新事物，其目标仍然是消除民主的政治束缚，扩大民众对政府的参与，废除身份制，削弱公职领域的特殊化（既包括先赋规范也包括成就规范），摧毁合众国银行以及其

他“金权”的象征，向社会敞开经济机会的大门。“杰克逊主义运动最初的斗争对象是政治特权……后来扩大到反对经济特权，笼络了众多‘乡土资本家和农村企业主’作为其支持者”。¹除了南方问题和黑人地位问题，杰克逊改革的确在事实上废除了传统的制度与实践。这些制度和实践要么继承自旧殖民地时代，要么是联邦党商业寡头的图谋，总之都背离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宽泛而言，所有这些行动都具有进步意义，但也带有保守主义内涵。杰克逊主义者的矛盾在于，虽然他们为发展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扫清了障碍，却在政治上回到了农村共和党人的朴素理想²。他们传递的信息不是革命，而是复辟。

当然，杰克逊时期的制度变革并未使政治现实完全符合杰克逊主义的原则。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都没有实现平等分配。在大城市中，少数富人（其中大部分人的地位得益于继承）控制了大量财富³。然而和通常一样，收入的分配比财富的分配更为平等；在集中了90%人口的乡村，无论是财富还是收入的分配都远比城市更为平等。除此之外还有高度的社会与政治平等，来访的欧洲人无论对此持批评还是赞同态度，都必然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在杰克逊时期，金钱、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白人男性中的分配平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美利坚信条的其他核心价值——自由、个人主义、民主——也在这一时期美国制度的各个方面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

出于上述原因，伍德认为，杰克逊主义的那一代人“经常被认为是最‘美国’的一代”。美国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被贴上了恰当“协调时期”的标签，因为：

美国历史最初两百年的诸多发展似乎是这个时期的前奏，此后导致今日现状的那些变化则像是从这个时期的倒退。就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特色而言，1820—1860年的这段协调时期标志着整个美国历史发展轨迹的顶点。在那个个人主义盛行、制度虚弱无力、无拘无束的时代，美国人享受的“自由”是此后未曾有过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权力，都和历史中的其他时候一样处

于支离破碎的分散状态。⁴

在政府实现民主化而工业尚未发展之前，协调时期是美国历史上距离社会失调最远的一段时期。那时候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已经“实现了自由的要义”，因此无须进行“更深入的划时代变革”⁵。人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维护过去的成就。

总之，协调时期的美国梦想与美国现实可谓携手并进，虽然不久之后二者就分道扬镳了。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理想与制度间的鸿沟已经清晰可见，但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都要窄（南方地区除外）。社会等级和政治贵族导致的旧的不平等已经减少，工业财富和组织等级创造的新的不平等尚未出现。长子继承制被废除了，白人男性普选权得以实现，而标准石油托拉斯尚未出世。

在协调时期及之后的时间里，奴隶制和奴隶继承是主要制度遗产中唯一严重违背美利坚信条的，直到南北战争结束100年后，人们仍在清除其残余。美利坚信条一直在黑人地位问题上发挥着进步作用，面对公然违背“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种族歧视与隔离制度发起的挑战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因此在分析30年代困境时，缪达尔才能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本质上乐观的态度。他能在美国看到希望，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不平等领域，而这种不平等显然是过往时代的错误遗留。

更一般地讲，协调时期标志着美国进步的本质性转折。此前，“进步”意味着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美国理想，这与改善经济、巩固安全的“历史发展”并不矛盾。然而在协调时期之后，进步和历史开始分道扬镳。用克罗利的话来讲，“实现民主理想”的进步经常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大规模组织、等级制、专业化、权力与财富不平等，这些都是物质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进步意味着回到最初的原则；美国人在政治上前进的方式就是向后看，再次献身于过去的理想，以其作为未来的指南。历史发展则要求对社会经济不断增加的规模和复杂性

作出实用主义的回应，并增加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互动。

杰克逊时期最著名的外国观察家很好地记述了协调时期的显著特征，还发现了这些特征与历史发展方向的格格不入。托克维尔针对美国的平等提出了两个核心经验命题（一个静态的，一个动态的），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尝试可谓对错各半。他认为美国社会最独特的一面在于“人民间条件的普遍平等”。这“推导出所有其他结论的基本事实，也是我所有观察的最终落脚点”。其次，美国和欧洲社会的平等潮流都导致了“不可避免的革命”；“平等原则的渐进发展”是一个“幸运的事实”；它“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排除所有人为干扰，所有的人和事都对其进步做出了贡献”⁶。像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欧洲观察家一样，托克维尔也将美国价值理想同政治社会现实混为一谈。然而他的描述性假设仍然真实可靠。总体而言，协调时期美国社会的特征是普遍的条件平等，与欧洲国家相比较时尤其如此。相比之下，托克维尔的历史映射显然没有将财富的分配纳入其中，而仅仅考虑了政治权力的分配。

在试图总结杰克逊时期的多样性和共同目标时，约瑟夫·L. 布劳（Joseph L. Blau）打了个有趣的比方：“就像是一个人开车驶出大城市，走上一条高速公路，他一定能看见一块大路牌，上面的箭头指出许多可能到达的目的地的方向。这些箭头只有一个共同点——全部从他刚刚离开的城市指向远方。这块牌子就象征着杰克逊主义者。虽然他们指出了美国未来的若干种不同可能，但这些方案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让国家摆脱特权和垄断。”⁷ 杰克逊主义者能精确地指出美国追求民主价值与理想的道路，却不擅辨明政治经济发展的真实方向。南北战争后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治过程的腐败更加明目张胆，还出现了杰克逊时期料想不到的新型“特权与垄断”。进步主义时期历史与进步的“离婚”给重申美国政治价值的行动造成了两方面影响。

第一，在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对美国政治理想的阐述都在一

定程度上采用了保守主义的、向后看的语言，这是对以往权利的再确认，是用此前具有合法性的原则重塑政治生活秩序。在进步主义时期，这种政治理想和视野上的向后看特征更加突出。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言，国父们“梦想并规划了长远的未来”，协调时期的人们完全沉浸于当下，进步主义者则明确自觉地向过去看齐。“从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起，主流的美国理想就一直聚精会神于以前的制度和条件。在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中，这种向后看的观念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进步主义复兴的英雄，如布莱恩、拉·福莱特（La Follette）和威尔逊，都声称自己正努力纠正过去40年的错误，以期按照以下原则再造昔日的国家——权力有限且分散、真实竞争、民主机会和小企业”。⁸ 进步主义重申旧日理想，以此反对那些正在建构、塑造20世纪面貌的新型大规模政治经济组织。这点在布莱恩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用克罗利的话来讲，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协调时期的民主党人”。而按照李普曼的说法，布莱恩“认为他正在和富豪统治作斗争”，但实际上“他正在斗争的事物远比那深刻得多——他反对的是更大规模的人类生活”。因此布莱恩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代表了“美国大众的传统”，而其敌人正试图摧毁这个传统⁹。但他又是个激进主义者，一心想要践行美国革命的理想。实际上布莱恩和加里森一样激进，只不过加里森与时俱进，布莱恩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面对大型经济组织的增长，威尔逊的反应也是呼吁“恢复”美国政治，找回以往原始的、个人主义的力量与活力。威尔逊愿意为了达成目标动用政府权力，然而正如李普曼指出的，这恰恰给进步主义的核心观点制造了内部矛盾。在众多进步主义者中，西奥多·罗斯福最清楚地指出必须接受大规模经济组织；但他也是旧日理想的坚持者，其观点源自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这是兼并的时代，阻止一切兼并不仅是无用的，最终还是有害的，因为无法执行法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蔑视法律。”

10

第二，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对美国理想的肯定，使这些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于世纪之交重申理想的进步主义却难以做到

这一点。最为极端的布莱恩就是美国政治的堂吉诃德，为着一个永远无法再现的美国社会的幻象而战斗。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的制度改革是切实有效的。然而进步时期的改革，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最多都只能算是部分成功。反托拉斯法以及其他遏制大企业的措施的确对美国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稍微对比一下欧洲就能发现这一点——但显然并未阻止、扭转商业兼并和寡头垄断的趋势。在政治领域，初选制的引入非但没能终结政治机器和老板政治，在某些人看来反而是助长了这些现象。在国会里，对“沙皇”约瑟夫·坎农（Joseph Cannon）的攻击建立起了资历体系，实际上是用老人寡头统治取代了家长式独裁。让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行动刺激了总统权力的增长。这一时期的种种制度变革无可争议，但从总体事实来看，在实现其支持者的希望和目标方面，它们远不如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那么成功。

从某些方面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激情比进步党人的理论更具意识形态纯洁性。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对政治权威的侵蚀更为有效。然而除了种族关系问题，其特定改革并不比进步党人更成功。经济权力虽受打击，但仍然保持集中。总统权威虽遭削弱，但还是得以恢复。70年代，军队和情报机构在财力、装备和士气方面屡受打击，而到了80年代初，它们已开始在这三条战线上重整旗鼓。1985年美国社会的权力分布和制度结构看起来和1960年没有太大区别。除了种族关系这个重要的例外，80年代初理想与制度之间鸿沟的宽度与60年代初一模一样。

在不同的信条激情时期，变革的成功情况也各不相同，这表明改革的本质是不断变化的。早期的改革主要是“消灭”导致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美国政治的不和谐被认为是人为的——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移除了人为障碍后，社会和政治就会自然地朝着理所应当的道德方向前进。在进步时期及之后的信条激情时期中，理想和现实之间自然一致的假设被人为一致的观念取代了。为了

缩小理想与制度的差距，有为之政府政策与行动是必要的。“二战”之后，“平等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了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¹¹。为了打击垄断权力、促进竞争，进步主义者创建了反垄断机构和监管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者带来了“帝王式的法官”，以此消除种族隔离与不平等。比早期改革更为严重的是，后期的改革者为实现美国价值不得不设立众多制度化机制，反过来却对这些价值本身造成了威胁。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制度发展的真实路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复杂互动的结果。在美国，任何由政府官僚扩张导致的权力集中都会受到多元力量的抵制，权力分散于官僚机构、国会委员会和利益集团之中，让下级行政官员服从上级的努力也被破坏。然而，日益复杂的经济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更为迫切地需要等级制、官僚、集权和专业知识，特别地需要大型政府，普遍地需要大型组织。社会将以某种方式回应这些需求，同时仍然努力实现与之矛盾的美利坚信条的价值。如果历史反对进步，那么进步又能抵挡历史多久？

共产党中国成立的最初25年中，发展需求和意识形态规范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只要领导者们能够就孰先孰后达成一致，中国就能避免此类冲突。而在美国，没有哪个领导集团能够用命令去压制定义了国家认同的自由价值。除非有其他力量改变、稀释或者消灭美利坚信条的核心理想，否则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治下中国的那种发展需求与意识形态规范间的冲突很可能在未来的美国重现。

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有多大？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这里将描述几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信条的核心价值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产物。其根源在于英美革命经验、17世纪的新教道德主义和18世纪的自由理性主义。历经两百年之久，这些理想的历史活力和号召力可能趋于自然衰退，特别

是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和威胁重重的国际环境面前，它们越来越被视为无关紧要。除此之外，由于其新教信仰的起源，这些理想必定要受到即便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的世俗主义倾向的侵蚀。出现信条激情爆发之前，并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四次宗教大觉醒，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减退——同18世纪40年代的那一次相比，20世纪50年代宗教觉醒的冲击力已经十分的边缘化。当宗教热情退去之时，美国还可能维持对传统价值的信仰吗？一个失去了新教核心的美国还会是美国吗？

第二，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也可能导致新政治价值的兴起，从而取代在中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化上升时期占主导的传统自由主义。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和社会科学家都发现了“后中产阶级”，或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日益流行的证据——这在年轻人中间尤为显著。同样地，乔治·洛奇（George Lodge）也曾预见洛克式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在美国被一种“社群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后者与传统日本的集体主义模式有诸多相似之处¹²。

第三，正如霍夫斯塔特和其他人的观点，20世纪初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移民在美国城市中引入了一种不同的“道德”。20世纪后期的美国正在经历独立后的第三波移民潮，其中大部分来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古巴，其他的则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其前辈一样，这些新近到来的移民也会把显著不同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引入美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由主义的共识很可能土崩瓦解或逐渐淡化。

第四，可以预见，美利坚信条在定义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普遍的信条共识对于美利坚国家的存在与维系也不再至关重要。作为有效运转的民主社会和政治实体，美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两百年，未来的它也许不再那么需要以信条理想定义国家认同。数个世纪以来，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了历史、传统、习

俗、文化和共同经验，这些也可以用于定义美国认同，而抽象理想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许会下降。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可能会被有机基础取代。“美国例外论”将会消失。美国不再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而会变为拥有民族灵魂的国家。

上述四个因素的部分或全部都可能改变美国的政治价值，从而缩小政治价值和制度实践之间的差距。然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高。虽然美国价值与理想源自17、18世纪，但它仍然在20世纪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弹性。凭借内容上的模糊性和抽象性，这些理想能相对容易地适应一代又一代人的需要。美国社会的持续变迁让它们得以永生。新兴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团体需要重申这些价值，使之再现活力，以便从美国社会获取更多的好处。六七十年代青年人中出现的价值重心转移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范式的终结。从许多方面来看，对美国价值的宣示都和过去一样，是对公然出现的新权力中心的抗议。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渴望“归属感、理智和审美方面的自我实现”¹³，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对后工业主义的官僚化和技术化潮流做出的浪漫的、勒德分子式的反应”。可以很容易地将这种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对抗纳入已有的美国范式中。“后工业社会比过去的美国拥有更高的教育和政治参与水平，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以往更加官僚化、等级化，在此情况下，意识形态与制度间的冲突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¹⁴

类似地，50—70年代拉美裔移民带来的更为广泛、长期的冲击，也会加强美利坚信条的地位，它仍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诉求合法化的重要渠道，也是定义国家认同必不可少的要素。20世纪早期欧洲移民的子孙没过多久便成为传统美国中产阶级价值的热情拥护者。国家的文化多元程度越高，特别是当多元文化中包含着多元语言时，作为美国人共性的信条政治价值就越重要。早晚有一天，以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民主为核心的传统美国理想会丧失吸引力，和种族歧视、君权神授等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意识形态垃圾堆。然而没有证据表

明这将会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

如果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那么问题就来了：回应鸿沟的传统模式将发生哪些变化（如果存在的话）？大致的可能有三种。

第一，原有的回应模式将继续存在。如果过去的周期规律仍然奏效，那么在21世纪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十年将会出现一段持续的激情时期。在间隔期中，为了应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不同的美国人将会以不同方式运用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自欺欺人这四种回应模式。鸿沟引起的紧张将会持续，或许还会有所加强，但造成的结果不会比以前更严重。

第二，回应模式的循环可能比以前更加稳定。美国人将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认知失调现象，因此能够比过去更加轻松地面对社会困境，在回应问题时采取的方式更为复杂，更具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

第三，不同回应模式间的频繁变动可能使美国理想与制度面临毁灭的危险。

就未来的美国政治系统而言，第一种情况最为可能，第二种最为理想，第三种则最为危险。下面让我们集中讨论第三种情况。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体一直是虚弱的政体——没有国家概念，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也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的中央集权和官僚机构。它被有意设计成这个样子，在漫长的历史中，是传统遗产和社会环境共同支持了制宪者的目标。20世纪的外部威胁和国内社会经济需求形成了压力，要求建立更为强大、更具权威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机构。然而美国社会的主要团体一直有着强烈的道德情绪，这令分裂、虚弱的政府得以继续存在，权威则处于缺失状态，无法令人满意地应对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和外交挑战。历史与进步冲突的加剧可能导致越来越强的挫败感，在道德主义和犬儒主义之间的波动也会更为剧烈。美国道德

主义导致政府永远无法真正有效，权力的现实则让政府永远无法真正民主。

这种情况将导致辩证关系的两个阶段：首先是改革政府的激烈举措；当改革努力没能在自由民主方向上取得进步，反而不利于满足迫切的功能性需求时，继之而起的便是强烈的挫败感。为了改革政府而对其进行削弱，最终可能导致人们强烈要求抛弃虚弱、无效的政府，以更具权威性、更能有效满足历史发展需求的结构取而代之。鉴于改革的乖张本性，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极端主义可能会产生一股追求独裁效率的逆流。正如柏拉图所言：“真理就是，就社会的构造而言……任何过分行为都会导致同等激烈的反应。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自由的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这意味着，民主制下的极端自由，恰恰给暴君治下最残酷的奴役创造了条件。”¹⁵

美国政治理想，它对于希望改进美国政治制度的人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对于意图摧毁制度的人也是如此。出于对理想的信仰，自由主义的改革者试图让制度变得更接近理想。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既反对自由理想，也反对自由制度，他们企图用前者削弱后者。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简直就是为后者专门定制的机会。他们可以把自由民主制度与其政治理想的原型作比较，突出其在效率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这是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对美国政体的常见回应，但并不局限于自由主义的外国敌人。南方启蒙运动（Southern Enlightenment）的主要理论家津津乐道于北方“工资奴隶”体系下的压迫与不公，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工人都应享有平等和自由，而是因为他们想让威胁南方奴隶制未来的经济体系名声扫地¹⁶。

然而，用自由理想大棒猛击自由制度的人大多来自左翼，而非右翼。可以用保守派、自由派和革命派对政治平等的看法解释其中的原因。传统的保守派反对平等。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实现的平等已经超出了合适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通常会要求美国社会停止

支持内外移民。美国平等表象与说辞的背后仍然存在权力与不公的现实，传统保守派也可能觉察到这点并暗自窃喜。美国制度的自由派捍卫者则对此作出了自欺欺人式的回应——认为事实上没有也不应该存在不平等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敏锐的保守派和虚伪的自由派都是墨守成规者，而令二者都对现状感到满意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对究竟何为现状、平等是好是坏这两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传统保守派和虚伪自由派合作维持现状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方的观点他们从不买账。此外，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能够清晰表达其观点的传统保守派不仅是少数，而且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其价值观和美利坚信条完全背道而驰。（见表 6）

表 6 政治信仰与政治平等

	传统保守派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革命派	
虚伪自由派	道德自由派			
政治平等是否 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政治平等是好 是坏？	不好	好	好	好
	维持现状	激进主义		

政治光谱另一头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道德自由派和虚伪自由派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不平等是错误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发现美国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因此积极地投身于消灭不平等的改革活动中。在光谱上位于道德自由派左侧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其观点和信念至少在表面上同道德自由派一致。革命派认为不平等是邪恶

的，现存制度处处不公，因此对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在更为深刻、更具哲学意味的层面上，革命派深信有必要用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纪律森严的列宁主义政党作为革命的先锋队。但是如果革命派直言其信仰，就等于将自己置于美国政治的最边缘地带，宣布放弃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力。将改革视为革命的催化剂，这是列宁主义的良好传统。¹⁷ 因此，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有动机去强调将其政治信仰与自由主义共识的共同思想，回避分歧理念，以此团结自由派改革分子。有了对改革的共同追求，道德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就能联合起来攻击现存制度，虽然前者的长远目标是让制度更好地运转，而后者则想将其彻底推翻。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共识社会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于西欧意识形态多元社会中的角色。在欧洲，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目标和诉求方面的分歧被严重放大，二者得到了形形色色的选民和政党的支持，彼此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而在美国，自由主义占据主流，这意味着存在一套用于评价社会制度的共识标准，别无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也只能采用这套标准。为了共同的短期利益，改革的自由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搅在了一起，形成了某种无可名状但又存在政治关联的激进主义，从而模糊了二者的哲学分歧。而且这种融合不仅存在于社会层面，也存在于个人层面：某些人会在自己的思想中同时掺进自由改革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美国的激进分子能很容易地察觉理想与制度间的鸿沟，却很难发现改革自由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间的矛盾。在共同的短期目标之下，这两套截然不同的哲学观念常常共存于同一个头脑中。

自由派改革者和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支持激进改革的共同立场，这同虚伪自由派和传统保守派之间的距离形成了对比。虚伪自由派捍卫美国制度的唯一办法就是扭曲事实现状，保守派则用一套令大多数美国人憎恶的价值观为制度辩护。马克思主义者为颠覆自由制度而赞同自由共识，保守派却为保卫自由制度而拒绝自由共识。二者的

合力效应使现存秩序遭到了更猛烈的攻击。矛盾之处在于，保守派从保守论调出发捍卫美国制度（制度是好的，因为它使政治不平等制度化），激进派则出于相同的原因攻击制度，而前者对制度造成的破坏至少和后者一样大。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激进联盟与维持现状阵营之间的分歧矛盾造成的最终影响，加剧了上述政治理念对美国政治制度造成的威胁，而美国制度的持续活力对于这些政治理念的生存恰恰是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以明确两点。美国的政治制度，比现在和过去的任何其他主要国家都更为开放、自由和民主。如果美国人想要放弃或摧毁其制度，他们也会以自由民主理想的名义采取行动。美国人对外来思想的诱惑免疫，而只需为自己的思想感到恐惧。

美国vs世界？

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给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外交关系和国家安全方面，这条鸿沟对美国政治制度与过程产生了哪些影响？政治制度与进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相契合？其次，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社会的关系方面，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使其他社会的制度和政策符合美国价值的要求？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当美国像1815—1914年那样相对隔离于外部世界时，它就不必认真对待上述问题。然而到20世纪中期，美国开始深入、复杂、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事务当中。这便将上述两个长期存在、紧密相连的问题推向了前台，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和紧迫性。说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是因为弥合外交制度与过程中理想/制度间的鸿沟的尝试，反而不利于美国运用权力处理国际事务，还会削弱美国缩小本国价值与他国制度政策之间差距的能力。反过来说，鼓励外国制度与实践向美国理想看齐则需要美国权力进行扩张，这又会让美国

的制度与政策更难以符合其理想。

比起其他国家，外交制度与过程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理想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美国显得更为严峻。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不同。首先，西欧国家是意识形态多元社会，并不存在评判对外政策制度与实践的单一政治原则。西欧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也使外交制度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一样，在合法性方面有所受益。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早在意识形态出现之前，大多数西欧社会已至少出现了民族共同体的萌芽，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民族国家。因此它们也就需要处理外交关系，保护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安全。当意识形态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之时，国家安全部门、军事力量、外交部门、情报机构、国内安全部门和警察系统都已经被建立起来。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对上述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提出了某些要求，但其支持者也承认，这些机构首先代表的是处于国际竞争中的本国民族共同体的需求。欧洲民主政权因此接受了安全机构的存在，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民主政治的一般过程，无论主导政治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化，它都代表并捍卫共同体和国家持续的利益。

因此，欧洲的各种意识形态是在此前已经存在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美国，美利坚信条的意识形态早在民族共同体和政治系统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当这些原则定义共同体认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建立起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外交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一样，对外政策制度也被认为应当体现先前已经存在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然而恰恰是外交、军事、情报、警察等具有强制功能的机构，与美利坚信条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产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信条的本质就是反对权力，反对中央集权。由此导致了一系列行动：最小化权力资源（如武装力量），限制专业化官僚等级制度的效率，限制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权

威，等等。常备军和职业军队应在自由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经典问题最能体现制度与价值的冲突。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得以完全避免此类冲突的影响，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允许其采取“根除”政策——几乎废除军队，将仅存的武装力量弃置于社会和地理空间的边缘地带。¹⁸ 同样，美国似乎不需要，也没有建立情报机构、专业外交部门和国家警察力量。

随着隔绝于世界在20世纪成为不可能，美国开始建立并完善上述部门。然而这些机构只能艰难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共存，二者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这比欧洲国家同类机构遭遇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二战”后，全球性的角色与责任意味着美国有必要大规模发展、维持此类组织，让其在对外政策领域发挥中心作用，这导致制度与价值间的不相容性更为尖锐。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美国人沉浸在幸福的满足感中，没有意识到在外交和防务领域已经出现了一条宽广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认为外交和安全部门不应受到自由社会政治需求的影响，如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超然于政治的职业外交官理想，以及亨廷顿的“客观文官控制”概念。¹⁹ 然而自由派的干预最终还是难以避免，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巨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外交和安全机构遵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随着信条激情的猛烈喷发，美国人展开斗争，声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反对防务开支、海外用兵，批判军工复合体和帝王总统，并试图曝光、削弱、瓦解甚至废除那些保护自由和抵抗外来威胁的机构。谎言、暴力、践踏个人权利——政府为保护美国社会而采取的这些行为在他国看来不过是理所应当，但怒火中烧的民众仍然以充满道德激情的自我批判作为回应。

美国人有质疑、破坏政治制度权威的倾向，就连事关国家安全和外交的部门也不放过，这让欧洲人和其他非美国人感到不解，其反应也是颇为混乱的。对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水门事件”和针对中情局的调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愕和困惑。“你们美国人到底在做些什

么？为什么要给自己拆台？”紧接着，他们通常会勉强地称赞美国社会珍视自己的原则，称赞美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原则。随之而来的还有带着羡慕和向意味的评论，将美国的情形同本国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一番对比。最后则是深深的担忧，怀疑信条动荡造成的冲击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削弱其保护盟国和友好国家的能力。

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否允许美国维持捍卫其全球利益所需的物质资源、政府制度和政治意愿？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因为美国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也因为美国被牵扯进他国的变革之中。20世纪前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中心在西欧，在那里，大部分国家的主要政治组织奉行着同美国相似的政治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给西欧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美国政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潮流，美国人的信仰早晚会成为整个文明世界共同的信仰。这种同情可能是潜在的、有失公允的，却给美国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外交资源。欧洲社会或许对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感有所不满，但双方都清楚，美国人推崇的道德价值（不论真诚与否）将在欧洲社会引起共鸣，在某些时刻还会与后者的社会政治运动产生联系，这是欧洲人根本无法忽视的。

20世纪中期，民主价值在德国和日本青年人中的广泛传播，为上述的价值趋同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然而在更广的层面上，这种将欧洲的未来等同于美国的观念却大为弱化。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后期，美国与苏联、中国和日本之间合作性和竞争性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多。在与它们的关系中，完全没有美国同欧洲之间那种片面的认同感和未来趋同感。和美国一样，这三个国家的社会政治价值与意识形态也具有高度的共识性和同质性。然而它们的内部共识却和美国截然不同。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三国都认为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具有普遍性，主张“权威神圣”，²⁰ 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对挑战权力、提出异见等行为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战后的日本固然建立起一

套有效运转的民主体制，但其传统价值观强调的是等级制度、垂直体系和服从。这套价值观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和谐”，这与美国颇为相似，不过两国的不和谐在内容上是完全相反的。这三个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同美国的开放、自由主义、平等、个人权利、自由异见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苏联、中国和日本的主流政治价值与社会规范增强了核心政治机构的权威，提升了这些机构同其他国家竞争的能力。而在美国，只要美国人还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美国的主流规范就会破坏、削弱政府的权威和权力，在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损害政府的国际竞争力。在西方的小圈子里，美国是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表兄；在包括东方的更大的世界里，美国却常被视为天真的异乡人。美国的政治系统中存在着“不和谐”因素——源自美国思想的、对政府权威或公开或隐蔽的持续挑战。面对全球权力竞争中那些历史传统完全异于本国价值的国家，美国该如何行事呢？

在美国人眼中，不仅是外交机构的构成和运行应当遵循自由主义价值，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身也应致力于在世界上促进美国价值的实现。这赋予了美国独特的国际角色。帕默斯顿子爵曾有名言曰，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和英国及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拥有以权力、财富和安全定义的国家利益，其中一些利益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致可以将其看作是永久的。然而作为一个人建构的社会，美国又拥有独特的政治原则与价值，并以此定义了国家认同。在国家利益之外，这些原则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第二份目标清单，形成了评价外交成败得失的另一套标准。

在这份思想遗产的作用下，外交政策领域也出现了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从而又一次将美国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西欧国家显然并不否认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同外交政策的执行存在着关联性。然而它们的确相信，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安全和经济领域那些重要的、持续的国家利益。政治原则虽然为外交提供了界限和参考，但并非外交

的目标。于是除了极少数情况，欧洲国家有关道德与权力在外交政策中关系的公开争论并没有像在美国那么重要。在共产党国家的外交中确实出现过这种问题，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已经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间的冲突作了大量讨论。然而在苏联，此类冲突的严重性要比在美国低得多。原因有三。首先，独裁政治系统排除了对这类问题的公开讨论。自从1920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永久革命之争以来，虽然苏联外交时而过于权力导向，时而过于意识形态导向，国内却再未出现过针对外交政策的公开批评。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学说和战略战术之间作出了明确区分。前者是不变的，后者则视特殊历史环境而定。党的路线的变化转折，即便在事实上主要出于国家利益的动机，也会经常被说成是在特定时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而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性。美国政治价值通常被认为是普世的，实用主义不是在特定环境下实现价值的手段，而是对价值的背弃。最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外交政策，当需要追求特定的国家利益目标时，他们有能力迅速地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然而对美国人来说，外交政策目标不仅应当反映国家安全利益和国内主要集团的经济利益，还要包括那些定义了美国认同的政治价值与原则。如果这些价值被用于界定政策目标，那么外交政策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国内外的政策反对者在道德上就是非法的，美国人必须竭尽全力战胜这些反对者，实现外交目标。因此，美国外交的主流不是斯蒂芬·德凯特（Stephen Decatur）（“我们的国家，无论对错！”），而是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我的国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当它正确时，保持它的正确；当它错误时，促使它正确！”）。然而实现自利与道德的统一并非易事。美国历史有两种常见的趋向：退守大陆，独善其身，只同外部世界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从而无须在腐朽的、不友好的环境中为了平衡利益诉求与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伤脑筋；或者与之相反，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以净化世界，使其符合美国原则的要求，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权力扩张以

保护国家利益。

用外部标准评判国家和政府行为的是非对错，导致美国经常因其参与的战争而备受批评与反对。只有当国家安全和政治原则都受到明确威胁时，美国上下才会对战争作出一致反应。独立战争结束以来的两百年，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国内没有人用战争目标与手段偏离了美利坚信条基本原则作为理由反对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二战”对于美国来说是“完美的战争”；除此之外的每一场战争都由于无法同美国原则保持一致而遭到一部分美国人民的反对，因此都是不完美的战争。美国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的政府打了一场“反美”战争，这在外国人看来真是咄咄怪事。

对美利坚信条的追求超越了现实权力的考量，可能会导致十分虚伪、武断的政策立场。正如李普塞特所指出的，如果只能为道德目标而战，那敌人就必定是恶魔，因此必须对其发动全面战争，打到对方无条件投降为止。如果战争不具有道义合法性，那从事战争的领导人就必定是恶魔，用一切手段反对这样的战争是合乎道义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义务。一个很容易对战争产生十字军圣战热情的国家，恰恰也是最激烈地用良知反对战争的国家，对美国而言这绝非偶然现象。²¹

在海外用美国外交政策推进美国价值的尝试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政治行动，第一种旨在让美国的国内政治实践符合美国价值，第二种旨在让美国的外交实践符合美国价值。缩小美国制度与美国价值之间的差距是合法行为，但是缩小他国制度同美国价值之间的差距还是合法的吗？答案并非不言自明。

至少有四个理由支持否定的回答。首先，美国试图操纵他国制度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些制度应当体现的是其所在国家人民的价值和行为。从外部强加干涉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行为，这本身就违背了美国价值。其次，美国实际上很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对他国的制度发展施加重大影响。美国拥有的知识、技术和资源难

以满足这项任务的要求。此类尝试经常会适得其反。再次，任何改变他国内部制度的企图都将毫无必要地引起其政府的不满和敌对，进而使其他方面的外交活动复杂化，破坏已有的、更为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成果。最后，影响其他社会的制度变迁，需要美国政府大幅扩充其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这反过来则会威胁民主政府在美国国内的运作。

肯定的回答同样也有四个理由。第一，如果他国制度对美国制度与价值在国内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那么美国改变他国制度的行为就具有合法自卫性质。然而很难在特定环境下判断他国制度是否造成了直接威胁。即便对于1940年的纳粹德国，美国国内也有广泛的不同看法。“二战”后，人们对不同于苏联政策的苏联制度是否威胁了美国也存在认识分歧。

第二，所谓直接威胁的观点可以被大而化之，即任何大陆上的独裁政权都对自由制度与价值在美国的生存构成了潜在威胁。自由民主体制只有在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环境中才能获得安全。这种观点在过去没什么影响力，是因为美国在地理上隔绝于不同政体的国家。然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各国间的互动与日俱增，出现了在许多国家同时运作的跨国机构，政治系统彼此融合的压力越来越大。独立与共存可能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像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西欧一样，奴役和自由将无法共存。因此，民主制度与价值在国内的生存将依赖于它们在海外的扩张。

第三，美国使他国制度符合美国价值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认可这些价值。历史上，西欧和拉美国家对美国价值的支持要多于亚洲和非洲国家，但毫无疑问的是，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权利的支持。在美国人看来，支持、帮助那些拥有和自己相同价值观的外国个人、团体和组织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同时他们也应当明白，截然不同于美国的制度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实现美国价值。

第四，让他国制度符合美国价值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无论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民是否相信，这些价值都具有普世效用。美国人如果不相信美国价值的普世性，就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自由民主在本质上并不优于其他政治价值，它只是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才流行于美国。这种相对立场同美国历史文化中强烈的道德绝对主义和救世主观念产生了冲突，所以是相对主义的原因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在美国难成气候。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如果人们相信一套政治理想具有普世性，就能够激发出活力和热情，来捍卫以其为模板的美国社会理想与制度。

大体上讲，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相信其价值具有普世性。美国人在“二战”结束之际迫使德国和日本实现了自由，但他们从未停下来思考过自由民主是否真的是这两国人民想要的。美国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他们思维中暗含的假设，如果不能让德国和日本按照这套价值观重建政治制度，那美国就至少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美国思想传统强调美国的救世主角色，导致美国人试图将其价值与制度强加给其他社会，对于美国价值普世性的信念显然反映并且助长了这种虚伪的思想。不过，如果能够承认美国价值的普世性并非在任何时间与地点都成立，就能够对上述趋势形成一定的限制。

美国人希望美国制度和政策能够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体现自由主义的标准和原则，外国人也很大程度上有同样的想法。无论美国还是外国的公民，都对美国采取了一套通常不会用于其他国家的评判标准。例如，人们希望法国能够无视意识形态和价值因素，径自追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国家利益，但是对美国的期望就大为不同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国身上，人们不过耸耸肩而已，倘若是美国犯下的，则会令人感到惊讶、错愕和愤怒。“欧洲承认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国家，因此采用一套单独的利他标准评价其行为也是合情合理的；欧洲人认为，对于不符合这套标准的缺憾之处破口大骂是理所应当的；当代美国走向堕落的每一个案例，都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感到快

这种双重标准实际上间接承认了美国人将其原则转化为实践时的严肃性。它还为批评美国的外国人提供了现成的武器，就像在国内的情形一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经济不平等、政治与宗教不宽容都是美国社会的常态，这同美利坚信条宣称的理想形成的强烈对比，为好几代欧洲批评家提供了充足的把柄。“这种形式的反美主义是一种抗议，它针对的不是美国主义，而是美国主义明显的失败”。²³ 这句话或许在表面上是正确的。但是美国主义的失败——美国制度与政策中持续存在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为带有敌意的外国抗议提供了借口和机会，抗议的真正对象就是美国主义本身。

权力与自由：美国压迫的神话

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模式经常被解释为两种力量冲突对抗的产物。冲突的一边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另一边是政治原则和道德。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方式描述这种二元对立：自利对理想，权力对道德，现实主义对乌托邦，实用主义对教条原则，历史现实主义对理性理想主义，华盛顿对威尔逊，等等。²⁴ 然而几乎所有的分析都假设确实存在这种二元独立关系，并在历史中追溯国家利益和道德对于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相对重要性。例如有观点认为，在联邦党时期，现实主义和权力考量总体而言占上风，而20世纪的前40年中，政策制定者在头脑中优先考虑的是道德问题和意识形态原则。“二战”结束后，一批在外交政策领域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其中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沃尔特·李普曼、罗伯特·奥斯特古德——阐述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并对此前流行于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道德主义、法制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威尔逊外交进行了批判。新现实主义的典范，在理论上是权力均势的中心作用，在实践中则是亨利·基辛格的外交活

动。基辛格认为，外交政策应当以影响他国的外交政策为目标，“以改变外交对象国家的国内社会结构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不正确的。²⁵

然而五六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在70年代遭到了“新道德主义”（“new moralism”）的挑战。战后曾摆向一边的钟摆更为猛烈地荡向了另一边。这是越战、“水门事件”以及60年代民主浪潮和信条激情导致的最具重大意义的结果之一，说明此前瞄准美国内部制度的道德主义现在转向了外部世界，美国人又开始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回应美国价值与制度之间的鸿沟。新道德主义首先表现在国会的行动中，对外援助法案于1966年增加了旨在推进外国民主制度的第九条（Title IX），70年代初又添上了有关人权条件的内容。1976年，吉米·卡特严厉地批评了福特总统，因为后者相信“外交活动中没有考虑道德问题的余地，我们必须把本国利益置于道义准则之上”。²⁶ 卡特成为总统后，人权就成了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议题。

因此，道义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界限是很明显的。不过双方还是有一点共识：他们都认为道德与自利、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不过就另一些方面而言——特别是谈及自由与权力间的冲突时，这种看法就不成立了。从定义上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二元对立。这种观点没能准确地理解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外外部世界打交道时面临的真正选择，而是用反权力伦理的假设理解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结果。美国人从建立社会之初就认识到，在政府权力的强制性与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权力和自由在国内是对立的，所以人们假设二者在国外也同样如此。因此，美国政府在世界上追求权力的行为必定威胁世界的自由，正如在国内追求权力也会威胁国内的自由一样。美国社会内部权力与自由的矛盾被投射到外部世界，变成了美国权力与外国自由之间的矛盾。

六七十年代，这一思想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宣扬所谓“美国压迫的迷思”——美国对他国政治的干涉必然不利于自由，还会支持那里的

压迫。汉斯·摩根索认为美国是“压迫之友”：“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我们代表保守分子和法西斯压迫进行干涉，去反对别国的革命和激进改革。在这个时代，各个国家要么正在革命，要么准备革命，于是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反动的维持现状大国。这样的政策只能导致道德和政治的灾难”。²⁷ 摩根索的这番话和其他支持“美国压迫神话”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一样，存在两个根本的问题。

首先是将支持左翼和反对压迫混为一谈。这表明，拥有共同的短期目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模糊自由派与革命者之间的界限。然而，那些支持他国“革命与激进改革”的人并不比支持“保守分子和法西斯压迫”的人更关心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实现。事实上，如果非要在右翼分子和独裁家之间挑一个的话，有至少三个好理由能够让自由派选择前者而非后者。（1）右翼威权主义政权对自由的压制不像左翼极权主义政权那么全面。在六七十年代，韩国侵犯人权的情况之所以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是因为尚有能够呼吁外界关注的韩国记者、宗教团体、知识分子和反对派政治领导人的存在。媒体上没有关于朝鲜的此类报道不意味着朝鲜没有压制自由，反而表明它对自由的迫害是全面、彻底的。（2）有关记录显示，右翼独裁者的政治寿命不像其左翼同行那么持久。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就是右翼独裁统治被民主政权取代的例子。然而直到1980年，还没有哪个共产党政权被民主政府取代。

（3）美苏的全球性竞争，导致右翼政权比左翼独裁统治更容易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完全是支持自由价值的。

最后一点引出了摩根索等人所谓“美国压迫神话”的另外一些根本性缺陷。他们描绘的六十七年代世界图景，是由一个拥有绝对权力优势、具有绝对压迫性的美国所主导的。事实上他们相信现代版的“美国全能幻想”，把其他社会的丑恶全部归罪于五角大楼、中情局和美国企业的阴谋。然而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在两个维度上是有问题的。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权力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到70年代中

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社会的影响同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相比已是苍白无力。然而在美国拥有这种影响力的时候，美国权力对其他社会产生的总体影响就是推进自由、多元和民主。在用于影响其他国家时，美国权力和美国原则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令人们意识到理想与现实间鸿沟的因素，恰恰也在现实中限制了这条鸿沟的宽度。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它为公民权利提供了比任何其他国家好得多的制度化保护措施。正由于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和影响力的任何增长都会在总体上（虽然不是必然，但也是经常）导致全世界范围内自由与人权状况的改善。美国权力的扩张不等于自由的增长，但是在美国权力的涨落与全球民主自由的兴衰之间的确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波自由民主扩张出现在“二战”后，当时战败的各轴心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曾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都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权。到8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两亿，其中还包括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要求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几乎完全是美国的功劳。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美国政府在设计两国民主制度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前轴心国家的“被迫自由”是美国决心与力量的结果。²⁸ 相反，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向自由民主过渡的温和步骤很快遭到逆转，斯大林式的镇压体制建立起来，民主力量被消灭殆尽，美国从此无法在东欧使用其权力。如果“二战”没有以全面胜利告终，或者美国没有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发挥那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就是如此），那么中欧和东亚的民主过渡就不会发生。但是美国军队开到哪里，民主就会随之到来（韩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

“二战”结束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些国家民主制度表现出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国“栽下”的制度与实践已经在当地找到了适宜生根发芽的社会政治气候。而美国在西欧和东亚持续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存在也是民主获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如果美国在战后的任

何时刻撤回其安全保证和军事力量，这些都会在未来给中欧和日本的民主造成最严重的动荡，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冷战初期，美国的影响力主要用于确保意大利民主政府的延续，以及在希腊促进自由选举。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具有双重利益目标：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系统，确保共产党无法获得权力。在这两个案例中，共产党没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哪怕一丁点支持，因此没有出现主张废除民主的政党通过民主手段获得权力的尴尬情况。在美国的支持下，民主制度在意大利得以生存，在希腊也坚持了一段时间。此外，美国获得“二战”胜利也刺激了土耳其，导致了政治史上罕见的一幕——威权主义的一党制政治系统以和平方式主动转变为民主的多党制系统。

在拉美地区，民主政权的兴衰也和美国影响力的涨落保持一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对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干涉，带来了这3个国家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和最开放的政治竞争。在这3国以及其他的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国家，美国经常施加影响力支持自由选举，这是为了回应当地反对派团体对本国政府压迫行径进行的抗议，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因重要社会政治力量失去平等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而导致革命或内战。正如西奥多·赖特在其综合研究中明确指出的，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支持自由选举促进政治稳定”，而非巩固军事独裁。在1900—1933年对8个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的干涉中，“在革命爆发前予以阻止，或在其爆发后判断其是否正当的唯一办法就是保证选举自由”这一假设成为美国采取行动的基础。²⁹ 在古巴，通过支持“反对派团体的兴起与巩固”，大幅增加“政治权力的来源，从而使任何单一团体乃至政府都无法将其意愿长期强加于社会经济生活”，《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和美国的干涉实现了“使古巴政治系统多元化”的效果。“自由主义的精神与实践——竞争性的、非管制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席卷了多元化的古巴”。³⁰ 近年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地、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

国以及其他地方进行的干涉，与60年代联邦法警对美国南方选举活动的干涉十分相似：登记选民，防止选举暴力，确保投票自由和计票公正。

美国政府在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直接干涉于30年代暂告一段落。结果，该地区的政权无一例外地朝着更为独裁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即便是最温和的民主活动也需要有美国权力的支持。美国干涉结束之日，便是民主覆灭之时。对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而言，有个好邻居的时代也是暴君横行的时代。如果美国努力做好邻居，就会给特鲁希略（Trujillo）、索摩查（Somoza）、巴蒂斯塔（Batista）这样令人讨厌的当地政治人物做暴君的机会。

“二战”后初期，美国主要将注意力和行动放在了欧洲和亚洲。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50年代末，情况开始变化，到了卡斯特罗在古巴夺权时已是一场巨变。60年代初，美国向拉美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项目，还在那里展开宣传攻势，总统和高官也经常关注拉美动态。在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的名义下，美国的权力被用于促进、维持民主政府，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区推进社会平等。美国在拉美权力的巅峰时期正好也是拉美民主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见证了“暴君的黄昏”——十个南美洲国家中除巴拉圭外全部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政府。³¹

美国的政策与权力显然不是这一时期民主政权大获成功的唯一原因，但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小心翼翼地扶持50年代末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出现的民主政府，除了加以鼓励还提供经济支持。美国花了很大力气阻止左翼游击队和右翼军官推翻委内瑞拉贝坦科尔特（Betancourt）政府，从而确保了该国历史上首次向民选总统继任者移交权力过程的有序进行。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多米尼加的事务不感兴趣，也很少介入”——这也正是特鲁希略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期。50年代末，美国对这位独裁者的反感与日俱增。1961年特鲁希略遇刺身亡后，“美国实施了自好邻居政策以来对拉美

国家的最大规模干涉”。³² 美国阻止了特鲁希略家族成员卷土重来，发起了改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计划，并采取行动保证民主自由和竞争选举。1962年的选举使胡安·博什（Juan Bosch）成为了总统。第二年，军队发难反对博什，美国官员先是试着阻止政变，在政变成功后又试图引导军人集团尽快恢复宪政秩序。然而，当时美国“影响（新政府）的手段十分有限”，美国承认军政府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在1965年举行选举的承诺。³³

1962年秘鲁发生军事政变后，美国更为有效地运用了自己的权力，恢复了民主政府。美国召回了驻秘鲁的大使，终止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价值8100万美元的援助也被取消。其他9个拉美国家也追随美国，断绝了同政变军人集团的联系——只有当美国手握数10亿美元慷慨馈赠，即将撒向这块大陆时，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³⁴ 结果秘鲁第二年就举行了新的选举，贝朗德（Belaunde）经自由投票当选总统。然而当6年后贝朗德被政变推翻时，美国不但无力扭转局势，甚至无法阻止新掌权的军政府将美国公民的大量资产国有化。在秘鲁，60年代末期的美国已经没有了60年代初期的力量和意志，因此也就没有可能保持秘鲁的民主政体。美国影响力的下降还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在智利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在1964年的智利大选中，美国倾尽全力支持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在他击败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在1970年的选举中，美国政府没有为战胜阿连德做出任何类似的努力，使其得以凭借微弱优势赢得普选。当时美国试图诱使智利国会拒绝承认阿连德胜选，并鼓动军事政变阻止其上任。这些活动不仅违背了智利的政治规范，也违背了美国道德，最终也没能成功。然而，如果美国能够像1964年那样积极干预1970年的普选，也许智利的民主就不会在1973年被摧毁。

总而言之，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在拉美的作用下降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拉美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民主道德

与人权标准的倒退，而美国本应在这两个方面向拉美国家施加影响。60年代初美国的拉美政策目标是民主竞争和自由选举（正如20世纪10—20年代）。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这一目标已经从扶持民主政府退步为劝导独裁政府不要公然侵犯公民权利。

在亚洲，美国权力与民主政府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权力也于6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而美国权力的下降同样伴随着自由民主的衰落。美国对菲律宾有着全面的影响力，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菲律宾有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日本以外）最为开放、民主的政治系统。1949年那次无可辩驳的不正当选举之后，面对胡克（Huk）叛乱给菲律宾政府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大幅增加了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对菲律宾政治的直接干涉，不仅在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绝对作用，还确保了1951年的国会选举和1953年的总统选举是“没有欺骗和恐吓”的公开选举。³⁵在后来的三次选举中，菲律宾的民主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在任总统竞选连任失败。然而此后美国对菲律宾的干涉和影响力都下降了，使菲律宾民主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当马科斯（Marcos）总统于1972年建立起戒严政体时，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衰退，拿不出什么有效手段去影响菲律宾的政治进程。越南政治自由和民主的高潮与美国在越南影响力的最高点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这个国家历史上唯一一次自由的全国选举就发生在1967年，当时正是美国军事干涉的巅峰。和在拉美一样，美国的干涉在当地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多元化，限制了政府，鼓励、增强了政治反对派的力量。而当美国在越南遭遇失败，其力量完全撤出印度支那地区时，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随后便控制了印支三国。

美国与韩国的关系也是如此。40年代末，在美国的支持下，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建立起大韩民国政府，李承晚（Syngman Rhee）当选总统。尽管严格地讲，韩国几乎总是在事实上处于戒严状态，但是从朝鲜战争（1950—1953）到5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援助最多，

韩国也得以保持温和的民主体制。1956年，李承晚以微弱优势竞选连任成功，反对党则赢得了副总统职位，并在中心城市大获成功。

然而在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对韩经济援助的减少，李承晚政权变得越来越专制。1960年的副总统选举是一次公然的骗局，学生和民众进行了强烈抗议。由于军队作壁上观，李承晚被迫放弃了权力。以张勉（John M. Chang）为首的民主政府随后成立，但难以有效行使权威、维护秩序。虽然张勉得到了美国大使馆和驻韩美军的大力支持，但还是于1961年5月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随后的两年中，美国一直向军政府施压，要求其重开选举，还政于文官政府。军队内部为此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得到了美国支持的朴正熙击败了军人集团内部的反对派，随后在1963年10月举行了一次具有一定公开性的选举，朴本人以43%的选票当选总统。在同军方内部强硬派的斗争中，一位记者发现，“美国的声望与承诺受到了严峻考验”。然而美国“摆脱了危机，其决心令韩国人震惊，获得了他们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来自积极支持美国给军政府施压的人，还来自激烈反对这么做的官员”。³⁶ 但是13年之后，美国无力再对韩国政治施加同样的影响力。一位美国官员说：“你没法跟这帮人谈论纯粹的杰斐逊主义。必须得使用一点威胁，否则他们就不听话……但是我们在韩国没什么手段可用。我们只能试着一直和韩国当局讨论各类民权问题，希望这样做能有点效果。”³⁷ 到了1980年，美国在韩国的势力已经严重萎缩，就像1961年和1962年那样，已经不存在所谓给军方领导人施压，要求其尽快举行公正选举的问题。美国能做的仅仅是劝告韩国政府不要处决反对派政治领袖金大中（Kim Dae Jung），而一位韩国官员发现，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也没有什么砝码”。³⁸ 随着美国在韩影响力的下降，韩国国内的政治压迫越来越严重。

美国权力对其他社会的自由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一部分原因在于像肯尼迪和卡特这样的总统有意为之，将促进民主和人权列为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即便没有故意这样做，美国力量在他国的存在和运用

通常也会导致类似的效果。70年代的新道德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别无选择”，道德与政治价值定义了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美国必须以此行事。他们明确表示这一观点带有规范含义，但实际上它也表明了某种历史必要性。尽管那些沉浸于“美国压迫神话”的人不愿意承认，但从事实来看，美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道德主义。美国的本性使其必定要站出来带头支持自由民主。显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在推进自由民主方面对世界事务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的权力也不能幸免——在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它既服务于好的目标，也服务于坏的目标。但同样是在这些方面，相比任何其他大国政府的权力，美国权力腐败和滥用的程度要轻得多。原因有两个。首先，美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毫无疑问是美国文化的产物，他们自己就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这不意味着某些领导人就不会在某些时刻采取违背这些价值的行动。感知能力趋于迟钝，安全需求指导一切，权宜之计大行其道，只顾眼前无视全局，这些情况显然都曾出现过。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于不同目标间的权衡取舍更为敏感，也更不愿意牺牲自由民主价值。其次，美国政治系统的制度多元化与权力分散限制了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这是其他社会所没有的，任何此类行为一旦发生，必定为公众所知晓。在曝光腐败官员和糟糕政策方面，享有高度自由的、强大的美国媒体表现得十分积极。美国国会有着其他国家立法机构无可比拟的调查权、立法权和财政控制权。因此，美国官员侵犯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能力十分有限，报纸上充斥着相关报道，并不意味着此类行为在美国比在别国更普遍，而是说明美国社会比别国更不能容忍此类行为。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中，认为美国在自由民主旗号下就不会做错误的事情，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但是7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的那种观点，即美国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从来没做过正确的事情，也是不对的。美国权力更有可能被用于支持而非反对这些价值，美国比其他任何大国都更愿意为了

自由民主而使用自己的权力。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自由的健康状况与其他社会自由的健康状况有直接关系。如果一个生了病，另一个肯定也会被传染。因此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 Ullman）认为：“其他国家政治生活的质量也会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质量。政治自由在智利被消灭殆尽，在葡萄牙和捷克斯洛伐克则有所增长，这些都会对美国的政治自由产生微妙而重要的效果。”紧接着他又反过来说：“正如其他国家的政治自由水平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美国政治生活的质量也会在国外产生重要影响。”³⁹ 他的这个观点经常被阐述成所谓的“清白原则”——只要其国境之内还存在对自由的严重侵犯，美国就无法真正在他国推进自由。美国需要依靠榜样的力量，就像霍夫曼说的那样，“先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乐善好施、井然有序的正义运动应当从我做起”。⁴⁰

但是这两种观点——腐朽环境与光辉典范——都只是部分真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观察，像智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其国内的自由状况都没有对美国的自由产生影响。外国人通常也会承认美国人容易忘记的一点——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因此，美国自由状况的任何改进都不太可能对外国产生影响。然而，如果向等式中添加一个新的变量，上述两种观点就会包含真理的成分。这个变量就是权力。

其他国家的自由状况能够对美国自由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这些国家有多少权力，以及它们对美国行使权力的能力。智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自由，是因为这些国家既弱小又遥远。但是如果英国、法国或者日本的自由消失，就会对美国自由的健康造成后果，因为它们是强大、重要的国家，和美国有密切的联系。反过来，美国自由状况对别国的影响，并不取决于美国自由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外国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取决于美国在目标国家的权力以及干涉的直接程度。拥有权力的榜样才会产生榜样效应。如果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以强大、自信、卓越的形象示人，其他国

家将对此印象深刻，相信自由是力量之源，从而模仿美国的自由。1946年，土耳其未来的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eres）在解释土耳其为何转向民主时，对以上内容做了颇有说服力的阐述：

二战期间土耳其遭遇的困难，揭示了一党执政体系下国家结构的弱点。一党制国家在战争中纷纷失败，因此人们对一党制奇迹不再抱有幻想。在二战血与火的动荡中，一党制思想被摧毁了。没有国家能够远离重大国际事件和当前主导意识形态潮流的影响。我们的国家也同样如此。⁴¹

总而言之，没有人会效仿失败者。

因此，世界自由的未来与美国权力的未来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但是，新道德主义是把双刃剑，既能在全世界扩大自由，又会减损美国的权力。70年代美国权力的相对衰退有多个原因，60年代到70年代初国内出现的民主浪潮（新道德主义也是其内容）必定是其中之一。那一时期对民主、自由和民粹价值的强烈信仰，最终导致人们采取行动限制、削弱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来自媒体、知识分子、国会议员和政治领袖的持续、猛烈攻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一结果。美国国际权力的下降，意味着他国自由民主得到的支持减少了。因此，美国民主与外国民主可能是负相关的。由于权力的中间作用，二者间的关系与厄尔曼的假设明显相反。

因此，外国自由的增进需要美国权力的扩张；美国国内的自由运动则要求限制美国的权力。要想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实现民主目标，就需要承认这个矛盾，在二者间有所权衡。例如，欢迎美国西半球霸主地位终结，同时又谴责拉美国内部严重的政治压迫，这两个目标之间就存在矛盾。在70年代，恰恰是最坚定地支持在他国促进人权的那批国会议员，对于削弱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美国权力——也最为积极。在第94届国会的关键投票中，132位国会议员一直支持对外援助法案中的人权修正案。其中78名议员坚持反对一项扩大军队规模的法

案，28名议员该问题表态前后不一。132人中，只有26人在赞成人权修正案的同时，坚持要求增加有助于实现人权目标的军事力量。

新现实主义盛行的四五十年代正是美国扩张其国际权力的时期，美国支持的自由民主也在全世界得以推进。70年代，新道德主义与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同时发生，与之相伴的还有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步。新道德主义对美国权力的限制加剧了其衰落，其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权力衰落的结果。新道德主义对全世界人权状况的担忧，明显反映出自由民主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倒退。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捍卫人权能力的下降，美国却更执着于捍卫人权的各种方式。1966年，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的第九条，这次旨在促进海外民主价值的立法行动，正好发生在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持续下降期的中点。类似地，70年代的国会还在对外援助法案中增加了各种严格限制，当时美国正在用海外军售广泛替代海外军援。在美国权力占有明显优势的时候，这些立法条款和限制措施都是多余的——没必要用《哈尔金修正案》（Harkin Amendment）强调自由价值的优先地位，美国的军队规模、航母特遣舰队、对外援助活动、情报行动已经表明了相同的信息。在美国权力开始衰退之际，国会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为保护人权设置更明确的条件和要求。然而，对于缩小国外的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国会立法仍然不能替代权力的作用。

因此，与所谓“现实主义者”“道德主义者”的看法正好相反，美国全球角色导致的矛盾，首先并不在于美国外交政策应当追求权力、自利还是自由、道德，而是限制美国政府权力以增加国内自由，与扩张美国权力以促进别国自由之间的内在张力。

“美国例外论”指的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令美国不同于欧洲社会的特征——比如相对较少的经济灾难、社会冲突、政治创伤和军事失败。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曾于1881年说过：“常备军、君

主、贵族、巨额债务、苛捐杂税、欺压成性，这些在欧洲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本不会出现在新大陆。亚美利加大陆属于纯洁的人性，它的制度是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与福祉。”然而，正如亨利·费尔利（Henry Fairlie）于1975年指出的那样：“美国现在有了常备军，时不时会出现非常类似君主制的东西，允许一定程度的遗产继承，从而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贵族制，税负也越来越重。”⁴² 丹尼尔·贝尔也在同一年用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从“帝国的终结、权力的削弱、对国家未来的信念丧失”中，都能看出“美国例外论的终结”。“内部张力急剧增加，政治和文化方面出现了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解决起来可能比国内经济问题更为棘手”。⁴³

20世纪后期美国遇到的许多问题，其实也是其他国家所共有的，只不过在此之前美国得以幸免罢了。然而这些问题对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仅限于那些附加内容——权力、财富、安全，等等。它们没有改变美国政治价值，只是拉大了对美国国家认同至关重要的那条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因此，美国历史上形成的最独特一面并没有被改变，一位南斯拉夫持异见者对此作了如下精辟总结与辩护：

美国是和法国、中国、英国等国都不一样的国家，如果哪天美国变得跟他们一样了，那将是一个大悲剧。区别何在？首先，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其次，美国的建国者认为个人自由高于自己的国家。

因此，美国首先是自由之国。这才是最重要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所有人都会说，我的祖国是德国、俄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但是只有美国人能说，我的祖国是自由。⁴⁴

美国人一直持有同样的看法，纵观美国历史，贯穿其中、无可避免的，是自由的理想、半自由的制度以及二者间的鸿沟。除去自由民主理想，除去为实现自由民主理想而付出的努力，美国就变成了没有存在意义、没有集体认同、没有政治文化甚至没有自己历史的国家。

作为社会存在的特征，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形式的内在张力。美国的特征正在于自由理想与制度现实间的张力。它定义了美国政治的痛处与承诺。如果这个张力消失了，我们所熟知的美利坚合众国便不复存在。

美国的存续，意味着美国仍然要承受认知失调，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尝试利用道德主义、犬儒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四种回应模式的某种组合加以应对。如果相当比例的美国人将某种回应模式极端化，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导致的危险也将最大化。在美国政治系统中，道德主义、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都可能走向极端。对理想/制度间的鸿沟完全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可能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腐朽蜕化；如果自欺欺人，不提出任何批评，无视鸿沟的存在和美国原则的强烈信仰，则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扩张，最终在国外造成政治军事灾难，或是破坏国内民主；以犬儒态度接受鸿沟，可能使美国理想被逐渐抛弃，特拉西马库斯式的“强权即公理”或是其他政治信仰将取而代之；最后是强烈的道德主义，这可能会让美国人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更好的东西，从而亲手毁掉世界上最自由的制度。

为了维护美国的理想与制度，美国人别无他法，只能对自己的回应模式加以调节，使之更加平衡稳定。要化解未来美国受到的威胁，美国人需要做到：

——继续信仰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同时承认现有的制度与行为同这些理想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理想/制度间的鸿沟感到内疚，但也能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世界上任何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都更加自由民主，并因此感到宽慰；

——试图缩小制度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接受人类本性不完美的现实，这意味着鸿沟将永远无法被消灭；

——相信美国理想的普世性，同时明白这些理想对其他社会的适用性是有限的；

——赞成美国维持必要的权力，以保护、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理想及其制度，但也承认权力可能给国内的自由与制度造成威胁。

批评者会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

1.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 Knopf, 1951), pp. 65-66.

2.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8.

3. See Edward Pessen, "The Egalitarian Myth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Reality : Wealth, Mobility, and Equality in the 'Era of the Common Man,'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October 1971) : 989-1034, and *Riches, Class, and Power before the Civil War* (Lexington, Mass. : D. C. Heath, 1973), passim. For critical discussions of Pessen's evidence and argument, see Whitman Ridgway, "Measuring Wealth and Power in Ante-Bellum America : A Review Essay, " *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 8 (March 1975) : 74-78, and Robert E. Gallman, "Professor Pessen on the 'Egalitarian Myth, ' "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 (Winter 1978) : 194-207. For Pessen's response, see his "On a Recent Cliometric Attempt to Resurrect the Myth of Antebellum Egalitarianism,"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 (Winter 1979) : 208-227.

4. Gordon S. Wood, *History Book Club Review* , June 1955, pp. 16-17, commenting on Rush Welter's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

5. Rush Welter,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p. 7-10.

6.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54) , 1 : 6-17.

7. Joseph L. Blau, ed. , *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 Liberal Arts Press, 1954) , pp. xxvii-xxviii.

8.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 p. vi.

9.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 Macmillan, 1909), p. 156.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 pp. 81-82.

10. Hofstadter,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 pp. 223.

11. J. R. Pole,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326.

12. See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George C. Lodge,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New York: Knopf, 1975).

13.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December 1971): 991-1017.

14. Samuel P. Huntington, "Postindustrial Politics: How Benign Will It Be?" *Comparative Politics* 6 (January 1974): 188-189.

15. Plato, *The Republic* , tr.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290.

16.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p. 181.

17.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62-369.

18.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esp. pp. 143-157.

19.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93-94.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pp. 80-97.

20.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p. 91.

21.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Banality of Revolt," *Saturday Review* 53 (July 18, 1970): 26.

22. Peregrine Worsthorne, "America-Conscience or Shield?" *Encounter* , no. 14 (November 1954): 15.

23. Henry Fairlie, "Anti-Americanism at Home and Abroad," *Commentary* 60 (December 1975): 35.

24. See, for example, Hans J.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Knopf, 1951), and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 (December 1952): 961-988; Reinhold Niebuhr, *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and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 Robert E.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Richard H. Ullman, "Washington versus Wilson," *Foreign Policy* , no. 21 (Winter 1975-76): 97-124.

25. Henry A. Kissinger, quoted in Raymond Gastil, "Affirming Ameri 1976): 12.

26. Jimmy Carter, address, B'nai B'rith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8, 1976.

27. Hans J. Morgenthau, "Repression's Frien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1974, p. 46.

28. See John D. Montgomery, *Forced to be Free: The Artifici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and Japan*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29. Theodore P. Wright, *American Support of Free Elections A broad*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4), pp. 137-138.

30. Jorge I. Domínguez, *Cuba: Order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3.

31. See Tad Szulc, *The Twilight of the Tyrants* (New York: Henry Holt, 1959).

32. Jerome Slater, *Intervention and Negoti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p. 7.

33. Abraham F. Lowenthal, *The Dominic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6.

34. Jerome Levinson and Juan de Orris, *The Alliance that Lost Its Wa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pp. 81-82.

35. H. Bradford Westerfield, *The Instruments of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3), p. 416.

36. A. M. Rosenthal, *New York Times* , April 8, 1963, p. 14.

37. Quoted by Andrew H. Malcolm, *New York Times* , June 11, 1976, p. A2.

38. *The Economist* 275 (August 30, 1980), pp. 27-28.

39. Ullman, "Washington versus Wilson," pp. 117, 123.

40. Stanley Hoffmann, "No Choice, No Illusions," *Foreign Policy* , no. 25 (Winter, 1976-77), p. 127.

41. Adnan Menderes, *Cumhuriyet* , July 18, 1946, quoted in Kemal H. Karpat, *Turkey's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40, n. 10.

42. Fairlie, "Anti-Americanism at Home and Abroad," p. 34, quoting William Clarke, 1881.

43. Daniel Bell,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Nathan Glazer and Irving Kristol, ed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976*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 197.

44. Mihajlo Mihajlov, "Prospects for the Post-Tito Era," *New America* 17 (January 1980): 7.

美国总统演讲撰稿人贡献的超级畅销书
权力游戏的14条致胜法则/献给这个政治无所不能不在的世界

硬球

政治是这样玩的

[美] 克里斯·马修斯 著

林猛 吴群芳 译



Hardball

版权信息

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美）马修斯著：林猛，吴群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011-9259-5

I.硬... II.①马.....②林.....③吴... III.政治制度—研究—美国
IV.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2893号

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

作 者：（美）克里斯·马修斯

译 者：林 猛 吴群芳

责任编辑：黄绪国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三版
印 次：2010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259-5
定 价：35.00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

联系调换：010-630739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言

第一部分 盟友

第一章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第二章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

第三章 索取比给予还好

第四章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

第二部分 敌手

第五章 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

第六章 不要疯狂，不要扯平，而要向前推进

第七章 对任何飞来之箭，都要一一反击

第三部分 交易

第八章 说话是为了更好地沉默

第九章 永远对原则问题表示赞同

第四部分 名声

第十章 举灯照亮你的问题

第十一章 旋转你的角色

第十二章 记者就是敌人

第十三章 权力的声望

第十四章 形象的定位

展望

导言

写给所有人的14堂政治课

请注意，这不是一本公民学或市政学之类的教材。它呈现给世人的不是种种纯洁无瑕的程序与制度，而是并非天使的不完美的人类。它不是要对这个国家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领袖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做人做事进行空洞刻板的说教，而是站在一个熟知内幕者的角度揭示领袖们有时过于离经叛道或令人咋舌的行为。相应地，它所围绕的主题并非历史浩浩荡荡的行进历程，而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对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追逐，以及为了在华盛顿获得一席之地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争斗。

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本书的标题：硬球或者说硬式棒球游戏，在这里指的是角逐激烈的政治游戏，一种彻头彻尾的马基雅弗利式搏击。它集中体现了获取和保持权力所需要奉行的法则，那些法则适用于任何行业或领域，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得到了最为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运用。

当我最初在眼前写下上面这段话时，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一部备受推崇的经典：许多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将其奉为圣经，拿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首席执行官们爱不释手，将它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随身携带；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一遍又一遍地翻读这本书，似乎里面有掘取宝藏的路线图；政治学教授郑重其事地向学生推荐，将其列入必读书目；“硬球”这个术语本身也是广泛流传，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一大用语。

亲爱的读者，对于你来说，你现在尤其关心的是，这里所讲的政治游戏的基本法则，是如何一直被证实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书中所讲的那些政治智慧，无论是取自约翰·F·肯尼迪、里查德·尼克松和林登·约翰逊高人一等的竞技记录，还是来自我对唐纳德·里根及与他难

分伯仲的蒂普·奥尼尔的亲眼目睹，到今天都越发耀眼夺目、显而易见了。比尔·克林顿不止一次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旋转角色 的生动示范。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向我们展示了向前推进而不是与对手扯平的巨大好处。而那些像纽特·金里奇那样不怎么幸运的政治领袖则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懂得了说话是为了更好地沉默 的道理。

当我在1988年写作这本书时，我的另一个目的是娱乐。对于那些整日生活在无形的刀光剑影中的政治家来说，政治生涯绝对是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欣赏到真实坦率的描述，看到一些驰名遐迩的风云人物是如何实现自己的雄心，登上辉煌的权力巅峰的。你会碰到一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功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学会了游戏法则，并在实践中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最终取得胜利。

那些观看我的电视节目和阅读我的新闻专栏的人都知道我对这一激动人心的游戏的偏爱与迷恋。乔治·F·威尔就认为我身上的“一半是哈克·费恩（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费恩历险记》一书中的主人公——译者注，以下小括号中文字均为译者注，不一一申明）的冒险精神，另一半是马基雅弗利的冷静务实。”的确，我从自己切身的冒险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如我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学到了很多東西。我们都会同意，你只会对那些你亲自发现的东西确信无疑。

对于我而言，这一漫长而刺激的旅程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当时我还只是华盛顿的一个初来乍到者，自以为对政治相当精通。自从上高中开始，我就对选举游戏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了，我是一个真正的有政治瘾的人。早在那时，我就是某些候选人的铁杆支持者和另外一些人的坚决反对者，会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的胜利而欢呼，为他们在大选之夜的失利而黯然神伤。当我20岁出头参加和平外援助队时，我在异国他乡依旧保持了这份痴迷。凭借手头姗姗来迟的《纽约时报》的“本周评论”和为数寥寥的其他几本杂志，我会饶有兴趣地预测国会年度选举的结果——尽管当最终的结果到达我所在的斯威士兰（非洲东南部的王国）的一个小镇时，通常已经是在美国人参加他们的投票之后好几天了。所以，我自认为在跻身政治舞台之前是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的。曾经有许多年的时间，我满怀敬畏、全神贯注地关注着精彩纷呈、口若悬河的政治辩论，关注着上场者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个性品质以及整个美国变幻莫测、眼花缭乱的政治舞台。

但是，就政治上的硬式棒球策略而言，我只能说我到华盛顿时还是一个生手。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扑朔迷离的世界，就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的奇特景观丝毫不逊于我刚刚离开的那片非洲土地上壮丽的异国风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一次曾说那些“腰缠万贯、金玉满堂的人”是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不同的。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些在政界叱咤风云、功成名就的人也是这样。

在华盛顿那些富丽堂皇的紧闭的大门后面，隐藏着的不仅仅是别有洞天的权力天地，还有一套独特的语言，我自己现在也学会了说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充斥着年深月久的坚固联盟、冷酷无情的报复和精明狡诈的讨价还价的世界，但同时也是展示诸如角色旋转 和形象定位等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的政治策略的场所。

那些久经风霜、孜孜以求的政治老手的策略和手段，无论是沿用已久还是新近独创，都足以让大多数人耳目一新甚至目瞪口呆。事实上，从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技巧很少能够在严格意义上被归纳为“正当手段”。

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豪气万丈的雄心、残酷的钩心斗角和诡计多端的布圈设套。如果你觉得我的语调讽刺辛辣，如果某一些画面和情境在你看来过于荒诞不经，那你就准确地抓住了我想表达的态度了——在这个所谓的核能时代，政治是唯一供成人玩的游戏。

“政治使得素不相识者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19世纪的幽默作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这样写道。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只不过是以后层出不穷的政治怪诞剧的序幕而已。我从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发现，我们对于政治家所怀有的感想——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距离真实的状况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即便是那些最为愤世嫉俗的挑剔的挖苦者，他们对于真正的政客所玩弄的两面三刀的把戏和天衣无缝的欺诈恐吓，也没有足够的认识。

假定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你对涉及自己利益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概不关心。突然有一天，你的心头充溢了不常有的喜悦，因为有人对你的一切表示殷切的关注，对你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你自己动手之前他就已经为你的目标出谋划策了。假定你被他的曲意逢迎迷昏了头，而他借此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宏伟规划。他的真实意图，正如马基雅弗利在500年前教给他的，是利用你为他自己办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圈套的你发现，你为他做得越多，你就变得越是忠心耿耿，越是死心塌地为他鞍前马后地操劳卖命。

假定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复仇的欲火在你的心头熊熊燃烧，你遇到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厉害角色，这个人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本事，能够把有着血海深仇的死敌转化成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的盟友。假定有一场争论发生，你被对手轻易的妥协和让步所蒙蔽。是的，你在大的“原则”上似乎的确占了优势，然而，在较小的、更具体的地方对方却真正得到了好处。

假定你是一个患有自我膨胀症的自我陶醉者，生来就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你碰到了继承了另一类财富的人——一个有着结交那些他需要结交的人的内在动力和本事的人。假定你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自恋狂，你碰到了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将自己的缺陷、弱点暴露得一览无余，而且能够极其巧妙地施展和利用它们。

正是这些古怪的甚至是突兀离奇的行为使得真正的政治动物区别于一般的芸芸大众，并且赋予了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决定性的权力。

曾经有多少次，你听到自己的同事抱怨因为“钩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而未能获得升迁？又有多少次，你听到某人哀叹因为“无法处理好既得利益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白白地失去大好机会？还有，那些不时萦绕在公司走廊和所有职业领域的“卑鄙手段”和“诈骗勒索”，你又听到了多少？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了，在一些人步履维艰地蹒跚移步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成功地披荆斩棘，一日千里。

事情的真相就在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谋划和运作。

整整28年的时间，我都在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游戏环境里工作。作为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助手、总统演讲稿撰写人以及众议院议长的首席助理，我见过太多性格各异、形形色色的人，例如，罗纳德·里根和托马斯·蒂普·奥尼尔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玩起政治游戏来兴致勃勃，并且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和众多的政界要人的亲密关系之外，我在这些年里还获得了一些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懂得了成功是很少取决于外貌、财富或者个人魅力这样一些因素的。当然，活力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拥有充沛的精神和活力。但是，真正激发人活力的是不断学习的意愿和为了登峰造极而不惜做任何事情的决心。他们在跋涉的旅程上获得的荣耀越多，他们就越意气昂扬，积极乐观。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是竞选总统的死敌，但两个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怀有同一种热爱——对竞争本身的热爱。

跟所有的前人一样，我对美国政坛上层出不穷的传奇心醉神迷。林登·约翰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我对这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传奇故事耳熟能详——他们是如何学会建立和巩固联盟的，又是如何讨价还价的，还有，他们是如何巧妙地出奇制胜和抬高自己的声望的。

是的，在权力游戏中的确存在着有迹可寻的法则，它们是政治领袖们代代相传的政治智慧中的一部分。这些不成文的法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得到积累，就像国会山议员衣帽间（休息室）里的雪茄烟灰一样越积越厚。发生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的每一幕后面都隐藏着它们，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谄熟和遵循它们的人大获全胜，而对其懵懂无知或加以违背的人则头破血流。一位“做派老套”、在政坛如鱼得水了几十年的人，曾对我谈到过其中的奥秘：“你只需要向人展示……”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发自肺腑地讲起了政治游戏的法则，那些法则总结了许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的成功经验。

有一天，我站在民主党议员衣帽间里，那个狭小的房间位于一个僻静的所在，远离国会山的会议厅。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快餐厅和一长溜的电话亭，还有两排陈旧的皮革沙发，沙发上放了小垫子，以便议员可以在午间打个盹儿。当时正是午餐时间，空气中弥漫着冒着热气的热狗的香味。一小群国会议员一反会场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的举止，在不锈钢的餐桌旁一溜排开，急不可耐地大嚼口中的热狗和三明治。跟往常一样，谈话围绕的主题都是政治。我悄悄地向旁边的一个人透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我正在着手写一本关于政治游戏法则的书，并且，书中的内容包括了我在所有诸如此类的非正式场合中无意间听到的各种花招。他直直地看着我，额头上显出了一道痛苦的皱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道，“你为什么想把这些公之于众呢？”

我的回答是，这些交易秘密不仅仅对雄心勃勃的职业政治家有价值。在职业政治家所运用的游戏法则中，有着人类社会的持久真理。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但却终其一生都在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错误。他们对于自己是如此眷恋、入迷，以至于彻底忽视了他们特别想对之发生影响的人们。他们不是广结同盟，而是局限于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和孤军奋战；他们不是正面对抗或者迂回截击自己的对手，而是消极地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在进行重大的讨价还价时，他们对细枝末节斤斤计较，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他们因为自身的缺陷、弱点而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全然忘记了可以变不利为有利，从而转败为胜。

一些人或许会说这些倾向都只不过是人之常情，是人性中固有的方面。但是，这些被说成为人类天性的倾向——例如，在需要向别人提出要求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在面对挑战和反对时忐忑不安、一味逃避——其实是畏缩、退让的本能体现而不是领导才能的标志，说到底只不过是内心恐惧的反映。正是因为遵循这些所谓的天性，我们才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陷阱。我们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出格，要低下我们的头——旧时代奴隶的典型写照。

这本书的前提假定是一目了然的——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前进，你

可以从那些成功者身上学习许多东西。如果有朝一日你登上空军一号，你就会发现那个世界和你自己的世界之间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天堑鸿沟。人们一边千方百计地向上钻营，谋求地位，一边用警惕的双眼东张西望，互相提防。如果你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度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办公室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正如国会和其他任何巨型的复杂组织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一样。这里有朋友和敌人；有交易、妥协、针锋相对的斗争和不厌其烦的讨价还价；这里还有“角斗士”，他们的生存是建立在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法则，你不仅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充满了政治权谋的世界赢得一席之地，而且能够如鱼得水，兴旺发达。

在如何运用政治策略办成事情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任何党派差别的。正如鼎鼎有名的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过去经常所说的，“没有专门的共和党人清理垃圾的方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并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手段，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办。

当1973年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弹劾危险时，他仔细地审视了国会的形势。他悲哀地意识到，众议院被掌控在一个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手中，尼克松终于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当我看到蒂普·奥尼尔咄咄逼人的攻势时，我知道我陷入了麻烦，”大势已去的总统在其政治生涯覆灭之前这样哀叹，“那个人一向喜欢玩硬球。他从来不知道女子垒球。”

《硬球》这本书并不是供读者钉在墙上欣赏的政治人物肖像集。你将在书中发现一些熟谙此道的大师，并立即被他们所深深吸引，例如，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罗纳德里根。你会轻而易举地弄清楚，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约翰·肯尼迪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唯一的障碍就是他的宗教信仰，然而，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即便连这个劣势也转变成了他的优势。当然，要参透理查德·尼克松或者林登·约翰逊的成功之谜，要更为困难一些，前者在美国政治舞台中心足足活跃了30年，后者尽管貌不惊人，没有任何明显的公众魅力，但却有效地统治了美国参议院8年。仅仅用好运气来解释后者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它不足以抵消诸如笨拙拘谨的举止、

滑稽古怪的外表、反复无常的性情等负面因素。简而言之，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对政治谋略和技巧的由衷激情与高超把握。

比尔·克林顿是又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仔细观察一下他入主白宫的道路，便不难发现他那炉火纯青的游戏技巧。他无论在什么时候跌倒，都能很快地站起来。当他在198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了那篇糟糕透顶、拖沓冗长的演说之后，他很快在“今夜演播”中用自己谈笑风生的表演化解了形势。他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超越于自己困境的大人物形象。

1992年，克林顿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淋漓尽致运用角色旋转策略的高手。他给自己冠以“卷土重来的孩子”的称号，从而一举转败为赢，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中大获全胜。1994年，他正确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政坛中的第三方力量，既不偏向那些国会山中顽固不化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者，也不倒向保守的、在国会选举中击败了他们的共和党人，从而继续稳居总统宝座。

在这一新修订版中你将会看到，我所讲的硬球法则会一如既往地支配各个领域的政治活动。只要你小心谨慎地遵循这些法则，你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如果你违背了它们，你必将付出一个职业政治家所会付出的惨重代价。

对于那些职业政治家来说，政治硬球的游戏法则就如同卡西诺赌场一样牢牢吸引着他们，散发着无穷魅力，即便是对于这些法则有着诸多指责和非议的旁观者，也同样如此。或许其中的魅力源自明明白白的收益和进账，源自梦想成真的喜悦和激动，源自一朝雪耻的扬眉吐气和舒畅快意。

我曾经多次亲历在胜利的大选之夜那种喜极而泣的激动和兴高采烈。但我同样也记得在1980年11月2日的那个早晨，笼罩在吉米·卡特总统飞往佐治亚州普来恩斯的那架直升机上忧郁凄凉的气氛，那真是一片愁云惨雾，坐在飞机里的人简直就像是在一只笨拙迟缓、奄奄一息的巨鸟体内。

在这个不胜则败、不进则退的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种磁性引力。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站在金碧辉煌的宾馆的大厅后面，注视着满厅的公司执行官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某个政治家发表谈话。当到了自由提问的时间时，那些人会认真真地询问即将出笼的立法或者下一轮总统竞选之类的事。但是真正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权力。在这个成功的家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是如何到达他现在的这个位置的？

这真是不错的问题。我的这本书中充满了令你惊奇的答案。

第一部分 盟友

对于那些整日生活在无形的刀光剑影中的政治家来说，政治生涯绝对是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欣赏到真实坦率的叙述，看到一些驰名遐迩的风云人物是如何实现自己的雄心，登上辉煌的权力巅峰的。

第一章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他们不懂得一对一的单独会面最有可能赢得对方的支持，他们以为那种情形下都是“强奸”而不是诱导，因而，他们错过了为采取最后行动而铺平道路的良机。

——林登·约翰逊

对于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你可以料到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博比·贝克这种人了。博比·贝克是约翰逊总统的亲密朋友和助手，他十足地代表了华盛顿政坛最肮脏、阴暗的一面。如果有哪部字典要给“腐败”这一词条配一幅插图作为说明，贝克的照片就是最佳的选择。他利用自己精心编织的种种友情关系和身为参议院秘书的地位与内幕知情人角色，纷纷成为一家又一家停车旅馆、机械销售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秘密股东。然而，1968年秋天，他的如意算盘破灭，前程灰飞烟灭。这位精明、狡黠的国会山助手被以逃税、侵吞和共犯等多项罪名投进了监狱。

贝克是一个爱讲排场的人，他在出游时总是选择最豪华的方式。就在他自由自在的日子临近结束之际，他还为自己在豪华游轮“美利坚号”上订了舱位进行了一次大西洋旅行。他一上船就和他那帮乱七八糟的朋友以及一些不明不白的女人，占住了游轮的酒吧，在那里寻欢作乐。他在船上轻松自如地扮演的角色，也和他为自己在参议院的

那些庇护人扮演的角色一样——娱乐活动的总指挥。

然而，不管怎样说，贝克却首先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的家伙，他那带着讥讽神态的眼光，能看清事情是如何运转的，他知道，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中，“宝藏”到底埋在什么地方。

不过，以这方面的能力而论，他并不是那艘船上仅有的一位天才。在那艘船上的旅客名单中，还有一批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来自罗得岛的一批年轻学子，去牛津开始他们第一个学期的学业。他们早就听说过贝克声名狼藉，所以都不愿意接近他。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如果说在他的同学眼里，贝克是已经逝去的腐朽政治时代的一个活标本的话，克林顿也看到了这点，但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克林顿，这位当年曾以在玫瑰花园和肯尼迪总统握过手为荣的儿童，现在已经长大并开始在政坛经营了。他不顾与他同船的那些未来同学的轻蔑和不满，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贝克一伙人身上。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既然这位政治冒险家可以把另一位出身贫寒但却雄心勃勃的南方青年（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民主党人）推上政坛的顶峰，那么无疑也可以给他指点迷津。

那位南方青年登上权力顶峰的故事，不仅仅对于了解华盛顿、而且对了解整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都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1971年我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国会山还是城里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国会山警察分局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又脏又旧的地图，上面标有很多小“×”标记，标出了所有曾发生过谋杀案的街角、人行道和小巷子。

以前，一个人的生命在国会山是如此危机四伏，所以，联邦车站附近竟然有一家路边饭店为当地警察提供特价自助餐，不管他们吃什么都只要一美元。那个饭店叫道奇饭店，它的管理人员喜欢让人看到收银机旁边都是穿着蓝制服的警察，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频频发生的抢劫了。

但到1971年春天的时候，道奇饭店早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了。这

个为公共汽车提供便宜的停靠场所、高年级学生想风流一夜也可以掏得起腰包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了。它变成了旅行手册上一个标示方位的星点。

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道奇饭店不只是某个地理位置的标记，它也是一种历史的标记。50多年前一个冬天这里发生的一段故事，可以成为任何政治教育的第一课。

在1931年大萧条的那些日子，道奇饭店就成了一个供人住宿的旅店，里面住着几名联邦参议员，并且至少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及这些人那么显赫的房客。在门厅底下的两层地下室，有一长排卧房，那些卧房只有一个公用的洗澡间。每到晚上，这个阴冷、潮湿的地下世界就会生机盎然，因为那里面萦绕飞扬着两眼闪光、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梦想，他们是一批为美国国会工作的幸运的年轻人。

在这群地下房客中，有一位22岁的青年，他体格魁梧而笨拙，长了两只大象一样的耳朵。他刚成为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克莱博格的秘书，两周之前他还是休斯敦一所中学的教书匠。这位青年在道奇饭店度过第一夜的时候，就有一些奇怪的举动。那些举动，直到临终之前的几个月，他才告诉了他的好友兼传记作家多里斯·基恩斯。那天晚上，林登·约翰逊一共冲了四次澡。他四次披着浴巾，沿着大厅走到公用浴室，四次打开水龙头，涂上肥皂。第二天凌晨，他又早早起床，五次跑去刷牙，中间间隔只有五分钟。

这位得克萨斯州的青年人，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饭店里还有75个和他一样的国会秘书。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认识他们，认识得越多越好。

他的这一招成功了。在华盛顿还不过三个月，这位新来乍到的人就成了“小国会”的议长，那是一个由众议院全体助手组成的团体。

这是约翰逊在华盛顿的首场“演出”，他展示了自己基本的政治手段。他向我们证明，向上爬就意味着结交人，两者事实上是一回事。

在我还不懂国会山是如何运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难以理解，像林登·约翰逊那样的人为什么能爬到那样高的位置？这个人在电视上的形象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戴着一副滑稽可笑的老花镜，不断斜眼瞟看讲稿提示器，紧张得大汗淋漓。此外，他的一些声名狼藉的个人行为，例如卖弄身上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拎着爱犬的耳朵把它举起来，坐在厕所马桶上处理公务，也丝毫不能给他的形象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就是这个人在动荡不安的60年代，向我们这些“美国同胞”描画着他的伟大蓝图。我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始终被这个谜团困扰——为什么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中，这样一个人居然能爬到无数比他更加能干、更有魅力的同行头上，决定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渐渐明白，约翰逊所掌握的这套一对一的交往技巧——专家们称之为“零售政治”，在国会和其他各种组织中是多么有效。

林登·约翰逊之所以能掌握和行使权力，借助的不是电视聚光灯的炫目光芒，而是一对一交流时的个人风采。在本书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借助广播、电视赢得天下的例子。但这个得克萨斯人与他们不同，他多数的“买卖”都靠“零售”成交，一次只接待一个顾客。

对于所有渴求权力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位1931年曾披着浴巾、站在道奇饭店的洗澡间里到处和别人打招呼的高大青年更好的榜样了。

在约翰逊看来，国会山就是进行“零售政治”买卖的风水宝地。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在国会山他只需要与少数的一批人打交道。这一点与其他机构里的政治，不论是公司还是大学，倒是有相似之处。如果说罗斯福的杰作是通过“炉边谈话”影响了千百万广播听众，那么，约翰逊则是把魔力直接运用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在他那里，人数越少，效果就越好。虽然约翰逊在众议院度过了10个春秋，但他到进入参议院之后才真正成为权势人物。向100名参议员进行零售，总

是比向435名众议员零售容易得多（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人数分别为100和435）。

“从第一天起就可以看出来，参议院就是他待的地方，它的人数、规模刚好合适，”曾长期担任约翰逊助手的沃尔特·詹金斯在回首往事时这样说。

要计算约翰逊在这个机构里的政治上升速度，我们只需要记住两个日期：他1949年进入参议院，1952年底就成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约翰逊在参议院的权力之路，其开端和他当年在道奇饭店地下室洗澡间里完全一样——直奔权力源头而去。当年为了在秘书政治中脱颖而出，他深入到饭店的角角落落，找出最有分量的那批选票。他为了赢得参议院的领导地位，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开始，那就是查明权力源头的具体位置。正如政治学家西奥多·怀特所说，约翰逊表现出了一种追求权力的本能，那种本能“就像鲑鱼为了产卵就一定要溯流而上，是一种原始的本能”。

起作用的不仅是本能，还有大脑。当那些与他一同在1948年当选的新参议员们被他们即将在辩论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林登·约翰逊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参议院本身的政治上。毕竟，参议院和他以前参加过的其他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也会有“鲸鱼”，就是老大，掌管着整个地盘；其他的是“小鱼小虾”，会被巨浪席卷而去，随波逐流。

约翰逊早年在众议院摸爬滚打的时候，就学到了一课，那就是各政党衣帽间的重要意义。

所谓“衣帽间”，其实不是一个确切的称呼。如果议员们要放衣服，他们可以放在办公室，因为从19世纪初开始，所有的议员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衣帽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作用，就是为议员们提供一个白天闲聊、放松的场所，它并不对外开放，只有议员和他们信任的一些助手可以进去。除了几个快餐柜台和几把已经用旧了的躺椅以

外，衣帽间里还有一部国会电话转接机，以及一个可靠的“电话管理员”。这个电话管理员头衔虽然不起眼，却不是一般的职员。对于国会山的生活，人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正在干什么？”，而对这个问题最清楚的莫过于这名管理员了。他知道白天的讨论什么时候结束，明天又会讨论什么，原定星期五举行的会议是否值得参加，等等。如果你想听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只是想体会一下国会的气氛，你就应该到他那里去问。对于国会山来说，衣帽间的意义类似于加油站对美国一些南部小镇的意义。事实上，任何行业都会有这样的场所，那些在岗位上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的人们会到那里去放松，谈论一些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实际问题。

衣帽间就是国会这辆豪华汽车的冷却器。林登·约翰逊，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农村孩子，非常清楚这种秘密角落的重要性。所以，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负责民主党衣帽间电话接线工作的一个20岁的青年侍应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那个青年的名字就是博比·贝克。约翰逊知道这个小伙子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对于那些平时需要依靠他的参议员，他能敏锐地判断他们的长处与弱点。比如，贝克知道哪些参议员属于勤奋工作型，哪些参议员却是宁愿早点回家，或者去其他地方消遣的。他知道他们的习惯、计划、兴趣、社会需求和政治目标。所以，约翰逊甚至还没有进行参议员就职宣誓，就安排了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我要知道这里谁说了算，”他向侍应生提出了要求，“他们怎样办事，哪些委员会最有影响，有哪些工作在进行，你都告诉我。”

几年以后，贝克成了约翰逊的助手，并为自己赢得了华盛顿头号“操盘手”的名声。虽然后来的丑闻迫使约翰逊不得不忍痛炒他的鱿鱼，但贝克这个知道所有参议员生活里的善恶美丑的人，对于约翰逊爬上权力顶峰一直是一笔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财富。

约翰逊从这位新结交的青年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和他事先的估计差不多——所有的参议员并不是生来就平等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孤高的俱乐部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由南部参议员组成、由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无可争议地领导着的“核心俱乐部”。这个核心俱乐

部对其他势力十分警惕，它会摧毁任何向自己挑战的个人或组织。就在那次会面之后，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林登·约翰逊决定“嫁给”理查德·拉塞尔。

当然，他的“求爱”不能做得过于明显。另外一些人也有他这样的野心，他们尝试过，都体会到了那种没有回报的“爱情”的痛苦。所以，约翰逊要更加隐蔽、谨慎一些。他的第一步就是争取进入拉塞尔所领导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样他就有充分的借口，花很多的时间待在这位资深参议员身边，同时却不会给人留下巴结的印象。

结果，他的第一步棋非常成功。他很快就以批评五角大楼挥霍浪费、办事拖沓而在拉塞尔的委员会里赢得了声誉。他找到了一个办法，既充当强有力的国防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当前军事部门的批评者。

约翰逊和那位佐治亚州政治家拉关系的手段，已超过了职业水平。拉塞尔参议员是个单身汉，早餐、晚餐都是在国会山餐厅吃的。“我可以肯定，他总是有一个伙伴，一个参议员，工作像他一样勤奋，工作时间也和他一样长。那就是我——林登·约翰逊，”约翰逊临终前回忆道。“在星期天，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空空荡荡，悄无人声，外面街道上人也人迹稀少。这样的一天对职业政治家来说非常难熬，尤其像拉塞尔这样的单身汉。我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数着直到星期一的。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一定会请他一起吃顿早饭、中饭，或者只是一起看看周日的报纸。他是我的导师，我希望能照顾好他。”

这种友谊已经超出了功利的范围。约翰逊渐渐对他的庇护人从心底产生了深深的尊敬之情。若干年后，约翰逊还会说，这位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本来是应该当选总统的。

但约翰逊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虽然他在参议院里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却练出了近乎炉火纯青的政治技巧，那套技巧今天仍然被政坛老手们尊称为“约翰逊疗法”。

今天的职业政治家喜欢用“广而告之”的方式向他们的听众说话，好像每个人都只是一大群毫无区别的人中的一分子，而约翰逊却十分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每次都要想方设法准确地搞清楚，他到底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谈话。他和后来的众议院议长托马斯·P·“蒂普”·奥尼尔（托马斯·P·奥尼尔是美国民主党领袖，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人们习惯称呼他“蒂普·奥尼尔”，“蒂普”是昵称，它的本意是指棒球比赛中，用球棒侧面击打投出的棒球，这是19世纪一位著名的棒球明星爱德华·奥尼尔的拿手绝活），还有其他老一代的政治家一样，都喜欢充当政治生活的交通警察，不仅时时留心自己车辆行驶的方向，还留心屏幕上其他小圆点的方向。还有一点可能更加让人想象不到，像他这样突出自我的人，居然是靠不仅研究别人外在的需要，还研究别人的内在需求，才爬上了那样高的位置的。然而，正是因为约翰逊乐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和别人关心的事情上，而不论那些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才使得他与那些他试图影响的人能进行几乎无所不谈的沟通。

杰克·布鲁克斯是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也是约翰逊的亲密朋友，他就亲身领受过“约翰逊疗法”。他告诉我，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方目前的处境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力量。“林登·约翰逊总是能够让你相信，你的问题不管在别人眼里多么微不足道，对林登·约翰逊来说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剧作家拉里·金是《得克萨斯最佳小妓院》的作者，他还记得自己1959年与约翰逊交往的一段经历。当时，金正在给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J·T·卢特福德做助手，那位众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约翰逊的影响范围之内。一天晚上，约翰逊来到了那位众议员的选区，那是他旅行的一站，为的是锁定该州以争取1960年成功竞选连任参议员。他还计划在当年竞选总统，所以要确保自己的后院不会起火。

金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位来访的大人物，但他对这项工作并不热衷，而约翰逊很快就表现得跟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浑蛋。这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敞开盥洗室的门，站在抽水马桶前面，一边撒尿一边报出了一长串人名，他要金“按照我口述的顺序”依

次给那些人打电话。

但是金对伺候林登·约翰逊的工作已经感到厌烦了，他把名单留在靠近盥洗室门口的桌子上。在约翰逊再次露面的时候，金，还有他的那位众议员老板，以及民主党的一些地方要员，看到了一个因为没有人帮他打电话而正在大声咆哮的约翰逊。

“我让谁去打电话了？”他问道。

金也不甘示弱，回答道：“参议员，名单在桌子上。我服侍一位议员已经够忙的了，不想同时侍候两个人。”

金的老板吓坏了，连忙给“这个孩子”找各种解释，说他“太累了，工作过度”，一面一把把金拉出屋外。“去找个地方喝点东西，上哪儿都行，”等他们走到外面的大厅后，他对金说道，“在约翰逊明天早晨离开之前不要在这里出现。”

第二天早晨6点，金刚爬到床上睡觉。但过了10分钟，电话铃就响了，“你喝过咖啡了吗？”虽然电话不太清楚，但金还是听出来是约翰逊嘶哑的声音。当金回到他昨晚被轰走的地方时，约翰逊以自己那特有的姿势在散落着一大堆报纸的房间里迎接他。看那样子，他大概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

“你喝什么？”约翰逊手里举着滚烫的咖啡壶，走近他问道。金说要奶油和糖。“我喝黑咖啡，”约翰逊一边说，一边给金倒了一杯。

接下来，拉里·金就要碰到所谓“约翰逊疗法”了。

“嗯，过去我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约翰逊站得离金很近，使他的眼镜片都模糊了起来，“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干一番事业、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却又不得不给别人干活，那是什么滋味。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金说自己做过记者，约翰逊没有什么反应。“这一行钱很少。你应该去读法律。这样，如果还想干新闻这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并

且那时候你已经有学位了。”

金一直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位大人物会把他找来，向他提出这番30秒钟、发生在天亮之前的父亲般的忠告。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表现：一向不愿受别人鸟气的自己，很主动地替参议员把行李提到楼下，然后又回来问参议员，自己是不是还能帮他做些什么。

就这样，约翰逊不仅把一个冒犯他的人变成了听他调遣的男仆，而且，还为自己的竞选班子招募了一员干将。

曾经为肯尼迪总统撰写过很多著名演说的西奥多·索伦森，在达拉斯刺杀案后仍在自己的位置上干了一段时间。他曾经这样描述过约翰逊的这种个人交往方式：在没有准备好弹药前，绝对不要拿起枪炮。换句话说，为了在一项法案上得到某位参议员的支持，约翰逊会花上好几天时间，仔细研究任何能想象到的、能说动别人的因素。一旦做好准备，他就会装做恰好遇上对方。对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

只要约翰逊使出这一招，很少有人不被击中。保罗·道格拉斯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参议员，有一次在讨论一项议案时反对约翰逊，不过，他对自己能否抵挡住约翰逊的推销很没有信心。“我不走开，”他告诉助手，“他马上就会来说服我的。”

偶尔有一些场合，约翰逊也会在没有做好“家庭作业”的情况下，就实施他这套鼎鼎有名的疗法。

拉塞尔·贝克以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就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面。1961年的一天，受报社指派报道参议院活动的贝克正站在大厅里，这时约翰逊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进了办公室。“你来，我一直在找你。我想告诉你，你是唯一最了解这里的情况的记者，如果不是我，肯尼迪是不可能在这里通过‘十诫’立法的……”

约翰逊一边做着他的长篇大论，一边在一张纸条上胡乱写着什么，并且叫来秘书，把纸条给了他。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把纸

条交给约翰逊。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约翰逊对贝克的工作、他的记者才华进行了一番出乎意料的赞扬，贝克听了感到非常惊奇。

后来，贝克从在他之后进入约翰逊办公室的一个人那里了解到，这位副总统在交给秘书的那张纸条上字迹潦草地写着这么一行字：“我是在跟谁说话？”

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岁月，约翰逊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有一双珠宝商一样的眼睛，可以看穿别人的自我。就像在道奇饭店时他不厌其烦地挨个向那些国会助手做自我介绍，到了50年代，这位未来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又同样热情满怀地对他的同事们表示个人的关切。即使在他身为总统之时，他也依然采用这套深入他人内心深处的方法，来争取别人支持新政以来最庞大、最具历史意义的立法计划，立法的内容包括医疗保险、民权、减税和贸易扩张等等。对于这个一贯坚持“零售政治”的人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立法就是对他的嘉奖。当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约翰逊会拿出惊人的耐心和谦卑，逐个做议员们的工作。“肯尼迪总统会给五六个人打电话，而约翰逊却会拿来19个人的名单，一个个打过去，”众议院助手克莱格·劳普先生回忆说。这样辛苦的“零售”最终得到了“红利”：肯尼迪，这个想大干一场的“批发商”在国会山处处受阻，而伟大的“零售商”却春风得意。

约翰逊勤于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对各种成功的诀窍，他都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个人的提升有什么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会经常问这类问题。但这不是说约翰逊关心别人是因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不喜欢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狂妄自大的罗伯特·肯尼迪，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担任总统之后，暗地里研究这位对手的每一个习性。他知道博比（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喜欢每天在西克里山待得很晚，和一帮心气很高的朋友谈论重大的艺术和政治问题。所以，约翰逊每次都特意在早晨8点安排和罗伯特的见面，在对方精神不振、最容易被说服的时候做他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内几家报社的主笔开始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进行严厉的批评，约翰逊就把他们一帮人请到白宫共进午餐。他

们到达以后，被直接送到白宫西翼的游泳池。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他们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正全身赤裸，在水里劈波斩浪。虽然他们说没有带游泳装，纷纷表示不愿意下水，这些惊慌失措的笔杆子们还是不得不和这位“总司令”进行了一次亲密交谈，这是他们早晨离开办公室时都没有预想到的。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像不认识这个人那样抨击他了。约翰逊就是这样，一旦他觉得需要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就什么都说得出来，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过，“零售政治”也有局限性，约翰逊很快就发现这点了。50年代末，当新生代的约翰·肯尼迪忙于为在举足轻重的总统初选中赢得“批发式”的胜利而奠定公共关系方面的基础时，约翰逊则在指望靠他在参议院发展起来的那套关系打天下。他没有意识到新闻媒体正在展现的巨大力量，仍然稳坐在办公室里圈点一长串参议院支持者的名单，仿佛那些人就是统领选区的酋长，可以把他们各自的州配送给他。“阿肯色州没问题；麦克莱兰、富布赖特也是我的，还有……”。结果，那位以整个国家为对象的肯尼迪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走内部路线的约翰逊则成了他的副总统。

约翰逊也经常想尝试“批发政治”的做法，但他的本能又把他拉了回来。白宫顾问哈里·麦克弗森曾讲述过，约翰逊如何一次次请他帮着写一篇描绘伟大社会“宏伟蓝图”的总统演说稿，但接下来又总是坚持在演说稿里要提到他曾经增加了农业部鸡肉检查人员的人数。

约翰逊在有生之年都不知道如何抓住媒体的力量。资深记者马丁·阿格龙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供职，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被召到白宫的生活区，当时约翰逊正在厨房吃晚饭，他告诉阿格龙斯基，他打算过几天邀请几位州长一起用晚餐，希望CBS进行实况报道。按照计划，晚餐之前还会有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约翰逊将利用这个机会向全国观众阐述自己的越南政策。阿格龙斯基离开之后立刻召见了自已手下一个新部门的负责人弗雷德·富兰德里，两人匆忙地进行了相关的安排。然而，就在活动开始前的一个晚上，阿格龙斯基又被召到白宫厨房见约翰逊。但是这次约翰逊却要求取消报道安排，因为约翰逊夫人认为，把晚宴放在电视屏幕上“会有损白宫款待州长

的美意”。为了顾全他对州长和州长夫人们，还有林登·约翰逊夫人的礼貌与殷勤，约翰逊非常乐意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段的电视宣传机会。

今天的政治家们很少还会做这样的选择。新一代政治家都是这个时代熏染出来的，他们对电视镜头有本能的敏感，就像飞蛾对灯泡的敏感一样。然而，即便在今天这个“电视老板”的时代，掌握一对一的基本沟通技巧，仍然是聪明的政治策略的第一步。约翰逊懂得，成功的关键有时并不在于你要想的是大事，而在于要想小事；要喂饱你心中豪情万丈的自我，最佳的办法是先喂饱那些你需要去影响的人。

在80年代初曾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小霍华德·贝克，和约翰逊一样对参议院抱着务实主义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取得约翰逊那样辉煌的成功。“对一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说，”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坎坷的领袖生涯之后，有一次他感叹道，“最重要的教育在小学三年级就完成了：那时他已经会数数了。”

在约翰逊的继任者中，有些人懂得怎么利用这套基本的、“零售政治”的原理，有些人则始终不懂。当1976年吉米·卡特竞选美国总统时，他打出的口号是反对水门、反对官僚体制、反对官样文章、反对当权派。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简单的符号来表达，那就是“华盛顿”。

卡特把反对华盛顿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这是很漂亮的一种政治形象定位。虽然他所属的政党不久前还把持着华盛顿的舞台，但这个口号使他可以扮演一个“置身事外”的候选人角色。这给了他一个锋利的武器去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击败了招人喜爱的杰拉尔德·福特。

但卡特的错误在于，在来到首都之后他却让这种反华盛顿的姿态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虽然当他在野的时候那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竞选的时候反对一种体制是一回事，但要向每天与之共事的人们宣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要国会首先投票反对，或者如果官僚机构消极抵抗，那么，任何总统也不可能执行什么计划。“人们在你向他们头上撒尿的时候，是不会好好干活的，”一位混迹华盛顿多年的老手一次对我这样说。

政治分析人士一直不明白的是，卡特的高层幕僚对于那些自己很快就要有求于他们的国会领袖，为什么那么看不上眼、不当一回事。比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要求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当然可以得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门票，但位置是在大厅的后排。

这种发生在奥尼尔身上的草率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被添油加醋，使卡特和国会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四个不幸的年头。卡特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乔迪·鲍威尔后来承认，那一届内阁在任职之初忽视了各种“社交”背景因素，这给他们造成了损害。如果他们和原体制打交道时多注意一些，事情本来是会更好一些的。“结果，我们在华盛顿这个城市没有一批回心转意为我们辩护的支持者，”他坦诚地说。

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为了缩小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受到全国关注的“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卡特做了很多努力，以便在上任伊始就给人们一种新的白宫形象。他的一个惊人之举是，在庆祝总统就职的阅兵仪式上，他不乘坐豪华轿车，而是沿宾夕法尼亚大街步行走完全程。不过，他的另一步棋却并不那么成功：他卖掉了总统专用的高级游艇“红杉号”。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总统们都发现，要让国会里那些难对付的议员们松弛下来，没有什么方法比在夜幕之下到波托马克河上做一次安静的巡游更好的了。一位长期从事白宫游说活动的人士评论说，卡特总统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莫过于卖掉“红杉号”。他这样做固然为新总统赢得了一时的赞扬，媒体都夸奖他珍惜纳税人的钱，但在“零售政治”的意义上付出的代价却十分高昂。

卡特的后任罗纳德里根做法就不一样了。他也高举“反对华盛顿”的标语，甚至宣称“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相反，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样的口号对于一个全身心都扑在政府事务上的城市来说，可不是什么得人心的话。但里根从卡特的错误里面吸取了教训，他并不因此而为自己实际树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话中听出来新总统的批评是针对自己的。

里根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一系列在首都各界名流，包括记者、律师和商人家中精心筹办的各种聚会。这些聚会的序幕，是当选总统及其夫人南希在“F大街俱乐部”举办的一场招待晚会，应邀出席的客人都是华盛顿政界的那些“一贯可疑的面孔”，换句话说，他们多数是民主党人（里根是共和党人）。“我想现在应该让大家知道了，我们也是这里的居民，”里根对《华盛顿邮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说道，“我们也想在华盛顿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还出席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米尔的午餐会，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最近几届共和党政府的死对头凯瑟琳·格雷厄姆。接下来，他们又参加了这位女老板在自己乔治敦的家里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里根带来的人想要融入华盛顿这个社会，而不是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这种社交上的殷勤换得了长久的回报。到1987年底，在格雷厄姆夫人七十大寿的宴会上，里根总统还充当了主持人。他举着酒杯来到首桌，用他特有的方式偏着脑袋，模仿着电影明星亨弗莱·鲍嘉的语气向尊贵的女主人微笑道：“我在注视着你，孩子。”

里根还对国会山发动了一场类似的魅力攻势。

每年当中，众议院的议员们，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会在国会山的一个员工餐厅举行一次小型的聚餐，活动的赞助商是众议院体育馆的老板们，这个体育馆在国会的作用和衣帽间类似，也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聚会场所。年轻一些的议员在这里玩玩棒球，年长的就去蒸气室洗桑拿，蒂普·奥尼尔每次到那里都会带上很多雪茄分给大家。

每逢这样的晚宴，吃的都是一般菜单上常见的东西，例如牛排、烤马铃薯、色拉，以及当点心吃的苹果饼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议员们简简单单地走进来，自己去餐柜取吃的东西，拿瓶啤酒，在众多的长条形桌子中找一个座位。他们聊着天，和朋友打招呼，很多已经卸任的议员也会回来。大家吃饭，然后再聊上一回，就离开了。在一个极其需要政治策略的世界，议员们每天都要担心自己失言，所以，

他们很多人都会非常热心参加这样轻松的聚会。

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令我意外的是，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另外两位客人：副总统乔治·布什和总统罗纳德·里根，后者并且是一身运动装打扮。他们过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只是和大家一起喝点东西，与一些议员们照几张相。乔治·布什是60年代的老国会议员，他懂得这个场合的意义，他的新老板如果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就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知道，议员们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里根来参与他们禁止媒体涉足的内部活动。

吉米·卡特从来未曾出席这样的聚会。

里根对政府的批评比起卡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并不打算因为政治或哲学观点的分歧而使私人的交往蒙上阴影。里根知道，这些长年生活在华盛顿的“当权派”，对他领导的行政机构既能雪中送炭，也可以雪上加霜，所以，他要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华盛顿”，好像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华盛顿一样，但当地那些曾经刺伤他的前任的非难，却并没有刺伤他。

其中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要和别人一起办公事，千万不要忽略私人方面的东西。新一代的政治家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学会了运用媒体的技巧，但却忘掉了唠家常的艺术。

我还记得自己和里根的第一次直接交谈。他到众议院来发表1982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按照惯例，每逢这种情况，众议院议长的典礼办公室都要用作总统临时歇脚的“禁闭室”。我在招呼里根的时候，因为太想打破坚冰（蒂普·奥尼尔几乎每天都和里根进行“拳击赛”）而有点不自然：“总统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对付你的房间。”这话太像预先安排好的。

“只是在六点之前，”里根微笑道，“奥尼尔先生不是说，在华盛顿，六点以后大家都是朋友吗？”

事实就像很多小说家、剧作家笔下描述的那样，在华盛顿，大量

的事情都是在这种非工作时间的关系基础上搞定的。

例如，在里根上任伊始的时候，有一次，记者尼古拉斯·霍夫曼求我帮忙，去阻止一个叫米奇·施奈德的家伙自杀。这个人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后来因为呼吁改善无家可归者的条件而声名大噪，不过，当时他从事的事业还没有那么大。五角大楼打算把一艘核动力攻击舰命名为“圣体”号，他认为这是亵渎耶稣而进行了绝食抗议，此时已经到了第15天。

结果证明他找我是找对了。我知道，蒂普·奥尼尔虽然和里根总统在国家经济政策上打得不亦乐乎，但他和里根的助手米歇尔·迪弗关系却很好。他们两人是一天晚上在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劳丽家中认识的。那天晚上，奥尼尔甚至即兴演唱了几首歌曲，而弹钢琴伴奏的则是迪弗。

奥尼尔给迪弗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一下“圣体”号事件。当迪弗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我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无论他能做点什么，众议长都会欣赏的。这位总统助手当时并没有承诺什么，事实上，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施奈德的抗议。

不过，很明显，对这件事情他实际上还是很卖力的。几天以后，议长办公室就得到消息说，迪弗直接去找了里根，而且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总统推翻了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意见，亲自把军舰原来有争议的名字改为“圣体之城”。军舰的名字世俗化了，米奇·施奈德也结束了抗议，重新开始吃饭。总统避免了一个公共关系上的难题，同时也为一位未来的英雄人物、华盛顿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推动者，多争取了几年寿命。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1989年4月3日的下午，乔治·布什总统是在棒球上挥笔不停地签名而度过的。与他一起观看联赛开球赛——巴尔的摩金莺队对波士顿红袜队，并在相同的棒球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另一位球迷，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总统逢人便夸布什，说这位1948年耶鲁大学校

队队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乔治·布什是怎样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秘诀就在这里。当1990年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入侵毫无防御能力的科威特时，布什花了多年时间结交的朋友如穆巴拉克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就成了布什“银行里的现金”。这样一些人，布什可以在电话里和他们迅速、坦率地交换看法，他就是利用这种亲密关系结成了二战以来声势最浩大的战时同盟。可以说，真正把萨达姆军队赶回巴格达的不是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而是布什交下的那帮盟友。

看看布什是如何采取行动的——

8月2日，伊拉克越过边界入侵科威特。正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的布什总统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络之后，宣布组成英美联军，要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国土。同时，正在西伯利亚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晤的国务卿吉米·贝克，说服苏联也加入了反伊阵营。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三巨头又走到了一起。

8月6日，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应邀到白宫做客。记者问他，加拿大对于伊拉克的入侵采取什么立场，马尔罗尼回答：“我们的立场就是布什总统的立场。”

8月7日，法赫德国王答应，美国可以把沙特阿拉伯作为对伊行动的主要军事基地。国王早在布什还在中央情报局效力时，就与他认识了。

8月10日，在穆巴拉克总统的倡议下，阿拉伯国家联盟投票批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并派遣阿拉伯联军参加海湾盟军。次日凌晨，穆巴拉克总统接到了他在白宫的朋友打来的感谢电话。

这一连串闪电般的全球外交行动并不是仓促做出的无奈之举。布什总统一生都在结识像穆巴拉克这样的人，并和他们保持联系。“他总是外出，忙得团团转，”总统助手威克·古尔德有一次向我透露说，“编织关系网，跟各种人打交道。”

总统新闻秘书彼得·蒂雷回忆说，1981年的一天下午，他正在白宫急着找布什副总统，有人告诉他，老板远在马萨诸塞大街副总统住处，“正在和埃及副总统一起喝咖啡”。“那个人是谁？”蒂雷还记得当时自己用十分沮丧的口气问道。结果，就在当年的秋天，尊贵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死于恐怖分子之手，使这个问题立刻有了答案。那个并不为大家所知、但一直受到布什个人高度礼遇的家伙（指穆巴拉克总统），转眼之间就成了美国一位至关重要的盟友。

糟糕的是，布什总统从来没有和一位盟友，也是所有美国总统都必须首先发展关系的一位盟友——普通美国人，建立同样亲密的关系。更糟的是，1992年挑战布什连任的新人克林顿，也擅长布什那套拉关系的技巧，不过布什是把它用在海外并收到了惊人的效果，而克林顿则把这套技巧出色地用在国内。

威廉·杰弗逊·克林顿（一般称为比尔·克林顿）出生于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他中学毕业时只向一所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乔治敦大学。那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克林顿这位南方的浸礼会教友之所以选择那样一所学校，并不是因为他对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重要的神学家之一）或者天主教神学有什么神秘的爱好。令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动心的只是乔治敦大学的地理位置：它坐落于首都华盛顿。

像30多年前约翰逊初到华盛顿时一样，克林顿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开始四处结识人。他到校园的第一天就开始竞选新生班班长。他以后在牛津大学，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及1972年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充当志愿服务人员时，一直孜孜不倦地继续营造他的关系网。他总是在记录别人的姓名和各种细节，这些在将来都成了彼此交情的见证。到1974年克林顿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已收集了一箱子的饭店餐巾纸和其他一些随手找到的、乱七八糟的纸片，上面记满了同学、老师和政治活跃分子的姓名、电话、地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平时的积累，正是为了机会来临、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一刻。

我自己在华盛顿以及其后的政治生涯，相对而言要顺其自然一些。

我70年代初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国会山还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它还是约翰逊在道奇饭店的地下室里所发现的那个“零售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对这句古老的格言我当然并不十分陌生，但那时候我和别人一样，并没有把它看成某种含义深远的告诫，而只是把它看成一条普通的格言和行动的指针：有谁不认识吗？去认识他好了，竞选要做的就是这种事。

当我开始敲开国会山大门的时候，有件事让我大受震动。我发现，人们不厌其烦地使用“庇护人”这个词，而这个词语在我学完中学公民课后就再没有听别人说过。

在华盛顿，无论是那些显赫的委员会的总顾问，还是往来于参议院大楼和国会山之间的地铁司机，每一个人得到工作都和某位参议员有关。家乡朋友的子弟在开着已经自动化了的电梯。一位衣冠整齐的年轻人整天坐在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入口处，他的工作就是等候那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立法机构的某个成员从电梯出来。当看到某位参议员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询问那位先生或女士是否需要乘坐国会山地铁。如果需要，他就按一下墙上一个按钮，通知地铁司机，然后又回到座位上。

在这个官僚体制蔓延到每个角落的“大种植园”里，无论你到哪里，都离不开“庇护人”。要找一位庇护人，首先需要从这些人里——100位参议员和435位众议员中确定一位发展关系，要想好跟他们说些什么。没有庇护人，就没有工作。

我到国会山也和大家一样，就是雄心勃勃地希望能进入政坛。我的近期目标是成为一位众议员或参议院的立法助手，也就是泰德·索伦森曾给肯尼迪干过的活，我希望自己最后也能爬到他那样的位置。我身上只有200美元，还是从离开和平外援队时拿到的“安置费”中剩下的，我就带着这点钱开始敲国会山的大门了。

我在那里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列了一张来自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党议员的名单。我开始时的目标是那些外交委员会的议员。我想他们或许会看中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两年工作经历。在国会办公大楼各个走廊散发了50多份简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了。我开始考虑寻找某种小巧的敲门砖。我曾在马萨诸塞州一所耶稣会大学上过学，于是就翻出国会议员通讯录，查找有类似经历的人。我找遍了民主党人，又开始找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找一份工作，我最后的100美元也快花完了。

最后，我得到风声，众议员詹姆斯·柯林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炙手可热、保守的共和党人，正需要一名立法助手。

那是一次狼狈的接触，但并非不可以忍受。从我走进会客室的那一刻开始，文化的冲击就出现了。国会议员柯林斯穿着一身阳光浴束腰套装，脚下是一双发亮的白皮鞋，发式也是那种窗口挂着国旗的理发店才能理出的发型。他对我做了闪电般的判决：“我相信，我的选区的人民，他们会被你说话的方式吓跑，我这么说并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随后他又回头对他的一名助手说道，“罗伊，如果老家那边的人到我们办公室看见这个年轻人，就会想象他从和平外援队那里带回了一堆太理想主义的观念，你说是不是？”

他最后又问了我一句：“你认识些什么人？”

当我低声告诉他我认识一个有人庇护、开电梯的小伙子时，他意识到正有适合我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于是他给我提了一些足以使我对“零售政治”的信念越来越牢固的建议。

“你应该试一试去找那些从东北部大城市来的议员。我打赌有很多议员会喜欢有你这种背景的人为他们工作的。”

柯林斯议员把不录用我的决定抛到了脑后，又说了几句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的话。“政治”，他说，“就像挨家挨户推销保险，我没干这行之前就是做保险的。有的人会买你的，有的人却不会。你敲了100家门，只有9家会喊住你，要看看你的广告。在那9家人里面，最

后只有3家会买你的保险，你要做的就是把保险卖给他们。但是，如果你不是把100家都一一敲过去，你是找不到那3家人在哪里的。”

两周后，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在我口袋里只剩下80美元的时候，我开始为犹他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莫斯工作了。他的高级助手，日后也成为国会众议员的韦恩·欧文斯，曾做过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显然，韦恩看上了我在和平外援队的经历。不过，他需要一个有经济学知识的人，于是就给了一个考察我的机会。他把一封信交给我带回家处理，那是犹他州交响乐团指挥的夫人写给参议员的信，打听与非营利组织的雇员有关的税收问题。

星期一，我为了从国内税务署得到准确的信息拼命忙了一阵，然后得到了回报：我将在国会山做警察，每天下午3点到11点值勤。早晨还有下午上班以前的时间，我将在莫斯参议员办公室工作。“这样至少把‘商品’摆到桌面上了，”我的新朋友韦恩说。他说得一点不错。要想赢得比赛，首先必须报名取得比赛资格。

我怀着满腔热忱开始了自己在政治和人生两方面的熏陶。我学到了“政治零售业”的第一课——一对一的人际交往非常重要。

我在华盛顿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我的经验是，多数的机会都来自某个你认识的人。

从1981年到1986年，我担任了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高级助手和发言人，那是一份令人激动而又引人注目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拥有两个条件，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把我引入华盛顿上层最活跃部分的职位。第一，我曾做过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第二，我和马丁·弗兰克斯共过事。马丁在卡特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中是研究部主任。当里根的人马入主白宫后，马丁成为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主管。他上任后立即处理的事情之一，就是向他的老板——加利福尼亚的众议员托尼·库尔霍提出，要聘请我去做“媒体宣传顾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去协助蒂普·奥尼尔议长，协助这位伟大的“政治零售商”抵挡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批发商”罗纳德里根的进攻。还不到三个月，由于奥尼尔的助手转而负责公共关系，奥尼尔把他的位置给了我，同时也把对他的信

任给了我。随后的六年为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观察华盛顿紧张激烈、变幻莫测的政治游戏，那种机会是政治学博士课程里永远无法得到的。

我的关系链条在继续延伸着。早在1979年，亨德里克·赫茨贝格提名我做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我和他认识是纽约一位朋友罗伯特·谢弗牵的线。谢弗是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公务员，在此六年前，我和他在布鲁克林参加竞选活动时初次相识了。

我之所以能到白宫为卡特总统工作，最初是因为一位朋友，也就是帕特里西亚·瓜尔特尼，被任命担任管理和预算局的高层领导，负责卡特总统特别重视的政府重组计划。我和他曾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过事，预算委员会主席，缅因州的埃德蒙·马斯基，提名我到那个委员会。当时我原来的老板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莫斯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听说你想找个好帮手？我这里就有个人。”

在华盛顿像在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营造一种职业生涯与展开一场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与竞选的区别只在于听众的多寡不同。“零售”一词是对这种游戏的最恰当说明。在你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你结交的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只要你得到他的支持，你就能夺标。

在政界和大多数其他领域，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假如除了促使某个人将工作给你外，还有其他方法得到工作，这种好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林登·约翰逊在破旧的道奇饭店洗澡间里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关键在于找到你的目标，然后全力以赴。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这一法则放之四海而皆适用。我在开辟进入华盛顿政坛的道路时，并没有依靠一个犹他州摩门教徒的庇护而在国会山找到一个在月光下执勤的警察工作，但我使用的策略其背后的原理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后来我在新闻界的崛起再次证实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妙用。80年代

初，我过去负责演讲撰稿的老板亨德里克·赫茨贝格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引起了反响，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詹姆斯·希尔伯曼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鼓励我写成一本书，于是就有了这本《硬球》。

1987年机会再次向我招手。在去旧金山参加我的小姨子的婚礼时，我邀请《旧金山观察》的新任主编拉里·克莱默共进午餐。气氛活跃的午餐结束后，拉里·克莱默，这位当初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我就认识的先生，问我是否乐意在他的报纸上开一个专栏，每周写一篇政治评论。同一年夏天，克莱默让我主持报社的华盛顿分部，这和我原先的工作（我当时在华盛顿一家咨询公司做CEO）相比，在薪水上损失很大，但我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一直没有后悔。

我的电视之旅的行程几乎完全一样。我妻子的一位同事，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里奇·加夫尼，知道我在《新共和》上写过一篇文章评论1988年的总统大选，就邀请我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节目做一次访谈。后来，我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制作人戴维·柯尔沃看了节目录像，他立刻介绍我去《晨讯》节目做定期的评论嘉宾，后来我又转到《头版新闻》，这是加夫尼专门为福克斯网络公司制作的杂志节目。不久后，美国广播公司的执行制片人杰克·瑞利，还有查理·吉卜森，他曾是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消息的专职记者，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两人又力邀我担任《早安美国》节目的评论员。

我成为专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得益于这样一种友谊关系。90年代初，我的母校圣十字架学院的校友、作家乔·麦克吉尼斯正在写一本关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书，他想了解我在担任蒂普·奥尼尔助手时的各种想法与感受。

麦克吉尼斯从25岁出道成为《费城调查者报》专栏作者之后，他的生涯一直让我着迷和羡慕。随着《总统的推销术》一书的出版，他在我眼里成为一位英雄人物。他这本书是对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那场已经臻于化境的电视竞选活动的一种深刻洞察。

因为我们两人一周后都要去旧金山，我们就约定在旧金山贝弗利

山烤肉店见面。用过餐之后，麦克吉尼斯说他稍后要与另外一个人一起“喝点东西”，对方可能是我也非常有兴趣一见的人——罗杰·艾尔斯！在那一瞬间，我真是吃惊不已。对所有曾在民主党一边工作的人来说，包括我，艾尔斯都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字。早在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一役中，这位天才的媒体战略大师就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而在20年后他击出的球更加致命，彻底封杀了迈克尔·杜卡基斯当选总统的希望。他成功地使一个温和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变了形，将其塑造成一名拒绝向国旗致敬、把周末时间用来争取杀人犯和强奸犯不在监狱服刑的左翼分子。

虽然我与艾尔斯之间在党派背景上有裂痕，但两人很快就谈到了一起，一见如故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我都会到他在纽约的那间漂亮的咨询办公室看望他。我们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像观众口味急剧变化之类的问题。1994年，当全国广播公司（NBC）任命艾尔斯负责商业电视新闻网络（CNBC）时，他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做节目主持人。到1997年，在CNBC总裁比尔·波尔斯特和布鲁诺·科亨先生的推动下，电视专栏节目“硬球”诞生了。一年之后，承蒙NBC新闻总裁安迪·莱克和戴维·柯尔沃（他现在已经不是NBC新闻的高级总裁）的关照，节目延长到一小时。像约翰逊一样，我懂得了个人关系对事业腾飞的力量。今天，我们就在国会山附近从前的道奇饭店的位置，制作我们的“硬球”节目。

第二章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

有人来找你帮忙，虽然事情在你看来未免太异想天开了，但要记住，对于对方来说，那件事情却非常重要，否则他就不会来找你了。

——蒂普·奥尼尔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我幸运地正好在场。我早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一重大事件，所以提前一周到了那里，以便接下来采访东柏林人。“什么是自由？”我问一位守卫在勃兰登堡门下的青年。“就是和你说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两周以前是不能这样

的。”

一位38岁的物理学家和我谈到了东德的货币问题，那是令东德人怒火中烧的一个更寻常、普通的原因。“你提前一周就预定了航班，”他对我说，“但是这时突然冒出一个西德游客，他本来并没有费心做什么乘机安排，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带着他的德国马克到了机场，但是你的位置却被他抢走了。”他告诉我，即使一位东德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会接受他手中货币的国家，在那里也只会受到更为变本加厉的羞辱。“比如在布达佩斯，你去旅馆，别人会告诉你客满了；如果这时又来了一对西德夫妇，可以用德国马克付费，你就能听到服务员马上改口说还有空房间。”

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街上，东德人同样也要忍受这种歧视与羞辱。例如，他们一连要走好几家国有旅馆，因为那些旅馆不接受“本地”货币，要订房间，或者哪怕是要一杯饮料，也要求用美元或者德国马克付账。

正是生活中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和人格伤害，最终摧毁了东欧的社会政治体系。在柏林墙边上，我吃惊地目睹着东德人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就像黑白片里的主人公一下子进入了彩色片一样来到围墙这边，等待着负责接待他们的人从一排排后盖敞开的大卡车上，取下食物和其他物品免费发放给他们。“40年的斯大林主义就换来了这些，”给我开车的西德司机说道，“排队等着发饼干。”昔日森严的铁幕之所以最终被撕开，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声势浩大、突如其来的革命冲击，而是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的官僚体制的轻蔑，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与此截然不同，民主政体的一大优点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照顾好人们的油盐酱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们渴望的回报。

蒂普·奥尼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即使他的对手也会承认，蒂普·奥尼尔对于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裔同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他很少会充耳不闻、漠不关心。所以，那些人热情地支持他

待在那个位置上。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次选举中屡战屡胜，最后登上了整个国家竞争最激烈的位置之一，凭借的是某种扎扎实实、不可缺少的东西。那是所有伟大的政治人物都非常珍惜和赞赏的一种宝贵智慧——如果要了解并影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

奥尼尔用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概括这一原则——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就应该观察他在家乡受到了哪些影响，投票支持他的人来自何方。政治家相互之间较量的时候，也会采取这样一种釜底抽薪的高明方法：如果你想使某个人元气大伤，那就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后院，打击他。

查尔斯·考尔森是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一位政治盟友，他也是这条法则的一位深信不疑的信徒。这个人在政治上以对尼克松狂热的忠诚而著称，他曾说过：“只要能帮助尼克松，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从我奶奶身上踩过去。”这个人同时也对如何打动他人、让别人行动起来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曾说，“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

考尔森这句话所使用的措辞和情绪渲染也许不登大雅之堂，但其中的逻辑却是无懈可击、颠扑不破的。人们在观察公共问题时总是戴着自身利益的有色眼镜。他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给自己的肠胃。就像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说：“邻居丢了工作的时候是经济不景气，我们自己丢了工作的时候就是大萧条了。”有经验的政治家牵挂的是老家的街坊邻居。他的目光盯着他的选民所生活的世界。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而像林登·约翰逊那样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一次招待一个顾客。

当新泽西州的威廉·休斯1974年第一次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时，为了保持与家乡人民的接触，他发起组织了“城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他的家乡萨勒姆县召开。在会上，这位初出茅庐的众议员一开口就讲国会议员的职责：“我是你们在联邦一级的代表，”他说，“我不关心你

们的路面是不是平整。我不负责收拾你们的垃圾。”

提问的时间到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妇女不停地举着手。“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她说道，“他们应该周四下午来收垃圾，但他们从没有来过，狗都可以钻到垃圾里去了。”

“你知道，夫人，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联邦的立法委员，”休斯告诉她，“我管联邦的预算和全国性问题。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你们的镇长，或者你们当地的工程专员。”

这位妇女看着春风得意的新任议员，直视着他的目光，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地说道：“我不想一开始就找那些高层人物。”

如果说一个人进入世俗的政治领域也要经过洗礼仪式的话，此刻发生的一切就相当于这种仪式。政治生活的真正面目犹如一瓢冷水，会泼在每个踌躇满志的年轻政治家身上：不是你去告诉人们应该考虑什么，相反，是他们告诉你应该考虑什么。

人们对“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名言的运用，有时甚至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0年，来自新泽西州另一边的年迈议员爱德华·帕顿遭遇到了——一场在外人看来非常严峻的预选挑战，他的对手是一位联系广泛的反战人士。当时民间反对越战已经成为愈演愈烈的风潮，一直在毫无希望地抵制着这股潮流的那位年逾古稀的现议员，手里却有一件法宝——他的对手不是“本地”人。

就在预选竞选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帕顿先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他没有凭空捏造任何东西，只是翻印了一页曼哈顿（美国纽约的一个区）的电话号码簿，把印着对手姓名及其在该区的住址的地方用圆圈圈了出来。就这样，那位外来的选手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自己的行李，就已经被逐出了比赛。

事隔10年之后，俄勒冈州的选民也进行了一次同样苛刻、无情的利弊计算，不过这次倒霉的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现任国会议员。艾尔·乌

尔曼是众议院权势显赫的筹款委员会的主席，本来他是有可能终生保住那个职位的。他在华盛顿的政治鼓动家和分肥者中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不幸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大西北镇停留足够的时间。他的共和党对手抓住两点发起了攻击。首先，他的家已经不再在这个地区；其次，他去年一年只到过这个地区6次。乌尔曼反驳说他去年回去过“10”次。然而，在一个可以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时代，大多数议员每隔一周就要回自己的选区一次，所以，乌尔曼的辩解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

说到这里，你也许立即就会想起，美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因为这种情况而遭到了选民无情的抛弃。例如，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爱达荷州的弗兰克·丘奇，田纳西州的阿尔伯特·戈尔——他是未来的戈尔副总统的父亲。一旦选民们感觉到，他们那些年轻的希望之星在华盛顿并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家乡谋福利，还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染上了严重的波托马克热（波托马克是流经华盛顿的一条河流），对乔治敦的沙龙要远比自己家乡的议事厅熟悉，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高明的职业政治家绝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仅仅做到多回几次家乡，那其实还是很不够的。重要的是，你首先要让人们感觉到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佛罗里达州的劳顿·柴尔斯曾长期担任联邦参议员，他就拒绝为自己做一套当时在华盛顿非常时髦的做工精细的深蓝色套装。“如果我那样打扮，”他向自己的一位秘书解释道，“就没有人会去机场接我，向我问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劳顿·柴尔斯身上总是穿着出自乡村裁缝之手的服装的原因。这个靠走遍佛罗里达全境而当选参议员的人，希望自己的外表继续与当初乡亲们选出的那个人一样。

这位参议员不一定听说过马基雅弗利在1513年最早提出的一条基本政治原则，但他身体力行的却正是那条原则。马基雅弗利在他著名的《君主论》一书中，提醒未来的政治家要待在和他们统治的人民很近的地方。如果政治家自己就在场，“他就能在骚乱刚刚萌芽的时

候便觉察到，从而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马基雅弗利早在500年前就这样写道，“但如果他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么对于骚乱他只能听到一些传闻，等事情真的进入他视野的时候，往往已经无药可救了。”

1981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员约翰·布劳克斯演出了特别赤裸裸的一幕，来展示“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法则的力量。他向一位记者坦白说，他之所以支持里根政府提出的关系重大的税收和预算政策，是因为里根政府承诺提高蔗糖价格，而蔗糖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主要出产。记者于是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他的那一票可以用金钱收买，他机敏地回答道：“不能，但它可以出租。”这句名言，这种观念，传到他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后大受赞赏。现在，众议员布劳克斯已经成为参议员布劳克斯了。

在我周旋于各种各样的政界人士中，往来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两头的那些年月，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比“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名言的发明者——蒂普·奥尼尔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了。奥尼尔和“伟大的沟通者”罗纳德里根不同，里根通过电视尽情喷发自己的力量，而他的品牌则是一种面对面的政治，一次只有一个对象。

当然，敌人一次也只有一个。

1982年，马萨诸塞州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一位年轻律师，颇有政治明星气质的名叫弗兰克·麦克纳马拉的人，决心向正在谋求连任的众议长蒂普·奥尼尔发起挑战。他从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两个州的石油利益集团那里筹集了100万美元经费来参加竞选，因为石油利益集团对奥尼尔这个长期支持价格管制的老牌自由派人士很不满意。这是一个糟糕的错误。在一个人们饱受严寒和高昂的燃料费用之苦的古老工业区，只要提到“达拉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美国的石油中心之一）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当地的人们愤愤不平、怒火中烧。

挑战者麦克纳马拉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在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山的台阶上宣布了他的参选决定。就在媒体进行现场报道的时候，有几个戴着加仑帽的年轻人向人群散发了一批重要的文字材料。材料的封

面上写着一句醒目的话：“你也许不认识麦克纳马拉，但在达拉斯有人认识他！”材料里面是一些新闻剪报，都和麦克纳马拉在得克萨斯州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捐款人有关。第二天早晨，《波士顿环球报》登载了麦克纳马拉的一个简短声明，但是，那个声明太简单了，根本无法抹去那些煽情的加仑帽和这位年轻候选人的石油利益背景给人留下的毁灭性印象。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条规则也适用于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县，就像它适用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一样。前面的事件过去几个月后，第88届国会的选举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关头，这时蒂普·奥尼尔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拨款10亿美元扩大就业的议案。共和党对此冷嘲热讽，说那不过是选举年的作秀而已。而对这位民主党第一人物批评最严厉的，则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罗伯特·米歇尔。

开始的时候，奥尼尔本来想避免和他的朋友米歇尔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当米歇尔进而猛烈抨击这项提案是民主党大手花钱兴建无价值的政府工程的最恶劣表现时，奥尼尔的助手们迅速地搜集了一些数据。他们借助于设在当地的一个办公室的热情帮助，在这位共和党领袖的后院皮奥里亚县挖掘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

当奥尼尔再次走上众议院讲坛的时候，他一一宣读了皮奥里亚县所有低于伊利诺伊州安全标准的桥梁名字及其所处的街道位置，而那些桥梁根据奥尼尔提出的扩大就业议案都在维修的范围之内，但是，不幸的是，那项议案却被共和党人抨击为“无端生事”，是又一项可恶的新政式的无用立法。

当议长宣读的那一连串冗长而枯燥的危险地区名字被录音后，他的话通过有线电视直接传送到了那位共和党领袖的选区。就在几分钟前，米歇尔还一直以共和党全国代言人这样一个高大而忠诚的形象出现，但转眼之间，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形象在老家可能会受到损害而不安了。他脸涨得通红，站在会议厅的后面，焦躁、匆忙地向他的新闻秘书部署着什么。毕竟，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卖力比赛是一回事，而使自己当晚就要在家乡皮奥里亚遭到一场严厉的政治攻击，那又是另一

回事了。就这样，奥尼尔通过在对手的家乡展开攻击，把一场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批发”性质的辩论，转变成了地方性的、纯粹“零售”意义上的辩论。

奥尼尔声名卓著的前任，矮小、秃顶的萨姆·雷伯恩也擅长此道。雷伯恩绝对不是那种会令女戏迷倾倒的男明星，人们也不会把他的话作为格言警句刻在大坝上或者中学的教室里。但他有一种朴实无华的能力，可以反反复复与一个接一个的议员打交道，就是凭借这种能力，他竟把平时乱糟糟的议会整合成一支纪律严明、手拿法律和政策的军队，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从对方的根据地发起攻击。“雷伯恩一个电话，‘陆军工程兵’就会去干活，”奥尼尔回忆道，“雷伯恩回过头来会解决有关拨款的细节问题。”

据说，这个传奇般的得克萨斯人还可以向那些不怎么好说话的联邦机构挥舞指挥棒。雷伯恩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国内税务署的审计员像工程兵一样义无反顾地去干活。那些精神紧张的众议员们不敢肯定雷伯恩是否真正行使过这样的权力，不过，他们却生活在这种敬畏之中。

丹·罗斯滕科斯基长期担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他也是对政治利己主义的力量深信不疑的政治家。为了能够顺利地通过，他提出的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采用了一种两步式的立法程序。首先是议员们对法案的正文进行投票；然后是对法案后面的“过渡条款”投票。所谓过渡条款，就是规定各种具体的税收变化应该在何时生效的一些条款，它们对一些特殊产业和地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实中，每个议员当然都希望确保自己选区的产业尽可能得到最多的照顾。所以，这些“过渡条款”使罗斯滕科斯基手中掌握着许多张王牌。比如，一家公司如果不是在10月份而是到明年1月份才缴纳新税种，它就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同样，如果某一税种将被取消，当然取消得越早越好。那些支持罗斯滕科斯基的税收改革立场的议员，显然是希望将来在就这些问题举行听证会时会得到他更热情的待遇，而那些不支持他的议员则别想会有这样的好事。罗斯滕科斯基清楚这一点，其他议员也心知肚明。那些本来打算反对这位主席的改革措施的企业游说人

员，同样也知道这一点。

外行的政治家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对所有的人不加区别、一视同仁。而出色的政治玩家是不会犯这样迂腐的错误的。他们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真正能够促使问题解决的压力点。

1940年，一场普罗米修斯式的意志考验在两位巨人之间发生了，而且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一套行动计划。一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战胜了小儿麻痹症之后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也最有活力的一位总统。他已经连任了两届总统，但还想打破先例第三次当选。在对他这种努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有他派驻英国的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一位未来美国总统的父亲，肯尼迪政治王朝的开创者。冲突达到高潮的一幕就出现在11月大选之前。肯尼迪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罗斯福连任的立场。他猛烈抨击罗斯福与英国合作以及显然想让美国卷入对德战争的政策。肯尼迪这位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对英国没有任何好感，他认为罗斯福不只是在使美国卷入一场严重的全球冲突，而且是让美国站在了肯定会战败的一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强调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不同，扩大他们已经存在的沟壑，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肯尼迪说，“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毕竟我们大家都必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在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阿道夫·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三周之后，肯尼迪在伦敦发表了这番代表美国孤立主义立场的“绥靖”言论。

罗斯福意识到机会来了。如果他能够说服肯尼迪这样的反对派，那么，在安抚整个美国和日益高涨的恐战情绪方面，他就等于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即使对于伟大的罗斯福来说，要想降伏这位爱尔兰裔巨人也要费一番工夫。10月16日，肯尼迪致信罗斯福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但在一周之内，罗斯福就完全控制住了事态。在1940年大选投票前9天，罗斯福邀请肯尼迪到白宫共进周日晚餐。到星期二那天，肯尼迪发表了全国广播讲话，给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送上了在很多人看来是

整个竞选战中最有效的一篇助选词：“星期天，我从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回到我们可爱的祖国安宁和平的海岸，我内心的信心又被唤醒了，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而且也会置身于战争之外。”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立刻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粗暴地指责罗斯福总统正准备把我们的青年送到伦敦去，肯尼迪大使简短而诚实的声明粉碎了这种无稽之谈。”

在这件事情中，有一点再清楚不过了。约瑟夫·P·肯尼迪在美国应该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大问题上，他内心的信念并没有发生使徒保罗式的大转变（保罗是《圣经》中的著名人物，曾是犹太教徒，狂热地反对基督教，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得见耶稣显灵而皈依了基督，从此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传播基督福音的事业）。他对英国仍然不抱什么好感，对反纳粹事业也没有多少兴趣，对已决定把美国带入战争的总统并不爱戴。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斯福知道，这位大使在自己的长子小约瑟夫身上寄予了最高的政治野心。年轻的小约瑟夫几个月前作为代表参加了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没有追随罗斯福，而是追随了罗斯福最有力的挑战者詹姆斯·A·法莱。他的前途于是就成了政治交易的筹码。16年后，老肯尼迪面带得意的微笑，向他的共和党朋友克莱尔·布兹·卢斯透露了这个秘密：“我不过是和罗斯福做了一笔交易。我们同意，如果我支持他1940年的总统竞选，他就支持我的儿子约瑟夫1942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用硬球游戏的术语谈到过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这次高峰会晤。据他透露，当时他父亲向肯尼迪摊牌，他很乐意为肯尼迪家族年青一代在政治上的发展提供帮助，但如果肯尼迪大使放弃支持本党候选人的原则，就会使这些年轻人的事业在还没有起步的时候便受到损害。罗斯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卖点。后来的结果是，老肯尼迪当然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讨还债务。他的长子小约瑟夫参加了美国空军，在欧洲上空一

次英勇的轰炸行动中牺牲了。

30年之后，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又被别人上了一次内容近似的推销课。当时，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M·肯尼迪身为参议院多数党的议会督导员，是参议院民主党的二号人物。1970年12月，他准备竞选连任这个位置，但这时一位意想不到的竞争者——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C·拜尔德出现了。

特别出人意料的是，问题的关键不是两年前的一起车祸，当时在那次车祸中，一辆轿车内的一名女子身亡，而驾驶那辆车子的是爱德华·肯尼迪。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参议院的内部问题上。亚瑟王的继承人不幸遇到了一位超一流的“政治零售商”。

在西弗吉尼亚老家，罗伯特·拜尔德会在乡村集市上认真地拉他的小提琴。在华盛顿，他以事事上心而闻名。只要其他参议员觉得需要办的事，就是鸡毛蒜皮在拜尔德眼里也不是小事。他过去的一位同事说得好：“如果你拿出铅笔，他也会过来帮你削。”

督导员在参议院的工作有点像工厂门市的销售员，他需要照看每个议员关心的问题和利益，而那一切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如果他们的家乡出了重要事情而需要改变日程安排，这时督导员就要去想办法看能否做些调整。如果有位参议员关心某条通过他家乡的高速公路的拨款问题，督导员就要告诉他什么时候会讨论那个议题，从而保证他可以在场。

肯尼迪的优势和对这一职务的看法，与拜尔德大相径庭。身为政界名流，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认为督导员是管大事的。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让他站在上面对当今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临时讲台，供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施展他拿手的“批发政治”的又一个论坛。

拜尔德的魅力就在于他更像一位和善可亲的街坊邻居。当时他担任民主党会议的书记，是参议院第三号人物。每次肯尼迪离开华盛顿到全国发表演说，拜尔德总是让肯尼迪相信，不用担心工作上会有什

么问题。肯尼迪可以放心地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交给他来做，那些事太无足轻重了，不需要一位大人物来操心。

面对是要一位全党的发言人还是要一个商店的售货员，那些参议员选择了后者。让国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把拜尔德推到了全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继承人之前。非常明显，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更喜欢有人帮他们削铅笔。

一位现代美国政治舞台上最声名狼藉的政客，也采用过类似的策略来获得他梦寐以求的宝藏。

很少有人意识到，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能那么长时间将美国置于他的魔咒之下，主要是由于他对新闻业的精通。他知道记者什么时候必须给通讯社发稿，他知道他们的工作承受着哪些压力，而他对这些知识的利用也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20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麦卡锡如日中天的时候，有关国会的消息多数都是通过美联社、合众社以及国际新闻社的电文向外传播的。这位威斯康星的参议员迷上了电报，他知道那些记者每隔几个小时就需要发出一条新的“头条”新闻来报道事情的进展，只有这样，他们的电台才能每个小时都有节目播出，他们的报纸才能出最新的一期。

这位参议员一心想使自己的“反共斗争”始终兴旺红火，于是，他使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伎俩。据当时曾在场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罗伯特·希利回忆，麦卡锡每天下午都会去看那些电报的自动收报机，如果当天的报道符合他的路子，他就不做什么；如果不符合，他就会走到某个正在发报的家伙跟前，扔给他一条全新的消息，从而掀起新的高潮。

“机枪手乔”（约瑟夫·麦卡锡的绰号，乔是约瑟夫的昵称），用一种卑劣无耻的手段发动了一场并不存在的战争。他知道那些记者都是带着工作任务的人，他要做的就是投其所好，使他们的工作变得尽可能简单。他从来不让事情的全貌或真相捆住自己的手脚，而是断章取义，从而使事情变得面目全非。

麦卡锡知道，有两件东西能够让记者们着迷：时间和文件。他常说“我手里有一份名单……”，这不啻于把一块肥肉扔到了记者面前。幸运的是，人们逐渐注意到，麦卡锡提供给媒体的全部消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实际的、仍然在世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如果事情本身不正当，那么设计得再完美的策略，它愚弄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到此为止。

我在这里当然不是教大家如何去做一个歪曲事实的疯子，而是说我们要怎样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们打算影响的人们的个人抱负上，从而成就我们的事业。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都需要知道你打算去影响的那些人关心什么事情。

在麦卡锡的同时代人中，有一个人为了保卫自己也运用了“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法则，但他采取的策略同样冷酷无情。

1950年，37岁的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正在竞选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他与女演员海伦·G·道格拉斯的竞选，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次选举。但同时那次竞选也展示了一种不仅有效、而且完全无可厚非的技巧。

尼克松当时遇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虽然加州共和党州长厄尔·沃伦与他同属一个党派，但却拒绝支持他的竞选。这样做是出于自我利益的权衡。沃伦这位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时正陶醉在一种想法里——在加州人民面前扮演一个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人。他是一个自命不凡、踌躇满志的人，他不仅认为自己也是竞争全国性职务的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手，还认为自己在社会出身上要比野心勃勃的尼克松更加优越。结果，无论尼克松诉诸党派的忠诚还是政治理念上的相似，都丝毫无法打动这位挑战者。身为众议员的尼克松也找不到一个公共问题把沃伦拉到他这一边。

尼克松还面临着另一道障碍。他的对手道格拉斯夫人为了怂恿沃伦保持中立立场，对沃伦投桃报李，也不支持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詹姆斯·罗斯福。

尼克松和他的手下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了赢得沃伦心照不宣的支持，他们不再诉诸党派忠诚和意识形态，而是诉诸他心中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这位出身高贵的沃伦本人。

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一种闹剧，但却收到了效果。每次道格拉斯夫人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尼克松这边都会派出一个助手到场，向道格拉斯夫人提问她是否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子詹姆斯·罗斯福。最后，就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道格拉斯夫人终于落入了陷阱。她表态支持小罗斯福：“我希望、我也祷告他会成为下任州长，只要民主党人都将票投给本党的候选人，他会成功的。”

计谋终于得逞了，尼克松欢呼雀跃。他们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一位就要采访沃伦州长的记者。当那位记者问沃伦如何看待道格拉斯夫人支持罗斯福的问题时，沃伦一开始拒绝评论。过了24小时后，他意识到他已无法绕开尼克松为他设下的狡猾陷阱：“对这种情况我无意扭扭捏捏。媒体报道说道格拉斯夫人希望并祷告罗斯福先生成为下一任州长，这一消息并没有改变我的立场。不过，鉴于道格拉斯夫人的声明，我想请她设想一下，下周联邦参议员选举时我会怎样投票。”

至此，那些一直紧盯着他的人开始欢呼胜利了。“加利福尼亚每个读到沃伦这一声明的选民都会知道，沃伦在选举日会把他的选票投给尼克松。”尼克松的竞选负责人莫雷·乔迪内尔兴高采烈地宣布。

尼克松大概永远也无法赢得沃伦的友谊，但却得到了他的帮助。在整个事件中，未来的沃伦法官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克制态度，权衡得失之后伸手帮助了他并不喜欢的候选人。尼克松的拇指放到了沃伦的天平上，沃伦没有办法把它拿走。

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你是在哪个领域竞争，这一点并不重要；要想赢得各种盟友的支持，关键在于倾心关注他们的敏感点。例如，一个大学生要注意的是那个最主要的听众——教授。只要给予足够的留心，学生就能够搞清楚老师的想法和他特别关心的问题，你的课堂笔记不仅是那门课程的最佳指南，也是了解授课者本人的最佳指南。

在校园之外也同样如此。无论你在宗教和哲学上有什么偏好，你都千万不要做一个唯我主义者，也就是那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的家伙。如果你专注于自我，你一定会失败。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让他的目光离开别人的自我。

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为医疗保险计划大造声势之时，恰恰忘记了这一点。那对于她本人和这个国家，都是一种不幸。她的眼睛没有看到几千万劳工和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大多数都已经得到了保险，本来是可以成为她最坚定的支持者的。

美国的选民们对如何才符合自身的利益，向来是明察秋毫也毫不退让的。在这一点上，希拉里却做了错误的判断。

1991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了一次特别选举，因为国会参议员约翰·海因兹不久前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留下的职位空缺需要补选。前任州长、共和党人理查德·索恩伯是最热门的人选，被认为必胜无疑。他的对手则是一位温和的、始终低姿态的退伍军人，叫哈里斯·沃福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后沃福德却成了胜利者。索恩伯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他整整40个点之多，但沃福德借助一个电视广告就战胜了索恩伯。“如果说犯罪分子有获得律师的权利，”在电视上，这位民主党人对观众说，“那么，工人家庭也有获得医生的权利。”

这句简单的话传进了千家万户。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眼前终于有一位竞选显赫职位的人和他们谈论餐桌上的经济学了。那些人到中年、担心丢掉工作和尊严的丈夫，以及那些担心全家会失去医疗保险的主妇，都是他的听众。

三年以后，希拉里·克林顿也想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她以为沃福德这匹黑马的胜利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草根民众有一种强烈的要求，那就是他们希望政府创立一套“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然而，对于她和这个国家都不幸的是，在这点上她却看错了。她许诺的“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体系，让人感觉到不是向那些已经拥有医

疗保险的家庭提供安全保证，而主要是针对那些正在享受福利救济的人口。所以，她不仅没有能够像沃福德那样减轻中产阶级的担忧和怨恨，反而加深了这种情绪。她的做法无非是要选民们把好不容易从谈判桌上争取到的医疗保险计划扔进公共水池，让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如果说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还是对努力工作的酬劳的话，那么，希拉里的计划却是要把勤劳工作的人和懒汉同等对待了。

结果，这套方案没有推销出去。人们认为他们来之不易的好处和权利将会被取走，用来满足所有人的医疗费用需求。希拉里的计划不是要为“辛勤劳动的家庭”提供医疗保险，而是要为那些不工作的人提供一种所谓“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体系，而费用却要由那些工作的人来承担。对于这样的方案，人民会满怀情绪、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第三章 索取比给予还好

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本杰明·富兰克林

1992年，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向全国宣布，只要能满足一个条件，他就愿意出来竞选总统，那就是：如果平民百姓们想打破两党体制，向官僚作风开刀，并争取把他的名字列在合众国50个州的选票上。

佩罗这一招真是大师手笔。当他说如果没有普通百姓的支持他就不参加竞选时，他实际上是在使自己成为一支由拥戴者组成的军队的代言人。他把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得到邀请扮演政治角色的人招募到自己手下，掀起了一场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抗衡的政治运动。

大胆地依靠整个美国城市、郊区和乡村的普通民众，这就是罗斯·佩罗卓越的政治天才的表现。在每一个商场，都有佩罗踊跃的志愿人员摆着一张便桌，“我们支持佩罗，”他们会告诉所有往来的人们。“我自始至终都支持佩罗，”每个信徒都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是他

们自己发起了这场竞选。

佩罗正在利用的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早在4个世纪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就已发现了这一天性。你在一个人身上付出越多，你对他就会变得越忠诚。赢得一个支持者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为你做点什么。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就是：“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佩罗的策略成功了。他不仅使自己的名字印在了选票上，而且还赢得了19%的选举人票。在这一历史性的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方法。一个以拥有不可思议的财富和独立的开拓精神而知名的人，却是通过向人们求助而展开他竞选总统的运动的。

佩罗并不是奉行这套马基雅弗利战法的第一位当代政治家。

1974年，我曾短暂地告别华盛顿的政治圈，向费城的民主党组织发起挑战。我与一位力量雄厚、志在必得的现任议员竞选国会众议员。几百名学生志愿者为我摇旗呐喊，他们看到有可能选出一位和他们年龄相差不远的独立候选人进入国会而兴奋不已。当时我只有20多岁，我在人们身上唤起的热情要远远高出我的竞选实力，所以，在民主党内预选中我很快就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不过，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安慰。预选过去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一封信表达对我的殷切希望：“继续积极地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但信中最重要不是这句慰问，而是与慰问一同而来的请求：“如果你能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或者其他州的努力提供任何有益的信息或建议，我将非常感激。你随时可以和我本人或者和汉密尔顿·乔丹联系。吉米·卡特。”

这是发生在总统大选之前两年的事。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时是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主席。那封信来得适逢其时，给我留下了久久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们今天仍然感到困惑不解：吉米·卡特是怎么当上美国总统的？

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靠什么手段才把两个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把赢得党内预选所需要的基层草根组织，与佛罗里达、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各州党的高层会议结合起来？

事实是，吉米·卡特在那段时间就像一根江湖老油条。他看到，选民们在经历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正渴望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当时的大背景，但他没有满足于此。他还深入到广大的乡间去，让自己置身于更微观的图景，也就是选民们每天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中。而这个时候，他的那些在城市活动的竞选对手，却在使尽浑身解数，试图在纽约和华盛顿那些民主党已经逐渐失宠的选区捞回民心。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要建立个人的势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要扩展个人的能量，需要从最初的两个步骤开始：第一步，密切关注什么东西能动员他人。第二步，为了赢得那些对实现我们的目标至关重要的人的支持，我们要根据这些信息绘制出通往他们的“心灵和脑海”的路线图。

其中的第二步，也就是学会如何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去，用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发起一场运动。

要发起一场运动，不论是什么运动，你首先需要有一个组织。吉米·卡特在1974年到1976年间创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作。

作为一只“跛脚鸭”，一个只当了一任州长的、来自南方腹地的家伙（卡特已在竞选连任州长中失败，所以被称为“跛脚鸭”），卡特在政界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他不能指望那个通常由全国性的利益集团、华盛顿的关系网和一些意识形态人才组成的民主党网络。卡特必须创立自己的组织。

卡特的策略很简单：发起一场“局外人”的运动，招募一些“局外人”为他的竞选出力。吉米·卡特1974年写给我的那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而且我并不是唯一一位保留着他的信的人。所有在那一年的

初选中失败的民主党人都收到了一封个人信函，发信人就是那位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真是高明的政治策略。卡特意识到，他最好从那些已经在政治上失势的人群中寻找支持者。杰里·拉夫肖恩是卡特的媒体顾问，他还记得，当时他劝卡特支持一位很有人缘的国会候选人，他认为这个人很有希望赢得胜利。然而，卡特看得更远，他说：“他赢不了，这里是共和党的地盘。但他输了对我们更好，那样他就会为我们工作，而且会把他的组织一起带过来。”

乔迪·鲍威尔从一开始就跟随着卡特，他还记得自己的老板所作的直截了当的解释：“失败的一方总要再找些事情干干，而如果你当选了，你就是一个国会议员了，马上就要动身去华盛顿了。”鲍威尔亲眼目睹了卡特用这种策略铺平了通往宾夕法尼亚大街（白宫前面的一条大街）的道路，“重要的不只是候选人，还有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我们建立的是一支游击队，他们都有政治经验，而且多数都参加过国会竞选活动。”

卡特在1974年的选举中始终遵循了这一策略。在选举之夜，当党的全国主席罗伯特·施特劳斯召集民主党的获胜者们庆祝胜利时，这位佐治亚州州长却在给每一个失败者打电话。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暂时受挫，无处可去，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的理查德·帕蒂格鲁、俄亥俄州的约翰·吉利根、纽约的米奇·考斯坦查，等等，他们都参加了那支“花生”部队（卡特在家乡拥有花生农场），和许多名气不如他们的人一起为卡特在预选中一路过关斩将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在国会争夺战中已经失手、本来有可能被人遗忘的候选人，现在成了卡特在各地的协调人，他的政治拉拉队的小队长。

罗伯特·基夫当时是华盛顿州国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的资深政治顾问，他很快就发现了卡特的战术是建立一个由政治“局外人”组成的全国性网络，看出了这一网络有攻破现行政党体制的远大潜力，他形象地将之称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特洛伊花生’。”这颗花生就像它的前辈，也就是那匹古代的木马，制造它是因为它的设计人没

有办法直接拿下城堡，于是就只有用计谋铺平攻破城门的道路。

那些在1974年中期选举中春风得意跑在最前面的人，他们是用不着一位来自南方农村的“跛脚鸭”州长来为他们的选举造势的。他们有更辉煌的同盟者，有名声显赫的大人物，例如爱德华·M·肯尼迪、休伯特·H·汉弗莱，等等，来帮助他们建立民众联系以及设计出能拉到赞助的竞选纲领。当然，作为交换，他们会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那些大人物。“只有那些已经败下阵来的人，”乔迪·鲍威尔说，“才需要卡特。”同样，卡特也需要他们。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竞选活动的耗资越来越巨大，需要面对的电视观众人数越来越多，竞选人员乘坐的飞机也越来越豪华，然而，卡特却奏响了一曲与众不同的新旋律：他让成千上万的选民感到，他们在为他的成功而进行投入。随着他在各州之间巡回穿梭，在一个又一个支持者家里歇脚，他在自己和支持者之间编织了一根牢固的忠诚纽带。他每去一个城市，都不是作为观光者，而是到人家里做客。正如已故的肯尼迪总统的助手泰德·索伦森所说：“你怎么可能投票反对一个在你家沙发上睡觉的人呢？”

许多人以为，要赢得他人的忠诚，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人恩惠，但事实正好相反，最好的办法是让别人给你恩惠。在这一点上，我们又要归功于16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正是他发现了人性中某些基本的方面。他注意到，当一座城市被围困了许多个月的时候，当人们在城墙之内经历着巨大的艰辛与困苦的时候，当他们为了保卫国王而经历着恐惧与饥饿的煎熬的时候，对国王的忠诚不是减少，而是进一步加深了。从此以后，他们甚至会感到自己与国王的纽带更加紧密了，“因为为了保卫他，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房屋和地产，他们现在就仰望着他认为对他负有某种义务。人的天性就是，无论是要求他人承担义务，还是自己履行义务，他都感到同样的快乐。”用马基雅弗利的另一句睿智的格言说就是：“施恩正和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天性。”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托马斯·S·弗莱也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一次

他乘坐的小飞机在华盛顿州东部一个乡村失事，当地一个人救了他。虽然那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弗莱的大名，但从此以后却为弗莱的竞选出钱出力，任劳任怨。在其他一些没有这样危险的场景下，也会产生出同样的纽带。那些伸手帮助过你一次的人往往会养成习惯，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关注你、照看你。我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记住那些我们在路边“发现”的人，并努力提供条件让他们证明我们当初是多么有远见。

当你开口向某个人请求帮助的时候，你隐含的意思就是让别人在你身上下赌注。你争取到越多的人下赌注，你输掉的几率就越小，因为你的基本支持者网络进一步扩大了。然而，很多人都克制自己不愿启齿请人帮忙，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弱小，他们认为坚持依靠自我才是力量的象征。这种“一切自己干”的心态，有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对于一个参与竞争的人来说，那样的心态会限制并孤立他，导致他没有同盟者。

一个人在被追求的时候总是会产生快感，高明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个小秘密。他们懂得，当你向一个人提出请求时，并不等于你只是在要求他付出，你也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让他有了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所以，那些四处争取资金和拉选票的候选人，其实是在向别人提供一个参与政治行动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他的成功的一部分。他做的事情就相当于让人们购买他的股票，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在创建一个股东网络。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拥有的资本，就在于他有能力接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仅要求他投自己一票，还要求他为自己付出他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在鸡尾酒会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走到一位富有的女人身边，与她搭话要求她提供五千美金，或者请别的人把一切事情都搁下，去为他的前程奔忙，他会说：“我需要你来做志愿人员，帮我干6个月。”他心里完全清楚，这意味着那些应召者需要争分夺秒地工作，而给予他们的报酬却很少或者干脆没有，而且即使他们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也不能保证会给他们一份工作。所有的职业政治家都把这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粗俗的褒奖之词出自一位了不起的加利

福尼亚议员、人称“老爹”的杰斯·昂鲁之口：“如果你不能喝干他们的酒窖，拿走他们的存款，骗走他们的女人，并且第二天一早就投对他们不利的票，做不到这一切，你就不配站到这里。”

约翰·F·肯尼迪尽管有富可敌国的家族背景和令人艳羡的常春藤联合会关系资源（常春藤联合会是由美国东北部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校友组成的一个团体），却依然钻研此道而成为行家里手。他从来不走慈善互助俱乐部的路线——戴着滑稽的礼帽，整天晚上让人拍后背——但他却学会了用一种更个性化的方式竞选。他会走到坎布里奇或者查尔斯顿港，在三层甲板的船上上上下下，挨个敲船舱的门，请那些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和亚美尼亚裔的工人“支持”他的竞选。

1946年，肯尼迪竞选国会众议员，他的对手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当地市长，所以他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一套完全独立的政治组织。这奠定了他后来所有竞选活动的模型。他使波士顿两万工人都变成了他那显赫家族的竞选队员。实际上，每一个志愿者都成了“肯尼迪棒球队队长”，他们到处散发有关肯尼迪二战期间在PT-109巡逻艇上英勇作战的纪念品和宣传单。

肯尼迪懂得如何展现和利用他们家族光彩照人的魅力。在坎布里奇，每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的母亲都鼓励女儿去做他的志愿人员，以便有机会接近这位英俊、富有、年轻的单身汉。那些紧张激动的年轻姑娘很快就被分配去做一些重要的工作，例如为这位候选人的“家族”撰写私人感谢信。她们的信有些可能就是写给和她们自己一样的人，也就是志愿走上街头为肯尼迪做宣传的其他姑娘。但信是写给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她们所接受的任务里面包含着那个“家族”的信任。那是令人自我陶醉的时刻，正是在一个个那样的时刻中，肯尼迪那个遐迩闻名的组织诞生了。

在随后的几年中，还会有一个个类似的宴会，那些每小时能挣到一大把美金的律师，只要某个时刻接到一个电话，就会抛下自己的家人和事业，去为肯尼迪家族的某个公子的前程奔忙。人们的付出所能

换来的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不过是一枚PT-109巡逻艇的纪念别针，但通过这个可以摆在外面的、明显的实物标记，他们就感到与“肯尼迪家族”有了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那些长年累月为肯尼迪竞选提供财政支持的人，只要肯尼迪能亲一下他们的老妈妈，就觉得自己完全得到了回报。“他们总是让你感觉到，你也是个圈内的人，”泰德·索伦森20多年后还动情地回忆说。

20世纪50年代末肯尼迪身上那令人倾倒的巨大魅力，其秘密养料就是这种走出家门大胆地向人们索取的精神。一位从来没有跻身于民主党高层、也不是参议院领袖的43岁的参议员，却能从民主党的组织机构争取到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奥秘就在于此。

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在竞选中采用的战术是破天荒的：他把自己在地方上的那套“政治零售”技术施展到了总统争夺战中。他派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劳伦斯·奥布赖恩专门深入到下面，去请求县里的主席、小城市的市长和各州劳联、产联的财务总管支持他竞选美国总统。以前从来没有人向这些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回想我的那些旅行，令我震惊不已的是，”劳伦斯·奥布赖恩回忆说，“我们几乎把那些地盘都拿下了。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人代表约翰逊、汉弗莱或西敏顿（他们都是民主党内争夺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去过那些州下的议事厅和工会礼堂。我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不停地和当地人交朋友，本来满心以为可能会遇到反对的声音，但结果一直没有出现。”

1960年7月13日，肯尼迪赢得了民主党党内的提名。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他宣布他请林登·约翰逊做他的竞选伙伴。那位得克萨斯人作为党内提名战中的竞争对手曾对肯尼迪进行过激烈地攻击，不仅拿肯尼迪在政治上的可怜阅历做文章，还在他的健康问题上做文章，放风说肯尼迪患了一种不为人知的绝症。但肯尼迪很清楚，为了赢得南方的广大地区，他需要挑选约翰逊做竞选伙伴。今天，政治分析家们还一致认为，如果不是肯尼迪这一不同凡响的决定，尼克松会提前8年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1960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像肯

尼迪军团此前在争取提名的漫长战斗中已经证明的那样，不吝于向人启齿求助是所有权力游戏中的最高境界。尽管林登·约翰逊被肯尼迪的请求震惊了，但正如他后来所说：“一个大人物向一个反对者提出了请求，那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他只向下走了两级台阶就做到了，而对方却把南至巴拿马运河的所有行程都用来反对他了。”

人们是不会介意被别人所用的，他们介意的是不被别人重视。蒂普·奥尼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败的竞选经历。1934年，当时他还是波士顿大学四年级学生，就参加了坎布里奇市议会席位的竞选。选举日那天，他凑巧遇到一位女邻居，对方说她打算投他一票，虽然他并没有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奥尼尔听了她的表白很吃惊，他说：“我在你的街对面已经住了18年，冬天在你们家路上铲过雪，夏天为你们剪过草，我觉得已经不必再向你提这样的要求了。”对方的回答让奥尼尔终生难忘：“汤姆（奥尼尔的昵称），有件事情你应该明白：人们喜欢别人求到他。”

所以，你要求别人给予的帮助越多，你拥有的支持者就越多。那些把他们的心血和银行存款都已倾注到你的命运中去的人，是不情愿对你太挑剔而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的，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伟大的事业就像伟大的战争：只要作出了牺牲，就需要进一步作出牺牲。

保罗·科尔宾是长期在罗伯特·肯尼迪身边工作的一位资深政治操盘手，他讲过一个他50年代中期为一位成功的候选人竞选威斯康星州州长募集资金的故事。

在民主党内的初选活动刚刚开始时，科尔宾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已登记为共和党的人，他游说对方说，如果他能提供一笔资助，将对防止左翼势力控制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位共和党人很快就寄来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帮助了科尔宾的候选人在白热化的预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

进入大选以后，科尔宾又去找那位赞助人。他说，很明显，威斯康星的共产党人都是一些铁了心的人，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

他的候选人在11月的大选中失利，下一次民主党就会落到亲共分子手里。他又成功了：巨额的捐赠，接下来是巨大的胜利。

在就职典礼那天，那位赞助人走进了州长官邸。

反应敏捷的新州长直奔主题：“我想告诉你，我们是多么感激您的帮助。”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客人被请进了装饰一新的办公室。他终于开口了：“办公室很不错，是不是？”

州长心里着急了。这个家伙到底想要什么？公路承包合同？改变城市规划方案？还是要求官职？

又是一阵沉默。

“我不过想让你们知道，”客人大声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资助共和党，并且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里面。”

“如果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惊讶不已的州长说道。

“不用。”

“真的不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吗？”

又是一阵沉默。

“好吧，有件事情。”

那两位职业政治家，州长和科尔宾，精神为之一振，听他往下说。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号码比较靠前的汽车牌照？”

这并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即使是一个最富有的捐赠人，他

或多或少也是一个政治追星族。一个号码靠前的汽车牌照毕竟意味着和权势人物的某种关系，号码越小，就意味着关系越紧密。1980年，凡是资助罗纳德·里根一万美元以上的忠心耿耿的共和党人，都获得了“雄鹰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也就是说，花一万美元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赞助者，而是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组织的正式成员了。

一个政治家或许可以帮忙把一个选民的女儿送进名牌院校，但那个人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他只记得他还有一个女儿议员没有帮忙）。但同样是这个人却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为议员的竞选捐过款。有意思的是，赞助人和政治家在提到对方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不对称性：给予者把接受者称为“朋友”，接受者则称呼给予者“赞助人”。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信奉凡事不求人的原则，这种做法所拒绝的不仅是对方的直接赠与，还错过了比赠与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从接受他人赠与中所产生的对他人的影响力。千万别忘了，在那种情况下，起作用的一条基本运算原则是：只有可以收回的账目，才能计入到资产中。那些过去帮助过你的人，也是将来最有可能帮助你的人。从事资金募集工作的专家们最看重的就是以前各次竞选中的“资助人名册”，他们心中有一个已经过科学验证的观点，那就是，只要你提出要求，人们往往会“继续投注来坚挺过去的投注”。你的目标就是争取使你自己成为他人账上的资产，建立你自己的“资助人名册”。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举债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一样都靠一种债务网络生活——拿出实物抵押，向银行贷款买车，等等。然而，这套适用于买房买车或者贷款上学的逻辑，在涉及非财政方面的信用时却被人们忽视了。

我们还没有开发的最大的资源不在阿拉伯沙漠之下，也不在阿拉斯加北部斜坡附近，它就存在于千百万颗无人光顾的心灵中。一个竞选总管的最大罪恶莫过于让一个潜在的志愿者得不到什么事情做，而怅然地离开竞选指挥部大楼。

让你的事业成为他人的希望所在吧！那份希望会成为他们账上的资产，也就是你成功的机会。他们在你身上的投资越多，就越有可能

一次又一次地投下去。

有些人害怕接受别人的援助，因为他们担心给自己套上绳索。然而，事实上，人们对政治候选人的援助，很少是那种处心积虑、斤斤计较的交易，要在将来为时间和财力上的付出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相称补偿。他们的援助往往会构成某种更微妙的交易——一种对行为本身的价值进行的投资。

每次我参与政治竞选工作，从国会议员到总统选举，我都会感到情不自禁地被事情本身所吸引，竞赛本身就能使我几乎如醉如痴。

人们喜欢自己能被别人所求，无论是要求他们出谋划策，还是提供援助，或者是对你给予任何形式的关注，都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更有价值，感到自己的存在更真实。联系双方的纽带就这样得到了加固。正如你很难投票反对一个在你家沙发上睡过觉的家伙，你又能怎么打击那个你一直在为他出谋划策的家伙呢？曾在卡特总统手下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布什总统时期出任驻俄罗斯大使的罗伯特·施特劳斯，就是深谙这套招兵买马技术的一代大师。

1980年，他在助选途中穿过费城古老的百勒维·斯特拉福饭店走廊时的情景，今天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突然发现一个他并不太熟悉的人在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话。如果换成一个不那么老练的人，只会简单地与那个和自己还没有什么交情的熟人打个招呼。但施特劳斯却直接和那张新面孔打起了招呼，从而通过一记“边路传中”把一股熟悉劲儿传给了另一个人：“他是不是又在和你胡说八道了？他的话我从来不信，一句都不信。”

施特劳斯对他认识的那个人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走了。就在那样偶然的一瞬间，他的收获要相当于花一个星期时间拉赞助、套关系的价值。

其中的奥妙何在？

首先，施特劳斯不拘小节的闪电式招呼会让那个陌生人惊喜地联

想到，自己正在和一个全国性政界要人的朋友交谈。在那一刻以前，他竟然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伙伴有这样优越的地位。从他亲眼目睹的这种无话不说的亲密一幕看，他的朋友不仅认识施特劳斯，说不定当年还是战友，并肩参加过什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呢！

其次，还有一个同样奇妙的效果。施特劳斯加强了与那个他认识的家伙的关系，却甚至连话都没有对他说一句，施特劳斯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一次，并且可能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那个家伙就是汤姆·多尼隆。这位在几次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有一次凌晨四点半在家中被施特劳斯的电话叫醒：“快从被窝里滚出来，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左派分子。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在电视里出现了，是在那个叫《今天》的节目里。”

对多尼隆来说，这种粗暴无理的起床号是“施特劳斯做过的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事情”。被施特劳斯这样重要的大人物请求出谋划策，这比什么好听的话都管用。“人们，”多尼隆分析道，“最需要的就是被当人对待。”这套澡堂语言就是施特劳斯用来和那些难对付的有钱人——偶尔还有初出道的青年——打交道的特有方式，他让他们感到，他们不只是他队伍里的一分子，而且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臭小子。

华盛顿州的沃伦·G·马格努森是参议院历史上举止最粗鲁的人之一。他的竞选口号“他和那些大小子们对着干”，就充分地说明了他这个人。不过，也正是这个叼着烟斗的、粗暴的马格努森，在与一批臭小子玩了一整夜的牌以后，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如何用一张支票来支付总统所输的钱——装模作样掏出支票签上名字，相信没有哪位赢家会去兑现。确实，为了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马格努森从来不去兑现。

当然，老小子们拉关系的这套伎俩，迄今还不能被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所接受。偏见的壁垒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可能还像在商业领域一样森严。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使得这些群体的人与别人发展关系特别困难，尽管如此，这一法则还是同样适用——开口向别人求助，永

远要比坐等别人施舍高明。

在卡特总统1980年竞选连任的那场令人痛心的选战中，每天早晨八点他的助手们都会在竞选总部举行一次例会。竞选总部设在华盛顿K大街上一座破旧不堪的楼房里。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边和几把同样廉价的折叠椅上，围坐着竞选活动的总指挥汉密尔顿·乔丹，来自工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有副总统办公室的一名代表，以及总统的撰稿人。

在这些天天到场的人中间，有一位刚当选的女议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样的人，尤其是来自日趋衰落的乡镇选区的人，应该是很忙的：在国会谋个好位置，了解华盛顿的内幕，还要防止后院起火，提防选区里出现挑战者，等等。所以，她每天上午都来参与这种繁重的、没有报酬的额外任务，就显得十分不同寻常了。

1981年，当我转到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工作时，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两年前才当选的女众议员，同样出现在所有涉及民主党全国性事务的场合：每次有新的职位空缺，比如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会议需要补充秘书，或者议长需要有人代替他出席民主党全国会议，都是这位女士默默地去争取，并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她就是杰拉尔丁·A·费拉罗。

1984年，她参加了副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战，不管最终由于什么问题她没有如愿以偿，但她确实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那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为自己谋求一个位子。她之所以能一次次进入核心政治的圈子，不外乎一条简单的秘诀：她要求；她接受；她成了硬球高手。

费拉罗女士在民主党内极其有名，因为无论讨论党的什么重大问题，或者领导人的人选，都会有她在场。当有的议员指责她太突出自己的时候，蒂普·奥尼尔议长总是用他的方式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说：“不错，她是总在突出自己，不过我们这一行就需要这个。”

1984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廉·H·格雷三世，

打出了漂亮的一击政治硬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众议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黑人。在他之前，很多年来黑人议员只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担任要职，比如民权、非洲事务、教育以及福利等等。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主要领域的领导职务，他们从来没有人竞争过。这一格局最终被格雷打破了，他凭借出色的竞选策略而成了权势显赫的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找到向来以立场最保守而著称的南部议员，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表明了自己获胜的决心，以及请他们给予积极而公开支持的愿望。

在一个充斥着如此顽固的偏见的世界，许多机遇之门依然是对外关闭的，然而，杰拉尔丁·费拉罗和威廉·格雷却有勇气敲门，向世人证明并非每一扇门都是闭着的。他们让另外一些人成为手下败将。他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权力的争夺战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敢于向别人提出要求。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坐在国会山众议长办公室密室里时的情景。当时参议员鲍勃·多尔，一位在二战中失去右臂功能的人，拿着杯子，对着咖啡壶，回过头问我是否能帮他转一下壶柄。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多尔显然是一个爱耍手腕、操纵他人的家伙。然而，每次我想起他毫无异心地开口向我求助，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一丝好感。

我还记得一次类似的经历，不过角色恰好倒了个个儿。我年轻的时候曾作为和平外援队志愿人员去过斯威士兰的乡村，来往于一个个零售店之间，向人们提供一些记账和经营方面的建议。其中有一位小店的店主，每次都不忘给我一杯热饮，因为那里气候炎热，却又没有冰箱。由于这个简单的行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紧密的关系。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的专家很久以前就发现，在这些文化中，接受帮助和给予帮助是同样重要的行为。任何关系都不是靠一方来维持的。在南部非洲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无意之中恪守了一条如马基雅弗利般冷酷、又如富兰克林般友善的法则：“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第四章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诚党员。我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党派，但我是为政党而生的。

——休伊·“月鱼”·朗

当乔治·布什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承诺。那就是，如果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导人向他要求大幅度增加政府税收时，他会干净利落地一口拒绝；如果他们再度要求，他会再度回绝。最终表决心的时刻来了。“看着我的嘴唇，”他指着自己的嘴，发誓自己一定会说，“不……新的……税收……没门！”

后来的事实证明，1990年的形势发展完全符合布什出色的预言。民主党的领袖跑到他面前，态度强硬地要求他要么增加政府税收，要么等着看好戏。他进行了抵制。然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他最终屈服了。他同意了一个包括更高的政府税收在内的一揽子财政预算计划。在那些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他的行为不啻于背信弃义——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得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好莱坞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擅长塑造坚强不屈的硬汉角色），而在登上总统宝座后的统治风格则变成了巴尼·法伊夫（也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塑造的人物与前者截然不同）。

任何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知道这样的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它不仅仅会危及你一对一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会使得你丧失信誉，声名扫地。对于职业政治家来说，忠诚就如同道德操守一样，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之一。想想看，谁会信任一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人呢？

在白宫适用的道理在其他地方同样是金科玉律。

1981年，在北费城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国会议员选举，以便更换一个卷入“阿布斯卡蒙”丑闻的现任议员。最终的赢家是约瑟夫·史密斯，一位真正的政界老兵。他先是在地方小镇的政府机构中工作，耐

心地等待机会，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终成为光芒四射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山会议厅的宣誓就职仪式举行之前，我站在众议长的座椅旁，简要地向蒂普·奥尼尔介绍即将上任的议员的生平履历。只有一点在我看来是有着实质性意义的。我告诉议长，这位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新议员曾经长期担任奥尼尔的旧同僚即众议员威廉·“掘地者”·伯恩的亲密助手，后者在10年以前同样是代表费城地区的议员。

封建传统确实根深蒂固。伯恩本人是接替他的父亲为这一地区服务的。他先是担任他们家族的丧葬公司的董事长——伯恩过去经常在议员衣帽间里拿那个公司友善的经营宗旨开玩笑，那就是“我们会让你在地底下安息的”——后来又接替了父亲在国会的议席。议长问我“掘地者”现在是否仍然健在。我告诉他伯恩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当议长和从北费城来的新议员面对面地交谈时，只有那些久经风雨的政坛老手才能破译其中复杂而微妙的信息。

议长：“呃……‘掘地者’怎么样了？”

史密斯众议员：“噢，他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

议长：“是的，我听说了。”

对那些漫不经心的听众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文不对题的无聊谈话。然而，在那些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基本礼节的耳朵听起来，蒂普·奥尼尔并不是在询问一个死者的健康状况。他是在向另一个人打招呼。“‘掘地者’怎么样了？”这句话后面隐藏着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你的忠诚。”

在局外人看来，政治舞台似乎是一个凶险无比、残酷无情的场所。那些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会气势汹汹地质疑竞争对手的动机以及是否具备爱国精神，甚至不惜在他的私人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很少引起注意的是对这些利益攸关的角斗士有着共同约束力的深层次的封建准则。为了无牵无挂、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你必须先确信不会后院起火。

“忠诚在我们这个行当中决定一切，”这是蒂普·奥尼尔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所有明智的职业政治家的共同心声，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如果你到华盛顿特区旅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和美国20世纪的其他大城市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我指的不是林立的庄严肃穆的纪念碑，而是你看不到在别的城市司空见惯的大烟囱。跟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同——它们的政治中心地位很显然依赖于遍地蔓延的现代化大工业和生产流水线，华盛顿只生产两种东西——供我们所有人使用的纸币和供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货币。华盛顿人从事的工作就是交易，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当一个参议员告诉另一个参议员，他会支持对方为其所在州的某个重要的公共建设项目争取财政资助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投桃报李。如果他不指望回报的话，他的承诺也就毫无价值了。如果不存在这种互相利用，他的“有效性”必定会在自己所代表的州遭到质疑，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说从职业政治家身上可以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变节的叛徒。一个人可以是为其祖国而战的伟大斗士，可以在一场辉煌的决定性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一旦他背叛了朋友，他就变成了千夫所指、臭名昭著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逃亡英国）。

即便在这个猎头公司到处挖掘人才的年代，变换一个工作是一回事，对你的前任老板缺乏必要的忠诚则是另一回事。再也没有比在背叛旧老板的同时竭尽全力地想赢取新雇主的信任更自欺欺人的事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老板对于这样的背叛总是耿耿于怀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有一次在谈起演讲稿撰写人理查德·古德温时（后者曾经为他服务过，后来在他的死对头罗伯特·肯尼迪参与总统角逐时又转而为肯尼迪工作）就对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智处理大加赞赏，“迪克（理查德·古德温的昵称）是那种穿上新制服而不忘旧主人的人，他知道怎样掌握分寸。”

对于罗纳德·里根来说，他的一大强项，或者说，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主要基础，就在于他与共和党内部的保守主义运动所结下的长

期、稳固的关系。从1964年开始，当他为戈德华特（美国参议员，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属共和党保守派，主张扩大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已陷于山穷水尽的总统竞选活动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时，里根就已经坚定地站在了保守派的阵营。他没有听从那些主张走中间道路从而获取更多选票的顾问的建议，继续义无反顾地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里根为保守主义事业毫无保留的呐喊助威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当那些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那么浓厚的候选人纷纷落马的时候，唯独他始终屹立不倒、稳如泰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1976年北卡罗莱那州的预选中拉撒路式的复活（拉撒路是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人物，系Mary和Martha的兄弟，死后4日耶稣使他复活）。尽管权威的政治评论家纷纷预言他这一次在劫难逃，里根却再度成功地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法宝，从而赢得了共和党内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分子的选票。要知道，那可是在爱国主义浓厚的南部，那里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都把从事政府公职和做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作为无上的荣耀。在那样一个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情结根深蒂固的地方，里根向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搬救兵自然是再明智不过了。他宣称，跟共产主义者作战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而杰拉德·福特显然不是一个坚强有力的人。

里根在1980年再度起死回生，继在艾奥瓦州共和党预选会议中惨败于乔治·布什后，却奇迹般地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成功，因为那些对他一往情深的保守主义分子，那些经年累月一字不漏地倾听他的电台评论的人，始终和他紧紧抱成一团，正如他和他们紧紧抱成一团一样。

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里根继续保持他和保守派之间的“热恋”关系，而不是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他不遗余力地促进自己与主要的保守主义刊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每年都参加《全美评论》的周年庆典，对保守派的喉舌《华盛顿时报》也是另眼相看非常在意，每逢记者招待会他总要与该报特派记者杰里迈亚·奥里里打招呼。他一向以自己和保守派之间患难与共、安乐共享的稳固联盟而自豪。他会脸不红心不

跳、泰然自若地出现在最极端、最偏激的保守主义分子的集会上。在1985年的一个思想论坛上，里根发表讲话时说道，“我一直把这个集会当做一个机会，一个与带你来的人共舞的机会。”

里根对共和党右翼的忠诚唯一一次发生动摇，是1986年他处理伊朗武器事件的时候。伊朗门丑闻给里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原因很简单，这一次他没有和他的保守主义伙伴共舞，相反，他被人抓住是在和阿亚图拉·霍梅尼共舞（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有很多关于伊斯兰哲学、法律和道德观的著作，领导推翻国王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伊朗政治和宗教终身领袖）。

忠诚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聚集政治力量的一幢大厦。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拥有强大联盟的途径是：（1）了解他人的兴趣和愿望所在；（2）找出相应的道路建立对你有帮助的关系；（3）用相互支持和互惠巩固这种关系。不难看到，忠诚是这一支持网络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一网络的兴衰存亡而言，政治忠诚要比“政治零售”更加利害攸关。政治上的背叛不仅会毁坏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些关系，还会使一个人的名声一败涂地，付诸东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个媒体政治的时代，政治家主要通过电视的狂轰滥炸宣扬自己的政绩，个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忠诚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了。他们会振振有词地声称，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是个人魅力，是个人有效地在电视屏幕上塑造一个富于感染力的形象的能力。然而，最新的历史跟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

在美国最新的历史中，最具魅力的两个政治人物或许要数得克萨斯州的约翰·B·康纳利和纽约州的约翰·V·林赛了。他们两个人都有着一流的敏捷头脑，在媒体上更是有炉火纯青的表现技巧。康纳利与林登·约翰逊一样，也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得克萨斯人，浑身散发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息。但是，他却与林登·约翰逊不同，媒体顾问梦寐以求的一切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他的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恰与约翰逊的丑陋滑稽、笨拙粗鲁形成鲜明反差。约翰·林赛曾任纽约市市长，是继约翰

肯尼迪之后在电视镜头上最璀璨夺目的公众人物；同时，由于在娱乐业方面的杰出天赋，他甚至代替约翰尼·卡森在《今夜演播》中担任客串主持。

1963年，当时正任州长的康纳利声誉鹊起，一举成为全美瞩目的人物。因为在那一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总统，康纳利也被奥斯瓦尔德射出的连发子弹击中。9年后，他再度红极一时，因为他领导了“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党员”。但是，当这位高大英俊、一脸总统相的康纳利1980年转变阵营，跑到共和党那边谋求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却竹篮打水、一败涂地。他耗费了1200万美元的巨资，最终的结果只是把阿肯色州的艾达·米尔斯推选为代表他参加共和党全国会议的全权代表。康纳利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变节者的恶劣形象，这一形象比起与水门事件丑闻有牵连对他的打击更大。

当作为共和党人的林赛谋求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时，康纳利现象再度发生了，只不过这次是掉了个个儿。林赛改变阵营，至少还有一个理由。1969年，他所在的共和党拒绝再次提名他角逐连任。为了获得连任，他不得不在自由党和他自己创立的“城市党”的旗帜之下竞选。

1972年，当林赛宣布他将参与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一时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之所以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就是因为他的政治“身份”。正如纽约州民主党分部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给他塑造一个可信的民主党人的新形象。”但是，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在举足轻重的佛罗里达州预选中，林赛凭借他与纽约州的关系本来并不难得手，但却因为转变阵营而备受嘲笑。他当时的竞争对手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尖刻地说：“这是一个前脚刚踏进教会，后脚就要求成为教堂执事委员会成员的贪婪之徒。”在佛罗里达的预选中林赛排在第五位。而在下一轮即威斯康星的预选中，这位媒体明星则屈居第六位。

应该说，无论是康纳利还是林赛，他们的背叛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选民是不管这一点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大

政党之间的分歧和不同越是缩小，选民对所谓的政党忠诚也就越是看重。人们或许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在执政观念上的细微差别知之甚少，或许自身也频繁地变换立场，在两大政党之间游移不定，但是，当他们的眼前出现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分辨出来。作为一个“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康纳利曾经展现出一种政治明星的品质。作为共和党旗下一个遮遮掩掩的自由派分子，林赛在政治上具有性感的魅力。他那时就像一个穿着紧兮兮的比基尼的妙龄女郎。由于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挑逗，他便暴露了自己十足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原形。

康纳利和林赛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证实了这一法则——忠诚是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一个默默无闻的公民每天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并且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们。但是，这绝对不适用于作为公众人物的政治家，他们是靠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人。一个担任着政治职务的人如果要变换党派，唯一名正言顺的、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先辞去自己正在担任的职务。1983年，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菲尔·格拉姆，就是这样做的。他先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因为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获得那个席位的，然后又在一次特别的选举中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角逐这个职位。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居然在第二年进行的竞选中成功地再次当选为参议员，只不过这次他成了一名共和党人。菲尔·格拉姆退回了曾经给予他的东西，了结了他原来的选民和政党的债务，从而避免了使自己成为不为人所齿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他在严密的火力封锁下穿过生死线抵达了对方的阵营，因此，他在新加入的一方的位置是自己拼搏得来的，而不是通过肮脏的交易买来的。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这一法则还包含着两个重要推论。

一、是你选择你的老板

当你在政界或其他领域谋求一个职位的时候，你一定要十分小心、慎而又慎。因为一旦你建立了某种忠诚关系，你就很难从中退出来。如果你不幸站错了阵营，你就会陷入霍布斯笔下那种狼狈不堪的

选择（霍布斯是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利维坦》）——要么赶快抽身、溜之大吉，要么就与某个人或某一事业一起葬送于沟壑之中，或许永远都别指望会有出头之日。

当我第一次敲国会山的大门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差点陷入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灾难之中。

前面我提到过，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建议我在找工作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出生地和背景与我相似的议员身上。我于是依据出身和地理背景列了一大堆名单，拿着名单按图索骥，走进了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民主党众议员的办公室。议员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我就在外间等着他的接见。我想，那位议员作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或许能够为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工作，因为我是圣十字架学院的毕业生，并且最近还有过作为和平志愿者去非洲服务的切身经历。

那时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你们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那个富有魅力的哥伦布骑士会绅士从里间走出来（哥伦布骑士会是美国天主教的一个慈善组织），来到接待桌前问我是否能帮我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激动了。

当我告诉他我刚从斯威士兰回到美国，希望能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找到一个办事员的工作时，他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不。你应该在我的办公室做我的立法助手。”

我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当这个实际上是个混账的家伙指着墙上的一块纪念匾额说他就是那项成立美国和平队的提案的最初推动者的时候，我以为一切都能轻易搞定了。直到稍后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家伙已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生活》杂志揭露了他与流氓团伙的暧昧关系，据传闻他还利用这种关系从他的地下室转移了一具尸体。

显然这件事对我的应聘产生了消极影响，后来我又去过几趟这个来自新泽西的绅士的办公室打听消息。有一天，他的首席秘书用一种

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口吻对我说道，“议员先生让我转告你，不能让你在这里工作。”

当我回首这一经历的时候（就在他拒绝聘用我做他的秘书的那一年年底，这位议员就被指控隐瞒自己的收入逃避税收，而且这只是他卷入的诸多法律纠纷的开始），我很乐意把这个很久以前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的秘书看做是一个想挽救我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想把我与一个注定要陷入更深困境的政治人物拴在一起。

对于忠诚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你要选对向谁效忠。一旦你上了船，你就难以做到无视船长的影响与存在了。一旦你选择了老板并为他服务，你就再也不可能拒绝他的指令和控制。

二、你最近又为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殆尽，即使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也有可能这样。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就早已对他们失去信任了。你去问一问任何一个职业政治家，他们都会对你说，选民们是多么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出这种那种努力，来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显示自己是多么忠诚、可靠。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济会亦步亦趋地随着政治日历的翻新而回来波动吗？在总统当选后的第一个年头，美国的经济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之前，美国的经济肯定又会恢复得生机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在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之中，否则他就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如果他想消除通货膨胀并砍掉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话，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动手，越早越好，因为只有这样，等到下次大选来临的时候，选民们才会忘记他们曾经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当你要给人们施加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应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品味痛苦的时间越短，他们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里这样写道，“而另一方面，在给予人们好处的时候，却要一点一点地、逐步地给，因为只有这样的连续不断的给予中，人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处。”

马基雅弗利这条训谕的第二部分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政治家们在上任后不仅要先把会引起抗议风潮的棘手之事干完，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且，在下次选举之前几个月中还一定要给选民们带来持续不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在支持他们的选民们正在试图判断他们的服务是否合格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做出回报来显示自己的忠诚。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全国的选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将罗纳德里根选进了白宫。人们看到的只是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就一直处在强劲的复苏之中，而忘了此前它一直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并且眼前的短暂复苏也仅仅是衰退中的复苏而已。

然而，如果一个政治家在再次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差劲或者政绩平平，那么，无论他在两年前干得多么好，给予选民的好处多么巨大，那也将于事无补，他将注定被选民们抛弃。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总统。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尽管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险，但还是提出要通过减税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而降低失业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也就是他要竞选连任的那一年，他才开始采取紧缩措施。他不仅任命了一贯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的专家保罗·V·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提出了一个急剧压缩的选举年财政预算方案。在美国历史上，唯一比这更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杀的愚行，是前副总统沃尔特·F·蒙代尔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宣布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增加税收。

在一场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政治游戏中，选民们往往是缺乏记忆力的。来自肯塔基州的前参议员阿尔本·W·巴克利——他后来还担任过哈里·杜鲁门的副总统——对此曾有过经典的阐述。1938年秋天，当巴克利竞选连任代表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的时候，他受到了该州的州长——绰号叫“快乐天使”的A·B·钱德勒的强有力的挑战。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巴克利经常把一个乡村选民的故事挂在自己的嘴边，他在选举前的数周曾召见过那个选民，结果却发现那个选民居然想投票给州长，而不是他自己。巴克利提醒那个农夫说，在他担任检控律师、乡村法官、众议员以及参议员期间，他曾经为他做过很多事。

“我还记得，我是如何争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农场的；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时候，我是如何到法国的一所军队医院里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后，我又是如何帮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从农场信用基金管理局为他安排贷款；当他的农场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毁的时候，我又是如何为他争取救灾贷款的。”

“你怎么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乐天使’呢？”巴克利恼怒和不解地对那个农夫尖叫了起来，“我想，肯定你还记得我为你做过的所有这些事情吧？！”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农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妈的最近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

实际上，在美国所有的选民中，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往往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较早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来判断他们所选出来的人是否对他们忠诚、是否称职。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总是会不时地向选民们表现自己的忠诚。就像送一张小小的圣诞卡也可以维持一种个人或者是商业联系，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彼此的关系就将烟消云散。

职业政治家会告诉我们，经常性地修补与选民的关系，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当他们竞选公职的时候，他们就与选民们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为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而奠定了一个基调，就像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竞选一样，他们也将这样的基础上履

行自己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述职，倾听他们的呼声。尤其重要的是，要经常地、不间断地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关心，从而不断地给彼此的关系注入新鲜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这一套。我在参议院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久，我的老板，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弗兰克·莫斯，决定向参议院提出一个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个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注意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会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我为弗兰克·莫斯参议员起草的这一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指标——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自动地联系起来。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够得到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广泛支持，但是，最后居然只有1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那个提案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因为每隔几年，那些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抓住机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阶层选民们踊跃地支持自己，同时也可以借此使劳工领袖们能够介入到党派的立法议程中来。因此，如果他们表决通过了我所主张的提案，也就是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几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话，劳工阶层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这一能够赢得民心的光荣机会。

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国会议员都深深地懊悔他们几年前在《社会保障法案》中汇总了各种社会福利指标，也就是将那些福利同生活费用的上升直接关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称国会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艰辛的老年公民的社会福利的机会。当然，他们也会很快会为刚刚汇总了各种税收指标而后悔不迭的。以前，他们曾经因为推动减税而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和选票，而实际上那时候他们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减缓了税收“沿着脚手架不断往上爬”的速度而已。

马萨诸塞州的国会众议员詹姆斯·A·伯克，也为我们留下了同样经典的一幕。当伯克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被选进众议院后不久，伯克的同事，同样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议长约翰·W·麦克科马克，问伯克是否需要帮助，为他所在的选区做点什么事。伯克立即回答说有一件事需要麦克科马克帮忙，那就是他希望促使联邦政府重新修复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他的选区内的故居。昆西·亚当斯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离任以后，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后17年一直是代表这一地区的议员。杰米·伯克如果办成了这件事，他将成为这一地区选民心目中的英雄。

麦克科马克问修复亚当斯的故居大概要花多少钱。“喔，我想大概需要75,000美元”，伯克兴致勃勃地回答道。麦克科马克笑了，他对伯克说，重新修复亚当斯总统故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在本次国会会议上，伯克就能得到全额拨款。

听到这里，伯克突然若有所思、面带忧虑。“我希望这次只拨30,000美元，行吗？我可不想在一年内就完成整个重修工程！”

在70年代早期的时候，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来帮助人们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国会各议员办公室从一项有时会非常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帮助家乡的选民与联邦官僚机构打交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因此马上就有很多的议员签名表示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有戏，因为，国会中那些资深议员们绝不会让这样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来争夺那份荣誉与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应该由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1932年，去看看詹姆斯·A·哈格蒂吧。这个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闻秘书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是《纽约时报》一个非常机智的政治评论记者。有一次，他为梅西公司总裁杰西·I·施特劳斯出了一个高明的点子。施特劳斯告诉哈格蒂，他打算为富

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捐一大笔钱，并且说那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候选人，而且也是出于他自身目的的考虑。他希望一旦民主党人入主白宫，新总统会任命他担任一个公职。他准备预先支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15,000美元。要知道，如果折换成今天的美元，那可是一笔巨款。哈格蒂在听了施特劳斯的打算之后，马上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条非常高明的策略。

“这可是一大笔捐款啊，”他对施特劳斯说，“最好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你可以先给5,000美元，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需要钱的话，可以还来找你要。毫无疑问，在选举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他们肯定还会回来找你要钱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急需竞选资金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给他们5,000美元，并告诉他们说这是你打算捐赠的最后一笔钱了。这样的话，等到选举前一周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资金匮乏而心急火燎，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向罗斯福建议提出某些诱惑条件从而促使你再次出钱救急。当然，对于再次到你这里来弄钱，他们会有一些犹豫，不过他们还是会来的，虽然可能有点勉强。到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们最后的5,000美元，我敢担保他们会对你感激得涕泪交流的。这样，你就会取得比你一次性给他们15,000美元（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老早就把钱花光了）大得多的效果。”

哈格蒂的这条计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了施特劳斯担任驻法国大使，并且让他干了很多年。

当然，那些在国会走廊游说议员们的说客，对于这样的交易也是非常精通、老练的。他们会把交易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以求得到预想中的结果。你永远都不会听到任何一个领着丰厚报酬的“驻华盛顿代表”告诉那些出钱雇用他的公司，说消费运动已经达到了巅峰，或者某个产业长期担心的立法已经被永久性地搁置了。“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会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对他的委托人说道，“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活动和关系，让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恶化。”对于这些说客，我们还是听听H·L·门肯的警告吧。门肯说：“如果一个人的饭碗依靠的就是不确定状态，你最好不要与他争论。就如同不要指

望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能恭维你那年轻的脸庞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个出色的说客心里会清楚地知道，他的饭碗依赖于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务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才不会有失业之虞。

马丁·阿格隆斯基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曾长期在华盛顿从事政治报道，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纽约卖饼女人的故事，那个故事形象地揭示了人们身上这一规律性的综合征——“你最近又为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纽约城里，曾经有一个卖白吉饼（先蒸后烤的发面圈）的老妇人，她已经在“麦迪逊大街”街头卖这样的饼好多年了。在每天早晨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男人经过她的小摊子，并把25美分的硬币扔进她收钱的铁罐里，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从来都不要白吉饼。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15年。有一天，老妇人终于拦住了那个男人，对他说：“你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那个男人吃了一惊，说道：“我猜想，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坚持往你的铁罐里扔钱，但却从来都不拿白吉饼，是吧？”

“不，先生，你错了！”老妇人回答道，“我的问题是，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白吉饼的价格已经涨到50美分一个了吗？”

第二部分 敌手

这里还有角斗士，他们的生存是建立在打败一个又一个对手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法则，你不仅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充满了政治权谋的世界赢得一席之地，而且能够如鱼得水，兴旺发达。

第五章 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

宁愿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帐篷内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边往帐篷里头撒尿。

——林登·约翰逊

在《教父》一书中，当迈克尔·科尔奥尼的“塔霍湖大院之谜”被杀手的子弹解开的时候，他差一点就没命了。科尔奥尼，这个年轻的黑手党绅士，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猜疑隐藏于心底，若无其事、非常好地拜访了那个他相信是谋杀指使者的人。“跟你的朋友们要保持密切的关系，”科尔奥尼的父亲曾这样教导他，“但是你要记住，你应该与你的敌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在这部经典之作中，作者马里奥·普佐借着这个勇士的嘴所说出的箴言，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上，萨拉托加战役是那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转折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当英国的伯戈因将军将自己的佩剑交给美国的盖茨将军表示投降的时候，这两支军队的将领就立即坐在一起了，参加了一场即便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极其侈靡的晚宴。那奢华的酒席上可以说是各种美味应有尽有：火腿，鹅肉，牛肉，羔羊，以及“各种各样盛在大盘子里的清脆碧绿让人直流口水的蔬菜”，数不清的散发着诱人的醇香的朗姆酒和香浓的苹果酒。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从书上读到这一幕的话，我肯定会感到极度

震惊，认为那样做实在荒谬绝伦。毕竟，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一些有血性的勇士，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曾经为了打败对方而刺刀见红、拼得你死我活，现在居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握手言欢，并非常愉快地共进晚餐。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得了呢？！

不过，这只是我30年前的想法，也就是我几乎还没有步入政坛、没有与职业政治家共事之前的想法。

当你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那场在萨拉托加举行的煌赫一时、欢天喜地的宴会的时候，你就发觉在“胜利的美国人的帐篷”里上演的这一幕是很完美的。对于那些战败了的英国士兵们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向他们传达失败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一信息更能安抚他们内心那狂热的复仇之情呢？当你与美国佬坐到一起，并分享他们的苹果酒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些好战的美国佬并不是那么卑劣不堪的。

在对待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一流的政治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盖茨将军两百年前就曾采取过的姿态。正如盖茨将军邀请绰号为“约翰尼绅士”的伯戈因将军到他的帐篷里去共度那个令人愉快的、结交友谊的良宵一样，国会山那些著名议员在应付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完全针锋相对的“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师般的能耐，也让我长时间地叹为观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看见有议员大步穿过众议院的会议厅，在刚刚与对手唇枪舌剑、怒火填膺地理论过后，却与对方搂肩搭背，插科打诨、嘻嘻哈哈地聊着家常，一起走出国会大厦长长的走廊。

跟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友谊或者伙伴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9世纪著名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曾经这样说。就像那些伟大的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中的表现一样，伟大的政治家们总是同他们的敌人、即使是最凶猛的敌人保持着对话和联系，而他们保持这种关系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首先，它能够显示一种强大的力量。当你轻松自如地同一个你恨不得要砍掉其

脑袋的人闲谈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你的对手感到强烈的震撼和不安了。第二，它能够使你知己知彼。你和你的对手交流得越频繁、倾听他们的诉说越多，你就更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对你的看法、他们对你这一方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他们自己一方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你做出决策。第三，同时也最重要的是，也许有一天你会不得不和这个你所讨厌的家伙，也就是你的敌人共事，你在这场决斗中的对手很可能是你在下一场战斗中非常重要的盟友。因此，任何一个聪明的政治家都不会关上同自己的那些敌人，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对话与和解之门。柯克·奥唐奈是蒂普·奥尼尔长期信任的顾问，正如他所说：“你应该随时准备对话，与你的对手讲和。”

罗纳德·里根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是对这条由来已久的法则所蕴涵的力量的验证，并且，没有人能够比我们这些站在与里根总统以及他所属的共和党对立面的民主党阵营里的人，更能了解这其中的奥秘了。

在1981年当选总统入主白宫以前，里根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些大集团或组织内任职。里根曾经是华纳兄弟影视公司以及其他大影视公司的签约演员，也做过影视演员经纪公司的执行官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总发言人，所以，他深深地懂得，任何一个大公司或集团里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殊作用和地位。里根与吉米·卡特不同，后者除了曾经在海军一艘潜艇上服过役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经营自己的那个小农场和五金商店上了，而里根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像卡特一样离群索居的企业家。

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在职业背景上的这种天差地别，使得他们的总统任期都具有鲜明的、但彼此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一天的相当一部分时间中，卡特喜欢沉浸于一种自得其乐的孤独中，从事大量的案头工作或听古典音乐，而里根则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和他的团队、与一批人一起工作上。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大公司工作经验的人，里根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不需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独自一人处理所有的事情。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当他在拍摄电影《纽特·罗西纳》或《圣诞老人费·特莱》的时候，有制片人在做总管，有

著名的作者在为电影编写剧本，有出色的导演来指挥电影拍摄，有公关部的那些潇洒迷人的男孩子们在为电影做巡回宣传。当然，所有人都是围绕着他这个明星转的。

无论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们会对他说什么，里根这个经验丰富的演员知道自己的长处所在。当他1981年走进白宫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沟通者”带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幕僚班子，那帮幕僚就是他招来向人们展示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所有天才的。这个强大的幕僚班子的成员包括一些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大批的公共关系顾问，甚至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导演——迈克尔·迪弗，一位非常善于选择拍摄角度和背景的大师。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里根在劳动节那天露面为自己的竞选造势时，那个非常有感召意义的地点就是由迪弗精心选择的。里根穿着有袖子的衬衫，他的背景就是著名的自由女神雕像。早在李·艾科卡在美国人的心中唤起对自由女神光辉的崇敬之情，并使人们对女神雕像所在的地方也充满了尊敬以前，迪弗就在它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即将喷发的潜在的爱国激情。这种生动的图片的力量绝对要胜过千言万语，当罗纳德·里根以自由女神雕像为背景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以后，人们一致认为里根是最好的领路者，他能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里根，也知道一个新上任的总统所具有的弱点和面临的障碍。他面临着一场艰巨的行政上的挑战——一个巨大的官僚系统正等着他去驯服。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的是一种非凡的管理才能，而里根此前并没有展示过这方面的天才。这意味着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主管，这个人必须有船长般的杰出指挥才能，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才能。为了使自己这颗明星看起来继续光彩照人，里根只靠自己那套保守的政治主张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出色地识别人才、知人善任。

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已经有了两个理想的人选，就是迈克尔·迪弗和他们的理论家艾德温·米斯。他们现在所缺的就是一个天才的制片人，这个人要具有协调各种事情的能力，以及干净利落地处理琐事的才能。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选，那就是詹姆斯·A·贝克。

毫无疑问，任用贝克是非常出色的决策。在以后的岁月中，就是这个贝克组织实施了新总统1981年的三大立法方案——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增长、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国内开支削减。即使是长期跟随里根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如果没有这个来自得克萨斯的绅士——也就是贝克——鼎力相助的话，他们的总统是不可能取得非凡的成就的。

里根总统最初之所以做出雇用贝克的决定，接着又把他提拔到最显赫的高位上，主要是因为贝克的背景深深地吸引了他。而令人感到非常吃惊与意外的是，在过去的好几年里，詹姆斯·A·贝克其实是罗纳德·里根最大的死敌。

两人第一次互相敌对发生在1976年，那一年罗纳德·里根第一次正式参加竞选美国总统的角逐。造成两人对立的主要原因是杰拉德·R·福特总统。福特在理查德·尼克松因为“水门丑闻”而辞职后接替了总统的职位，到了1976年，在经过了一系列血腥的竞争以后，他已经在共和党的党内提名竞争中遥遥领先于里根。眼看自己胜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里根决定孤注一掷，使出最后绝招，以期出其不意地给福特致命一击。他提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S·施韦克为自己未来的总统竞选搭档。

依照美国的惯例，总统候选人只有在获得党内提名以后才能决定挑选谁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每当被问起为什么要打破这一传统的时候，里根说他只是想为共和党提名大会提供一个“平衡的候选人名单”。实际上，里根提名施韦克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他的最主要的战术动机是想借此瓦解与施韦克来自同一个州（宾夕法尼亚州，领先的福特也来自该州）的代表，希望能促使这些倾向于福特的人在提名大会上倒戈支持自己。这是很大胆、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一招，虽然它具有很高的风险，但是对于一心想当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来说，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于里根这种公然挑衅和突然袭击，福特总统的竞选班子开始了

猛烈的反击，就像当年美国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于德国人的进攻必然要实施更猛烈更残酷的反攻一样。他们派出了吉米·贝克（就是詹姆斯·贝克，吉米是詹姆斯的昵称）来粉碎里根的进攻，要吉米·贝克不惜任何代价。

贝克一心一意地投入了战斗，决心竭尽所能让尽可能多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拒绝“里根—施韦克轴心体系”（二战中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叫轴心国体系）。他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零售”战役，每次都要把一个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拉回到福特这边来。“零售”战役开始以后，那些本来默默无闻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发现自己居然成了白宫的座上宾，而且，他们的家属也跟着成了小名人，被邀请到总统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去做客。水坝、桥梁、医院等公共建设项目，就像甘霖纷纷降到这些议员所属的社区。作为福特总统委托的特派员，贝克这位能干的牛仔几乎使宾夕法尼亚州所有“迷失了方向的”代表都转变了态度，倒向了福特总统。最终的结果是里根弄巧成拙，他抛出了他最有吸引力的诱饵——副总统候选人，却只得到了四个代表的支持。

对于里根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他的战线崩溃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非福特莫属了。对于杰米·贝克来说，则意味着一次火线提升，他成了福特那年秋天的竞选活动的总管。

这只是里根和贝克之间惊心动魄的智力较量的序幕而已。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贝克又作为他的老朋友乔治·布什的竞选总管为赢得共和党内的提名而再次与里根较量。布什的首要竞选主张是把美国从“像中了巫术一样的经济”中拯救出来，但是，不幸的是，这显然不是美国的选民们当时都最在意的头号问题，当然也不是共和党的选民们最在意的头号问题。在艾奥瓦州的共和党预选大会上，一场原本以为会稳操胜券的选举因里根后来居上而泡汤，贝克这位布什竞选班子的“大哥大”遭到了重挫。接下来，“请选举布什为总统”的标语牌口号便换成了“请选举布什为副总统”，而布什竞选班子的负责人贝克开始了一场魔术般的悄然变换：在几个星期内，他就从失败的布什的竞选负责人转变成了作为胜利者的里根的首席顾问，从丑恶的毛毛虫转变成了美丽的花蝴蝶。

通过任命自己的敌人贝克担任自己的总管，里根向人们雄辩地展示了那条古老戒律的力量——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而不是让他们躲在你的身后。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会驱逐他的敌人的，相反，而是要遵循那条权力竞技场上的古老的教条——使你的敌人最终为你所用。

起用贝克不仅是这位里根的首任行政主管本人的巨大胜利，同样也是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巨大胜利。对于正举步维艰、前景不容乐观的里根来说，任用贝克就等于收服了一个权势集团首领，因为贝克与美国东部地区的共和党人和全美的新闻记者军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杰米·贝克后来又担任了里根的财政部长，人们将不会忘记，正是他出色地包装了里根的立法计划，使他在白宫的同事们强硬的意识形态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并赢得了华盛顿那些非常挑剔的媒体的尊重和赞誉。虽然贝克是站在与国会相对的一面，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庄重而有礼貌的职业政治家，而且是里根总统的白宫的“非常好的管家”。有很多次，正是贝克对众议长那种充满尊敬的秘密拜访为里根避免了很多潜在的麻烦和冲突。在新闻记者们眼中，贝克是“白宫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对他们开诚布公、坦白相告的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贝克的聪明才智都本应在里根政府后期的岁月中发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芒，然而，人们却只能痛苦地回忆由于他的离开白宫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当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那种明智、有条不紊的策略，被第二个任期内被人认为是痴呆的混乱不堪的政策所代替的时候，人们都在热切的期盼中呼唤着吉米·贝克这个名字，希望他能再次来为里根保驾护航。如果贝克还是白宫主管的话，对里根总统造成极大伤害的伊朗门事件的那种毒素，是绝对不可能从白宫向外喷射散发的。

可以说，里根的第一个任期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战绩，不仅是因为他雇用了吉米·贝克，还因为他把这个过去的对手放在了一个如果里根自己在总统的位置上干得不好，那么他也干不好的位置上。白宫主管这个位子，与总统的联系是内部性的，笼罩在总统的光环之下，所

以，贝克一切的成功都只能通过里根取得的成就来衡量。如果贝克开始时是在外面负责一个部门或机构，他就有机会建立自己独立的地盘，从而获得属于他本人的名声和支持者。由于被笼罩在总统的光辉里，新闻媒体是很难直接评价他的。只有当里根总统自己提出的议事日程遭到失败以后，媒体才会在首要位置将他描述为“里根政府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白宫行政主管，贝克的作用在里根政府内是举足轻重的。但是贝克的成就只能加强他的老板头上的光环。他别无选择，只能使里根成为一个胜利的改革者，他自己当幕后英雄。

把自己多年的对手安排进新政府，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是从里根时代才开始的。在1940年的总统大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温德尔·威尔基，但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总统就任命威尔基出任美国驻英国特使。罗斯福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因为在大选过程中，威尔基曾攻击罗斯福说他过分地靠近和援助了英国，所以他被特意派去重申民主共和两党对罗斯福的政策的支持。10年后，哈里·杜鲁门则任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共和党人）监督一次对联邦机构的彻底检查。通过利用胡佛那敏锐的管理和领导能力，这位民主党总统也给自己领导的政府赢得了急需的公众信任，因为当时对他的政府“浪费和腐败”的批评已经越来越激烈。

然而，真正开创这种和自己的敌人共事的传统的，却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他是在一种远为艰难、远为迫切的情形下进行这种合作的。这个伟人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几乎是难以想象的。1861年，对林肯生命的威胁是如此猖狂和变本加厉，以至于他和家人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入首都华盛顿。军事对抗的局势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令人担忧。当林肯到达华盛顿的时候，他□望波托马克河对岸（美国东部重要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看到南方联盟的旗帜已高高飘扬在亚历山大要塞上空了。

即使在那些忠于联邦政府的州，危机也越来越深重。作为第一位领导着一个由相互冲突的两种力量（那些极力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激进分子和那些仍然留在联邦中的旧辉格党人）组成的嶄新政党的共和党总统，他必须首先解决党内的派系纷争，将全党团结起来，然后才能

维护整个国家的统一。

这位刚当选的总统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并没有只在自己的坚定追随者中挑选内阁成员，他决定还要把自己的敌人拉上船来同舟共济。他把以狂热激进著称的萨尔蒙·P·蔡斯和因小心谨慎而出名的威廉·H·苏厄德都选进了政府，在他的那些天差地别的内阁成员中，可以说只有两点是共同的：每一个成员都憎恨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比林肯更适合于当总统。

“他们会把你给吃了的，”有人这样警告林肯。“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同样想干掉其他的人，”林肯用一种政治老手惯用的幽默口吻回答道。以林肯的精明和顽强，他有能力将强有力的人物招到自己的麾下，给他们安排合适的位置并置于自己双眼的监督之下。但是，只有当苏厄德和蔡斯都向林肯提出辞职，而林肯说服了他们留下来、将他们的辞职信都搁置在他的保险柜中的时候，林肯才确信自己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在我的每一个衣服口袋中都藏着一个香甜无比的西瓜”，林肯这么说道。

在卡特总统领导的政府里，我曾清楚地看到，确保那些新政府成员的期望牢固地与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成功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和招募干将组建新政府本身是一样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缺乏这一前提的话，作为政府这艘巨轮的船长的总统，就会发觉巨轮的甲板上有一尊不听指挥的大炮。

当吉米·卡特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联邦政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以下简称 **HEW 部**）一个部的预算，就远远超出了美国50个州所有这类部门的预算的总和，也超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同部门的预算，只有苏联除外。卡特任命约瑟夫·A·卡利法诺担任HEW部部长，卡利法诺在接受这一任命的同时，也接受了一个更具有个人色彩的任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为HEW部部长，我面临的无穷挑战是促进社会公正，不仅要面对人民、国会两院议员、HEW部的公务员们进行说服、教育、哄诱以及请求谅解，还得经常替被国内外的指责和各种要求弄得焦头

烂额的总统及其政府解围，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卡利法诺知道，卡特总统之所以提名他出任HEW部长，是因为希望他将这一新职位当做为改革运动提出不受限制的独立倡议的舞台。卡特希望卡利法诺领导的部门能够成为自由的民主党政府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靠反对现行的官僚习气和体制而取胜的。现在，到了自己与别人分享权力和职务的时候了。在卡特的助手乔迪·鲍威尔看来，这个新当选的总统也需要能够清楚地“了解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并知道该如何玩下去”的人选。卡特有他自己的改革议程（福利、健康保险的改革），他需要有人将所有的球都轰轰烈烈地踢起来，但又不要把他本人淘汰出局。

就这一点上来说，任命一个像卡利法诺那样在华盛顿久经考验的斗士担任HEW部部长，似乎是完全有道理的。卡利法诺自从在林登·约翰逊手下风风火火地担任白宫主管以来，他在华盛顿就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华盛顿邮报》的法律顾问，他是那种典型的熟知各种内幕的人，他的朋友遍布华盛顿的那些很有权势和影响的组织中：国会、重要的律师事务所、新闻媒体，以及那些很久以前就把华盛顿当做自己永远的家和权力基地的前民主党政府的高级官员。

很明显，新当选的卡特总统为了赢得这些支持者的好感，便决定从他们中间找一个人来负责实施这些宏大的社会改革计划，正是在这些支持者特别是卡利法诺的协助下，那些计划才得以制订出来。但是，卡特从来没有想过需要什么政治策略来驾驭这种新的关系，如何控制他刚招到自己麾下的这个硬式棒球手。

在挑选卡利法诺的时候，卡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主张政府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强硬派。尽管卡利法诺和卡特总统有共同的决心要使HEW部的运作变得更加有效率，但卡利法诺还怀有一种与卡特不同的热情，那就是他认为这些计划必须完全服务于它们当初的目标。在他看来，在加强公民权利、改进卫生和教育等事情上，不能存在与任何理想妥协的余地，而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了，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将使新政府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例如，在北卡罗莱那州，卡利法诺大张旗鼓、情绪高昂地推动司法部门判决该州所偏爱的大学制度构成了种族歧视。而与此同时，该州那些种植烟草的农场主们也感受到了他发起的禁烟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两项措施面临着重重阻力，但并非没有理由。一个联邦法官威胁卡利法诺说，如果他在北卡罗莱那州大学问题上退却的话，将以藐视法庭罪拘捕他。美国每年有30万人因吸烟而死于肺病和其他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卡利法诺因此也变成了一个狂热地鼓吹禁烟的人。

如果失去了北卡罗莱那州或者肯塔基州，卡特竞选连任的希望将变得极其渺茫，而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对卡利法诺已经恨之入骨，叫嚷着应该撤他的职了。面对这种情况，卡特总统和他的白宫助手们有点坐不住了，但卡利法诺还在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进着自己的改革计划。白宫的气氛已经因卡利法诺的改革运动而异常紧张，不过卡特总统还没有明确要求卡利法诺放弃他的禁烟“圣战”。《纽约时报》对卡利法诺越是赞不绝口，在褊狭的北卡罗莱那和肯塔基，媒体对卡特政府也就越来越恼怒。

当卡特从卡利法诺推行的这场高调的运动中清醒过来，绝望地告诉北卡罗莱那的听众们说他的愿望只是“想使吸烟变得比现在更安全一点”时，总统与他所任命的这位官员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变得遥远和荒谬了。

当卡特向人们许诺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冲突又出现了第二个战场。卡利法诺在任职的第一年中，一直在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独立的教育部，认为新的独立的教育部将会屈服于教师联合会的政治压力，而不适合于推进广泛的教育目标。虽然卡特愿意就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考虑和磋商，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倾向于兑现他和全美教育协会都认为纯粹是个人意向的承诺。当卡特在1978年度国情咨文中正式向国会提出成立独立的教育部的时候，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卡特正在履行一个连他自己的部长都公开认为是一个糟糕的主意的承诺。人们应该感谢卡利法诺，因为是他使他们弄

明白了卡特的计划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危险。

在一个信誓旦旦宣称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内阁中，怎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内讧和混乱呢？首先，任命卡利法诺的前提条件就有问题。起初，也就是在任命前的谈话中，当选总统卡特说过：“我将兑现我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建立内阁制政府，内阁成员拥有真正的权力。”这种话意味着他的内阁部长们可以挑选他们自己的人马，按自己的意愿管理各自的部门。以卡利法诺和他的HEW部为例，他坚持向卡特要求，无论自己在HEW部想任命谁，都要有绝对的权力，而可以不理睬白宫方面的任何建议和看法。

正如乔迪·鲍威尔后来所说，这或许就是致命的错误所在。“我的印象是他总是向前推进，再推进，直到他遇到反抗为止。”鲍威尔这样评价卡利法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利法诺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卡特那帮人越来越难于抵挡他。“想要制止他的这种独断专行越来越困难了，”鲍威尔回忆道，“这不仅是因为卡特总统的软弱和姑息养奸，也因为要收回那些被卡利法诺认为已经归他所有的权力是很困难的。”这就是白宫当时的尴尬处境。对于这位卡利法诺部长，卡特总统一开始就没有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来约束和管教他，而是听之任之。

卡特的错误就在于他提出了任何内阁部长都应该，或者能够，独立于任命他们的总统——也就是他自己，而自负其责。内阁成员应该与同样是由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们不同，他们必须服从于总统的意志。公众不仅知道而且在心中也认为，美国政府奉行的是总统负责制。无论政府制定出的计划或者政策是什么，最后有拍板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们选举出来的总统。

然而，卡利法诺却不这样看。“每一个内阁成员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让他与总统之间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卡利法诺后来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这种距离能使总统“回避”一些敏感的问题，从而不受伤害。然而，就卡利法诺的禁烟运动和抵制成立独立的教育部这两件事而言，他的行为和总统的近期政治抱负——卡特想竞

选连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卡利法诺完全误解了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他应该服从于总统的意志，而不应该自行其是。最终的结果是，卡特总统1979年要求他的HEW部长辞职。

像卡利法诺这样的内阁部长被解职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我们很难想象林登·约翰逊或者罗纳德·里根会纵容自己的下属公开执行偏离总统政治议程的政策。当连任竞选在即的时候，对于约翰逊和里根来说，也很难想象他们会不告诫自己的阁员千万要小心一些，否则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从所占据的高位上一脚踹下去，尽管此前他们可能冠冕堂皇地说过阁僚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管理所属的部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林登·约翰逊任总统的时候，如果有人敢与总统打硬球的话，总统的白宫主管——在约翰逊时期也就是乔·卡利法诺本人，一定会向他的老板建议教教那个家伙该如何玩这种游戏：那就是立即将他解职。

吉米·卡特无视“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这条古老的法则，并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像大多数人一样，卡特倾向于疏远自己的那些潜在的敌人，而毫无疑问的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惨痛的。在通往椭圆形办公室的道路中，卡特虽然巧妙地将民主党内那些有权势者淘汰出局，却发现那些已经被淘汰出局的人依然自命不凡地站在边线上，挖他的墙角迎接他的垮台。他发现自己的政府不但毁于那些卷土重来的右派力量，同时也被那些曾经一贯支持民主党总统的力量给抛弃了。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透彻一些，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了。里根把吉米·贝克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贝克的利益必须和整个政府的利益一致，说确切点，就是必须和里根总统的利益一致。而卡特却给了卡利法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自主权。他不但没有给这样一个久经沙场、以固执著称以及还与官僚系统有很深渊源的阁僚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反倒给了卡利法诺绝对的自由和权限，这毫无疑问助长了卡利法诺独断专行的作风，也使得到了最后，除了卡特总统本人的直接命令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了。

当然，造成卡特这样放任自流的原因也不能全怪他，历史也负有部分的责任。为了避免在白宫再产生一个尼克松时代的“宫廷卫士”，卡特事先就已经声明自己不需要幕僚来指导内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剥夺了自己对下属各行政部门的工作进行日常管理的权力，而那些行政部门本来就相对独立松散、缺乏总统本人的亲自检查和指挥。由于形势的发展经常使总统很难亲自介入下属部门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就会产生巨大的权力真空。

例如，在1978年2月的时候，当时负责与各行政部门联系的白宫助理杰克·沃森曾经打电话给卡利法诺，告诉他总统在北卡罗莱那州所面临的政治危险。杰克·沃森告诫说，卡利法诺倡导的禁烟运动以及反对北卡州大学制度的举措，将可能导致卡特在下次大选中败北，并且告诉他说卡特总统本人想和他就这个问题谈谈。

几天以后的三月初，副总统蒙代尔邀请卡利法诺共进午餐。但是在午餐桌上，就在蒙代尔刚提出禁烟运动这个话题的时候，卡利法诺打断了他的话。卡利法诺警告蒙代尔说自己不能向他保证这次谈话的内容会得到保密。他告诉蒙代尔说，已经有新闻媒体追问他白宫是否因他所提倡的禁烟运动而和他进行了谈话或者施加了压力，而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只能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至于以后可不能担保。蒙代尔听了这番话，不得不打消自己先前的试图劝他停止那场运动的念头。

就这样，卡特总统被自己的内阁部长们给架空了，他似乎成了一个已经无权力的总统了。他的一个内阁部长告诫他说他就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说禁烟——所发表的任何评论，都有可能被用来反对他自己。卡特发现，如果自己呼吁卡利法诺放弃他的禁烟运动的话，他肯定会遭到媒体的公开羞辱和耻笑的，他因此不得不忍耐着。而与此同时，卡利法诺也猜到了卡特的难处，因此他就把卡特的沉默看做是对自己推行的改革运动的认可；只要卡特本人没有直接给他发一道命令，他就可以照着自己所定的日程自行其是。

当吉米·卡特1976年底赢得大选开始组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深

思过如何对付像卡利法诺这样的硬球手。他当时想的只是要尽力避免第二次“水门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尼克松时代白宫权力高度集中的那种专横、可怕的事情——那时候的白宫主管是绰号叫“鲍勃”的H·R·霍尔德曼，他在白宫拥有一种危险的权威——吉米·卡特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管理政府的首要原则似乎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

当吉米·卡特起用卡利法诺的时候，他遵循的是林登·约翰逊在任命埃德加·胡佛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候援用过的至理名言：“宁愿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帐篷内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边往帐篷里头撒尿。”

但是，这位佐治亚州人却忽略了那个伟大的得克萨斯人所援用的名言中一个不可分离的必然推论：“紧紧地拥抱你的朋友，但是你必须更紧地拥抱你的敌人，抱得他们足够紧，使得他们连移动一下都不可能。”

这一训诫不仅适用于政治，在所有的领域都是金科玉律。不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你想雇用最棒的人，请你务必要留意你的那些最强有力的敌人和对手。请你务必记住：才智就是才智，它不分敌友，无论你们今天的竞争是多么残酷激烈，但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也许有一天你会需要你的敌人的帮助的。实际上，如果你不能和你的对手顺便在别的什么地方做点交易的话，这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呢。此外，雇用你的对手还能显示你的胆量和魄力。它不仅能够增强你的名望和决断力，而且往往还能削弱你的对手的势力。

当然，我们的本能冲动会使我们竭力回避那些和自己作对的人。毕竟，生活是短暂的，谁又愿意天天看着一张自己所憎恶的面孔呢？对于那些其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让自己过得尽可能地快乐、尽可能地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样的一种回避敌人的态度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然而，这种态度只是逃避权力而不是争取权力的灵丹妙药。

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和他的竞争对手坐到一起讨论事情，那么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因为他白白扔掉了一些黄金般的机会，

不仅丢掉了能帮自己扩大财富的宝贵财源，也因此错失了非常有用的人际交往。在你的对手的公司里感到不自在，这并不会大大伤害你的体面，如果你连谈判桌旁边都不去，你就很难进行交易了。

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是绝不会拒绝通向对手的道路的。他们不但不会回避自己的敌人，高傲地宣称“我是不会搭理那些家伙的！”，相反，他们会重用他们，这样才能密切注视他们的企图，揣摩他们的感情并在心理上震慑住他们。特德·索伦森就见过约翰·肯尼迪是如何用这一招对付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政治评论家的。“当有人想攻击他的时候，肯尼迪总是让他的对手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他的意图了。”

当然，约翰·肯尼迪没有必要把这一套教给蒂普·奥尼尔，因为后者同样精于此道。

在1984年的时候，我曾亲眼目睹这条令人震撼的“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的策略，是如何展示其威力的，那精彩的一幕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幕就发生在当时的众议长的办公室里，在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开始的时候。那天，就像往常一样，众议长奥尼尔坐在自己那巨大的旋转椅子上，和其他的民主党领导人在等待着那些采访国会的新闻记者们蜂拥地挤进门来。

当时，民主党正陷在一场特殊的混乱中。得到众议长全力信任和支持的沃尔特·蒙代尔代表民主党参与总统角逐，想将现任总统里根从宝座上拉下来，结果却被打得落花流水、惨败而归。这样一来，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席位似乎将岌岌可危了。因此，一些议员开始试探性地发出了微弱的呼声，要求更换民主党国会领导人。

这些潜在的、可能成为奥尼尔的挑战者中的一位，现在就坐在离奥尼尔很近的地方。就在我们听大批的新闻记者正在朝着众议长的办公室门口涌来的时候，奥尼尔突然站了起来，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朝着那个企图挑战自己地位的人质问道：“你想取代我吗？”

这句话就像一记重拳突然击在太阳穴上，那个蠢蠢欲动的挑战者一下就晕了。“不，”他语无伦次、喃喃而语道，“不，我没有这个打

算。”

就这样，在那些记者涌进来以前，一切都已经搞定了。

第六章 不要疯狂，不要扯平，而要向前推进

我的高尔夫球杆总是扔向我前进的方向。

——罗纳德·里根

1994年4月的一天，我站在南非开普敦一块宽敞开阔的空地上，看到成千上万的选民秩序井然地排成一条长龙，那长长的队伍一直从地平线的这一端延伸到目不可及的那一端。选民们一大早就赶到了这儿，在没有食品和饮料的情况下要苦苦等候几个小时，目的只是为了在南非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种族都参与的全民选举中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

这一激动人心的民主尝试是选民们即将选举出来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终身追求的事业和信仰的明证。在监狱里煎熬了漫长的27年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对建立一个消灭种族歧视的南非共和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的斗争技巧和政治手法也更为娴熟巧妙、出类拔萃。为了这一他曾做出罕见牺牲的目标的最终实现，他拒绝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

“我们的人民在过去的凄惨境遇，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他在大选前夜对公众慷慨陈词，“但是，现在，我们历尽千难万阻、苦苦追求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让我们忘掉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让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位南非的新任领袖不仅拒绝报复这个国家以前的统治者，相反，他承诺要致力于实现所有种族之间的和解与团结。他邀请他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结下友谊的白人看守出席自己的就职典礼，用人类灿烂的笑容来为自己的承诺作见证。

尽管政坛以无休无止的权谋诡诈而闻名于世，但明智的政治家都懂得与对手合作、同化任用自己的敌人。当这一计策在实践中行不通时，他们同样会像结交同盟时那样冷静、坚定地向前推进，集中精力加强自己的力量来击败对手，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似的盲目发起攻击。他们不做“高高在上”、无援无助的孤家寡人，相反，他们懂得要更进一步深挖战壕，要更广泛地结交同盟。他们不是想方设法地要削弱敌人，而是千方百计地壮大自身的力量。那些最专注于达到自身目标的人必然会获得一种珍贵的副产品——有更大的能量去伸张公平正义。像罗纳德里根这个罕见的高尔夫球手一样，他们的眼睛专注地盯着球，全神贯注地瞄准自己的目标。当被激怒时，他们把手中的高尔夫球杆扔向自己前进的方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通往球洞的路上再把它找回来。

下面我们将看到，扯平要比疯狂好，而向前推进要比扯平更好。

弗朗西斯·帕特里克·苏利文在他的朋友中，堪称是这方面的一个传奇人物。就跟埃德加·艾伦·坡（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恐怖小说《莉盖亚》，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等）的《白葡萄酒之盔》中那个被逼上梁山的主人公一样，他一直忍受着别人对自己的伤害，但是，当他的对手转而凌辱他的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发誓要报仇雪恨。

在许多年中，苏利文一直雄心勃勃地渴望在国会山谋得一个显赫的工作。他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为此而选择的途径。他认为如果能够在国会山周边多如牛毛的小酒馆和夜总会里遇到前来消遣的国会议员的话，他肯定能够凭借自己精彩动听的言辞和含蓄巧妙的恭维赢得他们的欢心。

在他的这一策略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职业政治家通常都公私分明，不喜欢把自己的私生活和公事搅在一起。他们不会和自己的下属一起去喝酒狂欢。同样，他们不会雇用某个自己头天晚上在烟雾缭绕、弥漫着杜松子酒香气的酒馆里结识的人。一个尊贵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山附近某个破旧凌乱的低档酒馆和苏利文共饮了几杯啤酒之后，

是不会痛快地接纳他这个往日曾经刺眼的外场棒球手的。况且，苏利文还存在另一大障碍，他有满腔的怨恨，仅仅是酒过两杯之后，他的抱怨和委屈就一股脑儿涌到了嘴边。

时间回溯到1974年，当时他在国会山一展头角的绝佳良机终于来了。他在紧邻华盛顿市的波托马克河边负责一项旨在进军众议院的竞选活动，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到正式的选举日之前，他总共筹集了8万美金的竞选资金，并招募了2000名左右的志愿者。他对这些新招募的志愿者所发出的战斗宣言既有乐观昂扬的色彩，又颇有百折不挠的气势。“要敢于去赢，敢于成功，敢于伟大，”他慷慨激昂地在台上说，“让我们为赫比的成功而努力。”（赫比是苏利文的老板赫柏特的昵称）

现在，即便是苏利文也低声地承认“赫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让我们面对事实，迷惑苏利文的并不是“赫比”堂堂的仪表，而是他看似远大的前程。毫无疑问，苏利文认为自己这次是和一个大赢家在一起。

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至少从选举角度看，赫比也确实是一个赢家。水门事件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个原本是共和党人的席位。但是，在选举结果揭晓的第二天早晨，他就上演了一场过河拆桥的好戏。帕特里克·苏利文被冷酷无情地告知，他并不适合到国会议员办公室工作。那个功成名就的候选人，那个被苏利文看成是自己的庇护者的忘恩负义者，冷冷地说他不得不帮助苏利文“另谋高就”。

这一消息对苏利文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遭到一个他开始并不怎么尊敬的人的抛弃和背叛，这一打击令他很长时间都回不过劲来。几乎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他日日饮酒买醉，在酒精中麻醉自己，向任何一个自己遇到的人倾箱倒筐地敞开心扉，痛心疾首地控诉赫比的阴谋诡计。随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流逝，他心中的愤懑和忧伤简直达到了一种荒谬可笑的地步，他给那位踌躇满志的新任议员寄去了一张圣诞贺卡，上面写着他“正在享受失业以来的第三个月份。”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利文就像你们所遇到的许多失意落魄的政坛败将一样，一味沉溺于往日的创伤而无法自拔。而且，比起一般的郁郁不得志者来说，苏利文的表现要更是变本加厉。每逢赫比想要募集资金时，他的这位前竞选主管总是千方百计地从中作梗，从而使他的打算泡汤落空。他甚至变换了自己所属的党派。尽管竞选活动和候选人如同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没有定数，但他出现在共和党阵营里则是确定无疑的。

最终，经过了6年的痛苦徘徊之后，苏利文看到了他的机会。有一天，他在阅读一份当地的周报的时候，偶然在报纸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位正在与赫比竞争议员席位的候选人发布的招募助手的广告。帕特里克·苏利文见到这个广告欣喜若狂，他认为自己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凄凄惨惨的政治冬天即将过去，出头的机会终于就要来临了。

那个候选人提出的竞选纲领是要使关于大麻种植的法律更加宽松。对此，苏利文依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向她提供了自己的建议和忠告。对于这场竞选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抓住这样一个问题，而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对于苏利文投靠的这个候选人来说，她的竞选纲领能打动的主要是一些居住在当地那些高耸入云的公寓里的年轻人以及独身者。

那场竞选发生在1980年，那也是一个有不少重大问题笼罩着整个国家的年代，但是苏利文知道自己协助的这个候选人所在选区的选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麼。在那个选区里，如果你以一个鲜明的反主流派的形象出现，成千上万一贯支持思想开放的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就会临阵倒戈，转而把选票投给你。

如果没有苏利文的鼎力相助的话，这个“大麻候选人”是绝对不可能脱颖而出、掀起任何波浪的，因为她对政治一窍不通。当苏利文找到她去自荐的时候，那个女候选人还在为收集她的选区以外的选民的签名支持而奔忙。

正是苏利文的新近加盟，使她梦寐以求的候选人资格成为现实。她终于成功地使自己的名字写到了选票上，并且得到了6,000张选

票，虽然这个数字不足以使她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但却刚好足以毁掉那个已在劫难逃的赫比，因为赫比以94票之差输给了另一个候选人。但是，要想将赫比真正置之死地的话，苏利文还需要在他的政治棺材盖上再牢牢地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当下一次国会大选临近，赫比想东山再起的时候，苏利文又出场了，要借此机会给他致命的一击，让他永远都不得翻身。

对于一个民主党候选人来说，这一年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选举年，因为美国经济正在陷入衰退中。人们猛烈地攻击里根总统，因为他削减了社会福利。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的选民们都有不满情绪，最后的选举结果就体现了他们这种不满心态，民主党夺得了改选的国会席位中的26席。但是，对赫比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在过去曾属于他的选区胜出。他的死敌苏利文再次成功地扮演了掠夺者的角色，从赫比的手中夺走了大量年轻的自由派分子的选票，而民主党人本来以为那些人的票是非他们莫属的。

苏利文这一次紧跟时代的潮流，找到了一个反对核试验的活跃分子，这个家伙同时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球环保主义者、一个极力反对捕鲸的世界主义者。但是苏利文这次辅佐的新的马前卒并没有取得以前那个“大麻候选人”那样的战绩，他只得到了3,000张选票，不过，他成功地使赫比损失了500张选票。泥土纷纷洒落在赫比政治棺材的盖子上。

到了最后关头，这个越来越绝望的、曾经抛弃了苏利文的忘恩负义者，还拼命地试图做困兽之斗。在选举的前夜，赫比已经变得快歇斯底里了。在离投票还差几个小时的时候，有人邀请赫比参加由一个非常重要的市民团体资助的辩论会。令他感到心惊胆战的是，当他到会会场时发觉是一场三方辩论会：他本人，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八年前在苏利文的帮助下，他曾经击败过这个家伙），以及苏利文现在帮助的那个反核主义者。

“先生，我想知道帕特里克·苏利文现在是否在为你工作，”赫比失控地尖叫了起来，“如果他在为你工作的话，你就要倒霉了！”

但是，苏利文的目标就快实现了——在政界彻底铲除这个背叛自己的家伙。在1982年国会选举揭晓之夜，当这个国家的其他民主党人都在为胜利而弹冠相庆的时候，苏利文给那个已经被彻底击垮了的赫比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前议员先生……”

帕特里克·苏利文的复仇故事是令人无比痛惜的。虽然他最终斩杀了无情背叛自己的那只大白眼狼，在欢呼雀跃中举起了酒杯，但苏利文本人最清楚整个事件对他自己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创伤。“八年来，赫比的身影一直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的神经，现在，是他该为在我的脑子里免费住了八年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苏利文后来这样说。

苏利文的故事表明，人们为自己遭受的痛苦和屈辱所激发的复仇力量，会可悲地与那些抢劫银行的非凡犯罪天才相媲美——他们的抢劫计划在创意和灵感方面，往往要远远超过那些银行家建造自己银行的方案。

如果你在国会议员衣帽间里问任何一个议员，他怎样看待这一古老的做法——“不要疯狂，但要扯平”（这句话可以追溯到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艾弗雷特·M·德克森），你会听到大家都深有体会的回答，“太不值得了”、“代价太昂贵了”、“浪费时间”、“真他妈耗不起”等等。就如马里兰州前州长马文·曼德尔所说的那样，“不要浪费你的生命盯着汽车上的反光镜。”

伊利诺伊州的唐·罗斯腾克斯基后来角逐过显赫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一职，他有一次曾被一个记忆力惊人的“小人”所算计。事情起因于1968年，那时罗斯基（罗斯腾克斯基的昵称）眼看就要当上众议长了。罗斯基当时才40岁，但在国会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资历，在他所代表的芝加哥北部地区，无人能对他的席位构成挑战。这是一种显赫的政治资本，人们戏称他为“前途不可限量的小男孩之一”，认为他属于那种似乎注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众议员。

1968年的夏天，当民主党人汇集在芝加哥举行那次臭名昭著的全国大会的时候，罗斯腾克斯基那条通往众议长宝座的快车道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当时越南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成了所有美国人关注的焦点。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场的外边，在格兰特公园和芝加哥城的所有大街上，无数学生正在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芝加哥的警察动用了警棍、高压水龙头以及催泪瓦斯，来驱散会场外的学生。

而在举行大会的宽敞明亮的大厅内，该市的市长理查德·J·戴利，也是这次大会的“老板”，却想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他以为，他负责的是政治，而不是外交政策。他关心的是这次大会的议程是否能很好地反映芝加哥的利益。

戴利市长从来没有想到过电视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尽管有警察的层层保护，这座大厅还是不可能与外面正在进行的暴力完全隔离开，大会代表们从电视上了解了外面的一切。于是，他们开始指责戴利市长和他所采取的那些对待游行学生的粗暴手段。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亚伯拉罕·A·里比科夫站到了大会的主席台上，义愤填膺地谴责“芝加哥大街上的盖世太保暴行。”

就在里比科夫参议员声色俱厉地谴责那些法西斯暴行的时候，台下的戴利市长和那些支持他的人开始大声地吼叫起来。现在，外面进一步升级的骚乱发出的种种尖叫声、哭喊声、警笛声、喇叭声已经穿透了大厅的玻璃窗传到了大厅里边，就像催泪瓦斯穿透你蒙在自己鼻子前的潮湿的手巾而进入你的鼻孔那样。戴利大声地叫喊着想把里比科夫参议员从主席台轰下来，同时挥舞着自己的一只手，做了一个切割脖子的手势，从电视转播的戴利的嘴唇动作来分析可以看出，他是嘟囔着骂出了一些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脏话：“去你妈的，你这个犹太婊子养的！你这个下贱的不要脸的东西！你去死吧！”

眼前上演的这丑陋的一幕不仅仅激怒了西斯佐纳，林登·约翰逊总统也从电视上看到了大会场上的这一幕丑剧，他怒气冲冲地从白宫打来了电话。很明显的是，这次大会的懦弱的主席——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并不是一个有能力恢复已经乱成一

锅粥的会场秩序的人。因此，即将下台的“跛脚鸭总统”林登·约翰逊要求由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来控制住失控的会场秩序。

罗斯基清楚地记得艾伯特接到总统电话时的情景。“他尴尬地把头转向我，好像叫我接电话。”是总统在让罗斯基采取措施恢复会场秩序。于是，罗斯基对艾伯特说了一些客套话以后，就坐到大会主席的位置上开始主持会议了。但罗斯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另一个他更向往的位置。

三年以后，卡尔·艾伯特当选为众议长并对罗斯基展开了报复。当新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推荐罗斯腾克斯基出任本党的督导员，也就是民主党在国会的第三号人物时，艾伯特议长冷淡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尽管已轮到罗斯腾克斯基接替这个位置了。最后，艾伯特议长推荐了奥尼尔出任督导员。

但是，艾伯特并没有就此罢手。几天以后，罗斯腾克斯基在竞选连任众议院民主党核心领导小组的主席一职的时候，居然被比他晚进众议院、比他资历更浅的、被人称为“老虎”的得克萨斯州议员奥林·迪格击败了。原因很简单，迪格得到了艾伯特议长的全力支持。

就这样，唐·罗斯腾克斯基失去了他在众议院的领导阶梯上的位置。几年以后，当回顾1968年度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那令人难忘的一幕时，罗斯腾克斯基的一位朋友不无惋惜地抱怨说，“如果罗斯基当时能够闭上他的嘴的话，他现在肯定已经是众议长了。”

在运用“向前推进”这一游戏法则方面，有的人要高明巧妙、卓有成效得多。在下面我即将讲述的一个故事中，你可以看到一个高明的政治棒球手，是如何把别人的怠慢与刁难经过老练的处理，从而转变成脱颖而出、大展宏图的动力的。

1948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州长竞选中，民主党的候选人切斯特·鲍尔斯，就像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杜鲁门那样，上演了一出反败为胜的好戏。在这场精彩的好戏中，没有人能比民主党康涅狄格州主席约翰·贝利更兴奋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鲍尔斯遵循的都是贝利为他

制定的竞选战略，最后，当鲍尔斯赢得选举的时候，精疲力竭的贝利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就是我整整两年为之辛劳奋斗的东西。”

但屈辱紧跟着胜利而来。第二年，康涅狄格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辞职了，从而给该州留下了一个空缺席位。贝利明确地表示希望任命自己填补这个空缺，他的全部要求只是在1950年选举之前暂时占住那个席位。等到挑选正式的竞选候选人的时刻来临的时候，贝利将会很高兴地拱手让人的，因为他所追求的只是暂时填补这个空缺所带来的荣誉，而不是真正想从事这个职业。我们可以理解，贝利多么希望鲍尔斯州长对自己的付出有所回报。然而，鲍尔斯却选择了威廉·本顿填补这个空缺，这个家伙在同鲍尔斯合伙做广告生意的时候发了大财，并且他的家族渊源能够追溯到“五月花号”（“五月花号”是1620年英国一批清教徒到美洲时所乘的船，那批清教徒是英国在北美的最早的殖民者），但这个家伙却从来没有为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组织做过任何事。

贝利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他虽然对州长的无情回绝和过河拆桥感到愤愤不平，但他却将自己的失望和愤怒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让人看出来。数年以后，贝利这样对人说道：“我猜想他是担心密歇根州和华盛顿的人会指责和嘲笑他提名一个二流的政客出任美国参议员。”其他人认为贝利有权否决鲍尔斯对本顿的提名，但是，他不愿伤害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党组织。贝利反而做工作维护党内的团结与安定，平息了民主党骨干分子对鲍尔斯提名本顿的反对意见。当新上任的本顿参议员访问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首府）的时候，贝利还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并住在自己的家中。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也一如既往地这样主动息事宁人。最后，贝利家族和本顿家族成了好朋友。

1954年，又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推选州长候选人的时候了。曾担任了4年州长、在1950年谋求连任时遭到惨败的鲍尔斯，这次又积极努力想东山再起。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主席贝利开始到全州巡视，要求民主党的官员们把他们倾向的候选人写在选票上，然后把选票扔进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黑盒子里。贝利也写下了他的选择——

阿贝·里比科夫（即上文提到的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多年以后，每当人们问起那次党内选举的情况时，贝利总是简单地回答说：“喔，阿贝赢得了大量的选票！”里比科夫随后开始了一段辉煌灿烂的政治生涯。他在州长的任上干得棒极了，后来又进入总统的内阁当部长，接着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如果说他在自己的清教徒血统中可能有什么欠缺的话，他却得到了一个爱尔兰裔人的真诚友谊，而这已足以弥补他的先天不足。

四年以后，鲍尔斯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竞选中，这次是竞选参议员，还是惨遭败绩，这次击败他的人是托马斯·J·多德，后者的竞选活动由于贝利刚刚结交的新盟友——爱丽·格拉索夫人在党内提名大会上的倒戈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位未来的州长——爱丽·格拉索夫人，在人们的眼里本来是应当和鲍尔斯站在同一条阵线的。但是，她公开声明自己坚决支持多德，她的立场也明白无误地向每个人表明了作为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主席贝利的立场。三年以后，也就是1961年，约翰·贝利随着新当选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到华盛顿走马上任，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当人们问起贝利早期的挫折对他有什么影响的时候，那些最接近贝利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失掉那次出任参议员的机会是他曾经有过的最好的经历了。“如果他在40年代就得到那样高的荣誉的话，他现在可能早就不再努力了，”他的一个亲戚说道，“相反，在受到那次挫折以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

规则：你一定要时时刻刻盯着你的目标。不断地积蓄力量，这样，公正地补偿你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机遇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当然，这需要你花费无数的心血以及也是最重要的——时间。

作为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约翰·贝利并没有心胸狭隘、费尽心机地报复自己的敌人，但是，他在如何与自己的敌人打交道方面却给我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他不但没有被别人的不公正对待所削弱，反而被那种不公正对待所提升和壮大了。他没有苛刻地攻击和谩骂自己的

敌人，只是远远地把他甩在后面并变得越来越比他强大。

对于权力场上的公平正义与睚眦必报之间的界线，约翰·肯尼迪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当他第一次竞选公职的时候，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活页书，里头写满了形形色色的箴言和谚语。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的父亲所说的：“死于嫉妒的人要比死于癌症的人多。”

约翰·肯尼迪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了一种来之不易的智慧。“他也许会奖励自己的敌人，”特德·索伦森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回忆道，“但是他绝不会忘记1948年哪些百货公司的橱窗上不愿张贴他的海报。”

肯尼迪在国会中的继任者，蒂普·奥尼尔，也是精于此道的高手。1980年，一个名叫约翰·勒布蒂耶的富有的社会名流被选进国会，作为纽约长岛大盖茨比地区的代表。他之所以能赢得选举的胜利，有两样东西是功不可没的：当地的共和党竞选组织的鼎力相助和一大笔数目惊人的竞选基金。有了这些做后盾，勒布蒂耶似乎应该能够稳坐这个位子并更上一层楼了。

但是，在他任期的早些时候，他犯下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有一次，他在纽约州的一次共和党大会上作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说中把众议院议长托马斯·蒂普·奥尼尔说成是一个“大腹便便、不可一世和无法控制的家伙，就像现在的联邦预算一样。”那天是星期六，通常来说这一天的消息总是传播得很慢的。但是，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们还是捕捉到了这一条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鲍勃·谢弗甚至在CBS的新闻栏目中宣读了这一演讲。

这条消息传播开以后，许多人对勒布蒂耶这种公然侮辱议长、议长办公室以及由议长所主持的众议院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可是，众议长本人对此却没有多说什么。当有人问起他对这个如此恶毒地公开讥讽他的人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的话是那么冷静而不露形迹：“我本来是对他一无所知的。”

在这一事件发生两年后，民主党议员举行了一次讨论筹集竞选资金的会议来“加热”蒂普·奥尼尔。在会上发表讲话的人之一是罗伯特·J·

姆拉泽克众议员，他在最近刚刚结束的选举中击败了勒布蒂耶。“有一段时间，我真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弄那么一大笔钱来进行一次声势不凡的竞选，”他说道，“可是，离选举日只有三周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笔大笔的钱就开始朝我们涌来，从芝加哥，从每一个地方，向我们涌来。”显然，那些捐款者中很多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鲍勃·姆拉泽克。他们本来对他是一无所知的。他们给他捐款只是希望让一张信口雌黄、出言不逊的嘴闭上。

此后不久，一位显然很富有的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就餐。他发现众议长奥尼尔就坐在离他不远处的另一张餐桌旁，于是他让服务员给议长送去了一瓶葡萄酒，几分钟后，自己也走到了众议长的餐桌边。“我只是想向你问好，”他说，“我就是约翰·勒布蒂耶。我想，你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受人欢迎得多。”

在运用或误用自己的愤怒这一学问方面，奥尼尔的继任者却尝到了一个比较苦涩的教训。

1995年底，比尔·克林顿陷入了与国会中的多数党——共和党进行的一场令人厌恶的拔河比赛中。这位民主党总统想要保住他的政党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社会福利“安全网”，但是，新当选的众议长纽特·金里奇却不这么认为。

这场肮脏的拔河比赛最终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政府停工”（由于总统与众议院在新财政年度预算上陷入僵局，政府得不到拨款给雇员发工资，只好暂时停止工作）。联邦政府所有的雇员都被打发回家了。博物馆和其他公益建筑和场所也都被迫关闭了。而最为恼火的是那些已经退休的人，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社会保障金就要泡汤了。现在，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到底该谴责谁，是指责主张削减联邦预算的共和党呢，还是谴责一边声称“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痛苦”一边却挥舞否决权大棒的比尔·克林顿总统？

在一次同记者见面的早餐会上，金里奇议长自己揭开了这场拉锯战的谜底。他说出了他与总统对峙的个人动机。在不久前他们共同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以色列参加遇刺身亡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

拉宾的葬礼时，克林顿总统显得很高傲，不搭理他，并且，更为可气的是，克林顿居然让他这个众议院议长从飞机的后部走下舷梯。

“他们最基本的礼貌到哪里去了？”金里奇对着那些喜欢添油加醋、嘴里正大嚼着腊肉和鸡蛋的记者愤愤不平地抱怨道，“他们难道就这么没有教养吗？”

正是由于金里奇这番话，第二天的报纸上对这次政府被迫关闭的原因就有了一个现成的解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导致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政府关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因为什么财政政策，而是因为一个男人——众议长金里奇，出于自私心理对克林顿的私人报复。

“哭泣的宝贝！”《纽约每日新闻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标题的下面是一幅醒目的讽刺画：金里奇议长裹在尿布中，正在号啕大哭着。“纽特的愤怒：他之所以要关闭政府，是因为克林顿让他坐在了‘空军一号’的后部。”

不要疯狂，不要扯平，而要向前推进！

第七章 对任何飞来之箭，都要一一反击

如果你对某个人找不出什么好听的话来说，那就坐到我的旁边来吧。

——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

1992年，比尔·克林顿在他的总统竞选政策中引入了一项“新型武器”——建立迎战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迎接冲克林顿而来的各种攻击性炸弹，并一一反击。那些攻击性炸弹可能涉及各个方面，其中有的是针对他有逃避越战征兵的记录，有的是针对他曾经吸食大麻，还有的则是针对他桃色事件不断的历史而指控他最近与某位女子有染。

这个迎战委员会里年轻有为的司令官，正是鼎鼎有名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他深知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老老实实在那里，听凭他的政敌们在自己身上找出各种可怕的事情，肆意进行攻击，他是何等脆弱，何等易受伤害。

四年前，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曾经在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的竞选委员会中做助手。当时是1988年，在那个乱糟糟的夏天，他的这个希腊裔美国同胞以美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最质朴的形象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其他各州州长一直都认为他们是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认为他从来都不像其他的共和党人或者民主党人那样喜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相反，他是一个坚定务实的温和派。在对内政策方面，人们一直认为他在财政政策上简直是一个守财奴，也就是波士顿人经常说的那种把钱当做下水道盖子，只有在非要不可的时候才拿去堵窟窿的人。这种在社会开支政策上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正是帮助他1978年成功地击败自己的对手而连任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杜卡基斯作为一个充满干劲的实干家所赢得的巨大名声，为他参加1988年的全国竞选增加了很大的筹码。这一点让乔治·布什的顾问们大为震惊。在后来他面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激烈竞争中，他的名声又帮了他的大忙。每一个星期二，随着他在一场又一场的党内预选投票中击败杰西·杰克逊，这个第二代希腊裔美国人在那些举足轻重的美国选民眼中的形象越来越好。要知道，那一批选民正是在1980年和1984年投票给罗纳德·里根的民主党拥护者，他们大都属于中产阶级。

震惊之余，布什竞选委员会的人立刻剖析杜卡基斯现象，他们研究的仔细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中学的生物课学生解剖一只青蛙。他们先是拉了一批保守的民主党选民，让他们组成一个“核心集团”，聚集在新泽西州的帕拉姆斯镇。然后调查原因，问他们为什么原来是投罗纳德·里根的票的，而现在却转而准备投迈克尔·杜卡基斯的票了。竞选委员会的助手们听到的解释让他们震惊不已。因为那些“里根派民主党人”不但喜欢迈克尔·杜卡基斯，他们甚至认为他比共和党的乔治·布什更加保守。从任何一方面而言，无论是他们所听到的，还是他

们所看到的，这个马萨诸塞州州长在控制毒品向相邻各州传播方面的手段比副总统更加强硬。

尽管选民们的这个裁决令人措手不及，布什的竞选班子还是不懈地进行努力，试图找到一线机会。他们又向这一批新泽西选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对马萨诸塞州的一项特别政策熟悉吗？这项政策允许监狱囚犯有周末休假，连谋杀犯都有休假。你们是否知道，杜卡基斯作为一州之长，曾经拒绝签署一项旨在要求教师带领学生遵守宣誓效忠美国的法案？

帕拉姆斯“核心集团”的选民们脑袋里灌满了有关杜卡基斯过去的甜言蜜语，但他们中有一半的人立刻改变了主意。他们再也不可能支持这个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了，而在几分钟之前他们还把他当做一个脚踏实地的温和派。有一个妇女甚至当场就情不自禁地高喊道：“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当看到这个有关新泽西“核心集团”情况的录像带时，布什一改自己刻板拘谨的形象，瞬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狂热的硬式棒球手，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顷刻之间，他才思泉涌，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将一枚枚滚烫的炸弹扔向对手，极尽所能把对方刻画成一个滑稽的州长，那位州长站在监狱的门口，向所有的囚犯一一道别，并祝他们周末过得愉快。

这个方法非常奏效。布什的助手们利用杜卡基斯的囚犯休假政策和否决效忠法案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杜卡基斯原有的良好形象，使他由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变成了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即便是那些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监狱囚犯休假政策的人也立刻对威利·霍顿这个人耳熟能详，知道他是马萨诸塞州的谋杀犯，曾经利用该州的囚犯周末休假期间实施强奸并杀害了马里兰州的一对夫妇。

布什方面的力量正是借助了囚犯周末休假事件给公众一个印象，使得杜卡基斯显得在对付犯罪方面软弱无力，又通过效忠法案事件将他描绘成一个在国防方面软弱和不可靠的人。布什竞选委员会主席李·阿特沃特和媒体宣传策划人罗杰·艾尔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将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定位为一个“与爱德华·肯尼迪和蒂普·奥尼尔同出一州的人，一个冷若冰霜、开支庞大、税收繁多的自由主义者。”

布什方面的攻击所产生的力量，甚至比他们预料的还更加具有颠覆性。迈克尔·杜卡基斯在人们的眼里不仅仅成了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政治分裂分子。他被描绘成一个在政治主流文化中跟大多数美国人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人。《新闻周刊》在提及杜卡基斯的时候，总是将这位民主党候选人的负面定位称之为“迈克尔·杜卡基斯的非美国化”。1988年总统选举进行的五天前，迈克尔·杜卡基斯在费城郊区一个中学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当时有人要求杜卡基斯说一点政治方面的忠告。提问者是一个年仅九岁的学生，他说在不久将要进行的辩论中自己被指定要扮演杜卡基斯的角色，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候选人，有什么建议吗？

“对别人的攻击立刻反击”，这位绝望的候选人刻薄地反应道。“不要给他们任何一丝成功的机会”。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忠告，它充分说明了几个月前杜卡基斯的策略失败的原因。

1988年6月，一位右翼批评家到处散布谣言，说杜卡基斯正在因为情绪低落接受治疗。杜卡基斯的本能反应是声称医生对病人的情况有拒绝泄露的权利，这样反而让人们觉得他躲躲闪闪，其中似乎有什么隐情。而当共和党人拿囚犯休假事件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不合时宜地将这个过错推到了一个已经在14年前就离任的共和党前任身上去，所找的托词显得苍白无力。在布什方面的人将效忠法案事件弄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杜卡基斯却用法律条文来为自己辩解，他的一个助手称之为“像一年级法律专业学生引用条文一样”。

迈克尔·杜卡基斯完全低估了针对他的这些谴责所带来的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力。直到事后，杜卡基斯竞选委员会的人才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了。杜卡基斯州长最信任的助手约翰·萨索意识到竞选失败的全部原因已超出了策略的范围。几个月以后，约翰承认，他们真正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布什对杜卡基斯的

攻击里面价值观所起的巨大作用。“许多事情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们本身。任何事情都包含了某种信息，它们承载着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信仰、力量、个人的性格，甚至承载了领导艺术的格调。我们的候选人就是在价值观这个问题上遭到了重创。迈克尔·杜卡基斯的父亲在说到对祖国的热爱时总是不禁热泪盈眶，谁会想到他的儿子居然会被认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呢？这简直让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对任何飞来之箭，都要一一反击。在这场硬球比赛中，杜卡基斯为了打破固有规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威利·布朗曾经说过，“在这个疯狂的游戏里，对任何一个谎言如果置之不理的话，24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变成了真理。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威利·布朗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长，现任旧金山市市长。

共和党媒体宣传策划人罗杰·艾尔斯曾经在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两届政府任过职。为了彻底结束杜卡基斯的政治生命，他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电视广告不断播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则商业广告是杜卡基斯录像带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但是把它荒诞化了。广告中的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头戴钢盔，在美国军队的坦克上游行抗议。这不禁让观众想起了史奴比（漫画家舒尔茨创作的小狗形象）装模作样冒充空战英雄红色男爵的情景。

但是艾尔斯的第二个广告就远没有这么幽默滑稽了。它采用了粒面的黑白电影胶片摄制，刻意模仿新闻纪录片形式，画面上是一群囚犯们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穿过一个旋转门。

“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否决了要求强制判决毒品贩卖者的提案”，选民们不断地听到这样严正的指控。“他还否决了执行死刑制度。他执行的‘旋转门’监狱政策使得那些根本不适合假释的谋杀犯也有机会享受到了周末的休假。有268个罪犯因此而逃跑了。还有许多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这些罪犯在逃过程中，有许多又犯了其他的罪，强奸的，抢劫的，许多罪犯仍然不能绳之以法。现在，迈克尔·杜卡基斯还

在说他希望把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的许多做法在全美国都推行。美国可冒不起这个险。”

尽管杜卡基斯的形象已经被描述成一个假慈悲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本人拒绝反击这种做法，也没有为自己辩护。在与布什进行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有人问杜卡基斯，如果有人强奸并且杀害了您的妻子的话，您是否会反过来支持恢复死刑制度呢？这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后就再也没有理会这个话题。在众多的美国听众面前，他又一次加强了自己原有的形象。他是一个温和的精英人物，他所受的教育，使他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去惩罚坏人的。事实上，他的话听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实在是一个好人，一定会给谋杀犯时间，让他们在周末的时候走出监狱去度假的。

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已经注意到了杜卡基斯的对手对他所玩的一切花样，也完全看到了在1988年那个糟糕的夏天和秋天杜卡基斯的人是如何就这么眼睁睁地听之任之的。“在我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还比对方领先17个百分点。紧接着布什的夏季大进攻开始了。布什竞选委员会的人在李·阿特沃特的领导之下，开始了一场有计划的持久攻坚战，他们毫不留情地抨击杜卡基斯州长以前的执政记录，对他展开人身攻击，抨击他的性格缺陷。休假制度啦，宣誓效忠法案问题啦，国旗问题啦，等等，都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到了8月份共和党的党内提名大会时，我们原来领先的百分点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们的候选人已经成为讽刺漫画的一个主角，而整个竞选委员会人员的工作至此也就完全结束了。”在1988年11月8日，布什以54%对46%的成绩完全击败了杜卡基斯，选票比后者整整多出8个百分点。在选择谁作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时，有四分之一的选区改变了主意，改投了布什的票。

四年以后，在斯特凡诺普洛斯又为比尔·克林顿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对于别人的任何指责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后果将会是多么致命。“建立这个迎战委员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击来自共和党方面的攻击”，他后来解释道，“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快地进行回击，甚至在这些攻击的言论播出或者是出版之前，在这些所谓报道

的导语还在记者的脑子里晃动，没有成为文字之前就迅速做出反应。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确保没有任何指责会在我们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就公布于众了。”

克劳德·佩珀出生于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一直在国会中任职到这个世纪末。这位美国国会中最老的议员也有不少的故事可讲。但不幸的是，他最令人惊讶的故事却是一个他以难忘的方式获得的教训。他是同杜卡基斯有着同样遭遇的政治家，同样通过自己的经历明白了对那些不真实的攻击性言语不理不睬有多么愚蠢，这个教训让他终生悔恨不已。

许多人在回忆起佩珀时，都认为他是一个为美国老年公民利益奔走的当代十字军战士。在“灰豹党人”（美国老年人维护其权利的激进组织的俗称）集会上和其他一些批判那些敢于篡改社会保险政策的人的美国老年公民聚会上，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早就已经被人们所熟悉。里根总统的一个助手在《时代》周刊上发表评论时就曾经说过，能够真正让里根重视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蒂普·奥尼尔，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佛罗里达的一直喋喋不休谈论社会保险政策的国会众议员。”

我仍然记得自己参加1982年一个招待会的情景。当时的那个招待会是专门为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召开的。就在那些眼睛闪着亮光的新当选议员手挽着自己的伴侣亲切交谈着，不停地在国会山的雷伯恩大厅里好奇地东张西望的时候，有的人却停下来恭敬地听一个跟他们打招呼的人的高谈阔论，要知道，这个人早在雷伯恩还没有就任美国参议院议长的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国会中待了许多年了。克劳德·佩珀正在跟一个来自长岛的新议员谈论当年是如何采取措施让美国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他在卖弄自己的经验。正是“佩珀计划”与美国当时的中立主义进行了调和和妥协，使得我们国家能够给予大不列颠以直接的援助。

克劳德·佩珀在国会的政治生涯横跨了30多年。事实上他当时在国会中所从事的已经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了。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936年

罗斯福新政时期，明显的结束时间是在1950年他失去参议院议员位子的时候。

回顾起1950年的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党内预选的时候，大部分的政治家们都一致认为那是历史上最为丑恶肮脏的一幕。那就是当时声名狼藉的“赤色佩珀”运动，在那个运动中依然身居要职的参议员佩珀被刻画成一个被斯大林愚弄了的傻瓜，是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敌人。尽管他被扣上了“赤色分子”的帽子加以迫害，对手也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攻击。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是指责的理由却表明对手又多么地险恶。“整个华盛顿都知道佩珀是一个无耻的‘吃里扒外者’”“佩珀有一个姐姐以前曾经是演员”，“佩珀在结婚以前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就如爆竹一般在整个国家中处处响起。

那一年，有7个美国参议员在竞选连任的时候遭到了失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对把自己涂成鲜红色的刷子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身败名裂，整个政治生涯就终结了。佩珀是这一批人当中第一个被赶下来的，他在5月份的党内预选中就失败了，而他始终没有对攻击他的言论进行回击。这是他所记得的最为生动的例子和教训之一。他是被戴上赤色分子帽子而遭到陷害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是最没有准备、最没有任何预料和提防的一个。

坐在国会大厦第三层那间装饰着枝形吊灯的办公室里，佩珀跟我谈起了那场“赤色佩珀运动”。他谈到了那个时候自己的竞争对手乔治·A·斯马瑟斯以及他当时运用的策略。他情不自禁地再一次重复着自己当时对那些谴责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那场运动，经常想那个时候我本来应该做些什么来回击。”36年后他说起那场运动时，脸上露出的表情总是若有所思，如同福尔摩斯在绞尽脑汁破一个拖了很长时间的棘手的案子。

问题的大部分出在时机上。那个后来被称之为麦卡锡主义的名词在当时的一次党内预选中首次被提了出来。那一年其他所有被选为参议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最后的大选中受到了这个问题的挑战。事实上，“赤色佩珀运动”只是后来这些大崩溃的一个序幕，一个例子而

已。

佩珀所碰到的对手又是一个意外。乔治·斯马瑟斯曾经在1938年佩珀的竞选委员会中负责过。而后来佩珀又帮助他成为其所在地区的一个助理律师。后来，到了1945年时，佩珀要求当时的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将斯马瑟斯提拔为助手。也正是这次任命，使得他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中提前退伍。

斯马瑟斯为了得到这次提拔和任命曾想方设法活动，这些是他在为自己吹嘘时最不愿意提及的事情之一。佩珀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1945年的6月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仍然在太平洋上绵延不断，这个年轻人来找他了。“三个星期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来纠缠不休，反复恳求我。他想离开军队，这样的话汤姆·克拉克才会任命他为美国司法部长助理。后来斯马瑟斯最终如愿以偿从海军陆战队中退役的时候，他的妈妈写信给我说‘感谢上帝，有克劳德·佩珀这样的人在。’”

佩珀作为斯马瑟斯的领路人，对后者的帮助还不仅仅是这些。在1946年斯马瑟斯竞选众议院议员时，他被认为是“佩珀式的候选人”，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当他问这位参议员面对谴责该如何应对时，佩珀忠告自己这位年轻的同事说：“他们只是企图将胡椒粉撒到人们的眼睛里而已”。斯马瑟斯非常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就在佩珀推动着斯马瑟斯往事业顶端走的时候，美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对佩珀越来越不满。因为这位议员支持最低工资立法法案，支持国家健康保险，反对当时被认为共和党议员应该提出的税收减免提案。那些利益集团正在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战，以挫败正在争取1950年连任的佩珀。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能够将这场运动发动起来的最佳人选——乔治·斯马瑟斯。

斯马瑟斯立刻就开始了攻击。“他们出其不意地攻击了我，这让我惊讶不已。”几乎是过了40多年以后，佩珀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仍然感慨不已。“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竞选活动的本质是这样的——胜利与否在于你说服别人的嘴皮能力。”即便在党内预选前两个月佩珀开始

自己的竞选活动时，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遭受了怎样的损失。“我当时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佩珀后悔不已地说。

最终，佩珀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成为那场玩弄卑鄙手段的运动的帮凶。在当时的美国南方，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武器，对于任何人而言，这个武器只不过是一个怎样拿来武装自己在什么恰当的时候引爆的问题。

一天晚上，佩珀参议员刚刚在利兹堡发表完演讲，他正从户外的演讲台上走下来，那个演讲台是他的支持者们为他搭建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子从人群中拼命地挤出来，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这张他同这个男子握手的照片很快就在第二天的《奥兰多守卫者》报纸上刊登出来，占了报纸整整半个版面，原因很简单，那个男子是一名黑人。当时的佛罗里达州还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样一张反映一个重要的白人政治家同黑人支持者握手的照片在当时相当于一张宣布他的政治生命终结的判决书。“那张照片非常致命”，佩珀回忆道。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人是当地一家剧院的看门人，有人雇用他来故意站在那里，等待机会当参议员从演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去握住他的手，他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握住他的手，一直到照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以后才放手。

但是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对他有亲布尔什维克倾向的指控。党内初选即将进行的前三天是一个星期天，这位在任的议员意识到了这一天在他政治生涯中的分量。就在他刚刚走出教堂的时候，一位妇女递给他一本小册子看，这是她那天早上刚刚在教堂门口收到的。上面的大题目是：佩珀议员的赤色记录。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成千上万份这样的宣传册子被用卡车拉着散发到了全国各地。等到佩珀的竞选委员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佩珀认为自己的整个竞选政策都有漏洞，认为自己的竞选委员会“犯的每一个错误都让对手有机可乘”。

第一个错误就在于，对于每一个针对他的指控，他们没有针锋相

对地予以反击。“我一直遵守着这样的规则，在抨击对方时，从来不提到对手的名字。在竞选中我的策略就跟去应聘一份工作一样，总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我将来一定会胜任这份工作，而从来不正面提及其他的竞争对手。”问题在于，虽然佩珀从来不讲自己竞争对手的任何坏话，但是选民们却从他的竞争对手和他的政敌那里听到了太多有关他的坏话。就是因为拒绝对所有对他的指控进行反击，也没有去攻击那些指控他的人自身的信誉度，他给了那些长期支持他的选民一个错误的印象和错误的看法。

佩珀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当时最好的策略就是应该先下手为强，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斯马瑟斯的一切对选民和盘托出，给他致命一击。在他的竞争对手对他发出“叛国者”的指控时，他就应该对这个自己以前的受保护人进行回击，揭露他说的是谎言，告诉人们他是一个怎样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当时就应该说，‘如果他能够这样出卖一个朋友，他将来也一定会同样出卖你。’”佩珀相信，如果当时自己把斯马瑟斯是如何为了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择手段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以获取司法部职位的事情公布于众，告诉人们这个无耻的竞争对手才是一个超级叛国者，斯马瑟斯一定会因此而身败名裂。

当时佩珀对毁灭他的指控哪怕是稍微进行一下回击的话，那场所谓的“赤色佩珀”的运动就不可能得逞。然而，不幸的是，佩珀没有任何反击。这场运动成为一个模式，一个例子，尤其是对于美洲大陆另一端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候选人而言，这种运动成为一个最好的攻击手段。

1950年下半年，形势越来越明显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年轻的国会议员仔细研究了斯马瑟斯发起的这场运动，并将这一手段进一步完善后付诸实施。理查德·尼克松授予他的竞争对手众议员海伦·G·道格拉斯一个新的称号“粉红色夫人”。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人印发了一份宣传小册子，在上面将道格拉斯的选票记录与纽约市激进的众议员维多·马尔坎托尼奥的选票记录相提并论。几年以后，这份被称为“粉红色传单”的文件使得尼克松在全国的自由派中为人所不齿。但是像在佛罗里达州6个月前一样，这样的攻击产生了作用。而尼克松也因此开

始了他的议员生涯。

如果有人作出了不公正的指责，被指责的受害者就应该承担起为自己洗刷罪名的责任。要知道，在当今这个存在着24小时新闻直播的时代，一则诋毁人的小道消息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传得沸沸扬扬。任何消息和故事，尤其是那些有关一个人非正面的消息，都会变成一场电子风暴，以光一样的速度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故事，而没有任何人对此作出反击的话，这个故事就一定是真的。

幸运的是，有多少种攻击的手段，就有多少种进行防御和反击的策略。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和幽默感，就一定能让那些对你尖刻地评头论足的人望而却步，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放出这些子弹，还是让它们老老实实待在枪膛里的好。

第一种方法：在他们撒谎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当场揭穿

许多历史上让人难以忘记的运动，都是以被诽谤者的胜利而告终的。在每一个例子中，能够以排山倒海之势赢得竞选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能够成功地进行反击，在于被诽谤者能够聪明地向对手喊：“你使用卑鄙手段了”。

1970年，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莫斯被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指控为支持学生进行反对越南战争的暴力示威游行。莫斯立刻对这个指控进行了反击。他在报纸上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展示了当时他写给学生的那封信。在信中他的确是支持学生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是规劝他们不要使用暴力。在整个版面的上方写着一个大标题：“这就是那封著名的信”。这一举动使他成功地赢得了竞选。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82年纽约州的参议员竞选活动。

在那一年的上半年，参加竞选的种子选手是仍旧在职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他当时获胜的希望看来似乎并不太大。刚刚从1980年竞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共和党人准备提名一位极具吸引力的

年轻候选人参加竞争。这位年轻人以能够猛烈抨击自由主义当权派，尤其是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而在整个众议院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个年轻的共和党激进派并不把资深的政治家们看在眼里，他似乎喜欢抨击那些站在权力阶梯最顶端的人。对于一个渴望建立政绩的政治强手来说，这些人恰好成为他练手的最佳靶子。

莫伊尼汉作为学问渊博的老学究，自然成为所有靶子中最佳的选择。他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受过熏陶，而他的自由主义作风则是来自“地狱的厨房”（指纽约市曼哈顿区西头）。对于共和党人而言，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选，一个有自由派倾向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来自大都市的民主党人，对自己政党中选民越来越高的要求总是非常在意。

但是莫伊尼汉也的确有一定的政治资产。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人事主管兼新闻秘书蒂姆西·罗赛特。此人坚信，在受到别人的指控时，比如像现在参议院被指控对苏联人太手软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指控者在另一个场合中撒谎的情景。在仔细调查了对手在1982年竞选活动中的表现后，罗赛特注意到这位挑战的共和党快车尽管受到了良好的训练，知道怎么进行政治的攻击，但是对于自己的过去总是含糊其辞，躲躲闪闪。问题就围绕着他战争中的记录展开了。

这位年轻的主角对于有关自己在军队服役情况的说法开始出现了自我矛盾的地方。作为70年代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他一直强调自己在五角大楼所做的文案工作，强调自己是一个天才的策划家，他的策划在国家向和平时期经济战略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同越战后的过渡时期紧密相连，似乎他自己就是使战争本身能够得以平息下来的一个主要人物。

到了好战的强硬派当权的80年代，他在自己的“自画像”里又增添了一丝别样的色彩。现在整个国家正被伊朗的人质事件搞得晕头转向。全国弥漫着一片好战情绪，而这位年轻的“老兵”又走在了时代潮流的最前面。顷刻之间有关他的所有文章都不再把他描述成为一个在五角大楼耍笔杆子的人了，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战士，

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曾经在越南战争中手上也沾过敌人鲜血的战士。

罗赛特开始将这位候选人的所有演讲、新闻稿和新闻剪辑进行分类。他把自己找到的一切都写在黄色的书写本子上，将所有有关这位年轻候选人的文章上的每一个事实都一一记下来，最后他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在五角大楼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字表演天才而已。事实的真相与他一开始的自我描述比较接近。他绝不是自己所标榜的所谓什么正式军官，这位再生的好战的老兵在当时只不过被任命为国防部的一个文职官员而已。

罗赛特竞选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开始反复强调这位候选人在自己言语中出现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连他自己对自己在军队中经历的描述在每一篇文章中都各不相同”。最后，他们精心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新闻记者们跟这位年轻的共和党挑战者共进午餐，然后将经过仔细斟酌整理的新闻剪报散发给了新闻记者们。

等记者们坐下来进行午餐采访时，这位候选人在讲话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在越南服役时的情况。那些由罗赛特安排采取行动的新闻记者们立刻将这位候选人自我吹嘘的虚假情况同他的真实情况一并报道了出来。最终，这位候选人不得不退出了竞选。而莫伊尼汉则以纽约州历史上超过对手票数最多的参议员候选人而名声大振。

1986年9月，约瑟夫·P·肯尼迪三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国会众议员的党内预选活动中，也运用了同样尖锐的回击，将自己的竞争对手击落而当选。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辩论中，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激烈抨击他，声称这位年轻的肯尼迪所经营的非营利性石油进口公司在跟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政府做交易。“让我坦率地问您一个问题吧，卡扎菲欠过您什么债吗？”肯尼迪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并不慌张，也正是他这种绝对的冷静与对手脸红脖子粗的愤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他后来争得了大量的选票。“还是让我来向您讲一下有关利比亚的一点事实吧。在我的父亲（即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遇刺于洛杉矶）被西尔汉刺杀以后，利比亚政府为西尔汉提供了避难所，您如果略为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如果您认为我的能源公司或者是开发公司同产自利比

亚的石油有任何一丝联系的话，那简直是大错特错了。”这场辩论就此告终。

第二种方法：奚落对方

194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第四次总统连任。他的竞争对手是咄咄逼人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杜威曾经以一个敢于劈头盖脸声讨对方的起诉人的形象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但是，老罗斯福更加难以对付。即便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也依然清醒地知道自己该如何扭转大局。他放弃了原来超脱于争斗之上的姿态，转而集中火力针对杜威对他的一项指控进行反击，从而让杜威丢盔弃甲，一败涂地。

共和党人声称，罗斯福滥用自己的职权。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在一次去阿拉斯加的旅行中，他将自己的爱犬丢在了那里，后来他派了一艘驱逐舰执行紧急任务去找回自己的那只小狗。在由卡车司机联合会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正式宴会上，罗斯福站起来说了几句话，虽然言辞不多，却颇为经典。他没有对共和党的攻击表现出极端的愤慨，而是针对这起事件上演了一幕单人滑稽剧。他娓娓而谈，“共和党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单单攻击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不，他们对此绝对不满足，所以，现在他们把我们家可怜的小狗法拉也列入攻击对象之内。”说到这里时，台下开始传来观众的低声轻笑。

“当然啦，我本人并不反对别人对我进行抨击，我的家人也不在乎这些，但是，法拉却非常讨厌别人这么抨击它。”罗斯福继续说道，这时候台下听众的轻笑变成了哄堂大笑。“大家都知道，我的法拉原籍苏格兰。作为一只苏格兰狗，如果它知道共和党的编著家们曾经虚构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我居然曾经把它丢在了阿留申群岛，后来还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它找回来，花了纳税人高达200万或300万甚至是800万到2000万美元的代价，它那颗苏格兰的心一定会暴怒不已。”罗斯福的声音里满是讽刺性的悲伤。最后总统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自此以后它再也不是原来的那条狗了。”

共和党本来的意图是希望能够把罗斯福从白宫里拉出来，让他跟杜威面对面地进行较量。但是总统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回击了他们的指控，他们的策略因此便无法进行下去了。正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这次著名的“法拉演讲”之后所称的那样，“这次竞选变成了总统的狗与杜威的山羊之间的较量”。

1944年当选总统之后，在写给当选的女国会议员海伦·道格拉斯的一封信中，罗斯福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如何看待杜威处心积虑的攻击以及他对自己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硬球策略是如何的得意：

“所有的一切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尽管我仍然对这个小人耿耿于怀，并且以后还会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我想这对我没有什么坏处。这是我34年来所遇到的最卑鄙最糟糕的竞选活动，但是我的策略起作用了。在9月25日的卡车司机联合会宴会上，我作了一番别出心裁的演讲，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杜威州长暴怒。这样做果然有效。他变得越来越暴怒，他越是这样，在竞选中丧失的选票就越多。”

第三种方法：柔道防身术

这种以借助对方攻击的力量来击败对方的方法是由杰夫·格林菲尔德命名的。杰夫是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资深记者，曾任罗伯特·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

我要举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瑟夫·加特兰1975年竞选连任的活动。

那一年加特兰的竞争对手对公共汽车事件大肆渲染。当时的宪法修正案决定终止用公共汽车运送学生去学校的做法以结束种族隔离，而加特兰没有支持这项修正案。对手紧紧咬住此事不放。这是因为如果这一修正案被大多数州批准的话，就会被写进美国宪法中，成为一个禁令，即禁止用公共汽车将学生从一个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地区中去。

在大多数学生是白人并且都上公立学校的地方，公共汽车问题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弗吉尼亚北部居民并不是全部都热切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乘坐公共汽车去市中心上学。民意测验表明，现任议员的支持率在不断降低，在民主党传统的支持人群——工人阶级中尤为如此。就在选举前的几天里，情形看上去对加特兰非常不妙，他的政治生涯也许就此结束了。

紧接着，在选举进行前的星期五，他的顾问阿诺德·本尼特精心策划了一张竞选活动使用的传单，这张传单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其实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胶印纸，上面是一幅画，画上是华盛顿纪念碑，一辆学校的公共汽车正冲着它开过去。这幅画击中了共和党对手的要害：“约翰·沃金斯认为用公共汽车把你的孩子一直运送到华盛顿去也是符合宪法的。”这种描述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描述也是十分准确的。沃金斯以前也的确说过有必要对宪法进行修订，阻止学校的公共汽车跨地区行驶。他甚至声称如果没有一项这样的修正案，法院就不可能有效阻止用校车运送学生。事实上他这是在暗示，“将你的孩子运送到华盛顿去”很可能被判定为并没有违宪。

通过运用这种大胆的逆转思维，这位现任议员紧紧抓住了极具爆炸力的指控，并把这个大火球按原路扔回给点燃它的人。他把这个问题进行细分，只是针对其中工人阶级的四邻们——在这些选民中公共汽车运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而避免了激怒那些用自己的沃尔沃汽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自由派选民。他在选举即将举行的前三天内进行回击，使得对手毫无反攻的时间和机会。

有的时候，更加直接的方法是最佳的选择。

1952年，一位来自东部得克萨斯的年轻人杰克·布鲁克斯第一次参加竞选美国众议院议员。他当时还不到30岁，也被扣上了“赤色分子”的帽子，成了被攻击的靶子。类似佩珀曾经受到过的各种指控铺天盖地地向他涌来。然而，跟佩珀不同的是，他没有刻意去装作好像那些攻击从来都没有发生。在一次大型的选民集会上发表演讲时，他调

侃起了这些针对他的指控，并表明了自己对指控的态度。“我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法西斯战斗了整整5年；我在家里拥有机关枪，谁要是胆敢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会毫不客气地请他吃我的枪子儿”。

这肯定是得克萨斯气派，同时那些子虚乌有的指控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布鲁克斯因此在华盛顿作为本地区的代表继续任职四年。

第三部分 交易

在如何运用政治策略办成事情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任何党派差别的。正如鼎鼎有名的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过去经常所说的，“没有专门的共和党人清理垃圾的方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并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手段，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办。

第八章 说话是为了更好地沉默

沉默是最佳的权力武器。

——查理·戴高乐

“今天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这是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早上我见到蒂普·奥尼尔时听到的第一句话。

要是我在家里给他打个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也必定是“早上好，克里斯。今天听到什么消息了吗？”要是我打电话给他时，恰逢他在去国会山的路上，要去参加一个有关尼加拉瓜的正式辩论会或者是要去国家机场，到克里夫兰的某一个募捐聚会发表演讲，我听到的第一句也必定是这样的话。

每一次当我踏进他的密室时，他也一定会打开真空吸尘器，然后问：“今天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接下来就是一阵沉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在早晨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种沉默是一个信号。为他工作的人会坐在那里，像比赛前的职业拳击手一样焦躁不安，随时准备将这种沉默击个粉碎。我们紧接着会七嘴八舌地向他讲述大家所听到的一切，报纸上看到的每一段摘

录，整个早上以及整个周末所看到的都无一遗漏。我会对采访中或者访谈录中出现的每一个有趣的要点一一进行评论，对这个国家里专栏作家们的观点进行分析。如果总统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我刚刚听说白宫可能会有某些动作，所有这些都会立刻就从嘴里流出来。

紧接着是内部新闻，无意间听到的闲话；衣帽间里听到的抱怨；某个会议上对领导政策的抨击；所有可能听到的有关共和党人动向的花边新闻。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么短，说完了这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接下来又是一阵长时间残酷的沉默。最终我感到自己仿佛在被一大堆的事实真相啦、人物啦、流言蜚语啦等等使劲推拉著。“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

要是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助手走进来，不管他是总顾问还是最近新来的实习生，他立刻就得接受这个挑战。“科克，有什么特别消息吗？”“你听到什么消息了，杰克？”

作为50次直接投票的获胜者，从未受到过任何挑战的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的议长，10年中无人敢挑战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每天早上的生活都是这样开始的。在这样一个对于银行而言信息就是金钱的世界里，这位强硬的老议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为他那只大手所能抓到的每一分钱进行马拉松式的交涉。

蒂普·奥尼尔万分重视信息的作用。那些没有任何信息的人会被毫不犹豫地解雇掉。在谈到一个被解雇掉的毫不知情的可怜虫时，奥尼尔解释说：“这个家伙居然会问我在一个法定人数会议上该怎么投票。”尽管奥尼尔非常尊重他的雇员们，甚至以有我们这些雇员而自豪，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那就是消息不灵通。对于一个领导人和他的下属来说，不知道“党员们”在干什么简直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犯了一个天大的政治错误，等同于跟自己所代表的选区内的选民失去了任何联系。对于领导层而言，议院就是自己所代表的选区。

看看蒂普·奥尼尔在会议上是怎样专心倾听的或者他是如何用自己

沉默的方式吓倒自己的雇员的，你就会明白沉默真的是一门艺术。这个喜欢发号施令的庞然大物仅仅发出几个音节来，就立刻引起别人潮涌般的话，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拼命说话来填补沉默的空白。

那些在大型组织和机构中处于权力顶端的人，无论他们是男是女；无论他们所在的机构是一个公职机构还是一个私有机构、一个政治机构还是一个公司，都是因为能够对整个机构和其中的成员有深刻的了解才得以成功的。他们的成功不是依靠演讲得来的，而是依靠倾听；不是依靠颐指气使地指挥和下命令实现的，而是依靠用正确的方式向下属们提出恰当的问题。

在我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同各种各样的政客打过交道。有的人正直；有的人狡诈；有的人彬彬有礼；有的人野蛮粗鲁。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运用沉默这一武器。从事政治这个职业决定了他们需要用言语来为自己做广告来宣传自己，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同时也需要他们能够巧妙地运用沉默这个工具在最为关键的事件中发挥作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蒂普·奥尼尔口中都叼着一根雪茄，用这种方式逼迫着他的雇员们像一个乐队那样相互配合，发出声响。比如，在格雷丝·艾伦和乔治·博恩斯之间。“跟他们说一说你的老哥，格雷丝。”乔治会这么说，紧接着余下的“演奏”就是艾伦的任务了，乔治还得耐着性子“伴奏”。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我原来的上司拒绝同意对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进行电视报道，这既是对变化采取的一种顽固的抵抗，又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放弃报道就意味着放弃了一个巨大的日常机会。在我看来，如果他允许电子传媒定期进行早间报道，那么蒂普·奥尼尔这个名字本来是可以在华盛顿的日常报道中占有更大的一席之地的，他会成为首都变化莫测的政治舞台上更加叱咤风云的人物的。

正是后来的继任者自取灭亡的经历教给我一个道理，让我明白了原来的上司是多么明智。当纽特·金里奇在1995年当上议长时，我当时认为他是一个最出色的议长。在他掌管工作的时期，所有的记者招待会都被允许进行电视报道。他从来都不会把自己的才华严严实实地

密封在一个大口袋里，相反地，每一次只要他张开嘴，就必定会有大群的记者侧耳倾听。

但是，紧接着灾难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每一天议长的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所有对准他的媒体镜头都会带着当天各种各样的新闻满载而归。对这一天早些时候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无论是什么，是一场龙卷风还是自己同事发表了一通让人遗憾的讲话，抑或是一起丑闻，记者们都不会放过他，紧追不舍地问他对此有何看法和评论。没过多久，纽特·金里奇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就已经和坏消息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坏消息的代名词。最终，由于他具有的用自己的言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爱好（枪打出头鸟），人们都希望金里奇这个名字就是坏消息了。最终的结果是，由于他非常不受欢迎，很快就从新闻中消失了，同时也从他原来议长的位子上永久消失了。在他离开的那一年，他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确是有些太过鲁莽，太过于自信，太爱出风头了。我为此而道歉。”

迪克·格普哈特这位众议院领袖人物，跟蒂普·奥尼尔一样，从来不像纽特·金里奇那样喜欢说话，相反，他知道让别人有说话机会的价值。他之所以能够从众议院中自己众多的同事里脱颖而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愿意做一个听众，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在他们一本正经地谆谆教导的时候；在他们开着玩笑的时候，格普哈特都能够认真地倾听，跟他们一起哈哈大笑，分享他们的情感。他成了研究自己同事的专家，他知道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关心什么、在意什么；知道什么会激怒他们。他成了众议院最好的计票能手，在最终的投票结果中他几乎可以列举出所有投票的人当中是谁投了反对票，谁投了赞成票，误差往往不超过三票。

林登·约翰逊过去经常说：“专心倾听别人的谈话，我从来都不会一无所获。”这一句老掉牙的政治格言也一直引导着像迪克·格普哈特这样的后起之秀。在工作方面谦恭有礼永远都不会过分。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善于倾听的能力是大多数政治家无论如何努力都望尘莫及的。

沉默不仅仅能够帮你赢得常人难以具有的才智，而且还会促使事情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真正能够掌握国会山权力的人是那些懂得使用沉默作为武器的人，他们深深明白有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比伶牙俐齿更为有效的武器，吵闹喧嚣很少等同于真正的行动。不要让那些高不可及的天棚顶和枝形吊灯迷惑、愚弄了你。要记住，在那些貌似和平的谈判桌上要进行的事情只有两件——制定法律和玩弄手法。

正是在这样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不动声色地为自己为在议员中赢得了一个立法者应有的声誉。

马斯基最初为人们所知是在197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以后。那次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固执。他拒绝向人们许诺将来的马斯基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结束越南战争。这样就使得乔治·麦戈文有机会挪到他的左侧，在这个问题上从侧面包抄他。要知道在那个竞选年度，越战问题对于民主党的选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次，他有一个擂桌子的坏脾气，一旦暴怒起来就会不可控制，他在那一年2月份一个下雪的下午就在新罕布什尔州发作过一次。事情的起因是当时作为《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这份报纸编辑的右翼分子威廉·洛布取笑马斯基妻子的举止，结果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拍案而起。

然而，正是这两种在当时看来对他竞选总统极端不利的品质在他成为一个负责制定法律的参议员以后变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

大多数参议员等法律草案已经实际制定出来以后，都老老实实在地盼望着召开委员会终审会议。但是这中间的过程极为缓慢。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众多的数据和核实具体细节方面，有时候甚至要为一些极其微小的漏洞不惜时间地查漏补缺。华盛顿的那些新闻军团们自然还有比这更加精彩的报道，他们不愿意等着看16个中年立法者就开支预算进行的慢吞吞的讨论。而马斯基就不同了。他像一个孩子打开他的莱昂内尔火车设计图为圣诞节做准备一样，只是静下决心，耐心等待。他很清楚，只要自己做一点点工作，肯花一点点时间，就一定会得到自己预料之中的回报。

事实证明，马斯基对立法细节的极大兴趣和他蜗牛般的速度以及对同事的极大耐心有了回报。这位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在制定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邦立法的最后一个环节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立法包括：1972年制定的洁净水法，要求美国所有工业都自此开始避免污染这个国家中的河流和湖泊；1974年制定的控制预算法，使国会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通过某些方法控制联邦预算；还有1977年通过的洁净空气法，这项法令给当时强大的汽车工业造成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曾经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中做过两年的助手，亲眼目睹了马斯基以什么样的方式赢得胜利。我在最近的距离内看到了一个政客是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不是像街头行凶抢劫的路匪一样依靠暴力，而是像一个熟练老道的扒手一样以不为人知的方式秘密达到目的。

马斯基的步骤是这样进行的，在委员会召开会议的那一天，马斯基会在10点钟前几分钟到达会场，然后在桌子的最前面就坐。紧接着，他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的进来了。议员们相互客套地寒暄着。这个时候专门供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代周刊》以及其他媒体上的照片也已经拍好了。

“有什么声明要宣布的吗？”主席在这个时候一般都这么问。

其他的议员都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的观点公开发表出来。所有的宣言都在这个时候被宣读了出来。摄像机镜头急速旋转着。大家对许多观点和态度不断地点头称是，称赞附和着。这些都是马斯基的同事们最乐此不疲的事情。英俊帅气的南卡罗莱那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会对这一个或是那一个目标不断说一些揶揄的话，话中总是不无讽刺。他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总是带来一片窃笑，即使他的妙语还未结束，就已经让大家控制不住地笑成一片。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会高声地宣布自己的意见，申明为某一个儿童发展项目提供充分资金的重要性。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声色俱厉地抨击中央情报局的庞大开支，一再重申有必要要求中情局说明开支的主要用途。而参议员鲍勃·多尔则总是姗姗来迟，最后一个到达会议现场，坐定之后便找某一个易受攻击的自由派分子进行冷嘲热讽，

沃尔特·蒙代尔一般是他的习惯性目标。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小约瑟夫·比登总是眼睛一眨不眨地将几天前刚刚在同一个委员会会议室里对同一群观众讲过的一个笑话再次重复一遍。

终于，整个会场情形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所有的摄像机三脚架都被收了起来。然后，一切如人所料，参议员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会场，有的去跟自己选区的选民们见面，有的去参加他们早就已经“许诺参加”的午宴并在那里发表演讲，还有的则去参加另外一个委员会的会议。

整个终审会议期间，马斯基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椅子一步。会议议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他的同事们的胃开始骨碌碌地抗议起来了，但是会议主席还是坚守着自己的椅子不动。

“还有人要说什么吗？”主席这个时候会问，极有耐心地一个接一个地问周围那些已经走神的同事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时针已经指向1点多了，这个时候主席的左手边已经积攒了一小摞纸条。这些都是那些已经先行离开的同事的授权证明书。每一张小纸条都稍微不同，上面写的虽然都是这些参议员们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是他们的观点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了主席先生的观点。“还有人要说什么吗？”他会极有耐心地继续问，一边慢吞吞地将那些折叠的小纸片一张一张地整理着。“还有没有人要说什么？”他仍旧耐心十足。等整个屋子都空了的时候，主席先生的口袋里就已经塞满了授权证明书。

能够在立法决策中获胜的参议员很少是那些有着“新想法”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那些有着坚韧毅力能够忍受漫长的整个会议过程的人。埃德蒙·马斯基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是整个会议室中最聪明的人，尽管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而是因为他愿意坚持成为在整个会议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马斯基的策略极其简单明显——说话是为了更好地沉默。让立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不仅仅是题目符合自己的要求，而是每一行每

一个字都是自己意志的结果，这是马斯基一直念念不忘的事。在别人摆出自己的姿态，说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倾听，只有自己最钟情的项目受到了威胁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他的同事们已经烦躁不安的时候，他还在耐心等待着。他等待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让人惊讶，所以同事们送了他一个“铁裤子”的绰号（英语中说某人不耐烦的时候表达方式为“厌烦得裤子都掉了”）。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不是辩论的要点，不是有关自己立场和态度的宣言，也不在于媒体的关注如何，而是法律议案本身。

时间对于马斯基就像是灵魂的孪生兄弟一样宝贵。他参议院的同僚们在3天之内就能够写就一份预算计划，而马斯基的委员会做同样的事情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他所写就的每一份有关环境的出色法案都花了两年时间才变成法律，正好是一届国会的时间。水清洁法花了整整55天的时间才结束委员会终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会议上又花了54天才最后得以通过。

在一次讨论空气清洁法议案的辩论中，马斯基让人看上去似乎已经准备要让全美国的汽车工业全部关门了。按照现行的法律，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所有的流水线都应当停止使用，除非国会出台一个补救性法令。当时马斯基的反对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约翰·D·丁格尔，这位议员一直以热心于支持汽车工业而著称。当马斯基听说如果不能跟众议院达成一致协议就意味着所有汽车工业必须关门时，马斯基立刻做出了简短有力的回答：“在缅因州根本就没有汽车工业。”（马斯基是代表缅因州的参议员）这句反击的话后来一直为人称道。

马斯基远近皆知的坏脾气在跟众议院交换观点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压力作用。一个谈判高手最珍贵的财富就在于他有着“难缠”的名声。一般情况下，马斯基的面部表情跟拉什莫尔山上那几尊著名的总统头像一样，总是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但是一旦他想让自己变得激动起来的话，他的脾气会分几个步骤爆发出来。首先是轻微的颤动，然后是一阵更大的爆发力散发出来，紧接着就发展成为里氏12级的大地震，不可遏抑地爆发出来。没有几个人希望见到他发怒的整个过

程。三个世纪以前，洛舍夫科尔曾经写过一份毁坏情况评估，用来形容马斯基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命运有时候会利用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来促进我们的发展和进步”，他写道，“有些人讨厌之极，要不是我们拼命想办法摆脱他们，他们所有优点是不会被人注意并给予回报的。”

一天早上，我跟马斯基议员刚刚参加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7点钟的一个实况转播，正在急急忙忙往回赶。当时我要挤在早晨的交通高峰期中赶往国会山，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仿佛整个拥挤的交通都是由我造成的一般。我脑子里产生了巨大的紧迫感，恨不能立刻从车里跳出来，挤到我面前的每一辆车前面大声喊：“嗨，让开点好不好，拜托了，你们让马斯基议员的冲天怒气快要爆发出来了。”

想象一下吧，跟这样的一个人坐在一起，在沉闷的国会山中一个小会议室里待上整整几个星期是什么样的感觉。无怪乎人们总是这么轻易就向他妥协了。我也同时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在走进这个仿佛无休无止的漫长会议中去，希望从中得到一点什么的时候，总是把眼光放得很低，而在这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也会不可思议地被形容成一个大的胜利。有的人离开的时候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已经非常艰难地，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地达到了他们原来既定的目标。而另外一些人之所以高兴则是庆幸他们终于能够离开这里了。

埃德蒙·马斯基是一个能够非常冷静看待自己成功的人。在我从他那里卸任前的最后一天，我跟他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议会制国家的话，他一定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首相的。跟林登·约翰逊和休伯特·汉弗莱一样，他也是一个出色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立法领导人就相当于政府首脑的国家里，这位从缅因州来的成就非凡的参议员最终在最高层确立了自己牢固的位置。

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马斯基非常耐心地听着，他看了看我，然后说：“可是我们的国家不是议会制，不是吗？”那声音非常地冷静，冷静得如同缅因州悬崖上的岩石一般。

马斯基从来不做投机的事情。在跟美国参议院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他始终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参议院实实在在的事务中，保持着自己的反抗力和忍耐力。对他而言，连自己火山般的脾气也是自己“风格的一部分”。无论任何事情，一旦出现了危急情况，他的义愤总是不可遏抑，源源不断地爆发出来。“为什么我必须妥协？”他会大声地咆哮道，“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糟糕的一个法案。”

正如政治家们对他的评论一样，马斯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尽管他有不少的缺点。由于他对参议院内事务的注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加上他那令人可怕而他自己又能够加以正确运用来造成有利结果的脾气，使得他成为“参议员中的参议员”。

法国政治学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是美国民主政体伟大的编年史著作者。他注意到了像马斯基这样的人所会发挥的巨大政治影响。“在那些要求人们具有积极品质的企业和组织中，我们会非常成功，但是在那些能够认识到并充分利用我们的缺点产生积极作用的企业和组织中，我们会更加出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在任何一个谈判中，双方的竞争和比赛很少是在短时间内飞速完成的。国会也极少会按照它原来的计划完成每一年应当完成的事务，因为某些重要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可以凭借耐心的等候来拖延时间，知道一旦对手不耐烦了自己就能够胜利达到目的。那些始终能够让自己枪里的火药安静待着的谈判者通常会获得决定性的优势。

说话是为了更好地沉默，这一原则在20世纪的历史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使用我们的语言的人当中，有两个伟大的演说家。一个是温斯顿·丘吉尔，另外一个则是比他年轻一些，远不及他老练的约翰·F·肯尼迪。然而，这两个依靠自己的语言达到行动目的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命运最为关键的时刻是在他们收住自己的舌头缄口不言之时。

1940年5月4日，这是不列颠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希特勒刚刚侵占了荷兰和比利时。当时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所推行的绥靖政策土

崩瓦解。温斯顿·丘吉尔在当天晚上11点钟被紧急要求去内阁会议室，他仔细听着张伯伦的话，张伯伦正在继任问题上做命运攸关的决定。他那岌岌可危的政府已经不可能赢得议会的信任，也已经无法留住英国人民的心了。张伯伦此时不得不承认现实，更换首相和更替政府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最佳的人选是丘吉尔，当时他是英国海军大臣。10年以来他就一直主张必须向希特勒挑战，向当时主张绥靖政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挑战。

现在这三个人就坐在内阁会议室中。当天早些时候，张伯伦就会向当时的国王乔治六世提交自己的辞职报告，或许还会提交他对继任者候选人的建议。乔治六世当时比较喜欢哈利法克斯。

“温斯顿，”首相发话问道，“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身为贵族的人不能成为首相吗？”

“一般情况下我比较喜欢说话，总是滔滔不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沉默着。由于我一直没有说话，后来屋子里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哈利法克斯说话了。他说，‘自己身为贵族，又不是下院议员，这样的一种身份使他很难在这样的一次战争中履行一个首相的责任。’他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他把话说完了，整个局面就已经很清楚了，这个重任肯定会落到而且事实上已经完全落到我身上了。在这个时候，这场决定性的谈话就结束了。”

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即将用自己的声音让不列颠这头雄狮在炮火硝烟中咆哮的人，在这个时候却一个字都没有说。他只是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看着下面的街道。第二天，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上任了。

约翰·肯尼迪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也用同样的方式利用了沉默这个武器。

1962年10月，美国再次确认了一个信息：苏联正在古巴岛部署中程导弹。这个发现使得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陡峭的

滑坡上，眼看就要滑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泥潭里去。

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发生后最为关键、最让人心力交瘁的那几天里，肯尼迪总统先后收到了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发来的两个自相矛盾的电报。第一封电报是提出妥协的。上面说，只要美国承诺今后不再支持与前一年所发生的类似猪湾事件的侵略企图，苏联就会将导弹从古巴岛上撤走。刚刚过了半天，第二封电报便发来了。这是一封充满火药味的挑战信。上面提出了交换条件，苏联可以将导弹从古巴撤走，但前提是美国也要将自己的导弹从土耳其撤回。

肯尼迪仔细权衡着他最终的策略该怎样进行，同时美国的战斗机也做好了袭击古巴导弹基地的准备。肯尼迪在听取了弟弟，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建议以后，决定不理睬赫鲁晓夫发来的第二封电报，只对第一封电报做出反应，巧妙地避开了土耳其导弹基地问题。

精心策划的这一着棋立刻见效了。第二天早上从克里姆林宫传来消息，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很快就会被装箱撤回苏联去。世界上第一次核武器危机终于消除了。约翰·肯尼迪这位将自己的话语镌刻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墓碑上的人最终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最为出色的贡献，这正是因为在那个时刻他和他的顾问们能够沉着冷静，始终缄口不言，因而最终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我还看到过这个策略在秘密交易中被原封不动地再一次使用过。

1974年2月，一个出身豪门的年轻国会众议员候选人刚刚跟当时的布鲁克林民主党党魁米德·埃斯帕斯托会过面后回到家中。“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兴奋地说道，一边轻快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我简直无法相信事情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在屋子对面，政坛老将保罗·考宾正光着膀子坐在电话机旁。他当时正呆在圣瑞吉斯，捣弄着电话。考宾以前经常教导年轻的罗伯特·肯尼迪，对纽约的政客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他自己也一直保持了这个习惯。

“他说什么了，山姆？”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真难以相信，埃斯帕斯托从一开始就非常地友好。他说他听说过很多称赞我的话，他那里的人都说，如果这个区有我做代表的话，是一件好事。保罗，你不知道，真见鬼，他居然……居然这么支持我。”

这时，这个候选人的讲述里出现了第一个大问号。“山姆，他到底说什么了，真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说他一定支持这样的话？”

这位初涉政界的年轻人的热情开始消退了，话也支支吾吾起来。“准确地说，关键不在于他说什么了，关键在于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的。反正就只能这么理解了。我无法准确地跟你描述他的意思有多么肯定。”

“那他到底说什么了，山姆？”

“他什么都没说。”

“这就对了，山姆，他可是什么都没说啊。”

1974年，我刚刚开始筹备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国会众议员时，遇到了邻近地区的一个国会众议员，我问他会不会支持我。他非常真诚地望着我的脸说：“不会在公开场合公开支持。”

这样一来，他的回答并没有伤害我的感情。相反，我把他的话当成是用另一种方法在说：“那当然，我私下一定会支持你的。”但是他所说的“不会在公开场合下支持”并不等于那种说动大批选民倒向我、支持我的承诺。就当时的政治潮流和动向来看，那时还不是表态的时候。但是，在那样的时刻，一个国会议员这样不带任何承诺意味的话对于我却是意义重大。因为这句话暗示了他当时正在为我鼓劲，在全力支持我。说出那样的话对于他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我成功了，赢得了竞选，他可以自认为很早就曾经为我打过气，我相信他当时的确是为我打了气。而如果我失败了，他也可以找到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毕竟，他当时说的是“不在公开场合”啊。

你经历得越多，你就会越精于此道。跟你的一个支持者说希望他能够帮你一个忙，他一定会反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呀？”这个暗示很明显是正面的。这句反问一方面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含有轻微的责备口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他，而是你。在跟一个政客打交道的时候，最经常容易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把他事实上根本没有亲口说出来的话，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亲口做的承诺当成是真的，当成了极其重要的金玉良言。

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曾经在罗斯福政府时期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但是他有一个不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选区内选民们各种刁难性的问题。每一次当他穿过人群的时候，人们总是在他身边拥来挤去，纷纷提问。“对于税收提案，您有什么打算？”“您能谈一谈那个保护消费者协会吗？”“您在控制枪支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他都会非常有技巧地回答同一句话：“不用担心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问题。”

第九章 永远对原则问题表示赞同

如果法西斯主义进入美国，它会被命名为反法西斯主义的。

——休伊·朗

斯威士兰是非洲南部的一个独立小国。我曾经作为美国和平外援队的一名志愿人员在那里待过。一天早上，我坐在一间政府办公室里，等待着和该国的商务大臣西蒙·祖马罗进行每月一次的例会。跟我一道围坐在圆桌边的还有一大群人，其中有政府官员、联合国驻该国的顾问人员以及为数不少的美国志愿者，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个国家鼓励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项目。

大家的士气都相当低落，政府部门似乎对项目的进展缓慢颇为失望，而我们中的一些志愿者则被繁重的工作搞得筋疲力尽，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与政府高层之间的有效沟通的缺乏更是令我们焦头烂额、沮丧之极。看来情况必须得有所改变了。

姗姗来迟的商务大臣总算在主位上就座了，他那双鹰似的眼睛锐利地扫过在座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斯威士兰人。跟往常一样，他那短而粗的脖子紧紧地被箍在雪白的衬领里，仿佛被勒住了一般。

随后他开口说话了，其用词的娴熟圆滑足以证明，政治家那一套工于辞令、虚虚实实的本事是没有国界的。“在座的所有各位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共同的，”他说道，眼睛的余光扫过一张又一张显露着无奈的脸，并且在每张脸上都停留了那么一会儿，刚好足以让人注意到。

“那就是我们都很不满意。”

接着，他开始一一列举这个项目所遇到的重重挫折，语气时轻时重、时缓时急，中间夹杂着他的人民急于让国家强大的雄心壮志和迫切心理。

这就是聪明灵活的政治策略。不是徒劳地否认弥漫在空气中的不满气氛，而是开诚布公地把它指了出来；不是回避批评和指责，而是巧妙地加入抗议者的行列。在这种看似需要他解释和辩护的情境中，他却游刃有余地扮演起了控诉者的角色。是的，我们都感到很不满意；是的，我们都有点垂头丧气，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一努力，希望这个国家能更加强盛的努力。

他那动人心弦的最后一句无疑是反弹球。因为如果我们的沮丧不是因为无力为斯威士兰人民做点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势必会联想到诸如我们自身的利益和方便等等这样一些私人因素，而这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或不愿承认的。

作为斯威士兰国的商业、工业和煤矿大臣，西蒙·祖马罗给那些前来向他传授经济发展诀窍的人们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堂政治课。在众多的情境和氛围中，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在挑战和争论面前让步。“是的，”他说道，“你们都对项目的进展、对我们这里的办事方式感到不安。知道吗？我的感觉跟你们完全一样。”

跟他们的政府大楼灰蒙蒙的单调建筑一样，永远对原则问题表示赞同 是大英帝国政策中的一项老遗产了。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具体实施技巧。面对亚洲或非洲各殖民地风起云涌、无法遏止的争取独立的浪潮，帝国利益的捍卫者们想方设法地一拖再拖，直到为自由而抗争的呼声响彻云霄、不可逆转为止。然后，英国政府会以一系列让步为条件，给予殖民地梦寐以求的独立。结果是，民族主义者如愿以偿地在他们的国土上飘起了自己的国旗，而英国人依旧拥有他们对重要港口和发电站的控制权。

“对他人的品位表示适当的尊敬和顺从，”爱德华·布尔沃·利顿（英国19世纪外交家）在1835年写道，“通常意味着他会在你的利益问题上投桃报李。”再也没有比罗纳德·里根更谙熟这一古老的保守党交易规则的人了。作为这一规则的炉火纯青的实践者，他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最佳导师，通过告诉别人他们爱听的东西而从他们那里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1983年春天，里根成功地向国会推销了他的MX导弹计划，这也堪称他展示自己能力的经典之作。就跟一个久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一样，里根巧妙地借风使力，将反对者的反对声浪转变成了自己乘风破浪的助力。

为了更好地欣赏这一成果，不妨先回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扔在欧洲的炸弹，回顾一下从闪电战开始的所有新闻影片的镜头，发生在诺曼底的惨烈战斗和席卷法国的激烈角逐，东部战线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德国毁灭式的地毯轰炸，科隆和得累斯顿的残木断片、满目疮痍。现在，把所有这些在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定格为一次能量空前的大爆炸，这次大爆炸的毁灭性力量是由美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所扔的所有炸弹的能量的总和。

如此威猛的力量就是一枚MX导弹所拥有的能量。

然而，这种武器的缺陷也是致命的。由于其20万磅的庞大身躯，想要把它藏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在导弹配置并准备好发射之前，苏联的人造卫星早就已经拍摄到了它的踪迹并将其置于瞄准

器之下。

这个无法克服的弱点赋予MX导弹不成功便成仁的特性。如果首先开火，它的10个分弹头能够摧毁10个目标。毫无疑问，在一场核军备竞赛的游戏中，它将成为对手优先打击的目标。这也意味着，一个苏联的核弹头在一次攻击中就可以摧毁美国的10个核弹头。

部署这样一种武器的后果正如斯特奇洛甫博士所言，为了确保有效性，诸如MX之类的导弹必须在收到第一次来袭警告后数分钟内发射升空，射向对方，否则就只能被摧毁在地下发射井里。这也是过去人们在西方常说的，控制核按钮的手指总是发痒。

对MX导弹最早和最严厉的批判并不是来自那些作为政治上极左派的道德说教者，而是来自那些认为国家的核战略能力应该建立在更为稳健基础上的温和派。他们认为美国应该部署更小、更轻并且能够安装在移动发射架上的核导弹，以避免苏联卫星的监测，而不应该部署像MX这类庞大笨重、不能机动的导弹系统。除了具有首先攻击的优势之外，这些MX导弹将使美国核导弹体系所希望的微型化、多功能化以及更强的机动性目标变得不切实际。然而，一个在整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秘密部署了大量这类导弹的国家可以实施静态核威慑，从而能够遏制对手的核攻击。

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争论，里根总统发动了一场捍卫MX导弹的运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被邀请到白宫看一个关于它的高科技简报。总统本人亲自出马，借助于先进的图像技术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绘声绘色地向人们介绍了这个庞然大物。他告诉人们尽可以高枕无忧，压根不用担心MX导弹的这个潜在的巨大危险，因为专家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避免陷入不成功便成仁的尴尬境地，他会将所有的100枚MX导弹都部署在彼此很靠近的地方，对其中任何一枚的攻击都会导致一个大爆炸，这个爆炸可以摧毁进入这个区域的任何苏联核导弹。他将此称之为“密集包装”。

这个演讲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人们开始探讨“密集包装”策略。一些批评者说，现在苏联人所需做的就只是给他们的导弹安装一

个定时器，因为所有核弹头都将汇集在MX导弹上并同时引爆。他们认为，为了减少那些针对MX导弹像一只蹲着的鸭子的批评，总统想出来的对策居然就是向敌人提供一群蹲在同一个窝里的鸭子。

里根的批评者们这下子可乐坏了，例如众议员爱德华·马基就是如此。“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美容室和理发室里，人们都津津乐道，‘我总算明白了密集包装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国会也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在一个由总统召集的讨论如何解决那些因得不到政府津贴而无法维持的企业问题的会议上，白宫决定推迟MX导弹的部署，等到下一年的春天再作考虑。跛脚鸭代替了蹲着的鸭。

但是总统并不准备就此放弃。由于无法使人们认同MX导弹的优点，他转变了策略。现在，他选择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而不是同他们继续战斗。

是的，军备竞赛必须结束了。美国和苏联都应该减少自己部署的核武器，而不是继续部署更多的核导弹。实际上，我们应该致力于彻底消除这些武器。

是的，批评者关于MX导弹的缺陷的批判是正确的。应该用较小的、能够安装在机动发射架上的单弹头导弹替代像MX这样的巨大的多弹头导弹。

以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为首的总统战略武装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展示了里根的这一让步，该报告承认确实有必要对多弹头导弹进行改革。这个报告指出，侏儒导弹由于其能在第一次核攻击后生存下来的特性，因而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实际上，请注意这一点，MX导弹的部署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必需的催化剂。为了得到侏儒导弹，我们需要部署MX作为中间替代物，以便在同苏联的谈判中取得筹码，苏联正在追求部署更多具有更强生存能力的导弹。

在做出这种姿态之后，毫无疑问，里根的日子好过多了。国会的

中间派为他们的成功狂喜不已，在他们看来，既然他们已经成功地“教育”总统将眼光投向了有着更高生命力的侏儒导弹，他们在MX导弹这一问题上向他表示一下屈服似乎也未尝不可。

以威斯康星州的莱斯·阿斯平和田纳西州的艾伯特·戈尔为代表的一些国会议员为他们在武器政策上的老谋深算洋洋自得，就这样，面对总统设下的诱饵，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上了钩。以在将来部署侏儒导弹这一有策略的让步为交换条件，总统的人马赢得了谈判桌上的成功。然而，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事情就变得明朗化了，那就是，总统的行政班子并没有打算实施改革者提出的任何建议。当削减军备的会谈开始后，总统的谈判小组早已是心知肚明，那就是能够安装在机动发射架上的单弹头导弹将成为第一批被削减的对象。

最终的结果是相当令人尴尬的。在为是否部署MX导弹而进行投票时，国会的核心成员在通过一项削减庞大笨重、不能机动的多弹头导弹的政策的同时，又采纳了一项立即部署它们的提议。50枚MX导弹（每一枚导弹所拥有的巨大能量足以把广岛毁灭200次）将被部署在俄怀明州朔风疾吹的广袤的平原上，随时准备接受发射命令。

舆论普遍认为，罗纳德·里根总统是一个直到最后1分钟才妥协的人，他有足够的耐心坚守到谈判的第11小时才勉强同意对方的要求。事实上，这种妥协很难说是有形的，它并不是在某一具体事项上的让步，而是在原则上的让步，通过迎合反对者的口味并投其所好，他给人留下了一个妥协者的印象。而在很多情况下，他只不过是借反对者的话语将自己的意志改头换面，重新表达出来而已。

通过寻找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共识，罗纳德·里根顺利地反败为胜，将1982年末的劣势扭转成了1983年春天的胜利。借助于将自己的观点用反对派的语言和逻辑包装起来的手段，他的执政一帆风顺。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那就是里根为了给尼加拉瓜对抗共产党政权的叛军提供军事援助而对国会进行的游说活动。

媒体经常把里根在1981年发动的削减税收运动看成是他的重大胜

利之一。常识应当早就告诉他们，削减税收的难度无疑与在一次酷热炎炎的棒球比赛上指望有人派送免费啤酒一样不相上下。然而，说服国会同意卷入中美洲某国的黑暗内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总统所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渴望能够在4月15日喘一口气的美国人，而是公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警惕尼加拉瓜变成另一个越南的危机意识，以及一支装备落后而行动乏力的游击队伍，后者的事业与早期的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势力密切相关。里根获得成功的这一事实（尽管成功是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是他那聪明灵活的妥协策略的明证。

如同在MX导弹的个案中的做法一样，总统领导下的行政部门一开始尝试的是强行推销。在1986年春天，白宫对外联络主任帕特里克·布坎南对那些在尼加拉瓜问题上反对总统政见的民主党人连续进行了严厉谴责。在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毫不客气地给他们贴上了“北美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共同担保人”的标签，换言之，他们在他眼里都站到了莫斯科同盟一边，从敌人那里接过了口号。

这篇文章铸成了大错。它并没有起到凝聚舆论的作用，而是使得争论更加两极化。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坚持他们的主张并否决了里根的尼加拉瓜提案。许多人在这样做时都恼怒地引用了布坎南尖酸刻薄的攻击之词。里根所发起的这场争取军事援助的运动似乎正在走向失败。

到6月份，总统分析了一下形势，并且，正如在MX导弹个案中的做法一样，他改变了策略。他停止了发表要求对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给予军事援助的言论，转而开始以这项政策的批评者的姿态出现。在一次关键的国会投票前夕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他再次在原则问题上表现出赞同和妥协。

是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历史很令人遗憾。“我首先要呼吁的是牢记我们在中美洲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应当承认，在以往的岁月中，在很多时候，美国的立场没有能够同中美洲人民争取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的期望与努力保持一致。”

是的，叛乱所带来的后果中有着残忍和血腥。“我知道国会的成员以及许多美国人民都被对武装抵抗力量领袖滥用武力的指控而困扰不已。我在这一点上完全跟你们一样。即便这些指控中的某些内容属于桑地诺分子（尼加拉瓜当时执政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的恶意捏造，我也确信类似的丑恶在过去的确发生过，并且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是的，我们必须终结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无孔不入的纽带。“作为美国总统，我坚持对所有的军事力量实施和平控制，坚持任何对人权的践踏行为都应得到惩罚。我认为任何形式的腐败都必须彻底根除。美国的援助只能用于那些真正的民主事业和民主目标。美国人民决不会允许这一民主革命遭到颠覆和扼杀，同样地，他们也不允许索摩查独裁政权令人厌恶的专制统治卷土重来。”

是的，我的批评者都是满怀爱国热情的。“我知道，即便国会中对白宫的批评措辞最为严厉的议员也压根不相信桑地诺主义。我知道，国会中没有任何成员希望看到尼加拉瓜变成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

这篇演讲的措辞、结构及口吻明明白白地表明，在尼加拉瓜事件上，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双方都是有着良好意愿的。许多聆听了这篇演说的人都觉得，从用词及语言风格来判断，这篇演说更像是出自一个民主党人之手。

事实真相是，起草这篇稿子的人是伯纳德·阿伦森，他也曾经是沃尔特·蒙代尔和吉米·卡特的前演讲撰稿人。用布坎南的话来说，总统和他的下属极为明智地选择了用这一方法来赢得他们的目标，即便那意味着不得不用反对者的言论来包装他们自己的主张。这一策略的确奏效了。有30个议员转变了他们的立场，投票赞成向叛军提供援助。

通过对原则问题表示赞同，里根成功地操纵了他的批评者，并将他们最终纳入他自己的政策框架。

的确是精明之举。

传统的观点认为，政治家都喜欢维护自己的主张并且不驳倒对手誓不罢休。实际上，他们经常有着其他的偏好。比较聪明的那种人懂得不一味纠缠于原则问题而更注重具体切实的目标的达成。当坐下来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总会把原则问题与具体事项分开，然后，在洋溢着浓厚戏剧味道的氛围中，他们在原则问题上表示了自己的赞同和妥协，并收获了自己所想要的果实。

正如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所言，成功的领导人必须同时是凶猛的狮子和狡猾的狐狸。在削减税收个案中，里根所热衷的是扮演狮子的角色。而在为卷入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而努力的那些年中，他的表现完全证明，他也可以同时成功扮演狡猾的狐狸的角色。

第四部分 名声

那些久经风霜、孜孜以求的政治老手的策略和手段，无论是沿用已久还是新近独创，都足以让大多数人耳目一新甚至目瞪口呆。事实上，从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技巧很少能够在严格意义上被归纳为“正当手段”。

第十章 举灯照亮你的问题

吉米·卡特。吉米·卡特？怎么可能呢？我甚至都不知道吉米·卡特是谁，并且，据我所知，我的朋友中也没有认识他的。

——W·艾夫里尔·哈里曼

1974年是吉米·卡特担任佐治亚州州长任期的最后一年。一天晚上，当和新闻顾问杰拉尔德·拉夫肖恩在州长官邸共饮啤酒时，卡特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他将话题从他们刚才正在讨论的私人问题转移到了远景规划上。

“我们的确是有必要开始考虑这次总统竞选可以在什么问题上做文章了。我想我已经把它们都想好了，”拉夫肖恩记得他这样说道。然后，在一张长长的黄色便笺纸上，卡特把他认为是自己财富的东西都写了下来。

不是一个律师

南方人

农场主

一年有300天的时间参与竞选（将很快离任）

有道德操守

不属于华盛顿熟面孔中的一部分

虔诚信教

在那个晚上以及此后的许多个月里，拉夫肖恩以及卡特小规模的工作班子里的其他核心成员都开玩笑说，绝大多数人都会把列在黄色便笺纸上的那几点彻底看成是卡特的劣势，而不是他的优势。“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们转变成强项，”州长在那个晚上就这样说了，日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在常人看来，卡特背景中的这些因素是不利于竞选总统的，但他没有遮遮掩掩，而是选择了自曝其短。在通往白宫之路的两年的竞选过程中，他的陈述越来越臻于完美。“我并不是一个律师，尽管我对他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并且，我的儿子就是一名律师。我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工作过。我既没有当选过参议员也没有当选过众议员。我从来没有和一位民主党总统会过面。”他甚至将自己描述为一匹政治上的黑马来与听众逗乐，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最近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该测验要求人们将他们心目中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民主党人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接着，卡特会故意板着一张扑克脸，拖腔带调地念那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赫，纽约州州长休·L·凯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

“哦，这张单子上甚至还有一个佐治亚州人呢，他在民意测验中得到了1%的支持率，”他微笑着补充道，并稍微停顿一下，“他的名字就是——朱利安·邦德。”

卡特完全知道，在传统的眼光看来一个总统候选人应当是怎么样的——律师，担任过参议员或者州长，在对外政策方面富有经验。他同时也认识到，公众的态度是有着很大灵活性的。人们完全有可能接受一个在内政外交上与前任有着截然不同主张的候选人。重要的是候选人本人如何向公众解释他那不是那么符合普遍看法的履历。

卡特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同样坚信这一政治原则——做你自己的不幸消息的送信者，总比让别人来传播你的坏消息更好。

当里根在1984年的首次总统竞选辩论中遭遇沃尔特·蒙代尔时，他的差强人意的表现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质疑。最大的障碍就是他的关于社会保障并不是联邦赤字的一部分的论点。

但是，导致他落败的并不是他在首轮回合中没能抓住某一特定事实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让人们议论纷纷的是他的整体表现。譬如《新闻周刊》就说他显得“虚弱不堪”，到底是年龄不饶人，这位73岁的总统应该让路了。紧接着的几天，“早安，周一”节目的主持人也幸灾乐祸地将里根奚落了一番。即便是某些忠实的追随者当时也转变了态度，语气中明显地含讥带讽。作为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小霍华德·H·贝克就这样告诉记者：“你们在辩论中所看到的也就是你们会在内阁会议和首脑会议中所看到的。”他的批评并没有点到为止。“如果这件事的意义是让你们得到了一个突破了表面的印象，那么我得说，你们在今天晚上所得到的要比我在各种公众场合所得到的罗纳德·里根的所有印象还要多。”

一旦共和党内部乱了阵脚，一再升温的反对声浪也就压抑不住了。大名鼎鼎的众议长蒂普·奥尼尔不失时机地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白宫的人们希望尽快地恢复旧日的威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道。另一个民主党人可就没有这么含蓄了，他直截了当地说总统在辩论中“昏话满篇”。

几天之后，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把公众对里根的愤怒之情推向了顶峰。标题是“美国年纪最大的总统现在是否已老迈昏庸？”“里根在辩论中的表现导致了人们对他的执政能力的公开猜疑。”

民主党人嗅到了空气中漂浮的胜利气息。自从竞选开始之后，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了沃尔特·蒙代尔击败有着良好舆论基础的现任总统的可能性。如果里根在他们第二个回合的较量中继续犯错的话，毫无疑问，相当部分公众的眼光将会投向年富力强的沃尔特·蒙代尔。

里根的竞选班子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白宫总管詹姆斯·贝克公布了总统最近的健康检查报告，以便说明他仍旧“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的事实。他的核心顾问之一李·阿特沃特制订出了一个应急计划，以备总统在第二次辩论中的表现和第一次一样糟糕的情况下实施，那就是大肆渲染蒙代尔对社会大福利计划的支持以及对新武器系统的反对态度，对此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

阿特沃特的备忘录同时还号召里根的支持者指责竞选辩论为“古怪的仪式”，这种古怪的仪式在按照文明规则选择总统的过程中不应当有立足之地。一旦他们所担心的里根的失败真的发生，这一事实将被用“烟雾制造机”遮掩起来。备忘录中继续写道：“如果总统的表现真的很糟，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模糊这一结果。‘烟雾制造机’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蒙代尔身上，并尽可能地突出对他的负面评价。”

与此同时，经过了紧锣密鼓准备的第二次辩论开始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年龄。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只有一个，罗纳德·里根是否显示了“思维混乱”的任何迹象。

亨利·特里惠特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作为辩论现场的一员，他的问题直切主题。在举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后，他提醒观众，没有哪位总统确切地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可能不得不面对高度压力的考验，这种考验通常要求领袖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高度迅捷的判断力。里根总统觉得他自己“足以在类似的情境中担当起大任吗”？

里根对此显然早有准备。他以一种假装的严肃口吻回答道：“我在这次竞选中不会把我的年龄作为一个因素。我不想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的竞选对手太年轻、还缺乏经验的弱点。”辩论结束了。即便是蒙代尔也不得不报以一笑，尽管他知道，在充斥他周围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在竞选中曾经拥有的机会已经转瞬即逝了。

里根的重振雄风为当地和全国的新闻网络提供了一个最佳题材，所有的新闻广播都在回放那10秒钟的“原声摘要”，并且在此后的日子里一播再播。他自己的民意测验专家则从电视观众那里获得了一个积

极的反馈。一句话，这位来自好莱坞的老演员成功地搬掉了有可能阻碍他连任的唯一的绊脚石。

在消除年龄障碍时，里根同时也展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策略，那就是如果你个人背景中的某个问题被公开提起，你需要自己来解答这个问题。

你在面对面地向别人推销自己和向一大群人推销自己这两种情况下，“举灯照亮你的问题”的解决途径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无论是通过“零售”还是“批发”推销自己，持久的真理都是：当陷入疑云时，尽快地从中解脱出来。如果你做了某件你的老板不喜欢看到的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这会给他一个极好的松弛紧张情绪的机会。因为你的行动表明，你没有想方设法地对他隐瞒什么。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防止他因为从其他什么人那里得到消息而出现震惊或者极度尴尬的现象。

坏消息都有着自动传播的特性。与其坐等别人对你做出不利的安排，不如主动认错受罚。

1960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因为他的罗马天主教信仰而受到持续攻击。许多人认为，在肯尼迪对国家的忠诚和他对教会的虔诚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在这个新教徒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国家，选民过去从来没有允许过一个天主教徒荣登总统宝座。公众舆论沸沸扬扬，那就是无论教育政策还是对外政策，约翰·F·肯尼迪肯定会对梵蒂冈的指令俯首帖耳。

为了消除反对者对他的敌意，肯尼迪开始了努力。他前往一个由一群新教牧师在休斯敦召开的会议，那个会议备受公众瞩目。这一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在秋季竞选活动开始后的第一周便到得克萨斯，以一个等待评判的被告的姿态出现，主动接受那些被认为对他持最强烈怀疑态度的人们的评判。

为了重点突出此次旅行的“大卫——歌利亚”（后者是《圣经·旧约》中记载的非利士族巨人，为大卫所杀）性质，肯尼迪的竞选班子

做出了两项决定。首先，总统候选人将单枪匹马地前往休斯敦。其次，正如策划这次活动的罗伯特·斯特劳斯所回忆的，他接到林登·约翰逊的命令，在第一时间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得克萨斯传教士们“最为卑鄙、最为肮脏无耻的一面”。这样，全国的电视观众在决定将选票投向谁时就不会有丝毫犹豫了。

肯尼迪传递的信息明晰透彻而又振奋人心。他把美国描述为这样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天主教的高级教士会在这个国度里对总统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如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并且，也不会有任何新教的牧师告诉他所在教区的选民应当投票给谁。”在这个国家，他说道，“宗教自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针对某一教会的任何一个恶意举动，都会被看做是针对所有人的恶意举动。”

最后，他总结说，一旦他发觉自己的良心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这一奇特的承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对于相当部分公众来说，他们对于一个天主教总统的担忧并不是基于任何内在的偏执，而是基于很容易想象的一些紧张压力，诸如在离婚、生育控制、死刑等这样一些问题上，总统会在他的世俗事务和宗教信仰之间摇摆不定、无法抉择。而肯尼迪所做的这个承诺，使这一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

通过在休斯敦的传教士们面前出现并一一回答所有合情合理的问题，肯尼迪留给他的反对者的是这样一些不合情理的疑问，诸如，美国真的需要一个天主教总统吗？现在，任何基于宗教理由而反对他的人都看成了顽固不化者。山姆·雷伯恩在休斯敦会议前是对肯尼迪持强烈怀疑态度者中的一员，在这次会面后，他感觉肯尼迪就像一个孤身深入虎穴的角斗士，不仅避免了被吃掉的厄运，还成功地驯服了凶猛的野兽。“正如我们在得克萨斯会议上所说的，他征服了我们。”

肯尼迪聪明地“举灯照亮自己的问题”。他建立了自身将受到评判的规则，自己为自己确定了审判日期，并主动召集了评判者。借助于一种古怪而巧妙的方式，他个性中的大胆无畏注定了休斯敦审判的结果只能是无罪判决。

肯尼迪家族很快再一次运用上述法则。当总统最小的弟弟爱德华·穆尔·肯尼迪于1962年参与参议员的角逐时，他在一次电视辩论中被对手攻击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这无疑是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的致命一击。“如果你的名字是爱德华·穆尔，你甚至都不具备成为候选人的资格，”他的对手在电视辩论停止转播的最后一刻这样说道。打击是巨大的，肯尼迪如芒在脊、坐卧不安。

第二天早上，命运之神，或者说策略干预了。在剩下的竞选时间里，爱德华·穆尔将不遗余力地向选民讲述这个故事，当他在工厂门口兜圈子时，一个老工人走近他并问道，“嗨，肯尼迪，你就是那个他们在昨天晚上说的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的家伙吗？”

在确认他的眼力没错的情况下，饱经风霜的码头工人对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年轻候选人说：“哦，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没有错过任何东西。”

这个故事和两年前肯尼迪的竞选班子为他在西弗吉尼亚的总统竞选活动所制造的宣传攻势异曲同工，这样的故事总是能引起广大工人阶层的共鸣并使得他们开怀大笑。这个小故事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候选人的资格条件——这在当时是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相对不是那么薄弱的环节即财富问题上。难道任何人应当为他们的富裕而受到谴责吗？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渴望致富吗？通过直面问题，爱德华·穆尔·肯尼迪顺利地扭转了颓势。富可敌国不再是一种障碍，而是公众认可的优势。

一代人之后，同样的策略被另一个家财万贯、声名显赫的美国人再次运用。

约翰·D·洛克菲勒是一个拥有一笔比肯尼迪家族更为庞大的财产的继承者，这使他所面对的“富裕而无能的富家子”的问题注定会更加棘手。他不仅仅是一个通过继承而变得极其富有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还显示了一种趋向，那就是为了当选他会逼迫家族贡献出最后一个美元。他在西弗吉尼亚附近连续4年的大肆挥霍，在华盛顿记者中间已经传为一桩丑闻。

1985年，洛克菲勒抵达华盛顿，开始一场通向参议院席位的势均力敌的激烈角逐。首都媒体中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是如何获胜的。在刚刚过去的整个秋季，他的商业广告一直在华盛顿电视台上轮番轰炸，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首都的媒体熟悉西弗吉尼亚那块狭长的土地。为了赢得小镇哈波斯菲利的选票，他不惜花费巨资占领昂贵的新闻市场。华盛顿的市民只能猜测他在他所在的州到底投入了多少来争取更为广大的电视观众，毫无疑问，那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就当选过州秘书长，曾经两次当选为州长，现在又重金出击来赢取一个参议院的席位。因此，当风度翩翩的年轻参议员出现在华盛顿媒体基金会的年度半正式宴会上时，他并不像在家乡一样是大家的一个宠儿。大厅里的一个普通记者一年能赚4万美元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在退休时年薪能达到6万美元。然而，在那个晚上，约翰·洛克菲勒，这个来自查尔斯顿和乔治城的有钱的乡下人，巧妙地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反感和敌意。事实上，他让他们都喜欢上了他。

在轮到他致辞时，洛克菲勒一语惊人，令人久久难忘。“在座的各位中如果有谁不得不掏出75美元来购买这次宴会门票，请你想开一点。要知道，我今晚能坐在这儿的代价可是1200万美元。”

洛克菲勒验证了那条古老的法则。新闻媒体所需要的就是，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神气活现的人自己承认，他所获得的一切既不是因为辛苦的劳动，也不是由于出众的才智。他没有宣称自己有丝毫优越于他们的地方。通过这样一番表白，他被接受进了这个团体，为他在华盛顿的生涯打开了一条路。

1958年，还有一个西弗吉尼亚州人也运用过这个策略，不过，他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作为美国矿工一贯的支持者，众议员罗伯特·C·伯德在角逐参议院席位时，对获得矿工团体的认可这一点可谓胸有成竹。不过，事情好像并非如此。他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在竞选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个代表约翰·L·路易斯想要跟他会面。他隐隐约约地猜测到，这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结果真的如此。在双方见面的宾馆里，他获得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路易斯和他

那势力强大的组织将支持前州长威廉·马林竞选参议院席位。至于伯德，他们打算支持他重新当选众议员。

伯德一言不发地听完了这个决定，第二天就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发布声明。首先，他将作为候选人角逐参议院的席位。其次，威廉·马林也将参与竞选。第三，约翰·L·路易斯打算支持马林参选。

这一举动的成效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他对路易斯的决定保持沉默的话，他肯定会被巨大的压力击败。而如果他发布的声明只涉及自己，那么在马林也发布声明的情况下，他的声明肯定会黯然失色。现在，通过同时为马林和路易斯发布声明，他的移花接木之计大获成功。最终的结果是，马林决定退出这场特殊的角逐，而约翰·L·路易斯则宣布支持伯德。

“举灯照亮你的问题”的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政治选举领域。在申请任何位高权重的工作时，你都不妨借鉴一下另一位华盛顿人非同寻常的成功经验，尽管他可能不是那么出名。

在20世纪70年代，道格拉斯·贝内特曾经先后是密苏里州的托马斯·F·伊格尔顿参议员和康涅狄格州的亚伯拉罕·A·里比科夫参议员的高级助理。由于贝内特展示他自身缺陷的功夫是如此老道，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都低估了他的实力。

当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于1974年创建时，贝内特申请了其中的主管一职。在他写给委员会主席缅因州的埃德蒙·S·马斯基的申请信中，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既没有经济学方面的学位，并且在预算事务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不过，他继续解释道，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尤其是它的主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说服其他的参议员接受委员会的存在并支持它削减和消灭非必要花费的工作。毫无疑问，委员会将雇佣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大量经济学家和数字专家。但是，马斯基班子所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专家，而是一个清楚地知道如何在参议院内部寻求和培养一批委员会的支持者的主管。委员会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与参议员们熟悉并握有关于他们的倾向偏好的第一手资料。譬如，曾经担任过参议员的高级私人助理的人就是恰当的人选。

贝内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份工作，并且表现出色、游刃有余。

几年之后，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混乱的财务管理后，宣布说它聘请了一个新的总裁。《华盛顿邮报》对这个千挑万选出来的佼佼者进行了专访。道格拉斯·贝内特解释了自己能荣任这个职位的可能原因。

他承认他在广播或新闻方面都没有什么背景。他说他知道国内公用无线电台早就已经拥有大量有着丰富广播经验的人才和众多的资深新闻记者。国内公用无线电台总裁的职位，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预算管理并能够在国会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争取到足够财政资助的人。

“举灯照亮你的问题”的法则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是不胜枚举的。例如，身体有着明显残疾的人通常会令其他人在与之交往时拘束不安，然而，如果能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平和心态甚至轻松的口吻主动谈及这一点，对方的心情也会随即放松下来。

巴巴拉·A·米库尔斯基是第一个获得参议院议席的民主党妇女，她在1986年凭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作为某个政要的遗孀或女儿当选。这位来自巴尔的摩的活跃的前市议会女议员终于赢得了成功，尽管她的反对者曾经以她是否有损参议院的“形象”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成为指责把柄的不仅仅是她普普通通的政治背景，同时还有她的身高。米库尔斯基身高仅为4英尺11英寸（1.49米）。

她在政治竞选活动中抛头露面时的标准道具是一个两边为波纹状的铝质的小手提箱。她把这作为自己的讲台。当别人以极其简单明了的方式将她介绍给听众时，她的话就像从机关枪里射出来一样又快又急：“这个介绍和我的身材一样短小。”

凡是从事过公共关系工作的人都会深有体会，那就是不论涉及的是你的客户还是某件产品，主动承认问题都会更加有助于事态的解决。泰莱诺尔的制造商在因瓶子事件成为牺牲品之后，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原则蕴涵的智慧。通过公开坦荡地直面问题而不是遮遮掩掩，他们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和尊敬，股票价值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由

于管理层在明知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仍旧对公众报以诚信，实事求是地介绍存在的隐患，他们及他们的产品在公众中树立了极其良好的形象。

吉米·卡特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在其白宫岁月结束之后这样写道：“放弃你个人一相情愿的想法，主动提供那些注定只能给你带来麻烦的消息，这当然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但是，正如鲍威尔在伊朗人质事件以及其他危机事件中所学到的，这也是事实证明的唯一可行的缓和并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论事态在一开始有多么糟糕，一味拖延的结果只能使它变得更糟。”

遗憾的是，罗纳德·里根并没有从他的前任们那里学到这一原则。当1986年底伊朗门事件在公众面前曝光，媒体揭露了他的代理人曾经秘密向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出售武器的事实时，里根的第一反应是尽量进行遮掩，然后他又把责任推到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头上，接着，他又把责任推卸给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T·里甘。最终，4个月之后，在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降低2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他才承认了错误。

事实上，他早该从历史上学到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约翰·F·肯尼迪执政时期，他在全国民意测验中得到的支持率从来没有像在他为猪湾事件独自承担起全部责任后的那一段时期那么高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里根的畏首畏尾导致他在数个月中惨遭媒体围攻，并由此导致了国会调查，而肯尼迪主动承担责任以便减小损失的果断举动则使他的支持率大大飙升。“通过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他的助手特德·索伦森这样写道，“他同时赢得了专业人员和公众的尊敬，避免了党派性的调查和攻击，并由此阻止了进一步的指控。”

由于在谁应当为向伊朗出售武器承担责任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躲闪推诿，罗纳德·里根自己为自己挖下了陷阱。一点一点地，内幕被逐渐揭开；一点一点地，总统的信誉日益下降。为了对他如何缓慢地在羞辱中回归诚实这个过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不妨来比较一下下面两份对公众发表的声明，它们都是里根在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公布

的。

1986年11月13日：“指控认为，美国将武器用船只秘密运送到伊朗，作为释放美国在黎巴嫩的人质的赎换条件，美国出卖了他的盟友并违反了禁止与恐怖分子进行非法交易的政策。这些指控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987年3月4日：“几个月之前，我告诉美国人民我没有为了人质而出售武器。我的内心和我最良好的意愿仍旧告诉我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和证据告诉我并非如此。现在，当你犯了错误时应该是这样做，你承担起责任，从教训中学习，然后继续前进。”

5个月之后，总统恢复了正常。有趣的是，他的第二篇演说稿出自兰登·帕文之手。在6年前，同样是这位演讲稿撰写人曾经帮助南希·里根解决了一个严重的公共关系问题。

在她入住白宫的第一年，里根夫人曾经被媒体描绘成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式的人物，对设计师设计的时装的关注远胜于对她的国家的关注。

里根夫人在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破除了外界对她的消极印象，当时她出现在一个云集了华盛顿所有著名记者的正式晚宴上。由兰登·帕文亲自为她谱写歌词，她声情并茂地高歌的一曲经过改编的“二手玫瑰”，赢得了满堂喝彩和如雷的掌声。就这样，这个因为抱怨白宫瓷器质量而备受指责的女人，这个被认为是只对时装感兴趣的女人，证明了自己并非贝弗利希尔斯（好莱坞影星集聚地）孤僻冷漠、高不可攀的女王，那是她惯被媒体描绘成的形象。

在此后里根总统的任期内，她的支持率持续攀升并一直居高不下。

已故的罗伯特·F·肯尼迪习惯于通过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无情的人”从而消除听众的敌意，南希·里根也像他一样，学会了举灯照亮她的问题。

几年之后，一个很有希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采取了跟南希同样的策略。作为198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主要发言人，阿肯色州长比尔·克林顿抵达了亚特兰大。当他大步走向讲台时，乐队正在演奏昂扬激越的《烈火战车》的主题曲。与周围热烈的气氛相反，比尔·克林顿的心却在越来越往下沉。从最初的几分钟开始，他就知道没有人在听他的演说。在煎熬了可怕的32分钟之后，他总算获得了台下的第一片掌声，他当时说的是：“最后……”

第二天晚上，约翰尼·卡森就用这个有着不可思议的煽动性的词（指“最后”）作为他的独角戏的开场白。他顺便还借题发挥，开玩笑说美国卫生局局长已经同意把克林顿在亚特兰大的演说作为一种“非处方安眠药”。

第二个星期，克林顿举灯照亮了他的问题。帕尔斯·哈里·托马森和他的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用计让他在“今夜演播”中做了一回客串。他技艺娴熟地演奏了萨克斯管，讲了几个关于他自己的笑话，一下子使公众形象大为改观。正如传记作家大卫·马拉尼斯所指出的，并且克林顿本人也表示赞同，更多的人是从他对卡森的对应动作而不是从亚特兰大的演说中认识他的。

第十一章 旋转你的角色

你将和总统共进午餐。菜单上的主食就是屈辱。你将低声下气、忍辱含羞地把它吃得一干二净。你将是历史以来最为懊悔不迭的浑蛋。

——詹姆斯·A·贝克三世

1992年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结束后的那天早上，我跟我的“早安，美国”节目的辩论搭档比尔·贝内特一起坐在美国广播公司四面绿色的房间里。突然，一个穿着蓝色套装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是神采飞扬一脸自信的比尔·克林顿。他随手抓起一个油炸圈饼，然后开始轻松随意地和贝内特侃侃而谈，很显然他们是一对老朋友了。过

了一会儿之后，一个态度谦和的人从同一个入口进来了。走近我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问我他是否能从刚才比尔·克林顿拿油炸圈饼的盘子里拿一个饼。他的肩膀上斜挎了一个大学男生常用的书包，从外表上看，一点都不像是刚刚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

与此相应，比尔·克林顿的表现也一点不像是刚输掉了预选。他有什么必要垂头丧气呢？通过表现出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克林顿让其他人也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彻底忘掉了保罗·聪格斯——那个挎着书包的家伙曾经以整整8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他。在第二个回合的较量中，他为自己打出了“卷土重来的孩子”的旗号，并一举扭转劣势，以大比分胜出。通过在他的问题上挂一盏灯，包括逃避兵役的证据和女歌手珍妮弗·弗劳尔斯发表的关于两人之间长期非正常关系的公开声明，他重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赢家。

和华尔街上的任何一个分析师谈话，你都会听到大量故事，讲述公司如何不计时间、精力和花费，竭尽所能地调节人们对他们的业绩的期望心理以及相关反应。当他们的股票价格上扬时，固然是好消息，当股票价格下跌时，则意味着见利抛售或见利补进，所以同样是好消息！

政治家把这种策略称之为旋转你的角色，让对手退场。

1984年，作为候选人的沃尔特·蒙代尔在民主党内的提名竞争领先。他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谨慎的运动，旨在加强他的领先地位并使他的提名成为定局。在艾奥瓦州举行的党内领导人会议上，在第一回合真刀实枪的较量中，蒙代尔以49%对16%的绝对优势击败了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加里·哈特。

但是，当年轻、没有经验的新生代候选人哈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较量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一周以后，在缅因州的党内领导人会议上，哈特再次超越蒙代尔。

这时距离超级星期二，也就是1984年的民主党内预选大会举行的日子——这也是蒙代尔计划赢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日子——还有

两天。但是，哈特正在把他当做早餐逐渐蚕食，在马萨诸塞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角逐中，哈特都是一路遥遥领先。即使是戴德郡也打算在投票中反对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竞争者，尽管他是休伯特·汉弗莱所维护的对象。如果蒙代尔能够赢得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胜利并最终在党内预选大会上胜出，那只能说明他太幸运了。

蒙代尔的竞选主管罗伯特·贝克尔清楚地知道，佐治亚州的失败将是灾难性的。曾经担任过吉米·卡特副总统的蒙代尔在吉米·卡特的家乡竞选遭到失败，会是无法解释的。

贝克尔应用了旋转的策略，这也是“举灯照亮你的问题”那一策略的狡猾、聪明的延伸。首先，你得承认你遇到了危机。其次，当公众还买你的账的时候，迅速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烫手的山芋扔给对手。

下面就是贝克尔在超级星期二中运用的策略。如果佐治亚州的失败意味着导致全国的失败，那么反过来也一样，佐治亚州的胜利也可以认为是全国的胜利。如果蒙代尔赢得了佐治亚州的胜利，那将意味着他打通了通向白宫的道路。

在民主党预选大会前的36小时内，贝克尔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记者传递着这样一条信息——为了赢得竞选，蒙代尔必须拿下佐治亚州。如果他失去了佐治亚州，他就完蛋了，但如果他赢了，他就能击败哈特。

为了超级星期二民主党预选大会，贝克尔还准备了另一个方案。也许蒙代尔在会前处于劣势；也许他在那些对大会结果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州缺乏支持，但是，媒体仍然需要预选大会的新闻。尤其是全美广播公司专门安排了一个在东部标准时间晚上10点钟报告超级星期二最新结果的一个小时长的特别节目。

贝克尔想要确保这些新闻报道看起来对蒙代尔十分有利。虽然他的候选人在那几个主要州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但贝克尔仍然能在首都召集足够多的、能够引起媒体关注的人参加大会。他给大华盛顿地区每一个他所认识的蒙代尔的支持者打电话，以确信他们能在预选

大会当晚赶到希尔顿国会大厦。他告诉他们：“你们和弗雷兹站在一起，这是一个他需要你们的夜晚。赶到那里去吧，成败就靠你们了。”

一大群数量可观的“蒙代尔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每一个专职的竞选工作者、每一个正在寻找业务的华盛顿律师、每一个所能找到的民主党支持者都集中在大厅熠熠闪光的媒体聚光灯下。

这个蒙代尔的智囊（指贝克尔）采用了杰里·布鲁诺曾经运用过的策略，这一策略曾经在1960年成功地造就了著名的约翰·肯尼迪。具体而言，就是使用隔墙把房间分割得尽可能小。贝克尔后来：“我们建起了一道围墙，使房间的面积只有大厅的三分之一，整个房间简直拥挤得无立锥之地。在他妈的这么狭窄的地方，你动也别想动。”

为了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选举夜晚，还专门搭起了音像舞台。蒙代尔输掉了9轮角逐中的7场。但这仅仅是机械的数字而已。当10点刚过去几分钟的时候，竞选主管罗伯特·贝克尔走进这个看起来像一个拥挤的舞厅的地方，告诉那些忠实的支持者说蒙代尔刚刚拿下了佐治亚州。对那些国家广播公司的听众来说，这真像一个胜利宣言。

贝克尔的旋转策略运用得极其成功。超级星期二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当他去参加一个叫“今日”的直播采访节目的时候，贝克尔受到了布赖恩特·甘贝尔的热烈祝贺。这位神采飞扬的客人高兴地说：“是的，我们又赢得了优势。”

贝克尔通过两个步骤实现了这个新闻策划的奇迹：通过公开承认所面临的困境，他建立了自己的媒体信任度；通过用尽可能最有利的方式来说明这些事件，他建立了短暂真实性。通过告知媒体佐治亚州的失败会导致蒙代尔的彻底完蛋，他就能在他的候选人仅仅在一个事先被忽略的预选州取得胜利后，宣布他的候选人取得了超级星期二的胜利。

通过提前一步跨越最后的结局，到处都可以运用旋转策略。一旦用“举灯照亮你的问题”的策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诚实的游戏者，你就能利用这种可信度了。

旋转策略在政治中并不新奇。多年前一个焦头烂额的年轻政治家用它实现了一个更为戏剧性的逆转。

1952年9月22日，一个39岁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正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由波兰飞往洛杉矶。第二天夜里他将要发表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演说。从他前面的座椅背后，他抽出一叠明信片，开始在上面勾画他的计划。

“西洋跳棋……帕特的布外套……”

这个年轻人正准备捍卫自己如日东升的事业，驳斥对自己腐败的指控。正如一个聪明的政治家能够仅仅通过承认自己面临困境从而控制局势一样，这个狡猾的年轻人学会了迅速地实现把这种承认转变成优势的战略转变，从而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地方上去。

如果说有人需要旋转策略，这个人就是理查德·尼克松。早在6年前，他靠攻击他的政敌和美国左翼联盟，顺利地进入了众议院。他揭露了阿尔格·希斯的共产主义情结，并在1950年通过给人扣上“赤色主义”的帽子进一步挺进参议院。两年后，他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和美国二战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搭档竞选总统。现在尼克松正处在一个政治风暴的中心。4天前，那时还是自由主义报纸的《纽约邮报》打出了醒目的两行标题：“神秘富翁的信托基金使尼克松的所得远远超出他的薪水”。

最初这个年轻的加利福尼亚人感觉自己很迷茫、无助。当他的竞选列车被剧烈的批评者围攻的时候，他拼命地试图将这次基金丑闻归因于早些时候自己在攻破西斯案上取得的成功。“自从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共产主义者和左翼联盟总是想抓住任何无中生有的污点来攻击我。”

人们很可以理解尼克松没有保持冷静。首先，遭到质疑的尼克松的基金问题和其他政治家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且，他没有把该基金中的一分钱装入个人腰包。但是，这些理由在这时候似乎都无关紧要了。这个总是通过制造混乱、乘机浑水摸鱼而发迹的政治家，现在发现自己正处在政治风暴的中心。

在随后的几天内，要求尼克松放弃竞选的压力日益增大，公众的抗议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在周六，也就是9月20号，共和党的主要媒体《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刺目的评论：“在这件丑闻中，参议员尼克松唯一能做的就是发表正式声明，退出竞选。”

无论走到哪里尼克松都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标语：艾森豪威尔希望他退出竞选。同一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邀请参议员威廉姆斯·F·诺兰加入竞选阵营，他也是加利福尼亚州人，也以反共著称。至此，尼克松的接替者已昭然若揭。当媒体问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是否会继续参加竞选时，他告诉媒体说他的竞选搭档必须是和“猎犬的牙齿一样清白无辜的”。到了星期天，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来。一个在共和党内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哈罗德·史塔生，给尼克松发了一个电报，催促他赶紧声明退出竞选。

作为艾森豪威尔竞选班子的幕后关键人物，州长托马斯·杜威给了尼克松一个建议。他认为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在全美广播公司新闻播报节目中请求美国人民的原谅。如果他这样做的结果是60%的人支持他而40%的人反对他，那就意味着形势不妙。“但是，如果有90%的人支持你，而反对者只有10%，你就应当继续坚持。”尼克松预感到自己似乎快要完蛋了。稍后一点，艾森豪威尔本人又打电话来说：“告诉人们你想说的一切，告诉他们从你政治生涯开始你所能记得的一切，告诉他们你曾经收到的每一分钱。”艾森豪威尔坚持道。

“将军阁下，你是否认为在这次电视节目之后，事情会有可能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尼克松问艾森豪威尔。

“也许是吧。”后者回答说。

尼克松看着天花板说：“在这种情形下，结果就是这样，要么你占着马桶，要么就马上滚蛋。”

艾森豪威尔从他还是一个低级军官的时候就不喜欢听如此粗俗的言语，马上不高兴了。“请闭上你的臭嘴。”他说道。

尼克松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准备演说。当离节目开始还有4个小时时，他就打算离开饭店了。此前他一直在和他的长期竞选总管默里·乔蒂纳以及他未来的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商讨如何才能动员听众来支持他，从而赢得党内提名的胜利。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是一个叫“查普曼先生”的人打来的，尼克松知道这是杜威州长的别名，勉强拿起了话筒。

杜威：“艾森豪威尔的所有高级顾问们已经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让我转告你，在他们看来，你应该在转播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递交退出辞呈。”

尼克松没有答话。

杜威：“喂，你在听电话么？”

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本人的意见怎么样？”

杜威：“我应该告诉他们你准备怎么做。”

尼克松：“你就告诉他们我对自己将要如何做还没有一丝头绪，如果他们想知道结果的话，让他们收听广播好啦！并且转告他们，我是懂得政治的。”

那天夜晚，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电视观众，据估计有5800万人面前，尼克松让他的政敌们大吃了一惊。

站在一张桌子前面，他开始了他的演讲：“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今天晚上以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你们面前，同时，我也是作为一个正直和诚实受到质疑的人出现在你们面前。”

接着，他向他的巨大、狂热的观众们交了他的“彻底的财产账”。尼克松把观众带回了他的年轻时代，并列举了他的所有财产。

一辆1950年产的老式汽车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价值3000美元的房子一所，目前他的父母居住在那里

一套在华盛顿价值2万美元的住宅

没有任何股票，没有任何证券以及其他任何东西

在他富有感染力的极其戏剧性的演说中，尼克松很得体地展示了自己。当时的美国家庭仍然把自己的财产状况看成是一种秘不可宣的个人隐私，而尼克松实实在在地告诉美国人民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在那个抵押被看做是很丢人的事情的年代，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布了他所有的债务。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对此曾经有过精彩的描述：“很显然，那些跟他一样为如何矫正孩子们的牙齿、更换壁炉以及偿还分期债务而忧心忡忡的观众，那些深有同感的人们，他们彻底被他征服了。”

尼克松同时还应用了旋转策略。他毫不避讳他需要外界的帮助，也承认仅靠自己的力量他很难办好任何事。如果能像民主党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雷·E·斯蒂文森那样，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来竞选公职，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任何一个出身平常、没有万贯家财的人也应该能够参加角逐。通过向人们坦白自己微薄的财产，尼克松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讨论人的诚实与否转移到了阶层出身上。在向人们公布了自己的整个财政状况后，尼克松说：“我们的钱并不多，但帕特（尼克松的妻子）和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每一分钱都确实是我们自己的。我想我还得说说这个，帕特虽然没有貂皮外套，但她却有一件让人尊重的共和党布外套。”

尼克松恢复生机了。他描述了有人如何送给他的女儿特里西娅一

只英国小猎犬，并且特里西娅如何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西洋跳棋。“现在我只想这样对大家说，无论他们说些什么，我们都将坚持到底。”

这些仅仅是初步的动作。那些以为自己记住了“西洋跳棋的演说”的人们却忘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在无所顾忌地展示了自己的灵魂以后，现在这个饱受批评的候选人终于可以利用他所赢得的大众信任度了。他要开始猛烈地反击了。他没有仅仅停留在被动的防守上，他咄咄逼人的言词直指那些指责者。

“现在我要给那些吹毛求疵者一些建议。首先，你们已经读过关于其他基金的文章。斯蒂文森先生目前有两个这样的基金，我认为斯蒂文森先生应该做的就是和我一样，站到美国人民面前来，把那些向该基金捐赠过金钱的人们的名字告诉他们，把那些一边把这些金钱中饱私囊一边又从美国政府获得资助的人的名字告诉他们，同时让我们看看，他们用这些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如果有什么好处的话。”

接着他又开始攻击他竞选副总统的对手。“对于斯帕克曼先生（阿拉巴马州的约翰·J·斯帕克曼参议员），我也建议他做同样的事。他把他老婆弄进了拿薪水的名册中，我并不想为此而谴责他。但是，我想他也应该站到美国人民的前面来，向他们解释清楚他所有收入中的那些外来部分是怎么回事。”

尼克松把话题从候选人的行为不当转移到了他们是否愿意自我揭露、自我检讨。通过公开那些有辱身份的丑闻，他为官员们建立起了一个标准，那就是要公开自己的财政状况。在这场竞争中，尼克松在其他入还没有离开起跑线的时候就已经冲过了终点线。

旋转策略现在达到了顶峰。“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我建议斯帕克曼先生和斯蒂文森先生都应当站到美国人民面前来，就像我所做的那样，向美国人民讲清楚他们的财政状况。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需要隐瞒。”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需要隐瞒！当听到这一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在克里夫兰收看电视直播，由于震惊，他居然把正在做笔记用的铅笔猛地插入坐椅的垫子中。尼克松所说的似乎直指自己。如果人们要求候选人将他们的纳税情况以及其他材料公开，这将包括艾森豪威尔自己本人的秘密基金，特别是那些国会已经立法禁止使用、但自己仍从中接受金钱的战争纪念基金会。

第二天早晨，这个大人物（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西弗吉尼亚州会见了这个以全新面目出现的老谋深算的朋友，并向他大声叫嚷：“你真是好样的！”

这段西洋跳棋似的插曲表明：一旦你提高了大众信任度，你就能够控制局势并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应用旋转策略。

就旋转策略而言，再也没有人能够比里根总统第一个辉煌的任期内的媒体专家戴维·A·斯托克曼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的戴维·A·斯托克曼事件。

整整一年中，新上任的总统行政班子都在致力于驳斥民主党的攻击，后者指责总统的财政政策将给政府带来巨额赤字，以及政府的税收政策向富人倾斜。作为反击，12月份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采访戴维·A·斯托克曼的长篇文章，在该文章中，这位里根的预算主管承认民主党的攻击实际上是正确的。下面就是这位总统的首席财政顾问亲口所说的。1981年度的税收削减政策和五角大楼庞大的军费开支之间“并不是那么一致”。“这些事件是独立运作的，税收政策决定着政府的财政来源，而国防政策，它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计划而已。”斯托克曼这样跟采访者威廉·格雷德说。

斯托克曼大胆地承认，通过在账面上的瞒天过海——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小伙子喜欢将这称之为“神奇的星号”，整个预算草案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张废纸。换句话说，总统的行政班子认为财政赤字可能减小的唯一原因是：预算主管的记录表明总统将在日后的某个时间宣布削减预算。也可以这么说，现在只管花，以后补上就行。事实是，预算主管对如何削减赤字压根就是一筹莫展，“没有人真正知道所有这

些数字将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这届“保守的”行政班子的财政赤字的可信度，这些话无疑是猛烈的攻击。

斯托克曼对税收政策的曝光就更令人尴尬了。几个月以来，总统一直强调他的减税政策是非常公平的，该政策的目的是使普通纳税者能挣得更多。但是当人们发现税收政策是向富人们倾斜时，对它的抨击声就像连珠炮一样的不绝于耳。现在，斯托克曼的一番话语显然使得攻击的火力更猛了。斯托克曼指出，总统的税收政策的意图是：将高收入者的税率从70%调整为50%。为了“把这道美味做成政治糕饼”，该政策也将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纳税率。整个纳税政策就像一个“把富人们的纳税率降下来的特洛伊木马”。

正是最后一个比喻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随后公布的政策上。

为了控制政府公众形象的破坏程度，白宫主管詹姆斯·贝克精心设计了一个了不起的旋转策略。该策略还是使用通常惯用的两部曲。首先，承认你遇到了麻烦，以便建立大众信任。然后运用这个已经增强的大众信任度，以一种可以将政治危害减少到最小的方式来处理你所遇到的麻烦。

正是斯托克曼本人给这个旋转策略进行了必要的包装。根据这位预算主管的备忘录的记载，他被叫进贝克的办公室，并被告知他有一个可以保住他职位的机会。“你将和总统共进午餐。菜单上的主食就是屈辱。你将低声下气、忍辱含羞地把它吃得一干二净。你将是历史以来最为懊悔不迭的混蛋。”

最重要的是，斯托克曼将要向白宫的新闻媒体展示这种悲哀的姿态。“当你经过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口时，我想看到你这个蠢驴摔倒在地毯上。”

作为里根行政班子的核心人物之一，斯托克曼清楚总统的顾问们

赋予这样一个比喻的重要性。他知道正是由于他使用了“特洛伊木马”这个比喻，给原先的故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由于在这次发言中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现在他不得不遵循同样的规则走出困境。

当他还是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农场的小孩子的时候，他手头就经常有一些聪明的比喻。“如果他们（里根总统的公共关系顾问）不知道现实和一个比喻之间的区别，我会把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告诉他们。一个反喻。一次令人颜面扫地的训斥。一个自找的公开的侮辱。”斯托克曼告诉媒体说，他曾经被他的老板兼教父，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声色俱厉地训斥过、羞辱过。

整个华盛顿地区的媒体沸沸扬扬的风言风语由此告终。就如同是一个很小但很细致铺排的戏剧，白宫的公共关系顾问们通过利用斯托克曼提出的这个顽皮孩子常用的比喻，成功地把整个媒体的关注焦点转移了，从对不健全的财政政策毫不留情地揭露转移到了一幕小肥皂剧：一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是如何出卖一贯对他信任有加的老板和精神导师的。

旋转策略的基本原理是引人注目的。针对媒体的揭露引起的尴尬处境，唯一的途径就是矢口否认。但斯托克曼拒绝这样的矢口否认，他的发言被飞速地传了出去。因此，把媒体关注的焦点从预算审定转移到背叛出卖，这是至关重要的。解决背叛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补救，由此也就有了斯托克曼被严词训斥的自白。对大量不知内情而又不加分析的公众们来说，道德的比喻总是比科学的事实更有趣，更吸引人。

采访白宫的记者们迅速落入了圈套。有人向佩特·奥莉芬特和她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可用作社论卡通的极好的题材，他们采纳了它。一个乡村小男孩，也就是小戴维·斯托克曼，泪流满面地从一幢丑陋的小建筑物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旁边站着一个冷酷的大人，他正在挥舞手中用于惩罚小戴维·斯托克曼的工具。读者的目光都被醒目的标题所吸引——“惩罚之旅”。

仅仅在数天内，白宫的旋转策略就完全控制住了局势。当然，这

中间不乏一些关于斯托克曼所揭露的事实的经济意义的流言蜚语，但这些都隐藏到政府的财政计划中去了。电视晚间新闻和报纸的头版头条所津津乐道的是那个关于被严词训斥的滑稽的卡通剧。斯托克曼的恶作剧意味着他承认严重违反了他对工作应有的忠诚——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的承认——通过这一手法里根的顾问小组成功地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一个他们能够应付的事件上。他们甚至将总统塑造成一个既威严又仁慈的形象，从而成功地使他在人们心目中得分不少。现在这个可怜的回头浪子又开始重新为这个老头工作了，他感到一些羞辱，可心里对总统仁慈的品性又有那么一点点感激。背叛给自己带来的首先是惩罚，随后是懊悔，最后是赦免。

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和几乎任何组织都可以运用这种旋转策略。如果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对某事运用旋转策略就相当于认罪辨诉协议（检察官与刑事被告或被告律师达成的由被告承认轻罪以便减轻处罚）的一次练习。当面对指控的时候，律师们总是告诉他们的当事人向法庭认罪，但要求法庭从轻量刑。在斯托克曼这个特殊的案例里，我们被告知犯罪是个人所为，而并非国家所为。他所犯的错误是对他的政治导师，也就是里根总统的信任的背叛，他的所作所为是应当受到适当的惩罚的。

事实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对于那些指责者来说，在任何时间里，他们的脑子里只可能有一个想法，他们试图证明你有罪，但又担心你在法庭上永远都不会受到类似于我们在有关司法审判的电影戏剧里看到的那种斩钉截铁的严厉谴责。似乎只有在《佩里·梅森》这部戏剧里头，罪犯才自己在法庭里站起来，大声承认自己的罪恶。

使用旋转策略的乐趣在于告诉指控者他非常正确，从而使指控者认为他所指控的都是对的，由此在洋洋自得中获得自我满足感。

在1987年，杰西·杰克逊就是这么干的。

在华盛顿特区一次精英云集的正式的筹款会议上，他向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大献殷勤。杰克逊说布莱德利是他最崇拜的几个英雄之一，因为布莱德利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的种种陈词滥

调。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一名职业篮球明星。尽管受到种族困扰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他还是努力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比尔·布莱德利的故事，这个年轻的白人是如何顶住世俗和舆论的压力，并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的。

“他的邻居们都看不起他，他的朋友们也耻笑他，但他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了下来。比尔是注定要成功的，直到最后他终于打破了种族观念的枷锁，并成为美国职业篮球界最伟大的球星之一。”原本还摸不着头脑的听众在听了杰克逊这一番讲话后，开始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当比尔第一次大声地向人们说出他的梦想的时候，他学校的指导顾问们竭力试图打击和挖苦他，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知难而退。最后，他的一个指导顾问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了他生活中的事实。‘比尔，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这和你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不管你每场比赛能得多少分，不管你能得到多么惊人的喝彩，但你终究不能成为一个顶级运动员的，因为你是一个白人。’”

当杰克逊以坦率直白的语气说出最后一段话时，在场的民主党听众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但杰西·杰克逊已经极富戏剧性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作为下一届总统的角逐者，杰西·杰克逊承认自己在竞争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阻碍。但是，他简洁清晰地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他激进的政治立场或者他设计的竞选观点，而仅仅在于他的种族出身。

这正是一个旋转策略应用的得意之作。当那些衣冠楚楚的听众走出希尔顿国会大厦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仅是杰西·杰克逊用讽刺的语调给他们讲了一个好玩的笑话。但实际上，杰克逊所做的远不止此，他已经为他的第二次总统竞选活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是的，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是有弱点的，但他——杰西·杰克逊，却不会因为这个弱点而受到指责。

在如雷的掌声和连绵不绝的笑声背后，人们开始为自己的怀疑而负疚——因为总统候选人是对的。

第十二章 记者就是敌人

我说得没错，我在这一点上就是偏执多疑，最好是应该偏执多疑。

——威廉·萨菲尔

1991年的秋天，比尔·克林顿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鲍勃·凯里将要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民主党筹款大会上发表演说，但离开会还有些时间，因此双方闲聊以消磨时间。每一方都试图用自己最新、最搞笑的笑话来压倒对方。凯里参议员是一个受过多次伤，并且留下残疾的越战退伍老兵，他讲了一个关于他俩共同的对手杰瑞·布朗的笑话，杰瑞·布朗在他两度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因不和其他人保持正常联络而出名。

这个笑话讲述布朗有一次走进一家酒吧，并注意到有两个迷人的女人也坐在这个酒吧里。当布朗要向那两个女人走过去的时候，酒吧里的男招待警告他不要企图去骚扰她们，并告诉他那两个女人是同性恋。这个笑话的后半部分并没有这件事的前半部分精彩，因为一个暗藏的麦克风正在录制凯里说的每一句话。

震惊于事件的本身，并确信那段被录音的话被四处传播只是一个早晚的时间问题，我核实了这个故事并把它编进了第二天的《旧金山观察》的最后一版。

我的报道所没有反映的部分（因为我并不知道）是：那天晚上，两个候选人，即克林顿和凯里都讲了这样粗俗的笑话。虽然凯里的新闻秘书迈克·麦克柯里拼命地劝说他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然而，为了保住自己仅存的荣誉和大众信任度，凯里宁愿永远保持这个秘密并守口如瓶。麦克柯里未来的老板，也就是比尔·克林顿，任由他的竞争对手为自己所说的同性恋笑话付出惨重代价，在秋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可是，对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不光彩角色，克林顿却不置一词。

从来自阿肯色州的那个家伙后来的情况看（指克林顿日后的性丑闻），这次事件对凯里这个内布拉斯加州人的说明还不如对后者多，但它的确毁掉了凯里的竞选活动，特别是在克林顿竞选班子接下来便说他“毫无品位、粗俗不堪”之后。

永远不要忘记，新闻记者们是在黑夜的桌子上度过他们的学徒生涯的。当一起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或者一起惨绝人寰的车祸发生时，都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这些行动敏捷、善于捕风捉影的杰米·奥尔森类型的记者，驱车赶到刚遭不幸的死者家中，向其亲属索求“近期照片”。在提出这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要求之后，他们会漠然地无动于衷地站在走廊里，等候逝去的亡魂的照片从家庭影集册里拿出来。

对于这些低级的新闻记者，你必须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你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刚刚从这一行业的训练营里出来，事业才开始起步。这些刚从事新闻工作、地位卑微、对自己的行业一知半解的新闻记者对采访都非常饥渴，为了所谓的扬名立业他们不惜绞尽脑汁、辛苦钻营。

虽然这样说显得有点刻薄，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本书不是为新闻系的学生们编写的，它是为那些一旦抛头露面就会被跟踪盯梢的公众人物写的。

你也许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看着一些商业人士在《60分钟》节目里被主持人犀利尖锐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洋相百出，不禁在心头纳闷，为什么这些有着比飞蛾更大的脑子的人会愿意接受采访呢？他们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聪明得足够使自己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的人，这些在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中运筹帷幄的人，愿意到这里来栽这样的跟斗呢？我在这一点上对他们有着更多的同情。我一直在问自己，在最后切中要害的有力反击前，为了活跃气氛，这些受害者不知道要浪费多少制作者的磁带，回答多少无聊的问题，浪费多少宝贵的时间和这些所谓的新朋友们——麦克或艾德或戴安娜们闲聊以进行热身呢？

事实是：你的生意做得越好，你的位置越高，你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媒体前面站着装瞎子。每天，你必须品尝那些难以忍受的、难以下咽的苦果，就如同政治家们每天所必须做的一样。

在这一点上，政治家们肯定是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的。作为一群随时都可能由于自身的公众形象而丢掉饭碗的人们，那些善于应付媒体的政治家们想必永远不会忘记，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破坏远远要甚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造就。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机枪手·乔”麦卡锡变成了一个现代的美国政治煽动家，他与采访希尔顿大厦的那些新闻记者像牛皮糖一样难缠的习性和紧张、激烈的角逐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罗纳德里根也是利用媒体的大师。但是，正如人们在许多晚间新闻节目中所看到的一样，里根同时也坚信另一条铁一样的原则——“说话只是为了更好地沉默”。当他富有戏剧性地大步穿过白宫南草坪的时候，不会没注意到那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然而，他一边职业性地笑着，一边把手弯在他完全敏锐的耳朵上，装作在尽力听清楚远方的记者们到底在问些什么。当直升机的螺旋桨声音变得震耳欲聋的时候，他一边故作遗憾地摇摇头，一边向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们作出“对不起，伙计们，我得走了”的遗憾表示，然后大摇大摆地登上了直升机，飞向戴维营或圣巴巴拉，成功地摆脱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他们在职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时，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迎合新闻媒体，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直升机的螺旋桨可以掩护他们轻松地逃脱媒体的纠缠。为此，他们必须记住这个虽然曲折但很有用的定律，它因理查德·尼克松而著名——记者就是敌人。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这话说得太刺耳了，那就让我用一种更加委婉的方式来表述吧，要时刻记住，这些人是靠什么谋生的。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编造好听的故事，并且，在他们这一行里，通常的规律是只有坏消息才能够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失败、不幸、灾难，只有这些东西最能刺激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神经，而这些故事往往是要伤害人的。

请看看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个案吧。

1986年7月，白宫主管唐纳德·里甘正在就政府对南非的政策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那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好几个月以来，政府一直在顽强地抵抗来自国会和公众的压力，坚决反对对比勒陀利亚（南非首都）实行经济制裁。唐纳德·里甘千方百计地试图向人们传达这样一条信息：禁运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多种难以意料的后果。他问道：“难道所有的美国妇女都准备好放弃她们所有的首饰珠宝了么？”

唐纳德·里甘显然不是傻子。他极其有策略地向人们指出了禁运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诸多还没有公开的经济影响。并且，这次新闻发布会是受到一套严格的幕后规则约束的。这个白宫主管的新闻发言被清楚地定位为“背景情况介绍会”（所介绍的情况允许发表，但不得提到来源）。参加发布会的新闻记者们可以泛泛地把这些评论归结于某些“政府官员们”所说，但不得提到唐纳德·里甘先生本人。

但是，对于这个来自美林证券公司里的里甘先生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幕后规则并不是铁板钉钉的。无论规章制度建立得多么完善，它们总存在一些漏洞，允许时不时的例外发生，一个记者完全可以声称他不必受这些规则的约束。

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早晨，《洛杉矶时报》记者卡伦·塔马尔来到我位于国会大厦宽大的众议长办公室内的办公桌前，给我读了合众国际新闻社报道的唐纳德·里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一段话，并对我说，依据这个报道中后面提及的参考资料，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猜到这些话究竟是出自哪个“政府高级官员”之口。在报道里看到了白宫主管惯用的诸如“男士的更衣间”之类的用语后，我说道：“这听起来像是钻石唐·里甘的发言。”

气氛变得有点血腥了。海伦·托马斯——合众国际新闻社的老资格记者，很快就将她报道中的用词从所谓的“政府高级官员”转变成了“唐·里甘”。说实话，事态发展到这个时候，要求一个新闻记者严格服从那些幕后规则已经没有意义，特别是在当她并没有亲自参加那次新闻

发布会的情况下。

对于这几个月来一直以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自居的唐纳德·里甘来说，“钻石唐”这个绰号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顶套在他头上的荆棘遍布的皇冠。那些对他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指责仅仅是一场风暴的开始。加里·特鲁多的滑稽戏剧《唐尼的葬礼》，使得“钻石唐”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

像唐·里甘这样一个精明的商人出身的人如何会陷入媒体的圈套而备受奚落呢？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第一，负责报道华尔街的新闻媒体远比那些收集政府官员们的日常缺点并进行大肆渲染的媒体更为恭顺，特别是在里甘春风得意的辉煌时期更是如此，这使得他没有具备足够的警惕心。第二，捅出这个故事的记者并没有参加唐·里甘关于南非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因此也就不受那些幕后规则的制约。她仅仅只是听说了这个发布会的消息，知道是谁作了发言，并读了相关的报道。此外，这些幕后规则之所以被人置之不顾，可能还有下面这个原因。从在场的任何记者的个人判断来看，唐·里甘那些关于妇女只关注“她们的珠宝”的评论本身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男性至上主义色彩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多记者当然倾向于置游戏规则于不顾。

不管你为记者制定了多么复杂或多么深思熟虑的幕后规则，只有在双方利益一致的情形下，他们才会遵守它。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记者必须遵守这样的幕后规则。如果要报道的消息有足够的轰动效应，记者们总能找到避开这些约定的方法。借助于“不供发表”的承诺，一个记者经常能够找到替代性的消息来源。正如资深的参议院助手、多次民主党竞选活动的参与者斯文·赫尔姆斯所说：“如果所发布的信息是供发表的，它就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如果它是不供发表的，那么一周以后它也会见之报端。”

任何人如果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请你们想想那些你们听到的、一个焦头烂额的公众人物为了一次不妥当的公众发言而竭力捍卫自己的时候吧。他们常常声明说：“但是这是不供发表的。”这种“不供发表”的声明就像在一宗盗窃案里，被告声称自己中了别人圈套从而企

图逃避惩罚一样。对任何门外汉来说，他们都能听出其中的认罪意味。完全可以把这种声明理解为：好啦，的确是我说的，可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把它公之于众。

没有人能够垄断媒体源源不绝的电波发射。

1986年，就在加里·哈特宣布竞选总统的前一周，《新闻周刊》援引了他的一个主要助手对于哈特本人的私生活的评论，“如果他不能穿好自己的裤子，他就总会有被揭发出桃色事件的危险。”

当哈特的这个助手打电话给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哈特竞选总部，试图解释他的这些言论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哈特的妻子在旁边说：“让他滚蛋吧”。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新闻周刊》以“关于哈特事件的澄清”为标题，刊登了这个郁郁不乐的人的一封信。这个助手在信的开头就说，他知道这个给自己带来痛苦的采访是不供发表的。他接着又说：“被引用的那几句话是记者从一段纯粹是猜测和虚构的谈话中抽出来的，它们和我所知道的关于哈特的事实完全相反。”但是，无论对候选人还是对候选人与这位助手间的关系而言，伤害已经产生了。更糟的是，当哈特被发现已处于他的助手所担心的那种伤人的境地时，就意味着伤害更严重了。

总的来说，仅有两种能够从容应付媒体的政治家，一种是那些天生就害怕新闻媒体并敬而远之的人，另一种就是那些通过惨痛的教训真正知道媒体厉害的政治家。

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个案，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厄尔是如何成为自己所说的笑话的牺牲品的”。

在1976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数天后，福特总统的农业部长正向西飞行，去参观位于墨西哥的一个专门制造能够杀死蚊子幼虫的灭虫剂的工厂，事后表明这似乎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目的地。在坐上了一个商业航班的头等舱后，厄尔·巴茨发现自己和歌星帕特·布恩及桑尼·博诺在同一个机舱，此外，同行的还有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他也是水门事件的泄密者，作为《滚石》杂志的记者，迪安最近刚刚采访和报

道了共和党全国大会。

在经过了一番介绍寒暄之后，他们谈论的话题转到了政治上，帕特·布恩问农业部长为什么很少有黑人被吸收加入共和党。

巴茨回答道：“在现实生活中，黑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仅仅是沉溺于声色娱乐、体面的服装及一个能够吃喝拉撒的温暖的地方。”

迪安很显然认同了巴茨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句不应当浪费的绝妙好词。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他为《滚石》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并说明引自“福特总统内阁中的一员”。此外，迪安的报道还指出，这些粗俗下流的话是在一次向西飞行的航班上所说的，时间是刚好在福特获得总统提名之后。《新时代》——一个与《滚石》竞争激烈的杂志，通过排除法进一步揭露说，那个在飞机上的内阁成员就是厄尔·巴茨。很难想象巴茨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竟然会在一个3年前曾出卖过福特总统、野心勃勃的政治新闻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说出那个种族主义的玩笑话。

不幸的是，任何一个和新闻媒体有瓜葛的人都必须（借用因好莱坞名人亨利·罗杰斯而闻名的短语来形容它）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绳”。当你向新闻媒体传达信息的时候，你必须大胆并且极富戏剧性（因为你总在和其他成百万人在竞争），同时又不能导致自己的毁灭。

为了保护你自己，这里有一些或许有助于你在钢丝绳上保持平衡的术语。

当你说到只是“背景消息”的时候，就意味着记者在引用你所说的内容时，不能指名道姓。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或她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你：“众议长的一个主要助手”或“一个和厂长工作关系很密切的人”，这些都会像直接提及你的名字一样，给你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深度背景消息”意味着你要求新闻记者在发表新闻评论或电视播报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泄漏出那些能够让人们猜到你是谁的任何蛛丝马迹。在水门事件中，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特就是这样

和消息的提供者“深喉”达成协议的。当你在读一个报道时，如果里头有“有消息说”这样的表述，你就应当明白你在读的是一个“深度背景内部”的报道。

“不供发表”意味着记者不能报道、使用这些信息。它们可以深藏在记者的脑海中；它们也许对弄清楚其他事件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也许可以决定那些重大新闻的报道基调，但是，它们本身不能见报。

在所有的这些幕后规则中，没有哪一条可以被假定为是不可推翻的。记者们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向你告知米兰达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讯问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之前，调查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自证其罪的供词，并有权聘请律师，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等，这就叫米兰达原则）。他们可不会这样告诉你：你所说的已经被记录了。那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仅仅熟悉和精通幕后规则的种类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明确无误地使用它们。对那些政治家和他们的发言人，以及任何经常与新闻媒体打交道的人来说，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必须像条件反射似的迫使自己对记者说：“现在，这些都属于背景情况介绍，明白么？”“好啦，我不希望在报道中出现一个‘民主党助手’、‘领导助手’之类的东西，明白么？”

永远也不要忘记，在你使用这些隐语的同时，你也处在随时可能来临的灾难的边缘。这些幕后规则是由游戏者们制定的，也是为游戏者们制定的。如果你和新闻记者之间是互相信任的，那么这些幕后规则可能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是会遵守这些幕后规则的，不仅仅是出于伦理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他或她不希望使这个新闻源泉枯竭或坏了自己的名声。

但是在某些时候，当记者们不想再遵守这些幕后规则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简单地终止游戏。在经过一番残酷的计算之后，当记者们认为从你身上得到的已经远远比将来可能从你身上得到的更多、更重要时，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有可能使用已经从你这里得到的信息。所以，有时候当记者以不供发表为名要求你提供一些重要信息的时候，

你可要特别提防他了。如果他不能发表这些信息，他要它干什么用呢？

在这里，你所要记住的最好的规则是：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如果你的任何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言辞会导致你丢掉自己的工作，那么你去玩这种幕后规则操纵的游戏就显得有勇无谋了。如果你确信这给你带来的麻烦只不过是让你在办公室里不开心一两天，并且你也确信记者会严格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为什么不玩玩呢？生活太短暂了，为什么不给自己找点乐子呢？

即便是当你和新闻界最好的朋友打交道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是很明智的。就像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那样，这些新闻从业者也总是保持他们的职业敏感。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社交场合”时，你更应该加倍注意你的言行。对新闻记者而言，你酒后所说的任何东西与你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或在去上班途中的地铁里的闲聊，都是编造消息的好材料。正如白宫新闻助理拉里·斯皮克斯曾经对他的手下所说的那样：“今天晚上你也许会获得一顿免费的晚餐，但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后悔不迭的。”

即便是在最严格的幕后规则约束下，你对新闻记者所说的有些东西也可能成为他们捕猎的猎物。这其中就包括可能被广泛认为是伦理污点的任何东西。

可能有人还记得，在1984年，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和一群黑人记者进行了一次漫不经心的会谈，在谈话中他偶然地把犹太人和纽约城比做了“海米”和“海米城”。在此之后的第二个周末，《华盛顿邮报》以大幅报道披露了这个故事。杰克逊对此进行了反驳，他的理由是当时他是这样说的：“让我们谈论一下黑人们所议论的一些东西吧。”但是，基于下面两方面的原因，他要求对自己的言论保密的呼吁是彻底失败的，第一，他没有和记者们达成清楚的、不供发表的协议；第二，他的言论属于伦理污点的范畴。大部分记者把他的这些言论看做是滥用了对他的信任。

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奉行“我可逮着你了”信念的新

闻年代。如果新闻记者在他编写消息的过程中能够踹你一脚的话，他一定会的。

对那些不得和新闻媒体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很富有挑战性的。消息需要编得精彩，但又不能太出格。我有时要度过一个难眠之夜苦苦思索我所说的是否能够确保被记者们引用，但又不会惹火烧身，才会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否恰到好处放心。“我说得没错，我在这一点上就是偏执多疑，”前尼克松助理、现在是专栏作家的威廉·萨菲尔曾经这么说过，“最好是偏执多疑。”

1973年，那时我还是在拉尔夫·纳德手下从事小新闻报道的一个国会通讯记者。尼克松刚刚开始实施“周六之夜大屠杀”，而伍德沃特和伯恩斯坦则因发掘丑闻有功而红得发紫。“调查性”新闻成了当时的时尚。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在试图挖掘出下一个关于邪恶、腐败或者其他任何能让当权者难堪的骇人听闻的大丑闻。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正在整理我的报道的时候，分社社长皮特·格鲁恩斯坦走进了办公室，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并不停地念念有词：“丑闻，我们必须找到一些丑闻。”当我完成了一个标准的、提供情报的新闻故事后，得到的评价令人沮丧——太平淡无奇了。“这哪里是新闻稿啊，”格鲁恩斯坦皱着眉头抱怨道。

在几周的绞尽脑汁之后，我总算赶出了一个符合社长标准的报道。一个宾夕法尼亚众议员的前助手为我提供了一些“丑闻”，主要是涉及他的前老板假公济私。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国会议员在众议院的薪水册里一直有一个记者的名字，另一方面这个记者为当地一家报纸专门提供对该议员的报道。每个月，这个记者都会得到两份薪水，一份来自他工作的报社，另一份来自他那位在华盛顿工作的和善的立法者。

当我给该报社主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知道这个记者的第二职业，但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假公济私。他认为这样很不错，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的角色可以互补。“无论乔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他总把记者的职责放在首位。”

在那以后不久，我在议长休息室里拦住了那个国会议员，想要知道他的反应。“这是10年中最糟糕的事。”当然是这样。在我来之前，他已经习惯于在当地的报纸上只看到他自己发布的新闻稿。

但事实上，他也并非全无理由。在旧有的规则下，这样的安排是得到默许的。毕竟在不久以前，政治家们还不得不把新闻记者放进自己的薪水名册，以确信自己能获得他们的有利报道。如果你给这家伙买一瓶啤酒，你就觉得自己能控制住他。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报纸与报纸之间相互攻击的年代，从宗教偏见到广告合同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引发激烈的战火，记者们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你们的记者和他们的记者。你相信“你们的记者”，而对“他们的记者”恨之入骨。

而在今天，想要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却难之又难了。

1984年初，一个记者找到了我，他正在为一家高层人物所喜爱的杂志——M杂志撰写报道。他想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一些国会职员上，并问我他应该采访我还是采访众议长的首席顾问科克·奥唐奈。事后我才明白，我应该把这个黄金般的机会让给我的同事的。这个报道并没有表明我是为众议长工作的，而是使用了其他的表述。我现在还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其中一句原话：“华盛顿的任何一个人人都清楚，克里斯·马休斯是如何指导众议长的。”指导？建议，的确不错，是有一些建议。劝告，这也没错，的确是有劝告，但是，怎么能说是指导呢？

这篇报道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蒂普·奥尼尔面对面地跟我谈了他对这个报道的想法。在那种严肃的气氛下，向他指出那一行得罪人的话并不是采访者自己写的而是一个编辑在添加了前言之后一挥而就的，并不能对事情有任何改善。

不幸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几个星期以后，在我家里喝完酒并用完晚餐后，接着又喝了一些餐后酒，我和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及另一个新闻记者坐到了客厅里的长桌子前。我们讨论起了新闻记者和他们采访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相信我，”我的朋友霍夫曼悲哀地叹息道，“并不存在不供发表这么一回事，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并没有理会这个警告，并谈起了我的老板对我在M杂志中的斯文加利式（英国小说家George du Maurier所著小说Triliby中一个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并使其唯命是从的音乐家）的形象不太高兴。

我本来应该听从霍夫曼的警告的。通过对那天晚上的谈话进行反刍，另一个新闻记者，也就是参与我们谈话的另一个人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他编辑的报道，声称我已经处在被解雇的边缘了。

不要信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永远要牢记：他们属于跟你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当你跟他们说一些可能会给你或其他人带来难以估量的痛苦的事情时，他们的神经就会变得极度活跃兴奋。有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当你给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时，他们的眼皮就在那里轻微地跳动。就在这一瞬间，但早就已经太迟了，你才意识到：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沉闷的下午，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为抓住了别人的污点而欣喜若狂，而那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黯然泪下。

第十三章 权力的声望

权力的声望就是力量。

——托马斯·霍布斯

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新泽西的海滨度过数个暑假，在那里给别人打零工，我的雇主是默里兄弟。伯尼是两个人中的老大，他整整干了29年马戏团的杂工工作，跟随着巴纳姆马戏团和贝利马戏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居无定所，四处流动，伴随着他的只有每天五分之一加仑的烈性酒。当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放弃了这一切——马戏团、旅行、烈性酒，转而在大洋城粉刷起了房子，每个小时都要设法溜出去喝一杯咖啡，以此来满足那仍然对酒精极度渴望的身体。

伯尼或许的确已经驯服了流动游艺场工作人员内心特有的骚动不安，把对无牵无挂四处流浪的那种渴望深深地压制在了心底，然而，

他的举止行为仍然保持着巡回旅行艺人的风格。当他和他那同样热衷于酒精的弟弟乔靠粉刷海滨那些式样陈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而勉强度日时，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句以前那个行业的奇怪而难懂的行话。“让我们把这wabash一下，尽快离开。”当临近黄昏的阴影开始覆盖我们正在磨磨蹭蹭地粉刷的门廊时，他会这样说。

他所说的“Wabash”意思是把手中的刷子在油漆桶里蜻蜓点水一般地随便浸一浸，然后，刷子就如同突然长上了翅膀一样，在栏杆和柱子上上下下翻飞，速度惊人。刚刚粉刷完的表面的确是油光漆亮，闪烁着美丽的光泽。几分钟之内，原本应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的工作就轻松搞定了。而在几个星期之后，原本应当维持几年的油漆光泽开始剥落消失，此时默里兄弟早就已经转战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想找也找不着了。

在政治中，同样有着许多Wabashing。事实上，政治宣传活动的组织者和巡回马戏演出的发起者都被称之为先锋人员，这绝非偶然。他们匆匆忙忙地抵达，不遗余力地进行大吹大擂的宣传，然后在供展览的各种野生或珍奇动物正式登场前先行离开了。

与此同时，如果有人说许多政治名望的建立都是依赖于Wabashing，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的名望和建树更多地不是基于真实能力，而是基于表面现象，通过诱导人们以为他们想做某些事情，从而使得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那些实际上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情。正如哈里·杜鲁门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所谓的领袖就是那些有能力让别人做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情并为此怡然自得的人。”

除了少数一些例外之外，绝大多数政治领袖都缺乏天然的政治影响力。幸运的是，他们既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斩首示众，也不能把自己智商低下的亲戚朋友变成公爵伯爵。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领袖们行使和运用的是另外一种权威，他们之所以有权有势，只是因为他们显得有权有势。如果对这一点细加研究，不难发现一系列对那些渴望在任何行业里追逐权力的人们大有裨益的诀窍。

充分运用你的强项

1994年，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为了再一次当选，遭遇了他32年的职业生涯中首次艰巨的挑战。选民们对他多年花天酒地的生活明显不满，而他某个夜晚在棕榈滩上的不成熟表现（在这次事件中，他的侄子被指控强奸）更是令他们心生厌恶。这位杰克（约翰·肯尼迪）和博比（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面对自己职业生涯中坠至最低谷的民意支持率，如梦方醒。

挡在爱德华·肯尼迪面前的障碍中还有一个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有着强大魅力的、精明能干的竞争对手。米特·罗姆尼不仅仅是一个成功、英俊的商界精英，同时还是备受尊重的密歇根州州长的儿子。随着竞争越来越趋于白热化，罗姆尼当选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肯尼迪则如同明日黄花，在罗姆尼的阴影下黯淡无光。

曾经有一段时间，形势对挑战者极为有利，而对在职者糟糕透顶。当肯尼迪为庆祝他的一项要求严惩罪犯的法案获得通过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并进行播出时，米特·罗姆尼和绝大多数马萨诸塞州人都哄笑不止。作为敌对一方的罗姆尼竞选小组迅即作出了反应，他们以轰动的声势播出了一个广告，讽刺、攻击肯尼迪这个老牌的自由主义者怎么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罪犯的头号敌人。肯尼迪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开始直线下跌。到了劳动节的时候，罗姆尼的支持率已经基本与肯尼迪持平，肯尼迪的一个竞选助手公开承认犯罪法案并非肯尼迪的“成功之作”。

致力于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家族的传统而战的肯尼迪不得不改弦更张，他回过头来借助于自己的强项并找到了它。当他在一次电视辩论中质问对手他所提出的健康保障计划要花费多少时，罗姆尼变得张口结舌。肯尼迪乘胜追击，他严词叱责了这个在他眼里的政治上的暴发户，指出这是参议员所必须知道的东西，充分了解立法的细节是一个立法者的职责所在。

一个对那些刚在选举日参加完投票的选民的民意测验表明，每10

个人当中，就有6个人认为肯尼迪的观点更贴近于马萨诸塞州普通百姓所关心的问题，这最终导致民主党候选人，即肯尼迪，以58:41击败对手，赢得了选举。在肯尼迪的竞争对手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年轻、俊朗的外表，富有朝气时，老成的肯尼迪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强项——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当地人对马萨诸塞州人民长期的奉献。

十多年前，我本人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充分利用自己强项的竞选运动。

在1982年的国会选举中，民意测验专家彼得·哈特提醒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们要注意强调诸如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之类的问题。民意测验表明，在他们的竞选标题中，对这类问题关注得越深入，他们得到的选票就越多。相反地，他们也警告民主党领导们最好不要提及预算问题。如果他们对新政府的日益增大的财政赤字说三道四，民主党人就会被认为在国家财政责任上是不可靠的。人们会认为他们挥霍得太多，同时税收也提得太高了。

里根总统的民意测验专家想必也对他提了同样的建议。白宫的官员们竭尽全力想要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政府的预算问题上。1982年，当里根总统去国会参加一个与两党的领导人共同举行的“预算峰会”时，他带上了采访白宫的庞大的新闻媒体队伍，以及隶属于这些媒体的大量的电视摄影师及照片摄影师。总统和国会两党领导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晤，这次会晤成为一系列公共关系演出的序幕。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总统和国会就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也不会取得什么进展。

真正的较量是在会议厅外面上演的。在警戒线的后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新闻记者，白宫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一边在其中挤来挤去，一边像海洋馆里的训练员一点一点地喂海豚那样散发一些零星的消息。总统的这个“多走一英里”以寻求和国会达成协议的策略，将在晚间新闻里得到极大的回报。

仅仅通过将总统和国会每周一次的例行会晤的地点从白宫迁到了

国会大厦，里根政府的公共关系头头们就将一个关于财政政策的老掉牙的故事变成了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

事情的发展完全和里根筹谋该计划时所期望的一样，“预算”成了主要的新闻名词。人们可以看到里根总统正在“采取措施”以消灭财政赤字。为了确保每一个人都看到这出好戏，白宫施展出了画龙点睛之笔。白宫主管詹姆斯·贝克在下午5点召开了一个经过充分筹划的新闻发布会，时间上的精心选择刚好能使它上晚间新闻，正好是对这个故事实施旋转策略的时候：让国会显得是一个揉好的面团，毫不讲理，滴水不漏，所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至少里根总统已经竭尽全力了。

这出戏的最终结果如何呢？在1982年度的“预算峰会”并没有减少一分钱的财政赤字的同时，里根总统在电视上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赞誉。他那些民意测验专家们认为是财政问题为共和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只要“预算”这个词出现在新闻报道的标题中，共和党就能继续赢得民众的支持。预算本身有何问题并不重要，在这个案例中，它根本就一文不值，重要的是只要它正在被人们津津乐道就行了。

但是两个人也可以玩同样的游戏。在1982年的国会选举前夕，民主党首先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在离投票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给《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斯潘塞·里奇打了个电话，向他提供我听到的关于政府正打算在大选过后对政治上敏感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一些改革的信息。

然而里奇并不买我的账，因为他手头已经有了更猛的料。他已经听到传闻，说共和党国会竞选委员会已经给其支持者们发出了一封内容尴尬的筹款信，信的内容是关于同一件事即社会保障体系，他怀疑我是否有能力抓住并利用好这个精彩的故事。

我确实抓住了它。因为埃里克·伯克曼——民主党自己的竞选委员会里的炙手可热的研究者，能够挖掘出任何我们所需要的资料，特别是那些我们喜欢称之为“负面研究”的东西。

毫无疑问的是，共和党的筹款者们最近要求他们的潜在的支持者们“投票支持”共和党，具体方法就是通过让这些支持者们有一些“选票”中，挑选出他们认为是解决当前的社会保障基金危机的最好方法。例如，“选票A”就代表使社会保障“志愿化”。在那个夏天，对共和党候选者们来说，这个“志愿化”仿佛已经成了他们的自杀宣言。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星期二，就在全国的中老年选民们投下他们真正的选票之前，《华盛顿邮报》在显眼的位置发表了斯潘塞·里奇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立场和所列素材都是非常低调和非政治性的。

但好戏才刚刚开始，上午9点的时候，众议长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它要求“里根总统个人必须谴责那个共和党提出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志愿化的建议”。

合众国际新闻社立即转载了斯潘塞·里奇的这篇文章。数小时后，当里根总统抵达怀俄明州——他竞选的最后一站的时候，他立刻就陷入了大批记者的包围之中，记者们要求里根回答他是同意还是反对共和党的社会保障制度志愿化的建议。

里根愤怒了，他矢口否认自己曾提出任何打算修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然而，政治上的破坏已经产生了。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里根总统都受到自己早期提出的一个建议——“志愿因素应该被引进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的困扰，现在他又陷入了另一个这样的困境中。

法则：当你已经处于洞中的时候，请停止挖掘。如果说共和党利用预算问题作为保证自己不败的筹码是很明智的话，那么，他们继续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喋喋不休就显得很愚蠢了。他们做得越多，也就显得越虚弱。

这些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老掉牙的政治故事。一个老妇人告诉记者说她将要投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反对票，“这家伙试图消灭电视”。

“但是，夫人，”记者打断她的话，“我想你可能搞错了，戈德华特

参议员所说的是要取消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不是电视TV。”

“好啦，”这个老妇人坚持道，“我可不打算更改主意。”

就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一样，承认你的过失很重要，这样做不是为了要接近你的敌人，而是要把你的麻烦抛在身后。在你承认了你的过失和对手的强项以后，现在剩下的就只有你自己的强项和对手的缺点了。

降低球筐

这里有一个政治家可以教给公众的关于公共关系的前奏类型的经典例子。概念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想用你的扣篮能力征服球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篮筐的高度设为8英尺（2.44米），而不是通常的10英尺（3.04米）。当你把篮球轻易地扣进已经秘密地调低的篮中时，在家看电视的百姓还以为是威尔特·张伯伦再生呢。

在1968年，也就是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时候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有名的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中击败了林登·约翰逊总统。正是这背后一击使罗伯特·肯尼迪加入了总统角逐的行列，同时也迫使约翰逊总统在几周以后宣布退出竞选。

人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仅仅是他们想象的发生在1968年的政治冬天里的故事。可实际上，真正的情况并非如此。林登·约翰逊总统不仅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中击败了尤金·麦卡锡，而且，他并没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预先在那里发动竞选攻势，他甚至没有让他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那些去投票站投票的人们不得不在选票上写上LBJ（林登·约翰逊）这个名字，不管这时的通货膨胀是多么高涨，也不管美国这时正陷在一场可怕的战争里头，他还是会击败麦卡锡而取得胜利的，虽然后者已经在该州进行选举宣传好几个月了。但是，媒体却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明显学院派的中西部人能够在与现任总统的角逐中获得足够多的选票，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近似胜利了。麦卡锡虽

然失败了，但他的高达42%的得票率已经超过了人们事先的估计。新闻媒体对这种“大卫——歌利亚”式的角逐非常感兴趣，他们情不自禁地参与进来，并擅自改变比赛的结果，实际上虽然“歌利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媒体却认定“大卫”是胜利者。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降低球筐策略实际上是旋转策略的一个反应更迟钝的堂兄。蒙代尔最终“赢”得了超级星期二，因为他的竞选主管已经使媒体接受了死里逃生和胜利实际上是一回事的观念。麦卡锡之所以能够在1968年的选举中“击败”林登·约翰逊，仅仅是因为他成功地降低了人们对他胜利的期望。旋转策略是一个曲线球，而降低球筐策略更像是一个快球。如果你投球的劲足够大，它就能最终穿透层层击球手而为你赢得胜利。

四年以后，也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艾德蒙·马斯基以46%对37%的优势击败了乔治·麦戈文。但媒体却宣称麦戈文是胜利者，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马斯基的一个竞选工作人员曾经愚蠢地说过“如果我们得票超不过50%，我就自杀。”相反，麦戈文的竞选班子就显得聪明多了。通过向选民反复宣传麦戈文是一个反战的理想主义者，而把马斯基说成是一个权力的奴隶，麦戈文的竞选班子在人们心中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观念：如果麦戈文能够赢得数量比较可观的选票，他就能够宣称自己是胜利者。当然了，他实际上并没有赢得这场通向权力中心的政治游戏。

在198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战中，低调策略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形式。面对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强有力挑战，卡特总统派遣他的手下去参加在艾奥瓦州举行的党内领导人秘密会议，4年前卡特曾经在那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卡特的一个老练的新闻发言人，爱德华·杰西此行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使随机旅行的政治新闻媒体相信肯尼迪已经在艾奥瓦州建立起了不可动摇的优势。

随着党内领导人会议的日益临近，普通的老百姓早就认定肯尼迪“已经在艾奥瓦州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迄今为止最好的竞选组织”，这是一个由杰西精心编造的句子，他花了数周时间和新闻记者觥筹交错

并不停地抱怨说肯尼迪的优势太大了。他的努力现在正在得到回报。

当最终卡特以3:1的优势击败肯尼迪的时候，这个肯尼迪兄弟中最小的一位由于在竞赛中被对手甩得如此之远，不得不在乔治敦大学发表了一篇竞选演说，这也使得一场严肃的角逐总统的战役变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次呼吁。这个两星期以前还是全美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现代的阿德雷·斯蒂文森。

在使人们盲目崇拜肯尼迪，抬高人们对他的胜利的错误期待方面，没有人能做得比杰西更多了，在杰西离开这个玉米和小麦之乡并返回华盛顿时，他留下了他那句不朽的告别词。“最后一个离开梅因（艾奥瓦州首府）的人，请你关掉所有的灯，好么？”

几个月以后，我离开白宫前往宾夕法尼亚，担任卡特总统在该州的党内预选发言人，我此行也带着一个和杰西在艾奥瓦州所从事的类似的任务——继续玩期望值游戏，以便使新闻媒体相信即便是肯尼迪在宾夕法尼亚州取得了胜利，也无伤大局。毕竟，挑战者已经在那里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竞选宣传，并明智地采取了许多措施——对红衣主教克罗尔作礼节性拜访，在费城宽敞的大街上大吃松软可口的椒盐卷饼，在电台的采访节目中大出风头。与此同时，卡特总统也在实施他的“玫瑰花园战略”，那就是呆在白宫致力于解决伊朗人质危机。

降低球筐策略在这里似乎进展顺利，人们已经相信卡特将在这里遭到惨败。他在临近的纽约已经大败了一场，当整个国家对他不能迅速地解救那些被德黑兰的疯狂的“学生”劫持的美国人质感到失望时，这已经是一个尴尬和明显的信号了。真正的竞选运动是由那些前往伊朗营救入质的人的成功与否操纵的，但这次行动卡特失败了。然而，还是有人能够看清形势的，当我试图降低对卡特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机会的期望时，《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罗伯特·肖根说他已经受够了这些东西。“我知道有人说过他们可能会输，最终他们还是输了，”他向我说道。

不过它还是起作用了。借助于杰里·拉夫肖恩的才华横溢的、毁灭

性的电视广告“大街上的男人”的帮助，该广告无情地揭露了很多肯尼迪的私人问题，卡特总统差一点保住了宾夕法尼亚州。由于两人的得票太接近了，统计选票就花了大半夜的时间，甚至于在新闻节目的第一版中，并没有说肯尼迪已经赢得了角逐。一个叫《费城每日新闻报》的小报，在它的整个头版就印刷了一个词“Squeaker”，意思是“到最后一刻才决出胜负的比赛”。这已经是卡特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了，而被人们抱以厚望能以大比分赢得预选的肯尼迪，他已经被陷在了僵局里头了。

罗纳德·里根是运用这样一些技巧的职业高手。他在对手身上应用降低球筐策略的历史比任何人所记得的都长。里根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勇敢面对政府和政治组织的朴实无华的普通公民，他反复宣称自己就像是电影《史密斯先生上华盛顿》中的史密斯先生，宣称次数之多几乎和这部伟大的老电影被重复播放的次数接近了。正如曾于1966年在竞选中败给里根的埃德蒙德·G·“佩特”·布朗州长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在不停地说自己是门外汉或‘平民’政治家的时候，里根应用了苏联人在宣称他们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仅仅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即便他们毫无疑问是非常优秀的）时常用的逻辑。”

罗纳德·里根在其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都让媒体，让公众以及最重要的是让他的对手们相信他是不起眼的。当里根第一次竞选州长的时候，那个在职州长的支持者们都认为他们能够轻松对付这个“前电影演员”。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的支持者认为里根的背景将使他成为最容易被击败的对手。当里根最终赢得总统选举并举行总统就职仪式时，众议长奥尼尔的祝贺是“欢迎你来到职业体育总会，总统先生。”随着两个党派之间斗争的延续，数年以后，两个人都会对他们当初对对手的估计进行重新评估。蒂普·奥尼尔将会看到一个杰出的善于利用媒体的政治家，而里根总统也会把众议长看成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以65%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自己的不足50%支持率的杰出人物。

公司的执行官们都清楚地知道，为销售和生产设定一个合适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一个在比赛中获得最后一名的棒球队，除了力

争上进就别无选择一样，一个总是亏损的公司，正是那些勇敢的积极进取的人所渴望得到的职业机会。无论对任何职业而言，你设定的成功起点越低，你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在早期的政治生涯中就发现，一个政治家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许诺一些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给英国人设定了最糟糕的结局。伴随着英国在敦刻尔克的大溃败，他发表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演说。

假设纳粹德国可能要入侵英国，丘吉尔发誓说他将领导英国人民“在海滩上……在陆地上……在每一条大街上……在每一座山峰上和纳粹德国血战到底，我们永远也不会屈服，即便是……”，他继续说道，“我从来都不相信，整个不列颠，或它的大部分，会被德国占领并处于饥饿中，即便到那时，我们在海外的力量……也将继续战斗，直到上帝认为合适的时间，新的世界，倾尽它的所有，把整个世界从纳粹统治下解救和解放出来。”

演说中虽然透着一股浪漫的气息，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演说。通过向人们假设了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这个战时首相确保他的政府赢得了民众的对政府足够的耐心。英国也许还会输掉一些战役，但人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最坏结局的打算。

对任何一个处在需要你负责任的位置上的人来说，你能做的最明智的事就是为自己定一个适度的短期目标，在这里当然你要避免设定像丘吉尔所说的大不列颠的灭亡的糟糕结局。一旦实现了这个简单的目标，也许就能从此稳步地迈向更大的成功，取得更辉煌的胜利。正如李·阿特沃特（共和党战略专家，曾经在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两届政府中任职）所说，“因为打败了歌利亚，大卫现在还是声名远扬。”

发射沙袋

发射沙袋是降低球筐策略的必然结果。削弱你的对手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承认对手的长处，并为他的潜力给公众设立一个不合情

理的期望值。在罗纳德·里根同吉米·卡特的总统角逐中，里根的顾问们就是这么对吉米干的。众所周知，这次竞选战役的焦点，就是那50名在伊朗的被劫持的外交官。由于担心吉米·卡特总统会在选举日前非常幸运地救回所有的人质，里根的竞选班子拼命地通过媒体制造谣言，以至于新闻媒体和公众都在期望“10月奇迹”的出现。里根竞选总部的人宣称卡特总统和他的政府有一个在投票日前一个月救出人质的计划。如果卡特成功地救出了人质，他也会发现媒体已经被里根的竞选班子灌输了一种思想，人们都认为人质是按照一个政治时间表来释放了（即营救人质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为了人质本身的安全），因此人质营救成功带来的政治好处也会因为人们的这种责难减小到最小。

最终的结果是，卡特总统非常不走运。营救人质行动失败了，人质还被扣押在伊朗，而卡特也丢掉了白宫。对那些还记得那个在总统选举时发生“10月奇迹”的故事的人来说，里根的这个策略就是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卡特的一记重拳，也是给卡特的政治棺材牢牢地再钉上一颗钉子。

你能施展到你的竞争对手身上的最无耻的伎俩就是抬高他，高得远远偏离他的实际能力。民主党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对国会两院之一的控制，并在里根当政时期又夺回了另一院的控制权，他们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齐声夸赞总统的魅力和与人打交道的技巧。通过公开承认总统是一个杰出的、非常受欢迎的“沟通者”，通过把这些伎俩使用到里根身上，民主党把里根的声望和共和党的声望分离开来，砍断了他和他的政治靠山之间的联系。这样，即便是在声望不高的时候，民主党也能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权力。

《最后的欢呼》一书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斯克芬顿市长是如何使用沙袋策略对对手实施致命一击的吧。市长的母亲过去曾在一个老迈的新英格兰名门贵族家中当管家，被那位老绅士解雇，为报复此事，市长任命这个绅士的白痴儿子为消防局局长。几个星期以后，这个可怜的傻瓜便成了公众取笑的对象，也成了对公众的威胁。这个爱尔兰裔市长终于找到了一个把这个老家伙施加给自己上一辈的耻辱回送给他

的办法，通过侮辱他的家庭，而且是变本加厉的羞辱，市长报复了这个老绅士。

对低调处理和发射沙袋两种策略而言，原理是一样的，制造一个看似对自己不利的体系，可以使你获胜的机会比实际大，而使对手获胜的机会要比实际小。

创造新的戒律

当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步入政坛的时候，他试图保持自己头上的战争英雄的光环，那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时赢得的。正如他的孙子戴维在许多年以后所说的一样，对这个拥有在法国兰斯大教堂接受纳粹投降的巨大荣誉的艾森豪威尔来说，要让他对在竞选中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选票这样的荣誉在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是很难的。

在他当选后，为了自己能长久地留在权力的顶峰，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必须凌驾于共和党内部关于各项政策的繁琐的争吵之上。但他也面临着来自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一个动员公共舆论的天才的令人烦恼的指责，尽管当时的白宫是由共和党把持，可麦卡锡还是不停地在找政府内那些有共产党嫌疑的人的麻烦。

当艾森豪威尔最终用一些幕后策略使得麦卡锡屈服时，为了避免和对方发生公开争吵，他还耍了一个滑头。在面对媒体提出的有关麦卡锡愈演愈烈的倒行逆施问题时，他宣称自己的原则是“不进行人身攻击”。

林登·约翰逊也通晓同样的策略。1964年，他正面对着这样的尴尬处境，罗伯特·肯尼迪——连任的司法部长，要成为他的竞选搭档的趋势似乎正在变得不可更改。如果真的如此，对林登·约翰逊来说将意味着他向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观点投降：历史将会把他看做是肯尼迪家族的守护者，一个帮他们看管这把金交椅的家臣，直到这个前总统的弟弟有一天来要求收回它。如果此人的名字出现在全国的选票上，林登·约翰逊就无异于接受了做肯尼迪王朝下的纯粹的摄政王的角色。

对感觉自己长期受到这个前总统的弟弟照顾的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侮辱。他想用的伎俩就是找到既能不选罗伯特·肯尼迪做自己的竞选伙伴，又能不得罪遍及全国的数量众多的肯尼迪家族的崇拜者的办法。

在苦苦思索了几个月之后，这个坏脾气的得克萨斯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向采访白宫的新闻媒体发布了一个后来成为独断专行地创造新戒律的新标准的声明：“我个人认为，向大会推举我的任何一个内阁成员或那些经常与内阁打交道的人做竞选搭档都是不明智的。”

华盛顿的知情者们当然清楚地知道，这条针对副总统候选人的新规则制约的对象就是罗伯特·肯尼迪。然而，这个声明设计得很全面，它成功地掩盖了其中的一些报复行为。这个伎俩使约翰逊搬掉了压在自己背上已经4年之久的这块肯尼迪家族的巨石。

在1980年总统竞选的开始阶段，候选人里根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已经被通货膨胀和伊朗人质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吉米·卡特。他的问题是自己曾做了很长时间的右翼政治评论家，无所畏惧地发表过大胆但不得当的评论。“我们应当对北越宣战，”有一次他宣称，“我们应该铲平并征服这个国家，然后再回家过圣诞节。”这当然还包括他那在1964年提出的社会保障“志愿化”的臭名昭著的评论。如果他的共和党对手们沿着这个话题再稍加攻击，他在预选的早期就被踢出局了。即便是在他赢得了党内提名后，如果他的党内提名竞争者们给民主党人稍加指点，那么即使是焦头烂额的卡特也早就在11月份的大选中击败里根了。

因此，他采用的伎俩就是要使他免受本党同仁乔治·布什、霍华德·贝克尔、鲍勃·多尔以及其他对手的重击。这个被里根引入到政治舞台中的极富创造性的策略是有点类似于摩西戒律的东西，他喜欢将其炫耀为摩西十戒的“第十一戒，你不应该说本党同仁的坏话”。罗纳德里根本人曾在1976年迫使一位在职的来自共和党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福特总统）提前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对这样的事你也不要感到太

惊奇。他要采取一种全新的姿态。如果他想在秋天的大选中击败卡特，他就需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来闯过预选的枪林弹雨。他拒绝批评布什或贝克尔或多尔或约翰·康纳利或菲尔·克兰这些人，他集中所有的火力猛烈攻击卡特总统。而当他的共和党竞争者们拒绝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时，他就高喊他们犯规。

在1987年年初，当他想撤换他的白宫行政主管的时候，他抛出了另一条戒律。他没有直接要求唐纳德·里甘辞职，而是在一次采访中利用照相的时间向新闻媒体宣称“切不可与一个决定要辞职隐居的人谈什么”。这是一条再直接不过的戒律，总统的暗示已经十分清楚了，即便像唐纳德·里甘这样无情的野心勃勃的人也不可能不顾及总统的言下之意。不过，它使总统本人得以避开要求里甘辞职的责任，几天后唐纳德·里甘就辞职了。

让雄鹿跑过去

这是一句非常阴险的古老的美国谚语，指的是将别人对你的指责转移到他人身上去。当杜鲁门总统把他那著名的写着“鹿啊，停留在这里吧”的小牌子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时候，他使这条谚语更加声名狼藉。

我们往往不记得这个经常叫嚣“让他们去见鬼去吧”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曾做出过许多强硬的决策，例如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和解除五星上将道格拉斯·A·麦克阿瑟的职务等等，因而树敌颇多。他是在一片责骂声中离开白宫的。考虑到他的名声和所作所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让他把那块牌子转移到他位于独立城内的图书馆，就不足为奇了。

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人们充分地展示了他驾驭别人的天才。他的战时经历教会了他如何驱使别人，必要时甚至驱使别的国家为他服务，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更能像战争这样教会他这方面的才能了。在50年代末，当艾森豪威尔的农业政策陷入困境时，是他的农业部长埃兹拉·塔夫特·本森替他背的黑锅。在对外政策

执行过程中，他也是如此表演的。每当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在国外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的时候，总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来替他收拾残局。人们因此给他的名字加上了“政策颠倒器”的标签。为了处理好他与新闻媒体间的关系，艾森豪威尔雇用了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总统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在很多时候，哈格蒂的角色就是替艾森豪威尔充当采访白宫的新闻媒体的沙袋。下面就是哈格蒂自己所说的。

“艾森豪威尔会对我说，‘照我说的做’，我向他抱怨道：‘如果我在新闻发布会上照你要求我的去做，我恐怕就得下地狱了。’每当说到这里，他就会微笑着站起来，绕着办公桌踱着步，然后用手拍着我的背说：‘我的孩子，祝你好运。’”

罗纳德·里根发明了让雄鹿跑过去的一种新方式——成立委员会。他一贯反对官僚，可是当上总统后，他展示了一种策略——成立一些委员会，并且全部掺杂有民主党人。这些委员会包括：负责中美洲的基辛格委员会，其职责是设法紧缩防务开支；帕卡德委员会，其职责是寻找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社会保障委员会，其职责是向整个国家推销政府的提高税收和暂缓提高生活费用的补贴政策；斯考克罗夫特委员会，其职责是向国会推销MX导弹计划；最后还有一个托尔委员会，负责调查用武器交换伊朗扣留的人质的交易。即便是在最后一个委员会里，里根总统也能利用它给自己赢得政治好处。托尔委员会的权限被限制在营救程序和组织结构等事项上，而在政策方面它却没有任何权限。它的矛头必然是指向那些负责执行政策的人，而不是像总统这样的制定政策的大人物。

每当没有委员会来替他背黑锅的时候，里根就会把这些烫手的山芋扔给他的手下。好多年来，采访白宫的新闻媒体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能准确地辨别里根总统在同国会的较量中是输还是赢了。如果赢了，里根总统自己就会兴高采烈地出现在白宫西翼的记者室，也会把事件的全过程向新闻界公开。可如果里根输了，出现在媒体面前的就是他的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或他那些不出名的代理人中的任何一个。在后面这样的情形下，理所当然，是绝对不允许拍照和

录像的。“成功者有很多父亲，”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但是失败者就只能是一个孤儿。”

仁川登陆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最根本的公共关系侧翼攻击策略上来。没有能比从敌人防线后面偷袭更能让敌人惊惶失措的方法了。在1950年，由于北朝鲜军队的进逼，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压制在朝鲜半岛南部一块狭窄的区域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对强大的敌人进行寸土必争的正面反攻，而是在仁川港实施了一次杰出但冒险的登陆作战。他成功了，登陆数天内，麦克阿瑟将军就夺回了汉城，登陆两周内，整个南朝鲜的失地都被联合国军收复了。

和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政治家们也是因为他们出其不意地击败对手而留名青史的。当他们通过夺取对手的后方政治地盘从而成功地对手实施了侧翼包围时，他们会赢得特别的尊重。

这里有一个政治仁川登陆的极好范例，它是由哈里·杜鲁门实施的。在1948年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失败的命运看来似乎不可逆转了。他抵达费城，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气氛压抑的民主党大会，那时候他在每一次民意测验中都落后于对手，人们认为他已经没有赢得选举的任何希望了。非常善于即席演讲的杜鲁门在演说中，提出了现在著名的“让他们见鬼去吧”的政治策略，这个策略以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混乱而闻名。然而那天晚上真正的惊人之作并不是杜鲁门总统所说的，而是他所宣布的自己将要做的。在仔细研究了共和党选举班子提出的关于医疗保健、住房、物价控制以及教育补助等一揽子计划后，杜鲁门宣布他将召开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以便开一个特殊的、事先没有计划的会议来落实共和党所提出的这些计划。“现在，我的朋友们，如果共和党提出的这些计划中存在任何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大家都将从第80届国会的一次短暂的会议中得到好处。”

恼羞成怒的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这一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次为期两周的国会特别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国会最终休会的时候，

杜鲁门在共和党人的心窝上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由这些只会退缩不前的立法者组成的“无所事事的国会”，刚刚结束了一次“无所事事”的会议。

当美国总统大选在11月如期进行的时候，这个民主党总统成功地迷惑了每一次重要的民意测验和全国每一个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通过使用这招侧翼出击策略，他迫使共和党人们疲于招架，结果共和党不但不能对总统吹毛求疵，而且他们还成了必须对采取迅速措施以实现某些计划负责的责任者和政党。公众认为，如果共和党认为他们的那些计划确实重要，那就表决通过它好啦。

理查德·尼克松在70年代也成功实施了一次类似的政治仁川登陆。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他因为主张让红色中国返回联合国而使民主党难堪。在那个年代，仅仅提及这个主意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左翼，被扣上“同情共产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如果回溯到那个争论“到底是谁丢掉了中国”的年代，尼克松本人就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反共分子。在整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谴责那些同情中国大陆的人。“我认为预测红色中国和苏联之间将要出现裂痕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说道。然而真正使尼克松青史留名的正是他在1971年作出的对中国打开大门的决定。正是他的由亨利·基辛格事先秘密打前站、随后他亲自出马的举世瞩目的北京之行彻底震撼了他的对手，并使那些几十年来一直讨厌他的人变成了他的拥护者。理查德·尼克松完成了他的对手们因为惧怕他而不敢做的伟业。

颇具讽刺意味的这一事实不会不引起一向批评尼克松的人们的注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曾经这样写道：“比起那些生活在生怕被人扣上‘同情共产主义’帽子的恐惧中的美国自由主义者而言，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更容易接受事实及更明智地同苏联和中国接触并讨价还价。如果休伯特·汉弗莱敢于访问中国，并和周恩来及其他中国人碰杯的话，他一定会被人嘲弄的。但对尼克松这个恶毒的反共分子来说，向‘红色中国’打开大门也许是能挽救他政治生命的杰作。”

法则：搅乱竞争的阵线，乘机夺取对手的后方地盘。没有什么能比可怕地意识到敌人已经渗透了你的防线，并正在从后方向你发起进攻更能引起你的恐慌了。

事实上，也曾有一个在战争中利用该策略的经典例子。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假冒一个阿拉伯电台宣称通往大马士革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已经沦陷。听到这个假消息到处传播，惊惶失措的叙利亚军队放弃戈兰高地上的军事要塞，仓皇撤退了。

一击巧妙打出的公共关系硬球，它的威力相当于一颗炮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第十四章 形象的定位

“我刚刚想到了一件事情，它可能与这个演讲没有任何关系，我一直担心，不知道该不该说。”

——罗纳德·里根

对于比尔·克林顿而言，1994年的选举不啻是在自己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个巴掌。他所在的政党自1954年以来第一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时失去了领导地位。克林顿在医疗保健问题上笨拙的处理办法，使得民主党丧失了自己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要知道，他们为此努力了接近40年才取得这样的地位。

但是克林顿拒绝就此放弃，拒绝言败。他没有跟自己已经认输的民主党同僚们一样意志消沉，而是采纳了顾问迪克·莫里斯的建议，用“三角形稳定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莫里斯解释道：“如果重复国会中民主党党员的陈词滥调，就意味着只能跟他们一起躲在同一个暴风雨避难所里，一直等到共和党引发的暴风雨安全过去为止。总统当时需要给自己一个定位，这个定位要综合两党中最好的定位。”

“三角形稳定法”见效了。克林顿在1996年共和党仍旧控制着国会的时候胜利地实现了连任。唯一的失败者是国会中那些已经与克林顿

脱离关系、为他们自己辩护的民主党人。

用政治术语来讲，克林顿的方法被称之为定位。第一，首先要决定你希望跟选民们之间的关系要走得多近。第二，把自己放在这个理想的位置上。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做得比政治家们所称的“伟大的沟通者”更好了。

1983年1月25日的晚上，里根总统赶到国会山去，要在那里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跟平常一样，众议院议长的办公室要作为他进入国会会议室之前稍作休息和调整一下的地方。在跟同僚们握手打招呼的时候，他注意到国会议员唐·爱德华兹坐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正仔细阅读着总统演讲的手稿。“你从哪里拿到这份手稿的，唐？”里根很是惊讶地问这位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同僚。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知道，他演讲稿的非法复印件早就已经传到了每一个国会议员手里。

正是因为手里已经有了里根演讲稿的复印件，参加会议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事实上已经准备好了攻其不备，对总统进行突然袭击。他们找到了一个信息，即便是最激进的共和党人似乎也首次承认，政府有责任采取某些措施以降低越来越高的失业率。几个月以来，里根一直在辩论说“这个问题可以先不理睬”，他承诺说，到1981年削减税收的时候，高失业率一定会降低的。但是，在他事先准备的演讲稿中却有这样一行字，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这一行字是：“我们在政府中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带头努力恢复经济。”

于是民主党精心策划了一个计划。当总统读到这一行字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大声喝彩表示对此热烈欢迎。里根一时间似乎愣住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传达给全国的信息明白无误，他们正在欢呼，因为总统已经勉强承认，自己的政府现在的确是到了需要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的时候了。

里根稍微停顿了一下，等掌声慢慢平息下来，这个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那些坐在普通议员席位上的人正在戏弄他，他们正在意味深长地笑着，慢慢悠悠地看他的反应。紧接着，里根用杰克·本尼般准确

的手法，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反击，“噢，我一直都以为你们只是读那些纸片呢。”

民主党人还以为总统只是随口一说，指的是他们中很多人一直在看他的演讲稿并对此发表一些自以为是的解释呢，于是就哄堂大笑起来。所有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总统话中的弦外之音，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对于在自己家的起居室里看电视的观众来说，这个暗示再明白不过了，这些立法者们只不过是一群具有官僚作风的典型政客，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脚翘在桌子上，一边悠闲地读着报纸，一边含着雪茄吞云吐雾。里根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这些“摄影棚观众”而已，用他们自己的笑声来嘲笑刚才的笑话，而在这个笑话里面，这群“摄影棚观众”才恰恰是笑柄。

一个星期以后，他把这老一套的办法又重新演绎了一遍。不过这一次他借用的观众变了，是白宫的新闻记者们。一天下午，一次记者招待会正在进行之中，他的妻子南希突然间推着一个大生日蛋糕进来了。那一天是总统72岁的生日。就在总统兴高采烈地开始为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记者切生日蛋糕的时候，全美广播公司的记者山姆·唐纳逊大声喊道：“可是总统先生，你要知道，我们可不是一块蛋糕就能收买得了的。我们不接受交易。”

全场一片寂静。

“噢”，总统直视着山姆说：“您已经被比这块蛋糕更少的东西收买过了。”山姆的同行们听到这句话都哄堂大笑起来。事后，有的记者就批评他们这位自作聪明的同行。

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里根的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信息，总统当着这些华盛顿记者的面在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们，说他们的许多报道其实是受了很多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是时刻准备着被“收买”。这是在明白无误地说，以前右翼批评家们几十年来对一些有影响的大媒体的指责是正确的。不仅如此，里根还让他们

对他所说出的事实发笑。正如他一贯在国会会议上表现的那样，里根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华盛顿游戏中的玩家，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对自己周围不怎么样的事情的评论家，他极具洞察力，却又超然于这个游戏规则之外。

这样的才智的确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本研究实际政治现象的作品的开头，我们就曾经详细描述过这个国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零售商”林登·约翰逊是怎样崛起的。我们看到了“约翰逊疗法”，知道这种方式是怎样让那些身材高大的成年人变成了摇尾乞怜的小哈巴狗的。同林登一样，里根也同样值得我们在本书结束的时候大书一笔。作为他的主要对手——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助手，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深入研究这位“伟大的沟通者”，来回答与林登·约翰逊经常给人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的疑问——“他是怎样崛起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跟那位伟大的“零售商”林登·约翰逊完全不一样，他不像后者一样去一个接一个地单独会见选民，恰恰相反，罗纳德里根是一个善于利用传媒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批发商”。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指责。我的外祖父亨利·斯图克终生都以推销为业。他最喜欢的座右铭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一个是推销，另一个是政治。”我非常崇敬他，我得说，世界上仅有的职业不是两种，是一种，而罗纳德里根已经完全掌握了其中的技巧。其他的领导人总是在告诉我们儿童文学作家霍雷肖·阿尔杰作品中激励人的那些话，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你的梦想有多高，你能够走得有多远。但是这位伟大的“批发商”却告诉我们在这个电视时代的另外一个类似的道理——只要你找好定位，你就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一种人。

这样说绝不是在指责或是批评。这正是这位伟人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功伟绩的秘密和法宝。就在其他政客们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看做职业政治家的时候，这位来自西部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却有另外一个雄心，让自己时刻保持一个旁观者的形象。他教给我们的一个法则就是：任何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某个组织，都

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进行定位。一个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仅仅是公司的另外一个雇员而已”，或者将自己置于一个与众不同的位置，做一个发号施令的人。艾维斯也可以租用大量的汽车，声明自己只是“第二号人物”，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会更加有煽动力。百事可乐可以称自己是“新一代人喝的饮料”，而可口可乐则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经典”饮料，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软饮料公司正在通过对自己重新定位以适应这样一个文化转变迅速的时代，从而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

罗纳德·里根也同样熟谙这样的游戏规则。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政治上的旁观者，这样的形象绝不是自动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而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他通过给自己正确定位来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其方式不是力图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政治圈内人”，而是将自己溶入到他最重视的电视观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毫不奇怪的是，第一个意识到里根这个策略的人正是里根在政治上第一次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加利福尼亚的前任州长帕特·布朗，他也是里根进入政界以后第一次竞选公职时打败的人物。“他是‘我们’之中自封的领袖，”布朗在1966年被里根击败，他许多年以后曾经这么写道，“而他的敌人总是他所称的‘他们’。”

然而大多数里根的批评者们却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攻击他是一个“二流的电影演员”，不但否定了他当前的出色表现，也抹杀了他在原来所从事的职业上取得的成就。

罗纳德·里根在进入政界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只是继续扮演了许多年以来在自己生活中一直扮演的角色。

很多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位“伟大的沟通者”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声誉，并不是依靠他原来的职业在电影屏幕上得来的，而是凭借电视显像管取得成功的。人们并不是在自己家附近的电影院里认识了里根这个人，而是坐在自己家的电视旁看到并认识了他。成千上万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演员而熟悉他，而是因为他以一个更加亲近的角色出现。他们没有认为他是在表演某一个角色，而

是认为他只是在表演他本人这个角色——“您的主持人，罗纳德·里根”。

里根最大的幸运就在于，他的对手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策略。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里根将自己具有亲和力的性格表现出来时，他们只是跳出来抨击他没完没了的宴会。他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里根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仅仅凭借自己英俊的外表，迷人的魅力和出众的智慧，而是因为他能够利用自己特有的天赋为自己的特别策略服务。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应当在公众的心目中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并立住脚。

在他演出的长达8年的通用电气剧场里面，里根具有鲜明的职业优势。这个节目中的其他表演者都要受当时每一周新出现的工具和设备所左右，因为这是一个系列剧，但是剧中扮演主角的人却没有。就跟他不用为他所演的通用电气产品的质量负责一样，他也不用为整个演出的质量负责。正是里根在每一次演出结束以后都要说那句家喻户晓的结束语“这就是通用电气，促进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他所说的“这”，其实可以指通用电气公司到你的家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20年以后当我想起通用电气剧场时，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主持人和他的妻子南希坐在他们“完全电器化”的家中那宽大舒适的起居室里。他们看上去似乎比一般的电视观众稍微富有一些，但是在其他方面跟所有其他人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同。事实上，他们只是把我们想象中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或者说我们自己希望拥有的东西演绎出来了而已。

里根在政界同样保持了这样一个中性化的位置。从他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就可见一斑。

很多年来我们都在看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大军是怎样无休止地盘问尼克松、福特或者卡特，对他们紧追不放。我们看到我们的总统在传媒面前总是愁眉不展，一副苦相，就像一个嫌疑犯因为涉嫌谋杀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一样。尤其是尼克松总统，他看起来总像是刚刚从拘留所被提出来拉到被告席上一样。里根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被

动的局面。他和他的顾问们从来就没有忽视过最初从总统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谁才是真正的总统。

首先，他仍旧表现得十分放松，极具吸引力，就像他仍旧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一样。他给人的不是一个躲在白宫的秘密办公室里的孤独者的形象。为了将这样一个信息传达给自己的观众，他利用了电视时代的许多除摄像机以外的设备。

你以前有没有困惑不解，里根怎么会在他召开的所有记者招待会上似乎总是知道大部分记者的名字呢？看起来就好像他曾经跟这些人经常待在一起，混得很熟的样子。事实的真相是，他只是在利用白宫里的记者们来说服坐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观众，让他们认为里根是一个多么平易近人的人。不论起来提问的记者是谁，也不论他是来自哪一个不知名的小报，我们的总统似乎总是能够一下子叫出“乔”“鲍比”或是“安妮”等等一类昵称来。

很多人对于里根的记性之差总是很震惊，因为他总是在其他一些事情上表现得心不在焉，比如在为了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而秘密向伊朗卖军火一事上的表现，就是一个随手拈来的例子。但是他们一定会更加惊讶，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但是他们不知道，所有的总统都会利用在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的这些时间来做准备，想好就政府政策、外交、内政等一系列问题应该怎样应答，而里根却在这段时间里让人画好一张座位图，在走到摄像机镜头之前，他自己先要走到闭路电视监视器前扫视一下那些“乔”“鲍比”和“安妮”等人，确知他们的位置。这样，他就能够知道当天晚上他所希望与之开开玩笑或者交交锋的记者们每个人固定的位置了。等把所有这些人的昵称或者是绰号跟他们的脸对上号，把这些脸再跟他们的座位对上号以后，他才完全准备好，走到摄像机面前去。

但是里根的这个体系并非完美无缺。1984年上半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向下面的人群中望去，然后叫出了一个名字“帕特”。他要叫的人是来自都市媒体网络的帕特里克·麦克格莱斯。帕特里克后来回忆说，起初他根本不敢相信总统叫出来的这么亲昵的一个名字是在

对他叫的。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总统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那个时候在总统喊出名字以后，他自己也想当然地朝着后面几排位子上张望，看看他在叫的是什么人。但是犹豫了一会儿他才确定叫的是自己，于是麦克格拉斯这个时候才站起来向总统提问他准备好的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在电视黄金时段面对着全美国人都会看到的摄像机镜头，能够被叫起来问问题，在自己后面的其他同行们还在新闻编辑室里不停地跺脚、喊叫的时候，有哪一个新闻记者会来得及耍花招呢？处在聚光灯下的这个人绝对不会打算让所有人扫兴的。更何况，如果一个人曾经被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指名叫起来问过问题，而且总统叫的是他的昵称，他目前的饭碗就会比被点名的几秒钟之前更加牢固了。

还有一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总统做得比这还让人惊讶。他居然向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所有记者介绍了白宫记者团刚刚添加的三名新成员。那个时刻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电视上一个智力游戏节目主持人在欢迎几个新嘉宾来参加活动一样。

但是与罗纳德·里根在电视上进行的实况即席电视讲话时所采用的高科技手段相比较，这些为记者招待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就黯然失色了。

有一次，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收到一位女士的来信，这位女士情绪非常低落，因为她在为总统担心。她在信里说，很明显总统决定不带任何演讲稿发表一场长达45分钟的即席电视讲话，这样做会非常危险的。她非常担心地问，如果总统在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问题上不小心犯一个错的话，那该怎么办？

但是，要知道，像这样的电视讲话，其实根本不存在即兴这么回事的。无论里根什么时候在国会发表讲话，众议院都会给总统的通讯组提前留出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让他们迅速把总统的讲稿提示器草草装上。跟自己所有前任不一样的是，里根总是让助手们把两个电视讲稿提示器的显示屏远远地隔开放好。这样他就能不停地将眼光从一个提示器转到另外一个上去，给人的印象却是他在朝着整个会议

大厅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两个提示器却照不到摄像机的镜头里去。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观众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只是总统对这两面的听众在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总统这个时候戴着隐形眼镜，让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实际上是在照本宣科地读他的演讲稿。不仅如此，由于提示器故意被悬挂得非常高，这使得总统不得不睁大眼睛看，从而使他显得更加年轻。

只有很少时候，偶尔会有一两个画面宽的镜头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两个玻璃板。但是当普通人从电视里看到的时候，这两个玻璃板看起来非常像两个为安全起见而装上的防弹玻璃罩。

无论走到哪里，总统都要随身带着他的电视提示器，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说这位伟大的沟通者的所有技巧仅仅是依靠技术的话，那就错了。他首先是一个老练的表演者，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排练的机会。他把最关键的时间都花在了白宫的家庭剧院里。他的驾驭能力如此高超，以至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瞳孔停顿在提示器屏幕上。他演讲的言词表达得如此流畅，所有的听众都觉得他的眼睛似乎锁定在他的听众身上，而不是落在玻璃板上的文字上面。

总之，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最为重要的产品是他本人，而不是他所讲到的“供方经济”或者是“战略防御”。后台的监视器在帮助他表现出更多一些“平民化”的味道，少一些帝王般的气势。太空时代特有的提示器和隐形眼镜让他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显得更加“平易近人”。

里根之所以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主要目的是为了用强大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为自己定位，把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定位为一个人们的邻居一样的普通人，而不是一个超然于众人之外的政府首脑。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显得贴近群众，远离政府。他所有的前任们总是将自己看做是政府权力的化身，而里根却将自己的形象定位为一个到白宫做客的普通市民。在宣布竞选连任的时候，他提及总统职位时只是很笼统地称之为“我现在所任的职位”。在他出去度假时，他总是毫无顾忌，从不摆总统的架子。

让我们比较一下同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最近的两位总统。理查

德·尼克松回家的时候，他立即在自己的“西部白宫”内召开国事会议。换句话说，他把办公室也随身携带了。还记得我们经常见到的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些照片吗？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圣克利门蒂岛的海滩上散步，穿着黑色包头的鞋子，身子使劲地弓着，仿佛被自己高高在上的位子压得抬不起头来。而当罗纳德里根回家的时候，他却去了“大农场”，穿着格子花呢的衬衫和牛仔裤，脚上蹬一双靴子，驾着一辆吉普到处跑来跑去。通过一个望远镜的镜头，我们可以发现他正在清理刷子或者在修一段篱笆。在那些山区里跑来跑去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说明自己是一个正在休假的政府首脑，偶尔忙中偷闲，从自己的工作中偷偷溜出来一会，这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品质。但是不要忘记，里根为了能够得到这个最高的职位不懈追求了20多年，他曾经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行政机构。

许多权威的评论家曾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研究里根，他们想弄明白，罗纳德里根到底是怎样从政府中存在的问题和所犯的错误中推掉自己的责任的。答案非常简单，他只是拒绝将自己看做是那个政府的一部分。他拒绝的方式就像一个人身体内的组织在排斥一些体外来的异物一样坚决。罗纳德里根表现出来的不是爬上总统职位，而是重新定义了这个职位。他使得总统职位看起来不像是在指挥一个政府的运行，因为那些繁琐的事务总是由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人来完成的，比如亚历山大·黑格，玛格丽特·海克勒以及唐·里甘等人，他只是进行作为罗纳德里根这人该做的工作。

毋庸置疑，里根绝不是第一个进行政治定位的美国政治家，他只是改进了技巧而已。乔治·麦戈文之所以能在1972年赢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成功地为自己定位，使得大家都一致认为他比其他的所有候选人在越南问题上更加激进。正是这个定位为他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从而能够成功地发起竞选活动，打败自己党内其他更有名的领导人。但不幸的是，他这样做使得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竞选伙伴斯普罗·T·阿格纽在几个月以后声称自己是政治上的中立派，从而轻而易举地竞选成功。

参议员盖里·哈特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次头版头条中占据了显要

的位置。1984年他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具有“新思想”的活跃的候选人，成为新一代民主党人的代表。他穿着一件格子花呢的衬衫和牛仔褲，脚上蹬一双靴子（是不是从他身上看到了里根的影子？）。他拿出专门接受媒体拍照的时间来宣传自己，在照片上的他正将一把斧头砍向一个树桩。他真正的目标是民主党机构内那些花白头发的老资格的“内部人士”。他利用他那L·L·比恩式的形象当做武器，矛头直指当时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的沃尔特·蒙代尔。蒙代尔这位前副总统也承认他本人表现得的确比较“官僚”一些。

罗纳德·里根寻求更加微妙细致的定位，并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们必须想到，在这位极其受欢迎的人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他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从林登·约翰逊开始，公众们已经看到在12年内有4届总统被越南问题、水门事件和伊朗人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纷纷落马。里根下定决心要给这个职位重新定义，而不是让这个职位将自己重新定义。

里根亲眼目睹了一个试图背起沉重包裹的总统是怎样痛苦地被毁掉了。吉米·卡特拒绝扮演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色，他将自己的角色设计成为一个政府首脑。他拒绝使用所有与这个职位有关的华丽的外衣，比如他曾经下令要求大家不要在他到达的时候欢呼，他甚至对任何出了问题事情都毫不犹豫地负起个人责任来。面对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他创造了一个以“通货膨胀政府”著称的白宫。在50个美国人在伊朗被劫持为人质时，整个国家要求采取措施解救人质的呼声淹没了白宫，也淹没了他的整个总统任期。他就像扛着自己的一个大包袱一样把总统办公室的所有负担扛在了自己肩上。

里根从一开始就让公众明白一个问题，他被人民选出来是到华盛顿工作的，他并不属于华盛顿。他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监护人，不会事无巨细地对一切事情负责，小到哪个地方停电了，哪个地方漏水了这样的琐事不是他的职责所在。在欢迎他的宴会上，里根就曾经讲过：“政府不是我们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只有从问题本身出发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他绝对不会让自己也成为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他会让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了解这样一

个事实——里根的家在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特区可不是他的家。一直到了1986年8月，他还设法参加了伊利诺伊国家博览会，以一个西部牛仔的形象出现。对表示欣赏的观众，他说道：“参加这个国家博览会最妙的事情就是，我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开玩笑，但这样的玩笑华盛顿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里根在这样的时刻说出这样的话来，并不仅仅意在指责和批评。他实际上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让他跟其他传统的政府首脑形象稍微有些差别。他没有将自己的身份放在政府中看待，而是放在了一个特殊的点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位置，介于政府与我们这些普通人之间。这样做就给了他非常宝贵的距离，无论是发生灾难时，还是哪些政策发生失误或者行不通时，抑或是他所任命的人做了令人尴尬的事情时，他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为自己开脱。

里根选择了很久以前就被人们忽视了的媒体——无线电，作为每周发表全国讲话的方式，这绝不是偶然的。每个周六，他都会选一个不同的话题来谈，但是他所传达的信息大体上都是一致的，没有太大差别。不管当时国家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无论是谁，只要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12点过5分打开收音机，都会听到相同的论调，知道“他们”那些政府的人如何如何。每一个周六，那个在艾奥瓦受过训练的标准播音员的口音就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怒气冲冲地发着对政府的牢骚，说政府简直就是一个传播邪恶的地方，什么赤字啦、犯罪啦、官僚主义啦，等等，不一而足。听着他讲话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了，这个发表评论的“波托马克河上的保罗·哈维”式的人正是联邦政府的首脑。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具体形象的声音，因为白宫不允许对这样的讲话进行电视实况转播。听着这样的话，让人感到他就是自己的国家里的一个邻居，跟自己一样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关切。时间的选择是关键。里根选择的时间非常恰当。因为星期六人们不用上班，总统也停止工作，走下华盛顿权力高层休息了。

收音机里的演讲给里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在任何时候，无论椭圆形办公室遇到了多么棘手的问题，都能够找到台阶下。正是有了这样一道篱笆做屏障，总统才有机会在自己的好友詹姆斯·G·

沃特受到媒体和最先锋的环保主义者不公正的对待时，毫无顾忌地进行指责。打开收音机倾听，你很难想到，这个充满义愤的评论家，跟那个从前任内政部长手里抓过辞职报告的总统，竟然是同一个人。对于他任命“一个黑人、一个妇女、两个犹太人和一个瘸子”加入联邦顾问班子，前任内政部长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些并不太尖锐的话，被传得沸沸扬扬，被迫辞职。

非常明显，到了1986年下半年，这个方法就不怎么灵验了。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让自己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中所得的利润流向了尼加拉瓜，支持那里的反政府武装，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里根不得不下令将奥利弗·诺思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除。三天以后，还是同一个诺思，里根又高度赞扬他，称他为“民族英雄”。其实，他应该跟在吉姆·沃特事件中的表现一样，再坚持等几个星期，然后才给自己重新定位，以一个喜欢抱打不平的第三方的身份出现，对此事发表意见。

他能够及时为自己重新定位，把自己放在一个远离华盛顿官方的安全位置上，这样的能力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了他，使他远离在职期内经常遇到的危险。远在贝鲁特的一个美国兵营遭到了汽车炸弹的攻击时，总统轻而易举地闪在了一旁，远离这个灾难。自然不能归咎于士兵，因为他们正在加固兵营周围地区的防御工事，但是“就像给厨房重新装修一样，不能说你想干就立即干完了”。在紧接着进行的国情咨文会议上，他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提醒大家国会曾经授权在黎巴嫩部署军队，但是他自己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好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将是否支持他的维和任务作为是否爱国的标准。

里根以前的所有总统们都无一例外地紧握住所有象征总统职位的东西，而里根却相反，他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自由的状态。他作为联邦预算撰稿人的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来都不提交平衡预算书的总统在1982年两次到国会山去主持一个平衡预算会议。他站在一大堆愤怒的人群中，尽量让自己看上去跟一个普通的市民没什么两样，跟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样，对不断升高的赤字浪潮充满了关切之情。两年以后，这个曾经在自己任期无可奈何地目睹国债成倍增长的人，悠然地站在自己的母校尤里卡大学里说着自己的要求：“绝不能允许这

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拿着你们的前途进行投机。”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1968年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共和党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正在发表演说，大谈自己的经历。在把自己要演说的大部分内容结束以后，他放慢了速度，开始跟全国的观众套近乎。紧接着，他换了讲话的语气，开始用第三人称的口气讲述一个南加利福尼亚小镇上的小男孩如何利用有限的机会，如何成长的故事。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在晚上他听见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去，开始梦想着自己能够去很远很远他一直想去的地方，这个梦想在当时看来是那么地遥不可及……”

紧接着就说到故事的高潮了。那个夜晚在枕头上聆听西太平洋浪涛声的男孩子，那个做着“遥不可及的梦”的男孩子，现在就站在几千名代表的面前。“今天晚上，他就站在你们的面前，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提名。从这个故事中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对美国梦是如此地坚信不移。”就连憎恨尼克松的人也不禁为之动容。

这些话看起来好像完全是即兴发挥的，其实不然，在这一幕背后有不少精心的策划。那天晚上夜深以后，尼克松回到宾馆自己的房间里，为自己能够在演讲结尾处画了这么完美的句号而兴奋不已，变得更加自信了。“我很爱看罗吉或者是罗姆尼或是林赛表演‘不可能的梦’这动人的一幕，我只是把声调变了变，”他跟自己的助手威廉·萨菲尔说，“里根是个演员，我倒是很愿意看看他怎么来演这一幕。”

12年以后，在198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里根接受了总统提名这几个字可能在历史书上不值得大书一笔，但是他演讲时的美妙声音却长久地回荡在历史长河里。

当里根精心准备好的演讲即将达到尾声的时候，高潮时刻到来了。他在演讲台上稍微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四周也环顾着远在家乡的成千上万的听众们，依旧沿用了好莱坞的最好的传统，完全抛开了脚本。

“我刚刚想到了一件事情，它与这个演讲没有任何关系，”里根用

他那沙哑的、略带亲昵感的嗓音说道，“我一直担心，不知道该不该说。”

他又顿了顿，紧接着对美国讲了一通溢美之词，称它是“所有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最好的避难所，然后才是最关键的话。“我得承认，对于我即将建议的事情，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会更加恐惧。”

然后他要求大家为他即将进行的“十字军东征”默默地祈祷。

里根演讲的结尾在这次大会上极为成功。整个演讲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有悬念，甚至在结尾处还有希区柯克式的一波三折，所有这些都让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政坛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这一幕也让里根有机会去做他最擅长的事情——在一群职业选手中把自己刻画成为一个业余选手，一个被政治家包围着的普通市民。一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他那个结尾是早就事先写好的。最后收尾那几句话，在记者们手中拿到的演讲稿中也早就特意删掉了，而在里根自己用以参考的大卡片上自始至终都存在着。

展望

是的，在权力游戏中的确存在着有迹可寻的法则……发生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的每一幕后面都隐藏着它们，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谄熟和遵循它们的人大获全胜，而对其懵懂无知或加以违背的人则头破血流。

1999年，副总统艾尔·戈尔在竞选民主党200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受到了新泽西州前议员比尔·布莱德利的挑战。很多年以前在布莱德利举行的一次正式宴会上，戈尔曾经讲了下面的这个故事来取笑他未来的竞争对手。

布莱德利参议员进入参议院的时候，他头上有两个光环，他不但是普林斯顿最优秀的学生，之前还曾经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著名球星。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大型宴会上发表演讲。这位自信的立法议员坐在贵宾席上，等着发表演讲。

这个时候一个侍者走过来，将一块黄油放在他的盘子里，布莱德利立刻拦住了他。“打扰一下，能给我两块黄油吗？”

“对不起，”侍者回答道，“一个人只有一块黄油。”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吧。”布莱德利高傲地说道，“我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职业篮球联赛球员、世界冠军、美国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

听了这句话，侍者回答道：“那么，也许您也不知道我是谁吧。”

“这个嘛，说实在地，我还真不知道。”布莱德利回答道，“您是谁呢？”

“我嘛，”侍者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就是主管分黄油的人。”

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总会有人是主管分黄油的。

T
CHINA, THE UNIT

大巨

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作者 [英]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译者 卿松竹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英)科克尔著;卿松竹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15

书名 原文: 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ISBN978—7—5166—2268—1

I.① 大..... II.① 科.....②卿..... III.① 中美关系—研究
IV.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3072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6255

TheImprobable War: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by C. Hurst& Co. Publishers Ltd.

Copyright © Christopher Coker 2015

简体中文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第1章 历史类比和历史的逻辑

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第2章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和大国冲突的逻辑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第3章 战略叙事和战略的逻辑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

第4章 战争及其多变的逻辑

《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结 论

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神看到未来的事情，凡人看到眼前的事情，智者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

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命运。

——卡尔·荣格（Carl Jung）

如果麻烦将在你最意想不到之时出现，那或许你就应时时戒备。

——考麦克·麦克西（Cormac McCarthy）

序 言

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本书并不预言中美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即便有所尝试，考虑到政治学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向来成绩不佳，如此臆测实难令人信服。事实很简单，人类并不擅长对那些最接近我们自身直觉和经验的领域进行预测。人类只有在观察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时才最有把握，例如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或遥远天体的运动。科学试图发现表象之下的规律和共性，即各种“定律”和“守恒”，各种“常量”和“原理”：这些模式使人能够作出可靠的预测。结果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定律迄今很难被证明是可靠的。人类社会太复杂了。

政治现象会随时间而演变和分化，因此在政治学领域作出精准的预测尤其困难。尽管我们有可能确认革命环境和战争环境，但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主张的那样，革命环境并不总是导致革命发生，战争环境也并不总是以战争结束。政治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经济周期逆转政治命运；民族主义情绪在出人意料之时爆发；或许最重要的是，人类是任性的，容易冲动行事。

这并不是说政治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为国家行为甚至政治家行为创建模型是可行的。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可以开展行为分析，但人们的行为并非每时每刻都具有可预见性。与知道故事如何结局的历史学家不同，政治学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他们唯一的指南就是逻辑规则，也就是对人类行为进行长期观察后发现的模式和规律。政治学家正是利用这些逻辑规则来帮助政治家预见具体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涉及战争的可能性，无论这样的前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大可能”。

在很多人看来，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纯属天方夜谭，而且中美两国的政府和军队高官也持有这种观点。当我告诉我的同事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回应。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这种观点，或许在西方尤其如此，但在亚洲也一样——尽管那里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当我对这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质疑时，我才认识到它既根植于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相互提及的元叙事¹，也根植于国际关系的主流范式——根据这种范式，和平有利于积累财富。这种理论在自由派思想中根深蒂固。

然而，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强调大国战争匪夷所思，但两国仍然在为此作准备，尤其是现在，全球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21世纪主要冲突的地位。尽管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9·11”事件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但明天的历史学家更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9·11”事件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而不是21世纪的开场曲。一些政治分析家早就认为1979年是真正的转折点——在那一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斯兰主义从此兴起。同样在1979年，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崛起之势不可阻挡，这个国家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880年以来美国一直占据这一地位）。

如果世界最大的两个军事和经济强国展开对抗，那么会不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历史从不重演，但有其自身规律，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本书旨在确定一种在大国关系中和对抗时期内反复出现的逻辑。有关大国不再走向战争的说法或许

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战争具有某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逻辑，即便这种逻辑只能算是某种“经验之谈”。对于大国战争已经过时的乐观言论，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的确，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个世纪，唯一比预测战争结束还常见的就是战争本身了”。

挑战传统思维、提出不同问题并给出新答案正是学者的职责所在。就此而言，大国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因为它让我们理解大国领导人在局势紧张时期握有哪些选择。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对未来的深刻认识，而是基于当前的一种可能性，而作为一种可能性，它就还没到不可避免的地步。

关于逻辑

让我举一个大国冲突逻辑的例子，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战略学逻辑的例子。“战略学看似自相矛盾的逻辑与日常生活的逻辑相反，与一切对智慧的通常定义都相反……只有你理解辩证法的时候它才讲得通。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就去备战。如果你求战若渴，你就解除自己的武装，战争很快就会找上门。”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的前提正是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² 理论的例证：最简单的解释是最可信的。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勒特韦克是在引用一句古罗马格言：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想要和平，就去备战）。尽管这句格言在历史上被多次证实，但这并不能使其成为科学的准则。简单性原则只告诉我们应该先沿着哪条思路展开探讨，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些解释就一定是正确的。的确，符合逻辑的解释常常是简洁明了的。但有时并非如此。不去备战的国家并非总是遭到攻击。如果所谓逻辑就是能让我们在人类活动中找到某种一致性，那么这并不要求人类时时刻刻都必须保持一致。

一个以战争内在逻辑为基础的论证要想成立，就必须能从其前提合理地推导出一个结论。本书探讨了有关大国竞争的多个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前提必然推导出战争爆发的结论。要理解某种逻辑就需要用演绎法——判断从给定前提中能推出哪些结论，还需要归纳法——在这些前提之外总结出新的东西。这些都依赖于我们的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或许远不及我们的想象力强大。

此外，我们并不是天生遵循逻辑的物种。即便人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们也并不总是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历史学家常常说这种不作为才是正确的作为。善于推理或许能帮助我们演绎出自身行动所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后果。然而，并不能以此断定一国必将接受另一国的挑战，或者一国必然不愿接受对手以智谋取胜。在某些情况下，失败甚至可以被视作胜利。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认为的，对于按照逻辑得出的结论，我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于逻辑的掌握。

维特根斯坦还坚持认为，逻辑的局限性就是世界的局限性。换言之，逻辑的局限性决定了什么是可能的。然而，我们确认的行为模式并非真正的规则。它们是规律，知晓这些规律不必然帮助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尽管如此，不承认这些规律几乎总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你意识到事件的逻辑，那么至少这个世界在你看来会有所不同。你会发现，你并非生活在一个毫无确定性的宇宙中，万事万物并非只能用偶然或者人类的冲动来解释。这个世界有很多需要了解的东西，这种了解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它能帮助你避免被那些理解能力胜于你的人利用。

在本书中，我将找到我认为大国走向战争并常常陷入无法避免的冲突循环的主要原因。我将考察大国误读历史的常见方式以及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诉诸战争极少是非理性的选择，但它可能是不合理的，而理解两者的区别非常关键。我将考察大国竞争的逻辑，尤其是

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时候，后者守护现有体系规则的能力或许不及以往。我将考察战略学的逻辑；必须打造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并且以足够的智慧精心制订一个体现这种智慧的战略。我还将讨论战争如何具有自己的逻辑；它的确是多变的，因而会产生多种可能。正当你认为战争已经演化至尾声的时候，它会来一个出其不意——又找到了新的演化方向。

本书不应该与那些预言战争的虚构和非虚构著作归为一类，例如H·G·韦尔斯（H. G. Wells）的《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 1908）或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下一次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1990）。《空中战争》虚构了一个东亚联盟（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一决胜负的故事，而《下一次美日战争》出版之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才刚刚开始。如果中美之间将爆发战争的话，那么我估计这在可预期的未来就会发生，但这场战争被避免也是完全可能的。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这两个大国是否认识到大国冲突的内在逻辑。

对好奇者的警告

在此处发布一个免责声明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汉学家。我提出的任何专家意见都是通过常用的学术方法取得的。我从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借用了一些观点，并将它们融入我个人的论证之中。我也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我正确使用了历史类比，那也是受到他人的视野和思想的启发。

本书从一个战争现象学家的角度审视有关中美可能爆发冲突的主流论述，旨在寻找大国冲突的逻辑并考察这样一种逻辑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说：“我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与我预测事件的能力极不相称……即便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我的

成绩也谈不上突出：最恰当的说法是，我的理论框架让我能够在事件的进展中理解它的重要性。”关于预测未来的各种理论，值得一提的恐怕只有这个——而这很可能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

主观倾向在所难免，我基本上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我曾尝试对中国公平一些，公正对待中国对美国提出的、我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批评。我也要批评美国大多数战略思维的低劣，以及美国常常不惜损害自身国家利益、一味追求自由国际主义（或干涉主义）的狭隘做法。

然而，考虑到竞争的逻辑，我深信，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大于美国，美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从本能上讲它并不一定是好战的，尽管它可能经常导致战争和冲突。中国却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中一股危险的力量。或许中国崛起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方面就是其“近乎病态的赶超西方的需要”。尽管战争并非总是野心或者恶意的产物，但它常常是判断错误的结果。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计划事与愿违，或者图谋因偶然因素被挫败。如果寻常/不寻常的外部因素——无法列入考量范围的事件或者人物——也被考虑在内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和战争常常毫无逻辑。

本书针对大国冲突的本质以及中美未来交战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我们能找到的似乎最合理的历史类比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吸取错误的经验教训将落入哪些陷阱？对于像“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观念，我们应该给予多大重视？国家例外主义是不是冲突的引擎？尊严和名声还会刺激人们相互争辩吗？如果大战略包括社交智慧，那么中美两国有多大智慧？两国在制定各自的国家战略时会遵循某种特定的逻辑吗？两国的努力是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为了一旦战争爆发自己将处于优势地位？本书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一场战争很可能以何种形式发生。在小说《时间的尽头》（*Toward the End of Time*, 1997）中，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描述了2020年的中美战争：

站在令人目眩的四叶形立交桥上回看这座城市的轮廓，我们看到那些蓝色玻璃的后现代大厦在战后的荒芜中黯然失色，那些嶙峋的建筑的底部已染上斑斑锈迹，它们惨遭遗弃，因为对我们这个衰败不堪、老态龙钟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建筑太过靡费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子。他认为21世纪早期是一个“饱受创伤、复仇心切的时代”。这场战争主要由一群“受过高度训练的年轻男女”来指挥，“他们坐在安全的密室中观看三维计算机图像”。每个人都曾想象过，如果真要打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它肯定是由坐在密室中的大量操作人员来操控的，他们向计算机输入密码和指令，在计算机屏幕上，人只会显示为风格化的图标、颜色条或者不断运动的网络流。正是这些受过高度训练、坐在屏幕前的年轻男女最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中下一场大国战争的主角。

在后面的一个章节中我将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两个热核大国相互交战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但真的是这样吗？网络空间的冲突与传统冲突相比是非动能的，但那仍然是一场战争。的确，诺厄·费尔德曼（Noah Feldman）提出“凉战”³的概念，这种战争“比冷战暖一些，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几乎不停歇地采取进攻性措施，尽管称不上真正的战争，但通过侵犯主权和渗透防御，不断地尝试破坏或削弱对手，或者占据优势地位”。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这种凉战的热平衡能维持多久。

撬动历史

展望未来犹如雾里看花。往事可顾而不可塑，未来可塑而不可顾。人类是一个向前看的物种，更偏爱未来，但这种偏爱并不允许抛

开历史对未来任意想象，正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1871）里白棋女王所说，“这是一种可怜的回忆，因为它只能忆及过往”。不理解这个事实就无法研究历史。过去的人们无法看到未来，后见之明所看到的事情是当时的人们所看不到的。有些事情常常看起来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质疑当时的人们为何就看不出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是在告诉我们，超前思维有助于克服后见之明的偏见。我们以为我们比祖先知道得多。我们利用历史的优势（透过爱丽丝的镜子）看待事件。我们解读事件时并未思考该事件之前的事件，而是之后的事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们善于评价过去，因而自认为也善于预测未来，这种倾向实不可取。

当人们仔细思考中美之间这场不大可能发生的冲突时，最常被拿来作类比的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查尔斯·埃莫森（Charles Emmerson）写道：“在很多方面，一战前夕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反而更像今天的世界，犹如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奇异的折射。这种看法让我们很难不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就像把一个世纪压缩成一眨眼的瞬间。”一战前夕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最明显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如此多的顶级思想家都感到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

关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争论从未停止。基本共识是列强与其说是昏昏沉沉地误入战争，不如说是跌跌撞撞地陷入战争，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不大可能爆发。在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在共同边界附近调动部分军队。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 - Wachter）当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虚张声势，都是虚张声势。除非有人愚蠢至极，做过了头，以至于无法收手，否则战争不会爆发。我确实认为当今政坛还没有谁会这么蠢。”几年以前，一位英军准将曾被问道：“是不是只有当政治家愚蠢到难以置信时才能点燃

欧洲的战火？”他回答说：“你马上就将见识什么叫愚蠢到难以置信。”

这场战争带给人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列强的领袖们最终冒了太多的风险，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杰克·贝蒂（Jack Beatty）将有关战争起源的看法分为三种——可以避免、不大可能和不可避免。只有当政治领袖竭尽所能阻止战争的时候，战争才“可以避免”。他们并未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太低。考虑到欧洲政治具有火药桶的特性，要想让这块儿大陆保持和平，必须具有非凡的危机管理技能。只有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战争才“不大可能”。因此可以推知，战争基本“不可避免”，因为这些政治家并没有认真考虑战争爆发的前景。

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就一战爆发的原因达成“最终”一致。一些人主张战争源自政治上的误判，而另一些人将战争归因于同盟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冒险之举。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以这样一个因素为基础，即各方政治家都得出战争不大可能发生的结论，结果导致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它。

今天的世界面临重蹈覆辙的风险，因为我们在重复1914年时我们对自己说过的话。对大国冲突前景的普遍懈怠基本和当年一样，认为国家间战争几乎“绝迹”或者“过时”的错误的自由主义假设也和当年别无二致。正是这种思想有可能在近期导致冲突的爆发。理性行为体模型的信徒凭借对世界的粗浅理解认为国家间战争不会爆发，而经济学家和全球主义者则认为“距离已经消失”，因为全球主义已经战胜了地理。本书正是要打破这些人对国家间战争的看法。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历史类比并不考察全部历史经验，任何规则总会有例外，但我们也只能做到类比这一步。当有人警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 在越南的行动暗藏危险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工夫跟你扯历史。”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想避免犯下前人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他那样的豪气。

1 元叙事 (metu-narrative) 指的是完整解释，即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它通过预期实现，对一个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编注

2 “奥卡姆的剃刀”是由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 (1287—1347年) 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这个原则一般被概述“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不同的假说在预测或解释同为同一件事情上具有相同的效力，那么最简单的、需要最少前提的那种假说最为可信。——译注

3 相关著作《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已由新华出版社于2014年引进出版。——编注

第1章 历史类比和历史 的逻辑

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历史的首要实际用途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貌似合理的历史类比。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说：“上天没有赐予我任何东西，每一样都要去争取；不仅现在和未来要去争取，过去也是如此——当然，或许每个人都继承了过去，但这也必须争取才能得到。这或许是最艰难的任务。”“争取”过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过去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如果通过研究最合适的类比而吸取了正确的经验教训，那么我们至少有机会认真准备、以防不测。

类比有助于逻辑思考，它们是归纳推理的核心。这种推理假定被

过去验证的规律性和相关性在将来也成立。归纳推理往往从具体的个例（例如1914年战争的具体原因）指向一般性的结论（一切战争的原因），或者从一般性的结论（凡大国必相争的观点）指向具体的个例（中美之间的竞争）。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归纳推理，这也是人们普遍喜爱历史的部分原因。历史是一种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向导，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学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实现与过去不同的未来。不过，尽管类比是归纳推理的基础，但它们不一定有助于预测历史与过去相似的方式。问题在于具体情况：规则的例外或者统计异常。

归纳推理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归纳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自然规律的可靠性可以使预测的准确率高达99.9%。然而，人类社会高度多元化的本质意味着归纳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适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文化信仰、自身定位和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对战争原因作出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的一般性陈述。如果能作出这样的陈述，那么作出准确的预测就简单得多。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救援》（The Rescue）中，一个角色宣称，世界上一切冲突都可以归咎于女人：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乘客……他曾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希腊人为某个女人打了十年的仗。土耳其人好像是绑架了这个女人。无论怎样，他们在土耳其打仗，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直在打仗。

尽管康拉德小说中的这位老者振振有词，但关于战争的原因人们已经争论了几千年，很可能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例如，修昔底德颇感自豪的一点就是，他认为他理解战争的“真正”原因，这使他的作品不同于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叙述。在荷马的叙述中，一切都归咎于神

灵，当然，还有一个女人——海伦。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将希波战争解释为东方企图对特洛伊的陷落进行报复。

1914以及一切此类论述

一个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即刻否定。这个今天再度流行的观点认为，激烈的国家间冲突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带来回报。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曾说，“求知使人远离平庸，经神秘之路前往世外之地，万般新知藏于彼处。”这就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原因——他们引领着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波兰工程师让·布洛克（Jan Gotlib Bloch）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在他对战争原理的研究中，他断定战争是一种消耗资源的活动。战火不仅烧毁希望，也烧毁资源。他对列强在20世纪前夕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估计，认为欧洲爆发战争对胜利方和战败方都是灾难，因此战争不大可能爆发，甚至是“不可能的”。他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G·B·古奇（G. B. Gooch）在1911年写道，“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像决斗一样过时。”

很多著名的作家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不仅不再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违背开明自利论。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就是其中之一。1912年1月，他在对伦敦银行家协会发表演讲时说：

商业上的相互依存是银行业的一大特征，因为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任何其他职业或行当都不存在的——事实上，一家银行的利益和偿付能力与多家银行的利益和偿付能力密切相关。各家银行都必须有信心相互兑现责任，否则整座大厦都会垮掉。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道德终究

不是建立在个人牺牲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开明的自利上，即对于将我们绑定在一起的全部纽带有一个更清晰、更完整的认识。这种更清晰的认识必将进一步完善，不仅涉及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观念将推动建立更有效的人类合作和更美好的人类社会。

一名在会议现场的前《金融时报》编辑随后报道说，安杰尔几乎征服了全场观众。

这种认为世界日益错综复杂导致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爆发的观点在今天也很常见。像今天的很多分析人士一样，安杰尔认为，世界的错综复杂性挑战了此前主导战争的力量，他在《欧洲的幻觉》

(Europe's Optical Illusion, 1909)¹ 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此书认为，战争将扰乱国际信贷的流动，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以避免任何战争。即便战争爆发，信贷危机也很快会使其结束。安杰尔坚持认为，国际金融如此错综复杂，世界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抢劫”无利可图，外交“欺诈”徒劳无功。

安杰尔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理论。到1914年时，先进的欧洲经济体已经成为一个覆盖整个大陆、延伸至大西洋彼岸的商业循环的组成部分。但安杰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高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及其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各国政府在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领域签署了国际公约，并且统一了铁路时间表，但它们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如此，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债券市场非但没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在冲突最终爆发时为战时财政提供了便利。

安杰尔的观点与一套被广为接受的思想体系相符。就是在那段时期，人们第一次开始谈论全球联网，尽管他们那时还尚未使用该词。到1900年时，世界已经开始全球化。19世纪从欧洲迁往北美的数以

百万计的移民成为一个大西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跨大西洋资金流动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经济体。不同市场的价格和利率趋于一致。随着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一国的经济下滑可能迅速蔓延至整个世界。

之前充当国际贸易语言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可以说英国人是全球化的创作者。当有人问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什么将是20世纪政治最重要的因素时，他回答说是北美人讲英语这个事实。英语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好发脾气、好与人争的大国联合起来，先是反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然后是反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最后是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

在安杰尔看来，20世纪初全球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英语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意味着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反常现象。持有这种观点的绝非安杰尔一人。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批判战争的人，包括荷马——“愿争斗从神界和人间消失”——但人们一直以来都想当然地将战争视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直到人类开始对战争的原因产生怀疑时，这一点才发生改变——人类对生活中其他一些此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活动也都产生过类似的怀疑。如弗朗茨·博阿斯（Franz Boas）所写，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开展的活动逐渐被当作论证的对象”，而战争就是这种情况。在安杰尔著书之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合作胜于竞争的观点，而最认为这个道理不言自明的国家恰恰是安杰尔的祖国。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总结说：“我们已经从战争那里索取了它能提供的一切。”作为达尔文的信徒，斯宾塞宣称，推动人类进步并且导致战争的那种热忱和情感已经失去了适应能力。自那时起，这种观点一直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大量文献中，最近的要数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1）。

然而，尽管安杰尔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保持一致，但他确实招致了一些批评。最重要的是，支撑其著作的一套观点是典型的20

世纪初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任何与他的世界观无关的东西都被他直接删掉了。他看到的全是战争的风险，却看不到战争创造的机会。

安杰尔还忽视了德意志帝国那些竭力宣扬战争好处的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895年获聘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科学，唯一目的就是扩张各国的民族经济。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但他论述时咄咄逼人的措辞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演讲中布满了直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拿来的行话，例如“生存”和“选择”，以及像“历史法则”和“国家竞争”这样的表述。类似的观点可以在韦伯同时代的人，例如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著作中找到，后者对斯宾塞有关战争已经提供“它能提供的一切”的观点尤其不屑，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繁荣后便“沾沾自喜”的典型表现。当与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松巴特抱怨说，“我们常常不得不感到我们的敌人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百货商店”。

有一种说法认为，战争摧毁了人们对自由主义和进步的信仰，但正是这种信仰导致了战争——这么说或许不太公平，但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犯下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历史学家今天仍然在问为什么德国在1914年选择了战争这条道路，他们给出了从争夺市场和民族主义情绪到国内政治压力等各种解释。然而，尽管这些都毫无疑问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实质性因素通常并不“导致”战争：它们只是构建了斗争展开的参照系。冲突的爆发归根结底源于一个社会对暴力以及预计从参战中获得的好处的情感反应。当足够多的人认为战争对生存竞争来说必不可少，是第一等的生理需要，或者当战争被视为一个国家用来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舞台时，用实质性因素去解释未免多此一举。

对于认为和平能带来一切、战争使人一无所有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安杰尔的观点格外有影响力，原因就在于它们根植于在当时的英国虽未得到认可，却占据主流的思想体系。例如，他坚信大英帝国是

人类行为的终极楷模：

在这方面，世界当以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为指导……将大英帝国的指导原则推广至整个欧洲社会正是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方法。通过武力获得进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将靠观念获得进步，否则一无所有。由于这种不同团体可自由开展人际合作的原则在特殊意义上是英国人的创造，那么领导责任就理应交给英国。

经济观念像其他一切观念一样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转或应该如何运转的主观意见，而且经济学家比大多数人更一厢情愿。1914年世界走向战争之时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箴言，在幕后管理世界经济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问题就出在这儿。欧洲青年在1914年走向战场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令人吃惊，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学这门刚刚接管政治生活的“沉闷的科学”抱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胜利属于全心全意维护自己利益、不满足于安逸生活的一方。

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过程也是一整套思想体系坍塌的过程。自由主义思想在德国日渐式微，而视政治经济为竞争与零和游戏的观念逐渐兴起，与之相伴的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强烈鄙视。

尽管《大幻觉》出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安杰尔仍坚持己见——权力政治无法再保证繁荣，而和平有可能为创造财富提供更好的机会——直到他在1967年去世。由于英国即将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所以安杰尔有绝对的理由相信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便是在临终前。不过，如果活到今日，他或许就不会对自己的观念那么自信。毕竟，他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军事征服不再保证一国实现现代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形式，因为金融和信贷市场都需要和平。

安杰尔的论证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深信“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歧根植于各国内部，与政坛斗争相互交织”。尽管安杰尔意识到在德国有一股主战的思潮，英国也有浓厚的保护主义传统，但他认为两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终将主导两国之间的任何对抗。但他高估了在那一刻最终到来时自由主义相对于民族主义的实力。在英国，当战争爆发时，大批此前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立刻收起自己的疑虑，发表了爱国主义声明。另一方面，在德国，众多知名的自由主义者从来就不反对战争，包括马克斯·韦伯、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弗里德里希·诺曼（Friedrich Naumann）。这三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大战很可能“无法避免”。

安杰尔在1913年赴德国开展和平运动时发现了这一点。在此行之前，2000本《大幻觉》德译本被发给指定的德国教授和学生。安杰尔的德国赞助人认为，即便只有少量学生参加他的会议——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参加——德国的大学也至少会接触他的观点。但安杰尔及其赞助人发现，舆论氛围明显对他不利。在哥廷根大学，25名学生在安杰尔开始用英语发表演讲时离场，他们随后来到警察局，抗议以外语举行政治会议。在柏林，会议以骚乱收场，安杰尔抱怨一些教授唆使学生起哄。安杰尔此行以失败收场。在这样一个国家，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阳光下的地盘”，即便这个梦想最终成为史上最大的幻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尽管描述战争本身很容易，但理解和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绝非那么简单。历史学家不愿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德国，而是更愿意强调为1914年做铺垫的长期动态，例如经济和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在所有国家甚至是自由主义国家都肆意蔓延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这种信仰已经深入大众文化的骨髓；联盟体系和先发制人战略让大多数列强同时成为侵略者和受害者，但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在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是奥匈帝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决定发动战争。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德国人实际上从最开始就准备发

动战争，但他们肯定作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因为他们坚信，与未来相比，在1914年他们战胜俄国和法国的机会更大。战争在德国人自己的世界观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让他们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

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有助于发现它与未来的中美冲突的相似性，但仅靠实质性因素并不能将不同社会推向战争。社会像人一样，受到对世界如何运转或者应该如何运转的推动。他们既受信仰驱使，也受激情支配。

安杰尔书名中的“大幻觉”也可以指代另一种幻觉，即我们固执地认为人类有能力使自己的行为保持理性，即便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结果。我们并非总能认识到什么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并非如我们自己认为的那般理性。我们还非常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应对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困境。当然，自由主义世界观不会轻易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而且由于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相连，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也会受到世界观的影响。

1921年安杰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的获奖者挪威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劳斯·朗厄²（Christian Lous Lange）在获奖感言中赞扬了安杰尔的这本书。让他尤其感到鼓舞人心的是“安杰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的，对‘人类的理性潜质’深信不疑且满怀热忱”。然而，安杰尔所说的理性基本上对人类的激情避而不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回顾欧洲复古的军国主义表现时打破常规，批评他的自由主义同僚们过于强调人类的需求，结果却忽视了人类的欲望。他强调，如果冲动和欲望是重要的，那么采取行动的欲望和出类拔萃的需要也是重要的：成功克服阻力的意义以及成功通常会赢得他人的尊敬。罗素将这一分析延伸至国家（的确，对那些无法在个人层面出类拔萃的人来说，从属于一个能够赢得尊重的国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自尊）。

罗素深受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的影响。在战争爆发前，詹姆斯认为人性中的好战情绪过于根深蒂固，这种情绪很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除非我们能找到比贸易回报更好的东西来替代民族荣誉。尽管贸易可以带来财富，但某些社会渴望得到的东西远不止财富一项。詹姆斯还说，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倾向于掩盖这个人们不愿面对的事实，因为欧洲已开始认识到战争的麻烦：

当前，文明社会的观点是一种奇妙的思想混合物。军事本能和理想从未减弱，但它们受到了理智的批判，这种自古以来的自由被大大限制。无数作家都在呈现兵家野蛮的一面。纯粹的掠夺和控制似乎不再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动机，必须找到借口将这些动机全部归于敌人。英格兰和我们美国，以及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当局，在任何时候都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平”。一心想要战利品和荣耀的是德国和日本。

詹姆斯的批评不仅限于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在《道义战争》（*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1910）——上述引文便摘自此书——中，詹姆斯还抨击了西方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他们试图用一些伪科学的术语为战争辩护。一个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撰写的《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 1909）。这位将军认为国家有兴必有衰，在未来与日本的任何一次冲突中，美国都不大可能取胜，原因是美国的高傲自大、商业精神以及（不可避免的）女权主义。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德国作家所著的《战争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War*）。这位作家认为，战争由上帝主宰（上帝可以借此评估人类在英雄品质、顽强意志、创造才能，以及——不可避免的——男子气概等方面是否有长进）。

这些被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称作“侵略借口”的东西在英格兰自由主义阵营中同样存在。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找到了为战争

辩护的理由——战争提供了一种既包容又排外的集体身份认同感。这些理由通过认定谁是“外人”来团结社会，而对“外人”可以随意欺侮、奚落或者诛灭。这些理由既制造仇恨又讨好仇恨——在培育和压制仇恨的同时又为仇恨披上一层科学的伪装。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个典型的例证，其影响甚至在伟大的议会制度评论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著述中也有体现。他不仅受到了达尔文的启发，还反过来对达尔文创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1871）产生了影响。白芝浩主张，“战争这种竞争性的考验”推动了进步，因为它改进了种族的“适应性”。三十年后类似的观点再次出现，彼得·查默斯·米切尔（Peter Chalmers Mitchell）将国家称作“一个正在形成的物种”，并视德国为英国和法国（一对“共栖动物”）的“生物学”天敌。这种观念持续的时间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长。例如，一些美国人将日本人视为一个劣等民族，在珍珠港遭袭之前并未将日本视为一个严重威胁。在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小说《召唤》（*The Call*, 1985）中，故事讲述者评论说，日本人因为袭击美国而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丑化自己，而是成为真正的人类。

事实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元叙事一样有说服力，后者认为各国将不得不遵守这种相互依存的对称关系的逻辑，因为这是市场的要求。然而，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原因并不是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能证明战争合理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对战争的辩护，例如盖伊所说的“侵略借口”，而是这些辩护适用的论证框架。

詹姆斯的作品有其重要意义，因为他认识到鹰派与鸽派同样理性。他在职业生涯开始时（1878年的《理性情绪》）就曾主张理性不过是一种感觉或者情感。詹姆斯的作品仍被选入逻辑学的权威文集中，因为他的论证相当有说服力。有些信仰问题不是仅凭智慧就能解决的。詹姆斯承认，由于信仰可以伤害其他人（有时也伤害信仰者本人），所以信仰就必须尽可能理性，但他也坚持认为，信仰还应该充

满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意识到必须直接回应有关战争的争论，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者想象力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像安杰尔这样的作家无法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观念利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激情，而最重要的正是激情，并非观念：

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恐惧——我正要这么做，似乎它必将指向人类想象力的两处禁地，其一关乎审美，其二关乎道德。首先，人们不愿想象在未来人们可能会告别充满诱惑的军旅生活，各民族的命运不再通过武力来决定——这种方式犹如风驰电掣，惊心动魄之外也可能惨不忍睹，而只能通过“演变”来决定——这种方式旷日持久、乏味无趣；其次，人们不愿看到人类施展本领的最高舞台被关闭，人类优秀的军事天赋注定永久埋没，绝无发挥的可能。这两种不情愿像其他任何审美和道德方面的不情愿一样难以克制。在我看来，这两种不情愿必须得到倾听和尊重。你不能仅仅以战争的昂贵和恐怖来克制它们。恐怖会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而当讨论如何将人性发挥至最大限度和最高程度时，讨论成本就显得不体面了。如此多的否定批判却丝毫没有说服力——和平主义没能从鹰派中策反任何人。

詹姆斯坚信，信仰永远和欲望以及需求的满足相关。战争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利益（也几乎没有满足任何需求）。对德国人来说，它可以满足赢得更多尊重的需求。它可以暂时缓解具有严重危害的怨恨情绪。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詹姆斯得出结论认为一切真实性都带有个人印记。现实如果在你的看来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

现实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看待世界和理解生活的方式有多种。任何一种现实都不比另一种更根本，更不要说“真实”了。很多个世界在那里共处，有时并不安宁。这与现代人的理解是一致的，即现实受到语言、观念和符号，尤其是象征的影响。詹姆斯认为，要认定

某事是真实的、正确的或者现实的，就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对谁来说是真实的？真实的观念是一个社会能够从其自身历史经验中得到印证和证实的。此前的理论学家将真相视为坚持真理者的财产，而詹姆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进程：“一种观念的真实性不是这种观念固有不变的属性。观念会后天具有真实性。它变得真实，被其他事件塑造成真实。其真实性实际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即自证的过程。”

詹姆斯认为，有关真实的观念还解释了人类行为模式的迥异。有些人对失败的恐惧大于对争取成功的胆怯，因而倾向于谨慎行事。其他人对寻找生存的真实性或者意义更感兴趣，而不是如何避免判断失误，而还有些人甚至愿意（冒着个人风险）大胆地迈向未知之地。换句话说，有些人愿意承担风险，而其他人则不愿意。

在《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1896）中，詹姆斯举了一个人爬山的例子。此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他只有跳跃深渊才能逃离险境。詹姆斯说，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具备成功跨越深渊的勇气。如果你怀疑并且不相信自己的跳跃能力，那么你就很可能坠入深渊。“拒绝相信自己，那你就真判断对了，因为你将彻底毁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那么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将拯救自己。”在所有情感之中，信念最为突出。

詹姆斯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然而，现代科学如今已经对大脑如何工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避险意识并不是在大脑中负责思考的区域产生的，而主要是在负责情感的区域产生的。感到危险并鲁莽行事也是一种“情感”。理性思考与避险毫无关系。真正理性的是人们在采取某项行动后常常试图论证风险的合理性，或者在事后让决策更合理。因为人脑不能“计算”我们与世界关系中的一切变量，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情感上走捷径。詹姆斯的大胆一跳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1914年，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要比判断保护主义的利弊复杂得

多。人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大国战争是非理性的（没有谁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重视防守胜于进攻的现代战争必将耗时耗力）。但如果支持与反对的观点同样有说服力，或者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那么理性就不会在争论中获胜。法国人参战时认为锐气和胆量足以帮助他们取得胜利。很多德国人错误地认为英国人会保持中立，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对付俄国。英国人则幻想德国会出手干预，阻止奥地利人挑起另一场巴尔干战争（最大的幻觉）。

选择相信“谁”或“什么”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难题，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难题。而当问题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时，这种挑战性就更大了。例如，考虑到气候变化或者核能等问题的复杂性，很多人除了相信专家的观点别无选择。但专家们总是相互争执，有些像全球变暖一样的观点受到了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的科学推测的影响，并无真凭实据，你只能选择信与不信。在法国，军事专家在1914年时恰好相信进攻胜于防守，对国家锐气决定胜负的逻辑深信不疑。

当两种观点都可能正确的时候，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似乎也有道理。但詹姆斯补充说，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得不作出选择。如果一国对于战争的功用持不可知论的立场，而另一国不是，那么对于前者就可能是危险的，它甚至可能遭到攻击。英国在1914年选择参战是因为它认为不参战更危险。很多英国历史学家赞同这个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被视为“正义之战”，但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一战是不可避免的灾祸。从根本上说，战争双方并非在道德上无法区分。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有人主张英国应该接受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如果英国选择中立，那么这种前景非常可能成为现实——作为避免日后悲剧的合理代价，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很值得商榷，今人看来如此，当年志愿入伍或者随后被征召入伍的人看来也是如此。”

詹姆斯的论证本身就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显示出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而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且在今天美国人

观察世界的方式中，实用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詹姆斯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对现实有不同的文化构建，而美国人的构建是结果主义（即一个行为的道德高低应单纯以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是对是错（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詹姆斯本人认为战争是错的），每个社会都应该自问：参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战争的意义不取决于其根源，而在于其结果。

詹姆斯的批评者还在其他地方对他的论证提出挑战。例如，詹姆斯没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无能为力时我们该做什么？乐观的态度或许可以帮助一个人跳跃深渊，但如果他脚步踉跄，跳跃失败，那么乐观并不能帮他免死。詹姆斯还忽视了内在价值的问题。认为真实性取决于需求的满足确实无可厚非，但这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满足何种需求，或者满足这些需求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最后，詹姆斯没有讨论人类需求的根源，它们是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文化性的。毫无疑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认为我们注定为生存而战是一回事，认为一国好战源于其文化DNA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人们尽可对詹姆斯的观点提出批评，但在很多地方他都是正确无误的。战争本身并不是非理性的，正如布洛克所认为的，战争不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带来回报。尽管战争的结果是德国战败，但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结果也是很可能的。在开战最初的几个月，德国人几乎就要击败法国，而此时英国很容易选择完全不介入战争。如果英国置身之外，那么德国就会更早地击败俄国，从而以最小损失夺取胜利。德国没能如愿以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打的算盘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不合理的。

詹姆斯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所称的“可误论”的鼻祖。可误论是一种认识论领域的命题，主张理性的人永远不会对一种观点给予盖棺定论式的肯定。其他可误论者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以及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其中，波普尔怀疑有关智识的一切必然性，哈耶克怀疑政府的必然性，西蒙认为一切理性都是“有限的”，而卡内曼和特韦尔斯基主张人类决策常常以非理性的启发法和偏见为基础。

俾斯麦也可以被称为可误论者，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人们是多么轻易地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与他之后的历任德国首相相反，俾斯麦认识到，在诸强之中，德国的实力远逊于英国或法国，一旦战败，德国将遭遇灭顶之灾。甚至是取胜的前景也让他忧心。正如一位外交官所写的，德国不得不为1870年的胜利付出普选权的代价，“如果再赢得一次战争，德国就要实行议会制度了”。在战争中获胜可能会释放平民主义的思潮和理想，而这些不是政府能控制的。

德国的劣势并不源于其经济，而是源于其宪法和政治制度。议会制度——尽管以普选权为基础——由于议会自身受到的限制而形同虚设。德国议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控制预算，但军事预算每五年才审批一次，因而削弱了议会的监督权。尽管议会能够对首相投不信任票，但它不能将首相免职。简而言之，德国勉强称得上是民主国家，但这种民主并不自由。这是“反动的现代主义”³的典型例子。

结果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数年间，德国的这一劣势是致命的，同样致命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德皇负责评估德国的作战计划和战争政策。虽然几乎有50个人与德皇有直接联系，但这些人之间没有讨论和协调的机制。甚至有关作战计划的信息都不能在总参谋部、战争部、海军部、海军总参谋部以及外交部之间共享。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这可能与冷战期间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相似，当时该部有权制订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计划，而无需咨询美国海军、陆军或者国务院，总统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在其政府内部发布有关作战计划的细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一个“教训”是，从文化的角度讲，对

战争寄予希望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但自信一定能取得战争胜利或许就是了。詹姆斯想要论证的是，在黑暗中向前跳，指望运气或者全凭天意是完全“理性的”。非理性体现在知道或感觉这样的一跳会带来致命后果却仍不放弃。一部分德国人肯定意识到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公开的秘密备忘录显示，普鲁士陆军元帅冯莫尔特克（von Moltke）向德皇表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正如将军们公开表示的那样），而是很可能迁延日久，并最终耗尽所有大国的元气。同样“不合理的”还有德国海军在刚刚以“无法取胜”为由放弃海军军备竞赛的时候，决定制订与英军作战的计划。

1914年，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如此悲观，以至于他对儿子说没必要为自家庄园栽种榆树，因为30年后俄国人会把它砍倒的（事实证明他这个预测相当准确——俄国人的确在30年后来了，而且又在此停留了50年）。每个人都可能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而大多数时候理性的人过着不合理的生活。如今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远胜于1914年时人们的理解，我们也远比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意识到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所说的“人类总是把事情搞砸”。

为什么理性行为体模型并不总适用

暂且不考虑我们选择相信哪一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解释，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领导人简直太乐观了。乐观是人类适应性特征的一种，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乐观有助于人类生存或繁衍后代。甚至有人表示，乐观这种适应性特征在人类采集狩猎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战争的演化中也能找到。如果战争是进化史中最重要的选择性压力之一，那么战争的长期存在很可能对我们的心理进化产生重大影响。

但乐观还会使人更愿意冒险，负面想法和情绪所产生的压抑可以

提高个体在完成给定任务时的表现，这也适用于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写的，“在战争中，勇气……是除了对时间、空间和军力的准确计算以外，另一种应该被给予重视的力量，因为只要有一方的胆量超过另一方，那么前者就会因为后者的怯懦而占据优势。换句话说，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说，如果一种积极的幻觉具有适应性，并且那些产生乐观幻觉的人往往取得成功，那么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产生这种幻觉是有好处的。误判可能是对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虚张声势进行权衡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自身无法准确判断形势。1914年的教训不是误判造成致命后果，而是如果战争通常能分出胜负，那么盲目的乐观和合理的乐观从定义上说都是真实的。

盲目乐观源于个体无法判断什么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人性的这个特征在今天与在1914年别无二致，尽管坚信理性行为体模型的人有不同的意见。理性行为体模型在美国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其标准表述是这样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假定个体根据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作出旨在将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的选择。这个模型假定人类确实会努力保持理性——至少大部分时候如此，这种假定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并非聪明绝顶，人类在确认自己的真正利益时困难重重。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前主席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未能说服美国国会监管期货衍生品市场。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相“当吃惊地”发现，金融机构和银行并没有理性地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它们向还款可能性几乎为零的人发放贷款）。这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所说的经济学家具有“无法计算的主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事务中“可计算的理性”的缺失。

即便我们更具智慧，社会心理学家也已断言我们的智慧相当受限。在20世纪50年代，包括赫伯特·西蒙以及哈佛商学院几位学者在

内的作家都开始指出，我们有限的计算能力和预测能力严重限制了我们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是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论”的拥护者。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第一个提出，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其行为准则允许作出能够接受但并非最好的决定。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满意度原则”。由于人们无法以足够准确的方式评估一切结果，他们会满足于可获得的选项中最佳的一个。我们在找到接近满意的解决方案时就会停止继续寻找。如果我们不选择这么做，那么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或者展开最基本的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因此，我们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经济学家基本接受西蒙的观点，但倾向于抵制卡内曼的观点。尽管经济学家愿意承认人类是有缺陷的这一观点，但他们很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缺陷的机器——我们不大善于判断什么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按照理性原则管理经济，因此他们常常假装政府确实在这样做。经济学家还倾向于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他们会把任何经济体中常见的元素，如罢工、腐败和关税，描述为失常。理性选择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被强行套用这个模型（即便是明显的异常现象或“异样的”案例），以致削足适履、杀头便冠。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为之，但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丹·阿里利（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2008）就是一本认同这种做法的畅销书。但正如约翰·凯（John Kay）所说，如果人们真的是“可预测地”非理性，那么或许他们就并非真正的非理性。或许这个世界没有错，而是我们对理性的理解有误。当然，我们努力保持理性——我们受制于理智，但我们真的没有那么聪明。正因如此，我们的“理性”选择常常让我们损失惨重。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卡内曼被授予诺贝尔奖。然而，人们也很容易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忽视卡内曼的观点：你不可能把非理性纳入经济学计算机模型中。

理性的问题不仅局限于经济学。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所指出的，政治行为远不止动机和时机那么简单。思想体系并非全球通用，文化也很重要。如詹姆斯所主张的，理性带有个人印记。理性行为体模型对于描述个人来说无能为力——换言之，理性行为体模型很难理解人类行为背后常常有高度个性化甚至另类的原因；描述人类是一项过于复杂的工作。例如，当分析政治抗议时，政治学家常常忽视民众的热情，或者对运动领袖的态度，或者作为抗议者对个人能力不足的感受，甚至还有参加某项超越个体自我的活动的愿望。这也适用于战争，战争的爆发常常是因为决策者陷入认知失调或确认偏误（倾向于偏爱支持某个观点或假设的信息）的陷阱。在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和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bl）合著的《社会思想中的战争》（War in Social Thought, 2012）一书中，两位作者对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这样的社会学家提出批评，认为此二人把模型根植于理性行为，而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批评的理由还包括蒂利和曼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的社会进程，并且在历史已经证明的情况下仍不接受人们会为了战争而挑起战争这一事实。

用詹姆斯的话说，理性选择无法“测量现实的厚度”。经济学模型不适合描述人类的实际行为。人们最珍视的东西常常是他们不愿与他人交换的东西，像名声这样无法定价的东西。与1914年的世界不同，如今我们有可能在计算机模型中“测量现实”。但即便是抛开理性，单纯地考虑逻辑，人们仍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款无差错的计算机程序。原则上，一款计算机程序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不受日常现实浸染的“纯洁的思想”。然而，实际上错误会不停地出现，它们不可避免。

行为模型可能导致懈怠，因为它们诱导我们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件事，或者说适合我们的东西也一定适合别人。詹姆斯认为，人们作出的很多决定都源于信念，而不是论证。个体的看法是“被采

纳的信念”，持有这些看法的人可能经常把它们曲解为“合逻辑的”。文化上的偏好，尤其是“相信的意愿”，或者拼一拼运气，例如詹姆斯的大胆一跳，都因一种自我感知而大大加强。如果理性带有个人印记，那么它很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感觉历史对其亏欠得更多些。对国家例外主义的信仰甚至可能鼓励冒险。安杰尔同时代的人还持有一种有关理性选择的前理论的说法，但他们最终发现，他们对现实的所有描述只不过是“满怀热情地肯定了我们对社会制度能够给我们提供支持的期望”。也就是说，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安杰尔提出的论点对他自己来说是正确的，而作为一名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人，这种论点对他来说就加倍正确。

这并不是说关于战争为何在1914年爆发的实质性解释不准确，这些解释包括一种至今仍然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一战爆发是政治失误、杞人忧天、重大误判和非理性动机等若干行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模型仍然在人们理解战争时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但为所有这些解释奠定基础的其实是非理性本身：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我们的世界观。关注理性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行为，相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行为。

结 论

类比是矛盾且危险的工具。历史学家常常引用英国主教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名言：“万物皆有特异之处，不可与他物混同。”历史是独特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律的，但它同时也遵循某些规律。如果历史完全没有规律，那么研究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杰克·贝蒂写道：“历史发展有时是意外的巧合导致的结果……特定领袖人物与特定环境的结合以及特定事件与其他事件的结合永远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作类比时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例外的事件与大的模式同样重要。

其次，历史永远是在事后书写。历史的本质是后见之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根据我们对这些教训的理解来绘制未来的地图，但即便是最好的预测也不见得比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准确多少，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我们需要询问作者来自哪里。他是否择优挑选？或者换一种比喻，留在剪辑室里的部分是不是比最终出现在影片中的部分更重要？为什么他一开始就选择1914年这个例子而不是其他例子？即便是客观公正的专家也往往会受到心理学家所说的“可得性启发法”的干扰：我们倾向于根据举例的难易程度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常是近在眼前和信手拈来的）。往最好的方向说，这种思考是懒惰的；往坏了说，这是学术欺诈。变奏曲常常和主旋律同样重要；噪音常常比信号更重要；我们有时应该更关注一个趋势中的可变性，而不是趋势本身。你可能预计会发生战争，但结果可能是和平。

从1914年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这样一个事实，列强中没有一个真正想要战争，但有一些大国为抓住机会作好了充分准备。它们未能控制住局势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相信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之死引起的夏季危机最终会点燃整个欧洲。因此，真正的解释是一种奇怪的乐观精神诱使欧洲政治精英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无论发生什么，和平都会永驻，而这种奇怪的乐观精神在德国人身上最明显，他们愿意不惜一切地发动一场他们终将取胜的战争。

就德国而言，所有常见的解释都有其意义——海军军备竞赛、该国的战略自闭症、军队的独立性以及民主问责机制的缺失。不过，尽管这些解释很重要，但它们全是次要的。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检验其中一些因素，试图探寻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之是否有相似之处。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中国可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与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不同，中国可能只寻求“对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进行渐进式的修正”，但这会使我们感到心安吗？

我们今天对自己所说的话与政治家们在1913年的自言自语并无差别。其中包括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观点，即全球化使战争不可想象的程度超过了1914年。各国市场进一步相互关联，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机制，还是作为改变国际现状的途径，都只会适得其反”。但这种说法可信是因为你选择相信它。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经济学家主张一致性是理性的本质，从数学角度看，利益最大化和作选择时的一致性应该被视为一回事。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人们希望使财富最大化，并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开战的决定与人类这些基本欲望是不一致的。但一致性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约翰·凯（John Kay）写道，“每晚都在花园深处与仙女交谈体现了一致性，但这很难说是理性的。然而，如果说有一致性而无理性是可能的话，那么有理性而无一致性也同样可能。有时人们寻求得到一些并不一定相互兼容的东西——例如既想受人尊重，又想家财万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人们就有可能要求别人给予尊重，即便这会对其财富状况构成威胁。德国要求获得尊重，这部分地导致了该国的外交孤立。”我们可能看到，中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如此，谢韬⁴（《与龙共存》的作者之一）认为，中国正处于即将和美国相撞的轨道上，因为中国正在追求两个互不兼容的目标。“如果你尊重我，那么你就不会挑战我；如果你挑战我，那么你显然不尊重我。”中国像德意志帝国一样无法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各让一步才能赢得尊重。

凯的主张是不一致性也可以是相当理性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他引用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句：“我自相矛盾吗？/好吧，我的确自相矛盾，/我博大之极，我包容万物。”不可能将一个国家锁定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中。正如詹姆斯所理解的，世界过于错

综复杂，一致性不可能永久存在。整体看，各国的确更希望得到和平、创造财富，而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也是有情感的生物，尽管经济学模型重要，但它们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人类之间的互动。

人们普遍对爆发另一场大国战争不以为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看重理性选择模型，并认定人们一贯理性行事。安纳托·利芬（Anatol Lieven）和约翰·赫尔斯曼（John Hulsman）认为，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是应该对中国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还是只用大棒。他们声称答案很简单。美国不应该寻求使中国民主化，而是应该像小布什政府的一位官员⁵在2005年时提出的那样，使其成为现有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可以“适应国际社会”，而且理智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遏制。中国并非一个全球性大国，目前还不是。它有自己的全球利益，但这不能被当作全球责任。的确，中国不愿分担这些责任，这一点日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刺激因素。利芬和赫尔斯曼坚持认为，理智肯定会使中国相信，它不可能取代美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理智还应该决定应该依靠日本和越南来反对中国的这个企图。然而，至于美国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能“管理”好朝鲜，就像欧洲人在1913年是否相信德国人能管理好奥匈帝国，或者俄国能否管理好塞尔维亚一样，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利芬和赫尔斯曼坚信，“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两国爆发冲突可能带给任何一方的好处都无法弥补这种冲突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这样一场冲突很可能破坏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或许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并且还将浇灭中国崛起为伟大强国的希望。但他们对各国通过推理得知各自最大利益的能力过于乐观。他们自己也指出，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过度就是明显的失败。中国在推算自己的最大利益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

诺厄·费尔德曼在《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Cool War: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 2013）一书中也提出世界大战不再可

能爆发的观点。他认为，美中两国都有太多害怕失去的东西。战争会直接摧毁两国的经济，对中国来说还会危及国内稳定。开战“完全是非理性的”。但仅仅因为某事是非理性的，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历史上不乏睿智的政府怀恶心行善事的例子，而当它们受到焦虑和恶魔的驱使时，则会怀恶心行恶事。人们很少怀善心行善事。能够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多得很（台湾就是一个），而无论两国的领导人多么思想开明，两国要想展开合作都将会面临很多的实际障碍。

费尔德曼至少在一点上很可能是正确的：他暗示美国例外主义可能是个麻烦。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美国政府还希望这个政权全盘崩溃。在中国领导层看来，与这样的一个政府进行政策磋商定会让人懊恼。正如费尔德曼所评论的，就相互信任和尊重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起点。但美国不大可能在近期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如果双方都不能从对方获得信任和尊重，那么两国就会处于相撞的轨道上。

李光耀曾在2013年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这种见解令人欣慰，且不容轻易否定，但战争并不总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引发战争的是意外、灾祸、计算失误以及像民族主义这样的激情。因此战争是不可预测的。的确，理智常常与战争毫无关系。

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一方面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另一方面却永远学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严刑拷打被加强型审讯取代，奴隶制被色情人口贩卖取代。战争也没有终结：它从我们的想象中逐渐消失，但它仍在潜伏，等待着被‘祖先的声音’⁶ 唤醒。”当我们援引进步这种观念时，我们是在将两个不同的传说混淆在一起：苏格拉底有关理智的传说和基督教有关救赎的传说。格雷写道：“如果结论中的各种观点不一致，那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相信人类随着知识的增长会不断进步，但文明进步带来知识增长的观念实为一种

信仰。他在论述的末尾提出了一个让人沮丧但基本上无法辩驳的结论：尽管人类的知识可以不断增长，但人类的理性却原地踏步。这也意味着，即便我们能正确“解读”某个历史类比，我们也未必一定能够受益匪浅。

当日本和中国在2012—2013年再次陷入外交争端时，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宣称，中国处在“拐点”上，可能迎来重大转变。之前十年辉煌的经济增长使中国越来越过度自信，与此同时它对自己的外交局面开始感到不满。中国一位学者在评价拜登的言论时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就不得不调整现有的体制，中国社会将不得不更加开放。他说，除此之外的另一种结果不会令人满意：中国可能希望重新制定国际体系的制度。这是一个严肃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过去300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

1 后续版本皆弃用原书名，而改用如今广为人知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译注

2 实际上安杰尔是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朗厄为19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注

3 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其1984年出版的《反动的现代主义——魏玛和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首次提出“反动的现代主义”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既热切追求现代技术与进步，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分体现。——译注

4 谢韬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其与美国

学者本杰明·佩奇（ Benjamin Page ）合著的作品全名为《与龙共存——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编注

5 指美国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编注

6 语出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创作于1797年的著名诗篇《忽必烈汗》，诗云“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地听到/祖先的声音在预言战争”。——译注

第2章 占支配地位的 冲突和大国冲突的逻辑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中华民国陪都重庆遭遇空袭时，美国作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一个防空洞中避难。他无意中听到了两位中国官员的对话。尽管中国与美国结盟，对抗同一个敌人，但这两位官员讨论的并不是中日战争，而是未来的中美战争。他们把美国视为一个远比日本可怕的威胁，因为美国企图将一个远比它自己古老的世界美国化。

事实上，美国的崛起及其在全世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同时发生的。亚洲民族主义在大众意识中描绘了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它还使亚洲社会重新发现了它们相互之间有何不同。正是在这方面，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它们的社会何以具有印度特色或中国特色。

尽管如拉铁摩尔所听到的，中国人心怀疑虑，并且此后中国明显兴起一股民族主义浪潮，但实际上中国人对美国是有亏欠的。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劝说他与日本达成协

议。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纳粹德国，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放手不管要明智得多，因为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卷入与日本的新冲突之前全力对抗第三帝国。这种建议并非完全不合理，但罗斯福拒绝放弃中国。在美国，当地教会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作为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其《一个世界》（One World, 1943）一书中对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辩护。美国人是当时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试图打破大英帝国、纳粹的欧洲要塞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等各种保护主义壁垒。美国寻求创建一个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它还期望中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根据二战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具有民主可塑性”。中国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反之亦然（尽管事实上根据一项在二战期间进行的调查，多达60%的美国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

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如果朱塞佩·赞加拉（Giuseppe Zangara）在1933年2月13日¹ 成功刺杀罗斯福，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保守主义者、对国际主义毫无热情的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成为未来8年的美国总统，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将变得完全不同。美国会与日本达成协议，用中国的命运换取自身利益吗？毕竟与日本开战是迟早的事。当今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是由国家利益推动的，但它们也是由各国对未来的不同看法引燃的，后者在当今时代尤其正确。

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人们在研究历史和大国冲突背后的因素时，极少关注那些没能发生的战争。英国在1877年至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险些与俄国开战，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又险些与法国开战。在1870年之后英国没能与俄国或法国开战的最重要原因是就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协议——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称之为“交通规则”——相对而言，德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威胁要大得多。我将在本章中展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对这些规

则的重视程度基本上决定了它是否会为了捍卫这些规则而开战；我还将展示崛起大国之所以愿意考虑发动战争，究竟是因为它怀疑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能否继续贯彻这些规则，还是它希望修改这些规则以追求自身利益。这也是大国冲突逻辑的一部分。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

1914年的大国冲突有一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这些变奏曲就包括势力均衡（其实质是法德争夺欧洲霸权）。但真正的冲突——用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术语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发生在英德之间。利斯卡将“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定义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企图改变国际体系时引发的冲突。

1914年的国际体系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取胜的部分结果。尽管自那时至1914年之间，英国的实力已开始衰落，在工业产值方面被美国和德国赶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英镑是世界储备货币，英国在金融服务、银行业和保险业领域遥遥领先其竞争对手。英国继续管理全球金融体系，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取代。尽管全球大部分地方可能都已爆发革命，但英国的实力绝非仅仅仰仗其帝国疆土之广。在1914年之前这个世界的很多甚至大多数特征都源自英国，从蒸汽动力到追求进步和信奉进化理论，皆是如此。除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外，欧洲所有国家都采用了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选定的铁路轨距。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火车靠左侧行驶（至今如此），因为事实上铺设铁轨的是英国的工程师。英国人发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英语被确立为国际贸易的语言。英国还在传播自由主义观念——包括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所有大国最终都选择赋予其公民或臣民以选举权（俄国是唯一的例外，它将成为20世纪唯一经历革命的大国，那将是它为自己的误判所付出的

代价)。

尽管英美思想继续支撑着当今的国际秩序，但这套体系本身并非从未受到指摘。例如，将自由主义思想扩展为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美国人称之为“自由干涉主义”）的做法一直以来并未得到热烈的响应。如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说，一旦我们不再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视野，那么一切就都能对接上了。经济自由主义（开放的市场）、民主化（开放的思想）和国家建设（开放的政府）看起来如此交织，以至于它们无法相互分离。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20世纪30年代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自由是“自由贸易的哲学附件”。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的第一块试验田。在伦敦，反对派指责自由党政府为自由贸易原则而非狭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将英国拖入战争，自由党政府则反驳称，自由贸易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有助于该国融入国际社会。当战争爆发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名特约记者写道，“他见证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原则，‘炽热钢铁的鼓吹者’如今是自由派而非保守派，这些鼓吹者预见了美国人后来所说的‘新世界秩序’。”这名记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第一次冷战（1871—1914）

1871年至1989年这段历史时期包含多个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当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带领美国参战时，他认为此战是为了反对一种观念，即“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德国本身。英国作家也持有这种看法，包括H·G·韦尔斯，他将这场战争视为一项“卫生工程”。自由民主主义者20年后会发现他们又将与一种原则

展开斗争，即法西斯主义，若干年后又会在冷战中与苏联共产主义交锋。实际上，欧洲自由主义大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最早爆发冷战的时间远远早于1914年。然而，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和苏联之间爆发的那场冷战不同，这场冷战实际上演变成了“热战”。在1914年之前，马克斯·韦伯视英德战争为一场酝酿中的冷战，用两位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话说，这是一场“干燥的”或者“潜伏的”战争。这场冲突的根源是德国与其他欧洲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追溯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法国人看来，法国的战败表明德国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法国存在根本差异。用路易·迪蒙（Louis Dumont）的话说，这“让法国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即人权并非政治的全部”。德国对人性的追求与法国并不一样。

这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是上文讨论的规范性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只是为实质性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背景。就英国来说，战争是若干更加直接的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殖民地冲突以及德国将击败法国甚至俄国从而称霸欧洲的前景。但英国之所以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担心由德国来操控和平将意味着什么，一种前景可能是德国主导下的欧洲不再坚持欧洲外交体系的“自由”原则。

法国人怀有同样的忧虑。德国自由主义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1917年在苏黎世流亡时通过对比两份19世纪的政治宣言，对德国与法国针锋相对的世界观作了解释：

我最近比较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848年的《德国人民基本权利》（它们分别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法兰克福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二者有惊人的差异：

1. 《人权宣言》包含（有关人和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绝无此类内容。

2. 《人权宣言》在普遍意义上确立了人民主权高于国家主权，只赋予国家监管宪法的消极权利。《基本权利》则不然，它没有在原则上设定国家应受何限制，甚至没有设定国家对国民的依赖程度。

3. 法国制宪会议规定了个人不可剥夺的一些权利（安全、财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有权反抗所有这些权利受到的压制）。宪法既由所有人担保，也由每一个个人担保。宪法使用“人类”一词（暗示包含下层阶级），所言之事皆针对“人类”。然而，《基本权利》只提及公民和臣民的权利，而没有提及“人”的权利。

4.要概括《基本权利》的特点，必须.....

5. 不能忘记它制定于法国大革命的半个世纪之后，拥有这一时期的全部经验和德国古典主义的全部成果。尽管如此，在《基本权利》中找不到任何德国人性和德国哲学的踪迹。

之所以详细地引用这段论述，是因为它抓住了德国对英法两国代表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的挑战的本质：尽管英国在创建当代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法国也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留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那就是人权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人权都不是德国世界观的核心。与其说德国是世界主义国家，不如说它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强调社会基本单位的效忠胜于一切。根据德国的主流世界观，一国之民从社群中获取价值，通过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获取生命意义。德国的主流观念认为，生命内在地具有社会属性且根植于文化。借用托马斯·曼（Thomas Mann）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1918）中的句子，“（一个德国人）如果将其忠诚献给.....被欧洲各国称为自由的东西.....无异于要求他摧残自己的本性”。德国对于它希望用什么来取代现有国际秩序并没有具体的看

法。德国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大国，是一个捣乱分子。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研究中发现，欧洲主要大国在一战前夕秉持的规范性行为准则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埃利亚斯说，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Henri Bergson）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最清晰的阐述。贝格松坚持认为，法国人在战争期间试图维护支配这个体系的规则，因为它们反映出法国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在提到道德准则时，贝格松问道：“这些准则是针对什么提出的：是对人类整体，还是对某人出生的国家？”“不强调这种区别的道德哲学就难以窥见真谛……当我们主张尊重他人生命和财产的义务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要求时，我们指的是什么社会？”贝格松认同历史学家朱尔·米舍莱（Jules Michelet）的观点。在后者看来，你出生在法国就意味着你是世界公民，人权就是你的立身之本。

然而，在任何战争过程中，社会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置于“人性”的需求之上。的确如此，埃利亚斯还说，各个国家和社会的日益民主化导致了相应的世界观民族化和民主主义情绪，社会的道德需求几乎成为在大众感受和情感中根深蒂固的、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紧急事项。正如埃利亚斯所说，规范并不总是善意和包容的。尽管规范可以让人们团结一致，但同样的过程还可以常常鼓励人们一致反对其他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哪些国家已经把自由主义规范内在化，哪些国家还没有，答案很快就大白于天下。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德国的政策——这真的是政策——是抓捕大批人质并将他们成批屠杀，以此回应敌人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很大程度上甚至从根本上就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政策就规模而论在西欧无出其右者。”德国对英军战俘的处置就足以说明问题。死于囚禁的英军战俘的官方数字仅略高于1.1万人，但还有数以千计的、被报告为失踪的战俘因充当奴隶劳工而累死。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英军战场死亡率为4%。在英军战俘中，这一数字则为5.2%。德国处置战俘的政策被普遍视为以“战事所需”为名违反规范、置制度于不顾所导致的必然结

果。

至于英国人为什么能够在战争期间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埃利亚斯的理解就没有那么透彻了。他试图借用英国的“实用主义”和著名的“妥协精神”来解释。尽管这两种观念都不是英国所特有的，但它们都反映了英国的历史经验。如詹姆斯所说，真实性确实带有个体的印记。由于受到“木墙”²——如今是“无畏”级战列舰——的保护而免遭侵略，英国人具备道德说教的条件。公众期待英国的外交政策能够与他们和英国精英阶层在国内共同宣扬的那些原则保持一致。然而，英国人也可能是反自由的。例如，战争期间德国境内有75万人死于饥饿，其中很多人都是英国为确保德国将商船队交给协约国而实施封锁的受害者。封锁直到1919年夏天才结束，而几个月之前德国就已经投降了。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在继续实施封锁期间，妇女和儿童遭受的苦难大于停战之前。

然而，尽管英国并非矢志不渝地践行所谓的英国世界观，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对政治生活的渗透，以及中产阶级在制定英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发挥的更加积极的政治作用，都使英国有条件宣扬一种普世的道德观，使其“赢得叙事”。对于1915年之后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来说更是如此。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想象中的法国和英国的位置被美国取代。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认为，这套秩序本是由英国苦心经营的，而美国被拉进这套秩序之后，逐渐将保护这套秩序不受他国挑战视为自身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曾宣称，德意志帝国有一个英格兰的内核（或者说自由主义第五纵队），这个内核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毒害。1945年2月，在希特勒帝国的废墟之上从事写作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认为，德国拯救自己灵魂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这个（如今是受美国人启发的）自由主义内核在未来的秩序中发出声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通过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来融入当代世界

体系。到1960年，德国人就这样把自由主义规范内在化，从而限制了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选择，包括对其他自由主义大国发动战争的选择。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在勃兰登堡门重申了美国的价值观。他援引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是因人性而固有的权利”。奥巴马试图在演讲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796年康德说出这句话的多年以前，美国人就已经把这些内容写进了《独立宣言》。奥巴马在柏林对听众说：“我们不仅仅是美国公民或德国公民，我们还是世界公民。”

汉学家或许很难在1871—1945年期间反自由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之间找到共同点，而是更容易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免另一场“冷战式的”对抗。只有当这个世界的结构过于僵硬、泥古不化时，“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才会起作用。如果世界的结构并非如此，那它就不会起作用。我们的叙述能够压倒一切判断力：我们可能被这种叙述背后的操控力蒙骗。叙事源于冲突的环境，与具体讨论哪个国家没有关系。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不过，美国是不是仍然致力于执行这些规则呢？在后苏联时代伊始，似乎国际秩序将越来越民主化。用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说，世界似乎已成为“一个轴辐系统”，任何事情都取决于美国。由于这种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已经消失，世界看起来已大不相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如果美国选择放弃作为“必不可少的”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出现“管理缺口”。最近一篇有关奥巴马外交政

策的评论文章认为，美国当前所走的道路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它失去了“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即将把它的战略优势让与中国。

另一种解读当前美国政策的方法——这种方法似乎会被美国的“亚洲支点”战略证实——涉及区分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一位作家所说的“民主全球主义”——这是一项重塑外部环境以使其更易于接受民主价值观的规划。另一种观念是维护并在必要时强制执行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是一个更为适度的目标。美国仍然认为后者符合全球公共利益。“亚洲支点”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持五角大楼所说的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通过恢复地区联盟的活力，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这些规则。

美国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可以归功于它采取了需求模式，而非供给模式，这与19世纪的英国可谓异曲同工。当美国寻求维护这套体系，或者选择强制执行这些规则时，美国的政策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当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或者当它提供没有任何需求的服务时，结果就可想而知：美国很快就失去了国际合法性。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美国为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逐出科威特而组建的国际联军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但入侵行动本身却未能赢得安理会明确授权开战的决议。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案例（包括关塔那摩监狱和非常规引渡）中，美国拒绝接受外界对其行为的正当批评，结果严重损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正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美国政策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常常伴随着美国“豁免主义”，或者说美国坚决反对用它自己提出的规则束缚自己。当有可能限制美国行动自由的国际机构成立时，美国学者的反应中就会频频体现出这种“豁免主义”的观念。例如，历史学家穆尔豪斯·米勒（Moorhouse Millar）为证明美国决定不加入国际联盟是正当之举时曾说：“当然，如果美国要致力于和平事业，那么唯一途径就是将其自身秉持的原则明确而充

分地宣示于天下，而不是用这些原则去换取一种基于功利主义、作为权宜之计的国际安全。”20年后，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失望地说：“如果美国选择从属于联合国，那么它将把自己的历史责任推卸给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可能并不理解其首要职责是履行与历史达成的契约。”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声音属于少数派。“美国优先”理论的信徒也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同一类国际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世界，而是因为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种宣称为这个世界代言的机构都是由美国设计的，并且仍然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启迪。

诚然，今日美国的期望值远低于“9·11”事件刚发生后的那段时期。在美国的政策讨论中，重点如今已放在“更高级的自由主义”上，这种观念在奉行自由主义原则与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说的“适当考虑其他大国根植于历史的利益和志向”之间寻找平衡。美国外交决策层有充分的自信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并非只有新孤立主义者才知道保持谨慎的重要性。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话说，“在某个行为中，其他人使我们明白他们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对这些要求予以考虑，权利二字不过是这许多要求的抽象名称罢了。”康多莉扎·莱斯（Condoleezza Rice）2006年曾表达过类似的态度，当时她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努力使世界从根本上更加安全。不完美，但会比原来好一些。”

这种理解内在地含有现实主义色彩，正如相信历史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内在地包含谨慎思维一样。美国在冷战中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相信自己与历史保持统一步调。我们的祖先曾说，“上帝最了解他自己”，同理，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常说“历史最了解它自己”。笔者出生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大约20年后，笔者完成第一学位的学习时北越军队成功夺取西贡。当时，美国的命运似乎并不受历史眷顾。然而，那些给自己讲述这些故事的国家即便刚

刚经历了战场上的失败，通常仍有足够的自信坚持到底。然而，自信也可能让一国高估自己的实力，“9·11”事件之后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一位保守派评论家曾说，当时的美国以“一种顽固到底、不容和解的态度展示自己的意志”。

今天的美国不再像过去那般坚定自信，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崛起致使很多美国人怀疑美国是否仍然引领着历史的潮流。如果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那么中国对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表现出的毫无兴趣能让美国公民和决策者感到些许宽慰吗？

在《面对与隐藏》（Confront and Conceal，2013）一书中，戴维·桑格（David Sanger）写道，“美国对世界而言仍然具有吸引力，这部分源于它所彰显的价值观：美国的政策仍然表明它信奉自由主义原则。”这是典型的美国说法，但并不清楚它是否仍然是真实的——如果它曾经是的话。中国是否像桑格所说的那样，将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抑制自己获取更大权力和财富的雄心，这个问题有待商榷。的确，中国频频批评这套体系缺乏“公正”和“和谐”，甚至还对将“儒家”规范引入国际政治生活表现出热情。一旦中国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采取针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政策，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某些特征将再次呈现。1902年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思想取得“世界霸权”，当战争最终爆发时，大批德国学者将之阐述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斗争必将以“1914年的德国思想”战胜“1789年的西方思想”结束。尽管德意志帝国自己似乎并不知道它希望用什么来替代英国管理的这套国际体系，但很多德国人是知道的。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是这种情况，政府似乎支持这套体系，但很多知识分子则希望看到某种儒家“改革”。未来可能会发生一场类似的思想冲突，对历史优势的再一次争夺。就目前而言，世界仍然大体上对美国领导的这套国际体系感到满意。例如，在《经济学人》发布的调查中，人口数量排在前150位的国家中只有26个被视为反对或对抗美国。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

获得广泛支持，而这种支持很可能会持续。但有必要指出，中国是这26个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

美国在衰落吗？

请放心，我年轻的朋友，一个国家可以毁掉的东西有很多。

——亚当·斯密

1990年9月11日，也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遭到袭击的11年前，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Bush）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号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平之路如此难觅，人类求之百世而不得，却经历千战之苦。今日，这一新世界即将破土而出。”

“基地”组织发动袭击之后，没人再向美国人许诺新世界秩序的来临。美国只是努力加固旧秩序，而作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然而，在2008—2009年金融崩溃之后，很多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在衰落，而外界认为他们看到了症状——一种丧亲之痛。对悲痛的正常回应首先要么是震惊，要么是拒绝接受。在这个伤心欲绝的阶段，伤心之人会有一种逝者健在的感觉，即便是在梦境中。下一个阶段是对失去亲人的愤怒，这种愤怒将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去寻找应该怪罪的人或者机构——就美国而言，这是指银行或新保守主义者，或者小布什，或者干脆是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在愤怒或沮丧阶段，悲痛被固定下来。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之人才会逐渐接受痛苦的现实。美国正在经历这些吗？美国人甘心接受（或者无法接受）他们自己的“衰落”吗？

如果美国确实在衰落，那么它在维护国际体系的规则时就处于不

利地位。然而，很多人一直主张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衰落了，当时美国世纪似乎在东南亚的战场上逐渐走向终结。一位作家说，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落下帷幕的过程比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更快，而另一位作家则总结说，越南战争意味着美国“长大成人”，应该学会接受自己沦为一个“普通”国家的现实。

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辩与当年没什么差别。例如，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的书《美国，醒醒！》（Time to Start Thinking：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2012）让读者可以一窥该书副标题所说的“没落时代”。这本书为此详细描述了中产阶级被“挖空”、初级和中级教育的退步、创新领导者地位的丢失、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以及金钱对政治的腐蚀等多种问题。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松散》（The Unwinding，2013）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书将2008年的大衰退视为经济和道德双重衰退的标志：

堕落的盗贼统治正迅速衰败，两党都在为此出力——美国民众一边用食品券换取加工过的毒药为食，一边却在刷卡消费；低技能工人在就业结构上不再有任何价值，但他们过于愚蠢，并不知道那些过时的工作不会再有；纽约的银行正在榨干这个国家的最后几滴血，公司则不受任何国家利益的观念束缚，物权法体系一片混乱，全世界被债务淹没。

帕克善于对复杂问题抽丝剥茧，他的《松散》一书在分析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方面进行了诚恳而有趣的尝试。但此书传达的信息并非让人全无希望。“每一两代人都会遇到一次松散……每一次衰落都会带来复兴，每一次内向崩溃都会释放能量，每一次松散之后都会迎来新的凝聚。”

对这种观点的宣传者来说，肯定有很多证据表明美国确实在衰

落。美国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善于创新。实际上，美国在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要回溯至1940年之后美国工业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的时代，而中国正在迅速赶上。由美国学者撰写的科研论文的比重从1993—2003年的26%降至2004—2008年的21%。中国在已发表文章数量和同行评审科学期刊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

然而，经济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并非一回事，而这正是1870年以后英国的衰落与今天美国的衰落之间最大的不同。经济变化并不一定导致霸权易主。亚洲世纪并非已经到来，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创造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大约14%。美国只有全世界6%的人口，但创造了全球20%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并且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中国人的6倍。换言之，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有生产力，而当中国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这一点很可能不会改变。中国似乎无法继续像过去那样实现10%的增长率。中国也有可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既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技能、善于创新的先进经济体竞争）。自1960年以来，只有13个国家成功避开了这个陷阱。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迅速失去优势，但由于落后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流失，中国尚未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美元或1.5万美元时，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就会出现。如果中国继续以之前的速度前进，那么它将在2015年或2018年抵达减速带。

还有必要考量一下美国的一些无形优势，其中很多源于作为建国基础的原则。尽管美国已经出现了社会不公和社会信任度下滑的严重迹象，但这个国家的社会架构与中国大不相同。这虽不能使美国显得例外，但确实使中国显得与众不同。两国在其他领域也相差悬殊。例如，中国没有进入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的前列，而腐败问题是新兴市场在规模、平等性和深度等方面排名远远落后于发达市场的一个

原因。大多数私人投资资金仍然源自西方世界（80万亿美元的养老金、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中的70%都源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尽管经历了全球衰退，但西方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仍优于“金砖国家”。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公司的股票上涨了6%，而新兴市场公司的股票却下跌了10%。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在规范性制度方面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法制、产权和反腐败法律。

美国还极其幸运，因为它还将从3D打印革命和页岩革命等新的技术发展中获益。经济学家常常提到“现时偏见”，或者说相对于既定的行为模式或者更长期的系统性趋势，人们倾向于夸大新进展或技术进步的影响。然而，事实可能会证明页岩革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开发页岩资源的条件好于其他任何国家，它在管理上面临的障碍要少得多。建设页岩气井的成本低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另外两个页岩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发布的报告。页岩油繁荣：美国的奇迹。强调了页岩革命的重要性。报告指出，美国石油产量已经大幅增加，而此前30年则是一路下滑。1995年，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巴肯油田蕴藏1.51亿桶可采石油。2008年，这一数字被上调至近40亿桶，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未来这个数字很可能会被继续上调。换句话说，我们仍有理由论证美国在物质层面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的确如此，页岩革命可能使人们对美国实力的物质基础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

因此，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还言之尚早。还应指出，由于美国的基本劳动力正变得更廉价、更有生产力且更加灵活，美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复兴。包括计算机、发动机零部件、塑料和橡胶在内的一些产品领域，已接近制造商将生产活动迁回美国的拐点。

然而，很多美国人仍然对未来感到极度忧虑。这一点无人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更有先见之明。他说，属于美国的历

史时刻不会以经济崩溃而终，不会以战争失败而亡，最有可能以能量耗竭而止。美国若果真衰落，必因其“志趣平庸”，其实力只会因“缺乏鸿鹄之志”而渐衰。雄心不再，激情难燃。社会无所追求。有很多人担心美国的霸业不会以功成名就而收场，而是随着不可逆转的缓慢衰退，与梦想渐行渐远。

预言，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和道德衰落的预言，极少变为现实。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写道，“成为未来主义者的最好方法就是等到明天，那时明天因成为今天而即刻被人忽视。”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写道，“尽管美国仍然有其例外之处，但它已不再是‘从建国到20世纪上半叶期间那个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欢乐、惊奇和迷茫的独一无二的异类’。”但美国很可能长期保持弹性。托克维尔将美国的民主视为一种政治信仰，这不单单指信仰民主本身的价值，还包括信仰更宏大的美国工程。他认为，权力不只是对物质情况的生硬测量。它还包括观念、志向和国家的视野。只有当美国不再信仰那些仍使其在他国眼中成为例外的因素时，美国才会失去领导世界的雄心。

存在性焦虑？

在西方世界，例外主义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当时希腊诗人福西尼德（Phocylides）写道：“一个希腊城邦胜过华而不实的尼尼微³。”柯勒律治也对中国历史发表过差不多的评论：欧洲一世纪胜过“中国一甲子”⁴。中国人历史上曾倾向于对其他民族不屑一顾，因为他们首先自诩为“中央王国”——例外主义并非某一种文化所特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权力越大对别人要求的尊重就越多。

不过，说例外主义是一种虚构之物并不意味着它不正确，而是说

它是人为设计或制造的。例外主义这种思想是编造出来的，像所有编造的说法一样，只有当它符合现实，或者符合人们普遍视为真实的情况时，它才有说服力。事物在某个特定时点上的表现方式基本决定了我们倾向于如何看待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虚构之说会逐渐失去说服力。

当然，只要我们坚持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国家层面的虚构就是必要的。即便它们是幻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幻觉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幻觉。弗洛伊德说，幻觉不同于错误，前提是它没有变成妄想，妄想过于荒谬，没有人会相信。

美国“例外主义”思想如今已失去了大部分光彩，这从一些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的《天定命运的讽刺》（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 2010）和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的《权力的界限：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The Limits of Power: 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2008）。按照巴切维奇的说法，例外主义的观念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避难所，这些人试图否认世界的真实状态。在这种思想的背后是一种愤怒，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已越来越明显，具体迹象包括收入停止增长或者不断下降、债台高筑以及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不断出现。一边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阶层所发出的豪言壮语——基本上一致认为应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另一边是可以实现这种抱负的手段。二者之间正出现一个巨大的鸿沟，这导致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处于特殊位置的信仰似乎日益难以维系。巴切维奇在重读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作品时，发现了这段写于1937年的话：

人类历史最可悲的一面在于，每一个文明都以最自命不凡的态度表达自己，都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将自己偏狭

的价值和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且在走向灭亡的衰败进程开启的那一刻宣称自己将万古长存。

21世纪各国的相互依存使人更难相信某一个国家是例外的，包括中国。当一国面临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都需要联合行动时，你就很难把这个国家视为例外。如罗杰·科恩（Roger Cohen）所言，例外主义的极端形式是一国没有盟友，也毫无影响力，对于执行某套行动方案会面临哪些风险也一无所知。唯一能够长期存在的例外主义形式必以根植于虚构叙事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在这方面，美国可能仍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国家”。对美国的盟友来说，这一点或许最为重要。

虚构叙事使行为体能够编织有关它们是谁以及它们会如何演变的故事。这就是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美国本身就是观念的产物，并且在很多方面美国仍然是最后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当然在不断增强，但中国政策的最终目的和抱负远不如美国的清晰。只要美国坚信一种国家神话，它就仍将在集体想象中“占支配地位”。神话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如今相信这个国家拥有“天定命运”的人已经找不到了，认为它是“自由的灯塔”的人也少于过去。但诸多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在很多人听来依然真切——美国是“山巅之城”。提到国家神话并非指责它子虚乌有，这只是意味着它被赋予象征意义，这种性质与它的实际情况或者人们对它的描述无关。正是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构成了现实。“现实”是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而我们所选择的想象结果常常是我们内心希望成为真实的东西。

美国的“现实”与小布什在2002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所说的“人类尊严提出的不可辩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论及尊严时，小布什是在引入另一种虚构的现实，因为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尊严的重要性。我们总是先讲述一个故事，然后从我们选择

讲述的故事中提炼出一种意义，并将这种意义赋予历史：碰巧的是，美国人讲述了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故事。这就是美国“信条”的核心——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最早推广了美国“信条”一说。米达尔写道，“尽管美国具有种族、宗教、伦理和地区多样性，但美国人持有同一种‘社会信仰和政治信条’。”不同的学者给信条下了不同的定义。米达尔自己称之为“人类个体的基本尊严”。

尊严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因为唯有人类坚持让其他人拥有尊严和自由——自由是能够实现尊严的条件。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只能在我们自己的人性中找到价值的来源。认为一国历史“有意义”等于能够把万事万物看成受目的论限制的对象，或者即便这不是人类的目标，也至少是人类的命运，它要么已经在历史中实现，要么必须在未来实现。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写：

每当我面对人类尊严受辱而高声反对的时候，每当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源自人类尊严的理由的时候，我都是在证明，我知道实现自我之人是何样之人，或者人性会提出何等要求。

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知道人类尊严应该提出哪些要求的时候，这些要求才能是“不可辩驳的”，并且我们只能假定我们知道——不是通过分析那些历史记载，而是回到帮助我们为历史设定秩序、赋予历史形态和意义的传说上。毕竟，只有通过讲故事，历史才会真实发生，历史通过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来恢复生命。

记者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在参观埃利斯岛时曾有过这种感慨。埃利斯岛是纽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最终关闭期间，这里曾是一波又一波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通道。如今它是一座博物馆。阿代尔在岛上的走廊里闲逛时，无意间为墙上的照片所震撼。在这些照片中，满脸困惑的中欧移民像牲口一样

被集中成群；还有同样迷茫的儿童，他们的衣领上缝着随意分配的名签；匆忙打包的、中产阶级使用的手提箱与用绳子扎好的、已经磨损的纸箱堆积在一起。他略感不安地意识到，他曾经见过这一幕。然后他想起来他确实见过：他曾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看到过这一幕。“埃利斯岛是一个良性的奥斯维辛，一个倒转的大屠杀，一个积极的‘最终解决方案’。”问题是，一个因移民而改观的美国在例外程度上会不会不及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它在向世界其他地方发表意见时自信心会不会不及从前？

诚然，移民会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挑战，但它也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力量之源。由于出生率更高，移民可以确保美国生育率保持在2.0以上。根据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数据，美国人口到2050年将增加1亿人，从而确保该国不但将继续繁荣发展，还将走在债务曲线的前面，这一点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做到的。美国将是最年轻的后工业经济体，而同时中国将步入最年迈国家之列。生育率预示着美国的文化生活将恢复活力，美国这个品牌将得到振兴。

查尔斯·默里在其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已经落在了其开国元勋的后面，这些开国元勋的伟大成就在于将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执政信条。没有哪个政府像随后两个世纪的美国政府那样限制自己的权力，但这项伟大成就不再适用于这个国家——社会契约在瓦解，为社会契约提供基础的社会信任也在崩溃。美国梦已经破灭：美国是特殊的，但不再是例外的。但默里的这种观点没有抓住要领。尽管有各种困难，但美国这块牌子仍在不断更新。迪安·艾奇逊抱怨说：“我们是一个19世纪的民族，我们的思想还是我们曾祖父、曾祖母的思想。我们不是20世纪的民族。我们的观念继承自过去。”20世纪20年代美国曾迎来一位著名的英国游客——作家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他当时已经得出了与此极为相似的结

论。美国的终极考验将在本世纪末来到，届时“以18世纪语言表述的18世纪的理想将无法继续压制那些异端邪说”。

拉美裔美国人已经占到美国青少年的约五分之一。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移民的大量涌入很可能给美国带来巨大变化。借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就职演说中使用的词语，美国的确面临“自我改造”的挑战。克林顿当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杜威原则上并不反对国家层面的虚构叙事：他只有在这些表述否定生命，而不是肯定生命的时候才提出反对。如果一个虚构表述使人意气风发、有所作为，那么它就对社会有益。在他看来，这种虚构在本质上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内在价值就是鼓励人有所作为。真实不是成功的原因，而是坚持某种信仰的结果。换句话说，杜威评判一切信仰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它们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杜威的观点在美国之外颇有影响，尤其是在日本。1919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讲座⁵ 时曾对校方的主持人说，日本人将不得不重新评价他们的传统，这样才能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他们的自我革新是否成功将取决于他们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所有现代社会都会面临这种挑战，如今轮到了美国。1945年以后，美国人通过制度建设来维护国际体系，但毫无疑问，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美国人不会再尽心竭力地推广和捍卫这套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了。

对美国这块品牌的信仰甚至渗透到对美国现状的批评中——乔治·帕克的声音与英国人爱德华·卢斯的声音截然不同，后者所表达的失败主义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可能有明显的“欧洲”色彩。“美国性情”——借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说法——不只有移民的因素：它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十分典型的美国式活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坚持替全世界追求梦想的态度将会松懈，即便它的敌人甚至一些盟友似乎这样认为。当然，总会有疲惫之态出现，但不存在任何证据证明美国自身有意放弃“占支配地位”大国的角色，更不要说

允许其他任何国家挑战现有“交通规则”了。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对纠缠于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到厌烦。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少管闲事”，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而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反对（这是该项民调自5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赞成美国管好自身事务的人比例最高的一次）。但这项民调还显示，美国人仍然希望捍卫当前国际体系的规范与制度，尤其是商业方面，并且多数美国人认为亚洲是美国的“事务”。的确，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历史很长，并且一直致力于建设亚洲的未来。美国在本质上——并且向来如此——是一个亚洲大国（尽管中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问题在于，中国也处在自我革新的进程中——尽管“中国梦”才提出不久。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相对切实的目标是，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则极为远大，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一个十足的发达国家⁶。

不论这些目标是否会实现，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将远比今天自信和坚持己见。下一代领导人走向政治成熟的时期正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期。未来民族主义可能再次呈现上升势头。在当代，人类的集体认同尽管是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民族的。在后现代西方社会，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成熟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忠诚相互交叉，它们组成了人们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基本结构，但中国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可能未来也不会如此，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正在步入民族国家成熟阶段的主要大国。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终点在哪里？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坚持认为，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交流，每一个社会都有话要说。但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特定的社会究竟想说些什么。社会话语可以缩减为一个简单的短语——“我

是”。然而，这个短语还有很多变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或者“优等民族”，或者“世界头号大国”。在前现代，人类从民族、部落或种族的角度思考。在现代，主要的概念单位变成（并且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不过是动词“是”的最新表达方式。

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只有因具备某种属性而实现其价值时才能用“是”这个动词，例如“我是更强大的人”，或者“我是某种宗教教义的信徒”。我是更强大的人因为我所效忠的群体是强大的，我与众不同因为我崇拜一个与众不同的神。每一个人都能在他们从属的特定群体的实力中获得安全。我们仍然重视安全。

民族主义并非总是危险的，甚至并非总会带来麻烦。国家有时可以突破自己的局部利益和狭隘思想，置身于人类整体历史之中，一国的历史既包含与邻国的冲突，也包含与邻国的合作。

鸦片战争和中国的历史权益

是啊，尽管时光于我们如此重要，

但我们却不应打开记忆的匣子。

那里收藏的每一个瞬间，

都记载着我们失去的一切……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一位英国作家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的美国之行并未达到预期。他本将与一位华裔美国人结婚，女方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但他来到女方家中时，他立刻感觉到不舒服。对方

有礼貌地欢迎他，但并没有他预想的那样热情。空气中隐约飘浮着一丝凉意，这凉意在那个难熬的夜晚似乎不断加重。最终，女方的父亲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与我女儿成婚之前是否愿意道歉？”他问：“为什么道歉？”答案让他吃惊：“为鸦片战争。”

记忆是有弹性的。人们之所以能记住历史，是因为在某一个特殊时点上历史需要向人们传递某些信息。这就是历史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过去的事件被重塑，以至于它们被赋予一种事发之时并不具备的意义。这就包括19世纪中国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

欧洲与中国的军事交战（包括最重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瓦解清王朝只起到了部分作用。实际上，清王朝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中国是一个由很多各不相同、常常相互竞争的部分组成的帝国。中国有丰富的民族多样性；确实如此，甚至清王朝都来自异域。企图脱离清朝统治的运动也时有发生，包括1850年至1870年间南方苗族人在湖南和贵州发动的起义，以及1862年至1873年间穆斯林在云南和新疆等地反抗中央政府的起义。反抗清王朝的叛乱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例如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其中很多运动远不止叛乱那么简单：一部分属于独立运动。

用拉金的话说，只关注短期历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被用来强化一种具有深度误导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中国并非一直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是羸弱的（19世纪只不过是这些时期的一个），在较长时期内，统治中国的王朝甚至不属于汉族（例如1271—1368年的元朝和1644—1911年的清朝）。西方进入中国历史后，打破了此前中国政治变革的模式，这种模式基于一种存在已久的假定，即变革源于历史的往复循环。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这一信念或将被打破。现在，变革的发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线性的，并且只可能因为暴露于外部世界而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利用中国衰落的机会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获取内河航行权、往来中国内地不受限制，所有这些都是以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相威胁而取得的。到1920年时，通商口岸总计达69个。通商口岸体系在将中国带入单一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随后的历史中，这套体系成为一种将权利、利益和特权相互交织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安排。在这一安排下，外国公民享有独立的税收和司法体系，在中国管辖范围内拥有豁免权。这套体系毫无国际色彩，而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包括拥有他们自己的行政服务，例如邮政和海关，他们还有权在北京以及从北京到沿海的铁路沿线要地驻扎军队。

但中国向来过于庞大，难以分割、吞并或者占领，就像同一时期的非洲。显然，欧洲人认识到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它的悠久历史和统一文明让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殖民化成为不可思议之事。然而，这套不平等条约体系日益难以维持，因为中国已慢慢地融入国际体系之中。一位中国代表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中国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京师大学堂等大学的国际法课程为中国人传授了国际体系具有契约性和平等性的观点——即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平等。的确，在国际联盟法庭体系建立之后，中国是第一个以主权平等为由申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不久之后陷入内战，之后又与日本进行了持久的战争，这套条约体系又得以存续了一段时期。

从外部入侵中国的不只是欧洲人。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破坏力甚至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震惊。1938年，W·H·奥登（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他们发现这座城市被巨大的墙壁包裹，高墙之外是一片片荒山野岭。他们写道，“西安闻起来有谋杀的味道。1926年，这座城市被地方军阀围困7个月之久。到1938年时，它又遭到日本的轰炸。西安的这段经历就像是中国与

20世纪不愉快接触的缩影。”在奥登颇负盛名的十四行组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 1938）（写于他返回西方之后）中，有一行描写一名死去的日本士兵的诗句令人唏嘘：“他效命于远离文化中心之地。”人们常常忘记的一点是，中日战争⁷与纳粹眼中的苏德战争一样，都是种族战争。它不只是一场领土争端，也不是两个相邻大国一心要取代对方成为地区领导者的传统政治冲突。它更不会像一场打破地区力量平衡的斗争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两国社会陷入了一场生存冲突。日本人认为他们不是亚洲人而身在亚洲。为了解释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诸多糟粕。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技术上或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因为他们是落后的人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清国奴”相当于英语中的“中国佬”。

所有国家都有选择性的记忆。卡尔·波普尔曾认为，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经历”。他的这番高见早在18世纪就有小说家提出过。这些小说家描写了他们的主人公——例如特里斯特拉姆·项狄（Tristram Shandy）和汤姆·琼斯（Tom Jones）⁸——的“经历”。然而，即便历史总是存在争议，人们也应该避免使其退化成神话传说。如果所有历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虚构色彩，那么人们就应该记住，虚构有助于发现和理解新事物。当人们不再有意识地将虚构视为想象之物的时候，虚构就退化成神话传说。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写道，“神话传说的前提是它能完整充分地解释事物的现状和过去。与通常是促变因素的虚构之辞相比，神话传说是稳定因素。就美国而言，有关例外主义的虚构之辞将帮助美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但对中国来说，有关民族屈辱的记忆或许就起不到那种建设性的作用。”

正如尼采所认识到的，一种观点的荒谬性并不能作为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唯一标准是这种观点能否促进或者维护生存。中国作家阎连科2013年4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记

忆缺失的话题。他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住自己过去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录自己历史的国家。这两点都做不到，那就只有怨恨。”接下来的一章将解释，怨恨或许会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症结。尽管产生怨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向前看，或者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它堵住了通向未来的出口。

汉文化圈

在西方迫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国一直维护着一个非常成功的地区体系。它在7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如果中国寻求重新在本地区称雄并更改当地的“交通规则”，或者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传统来重塑国际秩序并以此挑战美国，那么中国将几乎肯定处在与美国相撞的轨道上。

借用汉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的话：“最开始，只有中国。”尽管严格意义上这句话并不正确，但这一描述抓住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地区重要性。在某些方面，中国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中国是东亚的“学校”，是万众瞩目之地，与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雅典不同，中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持续数个世纪。居于这套体系核心的是定期朝贡的行动，这类行动通常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经指定路线抵达都城。这一时期出现的最为人熟知的习俗之一是叩首（一连三次前额着地的跪拜）。叩首是一种礼仪，而儒家学者希望统治者以礼治国，礼仪又与秩序密切相关。儿童向父母叩首，父母向祖父母（和祖先）叩首，大臣向皇帝叩首，皇帝向上天叩首。儒家经典《大学》这样描述秩序的不可分割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叩首只是这套体系的末端。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文化影响并非有意识地将中华文化推向边界之外的成果。相反，中国最关心的是边界以内的稳定。对中华文化的接纳似乎纯粹是自愿行为，学者将这个占支配地位

的大国称为“文献之邦”，即通过文本治理国家。例如，在14世纪初，朝鲜开始吸收和实践儒家思想，并将之制度化和内在化，这一过程持续500多年，几乎从未受到中国的鼓动。

这是一套地区体系，而非一套全球体系。仅有的一次突破东亚范围的尝试发生在15世纪早期，当时中国在开展大规模造船项目之后，向红海和印度洋派遣了七批远航队，直至造船项目很可能是出于财政原因被废弃。远航活动被取消了，甚至航海记录后来都在一次抵制科学的行动中被焚毁。到1500年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完全中断。未经专门批准而乘坐两个以上桅杆的船只出海乃是死罪。中国船只驶往欧洲要等到300年后——1851年赴伦敦参加万国工业博览会。

如果造船项目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人很有可能跨越太平洋抵达美洲——途经日本、太平洋北部抵达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并从那里前往今天的加利福尼亚海岸。他们也可能选择低纬度的跨太平洋航线，事实上麦哲伦在1521年就采用了这条航线。他们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的接触不大可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出现强迫皈依基督教的事件，不会有殖民社会，不会奴役本地人。如果郑和抵达美洲，那将给中国制造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挑战；在工业革命的几百年以前，中国将会接触一个前所未见的文明。跨太平洋贸易体系的建议将让中国见识到人类社会的多样化和社会实践的差异性，那将扩大中国的文化视野。

汉文化圈与欧洲人在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差异很有启发意义，因为今天的国际秩序模仿的正是欧洲人最先为自己设计而后推广至全世界的“规范性制度”。汉文化圈是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这种体系假定，如果规则常常受到轻视或者有国家行为不端，那么这些破坏规则者将受到惩罚。尽管在国外对规则的执行力相对较弱，但欧洲国家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已基本将这些规则内在化。在一定程度上，各国发自内心地不希望打破这些规则。这套体系包括派遣使节常驻他国，这是自文

文艺复兴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特征。在17世纪中期之后，各国都认可主权不容侵犯，包括不应干涉他国内政。除极少数例外（瓜分波兰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各国承认他国的生存权。这套体系逐渐根深蒂固，到18世纪中期，欧洲人已将其视为国际通行的规则。

中国这套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则截然不同。这套体系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首要代理人中国是否足够强大，使之有能力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如“天命”）来扩大利益和行使权力。但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完全取决于中心与外围的相对实力。当中心很强大时，朝贡使其更加强大；当中心虚弱时，外围地区就有实力施加影响，重塑甚至颠覆中心。

这套体系的“规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副产品，因为它们不属于这套体系的基础结构。不仅如此，汉文化圈依赖软实力远多于硬实力。中国皇帝要求进贡，但他恩赐给进贡者的上等货品（丝绸）常常比他获得的贡品高贵得多。这正是朝贡活动的全部意义，因为它强化了中央王国的文化优越性，但它对中国文化势力范围之外的游牧民族就不起作用了，中亚大草原上的马背上的民族贪得无厌、寄食他人、暴殄天物，在18世纪他们最终被驯服之前，中国人始终心神不宁。但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刚刚被驯服，另一伙人在19世纪初又经海路而至。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英国人掠夺成性、残酷无情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很快知道，软实力对于一个文化上既不受媒介影响，也不受讯息影响⁹的民族来说毫无作用。

汉文化圈经受住了蒙古人的冲击，却没能挺过英国人这一关。基于规则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代了以代理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后者毁于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两极化和使战争破坏力远超前后的“火药革命”的双重夹击，与之类似，一套由发明火药的国家维持多个世纪的东亚地区秩序也很快土崩瓦解。1800年后欧洲人的工业化战争终结了中国在东亚“对权力的垄断”，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作为地区霸主的合法性。

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认为，一切国际秩序都是规范性的。这些秩序通过提高对神圣和世俗两者的觉悟得以体现，并承认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体现在两者的基本结构上，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取决于各自对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恰当关系的本体论认识。汉文化圈依赖于“天命”。与之相反，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则以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政治神学为根基，后者宣扬权力既是现世的，又是精神的。教会拥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关照灵魂，同时也有一个由政府监管的公共范围，这个范围与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财产有关。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精通宗教法规之人开始设计一套包含个体固有权利的法律体系。15世纪的会议运动寻求限制教皇的权利，并向教会引入类似于代议制政府的制度。尽管失败了，但随后爆发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最终导致教会与政府之间更系统的分离，并产生了认定宗教纯属精神事务的世俗主义。欧洲国家制度对奥古斯丁神学体系的取代具体表现为一套由法律公约和规则构成的纯粹的世俗体系。

西方的这些国际秩序观念表面看来具有强调平等、尊重法律的性质，因为它们重视主权平等的观念，因而与中国的等级制度假定相比显得迥异，后者包括作为东亚秩序基础的朝贡体系。中国人最终被迫放弃了作为东亚外交特征的家长式道德主义，而接受通过去个性化的、正式的、合理化的国际法文本来处理外交关系。1871年日本在起草与中国之间的第一个正式贸易条约时，保守派希望签署一份措辞笼统的协议，不必有明确的条文，因为这对于两个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友邦来说实无必要。日本外务省则坚持签署一份措辞清晰准确的欧洲式的条约，赋予日本它所希望扮演的角色，即东亚贸易权利的合法捍卫者。

任何秩序的瓦解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势力不过是乘虚而入。真正破坏汉文化圈的不是商业冒险主义，而是其他行为规范和制度的挑战——太平天国就是如此。汉文化圈的最终崩溃伴随着广大农村地

区的动乱和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混乱程度与17世纪中期的欧洲不相上下。

汉文化圈不可能再恢复到它最初的样子，但旧观念极少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重温在帝国强盛、儒家文化上升时期为东亚带来数百年稳定的那套思想——即便他们不想再实践一次。一旦感到有人阻挠他们获得阳光下属于自己的地盘，那么他们或许就会考虑其他选择——一套更加网络化的东亚关系统。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大多数亚洲国家将反对美国为迫使它们选边站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大多数国家在过去几年都向中国靠近，这或许是因为它们认识到，边界和专属经济区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其势力范围就会继续扩大。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enovic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异常惊人的论调，他说中国正将西太平洋“芬兰化”。¹⁰

欧文·拉铁摩尔曾在1940年的作品中指出，中国的边界不断地变动。作为地理事实的线性边界从未得到确认：“在政治上被视为清晰边缘的国界随着历史的兴衰更替而持续扩展，最终变成一种相对宽阔而模糊的边缘，这条边缘意味着增长的最佳限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汉文化圈是一个基于不断变动的中心权力的体系。当中心强大时，其影响就会向外扩张。

中国和国际秩序

当前国际体系的回弹力有多大？回答该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不同的领域的专家对“回弹力”一词的用法也极为不同。在工程领域，回弹力意味着像建筑物这样的结构受外力扰动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到基线状态。在生态领域，它指一套生态系统避免彻底退化的能力。一个通用的定义是一套体系在情况发生剧烈变化时坚持核心目标、保持自

身完整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一套体系能够迅速适应战略冲击，同时坚持核心目标不动摇。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目标是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适应中国崛起的能力。

大国冲突终结论根植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国际体系在面对挑战时有足够的回弹力，或者它能够不通过战争进行改革。与德国和日本（唯有这两个国家被威廉·詹姆斯¹¹ 指责为“掠夺成性”）不同，当代国际体系中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希望从战争中牟利，但这并非高枕无忧的理由。中国的崛起与1870年之后德国的崛起一样具有冲击力。同样的，美国也会感到难以适应自身的衰落。我们真能期待这两个国家会轻易地适应日益复杂、变动和互联的21世纪吗？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深受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的经典之作《原谅设计》（To Forgive Design，2012）的影响。这本书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每一次失败……都能为我们提供从其他任何途径可能都无法获得的知识”。“保持不败的最佳方式是更加彻底地理解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唯一途径。尽管彼得罗斯基的这本书主要关注重大工程事故，但它也讨论了人类作为工程师设计的社会体制（例如国际秩序），这些社会体制偶尔也会暴露出“论证、知识和效果上的缺陷”。

体制需要不断地改进，而彼得罗斯基认为，永不停歇的改进正是工程学的本质，因为不幸的是，人类制造的每一件东西都内含缺陷，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制造新产品，但他问道：“如果我们无法像过去一样求助于历史的话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这对工程学而言已是不争的事实。工程师在预测某种事件——例如百年一遇的暴风雨——发生的可能性时，会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一个百分比，但长达1万年、气候稳定宜人的全新世已经结束，全球气温在上升。大气中的能量大幅增加，这加快了所有依赖这种能量的进程。为什么这对工程学来说很重要？温暖的空气可以蓄积更多的水汽。我们已经使大气中的湿度提高了4%，干旱（因为热量使地表水蒸发）和洪涝（因

为蒸发的水最终会变成雨)的危险都因此而增加。两者对我们现有建筑物的回弹力来说都是一场工程学噩梦。百年一遇的事件如今变成了50年一遇,而50年一遇的事件会变成25年一遇。

那么当前这套设计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际体系也有这种问题吗?所有体系都不得不根据权力分配的变化实时进行再平衡,但我们从未在和平时代见证过今天这般剧烈的变化。2003年,高盛公司预测中国将在2042年超过美国。几年之后,它将这一预期修正至2020年。这必然会引发诸多问题:美国是否将无力执行这些规则?美国是否将失去自信、失去它的存在确定性?中国是否希望挑战这套体系?

中国全盘接受当前规则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仍然有强烈的新教徒精神。中国不是一个喜欢劝别人改变信仰的国家,它可能永远不会产生美国那样的使命感。以中国的身份成为世界大国或许就足以实现其历史抱负。但中国国内的讨论却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军方的很多人现在公开表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这就留下一个必须填补的政治真空。像阎学通这样的学者将中国的衰落描述为需要纠正的“历史错误”。中美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关乎领土、资源或市场,而是关乎规则的制定,并且阎学通认为中国亟须亲自制定全球规则,其他人则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构筑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契机。哲学家赵汀阳写道,“这样的一套秩序将为主权、世界利益和世界权利提供担保,而不只是关注物质权利和利益。这套秩序有其独特的规范性,并以儒家思想为灵感。”

然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接班的准备,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对管理这套体系失去兴趣,那才值得担忧。一边是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改造国际体系,另一边是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这方面的准备,这两派在2006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论战,起因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王义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防止美国过快衰落?”在沈丁立看来,北京还没有准备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目标应该是改“造美国,使之更受限制且

更愿与世界合作”。

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中国也有自己的抱负和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憧憬。在2013年夏季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安纳伯格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委员杨洁篪曾对这些抱负和憧憬作过表述。杨洁篪提出这两个最重要的全球大国应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种被中国人称为“合作共赢”的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将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基础上，应该摒弃过去的零和思维。

中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坚持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因为中国的志向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也不是霸权主义的，但其他亚洲国家不一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邻国来说，它们仍然不清楚中国的“王道”将与西方的霸道有何区别，就此而言，还有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皇道¹²，当时日本人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

中国将走向何方？

根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叶自成的观点，中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与意识形态并不相同。再次爆发一场冷战的前景同样不值得期待，只有当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对抗和遏制的敌人时，这种前景才会出现。叶自成不愿展望中美开战的前景，但他对两国可能避免某种形式的摊牌也不抱有幻想。最佳选择应该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关系，兼具合作与对抗两种元素。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对于美国更加亲密的关系，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两种关系可以充当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

在叶自成看来，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内政治改革的推进是中国避免

与美国和邻国发生对抗的关键。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而政治改革将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眼中成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大国。这两个因素都将帮助中国更快、更有效地适应变化的形势，因而使其在重新设计当前国际体系方面更有话语权。1994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经常在人权问题上高谈阔论，如今这些说教已变得有失严谨。10年之内，中国的强大将使这些说教无关紧要。20年内，这些说教就会显得滑稽可笑。”但中国的强大会使这些说教毫无必要吗？中国是否会像叶自成所希望的一样发展出一套更具自身特色的民主？

民主很可能是对抗或者合作最终都无法避开的问题。正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所说：“21世纪最大的悖论是这套不民主的世界秩序却由实际上最民主的民族国家——西方国家——维持着。”这就是美国的挑战：它能接受变革的必要性吗？但同样的，中国能接受政治改革的挑战吗？一些评论人士警告，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大国。蒂莫西·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曾写道，“环境退化、网络战争和逃避历史事实使中国给外界留下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印象。分析人士也在问，中国是否在建设一个没有真正文化和道德标准的社会。这些问题如此频繁地出现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深感不安，它们不知道这套仍在管理国际事务的规范性秩序将被何种新秩序取代。”尽管很多西方评论家对中国的改革承诺冷嘲热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可能并非绝对公平。毕竟，中国举行的选举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中国的100万个村庄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选民达6亿人）。根据萨塞克斯大学的罗伯特·贝内维克（Robert Benewick）进行的调查，这些选举的竞争性越来越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还出现了更多的独立候选人。根据一项长达6年、涵盖40个村庄的调查，公共服务开支在这一期间增长了20%，而“行政开支”则几乎减少了同样的幅度。

中国的任何民主进步都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儒家思想看来，

权力应该有三个来源：“天”（神圣或超验的合法性）、“地”（从历史和文化中获得智慧的合法性）和“人”（民意的合法性）。从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民意一定位居其他两者之上。一国政府应该只有人民一个合法性来源吗？即便是西方哲学家也曾警告不要实行多数主义——多数人的独裁常常催生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学者也发出过类似的疑问：民众的短期利益是否应该位居社会的长期利益之上？

毫无疑问，中国人仍将继续渴望过上更加美好、更受尊重的生活，而民主似乎是生活得到满足的唯一方式。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写道，“一切生命形式都存在于一个达尔文式的丛林中。对哪种生命形式将存活下来的最准确预测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足感。”中国人对自身生活的不满意程度可能高于美国人，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率先抵达了未来。中国的崛起或许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的确，布莱克本接下来还反驳了另一种观点，即一个国家对民主的亲身体验就是人类进步的“实现”，或者说是进化三角形的顶点，或者其他所有人前进的“终点”。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极具黑格尔的色彩。它假定所有人对道德真理的接受能力是一样的，因为像民主这样的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道德真理并非显而易见地正确，布莱克本警告说，即便它们是正确的，对道德真理的普遍接受也并不会使一个大国在生活竞争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具有选择性优势。

毋庸置疑，一个更民主的中国将是巨大的进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而非“美国的”世纪。然而，中国式道路和“儒家浪潮”如果只是徒有其表，缺乏根基，除了对过去的报复之外别无他物，那么结果也可能是胎死腹中。最终盛行的会是另一种西方的舶来品——民族主义。

如上文所述，叶自成对未来的看法自成一派且比较务实。这种看法明显将一种对中国屈辱历史抱有的深度不满隐藏起来。叶自成希望

中国可以获得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原则上这一点应该不难实现，因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机制易于融入却难以推翻。它们具备伊肯伯里所说的“机制内流动性”，即在现有机制中，成员国可以兴，也可以衰，但中国之志可能远大于此。自苏联垮台后，美国在施展权力时不受任何限制，但荒谬的是，导致当前这套世界秩序在几年前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自己，它险些破坏了由它一手创建起来的这套秩序的规则。尽管叶自成的观点相对温和，但他提出的大战略是维持现状，直至“不同力量的消长”最终对中国有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叶自成才能被称为“实用主义者”。但他可能是错误的，美国并没有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也有可能不会按照预想的速度崛起。如果亚洲世纪不过是海市蜃楼，那么一旦中国的怨恨继续加深，结果会是怎样呢？

叶自成担心中国为重建国际体系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尽管中国是在1840年之后被强行拖入这套体系的。那么美国是否准备好改革金融体系，给予北京更大发言权呢？或者允许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充当一支“稳定力量”？叶自成更愿意接受的一种情况是美国并非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防范。不过，如果中国不只是希望增加自己的筹码，还希望改变国际体系呢？如果规则制定者失去权力，那么规则也就难以为继。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警察”——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如此描述1815年后的英国——最终被其全球责任压垮，接班的美国或许会重蹈覆辙。一切历史教训都表明，如果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美国就需要与中国分担责任；两国亟须就哪些“规则”（如果有的话）需要调整展开对话。

在缺乏此类对话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可能会逐渐被掏空，或者中国可能会逃避自己的管理责任。安德鲁·菲利普斯指出，国际秩序的衰落会产生大量风险，并可能导致巨大损失。最坏的前景是出现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没有霸权，只有一些地区大国，均势政治的运作缺乏19世纪那套可提供支撑的价值体系，结盟政策一天一变，只考虑短期利益，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样的世界可能导致管理空缺。

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全球治理结构或许无法提供给各国公民要求得到的多种国际公共产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支配这套体系同样会出问题（例如，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负责设置议程或维护规则）。中国对这套体系提出的一种批评是它以西方权力为中心，对已经发生的真正的权力重新分配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很多中国人还认为这套体系根本就是不公平和不和谐的。但如果一个世界不以西方有关“人权”和“民主”推广的议题为主题，那么这样的世界对于何为最好的公共产品、应该维护何种规范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有价值的理解。一套没有任何价值观的国际体系或许同样能阻止大国冲突，但事实证明它无法处理其他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好战的非政府行为体的袭击。

中美两国都面临双重挑战。一个挑战是在避免卷入冲突的同时继续参与竞争——大国向来如此。另一个挑战是共同努力让这套体系适应中国的崛起，以及西方权力的相对削弱。如果两国能够展开真正的战略对话，那么它们就有机会让世界变得比现在美好一些。

文化冲击？

1943年，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新的“规范共识”，而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曼海姆生命中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同一件事上，那就是提醒他的同行，民主应该具有“道德深度”，而考虑到在当今天这套国际秩序下很多国家被剥夺了权利，曼海姆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尽管很多国家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全球化也损害了其他很多国家的利益，并且后者的数量在上升。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美国不应该为捍卫这些规则而与中国钩心斗角；这两个大国应该为未来几十年、为所有国家制定这些规则。如

果两国不能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陷入冲突。它们真的需要商定哪些价值观最重要，哪些价值观需要防止修正主义大国的破坏。曼海姆对他所在时代的民主国家的主要批评在于，这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价值观不够重视（毫无疑问，它们在这点上不及那些极权主义政权）。

但尚不清楚像中美这样存在根本差异的两个大国能否通过合作实现这一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欧洲人》（*The Europeans*, 1878）中的一个角色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由他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人看待生活的基本方式决定的。中美世界观存在差异。两国都形成了复杂的观察方式，它们会以此过滤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正如亨利·詹姆斯的兄长威廉所理解的，一切现实都“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受到集体经验的影响。或者像未来主义者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在《未来的足迹》（*Footprints of the Future*, 2002）一书中所写的：“没人拥有真实。”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各自的世界观。

然而，尽管中美世界观差异如此明显，但我们在面对上述言论时必须保持谨慎，因为在某一种文化中观察到的思考的一致性或许只不过是观察者与之保持距离的结果。在1947年，诺思罗普（F. S. C. Northrop）指出东西方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知识用符合逻辑的科学论述来表达，而东方的知识则具有这样的形式，即“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即刻理解的、自己身处其间的美学连续体上”。他还声称，西方知识“通过假设产生观念”，而东方知识“通过直觉产生观念”。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及中美世界观差异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基辛格称，美国人的思维倾向于针对特定的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而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分阶段不断接近某一主题，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过程。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国际争端要么源于误解，要么源于恶意，因而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就是劝导或者逼迫。中国人的方法则更加去人性化，更有耐心。对美国人来说，善意

和真诚是外交政策中的润滑剂。对中国人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外交活动中并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一书中，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认为，东方人在观察和解读世界时习惯指出其中的模式和联系，而不去详究事物自身的真实（中国人称之为“势”，即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向，我将在下一章末尾讨论这一点）。他与京都大学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所作的研究认为，西方人关注个体需求，而东方人更关注背景与关系。对亚洲人来说，这个世界只能通过化零为整才可以被理解，它受集体而非个人控制。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一天时，一个6岁的美国孩子提到“自己”的次数是同龄中国孩子的3倍。在看到一张母亲与孩子争论的照片时，美国孩子往往会选边站，而中国孩子往往会认为双方都有正确的地方。

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的说法，当西方人被要求定义“自己”的时候，他们常常采用纯粹个人的视角，例如“我是高个子”这种表述，而亚洲人倾向于强调关系，例如“我比我妹妹高”。中国人更愿意在社会背景中观察自己。像尼斯比特一样，胡德也认为成长的过程会影响个体关注世界的方式。大脑的适应性使其能够对相关经验进行编码，甚至塑造语言的使用方式。例如，东西方的母亲对子女的说话方式就存在差别。西方母亲极有可能让子女关注一个玩具有哪些特征，而日本母亲更有可能让子女学会交换——先把一个玩具交给一个孩子，再要求孩子把玩具还回来。

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6年在东京举办一系列讲座时提到的一点。他认为，西方文化中争强好胜的个人主义可以通过“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自主、已经完成构建过程的实体来解释。与之相对，日本人参照更大的团体、从外部构建“我”。“我”不是一个原生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被塑造的实体。

如果中美两国共同打造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那么它们就必须考虑对方的生活哲学，而这是否可行人们并不清楚。尽管世界面临很多共同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但东西方应对这些问题时有极为不同的框架。下文将概括应对某个问题时制定框架的三种方式：

1. 单一文化内的狭窄视野。人们倾向于按照个人的体验对风险作出不同的评估，这被称为可得性启发法。人们倾向于将一个风险与另一个风险对比（借来作对比的通常是我们最近一次遇到的风险）。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某个事件会在人们的想象中变得十万火急（美国人相当自然地将“9·11”事件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作类比）。人们还受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通过体验行为的趋向来学习”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件事“很可能”而不是“可能”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自身经历决定的。所有这些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丹尼尔·卡内曼所说的“叙事性谬误”——人们偏爱故事胜于事实，并渴望将一些不相干的事件压缩进同一个故事。马拉梅（Mallarmé）所说的“部落的方言”实际上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早发现。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尤其担忧的是，中国人有关国际政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囿于1840年之后的经历——遭受迫害。他引用了《瞭望》杂志2012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建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秩序”，这将使其能够持续主宰太平洋。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解构东亚区域合作构架。换言之，这篇文章指责美国故意在中国及其邻国之间挑拨离间。布热津斯基还引用了另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的一段内容：美国“强化旧的军事同盟，破坏东亚和平的政治基础，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矛盾，构筑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这篇文章认为，作为回应，中国应该与俄罗斯联手，防止美国全面控制欧亚大陆。与之类似，另一篇由《解放军报》刊登的文章¹³敦促中国丢掉“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与美国之间不可避免战争作准备。

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些文章因使用现在时态而具有一种可信性，其措辞似乎是在描述现实而非一种可能性。它们在描述现在和未来两种情况时只采用单一时态（现在时态），这使读者（甚至某些专家）强化了这样一种幻觉，即未来可能发生之事已在今天发生。如果中国人普遍持有这种看法，后果将极其危险。

2. 确定基点。人们倾向于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虚构叙事的基点。西方常常将军事干预的基点设定为保护人权的必要性。但坚持赋予自身这些权利和自由（自由是获取权利的条件）的乃是我们自己。在谈论权利时，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虚构的现实秩序，而虚构是带有个人印记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能证明人类拥有权利。我们总是先讲故事，然后赋予历史某种意义。人权的故事只不过碰巧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故事罢了，它以一种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认知为基础，即人类的天职就是在有生之年提炼和体验生命的精华——在今世，非来世。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讲述了另一番故事，而中国人的故事也与人类尊严有关。的确，中国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思考（希腊人的解释），而是因为人有能力过上道德的生活。

事实上，价值判断是自然选择带给我们的本能。一切社会都看重公平。人们努力纠正错误、维护自尊。我们都不喜欢背叛和不忠，换句话说，我们都不喜欢反社会的行为。我们欣赏的价值观都是亲社会的，原因在于这些价值观提倡相互合作。我们之所以有语言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可以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一些人因为可以依靠和信任而受到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不值得我们信任而遭到鄙视。

3. 牵强附会。根本没有客观上安全的世界这回事。我们是否感到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自己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当你改变观察事物的方式时，你观察的事物也常常随之改变。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提到他们怀疑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盟军并非因为发现了这些武器存在的新证据而采取行动，盟军

采取行动是因为它在审视已知证据时采用了新的视角——透过“9·11”事件这面棱镜。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坚称“没有证据”不等于“证据不存在”，实际上证据显然不存在。这是一个认知失调的突出案例。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年创造了认知失调这个词，用来描述一种面临特殊问题的心理状态，例如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那段时期的表现。失调使我们在已经明显失败的时候误以为我们已经成功。

卡内曼认为，中美之间诚恳的对话将为更理性的决策创造条件。诚恳的对话绝不含有以上各项内容：视野狭窄、确定基点和过分（基于联想的）牵强附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差异程度如中美之大的两个国家而言，你能抱有的最大期待莫过于它们能找到一种培养更好的合作习惯的方法。如果两国懂得它们自身社会对规范性的幻想比对方的此类幻想还难识别，那么它们或许就能够减少决策失误。理性发出的声音与传统发出的高音相比常常几不可闻。就“判断哪里是雷区而言，观看别人蹚雷比你亲自去试要容易得多”。

但这样的对话能否展开令人质疑。由于起点不同，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抵达相近的终点。两国在战略平衡中相互对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两国要想持续繁荣，最低要求是和平共处，最高要求是相互合作，但两国都难免心生疑忌和焦虑。尽管它们看起来都承认战争打不起来（至少现在），但尚不清楚两国能否和平共处。面对一个希望中国政权更迭、认为除自身外其他任何政治模式都不合理的美国，中国愿意接受它并继续与之谈判吗？面对一个对本国历史有着屈辱的记忆、对自身未来充满信心的中国，美国愿意与之展开建设性的交往吗？两国都渴望和平，但共处要求达到最难以捉摸的状态：它要求两国首先要与自己和平相处。

结 论

以1914年作类比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战争释放的暴力很可能已经在战前世界的DNA中进行了编码——例如爱尔兰自治运动在英国国内引发的暴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斗争以及工人对最低工资的要求。它还根植于俄国几乎不受压制的革命情绪，早在几年之前的1905年，这种革命情绪就已经十分高涨了。它还体现为德国军方和议会内心深处敌意，体现为被赶入城市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他们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上。这种暴力最深层的根源则是欧洲帝国主义。白种人曾经对他们此前征服的“次等民族”施以暴力，而欧洲帝国主义让他们有可能将同样的暴力施加到其他白种人身上。换句话说，1914年以前的世界很可能注定毁于其内部矛盾，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也可能爆发于当今世界的矛盾：令人目不忍视的社会不平等仍在加剧，持续不断的暴力破坏着非洲大部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环境，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重新抬头……这一切都会使舆论相信，战争并不像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遥不可及。

现实地讲，几乎无人相信中美这两个竞争对手能够合力重建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达成的那套体系。国际秩序没能实现从“国家思维”向“世界思维”的转变。中国对未来的展望仍严格局限在本地区范围之内，尽管很多中国作家憧憬着一个结成网络的世界——一个“关系网”。在这个次级权力体系中，中国可以与非洲和拉美的“次要”国家联合，减轻这些国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华盛顿支配的机构的依赖。

随着资源稀缺和经济紧缩开始对各国社会造成影响，当前的世界秩序或许难以持续。零和经济可能产生一个竞争性的、容易陷入冲突的零和思维。去全球化的前景和对西方自由主义规范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可能导致世界进一步分裂。然而，权力被重新分配并由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共享也是有可能的，那或许标志着由“俱乐部管理”向“中心管理”的真正的模式转变。这些不一定会使人质疑大国冲突的逻辑，但它们可能为大国冲突这套机制自动发挥作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而这

一点可能决定是战还是和。但这一切要想在这套体系中发挥作用还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从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到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等多位全球化批评者都认为，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被卷入这样一套地缘政治体系：各国除了自己的未来，其他声音一概不听。

对当下的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乃是我们人生旅途的常客。未来一词本身就是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没有一件事你确定知道或者确定去做”的概括。“去做”最重要。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未来。安东尼奥·格拉姆希（Antonio Gramsci）坚信，“预测”未来的唯一方法是与其他力量联合，劲往一处使，让未来符合我们的期望。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克服不确定性，但我们要想获得机会就别无他途。遗憾的是，没有人确定像中美这样两个相差极大的国家能否联合起来，代表世界其他国家作出这样的努力。

1 这起刺杀事件的准确日期为2月15日。——译注

2 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木制军舰在战斗中常常一字排开，以舷侧火力攻击敌方，这种阵型被称为“木墙”。随着钢铁军舰的出现以及现代海战不再以近距离火炮攻击为主，该词逐渐退出历史。——译注

3 尼尼微，新亚述帝国都城，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繁盛一时。——译注

4 这一说法的准确来源是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作品《洛克斯庄园》（Locksley Hall, 1835），原句为“欧洲50年胜过中国一甲子”。——译注

5 讲座内容后来结集为《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1920) 一书。——译注

6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底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注

7 作者此处指第二次中日战争,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译注

8 这两个人物分别出自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759—1767)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弃儿汤姆·琼斯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译注

9 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强调传播工具本身对人和社会的巨大影响。——译注

10 “芬兰化”指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地听命于强大的邻国。冷战时期,芬兰因忌惮苏联的威慑,而在外交与内政方面对其有所调整配合。——编注

11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2006年被美国《大西洋期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之一(第62位)。——编注

12 皇道,20世纪上半叶陆军的一个派别,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编注

13 这篇文章的准确出处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头版,标题为《中国怎样才能和平发展得更长久》。——译注

第3章 战略叙事和战略的逻辑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

在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的结尾，主要角色卡明斯将军（General Cummings）总结说，他不大可能参加下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为太平洋战争，卡明斯在这场战争中扬名。他认识到，未来属于年轻人，因为战争在不断地演变。以代理人战场和核武器为特征的冷战不可能有他的位置。他所想象的战争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事实上，核武器从未在冷战中使用，而这一点完全要归功于美国精心设计的一套成功的大战略。

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对大战略的目的作过最准确的概括。他主编的开创性著作《现代战略的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1943）是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全面剖析的论述之一。尽管厄尔并没有明确地将他的研究与他所处时代的苦难联系起来，但由于他写作的时间是1943年，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

免的研究背景。厄尔认为，大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将各国的政策与武力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不必诉诸战争。如果战争果真爆发，那么一个高明的大战略应该确保战争爆发时己方已胜券在握。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中国和美国当前都在根据它们对对方意图的解读来精心设计各自的大战略。奥巴马的“亚洲支点”战略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遏制战略，只不过名义上不那么说罢了，但美国政府自己却不这么看，它认为美国因专注于反恐战争而对亚洲投入不足，“亚洲支点”战略是对这一事实的迟来的矫正。中国则认为“支点”进一步证明美国在衰退。按照中国的视角，该战略是一个身处逆境之国的绝望之举，它趁着自己还有时间想要奋力一搏。它被视为一国在衰退之际仍然穷兵黩武的证据。一些中国战略思想家认为，美国构成的主要威胁是它的虚弱，这会带来他们所说的（在南海）“搅局”和不必要的“挑衅”（例如决定通过在澳大利亚轮换部署一支海军陆战队来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

一切大国都有对自己的一番解释。大战略可以使它们理解自己的过去，并使当下的存在具有连贯性和重要性。然而，大国对自己讲述的某些故事总是比另一些故事更可信。一些故事讲得如此动听，其中一部分甚至符合现实。人类是一个讲故事的物种：考古学家将历史上的手工艺品拼凑起来就能讲述史前时期的故事；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时代就开始讲故事；企业高管为他们销售的产品编故事，这些产品经他们的推销似乎立刻就有了市场；律师们自从法院开始存在以来就在精心编造自己的辩词；最近，军队被告知胜败取决于是否能“赢得叙事”。正是各个国家和社会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将人们引向了冲突或者和平之路。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865) 中，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得出教训，只要你能把它找出来。189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没有爆发战争，这其中的教训颇有启发性。英国能够设计出一套经得住时间考验，也可以说目前仍然有效的大战略。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美国可能效仿英国，直接将世界领袖的位置腾给中国。但这不会发生，因为英国在1890年之后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是美国编不出来的。

我将在本章中展示大国冲突逻辑的另一个方面——编织可信的战略叙事的必要性。另外，各国有必要理解，在缺乏有说服力的大战略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像1914年那样昏昏沉沉地陷入灾难。说到底，战略思维不过是社交智慧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它是指通过设计一系列选项达到知己知彼的能力。爱德华·勒特韦克所说的“战略自闭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德意志帝国未能通过他国的视角来观察自己。英国能够相对成功地处理好自己从“国际警察”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与美国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交智慧可谓功不可没。

从未发生的战争：美国与英国

1913年5月，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纽约，与美国商谈庆祝两国缔结和平100周年的计划。两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在1815年结束¹。在广场饭店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代表同意在1915年2月27日整个英语世界默哀5分钟。唯有一人提出异议：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代表们抛出惊人之语，他说这两个国家是在谋划联合向德国开战。这位教授恰巧是德裔美国人。有人上前安慰他说，两国都没有考虑发动战争。的确，所有国家都将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随后，大家都报以掌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然而，仅仅在18年前，英美两国还险些因为一场鲜为人知的领土

争端而爆发冲突。这起争端发生在委内瑞拉和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圭亚那之间。美国国务卿选择单方面且溯及既往地重新定义门罗主义。“遥远的距离和3000英里的海洋意味着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永久性政治联盟都是不正常的。”在一篇违反现实的文章中，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对这样一场战争结果如何进行了想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似乎掌控整个局势。他指出，美国东海岸几乎没有任何沿海火力点来保卫像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美国海军只有一艘一级战舰，另有三艘正在建造。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9艘一级战舰，22艘二级战舰和15艘装甲巡洋舰。当然，现实是英国几乎无法保卫加拿大。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认为，英国对加拿大的占领使英国成为一个陆地面积实际上比美国还大的“天然的”美洲国家。在罗伯茨的设想中，美国人将拿下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迫使皇家海军从封锁海岸转为轰炸沿海城市。四颗高级炮弹就可以清除自由女神像，但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并没有下令轰炸曼哈顿。

罗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在1895年与美国开战的最好结果可能是英国割让魁北克省。英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正如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所承认的，遏制美国实力的最佳时机是美国内战。只有40年前南部邦联获胜才能将美国的实力削减到“可控的范围”。用他的话说，“一个国家不会遇到两次这样的机会”。

与委内瑞拉的战争本该发生，却没有。在那之后英国人也从未真正考虑过与美国开战。但崛起中的国家往往比守成大国更好战，美国仍将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根据美国的“红色战争计划”（1930）——该计划对美国与英国之间一场假想的战争进行了预演——美国将消灭英国在加拿大的全部陆军部队，并将把皇家海军赶出北大西洋。对加拿大的入侵将从大规模轰炸关键工业目标开始，此战甚至可能动用化学武器。签署该计划的最高级别官员

不是别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通过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这场冲突的规划，今天的专家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北大西洋发生大型海战，尽管皇家海军可能获胜，但英国为了保持至关重要的商路不被切断就必须割让加拿大。直到1939年6月，也就是德国人侵略波兰的几个个月前，美国一份内部备忘录才得出结论，认为“在新形势下”这些战争计划根本不具有可执行性，但它们仍被存档以备未来之需。

公爵夫人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衰落中的大国应该现实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英国人就已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者的位置交给美国了，而且在1900年以后英国领导人也不愿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布尔战争（1899—1902）将英国的孤立暴露得一览无余。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英国没几个铁杆盟友（在这场冲突中，支持英国的唯有美国人，正如两年以前的美西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有英国人一样）。俄国的威胁和对法国的担忧（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与德国达成协议，都迫使英国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英国已经朝这个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在加拿大，有人抱怨英国早在1871年就开始以牺牲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代价与美国妥协。这些抱怨在解决阿拉斯加边界争端问题时再次出现，加拿大人认为，妥协方案过分有利于他们的邻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议，一旦出现最坏情况，“太平洋地区500万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保护”。在加勒比地区，1901年签署的《海—庞斯富特条约》标志着英国不再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美国实际上在中美洲不再受任何约束，这使它有能力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的财政并对海地和墨西哥进行军事干预。

英国人就这样接受了现实——1900年之后不可能再与美国开战了。选择退让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英国人开展了最早的趋势分析。英国人最先发现的一个趋势就是英国记者W·T·斯特德（W. T. Stead）

所著的《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World : 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1902 ）。他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为“20世纪的趋势”。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正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惊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趋势分析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法。

人们常常将趋势提炼为某种反映时代语言的说法。几年以前，斯特德曾给莫利勋爵（Lord Morley）写信说，“英语世界的中心”正在西移，正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曾经承认的，“人类的重心已经移至此地，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调整好自己”。像“英语世界”和“人类的重心”这样的词语就是战略叙事的一部分。当然，这两个社会都讲英语确实提供了帮助。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准确描绘了这种发生在20世纪某个特殊时刻的态度转变。他写道，“在1907年圣诞节期间，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经历了严冬的极端考验之后前往费城，去拜访自己的妹妹。当时第一批摩天大楼已经拔地而起，美国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国家，国土之大超出英国人的想象。”但卢卡奇也准确描述了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另一种感受：“他们不但接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且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甚至没有因这种预期而感到地位下降。”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相互态度开始发生明确的转变：1907年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很多美国人都将这块殖民地的建立视为美国的“基石”。1907年也是亲英派古德温·阿彻（Goodwin Archer）提出英美共生说法的一年（他的儿子1943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死于英国）。同样在1907年，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发表了一本小说，描绘了一些美国人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时开始坚持自己的英国传统。

卢卡奇承认，“尽管在某个地方梭子开始重新编织，但另一个地

方却在开线，因为在美国人这块布料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纤维含量正变得越来越低”。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 1907）中曾对这个事实发出警告，而这本书也成为他对这个日后不会再踏足的国家发出的告别宣言。根据19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不能讲英语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近25%。担心这种“民族大杂烩”可能影响美国人特征的不止詹姆斯一人。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东海岸美国人很容易与英国人产生认同感的原因之一。尽管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英美关系从未像英国人希望看到的那样紧密，但很多美国人确实对两国关系投入颇多——包括英国文化、语言、文学以及从一开始就有的英国“时尚”。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一位作家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崇拜”。

卢卡奇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他承认，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尽管在文化上彻底地“英国化”，但对英国的动机仍保持怀疑。当伍德罗·威尔逊带领他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称英国为盟国，而用“伙伴国”代替。如果说两国之间还有某种合作关系，那一定是因为英国不得不投入更多。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重新缔结关系，重新编织它们的共同命运，越走越近”。这种努力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久，这一时期乔治·卡特林（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发表了《英美联合》（Anglo-American Union, 1943），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发表了《此刻联合》（Union Now, 1939），后者建议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国家组建联邦²。

英国人和美国人并非只是语言相近。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继承了一种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理性和可被经验证实的人生观。两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寻求挑战“神灵”的存在或者为他们在20世纪的手提供灵感的“历史绝对真理”。英美两国的现代视野具有将相对事物并置以寻求解决方法的特征，这种视野为它们所独有。两国都坚持使主观的事物客观化、使

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使特殊的事物常规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化。两国都不大重视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晦涩观念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简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退让是合乎某种规范的。它与力量对比毫无关系，而与内在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英国面对的是更加危险的德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中讨论了英国以和平方式向希特勒妥协的理由，爱德华·卡尔（E. H. Carr）的《20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39）一书曾对这个理由作过最有名的阐释。卡尔认为，绥靖政策对于使国际体系顺应国际权力格局的现实必不可少。纳粹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领土交换和权力重新分配在所难免。当然，绥靖政策最终失败了，因为德国人将这一政策解读为对手的软弱，因而加大了赌注。但吉尔平评论说，仔细阅读卡尔的文字会发现，他本人并不主张英国放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卡尔更倾向于欧美结盟，甚至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后者至少可以巩固基于价值观的国际体系“规则”。从这一分析中，吉尔平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向来把价值观置于和平之上，随时准备为维护国际体系规则而战。

本章开头提到，中国国防大学一位教授表示，美国有望效仿英国，直接放弃在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不幸的是，英国对美国的退让并没有帮助较弱的一方守住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这种退让或许并没有让英国加速失去这一地位，但也没有起到任何延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仍在谈论英语民族的联盟，当时，英国的政治资本已经消耗殆尽，这使他显得极为可怜。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眼中的大反派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两个

人都在争夺打造战后经济体系的权利，希望以此确保各自的国家在战后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英国人下了很大工夫确保伦敦仍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大英帝国仍为英国出口提供贸易保护。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写道，“美国人最终获胜，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局势：当此之时，英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怀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两个由美国支配的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还成功地迫使其他44个与会国接受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美国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是经济任务——阻止英国人（通过向大英帝国市场提供优惠）干扰美国以出口主导的战后复苏——而第二项是政治任务（通过组建负责管理战后欧洲的美苏“委员会”使英国陷入贫困）。幸运的是，冷战意味着英国人重新获得美国的重视。苏联人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也不会同意按照这套“规则”办事。杜鲁门后来重新将英国确定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但他坚持要求英国偿还战争欠款（直到2006年才还清），从而使英国继续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

英国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吗？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说，幻想只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在设计故事结尾时总是纠结万分。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充满浪漫色彩的最后一幕中，皮普和埃丝特拉两人走到了一起，但在最初的设定中，他们在街上相遇，闲谈几句之后便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由此得出的一点是文学可以为读者隐去那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能假装他们最心爱的角色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人们能够抱有的最高期望仅仅是生存。

在美国人看来，用英国失去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作类比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因为中美之间无法像美英之间那样产生文化上的共鸣。美国不大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位置，但美国和英国成功避

免战争这个事实至少反驳了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说法——民主国家不会作战略思考，除非是在战争期间（那通常为时已晚）。相反，民主国家更善于战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为它们是开放的社会，它们往往更愿意作自我批评，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行为——过分纠缠于权力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断失误——或许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缺陷，而是它们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

战略叙事

美国不大可能效仿英国，因为美国给自己讲述的故事与英国的故事结局不同。从战略的角度看，主要危险不在于美国给自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而在于它给自己讲述了太多的故事。

在《好战略，坏战略》（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2011）一书中，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主张一国在制定战略时应该寻找并利用两种力量之源。第一种是连贯性：将政策和行动协调起来有助于开发现有力量，并通过设计上的连贯性生成新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之源是重构竞争态势以使自己具备新优势的能力。英国人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在将德国确定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之后，英国人立即采用唯一可行的政策：向美国“让步”，以确保在战争爆发时——这是最坏的打算——美国仍保持中立。英国通过引入“英语国家联盟”、“同族兄弟”以及后来的“特殊关系”等概念重构了自己的战略叙事。就这样，英美之间的战争渐渐失去了可能性，因为它已经无法想象了。

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不测之事会越来越少。我们的选择性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能够找到避免和预防不测的方法，生活因此变得越来越“可测”。丹尼尔引用了尼古拉斯·马克斯韦尔（Nicholas Maxwell）对自由的定义：在“各种情

况下获取价值的能力。”对英国人来说，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但被美国人取代，德国的崛起也迫使英国重新思考它对欧洲的投入。争端可以拿去仲裁，就像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时英国的经历一样。生活也总能找到不同的观察角度，任何时候都可能改掉原有的思维习惯，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英国战略思维核心的均势思想。

然而，每一次行动几乎必然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解决一个问题常常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丹尼特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们总会给自己讲述一个不那么积极的故事。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对比过去200年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时指出，英国决定放弃均势战略，将头把交椅让给美国，这使它能够继续赢得战争，甚至在交出经济霸主地位后很久仍能保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托马斯·布赖姆洛（Thomas Brimelow）在1946年时所说的那样，苏联知道英国还没有在比赛中出局；它即便不是最强大的对手，也很可能是最精明的那个。“最让苏联政府感到不安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让其他国家为我们而战……他们并非尊重我们，而是尊重我们结交盟友的能力。”这种夸耀并非毫无根据。亨利·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个政府像英国这样可以让我们与之如此开放地交往、如此自由地沟通，实际上，我们已经让英国人参与我们的内部讨论。”

但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承认的，21世纪的美国与19世纪末的英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经济基础远强于英国。一切迹象都表明，即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被中国取代，甚至被印度取代（尽管后一种情况在未来很多年内都不大可能发生），它仍将保持强盛。真正的挑战是政治性的：美国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西方伙伴（甚至德国也不可靠）来分担作为占支配地位大国的责任；因此，美国没有真正的动机将第一的位置体面地让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满足的要求很可能远比当年的英国具有挑战性，现在也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调整自己并适应其他正在扩大影响力的大国，以及美国是

否能够应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所说的“全球实力构成”的新变动。“华盛顿能够真正地接受一个包含多种声音和观点的世界吗？它能够在一个它无法支配的世界中兴旺起来吗？”美国已经察觉到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中国的崛起，并且美国不准备抵制。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鲁梅尔特的观点，美国没能做到以一种可以被其他所有人理解的语言重构竞争态势。

美国现行政策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自1980年以来用多种不同的眼光审视中国，结果它对自己讲述了多个不同的（常常是矛盾的）故事。美国曾经强调中国构成的意识形态挑战，认为中国拒绝民主，实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且拒绝接受人权问题上的规范性共识。

“9·11”事件后，中国成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但小布什政府在始于2001年的第一任期内却将这个国家视为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之一，这为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还谈到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政权更迭”。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华盛顿的口头禅是“巴格达的下一站是北京”。五角大楼一位颇有影响的发言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入侵伊拉克是“为对付中国热身”。当美国人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后，他们又换了一个火药味没那么重的说法，甚至还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中国拯救了自己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美国依靠借款实现自己的全球野心。两国被绑在了一起，尽管它们对此深表不屑，但这确实对双方都有利。当2008年的经济危机威胁美国经济时，中国银监会被问到是否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一名官员回答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这就是华山一条路。”所有新兴市场都需要安全的流动资产来保护本国货币不受动荡的资本流动的冲击：时事越艰难，对可变现资产的需求就越大。尽管中国购买如此多的美国国债看起来不明智，但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就成了一种违反常态的稳定。

然而，“中美国”一词暗含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实为一种对两国都不

利的幻觉（这种幻觉鼓励美国人过度开支，促使中国对此习以为常）。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以外的市场，通过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财产进行投资来对冲美元。“大脱钩”或许已经开始。当2013年9月国会迫使政府关门长达数周、导致美国接近债务违约时，即将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中国人。在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1.3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建设“去美国化的世界”的必要性。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在抬头，像电信业巨头华为这样的中国跨国公司如今被禁止收购美国资产，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对美国大型石油企业优尼科的收购也被否决。在宣扬美国民族主义方面，一个尤其耸人听闻的例子是2012年夏季发行的电影《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以及这部电影发出的警告：“所有大国中唯有中国为消灭美国人作着系统性的准备。”在电影海报上，一把刻着“中国制造”的匕首插在一张美国地图的中央。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迹象表明这个世界的保护主义倾向正在增强。正如《经济学人》指出的，多边治理正变得越来越软弱。俄罗斯尽管身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却正在采取新的措施来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美国正在寻求创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与其盟友以及中国之外的伙伴之间的贸易。

2013年7月，《经济学人》对这种地区性贸易协定的扩散表达了严重忧虑，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经济正在分裂为若干部分。《经济学人》警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经济放缓可能会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各国应对这种局势的传统方法就是挑起冲突：

一个世纪以前，这个世界最后一个贸易融合的时代以一场战争宣告结束，并开启了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时代……世界能否巩固当前这个不同寻常的增长期，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大国是踏上一条通往更大程度的全球合作的道路，还是失足、跌倒，或者最坏的情况——发动斗争。

“支点”战略是当前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重振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并调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部署，此举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感到担忧。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成功入侵伊拉克的刺激，在那之前还有一系列被中国视为“挑衅”的行动，例如台海危机（1996）、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1999）和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

“支点”战略旨在矫正因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而造成的势力失衡。小布什政府对中亚的关注超过了亚太地区，导致美国专家抱怨这个时代成了“失去的十年”，这是在效仿丘吉尔的一个有名的言论：他曾将20世纪30年代描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美国正在重新联络自己的盟友，恢复联盟体系的活力，同时增强现有军事力量。美国将在日本部署F - 35战斗机（2017），在关岛驻扎攻击型潜艇，到2020年，太平洋战区的舰艇数量将由50艘增至60艘³。这种再平衡是为了让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国将继续维护秩序。因此，美国当前的政策是防范任何企图挑战航行自由的做法。自18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首次与巴巴里海盗交战以来，航行自由一直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目的十分明显：它想要留在西太平洋，继续做东亚地区的军事大国。然而，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无法满足一个真正的“支点”最基本的要求：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投入、与重新强硬起来的俄罗斯达成某种共识（运用俾斯麦式的谋略——这种“大妥协”或许会从中国手中夺走一张关键的战略牌）。因此，这个“支点”能否实现既定目标还有待观察。

在冷战结束后的不同时期，美国曾先后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辟快速通道）、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伙伴以及G2世界中的潜在全球伙伴。但对于两国在G2世界中合作的希望在2011年初开始破灭，当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在局部地区，尤其是东海和南海，变得越来越强硬。现在仍不清楚，这两个大国中哪一个甘愿在G2关系中扮演次要角色。两国都认识到它们互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两国都对这种竞争会走向何方感到担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将试着在某些问题上保留各自意见，而在其他问题上相互合作。

在中美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两国会建立伙伴关系。信任是要努力争取的。大国之间很少真正地相互信任，但一些大国能够找到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方法。关于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不同的观点相差极大。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评论家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够开展一项“共同事业”，而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弗雷德·伯格斯特滕（C. Fred Bergsten）甚至建议以“中美共治”来管理全球经济。然而，你很难想象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污染物排放国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相互配合。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宣称，国际体系已经呈现两极化，这可能会促使这两个大国展开合作。然而，同样是这种动力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持久冲突，尤其是它们都极为看重各自的例外主义的时候。

从美国的角度看，重中之重是当前体系的规范性制度继续得到维护。正如奥巴马在2011年所声明的，尽管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它希望确保中国崛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维护国际规范与制度，并巩固安全与和平。问题在于，美国越来越不相信中国有兴趣支持这些规范，更别提推广它们了。这种关切体现在2011年五角大楼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这份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详细描述了中国构成的威胁。国防部预测中国不会致力于加强当前的国际规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作美国利益的威胁。在美国开始防范中国崛起的这25年间，美国对华战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对这个世界作了这

样的假定：“战后秩序仍在缓慢瓦解，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世界很可能回归均势政治。对于后者，英国在1900年之后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就已经弃之不用了。”

寻找大战略

美国的决策缺乏连贯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因缺乏连贯的战略叙事所引发的問題。加里·哈特（Gary Hart）将连贯性定义为包含目的与方向的单一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随机的——但不能是极端的——事件能够被解释、赋予意义并按要求予以应对”。如果这个定义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的政策在决策层面显然是不连贯的。

让人感到离奇的是，美国的确曾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制定了一项具有连贯性的战略。不连贯的问题只是在如今中国崛起之后才出现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认为遏制中国是可取的，甚至是可以做到的。相反，美国决定将政策调整为防范中国的崛起。用《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06）的话说就是，“我们寻求鼓励中国为其人民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我们也防范其他可能性”。在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国防部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防范未知事件”。如果不可预测之事如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长期因素——这与冷战时期有别——那么符合不可预测定义的事件就必须加以防范。美国尝试通过将中国嵌入现有安全架构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快速通道背后的逻辑。美国的意图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或许不是盟友，但它们确实拥有共同利益。

防范政策的问题在于即便它能削减风险，但也无法消除风险。公司往往会防范那些影响核心业务的风险，例如货币波动。它们防范风险的目的是增强或者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公司之间的竞争不同于国

家之间的竞争。当公司竞争失败时，它们往往会停业；国家却很少停业。无论防范政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谨慎的还是投机的（取决于这些政策是防范不利因素还是利用有利因素），对社会而言，其安全程度常常只取决于自己的感觉。

尽管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内部对于如何与崛起后的中国打交道莫衷一是。鲁梅尔特认为，美国不过是在原地踏步。他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尽管美国善于表述自己的战略目标或子目标，但美国并不善于思考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不连贯性”。当一个政府错把目标当成战略本身的时候，这个战略就变得不连贯。鲁梅尔特坚信，所谓战略目标的设定意味着应该明确知晓成功需要哪些条件，否则一个国家仅仅是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绩效目标而已。

奥巴马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列出了相当模糊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推动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培养强大和有能力的伙伴”、“加快适宜的⁴ 发展”和“增强我们作为榜样的力量”。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含糊不清。尽管报告自称具有战略考量，但有关中国的部分仅仅得出了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崛起并监督其崛起是否威胁国际规范的结论。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美国国防部仅作出了“密切关注”的决定。它希望“鼓励”北京通过减少不信任和增加两军对话来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至少从这份文件看来，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一致性。

如果没有对挑战进行足够准确的定义，那么你就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如果无法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那么你就不可能抵制一个低劣的战略或者改良一个良好的战略。一个良好的战略能够准确定义关键的战略挑战并确定应对这一挑战的最现实的方法。它提供了一条改善局面的明确道路。“低劣的战略”会设定异想天开的目标，只是简单地陈述或者重复理想的事态，而常常忽视这样一个恼人的事实：没

有人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有一个战略原则似乎确实赢得了广泛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个词已经成了流行语。由于没有一个受到一致认可的连贯的战略叙事，美国只能给自己讲述一个非常古老的、从古希腊人那里汲取灵感的故事。在此之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战略家的话）我们似乎应该多次落入过这一陷阱，这样一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实际上并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修昔底德陷阱

1914年世界大战突然降临时，我正在向贝利奥尔学院的本科生讲解修昔底德——在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经历与很久以前修昔底德在其世界中的经历毫无区别。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西方军事评论家提及修昔底德并非最近才有的事。毕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军事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政治学家。正如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所指出的，修昔底德在当代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中向来颇受欢迎，这从大量学术著作的标题中就可见一斑：

《战争与民主：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比研究》《霸权之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等。“9·11”事件后，汉森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独一无二的战争》（A War Like No Other，2006）。这本书告诉读者，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今人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军事教训：战争可能会动用恐怖和卑劣手段，被强行灌输民主的国家有时并非心甘情愿，民众对出兵海外的不满可能会导致国内动荡和文化动乱。汉

森说：“如今反恐战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往回看，寻找各自的修昔底德。”他说，考虑到当今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存在交战的可能性，我们也要开始寻找修昔底德了。

任何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经典著作的人都承认，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很少能应用到实际中。然而，尽管事实上经典著作常常被误解或者为了适应特殊情况而被滥用，但现代作家反复引用希腊人是有原因的——他们需要希腊人的归纳推理和真知灼见。尽管希腊人的观点能够并且已经按照现代科学语言进行重构，但希腊人最早观察到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至今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仍然非常重要。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 1968）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Lévi - Strauss）评论说，科学解释的意义并不在于将复杂化为简单，而在于将不易理解的复杂替换为容易理解的复杂。但简单的好处在于它简洁明了，这就是人们在思考守成大国如何才能避免与崛起大国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

修昔底德陷阱——用社会科学术语说就是“安全困境”——似乎肯定适用于美国和中国的案例中。中国的能力和实力将会继续增强，这对于地区安全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预示着什么，这类问题将让美国感到紧张。只要美国继续留在东亚，中国就将越来越担心美国将下多大功夫限制中国的军事雄心。“这是野兽的本性……双方必须处理好这个困境，防止其恶化为公开的冲突”。

在2011年春季号《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上刊登的一篇有关未来各国实力的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表达了这样的希望：美国有时间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且能够避免落入陷阱的第二层——因为忧虑而反应过度。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奈在哈佛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同样将中国和美国描述成斯巴达和雅典。他认为，破坏系统平衡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的相对衰落。在这两者之中，中国的崛

起或许破坏性更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国民生产总值（GDP）小于西班牙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被修昔底德的魅力吸引的不限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自从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宣称唯有阅读修昔底德才能理解大国竞争以来，高级军官都被鼓励认真对待这位希腊历史学家。自1972年以来，修昔底德一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必读书目。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2012年5月表示，他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美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现在连军方都知道与政府保持口径了。

美军对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感到担心是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被不断削弱。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美国的主导地位“很可能”在20年内完全消失，或者至少被严重削弱。然而，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这两个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阻止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

尽管这份报告的作者宣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使它们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但他们也设想了一种结果相差极大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美国经济则遭遇自由落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防预算持续下滑。最终，美国不得不在2030年之前交出西太平洋的控制权，迫使日本单独与北京达成妥协。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不大可能，但并非不可想象。美国不但没能抵制中国的崛起，反而让自己淘汰出局。守成大国不能或不愿维护自己的地位，崛起大国几乎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崛起。

第二种情况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中国的增长遭遇困境，与美国的技术差距没有缩小。今天存在的军事上的缺陷依然没有消除。美国重新获得了勇气和能量，帝国发动反击。美国做到了将国防开支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在这种情况下，守成大国仍然鹤立鸡群，而崛起大国像过早冲刺的运动员一样力量衰竭。报告

认为，这种结果也不大可能出现——美国根本不具备甩掉中国的金融手段或者技术能力。

第三种情况是，美国的地位继续被削弱，但这个国家也没有就此衰退。它仍然有能力竞争，就像恢复活力的日本那样。这种情况下，陷阱尚未搭建，但可能因为中国南海的一起事故或者外交冲突的升级而出现，但这两个大国都尽量避免战争。事实证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可控的。守成大国仍然保持一个微弱但重要的优势：崛起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内部凝聚力来冒过多的风险。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最大，但这些作者也承认，这种情况过于“不稳定”，无法作出确切的预测。

附庸国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程度，要受到我们所能掌握的比喻的限制。比喻不是对应，而是类比：它将某种经历转化为一种观念，从而把陌生的事物变为熟悉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思考中大量使用比喻的原因：它们能传达复杂的观念并按照某条既定的轴线传递我们的思想。例如，陷阱会以多种形式出现，落入陷阱常常是致命的，但仔细阅读修昔底德就会发现，我们讨论的这个陷阱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复杂。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不愿向对方开战，但他们各自的盟国让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结果导致这两个大国都试图夺取决定性的先发优势。两国作此决定是因为它们听从了各自的附庸国。当时，科西拉（一个没有盟国的城邦）正与斯巴达的盟国之一科林斯交战，只有当雅典援救科西拉时这场大战才正式开始。雅典人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听信了科西拉人所说的话：科西拉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打响。另一方面，科林斯人警告斯巴达，如果它不入侵阿提卡，那么

它就会遭到雅典人的袭击。科林斯人对于斯巴达人没能认识到自身处境的真实危险颇为鄙视。他们指责斯巴达人没有考虑“你们即将面对的雅典人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与你们有多么大的差异、多么根本的区别”。

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免被各自的盟国拽入冲突吗？在《纽约时报》2013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两国或许不愿被拖入彼此之间的对抗，因为它们对于当前力量对比发生任何变动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后果都感到担忧。那么我们能期待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吗？就像1815年后欧洲所经历的那样？

肯尼迪承认，未来或许会发生战争，但他认为这些战争很可能是局部的或者孤立的（就像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列强能够将战争各方与外界隔离一样）。但这要求中美两国展现出更程度的自我克制：“两国需要确保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肯尼迪的观点与西方世界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中占主流地位的务实主义相一致。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人继续对一套新的世界秩序抱有幻想。后果管理是国际安全永恒不变的原则。各国更愿对威胁这套体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开战，而不是那些有可能希望改变这套体系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之中没有一个是希望开战的。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原因是列强忽视了修昔底德有关加强对附庸国控制的警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俄国纵容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指责德国任凭维也纳对塞尔维亚展开报复——维也纳认为大公遇刺是塞尔维亚对它的“冒犯”。附庸国从来不像它们的保护国所认为的那样听话。附庸国往往将它们的保护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因为保护国会高估其盟国的战略重要性。这种关系常常造成误判的恶性循环，1914年俄罗斯—塞尔维亚联盟与德国—奥匈帝国联盟之间就是如此。

这正是美国和中国需要避免的陷阱。作为维持“全球领导者”地位的一部分努力，美国当前正寻求恢复地区联盟的活力。当前环境非常适合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支点被很多国家视为亚洲政治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但美国不应对这些盟国抱有想当然的态度，因为它们在近期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时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选择。然而，与修昔底德讨论的城邦和1914年欧洲列强的附庸国不同，当前美国或中国的地区盟国中没有一个希望将它们的保护国卷入战争。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针锋相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者的世界观有别所致。中国和希腊思想史专家劳埃德（G. E. R. Lloyd）认为，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存在根本区别。希腊传统倾向于关注根本问题，可以接受极端的、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思想倾向于优先考虑实际意义以及如何使实用性举措产生最大效果。劳埃德主张，这一差别源自社会政治环境的差异。希腊城邦时代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付诸阙如。此外，希腊人在市场上或者公民大会上争辩，而中国的圣贤们在宫廷中争辩，这种环境对论证的辩术和对抗性要求较低。

美国采取的对抗态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的确，美国的大部分政策与其政治体系、文化和制度都是分不开的，这包括以辩论为特征、以陪审团为核心的司法体系，拥有议会制政体的两党体制，以及市场竞争的理念。最后一个例子是宗教。中国的宗教体系，例如佛教和道教，通常可以和平共处；它们在多个世纪以来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下共存。美国则不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各种宗教信仰高度竞争的“市场”：300多个教派和团体为争夺信徒的注意力（通常还有金钱）而竞争，且每一家都宣称代表“真理”。换言之，对抗性是美国的默认编码和独特的文化风格。

该地区另一个潜在的导火索当然就是台湾了。美国与台湾之间并没有正式的防务协议，只是美国承诺一旦大陆对台发动袭击，美国将

采取“适当行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对台湾发动的任何袭击必将遭到强有力的常规军事反击。从长期看，北京首先要使美国的威慑失效，接下来要对美国的任何干预行动施加惩罚措施。

但很多台湾人的对抗态度并不如美国人那么强硬，一些台湾人甚至开始质疑与美国保持这种关系的得失。台湾问题可能会自行得到解决，台湾与大陆的交往越来越深，对大陆的投资如今占到台湾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83%。自2009年以来，台湾已经将很多高技术行业向大陆投资者开放。

然而，台湾的未来以及这块争议领土可能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都还不够明了。一位学者撰文称，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北京影响力扩大而华盛顿影响力缩小，考虑到台湾如今是美国海军沿第一岛链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遏制的关键部分，这种此消彼长很可能会带来麻烦。随着军事地位的不断提高，北京可能日益失去耐心。

如果朝鲜半岛或者台湾地区再次爆发危机，那完全可能导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战争。抵消这种可能性成为一项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因为环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战略断层线。我们的确应该对意料之外的战争感到担忧，但别忘了本书讨论的是冲突的逻辑，而不是常常作为冲突起因的偶然事件。大国战争的爆发是有原因的，它们具备亚里士多德的三位一体论：前提条件、突发因素和触发因素。中美战争的前提条件极有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与试图取而代之者之间的竞争，突发因素很可能是中国试图破坏美国与其盟友/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触发因素则很可能是海上摩擦或者一方嚣张过了头。

这再次提出了社交智慧的问题。战略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多数时候我们与复杂系统的互动非常成功，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处置得当，并非因为我们真正理解它们。民众和政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然后尽可能迅速地、富有想象力地应对大国的兴衰以及在很长时间里逐

渐出现的新的威胁、风险和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挑战。我们这种无尽和重复的互动证明我们并不清楚这套系统将发生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我们只能用社交智慧来引导自己，而为大战略奠定基础的正是社交智慧。有些证据表明中国人对这一事实的领悟比西方人早得多。

智胜美国

中国思想认为，就大国实力而言，失衡本身就包含了恢复平衡的可能，不仅仅是可能，还是一种倾向。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就能影响已经在发挥作用的活跃力量，从而避免冲突，甚至达到理想的效果。

——《恢复力》（Resilience：Why Things Bounce Back，2012）

“心态”（或者说不同文化风格的推理）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各类文献中鲜有提及，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是西方和中国论述中国有的且常常不被人注意的部分。例如，在西方，那些在重重困难之下敢于冒险并取得成功的人常常能够赢得赞许。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台风》（Typhoon，1902）中的麦克惠尔船长。面对一个热带风暴，麦克惠尔并没有绕开它，而是驾驶船只直冲风暴眼并成功脱险。他后来考虑了另一种情况：假设我偏离航道，晚回来两天，他们会问我：“船长，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里了？”“我能怎么回答呢？”我会说：“为了躲避坏天气绕了些远。”他们会说：“那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天气。”我又不得不说：“不太清楚，我躲得非常远。”在西方，人们往往更愿意颂扬那些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而不是躲避风险的人。同理，很多西方人称赞亚历山大（Alexander）率军远征印度河

流域并班师回国（尽管那次撤退是一场灾难），他们还称赞汉尼拔（Hannibal）带领他的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尽管他在途中失去了大部分大象，而如果他沿海岸行进就不会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人们传统上对这些冒险者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用孙子（Sun Tzi）的话说，他们就是“无知”的例子。孙子曾试图说明为什么迂回之道更可取。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更喜欢用“弯路”这个词。他写道，“大体而言，走弯路的人认识到复杂的目标往往没有精准的定义，这些目标的本质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只能通过实验和发现来习得，走弯路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按照凯的说法，走弯路只是一个适应和发现的过程。那些用直接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有时无法处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可能比不用直接方法的人更脆弱。

中国思想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强调在处理事务时须认清背后的逻辑并顺应趋势。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Julien）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伟大“创意”。按照中国思想，战略的逻辑要求利用事态固有的倾向性。从孙子时代开始，中国的战略思想就一直强调顺应敌人运动轨迹的必要性，而不是与敌人硬碰硬地正面对抗。《孙子兵法》建议，不要在决战中与敌人对抗，而是要顺应事态发展趋势，这样在两军交战前胜负就已分晓。任何事情都源自内部发展，而内部发展的启动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伤亡。

孙子有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建议与西方战略思想强调尽早与敌人交战不同。任何一场战斗都存在风险，不可能成为决定整个战局走向的关键时刻。各方核心力量的碰撞永远都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在中国人看来，像勇气这样的人为因素不过是形势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一名士兵之所以勇敢不是因为某种内在的品德，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局面迫使他勇敢。正如孙子所写，良将“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中文里“势”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可能性或趋势，一种可以预见或者处理的事态发展。顺势而为的国家将会胜利。中国采用这一战略的方式有很多：向美国的盟国施压，迫使它们与华盛顿保持距离；通过网络战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或者通过慷慨的经济援助在全球范围以智谋战胜美国。

1914年的德国试图摆脱由自己一手造成的战略残局（它实际上将自己包围了）。与德国不同，中国没有必要孤注一掷地打破在它眼中由美国盟国对它实施的包围。中国人认识到，要制定最好的战略，就必须对当前形势下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用朱利安的话来说，中国人倾向的不是避免对抗，而是完全消除对抗。

朱利安试图提供一个让我们“无中生有地展望未来思想”的视角。一些汉学家批评朱利安的观点，认为他在没有明确地定义和说明他的主要参考点（西方）的情况下就创造出“另一个”中国。其他批评者则坚信，对西方思想来说，弯路和迂回并不是陌生的概念。要想对不同的思想传统进行对比，就必须首先按照各种思想传统自身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然而，尽管有这些批评，中国的战略逻辑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或者说至少它对迂回的偏爱远胜于西方思想。这很可能将是中国在设法对付美国最重要的地区盟国时所采用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尝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促使美国的盟国疏远华盛顿，直至事态发展趋势转向对自己有利之时。这又会导致美国日益被孤立的局面，那种局面与当前中国在亚洲的局面截然相反。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一个战略残局，在面临是发动战争还是在历史中靠边站的严峻选择时，它甚至会选择后者。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会步德意志帝国的后尘，把一切都押注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大胆一跳上。美国孤立主义的本性可能会再次凸显，中国最终可能真的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日本和美国：独一无二的联盟？

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能达成大妥协呢？休·怀特（Hugh White）的《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2012）一书提出了这个观点。尽管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发起了挑战，但2012年8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每一个国家”。然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随即指出，太平洋也足够小，可以发生威胁和平的冲突。怀特建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个新秩序，使中国能够继续增强其实力和影响力，而美国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安全。怀特认为，如果这两个大国无法达成这样的妥协，那么一次小规模对抗就可能导致大国战争。他还建议美国应该趁自己的“衰落”还没有明显暴露，中国仍愿意寻求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时候，抓紧与中国达成一致。怀特认为，对美国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认识到一旦中美爆发冲突，它的盟国（甚至可能包括日本）或许会拒绝选边站。

怀特的主要担心在于，南海的领土争端，或者美国海军在黄海的演习，或者中日在东海的争吵都可能导致中美滑入一场战争。例如，2012年，日本参加的一场名为“铁拳”的军事演习导致中日紧张关系升级，并让人质疑日本是否逐渐放弃战后一直采取的和平主义立场。那次军演包括从一个假想的入侵者手中夺回一座日本岛屿。然而，由于日本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意愿占领该国岛屿的国家，那场军演的目的显然指向了中国可能威胁日本主权这一前景。那次军演与以往历次军演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士兵请求美国海军和空中打击力量的支援，这支精英部队的领导人首次参与了军演的筹划工作，扮演了近乎平等的角色，而不是为美国打下手。在那以前，此类军演的挑衅性质不可想象。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美之间的海上竞争愈演愈烈，但两国现在都没有兴致展开直接的军事对抗。有关亚洲各国应该如何打交道的明确规则也尚未确立，但看起来中国正准备与日本进行一场持久的对抗。的

确，只要中国仍然坚信自己对战略逻辑的理解，那么它或许就有能力让日本脱离美国的怀抱。然而，从根本上说，日本的文化和历史表明，中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认为，日本的太阳在重新升起。尽管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但就此认为日本一蹶不振恐怕是愚蠢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自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又恢复了活力；日本正在制定一套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它启动的财政和结构改革项目放在几年之前还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地理因素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在日本人的想象中，中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地理因素让日本政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难题：与这个巨大的邻国共处还是对抗。这常常导致日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请允许我举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美国伞兵部队认为他们俘虏了一名日本士兵，后来才发现他是一名朝鲜人。他的名字叫杨景勇（Yang Kyoungjong）。他曾被日本人强征入伍，后来被派往中国东北。在诺门罕战役中他被苏联红军俘虏（这场战役的失败让日本司令部相信不应在1941年对苏联开战）。后来他先是被押往一处劳改营，然后又被征入苏军。1943年初，他在哈尔科夫战役中被德国人俘虏。一年后，身穿德国军服的他被派往诺曼底，在那里他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他后来选择移民美国，一直活到1992年才去世。

就盟军胜利而言，关键不在于纳粹德国选择与大日本帝国结成轴心联盟，而在于诺曼底登陆期间日本人并没有与苏联人作战这样一个事实。这至今仍是一个缺乏战略远见的经典案例。更令人称奇的是，东京是在德军进攻莫斯科受挫之后才决定对美国宣战的。如果等到第二年再作决定就会明智得多，因为那时可以判断德军的进攻是否彻底失败。结果，到1942年1月德日签署以东经70度线划分各自作战范围的军事协议时，所谓全球轴心战略的观念已经烟消云散了。

地理因素影响国家命运，日本缺乏全球思维或许就是一个例子。历史和地理具有共生关系。我们理解精神和心智的最佳方式就是确定它们在自然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固定不变的地理因素并非总能影响变化无常的人为选择因素，但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对日本来说，地理因素似乎让这个国家染上了视野狭隘的顽疾。

日本常常依赖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来支撑自己的地区野心。最早是英国，那是在20世纪初日本与俄国对抗的时候。后来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以此抗衡美国。战后，美国帮助日本崛起成为冷战的胜利者之一，日本也依赖美国抗衡中国。美国的安全保证是日本唯一的真正防御，但日本未来认为美国不再是可靠盟友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毕竟，尽管美国常常划定“红线”，但其他国家跨越红线时华盛顿并不总是采取行动。

尽管戴维·皮林对日本的未来作出了乐观的估计，但这个国家正面临恶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1992年西摩·利普赛特（Seymour Lipset）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来几年，这个世界是对美国例外主义更感兴趣，还是对日本的独一无二更感兴趣？”在利普赛特提问的时代，日本经济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并在随后的20年里萎靡不振。尽管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但威胁日本经济前景的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依然没有消除。日本的核心困境既不是它的债务负担，也不是它持续贬值的货币，而是它失衡的人口状况。这个国家正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出生率不可逆转地下滑，人口不断老化，外来移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40%，而迅速老化的人口正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日本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0%。

日本的外国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也是最低的（1.7%），并且它还在浪费本国的人力资源。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表明，如果日本经济中女性的就业人数提升至与男性相当的水平，那么日本就会新增800万劳动力，国民生产总值

（GDP）会提升15%。然而，当前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仍处于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尽管它也在上升。如果不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度改革，不对文化心态进行调整，那么很多日本女性仍然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离开工作岗位。

尽管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从未摆脱狭隘主义。尽管它是一个大国，但它关注自身远胜于关注外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10万人之多，而日本学生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减少。日本人的托福考试成绩在亚洲倒数第二（比朝鲜还低）。自绪方贞子（Sadako Ogata）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之后，没有任何知名日本政治家担任过国际职务。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几乎找不到日本人的踪影，在日本的公司、大学、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中也几乎没有外国人担任长期职位。

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日趋恶化，中国或许会测试美日关系的深度。尽管日本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团体可能主张与中国对抗，或者在中国采取不可预测的行动时鼓励日本予以军事应对，但日本选择对中国让步的可能性远大于继续挑衅中国的可能性，它希望与中国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

印度和规范之梦

就维护国际体系规范而言，印度可能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盟友。尽管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印度人说英语，但它仍是高等教育、媒体和商业使用的语言。的确，印度号称世界第二大（有人认为是最大）英语国家，“印度英语”——英语与印地语的混合体——如今可谓与英语平起平坐。

美印关系的潜台词在克林顿时代就已写好，当时美国号召达成一

个“民主协约”。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协约有可能替代联合国。这个观念后来在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的“民主联盟”（2008）设想中重现，这是一个包含100多个国家的共同体，其灵感来源于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阶段时签署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然而，这两个想法都无果而终，因为它们都将被中国视为挑衅。

尽管有关美国与印度组建更紧密联盟的建议未能实现，但印度对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性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国防部2012版《国防战略指针》（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认为，“与印度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两国也的确形成了某种密切的伙伴关系。它们定期开展双边军事演习，并在一系列防务问题上进行合作。最近几年，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安全框架的核心。

影响美印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两国都对巴基斯坦的未来感到担忧。在华盛顿看来，巴基斯坦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友。在2005年美国和印度就两国民用核合作达成一致后，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在拉瓦尔品第附近兴建了一处弹道导弹工厂。中国人还帮助巴基斯坦研发了“沙欣-1”导弹。中国人对瓜达尔港也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取得了管理权。瓜达尔港可能成为中国航母战斗群的一处重要基地——如果中国决定（可能是2020年左右）在印度洋部署这样一支力量的话。

然而，美印关系的历史有些复杂。奥巴马曾公开表示，两国“有担任领导者的责任”，他还发声支持印度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这两个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印度曾竭力规避对伊朗的制裁机制，并且像巴西一样奋力抵制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印度对美国的很多倡议以及自由主义议程并不热心，并且像所有“金砖国家”一样，印度对西方的统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印度和美国在有关阿富汗未来的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使人们想象中支撑两

国关系的共同价值观遭到进一步的质疑，人们还会发问，一旦与中国关系恶化，印度将获得多少支持？如果中国继续向中亚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将自己的海军力量直接投放到印度洋和海湾地区，那么中印之间必将爆发冲突。一旦中印之间出现危机，那么美国支持印度的可能性极大，实际上这与冷战时期经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颇为相似。

然而，历史上印度向来缺乏战略头脑，当代印度政治家是否能够制定出符合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的战略叙事仍值得怀疑。不仅如此，地区性对抗固然重要，但印度的内部脆弱性也很严重。在外部世界的游客看来，印度似乎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然而，三分之一的印度人没有电力供应，印度的成人识字率（65%）与马拉维相同。每年17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在幸存下来的儿童中，半数发育不良，因为印度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比厄立特里亚还严重。

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数据，37%的印度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的贫困人口比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加起来还要多。在印度，讲英语的政治阶层与普通选民之间在寿命、预期和行为上的差距比任何其他成熟民主国家都要大。

印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 2013）中写道，“印度社会被各种矛盾撕裂着。”森援引安布罗斯·比耶尔斯（Ambrose Bierce）在《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 1911）中的解释，即耐心是“一种低级的绝望，却伪装成一种美德”。印度正面临自己的存在性危机，或许不愿意——甚至不能——在事态严重时顶住这个邻国的压力。如果再次爆发1962年那样的“战争”，那么中国或许会相当轻松地取胜；那或许足以遏制新德里在印度洋扮演大国角色的野心，还将使印度在推进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时战战兢兢。

中国、大战略和战略自闭症？

简单地说，中美两国不大可能被各自的盟友拖入冲突。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况是它们会因为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而发生冲突，就像过去200年间大部分的大国冲突那样。如果爆发此类冲突，那么美国或许不会拥有它希望的或者需要的盟友。话说回来，正如接下来一章将要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战争或许根本不需要盟友或者联盟。

2011年，一位中国学者暗示，中国没有一个大战略。其实很多西方人也持有这种观点。美国最具启发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甚至认为中国无法战略性地思考。根据他对“战略逻辑”的西方式理解，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漫无目的地最大化自己的实力，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外部的反应。

勒特韦克在《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2002）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战略的逻辑。该书认为，实力的增长会激起外部反应，最终延缓其增长。希望变得无比强大的国家往往只能强盛一时。他在距今更近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远比前作惊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向来没有进行战略性思考的必要，因为它与世界割裂得太久。它患有“战略自闭症”和“战略缺乏综合征”。它孤芳自赏，把一切问题归于美国，殊不知若自己处在美国的位置上也可能会那么做。它还坚持中国中心论，只能带着自己的眼镜看世界（勒特韦克还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中也存在这种问题）。结果，中国对难以管理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简化、概要的描述，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基础。

然而，中国的行为中被勒特韦克批评的那些方面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意志帝国据说就患有“战略自闭症”。德国人常把被外界包围挂在嘴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它基本是自作自受。如果将德国人眼中的包围描述为其他国家遏制反应的被动反应或许更恰当些。实际上，德国把自己包在了大国的一致行动之外。

德国还缺乏社交智慧——德国也患有“战略缺乏综合征”。社交智慧是大战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一国选择正确的敌人和正确的盟友，正如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所说，这可以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国家至少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社交智慧是战略思考的核心部分。要想具有社交智慧，一国必须具有原始同理心：把自己置于另一国处境之中的能力。同理心要求一个人理解其他人的所感和所思，它需要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的“同理心倾听”。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亚当·斯密写道，“一个人需要通过想象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之中，设身处地地体会受害者在‘最细小的情况’中可能遭受的每一丝烦恼，这甚至超出了一个人自身的经历。如果一个人并不希望获得对方的感受，那么这件事就很难办了。”社交智慧还要求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认知能力，包括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运作，以及这个社会的习俗和禁忌。它要求我们破解其密码，洞悉其规律。它使我们有机会创建成功的伙伴关系，从而在危机恶化之前将其化解。

这些特征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行为中付诸阙如。例如，德国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挑衅英国。它对1895年中日战争的结果进行干涉，这源于一种毫无根据的担心——如果它不干涉，英国就会在该地区获得新的利益。在19世纪90年代，刚果、苏丹、摩洛哥甚至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每一个战场都有德国人插手。1894年，英国外交大臣在写给驻柏林大使的信中说：“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恐怕会产生深远影响，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指望用这样的政策获得什么优势呢？”德国人在南非詹姆逊突袭事件（英国人试图撼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政府）上进一步惹怒了英国人——他们祝贺德兰士瓦总统在外部进攻之下维护了国家独立。正是这个举动促使英国大众传媒界第一次公开批评德国。

德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只算是序幕，日后它将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决定打造一支一流的海军，这个决定同时惹怒了英国政府和民

众，其目的何在至今仍未有公论。发展德国海军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但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成本过于高昂。尽管德国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位居世界第二（244美元，而德国为184美元）。尽管德国经济规模更大，但到1914年时这种领先优势十分微弱（差额只有10亿美元）。与此对比的是，即便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但人均收入（377美元）全球最高，而且其经济规模也比排在后面的4个国家（包括德国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大。1912年，德国人不得不中止了海军军备竞赛。然而，根据海军上将穆勒（Admiral Von Muller）的日记，就在叫停军备竞赛的同时，德国海军的首脑们却要求开战。穆勒出席了1912年12月的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是德国人第一次详细讨论与英国进行海上作战。

这是“战略自闭症”的明显案例。心理学家西蒙·巴伦 - 科恩（Simon Baron - Cohen）将自闭症患者描述为“脑盲”患者。他认为，要想对自闭症患者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就应该将他们对外人的感知能力和整体心智技能理解为弱于常人，而非完全缺失。因此，自闭症是一种情感缺陷，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国家就没有情感生活。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感像欲望和需求一样，对社会行为起决定性作用。情感是平衡与失衡、满足与不和的精神表现。它们不一定反映出外部世界真实的和谐或不和，但一定会反映出自身的不和，反映出内心深处的生命状态。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写道，“人们有理由好奇，情感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复杂物种的主要特征，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生命状态。情感不只是装饰品或者感情的附属物。它们能够并且经常地揭示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达马西奥强调：“如果说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能够同时揭示我们的渺小和伟大，那这种东西就是情感。”这种论断在讨论冲突时依然重要。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将情感视为未来战争爆发的最大导火索，它们取代了曾在20世纪引发多次战争的政治信仰。

这方面文献论述较多的一种情感就是怨恨（resentment）或者法语中的“怨恨”（ressentiment）。尽管这个词常常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联系在一起，但在政治学文献中使用这个词的学者们往往对尼采的作品一笔带过。对这个词探讨最透彻的要数理查德·艾拉·休格曼（Richard Ira Sugarman）的《及时行恨——怨恨现象学》（Rancor Against Time：The Phenomenology of Ressentiment，1979）。这一概念被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用于描述期望落空，这是伸张正义的核心动力之一。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特别强调权力集中和权力缺失，尽管他在处理这个词的时候更喜欢用英语的“怨恨”。然而，法语“怨恨”的含义覆盖了从“尖刻”、“不快”到“愤恨”的各种语义，有时是这三个词的组合。

进入20世纪后，德国开始追求尊重、认可和权力均等——全都是具有情感和精神意义的词语。这三种愿望表明，德国希望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三种愿望适得其反，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危险性。当一个社会缺乏自信时，它不大可能对其他社会的成就表示尊重，反而会转向孤僻。过于关注自己往往会使自我过于膨胀，同时过于敏感。当一个国家变得自我封闭时，它就会认为自身才是真正重要的，外界的认可几乎毫无意义。正如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写的，当国家陷入不安全感和自我认可的循环之中时，它们常常会抱着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将此前的成就挥霍掉。德意志帝国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它总是在担心无法参与公平的竞争，因为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所以它必须坚持己见。它可以要求获得尊重，但它没有能力赢得尊重。德国决策者担心，德国如果做不到坚持己见，就会面临帝国首相所说的“挥刀自宫”的后果。

但怨恨也并非没有心理上的回报。对那些认为自己分到了一手烂牌的人来说，怨恨能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它还

能使人忽略自身行为的后果。的确如此，正如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所写的，当一个国家像1914年以前的德国那样无法实现梦想时，对于后果（例如一旦战败可能遭受的破坏或者毁灭）的思考不大可能阻止它抑制自己的冲动。正如神经科学家如今宣称的，人类处理要求获得尊重之类的“神圣价值”的大脑区域正是专门负责按规则行事的区域，而不是打功利主义算盘的区域。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也染有此疾。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局部大国”，这个国家仍然感到不够安全、困惑、失落、愤怒、不满足、自私、暴躁并且内心深处倍感孤独。尽管他没有提及“怨恨”这个词，但他似乎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概念。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大国，既无友邦，也无盟国”。尽管中国频繁表达它反对什么，但它在表达它渴望什么或者代表什么的时候却谦卑得多。沈大伟还指出了当代中国历史和德意志帝国历史的其他相似之处。例如，在2009年10月中国庆祝国庆节期间，他观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包括上万名迈着正步的士兵和搭载洲际弹道导弹的重型卡车，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强大，但也凸显了它的焦虑。一边是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另一边是深深的不安全感，两者的混合揭示了中国矛盾的本性。

勒特韦克对中国崛起的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他坚信，中国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难以管理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简化、概要的描述。它认为其他国家都暗藏动机，但它如果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也可能会有这些所谓的“动机”。它自受到伤害，于是更加固执己见。但这真的是文化（或者说是心态）或者战略DNA的产物吗？或者它也很可能是历史的产物？毕竟中国现在才开始面对自身权力的本质，这些挑战考验的正是社会的社交智慧。

这些挑战中的第一项就是评估自己的实力。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人类发展指

数”（联合国对各国生活水平的排名）分别排在世界第120位和第121位。它的人均生活水平处于厄瓜多尔和牙买加之间。按照可供比较的数字，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而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近期追赶上美国的前景十分渺茫。日本在1990年也达到了这个阶段，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陷入一场长达20年的衰退（然而，按照可供比较的数字，当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0%）。在《蹒跚的巨人》（Stumbling Giant, 2013）一书中，蒂莫西·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将人口问题视为中国希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富强的最大单一障碍。中国甚至在2011年首次遭受劳动力短缺之苦。到2030年，年长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的数量比将达到4比3。比尔德森还认为，中国或许最终会栽在人口结构上。中美两国人口比例可能将从当前的4比1降至本世纪末的1.9比1。

应该记住的是当年人们对德国即将崛起也曾达成普遍共识。直到1945年，德国一直在科学领域领先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发动机、第一枚巡航导弹（V1）、第一枚弹道导弹（V2）以及第一架洲际轰炸机。它还非常接近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德国一些最优秀的犹太人科学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爆发，那么德国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德国人对于他们的未来过于悲观，因而选择争取主动权，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中国面临的第二项挑战是如何将它的实力转化成影响力。中国相对缺乏文化实力。尽管它在国外开设了大约400所孔子学院，但几乎没有外国人梦想成为中国人，或者永久性地在中国工作。与德意志帝国的“英格兰内核”不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内核”。法国《世界报》主编在“9·11”事件后写道，“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尽管小布什政府将蠢事做尽，但这一点并没有真正改变。美国代表着所有仍然需要它保护，或者说仍然在其保护罩内生存的国家。作家J·M·库切（J. M. Coetzee）写道，“由于美国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因此它

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也是我的国家，是这个地球上其他任何人的国家。”

第三项挑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中国极难与他国分享权力，因为它此前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它缺乏与盟国密切合作的历史经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一些建立多边机制的经历。它从未召集或者领导一个国际联盟。不仅如此，它（在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的权力社交网络尽管一直在扩大，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尽管中国在逐步构建这些网络，但与美国和更广义的西方“想象的共同体”相比，这些网络还很“单薄”。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明昊的分析相当令人信服。中国距离让其他国家相信自己的“诚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将不得不学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立场，抑制他所说的“帝国式冲动”。但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对未来的焦虑的话，那么它们也需要展现出足够的社交智慧——尤其是同理心倾听。

不幸的是，中国所面对的大国拒绝放弃对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处境的重要方面鲜有换位思考。前文述及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轮换部署一支“小规模”海军陆战队，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是怎样呢？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轮换部署一支“小规模”部队，并且在美国周边保留军事基地、在拉丁美洲组建联盟，那么美国会作何感受？如果中国宣布主导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要求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么美国又会作何感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绝对主角，美国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它很难想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面对外界的威胁，或者至少是包围会有何种感受。面对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本就无法换位思考，可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竟也丝毫不放在心上。

大战略是社交智慧的一种新质⁵，美国——至少在当前——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以及国际政治乱局中穿梭自如，这一点远胜中国。有时它可能愚钝（“丑陋的美国人”）或者天真（“沉静美国人”），有时甚至粗野无礼，但它能迅速调整。这部分是因为它不得不满足如此多盟友的需求并且管理如此多的联盟——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话说，联盟就是手铐，它们不让你的手臂自由挥舞。联盟的社交质量就像个人关系的情感质量一样，取决于我们在与盟友或友邦互动方面投入多少时间。网络建设要求各方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确保互惠（抵制搭便车的行为）。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动用操纵、诱惑甚至含蓄的威胁等各种手段，这样才能确保各方坚守承诺，自己不被自己操纵（那将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简而言之，这里需要的是战略头脑，而那些历史上参与过真正的同盟战争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下半叶的苏联不能计入此列）通常在设计战略时更有头脑。

中国军队和《孙子兵法》

中国人对战略的论述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它仍频繁地引用孙子。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写道：

除中国外，你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略方针发起一项全国行动，并且他还深信其同僚能够领悟他引用典故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不断的文明，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其古老的历史以及经典的战略方针和治国之道如此地密不可分。

《孙子兵法》以及《武经七书》⁶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份认

同至关重要。解放军的各种手册中常常将4000年前的战争作为战略思考的教学案例。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战略文化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优于西方，而尊重这些凝聚古代中国战略智慧的作品正是持有这种信念的基础。然而，任何曾经尝试阅读《孙子兵法》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它不但多用警句，而且深奥晦涩。它的理解难度堪比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格言。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这本书受到了孙子之前的周朝军事思想的影响，而孙子相信他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不仅如此，为了减轻文本的晦涩程度，译书之人常常加入了对作者意图的解读，而这可能会产生误导。译者过于渴望使孙子的观念和论述变得更易于当代西方读者理解，这导致读者常常无法在准确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理解孙子的观点。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能面临被忽视的风险。第一个原则是战争往往会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启动非理性的力量。第二个原则是战争绝对有必要从属于政治。如果这两点继续被忽视，那么中国绝对有高估自身力量的风险。

关于第一个原则，孙子的思想与克劳塞维茨有些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三位一体”：非理性力量，例如暴力的情感（包括仇恨）；不确定的力量，例如摩擦和“战争之雾”；以及理性，即战争从属于理智（被用作政策工具）。其中两个元素，即情感和理性，属于人类心智的内部力量；偶然性和可能性则属于外部力量。情感和理智都有关人类意图。偶然性和可能性则代表具体的事实——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上，但后者常常让这些意图无法实现。换句话说，战争是一套以人类维度主导的复杂体系。正是这个维度有一种摆脱政治控制的倾向。

孙子的观点与之大体相同。的确，中国的经典兵书对战争如何迅速启动非理性力量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与西方战略思想家相比，它们对理性能够控制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怀疑程度也要大得多。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摆脱政治控制的风险。

2012年中国民众反日游行的规模程度让中国的领导层都感到惊讶。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经济学人》甚至开始猜测两国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

中国战争思想的第二个主要话题是国家有必要控制军队。问题在于，军方的很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文官政府则谨慎得多，不愿对历史发展进行猜测。有些官员认为，美国会反弹甚至复苏；其他人预计中国的增长会下滑，两国的差距会扩大，而不是缩小。总之，他们希望控制美国，而不是与美国对峙。

中国的国防开支已经并且仍在大幅增加。2013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宣布将国防开支增加数十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0%）。这延续了自1989年以来国防开支维持两位数名义增长率的趋势。唯一的例外发生在2010年，那很可能是由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资金被用于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军事大发展的起步水平较低，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其国防开支大幅增长，以至于解放军获得的资金已经仅次于美国军队（但与美国军费的差距高达数千亿美元）。

中国认为自己只打防御性战争，但西方人可能并不这样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认为，对于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海军将付出多大代价，或者其他大国可能作何反应，中国军方的著述显然缺乏思考。民族主义言论常常对中国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作出极端化，甚至是非理性的评估，并且幻想着中国有能力通过开发自己的军事资源来应对美国的“威胁”。

结 论

本章之前曾提及鲁梅尔特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大战略都既需要一

个连贯的设计，又需要颇有眼光地重构竞争态势。就第一点而言，中国人对战略逻辑的理解有很好的连贯性，只不过他们尚未制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关于第二点，中国的军方和政治家有可能在执行不同的政策。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策划战争而言，美国军方也不是完全受政治操控。美国军队一直是一个“自变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随其规模变化而变化的应变量——即便未来美军的规模会缩小。的确如此，回顾近期历史，美军似乎多次下定决心打一场政治家们并不想要的战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1961年来到国防部之后发现，这个最高军事指挥部固执己见、桀骜不驯。在一年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几位参谋长几乎独断专行，险些酿成大祸。今天的问题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军事行动黯然落幕之后，很多军方领导人下定决心要与中国开战作准备，希望扭转，或者至少延缓即将实施的国防开支削减计划。

尽管两国政界领导层都谈论和平与合作，但两国的国防部门想得更多的似乎是战争。值得关注的焦点是“空海一体”战略，美国的民选官员——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并没有对这一战略进行彻底的评估。

当前有关中美冲突的思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的想法高度相似。在大国冲突问题上的普遍懈怠令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军队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的媒体常常发表一些号召告别“浪漫的和平主义”的论调，认为对中美战争的前景和可能性进行现实主义讨论已无必要。因此，明智的做法是追问这场战争将采取何种形式，一旦战争爆发，最终获胜的是美国还是中国。

1 实际上，和平协议在1814年就已经签署，而美国人在最后一

战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则开启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政治生涯。——作者注

2 事实上，《此刻联合》一书建议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组建一个共同政府，并非只包括英美两国。——译注

3 此处作者引用资料有误。准确说法是，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到2020年，美军将在太平洋部署60%的军舰，而之前这一比例为50%。——译注

4 此处系作者笔误。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原文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可持续发展”，而非suitable development（适宜的发展）。——译注

5 新质（emergent property），生态学用语，概指事物突然涌现出来的性质。——编注

6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大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编注

第4章 战争及其多变的逻辑

《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预测任何战争的可能性通常都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战争要么爆发，要么不爆发，一旦预测失误，那些末日预言家必感难堪。在19世纪早期，知识分子阶层基本持乐观态度。尽管英国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有一定的战争恐慌，但这些恐慌主要体现在畅销小说中。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大国战争的终结就像宗教和迷信的终结一样不可避免。《经济学人》甚至总结说，1904年英法协约“体现出的趋势正缓慢但确定无疑地消除各文明社会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乐观的氛围已经消失，空气中弥漫着悲观的味道。几乎从最开始就有人预见了纳粹构成的威胁。H·G·韦尔斯在他的小说《未来互联网》（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1933）中不仅预测将再次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甚至还指明了战争爆发的日期（他预测的是1940年，与现实差了一年），并且他确实成功地预

测了最可能成为导火索的地区：但泽走廊。30多年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ison Salisbury）出版了《即将爆发的中苏战争》（The Coming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1969）。他在书中预言，中苏即将发生碰撞，双方很可能已无法回头。问题不是是否会开战，而是何时开战。他并非完全判断错误。当时两国距离开战仅有一步之遥（据说苏联人甚至考虑对他们的昔日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多年以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 Munro）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1997）一书中也对未来中美交战作了设想。

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作者在预测未来时就处于一种有利位置——他们暂时还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举这些例子的目的不是嘲笑未来学家或未来主义者，而是告诉读者，他们的最大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战争自身多变的本性。

乍一看，H·G·韦尔斯似乎是个意外。在1902年，他预见到制空权的极端重要性，并想象了未来空中战场下方平民的命运。“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时时仰望，心中充满失落和不安。”他还设想人类会发明原子弹，还有“陆地机器”（即坦克）甚至潜射导弹（或者“远程航空鱼雷”）。然而，尽管他的预测令人印象深刻，某些部分也大体准确，但在其他方面，这些预测相当狭隘。在《未来互联网》中，韦尔斯笔下的太平洋战争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的放大版。他把坦克想象为移动火炮，相互投掷炮弹，直至一方获胜。甚至他所想象的原子弹也是从双翼飞机上扔下去的，而不是由远程轰炸机来发射。正如他后来承认的，他的小说《空中战争》中对未来的设想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已，是“一部荒诞的闹剧”。

同样的缺陷也能在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他的妻子梅雷迪思·勒巴德（Meredith Lebard）于1990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中找到。两位作者预测，美日两国将在20年内发生冲突，曾在1941年引发战争的地缘政治动力很快又会发挥作用。这种预测现在

看来相当不合时宜。当然，它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引发的普遍恐惧，这在当时的大量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就包括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的惊悚小说《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1992）。讽刺的是，该书出版时，日本已陷入衰退。该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抓住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引发了有关美国衰退的又一场全国大讨论。这些作者再一次让读者相信，未来的海战仍将采用大型舰队在太平洋作战的形式，就像美军与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交战那样。

高枕无忧的心态让西方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毫无准备，而认为大国战争如今已经过时的观念正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例证。即便这种观念可以被视为正确，但它仍将面临冲击。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不解决战争问题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战争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过去曾发生变化，而今仍在继续变化。正如我在其他作品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战争穷尽其进化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终结。

战争不断变化的特征

中国是否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构成军事威胁？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但这个答案或许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展望未来》（*Futurevision*，2012）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战争一词让人误以为它是具体的，但一切具体事物只能用比喻来表述。就战争而言，克劳塞维茨简要描述了三个比喻：意志的冲突、决斗和摔跤比赛。决斗不一定导致流血（只要维护尊严即可，重要的是要为外界所知），摔跤通常根本就不会流血。即便是意志的冲突也可以采用非暴力形式。然

而，在克劳塞维茨及其信徒看来，流血才是战争的核心。

我们所界定的“正确”或“错误”并非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我们对事物的定义。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1808年之后给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带来麻烦的西班牙起义。当时的两位杰出军事思想家——亨利·若米尼（Antoine - Henri Jomini）和克劳塞维茨——在西班牙起义是否属于战争一事上存在分歧。若米尼认为这些起义者——历史上最早的“游击队员”[英语中的“游击战”（guerrilla）一词即源于此次斗争]——参与的是一场战争，但克劳塞维茨不这样认为。然而，萨拉戈萨的确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惨烈的巷战。起义者的战术只是造成这种分歧的部分原因。二人的分歧还涉及宗教是否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在这起激烈的冲突中，启蒙运动与之前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迎面相撞。拿破仑曾宣称，“修士越多的国家越容易征服”，但历史学家今天在回顾西班牙的这场斗争时，倾向于将其视为1648年以来的第一场宗教战争。历史学家威廉·内皮尔（William Napier）将西班牙人不愿屈服的原因归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神父让他们相信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受到上帝的诅咒，“圣灵流出、奇迹、预言、圣物分配以及任命圣徒指挥军队等，这一切让爱国群众狂热不已”。在当代，正是宗教为城市中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如此多的人手，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徒或者犹太人，都是如此。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都是从有信仰的人群中招募而来的。

换言之，人们倾向于参考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来理解不同的现象，但只要是定义就存在争议。说三角形内角之和是180度只有在欧几里得体系内才是正确的（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就不是）。说苹果是被子植物只有以某些植物学分类规则为基础才是正确的。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战争一定是暴力的（动能的），尽管人们常常强调这一点，但它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笃信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称，一个定义只有在被证明有用时才是正确的，而只有当它正确时它才有用

（这里所说的正确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这是正确的唯一定义）。战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某种特定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对上述西班牙起义解读不一。在同一个文化内尚且常常会出现意见分歧，当不同文化对话时这些分歧只会更大。这可以解释西方读者为什么常常对《孙子兵法》感到困惑。孙子对战争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它反映出道教对世界的领悟。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强调未雨绸缪、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势”的理解——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现实。即便西方和中国对战争的理解无法用同一种尺度来衡量，就像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一样（只有在托勒密体系中，本轮和均轮¹的概念才具有准确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无法比较。事实上，正是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理解托勒密通过本轮和均轮这两种概念来解释的宇宙天象。正是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就是哥白尼希望用另一套概念解释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孙子兵法》成书两千年后仍被人阅读，以及为什么孙子的思想在今天仍能引发共鸣（尤其是在美国军人中，尽管这颇有讽刺意味）。这些思想在未来很可能会引发更多共鸣，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争阶段——一个“凉战”和“密码战”的时代，战争手段是非动能的，包括胁迫和用最小代价将己方意志强加给对方。

即将与中国在海上开战？

历史是杂乱无章的：连续性和严重的不连续性并存。尽管战争是多变的，但它总能从历史中汲取灵感。旧的现实并不总是被新的现实取代。1944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质疑世界是否真的在缩小。他批评1914年之前出版的那些进步主义书籍滥用一些套话，例如“消灭距离”和“边界的消失”。今天的世界正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尽管人们大谈特谈全球化，但地理仍然极其重要。要说明这一点，可

以参考一位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作品，这位思想家就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

斯派克曼的作品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不再被读者重视。今天之所以还有人阅读他的作品，通常是因为曾经有人读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遏制政策的提出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斯派克曼的写作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时很担心美国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会重拾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奉行的孤立主义的下策。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中国最终将成为亚洲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美国可能被迫承担防卫日本的责任。

斯派克曼主张一国之地理乃其制定政策之本，而非制定政策之因。他认为，地理会影响行为，而不是决定行为。地理给一国带来的机遇和限制对于政策和战略选择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点一直被当代地缘政治思想家科林·格雷（Colin Gray）反复提及。格雷断言，地理决定了各国本身以及它们所争夺的利益，并且各国永远会根据地理决定的条件来衡量自己的相对安全程度。地理也决定了政治话语，它甚至会影响身份认同。在地理的主导之下，几乎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国国土大小和资源禀赋对其政治凝聚力具有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这在其漫长历史中位居决定性要素之列。

斯派克曼的思想对于理解中美两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战略现实依然有重大意义。美国是海洋大国，中国是陆地大国。两国的最大差异在于它们对空间的理解不同：

海洋大国在不同的落脚点之间来去自如，以此占领大片空间。它尽可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存的政治关系。通常在自己的事实统治被默认许久之后，它才会确立自己的合法控制。陆地大国的扩张则是节奏缓慢、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地理特征迫使它一步一步地确定自己的控制，并维持部队的机动性。因此，陆地大国思考的是围绕一个核

心控制点的连续扩张的平面，而海洋大国则思考通过多个点及其连线控制大片区域。

当前亚太地区的战略现实与斯派克曼的时代相差无几。中国人掌控了陆地区域。在中俄边界，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除非俄罗斯能够使其武装力量现代化，否则中国人的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即便俄罗斯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它在远东的势力可能依旧薄弱。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² 已经是一座双语城市，懂汉语和懂俄语一样重要。中国对西伯利亚的渗透同样迅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在几乎掌控了整个东亚大陆。

中国有可能决定向内陆扩大战略纵深，而不是在海上与美国对峙。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并非西方独有，就像并非只有西方国家关注大战略一样。中国也在打造自己的地缘政治叙事。面对美国的支点计划，著名美国问题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王缉思提出“西进”——加强和深化中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影响。他敦促中国不忘自己陆权大国的根基，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向西发展破除美国的战略优势。“西进”不仅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这项国家战略的目的是推动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将对过于关注东亚的传统（这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的遗产）进行再“平衡”。这将涉及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中亚从闭塞内陆改造成四通八达之地，从而使该地区（以及中国）能够进入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市场和港口。

王缉思认为，在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的瓶颈地区，海军力量对于保卫战略交通线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地区空间过窄、海水过浅，海军无用武之地并且很容易被水雷和反舰武器限制。他更倾向于利用中国自身的战略纵深，也就是内陆交通线——通往中亚和东南亚的陆上通道。一个世纪前，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欧亚地区是海洋大国力所不及之地，但铁路却可以进入这一地区，而铁路是一国权力的延伸。他认为铁路为具“有深远影响而又有

所局限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这使欧亚地区成为“历史的地理枢纽”。

一些美国专家也大致认同这一观点。2013年，巴里·波森（Barry Posen）提出，美国已经无力承担没有终点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始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决定在从朝鲜半岛到中美洲的各个地区对抗共产主义。人们认定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推动了这一战略，但实际上凯南本人对这一战略是心有疑虑的。波森希望美国将一个没有必要、没有效率、扩张性的霸权主义战略替换成一个专注于阻止中国打破当前全球力量对比的战略。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欧亚地区站稳脚跟，那里是麦金德眼中的世界地缘政治轴心，因为任何大国只要掌控了这一地区，就掌控了世界上三个最发达且最具经济生产力的地区中的两个。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麦金德甚至预见中国最终将从这个全球大棋局上挤掉唯一的竞争者——俄罗斯。

战略纵深是一种物质实体。但即便稍稍翻阅一下麦金德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感到欧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仅是由地理决定的，还是由那些可能利用这一地区的大国的生命力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在麦金德看来，铁路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而在当代，铁路更是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中国才下了很大力气在中亚和东南亚修建新的铁路网并扩建原有的铁路网。

战略纵深还是一种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会创造出物质实体（延长铁路网和能源管道），这又对我们的选择起到反馈作用。因此，战略纵深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现实。大国政治的永恒因素之一就是想象决定存在。如果竞争（借用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著名类比）是意志的冲突，那么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迫使对方按照己方设定的条件来谈判。乔治·凯南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才敦促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缔结同盟，这样美国在与苏联谈判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冷战强调的不是在实战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是确保这种优势对手构成潜在的威胁。

按照中国的看法，欧亚牌为其提供了打破美国战略优势的机会，因为中国可以经亚洲中部和西北部的陆上通道抵达海湾地区和印度洋，从而彻底破除或者严重削弱美国作为海上霸主的优势地位。美国的优势体现在它能够控制世界主要海上商道，以霸主之尊维护海洋或者“全球公域”的秩序。美国海军实际上控制了连接东亚和中东的重要航线，这部分原因在于它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达成了海军准入协议。

借用另一位古典地缘政治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的话：

最能看出海洋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方法就是将其视为一种交通要道；再准确些，就是将其视为一片宽广的公域，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穿过这片公域，但其中一些路线走的人最多，这说明某些原因让人们选择这些路线而不是其他路线。

美国仍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咽喉要道（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最有条件将这些要道封锁）。就当前而言，美国还最有实力维护“现行交通规则”。像当年的英国海军一样，航行自由一直都是美国海军获得的一项重要授权。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时会引用艾尔·克劳（Sir Eyre Crowe）在1907年写下的著名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解释了为何第三方（甚至是英国的对手）无论多么不情愿，最后都会接受英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克劳大胆地提出，这些国家或许不喜欢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英国是任何潜在的海上霸主中最不令人反感的一个。因此，英国皇家海军作为国际警察维护着海上航道的秩序。就美国而言，这正是它的最大优势：需求政治而不是供给政治。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崛起大国常常试图挑战现有大国。中国人正在加强自己的海军建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人在

建造潜艇方面全球领先，几乎平均每年建造三艘潜艇。尽管这种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应该以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审视它，那就是中国正在从一个以平台为中心的海军——几乎全部依靠单独作战的战舰和仅具备基础无线电和数据通信协调能力的战机——向一个协调性强、具备离岸兵力投放能力的海军转变。中国甚至可能怀有更宏伟、更长期的雄心：不仅仅是让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处境艰难，最终还要迫使它退回珍珠港，而那里正是美国成为今天这个超级大国的起点。

空海一体战

美国与中国如果进行长期对抗将采取何种形式？美国海军拥有一个名为“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念。尽管过去这一战略常常被人提及，但现在军方非常谨慎，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语。它显然绝非一个作战理念那么简单，一些专家将其视为一项战术方案，而另一些专家则直言，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与美国对抗。

2011年11月，五角大楼在一篇充满专业术语的简报中宣布成立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实际上该办公室3个月前就成立了），但这篇简报没有对这一概念本身作出多少解释。然而，我们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足以得出一些结论。一旦中国在西太平洋向美国发出挑战，美国海军将努力承受住第一轮攻击，随后将对中国的战斗网络发起反击，压制中方远程打击系统，夺回主动权。美国海军因此有能力在一个拒止环境中重获战略霸权。

美国将需要日本海军的帮助——那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目的是控制中国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美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是否能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尤其是隐身技术，以及中国的网络战能力是否能继续提高，直到足以对美国的指挥控制系统造成破坏。

在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一书中，两位作者³提出，中国直接与美国对抗（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做法是化解美国的优势：阻止美国将航空母舰部署到台湾海峡，并且通过破坏其卫星能力让美军失明。这种更加间接的方式似乎正是中国当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上投入巨大，使用潜艇和路基导弹，包括东风 - 21导弹（该导弹目前射程只有800海里，但可以升级至1500海里）。美国方面则投入资金提升应对能力，希望其海军舰艇能够击落来袭导弹，最好是阻止这些导弹锁定目标。美国还计划使用更高级的潜艇对付中国部署在近海的潜艇，从而保护美国的海面舰队。中国人也将面临自己的问题，因为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所需要的很多侦察和武器平台都是由空军或第二炮兵部队部署的，并非海军所控制。这三个军种可能拥有不同的组织体系，这可能是一种优势，也可能是一种障碍，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军种之间的协调程度。

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宣称，空海一体战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各军种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本身”。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航空母舰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成为东风 - 21导弹的主要目标（也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目标，因为美国海军60%的兵力都被编入航母部队）。中程弹道导弹尽管不如反潜弹道导弹技术先进，但也可以将关岛的美国海军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导弹技术（相对于造船成本来说）是廉价的，而且中国熟练掌握这一技术。此外，美国也很难摧毁路基导弹发射场。然而，要打击海上移动目标也没那么容易，远程侦察系统依靠超视距雷达系统，后者又依赖大量侦察卫星，而中国的此类卫星数量有限。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写道，“美国很可能希望通过网络战或其他非动能手段削弱中国的侦察能力，而不必打击其路基系统。为了降低本方军舰的目标特征，美国很可能会建造更小的平台，同时尝试通过部署潜水无人机或无人水下航行器来消除中国潜艇构成的威胁。”

与19世纪英国皇家海军非常相似的是，美国海军也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哪个对手可以在海上对其构成明显威胁。但如今发生了变化，中国海军尽管远不如美国海军强大，但中国具有战略纵深的关键优势。为了对抗这一优势，美国海军正在部署新的濒海战斗舰，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务必取得在领海上的本地优势。

然而，如果更加仔细地审视一下空海一体战理念的细节，就会发现其中的危险——美国将不得不袭击中国的雷达站和路基导弹发射场，而这可能导致战争升级。远程隐身轰炸机和第五代战斗机以及巡航导弹将不得不瞄准中国的指挥中心、地对空导弹群和反舰弹道导弹发射场。网络攻击很可能会扩展到其他路基系统。的确，网络空间与有形物质（而不是虚拟）环境之间的互联性日益加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联网”或者“网络物理基础设施”——这意味着这两个领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消失。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所有的陆基弹道导弹都由第二炮兵部队控制，因此只要打击东风-21导弹发射器就必然打击第二炮兵部队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还负责执行中国的核威慑。因此，这种打击与先发制人的打击也就无法区分，被解读为后者也几乎是必然的事。

很多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以外的军事专家担心，美军后勤方面的虚弱意味着必须选择首先发动攻击的策略，如果美国等到遭受攻击后再反击，那么这场冲突迟早会升级到脱离政治控制的程度。空海一体战将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终在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在美国看来，这种战略的理想程度达不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想型”。这种前景在计算机模拟中看似不错，但如果考虑政治现实的话就不是这样了。美国的盟友或许只有在战火燃烧到本土时才愿意入伙。一旦朝鲜进攻韩国，或者如果解放军攻打日本的指挥和控制中心，那么其他盟友是否愿意参与进来就值得怀疑。

即便是美国最早的地区盟友澳大利亚或许都不愿意卷入其中。各国都渴望留有回旋余地（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盟国将大国卷入战争，

而盟国有时会改变它们的效忠对象)。澳大利亚一些顶尖的防务专家高度怀疑参与这种不大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是否明智。如果美国从澳大利亚的基地发动空袭,甚至澳大利亚海军参与在马六甲、龙目岛或者巽他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封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深陷一场可能以动用核武器收场的冲突(例如对关岛发动战术核打击)。正是因为察觉到关岛容易遭受攻击,所以美国正在将塞班岛改造为一个备用的军事基地。美国空军不仅计划定期向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廷德尔派遣军机,还计划向新加坡的樟宜东空军基地、泰国的呵叻(Korat)和印度的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派遣军机。如果这些盟友感到这一战略对它们构成威胁,那么这些设施十年之后还能为美军所用吗?

空海一体战是一种作战理念。一切没有明确战略的作战理念都是灾难性的,就像德军的闪电战一样,在1940年对付法国时相当有效,但在第二年对付苏联时完全失效,只带来了一系列“失去的胜利”(战术上的成功没有带来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果)。一个替代空海一体战的选择将是离岸控制,这是由T·X·黑姆斯(T. X. Hammes)提出的经典的封锁战略,它是指将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结合起来,通过租用商业平台使美国海军及其盟国能够拦截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超级油轮和超巴拿马型船,或者迫使这些船只绕道而行。在第一岛链以内将设定海上禁区,美国海军可以拦截、没收和出售可疑船只。

如你所料,黑姆斯对离岸控制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该战略不需要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打击,也不需要第一岛链以外采取海上行动。中国经济仍然能够运转,但它很快就会失去全球竞争力,因为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开始将目光投向别处。美国对其盟国提出的要求要比空海一体战中提出的要求少得多,因为尽管一些盟国的海军或许会参与封锁行动,但离岸控制战略并不需要在盟国(澳大利亚除外)部署军队,中国也就无法威慑这些国家。中国对美军基地(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的基地)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可能把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冲突并使它们站在美国一边。中国当然可以通过对日本实行反封锁、袭击驶往

日本的护航船队来扩大战争，但由此导致的战事升级是中国无法应对的。离岸控制战略还要求通过网络空间发动非常规打击（网络空间对于该战略的有效应用必不可少）。

离岸控制战略可能还具备一个优点，一个黑姆斯并未提及的优点。一旦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将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市场。如果美国准备购买商品并且能够生产中国所提供的商品的替代品，那么美国在（规模显然大不如前的）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增加，假如这场对抗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收场，那么美国很可能保持住这部分增加的比重。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论证这项建议优于空海一体战，但如果未来海上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美国倾斜，那么这两项战略孰优孰劣就会发生变化。这需要采用美国军事专家们偏爱的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型：对成本、收益和升级的后果进行功利主义的计算。这个例子——回到了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显示了一个战略能够在完全合理性的同时又是完全不合理的。

黑姆斯假定封锁可能持续数月而不会对国际经济或者美国的法律和道德权威造成严重破坏。他的结论是，与直接攻击中国大陆或者其关键基础设施相比，封锁（这是称霸海洋300年来西方国家传统上优先考虑的战略）会让北京产生的怒火小一些。不幸的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政治家们让步的空间就越小。尽管封锁战略设计巧妙，但它显然也有很多缺点。未来几年，美国海军很可能会讨论与之相似的战略和作战理念。在所有军种中，美国海军在抵制即将到来的军费削减时毫无退路。它将面对中国的主要优势：战略纵深。然而，在另外两个领域不存在战略纵深的问题：太空和网络空间，正是在这两个领域中中美战争最有可能爆发。

从凉战到密码战：大国网络战的前景

理查德·克拉克 (Richard Clarke) 的《网络战争》(Cyber War, 2010) 描绘了中国对美国本土发动网络袭击的情节，中国启动了预先安装在美国电网中的“逻辑炸弹”。金融系统崩溃；美国上空的飞机无法降落；火车脱轨；城市陷入黑暗；化工厂排放毒气；核电站面临堆芯熔毁的严重危险。在具有同样末日色彩的未来展望中，《黑市》的作者写道，“中国若发动袭击可能会引发费城和休斯敦的大型炼油厂爆炸，纽约州和特拉华州的化工厂将释放大量致命的氯化物气体，弗吉尼亚州的空中运输系统也将彻底崩溃。因为世界如此依赖网络空间，所以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恐惧。”这种前景确实相当可怕，因为网络袭击不但会影响到经济，而且会很快跨越“基础结构的边界”。它甚至会破坏政府的结构并导致社会崩溃。

这些前景让人似曾相识，由此可见恐惧对我们的长期影响。具体说来，这些恐惧可以追溯至冷战结束。1991年，安全专家温·斯瓦图 (Winn Schwartau) 发表了《终端受损》(Terminal Compromise, 1991)，这部小说预言会发生“电子珍珠港事件”，那将是真正的人类灭亡：

其目标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信息.....这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关键.....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命脉.....这个全球也是各国的战略优势正遭到袭击.....如果没有信息，没有获取信息的机制，一个真正的电子图书馆，那么美国就将倒退30年。

这部小说深入挖掘了当时一种更为普遍的忧虑：美国即将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超越。小说的反派角色是一名日本公民，他希望对美国发动袭击，为他死在广岛的双亲复仇，同时减轻他作为核爆炸幸存者的屈辱感。他说：“我们或许在珍珠港事件后失败了，但我们通过晶体管收音机和录像机取得了胜利。战争还没有结束。”在作者于“9·11”事件后再版的小说《珍珠港.com》(Pearl Harbor Dot

Com, 2002) 中, 这场袭击代表着“对美国发动的……终极网络战争”。两部小说都提醒美国人, 他们遭到的最具毁灭性的袭击并不来自中东, 而是来自东亚, 类似的袭击或许有一天还会从那里发动。唯一不同的是, 最可能充当袭击者的不再是日本, 而是中国。

1997年, 一场代号为“合法接球员”的美国网络安全演习模拟了网络战争的情景, 这是美国最早开展的此类演习之一。演习中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 而是朝鲜。在演习中, 朝鲜侵入了美国太平洋战区的作战系统。在两周时间内, 美国安全局扮演的“红军”不仅成功袭击了美军前线指挥和控制系统, 还即将袭击美国本土的电网。来自政府的消息人士用“不寒而栗”一词形容演习的结果。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说, 三天之后五角大楼才有人意识到计算机系统遭到了袭击。尽管人们大多认为这次演习及时地敲响了警钟, 但批评者抱怨因为演习属于保密性质, 公众无法讨论朝鲜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具备这些能力, 甚至是否有能力掌握它们。没过多久美国人就发现, 的确有人具备这些能力: 在仅仅一年之后的一次袭击中(也就是那起被美国政府称为“月光之谜”的袭击), 五角大楼、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其他部门的机密情报被窃取。直到2000年, 政府官员才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现了这个漏洞。也就是说, 黑客活动持续两年之久竟无人察觉。

一份由克里斯托弗·布朗克(Christopher Bronk)撰写的报告也讨论了这一前景。在该报告所设想的未来, 一个强大的中国试图将新加坡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向南海上的一艘新加坡导弹护卫舰发动袭击之前, 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袭击, 目的是削弱和扰乱美国及其盟国的通信能力。中国的网络作战部队进入了美国军方、政府和企业的网络。当针对新加坡的常规打击开始时, 美国陆军发现他们的通信能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关键的军方网络和服务器遭到了毁灭性的拒绝服务攻击, 严重限制了美国陆军调动常规作战部队的努力。55天后, 这场冲突以中美两国海军对峙收场, 战争的风险在最后一刻才被消除。新加坡保住了独立, 但仅此而已。整个过程印证了我昔日

的同事迈克尔·莱费尔（Michael Leifer）所说的新加坡的“例外主义”——不是指它的经济成就（的确成绩斐然），而是指它独一无二的“脆弱性”。

当然，在这次冲突中，没有一方“获胜”，战事也没有升级。双方都退后一步，继续以其他方式展开竞争。但在布朗克的假想中有一些值得担忧的现象，它们表明战争本身可能在不断演化。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开始很久以后其中一方才认识到战争爆发。黑客在侵入一个系统后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将之摧毁。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代码行弄乱，这样就能使这些系统丧失准确性和可靠性，甚至完全无法响应。这种方法还算不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例如珍珠港事件），但或许比之有效得多，因为它更难被察觉、预防或修复。美国或许会因为担心中国发动空袭而命令本国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紧急起飞。但如果失去了电子工具，每一架战斗机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就会变成一个手动操作的漫长过程，那景象仿佛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布朗克的设想中，中国的秘密武器是一串神出鬼没的计算机代码，不仅能够改写自己的主机代码，还能够利用主机代码以不受限制的全新方式袭击主机。换句话说，这场网络战争爆发很久以后美国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个人计算机、无线网络、卫星接收器、控制系统和战场通信设备都会失灵，美国人只能依赖一些专用的高端卫星通信信道与日本和夏威夷的战场指挥官取得联系。当这场战争最终进入“动能”阶段、中国摧毁一些美国卫星时，这些通信手段也会被破坏，因为卫星被毁将破坏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通信卫星信号。无论事态如何升级，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布朗克的设想中并未出现用电磁脉冲武器袭击通信网络的情景，取而代之的是用僵尸网络袭击全球光纤系统。

布朗克写道，“最有可能的是，即便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发动网络袭击的政策，但网络冲突终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冲突。有关网络冲突的唯一确定性在于，它永远不会以我们所预料的方式展开。”然

而，布朗克仍谨慎乐观地表示，一旦网络战争爆发，不大可能出现电网被关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情况。换句话说，他也像某些学者一样，认为此类威胁被夸大了。

很多人都表示国家之间的网络战争不大可能在近期爆发，然而，网络空间的本质不能不让人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正如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所言，网络空间的麻烦之处在于它难以控制和理解。它不与任何可以从外部检查的物理结构保持一致。我们或许已经创造了它，但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创造的究竟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那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基本上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的猜测可以弥补我们的无知。第一篇主张网络战争可能会爆发的论文是近20年前由兰德公司发表的。这篇论文确信，袭击敌方计算机系统可以起到一种“战略效果”。从那时起，网络战争的倡导者开始编造出一系列与网络有关的新词，包括“网络安全”、“网络权力”和“网络战略”。或许最有误导性的是“网络珍珠港”的概念，这是具有严重误导性的类比，因为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的这场袭击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果。

很多技术爱好者不但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领悟一项战略，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钻研军事史。用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的话说，战略要求“对平凡之事有深刻理解”：

（日本）企图在战争首日即定胜负，这不仅相当于轮盘赌赌徒孤注一掷，还相当于将一整部《源氏物语》压缩成一首俳句。此等任务实难完成。即便美军航空母舰全部停泊在港，它们也不可能在这片浅海中被彻底击沉以致无法修复。美军舰队总会以某种方式恢复元气。

当前有关网络战争的讨论在很多方面都与空中力量（第三维度）刚出现时的讨论相似，当时有专家认为，第三维度能够并且即将不受

其他军种和维度的影响，独立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后果。换言之，仅凭空中力量就可以取得胜利。然而，无论盟军轰炸机对德国和日本的城市如何狂轰滥炸，甚至对汉堡和东京投掷燃烧弹，但盟军绝不是单靠空中力量就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未来某一时刻，网络战争同样会成为一种常规战争。

网络战争不但可能发生，甚至还可能像冷战一样危险。微软公司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认为，由于人们很难将网络袭击的责任归咎于某个单一的个体或国家，这意味着与传统战争相比，网络战争更可能偷偷摸摸和鬼鬼祟祟地发动。由于无法追究责任，那些在现实中被各国认为过于挑衅的行为更有可能在网络中出现。追责之难会刺激人们更加地不计后果，还会导致谷歌公司所说的“密码战”，即在“真实”世界中与贸易和外交冲突同时进行的虚拟竞争，而不是冷战或“凉战”。然而，密码战仍然具有冷战的某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间谍活动的核心作用，包括用蠕虫、键盘记录软件和基于位置的跟踪取代20世纪50年代的卧底和秘密情报投放点。另一个类似冷战的特征是使用代理人冲突，即转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第三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极难归咎于某个单独的行为体，因此，网络袭击不会像导弹一样在身后留下一道烟痕。

有些人士对网络战争这一概念持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非暴力的数字袭击不应被理解为新型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网络战争的概念代表着对暴力这一概念本身的冲击。以网络空间为媒介的暴力在物理形态、感情色彩以及最根本的象征意义上都逊于以传统方式施加的暴力。像克劳塞维茨一样，汤姆·里德（Thomas Rid）也认为暴力是定义战争的核心要素。由此可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也是定义战争的关键。历史上从来没有无人负责的战争行为。

表达此种怀疑态度的并非只有里德自己。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也认为，要给网络袭击下定义，就必须扩大战争的维度。

多萝西·丹宁（Dorothy Denning）也坚信，网络袭击永远无法达到使用武装力量才能达到的效果，例如推翻一国政府、占领土地或者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但即便两个热核大国交战，这些目标很可能依然无法实现。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把推翻另一个大国的政府列为现实目标（尽管战败国的政府很可能随后从内部瓦解）。伤亡人数也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正如一位美国将军在1991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所说的，“我们无法再执行类似轰炸德累斯顿的任务了”。如果这对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来说都适用，那么它肯定适用于未来的任何大国战争。

为了适应网络战争构成的威胁，我们或许需要更新一下对军事史的理解。批评者过于看重暴力在克劳塞维茨战争思想中的地位。战争并不总是暴力的。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成功的指挥官总是努力避免战争。即便是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对他的赫赫战功赞叹不已——也曾 在乌尔姆战役（1805）中凭计谋战胜了麦克将军，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后者缴械投降。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堪称英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也能凭计谋而不是武力战胜法国人，成功绕过“至高无上”防线（保护巴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审视了大量网络袭击后，北约赞助的一个专家小组得出结论称，“所谓动武并不需要立即造成物理后果”。一个例子就是病毒或者计算机代码能够关闭航空母舰上的弹射系统。这或许并不会摧毁某架战斗机或者航母本身，但它仍然可以使这个价值150亿美元的平台沦为鸡肋。

像菲利普·迈林格（Phillip Meilinger）所说，海上封锁就是以最低程度的暴力发动战争的一个明显例子：

战争的本质变幻不定。现代世界的战争仍然具有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不一定是暴力的或血腥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战争的基本形式或许是步兵之间的血腥战斗，但

现在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了。传统的海战以及今天的网络行动可能同样具有强烈的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们既不暴力，也不血腥。

太空中可能也是如此，摧毁卫星不会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然而这样的袭击将使敌人失明，使其失去最重要的优势——制信息权。

外太空战争

1961年，美国为组建新的“北极星”战略部队而成功摧毁了本国第一颗成像侦察卫星。自那时起，太空就已经被军事化。目前各国还没有在太空部署武器。然而，正如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首次驾驶飞机后不久空军时代就来临一样，太空部队的时代也为时不远。毕竟，从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首次试飞到各国开始用轰炸机轰炸城市只用了14年时间。

太空力量很适合拿来与20世纪早期的空中力量作类比。它通过提供导航、通信和情报服务而起到辅助作用，恰如空中力量最初被用来确认炮弹的落点和作为骑兵之外的另一种侦察手段。真正的太空战争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空军上将伯纳德·施里弗（Bernard Schriever）呼吁抢占“太空优势”。这一时期此类言论受到了压制，目的是避免与苏联展开太空军备竞赛。然而，美国很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与中国展开这种竞赛。把战火烧到太空将需要新的组织结构、新的作战条件、新的战争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新的战争思想。

科林·格雷（Colin Gray）曾在20世纪末总结说，太空力量缺乏战略理论。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太空力量仍在等待属于它的克劳塞维茨。为了填补这块空白，作为当今世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顶级学者，格雷在他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现代战略》（Modern

Strategy, 1999) 中尝试将克氏的观点应用于太空。

格雷认为，在常规战争中指挥官都想占领“高地”，而太空就是“高地”的现代版本。无论是出于侦察目的，还是出于海陆军通信目的，使用卫星的太空技术都提供了终极优势。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卫星技术成为“力量倍增器”，这使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将“沙漠风暴”描述为史上第一场卫星战争。卫星技术没能应用于核威慑，反而在常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泽维尔·帕斯科（Xavier Pasco）称之为“对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改写”。那次军事行动也让中国军方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证实了他们心中的忧虑，即美国已经开始稳步推进新型军事技术的运用。

帕斯科认为，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充当战术力量倍增器的太空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安全保障，催生了今人所说的网络中心战争。军方地球观测卫星具备更高的（几何和光谱）分辨率和更宏大的视野，通过相互联网形成真正的太空体系。太空力量使美国在作战时机、作战速度、部队协调性、兵力调遣和火力综合运用等各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1991年，太空力量帮助美国在对抗萨达姆的军队时占得先机，而到了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期间，太空力量则为美国提供了“全谱控制权”。此时，人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任何国家要想保卫自己，就必须阻止敌人动用太空力量。一位中国评论人士曾指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才在2007年测试了它的第一个反卫星系统。

太空军事化很可能无法避免。2009年，中国的一位空军将领称，中国应建设一支符合空天时代发展需要的空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利益。当然，中国的太空利益本质上具有纯粹的防御性质。美国只要拥有制太空权，就仍然可以考虑实施一个类似空海一体战的、有一定成功概率的战略。然而，只要是太空军备竞赛，中国就不大可能接受落后于美国的情况。这样说或许为时已晚。据太空评论网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解放军很多出版物的论述基础都是他们坚信太空军事化

不可避免。凯文·波尔彼得（Kevin Pollpeter）对这些研究进行评估后指出：“中国人认为不仅太空军事化不可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同样不可避免。随着对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争夺日益成为战争的新焦点，太空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场。”

随着中国不断在太空项目上取得进展，《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 1967）很可能失去效力。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自己的国际空间站，它还在研发重型大推力太空火箭。作为中国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35颗中国卫星不久将进入地球轨道，而北斗导航系统将提供与全球定位系统（GPS）一样的地理定位服务（包括军事功能）。美国对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十分担心，以至于它在2011年的《国家太空安全战略》（National Space Security Strategy, 2011）报告中警告，它将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利。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以至于康多莉扎·赖斯专门就两国紧张关系升级的前景（实际上就是太空军备竞赛）向中国发出警告。

并非所有太空空间都能为军事目的服务，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太空战争将是何种形态。大气层上空60~300英里的近地轨道是情报卫星的理想工作区域，这些卫星在成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们相对接近地球，能够拍摄高分辨率的照片。大气层上空300~22000英里的中地球轨道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的工作区域。地球静止轨道是最重要的区域，因为这条轨道上的卫星最不容易受到袭击，通信系统和导弹预警系统也正是以这个轨道为基础。

美国在这三种轨道上都有卫星。美国军舰依赖近地轨道卫星对敌舰进行侦察，而无人机操纵者同样依靠这些卫星获取情报。美军还依赖时距导航系统（NAVSTAR），这是一个目前包括32颗导航卫星的卫星系统，没有它就无法引导精确制导武器和操纵无人机。美国还拥有重要的外太空优势，包括6颗用于察觉核打击的预警卫星。所有这些轨道都会出现在未来的中美战争中，无论这种战争是局限于太空，

还是采取利用太空优势的常规战争形式。

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杰弗里·福登（Geoffrey Forden）曾发表过一段引人入胜的剧本：

当又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北京的酒吧和俱乐部开始了营业，而在亚洲上空，美国的一颗预警卫星发现，一枚发射自中国西部荒漠的导弹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令人警惕的烟痕。随后，警报声响彻整个五角大楼。近来中美关系一直紧张，因为两国为如何解决最近一次台湾危机而争执不下。中国在太空中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举动：过去两天中国向外太空发射了四艘宇宙飞船，其中三艘是在刚刚过去的6个小时内发射的。幸运的是，美国的一颗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即将在几分钟内抵达中国的第二个发射场，这样美国就能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对可疑发射场拍照的任务指令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这颗代号为“水晶 - 3”的卫星失控了。几分钟内，美国太空司令部报告说，四颗NAVSTAR/GPS卫星——用于引导美国无人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已停止传送信号。中国对美国发动的太空战争已经打响。

在福登的剧本中，中美太空战争并不会让美国大伤元气。他认为，即使中国的所有反卫星导弹都击中各自目标，甚至美国人在很早就获得袭击证据的情况下仍不作出应对，这种袭击也不大可能导致美国瘫痪，因为美国仍然拥有足够的太空优势发动常规反击。

中国人将在战争首日摧毁9颗美国卫星，但他们要想在发动袭击前保守秘密并不容易。他们至少需要36台移动发射装置（每个目标要配备两枚或者更多的导弹），而这些装置需要提前数周部署在全国各地。美国人会观察到这种部署。即便是在建筑物内组装的导弹也需要一枚一枚地移至发射台上。中国携带外太空反卫星导弹的“长征”火箭

需要在发动袭击的四天之前发射，并且停留在距地面200英里高度的轨道上，等待其他导弹就位——这是即将发动袭击的明显信号。其他导弹将不得不在发动主要攻击的6个小时前发射。

即便美国放弃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要秘密进行战前准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不可能摧毁美国的全部军用通信卫星、导弹预警卫星和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侦察卫星。美国还有商业后备力量——由商业运营者所有或运营的卫星，以及近地轨道上的民用和军用通信卫星。美国或许是军事行动最依赖太空的国家。但它也是最容易被击垮的国家，因为它的太空资源多得惊人。

福登在这个剧本中还考虑了其他可供中国选择的策略。例如，中国可以选择袭击导航卫星，使美国失去对于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来说必不可少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系统。如果导航卫星被毁，那么美国空军就将被迫在白天执行任务，而且要执行一些如今由无人机负责的危险任务，但中国人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中国人在最初几天发射的导弹不足以严重削弱美国的能力。他们当然可以选择袭击通信卫星，因为这将使美军需要的带宽大幅缩小，但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带宽保存下来，何况还有曾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得到广泛应用的民用卫星。中国可以尝试摧毁美国的预警卫星，但那同样有风险，因为美国依靠这些卫星侦察核打击，所以中国的行动可能挑起一场核战争。中国人还可以选择打击近地轨道上的卫星，这些卫星常常三两一组，距离较近，它们能将美军战舰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传播至别处。在中国人看来，这个战略选项最有吸引力。然而，美国可以通过改变剩余卫星的绕行速度予以应对，这样中国就几乎不可能瞄准它们了。福登总结说，与珍珠港袭击很相似的一点是，尽管中国在太空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使美国在战术层面遭受重挫，但这不会导致美国在战略层面无法挽回，美国人仍然有能力继续作战。

尽管如此，福登也承认，中美之间的太空战争仍将造成灾难性的

后果。虽然在袭击开始后第一个小时内仅仅有9颗卫星被毁，但这将导致近地轨道卫星最密集的区域出现近两万块直径超过4英寸的碎片。一段时间后，这些碎片将先聚后散，导致一系列无法控制的撞击，最终使这片空间无法利用。无论是民航班机，还是日常信用卡交易，这个世界赖以运转的很多系统都将被关闭。

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纸上谈兵。太空武器过于昂贵，或许毫无必要。袭击地面卫星接收站或者使用高空核爆同样可以摧毁卫星。还可以干扰卫星的上行线路和下行线路。对激光发射台发动常规打击或许更有效。至于通过太空地雷发动袭击，美国完全可以依靠卫星系统的数量来应对，美国的很多卫星系统功能相同，损失一套系统未必就是损失惨重。

然而，基于美国霸权的太空现状或许不会持续太久。正是这种前景促使埃弗里特·多尔曼（Everet Dolman）建议美国应该退出《外层空间条约》，在太空中部署武器，并控制近地轨道。美国接下来应该通过使用天基激光或其他动能武器，阻止其他国家在太空中部署武器，以达到确保太空商业开发自由的目的——就像英国皇家海军曾通过剿灭海盗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一样。在此基础上，多尔曼主张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力量确保一个安全的太空环境（包括消除太空碎片的威胁）。

多尔曼宣称，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事实上还可能降低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美国控制了近地轨道，那么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太空战争。美国若想阻止其他国家部署武器，只需将这些武器击落即可。一旦某场危机恶化，美国还能够摧毁任何路基反卫星设施。如果美国采纳这套行动方案，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将把它视为一种“军事讹诈”，那将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加深，彼此更加不信任。然而，正如多尔曼主张的，这个结果很可能好于两国之间的太空军备竞赛，那种竞赛几乎必然会失控。

考虑到这种军备竞赛的潜在后果，这两个大国避免直接在太空中对抗就显得很重要。1962年美国在太平洋约翰斯顿岛上空250英里处引爆了一枚140万吨当量的核弹，由此产生的电磁脉冲大大超出预期，而且更糟的是，核爆产生的人造辐射带导致近地轨道上三分之一的卫星瘫痪。所以，即便是有限度的太空战争也会导致毁灭性结果，而且后续影响还将持续很久。福登建议美国应该寻求制定太空行为准则并充当准则的守护者。这样既可以确定新的“交通规则”，同时又能劝服从澳大利亚到日本等所有向太空进发的国家同意禁止使用所谓的“动能拦截弹”，这种武器造成的破坏是最严重的。

赢得中美战争是怎样一种前景？

前文所述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和美国拥有的军事手段非常有限，现有选项没有任何吸引力，尤其是在两国爆发一场有限度的核战争的情况下（考虑到空海一体战理念或者太空中的反卫星攻击，这种核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之所以有人相信这两个大国显然“不大可能”发生战争，核因素正是关键的原因。中美两国都认为它们的核武器能够保证双方永远不会开战。

然而，尽管中美两国可以采用的军事手段毫无吸引力，但应该指出1914年各国可以采用的手段同样不怎么诱人。从政治角度看，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中美两国爆发海战，但这很快就会升级。外太空战争则会给各方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样就剩下最后一种前景——网络战争，但由于中美都有核武器加身，网络战争显然会把两国引入未知之境。两国可能都预计对方会疏忽大意，这种做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官们的做法如出一辙。那些外交官们认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将决定性地改变军力平衡，使之倾向于发动打击的一方，结果他们不但赌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本书避免作出预测，而是描述了一些供读者自己探讨的故事。用一位知名未来学家的话说，向未来学习需要“再认识”。通过探讨战争的蛮荒海岸，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更好地审视当下，从而能够以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这就是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试图在《打赢下一场战争》（Winning the Next War, 1994）中讨论的内容。该书宣称，战争形态不断演化所造成的挑战之一就是我们需要确定有效性的新衡量标准（或者测量方法）。如果对于胜利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那么“战争似乎不大可能在战后带来回报”。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问道，“如果网络力量——控制和操纵与现实世界日益融合的网络空间的能力——不只是力量倍增器，而是一种新型的力量和影响力，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胜利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非传统冲突形式的涌现不仅重新定义了战争的本质，而且迫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彻底审视武力、暴力和致命三者的关系”。“武力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尤其是在暴力意味着致命的前提下”。若果真如此，那自然意味着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评估“胜利”的定义。

在最近发生的冲突中，胜利的本质令人困惑，正是这种困惑迫使我们对这个词本身重新进行定义。一位学者提出有必要区分胜利和战略中动用武力的结果，另一位学者对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层面可能（通常很难）取得的总体成果进行了区分。威廉·马特尔（William Martel）对美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参加过的战争最为关切，在这些战争中，尽管美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它在战后阶段迷失了方向。

《麦克白》（Macbeth）中的女巫说：“当输掉和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输赢在这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莎士比亚使用了“和”这个关键的词，而不是输“或”赢。麦克白的故事就是如此，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他在战场胜利之时就是他人格崩溃之始。正如他在这部戏的末尾所认识到的，他的一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失去和平的、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的胜利者又何止麦克白一人？

除了空海一体战理念的支持者，美军大部分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战争的形式和内容如此丰富多变，足以推翻任何单一的定义，战争的政治结果同样如此。胜利的标志不再是投降仪式或者胜利阅兵，更不能是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那样的战犯审判。用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即便是地区性的反恐战争胜利也不再被大众知晓。大型战役不会再被镜头捕获。硫磺岛或者冲绳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的经典照片也不会有。真正的故事都发生在幕后，例如安全部队为预防任何“9·11”级别的暴行而拦截恐怖分子的通信，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未来的国家间战争中。

政治暴力具有传递信息的本质，这正是理解武力何以直接产生政治结果的关键。用埃米尔·辛普森（Emile Simpson）的话说，战争为军队决策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武力不过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辛普森最重要的见解之一是，在当代冲突中，政治行为体日益绕过战术层面的军事对抗（或者说战争），而选择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部署力量，包括恐怖主义、叛乱活动以及瓦济里斯坦上空的无人机袭击行动——这些都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其目的在于利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按照自己的条件赢得战争胜利。

能够使美国暂时陷入瘫痪的网络袭击必将传递出某种意图。它同时还会造成一种挑战——是否选择让局势升级。在休·怀特的书中，对关岛发动战术核打击也是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总统一开始会疏忽大意，拒绝使战事升级。然而，任何攻击都会招来反击，与是否动用核武器无关。五角大楼认为怀特设想的前景挑衅色彩太重，因此当罗伯特·盖茨访问堪培拉时，五角大楼将怀特从嘉宾名单中抹掉了。想象一下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发生在太空，那会破坏美国侦察全世界核导弹（以及其他目标）的能力。任何战争的本质都是摧毁对方的意志，而不是能力，因为前者可以免去或者减少武装冲突。然而，马丁·范克里韦尔德认为，一切技术创新，无论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都不会

改变冲突的本质。战争永远“事关人心”。

中国人向来明白运气和偶然是战争的关键。《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1 在托勒密体系中，地球被视为宇宙的中心，七颗行星各自在不同距离的轨道上绕地球旋转。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托勒密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编注

2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城市名称的俄语本意为“东方统治者”或“征服东方”。——编注

3 即乔良（国防大学教授）和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编注

结 论

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战争是个危险的地方。¹

——小布什

大国战争不再爆发了吗？

关于为何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没有爆发任何战争，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备受推崇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给出了几种解释。该书认为，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战争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平克承认，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断言，在今天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同样的断言出现在《华盛顿季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上：《战神的退位——我们所知道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这篇文章认为，国家间战争如今已成为一种小概率事件，典型的国际冲突事实上已经从现代世界消失。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战争的数

量一直在稳定下降。1700年至1815年间爆发了9~11场大国战争，1815年至1930年间爆发了2~6场大国战争，而从1930年至今只爆发了两 three 场这样的战争。

无论这些数字看起来多么令人欣慰，只要想到20世纪两场大国战争给全世界造成的浩劫，我们就绝不能心生懈怠。大国战争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但这些战争的破坏力显然更强了：在43年的和平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3700万人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它的两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夺去1.5亿人的生命，甚至更多。尽管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未来两三个大国判断失误的情况并非不可想象。例如，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距离爆发核战争仅有一步之遥，而两国似乎没有从那次险情中吸取任何教训。2008年孟买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度海军意图封锁卡拉奇港。只有在美国向新德里施压，要求它避免与巴基斯坦对抗之后，印度海军的计划才算是被劝阻了。

如果爆发中美战争，那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即便以死亡人数而论可能排不到首位，但它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肯定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这场战争至少有一部分发生在太空的情况下。任何一场大国战争都比上一场惨烈，英国人常常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世界大战”（Great War），但这个词语此前专门用来指代拿破仑战争（这场战争共造成200万人死亡，其中1812年入侵沙俄的一次军事行动就造成8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大可能是最惨烈的最后一次大国战争。如果过去（1914—1918）并没有重复过去的过去，那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意外呢？

上文所述并非是为了否认战争日益衰退的吸引力，事实上各个大国仍在相互竞争。随着历史的演进，贸易在创造财富方面要有效得多。战争代价太高，早已不被人看好，它的频率越来越低也不止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在国家间战争被宣布“过时”之前，两个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还是值得警惕。

第一个事实是统计数据不是故事的全部。从统计上的关联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是愚蠢之举。20世纪大国战争次数较少并不意味着未来会越来越少。

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趋向的世界》（A World of Propensities, 1990）中所写：

如果条件不变，那么统计数据的均值倾向于不变，这种倾向是我们这个宇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我认为，这只能用趋向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除了一般的可能性外，还存在加权可能性，它们是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趋势或趋向：它们不同程度地内含于各种可能性中，就像保持统计数据不变的某种力量。

换句话说，我们有可能找到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加权可能性”。世界不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种“因果机器”，它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结果的世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定这些“加权可能性”会导致何种结果，但我们仍然能够利用波普尔所说的“客观可能性理论”。某些结果比其他结果更可能出现。最终，这些“加权可能性”限制了能够发生的事件的数量，决定了哪些事件一定会发生，并有可能确定其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正是这个虽然有限但仍很重要的方面值得我们讨论。

在此基础上似乎可以非常合理地推断大国战争不大可能再次发生，但1913年的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坚信这种观点的理由也非常充分——一些本应爆发的冲突最终没能爆发，但历史学家一定会争辩说，像19世纪90年代俄英战争这种虚张之事只能以独属于该事件本身的理由来解释。显然，大国战争越来越罕见，一个原因可能是当代世界日益错综复杂。战争的成本上升了，而回报却下降了，但复杂性不会否定大国冲突的逻辑，它不过是让这种逻辑更加复杂罢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尽管合作为各大国带来的好处前所未有，而冲突带来的好处大不如前，但竞争仍然是本质——“非敌非友”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常见表述。合作能提高效率并最终产生更多回报。的确，大国能够通过合力避免战争而大幅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遗憾的是，战争的消失并不是“幂定律”的结果。

幂定律是指两个实体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幂定律在科学中尤其常见。热力学系统中的相变与某些性质呈现幂律分布有关，例如一个系统中的临界指数。人们认为幂定律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取决于某个物理系统的具体情况，而只取决于它的维度）。幂定律关系在物理学中无处不在，这部分源于维度束缚，而在一套复杂的体系中，幂定律则被认为是特定随机过程的标志（随机场就是一个例子）。在市场中，幂定律在三个条件都具备时才会发生作用：多样性（很多不同的产品在出售）、不平等（某些产品的质量更好）和网络化效应（例如口碑和时尚往往会放大差异、推广高质量产品）。简而言之，成功会带来更大的成功。

就大国战争而言，（趋向于和平的）幂定律将在社会和经济复杂性削减战争回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大国会因为成本而打消参战的念头，这种情况持续越久，就越难以“想象”战争是有用的。一旦战争的功用遭到质疑，那么它的道德性也一定会遭到质疑。用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话说，德法两国如今“在人类学上”已经无法相互开战了。

但幂定律同样复杂，幂定律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们是分形的（无论你拉到多么远的距离观察，它们看起来仍然像幂定律）。数学家将其描述为“多重尺度上的自相似性”。有关大国战争越来越少的漫长故事是由很多短故事组成的，每一个短故事都有自己的小小世界。市场从未如此复杂（一个例子就是安杰尔提到的债券市场），社会也变得多元化（各国的本质特征在弱化；某些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变得日益离

散；未来可能连国家都不存在了，何谈战争），但这种形势下真正的外部因素反而是战争本身，战争有惊人的韧性。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战争就像疾病，它显示出变异的能力，当人们努力控制它或者消除它的时候，它变异的速度反而最快。战争永远不会从政治中消失，除非我们能消灭战争爆发的原因。”不幸的是，大国冲突的首要原因从未改变，那就是竞争。

我们是一个天生爱好竞争的物种，而大国因利害重大之故，争胜之心尤甚。然而，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有必要对争强好胜和竞争进行区分。竞争是各物种的天性：让我们能够一起生活的那些品质正是竞争的源头。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密切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亲族或者部落——来获得安全，这些形式将“内部人”与“外部人”分开。正是这种对群体性和社会凝聚力的倾向使我们既想与他人竞争，又对他人极度恐惧。

争强好胜则截然不同，正如霍布斯所说，它是某种形式的争吵。争强好胜之人甚至会为鸡毛蒜皮之事而争个没完。战争常常与身份有关——大国希望维持自己的身份；小国与大国结盟，以此获得身份。在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受辱于他国仍然是很危险的。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对新现实主义强调实质性因素的做法提出挑战，他更认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名声、身份和地位的看重。的确，与现实主义的期待相反，勒博认为在他调查的94场战争中，追求安全只是其中19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与之相对，对地位的追求是62场战争的首要或至少是次要动机。另有11场战争与报复行为有关——这同样是地位的体现（尤其是一国的可信度受到威胁时，就像“9·11”事件后的美国）。一句话，“精神”因素是多个世纪以来战争爆发的首要原因。

争强好胜有其自身逻辑，没有哪套统计数据能够做到不遗毫发或者言之甚明。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因为世界即将进入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竞争的最危险阶段。国际体系的韧性可能会面临与

1914年同样严峻的考验。

回到1914

历史学家常说过去之事会影响未来。但我们需要思考另一种情况：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如何影响我们当前的行为。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为此提供了一个相当乏味的例子。他指出，砍伐圣诞树不会“导致”圣诞节。对圣诞节的预期却“导致”这些树被砍伐。导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的不只是昨天发生的事，还包括我们对自身行为会给明天带来何种结果的预期。在这种意义上，未来像过去一样影响当下。

但我们反复回溯的是过去，类比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能够看到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多么脆弱、不稳定、转瞬即逝。最好的结果是，类比能让我们思考当前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会将我们引向何处。换句话说，类比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实现不同结果的难题。

美国学者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将历史类比称作“肤浅之人的分析”。然而，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正是理解为何历史可能重演的能力才将“肤浅的类比”与有理有据的分析区别开来。贬低历史类比意味着没能理解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或者至少是我们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多年以前，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研究出了一种模板，它能够让历史为决策者所用。在研究像1914年这样的危机时，他们建议我们应该确定哪些是我们知道的，哪些是我们不确定的，以及哪些是我们推测的。那么，关于当前的国际局势我们知道哪些呢？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明白1914年的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他们非常希望避免重蹈覆辙。第一次

世界大战仍然是当代大国冲突的原始版本。所有人都不想要战争，但不是所有人都尽心竭力地避免战争。很多历史学家现在相信，战争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家认为它太不可能爆发。

但我们还知道，中国崛起的背景不同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与德国不一样的是，中国或许只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的修改，而且它肯定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中国与俄罗斯也不一样，俄罗斯对当前的秩序不满意，却没有力量挑战它，中国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作出改变，但它（至少在目前）颇为满足，能够适应美国的领导。尽管美国或许处于相对衰退的过程中，但与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实力地位要强大得多。即便美国将要削减5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它的军事实力也远强于1913年的英国。将“支点”转向亚洲或许很像英国当年将“支点”转向欧洲（当时英国在与美国和日本敲定协议后将加勒比和远东地区的战舰召回）。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像德国一样满怀仇恨，至于是否像德国那样对未来感到悲观就更不清楚了（德国人无法摆脱的心结是，他们认为未来属于美国和俄国这样的“陆地强国”）。同样，由于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模式，不可能有谁会真正地鼓吹战争的积极意义，或者认为战争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颇有声势，但他们仍是少数派。

1909年，安杰尔四处宣扬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即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已经使大国战争变得过时，而今天我们仍不时地听到类似的言论。在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参与大国冲突的动机已经被国际经济高度全球化的本质削弱了。一项研究发现，大国战争与战前和战后时期贸易减少之间存在关联。考虑到今天相互依赖的贸易网络，战争根本打不起来。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同样认为，与1913年的国际经济相比，今天全球化生产的本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考虑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公司内交易和国际分包的日渐普及，一件产品很可能是由多个国家生产的，而不是一国生产，因此，战争的吸引力下降

了。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公司内交易的水平并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的28.7%和从中国全部进口的13.7%属于公司内交易，这两个数字都明显低于47.8%和27.7%的全球平均水平。

如果我们注定要不停地猜测未来，那么我们也注定要回顾过去。当我们试图理解中美关系可能如何演变时，最恰当的历史类比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战略思想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着迷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容易想到那些处于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冲突中的各方。政治学家会对此提出质疑，他们会指出，各国参战的原因是他们误会了彼此的意图，或者他们因为疏忽而误打误撞地卷入战争。有抱负的大国希望获取的东西可能超出了现有大国愿意分享的范围，或者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被证明无法维护这套规则，而崛起大国既无意志也无意愿承担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主要教训是，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理性，这常常促使它们对战争与和平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达尔文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就是受到了自然选择的影响，而自然选择的目的是获取直接关乎生存的信息。认知失调和确认偏误很可能是我们这套生存技法中对环境适应不良的部分，但我们似乎无法摆脱它们，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宣扬和平的好处，我们就必须理解战争的吸引力。像诺曼·安杰尔那样的信仰体系（今天的信徒远多于当年）并不像熔岩灯里的蜡滴一样因其自身属性而成形和流动。错误的观点本应沉入海底，却仍可能浮出水面。正确的观点则可能因其倡导者的懈怠而沦为牺牲品。

掌握未来

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的看法林林总总。像郑必坚这样的学者认为，中国不但不会走德意志帝国以及1945年之后美苏两国所走的道路，而且会一举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因为这一逻辑根植于西方思想，而非中华文明。同样的，王赓武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秩序最有力的支持者”，它希望通过用多极世界取代美国支配的世界来进一步巩固这套秩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可能是“中国世纪的促成因素”。同样的，坚定的现实主义思想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宣称，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平崛起——毕竟，战争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本书主张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也不会像很多专家表示的那样不大可能发生。对于专家或者任何对预测未来冲突感兴趣的人（尤其是面临削减军费开支的军方人士）给出的建议，我们必须保持谨慎。

如果这个世界认同本书勾勒出的这套逻辑，那么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中国和美国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持续作出理性决策的能力，也不要相信自己明白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这两个大国应该就各自的价值观努力展开建设性的文化交流，同时要求对方为如何解读这些价值观负责。两国应该避免海上军备竞赛，并采取措施防止太空军事化，它们还需要意识到网络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战争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至少在战争初期如此。这些步骤都不会要求两国以非零和的方式重构二者的竞争关系。

然而，人们必须不断地讨论中美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历史浪潮云谲波诡，能够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人们还必须记住，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小布什在总统任期内的很多讲话并不符合英语语法或者语言习惯，常被美国民众传为笑谈，此句就是一例，小布什的英语原话为“War is a dangerous place”。——译注

纠缠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未来

[美] 沈大伟 主编

丁超 黄富慧 洪漫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 （美）沈大伟 主编；丁超，黄富慧，洪漫 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66-1511-9

I. ① 纠... II. ① 沈... ② 丁... ③ 黄... ④ 洪... III. ① 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939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243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目录

前言和致谢

第1章 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

“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在中美关系中管理“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第2章 美中关系的演进

1949—1969年：动荡和怀疑

1969—1979年：更宽的视野

1980—1989年：乐观主义

1989—2001年：混乱无序

2001年及以后：新的全球现实

结论

第3章 中国的崛起、美国及自由世界秩序的未来

权力转移与自由国际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自由崛起

结论

第4章 现实世界中的中美关系

中国独特的崛起及其对竞争的影响

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中美安全竞争

结论：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第5章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性影响

后冷战时期——大陆政治风波和台湾民主化的影响

小布什政府

奥巴马政府期间国内因素的影响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现状和前景

结论

第6章 中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决定因素的结构性改变

国内体制的变化

社会力量

结论

第7章 外交关系：要旨及过程

各自的目标

政府部门的作用

双边机制

双边外交议程

挫折和妥协

中美政治对话取得的效果

第8章 商业和经济关系

作为榜样的美国经济

幸福的依靠

移动的沙与再平衡议程

争论的焦点

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的管理机制

结论

第9章 文化关系

中美之间的文化外交

文化理解的方式

结论

第10章 军事安全关系

新的安全考量

近海和周边地区

中间地带

全球范围

军事冲突的制度性限制

结论

第11章 中美两国在亚洲的交流

地区关系中的中美因素

地区发展

结论

第12章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1949—2000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2000—2008年间的两岸关系

2000—2011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是該有点新意的时候了？

结论

第13章 中美在中东、非洲、欧洲和拉美的互动

欧洲

中东

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结论

第14章 美中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中的交流

评估行为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中国与全球治理

中美交流的类型

结论

第15章 中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塑造未来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

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成绩

中美关系未来的前景

结论

第16章 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竞争

对抗关系

结论

编者与作者简介

前言和致谢

本书源于我略有不安，却又日益强烈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因素都已发生转变，两国关系确需重新评估。这种感觉早在2009年至2010年我在中国做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之前便已萌发，但正是在访学期间，这种感觉逐渐明晰起来。

在那一年中，我经历和见证了许多事情，它们让我认识到，形势正在变化，而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看到，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到访北京和上海时受到冷遇，同时中国政府对奥巴马的每一项日程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与之前历任美国总统访华时受到中国民众和官员的热烈欢迎相比，奥巴马及其随行人员所受到的冷遇显然是不够友好的，这也象征着两国关系的紧张。总统访华前一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那一天，我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庆祝仪式。在长达数小时的阅兵式中，我看到各种先进的武器通过长安街，中国人那新生且极富活力的民族主义展露无遗。在这一年里，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研究。在与中国同人以及普通百姓——从出租车司机到商店店员再到学生——的交谈中，我清楚地感受到，曾经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漠然和反感。我所认识的其他美国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跟我抱怨说，他们已经被中国社会和政府“拒之门外”了。我受邀参加过很多讨论“中国模式”的媒体采访和学术会议，人们标榜这一模式将用来取代伴随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宣告失败的“美国模式”。反美情绪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骄傲在很多场合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一整年里，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不断冲击着中美关系：谷歌事件、哥

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报复性关税、中国在亚洲日益强硬的外交等。无论是奥巴马访华结束时两国所宣称的“全球伙伴关系”蕴含着多少期待，它也很快遭到了这些意外事件的打击。

这一切使我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深感不安。连续23年的访华经历使我有机会见证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丰富的经验告诉我，这仅仅是另一个“低潮期”而已，会慢慢过去。但是，2009年到2010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两国关系正在出现一些根本性，甚至是非常消极的变化。中国自身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但并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离京前，我在北京的美国商会作了一次演讲，并撰文简要谈论了这些变化，呼吁美国采取新的对华战略来应对这些新的现实。当然，美国国内的一些痛苦经历同样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变化。金融危机令美国元气大伤，其国际地位受到重大影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遗疾久未散去，同时对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这包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强硬外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结束访学回到华盛顿后，我同样发现人们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的这个“强硬的一年”令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改变了看待中国的方式。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他们在2008年上台时曾希望同中国建立一种全球伙伴关系——的交谈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一条新的界限。在他们眼中，北京没有行动起来同美国携手处理2009年到2010年间一系列富有争议的问题。可能在美国看来，两国关系的基础十分薄弱。

回到美国更加深了我对两国关系发展轨迹的不安，但同样坚定了我的决心，促使我进一步去理解其中的深层动因，认真考察两国关系的现状。但是，如何对我的工作加以阐释和组织呢？这就需要对这一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重新展开一次深度调查，探究其中的深层动因和推动力量，从不同视角审视中美交往中的不同背景和领域，而且要避免浅尝辄止。为此，2010年秋，我耗时数月思考如何组织这项研究工

作，由谁来参与，到哪里寻找经费。

本书便是最终的成果。它能付梓出版离不开众多参与者和机构的努力和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首先，我要诚挚感谢15位作者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他们都是中美关系领域声名显赫的专家和日理万机的学者，准备文章耗费了他们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不仅对自己的主题作了大量研究和思考，而且每篇文章都是几经修改。面对我提出的修改意见，他们总是礼貌回复，同时对来自外部审稿人和彼此之间的意见，也都抱着积极探讨的态度。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合作。当初投身该项目时，我们都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但大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自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转变。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需要研究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的最新变化和其中的动因。虽然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主题上是有共识的，但实际上我们从未试图去刻意“求同”。

2010年11月，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议程紧凑的会议，目的是以同行评议的方式展示各章初稿并提出意见。华盛顿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拨冗光临，带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参与了不同主题的讨论。这些专家包括：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乔治·华盛顿大学）、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傅强恩（John Frisbie）（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李成（布鲁金斯学会）、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胡达（Michael Yahuda）（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布鲁金斯学会）。我对他们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还要对西古尔亚洲研究中心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中心主任爱德华·麦科德（Edward McCord）以及研究员马特·格里格尔（Matt Grieger）和克里斯托弗·王（Christopher Wong）。他们不辞辛苦，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国际会议复杂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他们在幕后的辛勤劳动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最后，没有资金支持这样的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尤其要感谢的是福特基金会驻北京代表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先生个人的大力支持和对该项目重要性的理解。其次，本书还得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的帮助，要特别感谢的是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理事会成员、校友克里斯托弗·富斯纳（Christopher Fussner）先生对中国政策项目源源不断的支持。没有富斯纳多年来的支持，这个项目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所有对本书的出版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希望本书能够促进大家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只有这样，这两个强大且伟大的国家才能携手构建一个和平积极的未来（虽然不同的分析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希望将此书献给中美两国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各自的社会和政府解读对方，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彼此的工作都没有尽头，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沈大伟

第1章

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中美关系被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是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更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推手；它们为全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博士和专利；它们更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仅有的全球性行为体。它们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每天约有9000人穿行于两国之间，约1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中国则吸引了约两万美国留学生。两国有38对“姐妹省/

州”，更有169对“姐妹城市”，这种关系使双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在中国，有3000万人正在学习英语，而近20万美国人则在为学习中文而努力。

中美两国用上述及其他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最大影响。理解中美关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驱动它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但是，影响两国关系的要素不是固定的，并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也使很多之前的研究落伍了。本书试图修正、剖析并解释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在本章之后，本书将分为7个不同部分：历史、理论、国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及其他有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

“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本书的主要论点，也是我们所认为的中美关系中短期内的主旋律是：两国紧紧纠缠在一起，并存在广泛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这导致了合作与竞争交错的景象，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合作性竞争（coopetition）”。正如扎尔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和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在多年前创造了“接触兼遏制（congagement）”来表述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与遏制交织的情况，我认为“合作性竞争”一词能够充分体现当前中美关系中相互矛盾的双重属性——也即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常态。下面的章节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诚然，两个国家既竞争又合作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很少有两个世界大国会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历史上，两个主要的大国只会维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而更多地处于非对称的、竞争性的，常常是敌对的关系中。有时，主要的大国可以在一个多国协调机制中共存（如同19世纪的欧洲一样），在这样的机制中，各国共享安全和商业利益，因此两个主要国家的竞争冲动会多少因其他国家而受到缓冲和抵消。但协调机制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在这个机制中安全

困境和战略猜疑会像春雨中的野草一般滋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大国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当两个主要国家的综合力量从协调机制中抽离后，一些次级国家的实力将开始迫近两大主要国家，“权力转移”会逐步出现，从而催生一个更为不稳定的战略环境。即便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这样更为经典的两极秩序下，两国的合作也仅限于最小限度并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的是竞争和敌对。

有人认为上述情境也出现在当下的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而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日益增长并成为主要方面，而合作性因素则正在下降并沦为次要方面。两国展开合作的领域正在日益变得狭窄，政府间试图促成合作的会议正变得形式化且日益艰难。两国政府中弥漫着互不信任感，两国的政府中也很难再找到具有强烈的合作使命感的官僚部门（当然教育领域是一个例外）。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既是由两国内在的一些因素所引起的，又是国际事务的系统性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中美关系还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机制），它们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以及实质的双边联系——我称之为“结构性相互依赖”（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结构性相互依赖认为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将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但是同时，这些相互依赖也激化了两国已有的分歧并催生新的竞争。这导致一种奇怪的“合作—竞争”动态混合状态——在这种关系中，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从前者向后者转移。我将这一新阶段中的中美关系称为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尽管两国仍然相互依赖，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华盛顿和北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谨慎地控制竞争并使合作最大化，这样才能防止两国关系朝着敌对的方向发展。

上述状况的含义将在本章的最后和本书的主要部分得到进一步的论述。首先，本章余下的部分提供了一系列范式来理解两国复杂的关

系。理论有助于阐明事实，并将之分类。诸多竞相解释当下中美关系宏观动态的理论的存在，本身就是两国关系复杂性的明证——而它们也提供了各自的重要视角并多少具有解释力。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但为了追求简洁，本章将先后采用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以及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解释当下的中美关系。

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第一种看待当今中美关系的视角结合了两国各自的现代历史和文化。尽管不易概括，但这些对于理解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心理性和经验性的固有看法非常重要。唐耐心（Nancy Tucker）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阐述了大量历史要素和事件。不过我将进一步补充一些内容。我认为，至少有五大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影响中美两国对对方的看法。

首先，中国对外国势力侵犯中国陆海疆域非常敏感。这是中国人修建长城，并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不断重建长城的原因。在中国前现代历史中，因境外势力入侵而造成的国土破碎是显著的事实。而在其现代史上，尤其是18至20世纪期间，中国仍然因欧洲殖民国家、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惨遭领土分裂。与此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常常分崩离析，且伴随着分合交替。内部的困扰又常来自外围的入侵而加深。中国人称此为“内乱和外患”。

对内忧外患的担忧影响着当今的中美关系。很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试图一面在周边给北京制造压力，阻碍两岸统一，一面则通过在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制造不安定来颠覆中国政权。

其次，中国在过去的150年中始终在寻求“富强”之道，并试图重

塑其大国地位。因此，中国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非常简单：它们帮助，抑或是阻碍了中国的伟大使命。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在这方面美国顶多属于功过相抵。但是精明的美国人认为，在1949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的两个时期，美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在中国，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更别说心怀感激了。由于相信美国正在战略、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阻碍中国的崛起，即便美国不再做什么，中国也不会心存感激。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历史性因素：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家长式作风。这两者在中华民国（1911 - 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时期显露无疑。美国的例外主义认为，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和历史经历以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前提。这些都对塑造美国的自由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内战时期；同时，这也导致了美国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这种帮助，甚至是塑造中国发展进程的富有使命感的欲望充分体现在医药、科学、农业、教育、宗教、政府和军事的组织，以及经济等方方面面。

正如劳泰瑞（Terry Lautz）在本书中所阐释的那样，美国试图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改造中国的家长式的使命感并没有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而消亡，相反它继续存在：首先体现在美国对逃亡台湾的国民党的继续支持；其次反映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之后）1978年之后美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对中国大陆的大笔捐赠上。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向中国倾注了不计其数的人力和财力以帮助其现代化和民主化。美国的做法不时（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引发强烈的反响，其结果是很多热切的中国“学生”开始支持美国“老师”的行为。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堕落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后来的动乱和稳定，这些自由的小插曲都以悲剧收尾。除此之外，美国在对待中国时显现的例外主义和家长式作风在美国人心中依旧根深蒂固。美国寻求以与美国传统和利益相称的

方式在政治、经济、知识、战略上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但中国“顽固”地违拗了美国的期望，这使美国一再感到失望。我感到，美国社会中对中国和援助其发展中家长式的专断态度在近20年中显著消退了。这源于1989年的后遗症，更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崛起和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很多美国人颇感疑惑：“中国只会威胁美国，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发展？”如果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处于零和竞争之中——无论是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还是战略上——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

中国的例外主义也在发展。许多观察家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点我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成为一个大国依旧是它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北京依然将美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威胁。正如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2011年10月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阐明的：“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对他们来说，美国依旧是反共的。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人权固有的信仰依旧影响着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在美国例外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家长式作风，同中国例外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之间，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中美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始终存在，但更大的战略利益会掩盖这一分歧。不过在缺乏更大的战略共性的今天，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再次从幕后来到台前。

第四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因素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问题。“给面子”意味着给予对方地位和尊重。中国人注重给他人面子，维持自己的面子，避免丢脸。这原本是一个国内社交上的习惯，但却变成了外交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待像美国这样比它更强大的国家时。中国官员渴望他国以大国礼仪来对待他们，强化他们的形象；同时，他们竭力避免在国际上陷入窘境。当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中方关注的事宜主要

集中在：白宫南草坪上将鸣放多少礼炮，东道主会以工作午餐还是国宴来招待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谁会得到宴会邀请，在机场迎接的官员是什么级别的，美方是否会提供有特工保护的车队，是否会有示威游行，他们是否会在发布会上遭遇即席提问等。美国官员则恰恰相反，他们更渴望切入主题，并在艰难的谈判中达成协议，这源于美国人好争论的文化。在谈判中，美国式的不耐烦和对获得实质性结果的渴望，时常同中国式的耐心、官僚主义以及倾向于维护面子的作风产生冲突。对中国人而言，在会议桌（方桌）前相对而坐进行谈判本身可能被视为挑衅，有失面子；他们更喜欢在餐桌（圆桌）上——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场所——达成协议。

这些都意味着，在中华文化中，冲突对他们来说是严重丢脸的，也是侮辱性的。因此，美国人在人权、人民币升值、贸易赤字、军事现代化等广泛领域中公开与中国对抗的倾向被视为对中国公开的羞辱（而中国只是在斥责或威慑越轨行为时才会使用这种方式）。为了维护面子，中国大多选择“关起门来”讨论敏感问题。在中华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争议应被隐藏，而美国文化则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因素与地缘有关。具体来说，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自己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另一个是美国“亚太大国”的自我定位。如同美国在西半球所宣示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一样，中国也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亚洲局势，建立了朝贡体系和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亚洲地区的“天然”秩序，并在中断了三个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强大而重新回归，并将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吸引到它的势力范围内。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即将统治世界。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准确地说是中国衰落的时期），美国成功进入亚太地区并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正当行为者和主要大国。近期，奥巴马政府又将战略重心转向该地区。中国似乎并不接受美国的自我定位。中国能够接受美国在亚太的部分存在，但绝不

会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先地位和霸权。尽管中国官员偶尔以“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来安抚美国，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厌恶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这种冷淡的承认反映出中国的容忍，而非诚心接受。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给予了美国更多的宽慰，“我们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这没有必要，美国已经在我们家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从周边地区赶出去？”一位时任外交部高官在一次采访中对笔者如是说。此外，中国大多数的亚太邻国公开或私下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作为平衡正在崛起的，有时“咄咄逼人”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说，这里存在一个战略性的“矛盾”。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是一个新来的闯入者，而中国在地缘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已经在亚洲存在六千年了。但是，正如门罗主义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美国一样，朝贡体系如今也不可能恢复了，但是这仍然潜藏在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之中。

中美历史和文化中的很多方面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并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潜在的宏观因素常常被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忽略。但是我确信它们仍然发挥着有效的影响。接下来的文章运用了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并简要地讨论了每个理论如何提供了看待中美关系的不同方面。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的范式。古典现实主义源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 - 前404年）的研究和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 - 前221年）思想家韩非子（公元前280 - 前233年）的思想。尽管现实主义的每一分支和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对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将国家作

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强调国家的物质力量；国家固有的不安全感；他国的意图难以把握；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强调结构和国际体系；对权力的追逐；国家以保障安全为首要目标。现实主义者将权力政治视为零和游戏，并认为现有大国和新兴挑战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有人认为冲突可以延缓，新兴的竞争者可以在中短期内被遏制，但是长期来看，对生存的内在渴求会驱使国家陷入长期和危险的竞争中。如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在第4章里简明扼要地指出的：“强化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者中）唯一的争议在于激烈的程度。”

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的结构视为关键变量，所以他们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极”。他们将大国视为构成体系的“极”，而中等国家和小国同大国或结盟（搭便车）或对抗（平衡）。关于单极、两极、三极还是多极，哪种格局是最稳定或最不稳定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定论。但是现实主义者都认为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转变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这时经常出现误判，紧张关系加剧，导致冲突。这在权力转移理论等新现实主义思想中得到了体现。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同现有大国的实力接近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也是最趋向冲突的——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将其称为“交替”点。在这个时期，现有大国可能先发制人，以应对新兴国家的挑战，更常见的是，新兴国家会首先发动进攻。这就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的“霸权战争”。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霸权理论的扛鼎之作。在该书及其他的著作中，米尔斯海默教授阐述了他的“铁律”——所有的国家都追求霸权，并对均势不满，中美两国概莫能外。在他看来，这将给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埋下隐患。他进一步说：“中国比任何一个美国在20世纪所对抗过的霸权都要更强大、更危险，这使将来中国带来的威胁变得如此令人担忧。”米尔斯海默大胆、明确地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写

到，华盛顿应当毫不犹豫地阻碍和对抗中国的崛起——也就是“先发制人的遏制”。米尔斯海默的论述基于对国家物质力量的评估和所有国家都追求绝对霸权这一假设——在他的分析中，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几乎不产生影响。正因如此，中国所声明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其古老的传统和治国方略、其受外国侵略的经历和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上去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显得无关紧要。

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也同意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两国争夺霸权的观点，他的分析并不是着眼于权力转移，而是更多地来源于亚洲的地缘竞争。他用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将亚洲的未来同旧时欧洲的对抗作对比，称“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与米尔斯海默不同，弗里德伯格将中共政权的性质作为关键变量和中美两国摩擦的肇因：

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即便不会造成中美对抗，也会使两国走向互不信任和竞争。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显著地加剧了对抗。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不仅成为两国采取措施减少不确定性和抑制竞争的障碍，更成为两国敌对和互不信任的根源美国对中国更为怀疑和敌对，更多的是源于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考虑。

这方面，弗里德伯格借鉴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和评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而其他情况则不然。

米尔斯海默和弗里德伯格的阐述代表了那些“危言耸听”的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但是，这些预言中美冲突难以避免的著作并没有什么破绽。现实主义者往往只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和军事变量，而忽略了使它们陷于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文化因素。这些看法多数会将美国看作一个仁慈霸权，而将中国视为一个咄咄逼人、蠢蠢欲动的国家。因此，他们将中国视为“扩张”和“修正主义”的国家，而美国则被看作不得不对中国的崛起和挑衅作出“回应”的“现状”国家。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挑战当时霸权国家的典故常常被拿来与中美关系作类

比，特别是19世纪末德国挑战英国的故事。对此，现实主义者的建议是：美国需要通过平衡和两面下注（strategic hedging）的策略，同它在亚洲的盟友一道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优势。

这些看法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中美之间权力的不对称，以及因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而导致的权力转移。阿什利·特利斯在本书中的相关章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但是，并非所有支持权力转移的学者都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

除了均势的相对变化之外，“安全困境”也在现实主义者的分析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概念假定，即便一国纯粹是为了防御性目的而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的实力，其他国家仍会担心，这些行动可能是带有进攻性和威胁性的。1978年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使这个概念广为人知。当下，中国在海军、网络战、反卫星和弹道导弹现代化等项目上被认为适用于“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境。上述的每一个行动都被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是不稳定，甚至是富有进攻性的。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在本书中完美地描述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困境，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两国关系中潜在的危險和千钧一发的冲突。

其他观察家则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在面对安全困境时，一个国家最好的选择是保持克制或者寻求合作。国际安全学者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指出，中美之间无论是常规层面还是核武层面上的安全困境都并不严重，有的甚至仅是空穴来风，因为两国有理由感到安全，他们能够在两极格局中共存，同时两国有足够的空间来采取措施以增强互信，减少战略上的不信任。一些研究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如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充满信心地认为，两国在战略上的竞争是可控的。尽管有人认为竞争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在本书中对两国关系的“斗而不破”表示乐观。葛来仪（Bonnie Glaser）和杜孟新在本书中详述了两国政府之间现存的广泛的外交机制，以此减少不信任和错误知觉，并

促成战略合作。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他的章节中罗列了两国在亚洲需要处理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进行的研究同样认为，当两国都保持克制并避免刻意挑衅对方、破坏对方的核心利益时，控制竞争就是可能的。最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危险在上升，建议两国采取“合作的方式保持克制”：

它们需要认识到一些竞争是与生俱来且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被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它们应当限制竞争的范围。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军事冲突则可以避免，否则，两国的紧张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两国的外交有责任探索有效控制的空间，并将之扩大，以防止两国关系被战术或者国内需要妨碍。

陆伯彬（Robert Ross）和朱峰领导的研究小组探讨了权力转移理论对中国崛起问题的适用性。与在信奉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中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在新兴国家与原有霸权国实力接近的阶段，两国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不同，这些学者认为，在权力转移阶段，中美之间的战争并非可避免，“包括全球的单极格局、地区的两极格局、地缘和武器系统在内的结构性的变量，将使两国间的安全困境和对战争的预期得到缓和”。

上文展示了在中美关系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观点。从数量上看，没有一个范式能够像现实主义一样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产出如此多的著作。由于现实主义中存在许多流派，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会有多种多样的分析、对策和判断。不过新现实主义普遍认为，当下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依然会以战略竞争、地缘对抗和可能的军事冲突为特点。

本书的读者和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应该明白，现实主义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同美国对大战略、大形势和军事力量的分析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关注两国关系的其他维度——正如本书所尝试的

——我们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旦运用别的理论，关注其他层面的分析、变量和行为体，便会得到不同，至少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危言耸听和悲观的结论。

自由主义

另一个盛行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源于启蒙运动，以及孟德斯鸠、洛克、康德、亚当·斯密的思想。自由主义基于社会进步、理性、道德价值和伦理，因此，自由主义者相信对权力的追求可以得到约束，普罗米修斯式的精力可以被导向社会公益。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观念和价值、国内政治、市民社会以及制度同样重要。

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并不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的，也不是一味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实际上，它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深化国家间的联系，并通过制度化的规范和法律约束行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决定国家之外的系统性因素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但是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从国家内部和社会中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个人解放和自由被视为进步（进步观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和现代化的基础。代议制和受约束的民主是自由的信条和规范的体现。自由主义同现代宪政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自由主义者信奉“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尽管民主国家之间在不同领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之间不会打仗。相反，他们认为非民主国家天生就是有侵略性的——仅仅因为它们不对民众负责。另外，自由主义者也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

在强调国家内部变量的同时，国际制度、国家的外部约束和所谓的“全球治理”都成为新自由主义关注的维度。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缺少全球性的权威；与此不同，自由主义

者则认为国家的达尔文式的倾向可以被结构、法规抑制，全球治理也是可能的。

相互依赖理论源自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也是对现实主义仅仅关注国家间关系所作出的回应。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70年代极力推动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跨国性的关系和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它也成为全球化理论的先驱。于是，相互依赖理论被长期用于分析国家间以及次级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诸多变种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得到了大量应用，其中有三个领域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本质。考虑到美国自由主义者对西式民主的偏好，他们对中国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可被称为“共和自由主义”。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对中国家长式的作风也根源于自由主义。这也是国民党溃败后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失落”充满焦虑的原因。而在随后的几十年，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以对抗大陆。

自由主义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贸易。这也就是所谓的“商业自由主义”。这是美国在30多年中不懈地将中国拉进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关键要素。其预期是中国将因此按照国际商业规则行事——特别是中国将打破壁垒和补贴，并将经济规模和比较优势最大化。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相信，贸易将给中国带来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变革性影响。

第三个领域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有关。这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和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他们的章节（分别是第3章和第14章）中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个问题。艾肯伯里认为，无论是过去30多年的改革，

还是现在，抑或将来，中国的发展都受制于国际自由秩序。他指出，中国已经深深地，且不可逆转地将这种秩序制度化，如果中国想对自由秩序发起挑战，它将面临失败：

现有的国际秩序已经牢固确立。这是一个包含威斯特法利亚原则、自由规则和制度的多层体系。这套秩序影响深远。这不仅是一个与美国的权力绑定的政治形态。制约中国打破并重建国际秩序的阻碍和限制很多：中国“模式”作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持续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行为可能会导致自我孤立；打破旧有秩序的机制——大国战争——已经不存在了。

艾肯伯里进一步为中国辩护——即便中国想要用自己建立的秩序来代替现有的自由秩序，它也将面临许多严峻的困难。

如同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其著作《中国、美国和全球秩序》中阐述的那样，她撰写的章节拓宽了分析的角度。福特教授同其他几位学者有一样的观点，她认为中国乐意并已完全融入了国际秩序，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状国家。尽管中国已融入其中，但是，其对于自由秩序仍存在矛盾心态，同时对一些过于独立的组织感到不安。福特的结论与安·肯特（Ann Kent）和格雷戈里·陈（Gregory Chin）等学者的结论相互辉映——中国仍存在矛盾心态，并有策略地在特定的国际机制中进行合作（特别是安全和人权领域）。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这是40年中美国和欧洲对华战略的关键），但它仍未完全融入该秩序中的根本自由规范。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以及中国同西方打交道的经历，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委身于自由秩序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意愿。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在用来考察中美关系时，也产生了很多令人不安的结论。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担心中美之间潜在的冲突会被激发，因为他们高度赞赏自由的国际秩序在约

束和塑造中国的选择和行为方面的能力。不过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对全球贸易规则半心半意的顺从，以及北京对基于自由原则的国际规范和机制的保留态度表示担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同美国在很多全球议题和全球责任上有共同语言，例如地区与全球安全、环境、跨国犯罪、能源供应、自由贸易和投资、核扩散等。这些跨国议题构成了中美合作中的核心议程。中美间的首脑峰会和一年一度的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即为两国开展双边合作制定议程的明证。两国的合作制定的议程不仅清晰可见，而且意义重大。葛来仪在本书中罗列的支撑中美合作的广泛议题和机制便是铁证。这也引发了关于中美伙伴关系或中美“G2”共治的猜想。

这些都说明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状态将持续。关键在于，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与控制问题。

建构主义

与强调物质性因素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观念如何被建构，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中或不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构造、社会化、个人和国家认同的转变是建构主义者分析的重要步骤。尽管建构主义源自国内文化和社会，但是它同样“跨越国界”，影响国际社会行为的塑造。建构主义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知识社会学，在冷战早期的国民性研究中得到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伊恩·赫德（Ian Hurd）、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等人的推动在国际关系界盛行。在后冷战时期，建构主义开始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很多建构主义的文献也在研究规范的社会化及其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下的传播。

美国和苏联专家都试图探索在这两个敌对的社会中（主要在科学和军控领域）建立“认知共同体”以促进两国关系的缓和，这成为建构主义在冷战后期的一次重要体现。有人认为，如果两国在专业领域建立联系，两国将更容易找到互相都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这可以稳定两国关系。美苏尝试建立“认知共同体”的经验也被用于中美关系，这次涉及的专业领域更为广泛。正如美苏一样，20世纪80年代早期，两国大批科学家和军控专家启动了一系列交流（尽管中美两国没有进行军控谈判）。而非政府的“二轨”外交也促成了两国大量国际关系学者、安全专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

与美苏的情况不同的是，在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在教育领域有着广阔交流机会（其实，笔者是第一个被获准在中国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和外国学生）。很快，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建立了三个在国际关系、法律和经济方面管理和资助两国交流活动的专家委员会。有人认为，这些委员会的存在有助于通过培训中国学生和学者，向他们灌输美国（也是世界流行的）观念，同时也可以在这两国之间建立“认知共同体”。美国国家科学院及其他专业机构也涉足其中。这也是上文讨论过的“塑造”中国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3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学生和学者参与了这些领域的交流。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专业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尽管有时候中美两国的专家和学者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但他们往往会有一些相近的看法——这也印证了建构主义所说的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的联系。尽管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安·肯特（Ann Kent）等学者对中国及其官员在国际组织中的社会化问题有所研究，但至今仍未看到有关中美之间“认知共同体”的系统研究。罗斯玛丽·福特和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的著作探索了中美在多个全球机制和全球治理议题中的互动（见福特教授所撰写的章节）。

在中美关系中管理“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通过前面的阐述，我试图展现历史性因素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尽管它们都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学者在分析时必须借鉴上述四种方法。实际上，还有很多理论——如英国学派、理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决策理论等——都为分析中美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和视角。运用这些理论，观察家将看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中美关系全景。两国关系不止是数据、事实、事件、行为体和互动等因素的简单集合，上述的理论所产生独特而明确的模式使这些独立的现象串联在一起。

尽管有诸多理论可供应用，但本书后续的几章均表明，“结构”和“相互依赖”依然是当下和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它们都认为国际结构（安全结构、外交结构、商业结构）对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国际安全结构促使两国竞争和敌对，而国际经济结构和规范机制则有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约束两国的竞争。就均势而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美国在全球许多领域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两国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可能加剧。

不过，本书的其他章节也认为，中美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两国由于大量双边和多边的互动、政府间机制和两国的社会联动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葛来仪介绍了两国的政府间的互动后，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和劳泰瑞在他们的章节里分别详细叙述了两国间密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约翰·艾肯伯里和罗斯玛丽·福特则指出了为数众多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对两国政府的影响。多边或双边层面的官方交流的制度化能够有效防止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震荡和偶发性破坏。不过，相互

依赖同样会造成摩擦（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另外，任雪丽（Shelly Rigger）在本书中指出，尽管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看上去比较稳定，似乎已经不再是中美之间的中心议题，但它依旧是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两国关系呈现出了这些“双重性格”，因此，它日益表现为“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尽管两国尚能共处，但日益显示出竞争性。本书的很多作者（以及很多学者）都认为，近年来，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在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安全和地缘方面均有明显表现。两国出现了更多利益、手段和政策上的分歧。很多人注意到，两国明显缺乏战略互信。很少能看到两国通过多边或双边机制进行合作和协调政策的努力，尽管有众多制度性机制可用来促进合作。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竞争的力量已经威胁到了合作的努力，但是两国制度化的合作努力经常是短暂和间歇性的。实际上很多机制在创建时以促成合作为宗旨，如今已经成为讨论分歧、控制竞争的论坛。在两国政府间各领域的60余次会谈中，并没有涉及多少实质问题。这些对话更多的像是磋商，将各自的偏好和政策与对方通气，而不是真正地促成合作和协调。在这些政府间对话和高层外交活动中，双方竭力展现一种浅层次的合作与和谐的交流，但是在这些对话之下——甚至是整个中美关系——都显示出双方的互不信任。有时双方的分歧会罔顾外交礼节而浮出水面。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两国的国内利益也制约了它们解决双边问题的能力。中美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观点，并因此陷入斗争：美国希望扩大自由秩序的范围（包括增加自由国家的数量），而中国则对自由秩序怀有矛盾心态，甚至抱有抵制心理。总之，这是两个纠缠的巨人。

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而言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持续。当竞争的领域扩展时，合作的范围自然会减小。基辛格认为，两国应当努力扩展合作并限制

竞争。必须明白，这些不是相斥或零和的领域，而是共存的。合作和竞争是同时存在的。处于变化中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有时合作更为明显，有时竞争则会增加。如果简单地以“冲突”和“和谐”的两极光谱来考察中美关系，那么居于中间的则是竞争与合作。如今的中美关系则正处于光谱的中央——处于“竞争”与“合作”之间，既没有触及冲突的危险，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谐。

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和结构性问题正日益突出，在缺乏能够促使两国合作的全球威胁之下，这样的趋势也将延续下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中美再也没有面临过能促使双方合作的共同威胁（除了共同反对“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缺乏这样的共同威胁，两国的合作会减少而竞争会增加。基辛格表示，缺少共同目标和一致认可的约束规则，对抗会出人意料地升级。



图1.1 中美关系的变动范围

因此，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在于对竞争的控制，避免使之发展到冲突的边缘，同时真正地扩展合作（当然，完全的和谐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设想了两国之间的共同发展，也希望能实现，但他也承认这需要“智慧和耐心”。这也需要两国的务实，相互接纳和容忍。我不清楚两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现有政治体系、国民意识、社会价值以及世界观是否会促成一次战略“大妥协”，就像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推动的中美缓和一样。

这两个纠缠的巨人会发现，它们越来越难以共存——但它们不得不那么做。无论多么复杂和令人担忧，这是一场不能拆散的婚姻。中美关系中有一点早已是老生常谈：两者的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它总是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只要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中国和美国就应当继续经营它们这段复杂的关系。两个巨人将继续纠

缠下去。

第2章

中美关系的演进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

一个多世纪以来，让国家强大起来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的雄心抱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泽东令人难忘地宣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认为，中国的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随着中国摆脱这场浩劫，中国将再度成为“伟大、勇敢、勤劳的民族”。

不那么明显的是，中国强大起来——统一、繁荣、安全——也是美国在与中国结交的大部分时间的目标。1979年，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访华时，令人们想起西奥多·罗斯福，目的是让接待他的中国东道主对华盛顿的良好意图感到放心。

如果任何国家变得稳定繁荣，能够维持境内的和平，强大到让外界不敢侵略它，那么这对其他国家就是有利而非不利。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取得进步，迄今为止，通过和平且合法的手段，我们将竭尽其能地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进步。

中美愿景的重要差异是，美国假设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应该并且将对美国友好，甚至与之结盟。

要看清楚这一点，先理解中美互动的历史十分重要。在1949年之前，美国人把他们对中國强盛起来的支持看作行善，这一姿态可以便利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外国列强的掠夺。正如历史学家韩德（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打造了美中“特殊关系”的神话，这种关系包括“美国人大发慈悲、中国人心存感激，相互间存在良好意愿”。美国人祝贺自己没有试图改变中国，相信通过把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而使中国变得更美好。他们希望阻止中国崩溃，担心如果中国出现混乱，就会让外国列强争先恐后地将其殖民化，从而造成秩序紊乱。但是对华盛顿而言，直到20世纪末，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欧洲的更广泛、更认真的博弈中的有用兵卒。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中国为“四警察”之一，在二战后维持和平——但是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这只不过是罗斯福通过变相合法手段取得投票权，从而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翻云覆雨。虽然美国人哀叹中国的疲弱，但中国还没有重要到能够招致认真补救行动的地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虽然美国人或许不像英国人或者日本人那样贪得无厌，但他们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对遏制中国遭剥削毫无益处（除非他们要保护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此外，随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美国与毛泽东的对手并肩作战，称他们是“自由的中国人”——尽管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专制、腐败和无能。历史学家杜维明认为，“美国人是科学和民主化身”的早期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形象是：贪婪、暴力的国家，千方百计地要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北京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华盛顿决意要遏制和改变中国大陆，使其疲弱不堪、四分五裂。

所有这一切今天还引起特殊的反响，因为美中关系已崛起为21世纪“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从经济上、战略上、环境上和政治上

而言均如此。正如罗斯玛丽·福特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所展示的那样，美中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文化不同，在国际体制中竞相制订各自的标准。中国的崛起——其演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许还是超级大国——对美国人来说是否是件好事还未可知。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和行为作出必要且无可避免的调整，而且还要求中国人分担美国为世界事务承担的责任。今后几十年的一个特点就是，华盛顿愿意优雅地后退，而中国有能力承担这些任务，而又不会试图利用其实力来主导东亚乃至全世界。

1949—1969年：动荡和怀疑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它决心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且繁荣的国家，这一决心在美国普遍引起不安。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和现代化，但是“新中国”展示的实力却构成了威胁，因为意识形态倾向让它与苏联结成盟友。华盛顿担心，中国日渐增强的力量将被用来进行破坏稳定的干预行动，引发革命——并最终演变成军事对抗。美国认为，与其鼓励中国强大起来，还不如确保中国仍然疲弱。

敌意或许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意识形态、文化和私利使得敌意难以避免。比起和解，对抗更适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目的。对中国人来说，要消灭帝国主义，动员庞大的人口支持革命，击败和消灭国民党，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民族自尊，煽动反美情绪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方面，美国政府、传教士、商人和军人提供了几十年的援助被弃如敝屣，中国撤退到“铁幕”后面。

华盛顿对“红色中国”的成功感到沮丧，但这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的腐败无能持有的天真态度。美国人已发现，蒋介石的部队在抗日方面表现差劲，国民党政府对困扰着中国人民的贫困、饥饿和疾病麻木不仁。一些人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更

受欢迎，他们盛赞它能够更加奋勇地抗日，更致力于为中国数百万人谋福祉。华盛顿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更接近于抛弃该党，与北京建立关系。事实上，总统哈里·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预料蒋介石的政府将会倒台，中国的内战将会结束，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会分道扬镳，1950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的时期将是与中国展开贸易和外交交流的好时机。

朝鲜战争拯救了蒋介石，建立美中关系的任何主张都被搁置起来。华盛顿立即向韩国伸出了援手，并且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尽管杜鲁门政府本打算临时蹚一下浑水，但事实证明进去容易出来难。195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向美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场上的血腥令此后二十年双方难以实现和解。北京为中国的安全感到担忧，而华盛顿则得出结论认为，它在亚洲的所有朋友和盟友在被动员起来的共产党人面前不堪一击。

打朝鲜战争的艰苦程度出乎美国的意外。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人与无能的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并且看着他们在内战中被迅速击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美国人并没有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果实，而是将其视为国民党的失败。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半岛上横扫千军之时，美国人感到极度震惊。中国共产党军人英勇善战，意志坚定，提升了人们对中国的实力和威胁的估计。华盛顿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经济禁运，北京则驱赶或者监禁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最后的美国入侵者，并且主要与共产主义国家达成外交协议。此外，除了朝鲜半岛冲突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之外，战争的残酷性重新在美国点燃尖锐的种族主义（在对付日本的斗争期间，种族主义十分猖獗）。

朝鲜战争也在美中两国的国内事务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在美国，它激起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令人不齿的运动，攻击哈里·杜鲁门和他的政府在中国和美国政府中培育了共产主义。麦卡锡围捕外交官、军人和学者，罪名是他们曾经准确预言共产党人会取得胜利，从

而让美国人暴露在无法想象的危险之中。在美国，中国共产党人令人们焦虑不安，从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描述了耸人听闻的形象，从而令暴露在共产主义面前的危险清晰明确：你会受到虐待、利用，甚至被洗脑，最终成为被操纵的傀儡、间谍或者刺客。

在1953年朝鲜停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似乎致力于孤立和动摇中国。杜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蒋介石反攻大陆，与台湾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派驻军队。但是，当代的政治、流行文化和历史文字作品描绘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僵硬的中美关系。例如，尽管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将不再通过防止国民党的反攻来充当“中国共产党的盾牌”，但这个政策被错误标注为来“让蒋介石腾出手”，美国当局立即施加限制，以防止他试图“光复大陆”。

联系依然存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有可能被视为令人厌恶，但美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无法推翻它——它是蓬勃发展且团结一致的，将会持久下去。犹犹豫豫地使用权宜之计周期性地发生。但是，这样的建议从来没有同时抓住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的想象力的实质。例如，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开始于1954年，协助释放囚犯，保障定期沟通，偶尔化解爆炸性的紧张局势，但在关系方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官员们尝试着可能的举措，特别是在中苏关系集团开始瓦解的时候，例如艾森豪威尔主张承认中国，给予中国联合国席位并与中国开展贸易，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超越国内的政治反对派。

双方之间的联系更经常地来自对抗。在1954年和1962年之间，三场台海危机引发了战争的幽灵。中国的内战仍未完全结束，内战余波中发表的主权声明引发了冲突。台湾控制的离岸岛在大陆的视线范围之内，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派驻那里，意图骚扰和颠覆共产党政权。蒋介石成功地争取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在战火中支撑他的部队，但他不能说服华盛顿支持他“光复大陆”的行动。

越南战争比台海危机对美国来说更关键，越南战争增大了美方对中国提升能力和它的意图的焦虑。华盛顿认识到，中国正向胡志明提供宝贵的支持。北京鼓励利用这场战争来消耗美国的资源和人力。但美国害怕朝鲜战争的血腥冲突再次上演，因而尽量减少越境袭击中国军人。与此同时，北京送去物资和人力来保护其脆弱的前沿，巩固意识形态同胞的力量，破坏美国的遏制，建立其作为对阵美国和苏联的“第三世界”领袖的国际信誉。正当美国的国家团结和国际影响力由于越南战争而遭到破坏的时候，中国朝着更为毁灭性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迈进。中苏分裂减缓了北京加强国力的努力，迫使它变得更加自立。但是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当证据开始堆积起来，表明中苏同盟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华盛顿才慢慢接受其真实性。一直到1960年，美国的《国家情报评估》还在断言，在未来五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会公开决裂，美国的陆海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同这一评估。政府和学术界分析师相信，中苏之间的争论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如何最好地应对美国方面产生分歧。

美国人认为，正是中国施压才促成赫鲁晓夫鲁莽地在古巴安置了导弹。他们还怪罪中国军队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虽然这次袭击是新德里挑起的，而且许多人判断中国作出了有限的谨慎回应）。

随着北京研制核武器，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观点似乎更可信和更令人震惊。由于苏中关系受损，莫斯科拒绝给中国这样的原型弹，并且撤出了技术人员。然而，美国人并不了解中苏核合作的细节，他们紧张不安地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就会令中国更有影响力，更具威慑力。正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中国在1964年引爆了核装置，令北京在“第三世界”赢得尊重，特别是赢了海外华人的尊重。华盛顿为将中国的成就最小化而付出的努力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或华盛顿打算对对方使用核武器。

自始至终，在维持与台湾的关系时，美国还务实地与大陆打交道，这令两岸都感到懊恼。这项政策对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的胃口，他们认为它既符合逻辑，又具现实意义。他们的继任者坚持该政策，尽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认可它，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抗议美国干涉其内政。

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慢慢地走向与中国改善关系。民意也缓和了——在这个十年之初，支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人占53%，反对的占32%。国会听证会警告说，孤立中国是没有成效和危险的。肯尼迪总统曾暗示，他计划向北京伸出手来，但私下里承诺会否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对中国研制核弹忧心忡忡。到了1966年，约翰逊总统公开呼吁“合作而不是敌意”，国会听证会探讨了实行“新政策”的主张——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称之为“遏制而不孤立”。华盛顿不那么担心中国会直接卷入越南战争，他们成功地就限制这场战争与北京交换了信号。

美国和中国有可能会实现什么样的突破将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干扰了它。它大大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在国际上形象受损。“文革”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变成反对一切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排外言辞。英国驻北京大使馆遭到冲击；美国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它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一个代表处。

1969—1979年：更宽的视野

在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发生了足够的变化，因此到了这个十年结束之时，华盛顿和北京都谋求利用双方反对莫斯科的共同立场，而不是继续制衡对方。通过关系正常化，中美均可以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获益匪浅。中国预计美国会结束对蒋介石的支持，让台湾与大陆

统一。正常化将有利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美日同盟对北京而言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抵御日本未来入侵的保障。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分裂后，美国能够站在中国这边，从而令莫斯科不敢攻击中国。在中国国内，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让毛泽东能够腾出手来，加倍努力防止资本主义卷土重来。

经过多年来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之后，美国领导人再次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自信、繁荣和安全——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试图利用中国，使莫斯科回应华盛顿的优先事项，担心其安全，因而并不太愿意在“第三世界”采取冒险行动。华盛顿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并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尼克松还认为，向中国开放会赢得喝彩，甚至赢得他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敌人的喝彩，并帮助确保他成功连任。

乒乓外交，基辛格1971年的北京之行，以及1972年“上海公报”的签署，完成了尼克松追求的大部分目标（除了结束越南战争之外）。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承诺将美军撤出台湾，不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不支持“台独”——所有这一切都没向北京施压，要其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在隐瞒这些让步的情况下，尼克松访华创造的兴高采烈席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食品、服装、家具和医药（针灸）热情高涨。中国获准加入联合国。1973年，美中两国建立联络处，以代替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

但是，尽管掀起了中国热，但美中外交关系并没有很快到来。水门丑闻令尼克松和福特不可能与仍在试图保护台湾的反共产主义/保守的共和党人抗衡。在中国，在最初的急躁过后，随着苏联的威胁减弱，中国领导人觉得与美国建交没那么紧迫了。美国反对苏联的政策减弱了，尼克松主义表明美国将减少在亚洲的驻军。

一直到吉米·卡特在1976年当选，并通过《巴拿马运河条约》，华盛顿才偷偷地恢复了对外交关系的推动，对帮助加强中国的力量抱

有信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像基辛格一样，意在针对苏联打“中国牌”，他对这个游戏投以更大的热情，并且终身对莫斯科抱有恶意。布热津斯基不想要简单的外交和解，他想要军事关系。因此，卡特政府向北京出售武器和技术，如果美国无法出售，布热津斯基就愿意找到一个欧洲的供应商。美国政府还向中国提供关于苏联军队的部署和军事设施的情报，并寻求中国的同意，在新疆建立一个监测站，取代在伊朗革命中失去的设施。一个强大的、合作的、反苏的中国将促进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北京也有复杂的动机。首先，邓小平追求自强的新时代，寻找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推行多层面、激进的经济改革。北京需要美国作为市场和技术来源。此外，邓小平希望美国抗衡莫斯科，他需要的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太多了，以至于他不情愿地默许美国（在中断一年后）恢复对台军售，并且当美国国会在1979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时也没有中断中美关系。这一法案令邓小平怒不可遏，而且感到难堪。它提供了机制，以便能够继续美台互动，维持对台湾的防御性武器销售，而且一旦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有可能向台湾提供援助。最后，虽然北京得到了华盛顿重申《上海公报》，承认台湾海峡两岸采取“一个中国”的立场，邓小平却无法让美国明确接受它。

1980—1989年：乐观主义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但这没有消除两国间的所有分歧，不过华盛顿可以祝贺自己拥有一个友好的中国，而它强大到足以给苏联制造麻烦。当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重新燃起了冷战，这点看上去尤其幸运了。先是吉米·卡特，然后是罗纳德里根，都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相形之下，中国发现阿富汗事件不那么令人不安，反而更有利。美国的军事集结以及它积极反对莫斯科的态度让北京放下心来。

中国看到了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的机会。它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又无须害怕华盛顿会破坏中美关系。结果成就了1982年8月17日的公报，北京通过它谋求减少并最终取消美国的对台军售。有关该协议的谈判十分艰苦，特别是由于里根政府中形形色色的职员都对台湾抱有同情态度。里根总统本人曾在竞选期间谈到了恢复外交关系。中国最终在1982年获得了一项联合公报，但美国的对台军售并没有显著下降，因为美国官员使用财政和其他机制来绕过它。此外，里根给了台湾“六项保证”——其中包括华盛顿不设定对台军售截止日期，在对台军售前不与北京磋商，也不会向台湾施压要其与大陆谈判。另外，里根签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声称“愿意减少对台湾的军售，但前提绝对对是，中国将继续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只有在美中两国携手合作挫败苏联时，一个强大的中国才会对华盛顿具有吸引力。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中国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提升其教育机构，恢复其法律制度和促进文化交流，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但是当中美双方的利益在像波斯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这一蜜月期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开始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从而放大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分歧。尽管美国公开称赞和解的前景，但如果北京与莫斯科结盟，那么对美国而言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远远不可取了。戈尔巴乔夫决定终止与中国有时是暴力的，往往是恶性的自相残杀，他于1989年5月前往北京，与邓小平举行峰会，这成为备受瞩目的分水岭事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蜂拥至北京报道这一重大事件。

1989—2001年：混乱无序

随着中苏关系的和解，美中和解的战略理由土崩瓦解，留下了一

个没有明确目的的关系——“战略胶水”，而这能够抗衡双方在文化、政治和安全上的积怨。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冷战随之结束，从而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加引人注目和令人不安。对强大中国的热情蒸发得无影无踪。

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害怕在新环境中，中美关系可能破裂。他偷偷派出代表到北京。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遇到了出奇平静、自信但态度抵制的邓小平，后者认为，商人们会迫使外国政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不仅不负责任的美国媒体煽动了中国的反革命分子，而且美国国会的错误行动制造了中美关系问题，所以华盛顿将必须要“解开这个结”。但是，美国人被老布什的“磕头”态度激怒了，他们宁愿实施严厉的制裁。因此，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赢得了大选，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谴责现任总统过于溺爱中国。

因此，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常常被华盛顿忽视的人权议程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当然，往年也曾有过失望的爆发。例如，中国对精神污染（1983年）和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的攻击，引发美国人——尤其是国会——谴责中国的行为。在1990年和1994年之间，美国国会试图把经济政策与改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但失败了，而且徒劳地通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中国。中国认为这一切都是虚伪和利己的。事实上，中国大陆迅速与日本和台湾地区恢复了商业联系。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增长的吸引之下，到了1993年，美欧投资者重返中国。2000年，美国国会就是否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展开争斗，人权问题再度威胁到双方的贸易关系。但邓小平相信私人利益会阻止有效行动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早在1989年就已经预言，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外国企业根本无法抗拒它的诱惑。

在20世纪90年代，其他大大小小的冲突搅乱了中美关系。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从中国驶往伊朗，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

它运载着一大批用于化学武器的元件。北京拒绝美国的指控。虽然美国军舰如影随形地跟着它，但它在抵达中东时船上并没有化学物质。该事件不仅损害了美国情报的信誉，还使中美关系紧张起来。1996年，有关克林顿竞选连任非法收受捐赠的指控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台湾和亚裔美国人身上。“捐赠门”余波持续到选举后，有人声称克林顿总统利用了非法资金。然后才有了间谍指控，涉及盗窃美国高度机密的核武器设计让中国有效复制了精密的微型弹头W—88。

台湾问题令所有这些纠纷相形见绌。台湾一如既往地成为分歧、沮丧和危险的源泉。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仍缺乏用于攻占这一海岛的军事能力，但是加速的军事现代化使得这一目标成为可能。美国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中展示了尖端的技术，再加上美台关系的变化，这一切刺激了北京的紧迫感。

美国和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了积极的非正式关系，但美国人对这一关系的热情下降了。然后在1992年，由于被困在一个针锋相对、即将输掉的总统大选之中，现任总统老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先进战斗机。自从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以来，老布什一直对中国大陆友好。他解释说，对台军售对他获得连任（这些飞机将在选票丰富的得克萨斯州制造）至关重要。

中国重提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的美国政策。当时在上海，克林顿发表了所谓的“三不”原则：“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两个中国’。我们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李登辉也不甘示弱，在1999年7月抛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然而，到那时，美中关系已显著恶化。1999年5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华盛顿坚持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中国政府谴责美国的袭击，拒绝接受美国的解释，中国人涌上街头进行抗议。对

许多评论家来说，这似乎只是美国努力使得中国保持弱小和分心的一个新篇章。

2001年及以后：新的全球现实

21世纪的局势出现了惊人的发展，其中包括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转移。虽然美国仍然在军事上远远强大于中国，但其多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分裂削弱了该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使得世界各地的评论家都在预测美国的衰落。同时，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方面大大提升，获得了相当大的钦佩和尊重。中国跟1949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时的它面临着贫穷、混乱和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官员也不再经常抱怨“百年屈辱”，要求赔偿遭受的帝国主义剥削了。相反，中国对自己“影响世界的能力”引以为傲。中国问题分析师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观察到，通过信息革命，中国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成倍扩大”。

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挑战，它付出努力，确保中美友好，或者至少防止敌对关系变得更重要。在小布什执政之初，固有的困难显而易见。小布什在竞选时反对溺爱中国，他称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远离了克林顿所吹捧的战略合作伙伴。像如此之多刚刚走马上任的总统一样，小布什认为他的前辈对当时被视为拥有成问题的价值观和机构的中等大国让步太多。2001年4月，美国一架侦察机闯入中国南海领空，并将中国战斗机撞落，中国飞行员丧生。在小布什对台湾授予庞大军售，并公开宣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之后，中美关系更是急转直下。

甚至在“9·11”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之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力图扭转双边关系受到的损害，这些严峻的事态发展促进了和解。中国对“反恐战争”提供支持，特别是通过打击洗钱、共享情报、加强港口

安全以及在塔利班被击溃后帮助重建阿富汗。美国欢迎中国的行动。但与此同时，中国认识到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国土安全以及小布什打响伊拉克战争给它带来的好处。虽然华盛顿专注于伊斯兰教和中东，但亚洲的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已经离弃了他们，而中国利用经济慷慨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赢得了朋友，从而成功实施了一个地区软实力战略。

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也令人们在想中国将如何使用这一力量。2005年，美国把这些预期在2005年付诸言辞。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向中国发起挑战，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抛弃狭隘的民族成见，遵守国际规范和支持国际机构。其中一些更广泛的关切，如维持和平和经济稳定，很容易就与北京的国际优先事项相符。其他一些则令中国人不悦，并令他们质疑“利益攸关方”概念背后的意义和动机。再一次，根本的不信任感导致一些中国人把华盛顿的劝告解释为一种机制，给中国造成过重负担，并破坏其上升。

在现实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来颠覆对方。不管好坏，双方的经济已经深深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中美间的亲密拥抱称为“中美国”（Chimerica）。显然，中国的出口和创汇，美国的消费主义和美国的债务相互关联的动能放大了普通的经济摩擦。中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截至2008年，北京的外汇储备中有70%是美元，并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债权方。因此，它对华盛顿拥有巨大的潜在杠杆作用。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毫无疑问，中国会“将其美元储备武器化”。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使用这种力量，因为出售任何美元资产都会降低中国保留的资产的价值。相反，北京敦促美国人少花钱，多储蓄，正确地坚持认为，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要怪罪美国国内的政策和做法。在另一方面，美国人指责中国造成美方损失就业机会，并威胁要征收惩罚性关税。

但是，尽管有这些问题，积极的贸易和投资还在继续。美国工业仍然争先恐后地利用中国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熟练的技术人员、价格低廉的土地和薄弱的环境法规，它们掏空了美国的工厂和城镇，把转让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中国企业急切地寻求在美国大量投资，由于在像能源这样的敏感部门以及购买某些高科技产品方面受到的限制而恼怒。

从2008年开始，在美国和欧洲被压垮之际，北京成功地应对了全球经济衰退，形成了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更自信的行为。在东海和南海，中国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在水底资源、分散的岛屿和包括捕鱼、监视和导航在内的海洋权益方面发生了争执。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连串的局势发展中，海峡两岸局势则成了重大例外。马英九在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保证说他接受“一个中国”，只保留“一个中国”的定义，两岸之间展开了对话，带来了十几项协议。华盛顿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因为它似乎是相互需要和经济上互惠互利的。国际观察家预计，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减少，虽然北京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其海岸部署导弹，维持军事威胁来阻挠台湾谋求独立的活动，并且获取能力来防止美国的干预。

但是，中国令人们难以判断其意图。北京继续声称，将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指导决策。中国境外的分析人士在北京的意图方面产生分歧。中国是继续坚持华盛顿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落实到位的国际体系，还是会寻求重写规则？中国是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不稳定上面，还是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野心？像哈佛大学的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这样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可能“希望变得更富有，更强大，但并没有把（这一希望）转化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努力，以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此相反，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在内的其他人则看到一个好战和野心勃勃的中国，它想要“通过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破坏美国的联盟，并最终把美

国逐步赶出亚洲，从而将自身打造成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瑞黎明（Dawn Murphy）在本书的各自篇章里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挑战之下，2012年华盛顿开始重新调整其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优先事项，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所谓的从大西洋世界、中东和恐怖主义的支点转移引发了政治和安全举措，以便安抚朋友和威慑潜在的对手。此外，这就意味着美军的部署更加醒目，包括在澳大利亚派驻军队，并派遣海军在中国周围海域举行演习，尽管美国的国防预算日益萎缩。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提出谴责。他对记者们说：“中国（必须）像其他人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我们不希望他们利用美国。”意料之中的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拒绝了这一美国的支点，并坚持说，美国看到中国对其霸权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美国的战略东移的目的实际上是牵制和遏制中国，抵制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邻国希望美国深入参与该地区以制衡中国。他们不寻求新的冷战。事实上，今天即使有可能，他们也不会支持遏制中国的努力。他们不认为华盛顿应该把中国视为敌手，以免它真正成为一个敌手。但他们不希望被横扫进中国的轨道上，或者为了保持自主性而展开新的军备竞赛，也许还包括核能力竞赛。他们希望能够在商业上获利的同时，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保持独立。要促成这样的结果，他们指望美国。但是他们想要从华盛顿得到的东西既不是对立，也不是美中共管。华盛顿与北京在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场合进行的对话没有造成困扰；更紧密的合作会造成困扰。从2006年开始，关于用“两国集团”作为解决问题的更有效方式的建议在美国成倍增长，尤其是在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开始倡导这一点的时候。然而，这个想法令其他国家感到惊惶，他们认为美国高估了中国的能力，即使是在中国人的眼里也是如此。

结论

在美中两国长达几十年的关系中，直到21世纪前夕，才有了一个两国可以同时宣称强大、繁荣且具有影响力的时候。双方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互依存，中国也很少能够对美国的权力和主导地位构成哪怕是初级的挑战。美国仍然领导着一个中国普遍而言会遵从的国际体系，但它可能会与之渐行渐远。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事后诸葛亮——已成为新时代关注的中心。

面对这些改变的现实，仍然会有一些关键的连续性能够预知未来。华盛顿仍然是灵感和知识的源泉。中国人仍然争先恐后地涌向美国接受教育和培训，虽然回国的人数增大了，但他们也是带着对中国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技能回国的。美国人继续寻求改造中国，但是，由于各自国内的政治因素，双方在共享的目标方面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消息不灵通或者不怀好意的利益浪漫和妖魔化了对方，夸大了期望，放大了威胁。但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互不信任感挥之不去——阻碍了合作与进步。美国人抱怨中国不透明，中国则坚持认为，美国仍然寻求遏制中国。

北京和华盛顿能否而且会否找到共同点仍不得而知。美国人对中国抱有的流行观点和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流行观点是相互矛盾的。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公司2011年秋季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4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但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扩张对美国而言是坏事，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构成中度或者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人则同样对美国抱有戒心。在2010年和2011年之间，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好感下降了。这看上去似乎是，接连不断的互动和相互依存已经不能有效地减轻紧张和猜疑。

在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方面，美国人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但中国人自己也在努力应对这个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影响。中国还未调整其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愿意接受伴随国际领导地位而来的许多职责。普

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的政策和意图是温和的，他们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害怕他们。有关中国具有挑衅性和对抗性的指责被解释为破坏中国的声誉并遏制它的阴谋的一部分。

此外，在未来几年，中国强大起来，美国变弱一些，人们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两点。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认为，“中国要么即将取代，要么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而且，皮尤世界民情项目证实，“这个观点在西欧尤其普遍”。因此在2011年，欧洲求助于中国解决其经济危机，而不是求助于美国。在20世纪，经过二战浩劫之后，华盛顿利用“马歇尔计划”帮助重建欧洲。然而，今天，欧洲人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帮助他们。

中美关系很少可以说是好还是坏，总会有乐观主义者歌颂新的亲密性、更广泛的合作和共同利益，或者悲观主义者警告脆弱性、仇外心理和孤立主义。甚至在中美两国更好地相互理解，更需要对方的时候，根本性的战略和经济差异仍然存在。美国将仍然是亚洲重要的参与者，拒绝有些人提出的建议——“华盛顿读一读长城上的文字，开始减少在亚洲的存在”。无论是中国超过了美国，还是美国维持了其影响力，在今后几年，这两国都将占据主导地位。美中关系的进程曾多次被中国的弱点和力量塑造，这就是未来以及过去的现实。

第3章

中国的崛起、美国及自由世界秩序的未来

约翰·艾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中国和美国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是世界政治的核心——但是中国正在奋起直追。如果近期的发展势头继续下去，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早会在2020年赶超美国。目前，中国是多数亚洲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商机、进行投资。尽管中国的军力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在几个世界大国中，中国军力的发展是最迅速的。美国依旧是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中国则是唯一一个可能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并对其构成挑战的新兴大国。不夸张地说，相比其他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更可能决定21世纪的世界政治走向。如果中美两国陷入地缘斗争、军备竞赛或是零和对抗，那么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将岌岌可危。中美若能求同存异，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领域找到更广泛的共同语言，那么亚洲，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前景都将得到增强。

那么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将会呈现何种态势？这一问题涉及两个大国逐步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中国同二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带有自由倾向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作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一直游离于美国所领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之外。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呢？中国是会选择融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还是会寻求改变？中国的崛起——广义上是亚洲的崛起——预示着一种非西方的、对抗性的世界体系的出现，抑或仅仅意味着一群新的利益攸关方试图在现有的世界体系内寻求更大的权威和领导权？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全球体系内的实力和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实力重新分布之后，全球政治秩序将何去何从仍未可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会接受现有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核心特征，还是会寻求新的规则和制度？

显然，很多学者认为前路荆棘丛生。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转移——正如当前中美之间的情形——充满危险。一旦权力转移，西方与亚洲大国兴衰交替，那么稳定的秩序将受到考验。缺乏安全、竞争和冲突——即便在全球权力变动并不激烈的时期，这些因素也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话题——将威胁旧有秩序的稳定。美国将感受到崛起的中国带来的威胁，而中国也将更大胆地将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和领导力。除此之外，中美关系将日益呈现对抗性，而世界将变得更加无序和分裂。这些现实主义者的论调会有多大的可能成为现实呢？

本文认可现实主义的这些论断，但将以自由国际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它关注的重点是通过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和外交接触塑造中美关系、加强稳定与合作的方式。本文并不会无视对抗和竞争的现实根源，但是会试图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那些力量的对抗及压力，通过这样的视角能够清楚地判断国际层面的积极因素，以及能够缓和两国全面敌对和安全竞争的条件。这样的视角同样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共同的弱点、规范制度和

外交来影响和限制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还会关注全球自由秩序是如何为中国崛起以及国家兴衰和规则斗争营造时代背景的。

对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观察家往往关注的是中国本身。中国想要什么？它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将怎样把实力转化成目标？这些都是“由内而外”的问题。但是也可以反过来问：现有的西方自由国际制度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会在限制和影响中国的选择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存秩序的吸引力是什么，对它的阻碍又有哪些？这些就是“由外而内”的问题了。崛起的国家会试图重塑国际秩序，但同样，崛起的国家也会发现现有的国际秩序也在塑造和制约着它们自己。

在探究中国的崛起将如何影响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我也在关注现有秩序会如何影响和引导中国的崛起，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我认为，有理由相信，现有秩序能够对中国的崛起施予广泛的制约和影响，也能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相比以往的崛起大国，中国所面对的“旧有秩序”大不相同。相比先前的国际秩序，现有秩序的制度更为牢固，功能更为明确，同时全球化的水平也更高。这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秩序，可能对中国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中国可以看到它的吸引力、好处和机遇，这些都会鼓励中国进一步融入现有秩序；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影响广泛、根深蒂固的秩序，要削弱或规避它难度不小，这使中国很难反对这一秩序，或提出一个替代方案。

我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比很多观察者所认为的更为持久。中国和其他崛起中的非西方国家并不会无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式的自由秩序的敌人。实际上，这个秩序所蕴含的很多理念既是西方的，也是全球的。现有秩序的替代方案恐怕并不存在。简言之，在过去美国主导的半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规则、制度和关系网仍将构筑通往未来的道路。美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终结，其权力和权威也会在全球体系中转移。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理念、能力和动机去摧毁现有秩序转而建立新秩序。

在本章中，我提出了五个观点。第一，我提出了一种思考中国崛起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方法。将这样的权力秩序大转移看作“权力转移”是十分有用的。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崛起、赢得战争并建立国际秩序，而后又开始衰落并受到寻求统治地位、重建世界秩序的新崛起国家的挑战。然而，国际秩序的特征纷繁复杂，因而权力转移的逻辑也是如此。在对国际秩序的描述中，区分不同层次是很重要的。而对于现代国际秩序而言，其最深层的基石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由国际秩序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该秩序是开放的，且至少是松散地基于规则之上的。这一秩序本身可以也确实有不同的特征。在该秩序中，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组织也许将渐渐消失，但一些更广泛的组织规则和原则将得以延续。

第二，现有的国际制度是一个规模巨大且十分强大的体系。这与之前的崛起大国所遇到的国际秩序大有区别。现有的秩序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进一步，整合度更高，也更加制度化。同时它扎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中。崛起的中国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和西方，更要面对一个规模巨大、分布广泛且仍在不断扩展和整合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全球体系。这一秩序不仅仅同美国的权力相关，而且植根于现代国家体系以及不断扩展的自由民主和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规模甚大、范围甚广的全球秩序为“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的兴衰等简单的概念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

第三，当下的世界秩序并不仅仅是二战后确立的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它应当被视为两个长期而渐进的“世界秩序建设工程”合力产生的结果。“工程”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历经500年发展和演进的现代国家体系的规则和制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家独立和主权至上、不干涉、自主决定等原则。另一个“工程”与“自由的崛起”有关。它是自由民主历经200多年从弱势和边缘地位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其间，这些国家不断努力以建设开放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长期以来，这两项“工程”合力产生了一个复杂和根深蒂固的体

系。

第四，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进入这个秩序——且将进一步融入。中国支持主权原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参与这一秩序——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令它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其吸引力。开放性使它们能够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并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规则以及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框架使它们在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并与贸易歧视作斗争时，能够得到应有的权利和保护。自由国际主义原则下建立的规则和制度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方便它们获得影响力，并在国内外获得正当性。

第五，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是不能持久的。替代方案会是怎样的？谁又会加入其中？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中国本身并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方案。所谓的“北京模式”也许能在特定团体、势力范围和重商主义国家间建立起来。但这样的秩序是不自由的，而且这一秩序的开放程度和规则基础会减弱，国家间的关系将是这一制度中的主导性因素。不过如果这一秩序在全球范围内运行，那么它将不能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北京模式”难以提供世界经济得以照此运行的一整套理念和原则，它是一个需要在自由世界体系之中或围绕该体系才能运作的模式。

总而言之，这些观点说明，中国终将发现它是在现有的秩序内崛起的，而不会在崛起的同时挑战这一秩序。中美之间将为权力和影响力展开竞争，但是它们的竞争会在自由的和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体系所塑造的大环境中进行。大国——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将会继续崛起或衰落，但现有秩序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牢固，任何国家——即使是强国——都不可能操控或颠覆它。这一结构性背景将塑造并制约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美关系的状况。

权力转移与自由国际秩序

全球的权力分布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中国连同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获得财富和权力。物质实力的分布也已经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曾具有所向披靡、史无前例的实力。但时至今日，这一单极的权力分布正在被侵蚀。权力的分布变得更为分散。权力分布的渐变过程常常被描述为“向多极化的回归”。一些人仅将多极化简单地视为世界权力体系向着非集中化方向的发展过程，另一些人则将多极化视为具有竞争力的“极”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在亚洲，地区性的权力转移也在发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力量、前沿部署的军队、同盟协定和贸易投资关系使美国与东亚国家紧密相连。美国是该地区霸权秩序的中心。美国在此出口安全，进口商品。而中国则多数时候游离于在这一地区性经济和安全秩序之外。现在，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已经出现，这一体系甚至具备了地区均势体系的潜质。这是双重转移。东亚的地理空间已经将印度、澳大利亚甚至美国包含进去。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增长，该地区的多极化趋势正在增强，霸权色彩则在减退。权力正在发生转移，该地区内的政治关系也在变化。

很多关于全球权力转移的论述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时代将要过去了，而权力的转移则会使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发生变化。随着权力向其他国家转移，围绕美国的权力而构建的“政治架构”正在崩塌。鉴于此，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的全球性对手正在崛起，并在制订改变秩序的计划。美国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实力最强的国家，并凭借这样的实力建立了国际秩序，该秩序反映了美国的意志和利益。如今，随着其他国家实力渐强，它们将寻求机会重建这一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以反映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在这些论述中，现有的斗争是在崛起的中国与衰落的美国之间展开的。随着美国实力的衰落，中国将对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制度提出新的设想。美国牵头打造的自由规则和制度恐将受到中国的挑战。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对各国赖以运行的“政治架构”的斗争。而政治架构实际上反映了领导者的价值观和利益。当权力从一个旧有大国转向一个新兴大国时，国际政治的政治架构也会发生变化。当中国逐渐强大，其重塑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意愿和能力也将大大增强；美国则将抵制这些变化，于是中美之间便会出现冲突和斗争。

这些有关单极体系衰落、中国崛起以及世界秩序新斗争的争论背后的理论是霸权主义和权力转移。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国际秩序的兴衰提出了经典的现实主义解释。在他看来，全球体系可以被视为历史循环的结果或者是一段段被大国战争分割开来的时代。战争摧毁了旧有秩序——实际上，战争本身已经说明了旧有秩序的失败。成王败寇，权力分布发生转移。新的大国或者国家集团达成和解，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吉尔平说，这些周期性的战争“解决了一个问题：谁来支配体系，以及哪些理念和价值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如1945年那样罕见的时刻，有关谁来指挥、谁将受益这些基本的问题被摆在世界外交的谈判桌上。世界秩序中的制度和规则就这样被敲定了。

这么说来，谈到国际秩序——其兴起、衰落和在特征上的变化——人们都着眼于国际关系的组织逻辑。国家的特点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在该体系的规则和规范中得到界定并扎根其中。国际秩序为很多重要问题提供了既定的答案。国家间的权利和权威是如何分布的？如要促进合作、集体行动、解决冲突、避免战争，那么可遵循的规则和制度又是什么？一般说来，国际秩序是一种功能性的政治秩序——无论它多么原始，多么基于权力，这种秩序都会建立国家赖以互动的规矩。

对秩序的产生和变化的讨论——有关中国的崛起会对国际体系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催生了一些想法。首先，对霸权和权力转移的争论都看重国际秩序——其稳定性和特征——同某个特定大国的关系。这有两层意思：其一，国际秩序的兴衰同起主导作用的国家的兴衰相关。一个强国崛起并创建了国际秩序，那么这个秩序的命运就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这个国家衰落了，那么这个秩序也将终结。其二，最终的国际秩序反映的是主导国的利益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和巨变之后出现的强国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原因，它想要建立一个反映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秩序。

第二，国际秩序的性质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是相对开放且基于规则之上的。国家间基于互惠基础上的贸易最能体现它的开放性。规则和制度——多少是独立于国家权力——作为管理机制而运作。一个理想的自由秩序能够为各国创建一个可参与互惠和制度化多边合作的基础。自由秩序同封闭的、不在规则基础之上的秩序——无论是地缘集团、排外的地区团体，还是封闭的帝国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自由的国际秩序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它或多或少同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规范和制度相关，或多或少是开放的，基于规则的，能被制度化的，也或多或少是全球性的并按等级划分的。

最后，我们可以对国际制度中权力和地位的分布以及秩序中的基本规则和组织原则加以区分。在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下，美国是霸主，它有权利和义务来组织和经营这一秩序。美国也提供了公共“商品”——如开放的市场和安全，而其他国家则与美国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自由国际秩序变成了其领导之下的自由霸权秩序。这一秩序划分了高低贵贱，并听从华盛顿指挥。但是，自由秩序的霸权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它正在迅速消失。这一秩序中的权利与权威正在重新被分配，其他国家则趋之若鹜。但在自由国际秩序内部，争夺领导权和权威的斗争应该同另一场斗争区别开来，即对这一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深层逻辑和特征所展开的斗争。

对中国崛起以及自由国际秩序的命运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关键在于当下对于国际体系支配权的争夺，其性质是关于权利和权威的斗争，还是一场关于世界秩序的深层原则和规范的斗争。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国际制度的每一个层次都进行细致的观察。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自由崛起

中美两国不仅视对方为崛起或衰落的大国。两国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背景，它塑造和制约着中国的崛起和受此影响的中美关系。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不仅面对着一个“美国领导的秩序”和一个“西方体系”，还面对着一个更为深远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是数世纪的斗争和改革的产物。这个秩序已经相当成熟，影响广泛，高度整合和制度化，并且来源于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它所具有的特征使其更加完善和持久。它可以同化崛起中的国家，并调和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而蕴藏其中的是一些有望遍及全球并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今天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二战之后美国领导下的产物，而是两项历经多个世纪的“世界秩序建设工程”合力的产物。其中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现代国家体系的创立与扩展。这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其中，各国确立了有关国家主权至上和大国领导的规范和原则。另一项“工程”则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引领下的自由秩序的建设。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在20世纪开始占据世界舞台的主导地位，因而这项工程也被推向前台。在许多事件、阶段和历史转折点，尤其是战后的调停和重建时期，都能看到这些有关秩序建设的“工程”。这两项“工程”也在共同运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着力于解决一些现实主义关注的问题，如在无政府状态下创建稳定的、合作性的国家间关系；而“自由秩序建设工程”只有在大国关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规则和制度使主权国家体系更具凝聚力。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国家主权至上和大国间的关系，其建立的标志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但是其中的规则和制度在此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而该体系的诞生地当然是在西欧。当时的强国、帝国和神权国家在西欧争夺主导权，通过战争及和平协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和制度方才建立起来，并开始逐渐发展。这一系列过程导致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大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规则和规范架构下竞争与合作。在此背景之下，国家的平等与独立，并对其国内的民众和领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

几个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发展为一整套原则和实践，并从欧洲扩展至全球，国家也由此获得政治和法理上的权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反映了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国家是建立合法统治最佳的政治单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发展出的原则和规范——如自决和非歧视等——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这些概念和原则已经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组织逻辑，并为体系中的政治权威提供了概念依据。在主权至上和民族自决的大旗下，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反殖民和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尽管有人违反或罔顾威斯特伐利亚的规范，但它们仍然是现代最突出、最受认可的规则和原则。

接连几次战后协定——1815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也为大国提供了一些机会，去发展那些能够塑造和更新大国关系运转的原则和实践的。通过战争与协调、学习与适应，各大国在多极的均势体系下运行成为可能。这一秩序的本源仍然是大国间相互竞争和平衡的非集中的国家体系。不过相互竞争和平衡的实践和原则已经逐渐发展，并吸收了限制和调节的战略观念，这也为各大国——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崛起中的还是衰落的——提供了相互理解的机会和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经验。

建设自由秩序的“工程”随之跟进。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体现在英国所支持的自由贸易和海上自由方面，但它仍是有限的，并不得不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共处。到了20世纪，美国逐步推进自由秩序。一战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为建设以全球性的集体安全组织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而奔走呼号，在这样的一个秩序下，各国能够共同行动以维护和平。自由贸易、民族自决以及对世界在改变的观念都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观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一个“大同”的民族国家体系——各国在多边的法律体系内进行贸易和互动，并以此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但是这次创建自由秩序的实验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封闭的经济体系和帝国主义集团。

二战后，罗斯福政府同样致力于建立自由秩序，支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和一个能够使大国合作维持和平的世界性组织。战后设计秩序的美人从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借鉴了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 Period）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些更具雄心的有关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想法，这些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得以体现。这些想法实际上带有世界性，但是由于二战后欧洲的衰落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它们逐渐演变成美国主导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冷战开始后，美国接过组织和经营这一体系的重任，并在经济和安全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实际上成为自由霸权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

建设自由秩序的“工程”扩大了普世人权这一进步观念的影响力，使之被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吸纳。人权革命也在战后构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中生根发芽，此后一系列的公约和条约形成了人们对权利、个人、主权和全球秩序等问题的看法。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国家保护责任”的概念赋予了国际社会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这是从两个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秩序建设过程中发展出的众多理念、规范、规则及制度中的一个。

威斯特伐利亚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虽然始于西方，但是它们却不是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自由贸易、民主、主权和多边合作现已成为世界性的理念。比如，世界政治应当（至少是松散地）基于法治这一观念已经被绝大部分国家接受。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较量，有的行为体支持并希望扩展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而另一些行为体则希望在势力范围和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作性较弱的秩序。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地理意义上，也没有造成亚洲或者西方的分裂。实际上，对于这个松散地基于规则的秩序，在中国不乏支持者，而在美国也不是没有反对者。

二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确曾向全球霸主的地位迈进，承担了组织和经营世界体系的责任，并享受着因此而来的特权。美国主导着一个建立在多边制度、结盟、特殊关系和保护国基础上的广泛的国际秩序——一个自由的等级秩序。当这一秩序开始发生变化，秩序中的等级性开始褪去时，而自由的一面仍旧存在。因此，即使中国或者其他崛起大国可能同美国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当下在体系内一场围绕主导国家的权利、特权和责任的斗争正在进行——但更深层次的国际秩序仍然会保持其完整性。即便中国或其他国家有背叛自由的野心，它们也会发现，要颠覆现有秩序并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品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现有的多层次的自由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崛起大国颇具吸引力，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机遇，同时也激励着它们融入其中，并在体系内运作。这些激励和吸引力包括：会员优惠、发展机遇、制度性保护，以及信用手段。

激励非西方崛起大国加入自由秩序的一大动因在于，作为该秩序的成员所享有的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会员优惠”。自由国际秩序并

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简单集合。它是一个具有成型的规则和制度、能够促进合作和共同发展的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这一秩序可以被视为国际“互助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为成员提供资源和手段以帮助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球性政治社区或俱乐部。其参与者能够获得诸多好处，例如贸易机会、争端解决机制、集体行动的架构、结盟带来的安全保障以及发生危机时的资源和相互援助等。加入该秩序就意味着获得了这些资源、手段和安全保障，而游离于外则会处于劣势。

诚然，中国要完全融入现有秩序面临着一定的难度。中国并不是一个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并不会接纳它——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是中国已经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中国正在采取措施以便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2011年7月，朱民被任命为该组织的副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考虑在董事会中提拔一些来自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官员。中国同样寻求成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国，这样便可以获得在农业补贴、创新政策和科教项目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中国对经合组织的兴趣反映出融入自由秩序的诸多好处：积极参与自由秩序下的多边组织和网络能够增强中国治理经济的能力。

第二，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会有更多直接的发展机遇。这就是在一个开放和松散地基于规则的秩序中运作的好处。开放性使各国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并获取他国的知识和政治支持。中国已经深陷这一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尽管中国领导人试图刺激内需，减少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但是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依旧十分关键。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而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开放和稳定世界经济努力了数十年。美国、西欧、日本及其他国家依靠开放贸易取得成功，为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内部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参与这一自由秩序。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规则和多边合作框架同样意义重大。随着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不断发展，它们可能面临来自国外的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待遇。因此，反歧视、促平等的规则和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现有秩序下最正式、最成熟的机构，一贯奉行这些原则和规范。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争相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为了得到它所能提供的权利和保护。世贸组织的原则——反歧视、互惠、透明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能够有力地保障各国的利益，并保证贸易体系的开放。虽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贸易争端中有胜有负，但这一规则的框架对于中国等新兴国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自由国家希望世贸组织能够成为促使中国开放、更加透明和加强国内法治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希望世贸组织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制度化规则以减少对中国出口的歧视，同时扩大贸易开放。

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原则同样对它们的崛起十分重要。中国在地区领土争端和反对西方干涉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多次重申了主权原则——包括不干涉、自决、反歧视等。在反对西方的“国家保护责任”时，中国使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其他的规范和理念。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依然进一步融入了现有国际秩序中，而不是避而远之。在这一秩序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系列原则同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倾向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正是有了矛盾，才会有抗争。西方民主国家实际上也存在这种情况，它们的规范和理念也是矛盾的——比如社会公平同自由市场。二者都是具有合法性的规范，日常的政治活动皆与这样的“斗争”相关。

第四，现有自由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对中国和其他崛起国家而言，在展现承诺和公信力方面是有帮助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现行行政体有利于其领导人实现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但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和法治的政治秩序会阻碍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其他国家担心中国所作出的承诺有多少公信力——这会导致这些国家之间难以建立制度

性的联系。如果中国希望自己成为全球领导者，那么它就会主动呈现更多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更加开放并加强法制。在这个复杂的秩序之下，中国正在展现其和平的意图，它在暗示，自己并非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对它来说相当有价值的制度，让世界相信它是值得信任的，并且具备领导能力。

事态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中国试图把自己打造成负责任的、有影响力的大国，那么它就必须进一步向现有的自由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靠拢。有时，中国仅仅是防卫性地利用这些制度来保证主权和独立。例如，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使美国和西方试图在人道主义干涉方面取得联合国支持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有助于中国制造有关“国家保护责任”以及主权和不干涉等原则的国际讨论。一般来说，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国际制度的复杂和密集使中国很难从中脱身，也难以寻找伙伴共同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秩序。

总的来说，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崛起中国家未曾参与战后几十年自由秩序创立时的“大妥协”。但是它们有理由支持旧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它们的利益。它们希望得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主权的保护。它们对主权和大国的权威十分在意，而这些它们所在意的东西恰恰存在于现有秩序中。它们希望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得到保护——这些正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规则和规范。它们还希望将这种自由国际主义的规则和制度作为塑造自身影响力、获得国内外正当性的平台。

如果中国试图用它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实力去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并以完全不同的规则和制度取而代之，那么它将面临巨大的制约和障碍。实际上，这种努力是不现实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现存的

秩序已经根深蒂固。这是一个混合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自由的规则和制度的多层体系，也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秩序。它不是一个简单地同美国权力挂钩的政治架构。阻碍和限制中国推翻并重塑国际秩序的因素是多重的：中国“模式”难以作为一种全球体系持续下去；中国实行修正主义会导致“自我包围”；在现有的环境下，推翻旧制度的大机制——大国战争——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很多观察家常常谈及中国模式，最近的经济危机和经济低迷已经打击了西方经济体，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经受住了考验。正如中国学者王缉思所说，“在中国精英，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当中，广泛存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它有别于西方的民主和经验。与此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之后，却经历了动乱”。中国模式，或者说北京共识的特征，是构建全方位强大的政治领导，从而确保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这与那些出现“颜色革命”进而导致国家分裂、西方侵犯其主权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作为全球性体系，这一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个不用于现有世界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谁又会加入其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不同的秩序——“北京模式”——可以想见是建立在封闭的集团、一定的势力范围以及重商主义网络的基础上的。这可能是个不自由的秩序。它不那么开放，不那么基于规则，国家间的关系是这个秩序中的主导因素。但在全球层面上，这样的体系难以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北京模式能运行下去的前提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够侥幸利用开放的市场体系。一旦上升到全球层面，它就会瓦解。一个或几个国家可以利用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是当每个国家都这么做时，那么这再也不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了，每个国家都会因此受损。

中国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再是一个重建世界规则和制度的非自由的霸权国家。它只会游荡于自由国际秩序内外，投机取巧地寻求同资源出口国的交易。这样，中国和

它的发展模式才能成功抵制使之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但是如果这种模式并不能吸引其他国家，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要求它开放，并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事。这一论断已现端倪——2011年2月巴西总统罗塞夫（Rousseff）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Geithner）一道表达了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担忧。中国可以搭自由国际秩序的便车，但它会为此付出代价，而且，它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世界。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现有政权的正当性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就业来实现的，而非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支持中国崛起的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坦承，“中国在迈出允许人民选择执政者这一大步之前，不可能实现成为发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没有人知道中国离民主改革还有多远，但是来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商业精英和人权团体的压力会一直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尽管老牌和新兴民主国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民主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虽然民主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践，甚至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在国际舆论的大背景下，民主政府大体上被视为是恰当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都将民主视为恰当而公平的统治模式——这是其他政治理念无可比拟的。

第二，中国还将面临另一项制约，那就是“自我包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不得不重申它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行动了。在许多政治和军事领域，中国已开始参与地区论坛和制度，以便向邻国相信它抱持的是和平的意图。

中国已经意识到，它的崛起已经使邻国感到不安。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引发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强烈的制衡和“自我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表现得约束和节制。它会通过参与现有的地区性和全球性体系来释放这样的信号。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和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所说，“中国的领导层希望其他国家将其视为一个

和平、没有威胁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接受联合国宪章和2005年世界领导人峰会的成果文件等行为都说明，对国际形象的关注是促使中国遵守诸多国际秩序规范的重要原因”。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大国克制和调节的原则和实践对崛起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意义。如果中国希望使邻国确信，中国追求的是和平崛起，那么它必须进一步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中。

中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对现有制度——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及东亚峰会（EAS）——的参与度，或者与其他地区大国一道建立新制度。这也是美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所做的——建立多层次的地区和全球性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并在其中运作，让自己显得更加可预测、更具亲和力，从而防止其他国家结盟对抗或削弱美国。

最后，在当前环境下，中国会发现推翻旧有秩序的经典机制——大国战争——并不存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对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在于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旧秩序。二战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同时，当其他国家在二战后衰落时，美国却走向强大。战后的重要“契机”给了主导国家不同寻常且转瞬即逝的机会去重建全球规则和制度。但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契机”——因此中国利用不断增强的实力去重建全球秩序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大国战争的缺失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核威慑以及自由民主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核武器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力使大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它们不会遭到其他大国的支配和入侵，也使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不理性，因此也就更不大可能发生。核武器是把双刃剑，哪怕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力也会受到它的限制。美国或许可以被视为单极大国，但它也不可能发动对其他大国的侵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军事强国也许在物质力量和军费方面不及美国，但它们却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威胁，因为战争的威胁在当时是切实存在的。核威慑的出现消除了战争的可能，也使美国这样的单极霸权

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小了许多。大国战争不再可能成为推翻现有秩序的工具，如此一来，现状得到了巩固。美国成为核时代的霸主是十分幸运的，因为这会让妄图推翻美国领导下的秩序的强国处于劣势。潜在强敌经过利弊权衡会倾向于在体系内寻求改变。同样，大国的核威慑同样也会对美国的实力投射形成限制，这有望使现有秩序变得更加包容。核威慑消除了体系内的大国间战争、侵略和征服这些行为，而这类行为在历史上往往成为试图推翻秩序的诱因。

结论

未来几十年，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本章认为，关注的重点应是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所领导的战后自由秩序之间的关系，这是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最关键的因素。美国和中国会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展开斗争和竞争，但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决定两国全面关系的是中国将加入现代世界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中，还是会加以反对。中国会融入这一套复杂的规则和制度，并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吗？还是会建立不同的规则和关系，打造一套修正主义视角的全球秩序？

我认为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崛起国家正在寻找参与、融入这个秩序的动力和机会，以此来推动和保护自身利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主权的规范会成为中国和其他崛起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贸易和发展离不开一个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为非西方崛起国家提供了一个制度的平台，以便于它们获得影响力并构筑自己的权威。崛起中国的未来之路必将经历几十年来，甚至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

在关于中国的崛起会对中美关系和现有自由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实力。但很

少有人关注自由秩序自身的复杂逻辑和特征。这一秩序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界秩序”，它是凭借美国的权力建立起来的，并仍将受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但是这一秩序有其“半独立”的基础和逻辑。它比以往的制度更加广泛、更加制度化，作用也更大。中国要面对的不仅是美国和西方，更要面对已经全球化的现代性本身。

现实主义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看法相当引人注目。美国不但希望保护自由的国际制度，还希望维护它在其中的地位。中国崛起后便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同时也会在东亚和其他地区——如南美、非洲以及中东——寻求扩展影响。一旦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强国，那么一场中美之间的激烈斗争就会出现。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中美冲突有两大动因。其一，随着中国的强大，它会希望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一个更强势的角色，也希望以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方式重建规则和制度。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所作所为。其二，面对中国的进步和挤压，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会越来越不安，因此，美国会增加其在亚洲的力量投射、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随之而来的便会是地缘政治冲突。

毫无疑问，正如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会引发紧张和冲突。但是现实主义者的解释忽略了现代国际政治的其他特征。中国和美国不仅是潜在的对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很高，也都依赖于开放而稳定的世界秩序。对那些希望成为唯一的世界领袖的国家来说，它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零和游戏。彼之所得便是己之所失。二者皆不能称王。但是，对那些需要一个合适的国际环境——包括规则、制度、伙伴和合法权威——来发展和保护其利益的大国而言，它们不会陷入零和游戏中，而是可以实现双赢。自由主义的观点要求人们全面看待问题。既存在由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和竞争结构导致的冲突和猜忌，也存在着因相互依赖和共同弱点而产生的稳定与合作。中美关系取决于这两个大国如何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寻找航向。

第4章

现实世界中的中美关系

阿什利·特利斯 (Ashley Tellis)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一直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技术现代化使中国国力急速扩张，中国如果这样持续发展下去，最终可能会超越美国。而且这种超越尤其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统计数字上。因为这种权力的蚕食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国际政治范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衡量一国国力最简单和最容易识别的方法。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旧时代的回归。

中国也许正在取得上述成就，这进一步使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成为可能。所谓“权力转移”，即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逐渐被新兴的中国代替。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是围绕着现有霸主的利益和价值形成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现存的大国将不断遭受相对力量上升的、不满足现状者的挑战，于是构成了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并不盲目坚持这种理论，但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关键的现实主义视角，那就是，在国际政

治中重大的权力转移时期，紧张局势和安全竞赛难以避免，因为现有的国际体系领导者和新兴力量都在努力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

本章试图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中关系的结构特征。在本文中，政治现实主义是指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即政治是基于对安全不断渴求，围绕权力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斗争。虽然国际政治学范畴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包括诸多范式、方法和公式，但是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

即政治行为体如何在普遍存在利己主义和永远存在的被伤害的可能性的环境中寻求保护自己。利己主义的存在意味着所有实体只重视自己；诸多利己主义行为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局面是，每个行为体都试图限制其他行为体的安全、自由和野心；而竞争则使每个行为体不断地与其他行为体发生冲突，以保护自身权力、提高自身安全。因此，现实主义认为政治主要就是冲突中的相互作用。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拉卡托斯的术语中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个“研究项目”，而不是一个单一理论。其形而上学的核心集中在“无序的人性观”这一概念，其“正面启发”包含各种公式或理论，假定在混乱中创建出来的秩序在社会、政治和国家关系中如何表现。

因此，最早的现实主义流派，或者被称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流派在理论分析的单位方面是折中主义的：不仅仅只关注个人，还关注社会的整体，如王国、共和国，或更大的国家系统，这取决于利益分析的直接对象。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现实主义出现了两个派别：以修昔底德、考底利耶、马基雅维利、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有资格被分为这一派）和摩根索等为代表的世俗派，和以奥古斯丁和后来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宗教派。

然而虽然这些人构成了不同的现实主义派别，但是他们都相信，人类的无序创造了社会的冲突，只有规定各级政治活动的秩序的政治统治才能对此加以解决。

现实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结合颠覆了现实主义传统。在系统论逐渐式微后，主流现实主义者将结构主义纳入理论系统，试图模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宏观历史分析以揭示现代历史的周期性趋势。但是这两个学派在关注国家间关系之余，却舍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人类社会对秩序的创造。因此，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强调在权力平衡中无政府主义和两极化的相互作用。而宏观历史学派，以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和奥甘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将霸权视为竞争激烈的国际政治中自然平衡的结果。

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所有现实主义者享有以下共识，即在政治行为的竞争性环境下，实力是利己的行为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决定手段。现实主义理论不同流派的分歧首先在于行为体的动机问题：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自私自利的举动是基于人类对安全、权力或荣誉感不断追逐的本质，而结构现实主义者则将这种行为视作国际体系结构的产物。传统现实主义者无须与结构现实主义者在此方面一致，后者对社会科学的偏狭研究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作出最狭隘的假设——国家行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保护。

在追求安全方面，针对国家如何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生存这一问题，现实主义内部产生了第二点分歧。如果在以情境逻辑来模拟基于最少假设的、任意国际政治层面上的自然竞争，就有可能证明，追求统治的驱动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竞争的自然结果。这一结果产生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宏观历史学派的一致性，也暗示了，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安全变为了一场零和游戏，而所有的理性国家行为体都试图追寻权力最大化。

另一方面，对立的观点认为，权力最大化并不等同于安全最大化，因此国家行为体的意图至关重要。一个国家是当前的权力所有者，该国家寻求颠覆国际体系，以及为解除安全困境将其意图示意给其他国家的能力，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的可靠性，依赖于为缓解自然冲突而引入的其他变量，比如攻守平衡、区域地缘政治等。随之而来产生了与现实主义传统相比较，更肤浅和更乐观的偏狭结论。

无论主流现实主义者的理论如何不一致，他们都会同意，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美关系将遵循自然、竞争的进程，他们的分歧只在于这一进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放缓或改道。日益增强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争论在于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本章的分析中所引用的“安全竞争”一词的定义主要来自传统现实主义，尤其是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定义，同时采用理性主义的逻辑，将竞争与对抗视为行为体寻求安全和政治独立最大化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这种意图的唯一结果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不断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争取统治权力，因为安全就像权力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总是相对的。这种观点在托马斯霍布斯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准确的分析。由此，本章对于中美关系的评估将坚持认为，中国实力的不断扩张将加剧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为美国带来复杂的挑战。因为中美政府的互动行为将自然产生一种对抗和竞争，而这种对抗与竞争则会带来国际体系的紧张，并以不同的方式考验着每一个体系内领导者（以及它们的同盟和中立者）。

中国独特的崛起及其对竞争的影响

与其他现代时期大国的崛起相比，中国的崛起非常独特。15世纪后，主导西方历史的大部分国家通过在本国外的军事扩张和本土内自

给自足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实现国力的增强。这些变化通常伴随着人口的显著增长、推动全球经济中新主导产业产生的技术创新以及政府能力的提升和政府—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政府不断向社会渗透，并且以国家目的为名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革命性的发展充满了“战争制造”和“国家制造”的辩证，因为残忍的国际政治要么推动国内创新、深化国家权力，要么就是国际政治自身的变化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种实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为冲突和领土扩张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虽然是整个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与其他国家的崛起不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二战后美国霸权主义带来的好处。因此，中国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战争来推动经济扩张。而中国的飞速发展，无疑需要一个成功有效的“国家制造”方法。身处在美国维持的更大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可能并不需要像以前那些崛起的大国一样走自给自足的道路，而是可以利用国际贸易体系的相互依存性。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美国为保持它的开放性而投资慎重。

美国在二战后为创造自由市场体系所作的努力是基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动，与中国无关。诞生于本国国内经验的自由主义信念认为开放的贸易体系通过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为促进全球繁荣和世界和平提供了最好的策略。

而现实主义者的算盘，在来自苏联的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也归于一点，那就是，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即使一开始是不对称的——因为为了支持朋友和盟国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更好的经济基础，美国不仅提供了经济援助，还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这种投资使西欧复苏，同时还创造出亚洲第一波的成功，如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较小的东南亚国家的早期复苏。

虽然这些盟友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是却有助于推动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宏伟战略目标——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年中，美国对吸纳中国融入这个遏制系统采取了试探性的步骤。这方面的努力是由需求激发出来的——两国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它们感到莫斯科在欧洲、非洲和亚洲都展现出挑衅的姿态，它们需要遏制这种态势的发展。那时冷战是否会以西方取得绝对胜利的结果和平结束尚不清晰。

随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经济改革（这使得对外贸易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冷战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美国开始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支持北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诉求以加强双方的关系。其物质能力的恐惧重重地压在美国决策者的心头。对传统现实主义者来说，第一个问题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相信，国内政治影响外交政策。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各行各业的现实主义者最容易理解的。然而，为避免在是否应该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身份这一问题上年复一年地激烈辩论，克林顿政府最终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从而为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

因此，毫无疑问，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有侧重的政策选择帮助了中国的国力增长。这一赌注非常成功，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惊人增长已经使数百万中国人脱离贫困，为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贡献，为美国巨大的贸易和预算赤字创造了稳定的金融来源，并且在亚洲大陆，聚集了一大批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制造、贸易和金融网络。

相应地，亚洲经济奇迹又迎来了第二春，但是这次与亚洲第一次经济腾飞有一个显著不同。在第一次亚洲经济腾飞的时候，遏制苏联扩张的政治需求恰好与加强盟国和中立国家经济联系的渴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牺牲美国的部分经济利益。但是中国的崛起好像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的持续繁荣有赖于它对国际经济的参与，而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另一方面，中

国频频卷入与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一些其他邻国一样）的摩擦之中，而且对美国这个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越来越构成军事威胁。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是由下面这一尴尬的现实所带来的：美国支撑的国际经济体系在为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一现象在现代史上非常奇特：虽然在一战前也曾经有一些类似的现象，当时英国和德国发现双方虽然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但是经济往来却把它们捆绑在了一起，但是现在，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今时代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凯瑟琳·曼（Catherine Mann）在另外一个场合很巧妙地将上述现实形容为“全球共依存”。这个词将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刻画了出来。最关键的是，它并没有消除深层地缘政治对抗或者是紧张的军事竞赛的可能性。一战的经验 and 当代政治显示，虽然国家之间有经贸往来，但是一国一定会，而且将会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因为安全方面的竞争意味着国家和政权的存在，从这方面来讲，经济往来与其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

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表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会因为经济上依赖中国而放弃追求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样，当如防止台湾独立等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处在危急关头的时候，不管将会如何影响与美国的贸易，北京也不会放弃诉诸武力。因此，可以预见，不管在经济上如何互相依存，即使在枪口威逼之下中美双方都会追求自己的核心战略利益。如果目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下去，双方无疑将会小心避免因一时冲动带来任何商业破裂，但如果对方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挑战，任何一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关系放到一边。

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中美安全竞争

虽然中美关系将继续展现出固有的矛盾，即北京的崛起是基于华盛顿资助的国际秩序之上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最终成功目前尚不能确定。事实上，中国很可能将无法维持其史无前例的高增长率，有以下几个原因。

新古典经济理论表明，增长最终来自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革新。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发展奇迹部分是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50%的高国民储蓄率所驱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发展速度很可能被社会老龄化、脆弱的国家社保体系、危险的金融系统以及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牵制。所有这些因素联合起来就可能抵消过去几十年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本积累速度。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威胁到其劳动力增长的能力，因为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正好和抚养比率（包括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在内的非适龄劳动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在同一时间增长一倍。

而中国在有限的领域——显而易见，尤其是经济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创造新的主导产业中拔得头筹，而创造新的主导产业才是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动力。

把这些因素考虑在一起，那么，即使中国将继续在相对一个时间段内持续发展，但是这种不正常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能长期维持，最终完成真正的大国权力转移，超越美国。

因此，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因为中国崛起是否能够持久而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即使由美国承销的开放的经济秩序能够毫发无损地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可能也不会发展出它寻求的“综合国力”——这是任何大国都必须具备的。即使中国能够成功地稳步扩大国民生产总

值（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人均收入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几十年。因此，从严格的权力转换的角度来看，北京甚至不能被视为一个名义上的挑战者。因为在很多权力转换理论家的眼中，人均收入是衡量的标准，而且这种观点是合情合理的。

即使把这种狭隘的概念问题放在一边，仍然有很多理由相信，虽然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将持续增长，但是在国力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中国仍和美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未来某个时刻超过美国，也几乎可以肯定，它仍然缺乏美国国力的标志——无所不包：经济实力是以普遍实施的国家福利来衡量的；军事能力使美国可以在离本国国界很远的地方仍然具备持续使用武力的能力；拥有基于相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强大盟友网络，由此具有地缘政治优势；国际上对其文化和社会的崇拜而带来的心理影响；最后，在全球体制中的机构能力使其政治影响力得以保持和提高。

然而，中国虽然在国际体系中离威胁真正的权力转移还很远，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之前中美关系就是和谐无比的。相反，它们转向敌对并不是因为权力“一定”会转移，而是因为权力“可能”会转移。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指出并详细说明的，自然状态的竞争不一定是因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的险恶用心，而是因为他们意图的不确定性使得只能通过权力的获得才能减轻对抗。在霍布斯澄清这条社会竞争的微逻辑之前，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分别展示了，如果必要，所有的政治实体，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在竞争性的政治环境中都会持续、无情地寻求统治地位，如果没有任何惩罚，仅仅因为环境允许，它们就会尽自己所能寻求权力扩张。

具体到中美关系，这个竞争的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利益至少有时是相交的，如果不是直接相悖的话。尽管两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加，但是崛起的中国力量也日益带来抗衡压力，美国

要维护其霸权地位。中国，最起码，旨在维护其领土完整和全面提升国力。虽然这些日益增长的物质能力会走向何方尚未明确，但其破坏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可能性恰恰造成了修昔底德所预期的——“霸权的较量”即将到来。

即使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可以避免真正的权力转移，中美两国也会在下面三大领域遭遇日益激烈的竞争：经济关系、军事行动和地区地缘政治。

不可否认，美国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了良多的经济利益。大多数决策者都清楚地了解，在过去二十年间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与不断扩大的中国经济紧密相连。201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457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进口货物的最大供应商。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不可否认。即便是中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也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商品提升了竞争力，无论是在本地消费或转出口。此外，在最近几年，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为美国巨额的预算赤字提供了资金。

尽管有这些好处，但是在美国，有一种恐惧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在削弱美国的利益，造成产业空洞化和本土失业率增高；与此同时，在高科技方面中国也日益成为竞争对手。关于产业空洞化和失业率的争论非常复杂，但在其最简单的版本以如下形式出现：中国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产品，然后自由地出口到美国，其结果就是破坏传统制造业，随之带来不可逆转的就业机会损失。虽然廉价的中国产品可能有利于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公民，但是进口会损害他们作为雇员的利益。如果美国公司希望有效地与这些低成本的中国产品竞争，他们或者可以将其制造业务搬到中国以享受便宜的劳动

力，而这将造成美国国内失业率攀升；或者可以降低本国劳动力的工资，这样就能保住他们的工作，但是会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

无论哪种方式，简单的产业空洞化文章都辩称，扩大的美中贸易使美国从中国进口额上升，削弱了美国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一旦缺乏就业机会，就不能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带来的好处。这种说法迅速变得复杂起来——制造业萎缩、薪酬萎靡已经困扰美国的中产阶级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强有力的出口得益于各种不公平贸易，如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国内保护主义和各领域的倾销。

毫无疑问，多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稳步下降，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否都可以归结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因为对贸易依存度的增加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似乎是美国在该领域成果丰硕的增长所致，而作为就业机会提供大户的制造业本身的长期衰退是同科技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关的。

虽然最后这个事实确实意味着，至少有一些美国制造业的损失可能与中国的内部变革和不断提高的出口效益有关，但总体而言，这些损失一般应该可以被其他领域的就业机会抵消，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经济是增长的。

但是有证据显示，美国持续增长的进口即使不会引起国内失业率增高，其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纺织品、服装、皮革及相关产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电气设备和电器等领域在制造和就业方面蒙受损失，后果比较严重，因为它们会影响一些关键的选区，这在美国政治中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学术经济学家能够具有说服力地证明，这些部门的损失（在任何动态贸易体系中都可能发生）并不能归因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而且就整体而言，它们总是

能够从国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和优厚的福利中获得补偿。但是这些结论并不能够化解这一政治体内居民的焦虑，也不能完全抑制美国领导人通过对中国采取政治行动以减轻经济损失的举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很容易理解这一行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国内的权力斗争与在外部寻求安全两者紧密相连。不出意外的话，在美中关系中经济优势的问题仍然会一直富有争议，而且这一争议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而愈演愈烈。

虽然从贸易中产生的非工业化问题会被变化的相对优势所带来的痛苦抵消，但是，各行各业的现实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美国主导下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可能会使中国成为先进的技术竞争者，这是一大威胁，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这种上升可以通过以下很多种途径实现：从美国、北美、欧洲、日本高科技进口贸易的增加；美国（或西方）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华设立研发和制造中心，或者将西方、美国先进的研发、制造中心移到中国；中国购买或投资美国（或西方）的高科技公司；作为对中国投标商业反馈的一部分，美国（或西方）将高科技转移给中国；中国合法购买到高科技产品后，为了研究其构造、功能和运作方式，拿出一小部分并将其解构。在开放的贸易体系中限制中国获得高科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但却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这是名义上的权力转移和成为现实的权力转移的根本区别。

近年来，对目前的贸易体系如何支持中国进行技术转移这一问题的担心与日俱增，因为上述渠道中显现出来的小支流已经汇集成了河流。例如，2010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定义，是指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电子、软件、信息和通信、生命科学、核技术、光电子以及武器）占美国出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不算上香港的话，美国是中国大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客源。美国和跨国私营公司都在推动中国非凡的技术迅速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大多数全球500强公司都在中

国有投资，其中包括以领先创新先进技术闻名的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索尼、波音、松下、西门子、东芝、英特尔、柯达、惠普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

根据中国国家法规，大多数上述公司至少将它们业务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合伙人或大学建立合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或大学往往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或负责的。

在今后的几年里，即使中国希望寻求特定的先进技术，即使美国还在致力于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制，但是其对技术转移的控制将会成为两国竞争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考虑某一特定贸易争议带来的好处或者整个贸易扩大带来的利益，中国对制造业主导权的日益增加也会继续使美国的神经紧张，因为它会由此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脆弱性。

美国国内用一致的内部平衡把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和其他竞争中与经济有关的部分放在首位。这将包括：更好地管理国家支出，投资新科技革命，如3D制造业。如果这些方法取得成效，近期权力转移的危险就解除了。但是如果这些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中国能获得什么好处的争论只会愈演愈烈，勾起另外一件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开放的贸易体系真的能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服务吗？

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挑战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现在，在军事领域又渐渐产生了新的令人不安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已经影响到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他们完成现代化后，将会破坏亚太战略稳定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当美国的盟友受到外部威胁时，美国有能力畅通无阻地协助他

们。

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安全系统往往被称为“轴辐模式”，但其潜在的战略概念被乔纳森波拉克更好地捕捉到了，他将其比喻为“执牛耳”。这个比喻说明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能够对另一国家造成严重战略危害的武器，而唯一拥有这样能力的外部实体，即美国，缺乏滥用它们的动机，因为它要将自己的力量为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执牛耳”的策略从而利用了美国距离东亚遥远的事实：它将美国置身于一个没有威胁的角色，它依靠前沿部署力量成为外部保护者，由此降低了该区域国家获得任何军事能力的动机，而这使它的保护任务要么更具有强制性，要么更困难。

美国军队在亚洲沿海地区周围活动或者是致力于这一地区是这一战略的关键，因为，一方面他们要防止任何其他国家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区，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创建了该地区的秩序，避免该地区内的国家为了安全问题单方面轻率地消耗资源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队的超级战斗能力的存在实际上是为所有该地区的国家提个醒：任何想在该地区当霸主的企图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最终是徒劳的。如果有哪个国家胆敢挑战这一信息，美国前沿部署力量就会立刻成为支持其该地区盟友防卫的工具，如果需要的话，还将会成为实施更大规模遏制战略的工具。到目前为止，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为亚洲经济奇迹般地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亚洲各国得以不搞军备竞赛，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却成功地“执”亚洲之“牛耳”：它阻止了具有威胁性的地区霸权的崛起，避免本地区危险的、可以带来潜在战略后果的军备竞赛，为经济可持续合作创造了积极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前沿部署力量和美国军队前沿运作在保护其亚洲盟友和亚洲沿海重要中立国任务中从根本上未受到挑战。

但是，中国最新精心部署的“反接近和区域封锁”能力将会从根本上威胁到美国的主要海上机构和与它们相关的陆地基地，实际上会阻止美国在亚洲履行安全义务。这种失败不仅会损害美国赖以阻止本地区军备竞赛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威慑力，还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带来更大的恶果，如该地区进一步核扩散，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还将会对美国的全球利益造成损害。

中国发展“反接近和区域封锁”能力最初的原因是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防止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有效干涉。这个目标是北京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台湾分裂国家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更高的要求——在更长的边境线上遏制美国的军事力量。中国军方希望在黄海、东海、南海及其他近海地区，解放军称为“第一岛链”的区域具有绝对控制权，并把触角延伸到“第二岛链”（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海域，从千岛群岛、北海道、马里亚纳群岛、帕劳群岛一直到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中国军方的这些抱负还包括中国“积极的近海防御”政策，即通过实施中国规划者称为的“非线性”、“不接触”、“不对称”等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改变西太平洋地区，在这里形成一个由中国控制的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因为中国有能力使美国的军队力量处在危险之中。

鉴于这种利益关系，在自身力量崛起的情况下，中国产生了控制从边境向外辐射的合适范围的欲望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中国已经投身建设一个强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侦察打击大本营”。这种能力植根于一个广泛的情报监视侦察（ISR）系统，包括在陆地和太空使用多个现象学的传感器以检测、定位、跟踪在远离中国境内的地方工作的美国移动军事系统，以及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固定基地的活动。

这些信息和中国海军、空军收集到的其他情报一起，通过国家指挥与控制网络传送到中国的进攻部队。而后，各级指挥梯队命令中国最有力的武器，包括反舰弹道导弹，以及更普通的、数目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大规模袭击整个战场中美国的水面舰

队及其配套基地。这些攻势很有可能会辅以对美国更大的空间、情报和计算机网络“动态的”和“非动态”的袭击。

最后的这类军事行动，虽然首先由地区性突发事件引发，但是因为美国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C4ISR）系统的高度综合性，必将带来全球性影响。即使可以避免中国这样的攻击带来的全球后果，美国的规划者也越来越多达成共识：即使像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有限的、传统的冲突，美国的前沿部署和运行水面力量，尤其是航母战斗群，也将处在严重的危险中。

随着中国的“侦察打击大本营”扩大到西太平洋以外的其他地方（如印度洋），传统上美国享有自由行动的战场不断减少，从而使美国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削弱。因此，北京军事能力的扩充不但威胁到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提供延伸威慑担保服务的能力，还威胁到中国和其主要竞争对手如日本、印度、俄罗斯等之间现有的军事平衡。

这些战略趋势的不断延续预示着亚洲未来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将会遭到美国坚决的抵抗。美国致力于主导攻守平衡地位的斗争已经开始，并表现在三个不同但互补的方向：第一，通过在战术和操作层次寻找旨在使各种中国武器系统失效的技术解决方案；第二，通过修改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从早期强调纯粹的僵局或美国盟国原位防御转移到对中国的关键点进行攻击；第三，通过更系统地组合各种选择，以对抗中国通过进攻和防守手段构成的更大的核威慑和其他配套能力。

这些行动反过来将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军事反应，而中国的这些军事反应又将激起美国更多的进取心。如此周而复始，将导致在亚洲争夺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永无休止。因此，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即使由此带来的权力过渡并非迫在眉睫，为保证在重要的亚洲战场上行动自由，美国和中国也将在技术和军事方面持续竞争，虽然两国竞争的原

因不尽相同。

最后，对军事优势的竞争是对同样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争夺的应有之义。这场竞赛源自两个相互作用：首先，美国对中国的持续增长的不安。中国力量如果能够持续不断增长的话，最终可能导致全方面、广泛地挑战美国的霸权，先是在亚洲，随后（或同时）扩展到全球范围；第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恐惧，特别是在与中国竞争的国家，中国实力的扩大预示着将会给它们的安全和政治自主性带来威胁。这些危险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现存的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同时也因为其他国家的天然恐惧，它们害怕崛起的中国最终将寻求建立一个现代版的“朝贡”系统，而这自然将会限制它们的自由。因此，中国邻国的战略关切与美国完美结合在一起，虽然所有有关各方都希望继续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持续获益，但是它们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可以有效制衡中国日益增长实力的解决方案。

这个挑战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并不明显。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关系，以及美国通过“执牛耳”战略建立起的强大安全保护伞，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在亚洲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在苏联霸权的鼎盛期，与其在欧洲的能力相比，莫斯科在亚洲的高压触角也更为有限，沿海地区对苏联政治统治的威胁的恐惧也更弱。因为，莫斯科没有控制外围亚洲的历史，也没有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对这些地方取得持续控制的海上能力。中国未来的崛起在这方面是不同的。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宗主权历史，它的邻居对此记得很清楚，这也决定了它们现在在有利条件下会采取抵抗的态度。中国还与本区域的重要国家如日本和印度时常产生政治纠纷。由于地理和科技的原因，中国能够比苏联更好地抵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

而中国的日益强大、新兴的军事能力以及其关键的区位优势，这些结合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和本地区的不安。这场竞争关系重大，亚洲自身的命运也因此处在危机关头。这是因为，这是亚洲大陆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体系中一定会成为最大的单一经济地区。到2025年，全球43%的商品和服务将在这里产生，这里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政治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而欧洲则会变成最后一名。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正面临着与上个时代完全相同的任务：防止任何本地区的国家统治大陆的可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积累足够的力量来控制亚洲的资源，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重要的中立国家，甚至美国自身的安全。未来中国可能会以贸易关系为基石，在亚洲建立起一个以中国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为中心的网络。使印度洋—太平洋周边地区一体化。美国的利益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因为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可以使它在未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假设现在还没有开始这么做的话。美国自本世纪初已经尝试新的措施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这么做并不是认为中国就像曾经的苏联那样是一个恶意的国家。相反，美国的此类行为因为不确定性这一可怕的诅咒而获得了生命力——霍布斯称之为“无自信”或“先发制人”，这使得任何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无法准确了解它的竞争对手未来会如何作为。因此，有人担心，快速发展的中国可能在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演变成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竞争对手。而且还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将来可能通过高压外交或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或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大的、与国家规模和国力相称的特权。美国需要采取“与中国竞争”政策的信念因中国政策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而加深。北京军事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最终引发了具有决定权的掌舵者支持对中国的崛起采取有计划的反应，因为中国新的武器装备加重了美国的安全困境，这意味着美国将不能再维持冷战早期“观察等待”的政策。

小布什政府认识到，中国的重新崛起如果不朝增强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前进，则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它开始制定和实施

新的战略，以适应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性带来的利益，同时对冲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小布什政府很清楚，曾长期主导美国与苏联竞争关系的旧的遏制战略，在新兴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再适用。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方面美国与其他亚洲伙伴之间经济联系紧密，另一方面，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鉴于这一现实，小布什政府决定继续实施深化与中国和其他国际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战略，甚至故意扶持中国周边的国家，它们日益增长的能力将会成为北京使用权力的客观限制。基于这一政策，美国复苏了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与重要的东南亚伙伴如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加深了关系，而且还取得了一个巨大突破，即改变了以前与印度疏远的关系。印度是亚洲大陆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有能力，也有动机与中国抗衡；与中国的抗衡有助于维护区域平衡，这是华盛顿所乐见的。

小布什的方法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允许各方——美国和它的盟友、合作伙伴——以及中国，继续从相互之间的贸易中获利，与此同时，在不遏制中国的情况下创造了限制中国潜在不当行为的基石。然而，这一“广泛联盟”的战略被中国视为“不太巧妙”地遏制北京的做法。无疑，中国的想法是正确的。本地区对中国强大国力的恐惧日益加剧，美国对维持全球平衡的焦虑也与日俱增，这都强化了美国的这种做法。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必将被刺激，从而采取各种方式“打破联盟”，而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这样做了。

北京的参与者对演变中的美国战略将作出各种可预见形式的反应。在可能或必要的情况下，为了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重大纠纷时，美国的同盟伙伴团结起来，作出一致反应，中国会试图在它们之间埋下楔子。只要有可能，北京还将防止中立国家和地区支持美国和它的盟友对抗中国。为约束竞争对手的行为，中国还利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关系，威胁它们可能会失去中

国市场，或承诺提高非对称市场准入。最后，在极端条件下，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中国将会惩戒性地故意使用武力，威吓可能勾结起来破坏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者。

以上任何情况下，不管北京反应如何，事实就是，中国会利用其历史悠久的“打破联盟”的战略，单边惩罚、区别恐吓，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全面对抗，以抵消美国寻求通过平衡政策所得到的利益。反过来，这些举措又将驱使华盛顿增强在该地区的能力和对同盟伙伴的承诺，尽管双方都试图掌控变化莫测的拔河比赛中另外一方给出的力量，更害怕进入对方突然放手的圈套。维持联盟，即使在危险的敌人面前是一个动态的、通常不稳定的过程，也并不总能保证成功。结果，美国和中国将面临长期的、小心翼翼的竞争关系，它们想影响亚洲主要国家（也许是同盟伙伴，也许是旁观者）的选择，因为很明显，在北京和华盛顿有所行动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决策的重要性体现在美国能够在面临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保持何等程度的优势。争夺地缘政治定位也因此将持续一段时间，只有在华盛顿或北京停止以对方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局势才能缓解。

结论：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无疑是独特的，因为它是在美国权力的保护之下，通过由美国维持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形成的。中国是否能够无限期地保持这一优势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内部无数的弱点可能会相当程度地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会发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越美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均收入也绝对不会超过它的西方竞争对手，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在“综合国力”上同美国竞争。

即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些相对劣势，中美关系也将会因

为经济关系、军事合作和地区地缘政治领域存在的一系列短期问题而继续充满困扰，呈竞争性关系，让人伤脑筋。虽然双方都拥有会阻止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核武器，但是一旦发生冲突，从关系恶化到超限战，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也不会预测两国关系将会是和谐相处的。美国对中国总有一天会挑战自己的恐惧日益增加，这导致了它不可避免地为阻止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自由增长而采取遏制中国的战略，而中国对美国的恐惧恰恰将其推向以更大的自信心保护自己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方向。

只要目前的权力对比关系存在，这种互动模式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然而，不管是因为内部危机，还是在和美国或者其他第三方的战争的战败，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不确定性因素，或仅仅因为美国由于新的技术突破或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而发生戏剧性的复苏，由此中国的力量在某些点上相对下降，那么双方的竞争激烈程度也必然会放缓。

如果现实情况与此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力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取决于在国际体系中其他大国的情况。如果美国明显衰退、中国持续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第三方国家的国力也在增强，比如印度，则会形成新的政治局面：一种可能性是美印联手制衡中国，另一种则是它们之间不能取得长久稳定的平衡，依据时事来形成两两联合、对付另外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在决定此三极是否稳定或不稳定，是否仍然是“均衡”的结果的问题上，中国的举动显得尤为关键。如果美国的相对衰落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大国崛起的同时，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将会异常复杂，呈现出多极化样态，问题的性质、利益竞争的强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单个国家或者不同国家联盟之间）等都将会影响中美关系。

如果美国的衰落仅仅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国家获得与美国或者中国相匹敌的物质能力，那么中美关系将取决于两者崛起和衰退的速度。如果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缓慢的，那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前的系统配置会逐渐朝着两极

方向演变。然而这种迭代的两极并不一定会像昔日的美苏竞争关系一样，除非现在将两国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国际秩序分崩离析，形成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每一个由其中一个全球大国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两个竞争对手的绝对和相对的经济表现，随之而来的两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世界将像扩大的、泛化的冷战一样，经济实体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会造成大国之间的剧烈竞争。然而，如果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仍存在并继续纠缠有竞争关系的大国，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除非合作的收益是完全对称的，这样竞争仍将随之而来。但每个国家都将会更加克制，因为要考虑政治斗争与经济损失之间的平衡。

如果，跟上面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都是快速进行的，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崛起，那么两极现象将会转瞬即逝，随之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格局，一个被称为“中国霸权”的格局。届时，整个世界将会和现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很明显风格和细节肯定不同，当然，细节以中国如何取代美国为主。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这个新的霸主是否愿意承担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这将包括为维持这一系统流动性所必需的一切——从作出更大的贡献到生产全球公共产品，到承受结构性赤字。

在这个世界格局中，美国可能仍然是一个重要国家，但它会不断担心北京和其盟友会对华盛顿及其利益造成威胁。不论美国的常规力量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都将需要在其核武器方面——假使核武器仍然是未被其他设备取代的“终极武器”——采取更深层次的避难措施。美国显然试图与其他有相似兴趣的国家共同抵制中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力的分布”将被定义为防止任何有效阻止中国崛起的措施受到限制。

不论这样的结果带来何种结构性的好处，它肯定对美国与其盟友非常不利。这一在将来某一时间非常有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促使华盛顿

在中期阶段（即现阶段，也就是中国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时间）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一切最终成为现实。因为中国也恰恰预料到美国会是如此反应，所以中美关系注定是竞争性的，而且在将来也会是如此。一个传统现实主义者不会得出其他的墓志铭。

第5章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

近几十年来，阐释美国国内因素对其外交政策影响的相关研究指出了几个关键的国内因素，其中包括：舆论、媒体、政党及相关的党派斗争；与经济事务、国防事务、价值观及民族团体相关的利益集团，以及反映、有时甚至能够塑造特定利益看法的智库。这些国内因素的影响体现在总统和行政机构制定外交政策时的考虑和行动之中。不过，有时，总统和他的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会通过规章制度、保密或其他方式来与国内因素保持距离。与此相反，美国国会对于这些国内因素则更为开放，也更加依靠它们。相比于政府，国会的权威更为分散，缺乏集中控制，也具有更多的接触渠道，这些都有利于美国的国内势力影响政策的审议。实际上，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特定问题上，国会往往更多地反映国内团体或组织的关切。

本章评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

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的发展情况，以期阐释其在当下及未来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的一种主流模式是，总统和政府主导着美国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他们在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国际环境中努力经营和发展中美关系。由于专注于国际政策，总统和政府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时往往并不关注国内因素。美国的国内势力常常反映出美国同中国的分歧，因此它们通常被视为政府强化对华合作、扩展国际利益的障碍。

本章认为，尽管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国内因素通过很多渠道同总统和政府打交道，但它们主要还是同国会打交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观察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关系便可从中窥探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性影响

美国国内因素虽然有时也支持总统和政府提出的发展建议及其他政策倡议，但它们还是更多地体现了同中国的分歧，它们给政府政策的执行设置障碍，也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掀起争论。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并分析当前的发展，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 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利益有时会引发争论，而这些争论被证明是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方向的关键因素或“驱动力”。很多时候，它们发挥着“制动”作用，放慢了美国同中国接近的步伐。

- 从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初期，美国国内因素减缓了美国政府试图进一步接近中国的努力，并阻止了政府对台湾的疏远。在卡特政府期间和里根任期之初，由于政府和国会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并持续多年。

-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国内因素促使美国制定反华政策，并力图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北京日益强烈的反抗所造成的不利后果，美国国内因素对华强

硬、对台支持的立场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及上世纪90年代这两个时期，国会中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加以分析之后会发现，在后一阶段，国会对政府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的反对态度显著减弱。

•由于过去十年中，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反恐、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朝鲜和伊朗的核危机、国内和国际经济停滞以及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大国等问题上，对美国政府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国内因素依然较弱。此外，美国国会在捍卫其外交政策权力上的意愿也大幅下降，这同样反映在对华政策上。

•对于国会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它在外交事务中的位置，专家给出了模糊的预测。在美国国内因素中，既有支持美国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声浪，也有对此表示反对的声浪，这进一步说明，国内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综合影响仍将是次要的，它们只是造成了周期性的争论，减缓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早在尼克松和毛泽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内因素就不时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展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随着冷战在亚洲浮现，同时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一败涂地，美国“失去”中国迅速在媒体上、国会中以及国会和总统选举期间成为一个突出且能够造成两党纷争的问题。1950年到1953年间，中美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两国在冷战期间近20年的对抗和冲突。这20年的初期，美国开始在国会、媒体以及行政部门中清除、隔离那些被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持温和态度的人。在此背景下，即便有人曾经提出更为温和、更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倡议，也只能在暗地里商讨，也许根本就不会商讨。

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和一小部分美国官员在为开启中美关系大门所作的早期努力中采取了秘密外交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担心反对同中国缓和关系的美国国内因素会产生强烈反弹，从而令中美关系取得突破的希望破灭。不过实际上，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受到了美国民众和精英们的广泛欢迎。国会领袖、媒体人士、商界人士和其他意见领袖也纷纷开始与中国代表展开一系列的交流。

尼克松政府之后一直到里根政府中的领导人都有一种明确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同中国接近以使美国获利，特别是在同苏联的竞争中更是希望如此。尼克松、基辛格和后来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同北京进一步发展关系对抗苏联，就必须切断同台湾的关系。由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要以台湾及美苏关系为代价，所以它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在国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这一争论持久而激烈。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中的批评者争辩执行这些政策是否会使美国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认为，美国比过去虚弱，需要中国的支持来应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反之，很多国会议员和支持他们的选民则担心，华盛顿应北京的要求而同台湾断交会使这个长期以来的盟友无法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包括少数政府高官在内的其他人则担忧，推动对华关系会给美苏关系带来副作用。

那些希望通过牺牲美国同台湾的关系而交好大陆共抗苏联的人如愿以偿。但是，这遭到了美国一些国内势力的坚决反对，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美国弃台转而接近大陆的步伐也因此放缓。主要的反对因素包括：

- 国会、媒体以及意见领袖中支持台湾这个长期盟友，并对共产主义和北京的领导者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人士。
- 认为依靠中国平衡苏联十分愚蠢，或希望美国调整立场同莫

斯科达成共识、实现缓和的战略家们。

- 国会、媒体以及其他团体中的一些意见，认为同台湾断交会破坏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和其他盟友对美国的信任。

- 国会及其他领域的一些人反对政府通过秘密的方式与台湾断交而同北京建立关系。一些国会议员认为以秘密方式制定外交政策是在无视国会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中的权力。

尽管反对意见减缓了美国政府的脚步，但实际上，美国断绝了包括美台防御条约在内的同台湾的所有官方联系，甚至还在1982年同北京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这仿佛宣告了美国对台军售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意见还是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胜利，特别是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令政府决策者无法轻易绕过这个障碍而同大陆发展关系。

在里根政府后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源于美国国内因素的压力，而更多地是因为以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为首的政府官员重新评估了中国在制衡苏联方面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且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较有利的位置。美国军力的增强，来自日本等盟友的坚定支持以及苏联的显著衰落，加之美国认定中国是个难以相处的伙伴，这些都促使美国不再急于通过寻求中国的支持来对抗苏联。支持台湾、反对以牺牲美国其他利益为代价来同北京发展关系的那些国内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它们认识到，美国政府越来越不愿迎合北京的要求，因此不再认为需要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制动”的作用来保护美国在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利益。与此同时，后毛泽东时代（1976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台湾地区逐渐对大陆开放的势头，使北京更多地通过两岸接触来解决台湾问题，而非向华盛顿施加压力。

总之，从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期间的一系列争论涉及了事关美国重大利益得失的问题。而美国相对苏联的战略态势、台湾的未来则是最受热议的问题。在美国，政策倡议者在争论中往往不惜以巨大牺牲来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反映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对于权力和目标的极大不确定性。最后，美国以结束与台湾的官方联系及与这个忠实盟友的防御协定，来换取同中国大陆建交所带来的利益——主要是帮助美国遏制扩张的苏联。

当时，有关对大陆和台湾政策的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之所以参与争论，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担心美国的政策取向可能产生的结果。而党派利益、利益集团或选民团体的影响在其中并不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主导了《与台湾关系法》的起草，后来又采取措施纠正了卡特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过度疏远台湾、亲近北京的问题，这些都证明，党派利益在美国国内争论中是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因素。

相对于以往总统团队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国会积极涉足外交事务的高峰。国会坚定地维护其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而美国政府官员则针锋相对地维护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这种权力的竞争加剧了国会和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摩擦。

后冷战时期——大陆政治风波和台湾民主化的影响

在1989年大陆政治风波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的争论对于制定有关中国大陆、台湾和相关问题的政策而言显得越来越显著和重要。美国舆论急剧转向反对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之后，美国媒体和舆论也开始变得反华，它们的报道近年来虽然已经相对平衡，但仍然喜欢强调中国大陆在发展

中的负面内容及其对美国的警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地区在同一时期内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这提升了台湾在美国媒体、精英和舆论中的形象。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上，20年来美国接近中国的主要原因也随之消减。利益集团、相关媒体和智库转而关注新的重要事件，强调一系列有限和特定的安全、经济或有关价值观的问题。这些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的分歧，例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贸易行为等。冷战期间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只起次要作用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开始走到台前。在此背景下，要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设定一个连贯且有明确优先目标的议程似乎不太现实。

后冷战时期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在重要性上已经不如起初那么大了，多年后它们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有分析显示，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国会和其他领域推动对大陆强硬、对台湾亲近的倡导者的决心和意愿总体上减弱。政府和国会中的决策者对美国的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信心十足，在苏联帝国业已崩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发美国政策大讨论的美国战略不确定性大为不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上面临取舍，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冷战之后，希望对中国更为强硬的人则不愿以牺牲美国的实际利益为代价。因此在1990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攻击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骤然而止。而随着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战争结束，美国不再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保持沉默，国会对中国的攻击便又恢复。当1994年克林顿总统不再将中国一年一续的最惠国待遇与其他条件挂钩之后，国会虽未强烈反对，但仍显得十分失望。1995年，数百位大力要求美国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发放签证的国会议员在北京的强硬回应之后陷入沉默。即便是部分反对给予中国大陆永久最惠国待遇的国会议员也声明他们无意阻碍中美贸易。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争论中的活跃分子寻求的

是党派利益或是抱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与7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外交政策问题本身是推动国内争论的主要动因。为了赢得1992年的总统选举，克林顿用中国问题攻击当时的老布什政府。而对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提出批评的共和党人同样是出于党派利益的动机。

小布什政府

在小布什任期内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美国国内批评中国以及美中合作关系的声音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降至新低。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骤减，在此之前，美国国内正专注于讨论中国崛起对美国安全利益所带来的威胁。随着美国将注意力放到恐怖主义相关问题上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转而寻求与中国交好。小布什总统以非凡的能力限制了国会对其外交政策的干预。在战争期间，国会也迁就了总统的权力。

2006年11月，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大胜预示着美国选民对改变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和优先事务的要求。民主党的胜利对美国对华政策是个严峻的考验。评论人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预言，中美间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相关经济问题会引发美国政坛的一场内战。

尽管有这些悲观的警告，但现实状况缓解了改变对华政策的急迫要求。特别是在小布什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总统面前，民主党领导的国会要求改变中美关系的筹码相当有限。而且，当时国会主要着力于国内事务和在伊拉克、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这使得有关中国的问题难以“脱颖而出”。尽管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曾试图迫使国会中的民主党人

像往常一样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占多数的民主党人和国会委员会领导人并未表示一致支持。2006年的国会选举之后，保守的民主党人增加了，而在美国的商业和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并不愿过度突出同中国的分歧。很多民主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并抵制他们的同僚对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些人受到了民调数据的支持，民调显示，美国人能够接受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委员会中，贸易问题上的鹰派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受到了一定制约。这些制约的力量包括：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领袖、民主党人查尔斯·兰热尔（Charles Rangel）以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领袖、民主党人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为首的贸易温和派，以及大量的民主党人，这些人加入了旨在促进对华务实交流并更明智、更有效地进行对华决策的工作小组。

直到最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在促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和行动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都相当有限。经常有人在国会中提出议案，或摆出姿态，抑或采取措施试图使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更为强硬。但另一方面，这些手段看上去并不足以改变两国关系。总之，这些事实表明，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国内持续的对华政策争论并未在实质上影响中美两国间的积极状态。

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争论的影响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会的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强势不再。评论人士和学者认为，越战之后，国会不再有兴趣约束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其实，从那之后，国会不再像当初插手《与台湾关系法》等事务时那么积极地介入对外事务了。

国会的静默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便是小布什政府出台的有关战争权力、被视为酷刑的逼供、羁押嫌犯等其他敏感问题的政策与几十年来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相抵触时，国会也默不作声。面对这些挑战，国会无动于衷。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国会受到了两党资深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国会不负责任地放弃了宪法赋予它的责

任，使小布什政府罔顾美国国父倡导的“权力制衡”原则而在外交事务中为所欲为。第110届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试图扭转国会的外交事务中的颓势，但是如上所述，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和有关东南亚、中东等一些更为突出的对外政策问题上，无暇关注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国会同中国对话的增加反映出，在国内因素和其他因素挑起的有关对华政策的问题和分歧上，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方式了。国会复制了小布什政府同中国政府的对话，并予以强化。正如葛来仪和傅瑞伟撰写的有关中美外交和经济互动的一章所介绍的那样，到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打响，美国进一步深化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加之朝鲜公开违反不扩散协议、积极研发核武器，小布什政府开始寻求同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加强合作。对中国来说，它急于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关系，以此建立两国间的相互依赖，进而约束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两国很快开始通过快速增加的官方对话和次级对话紧密合作、处理分歧。

而同时出现的美国国会同中国相关部门对话的增加也表明，国会转变了原先的立场——国内因素与政府同中国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努力相冲突。上文说过，在过去数十年中，国会主导了美国国内有关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和安全问题等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即便是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国会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两党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些纷争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到处施展影响力、人权和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的军力增长带来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通过相关立法，限制与中国的防务交流，避免促进中国军力的增长。

但与这种趋势相反，近十年来美国国会同中国同僚之间的交流明

显增加。学者指出了这种变化的几个原因。首先，国会务实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许多美国公司不断增长的在华投资，使开展同中国的建设性互动对于保护和促进选民利益十分重要。其次则是由于“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此后声势浩大的反恐战争。国会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事关美国安全的核心问题，追随总统更为务实地寻求同中国更好地对话与合作。

简言之，日益务实、专注和持默许态度的国会意识到，在中美两国政府间官方对话不断增加的同时，进一步开辟交流渠道是有好处的。由于美国国会权力分散，组织结构较弱，同时国会中的对华议案多取决于议员个人的倡议和利益，因此交流和对话的方式时常发生变化。不过总体上，以下几种建设性的交流方式呈增长之势。

美国众议院与中国“国会”间的交流活动在唐纳德·曼祖洛（Donald Manzullo）的带领下明显活跃起来。曼祖洛领导的代表团在2005年访问中国，进行了第七次两国立法机构间对话。两国都认为这种对话是“深化相互理解最有效的方式”。2004年，参议院也建立了同中国的立法机构间交流项目，该项目旨在就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交换意见。在2006年的一次访问中，胡锦涛主席同参议院领袖会晤并强调，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是“双边关系的强大推动力”。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和艾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成立了“中国连线（China Caucus）”，成员已达35人。福布斯和斯凯尔顿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者。在对中国的访问和同中方同僚的交流中，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在国际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两国间长期存在的双边问题上。

2005年，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和里基·拉森（Ricky Larsen）成立了美中立法机构工作小组，成员达到30人。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积极的交流活动，如研讨会、访问中国、与到访的中方人员交流，讨论和理解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他们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对话

对国会至关重要”。

奥巴马政府期间国内因素的影响

本书其他章节已详细阐述了奥巴马期间中美两国的外交、经济关系，以及其他成就和不足。在近年来的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是较为特殊的一位总统候选人——他并没有在前任的对华政策上做文章。与小布什一样，奥巴马和他的竞选团队不希望过多地展现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他曾表示要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有效应对中国影响力和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

但是，奥巴马逐渐改变了原先试图在国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寻求同中国合作的立场。他和他领导的政府转而在对华贸易、经济和外交政策、朝鲜和伊朗问题，以及亚洲海上安全问题上公开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立场。

奥巴马的这种转变发生在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压力与日俱增之时。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停滞的持续，使中国在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的做法成为美国国内讨论的热点，并影响着2012年的总统选举。2011年10月，参议院以较大优势通过议案，惩罚中国操控汇率的行为。奥巴马总统指责中国占尽国际贸易体系的便宜，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也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贸易措施。要求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最高呼声来自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们。其中一位较为温和的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也严厉斥责了中国，同时列出了一系列系统的措施，声称将在当选之后加以实施，以限制中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不轨行为。而在此时，为了评估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并继续对台军售，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11年9月到10月发起多年来国会首次关于台湾问题的听证会。许多国会议员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批评奥巴马政府不顾马

英九的强烈诉求，拒绝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向台湾出售战机的法案以及多项加大对台支持的措施。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现状和前景

为了评估上述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本节评估了目前在对华政策上产生影响的多种国内因素。结果显示，情况错综复杂，充满矛盾。这些国内因素希望周期性地批评中国并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促使政府对中国更为强硬，所以它们通常对中国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不过，总体而言，它们没有反映出美国国内对更加紧密或合作性的中美关系的抵制，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或者90年代则有所体现。总的来说，它们并未驱使美国采取极度消极的对华政策，而是更多地延缓和阻碍了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发展。

这种看法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它认为，中国近期对美国和在外交事务上的强硬态度相比于中国政府为了安抚近邻、美国和相关国家而宣称的和平发展的论调，仍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对美国持续和公开的强硬姿态会被国会和选民广泛视为一大挑战，进而要求美国作出强硬回应。

这一看法的前提是，在面临应对政府赤字、税收政策和大规模福利政策的僵局时，美国能够避免另一场大衰退或有效治理的崩溃。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是治理危机，那么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的壓力就会大增。这一看法还预测，中美之间在朝鲜、台湾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会竭力避免战争，两国能够避免像2001年南海撞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这样的军事冲突或军事意外。这样的事件在两国国内广泛要求采取强硬军事措施的情况下很容易升

级。

在评估影响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时，本文首先着眼于党派对立和2012年总统选举的影响，然后探讨了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前景。为了判断国会和美国政府将倾向于何种政策方向，本文考察了能够对国会和政府的对华政策偏好产生影响的国内因素，如舆论、媒体、大型的政府或非政府国家安全机构，以及包括利益集团、智库在内的要求对华采取更强硬（或合作性）政策的游说团体。

2012年初，党派对立成为支持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主要国内因素。共和党竞选阵营不断批评奥巴马在处理对美国不利的那些对华贸易、经济政策时太过软弱和低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是无视北京的强烈反对，决意要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他们猛烈抨击奥巴马在2011年拒绝台湾军购大单的做法。

倘若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他是否会兑现这些必然会引发中国报复的竞选承诺仍有待观察。上一位共和党总统小布什踏入白宫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要对北京强硬并支持台湾，但很快就扭转了立场，务实地强调同北京进行建设性对话和接触。尽管以单边主义和富有争议的外交政策而闻名，但小布什清楚地认识到，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掌握平衡对于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台湾的另一位支持者里根同样尴尬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收回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许下的要同台湾重建外交关系的承诺。历史经验表明，选举期间那些富有争议的对华政策声明最后都会被追求国家利益的务实立场取代。

同时，小布什8年任期中的对台军售比奥巴马首个任期中的相对少一些。在贸易问题上，尽管在竞选时出现了斗嘴和党派对立，但共和党领导层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是否明智的问题上仍存分歧。由于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强烈支持自由贸易，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领袖顶住了国内选民要求他们接受参议院通过的议案的压力。该议案要求对中国操控汇率的行为实施贸易和其他反制措施。

近几年，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国会的行动、讨论和其他同总统的分歧之中。2010年，共和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国会中期选举，他们以较大优势掌控了众议院，而民主党则以微弱优势控制着参议院。在共和党的领导下，国会开始强势维护他们在政府债务、政府开支以及包括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问题上的权力。

他们带来的压力迫使美国考虑在外交事务和国防上大量削减开支，其额度大大超过奥巴马政府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这将影响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维持对美国有利、有助于应对中国的安全和外交环境。不过，削减预算对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尤其是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已公开宣称将在必要时把其他项目的经费调拨给亚洲地区的项目。除了因削减预算会给美国应对中国的防务和外交政策造成不确定性之外，近来国会在预算和相关问题上的强硬预示着它将再度介入外交政策领域，特别是对华政策。

在某些事情上，国会认为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才能使利益最大化，不过即便如此也很难精确判断国会的政策走向。正如上文所述，更为强硬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在国会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支持，而且面临着来自某些集团的压力。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正如傅瑞伟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的那一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美国出口商品日益扩大的市场和美国的外资来源国。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国会议员认识到，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和经济措施可能会给他们和他们的选民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他们访问中国，并加入了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国会工作小组。他们还听取选区商业利益集团、中国使馆官员和中国雇用的说客，以及美国广大商业团体的游说，这些人敦促对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

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的印象仍是负面的，但这不会像1989年政治风波后那样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的消极转变。2010年，一项最权威的美国对华民意综合性研究对过去几年中的几个可靠的民意测验进行了谨慎的评估。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在某种程度上担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威权政体以及人权问题。在希望同中国“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和冲突的同时，美国公众也支持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制衡中国。研究还强调，一直以来很少有美国人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发生冲突。

同样，与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几年相比，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发展状况时，立场也更为温和。总体而言，美国媒体反映了美国舆论中一个持续的趋势——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是消极信号。不过这种观点出现的密度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数年里已经明显减小。最近一份学术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自由和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加之中美两国明显拓展的合作，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发展时已经显得较为正面。

傅瑞伟在谈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章中说过，美国的商业集团已经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有银行的广泛补贴及其他事项上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对付中国不公正的经济行为。有的还批评中国操控汇率，并支持参议院通过的、威胁将对中国操控汇率采取报复措施的议案。不过，美国商界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要保持中国商业环境的稳定，这对在华从事投资、制造业和贸易的美国公司是有利的。这种对稳定的渴求使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在游说美国官员时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纠纷置于次要位置。

美国的军事—安全界包括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国防部、各个情报部门、其他安全部门以及近年成立的国土安全部。除去这些政府机构，还包含为国家安全提供武器、技术、情报、分析和其他服务的商业机构。

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安全利益不受威胁。与日俱增的中国军力以及情报活动已经引起了这些机构的警惕。美国历任国防部长和美军高级军官有时会称，他们并不把中国视为敌人或威胁。一些最近退役的海军将领和国防部官员则敦促美国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总体上，军队、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资金来增强军事实力并采取其他措施，以此震慑咄咄逼人的中国，并在必要时应对同中国的冲突。它们倾向于寻求国会委员会的支持，这些委员会能够为它们提供资金并监管它们的活动。美国媒体也会将中国的军事活动和情报活动描述为值得美国担忧的问题。美国公众同样担心中国的军力集结和外交意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一些人希望同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以便使有关昂贵武器及相关系统——包括先进的飞机、水面战舰、潜艇、先进的导弹和防御系统以及精密的网络战工程——的提案更容易通过审批，获得资金。还有一些人认为防务承包商出于商业利润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研究显示，国会对中国的看法比美国其他精英和舆论对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原因之一可能是，很多希望通过国会来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美国国内因素都对中国政府及其政策和行为持负面看法。而且，尽管针对中国的国会行动是偶发的，但国会一直在支持两个委员会，它们在十多年里密切关注着被美国视为消极行为的中国政策和行为。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由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成立。其法律职能是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进程，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该委员会由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和5名总统任命的高级政府官员组成，此外，还拥有一批高素质专家来帮助其研究和评估，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总体倾向总是在突出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消极影响。

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同样由国会于2000年10月创立，其法律职能是就美国同中国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

产生的影响进行监督和调查，每年就此提交一份报告，并适时为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提供建议。该委员会定期就中国的发展可能对美国产生的重大且往往是负面的影响举行深度的听证会。年度报告会评估听证会和其他调查的结果，并警示读者中国的哪些政策和行为会对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产生影响。

试图影响国会对华态度的说客和利益集团的代表通常将目光放在某些可能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产生消极影响的特殊问题上，从而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化。这些特殊问题突出了两国间的分歧，例如人权、西藏、台湾、新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贸易等问题。

不过，这些委员会和游说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要求国会采取积极对华态度的努力抵消。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所雇用的说客和代表是支持中国利益、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能够从持续稳定的中美关系中获利。这个群体中的一大支柱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它与国会、美国政府、对中国感兴趣的专家以及中国同行合作，致力于推动两国的相互理解，培养更广泛的共识。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内的商业集团也在促进美国同中国的经济联系。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设立了国会事务处，已经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逐渐壮大起来。国会事务处与华盛顿的美国—亚洲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并连同中方相关机构，组织并资助了100多个国会议员代表团前往中国观光，并与相关的中方官员和专家交流。驻美国大使馆的中国官员对于过去十年中，安排两国立法机构官员交流等事务所取得的突破十分满意。

为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提供访华费用等用于游说的方式，效仿的正是台湾当局影响和接近美国国会的手段。不仅如此，大陆也学会了台湾给美国送大单的方式，高调地同美国达成购买各种美国产品的交

易。对这些交易的正面宣传转移了人们对曾经的美台和当下的中美贸易巨额赤字的关注。

在游说国会方面，台湾对大陆而言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台湾动员美国国会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能力在1995年达到了顶峰。那一年，除参议员贝内特·约翰逊（Bennett Johnson）之外，所有议员都支持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允许其访问美国。对于国会中这些台湾利益集团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游说努力受到了岛内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和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之间的政治分歧的影响。民进党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便开始同当政的国民党斗争，并于2000年赢得“大选”，执政8年。自2000年以来，蓝绿阵营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双方分别成立机构为各自的利益游说美国国会。由于两大阵营的目标相悖，因此美国国会中支持台湾的议员对蓝绿之争颇感失望和不解，这也导致了台湾影响力的下降。由于马英九当局寄希望于培植同美国政府之间紧密可靠的关系，对美国国会的关注减少，因此，马英九当政之后，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能力一直在下降。马英九似乎没能化解蓝绿阵营在游说事项上的分歧，特别是他任命泛蓝阵营驻美代表为台湾驻华盛顿代表。

族裔游说团体和族裔利益集团历来在美国国会考虑对华政策时影响不大。尽管几十年来华裔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印度裔美国人那些更为积极也更有组织的少数族裔那样，在政治上进行游说或参政。诸如百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100）这样的华人团体正在弥合这样的差距，提升华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该委员会倡导美国应同中国建立更具合作性和更加稳定的关系。在对华事务中最为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是在美国定居的台湾人。虽然他们的规模相对较小，但是他们十分积极，在经济上也更加富裕。他们动用资源，在1982年成立了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会（FAPA）。该委员会强调台湾有自决权，并且同泛绿阵营合作，支持和推动绿营的议程。

许多位于华盛顿的智库都倾向于认同美国政府维持同中国“商业化”的关系并通过外交解决两国分歧的务实努力。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都拥有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人在近年来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的前共和党政府的亚洲问题专家们近期加入对奥巴马未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批评，这些智库中的一些专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以及安全政策和行为都持有极为负面的看法。与国会关系密切的传统基金会同样坚定支持台湾，批评大陆的安全政策。与劳工组织联合在一起的智库也呼吁美国用强硬政策应对北京不公正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与此相反，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带头强调了美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也带头呼吁美国从亚洲的军事承诺和代价高昂的插手亚洲事务中抽身，这在美国的智库中仍属少数派观点。

结论

总之，美国国内强调中美政策和行为分歧的压力，不会挫伤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试图构建的务实、商业化的中美关系。尽管如此，中美关系的进步和发展仍将受到阻碍。美国舆论、媒体、利益集团和国会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两国安全、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突出分歧上。除非中国政府切实改变在美国看来与其利益和价值相冲突的政策和行为，否则美国的这些国内因素仍将继续阻碍美中关系的实质性发展。不过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很小。

第6章

中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郝雨凡 (Yufan Hao)

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国内因素而日益变得复杂。这不仅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者激增的原因。与此同时，在中国对美政策中还反映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想法。本章通过对在冗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因素，如网民、大众传媒、智囊研究机构、公众舆论以及企业界等的研究，来考察中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决定因素的结构性改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精英制定的，公众对此毫不知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都有人试图一窥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这一“黑匣子”的内幕。他们主要采取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外交政策制定的结构、过程以及官场政治给予了特别关注。鲍

大可（A. Doak Barnett）在1984年开创性地阐释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内机构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通过与学者和官员的深入交谈，细致地研究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和供职于研究机构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对于国际事务（起初是美国事务，后来扩展到亚洲和欧洲）的看法和研究方法。有些学者运用其他各种视角，通过研究研究机构、组织和政策制定过程来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外部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关系来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制定的环境。这些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是直到最近，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国内社会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掣肘和影响。随着获得信息的渠道的增加，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加积极，更加多样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国内因素和外部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涌现。

自1979年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得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不那么偏激，也不那么理想化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实用和老练，变得更加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更加现实和灵活。相应地，人们也致力于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国内因素的作用。不过，这种以国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还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偏好、主要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帮派政治、官僚作风等。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长期被忽略掉的社会因素，如舆论、传媒、智囊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北京的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但是，外界通常并不清楚领导人对这种压力有何反应。

国内体制的变化

总体而言，有两种国内因素影响中美关系：一是体制行为者很多，过程复杂，二是社会力量。体制行为者是指中国国家和政府结构

中有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单位和机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办公室、中联部、国务院系统与对外事务联系紧密的部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本书中，葛莱仪（Bonnie Glaser）和吴心伯（Wu Xinbo）所著章节将对这些行为者进行分析。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经历了数次有意思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称之为多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多元化是指参与决策的人员和机构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有很大的增加，现在已经开始包括一些非政府（或准官方）的行为主体。由于中国同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中国的中央各部委、大多数省级和下属地方政府，以及许多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都由于与外国同行直接打交道而卷入国家的外交事务中。外交政策已经不再是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务院领导（总理和国务委员）的专有权限，还涉及工业、商业、农业、银行，甚至出版（宣传）等众多机构都开始参与其中。

近期，发改委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上，以及如何保证中国在海外获得重要能源方面。发改委的一大职责就是“拟订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会同有关方面牵头组织参加国际谈判，实施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实际上，发改委主任解振华领导的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小组在很多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峰会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外交部只起辅助作用。在哥本哈根，就是解振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了辩论。

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大量的双边贸易、投资往来，这使商务部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行为者。商务部在协调贸易、知识产权、投资、反倾销案件、世贸组织讼案以及其他商业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不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商务部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持强硬态度，因为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美国经济是知识型的，因此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知识产权是美国保护自己国

家企业商业利益的有力武器。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谈判，负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条款来制定条例以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商务部还负责处理其他一系列中美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如倾销关税、关税补贴和世贸组织争端等。

虽然军队职业化的目标是使其与民间领导权分离，但是近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多地卷入中美双边关系中。除了国防政策和军队战略方针，在控制武器、防扩散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的外交政策制定中都有军方的身影。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问题上，解放军的立场和态度很明显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1996年台海危机时，军事演习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此后中国军方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最近，东海和南海领土之争愈演愈烈，而美方坚持自己可以自由进出这一备受瞩目领域的海岸线，由此，中国军方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成为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分散，分权化也越来越明显。内部体制的行为者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官员们可以利用他们在中国权力结构和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位置对其施以影响。部委也要提供国内外信息以影响高层决策。有些部委的负责人甚至就处于外交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内。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在中美关系的某些问题上发动运动来引导舆论，例如，解放军军官经常通过电视采访或者利用民间研究机构组织的公开辩论的机会在媒体上发表强硬言论。他们强硬的立场经常引起公众的民族情绪，同时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一定压力。

在制度化方面，近些年来，建立了各种部门间协调的机构，外交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从过去基本上集中于个人层面逐渐转移到参与外交决策过程的各种组织机构中来。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过去有着象征意义的机构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外交领域的各主要决策机构、经济实体，还有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国防

的不同部委也在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增加了部门间政策协调的能力，也有利于各部门在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达成共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由多个部委负责人组成，这就是制度化和提升部门间协调能力的一个努力。

此外，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更趋专业化。许多体制内的中基层官员都接受过国内一流大学的专业训练，对国际事务的认知水平和外语运用能力都很强。同时，他们也多有出国考察和深造的机会，这使他们更具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也积极参与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高层决策者也越来越依赖这些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所提供的决策信息和意见。

北京领导层的决策风格同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革命时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已经不复存在。在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参与集体领导，在集体中达成共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像以前那样是“最高”的了。这个事实，加上上述制度化的改变，为各种非传统因素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这是二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上述变化，社会因素开始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是指在最高领导层以外的各种影响因素，它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国内因素中一个日益重要但关注不够的变量，包括网民、大众传媒、在媒体或学术圈发表观点的人，组织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智库、研究机构，商业团体和其他次国家实体。他们都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外交决策过程，希望政策的最终产出能与他们的政治偏好相符。这些力量通常都是以一种较为松散、离散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影响，其中众多利益不同、目标各异的个人行为主体或组

织，大都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协调。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仍然可以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足以向决策者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中提到，公民关于公共问题的激烈讨论可能会影响国家的最终决策。虽然他主要是从17、18世纪的欧洲得出“好社交”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却同当今以“互联网、媒体网络、聊天论坛和专家出版物盛行”为特点的中国非常相似。人们逐渐可以讨论与外交关系相关的一切话题（而事实上以前政府会给出垄断性的唯一说法），而且人们认为自己对这些话题加以讨论是爱国的表现。

媒体和智库型研究机构也对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日益产生影响。由于大量信息每天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信息的占有已不再是体制内一定级别官员的特权，大众传媒开始参与塑造和影响公众对外部事件的看法和舆论，当然也能更有效地调动民意支持政府的相关政策。互联网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媒体传播的信息。在这种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也在间接地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式。尽管最近政府开始尝试审查互联网的信息内容，但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仍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获得大量的网络信息。

与其他国家相比，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中国更具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呈几何倍数增长，中国拥有世界上数目最大的网民，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自1987年5月中国建立第一个电子邮件网点以来，互联网迅速在中国呈爆炸性增长之势。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4.57亿网民，占全世界网民数量的23.2%，占整个亚洲网民的55.4%。上网的方式也呈多样性，784%的网民使用电脑，使用手机和便携式电脑的网民分别为66.2%

和45.7%。博客用户达到6.311亿，占全部网民的13.8%。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于它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获得信息，市场将会更有效地运转。

鉴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互联网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出现了使公众能够在线讨论的网络论坛。网络论坛包括在线聊天、即时信息、BBS、微博和其他一些在线讨论方式。其中，使用在线聊天的人数占77.1%，排在使用最频繁的网络活动的第四位，BBS拥有32.4%的使用者，排在第十二位。这些数据说明在线讨论是中国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网络活动。

根据洪俊宝（音）对中国上网行为的研究，网络论坛在公众参与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有四个方面，特别是在“公众参与”和“平民参与”方面。第一，这是一种面向所有公众的媒体。网络论坛发表的帖子和新闻能够被所有人阅读。第二，这是一种自媒体。一个网络论坛发布的信息能够即时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其他的网络上。第三，这是一种参与的媒体。发布的信息和评论能够随即引起回应，从而产生辩论，鼓励各种观点参与，因而这种大规模公民参与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达到的。第四，这也是一种产生行动导向的媒体。网络论坛能够成为组织社会运动的一个平台。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功能以外，网络论坛在中国还具有一些更重要而独特的功能。在中国，网络论坛的有效性将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并对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交政策还是公众话题的禁区，所有外交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高层制定的。普通民众被完全禁止谈论国家的外交政策，更不用说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在最近几年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很多普通民众开始使用互联网来表达他们对各项外交政策的看法，特别是在发生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时候。一部分专门针对外交政策事宜的网络论坛建立了起来。政府以更加容忍

的态度、对互联网采取了比传统媒体更为宽松的管理方式，允许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公开讨论、发布见解、批评某些外交政策、提出建议的渠道。公众在网络上的讨论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如中国最重要的国有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运作着一个非常知名的BBS——“强国论坛”。这个论坛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就敏感社会、政治问题宣泄感情和发表观点的平台，而在过去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强国论坛”拥有217万个注册用户和最多的浏览用户（每天350万人）。这样一个论坛的出现并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在向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迈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变得愿意了解公众对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回应的。所以，为了能够更加容易地通过网络收集公众的观点，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各级政府都实行了电子政务计划。该计划使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来改善与公众的交流和关系，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尤其是中央政府，一直在有力地促进电子政务工程。这项工程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网络观点收集体系，从而使政府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能够通过网络了解民意。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始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作出决定。

在审视社会力量的时候，谁也不能低估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和影响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而官员们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制定政策的。普遍的看法是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既然媒体可以左右人们对时尚、汽车、流行音乐、影视明星和政治候选人的看法，它当然也能在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影响公众舆论。

很明显，媒体擅长“选择并突出某些事件或某些问题的某些方

面，并对此加以归纳总结，以便得出某种解释、评价和解决方法”。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宣传系统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它会对某个特定的国家划定一个总体骨架，然后由专家学者和政府掌控的媒体填上血肉，使其丰满。一般情况下，政府会为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提供一个基本指导原则。今天，媒体在报道中呈现出不同的声音。基本模式是，政府影响媒体，继而通过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因为很多党报和出版社已经转型为营利型企业，它们开始制作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报纸，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填满了城市中的报亭与书店。大众传媒的商业化改变了政府、传媒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传媒和读者可以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媒体报道范围的扩大，中国媒体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日益增强。政府对信息和观点的垄断不断弱化，一个新的模式随之悄然而生——媒体有时候呈现出不同于政府的声音，以吸引读者，这样就可以设定议题，通过影响读者来影响政府。媒体报道什么样的国际事件、如何报道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有为了吸引眼球、扩大市场份额而取悦公众的习惯。为此，大众传媒必须了解公众的喜好，甚至要了解公众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媒体会自然地想去附和潜在读者的口味。编辑根据他们对读者口味的判断来选择报道的内容。

信息爆炸使人们可以获得营利性和基于互联网的新闻源，这改变了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领导和公众的互动模式。为了引导公众舆论，甚至是得到公众的支持，政府经常通过大众传媒努力解释自己的立场。例如，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每次召开之前，外交部会举行记者吹风会来解释背景、主要对话内容以及对话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所有地方媒体都必须根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来报道国际新闻。但是，商业化传媒往往不遵守这项规定，它们经常在未经外媒许可的情况下翻译其报道，或者是通过采访当地专家以增加新的内容，达到吸引当地读者的目的。大众传媒提供了中美交流的平台。在

中国，媒体做了很多塑造美国形象的事情。在2009年底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戴秉国和王岐山代表个人对记者表示感谢。戴秉国认为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示希望媒体的报道能够继续增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傅士卓（Joseph Fewsimth）和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经将能够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人分为三类：精英、次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精英这一层面，中国最高领导层似乎对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改革开放政策、是否继续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没有什么政策方面的异议。然而，在次精英层面，在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看待美国在全球以及亚洲的角色、如何对付美国等问题上，他们都在政策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

次精英大部分是在政府机构和大学工作的学者、智库分析家和政策分析家等。有些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参与公共演说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影响公众，甚至可能会在一系列外交问题上影响政策制定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普遍存在。次精英的界限比较模糊，一般包括政府机关下属的智库、大学里的研究院和一些非官方智库。在智库的作用方面，沈大伟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外交政策智库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外交决策和情报分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确实，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在某些领域出现了由专家组成的“学术界”，并且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知识分子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些研究员的文章通过政府内部渠道提交给政策制定者。智库分析家，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人员，几乎是专职为政府官员撰写文章。因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复杂性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技术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日益倚重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的意见。

见。智库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央和外国建立起了多层次的联系渠道。

第二，他们可以在杂志、报纸、互联网或中央、地方电视台上发表观点，影响舆论。在中国，中国的学者和大众传媒是舆论塑造者。为了给广大观众提供更多信息、更广阔的视角，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以及电台，越来越经常地邀请专家学者到谈话节目做客，地方报纸也经常发表他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他们开始在国际问题上影响公众舆论。这同时也为这些学者提供了不菲的工资外收入。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学者忙于在媒体上发表看法，或者到处参加国际会议，而无暇进行研究工作，也没有原创的学术成果。

最后，在某些问题上，他们还通过参与讨论来影响精英和舆论。21世纪的前十年，在国际社会衡量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力量时，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到底该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如何理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是否应该追求成为全球大国的目标？”“‘负责任的大国’到底是什么含义？”“中国是否应该追求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衰落了？”“中国是否应该跟美国一样，成为全球两极中的一极？”“中国是否应该采取跟美国竞争的大战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愈演愈烈。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然而，他们对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持不同看法。有些专家认为，美国政治越来越趋于保守和中央集权化，这导致美国在金融方面执行“单边金融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还有人认为，美国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仍会保持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

有些人认为中国作为传统大国的定位更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应该改变韬光养晦的战略。这个战略是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中国

国力的增加，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也自然地随之在全球扩大，继续保持低调的战略方针将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采取“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等自我保护的措施，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在“低调”和“有所作为”之间做到平衡。

很多专家认为，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将重心向亚太倾斜的目的是保持它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以此压制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能够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面对现实，增加对军队和国防基础建设的投入，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包含着武力的提升，需要建立一流的军队，发展高级的武装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中国必须抛弃幻想，面对现实，以最坏的情况来考虑国家安全形势和战略。有些人甚至以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更加具有侵略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依靠自己发展战略实力才能获得一定的国际地位。

很难断言上述这些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起码可以说，可能这些争论不仅仅影响了党政部门的中层官员，还对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政策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制定出来的。按照对美国看法的不同，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关的官员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亲美派，他们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二是反美派，他们总是对美国对华意图持高度怀疑态度，鼓吹对立立场。可以说，中国外交圈子里的人，特别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一般都持和平主义态度，认为和华盛顿保持稳定的关系是有利的。而在国防部门和军队工作的人倾向于持鹰派态度。

中国官员不仅被公众影响，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公共外交”，在外交政策方面影响公众舆论。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它的职责就是协调国内外媒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形成。原来隶属于国家的企事业单位渐渐能够自主行动了，利益集团多元化活跃了政治环境。根据苏

珊珊·奥德根（Suzanne Ogden）的研究，中国有20多万个县级、区级和省级利益集团和职业协会，有大约1800个全国性的和跨省的团体。她将此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提供咨询的方式协助国家，并且管理其内部成员服从国家政策；第二种代表成员的利益并挑战国家政策或政府控制；第三种兼具以上两者的功能。

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最近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新生势力：半自治的（虽然还是有所限制）公众舆论。在新兴市场经济中，互联网的发展、多媒体的崛起和中国政府控制民众思想能力的削弱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开始向外看，并且在国际事务上更加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最活跃的社会力量是学术界、大学生、专业人士、白领和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官员。城市里的蓝领工人对外部事务不太感兴趣，农村里的农民也许除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其他事务都不感兴趣。

在中国，公众舆论的日益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它在中国领导人了解民意方面是有意义的。由于中国新生代领导的接任，缺乏像以前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所具有的领导魅力，所以他们必须倾听公众的声音，对他们的利益表示关心。同时，这对实现领导人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也非常重要。最近，政府经常采取很多举措，通过各项民意测验来征求公众对各种重大事件的看法。

其次，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在于，当政策取向发生分歧的时候，决策层里的精英们就会动用公众舆论来加强他们政策的可信度。例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倾向：一些人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并且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而另外一部分人则相信两国通过合作和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接触，这种对抗完全可以避免。

在这一点上，公众舆论就显得尤其有价值。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中美谈判时中国立场的转变就显示了公众舆论的作用。据报道，中国首席谈判官、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舆论——他们骂他是“叛徒”。

中国对美国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中国公共舆论的作用却是新鲜事。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公众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而言，在过去30多年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变。虽然这种关系还是非常脆弱。在不同时期，中国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1989年以前，在中国人眼中，美国的形象是正面的。20世纪90年代，因为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和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等，中国国内出现了反美情绪。进入21世纪，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对美国持有更客观、更平衡和更理智态度。但是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不喜欢美国。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搞双重标准，一方面经常谴责其他国家政府的暴力行动，同时自己却在国际上经常采取这样的行动。

2010年6月至8月，中国社科院在8个城市就“中国人眼中的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7%的人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或者“比其他关系更重要”。只有15.8%的人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非常好”或者“很好”，73.5%的人认为“不是很好”，10.7%的人认为“不好”或者“糟糕”。这个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2010年12月，《中国日报》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这一问题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访问的中国公众中，90.9%的人肯定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其中，54.3%的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随着可以获得的信息的增加，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美国越来越持更加客观的看法。但是，53%的受访者将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纠纷归咎于美国。6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存在着竞争和合作。70%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超

过美国，53.5%的人认为这将会在20年内实现。调查显示，跟上世纪相比，现在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处于最好阶段。大约有86.7%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对朝鲜半岛动武，81.7%的人反对美国在东亚驻军。

根据以上这些调查，我们可以就中国公众在美国问题上的舆论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同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第二，中国人在经济和军事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磋商与合作解决，但是反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第三，他们反对美国利用中国的国内问题来破坏中国的发展和内部稳定。2011年11月，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说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的网民来“扳倒中国”。《环球时报》网站环球网就这一问题作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网民对此感到恶心。

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苦难遭遇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怒，这一情绪也指向了美国，并且反映在像《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1997）这样的图书，和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的游行示威活动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包含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内涵。这通常被认为是抗议羞辱和压迫的举动。

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对美国的公众舆论很显然经历了巨大转变。以往，美国被看作一个典范——一个在山巅上光芒四射的城市。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印象大幅下滑。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里兴起这样一股反美情绪？答案似乎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互联网和媒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最近阶段涌现的反美情绪似乎是因为公众更容易看到国内外消息，而政府在某些领域对公众发声的控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的缘故。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利用获得的信息和有限的言论自由增长了本领。有些人甚至将最近出现的反美情绪和反日爱国主义情绪定义为网络民族主义。确实，中国政府常常容忍作为爱国主义表现的反美情绪，甚至有时会利用这种情绪。但是

中国政府会采取措施使这种情绪不至于失控，不影响它对美政策的执行，更不能挑战它的执政地位。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界、商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国内外政策的一支活跃力量。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造就了一大批强有力的利益团体。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截至2010年底，超过13000家国内企业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约16000家公司。

这种扩张增加了企业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力。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政府存在的最正当的理由之一。企业不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还能够产生税收。中国大型国企同时还承担着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能源的责任，所以它们在中国政府某些政策的制定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那些中国有核心商业利益的国家。例如，当国有企业“走出去”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快也会出访那些国家。2005年1月至10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的国家至少有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家企业中的一家在当地有石油或天然气项目。

在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战略性行业如石油、矿产、核能源、国防以及银行业的大型国企可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自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参与制定汇率政策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管理政策以来，在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两家机构说了算。有时候，政府依靠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来实现更广义上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议题。例如，中国政府经常责令国有企业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2011年4月，中国发表对外援助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以平均每年29.4%的速度迅速增长。中国对外

援助的主要形式为提供经济或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维护，都由中国企业来执行。

企业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而游说相关政府部门则是最普通的一种。当美国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向中国施压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官员前往广州调研当地生产厂商的意见。为影响中央政府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这些外贸商人讲述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难处。结果，据报道，商务部成为反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强有力的游说机构。

企业自身也可以游说政府。经济发展是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地方政府通常同企业有更密切的关系，它们经常游说上级政府以保护当地企业的利益。在中国，有些企业属于政府所有，但是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中组部任命的。有些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可以在企业和中央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职位变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政策制定者有着直接联系。

在中美关系中，商业利益团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它们更希望两国关系朝着好的方向迈进。商业活动是两国关系相互依存的纽带。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但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而且能够拓展合作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企业也许会游说中国政府像美国一样承担起国际责任。但是，这些企业在海外的活动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摩擦。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企业在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和津巴布韦的投资削弱了美国对它们制裁的效果。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持相反看法，中国致力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并且怀疑美国的真实目的是限制中国的海外活动，通过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来阻止中国的崛起。

结论

随着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社会的多元化，国内因素已经变成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美国问题上，中国的领导层必须考虑次精英的看法和公众舆论，有时他们不得不去协调不同的观点。集体领导制度要求所有人意见一致，这使得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复杂，但同时也为社会力量影响中国的对美政策提供了些许的可能性。虽然所有国内单位和社会力量都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美国的要求和关切的同时，必须将这些利益集团的关切和利益也考虑进来。

本章阐释了社会力量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国内因素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变量。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力量一直比较温和、正面，但是现在正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不结盟政策问题上、在中国是否应该做全球领袖问题上，尤其是在对付美国这一问题上，学者、意见领袖和官员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都对中美关系有着明显的影响。

在新的变量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网民和互联网。因为它们彻底改变了政府和社会互动的模式。虽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很脆弱，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互联网通过为公民提供新的参与机会来推动公民社会开展活动。而公民社会则通过提供互动和沟通所必需的社会基础，如公民和民间团体，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这使中国政府更加难以独自制定对美政策，因为国内社会对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对美政策会置身于社会压力之下，特别是在两国有外部纠纷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中，有些人呼吁中国政府应对美国持更强硬的态度，以保卫中国在台湾、西藏、新疆和南海的“核心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应当享有与美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在贸易、人权和很多其他领域享受同等待遇。当感觉受到美国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中国公众通常反应强烈。这给中国领导层制定对美政策带来直接影响。

中国越融入世界，国内的社会力量发展就会越迅速。这种变化将迫使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些单位和社会力量的不同利益，而这使中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第7章

外交关系：要旨及过程

葛来仪 (Bonnie S. Glaser)

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中美之间的交往只是零星地局限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一系列大使级会谈上。这些会谈始于朝鲜战争之后两国遣返战俘的工作，关注的政治议题很有限。在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引导下，两国的对话上升到了更高级的层次，开始应对反对苏联的战略挑战，并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权宜之计。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两国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之间的工作层面的协调和双边对话有所增加。从两国建交的1979年一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十年间，双方的直接交流为促进双边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这十年中，向来对国际制度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们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论坛，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同各大国展开合作——这种变化正是美国所鼓励的。中国在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APEC)，1992年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NPT)。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下了基础。中美在这些机构中的合作迅速增多。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议程

也随之扩展，高层对话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1998年，中美设立首脑热线。

在小布什政府初期，美国认识到，中国正在具备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这对美国利益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促使美国积极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元首之间的交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特别是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为了减轻国际责任所带来的负担，同时出于担心中国在海外的活动可能给全球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小布什政府敦促中国放弃“搭便车”的做法，“巩固帮助其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此，双方建立了两个对话机制：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高级对话始于2005年8月，它为两国深入讨论一些战略问题创造了机会，同时也成为弥合分歧、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促进合作的尝试。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7月对这两个机制进行了合并和升级，即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成为地区和全球性的大国，双方外交议程的深度和广度也迅速扩展。如今中美两国讨论的范围涉及全球各领域，涵盖了21世纪所有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此外，中美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也在增强。同时，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机制的网络也建立起来，这是两国为增进理解、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而将两国关系制度化这一共同战略的一部分。

本章描述了中美之间日益多样化、全球化和制度化的外交议程，展现和分析了两国各自的目标、国内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双边对话机制以及双方所讨论的话题。另外，本章还评估了双边对话机制在处理两国关系、推进两国利益和推动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各自的目标

自尼克松起的连续8位美国总统都与中国进行了接触。经过多年发展，接触政策逐渐包含了两国最高级别和多部门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美国和中国都拥有深切的利害关系，也有很多彼此重叠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政策能够为美国的三大主要目标服务：（1）促使中国接受更多西方的规范和实践，制约中国的政策选择和行为，使中国融入当下的国际体系；（2）说服中国更积极地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贡献（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个词在小布什任期结束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了）；（3）促进相互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避免误判。通过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些目标的实现能够推进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通过军事现代化、维持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以及加强同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来防范中国采取破坏国际体系和军事侵略的政策。

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中国的目标是保护自身利益，在总体上推动双边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的目标可概括如下：（1）维持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安全；（2）同美国维持积极、富有成效和稳定的关系；（3）保证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中国重视通过对话和谈判管控与美国的分歧，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它希望在避免与美国发生零和竞争的同时使中国行动的自由度最大化，减少对它的束缚。此外，中国也试图防止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防范美国阻挠中国提高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的潜在企图。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仍旧对美国是否能够接受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和竞争者的意图和意愿心存疑虑。

政府部门的作用

在美国政府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行政机构的首要部门，它负责

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并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为总统提供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能源部长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家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顾问。如有需要，其他高级官员也可被邀请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政策协调委员会、副部长级委员会和主管委员会组成，掌管跨部门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些机构都有决策权，但前提是必须与不同部门的同事达成一致。政策协调委员会负责“日常的跨部门分析、行动路线、政策制定、协调、资源统计以及政策执行规划”。负责东亚地区的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副部长级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副顾问领导并主要由各部门的副部长组成。副部长级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议题得到彻底的分析，所有的观点和看法都会被考虑。绝大多数的决策都是在副部长级委员会中作出，然后提交给主管委员会进行审查，最后交由总统作最后决定。

除了总统和副总统之外，主管委员会的成员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基本相同，它是总统的高级政策审查和协调团队。与其他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一样，该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首要任务是促成各部门之间的共识，并向总统提供政策建议。当主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分歧无法弥合时，总统将加入讨论并作出决策。主管委员会的会议通常一周召开一到两次，开会的次数取决于需要审议的问题的多少。平均来说，主管委员会每年召开的有关对华政策的会议在12次以上。比如在2010年，主管委员会召集会议讨论了美中之间的战略和经济关系，并批准了一系列对台军售。除了这些正式机制之外，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也包含了非正式小型工作组，它们不定期举行会议，其成员是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中负责对华事务的低级官员。

国务院是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机构，而国务卿是总统的首要外交顾问。国务院制定、代表并执行总统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国务卿的

权力大小要视他/她与总统的关系而定，也取决于他/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内阁要员的支持。另外，国务卿也可能在某些事务上比在另一些事务上更具有影响力。

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通常会就具体的对华政策提案进行协调，不过也有例外。当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2009年9月提出对华“战略再保障”后，尽管这一政策提议在副部长级委员会中进行了讨论，但它并没有在政策协调委员会中得到批准。此外，很多由国务卿及其他主管亚洲和其他事务的官员所作的政策演讲也未必能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和批准。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有着不同的决策结构，尽管这两个平行的结构在功能、权力，甚至人员上都有重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发布由各部门所执行的战略纲领、方针和政策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负责协调和监管政策的8个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领导小组并不是决策机构，更多地是一种交流和协调机制，确保信息的流通并在各部门之间促成共识。它们同样也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供政策建议。大多数情况下，各领导小组中的相关中共官员所同意的政策提案也会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

两个讨论对美国政策的领导小组分别是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它们的组成人员有所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两个领导小组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他同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周都会召开会议，而且在中美元首举行大型峰会之前也会召开会议。他们参考党政机关和部队有关机构的建议，达成共识，最终作出决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各种问题举行严格的审议，不过实际上很多外交决策是由政治局常委中的少数人作出的。

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三个机构也在外交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三个机构分别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研究工作、提

供建议并为高层领导人起草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政治局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持，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向决策者分发的文件。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常常随中共中央总书记出访海外。外联部掌管中国共产党同国外政党和组织的关系，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它在制定对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部是政府机构，其任务是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比起美国的国务院和国务卿，中国的外交部及外交部长的权力要小得多。而且，在过去十年中，外交部的影响力还在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外交政策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同时一些希望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的部门——比如商务部、财政部、安全部、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和军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由于美国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往往由掌管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负责。自2008年起，中央外事办公室——负责研究工作并协调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活动——主任也由该国务委员担任。接到高层派下来的任务后，中央外事办公室就会带头协调各部委和政府智库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提供政策建议或是进行危机管理。

双边机制

比起其他的双边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对于促进双边合作、解决问题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和依赖中共领导的指令来指导政治体制的特点要求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必须先获得国家主席的许可才能采取行动。一旦最高层达成某种一致，官僚机构就开始运转起来，贯彻最高领导的指示。高层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于在敏感问题上达成一致以及解决

问题至关重要。

美国利用元首会晤来“设定优先事项、传递信息和获得许诺”。只有最紧迫的问题才会被列入元首会晤的议程中。近年来，美国将朝鲜问题、伊朗问题、苏丹问题、中国汇率和贸易问题、经济再平衡、人权、海洋安全以及维持军方对话等议题列为优先事项。中国国家主席则反复表达了对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担忧。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支持2011年1月南苏丹独立公投这两个问题上，元首会晤在协调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10年黄海和南海的一系列外交冲突以及愈演愈烈的贸易和网络安全摩擦之后，奥巴马和胡锦涛利用2011年1月会晤的机会将两国关系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上，并向对方保证本国的意图。

其他的高层交流对于增进两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重要。美国副总统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互访对美国了解中国领导层的变动尤为重要，因为这能够为美国提供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机会，影响他们对世界和美国的看法。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美国国务卿同主管外事的中国国务委员（同样也是下面要讨论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负责人）的会谈对于双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政策、确认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两国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十分有用。

双方较低级官员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性随这些官员的个人性格及自身影响而有所不同，这在美国一方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由于经常能够接触到总统，因而在塑造政策议程和战略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官员与美国这些官员之间的交流同样显得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是美国亚洲事务负责人与中国驻美大使之间的交流。包括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级官员都会在关键时刻不定期前往中国。

对中美双方而言，一个“专人”的存在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或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这样的人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能够同对方就一些问题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切实可行的行动进行坦率的讨论。这样一个官员通常很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能够达成积极的成果。如果双方均缺乏这样的人，那么双边关系将变得不那么顺利和富有成效。

大使馆和领事馆会报告对方国内的发展、接待本国来访的代表团并从整体上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它们在中美关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大使同对方的高级官员的定期接触能够提供一个交流信息、促进相互理解的渠道，尤其是当大使能得到所在国政府的信任时。

除了官员间频繁的访问交流，两国还建立了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就双方的共同利益、分歧、政策的协调以及促进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这些机制凸显了中美关系的制度化，也说明双方越来越重视对方。

中美关系中级别最高，也最受人瞩目的定期对话是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它始于2009年，合并了小布什政府期间设立的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包含战略和经济两个方面，分别由美方的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以及中方主管外事的国务委员和主管对外贸易的副总理负责。这四人都是本国元首任命的特别代表。该对话每年举行一次，在两国首都轮流举办。与会人员包含来自美国和中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高级代表，这为许多次级对话提供了便利。实际上，大多数次一级的对话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双方深入讨论一系列短期和长期议题创造了宝贵的机会。该对话既有能够讨论战略和经济问题的全体会议，也

包含着着力于敏感问题的小型会议。有15到30位部门负责人、内阁级别的官员和来自两国政府的共150多名官员参与该对话。全体会议的议程包括全球经济问题、气候变化、不扩散以及海外发展援助。

尽管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其前身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已经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这些对话机制最显著的成果在于促成了中美高层官员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一些官员升迁之后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官员表示，“如果不进行交流，这种关系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伊始，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能迅速与中方代表取得联系，商讨对策。

战略与经济对话打破了中国的垂直管理体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美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那些原本只把注意力放在粮食安全等狭隘议题上的中国官员开始对中美关系更广泛的战略背景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结识政治体系中他们原本很难有机会认识的官员的机会。中国官员承认，战略与经济对话强化了中国不同部门间的协作，也在某些特定议题上促进了中央同地方的协作。

中美官员间的跨部门联系因战略与经济对话而增加，一些存在共同利益的新领域也因而得到确认。例如，资源保护方面的讨论开辟了双边合作的新领域。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也衍伸出了其他的对话，如2010年开始的中美关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的讨论，中美关于亚太问题的磋商以及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后两者都建立于2011年。

战略与经济对话也使得中美双方能够克服官僚错位带来的挑战。在美国，发展援助的职责由国务院承担，而在中国则是由商务部负责。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讨论了发展援助的方式问题，并探索了合作的机会。毫无疑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总体上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包括两国高级官员在内的代表团汇聚一堂，中美两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两国国民和其他国家表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表明两国

能够一道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久而久之，两国之间得以建立合作的习惯，消除了误解，也增进了相互理解。

在准备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过程中，中美官员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双方这些交流活动同时满足双方所需。对中国来说，盛大的宴会和文化展示是必不可少的，这能向中国国民展现中美是具有合作性的，且在中国的掌控之中的。而美国更看重会谈“成果”，有了成果才能证明与会者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值得的。自对话建立开始，双方就对对话中的战略轨道作了一些调整，以提高其效率。据一位美国官员说，在前两轮对话中，全体会议十分冗长，高级代表们大多只就部分特定议题交换意见，没有给讨论其他问题留下足够的时间。在第三轮对话中，全体会议的时间被缩短，取而代之的是旨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的小型会议。双方都希望充分利用美国国务卿同中国国务委员交流的机会，讨论一些紧迫的议题。

战略与经济对话因其所获得的成果而受到称赞，但也不乏批评的声音。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专家一开始就对该对话的功效表示怀疑，认为两国缺乏合作和信任原因并不在两国政府，而是因为两国在“利益、价值观和实力上的不对称”，“提升两国关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一些人警告说，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举行一次，而不是像原先的高级对话那样每半年举行一次，这样会降低互动的效率，除非次一级的工作组能够保持良好的势头。有些人认为这样一个连美国同其盟友之间都不存在的独特对话机制会在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中引发对“两国集团（G2）”共治世界的焦虑。而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与财政部的内斗以及缺乏有效合作的问题引发了很多抱怨。还有人认为，该对话过于铺张，且占用了高级官员两天的时间（如果在中国举行，则还需要花费两天时间在旅途上）。还有一位专家警告说，美国需要防止对话本身变成“最终目的”，这会导致中国追求获得切实成果的意愿下降。

作为美国在全球层面就一系列政治安全问题同中国进行接触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两国之间存在一些从属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工作级别的对话。两国举行了有关非洲、拉美、南亚、中亚和亚太的地区性次级对话。这些对话机制多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之前由美国牵头成立的，只有2011年6月创立的亚太事务磋商（Asia-Pacific Consultations）是由中国提议建立的。大多数情况下，地区性的次级对话由美国分管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主持，每年举行一次。中国方面派一名外交部副部长率团参加亚太事务磋商，在该机制建立的4个月内共召开了两次。

其他关注安全议题的次级双边对话包括：1）战略安全对话，这是首个文官与军官共同参与的对话（下文有介绍）；2）美中国际安全与不扩散问题会谈，参与会谈的美方代表以主管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为首，中方代表则以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3）中美政策规划会谈，两国与会代表分别由美国的国务院政策规划署主任和中国的政策研究司司长领导；4）中美反恐安全磋商机制。其他旨在解决外交议程问题、促进两国合作的双边机制有，人权对话及其次级对话机制——法律专家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妇女领袖交流和对话机制以及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

2011年5月，中美双方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轨道下发起了首次由文官和军官共同参与的对话，也就是战略安全对话。美国希望通过该机制使两国在双边关系中一些可能出现误判和意外的问题上增进了解。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议题包括核战略和方针、导弹防御、外太空、网络安全等。中国则希望该机制能够促进两国的战略互信，并希望在它所关心的问题——美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上监视和对

台军售——上取得进展。中美两国军方关系的缓慢发展为该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动力，美国对中国体制内的文职机构和军方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的担忧也是动因之一。战略安全对话由两国的高级军官和文官主持，此外还有来自军方、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的代表。

战略安全对话是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的智慧成果。他在2010年2月访华期间提出创建一个由文官和军官参与的有关安全问题的高级对话。对美国来说，战略安全对话的好处是参与的官员相对较少，这样能够使会谈专注于“对意图和误解的讨论”。

双边外交议程

过去十多年间，中美两国的外交议程从本质和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方讨论的焦点仍是双边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双边对话的议题扩展到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从地理上讲，如上文所述，中美两国的磋商范围涵盖除中东和欧洲以外的世界主要地区。两国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也大大增加。以下罗列的是中美两国在外交对话和多边场合中进行协商的一部分议题。

正如傅瑞伟在其章节所言，经济问题在中美两国的议程中，特别是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是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美国的目标在于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使美国公司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则希望能够使经济问题产生的摩擦得到管控，说服美国放弃在高技术转让上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并为中国公司在美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两国讨论的具体经济问题有：全球经济再平衡、汇率、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保护、双边贸易不平衡、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和贸易纠

纷，以及在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问题。中国在口头上对美国的很多要求表示认可，但是却口惠而实不至。比如，中国出于对国内的担忧而不愿意使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签署进一步开放本国经济的协议，因为这样做会对其国有企业造成额外的压力。经济问题同外交议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曾在奥巴马政府供职的官员说，“一旦两国爆发哪怕是低水平的贸易战，其他的问题也将失控。经济关系的恶化会对外交议程产生影响。稳固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双方更好地推进外交问题。在这一点上无可让步”。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材料和运载方式的扩散，已经在双边和多边场合讨论了数十年。在这方面，美国主要是力争中国对制裁的支持，比如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采取更严格的保卫措施和出口控制，以及支持那些旨在控制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材料扩散的国际组织。中美在多边领域的军控及不扩散合作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两个国家都是一些与不扩散问题有关的机制的成员，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内瓦公约》、“核供应国集团”以及桑戈委员会等。双方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但两国都未批准该协议。中国与“澳大利亚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机制保持着联系，但美国对中国加入态度消极。中国因《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合法性问题而没有加入。《集装箱安全倡议》已经在深圳、上海和香港等主要港口得到落实。中国还加入了美国能源部发起的一项旨在阻止核材料扩散的《大港倡议》。美国根据国内法，以中国公司向伊朗转让美国所禁止的设备为由实施单边制裁。

“9-11”事件之后，美国加强了国内外的反恐工作，并寻求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展开合作。中美建立了反恐对话以期全方位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两国在反洗钱和包括制造假币在内的防止恐怖组织筹资等问题上也强化了合作。200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巩固了中美在反恐调查上的合作。除了双边领域，两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同样加强了反恐协作。

中国几乎在任何级别的双边交流中都会表达其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担忧。如任雪丽（Shelly Rigger）在其章节所言，中国把美国插手台湾和两岸事务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的官员普遍认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是美国阻碍两岸统一的战略之一。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以及美国支持台湾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这些都招致了大陆的抗议。北京反复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商讨控制对台军售，以便将其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但美国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担心违反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不与大陆就对台军售进行事前承诺”中磋商”的规定。

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一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能够从事哪些活动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分歧。如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在其章节中所述，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从事侦察监视活动。2009年中国在南海对美国的监测船只和飞机进行了拦截，这让美国担心2001年中美撞机那样的事情可能再度发生。中国同南海邻国在领土领海上的争端使南海在2010年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2010年7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表示，

南海航行自由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关乎美国国家利益，此后两国开始将南海问题纳入双边会谈中。北京坚持认为领土纠纷应该通过双边渠道解决，反对美国干涉；美国则支持该地区许多国家的要求，即制定行为准则，通过多边对话维持和平并找到解决主权、资源纠纷的方式。

过去十多年中，中美两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合作主要是打击塔利班，以及稳定并重建阿富汗。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期间，美国同中国展开对话，就中国为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呼吁中国开放一条供应路线，以便在阿富汗的盟军能够通过中国西部获得食品、衣物等非致命性物资。尽管阿富汗的稳定对中国也有好处，中国也同意对这一提议进行研究，但最后中国并没有接受提议。在同美国合作的问题上，中国表现得犹豫不前，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原因：1）开放中阿边境可能会招致国内穆斯林的反对；2）中国对支持北约领导的军事行动表现得过分谨慎；3）担心此举会引起同巴基斯坦的摩擦。不过，中国同意为阿富汗培训警察，并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投资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对于巴基斯坦问题，两国也就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安全、国家稳定进行了讨论。

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领域，中美两国举行了多种双边对话和交流活动，这既包括高级层面也包括工作层面，气候变化政策对话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国都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经济大国论坛等多边论坛。在2009年7月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两国达

成了谅解备忘录，要在气候、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加强双边合作。2008年建立的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以及2009年达成的7项清洁能源倡议也促进了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两国在联合开发新技术及促进减排上的合作有所进展，但是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和所应承担的义务，双方仍然存在根本性分歧。目前要在控制碳排放问题上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承诺很困难。

随着过去十年中国对外援助的迅速增长，美国开始寻求就官方发展援助同中国进行讨论。在这方面，中美之间的紧张源于中国不愿意同西方援助国就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协调，也不愿意提供其官方发展援助的准确数据。为了增进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提出了多个对第三国的联合开发项目。其中一个是在2011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宣布的旨在促进东帝汶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项目。有关对外援助的双边对话由中国的商务部部长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主持。但是，由于两国对外援助的方式迥异，因此对话进展不大。中国也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政策，但是它更愿意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工作组中展开合作，而不愿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中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合作，因为后者被中国视为富人俱乐部。

中美两国对于人权的定义存在分歧。美国更强调包括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和投票权在内的公民权利，而中国则更多地强调经济富裕和社会权利。成立于1990年的中美人权对话由负责民主、人权、劳工问题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领衔。这一以国际标准和规范为基础的对话机制为中美双方提供了一个坦率沟通的渠

道。该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法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问题、多边合作、人权领域的最新动向（如强迫失踪，非法拘留、逮捕和定罪）等。美国方面表达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切，而中国则强调它在提高和保护民众的生活水平、完善法律体系、发展基层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人权对话之下有法律专家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政府和非政府法律专家共同讨论法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法律问题，其中包括法律改革、新的法律提案、现有法律的执行、律师在社会和法律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司法的作用等。

正如劳泰瑞（Terry Lautz）在其章节所述，2010年5月启动的中美人员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旨在扩大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其中教育为重点。“十万留学生计划”旨在大幅增加在中国学习的美国留学生的数量。两国还设立了中美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和友好志愿者项目（Friendship Volunteers）。两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还包括推动文化和体育交流、双边妇女领袖交流和对话机制等。该机制由美国国务卿和中国主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的国务委员共同主持。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进行定期的磋商和协调。在联合国，伊朗和朝鲜问题成为两国议程中的重中之重。自2006年以来，中国支持了一系列制裁伊朗和朝鲜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两国的谈判充满争议，但也往往能够达成妥协。由于伊朗的核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年到2010年间通过了4个加强对伊朗制裁的决议。除了在2010年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929号决议——这是

有史以来对伊朗最严格的制裁——之外，中国还同意放缓在伊朗的能源投资，并在私下鼓励伊朗缓解国际社会对于伊朗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担忧。

美国和中国还在联合国就苏丹问题成功进行了合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在苏丹进行投资并援助喀土穆的行为招致美国等国家的批评。中国对国际形象的重视令此事有了一些转机。美国说服中国接受了苏丹分裂的必然性，并在支持苏丹举行自由、公正的公投上使中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美两国在诸如国际部队的使用、人道主义干涉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尽管除了经常对有关台湾的决议使用否决权之外，中国很少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但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使其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否决权。一位前美国官员讲到，“如今，中国有能力追求其利益，一旦它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它就会退出谈判。现在它有说‘不’的实力了”。虽然中美进行了密集的谈判，但两国仍旧无法在缅甸问题上达成一致。2007年1月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缅甸政府停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军事袭击，但中国联手俄罗斯否决了该协议。2011年10月和2012年2月，安理会谴责叙利亚政府镇压反政府示威者的决议草案也遭到中俄两国否决。

中美两国在全球和地区性机制中的互动仍在扩大。最重要的是，两国官员随时准备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以促成积极的成果。这些地区机制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二十国集团是除联合国之外中美两国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机制。

挫折和妥协

中美之间的外交往来对于双方而言都充满了挫折和愤怒。两国在构建共同战略以管控外交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只在很少的时候能用利益分歧来解释，更多的时候，造成这些困难的是两国对达到共同目标的最佳方式存在分歧。紧张的谈判多数时候都促使双方作出让步。通过对棘手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美中双方对各自的利益和角度有了更好的理解，也找到了推动各自议程的方式。

中美对双边关系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让两国都感到失望。中国非常重视美国描述两国关系时所使用的词汇，它花了大量精力要求美国接受一些积极的表述。例如，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经过磋商之后同意共同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中国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对中国而言，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数量也是中国衡量两国关系的标杆之一，高层访问的数量、通话次数、信件和会谈的次数都成为了判断标准。而对美国来说，判断两国关系的主要标准是两国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例如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国对美国政策议程的支持等。

尽管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朝鲜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一个极不和谐的议题。中国坚持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同朝鲜之间，因此敦促朝美两国举行双边谈判寻找解决方案，同时支持继续举行六方会谈以确保自身利益。而美国则认为，朝鲜90%的能源和一半以上的进口食品是由中国供应的，因此中国对于朝鲜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力，中国应该利用这一影响力说服朝鲜放弃拥核野心。中美两国之间就回应朝鲜的导弹试射、核试验所进行的双边或多边谈判总是充满摩擦。

美国拒绝同中国讨论对台军售问题也使中方大为沮丧。在2010年1月和2011年9月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后，中方要求奥巴马政

府就管控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讨论以防进一步危害两国关系，但美方拒绝了这一要求。另一个让中国感到愤怒的问题是，美国拒绝在2011年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加入在2009年11月双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表述，即“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美方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在美国国内以及中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经过70多个小时的艰苦谈判才最终敲定。由于在胡锦涛访美期间签订联合声明对中国的意义大于其对美国的意义，所以美国官员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中国被迫放弃将“核心利益”加入声明的要求，并同意了对朝鲜问题的相关表述。

除了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失望多数是由于经济问题。中国声称本国公司在美投资环境不佳，要求美国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此外，中国劝说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的努力也并不成功。美国在人权等被中国视为内政的问题上的干涉以及在南海等问题上的不恰当干预也招致了中国的反对，尽管中国表示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对于管理和提高两国总体关系是必要的。

中美政治对话取得的效果

美国和中国在减少错误认识和误解、管控竞争与摩擦、在广泛的议题中提高政策协调性以及寻找新的合作领域等方面有所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日益频繁和广泛的全方位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之间的对话，当然两国高级内阁官员、外交官和专家之间的对话同样十分重要。而且，同过去相比，两国的对话机制在不断拓展，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常规化，涵盖的议题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些制度化的机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它促进了两国内阁级别的高级官员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推动了部门

间合作，并为双方讨论不断拓展的议程提供了平台。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下的次级对话使双方得以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新出现的紧迫问题。由中国建议发起的亚太事务磋商旨在讨论两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避免采取零和方式导致更严重的对抗。由美方提议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意在邀请文官和军官共同讨论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重要安全问题。

双边对话机制对于加强信息交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广泛而多样的对话渠道——同美国与其盟友之间那些众多的沟通渠道和联系相比，这还显得不够——是为了促进中美双方相互理解，培养两国之间合作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误判，并在两国的同人之间建立关系以便在发生危机时避免出现紧张。

确认新的合作领域以及增加人员交流对于抵消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问题——例如安全领域不断增长的相互猜疑和竞争等——所产生的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发新能源和环保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弥补了两国在南海等其他领域的摩擦。双方的合作可以使两国的精英和民众认识到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以及携手创造共同繁荣的稳定世界的潜力。两国在一些对彼此都十分重要的议题上的协作也有所改善，其中包括反恐、核不扩散、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虽然这些对话促进了双方对彼此政策的理解，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在战略上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而且很可能继续加深。信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短期政策造成的，但两国对彼此的长期意图的猜疑是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在中国方面反映得尤为真切。中国领导人一直宣称美国在进行“西化和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国的媒体也坚称美国试图危害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阻止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及中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一度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释放，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要求他国尊重中国在困难时期无暇顾及的国家利益。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或政治体制，两国之间要形成更坚实的战略互信尤为困

难。

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出持续的关切，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使其谋求建立一个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新国际体系。美国欲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目标仅仅取得了有限而艰难的成功。从积极的角度讲，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和政策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也开始愿意选择性地对伊朗、朝鲜和苏丹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政策。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主要在于两大因素：1）中国不愿意接受西方对于“负责任”的定义，中国对于如何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2）由于专注于国内发展，中国不愿承担应有的领导角色和责任。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依旧是主动的一方。“中国仍然是被动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有所作为，但中国总是在规避压力。”大量倡议都是由美方提出的，中国总是“非常官僚主义，而且缺乏创造力”。美国通过一些策略在说服中国采纳某些特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将要发生的国际事件和高层双边会谈来获得中国的合作；2）参与高层直接对话；3）给中国尊重和面子；4）正面或者负面地进行诱导；5）使中国“丢脸”，利用中国保持良好国际声誉的心理。通常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告诉中国，改变政策能更符合其国家利益。

为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利用现有对话机制消减彼此的战略不信任。战略对话不能仅关注短期挑战，还要着眼于达成互利的结果。美国应当改变原先争取获得中国对美国议程的支持的做法，采取一种能够使两国合作更有效地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方式。正如迈克尔·斯温（Michael Swaine）所言，真正的战略对话“应当是在两国都面临的结构性环境可能出现变化的背景下，将全球、地区以及功能性政策议题同对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讨论结合起来”。比如，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长远意图以及保证朝鲜半岛永久和平的路线图。在一些格外敏感的问题

上，如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周边的监视行为、核武器、网络安全、外太空的军事使用等，两国不仅需要展开深入对话，还应当付诸行动。两国应当在这些领域作出克制和互利的承诺，以减少不信任。

除了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的对话，中美两国官员之间也应通过定期而持续的对话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系。两国元首之间以及高层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及高度信任尤为重要。两国还需共同努力寻找双方利益重合而有望展开合作的领域。在一些具体项目和政策上的有效合作能够防止对抗冲击两国关系。最后，中美两国应该在多边论坛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专题 7.1 美中对话机制

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

贸易

1. 透明度对话
2. 贸易救济工作组
3. 反垄断对话
4. 商法工作组
5. 结构问题工作组
6. 商务发展与产业合作工作组
7. 电信对话
8. 保险对话

9. 产业与竞争力对话

10. 无线网络协议标准小组

11. 数据统计工作组

12. 高科技与战略贸易工作组

13. 产业与创新政策对话

知识产权

14. 知识产权法实施小组

15. 知识产权刑事执行工作组

16. 政府及国有企业采购小组

17. 软件知识产权工作组

行业

18. 农业贸易工作组

19. 纺织业顾问小组

20. 旅游业工作组

21. 信息产业工作组

22. 钢铁对话

23.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技术小组

24. 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能源

25. 气候变化政策对话

26. 能源政策对话

27. 美中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联合工作组

28. 美中能效论坛

29. 美中油气工业论坛

30. 可再生能源论坛

31. 先进生物燃料论坛

外交

32. 美中战略安全对话

33. 美中人权对话

34. 美中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对话

35. 美中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

36. 美中政策规划对话

37. 美中反恐与安全磋商

外交/地区性

38. 非洲对话

39. 南亚和中亚对话

40. 拉美对话

41. 亚太磋商

行业

42. 中医论坛

43. 交通论坛

44. 铁路项目交流

45. 农业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工作组

46. 出口管制对话

47. 法律专家对话

48. 美中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双边论坛

其他

49. 美中反腐工作组

50. 美中投资论坛

51. 美中城市经济合作倡议

52. 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与对话

半独立机制

53. 原产地规则联合专家对话

54. 年度劳动对话

55. 中美医改研讨会

56. 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

57. 金融联合委员会

58. 科技联合委员会

美中军事对话

59. 防务磋商会谈

60. 防务政策磋商会谈

61. 国防海事磋商协议

62. 美中核专家对话

第8章

商业和经济关系

傅瑞伟 (Charles W. Freeman III)

20世纪70年代前期，当中美两国开启一系列涉及两国关系方方面面的交流时，商业关系并不在其中。这些早期的交流活动基本都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贸易并不是美国官员所考虑的问题。曾在1972年陪同基辛格访华的约翰·内格罗蓬特 (John Negroponte) 大使回忆到，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几年里，他的国务院同僚以怀疑的口吻互致疑问：“我们能从中国人那儿买到什么？”

1972年，也就是美中重启贸易关系的第一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3240万美元的商品，对华出口达到了6350万美元。近40年后的2011年，美国对华的进口额达到了3993亿美元，出口额也达到了1039亿美元。2011年，中国排在加拿大之后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以近830亿美元的总额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截至2011年12月，中国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美国官员不再质疑中国能卖给他们什么东西。由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消费品的主要产地以及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官员现在要应对的是被这一现实深深震撼的民众。

作为美国的进口来源国和债务持有人，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激增。但这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全部。到2011年，中国已经在近15年里成为美国公司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2000年到2011年之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543%，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仅为80%。那些总部位于美国，但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不仅将中国当作出口的平台，也越来越重视为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服务。考虑到在北美和欧洲等已经成熟的市场难觅机会，美国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依靠中国市场以获得短期和长期的收益增长。

表8.1 中美贸易额，2001—2011年（10亿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出口 变化%	16.3 23.9	19.2 18.3	22.1 14.7	28.4 28.9	34.7 22.2	41.8 20.5	55.2 32.0	65.2 18.1	71.5 9.5	69.6 -2.6	91.9 32.1	103.9 13.1
美国进口 变化%	100.1 22.3	102.3 2.2	125.2 22.4	152.4 21.7	196.7 29.1	243.5 23.8	287.8 18.2	321.5 11.7	337.8 5.1	296.4 -12.3	364.9 23.1	399.3 9.4
美国贸易差额	-83.8	-83.0	-103.1	-124.0	-162.0	-201.6	-232.5	-256.3	-266.3	-226.8	-273.1	-295.5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

作为榜样的美国经济

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的仅仅30多年里，中国就从“后进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非凡的变化同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尽管有人不愿夸大美国作为市场和“导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同美国的关系的确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首先，在这个时期中，净出口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着巨大的贡献（虽然将中国经济归为“出口驱动”并不十分确切），其中来自美国的需求是促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中国接受市场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因为它将美国作为其经济上的榜样。尽管鲜有中国官员将美国作为中国发展的典范，但是在1978—2007年的30年中，中国的决策圈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美国方式。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以及加入后的几年里，中国的决策者们时常学习美国的经济体制是为了将其运用于中国的独特模式中去。中国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对美国银行业、保险业、物流、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运行情况的研究中。尽管中国的政策专家常常言之凿凿地表示，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这些经济体制，但是这些剖析美国经济结构的努力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收美国经济结构的精华。

美国的市场和经济模式在改革全盛时期对中国的政策制定的影响，可以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力上找到端倪。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申请入世的过程中，充满了由于中国人渴望加入这一声名显赫的国际组织而产生的朴素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两个现实的经济考虑是这一努力的主要动机。首先，时任总理朱镕基和其他改革者认为，国有企业和主管经济的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构成了以改革促发展的主要障碍。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举国目标，改革者有效地向国内阻碍改革的势力施加了外部压力。毫无疑问，最有效、最有力的外

部压力就是美国。美国正寻求通过由贸易代表领衔的谈判小组使中国的商业管制向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并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尽可能地与美国趋同。这并不是说美国同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谈判就不艰苦，其实它们有时甚至是白刃相搏的。

表8.2 部分经济和金融指数, 2000—2011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 增长率%	9.921.5 8.4	10,965.5 8.3	12,033.3 9.1	13,582.3 10.0	15,987.8 10.1	18,493.7 10.4	21,631.4 11.6	26,581.0 13.0	31,404.5 9.0	34,090.3 8.7	40,120.2 10.4	47,156.4 9.2
消费者 价格指数	0.4	0.7	-0.8	1.2	3.9	1.8	1.5	4.8	5.9	-0.7	3.3	5.4
工业增 值产出 增长率%	2,539.5	2,832.9	3,299.5	4,199.0	5,480.5	7,218.7	9,107.6	11,704.8	N/A	N/A	N/A	N/A
固定资 产投资 增长率%	3,291.8	3,721.3	4,350.0	5,556.7	7,047.7	8,877.4	10,999.8	13,732.4	17,482.8	22,459.9	27,812.2	N/A
	10.3	13.0	16.9	27.7	26.8	26.0	23.9	24.8	25.9	30.0	23.8	N/A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GDP相关数字的单位为10亿元。

表8.2

中国入世的第二个现实动因，在于避免美国国会中一年一度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讨论给中国带来的尴尬和不确定性。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ck Amendment）允许美国有条件地向某些非市场经济体开放美国市场，不过同那些基于“正常”基础而同美国展开贸易的国家相比，这些经济体只能享受有限的优惠。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春季，美国同中国这一非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问题就会成为国会激烈辩论的主题，商业和劳工组织的代表齐聚国会山，宗教、人权组织的代表等也会加入混战。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将对中国的公开批评看作对国内政的干涉，因此这样的辩论是对他们的冒犯。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而言，更令他们担忧的是，每一年有关是否保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正常贸易关系”的讨论，会使有意投资中国出口产业的投资者感到巨大的风险——美国市场只是临时向中国开放的。加入世贸组织会使美国给予中国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也会使在中国出口产业的投资者更加安心。

显然，对中国来说，在1978—2007年的30年改革开放期间，美国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市场，也不是在经济政策上唯一的指路明灯。中国官方小心翼翼地学习了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那些行之有效且能为中国的发展所用的政策要素。但在很多方面，很多中国经济智囊将美国经济视为模范，决策者会认真采纳美国同行的政策建议。在入世前的大部分时间和入世后的6年，当美国的谈判人员遇到他们不太喜欢的中国贸易政策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这些政策与美国的相关政策作对比。这并不能保证政策得到修改，但却能够保证他们的说法会得到认真的聆听。

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美国金融市

场的解体、从前秘而不宣的危险的揭露，以及美国经济因信贷危机而显现的脆弱性使一些中国人感到担忧，这些人希望实现美国式的经济体制，并为此“赌上了”职业生涯和名誉。正如时任副总理王岐山在2008年轻描淡写地揶揄说：“现在老师出了问题。”愤怒的失望、感到“受骗”的尴尬和在经济领域失去方向的紧张，三者构成了中国评论人士对危机和“老师们”的挫败感。危机也导致了一场关于中国为何能以相对健康的经济在危机中崛起的激烈讨论，同时也促生了界定和提出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的尝试——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它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而不是因为与之相似或借鉴其政策。

无论如何，这场危机使中国官员对那些试图以正确的方式（也就是美国标准）劝诫中国官员的美国贸易谈判人员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再洗耳恭听。无论“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成为代替美国和其他西方模式而带来持久、公正的发展的新选择，中国官员越来越深信，在经济事务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向美国同行学习的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利益集团开始质疑两国贸易，并将中国看作战略、经济和规范方面的竞争对手。60年来的共识受到破坏，而这一共识曾支撑着全球自由贸易的议程并将建设性的对华接触作为亚太外交战略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两国国内都出现了有关不平等的质疑，这使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不再是两国政府所能够掌控的了。

两国之间关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当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应当对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负责时，很多中国人却认为美国的政策就是有预谋地使中国经济维持在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的水平上。在中国，有大量的论调认为，美国及其他外国利益集团在小心翼翼地限制中国进入商品的最终加工阶段，而这正是利润最为丰厚的环节，目前正掌握在美国和其他外国利益集团手中。中国官方和民众

经常抱怨说，国外投资者会通过保留在中国组装的产品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或为商品标定远高于他们支付给中国供货商的零售价格，从而在中国的出口中获得巨额利润。中国希望从中国生产的产品中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这一想法也体现在了许多政策中，但恰恰是这些使美国更加担忧中国在寻求削弱美国的比较优势。2010年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在华美国商界对中国政府的歧视性法规日渐担忧。中国政府偏袒国内企业，一些政策限制了外资在某些领域的发展，而这些领域实际上已对外资开放了30多年。2010年11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次民调显示，58%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实力”视为对美国的威胁，相比之下，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机遇。

幸福的依靠

观念的转变，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对两国经济关系不怀好意的鼓噪似乎掩饰了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特点。在1998—2008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也就是两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的时期），这两大经济体已经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和显著的互补关系。现在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美国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工作岗位和生产力，同时也得益于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代替“美国制造”，但是这些看法经不起仔细推敲。

一来，这些看法忽视了超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在过去30多年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和我们向中国出售的产品不尽相同。很多时候，我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是在中国进入国际贸易领域之前我们的制造业就已经停产多年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电子产品、玩具、服装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尽管此时这些经济体仍在相关的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时美国所进口的产品上已经打上了“中国制

造”的印记。这使美国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相对下降，当然所减少的部分被对华贸易中大幅攀升的赤字抵消。总体来说，美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产品目录很难解释工作岗位和制造业为何向中国流失。

再者，起初美国出售给中国的是那些中国无法同美国形成竞争的产品，比如高端技术和工业产品，名牌产品以及中国以满足国内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而正在竭力生产的农产品。在这些领域，美国最初面临的竞争来源于西方和日本，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过去的30多年间，部分产品的生产工序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中国，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以及中国所组装的产品中高附加值工艺的输入都是中国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确定哪些来自中国的商品取代了美国商品方面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难题，即富有活力的全球供应链使得双边贸易甚至是地区贸易的统计数据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用于辨别进口商品来源的统计方法将产品的所有价值都归于该产品的最终组装地。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大量商品都是加工贸易型商品。也就是说，中国赋予这些产品的价值仅仅是组装材料所需要的劳动，那些商品的材料则来自东亚，甚至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换句话说，一件在中国大陆组装的商品包含了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和泰国的技术，而它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则可能在美国。商品的其他原料，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过中国所赋予产品的价值，但是出于统计的考虑，这些进口商品一律被视为在中国设计和生产。

表8.3 美国与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赤字，2000—2011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国大陆	-83,833.0	-83,096.1	-103,064.9	-124,068.2	-167,254.3	-202,278.1	-234,101.3	-258,566.0	-268,039.8	-226,872.2	-273,063.2	-295,456.5
赤字率%	19.2	20.2	22.0	23.3	24.8	26.2	28.3	32.0	32.8	43.1	43.0	40.7
其他亚洲经济体	-142,763.6	-121,955.6	-236,258.0	-123,330.1	-241,534.7	-153,500.1	-162,109.5	-146,891.7	-126,577.9	-84,937.0	-94,220.9	-99,057.1
赤字率	32.7	29.6	27.0	23.2	21.6	19.7	19.6	18.2	15.5	16.9	14.8	13.6
文莱	-227.5	-295.0	-240.7	-385.0	-358.0	-51.1	-502.2	-264.9	-2.7	58.6	112.3	160.9
缅甸	-453.8	-453.5	-346.1	-268.8	11.7	5.4	7.5	8.7	10.8	6.8	9.7	48.8
柬埔寨	-793.9	-932.9	-2,041.8	-2,204.2	-1,438.5	-1,697.3	-2,113.9	-2,324.6	-2,257.3	-1,797.1	-2,147.0	-2,526.6
香港（地区）	3,133.0	4,381.4	3,266.2	4,699.3	6,513.5	7,452.3	9,795.5	12,875.7	15,015.2	17,479.6	22,274.1	32,214.8
印度尼西亚	-7,965.2	-7,531.0	-7,087.6	-6,998.7	-8,119.1	-8,960.4	-10,346.2	-10,331.6	-10,154.7	-7,831.6	-9,532.2	-11,696.4
日本	-61,555.0	-69,021.6	-63,979.4	-66,032.4	-79,236.5	-83,321.1	-89,721.8	-84,303.8	-74,130.4	-44,568.5	-60,059.6	-62,643.0
老挝	-5.4	-0.1	1.4	0.6	2.5	5.6	1.7	-14.5	-34.1	-23.1	-47.1	-32.8
马来西亚	-14,630.9	-12,962.6	-13,665.3	-14,536.1	-17,328.7	-23,224.3	-24,089.1	-20,948.3	-17,786.6	-12,879.3	-11,820.5	-11,553.9
蒙古	-99.2	-131.8	-95.5	-162.6	-211.0	-121.8	-90.8	-37.5	4.5	25.7	103.9	302.3
朝鲜	2.6	0.5	8.0	25.0	22.3	5.8	0.0	1.7	52.2	0.9	1.9	9.4
新加坡	-1,172.0	2,651.8	1,415.5	1,422.4	4,027.0	5,356.0	6,057.5	7,224.9	11,968.7	6,536.9	11,590.2	12,282.3
韩国	-12,477.7	-13,002.8	-12,996.0	-13,156.8	-15,981.2	-16,309.8	-13,584.5	-13,160.6	-15,460.4	-10,563.7	-10,028.9	-13,150.5
台湾（地区）	-16,096.7	-15,252.6	-13,766.2	-14,151.5	-13,038.4	-13,211.3	-15,502.5	-12,448.9	-11,359.8	-9,878.5	-9,802.6	-15,429.4
泰国	-9,768.1	-8,719.6	-9,932.7	-9,343.2	-11,210.5	-12,633.1	-14,550.9	-14,418.2	-14,471.7	-12,164.1	-13,716.2	-13,898.5
越南	-453.8	-592.8	-1,814.8	-8,291.1	-4,169.8	-5,439.0	-7,466.4	-5,729.8	-10,111.6	-9,193.6	-11,158.9	-13,144.5
美国贸易赤字	-436,103.0	-411,899.0	-468,262.0	-532,350.0	-654,828.5	-772,574.2	-837,970.0	-808,765.0	-816,200.0	-503,582.0	-634,896.0	-776,714.0
美国GDP （万亿美元）	10.0	10.3	10.6	11.1	11.9	12.6	13.4	14.0	14.3	13.9	14.5	15.1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单位：百万美元

表8.3

移动的沙与再平衡议程

对于认为美国经济基本健康并信奉美国经济政策的中国人来说，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冲击。不仅如此，对两国各自的经济结构的长期持续性的看法也因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了转变。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时，美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70%，而自1980年开始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速。而在2008年秋季，中国的家庭消费尽管在绝对值上是增加的，但是在GDP中的比重则下降到大约35%。这两个经济体是截然相反的：对美国来说，因低息贷款而膨胀的过度消费已到了难以持续的地步；而在中国，相比于投资和出口，驱动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中显得并不重要。在美国的经济体制中，美国消费者对其支付能力之外的进口产品的需求同商品出口国（主要是中国）是否助长这些过度消费的意愿无关。对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官员而言，这样的经济体系，其长久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

两国政府单独或通过磋商在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概念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奥巴马总统保证在五年内将美国的出口额翻一番，因此他也采取了多项措施，旨在刺激新的、生产性的投资（包括吸引来自中国的资本）。中国在2011年春季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着眼于经济的调整。中国希望通过减少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忧虑，同时将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转移，从而促进国内消费。

认识到GDP结构的不可持续性，并有意调整GDP中各项的比重，这是一回事；而要通过重构两国各自的经济来修正经济的不平衡，则是另一回事了。美国要减少长期的消费，中国则要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这都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再分配和巨大的政治决心。即便是在处境最好的时候，这两者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在全球经济仍然疲弱、中美两国仍处于艰难的政治转型的时期，限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传

统动力，转而希望其他因素能够取而代之，这完全是碰运气。对两国领导人来说，任何可能增加失业的举动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

在再平衡问题上的交易几乎很难达成。实际上，两国正各自作出努力，同时竭力劝说对方不要采取破坏性的措施。中国希望美国不要限制其出口（尽管中国试图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或限制中国资本在美国投资那些比美国主权债务工具收益更好的资产。而美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接纳更多的美国出口商品，同时也希望中国减少试图削弱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政策和行为。

再平衡不仅仅是中美经济政策中唯一的议题：两国都试图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美国（和欧洲）地位下降，而中国（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越来越强大——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由于一些为了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政策会被视为向非本国的公司制造竞争壁垒，所以这些政策本身会对两国间的再平衡议程和减少经济摩擦的努力产生短期影响。

表8.4 通过支出方法计算出的GDP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	9,874.9	10,902.8	12,047.6	13,663.5	16,080.0	18,713.1	22,224.0	26,583.4	31,490.1	34,631.7	39,430.8	未知
总消费支出	6,151.6	6,693.4	7,181.7	7,768.6	8,755.3	9,905.1	11,263.2	13,151.0	15,234.7	16,682.0	18,690.5	未知
占GDP%	62.3	61.4	59.6	56.9	54.4	52.9	50.7	49.5	48.4	48.2	47.4	未知
家庭总支出	4,585.5	4,943.6	5,305.7	5,765.0	6,251.9	7,265.3	8,210.4	9,651.0	11,059.5	12,113.0	13,329.1	未知
政府总支出	1,666.1	1,749.8	1,876.0	2,003.6	2,233.4	2,639.9	3,052.8	3,500.0	4,175.2	4,569.0	5,361.4	未知
总资本构成	3,484.3	3,976.9	4,556.5	5,596.3	6,916.8	7,785.7	9,295.4	11,094.3	13,832.5	16,446.3	19,169.1	未知
占GDP%	35.3	36.5	37.8	41.0	43.0	41.6	41.8	41.7	43.9	47.5	48.6	未知
总固定资本构成	3,384.4	3,775.5	4,363.2	5,349.1	6,511.8	7,423.3	8,795.4	10,394.9	12,808.4	15,668.0	18,234.0	未知
库存变化率	99.8	201.5	193.3	247.2	405.1	362.4	500.0	699.5	1,024.1	778.3	935.1	未知
物资和服务净出口	239.0	232.5	309.4	298.6	407.9	1,022.3	1,665.4	2,338.1	2,422.9	1,503.3	1,571.2	未知
占GDP%	2.4	2.1	2.6	2.2	2.5	5.5	7.5	8.8	7.7	4.3	4.0	未知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单位：十亿元

争论的焦点

2003年，一些工业公司和劳工组织首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国会和小布什政府进行游说，他们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币值被低估了，这使中国在向美国出口商品时获得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此后，来自纽约的国会参议院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同其他人一道推动立法，欲对所有进口的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以此纠正人民币汇率过低导致的问题。

虽然在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上有所分歧，但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有意地大规模压低人民币币值。如果人民币币值被低估，那么很明显，中国产品的成本会更低，人民币币值实际上是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对本国制造业进行出口补贴。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受到低估会产生不可否认的扭曲性影响，这会削弱一些国家同等发展的能力及同中国竞争的经济结构。因此，很多观察家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拖了全球增长的后腿。

事实上，即便算上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还是要比同等条件下在美国生产的产品更便宜，特别是在上文所说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了其他国家（更不用说美国）的产品之后。这也说明，即使人民币币值发生足以使世界贸易格局改变的变化，中国的产业也不会转移回美国，而是会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并从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即使部分美国商品能够同中国竞争，对美国国内经济而言，总体上的影响是压制商品的零售价格，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公司从美国进口商品的能力。

考虑到美国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对中国贸易的赤字就成了政治话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成为极富爆炸力的议题。不管是左翼还

是右翼的评论人士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同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联系在一起。不管汇率问题是否是两国间的双边贸易问题，这一问题已经使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黯然失色。虽然到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7.5%（这是美国早先认定人民币被低估的额度，也是2004年参议院议员舒默在他的法案中为惩罚性关税确定的额度），但是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还是正式通过了对汇率操纵者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即便没有指名道姓）。虽然该法案未被两院通过，但汇率问题仍然将是有关美国与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政治讨论的焦点。

美国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也使那些提倡更为自由的汇率机制的中国官员大为失望。这些官员私下对美国同行抱怨说，中国汇率管控事关主权，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干涉大大限制了像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机构改革汇率机制的能力，因为这样的举动会被认为是对美国利益的屈从。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汉克”·保尔森（Henry “Hank” Paulsen）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曾寻求淡化在汇率问题上同中国的公开冲突，以便给予中国人民银行一定的政治空间在内部解决这一问题——自由的汇率机制也会减少中国金融系统的压力并在处理通胀时赋予中国政府更多的手段。但是没有了美国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也面临着来自其他部门的抵制。

2003年末，在与时任中国央行副行长的会面中，笔者提到中国的汇率问题在美国产生了政治后果，因为它被认为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该副行长恼怒地表示，其实，“在中国，我们每天必须创造5000个工作岗位，以应对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一内政问题远远超过了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特别是中国的商务部，汇率问题普遍被视为就业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过去8年中持续关注人民币的升值。他发

现，随着人民币币值升高，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也在增长，这说明在人民币币值升高后，出口商的日子基本没有变得不好过。但是很多中国官员认为，在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如不缩小规模，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所获得的微薄利润将使它们难以为继。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在沿海出口工业聚集地，企业因受到不断增长的工资压力而将工厂搬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加重它们的压力，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再注重传统出口密集型行业中低利润、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将重点放在了能够提高这些行业的利润和价值的战略上。

表8.5 人民币 / 美元的汇率以及美国的贸易赤字，2000—2011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汇率，人民币 / 美元 增值%	8.28 0.0	8.28 0.0	8.28 0.0	8.28 0.0	8.28 0.0	8.07 2.5	7.80 3.3	7.29 6.5	6.82 6.5	6.83 0.0	6.60 3.3	6.29 4.6
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赤字（10亿美元）	83.8	83.1	103.1	124.1	162.3	202.3	234.1	238.5	268.0	226.9	273.1	295.5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在通信、新能源、铁路和其他领域内，中国已经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典范。2011年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占到了出口总量的35%。其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也十分惊人：2010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了56.2%，而美国在同期则下降了1.7%。2010年中国有1万名工程学博士毕业，而美国仅有8000名（而且其中的中国学生和华裔学生有很多人计划回中国发展）。中国建设以企业为引领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努力引起了跨国公司和媒体上的警觉。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要在2020年之前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该纲要提出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到2020年，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将加强技术创新作为国家目标对经济发展和提高民族自豪感都有好处。中国领导层着力提高中国的技术能力有其重要原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就任之初就认识到，过去30年过度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人口、环境和社会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中国在接受和改造已有技术方面（这也是一种创新）成效显著，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仍比较低。世界银行2008年的研究显示，1992年中国对加工贸易（即从外国进口材料和配件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国外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整之后，中国的技能密集度就没有出现过变化。且不说像电信巨头华为这样的创新公司，在当今的中国工业中，创新企业仍是少数，更多的是不投入持续研发的非创新企业。

2005年胡锦涛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中国的长期繁荣要建立在以效率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上，而不能基于初级产品的输入。要求中国企业通过创新增强竞争力是十分明智的。但是，企业应当明白它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道路上也有一些教训。首先，盲目着力于创新而忽视了它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会使这些努力难以实现最终目标。对创新广义上的定义——不仅是发展前沿技术，也包括对现有技术的改进——会更有助于实现长期创造工作岗位和财富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求技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限制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也会限制知识和效率的发展。将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这一目标看上去就像过去的出口代替政策一样，同样与自由市场政策背道而驰。须知，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自由市场政策。

第二个教训是中国政府应该明白何时结束其推动创新的努力，何时把这些交给市场来做。目前，促进大型国有企业的研发是推动创新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些大型企业恰恰对传统上能够产生发明和创造的激励因素不甚敏感。据估算，比起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利用每一百万科研经费所能创造的专利更多，每100名科学家所能发明的专利也更多。依靠国有企业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方式。

最后，如果私有企业比国有大型企业更具创新能力，那么中国有必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能更好地鼓励私有企业创新。按照现有的发展路径，拥有更多政治权力的国有企业也许能更好地保护其发明不被盗版，但是这将使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私有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

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资本史无前例地涌向美国。中国利用巨大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境外国债持有者。截至2012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178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0959万亿美元）。此外，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也大幅增长。2009年和2010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额增长幅度都达到了130%。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为53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额已累计达到约116亿美元。

随着中国投资的增长，一些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战略选择，这种投资不仅为了获取商业上的利益，更是政府大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政策着眼于为中国获取自然资源和核心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结论便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和技术正在受到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来自中国政府所控制的投資。另一方面，那些对增长的中国投资持支持态度的人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游说中国核心领导层，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中国对美国的投資有三种途径：（1）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資美国国债；（2）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利用部分外汇投資美国股票；（3）通过新建投資和并购两种手段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資。其中，中国对前两种投資方式严格管控；对于第三种，一部分受到政府的控制，另外一部分则由市场驱动。

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0年以来显著增长，在2011年6月达到3.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约70%为美元资产。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了美国国债。为了应对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更能规避风险的投資战略，将资产变更为分散地投資期货和包括股票、对外投資在内的其他硬资产，特别是投資于资源和技术。

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資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欢迎任何资本前

来投资，另一种则担心中国的投资是由中国的战略考虑所驱动的，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相悖，这也使美国的决策者对中国在“战略性”技术和资源资产上的投资深感担忧。在美国外资委员会多次审查之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Unocal）和华为收购3COM子公司的行为由于这些担忧而流产。

美国决策者担心，中国的海外投资会将国家安全的考虑置于企业的利益之上。但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公司——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以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国家战略为导向。国有能源公司由于其糟糕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媒体严厉的批评，而其政府中的支持者也遭到了挥霍无度的指责。因此，中国政府很难通过那些仅着眼于安全利益的行政命令来推动非市场化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若是出于分散外汇储备目的，那么比起大型国企，让私营企业使用这些资金在海外进行投资在政治上更加可行，同时也会更加理性和以市场为导向。

正如上文所说，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决策中产业规划的回归。鼓励某一产业发展而限制另一产业发展的政策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中由来已久。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出版“投资目录”，该目录将各产业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个层次。这一目录是省级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指南。“受鼓励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在高科技和提供大量就业的产业中）会得到相应优惠。以税收、土地和用工上的优惠而体现的补贴、极为简化的管理程序以及其他优惠使中国经济中的某些产业比其他产业更受优待。

近年来，对产业的鼓励和抑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超的艺术。在中国，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官方团体，特别是被认为与国内所支持的产

业打交道那一群人，正在迅速形成新的工业集团。很多时候，即使中国政府中不存在广泛的共识，这些集团也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来鼓励中国某些产业的发展，从而对美国公司及其员工形成挑战或让它们处于不利地位。一些有望发展成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不一定是国企）已经获得了一些特殊的优惠。这些公司所获得的优惠各不相同，但是中国政府扶植它们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官方出于提升民族自豪感的目的是支持中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竞争。当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产生利益冲突时，中国公司总能够因为“爱国主义”而获益。这一点在绿色能源技术领域尤为明显。考虑到中国国内的风能和太阳能市场规模庞大，很多中国官员认为，绿色能源领域是中国公司可以在国际商业中大展拳脚的领域。

这些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会认为中国政府会不顾经济理性，而对中国公司进行补贴。它们认为，这种无限制的补贴将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和市场的扭曲，这在资源和商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新兴的中国技术公司却手握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支票本。

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的管理机制

自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政府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大大增加。为了促进对话与合作，并为中国同人提供一个学习美式经济活动规则的平台，很多经济机构和部门之间的会谈一再升级，并实现正式化。到2008年，大量的美国内阁成员和中国的部级干部实现互访，并就经济和商业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3年，一年一度的双边合作机制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获得升级，中国方面派出了副总理，而美国方面的代表则是两名内阁官员（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这一原本为促进合作而

建立的机制成为两国解决贸易和经济问题，回应公众对两国关系的关切的平台。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悄然搁置了两国财政部之间沉寂多年的对话（经济联合委员会），另起炉灶牵头建立了由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副总理参加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涉及许多美国内阁官员和相应的中国官员。保尔森的这一举动是希望将两国对双边商务摩擦的讨论上升到对全球经济战略的讨论。该会谈包含金融结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方面的讨论，美国希望中国能在这些问题上成为其全球经济管理的伙伴，而不是其经济政策的跟随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她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两国在合作气氛下解决实质性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这些高层会谈之外，有关农业、能源、创新及其他问题的内阁和内阁以下级别的广泛交流，已经成为管理和维护积极的商业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从所达成的协议来看，这些对话的结果反映了两国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努力，也能看到美中力图转移国内对两国经贸关系中所体现的不平等的批评。

结论

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成为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处理好这些问题，使国内一致支持向中国开放市场，这绝非易事，但也不是没有好处：除了个别时候的龃龉之外，无论怎么衡量，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都是极其成功的，也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是其全球业务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很多公司正在扩张它们的在华业务。尽管如此，两国的贸易问题仍在不断增加，同时在这类问题上达成实质性进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原因之一是中国官员似乎不再把美国同侪当回事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者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等外部压力使市

场经济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认为入世的失大于得；有的人甚至怀疑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世贸组织的原则——这些原则多数是在美国领导下形成的——是否能够兼容。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意味着两条核心原则：开放市场（保持市场的开放性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状态）以及国民待遇（一个国家应该在该国市场上给予外国人同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应当相互承诺彼此开放，并将此作为国家利益。世贸组织的成员认识到遵循这两个原则所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国内企业很可能转瞬即逝的狭隘的利益。世贸组织在某一方面是很大胆的创新：使主权国家转让部分权力，来约束和控制它们的经济。通过打破贸易壁垒，世贸组织和该组织所代表的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共识都主张，一个没有国界的商业世界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一共识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许多利益和财富。但这一共识是十分脆弱的，而且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身上似乎也找不到替代方案。

作为这一共识新近的参与者，这一状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的经济健康和福利非常依赖一个高效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来管理国际贸易。美国在领导一个更为稳健的世贸组织自由化进程问题上左右摇摆，也难以清晰地阐明其对贸易政策的愿景（除了一个地区性颇强的方案之外）。

每一个政治体系中的地方政治都会破坏国家对开放市场和国民待遇的国际承诺。每个政治体系中的国内行为体都会也都愿意参与（有时甚至是控制）政治进程，从而以一种与世贸组织根本精神相悖的方式维护它们的利益。所以毫不奇怪，中美两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两国遵循世贸组织的原则。但问题在于，如果排斥世贸组织的原则，中美双方都会摒弃各自经济成功的本质要素，也会对其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困难，更会侵蚀双方建设性接触的根本基础。像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十分有用的机制，但是这距离建立一个两国贸易关系的可持续的双赢途径还很远。

如果中美两国希望建立一种既能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又能给对方保护其国家利益留有一定空间的关系，那么两国之间成功的经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对成熟的贸易关系都面临国内政治的压力。但是双方必须达成一致，至少双方必须认可某一核心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附和美国的 worldview，也不意味着美国必须为了更大的外交利益而放弃国内的经济利益。但是，美中两国间的关系日益变得不协调，缺少共识。经济关系一度是联系两国的纽带，但现在却可能使两国翻脸。40多年的商业互动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关系。官方来往引人注目，但实际上，两国中其他的利益攸关者对于推动这种关系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应对政策挑战和向各自的公众展现它们对建立高效的双边关系的承诺等方面，两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美经济中的利益攸关者的直接联系和对话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公众对两国关系的讨论并没有抓住中美关系的进步和取得的成果。如果中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实现其潜力，两国利益攸关者之间的交流就必须反映出这种前进的态势。

第9章

文化关系

劳泰瑞 (Terry Lautz)

文化可缓解国家间及民众间的紧张关系，并促进其互信。文化能够赢得人心以实现国家和政治目标。文化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增进理解的桥梁和展示实力的手段，但是，这一点却常常被政策分析人士忽视。相反，他们更注重国家间的外交、经济、军事关系等“硬”的安全问题，却忽略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在塑造形象、影响舆论和传递价值方面的作用。

本章分析了近年来中美文化关系所展现出来的趋势。文章首先介绍了两国政府如何利用文化来提升形象、增强影响力，接着分析了中美社会之间随着中国的财富和机遇增加而兴起的一些交流形式，这些交流多是通过大学、非政府组织、智库、基金和艺术界进行的。本章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在同中国进行的文化影响力甚至软实力的竞争上，美国是否正面临失败？文化交流是否创造了更多的互信和自信，而不是摩擦和忧虑？展望未来，又有哪些教训、机会和需要关切的问题？

两国对彼此的看法历来是复杂和矛盾的。模板、伙伴、自私的恶

霸、霸权国家，这些都是中国对美国的看法。而美国不是认为中国弱小且贫困，就是认为它危险而充满敌意。这些正面或负面的看法不稳定地混杂在一起，纠缠于两国关系之中。这个问题主要可以用美国的家长作风和例外主义来解释，此二者在美国历史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其他国家相比，前往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显然更多，他们给中国传递着一条信息：只要接受基督教和西方价值，现代化就会接踵而至。很多中国的教育家和领袖人物同意外国人的看法，并同他们一道建立了大学、医院和减少饥荒项目。但是中国政府有时会将这些机制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明证。正如唐耐心（Nancy Tucker）在其章节所言，在20世纪前50年里，试图以美国的意愿再造中国的尝试以戏剧性的失败而告终。

中美关系的新纪元随着1971年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交流而开启，继而尼克松总统在次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随之而来的是大熊猫、剧团、体育团队和学者，两国期望这些善意的努力能为两国的官方关系赢得群众支持。冷战带来的孤立已经给双方对彼此意图的认识造成了危险的扭曲。

中国同美国进行接触，被视为美国人改变中国的又一个机会。通过文化和贸易接触引导中国发展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的体制，这成为美国人不言而喻的希望。这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信奉的“和平演变”战略异曲同工。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中国领导人对于那些被他们称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价值观所具有的腐蚀性仍然心存怀疑。他们质疑美国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并认为应当重视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争论仍在继续。2011年，胡锦涛强调要加强中国的“文化安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中国随即在2012年1月推出禁令，限制“低趣

味”的选秀、竞赛及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数量，增加新闻和教育性节目的播出。

即便是邓小平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79年启动两国学生交流项目时也是各打各的算盘。务实的邓小平希望通过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培养来弥补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高等教育遭到的破坏。许多中国学生被派往美国主要进行理工学科方面的学习，同时，大量美国学生和教师来华进行中国研究。卡特和邓小平都认为，指导方针应该是平等、互惠和互利的，但事实远非如此。

不过，其产生的结果是积极的。正如李成（音）所言，中国的对外学习实际上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国际金融、国际法、宪政和公共管理等新的学科建立了起来，中国的大学还开设了有关人权、环境与气候变化、宗教、性别问题以及同性恋的课程。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精英并不见得比“本土精英缺少民族主义感情，或更加亲美”。相反，“海归”学生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但是他们对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以及中国的巨大社会变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存在摩擦和怀疑，但总体上，文化交流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中国人喜欢好莱坞电影、NBA以及麦当劳，而美国人则对针灸、艺术展和武术十分推崇。中美之间的旅游业日益兴旺。此外，21世纪以来，美国家庭已经收养了超过6.5万名中国儿童。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得学习英语，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也开始学习中文。成千上万的交流项目推动着两国关系。双方的这些联系值得欢欣鼓舞，它们有助于克服误解，并有利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不过，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两国在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这些联系中也会出现问题 and 风险。

中美之间的文化外交

中美官方现在越来越注重公共外交和两国关系中的文化维度。其中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2010年5月启动的中美人文交流磋商机制，该机制在北京和华盛顿轮流举行会议，目标是“提高和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联系”。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补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其视为“建立两国政府间合作的首要对话机制”。

中美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是一个高层论坛，交流信息的渠道，也是鼓励双方增进交流的一种方式。文化、教育、体育、科技和妇女问题已经被视为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文化交流包括在表演和视觉艺术上的青年发展协助，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中国教育部联合主办的文化论坛，博物馆和图书馆间交流以及由费城交响乐团、美国西部牛仔竞技表演（Rodeo China，向中国介绍美国西部文化的团体）、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和常青藤学生理事会（Ivy Council，常青藤联盟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的合作机构）等团体所组织的项目。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认为，该机制“不仅能够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同时也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

胡锦涛在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将“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领导人相信，输出中国的文化将会提升其国家形象、赢得尊重，并帮助其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这也能够缓解外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胡锦涛的政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的增长也体现了这一政策。

2011年9月，时任文化部长蔡武向美国听众介绍了“基于人伦关系的开放而包容的中国文化它体现了辩证法的中庸哲理，以及能够防止

偏狭与偏执的和谐、平衡的理念。同时，中国文化也表现出一种既深且广的博爱精神和慈悲情怀”。蔡武还表示，中国从没有把弱小国家作为殖民地，中国古代对外的经济往来，也一向以和平互惠的方式进行。总之，“千百年来，中国人崇文而不尚武”。他说，这种和谐文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种文化依赖于“一个和平、安宁、稳定的国际环境”。他总结说，“我们应该通过交流深化相互理解，通过对话增加相互信任，通过交往扩展共同基础”。

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其软实力的龙头项目，该项目是为了在国外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孔子学院由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这是由政府资助的机构，通常被称为“汉办”。2004年马里兰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截至2011年，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达到75个，而在世界各地已经有350多所孔子学院，总共耗资约5亿美元。隶属于孔子学院的500多个孔子课堂还为中小學生提供教学资源。大多数孔子学院都建在大学里，这区别于法国、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所资助的独立的文化中心。他们在中国的伙伴大学为其提供师资，而国家汉办不仅为其提供教学材料（但不要求必须使用这些材料），还每年都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201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有超过2000名代表参加。这些项目中最为活跃的项目包括：匹兹堡大学（该大学帮助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教师和高中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犹他大学和芝加哥公立学校等项目。2011年1月胡锦涛视察了在芝加哥的项目。

每一所孔子学院每年会得到国家汉办10万美元的拨款，同时孔子学院也需要通过一定形式进行对等的支持，这种支持一般是提供师资和办公场所。随着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等名牌大学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一种双重体制正在形成。斯坦福大学每年获得100万美元，同时提供100万美元，供相关的会议和项目使用，此外，它还会得到100万美元的研究生奖学金，另有200万美元用于在孔子学院资助一个有关中国诗歌的教授职位。这样一来，斯坦福大

学每年总共能够从孔子学院的项目中获得400万美元。

孔子学院拥有相当的自主性，没有证据显示国家汉办干涉各学院的工作。孔子学院在资金的使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弹性。很多孔子学院把精力集中在小学和中学，有的则着力于商务，有一个孔子学院甚至专注于京剧。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中国的资助只是预算中的一小部分。孔子学院能够创造或强化同中国大学的关系，为学术研究、交流和招生提供机遇，这也是该项目的一个激励因素。对中国来说，孔子学院是获得新受众的一种划算且有价值的方式。

2011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美国在华公共外交的详细报告，其中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软实力竞争表达了忧虑。在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要求之下，该报告称，中国发起的一些充满活力且经费充足的项目连美国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在外交政策领域已经被中国赶超，中国能够利用美国开放的体系，以不同的方式散播其信息，反过头来却可以用它自己封闭的体系阻碍美国的相关努力。”正如中美之间失衡的贸易一样，“当直接与其他国家的公众打交道时，我们会面临另一场失衡的竞争”。

尽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增，卢格的报告仍指责说，中国已经阻碍了美国同中国公民接触的努力。中国在美国建立了孔子学院，而美国却无法开展对等的项目。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大型的文化中心——只有五大“spaces”。美国资料中心——建于各驻在国图书馆中的资料中心——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富布莱特项目十分活跃，但是共同资助十分有限，而且有关建立中美合作的富布莱特委员会的讨论也未能成功，而这在其他国家早已建立。

报告表达了对美国可能在信息战中输给中国的担忧。2011年5

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纽约时报广场设立办事处，中央电视台出现在很多美国的有线频道中。中国的国家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美国9个城市发行（当然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舆论要另当别论）。相比之下，只有两名驻京记者的美国之音（VOA）已经缩减了普通话广播和电视，其粤语服务则被完全取消，它已经将精力转向网络和社交媒体。

美国驻华大使馆于2011年10月仿照孔子学院的模式，给予美国相关机构近100万美元，与中国大学合作建立美国文化中心，旨在介绍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办的美国文化中心成为其中的试点；这两所大学有很多联系，其中就包括合办孔子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华的公共外交所受到的限制包括国会预算的削减、对安全的担忧（限制了同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接触），以及美国将外交重点放在伊斯兰世界等。冷战之后，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于1999年取代了美国新闻处，这标志着公共外交重要性的下降。不过说到底，美国政府各机构在介绍美国文化和价值上并不是最有效的。多元而富有生气的美式生活实际上通过媒体、电影、电视、广告、非政府组织等多种交流形式，由私人领域的个人和机构进行传递。

文化理解的方式

教学是中美文化交流中最有效的方法，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数量都要多。2010年到2011年，大约有157558万名中国学生（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2%）前往美国大学学习。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所占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上

一年度人数增加了43%。其中绝大多数人自己承担全额学费和食宿费用。很多人甚至向招生人员支付了大量费用。同时，有很多难以达标的学生使用伪造的文件，这也招致许多抱怨。

相比之下，2010年到2011年间，有1.4万名美国学生前往中国，而十年前这一数字只有3000。这使中国成为美国第五大留学目的地，不过前往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只占赴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总数的5.1%。（前四位的国家依次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另外，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另有1666名美国人在中国参与各种项目。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访问中国时曾呼吁扩大这一数字。随后国务卿希拉里宣布了“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期望到2014年能够将前往中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的数量翻一番。与之相关的目标是，为弱势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以便更多不同层面的美国人能够对中国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为投身全球经济作好准备”。其对象包括社区大学、初高中学生、非裔和拉丁裔学生，以及相对贫困和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为了帮助该项目获得所需的6800万美元的经费，卡特皮勒、摩托罗拉、花旗集团和可口可乐全力资助了许多学校和海外学习项目，美国国务院也发动各个基金会提供支持。中国也为该计划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国家汉办为美国高中生、校长以及美国的汉语教师提供了1万个前往中国进行短期学习的“汉语桥”奖学金名额。2011年4月，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决定为美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再提供1万个为期4年的奖学金名额，以支持他们在华学习。中国在美国的6个领事馆每年都会给美国的大学50个奖学金名额，同时中国地方政府也会为外国学生提供经费。

美国政府为许多资助美国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和教师前往中国或其他国家从事研究、语言学习和文化研究的项目提供了大量经费。这些项目包括富布莱特项目、本杰明·吉尔曼国际奖学金、伯仁国际研究奖、国家安全教育计划、国家安全语言青年计划（针对高中

生)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同样也遇到过挫折。如2011财年给国家资源中心项目的拨款从3400万美元减少到1800万美元,减少了将近47%;该项目在美国许多大学中开展,以支持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地区研究。另外,富布莱特—海斯博士论文海外研究项目也被取消。

尽管研究中国的美国人要远远少于研究美国的中国人,但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平很高,相比起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仍不完善——虽然中国人更了解美国的流行文化。中国学者渴望更加细致地了解美国,但是由于当前的政策问题(如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学者对英语语言和文献的过分投入(而非重视文化和历史),使得他们对美国社会有着先入为主的想法。一名中国分析人士表示:“我们不应该过度关注美国总统的讲话,而是应当研究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来帮助我们阐释美国的行为和决策。”

美国研究学会、港美中心、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美教育基金会以及中国富布莱特学者项目都在积极地阐释美国历史和文化,但仍需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和机构间交流。美国的基金会、智库和大学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所提供的支持远远不够。另外,美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相当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很容易被人理解。

英语教学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具有中心地位,中国对外国英语教师的需求依旧很旺盛。对此,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作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设有英语教学项目办公室,负责教师培训和课程开发,美国驻华大使馆设立的地区英语项目办公室负责协调相关工作。另外,和平队也有138名志愿者在中国教授英语。

很多美国青年通过科罗拉多中国委员会、铭贤联合会、普林斯顿

亚洲、斯坦福亚洲志愿者、世界教学组织（由哈佛学生创办）以及雅礼—中国协会等非营利组织有机会到中国做英语教师。这些组织都提供了深入进行跨文化学习的良好机遇。

美丽中国——原名中国教育行动——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尝试。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北京的美国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08年，隶属于成效显著的美国教育。除了岭南基金会和卢斯基金会提供的启动资金外，美丽中国从高盛集团和香港的李嘉诚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在这个项目中，来自中美两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会被派往缺乏师资力量的小城镇，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美国大学生主要教授英语，中国大学生则教授理科和数学。中国的学校为支教人员提供住宿和一半的薪水，美丽中国项目要求每个支教人员都能够享受到淋浴和网络服务。2010年，有60名教员在云南的20所中学里支教，2011年这一项目将扩展到广东，届时将有180名教员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该项目的目标是，到2016年参与者能达到1000人。

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统计，2009年，美国有近61万名大学生报名学习汉语。许多双语和双向浸入式（two—way immersion）项目在美国的出现说明中文热并非昙花一现。虽然犹他州的亚裔人口不多，但该州小学仍开设了17个浸入式中文教学项目。（洪博培曾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大使。他在担任犹他州州长期间，对这些外语项目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些项目中，学生们在一天中有一半时间使用英语，另一半时间使用中文。犹他大学的埃里克·奇普曼（Eric Chipman）表示，“这种项目的需求很大，每个学校都有大量的人等待入学”。2011年至2012年间，中国汉办向犹他州派遣了30名汉语教师，其中的6人负责双向浸入项目，其余24人则负责教高中和初中。由于中国是犹他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商务活动是解释犹他州拥有众多汉语项目的首要因素，此外，对东方文化、哲学的兴趣以及摩门教的影响对此都起到了作用。“多数从事浸入式汉语教学的非母语教师曾经是传教士，而这些项目的很多学生，其父母也是传教

士——他们认识到能够说流利的汉语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他们希望子女也能学好汉语。”奇普曼说。

许多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中国促进中小学教育。2011年，约1200人参与了在旧金山召开的全美中文大会。管理中文进阶考试的美国大学理事会通过中文和中国文化行动为管理人员和教师提供帮助，同时也同中国孔子学院总部联手与全美的地方学校和私立学校展开合作。全国亚洲教育联盟为美国中小学的亚洲研究举办研讨会并提供其他资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起的全国中美教师教育交流计划得到了弗里曼基金会的资助，过去5年间，已向两国派遣了约400名教师。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很多美国大学纷纷涌入中国合办大学，这与传统上在海外进行研究和语言学习的模式大为不同。中国会确保外国学生的人身安全，给他们提供安定的政治环境，当然也会带给他们中国美食、令人激动的异域生活经历以及工作前景。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大量的留学生和外国学者的到来能够促进它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同样也能弥补因大量天才学生流向海外而造成的人才流失。

另外，当美国大学面临财政困境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校长托马斯·乔治（Thomas George）毫不讳言建立四川密苏里大学的原因。他说：“我们可以从中赚钱。”根据协议，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密苏里科技大学以及天府学院将进行合作。这两所美国大学将帮助设计课程，而该校中国学生的最后两年将会在密苏里度过。通过合作，两所美国大学每年能够获得400万美元的收入。

许多合作是工商管理类项目，这些领域能够迎合中国提升其在经济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需求，所以毫不奇怪。哈佛商学院与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合作推出了中英文双语教学的高级管理课程。该项目为期三周，分别在中国和哈佛大学进行，培训费用高达4.5万美元。哈佛大学面向中国推出的全球CEO项目同样为期三周，费用为7万美元。

美国的大学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办事处来协调大规模的海外学习、学术研究和交流项目。设立于2010年9月的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要负责三项工作：商业、经济和政策；医药与公共健康；文化、社会和艺术。2012年，斯坦福大学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斯坦福大学中心，“作为斯坦福大学师生在中国进行研究、教育项目的基地”。一位在香港的斯坦福大学校友为该项目捐赠了500万美元。密歇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在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研究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计划在上海启动工程研究项目。

根据位于伦敦的“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报告，已有9所美国大学在内地或者香港开设了分校。1986年由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最早的中美合办教学研究机构，它开设一年制和两年制的硕士班。近期，从中国移居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本杰明·杨（Benjamin Yeung）向该机构捐赠了1000万美元，这将为两所大学的科研和交流创造新的机遇。

纽约大学将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于2013年在上海浦东开办新学校。纽约大学称，上海纽约大学“是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提供文理通识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校园相似。该校将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为来自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海市政府为该校提供初始资金。

与此同时，杜克大学与江苏省在距离上海65公里的昆山共建了一个200公顷的校区。这个将在2013年挂牌的学校在杜克大学的教职工中引发了争议，他们质疑建立该校的决策过程，并对学术自由以及建校将花费的4000万美元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表示担忧。尽管宣称要建立

一个综合性大学，但昆山杜克大学首先开设的将是工商管理课程。该校学生将分别在昆山和北卡罗莱纳接受教育。

美国的私立机构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推动了中美之间的教育、对话、倡议和交流。它们在医疗保健、人道主义援助、法律和人权以及环境等问题上提供培训或技术性援助。这些行动的目标都是促进目前规模不大，但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与中国的部委合作来实施各种项目。总部位于波特兰的美慈组织就是一个例子。该组织为少数民族、农民工和农民提供帮助，并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参与了救灾援助。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在生物多样化、气候变化、能源和其他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行动，并资助了许多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该组织以大熊猫作为标志）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同时在中国拥有6个地区办事处和80余名工作人员，并致力于可再生能源、森林可持续经营、优化药用动植物贸易管理等工作。

宗教性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有很大的自由度。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世界宣明会、安泽国际救援协会、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以及仁人家园拥有庞大的人员和预算。尽管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其他宗教活动是被允许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东门国际已经在中国发放了数百万《圣经》，并建立了50座教堂和超过200座图书馆。

很多组织都在促进教育和交流。1966年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深信健全而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 and 世界的利益，因而致力于促进美国同大中华地区的理解与合作”。该委员会为两国领导人

提供了陈述各自观点的平台，培训教师、议会工作人员及青年学者，同时设立了旨在让两国公众增进了解的项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组织是百人会。这是一个无党派组织，旨在“使华裔美籍领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上发出统一的声音”。

中国官方对于私人领域的扩张态度颇为矛盾，在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但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包括限制性的法律、内部管理和治理结构的缺陷、全职专业人员的匮乏以及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但总的来说，中国对这些组织——它们能够增强中国提供培训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的容忍度在增加。

美国主要的智库几乎都有研究美中关系以及中国的国内问题、区域、全球实力问题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智库通过讲座、会议、政策出版物、在国会作证以及同美国政府机构的交流来向公众和媒体传递信息。部分智库还出资赞助了讨论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议题的非官方二轨外交会议。这些智库的资金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赞助，也有一部分来自情况说明会、研讨会和课程所得收入。

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全国亚洲问题研究所、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都在对与中国相关的内政、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性问题进行研究。它们的议程涵盖卫生、能源和气候变化、贸易、经济、政治、战略等。

美国专家也会与中国同行交换信息，交流意见。已有两个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促进“美中两国的学者对中国发展过

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合作或单独的研究”。卡内基基金会也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它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学者，“针对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合作开展研究，这些问题包括：核不扩散与裁军、国际经济与贸易、气候变化与能源；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安全挑战，如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等”。当然，获得来自中国的资助是这些机构在北京设立相关机构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

前往美国的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的中国研究生和政策专家很多，但长期在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却不算多。尽管许多较为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流利，其中也不乏华裔，但是许多高级中国问题专家汉语水平不够高。许多中国的研究机构对国外的学者表示欢迎，但是缺乏与之配套的组织良好的项目。中美两国在政策方面的合作研究相当少见。

私人基金会在中国的关注领域与非营利机构和组织略有重合，包括教育和文化交流、扶贫和医疗保健、中国公民社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中的作用。

弗里曼基金会、卢斯基金会和斯塔尔基金会致力于教育和交流事业，以促进美国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并非巧合，因为这三个组织的创始人——霍顿·弗里曼、亨利·卢斯和斯塔尔——年轻时都曾在亚洲待过。其他基金会则着眼于跨国性问题。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关注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蓝月亮基金会关注环境问题。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中国防治艾滋病。

福特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培育本土组织，且每

年会为此提供1200万美元的资助。福特基金会特别重视对贫困人口、妇女、移民、少数民族及其他团体的帮助。亚洲基金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重点关注法律发展、治理、妇女权利、灾害管理、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对福特和亚洲基金会本土员工的薪酬规定十分复杂，但并没有干涉基金会的其他工作。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南方的环保项目。其中之一是同北京的全球环境研究所以及华盛顿的气候战略中心共同管理的降低碳排放项目。该项目的主任郭慎宇女士经常往返于纽约与广州之间，致力于培育中国本土的基金会，帮助非政府组织提高获取资助的能力。郭慎宇表示，现阶段出现的中国慈善组织“有钱却不知道如何进行捐助”，其管理和吸纳大额捐助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许多团体与中方同行展开合作，交流最佳行动方式，以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的统计，2011年中国已有1186个私人基金会，自2004年管制放松以来有了显著增长。公众对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7万多人死亡，50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反应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的转折点，尽管其中多数捐赠仍然来自企业。

位于纽约的美国基金会中心与成立于2010年中国基金会中心共享信息和数据库。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也同一批新近出现的中国慈善机构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和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在2011年8月发起建立了中美战略慈善平台，希望能够建立“中美慈善领袖合作平台，促进创新型慈善”。该平台建立了五个联合委员会，负责五个领域的工作：法律问题（包括税收政策）、能力建设、社会事业投资和创新、非营利部门、透明度和公信力。

随着中国日益富裕，美国的基金会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其中两个主要问题是：首先，如何能够让慈善事业在中国得到支

持，美国的基金会在这方面如何提供帮助？其次，美国人能否将他们的计划同中国的现实协调起来，特别是在像法律和人权这样的敏感领域。

艺术交流的形式通常会令人惊讶。华盛顿国家纪念公园上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花岗岩雕像出自中国福建雕塑家雷宜铎之手。2011年，华盛顿、费城和纽约举办了前所未有的联合音乐会。

许多新的合作正在出现。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由亚洲协会和阿斯彭学会联合举办。2011年11月，该论坛耗资100万美元的启动仪式在北京召开，活动包括电影、对话和表演等，两国知名的演员、音乐家、导演和作家参加了该论坛，其中包括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马友友、乔尔·克汗（Joel Cohen）和谭恩美（Amy Tan）。2012年，一个由中国文化界名人组成的代表团将会回访美国。

随着中国对国内文化投资的增长，美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同一家中国国企之间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将在天津合作建立一个新的艺术中心。林肯中心将“提供有关表演内容、运营模式、设计和建筑的建议，并为其进行员工培训”。林肯中心的发言人表示，希望这次合作能够“促进中美两国艺术家和艺术团体之间的交流”。

博物馆在塑造文化认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美国艺术300年：适应与革新”是首个反映美国艺术发展历程的展览。2010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合作举办了一个关于生活与文化的展览。有关中国传统艺术的展览在美国吸引了一大批观众。亚洲协会、华美协进社与国际摄影中心在纽约举办

了中国当代艺术和摄影展，一些在中国不一定被人接受的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大受欢迎。

结论

在教育、政策研究、慈善、艺术和其他一些领域，中美之间的合作已经使彼此大开眼界。这些合作有的是公共的，有的是私人的；有的是正式的，有的是非正式的；有的是机构间的，还有的是个人的。30多年前，中国一贫如洗，它自身的传统也刚刚开始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恢复过来。为了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将最优秀的人派往海外接受教育，虽然他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会再回来了。在迎头追赶的过程中，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一边倒”的，因为美国总是老师，中国总是学生。如今，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也开始资助大规模的文化外交，并要求世界正视中国的软实力。

这种局面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富强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而扭转？美国是否会像2011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所说的那样，在同中国的文化竞争中节节败退？美国的外交官面临着中国方面带来的阻碍，而在文化实力的构建上，中国确实比美国投入了更多的财力。国会削减美国大学在国际教育上的预算着实令人担忧。在美国，更多人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被视为可喜的现象。同样，美国国务院对设在中国大学中的美国文化中心的支持对中国公民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但是现状仍然不平衡。前往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数量比前往中国的美国相关人员的数量多9倍——双方政府都在努力提高这一比率。由于中国人过分重视科学和商业，因此他们对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缺乏深度。相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力更强。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的电影、音乐和电视节目十分熟悉，而美国人却不

怎么欣赏中国的流行文化。不过，最严重的失衡则在于美国是通过私人组织来传递文化价值和规范的，而中国则过分依赖政府。

这些不平衡没有打击中美社会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的动力和热情。从本章的事例来看，总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现在，双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联系，更多的共同利益，更多的合作以及更多的交流方式，而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领域美国也向中国方面传授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依然面临危险。首先，人文交流能够消除固有观念，引发共鸣，促进理解。但是，如果中美两国民众不能正视各自的设想、动机、目标、职业和教育标准、法律法规，那么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加可能事倍功半。

另一个风险在于，两国文化关系的商业化和货币化。这在美国的相关机构中——无论它们多富有，多有名望——造成了淘金心态。那些能够支付全额学费，却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会导致投机主义的出现。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争相在中国开设联合项目和双学位项目、设立分校区会造成标准的降低和期望的幻灭。现在美国同日本之间已经鲜有合办的教育机构了。

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不应被视为零和游戏。文化实力不仅仅是数字、金钱或政治，其内容必须是有趣、有用和可靠的。美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它来自个人的自由表达和创新。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2010年进行的民调显示，美国的软实力依旧远远强于中国，这种实力更多地依靠的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美国的软实力来自许多资源：从好莱坞到哈佛，从麦当娜到盖茨基金会，从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到奥巴马的选举。如果美国政府的言论同国内的现实不一致，那么它们恐怕很难对别人产生吸引力”。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民众都对对方表示过长期关注，有时是羡慕和模仿，有时是嫉妒和敌视，这取决于各自的需求、机会以及政治环境。深入和广泛的文化交流减少了误解，但文化仍然是两国的竞争领域。美国断言民主是普世价值，而中国则强调儒家美德。如果中国依旧不能勇敢地接受多元化，那么中国人仍会觉得还是美国的月亮圆。

第10章

军事安全关系

杜孟新 (Christopher Twomey)

迄今，中美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未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判断当前仍然是准确的，但其中的不确定性却越来越明显。本章的重点便是这些变化中的问题——它们总体上展现出一幅前景暗淡的画面。但是，这并不是两国整体关系的准确反映。正如本书的其他章节所阐释的那样，两国关系中有着许多制度性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际上的因素，它们能够缓解这些紧张关系。其中，如同约翰·艾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在其一章中所强调的，中美两国间巨大的双边贸易、中国在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制度中更为广泛地融入，是两国关系中最稳定的因素。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很可能超过安全领域存在的负面因素。

在评估两国关系的时候，要切记勿陷入最悲观的假设之中。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可参见本书阿什利·特利斯 (Ashley Tellis) 的相关文章]不同，尽管安全困境 (受本性驱使，可以得到缓和) 是中美竞争的重要原因，但两国关系并未笼罩在零和游戏的阴影中。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些国家利益的冲突，但这些利益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

生变化，冲突并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可供双方纵横捭阖的空间，以减少最坏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新的安全考量

中国正日益强调其军事上的全球利益。2004年，胡锦涛提出，解放军要“履行新的历史使命”。这一战略方针继承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国际环境的积极看法，改革开放期间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保卫中国国土完整的诉求。但这一方针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胡锦涛要求“军队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国际安全。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接近尾声，核不扩散、全球公域的保护（包括国际水域、外太空等）等问题变得相对重要起来，这些问题也需要多方进行合作。美国重心的改变也反映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上。美国的政策仍然明确否认要“遏制”中国，而是呼吁“战略稳定”。

然而，从军事角度看，安全利益是首要的。这一点在两国将军事需要放在预算优先事项上有明确的体现。过去15年中，中国军费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而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在700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对外援助和外交开支的15倍，将近占到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一半。

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关安全问题的交流很多。本章将以中国为中心，分区域对它们进行介绍。文章将由中国近海周边地区延伸到中间地带，最后扩展到全球问题，以此详细介绍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在每个按照地域划分的板块中，文章会在评估中美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之前，讨论双方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通过对这些区域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均势正在向中国方面倾

斜；不过这一趋势只是在接近中国的近海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因此，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分歧给两国的战略关系带来了潜在的困扰。在外围区域，冲突并不那么严重，天平也更偏向于美国。总之，两国关系中既有传统的安全困境，也存在常规的利益冲突，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近海和周边地区

在中国附近的海域，中国对安全利益的关注最为强烈，也最为敏感。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多数陆地边境都有天然的屏障，但中国的海岸线一直让它感到担忧。

虽然近年来两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台湾问题仍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问题。双方都希望避免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除此之外，北京希望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而华盛顿则希望台湾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双方在这一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胡锦涛在统一问题上的语气较为温和（如，通过宽松的方式达成统一的时间表，并与台湾进行务实的接触）。不过，在胡锦涛任期内，军事现代化增强了大陆对台湾的威慑能力。

从小布什政府至今，美国一直在同台湾强化非官方关系。美国与台湾的“正式”接触始终让大陆颇为不满。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描述以外，美国不断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可以说在这十多年里，美国加强了对美台关系的政策表述。其中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对台军售，军售已经变得更为“常态化”，同时伴随着美国与台湾防务部门更密切的军事交流。近年来的大规模军售包含了台湾军方（或

军事预算)能够消化的所有项目。除了先进的武器之外,双方之间的合作还涉及台湾防御能力的原则以及其他“软件”方面的改革。虽然高层的政治接触尚未解冻,但许多双边动议进行得如火如荼。美国向台湾出售导弹防御系统是最令大陆感到不安的一个问题。这些导弹防御系统能够化解大陆威慑台湾的主要武器所带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些交易显示了美国与台湾合作的程度,这令大陆十分不悦。

正如任雪丽(Shelly Rigger)在其章节中所探讨的那样,民族主义在台湾正在不断强化。这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而言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美国在中国领海附近的侦察和打着“航行自由”旗号的巡逻已经诱发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它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现行规范——包括抵近侦察、国际水域的原则(这是美国方面经常引用,但缺乏法律依据的条款)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美国并未签署该公约,但美国通常都支持这一“习惯法”)。美国遵循着数十年来它所奉行的规则,并遵守被广泛(虽然不是完全)接受的国际规范。不过,这些规范正是美国依循上一任全球海上霸主英国的惯例而主导建立起来的。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随着权力对比的变化,关于这些规则的争论必然会存在。

更大的争议在于,中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要求。具体来说,中国要求停止在其专属经济区(可能被视为巡逻或侦察)的军事过境。美国常有军事过境行为,并认为其行为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这些行为并不违反国际惯例,但国际法对这样的军事过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相互冲突的看法也酿成了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美国“无暇号”监测船与中国船只的冲突。在这两次事件中,中方都对美国进行的侦察感到恼火。

第二，美国对通过上述行为监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在克林顿政府后期，随着现代化的中国海军舰艇开始在近海活动，美国对华进行海上侦察的频率明显提高。随后的几届政府和军事领导人对此事也非常重视。随着中国海军持续部署新的船只和潜艇——特别是核潜艇，美国的情报搜集会更为频繁，手段也将更加多样。对美国而言，这些情报搜集工作对于在战时维持美国军队的优势十分重要。

朝鲜是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一个无常的角色，并令中美关系更加复杂。但从根本上说，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上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希望朝鲜半岛去核化，不过相比于中国，这对美国更加重要。无论朝鲜半岛的统一之路顺利与否，中国都希望能够减弱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特别是对朝鲜的影响。美国不能保证一定不会采取颠覆朝鲜政权的手段，实际上它在这个问题上刻意保持沉默。对中国而言，一个麻烦不断的缓冲区也比一个受美国影响的统一的朝鲜半岛更符合其利益。

为了应对朝鲜的核计划，许多机制应运而生。在美国推动下中国所建立的六方会谈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一会谈缓解了中美间的紧张关系，使双方在面对朝鲜的核计划时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中国则对美国所发起的防止核扩散的“防扩散安全倡议”表现得相当谨慎。这些机制可能对限制朝鲜核扩散带来的危险有所帮助，但无法解决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更广泛的分歧。

未来，中美因朝鲜半岛发生的意外事件造成无意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未来朝鲜的挑衅行为会遭致美韩联军的回应。对于前几次美韩两国的适度回应，中方的反应相当紧张。美韩两国更大规模和更活跃的介入可能会将强大的军力带入中国领土周边的海域和空域中，并对中

国的重要利益——将朝鲜作为永久的缓冲国——造成威胁。如果朝鲜的挑衅或者政权的崩溃引发了地面冲突，那么美韩联军会很快推进到中国边境。中美之间并没有讨论过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境在1950年造成了误解，如今类似的风险依旧很高，相似的情况仍可能发生。

在近海和周边地区，中国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尽管覆盖范围各不相同，但很多系统的覆盖范围能够达到数百公里。

如今，中国在本土水域中的活动通常被概括为“反介入/区域拒止”。这种能力主要是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利用附近水域，并削弱其投射军力的能力。

其中的第一层次是现代化的柴油动力潜艇舰队。这个约有30艘潜艇的舰队被视为强大的短程武器。考虑到这些潜艇舰体小、部署慢、续航能力有限，它们主要被用于应对周边事态。

第二层是来自各个空军基地的陆基战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拥有能够装备防区外巡航导弹的攻击机。这些导弹射程不等，性能十分强大。尽管这些飞机可能遭到对方战机的攻击，但当它们在距海岸线160公里的范围内活动时，先进的防空导弹会给敌机造成巨大的麻烦，使它们更加安全。

中国的许多军舰也在这些水域中活动。中国最近部署了大约80艘装备有先进的地对舰导弹的攻击快艇。这些致命性舰船和其他一次性舰船会对在中国附近海域活动的敌方海军造成重大的威胁。另外，其他性能更强的舰船则在更远的海域具有相对优势。

但迄今为止，中国所发展的这些能力都受制于联合作战能力的缺

乏。这一点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

面对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五角大楼的回应是强化海军、空军与其他平台的协同作战能力，增加中国判断的复杂性。现在，美国仍然保留着能够从相对安全的位置穿透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区域的武器，如隐形轰炸机、潜艇和防区外巡航导弹等。对美军来说，发生军事冲突时，在接近中国领土的区域作战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美军的反潜作战能力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巅峰状态大幅下降。海军的巡逻机在争议空域又极易受到攻击。由于护卫舰数量大大不足，美国没有可靠的方式在战时将海军陆战设备投送到濒海地区。不过，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静音效果极好，具备超强续航能力，并装备有先进的传感器和武器。

作为目前美军作战主力的战术攻击机同样面临着挑战。中国的潜艇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给美军造成的威胁，使美国在中国海岸附近部署航母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冲绳和关岛易受中国陆基导弹的攻击，因此，陆基战斗机也受到了挑战。

中国在其周边区域有着巨大的安全利益。中国保卫这些利益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而且在不断提高。美国在该地区同样有很多安全利益，在有些情况下，两国存在潜在的冲突。从十年前开始，美国通过这些海域向中国投送军力的能力大大削弱。此外，由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在这些区域的作战能力也被削弱。这并不是说一旦中国周边区域发生冲突，美国没有别的办法与其作战。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冲突可能会转移甚至升级。

另外，该区域存在使冲突升级的倾向。出现在近海地区的水面舰船会成为诱人的目标。即便双方无意使冲突升级，但大量易受攻击却

有着强大攻击力的武器的出现，会成为混乱的诱因——一方面，这会在战略层面造成不稳定（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指挥官都会要求当局出于保护部队的目的先发制人。

最后，反舰巡航导弹的出现可能导致出现“空空如也的海洋”。在这种情境之下，制海权失去了实际意义，不过双方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也要面对小型导弹艇、潜艇和来自空中的威胁。

中间地带

另一些可能存在竞争的区域位于距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之外的区域。2009年到2011年期间的南海是最典型的代表，当然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紧张局势也愈演愈烈。

南海地区争议众多，南沙群岛是其中之一。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对该群岛（或部分地区）宣称拥有主权。如果某一国对这片富含岛屿、珊瑚和鱼群的群岛的主权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那么它将可以对丰富的渔业资源、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行商业开发。2009年，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设定的期限的临近，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提交了它们各自确定的基线、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方案。

另外，由于中国对它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态度坚决，这个问题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贸易量占到全球总贸易量的40%，因此对这些航线的畅通所构成的威胁会产生经济和安全上的影响。同样，由于美国常常在该地区部署海空装备并进行常规演习，这

里将成为产生冲突的主要地区。

第三，美国同南海周边国家长期保持着关系。美国同菲律宾保持着盟友关系，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盟友关系对美国有全球意义。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近来美国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在深化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美国同文莱的关系也出现了热络的趋势。所有这些关系都包含着美国的承诺，有的甚至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上的友谊。

最后，核因素使南海问题更加重要。中国在海南岛建造了潜艇基地，可能会将此作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地。这可能进一步激化该地区的安全竞争。中国不会将南海用于发射导弹（因为中国的导弹在南海无法打击任何一个位于美国的目标），中国可能将南海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堡垒和安全调遣这些潜艇的基地。由于中国的空中力量和海军能够在该地区进行巡逻，美国海军要在这里进行反潜战并全身而退恐怕十分困难。这样，双方就会对此提高军事关注。

中美的另一个安全利益冲突与日本相关。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双边盟友结构的关键。美国十分关注日本的安全和美日盟友关系。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是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根本依托。美日盟友关系具有全球影响，包含各方面能力的紧密协调与整合。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两个国家也存在许多社会联动。所有这些重要因素使它们的利害关系更为紧密。

本书在其他章节中已经谈到，在过去几年里，日本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长期存在的敌意令两国之间的具体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中国海军的远洋打击能力不断进步，他们开始突破“第一岛链”，其中就包括日本。由于中国海军舰队的发展，这些行为对日本的刺激更大。多种“水面行动小组”的部署表明，中国的战术装备在不断提升，攻击能力越来越危险。就像美国进行海上侦察所显示的，一些自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会刺激周边的海上邻国。（中国的军力发展虽不是针对日本，但显然会刺激日本，这是一种固有的安全困境的体现。）

日本与中国还存在钓鱼岛争端。这个被日本控制的小岛成为两国民间极端人士争论的焦点——两国渔船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于美国承诺保护钓鱼岛，近十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钓鱼岛问题。

最后，美国向日本提供扩展核威慑的承诺变得越来越重要。表面上看，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源于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的核能力。过去几年中，日本与美国正式就扩展核威慑政策启动官方双边进程，以进一步落实美国的承诺，同时美国的高级官员也重申向日本领土提供核保护。美日之间的导弹防御合作既是对这一承诺的支持，也是对中国的威胁。

在距中国海岸线数百英里的范围内，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十分有效。南沙群岛距离中国本土1000多公里，相比之下九州岛距离中国仅800公里。与上文所述的中国周边地区相比，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战事，中国投入的军力会较少。中国军队若在这一地区作战将很容易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他们将远离其陆基防空导弹的保护范围，而他们可能依靠的陆基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是勉强能够到达这些区域。中国最新型号的柴油潜艇确实能够在这些区域执行巡逻任务，但前提是潜艇必须放弃其隐形能力进行近水面航行，而这会使这些潜艇极易受到海上巡逻机的攻击。中国的导弹艇和绝大多数导弹在该区

域难有作为。

中国仍有一些能够发挥作用的武器平台，尽管也会受到局限。中国可利用的导弹不多。据五角大楼估算，中国所拥有的东风—21导弹不超过100枚，而航速更慢、威力更小的东海—10巡航导弹约有数百枚。这两种导弹能够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基地。一些改进型号的导弹也能够攻击水面舰艇，但要对敌方的大型基地进行封锁则远非导弹所能胜任。实际上，这些基地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性能先进的战区或战术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另一个可利用的武器平台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开始在远离中国沿海的地区执行巡逻任务，并参与联合舰队的行动，这是中国海军在战术方面一个巨大的提升。不过中国的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噪音很大，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潜艇相比，它们在舰队中的巡逻率要低得多。由于只有6艘该类型的潜艇，所以持续巡逻将是个挑战。

最后，中国的水面舰队也会在近海之外的地区进行训练，但在战时这样做的风险很高。长期以来，中国的舰艇易受空中打击的严重弱点已经大大改善，但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海军。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反潜战能力和推进系统依旧十分落后。中国的舰队相比小国的海军来说实力强劲，但当它们面对美国的核潜艇和舰载机时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美国海军的规模虽然不像冷战时期那么庞大，但相对而言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它拥有11个航母战斗群，此外还有11个两栖攻击舰群作为补充，这些两栖攻击舰群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是航母战斗群了。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宙斯盾驱逐舰也领先于其他国家。

除了武器能力，美国在该地区所缔结的安全合作关系使其在竞争中更具优势。美国同日本和韩国日益紧密的盟友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

来最牢固的同盟之一。每年，美国都会同6个东盟创始国中的大多数国家进行联合军演。美国在新加坡部署了两艘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而且同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重新恢复了活力。这些关系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地区安全合作影响力之争提供了便利，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军力态势多样化。

由于这些关系的发展，美国在战时能够动用的潜在前沿军事基地得到增加。这也使美国在面对进攻时，能够以区域力量作出回应，中国的政治成本计算由此变得更为复杂。

全球范围

21世纪的中国拥有更多的全球安全利益，而它也有更强的实力来捍卫这些利益。比起近距离区域中的问题，这一区域中的问题较为缓和。另外，在这一区域所能够使用的军事装备也有所不同。

利用资源和市场是其中最重要的利益。随着中国直接参与在拉美和非洲的资源开发，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国家利益也相应增加。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瑞黎明（Dawn Murphy）在其章节所述，确保中国能够畅通地通往这些地区是中国在同美国打交道过程中的重要安全问题。

中国依赖于跨越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以及由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及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中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都严重依赖这些通道。2009年，中国的石油消费中有53.5%来自进口，而其中85%的进口石油和石油制品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中国表达了对“马六甲困境”的担忧，中国军方高官曾在官方刊物中写道：“获取能源和资源的海上运输和战略通道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在海上面临的安全威胁，认识到我国海军的特

殊地位和作用，为战斗作好准备。”

不过，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狭义的军事问题。实际上，正如金骏远以及沈大伟和瑞黎明的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广泛的利益，但这个问题不一定非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比如，中国只有10%的进口石油是由属于中国的船只来运输的。“保护”在他国运输船上的中国石油意味着什么？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在2005年中期开始强调不要过多地从军事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一位中国学者称，“中国主要利用非军事手段来缓解‘马六甲困境’”。

在南海之外，中美之间在防止非传统威胁影响货物自由流通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打击海盗的行动是其中最值得肯定的领域，这也许是因为打击海盗对两国利益的意义是最明确的。中国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的巡航拉近了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距离，使它们为共同的目标而战斗。尽管中国尚未完全加入负责这些巡逻任务的北约联合指挥与控制机制，但它确实进行了广泛的协作。2012年初，中国派遣的第九批舰队就位，对一支不善远程部署的海军来说，这是它所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在这一地区，中美两国的行动队员进行了交流互访，打击海盗的双边演习已经商定，但尚未举行。

在中国和美国的安全竞争中，印度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印度与中国所担心的“马六甲困境”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在两国发生边界战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国的边境问题依旧很突出。中国往往以有利于邻国的条件在名义上解决与其他国家的陆地边界争端，但它同印度的边界谈判却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期双方在边境上的军事建设以及两国潜在的核竞赛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尽管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算不上核心问题，但也会造成一定的紧张。美印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之间尚不成熟的军售预示着中印关系仍将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存在潜在冲突的区域，军事天平一边倒地倾向于美国（实际上，只要远离国土，即便是对付小国，中国都难有作为）。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海外基地使美国受益匪浅。由于美国拥有一批能够进行海上补给的大型舰队，其中一些舰船的续航能力长达数月，因此美国得以称霸全球各大洋。位于美国本土的轰炸机能在全球任何地区提供火力援助，这一点之前已经谈过，而且在近20年的战争中也得到了证明。

在亚洲之外，中国很难与美国及其盟友相抗衡。中国的潜艇并无多少长途巡航的经验，其舰队也没有远程作战部署的经验。（实际上，中国打击海盗的行动才刚刚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此外，中国的舰队极易受到来自水面或者水下的攻击。

中国的新航母可能会在距中国领海不远的亚洲海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主要的相对优势体现在更远的海域。中国航母的唯一价值就是在陆基飞机难以到达的区域提供空中力量。虽然该航母尚未形成战斗力，但可以预计，它将能够搭载15至20架左右的苏—33或歼—15战斗机。英国早在英阿战争期间就发现，如果只有少量这种航程较短的飞机，那么这些飞机不得不将所有精力用于防御性巡航以保护航空母舰。这种情况在缺少综合的情报、监视与侦察体系和较强的防空护航能力时尤为突出。因此，中国的航母在执行远程任务时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保护自己。

由于军事天平向美国一方倾斜，且两国的利益并非有着根本性矛盾（实际上往往是一致的），因此爆发全球性冲突的可能不大。

将上述按地理区域划分的问题放在一边，现在来看看“战略性”武

器。在冷战背景的形成过程中，对核平衡的考虑起着重大的影响，这种现象如今依旧存在。不过，当下由于行为体的多样化、导弹防御和其他新的因素，“战略”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实施了现代化，并适度增强了核力量。十年前，中国所依赖的是几十枚可到达美国本土但易受打击的导弹。而如今，中国的武器库不断扩展，其中包括保存能力很强的陆基导弹。未来五年，中国可能还会部署战略导弹核潜艇。这将丰富其战略武器，但同时也会使它对指挥与控制问题的关切更为复杂。

为了威慑中国的导弹，美国在与俄罗斯达成战略武器削减协议之后将保持1500枚弹头（此外，美国还保留了5000枚未部署的弹头。）这些弹头能够通过先进的轰炸机、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越来越可靠和出色，这也增加了中国进行考量的难度。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些系统并没有在实战中得到验证，它们是否能够经受住“反制措施”的考验仍存疑问。实际上，中国的安全分析人士偶尔会暗示，中国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反制手段。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对导弹防御系统感到担忧，也对美国与该地区盟友的关系因此得到巩固而感到焦虑。

美国还在研发具有“全球快速打击能力”的常规武器。一些改装之后能够携带154枚远程常规巡航导弹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已经在亚洲海域执行任务。上述武器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武器系统，使美国越来越有可能不用核武器即可摧毁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些都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

太空日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新领域。2007年中国摧毁了一颗废弃的气象卫星。美国在这一领域仍然掌握着多项技术。美国最近测试了一款机器人航天飞机，摧毁了一颗卫星，并开始研发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考虑到轨道环境的脆弱性，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中

美之间并没有像美国与苏联那样在太空相互约束彼此行为的协议。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于源自太空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来为军事和商业利益服务，这样的情况应该会改变。但是，太空武器军控问题存在难以“核查”的固有困难，而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武器将令该领域继续充满争议。

网络安全是中美之间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但区分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是很重要的。网络攻击可以避免传统的军事防御，攻击对一国具有重要价值的目标，这与核武器类似，因此有人将此提升到了“战略”层面。虽然有一些预测十分悲观，但更加冷静的分析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事实上，迄今为止，网络攻击造成的有形后果很有限。而间谍活动——国际政治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开始利用网络工具。

就中美两国在战略（核）层面的外交而言，美国曾向中国释放信号，表示愿意接受两国之间模糊但稳定的“战略平衡”。尽管要回避“相互脆弱性”（该词带有冷战色彩，在美国有着政治上的敏感性），但五角大楼明确表示，不会试图用核武器、常规武器或导弹防御系统来打破平衡或“战略稳定”。中国不完全相信这样的表态，但它对美国在核武器作用上的政策转变表示欢迎。双方就这些承诺进行了会谈，也就未来建立信任的措施进行了非官方接触。但是，这些讨论远不及冷战时期美国同苏联所进行的相关讨论。

军事冲突的制度性限制

前文聚焦于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地区，并分析了在那些地区中美两国的军力平衡。正如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人所言，大量证据显示，制度和规范能够缓和这些狭隘的安全竞争。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中虽然存在许多这样的机制，但发展尚不完全，且缺乏实

质性。

以下是中美两国双边军事外交的状况：

- 多年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国防部长都会在正式的双边会谈中与中国同人会晤。

- 1997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每年都会与中国军方的副总参谋长参加中美防务磋商。

- 2005年启动的防务磋商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与会者包括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和中方的副总参谋长。

-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是和平时期两军（特别是两国海军）商讨“交通规则”的长期性工作级会谈（与1973年《美苏海上事件协议》相似）。

- 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互访也十分普遍。

- 两国国防大学的代表团有时会互相访问对方选定的地点。

- 由文官主导并聚焦经济和战略问题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安全问题，并在2011年启动了战略安全对话。这样做是为了将文官与军官对安全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

通过这些常规对话，中美高级领导人能够就彼此的威胁认知、政策方略和地缘政治影响等问题进行接触。葛来仪在其章节中表示，这些会谈中的实质性接触越来越多，而不是仅仅复述事先准备好的纲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在许多交流中，中方的透明度在增加，透明度的问题一直是美国所担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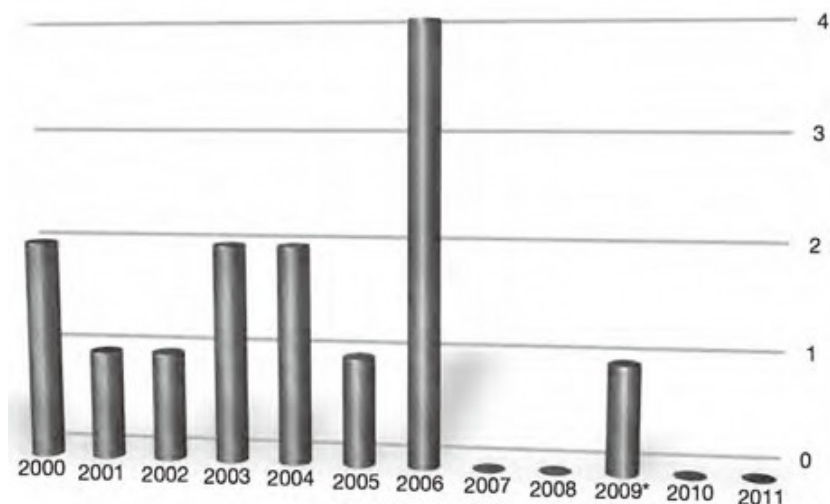


图10.1 中美海军港口互访次数

在这些外交接触之外，两国很少采取切实的手段来降低危险出现的可能性。再三拖延之后，中美于2008年建立了军事热线。双方作战舰船的互访也在2005年左右达到了高峰。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只进行了两场海军联合演习（2006年在圣迭戈附近举行的通信演习和同年在南海举行的搜救演习）。尽管双方已就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HA/DR）以及打击海盗的演习达成协议（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但目前仍未落实。

多边领域的情况也大概如此。美国主导了许多多边演习和对话，中国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对话。虽然美国试图鼓励中国积极参与，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军演仍算不上多，即便这些演习只是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助或者海上搜救。

表10.1 部分多边军事演习和对话

军事演习	目的	参与国家	存在年限	备注
环太平洋军演	军事演习	14 (+ 3观察 员)	40	中国未参与， 2010年拒绝 成为观察员

太平洋空运	防入侵/区域 封锁空运	25	16	中国拒绝参与
太平洋尝试	防入侵/区域 封锁	20	8	中国拒绝参与
太平洋范围	水下搜救	5 (+ 13观察 员)	5	中国是观察 员，但拒绝参 与
军事对话				
西太平洋海军	海军事务对话	20 (+ 4观察 员)	23	中国参与
太平洋军事会	多边安全对话	22	35	中国参与
议				
国防部高层	高级对话	36	14	中国拒绝参与

中美两国在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展开了一些有限的合作。两国军队在地区或全球性的灾难救助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对立（硬实力竞争也许是零和游戏，但软实力绝对不是）。因此，2008年美国的飞机向中国提供了援助。2010年1月，中国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海地提供了援助。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它还强调自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对维和行动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喜欢提供一些其他的支持要素（当然这也是急需的）。中美两国参与维和行动的部队很少有互动，但仅有的几次，如在海地的合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缺少常规的定期交流，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any 积极意义都取决于转变中的中国的安全认同和行动规范。这也许会在将来成为可能，但当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维和行为是出于多种利益的考虑，其中包括多边主义、国家形象构建以及一些更为传统的考虑。”除了“国家形象构建”外，上述目的表明规范或认同的转变并没有出现。但当然，这些变换已经有所显现，虽然几年内可能不明显，但

未来几十年应该会出现。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其一章中指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规范的变化。

同样，金骏远在其一章中表示，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表明，中国开始积极并有建设性地介入一些令中美两国都感到棘手的安全问题。中国支持了一系列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倡议，而这一多边论坛也为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的伙伴国谋得了重要的发言权。

在核领域，中美两国的双边接触很有限，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利益，也展开了一些共同行动。在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方面，虽然最终结果还有待衡量，但已显露出一些积极的迹象。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中国一贯倡导限制外太空军事化，支持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就《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不过，中国对五大核国家有关核透明问题的讨论的默许态度以及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和美国一样，签署但未通过）要积极得多。

尽管这些接触是积极的，而且应当继续下去，但效果并不大。原因之一是，它们常常为一些“政治性”问题所裹挟。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成为冻结两国军事交流最大的借口，也导致了上述双边接触的暂停。长远来看，像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美国的侦察行为等事件都是导致两国军事交流中断的原因。鉴于此，双方对双边接触的预期并不高。

更重要的是，双边讨论的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在涉及专属经济区的主权问题上陷入了停滞。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弱势而不愿进行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部分，但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到，苏联当年也有着同样的顾虑。中美之间在军事实力如何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问题上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十分有限，而这种深入的讨论对于减少可能加深两国国家利益分歧的一些误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暂停的进程还是很有可能继续进行。特别是在人权和打击海盗这些凝聚了全球共识的问题上，两国的合作越来越频繁。这样一来，双方更需要在多边或双边论坛和演习中进行军事接触。

结论

本章对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层面进行了分析，一些更深远的主题正在显现。首先，尽管均势发生了改变，但这种变化在中国周边地区最明显。随着离中国领土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年均12%的国防预算增长所能产生的效果也就越少，实际上，在第二岛链之外，它只能对中美之间的平衡产生有限的影响。

其次，出于上述原因，临近中国的区域中的安全挑战会十分严峻。这一区域的军事动态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旦政治紧张关系升级，一国可能率先发动袭击或调动部署兵力，这种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意外情况是一大担忧。

第三，越是远离中国，中美之间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原因之一是，中国无力保护马六甲海峡之外的海上交通线，它不得不——也已经开始——考虑采取多边手段保障能源安全和运输。由于中国所从事的其他“全球行动”也开始影响安全问题，所以，类似的因素将很可能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影响。

第四，均势和战略层面的技术变化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技术产生变化，双方采取不同的军事手段发生对峙时，红线、门槛和信号这些问题都会变得复杂。这在以往的中美关系中就是很棘手的问题，如今它依旧如此。

最后，中美关系中既存在传统的安全困境，也存在传统的利益冲突。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存在。通过成熟的外交方式，安

全困境是能够克服的。但更加棘手的是利益冲突。不过，利益并不是由国际体系确定的，也不仅仅来源于国际体系（这与阿什利·特利斯一章中的现实主义观点不同）。相反，利益随着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参见约翰·艾肯伯里的相关章节）、政治同盟的发展、文化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相互依赖性的不同而变化。这些因素将逐渐缓和中美两国在全球性利益上的冲突，尽管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的安全观念仍然是零和式的。

第11章

中美两国在亚洲的交流

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

自世纪之交以来，影响亚洲，尤其是东亚国际关系状况的最重要因素是该地区两个最大的行为体——中国和美国。中美两国在整个亚洲的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该地区不仅国家众多，地理范围也十分广阔。因此，不断变化的中美关系对东亚（从韩国到缅甸）、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中亚（阿富汗及与中国接壤的原苏联加盟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是在东亚内部，人们可能还是会发现差异，因此，想要一笔概括总的区域趋势不大可能，总有明显的例外。显然，仅用一章的篇幅不可能全面讲清楚如此复杂的区域特征。相反，我列举了中美关系的几个宏观趋势，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联系以及亚洲地区近来出现的一些主要发展趋势。这种方法不单是为了突出一些共同的主题，也是为了理解这些主题中一些重要的差异及例外。

除了将注意力放在这一特定地区外，本章内容（像本书中的其他章节一样）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时间节点，以此考察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中美之间相对稳定的工

作关系似乎在2007年扎下了根，顺着这股良好趋势，2008年成为一个格外有用的起点。当时看来，两国关系似乎很可能推动这一地区的稳定。然而，2008年之后，中美关系问题迭出，东亚地区紧张不断，这给该地区的稳定与未来打上了问号。一些人将这些紧张理解为引发中美关系及其各自与该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甚至是重大转折的原因。但也有人将近来出现的这些困难视为再正常不过的复杂因素，它们时不时地搅动该地区持不同，有时甚至是敌对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经常出现的“紧张与缓和”的循环关系类似，并未预示着一个更具对抗性的新型亚洲国际关系时代的到来。

本章首先简述了该地区发生变化的背景，然后考察了这两个“相互纠缠的巨人”之间影响该地区事务以及被这些事务影响的方式。文章将重点放在了东亚这一世界上最具变化的次区域上，同时也关注了澳大利亚、南亚、中亚以及东亚一些多边组织的发展。最后，我对该地区的未来提出了一些设想，我更多地是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而非给出确定的答案。

地区关系中的中美因素

2008年，随着美国的选举季逐渐展开，中美两国在亚洲的关系似乎稳稳地走在以合作为主的道路上，尽管在众多国际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上两国仍存在长期的分歧。当时，似乎有理由认为两国双边关系会保持这种态势，而且双方会努力管理或避免因在亚洲的分歧而发生尖锐的冲突。关系的延续性似乎是很有可能的，首先是因为，牢固的工作关系不仅对中美双方有利，也能使其他亚洲国家获益；其次，很少有迹象显示，中美各自的领导层有改变这种态势的意思。中方高层似乎奉行“和平发展”的宏观战略，这在其与邻国增进关系并与美国保持建设性、合作性关系上得到体现。这一战略在21世纪初受到了公开

欢迎，当初欢迎这一战略的中共领导人将继续执政5年。然而，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鼓励和欢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外政策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与前任小布什抱有广泛的一致。其实，在奥巴马首个任期内，中美关系以及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区域关系都保持了延续性。

然而，在此之后，人们对这种延续性的预期开始变得不明朗起来。从2009年底一直到2010年底，地区稳定在多方面都遇到了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令人意外的变化都与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2010年夏，观察人士想知道，该地区新出现的这些令人不安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尽管2010年发生的那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并未预示着该地区将彻底转型，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两国在能力、行为和意图上的一些重大转变。对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来说，这三个因素影响它们如何理解有关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国会在亚洲的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

2008年以后，美国对从经济大衰退中复苏投入了压倒一切的关注，忙于应对该国长期经济健康所受到的威胁，其对外政策因而受到牵制。现实令美国急需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抽身。“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迅速增加，但到2009年底，其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减少，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比预想的复杂得多，而国内的经济挑战又似乎更为艰巨。

由于华盛顿开始缩减海外部署的规模，并且不再对担任全球领袖所要承担的巨大压力表现出以往的热情，美国重新审视了其军事现代化的计划，以确认在这个资源稀缺的时代应该优先往哪些方面进行投资。重新审视对于中美关系及其对亚洲安全图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义。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以及后来的里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规划美国未来的军事采购需求之际，决定向哪些重大冲突进行投资的依据显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美国必须为之准备的突发事件是那些涉及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事件。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也指向同样的方向。说具体点，美国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方案反映出美国的注意力将转向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它担心中国可能会拿出一副要在亚洲有所作为的姿态，从而损害美国的关键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新提出了一个“空海战”的概念，并对此展开广泛讨论。但这一概念的细节仍未确定，它能获得多少预算或许决定着其最终是否会被用作美国军事现代化的基础，来应对与中国相关的突发状况这一新的关注点。

明确这一军事优先事项的工作会继续进行。在奥巴马上任初期，华盛顿也明确了其外交优先事项，强调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美国最初的论调转变很快变成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美国努力增强与一些亚洲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组成了美国长期设计的“中心辐射”式地区安全架构。除继续推行小布什政府时期与韩国、日本这些盟友深化关系的政策之外，奥巴马政府还努力增强自冷战结束后有所弱化的辐射关系，尤其是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关系，并借着与印度关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甚至还有越南）的好兆头培养潜在的重大新型安全辐射关系。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种外交活动。她指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理念，即美国的“重心”要从中东和阿富汗转向亚太。

不论是美国未来的军事现代化规划，还是重新强调其在亚洲的盟友与伙伴，这些动作都未被看作企图遏制中国的新战略。但美国的政策的确明显表现出了对更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担忧，尤其担心在不明朗的未来，中国可能具备什么能力，抱着什么意图，而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亚洲伙伴一样，继续与中国进行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合作。毕竟，在当下关切的重大问题上——包括防止朝鲜半岛爆发公开

冲突、振兴全球经济以及避免周期性的海上冲突升级——各国的利益即便不完全一致也是会有重合的。可是，从2009年末开始，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一方面是两国之间的一些双边分歧（本书其他章节有详细阐述）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与其区域邻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此前十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国与韩国、日本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经过了一段改善期。实际上，这一地区趋势在2001年后引发了一种猜测，认为中国在东亚的进展或许会以被“全球反恐战争”分了心的美国为代价。然而，在本世纪头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与该地区各国的关系却出现恶化，削弱了北京近来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并促使其邻国纷纷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

在外界眼中，中国在东亚地区更直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国内引发了新的担忧，它们对北京的意图感到不安，尤其是一个财富和实力都迅速增长的强大中国。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中国经济却在持续增长。近20年来不断攀升的军事预算也终于看到了成果，中国测试、展示或开始部署了一系列先进的武器（包括反卫星系统、隐形机、装有机动式弹头的反舰弹道导弹、大量隐秘性很好的柴油潜艇、性能更强大的舰船、第二代核导弹潜艇以及首艘航母）。虽然短期来看，这些新武器系统中大多数的军事意义并不大（除了柴油潜艇和新型驱逐舰），但它们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兆头，其对地区力量平衡的影响只是时间问题。

毫无疑问，2009年以前，亚太各国就对中国不断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但北京在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它的强大不会产生威胁方面却十分成功。消除对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担忧情绪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宏观政策中的一条主线。就算没有使人彻底相信，但中国的承诺至少推动了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看法，即中国的长期意图仍不明朗，有可能通过合作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意图并不急着需要加以制衡。中国的邻国在自发与北京改善关系中找到

了些许安慰，目的是让保持合作关系牵涉到中国的利益，即便它越来越强大，同时继续与华盛顿保持一贯以来的良好关系，以便万一强大起来的中国拒绝合作能得到美国的帮助。由于中国对于东亚未来的长期塑造作用尚不清楚，因此在21世纪头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来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

然而，2009年以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促使外界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北京的对外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强硬，在与他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会明确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观点令中国的几个东亚邻国认为，崛起的中国对于未来的影响是凶险的，而非不确定的。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以及它最近在南海和东海主权利益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更加深了外界的这种看法。日本、菲律宾和越南无法将此视为未来地区关系的积极信号，而认为这是对中国长期意图所发出的预警。它们原来打算尽量在中美之间一碗水端平，如今却在试图增进与美国的关系（比如越南），以此应对日益强大和强势的中国可能给它们带来的压力。2009年底之后，中美之间新出现的摩擦让华盛顿更下定决心要与中国那些紧张不安的东亚邻国加强合作。

但在2010年底，中国领导人开始回应这股地区关系方面的不利趋势，他们默认自己之前一年的对外政策确实引发了风险。当时负责外事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重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后，北京除了改变论调，还开始与亚洲邻国接触，以缓和2009至2010年间一些争端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虽然在组织地区关系恶化方面——主要是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北京在2010年底再次强调自身和平承诺的努力却并未取得像上世纪90年代时那样的成果。这或许是因为，15年后的中国变得如此富有和强大，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的行为背离了其所谓的与邻为善的承诺。对于其在2010年底所作出的政策调整，中国越来越难以缓解外界对该政策的真诚度和持续性所怀有的不断加深的疑虑。

地区发展

2008年，东京似乎进入了一段与中美两国都维持良好关系的时期。小布什政府结束前夕，美日两国就驻日美军部署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有助于巩固保持了几十年的美日安全同盟。2008到2009年间，中日关系也相对平稳。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大选获胜似乎预示着自小泉纯一郎政府以来，不时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一些长期分歧有望得到进一步化解。不过，如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一些事对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和日本继续执行小布什政府时期达成的有关驻冲绳美军搬迁的协议。但新上任的日本首相、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在竞选时承诺，将重新考虑其前任达成的这项协议。鸠山还暗示，他或许会在驻日美军的期限问题上寻求改变，并重新考虑日本对于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作战任务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鸠山的做法给2009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及同年11月奥巴马的访日行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作为日本对外政策再平衡的一部分，鸠山欲进一步改善自小泉纯一郎下台以来的中日关系。此举有助于增强日益紧密的中日经济联系。然而，鸠山本人及其继任者菅直人所进行的两次努力最终都加强了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

首先，2010年3月爆发的“天安舰”事件大大增加了日本对朝鲜的核武能力可能带来的威胁的担忧（这一能力随着2009年平壤的导弹以及核试表现得更加明显）。朝鲜在“天安舰”事件（以及后来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的立场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这个短期安全挑战的忧虑，对此，东京能得到的最好保护是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加入国际社会对朝方挑衅行为进行谴责的决定让鸠山对自己原打算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想法产生了疑虑。

第二，2010年9月，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东海一片中日争议海域命令一艘中方渔船驶离时与对方相撞。日方逮捕了中方船长，从而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中方坚持要求放人，日本当局则坚持要对其进行审判。随着冲突的加剧，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日本的高科技工业面临威胁。北京坚称，暂停稀土出口并不代表中国在使用经济手段迫使日本放人，但这却反映出与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可能给日本带来的风险。日本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华舆论，而中国人也质疑东京对这起事件的解释以及逮捕船长的合法性。

简言之，在一年时间里，日本的对外政策从一边修复日美关系、一边改善对华关系转向了增强日美关系以反抗中国（及朝鲜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危险）。正如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所言：“鸠山向中国倾斜的政策变成了拥抱美国。”驻日美军基地的问题被搁置，后在鸠山的继任者菅直人和野田佳彦时期，双方同意考虑冲绳当地人对美军基地的反对意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到2011年，美日关系回到了正轨，而中日关系却退至小泉执政时期“经济上热、政治上冷”的局面。中日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继续确保双边关系不至出现严重的裂痕。但2010年发生的一些事意味着，东京更加清楚经济上的依赖性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加深其与北京之间的政治摩擦，同时提醒其与华盛顿保持盟友关系的长期重要性。

在2008年和2009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和美国似乎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支持按照六方会谈的框架通过谈判解决朝鲜核问题。平壤在2009年进行的核试验和导弹测试破坏了会谈，而这似乎进一步巩固了中美外交合作方面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在2010年，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出现问题。时年3月，爆发“天安舰”事件，11月又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两起事件均造成了韩

方人员伤亡。美国和中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截然不同。美国支持盟友韩国对朝鲜的控诉，重申其对韩国安全的承诺，并高调地进行联合军演，显示其与盟友的团结一致，而中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虽然北京和华盛顿都一直公开表示自己有意重启六方会谈，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将朝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作为前提条件，因为朝鲜自2008年以来的行为让各方开始怀疑其对和平及去核化所作的承诺。中国希望让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在这个平台上来讨论更广泛的紧张升级的问题。美国则支持韩国的立场，称若要重启六方会谈，平壤必须先与首尔进行对话，就那两起事件给韩方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外，美国还坚称，朝鲜必须先证明它已作好重启会谈的准备，会谈的目标则是让朝鲜彻底停止研发核武。朝鲜在2010年透露其正在实施一个铀浓缩项目，这个项目可能是为了替代其钚反应堆项目，以生产武器级的核材料，此举让重启会谈变得更加困难。

中美两国在2010年应对紧张不断的朝鲜半岛局势上所出现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分歧：一方面公开对朝鲜施压，另一方面又依靠外交手段商讨无核化协议，这种方法是否有效？2010年期间，伴随中美关系的总体消极趋势，两国分歧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令北京感到惊慌的是，华盛顿对与中国之间纠纷不断加剧的东亚国家给予了更大的支持。面对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不断恶化的战略和外交形势，中国似乎还准备将其东北与朝鲜半岛接壤一带的不稳定局势列入挑战事项。中国过去一直有意与美国合作重启六方会谈，并鼓励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但如今它担心，与美国及其盟友一道反对朝鲜可能增加半岛陷入混乱的风险，从而在中国附近的又一个舞台上增强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对美韩在2010年夏天和秋天举行的联合海上军演提出批评，这反映出，北京担心，朝鲜半岛的不稳定会被美国及其盟友用作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加强军事合作的借口。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称正是中国不愿对朝鲜施压加剧了平壤不断作出挑衅的风险，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如此应对，从而令东北亚安全环境很可能

朝着北京所担心的方向发展。

然而，如同东亚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有起有伏一样，2011年，各方都收回了决不让步的态度，重启六方会谈的前景有所增强。朝鲜、韩国、中国和美国都开始寻找挽回面子的方式，以满足各方为重启谈判所提出的条件。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凸显了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尽管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从好的方面说，中美两国从2009年到2010年之间一连串事件中吸取的教训将令六方会谈变得更加复杂；从不好的方面看，这增加了朝鲜问题持续陷入僵局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北京和华盛顿都想避免的结果——任由朝鲜发展核武项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邻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断加深，共同的经济利益促进它们之间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北京欲维持这种势头并与东盟培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诞生，并在协议原定于2010年生效之前就早早享受到了东盟国家所给予的特权。此外，北京还表现出了新的灵活性，同意努力与各方达成“行为准则”，以缓解该地区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冲突对地区关系的影响。如上文所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进展证明中国的东亚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2008年以后，越南和菲律宾对它们眼中崛起的中国对地区利益的诉求日益感到不安。如同日本和韩国一样，越南和菲律宾纷纷开始调整各自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只不过日韩两国的呼声更高。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南海主权争端非常棘手。它们曾在2002年宣布要签署一项《行为准则》，但这方面的进展已陷入停滞。2009年到2010年间，随着海上领土争端加剧，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急剧恶化。为此，越菲两国都积极与美国靠近，以减少各自在应对日益强

大的中国时可能面临的风险。

分析人士在争论，南海争端的尖锐化是否是北京对菲律宾和越南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造成的。认为起因是中国改变行为方式的人说，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在上升，而与此同时，美国仍将注意力放在海湾地区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上，再加上其国内的经济危机，这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战略缺口。但也有人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决定抓住这一机遇，推进其主权诉求。相反，他们认为，三方都明确表示了一致的立场，不仅因为经济发展的计划正在推进，还因为他们需要在截止日期前将相关海上诉求提交给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由于在最后期限到来前未能拿出化解分歧的方案，三个国家都宣传自己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任何一方都不会放任他国发表这样的言论，因为，如果未来将争端诉诸国际法裁定，就可能影响自身诉求的正当性。

2009年到2010年间，各方的论调不断升温，南海争议海域的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一些事件据说是因为中国船只强行捍卫自身主权而引发的，但中国领导人对此给予了多大的指示或授权便不得而知。虽然一系列新的冲突的起因和责任方不够明确，但很快，中国在东南亚海域的战略意图所产生的后果便显现了出来。菲律宾投向美国，重申美菲安全协议规定的美方的援助义务，希望一旦受到中国的直接挑战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越南也加快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升温，并出人意料地将双边军事合作提升了一个层级，目前尚不清楚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有多广。

奥巴马政府早些时候决定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多边论坛同样为美国释放自己的立场创造了机会。随着海上局势日渐紧张，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8月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论坛在越南举行，且东盟各国对希拉里的立场（重申美国对确保国际水域自由通行的关注，倡导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美国在这方面不持立场，同时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化解分歧）表

示了广泛而一致的支持，这被外界视作对中国的警告，告诉它不要动用自己的硬实力来压制东盟小国，迫使其通过双边途径解决争端。

外界对希拉里演讲的反应，以及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一开始在河内论坛上作出的强烈回应，凸显了中国在东南亚面临的新挑战。是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强硬对抗，还是努力恢复与东盟邻国保持了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北京面临抉择。2010年末，北京明确表示，它决定选择后者。2011年期间，中国加快了与菲律宾和越南的经济和外交合作，并重申其愿意朝着达成《行为准则》的方向迈进，以减少海上领土争端可能带来的冲突风险。不过，如同韩日关系一样，中国能够缓解与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但它无法抹掉这些邻国从近来的经历中获得的两个经验——其一，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如果其改变意图，它们捍卫自身利益时就会面临风险；其二，强大的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能给它们带来无可取代的好处。

中国想要说服外界相信其在该地区仍是抱有善意的，但这是有难度的，最明显的体现便是菲律宾不断向美国寻求更大的帮助。该地区的亲美倾向在2011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召开前夕达到了顶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马尼拉参加庆祝美菲同盟60周年的活动，她在停靠在马尼拉港的美国“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上签署了《马尼拉宣言》。在随后的演讲中，她承诺美国会继续与菲律宾保持双边合作，重申了美国对于海上安全问题的立场。相比之前一年在河内的表态，她似乎更清楚地表明，美国支持通过多边手段解决南海争端。在谈到南海争议水域时，她还使用了“西菲律宾海”这个新词，以示对菲律宾的支持。

除了寻求盟友华盛顿的支持，马尼拉还试图在东盟伙伴国之间建立统一战线。不过，努力没有成功。在2011年的东亚峰会上，菲律宾未能说服地区国家联合起来公开反对中国的海上领土声明。虽然其他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海上野心有自己的担心，也欢迎美国加深与东盟和东亚峰会的接触，并且在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将海上安全列为一

个重要的议题，但它们（可能是东盟最大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反对联合美国及其盟友来公开对抗中国。其他东盟国家并未觉得自己面临着像越南和菲律宾在本世纪头十年末所感受到的那么急迫的挑战。对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优先任务是应对国内问题，而非国际挑战。此外，维护和平的地区环境事关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它们与中国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因此，它们不会在海上争端的问题上采取可能令自己与北京的关系加剧紧张的立场。至少除了菲律宾和越南，其他东盟成员国都会尽量避免挑衅中国、煽动所谓的中美对抗，否则，这些小国家可能就得要选边站了。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显然制约着东南亚一些邻国的反应。事实上，即便是越南和菲律宾因担心中国而投向美国，它们仍试图维持与中国的交往。曾有人认为，中国将凭借其经济影响力很快把美国从这一次区域中赶出去，但2009年到2010年期间发生的事让这种预测变得复杂起来。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强大经济利益令东盟各国不能无视这种好处而一味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与中国关系极其密切的缅甸在2011年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或许能令其摆脱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不利。缅甸军政府同时宣布在国内实施政治改革，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美国对改善双边关系所提出的条件。美国方面表示它将以实际行动来回应缅方。东亚峰会后，美国宣布国务卿希拉里将于2011年12月访问缅甸，这是1955年以来首次有如此规格的美国官员访问缅甸。事情进展得很快。2012年1月13日，美国宣布将与缅甸全面恢复外交关系。虽然尚不清楚两国关系的解冻最终能产生怎样的战略意义，但这意味着，缅甸也将像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在中美关系交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追寻自己的利益。

与中国的许多邻国一样，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是经济上十分紧密，但政治上却可能出现周期性紧张。2007年陆克文（Kevin Rudd）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有人猜测，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包括能讲流利的汉语）或许能开创一个中澳关系的黄金时代。事实却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不仅在中国的人权记录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争端，而且在中国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处理方式上也与对方产生了分歧。2009年发生的力拓间谍案所引发的外交纷争一度令两国关系异常紧张，中方还逮捕了一名澳大利亚人。不管此人遭逮捕是否与力拓间谍案有关，但此事都严重损害了中澳政治关系。不过，同中澳间的其他政治分歧一样，此事并未从根本上损害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关系。2007年，经济繁荣的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成为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尤其是钢铁、煤炭和液化天然气）。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澳大利亚得以免受全球经济衰退重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这是该地区一个常见的模式。2010年7月取代陆克文出任工党领袖和澳大利亚总理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提出了一种立场，既凸显澳大利亚与美国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这两种关系之间的不同。她呼吁自己领导的政府采取一种符合这种双重利益的新型战略立场，以适应21世纪的今天该地区以及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崛起。

吉拉德的话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即澳大利亚同东亚许多国家一样，仍希望中美竞争不会迫使该地区其他国家选边站。一方面，经济现实为澳大利亚避免与中国这个诱人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发生冲突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又需要预防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安全挑战，因而它也有充足的理由与美国保持牢固的盟友关系以实现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澳大利亚的行为反映了这两方

面的考虑。它一再向中国申明它对双边关系所给予的重视，同时积极参与亚洲的多边组织，即便美国的利益已经变得多元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加强了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澳期间宣布，多达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将轮流驻守在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基地。

这一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新的军事安排并非第一个地区和国际变化促使美澳两国重申盟友关系的事例，但这一声明的背景有两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1996年对这一盟友关系进行升级是在冷战结束后，当时，中国尚处于经济崛起的最初阶段，其军事现代化还远未取得多少进展。而2011年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已崛起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行为体，而且在对军事现代化进行长达20年的巨大投入后，它开始部署一系列引起各方关注的先进军事力量。其二，财政吃紧的美国很可能会减少其海外的军力和装备部署。考虑到这一背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设立军事基地不仅意味着华盛顿要继续与堪培拉保持盟友关系，而且清楚地体现了奥巴马所作的一个更为广泛的承诺，即美国要在亚洲发挥作用，而且不会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还与新加坡达成协议，同意美国的濒海战斗舰部署在樟宜。这虽然算不上多大的军事合作，但同样象征着美国对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所作的承诺）。中国对此的反应与2009年后它对美国一些倡议的反应如出一辙。虽然澳大利亚（和美国）明确表示，新的军事安排并非出于对中国的担忧，但中国先是表示怀疑，然后斥责这种行为是“过时的冷战思维”，是美国欲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计划。

2008年后，中美两国在南亚和中亚的利益虽不能说是完全一致，但也比本文所讨论过的该地区其他区域内的利益要协调。这一区域的大背景是，在2009年末再次加强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美国公开宣布，

计划从2011年底开始逐步撤离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美国战略上的转变恰好证实了该地区许多国家长期以来的猜想，即美国也像苏联和英国一样，想要摆脱在阿富汗旷日持久的行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正如埃文·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所言，在中亚，即便中美双方没有正式的协作行动，但在经济发展、贸易以及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跨国恐怖组织方面，两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因而能够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中美两国在中亚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都希望限制可能助长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的不稳定因素；在经济方面，双方都希望创造条件以充分释放这一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潜力。此外，双方的战略意图也都较为缓和，目的是确保谁也不要主导这一地区。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防止欧亚中心地带被一个强大的对手控制。这一担忧原来针对的是俄罗斯，现在则是实力和意图均不明朗的中国。中国的战略意图则是近来才产生的，即防止受美国支持的地缘政治包围圈——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起，南至印度，西抵中亚——将自己包围。虽然这些战略意图为冲突提供了基础，但至少从2008年以来，中美在中亚的对抗远低于两国在东亚的程度。

中亚之所以没有为中美对抗提供土壤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2009年之后，中国对于美国长期在其西侧保持大规模军事存在的担忧逐渐减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将很快减少美国在与中亚各国进行物流合作方面的需求，这种合作在2001年之后曾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美国对阿富汗建国努力的期望破灭缓解了中国的一个担忧——美国在中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活动（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欲在该地区实现的一个目标）可能会给北京带来另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挑战。第三，与东亚不同，苏联统治和地缘政治的遗风意味着，俄罗斯仍在中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减少了中美两国对对方在该地区建立危险而不可挑战的主导地位的担忧。此外，俄—中—美三足鼎立的状况为中亚各国创造了一个利用这些大国间有限对抗的独特机会，而在竞争激烈、争端迭起的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鉴于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计划从2011年底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巴基斯坦和印度面临着其所在地区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两国都担心对方利用阿富汗的局势变化对自己不利。早在美国于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巴基斯坦就已制定对阿战略目标，即防止阿富汗出现一个与印度关系过分密切的强大的全国政府。而印度的战略利益则是与喀布尔建立关系，使巴基斯坦不敢只关注其东部与印度接壤地区的情况，否则就可能腹背受敌。但新德里更大的战略利益是防止阿富汗（不管有没有巴基斯坦从中作梗）成为另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孵化器，否则这将令新德里面临的两大挑战进一步加剧，一个是因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的国与国冲突所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另一个则是针对印度国土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对南亚地区的这些考量表面上似乎与不断变化的中美交流并无关系，但实际上存在着两层联系。其一，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的安全重心转移，其中包括将其在南亚和西南亚地区的关切转移到中国发挥影响力的东亚海上安全关切上，这可能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考虑寻求美国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区域利益。其二，2009年底以后，即美国开始减少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之时，中美之间不断增多的摩擦塑造了新的战略背景，而印巴双方都据此调整了各自的政策。

巴基斯坦与美国本就因后者在巴阿边境打击叛乱分子的行动而产生争端，随着2011年5月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两国间的正式合作关系更是严重受损。

印度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担忧令其与美国和中国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新德里与日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这一长期国家利益促使各方不要将目光局限于眼前由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在巴基斯坦的国家支持者以及它们与阿富汗未来的战略地位的相关性所带来的危险。引发1962年中印交火的边界争端目前看来是可控的，而且印度出于经济利益尚不会与中国发生激烈的冲突（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立场经常是一致的）。但印度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的

担忧促使它进一步推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关系始于克林顿政府晚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加速发展。虽然尚不清楚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像前任一样努力将印度发展成自己的战略伙伴，但阿富汗的困难、对巴基斯坦的失望以及对华关系的动荡很快便促使华盛顿重申美印关系的重要性。

在21世纪头十年晚期，中国很难像之前那样通过多边组织深化地区经济合作、缓解外界对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的担忧。随着贸易和投资流动的频繁，伴随日益扩大的经济交往而来的是摩擦，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不过，这种定期出现的挑战并不能解释该地区多边外交出现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更明显的原因是，中国与其东南亚邻国的海上领土争端、与日本在东海不时出现的紧张以及因北京在朝鲜问题上保持中立而令其与忧心忡忡的韩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所谓的“好邻居”政策深感怀疑的东亚各国欢迎美国加大在地区组织中的作用。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被认为只关心其自身的“中心辐射”盟友网及“全球反恐战争”，对亚洲的区域架构和其他问题却不够关注。外界所称的美国对亚洲国际关系的其他方面（如东盟支持的各种会议以及2005年东亚峰会的创建工作）不感兴趣或表示怀疑以及美国多次缺席该地区重大会议，或许恰好反映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烧钱的行动需要其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小布什政府的遗产为奥巴马总统提供了一个与前任划清界限的机会。奥巴马政府抓住这个机会展开了一系列高调的行动：宣称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决心提前结束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这一它早已加入的机制

中采取了更明显、更积极的立场。正是在上文提到的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关于南海安全问题的讲话，讲话受到了东盟国家的欢迎，也遭致中国的批评。但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早已释放出欲与该地区组织加强交往的强烈信号。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扫清了其参加东盟峰会的一大障碍。这一动作发生在2010年中国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为之前，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担心在一个对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地区机构中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随着2010年中国与美国以及与其东亚邻国之间分歧不断，外界认为，华盛顿拥抱东盟峰会（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东盟巴厘岛峰会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该地区对其表示的欢迎反映出，美国担心该地区其他只有亚洲国家参加的机制（比如由中国、日本和韩国参加的“东盟+3”）可能变成中国用来限制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地区多边主义形势的变化还反映在2005年有关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提议上。这是一个环太平洋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拟将亚洲的几个主要经济体囊括其中。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不久以及在奥巴马总统于同年11月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期间，美国宣布将加入有关建立TPP的谈判之中。2009年的时候，这一消息还仅被视为美国为确保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更广泛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但当两年后的2011年11月在檀香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美国的支持成为建立该协议的重要因素。外界广泛认为，该协议的建立对2009年奥巴马访华后两国关系出现的动荡具有新的政治意义。这种看法在那次会议召开的前夜日本宣布计划加入TPP后进一步增强。尽管日本首先必须应对其国内对加入TPP的强烈反对，但外界清楚，日本的障碍要小于中国加入TPP可能面临的障碍。虽然各方都欢迎中国加入TPP，但这将需要它改变其管理在华外国企业和投资的经济政策，而这是北京一直以来所抗拒的。外界广泛认为，成为TPP成员的要求意味着中国短期内无望加入其中。人们认为，TPP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多边协议，其原则可能会制

衡那些不包括美国但包含中国在内的区域经济组织（如“东盟+3”），尽管也许这并非故意。中国尤其对美国重新在亚洲倡导多边主义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这只不过是美国及其盟友欲联合起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而采取的又一个手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将地区组织视为安抚其忧心忡忡的邻国的工具，但如今对美国的意图感到怀疑的中国或许会重新考虑地区组织的有效性。如果它们变成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或美国制约中国崛起的舞台（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这样的担忧），那么它们的吸引力就会减小。实际上，从中国对希拉里在2010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所作发言的强烈反应或许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在重新审视这些地区组织了。但在2010年底，中国又释放信号，认为继续在地区组织中扮演建设性伙伴的角色更有利于自身利益，而且在中国通过双边努力让邻国相信它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同时，这种多边机制还能对此起到补充作用。但尚不清楚的是，自2010年底以来中国继续支持地区多边主义的温和态度是北京的广泛共识，还是争议尚未解决下的权宜之计。如果是后者，那么美国对TPP的态度变化及其对东盟各国将海上安全问题列入2011年东盟巴厘岛峰会议程所表示的支持很可能再次引发北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讨论也很可能被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国内因素左右。

结论

2008年之后，亚洲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未曾预料的转变。近25年来，这一地区出现了一股扩大合作的总趋势，而基础则是各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所持有的广泛利益。不过，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该地区的利益冲突已浮出水面，这给地区关系在未来能否像本世纪初那样顺畅打了问号。或许同样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地区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并未如世纪之初所预料的那样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的两

个因素——台湾问题和中亚。2008年以后，中美之间因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的分歧而爆发冲突的风险有所变小。而且虽然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临时增加了，但美国提出撤兵计划意味着，台湾问题也不大可能成为中美对抗的新战场。相反，亚洲其他地区的局势增强了人们对稳定前景的担忧。

实力日增的中国早已开始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但它对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问题的反应令其邻国感到不安，这些与华盛顿增进关系的美国盟友（如印度、越南等）开始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分歧，它们开发出了一种只有美国这个伙伴才能发挥的杠杆作用。此外，鉴于2009年11月之后中美关系的恶化，华盛顿也越来越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支持。认为自己的政策只不过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中国不认可各方作出警惕性反应背后的根据（尤其是认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并称这只是它们遏制中国崛起的借口。

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可能并不觉得这样的变化出乎意料，认为在这个“无政府”的国际舞台，出现利益冲突的国家都只顾自身利益，未能与他国共同处理好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感，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安全困境。然而，安全困境背后的逻辑固然十分重要，却未能回答这种状况到底有多么激烈。随着实力的转移，每当国家面临新的挑战，领导人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应对。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和平合作与棘手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每个国家的选择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看法和选择，从而决定着它们所面对的安全困境是会缓和还是会恶化。2008年以来的亚洲国际关系表明，这样的选择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因国家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分歧。

2010年，在实力发生重大转移的时候来处理这些分歧所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一些人认为，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已经迎来转折点。按照这种观点，亚洲的两极化和摩擦正反映出受困

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对抗，这种对抗决定着亚洲国际关系的背景，如同美苏对抗对冷战的决定性作用一样。然而，也有人不同意所谓“转折点”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紧张是暂时的，中国与其邻国以及美国之间很可能恢复本世纪头十年初的那种相对合作的关系。他们认为，经济交流所带来的好处、互相依赖的制约作用、军事冲突的代价以及国际机制的多元化能提供外交途径，避免两极化的出现，促进以“双赢”方式处理分歧，而这才是决定亚洲国际关系背景的力量。

当然，现在判断亚洲2008年之后出现的动荡到底是转折点抑或只是一段小插曲为时尚早。中国在2009至2010年期间作出强烈的消极反应后又重申坚持和平发展政策，这或许支持了第二种解释。然而，中国的邻国在2011年热烈欢迎美国高调地“重返亚洲”，以及西方媒体不断声称奥巴马总统11月的亚洲之行就是为了展示美国反对日益强硬的中国的决心，加之北京对此作出的强烈反应，这些都表明，动荡期仍未结束，同时也暗示着第三种可能性。

事实证明，2011年既不像本世纪头十年初的形势那么温和，也不像2009年底以后的形势那么紧张。相反，2011年是一个混合体，这或许就是新的常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亚洲的地区关系则既不会像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随着中美对抗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不会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正如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20年前所言，亚洲新的常态或许最终是一种更趋向现实主义且更加健康的大国间关系，而非在夸大的敌意和天真的友谊之间摇摆的关系。避免毫无根据的希望或担忧有助于将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处理真正的利益冲突上，从而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尽可能减小它们的破坏作用。

虽然亚洲的未来走向仍不明朗，但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面对一些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问题，人们的答案将塑造亚洲的未来。亚洲的主要国家会和美国联手从“既合作又限制”的政策转向“制

衡”中国的政策吗？或者近来的政策转变反映的只是战术上的调整，而限制仍在继续？中国会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样花更大的力气来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其和平意图吗？还是中国的反应表明它想要防止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即不断恶化的战略环境促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安全合作架构发生改变，转而结成一个旨在制衡和遏制中国的联盟？如果中国的实力继续增长，那么什么样的地区角色是北京所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其影响力增长到什么程度才是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所能接受的？如果在可接受的地区角色上的分歧无法调和，各国又会采取怎样的战略来保护各自的利益？对亚洲而言，广泛的经济交流令政治考量变得复杂，核武阴影又制约着军事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战略选择无法令人信服或者不具有吸引力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包括中美在内的亚太国家能否想出其他方案来满足实力转变背景下各方的利益？抑或它们仍只会选择固有的做法，而无法很好地适应21世纪的亚洲所面临的现实？

第12章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任雪丽 (Shelley Rigger)

中美关系包含很多富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台湾问题困扰两国关系的时间最长，也最激烈。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态度都十分坚决，互不退让。不过，使这个棘手问题更为恼人的是台湾对双方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力。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宏观战略目标大体上是确定的，但它们具体的对台政策却要受各自的战略考量和政治压力的共同驱动。由于台湾具有使局面发生变化的主动权，因此，双方的决策者在很多时候都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于是，台湾的内部政治情况不仅是影响台湾与大陆、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重要因素。这种态势在21世纪以来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台湾的政治从排斥大陆的陈水扁过渡到倾向与大陆接触的马英九，但这都不是新现象，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改变。

自1949年内战胜利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从未发生过动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解放台湾来实现统一，其目标是要将台湾同胞从国民党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与大陆统一。随着

内战热情的冷却和民族主义在大陆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大陆调整了论调，由“解放”转为“和平统一”。“和平统一”设想通过一个协商的过程，而非诉诸武力来统一台湾。当然，这一过程最终能走到哪一步仍存争议。

1949—2000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它一直是一个核心关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去考虑是没多少意义的。当时并没有“台湾问题”，只有“红色中国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和华盛顿开始外交接触以来，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就一直是双方推进关系的绊脚石。

20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发现，大陆官员一心想借中美关系的解冻来推动两岸统一。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眼中，国民党能够抗拒统一并挑战大陆的关键正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因此，大陆方面希望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美国不再支持台湾，从而打开统一之门。

在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助长了中国人的这些期望，但是在美国，多数人并不认可把台湾作为同大陆交易的筹码。“自由中国”有许多强有力的朋友，其中包括国会中的反共人士和富有的说客。最后，尼克松政府决定巧妙处理这一问题。结果便是《上海公报》——由北京和华盛顿共同发表的一系列原则性声明——中那样的措辞：认可统一但又没有明确支持这个目标：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公报签署时准确描述了两岸政治人物各自的诉求，也算为这个棘手的外交问题找到了一个有效而聪明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一做法太高明了：对中国人来说，公报看上去支持统一，但美国人明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份为中美关系后续发展打开大门的文件并不是一份有关共同价值或原则的声明，而只是用艺术性的措辞拒绝表明立场——未来必定会产生误解。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随着1979年签署的第二份联合公报而达到高潮，同时回避了美国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重申将《上海公报》作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但是在美国，台湾在国会中的盟友依旧决心在美国可能抛弃台湾之际维护其利益。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同样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此外，该法同样要求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北京最大的诉求是切断美国同台湾的安全关系。美国同意废除它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军，但是终止对台军售就没那么简单了。很多美国人并不同意让没有防御能力的台湾独自面对他们眼中咄咄逼人的大陆。这种想法在《与台湾关系法》中有所体现——“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是美国的政策。《与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承诺在两岸发生冲突时保卫台湾，但该法要求历届美国政府“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不出所料，中国官员对于没能将终止美国对台军售写入建交协议中大为失望，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出建交谈判，而是仍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其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行动。1982年中国同里根政府

签订的第三个联合公报中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九年内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促成最后的解决”。

中国认为1982年的联合公报是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承诺，但美国却没有满足这一期望。相反，华盛顿仍在批准向台湾出售大量的武器和防御性装备，其中包括能够显著升级其系统的设备。对大陆和很多美国分析人士而言，美国的做法显然有违1982年的公报。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则试图将对台军售正当化，他们的理由是，1982年联合公报所预期的两岸之间军事紧张关系的减弱并未成为现实。

30多年来，1982年联合公报已经成为两国摩擦的源头。华盛顿的行为违反了公报的规定和精神，而其对台湾的承诺则进一步破坏了它对北京所作的承诺。由于担心公报可能对台湾产生影响，里根总统通过其驻台代表向蒋经国传达了口信。里根对蒋经国所作的“六项保证”包括：不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设定对台军售终止期限、美国不做两岸调解人、不强迫台湾进行谈判。里根政府的姿态安抚了台湾，但也让大陆领导人更加认为美国在谈判中背信弃义。

总之，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些措辞模糊的文件上的，在推动两国关系的同时，也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三个联合公报模糊的措辞使北京方面对美国断绝同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充满期待——在他们看来这是确保两岸统一的一步。而与此同时，无论尼克松和基辛格如何承诺，美国政府都无意将台湾拱手交给大陆。

这一段扭曲的历史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纠纷不断的主要原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的民主化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让台湾有了更好的筹码来博取美国的同情。与此同时，这也破坏了几十年来两岸关系之间的静态平衡（尽管也是麻烦不断）。

从内战结束到1987年，台湾奉行不同大陆接触的政策。台湾所要做的就是为重返大陆做好准备。虽然两岸还是有过一些不可避免的接触，但都限于最小程度。由于双方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两岸统一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水火不容，但双方都将统一视作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双方置于对等的地位。

但是，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打破了这种僵局。首先，这使台湾人能够向领导层施压，要求开放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当1987年台湾人被允许前往大陆时，他们立刻明白了两件事：大陆同台湾差异巨大，其中一些差异使大陆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很快，台湾企业家涌进大陆，投身制造业，许多企业得以摆脱台湾高工资、高地价的包袱而重获生机。把大陆视为难以对付的敌人、台湾人不能去的危险异域的想法，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好的方面讲，民主化开启了通往大陆的大门，改变了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但也同样唤醒了对立势力。政治改革结束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关两岸关系的讨论因而活跃起来。这场讨论中马上出现了要求正式独立的呼声。改革同时也加剧了选举的激烈程度，政界人士也更需要考虑选民的诉求。统一并不是唯一诉求（独立也不是），因此台湾政界人士对统一热忱不再，对该问题的谈论也在减少。

2000—2008年间的两岸关系

2000年台湾的第二次大选震惊了台湾选民，也震惊了大陆领导人。反对党民进党的支持率一直停留在40%左右，远不到多数。但是，2000年过于自信的国民党失算了。候选人提名使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不满的一派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民进党得到了该有的选票，而国民党的选票却被分散了，最终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

陈水扁温和的就职演说是为了消除大陆领导人的疑虑（同样也是为了安抚台湾选民和华盛顿的官员），但北京仍然对陈水扁和民进党心存疑虑，北京方面认为二者都致力于台独。北京方面起初表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但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点，两岸关系进展趋缓。陈水扁同样面临着由国民党领导的立法院的反对。2002年8月，陈水扁开始偏离温和路线，将两岸关系描述为“一边一国”。在随后的任期内，他一直致力于加强台湾抵制统一的力量，包括旨在灌输台湾人身份的教育改革。

2008年马英九的胜选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陈水扁当政时期，两岸的经济联系和人员交流飞速发展，但两岸政府之间半官方代表的谈判则陷入僵局，这是因为陈水扁不愿接受北京方面提出的对话前提——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即便是李登辉时代所达成的措辞模糊的“九二共识”，对陈水扁和民进党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曾经促使两岸关系有序发展的会谈渐渐消失，两岸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马英九在竞选中承诺重新发展两岸关系，既要减少紧张又要使经济往来更富成效。他愿意将“九二共识”作为新一轮会谈的基础。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让大陆大松了一口气。它消除了台湾向独立跃进的威胁，并使两岸在经济甚至政治问题上取得进展成为可能。

经过8年的“怒目圆睁”，大陆领导人在2008年发现，即便不足以微笑，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陈水扁时期令他们担忧的最坏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尽管马英九也不大可能很快推动统一，但合作和接触的前景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长远来看，大陆领导人认为，合作和接触会为统一创造条件。

在马英九就任一个月之内，双方的半官方代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打破了它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僵局，并在一些困扰了双方8年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它们使一系列定期会议制度化，而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两党定期会谈也成为另一个

平行的渠道。海基会与海协会签订协议的速度超过了各自政府执行协议的速度。合作在2010年6月29日达到高潮，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协议放松了投资和市场限制，降低了关税，创建了纠纷解决机制并确立了其他经济合作措施，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措施给台湾带来的好处要多于给大陆带来的好处。

两岸之间的谈判和经济合作在2008年至2012年间迅猛增长。不过，虽然好处是实实在在的，但两岸关系中仍存隐忧。很多台湾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和方向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希望同大陆维持和平的局面，也承认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好处，但就是不愿越过经济和其他一些实际问题来考虑政治话题。

2000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复杂性凸显了大陆对台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大陆领导人希望能够抓住机遇，但不想被人利用。他们担心包括马英九在内的台湾领导人只想获得好处而不想回报。所以，他们的让步基本仅限于经济领域，原因之一是，政治上一旦作出妥协，想要撤回就不那么容易了。

北京的谨慎也反映出它实现长期目标的决心。大陆愿意在经济上给予台湾好处，从而使自己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如果这样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大陆就不必作出政治让步。

2000—2011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追溯中美关系因台湾而出现的紧张，其根源几乎如出一辙。大陆要求美国尊重其主权，也勉强接受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非官方联系，但是对于任何可能使台湾地位升级的行为，它都会进行抗议。美国愿意断绝同台湾的官方联系，但却不愿停止给予

台湾它向其他国际朋友所提供的一些实质性好处。在这些好处中，最主要的是防务援助，这也是引发中美关系紧张的第二大源头。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尼克松、卡特和里根都背弃了原先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承诺。这些根本矛盾扩大了双方的分歧：大陆认为统一在道义和政治上都是不容置疑的，而美国官员则不然。

陈水扁的政策在这些方面挑战了华盛顿和北京。2002年年中之后，陈水扁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提高台湾国际地位的行动：推动新“宪法”、要求进行有关台湾“主权”问题的公投、要求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等。不出所料，大陆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2005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授权人民解放军可以使用武力阻止台湾正式独立。

美国也认为陈水扁的很多行为十分冒险，有损稳定，也是在无理取闹。虽然小布什是几十年来看上去最支持台湾的总统，但2003年底他也被陈水扁的挑衅行为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期间，小布什对记者说：“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作出决定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是反对的。”

陈水扁的政策不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2000年到2008年间，声势浩大的台湾游说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一落千丈。克林顿时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大打政治牌的美国国会，在小布什上任后兴趣大减。这一方面出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崛起。议员们对此的忽视使台湾在国会山中的关注度大大降低，当然这是政府官员乐见的。在李登辉签证事件上遭遇惨败之后，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直接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通过国会施压。当白宫对陈水扁失去耐心时，台湾显得无可依靠。

台湾在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完全是自找的。李登辉将大量对美外交事务都外包给了私人游说公司，而陈水扁政府则采用了另一种外包方式。台湾在美国的准官方代表处由从外事部门派出的官员

组成，但陈水扁和民进党并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从台湾派特使直接同美国官员打交道。不同信使所传递的信息难免会有冲突，这令美方感到疑惑和失望，特别是陈水扁的许多特使对美国官员的话毫无兴趣。包括美籍台湾人团体在内的支持台湾的非官方组织也只是增加了不和谐的声音。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连对台军售都会造成美台之间的紧张。2001年春，小布什总统批准了台湾在克林顿时期所提交的军售清单。这项决定引发了北京方面意料之中的反应——强烈的谴责，但台湾方面的反应则完全出乎意料。台湾政界人士非但没有欢迎这一期待已久的防务大单，反而提出了批评。7年中，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一直拒绝拨款购买大多数美国希望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军购的反对者利用此事招揽选票，甚至指责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剥削台湾。他们意在否定陈水扁在政治上的成功，却破坏了美台关系。美国官员对台湾的两个政党都失去了信心。最让人难堪的是，美国顶住北京的压力批准了军购清单，却未因此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回报。

陈水扁执政的前两年可称得上是“错失”的两年，因为大陆错失了一些有助于陈水扁走温和路线的机会；而他执政的最后两年则由于丑闻频发而陷入死亡漩涡。2002年到2006年间，他将“大陆恐惧症”的观点嵌入了台湾的政策和政治中。几十年来，大陆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美国插手，但在那四年里，大陆却依靠美国来约束台湾。大陆直接向台湾施压的努力事与愿违。

经过陈水扁时期的紧张和不确定之后，马英九的当选使中美官员都松了口气。2012年，他的连任也同样受到欢迎。尽管如此，三方领导人依然明白，他们不同的目标和愿望会继续制造艰巨的挑战。大陆欢迎马英九反对台独的立场。美国官员对两岸恢复会谈和合作表示欢迎，但也明确指出，只要军事威胁存在，对台军售就将继续。马英九当局则一边同大陆展开贸易，一边向美国购买军火。

2008年10月，白宫告知国会，希望向台湾提供价值65亿美元的军售大单，这是美国向新的台湾当局释放的信号。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阵营表示会跟随小布什政府的脚步：“奥巴马参议员强烈支持缓解大陆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赞扬了双方在这方面的努力。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不仅不会使两岸缓和关系的进程遭到破坏，反而会促进这一进程。”

北京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并取消了多项与美国的交流。但它并没有批评台湾，而只是批评了美国。这种模式贯穿了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不论台湾方面多么渴求军购，大陆都无视台湾在军售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将矛头直指美国。

在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里，大陆进一步回击了美国对台军售。2009年6月，中国军方官员在美国参加防务会谈时，重申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在2009年中国时任台办主任王毅同美国外交官的会谈中，对台军售也是会谈的焦点。

2010年5月，关友飞少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期间发表长篇演说，抨击美国对台军售。同年夏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访问亚洲期间，中国军方拒绝邀请他访问中国。当盖茨表示中国过分强调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时，马晓天回应道：“对台军售表明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

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在对台军售上的步伐是有所克制的，但中国并不买账，反而对事态的每一次发展都作出了强烈反应。在媒体曝出美国政府已经同一些企业签订为台湾生产“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之后，大陆痛斥美国，并威胁对相关公司实施制裁。大陆的强烈反应和对相关企业前所未有的制裁威胁使美国的观察家认定，大陆增强了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反对。

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

的武器。大陆像往常一样继续指责美国，而不是台湾。它断绝了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并威胁制裁美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批评美国的军售使中国无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2011年10月，美国批准对台湾现有的F—16A/B战斗机进行升级。升级现有战机而不是出售新战机的决定使台湾方面和它在美国国会中的盟友感到失望，因为台湾一直希望美国能够出售新的、更先进的F—16C/D战机。尽管如此，这一决定还是引发了大陆标准化的反应，而台湾无法获得足够拨款完成美国已经批准的军购项目也使美国感到不快。

总之，在马英九时期，对台军售问题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大陆提高了反对的调门，同时在言论武器中加入了新的内容。除了常规的措辞——对台军售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违反了1982年的联合公报——之外，大陆领导人开始用日渐热络的两岸关系来证明结束对台军售的正当性。他们指出，现在两岸之间一切顺利，唯一在闹事的就是美国。

马英九在2012年1月的连任肯定了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大陆在经济上对台湾慷慨让步，希望以此强化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但大陆不要求马英九在政治上作出突破，以防在台湾不稳定的政局中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同时，大陆继续扩张军力，不仅为了震慑台独，也为了从长远上为大陆赢得更多选择。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北京公开寻求华盛顿的帮助来遏制台湾作出它所反对的行为。马英九上任后，战略发生了变化。大陆不再通过美国限制台湾，而是试图在美国和台湾之间打入楔子。大陆官员抨击美国对台军售，却不批评台湾。当台湾没有完成军购时，美国官员有理由惊讶，为何台湾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得到了政治利益，而遭受惩罚的却是美国。

是该有点新意的时候了？

美国在同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保证了美国大体上能够同大陆和台湾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被称为“战略模糊”的方式既不支持统一也不支持独立，它强调不管两岸关系如何发展，都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援助能够确保两岸关系保持非强制性的和平发展。这项政策的模糊性在于，美国没有明确承诺，如果两岸和平发展进程遭到破坏，它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保卫台湾。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模糊性能够形成对海峡两岸的双重威慑：既能震慑大陆进攻台湾，也可震慑台湾挑衅大陆。

战略模糊也遭到了批评。有的人希望美国更坚决地支持台湾，有的人则要求优先确保良好的中美关系，即便这意味着要减少甚至取消对台湾的支持。在马英九执政之初，这一讨论开始升温。奥巴马政府继续执行以往的战略，但要求重新审视对台政策的压力在增长。批评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其中大多数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分析判断：一个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有关，另一个则与两岸关系有关。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政治难题，但在2000年之后，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中美经济合作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同时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也比以往更加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小布什总统立下目标，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机制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些发展预示着什么？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这一问题在分析人士中产生了分歧。有些专家强调中美之间合作的潜力，另一些人则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使中美之间产生战略竞争。在台湾问题上，观察人士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台湾曾经是，将来也会是中国内政和外交中具有破坏力的因素，另一派则认为未来几年台湾对大陆的挑战将会有所缓解。

2011年，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 Jr.）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美之间日渐增强的战略竞争以及台湾在中国政治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美国撤销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成为必要之举。按照前大使傅瑞伟的说法，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正在经历自由落体。他的结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减少那些促使中国准备好同美国一战的活动是十分明智的”。他认为，这种活动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援助：

台湾问题是唯一能够引发中美之间战争的导火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同台湾的协议标志着美国对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敌视态度。美国持续的对台军售、为台湾军队提供训练和军事建议是对中国自尊心、民族主义、日益强大的实力以及军方的潜在挑战。

傅瑞伟暗示说，对台军售阻止了台湾接受他所认为合理的统一条件。他说：“北京认为美国的政策是阻碍中国在唯一且受国际尊重的主权之下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后障碍。尊严和统一曾经是，也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核心目的……追求民族尊严的政治动因迟早会促使北京采取比现在更加冒险的政策。”而对台军事援助正是把衰落的美国放在了崛起的中国的对立面。

唐耐心和葛来仪虽然与傅瑞伟有着相似的推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她们同意傅瑞伟有关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增强，以及台湾对大陆而言是个棘手问题的论断，但她们并不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迁就大陆就能够缓解问题。相反，她们认为，“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或者仅仅只是削减对台湾的援助都会让大陆更自信地认为美国已经式微、犹豫不决、不可依靠”。与此同时，大陆的民族主义“虽然会对美国放弃台湾感到满意，但这不会完全满足大陆展现实力的需要”。因此她们认为，不再对台湾进行防务援助会造成两岸的不稳定，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利益。

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在他讨论对台政策的文章中也同意这些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增强的判断。这些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对大陆的挑战会越来越大。但萨特怀疑，如果台湾顺从大陆，这是否会给美国带来风险。他认为，台湾在大陆的压力之下已经很难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目标——维持台湾地区实力和影响力的平衡，使之有利于台湾和美国的利益，并受美国影响——而言，两岸实力的现状和趋势已经对其构成了更大的挑战”。萨特呼吁美国重视那些可能导致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受阻的事态发展。他也暗示，台湾如果被允许（也自愿）与大陆统一，那么美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

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也认为台湾正在向大陆靠近。但是与萨特不同，他认为美国应当欢迎这种被他称为“芬兰化”的发展势头。“芬兰化”意味着“台湾会走向中立，而不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这样能够使大陆不再担心台湾会成为它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抱负的绊脚石。反之，大陆也会放弃军事威胁，允许台湾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组织中，并扩展其经济和社会利益”。

在吉利看来，华盛顿的战略模糊政策使“芬兰化”的进程复杂化了。如果台湾无法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它就不会再犹豫不决，“芬兰化”进程就会加速。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避开这个问题，任由“芬兰化”发展，因为台湾不应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傅瑞伟等人认为“大陆受到民族主义驱使，其统一台湾的要求源于民族所遭受的耻辱和虚弱……大陆正在试图通过重新统一台湾来转移民族主义的诉求并避免合法性危机”，而吉利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以高度的交流、互信以及减少武力威胁为前提的安全观是两岸都认可的”。

他认为“芬兰化”对大陆、台湾和美国都有好处。这一进程之所以有利于美国，是因为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地缘战略上的：大陆希望确保台湾不会成为包围和威胁它的工具。他表示，美国现有政策可能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是它发展军

力”。

“加剧中国大陆对被包围和其海上领土的担忧，进而促使与傅瑞伟、唐耐心、葛来仪和萨特不同的是，吉利强调中美进行合作和双赢交流的潜力。但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前提是使台湾问题不再“碍事儿”。事实上，他表示，“对于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实现其最高目标——维持和平的国际自由秩序——的美国政府而言，台湾开辟新路的决定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这种乐观的看法得到了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和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这两位台湾问题专家的回应。格拉泽在《外交》杂志撰文称，“中国的崛起不会像正统的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危险和具有竞争性，因为导致大国冲突的结构性力量仍然较弱”。但这场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台湾问题在大陆政治中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欧文斯和格拉泽就不再乐观了。

格拉泽认为，大陆将大量军费用于准备同台湾之间的战争上，由此认定，“鉴于这样的风险，美国应当考虑收回对台湾的承诺。这会消除美中两国间显而易见的冲突导火索，也会在未来数十年中保证中美关系顺利地发展”。欧文斯在一篇敦促美国修改或废除《与台湾关系法》的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写道：“重新审视这一过时的法律是必要的，这一做法会被中国视为美国为发展两国关系所作的真诚的努力，这可能带来开放、互信甚至是友谊。”

在台湾问题上的第五种观点主张维持现有的战略模糊政策，这并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或两岸关系的乐观（或悲观）看法，而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认为当下改变政策将带来更多的风险而不是好处。卜睿哲（Richard Bush）和容安澜（Alan Romberg）在一篇回应罗伯特·萨特的文章中坚持认为，美国的利益不是保持海峡两岸的均势，而是维持其和平与稳定。

鉴于这个目标，他们表示，萨特不必担忧台湾的发展方向，因为岛内健全的民主制能够保证它不屈从于压力或者恐吓。他们赞同目前台湾同大陆接触的政策，“使大陆安心会带来风险，但是同样也能够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也能为两岸关系奠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基础，这不仅是美国的目标，也是台湾和大陆的目标”。我也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台湾尚未准备好接受统一，因此撤销对台湾的防御援助会在统一条件尚未具备之时提升大陆的预期（也会提高民族主义者要求对台湾“有所作为”的呼声）。最后，“这种变化会让大陆高兴，但也会同样会创造与原有问题同样棘手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更加陌生，因此也可能更具挑战性”。

结论

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重创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在中国，这场大衰退令一些人认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从传统大国转向中国。中国学者、官员的公开言论以及在中国周边地区一系列强硬的行动正体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信心。美国的评论人士认为这已经证明战略竞争将要出现。奥巴马总统2011年实施的“重返亚太”的政策被广泛认为——包括中国在内——是在应对中国的崛起。

如果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幅大国竞争的场景，那么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位置也很可能发生改变。台湾将不再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独立问题，而将成为大国较量中的人质。大陆坚称，台湾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统一台湾的决心不应被认为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随着北京在南海及其他地区的政策越来越强硬，包括卜睿哲和美国前驻台代表杨苏棣（Stephen Young）在内的一些观察家也将台湾视为中国大陆崛起的危险预警器。他们认为，大陆对待台湾的态度是

其对待邻国态度的指针。目前，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看法认为，台湾是特殊的，不过这一逻辑在大陆收缩对台湾的野心时更容易理解。现在中国大陆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其他问题上，如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很多决策者会怀疑，台湾并非大陆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开始。

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的意图很关键。一方面，美国坚持几十年来在统一问题上不明确表态，只要是通过和平方式所获得的结果，它都可以接受；另一方面，在地区发展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美国仍要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对中国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定论。一些美国人为了避免中美冲突升级而准备迁就中国的要求；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必须阻止北京的野心，即便这意味着要反对台湾同大陆接触。

对台湾来说，它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北京有何意图？在积极接触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保持政治自主，抑或大陆会在统一问题上施压？如果是后者，那么台湾如何利用它同美国的关系来对抗这种压力？美国又会怎么做？它会帮助台湾实现其目标，还是决心遏制大陆的崛起？如果是后者，那么台湾如何在两个超级巨人的冲突中自处？这些只是台湾决策者未来几年所要面对的诸多棘手问题中的一部分。

第13章

中美在中东、非洲、欧洲和拉美的互动

沈大伟、瑞黎明 (David Shambangh and Dawn Murphy)

全球层面的互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引人注目的新特点。自1971—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来，两国间的互动仅限于双边和地区（亚洲）层面。从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会谈开始，中美两国多次探讨全球议题，但实际上，两国之间的互动仍然局限于亚太地区（当然也有例外，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支持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扩张进行反制）。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七届政府期间，中国一直希望被纳入战略对话中，美方对此亦表示欢迎，但实际上，美国作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希望将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亚洲。

不过，如今世殊事异。现在以及将来，中美关系将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关系。因为中国已经跻身世界舞台。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在很多方面扩展了全球影响。尽管中南美洲、加勒比、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仍有22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但中华人

民共和国早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外交承认。在亚洲、中东、非洲和美洲等多个地区，中国以成员国或观察国的身份进一步深化了同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在某些地区，它建立了新的地区间对话组织）。现在，中国已经是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能源机构之外所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同其他国家的军方开展军事交流，并同世界各国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除此之外，它更是将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作为工作重点。经济上，中国的足迹同样遍布全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贸易上，也体现在其服务、海外直接投资以及对亚非各国的援助等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介入跨国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中。

在以上及其他方面，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加。但有人认为，中国仅是一个全球行为体，而非全球性大国。这是因为，虽然中国在外交、制度、军事/安全、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经济领域之外，中国还是无法影响地区或全球走势。如果将对其他国家和事件结果产生影响的能力作为衡量世界大国的标准，那么中国远未达标。除了贸易和商品价格领域，中国的影响力尚显不足。因此，中国应被认为是一个“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而非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外交依旧是消极而应激式的，这体现在中国并不热衷于解决地区或全球问题，或影响争议问题的走向。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一些敏感的国际问题上，中国通常力求迎合所有人。除了朝核问题，或许还包括气候变化议题，中国无意深度介入任何国际问题。即便是在朝核和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上，中国的反应也常常是迟缓的。中国在外交上的行为常常令美国感到失望。美国原本希望中国奉行更为积极、合作的外交政策，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除了弹道导弹、太空计划和网络战能力以外，由于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依旧局限于亚太地区，因此中国尚无全球性的军事影响力。尽管增强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被列入政府新的工作重点，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依旧虚弱，而中国的国际形象（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是略显消极。中国的确是一个贸易大国，不过2010年它的对外投资额仅

以58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五，这与美国高达24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额相去甚远。

因此，从多个标准来看，中国虽然十分积极，但缺乏全球影响力。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依旧广泛而深刻（虽然相对而言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虽然越来越广，但并不深刻。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难免略显“肤浅”，但中国仍不啻为一个重要的大国。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1999年撰写了著名文章《中国重要吗？》，现在来看（当时亦如此）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西格尔十分正确地告诫分析人士不要高估了中国的能力（尽管他没有回答影响力这一问题）。

中国在各大洲、各领域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催生了中美关系新的变化。中美之间在许多曾经“素未谋面”的领域展开了争夺。本章的核心观点是，迄今为止，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各自为战。也就是说，两国以一种自主的，而非互动的方式在追逐利益并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诚然，美国官方和情报机构对中国在西半球的活动表现出了严重关切，也在非洲和中东关注着中国的行动，但是美国并没有将应对中国的行为作为当务之急，也没有针对该问题制定政策。中国对美国在战略上的关切了然于胸，因此，中国想尽办法避免惹恼美国或成为美国战略关切的目标。

因此，本章认为，尽管中美之间是首次形成全球性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竞争性的，也不是互动的，正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一样。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深入，这样的局面会发生改变，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同敌视美国的国家保持紧密的关系；或直接挑战美国的盟国和伙伴；或是在海湾及附近地区建立海军军事存在；或是试图破坏美国的地区安全机制；或是支持反美的恐怖活动；再或是损害美国的经济和能源利益。至今，中国已经将部分做法付诸实践：它在挑战美国的盟友，试图制约美国在亚洲的安全部署，并支持敌视美国的国家。两国之间初显战略竞争，但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

体现。

虽非直接竞争，但是在任何地区，两国也未协力合作。因此在操作层面上，所谓的“两国集团（G2）”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两国在广泛的全球事务和地区范围内不存在双边协商。2009年和2011年召开的中美首脑峰会及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公报反映了两国双边对话的全球化的本质。如同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其章节所述，中美之间存在60多个以促进切实合作为目标的政府间机制。其中包含了有关亚太、南亚和中亚、非洲以及拉美的双边对话。两国利用这些机制就它们在各地区的首要任务、政策、公平性等交换看法，以此作为潜在摩擦的“早期预警”，同时确定双方在这些地区可展开实际合作的领域。同时，非官方的“二轨”外交对这些官方交流起到了辅助作用。

全球性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完全竞争性的也非完全合作性的，就如本书序言中所说，二者处于“合作性竞争”之中。这就像是一场尴尬的现代舞——双方围绕彼此起舞，但又竭力避免碰到对方，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对方，各顾各的。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考察中美两国在中东、非洲、欧洲和拉美这四个重要地区的关系。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本书中对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两国在亚洲存在明显的竞争态势）。把这些结合在一起，读者应该能从总体上把握中美两国的全球性关系。

欧洲

中美两国同欧洲都有紧密的联系，但是美欧关系更深，也更牢固。美欧有着共同的纽带，这来自共同的价值、公民社会、民主、宗教、语言、移民、相互通婚、经济、共同安全等。这些起源于18世纪的联系经过几代人的往来而强化，历经战争的考验，在和平时期重建

起来，并被各国政府制度化，最后通过大量的社会联系得到确立。

中国和欧洲则有着更为矛盾的历史。同样追溯到18世纪，当时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接着在19世纪，商业和殖民成为中欧关系的主要内容，而“炮舰外交”、羞辱性战争以及领土割让也频频出现在双方的关系中。虽然一些清朝的官员和学人向欧洲寻求富强之道，但总体看来，中国人十分痛恨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和目标也深受这段屈辱历史的影响，这一点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后达到了高潮。此后的几十年里，中欧之间罕有交往。中国同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建交，但是受冷战的影响，它同西欧的关系一直相当疏远。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同英国建立了贸易联系；1964年同法国建交，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其他西欧国家建交。但冷战给它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了一层阴影。后冷战时期，中国和欧洲才脱离美苏的影响，自主建立了联系。随着苏联的解体，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开始与中国建立广泛的联系，并为同中国打交道制定了战略。中欧关系随后在2000年到2006年间进入蜜月期，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复杂。

中欧关系具有许多特点，其中最鲜明的是双方的商业往来。如今，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出口市场和高端技术的进口来源。反之，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地。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4315亿美元。欧洲进口了23%的中国出口商品，而中国也是增长最迅速的欧洲商品出口市场，2010年双方的商品贸易同比增长达到35%。在外商投资方面，2010年欧洲对华投资额达到49亿美元，在总共33361个项目中累计投资达到733亿美元，成为中国第四大外国投资者。而中国公司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仅有9亿美元，仅占欧洲外资总量的1.7%，欧洲吸纳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是继亚洲/大洋洲（65%）和拉美（17%）之后的中国第三大投资地。

中欧商业关系也不是没有摩擦。双方的贸易仍不平衡，2010年中

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688亿美元。欧洲的公司和商会时常抱怨在中国遭遇众多市场准入限制，而中国政府则不停敦促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由各主权国家认定的“市场经济地位”使出口国免于被征收反倾销关税。到2009年，已有97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主要的发达国家仍未承认。中国每年都要遭受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其中多数来自美国和欧盟。2009年，40%的反倾销调查和75%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的。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仅在2010年的前六个月中，就有119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被承认，那么中国商品的市场价值将会以“替代国”——而这些替代国的生产成本比中国高出许多——的成本数据，而不是其实际成本来计算。这使中国公司很容易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中国希望欧美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据估算，欧元资产占到中国2.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45%（其中多数为德国国债）。手握4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中投公司也准备投资固定资产，而不愿援助欧洲。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倒是有兴趣投资欧洲基础设施升级的项目（公路、铁路、桥梁和码头），但是他希望能够通过投资获得这些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在美国的情况一样，让中国人拥有并经营欧洲的核心基础设施，欧洲人会感到紧张。

中欧关系的另一个焦点是所谓的“武器禁运”。欧盟自1989年来一直保持对华军售的禁令。如今要改变禁令，则必须由27国一致同意，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武器禁运问题反映出欧洲各国在对待中国上的分歧。虽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希望同中国保持积极的外交、贸易和投资联系，但一些问题引发了双方间的紧张气氛。很多在中国具有大量业务的欧洲公司不断抱怨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许多民调显示，在欧洲民众中，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是最低的，并在2007年到2010年间持续下降。但是2011年，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皮尤全球

态度调查 (Pew Global Attitude survey) 对所有欧洲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 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有所上升。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好感是否会保持下去尚不能确定。实际上, 在2011年, 除了巴西、土耳其、约旦、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对中国的好感同比下降之外 (虽然后两个国家的绝对数值依旧很高), 全世界对中国的好感都在上升。

表13.1 中国的受欢迎率 (2002—2011年)

	2002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0-2011 变化
美国	—	43	52	42	39	50	49	51	+2
英国	—	65	65	49	47	52	46	59	+13
法国	—	58	60	47	28	41	41	51	+10
德国	—	46	56	34	26	29	30	34	+4
西班牙	—	57	45	39	31	40	47	55	+8
立陶宛	—	—	—	—	—	—	—	52	—
波兰	—	37	—	39	33	43	46	51	+5
俄罗斯	71	60	63	60	60	58	60	63	+3
乌克兰	—	—	—	64	—	—	—	63	—
土耳其	—	40	33	25	24	16	20	18	-2
埃及	—	—	63	65	59	52	52	57	+5
约旦	—	43	49	46	44	50	53	44	-9
黎巴嫩	—	66	—	46	50	53	56	59	+3
巴勒斯坦	—	—	—	46	—	43	—	62	—
以色列	—	—	—	45	—	56	—	49	—
印度	—	—	—	—	—	—	—	25	—
印度尼西亚	68	73	62	65	58	59	58	67	+9
日本	55	—	27	29	14	26	26	34	+8
巴基斯坦	—	79	69	79	76	84	85	82	-3
巴西	—	—	—	—	—	—	52	49	-3
墨西哥	—	—	—	43	38	39	39	39	0
肯尼亚	—	—	—	81	—	73	86	71	-15

资料来源: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

表13.1

美欧关系近年来颇为稳定牢固。在经历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波折后, 双方的关系持续回暖。2011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Marshall Fund) 的调查显示, 仅有4%的公众认为美欧关系不佳, 绝大多数公众认为美欧关系“良好”或“不好不坏”。虽然阿富汗战争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不受欢迎, 同时战事正在得到平息, 但阿富汗仍有一支北约领导的, 包含了12个欧洲国家及土耳其的军队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北约同样领导了对欲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由

于欧洲国家纷纷削减防务支出，北约的未来也许会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欧联盟已经作了调整，并在实质上得到了强化。

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及2010年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但这也促使双方一道努力来应对危机。2010年，美欧贸易额达到6678亿欧元（约合8899亿美元）；同年，欧洲对美投资达到792亿欧元，美国对欧洲的投资也达到了1296亿美元（约合973亿欧元）。美欧商业往来依旧繁荣。

早些年有过对中美欧“战略三角”的讨论，但实际上，自2007—2008年以来，这三方之间很少有互动，三方之间同时缺少常规化的官方磋商机制。尽管为了增进相互理解，合作应对全球治理的相关挑战，三方的确不时开展非官方的磋商，但美欧关系才是主角。自2005年起，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开始轮流举办美国官

员与欧盟委员会官员之间的正式（也是私下）磋商，这些会面涉及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同时，美欧之间还存在许多相对不那么正式的定期互动。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在了美欧首脑峰会的议程中。在2008年的峰会上，美欧达成共识，将各自同中国的关系长期列入峰会议程。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专家继续就中国问题和西方与中国的关系私下展开讨论。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如今还算不上西方的合作伙伴，更多的是西方政策所针对的目标。

中东

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越来越多，在该地区打交道也越来越频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对美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东，美国要保护的利益包括：保证能源安全、反恐、防止伊朗获得核

武器以及支持以色列。反之，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则没有美国那么历史悠久，也仅仅局限于某些领域。中国在该地区首要的利益包括保证能源安全，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拓展市场以及防止国内，特别是新疆的极端分子从这里获得支援。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同中东地区的互动显著增强，其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包括：

深化经济关系；

2004年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02年任命第一位中东问题特使；

参加联合国在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

2008年派海军前往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多边行动；

同埃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1999年）、沙特阿拉伯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2008年）、阿联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阿尔及利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

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

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建立经济特区（经贸合作区）；

在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摩洛哥、苏丹、土耳其、阿联酋和巴林开设孔子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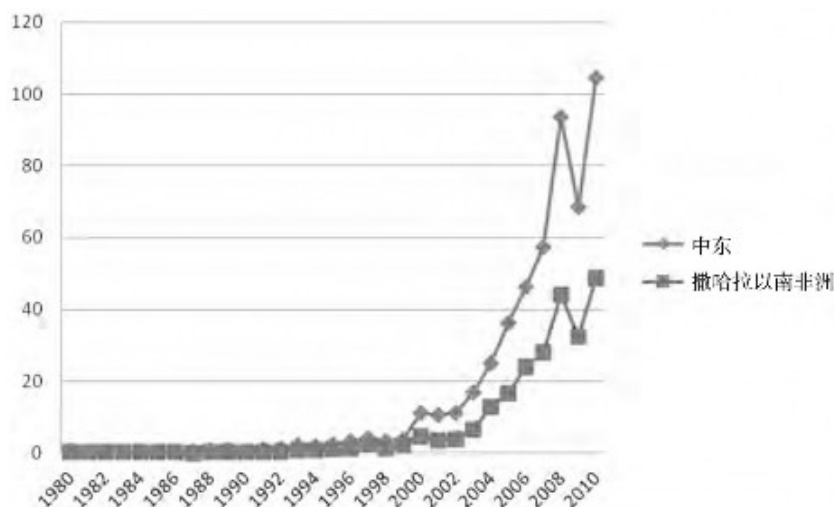


图13.1中国从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口额（10亿美元）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日进口量960万桶），而中国是第二大进口国（日进口量480万桶）。

中东地区的油气生产和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对两个国家而言都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还是新近的事。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开始猛增。2010年，中国进口的原油中有52%来自中东（日进口量250万桶）。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原油进口比例将达到72%，2010年这一数字是50%。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五大石油进口来源国是沙特（19%）、伊朗（9%）、阿曼（7%）、苏丹（5%）、伊拉克（5%）、科威特（4%）和利比亚（3%）。相比之下，美国进口的石油中只有25%（日进口量240万桶）来自这一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原油进口来源国主要有沙特阿拉伯（10%）、伊拉克（5%）和阿尔

及利亚（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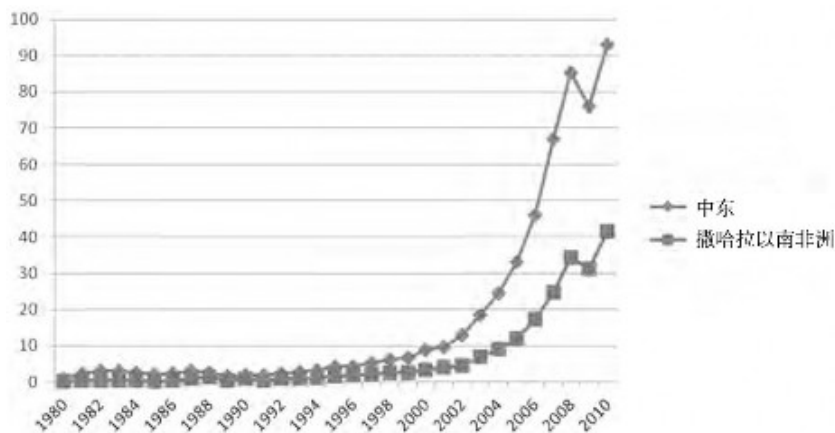


图13.2中国向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额（10亿美元）

鉴于中东巨大的原油储量，中国对该地区的能源依赖很可能上升。由于中东的能源对中美两国都很重要，两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但是，在能源领域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通过在索马里海域参与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国已经表明，当其经济利益遭到威胁时，它愿意在海洋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由于中东能源输送事关中美利益，因此在这一地区保护能源运输安全成为双方潜在的合作领域。比如，两国可以合力确保游轮和其他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等石油运输阻塞点的行驶畅通。

拓宽商品和服务市场是除能源安全外中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利益。截至2010年，中国对中东的出口额已达到930亿美元。中国在中东的五大商品出口国分别是阿联酋（212.4亿美元）、土耳其（119.6亿美元）、伊朗（11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03.7亿美元）和埃及（60.4亿美元）。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工产品（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等）、纺织品、服装、机械和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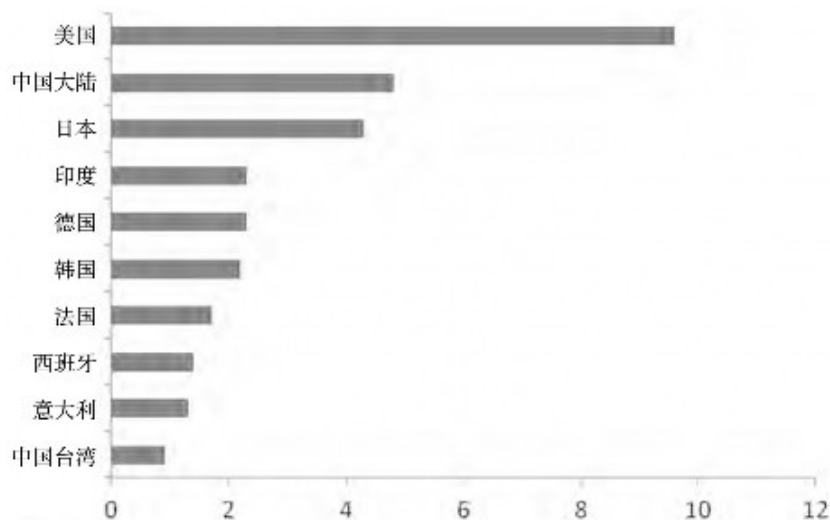


图13.3全球十大石油进口经济体（百万桶/天）

中国不光要为商品寻找市场，也要为服务开拓市场。中国在中东的服务出口市场主要是建筑、通信和金融。中国建筑公司的合同是这些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中国在中东的施工合同总额已达244亿美元。2009年，中国在中东的五大建造服务出口市场分别是阿尔及利亚（59亿美元）、沙特阿拉伯（36亿美元）、阿联酋（35亿美元）、伊朗（21亿美元）和苏丹（21亿美元）。

不过，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所在。与商品和服务出口相比，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微不足道。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只有9.7303亿美元。

与中国不同，寻求商品和服务出口机会并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利益。2010年，美国对中东的出口额仅为600亿美元。不过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可以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阿拉伯动荡后，很多阿拉伯国家渴望外来援助帮助其进行经济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这种政治上的发展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合

作提供了机会。随着中东国家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国都能从该地区日益增加的进口需求中获益。中美两国可以利用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来指导中东国家重构和发展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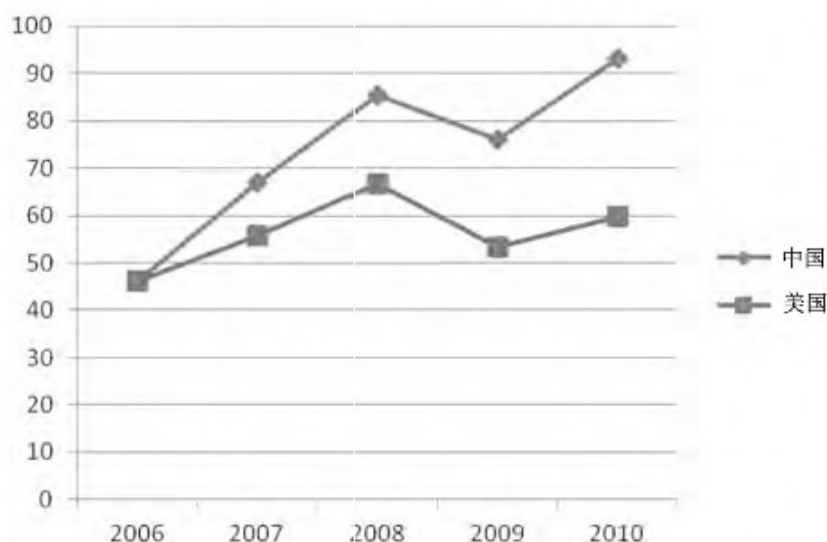


图13.4中国和美国向中东的出口额（10亿美元）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发源于中东的恐怖主义感到担忧。中国的穆斯林中有50%是维吾尔族，大多居住在新疆西部。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继承了共同的道德文化。多年来，维吾尔人在新疆和东部多个省份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汉人的袭击。主要的叛乱运动就是我们所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该组织已经被美国和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列为恐怖组织。

2009年7月新疆发生骚乱之后，中国对内生和跨境的恐怖主义越来越担忧。有迹象显示，由于2009年的新疆骚乱和中国在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影响的扩大，基地组织对“东突”恐怖组织的支持力度在加大。

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往来的增加，其在国外的业务可能日益成为基地组织攻击的目标。

中国已经表示愿意加入中东地区的多边安全协议（如在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参与联合国在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因此，如果基地组织威胁到中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中国会更积极地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反恐行动中加强合作。

最后，除了保障能源安全、反恐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大利益是支持以色列。中国成功地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取得了平衡，不过，在1992年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中国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有力支持者。2002年，中国设立了中东问题特使，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国家一直要求中国在此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它们相信，相比美国，中国并没有那么多偏见。不过，看上去中国并不愿意在这一进程中触动美国的利益，也希望维持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未来，如果中国屈从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或因为其他原因而更加积极地在和平进程中帮助阿拉伯国家，那么中美关系无疑又将受到考验。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与中东的情况类似，过去20多年来，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但不同的是，中国同这一地区的联系已维系了60多年。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利益涵盖能源安全、获取自然资源、为商品和服务开拓市场。它在这一地区的显著进展包括：

同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显著增强；

为该地区提供了重要援助；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以及此后各领域分论坛的成立；

2007年任命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和南苏丹等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与尼日利亚（2005年）和安哥拉（2010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南非（2010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国建立经贸合作区；

在贝宁、博茨瓦纳、喀麦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美国在这一地区也有重要利益。对美国而言，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能源安全、防止恐怖主义扩散（主要是失败国家和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以及公共卫生。美国同样希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

从石油进口和缓解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的角度上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中美两国都有重大的意义。

在非洲，中国有着广泛的商业、政治、文化利益。2011年，中国

进口的原油（日进口量120万桶）中有25%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2010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四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和赤道几内亚。美国有14%（每天130万桶）的进口石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是主要的供应国。因此，中美之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围绕能源展开的竞争会愈演愈烈。

与中东不同，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多种自然资源，不仅包括能源，还包括矿石和农产品。中国从这里进口的主要自然资源有铁矿石、铜、铬、钴、锌、锡、金、钻石和农产品。美国也从这里进口自然资源，其中80%是能源，对非洲大陆关键资源的进口依赖度达30%至60%。除了能源之外，美国从这里进口最多的是矿产、金属、化学原料和农产品。美国是非洲矿业投资最大来源国，占有非洲大量矿产资源开采权。2011年美对非矿业直接投资存量达333亿美元，占其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的59%。

中国同样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视为其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在这里的出口额达到415亿美元。2010年中国在该地区的五大出口国分别是南非（108亿美元）、尼日利亚（66.9亿美元）、利比里亚（43.9亿美元）、贝宁（22.7亿美元）和安哥拉（20亿美元）。中国向该地区出口的产品多为电子产品、机械、纺织产品、运输工具等。相比之下，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额为170亿美元。

和中东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是中国建筑、通信和金融服务的主要市场。2009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建筑项目额达166亿美元。这些服务的主要市场在安哥拉（49亿美元）、尼日利亚（20亿美元）、赤道几内亚（13亿美元）、埃塞俄比亚（12亿美元）和刚果共和国（9亿美元）。中国在这里的对外投资并不多，2009年它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只有10.7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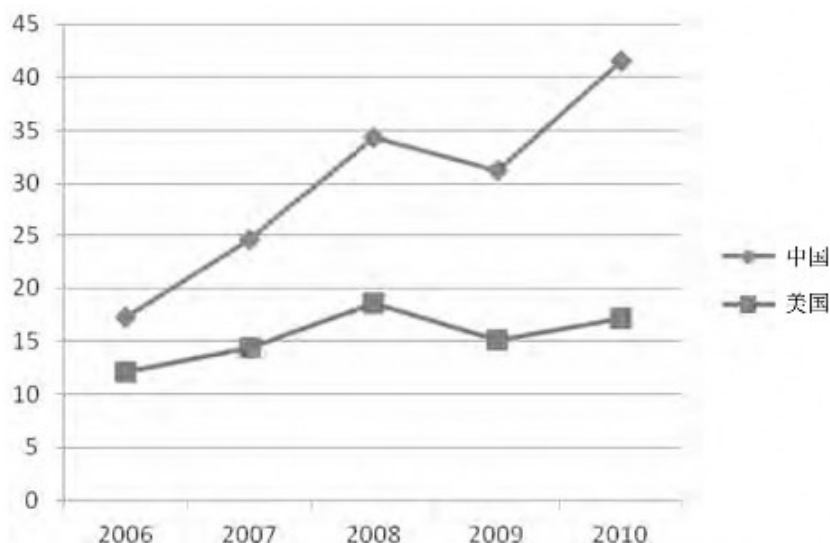


图13.5中国和美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额（10亿美元）

过去，对非出口仍然不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看重的利益，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促进该地区自然资源和工业产品的出口也许会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领域。

以上所阐述的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为两国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对两国都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非洲沿海水域——特别是几内亚湾、亚丁湾以及西印度洋沿岸——饱受海盗侵扰。中国已经参与了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行动，也许类似的中美联合行动也会出现在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除了能源安全，美国在这一地区最为关注的就是防止因为贫弱国家或失败国家而产生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这种忧虑源于1998年美国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的内罗毕所遭受的恐怖袭击，并在“9·11”事件之后进一步加剧。于是在2008年，美国设立了非洲司令

部。近年来不少中国工人在非洲国家遭到绑架，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也成为中国所担忧的事项。近年，出于对非洲国家政局稳定的担忧，中国向刚果（金）、利比里亚、南苏丹等国派出了维和部队。这样一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携手训练非洲当地部队，以防止恐怖主义出现在失败国家和贫弱国家中。

公共卫生是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另一个潜在的合作领域。美国致力于在该地区解决艾滋病及其他卫生问题。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投入这一领域的联邦经费大幅增长。中国也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派遣了医疗队，并在国内对当地的医生进行培训。中国在抗疟疾方面的工作十分成功。在这些卫生领域的合作不仅能令该地区获益，也能够使中美之间产生善意，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中美两国同样在西半球小心翼翼地打着交道。中国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角色使西半球的战略平衡开始被打破。虽然门罗主义已经十分遥远，但是华盛顿仍然将这里视为它的后花园，并对中国涉足西半球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它竭力避免成为美国的眼中钉。比如，中国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保持着一定距离，也没有直接支援当地的叛乱、社会主义运动或是左翼政府；将对这一地区的军售保持在很低水平；没有在该地区建立任何形式的军事存在；尽管支持古巴，但也仅与哈瓦那保持低调联系。

虽然中国竭力避免在美国的后花园刺激它，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同这一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果从外交、商业、

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来观察，就会发现，与上述几个地区以及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其章节所写的相比，中国在该地区的情况既有相似，也有不同。

从外交上来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京仍然面临着台湾的竞争。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近年来，两岸宣称在“外交事务”上非官方地“暂停”竞争，但这仍是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核心。还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这与其同非洲和中东的关系一样——拉美地区代表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立场以及推动多极世界的愿望，因此，双方都在推动所谓的“南南合作”。对北京而言，巴西在这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拉美国家正在寻求“多向性”的外交政策，试图扩展与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关系，从而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与中国交往恰恰符合它们的政策诉求。

中国和该地区多数国家建立了不同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总体框架。巴西同中国的关系异常紧密——也许是所有拉美国家中同中国关系最紧密的；同时中国也致力于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建立和谐的关系，特别是与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古巴。高级别双边外交异常活跃。1997年到2010年间，超过110位拉美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领导人到访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也先后五次访问拉美，此外，很多中央政治局级别的领导人也曾到访多个拉美国家。

在多边领域，中国在当地的多个国际组织中也相当活跃。2008年中国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实际上，早在1997年它已经加入了加勒比开发银行，2004年它还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常驻观察员。中国从1990年起同里约集团举行了多轮对话，还同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和拉丁美洲议会建立了对话机制。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中国也同拉美地区建立了许多论坛机制，如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南方共同市场对话、中国—安第斯共同体磋商和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中国利用这些多边机制同拉美国家展

开了广泛的联系。因此，不论在双边还是多边领域，中国都同西半球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和政治联系。

除了国家间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拉美地区的各政党也开展了极为活跃（但十分低调）的交流。在该地区，中国共产党同33个国家中的80余个政党保持着工作联系。中国共产党不仅同执政党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也同反对党以及在野的政客发展关系——这样如果他们上台，中共对他们已经相当熟悉（反之亦然）。中国还同很多拉美国家开展了议会交流，尽管不像党际交流那样广泛。

在这里，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国同19个国家签订了团体旅游协议，大量的中国游客涌入拉美。超过100对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城市建立了姐妹省/城市关系。移民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大约有3万名华裔居住在阿根廷，在秘鲁的也不少。中国加强同拉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努力还体现在建立孔子学院上，中国目前已在这里建立了24所孔子学院（全世界共有350所孔子学院），同时每年还为1000名拉美学生颁发奖学金以鼓励他们来华学习。中国与拉美已经达成了许多官方文化交流协议，两地的大学之间也开始签署合作备忘录。但学术界和拉美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依旧处于极低的水平。

中国目前在拉美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并不大，但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很明白，对于它在拉美的出现，美国已经开始感到焦虑，而美国对军事活动尤为敏感。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安全活动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首先是专业的军事交流，其中有一些级别相当高。例如，在2008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4位中央军委的领导人访问了该地区——比访问其他地区的频率都要高，同时每年也有大量拉美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军队高官访问北京。中国也在其军事学院中培训拉美军官。第二个层面是双方的军火贸易。中国一般向拉美地区出口小型武器和装备——中国每年大约向拉美地区出售价值1.5亿美元的直升机、火炮、装甲运兵车、车辆、K—8教练机、雷达、指挥控制装备、反舰导弹及轻型攻击武器。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在海地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总

之，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安全活动不多，但是在逐渐增加，不过显然还没有达到令美国严重担忧的程度。

目前，商业活动是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活动。双方贸易额呈指数级增长，在2010年达到1789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15倍以上，其中2006年至2010年增长幅度达到160%。现在，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很多拉美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在同拉美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与巴西的贸易占到总量的40%。虽然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但拉美同中国的贸易额只占中国总贸易额的4%。巴西作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也仅排在第20位。

双方的贸易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极度单一的特点。中国主要从拉美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它从巴西进口的商品中有70%为铁矿石和大豆等初级产品。中国从拉美进口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的矿产、能源和原材料。2008年，中国进口了168亿美元的铁矿石、74亿美元的铜矿、58亿美元的精炼铜、94亿美元的原油和精炼油，还进口了相对较少（数值仍较多）的铝、镍、铅矿、锌、镁和钼。中国从拉美进口的石油（包括原油和精炼油）也在增长：2009年4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北京承诺，将向中国输送的石油增加四倍，即从每日20万桶增加到100万桶。2010年巴西对华石油出口量也提高到每天20万桶。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推高了这些商品的全球价格（也大大提高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等国的财政收入）。现在中国要消耗世界上40%的煤炭、25%的镍、25%的铁矿、20%的铜矿和14%的铝。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第二大铜矿进口国。

中国也从拉美进口大量的农产品、渔业产品和酒。大豆和大豆油是中国在该地区的第二大进口商品。中国的大豆进口占全球的40%，中国进口的鱼肉有80%来自秘鲁和智利，其进口的糖有80%来自古巴。中国同样从阿根廷进口大量肉类和皮革制品。

拉美国家则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电子产品（主要是手机和电脑）和

工业品。大量的中国纺织品、鞋类及其他低端商品极大地冲击了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因此，2007年起，墨西哥和阿根廷不得不采取单方面的保护措施，避免大量中国商品涌入带来的冲击。这一年，阿根廷所采取的50%的反倾销和反向贸易措施都是针对中国的，2008年这一比例涨到90%。中国在同拉美的贸易中逐步提升技术含量，开始向拉美出口汽车、摩托、飞机及相关配件、电子产品以及农业、生物、纳米和信息技术。这样一来，双方在低端产品领域的竞争得到了缓和。

为了促进贸易，中国同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创新型贸易融资也是一个有趣的新领域。中国同阿根廷达成价值100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允许阿根廷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这项协议同中国与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白俄罗斯所达成的协议类似。

中国正在该地区增加投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拉美已成为仅次于亚洲（2009年为73亿美元）的中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但是其中大量的资金流入了英属维京群岛（16.1亿美元）和开曼群岛（53.6亿美元）这两个免税天堂。据商务部估计，截至2009年，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达305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则更高一些。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占到该地区外资总额的10%。

中国也向一些拉美国家提供援助。虽然很难得到准确数据，但是一则报告称中国在2002年到2007年间向拉美提供了267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数据显得过高，很可能将中国在该地区的部分投资计算在内。

总体而言，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足迹日渐增多。当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依旧强大。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2009年，美国与拉美贸易总额达到5230亿美元，是同年中国与拉美贸易额的3倍多；

美国在该地区有11个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只有2个；

美国是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这一地区其他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

2010年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达到519亿美元，是同年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额的20倍，也与当年中国全球对外投资总额几乎持平！2003年到2010年间，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为1470亿美元；

2010年美国对拉美的武器贸易额为6.27亿美元，是中国的3倍多；

美国通过1947年签署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即《里约条约》）承担了西半球“安全互助和防御”责任；

美国每年为该地区培训1.5万名军事和警务人员（2009年的数据）。

美国在西半球的援助和培训项目也相当广泛，包括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进行的禁毒和反走私项目。美国国务院在这里确立了四大优先政策：促进民主、扩大贸易、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增进合作。

美国和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十分活跃，但是美国与该地区的联系历史久远，也更为深入。同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样，美国同拉美国家和社会间的往来已有两个多世纪。共同的价值、语言、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共同的安全利益、庞大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美国定居的大量拉美移民，这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

结论

本章考察了中美两国各自在欧洲、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和政策。在所有这些地区中，中国的影响在增强（有时甚至是十分迅速的），但是，从深度和广度上来看，中国仍然无法与美国相比（也许除了在非洲）。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中国的脚步不断扩展，但是都不够深入。

同时，这两个国家在上述地区都是各行其是，它们尚未陷入战略竞争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似。两国的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在这些地区分别展开活动，但双方并不存在互动。但这并不是说，彼此之间不存在相互警惕，美国政府密切留意着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外交、军事、文化和商业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损害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资源——尤其是在中东和拉美地区。尽管双方在这些地区并不是竞争性的，但双边合作也不多（如果有的话）。就像本章开头所言，中美两国尽管是在同一舞台上“跳舞”，却不是舞伴。一旦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增长或者中美在亚洲陷入竞争性更强或敌对的战略关系，这种局面就可能发生改变。但在目前，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确都是在“独舞”。

第14章

美中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中的交流

罗斯玛丽·福特 (Rosemary Foot)

20世纪80年代初，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中国融入全球机制有助于促进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组织及其他相关全球治理机制中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有约40年的时间。邓小平认为，和平与稳定对于中国领导层的优先政策事项——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而美国在创建这一关键的战后秩序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71年，中国同美国一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先后加入了其他一些核心组织，如1980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裁军谈判会议，1982年加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世纪90年代末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建立时，中国很快崛起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主要成员国，特别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开始在多项讨论中发挥关键作用。

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参加这些组织记录情况的学术分析大体都给予了积极评价，少数分析人士可能认为中国在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作出了直接或创造性的贡献。比如，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2003年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区 and 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参与度与合作度都超过了以往”。此后的一些著作也都赞同这种观点。

然而，自2008年起，这种总体积极的评价开始减少。从那时起，中国的多边外交经常被认为挑战或扰乱了我们所熟悉的多种全球治理秩序。目前，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持相同立场的人并不多，但或许用不了多久，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她的观点。如埃克诺米所言，“北京启动了‘走出去’的战略，目的是重塑全球规则与制度。中国自身在改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在她看来，我们需要搁置视中国为墨守成规的行为体的观点，而应当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支变革的力量”。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及其行为所发生的消极变化所进行的解释与中美关系的状况密切相关。在上述例子中，美国一直在政治和经济上软硬兼施以诱使中国与其合作。更近一点，中国相对美国的实力增长可能助长了其国内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声势，实力增强的中国希望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军费预算也跃居全球第二。对中国的某些民族主义者来说，这应当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幻的地位提升。

此外，在中国物质实力增强的同时，美国政府在竭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殃。外界广泛认为，两党合作制定政策的机制已不奏效，其结果是效率低下的政治泥潭。一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不适，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由美国发挥支配作用、在全球秩序建设和维护上居中心地位的世界。在后冷战时代，由于具备无可匹敌的资源，其最大的战略敌人苏联又遭遇解体，美国享有很高的地位。可如今，多极体系正在加速显现，人们难以适应并感受到了挑战，而且“游戏

规则改变”的可能也越来越大。

崛起的中国被视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行为体，而且比其他所谓的新兴大国更有实力来影响规则的改变，这意味着，本章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行为上，以此来衡量这个“新来者”参与国际体系的情况。此外，如克里·布朗（Kerry Brown）所言，世界“将日益视其自身为中国的利益攸关方，正如中国被鼓励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利益攸关方一样”。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要理解中国的内外行为就要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核心政治挑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外部行为都受制于一个条件，即它所认为的它与美国一道在多边机制中的得失，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近年来，美国发现它也处于类似的境地。美国的官员、分析人士及评论人士日益意识到国际事件及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权力结构的重塑作用是何等迅速，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经常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及对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影响来评估其全球治理行为的价值。

因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交流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以及双方的行为和看法。只讨论中国而不考虑美国在相应的多边组织中的行为，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于中国在这些组织中的行为的理解。对美国而言，情况也越来越如此。我们既不能建立在近来中美双边关系紧张加剧及中国相对实力崛起的基础上，假设两国的交流及成果缺少实质性进展，也不能单纯以零和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应当认为两国是可能展开交流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两国的确存在零和式的对抗关系和明显的分歧，但两国又都从这种僵局中收获了满足，因为它们限制了一个彼此都不喜欢的国际协议的出现。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它们的行事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有利于全球治理。

因此，在解读这一系列活动的问题上，我反对那种认为中国在故意重塑全球规则和制度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中国的这种“关注自我”的政策有时能够促进合作，有时又制约或促进着现有国际组织的

改革。我还借助经验主义的证据来考察，是否应将2008年视为中国彻底改变其所奉行的从国际机制内部重新崛起的战略的一年，这一战略中国实行了30多年。不过，我的确承认，相对实力的增长令中国官员更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胆表达见解。这些官员同样对一系列广泛的中国利益作出更明显的回应，这些利益需要在国内日益多元的政治背景下加以协调。

我首先简要考察了评估和概括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国家行为时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全面描述了美国和中国对于这些作为全球治理核心要素的多边机构的态度，包括双方对于彼此在这些机构内的行为所持的看法。接下来，我列举了上文中提到的两国在众多机构中进行交流的典型例子。我特别将重点放在了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交流，正如伊恩·赫德（Ian Hurd）所言，联合国安理会可能是所有涉及全球

治理的国际组织中权力最大的一个。不过，我也用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全球组织来举例，有些隶属于联合国，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此外还有非正式的二十国集团等。这些例子更多地显示了中美两国行为方式上的长期趋势，而非突出2008年是中国行为方式的转变之年。最后，我简要评估了中美交流对于未来全球治理的意义。

评估行为所面临的问题

为了帮助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国际规则、条约等其他多边机制，衡量一个国家在这些机制中的行为存在公认的难度。比如，全球治理机制可能由一系列广泛的原则组成，并与详细的规则和行为标准相联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要求越具体，国家就越不愿遵守。全球制度包含多种不同的内容，其中一些可能相互冲突，国家遵守的程度也彼此各异。这使国家可在众多的全球

标准框架中“东挑西拣”，一个国家可以声称自己确实遵守了某一框架。

在不同的领域，国家的参与度可能很消极，也可能十分积极。它们既可以最小程度地遵守这些框架，也可以积极参与有利于某个特定组织或全球机制的核心价值的活动。区分这些最小程度的遵守和深层次的合作以及评估这些行为方式是否始终如一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此外还有国内能力的问题。一国政府可能希望遵守规则，但因缺乏制度或法律能力而无力为之。在核不扩散原则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早期的一些行为方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事实上，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很难想到哪个国家在遵守国际组织的要求方面是完美的。最后，在评估有关全球治理的行为时，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形式的多边主义。这一概念同时包含最小化和最大化两种解读方式。最小化的形式指的是三个及以下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协作；最大化的形式则意味着各行为体自愿限制其政策自由以遵守协商一致的规定、规则 and 标准。它们还可能产生具有超国家权力的多边机制。

在综合评估一个国家的行为时，需要牢记这些分析、衡量及定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将“现状”与“革新力量”的对比作为主轴，而不是采用非此即彼的分析框架。

美国、中国与全球治理

尽管分析起来很复杂，但有关美国在全球治理及多边组织上的行为表现方面存在一个共识。人们长期认为，美国与国际组织及更加广泛的多边组织之间的关系颇为矛盾。总体而言，美国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多边主义者”，地区和全球组织、安全 and 经济领域都有它的身影，“它根据具体问题、自身利益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从

一系列可能的方法中进行选择”。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和谢泼德·福曼（Shepard Forman）在2002年写道，“全球相互依存在不断加深”，“谁都无力独自解决的跨国问题”也在不断扩展。但他们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多边机制怀着深深的矛盾心理，在履行新的国际承诺时也变得十分挑剔”。此外，虽然我们应当承认，美国政府在建立众多现代主要全球治理机制上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当它认为有必要远离这些机制时，它也表现出了持续的疏离倾向。

美国位居全球层级顶峰的地位是解读这一倾向的关键因素。美国的霸权赋予了它借助多种手段——从单边到多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但这种选择性同样来自美国的例外主义冲动，这促使它擅自设定其自身理想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自认为是“国际秩序的终极保持者”。如爱德华·C·卢克（Edward C. Luke）所写的，美国以为“其国家价值和实践适用于全世界，其政策位置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而不只是权宜之计”。多种信念的结合促使美国决策者有时置多边场合于不顾，当他们认为某些机制不符合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需要时，就会不时地试图加以改革或修改。因此，在相对而言的强大实力和例外主义的推动下，美国在必要时更愿意与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的共识保持距离，有时甚至试图彻底重塑这些机制。比如，1990年到2007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几个国家避免经常动用否决权，而美国却频繁使用，22次投票共动用了15次。在决定是否动用武力的问题上，美国也十分强硬，且表现得与众不同。如今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的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有关联合国安理会是动用武力的“唯一合法授权机构”的说法作出回应时说，“参议院没有人认同这种说法，毫无疑问，安南错了”。

因此，鉴于美国的这些看法，在中国的国际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之际，美国官员和一些评论人士强调要让中国在这个美国主要为自身利益塑造并将继续塑造的国际秩序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也就不足

为奇了。在这一点上，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2005年发表的那场题为“中国应当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过，美国也曾发出类似的劝告，比如尼克松总统1971年呼吁中国“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关系”；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1989年表示，“自1971年以来，我们的对华战略是让中国摆脱孤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的期望是，我们未来的对华态度能够促使中国领导人逐渐接受并遵守国际行为准则”。

中国加入众多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时，心里清楚美国在创建许多核心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知道美国的行为方式会不时发生改变。这种意识还附带有两个彼此关联却又多少有点儿相互矛盾的立场：其一，美国令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准则屈服于自身意志；其二，中国严格遵守这些组织原则和准则可作为削弱美国正当性和实力的方式，同时也能够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崛起且更值得信赖的全球行为体。

然而，尽管对国际组织和强国之间的关系怀有深深的疑虑，但约翰斯顿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显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行为仍表现出了诸多合作的特点（也有一些大的例外）。从毛泽东时代的低起点开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并且未对全球秩序构成大的挑战，至少目前没有。安·肯特（Ann Kent）2007年对中国在4个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进行了研究，她得出结论认为，“外界可能会依据中国对国际组织及其准则、原则和相关协议规定的遵守程度来对其作出评价。事实上，如果从中国1980年与国际组织参与程度和合作程度的起步水平来看，其进步是显著的”。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J. Christensen）虽然指出中国在2009和2010两年出现了一些消极变化，但他还是对中国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其间克里斯坦森在小

布什政府任职）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全球治理行动表示赞赏。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描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核不扩散政策，大体上得出了积极的结论：“中国加入了众多的核不扩散条约和协议，缩小了其敏感的出口的规模和内容，其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承诺实现了制度化，并打造了一批包含政府内外人员的核不扩散专家。”此外，中国还努力推动这一标准框架超出国界，这一特殊承诺使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利益展开直接竞争。在全球金融领域，尽管在银行管理体系（所谓的巴塞尔规则）中很明显是“规则执行者”而非“规则制定者”，但中国依然总体上遵守了这些管理规定，并在2003年组建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从那时起，中国就接受了二十国集团的共识，即巴塞尔框架依然有效，但需要根据自2008年11月以来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所设定的路线进行改革。2009年3月，中国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并同意加入互相审查的长期过程，目的是促进这些标准的执行。

当然，这一总体上合作的趋势也有重大例外，这些例外可根据大多数全球治理机制的自由价值（这些自由价值在约翰·艾肯伯里撰写的章节中有概述）以及完全遵守这些规则可能产生的消极国内结果来加以解释。例如，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不那么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调整人民币币值的诉求了。虽然中国口头上依然坚定地支持核不扩散准则，并加强了国内监管和对协议的执行力度，但它仍迟迟不愿对朝鲜或伊朗的核活动施加严厉制裁。中国认为，一味地配合将给其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国内优先任务带来消极后果，在上述例子中，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由此来解释。然而，当全球需求和国内需求一致时——如巴塞尔规则的例子，中国国内的改革者希望借此来改革中国脆弱的银行业——我们看到，中国十分支持全球规则，即使有些规则当初完全是由他国制定的。

不过，虽然有证据显示中国在多边领域的行为是积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严格践行上文定义的多边主义概念的行为体。中国

总体上对自由的国际秩序抱有矛盾心理，并在独立于成员国行事的机构中感到不适。这在中国对地区组织的偏向中可见一斑。此外，这些倾向近来变得愈加强烈，随着相对实力的增长，中国有时会将这些机构视为为中国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而非所有国家和人员都有利可图的机制。如时殷弘所言：“在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长期关切方面，有一个关切或许是压倒一切的，即中国政府经常感到，西方所谓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将超过中国的能力，从而损害其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利益。”

因此，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希望在决策方面保留尽可能多的自主性。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既没有在全球治理机制的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这种角色使美国在面对全球秩序问题时，能够运用单边、双边和多边等多种手段在多个多边组织中进行选择。总体而言，中国从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机制中看到了利益，尤其是在这些活动与其国内目标相一致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参与这些多边机制有利于支持中国所谓“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论调，有时能够赋予其行为积极的印象，将这些行为与其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行为区分开。

中美交流的类型

中美两国在全球层面的交流主要可归为四类：（1）零和对抗；（2）虽有明显分歧但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3）两国利益碰巧重合；（4）两国的行为方式可能不同，但结合起来却总体上有利于全球秩序。

第一种类型的典型案例与全球经济失衡有关。这如今是二十国集团商议的主要问题，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中美双边讨论的一大长期关切（详见葛来仪撰写的章节）。2010年11月在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遇到的困难尤其多。有报道用“狂风暴雨”来描述谈判过程，首尔峰会发言人谈到各国副财长举行的前期会议时说，“各方都提高了调门，不肯让步。争辩如此激烈，氧气仿佛都不足了，我们不得不敞开门”。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要求美国多留心其“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还有一些人暗示人民币币值问题不应放在国际论坛上来讨论，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国内带来严重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以及美国等外部行为体都应考虑到这些后果。

在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美国国会于2011年8月最终投票决定提高美国债务上限，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纷争随之进一步恶化——至少在言语上如此。新华通讯社发文称，美国应“治愈其借债成瘾的问题”，并“量入为出”。这意味着美国应削减其“巨额军费开支”，并“提高社会福利”。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指责政府将一半的外汇储备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实在是太愚蠢。中国学者朱峰称，财政部的官员都紧张地“双手紧握”。

毫无疑问，这种两极化的态度吸引了二十国集团的注意力，妨碍了它们长期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后果的能力。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也比以往更加决心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保持在全球议程范围之外。不过，这种两极化以及日渐强烈的相互指责的成因是复杂的，不完全是由于自2008年以来中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一问题来源于2005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国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2006年成为世界主要的顺差国，而美国却成为最大的逆差国。

相比2008年以来中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初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则需要顺差国和逆差国

双双作出调整。对此，中美两国在2009年11月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似乎也表示认同。声明写道：

中国将继续实施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消费比例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无通货膨胀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恢复到可维持的水平，并采取鼓励私人储蓄。

可不幸的是，这一对称且明智的方法并未深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中美两国的心中，情况又退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点放在顺差国的储备积累上，同时放松对美国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制约。事实上，中国官员在2005年的言辞让人想起20世纪末他们的措辞：“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大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首先要拿出可信的行动，削减财政赤字，增加国家储备。”2005年左右对中国心灰意冷的美国试图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规则。2007年达成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收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汇率的监督。中国认为该政策是在针对自己，并且由于助长了投机性资本进一步流入该国而引发中国不快。对于一个向来都根据共识运作的机构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中国反对这一提议，并在2007至2008年间退出了双边监督程序，仅在2009年又重新回来，但仍对监督程序保持警惕。在当时的中国看来，这些规则是不公平的，这些规则太过迎合美国的利益，需要加以改革，而且这些多边机制完全无视汇率调整可能产生的国内成本。中国已经提升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比例，但在2010年，这也不过提升至了总份额的3.81%，低于法国和英国的联合份额，更远低于美国的16.73%。因此，中国仍将对这个似乎不照顾其国内关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心存疑虑，而依赖二十国集团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似乎也算不上是好办法。

然而，也有一些时候，中美之间的交流虽然公开呈现对抗性——有时是因为双方有根据认为彼此的价值观不可协调，有时则是因为官方声明的论调——但事实上，这却在无意中促进了双方在结果上达成一致。这一部分的大多数相关讨论恰好都处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如约翰斯顿所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倾向于比较传统的国家主权定义。不过，鉴于保守的共和党在美国的实力一直有所延续，这些利益上的重合一直到奥巴马执政时都还依然存在，奥巴马政府的行为方式更趋向于多边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尤其是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后以及小布什时代——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交流特点。在这些谈判中，中美在推动有利于防止对人类造成进一步伤害的核心原则上存在巨大分歧，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双方对此原则仍有分歧。

美国长期认为中国是在该领域实施相关政策的障碍。美国评论人士，尤其是国会议员强烈表示，《京都议定书》将所有改革成本都算在发达国家头上，而让中国这样的主要排放国无所作为是不公平的。中国则称，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先导致了这个问题，是它们挥霍能源，在城市和工业发展进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中国还认为，其生产的许多商品以及导致碳排放的商品在世界各地都有消费，尤其是在美国市场。这些冲突严重制约了气候保护协议的达成，以及为《京都议定书》寻找合适接替者的努力。

不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的气候保护立法进程受阻可能促使两国政府以某些形式展开协商。安·肯特写到，双方似乎在2005年的谈判上联手减弱商讨后《京都议定书》机制的努力。那一年，也就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大约四年后，小布什政府启动

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中国也加入其中且绝对支持，原因之一是该计划的要求是自愿而非强制的。中国还加入了美国在2007年发起的“经济大国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美国此举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对其不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的指责。中国对于该论坛建立起来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表示欢迎。即便如此，该论坛并未取得多大成果。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也难以取得进展，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用于各种国际减排努力的资金，国内其他政治团体以经济为由反对减排，并经常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表示他们的不满。

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也会进行合作，以显示它们在某些有限的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如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所言，在广泛意义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发展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例如，在2005年的世界峰会举行前夕以及对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大自由》报告的讨论中，有关国际社会如何应对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就符合中美两国的要求。两国都反对科菲·安南提出的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制定干预原则的做法。中国（和俄罗斯）坚持认为，任何干预行动都必须获得安理会授权，这意味着有可能遭到否决。美国也反对可能对其决定何时动用武力的自由产生约束作用的规定，它不想卷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坚称，“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责任和义务“不具有法律意义”。他说：“我们不认为，作为整体的联合国或者安理会，抑或任何一个国家有义务根据国际法进行干预。我们认为，联合国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应当取决于具体情况。”事实上，中国对此非常欢迎，其主要关切更多的在于国家对于民众的权力以及任何可能破坏不干预原则的行为，而非战略自主性，这一点与美国类似。

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概念以及对个体人权的保护表示认同，但美国在多起事件中的审慎态度表明，它并不想将这个领域的政策自主性让给联合国。比如对苏丹，它呼吁进行“坦诚对话”，软硬兼施；对斯里兰卡，即便军方对泰米尔猛虎（Tamil Tiger）组织的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但美国仍采用的是经济手段而非以武力相威胁；对“阿拉伯之春”，它对暴行保持了审慎的克制反应。中国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以及在一些事件（如干预利比亚）上的做法反映出，它也希望缩小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但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公然反对推进这一原则。

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也有着广泛的相似立场，即使中国竭力反对日本“入常”，而美国则支持日本。它们立场的相似之处在于，宁愿“不改革”也不接受“不可接受的改革”。两国都坚称，要避免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分歧，这样可以防止进程停滞。尽管奥巴马政府对增强安理会代表合法性的需要表示了关切，但改革进程并不快。美国依然坚持认为，改革不应降低安理会的“效率”，而在中国官方声明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主张。

上述中美交流的方式既可以被认为不利于全球治理挑战的化解，也可以被认为会产生模糊的结果。我在本节要讨论的两个案例对于全球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哪个案例都不代表中美两国间直接或有意的交流形式。我这里要讨论的是两国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首先，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刻意营造而由中国来填满的真空地带。自2000年的卜拉希米报告——矛盾的是，该报告主要支持的是西方对于维和目的的理解——出台以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西方人员“在相对和绝对意义上”都减少了一半。20世纪90

年代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以来，美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力度减少得尤为明显。对此产生影响的还有2002年通过的《美国军人保护法》，该法规定，除非受助国能保证维和人员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否则禁止美国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填补了其中的一些空缺，如今其派出的维和人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自2004年5月以来，其派出的维和人员数量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中排在第12至第15位——在绝对意义上这是一项良好记录，尽管按人均计算并不算突出。中国还是第7大维和资金提供国。在广野美和（Miwa Hirono）和马克·兰特根（Marc Lanteigne）看来，“中国如今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忠实支持者，并试图深化、拓宽与该机制的接触”。中国在这些行动中的贡献主要是冲突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修复。中国也特别强调冲突预防以及对争端进行政治调停，而不是用高压手段来压制滥用暴力。反对干预以及对侵犯国家主权的担忧意味着，当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它们不是“第一应对者”，并试图防止作出军事应对。这与贝拉米（Bellamy）和威廉姆斯（Williams）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西方倾向于发挥“战斗”作用，挽救面临危险的生命。

然而，虽然这些方式不同，本质上也依赖于不同的价值观，但西方这种在联合国行动中发挥短期作用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由中国填补了空缺，这个国家更愿意建立在提供与发展直接相关的项目的基础上，采用有可能打造长期和平的方式。广野美和与兰特根认为，“不论中国政府这么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中国对于维和行动的贡献促进了受助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国政府和企业愿意支持这样的行动”。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中的互补关系。它们的行为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持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政治中的正当性，从而有助于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如伊恩·克拉克（Ian Clark）等人所言，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之间的相互接触对双方都有

利，因为“一旦双方闹翻，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就会使双方的正当性都面临危机，从而导致美国的权力和联合国的权威都被削弱。中国的行动有时能够帮助维持这种相互性。中国在安理会经常投弃权票（比如2011年3月在对利比亚实施干预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上投弃权票），而不常动用否决票，使在严重牵涉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华盛顿不大可能绕过安理会采取行动。中国的否决票（如2012年2月的叙利亚问题）助长了美国的单边行为，或者促使美国去寻求“意愿同盟”，从而令联合国的正当性面临危机。中国表示它希望维持这个机构的存在，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持“国际社会”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克拉克指出，阻挠美国参与的行为有可能导致美国实施单边主义，而这可能损害赋予中国（及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殊地位的那个机构，也会损害这个经常被中国官员给予积极评价的机构。如中国2005年对联合国改革的报告所言，“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最广泛、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也是共同应对各种威胁与挑战的有效平台”。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保持克制，这有助于维持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接触，从而有助于维持联合国作为一个治理机制的重要作用。

结论

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交流范围如此广泛，仅一章内容无法完全涉及。此外，我的讨论并非要帮助我们确定上述四种交流类型中哪个占主导地位。然而，揭示这些交流形式的确能够引发我们对“修正主义者”与“现状”大国这一概念对比的可行性作出思考。衰落大国与崛起大国——尤其是基于不同政治体系的大国——的假想将无助于在国际组织中构建富有建设意义的关系。多边机构以及它们的组织原则能够促进妥协，鼓励务实行为。外交时时刻刻都能够减缓战略失信所引

发的破坏性影响。即便在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刻，意料之外的结果也可能对全球和国内治理产生积极作用。正如伊丽莎白·埃克诺米所言，“中国希望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现状，尽管若操之过急，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但长期来看又可能对美国有利，或许能够帮助美国经济实现财政自律”。此外，又如约翰·艾肯伯里在其章节中所言，对中国来说，推翻合理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并非易事，那些深深融入全球机制中的准则、规则及相关标准对任何一个行为体来说，想要改变或推翻都是很困难的。这些要素导致全球秩序出现一种惰性，各国，尤其是崛起中国家需要对它们可能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行为找到充分的理由。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富有成效的参与不仅在物质上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被认为是展示其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和国内改革的负责任大国的方式。国际组织有时会成为其国内法改革的理念来源，并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些理念被认为很可能有助于巩固占主导地位的国内价值。不过，中国对国内需求的过度关注导致其行为表现出狭隘主义的特点和保守的递增主义的倾向，目的是测试国际组织的决定对于其自身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意义。对于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的需求，它的关注远远不足。因此，尽管中国试图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寻求更广泛的代表性，并且认为某些机制在程序和实质性成果上不够公平，但发言权越来越大的中国除了在增强其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之外，不会有别的作为。

而美国在创建自由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全球体系中的许多人仍指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来维持和发展这种秩序。然而，在推动全球性视角的过程中，美国经常表现出一种不积极的倾向，不愿打造其国内价值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使它经常无视其他国家立场的正当性——在权力分散的全球体系中，这种倾向事关重大。在经济衰退和经济、政治总体上不稳定的时刻，国际社会对此的质疑在不断放大。可是在美国国内，人们越来越认为，国际组织经常代表着一种

不民主且充满敌意的空间，纵容他国无偿享用美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美国却无力再进行提供。

美国国内对自身需求的高度关注加之中国对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一党执政的长期投入使未来几年，全球治理很可能迎来一个复杂且薄弱的发展期。正如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和吴心伯（音）在本书所言，我们将会看到中美两国合作交流为自身谋取特殊利益的情况。此外，本章所提供的许多中美合作的例子在为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时，更倾向于不作为而非采取行动。再者，在中美充满争议的一些领域，国际社会的需求还会被忽略。鉴于两国关系中的自我中心倾向，未来全球机制将充满挑战，且变得难以预测。

第15章

中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吴心伯 (Wu Xinbo)

中国的学者和专家认为，自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每十年都会经历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明确反映在双边关系的议程和发展轨迹之中。1979年到1989年间，由于冷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同时两国关系也得到了相对顺利的发展。接下来的十年中，由于冷战的结束，加之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双方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经济关系、台湾问题、核不扩散及其他问题上出现了持续的分歧和紧张，两国关系几经波折。到21世纪的头十年，随着美国将精力集中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上，同时中国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双边关系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地区、国际事务以及全球议题上合作的扩展。

那么，到2020年，中美关系会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界、学界精英中并没有共识。对此，中国政府中的主流观点是乐观

的。2011年初，中国外交部负责中美关系的副部长崔天凯发表了一次有关两国关系的演讲。在提及2010年中美关系所遇到的麻烦之后，他抛出一个问题：“中美关系这艘船究竟能不能继续向着合作的方向前行，驶向更加广阔的前景？”他的答案是肯定和明确的。他接着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中美合作的历史趋势不可阻挡；中美合作的现实步伐也不可阻挡；中美合作与亚太振兴之路相辅相成；中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前景备受期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1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这次访问期间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一致认为，两国要“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职官员和军方仍然公开抱怨美国的对华政策。主管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美国“拉帮结派对付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和“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及在中国近海搞联合军演”的行为，并指责其因“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需要”向台湾出售军火。2011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同样表达了对美国试图强化军事同盟、进一步涉足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对台军售的担忧，认为这些将“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损害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中国的学界在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上分歧更大。乐观的观点认为，随着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建设性态势，中国和美国更可能成为真正的伙伴。悲观者则认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催生了结构性竞争，并断言两国之间对立、冲突的利益多过共同、互补的利益，两国间很难发展出真正的战略友谊。

中国的政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有着多种看法，本章试图展现中国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看法。本章先分析了双边关系的新局面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接着深入研究了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然后又考察了中国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值得称道的地方，最后，文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作出总体分析。

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迅速发展，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特点。本书前面几章已经详细阐述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而且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都在塑造着两国关系。但是本文会着力于几个关键的因素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后几年两国关系的走势。

首先是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两国相互依赖中对称性的增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对称性得到增强。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而来自美国的出口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却没有那么大。由于21世纪初中美两国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显著增强，如今美国也倚重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也是第四大外资来源国。另外，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在帮助美国融通资本应对巨额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对美国政府平衡赤字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贡献良多——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使美国政府能够保持低利率，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中美两国间现有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表明，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并发展出多层面且不断增强的对称性。

第二个因素是中美关系的国际化。两国关系的国际化始于1972年，当时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苏战略三角就此形成。因此，中美关系产生了全球战略影响。但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崩溃，战略三角消失了，两国间的互动主要集中于双边议题，很少涉及地区或国际议

题。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受累于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认识到其力量有限。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虽然强大，但并非无所不能，于是他们开始寻求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世界大国展开协商与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间的互动范围得到扩展，所涉及的地区、国际性问题也越来越多。正如2005年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日益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如今当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他们讨论国际问题的时间常常多于双边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方面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国的对美政策往往是由极少数的几个高层领导人制定的。不过随着过去十年中，中国政治由“强人政治”过渡到集体领导，更多领导层内外的行为体加入了决策过程。与此同时，随着两国交往领域的拓展，很多政府机构开始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外交部的影响力随之减弱。因此，中国对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内部协调（有时甚至没有内部协调）和讨价还价很困难，造成这一过程中的低效和自相矛盾。而且，正如郝雨凡在其文章中所言，随着经济增长和信息技术带来的重要发展，中国社会在思想和利益上都变得更为多元，互联网大规模普及，受过教育的公众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也越来越热衷于讨论这些。在信息时代，中国的决策者也很看重自己的国内形象和声望，所以他们很重视民众的情绪，特别是中美关系中一些备受瞩目的议题（如台湾、西藏和贸易摩擦等），这使中国的对美政策比以前更具有不确定性，总体上也更为强硬。

最后，但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美之间均势的转移。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18万亿美元，仅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6%。到了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88万亿美元，已经是美国的40.5%。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但中国有信心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缩小差距。同时，

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以及美国和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都使中国的经济活力更加耀眼。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遍及全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提升。这一切都增强了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的地位和信心。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中美双边关系中议程的设定者，中国则处于被动地位。然而近年来，北京在议程设置中更为积极。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赋予了它更多筹码。因此，与过去20多年相比，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更为活跃和重要的角色。

自中美在1979年建交之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与美国的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两国关系同中国一系列重要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从台湾问题到经济发展，从安全环境到国内稳定。在新的环境下，由于对中国的重要性日增，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经济上，美国依旧是中国不可代替的伙伴。作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贡献巨大。尽管近年来中国极力扩大内需，但短期内无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美国作为外资来源国的重要性却在减弱，因为中国不再缺少资金，但是美国依然是中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中国正致力于经济结构转型，希望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中国比以往更需要来自他国的技术转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近年来频频敦促美国放开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美国成为他们的主要投资地，中国也呼吁美国为中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后，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美元的大幅贬值或华盛顿无力偿还国债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维护其财政稳定和国家信用，以保证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安全。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始终期待同美国展开合作。尽管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稳步发展，但是岛内政局不稳，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仍在伺机重掌大权。北京希望国民党能够掌控岛内

局势，美方也乐见两岸关系的发展——当民进党上台时，美国也会对其施加影响，压制其“台独”倾向。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国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台军售。

在亚太地区拥有大量安全资产的美国是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外部因素。自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积极加强了同该地区盟友以及其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安全政策和战略意图感到担忧的国家的合作。现在，美国还开始插手南海纠纷。中方认为，这些行为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并使它承受了更多安全压力。稳定和平的安全环境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至关重要，所以中国希望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调整幅度不要过大。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就曾表达过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政策的期望，“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目的，希望有关国家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生存发展的这个地区，在我们家门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拥有越来越多海外利益的世界大国，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对中国也日益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将美国视为重要的参与者，并珍视美国在帮助提供这些公共品方面发挥的作用。随着中国更积极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它期望美国成为一个积极负责的伙伴。2011年1月访美期间，胡锦涛主席在演讲中表示，“中美两国应该开展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通过双边渠道和各种多边机制，加强在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继续在地区安全、区域合作和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和交流，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其文章中深入讨论了中美在很多议题上的观点。中国不愿看到一个被分化的国内政治拖累而无法履行其国际责任的美国，也不愿看到一个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困扰而退回孤立主义、不愿意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的美国。

最后，在扩大自身国际影响时，中国期待与美国合作。过去30多年里，中国是美国所建立和领导的这一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即便中国国力增长，它也只会试图在国际体系内增加其影响力，而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希望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其国家利益，并对体系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公平、公正、包容和更易于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就显得更加重要。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权利，因此，中国成为两大机构中的第三大股东国。鉴于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同意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同时向欧洲国家施压削减其投票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长期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野心面前，进一步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展望未来，当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多发言权，特别是需要以美国的影响力为代价时，中国希望美国会以开明而通融的方式回应。

塑造未来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未来无法预测，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上述种种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经济联系会继续成为促进稳定、合作的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加深两国的相互依赖，并使这种关系更为对称。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中国还可能在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的同时，成为美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国。有关贸易和投资的摩擦仍会不时发生，有时甚至会引发报复和反制措施，但是，这些应当得到控制。因为两国的经济联系太重要了，双方都不愿意破坏它。此外，近几年中我们看到，

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有效的分歧解决机制，并为中美两国提供了经济摩擦的缓冲区。总之两国互为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所带来的利益将帮助双边关系在稳定的轨道上发展。

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的协作同样会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冷战结束后的20年相比，在当前的十年中，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会进一步下降。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多极化将进一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回到19世纪大国竞争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主要行为体必须进行合作以强化全球治理，这事关每个人的利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也为了与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称谓相符，预计中国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合作的领域很多，但最突出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鲜的无核化以及半岛安全机制的建立）、美国撤军后阿富汗的稳定、伊朗核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谈判、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果等。稳健的中美关系能够促进两国在经济、安全、环保等领域的国家利益，培育两国的合作习惯，将伙伴关系实质化以解决共同的挑战，这是两国共同承诺要发展和强调的双边关系中的积极趋势。

从消极的角度讲，中美之间实力的转移是双边关系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近十年来，中美之间经济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在中国，这意味着外交上更多的自信和民众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于和美国之间旧有的或新生的矛盾，中国会更强硬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更不愿意妥协。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权力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冲突，这种宿命论令美国产生了焦虑感，这种焦虑可能使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作出过激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在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竞争的态势可能加强，并超过合作的态势，使中美关系出现更多的紧张。

如果这样，亚太地区将出现中美两国的战略对抗。亚太地区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这一地区也是

中国扩展海外利益最重要的平台。在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存在的美国希望保持其在该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同时确保该地区的发展不会损害它的地位。美国希望通过积极的外交行动、强大的军事存在以及同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来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则会尽全力反抗对它的包围，甚至遏制。中美之间的这种零和互动可能会分化该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使亚太地区重现地缘竞争。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中美关系则会呈现两分态势——经济上的合作与战略和安全上的竞争。沈大伟在序言中称这种状况为“竞合关系”。战略和安全上的竞争过于激烈，也会对两国的经济合作造成破坏。

尽管全球治理急需两国展开合作，但是在这一领域同样会出现摩擦。随着中国在推动世界事务的良治过程中愈发积极，它不会满足于参与，而是更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自己的提案被接受。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从国际体系的改革到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国重新给自己定位，并维护这种地位。正如近来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两个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场合所反映出来的那样，两国之间的分歧往往会导致激烈的外交摩擦。多边领域的竞争和摩擦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令气氛恶化并损害互信。

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尽管中国对于推广其发展模式持谨慎态度，但是一些美国人仍对中国模式的走俏感到担忧和沮丧。对一些美国人来说，所谓的“北京共识”打击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在美国，一些警告的声音认为，两种模式的竞争不仅掀起了两国软实力的竞争，也掀起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拉锯战。一旦将来这样的想法在中美政策层得势，那么双边关系将面临意识形态竞争的冷战。

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成绩

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双方所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关系是重要而复杂的”。复杂性体现在双方在各自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的诸多差异上。这些不同加上两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使中美关系同历史上任何一对大国关系都不相同。

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使两国关系更为独特。在任何国家间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分歧或重合，双方采取的战略、政策和策略也很重要。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双边关系中的议程设置，因此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大。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也在增强。未来，中国处理两国关系的方式对两国关系的走向所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重视从过去和历史的智慧中汲取经验。随着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中国决策圈和学界的主要忧虑在于如何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也就是历史上常见的、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过去十年中，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理论作为其大战略的首要概念框架。这包括以下要素：“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实现发展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也要实行对外开放；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同其他国家一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和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

对“和平发展”理论的阐述不仅是为了打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同样也为了凝聚国内共识，指导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中国相信，它能够走上一条同历史上其他大国所选择的以战争和冲突为特征

的道路截然不同的道路，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可以这样说，中国是现代历史中第一个对和平发展有着严肃全面思考，并希望避免过去暴力崛起的旧道路的大国。除了“和平发展”这一理论框架外，中国所追求的一些重要政策同样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挑战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上有所克制。中国从未挑战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威胁美国的国内稳定。中国对美国主要的国家安全顾虑也十分敏感。在20世纪90年代，核不扩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完善了其核导弹出口管控政策。“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又在削减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同美国展开了广泛的合作。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这不应仅仅被解释为是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同样也表明了中国对美国关键国家利益的尊重。

其次，中国不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正如中国在许多场合中所阐述的，中方“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合作，中国政府承诺要“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尊重地区外国家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中国明白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也明白美国担心中国会将东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像二战前日本所做的，或者美国在门罗主义之下在西半球所做的一样。为了缓解美国的忧虑，中国不仅在口头上一再向美国作出承诺，同时接受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中方的努力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同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冲动，降低了地区两极化的风险。

再次，中国无意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尽管美国的防务政策带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点，强调军事上的优势，但中国的防务政策则遵循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依赖可靠的威慑力。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的物质实力有限，也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尽管随着经济的发

展，中国承受得起更多的防务开支，但其军事实力不太能够赶超美国，即便是在美国因国防预算削减而收缩军事存在时也不大可能。在中美安全关系中，中国当下所进行的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对美国可靠的威慑力，而不是压倒美国的优势。尽管在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努力避免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但它仍需努力控制美国方面警惕的声音，避免走上美苏在冷战时期的老路。

最后，与苏联或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并不追求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发展模式。实际上如今的中国思想界是十分务实的，并不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而且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再热衷于输出意识形态来改变外部世界，而是更集中精力通过经济发展改变自身。尽管过去3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但中国在处理其发展经验时依旧十分低调。虽然国内有人讨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但中国政府仍十分谨慎地避免输出这一模式。中国的确认为它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当同自身国情相适应。中国缺乏输出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热情也有利于抑制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

从策略角度讲，中国的一些做法在稳定和促进双边关系上发挥了作用。例如，中国常常以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不拘泥于短期利益（这种态度缓解了因短期损失而产生的压力）。在与美国的接触中，中国把它看作正和游戏而非零和游戏，这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使之保持积极的势头。此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积极同美国建立各种对话机制，这不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增强互信，久而久之促进问题的解决或减少麻烦。

在除了台湾问题以外的很多分歧上，中国很少诉诸对抗性的措施——例如施加军事压力或进行制裁。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该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和盟友使美国具备了军事上的优势，美国也不时运用这些优势对中国施压。美国也经常利用两国在市场上不对称的依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或对它们采取反倾销措施。对中国而言，这些措施不仅

损害了两国的互信，也使冲突升级，对两国的整体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中国在战略、政策和策略上的长处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之外，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保证了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选举政策和利益集团而产生的政治周期，美国的对外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确定性，而对华政策也常常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受害者。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要用战略和长远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但是受制于政治周期，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着眼于策略性的短期利益。中国的国内政治在处理对美关系上越来越复杂，但这种影响是可控的，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波动也远远小于美国政治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波动。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愿意投入精力处理中美关系，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导人在国内面临的政策争论和政治风险要比美国领导人在党派纷争、利益集团横行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小得多。

中美关系未来的前景

理论上说，中美关系可能存在三种前景：伙伴、竞争者和敌人。让我们看看这三种“想象情境”如何上演。

作为伙伴，两国会以一种合作的模式打交道。在这种情境中，双方不仅彼此信任对方的战略意图，同时对于地区和全球走势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这为它们的合作提供了战略和概念框架以及实践基础。双方在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将促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发展出合作共存的模式，扩展共同利益，有效克服或处理分歧。在亚太地区，两国将携手塑造以中美协作为特征的新的地区秩序。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中国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美国则更愿意倾听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声音，从而形成一种大国分享责任和权利

的模式。

作为竞争者，两国之间将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并常常在地区或全球议题上持不同观点，也会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竞争会代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总体特征。在双边往来中，贸易、汇率和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摩擦，以及有关人权的政治纠纷将会不时出现。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美国会采取制衡中国的战略，以保持它在地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虽然它们可以相处，有时也能够进行协商与合作，但双方在影响力和利益上的竞争会使应对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两国在原则和方式上往往意见相左。它们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作为敌人，中国和美国相互视对方为自己核心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它们在国际和全球问题上不仅看法不一，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与竞争关系——两国虽然试图获得更多利益，但是在经过艰苦谈判之后仍能够展开合作——的情况不同，在敌对情况下，两国都会阻挠对方获得利益，合作几无可能。在双边关系上，经济关系会迅速降温，贸易战和制裁频现，激烈的政治纠纷也会增加。在亚太地区，双方都大打地缘政治牌，积极争取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以打造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地区秩序的分化将不可避免。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竞争和敌对将压倒合作与协商，由于种种纠纷，促进全球治理的努力也会陷入僵局。

事实上，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最有可能是合作、竞争和有限冲突的混合体。它们既是伙伴同时又是竞争者，这种关系甚至会在同一议题上有所表现。但是，它们绝不会是敌人。这就是沈大为在其文章中所说的“竞争性共存”。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也赞同这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联系将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支柱，即便在贸易、投资、汇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会有更多的摩擦。中国和美国在地区及国际和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与协商将是另一大支柱。在人权、

军事发展和军事活动以及处理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方法等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会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加剧，但这不会给双边关系造成太大障碍。对两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保证双方之间的合作多于竞争，同时减少或避免冲突发生的风险。

认识到这一点，两国就不应该对双边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脱轨状况视而不见。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萧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将不仅会加速缩小两国的实力差距，还会进一步打击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使其对中国的怨恨越来越大，这正是目前表现出来的。美国持续抨击中国会使双边关系气氛恶化，削弱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就不仅将阻碍中美经济关系的拓展，同样也会影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从而破坏中美关系中的两大支柱。

其他领域也会出现问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朝鲜在金正日突然去世、不成熟的金正恩紧急接班后进入不确定期，中美在半岛局势出现意外时或许会出现正面冲突。中国希望保持半岛局势稳定，而美国则可能利用意外事件推动朝鲜政权倒台。在南海争端中，菲律宾和越南都试图利用美国的支持对抗中国，而美国对于卷入南海问题也越来越有兴趣。一旦菲律宾和越南为了拉美国下水而制造危机甚至同中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也可能随之爆发冲突。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模式还将呈现其他的特点。首先，日益自信的中国会在议程设置中更加积极，也会在讨价还价中更加强硬。因此，美国应该以更平等互利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第二，影响两国关系的国内因素会增多，比如中国的媒体和公众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这将令管理两国关系更为复杂。第三，相比从前，“第三方因素”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将进一步扩展双边议程，同时要求建立新的机制来管理双边往来。

结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在每个十年里都曾遇到不同的挑战。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挑战是如何在后冷战时代建立双边关系的新模式。经济合作成为两国交往中的重点，美国避免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中国也寻求参与国际体系。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两国关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中国高速发展和全球性议题大爆炸的背景下管理双边关系。在保持高速发展的经济联系的同时，美国缓解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忧虑，而中国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前这个十年的挑战是，如何在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全球治理需求增长的情况下管理两国关系。随着权力的平衡迅速转移，中国和美国需要建立高度的战略互信并使经济摩擦得到控制，这样才能保证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另一方面，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挑战，中美应建立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有效解决挑战，并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全球治理。

第16章

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

中美关系的未来经常被描述为互不相容的状态。中国和美国将成为“朋友”还是“敌人、伙伴或对手”？它们会成为亲密的合作者，共同解决双方越来越多地拥有共同利益的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吗？它们会成为经济和战略上的竞争者，即便不发生直接对抗，也会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吗？抑或双方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如此之大而让两国关系呈现激烈的对抗，甚至引发公开的冲突吗？

虽然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冲突不可避免，但也有不少人预计，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将促使这两个国家彼此合作。不管有多么勉强，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呈现合作、竞争和冲突共存的特点，这三种情况之间的平衡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定义和优先考量、寻求共同目标并共同推进这些目标的能力以及处理利益和价值观分歧的水平。

为本章内容贡献力量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种对中美关系未来更为平衡的预估——以合作、竞争和冲突共存为特点——很可能比另外两种经常主导中美关系讨论的设想（冲突或伙伴）更为准确。不过，这种预估仍有待进一步发展。这三种可能的结果——合作、竞争和冲突——都包含更多的可能性，需要加以更仔细的确认和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地预测中美关系将呈现竞争的态势，而是要探索这种竞争可能具有的性质：双方可能明显出现竞争的层面、双方竞争的方式以及竞争可能给两国整体关系带来的后果。类似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合作或对抗的情况。

我在本章指出，不同形式的合作、竞争和对抗会对中美关系的总体情况产生不同的影响。进一步看，这一总体情况将会塑造这三种不同的关系，甚至可能在它们之间取得平衡。原因在于，以合作为主线、有序竞争的关系很可能将增加信任感，减少不和谐的声音，相反，勉强合作、无序竞争、在彼此眼中都被视为不公平的关系将更有可能导致互不信任，甚至引发冲突。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或许并不是竞争、冲突及合作的简单混合，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会随时间而改变，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中不同方面的问题。

竞争

中美两国在许多领域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从奥运会上的金牌争夺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但问题不仅在于这两个国家是否在展开竞争，而更在于它们竞争的形式：竞争的领域、竞争被双方都接受的规则（默认的或制度化的）有效管理的程度以及竞争所产生的结果是否都被双方认为是合理的。对中美两国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两国关系越来越趋于竞争，还在于其中的一方或双方认为它们所竞争的领域代价高昂、不够公平且风险巨大——这种观点会导致互不信任，最终引发更为激烈的竞争关系。

评估一种竞争关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确认竞争发生的领域。例如，在经济领域，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之间，平等、公开的竞争是决定一个市场是否运行良好的特征，这种机制有助于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供应并降低价格。因此，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都制定了政策来促进竞争、防止垄断等其他有碍竞争的商业行为。与此类似，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竞争所能给贸易和跨国投资带来的好处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而竞争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得到促进。简言之，在经济领域，竞争是受欢迎的，而不是想方设法规避的，即便一些行为体可能从竞争中得到的好处比别人多。

竞争同样被认为对于民主政治制度必不可少且大有帮助。政治候选人参与公共职位的竞选；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竞争成员资格和资金支持；政策和意识形态则争取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事实上，“观点的自由市场”产生了一个有关竞争的隐喻：正如市场竞争有利于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领域的竞争有利于社会。

相反，在其他领域，竞争对参与竞争的各方或整个体系可能就不那么积极。在国际安全领域，竞争可能引发烧钱的军备竞赛并导致著名的“安全困境”：一个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努力会引发其他感到威胁的各方的应对措施，最终增加所有各方的不安全感，甚至诱发先发制人的行动或令已经开始的对抗升级。在安全领域，竞争可能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

竞争关系变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它们受规则所限制的程度。规则可以限制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促进更有益的结果，并为竞争参与者所接受和遵守。阿纳托·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关于竞争关系经典的三分法指出，“游戏”和“辩论”都由限制参与者可使用的方法的规则所指导，因此，国内经济竞争可被禁止虚假广告、抑制垄断、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规定来管理。国际竞争同样为一系列越来越多的规则所推动，比如减少商品、服务和投资流动的障碍，禁止倾销（凭借补贴在对象国以低于当地市场价格的售价出售进口商品的行为）等

不公平行为等。许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都将这样的措施写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谈判中也都涉及相关内容，并在该组织内部建立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实行这些规定时出现的分歧。国内政治竞选同样有旨在推动“公平”竞争的竞选法来管理。即便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竞争也可能被一些广为接受的对于“公平游戏”的一般理解约束。

即便是“格斗”——拉波波特所称的第三种也是最激烈的竞争关系——也会受到类似的约束。几乎所有涉及身体接触的体育项目（摔跤、足球、拳击、橄榄球等）都设立了旨在减少身体损伤风险的规则。战争法的发展、军控制度的创建以及互信建立措施的发展同样可被视为旨在减少国际安全领域竞争关系代价和风险的努力。

最后，竞争关系变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所有竞争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在相对得或失的问题上——赢家赢了多少、输家输了多少，结果是零和的、负和的还是正和的——却经常有重大差别。在竞争各方对结果是否合理、是否公正的问题上同样也会有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双方竞争的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具风险、代价更高。此外，管理双方竞争关系的机制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而且双方的一些观察人士都认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衡与不公平的。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一段时间里，鉴于双方不同的国情和发展水平，中国和美国都将彼此视为高度互补的经济体。当时，有关中美经济关系最熟悉的一种说法是，世界最大发达经济体与世界最大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这种关系能够互利互惠，互补性远远

超过竞争性。随着冷战渐渐退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经常说，虽然来自苏联的共同安全威胁让中美走到了一起，但让这两个互补经济体保持紧密关系的将是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

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尼克松作出上述预测时，中美经济关系却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性。随着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进入了不同的经济领域，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渐减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越来越多，并出现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换句话说，中国进入了曾被视为美国专属的经济生产领域。伴随这种情况的出现，两国经济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少，竞争气氛逐渐增加。中美两国企业纷纷在国内外市场争夺份额，竞争逐渐扩大至两国政府都视为具有高度战略性的领域，例如汽车、超级计算机、商用飞机、太阳能电池板等。中美两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众多领域争相创造新的研究成果，例如超级计算机、生物技术、载人航天等。两国企业也在争购合同（同时也与第三方国家的企业），欲在全球各地开发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两国的金融中心——纽约和上海——也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展开竞争，同时两个经济体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竞争曾经，也将继续带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预见的那种积极结果，例如，中国经济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同时缓解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通胀压力，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竞争还为生产中国企业所需设备、材料和部件的外国企业拓宽了市场或开拓了新市场。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新发明、新创造最终也丰富了整个世界的知识储备。

然而，中美两国观察人士却日渐抱怨，两国经济竞争不仅在加剧，而且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缺乏足够的管理。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歧视性政策的受害者，尤其是美方认为中国欲在美国进行的投资项目涉及先进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的占有而遭到严格的审查或阻碍。北京还抱怨美国不断限制对华先进技术出口，而且中国因制定反倾销法规而迟迟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反过来，针对中国的抱怨也

并不少。起初是在美国，如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欧盟和日本。它们称，中国企业从政府的一系列规定中获益，比如不鼓励购买外国产品和进口技术、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关系中国经济战略的部门以及推动一批强大的中国品牌帮助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外国同行展开有效竞争。还有人指责中国企业利用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币值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一些外国批评人士称，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展开不公平竞争，以期获得海外能源和自然资源，手段之一是向他国提供大规模的无条件援助项目，从而获得对该国政府的影响力，最终拿到开发和生产合同，中国企业不仅为了通过在公开的国际市场上销售这些资源而谋取利润，更试图“独享”这些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曾试图建立机制来管理双方间的经济竞争，缓解彼此的抱怨。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被要求接受一系列开放市场的措施和旨在确保公平跨国竞争的规定。世界贸易组织也建立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涉嫌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此外，中美还举行了一系列双边谈判和对话来解决双方竞争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但美国日益认为，中国没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与自己进行的后续谈判中有关提高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此外，中美竞争中的一些领域仍缺乏管理，尤其缺乏针对直接投资的双边投资协议。

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坚称，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能产生可使双方都受益的“双赢”结果，至少总体上是这样。他们称，尽管各方可能有得有失，但中美两个经济体都能从双边经济关系中获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道理，但美国日益认为，中国获得的相对利益更多，它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市场份额及其在主要经济领域中的相对优势。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这种不公平竞争的观点令中美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导致了双方间的不信任，从而有可能蔓延至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

除了经济竞争，中美之间也存在规则竞争。这有时被描述为两种相对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即美国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倡导的“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主张快速走向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北京共识”则提倡国家对于管理经济发挥持续的强大作用，其中包括在战略领域里相当程度的国有比例，并逐步推动试验性的经济改革。

虽然近年来“北京共识”吸引了相当大的关注，但经常提及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竞争关系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一些外国观察人士。中国分析人士，尤其是官方发言人，更趋向于否认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而是声称，中国的发展经验只不过表明，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国际环境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逐步推动试验性的经济改革。此外，在中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与“华盛顿共识”有所不同的问题上，中国分析人士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承认，中国近来的发展经验体现了“华盛顿共识”中的许多主张，包括融入全球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对经济生活中的私人和外国成分更大的接受程度。此外，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些专业建议也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事实上，“中国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模式，不如说是“反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普遍适用性的反对，而非表达清晰、普遍适用的所谓“北京共识”。如此看来，中美两种发展模式之间其实并未如人们设想的存在那么激烈的竞争。当然，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明显的竞争的，比如美国认为“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自由的改革发展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则坚持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此外，中美之间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可能更加明显，尤其是两国在管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方面存在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然赞同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其章节中所描述的“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这是一种以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领土完整等长期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美国采取的是艾肯伯里所称的“自由”的国际政治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在时间上较近的自主概念可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推动人权和其他人道主义考量的行为或许可以成为干预他国事务（包括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这些自由准则还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系统的扩散，即便国家主权、自我防卫权这些历史更久远的原则或许可以为这些行为提供正当理由。虽然北京对这些新的自由准则持保留态度，但可以说，美国及其盟友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挑战有时比中国对艾肯伯里所称的“自由秩序建设体系”的挑战更为有效，至少目前是这样。

相应地，中美之间在管理外部援助的准则方面同样看法不一。美国更倾向于认为，包括遵守善治和人权在内的这些条件都可以通过官方的发展援助项目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而北京至少在目前更愿意对外国提供无条件的援助——或者，至少不会以尊重人权和实施善治为条件。北京所开出的条件，不管是含蓄提出还是开门见山，更多的是与受助国在一些重大涉华问题上的立场有关，比如与台湾的关系，对西藏问题的看法等，而不是美国十分关切的那些问题。

这些彼此不同的模式和准则——“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自由秩序建设体系”以及对外援助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限制了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能力，因为这些分歧有时会导致双方对同一问题支持不同的解决之道。此外，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试图寻求其他国家来支持各自的观点的话，这些分歧就可能还会引发双方的进一步竞争。

再往前看，中美可能还会开始在其他文化领域展开竞争，比如，在发展国家“软实力”方面的竞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十分渴望找到他们认为专属于中国的价值观，至少要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区别开来。中国近来强调的“和谐”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与美国所倡导的

文化多元性（即便可能会以社会不稳定为代价，这也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同样，一些中国社会学者也期望在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创建中国自己的“学派”。这些所谓“中国学派”的特征仍有待确定，但一些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既然科学具有普遍性，那么试图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创建本国“学派”的做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方法论或结论上的任何重大差异都不大可能以国界来区分。对中国来说，比较现实的或许是打造可与外国同行竞争的一流研究机构 and 高等学府，吸引在海外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籍人才。中国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模式（至少在形式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式的——大力招募世界级的教师、推动前沿研究以及效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制度化的评级体系来衡量成功。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学术环境对许多一流学者的吸引力不够大，过于强调政治教条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及其他国家）参与该领域竞争的决心。打造世界级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努力与上文所述的科技领域的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美两国不仅将彼此视为经济和规则上的竞争者，而且认为双方同样存在战略上的竞争，这是最大的危险。不幸的是，两国军队已开始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彼此，都在部署武器系统，设计战术来应对对方，尤其是针对台湾问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此外，两国间的竞争正日益聚焦于南海，中国与美国的一些盟友就一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产生了纠纷。为了推进这两方面的领土主权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制定阻止美国进入西太平洋的战略（如反舰弹道导弹），而美国则在努力保持进入的能力（如“空海战”理念）。

这种竞争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并导致沉重的经济代价。在中国近海执行侦察和巡逻任务的美军与试图将他们赶出中国领海的中国军队发

生冲突的事件已有多起。在高度紧张时期，这样的事故搞不好会升级为公开的冲突。这与两国间另一个规则分歧有关，即双方对中国是否有权限制或禁止外国海军舰船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各执一词。中国认为它有这样的权利，美国则不以为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是此类事件中最严重但并非唯一的一起。这种事件升级的风险并不小，并有可能增加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

还有一种日渐盛行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在亚洲所提出的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倡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北京“与邻为善”的政策以及对美国在该地区拉帮结派、部署军事力量的指责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在企图削弱美国当前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相反，美国在撤出伊拉克后的“重返亚洲”，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菲律宾及越南进一步发展安全关系的努力，将中国排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外的行为以及及与缅甸这种昔日的下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举动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在加大对中国的包围和遏制。

为了管理这种不断抬头的战略竞争，中美两国展开了军事交流，以增加透明度、建立互信，并举行了高层战略对话以增进彼此对对方利益和意图的理解，此外，还商讨了一系列军控措施来制约两国对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部署。但目前为止，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双方达成的实质性协议少之又少，中国并未在交流中表现出多大的透明度，军事对话不时中断，尤其是中国为了表达对邻国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台军售）等紧张局势的不满经常这样做。缓和两国战略竞争的努力失败增加了这种竞争带来重大风险和造成沉重代价的危险。同经济领域的情况一样，在战略竞争中，有可能减少这种危险的机制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即便是在战略领域，并未削弱两国合作推

动共同目标的可能性。事实上，两国在一系列广泛事务上拥有共同或重叠的利益，因此也在努力展开合作，比如制衡俄罗斯的崛起、鼓励朝鲜去核化、防止伊朗拥核、确保世界经济繁荣、打击非洲海岸的海盗活动、支持中亚和西南亚的反恐行动、扼制台湾独立、促进能源供应安全、开发新能源以及控制气候变化等。

中美在保持全球经济活力方面的共同利益体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双方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两国都支持在亚太地区构建地区安全 and 经济架构。毫无疑问，如果其他威胁双方利益的领域（如非典、禽流感）出现危机，它们同样会合作。两国还同意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提高能源安全、开发替代能源、推动能源的高效利用等。

不过，同竞争的情况一样，问题不只在于两国是否存在合作，更在于合作的形式、结果以及双方对结果的看法。可以预见的是，中美合作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代价和好处的分配问题。此外，两国在合作方式上的分歧也十分严重。例如，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将给两国都带来损失和风险的问题，但它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的责任分配问题上却各执一词，甚至在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对此制定法律约束方面也难以达成一致。同样，华盛顿和北京也许都同意在亚洲打造更强健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但它们在这些组织的成员和议程方面又意见相左。它们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但在对朝鲜施加严厉制裁的问题上又态度不一。

这些责任分配上的分歧更多地体现了中美关系的竞争层面，而非共同利益。两国在气候变化责任分配上的分歧与它们的深层经济竞争有关，正如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与它们在亚洲的战略竞争以及对人权问题的不同态度有关。这些分歧令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成一致，从而令整体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代价和好处的分配问题只是可能令两国关系复杂的一个因素，另

一个是合作的质量。光谱的一端或许可以被称作“被动同意”，一方对另一方希望采取的行动表示同意，但也有可能说反对就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的许多投票中，尤其是涉及对第三国实施制裁或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国所能得到的中国方面的“合作”正是中国所希望的弃权，而非动用否决权。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或许可以淡化商议之中的决议，将其强烈反对的一些内容取消，以此作为点头的条件。有时，中国弃权只是因为它不愿成为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投否决票的国家。但确保这种适度的合作对华盛顿而言是重要的，因为这能使美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它所希望的制裁或军事行动。

更紧密的合作形式有赖于两国对共同利益的认可，不管是默认还是公开承认，然后再采取独立行动来推动这些目标，而不必非得紧密携手。真正的合作能走得更远，即不只是认可共同利益和采取单独行动，更要联手制定和实施相似或协调的措施来实现这些共同目标，并承诺进行持续合作直到这些目标都已达到。强弱两种合作形式之间的差别与同步努力和并行努力或是正式盟友和松散的“统一立场”之间的差异相类似。相比后一种形式，前者中各方的自主权和行动空间牺牲的更多，而在后者中，各方都作出了更强的承诺，并接受实现合作所需承担的更大制约。

多年来，许多美国人认为，即便中国与美国在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展开了合作，但合作的方式往往是相对被动或疏远的。在某些领域，中国或许会同意美方的倡议，但不会动用自身资源来表示支持，或许还会对这些倡议的明智性和合理性持保留态度。在另一些领域，中国又可能通过更积极地采取和实施自己的政策来实现合作，推进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但是，在制订共同对策方面，北京向来不公开表现出积极与华盛顿合作的态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想被国内外人士认为自己与美国走得过近，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自主权的需要。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强调的，这一点在两国共同反对苏联在亚洲的扩张

时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两国对于反对苏联霸权拥有共同的利益，但并未像美国与其北约盟友一样公开表现得那么亲密。基辛格讲述了1971年他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内容大概是“美国和中国如何进行全球合作？毛泽东建议，各方都明确提出自己的国家利益概念，（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合作”。

毛泽东称此为“手拉手”，但他的回答明显暗示着，事实上，两国的“合作”是一种有距离的“合作”。基辛格对中美就共同反对苏联霸权所进行的交流是这么总结的：

在合作谈判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和其他中方领导人都坚持维护中国行动自由和自尊的立场。他们不需要保护，必要时中国有能力独自应对所有可预见的危机。他们使用了共同安全的说法，但又保留了指明其内容的权利。

1971年以来，形势明显有了很大改变，中国不再有能力“独自应对所有可预见的危机”。但中国在与美国合作上更倾向秘而不宣而非大方公开的做法依然在许多方面有所体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希望采取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或许它想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发挥首尔和东京都做不到的调解作用。北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认为，与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高层磋商本身就是一种合作形式，即便结果更多的是对分歧的相互理解，而非达成旨在推进共同目标的协议。中国采取的是名义上的被动合作，而美国更希望看到的是更积极的态度，正是这种差距导致美国许多观察人士对中美合作感到不满，甚至加深了两国间的不信任。

对抗关系

中美关系第三种可能的结果是不合与冲突，有人称之为“新冷

战”，甚至是公开的军事对抗。对抗关系意味着，两国的目标存在严重分歧，超越了共同利益，因此它们可能动用各种施压手段——从外交倡议到经济制裁，再到威胁使用武力甚至真的动用武力——以强迫另一方妥协。这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竞争关系有很大不同。竞争关系并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因为竞争可能给其所存在的领域带来很大的好处，比如经济竞争可能令其所存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对卷入竞争的行为体而言，竞争甚至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们能从竞争中获益，只不过程度有别。相反，对抗关系更容易成为零和博弈，结果通常为一方获胜一方失败。更甚者还会发展成负和博弈，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尽管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获益。

对抗对中美两国来说都不陌生。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经历过多段对抗期，其中不乏武装对抗。其中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几次台海危机，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美国对华制裁、1999年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在这些对抗中，持续时间最长、被中国视为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是台湾问题。华盛顿希望看到台湾有一个和平的未来，而北京则坚持保留以武力实现统一的权利。不过，1989年以来，人权问题成为两国对抗的第二大导火索，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和贸易问题也可能成为诱因。

然而，同看待合作一样，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才能发现，因利益分歧所导致的各种关系并不总是类似的，而是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上文对各种合作形式所作的区分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对分歧、对抗甚至公开冲突这些对抗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加以区分。

分歧的情况意味着，中美公开承认两国存在利益分歧，但不至于导致对抗行为，因而不大会破坏两国整体关系。这种行为方式经常被中国描述为“有所保留的分歧”，美国则称为“和而不同”。例如，美国不断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在国内事务上倒退。但尽管美国仍会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发表这样的言论，它已不再对中国施加严厉的制裁。中国

经常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是冷战遗风，但并未怂恿相关国家撤销美军基地（也未要求美国政府将它们关闭）。受到谴责的一方或许会对这些公开表达的分歧感到恼火，但不至于马上给整体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国际关系中，对抗关系最危险、最强烈的形式是动用武力或施加武力威胁。对此，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台湾问题（程度较低）以及在越南的代理人战争中已有过体验。如果朝鲜半岛或台海局势再度失控，再次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公认的台海局势最危险的两种情况是，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大陆报以武器回应，或者大陆单方面动用武器迫使台湾接受统一。不管发生哪种情况，美国都必须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美国对台湾安全所作的承诺。倘若美国决定这么做，中美将极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此外，虽然这种情况人们谈论的较少，但朝鲜半岛局势还是有可能再次成为中美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最令人担心的可能结果是平壤政权的垮台，然后各种外国势力为推动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竞争性干预，不管是否能建立一个友好的新政府，确保朝鲜核武器和核裂变材料的安全，或者只是单纯的恢复秩序。这种竞争性合作并不一定会一开始就让美国也参与其中，但如果韩国在这种情况下越过非军事区，受到跨过鸭绿江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抑或中国在未事先与美国和韩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朝鲜实施干预，那么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其他对抗形势同样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可能包括中国与美国在南海或东海的某个盟友之间出现危机，或是中美军队之间发生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那样的事件。这些情况升级到足以引发中美军队爆发真正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并不能完全排除。

令人格外担心的是，管理这些对抗情形的机制还不够成熟。鲜有证据显示，两国间的各种安全对话曾商讨过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两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中美两国政府还远未能够商讨一旦平壤政权垮台

它们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使我们无法排除出现上文所述的那种竞争性干预的可能性。中美似乎也未曾认真讨论过如何应对台湾海峡可能再次出现的危机。虽然两国政府间建立了热线，但很少有人相信两国高层能够有效利用这一通信渠道来应对危机。目前为止，令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降低的更多的是各自所明确表示的“红线”，而非当红线被越过时能够缓和局势的机制。红线有一定作用，但无法替代危机发生时有效沟通的作用。

结论

本章认为，中美双方在近几十年中都觉得两国关系在经济、规则和安全领域均呈现更多的竞争态势。此外，双方都日益认为，两国经济关系不公平地倾向另一方。尽管双方作了大量努力来制定规则以管理这种竞争关系——不论是通过双边谈判还是让中国加入管理竞争的国际体系中——但不论是对自身规则还是另一方对规则的信守程度，双方都不满意。在战略领域，竞争管理机制以及防止利益分歧升级为对抗或冲突的机制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尽管两国提出做合作性“伙伴”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对话，但中国对自主行动的偏爱而不是与华盛顿进行公开合作，以及对“干涉”他国内政或对美国此类行为给予支持的犹豫态度导致美国国内出现大量不满情绪。简言之，虽然中美进行了管理竞争、减少不合及促进合作的努力，但最终结果还是让中美都认为两国关系本质上更趋向竞争，彼此间由此产生深深的不信任。

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了双方间的不信任，但未能想出有效的手段加以缓解。他们没能解决彼此存在重大分歧的那些问题。敏感问题的透明度依然缺乏，而且由于缺少各种措施，两国对对方所作的承诺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未来几年，在竞争、合作或对抗这几种广义上的交流形式中，哪

个会相对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主流形式？如果上述形式都不是主流，那么这三种形式混合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似乎不大可能，至少中短期内如此。双方在价值观、政治制度、利益、发展水平以及对现有国际制度的看法上所存在的分歧如此之深，很难让它们在所有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或是在追逐共同利益的时候找到彼此都认可的代价和利益分配比例。只有广泛而强烈的共同利益才可能促使合作成为两国间的主流关系，比如大范围流行病的爆发、又一次金融危机、针对两国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等。但即便是出现这样的共同利益，中美也未必能在责任分配方面取得一致。

幸运的是，中美之间出现本质性对抗的可能性也不大，尤其是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两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性使双方关系具有相对弹性，关系严重破裂的代价对它们来说都是高昂的。同样重要的是，军事冲突的代价——尤其考虑到两国都是核大国——将会对军事冲突产生有力的遏制。中美或许无法被迫合作，但换句话说，它们可能会被迫避免对抗。此外，目前看来，上面提到的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性很低，同样，大陆以武力强迫台湾统一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一种互相遏制的机制得以防止一方越过另一方的“红线”。另一个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事件——平壤政权的垮台——可能性略高一些，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红线也不那么清晰，但两国迅速沟通以避免公开冲突的能力虽有待加强，但估计也够勉强应付，除非在此之前两国关系就已进一步恶化。互相遏制对防止两国陷入军事对抗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上面的分析正确的话，则中美关系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和的混合状态，即沈大伟在序言中所称的“竞合”关系。但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仍要由双方的行为所决定。如果中美能做到以下几点，两国关系的天平将会向合作一方倾斜：

确认并认可更多的共同利益。

在追寻这些共同利益时将合作交流的形式从相对被动（缺乏成效的“对话”、“搁置分歧”、对彼此倡议不冷不热）转变为更积极、更公开和更富成效的合作。

确保两国关系的竞争层面受到双方都认为公平的规则和制度的管理，每一方都要遵守这些规则和制度，并认可对方的表现。

将两国竞争关系中的战略因素降至最低，尤其是在亚洲。在军事采购和军事部署方面，单方面克制或谈判加以限制尤为重要。

预防可能威胁两国关系稳定的争议问题。

在管理两国关系不和谐因素的问题上，明确确认对方不应逾越的红线，并坚持谨慎行事的原则以降低对方越过红线的可能性。

在坦率表达分歧的同时双方都作出合理让步，防止出现制裁与反制裁的升级态势。

简言之，中美关系将呈现竞争与合作共存的这一熟悉形式并没有问题，但还不够完整。有些竞争或许激烈，但却是健康而有建设性的，有些合作却可能招来怨恨或导致紧张，因而会令人失望。两国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一定会存在分歧，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对抗。中美关系将会被两国高层间的缺乏互信影响，尤其是在竞争与不和最强烈的问题上。

中美之间并非注定要出现对抗关系，前提是它们能学会如何管理竞争、增强合作、减少利益分歧，这是摆在两国面前共同的责任和挑

战。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两国间的高度依赖性应该能增强双边关系的复原力。鉴于这些进展，用“脆弱”来描述中美关系已不再合适。但又考虑到双方间的不信任、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以及国际体系规范方面的分歧，中美关系依然易遭受谁也无能力控制或预防的重创。预见、预防及管理这些重创将是对两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美关系复原力的考验。

编者与作者简介

编者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及中国政策项目主任。他同时还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在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任教前，他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国政治学教授，并担任《中国季刊》编辑。沈大伟教授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军事与安全及亚洲国际关系的著作。其近著有《中国走向全球》、《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挑战的图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权力转移：中国及亚洲的新动态》、《中国皇家艺术珍品的冒险旅程》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沈大伟教授经常在国际媒体担任中国和亚洲问题评论员，并在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此外还担任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基金会和私营企业的顾问。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担任访问学者或教授，如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

作者

罗斯玛丽·福特 (Rosemary Foot) 是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及高级研究员，主要负责研究生的国际关系课程。她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贝尔弗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福特教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她曾撰写或编写了大量著作，如《权力的实施：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超越边界的权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权问题的抗争》、《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及《中国重要吗？》等。其最新著作是与安德鲁·沃尔特 (Andrew Walter) 合著的《中国、美国和全球秩序》。福特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如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亚洲地区机制等。

傅瑞伟 (Charles W. Freeman III) 是百事可乐公司亚洲、中东及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同时还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非常驻高级顾问。傅瑞伟是第二代“中国通”，人生中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亚洲和美国生活工作。在政府供职期间，他曾担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主要负责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其间，他曾担任对话贸易首席谈判代表，在制订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整体贸易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了美国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全球贸易框架中所做的各种努力。傅瑞伟现为华盛顿全球战略咨询公司麦克拉蒂公司高级顾问，同时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和哈丁—勒夫纳新兴市场基金集团董事会成员。傅瑞伟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校时曾任《法律评论》编辑，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在塔夫茨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经济。此外，他曾赴上海复旦大学研究中国经济政策，并在台北的中华语文研习所学习汉语。

葛来仪 (Bonnie S. Glaser)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问题，她同时也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高级研究员和美国政府东亚事务顾

问。2003年到2008年中期，她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担任高级研究员。葛来仪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对外和安全政策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内容涉及中美关系、两岸关系、智库和中国军方在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对美国实力的评估、中韩关系以及中国对导弹防御和亚洲多边安全的看法等。她的文章发表在大量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如《华盛顿季刊》、《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国际安全》、《共产主义问题》、《当代东南亚》、《美国外交政策利益》、《远东经济评论》、《韩国防务分析》、《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各种有关亚洲安全的文章汇编。葛来仪自太平洋论坛网络刊物《比较联系》1999年创立以来便担任固定供稿人。她目前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及国际战略研究院成员。她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获得硕士学位。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担任克里斯·托弗布朗国际政治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国际关系、安全研究及中国政治。其著作主要有《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21世纪的遏制与安全：中国、英国、法国及核革命的长期影响》、《从得势者到权力政治的平衡：中国政治与结构性限制》。此外，他还在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如《国际安全》、《国际组织》、《战略研究期刊》、《中国季刊》、《亚洲研究》、《比较政治学》等。他还是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郝雨凡（Yufan Hao）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曾在美国科尔盖克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研究领域主要有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决策、中国政治。他曾任哈佛大学贝尔弗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麦克阿瑟研究员、韩国东亚研究院卢斯研究员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他在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其著作主要有：《澳门与中美关系》、《中国的边境政策与国际影响》、《中美关系：前方的挑战》、《中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外交、全球化及下一个世界大国》、《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回顾与展望》以及《中国外交决策》。

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弗兰克·巴腾领导力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及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此外，他还是亚洲基金会副主席、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理事会成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委员会成员。他曾在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任教，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担任高级研究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担任院长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并担任欧亚集团研究与分析部门主任。其研究领域为亚洲问题，主要著作有：《印中关系：美国需要知道的》、《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中美关系：1945—1955》、《中国的二次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及《组织中国：官僚问题》。哈丁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及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同时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而且是韩国庆熙大学的国际杰出学者。其著作《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2002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评为年度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最佳著作，获得施罗德·杰维斯奖。艾肯伯里的著作主要有：《自由秩序与帝国抱负：美国的权力与国际秩序》、《西方的终结？大西洋秩序中的危机与变化》、《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21世纪的威尔逊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艾肯伯里教授是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联合主任，并与安妮—玛丽·斯劳特合著《依法打造一个自由世界》。此外，他还于2003

—2004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团成员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美欧关系特别小组成员。

劳泰瑞（Terry Lautz）是美国锡拉丘兹大学访问教授，2010年曾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公共政策访问学者。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卢斯基金会副主席，领导了亚洲项目和亨利·卢斯项目。他现在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顾问之一。他曾担任岭南基金会的受托人和耶鲁—中国协会董事会成员。劳泰瑞是一名越战老兵，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求学。其最近的研究内容与相关著作主要涉及中美对彼此的看法、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美国在华传教士和士兵约翰·伯奇的书。

瑞黎明（Dawn Murphy）是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冷战后中国与中东和次撒哈拉非洲的关系。撰写论文期间，她曾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实地研究，并在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她曾在南非斯泰伦波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研究。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她曾在美国和中国的多个私人机构任职。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任雪丽（Shelley Rigger）是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及政治学系主任。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公共与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政府管理博士学位。她于2005年在台湾政治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2006年在复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任雪丽出版了两本有关台湾内政的著作：《台湾政治：为民主邮票》和《从反对到权力：台湾民进党》。其他著作还有《台湾为什么重要：小岛、全球发电站》、《抬头的台湾民族主义：世代、政治和台湾的民族主义》。她还发表了众多有关台湾内政、台湾的民族身份等两岸关系的文章。其最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两岸经济互动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影响。

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 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此前，他曾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担任亚洲研究访问教授，在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兼任任教长达40年。萨特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当代东亚和太平洋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文章和政府报告。其近著主要有《中国的对外关系：冷战以来的权力与政策》、《中国外交政策历史词典》、《美中关系：危险的过去与务实的现在》、《美国在亚洲》、《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前景与危险》。萨特还曾在政界任职，先后供职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要从事与亚太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工作。他曾多年担任美国国会研究处外事与国防部门的高级专家顾问。他还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和亚太事务情报官员，并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担任中国事务负责人。

阿什利·特利斯 (Ashley J. Tellis) 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合伙人，为国际安全与防务及亚洲战略问题专家。他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政治事务高级顾问，密切参与了美印民用核协议谈判，并曾担任美国驻印大使的高级顾问。他还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战略规划高级顾问和西南亚事务高级顾问。在供职于政府之前，特利斯在美国兰德公司担任高级政策分析师，并在兰德研究生院担任政策分析教授。其著作有《印度的核姿态》，并与他人合著了《中国大战略：过去、现在与未来》。他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战略亚洲项目的研究顾问，并在该研究所近来编撰的8本书中担任编辑，其中包括《战略亚洲2011—2012：亚洲应对崛起中大国——中国和印度》。除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兰德公司出版的大量著作之外，特利斯还在众多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唐耐心 (Nancy Bernkopf Tucker)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担任历史学教授。她还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

高级学者。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外交史学家，其研究方向主要为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尤其是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关系。她曾在多个机构供职，如美国国务院顾问委员会、外交研究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年，她被授予美国国家情报成就奖。其著作主要有：《中国威胁：20世纪50年代的记忆、迷思与现实》、《海峡对话：美台关系与中国危机》、《不确定的友谊：台湾、香港与美国》。她还担任《林登·约翰逊面对的世界》和《危险的海峡》两本书的编者，并给《中国秘密》一书做注并担任该书编者。此外，她还在众多杂志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如《外交》、《美国历史》、《美国历史评论》、《政治学季刊》、《外交史》、《华盛顿季刊》等。

杜孟新（Christopher P. Twomey）是美国加州蒙特利海军研究生院的国家安全问题副教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曾担任当代冲突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及美国国务院在亚洲外交事务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及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顾问。其著作有《军事视角：中美关系中的学说差异与遏制失败》。此外，他还是《中美战略核问题》一书的编者。杜孟新在众多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如《亚洲研究》、《安全研究》、《当代军控》、《当代安全政策》、《亚洲政策》、《当代历史》、《当代中国》等。他曾在哈佛大学、兰德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教或担任研究员。目前，他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有众多在华生活经历，懂中文，经常来亚洲旅行。

吴心伯（Wu Xinbo）为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美国的亚太政策，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问题的著作。他在复旦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亨利·史汀生中

心、布鲁金斯学院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并任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宁斯·兰朵夫高级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美之间：处理危机与保持和平》、《世事如棋局——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此外，他还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他还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华盛顿季刊》编委会成员，并参与编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安全研究系列丛书。



THE CLASS AND THE V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 塞繆尔·亨廷顿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美) 亨廷顿著 ; 周琪等译.--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11-9040-9

I.①文... II.①亨... ②周... III.①国际政治 - 研究 IV.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310号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

其他世界？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主义、简化和预测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普世文明：含义

普世文明：来源

西方与现代化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力量、文化和本土化

西方的力量：支配和衰落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上帝的报复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亚洲的自我肯定

伊斯兰教的复兴

挑战的变化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文化与经济合作

文明的结构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西方边界的形成

俄罗斯及其近邻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武器扩散

人权和民主

移民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

亚洲：中国和美国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终止断层线战争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世界之中的西方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文明的共性

附录

脚注

注释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编后记

中文版序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著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

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我所主持的哈佛国际和亚洲研究会正在积极地提倡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做同样的事情。

塞繆尔·亨廷顿

1997年12月6日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包括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作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

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士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卢森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中国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带相当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扎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

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彼得·琼和克里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至于她几乎一定把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恩·考克斯，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成书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加赞扬。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 的世界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次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年10月16日，在洛杉矶，7万人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号公民提案，该提案是一个提交公民复决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种举旗方式确保了187号公民提案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套语。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

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都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第五部分：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近代时期的起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0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

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注

1) 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注2）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维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注3）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它们或者像苏联、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那样分裂开来，或者像乌克兰、尼日利亚、苏丹、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样，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

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在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这条线已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文化可以改变，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 and 文化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

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地图和范式。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包含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一画面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库恩写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注4）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是由哈里·杜鲁门首次清楚地表达的，作为“地缘政治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导（注5）。

40年间，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用库恩的话说，存在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一范式时而会妨碍学者和政治家看清一些重大的发展，如中苏破裂。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

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几乎被普遍接受，并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否认需要这样的指导，并假设我们将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欺骗了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

- 1 理顺和总结现实；
- 2 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 3 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 4 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 5 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各个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

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冷战结束时，人们曾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

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一个被广泛阐明的范式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阐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1.1} 福山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说，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且不仅仅是在欧洲。“正是在非欧洲的世界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和苏联。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壤和马塞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注6）

对和谐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都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美国将呈现出新的重要性，昔日的冷战对手将参与“伙伴关系”和“重大的讨价还价”，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将被提到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国家的总统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学的校长否决了对一名从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为不再有此需要：“感谢上帝！我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

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变得不一样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单边行动体系、排他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注7）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冷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罗斯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的中国日益自信。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冷战后世界作有用的指导。

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学者们曾根据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来来分析世界。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Dar al—Islam和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一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本，它拥有大约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注8）

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这两部分。出现在各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

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注9）这些形象中的每一种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成分，但同时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现代国家具有一些使它们区分于贫困的传统国家的共同特征，后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或更传统的社会，并使之殖民化时。西方在400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一些殖民地开始造反，发动了反对殖民国家的解放战争，殖民国家则很可能失去了维持殖民帝国的意志。在当代世界，已发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被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简单的界限。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

把世界在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更没有意义。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然而，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缺陷，对此爱德华·赛义德作了适当的批评，因为它宣扬了“熟人（欧洲、西方、‘我们’）同陌生人（地中海以东地区、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且假定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注10）冷战时期，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着一个意识形态系列两极化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系列。“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两极化，部分是由于把欧洲文明称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却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东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这一较恰当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着许多

非西方。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

或多或少184个国家。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实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正在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就要试图通过加强自己的实力，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保护自身安全。冷战后世界中或多或少有184个国家的利益和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些假设来预测。（注11）

这种关于世界的描述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起点。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实体。它们维持军队，实施外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各国政府把确保本国的外部安全作为优先考虑（虽然它们可能常常把对付内部威胁以确保政府的安全作为更优先的考虑）。从整体上说，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确比一个世界或两个世界的范式更现实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况，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然而，它也有严重的局限。

它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简单地假定实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据实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

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的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欧洲，国际机构已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强有力的国际行政机构已被制造出来，它们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

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导致许多人认为坚硬互碰的“台球”式国家将逐渐消失，这种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1.2 以来曾一直被有意地当作规范；（注12）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已更加接近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

完全的混乱。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世界形象，即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组织的出现；避难者倍增至数千万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盛行。两本于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令人信服地提出和总结了这幅陷于混乱的世界的图景，一本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另一本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大混乱》。（注13）

同国家主义的范式一样，混乱的范式也接近于现实。它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上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生动、精确的图景，而与以国家为主体的范式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到1993年初为止，估计全世界共发生了48场种族战争，苏联存在着164个“领土—种族要求和与边境有关的冲突”，其中30个卷入了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注14）然而，混乱范式由于过于接近现实，因而比国家主义范式有更大的缺陷。世界可能是混乱的，但它并非全然无秩序。把世界描述成普遍的和无区别的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可以用来理解世界，整理事件和估价它们的重要性，预测无政府状态的趋势，区分不同类型的混乱和它们可能不同的原因和后果，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出指导路线。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主义、简化和预测

这四个范式中的每一个都显示了现实主义和简化两方面的各自不同的结合。每一个都含有自身的缺点和局限。可以设想，这些缺点和局限可以通过各范式的结合和提出例如世界同时参与分裂和整合的过程来加以抵消。（注15）两个趋势确实都存在，因此一个较复杂的模式将比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更接近于现实。然而，这会为了现实主义而牺牲简化，而且，如果走得过远，会导致拒绝所有的范式和理论。此外，同时包含两个相反趋势的分裂—整合模式，未能提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趋势占上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另一个占上风。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相似的抽象思维层面上，提出一个比其他范式都更能说明更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

这四个范式彼此也不相容。世界不可能既是一个整体，又在根本上分裂为东方和西方，或南方和北方。如果民族国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扩散的国内冲突搞得无所适从，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础。世界既不是一个，或两个，或184个，也不可能是近乎无限多的部落、种族集团和民族。

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它也建立在其他范式的要素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这些要素。它与其他范式之间较之那些范式彼此之间更加相容。例如，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认为：

-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

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这样，文明的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然而，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世界政治的冷战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关的，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变得过时了。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文明的范式将遭受类似的命运。然而，就当前阶段来说。它为区分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东西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导。例如1993年初48个种族冲突中的将近一半发生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文明的视角导致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把他们的维和努力集中在这些冲突上，它们比其他冲突更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战争。

范式也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例如，国家主义范式导致约翰·米尔斯海默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成熟到它们之间可能爆发安全竞争。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彼此之间有漫长而无保护的共同边界的大国，常常陷入因担忧安全而导致的竞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克服这一担忧，学会一起和谐生存，但如果它们这样做，那将是反常的”。（注16）另一方面，文明的范式强调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以及两国内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混合，于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分裂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东仪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要历史事实，与把国家看作是统一的和自我认同的实体的“现实主义”国家概念相一致，而这却完全被米尔斯海默忽略

了。国家主义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性，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却对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这是文化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预测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远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这些不同的预测也引起不同的政策优先考虑。米尔斯海默依据国家主义预测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俄罗斯人可能战胜乌克兰人，这导致他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文明的研究方法则鼓励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合作，敦促乌克兰放弃其核武器，提倡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措施来帮助乌克兰维持统一和独立，为防止可能发生的乌克兰的分裂而倡议应急计划。

冷战结束后的许多重要事态发展都与文明的范式相一致，并可以从它作出预测。这些事态发展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它们前领土上爆发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国内进行着关于认同的斗争；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冲突加剧；伊斯兰教国家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问题上抵制西方的压力；伊斯兰教国家和儒教国家努力争取获得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中国继续扮演“局外者”大国的角色；一些国家中新的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另一些则没有；东亚在发展武器上进行竞争。

文明的范式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相关性通过1993年六个月期间发生的适合于这一范式的事件得到了说明：

- 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并逐渐加剧。

- 西方未能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未能像谴责塞尔维亚人的暴行那样来谴责克罗地亚人的暴行。

- 俄罗斯不愿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的行动，以促使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政府一起创造和平，同时伊朗和其他

穆斯林国家提供了18000人的军队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 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的战争加剧，土耳其和伊朗要求亚美尼亚人放弃他们征服的土地，土耳其把军队部署到阿塞拜疆边界上，伊朗部署的军队跨过了阿塞拜疆边界，俄罗斯人警告说伊朗的行动将促使“冲突升级”，并“将把它推到危险的国际化边缘”。

- 俄罗斯军队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在中亚持续不断。

- 在维也纳国际人权大会上，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领导的西方同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的联盟发生了对抗，前者谴责“文化相对主义”，后者抵制“西方普世主义”。

- 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计划者以类似的方式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上。

- 显然几乎完全是沿着文明界线进行的投票，把举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

- 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部件导致美国要为此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之间因据说中国向伊朗转让核技术而发生对抗。

- 尽管美国作出了强烈抗议，中国还是破坏了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而进行核武器试验；朝鲜拒绝就其发展核武器计划进行进一步谈判。

- 据透露，美国国务院正在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

-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为两个“重大的地区冲突”准备的新战略，一个是针对朝鲜的冲突，另一个是针对伊朗或伊拉克的。

●伊朗总统号召同中国和印度结盟，以便“我们能够获得国际事件的决定权”。

●新的德国立法急剧削减了接受避难者的限额。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黑海舰队和其他问题的处理上达成了协议。

●美国轰炸巴格达，它实际上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一致支持，但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

●美国把苏丹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指出埃及的谢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随者阴谋“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的城市恐怖主义战争”。

●最终接受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约的前景得到了改善。

●199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显示出俄罗斯确实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

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初任何其他六个月发生的类似事件汇编成一个清单，就会发现它们都显示出文明范式的相关性。

在冷战的最初年月里，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富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活力。他警告说：“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会是荒谬的。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他在指出“几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一直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出“最广泛的问题不再出现在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各文明之间”。（注17）旷日持久的冷战两极化推迟了皮尔逊预料的即将来临的事态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确认的文化和文明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广大学

者和观察者已承认并强调了这些全球政治中的新因素的新作用。（注18） 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明智地警告说：“对于对当代世界感兴趣的人来说，尤其对那些不仅对当代世界感兴趣，而且还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值得’了解怎样在一幅世界地图上发现今天存在着什么文明，了解怎样能界定它们的边界、它们的中心和它们的外围、它们的范围和人们在那儿呼吸的空气，它们内部一般的和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结合形式。否则，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灾难性的观点错误啊！”（注19）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皮季里姆·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支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阿达·博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莫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注1）

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存在着区别。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

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镇的和有文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注2）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区别仍然与本书有关。单一文明的观点已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观、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注3）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

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注4）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涂尔干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施本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注5）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人时，他们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结果。

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也是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和非希腊人的东西。（注6）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注7）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

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文明是一个“整体”，梅尔科继续说，文明

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加相互依赖，会存在普遍的美学潮流和哲学潮流。

（注8）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各个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大利南部的村落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的村落文化，但它们具有使自己区别于德国村落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欧洲社区也具有使自己区别于中国社区或印度社区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国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讲英语的加勒比文明。纵观整个历史，一直存在

着许多小的人类群体，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人们一直根据规模和重要性来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边缘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产的文明（汤因比）。本书所关心的是，一般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他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注9）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注10）实际上，20世纪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经存在了1000年之久，或者像拉丁美洲的文明那样，是另一个长期生存的文明的直接后代。

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它们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梅尔科总结出了一个变化模式：从一个定型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再从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帝国制度。汤因比把文明的兴起看

作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所造成的文明环境日益得到控制，接下来便是动乱时期，普遍国家兴起，然后崩溃。虽然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它们都认为文明经过动乱或冲突时期演变到普遍国家，再到衰败和崩溃。（注11）

第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法制，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恩·派伊曾评论说，中国“自命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注12）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最后，学者们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见一致。然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总数，他们常常各执一词。奎格利认为，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很可能还有另外8个。汤因比起先列出了20个文明，然后是23个；施本格勒详举了8个主要文化。麦克尼尔分析了全部历史上的9个文明。巴格比也认为有9个文明，或者11个，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话。布罗代尔识别了9个文明，罗斯托万内指出了7个主要的当代文明。（注13）这些差别部分取决于是否把像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样的文化群体看作在整个历史上曾有一个单一的文明，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密切相关的文明，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后代。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人们对主要文明的身份都没有争议。正如梅尔科在考察文献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人们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注14） 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5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这样，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

中华（**Sinic**）文明。 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1000年；或者存在着两个中国文明，其中一个在公元最初的世纪中继承了另一个。我在发表于《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这个文明称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华（**Sinic**）文明一词更为精确。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有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

日本文明。 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印度（**Hindu**）文明。 人们普遍认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来，在南亚次大陆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相继的文明。这些文明一般被称为Indian、Indic或Hindu文明，人们更喜欢用后者来称呼最近的那个文明。自公元前1000多年以来，印度教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注15） 它经过现时代继续起着这种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数文化。像“中华”一词一样，Hindu一词也把文明的名称与它的核心国家分离

开来，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当该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个国家时，这样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兰文明。所有重要学者都承认存在着独特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迅速传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伸展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结果，许多独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于伊斯兰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

东正教文明。有几位学者单独列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东正教文明，它区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因为它源自拜占庭文明，不同于西方的宗教；那些地区遭受过鞑靼人200年统治，以后又是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西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有限的。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700到800年。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然而，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虽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演进的。它具有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则根本不存在。欧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虽然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拉丁美洲一直仅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结合了一些本土文化，这些文化不曾存在于欧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灭，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鲁和玻利维亚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一方两者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与流行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模式大相径庭。从主观上说，拉丁美洲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是的，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声明，“不，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学作品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文化差别。

（注16） 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对于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包括以拉丁美洲为一方和以北美和欧洲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说，后者是更恰当的和有用的称呼。

这样，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西方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注17） 尽管19世纪美国把自己看作不同于和对立于欧洲，但20世纪美国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实体的领导。

于是“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这样，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 2.1 这种确认方法是把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提升出来。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图上发现欧洲、美国和北大西洋，却不能在地图上发现西方。“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设想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欧美化”。然而，欧洲—美国文明被普遍归诸西方文明，尽管这一术语有严重的缺陷，但这里仍将沿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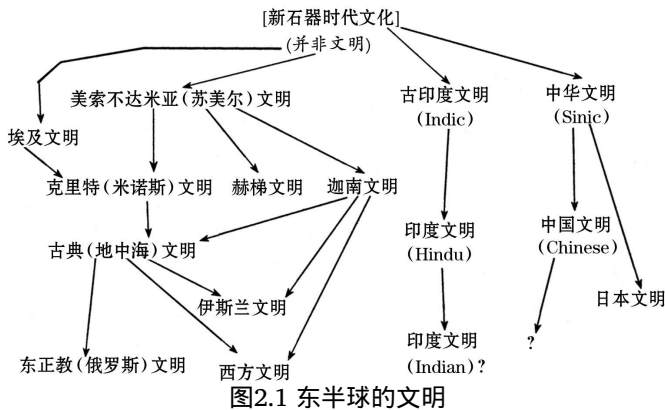
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除了布罗代尔之外，大多数研究文明

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非洲的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构成了自己的文明。在其他地方，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带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在南非，荷兰、法国然后是英国的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多板块式的欧洲文化。（注18）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带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大陆。在整个非洲，部落认同普遍而强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认同感也在日益发展，可以想象，由于南非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国家，这个地区可能会黏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注19）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第五个宗教佛教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早期分裂为两个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样，没有在其诞生地幸存下来。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并压制它。因此。虽然佛教仍然是这些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社会并没有构成佛教文明，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然而，佛教实际上在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化，意味着它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注20）2.2

文明之间的关系

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间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0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这些交往的词——“遭遇”，准确地表达了它们的性质。（注21）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只有数量很少的文明存在于同一时期，而且，正像施瓦茨和艾森施塔特所论证的，在轴心时代和前轴心时代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其差别在于它们是否承认“超验的秩序和世俗的秩序”之间的区别。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像它们的前辈，具有被一个独特的知识阶级所传播的超验神话，这个阶级的组成是“犹太人的预言家和祭司、希腊的哲学家和诡辩家、中国的文人术士、印度的婆罗门、佛教的桑加和伊斯兰教的乌理玛（Ulema）”。（注22）随着一个文明的陨落和经过一个中断期另一代继承者的兴起，一些宗教目睹了两代或三代隶属文明。图2.1是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欧亚文明之间关系的简图（根据卡罗尔·奎格利的图表复制）。



资料来源：卡罗尔·奎格利：《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公司，第2版），第82页。

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公元1500年以前，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以及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往。尼罗河流域、印

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没有影响。东地中海、西南亚和北印度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最终的确增多了，然而，分隔文明的距离和有限的克服距离的交通工具，限制了交流和商业关系。虽然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上有一些海上通商，但“旅行的有效手段是穿越平原的马匹，而不是海上航船，像公元1500年以前一样，世界上相互分离的文明靠它们而彼此之间维持着微小的联系”。（注23）

思想和技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但这常常历时几个世纪之久。最重要的并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传播，也许是佛教被传到中国，这发生在它发源于印度北部大约600年之后。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9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才到达欧洲。（注24）

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从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和印度之间确实发展了相对持续的和时而强化的文明间交往。然而，大多数商业、文化和军事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文明内部。例如，虽然印度和中国偶尔受到外族（莫卧儿人、蒙古人）的入侵和奴役，但这两个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内部都有漫长的“战国时代”。同样，希腊人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贸易要比他们同波斯人或其他非希腊人之间的更频繁。

冲击：西方的兴起。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1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

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注25） 11—13世纪之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儿而无重大的改变。12和13世纪期间，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西班牙的控制，而且确实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然而，其后土耳其势力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欧洲的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垮台。（注26） 不过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结束时欧洲人终于从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一些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世纪末，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尔后是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世纪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统治，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控制，到20世纪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 万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

（注27） 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罗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

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这一独特的和急剧的发展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城市和商业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权力在各等级和贵族之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相对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然而，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注28）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那时国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任何时期。（注29）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 2.3 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

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治的第二个重大发展。除了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各社会之间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

用。这些在一个单一文明内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文明内部的相互影响非常相似。它们建立在包含“语言、法律、宗教、行政实践、农业、土地占有制，也许还有亲族”的文化同质性之上。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并通过有活力的贸易网络、人员的不断流动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大量联姻而维持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注30）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常常被看作是欧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帝国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150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正如R. R. 帕尔默1793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注31）这一19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由于俄罗斯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罗斯，然后在中国和越南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的，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其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

自主。然而，这一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垮台以及它在中国和越南的实质性改编，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将引进另一个西方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作出这种假设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恢复力和个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 因此，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的文明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年的世界地图与1920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影响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在以后的一章中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探讨）。西方仍然具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20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黏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20世纪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

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注32）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20世纪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20世纪90年代的6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20世纪60年代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收缩为20世纪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表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政治现象来提及，以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多种分裂。

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认为它们都受

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像它的前辈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1世纪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际体系一样，17至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至20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之理。1918年，施本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注34）几十年后，汤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施本格勒一样，他不愿承认历史的单一性的假设，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注35）在汤因比之后50年，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注36）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到20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自以为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2.1 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两个词汇的情况

	提到的次数		百分比的变化
	1988	1993	
纽约时报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	144	+213
华盛顿邮报			
自由世界	112	67	—40
西方	36	87	+142
国会记录			
自由世界	356	114	—68
西方	7	10	+43

资料来源：Lexis/Nexis。提到的次数是关于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这两个术语的文章数量。凡提到“西方”之处都检验过其出处的适当性，以确保提到“西方”时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政治实体。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普世文明：含义

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注1）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事情。

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注2）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深刻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如果人们在历史上共有少数基本的价值观和体制，这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却不能阐明或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这一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人类被划分为一些次群体——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称为文明的更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

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注3）然而，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把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作“文化”或“次文明”，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 3.1

其次，“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当然，这是18世纪时这一词的独特含义，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普世文明正在出现，它使各种人类学家和其他带着惊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说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逐步扩张，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观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1000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5000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且）值得怀疑的是，

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观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注4）

第四，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新奇的，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说什么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是否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完全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关于普遍大众文化的论点稍微复杂些的版本，一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而是集中在传媒上，集中在好莱坞而不是可口可乐上。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

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注5） 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信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正如迈克尔·弗拉霍斯所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第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观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信。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注6）

全球通信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信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此外，到20世纪90年代初，非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正在导致出现一些迎合那些社会独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区的传媒业。（注7）例如，到1994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估计它拥有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长预测，其英语广播可能最终会吸引2%—4%的市场。然而，地区的（即文明的）网络将会出现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为西非）和其他语言的广播。三位学者得出结论说：“建立全球统一的新闻编辑室仍然是一个空想。”（注8） 罗纳德·多尔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员中出现的全球知识文化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对被强化了了的通信的影响作出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结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信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

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不过他补充说，“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确会是非常重要的。”（注9）

语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人们常常提出普遍语言的要求。《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就提出，“世界语言是英语”。（注10）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论点。它可以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说英语。但不存在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无可否认它们不可能非常精确）恰好显示了相反的情况。所能得到的涵盖了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见表3.1）。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讲汉语普通话，大约两倍于讲英语的人口，而且还有另外3.6%的人口讲其他形式的汉语（见表3.2）。

表3.1 讲主要语言的人
（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年度 语言	1958	1970	1980	1992
阿拉伯语	2.7	2.9	3.3	3.5
孟加拉语	2.7	2.9	3.2	3.2
英语	9.8	9.1	8.7	7.6
印地语	5.2	5.3	5.3	6.4
汉语普通话	15.6	16.6	15.8	15.2
俄语	5.5	5.6	6.0	4.9
西班牙语	5.0	5.2	5.5	6.1

*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表3.2 讲主要的汉语和西方语言的人

语言	1958		1992	
	讲该语言的人数 (单位 100 万)	占世界人口 的百分比	讲该语言的人数 (单位 100 万)	占世界人口 的百分比
普通话	444	15.6	907	15.2
广东话	43	1.5	65	1.1
吴语	39	1.4	64	1.1
闽语	36	1.3	50	0.8
客家话	19	0.7	33	0.6
汉语	581	20.5	1119	18.8
英语 278	278	9.8	456	7.6
西班牙语	142	5.0	362	6.1
葡萄牙语	74	2.6	177	3.0
德语	120	4.2	119	2.0
法语	70	2.5	123	2.1
西方语言	684	24.1	1237	20.8
世界总数	2845	44.5	5979	39.4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那就也可以这么说。（注11） 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在一个

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的时间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公制（米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舒亚·菲什曼所观察到的，如果人们认为一种语言不与某一特殊的种族群体、宗教或意识形态相一致，那它就更可能被当作共同语言或LWC来接受。过去，英语有许多这样的特点。更早些，英语已“非民族化了”（或最小程度地民族化了），正如以往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代西亚的通用语言——译者注）、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经历的那样。下述情况是“英语作为一种例外的语言相对较好运气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并没有把英语

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的或深入的考察”。（注12）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也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而且它吸收了使它区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地方色彩。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使得那些英语几乎彼此不可理解，就像是汉语的各种变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尼日利亚皮钦英语、印度英语和另一些形式的英语正在被并入它们各自的本土文化，而且可以假定，它们将继续保持自己的区别，以便成为既有联系而又独特的语言，甚至会像各种罗曼语从拉丁语演变出来那样。然而，与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不同，这些从英语中产生出来的语言或者将只是社会一小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将主要被用于特殊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

可以在印度看到所有这些过程。例如，1983年印度73300万人口中有1800万讲英语，1991年86700万人口中有2000万讲英语。这样，印度人口中讲英语的比例相对稳定在大约2%—4%。（注13）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精英之外，英语甚至不是通用语言。两位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宣称，“基本的现实是，当一个人从克什米尔南下旅行到坎尼亚库马里的最南端时，最好的交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印地语，而不是英语。”此外，印度英语正在吸收许多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正在被印度化，或者毋宁说，随着带不同地方口音的各种讲英语者之间差异的发展，它正在变得地方化。（注14）英语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正如梵语和波斯语从前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一样。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

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注15）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娴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注16）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和彼此之间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这种局面像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国家，其时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能够轻易地用法语相互交流，但他们却不会说自己语言的方言）。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

教育语言，本土语言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1948年印度教育委员会预见了这一发展，当时它指出：“使用英语……把人民分裂成两个民族，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一个民族不能讲另一民族的语言，而且相互不理解。”40年后，坚持把英语作为精英语言的做法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在“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运作着的民主制中，制造了一个反常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镳”，这刺激了“懂英语的少数上层人士和那些不懂英语却享有选举权的数百万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注17）随着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民主体制和这些社会中的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对西方语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语言变得更为流行。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原先被压制和遗忘了的语言的传播及其活力的恢复。在大多数苏联共和国中，人们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来使其传统语言复苏。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现在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国语。在穆斯林共和国中发生着类似的对本国语言的维护，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的书写方式从其前俄罗斯主人的西里尔书写方式改变为其土耳其亲族的西方书写方式，而讲波斯语的塔吉克斯坦则采用了阿拉伯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作塞尔维亚语，而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从他们天主教敌人的西方书写方式改变为他们俄罗斯亲族的西里尔书写方式。并行的现象是，克罗地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为克罗地亚语，并正试图从中清洗土耳其语词汇和其他外来词汇，而在波斯尼亚，“因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统治450年而遗留下来的语言沉淀”——同样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语，却重新流行”。（注18）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随着权力的分散，使用本土语言而引起的混乱蔓延开来。

宗教。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见本书

第四章最后一节），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发生重大变化。关于信教者的数据甚至比关于讲某种语言者的数据更不完整，也更不可靠。表3.3的数据引自一份被广泛使用的资料，这些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资料所记录的最大的变化是被划分为“非教徒”和“无神论者”的人数比例从1900年0.2%增加到1980年20.9%。可以确信，这可能反映了脱离宗教的重大变化和1980年的宗教复兴尚在积蓄力量。然而，这一20.7%的非信徒的增长比例几乎可以同被划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奉者的下降比例相比，后者从1900年的23.5%下降到1980年的4.5%。这些实际上相等的增长和下降表明，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中国的大量人口从民族宗教的信徒被重新划分为非信徒。

这些数据确实显示出信奉两个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这80年中有所增长。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计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个估计为18%。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在非洲有很大的增长，在韩国也发生了人们皈依基督教的重大变化。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在这些社会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经理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不能满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学毕业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会需要。虽然耶稣基督可能也满足不了他们，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

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注19）

表3.3 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

年代	1900	1970	1980	1985（估计）	2000（估计）
宗教					
西方基督教	26.9	30.6	30.0	29.7	29.9
东正教	7.5	3.1	2.8	2.7	2.4
穆斯林	12.4	15.3	16.5	17.1	19.2
非信徒	0.2	15.0	16.4	16.9	17.1
印度教	12.5	12.8	13.3	13.5	13.7
佛教	7.8	6.4	6.3	6.2	5.7
中国民间宗教	23.5	5.9	4.5	3.9	2.5
部落宗教	6.6	2.4	2.1	1.9	1.6
无神论者	0.0	4.6	4.5	4.4	4.2

资料来源：戴维·巴雷特主编：《世界基督教百科：公元1900—2000年现代世界各教会和各宗教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普世文明：来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单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中，像边缘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有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奈保尔和福阿德·阿扎米，对于他们来说，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白人的黑鬼”是一个阿

拉伯知识分子用来称呼这些移民的词，（注20） 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视为普遍的东西视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为有益的全球一体化先兆的东西，如世界范围媒体的扩散，却被非西方人宣布为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单一的，他们就感到它是一个威胁。

存在着三种说明普世文明为什么会出现的假设，某种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就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中的一个之上。首先，是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假设，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可能是唯一重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信——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像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

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注21）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注22）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注23）

贸易和通信未能产生和平和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时，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注24）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信、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两个相互交往的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会把彼此认作是德国人和法国人。而两个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同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和一个埃及人交往时，会把自己和对方看作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移居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中引起敌意，但法国人却日益愿意接纳信仰天主教的欧洲波兰人移民。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日本，但美国对后者的反感却远远超过前者。同样，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可以是……奥韦里艾比欧人或是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不过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则是一

个非洲人。”（注25）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全球化理论产生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全球各种宗教的复兴，“向神回归”，是对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场所”的回应。（注26）

西方与现代化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注27）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观、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毋庸置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

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注28）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第一，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设想的。第二，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

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注29）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而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

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力，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m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注30）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注31）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罗斯、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

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注32）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个人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大体上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度过自己一生”——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注33）另一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一再把个人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注34）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一些社会也有某些类似的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与西方相似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

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确实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注35）

拒绝主义。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Perry，一译“佩里”，译注）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几个世纪中，中国也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闭关自守一样，中国的闭关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之所为。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

20世纪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

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丹尼尔·派普斯写道：“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戴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然而，他们的纲领的不可实践性严重地限制了这些集团的吸引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尼日利亚卡诺城的延·依拉扎（Yen Izala）集团、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阴谋集团、袭击麦加清真寺的集团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达克瓦（Dakwah）集团，在他们与当局的武力遭遇中失败后便也销声匿迹了。”（注36）销声匿迹总结了到20世纪末纯粹的拒绝主义政策的命运。用汤因比的话来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对西方的第二个可能的回应是汤因比所说的希律党人的主张（Herodianism），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论据是，“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宗教价值观、道德设想和社会结构至少同工业主义的价值观和实践相异化，有时还相敌对”。因此，经济发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设性地重建生活和社会，而且，正如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常常要求重新解释生存本身的含义”。（注37）派普斯在明确提到伊斯兰教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

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注38）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20世纪末，有几个国家正在追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它们的努力将在第六章中进行分析。

改良主义。拒绝意味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人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日本，口号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因为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他的大部分改革。结果，阿里注意到，“埃及的命运不是日本的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也不是通过文化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的命运。”（注39）然而，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

性”，“并为接受现代思想和体制，无论是科学、技术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注40）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改良主义，倾向于基马尔主义，它不仅接受现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体制。这种类型的改良主义是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对西方的占优势的回应，其时它先是受到基马尔主义兴起的挑战，然后又受到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兴起的挑战。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图3.1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路线。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走向D点”。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A到E的曲线。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连，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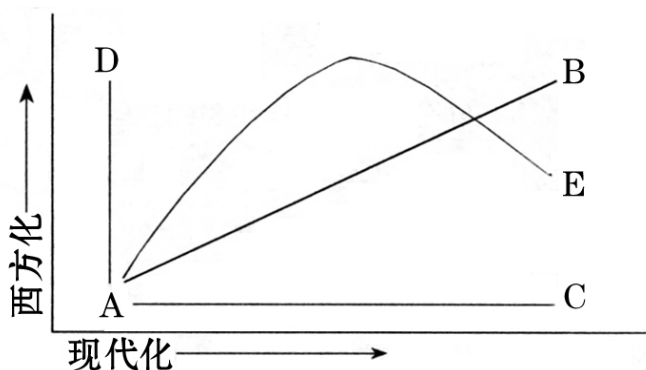


图3.1 对待西方影响的不同回应

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这一假设的一般模式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是一致的。雷纳·鲍姆检验了一系列可以得到的关于“不变性的假设”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人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注41）正如弗罗本纽斯、施本格勒和博兹曼等人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注42）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1000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

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也只能期望它在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注43）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注44）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图3.2 现代化与文化复兴

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要想实现现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的革新可以显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

统一直敌视革新”。（注45）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注46）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中国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革道路。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息、斋戒、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然而甚至他也赞同地引用了马克辛·罗丁森的话：“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他还认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信、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注47）

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

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注48）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

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 文明力量对比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 力量、文化和本土化

西方的力量：支配和衰落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其结果是在日本可能会偶然给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会同英国和法国一道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作关键性的决策，会同德国和日本一道在经济问题上作关键性的决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 and 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 控制着海上航线
-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 控制着宇航技术
- 控制着航天工业
- 控制着国际通信系统
-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注1）

关于西方的第二幅图画却与这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力量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会随之消失。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就美国衰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项力量对比分析得出了某种相似的结论：

在许多重要方面，它（指美国）的相对力量将加速下降。就其纯经济能力而言，美国的地位相对于日本、最终相对于中国可

能会进一步动摇。在军事领域，美国与许多日益壮大的地区力量（可能包括伊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天平将由中心向外围倾斜。美国的一些组织权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些实力（其中一些是软实力）将落到诸如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注2）

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究竟哪一幅描绘了现实？答案当然是：它们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力量，其余的力量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力量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力量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著名英国学者海德里·布尔论证说，“欧洲或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注3）施本格勒文集的首卷于1918年问世，自那时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衰落过程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在延续。然而，可以设想的是，它可能会加速。在一国的能力中，经济增长及其他方面的增长通常呈S形曲线：起步缓慢然后急剧加速，接着是增长速度降低，再到停滞。国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线发展，正如苏联的情形一样：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后迅速加速，最后到达谷底。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呈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在西方的弱点暴露出后，它会再次坚持自己的权力。西方开放的民主社会具有巨大的更新能力。此外，与许多文明不同，西方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布尔所看到的始于1900年左右的衰落，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中欧洲部分的衰落。从1910年到1945年，欧洲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的分裂，被其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困扰。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主导地位中的美国阶段开始了，而且1945年，美国短暂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几乎可以与1918年的同盟国相比。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影响，但并没有削弱以新的跨国帝国主义代替传统殖民帝国的美国的影响。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力量可以与美国相抗衡，而且美国的经济力量相对日本来说下降了。尽管如此，美国仍为恢复军事和经济力量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另一位英国著名学者巴利·布赞认为“更深刻的现实是，现在的中心变得比非殖民化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处于支配地位，而边缘更处于从属地位”。（注4）然而这种看法的准确性随着引起它的军事胜利在历史上被淡忘而消失了。

第三，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实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领土和人口。 1490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即5250万平方英里的全球陆地面积（南极洲除外）中的大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西方的

领土恢复到其原先欧洲核心部分，再加上其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聚居的广袤土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对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达到48%。1993年，除几个小的帝国残余如香港外，西方政府只统治着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到21世纪初将下降到大约11%，2025年下降到10%。（注5）就西方总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名列第四。

表4.1 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领土，1900—1993年
文明控制的总领土估算（单位：万平方英里）

年份	西方文明	非洲文明	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	日本文明	拉丁美洲文明	东正教文明	其他
1900	2029	16.4	431.7	5.4	359.2	16.1	772.1	873.3	746.8
1920	2544.7	40	391.3	5.4	181.1	26.1	809.8	1025.8	225.8
1971	1280.6	463.6	393.6	131.6	918.3	14.2	783.3	1034.6	230.2
1993	1271.1	568.2	392.3	127.9	1105.4	14.5	781.9	716.9	271.8
占世界领土的百分比估算*									
1900	38.7	0.3	8.2	0.1	6.8	0.3	14.7	16.6	14.3
1920	48.5	0.8	7.5	0.1	3.5	0.5	15.4	19.5	4.3
1971	24.4	8.8	7.5	2.5	17.5	0.3	14.9	19.7	4.4
1993	24.2	10.8	7.5	2.4	21.1	0.3	14.9	13.7	5.2

注：占世界领土的相对份额根据当年通行的国界估算。

*世界领土估计为5250万平方英里，不包括南极洲。

资料来源：《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书籍图册》（芝加哥：领域企业教育公司，1970年）；《大不列颠年鉴》（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92—1994年）。

表4.2 世界主要文明所属国家的人口，1993年（单位：万）

中华文明	134090	拉丁美洲文明	50750
伊斯兰文明	92760	非洲文明	39210
印度文明	91580	东正教文明	26130
西方文明	80540	日本文明	12470

资料来源：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数字统计，《1994年年鉴》（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94年），第764—769页。

表4.3 在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额

1900—2025 年（百分比）

年代	西方 [世界总数]* 文明	非洲 文明	中华 文明	印度 文明	伊斯兰 文明	日本 文明	拉丁美 洲文明	东正教 文明	其他
1900	44.3	0.4	19.3	0.3	4.2	3.5	3.2	8.5	16.3
1920	48.1	0.7	17.3	0.3	2.4	4.1	4.6	13.9	8.6
1971	14.4	5.6	22.8	15.2	13.0	2.8	8.4	10.0	5.5
1990	14.7	8.2	24.3	16.3	13.4	2.3	9.2	6.5	5.1
1995	13.1	9.5	24.0	16.4	15.9 ⁺	2.2	9.3	6.1 [‡]	3.5
2010	11.5	11.7	22.3	17.1	17.9 ⁺	1.8	10.3	5.4 [‡]	2.0
2025	10.1	14.4	21.0	16.9	19.2 ⁺	1.5	9.2	4.9 [‡]	2.8

注：占世界人口的相对份额根据当年通行的国界估算。1995年至2025年的人口估算根据1994年边界。

*世界人口估算以10亿为单位。

+估算不包括独联体或波斯尼亚的人口。

‡估算包括独联体、格鲁吉亚和南斯拉夫的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预测，1992年修订本》（纽约：联合国，1993年）；《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年历和事实书籍》（纽约：新闻出版公司，1970—1993年）。

因此，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在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较健康，较城市化，有较高的识字率和较良好的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婴儿死亡率只是其30年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些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增长，增加值从非洲的11年到东亚的23年不等。20世纪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中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识字。20世纪90

年代初，除非洲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识字率都高于二分之一。50%的印度人和75%的中国人能够读和写。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平均是发达国家的41%；1992年平均是71%。20世纪90年代初，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区的学龄人口几乎都接受了小学教育。最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不到三分之一的适龄人口接受中等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初，除非洲外，一半的适龄人口接受了中等教育。1960年城市居民占不发达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然而1960年至1992年间。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拉丁美洲从49%增加到73%，在阿拉伯国家从34%增加到55%，在非洲从14%增加到29%，在中国从18%增加到27%，在印度从19% 增加到26%。（注6）

在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方面的这些变化造就了社会动员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的能力加强了，期望值更高了，他们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这是不识字的人所做不到的。动员起来的社会是更强有力的社会。1953年，伊朗只有不到15%的人识字，不到17%的人是城市居民，科米特-罗斯福以及少数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一次暴动，使伊朗国王重登宝座。而到1979年，当50%的伊朗人识字和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时，多大的美国军事力量都不可能再保住国王的王位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仍把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与西方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分离开来。但这道鸿沟正迅速变窄。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道鸿沟。西方、日本和俄罗斯人的平均年龄日趋稳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给那些仍然受雇的生产者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其他文明的负担是大量的儿童，但儿童是未来的工人和士兵。

经济产值。 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明显下降。175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印度占将近四分之一，西方则占不到五分之一。至1830年西方已略微超过中国。在后

来的几十年里，正如保罗·贝罗克所指出的，西方的工业化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化。1913年非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大约是其1800年的三分之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所占份额急剧增加，1928年达到其最高点，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84.2%。此后由于其增长率不高，以及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二战后制造业产值的迅速增加，西方所占份额有所下降。至1980年，西方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57.8%，大致相当于其120年前即19世纪60年代所占的份额。（注7）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总产值的可靠数据无法找到。然而1950年，西方占世界总产值的大约64%；8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49%。（见表4.5）据估计，到2013年，西方将仅占世界产值的30%。据1991年的另一项估计，世界上7个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有4个是非西方国家：日本（第二位），中国（第三位），俄罗斯（第六位）和印度（第七位）。1992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在十大经济国中包括5个西方国家，还有其他5个文明的带头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些似乎言之成理的预测表明2020年排名前5位的经济强国将是5个不同文明的国家，经济占前10位的国家中将只有3个是西方国家。当然，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注8）

表4.4 各文明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份额，1750—1980年
（百分比，世界总量=100%）

国家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1953	1963	1973	1980
西方	18.2	23.3	31.1	53.7	68.8	77.4	81.6	84.2	78.6	74.6	65.4	61.2	57.8
中国	32.8	33.3	29.8	19.7	12.5	6.2	3.6	3.4	3.1	2.3	3.5	3.9	5.0
日本	3.8	3.5	2.8	2.6	2.4	2.4	2.7	3.3	5.2	2.9	5.1	8.8	9.1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	8.6	2.8	1.7	1.4	1.9	2.4	1.7	1.8	2.1	2.3
俄罗斯/苏联*	5.0	5.6	5.6	7.0	7.6	8.8	8.2	5.3	9.0	16.0	20.9	20.1	21.1
巴西和墨西哥	—	—	—	0.8	0.6	0.7	0.8	0.8	0.8	0.9	1.2	1.6	2.2
其他	15.7	14.6	13.1	7.6	5.3	2.8	1.7	1.1	0.9	1.6	2.1	2.3	2.5

*包括冷战期间华约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保罗·贝罗克：《1750年至1980年的国际工业化水平》，《欧洲经济史杂志》，第11期（1982年秋季号），第269—334页。

表4.5 各文明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1950—1992年（百分比）

年份	西方文明	非洲文明	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	伊斯兰文明	日本文明	拉丁美洲文明	东正教文明*	其他+
1950	64.1	0.2	3.3	3.8	2.9	3.1	5.6	16.0	1.0
1970	53.4	1.7	4.8	3.0	4.6	7.8	6.2	17.4	1.1
1980	48.6	2.0	6.4	2.7	6.3	8.5	7.7	16.4	1.4
1992	48.9	2.1	10.0	3.5	11.0	8.0	8.3	6.2	2.0

*1992年东正教文明的估算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

+ “其他”包括其他文明和四舍五入造成的误差。

资料来源：1950、1970、1980年的百分比由荷伯特·布洛克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出，见《1980年全球总产值：创造性的停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1981年），第30—45页。1992年的百分比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的关于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估算表30计算出。

经济生产总值部分地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亏西方创造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将变得日益困难。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公认的威胁，加之技术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况便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即使不是在21世纪中叶之前，那么到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业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也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主宰”行将结束。

军事能力。 军事实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士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20世纪20年代西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遥遥领先。在以后的岁月里，西方的军事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下降了，这种下降反映在军事人员对比的变动上，尽管很明显这不是军事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是标准之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引发了国家发展其军事能力的愿望并为其提供了资源，很少有国家不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苏联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军队，这一点在二战中得到显示。冷战期间苏联拥有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目前西方垄断了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大量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至于它是否将保持这种能力尚不得而知。然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具有与之相当的能力。

表4.6 各文明在世界军事人员总数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年份	西方	非洲	中华	印度	伊斯兰	日本	拉美	东正教	其他
[世界总数]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文明	
1900 [1008.6]	43.7	1.6	10.0	0.4	16.7	1.8	9.4	16.6	0.1
1920 [864.5]	48.5	3.8	17.4	0.4	3.6	2.9	10.2	12.8*	0.5
1970 [2399.1]	26.8	2.1	24.7	6.6	10.4	0.3	4.0	25.1	2.3
1991 [2579.7]	21.1	3.4	25.7	4.8	20.0	1.0	6.3	14.3	3.5

注：以该年度通行国界为基础估算。

世界武装部队总人数（现役）以万为单位。

*其中的苏联军队人数，系G·M·麦金托什所估算的1924年数字，见D·H·利德尔—哈特：《红军：1918—1945年的红军及1946年迄今的苏军》一书（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56年）。

资料来源：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军费和武器转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该署，1971—1994年）；《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

总的来说，冷战后几年中全球军事能力的演变由五大趋势所主导。

第一，苏联武装部队在苏联解体之后迅即不复存在。除俄罗斯外。只有乌克兰从苏联脱离之后，继承了重要的军事能力。俄罗斯军队在规模上大大缩小，并已从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撤出。华约组织解散了。向美国海军挑战的目标被放弃。军事装备要么被处理要么任其损坏，以致无法使用。国防预算锐减，官兵士气普遍低落。同时，俄罗斯军队正重新确定其使命和学说，并为其在保护俄罗斯人和对付邻近的地区冲突中所起的新作用而进行重建。

第二，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急剧减弱引起了西方军费开支、兵力和能力较为缓慢但明显的下降。根据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计划，美国军费开支将减少35%，即从1990年的3423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计算）减至1998年的2223亿美元。1998年的军队建制将减至冷战结束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军队总人数将从210万减至140万。许多重要的武器研制项目已经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间主要武器的年度采购量从29艘舰只减至6艘，943架飞机减至127架，720辆坦克减至0，战略导弹从48枚减至18枚。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国、德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法国，在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削减。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武装部队预计将从37万人减至34万人，也可能减至32万人；法国军队将从1990年的29万人减至1997年的22.5万人。英国军队从1985年的37.71万人减至1993年的27.48万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大陆成员国也缩短了服兵役期限，并讨论了放弃征兵制的可能性。

第三，东亚的趋势与俄罗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增加军费和改善军队被列入日程，在这方面中国是样板。在自身经济财富增长和中国扩充军备的刺激下，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和扩大军队。日本继续改善其高度先进的军事能力。中国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纷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队，从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购买飞机、坦克和舰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开支在1985至1993年期间大约降

低了10%（从5396亿美元减至4850亿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而在同一时期，东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50%，从898亿美元增加到1348亿美元。（注9）

第四，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军事能力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随着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生产武器的能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能够生产战斗机的第三世界国家从1个增加到8个，生产坦克的国家从1个增加到6个，生产直升机的国家从1个增加到6个，生产战术导弹的国家从无增加到7个。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军火工业的全球化，这可能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军事优势。（注10）许多非西方社会或拥有核武器（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或许还有朝鲜），或竭尽全力获得核武器（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可能还有阿尔及利亚），或者使自己达到这样的地位：当它们认为必要时，便能够很快获得核武器（日本）。

最后，这些事态发展使区域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军事战略和军事实力的主要趋势。区域化为俄罗斯和西方裁减军队和其他国家增加军队提供了理论依据。俄罗斯不再拥有全球军事能力，而是把其战略和兵力集中于防范近邻国家。中国已重新调整了其战略和军队，把重点放在了地区兵力投放和保护中国在东亚的利益上。同样。欧洲国家也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来进行军事调整，以应付西欧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美国明确地把其军事计划由在全球遏制苏联并与其作战，改变为准备同时对付波斯湾和东北亚发生的地区性紧急情况。然而美国不可能具备达到这些目的的军事能力。为击败伊拉克，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其75%的现役战术飞机、42%的现代化作战坦克、46%的航空母舰、37%的陆军兵力和46%的海军陆战队兵力。由于未来将进行大幅度裁军，美国若进行一场针对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区强国的干涉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两场了。全世界军事安全日益不依赖于全球的实力分配和超级大国的行动，而是依赖于世界各区域内的实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国家的行动。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实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达到该顶峰100年之后，西方将可能控制世界版图的约24%（顶峰时曾达到49%），世界人口的10%（顶峰时为48%）和社会动员人口的15%—20%，世界经济产值的大约30%（顶峰时大概为70%），制造业产值的25%（顶峰时为84%），以及全球兵力的不到10%（顶峰时为45%）。

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克里孟梭实际上一同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他们还决定如何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干涉，从中国榨取经济特权。100年之后，将不会再有能够行使类似权力的政治家小集团；任何这样的集团将不是由3个西方人组成，而是由世界7个或8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所组成。邓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叶利钦、霍梅尼和苏哈托的继承者将对抗里根、撒切尔夫人、密特朗和科尔的继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

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4.1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实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实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实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实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实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注11）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实力和财富的源泉。这个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间，基督教、罗马法和西方文

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对西方君主军事才能的畏惧和钦佩的混合，刺激了人们去接受西方文明”。（注12）随着西方实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这些态度的抬头是罗纳德·多尔所称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表现。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入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全球性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

常“易受排外主义运动的鼓动”。（注13） 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

本土化并不需要等待第二代来进行。能干的、有洞察力和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人就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4.2}，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个基督教徒。然而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他们不得不实行本土化。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过程中不时改变自己的认同、姓名、装束和信仰。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立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了佛教并求助于僧伽罗民族主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界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注14） 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罗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

从的”国家。然而在10年里，当西方化的戈尔巴乔夫被具有俄罗斯风格和西方信仰的叶利钦所取代时，趋势也随之从西方化转为斯拉夫化，而叶利钦又受到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民主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能获得权力。20世纪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和亲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变和革命的威胁；20世纪80和90年代它们日益面临被选举下台的危险。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结果是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集团在穆斯林国家为数不多的几次选举中表现出色，如果不是军队取消了1992年的选举，它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掌握国家政权。在印度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可能鼓励了向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和社会群体间的暴力。（注15）斯里兰卡的民主使得斯里兰卡自由党于1956年击败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观念的统一国民党，为80年代津达那亚僧伽罗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949年之前南非精英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个西方国家。种族隔离政权建立后，西方精英们逐渐把南非开除了西方国家阵营，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当成是西方人。然而为了恢复他们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这导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权。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话，他们的继承人将会有更多的科萨人、祖鲁人和非洲人观念，南非将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洲国家。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

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注16） 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注17） 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上帝的报复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宗教的衰亡。无论是欢迎还是痛惜这种趋势的人都接受这一观点。现代世俗主义者对科学、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构成现存宗教核心的迷信、神话、非理性和宗教仪式而欢呼。正在出现的社会将是宽容的、理性的、重实效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世俗的。另一方面，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警告说：宗教信仰、宗教体制以及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注18）

20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希望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吉利斯·凯伯尔称这次复兴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和几乎所有的国家。70年代中期，如凯伯尔所说的那样，世俗化和宗教与世俗主义相适应的趋势“发生了逆转。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

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观，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来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了上帝。它的主题不再是使教义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它的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性伊斯兰化’”。（注19）

这种宗教复兴部分地涉及一些宗教的扩张，这些宗教在一些原先没有成员的社会中吸收了新成员。然而在更大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包括人们回归和振兴他们社会的传统宗教，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都经历了原先的因某种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传播教义和举行仪式的新浪潮。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然而它们仅仅是在20世纪末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同特色的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宗教大潮的表面波浪而已。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远超过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在各个社会这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政府的关注和计划中。世俗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复兴采取了肯定亚洲价值观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复兴却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正如乔治·威格尔所评论的，“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注20）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现实意义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复兴席卷了从阿尔巴尼亚到越南的许多国家，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在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1994年，俄罗斯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区使用中的教堂数目由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宗教得到政治领袖一致的尊重和政府的支持。在俄罗斯的城市里，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于1993年所报道的：“教堂的钟声再

次回荡在空中。新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久前还是废墟的教堂重新响起美妙的歌声。教堂是城市里最繁忙的地方。”（注21）与东正教在斯拉夫共和国复兴的同时，一场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中亚。1989年，中亚有160座启用的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教神学院；到1993年初有大约1万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学院。尽管这场复兴涉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运动，并得到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界鼓励，但它基本是一场基础极其广泛的、主流的文化运动。（注22）

如何解释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显然，各个国家和文明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然而，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时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引起类似的发展。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无论在一些特殊国家发生的大量事件可能受到什么独特因素的影响，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定在起作用。它们是什么呢？

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宗教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正如李光耀对东亚情况所解释的：

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大约50年或更少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因而注定会有脱节和失误。如果你看一眼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宗教的兴起……旧的风俗和宗教——祖先崇拜、萨满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注23）

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注24）

伯纳德·刘易斯认为，穆斯林世界正“再次出现一种趋势，在紧急时刻，穆斯林需要在宗教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一个由伊斯兰教而不是由种族或区域标准来定义的实体中，寻找他们的基本认同和忠诚”。吉利斯·凯伯尔也同样强调了寻求认同所占的中心地位：“‘从底部’重新伊斯兰化是在一个已经失去意义并变得乱七八糟和异化的世界里，重新确立认同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方法。”（注25）在印度，“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它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注26）在俄罗斯，宗教复兴是“对认同的狂热渴望的结果，而这种认同只有东正教会能够提供，因为它是唯一未被破坏的与1000年前的俄罗斯相联系的纽带”。而在中亚伊斯兰各共和国，宗教复兴同样源自“中亚人民最强烈的渴望：重申已被莫斯科压制了几十年之久的认同”。（注27）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应付混乱、失去认同、失去意义和安全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法，而这些都是由于迅速引进现代社会和政治模式、世俗化、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而造成的”。威廉·麦尼尔赞同说，重要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那些从社会上广泛吸收成员的运动，因为它们回答了，或似乎回答了人们新近感

到的人类需要……这些运动毫无例外地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不可能，而以城市为基础的大众传播通过对乡村的渗透，已开始侵蚀农民生活的古老框架”。（注28）

更广义地说，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注29）

如果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没有满足无根基者的感情和社会需要，那么其他宗教团体就会来这样做，并在此过程中大量扩大其成员，并扩大宗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韩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可能占人口的1%—3%。当韩国进入经济迅速发展阶段，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职业分工，佛教就变得不再适用。“对于涌入城市的几百万人，以及许多留在已发生变化的农村的人们来说，韩国农业时代不活跃的佛教已失去了吸引力。宣扬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基督教在混乱和变化的时期则给人以更可信的安慰。”（注30） 到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韩人口中至少占30%，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及天主教徒。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新教徒数目由1960年的大约700万增加到1990年的5000万。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主教们1989年承认，新教成功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技术性”和“教会结构有时也使它不能对现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作出反应”。据一位巴西牧师说，与天主教会不同，新教教会满足了“个人的基本需要——人情温暖、治疗、深刻的精神体验”。新教在拉丁美洲穷人中的传播主要不是一种宗教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宗教信奉和参

与的巨大净增，即由名义上的消极的天主教徒变成积极而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例如在巴西20世纪90年代初20%的人口称自己是新教徒，73%的人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然而礼拜日时新教教堂里聚集了2000万人，天主教堂里约有1200万人。（注31）像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正经历着一场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复兴，在拉丁美洲它采取了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形式。

韩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佛教和既定的天主教已不能满足在现代化中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社会需要。其他地方是否也发生宗教信仰的重大转变，取决于流行的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求。鉴于儒教在感情上缺乏生气，它在失去信徒方面显得首当其冲。在儒教国家，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可能具有与福音新教对于拉丁美洲人、基督教对于韩国人以及原教旨主义对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样的吸引力。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当经济增长达到高峰时，基督教也得到传播，“尤其在年轻人中”，可能有5000万中国人是基督徒。政府企图阻止其增长，监禁了一些牧师、传教士和福音传道者，禁止和压制一些宗教仪式和活动，而且在199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劝诱人们改变宗教信仰、设立宗教学校或其他宗教组织，并禁止宗教团体从事独立的或由国外资助的活动。在新加坡，正如在中国一样，有大约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政府部长们警告福音传道者不要打破国家“微妙的宗教平衡”，拘留了包括天主教组织官员在内的宗教工作者，并以不同方式骚扰基督教团体和个人。（注32）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西方教会也进入了东正教的苏联各共和国，与复兴的东正教会相竞争。在那里也和在中国一样，政府极力限制人们改变宗教信仰。1993年，在东正教会的强烈要求下，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要求外国宗教团体在从事传教或教育工作时需经国家许可，或从属于某一俄罗斯宗教组织。然而叶利钦总统拒绝签署该法案，使之未能生效。（注33）总的来说，这件事表明，在“上帝的报复”与本土化发生冲突的地方，前者会获胜，因为如果人们的传统信仰不能满足他们在现代化中对宗

教的需要，他们就会转向能够满足其感情需要的外来宗教。

除了在现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会创伤外，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从19世纪开始，非西方文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一般来说是从西方引进一系列意识形态。19世纪，非西方精英们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最初采取自由民族主义的形式对西方表示反对。20世纪，俄罗斯、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及其在中国的重大修改，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西方政府、集团和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政治学来填补这个真空。这些学说将在非西方文化中产生多大的持续影响还很难说。然而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注34）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它们也反对与布鲁斯·劳伦斯所称的有别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相关联的相对主义、本我主义和消费主义。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反现代的。正如李光耀所评论的，它们接受现代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的不可避免性及它们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它们“不能接受它们已被西方化的观点”。图拉比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宗教是发展的动力”，经过净化的伊斯兰教在当代将起与新教伦理在西方历史上所起的类似作用。宗教与现代国家的发展也不相矛盾。（注35）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较先进且似乎较世俗的穆斯林社会中势力强大，如阿尔及利亚、伊朗、埃

及、黎巴嫩和突尼斯。（注36） 宗教运动，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善于运用现代通信和组织技术传播其信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美洲新教福音派成功的空中传教。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需要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

（注37） 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多尔所说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新中间阶级。正如凯伯尔所指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是年迈的保守主义者或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穆斯林和其他人来说，宗教复兴是一个城市现象，它吸引了那些现代取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专业部门、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业的人。

（注38） 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轻人信仰宗教，而他们的父母却是世俗的。印度教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其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来自本土化的第二代人，而且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20世纪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间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注39） 在韩国，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越来越多地汇集了同样类型的人。

土生土长的宗教或外来宗教给现代化社会中的新兴的精英们指出了意义和方向。罗纳德·多尔注意到，“传统宗教的价值属性”“是主张相互尊重，反对居控制地位的其他国家，而且常常同时更接近于反对当地统治阶级，因为后者接受那些居控制地位的其他国家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据威廉·麦尼尔指出，“无论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肯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教派形式，它都更多地意味着否认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注40）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非西方宗教

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的抵制。它是针对西方的文化独立宣言，是一个骄傲的声明：“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 挑战者文明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相比之下，其他非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人民可能肯定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却踌躇于宣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亚洲和伊斯兰有时单独地，有时携手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张。

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然而这些冲击又有很大区别。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了动力和资源，使其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苛求。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至20岁年龄段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

暴动和移民提供了生力军。经济增长增强着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着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

亚洲的自我肯定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龙紧跟其后。（见图5.1）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经济将于21世纪早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注1）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

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少地顾及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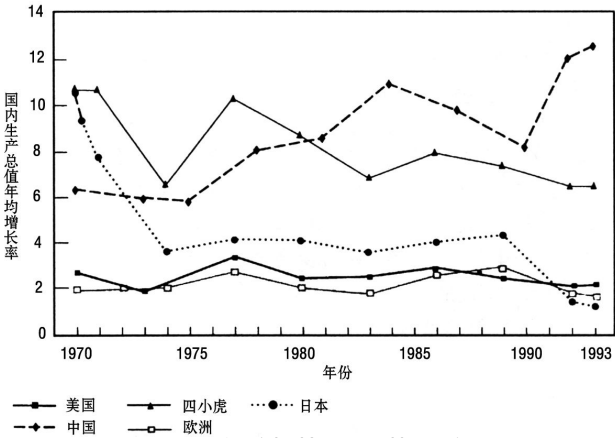


图5.1 经济挑战：亚洲与西方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5，1991年世界图表》（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1年）；“中华民国行政院”主计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收入统计摘要，1951—1995年》（1995年）。注：数字表示每连续三年的平均值。

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注2）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当19世纪中叶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和日本时，经过短暂的对基马尔主义的迷恋之后，大多数精英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随着明治维新，一个有生气的改革家集团在日本掌握了政权，他们学习并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实践和体制，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采取了保持传统日本文化精髓的方式，它既在许多方面有助于现代化，又使日本有可能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求助于、重新阐述和依赖于该文化的要素，以此来唤起对其帝国主义行为的支持和辩护。另一方面，在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已无法成功地适应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被日本和欧洲列强所击败、剥夺和羞辱。1911年清政府垮台，随之而来的是分裂、内战，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求助于西方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40年代末，那些从苏联引进的观点战胜了从西方舶来的观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基督教，中国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导致了文化的彻底破坏。一位曾深深涉足于日本事务的西方人于1994年评论说，“现在我们非常难以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宗教、文化，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曾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战败是对制度的彻底打击。在他们的头脑中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并被抛弃了。”（注3）在这个国家，所有与西方有关联的东西，尤其是战胜国美国的东西，都开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因此，就在中国效仿苏联时，日本试图效仿美国。

20世纪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临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这一趋势在电视系列片《河殇》和竖立在天安

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上达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顶峰。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也如同它在19世纪末一样被认为是不可行的。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

（注4） 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注5）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注6）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注7） 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与此同时，日本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

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摒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却又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注8）这一趋势首先包括对日本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以及重新伸张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问的，是努力使日本“亚洲化”，并认同于一般的亚洲文化，尽管日本有其独特的文明。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另一方面，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华人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较容易，而与亚洲混合在一起却不会那么容易。（注9）日本通过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强调了其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差异。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工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着的经济增长导致东亚人20世纪80和90年代清楚地表达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亚洲的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个态度总的来说有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经济增长在亚洲社会中刺激了一种权力意识以及对自己抵抗西方的能力的肯定。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宣称，“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补充了这个隐喻：“即使

美国发高烧亚洲也不会咳嗽。”另一位亚洲领袖说，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畏惧时期的结束和反驳时期的开始”。马来西亚副总理断言道：“亚洲的日益繁荣意味着它现在已处于为全球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提供需认真对待的其他选择的地位了。”（注10）东亚人认为，这还意味着西方正迅速失去使亚洲社会在人权和其他价值观上遵循西方标准的能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时日本人的经济、出口、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于他们的沙特人一样，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胜利论在只能称其为“新加坡文化攻势”的表现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他们认为，为了与东方竞争，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注11）

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注12）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中国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其核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亚洲社会在面对西方维护这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亚洲人认为这需要发展新形式的亚洲内部的合作，如扩大东盟和建立东亚经济会议。虽然东亚社会的直接经济利益是继续进入西方市场，但在更长的时期内经济区域主义可能会流行，因此东亚必须日益加强亚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注13）特别是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的领导，必须放弃其历史上“非亚洲化和亲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亚洲化的道路”，或更广义地说，促进“亚洲的亚洲化”，这是新加坡的官员们所赞同的道路。（注14）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更新。东亚人宣称，“盎格鲁—撒克逊发展模式在过去40年里如此受到尊崇，被当作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建立一种可行的政治体系的最好手段。现在它已不起作用了。”东亚模式正在取而代之，从墨西哥、智利到伊朗、土耳其以及苏联各共和国都在试图学习它的成功经验，正如前几代人试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一样。亚洲必须“把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亚洲价值观传给世界的其他部分……传播这一理想意味着输出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体系”。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必要促进“太平洋全球主义”，“使亚洲全球化”，并由此“决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注15）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值观是普遍的价值观，欧洲价值观是欧洲的价值观”。（注16）与亚洲普世主义伴随

而来的是亚洲人的“西方学”，它几乎是用西方的东方学曾用来描绘东方时所持的同样的否定态度来描绘西方的。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如果未来某一天印度取代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那么世界就应当准备对印度文化的优越和种姓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如何通过回归本源和克服英帝国主义留下的失去光泽的西方遗产而最终取得文明中名列前茅的位置，进行广泛的专门的研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

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人变得日益自信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力量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正如沙特的一位高级官员于1994年所解释的，“‘引进外国的东西’是好的，如闪光的或高科技的‘东西’。但从外面引进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是有害的——伊朗国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注17）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穆斯林为达到此目标所作的努力。它是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视为政治的伊斯兰教，但它只是范围更加广泛的伊斯兰教观念、实践和辞藻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再作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兴运动是主流而不是极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

的。

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约翰·艾斯波西多曾写道：

伊斯兰教在个人生活中觉醒的标志有许多：对宗教仪式日益浓厚的兴趣（参加清真寺礼拜、祈祷、斋戒），宗教节目和出版物的广泛传播，更加强调伊斯兰教的装束和价值观，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复苏。这种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复兴也伴随着在公众生活中重新坚持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取向的政府、组织、法律、银行、社会福利部门和教育机构日益增多。政府和反对派都转向伊斯兰教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和赢得公众的支持……大多数统治者和政府，包括较世俗的国家，如土耳其和突尼斯，都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力量，对伊斯兰问题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敏感和担忧。

另一位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阿里·希罗·迪斯苏基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复兴运动包括：重新确立伊斯兰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越来越多地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表现在伊斯兰教学校的大量增多和国立学校课程的伊斯兰化），更多的人遵守伊斯兰教关于社会行为的法规（例如，妇女必须蒙面、禁酒），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注18）上帝的报复是一种全球现象，但上帝，即安拉，已经在伊斯兰群体中进行了最普遍和最彻底的报复。

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的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体制僵化和腐朽的反应；都提倡回复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

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气的中间阶级有吸引力。两者都是复杂的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分支，但其中都各有两支是主要的，即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甚至约翰·加尔文和霍梅尼之间以及他们试图强加于其社会的禁欲纪律都相似。基督教改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都是根本的改革。一位清教牧师宣称，“改革必须是普遍的……改革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和职业；改革法官、低劣的执法者……改革大学，改革城市，改革国家，改革劣质学校，改革斋日，改革宗教仪式、对上帝的礼拜。”图拉比也作了类似的断言：“这种觉醒是全面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虔诚；它不仅是知识的和文化的，也不仅是政治的，它是这些的总和，是对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重建。”（注19）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一个关键方面与基督教改革不同。后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北欧；总的来说，它在西班牙、意大利、东欧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复兴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0亿穆斯林当中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无论是否喜欢它，都不能忽视它，或避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适应它。彻底的大一统总是危险的且常常是错误的，然而，有一点似乎被证明是合理的。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注20）

在大多数国家，伊斯兰化的核心要素是伊斯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团体对现存组织的控制。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教学校和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

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在埃及，20世纪90年代初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自觉地遵循发展“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的政策，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小国家，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40所伊斯兰教学校、120个古兰经学习中心。在相邻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管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包括从幼儿园到一所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学校，诊所、孤儿院、养老院，以及一个伊斯兰司法和仲裁系统。20世纪70和80年代，伊斯兰教组织扩展到整个印度尼西亚。到20世纪8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迪亚（Muhhammadiyah）的拥有600万名成员的组织，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着堪与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机构相比的社会服务。（注21）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如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普遍，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25年穆斯林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对伊斯兰教运动的政治支持的程度和构成，因国家而不同。然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趋势。总的说来，这些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大力支持。像其他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伊斯兰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这一进程的产物。他们是流动的、现代取向的较年轻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三个群体。

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

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在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学里出现了伊斯兰主义的“突破”，然后转到了其他穆斯林国家。伊斯兰主义的吸引力在技术院校、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中尤其强大。20世纪9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第二代本土化”表现在使用本国语言受教育的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因此日益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注22）伊斯兰主义者对妇女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在土耳其，老一代的世俗主义妇女和她们伊斯兰教取向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界线。（注23）一项对埃及伊斯兰教团体的好战领导人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五大特征，这些看起来也是其他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大多数是二三十岁；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注24）

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好战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的人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来自通常被称作“传统的”中间阶级的群体：商人、经纪人、小业主、小贩。他们在伊朗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为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提供了重大支持。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中间阶级中较“现代”的部分。伊斯兰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最聪明的各类年轻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数量”，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和公务员。（注25）

伊斯兰运动拥护者的第三个主要成分是新近移居城市的人。20世纪70至8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增长。涌入正在衰败的常常是原来的贫民区的城市移民，需要伊斯兰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并成为其受益者。此外，欧内斯特·格尔纳指出，伊斯兰教为这些“新迁移的民众”提供了“体面的身份”。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开

罗和艾斯尤特，阿尔及尔和非斯，以及在加沙地带，伊斯兰主义党派成功地组织并吸引了“被蹂躏和被剥夺的人们”。奥利弗·罗伊说，“革命的伊斯兰大众”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新来到城市的几百万农民，他们使穆斯林大都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注26）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有伊朗和苏丹是明确的伊斯兰政府掌权。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存在着主张某种民主合法性的政权。其他四十来个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绝大多数是非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或上述这几种情况的综合，通常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础之上，在一些情况下严重依赖于外国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试图援引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合法性。然而这些政府大多数缺少根据伊斯兰的、民主的或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为其统治辩护的任何基础。用克莱门特·亨利·莫尔的话来说，它们是“地堡式的政权”，是压制性的、腐败的、脱离其社会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可能会维持长久，它们不一定会垮台。然而在现代世界，它们改变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因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涉及可能的替代性选择：它们的继任者将是谁或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几乎所有国家，最有可能的继任政权是伊斯兰政权。

20世纪70和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几十个国家。这股浪潮对穆斯林社会有所冲击，但是冲击有限。当民主运动获得力量并在南欧、拉丁美洲、东亚外围和中欧取得政权时，伊斯兰运动同时也在穆斯林国家获得了力量。伊斯兰主义在职能上代替了基督教社会中反独裁主义的民主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似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动员，独裁政权失去了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原油价格上涨，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励的不是民主潮流而是伊斯兰主义。教士、牧师和一般信徒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社会里的反对独裁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群体、以清真寺为基础的宗教团体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在穆斯林社会中也起了类似的反对作

用。教皇是结束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主要力量，阿亚图拉则是推翻伊朗国王政权的主要力量。

20世纪80和90年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主导并常常垄断穆斯林社会中政府的反对派。它们的力量部分是因反对派缺乏选择余地造成的。左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信誉，然后又受到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瓦解的严重削弱。自由、民主的反对集团存在于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但它们通常仅限于数量有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有西方根基或联系的人。除个别例外，自由民主主义者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取得持久而广泛的支持。甚至伊斯兰自由主义也不能站稳脚跟。福弟·阿加米评论道，“在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社会里，撰写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就是在写承担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责任后便失败了的人的讣告。”（注27）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会的普遍失败，是从19世纪末以来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失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社会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冷淡态度所致。

伊斯兰运动成功地主导了反对派，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这种成功也得到那些政权的政策的很大帮助。冷战期间有许多政府，包括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约旦、埃及和以色列，曾在不同的时期鼓励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抵制共产主义或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至少直到海湾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向各类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主义集团提供了巨额资助。伊斯兰集团主导反对运动的能力也由于政府对世俗反对运动的镇压而增强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一般与世俗的民主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成反比，而其力量在诸如摩洛哥和土耳其那样的允许某种程度多党竞争的国家比在那些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国家要弱。（注28）然而世俗反对派比宗教反对派更容易受到镇压。后者可以在清真寺、福利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感到不能镇压的穆斯林机构组成的网络内部或背后活动。自由民主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保护层，因此更容易被政府控制或

清除。

为了预先控制伊斯兰主义趋势的增长，一些国家的政府扩大了在国家所控制的学校里的宗教教育，而这种教育常常受到伊斯兰主义教师或观点的支配，政府还扩大了对宗教机构和宗教教育机构的支持。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证据，而且政府通过对它们的资助，扩大了对伊斯兰教机构和教育的控制。然而这些也导致了大量学生和人们接受伊斯兰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和为伊斯兰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战毕业生的吸引。

复兴运动的力量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号召力导致政府提倡伊斯兰制度和习俗，并把伊斯兰的象征和习俗纳入了其政权。在最广泛的层次，这意味着确认或再确认他们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征。20世纪70和80年代，政治领袖急于使其政权和自己认同于伊斯兰教。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前途，他谈到建立“伊斯兰民主”和“使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国王哈桑强调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孙和他作为“信徒的指挥官”的角色。文莱的苏丹先前并不因推崇伊斯兰习俗而知名，后来却变得“日益虔诚”，并把他的政权确定为“马来人的穆斯林君主政体”。突尼斯的本·阿里开始经常地在演讲中祈求安拉保佑，并“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的长袍下”，以制约伊斯兰教集团日益增长的吸引力。（注29） 20世纪90年代初苏哈托明确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原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宪法中被删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的认同首次面临严重挑战。（注30） 为了突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政府领袖如奥扎尔，苏哈托，卡里莫夫，都急于去朝觐。

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兰化的法律行事。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概念和习俗被纳入了世俗法律体系。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由于拥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实行了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注31） 在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经济伊斯兰化。

它引入了伊斯兰教的刑罚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体系，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该国的最高法律。

像其他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样，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其潜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趋势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复到伊斯兰教的观点、习俗和体制，为现代化提供指导方向和动力。（注32）

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西方权力和特权衰落的产物……当西方失去了其全盘支配地位后，它的理想和体制也失去了光彩”。更具体地说，这一复兴运动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所刺激和推动，它大大地增加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改变了它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如约翰·凯利当时所评论的，“对沙特人来说，使西方人遭受屈辱的惩罚无疑使其倍感满意；因为这些惩罚不仅是沙特阿拉伯权力和独立的表现，而且也正像他们想要显示的那样，显示了他们对基督教的轻蔑和伊斯兰教的杰出”。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行为“如果放在其历史的、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环境里来看，就不过是使基督教的西方屈从于穆斯林的东方的大胆尝试”。（注33）沙特、利比亚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用它们的石油财富来刺激和资助穆斯林的复兴，穆斯林的财富导致它们由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转向倾心于自己的文化，并愿意在非伊斯兰社会中坚持伊斯兰教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西方的财富以前被看作西方文化优越的证据一样，现在石油财富也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优越的证据。

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

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在2.0%以上，常常超过2.5%，有时达3.0%以上。例如，1965至1990年，马格里布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65%，从298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其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口以每年3.0%的比率递增。同一时期，埃及人口的增长率为2.3%，由2940万增加到5240万。在中亚，1970—1993年间，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2.9%，乌兹别克斯坦为2.6%，土库曼斯坦为2.5%，吉尔吉斯斯坦为1.9%，但人口几乎有一半是俄罗斯人的哈萨克斯坦增长率仅为1.1%。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5%，而印度尼西亚年增长率是2.0%以上。总之，正如我们所提到的，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0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注34）

马格里布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顶峰并正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将很大，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将感觉到这一增长的影响。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图5.2）。此外，这个年龄组的人将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这一结合具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据说，“基督教新教改革是历史上杰出的青年运动的范例之一。”杰克·戈德斯通曾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注35）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口对政治的冲

击。然而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注36） 40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20世纪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80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的激增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其他国家将于下世纪初达到顶峰（表5.1）。所有这些国家实际的或预测的高峰，除了沙特阿拉伯一个例外，均在20%以上；预计沙特阿拉伯青年人口的增长在21世纪头10年达到高峰，只是略低于20%。这些青年人为伊斯兰教组织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力军。或许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这一数字也达到了这个高度，此时正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公众支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膨胀也出现了潜在的重大的地区差异（图5.3）。尽管必须谨慎地对待数据，但预计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青年人口的比例在世纪之交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青年人口的激增在海湾国家将仍然会很高。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注37） 根据这些预测，这种威胁将持续到21世纪。

表5.1 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激增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2000—2009 年	2010—2019 年
波斯尼亚	叙利亚	阿尔及利亚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巴林	阿尔巴尼亚	伊拉克	土库曼斯坦	马来西亚
阿联酋	也门	约旦	埃及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	摩洛哥	伊朗	叙利亚
埃及	突尼斯	孟加拉国	沙特阿拉伯	也门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科威特	约旦
	马来西亚		苏丹	伊拉克
	吉尔吉斯斯坦			阿曼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15—2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或预计达到高峰（几乎总是大于20%）的10年。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的高峰出现两次。

资料来源：见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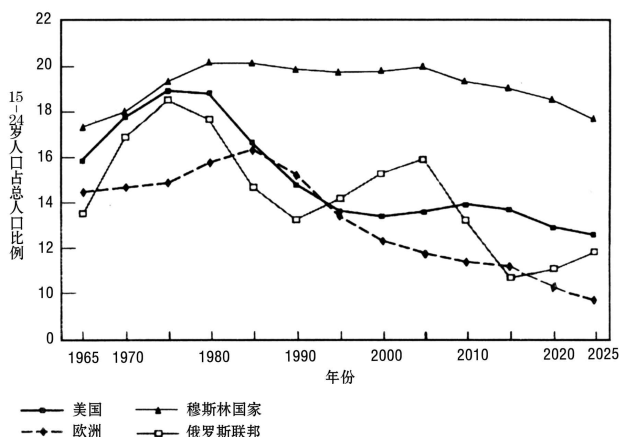


图5.2 人口挑战：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西方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预测，1994年修订版》（纽约：联合国，1995年）；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性别和年龄分布，1994年修订版》（纽约：联合国，1994年）。

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

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增长约50%；在叙利亚将超过10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青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注37）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导致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停滞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增长了24%，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6.5%，这在中亚共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注38）同样，阿尔巴尼亚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也难以让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放心。以色列人关注巴勒斯坦人的高增长率。西班牙本身的人口年增长率不到0.2%，它感到不安的是，它的马格里布邻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西班牙的10倍以上，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西班牙的大约十分之一。

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增长率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后也没有明显地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其他出现亚洲“经济奇迹”国家的增长率也会下降，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

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21世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到那时，好战者、老战士和移民的队伍将缩小，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见第十章）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减少。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虽不会变得密切，但冲突会减少，准战争（见第九章）可能会让位于冷战，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类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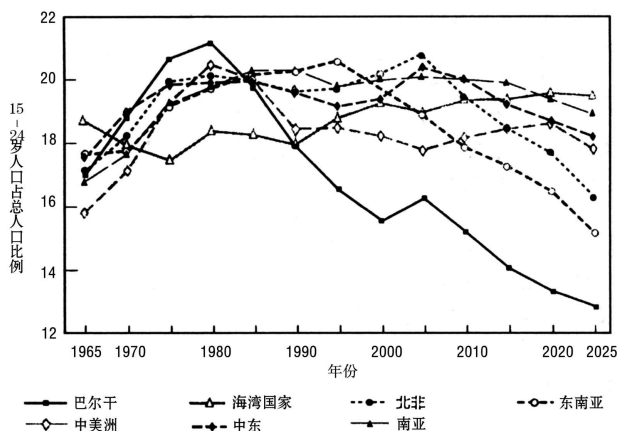


图5.3 穆斯林青年人口的激增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预测，1994年修订版》（纽约：联合国，1995年）；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性别和年龄分布，1994年修订版》（纽约：联合国，1994年）。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 and 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 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可以不结盟，许多国家是这样；也可以改变结盟，从一方倒向另一方，有些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及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来作出选择。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

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在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恪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与中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的主要

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的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义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励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来，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注1）

与此同时，在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土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它们，一面抑制冲突。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火。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然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

或依赖于中国大陆。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旧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政治家呼唤，公众认同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包括“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在一个时代形成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联盟形式会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然而，它们可能会变得更虚弱、更没有意义，因而必须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毫无疑问，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削弱。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联盟，它与以色列事实上的联盟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也是这样。像东盟那样的多文化的国际组织在保持一致性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超级大国的伙伴，现在则重新确定它们的利益，寻求反映它们各自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联合。曾依赖西方支援以对抗苏联影响的非洲国

家，正日益转向南非，寻求它的领导和援助。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经典性的例子是，1914年德国工人不得不在认同国际无产阶级还是认同德意志人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单一方面的认同通常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然而，狭隘的认同不一定与广泛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军官可以从体制上认同他的连队、团、师和军种。同样，一个人可以从文化上认同他或她的部族、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较低层面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可能会使其在较高层面也更加凸显。正如伯克所说：“对整体的爱不会因对一排人次要的偏爱而消失……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属于的这一小排人，是博爱的第一原则（正如过去一样，它是博爱的幼芽）。”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就是部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其次，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论证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

界定。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穆斯林对待伊斯兰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

1. 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
2. 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3. 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
4. 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信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中东的穆斯林认同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人和车臣人。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俄罗斯人认同并支持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东正教的民族。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

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涉及文化问题。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

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一个自己的寺庙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也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同样，法国当局或穆斯林学生家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妥协，即：允许穆斯林女生在校期间每隔一天穿戴一次穆斯林服饰。像这类的文化问题答案只有是或不是。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包括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在。”（注2）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文化与经济合作

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耳闻了许多区域主义或世界政治区域化的高谈阔论，在世界安全日程上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主要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次要大国如瑞典和土耳其，明确从区域的

角度重新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间的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许多人预言，欧洲、北美、东亚可能还有其他区域会出现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然而，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像在巴尔干区域或中东区域的情况一样，它们可能被文明内部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割裂。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结果，尽管时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与成员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构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 自由贸易区

2. 关税同盟

3. 共同市场

4. 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同质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多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在西欧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西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知道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东亚存在着五种（如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就是六种）文明，结果它成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础上建立有意义的组织的试验场。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亚没有可与北约相比的安全组织或多边军事联盟。成立于1967年的多文明区域组织东盟，其成员国包括一个中华文明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两个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面临着共产党的暴动的积极挑战及来自北越和中国的潜在挑战。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们也全都在各自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军备削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注4） 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

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注5）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者势必开始互相攻击”。（注6）东盟及附属机构证明了许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无疑共同拥有使它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这个核心论坛将包括东盟国家、缅甸、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和日本。马哈蒂尔论证说，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它不应因设在东亚“就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地缘性集团，它也应被看作一个文化集团。尽管东亚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亚洲人也应当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它的目的是增加“亚洲具有共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注7）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不属于亚洲。然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日本和中国的参与。马哈蒂尔曾呼吁日本参与进来，他对日本听众如是说：“日本是亚洲的，日本是东亚的，你们不能无视地缘文化的事实，你们属于这里。”（注8）然而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是其国内在是否应认同亚洲这一点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它就将主导这个论坛，这可能引起

中国方面的激烈对抗，同时在成员国中引起恐惧和不安。几年来，盛传日本要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平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日本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团尚未实现。

尽管东盟进展缓慢，日元集团仍然是一个梦想，日本动摇不定，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原地踏步，但是，东亚的经济相互作用却急剧增强。这一增加是基于东亚华人社会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以华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持续的非正式一体化”，它在许多方面可与汉萨同盟相媲美，“也许还会导致事实上的中华共同市场”。（注9）在东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注10）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国家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的褊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注11）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较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协调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

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年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

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表。（注12）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贸易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6%，而1989年增长到58.9%。北美和东亚的区域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安第斯条约的复兴促进了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的急剧增长，1990年至1993年，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两倍，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阿根廷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有了重要的增长。东亚内部贸易的扩大也远比与外部贸易要迅速，但它的扩大因日本倾向于关闭市场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东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大陆）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30%，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3%下降到13%。1992年，中华文化圈对圈内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共同体出口的总和。（注13）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

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注14）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文明的结构

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文明也有政治结构，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

核心国家的数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日本文明实际上与单一的日本核心国家相等。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海外华人、“近邻”的俄罗斯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历史上，西方通常有几个核心国家，现在它有两个核心，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这部分地

要归因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它们曾瓜分了非洲和中东，在更早的世纪里还不那么明确地瓜分了拉丁美洲。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这在第七章中将要讨论。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至伊比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巴西就疆域、资源、人口、军事和经济能力来说有资格成为拉丁美洲的领袖，可以设想它能够做到。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因此，拉丁美洲有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任何一个潜在的核心国家承担撒哈拉以南非洲领导的能力，都受到了该地区分为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现状的限制。科特迪瓦一度是讲法语的非洲的核心国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联系。最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国家，疆域、资源和地理位置使尼日利亚成为潜在的核心国家，但其文明内部的不团结、严重腐败、政治动荡、压制性政府以及经济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扮演这一角色的能力，尽管它偶尔也能这么做。南非通过协商和平地实现了从种族隔离体制的过渡，其工业能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其军事能力、自然资源，以及黑人和白人共同担任政治领导的周密体制，都明显地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的领导，也许还是英语非洲的领导。并有可能成为整个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领导。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孤立的，原因在于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科普特（基督一性论）东正教、它的帝国历史，以及它与周围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宗教差别。海地的精英传统上津津乐道于与法国的文化联系，海地的克里奥耳语、伏都教、革命奴隶的出身以及野蛮的历史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孤独的国家，西德尼·明茨注意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一面，但海地独自归入一类”。结果，在1994年海地发生危机时，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把海地看成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因而不愿意接受海地的难民，尽管它们接受古巴的难民。正如巴拿马的当选总统所说，“在拉丁美洲，海地不被看作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海地人讲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道德基础和不同的文化。总的说来他们（与拉丁美洲）格格不入”。海地与讲英语的加勒比黑人国家同样存在着隔阂，一位评论者注意到，“格林纳达人或牙买加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就像艾奥瓦州的人或蒙大拿州的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一样”，海地“这个无人要的邻居”真正是一个没有亲族的国家。（注15）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在其他国家中，日本移民要么在数量上不重要，要么被那些国家的文化所同化（如日裔美国人）。日本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民族、种族和宗教集团。许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这些国家中，这些集团的差异或冲突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裂的程度通常随时间而变化。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

时，可能就会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离运动。如果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一致，人们可能会通过种族灭绝或强制移民来使之一致。

属于同一种文明但拥有不同文化集团的国家，可能会因已发生的分离（捷克斯洛伐克）或可能发生的分离（加拿大）而产生深刻的分裂。然而，深刻的分裂更可能在这样一个分裂国家中出现，在其中，大的集团分别属于不同文明。当属于某种文明的一个大集团企图把这个国家作为其政治工具，使它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成为这个国家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时，这种分裂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常常会有所发展，如印度的印度教徒、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曾试图做的那样。

其领土横跨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国家，面临着维护统一的特殊问题。在苏丹，穆斯林的北方和主要是基督教的南方之间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同样的文明分裂几十年来一直纠缠着尼日利亚政治，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分离战争以及政变、暴乱和其他暴力行为。在坦桑尼亚，信奉基督教泛灵论的大陆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桑给巴尔已经疏远，它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国家。1992年，桑给巴尔偷偷地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然后在坦桑尼亚的劝导下，又于第二年退出了该组织。（注16）同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在肯尼亚造成了紧张状态和冲突。在非洲之角，主要是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相互分离，然而，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中间仍留下了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文明断层线分裂的其他国家还有：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徒和泰米尔印度教徒）、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和马来穆斯林）、中国（汉族、藏传佛教徒、突厥穆斯林）、菲律宾（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和帝汶岛的基督教徒）。

在冷战时期，那些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的共产党集权政府强行结合在一起的分裂国家中，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后果最为明显。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文化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吸引和排斥的磁石。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了，并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分裂成一些新的实体：在苏联有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新教和天主教）、沿岸各东正教共和国以及各穆斯林共和国；在南斯拉夫，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东正教的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而这些承继的实体仍然包括多文明的集团，第二阶段的分裂表明了这一点。波黑被战争分成塞族区、穆斯林区和克族区，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在克罗地亚相互开战。在位于斯拉夫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内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居多的科索沃，极难维持持久和平，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少数与斯拉夫东正教多数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许多苏联共和国也横跨文明断层线，部分是由于苏联政府在划界时故意造成一些分裂的共和国，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被并入了乌克兰，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并入阿塞拜疆。俄罗斯有几个相对较小的穆斯林群体，最明显的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坦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苏联的政策造成的。乌克兰被分成讲乌克兰语的东仪天主教民族主义的西部和讲俄语的东正教的东部。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来自两种或更多文明的主要集团事实上在说，“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我们属于不同的地方”，排斥力使它们分开，而别的社会的文明的磁石又将它们吸引。相比之下，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则是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中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在说：“我们是一个民族，并共同属于一个地方，但我们想换个地方。”与分裂国家的人民不同，无所适从的国家的人民在他们是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哪一个文明是他们的文明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一部分重要领导人抱有基马尔主义战略，决定他们的社会应当摒弃非西方的文化和体制，应当加入西方，应当既现代化也西方化。俄罗斯自彼得大帝起就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独特的欧亚东正教文明核心的问题

上发生了分歧。当然，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一直试图实现现代化和西方化，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墨西哥把自己定位为与美国相对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之久。20世纪80年代，由于其领导人试图把它重新定位为北美社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试图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西方并使之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因而从相反的方向造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这两个现象证明了无所适从的国家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而观察家则把它们说成是“两面人”。“俄罗斯人面向西方——也向东方”，“土耳其：东方，西方，哪一个最好？”“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分裂的忠诚”，这些都是强调无所适从的国家认同问题的最典型的文章标题。（注17）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罗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罗斯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

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又在俄罗斯人中点燃了关于俄罗斯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以下这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欧洲之行中发现，俄罗斯不仅不同于欧洲，而且与欧洲相比也很落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来像欧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方的单词和短语，然而，他将俄罗斯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置于首位：创建了一支海军，引进了征兵制，建立了国防工业，设立了技术学校，并派人到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了最新的有关武器、轮船、造船、航海、管理体制及其他对于军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识。为了进行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扩大了税收体制，而且在其统治的晚年，改组了政府结构。彼得大帝决心使俄罗斯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

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并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目的是使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罗斯贵族的势力从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注18）。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紧地束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罗斯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开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列宁、斯大林，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罗斯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罗斯，主张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罗斯的历史教训在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为他们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罗斯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罗斯人，就是伤害了一个鞑靼人。”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

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罗斯人要用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下来的制度；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注19）在其后的俄罗斯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向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罗斯不落后，那么俄罗斯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罗斯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俄罗斯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事实上，革命使俄罗斯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它们与西方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观点的大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

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罗斯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的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那些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着自决和民主；而那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苏联帝国的胜利。然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和萨哈罗夫之辈都向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戛然而止。随

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它由于负有联结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迥异。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注20）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延展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夫所主张和集中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被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着有利于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注21）具有这种主张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的利益，削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罗斯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连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

方，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罗斯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罗斯人所作的抽样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注22）同样，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罗斯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注23）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尔（又译凯末尔）·阿塔蒂尔克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基马尔抛弃了多民族帝国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然后，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他还废除了哈里发的职位（哈里发是宗教权威的主要来源），撤销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庭，代之以建立在瑞士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律制度。他还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

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译者注）。他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越突出的扫盲问题”。（注24）20世纪30年代，基马尔在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认同之后，积极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西方化与现代化携手并进，并预定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内战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战后，迅速地认同了西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它通过游说最终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进一步证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它接受了西方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土耳其与西方的这种联系与它对西方的认同，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并被伊斯兰国家攻击为亵渎神明。（注25）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为西方和欧洲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继续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与西方的一种密切的组织联系，对于平衡希腊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击伊拉克的

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从而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注26）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威胁的意愿，跟它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注27）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联盟确实与土耳其一起协商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员资格看来仍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而且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000万穆

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正如奥扎尔总统在1992年所说的，“土耳其的人权记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盟的虚构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欧洲官员也赞同欧洲联盟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土耳其太贫穷，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强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魇”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注28）

在抛弃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后，土耳其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转向塔什干。奥扎尔总统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作了极大的努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外部土耳其人”的联系，并特别注意与阿塞拜疆及四个讲突厥语的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1991年和1992年，土耳其开展了一系列的广泛活动旨在加强它与这些新共和国的关系及维持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7900万美元的直接紧急援助、卫星电视（以取代俄语频道）、电话通信、航空服务，以及为数千名来土耳其学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土耳其为中亚和阿塞拜疆的银行家、商人、外交官及几百名军官提供训练。土耳其的教师被派往那些新共和国教授土耳其语，并开办了大约2000家合资企业。文化的共性促进了这些经济关系。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评论的：“在阿塞拜疆或土库曼斯坦，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伙伴，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并非难事，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语言，饮食习惯也相同。”（注29）

土耳其重新倾向高加索和中亚，不仅是被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

体的领袖的梦想所激发，也是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区域扩大的影响、防止鼓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需要。土耳其人认为自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思想”作为另一种选择，即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市场经济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土耳其人希望遏制俄罗斯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可能通过提供俄罗斯和伊斯兰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从欧洲联盟那里得到对其要求的支持并最终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土耳其与突厥语族各共和国的活动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原因在于土耳其的资源有限，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奥扎尔去世后继任总统，以及俄罗斯在它认为是其“近邻”的国家重新确立了影响。苏联的突厥语共和国刚刚独立时，它们的领导人曾涌向安卡拉，向土耳其献殷勤。随后，在俄罗斯的软硬兼施下，它们又转变过来，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然而，土耳其人继续努力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是与有关政府和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修建一条把中亚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境内运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注30）

当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其与苏联突厥语共和国的联系时，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认同在国内受到了挑战。首先，对土耳其来说，正如对许多国家一样，冷战的结束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混乱引发了“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的重大问题，（注31）对此，宗教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久的阿塔蒂尔克和土耳其精英的世俗遗产越来越受到猛烈攻击，海外土耳其人的遭遇倾向于刺激国内的伊斯兰情绪。从西德回来的土耳其人“求助于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来回击西德对土耳其人的敌意，那就是伊斯兰教”。主流舆论和实践越来越伊斯兰化。据报道，1993年，在土耳其，“留伊斯兰式胡须的男人和戴面纱的妇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一些书店里充斥着颂扬伊斯兰历史、戒律和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奥斯曼帝国在维护穆罕默德先知的价值

观中所起的作用的书刊、磁带、光盘和录像带”。据说，有“290多家出版社和印刷厂，包括4种日报在内的300多种出版物，大约100个未经注册的广播电台和大约30个同样未经注册的电视频道，全都在宣传伊斯兰教思想”。（注32）

面对伊斯兰情绪的增长，土耳其统治者试图采纳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并接受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的号称世俗的政府维持着一个预算大于其他某些部门的宗教事务署，它还资助修建清真寺，要求所有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并为伊斯兰学校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教学校的数量增长了4倍，注册就读的学生占中学生的15%，这些学校讲授伊斯兰教教义并且有数千名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与法国禁止穆斯林女学生戴面纱一事形成象征性的也是鲜明的对比的是，在阿塔蒂尔克禁止戴土耳其帽70年后，土耳其政府实际上允许女生戴传统的伊斯兰头巾。（注33）政府的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中占上风，它证实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伊斯兰主义者掀起的旋风是多么强劲。

其次，伊斯兰教的复兴改变了土耳其政治。政治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扎尔，公开认同穆斯林的象征和政策。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加强了本土化和向宗教的回归，“由于急切地想讨好民众并赢得选票，政治家，甚至军人——世俗主义的堡垒和卫士——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宗教热望：他们作出的许多让步都带有蛊惑人心的味道。”民众运动具有宗教倾向。尽管精英和官僚集团，特别是军人，倾向于世俗化，伊斯兰情绪也在军队内部表现出来。1987年军事院校的几百名学员因被怀疑有伊斯兰主义情绪而受到清洗。主要政党越来越感到在选举时需要寻求某些复兴的穆斯林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在过去曾被阿塔蒂尔克所禁止。（注34）在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在5个主要政党中，只有原教旨主义的繁荣党获得选票的份额有所增加，它获得了大约19%的选票，而相比之下奇莱尔总理的正确

道路党只得到了21%的选票，已故的奥扎尔的祖国党得到了20%。繁荣党控制了土耳其的两个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并在土耳其南部地区日益壮大。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繁荣党赢得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选票和议席，并在6个月后与一个世俗党联合接管了政府。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来自年轻人、从国外归来的移民、“被压制和被剥夺者”以及“新的城市移民和大城市中的无套裤人”。（注35）

第三，伊斯兰教的复兴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海湾战争中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边，期望这一行动能促进欧洲共同体接纳其为成员国。然而，这一愿望并未实现。而北约在一旦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受到伊拉克攻击时北约应作何反应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这使得土耳其人无法确信，当他们的国家受到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时，北约将会作何反应。（注36）土耳其领导人试图扩大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联系，但遭到本国伊斯兰教徒的激烈批评。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扩大了它与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联系，90年代它向阿塞拜疆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重大支持来积极促进伊斯兰的利益。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方面，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伊斯兰化。

多年来，土耳其具备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转变文明认同的三个最起码条件中的两个，即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这一行动，公众也默认了这一行动。然而，西方文明的精英们却不接纳土耳其。当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时，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公众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绪，并开始损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亲西方的倾向。土耳其在完全成为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它在苏联突厥语共和国中起支配作用的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侵蚀阿塔蒂尔克遗产的伊斯兰倾向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使人确信土耳其似乎仍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土耳其领导人通常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反映了这些互相矛盾的拉力。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1993年争

辩说，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又是“中东的一部分”，并“在物质上和思想上成为两种文明的桥梁”。奇莱尔在国内公开场合中常常以一个穆斯林的形象出现，也反映了这种矛盾；然而她在北约讲话时坚持说，“地理和政治的事实是，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统同样将土耳其称为“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即从欧洲延伸到中国的地区中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注37）然而，联结两个牢固实体的桥梁只是一种人工的架设，而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的一部分。当土耳其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国家说成是一座桥梁时，亦委婉地证实了它是无所适从的。

墨西哥。土耳其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墨西哥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这样的国家。然而，它们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与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具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还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欧洲的。”（注38）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墨西哥在19世纪也被西方列强瓜分。也像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革命建立了民族认同的新基础和新的一党政治制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化，也包含了努力引进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罗斯一样，革命包含了融合和采纳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这造成了一种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新民族主义。因此，60年中，土耳其试图把自己确定为欧洲国家，而墨西哥则试图把自己确定为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年革命以来最广泛的变革努力。萨利纳斯事实上成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阿塔蒂尔克促进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在他那个时代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

题；萨利纳斯则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民主，他没有接受）。像阿塔蒂尔克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些观点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赞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萨利纳斯及德拉马德里一样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萨利纳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大量公有企业私有化，他促进外国投资，降低关税，削减补贴，调整了外债，向工会势力挑战，提高了生产率，并使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如阿塔蒂尔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从一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的欧洲国家一样，萨利纳斯的改革旨在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为一个北美国家。

对于墨西哥来说，这并非是不避免的选择。可以设想，墨西哥的精英们本来可以继续沿着先辈们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路线前进。另一种选择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极力主张的，墨西哥可以努力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国家建立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联盟。

墨西哥成为北美国家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经济、知识界的绝大多数精英都赞成这条道路。同样与土耳其的情况不同的是，北美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组。文明之间的关键问题——移民问题，突出了这一差别。对土耳其大规模移民的恐惧使得欧洲精英和公众反对接纳土耳其；对比之下，美国拥有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实，是萨利纳斯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的一部分：“你们要么接受我们的商品，要么接受我们的人民”。此外，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远远小于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它的精英历史上倾向于欧洲（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上学），最近则倾向美国（现在，他们把子女送到美国受教育）；盎格鲁—美国的北美与西班牙—印第安墨西哥相互适应，应当比基督教的欧洲与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适应容易得多。尽管有这些共同点，在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

出现了反对更密切地与墨西哥发展关系的呼声，并要求限制移民，抱怨工厂南移，对墨西哥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质疑。（注39）

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认同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公众普遍的默认，尽管不一定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公众的观点在那个国家的决策过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亲西方的立场还没有受到民主化的考验。这年元旦几千名组织良好的、并得到外部支持的游击队在恰帕斯发动了起义，这一行动本身并不表明有很多人反对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识分子、记者及其他制造舆论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暗示着，一般来说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萨利纳斯总统非常有意识地把经济改革和西方化置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先。然而，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美国越来越多的联系，将加强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化和民主化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剧地削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倾向西方的精英强加给墨西哥的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与其民主化相适应？

澳大利亚。与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中，它先是与英国，而后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在冷战期间，它不仅是西方的成员，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军事和情报核心的成员。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保罗·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认为，为确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同，这是必要的。“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出现在世界上，与亚洲交往，建立与亚洲的联系，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

而同时又依然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至少在宪法上如此。”基廷宣称，多年来澳大利亚遭受了“亲英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经济前途以及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命运受到不良影响。”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注40）

把澳大利亚重新确定为亚洲国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中，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1971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9%，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21%；至1994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2%，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4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91年，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8%，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1%。与亚洲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使澳大利亚人更加坚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的位置是在东亚集团中。

尽管有这些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亚洲策略看来不可能满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文明的任何条件。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精英还不是非常热衷于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党派争论的问题，自由党对此态度暧昧或者反对；工党政府也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大量批评。在选择亚洲的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精英共识。其次，舆论也模棱两可，从1987年至1993年，支持结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亚公众的比率从21%增至46%，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支持开始动摇和减退，支持把英国国旗图案从澳大利亚国旗上去掉的公众从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官员1992年所说，“公众很难接受它。我时常说，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亚洲的一部分，但我无法告诉你，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注41）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亚洲国家的精英对澳大利亚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欧洲国家的精英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们说得很清

楚，如果澳大利亚想成为亚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它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人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注42）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色，而是由于文化。”（注43）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同。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

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社会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注44）人们指出的差异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

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吧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脑袋坏了的大傻瓜”。（注45）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廷—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帝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垃圾”。（注46）

这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命运。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实现脱离英国的愿望的同时，可以把澳大利亚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正如基廷的前任罗伯特·霍克总理曾试图做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愿脱离英国王冠而成为共和国，它可以与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结盟，这个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也具有英国的本源，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也拥有大陆规模，也讲英语，曾是三次战争中的盟国，其人口中也是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像澳大利亚一样，亚洲人越来越多；文化上，在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价值观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价值观更符合澳大利亚。

经济上，澳大利亚不应竭力挤入一个文化上相异的集团，并因这一差异而遭到后者的排斥，它的领导人可以建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成北美—南太平洋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个集团可以协调文化和经济，并为澳大利亚提供一个坚定而持久的认同，这种认同从它旨在融入亚洲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是得不到的。

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当澳大利亚踏上追随亚洲的征途时，其他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墨西哥和俄罗斯——正试图把西方融入它们的社会，并把它们的社会融入西方。然而，它们的经历强烈地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尽管对西方的拒绝主义回应是不可行的，但基马尔主义的回应并不成功。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族、维吾尔族，俄罗斯对鞑靼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罗斯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史上反对俄罗斯的控制，却又与俄罗斯

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之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核心国家，不能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南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较缓慢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

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一个由联系更紧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

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族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东欧’这个词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社区，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他论证说，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两年后，皮埃尔·贝阿尔评论道：“一条新的断层线”正在出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或新教）为标志的欧洲为一方，以东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为标志的欧洲为另一方。类似的，一位重要的芬兰人把在欧洲取代铁幕的关键分界线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古老的文化分界线”，它位于西方欧洲内的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前奥匈帝国的土地和西欧之外的其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一位著名的英国人同意，这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广义上说，这是那

些从罗马直接接受或通过凯尔特人或日耳曼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与那些东方或东南方的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注2）

中欧人也强调这条分界线的意义。这些国家在摆脱共产主义遗产、走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们不同于那些没有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为一方、东正教为另一方的分界线划分开来的国家。立陶宛总统认为，几个世纪前，立陶宛人不得不在“两种文明”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了拉丁世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选择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组织形式”。波兰人用类似的话声称，自从10世纪，他们在拉丁基督教对拜占庭的斗争中选择了前者后，他们就一直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注3）相比之下，东欧东正教国家的人民则以矛盾的心情来看待人们现今对这条文化界线的重新强调。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到了作为西方一部分并融入它的体制的巨大的好处，但他们同时也认同于自己的东正教传统，就保加利亚人而言，他们历史上与俄罗斯和拜占庭有着紧密的联系。

欧洲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为接纳西欧组织新成员国提供了明确的标准。欧洲联盟是西方在欧洲的基本实体，1994年，随着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再次扩大了。1994年春，欧洲联盟明文规定，除波罗的海诸国以外，排除所有苏联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它与四个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联系协定”。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有一个有可能在21世纪之前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而中欧国家毫无疑问要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先获得那种资格，假如后者确实能加入的话。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文尼亚最终成为成员国看来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小国马耳他以及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请在1995年还悬而未决。在欧洲联盟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较发达的国家。如果采用这条标准，

那么，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最终将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欧盟将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正如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

文明的逻辑可以就北约的扩大推出类似的后果。冷战开始于苏联把其政治和军事控制扩大到中欧，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以遏制，如果必要的话，击败苏联的进一步侵略。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一个中心的、必须遵循的目标：通过阻止俄罗斯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冷战不再出现。作为西方的安全组织，北约适当地向那些愿意加入北约的、在军事能力、政治民主和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的西方国家开放，吸收它们为成员国。

美国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政策最初体现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方针，它体现在“和平伙伴”关系中，它对欧洲国家，实际上对欧亚国家普遍开放。这一方针也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现在自由世界的边界应当根据新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老皇历来确定。我要对所有想在欧洲划定一条新界线的人说，我们不当排除欧洲拥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到处都是民主，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到处都是为相互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较差的结果出现。”然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根据“老皇历”来确定边界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反映文明差别现实的“较差的结果”。该政府积极行动为北约成员的扩大提出标准和日程，首批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然后是斯洛文尼亚，以后有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

俄罗斯激烈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任何行动，那些被认为是较开明和较倾向西方的俄罗斯人争辩说，东扩将大大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约东扩仅限于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国家，就会向俄罗斯作出保证，它将不包括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继续保持统一）。北约东扩只限于西方国家，也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应对东正教边界内和沿边界的秩序负责。

根据文明来区分国家，这一点的有用性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是根据历史、文化、宗教来判断明显属于西方的仅有的三个苏联共和国，它们的命运始终受到西方的重大关注。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它们与苏联的合并，苏联解体时，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坚持俄罗斯人应当遵守它所同意从这些共和国撤军的时间表。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信息的含义是，他们必须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不在他们可能想在其他苏联共和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瑞典首相所说：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是“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证实了，由于西方对波罗的海诸国明确负有的责任，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复仇企图都无望实现，以此帮助了俄罗斯的民主人士。（注4）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土耳其很难在欧洲联盟获得正式成员资格，问题很大，并且它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已受到本国繁荣党的攻击；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约，除非繁荣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或者土耳其有意识地摒弃阿塔蒂尔克的遗产，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的一个领袖。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可以设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将来却不大可能实现。无论土耳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关于巴尔干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问题上，将越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注5）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绕开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而通过保加利亚—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盟国。

俄罗斯及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连，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自我民族认同感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这些国家中的

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罗斯的利益，而俄罗斯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自我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20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罗斯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格鲁吉亚在1801年以前曾是一个

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罗斯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罗斯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很大一部分人讲俄语。20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31%。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注6）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

兰，其借口是承认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注7）而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数确认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注8）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注9）。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注10）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10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注11）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

系之于西欧。（注12）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注13）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韩国、越南）。

20世纪50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中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国外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定位为世界华人的代表”。（注14）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注15）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中国大陆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的经

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注16）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注17）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注18）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

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注19）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参与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地区（占68.3%），还有台湾地区（占9.3%）、新加坡、澳门地区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地区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地区）；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地区）；一个优良的通信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中国大陆）”。（注20）当然，此外，中国大陆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入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

家。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地区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20世纪90年代初，内地在香港地区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内地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注21）至9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地区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地区。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并开始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方代表第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地区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地区撤销了到大陆旅游的禁令。（注22）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台湾地区与大陆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地区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大陆赴台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道，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150亿—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

意力集中于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于大陆。一位当地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我们认识到，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动力短缺的台湾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不平衡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注23）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高层领导人之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独立将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主权，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初，北京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际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于1995年12月进行了“立法”机构选举，随后于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港口附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

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湾如果不保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的政府相冲突。20世纪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这就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被讲普通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界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于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界定看来经历了一个演变：从整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后一个使其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门后，他们将着手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会不会促使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能的大陆军事能力的发展如何。21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新加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于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

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他于1993年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注24）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西方正好相反。对于后者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较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群体——语言或宗教社会群体，或者文明，对忠诚和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强烈。沿着从范围较窄到范围较大的实体的连续曲线，西方忠诚往往是在中间达到最高点，忠诚强度的曲线在某种程度上呈倒U字形。在伊斯兰世界中，忠诚的结构差不多恰恰相反，在伊斯兰的忠诚曲线中，中段是个空缺。恰如艾拉·拉皮德斯所说，有“两种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一方面是对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注25）一位利比亚的学者亦持类似观点：“在阿拉伯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中，部落主义和宗教（伊斯兰教）曾起过并仍然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确实。它们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被看作是形成和决定阿拉伯政治文化和阿拉伯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正如塔赫辛·贝希尔所指出的，许多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巧妙地通过联姻和其他手段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亚的发展中，至少有18个部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在

苏丹生活着大约5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12%。（注26）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在车臣人和相关的北高加索人中间，存在着100个“山区”部族和70个“平原”部族，它们如此紧密地控制着政治和经济，以至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据说车臣有“部族”经济。（注27）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就被分隔在不同的国境内。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者的团结一样。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中，尽管穆斯林集团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冲突，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却很罕见，其中两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伊拉克对邻国的侵略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国造成伊斯兰复兴的同样因素也加强了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一位学者在80年代中期评论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穆斯林国家地下的石油财富和其他因素相关联的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刺激了对穆斯林认同和团结的严重关注……现代通信加强

并发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远至中国、塞内加尔、也门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中东的大学读书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和非洲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们传播思想，建立跨国界的个人关系。在诸如德黑兰、麦加和吉隆坡这样的中心，穆斯林知识分子和乌理玛经常性地越来越频繁地举行会议和磋商……磁带（录音带和现在的录像带）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国界传播开来。因此，有影响的布道者现在的听众远远超越自己的本地社区。（注28）

穆斯林的团结意识也反映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并受到这些行动的鼓励。1969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领导人一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了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产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于197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吉达。实际上，所有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现在都属于该组织，它是唯一的这类国家间组织。基督教、东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基于宗教的国家间组织，而穆斯林各国政府却有。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亚政府发起并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会（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联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认为具有同它们相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远的政权、政党、运动和事业”，这些组织又“增进了信息和资源在穆斯林之间的流动”。（注29）

然而，伊斯兰意识能否发展为伊斯兰凝聚力涉及两个矛盾。首先，伊斯兰世界因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开。沙特阿拉伯领头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部分是为了与阿拉伯联盟相抗衡，后者当时受（埃及的）纳赛尔的控制。

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苏丹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以便与沙特阿拉伯控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初在喀土穆召开，来自80个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运动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注30）除了这些正式组织以外，阿富汗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老战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团的广泛网络，这些老战士为穆斯林或伊斯兰主义事业，曾经在阿尔及利亚、车臣、埃及、突尼斯、波斯尼亚、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久经沙场。战争后，由于又有一些战士在白沙瓦外的达瓦圣战大学，以及阿富汗各种派别和外国支持者主办的军营里受到训练，他们的队伍得到了更新。激进派政权和运动的共同利益偶尔也会克服较传统的对抗，在伊朗的支持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苏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军事合作，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使用苏丹的设施，而且两国政府联合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据说，哈桑·图拉比与萨达姆·侯赛因于1994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注31）

其次，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7世纪阿拉伯人对北非和中东的迅速征服，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时达到了顶峰。随后是8世纪以巴格达为基础的、受波斯人影响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10世纪在开罗和科尔多瓦还出现了次一级的哈里发。4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中东，于1453年占据了君士坦丁堡，并于1517年确立了新的哈里发。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些突厥人侵入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

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并被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接受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下去吗？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的影响的混合体。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

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记录，关注与印度的安全问题。这最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巴基斯坦为什么要发展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20世纪70和80年代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从清真寺、教科书到政党、伊斯兰组织和恐怖主义运动，它这样做时相对来说是一视同仁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较少，地理位置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最后，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它在宪法中规定信奉世俗主义。只要土耳其继续把自己界定为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就与它无缘。

那么，假如土耳其重新给自己定位呢？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原教旨主义已在土耳其兴起；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作了广泛的努力来认同阿拉伯世界；它利用种族和语言的联系在中亚扮演了温和的角色；它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穆斯林国家中，土耳其与巴尔干、中东、北非和中亚的广泛历史联系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设想，土耳其实际上可以“充当（伊斯兰世界的）南非”：放弃与其现状相悖的世俗主义，就像南非

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从而把自己从一个伊斯兰文明的贱民变为该文明的首要国家。南非在体验了西方基督教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特别有资格领导非洲；在体验了西方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制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土耳其可能同样有资格领导伊斯兰。但是，要这样做，它就必须摒弃阿塔蒂尔克的传统，甚至要比俄罗斯摒弃列宁的传统还要彻底。它还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尔克的能力的领导人，以及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将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个核心国家。

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

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不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观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例如，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西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将自认为恰当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国家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会得到财政部长们和少数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对它的评价都是不利的。他们会赞同谢尔盖·阿尔巴托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描述：“一群热衷于夺取他人钱财、将不民主和相异的经济政治行动规则强加于人、压制经济自由的新型布尔什维克。”（注1）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及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求，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非西方国家便希望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军事

和文化的控制。东亚社会在争取与西方经济平等的道路上进展顺利，亚洲和伊斯兰国家正在寻求与西方取得军事平衡的捷径。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是一种困难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及其对抗的程度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们可以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实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由于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因而其各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西方浪潮，其标志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国家的政权从亲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转移，一些伊斯兰集团和西方之间的准战争，以及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过的安全纽带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来决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在一些地区，这一现象确已发生。然而在最近

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到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1.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的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2.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体制；3.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很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为富裕之时，其军事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伊斯兰国家最终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它也会是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西方各

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的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产设施。21世纪初期，这些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地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们在本文明内和地区内控制其他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推迟两三年，直至伊拉克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就很可能占有了科威特，并极有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中汲取了明显的教训。对朝鲜的军人来说，这教训即是：“不要让美国人集结他们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用空军，不要让他们获得主动权，不要让他们打一场伤亡极小的战争。”对一位印度高级将领来说，这个教训甚至更为明确：“不要和美国人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器。”（注2）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对你开战。”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权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

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注3）

因此，俄罗斯在其防务计划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于1995年计划从乌克兰购买洲际导弹和轰炸机，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美国的一位武器专家评论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指责俄罗斯人的那些话。现在是俄罗斯人在说‘我们需要核武器来弥补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另一个反过来的相关事例是，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使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慑作用，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中国在发展其有限核威慑战略时，对它于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并开始降调。（注4）当其他核心国家和地区强国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可能效仿它们的举动，尽量扩大其武器对西方常规军事行动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还可能更直接地威胁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可达到欧洲和北美的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扩大其导弹的射程，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也可能拥有直接打击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运载。军事分析家对诸如恐怖主义、零星游击战这类强度很低的战争，到有限战争、动用大规模常规武器的更大的战争，直至核战争的暴力范围作了界定。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量劣势的手段。过去，恐怖主义者所能进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动，在这里杀几个人，在那里摧毁一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需具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巴基斯坦，也许还有朝鲜，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装配核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更远的导弹。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视的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并为获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过巨大的努力。伊朗制订了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庞大计划，并一直在扩大其运载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宣称：伊朗“必须用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武装自己”。三年后，伊朗副总统在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说：“既然以色列继续拥有核武器，我们穆斯林就必须合作生产原子弹，而不顾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获得核武器；1995年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明确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顾一切地研制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国家据说对研制核武器也有兴趣，其中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里·马兹瑞伊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注5）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除此之外，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器。（注6）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

有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火炮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刺式导弹。（注7）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之后，两国于1990年1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座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座300兆瓦反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朝鲜提供的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

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劳动I型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目的协议。（注8）中国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广泛援助，这证明这些国家相互承担的义务和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水平。

表8.1 中国在1980—1991年间的部分武器转让

	伊朗	巴基斯坦	伊拉克
主战坦克	540	1100	1300
装甲运兵车	300	—	650
反坦克导弹	7500	100	—
火炮 / 火箭发射器	1200*	50	720
战斗机	140	212	—
反舰导弹	332	32	—
地对空导弹	788*	222*	—

*数字未全部核实。

资料来源：卡尔·艾肯伯里：《解释与影响中国的武器转让》（华盛顿：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尼尔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页。

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例如，1990年，59%的美国公众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4年，82%的公众和90%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持上述看法。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强调了核不扩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国紧急动员”，来对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对“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造成的异常巨大的威胁”。199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拥有100名工作人员的核不扩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了一个新的国防部反扩散动议，并新设了一个负责核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部长职位。（注9）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古典式的军备竞赛，研制了技术上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在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的军备竞赛却是另一种类型。西方的对手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则试图阻止它们。这不是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而是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除了口头上的争辩以外，西方核武库的规模和能力并非是竞争的一部分。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的武器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在资源、义务和技术上的竞争，它不是预先注定的。但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的竞赛结果却较容易预测。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减缓其他社会增强军事能力，却不能阻止它们。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通过出售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获取利润的商业刺激，以及核心国家和区域强国保护其地区霸权的政治企图，都削弱了美国为抑制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这一情况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扩散影响的地区强国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分歧。朝鲜的情况明显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国在朝鲜核武器发展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场心理危机。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明确声明：“不能允许朝鲜发展核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必须非常坚决。”参议员、众议员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们讨论了对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必要性。美国对朝鲜核计划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它对全球核扩散的考虑。朝鲜的核力量不仅会使美国在东亚可能采取的行动受到遏制和复杂化，而且，如果朝鲜出售核技术和武器，还会影响美国在南亚和中东的行动。

另一方面，韩国却将核弹与其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许多韩国人将朝鲜的核弹视为“朝鲜的”核弹，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其他的朝鲜人，而可能用来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利益以对抗日本和其他的

潜在威胁。韩国的文武官员们明确地希望组成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这样，韩国的利益将万无一失，因为朝鲜花费了资金并为发展核弹而遭到国际谴责，而韩国最终会继承它；朝鲜的核武器和韩国的工业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一个统一的朝鲜在东亚舞台上作为一个重要角色而发挥与其身份相称的作用。结果，美国 and 韩国之间的明显重大分歧达到了这一程度：1994年，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危机。但汉城却没有任何严重危机感，这造成了两个首都之间的“惊人差异”。一位记者在1994年6月“危机”达到高潮时评论说：“始于几年前的朝鲜核武器怪现象之一，是危机感加剧了来自朝鲜的更大的危机”。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南亚国家的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差距，美国对那里核武器扩散的关切更甚于该地区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胁，而难以接受美国遏制、减轻或消除来自这两个国家核威胁的建议。（注10）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不能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一个月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说，朝鲜可能已拥有了一、两件核武器。（注11）美国随之转而对朝鲜采取胡萝卜政策，引诱它不要扩大核武库。同样，美国无法扭转或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亦无法使伊朗停止发展。

1995年4月召开的关于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该条约的期限是否应续定为无限期或者定为25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赞成无限期地延长，但其他许多国家反对作这样的延长，除非五个公认的核大国更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对延长，除非以色列签署该条约并接受安全核查。最后，美国非常成功地通过耍手腕、贿赂和威胁并用，在无限期延长的问题上赢得了压倒多数国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都曾反对无限期地延长该条约，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因而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该条约的延长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但七个穆斯林国家（叙利亚、约旦、伊朗、伊拉

克、利比亚、埃及、马来西亚）和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在最后辩论时仍提出了反对意见。（注12）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标正如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的那样，从核不扩散转向了反核扩散。这种转变是对现实的承认，即某些核扩散已无法避免。在适当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将会从反对扩散转向接受扩散，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跳出冷战思维定式，转而去促进扩散、使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话。然而，美国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坚持奉行抑制政策，而这一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实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人权和民主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国、西欧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和行动，也对西班牙、葡萄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韩国和东欧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帮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新的民主政权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欧和中欧最可能保持稳定，在拉丁美洲稳定性较差。在东亚，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国极大影响的菲律宾于80年代回到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同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也在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在苏联、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取得了成功；在东正教诸共和国中，民主制度的稳定程度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别，并且难以预测；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前景则很暗淡。至20世纪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数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都开始了向民主制的转变，但非洲是例外。

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布什政府也赞同这一看法。1990年4月，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谈到冷战后的世界，他说：“布什总统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克林顿上台之后，他建议将拨给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三分之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他的国防部长确认促进民主是该部的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并试图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职位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促进人权和民主在较小的程度上、以较不明显的方式，也在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也将此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和援助的标准。

到1995年，欧洲和美国为达到上述目标所作的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种抵制植根于伸张自身文化的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具体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的自我肯定。

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主要源于亚洲经济财富日增和亚洲国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长。亚洲的国际法专家反复地提醒西方，亚洲依赖和从属于西方的旧时代已经过去，20世纪40年代西方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控制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一位新加坡官员说：“在亚洲促进人权的努力，必须考虑到冷战后世界实力分配的变化……西方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已经极大地减弱。”（注13）

他言之有理。美国和朝鲜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被恰当地称

为“有条件的投降”，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屈服，则是无条件的投降。美国曾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便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给面子的冷遇。美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是放弃原先的政策，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中国对美国软弱表现的回应是继续并强化克林顿政府所反对的做法。美国政府在与新加坡就一位美国公民遭鞭笞、与印度尼西亚就其在东帝汶施行暴力镇压的问题打交道时，也采取了退缩的态度。

亚洲国家政权抵抗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能力，还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企业急切地想要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投资，因而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干扰它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此外，亚洲国家将西方的压力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便会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是否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关系到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湾、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益。日本政府通常与美国的人权政策保持距离。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说：我们不会让“抽象的人权观念”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东盟国家不愿意对缅甸施加压力，而且于1994年欢迎它的军人政府参加会议；而欧洲联盟，正如其发言人所说的，不得不承认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为它不得不与东盟对缅甸的态度保持一致。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诸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对批评它们或者参与它们认为令人不愉快行动的国家 and 公司实行“反条件限制”。（注14）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注15）然而，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西方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教。经济增长会加强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看，它

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亚洲国家实现。

与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相比较，西方在联合国机构中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总的说来是一无所获。除个别例外，比如除了对伊拉克的谴责以外，有关人权的决议在联合国的投票中总是被否决。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他国家政府总是不情愿支持被许多人视为“人权帝国主义”的努力。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个西方国家提出谴责缅甸军人政府的提案，但由于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被否决。谴责伊朗践踏人权的决议亦被否决，而且20世纪90年代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中国都能够动员亚洲国家的支持，否决由西方发起的对其侵犯人权表示关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议案，谴责印度在克什米尔侵犯人权的行为，但遭到与印度友好的国家的联合反对，而巴基斯坦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曾是攻击目标的中国和伊朗也表示反对，并且劝巴基斯坦撤销提案。《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未能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残暴行为进行谴责，它便“因失职而认可了印度的行为。其他国家也正在逍遥法外：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逃脱了谴责。人权委员会就是这样支持了施行屠杀和酷刑的政府，这与它的创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注16）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权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西方实现其目标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6月的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欧洲和北美国家形成一方，由大约50个非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形成另一方，后者中最活跃的15个成员国包括1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1个佛教国家（缅甸），4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儒教国家（新加坡、越南、朝鲜和中国），9个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苏丹和利比亚）的政府。这个亚洲—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

国家，它们经常支持西方；还有非洲和东正教国家，它们有时支持西方，但更经常的是持反对西方的立场。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人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维也纳会议召开之前两个月，亚洲国家在曼谷聚会并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强调：人权必须“置于国家和地区特性，以及各种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来考虑；人权状况监督侵犯了国家主权；将人权状况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有悖于发展权。在上述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维也纳大会最后预备会议（5月初于日内瓦召开）产生的几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号，以标明一个或更多国家不同意。

西方国家没有为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作好准备，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会议中比其对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结果，除了对维护妇女权利表示强烈支持外，大会通过的宣言只是个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权支持者评论道：这是一份充满“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亚洲—伊斯兰联盟的胜利和西方的失败。（注17）维也纳宣言没有明确地表示对言论、新闻、集会和宗教自由的赞同。因而，它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比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软弱。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权力的衰落。一位美国人权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国际人权制度已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即使有1992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欧洲也不过是个半岛。现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

约对于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那样重要。”一位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亚洲评论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没有完全进入犹太—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现在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将决定新的国际人权政治，并将带来更多的冲突机会。”（注18）

另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就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不断取得胜利，其方法就是到处显示它的重量”。（注19）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票数处于劣势和失去调动权的西方，却在几个月之后获得了反对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争取在北京举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为得到举办权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在中国，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公众的期望也很高；中国政府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也来助威。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都强烈地反对选择北京。尽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各国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文明划分的。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据说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所得票数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随后几轮的投票中，当伊斯坦布尔被排除之后，绝大多数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将其选票投给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彻斯特退出之后，这两个城市原先得到的绝大部分选票又转给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轮中获得了胜利，使中国遭到惨败。中国则把这笔账都记在了美国身上

8.1。李光耀说：“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降低了中国的威望……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注20）毫无疑问，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体育而不是人权。但是，鉴于西方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在人权问题上遭到的失败，这一显示西方“影响”的孤立事件仍会令人想到西方的虚弱。

不仅西方的影响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

国面临着“友好的暴君”的问题：在那一时期，反共的军人政府和独裁者是冷战中的有用伙伴，与它们合作，成为难题。当这些政权粗暴地践踏人权时，这种合作会令人不安，有时会令人尴尬。然而，西方辩解说，这种合作是较少有害的，因为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产主义政权那样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它们维持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也较容易接受美国和其他的外部影响。为什么不接受一个较为不野蛮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更野蛮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战后的世界，在一个友好的暴君和一个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间作选择可能更为困难。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设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会的政府不一定亲西方，因为在那里，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人干涉并取消了明显地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令西方人如释重负。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繁荣党、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被赶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国政府放下心来。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进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较民主的政权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中，竞争几乎肯定会导致远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国，通过公民选举上台的政府，很可能会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那些世纪里，不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迁移是相对平和的，在另一

些情况下却充满了暴力。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信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注21）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0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的流入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1965年，美国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彻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80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并造成了新的移民来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1990年，估计有2000万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国，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为1970年的两倍；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25%，纽约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约有830万人进入了美国，在90年代的前4年这一数字大约是450万。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据信大量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90年代中期，大约有400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注22）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注23）

20世纪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战来自人口——移民占西欧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群，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

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敌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敌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注24）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46%认为黑人太多，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的街区，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20%不愿意有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注25）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20世纪90年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但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80年代的约5%升至90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

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23%。
(注26)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义分子都参与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穆斯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权势集团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穆斯林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征、政策和实践普遍变得更伊斯兰化。欧洲的主流政党则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党的辞藻，并推行它们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存在着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地方，伊斯兰主义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可望达到大约20%。只有当不存在可能代替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政党时，反对党才能打破这个比率，正如阿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意大利的情况那样。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的政治领袖竞相对反移民情绪作出反应。在法国，希拉克于1990年宣布“必须完全停止移民”；内政部长帕斯卡于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对移民的立场。移民是1993年议会选举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并明显地有助于保守政党的胜利。90年代初，法国政府改变了政策，使外国人子女入法国国籍、外国人家属移民、申请避难，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国签证变得更为困难。非法移民被驱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当局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在德国，科尔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对移民问题表示了关切，政府最重要的举动是修订了德国宪法第16条（该条规定“为受到政治迫害

的人”提供避难），并削减了寻求避难者的福利。1992年到德国避难的人数达43.8万人，而1994年只有12.7万人。1980年，英国大幅度地削减了允许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控制在5万人左右，因而移民问题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引起严重的紧张情绪和反对。然而，1992—1994年，英国再次将批准避难人数从2万多人减至1万人以下。由于欧盟国家实现了边境开放，英国最为担心的就是非欧洲移民从大陆进入英国。在整个9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国家都愈益坚决地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话。

在美国，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稍晚于欧洲，且未引起那样紧张的情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的失业问题远不及欧洲国家严重，害怕失业不是形成对待移民态度的一个决定因素。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比欧洲更为多样化，所以担心被一个单一的外国群体所湮没的恐惧亦没有那样遍及全国，尽管在一些特定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注27） 尽管对经济的关切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但不论经济状况好坏，反对移民的人数都在持续增长，这说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众改变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一位评论家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

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便反映了这些担忧。欧洲人认为移民威胁来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还是来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太多时，认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两倍，其次是古巴、东方（没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没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国和韩国。（注28）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公众反对移民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类似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反应。鉴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右翼政党和反移民的政党虽未赢得选票，但反对移民的国际法专家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50万—400万非法移民上，对此政治家们作出了反应。如同在欧洲一样，反应最强烈的是承担移民大部分费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级。结果，佛罗里达州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每年8.84亿美元的拨款要求，以支付由非法移民引起的教育、福利、执法以及其他开支，此后又有6个州提出同样的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该州州长彼得·威尔逊极力主张不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公民权，停止由州为非法移民支付紧急医疗费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87号公民提案，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医疗、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样是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早期的立场，开始对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严格了政治避难管理制度，扩大了移民局，加强了边境巡逻，并沿墨西哥边界修筑了障碍物。1990年由国会授权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于1995年建议将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从80万减至55万，给予现有公民和居民的幼年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亲属以优先权，这一规定“激怒了亚裔和拉美裔美国家庭”。（注29）1995年至1996年，包

括许多委员会的建议和其他严格限制移民措施的立法进入了国会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总统竞选中将反对移民作为其主要政纲。美国紧随欧洲之后大幅度地削减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数量。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让·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8.2}（注30）但是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拥有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离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会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注31）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其经济得到发展并促进了西非和中非的社会流动，那么对移民的刺激和进行移民的能力也将增强，于是欧洲“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这种威胁会在何等程度上实现，也将极大地取决于非洲人口因

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少的程度，以及南非从非洲其他国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设当前的趋势和政策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拥有大约50%的白人和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实施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但即便如此，中心问题将仍然是拉美裔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体一样被美国社会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临着被同化的广泛刺激和压力。另一方面，墨西哥与其他移民有着潜在的重要不同。首先，来自欧洲或者亚洲的移民需要漂洋过海，墨西哥人却只需步行穿过边界或者渡过一条河。交通和通信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们能够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仍然认同于家乡的社会群体。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构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罗拉多连成一片的墨西哥社会。第三，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187号公民提案的斗争所明确显示的那样。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激起墨西哥人的复仇主义情绪。到一定时候，美国19世纪军事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受到21世纪墨西哥人口扩张的威胁，并为它所改变。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形势下，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它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以便使其他社会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的手段难以实现，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西方推行这些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之间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认同于

摇摆文明的程度和与之发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表8.2 按种族和民族计算的美国人口（ % ）

	1995	2020（预测）	2050（预测）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	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	25
黑人	12	13	14
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人	3	6	8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	<1	<1	1
总数（万）	26300	32300	3940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人口按年龄、性别、种族及拉丁美洲裔区分的预测：1995—2050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页。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消失。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正在形成的文明间的关系通常有从淡漠疏远到暴力对抗之不同，大多数则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鲍里斯·叶利钦所警告的：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状态。13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们与地中海区域穆斯林的“不安宁共处”状态时，创造出la guerra fria（即“冷战”）一词。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注1）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

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将探讨这些冲突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

1. 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

2. 相对军事实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

3. 经济实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

4. 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

5. 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

6. 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问题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其中，当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卷入冲突时，文化差异就会加剧冲突。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然而，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诸如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下，各核心国家在文明断层线上相互毗邻。否则，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第一，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包括核心国家在内的亲缘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参战者。然而，这一可能性会强有力地促使对立文明的核心国家设法遏制和解决断层线冲突。

第二，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伊斯兰与西方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1400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

和表面的历史现象。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度热战的关系。约翰·埃斯波西托评论道：“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中，有时陷于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注2）多少世纪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教通过最初的向外扩张，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稳定了两个世纪左右。至11世纪末，基督教恢复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占领了托莱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基督教徒试图在圣地和近东的毗邻地区建立起基督教的统治，但后来却节节败退，并于1291年失去了他们在那里的最后落脚点阿卡城^{9.1}。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伯纳德·刘易斯说道：“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注3）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然而到15世纪，潮流开始转向。基督教徒逐步地收复了伊比利亚，于1492年在格拉纳达最后完成了这项使命。与此同时，欧洲航海技术的革新使得葡萄牙人和其他人先后绕过了穆斯林的中心地带，深入到印度洋和以远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人结束了鞑靼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统治。接着，奥斯曼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于1683年再次包围了维也纳。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标志着一个长时间退却的开端，包括巴尔干东正教徒摆脱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以及俄罗斯人向黑海和高加索的急剧推进。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带来灾难的基督教徒”变成了“欧洲病夫”。（注4）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只有土耳其共和国除外。至1920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独立而未受到非穆斯林统治。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注5）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伴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萨桑帝国大规模迁移，其规模和速

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是11世纪欧洲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和“克吕尼复兴”^{9.2}的结果，这一切使得动员大批骑士和农民向圣地进军成为可能。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拜占庭人写道：就好像“整个西方，包括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以远直至海格力斯灯塔的所有野蛮人部落都开始了大规模迁移，他们踏上远征之路，带着所有的一切挺进到了亚洲”。（注6）19世纪的人口剧增再次使欧洲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涌入了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主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的共同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问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谁？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列宁所界定的这一政治中心问题，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较量的根源。然而，还存在着列宁或许会认为毫无意义的另一种冲突，即：由是与非的分歧而导致的孰是孰非的冲突。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

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两者在大量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或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它们的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领土的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相对不重要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断层线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其中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在这些暴力或者潜在的暴力冲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断层线发生的，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冲突。西方领土帝国主义的终结和穆斯林的领土扩张迄今为止尚未重新开始，这造成了一个地理上的隔离带，使西方和穆斯林群体仅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

冷战之后，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广泛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对抗正在日益加剧。例如，1991年巴里·布赞看到了社会冷战正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形成的众多原因，并指出，“在其中，欧洲可能处于前线”。

这一事态发展部分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部分是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敌对；部分是由于对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于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还部分地由于，在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的痛苦和屈辱。

此外，他还指出：“在欧洲联合进程的关键时刻，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全面认同。”因此，“西方应当拥有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它不仅能够支持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而且还能够对其采取鼓励政策。”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

斯分析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它们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策，以及推行它们的政府的层面。除了文明的冲突，它不会是别的——它或许是不理智的，然而却肯定是一个古老对手对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我们世俗的现在，以及这两者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
(注7)

在伊斯兰社会群体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响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锡德—艾哈迈德1994年说道：“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伦理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它正从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东方的中国。”一位杰出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一位突尼斯著名律师则认为，这场斗争已经开始：“殖民主义试图破坏伊斯兰的所有文化传统。我不是一个伊斯兰主义者。我认为不是在宗教之间，而是在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注8)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总的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gharbzadegi”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无论其具体的宗派形式是什么，再次确认伊斯兰教意味着摒弃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注9) 穆斯林领袖们过去的确告诉过他们的人民：“我们必须西方化。”然而，如果他们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讲这番话，一定会受到孤立。确实，我们难以找到任何一个赞扬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穆斯林，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是记者。相反，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优越性，抵制西方的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对他们的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道德的。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诱

惑力，因而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穆斯林攻击西方的，不再是信仰有缺陷的、错误的宗教——至少还算是“书本上的宗教”，而是越来越激烈地攻击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冷战期间，西方将其对手视为“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

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们，还有被西方很多人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没有哪部像法蒂玛·默尼斯所著的《伊斯兰教与民主》那样在西方受到过如此的赞扬。西方人普遍称赞该书是一个现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论。（注10）然而，在这部书中，西方的形象并未得到恭维，她指出：西方是“军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而且通过“殖民恐怖”伤害了其他国家（第3、9页）。作为西方文化标志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第8页）。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只有“西方才能够决定卫星是用来教育阿拉伯人，还是用来向他们投放炸弹……西方摧残我们的潜力，用它的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我们的生活……（它）是摧残我们，抢占我们的市场，控制我们的宝贵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海湾战争则证实了我们的感觉”（第146、147页）。西方“通过军事科研构建自己的力量，然后把研究成果卖给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被动的消费者”。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依附地位，伊斯兰必须培养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员，生产自己的武器（她没有指明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摆脱对西方的军事依赖”（第43、44页）。再重复一遍，这些并不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的阿亚图拉的看法。

不论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穆斯林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正如赛伊克·盖努希所说的：“根本问题

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员说：美国人“来到这里，希望我们变得与他们一样。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一无所知”。一个埃及记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有权利有不同的未来。”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严肃的穆斯林学术出版物都反复描述所谓的西方阴谋，以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颠覆伊斯兰体制和文化的企图。（注11）

反对西方的反应，不仅可从伊斯兰复兴运动智囊人物的攻击中，而且可从穆斯林国家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变化中看出。后殖民时期初始，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对外政策是亲西方的，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几个例外，因为它们的独立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结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朗、苏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较少认同西方或者明确反对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国家的取向和结盟关系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变化没有如此剧烈，这些国家包括突尼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美国在冷战中的两个最坚定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压力，它们与西方的关系经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

在穆斯林国家中，1995年时比10年前明显地更亲西方的国家唯有科威特。西方在穆斯林世界的亲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酋长国那样在军事上依赖西方，便是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西方。20世纪80年代末，当苏联很明显已不再可能或者不愿意向东欧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时，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如果西方明显地不再可能维持其穆斯林卫星国政权，那么它们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

源。这些是公众和领导人共同的关切。例如，在1994年11月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伊斯兰复兴”是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之时，在35000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美国公众中，有60%的人回答“是”，只有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随意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来说最危险时，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国和伊拉克。同样，在1994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当要求确认什么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时，72%的公众和61%的对外政策领导人认为是核扩散，69%的公众和33%的领导人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与伊斯兰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此外，33%的公众和39%的领导人认为是有可能扩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欧洲人的态度也大体如此。例如，在1991年春，51%的法国公众认为对法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只有8%的公众认为来自东方。法国公众最担心的4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亚26%；阿尔及利亚22%。（注12）西方的政治领袖，包括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北约秘书长于1995年宣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则指出，伊斯兰是西方在全球的对手。（注13）

在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实际上消失之后，北约的计划便日益针对来自南方的潜在威胁。一位美国军事分析家1992年说：“南方的防线”正在取代中央防线，“而且很快会成为北约的新前线”。为了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北约的南方成员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联合军事计划和军事演习，同时向马格里布各国政府请教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办法。这些假想的威胁也为大量美军在欧洲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理由。美国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说：“尽管美国在欧洲的部队不是解决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所造成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些部队确实对这一整个地区的军事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记得1990年至1991年美国 and 来自欧洲的法、英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部署吗？海湾地区的人都记得。”（注14）他或许还应加上一句，他们带着恐惧、愤怒和仇恨记得这一切。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称其为准战争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他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第二，称其为准战争，是因为除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外，它们之间的争斗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义，另一方采取空中打击、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应的断断续续的行动。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即使不将1991年1—2月在西方轰炸中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计算在内，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后实际上每年都有伤亡。在准战争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湾的“真正”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注15）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和国家的穆斯林领袖也持同一腔调。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朝鲜。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政府指责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制造者企图“对美国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争”，指责计划在曼哈顿进一步制造爆炸案的密谋者是“卷入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的“战士”。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就似乎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活动正在进行。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度的炸弹。伊斯兰参战者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美国则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除海湾战争外，双方迄今都将暴力程度控制在适当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动引起全面的战争。《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如果利比亚命令它的一艘潜艇炸沉美国的客船，美国将视其为政府的战争行动，而不会要求引渡潜艇指挥员。原则上说，利比亚特工人员爆炸客机的行动也是如此。”（注16）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曾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

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亚洲：中国和美国

多文明的大杂烩。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过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几个世纪中，能够称为国际关系的不过

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间进行的西方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些国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于18世纪加入进来，后来是日本于20世纪加入进来。欧洲是大国冲突和合作的主要场所，即使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主要战线也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西欧所有的国家都有稳定的民主制，它们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包含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几个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世界上尚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四个，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朝鲜各不相同。尽管东亚总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有朝鲜的指令性经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

除了中国的霸权在历史上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注17）20世纪末，欧洲被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复合体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构有：欧洲联盟、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等。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并没有类似的组织，而

该联盟不包括任何主要国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向经济一体化的初始形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将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它是一个比东盟更松散的论坛。此外便没有把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他重要多边机构了。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然而，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两个朝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展。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正如一份中国军方文件赞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注18）虽然在两个朝鲜或者“两个中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共性最终大概会消除这种可能性。

在东亚，反映了往日敌对关系和新经济关系的其他可能的冲突，补充和取代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对东亚安全关系所作的分析，通常把东亚说成“危险的邻居”、“准备就绪的对手”、一个“进行着几场冷战”的地区，正“倒退着”走向充满战争和动荡的“未来”。（注19）与西欧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有着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其中最重要的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岛屿争端；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潜在的还有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和印度为另一方的边境分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所缓解，但如果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争端会再次出现。暴动和脱离主义运动在棉兰老岛、东帝汶、西藏、南泰国和缅甸都存在着，并且大多得到了外国的支持。此外，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

所有的邻居，包括韩国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1993年，中国军方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确认了八个威胁到中国军事安全的地区热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东亚安全的形势总结为“非常严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欧洲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注20）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促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获得的财富，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东亚国家得以用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技术更先进的军队取代了人数众多、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由于对美国在东亚承担义务的范围日益担忧，各国的目标是在军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东亚国家继续从欧洲、美国 and 苏联进口大量武器，但它们更倾向于进口技术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国内生产先进飞机、导弹和电子设备。日本和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拥有日益先进的军事工业。鉴于东亚沿海的地理状况，它们将重点放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和空军、海军能力上。结果是，以前不具备相互作战军事能力的国家，越来越能够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注21）在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亚洲—美国冷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注22）这些同时发展的趋势始于布什执政时期，在克林顿任内速度加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

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变得更好的前景 9.3。

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为平常的话题。（注23）美国官员，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要求日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日本官员则日益强硬地抵制这些要求。与以往的争端相比较，当前的每一个贸易争端都更尖锐，也更难以解决。如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使自己有权对日本实行更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命令，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日本的抗议，而且遭到了世界主要贸易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负责人的反对。不久，日本作出了反应，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此后，美国很快“正式谴责日本”在提供政府合同时歧视美国公司。1995年春，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其后仅仅在制裁即将生效之前才达成了扭转这一局面的协议。在美日两国之间，显然发生了非常类似贸易战的行动。至90年代中期，相互的恶言恶语达到了顶点，致使日本政界要人开始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提出质疑。

在这些年中，两国公众彼此都变得越来越不满。1985年，87%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对日本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19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至1993年，只有50%的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尽可能少买日本产品。1985年，73%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友好的；1993年，64%的人认为日美关系是不友好的。1991年是公众舆论跳出冷战模式而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该年，两国在看待对方时都排除了苏联的因素。美国人第一次将日本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日本人也第一次将美国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注24）

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由学术界、知识分子和政治修正主义者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强调

美日两国在文化和结构上存在着差异，美国在处理与日本的经济问题时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美国传播媒介、非小说文学出版物和流行小说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坏。在日本，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没有体验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力量和它在战后的善行，他们为日本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非常愿意以前辈未曾使用过的方式来抵制美国的要求。日本的“抵制派”与美国的“修正派”是对等的，两个国家的候选人都发现，在影响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提倡强硬路线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邓小平于1991年9月说，两个国家的冲突构成了“一场新的冷战”，这句话曾被中国新闻界反复引用。1995年8月，政府新闻机构宣称：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员经常谴责所谓的美国对中国事物的干涉。1992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我们必须指出，美国自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来，为了建立新的霸权和强权政治，一直在到处插手，但是它的力量在相对削弱，因而力不从心。”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8月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阴谋企图。”^{9.4} 至1995年，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注25）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领土”，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否决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化学武器部件，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装置而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威胁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同时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都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违反了就导弹出口、知识产权和使用劳改犯达成的协议；在中国看来，美国允许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

出售先进战斗机，是违反了中美协议。

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很明显，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1993年6月，据说有100位中国将军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抱怨政府对美国采取“被动”的政策，未能抵制美国“讹诈”中国的行为。同年秋天，一份中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概括了军方对抗美国的理由：“由于存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既然美国人认为，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就不可能容忍在东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注26）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和各机构都照例把美国描述为敌对势力。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同中国的和解举动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政界经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态，诸如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这些举动激怒了美国，并致使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比如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做法。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

在10年里，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恶化”了。亚洲和美国关系的这一变化是如此广泛，包含了如此众多不同的问题领域，似乎不可能把其原因仅仅归结于个别的利益冲突。例如一方面的汽车零部件、照相机销售或者军事基地问题，另一方面的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武器销售、知识产权问题。此外，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时变得更紧张，显然于其国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强权政

治的基本原则，美国应当利用两者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或者至少在与一方的冲突加剧之时，设法改善与另一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加剧了亚洲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使得解决这些关系中的单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造成这一普遍现象的是一些普遍的原因。

首先，亚洲社会和美国的相互作用在加强，其形式是扩大交流、贸易、投资和相互了解，这增加了它们之间可能和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和项目。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的。其次，20世纪50年代，为了应付来自苏联的威胁，美日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70年代，苏联力量的增长导致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促进其共同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以抵消来自苏联的威胁。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美国 and 亚洲国家之间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结果使得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其他问题凸显出来。第三，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全面改变了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均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国家越来越坚信其价值观和体制的效力，并自认其文化比西方的文化优越。另一方面，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特别是在他们取得冷战的胜利后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遍适用的，他们仍有力量左右亚洲社会的内外政策。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

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这些差异给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后果。外交家们竭力解决美国和日本在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尤其是日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抵制问题。美日贸易谈判具有冷战时期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许多特点。至1995年止，美日贸易谈判取得的结果比后者还要少，原因在于这些冲突是源于两国的根本差异，特别是日本经济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独特性。日本的制成品进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1%，而在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占7.4%。外国直接投资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0.7%，相比之下却占美国的28.6%，欧洲的38.5%。20世纪90年代初，在工业化大国中只有日本的预算出现盈余。（注27）

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示的普遍规律发展。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美元贬值能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但此法并不灵验。1985年的广场饭店协议调整了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逆差，然而在解决对日本贸易逆差问题上却收效甚微。当日元增值到与美元的比率低于100：1时，日本贸易仍保持着高顺差，甚至还有所增长。因此，日本同时保持了货币坚挺和贸易顺差。西方经济思想假定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当失业率大大低于5%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日本多年来的平均失业率不足3%，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5%。至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都开始认识到两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差异，并使之理论化。一份谨慎的研究报告总结道：日本制成品进口水平低的特有现象，“不能用标准的经济因素来解释”。另一位分析家说：“不论西方人作何预测，日本的经济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注28）

那么，怎样解释日本经济的独特性呢？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本

的社会和文化与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不同。这些差异在所有严肃的日美比较分析中都被突出出来。（注29）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是会发生变化的。它可能是重大破坏性事件的结果：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使得世界上两个军国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提倡和平主义的国家。但是，不论美国还是日本似乎都不可能在经济上彻底打垮对方。经济发展也能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如同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经济上的富裕或许能够使日本变成一个更像美国的消费取向的社会。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和美国的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当更像对方。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签订就是为了以有限的方式促进这种趋同。这一尝试和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这就证明经济上的差异是深深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文化之中的。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实力关系的变化。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它是“国际社会”的领袖，并默许在其社会中采取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亚洲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取得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它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倾向于把美国看作“一个国际保姆，如果还算不上恶霸的话”。然而，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结果是美国与亚洲的期望变得越来越不一致。在广泛的问题上。日本和其他亚洲领袖学会了对其美国对手说“不”，有时还会用彬彬有礼的亚洲方式说“走开”。亚美关系象征性的转折点，可能是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所说的美日关系的“第一次大撞车”，即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坚决地拒绝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规定日本进口美国制成品指标的要求。另一位日本官员评论说：“即使是在一年前，我们都不可能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年之

后，日本外相强调了这一变化，指出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注30）

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均势变化的逐渐适应。

首先，美国在事实上承认它缺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的意志或者能力的情况下，将遇到冲突的问题领域和它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其他领域分离开来。尽管克林顿曾宣称人权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1994年他在美国商界、台湾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下，使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脱钩，放弃了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手段来影响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做法的努力。同样，美国政府把它可能施加影响的对日安全政策，明确地同它与日本冲突最激烈的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分离开来。就这样，美国放弃了它能够用来促进中国人权和促使日本作出贸易让步的武器。

第二，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将“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第三，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实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切照旧进行。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中国勉强地同意了在人

权、知识产权和核扩散问题上的广泛的原则声明，但是对声明的解释却与美国极为不同，并且继续执行它以往的政策。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亚洲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各亚洲社会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持。例如，在1994年，“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到韩国”，实际上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站在日本一边，抵制美国规定日本进口数额指标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也出现了亚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中国的情况。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带头争辩说，西方的人权观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亚洲；新加坡的李光耀则警告道：如果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太平洋地区受到孤立”。（注31）团结的另一个表现是：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不顾西方的反对而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在任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当选连任，而日本又反对美国提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而推举一位韩国人做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

冷战的结束、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和日本及其他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显出来，并使后者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同美日冲突一样，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二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从美国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9.5，美国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美国同德意志帝国、纳粹德

国、日本帝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国的这一利益仍然存在，并得到里根和布什总统的重申。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 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设想，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或者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之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还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保持统一，不因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瘫痪，那么它可能争取实现这最后一种可能。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

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的军事开支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下降。然而，在1988至1993年间，中国的军事开支按当前价格计算翻了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加了50%，并计划于1995年再增长21%。按官方汇率估算，中国199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20亿—37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了900亿美元。80年代末，中国重新设计了它的军事战略，从打防御苏联入侵的大仗转变为以远距离投放兵力为重点的区域性战略。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开始发展海军力量，购置现代化的远程作战飞机，发展空中加油能力，并决定购买一艘航空母舰。中国还与俄罗斯建立了互惠的武器购买关系。

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东亚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面向中国，得到了大陆和其他三个华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以及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强烈的主权要求：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建设军事基地，1988年与越南为争夺几个岛屿的归属权而开战，在菲律宾近旁的米斯奇夫礁（美济礁）驻军，对毗连印度尼西亚纳图纳岛的天然气田提出主权要求。中国还结束了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低调支持，开始积极地加以反对。同样，虽然冷战期间中国曾暗地里主张日本加强军事力量，但冷战后却对日本的军事建设表示了日益严重的关切。在按照传统的区域霸权方式行事时，中国在尽量减少其获得地区军事优势的障碍。

除个别例外（如在南中国海），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诸武力的方式扩大其对领土的控制。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希望其他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 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回归大陆。

- 默认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许还有对蒙古的领土主权。

●当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人权、武器扩散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普遍支持中国。

●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不发展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或常规力量。

●采取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和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在处理地区问题时听从中国的领导。

●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普遍开放。

●制止或镇压其国内反对中国和反对华人的运动。

●尊重华人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包括保持与其亲属和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权利。

●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联盟或进行反对中国的合作。

●提倡使用汉语普通话，将其作为在东亚进行广泛交流的语言工具，补充并最终取代英语的作用。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注32）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

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此外，与较弱的一方结盟，能够增进一个国家在合作中的影响，因为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注33）

沃尔特对西南亚联盟形成的分析表明，各国几乎总是采取均势策略来反对外来威胁。人们也普遍假定，在欧洲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均势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一些国家重组联盟以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它们所看到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德意志皇帝和希特勒构成的威胁。然而沃尔特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可能选择搭车，而且正如兰德尔·施韦勒所指出的，持修正态度的国家可能采取搭车的策略对待兴起中的国家，因为它们不满现状，希望从现状改变中得到好处。（注34）此外，正如沃尔特所言，搭车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怀恶意。

在用均势来平衡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各国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可扮演次要的角色。首先，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

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开始在东亚出现，各国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反应将会是极不相同的。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与美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或亚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关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在欧洲已不再适用，但是它可能仍适用于亚洲。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作好有效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如果其他大国能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

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日本可能愿意参加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尽管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但它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平衡者。此外，美国并未表现出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兴趣和能力。在拿破仑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小国家，美国曾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是与英国和法国都打了仗。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只作了微不足道的努力来促进欧洲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均势，结果参与了为恢复被打破的均势而进行的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美国别无选择地成为苏联的主要平衡者。作为一个大国，美国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一个次要的平衡者。充当一个次要的平衡者意味着扮演一个微妙的、灵活的、模棱两可的甚至是不真诚的角色。它可能意味着从支持一方变为支持另一方，拒绝支持或反对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念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或者支持一个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国家。即使日本确实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平衡者，美国是否有能力支持这种平衡仍然是个问题。美国更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最后，亚洲国家中存在的搭车倾向可能阻碍美国作为次要平衡力量所作的一切努力。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当与其他男孩子对抗时，一个小男孩往往服从哥哥的旨意；但是当他们兄弟俩在家时，他就不那么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因为其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普遍采用均势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东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除了这些影响外，对于权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会影响搭车或均势倾向。欧洲各社会经历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阶段，但避免了亚洲国

家历史上特有的持续的官僚帝国或“东方专制国家”的出现。封建主义为多元论以及某种权力分散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假设提供了基础。于是，在国际层次上，均势也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家的责任就是维护和保持它。因此，当均衡受到威胁之时，就需要用平衡行动去恢复它。简而言之，国际社会的欧洲模式反映了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模式。

与此相反，亚洲的官僚帝国没有给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权留有余地。与欧洲的情况相比，在中国，搭车似乎远比均势重要。卢西恩·佩伊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军阀们首先想要了解与强者站在一起能够得到什么，只有这时他们才可能探讨与弱者结盟可能得到的回报……对于中国的军阀来说，自治并不像传统的欧洲均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终极价值，确切地说，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与实力相联系的考虑。”艾弗里·戈尔茨坦指出：1949—1966年，当权威结构相对明确之时，搭车便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特点。然而，当文化大革命造成近乎无政府状态和权威变化无常并威胁到政治家的生存时，均势行为便开始占上风。（注35）1978年以后较明确的权威结构的恢复，大概又使搭车成为占上风的政治行为模式。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番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

京控制而自治。（注36）当然，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然而，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对世界秩序持此看法，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其国内政治中的搭车倾向。这种倾向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程度，依它们的儒教文化和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的深浅而不同。朝鲜与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历史上一直倾向于中国。冷战期间新加坡视共产党中国为敌人，但是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改变立场，其领导人积极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权力的现实。马来西亚有大量华人，其领导人又有反西方的习性，也强烈地倾向于中国。19和20世纪，泰国通过适应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现在它对中国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种倾向由于它看到它的安全受到越南的潜在威胁而得到了加强。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东南亚两个最倾向于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远离中国的穆斯林大国，但是若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它不可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1995年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双方决定在安全遇到“敌对挑战”时相互磋商。尽管双方都否认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安排，但是它们都将中国视为敌对挑战最可能的来源。（注37）越南大体上是一个儒教文化的国家，但历史上它与中国的关系极为敌对，并于1979年与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越南和中国都宣称对全部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双方的海军时有交火。90年代初，越南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国有所下降。越南比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国家都更经常地有寻求伙伴以平衡中国的动机，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1995年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两步。然而，东盟内部的分歧和该组织不情愿向中国挑战的态度，使东盟极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或者为越南对抗中国提供重大支持。美国可能更愿意遏制中国，但是在90年代中

期，它在反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上能走多远尚不明朗。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害处最小的选择”可能是顺应中国并接受“芬兰化”，那将“伤害越南的自尊心……但是能保证生存”。（注38）

在20世纪90年代，除中国和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菲律宾关闭了美国在那里的主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冲绳岛反对美国大量驻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94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美国在其水域停泊6艘供给舰的要求（在美国对东南亚或者西南亚进行军事干预时，这些舰只将作为提供给养的浮动基地）。顺应态度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首次会议上，中国不把南沙群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要求得到了默许，中国1995年占领菲律宾附近米斯奇夫礁（美济礁）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其他东盟国家的抗议。1995—1996年，亚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大陆口头上和军事上对台湾地区的威胁再次保持绝对的沉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对这些国家的搭车倾向作了简要的概括：“在预测未来之时，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对均势可能发生于中国有利的变化感到担忧，但他们现在不想与北京对抗。”而且，“他们不会参加美国讨伐中国的行动”。（注39）

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付战略上将产生严重分歧。它是否应顺应中国，以承认中国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来换取中国对日本在经济事务方面首要地位的承认？或应当赋予美日联盟新的意义和活力，把它作为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合作核心？还是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日本或许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可以设想，日本可能会缓慢地默认该联盟根据这一目的所作的调整。这样做取决于日本对以下几方面的信心：1.美国保持作

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在世界事务中维持其积极领导作用的全面能力；2.美国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和积极阻止中国扩大影响的义务；3.美国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资源代价、不冒很大的战争风险的前提下遏制中国。

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义务或未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仅有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当时它在东亚推行单边的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即使是在30年代参加轴心国之时，日本也是与当时在世界政治中显得最具活力的军事—意识形态力量结盟。20世纪更早些时候，日本相当有意识地加入了英日联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量。50年代，日本同样与世界上最强大并能够确保日本安全的美国结成了联盟。像中国一样，日本把国际政治看作是等级制的，因为其国内政治是如此。正如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

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进贡制度）的长期经验的影响。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注40）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指出，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老大？”答案正在变得明朗。“尽管不会有明确的声明或协议，但日本天皇选择了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在国际上仍受到相对的孤立，这是意

味深长的。”（注41）

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势的美国的庇护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44%的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注42）正如1995年日本的一位高级官员所预测的，日本将有一套顺应中国崛起的“做法”，接着他又提出了美国是否会这样做的问题。他的前一个看法似乎有理，但他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然而，是谁，又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将发生的事情。经济增长会扩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但也会促进政治的发展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可以说经济增长在韩国和中国台湾起到了这个作用，然而，在那里最积极地推动民主的政治领袖都是基督教徒。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政治开放的先决条件通常是独裁制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执政。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

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对西方变得更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有时可能是高强度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极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合作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对伊朗和巴基斯坦

的访问、拉夫桑贾尼总统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访问使这一点明朗化了。这些举动“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联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国的路上，拉夫桑贾尼在伊斯兰堡宣称，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一个战略联盟”，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伊朗的攻击。为了加强这一模式，贝娜齐尔·布托在1993年10月就任总理后立即访问了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政治、军事、政府官员定期互访，以及在各种民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包括军工生产合作，加上中国向另两个国家出售武器。这种关系的发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思想中的“独立”派和“穆斯林”派的强有力支持，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在德黑兰，人们认为，“当代世界的独特性”要求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紧密和持续的合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注43）

这三个国家能成为涉及其他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更为广泛的集团的核心吗？格雷厄姆·富勒认为：一个非正式的“儒—伊联盟得以实现，并非因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最强烈地呼吁这种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1994年3月宣布：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们能够，随后他们还将控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原先是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教和儒教。

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阵营之间发生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

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它结盟，和它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因此，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我们希望中国取得胜利……（注44）

然而，中国方面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江泽民主席1995年宣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这个立场或许反映了传统的中国观念，作为一个中央帝国，即中心国家，中国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合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的成员。此外，中国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可能会驱使它加强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一位能源专家1994年评论道：这样一个以武器换取石油的轴心，“再也不需要听从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旨意了”。（注45）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与西方及其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不同。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尽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或许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拉丁美洲与西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接近于西方。两个曾经试图获得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国家放弃了这一打算。整体军事力量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不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但却无意对它进行挑战。在不少拉丁美洲社会中，新教的迅速兴起不但使它们更像西方天主教—新教混合的国家，而且正在扩大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的宗教联系，使之超出原先仅通过罗马教廷保持的联系。反过来，涌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加勒比人，以及由此带来的拉丁美洲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在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实际上就

是与美国之间，主要的冲突问题是移民、毒品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例如，把拉丁美洲国家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对抗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这样的拉丁美洲集团的扩张）。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引发的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拉丁美洲和西方文明的结合并非易事，它或许会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缓慢地形成，但也可能永远不会形成。尽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仍小于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会引起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南非没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尽管它销毁了已拥有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是白人政府制造的，旨在威慑外国对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攻击，该政府交让政权时不愿意把它们馈赠给黑人政府用于其他目的。但是，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不能销毁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可能会建造新的核武库以确保其非洲核心国家的地位，并遏制西方对非洲的干涉。人权、移民、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也被提上了非洲和西方的议事日程。尽管法国政府努力维持与其前殖民地国家的紧密联系，但非洲国家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非西方化的长期过程，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正在缩小，本土文化正在被重新倡导，南非最终会将其文化中的南非白人—英国人因素置于非洲因素之下。在拉丁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依赖西方，除了在联合国的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很明显，三个“摇摆”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其核心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三个重要角色，它们与西方及其挑战者的关系可能是混合的、矛盾的和变幻不定的。它们彼此的关系也会极为不同。正如以上提到过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可能疏远美国向中国靠拢。与冷战期间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样，日本与美国的安全纽带将削弱，尽管可能永远不会正式挑明这一点。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

会是困难的，只要俄罗斯在它1945年占领的千岛群岛的问题上拒绝妥协。冷战结束时出现过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但由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稍纵即逝。在未来，美国没有理由像它过去所做的那样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

在冷战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成功地对苏联和美国打“中国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俄罗斯也可以打“俄罗斯牌”。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引起人们像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关切。与西方紧密配合的俄罗斯则会为抗衡在全球问题上的儒—伊联盟增添力量，并重新引起冷战时期中国对来自北方的侵略的恐惧。然而，俄罗斯与这两个邻近文明之间也存在着问题。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更倾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冷战结束的后果，是出于重新确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均势的需要，以及双方就基本的平等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需要。在实际中这意味着：

1. 俄罗斯同意欧洲联盟和北约扩大到把中欧和东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进去，西方则承诺北约组织不继续扩张，除非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

2. 俄罗斯和北约组织签订伙伴关系条约，保证互不侵犯，定期磋商安全问题，共同努力避免军备竞赛，为达成符合双方冷战后安全需要的武器控制协议进行谈判。

3. 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东正教国家及东正教人口占多数地区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4. 西方承认俄罗斯在与南面穆斯林民族关系中面临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安全问题，西方愿意修改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并支持俄罗斯为应付这些威胁采取的必要措施。

5. 俄罗斯和西方同意在处理一些同时涉及西方和东正教利益的问题

题，如波斯尼亚问题时，进行平等的合作。

如果按照上述或类似路线进行安排，俄罗斯和西方便不大可能对对方的安全构成长期的挑战。欧洲和俄罗斯是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成熟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可能成为扩张和进攻取向的年轻力量。

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较具有合作性：解决了边界争端，双方都削减了边境驻军；扩大了贸易；双方都停止将对方作为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两国外长探讨了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势力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发现中国是渴望得到坦克、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大客户。（注46）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俄中关系的升温表明，在俄日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下，它有意识地决定将中国作为其亚洲的合作“伙伴”，同时这也是针对它在北约东扩、经济改革、军备控制、经济援助，以及加入西方国际机构等问题上同西方之间的冲突作出的反应。就中国而言，中国得以向西方证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可以得到必要的军事能力来执行远距离投放兵力的地区性战略。对两国来说，俄中联系如同儒—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种联系能否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程度；第二，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崛起从经济、人口和军事上威胁俄罗斯利益的程度。中国的经济推动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韩国、日本的商人一道正在开发和利用那里的机会。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日益认识到，未来他们的经济更多的是与东亚而不是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联系在一起。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威胁是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据报道，中国在那里的非法移民人数1995年达到300万—500万，而东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大约是700万。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警告说：“中国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高级移民官员也赞同地说：“我

们必须反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注47）此外，中国与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发展经济关系的举动，可能激化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的扩张也可能变成军事扩张，如果它决定重新提出对蒙古的主权要求。蒙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罗斯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几十年中它曾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自蒙古人入侵以来一直萦绕在俄罗斯人脑海中的“黄祸”，有一天可能会再次成为现实。

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它通过对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亚部落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产物。当前，俄罗斯正与它的东正教盟友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起来以均势平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并与它的东正教盟友亚美尼亚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响。俄罗斯一直积极地维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将它们纳入了独联体，并在所有这些国家部署了军队。俄罗斯关心的中心问题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以及将这些资源运往西方和东亚的通道。俄罗斯还一直在北高加索进行着一场反对车臣穆斯林的战争，并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镇压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内的暴乱。这些安全考虑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同中国在遏制中亚的“伊斯兰威胁”上的合作，也是俄罗斯同伊朗恢复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潜艇、新式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以及侦察和电子战军事装备。此外，俄罗斯已同意在伊朗建造轻水核反应堆，并向伊朗提供铀浓缩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非常明确地希望伊朗遏制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扩散，并暗示希望它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来以均势平衡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它对沿其南方边界上的穆斯林人口爆炸所构成的威胁的看法。

第三个“摇摆”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龃龉相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冷战结

束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核武器、南亚次大陆全面军事平衡问题上都可能继续存在严重冲突。如果巴基斯坦能够赢得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印度与穆斯林的关系总的来说将会很困难。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印度可能会进行特别的努力，像以往那样逐个劝说穆斯林国家疏远巴基斯坦。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扩大到了印度，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因而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一趋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中国积极地卷入了南亚政治，而且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同巴基斯坦保持紧密的关系，加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能力，以经济援助、投资和军事援助讨好缅甸，还可能在那里发展海军设施。目前中国的力量正在扩张，在21世纪初，印度的力量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极为可能的。一位分析家指出：“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潜在的力量竞争，以及自认为是当然的大国、文明和文化的中心，会继续促使它们支持不同的国家和事业。印度将努力崛起，不仅是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是作为中国权力和影响的抗衡国家。”（注48）

至少为了对抗中—巴联盟，即使不是为了对抗更广泛的儒—伊联系，印度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联系、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也明显地符合印度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从俄罗斯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武器，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低温火箭技术，由此导致了美国的制裁。除了武器扩散外，印度和美国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 and 经济自由化问题。然而，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的降温和在遏制中国上的共同利益，最终可能使印度和美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于其有利。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与另一个文明中的国家的关系时，通常追随核心国家的领导。但是情况将不会总是如此。很明显，一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不会与第二个文明中的所有

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关系。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显然，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此外，沿断层线边缘的集团间的关系，可能与它们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差别。然而，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可以就文明间和核心国家间似乎正呈现出的结盟和对抗作一些合理的归纳。图9.1对此作了概括。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已为多极、多文明世界的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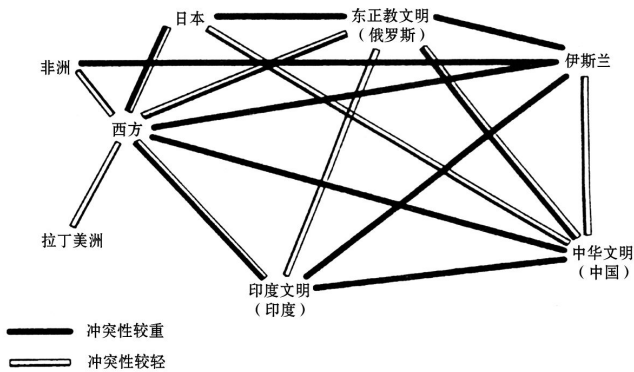


图9.1 各文明组成的世界政治：正在出现的组合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时这样称呼它。（注1）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以一个国家直接入侵另一个国家为开端，然后转变为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文明之间的战争。事实上，它们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民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由于美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组织、资助和装备了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起义者，而变成了一场冷战式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失败证明了里根主义推动对共产主义政权武装抵抗的正确，并使他们为苏联遭到可与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这场战争的失败对整个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帝国的瓦解。美国人和西方人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是滑铁卢之役。

然而，对那些与苏联作战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学者评论道：（注2）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

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作为圣战而发动的，它极大地增强了伊斯兰的自信心和权力。事实上，它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可以与1905年日本在东方世界击败俄罗斯人的胜利相比。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胜利。

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伊斯兰各国政府和各种集团，竞相努力击败苏联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胜利。穆斯林获得的战时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1984—1986年，沙特阿拉伯为抵抗力量提供了5.25亿美元；1989年，它同意提供总数为7.15亿美元援助中的61%，即4.36亿美元，其他部分则来自美国。1993年，它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93亿美元。在整个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总数至少与美国提供的30亿至33亿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过了它。战争期间，大约有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25000名志愿兵参战，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招募主要是在约旦进行的，这些志愿兵受到了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局的训练。巴基斯坦为抵抗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基地，以及后勤和其他支援。此外，巴基斯坦还是美国财政援助的代理人 and 输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将援助资金的75%给予了较强烈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其中有50%交到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最极端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手中。尽管在对苏作战，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参战者是强烈反对西方的，它们谴责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不道德和企图颠覆伊斯兰。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注3）

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地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

力量感和自信，以及进一步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一位美国官员1994年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者资格从宗教和政治上看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注4）

阿富汗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如此认为，并为了反对苏联而团结起来。而海湾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则是因为西方在军事上干预了穆斯林的冲突，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支持这种干预。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这种干预视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因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又一例证。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政府自战争伊始就产生了分歧。由于萨达姆·侯赛因越过了神圣的边界，1990年8月，阿拉伯联盟以绝对多数（14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谴责其行径的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向美国组织的反伊拉克联合部队提供了大批人员，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孟加拉国提供的略少。土耳其关闭了穿过其境内的从伊拉克通向地中海的输油管道，并允许盟国使用它的空军基地。作为对这些行动的回应，土耳其更强烈地要求加入欧洲；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重申了它们与沙特阿拉伯的紧密关系；埃及的债务被取消；叙利亚得到了黎巴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伊朗、约旦、利比亚、毛里塔尼亚、也门、苏丹和突尼斯，以及诸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拯救阵线等组织，尽管其中的不少国家和组织都从沙特阿拉伯得到过财政援助，但它们仍然支持伊拉克而谴责西方的干涉。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则采取了妥协立场或者试图避免采取任何立场。

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三周后访问了也门、叙利亚、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观察家报告说：“阿拉伯世界由于对美国的愤怒而热血沸腾，看到一个勇敢的阿

拉伯领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接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注5）从摩洛哥到中国，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欢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注6）“这场冲突的一大悖论”就是民主的悖论：在那些政治较开放、言论较自由的阿拉伯国家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却“最强烈和最广泛”。（注7）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些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西方以及诸如哈桑国王、贝娜齐尔·布托、苏哈托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他们称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叙利亚也出现了反对盟国的行动——“在那里广大市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印度的一亿穆斯林中有75%谴责美国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的1.71亿穆斯林“几乎普遍地”反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以类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个营垒之中，并为无视萨达姆的野蛮行径和谴责西方干涉提供了复杂的理论基础。（注8）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据一份报告说：“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阿拉伯世界抵抗大敌西方的一个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说：“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而谴责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则谴责非穆斯林部队进驻沙特阿拉伯“亵渎”了穆斯林圣地。（注9）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萨达姆·侯赛因像其他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样，将以前的世俗政权与可能具有最广泛号召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伊斯

兰。鉴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形分布，萨达姆并无其他的真正选择。一位埃及评论家指出，选择伊斯兰，使之居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不明确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义之上，“证实了伊斯兰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注10） 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比除伊朗和苏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更为穆斯林化，尽管它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团提供了财政援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伊斯兰运动都不支持它与西方联盟反对伊拉克，而且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对西方干涉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等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声称它们是在面临“对伊拉克人民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的。199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用同样的腔调说：这是“一场不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战争”。此外，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他们争辩说，这场战争是西方和犹太人阴谋策划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不仅发动圣战作为回报是正当的，而且必须这样做。（注11）

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地使自己疏远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

伯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运动；伊朗和伊拉克；总体说来，还有反对党和政府。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注12）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结束，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外部敌人同样也减弱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例如在1991年，有报告说，巴基斯坦“沉浸在反对西方的言论之中”，至少是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注13）

随着公众的反战态度日益坚定，原来与盟国有联系的政府退缩了、分裂了，或者竭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像哈菲兹·阿萨德这样的曾经为盟国提供过部队的领导人，现在却争辩说之所以有必要派出这些部队，是为了抵制并最终取代西方派驻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而这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应用于防御目的和保护圣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高级军事领导人公开谴责其政府与盟国结盟。为盟军提供兵力最多的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它们的社会，因而能够压制或无视反西方的压力。稍微开放一些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则受劝导疏远西方，并采取了越来越反西方的立场。在马格里布“爆发的对伊拉克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最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突尼斯公众舆论强烈地反对西方，总统本·阿里迅速地谴责了西方的干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军提供了1500人的部队，但是在反西方集团动员起来后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攻击西方。在阿尔及利亚，40万人举行示威支持伊拉克，促使本来倾向于西方的总统转而谴责西方，宣称“阿尔及利亚

将站在伊拉克兄弟一边”。（注14） 1990年8月，三个马格里布国家政府在阿拉伯联盟中投票谴责伊拉克，但是到当年秋天，为了迎合人民强烈的情绪，又投票赞成谴责美国干涉的动议。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时报》为此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强大、自傲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由宗教狂热燃起的更为广泛的对抗”。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发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对这场战争并无热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地反对西方的干涉。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苏海尔·哈什米指出：“对阿拉伯人来说，战争的结局并不值得欢庆。”相反，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失望、沮丧、屈辱和愤恨。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法蒂玛·莫尼斯问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场战争的结局更坏的吗？用全部技术武装起来的整个西方向我们扔炸弹。这是极端的恐怖。”（注16）

战争之后，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也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继续存在失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同情伊拉克。参加了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改变了立场。（注17） 1992年8月，埃及和叙利亚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反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1993年1月，阿拉伯国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对空袭伊拉克。如果西方的空军力量可以用来反击

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进攻，为什么它不能用来反击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进攻呢？1993年6月，当克林顿总统为了报复伊拉克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布什的行动，命令轰炸巴格达时，国际上的反应是严格按照文明线来划分的。以色列和西欧国家政府强烈支持轰炸；俄罗斯将其视为“正当的”自我防卫；中国表示“严重关切”；沙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保持沉默；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包括埃及政府，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用伊朗的话说，是美国在“新扩张主义和利己主义”驱动下的“公然侵略”。（注18）下述问题被反复提出：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即西方）不对以色列的暴行及其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作出同样的反应？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的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部族、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和各文明内部，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人民的认同。这些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们并不涉及那些与未参战者直接利益有关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尽管它们可能引起外部集团的人道主义关切。当认同的根本问题受到威胁时，这些冲突往往变成激烈而血腥的冲突。此外，这些冲突往往是长期的，尽管会被停战协议或协定暂时中断，但冲突往往会因违反协议而再起。另一方面，在为维护认同

而爆发的内战中，如果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注19）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独立的条件。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各族人民分离开来。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通过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种族清洗”，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这种冲突可能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双方都参与屠杀、恐怖主义、奸淫和酷刑。争夺的关键地区往往是强烈地象征着一方或双方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地区，是他们拥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的圣地，如西岸、克什米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德里纳河谷和科索沃。

一般说来，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持久的冲突。当它们发生在国家内部时，平均时间可能会比国家间的战争长6倍。由于涉及集团认同和权力的根本问题，它们难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不能为各方所有的派别认可，而且通常不能长久。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群体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由于具有持久性，断层线战争像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一样，往往造成大量死伤和难民。这

两个数字必须谨慎对待，人们普遍接受的20世纪90年代初仍在进行之中的各地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万—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0万—15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万—20万，车臣3万—5万，西藏10万^{10.1}，东帝汶20万。（注20）所有这些冲突实际上还造成了为数更多的难民。

在这些当代战争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20世纪末的暴力冲突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1956年在苏丹爆发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72年，虽于当年达成了给予苏丹南部某些自治权的协议，但是1983年又战火重燃。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叛乱始于1983年，为结束叛乱而举行的和平谈判于1991年中断，1994年又重开谈判，至1995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4个月之后，暴动的猛虎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撤出了和谈，随后又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战争。菲律宾的摩洛人起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1976年达成允许棉兰老岛某些区域自治的协议后开始减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持不同政见的反叛集团抵制争取和平的努力，又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其规模也日益扩大。俄罗斯和车臣领导人于1995年7月达成了非军事化协议，旨在结束于1994年12月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战争一度沉寂下来，但不久又重新爆发。车臣人袭击了俄罗斯人或亲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对此进行了报复，车臣人于1996年1月入侵达吉斯坦，1996年初俄罗斯开始大举进攻。

虽然断层线战争与其他社会群体战争同样具有旷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识形态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社会群体的战争可能在民族、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之间发生。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一些分析家有意贬低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种族特性和语言，在历史上曾和平相处并广泛通婚，而对宗教因素却用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情结”加以解释。（注21）这是一个基于

世俗之见的判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神而极大地增强。

第二，其他社会群体战争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对地说，不会扩散或卷进更多的参与者。相比之下，断层线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一般的社会群体冲突中，A集团与B集团作战，C、D和E集团没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团或B集团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但在断层线战争中，A1集团与B1集团作战，他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和B2、B3、B4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他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现代世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断层线冲突便“国际化了”。移民在第三个文明的地区内建起了聚居区。通信技术使得对抗的各方更容易寻求帮助，也使其亲缘集团更容易迅速了解他们的状况。世界总体上的缩小使得各方的亲缘集团能够为冲突各方提供道义、外交、财政和物质支持，并且更难以不这样做。格林韦所说的“亲缘国综合征”，是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注22）更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间即使是小规模冲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内部冲突所不具有的严重后果。1995年2月，在卡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礼拜的18名什叶派教徒被逊尼派枪手杀害，该事件进一步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和平，给巴基斯坦造成了问题。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了在希伯伦清真寺做祈祷的29名穆斯林，结果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给世界造成了问题。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社会群体的冲突和断层线战争是历史的内容。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32次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

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不至，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注23）

这些种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间。重大的断层线战争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而在少数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然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尽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流血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还与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人发生了冲突。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不满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保持着自己的地下政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希腊政府为坚持本民族在对方国家居住者的权利而争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历史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邻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一直关系敌对，各自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夙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为控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战。在北高加索，200年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了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

残酷的战争于1994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再次展开，在印古什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在伏尔加盆地，穆斯林鞑靼人在过去以及在90年代初与俄罗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就有限的主权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

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人使用武力逐渐控制了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20世纪80年代期间，阿富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打了一场大战，俄罗斯撤退后，战争余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一方是俄罗斯军队支持的现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团反对汉化，并且正在发展与苏联各共和国内的同族人和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此外还有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统治的起义，阿萨姆穆斯林移民与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骚乱和暴力冲突，这些都是由两个宗教社会群体中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议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的歧视；在缅甸，则是穆斯林抗议占多数的佛教徒对他们的歧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不时地发起反对华人的骚乱，抗议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在泰国南部，穆斯林集团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义。在菲律宾南部，曾发生过一次穆斯林摆脱天主教国家和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信奉天主教的东帝汶人则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镇压而斗争。

在中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建立家园。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四次战争，巴勒斯坦人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发动了起义。在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以失败告终。在埃塞俄比亚，信奉东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历史上一一直压制穆斯林种族集团，并遭遇过穆斯林奥罗莫人的暴动。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南部的唯灵论基督教黑人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苏丹，发生

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最血腥的战争，战争持续了几十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尼日利亚的政治一直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人—豪萨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暴动和军事政变频繁不断，还发生了一场大战。在乍得、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于是人们自然会问，20世纪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集团之间。事实并非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 1993—1994年，穆斯林参与了泰德·罗伯特·格尔进行深入分析的50次种族—政治冲突中的26次（表10.1）。这些冲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其中15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涉及穆斯林的文明间冲突是所有非穆斯林文明冲突的三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文明中的冲突，包括非洲的部落冲突。与伊斯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只卷入了两次文明内部的冲突和两次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穆斯林的冲突往往死伤惨重。在格尔分析的6次战争中，估计有20万或者更多的人被杀害，其中3次战争（苏丹、波斯尼亚、东帝汶）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2次（索马里、伊拉克—库尔德）是在穆斯林之间，仅有1次（安哥拉）涉及非穆斯林。

表10.1 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年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11	15	26
其他	19*	5	24
总数	30	20	50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泰德·罗伯特·格尔：《人民对国家：种族政治冲突及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47—378页。我应用了格尔的冲突分类法，只是将中国—西藏冲突作了改动；他将这个冲突作为非文明间冲突而纳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但它显然是儒教的汉人和喇嘛教的藏族佛教徒之间的冲突。

2. 《纽约时报》确认，1993年在48个地方发生了约59次种族冲突，其中一半地方发生的是穆斯林之间或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冲突。59次冲突中有31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与格尔的数据类似的是，在这些文明间的冲突中，有三分之二（21次）是穆斯林和其他文明间的冲突（表10.2）。

表10.2 种族冲突：1993年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7	21	28
其他	21*	10	31
总数	28	31	59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1993年2月7日，《纽约时报》第1版和第14版。

3. 在另一项分析中，鲁思·莱格·西瓦德确认1992年发生了29次战争（1年间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或以上的冲突定为战争）。在12次文明间的冲突中，有9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同样，穆斯林比属于任何其他文明的人都进行了更多的战争。（注24）

这样三个不同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 [10.2](#)。

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亦通过穆斯林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表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穆斯林国家拥有军队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军人所占的比率）和军费投入比率（军费按一国财富计算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比率。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军队的比率和军事投入指数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同类比率。穆斯林国家的这两项平均比率大约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两倍（表10.3）。詹姆斯·佩恩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在穆斯林与军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注25）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1928年至1979年期间穆斯林介入的总计为142起的危机中，利用暴力来解决的占76起。在25起危机中，暴力是对付危机的基本手段；在51起危机中，穆斯林国家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使用了暴力。穆斯林国家使用暴力，不用则已，一用便是高强度的暴力，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有41%诉诸了全面战争，38%为重大冲突。穆斯林国家在其53.5%的危机中诉诸了暴力；而在其他国家介入的危机中，英国动用暴力的比率仅为11.5%，美国为17.9%，苏联为28.5%。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注26） 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认。

表10.3 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军事化比较

	平均军队比率	平均军费投入比率
穆斯林国家（n=25）	11.8	17.7
其他国家（n=112）	7.1	12.3
基督教国家（n=57）	5.8	8.2
其他国家（n=80）	9.5	16.9

资料来源：詹姆斯·佩恩：《国家为何武装》（牛津：贝西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是指那些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该宗教的国家。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巴尔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巴尔干到中亚的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遍布非洲大陆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历史遗留的冲突会被那些认为有理由这样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这些关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并且是可怕的。

然而，历史上断断续续发生的屠杀，这一点本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末暴力冲突又再次上升。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毕竟非常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数明显例外，苏联的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都曾和平共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一个常常被称为热带乐园的岛屿上也曾平静地共同生活着。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定是出现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压力。20世纪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加里·富勒指出，在斯里兰卡，

1970年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暴动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尔人暴动的高峰，与这两个集团中15—24岁的“青年人口膨胀”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见图10.1）。（注27）一位美国驻斯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猛虎组织正在发动一场“未成年人的战争”。（注28）同样，俄罗斯人与其南面的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也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重大差异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出生率是1.5%，而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为穆斯林的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4.4%，80年代末后者的人口净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是俄罗斯的5—6倍。80年代，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车臣地区是俄罗斯境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注29）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从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对印度统治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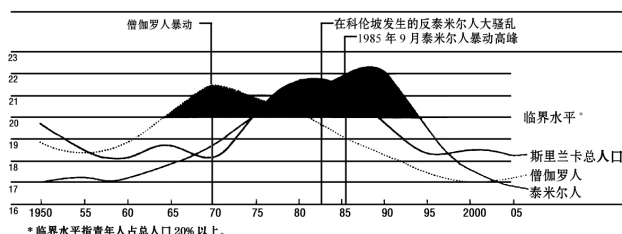


图10.1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青年人口膨胀
（15—2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南斯拉夫境内文明间战争的复杂过程有许多原因和爆发点。然而，导致这些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除了脱离权外，它拥有6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事实上拥有的各项权利。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

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人口问题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流向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以寻求经济机会。结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注30） 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并在其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20世纪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地位的要求。塞尔维亚人和南斯拉夫政府抵制了这一要求，担心科索沃一旦拥有脱离权便会如此实行，或者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1年3月，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爆发了抗议和骚乱以支持获得共和国地位的要求。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这一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誓言得到了塞尔维亚境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其结果是1986年发表了由200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有著名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政治家、宗教领袖、军官，还包括自由反对派杂志《实践》的编辑。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词，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察家说：“在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注31）

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呼吁塞

尔维亚人对自己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注32）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20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注33）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希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

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反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0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苏联和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断层线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构成成分时”（注34），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

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那么，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表10.4）

表10.4 穆斯林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穆斯林的外部冲突	内部和外部冲突
历史和当代冲突	地理邻近 互不相容	好战
当代冲突	受害者地位	人口膨胀 缺少核心国家

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注35）（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己人中间展开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

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力压倒穆斯林而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服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己的国家时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的重要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

标。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注36）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20世纪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注1）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注2）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温和派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就被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哥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

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补充，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补充。苏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注3）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注4）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

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如果两个非洲部落之间发生了地区战争，一个部落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另一个部落则可自称为基督教徒；于是前者可望获得沙特的金钱、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军事顾问；后者则有可能寻求西方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个集团能够像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让人相信自己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从而唤起西方的同情，否则它只能指望从本文明亲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外，情况通常是如此。断层线战争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集团间的区域战争，因此这种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

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样在打“伊斯兰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冲突演化而成的战争中，反叛者逐步地将其事业定义为穆斯林的事业。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穆斯林领袖沙米尔自称为伊斯兰主义者，并“在伊斯兰教和抵抗俄罗斯征服的基础上”团结了十几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20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发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行同样的战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并手持古兰经宣誓就职（甚至就是在叶利钦得到了东正教牧首的祝福之时）。1994年，杜达耶夫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车臣军人佩带着饰有“车臣圣战”的绿色围巾，在进入战斗时高呼着“真主保佑”。（注5）同样，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从包

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内的区域认同，或印度世俗主义者的认同，而转到第三种认同，反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克什米尔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它“使得克什米尔穆斯林感到自己既是伊斯兰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对印度的暴动，最初是由一个“相对世俗”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组织领导的。后来巴基斯坦的支持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于是这些集团便成了主角。这些集团包括“铁杆暴动者”，这些人似乎“要为圣战而继续进行圣战，不论希望和结果是什么”。另一位观察家报告说：“民族主义情感由于宗教的差异而高涨，伊斯兰战斗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尔暴动者，破坏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传统。”（注6）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群中。历史上，社群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然而，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各自的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界定。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为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样，在

1990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反对赞同多元社群的政党，绝对拥护由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由于积极倡导伊斯兰教而被共产党政府监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兰宣言》一书中，他论证了“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之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新闻媒介“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人手中”。（注7）

波斯尼亚独立之后，伊泽特贝戈维奇曾倡导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在其中穆斯林将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尽管它不是多数。然而，他并不反对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国家伊斯兰化。他不愿公开明确摒弃“伊斯兰宣言”的态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随着战争的继续，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迁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控制区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发现自己逐渐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会机构之外。“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社群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强烈的穆斯林民族认同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与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在传媒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达。学校里增加了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波斯尼亚语被作为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推广，而且收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政府官员攻击异族通婚，反对广播“侵略者”的节目或塞尔维亚音乐。政府鼓励信仰伊斯兰教，在雇用和提升时优先考虑穆斯林。最为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军队的伊斯兰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军队中所占的比率超过了90%。越来越多的军人认同于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并佩带穆斯林标志，其中精锐部队是伊斯兰教化最彻底的，且人数日益增加。这一趋势导致了波斯尼亚政府主席团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个克族人和两个塞族人）向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抗议，但遭到了他的否决，还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总理西拉季奇于1995年辞职。（注8）

在政治上，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扩大了对波斯尼亚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军队、民政机构和公共企业”。据报道：“不属于这个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道：这个党“已成为以共产党政府习性为标志的伊斯兰独裁主义的工具”。（注9）另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它现在毫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情绪，它是新近占据优势地位的穆斯林的财产、特权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要结果就是趋向民族同质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决定穆斯林的国家利益时也日益获得了主导权。（注10）

由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认同的强化，其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来自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压力，缓慢但明显地将波斯尼亚从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

在断层线战争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在区域战争中，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区域战争被界定为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将对人类相当大的部分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排挤了俄罗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注11）俄罗斯人发现，把在塔吉克斯坦发生的部族和宗教间的战争、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定义为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而它的区域对手们是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圣战义务，并且正在成为伊斯兰堡、德黑兰、利雅德和安卡

拉的代理人。

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把自己视为保卫西方、抵御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论这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时说，“将此视为欧洲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他宣称有义务根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最后遗迹。”（注12）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由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他们的忽视，因此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米沙·格伦尼指出，这场冲突“日益具有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在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注13）

视断层线战争为文明的冲突的看法，也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区域冲突中被击败，因为这一失败可能引发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灾难。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它的失败会刺激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提出独立的要求，因而导致印度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动，它可能会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而推动俄联邦内的穆斯林共和国的脱离主义运动，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终结果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红场上。因此，叶利钦说：阿富汗—塔吉克边界“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边界”。欧洲人则对在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国家表示了关切，担心它成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的基地，加强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注14）克罗地亚的边界，事实上是欧洲的边界。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诋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印度尼西亚将军苏特里斯诺提到1991年在东帝汶发生的大屠杀时说：“这些劣种人必须处决……我们将处决他们。”现在历史上的恶魔又复活了：克族人变成了“乌斯塔希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则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于复仇的行动而加强，屠杀、折磨、奸淫和残忍地驱逐居民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产品都成了攻击目标。塞族人有计划地摧毁了清真寺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克族人则炸毁了东正教的修道院。作为文化保护场所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未幸免于难，僧伽罗警卫部队烧毁了贾夫纳公共图书馆，销毁了与泰米尔文化有关的“无法复得的文献和历史文件”。塞族士兵则炮轰和毁坏了萨拉热窝的国家图书馆。塞族人还清洗了波斯尼亚城镇兹沃尔尼克的4万名穆斯林，并在刚刚被他们炸毁的奥斯曼塔遗址上竖起了一座十字架，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铲平东正教堂后修建的。（注15）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在冷战的40年中，超级大国试图聚集盟友和伙伴，并颠覆、改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伙伴或使其中立化，从而深化了冲突。当然，这种竞争在第三世界中最为激烈，新建立的、弱小的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被迫加入了大规模的全球竞争。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多极的相互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当这些相互冲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团时，往往会扩大和升级。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各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集团的支持。不论何种形式的支持，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物质的、人员的、外交的、财政的、象征性的或者军事的支持，总是来自一个或多个亲缘国家或集

团。断层线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支持、强制和调解角色的亲缘国家就越多。作为这种“亲缘国综合征”的一个后果，断层线冲突比文明内部冲突具有更大的升级潜力，通常需要文明间的合作才能得到遏制和结束。与冷战不同，这种冲突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爆发的。

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战争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第一层次上的是那些实际上彼此战斗和残杀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战争；但它们也可能是地方集团而不是国家，或者至多是雏形国家，像波斯尼亚人之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情况那样。这些冲突也可能包含第二层次的参与者，它们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诸如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与冲突关系更远一些的是第三层次的国家，它们更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诸如与南斯拉夫有联系的德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争端中的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这些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第一层次参与者有在外散居的人，他们也会在断层线战争中发挥作用。鉴于在第一层次上通常只有少量的人员和武器介入战争，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外援，无论是以财政、武器还是以志愿者形式提供的，它常常可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然而，遏制战斗和避免直接卷入，对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是有利的。因此在支持的同时，它们也试图限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并诱导他们降低自己的目标。第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还常常试图与断层线另一方处于同样层次的参与者进行谈判，以便阻止区域战争升级为卷入了核心国家的更广泛的战争。图11.1概括了断层线战争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断层线战争都具有所有这些特性，但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包括在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战争。此外，几乎所有断层线战争都具有将各层次参与者全部卷入其中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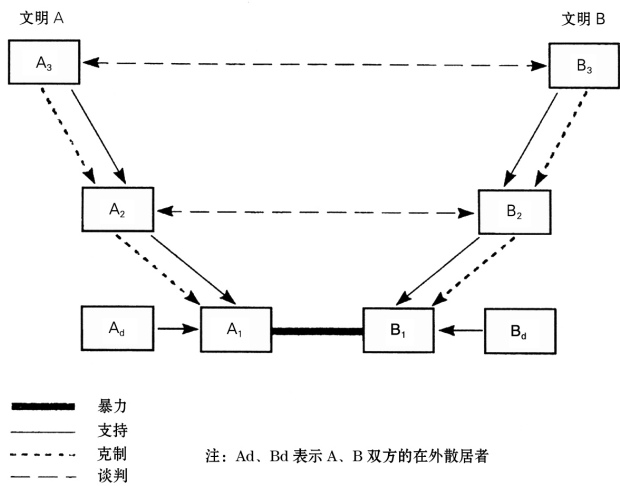


图11.1 复杂断层线战争的结构

在外散居者和亲缘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每一场断层线战争。鉴于穆斯林集团在这类战争中所起的广泛作用，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最频繁地成为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亚政府。它们有时还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苏丹和菲律宾与非穆斯林作战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除政府支持外，很多第一层次参与者中的穆斯林集团，还得到了从阿富汗战争退下来的伊斯兰主义国际流动战士的支持，这些人参与了从阿尔及利亚、车臣到菲律宾内战的各种冲突。一位分析家注意到，这些伊斯兰国际纵队参加了“派遣志愿军支持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和波斯尼亚建

立伊斯兰政权，开展针对反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宣传战，以及在在外散居者中建立伊斯兰中心的活动。这些中心成了各参战方面的政治总部”。（注16）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支持，并试图协调成员国在跨文明冲突中支援穆斯林集团的努力。

苏联曾是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冷战后，俄罗斯一直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印度是克什米尔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并且是斯里兰卡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西方主要国家是南斯拉夫冲突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和车臣的冲突中，双方的在外散居者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通过电视、电传和电子函件“与其前祖国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外散居者更有力地承担起了义务，有时还发生了两极分化。‘前祖国’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注17）

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为暴动者提供了明确的外交和政治支持。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武器，以及培训、后勤支援和一个避难所，而且还替暴动者游说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至1995年，据说暴动分子至少补充了1200名来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苏丹的圣战者组织士兵，他们配备着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时由美国提供的毒刺式导弹和其他武器。（注18）菲律宾的摩洛暴动分子曾经得到了马来西亚提供的资金和装备，阿拉伯国家政府还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几千名暴动分子在利比亚接受了训练；极端的反叛集团阿布·赛义夫组织则是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注19）在非洲，苏丹曾定期地援助与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厄立特里亚穆斯林反叛者，为了进行报复，埃塞俄比亚则为与苏丹作战的“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后勤和避难援助”。后者还得到了来自乌干达的类似援助，这部分地反映了乌干达与苏丹反叛者在“宗教、种族和民族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苏丹政府从伊朗得到了价值3亿美元的中国造武器，伊朗的军事顾问还为其训练部队，这一切使得它能

够于1992年向反叛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据苏丹政府说，西方的各种基督教组织为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食品、医药、补给和武器。（注20）

在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泰米尔暴动分子和佛教僧伽罗政府之间的战争中，印度政府最初为暴动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南印度训练暴动分子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资金。1987年，在斯里兰卡政府军几乎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际，印度的公众舆论齐声谴责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于是印度政府向泰米尔人空投了食品，“实际上是向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表示，印度打算阻止他用武力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注21）此后，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斯里兰卡给予泰米尔地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暴动者则向印度军队上缴武器。印度出动了5万名士兵到该岛去确保协议的执行，但是猛虎组织拒绝上缴武器，结果印度军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游击队的战争，而这些游击队正是它先前所支持的。1988年，印度军队开始撤离。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被暗杀，印度人相信这是一名泰米尔暴动支持者所为，此后印度政府对这次暴动的态度越来越充满敌意。然而，印度政府不可能在南印度5千万泰米尔人中制止对斯里兰卡暴动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下述情况反映了这一点：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官员违反新德里的旨意，允许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实际上自由地利用”其500英里的海岸，并穿越狭长的保克海峡为斯里兰卡暴动分子运送给养和武器。（注22）

自1979年起，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南面的穆斯林邻居进行了三场重要的断层线战争：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继之而来的始于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战争，以及始于1994年的车臣战争。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共产党政府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执政。1992年春，这个政府遇到了包括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敌对地区集团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挑战。从阿富汗得到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于1992年9月将亲俄罗斯政府赶出了首都杜尚别。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

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警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警告。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第201机动化步兵师为亲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俄罗斯还加派部队驻守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1992年11月，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达成了协议，由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出兵干预，这一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实际上是参战。在军事干预和俄罗斯的武器及财政援助下，前政府的军队收复了杜尚别，并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种族清洗，反对派的难民和部队撤退到了阿富汗。

中东穆斯林国家政府强烈抗议俄罗斯的军事干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日益伊斯兰化的反对派提供了财政、武器和培训援助。据报道，1993年有成千上万名士兵接受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训练，1993年春夏两季，塔吉克反叛者从阿富汗越过边界发动了几次进攻，杀死了不少俄罗斯边防卫兵。俄罗斯的反应是向塔吉克斯坦增派部队，用“重炮和迫击炮”密集攻击阿富汗境内目标，还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空袭。阿拉伯国家政府则为反叛者提供了购买毒刺式导弹的资金以对付空中袭击。至1995年，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派驻了将近2.5万名士兵，并提供了支持该国政府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资金，反叛者一方则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积极支持。正如巴尼特·鲁宾所指出的，国际机构或西方未能给予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重要的帮助，因而使得前者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后者则完全依赖于其穆斯林文明的亲族。“每一个希望得到外国援助的阿富汗指挥官，今天都不得不迎合希望在中亚推动‘圣战’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的经费提供者，或者去参加毒品交易”（注23）

俄罗斯在北高加索与车臣人进行的战争是它的第三场反穆斯林的战争，是以1992—1993年相邻的东正教奥塞梯人和穆斯林印古什人之间的战斗拉开序幕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迁徙到中亚的。奥塞梯人留了下来，并占有了印古什人的土地。1956—1957年，在二战中被迁徙的人民获准返回，

因而出现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地区控制权的纷争。1992年11月，印古什人为了收复普里戈罗德尼地区而发动了进攻（该地区是苏联政府划给奥塞梯人的）。俄罗斯人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派遣哥萨克部队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一位旁观者这样评论道：“1992年11月，奥塞梯境内的印古什人的村庄被包围并遭到了俄罗斯坦克的轰击，那些在炮火中幸免于难的人或被枪杀、或被带走。”这场大屠杀是由奥塞梯特种警察部队执行的，但俄罗斯派往该地区“维持和平”的部队却为其提供了掩护。（注24）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说：“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俄罗斯联邦内的“第一次种族清洗行动”。接着，俄罗斯利用这一冲突恐吓印古什人的车臣同盟者，“结果导致了车臣人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高加索人民联盟的迅速动员。该联盟威胁要派50万名志愿兵对抗俄罗斯军队，如果它不从车臣领土撤离。在一段紧张的相持之后，为了避免北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升级为整个地区的冲突，莫斯科作出了让步。”（注25）

1994年12月，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引发了更激烈、更广泛的冲突。两个东正教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乌克兰总统则“在外交上含糊其辞，仅仅号召和平解决危机”。俄罗斯的行动亦得到了东正教北奥塞梯政府和55%—60%的北奥塞梯人民的支持。（注26）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联邦内外的绝大部分穆斯林站在车臣人一边。伊斯兰国际纵队立即从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地开来支援。穆斯林国家支持车臣的事业，而且据说土耳其和伊朗提供了物质援助，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与伊朗和解的愿望。为车臣提供的武器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塞拜疆进入俄罗斯联邦，迫使俄罗斯封闭了它与阿塞拜疆的边境，从而也切断了运往车臣的医药和其他物资供应。（注27）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穆斯林团结一致支持车臣的行动。尽管号召全高加索的穆斯林发动反俄罗斯的圣战没有产生效果，但伏尔加—乌拉

尔地区六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求俄罗斯停止其军事行动，高加索各穆斯林共和国的代表呼吁民众进行反对俄罗斯统治的不服从运动。楚瓦什共和国总统则同意楚瓦什的应征入伍者不参加反对其穆斯林同胞的军事行动。“对战争最强烈的抗议”发生在车臣的两个邻近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人在俄罗斯军队开往车臣的途中袭击了它，致使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印古什政府“事实上已对俄罗斯宣战”。在达吉斯坦也发生了攻击俄罗斯军队的事件。俄罗斯人以炮轰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村庄作为反击。（注28）车臣人袭击基兹利亚尔市之后，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1月将佩尔沃马伊斯科伊村夷为平地，进一步激起了达吉斯坦人对俄罗斯人的仇视。

车臣的事业也得到了在外散居的车臣人的帮助，他们当年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世纪俄罗斯对高加索山区的入侵造成的。在外散居者筹集资金、采办武器，并为车臣提供志愿兵。为数众多的车臣族在外散居者居住在约旦和土耳其，因而导致约旦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使土耳其更情愿支持车臣人。1996年1月，当战火蔓延到土耳其之时，土耳其公众舆论对车臣族在外散居者扣押渡船和俄罗斯人质的行动表示了同情。在车臣领导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与俄罗斯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危机的协议，然而却使双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为恶化。

车臣冲突蔓延到达吉斯坦，俄罗斯作出的反应，以及1996年初的扣押渡船事件，凸显了这一冲突升级为俄罗斯同高加索山区人民之间沿着19世纪持续了几十年的斗争线而展开的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菲奥纳·希尔1995年警告说：“北高加索是一堆干柴，在那里，任何一个共和国发生的冲突都可能点燃一场地区性大火，这场大火将越过边界蔓延到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并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北高加索的在外散居者牵连进去。正如车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控制该地区的冲突并非易事……那里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与车臣毗邻的共和国的领土之上。”一位同意这一看法的俄罗斯分析

家指出：“非正式联盟”正沿着文明线发展。“基督教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和北奥塞梯人正团结起来对抗穆斯林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塔吉克斯坦参战的俄罗斯人“正冒着被卷入与穆斯林世界持久对抗的风险”。（注29）

在另一场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中，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为从后者中独立而战。第二层次参与者是亚美尼亚政府，第三层次参与者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量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争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于1992—1993年加剧，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后平息下来。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则支持亚美尼亚人，并利用它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抵制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势力。这场战争是新近的一幕，就其斗争而言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黑海地区和高加索控制权的斗争，而就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强烈的对抗而言，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后者对前者的大屠杀。

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始终如一地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反对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是首先承认非波罗的海的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独立的国家。在整个冲突中，土耳其都为阿塞拜疆提供了财政和物质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随着1991—1992年暴力冲突的加剧，以及亚美尼亚人挺进阿塞拜疆领土，土耳其人群情激奋，受到压力的土耳其政府开始支持其种族—宗教兄弟。但土耳其也担心这将突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并激怒其北约盟友。因此，土耳其受到了断层线战争第二层次参与者传统上面临的多重压力。然而，土耳其政府发现，支持阿塞拜疆和对抗亚美尼亚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你的兄弟遭受杀害之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位官员补充道：“我们感到了压力。我们的报纸上充满了这些暴行的照片……我们或许应当让亚美尼亚人看看，这个

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则说：土耳其“应当吓唬吓唬亚美尼亚人”。土耳其和伊朗一道警告亚美尼亚人，它将不赞同边界的任何改动。奥扎尔拦截了经过土耳其运往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结果使亚美尼亚人在1992—1993年冬天濒于饥荒。对此，俄罗斯元帅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警告说：“如果另一方（即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那我们就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一年之后，奥扎尔仍然是一副好战面孔。他嘲笑道：“亚美尼亚人能怎么样，如果打起来了……他们能打进土耳其吗？”土耳其“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注30）

1993年夏季和秋季，进攻的亚美尼亚人接近了伊朗边界，这进一步引起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应，这两个国家正彼此争夺在阿塞拜疆和中亚穆斯林国家内的影响。土耳其宣称：进攻威胁了土耳其的安全，要求亚美尼亚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领土。并向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增派了军队。据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在边界上交了火。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宣布，如果亚美尼亚军队进入邻近土耳其的阿塞拜疆飞地纳希切万，她将要求宣战。伊朗也向阿塞拜疆调遣军队并进入了该地区，据说是为因亚美尼亚入侵而造成的难民建立避难所。伊朗的行动据说使得土耳其人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而不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同时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在为阿塞拜疆人提供保护方面与伊朗展开竞争。这场危机最终通过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以及美国政府对亚美尼亚政府施加压力，亚美尼亚政府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而得以平息。（注31）

生活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且与充满敌意的土耳其接壤的内陆国家里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就不断寻求其东正教亲族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保护，特别是将俄罗斯视为老大哥。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发起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兵支持该地区被认为是忠于共产党政权的巴

库政府。苏联解体后，上述考虑让位于更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俄罗斯开始积极地支持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对此阿塞拜疆指责说：“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际上，俄罗斯军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早就存在于苏联军队中。军队中的亚美尼亚人比穆斯林更经常地得到提升并被派往战斗部队。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军队驻防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第366机动化步兵团在亚美尼亚人对科德扎利镇的进攻中起了主要作用。在那次行动中，据说有1000名阿塞拜疆人被屠杀。此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也参加了战斗。1992—1993年冬。当亚美尼亚遭到土耳其禁运时，它“由于从俄罗斯得到了几十亿卢布的贷款而免于全面的经济崩溃”。1993年春季，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亚美尼亚军队开辟连接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走廊的行动。据报道，俄罗斯一支拥有40辆坦克的装甲部队参加了1993年夏季在卡拉巴赫的进攻。（注32）而亚美尼亚，正如希尔和朱厄特所指出的，“除了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外，别无选择。它在原材料、能源、食品供应，以及在边界防范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这样的历史夙敌上，都依赖于俄罗斯。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所有的经济和军事协议，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为了让俄罗斯满意，还放弃了对苏联财产权利的全部要求”。（注33）

俄罗斯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扩大了它对阿塞拜疆人的影响。1993年6月，阿塞拜疆民族主义领导人埃尔奇贝伊在一场政变中被赶下了台，被据信是亲俄的前共产党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所取代。阿利耶夫认识到，为了制约亚美尼亚人，有必要讨好俄罗斯人。他改变了阿塞拜疆拒绝加入独联体的态度，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他还同意俄罗斯参加开发阿塞拜疆油田的国际合作。作为回报，俄罗斯开始为阿塞拜疆训练部队，向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要其停止支持卡拉巴赫武装力量，并劝说他们从阿塞拜疆撤军。通过把支持的重心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俄罗斯也得以对阿塞拜疆施加影响，并得以在该国对抗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不仅加强了它在高加索关系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该地区的主要

穆斯林对手。

除俄罗斯外，亚美尼亚获得的重大支持来自其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为数众多、富有和颇具影响力的在外散居者，包括在美国的约100万亚美尼亚裔人和在法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人。他们为帮助亚美尼亚人度过由于土耳其封锁而造成的危机提供了资金和生活用品，还为亚美尼亚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了志愿兵。来自美国亚美尼亚群体的援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达5000万至7500万美元。亚美尼亚族的外在散居者还对其居住国的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亚美尼亚裔人在美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马塞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他们的影响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并使亚美尼亚成为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占第三位的国家。从外国获得的支援对于亚美尼亚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高加索的以色列”。（注34）正如19世纪俄罗斯对北高加索的占领造成了那些现今支持车臣人反抗俄罗斯的在外散居者一样，20世纪初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造成了那些现今使亚美尼亚人得以抵抗土耳其人、击败阿塞拜疆人的在外散居者。

南斯拉夫地区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最复杂、最混乱和最全面的断层线战争的场所。在第一层次上，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族与克罗地亚塞族在克罗地亚交火；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开战，而且后两者还相互开战。在第二层次上，塞尔维亚政府通过帮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塞族的方式来推行“大塞尔维亚”；而渴望建立“大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政府则支持波斯尼亚克族。在第三层次上，是各个文明的大集结：德国、奥地利、梵蒂冈、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其他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伊斯兰国际和伊斯兰国家则普遍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后者亦同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亲

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克罗地亚在德国的在外散居者以及波斯尼亚在土耳其的在外散居者都行动起来支持其母国。在对这三方面的支持中，教会和宗教团体都非常活跃。至少德国、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的行动受到了其社会中的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重大影响。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于制止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为它们在其他共和国参战的本族人提供了武器、供给品、资金和庇护所，有时还提供武装部队。塞族、克族和穆斯林都从南斯拉夫之外的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了以资金、武器、供给品、志愿兵和军事训练形式提供的帮助，以及政治和外交支持。第一层次上的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通常都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绝不退让，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第二层次上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最初虽积极支持其在第一层次上作战的亲族，但其更多重的利益后来导致它们发挥了调解和制约作用。同样，第三层次上的俄罗斯、德国和美国政府，也推动了一直得到它们支持的第二层次上的政府采取制约和妥协的态度。

南斯拉夫的分裂始于199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在争取独立并寻求西欧国家的支持。西方的反应取决于德国，而德国的反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天主教联系。波恩政府在来自德国天主教集团、执政伙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法兰克福汇报》和其他媒介的压力下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巴伐利亚新闻媒介，在激发公众赞同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刘易斯指出：“巴伐利亚电视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以及与克罗地亚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和态度坚决的巴伐利亚天主教会巨大压力，战争开始后便热切地向全国作了报道，而且报道是非常片面的。”德国政府在承认两国独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在德国社会的压力下并无选择余地。“在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是由于舆论的

推动，而不是政府的推动。”德国首先向欧洲联盟施加压力，要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又先于欧盟在1991年12月独自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一位德国学者在1995年评论说：“在整个冲突中，波恩都将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某种保护对象，尽管克罗地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人愤怒，它却依然得到了德国的坚决支持。”（注35）

奥地利和意大利紧接着承认了这两个新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梵蒂冈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认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教皇宣称克罗地亚是“（西方）基督教的防护堤”，并抢在欧盟之前承认了这两个国家。（注36）于是梵蒂冈也成为冲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访问这三个共和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由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反对，教皇未能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塞尔维亚不愿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不过，他访问了萨格勒布，并在那里向塞普蒂纳茨红衣主教致意。这位红衣主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害和屠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曾有过联系。

克罗地亚在西方承认其独立之后，便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9月宣布对所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武器还是通过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以及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流入了克罗地亚。1991年战争升级后，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了6倍，据说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为天主事工会所控制”，其中大部分可能进入了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据报道，1993年克罗地亚从德国和波兰购买了一些米格—21型飞机，并且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认可。克罗地亚国防军得到了成百上千名“来自西欧、克罗地亚在外散居者以及东欧天主教国家”志愿兵的支持。他们迫切地要参加“反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战斗。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还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部分是由于这些亲缘国家的帮助，克罗地亚加强了军事力量，因

而能够与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相抗衡。（注37）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数十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罗地亚还从它为数众多的在外散居者那里得到了好处。居住在西欧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罗地亚裔人为购买武器和装备而捐款。在美国的各类克罗地亚裔人协会则代表其母国游说国会和总统。特别重要和有影响的是居住在德国的60万克罗地亚裔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捍卫其新近独立的母国”，他们提供了几百名志愿兵。（注38）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做顾问。1995年，美国和德国政府还为克罗地亚军队进攻克拉伊纳大开绿灯。美国军事顾问参与计划了这次美国式的进攻。据克罗地亚人说，这次进攻还得益于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罗地亚已成为“我们事实上的战略盟友”。据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打算，即估计到世界的这一部分最终将由两个地区势力中心主导，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前者与美国相联系，后者则加入了一直扩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团。”（注39）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军人、议员和东正教领袖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对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蔑视，以及对西方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批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在两国国内掀起了反对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罗斯公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怀有同样的情绪，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对北约1995年夏天发动的空袭。俄罗斯民族主义集团在几个大城市里成功地招募年

轻的俄罗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业”。据报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罗斯人与来自罗马尼亚、希腊的志愿者一道加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对他们所谓的“天主教法西斯分子”和“伊斯兰好战分子”作战。1992年，据报道，一支“穿着哥萨克军装”的俄罗斯部队活跃在波斯尼亚。1995年，有俄罗斯人在塞族精锐部队中服役，而且，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和希腊的士兵参加了塞族对联合国泽帕安全区的进攻。（注40）

尽管有武器禁运决议，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朋友还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装备。1993年初，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显然向塞尔维亚人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导弹导弹和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人员被派往塞尔维亚操作这些装置，并训练塞尔维亚人如何使用它们。塞尔维亚还从其他东正教国家购买武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其“最积极的”供应者，乌克兰也是其武器来源之一。此外，俄罗斯驻东斯拉沃尼亚的维和部队将联合国的物资转手给塞尔维亚人，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并帮助塞尔维亚军队获得武器。（注41）

尽管受到了经济制裁，塞尔维亚人依然较好地维持了生存，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从蒂米什瓦拉组织偷运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后是在希腊政府的默许之下，希腊的公司从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偷运。从希腊运来的食品、化学药品、电脑和其他物资通过马其顿进入了塞尔维亚，还有相应数量的塞尔维亚产品被运了出来。（注42）金钱的诱惑和对文化亲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笑柄，正如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对所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成为笑柄一样。

在整个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政府一直同北约西方成员国支持的措施保持距离，反对北约在波斯尼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塞尔维亚，并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1994年，希腊总理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强调希腊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东正

教联系的重要性，公开谴责梵蒂冈、德国和欧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给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外交承认。（注43）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领导人受到了两种愿望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想要保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塞尔维亚人，以借此使那些经常谴责他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解除武装。总体说来，他的后一种愿望占了上风，因而俄罗斯持续不断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罗斯政府坚决抵制对塞尔维亚实行较严厉的经济制裁，俄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解除现行的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决议。俄罗斯还推动加紧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及对克罗地亚实行的经济制裁。1993年12月，俄罗斯极力主张放松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允许它为塞尔维亚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气，但俄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阻挠。1994年和1995年，俄罗斯强硬地反对北约轰炸波斯尼亚塞族。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北约轰炸的决议，并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辞职，批评他捍卫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不力。同样是在1995年，俄罗斯谴责北约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叶利钦总统警告说：继续轰炸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他质问道：“当北约在轰炸塞尔维亚人的时候，我们怎能和它达成协议？”西方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穆斯林进攻之时，为什么不对其采取行动？还有克罗地亚进攻之时？”（注44）俄罗斯还一贯反对中止对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已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试图加强禁运措施。

俄罗斯还以其他方式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的地位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决了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禁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转运燃料。1994年4月，俄罗斯阻止了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行为的决议。它还阻止任命来自任何一个

北约国家的人担任联合国战争罪行公诉人，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有反塞尔维亚的倾向，它还反对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并允许他在俄罗斯避难。（注45） 1993年9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延长派驻南斯拉夫2.2万人维和部队的授权。1995年夏，俄罗斯反对但未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增派1.2万维和人员的决议，并谴责克罗地亚人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以及西方国家政府未对这次进攻采取行动。

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穆斯林世界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亚的事业在穆斯林国家深得人心；对波斯尼亚的援助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竞争，试图通过援助扩大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逊尼派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对波斯尼亚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义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00万美元），也有外交支持和大规模军事援助，还有暴力行动，例如1993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杀害12名克罗地亚人的事件，就是“为报复在波斯尼亚屠杀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罪行”。（注46） 这种支援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波斯尼亚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塞尔维亚人最初横扫一切的胜利之后成功地收复领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强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亚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对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它还使得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要求产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国家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反复重申它们与波斯尼亚的教友休戚与共。1992年，伊朗率先将这场战争称为反对信仰基督的塞尔维亚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宗教冲突。阿贾米指出，伊朗为得到“波斯尼亚的感谢预付了定金”，而且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榜样，刺激它们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动下，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了波斯尼亚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在联合国为波

斯尼亚人的事业游说。1992年8月，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号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1993年初，穆斯林国家为西方采取行动保护波斯尼亚人规定了最后期限，期限过后它们将不受限制地为波斯尼亚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制定的为穆斯林提供避难所、监视塞尔维亚边境但放弃任何军事干预的计划。它提出如下要求：结束武器禁运，使用武力对抗塞尔维亚的重型武器，在塞尔维亚边境巡逻，以及将穆斯林国家的军队纳入维和部队。同年6月，尽管遭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反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是使联合国人权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行为，并呼吁解除武器禁运。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由它向联合国提供1.8万人的维和部队，而这些士兵来自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美国否决了伊朗，塞尔维亚人则坚决反对让土耳其人加入维和部队。然而土耳其部队还是于1994年夏进入了波斯尼亚。至1995年，在联合国2.5万人的保护部队中，有7000名官兵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长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游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约立即进行空袭，保护波斯尼亚人不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据报道说，由于西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土耳其和北约盟国的关系曾处于严重紧张状态。（注47）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先后大张旗鼓地访问了萨拉热窝，以表示对穆斯林的关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区免遭塞族的进攻，因而导致了下述后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马来西亚违反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为军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资金。1995年8月，9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宣布联合国武器禁运无效，9月，伊斯兰会议

组织的52个成员一致同意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响，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个问题得到过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反对党伊斯兰繁荣党利用这个问题来反对政府。政府官员则强调土耳其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不断地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注48）

伊斯兰世界给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最为重要的帮助是军事援助：武器、购买武器的资金、军事训练和志愿兵。战争开始后，波斯尼亚政府立即请来了圣战者组织志愿兵，据说志愿兵的总人数达到了将近4000人，多是为塞族或者克族作战的外国人。他们包括来自伊朗共和国卫队和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还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的国民，也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中阵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将受伤的士兵运回吉达治疗。1992年秋天，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赶来训练波斯尼亚军队，此后训练主要由伊朗共和国卫队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分队正在组织极端主义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队伍。一位美国官员说：“伊朗将此作为进入欧洲薄弱地区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的消息，圣战者组织为伊斯兰特种旅训练了3000—5000名波斯尼亚士兵。波斯尼亚政府利用圣战者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非法的行动和突击行动”，尽管这些部队常常骚扰当地居民，并给政府带来了其他问题。代顿协议要求所有的外国士兵撤离波斯尼亚，但波斯尼亚政府通过给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亚国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国卫队人员作为救援人员，帮助他们留了下来。一位美国官员在1996年初警告

说：“波斯尼亚政府多亏了这些集团，特别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付这些人。12个月之后我们将撤离，但圣战者组织执意留下。”（注49）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首的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为波斯尼亚发展军事实力提供了大量资金。1992年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中，沙特政府和个人为波斯尼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表面上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大部分被用于军事目的。据报道，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波斯尼亚就得到了价值1.6亿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亚又从沙特获得了3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还有5亿美元的据称为人道主义的援助。伊朗也是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据美国官员称，它每年向波斯尼亚提供几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根据另一份报告，在战争头几年进入波黑的总价值为20亿美元的武器中，有80%—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于这些财政援助，波斯尼亚人得以购置成千上万吨的武器。这些武器中被拦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枪和百万发子弹，第二批中有1.1万支步枪、30门迫击炮、75万发子弹和炮弹，第三批中有地对地火箭、弹药、吉普车和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从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运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运往波斯尼亚的，但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克罗地亚转运的，先空运至萨格勒布再转陆路，或者从海上运至斯普利特和克罗地亚其他港口再转陆路。作为准许运输的回报，据说克罗地亚得到了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罗地亚人考虑到他们在今后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亚打仗，因而禁止经其领土运送坦克和重炮。（注50）

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得到的资金、人员、训练和武器，使得人们所说的波斯尼亚“杂牌”军变成了一支相对来说装备精良、具有实力的军队。1994年冬，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波斯尼亚军队在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注51）为了将新的军事实力用于实践，波斯尼亚人撕毁了停火协议，首先成功地发

动了对克族民兵的攻击，随后又在1994年春攻击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亚第五军从比哈奇联合国安全区出动，击败了塞族军队，获得了波斯尼亚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从塞族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而后者的实力则由于米洛舍维奇总统禁止对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亚军队再次破坏了停战协议，开始向图兹拉附近地区大举推进，随后于6月份在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攻。穆斯林亲族的支持，对于波斯尼亚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三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个例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都严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担忧。随着战争的继续，各集团间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认同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进行断层线战争。

这个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国，其领导人在言辞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同意使用美国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保护联合国安全区，并倡议结束武器禁运。美国没有认真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结束武器禁运，却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亚运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为波斯尼亚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并于1994年停止执行禁运。（注52）美国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盟国的反感，导致了被普遍视为北约内部重大危机的后果。代顿协议签订后，美国同意在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方面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

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美国试图通过站在波斯尼亚人一边和建议（尽管不成功）结束禁运，来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对原来是世俗的、倾向欧洲的波斯尼亚人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便是动机，那么美国为什么默许伊朗和沙特进行援助，为什么不更积极地推动取消禁运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国官员为什么不公开警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在巴尔干造成危险？对美国行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受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为了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而按照它们的愿望行事。然而，这些关系本是基于同波斯尼亚无关的综合利益，它们并不会因美国未能帮助波斯尼亚而受到严重伤害。此外，这一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其他方面经常向伊朗提出挑战，并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竞相扩大在波斯尼亚的影响之时，默许大量伊朗武器进入波斯尼亚。

文明现实政治的考虑可能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其他因素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塞族人在战争初期的残暴行为，使美国人将其视为杀害无辜、进行种族灭绝的“坏家伙”，而波斯尼亚人却为自己树立了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都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合国安全区和停火协议的破坏。按照丽贝卡·韦斯特的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波斯尼亚人成了“他们心目中被无辜受害、被他人屠杀却从不屠杀他人的可怜的巴尔干人。”（注53）

美国的精英也倾向于波斯尼亚人，因为他们偏好多文化国家的观念，而在战争初始阶段，波斯尼亚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奉行维护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政策，而不

顾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的反对。既然他们相信一个民族正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那么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精英仍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景象结合在一起，因而对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同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由于美国政府拒绝如实地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伯纳德—亨利·利维说：“波斯尼亚是我们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编辑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场战争，从感情上说已经成了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的同义语。在战争中阵亡的人被当作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牺牲的烈士。”（注54）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在各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波斯尼亚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而民主的政府、共产党的政府，以及最为积极的法西斯政府则分别对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战争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为了本文明亲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东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年之后，西班牙战争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而最后结束。巴尔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平息甚至暂时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意味着没有结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断进行中的文明冲突的又一流血插曲。

终止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等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至1994年春，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展开的持续了六年的战争，已使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筋疲力尽”，因而双方都同意停战。1995年秋，同样有报告说，波斯尼亚的“参战各方都已筋疲力尽”，因而代顿协议便应运而生。（注55）然而，如此停战只是一种自我限制，它使双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当一方看到有机可乘之时，战争便会重新开始。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

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通过拥有共同文化且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的调停得以解决，因为在该文化之内，人们承认这个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双方都能信任它去寻求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解决方案。教皇能够成功地调解阿根廷—智利之间的边界纠纷。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中并不存在非相关利益方，因此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个人、机构或国家极为困难。任何一个潜在的调解者都会是属于相互冲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属于另一种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种文明，无法获取双方的信任。车臣人和俄罗斯人，或泰米尔和僧伽罗人都不会寻求教皇的帮助。国际组织在调解时也经常失败，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使双方付出重大代价或满足它们重大利益的能力。

断层线战争不会由不具有相关利益的个人、集团或组织的调解，而只能由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调解而结束。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集结起来为其亲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够与其对等者谈判协议，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说服自己的亲族接受达成的协议。虽然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集结会加剧和拖延战争，但它通常也是限制和终止战争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支持者并不想转变成第一层次的直接参战方，因而希望将战争置于控制之下。与第一层次全力以赴的参与者相比，它们的利益是更多方面的，并要考虑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因此，在某一时刻，它们可能认为停止战争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它们集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亲族，它们便对其具有了影响力。支持者因此成为战争的制约者和终止者。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涉及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家的内部暴动和缺少重要集结的断层线战争，也同样构成了特殊的问题。如果战争延续一定时间，反叛者的要求往往从某种形式的自治升级为要求完全独立，而这正是政府所反对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为停止战斗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样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对外来者介入它认为涉及“犯罪分子”的纯内政事务。将此定义为内政事务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国家与车臣的关系就是这样。

对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有关文明来说，这些问题便成了综合性问题。例如，始于1956年的苏丹战争于1972年停止，当时交战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功地促使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使南苏丹获得了自治。这事实上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取得的唯一胜利。然而，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注56）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

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两个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和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一个方案，却遭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创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注57）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筋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的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在谈判期间是被置于边缘地位。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注58）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七种关系（见图

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销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们。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己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族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族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核心。（注59） 通过

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罗斯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罗斯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注60）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一方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注61）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

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地区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扩大到东斯拉沃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注62）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

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注63）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各自的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驱逐出克拉伊纳，允许克族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族占领的东斯拉沃尼亚，变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叛国

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51%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近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汤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注1）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注2）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注3）（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正走出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鳕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普世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

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普世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

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加，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想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

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轻的、更强有力的文明”。（注4）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12.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长率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备下述两个先决条件时，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首先，接收国给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资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专业人员以优先权；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够融入接收国和西方的文化。美国可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上存在问题，欧洲则可能在满足第二个条件上存在问题。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 反社会行为的增長，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 家庭的衰敗，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 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

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4. “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 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些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注5）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理念、价值观和实践。一位瑞典人说：“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体制、社会实践、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响，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做礼拜。有证据显示，尽管在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没有出现宗教复兴，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宗教活动似乎在加强（注6）。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较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

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注7）

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的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注8）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

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冈纳·默达尔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美国信条是“这个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国家的聚合剂”，此话进一步证实了自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和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的外国观察家的论点。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赞同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注9）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被其相当一部分公民所摒弃，那么在美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与美国相比较，另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以意识形态形式来界定其统一，它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实例。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注10）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库尔思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注11）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就西方的性质和未来展开了新的讨论，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对如何确保其继续存在也更为关切。这部分是由于认识到了扩大西方的重要机构北约、将东面的西方国家包括进来的必要性，部分是由于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南斯拉夫的分裂作出反应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它也更广泛地反映了，在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对西方未来的统一，特别是这一点对于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意味着什么，感到忧虑。随着西方国家与日益强大的非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西方人越来越意识到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西方文化核心。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强调恢复大西洋共同体活力的必要性。1994年末和1995年，德国国防部长、英国国防大臣、法国外交部长、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类其他重要人物都对这一目标表示了拥护。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总结，他于1994年11月论证了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必要，并指出它将建立在四个支柱上：“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和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注12）1995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个“更新”跨大西洋关系的计划，使得欧盟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协议。同时，许多欧洲政要和商界领袖都支持建立跨大

西洋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的劳联—产联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是其领导人却热情地支持建立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认为它不会使美国的就业机会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它还得到了欧洲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保守派（纽特·金里奇）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英国领导人的支持。

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欧洲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便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马哈蒂尔总理警告亚洲人说：“由于其贸易影响，联合起来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就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号施令。”（注13）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只有承认和理解现实，才能建设性地改变现实。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

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却反应迟钝。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曾支持多种文明共存的苏联、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俄罗斯的统一，却无力制止造成分裂的强大的种族和文化力量。他们推动多文明的经济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要么像亚洲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那样没有意义，要么就像与墨西哥搞在一起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带来未曾预料的巨大经济和政治代价。它们试图跟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与俄罗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接触关系”，即使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全心全意地让俄罗斯参与在波斯尼亚寻求和平的努力，尽管作为东正教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在那场战争中有重大的利益。为了实现波斯尼亚多文明国家的幻想，克林顿政府拒绝给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却在巴尔干扶持了一个伊朗的一党专政的伊斯兰伙伴。同样，美国政府还支持穆斯林服从东正教国家的统治，坚持认为“毫无疑问，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注14）

虽然欧洲人普遍承认，在以西方基督教为一方、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线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国务卿却说：美国“不承认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欧洲伊斯兰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然而，正是那些不承认这些根本差异的人，注定要为这些差异而灰心丧气。克林顿政府起初好像没有看到美国和东亚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而一再提出有关贸易、人权、核扩散和其他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总体说来，美国政府在适应受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那些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在一些情况下这表现为，仍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应尊重冷战时的盟友和武器控制协议；北约应保持其冷战期间的状态；日美安全条约对东亚安全至关重要；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违反；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必须遵守。显然，所有这些和另一些冷战

遗产都不应轻易抛弃。但是，继续保持它们在冷战期间的形式，也不一定符合美国或者西方的利益。多文明世界的现实表明，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还应当承认，让两个互为仇敌、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签订是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确保苏联和美国互不伤害，从而阻止苏美核战争，但它也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和其他社会保护自己不受预想不到的核威胁、恐怖分子和无理性的独裁者攻击的能力。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威慑苏联对日本的进攻。那么在冷战后时代，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遏制和威慑中国？推迟日本对崛起的中国的顺应？阻止日本进一步军事化？日本人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美国人对自己为防卫日本而承担的非互惠义务的必要性，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的签订是为了缓解北约和华约组织在中欧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已不复存在。目前这一协议的主要影响，是给俄罗斯在对付来自南面穆斯林国家造成的安全威胁时造成了困难。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中发现的“错误意识”相类似。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注15）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霍华德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几乎遍及世界的扩张和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在冷战期间保护美国不受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这种需要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西方人可能被引导去应验布鲁图 12.2 的众所周知的有力逻辑：

时机已熟我兵强，
敌势日增需谨防，
纵处高峰防滑落，
潮涨潮落有文章。
随潮进取操胜券，
错过机缘引恨长，

而今正是适航日，
抓紧时机旌旗扬。

然而正是这一逻辑导致了布鲁图在腓利皮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注16）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 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 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 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

紧密结盟。

- 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 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 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 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前面已经提及，这样的战争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升级而引发，特别是当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非穆斯林之时。如果雄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国家竞相为其参战的宗教亲族提供援助，战争就较有可能升级。如果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亲缘国家认为不深入地卷入战争符合自己的利益，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的

日益自我伸张继续下去，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注17）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若是发生战争，它将会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大幅度减少。台湾和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谈判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美国无视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地区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陆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了越南的大片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射核弹的能力，因此双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态度，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使用核武器。然而，两国国内都存在对核袭击的恐惧，在美国尤为强烈。于是，很多美国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种危险？即使中国控制了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对于我们又会有什么不同？反战情绪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内最为强烈，那里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这

不是我们的战争”，并试图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模式，选择退出战争。在中国人巩固了它在东亚的最初战果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时曾希望的那个方向转变，他们认为：击败这个新近宣称霸权的国家代价太大，还是让我们满足于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在西太平洋进行的零星战斗或“虚构的战争”吧。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中国的精力被牵制在东亚的机会，对巴基斯坦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旨在彻底摧毁该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前去支援巴基斯坦。与伊朗军队和由不同民族集团组成的巴基斯坦游击队作战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说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亚。但是，中国对抗美国的最初胜利在穆斯林社会中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西方运动，剩下的几个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伊斯兰主义运动推翻。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来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后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软弱而引发的反西方浪潮导致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对此，已被大大缩编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制止。

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其他重要国家中寻求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日本军队占领了存留下来的日本美军基地，美军人员匆忙撤出。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封锁，美日舰艇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战争伊始，中国提议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令人隐约地联想起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然而，中国的战果对俄罗斯产生了与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国赢取胜利和全面控制东亚的前景吓坏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反对中国的方向发展，开始向西伯利亚增派军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大量中国人干预了这些行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自己的同胞，并占领

了海参崴、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重要地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在中西伯利亚蔓延，在原先被中国置于“保护”之下的蒙古出现了暴动。

控制和获取石油对于所有参战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尽管对核能源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石油进口，这进一步加强了日本顺应中国的倾向，以及它确保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石油渠道畅通的倾向。战争期间，随着阿拉伯国家被伊斯兰好战分子所控制，波斯湾对西方石油的供应已减少到杯水车薪，于是西方日益依赖于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这导致西方加紧了把俄罗斯纳入自己一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加强对其南面石油蕴藏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急切地动员欧洲盟国给予全面支持。欧洲国家虽然扩大了对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但不情愿在军事上卷入。然而，中国和伊朗担心西方国家最终会集结起来支持美国，甚至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支持了英国和法国那样。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它们秘密地向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战争。除日本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恐吓几乎总是产生与中国预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并报告了这一部署行动，北约理事会声明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导弹。然而，在北约未及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卫士之历史角色的塞尔维亚，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了进去，于是两个国家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继续进行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被迫终止的种族清洗。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试图帮助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入侵，土耳其人纷纷逃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市内一片恐慌。同时，从阿尔及利亚发射的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马赛附近爆炸，北约以对北非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来进行报复。

就这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

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的战争将如何终止呢？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显，只要对它们的使用超过最低限度，双方的主要国家都将被严重损毁。如果相互威慑能够起作用，筋疲力尽的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西方企图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中国。然而，由于日本已与中国结盟，日本岛便成为中国的防护体，这使得美国无法使用海军攻击中国沿海的人口和工业中心。替代办法便是从西面对付中国。中俄之间的战斗促使北约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与它合作抵御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并维持俄罗斯对中亚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同时还促进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反对中国的统治，逐步调动和部署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相互核摧毁，或是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其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都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实力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印度逃避了这场劫难，即使它也是参战方，那也将为印度沿着印度路线重塑世界敞开大门。大批美国公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狭隘的西方取向导致了美国的严重衰弱。拉美裔领导人通过允诺可从置身战争之外的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马歇尔计划式的广泛援助，得以上台执政。另一方面，非洲不仅对欧洲的重建没有帮助，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民众反而出动掠夺欧洲残存的财富。在亚洲，既然中国、日本和朝鲜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权力也向南转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画脚。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度和复兴了的中国发生

冲突。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转移。

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来说，接受这些原则和各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为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回顾他为了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时曾辩护道：“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教和印度教文明都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注18）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伊朗尽管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显然仍认为它与巴基斯坦同样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放弃了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计划，南非也销毁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

日利亚开始发展其核能力，南非可能重新希望获得核武器。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的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会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甚至像七国首脑会议处理全球经济问题那样。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美国赞成给予日本和德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显然只有在其他国家进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巴西提出增加五个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德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然而，这样便使世界上的10亿穆斯林没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亚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林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弃权）作出选择。将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这样，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 and 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离。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注19）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注20）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

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较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讨论。两年后，一本白皮书提出了政府的立场。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

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

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

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注21）

新加坡要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声明，会更强调相对于社会群体权利而言的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真理源于思想争论、政治参与和竞争，强调法治而不是由专家、智者和负责任的统治者治国。然而，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新加坡这些价值观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至少在基本的“浅显”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的混合体。显然，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同时改变。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发展是直线式的还是循环式的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设想，加强教育和自觉性，以及提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理解水平所导致的现代化和人类道德的发展，会使文明向越来越高的水平持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粗犷，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较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它作为一个文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的进攻下消失。

总体来说，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当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对个人的恶毒侮辱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是否仅仅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的结果，如果是如此，那么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时是否会出现道德的回复？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可以说明“大混乱”现象的相关证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獗，吸毒现象泛滥；在许多国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会团结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以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兴起，越来越可与跨国公司生产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苏联、南亚和中东，它似

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国、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

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注22）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附录

脚注

1.1 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趋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原书脚注

1.2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意志30年战争）的局面，划定了各国疆域和确认了它们的主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当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转折点。——编者注

2.1 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两极的固定参照点。“东方”和“西方”却不具备这样的参照点。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是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西方和东方最初大概是指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然而，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远东实际上是远西。对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来说，西方意味着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着中国”。见威廉·E·纳夫《从日本观点看“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回顾》，载于《比较文化评论》杂志第13—14期，1985年秋和1986年春，第228页。——原书脚注

2.2 那么犹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很少提到它。从信仰者的人数来看，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汤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它在

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而且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保持在西方的、东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明中。随着以色列的建立，犹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观认同：宗教、语言、习俗、文学、体制以及领土的和政治的家园。但是什么是它的主观认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的文明认同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认同于犹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犹太教和完全认同于他们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后者主要发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犹太人。见摩德凯·M·卡普兰：《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费城：犹太教复兴运动出版社，1981年版；初版于1934年），主要见该书第173—208页。——原书脚注

2.3 格劳修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其《战争与和平法》（1625）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编者注

3.1 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暂且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原书脚注

4.1 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来说是有碍进步的。然而，那些为普世文明的优点辩护的人，通常不为世界帝国的优点辩护。——原书脚注

4.2 事实上，真纳是毕业于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李光耀毕业于剑桥大学，班达拉奈克毕业于牛津大学。——编者注

8.1

* 四轮投票情况如下: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北京	32	37	40	43
悉尼	30	30	37	45
曼彻斯特	11	13	11	
柏林	9	9		
伊斯坦布尔	7			
弃权			1	1
总数	89	89	89	89

8.2 拉斯帕伊所著《圣贤营》一书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罗伯特·拉夫兰特版）。在法国对移民问题的关切日增之际，又于1985年发行了新版本。1994年，当马修·康奈利和保罗·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4年12月）上发表的题为《一定是非西方反对西方吗？》的文章加强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时，这部小说也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为1985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后又在《社会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号，第115—117页）上用英文发表。——原书脚注

9.1 阿卡城（Acre）是地中海西岸的一个港市。在现今以色列西北部。——编者注

9.2 10至11世纪天主教会内部的一次僧侣运动，主张教皇有权废黜君主。——编者注

9.3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

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究过。——原书脚注

9.4 本书作者在此处及下文中所述中国领导人或中国文件的言论，绝大部分是摘自美国和港台报刊，我们的译文则是按此书原文转译，希读者明鉴。——编者注

9.5 指美国1899年和1900年两度照会英、德、法、意、日、俄六国，要求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求“机会均等”。——编者注

10.1 原文如此。——编者注

10.2 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

12.1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

12.2 布鲁图（公元前85—42年），古罗马人物，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行刺后逃往马其顿，兴兵与凯撒派势力交战，公元前42

年取得第一次腓利皮战役的胜利，但在三周后的第二次交锋中，败于安东尼和屋大维联军，遂自杀。——编者注

注释

第一章

1.Henry A.Kissinger , Diplomacy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94) , pp 23-24.

2.H.D.S.Greenway's phrase , Boston Globe , 3 December 1992 , p.19.

3.Vaclav Havel , “The New Measure of Man ,” New York Times , 8 July 1994 , p.A27;Jacques Delors , “Questions Concerning European Security ,”Address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Brussels , 10 September 1993 , p.2.

4.Thomas S.Kuhn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2) , pp.17-18.

5.John Lewis Gaddis , “Toward the Post-Cold War World.”Foreign Affairs , 70 (Spring 1991) , 101 ;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O.Keohane ,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Goldstein and Keohane , eds. ,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 Beliefs , Institutions ,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8-17.

6.Francis Fukuyama ,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 16 (Summer 1989) , 4 , 18.

7.“Address to the Congress Reporting on the Yalta Conference , ”1 March 1945 , in Samuel I.Rosenman , ed. ,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 (New York : Russell and Russell , 1969) , XIII , 586.

8.See Max 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 , The Real World Order : Zones of Peace , Zones of Turmoil (Chatham , NJ : Chatham House , 1993) ;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 “Introduction :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 ”in Keohane , Nye , and Stanley Hoffmann , eds. ,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 1989-1991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6 ; and James M.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 “A Tale of Two Worlds : 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46 (Spring 1992) , 467-491.

9.See F.S.C.Northrop ,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 (New York : Macmillan , 1946) .

10.Edward W.Said , Orientalism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 1978) , pp.43-44.

11.See Kenneth N.Waltz ,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8 (Fall 1993) , 44-79;John J.Mearsheimer , “Back to the Future :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5 (Summer 1990) , 5-56.

12.Stephen D.Krasner questions the importance of Westphalia

as a dividing point. See his "Westphalia and All That," in Goldstein and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pp. 235-264.

13.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 1993);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Pandaemonium: 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ee also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Atlantic Monthly*, 273 (Feb. 1994), 44-76.

14. See *New York Times*, 7 February 1993, pp. 1, 14; and Gabriel Schoenfeld, "Outer Limits," *Post-Soviet Prospects*, 17 (Jan. 1993), 3, citing figures from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se.

15. See Gaddis, "Towar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Atlantic Monthly*, 269 (March 1992), 53-63, and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Hans Mark, "After Victory in the Cold War: The Global Village or Tribal Warfare," in J.J. Lee and Walter Korter, eds., *Europe in Transitio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March 1990), pp. 19-27.

1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Case for a Nuclear Deterrent," *Foreign Affairs*, 72 (Summer 1993), 54.

17. Lester B. Pearson, *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82-83.

18. Quite independently Johan Galtung developed an analysis that closely parallels mine on the salience to world politics of the

seven or eight major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core states. See his "The Emerging Conflict Formations," in Katharine and Majid Tehranian, eds., *Restructuring for World Peace: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1992), pp. 23-24. Galtung sees seven regional-cultural groupings emerging dominated by hegemons: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Community, Japan, China, Russia, India, and an "Islamic core." Other authors who in the early 1990s advanced similar arguments concerning civilizations include: Michael Lind, "American as an Ordinary Country," *American Enterprise*, 1 (Sept./Oct. 1990), 19-23;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67 (1991), 441, 448-449; Robert Gilpin, "The Cycle of Great Powers: Has It Finally Been Broken?" (Princeton University, unpublished paper, 19 May 1993), pp. 6ff.; William S. Lind, "North-South Relations: Returning to a World of Cultures in Conflict," *Current World Leaders*, 35 (Dec. 1992), 1073-1080, and "Defending Western Culture," *Foreign Policy*, 84 (Fall 1994), 40-50; "Looking Back from 2992: A World History," chap. 13: *The Disastrous 21st Century*, *Economist*, 26 December 1992-8 January 1993, pp. 17-19; "The New World Order: Back to the Future," *Economist*, 8 January 1994, pp. 21-23; "A Survey of Defence and the Democracies," *Economist*, 1 September 1990; Zolt Rostovanyi,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Unity and Disunity of World Order," (unpublished paper, 29 March 1993); Michael Vlahos,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82 (Spring 1991), 59-78; Donald J. Puchala, "The History of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8 (1994), 177-202; Mahdi

Elmandjra , “Cultural Diversity : Key to Survival in the Future , ”
(Paper presented to First Mexican Congress on Future Studies ,
Mexico City , September 1994) .In 1991 Elmandjra published in
Arabic a book which appeared in French the following year entitled
Premiere Guerre Civilisationnelle (Casablanca : Ed.Toubkal ,
1982 , 1994) .

19.Fernand Braudel , On Histor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 pp.210-211.

第二章

1.“World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large cultures.”Oswald
Spengler ,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 A.A.Knopf ,
1926-1928) , II , 170.The major works by these scholars analyzing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civilizations include : Max Weber ,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 Beacon Press , trans.Ephraim
Fischhoff , 1968) ; Emile Durkheim and Marcel Mauss , “Note on
the Notion of Civilization , ”Social Research , 38 (1971) ,
808-813;Oswald Spengler , Decline of the West;Pitirim Sorokin ,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New York : American Book Co. , 4
vols. , 1937-1985) ; Arnold Toynbee ,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vols. , 1934-1961) ;
Alfred Weber , 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osoziologie (Leiden :
A.W.Sijthoff's Uitgerversmaatschappij N.V. , 1935) ;
A.L.Kroeber ,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44) , and Style and Civilizations
(Westport , CT : Greenwood Press , 1973) ; Philip Bagby ,
Culture and History : 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 Longmans , Green , 1958) ; Carroll
Quigley ,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1) ; Rushton
 Coulborn , The Origin of Civilized Societie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9) ; S.N.Eisenstadt ,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Dynamics : The Origins and Modes of Ideological
 Politics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32 (June 1981) ,
 155-181 ; Fernand Braudel ,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 1994) and On Histor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 William H.McNeill , The
 Rise of the West :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3) ;Adda
 B.Bozeman , “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 ,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 51 (Winter 1975) , 1-18 ,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Statecraft (Washington : Brassey's (US) , 1992) , and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to the Opening of the Modern Age (New Brunswick , NJ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94) ; Christopher Dawson ,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 (LaSalle , IL : Sherwood Sugden Co. , 1978) ,
 and The Movement of World Revolution (New York : Sheed and
 Ward , 1959) ; Immanuel Wallerstein ,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
 Millennium :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
 Scribners , 1995) .To these works could be added the last ,
 tragically marked work of Louis Hartz , A Synthesis of World
 History (Zurich : Humanity Press , 1983) , which“with
 remarkable prescience , ”as Samuel Beer commented , “foresees a
 division of mankind very much like the present pattern of the post-
 Cold War world”into five great“culture areas” : Christian ,
 Muslim , Hindu , Confucian , and African.Memorial Minute , Louis
 Hartz ,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 89 (May 27 , 1994) .An

indispensable summary overview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civilizations is Matthew Melko ,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Boston : Porter Sargent , 1969) . I am also indebted for useful suggestions to the critical paper on my Foreign Affairs article by Hayward W.Alker , Jr. , “If Not Huntington's.Civilizations , .Then Whose ? ” (unpublished paper , Massachusetts Insitute of Technology , 25 March 1994) .

2.Braudel , *On History* , pp.177-181 , 212-214 , an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pp.4-5 ; Gerrit W.Gong ,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Clarendon Press , 1984) , 81ff. , 97-100;Wallerstein ,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 pp.160ff.and 215ff.;Arnold J.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 X , 274-275 , and *Civilization on Trial*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8) , p.24.

3.Braudel , *On History* , p.205.For an extended review of definition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 especially the German distinction , see A.L.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Culture :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ambridge :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 Harvard Vniversity , Vol.XI VII , No.1 , 1952) , passim but esp.pp.15-29.

4.Bozeman , “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 , ”p.1.

5.Durkheim and Mauss , “Notion of Civilization , ”p.811;Braudel , *On History* , pp.177 , 202;Melko ,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 p.8 ; Wallerstein ,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 p.215;Dawson ,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 , pp.51 , 402 ; Spengler , *Decline of the West* , I , p.31.Interestingly ,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ed.David L.Sills , 17 vols. , 1968) contains no primary article on “civilization”or“civilizations.”The“concept of civilization” (singular) is treated in a subsection of the article called“Urban Revolution , ”while civilizations (plural) receive passing mention in an article called“Culture.”

6.Herodotus , The Persian Wars (Harmondsworth , England : Penguin Books , 1972) , pp.543-544.

7.Edward A.Tiryakian , “Reflections on the Sociology of Civilizations , ”Sociological Analysis , 35 (Summer 1974) , 125.

8.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 I , 455 , quoted in Melko ,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 pp.8-9;and Braudel , On History , p.202.

9.Braudel ,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p.35 , and On History , pp.209-210.

10.Bozeman ,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Statecraft , p.26.

11.Quigley ,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 pp.146ff. ; Melko ,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 pp.101ff.See D.C.Somervell , “Argument”in his abridgment of Arnold J.Toynbee , A Study of History , vols.I-VI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6) , pp.569ff.

12.Lucian W.Pye , “China : Erratic State , Frustrated Society , ”Foreign Affairs , 69 (Fall 1990) , 58.

13.See Quigley ,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 chap.3 , esp.pp.77 , 84 ; Max Weber ,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 ”in From Max Weber :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

Routledge , trans.and ed.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 1991) , p.267;Bagby , Culture and History , pp.165-174 ; Spengler , Decline of the West , II , 31ff;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 I , 133 ; XII , 546-547 ; Braudel ,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passim;McNeill , The Rise of the West , passim ; and Rostovanyi ,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pp.8-9.

14.Melko ,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 p.133.

15.Braudel , On History , p.226.

16.For a major 1990s addition to this literature by one who knows both cultures well , see Claudio Veliz , The New World of the Gothic Fox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 .

17.See Charles A.and Mary R.Beard ,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 Macmillan , 2 vols. , 1927) and Max Lerner ,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57) .With patriotic boosterism , Lerner argues that“For good or ill , America is what it is-a culture in its own right , with many characteristic lines of power and meaning of its own , ranking with Greece and Rome as one of the great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s of history.” Yet he also admits ,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the great theories of history find no room for any concept of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in its own right” (pp.58-59) .

18.On the role of fragment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creating new societies in North America , Latin America , South Africa , and Australia , see Louis Hartz ,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Latin America , South

Africa , Canada , and Australia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 World , 1964) .

19.Dawson ,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 , p.128. , See also Mary C.Bateson , "Beyond Sovereignty : An Emerging Global Civilization , "in R.B.J.Walker and Saul H.Mendlovitz , eds. , Contending Sovereignities : Redef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Boulder : Lynne Rienner , 1990) , pp.148-149.

20.Toynbee classifies both Therevada and Lamaist Buddhism as fossil civilizations , Study of History , I , 35 , 91-92.

21.See , for example , Bernard Lewis ,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 chap.IX , "Contact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Space (Encounters between Contemporaries) , "VIII , 88ff ; Benjamin Nelson , "Civilizational Complexes and Intercivilizational Encounters , "Sociological Analysis , 34 (Summer 1973) , 79-105.

22.S.N.Eisenstadt ,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Dynamics : The Origins and Modes of Ideological Politics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32 (June 1981) , 157 , and "The Axial Age : The Emergence of Transcendental Visions and The Rise of Clerics ,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 22 (No.1 , 1982) , 298.See also Benjamin I.Schwartz , "The Age of Transcendence in Wisdom , Revolution , and Doubt :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 "Daedalus , 104 (Spring 1975) , 3.The concept of the Axial Age derives from Karl Jaspers ,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Zurich : Artemisverlag , 1949) .

23. T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p.69. Cf.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pp.295-298, who emphasizes the extent to which by the advent of the Christian era, "Organized trade routes, both by land and by sea, ...linked the four great cultures of the continent."

24. Braudel, *On History*, p.14: "...cultural influence came in small doses, delayed by the length and slowness of the journeys they had to make. If historians are to be believed, the Chinese fashions of the T'ang period (618-907) travelled so slowly that they did not reach the island of Cyprus and the brilliant court of Lusignan until the fifteenth century. From there they spread, at the quicker speed of Mediterranean trade, to France and the eccentric court of Charles VI, where hennins and shoes with long pointed toes became immensely popular, the heritage of a long vanished world-much as light still reaches us from stars already extinct."

25. See Toynbee, *Study of History*, VIII, 347-348.

26. McNeill, *Rise of the West*, p.547.

27. D.K. 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Macmillan, 1984), p.3; F.J.C. Hearnshaw, *Sea Power and Empire* (London: George Harrap and Co, 1940), p.179.

28.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 Michael Howard, "The Military Factor in European Expansion,"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4) .pp.33ff.

29.A.G.Kenwood and A.L.Lougheed ,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20-1900 (London : Routledge , 1992) , pp.78-79 ; Angus Maddison ,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326-327;Alan S.Blinder , repor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 12 March 1995 , p.5E. See also Simon Kuznets ,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X. Level and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 Long-term Trends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 15 (Jan.1967 , part II) , pp.2-10.

30.Charles Tilly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 in “Tilly , ed.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p.18.

31.R.R.Palmer , “Frederick the Great , Guibert , Bulow : From Dynastic to National War ,” in Peter Paret , ed. ,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119.

32.Edward Mortimer , “Christianity and Islam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67 (Jan.1991) , 7.

33.Hedley Bull ,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7) , pp.9-13. See also Adam Watson ,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 Routledge , 1992) , and Barry Buzan ,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47 (Summer 1993) , 327-352 , who distinguishes between“civilizational”and“functional”model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concludes that“Civilizat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have dominated the historical record”and that there“appear to be no pure cases of funct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p.336) .

34.Spengler , Decline of the West , I , 93-94.

35.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 I , 149ff , 154 , 157ff.

36.Braudel , On History , p.xxxiii.

第三章

1.V.S.Naipaul , “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 , ”The 1990 Wriston Lecture ,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30 October 1990 , p.20.

2.See James Q.Wilson ,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93) ;Michael Walzer , Thick and Thin :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Notre Dam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94) , esp.chaps.1 and 4 ; and for a brief overview , Frances V.Harbour , “Basic Moral Values : A Shared Core ,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9 (1995) , 155-170.

3.Vacav Havel , “Civilization's Thin Veneer , ”Harvard Magazine , 97 (July-August 1995) , 32.

4.Hedley Bull , The Anarchical Society :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7) , p.317.

5.John Rockwell , “The New Colossus : American Culture as

Power Export , ”and several authors , “Channel-Surfing Through U.S.Culture in 20 Lands , ”New York Times ; 30 January 1994 , sec.2 , pp.lff;David Rieff , “A Global Culture , ”World Policy Journal , 10 (Winter 1993-94) , 73-81.

6.Michael Vlahos ,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Policy , 82 (Spring 1991) , 69 ; Kishore Mahbuhani , “The Dangers of Decadence : What the Rest Can Teach the West , ”Foreign Affairs , 72 (Sept./Oct.1993) , 12.

7.Aaron L.Friedberg ,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109 (Spring 1994) , 15.

8.Richard Parker , “The Myth of Global News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Winter 1994) , 41-44 ; Michael Gurevitch , Mark R.Levy , and Itzhak Roeh , “The Global Newsroom : convergences and diversit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 ”in Peter Dahlgren and Colin Sparks , eds. ,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London : Routledge , 1991) , p.215.

9.Ronald Dore , “Unity and Diversity in World Culture ,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 eds. ,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 p.423.

10.Robert L.Bartley , “The Case for Optimism-The West Should Believe in Itself , ”Foreign Affairs , 72 (Sept./Oct.1993) , 16.

11.See Joshua A.Fishman , “The Spread of English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 ”in Joshua A.Fishman , Robert L.Cooper , and Andrew

W.Conrad , The Spread of English : The Sociology of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Rowley , MA : Newbury House , 1977) , pp.108ff.

12.Fishman , “Spread of English as a New Perspective , ”pp.118-119.

13.Randolf Quirk , in Braj B.Kachru , The Indianization of English (Delhi : Oxford , 1983) , p.ii;R.S.Gupta and Kapil Kapoor , eds. , English in India-Issues and Problems (Delhi : Academic Foundation , 1991) , p.21.Cf.Sarvepalli Gopal ,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India , ”Encounter , 73 (July/Aug.1989) , 16 , who estimates 35 million Indians“Speak and write English of some type or other.”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5 , 1991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ble 1.

14.Kapoor and Gupta , “Introduction , ”in Gupta and Kapoor , eds. , English in India , p.21 ; Gopal , -English Language , -p.16.

15.Fishman , -Spread of English as a New Perspective , -p.115.

16.See Newsweek , 19 July 1993 , p.22.

17.Quoted by R.N.Srivastava and V.P.Sharma , “Indian English Today , ”in Gupta and Kapoor , eds. , English in India , p.191;Gopal , “English Language , ”p.17.

18.New York Times , 16 July 1993 , p.A9;Boston Globe , 15 July 1993 , p.13.

19.In addition to the projections in the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 see also those of Jean Bourgeois-Pichat , “Le nombre des hommes : Etat et prospective , ”in Albert Jacquard et al. , Les

Scientifiques Parlent (Paris : Hachette , 1987) , pp.140 , 143 , 151 , 154-156.

20.Edward Said on V.S.Naipaul , quoted by Brent Staples , “Con Men and Conquerors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22 May 1994 , p.42.

21.A.G.Kenwood and A.L.Lougheed ,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20-1990 (London : Routledge , 3rd ed. , 1992) , pp.78-79;Angus Maddison ,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326-327;Alan S.Blinder , New York Times , 12 March 1995 , p.5E.

22.David M.Rowe , “The Trade and Security Paradox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Ohio State University , 15 Sept.1994) , p.16.

23.Dale C.Copeland ,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Spring 1996) , 25.

24.William J.McGuire and Claire V.McGuire , “Content and Process in the Experience of Self ,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21 (1988) , 102.

25.Donald L.Horowitz ,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for Policy-Makers , ”in Joseph V.Montville and Hans Binnendijk , eds. , Conflicl and Peacemak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 MA : Lexington Books , 1990) , p.121.

26.Roland Robertson ,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 17 (Fall 1987) , 22 ; Jeffery A.Shad , Jr. , "Globalization and Islamic Resurgence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 19 (Fall 1988) , 67.

27. See Cyril E.Black ,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 Harper & Row , 1966) , pp.1-34 ; Reinhard Bendix ,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9 (April 1967) , 292-293.

28. Fernand Braudel , *On Histor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 p.213.

29. The literature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 of course , immense. See , among others , William H.McNeill , *Rise of the West :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3) Braudel , *On History* and earlier works ; Immanuel Wallerstein ,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Karl W.Deutsch has produced a comprehensive , succinct , and highly suggestive comparison of the West and nine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erms of twenty-one geographical , cultural ,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 social , and political factors , emphasiz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West differs from the others. See Karl W.Deutsch , "On Nationalism , World Regions , and the Nature of the West , " in Per Torsvik , ed. , *Mobilization ,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s , and Nation-building : A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Stein Rokkan* (Bergen : Universitetsforlaget , 1981) , pp.51-93. For a succinct summary of the salient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1500 , see Charles Tilly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 ”in Tilly , ed.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pp.18ff.

30.Deutsch , “Nationalism , World Regions , and the West , ”p.77.

31.See Robert D.Putnam ,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l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121ff.

32.Deutsch , “Nationalism , World Regions , and the West , ”p.78.See also Stein Rokkan , “Dimension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 A Possible Paradigm for Research on Variations within Europe , ”in Charles Tilly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p.576 , and Putnam , Making Democracy Work , pp.124-127.

33.Geert Hofstede , “National Cultures in Four Dimensions : A Research-based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 13 (1983) , 52.

34.Harry C.Triandis ,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i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Lincoln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1990) , 44-133 , and New York Times , 25 December 1990 , p.41.See also George C.Lodge and Ezra F.Vogel , eds. , 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 An Analysis of Nine Countries (Boston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 passim.

35. Discussions of the interaction of civilizations almost inevitably come up with some variation of this response typology. See Arnold J. 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5-61) , II , 187ff. , VIII , 152-153 , 214; John L. Esposito , *The Islamic Threat :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p.53-62; Daniel Pipes , *In the Path of God : Islam and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3) , pp.105-142.

36. Pipes , *Path of God* , p.349.

37. William Pfaff , "Reflections : Economic Development , " *New Yorker* , 25 December 1978 , p.47.

38. Pipes , *Path of God* , pp.197-198.

39. Ali Al-Amin Mazrui , *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 James Currey , 1990) , pp.4-5.

40. Esposito , *Islamic Threat* , p.55 ; See generally , pp.55-62 ; and Pipes , *Path of God* , pp.114-120.

41. Rainer C. Baum , "Authority and Identity-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I , "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 6 (Oct.1977) , 368-369. See also Rainer C. Baum , "Authority Codes :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 "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 6 (Jan.1977) , 5-28.

42. See Adda B. Bozeman , "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 , "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 51 (Winter 1975) , 5ff. ; Leo Frobenius , *Paideuma : Umrisse einer Kultur-und*

Seelenlehre (Munich : C.H.Beck , 1921) , pp.11ff;Oswald Spengler ,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 Alfred A.Knopf , 2 vols. , 1926 , 1928) , II , 57ff.

43.Bozeman , “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 , ”p.7.

44.William E.Nail ,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East and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apan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 13/14 (Fall 1985 & Spring 1986) , 222.

45.David E.Apter , “The Role of Traditionalism in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Ghana and Uganda , ”World Politics , 13 (Oct.1960) , 47-68.

46.S.N.Eisenstadt ,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 Political , and Cultural Orders in Moderniz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30 (Oct.1965) , 659-673.

47.Pipes , Path of God , pp.107 , 191.

48.Braudel , On History , pp.212-213.

第四章

1.Jeffery R.Barnett , “Exclusion 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Parameters , 24 (Spring 1994) , 54.

2.Aaron L.Friedberg ,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109 (Spring 1994) , 20-21.

3.Hedley Bull ,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 eds. ,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 p.219.

4. Barry G. Buzan ,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67 (July 1991) , 451.

5. Project 2025 , (draft) 20 September 1991 , p.7;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229 , 244;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0* (Mahwah , NJ : Funk & Wagnalls , 1989) , p.539.

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p.136-137 , 207-211;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4* , 1986 , 1990 , 1994 ; Bruce Russett et al. ,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p.222-226.

7. Paul Bairoch ,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 11 (Fall 1982) , 296 , 304.

8. *Economist* , 15 May 1993 , p.83 , cit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Global Economy , ” *Economist* , 1 October 1994 , pp.3-9 ; *Wall Street Journal* , 17 May 1993 , p.A12; Nicholas D. Kristof , “The Rise of China ,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61 ; Kishore Mahbubani , “The Pacific Way , ” *Foreign Affairs* , 74 (Jan./Feb.1995) , 100-103.

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Tables and

Analyses ,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4-1995 (London : Brassey's , 1994) ,

10.Project 2025 , p.13 ; Richard A.Bitzinger , The Globalization of Arms Production : Defense Market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 D.C. : Defense Budget Project , 1993) , passim.

11.Joseph S.Nye , Jr.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105 (Summer 1990) , 181-182.

12.William H.McNeill , The Rise of the West :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3) , p.545.

13.Ronald Dore , "Unity and Diversity in Contemporary World Culture , "in Bull and Watson , eds. ,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pp.420-421.

14.William E.Naff ,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East and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apan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 13/14 (Fall 1985 and Spring 1986) , 219 ; Arata Isozaki , "Escaping the Cycle of Eternal Resources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9 (Spring 1992) , 18.

15.Richard Sission , "Cultur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ia , "in Larry Diamond ,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 Lynne Rienner , 1993) , pp 55-61.

16.Graham E.Fuller , "The Appeal of Iran , "National Interest , 37 (Fall 1994) , 95.

17.Eisuke Sakakibara , “The End of Progressivism : A Search for New Goals , ”Foreign Affairs , 74 (Sept./Oct.1995) , 8-14.

18.T.S.Eliot ,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and Company , 1940) , p.64.

19.Gilles Kepel , Revenge of God :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Park ,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rans.Alan Braley 1994) , p.2.

20.George Weigel , “Religion and Peace : An Argument Complexified , ”Washington Quarterly , 14 (Spring 1991) , 27.

21.James H.Billington , “The Case for Orthodoxy , ”New Republic , 30 May 1994 , p.26 ; Suzanne Massie , “Back to the Future , ”Boston Globe , 28 March 1993 , p.72.

22.Economist , 8 January 1993 , p.46 ; James Rupert , “Dateline Tashkent : Rost-Soviet Central Asia,”Foreign Policy , 87 (Summer 1992) , 180.

23.Fareed Zakaria , “Culture Is Destiny :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 ”Foreign Affairs , 73 , (Mar./Apr , 1994) , 118.

24.Hassan Al-Turabi , “The Islamic Awakening's Second Wave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9 (Summer 1992) , 52-55;Ted G.Jelen ,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New York : Praeger , 1991) , pp.55ff.

25.Bernard Lewis , “Islamic Revolution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21 January 1988 , P.47;Kepel , Revenge of God , p.82 ,

26.Sudhir Kakar , “The Colors of Violence : Cultural Identities , Religion , and Conflic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ap.6 , “A New Hindu Identity , ”p.11.

27.Suzanne Massie , “Back to the Future , ”p.72;Rupert , “Dateline Tashkent , ”p.180.

28.Rosemary Radford Ruther , “A World on Fire with Faith ,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26 January 1992 , p.10;William H.McNeill ,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 ”in Martin E.Marly and R.Scott Appleby , eds. ,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Chl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 p.561.

29.New York Times , 15 January 1993 , p.A9;Henry Clement Moore , Images of Development : Egyptian Engineers in Search of Industry (Cambridge : M.I.T.Press , 1980) , pp.227-228.

30.Henry Scott Stokes , “Korea's Church Militant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28 November 1972 , p.68.

31.Rev.Edward J.Dougherty , S.J. , New York Times 4 July 1993 , p.10;Timothy Goodman , “Latin America's Reformation , ”American Enterprise , 2 (July-August 1991) , 43 ; New York Times , 11 July 1993 , p.1;Time , 21 January 1991 , p.69.

32.Economist , 6 May 1989 , p.23 ; 11 November 1989 , p.41 ;Times (London) , 12 April 1990 , p.12;Observer , 27 May 1990 , p.18.

33.New York Times , 16 July 1993 , p.A9;Boston Globe , 15

July 1993 , p.13.

34. See Mark Juergensmeyer , *The New Cold War ?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

35. Zakaria ,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 "p.118 ; Al-Turabi , "Islamic Awakening's Second Wave , "p.53. See Terrance Carroll , "Secularization and States of Modernity , " *World Politics* , 36 (April 1984) , 362-382.

36. John L. Esposito , *The Islamic Threat :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10.

37. Régis Debray , "God and the Political Planet ,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Spring 1994) , 15.

38. Esposito , *Islamic Threat* , p.10; Gilles Kepel quoted in Sophie Lannes , "L'arabisme de Dieu-Interview with Gilles Kepel , " *Geopolitique* , 33 (Spring 1991) , 14 ; Moore , *Images of Development* , pp.214-216.

39. Juergensmeyer , *The New Cold War* , p.71; Edward A. Gargan , "Hindu Rage Against Muslims Transforming Indian Politics , " *New York Times* , 17 September 1993 , p.A1 ; Khushwaht Singh , "India , the Hindu State , " *New York Times* , 3 August 1993 , p.A17.

40. Dore in Bull and Watson , eds. ,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p.411 ; McNeill in Marly and Appleby , eds. ,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 p.569.

第五章

1.Kishore Mahbubani , "The Pacific Way , "Foreign Affairs , 74 (Jan./Feb.1995) , 100-103;IMD Executive Opinion Survey , Economist , 6 May 1995 , p.5 ; World Bank ,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3 (Washington : 1993) pp.66-67.

2.Tommy Koh , America's Role in Asia : Asian Views (Asia Foundation ,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 , Report No.13 , November 1993) p.1.

3.Alex Kerr , Japan Times , 6 November 1994 , p.10.

4.Yasheng Huang ,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 "Foreign Policy , 95 (Summer 1995) , 57.

5.Cable News Network , 10 May 1994;Edward Friedman , "A Failed Chinese Modernity , "Daedalus , 122 (Spring 1993) , 5;Perry Link , "China's.Core.Problem , "ibid. , pp.201-204.

6.Economist , 21 January 1995 , pp.38-39;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 -The New Confucianism in Beijing , "American Scholar , 64 (Spring 1995) , 175ff. ; Benjamin L.Self , "Changing Role for Confucianism in China , -Woodrow Wilson Center Report , 7 (September 1995) , 4-5;New York Times , 26 August 1991 , A19.

7.Lee Teng-hui ,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al Renewal , "Journal of Democracy , 6 (October 1995) , 6-8.

8.Alex Kerr , Japan times , 6 November 1994 , p.10;Kazuhiko Ozawa , "Ambivalence in Asia , "Jopan Update , 44 (May 1995) , 18-19.

9. For some of these problems , see Ivan P. Hall , “Japan's Asia Card , ”National Interest , 38 (Winter 1994-95) , 19ff.

10. Casimir Yost , “America's Role in Asia : One Year Later , ” (Asia Foundation ,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 , Report No , 15 , February 1994) , p.4 ; Yoichi Funabashi , “The Asianization of Asia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78; Anwar Ibrahim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31 January 1994 , p.6.

11. Kishore Mahbubani , “Asia and a United States in Decline , ”Washington Quarterly , 17 (Spring 1994) , 5-23 ; For a counteroffensive , see Eric Jones , “Asia's Fate : A Response to the Singapore School , ”National Interest , 35 (Spring 1994) , 18-28.

12. Mahathir bin Mohamad , Mare jirenma (The Malay Dilemma) (Tokyo : Imura Bunka Jigyo , trans. Takata Masayoshi , 1983) , p.267 , quoted in Dgura Kazuo , “A Call for a New Concept of Asia , ”Japan Echo , 20 (Autumn 1993) , 40.

13. Li Xiangiu , “A Post-Cold War Alternative from East Asia , ”Straits Times , 10 February 1992 , p.24.

14. Yotaro Kobayashi , “Re-Asianize Japan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9 (Winter 1992) , 20 ; Funabashi , “The Asianization of Asia , ” pp.75ff ; George Yong-Soon Yee , “New East Asia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15 July 1992 , p.8.

15. Yoichi Funabashi , “Globalize Asia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9 (Winter 1992) , 23-24 ; Kishore M. Mahbubani , “The West and the Rest , ”National Interest , 28

(Summer 1992) , 7 ; Hazuo , “New Concept of Asia , ”p.41.

16.Economist , 9 March 1996 , p.33.

17.Bandar bin Sultan , New York Times , 10 July 1994 , p.20.

18.John L.Esposito , The Islamic Threat :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12 ; All E.Hillal Dessouki , “The Islamic Resurgence , ”in All E.Hillal Dessouki , ed. , Islamic Resurgence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 Praeger , 1982) , pp.9-13.

19.Thomas Case , quoted in Michael Walzer ,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pp.10-11 ; Hassan Al-Turabi , “The Islamic Awakening's Second Wave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9 (Summer 1992) , 52.The single most useful volum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 appeal , limitations , and historical role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may well be Walzer's study of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Calvinist Puritanism.

20.Donald K.Emerson , “Islam and Regime in Indonesia : Who's Coopting Whom ? ” (unpublished paper , 1989) , p.16 ; M.Nasir Tamara , Indonesia in the Wake of Islam , 1965-1985 (Kuala Lumpur :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laysia , 1986) , p.28 ; Economist , 14 December 1985 , pp.35-36 ; Henry Tanner , “Islam Challenges Secular Society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7 June 1987 , pp.7-8 ; Sabri Sayari , “Politicization of Islamic Re-traditionalism : Some Preliminary Notes , ”in Metin Heper and Raphael Israeli , eds. , Islam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 Croom Helm , 1984) , p.125 ; New York Times , 26 March 1989 , p.14 ; 2 March 1995 , p.A8. See , for example , reports on these countries in New York Times , 17 November 1985 , p.2E; 15 November 1987 , p.13 ; 6 March 1991 , p.All ; 20 October 1990 , p.4 ; 26 December 1992 , p.I ; 8 March 1994 , p.A15 ; and Economist , 15 June 1985 , pp.36-37 and 18 September 1992 , pp.23-25.

21. New York Times , 4 October 1993 , p.A8 ; 29 November 1994 , p.A4 ; 3 February 1994 , p.1; 26 December 1992 , p.5 ; Erika G. Alin , "Dynamics of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 An Assessment of Causes , Character , and Consequences , " Comparative Politics , 26 (July 1994) , 494 ; New York Times , 8 March 1994 , p.A15 ; James Peacock , "The Impact of Islam , " Wilson Quarterly , 5 (Spring 1981) , 142 ; Tamara , Indonesia in the Wake of Islam , p.22.

22. Olivier Roy ,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London : Tauris , 1994) , p.49ff. , New York Times , 19 January 1992 , p.E3 ; Washington Post , 21 November 1990 , p.A1. See Gilles Keppele , The Revenge of God :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 Christianity , and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Park ,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32 ; Farida Faouzia Charfi , "When Galileo Meets Allah ,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Spring 1994) , 30 ; Esposito , Islamic Threat , p.10.

23. Mahnaz Ispahani , "Varieties of Muslim Experience , " Wilson Quarterly , 13 (Autumn 1989) , 72.

24. Sand Eddin Ibrahim , "Appeal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 ”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Islam and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Muslim World , Harvard University , 15-16 October 1985) , pp.9-10 , and “Islamic Militancy as a Social Movement : The Case of Two Groups in Egypt , ” in Dessouki , ed. , Islamic Resurgence , pp.128-131.

25. Washington Post , 26 October 1980 , p.23 ; Peacock , “Impact of Islam , ” p.140 ; Ilkay Sunar and Binnaz Toprak , “Islam in Politics : The Case of Turkey , ”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 18 (Autumn 1983) , 436; Richard W. Bulliet , “The Israeli-PLO Accord : The Future of the Islamic Movement ,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42.

26. Ernest Gellner , “Up from Imperialism , ” New Republic , 22 May 1989 , p.35; John Murray Brown , “Tansu Ciller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Identity , ” World Policy Journal , 11 (Fall 1994) , 58 ; Roy ,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 p.53.

27. Fouad Ajami , “The Impossible Life of Muslim Liberalism , ” New Republic , 2 June 1986 , p.27.

28. Clement Moore Henry , “The Mediterranean Debt Crescent ,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p.346; Mark N. Katz , “Emerging Pattern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entral Asia , ” Central Asian Monitor , (No.2 , 1994) , 27 ; Mehrdad Haghighi , “Islamic Revival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 ” Central Asian Survey , 13 (No.2 , 1994) , 255.

29. New York Times , 10 April 1989 , p.A3 ; 22 December 1992 , p.5 ; Economist , 10 October 1992 , p.41.

30. Economist , 20 July 1991 , p.35 ; 21 December 1991-3

January 1992 , p.40 ; Mahfulzul Hoque Choudhury , "Nationalism ,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angladesh , "in Rafiuddin Ahmed , ed. , Bangladesh : Society , Religion and Politics (Chittagong : South Asia Studies Group , 1985) , p.68 ; New York Times , 30 November 1994 , p.A14 ; Wall Street Journal , 1 March 1995 , pp.1 , A6.

31.Donald L.Horowitz , "The Qur.an and the Common Law : Islamic Law Reform and the Theory of Legal Change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42 (Spring and Summer , 1994) , 234ff.

32.Dessouki , "Islamic Resurgence , "p.23.

33.Daniel Pipes , In the Path of God : Islam and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3) , pp.282-283 , 290-292 ; John Barrett Kelly , Arabia , the Gulf and the West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0) , pp.261 , 423 , as quoted in Pipes , Path of God , p.291.

34.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 The 1992 Revision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 1993) , table A18 ;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table 25 ; Jean Bourgeois Pichat , "Le Nombre des Hommes : Etat et Prospective , "in Albert Jacquard , ed. , Les Scientifiques Patient (Paris : Hachette , 1987) , pp.154 , 156.

35.Jack A.Goldstone ,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1) , passim , but esp.24-39.

36.Herbert Moeller , “Youth as a Force in the Modern World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10 (April 1968) , 237-260 ; Lewis S.Feuer , “Gener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 ”Survey , 18 (Summer 1972) , pp.161-188.

37.Peter W.Wilson and Douglas F.Graham , Saudi Arabia : The Coming Storm (Armonk , NY : M.E.Sharpe , 1994) , pp.28-29.

38.Philippe Fargues , “Demographic Explosion or Social Upheaval , ”in Ghassen Salame , ed. ,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London.I.B.Tauris , 1994) , pp.158-162 , 175-177.

39.Economist , 29 August 1981 , p.40 ; Denis Dragounski , “Threshold of Violence , ”Freedom Review , 26 (March/April 1995) , 11.

第六章

1.Andreas Papandreou , “Europe Turns Left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Winter 1994) , 53 ; Vuk Draskovic , quoted in Janice A.Broun , “Islam in the Balkans , ”Freedom Review , 22 (Nov./Dec.1991) , 31 ;F.Stephen Larrabee , “In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Balkans , ”Survival , 34 (Summer 1992) , 43 ; Misha Glenny , “Heading Off War in the Southern , Balkans , ”Foreign Affairs , 74 (May/June 1995) , 102-103.

2.Ali Al-Amin Mazrui , 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 James Currey , 1990) , p.13.

3.See e.g. , Economist , 16 November 1991 , p.45 , 6 May

1995 , p.36.

4.Ronald B.Palmer and Thomas J.Reckford , Building ASEAN : 20 Years of Southeast Asian Cooperation (New York : Praeger , 1987) , p.109 ; Economist , 23 July 1994 , pp.31-32.

5.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 ”Survival , 36 (Summer 1994) , 16.

6.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1 August 1994 , p.34.

7.An interview between Dats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 of Malaysia and Kenichi Ohmae , pp.3 , 7 ; Rafidah Azia , New York Times , 12 February 1991 , p.D6.

8.Japan Times , 7 November 1994 , p.19 ; Economist , 19 November 1994 , p.37.

9.Murray Weidenbaum , “Greater China : A New Economic Colossus ? ”Washington Quarterly , 16 (Autumn 1993) , 78-80.

10.Wall Street Journal , 30 September 1994 , p.A8 ; New York Times , 17 February 1995 , p.A6.

11.Economist , 8 October 1994 , p.44 ; Andres Serbia , “Towards an 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 : Raising Some Awkward Questions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 36 (Winter 1994) , 61-90.

12.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5 July 1990 , pp.24-25 , 5 September 1991 , pp.26-27 ; New York Times , 16 February 1992 , p.16;Economist , 15 January 1994 , p.38;Robert D.Hormats , “Making Regionalism Safe , ”Foreign Affairs , 73

(March/April 1994) , 102-103 ; Economist , 10 June 1994 , pp.47-48 ; Boston Globe , 5 February 1994 , p.7. On Mercosur , see Luigi Manzetti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OSUR ,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 35 (Winter 1993/94) , 101-141 , and Felix Pena , “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Southern Cone , ” Washington Quarterly , 18 (Summer 1995) , 113-122.

13. New York Times , 8 April 1994 , p.A3 , 13 June 1994 , pp.D1 , D5 , 4 January 1995 , p.A8 ; Mahathir Interview with Ohmae , pp.2 , 5 ; “Asian Trade New Directions , ” AMEX Bank Review , 20 (22 March 1993) , 1-7.

14. See Brian Pollins , “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83 (June 1989) , 465-480 ; Joanne Gowa and Edward D. Mansfield ,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87 (June 1993) , 408-421 ; and David M. Rowe , “Trade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unpublished paper , Ohio State University , 15 September 1994) , passim.

15. Sidney W. Mintz , “Can Haiti Change ? ” Foreign Affairs , 75 (Jan./Feb. 1995) , 73 ; Ernesto Perez Balladares and Joycelyn McCalla quoted in “Haiti's Traditions of Isolation Makes U.S. Task Harder , ” Washington Post , 25 July 1995 , p.A1.

16. Economist , 23 October 1993 , p.53.

17. Boston Globe , 21 March 1993 , pp.I , 16 , 17 ; Economist , 19 November 1994 , p.23 , 11 June 1994 , p.90.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urkey and Mexico in this respect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Barry Buzan ,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67 (July 1991) , 449 , and Jagdish Bhagwati ,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72.

18. See Marquis de Custine , Empire of the Czar : 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 (New York : Doubleday , 1989 ;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aris in 1844) , passim.

19. P.Ya. Chaadayev , Articles and Letters [Statyi i pisma] (Moscow : 1989) , p.178 and N.Ya. Danilevskiy , Russia and Europe [Rossiya i Yevropa] (Moscow : 1991) , pp.267-268 , quoted in Sergei Vladislavovich Chugrov , “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 ” in Steve Hirsch , ed. , MEMO 3 : In Search of Answers in the Post-Soviet Era (Washington , D.C. :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 1992) , p.138.

20. See Leon Aron , “The Battle for the , Soul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 3 (Nov/Dec.1992) , 10ff ; Alexei G. Arbatov ,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lternative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8 (Fall 1993) , 5ff.

21. Sergei Stankevich , “Russia in Search of Itself , ”National Interest , 28 (Summer 1992) , 48-49.

22. Albert Motivans , ““ Openness to the West’ in European Russia , ”RFE/RL Research Report , 1 (27 November 1992) , 60-62. Scholars have calculated the allocation of votes in different ways with minor differences in results. I have relied on the analysis by Sergei Chugrov , “Political Tendencies in Russia's Regions : Evidence from the 1993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Unpublished

paper , Harvard University , 1994) .

23.Chugrov , “Russia Between , ”p.140.

24.Samuel P.Huntington ,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8) , pp.350-351.

25.Duygo Bazoglu Sezer , “Turkey's Grand Strategy Facing a
Dilemma ,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 27 (Jan./Mar.1992) , 24.

26.Clyde Haberman , “On Iraq's Other Front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18 November 1990 , p.42 ; Bruce
R.Kuniholm , “Turkey and the West , ”Foreign Affairs , 70 (Spring
1991) , 35-36.

27.Ian Lesser , “Turkey and the West after the Gulf
War ,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 27 (Jan./Mar.1992) , 33.

28.Financial Times , 9 March 1992 , p.2 ; New York Times , 5
April 1992 , p.E3 ; Tansu Ciller , “The Role of Turkey in ‘ the New
World , ”Strategic Review , 22 (Winter 1994) , p.9 ;
Habernnan , “Iraq's Other Front , ”p.44 ; John Murray
Brown , “Tansu Ciller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Identity , ”World
Policy Journal , 11 (Fall 1994) , 58.

29.Sezer , “Turkey's Grand Strategy , ”p.27 ; Washington
Post , 22 March 1992 ; New York Times , 19 June 1994 , p.4.

30.New York Times , 4 August 1993 , p.A3 ; 19 June 1994 ,
p.4;Philip Robins , “Between Sentiment and Self-Interest : Turkey's
Policy toward Azerbaij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 ”Middle
East journal , 47 (Autumn 1993) , 593-610 ; Economist , 17 June
1995 , pp.38-39.

31.Bahri Yilmaz , “Turkey's new Ro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Aussenpolitik , 45 January 1994) , 94.

32.Eric Rouleau , “The Challenges to Turkey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119.

33.Rouleau , “Challenges , ”pp.120-121 ; New York Times , 26 March 1989 , p.14.

34.Ibid.

35.Brown , “Question of Turkish Identity , ”p.58.

36.Sezer , “Turkey's Grand Strategy , ”pp.29-30.

37.Ciller , “Turkey in‘ the New World , ”” p.9;Brown , “Question of Turkish Identity , ”p.56;Tansu Ciller , “Turkey and NATO : Stability in the Vortex of Change , ”NATO Review , 42 (April 1994) , 6 ; Suleyman Demirel ,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 2 February 1994.For other uses of the bridge metaphor , see Bruce R.Kuniholm , “Turkey and the West , ”Foreign Affairs , 70 (Spring 1991) , 39 ; Lesser , “Turkey and the West , ”p.33.

38.“Octavio Paz , ”The Border of Time , .interview with Nathan Gardels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8 (Winter 1991) , 36.

39.For an expression of this last concern , see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 “Free Trade with an Unfree Society : A Commit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 ” National Interest , (Summer 1995) , 28-33.

40.Financial Times , 11-12 September 1993 , p.4 ; New York Times , 16 August 1992,p.3.

41.Economist , 23 July 1994 , p.35 ; Irene Moss ,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 (Australia) New York Times , 16 August 1992 , p.3 ; Economist , 23 July 1994 , p.35 ; Boson Globe , 7 July 1993 , p.2 ; Cable News Network , News Report , 16 December 1993 ; Richard Higgott , “Closing a Branch Office of Empire :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K at Century's End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70 (January 1994) , 58.

42.Jat Sujamiko , The Australian , 5 May 1993 , p.18 quoted in Higgott , “Closing a Branch , ”p.62 ; Higgott , “Closing a Branch , ”p.63 ; Economist , 12 December 1993 p.34.

43.Transcript , Interview with Keniche Ohmae , 24 October 1994 , pp.5-6.See also Japan Times , 7 November 1994 , p.19.

44.Former Ambassador Richard Woolcott (Australia) , New York Times , 16 August 1992 , p.3.

45.Paul Kelly , “Reinvenling Australia , ”National Interest , 30 (Winter 1992) , 66 ; Economist , 11 December 1993 , p.34 ; Higgott , “Closing a Branch , ”p.58.

46.Lee Kuan Yew quoted in Higgott , “Closing a Branch , ”p.49.

第七章

1.Economist , 14 January 1995 , p.45;26 November 1994 , p.56 , summarizing Juppe article in Le Monde , 18 November 1994 ; New York Times , 4 September 1994 , p.11.

2. Michael Howard , “Lessons of the Cold War , ” *Survival* , 36 (Winter 1994) , 102-103; Pierre Behar , “Central Europe : The New Lines of Fracture , ” *Geopolitique* , 39 (English ed. , August 1992) , 42 ; Max Jakobson ,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Today” *Washington Quarterly* , 18 (Spring 1995) , 69 ; Max Beloff , “Fault Lines and Steeples : The Divided Loyalties of Europe , ” *National Interest* , 23 (Spring 1991) , 78.

3. Andreas Oplatka , “Vienna and the Mirror of History , ” *Geopolitique* , 35 (English ed. , Autumn 1991) , 25 ; Vytautas Landsbergis , “The Choice , ” *Geopolitique* , 35 (English ed. , Autumn 1991) , 3 ; *New York Times* , 23 April 1995 , p.5E.

4. Carl Bildt , “The Baltic Litmus Test , ” *Foreign Affairs* , 73 (Sept./Oct.1994) , 84.

5. *New York Times* , 15 June 1995 , p.A10.

6. RFE/RL Research Bulletin , 10 (16 March 1993) , 1 , 6.

7. William D. Jackson , “Imperial Temptations : Ethnic Ahroad , ” *Orbis* , 38 (Winter 1994) , 5.

8. Ian Brzezinski , *New York Times* , 13 July 1994 , p.A8.

9. John F. Mearsheimer , “The Case for a Ukrainian Nuclear Deterrent : Debate , ” *Foreign Affairs* , 72 (Summer 1993) , 50-66.

10. *New York Times* , 31 January 1994 , p.A8.

11. Quoted in Ola Tunander , “New European Dividing Lines ? ” in Valter Angell , ed. , *Norway Facing a Changing*

Europe : Perspectives and Options (Oslo : Norwegian Foreign Policy Studies No.79 ,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et al. , 1992) , p.55.

12. John Morrison , "Pereyaslav and After : The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hip ,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69 (October 1993) , 677.

13. John King Fairbank , ed.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 pp.2-3.

14. Perry Link , "The Old Man's New China ,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9 June 1994 , p.32.

15. Perry Link , "China's Core Problem" , Daedalus , 122 (Spring 1993) , 205 ; Weiming Tu , "Cultural China :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 " Daedalus , 120 (Spring 1991) , 22 ; Economist , 8 July 1995 , pp.31-32.

16. Economist , 27 November 1993 , p.33 ; 17 July 1993 , p.61.

17. Economist , 27 November 1993 , p.33 ; Yoichi Funabashi , "The Asianization of Asia ,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80. See in general Murray Weidenbaum and Samuel Hughes , The Bamboo Network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96) .

18. Christopher Gray , quoted in Washington Post , 1 December 1992 , p.A30 ; Lee Kuan Yew , quoted in Maggie Farley , "The Bamboo Network , " Boston Globe Magazine , 17 April 1994 ,

p.38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3 November 1993.

19.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3 November 1993 ; George Hicks and J.A.C.Mackie , “A Question of Identity : Despite Media Hype , They Are Firmly Settled in Southeast Asia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4 July 1994 , p.47.

20.Economist , 16 April 1994 , p.71 ; Nicholas D.Kristof , “The Rise of China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48 ; Gerrit W.Gong , “China's Fourth Revolution , ”Washington Quarterly , 17 (Winter 1994) , 37 ; Wall Street Journal , 17 May 1993 , p.A7A;Murray L.Weidenbaum , Greater China :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 (St.Louis :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Business , Contemporary Issues Series 57 , February 1993) , pp.2-3.

21.Steven Mufson , Washington Post , 14 August 1994 , p.A30;Newsweek , 19 July 1993 , p.24 ; Economist , 7 May 1993 , p.35.

22.See Walter C.Clemens , Jr.and Jun Zhan , “Chiang Ching-Kuo's Role in the ROCPRC Reconciliation , ”American Asian Review , 12 (Spring 1994) , 151-154.

23.Koo Chen Foo , quoted in Economist , 1 May 1993 , p.31 ; Link , “Old Man's New China , ”p.32.See“Cross-Strait Relations : Historical Lessons , ”Free China Review , 44 (October 1994) , 42-52.Gong , “China's Fourth Revolution , ”p.39 ; Economist , 2 July 1994 , p.18 ; Gerald Segal , “China's Changing Shape : The Muddle Kingdom ? ”Foreign Affairs , 73 (May/June 1994) , 49 ; Ross H.Munro , “Giving Taipei a Place at the Table , ” Foreign

Affairs , 73 (Nov./Dec.1994) , 115 ; Wall Street Journal , 17 May 1993 , p.A7A ; Free China Journal , 29 July 1994 , p.1.

24.Economist , 10 July 1993 , pp.28-29 ; 2 April 1994 , pp.34-35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3 November 1993 ; Wall Street Journal , 17 May 1993 , p.A7A.

25.Ira M.Lapidus ,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 p.3.

26.Mohamed Zahi Mogberbi , "Tribalism , Relig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The Case of Libya , "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Challenges in the Arab World ,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 Cairo , 22-27 September 1992 , pp.1 , 9 ; Economist , (Survey of the Arab East) , 6 February 1988 , p.7 ; Adlan A.El-Hardallo , "Sufism and Tribalism : The Case of Sudan , "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Challenges in the Arab World ,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 Cairo , 22-27 September 1992) , p.2;Economist , 30 October 1987 , p.45 ; John Duke Anthony , "Saudi Arabia : From Tribal Society to Nation-State , "in Ragaei El Mellakh and Dorotliea H.El Mellakh , eds. , Saudi Arabia , Energy , Developmental Planning ,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xington , MA : Lexington , 1982) , pp.93-94.

27.Yalman Onaran , "Economics and Nationalism : The Case of Muslim Central Asia , "Central Asian Survey , 13 (No.4 , 1994) , 493 ; Denis Dragounski , "Threshold of Violence , "Freedom Review , 26 (Mar./April 1995) , 12.

28.Barbara Daly Metcalf ,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Societies , ”Items , 40 (March 1986) , 3.

29.Metcalf , “Muslim Societies , ”p.3

30.Boston Globe , 2 April 1995 , p.2.On PAIC generally , see“The Popular Arab and Islamic Conference (PAIC) :A New‘Islamist International ’ ?”.TransState Islam,1 (Spring 1995) ,12-16.

31.Bernard Schechterman and Bradford R.McGuinn,“Linkages Between Sunni and Shi.i Radical Fundamentalist Organizations:A New Variable in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 ”The Political Chronicle, 1 (February 1989) ,22-34;New York Times ,6 December 1994,p.5.

第八章

1.Georgi Arbatov , “Neo-Bolsheviks of the I.M.F. , ”New York Times , 7 May 1992 , p.A27.

2.North Korean views summed up by a senior U.S.analyst , Washington Post , 12 June 1994 , p.C1 ; Indian general quoted in Les Aspin , “From Deterrence to Denuking:Dealing with Proliferation in the 1990's , ”Memorandum , 18 February 1992 , p.6.

3.Lawrence Freedman , “Great Powers , Vital Interests and Nuclear Weapons , ”Survival , 36 (Winter 1994) , 37 ; Les Asin , Remarks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 7 December 1993 , p.3.

4.Stanley Norris quoted , Boston Globe , 25 November 1995 , pp.1 , 7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China's New.Old Thinking. : The

Concept of Limited Deterrenc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20 (Winter 1995-1996) , 21-23.

5.Philip L.Ritcheson , "Iranian Military Resurgence:Scope , Motivations ,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 21 (Summer 1995) , 575-576.Warren Christopher Address ,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 20 January 1995 ; Time , 16 December 1991 , p.47 ; Ali Al-Amin Mazrui , 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J.Currey , 1990) , pp.220 , 224.

6.New York Times , 15 November 1991 , p.A1 ; New York Times , 21 February 1992 , p.A9 ; 12 December 1993 , p.1 ; Jane Teufel Dreyer ,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Sanctions or Rapprochement ? "In Depth , 1 (Spring 1991) , 17-18 ; Time , 16 December 1991 , p.48 ; Boston Globe , 5 February 1994 , p.2 ; Monte R.Bullard , "U.S.-China Relations:The Strategic Calculus , "Parameters , 23 (Summer 1993) , 88.

7.Quoted in Karl W.Eikenberry , Explaining and Influencing Chinese Arms Transfers (Washington ,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 McNair Paper No.36 , February 1995) , p.37 ; Pakistani government statement , Boston Globe , 5 December 1993 , p.19 ; R.Bates Gill , "Curbing Beijing's Arms Sales , "Orbis , 36 (Summer 1992) , p.386 ; Chong-pin Lin , "Red Army , "New Republic , 20 November 1995 , p.28 ; New York Times , 8 May 1992 , p.31.

8.Richard A.Bitzinger , "Arms to Go : Chinese Arms Sales to the Third World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7 (Fall 1992) , p.87 ; Philip Ritcheson , "Iranian Military Resurgence , "pp.576 ,

578 ; Washington Post , 31 October 1991 , pp.A1 , A24 ; Time , 16 December 1991 , p.47 ; New York Times , 18 April 1995 , p.A8 ; 28 September 1995 , p.1 ; 30 September 1995 , p.4 ; Monte Bullard , "U.S.-China Relations , "p.88 , New York Times , 22 June 1995 , p.1 ; Gill , "Curbing Beijing's Arms , "p.388 ; New York Times , 8 April 1993 , p.A9 ; 20 June 1993 , p.6.

9.John E.Reilly , "The Public Mood at Mid-Decade , "Foreign Policy , 98 (Spring 1995) , p.83 ; Executive Order 12930 , 29 September 1994 ; Executive Order 12938 , 14 November 1994.These expanded on Executive Order 12735 , 16 November 1990 , issued by President Bush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10.James Fallows , "The Panic Gap : Reactions to North Korea's Bomb , "National Interest , 38 (Winter 1994) , 40-45 ; David Sanger , New York Times , 12 June 1994 , pp.1 , 16.

11.New York Times , 26 December 1993 , p.1 ,

12.Washington Post , 12 May 1995 , p.1.

13.Bilahari Kausikan , "Asia's Different Standard , "Foreign Policy , 92 (Fall 1993) , 28-29.

14.Economist , 30 July 1994 , p.31 ; 5 March 1994 , p.35 ; 27 August 1994 , p.51 ; Yash Ghai , "Human Rights and Governance:The Asian Debate , " (Asia Foundation.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 , Occasional Paper No.4 , November 1994) , p.14.

15.Richard M.Nixon , Beyond Peace (New York:Random

House , 1994) , pp.127-128.

16.Economist , 4 February 1995 , p.30.

17.Charles J.Brown , "In the Trenches : The Battle Over Rights , "Freedom Review , 24 (Sept./Oct.1993) , 9 ; Douglas W.Payne , "Showdown in Vienna , "ibid. , pp.6-7.

18.Charles Norchi , "The Ayatollah and the Author:Rethinking Human Rights , "Yale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 1 (Summer 1989) , 16 ; Kausikan , "Asia's Different Standard , "p.32.

19.Richard Cohen , The Earth Times , 2 August 1993 , p.14.

20.New York Times , 19 September 1993 , p.4E ; 24 September 1993 , pp.1 , B9 , B16 ; 9 September 1994 , p.A26 ; Economist , 21 September 1993 , p.75 ; 18 September 1993 , pp.37-38 ; Financial Times , 25-26 September 1993 , p.11 ; Straits Times , 14 October 1993 , p.1.

21.Figures and quotes are from Myron Weiner ,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 1995) , pp.21-28.

22.Weiner ,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 p.2.

23.Stanley Hoffmann , "The Case for Leadership , "Foreign Policy , 81 (Winter 1990-91) , 30.

24.See B.A.Roberson , "Islam and Europe : An Enigma or a Myth ? "Middle East Journal , 48 (Spring 1994) , p.302 ; New York Times , 5 December 1993 , p.1 ; 5 May 1995 , p.1 ; Joel Klotkin and Andries van Agt , "Bedouins : Tribes That Have Made it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8 (Fall 1991) , p.51 ; Judith

Miller , "Strangers at the Gate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15 September 1991 , p.49.

25.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9 May 1990 , p.5 ; New York Times , 15 September 1994 , p.A21.The French poll was sponsor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 the German poll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26.See Hans-George Betz , "The New Politics of Resentment :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 "Comparative Politics , 25 (July 1993) , 413-427.

27.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8 June 1993 , p.3 ; Wall Street Journal , 23 May 1994 ; p.B1 ; Lawrence H.Fuchs , "The Immigration Debate : Little Room for Big Reforms , "American Experiment , 2 (Winter 1994) , 6.

28.James C.Clad , "Slowing the Wave , "Foreign Policy , 95 (Summer 1994) , 143 ; Rita J.Simon and Susan H.Alexander , The Ambivalent Welcome : Print Media , Public Opinion and Immigration (Westport , CT:Praeger , 1993) , p.46.

29.New York Times , 11 June 1995 , p.E 14.

30.Jean Raspail , The Camp of the Saints (New York : Scribner , 1975) and Jean-Claude Chesnais , Le Crepuscule de l'Occident : Demngraphie et Politique (Paris : Robert Laffont , 1995) ; Pierre Lellouche , quoted in Miller , "Strangers at the Gate , "p.80.

31.Philippe Fargues , "Demographic Explosion or Social Upheaval ? "in Ghassan Salame , ed. ,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London : I.B.Taurus , 1994) , pp.157ff.

第九章

1.Adda B.Bozeman ,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Statecraft : Selected Essays (Washington : Brassey's (US) , 1992) , p.50 ; Berry Buzan ,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67 (July 1991) , 448-449.

2.John L.Esposito , The Islamic Threat :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46.

3.Bernard Lewis ,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13.

4.Esposito , Islamic Threat , p.44.

5.Daniel Pipes , In the Path of God : Islam and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3) , 102-103 , 169-173 ; Lewis F.Richardson , 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Pittsburgh : Boxwood Press , 1960) , pp.235-237.

6.Ira M.Lapidus ,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 pp.41-42 ; Princess Anna Comnena , quoted in Karen Armstrong , Holy War :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 (New York : Doubleday-Ancor , 1991) , pp.3-4 and in Arnold J.Toynbee ,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4) , VIII , p.390.

7.Barry Buzan , “New Patterns , ”pp.448-449 ; Bernard Lewis , “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 Why So Many Muslims Deeply Resent the West and Why Their Bitterness Will Not Be Easily

Mollified , "Atlantic Monthly , 266 (September 1990) , 60.

8.Mohamed Sid-Ahmed , -Cybernetic Colonialism and the Moral Search-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Spring 1994) , 19 ; M.J.Akbar , quoted Time , 15 June 1992 , p.24 ; Abdelwahab Belwahl , quoted ibid. , p.26.

9.William H.McNeill , -Epilogue :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 -in Martin E.Marry and R.Scott Appleby , eds. ,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 the Family , and Education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569.

10.Fatima Memissi , Islam and Democracy : Fear of the Modern World (Reading , MA : Addison-Wesley , 1992) .

11.For a selection of such reports , see Economist , 1 August 1992 , pp.34-35.

12.John E.Redly , ed. ,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5 (Chicago :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1995) , p.21 ; Le Monde , 20 September 1991 , p.12 , cited in Margaret Blunden , "Insecurity on Europe's Southern Flank , "Survival , 36 (Summer 1994) , 138 ; Richard Morin ,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 , 8-14 November 1993 , p.37 ;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 National Opinion Ballot Report , November 1994 , p.5.

13.Boston Globe , 3 June 1994 , p.18 ; John L.Esposito , "Symposium : Resurgent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 "Middle East Policy 3 (No.2 , 1994) , 9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10 May 1994 , pp.1 , 4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24 February 1995 , p.1.

14.Robert Ellsworth , Wall Street Journal , 1 March 1995 , p.15 ; William T.Johnson , NATO's New Front Line :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Southern Tier (Carlisle Barracks , PA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U.S.Army War College , 1992) , p.vii ; Robbin Laird , French Security Policy in Transition :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Washington , D.C. :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 McNair paper 38 , March 1995) , pp.50-52.

15.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 Islam and Revolution (Berkeley CA : Mizan Press , 1981) , p.305.

16.Economist , 23 November 1991 , p.15.

17.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 "Survival , 36 (Summer 1994) , 15.

18.Can China's Armed Forces Win the Next War ? , excerpt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Ross H.Munro , "Eavesdropping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 Where It Expects War-Where It Doesn't , "Orbis , 38 (Summer 1994) , 365.The authors of this document went on to say that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aiwan"would be a really unwise decision."

19.Buzan and Segal ,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 "p.7 ; Richard K.Betts , "Wealth , Power and Instability :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8 (Winter 1993/94) , 34-77 ; Aaron L.Friedberg , "Ripe for Rivalry : Prospects for Peace in Multipolar Asia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8 (Winter 1993/94) , 5-33.

20.Can China's Armed Forces Win the Next War ? excerpts translated in Munro , "Eavesdropping on the Chinese , "pp.355ff. ; New York Times , 16 November 1993 , p.A6 ; Friedberg , "Ripe for Rivalry , "p.7.

21.Desmond Ball , "Arms and Affluence : Military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8 (Winter 1993/94) , 95-111 ; Michael T.Klare , "The Next Great Arms Race , "Foreign Affairs , 72 (Summer 1993) , 137ff. ; Buzan and Segal ,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 "pp.8-11 ; Gerald Segal , "Managing New Arms Races in the Asia/Pacific , "Washington Quarterly , 15 (Summer 1992) , 83-102 ; Economist , 20 February 1993 , pp.19-22.

22.See , e.g. , Economist , 26 June 1993 , p.75 ; 24 July 1995 , p.25 ; Time , 3 July 1995 , pp.30-31 ; and on China , Jacob Heilbrunn , "The Next Cold War , "New Republic , 20 November 1995 , pp.27ff.

23.For discussion of the varieties of trade wars and when they may lead to military wars , see David Rowe , Trade War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lict (Working paper no.6 , Project on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 John M.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Harvard University , July 1994) , pp.7ff.

24.New York Times , 6 July 1993 , p.A1 , A6 ; Time , 10 February 1992 , pp.16ff. ; Economist , 17 February 1990 , pp.21-24 ; Boston Globe , 25 November 1991 , pp.1 , 8 ; Dan Oberdorfer , Washington Post , 1 March 1992 , p.A1.

25.Quoted New York Times , 21 April 1992 , p.A10 ; New York Times , 22 September 1991 , p.E2 ; 21 April 1992 , p.A1 ; 19 September 1991 , p.A7 ; 1 August 1995 , p.A2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4 August 1995 , p.4 ; China Post (Taipei) , 26 August 1995 , p.2 ; New York Times , 1 August 1995 , p.A2 , citing David Shambaugh report on interviews in Beijing.

26.Donald Zagoria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sletter , October 1993 , p.3 ; Can China's Armed Forces Win the Next War ? in Munro , “avesdropping on the Chinese Military , ”pp.355ff.

27.Roger C.Airman , “Why Pressure Tokyo ? The US-Japan Rift , ”Foreign Affairs , 73 (May-June 1994) , p.3 ; Jeffrey Garten , “The Clinton Asia Policy , ”International Economy , 8 (March-April 1994) , 18.

28.Edward J.Lincoln , Japan's Unequal Trade , (Washington ,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90) , pp.2-3.See C.Fred Bergsten and Marcus Noland , 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 United States-Japan Economic Conflict (Washington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3) ; Eisuke Sakakibara , “Less Like You , ”International Economy , (April-May 1990) , 36 , who distinguishes the American capitalistic market economy from the Japanese noncapitalistic market economy ; Marie Anchordoguy , “Japanese-American Trade Conflict and Supercomputers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109 (Spring 1994) , 36 , citing Rudiger Dornbush , Paul Krugman , Edward J.Lincoln , and Mordechai E.Kreinin ; Eamonn Fingleton , “Japan's Invisible Leviathan , ”Foreign Affairs , 74 (Mar./April 1995) , p.70.

29. For a good summary of differences in culture , values , social relations , and attitudes ,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 W.W.Norton , 1996) , chapter 7 ,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30. *Washington Post* , 5 May 1994 , p.A38 ; *Daily Telegraph* , 6 May 1994 , p.16 ; *Boston Globe* , 6 May 1994 , p.11 ; *New York Times* , 13 February 1994 , p.10 ; Karl D.Jackson , “How to Rebuild America's Stature in Asia , ” *Orbis* , 39 (Winter 1995) , 14 ; Yohei Kono , quoted in Chalmers Johnson and E.B.Keehn , “The Pentagon's Ossified Strategy , ” *Foreign Affairs* , 74 (July-August 1995) , 106.

31. *New York Times* , 2 May 1994 , p.A10.

32.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 “Asia : Skepticism About Optimism , ” *National Interest* , 39 (Spring 1995) , 83-84 ; Arthur Waldron , “Deterring China , ” *Commentary* , 100 (October 1995) , 18 ; Nicholas D.Kristof , “The Rise of China , ” *Foreign Affairs* , 72 (Nov./Dec.1993) , 74.

33. Stephen P.Walt , “Alliance Formation in Southwest Asia: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Cold War Competition , ”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 eds. ,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53 , 69.

34. Randall L.Sehweller ,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19 (Summer 1994) , 72ff.

35.Lucian W.Pye ,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nsensus in Chinese Politics : A Model and Some Propositions (Santa Moniea , CA : Rand , 1980) , p.120 ; Arthur Waldron ,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 China's Turning Point , 1924-1925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p.48-49 , 212 ; Avery Coldstein ,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 Structured Constraints in Polities in China , 1949-1978 (Stanford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5-6 , 35ff.See also , Lucian W.Pye ,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in Search of Chinese Realities , "China Quarterly , 132 (December 1992) , 1161-1171.

36.Samuel S.Kim and Lowell Dittmer , "Wh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 eds. ,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240 ; Paul Dibb , Towards a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London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Adelphi Paper 295 , 1995) , pp.10-16 ; Roderiek MaeFarquhar ,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 "Economist , 9 February 1980 , pp.67-72 ; Kishore Mahbubani , " The Pacific Impulse , "Survival , 37 (Spring 1995) , 117 ; James L.Richardson , "Asia-Pacific:The Case for Geopolitical Optimism , "National Interest , 38 (Winter 1994-95) , 32 ; Paul Dibb , Towards a New Balance , "p.13.See Nicola Baker and Leonard C.Sebastian , The Problem with Parachuting:Strategic Studies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Jg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 18 (September 1995) , 15ff.for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f the inapplicability to Asia of European-based concepts , such a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37.Economist , 23 December 1995 ; 5 January 1996 , pp.39-40.

38.Richard K.Betts , "Vietnam's Strategic Predicament , "Survival , 37 (Autumn 1995) 61ff , 76.

39.New York Times , 12 November 1994 , p.6 ; 24 November 1994 , p.A1 2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8 November 1994 , p.1 ; Michel Oksenberg , Washington Post , 3 September 1995 , p.Cl.

40.Jitsuo Tsuchiyama , "The End of the Alliance ? Dilemmas in the U.S.-Japan Relations , " (Unpublished paper , Harvard University , John M.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1994) , pp.18-19.

41.Ivan P.Hall , "Japan's Asia Card , "National Interest , 38 (Winter 1994-95) , 26 ; Kishore Mahbubani , "The Pacific Impulse , "p.117.

42.Mike M.Mocbizuki , "Japan and the Strategic Quadrangle , "in Michael Mandelbaum , ed. , The Strategic Quadrangle : Russia , China , Japan ,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1995) , pp.130-139 ; Asahi Shimbon poll reported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10 January 1995 , p.7.

43.Financial Times , 10 September 1992 , p.6 ; Samina Yasmeen , "Pakistan's Cautious Foreign Policy , "Survival , 36 (Summer 1994) , p.121 , 127-128 ; Bruce Vaughn , "Shifting

Geopolitical Realities Between South , Southwest and Central Asia , "Central Asian Survey , 13 (No.2 , 1994) , 313 ; Editorial , Hamshahri , 30 August 1994 , pp.1 , 4 , in FBIS-NES-94-173 , 2 September 1994 , p.77.

44.Graham E.Fuller , "The Appeal of Iran , "National Interest , 37 (Fall 1994) , p.95 ; Mu.ammam al-Qadhdhafi , Sermon , Tripoli , Libya , 13 March 1994 , in FBIS-NES-94-049 , 14 March 1994 , p.2 1.

45.Fereidun Fesharaki , East-West Center , Hawaii ,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 3 April 1994 , p.E3.

46.Stephen J.Blank , Challenging the New World Order:The Arms Transfer Policies of the Russian Republic (Carlisle Barracks , PA : U.S.Army War College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1993) , pp.53-60.

47.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5 August 1995 , p.5.

48.J.Mohan Malik , "India Copes with the Kremlin's Fall , "Orbis , 37 (Winter 1993) , 75.

第十章

1.Mahdi Elmandjra , Der Spiegel , 11 February 1991 , cited in Elmandjra , "Cultural Diversity : Key to Survival in the Future , " (First Mexican Congress on Future Studies , Mexico City , 26-27 September 1994) , pp.3 , 11.

2.David C.Rapoport , "Comparing Militant Fundamentalist Groups , "in Martin E.Marty and R.Scott Appleby , eds. ,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 : Remaking Politics , Economies ,

and Militance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 p.445.

3.Ted Galen Carpenter ,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fghanistan , ”World Policy Journal , 11 (Spring 1994) , 78-79 , 81 , 82 ; Anthony Hyman , “Arab Involvement in the Afghan War , ”Beirut Review , 7 (Spring 1994) , 78 , 82 ; Mary Anne Weaver , “Letter from Pakistan : Children of the Jihad , ”New Yorker , 12 June 1995 , pp.44-45 ; Washington Post , 24 July 1995 , p.A1 ; New York Times , 20 March 1995 , p.1 , 28 March 1993 , p.14.

4.Tim Weiner , “Blowback from the Afghan Battlefield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13 March 1994 , p.54.

5.Harrison J.Goldin , New York Times , 28 August 1992 , p.A25.

6.james Piscatori , “Religion and Realpolitik : Islamic Responses to the Gulf War , ”in James Piscatori , ed. , Islamic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Gulf Crisis (Chicago : Fundamentalism Project ,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 1991) , pp.1 , 6-7.See also Fatima Mernissi , Islam and Democracy : Fear of the Modem World (Reading , MA : Addison-Wesley) , pp.16-17.

7.Rami G.Khouri , “Collage Of Comment : The Gulf War and the Mideast Peace ; The Appeal of Saddam Hussein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8 (Spring 1991) , 56.

8.Ann Mosely Lesch , “Contrasting Reactions to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 Egypt , Syria , Jordan , and the Palestinians , ”Middle East Journal , 45 (Winter 1991) , p.43 ; Time , 3 December

1990 , p.70 ; Kanan Makiya , Cruelty and Silence : War , Tyranny , Uprising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 W.W.Norton , 1993) , pp.242ff.

9.Erie Evans ,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 "Harvard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Review , 1 (February 1994) , p.28 ; Sari Nusselbeh , quoted Time , 15 October 1990 , pp.54-55.

10.Karin Haggag , "One Year After the Storm , "Civil Society (Cairo) , 5 (May 1992) , 12.

11.Boston Globe , 19 February 1991 , p.7 ; Safar al-Hawali , quoted by Mamoun Fandy , New York Times , 24 November 1990 , p.21 ; King Hussein , quoted by David S.Landes , "Islam Dunk : the Wars of Muslim Resentment , "New Republic , 8 April 1991 , pp.15-16 ; Fatima Mernissi , Islam and Democracy , p.102.

12.Safar Al-Hawali , "Infidels , Without , and Within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8 (Spring 1991) , 51.

13.New York Times , 1 February 1991 , p.A7 ; Economist , 2 February 1991 , p.32.

14.Washington Post , 29 January 1991 , p.A10 ; 24 February 1991 , p.B1 ; New York Times , 20 October 1990 , p.4.

15.Quoted in Saturday Star (Johannesburg) , 19 January 1991 , p.3 ; Economist , 26 January 1991 , pp.31-33.

16.Sohail H.Hasmi , review of Mohammed Haikal , "Illusions of Triumph , "Harvard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Review , 1 (February 1994) , 107 ; Mernissi , Islam and Democracy ,

p.102.

17.Shibley Telhami , “Arab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ulf War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108 (Fall 1993) , 451.

18.*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8 June 1993 , p.10.

19.Roy Licklider , “The Consequences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s in Civil Wars , 1945-93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89 (September 1995) , 685 , who defines communal wars as “identity wars , ”and Samuel P.Huntington , “Civil Violen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 ”in *Civil Viol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Adelphi Paper No.83 , December 1971) , 12-14 , who cites as the fiv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al wars a high degree of polarization , ideological ambivalence , particularism , large amounts of violence , and protracted duration.

20.These estimates come from newspaper accounts and 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 ,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 1994) , pp.160-165.

21.Richard H.Shultz , Jr.and William J.Olson ,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 Emerging Threat to U.S.Security* (Washington , D.C. : National Strategy Information Center) , pp.17ff. ; H.D.S.Greenway , *Boston Globe* , 3 December 1992 , p.19.

22.Roy Licklider , “Settlements in Civil Wars , ”p.685 ; Gurr and Harff , *Ethnic Conflict* , p.11 ; Trent N.Thomas , “Global Assess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 ”in Robert L.Pfaltzgraff , Jr.and Richard H.Shutz , Jr. ,

eds. , Ethn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and Army Roles and Missions (Carlisle Barracks , PA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U.S.Army War College , 1994) , p.36.

23.See Shultz and Olson ,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 pp.3-9 ; Sugata Bose , “Factors Caus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 ”in Pfaltzgraff and Shultz , Ethn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 pp.43-49 ; Michael E.Brown ,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Ethnic Conflict , ”in Michael E.Brown , ed. ,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3-26.For a counterargument that ethnic conflict has not increas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see Thomas , “Global Assess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 ”pp.33-41.

24.Ruth Lager Sivard ,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93 (Washington , D.C. : World Priorities , Inc. , 1993) , pp.20-22.

25.James L.Payne , Why Nations Arm (Oxford : B.Blackwell , 1989) , p.124.

26.Christopher B.Stone , “Westphalia and Hudaybiyya : A Survey of Islamic Perspectives on the Use of Force as Conflict Management Technique” (unpublished paper , Harvard University) , pp.27-31 ,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 Michael Brecher , and Sheila Moser , eds. , Cr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 Pergamon Press , 1988-89) , II , 15 , 161.

27.Gary Fuller , “The Demographic Backdrop to Ethnic Conflict : A Geographic Overview , ”i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The Challenge of Ethnic Conflict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1990's :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 D.C.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RTT 95-10039 , October 1995) , pp.151-154.

28.New York Times , 16 October 1994 , p.3 ; Economist , 5 August 1995 , p.32.

29.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 Population Division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 The 1994 Revision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 1995) , pp.29 , 51 ; Denis Dragounski , "Threshold of Violence , "Freedom Review , 26 (March-April 1995) , 11.

30.Susan Woodward , Balkan Tragedy : Chaos and Dis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95) , pp.32-35 ; Branka Magas , 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 : Tracking the Breakup 1980-92 (London : Verso , 1993) , pp.6 , 19.

31.Paul Mojzes , Yugoslavian Inferno:Ethnoreligious Warfare in the Balkans (New York : Continuum , 1994) , pp.95-96 ; Magas ,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 , pp. , 49-73 ; Aryeh Neier , "Kosovo Survives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3 February 1994 , p.26.

32.Aleksa Djilas , "A Profile of Slobodan Milosevic , "Foreign Affairs , 72 (Summer 1993) , 83.

33.Woodward , Balkan Tragedy , pp.33-35 , figures derived from Yugoslav censuses and other sources ; William T.Johnsen , Deciphering the Balkan Enigma : using History to Inform

Policy (Carlisle Barracks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1993) , p.25 , citing Washington Post , 6 December 1992 , p.C2 ; New York Times , 4 November 1995 , p.6.

34.Bogdan Denis Denitch , Ethnic Nationalism : “The Tragic Death of Yugoslavia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4) , pp.108-109.

35.Payne , Why Nations Arm , pp.125 , 127.

36.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 20 January , 1995 , p.2.

第十一章

1.Roy Licklider , “The Consequences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s in Civil Wars , 1945-93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89 (September 1995) , 685.

2.See Barry R.Posen ,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 ”in Michael E.Brown , ed. ,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103-124.

3.Roland Dannreuther , Creating New States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Brassey's , Adelphi Paper No.288 , March 1994) , pp.30-31 ; Dodjoni Atovullo , quoted in Urzula Doroszevska , “The Forgotten War :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ajikistan , ”Uncaptive Minds , 6 (Fall 1993) , 33.

4.Economist , 26 August 1995 , p.43 ; 20 January 1996 , p.21.

5.Boston Globe , 8 November 1993 , p.2 ; Brian

Murray , "Peace in the Caucasus : Multi-Ethnic Stability in Dagestan , "Central Asian Survey , 13 (No.4 , 1994) , 514-515 ; New York Times , 11 November 1991 , p.A7 ; 17 December 1994 , p.7 ; Boston Globe , 7 September 1994 , p.16 ; 17 December 1994 , pp.1ff.

6.Raju G.C.Thomas ,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South Asia , "Survival , 36 (Summer 1994) , 99-101 , 109 ; Stefan Wagstyl , "Kashmiri Conflict Destroys a Paradise , ."Financial Times , 23-24 October 1993 , p.3.

7.Alija Izetbegovic , The Islamic Declaration (1991) , pp.23 , 33.

8.New York Times , 4 February 1995 , p.4 ; 15 June 1995 , p.A12 ; 16 June 1995 , p.A12.

9.Economist , 20 January 1996 , p.21 ; New York Times , 4 February 1995 , p.4.

10.Stojan Obradovic , "Tuzla : The Last Oasis , "Uncaptive Minds , 7 (Fall-Winter 1994) , 12-13.

11.Fiona Hill , Russia's Tinderbox : Conflict in the North Caucasu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roject , September 1995) , p.104.

12.New York Times , 6 December 1994 , p.A3.

13.See Mojzes , Yugoslavian Inferno , chap.7 , "The Religious Component in Wars" ; Denitch , Ethnic Nationalism : The Tragic

Death of Yugoslavia , pp.29-30 , 72-73 , 131-133 ; New York Times , 17 September 1992 , p.A14 ; Misha Glenny-Carnage in Bosnia , for Starters , -New York Times , 29 July 1993 , P.A23.

14.New York Times , 13 May 1995 , p.A3 ; 7 November 1993 , p.E4 ; 13 March 1994 , P.E3 ; Boris Yeltsin , quoted in Barnett R.Rubin , "The Fragmentation of Tajikistan , "Survival , 35 (Winter 1993-94) , 86.

15.New York Times , 7 March 1994 , p.1 ; 26 October 1995 , p.A25 ; 24 September 1995 , p.E3 ; Stanley Jeyaraja Tambiah , Sri Lanka :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 p.19.

16.Khalid Duran , quoted in Richard H.Schultz , Jr.and William J.Olson ,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 : Emerging Threat to U.S.Security (Washington , D.C. : National Strategy Information Center) , p.25.

17.Khaching Tololyan , "The Impact of Diasporas in U.S.Foreign Policy , "in Robert L.Pfaltzgraff , Jr.and Richard H.Shultz , Jr. , eds. , Ethn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and Army Roles and Missions (Carlisle Barracks , PA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U.S.Army War College , 1994) , p.156.

18.New York Times , 25 June 1994 , p.A6 ; 7 August 1994 , p.A9 ; Economist , 31 October 1992 , p.38 ; 19 August 1995 , p.32 ; Boston Globe , 16 May 1994 , p.12 ; 3 April 1995 , p.12.

19.Economist , 27 February 1988 , p.25 ; 8 April 1995 , p.34 ; David C.Rapoport-The Role of External Forces in Supporting

Ethno-Religious Conflict , -in Pfaltzgraff and Shultz , Ethnic Conflict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 p.64.

20.Rapoport , "External Forces , "p.66 ; New York Times , 19 July 1992 , p.E 3 ; Carolyn Fluehr-Lobban , "Protracted Civil War in the Sudan : Its Future as a Multi-Religious , Multi-Ethnic State ,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 16 (Summer 1992) , 73.

21.Steven R.Weisman , "Sri Lanka : A Nation Disintegrates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13 December 1987 , p.85.

22.New York Times , 29 April 1984 , p.6 ; 19 June 1995 , p A3 ; 24 September 1995 , P.9 ; Economist , 11 June 1988 , p.38 ; 26 August 1995 , 21P.29 ; 20 May 1995 , p.35 ; 4 November 1995 , p.39.

23.Barnett Rubin , "Fragmentation of Tajikistan , "pp.84 , 88 ; New York Times , 29 July 1993 , p.11 ; Boston Globe , 4 August 1993 , p.4.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r in Tajikistan , I have relied largely on Barnett R.Rubin , "The Fragmentation of Tajikistan , "Survival , 35 (Winter 1993-94) , 71-91 ; Roland Dannreuther , Creating New States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Adelphi Paper No.288 , March 1994) ; Hafizulla Emadi , "State , Ideology , and Islamic Resurgence in Tajikistan , "Central Asian Survey , 13 (No.4 , 1994) , 565-574 ; and newspaper accounts.

24.Urszula Doroszevska , "Caucasus Wars , "Uncaptive Minds , 7 (Winter-Spring 1994) , 86.

25.Economist , 28 November 1992 , p.58 ; Hill , Russia's Tinderbox , p.50.

26.Moscow Times , 20 January 1995 , p.4 ; Hill , Russia's Tinderbox , p.90.

27.Economist , 14 January 1995 , pp.43ff. ; New York Times , 21 December 1994 , p.A18 ; 23 December 1994 , pp.A1 , A10 ; 3 January 1995 , p.1 ; 1 April 1995 , p.3 ; 11 December 1995 , p.A6 ; Vicken Cheterian , "Chechnya and the Transcaucasian Republics ,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 February 1995 , pp.10-11 ; Boston Globe , 5 January 1995 , pp.1ff. ; 12 August 1995 , p.2.

28.Vera Tolz , "Moscow and Russia's Ethnic Republics in the Wake of Chechnya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Post-Soviet Prospects , 3 (October 1995) , 2 ; New York Times , 20 December 1994 , p.A14.

29.Hill , Russia's Tinderbox , p.4 ; Dmitry Temin , "Decision Time for Russia , "Moscow Times , 3 February 1995 , p.8.

30.New York Times , 7 March 1992 , p.3 ; 24 May 1992 , p.7 ; Boston Globe , 5 February 1993 , p.1 ; Bahri Yilmaz , "Turkey's New Ro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Aussenpolitik , 45 (January 1994) , 95 ; Boston Globe , 7 April 1993 , p.2.

31.Boston Globe , 4 September 1993 , p.2 ; 5 September 1993 , p.2 ; 26 September 1993 , p.7 ; New York Times , 4 September 1993 , p.5 ; 5 September 1993 , p.19 ; 10 September 1993 , p.A3.

32. New York Times , 12 February 1993 , p.A3 ; 8 March 1992 , p.20 ; 5 April 1993 , p.A7 ; 15 April 1993 , p.A9 ; Thomas Goltz , "Letter from Eurasia : Russia's Hidden Hand , " Foreign Policy , 92 (Fall 1993) , 98-104 ; Hill and Jewett , Back in the USSR , p.15.

33. Fiona Hill and Pamela Jewett , Back in the USSR :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Russia (Harvard University ,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roject , January 1994) , P.10.

34. New York Times , 22 May 1992 , p.A29 ; 4 August 1993 , p.A3 ; 10 July 1994 , p.E4 ; Boston Globe , 25 December 1993 , p.18 ; 23 April 1995 , pp.1 , 23.

35. Flora Lewis , "Between TV and the Balkan War , " German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Summer 1994) , 47. Hanns W. Maull , "in the Yugoslav Crisis , " Survival , 37 (Winter 1995-96) , 112 ; Wolfgang Krieger , "Toward a Gaullist Germany ? Some Lessons from the Yugoslav Crisis , " World Policy Journal , 11 (Spring 1994) , 31-32.

36. Misha Glenny , "Yugoslavia : The Great Fall ,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23 March 1993 , p.61 ; Pierre Behar , "Central Europe : The New Lines of Fracture , " Geopolitique , 39 (Autumn 1994) , 44.

37. Pierre Behar ,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s Today :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 " Geopolitique , 35 (Autumn 1991) ,

p.33 ; New York Times , 23 September 1993 , p.A9 ; Washington Post , 13 February 1993 , p.16 ; Janusz Bugajski , "The Joy of War , "Post-Soviet Prospects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18 March 1993 , p.4.

38.Dov Ronen , The Origins of Ethnic Conflict : Lessons from Yugoslav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 Working Paper No.155 , November 1994) , pp.23-24 ; Bugajski , "Joy of War , "p.3.

39.New York Times , 1 August 1995 , p.A6 ; 28 October 1995 , pp.1 , 5 ; 5 August 1995 , p.4 ; Economist , 11 November 1995 , pp.48-49.

40.Boston Globe , 4 January 1993 , p.5 ; 9 February 1993 , p.6 ; 8 September 1995 , p.7 ; 30 November 1995 , p.13 ; New York Times , 18 September 1995 , p.A6 ; 22 June 1993 , p.A23 ; Janusz Bugajski , "Joy of War , "p.4.

41.Boston Globe , 1 March 1993 , p.4 ; 21 February 1993 , p.11 ; 5 December 1993 , p.30 ; Times (London) , 2 March 1993 , p.14 ; Washington Post , 6 November 1995 , p.A15.

42.New York Times , 2 April 1995 , p.10 ; 30 April 1995 , p.4 ; 30 July 1995 , p.8 ; 19 November 1995 , p.E3.

43.New York Times , 9 February 1994 , p.A12 ; 10 February 1994 , p.A1 ; 7 June 1995 , p.A1 ; Boston Globe , 9 December 1993 , p.25 ; Europa Times , May 1994 , p.6 ; Andreas Papandreou , "Europe Turns Left ,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11 (Winter 1994) , 53.

44.New York Times , 10 September 1995 , p.12 ; 13 September 1995 , p.All ; 18 September 1995 , p.A6 ; Boston Globe , 8 September 1995 , p.2 ; 12 September 1995 , p.1 ; 10 September 1995 , p.28.

45.Boston Globe , 16 December 1995 , p.8 ; New York Times , 9 July 1994 , p.2.

46.Margaret Blunden , "Insecurity on Europe's Southern Flank , "Survival , 36 (Summer 1994) , 145 ; New York Times , 16 December 1993 , p.A7.

47.Fouad Ajami , "Under Western Eyes : The Fate of Bosni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Balkans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The Aspen Institute , April 1996) , pp.5ff. ; Boston Globe , 14 August 1993 , p.2 ; Wall Street Journal , 17 August 1992 , p.A4.

48.Yilmaz , "Turkey's New Role , "pp.94 , 97.

49.Janusz Bugajski , "Joy of War , "p.4 ; New York Times , 14 November 1992 , p.5 ; 5 December 1992 , p.1 ; 15 November 1993 , p.1 ; 18 February 1995 , p.3 ; 1 December 1995 , p.A14 ; 3 December 1995 , p.1 ; 16 December 1995 , p.6 ; 24 January 1996 , pp.AI , A6 ; Susan Woodward , Balkan Tragedy : Chaos and Dis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 1995) , pp.356-357 ; Boston Globe , 10 November 1992 , p.7 ; 13 July 1993 , p.10 ; 24 June 1995 , p.9 ; 22 September 1995 , pp.1 , 15 ; Bill Gertz , Washington Times , 2 June 1994 , p.A1.

50.Jane's Sentinel , cited in Economist , 6 August 1994 ,

p.41 ; Economist , 12 February 1994 , p.21 ; New York Times , 10 September 1992 , p.A6 ; 5 December 1992 , p.6 ; 26 , January 1993 , p.A9 ; 14 October 1993 , p.A14 ; 14 May 1994 , p 6 ; 15 April 1995 , p.3 ; 15 June 1995 , p.A12 ; 3 February 1996 , p.6 ; Boston Globe , 14 April 1995 , p.2 ; Washington Post , 2 February 1996 , p.1.

51.New York Times , 23 January 1994 , p.1 ; Boston Globe , 1 February 1994 , p.8.

52.On American acquiescence in Muslim arms shipments , see New York Times , 15 April 1995 , p.3 ; 3 February 1996 , p.6 ; Washington Post , 2 February 1996 , p.1 ; Boston Globe , 14 April 1995 , p.2.

53.Rebecca West ,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in 1937 (London : Macmillan , 1941) , p.22 quoted in Charles G.Boyd , "Making Peace with the Guilty : the Truth About Bosnia , "Foreign Affairs , 74 (Sept./Oct.1995) , 22.

54.Quoted in Timothy Garton Ash , "Bosnia in Our Future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21 December 1995 , p.27 ; New York Times , 5 December 1992 , p.1.

55.New York Times , 3 September 1995 , p.6E ; Boston Globe , 11 May 1995 , p.4.

56.See U.S.Institute of Peace , Sudan : Ending the War , Moving Talks Forward (Washington , D.C. : U.S.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 1994) ; New York Times , 26 February 1994 , p.3.

57. John J. Maresca , War in the Caucasu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Special Report , no date) , p.4.

58. Robert D. Putnam ,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 The Logic of Two Level Game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42 (Summer 1988) , 427-460 ; Samuel P. Huntington ,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OK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91) , pp.121-163.

59. New York Times , 27 January 1993 , p.A6 ; 16 February 1994 , p.47. On the Russian February 1994 initiative , see generally Leonard J. Cohen , “Russia and the Balkans: Pan Slavism , Partnership and Powe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 49 (August 1994) , 836-845.

60. Economist , 26 February 1994 , p.50.

61. New York Times , 20 April 1994 , p.A1 2 ; Boston Globe , 19 April 1994 , p.8.

62. New York Times , 15 August 1995 , p.13.

63. Hill and Jewitt , Back in the USSR , p.12 ; Paul Henze , Georgia and Armenia-Toward Independence (Santa Monica , CA : RAND P-7924 , 1995) , p.9 ; Boston Globe , 22 November 1993 , p.34.

第十二章

1. Arnold J. Toynbee ,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2 vols. , 1934-1961) , VII , 7-17 ; Civilization on Trial : Essay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8) , 17-18 ; Study of History , IX , 421-422.

2. Matthew Melko ,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Boston : Porter Sargent , 1969) , p.155.

3. Carroll Quigley ,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1) , pp.146ff.

4. Quigley ,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 pp.138-139 , 158-160.

5. Mattei Dogan , “The Decline of Religious Beliefs in Western Europe , ”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47 (Sept.1995) , 405-419.

6. Robert Wuthnow , “Indices of Religious Resurg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 ” in Richard T. Antoun and Mary Elaine Hegland , eds. , Religious Resurgence ; Contemporary Cases in Islam , Christianity , and Judaism (Syracuse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 pp.15-34. Economist , 8 (July 1995) , 19-21.

7. Arthur M. Schlesinger , Jr. ,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 W.W. Norton , 1992) , pp.66-67 , 123.

8. Quoted in Schlesinger , Disuniting of America , p.118.

9. Gunnar Myrdal ,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 Harper & Bros. , 1944) , 1 , 3. Richard Hofstadter quoted in Hans Kohn ,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 Macmillan , 1957) , p.13.

10. Takeshi Umehara , “Ancient Japan Shows Post-Modernism the Wa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9 (Spring 1992) , 10.

11. James Kurth , "The Real Clash , "National Interest , 37 (Fall 1994) , 3-15.

12. Malcolm Rifkind , Speech , Pilgrim Society , London , 15 November 1994 (New York :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 16 November 1994) , p.2.

13.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3 May 1995 , p.13.

14. Richard Holbrooke , "America : A European Power , "Foreign Affairs , 74 (March/April 1995) , 49.

15. Michael Howard , America and the World (St. Louis : Washington University , the Annual Lewin Lecture , 5 April 1984) , p.6.

16. Schlesinger , Disuniting of America , p.127.

17. For a 1990s statement of this interest , see "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for the Fiscal Years 1994-1999 , "draft , 18 February 1992 ; New York Times , 8 March 1992 , p.14.

18. Z.A. Bhutto , If I Am Assassinated (New Delhi : Vikas Publishing House , 1979) , pp.137-138 , quoted in Louis Delvoie , "The Islamization of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 51 (Winter 1995-96) , 133.

19. Michael Walzer , Thick and Thin :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Notre Dam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94) , pp.1-11.

20. James Q. Wilson ,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93) , p.225.

21.Government of Singapore , Shared Values (Singapore : Cmd.No.1 of 1991 , 2 January 1991) , pp.2-10.

22.Lester Pearson , 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5) , pp.83-8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rebuild》 导读

潘忠岐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rebuild》一书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第二部分，标题为“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标题为“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标题为“文明的冲突”。这是全书的核心。亨廷顿首先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其次，亨廷顿认为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不仅如此，断层线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间。再次，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亨廷顿指出，由于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断层线冲突是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结束断层线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断层线冲突。这通常需要主要参与者的疲惫衰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休止断层线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断层线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

第五部分，标题为“文明的未来”。亨廷顿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

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均势的变换。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1）避免原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2）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3）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在书的结尾，亨廷顿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正如《外交》杂志的编辑们所指出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继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另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自然，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出版商认为，过去几年的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世界政治的热点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战斗就是明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今天和下个世纪全球政治发展动力的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它的确是近十年来最富有争议的著作之一。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结束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当然，对文明冲突理论提出质疑甚至批判的也不乏其人，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资深教授奈（J. Nye）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

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冲突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说：“存在于文明内部的狂热派与立宪主义之间、极权野心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以一种比存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更触目、更完全的形式出现。”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专门撰文《挑战亨廷顿》对亨廷顿提出挑战，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和民族将会像抵制殖民帝国对它们的侵吞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它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与亨廷顿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冲突不无关联。

（摘编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李慎之

1993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繆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其主要意思是说在华约垮台、苏联瓦解、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就是冷战）消失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按照他的分类，现在世界上还有七八种文明，即：（一）西方即基督教文明、（二）儒教主要是中国文明、（三）日本文明、（四）伊斯兰文明、（五）印度教文明、（六）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七）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八）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他本人所属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国为甚。秋季号的《外交》季刊就发表了七篇驳斥亨廷顿的文章。但是亨廷顿对此并不服气，又在当年《外交》的11/12月号（按：就从这一期起，《外交》从季刊改为双月

刊)撰文反驳。题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标题是《冷战后世界的范式》,借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说明他提出的“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在此以后,世界各国的评论不断。就我的视野所及似乎尤以中国为多,猜想这大概是他明确以中国文明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有关,因此难免不引起中国学者义愤填膺。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同志还特地在1995年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把中国学者的各种评论收集起来。除了一篇介绍亨氏理论要旨与他自己写的对中国学者论点的总评介外,收文26篇,据说还远未收全,真是洋洋大观,使我大开眼界。

不过,亨氏意犹未尽,大概真想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创立一个欧几里得式或者爱因斯坦式的范式,又在1996年底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全书还来不及看到,可是他又在同年末一期《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18页的长文《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作为他那本书的摘要。中国的《参考消息》曾予详细译介,读者应当超过百万。只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多少反应,《文汇报》最近倒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多囿于三年前的那些老观点,看起来有点不对题。现在只好由我来凑趣试加评论,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全文反复申明的主旨就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甚至引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说:“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价值,亚洲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大可表扬亨廷顿进步了。他确实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曰多极化的世界。这个事实或者趋势,已经为西

方世界中心的美国，而且为自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就是美国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的名门望族的当代名教授所肯定、所承认，当然是值得称道，值得欢迎的。

这样说，绝没有美化亨廷顿之嫌，细读全文，他除了在解释何为西方文化时不免有点自我表扬之外，对其他文明、宗教、种族……并无恶毒攻击或贬低之词。相反，他还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的可能。他还认为西方已经在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要明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完全是一副退守和无可奈何的姿态。

但是，从亨廷顿的三篇文章仔细寻绎，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难言之隐”，不过是在三年过程中通过三篇文章慢慢地、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来的，而且最后也并没有明白说透。

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却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中国的读者一般不大意识到美国近30年逐渐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至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大，然而真正大的影响还在后头。三年半以前亨廷顿的第一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正在那个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美国还是一个熔炉吗？》的“封面特写”，列举事实

说明，由WASP主宰美国的时代正在过去，相反，不但它在美国已经成为少数而且以它为中心的全体欧裔移民，也就是接受美国价值的全体白人也即将成为少数。而几百年来一向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则已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少数民族，而且在一些最激进的左派自由主义白人所制造的理论支持下提出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包括欧洲文明都源出于非洲黑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都是黑人。他们反对美国以WASP的价值标准同化外来移民的原则，主张大学不再开设单一的教授西方文明精义的课程而要平等对待一切少数民族的母文化。这在某些名牌大学，已经实际施行。除了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比白人快之外，上升得最快的是拉美裔人，美国人称之为Hispanics，如果再加上亚裔人，那再过50年就可以超过全部欧裔白种人。除了黑人当年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因而已失去自己固有的语言外，其他族系，尤其是西班牙语系的拉美裔人（大多是本地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种）还强烈要求不能以英语为唯一的法定语言。在许多地方，西班牙语已取得与英语并用的合法地位，不但大街上的招牌与告示已双语并用，而且在有些社区说英语甚至没有人理你。总而言之，美国这口坩埚虽然在过去200多年里（美国历史实际应从立国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算起）曾经融化了从欧洲去的各个民族，但是现在却明显地表现出投料太多，老汁太少，火力不足，锅也太小，再也融化不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成分了。甚至于被钉着镣铐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人，本来在语言与宗教这两方面已不得不接受主人给予他们的东西而且信奉基督教已达200年之久，自从40年前的民权运动以来也竟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改宗皈依了美国从来没有的伊斯兰教，而且一再声言要成立“伊斯兰国”，甚至要求把带有黑人发音特色与非规范的语法特色的黑人英语制定为美国法定语言之一。诸如此类种种事实都不但使以正宗西方文化自傲的白种美国人极厌恶，而且不寒而栗。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他们知道他们还能够雄踞权力与财富的巅峰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

可以猜想，在迄今为止还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国，这是一种有相当

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感情或者思想，但是外人却几乎看不出多少表露。其原因就在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悖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公开表现，如果你是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粗人”，你可以参加臭名昭著的“三K党”或者近年才出现的白人“民兵”，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西方价值与美国理想的卫士——一个有身份的自由主义者，你就只能把这种思想和感情压在心底。因为在几百年特别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直译就是政治正确性。在美国要做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不能表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约定俗成，越来越严。比如对黑人吧。本来叫nigger（黑鬼）也无所谓，叫negro则是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这样的称呼完全可以挨耳光，起码要叫black，最文明正规的叫法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你嫌啰唆麻烦吗？可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学过英文的人全知道，主席的对辞是chairman，可是现在就得叫chairperson，因为如果你称呼的主席是女性，你就犯了侮辱女性，在政治上不正确，或曰违犯PC的错误了。这方面的清规戒律极多，对英语和对美国的知识两者都极为有限如我个人，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一不留神就会犯规出错，招人鄙视（以为你不文明），甚至仇恨（以为你冒犯了他或她）。因此李光耀在向美国人宣扬“亚洲价值”的时候，说完了“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然”这句刺耳的话以后，还要自我解嘲地加上一句“这样，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他可以这样大胆狂言，因为他是一个亚洲的政治家。要是他是像亨廷顿一样的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等待他的命运很可能先是群众的抗议，然后是学校的解聘与失业（因为这样的人别的大学也不敢要）。正因为如此，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实在是努力压低了嗓门。而我们对他的心事的猜测也只有凭我们作为非美国人的特权了。

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是以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明眼人一望而知，

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原因在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气氛下，这是一个最危险的题目。但是这又是他实在躲不过的话题，事实上在各方批评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挤出一点儿来，比如直到他被迫答辩的第二篇文章中才透露出他真正的恐惧来。他说：“文明的范式也许也能适用于美国……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肤色意识强烈的社会……美国正在变成族群和种族

(ethnically and racially) 问题上越来越殊异的社会。据国情调查局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亚裔人。”换言之，2050年是欧裔白人从多数变为少数的临界点。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文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将不再存在，而将随历史上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中国的老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亨廷顿不会不知道人类几百万年进化造成的血缘、形体、肤色等的种族差异远比几千年造成的文明差异更难弥平。他只是不敢冒被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大不韪而公开说出来罢了。

不要以为只有亨廷顿一个人有这样的危机感，在美国，这一批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新悲观主义者”的共识。在文明冲突论发表的前一年，也许可称为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史学权威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出版了《美利坚的非合众化》(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表示了与亨廷顿同样的忧心。与亨廷顿几乎同时，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出版《大失控》一书，一再强调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其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的种族构成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国徽和硬币上都印着美国的国训E PLURIBUS UNUM三个拉丁字，意思是“一出于多”或者“合众为一”，现在，潮流倒过来了。

正因为如此，1993年6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

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三个月以后，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与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谈天，问他对亨廷顿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简单：“desperate”（绝望），倒也干脆。

亨廷顿有没有理由把美国的问题投射到全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按照亨廷顿的标准，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欧洲北美人口历来不足世界1/5，何况近几十年来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却不断上升，比例的反差越来越大。对亨廷顿来说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减少，他认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其次，西欧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剧上升，许多国家因此而出现了与美国相同的内部问题。亨廷顿指出欧洲国家已在收紧移民政策，并且建议美国也要这样做，但是能否收效尚未可知。像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出现的新右派、德国出现的新纳粹和澳大利亚最近出现的反亚洲人浪潮都在加强着亨廷顿的论据。

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

另外，亨廷顿对国际形势提出的若干自己的观察，确实可以说是深刻的，而且已被事实所证实。例如：他认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会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他看到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看来似乎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但都受到精英分子越来越强的抵抗。他看到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与第一代不同，后者更强调本土文化与本土价值。由于他所谓“西方价值的悖论”，正是全球化带来了民族主义，也正是现代化带来了各种宗教（或者更笼统地说

各种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他还看到,英语表面上似乎越来越国际化,但是英语的实际势力正在减弱。民主政治往往趋于使政府乡土化而不是世界化。还有,在西方认为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如果推广到非西方就是帝国主义……

绝不能随随便便把亨廷顿叫作种族主义者,在他的文章中并不能容易地嗅出这种味道来。他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但是他已不敢公然嗟叹盛世难再,而只敢承认西方已经衰落。他说“西方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他的普遍性”。不难推断,从西方中心时代的巅峰跌落下来,他心里是不会好过的。他为西方设计的战略只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自保,但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黄祸、绿祸与黑祸”面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是一位亚洲朋友的话,绿祸指伊斯兰、黑祸指黑非洲,因此还不能把这样“政治上不正确”的“反PC”的话安在亨氏头上)。对于黑祸,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恐惧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黑非洲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因此在他的文明分类中,只是把“非洲文明”列为“可能有的第八种文明”。他也有相当的“统一战线”意识,把日本文明单列而且与西方文明拉在一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他极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作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而且对俄罗斯也偶露拉拢之意。考虑到俄罗斯人既是白种人又是基督徒,这一意向不难理解;但是几十年的敌对,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顾虑重重。

亨廷顿的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设人性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如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例外。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历史上的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法国文明、西班牙文明……各种各样的特殊文明来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范围相当广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对照他自己说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西方的内战”的话,矛盾尤其明显。为什么50年前还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今天就已经可以统一

在“西方文明”的旗帜下了呢？但是亨廷顿所说的“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这话应当是可信的。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历史从苏美尔人算起还不过7000多年，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以后也不敢相信再有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因此亨廷顿的下一句话，也就是第一篇《文明的冲突？》的结语——“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种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听起来有一点伪善的味道。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绝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时他也不能排除21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对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再走过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才能通到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原载《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编后记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近年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他授权我社翻译出版系统阐述他这一论点的《文明的冲突》，并为此书中文版写了序言，我们谨在此表示谢意。

读者可以看到，此书对当今世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也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某些非西方文化甚至有一定误解和偏见。

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委员程思远1997年6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政协报》同时发表的重要文章《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之后，曾表示赞扬，指出：“现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不同的思想文化可以相互交流，而绝不应该只引起冲突。”

我们高兴地看到，亨廷顿教授在此书中文版序言中，针对上述观点，又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潘忠岐先生曾撰文介绍亨廷顿此书，李慎之先生曾对“文明冲突论”作过评述。征得二位先生同意，我们将他们的文章附录于此书，并向他们致谢。

此书的翻译工作由周琪、刘绯、张立平和王圆完成。具体分工如下：中文版序言、前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由周琪负责，第四

章和第五章由王圆负责，第六章和第七章由张立平负责，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由刘绯负责。刘绯对此书的部分章节作了初校，周琪对全书通校并审订。书中有些术语和名词的译法还吸收了李慎之等先生的意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评论与引述见诸多家报刊。为了方便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我们在以前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修订，重新推敲译名，订正若干译文，推出了这部最新的版本。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编者



WH

AMEI

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美] 塞繆尔·亨廷顿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美国人 / (美) 亨廷顿著；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11-9090-4

I.①谁... II.①亨... ②程... III.①社会心理 - 研究 - 美国 IV.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811号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第一章 国民特性危机

重要性：还挂国旗吗？

实质：我们是谁？

全球特性危机

美国特性的前景

第二章 国民特性及其他

Identity概念

别人和敌人

身份的来源

虚假二分法

第二部分 美国特性

第三章 美国特性的组成部分

变化、连续性和不完全的真理

移民来到之前的定居者

不只是信念

“不依附于一地”

人种和民族属性

第四章 盎格鲁—新教文化

文化核心

“持异议中的持异议”

“美国信念”

个人主义与工作道德

道德主义与改革论

第五章 宗教信仰与基督教

上帝、十字架与美国

信教的人

新教的美国与天主教

基督教的人

公民宗教

第六章 国民意识的出现、胜利和消损

民族国家的脆弱性

创建美国特性

国民身份与其他身份

国家和爱国主义胜利

民族主义走弱

第三部分 对美国特性的挑战

第七章 解构美国：国民层次以下的各种身份的崛起

解构主义运动

对“美国信念”的挑战

对英语的挑战

对核心文化的挑战

第八章 同化：归附者、双重国籍者 以及公民身份受到的损害

移民：同化与不同化

同化：仍是成功吗？

同化的缘由

外来移民

移民过程

美国社会：美国化成了非美活动

双重国籍和双重公民身份

公民与非公民

替代美国化的是什么

第九章 墨西哥裔移民及拉美裔化

墨西哥/拉美裔挑战

为什么墨西哥裔移民不一般

墨西哥裔人的同化滞后

个人同化与移民飞地

迈阿密的拉美裔化

西南部的拉美裔化

第十章 美国与世界会合

变化中的环境

寻找敌人

死灵魂：精英非国籍化

爱国的公众

移民社群、外国政府及美国政治

第四部分 重振美国特性

第十一章 新老断层起影响的趋势

民族属性终结

人种：恒久、模糊、淡化

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

两权化：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

非代表性民主：精英对公众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美国：易受攻击、宗教信仰及国家特性

易受攻击时代的“美国信念”

美国人转向宗教

宗教的全球复兴

伊斯兰好斗分子与美国

世界上的美国：是世界主义的，还是帝国性质的，抑或是民族性质的？

前言

本书谈美国的国民特性在其相对重要性和实质内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重要性是指相对于许多其他的特性而言，美国人对自己的国民特性重视的程度。实质内容是指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哪一些共同之处，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别国人民。

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心目中的国民特性的重要性是有变化的。18世纪末，大西洋沿岸的英裔定居者才开始认为自己不仅是各块殖民地的定居者，而且还是Americans¹。独立以后，美国/美利坚民族的概念在19世纪逐渐地而且是断断续续地确立了下来。1861—1865年内战以后，国民特性在重要性上超过了其他的特性，美利坚民族主义精神在随后百年中得到发扬光大。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亚民族的、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开始抬头而损害国民特性的重要性。2001年“9·11”事件引人注目地使国民特性重新受到重视。当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通常对国家有高度的认同感。如果他们觉得威胁减退了，别的特性就可能再次抬头，而盖过国民特性。

第二，两百多年来，美国人在高低变化的程度上，从人种、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些角度界定自己的特性。人种和民族属性的因素现在已大体上消失了，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²提出、后来又经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特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可是这一“信念”是17世纪和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

新教文化的产物。这一文化的重要因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式法治理念，统治者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对天主教持异议的新教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工作道德，以及相信人有能力、有义务努力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城”。从历史上看，千百万移民之所以被吸引到美国，正是因为有这一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所促成的经济机会。

第三，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特性来说，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中心地位。正是它使得美国人有了共同之处，而且正如无数的外国人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它使得美国人区别于别国人民。但在20世纪后期，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以下一些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一是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一是西班牙语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一是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特性；一是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一是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特性。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美国特性可能演变的方向包括：（一）出现一个只强调信念的美国，缺乏历史文化核心，团结的因素只是共同承认“美国信念”的原则；（二）出现一个分成两权的美国，有两种语言，即西班牙语和英语，两种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和拉美裔文化；（三）出现一个排他主义的美国，再一次定性于人种和民族属性，排斥和压制非白人和非欧洲裔人；（四）出现一个再次充满活力的美国，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并因与一个不友好的外部世界的对峙而充实力量；（五）出现以上这些及另一些可能性的某种组合。美国人怎样界定自己的特性，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中，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帝国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一个民族性质的国家。

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写作本书。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深盼我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和力量，继续是一个在自由、

平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作为一名学者，我发现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存在着一些引人入胜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可是，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尽量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仍需提醒读者，我对于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因为我希望发现它们在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

所有的社会的存在都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威胁，并最终屈从于它们。但是也有一些社会尽管受到这样的威胁，却能够遏制和扭转衰落的过程，重新焕发出活力和特性，从而推迟其衰亡。我认为美国能做到这一点，美国人应当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为正是它们三个半世纪以来为这里的各人种、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

请让我说清楚，我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新教的人重要。人种和民族属性曾是美国人特性的中心标志，但美国社会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界限，成为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人人都能以其是非功过而受到应有评价。我认为这是美国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或许还是成就之中最伟大的一项。这一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致力于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我们的前辈所树立的“美国信念”。只要保持这一努力，那么，即便是创建美国的那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无足轻重的少数，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这正是我所知道和热爱的美国。本书的内容证明，这也正是美国大多数人所热爱和所需要的美国。

1 American一词原本是指“美利坚人”，在美国建国以后，此词则

通译为“美国人”。——译注

2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美国《独立宣言》
主要起草人, 第三任总统(1801—1809)。——译注

第一部分 一个多文明 的世界

第一章 国民特性危机

重要性：还挂国旗吗？

波士顿市比肯山的查尔斯街，是一条令人惬意的街道，两旁都是四层的砖楼，底层是古董店和别的商店，上面则是公寓套房。在邮局和饮料店的门口，曾经天天悬挂着国旗。后来邮局不挂国旗了。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挂国旗的只有饮料店一家。两周后，这里挂出了17面国旗，还有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横跨在街道的上空。国家有难，查尔斯街的居民重新想到了自己的国家，与国同心。

查尔斯街人们的爱国主义高涨，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内战以来，美国人对国旗深怀感情。星条旗似乎成了一种宗教偶像，成了美国人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一个主要象征，其意义之深更甚于别国的旗帜。然而，“9·11”以后，国旗无处不见，其盛况大概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居民家庭、企业、汽车、服装、家具、店门、楼窗、路灯杆、电话杆等等，都有星条旗显现。据统计，10月初，80%的美国人说他们展示了国旗，家里挂旗的有63%，汽车挂旗的有28%，衣服上系旗的有29%。据报道，沃尔玛超市售出的国旗9月11日有116000面，第二天有250000面，而一年前这两天售出的数字分别为6400面和10000面。国旗的需求比海湾战争期间增长了10倍，制旗工人加班加点，日产量上升一倍、两倍或三倍。

国旗只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美国人爱国激情的猛然高涨，国民特性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别的特性。10月1日一位年轻女士的谈

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19岁那年迁居纽约市……过去，要是你问我是什么人，我会告诉你，我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会说我是名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犹太人。我不会提到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的女伴和我在大学研究性别问题与经济问题，对男女的不平等感到灰心，讨论过是不是去到别的国家。9月11日，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到我过去一直把自己享受到的自由当做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的背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看见喷气式战斗机飞过时尚向它们欢呼，我把自己叫做一名爱国者。

这位名叫雷切尔·纽曼的女士说的这番话表明，在“9·11”以前，国民特性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是不高的。在某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精英人士中间，国民特性有时简直被淡忘了。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民特性的情绪，都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方面的特性登上了前列。与先辈移民不同，许多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忠诚于两边的国家。拉美裔移民大量涌入，使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成了问题。公司经理们、教授们和信息时代技术专家们视世界性身份重于国民身份。美国史的教学让位于民族史和人种史的教学。强调多样性取代了强调美国人的共同性。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艰辛工作和战争而建立起来，又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巩固的全国团结和国家认同感似乎在衰竭。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到2000年时已不如此前百年间那样举国一体。在美国人各种特性的旗杆上，星条旗似乎是处于降半旗的位置，而另外一些旗帜却在更高处飘扬。

20世纪90年代的几件事突出表明了美国国民特性受到了其他的国民层次以下的特性、跨国的特性和他国的特性的挑战。

他国的特性

在1998年2月墨西哥和美国的金杯足球赛上，有91255名球迷沉浸于“红白绿旗帜的海洋”。谁打出星条旗，他们就嘘谁。他们向美国球员“扔石头、水杯、啤酒杯或更坏的液体”，还用“水果和啤酒杯”袭击了几个想举起美国国旗的球迷。这场球赛的地点并不是墨西哥城，而是洛杉矶。一个美国球迷低头躲开一块向他的脑袋砸过来的柠檬，气愤地说，“在我们美国不让举美国国旗，岂有此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也感叹：“美国队在洛杉矶踢球居然不是主场球。”

从前，历经千辛万苦来美国的移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热泪盈眶，他们满怀激情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自由、工作和希望。这些人往往成为爱国心最强烈的美国公民。在2000年，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略低于1910年。可是，身在美国而心却在别国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美国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

亚民族的特性

约瑟夫·雷亚在他的《种族骄傲与美国人身份》一书中，引述了两位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读过的诗。在1961年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罗伯特·弗罗斯特朗读一首诗，歌颂了美国的创建得到了上帝“赞许”而开辟新纪元的“英雄业绩”，诗中说：

我们革命造反的冒险
在自由的故事中证明了自己的正义
光荣啊光荣代代相传至今不息。

他说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诗歌和力量的黄金时代”。

32年以后，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玛娅·安杰卢朗读的诗所表达的美国形象却是另一个样子。她一次也没有提到“美国”或“美国人”，却列举了27个人种、宗教、部落群体——亚洲人，犹太人，波尼人，拉美裔人，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阿散蒂人，等等。她谴责

说，由于美国“追逐利润的武装斗争”及其“犬儒主义的血腥烙印”，那些群体受到了不道德的欺压。她说美国可能“永远陷于恐惧，永世套上野蛮枷锁”。因此，弗罗斯特认为美国的历史和特性是光荣的，值得庆贺，流传千古，而安杰卢却认为美国的特性是亚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真正身份受到邪恶的威胁。

一种类似的对照出现于1997年《纽约时报》记者对沃德·康纳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康纳利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领导一项公民立法提案，要求州政府停止“照顾少数民族”的“赞助性行动”。请看电话采访中的以下对话：

记者：“你是什么人？”

康纳利：“我是美国人。”

记者：“不，不，不！你是什么人？”

康纳利：“是，是，是！我是美国人。”

记者：“我不是问这个。我听说你是非洲裔美国人。你是耻于承认自己是非洲裔美国人吗？”

康纳利：“不，我只是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

接着，康纳利解释说，他的祖先包括非洲人、法国人、爱尔兰人以及印第安人。最后，

记者：“这使你成为什么人？”

康纳利：“这使我成为全美国人！”

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像上面谈到的雷切尔·纽曼那样的一些美国人，在回答“你是什么人？”的问题时，却不会像康纳利这样满怀激情地说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只会像《纽约时报》记者所期待的那样，报出国民身份层次以下的人种和民族属性或性别身份。

跨国特性

1996年，拉尔夫·纳德给美国100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提出他们的公司从联邦政府得到巨额的减免税优惠及其他补贴(据卡特研究所估计每年高达650亿美元)，因此要求他们表示支持“养育了他们、建造了他们、补贴了他们和保卫了他们的国家”，在年度股东大会开幕时向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宣读效忠誓言。一家公司(联合百货商店公司)回答时表示赞成；半数公司根本不作答复；别的公司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福特公司的代表明确地声称了他们的跨国身份：“福特是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公司，在英国就是英国公司，在德国就是德国公司。”安泰公司首席执行官说纳德的主张“违背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赖以立足的原则”。摩托罗拉公司谴责纳德的主张带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普赖斯·科斯特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问纳德：“你下一步还会提什么建议——要个人忠诚宣誓吧？”金佰利公司经理说得更肯定：这“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搞忠诚宣誓的那些阴暗的日子”。

美国大公司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原因之一无疑在于纳德找他们的麻烦已有好几年了，所以他们趁这一机会把纳德比做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然而，在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像他们这样贬低国民身份的意义甚至予以弃置一旁的人，还大有人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攻击民族主义，警告说给学生灌输美国自豪感是危险的，认为将个人认同于国家是不可取的。诸如此类的言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包括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甚至还有政界的某些人士，正在无国籍化，将跨国身份和世界主义特性置于国民特性之上。但就美国公众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一头是多数美国人依然重视国民特性，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操纵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在谋求跨国身份，两头之间出现了差距。

“9·11”急剧降低了这些非国民特性的地位，美国国旗又重新高地飘扬在旗杆顶上。它会长久在那里吗？我们在上面说到查尔斯街的17面国旗，它们到2001年11月减到了12面，12月为9面，2002年1月

为7面，3月为5面，到了“9·11”一周年时，只有4面，这等于“9·11”之前的4倍，但比一年前减少了3/4。如果说这是表明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指数，那么它是否表示了“9·11”以后的一种正常状态？难道我们都像雷切尔·纽曼一样，需要由一个本·拉丹来提醒我们自己是美国人？如果我们不再反复经受这种破坏性的惨痛袭击，我们会不会又回复到美国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像“9·11”之前那样低迷不振的局面？或者，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重新振奋起来的国家认同感，它不依赖于外界给我们造成灾难的威胁，却又能让我们得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缺乏的那种万众一心的团结？

实质：我们是谁？

“9·11”以后展现出来的国旗是美国的象征，但旗帜并不能表达出美国的实质意义。有些国旗，例如一些国家的三色旗、英国的米字旗、巴基斯坦的有星和新月的绿色旗，多多少少可以说明它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特性。我们的星条旗图像明朗，但只说明合众国最初由13个州、现在由50个州所组成。除此之外，这旗帜还有什么意义，就任凭美国人和别国的人想象了。“9·11”以后国旗大量展现，很可能证明了国民特性在大家心目中重新占有重要地位，但可能也表明人们对于这一特性的实质还不是很清楚。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会随着外来威胁的强弱而急剧上下波动，可是国民特性的实质却是由各种各样长期的、根本性的、往往还彼此冲突的社会趋势、经济趋势和政治趋势逐渐慢慢形成的。涉及美国国民特性的实质的那些关键问题，是不会在9月10日到9月11日一天之间就突然消失的。

“我们美国人”这句话，其主语就体现出国民特性的一个实质问题。我们是“我们”吗？我们是一种人，还是几种人？如果说我们确实是“我们”，那么“我们”和“他们”即美国人以外的人们又区别何在呢？在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宗教、价值观、文化、财富、政治或别的什么

吗？美国是不是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普世之国”，它所依据的价值观对全人类来说都是通用的，原则上囊括了所有各国人民？或者，我们是否只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的特性是由我们的欧洲传统和体制所决定的？或者，我们是不是像“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二百多年来所说的那样，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文明？我们是否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群体，我们的特性只存在于《独立宣言》及其他开国文献所体现的社会契约之中？我们是多文化的，还是双文化的，抑或是单文化的；是一幅镶嵌画，还是一个大坩埚？我们有没有超出于人种特性、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之上的一种有意义的国民特性？在“9·11”以后的时代，这些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依然存在的。它们部分说来是笔墨之争，然而，它们也是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内外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激烈辩论过不少事情，如移民和同化、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种族关系和赞助性行动、公立学校和公共单位中的宗教、双语教育、中小学和高校的教学大纲内容、学校里的祷告和堕胎、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意义、外国势力对美国选举的干预、美国法律在国境以外的运用以及移民社群在国内外日益增大的政治作用。所有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说都涉及国民特性问题。在这每一件事情上不论采取什么立场，几乎都须在国民特性问题上有所表态。

对外政策方面也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进行了激烈、广泛和相当混乱的辩论。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但这并不是人们对美国的作用掌握不准的唯一原因。国家利益来自国民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假如美国的特性就在于普世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那么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大概就是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别的国家去。可是，假如美国是与众不同的“例外”，那么在别国促进人权和民主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假如美国主要是多种文化和民族实体的联合体，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该是促进这些实体的目标实现，我们就该奉行“多文化的对

外政策”。假如美国首先是一个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西方国家，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注意加强与西欧的联系。假如外来移民使美国成为比较具有拉美裔文化特性的国家，那么我们的注意力首先就该放在拉丁美洲。假如美国的特性主要不在于欧洲文化，也不在于拉美文化，那么美国推行对外政策就不要跟我们与别国的文化联系扯在一起。国民特性的其他定义还会衍生出另一些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对外政策上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是什么人这一方面有争论。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于1707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于177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于1918年。它们的名称表明，它们都是若干个实体通过联合或征服而结在一起的联合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三国似乎都像是有凝聚力的和成功的社会，它们的政府相对说来是有效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承认是合法的，它们的人民作为英国人(British)、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有很强的国民身份意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不复存在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王国的联合不那么强了，北爱尔兰有人正为新政体而奋斗，苏格兰和威尔士正在实行权力下放，许多苏格兰人期盼最终独立，英格兰人日益普遍地自称为English(英格兰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颠人)。由几个十字构成的米字旗有分崩离析之势，联合王国到21世纪上半期某个时候也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

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之前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现在，也没有什么人预料美利坚合众国会解体或起根本变化。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也还是跟2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那倒会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

美国人在18世纪后期实现独立时，人口不多，而且是清一色：基本上全是白人(当时黑人和印第安人还不能具有公民身份)，是英裔人

和新教徒，有着共同的文化，绝大多数人都忠于《独立宣言》、宪法及其他开国文献中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到20世纪末，美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百倍，多种族(大约69%为白人，12%为拉美裔人，12%为黑人，4%为亚洲裔和太平洋岛裔人，其余约3%)，多民族(没有任何一种民族属性的人占人口大多数)，多宗教信仰(新教徒占63%，天主教徒占23%，其他宗教的信徒占8%，还有4%的人不信教)。美国的共同文化以及“美国信念”的两条主要原则，即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许多个人和团体的攻击。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邪恶帝国对立面。我们美国人已不是我们过去那样的人，而且说不准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正如卢梭所言，“既然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国家能希望永世长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无情的外部“野蛮”势力的威胁。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也会遭受斯巴达、罗马等国家的命运。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特性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美国的文化受到围攻。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像罗伯特·卡普兰所注意到的那样，可能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美国会比别的国家更可能走完由生到死的历程”。然而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美国人在“9·11”以后这样做了。在第三个千年的头几年，美国人面临的挑战就是：如果不受到袭击，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这样做。

全球特性危机

美国的特性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问题的绝不只是美国。

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中国被说成是“探索国家特性”。据说叙利亚和巴西都面临各自的“特性危机”；加拿大处于“持续不断的特性危机”；丹麦处于“尖锐的特性危机”；阿尔及利亚处于“破坏性的特性危机”；土耳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而导致激烈的“国家特性辩论”；俄罗斯则处于“深刻的特性危机”，这一危机重新打开了19世纪斯拉夫派和西方化派之间的辩论，争论俄罗斯到底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还是一个特殊的欧亚国家。在墨西哥，“墨西哥特性”问题提到了前列。原先两个德国——一个是民主的和西欧的德国，一个是共产主义的和东欧的德国——如今正奋力重建一个共同的德国特性。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对自己的不列颠(British)身份已不是那么肯定，在琢磨自己首先是欧洲人还是北大西洋人。国民特性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

以上这些以及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性危机在形式、实质和激烈程度上各自有所不同，每一处的危机无疑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独特的原因。然而，这一危机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如此之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很可能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普遍的原因包括：出现了全球经济，通信和交通运输大有改善，人口流动幅度上升，民主制度在全球扩展，冷战结束，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苏联共产主义也结束了。

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

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美国，这种身份碎裂表现为多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在另一些国家，它的表现形式比较极端，出现了一些种族、教派要求得到政治承认、自治或独立的运动。魁北克人、苏格兰人、佛拉芒人、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伦巴第人、科西嘉人、库尔德人、科索沃人、柏柏尔人、恰帕人、车臣人、巴勒斯坦人、棉兰老岛穆斯林、苏丹基督教徒、阿布哈兹人、泰米尔人、亚齐人、东帝汶人等族群中间都出现了这样的运动。

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超国家身份的出现欧洲最明显，它同时又加剧着身份的狭窄化。例如，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自称为Scottish(苏格兰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颠人，英国人)，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苏格兰人身份扎根于欧洲人身份。伦巴第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欧洲的另一一些人亦是如此。

一种相关的现象，是各种社群既互相杂居又各自抱团，既彼此交往又彼此分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暂时的和永久性的人口流动，使越来越多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掺和在一起：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流到美国，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流入西欧。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这些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散居海外的群落，保持着跨国的共性。他们既与所在地区的人杂处，又自己抱成一团。对于美国来说，现今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其他地方的移民日益增多，由于上述的情况，他们对于人口同化造成的后果，可能跟以往的移民浪潮大不相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人士，有时还有经济界精英人士，曾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爱国精神。他们提出了一些精心设

计和充满激情的口号，希望在本国所有同胞心中都激起爱国之心，为国家事业共同奋斗。然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在美国以及许多别的国家，精英人士中间也出现了日益上升的非国籍化现象。由于出现了全球经济和全球公司，加上人们能够结成跨国联合组织以便在全球范围促进各种改革(例如争取妇女权利，保护环境，清除地雷，捍卫人权，争取限制私人枪械)，这就使得许多精英人士具有超国家身份，而贬低一国国民身份。从前，流动人口一般是在国内从农村到城市或在城市之间移动，从事自己的事业或者追求财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从一国到另一国流动。从前在国内流动的人，乡土观念趋于淡薄；现在跨国流动的人，则是国籍观念趋于淡薄，他们成为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的人，或是成为世界公民。

在欧洲国家观念出现的早期，国民特性主要是界定于宗教信仰。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大都转向世俗化。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大多是按照自己的祖先、语言或文化界定国民身份，而宗教往往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到20世纪，除了美国这一明显例外情况以外，西方国家的人已普遍世俗化，教会和宗教信仰在公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作用已经降低了。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看来又将是一个宗教的世纪。除了西欧以外，几乎处处的人都回头到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指导和认同。如同吉勒斯·凯珀尔所说，到处可见“上帝的复仇”。宗教集团之间的暴力行动在世界各地蔓延。人们越来越关心尽管相距遥远但却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的命运。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要求按照宗教界定国民特性的强大运动。美国出现的运动有所不同，是号召人们记住美国的宗教来源以及美国人虔诚信教的传统。福音派基督教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美国人总的说来可能正在恢复三个世纪以来普遍存在的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的自我形象。

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世界各地有50多个国家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扩大民主

和深化民主的努力。个别的专制政府也许能够统治而且往往还确实统治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但民主制度则意味着人民起码能选择其统治者，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身份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谁是人民？正如伊弗·詹宁斯所说，“在有人决定谁是人民以后，人民才能作出决定。”决定谁是人民，可能有赖于长久的传统、战争和征服、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宪法修订或其他因素。但不论怎样，这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当专制国家民主化时，以及当民主国家面临着许多新来者申请公民身份时，如何界定公民身份，确定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都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是几百年反复发生的战争的结果。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又制造战争。”这些战争使得国家有可能也有必要在自己的民众中间培养国家和国民意识。国家当局的首要职能就是立国安邦，卫国卫民。正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国家当局才有理由扩大其权力，并建立军队、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赋税制度。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然而，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变得罕见。据一项估计报告，1989年至1999年期间，在110次战争中，只有7次不是内战。现在战争往往充当国家的分裂者，而不是国家的造就者。在比较通常的情况下，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降低了，这就降低了国家当局的权威，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理由认同自己的国家，相反，却更多地认同国家层次以下的和跨国的群体。

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文化中高低有所不同。在穆斯林世界，身份的认同呈现出一个U字形：最强烈的认同感，一头是家族、氏族和部落，另一头是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所属的教派，而对国家的忠心通常较弱，只有很少的人例外。在西方世界，则是把这个U字倒过来，对国家的认同最高，而比国家狭窄的或广泛的认同感较低。可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正在起变化，超国家的和国民层次以下的各种身份

的地位逐渐上升，欧美人的认同感不再是两头低中间高，而是趋于拉平，向穆斯林的模式接近。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在失去分量。如果说情况的确如此，那么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些什么东西正在取代上述概念的地位，那么它们是什么？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说情况并非如此，国民特性仍然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美国人国民特性的内容方面的变化对美国来说含义如何？

美国特性的前景

美国人国民特性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轻重，以及国民特性与其他特性相比较而言的重要性，随岁月而有所变化。在18世纪上半期，北美各殖民地和各州的人们开始形成Americans(美利坚人)这一共同身份，同时也保留着别的身份，主要是自己所在州县的身份。立国以后，先是与英国人打仗，然后与法国人打仗，随后又一次与英国人打仗，通过这些战争，Americans(美国人)作为大家共有的身份，地位加强了。1815年后，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外来威胁消失，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了。人们重视其地区身份和经济身份，国家逐渐陷于分裂，直至发生内战。这场战争使美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地位在19世纪末巩固下来。此后，随着美国登上世界舞台，而且在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心和国民意识得到了发扬。

美国人有过明显的民族属性之分，但19世纪中期移居而来的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以及1880—1914年之间移居而来的南欧和东欧人，均与当地原有居民同化，民族属性这一因素的作用逐渐弱化了。人种属性的因素，先是由于内战的结果稍有弱化，而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进一步削弱了它的作用。在那之后的几十年，美国人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信念这一核心因素遇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苏联解体，消灭了美国安全面临的一大威胁，因此，相对于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跨国身份、双重国籍身份和他国身份而言，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下降了。历史经验和社会学分析表明，国无外敌，其社会团结往往削弱，很可能孕育着分裂因素。目前断断续续的恐怖袭击以及与伊拉克和其他“无赖国家”的冲突会不会像20世纪的战争那样让美国人产生凝聚力，还是问题。

第二，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这一挑战是由克林顿总统明显挑动起来的，因为他说美国需要继独立战争和民权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以“证明我们即使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也能生存”。对这一文化的攻击也损害了这一文化所产生的“美国信念”，而且反映于各种鼓吹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运动。

第三，美国的外来移民浪潮过去主要来自欧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三大移民浪潮却是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他们原先祖国的文化跟美国的主流文化往往相距甚远，所以他们虽已身在美国，但在文化上继续与原先的祖国保持联系却要容易得多。从前，对外来移民有整套的美国化措施，让他们同化到美国社会之中。1965年以后，这样的措施都没有了。从前，同化比较顺利，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先后由于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停，而且当时还有限制移民的法律。现今的移民浪潮却没完没了，要消除他们对别国的忠诚而把他们同化到美国社会之中，将会慢得多难得多。

第四，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移民的大多数人共说一种非英语的语言的现象。现在，说西班牙语的人占移民绝大多数，何况他们原先的祖国又彼此相邻。他们绝对人数多；移民浪潮看来不会终止，也不会锐降；他们到美国后的人口分布集中；他们原祖国的政府鼓励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界施加影响；许多美国精英人士支持他们，鼓吹多文化论、多样性、双语教育和照顾他们的赞助性行动；美国商界为了

牟利而刻意迎合拉美裔人的口味，并在生意中和广告中使用西班牙语，雇用拉美裔员工；人们施加压力要求在政府标志、公文、报告和办公场所使用与英语并行的西班牙语。

国民特性中的人种和民族属性因素已经消除，如今它的文化和信念因素又受到挑战，这就给美国国民特性的前景提出了问题。至少可能有四种前景：意识形态的，分成两权的，排他性的以及文化性的。未来的美国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这些以及另一些可能的特性的混合物。

第一，美国有可能像克林顿总统预期的那样，失去其核心文化，而成为多文化社会。然而，美国还有可能保持继续忠于“美国信念”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为国家的团结和特性提供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基础。许多人，特别是自由派人士赞成这一方案。然而，它的前提是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仅仅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此外这些个人就并无共同之处。这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那种经典的国家理念。可是历史和心理学都表明，这恐怕不足以让一个国家长存。美国若是仅仅以“信念”作为团结的基础，那就可能很快演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它包括各种民族、人种、文化和政治的群体，这些群体除了共同生活在原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域之内这一点以外，就基本上没有或完全没有别的共同之处。这种由不同群体构成的集合体就类似于昔日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些集合体是靠一位皇帝及其官僚机构维系在一起。而在美国，有什么体制能维系这样一个松散的集合体呢？美国18世纪80年代的经历和德国19世纪60年代的经历表明，昔日的邦联通常都是长不了的。

第二，1965年之后大量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有可能使美国分成两权，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文化(盎格鲁文化和拉美裔文化)，从而加剧或者取代美国社会原有的黑白人种分权现象。美国的一些地方，首先是佛罗里达州南部和美国西南部各州，可能变成以拉美裔文化和西班牙语为主，其他各地则是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并存。简而言之，美国将失去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变成一个双语言、双文化

的社会，像加拿大、瑞士或比利时那样。

第三，各种势力向核心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挑战，可能促使美国本地白人重新抓起本来业已放弃和推翻了的人种和民族属性理念，排斥、驱逐或压制其他人种、民族和文化的群体。历史和当代的一些事例表明，当一度居统治地位的种族群体感到其他种族群体的崛起对自己形成威胁时，很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反应。这会使一个国家变得对其他种族缺乏容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会趋于高度激化。

第四，美国所有各人种和民族属性的人可能会重新振兴他们的核心文化。这将意味着美国成为一个宗教信仰深刻的、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引导若干个在人口上居于少数的宗教群体，恪守盎格鲁—新教价值观，说英语，保持欧洲文化传统，忠于“美国信念”的原则。宗教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国特性和国民身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许还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宗教的原因而创建的，宗教运动影响了它的演变历程将近四个世纪之久。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都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人。绝大多数的美国白人、美国黑人和美国拉美裔人都是基督教徒。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尤其是宗教影响到每一大洲各国人民的忠诚和敌友关系，因此美国人可以重新在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的国民特性。

第二章 国民特性及其他

Identity概念

人们常说，Identity这一概念“既不明确，又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20世纪著名学者埃里克·埃里克森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说这一概念“无所不在”，但又“意义含糊”，“莫测高深”。这个identity令人心烦，可是又躲不开。杰出的社会学家利昂·威塞尔蒂尔的著作即是一例。他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反对Identity》，谴责和嘲笑了知识分子对这一概念的迷恋。1998年他又出一书《祈祷文》，却又热情雄辩地肯定了他自己的犹太人identity(身份)。看来identity就像sin(罪)一样，不论怎么反对它，我们还是甩不开它。

既然甩不开它，那么怎样给它下定义呢？学者们提供过一些答案，虽不相同，但在一个中心主题上，它们却是彼此吻合的。这中心主题是：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有几位学者指出过，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既然要彼此交往，人们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

Identity重要，因为它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学者，我的行为就得像一个学者。但个人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行为有改变——例如从事政论活动——我就会感受到“认知的不协调”，这时就得停止政论活动，或是不再以学者自许，而改行当政论家。又如，倘若一个人本来是民主党人，可是越来越多地把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这时他也许就把自己改称为共和党人。

关于identity，还要说明几点。

第一，个人有identity，群体也有identity。个人可以是许多群体的成员，身份是可变的。群体的identity则主要取决于它定性的特性，不易改变。例如，我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师，身份是政治学家。如果以历史教学为主的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同意让我去讲授历史，我个人的身份会变成历史学家，但哈佛的政治系不会变成讲授历史的单位。一个群体只有当它的宗旨已经实现，其定性的特性不复存在，不变革就难以继续存在时，才会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以激励其成员再前进。

第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本内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国家是“想象出来的群体”。Identity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比较固定的因素只有祖籍(但也可予以否认)、性别(但也有人变性)和年龄(虽可否认但无法人为地改变)，个人身份的其他特性都可以相对自由地随个人意愿而定，当然，希望具有的身份能否实现，是另一个问题。人种和民族属性是遗传而继承下来的，但可以改变或放弃，而且“人种”的意义和实用性也是随时代而变的。

第三，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Identities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和情况变化，这些identities的各自轻重分量

也会变化，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卡尔梅拉·利布金德指出，“只有极端的社会情况，例如战时的交战，才会使人只剩下一种身份，而其他身份则失去意义。”

第四，Identities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他人对一个人或一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如果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被认为是“外人”，该人大概也会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一群体。对identities有影响的外部因素来自个人或群众所处的直接环境和较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当局。实际上，人们的种族等身份是由政府认定的。

人们也许希望得到某种identity，但只有当人们受到已具有该种identity的人们欢迎时，这一愿望才会实现。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东欧人希望自己也成为西方人，但只有西方人承认时，他们才算是属于西方。土耳其上层人士非常希望被承认为西方人，但迄今得不到满足。因此，土耳其人应当算是欧洲人、西方人，还是中东人和中亚人，或者是穆斯林，这在土耳其人内部也争论不休。

第五，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各种identities的重要性是随情况而定的。有时人们强调自己跟他们与之交往的人们的共性、同一性，有时却强调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强调自己的特性。常谈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女性心理学家跟一群男性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会想到自己是女性，但她跟一批并不从事心理学的妇女在一起时，她会想到自己是心理学家。人们在国外旅行看到处处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时，往往会加倍思念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是祖国的人。当年塞尔维亚人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就强调自己的东正教信仰。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则强调自己的语言和民族属性。与此相似的是，巴基斯坦的创建者以穆斯林宗教信仰为理由，争取到脱离印度而独立。后来，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孟加拉人又强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而从巴基斯坦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国。

Identities有广有狭，以何者为重，视情况而定。法国人与德国人一起，会想到自己是哪国人，但在世界各地，他们会想到自己都是欧洲人。如乔纳森·默塞所说，当出现更广的“我们”与“他们”，例如欧洲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区别时，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区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因此，全球化的过程会使个人和民族的更广的宗教与文明 identities 变得更重要，就是很自然的了。

别人和敌人

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是不是还需要有敌人呢？有的人认为需要。德国的戈培尔说：“啊，能仇恨，真好极了。”法国的马尔罗说：“啊，战斗，跟那些睁着眼能打斗的敌人战斗，真叫痛快。”这两位20世纪的著名人物的话是以极端的语言表达了人类通常较受压抑但却又相当普遍的一种需求。爱因斯坦1933年给弗洛伊德写信时说，人们企图消除战争的种种努力“都以可悲叹的失败而告终……人自身深处有一种仇恨和破坏的欲望”。弗洛伊德对此表示同意，在回信中说人也像动物一样，会通过使用暴力的办法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全权在握的世界政府才能防止这种事情。弗洛伊德认为人只有两种本能，即“力求保护和联合的本能……以及力求破坏和杀戮的本能”。二者都是基本的，而且相辅相成，“企图消除人的侵略意向是徒劳的”。

另一些研究人类心理学和人类关系的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瓦米克·沃尔肯说过，人需要“有敌人和有盟友”。青少年就有这种倾向，“爱将另一批人视为敌人”。这种心理“造出了敌人的理念……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之中得到满足”。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需要自尊和受人赞赏，即柏拉图和亚当·斯密所说的虚荣心。与敌人的冲突能加强群体中的这些素质。

人需要自尊心，因而往往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这种自我意识随着他们所认同的自己群体的强弱及其排他性的松紧变化而有升有降。默塞指出，民族中心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人们希望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为此情愿放弃个人的一定利益。心理学实验和民意测验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人表示宁愿自己苦一点但领先于日本人，也不愿自己富一点而落后于日本人。

承认差别，不一定会引起竞争，更不一定会引起仇恨。然而，即使是心理上并不需要什么仇恨心的人，也有可能陷于最终与人为敌的过程。要区分，就必然要比较，看“我们”跟“他们”区别何在。要比较，则会作出评估：“我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做法是优还是劣。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需要证明自己群体的优越性。竞争导致对立，使本来较狭窄的区别感导致较强烈和较根本性的同异感。这种认识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

需要有敌人，这就说明了人类的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社会内部为什么处处都有冲突，但还不能说明冲突的形式和地点。竞争和冲突只发生在同一环境或同一舞台之上的实体之间。如沃尔肯所说，“敌人”必须是在某一方面“像我们”。一支足球队视另一支足球队为对手，但不会视一支曲棍球队为对手。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会感到另一大学的历史系是对手，跟它争夺师资、生源和学术威望，但它与本校物理系不会有这类问题，尽管也许在本校经费分配上有矛盾。竞争者是在同一棋盘上下棋，多数个人和群体是在几个不同的棋盘上下棋。下棋的人可以变，一盘下完了就换上另一个人。因此，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持久和平的前景是很遥远的。历史表明，热战或冷战的结束会为下一次同类的战争创造条件。精神病学家们指出，“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寻找敌人，以体现我们自己暂时或长久放弃了的那些东西。”20世纪后期的社会生物学、个性理论、社会特性理论和归因理论都支持一条结论，即仇恨、敌对、需要敌人、个人和群体暴力以及战争，其根源都

不可避免地在于人的心理状态和所处环境。

身份的来源

人们有种种身份，其来源可能无限之多，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归属性的。例如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血统民族属性，人种属性。

二、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从生活方式界定的民族属性，语言，国籍，宗教，文明。

三、疆域性的。如所在街区，村庄，城镇，省份，国别，地理区域，洲，半球。

四、政治性的。如集团，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运动，事业，党派，意识形态，国家。

五、经济性的。如职务，职业，工作单位，雇主，产业，经济部门，工会，阶级。

六、社会性的。如友人，俱乐部，同事，同人，休闲团体，社会地位。

任何个人都可能从上述的若干来源获得其身份，但上述各个方面并不一定是一个人的身份来源。例如，一个人也许痛恨其职务或国家而拒绝承认他是干那种工作或拒绝承认他是那个国家的人。此外，各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当各种身份抽象说来是彼此兼容时，其

重要性会有差别，但有的身份，如家族身份和职务身份，有时可能对个人提出彼此相冲突的要求。另一些身份，如疆域性的或文化性的身份，有高低大小之分，范围较广的可以包含范围较窄的。同一种的身份可能有排他性，也可能没有。例如，有人有双重国籍，可以声称既是这一国人又是那一国人，但宗教身份很难有双重的，一个人无法声称自己既是穆斯林又是天主教徒。各种身份的相对重要性和使用频率，均随时间和场合而定。例如在战斗中，一个士兵热爱自己所属的小部队，如一个排，同排战友结成亲密友谊，是很重要的。

虚假二分法

在欧洲，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15世纪至19世纪动荡历程的产物。战争造就国家和民族。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认为：“从确切意义上说，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色。”人们通过战斗与自己人形成认同感，把自己跟语言、宗教、历史或地理位置不相同的人区分开，这样就建立了自己的国民特性。

法兰西人、英格兰人、荷兰人、西班牙人、瑞典人、普鲁士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这样一些国民特性都是在战争坩埚之中凝结而成的。在16世纪到18世纪，为了寻求生存和争得成功，王公们越来越多地动员自己领域内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最后建立了本国军队，以取代雇佣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倡导国民意识，让人们意识到斗争在于国与国的抗争。到18世纪90年代，正如R. R. 帕尔默所说：“国王与国王的战争结束了，人民与人民的战争开始了。”“英国人”(British)这一特性的出现就很典型。最初，经过与法兰西人的战争以及与苏格兰人的战争，形成了“英格兰人”这一国民特性。后来，从威尔士或苏格兰来的人都与英格兰人并肩战斗，一次又一次作为新教徒与当时世界上

最强的天主教国家法国抗争，这样就形成了“British”(“不列颠人”，通常译为“英国人”)这一特性。

学者们通常将民族主义和国民特性区分为两种，其名称多种多样，例如：公民的和种族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的和部族主义的，开明的和封闭的，理性联合的和有机神秘的，公民疆域性的和种族血统的，或是简单地分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每一对名称中，头一种被认为是好的，第二种则是坏的。好的、公民的民族主义是说社会是开放的，其基础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社会契约，任何人种和民族属性的人都可以签订这一契约而成为其公民。相比之下，种族的民族主义则是排他性的，只有同祖同宗、同种同族和同文化的人才具有成员资格。学者们认为，在19世纪初期，欧洲各社会的民族主义和建立国民身份感的努力，主要是属于公民性的。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确认了公民平等，从而逐渐打破阶级界限和地位高低。开明的民族主义向专制的多民族帝国提出挑战。此外，浪漫主义及另一些运动产生出不开明的种族性民族主义，鼓吹种族群体重于个人，这种民族主义在希特勒的德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种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二分法或在其他名称之下的二分法，过于简单，是站不住的。它们大多将所有非契约性的、非公民性的、非开明的民族主义，即所谓“坏”的民族主义，都归结在种族范畴内。特别站不住的是，这种二分法将国民特性的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即种族概念和文化概念混为一谈。事实上，国民特性在西方往往是最高形式的特性，它来源于多个方面。它通常包括疆域因素，还包括一种或几种归属感因素(如人种，民族)、文化因素(如宗教，语言)、政治因素(如国体，意识形态)，有时还包括经济因素(如农牧)或社会因素(如各种网络)。

本书的主题，是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特性而言始终居于中心地位。然而，文化一词有许多的含义。它通常是指一个社会的文化产物，包括文艺音乐之类的“高档”文化以及大众娱乐和消费

倾向之类的“低档”文化。但本书所说的文化，其意义有所不同。它是指人们的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是非观念和好坏观念，以及反映出这些主观因素的客观体制及行为范式。这里不妨引用第四章中谈到的一个例子：与发展水平相当的社会比较，美国人总的说来从事劳动的人比例高，工作时间长，休假短，失业、残疾和退休津贴少，退休晚。可是总的说来，美国人以工作为荣，对休闲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时甚至觉得是有过错，鄙视不工作的人，认为工作道德是作为美国人的必备要素。由此看来，这种主观上和客观上对工作的强调，是美国文化与另一些社会的文化相比较而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本书所讲的文化就是这种意思。

“公民”对“种族”的二分法将文化与归属感因素混同起来，可是这二者是大不一样的。霍雷斯·卡伦在提出美国种族理论时指出，不论移居美国的人怎样改变他自己，“他仍然改变不了他的祖父”，因此种族身份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种族之间通婚能使情况改变，但更加重要的是血统与文化之间的区别。一个人改变不了自己的祖先和皮肤颜色，但能够改变自己的文化。人们能从一种宗教皈依另一宗教，学习新的语言，接受新的价值观和信念，认同新的标志符号，让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一代人的文化往往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前辈。有时整个社会的文化都会明显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德国人和日本人都主要是根据种族和归属感因素界定其国民特性。然而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他们文化的一个中心因素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日本是最富于军国主义精神的国家，战后却变成了富于和平主义精神的国家。种族特性变不了，文化特性却是可变的。因此，二者必须明确加以区分。

国民特性的各个因素重要或不重要，随各国人民的历史经历而有所不同，往往有一种因素最为突出。德国的国民特性也包括语言和其他文化因素，但191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起界定作用的因素是血统。凡父母为德意志人者，即为德意志人。因此，18世纪移居俄国的大批

德意志人，其后裔仍为德意志人，如果他们再迁居德国，即可自然而然地获得德国公民身份，即使他们说的德语让德国人听不懂，或者有些异族的亲戚，也不要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1999年以前，凡是移居到德国的土耳其人，即使他们的第三代后裔是在德国长大和受教育，在德国工作，说一口地地道道的德语，要想成为德国公民也依然障碍重重。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公民身份是在政治上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体制而予以界定。它们都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其民族身份则是按照文化因素予以界定，得到官方承认。法国是另一种情形，在1789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期间，国民分裂成拥护法国大革命的一派和反对革命、主张复辟君主制的另一派。法国的国民身份当时只从文化上加以界定。移居法国的人只要接受法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能流利地说法语，即可被承认为法国人。与德国的法律不同，法国的法律规定凡是在法国出生的人即自动成为法国公民，而不问其父母国籍如何。然而，到了1993年，法国人担心来自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移民，其子女虽在法国出生，但能否接纳法国文化还是问题，因此修改了法律，规定在法国出生的外国移民的子女要到年届18岁时才可申请法国公民资格。这一限制在1998年有所放松，规定在法国出生的外籍移民子女到年满18岁时，若此前7年中有5年以上时间是生活在法国，即可自然而然成为法国公民。

国民特性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是可变的。在20世纪后期，德国人和法国人都抛弃了历史上有过的专制成分，将民主制纳入其自我形象。在法国，是革命派胜利了；在德国，是纳粹主义被剔除了。俄罗斯人的国民特性遇到了问题：少数人仍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多数人当中，有些人主张融入欧洲，有些人主张突出文化因素，包括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还有些人主张突出疆域因素，认为俄罗斯首先是一个欧亚社会。可见，在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突出过国民特性的不同因素，但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后起了变

化。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亦是如此。

第二部分 美国特性

第三章 美国特性的组成部分

变化、连续性和不完全的真理

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比完全的假话更有误导性。后者容易被人看穿，让人信以为真的可能性小一些。而不完全的真理令人感到可信，因为它确实有些根据，容易被当成完全的真理。有两种说法就是这种情形。第一种是说美国是一个移民之国，第二种是说美国特性仅仅界定于一套政治原则，即“美国信念”。对美国的这两种看法往往合起来，说共同的信念把移民而来的各民族的人团结到了一起。用冈纳·米达尔的话说，这就是“这个伟大的种族各异的国家的结构所赖以构成的水泥”。斯坦利·霍夫曼也有类似的说法，说美国的特性是由移民造成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物质特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二者结合而成的独特产物。

这些说法是有一些道理，移民和“美国信念”的确是美国国民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点不是说的不对，但不完全。这两点之中的任何一点或两点加在一起，都没有反映美国的整个真实情况。它们丝毫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社会能吸引移民，或者为什么这一文化产生了“美国信念”。

美国这个社会是17—18世纪由来自北美定居的人创立的，他们几乎

全部来自不列颠群岛。他们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为以后两三百年的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最初是根据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文化，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宗教信仰来界定这个社会。然后，他们在18世纪又不得不从意识形态上界定自己的社会，以证明从英国统治下争取独立是有理的。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特性都包括这四个组成部分。到19世纪后期，民族属性扩大到把德意志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包括在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有大量的南欧人和东欧人及其后裔融入了美国社会，民族属性实际上已不再成为国民特性的界定因素。到民权运动取得成就而且国会通过了1965年移民法以后，人种属性也不再起界定作用。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界定国民特性的因素只有文化和“美国信念”。此时，三个世纪以来起核心作用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了攻击，似乎此后美国特性就等同于意识形态上恪守“美国信念”。表3.1以高度简化的方式显示了这四种组成部分的作用的变化。

表3.1 美国特性的四个组成部分				
	民族属性	人种属性	文化	政治
1607—1775	Y*	Y	Y	N
1775—1940	Y	Y	Y	Y
				(1840—1865除外)
1940—1965	N*	Y	Y	Y
1965—1990	N	N	Y	Y
1990—	N	N	?	Y

* 表中的Y代

表

Yes（是），

N代表

No (否)。

——译注

移民来到之前的定居者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都不是对移民持友好态度，也不曾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然而，在1924年禁止大规模移民之后，态度开始有变化。这明显表现在1938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批评美国革命女儿会态度的一句名言：“请记住，永远记住，我们大家，尤其是你们和我，都是移民和革命者的后代。”肯尼迪总统在他死后出版的《移民之国》一书中引用了罗斯福总统的这句话。在该书出版之前和之后，学者们和记者们都一向乞灵于这句话。研究美国移民史的著名学者奥斯卡·汉德林说“移民正是美国的历史”。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也附和罗斯福的观点说：“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

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局部的真理，但不是完全的真理。罗斯福说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的后代，是部分的错；他说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成员（至少按其姓氏家族而言）是“移民”的后代，则是全错了。她们的祖先不是移民，而是定居者，那些人定居北美时，这里不是移民之国，而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来新大陆定居的人们构成的一个（或者说几个）社会。信仰盎格鲁—新教的定居者的社会这一起源，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深刻地、更加持久地对美国的文化、体制、历史发展及特性起了定形的作用。

定居者和移民有根本区别。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建立“山巅之城”，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是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它构成他们所建立的群体的基础并界

定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相比之下，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以个人的方式界定他们与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在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者来到北美，因为当时这里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除了可以杀掉或向西驱赶的印第安部落以外，这里还没有社会，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建立能体现和强化他们从原居国带来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社会。在这以后，移民来到这里，是为了加入定居者已建立的社会。与定居者不同，当移民及其子女试图吸收一种与他们原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文化时，他们感受到了“文化休克”。是定居者先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

美国人通常把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赢得独立和创定宪法的人称做“开国先辈”。然而，还得先有开路的定居者，才能再有“开国先辈”。美国这一社会的历史不是始于1775年、1776年或1787年，而是始于1607年、1620年和1630年的头几批定居者群体。正是在这中间的一个半世纪当中建立了盎格鲁—美利坚新教的社会和文化，而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的事态则是根植于这样的社会和文化，是这一社会和文化的产物。

创建了独立的美国的人们，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定居者与移民的区别的。正如约翰·海厄姆所指出的那样，在革命以前，英荷殖民者“认为自己是开创者、定居者或先驱者，是那些殖民社会的形成者，而不是移民。这里的政体、语言、工作和生活模式以及许多的习俗都是他们的，而移民必须适应这一切”。在美国，immigrant（移民）这一名词是在18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于英语之中，指当时外来的移民者，以区别于早先的定居者。

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工作道德，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以及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在这

一文化的基础之上，定居者们于18—19世纪建立了“美国信念”，其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则是同化于这一文化之中，又对它有所贡献和修订，但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至少到20世纪后期为止，正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创建的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才把移民吸引到了美国。

因此，从根源和持续保持的核心来说，美国原本是一个殖民社会（colonial society），这是严格从“殖民地”（colony）一词的原意来理解的，是指远离故土的人们在遥远地方垦殖而建立的一个新的社会。“殖民地”的意思后来变了，变成外国统治者统治一个地区及其本土居民。“殖民地”这两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开拓殖民地的定居者，对这一殖民社会的文化和体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和持久的。历史学家约翰·波特指出，这些人是拥有“特许权”的群体，作为“实际上的拥有者”，对该社会尔后的发展“有最大发言权”。文化地理学家威尔伯·泽林斯基将这一现象称做“第一有效定居理论”。在新的疆域，“能有效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能自我延续的社会的第一批人，其特性对该地区此后的社会和文化地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论这头批定居者人数多少都是如此……就持久的影响而言，最初的垦殖者即使只是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其活动对该地文化地理所具有的意义，也可能远远大于几代人之后的成万新移民的贡献。”

最早的定居者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体制。这些东西在这新的地区长久存在，而在其本土却在起变化。罗纳德·赛姆谈到古代西班牙地区的罗马殖民者时指出：“一个新国并非所有各方面都全新。在后来的漫长时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殖民者保留着在其故国已不复流行的生活习惯或语言。西班牙语和法语均源自拉丁语，但西班牙语可以比法语回溯到更古老的拉丁语。西班牙的罗马人（看来是如此）以他们对古罗马传统的忠诚为荣。另一方面，他们的辉煌成就又证明他们是热心的、有抱负的和有创新精神的。”托克维尔也对魁北克有类似

的感触：

一个政府的面目，在它的海外殖民地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评估，因为它的特点在那里得到放大，变得更明显。当我希望研究路易十四的功过时，我一定到加拿大，在那里可以像利用显微镜一样看到它的缺陷。我们这些当代法国人在那里处处受接待……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把我们当做老法兰西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妥。老法兰西是在加拿大，我们的法兰西则是新的。

在美国，戴维·哈克特·费希尔在他的学术巨著中指出，17—18世纪从英国来此定居的人按照他们在英格兰的原籍、社会经济地位、所属教会以及定居时间来看，可分为四大类。但他们都说英语，都是新教徒，都遵从英国法制传统，都珍视英国人的自由权。这一文化和它的四种亚文化在美国得到长久保存。费希尔说：“从文化上来讲，大多数美国人不论其先辈如何，都属于英国人后裔……在现今美国这个有自由意志的社会里，早期英裔定居者的四种民风的遗产依然是最有力的决定因素。”威斯康星的历史学家罗杰斯·霍林斯沃思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在研究美国的政治变化时，应当记住的最重要事实就是，美国是一个定居者社会的产物。”最初的英格兰定居者的生活方式“发展成一整个社会”，而且“引出了居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语言、工作和居住模式以及许多的习俗，后来的移民都必须适应它们”。

最早来到美利坚这片土地上的定居者也像其他地方的定居者一样，并不能代表他们祖国的全体国民，而只是来自其中的某些部分。他们背井离乡到远方定居，是因为他们在老家受压迫，而在一个新的地方看到有机会。到北美、南美、南非和南太平洋区域定居的欧洲人本来带着他们各自所属的社会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包括封建主义、自由主义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然而在新的地方，缺乏欧洲阶级意识所需的阶级对抗，那些思想因而蜕变成新社会的民族主义。定居者社会没有原先那些复杂社会的变化动力，因而得以保持原社会的体

制和变化。

定居者社会是新开创的社会，从时间和地点来看都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因此，它们的创建者觉得有必要用章程、协议和法规等形式规定它们的体制并制订它们的发展计划。第一部希腊法典不是产生于希腊本土，而是在公元前7世纪产生于希腊人在西西里创建的殖民地。英语世界中最早的系统的法典是制定于弗吉尼亚（1606年），百慕大（1612年并入弗吉尼亚公法第三章），普利茅斯（1636年）和马萨诸塞湾（1648年）。1638年由哈特福德及其周围诸镇的市民通过的《康涅狄格基本规章》则是“现代民主制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定居者社会往往是有明文计划的社会，其计划纳入了其创建者的经验、价值观和奋斗目标。

来自英国和另几个北欧国家的定居者在新大陆建立新社会的过程，在两个半世纪之后又得到重演，美国人成批到西部去，开辟新边疆定居点。建定居点不仅对于美国的创建具有中心意义，而且对于直至19世纪末的发展也具有中心意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1892年说：“直到我们今天为止，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开垦大西方的历史。”他指出：“直到1880年（含1880年），国家有一条定居的边疆，可是现今未定居的地区分裂成七零八落的定居点，很难说还有一条边疆线。”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或俄国不同，当时美国的边疆缺乏明显有效的政府治理。最先到那里居住的，是个别的狩猎者、探矿者、冒险者和商人，随后来到的才是定居者，他们沿着水路建立村镇，后来又沿着规划的铁路建立村镇。既有定居，又有流动人口，不断有人向西部流动。

美国的人口，除印第安人以外，在1790年共392.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不被视为美国社会成员。白人当中，60%是英格兰人，加上英国其他地方来的人，不列颠人共占80%，其余白人主要是德意志人和荷兰人。从宗教信仰看，98%是新教徒。除黑人以外，美国从人种、民族属性和宗教来看，当时都是一个高度均质的社会。约

翰·杰伊¹曾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国家如此团结一致的的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讲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宗教，遵从同样的治理原则，习俗风尚非常相近，通过共同的协商、战斗和努力，肩并肩地打完了漫长的流血的战争，高尚地赢得了自由和独立。”

从1820年到2000年，大约共有6600万移民来到美国，使美国在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变得庞杂。然而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仅仅略高于17—18世纪定居者及其奴隶的人口增长。大批移民开始涌入之前，在18世纪末，美国发生的人口爆炸之猛恐怕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人口出生率异常之高，此时北部各州占人口极大比例的儿童纷纷进入成年期。1790年，美国的出生率约为55%，相比之下，当时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仅为35%。美国妇女平均结婚年龄当时比欧洲妇女早四五岁。美国妇女平均生育率1790年约为每人7.7胎，1800年约为每人7.0胎，远远超出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胎。²直到19世纪40年代，生育率仍在6.0胎以上，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时，才降到3.0胎。美国总人口从1790年到1800年增长了35%，1800年到1810年增长了36%，1800年到1820年共增长了82%。在此期间，欧洲陷于拿破仑战争，来美国的移民微乎其微，上述人口增长量中，五分之四是由于自然生育，一位国会议员把这一现象形容为“美国人乘法表”。人口统计学家坎贝尔·吉布森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说，在1990年，美国人口中，49%归因于1790年原有的定居者和黑人，51%归因于1790年以后的移民。1990年美国人口为2.49亿人，假若没有移民，则会为1.22亿人。总之，到20世纪末，美国人口大致上有一半来源于早期定居者和奴隶，另一半来源于那些加入到定居者所创建的社会的移民。

当代美国人除了移民以及定居者、奴隶和移民的后裔以外，还有美国人征服的一些人的后裔。这包括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夏威夷人，以及19世纪中期从墨西哥夺来的得克萨斯及西南一些地区内原有的墨西哥人的后裔。印第安人和波多黎各人的特点是他们是在美国之

内，但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美国人，因为有过一些安排，如设置保留地、保持部落自治，波多黎各享有共同体地位。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但不交纳联邦税，不参加全国选举投票，公务用西班牙语，不用英语。

在美国生活中，大规模移民是时断时续的现象。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移民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都不大，后来上升，到19世纪50年代又下降了。19世纪80年代有过急剧增长，19世纪90年代降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多年，移民数字很高，而1924年移民法颁布后，移民人数急剧减少，以后一直不高。到了1965年移民法颁布后，移民再现高潮。在这些岁月里，移民对美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某些作用之大超过了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然而，从1820年到2000年，外国出生者平均仅略高于全国人口的10%。说美国是“移民之国”，就把一个不完全的真理夸张成一种起误导作用的谬误，而且忽视了美国起源于定居者社会这一基本事实。

不只是信念

人们常说美国人的特点就是笃信“美国信念”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制这样一些政治原则，由这样的信念团结在一起。从克雷夫科尔到托克维尔、布赖斯和米达尔等外国观察家都指出过美国的这一特点。美国学者大多同意这一看法。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说得最简明扼要：“我们国民幸运，没有几种意识形态，而只有一种。”但另一个学者的提法最合适：“《独立宣言》说‘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谁相信这些真理？美国人相信这些真理。谁是美国人？就是坚持这些真理的人。国民身份和政治原则是不可分的。”“美国信念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国民身份的基础。”然而，它们只是美国国民特性的几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

到18世纪中期为止，美国人界定国民特性的依据是人种和民族属性以及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当北美的定居者与英国政府因贸易、税收、军事安全及英国议会殖民地的权限等问题而起冲突、关系恶化时，信念问题开始出现。上述问题引起冲突后，定居者想到大概只有独立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多数地方的独立运动都是要推翻异族的统治，这一理由在北美这里不适用，因为这些定居者在人种和民族属性以及文化和语言方面，跟英国人都是一样的。因此，要独立就需要有别的理由，这就是从政治观念上想理由。最初的说法是英国政府自身偏离了英国的自由、法治和按照一致意见施政的原则，说英国政府背弃了这些原则，美洲的人们则要捍卫英国的这些传统价值观。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说过：“这一抵抗运动是要维护每个英国人都会赞成的英国宪制……维护英格兰人的自由权利。”后来，对英关系问题上的争论激化了，这才提出了新的主张，即启蒙运动所昭示的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这样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主张。这两方面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信念”这一成分，它最明显地体现在《独立宣言》中，但也表现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别的一些文献、著作、讲道和讲演之中。

美国人用这一“信念”的意识形态说明美国的特性，就可以声称自己的国民身份是“公民性”的，声称自己的国家“特殊”，不像别的社会是依种族属性或种族文化来定性。同时美国人又可以声称自己的国家有“普遍性”，因为“信念”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由此产生了“Americanism”（直译为“美国主义”），它代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信念，类似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汇，可是对法国、英国或德国就不能加“主义”（Frenchism, Britishism or Germanism）。它还使得美国具有宗教的特点，许多外国评论家都注意到这一点，例如G. K. 切斯特顿就说美国是“怀有教会灵魂的国度”。从驱逐亲英分子并没收其财产开始，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打击、排除和歧视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忠于美国信念的人。

美国人还一向从信念的角度区分敌友。18世纪70年代，美国革命对英国君主制的挑战第一次把意识形态引入了近代政治。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海德金指出：“1776年，意识形态，而不是种族、语言或宗教，成了国民身份的试金石。美国人心目中的英国敌人形象，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意识形态敌人的形象。”在美国独立后的头一百年期间，美国是唯一的始终保持共和政体和民主体制的国家。美国人把暴政、君主制、贵族制以及压制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行为视为敌人。他们谴责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企图建立“绝对暴政”。独立后头十年，联邦党人和杰斐逊党人曾辩论谁对美国的自由威胁更大，是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政权，还是英国的君主制。19世纪，美国人曾热情赞同拉丁美洲人和匈牙利人争取摆脱外国君王统治的努力。

美国人觉得别国政治制度像或不像他们自己的制度，这会影响美国对别国的政策，甚至影响到是战还是和的决策。正如约翰·欧文所说，在19世纪，英国政治制度向比较自由和民主的方向演变，这就使得它与美国的分歧变得比较容易解决。在1895—1896年的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中，美国一些重要人士就说英美政治传统有共同性，应友好相处。1873年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发生重大危机时，美国一些参议员就不应对西班牙开战，因为当时西班牙有一个共和国政府。可是到了1898年，西班牙又成了君主制国家，而且在古巴实施苛政，美国就觉得有理由向它宣战了。1891年，在智利发生了袭击美国水手的事件，两国关系紧张到了战争的边缘，但“许多美国精英人士反对跟一个兄弟共和国打仗”，最后智利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事件平息了。在20世纪，美国人自居为全球民主自由带头人，投入反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

因此，“美国信念”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一直是美国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恰如罗杰斯·史密斯所说，那种声称美国特性仅界定于“美国信念”的说法“充其量也只有一半的真理”。美国人曾长期奴役黑人，后来又对黑人实行隔离；曾屠杀印第安人，让印第安人处于社会边

缘；曾排挤亚洲人并歧视天主教徒；还对西北欧以外地区来的移民设置障碍。用迈克尔·林德的话来说，早期的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立足于英美新教的民族主义，既是政治的，同样也是种族的和宗教的”。可见，美国特性有几个组成部分，但从历史上看，疆域不是组成部分之一。

“不依附于一地”

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国家特性往往都是与一定的地点相联系。这地点可以是民族的发祥地（“法兰西岛”，科索沃，巴勒斯坦“圣地”），可以是城市（雅典，罗马，莫斯科），可以是岛屿（不列颠，日本），可以是自称的最早栖息之地（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也可以是自称从远古以来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德意志，西班牙）。他们把这些地方称为“祖国”“故土”和“圣地”。一旦丧失这些土地，就是“亡国”。赫伯特·凯尔曼指出过，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争斗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声称的故土是同一片土地。

人们深恋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并由此而认同国家。人们也可能将某一地方视为国家的核心。更广泛地说，人们还会认同于他们居住之地的地理特点和环境特点。

认同于疆域的这种表现，在美国人身上却很弱，或者是看不见的。就个人而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深恋某一地点，这表现在人口流动性很大。邓莫尔勋爵在18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美国人“不依附于一地，似乎天性好游荡”。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说：“人们早在1800年就指出，美国人一生要搬迁四五次……任何别的文化都不如我们好动。”在20世纪末，16%~17%的美国人年年搬家。1999年3月至2000年3月，变换住址的美国人达4300万人次之多。斯蒂芬·贝内特说：“美国人总在搬来搬去。”因此，很少有美国人热恋某一地方。

美国也不把自己与某一个体现民族特性的地点联系在一起。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有的是先辈艰苦创业之处（普利茅斯海岸巨砾，福奇谷地），有的是当年决战的战场（列克辛镇和康科德，纳克镇，葛底斯堡），有的是立国大事所在地（自由钟，独立宫），还有的地方是国家特性的象征（自由女神像）。诸如此类的地方能在美国人心中引起共鸣，但没有一个地点是美国人特性所必不可少的。首都华盛顿是联邦政府所在地，但对这政府满怀热情的老百姓却是罕见的。大部分美国人也不会认为纽约和洛杉矶是美国精神的体现。

美国人也不像外国人那样深情认同于全国的疆域。他们也会歌唱国土辽阔美丽，但只是那抽象的大地。美国人是别处迁来的定居者和移民及其后裔，他们也有爱国心，但不像别国人那样心系“祖国”，不把美国叫做fatherland或motherland。“9·11”事件后，政府大谈什么“homeland security”（直译为“祖国安全”或“本土安全”），可是有些美国人觉得“homeland”这一名词有点非美国的味道。

这种态度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主要在于政治理念和体制，而不在地方。1849年，一位欧洲人亚历山大·麦基在访问美国后指出：“美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欧洲人所特有的那种地方依附感。他的情感集中于体制，而不是国土。他谈自己，主要是说自己是共和国公民，而很少说自己是哪个家乡的人……因此，美国人是自视为特定政治信念的门徒。”100年后，有一次民意测验调查人们对自己国家最引以自豪的是什么，对国土自豪的人，在美国仅有5%，相比之下，英国人有10%，德国人有17%，墨西哥人有22%，意大利人有25%。而另一方面，对本国政治体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国人有85%，英国人则有46%，墨西哥人有30%，德国人有7%，意大利人有3%。对于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重于疆域。

作为国家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疆域在美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轻，原因有二。一是土地多而且便宜。几乎不花什么代价就能得到土

地，定居下来，加以利用，用完了就放弃。作为资源，得到土地比弄到劳力或资金容易得多。因此，它不受珍惜，不被视为神圣难离的东西。第二，在美国历史上，疆域曾不断扩大，没有固定不变的国界。国旗上的星星不断增多。进入21世纪后，又有人主张波多黎各也成为一州，把星星增加到51个。

因此，250余年期间，边疆不断地变，美国人也习惯于不断迁移。美国人不是认定一个地方为自己的故乡，而是什么地方能提供最佳机会就到哪里去。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研究了波士顿17世纪时的郊区，指出最早的定居者就是由英格兰西迁而来，指出“最老的西部就是这大西洋沿岸”，人们从这里再逐渐继续向西迁移。邓莫尔勋爵认为美国人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们从不安居于一地，总想再迁到新的地方”。因此，乡土观念不是美国人的特性。

人种和民族属性

与地域观念不同，人种和民族属性是美国人一个敏感话题。正如亚瑟·施莱辛格所说，在美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内，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国白人将自己明确区别于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和墨西哥人，把这几种人排斥于美国社会之外。历史上早年的一个事件象征性地体现了美国白人与其他种族的关系。

在最早的定居者于1620年和1630年来到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以后，他们曾在几十年当中与印第安人维持了合作关系。17世纪中期是印第安部落与新英格兰定居者之间的“共同繁荣的黄金时代”，双方彼此往来，贸易日增，共同获益。可是到了17世纪60年代，白人定居者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多，印第安人担心受到白人统治，因此发生了1675—1676年的“菲利普王³战争”。按伤亡人口比例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白人定居者的死亡率几乎比内战死亡率高一

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死亡率高6倍。在新英格兰的90个定居者村镇中，印第安人袭击了52个，掠夺了25个，烧毁了17个。白人定居者被赶到了海边，经济毁了，几十年后才得到恢复。但在印第安人方面，各部落都被打得七零八落，其领导人被杀死，大批的男女老少沦为奴隶，被运送到西印度群岛。吉尔·拉波尔指出，由于这场战争，白人清教徒在他们自己与印第安人之间“在土地上以及在思想上划出了鲜明的新界线”。英克理斯·马瑟认为这场战争是上帝给定居者的惩罚，因为“这土地上的基督教徒对印第安人太仁慈了”，定居者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对印第安人只能加以驱逐和消灭，多文化社会的可能性消失。而再次出现这种可能性，要等到300年之后。

正如理查德·斯洛特金所说，菲利普王战争“就许多方面而言是此后历次战争的一个原型”。此后200多年，美国人普遍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落后的未开化种族，跟印第安人的关系就是断断续续老打仗。在颁布《宪法》之后约50年期间，美国军事部门的职责就是对付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做法包括杀戮、威吓、驱赶和腐化。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说服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徙法》，将南方6个州内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强行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从而引发了1835—1843年的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要是在今天，这种迁徙就会叫做“种族清洗”。这些做法让托克维尔感到吃惊，他写道：“这种强迫迁徙造成的苦难之深，是无法想象的。被迁徙者本来就已经人口锐减，精疲力竭，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本已居住着别的部落，对他们充满敌意。路上忍饥挨饿，到了站还得打仗，苦不堪言。”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根据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意见，认定印第安部落是“国内附属民族”，他们个人效忠于部落，因此没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除非他们明确与部落脱离关系而融入美国社会。

在印第安人遭受驱逐和杀戮的同时，到1808年为止，成批黑人被运进来，沦为奴隶，备受压制。美国的开国先辈认为，共和国政体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保持种族上和宗教上相对高度的单一性。1790年的

第一部国籍法规定只有“自由白人”能成为美国公民。当时，黑人（绝大多数是奴隶）已占全部人口20%，但美国人不把他们当做自己社会的成员。第一任司法部长埃蒙德·兰道尔夫就宣称奴隶不是“我们社会的法定成员”。自由黑人也受到类似对待，普遍被剥夺选举权。托马斯·杰斐逊像其他开国元勋一样，认为白人和黑人“同等自由，就不能生活在同一政体之中”。杰斐逊、麦迪逊、克莱、兰道尔夫、林肯等著名政治家都支持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把自由黑人移居到非洲的主张。这种移居活动导致了1821年利比里亚“移民区”的建立。从美国迁去的自由黑人共达11000—15000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迁居那里，是值得怀疑的。林肯总统1862年接见第一个访问白宫的自由黑人代表团时，曾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迁居到非洲。

1857年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宣判中，首席法官罗杰·坦尼宣称，根据宪法，不仅黑奴，而且还有所有的黑人，都是“一种从属的和劣等的生物”，没有资格享受公民权和自由权利，因此不属于“美国人民”。直到1868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宣布所有出生于美国或归化于美国的人皆为美国公民，坦尼的上述裁决才被废除。然而黑人仍然备受歧视和隔离，得不到选举权，这种状况又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954年“布朗诉教育局”一案终审以及1964年和1965年国会先后通过《民权法》和《选举权法》以后，阻止黑人享受平等权利和参政的重大障碍才开始消失。

在19世纪初，在欧美学术界和一般民众思想中，人种概念均曾起过日益重要的作用。到19世纪中期，“人种之间固有的不平等在美国已被认为是一个科学事实。”美国人还认为人种的优劣是天生的，而不是环境决定的。人们广泛认为按照优劣程度排列的四大人种依次是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印第安人种和非洲人种。高加索人种又进一步细分，盎格鲁—撒克逊的日耳曼部落的后裔被列为最优等。在19世纪要不要扩张领土的争论中，双方都以种族特性作为论据。一方认为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因此有理由征服和统治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等。另一方则主张保持盎格鲁—美利坚社会的种族纯洁性，因而反对兼并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菲律宾。

美国在内战后大修铁路，导致了大量华工的移民。据说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华人妓女，于是美国在1875年通过了“第一部限制移民的法律”，禁止妓女和罪犯移居美国。1882年，加利福尼亚等地主张排斥华人的压力剧增，导致了美国颁布排华法，规定停止华人移民10年，以后又无限期延长。1889年，最高法院裁定排华合乎宪法，其理由，据斯蒂芬·菲尔德法官的说法，就在于华人属另一人种，“他们不可能被同化”，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单独群居，固守其本国风俗习惯”。这一“东方人入侵”若不加限制，将会构成“对我们的文明的威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人移民也成为问题，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日本谈判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日本同意防止日本人移居美国。到1917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几乎所有亚洲人移居美国。对亚洲移民的这些障碍直到1952年才取消。从各方面来看，美国直到20世纪中期为止实际上是一个白人社会。

与宗教或人种属性相比，民族属性是一个比较有限的范畴，然而它在历史上也对界定美国国民身份起过重要作用。直到19世纪后期，移民的绝大部分来自北欧。在原有的英裔定居者中间存在过对德裔美国人的敌对情绪，主要是因为后者在教堂、学校和其他公共场合继续使用德语。对爱尔兰裔美国人也有对立情绪，但主要是因为宗教和政治观念，与民族属性无关。

随着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大量涌入，民族属性问题变得更突出了。这一移民潮始于19世纪80年代，1900年出现高峰，以后又继续增多，直到1914年为止。菲利普·格利森指出，在1860年至1924年之间，“作为国家特性的一个因素，民族属性所占分量之重，是空前绝后的。”如同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一样，此时也是由于移民剧增，在学术界和政界出现了反对外来移民的运动。反对移民的人并没有严

格区分人种和民族，他们反对南欧和东欧人的重要理由也是说他们属于劣等种族。创立于1894年的“限制移民同盟”声明，问题在于美国人应是什么人，“是历史上一贯自由、充满活力与进步的英裔、德裔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人，还是历史上一贯受践踏、落后与停滞不前的斯拉夫、拉丁和亚洲各种族。”该组织主张对申请移居美国的人进行文化水平测验，国会1917年不顾威尔逊总统的否决而通过了这种措施。一些作家和社会科学家，如爱德华·罗斯、麦迪逊·格兰特、乔赛亚·斯特朗和洛思罗普·斯托达德等人，还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为限制外来移民的做法推波助澜。

国会于1921年通过了临时性的移民限额，到1924年，又规定了永久性的每年移民不得超过15万人的限度，并根据1920年美国人口中各种族后裔所占的比例，对这一限额按国别作了分配，82%分配给北欧和西欧国家，16%分配给南欧和东欧各国。这使得外来移民的民族属性背景起了明显变化。1907—1914年间，平均每年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为176983人，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为685531人。实施新的法令后，每年能从北欧和西欧来的人数为125266人，能从南欧和东欧来的人数仅为23235人。这套规定基本上一直实行到1965年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按种族属性界定美国国民特性的状况。1914年以前来美国的移民的子女大量入伍参战，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被描绘成一个真正多种族的社会。菲利普·格利森指出：“典型的战争故事片都描写意大利裔、犹太裔、爱尔兰裔和波兰裔的人如何与老牌美国人并肩作战，这一主题还不仅限于好莱坞。”各种招贴画和标语牌上都出现了各种族战士的姓名，还有大字幕上写着“他们战死在一起，所以我们能生活在一起”。美国作为多种族社会的特性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次战争的产物。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把美国人称做“盎格鲁—美利坚人”。百年之后，已不能再这么说了。盎格鲁—美利坚人仍是美国社会中占主

导地位的群体，大概还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但从种族上说，美国已不再是一个盎格鲁—美利坚社会，跟他们在一起的已有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波兰裔、德裔、犹太裔等各族的后裔。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在名词的变化上，盎格鲁—美利坚人现在被称做WASPs ⁴，是美国众多种族之一。盎格鲁—美利坚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但他们先辈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却300年来始终是美国特性的首要界定因素。

第四章 盎格鲁—新教文化

文化核心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核心文化或主流文化，深浅不等地由该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在这一全国性文化以外，该社会按照宗教、人种、民族、地区、阶级或其他范畴而区分的各种群体还有各自的居从属地位的文化，即国家层次以下的亚文化，有时还有跨国的文化。美国一向充满着这样的一些亚文化，但也有自己的主流文化，那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大多数的美国人，不论其亚文化背景如何，均共享这一主流文化。这是最早来北美的定居者带来的文化，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文化核心，成为国民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试想一下，倘若17世纪和18世纪来这里定居的，不是英国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天主教徒，美国会是今天的美国吗？肯定不是。那样就不会是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从英格兰继承而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以及习俗，最主要的内容有英语以及当时不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的理念和价值观，它们在英格兰逐渐消退了，但被定居者带来这里以后，却在这新大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这一文化既包括总的英国文化的一些成分，又包括那些定居者原先所属的英格兰社会特定群体的一些特定成分。开始时，如艾尔登·沃恩所说：“几乎样样事物

基本上都是英格兰式的，包括土地所有制和耕作的样式、政府体制、基本的法律格式和法律程序、文化娱乐和休闲的项目选择以及垦殖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亚瑟·施莱辛格也指出：“这新国度的语言、法律、制度、政治理念、文学、风俗、戒律以及祷告词，都主要是来自英国。”

最初的这种文化尽管经历过一些适应和修改，但基本上保持了300多年。上一章中谈到第一任首席法官约翰·杰伊1789年指出过美国人的六点共性，而200年后，共同的祖先这一条不存在了，其他的五点——语言，宗教信仰，治理原则，风俗习惯，战争经历——都有所改变或淡化（例如“共同的宗教”，即当时的新教，两百年后应改为更广泛的基督教）。然而杰伊所说的美国特性的这些组成部分尽管受到挑战，却依然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核心，新教价值观始终具有头等重要性。至于语言，18世纪来到宾夕法尼亚的德裔定居者曾试图使德语成为与英语平起平坐的语言，但惹怒了富兰克林等人，未能得逞。19世纪的德裔移民又曾试图在威斯康星建立德语飞地，在学校用德语教学，但也失败了，因为他们受到同化的压力，威斯康星州议会于1889年明文规定英语为教学语言。在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于迈阿密和西南地区以前，美国两亿多人口几乎完全是讲同一语言，这样的大国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者所建立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大部分体现了英格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都铎宪制”的制度和惯例。这包括：有一部高于政府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基本法；政府负责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职能，但又三权分立，各属独立的政府机构；立法机构和首席行政官各司其职；首席行政官身兼“高尚”职能和“实际办事”职能；议会分为两院；议员向自己选区选民负责；议会设立一些委员会；防务主要依靠民兵，而不是常备军。都铎王朝的这些体制后来在英国发生根本变化，但它们的基本因素在美国却保持到了20世纪。

从19世纪到20世纪后期，来到美国的移民受到各种方式的说服、

诱导或强迫，要他们遵从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基本要求。20世纪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多文化主义者和一些少数种族的代表人的言论恰好证明了上述努力的成功。迈克尔·诺瓦克在1977年尖锐地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被强迫当“美利坚人”，要他们接受盎格鲁—美利坚文化，这种美利坚化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迫的过程”。1995年，威尔·基姆利奇卡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移民们“被要求放弃其文化传统，完全同化于现有的文化准则”，而这些文化准则被他称为“盎格鲁—国教模式”。如果移民被认为无法加以同化，就遭到驱逐，像华人的遭遇一样。1967年，哈罗德·克鲁斯说“美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国家，是由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各少数民族的国家。它自以为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国家，以此自许”。

这些批评是对的。在美国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而成为美国人。这对他们有利，也对国家有利。正如本杰明·施瓦茨所说，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团结是来自“盎格鲁精英将自己的形象烙印到移居这个国家的各族人身上的能力和愿望”。他说：“这一精英的宗教和政治原则、风俗、社会关系及其善恶标准和道德标准，300年来一向就是美国的特色，今天尽管人们庆贺‘多样化’，情形依然如此。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化上和种族上的支配地位，它不会容忍事关美国特性的冲突或混乱，所以这个国家才得以摆脱种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冲突而享有自由，尽管这一自由比我们的国家神话所说的自由要少得多。”千百万移民及其子女在美国社会得到了财富、力量和地位，正是因为他们让自己同化于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文化。有人说美国人必须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种族特性和一种抽象、浅薄的“公民特性”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毫无道理的。美国人国民特性的核心，就是定居者所创立、世代移民所吸收的文化，“美国信念”就是由它诞生出来的。这一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新教精神。

“持异议中的持异议”

美国是作为一个新教社会而建立起来的。最初两百年期间，几乎全部美国人都是新教徒，后来，随着德国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移民而来，接着是意大利和波兰的天主教徒移民而来，新教徒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到2000年，约60%的美国人是新教徒。然而，新教的信念、价值观和论断，像英语一样，过去是美利坚定居者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今这一文化继续渗透和影响着美国的生活、社会和思想。新教价值观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美国还对天主教及其他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们形成了美国人对待私人和公共道德、经济活动、政府活动和公共政策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美国信念”的首要来源，而“美国信念”这些世俗的政治原则又补充了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何谓美国人起着重要的界定作用。

在17世纪初，正如艾德里安·黑斯廷斯所说，基督教在欧洲“对民族国家起了定形作用”，各国均将自己界定为新教国家或天主教国家。欧洲各国社会有的接受了宗教改革，有的拒绝这一改革。在美国则是这一改革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会。美国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这在各国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宗教改革，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另一位学者则指出，美国的来源“在于英格兰的清教革命。这一革命事实上是对美国政治史起成形作用的最重要事件”。19世纪访问过美国的菲利普·沙夫指出，在美国，“每件事都有一个新教的起点”。美国是作为一个新教社会建立起来的，正如同20世纪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穆斯林社会、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教社会而建立起来一样。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新教国家，别人也认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教科书、地图和文学作品中都把美国定性为新教国家。

托克维尔有一句名言，说美国“生而平等，不必再求平等”。更有意义的，应是美国生为新教国家，不必再成为新教国家。因此，美国

并不像路易斯·哈茨说的那样是从欧洲分裂出来的“自由主义”“洛克主义”或“启蒙运动”的一个板块。美国的创建始于17世纪30年代，而洛克1632年才诞生。此后出现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精神与其说是从欧洲进口的，不如说是北美这里建立的新教社会自身的产物。有些学者试图证明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或“信念”是源于洛克的思想或欧洲的启蒙运动，这是企图从世俗的角度来解释美国价值观的宗教来源。

当年人们定居美利坚，除了宗教动机以外，自然还有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动机，但宗教仍是主要的。在纽约和卡罗来纳，最初宗教成分少一点，但其他各地的垦殖都是宗教动机起最大作用。贵格会教徒和循道宗教徒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天主教徒在马里兰建了一处立足点。宗教热情最高的无疑是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尤其如此。他们首先宣布自己是“与上帝立约”而定居该地，建一座“山巅之城”作为给全世界的榜样。新教其他各教派的人纷纷效仿。在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的美利坚人都以圣经为根据阐述他们在新大陆的使命，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他们说美利坚是“新天地”，“正义之家”，是上帝赐予的土地。正如萨克文·伯科维奇所说，当年人们定居于美利坚时，“投入了探求宗教真谛的全部情感、精神和智力”。这种神圣使命感很自然地进一步扩展成为千禧年式的主题，认为美国是“救世之国”，是“有远大眼力的共和国”。

美国的新教与欧洲的新教有所不同，尤其是不同于圣公会或路德宗那样有地位的教会宗派。早在美国独立以前，埃德蒙·伯克就注意到了这一区别，他把英格兰人对于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畏惧、尊敬和顺从与美利坚人的“强烈自由精神”作了对比，说美利坚人的这种精神正是来源于美利坚牌号的新教。美利坚人，他说：“是新教徒，但属于那种最反对默默屈服于他人思想和意见的新教徒。所有的新教，即使是最冷静最消极的新教徒，也都是持异议者。但是在我们的北美殖民地流行的宗教是抵抗原则的进一步提炼，是持异议中的持异议，是

新教中的新教。”

从1620年到达普利茅斯的前辈清教徒和随后在新英格兰各地定居的清教徒身上，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持异议精神。这些清教徒的信息、作风和观点——如果说还不是教义的话——传遍了北美各殖民地，被吸收进其他新教群体的信念和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利坚的整个命运”是由清教徒形成的。詹姆斯·布赖斯也指出，新英格兰的“宗教热情和宗教良知在很大程度上传遍了美国全国”。清教徒留下的文化遗产经过修饰、改装和扩散，成了美国的精髓。“英格兰有过清教革命，却没有创建清教社会；美国没有经历清教革命，却创建了清教社会。”清教思想和作风渗透到了美利坚各殖民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来自东英吉利（东盎格利亚）的定居者的特点。戴维·费希尔谈到的最初来自英格兰四个地方的定居者当中，东英吉利人主要是城市手工业者，而不是农民。他们几乎都是全家人一起移居北美，而且基本上都是有文化的，许多人还在剑桥读过书。他们宗教信仰虔诚，致力于传播上帝的教诲。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文化扩散到这片新土地，尤其是中西部的“大新英格兰”，对未来新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新教的持异议态度，最初表现于清教和公理会的立场，以后又表现于浸礼会、循道宗、虔诚派、基要主义运动、福音派、五旬节派等各个新教派别的立场之中。这些教派各自不同，但它们都强调个人直接与上帝相关联，强调圣经是上帝的话的唯一来源，个人要通过信仰得救，许多人还需要经历转变而“再生”，个人负责改变信仰和作证，还强调教会组织的民主性和参与性。从18世纪起，美利坚新教日益大众化和情感化，等级观点和学术性日益降低。教条让位于感情，教派和运动日增，一代人的持异议教派又受到下一代人持异议教派的挑战。“持异议中的持异议”既说明美国新教的历史，又说明它具有的特性。

宗教热情是17世纪和18世纪美利坚新教许多教派的特色，它们以

各种形式努力传播福音。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马丁·马蒂的话来说，美利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福音帝国”。乔治·马斯登认为福音传道的新教是19世纪“美国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加里·威尔斯则认为福音传道的的新教一向构成“美国宗教信仰中的主流”。19世纪初，教派、传道者和信徒均激增，宗教上的持异议或造反成为当时的主题。历史学家内森·哈奇说：“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作为自觉的非神职人员，四处奔波发动各种运动。他们都主张不懈地劳动，热心于发展，敌视正统信念和作风，对宗教的重建满怀激情，而且精心策划如何实现其理想……他们都热心向普通人尤其是穷人灌输个人自尊心和集体自信心。”研究大觉醒时期的著名学者威廉·麦克洛克林指出：“美利坚福音传道的历史不止是一部宗教运动史。理解它，也就是理解19世纪美利坚生活的全部气质。”

对于20世纪后期，也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将近1/3的美国人说他们是“得到再生”的基督教徒，其中包括大多数的浸礼会教友、约1/3的循道宗教友以及1/4以上的路德宗教友和长老会教友。1999年，大约39%的美国人说他们“得到再生”。据报道，“当代的福音传道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人当中势头日升。”在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即拉美裔天主教徒当中，福音传道的的新教也赢得许多人的皈依。在一些名牌大学中，福音传道新教的大学生也日益增多，例如，哈佛大学福音传道联谊会的会员从1996年到2000年翻了一番，由500人增加到1000人。随着新的千年开始，持异议的新教和福音传道精神继续在满足美国人精神需求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

“美国信念”

“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一词因冈纳·米达尔1944年的《美国的抉择》一书而成为大众用语。他指出，美国人在人种、民族属性、宗教、地域和经济等方面多种多样，参差不齐，但仍有“共同

之处：一种社会气质，一种政治信念”，接着他用大写字母写出了“American Creed”。大家接受了这一名词，作为原先许多人论述过的同一现象的通用名称。由此，美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将“美国信念”定为美国特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往往还被说成是美国特性的唯一重大决定因素。

对这一“信念”的内涵，学者们说法不一，但主要内容上，意见几乎是一致的。米达尔谈到了“个人的尊严，人人平等，人人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公正，机会均等”。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进了人人平等，权利不可剥夺，以及“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一致主张“自由和平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陪审制以及政府人员责任制”。19世纪90年代，布赖斯总结了美国人的政治信念，其中包括个人拥有各种神圣权利，人民是政治权力的源泉，政府受法律和人民制约，地方政府优先于全国政府，少数服从多数，以及“政府越小越好”。在20世纪，丹尼尔·贝尔指出“信念”的主要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成就和机会平等”，并特别指出，“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洲是哲学大辩论的话题，而在美国却由个人主义予以解决，个人主义兼有自由和平等”。西摩·马丁·利普塞特认为“信念”的核心有五条原则：自由，平等主义（机会平等和人人受尊重，而不是贫富地位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经济自由放任。

“信念”原则有三大特点。第一，它们始终相当稳定。正如利普塞特所说，“就国家价值观体系的主要成分而言，连续性大于变化。”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信念”内容没有重大改变。第二，直到20世纪后期为止，“信念”得到美国人民广泛同意和支持，不论人们实际行为是否偏离，但态度是一致的。唯一的重大例外是19世纪中期南方一些州企图为奴隶制辩护。除此以外，“信念”的总的原则一直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赞同，19世纪的许多观察家和20世纪的历次民意调查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信念”的主要思想几乎全都源自持异议的新教。新教强调个人良知以及个人直接从圣经学习上帝的真理的责

任，这就促使美国人笃信个人主义、平等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新教强调工作道德以及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新教的教堂组织形式是教区教友齐聚一堂，这就促进了人们反对等级制，认为类似的民主形式应运用于政府之中。新教还促进了从道德出发改造社会以及在国内和全世界争取和平和正义。

像“信念”这样的主张从来不曾出现于欧洲大陆各国社会（只有大革命时的法国例外），也不曾出现于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甚至不曾出现于英国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的殖民地。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和天主教文化，甚至还有新教的路德宗和圣公会文化，都没有产生过与“美国信念”相当的东西。“美国信念”是持异议的新教文化的独特创造。美国人拥护“信念”的程度之深、热情之高和延续性之长，都证明“信念”是美国国民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信念”的源泉包括启蒙运动的思想，它们于18世纪中期在一些美国精英人士当中深入人心。然而，承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土壤是盎格鲁—新教文化，而这一文化在美利坚已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在这一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久已存在于英格兰的一些思想，即自然法和习惯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可以追溯到大宪章的英格兰人的权利。英格兰革命时期出现的较激进的清教这一教派又带来了新的思想，即平等以及政府应对人民作出回应。正如威廉·李·米勒所说，宗教在美利坚“促成了信念的形成而且与信念相容……在这里，自由新教与政治自由主义、民主宗教与民主政治、美国信仰与基督教信仰都彼此渗透，彼此产生深刻影响。”约翰·海厄姆指出，新教信念和美国政治信念包含了类似的和平行的思想，它们走到一起，形成了“19世纪把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最强有力的纽带”。杰夫·斯平纳也指出：“很难区分什么是新教的主张，什么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主张。”总之，“美国信念”是新教的世俗表现，是“有着教会灵魂的国民”的世俗信条。

个人主义与工作道德

美国的新教徒普遍认为有根本的好坏之分和对错之分。与加拿大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更有可能相信“好坏之分有着绝对明确的指导方针”，这适用于“任何情形”，而不会相信无好坏之分、一切随情况而定。因此美国人始终面临着这样一种差距，即一头是应当指导他们个人行为和社会性质的绝对标准，一头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社会未达到这种标准的现实。

多数新教教派强调个人应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教诲，而无需通过神职人员的中介。许多教派还强调个人求得灵魂的得救，即“再生”，也无需神职人员的中介。个人在今世得到成功就有责任在今世行善。正如F. J. 格伦德1837年所说：“新教教义、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全是一回事。”

美国新教文化使美国人成为世界上个人主义最强的人。吉尔特·霍夫施特德对IBM公司在39个国家的11.6万名雇员进行的比较分析表明，个人主义平均指数为51，而美国人的指数高达91，位居榜首。居第二位至第六位的依次为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和新西兰。个人主义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中，有8个是新教国家。对14国军校学员进行的调查，结果与此相似，个人主义前三位是美国、加拿大和丹麦。1995—199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向48个国家的人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对他们的福利负责的首先应当是个人还是国家。强调责任在个人者，最多的是瑞士人，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人及瑞典人。对6国1.5万名经理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个人主义方面得分最高的是美国人，以下依次是加拿大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最低的是日本人。这次调查的主持人在结论中写道：“美国经理人员个人主义最强烈，也比较内向。他们认为应当自己下决心做自己的事，而不应让自己受他人及外界事态的太大影响。”

美国人相信个人对自己负责，这一新教信念导致了个人靠自己奋

斗而取得成功的准则。罗伯特·贝拉说过：“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创立了个人奋斗致富取得成功的准则。”无数的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看自己的才干和性格如何。克林顿总统的一句话清楚表明了“美国之梦”的这一主旨。他说：

我们人人都是做着美国之梦而成长，这个梦既简单而又有力——只要你努力奋斗，按规则比赛，你就有机会前进，上帝赋予你的能力能让你走多远，你就可以走多远。

在没有严格社会等级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看自己的成就。机会是有限度的，能否实现，取决于个人的精力、条理和坚韧，取决于工作的能力和奋斗的决心。

工作道德是新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从一开始，美国的宗教一直是叫人努力工作。在别的社会，世系、阶级、种族、家族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贵族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贬低个人的工作的意义。布尔乔亚社会却鼓励工作，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布尔乔亚社会更是以工作为荣。正如朱迪思·什克拉尔所说，在美国历史上，社会地位始终取决于工作以及做工作挣到的钱。就业是自信和独立的源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就是“勤奋才能自由”。以工作为荣的风气在杰克逊时代更引人注目，人们有“干活者”和“不干活者”之分。什克拉尔说：“在19世纪前半期，每一位访问过美国的人都注意到这里人们埋头工作的态度。”19世纪30年代访问过美国的德裔瑞士人菲利普·沙夫说，在美国，祈祷与工作相联系，懒惰是罪过。同一时期访问过美国的法国人米歇尔·舍瓦利耶说：

风俗习惯表明这里是一个工作的、忙碌的社会。没有职业的人，还有不结婚的人，被人瞧不起。一个人只有成为社会的积极、有用的成员，为增加国家财富和人口作出一份贡献，才受到尊敬和喜爱。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一定要从事一定工作，积极努力和聪明能干就会发财致富。即使是富人家庭的子

弟也不愿过无职业的生活。生活习惯也是一心工作。美国从一早起床后就工作，一直干到就寝。进餐时也不肯懈怠，这只是不得已而中断一下工作，尽可能缩短吃饭的时间。

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中，有一条理由就是人人有劳动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当时新成立的共和党所主张的一项重要权利就是“进行生产劳动、从事自己职业和获取其报酬的权利”。“自立者”的概念正是美国这种环境和文化的一个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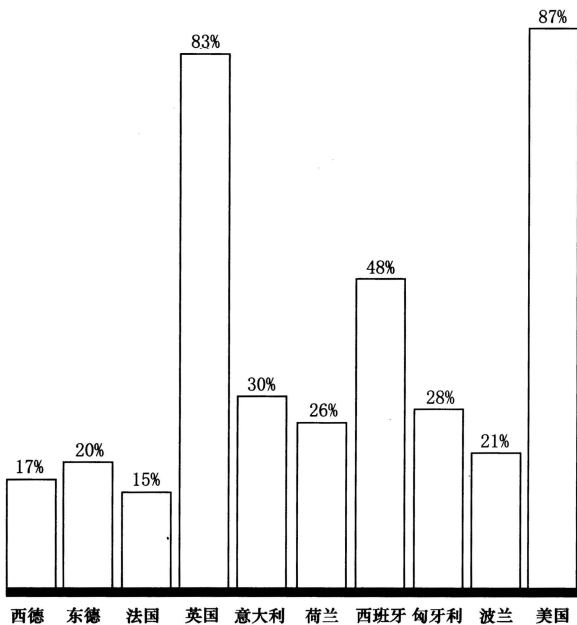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仍然是工作的人。与别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工作时间长而休假时间短。在别的工业化社会工作时间在缩短，但在美国却是有增无减。据统计，1997年全年平均每个工作者的工作时间为：美国—1966小时，日本—1889小时，澳大利亚—1867小时，新西兰—1838小时，英国—1731小时，法国—1656小时，瑞典—1582小时，德国—1560小时，挪威—1399小时。平均计算，美国人比欧洲人多工作350小时。1999年，美国20岁以下青年有60%做工作，为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数的3倍。美国人历来对休闲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往往还觉得休息不干活是罪过，力图把休闲与工作道德二者加以协调。正如辛迪·阿伦在她的《游戏时工作》一书中所说，美国人在20世纪依然“深深怀疑不工作而消耗时间对不对”。美国人往往觉得休假时不能一味玩乐，也要做些有益的事和学习。

美国人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比别的一些国家的人更能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在1990年对10国进行的“国际价值观调查”中，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的人，在美国多达87%，高居榜首。与此比较接近的只有英国（83%），其余8国中，有7国都在30%以下（见图4.1）。美国人一向认为努力工作是个人的关键。在20世纪90年代初，约80%的美国人说，作为一名美国人，就必须遵守工作道德；90%的美国人说，为了他们所在单位的成功，若有必要，他们愿意工作更辛苦一些；6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希望发生那种较少强调努力工作的社会变化。美国人认为社会存在着有成效工作的人和从不从事有

成效工作的人的分野。

图4.1 工作自豪感

对在职者提出的问题是：“你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吗？”下图所示为回答“非常自豪”者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价值观调查，1990”；此图取自德国《阿伦斯巴赫研究所》一书（1998年版）第71页。

工作道德自然影响到美国的就业和福利政策。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往往把各种福利救济金视为“政府的施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业救济金的领取年限在英国和德国为5年，法国为2年，日本为1年，美国仅为6个月。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有人建议缩小福利计划，如果可能就取消福利计划，其根源就在于相信工作的道德价值。“不工作而获”是可耻的。正如什克拉尔所说：“干不干工作，关系到公民资格——体格健全的人不积极努力挣钱，是否还能被认为是公民。”

在美国历史上，外来移民一直面临着适应这种工作道德的挑战。1854年，菲利普·沙夫曾向打算来美国的移民提出如下建议：

只是有一点要向移民讲清楚：对种种艰难困苦作好准备，不要碰运气求侥幸，而要相信上帝和勤奋努力。如果你希望过平静舒适的生活，最好就留在国内。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祷告和干活吧，这在美国是最中肯不过的了。真正的美国人最鄙视的就是懒惰吃闲饭。他认为人生在世的命运不是享乐，而是劳动，不是安闲舒适，而是辛苦忙碌。这对于他具有无以言状的重要性，整个说来对全国的道德生活有着最重大的影响。

在19世纪90年代，从波兰来的移民感到他们在美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给波兰亲友写信都会谈到这一点。有一个人写道：“在这里一天流的汗比在波兰一整个星期流的汗还要多。”百年之后，1999年，一个古巴裔美国人亚历克斯·阿尔瓦雷斯告诫新来的古巴裔移民说：

欢迎到这资本主义制度来。你们每个人都得自己干活，为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自行负责。政府不管你有没有饭吃，也不管你是穷还是富。政府并不保证你有工作或有住房。你们来到一个既富又强的国家，但是你们是不是能继续像在古巴时那样生活，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道德主义与改革论

美国的政治，如同其他社会的政治一样，一向是而且仍然是人物与派系的政治、阶级与地域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种族集团的政治。然而，美国的政治又在异常之高的程度上一向是和仍然是道德主义和道义激情的政治。美国的政治价值观体现于“美国信念”之中。争取在政

治行为和体制之中实现这些价值观的努力，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个人来说，美国人有责任追求美国梦，尽自己能力、性格和努力，实现其奋斗目标。就集体而言，美国人有责任确保自己的社会真正是希望之乡。从理论上讲，个人改造成功了，就不需要对社会进行集体的改革。然而在实际上，美国历史上的历次大觉醒都是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这几次“信念激情”的表现从根本上看都是由美国新教的持异议、传播福音的性质所形成的。罗伯特·贝拉精辟总结过这一点：

我们历史上的好坏观念大多是根源于我们的公共神学。每一次争取使美国完全实现它公开宣称的价值观的运动，都是产生于某种形式的公共神学，从废奴主义者到社会福音派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和塞萨尔·查维斯领导的农场工人运动，莫不如此。但每一次扩张疆域的战争以及每一次少数种族和移民群体的反抗亦是如此。

加里·威尔斯也认为是这样：“宗教是我们历次重大政治危机的核心，这些危机都是道德危机——不论是赞成或反对历次战争、奴隶制、法人权力、民权、女权、‘西部’、美国分离主义以及建立帝国的主张，都是如此。”

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新教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觉醒，每一次都与政治改革的重大努力相联系，有政治改革紧随其后。许多的政治、经济和观念的因素走到一起而形成美国的革命。观念因素包括洛克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辉格党人的共和主义。同等重要的是宗教的根源，最突出的是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那次大觉醒。那一运动的领头人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其他几位奋兴运动传教士，乔纳森·爱德华兹则为运动提供了教义理论。这次大觉醒传遍了当时的各处殖民地，动员了成千成万的美利坚人决心在基督信仰中求得新生。这一宗教奋兴运动为后来紧接着的政治奋起奠定了基础。虽然可以说，假若没有这次大觉醒，也会发生美国革命，但事实却是美国独立的革命

确实是建立在大觉醒的基础之上，受到大觉醒的重大影响。正如哈佛的学者艾伦·海默特所说：“福音动力是热烈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化身和工具。在革命前美利坚的福音教会中，铸就了日后体现美国早期民主制思想的各个论坛和民众的大联合。”将近当时美利坚人口一半的公理会、长老会和浸礼会的广大教友“接受了千禧年思想”，而这些“千禧年教派正是美国革命的最坚定支持者”。

当时的美利坚人支持或反对大觉醒运动的程度有高有低，但无论如何，这一运动是动员了殖民地几乎所有各教派的教友的第一次民众运动。大觉醒时深得人心的福音传播者怀特菲尔德四处奔走，从佐治亚到新罕布什尔四处布道，是第一位真正属于美利坚的公众人物。这为后来遍布各殖民地的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创造了经验和环境。美利坚人第一次联合起来，开始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而不再是只有地域意识。约翰·亚当斯在1818年指出：“革命兴起于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心灵之中，发生在他们对待责任与义务的宗教感情的变化之中。”1973年，威廉·麦克洛克林附和亚当斯的看法，指出大觉醒是“美利坚民族认同感的开始，是革命的起点”。

第二次大觉醒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说，它也是“福音传道和奋进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第二次革命”。它的特点是循道宗和浸礼会教会大发展，同时形成了许多新的教派，其中包括“后期圣徒会”。这时，与怀特菲尔德相当的人物是查尔斯·芬尼。他吸收了数以万计的人入教，他宣扬“既需要信仰也需要工作”，因此“对改革产生了有力影响”。宗教的奋兴精神鼓动了大批大批的人努力争取社会改善和政治改进。正如威廉·斯威特所说：“各种社团纷纷成立起来，推进节欲事业，建立主日学校，在港口和沿运河救助遇难海员，反对吸烟，改善饮食，促进和平，改善监狱，制止卖淫，送黑人到非洲定居，振兴教育。”这次大觉醒的最重要产物则是废奴运动，它在19世纪30年代初声势大振，把废奴问题提上了国家日程，在随后二三十年唤起和动员了民众参加解放黑奴的事业。当这一

问题导致南北内战时，北方和南方的士兵都认为自己打仗是为了上帝的事业。当时宗教热情之高，反映在朱利娅·沃德·豪创作的《战歌》唱遍北方各地，歌的开头颂扬“我主降临光荣”，歌的结尾说耶稣“他为了让人们神圣而死，我们则要为了让人们自由而亡。上帝在前进”。

第三次大觉醒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直接与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这些运动充满了新教的道义精神，而且，与以前的改革时期一样，改革派强调道义上有必要消除体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他们攻击大公司垄断集团和大城市机器权力过于集中，在不同的程度上主张反托拉斯措施、妇女选举权、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投票权、罢免权、禁酒、铁路管制和直接初选。对这些改革的最强有力支持出现于中西部和远西部，即清教徒后裔所迁居的“大新英格兰地区”，在那些地区，清教徒的思想、社会和宗教影响居主导地位。艾伦·格兰姆斯指出，进步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普遍相信“在美国出生的白人的优越性、新教尤其是清教徒道德的优越性以及平民主义的优越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国家和城市机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器是受‘利益集团’的操纵”。

第四次大觉醒起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即“因信称义”的新教福音教派发展的时期。西德尼·阿尔斯特罗姆认为这次大觉醒“使人类风景（至少是在美国）起了深刻变化”。它与美国两次政治改革运动相联系。第一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焦点在于美国价值观与美国现实的最明显差距，即法律上和体制上对美国黑人的歧视和隔离。它随后导致对美国既定权力体制的全面挑战，集中表现于20世纪60年代对越南战争做法的抗议以及70年代对尼克松政府滥用权力的抗议。在某些场合，新教领导人和新教组织，例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起了核心作用。在另一些场合起重要作用的组织，例如“新左派”运动，虽纯属世俗运动，但道德主义精神同样很强烈。“新左派”的领导者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说过，他们的运动是“起于被奉为绝对道德

价值观”。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保守性质的改革运动，主要是认为有必要缩小政府权力和缩小社会福利计划以及减税，同时还试图扩大政府对堕胎的限制。

持异议的新教的精神不仅表现于美国国内政治，而且也表现于美国对外政策。大多数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例如实力、安全和财富。在迫不得已时，美国也是这样做的。然而，美国人也认为有必要在自己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以及在那些社会内部倡导他们在美国国内所追求的道德主义目标。建国之初，在1815年以前，开国先辈们经过辩论，主要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推行美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当时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极小的共和国，周围全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三大强国的领地，但这三大国当时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在欧洲彼此征战不休。美国当时与英法两国分别进行过几次未决胜负的战争，对西班牙的领地进行过军事干涉，又从拿破仑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而使美国面积扩大了一倍，在这些行动过程中，美国领导人证明他们自己能熟练地运用欧洲式的强权政治。拿破仑时代结束时，美国已经能够减轻自己对实力和安全的现实关切，在对外关系中主要追求经济目标，同时集中精力扩大和开发自己的领土。在这一阶段，正如沃尔特·麦克杜格尔所说，美国人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希望的乐土。

可是，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彼此相冲突的局势。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已无法忽视强权政治的现实。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美国不得不在世界上与其他大国进行紧张的竞争，而在此之前，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它并不需要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另一方面，美国成为大国，就有可能在国外倡导它在自己国内所树立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而在这之前，它由于力量薄弱和处境孤立，是无法在国外这样做的。一头是现实主义，一头是道德主义，如何摆好这二者的关系，成了美国20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核心问题。用麦克杜格尔的话来说，美国人将自己的

国家由“希望的乐土”重新定位为“十字军之国”。

第五章 宗教信仰与基督教

上帝、十字架与美国

2002年6月，由三位法官主持的第九联邦上诉法院在旧金山以2：1的表决结果裁定，忠诚誓言中的“under God”⁵ 二字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法官们说这两个字构成了“赞成宗教”，是“一神论宗教信仰的表现”。因此，1954年国会决定将此二字添入忠诚誓言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公立学校的教师作为国家雇员，在教室中可以不再诵读这一短语。持异议的那位法官则争辩说，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要求政府对宗教保持中立，这两个字“对我们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自由权的威胁充其量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

就这样，在关系到美国特性的一个中心问题上，该法院这一裁定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声称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在言辞上和物质上支持宗教，人们在宣誓效忠国家时不应该隐晦地声明自己信仰上帝。批评者则指出，这一短语与宪法制定者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就用过这一短语，最高法院早就裁定并不强迫任何人宣读誓词，何况艾森豪威尔总统正确地解释过这两个字不过是“重申宗教信仰在美国文化遗产及其未来所具有的超凡地位”。

对第九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述裁定表示支持的人，是言辞清晰但人数不多的少数。批评者则是愤怒和占压倒优势的多数，包括各党各派的人。布什总统称这一裁定是“荒谬的”。民主党参院多数领袖汤姆·达施勒说那是“胡扯”。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说那是“垃圾正义”。参议院以99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撤销该裁定。许多众议员集合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读誓词和高唱《上帝佑我美利坚》。《新闻周刊》举办的民意测验表明，87%的公众赞成保留那二字，反对的人只有9%。另外，84%的人认为在学校和政府建筑物等公共场合可以提到上帝，只要不提某一特定宗教即可。

这一项法院裁定尖锐地提出了问题：美国到底是一个世俗国家，还是一个信教的国家？赞成保留“under God”二字的人如此之多，这反映出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之一，尤其是与其他高度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相比，更是如此。美国人当然也容忍和尊重无神论者与不信教者的权利。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迈克尔·纽道博士打算“铲除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宗教的一切恶毒行为”。他说：“凭什么要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第九联邦上诉法院也说“under God”二字“会让不信教的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不是这政治社会的正式成员”。他们说对了：在美国社会，无神论者正是“局外人”。他们可以不信教，不诵读誓词，不参加他们所不赞成的任何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但是他们也没有权利把他们的无神论强加于所有信教的美国人，因为正是这些美国的信仰界定了美国是一个信教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统计数字说明它是的：经常有80%至85%的美国人自称为基督教徒。然而，政府通过许多方式一般支持宗教，与政府具体支持某一特定宗教（包括基督教），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问题1999年在爱达荷州首府博伊西变得突出了，因为有人对那里一块公有土地上耸立了43年之久的一个60英尺高的十字架提出了异议。别的城市中也有公地上的高大十字架，例如圣迭戈市的高43英尺的十字架和旧金山市的高103英尺的十字架。支持保留十字架

的人想把那公地变为私有（社团所有），也就是含蓄地承认政府不能公然支持某一种宗教的象征。对博伊西十字架提意见的布赖恩·克罗宁说：“对于博伊西市内的佛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不信基督教的人来说，这个十字架只会让他们想到自己是一个陌生地方的陌生人。”像纽道博士和第九联邦上诉法院那两位法官一样，克罗宁也是说到点子上了。美国是一个有着世俗政府的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不信基督教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看做陌生人，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先辈当年移居美国，就是来到了一个由基督教徒建立和栖息的“陌生之地”，恰似基督教徒到了以色列、印度、泰国或摩洛哥也会成为“陌生人”一样。

信教的人

美国人是非常信教的人，在历史上一贯是绝大多数信基督教。正如我们所知，17世纪来美利坚的定居者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宗教信仰。18世纪的美利坚人及其领导者是从宗教角度，主要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争取独立的革命。在美国，“圣经对文化的形成起了作用，这一点是欧洲无可比拟的……美利坚新教徒是在圣经原则之上团结在一起。”这场革命反映出他们的“上帝之约”，是“上帝选民”与英国“反基督分子”之间的战争。杰斐逊、潘恩及其他自然神论者和不信教者都觉得有必要凭借宗教信仰来证明革命的正义性。大陆会议曾宣布斋戒数日以探求上帝的宽恕和帮助，以及感恩数日以感谢上帝对他们革命事业的促进。进入19世纪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最高法院和众议院都在星期日举行礼拜仪式。《独立宣言》呼吁“自然之神”、“造物主”、“世界的最高裁判”和“上帝”赐予恩允，使他们得到合法性和保护。

宪法没有包含这类词句，是严格的世俗文献。但宪法的制定者相信，他们正在建立的共和制政府只有深深植根于道义和宗教，才能存

在下去。约翰·亚当斯说：“一个共和国只有由纯宗教或严格道义来予以支持。”他说圣经提供了“曾经或将会保持世界上一个共和国的唯一体系”；还说“我们的宪法只是为讲道德和信教的人民而制定的”。华盛顿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若无宗教原则，是无法保持国民道德的。”在美国颁布宪法后半半个世纪，托克维尔指出，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宗教是“为维持共和体制所必不可少的。这一意见不是只属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而是属于全体国民，属于社会每一阶层”。

宪法中没有出现“政教分离”的字眼，正如西德尼·米德所指出，麦迪逊没有谈欧洲式的“church”（教会）和“state”（国，政府），而是谈到“sects”（教派）和“civil authority”（世俗权力），说到它们之间的“界线”，而不是说二者之间隔着一道墙。宗教与社会是互相连接的。禁止设立国教和逐步取消州教，促进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发展。乔恩·巴特勒指出：“随着国家在教会的权力消退，各教派组织的权力扩大了。革命以后，基督教最重要的体制变化，就是宗教的权威从国家转向‘志愿’社团。由于这一转变，各教派组织出现大发展，用新的方式接触大量的个人和群体，对影响社会及其价值观有了新的信心。”

有些人说，宪法和第一修正案中都没有宗教的语言，这证明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世俗国家。没有比这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在18世纪末，欧洲各国以及美国若干个州都有宗教机构。政府控制教会，这是政府权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而国教反过来又给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制定美国宪法的先辈们禁止设立国教，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和加强宗教。“政教分离”是宗教和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如威廉·麦克洛克林所说，“政教分离”的目的不是确立摆脱宗教的自由，而是为宗教确立自由。这一点是很成功的。由于没有国教，美国人不但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信仰，而且可以自由地成立他们想要的宗教组织。结果，美国人成立的教派组织和宗教运动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所有这些组织和运动几乎全都是属于新教。后来，随着大批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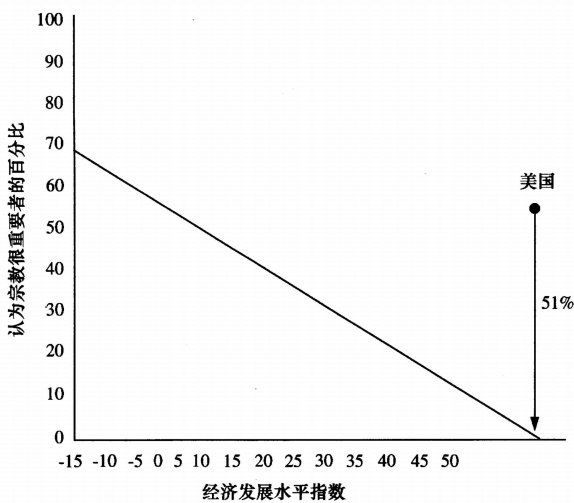
主教移民来美国，美国人就能将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又一教派而予以接受。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明确加入某一教会的人所占的比例一向是逐步增高的。

欧洲观察家们曾反复谈到美国人信教虔诚度高于他们本国的人。托克维尔又雄辩地指出：“我一到美国，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美国人宗教信仰之深，我待得越久，看到的这一新的事态所造成的巨大政治后果就越多。”在法国，宗教与自由是彼此对立的。可是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很成功地将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结合到了一起。”宗教在美国“应被看做是他们政治体制的第一项”。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德裔瑞士人菲利普·沙夫也指出了宗教在美国的重要地位，并以赞成的口气引述了一位犹太观察家的话：“美国是世界上最信教的基督教国家，这正是因为宗教在这里最自由。”沙夫说道，教堂多而且教派多，还有许多教会学校、传教活动、刊印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社团以及奋兴布道会，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多，凡此种种“都表达出人们普遍的基督教特点，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已领先于欧洲大多数老的基督教国家”。

在托克维尔和沙夫之后半个世纪，詹姆斯·布赖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美国人是“信教的人”，“宗教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大概超过任何别的现代国家，而且远远超过以前的所谓信仰时代”。“基督教的影响……在美国既巨大又广泛，看来超过西欧大陆各地，我觉得也超过英格兰。”在布赖斯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杰出的瑞典观察家冈纳·米达尔认为：“美国大概仍然是西方世界中最信教的国家。”在米达尔之后半个世纪，英格兰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形容美国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这样”；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美国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接着引述了林肯的言论，说明林肯是如何认识上帝对事态的影响，以及林肯是如何希望上帝支持联邦的事业。他接着评论说：“对于与林肯同时代的人，例如拿破仑第三、俾斯麦、马克思或迪斯累里，就

不可能这样去想象了。林肯这样做的时候，是确信他的美国同胞也会这样去想的。”

图5.1 经济发展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资料来源：Kenneth 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7.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现今仍确认他们的宗教信仰。在1999年一次民意测验中，当问到是否信仰上帝，或信仰宇宙精神，或两者都不信时，86%的人说信仰上帝，8%的人说信仰宇宙精神，5%的说两者都不信。2003年一次民意测验问到是否信仰上帝时，作肯定回答的人占92%。在2002—2003年的一项系列调查中，57%至65%的美国人说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12%至18%的人说不很重要。72%至74%的人说相信死后还有来生，17%的人说不信。1996年，39%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圣经真是上帝的话，句句要听；46%的人说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但不是句句都得听；13%的人则表示不信。

很大比例的美国人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在2002—2003年，63%至66%的人说自己是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的成员。38%至44%的人说

过去7天之内上过教堂。29%至37%的人说每周至少上教堂一次，8%至14%的人说几乎每周一次，11%至18%的人说大约每个月一次，24%至30%的人说一年有几次，13%至18%的人说从来不去。在2002—2003年，58%至60%的人说每天祷告一次或几次，20%至23%的人说每周祷告一次或几次，8%至11%的人每周少于一次，9%至11%的人说从来不祷告。鉴于并非人人说真话，以上统计数字无疑偏高，但即使打了一定折扣，宗教活动的水平仍然是很高的。属于教会成员的人数比任何其他组织成员的人数都高出一倍以上。美国人的慈善捐款中，42.4%是交给教会的，其数额比任何另一类捐款都高两三倍。据报道，任何一周内，上教堂的人都多于参加体育运动的人。

美国人信教程度深，所以瑞典神学家克里斯特·斯滕达尔说：“连美国的无神论者说话也带宗教味儿。”也许是这样，但在美国无神论者仅占人口10%，也许还不到10%，多数人对无神论不以为然。1992年，68%的美国人说，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信仰上帝非常重要或极其重要。这一观点在黑人 and 拉美裔人当中比在白人当中更加强烈。在对待各种少数群体的态度上，无神论者最不受欢迎。1973年一次民意测验曾问过“能允许社会主义者或无神论者在大学执教吗？”被调查的各群体领导人表示同意，而美国公众整个说来只同意让社会主义者执教（52%的人同意，39%的人不同意），但坚决反对让无神论者执教（38%的人同意，57%的人不同意）。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把选票投给少数群体产生的总统候选人，1999年一次民意测验表明，90%的人表示愿意投票给黑人、犹太人 or 女人，还有59%的人愿意投票给同性恋者，但愿意投票给无神论者的，仅有49%。看来，美国人仍然赞成开国先辈的观点，即美国的共和制政体需要一个宗教基础，因此，明确不信上帝和不信教的人很难被接受。

表5.1 宗教信仰 程度

(按7个问题的答案平均评比)

美国	1.7	挪威	11.0
北爱尔兰	2.4	英国	11.6
菲律宾	3.3	荷兰	11.9
爱尔兰	4.1	西德	12.1
波兰	5.2	俄罗斯	12.7
意大利	5.9	斯洛文尼亚	13.9
新西兰	8.0	匈牙利	14.3
以色列	8.3	东德	16.3
奥地利	10.6		

资料来源：

George Bishop,
 “What
 Americans
 Really Believe
 and Why Faith
 Isn't As
 Universal as
 They Think,”
Free Inquiry , 19
 (Summer 1999),
 pp.38-42.

信教程度如此之高，假若别国亦是如此，那也就不是多么重要的了。可是美国既是信教程度高，又是经济发展水平高，这跟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就很特别了。有三项跨国调查的结果表明了这一点。第一项调查表明，一般说来，宗教信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穷国人民宗教信仰深，富国则不是。图5.1中的斜线显示出这一点。这是对15个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等的国家调查的结果。按照这一斜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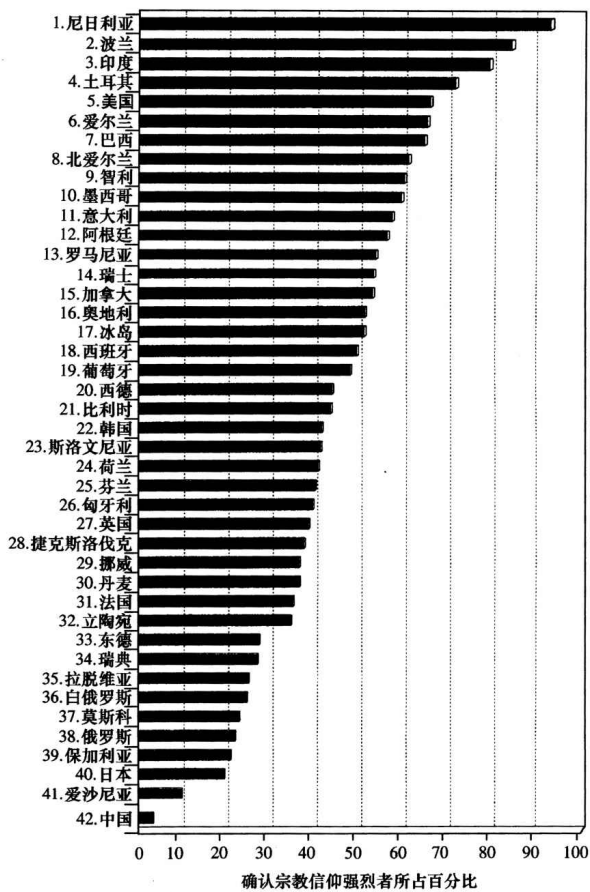
来推测，美国认为宗教“很重要”的人所占的比例似乎应该很低，仅在5%左右，可是调查结果却是美国这一比例高达51%（尽管这一数字还略低于我们上文中谈到的民意测验结果）。

第二项是“国际社会调查计划”1991年的调查。它对1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提出了七个问题，均涉及宗教信仰。在报道这项调查的结果时，乔治·毕晓普按照确认宗教信仰者在被调查人数中所占比例的高低，把这17个国家和地区排了队，见表5.1。在7个问题中，美国在4个问题上名列第1，在1个问题上居第2，在2个问题上居第3，平均评分1.7，遥遥领先。名列第2的是北爱尔兰，那里的人们分裂成新教和天主教两大派，宗教观念显然很浓。接下来是菲律宾、爱尔兰、波兰和意大利4个天主教国家，然后是新西兰、以色列、5个西欧国家，最后是4个前共产党国家，以东德殿后，它在6个问题上均居第17位（评分16.3）。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正是因为坚信天主教而与英国人对立，波兰人也是由于宗教信仰而在历史上与俄国人和德国人结仇，可是，在宗教信仰程度上，它们居然还不如美国深。

第三项调查是1990—1993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它在41个国家和地区就宗教信仰提出了9个问题。调查结果见图5.2。（应当说明的是，调查提的问题是统一的，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由不同的组织负责进行，因此调查结果的可靠程度可能高低不一。某些地方接受调查的人出于种种顾虑，例如不想得罪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政府当局，也许作出并不完全真诚的答复。）这项调查的资料说明，美国是世界上信教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波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外，美国人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的新教国家。信教程度居前15位的，有尼日利亚（被调查的唯一非洲国家），印度（以印度教为主）和土耳其（以穆斯林为主），8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一个东正教国家（罗马尼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严重对立的北爱尔兰，而以新教为主的只有居第5位的美国 and 居第15位的加拿大。除了冰岛（第17位）以外，其余以新教为主的

国家都落到了后一半的行列之中。因此，美国是信教程度最高的新教国家，直到20世纪末，仍保持着宗教改革的丰厚遗产。

图5.2 世界各地宗教信仰程度



资料来源：Graph prepared by James Perry from data in *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Political, Religious, Sexual, and Economic Norms in 43 Societies, Findings from the 1990—1993 World Values Surve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新教的美国与天主教

有两百年之久，美利坚人曾认为自己的特性就是反对天主教，将天主教徒视为异己，先是与之作战和加以排斥，后来是予以反对和歧视。然而，在新教的环境之中，美国的天主教吸收了新教的许多特点，最终同化到美国的主流之中。这一过程使美国由一个新教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新教价值观的基督教国家。

美利坚人最初的反对天主教的态度，一方面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时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来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英格兰人将天主教视为重大威胁的传统观念。英格兰长期与天主教的法国和西班牙交战，自视以新教立国。1609年议会决定禁止一切非新教徒获得英格兰国籍，以后又曾长期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1740年，议会决定在英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只许新教徒以及犹太人和贵格会教友入英国国籍，仍将天主教徒排除在外。

在英国人这种态度和措施的影响下，美利坚殖民地的人也以天主教为敌人。到1700年，除马里兰以外，美利坚各地的殖民政府均普遍禁止天主教活动，仅罗德岛和宾夕法西尼略有松动。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允许天主教在魁北克活动，美利坚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谴责这是向教皇妥协的行为，另一些人骂得更凶。独立战争期间的立法机构大陆会议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対英国议会这一法令提出抗议，认为它和茶叶税一样，威胁到美利坚人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革命战争开始后，美利坚人谴责英王乔治三世的“popery”（勾结天主教的行径）。由此而来的“popist”（勾结天主教分子）一词在美国人心中就如同20世纪的“communist”（共产党人）一样，成为可以扣到任何敌对者头上的一顶帽子。然而，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起义者很快减缓了反天主教的态度。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避免了正面攻击英国议会的魁北克法令，因为当时希望加拿大的天主教徒也参加争取独立的战争。1778年起义者与法国结盟，更使美利坚精英分子的态度大有转变。尽管民众中间仍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美国的

宪法还是规定了担任公职者不受宗教限制。随后，各个州的宪法也相继取消了宗教限制，只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宪法仍规定凡不承认“新教真理”者不得担任公职，这一规定在19世纪还保留了很久。

由于独立前的各殖民地法律对天主教施加严格限制，天主教徒大多不敢移居北美。这里天主教徒人数极少，不得不与新教徒通婚，因此在18世纪天主教徒在美利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可能是下降了。1789年，天主教徒约仅占美国人口的1%，犹太人更少，约1‰。因此，当时美国人自己以及欧洲人都把美国看做是一个典型的新教国家。菲利普·沙夫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访问美国，就看出了这一点，说新教“赋予这个国家以精神和特点”。

1815年后，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步伐加快，开始冲淡清一色新教的状态。在19世纪20年代，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共6.2万人。19世纪40年代，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将近80万人。19世纪50年代，95.2万人来自德国，91.4万人来自爱尔兰。爱尔兰裔移民90%是天主教徒，德裔移民中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这些人的大量涌入又激起了原先的新教居民的反天主教情绪。他们本来以反天主教者自居，这时觉得是敌人入侵了。此时恰值第二次大觉醒，正如佩里·米勒所说：“对天主教的担心成了奋兴运动的一种强迫症。”这种反天主教情绪与其说表现在宗教，不如说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上。人们把天主教看做是一种专制的、反民主的组织，认为天主教徒习惯于等级制和俯首听命，缺乏共和国公民所必需的道义品质。他们认为天主教不仅是对新教的威胁，而且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威胁。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反天主教的活动日益加剧，其中包括1834年烧毁了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市的一座天主教堂。在19世纪40年代移民剧增以后，反天主教者于1850年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叫做“星条旗会”，即人们所说的“一无所知党”。19世纪50年代中期，“一无所知党”选出了6名州长，控制了9个州议会，在国会中有43名众议员。他们在1856年推举的总统候选人米拉德·菲尔莫尔得到了

22%的民众选票和8张选举团选票。但此后人们对蓄奴制的争论加剧，转移了原先对移民问题的注意力，“一无所知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也就消散了。内战标志了公开反天主教政治运动的完结，各级政府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这时也消失殆尽了。然而，美国社会中仍有许多人对天主教抱有强烈的社会偏见和政治偏见。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当局就曾号召美国民众把古巴从“教皇把持的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公开反天主教的态度和活动逐渐消退的同时，天主教在这里也逐渐美国化，二者是直接相关联的。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在一个层次上，这涉及天主教建立一个庞大复杂的机构网络，包括教堂、修道院、神学院、慈善会、联谊会、政治俱乐部和学校，它们的作用从近期看是让新来的移民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从长期看则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升迁之阶，尤其是为他们的子女进入更广泛的美国社会提供踏脚石。在另一个层次上，这涉及天主教适应美国的环境，即新教环境，包括天主教改变自己的态度、习俗、组织和行为。实际上，这就是由罗马天主教转变为美国天主教。

整个19世纪，天主教上层人士中间一直在激烈辩论“美国化”的优缺点。天主教的主教们普遍地——但并非一致地——致力于把美国精神和天主教精神结合起来，使天主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存在得到新教美国人的认可。这些“美国化派”的论点，用大主教约翰·爱尔兰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会与美利坚之间没有冲突……天主教会的原则与共和国的利益是完全和睦融洽的。”反对美国化的人则认为美国化会导致天主教的腐败，滋生最恶劣的现代主义、个人主义、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但1899年1月教皇利奥十三世致信美国红衣大主教吉本斯，即发布“教皇通谕”，谴责“美国主义”谬误，等于是严厉批评吉本斯红衣大主教、约翰·爱尔兰大主教及其他的“美国化派”，但信中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使得美国的天主教会内两派的争论达到最高潮，但也使这场争论随之告终。

有的群体，尤其是从德国移民而来的天主教徒，曾抵制美国化，力图让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保持不变。然而，同化是阻挡不了的。天主教会的“非罗马化”还是发生了，天主教徒们日益感到自己是美国天主教徒，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到20世纪中期，天主教一些领导人，例如主教富尔顿·希恩和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都已成为热情的美利坚民族主义者，而且爱尔兰裔美国人当中的一些天主教徒成了美国爱国者的典型。正如彼得·斯坦菲尔斯所指出的，1943—1945年3年之内，有4部描写天主教徒爱国事迹的故事片赢得了34项奥斯卡奖提名，获12项奥斯卡奖，影片中的主人公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到1960年，爱尔兰裔的约翰·肯尼迪还当选了总统。

天主教徒们对自己的美国国民身份感到自豪，对自己的教会美国化而成为美国社会一支重要的和有影响的力量感到骄傲。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不喜欢别人说他们的教会“新教化”。可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化”的意义正在于此。美利坚社会源于新教，新教居压倒性主导地位已两百多年，新教价值观和观点在美国文化和社会中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作为后来者，又怎么能不适应这环境呢？天主教的新教化，也不是唯独美国才有的。正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认真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后所指出，在历史上先受新教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中——除美国外还有德国、瑞士和荷兰——天主教徒的价值观都更近似于其新教同胞的价值观。“这些社会内部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价值观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今天荷兰的天主教徒几乎与荷兰归正宗教友一样持有加尔文主义观点。”

在欧洲，新教是向早已稳居统治地位的天主教造反。在美国却有不同，正如菲利普·沙夫所说，是天主教来到一个新教社会，“作为诸教派中的一派”，“处处陷于纯新教体制的包围之中”。巴尔的摩勋爵创建的马里兰殖民地在早期被认为是天主教的，但“却是建立在彻底反罗马的、新教的宗教宽容的原则基础之上”。在19世纪初期，正如威尔·赫伯格所说，天主教“建立了一套非常接近于新教普遍模式的教会

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叫做“平信徒理事会制度”，确立了非神职人员在宗教团体管理方面的权利。1829年，巴尔的摩市的天主教公会拒绝这一制度，但主教会议再次确认这一制度必须实施。这件事表明天主教会受到了压力，需要适应美国的新教做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据多萝茜·多亨报道，“大主教爱尔兰和红衣主教吉本斯在他们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曾要求信徒接受新教道德（他们的提法是要养成‘美利坚的’一些美德，如节制饮酒、勤俭、有进取心）。”

新教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天主教上层人物把天主教普世主义与美利坚民族主义调和在一起。他们仿效“因信称义”的新教徒的思想、言语和腔调，声称美国在世界上的使命具有神授的合法性。大主教爱尔兰在1905年说：“我们不能不信美国被授予一项使命……带来新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使命……教会在美国得胜，天主教的真理将在美国影响的翅膀上飞翔，飞遍全球。”在20世纪中期，主教席恩以类似的方式谈到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定的民族，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则如一位学者所说，“公开将美利坚民族的判断和行动认同为上帝的判断和行动……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完全承认了美利坚的救世使命。”一位来自非洲的观察家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美国的天主教徒令罗马烦恼，就因为他们……啊，如此像新教徒。”在这方面，天主教跟犹太教或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宗教不论正式名称是什么，都明显是新教性质的。”

基督教的人

美国人总的基督教信仰也给外国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基督教对人们的灵魂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因此，基督教的统治毫无障碍，得到普遍同意。”布赖斯同样指出，基督教是美国人的“全国性宗教”。美国人也确认了自己的基督教特性。最高法院1811年宣布：“我们是基督教的人

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853年说：“我们是基督教的人民，几乎全国民众都属于或是同情基督教的某一教派。”在内战期间，林肯也说美国人是“基督教的人民”。1892年，最高法院再次宣布“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民族”。1908年，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共和体制永存的最好的和唯一的依靠，就是基督教爱国主义”。1917年，国会通过立法规定了祷告日，以支持战事，显出了美国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地位。1931年，最高法院重申“我们是基督教的人民，彼此皆有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心怀敬意地承认我们服从上帝意志的责任”。1873年，有人问前耶鲁大学校长西奥多·德怀特·伍斯利：“从什么意义上讲，这个国家可以叫做一个基督教国家？”他给了一个准确的回答：“肯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即全国绝大多数人都信基督教和福音书，基督教的影响是全面普遍的，我们的文明和学识文化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我们的体制都如此调整，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徒看来，是要为推广和繁荣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道德而提供最好的希望。”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人数比例随时间而有所变化，但总的说来，基督教徒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是相对稳定的。1989年至1996年期间的3次调查表明，有84%至88%的美国人称自己为基督教徒。这一比例相当于或超过了犹太教信徒在以色列人口中的比例、穆斯林在埃及人口中的比例、印度教徒在印度人口中的比例以及东正教徒在俄罗斯人口中的比例。但是，有人对于美国的基督教特性提出两点怀疑。一，有人说美国正在失去其基督教特性，因为别的宗教的人数在增加，所以现在该说美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二，有人说美国人正在失去其宗教特性，变为世俗的、无神论的和实利主义的，对宗教遗产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实际情形。

上述的第一种说法是几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的，他们指出美国社会中，非基督教的其他教徒人数增多了。印度教徒在1977年为7万人，1997年达到了80万人。1997年，穆斯林至少

有350万人，佛教徒则在75万人至200万人之间。因此，用戴安娜·埃克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宗教的多样性”已经“粉碎了”美国绝大多数人为基督教徒外加少量犹太教徒的那种“美国模式”。另一位学者建议根据宗教多样化的形势，改变节假日全按基督教节日安排的做法，一开始不妨只保留一个基督教节日（如圣诞节），而取消复活节和感恩节休假，改为一个伊斯兰教节日和一个犹太教节日。但实际情况却是向相反方向发展，例如，每年12月的犹太教“光明节”本来并不是犹太人的重大节日，但犹太人现在却把它变成“犹太教圣诞节”，以便适应社会的主流文化。

其他宗教信徒人数的增加，从轻里说，并没有对美国的基督教特性产生重大影响。犹太教徒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20世纪20年代为4%，到50年代降到3%，到1997年又降到略高于2%。美国的穆斯林人数，如果他们的代言人说的数字是准确的，在1997年只占人口的1.5%。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均不到1%。他们的人数还会增加，但若若干年内肯定还是只占很小的比例。它们的教徒固然有皈依者，但绝大部分是来自新的移民和高出生率。这些宗教的新移民人数仍远远不及从拉丁美洲和菲律宾来的新移民，而后两者几乎全是天主教徒，出生率也高。拉美裔移民中，还有些人皈依了新教。此外，来自亚洲和中东的移民当中也有许多人是基督教徒。到1990年，亚洲裔美国人大多数是基督教徒，而不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在韩裔美国人当中，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人数之比为10：1。来自越南的移民约有1/3是天主教徒。尽管“9·11”之前来自中东的移民曾增长迅速，但阿拉伯裔美国人当中，仍有2/3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穆斯林。当21世纪开始时，虽尚无精确统计，但大概仍可以说美国的基督教特性是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

其他宗教的信徒虽然人数少，但在增多，这就提出了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问题。美国人总的说来是力图容忍和通融其他宗教的活动。美国的基督教信念、新教价值观以及宪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保

证都意味着，非基督教的宗教群体可以自由地活动和传教，事实上通常也做到了这一点。1860年，安东尼·特罗洛普注意到在美国“人人都必定信教，但信哪一个宗教都行”。几乎百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说：“我们的政体若不是建立在深厚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便毫无意义。但我并不在乎那宗教是什么宗教。”既然社会普遍容忍宗教的多样性，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也只能承认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接受这一现实。这社会中，他们只占很小的少数，压倒多数都信基督教。欧文·克里斯托尔指出过：“美国人一向自认为是一个基督教民族，其他的宗教只要遵循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道德，都同等地得到容忍。但平等的容忍绝不意味着实际地位平等。”基督教不是国教，“但却是非正式的国教”。

然而美国人仍然信仰和奉行基督教吗？从前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即人们的宗教信仰逐渐淡化并最后消失，而被世俗的、即便不是反宗教也是非宗教的文化所取代吗？这一点可以说明美国知识界、学术界和传媒界某些精英人士的态度，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并不能说明美国人民的主流。有一个变化，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天主教徒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下降了。1952年，83%的天主教徒说宗教在他们生活中很重要。1987年，持同样态度的天主教徒减到54%。这一变化使得天主教徒对宗教的态度更接近于新教徒。

除此以外，在20世纪后半期并没有什么别的变化。多次调查结果表明，认为宗教很重要的人数在20世纪60—70年代一度有所降低，以后又有回升。安德鲁·格里利对民意测验的数据作了透彻分析后指出：“只有3项指数显示下降——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捐款数以及对圣经字面信仰程度。这3个方面的下降均仅限于天主教徒。”

在美国历史上，各种统计数字也有过波动，但总的看来，基督教信仰程度始终是很高的。1775年至1845年，美国人口增多近10倍，而基督教的教职人员增加得更快，按人口平均计算，从每1500名居民一名教职人员增加到每500名居民一名教职人员。基督教团体的会员

人数增长也很快。据多次调查统计，教会团体正式会员在人口中的比例，1776年为17%，1860年为37%，而1980年已至62%。在21世纪开始时，美国人的基督教特性并不低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很可能还是比过去更高。

公民宗教

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宗教……是与国民种种习俗和爱国主义热情交织在一起，因而形成独特的力量。”宗教与爱国主义相交织，就表现为公民宗教。在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贝拉指出，从美国人民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世界现实和超凡宗教现实的真正理解，这就是公民宗教的最佳表现。公民宗教使美国人得以将世俗政治与宗教社会结合在一起，使宗教信仰与爱国精神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互相支持和印证。

美国公民宗教包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美国的政体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它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开国前辈制定宪法时就指出，只有当人民充满宗教信仰和道德时，他们创立的共和政体才能持久。后来历代的美国领导人都对此表示赞同和加以重申。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指出我们的体制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说：“承认上帝的存在是美国精神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没有上帝就不会有美国式的政体，也不会有美国的生活方式。”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向美国社会 and 政体的根本原则挑战。

第二，相信美国人是上帝“挑选的”——或者如林肯所说，是上帝“几乎挑选的”，相信美国是“新以色列”，担负着神授的在世界上行善的使命。公民宗教的核心，如康拉德·切里所说，就是“意识到美国

负有上帝授予的特别使命”。开国先辈为共和国挑选的拉丁文国训就是：*Annuit Coeptis*（上帝赞佑吾人基业），*Novus Ordo Seclorum*（新制万年），还有*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

美国公民宗教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宗教言辞和象征遍布于美国公共言论和礼仪之中。总统宣誓就职时总是手抚圣经，宣誓末尾总说“愿上帝助我”。除了华盛顿第二次就职时的两段简短演说以外，所有的总统就职演说中都谈到了上帝。其他重大演说亦大抵如是。有些总统，尤其是林肯，演说中充满宗教感情和圣经语录。美国的钱币，包括纸币和硬币，除了印有“美利坚合众国”以外，再有的唯一一句就是“我们信仰上帝”。重大公共仪式开始时由一个教派的教职人员念祈祷，结束时再由另一教派的教职人员念祝福祷文。军队里配有大量牧师。国会每天会议开始时都先做祷告。

第四，国家重大典礼和活动本身具有宗教气氛，并履行宗教功能。正如劳埃德·沃纳所说，阵亡将士纪念日向来就是“美国的一个神圣的仪式”。庆祝感恩节的活动，以及总统的就职典礼和葬礼，均是如此。独立宣言，宪法，权利法案，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肯尼迪的就职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演说，都成为表明美国特性的神圣文献。

彼得·斯坦菲尔斯对比尔·克林顿1993年总统就典的报道，生动体现了宗教与政治在公民宗教中的结合：

核心是手抚圣经的庄严宣誓，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是祈祷，伴随着国歌和爱国歌曲的音乐……

这一个星期充满了宗教色彩，有些场合，宗教色彩虽然不是公开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这一星期的正式开始是全国教堂鸣钟。在哈佛大学，比尔·克林顿援引了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复述了他的教导，还引述了圣经，就职演说也以引述圣经作为结束……

整个这一天，总统周围都是一批宗教领袖。

这绝不是一个世俗社会的典礼，更不会是一个无神论社会的典礼。正如英国学者D. W. 布罗根所指出的，在过去，当学校的孩子们天天朗读《美国信念》时，他们都是作宗教练习，如同每天清早说“我信仰全能的上帝”或“只有一位上帝”一样的真诚。公民宗教把许多教派的信仰宗教的美国人转变为具有一个宗教灵魂的一个民族。

这是美国的宗教，但它是什么宗教呢？这宗教包括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以及其他的非基督教的宗教，甚至还包括不可知论者。然而，从它的根源、象征、精神、饰物来看，最重要的是从它对于人性、历史和是非对错的基本见解来看，它又是具有深刻基督教性质的宗教。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的文献，圣经的典故和譬喻，在公民宗教中处处表现出来。贝拉指出：“在公民宗教后面处处都是圣经的范型，如‘出埃及’‘应许之地’‘新耶路撒冷’‘为救民而牺牲’和‘复活’。”华盛顿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康拉德·切里有同感，指出：“公民宗教的象征、信念和礼仪的最深源泉均在于《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美国的公民宗教是无教派的、全国性的宗教，在它的明确形式上并不公开表现为基督教。然而它在源泉、内容、见解和声调上，却完全是基督教的。美国货币上说的美国人信仰的“上帝”不言而喻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但是，在公民宗教的言论和仪式上，有一个名字是不会出现的，那就是“耶稣基督”。⁶ “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

第六章 国民意识的出现、胜利和消损

民族国家的脆弱性

自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西方的重要特征。在20世纪，它们成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一个关键问题。以赛亚·伯林在总结民族主义问题时指出：“国家至上的要求是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国家的存在、目的和历史才让个人得以存在，让个人的所作所为具有意义。”约翰·麦克同样指出：“世上只有很少的事情能让人们去杀人或甘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挺身而出，即是其中之一。”然而，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固定的和永远不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同属一国时，国家才会存在，而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有高度可变性的。此外，与人们的其他义务感相比，他们对国家的义务感的轻重分量也可能有很大变化。如同第二章中所述，欧洲各国政府往往不得不花很大工夫让它们管辖的人们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建立万众一心的国民同一感。国民身份，如同其他的身份一样，是可建可拆、可升可降、可要可不要的。有的人对国民身份看得重，有的人却看得轻，同一个人心目中国民身份占多大分量，也会随时间而有所改变。20世纪后期的历史充分证明，国家和民族国家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可立可废的。与许多欧洲民族相比，美利坚民族更是一个脆弱的

和历史不长的结构。

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美利坚人⁷心目中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认同感的分量经历过四个演变阶段。其中只有一个阶段，美利坚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升到了其他身份之上。最初，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生活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自由的人们在人种和民族属性、政治价值观、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大致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不列颠诸岛上的人相同。到18世纪中期为止，他们是认同于他们各自定居的地方，如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纽约、马萨诸塞等地，他们的忠诚感局限于所在地域，在更广层次上则是效忠于英国王室。只是到了独立战争前二三十年，美利坚人身份感才开始出现。以上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美国独立了，亲英分子被驱逐出境，再没有人声称自己是英国人了，但人们地方观念突出，州公民身份有很重分量。彼此竞争的地方身份、南北身份、党派身份变得日益重要，1830年以后尤其如此，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身份却日益成为争议的问题。第三阶段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国民身份的最高地位牢固确立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胜利时代。但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国民身份的最高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他们与自己原先的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具有双重国籍甚至双重公民身份，对国家的忠心也是双重的。许多美国人日益重视自己的人种和民族属性、性别及各种文化的特性。知识界、政界和商界的一些精英人士日益贬低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将各种跨国身份或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放到更优先的地位。这就是第四个阶段。

“9·11”事件使上述第四阶段突然告终，国民身份的最高地位在几乎所有美国人心目中得以恢复。但两年以后，国民身份的首要地位又在下降之中。可以设想的是，这一过程继续下去，第四阶段那种局面会再度出现。或者，由于人们看到了美国又容易遭受袭击，需要大力确保本土安全，认识到美国是生存在一个大体上不友好的世界之中，这样就会更加关心国家的安危，从而使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进入一个

新的不同的阶段。

创建美国特性

1760年1月，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欢呼英军将领乌尔夫在亚伯拉罕平原击败法军，他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英国人”。但在1776年7月，富兰克林在《独立宣言》上签名，抛弃了他的英国国民身份。这几年之间，富兰克林使自己从英国人变成了美国人。他不是孤立的，18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大量的北美定居者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尽管他们的忠诚更多的是献给自己所在的州和县。这是一场迅猛的和引人注目的集体身份转变，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重要者有以下几点。

第一，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觉醒”，如第四章中所述，使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定居者有史以来头一回走到一起，有了共同的社会、情感和宗教经历。这是一场真正的美利坚的运动，使人们心中萌发了跨殖民地的意识、观念和主题，它们先产生于宗教的背景，随后转到了政治的背景。

第二，在1689年至1763年这74年当中，有一半时间，美利坚人跟随英国人对法国人及其印第安人同盟者打了5次战争。即便是在英法两国和平相处时，美利坚人仍在对印第安人进行较短的、局部的、但依然是流血的武装冲突。这些战争本身并没有促进或阻滞美利坚意识的形成。据理查德·梅里特分析，在殖民地报纸上，“美利坚人”的称谓曾在几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即1739—1742年的“詹金斯之耳”战争、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几次战争或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8 的开始时期出现过热潮，在战争过程中渐渐冷了下去，而在战争结束时又稍有回升。但这些战争使美利坚殖民者有了共同的经历。他们的定居点遭受过袭击，有时还被占领、洗劫和摧毁。战争和战争威胁成了他们不得不经常面对的现实。通过这些战争，美利坚殖民者学会了

成功作战的本领，掌握了组建民兵的能力，在军事上树立了自信心，还学会将自己的行动跟英军的行动以及敌人的行动加以对比，汲取经验。战争造就国家，正如S. M. 格兰特所说：“战争是美利坚民族经历之中的核心。”

第三，由于战乱连年，尤其是七年战争之后（它在北美实际上打了9年，1754—1763年），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北美殖民者征收种种新税，以负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战争费用，并加强北美殖民地财政收入的集中管理，还要在各处殖民地长期驻军，让所在殖民地负责驻军的开支。这些措施引起了殖民地定居者的抗议和反对，他们先是个别行动，然后逐步发展成集体行动。最先，1764年，在马萨诸塞发生了第一次联合政治抗议，1765年又出现“自由之子”联合行动和“印花税法会议”，1773年出现了一些“通信联络委员会”，1774年则出现了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大陆会议”。英军的一些行动，尤其是1770年屠杀抗议群众的“波士顿惨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英国统治者的愤怒和反抗。

第四，各殖民地之间的通信联络日益加强，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梅里特研究了当时5个城市的报纸后指出：“这些报纸刊载的各殖民地之间的新闻量，从18世纪3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增加了6倍以上。”他指出殖民地民众对英国政府举措的反应，“最初是孤立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但是，随着殖民地之间通信联络逐步改善，而且人们日益关注整个美利坚社会的动态，一地发出的不满声音就能在北美大陆各地激起回响。”

第五，北美有广袤的肥沃土地。人口增长迅速，商贸日趋兴旺，造就了一批新的农工商精英，人们普遍看到发财致富的机会，而对比一下他们祖国阶级对立严重、民不聊生的苦境，他们更是感慨万千。尽管他们当时还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但他们已感到大英帝国未来的中心会是美利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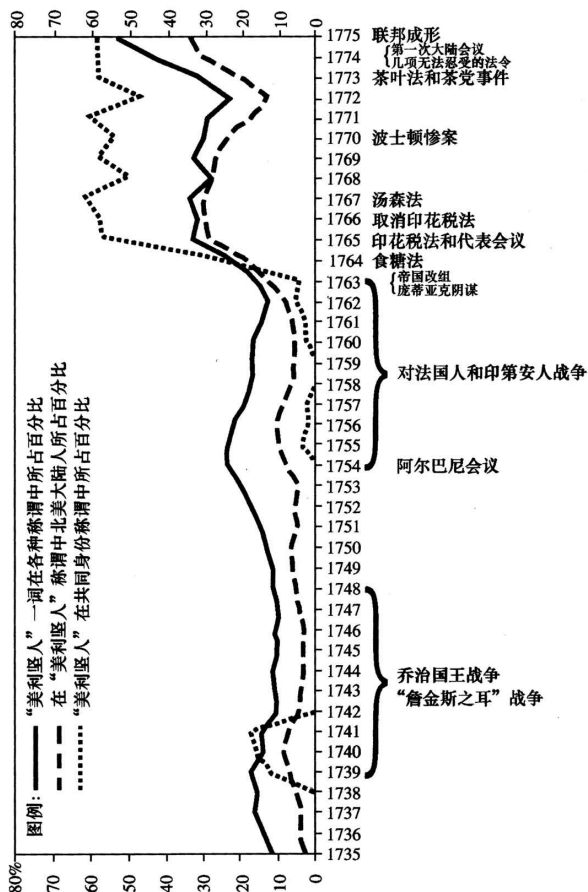
最后，当一个社会内部的人们还只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别而尚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时，外界的人往往会先看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把他们视为一个集体。最先将北美殖民者视为一个整体的，就是仍在英国的英国人。约翰·默里指出：“英国人当时就对这个整体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不了解各个局部的情形；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演化出一个整体的名称，即美利坚……总之，美利坚是英国人想出的概念。”梅里特研究当时北美殖民地报纸后，也证实了默林的判断是对的。从1735年到1775年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威廉斯堡和查尔斯顿5个城市的主要报纸上刊载的文章表明，最先将这片土地称做“美利坚”、将这里的人称做“美利坚人”的，是英国的作者，而不是美利坚本地的作者们。

以上这些事态发展促成了“美利坚人”身份的出现。1740年以前，“美利坚”一词还只是用于这一地区，尚无这样一个社会的意思。但1740年以后，这里的殖民者自己和别处的人就开始谈论“美利坚人”如何如何了。“詹金斯之耳”战争时，英国方面的参战者已有“欧洲人”和“美利坚人”之分。“美利坚”意识发展很快。据麦克朗·弗莱明考证，“有证据表明，有别于英国人的美利坚人这一群体的概念出现于1755年以前，到1766年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在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利坚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集体身份。美利坚人意识在1763年发生了大爆炸似的大发展，见图6.1（此图是梅里特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而绘制的）。

在欧洲，立国的过程是政治领导人先建立一套国家机器，然后力图让他们所要统治的人民建立国民意识。美国的立国过程则与此不同，是先有集体的经历，各界精英中又涌现出领导人，在民众中间建立了“美利坚人”共同意识，再为独立而战，赢得了独立，这时才建立最低限度所必需的中央政治机构。在整个19世纪，来美国访问过的欧洲观察家都认为，这一点中央政治机构实际上还没有构成欧洲意义上的“国”（state）。

图6.1 美利坚人群意识发展曲线，1735-1775年

(利用“移动平均数”作比较)



资料来源：Richard L. Merritt, *Symbols of American Community 1735—177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4. Copyright Richard L. Merritt.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国民身份与其他身份

美国革命的胜利对美国人的身份来说有两大后果。第一，横渡大西洋到北美定居的这些人再也不可能以英国人自居了，或自称为英国

殖民者或英王陛下的臣民。然而，正如亚当斯所指出过的那样，思想上、心灵上也发生了革命的，还只是一部分人。亚当斯估计还约有1/3的人仍忠于英国王室。英王统治失败了，这些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英国人身份，否则就得迁走。其中许多人还没有机会作选择就被迫出走了。迁到加拿大、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亲英分子共约10万人，他们的财产都被各个州的政府没收了。经过这样的事态之后，美利坚重新统一到英国的可能性即不复存在了。第二，独立战争胜利了，美利坚人不得不与之作战的敌人撤走了。这样一来，视美利坚国民身份重于一切并首先依意识形态确定身份的主要理由也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一个漫长时期中，国民身份的地位受到了地域身份、州籍身份和党派身份等其他身份的反复挑战。

革命使殖民者成了美国人，但没有造成人们的国民同一性。这一问题是不是一直存在到1865年，是可以讨论的。《独立宣言》没有提一个美国，而是提到“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自由和独立的各州”）。制宪会议的成员们在工作之初就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定，不在他们起草的文件中使用“national”（“全国的”）一词，并且用“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直译为“联合的各州”）代替“全国政府”。参加制宪会议的厄尔布里奇·格里总结过这种含糊不清的状态：“我们既不是同一国的国民，又不是不同的几国的国民。”1792年，费希尔·埃姆斯走得更远：“我没有感觉到我们是一个国家（nation），一个州（state）才是我们的国家（country）。”杰斐逊亦有同感，常常把弗吉尼亚说成是他的“nation”，不过他担任国务卿时，曾经把法国和美国并称为政体不同的两个“nations”。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内战时期，南方人拒不承认南北同一国家。约翰·卡尔霍恩1849年宣称：“在谈到 the United States 时，我从来不用‘nation’一词，我总是称它为‘union’（联邦）或‘confederacy’（邦联）。我们不是一个 nation，而是平等的和拥有主权的各州（states）结成的联邦或邦联。即使强烈主张全国统一的约翰·马歇尔在19世纪初说话也很小心：“在许多方面，而且为了许多目的，美利坚都作出了选择而成为一个 nation。”反

对一国论的人则强调，当初独立的各州代表一致同意成立的，是一个“union of states”，而不是一个天下一统的nation。主张维护全国统一的人士，如安德鲁·杰克逊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只是笼统地呼吁维护“the union”，而不用nation一词。

在建国之初，包括一些开国元勋在内的许多人都拿不准这个union能否长期存在下去。麦迪逊认为没有问题，但多数人认为只有小国才能保持共和制，而美国太大了，它也许会改变为君主制，或者是分裂成若干小国。杰斐逊认为有可能分裂成一个大西洋联邦和一个密西西比联邦。正如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所说，当时人们对能否保持全国统一，“毫无把握”。说英语的美利坚也许会像说西班牙语的美利坚一样四分五裂。

从美国革命到内战这一段时期，国民身份与州、地区、党派等方面的身份处于竞争的状态。1830年以前，国民感情曾占一定优势。华盛顿在世时，是深受全国人敬仰的人物，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国家统一的象征。在开国先辈当中，只有他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爱戴，他逝世后仍受大家尊敬。1810年大选中主战“鹰派”获胜，人们期待征服加拿大，英国干扰美国航运激起美国人愤怒，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使人们的民族主义高涨，超出了新英格兰范围，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尤其是杰克逊在新奥尔良取得的胜利，再次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最后一轮民族主义激情出现于1824—1826年，曾在美国革命中荣立战功的法国将军拉斐德1824年到美国周游全国各地，如一位学者所说，激起的美国民众欢庆之情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18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50周年，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两位开国元勋在这同一天逝世，使民众这一轮爱国激情达到最高潮。这三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从统计学上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觉得这只能是上天的安排，表明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

然而在此期间，其他的身份也跟国民身份激烈竞争，往往还有压倒后者之势。1803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的代表曾开会策划成立

邦联，脱离合众国。1814—1815年又发生过同样的活动。1807年，曾任副总统的阿隆·伯尔被控阴谋策划阿帕拉契亚山脉以西各州脱离合众国。1799—1800年，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先后作出决定，宣布州政府有权“废除”合众国政府制定的法律。此后直到内战为止，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党派斗争直到1815年也很严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各自代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还各自支持法国革命战争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连每年7月4日的国庆活动，两党也是各干各的，走不到一起。这表明他们将党派属性置于国民属性之上。

正如贝内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国家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群体，更具体说，是一种存在于记忆之中的群体，一种具有想象得到的历史的群体，由它的历史的记忆予以界定。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没有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这历史珍藏在国民的共同记忆之中，人们记得本国历史上的盛衰荣辱，它经历过的战争和敌人，它有过的英雄和坏人。按照这一标准来看，在19世纪初期，美国还够不上成其为国家，还没有国民共同记忆的历史。丹尼尔·布尔斯廷指出：“至少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历史还只是由各个州的历史所组成。各个州和地域的历史显得是首要的，而合众国的历史却显得是人为的和派生的。”各个州和各地区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历史学会，而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却成立不起来。有的学者想写出全国历史，只得把各地区的英雄抬升到国家英雄水平。

内战之前唯一的重要而全面的、由美国人写出的美国史，是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巨著《合众国史》，分10卷从1834年至1874年出齐。头9卷谈的都是从最早期从欧洲来的定居者到美国革命的事情。班克罗夫特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使命就是促进人的自由。这部著作大受欢迎，布尔斯廷说，班克罗夫特此书成了当时进行美利坚民族精神教育的“权威”，这正是因为当时“国民生活中，美利坚民族精神很薄弱，而彼此相冲突的地区观念却很盛行，对国家的意义和使命的认识很模糊和混乱”。然而，尽管班克罗夫特此书很有影响，“但直到内战结束以

后才开始出现全国对美国历史的正常的历史观。”布尔斯廷说，班克罗夫特是“一位杰出的‘国史’先行者，他描写的国家（country）是尚未成为一个nation的地方”。

1830年以后，地域观念和再度盛行的党派观念压倒了国家观念。约翰·博德纳尔认为：“一心一意的爱国主义和国家团结精神于1825年达到顶峰。”威尔伯·泽林斯基也认为美利坚民族主义于1824—1826年升到一个高点，随后即迅速下落。博德纳尔说，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的特点是“经济增长和民主党势力的崛起引起了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地区矛盾的加剧”。这时爱国主义受到了更严重的竞争，“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是纪念本县、本州、本地区的过去，以至于……1832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都很难得到足够的公众支持。”琳·斯皮尔曼也谈道：“地方观念和地区观念盖过了国家观念。分裂和局部化受到激励。”甚至在內战期间，“双方的兵都基本上是从地方的角度看待兵役。”

国民身份的地位在內战前30年来如此低，与美国人所处环境的两个重大变化有关系。第一点当然在于，废奴运动的出现、南北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疆域的大力向西扩张，都把奴隶制问题提到了国家日程的首位。第二点则在于，19世纪20年代前，美国的安全受到欧洲三大强国的威胁：北面和东面是英国人，西面是法国人，南面是西班牙人。但是，美国收购和攻占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把持的大片土地，通过拉什—巴戈特协议和门罗主义而与英国人达成了妥协，美国所处的形势变了，此后一个漫长的世纪中再没有强敌威胁自己的领土、安全和生存。但仍然还有两个敌人。一是印第安人，他们继续不断地跟美国人打仗，一直打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是向西开拓边疆的美国人的主要敌手，但并不是整个美国人民受到的重大威胁。美国人相信自己拥有入力物力和经济技术优势，最终打败印第安人不成问题。

美国人19世纪时的另一敌人是欧洲的旧秩序。欧洲大多数国家当时仍保持君主制、贵族统治和封建残余，美国人鄙视那种缺乏自由、

民主和法治的旧制度。美国恰恰与欧洲旧秩序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人相信自己代表着光明、开放、繁荣、民主的未来。他们同情欧洲人争取民主的努力，例如1848年的革命。匈牙利革命领导人拉约什·科苏特在革命失败后访问美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希望跟欧洲保持距离，不受欧洲打扰。

印第安人很近，但弱。欧洲人强，但远。二者都是敌人，但都不是严重威胁。此外，美国在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中获胜，使墨西哥也不再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美国可以不受外国强敌干扰，安全放心地占领、利用和开发大片疆域。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的注意力就集中到自己内部的地区、经济和政策分歧，其根源则在于奴隶制及其可能向新疆域的蔓延。1837年，还不到30岁的林肯就很有先见之明，警告过国无外患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一次演说中，他回顾了争取独立和安全、抗击外敌的革命斗争，指出在外敌的“强大影响”之下，

人之天性容易产生的、和平繁荣和自觉强有力的状态下如此常见的妒忌、怨恨和贪婪之心，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下去而不起作用，根深蒂固的仇恨之心和强烈的复仇之心不是用在彼此之间，而是完全指向了英国。因此，由于形势的力量，我们天性中那些最低劣的成分要么是处于蛰伏状态，要么是化为积极的动力以促进最高尚的事业，即确立和保持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可是这种情感必然会逐渐消退，正在消退，已经消退，产生这种情感的形势已经变了。

随着这样的情感消退，美国人就把他们的仇恨、妒忌、怨恨和贪婪之心转向彼此之间，直到踏上了内战之路。1861年4月12日，南方炮兵向萨姆特堡开火，内战爆发；4月14日，曾彻夜在麦克亨利堡上空高高飘扬的星条旗，被迫在萨姆特堡降下来了。

国家和爱国主义胜利

国民意识。内战结束时，美国文学家兼外交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说内战是“用来造就一个国家（a nation）的昂贵材料”。但它确实造就了一个国家，还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无保留的认同。正如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说，在内战之前，美国人对爱国主义只是偶尔玩之。但是，内战中“几十万人的死亡和千百万人的决心”证明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终于“成真”。内战前，美国人和别的人说到美国时都把United States当做复数名词，内战后它成为单数名词了。威尔逊总统在1915年阵亡将士纪念日讲话中说内战“造就了我国原先不曾有过的国民意识”。内战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国民意识有了多方面的表现。琳·斯皮尔曼指出：“19世纪后期是美国人国民意识大焕发的时期……现今的种种爱国举措、组织和象征大多是起源于那一时期或者是建立于那一时期。”

内战之后立即出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莫顿·凯勒指出：“知识界、政论界和政界人士当时都沉浸于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言辞之中。”提倡废奴主义的加里森创办的刊物《解放者》要改名时，十分自然地就改名为《民族》。几乎人人都认同于美利坚合众国。在关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辩论中，有很少几个人，例如特拉华州参议员威拉德·索尔斯伯里，持反对意见，但立即被压倒多数的人坚决驳倒。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奥立弗·莫顿就反驳索尔斯伯里说：

这位参议员今天坦率地对我们说，我们不是一国的人。他说，在我国牺牲了60万人生命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不是一个民族……他要我们明白他属于特拉华部落，一个独立和拥有主权的、生活在保留地上的部落……靠近费城……我要肯定地说我们是一国人民……我们是一个民族。

内战以前，有的州有可能闹分离主义而独立，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也有这种可能。但是1865年以后，这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再无

人提及了。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民族主义激情有所减退，但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又再现高潮。正如约翰·海厄姆所说：“1886年到1924年期间民族主义强劲。”到了大萧条时期，人们的心思转向经济和政治，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举国上下一心齐动员，民族精神有了最充分的展现。战后，美国人感受到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和安全方面的威胁，国民身份的重要地位尚得以保持。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分隔造成并加强了人们的另一些身份。苏联的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使国民身份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可见美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百年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国民身份的分量重于别的身份，各阶级、地区和种族的群体都竞相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之心。

经济发展和全国性的组织。林肯领导的联邦在内战中获胜，使全体美国人成了一国国民。胜利之后，民族主义高涨，其因素很多，但首要的因素是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许多社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俄国及随后的苏联，民族主义的确立和普及都是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并肩而行，这也发生于美国，并不令人奇怪。美国经济活动和财富成倍增长，造成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觉到力量日益强大，需要让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应有的地位，并确保这一新的地位得到承认。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改善，尤其是横贯美国的大铁路于1869年建立，以及电话1876年发明后迅速得到广泛采用，加强了美国人彼此联系的能力，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加深。

随着全国一体化经济出现，在全国范围活动的大公司也日益增多，其规模和活动均发展迅速。这些工商组织的首脑们不能不从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将原有的地方观念置于从属位置。与此同时，正如罗伯特·普特南和西达·斯科克波尔二人分别调研的结果所证明的那样，美国人还成立了空前之多的全国性志愿会社。凡是会员人数达到

过美国成年人人口1%的群众性组织，有一半都是成立于1870年至1920年这一期间。这些全国性的组织自然是让会员们的注意力和兴趣集中于全国性的问题。全国观念的形成是来自于民众，而不是政府。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家政府，只起了很小作用或没起作用。无数的个人和群体发挥了积极主动性。正如塞西莉亚·奥利里教授所说：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爱国者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倡议规定一些新的全国性周年纪念日；建议将一些杰出人物添进国家的先贤祠；要求在公立学校设立美国历史课和公民课；宣传要敬重国旗和每天宣读忠诚誓言；掀起高潮建造纪念碑，设立国家圣地和筹划历史朝圣活动；组织请愿和出席国会听证会，争取爱国主义方面的立法。

第一个、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民族主义组织，是1866年成立的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正如威尔伯·泽林斯基所说，它“迅速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礼仪活动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在推广大规模民族主义礼仪方面，它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个别的组织”。在美西战争之后，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协会又宣布成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一个重要的全国性退伍军人组织，即“美国军团”宣告成立。它们是真正群众性的组织，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此外，在19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爱国者世袭性组织”，如“美国革命女儿会”“美国革命之子会”“美利坚殖民女士会”和“五月花后裔会”（均成立于1889—1897年）。随后又出现了童子军、女童子军和营火少女团，它们的宗旨之一就是培养青少年爱国精神。在这些年代里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联谊会，但泽林斯基强调指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内战以前，美国的国家政府相对说来既弱又小。从内战时起，它不断扩大，活动渐广，还增设了一些部门，即农业部（1862年）、司法部（1870年）、商务部（1903年）和劳工部（1913年）。联邦政府（即国家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起管理移民事务，1890年则成立

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铁路。大萧条时期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变得更大，冷战则使国防部门达到空前的规模。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总统职权亦有扩展。

在这一时期，美国及其政府在世界上的作用也扩大了。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有史以来头一回得到了殖民地，但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原住居民，因而很难成为合众国的州。美国还开始扩大海军，大约30年内就达到与英国海军相等的规模。美西战争使美利坚民族主义出现高潮，同时使美国的势力延伸到了东亚，⁹ 从而大大扩展了这一新兴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美国1903年先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宣布独立，然后与巴拿马签约开凿巴拿马运河，这项浩大的工程完工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如海厄姆所说，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际小纠纷”开始，美国舆论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姿态，对西班牙的战争干净利落的速胜、巴拿马运河的建成以及大白舰队1908年的环球航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倾向。

南北和解。内战后民族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南北和解，共同致力于建设统一的国家。重新整合的过程是缓慢的，续续停停。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方人的“仇外心理几乎仍集中在北方佬身上”。但也有积极的事态：19世纪70年代，一些原南方邦联军队的老兵自愿投入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证明“我们虽是败军之兵，但不乏爱国之心”。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召开1897年会时，邀请原邦联老兵也来参加，当时的口号是“同国同旗同族同命运”。紧接着1898年发生美西战争，使全国团结在一起。海厄姆指出：“1898年的战争完成了南北和解，使原邦联战士尚武精神的传统投入到一场爱国征战，使全国各地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使南方有机会展现爱国的热忱。”威廉·麦金利总统刻意提拔重用原邦联军官，这一举措“使南方深受鼓舞”，结果是人们踊跃报名参军，“为新建志愿军招募官兵的机构应接不暇，南方各州组建的部队迅速满员。”

战后，黑人士兵对战争的贡献大多受到忽视，而南方白人官兵的战功则受到欢呼，国会还把原邦联部队的战旗归还给南方人。各州各县纷纷建纪念碑，纪念南北双方的阵亡将士。1910年，内战退伍军人协会的会长发表讲话，对南方人为战胜西班牙而作出的贡献致敬。他说，由于这场战争，“我们有了新的联合。不再分北方人南方人，大家都是美国人”。南北和解的高潮是1913年纪念葛底斯堡战役50周年的活动，原北军南军的老战士共约5万人参加了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向南北双方的英雄致敬。威尔逊总统讲话时说：“我们作为兄弟和战友聚在一起，再也不是敌人了。”

国家历史。内战以前，美国历史的编纂和教学是零零散散的，未受重视，而内战后，这方面的工作蓬勃展开了。泽林斯基指出：“美国历史编修到19世纪80年代才充分形成体制，大学设立了美国历史教授职位和科系，还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出版内容丰富的刊物和举行年会。”教育家和政治家都倡导美国历史的教学。内战前只有6个州要求公立学校开设美国历史课，到1900年这样做的州已达到23个。中小学校明确指示要给学生讲授爱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发了教材。用默尔·柯蒂的话说，教育工作者“强调必须生动地和有吸引力地向孩子们讲解美国英雄们的事迹，讲解我们的陆海军战士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讲授历届总统作为国家象征的人格力量。到19世纪90年代，各个州相继通过立法规定中小学一律设置美国历史课和公民课，以便于灌输爱国主义精神”。据泽林斯基报道，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小学就“必须以更大的精力向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让学生懂得必须保持全国团结……一些新成立的爱国者世袭组织和退伍军人组织都下了很大工夫，确保学校讲授美国历史和公民课。除了从历史、公民、地理和语文课本领悟爱国主义以外，中小学还举行升旗仪式和宣读忠诚誓词”。学生们开始懂得1620年乘“五月花号”轮船来北美定居的第一批清教徒、独立战争时自愿入伍的民兵、开国元勋、拓

荒者和一些伟大总统的光荣业绩。据一位学者分析，从1915年至1930年出版发行的中小学将近400种教科书中，绝大部分都包含爱国主义内容。“美国人从小被教导要尊重和敬爱自己的先辈以及他们建立起来的体制。”

爱国主义仪式和象征。在内战以后的几十年中，人们也创立了不少爱国主义的仪式和象征。1875年开始的纪念美国革命百周年的活动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其高潮是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百周年展览，在当时全国人口4600万人当中，参观这项展览的人数竟达到将近1000万人。1886年竖立自由女神像，以及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哥伦比亚博览会，都有力激发了美利坚民族自豪感。这些活动，尤其是1876年的百周年纪念，“让美国人民回想过去和展现国家的成就”。在这些活动的推动下，又成立了500多个新的爱国社团。

内战以前，只有7月4日“独立日”和华盛顿生日的纪念活动勉强称得上是全国规模的，后者还是时断时续，而前者也只是彼此竞争的群体各搞各的。内战以后，纪念活动更普遍了，而且各群体也比较团结了。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规定感恩节作为全国性节日，此后这一节日具有了浓厚的民族和宗教气息。每逢感恩节，“学生们倾听先辈清教徒的故事，牧师们在布道中按照传统的方式将宗教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感恩节的晚餐成了全国的习俗。”内战以后美国立即建立了阵亡将士纪念日。泽林斯基指出：“内战结束以后，北方和南方各地都是完全自发地于1866年左右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悼念活动，在北方尤其普遍。到1891年，它已成为北方每个州的法定节日……多年内，美国人都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度过这一天。”

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特性的象征，美国也不例外。这包括：“山姆大叔”，“乔纳森大哥”，自由女神像，费城独立厅的独立钟，白头鹰， “新制万年”、“合众为一”和“我们信仰上帝”等铭文。

但美国的独特之处是国旗凌驾于所有其他民族象征之上，而且随处可见。在别的国家，国旗通常只悬挂于公共建筑和国家纪念场馆，而在美国，国旗还展现于居民家院和工商企业、音乐厅和运动场、俱乐部和学校教室。泽林斯基根据他1981年和1982年亲自在10个州的观察，发现有国旗飘扬的地方除了所有政府建筑以外，还有50%以上的工厂和仓库，25%—30%的商店和写字楼以及4.7%的私人宅房。尽管没有别国的统计数字对比，但国旗如此多见的国家恐怕是罕见的。美国的国歌是对国旗的颂扬。美国人忠诚誓词是首先说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再说到这国旗所代表的共和国。美国还有一个节日“国旗日”，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对国旗的崇拜是内战及其后爱国主义高涨时期的一大产物。内战以前，正如M. M. 奎夫所说：“绝大部分美国人……还很少见到星条旗飘扬，到1846—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才在星条旗指引下作战。”因此，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人人敬爱国旗的激情”。内战爆发，星条旗在萨姆特堡被迫降落下来，令北方人深感震惊和痛心，由此而爆发了对国旗的感情，国旗引导着人们战斗。“一直保持到今天的崇拜国旗之情，正是内战的一个直接的结果。”1877年美国人庆祝了第一个“国旗日”；1916年，威尔逊总统正式宣布它为国家节日。“从19世纪80年代起，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维护国旗尊严的有组织的热情达到空前高度。”内战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主张每个学校都挂国旗，到1905年已有19个州通过立法要求学校这样做。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旗成了一种实际上宗教性的象征，等于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在这一时期，许多州通过立法禁止“褻渎”国旗。190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内布拉斯加州这样一项法律，该州最高法院曾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对待国旗必须像对待宗教象征一样保持其神圣，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

同化问题上的辩论。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剧本《熔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热情赞许。这一剧本突出展现了当时大量涌入美国的新移民是否有可能同化和如何同化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和广泛辩论。同化是否意味着新来移民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先辈定居者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并被吸收到这一文化之中？或者，同化是否意味着他们可以而且应该与先辈定居者、奴隶、征服者和先前的移民的后裔一起，共同创造一种新的美国文化和创造“新美国人”？或者，创造共同文化是否既不可取又不可能，因此美国应该是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一个混合体？这些问题涉及了美国种族和文化特性的核心。鉴于人们爱用比喻，同化问题上的三种见解，可以分别称之为熔炉理念、番茄汤理念和沙拉理念。

熔炉理念最先是在18世纪80年代由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提出的。他说“在美国，各民族的个人都融合成一种新人”，这种新的美国人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的合成体”。他还说，新的美国人“撇下其祖先的一切偏见和习俗，而接受新的思想和习俗，其来源是他所拥抱的新的生活模式、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克雷夫科尔不但认为美国人是各民族的人通婚而成的一个新民族，而且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是这些人原有的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赞格威尔把这范围扩大到西北欧以外，包括了“凯尔特人 and 拉丁人，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人和黄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他也像克雷夫科尔一样，认为这种“融合”和“再造”不但包括种族之间的通婚，还包括创建一种新的共同文化。

相比之下，番茄汤理念更强调的是文化上的同化。用米尔顿·戈登的话说，这一模式的基础就是“要求移民及其后裔必须采纳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标准”，用迈克尔·诺瓦克的话说，就是要求这些人“适应居民中那一部分盎格鲁—美利坚人的文化历史”。简而言之，这一理念就是要以先辈定居者的文化为中心，并使之长存。它将盎格鲁—新

教文化比喻为一锅番茄汤，移民可以往里面添加种种辅料和调味品，使之更加味美汤浓，但这基本上依然是一锅番茄汤。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基准的这一模式，如戈登所说，“有多种式样”，但明里暗里“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流行的同化论”。这一模式最能说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的移民同化情形。

熔炉理念和番茄汤理念二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美利坚民族主义，描绘了一种完整的美国特性。1915年，它们受到了霍瑞斯·卡伦强烈主张的沙拉理念的挑战。卡伦将这一理念称之为“文化多元论”。它事实上是一种“种族多元论”。他认为群体之分在于血统，而不在于文化。他的一句名言是：“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的衣服、自己的政治观点、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哲学信念，但改变不了自己的祖宗。一个爱尔兰人永远是爱尔兰人，一个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是天生的事实，公民和教会成员则是文明的产物。”总之，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但改变不了自己的种族属性。生物学决定命运，血统决定特性，这种特性代表“永远的群体区分”。卡伦认为，移民溶解了早先的美利坚民族，使美国变成了“一个多民族联邦”，“一个多民族民主国家”。他认为美国这一模式类似于欧洲，欧洲就是许多民族共存于一个共同文明框架之内。在卡伦所处的时代，美国思想界中有些人就是从种族角度看待国家特性，卡伦的生物天性决定论是一个典型。他攻击纯盎格鲁—撒克逊美国论为种族主义，但他自己的论断也差不多一样是种族主义。

卡伦强调血统对于人们的特性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这就很难理解他所说的“文化多元论”是什么意思。既然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政治观点和哲学信念，这就是说文化特性可以改变，与不能改变的种族特性应当加以区分。这样一来，卡伦强调永远不变的血统特性还剩下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爱尔兰人或犹太人改变了自己的语言、宗教信仰、哲学和政治，那么是从什么意义上强调他依然是一个爱尔兰人或犹太人呢？与卡伦同时代而且支持卡伦观点的兰道夫·

伯恩也批判熔炉理念和番茄汤理念，只是把话说得不那么极端绝对。但他仍然将美国比做欧洲，说美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联邦”，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只是“破坏性竞争的刺被拔掉了”。结果是美国不会是“一个民族，而是超民族，与其他地方用粗细不同、颜色不同的线来回交织”。

卡伦和伯恩的观点是针对当时很得人心的熔炉理念和番茄汤理念而作出的一种反应。亚瑟·曼指出：“卡伦是处于守势而提出文化多元论，想以此取代熔炉理念和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卡伦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兴趣，但对公众态度和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多大影响。一些权威人士谴责卡伦的主张是要让美国“巴尔干化”。曼指出，支持卡伦的“是两种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虽非犹太人但却亲犹太教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着迷于美国城市生活的种族多样化”。多年后，卡伦承认他的主张未起作用。在20世纪前期，美国人所坚决维护的美国，最终也许会通过种族间的通婚而成为熔炉，但仍将是番茄汤，保持其盎格鲁—新教文化特色。

西奥多·罗斯福最初曾赞成赞格威尔的熔炉论，但后来对它产生疑问，转而支持番茄汤理念。他说：“熔合为一的坩埚是形成于1776年至1789年那一时期，就是说华盛顿时代的人们已经把我们的民族特色的种种要素明确加以固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及大战期间，美国人为使移民美国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表明了美国人保持“民族特色的种种要素”的决心。

使移民美国化。美国人在18世纪末期定出了“移民”这一名词的含义和理念，这也就定出了美国化的含义和理念。他们看到了有必要使新来到这里的人成为美国人。约翰·杰伊说：“我们必须使我们的人民更加美国化。”杰斐逊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这方面的努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了高峰。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1919年宣布移民美

国化意味着“必须采用这里普遍流行的服装、举止和习俗……用英语替代其母语”，要确保“利益和情感均扎根于此地”，还要“与我们的理想和愿望达到完全和谐，并与我们合作促其实现”。移民做到了这些，才会有“美国人的国民意识”。对于这一定义，后来有人补充了如下要求：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放弃对外国的效忠，不得有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

人们认识到使移民美国化的必要性，因此在这方面形成了一些重大的社会运动。县、州和国家政府以及一些非官方组织和企业纷纷采取各种各样的、相互重叠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措施，而公立学校则发挥了一种核心作用。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这一运动的规模之大是很难被估计过头的”，它形成“社会十字军运动”，是美国政治进步阶段的一个关键因素。安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改革派人士、企业家和政界领导人，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都倡导或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另一位历史学家说：“运动组织者的名单排列起来，会像一大本名人录那样厚。”

一些新的、大型的工业公司需要招收移民当工人，因此在工厂内成立了移民培训学校，让他们学习英语和美国价值观。凡是有大量移民入住的城镇，商会都组织了美国化活动。在把移民变成有效率的美国工人这一方面，亨利·福特是一位带头人，他说：“来自许多国家的这些人必须学习美国工作和生活方式，学习英语。”福特汽车公司安排的美国化活动很多，其中之一是6—8个月的英语学习班，想在公司当雇员的移民均必须参加，毕业了就发文凭，持文凭者才能取得公民资格。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也有类似的培训活动。许许多多的企业开办了工厂学习班，在工资袋里分发公民教材，甚至出资补贴公立夜校。

企业家关心的事包括让移民工人学英语、学美国文化、理解美国的私营企业制度，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和防范工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他们的特殊利益与人们所认为的广泛国家利益是相互重叠的。

1916年福特公司还组织了大型爱国主义演出，舞台中心是一座大熔炉，大批的身着异国服装和原国名标语的移民工人从后台出来，鱼贯进入大熔炉，然后源源走出熔炉，这时都整整齐齐穿着西装，一人打着一面小的美国国旗。

许许多多非官方的非赢利性组织参与了移民美国化活动。这包括一些早已成立的组织，如基督教青年会、美国革命之子协会等等。还有一些是专门为移民美国化而成立的，如美国国际学院、陌生人信息委员会、北美公民同盟、芝加哥保护移民同盟、纽约市教育同盟，专门帮助犹太移民的赫尔希男爵基金会、意大利裔移民协会等等。许多团体积极帮助新来移民安顿住房和找工作。政党机构为了拉选票，也积极活动，给移民提供经济补助和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尽快成为美国公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教会均大力协助信奉其宗教的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天主教会利用它的教职人员、学校、报刊、慈善机构和联谊会等等，说服移民放弃其原有文化，遵从美国习俗。大主教约翰·爱尔兰……他自己就是爱尔兰裔移民，在从事美国化的活动中，他成了神职人员中的领头人……他坚决反对一些信奉天主教的移民企图保持其原有语言和传统的做法。”另外，“许多城市中都出现了犹太教街坊文教馆，鼓励犹太移民的孩子们学习美国生活方式，到公立学校念书，只在美国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内保持自己的犹太特性。”

美国化运动最初是由基层的非官方组织发动的，它们随后要求县、州政府支持和参与它们的活动。陆陆续续制定了相关法律的州达到了30多个。康涅狄格州还成立了一个美国化事务局。最后，联邦政府也积极参加，在劳工部设立了归化局，在内政部设立了教育局，它们竞相募集款项，大力推进其同化工作。到了1921年，参加归化局安排的同化计划的州、市、县、镇共达3526个之多。英语教育是最普遍的美国化活动，得到了各级政府大力支持。

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最重要的美国化机构是公立学校系统。这一系统建立于19世纪中叶，迅速得到巨大发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认识到开展美国化活动的必要性。据卡尔·克斯尔说：“同化教育在19世纪成为学校工作人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各地学校均坚持让移民子弟接受“盎格鲁—美利坚新教传统和价值观”。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新来的移民多，“人们最注意通过教育灌输盎格鲁—美利坚新教价值观，防止共和体制崩溃。”从长远看，斯蒂芬·斯坦伯格指出：“在阻止移民群体向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灌输其原有文化方面，公立学校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别的因素。”学校里到处是新教的气氛和价值观，还很自然地促使天主教会也采取措施，建立天主教学校系统，这些学校也成了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渠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为了使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美国化，学校起了主要作用。乔尔·罗伊特曼指出：“当时的进步分子相信教育，将教育作为同化（美国化）移民的基本手段，因为在1890—1924年期间来到美国的移民达到数以百万计的水平。”学校受到鼓励为移民中的成年人开办美国化和学英语的学习班。一个主要的美国化组织，即北美公民同盟，于1913年发表了一项《移民教育计划》。联邦教育局提倡这些活动，于1919年对各地学校提出要求，不但白天让孩子们学习，而且晚间为成年人美国化提供学习班。1921—1922年，有750至1000个社区为移民安排了公立学校特别学习班。从1915年至1922年，在这些学习班学习过的人超过了100万，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学完了全部课程。据里德·尤达报道，在20世纪头几十年，“学校教师们努力给移民的孩子们灌输美国国民身份感。教科书都着重谈美国的体制和政治历史，以及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全国各地教育系统“在霍瑞斯·曼直到约翰·杜威的几代教育家指导下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在外来移民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使社会日趋多样化的形势下，这些教育家强调教育是建立统一社会的重要工具。”

一些人批评美国化运动后期的做法对移民施加了不应有的压力，

带有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的色彩，导致1924年急剧削减移民限额的局面。然而，倘若没有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国化活动，削减移民限额的局面很可能会更早出现。美国化的活动使移民变得能为美国人所接受。这一运动的成功，表现在移民及其子弟踊跃参军，奔赴为美国而战的战场。

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爱国热情，提高了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但国民身份升至最高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种族身份和阶级身份都服从于对国家的忠诚。最初有些黑人组织和工会不支持美国参战，但保罗·斯特恩指出，敌人对珍珠港的袭击“使他们的种族立场或阶级立场至少暂时转变为国家的立场，人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行动”。同样，日本裔的美国人表明了忠于美国，志愿参军。全国1000多万人响应动员参军，是一个同质化的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新的共同价值观和传统”。

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表明了美国特性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重要性，为结束美国特性的种族法律定义铺平了道路。正如菲利普·格利森所说：“这次战争增强了全国的团结，使大家感受到同胞之情。”美国人民达到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经济上的不平等有所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伟大共同经历也为下一代人造就了国民身份意识”。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这样的经历并不局限于美国人。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达到空前高度，只不过他们事后对此感到悔恨。俄国人则以战时的全民上下一心感到荣耀。赫德里克·史密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经问过一些俄国人，他们认为俄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在何时，一致回答是“在战时”。史密斯报道说：“这些人不仅谈到战时的苦难和牺牲，而且也谈到战时的齐心协力。战争意味着死伤和破坏，但也展

现出坚不可摧的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苏联人把这次战争叫做伟大卫国战争，对战时共同经受的苦难和胜利喜悦的回忆，成了他们今天仍引以为荣的爱国主义的主要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伟大卫国战争”，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最佳时光”，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好的战争”。它是欧洲各国最强烈民族主义激情的展现和源泉，是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时代的顶峰。

民族主义走弱

美国人国民身份高居于其他身份之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高涨达百年之久，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弱。许多观察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指出过这一衰退趋势。1994年，有19位研究美国历史和政治的学者曾应邀对1930年、1950年、1970年和1990年的美国人民融和程度给予评价。评价采用1至5五个等级，1代表最高水平。评价结果是1930年1.71，1950年1.46，1970年2.65，1990年2.60。显然，1950年为最高，1950年以后，“文化和政治上的分裂加剧”，“逐渐强化的种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引出了冲突，对美国神话提出了主要现时挑战。”对这种衰退，有的人感到遗憾，有的人则感到同情，但不论态度如何，一些学者都指出了这一趋势。罗伯特·卡普兰谈到了“民族精神黯然失色”。戴安娜·肖布说美国面临着“爱国主义衰退的情形”。乔治·利布西茨攻击里根所说的“新爱国主义”，大讲他所谓的“民族特性受围攻的困境”。沃特·伯恩斯哀叹正在来临的“爱国主义的终结”。彼得·舒克则探究了“美国公民身份的贬值”。

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的消损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在某些精英人士中间大行其道，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抬高人种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以及其他的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而贬低国民身份；

二、原先促进移民同化的那些因素处于弱势或不复存在，同时越来越多的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双重国民身份和双重忠诚；

三、讲一种非英语的语言（西班牙语）的人（主要是墨西哥裔人）在移民中间居于多数，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结果是出现拉美裔化的趋势，美国变成双语言、双文化社会的趋势；

四、美国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与美国公众仍然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1 杰伊（Jay·John，1745—1829），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法官（1789—1795）。——译注

2 以亨廷顿家族为例：埃伯内泽·亨廷顿与伊丽莎白·斯特朗1806年结婚，有10个孩子，其中9个又再有孩子，第三代孩子共有74个。第二代的哈里·亨廷顿及其先后两个妻子共有16个孩子，詹姆斯·亨廷顿及其一个妻子共有17个孩子！见《亨廷顿家族联谊会通讯》，1999年5月一期，第5页。

3 菲利普王是当时印第安部落推举的首领。——译注

4 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的缩写。——译注

5 直译为“在上帝之下”，意译为“在人世间”。——译注

6 牧师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在2001年1月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就职典礼上违背了这条禁律，大受各方批评。布什本人在竞选过程中曾毫不隐讳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但鉴于格雷厄姆受批评，布什就任总统后自觉注意在重大场合不再提及耶稣基督的名字。（见《纽约时报》，

2003年2月9日，sect.4，p.4）

7 American一词现今通常译为“美国人”，但此处是从它的源头讲起，1776年以前尚无“美国”，故只能译为“美利坚人”。——译注

8 “詹金斯之耳”战争是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一场战争，直接的导火索是英国一个船长詹金斯在航海中遭西班牙人劫掠并被割去一只耳朵。七年战争是英、普与法、俄、奥等国的战争。——译注

9 主要指美国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译注

第三部分 对美国特性 的挑战

第七章 解构美国：国民层次以下的各种身份的崛起

解构主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国民身份的地位在政治上达到顶峰。肯尼迪总统1961年的号召象征了这种状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这十五六年，战时团结的影响犹在，冷战初期呈现出对抗态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来到美国的移民及其子女已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种族歧视正逐渐走向消失，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加强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共有一个主要体现盎格鲁—新教精神的核心文化，忠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这至少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应有形象的普遍看法，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奔向的目标。

这种美国理念的重要地位、实质和可取性，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一些强有力的运动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美国不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

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持这种观点的人指责此前流行的美国熔炉理念或番茄汤理念，而争辩说美国是各不相同的民族镶嵌在一起的马赛克，或一盘沙拉。先前曾承认过失败的霍瑞斯·卡伦，在1972年他90岁生日时，又反过来声称他的理论胜利了。他说：“一个观点要经过50年才取得突破而成时尚。谁也不喜欢一个闯入者，当这个闯入者打破常规时，就更是讨人不喜欢了。”克林顿总统欢呼美国人从欧洲文化统治下得到了解放。戈尔副总统对富兰克林·杰斐逊和亚当斯为美国选择的拉丁语格言“*E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作了重新解释，说它的意思是“一生众”。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引证了卡伦的“多民族的民族”的说法，把这句拉丁格言解释为“一含众多”。

解构主义者鼓吹提高各种亚民族的种族群体和文化群体的地位和影响。他们鼓励移民保持其原出生地的文化，给他们提供一些法定的特权（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却享受不到的特权），把美国化的主张谴责为“非美”思想。他们力促改写历史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把宪法上的单数美国人民改为美国“各族人民”。他们要求往美国历史补充各亚民族群体的历史，或以后者取代前者。他们贬低英语在美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鼓吹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化。他们主张在法律上承认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使之居于“美国信念”强调的个人权利之上。他们提出多文化主义理论，用以为他们的行动找依据，还鼓吹美国压倒一切的价值观念应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一致。凡此种种加在一起，其效果就是要使300余年逐渐建立起来的美国特性解构，让亚民族特性代之而起。

由此而起的争论涉及种族优先权、双语论、多文化主义、移民、同化、国家历史标准、英语作为语言的地位和所谓“欧洲中心论”，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在论战的一方，有美国政界、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人士，加上那些为促进自己利益而奔走的亚民族群体的领导人或想当领导人的人。他们形成一个解构同盟，其中的最重要人物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行政官员、法官和教育工作

者。从前，帝国和殖民政府给一些少数派群体提供资源，鼓励人们各自结成帮派，从而加强政府的分而治之的能力。而民族国家的政府则与此不同，总是力图促进其人民的团结，形成国民意识，压制亚民族群体的和地区的分立之心，全国统一用一种语言，对遵从国家规范者给予优惠。直到20世纪后期为止，美国政界领导人也大致是这样做的。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却开始采取措施，有意削弱美国人在文化上和信念上的认同，而加强种族的、文化的及其他亚民族的特性。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来解构自己所管理的人民，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

美国学术界、媒体界、商界及专业界精英中一些很有分量的人士与政界人士一起从事这种活动。可是这一解构主义同盟并不包括多数美国人。一次又一次的民意测验和几次公民复决投票都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拒绝削弱美国国家特性和鼓吹亚民族特性的主张和措施。甚至是这些措施所要施惠的那些亚民族群体之中，往往也有不少人乃至多数人并不赞成这种措施。总的说来，美国人民仍然是深深爱国的，坚持美利坚民族主义，忠于美国的文化、信念和特性。因此，在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及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上，美国部分精英人士与大多数美国人民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解构主义运动之所以出现，有几层原因。首先，较有限的亚民族身份在全球崛起，在世界各国都引发国民身份的危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与经济全球化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大发展相关联的，这使得一些人觉得有必要寻求跨国的较小群体的身份、支持和保证。这在美国就表现为削弱国民身份的重要性。第二，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开始抬头，而20世纪后期冷战局势趋向缓解，并且于1989年突然终结，这就消除了人们重视国民身份的一大理由，为提高其他身份的地位开辟了道路。第三，民选官员以及想当民选官员的人为了在政治上吸引某些选民的选票，就鼓吹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大选以前就赞成众议员罗曼·普辛斯

基就少数民族群体利益提出的立法议案，据说还鼓励少数民族就业方面的照顾措施，目的是激化民主党内部黑人与工人阶级白人之间的矛盾。

第四，少数群体的领导人以及想当领导人的人自然也鼓吹这些措施，提高其群体的地位，对自己也有利。第五，政府机关担任负责职务的公务员让政府官员从一定角度解释国会的法案，使之更易于执行，并能扩大自己部门的活动范围、权力和经费，促进自己的政策目标。第六，学术界、知识界、新闻界等人士当中，自由派的观点促使一些人同情他们所认为的驱逐、歧视和压迫行为受害者，感到对不起这些受害者。种族群体和妇女成为20世纪后期自由派人士关注的焦点，正如同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20世纪前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一样。对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崇拜取代了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同情。

最后，也许是重要的一点是，1964—1965年在民权、选举权和移民法中，正式规定种族属性不再是国民身份的组成部分，反而使得亚民族身份合法再现。过去，种族属性是界定国民身份的关键因素时，非白人和非北欧人要对此提出挑战，就只有采取“非美利坚”方式。那时，外来移民和黑人等要使自己成为美国人，就不得不“成为白人那样的人”和“遵奉盎格鲁文化”。当种族属性不再成为问题、文化的地位被贬低以后，界定美国社会的因素大体上只有信念了，这就为少数种族确立自己的身份开辟了道路。

解构主义运动在政界和知识界引起了不少争议。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评论家认为得胜的一方是解构主义者。1992年，亚瑟·施莱辛格说：“作为对盎格鲁中心论的抗议而崛起的种族意识，现在已成为崇拜对象，有可能形成一场反对那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一种共同文化’的理論的反革命。”1997年，哈佛的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宣称：“如今我们都是多文化主义者了。”可是反对这场反革命的力量迅速行动起来，有力地维护较传统的美国特性理念。政府官员和法官，

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曾经支持过种族区分的做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开始缓和甚至扭转他们的观点。出现了一些由企业家牵头的运动，要求通过公民投票取消那种照顾少数群体的“赞助行动”和取消双语教育。那种想要改写美国历史和教学大纲的企图，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学者们和教师们的反对。

“9·11”事件使“美国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文化”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受到有力促进。然而，解构战并未终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应该人人权利平等，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信念？抑或相反，只不过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联合体，大家能凑在一起，是因为希望从健壮的经济和听话的政府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这场解构战关系到对“美国信念”、语言和核心文化的重大挑战。

对“美国信念”的挑战

“美国信念”的核心，正如米达尔所说，涉及这样一些理想，即“人作为个人享有必不可少的尊严，人人享有根本的平等，在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以及实际做法并未达到这些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差距。有时，有些美国人感到这一差距是无法容忍的，因而发起了一些社会和政治运动，要求实行重大改革，使现实更靠近理想。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指出：“改革的历史总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比。”

米达尔着重谈“美国信念”，是为了突出表明“美国的窘境”，即20世纪30年代，美国崇尚的原则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美国黑人仍缺乏公民权、受到歧视和隔离这种现实二者之间存在差距。奴隶制及其遗留的问题一向是美国的窘境，是最明显、最深刻、最邪恶的违反美国价值观的表现。在1877年的妥协之后，美国人曾试图无视、否认和用

言辞摆开这一窘境。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有好几个方面的事态发展使得美国人再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这些事态包括：黑人生活城市化而且大量移居北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使得种族歧视问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一个包袱；美国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有所改变，试图解决他们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联邦司法系统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设法使涉及黑人的法律和规章符合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战后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一代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成为要求改革的积极分子；黑人组织的领导层有了新的信心争取实现他们过去被剥夺了的平等。

如同以往历次改革运动一样，这一次争取取消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运动，其动力的最大源泉仍是“美国信念”的原则。这次运动中反复提出的口号也是人人都应有人的尊严，都应有享受平等对待和平等机会的权利，而不论其种族如何。可以说，假若没有体现于美国特性之中的“美国信念”的原则，这次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运动将一无所获。要求在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行动中取消种族歧视，其根据完全在于“信念”中的人人平等的理念。著名的黑人律师瑟古德·马歇尔在1948年指出：“按种族或肤色把人分成几等，在我们社会是没有任何道义上或法律上的道理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指出宪法是“不承认肤色差异的”。美国民权委员会1960年在一项谈高等教育的声明中指出：“申请入学者的种族或肤色显然不应成为问题。高校完全没有理由从这方面考虑其招生。”

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都是旨在使美国现实符合美国的原则。头一项法令的第七条指出雇主下列做法均系非法：“一、因为任何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原国籍而不予雇用或拒绝雇用；二、将雇员分等级……从而因为任何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原国籍……而剥夺或意在剥夺其受雇机会。”带头提出该项法案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参议院发言时指出，这一法案使法院或行政机构没有任何权力“为了满足某种种族‘配

额’或实现某种种族比例而决定雇人、解雇或升迁事宜……第七条禁止歧视行为……鼓励用人以能力和资历为准，而不是以种族或宗教信仰为准”。1965年的选举权法又明文规定在该法令实施的地区（主要是南方一些州）不许以种族或肤色为借口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这两项法令加在一起，禁止了就业、选举、公共设施和公立学校中的歧视。这两项法律的语言及其拟订者的意图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从美国历史上看，改革者总是要使现实进一步符合于“美国信念”的原则。

然而，在这些法令刚颁布以后不久，事态就扭曲到相反的方向。民权法刚一通过，贝阿德·拉斯廷等黑人领袖就不再要求美国公民共有的权利，而是要求联邦政府给黑人提供特殊的物质福利，以便“实现与白人的（经济）平等”。联邦政府官员，后来还有一些法官，就违背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而给黑人种种额外的照顾，用内森·格莱泽的话来说，就是照顾黑人的“赞助性歧视”。

到1967年，正如休·戴维斯·格雷厄姆在《民权时代》一书中所说，根据民权法而成立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席、多数委员以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不顾该法令第七条的规定，企图建立一批判例法来证明根据种族给予照顾是有理的”。格莱泽也指出：“这些官员把统计数字上的不对称作为种族歧视的证据，企图对公私用人单位施加压力，要他们根据种族、肤色和原国籍安排就业，恰恰是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的禁令。”劳工部的官员还违背总统和国会的指示。1961年3月，肯尼迪总统发布了第10925号行政命令，规定政府用人单位不得因雇员或申请就业者的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而加以歧视。约翰逊重申过这一要求。可是在1968—1970年期间，劳工部发布的几项指示都要求政府用人单位招工要考虑自己业务所涉及地区的人口种族比例。该部还要求企业要照顾到少数种族群体的成员的问题和需要。正如安德鲁·克尔在《不承认肤色的宪法》一书中所说：“总统行政命令规定不得考虑雇员的种族而予以歧视，而劳工部对此命令的解释却恰恰与此相反。”劳工部的行动也违反了民权法第七条的规定。

最高法院就民权法第七条受理的第一个案例，即1971年的“格里格斯诉杜克动力公司”一案（401 U.S. 424, 1971）中，同样也无视了该项法令的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承认该公司“无意对黑人雇员予以歧视”，却仍然宣判该公司关于雇员必须有高中毕业文凭或通过标准的文化水平考试的规定为非法。克尔就此事指出，法院从民权法第七条引申出的判例恰恰违背了该法令的本意。这一判例产生了深远重要影响。正如赫尔曼·贝尔兹在《平等变了形》一书中所说，它“使公民权利政策变成了一种群体权利和结果平等的理论”，要求在就业方面照顾少数种族。贝尔兹指出，这一法院判例造出了“一种完全违反民权法的要求和意图的歧视理论”。

选举权法也遇到类似的情形。这项法令的本意是防止南方一些州剥夺或限制黑人的选举权。但最高法院1969年解释这项法令时，不仅要求保护个人的选举权，而且还要求保证少数种族的代表能够当选。这就是在法律上允许了不正当的“按种族重新划分选区”的做法，让黑人和拉美裔代表有稳保当选的选区。克尔指出：“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政府处于一种按10年前的标准来衡量是不正常的境地，竟然要求州政府和县政府按照种族的分布重新划分选区。”

美国政界、商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精英人士大多数是白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抛弃了“美国信念”中不承认种族差别的原则，而支持种族歧视。杰克·西特林1996年指出：“多年来，白人权贵拥护照顾少数种族的赞助性行动，明知这些做法偏离了不承认种族差别的原则而要付出道义上的代价，也只予轻描淡写。”著名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1992年报道说：“照顾少数群体的做法所得到的最强烈支持，似来自自由派知识分子，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占人口5%至6%的上过研究生院的人，以及在大学文科得过学位的人。有力的支持也来自政界精英人士，尤其是民主党人，但也包括许多共和党人（尽管担任要职者不多）。”在20世纪70—80年代，舆论界的主要报刊都热情支持赞助性行动及相关的措施，使少

数种族享有比白人优先的权利。福特基金会和另一个基金会为这些行动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钱。高等院校在教职员支持下竞相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给他们降低入学标准，提供奖学金及其他优惠。

在照顾少数民族的做法方面，尤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企业，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扩大销售，也是想要避免打官司，避免因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抵制而惹上坏名声。理查德·卡伦伯格在1996年指出：“赞助性行动的政治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那就是美国企业界实际上在支持赞助性行动。”可是这个秘密很快就公开了，一些大公司公开表示支持赞助性行动以及优先雇用和提拔少数民族和妇女员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杜邦公司宣布它的新专业和管理职位将有50%由少数民族和妇女担任。另一些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几次重大争论中，企业界都站到了支持赞助性行动一边。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和1998年华盛顿州就是否应取消种族照顾而举行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它们都采取了反对立场，而当密歇根大学对于一家地方法院禁止该校法学院招生中照顾少数民族的裁决提出上诉时，它们又采取支持的立场。

在上述两个州的公民复决投票中，精英人士与公众的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加利福尼亚州1996年那一次公决的209号提案，是明确依照民法提出：“本州在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合同中，将不会根据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种族、肤色、性别或原国籍而对其歧视或提供优先照顾。”参议员利伯曼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说：“我看不出我怎么会反对它，因为它基本上是陈述了美国价值观。”可是加州的权贵人士中，大多数人却反对这些“美国价值观”。大多数的政界领导人（州长彼得·威尔逊除外），高等院校校长，好莱坞名人，报界、电视台、工会领导人以及许多企业领导人都反对取消少数民族优先权。克林顿政府、福特基金会和一些全国性组织也站到他们一边。反对提案的人花的钱比支持者多得多。可是加州公众最后投票结果是54%比46%，批准了提案。

两年后，华盛顿州举行了类似的公民复决投票。该州的权贵几乎

一致采取反对立场，这包括州长和政界领导人、主要企业领导人、媒体人士（其中《西雅图时报》还免费刊登了反对提案广告）、教育界负责人、大量的知识分子和评论家，还有州外政界人物如副总统戈尔以及杰西·杰克逊牧师。商界的反对尤其显眼，其领头人物为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父亲老比尔·盖茨，还有波音、星巴克等大企业的头目。提案的重要支持者沃德·康纳利指出过：“我们在这场运动中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媒体，甚至也不是攻击我们的政界人士……而是大公司。”反对者花的钱比支持者多两倍，但华盛顿州的公众还是批准了提案，投票结果为58%比42%。

历次民意调查表明，公众总的说来支持本来意义上的赞助性行动，即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先后指示的采取措施改善少数种族和妇女的家庭状况、教育、住房和职业培训，防止歧视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参加高等教育和就业的竞争。但民意调查也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在就业、提升及高校招生方面给少数种族优先照顾。即使这种照顾被说成是为了纠正以往歧视的后果，也不恰当。据利普塞特报道，1977年至1989年间，盖洛普民意调查曾5次提出以下问题：

有些人说，为了弥补以往的歧视，妇女和少数种族应当在就业和高校招生中得到优先照顾。另一些人说，主要应考虑考试分数所表明的能力。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于你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在这些民意调查中，选择后一观点的人有81%至84%，选择前一观点的则有10%至11%。在1987年和1990年另两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以下提议，即“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改善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处境，即使这意味着给予他们优先照顾”。结果反对者为71%和72%，表示支持者为24%；接受调查的黑人当中，表示反对者为66%，表示支持者为32%。

与此类似的是，1995年一次调查提出的问题是“就业、提升和高校招生应严格根据能力与分数的高低，而不是种族属性”，支持者在

白人中占86%，在拉美裔人中占78%，在亚洲裔人中占74%，在黑人中占68%。1986年至1994年进行的另5次民意调查，要求公众对“就业和提升应优先照顾黑人”表态，结果是69%至83%的公众表示反对。《美国周末杂志》1995年就“为弥补以往歧视而在就业和高校招生中实行赞助性行动”这一问题，在24.8万名青少年中征求意见，结果是90%的人表示反对。杰克·西特林在1996年回顾民意调查的结果时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明显的优先照顾，不论所要照顾的群体是谁，都是一样。”

在这些民意调查中，黑人的态度是随问题的提法而有所变化。在1989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问题是就业和大学招生中是应当给妇女和少数种族以优先照顾，还是应当以能力为准，结果黑人当中56%选择了能力，14%选择了优先照顾。在1986年至1994年由美国大选研究所举行的5次民意调查中，问题是对“就业和提升应优先照顾黑人”是赞成还是反对，结果黑人当中表示反对者为23%和46%。总的看来，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对优先照顾问题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1995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刚提出建议取消对少数种族的额外优先照顾的公民立法提案时，调查表明，表示赞成的黑人有45%，拉美裔人有52%。但此后一年多，在少数种族组织领导人的大力动员下，不少人态度发生变化。1996年11月公民复决投票时，表示赞成的黑人降到了27%，拉美裔人降到了30%，下降幅度分别为18%和22%。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对优先照顾的呼声已日益广泛。公众纷纷表示不赞成，一些申请就业和升学的人为他们受到“逆转的种族歧视”而提起诉讼。在共和党总统当政的十来年里，由总统提名就任的联邦法官也使司法状况有所扭转，法院开始缩小对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的照顾。正如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和艾比盖尔·塞恩斯特罗姆所说：“1989年是再思的一年。”这一年，在“里士满诉J. A. 克罗森”（488 U.S. 469）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决里士满县对少数种族优先照顾的计划无效，重申了“美国信念”人人平等的原则。桑德拉·戴·

奥康纳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6位法官的多数，在判决中指出按种族把人分成几等是有害，若不扭转，“可能会引起种族优劣感和种族之间的敌对”，同时批驳了那种说现在优先照顾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歧视的论点，指出这样扭来扭去只会导致人人平等原则的消失。同一年，在“沃兹—科夫—帕金公司诉安东尼奥”（490 U.S. 642）一案中，最高法院还撤销了1971年“格里格斯诉杜克动力公司”一案的判决中提出的对种族区别对待的做法。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赶紧通过立法来限制法院这一裁决的影响。

1993年，在“肖诉雷诺”（509 U.S. 657）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多数通过一项裁决，将涉及北卡罗来纳州为确保黑人当选国会议员而重划选区的案子退回地方法院重审。奥康纳法官在这一裁决中指出：“任何按种族分类的做法都有对我们社会造成持久损害的危险，会让人重新产生那种在我国历史上已被太多的人坚持得太久了的错误见解，即人应按肤色予以评价。”按种族意识划分选区“会使我们巴尔干化，分裂成彼此对立的族群”。1995年，在“阿达兰德承包公司诉佩纳”（515 U.S. 200）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以5比4的多数通过一项裁决，认为政府有关优先照顾少数种族承包商的规定是站不住的。安托宁·斯卡利亚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在政府眼中，我们大家应是同一民族，即美利坚人。”可是，克林顿政府却不接受“美国信念”这一原则的重申，想方设法限制最高法院上述裁决的影响，结果，到1996年，正如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和艾比盖尔·塞恩斯特罗姆所说：“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事态：最高法院和美国司法部斗起来了。”

这种争斗到了布什政府时仍在继续，只是双方的立场变了。2003年在密歇根大学招收本科生和法学院研究生的问题上，布什政府认为不应当用加分的办法照顾种族，种族多样性的目标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最高法院以6比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本科部给少数种族考生自动加分（满分为150分，少数种族考生照顾性加20分）。但他们以5比4的表决结果同意给法学院的少数种族考生加分，理由是法学院生员的

种族多样性是“一个急迫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特别处理，但同时指出这种优先照顾必须“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希望25年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考虑它。

最高法院对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问题的裁决，被《纽约时报》的社论欢呼为“赞助性行动的一个胜利”。通用汽车公司、微软公司、波音公司、美国捷运公司、壳牌公司等几百家企业表示支持密歇根大学的做法。但他们的观点与美国多数人的观点是对立的。在最高法院审理这一案件期间先后两次进行的民意调查都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其中也包括半数以上的黑人，都反对在大学招生中额外照顾少数种族。

密歇根大学这一案件表明，在美国是否应该不考虑种族差异而人人权利平等这一问题上，美国仍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在美国历史上最初的200多年间，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受到忽视，未得实施。在20世纪40年代，总统和联邦法院，随后还有国会，开始努力消除种族歧视，在法律上做到不考虑种族差异，结果是终于制定了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然而，一些并非民选产生的官员马上从相反方向重新实行种族歧视。这种逆向运动的理由，正如赫尔曼·贝尔兹所指出，是这些人认为“群体权利、种族比例和结果平等应成为社会组织原则，成为民权政策基础”。这种以群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以具有种族意识的法律代替不问种族差异的法律的做法，从未得到美国人民认可，议员们的支持也只是时断时续的。然而，“这一变化的奇特之处，”杰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在于未经公众辩论，一种全新的权利原则就出现于政策之中。”贝尔兹也指出：“群体权利和处境平等被奉为新的公共哲学，它根据种族属性区分个人，最终否认公益的存在。”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和艾比盖尔·塞恩斯特罗姆指出，这种观点的含义就是：“种族区分提供了一个信息，即肤色非常重要。白人和黑人是不同的，种族属性真正起作用。这种种族区分意味着对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是血统，而不是性格、阶级、宗教信仰、年龄或教育。但是这种群体区分只适用于等级制度，在它的基础上是很难建立公民平等的社会

的。”

对英语的挑战

在1988年佛罗里达州公众争取宣布英语为正式语言的运动中，担任州长的共和党人鲍勃·马丁内斯竟然表示反对，公然宣称：“我们并未给美国人选择一种宗教。我们并未给美国人选择一个种族。我们也不曾为美国人选择一种语言。”他错了，美国300多年的历史已经选择了英语作为美国人的语言。到了选举日投票时，佛罗里达83.9%的选民赞成了这一选择。佛罗里达州把选择语言的建议印在选票上征求选民意见（那一年还有两个州也采取了这一做法），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表明在20世纪80—90年代，语言成了美国特性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争论的问题很多，例如：要不要双语教育；企业是否应该要求雇员说英语；政府文件是否要用英文之外的文字；在有大量不说英语的少数种族选民的选区，选票和选举材料是否也要用别的文字；是否应规定英语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正式语言等等。英语在学校等场合的作用问题以前也有过争论，但在20世纪后期，争论之广泛和激烈，在全国、州、县层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来说，英语问题的争论都是有关美国特性的大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一位学者认为争论在于“美国是不是应该反映出多数人讲英语就由英语居统治地位，抑或是应该鼓励多语言的文化”。然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多语言文化，而是要不要双语制。

对于英语在美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人最好能熟练使用英语，很少有人提出疑问。但语言方面的争论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美国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提倡人们学习和使用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并限制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及其他单位要求其雇员使用英语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其他语言都指的是西班牙语，这就引出第二个而且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双语社会，

让西班牙语具有与英语同等的地位？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说：“语言是灵魂的血液。”但语言又是更加实在得多的东西，它是交流的基础。在这一点上，马丁内斯州长错了，语言是与不同种族和宗教根本不相同的。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们往往彼此争斗，但如果他们有相同的语言，他们就可以彼此交谈和书信往来。正如卡尔·多伊奇在他的经典著作《民族主义和社会交流》一书中所说，民族是能够彼此广泛深入交流的群体。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交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是困难的，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两种或更多语言并行的舞台。有些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日本，基本上是人人共讲一种语言，而另有一些国家，例如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人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这两种国家的情形很不一样，在后一种国家，随时都有分离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它们得以保持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强邻的压力。想让一种语言群体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很难成功。例如，盎格鲁—加拿大人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流利讲法语，比利时的佛兰芒人和瓦龙人也几乎都不能熟练使用对方的语言，瑞士的讲德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彼此交流时讲的是英语。

在美国历史上，英语对于保持美国同一性起了重要作用。移民群体有时试图保持其原有语言，但除了某些小的、孤零零的或乡村的社区以外，英语都是在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取得胜利。我们上面已谈到，组织移民学英语一直是各级政府以及企业、教会和社会福利组织关心的一件大事。

至少到20世纪后期为止，情况是这样。可是在20世纪后期，一些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却鼓励亚民族特性，提倡少数民族语言和贬低英语地位。这种活动的关键是他们对于民权法（1964年）、选举权法（1965年）和双语教育法（1967年）的解释。民权法第六条规定，在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州、县政府和私立机构的活动中，禁止根据“原国籍”进行歧视。第七条规定，在雇员15人以上的企业招工中，禁止根据“原国籍”进行歧视。选举权法包括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提议的一

条规定，要求纽约选举事务当局给波多黎各裔选民提供西班牙文的选举材料。双语教育法是由代表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起草的，要求给家境贫穷而且因英语水平低而在学习处于不利境地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提供援助，首期拨款750万美元。

由这些看来并不起眼而且有限的规定开始，出现了一堆错综复杂的联邦规章条例、法院裁决和进一步的法案，其势头有点类似于本来规定不考虑种族差异的民权法却引出了一批种族优先照顾的做法。联邦政府一些工作人员有意将法律解释为授权和要求政府支持英语之外的语言，他们的解释通常得到了联邦法官的认可。接着国会又通过新的立法扩大对那些语言的支持和限制英语的使用。这些举措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组织起来维护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一问题的公民投票达到了10余次，除了1次以外，都是维护英语地位的力量得胜。

语言问题上对立双方的较量牵涉到选举、政府、企业和学校。按理说，只有美国公民才有选举投票权利，出生于美国的成年人或已归化的移民才可成为公民。除了波多黎各人以外，在美国出生而长大的公民应该是至少对英语有了起码的知识。而外来移民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的规定，应证明自己“懂得英语，包括有读、写、说的能力……懂得简单的词语……英语的一般用法”。只有在美国已居住15年以上的残疾人和老人才可作为例外处理。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几乎所有的有选举权的人都懂得英语，至少应能读懂选票和有关的选举材料。

然而，1975年，国会修改了1965年的选举权法，规定州、县政府不得以任何投票资格、先决条件或程序“剥夺或限制属于语言少数群体的美国公民的投票权利”。修改后的法令要求地方政府在以下两种选区提供双语选票：一、居民英语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在1972年选举中仅提供英文选举材料而使有资格选民参加选举者低于50%；二、选区内5%以上居民属于语言少数群体，如印第安人、亚

洲裔人、阿拉斯加土著居民，或西班牙语群体。1980年，为了对联邦法院一宗诉讼案作出反应，旧金山选民登记处同意提供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三种文字的选票和选民小册子，投票站监督员和选民登记车工作人员使用以上三种语言。到2002年，已有30个州的335个行政区不得不提供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书面和口语服务，其中西班牙语的多达220个。这些服务往往只涉及很小的语言群体。例如，洛杉矶县1994年就为692名讲他加禄语¹的人花费了67000美元。

一些联邦机构和法院将民权法中提到的“原国籍”解释为包括语言在内，禁止语言上的歧视，防止相关机构要求其活动参加者只讲英语。此外，还要求这些机构提供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服务，让讲其他语言的人与讲英语的人地位平等。法院还裁决一些州、县法律中关于一定场合应使用英语的规定为违反宪法，说它们违反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的保证。这就把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的内涵从自由的表达和言论的内容扩展到用以表达内容的语言。总之，各级政府即使认为有必要使用英语时，也无法要求人们使用英语。

20世纪80年代大量亚洲裔和拉美裔移民涌入加利福尼亚，因此加州许多市镇不得不对商店招牌作出规定，要求招牌中至少应有一部分用英文，以便于保证公共安全。波莫纳市一家亚洲裔美国人商业集团对这一规定提出异议，于1989年得到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罗伯特·高杉（Robert Takasugi）支持，其理由是招牌是“原国籍、文化和种族属性的表现”，因此对招牌加以管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另一件事是1994年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要求宾夕法尼亚州阿伦顿市撤销关于市长只能用英文发文件的规定，威胁说否则就停发每年给该市的400万美元的拨款。经过一番闹腾，该市市长说他将不执行上述规定，拨款才未停止。再一件事是1999年第11联邦上诉法院裁决，亚拉巴马州不得只用英语进行汽车驾照考试，因为民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得因“原国籍”而予歧视，亚拉巴马州的做法对于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应试者有不良影响。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此案的原起诉方要拿出亚拉

巴马州当局歧视性意图的证据，此案遂不了了之。

1988年，亚利桑那州的选民以微弱多数批准了该州宪法一项修正案，规定英语为该州官方语言，要求该州官员和雇员一律用英语履行公务。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一要求，因为当年美国国会接受亚利桑那为合众国一州时就规定过英语为唯一官方语言，但宣布州宪法这一修正案无效，说它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则拒绝复审该州最高法院这一裁决。

与上述诸案相似的是，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原国籍”的解释也是延伸到语言，认为雇主不得要求雇员工作时一律使用英语。为此，该委员会在1996年提出了32件诉讼，1999年提出了91件诉讼。它认为企业只有在“业务确有必要”的严格有限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雇员都说英语。一位反对以英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律师说，法律上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对“原国籍”的歧视是否包括语言上的歧视。若包括，那么“领取联邦经费补贴的私立医院未能给不说英语的病人提供足够的翻译服务”即应视为违法。

上面提到，代表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亚伯勒为了让贫穷的墨西哥裔选民的孩子更好地受教育而提出双语教育法案，于1967年获国会通过。此后，非英语教育迅速传布到全国各地，甚至出现在已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唯一教学语言的7个州。1970年，联邦民权署指示说，根据民权法第六条，一个学区内原国籍不在美国的少数种族儿童占儿童5%以上，即“应采取赞助性步骤纠正这些儿童在语言上所遇到的困难，让他们能跟上教学计划”。1972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裁决，根据法律上的平等保护条款，新墨西哥州的学生应得到其母语和原有文化的教育。1974年，在旧金山一起涉及华人儿童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对民权法第六条作出解释说，学校不能将不说英语的学生像说英语的学生一样对待，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弥补他们学习上的缺陷。到2001年，国会为双语教育拨款4.46亿美元，此外，各州又拨了大量经费。

在双语教育法开始实施时，双语教育的一位支持者就指出过：“双语教育法究竟是为了帮助孩子更快地向英语过渡，还是为了促进双语制，这一关键的目标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最初，两个目标并存，1974年对该法的一项修正案规定，“在允许孩子顺利完成学业的必要范围之内”给孩子提供其母语和原有文化的教学。当时既有保持母语教学的计划，也有向英语教学过渡的计划。1978年，美国教育研究所报告说，双语教育计划负责人当中，86%的人反映那些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在英语已经熟练以后仍然留在保持母语的教学计划之中。这时，国会停止了对这类教学计划的拨款，但到1984年国会又改变态度，明确恢复了拨款。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据《时代》周刊调查，双语教育中，“许多教学安排都是想让学生无限期地用原有语文学习，除语文外还学习原有国家的艺术、音乐、文学和历史。”旧金山一位双语教学负责人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他指的当然是孩子们的祖先的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1985年，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指出，双语教育“过多强调了让学生了解其本土语言和文化，而没有充分重视把它作为确保学生学习英语的手段，或帮助学生慢慢学好英语的过渡性方法”。众议员詹姆斯·朔伊尔本来是双语教育法的发起人之一，这时也表示了类似的忧虑。他说双语教育“被扭曲和政治化了”，它本来是要帮助学生学英语，可是“英语学习被削弱或推迟，在许多地方还被挤掉，全部课程都用西班牙语进行教学。本来的意图可不是这样”。另一位双语教育法发起人、原众议员赫尔曼·巴迪洛在2000年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在纽约市，参加双语教育班的学生，85%的人到中学毕业还没有把英语课学完。他说：“双语教育变成了单语教育，这对学生们是没有好处的。本来应是英语第一，西班牙语第二。不应该8年老是西班牙语，它本该是过渡性的。”

一些联邦政府机构鼓励英语之外的语言，一些州政府和私营机构反对工作中只讲英语，这就激起了许多人的对抗。1981年，参议员S.

I. 早川 (Hayakawa) 提议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为了这一目的，他和另一些人在1983年成立了一个名叫“美国英语”的组织。1986年，人们又成立了一个名叫“英语第一”的组织。这些组织发起了广泛的运动，结果在20世纪80—90年代促成19个州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这反过来又引起了西班牙语及另一些语言少数群体的强烈反对，他们与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民权组织促使三个州的议会通过了所谓“英语加其他语言”的决议。有几个州的议会则拒绝通过任何一种决议。但在公民投票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建议在所有地方都得到多数人赞成。

州议会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州，主要是外来移民、亚洲裔居民和拉美裔居民较少的州。而在少数种族人口众多的州，州议会则拒绝采取行动或拒绝了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建议。有4个州——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和佛罗里达——选民通过公民投票赞成以英语为官方语言（除亚利桑那外，其他3州都是赞成票占据大多数），正如西特林等人所指出，这4个州都是“不讲英语的人、移民、拉美裔人和亚洲裔人占的比例最高，而且在1970—1980年期间出现了拉美裔人及其他在外国出生的居民的最高增长率”。与此相似的是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市1989年通过公民投票赞成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也是在这之前10年当中出现了大量拉美裔和东南亚裔人的涌入，使得英语水平低的儿童在5年内增多至原先的4倍。有迹象表明，非英语人口迅速增多，有力地促使这些地方原住居民通过公民投票重申英语的地位以保持国民同一性，但当地的议员们出于选票考虑，却不愿意这样做。

种种迹象都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主张保持英语地位的。通过细心的民意调查，4位学者1990年得出结论说：“对于广大公众而言，英语仍然是国民同一性的一个重要标志。”1986年，81%的美国公众认为“每一个想住在这个国家的人都应该学英语”。1988年，在加利福尼亚一次民意调查中，76%的人认为英语对于美国人“非常重

要”，61%的人认为选举权应限于说英语的人。1998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2%的美国人强烈支持、25%的美国人基本上支持通过立法规定学校一律以英语为教学语言，英语水平低的学生则先上一年英语补习班。大多数美国人赞成保持英语的地位，而议员们在这一问题上却顾虑重重胆小怕事，这就促使人们争取通过公民立法提案权和公民投票复决权来维护英语的地位和反对双语教育。

在英语是否作为官方语言以及是否应结束双语教育的问题上，从1980年至2002年共有3个城市和4个州举行过12次公民投票（见表7.1）。这些公投都是由支持英语的群体发动的。除了1次以外，其他11次公投的结果都是赞成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结束双语教育。赞成票数所占的比例，最低一次为44%（科罗拉多），最高一次为85%（佛罗里达），平均为65%。在所有这些公投中，政界精英、权势机构几乎都与拉美裔及其他语言少数群体的头头们一样采取了反对立场。

表7.1 语言问题
上的公民投票，
1980—2002年

年份	行政区	公投目的	赞成票百分比
1980年	佛罗里达州戴德县	撤销1973年的双语条例	59
1983年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反对要求印发非英语选票的联邦法规	62
1984年	加利福尼亚州	要求联邦当局授权只印发英文选举材料	71
1986年	加利福尼亚州	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	73
1988年	佛罗里达州	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	85.5

		语言	
1988年	科罗拉多州	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	64
1988年	亚利桑那州	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	50.5
1989年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	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并要求批准美国宪法英语修正案	67
1998年	加利福尼亚州	结束双语教育	61
2000年	亚利桑那州	结束双语教育	63
2002年	马萨诸塞州	结束双语教育	68
2002年	科罗拉多州	结束双语教育	44

1980年，佛罗里达州戴德县那一次公民投票，要求撤销该市宣布为双语区和双文化区的条例，要求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并禁止使用公款“提倡美国文化以外的文化”。它受到拉美裔群体、《迈阿密先驱报》和大迈阿密商会的强烈反对，单是大迈阿密商会开支的宣传费就有5万美元。而提案支持者用于宣传的钱只有1万美元。戴德县的选民以59.2%的多数票通过了提案。

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一次公民投票，其提案是对州宪法的一项修正案，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反对者包括该州所有政界要人（唯一例外是当时任美国参议员的彼得·威尔逊），其中有当时的州长，州检察长，另一位美国参议员，州参院主席，州众院议长，旧金山和圣迭戈两市的市长，洛杉矶和圣何塞两市的市政会，全州各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除了《旧金山考察报》以外的所有各大报，加利福尼亚工会联合会（劳联—产联），以及加州天主教主教联合会。但到了选举日投票，全州73.2%的选民对这一提案投了赞成票，赞成票在所有各县均占多数。

1988年，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3个州就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提案举行公民投票，当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治·H. W. 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斯两人都表示反对。反对者包括这3个州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及著名社会人士。在佛罗里达州，反对者包括州长、检察长、州务卿、《迈阿密先驱报》、大迈阿密商会以及许多拉美裔组织，但有一些拉美裔组织因考虑到这项提案深得人心而决定弃权。最后，提案以85.5%的选票获得通过，全州各县都是赞成票占大多数。

而在亚利桑那州，斗争更加激烈。反对者包括州长、两位前州长、代表该州的两位美国参议员、菲尼克斯市市长、亚利桑那法官联合会、亚利桑那市镇同盟、犹太教领导人以及包括11个基督教教派的亚利桑那全基督教主教联合会。在投票之前的双方宣传运动过程中，提案宣传运动的主要资助人、“美国英语”组织负责人约翰·坦顿的一封信备忘录被泄露出去，他在备忘录中建议暂停移民入境，据说还对天主教徒说了一些有损人格的话，因此被提案反对者说成是“纳粹备忘录”，此事对提案一方打击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提案仅以50.5%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在科罗拉多州，反对提案的人包括州长、副州长、检察长、丹佛市长、一位美国参议员、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丹佛邮报》、州民主党（州共和党不表态）以及著名民权人士杰西·杰克逊。最后科罗拉多选民以64%的多数通过了提案。

1989年，斯坦福大学一位语言学家在回顾1988年的几次语言问题公民投票时，有些伤感但却准确地评论说：“大体说来，要求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运动取得了成功，却没有得到有权势的政界人物和组织的支持……‘美国英语’组织的领导人大概有理由声称‘谁也不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只有人民’。”

在随后10年，就是否结束双语教育问题举行的几次公民投票中，形势还是如此。199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就结束双语教育的227号提案进行公民投票时，有几位拉美裔群体领导人和许多拉美裔选民投了赞

成票。但该州所有民选的民主党官员都与克林顿总统一样，反对这一提案。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沃克·布什也有条件地表示反对。最后该州选民以61%的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案。两年后，亚利桑那州就同样的提案举行公民投票，反对者包括该州的共和党领导人，自州长以下的所有民选高官，所有各大报纸，布什州长和戈尔副总统。反对者花的钱比赞成者多好几倍，但亚利桑那选民仍以63%的多数票通过了提案。2002年在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支持结束双语教育的提案，但民主党领导人、包括8个院校的校长在内的著名学者和另一些上层人士表示反对。反对者还有包括《波士顿环球报》在内的各大报，以及“教师、工会、移民权利活动分子的联盟和某些群体”。公投结果是68%的选民通过了提案。

这20来年当中就语言问题进行的12次公民投票中，唯一的一次失败是2002年发生于科罗拉多州，就一项结束双语教育的提案公投的结果，是赞成票44%，反对票56%。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一位支持双语教育的女富豪在最后一分钟花费巨额资金，向那些怀有反拉美裔情绪的科罗拉多选民宣传说，一旦取消双语教育，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水平低的移民子女挤进主流学校的教室，引起课堂混乱”。科罗拉多的选民被吓坏了，于是选择了教育上的种族隔离。

拉美裔人对语言问题的态度，与黑人对种族优先照顾问题的态度有些相似，又有所不同。拉美裔人对于强调英语为官方语言这种基本上属象征性质的提案往往表示反对。例如，在1988年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公民投票中，据投票后调查，赞成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的盎格鲁裔选民有60%，而采取同样立场的拉美裔选民只有25%。在1980年戴德县就公务只用英语的提案进行公民投票时，表示赞成的人在白人占71%，在黑人中占44%，而在拉美裔人中仅占15%。1986年，加利福尼亚有41%的拉美裔选民赞成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两年后，在佛罗里达州就同一提案进行公民投票时，拉美裔选民中投赞成票的只有25%。

对于取消或缩短双语教育的措施，拉美裔人的态度就比较摇摆不定，往往表示赞成。这一问题对于他们子女的前程有直接的、很大的影响。1998年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表示，有66%的拉美裔学生家长希望其子女“尽快学好英语，即使在其他课程上落后一点也行”。1996年在休斯敦、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和圣安东尼奥五个城市进行的调查中，拉美裔学生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事是让他们孩子学英语。1998年一次全国性调查中，问题是学校是否该用英语进行教学，而给英语差的孩子另举办为期一年的补习班，对此表示非常赞成的拉美裔学生家长有38%，另有26%表示基本上赞成。1998年加利福尼亚之所以就结束双语教育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其直接起因是洛杉矶有90名拉美裔学生被家长拖出了双语班，抗议双语班教学质量低劣。正如艾丽斯卡拉汉牧师所说：“家长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只能到血汗工厂卖苦力或者在大楼里面当清洁工。他们希望孩子也能上哈佛和斯坦福大学，那就非得把英语学好不可。”1997年奥伦治县一次调查中，83%的拉美裔学生家长“说他们希望孩子一上学就学英语”。《洛杉矶时报》1997年10月的调查则表明，84%的加州拉美裔学生家长赞成缩短双语教育。拉美裔政治家和拉美裔组织领导人对这些数字感到震惊，遂加倍努力宣传要反对双语教育。他们又取得成功。据《纽约时报》报道，在1998年加州的公民投票中，几乎每一个民选的拉美裔官员都反对双语教育，赞成双语教育的拉美裔选民也不到40%。

对核心文化的挑战

克林顿总统1997年说美国需要一个第三次“大革命”，以证明即使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美国照样可以生存。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这一“革命”早已在进行之中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多文化主义运动，想要用主要与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来取代美国主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它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取得最大成

功，显赫一时，但随后遇到了反击，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战。当21世纪开始的时候，多文化主义是否还成功，有多大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多文化主义实质上是反欧洲文明。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多文化主义运动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单文化霸权，因为这一单文化霸权普遍排斥其他种族的文化价值观……这一运动反对狭隘欧洲中心论的关于美国的民主、文化和特性的理念”。它基本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多文化主义者提出了以下几点见解：第一，美国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构成的。第二，每一种族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第三，在美国社会居主宰地位的白人盎格鲁精英压制这些文化，强迫或引诱其他种族的人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第四，公正、平等及少数种族的权利要求将这些被压制的文化解放出来，各级政府和私营机构应鼓励和支持这些文化的振兴。美国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文化独霸全国的社会。大熔炉或番茄汤的譬喻说明不了真实的美国，相反，美国是马赛克，是沙拉，是“凉拌沙拉”。

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多文化主义者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很不相同的集团，自称“新民族属性”，其论点则与多文化主义者相平行。这一群体主要来自英国之外的欧洲移民，自称表达了“白人工人阶级”对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精英的愤怒，抗议后者压制各种文化，盛气凌人。“新民族”集团的一位领头人、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说，美国不是大熔炉，而是“油炸得滋滋作响的炒锅”。米库尔斯基说，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应该有民族意识，起来反对“虚伪的白人自由派、冒牌的黑人好斗分子及盛气凌人的官僚”。内森·格莱泽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他们1963年的巨著《熔炉之内》一书中说：“所谓熔炉之说其实是不曾有过熔炉。”他们承认，“独特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到第二代人就大体消失，到第三代消失得更多”，但他们争辩说“通过在美国的新感受”，民族属性又以“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再生了。为了促进这种民族属性感复兴，众议员罗曼·普辛斯基于

1970年提出“民族研究法案”，主张授权政府为民族活动提供经费。普辛斯基激烈谴责熔炉理念，热情鼓吹美国是马赛克。他这一法案通过了而成为法令，但对公众没有多大影响。此后10年这方面无大动静，到1981年这一法令就期限届满了。

“民族研究法”的完结象征了民族属性感复兴运动的失败。它的失败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各白人民族通婚者日益增多，某一民族属性感逐渐消退（见本书第十一章）。此外，白人移民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当中，有许多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国效力，他们基本上都已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之中。正如斯蒂芬·斯坦伯格所说，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属性感振兴运动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量移民的后裔的民族属性感临终的最后一息”。多文化主义者强烈谴责欧洲文明，所以也不会支持欧洲人闹民族属性。后者对此也作出了反应。波兰裔美国人的一位领导人1997年评论多文化主义时说：“多数波兰裔美国人都反对多文化主义者的反西方倾向，反对他们把西方文明说得一无是处而一味歌颂非西方文明……应强调指出欧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地，正是欧洲的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治、人权和文化自由的理想铸就了这个美利坚共和国。”总之，“新民族属性”运动强调的是第二波白人移民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之间的文化差别，而多文化主义者则认为这两种白人的文化都属于欧洲文明，他们要打倒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

多文化主义者直接向美国的“盎格鲁至上”形象提出挑战。他们恰如一位学者所说，是期盼着有朝一日美国“在文化上不再是‘合众’的，如果‘合众’是意味着信念习惯的‘统一’的话”；他们期盼着有朝一日美国“不再是文化上那么易于界定”。这样的转变将确实如克林顿总统所说，会是美国国家特性的一大剧变。多文化主义者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因此他们对中小学和高校影响很大。我们上文中已谈到，从历史上看，公立学校是移民的子孙融入美国社会的重要渠道。多文化主义者希望学校起的作用正好与此相反。他们不希望

学校优先讲授英语和共同的美国文化，而是要求首先重视各亚民族文化，像他们的一位学者所说，要求教师们“把学校变成真正文化民主的场所”。

多文化主义的一位著名作家詹姆斯·班克斯说：“多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革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让不同种族和不同阶级的孩子们能体验到教育上的平等。”从一个意义上说：“教育平等”可以指不同种族和不同阶级的孩子都能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对这样的目标，美国人恐怕都不会不同意。但在多文化主义者看来，教育平等还意味着教学大纲中，各种族、阶级的文化应受到平等的对待。要这样做，就会削弱孩子们对美国人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学习。多文化主义者忽视美国的主流文化，因为他们不承认有这一主流文化。他们有两个人就明确说：“我们认为多文化教学应贯穿于学校全部课程。”“多文化教育在所有各层次的教与学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多文化主义的出现，是美国教育中对国家特性的重视程度长期受到削弱的结果。在20世纪中期和后期，在中小学课本中有关爱国主义主题的内容越来越少，到20世纪末降至一个低点。夏洛特·艾姆斯对1900年至1970年课本中的有关内容作过详细调查，将其由低到高分五等：“根本未提国家”，“未讲爱国”，“提到爱国”，“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从1900年到1940年，中年级课本中的有关内容属于“提到爱国”到“民族主义”，而低年级课本中则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爱国内容。“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低年级和中年级多数课本都是未提爱国或稍微提到一点。”这一变化还表现在，“目的在于让孩子懂得一点共同历史和共同政治理想的战争故事内容，也逐渐减少了。”

保罗·维茨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等许多州使用的三年级至六年级22种课本进行的调查表明，在670篇故事和文章中，只有5篇“涉及爱国主题”。这22种课本中，有17种根本没有爱国主题的故事。那5篇爱国故事讲的都是美国独立战争。“涉

及1780年以来美国历史的课文一篇都没有。”那5篇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小女孩，其中3篇都是讲同一个小女孩西比尔·勒丁顿。22种课本都没有提到内森·黑尔、帕特里克·亨利、丹尼尔·布恩或保罗·里维尔这样一些卓越的爱国英雄。维茨的结论是，在这些课本中，“爱国主义几乎是不存在”。哈佛大学教授内森·格莱泽和塔弗茨大学教授里德·于达调查过20世纪70年代6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教科书非常突出的爱国主义主题，在这些新的教科书中都没有列为重要的目的。“道德和民族主义都成了过时的了。”在这些历史教科书中，“将美国社会联结起来的主要过程，都简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桑德拉·斯托茨基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使用的12种课本以后指出：“艾姆斯和维茨发现的那种趋势在继续，即使说不是在加速的话。”这些课本中，“有关国家的标志和歌曲的内容几乎全无”。课本的重点转向了种族问题。涉及美国的摘选篇章中，31%至73%都是谈美国的各个种族群体，其中90%是谈黑人、亚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结果，1987年的一次调查表明，知道哈丽雅特·塔布曼为何许人²的学生，多于知道华盛顿为独立战争时美军总司令以及林肯为《解放宣言》撰写者的学生。斯托茨基总结说：“最后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化消失了。”内森·格莱泽则于1997年总结说：“多文化主义在美国公立学院获得了多么完全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高校也出现了相似的动态，不仅添加了有关美国少数群体的课程，而且把它们规定为必修课。格莱泽指出，在斯坦福大学，关于西方文明的必修课被“重点介绍少数种族、第三世界各族人民及妇女的必修课”取而代之。随后，“规定了关于美国少数种族的必修课的高校，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明尼苏达大学、亨特学院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亚瑟·施莱辛格指出：“在78%的美国高校，学生不必学西方文明史即可毕业。有些高校，如达特茅斯、威斯康星、霍利奥克山等高校，学生必修课是关于第三世界或少数种族的课程，而不是关于西方文明的课程。人们的情绪是摆脱美国人的罪恶

欧洲遗产的包袱，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找弥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国最重要的50所高校都不再设有必修的美国历史课。

由于高校贬低了美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课程，高校学生对美国过去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都知之甚少。据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调查，常春藤名牌大学的大学生，90%的人知道罗莎·帕克斯是什么人³，但只有25%的人知道“民有，民治，民享”这句名言出自何人之口。1999年对55所高校四年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

1/3以上的学生不知道是美国宪法规定了政府三权分立体制。

40%的学生说不清美国内战发生于何时。

多半学生不知道是华盛顿指挥了独立战争的最后一仗，即约克镇之役，而误以为是格兰特（内战时北军统帅）指挥该役。

只有22%的学生知道“民有，民治，民享”名言是出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我们知道，在内战以前，美国历史主要是各州各县的历史。全国历史出现于内战以后，100年来对界定国民同一性起了关键作用。可是到了20世纪后期，美利坚民族这一层次以下的亚民族、种族的历史地位上升到相当于1860年以前的州、县历史的高度，而全国历史遭到了贬低。一个民族既是一个想象到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会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

上述的对于“美国信念”、英语首要地位及美国核心文化的解构性挑战，受到美国公众的坚决反对。多文化主义者对核心文化的挑战，也像另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引起了反击。已出版的一些书的书名，例如《并不自由的教育：大学校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诉苦的文化：美国的纠纷》《美德专政：多文化主义与美国前途之战》《多样性神话：多文化主义与大学校园的政治偏执》等等，就很说明问题。反对修改中小学和高校课程的力量增强

了，在一些地方已得到成功。“美国学校理事会成员与校友协会”和“全国学者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反对贬低美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反对降低美国高校教学水平。到一定时候，政界领导人也作出了反响。2000年，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教育机构采取措施，纠正学生对美国历史的无知状况。2001年，教育部预算拨款增加了几千万美元，用于改善美国历史教学。2002年，布什总统向一次有200位教育界领导人出席的会议致辞，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2003年，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提出一项法案，规定为教师和中学生设立美国历史和公民课暑假学习班。

“美国信念”、英语和美国核心文化所受到的种族主义、双语主义和多文化主义的挑战，以及它们引起的反击，已成为21世纪之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场解构美国和反解构之战的结果如何，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本土是否反复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以及美国是否不得不在海外与自己的敌人作战。如果外部威胁减退，解构主义者的运动就可能更来劲。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与外部敌人斗争，解构主义者的影响就会退落。如果美国受到的外部威胁不大不小、时断时续、含含糊糊，那么，对于“美国信念”、英语和核心文化在美国国家特性和国民同一性方面应占什么地位的问题上，美国人很可能会继续陷于分裂。

第八章 同化：归附者、双重国籍者 以及公民身份受到的损害

移民：同化与不同化

从1820年到1924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那些留在美国的人部分地同化了，他们的子孙则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从1965年到2000年，另有2300万移民来到美国，大多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给美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移民，而是移民同化或不同化。这些移民和随他们之后而来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会在多大程度上遵从原先的移民的做法，成功同化而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成为忠诚的美国人，放弃别的国籍，并且在信仰上和行动上拥护“美国信念”的原则？

美国并不是遇到这一问题的唯一国家，所有工业化的富国都一样。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全球人口流动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许多人是由一个欠发达国家流动到另一个欠发达的邻国，但也有空前之多的人进入了或想要进入富裕的国家。有合法移民，还有非法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当中，约有1/4是非法的。英国政府的移民与国籍管理局在2000年估计，每年非法进入世界各国者约有

3000万人之多。贫穷和经济发展都对移民起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工具既多又费用相对低廉，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迁居国外并与自己祖国亲友保持联系。据1998年统计，出生于国外的人占全国人的比例，在瑞士为19%，在德国为9%，在法国为10%，在英国为4%，在加拿大为17%，在澳大利亚为23%，在美国为10%。

移民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想迁居西方国家，而与此同时，多数西方国家又出现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保持人口稳定的出生率为2.1⁴。1995年至2000年，美国总人口出生率为2.04，但德国仅为1.33，英国为1.70，法国为1.73，意大利为1.20，日本为1.41，加拿大为1.60。人口出生率如此持续走低，意味着人口老化，最后导致人口下降。以日本为例，若不提高人口出生率或增加移民，其人口在2000年为1.27亿，到2050年将下降到1亿，到2100年将再下降到6700万。到那时，约1/3的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要靠少得多的有工作能力的人赡养。欧洲的人口和劳动力也会急剧减少，除非人口出生率迅速升高或吸收外来移民。这些国家人口下降，不一定会使个人富裕水平降低。然而，尽管生产率提高，但最终仍会带来一国总的经济产值降低以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降低，从而使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降低。从长远看，要避免人口减少，就必须提高人口出生率，但这就需要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上有重大改变，而以往政府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所作出的努力并未明显见效。

移民压力大，而人口可能减少，这二者加在一起，就促使有关国家允许更多的移民入境。就近期而言，移民有助于满足劳动力的短缺，即使在近10来年失业率颇高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劳动力短缺，就更加需要移民劳动力了。然而，大部分移民只能来自文化很不相同的国家，因此而出现的问题是，欧洲富国社会如何容纳大量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美国社会如何容纳大量的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等。

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以及保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角度看，吸纳移民会有很大好处，然而要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政府服务开支增多，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本国原有工人福利下降，社会两极分化，出现文化冲突，信任感降低，国民同一性的传统理念受到损害。移民问题可能在精英群体中间引起严重分歧，在公众中间引起反对移民的情绪，给民族主义政客提供利用之机。

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有些学者针对他们认为的移民威胁，提出了“社会安全”的理念。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勒·韦弗等人的解释，“社会安全”是指“社会在经历变化、遭受可能的或实际的威胁的条件下坚持其固有特性的能力”。它包括“在可接受的演变条件下保持传统模式的语言、文化、社交、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和习俗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移民。各国应付这一威胁的办法，可以是以下三种中的一种，或两三种的某种组合。粗略地说，它们是：不要或基本上不要外来移民；对移民不作同化；对移民加以同化。这三种做法都被采用过。

第一种做法，即限制移民，包括限制人数、提高允许入境的标准，包括技能、教育水平或来源地（美国1924年就这样做过），或者只允许移民停留有限的时间，如欧洲一些国家实行的“客籍工人”计划，以及美国实行过的短期合同工和H—IB计划。日本历来不欢迎外来移民，它2000年的全国人口中，在外国出生者仅占1%。迫于人口老化和最终下降的前景，日本政府曾考虑适当放宽移民政策，但受到了强烈反对。在欧洲，从历史上看，除法国以外，其他各国也是向来不愿充当“移民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中期，法国有些领导人提出了“零移民”主张，政府也采取了若干措施来限制移民。同一时期，德国有些领导人采取了类似立场，政府从法律上加强了对难民和避难的限制。这些行动成败参半。进入法国的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均超过10万人，至1995年降到约7.5万人，但至1998年又升到13.8万

人。进入德国的移民1992年达到120万人的高峰，至90年代后期下降了大约一半。美国的做法却与其他富国不同，它在1990年将合法移民的限额从27万人提高到70万人，整个90年代合法移民总数（包括限额外批准入境的人数）达到9095417人，大大高于80年代总数7338062人。

第二种做法，是对移民采取消极政策，不在同化上面下工夫。当来自文化很不相同的国家的移民人数众多时，就可能出现移民聚集的社区，他们自成一体，与外界社会不相往来或很少往来。移居法国的北非人和移居德国的土耳其人以及另一些欧洲国家内的移民就是这种情形，但这种做法导致了这些国家民众一致要求减少移民的呼声。对移民不作同化，会引起反对移民的压力，因而通常难以持久。

第三种做法是接受大量移民，同时促进同化，使他们融入本国社会和文化。欧洲国家以往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遇到大量移民，感到同化工作难做，因而采取限制的方针。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过成功的经验，只是1924年对移民采取限制措施后，移民锐减，使移民美国化的压力减少了。

20世纪60年代起，来美国的移民又增多，使如何同化的问题变得突出了。存在几种现实而又困难的选择，选择方案是明确的：是否应该急剧减少目前的移民名额？或者，是否大致接受目前的移民水平及其来源地组成，又不再进一步促进其同化？或者，是否大致接受目前的移民水平及其来源地组成，并大力促进其同化？若促进同化，又是何种同化？哪一种方案或方案组合最有利于促进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增进社会团结，推进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增强美国的国际影响和实力？考虑到美国现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哪种方案或方案组合切实可行？

同化：仍是成功吗？

部分而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更重要得多的是，美国是一个同化了移民及其后裔、使之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国家。正如米尔顿·戈登在他的精辟著作中所说，移民同化，就是他们采纳东道主社会的文化模式（文化适应），融入东道主社会的“群体和体制或社会结构的网络之中”，与东道主社会的成员通婚（就是他所说的“炼合”），而且养成东道主社会成员感。此外，美国接纳移民还要有三个步骤：走向消除歧视，再消除偏见，再消除价值观上的冲突。

不同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情形不一，而且从来不是完全彻底的。然而总的说来，移民同化，尤其是文化上的同化，在美国历史上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可能还是最伟大的成就。美国得以扩大人口，占领横贯东西的一片大陆，发展经济，所依靠的力量就是千百万充满献身精神和活力、既有抱负又有才干、忠诚于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和“美国信念”价值观的人们，他们使美国成为全球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成就，在历史上是任何别的社会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一成就的核心，就是彼得·塞林斯所说的“美国化同化”。他指出，移民只要承认英语为全国语言而加以接受，为自己的美国国民身份而自豪，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遵从“新教伦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和道义上正直）”，他就是融入了美国社会。人们对他的具体提法也许会有不同意见，然而从原则上看，这一提法的确是抓住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的千百万移民的美国化的核心。

同化的关键第一阶段是移民及其后裔接受美国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戈登指出，移民所参与的是“沉入一个亚社会的群体和体制的网络，这一网络已固定于基本轮廓之中，带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遍的新教的印记。由于早先已有盎格鲁—撒克逊的体制形式作为规范，英语又无所不在，而且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人数上居统治地位，移民的上述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并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熔炉，让

所有不同来源的移民的不同文化模式共熔于一炉，而是把后到的移民的一定文化贡献转变到盎格鲁—撒克逊的模子中去”。到了移民的第二代，“除了若干严密封闭的飞地以外”，人们的遭遇就是“在选定的阶级层次上几乎完全炼合（虽然不一定是结构上同化）到美国原有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之中”。

威尔·赫伯格在1955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指出，如果以为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合成体，那是错误的。相反，“美国人的自我形象依然是美国独立时即已具有的盎格鲁—美利坚理想……我们的文化同化进程基本上等同于我们的语言的发展：这里那里不时出现几个外来语词汇，有些字词拼写形式有点变化，但这语言仍然完完全全、明白无误是英语。”熔炉的譬喻并不恰当，用乔治·斯图尔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嬗变炉”：“每一时间添进一点异质材料，它不但熔化了，而且发生嬗变，因而并不会改变那原有的材料。”我们也可以用上文中谈到过的譬喻，即番茄汤，添加料会使它更有滋味，但不会根本改变它的实质。美国的文化同化史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又是一个同化的国家，这同化的意思就是美国化。然而，如今移民的人不一样了，与同化相关的体制和过程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美国不一样了。在移民同化方面，美国过去成就辉煌，如今却可能面临着并不确定的未来。

同化的缘由

过去，有许多因素促进了移民同化而融入美国社会。其中包括：

大部分移民来自欧洲各地，其原有文化与美国文化相近或相容。

移民自己要对去留作出选择，要留下来，就得愿意承担代价和风

险。

移民总的说来是想要当美国人。

移民若未归附美国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就返回他们祖国了。

移民来自许多国家，从来不曾有哪一国或哪一种语言的移民在一个时期内占绝大多数。

移民分散到美国各地，从来没有哪一个移民群体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大城市形成当地人口的多数。

从单个国家以及从整体上来看，移民都是断断续续、时多时少，不曾是持续不断的。

移民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一些人为国捐躯。

美国人有着共同的、相当明确的和高度正面的国民同一性理念，并且创立了各种机构，开展了各种活动，制定了各种政策来促进移民的美国化。

1965年以后，上述这些因素要么不复存在，要么是比较原先淡化得多。因此，现今移民的同化很可能缓慢得多，不如过去全面，而且不同于以前的移民的同化。同化不一定再意味着美国化。就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裔人来说，同化尤其成问题。他们移民来美国，给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问题，下一章中再细说。本章将比较一般地对比一下1965年之前和之后的移民、移民过程、美国社会的反应以及谈谈这种种差别对于现今移民问题意味着什么。

外来移民

相容性。在美国历史上，外来移民容易地、迅速地融入美国文化和社会，人们很自然而且很普遍地认为，其原因在于移民原籍的文化和社会与美国相近和相容。这有一部分道理。

这种见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关注移民原籍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是否与美国相似。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初说过，从绝对君主制国家来的移民对美国是一大威胁，因为可以估计到“会有最大量的移民”来自这些国家。更重要的是，杰斐逊认为这些人“会带来他们自幼时即已习以为常的那种政治理念，而假如他们已抛弃这些理念，他们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放荡不羁。如果他们止步于适度的自由，那倒是奇迹。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把这些理念传授给自己的子女”。杰斐逊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照他的见解去做，大部分的移民都该被禁止入境。事实上，的确有大量移民是来自政治制度与美国相反的国家，但其中多数人并非带来原籍的政治制度理念，因为他们在那些制度下受苦受难，才想逃脱到美国。

更多的人关注的是移民原籍的文化是否与美国文化相似。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曾认为华人的文化与美国文化大不相同，这妨碍了华人融入美国社会，这种文化差别论的见解后来也应用到另一些民族身上。它究竟有多大道理，也很难评说。最好的办法也许是看看从某一国来的人当中，有多少人决心不留在美国而重返原籍。这一数字是可能上下浮动的。在1908年至1910年期间，据迈克尔·皮奥里估计，重返原籍的人占移民总数的大约32%，分别来说，匈牙利人占65%，意大利北方人占63%，斯洛伐克人占59%，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占57%，意大利南方人占56%。比例低的则有：苏格兰人占10%，犹太人和威尔士人占8%，爱尔兰人占7%。看来，语言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原籍就说英语的人同化容易得多。

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人认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当中，来自北欧的人比来自南欧和东欧的人较易于同化。但这也不一定符合实

际。19世纪来自德国的移民当中，有些人就相当成功地抵制了同化，自成社群而不与外界往来，长达几代人之久。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移民，而是定居者。当然，这在德裔移民当中仍属例外情况。犹太移民大多来自东欧，重返原籍者很少，到第二代时，“在各个阶级层次上，这些在美国出生的犹太人已与当地非犹太人非常相近”。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当中，虽有相当多的人重返原籍，但留下来的人仍同化顺利。来自南欧、东欧其他各国的人亦大致如此。正如托马斯·索厄尔所说：“南欧人和东欧人虽然在大规模移民时代刚来美国时非常没有文化和未受教育，往往还不肯让自己子女上学念书，但到了1980年再看，他们已跟别的美国人一样有文化、受到教育，而且很多人走上了专业水平要求很高的各种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岗位。”

1965年以后的拉美裔和亚洲裔移民情况怎样呢？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的研究表明，按宗教和地理区域来看，不同群体之间有很大差异。目前，有关1965年以后的移民群体同化情况的材料还比较有限，但从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移民来到美国之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性质。总的说来，来自印度、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的人，其教育背景与美国人比较近似，一般同化较快。印度人和菲律宾人通晓英语，自然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来自拉丁美洲，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及其子女则同化较慢。墨西哥人来美国的人数多，又集中居住在某些地方，是同化慢的重要原因。墨西哥裔移民及其子女在教育水平上不仅低于美国原有的各种族群体，而且还低于几乎所有别的移民群体（详见第九章）。此外，墨西哥学者、美国学者和墨西哥裔美国学者都指出，墨西哥和美国文化差距大，这也有碍于同化。

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穆斯林，其同化似乎慢于1965年以后的其他移民群体。这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对穆斯林怀有成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极端穆斯林分子策划或据说是策划了一些受到广泛报道的恐怖袭击以后，对穆斯林的成见更深了。另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穆斯林文化的性质及其与美国文化的差别。在世

界上另一些地方，穆斯林少数群体被当地的非穆斯林社会认为是“无法消化的”。在美国，2000年对可能的穆斯林选民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66.1%的人认为美国社会表现了“对穆斯林信仰的尊重”，但31.9%的人认为并非如此。在洛杉矶对穆斯林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并不明朗的，“很多穆斯林，尤其是移民而来的穆斯林，对美国并无亲密感或忠诚之心。”当被问到“对谁更亲切或忠诚，是对伊斯兰国家（或你原籍），还是对美国？”移民中45%的人回答是伊斯兰国家，10%的人回答是美国，32%的人回答差不多相等。在出生于美国的穆斯林当中，19%的人回答是伊斯兰国家，38%的人回答是美国，28%的人回答差不多相等。57%的穆斯林移民和32%的出生于美国的穆斯林表示“若可选择，愿离开美国去一个伊斯兰国家生活”。对于是否要将公立学校改成伊斯兰学校这一点，52%的人认为非常重要，24%的人认为相当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想要保持其信仰的纯洁性和自己一套宗教仪式的愿望，可能导致他们与非穆斯林的冲突。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有大量居民为穆斯林，他们与基督教徒之间关系很紧张，有过一些暴力事件。那里有些穆斯林声称，公立学校“在夺走我们的青年人的伊斯兰信仰”，说“美国的公众政治制度失败了，已成为问题”。他们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100%纯洁的伊斯兰，要通过非暴力方式重建伊斯兰超级大国哈里发国家！”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往同化的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穆斯林移民，仍然是没法说的。

选择性。就同化而言，移民个人的动机和性格比他们原籍的文化更加重要。人们多多少少是自愿作出选择，离开故土而前往异国，往往要千里跋涉，这些人与那些宁愿留在故土的人当然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移民们有一种移民文化，这使得他们不同于那些不肯移居异国的人。

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过，爱玛·拉扎勒斯⁵给美国容纳的外来移民塑造的地球上“受苦的垃圾”这一形象，是一个并不准确的神话。莫伊尼汉指出，历史上那些移居美利坚的人是“一些非凡的、有事业心的、自力更生的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而且是自觉自愿这样的”。直到19世纪后期为止，选择了横渡大西洋来美国的人，通常在起程的港口就要等候很长时间，海上航行要一个多月，船上往往拥挤不堪，卫生状况坏得难以想象。离开了欧洲的人，多达17%死于渡海旅途。有了汽船以后，渡海时间短一点了，安全一点了，意外事件少了一些。可是仍然有一种风险，即到了埃利斯岛⁶，还可能有15%的人被打发回来，进不了美国。因此，选择了移居美国的人必须有毅力、有抱负、有进取精神，敢于冒风险，面对自己把握不了和无法预知的情况，为艰难的旅程付出情感上、财力上和体力上的沉重代价，决心要在自己并不确切了解的遥远异乡为自己创建更美好的生活。而绝大多数留在自己社会的人们，要么是缺乏上述的素质，要么是决心将自己的才干和活力奉献给其他的目标。法国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2000年说：“我们欧洲人是拒绝上船的美利坚人。我们不冒同样的风险，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

以往漂洋过海移居美国的那种种艰难困苦、代价和风险，如今大多不复存在了。当今的移民也可能像从前的移民一样有才干、决心和毅力，但并不是非有它们不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确实很需要这样素质的，倒是那些企图非法移居美国的人，企图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大概不必担心遇到边境巡逻队时受苦，但却有可能死在亚利桑那沙漠之中。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非法偷渡的人更是要冒巨大风险，他们把自己的钱和生命都交给那些阴险狡诈的蛇头，在海洋上历尽艰辛漂流几千海里乃至上万海里。像19世纪初期搭乘帆船来美国的人一样，他们必须是铁了心非来美国不可。可是，他们是真想成为美国人吗？

信仰。1820年至1924年，离开欧洲的人共有5500万，其中60%以上来到了美国。吸引他们的一个因素无疑是经济机会，因为据说这片土地上连街道都是铺着金子。可是别的地方也有致富的机会。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有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社会不分出身贵贱（南方除外），有着最早的定居者保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移民当中，有些人利用了这里的经济机会就走了，重返其故乡。而决心留下来的人则是对美国这里的原则和文化有了信仰，这种信仰往往开始于他们来到美国之前，是他们移居美国的一条重要的动机。正如奥斯卡·汉德林所说：“这些新来者几乎在登船之前就开始了当美国人的历程。”亚瑟·施莱辛格也说：“这些人渴望成为美国人。他们的目标是逃离，解脱，同化。”约翰·哈尔斯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从根本上说，移民刚踏上美国土地就已经是忠诚的美国人。人们广泛认为同化是促使移民转变政治信仰的主要手段，但它对一个异教徒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对一个归附者所起的作用。”

对于许多（但并非全部）移民来说，成为美国人，的确相当于皈依一个新的宗教，其后果是相似的。世代代信奉一种宗教，会习以为常，但要改变信仰皈依一种新的宗教，则需要作出自觉的、往往还是痛苦的选择。移民在痛下决心背井离乡以后，需要全心全意接受新地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才能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杰出的德国编辑约瑟夫·约费在20世纪90年代说过：“当年人们到美国是因为他们想要成为美国人。如今土耳其人并不是因为想要成为德国人而到德国。”

然而，因为想要成为美国人才来到美国的人，在移民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变化不定的。据不完整的资料表明，19世纪中期移居美国而又重返原籍的人较少。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的人，情况有所不同。许多单身年轻男人到美国干一二十年，挣够一笔钱，就重返原籍去过舒服日子了。这种人只是旅居美国，而不是归附美国。

现今来美国的移民，是要当旅居者还是要当归附者，也可以作出

选择，但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必定要作出这一选择。现在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脚踩两只船，既当美国国民，又继续当自己原籍所在国的国民，有双重居留地、双重依附关系、双重忠诚，往往持有双重国籍。之所以出现这一可能性，一是因为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手段发达，来来往往和互通音信既便宜又方便。二是因为美国社会不再像从前那样要求移民二者择其一。过去，美国人期待移民美国化，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社会的理想、文化、体制和生活方式。移民一遇到有人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就感到自己受歧视。可是在1965年以后的美国，美国化的压力变弱甚至消失了。移民若是遇到有人阻碍他们保留原先的文化特性，就感到受歧视。在1965年以后的移民当中，20%至35%的人会重返原籍，可是留在美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成为美国人，而有可能是想要有双重国籍。这些人既要享受美国这里能得到的机会、财富和自由，又保留自己原籍的文化、语言、家庭联系、传统和社会关系网络，二者得兼。

移民过程

多样性和分散。从前来到美国的移民，其原籍社会及语言多种多样，因而同化较顺利。在19世纪中期的移民中，来自英国、爱尔兰或德国的人都不占多数。在19世纪90年代，来自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人大约各占移民总数的15%，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和英国的人各占10%左右。1965年以后的移民当中，除了拉美裔的人以外，其来源地和语言更加多样化，这就迫使他们学英语，不仅为了与原有美国人交流，也为了移民之间交流。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今移民当中约有一半人是讲同一种语言（西班牙语），他们所占的比例仍在不断上升之中。

过去，移民群体分散在美国各地，这也有利于同化。开国先辈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必要的，这样做才能避免移民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他们对移民入境并无成见，但坚信不能让同一民族的移民集中在某一地区。华盛顿曾警告说，如果让移民定居在一起，他们就会“保持其语言、习惯和他们带来的信条（好的或坏的）”。但是让移民“与我们的人”混居，“他们或他们的后裔就会同化到我们的习俗、规矩和法律，一句话，就是成为同样的人”。杰斐逊也指出过移民“应分散到本地人中间，以便更快结成一体”。富兰克林要求将移民“较均匀地分散到讲英语的人们当中，在他们现今太密集的地方建立英语学校”。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国会的确认，国会于1818年拒绝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组织提出的在西北领地专门给爱尔兰移民划出一片土地的申请。国会这样做，是因为国会认为假如批准他们的申请，就会使国民分裂。正如马库斯·汉森所说：“这大概是美国移民政策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决策。”按照这一思路，国会此后要求一个地区只能在说英语的人占人口多数时，才能成立新的州。

可见，同化要求移民分散居住，这一直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基点。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的移民都是首先建立一个立足点，然后，随着更多的同胞陆续到来，立足点扩大到一个民族的移民聚居地。多数的移民聚居地都是在城市里，大城市成为许多不同移民群体的所在地。他们的多样性和彼此之间的竞争，防止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群体在当地建立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并促使他们全都学习熟练地讲英语。此外，随着移民入境速度减慢以及移民的第二代让位给第三代，一个群体中的社会地位上升的人逐渐搬移出去。其结果是，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各个街区，移民一代人替换一代人，一个群体替换一个群体，出现了塞缪尔·卢贝尔所说的“市区边境”。

与历史上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相比，1965年以后的拉美裔移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古巴人集中到了迈阿密，墨西哥人集中到了西南部，尤其是南加利福尼亚地区。但1965年以后来到美国的其他种族的移民，仍是呈现出多样性和随之而来的分散性（例外情形几乎没有）。移民来自非常之多的国家和地区。同一国的人聚居在一起，但

同一聚居地又是若干不同的群体混杂相处，其成分还时常起变化。在1995—1996年，纽约市内的移民有18%来自苏联，17%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10%来自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纽约移民聚居的街区中，通常都包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没有哪一个种族群体超过街区总人口的15%—20%。一个例外是下东角街区（Lower East Side），那里51%的人是华人。詹姆斯·达奥在1999年调查纽约的这种情形后指出：“与上一次欧洲移民大浪潮相比，现今的移民来自更加多得多的国家，说着更加多得多的语言。他们的经济地位有高有低，差别更大，其中也有受过很高教育和很有技术的人。这些人与先前的移民不一样，总是避开同族人挤在一起的聚居地，分散到别的街区。”（这里说说另一个例子：在20世纪30—40年代，我在纽约市昆斯区艾斯托里亚街区度过童年时，我的小朋友当中既有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也有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还有一个法国胡格诺教派的人。可是到了2000年，据《纽约时报杂志》9月17日一期报道，那里的少数民族老住户只剩下希腊人，其他的移民则是孟加拉人、巴西人、厄瓜多尔人、埃及人和菲律宾人。）多民族的人杂居一地自然有利于同化。据1990年统计资料，美国各县当中，从一个国家来的移民高度集中者，英语熟练的外来移民只有11%，而在多民族移民杂居的县，英语熟练的外来移民多达74%。开国先辈们说的对，分散是同化的关键。

不连续性。美国，正如内森·格莱泽所说：“并不始终是移民的国家”。维护移民权利的组织“移民论坛”指出，美国除了是一个移民之国以外，“又是一个本土文化保护主义之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通过立法先是限制亚洲移民，后来则是禁止亚洲移民，其中有40年期间总的移民入境人数也限制到很小的规模。可见美国不单是移民的国家，而且还是移民受限制和时断时续的国家。移民人数有高低起伏，而且正如罗伯特·福格尔所说，这种波动往往呈现出周期

性。19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移民高潮，到内战时停止了。直到19世纪80年代，移民绝对数字才重新上升到那一高潮的水平。移民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千分比）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8.4和9.3，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降到6.4和6.2，到19世纪80年代再升到9.2。爱尔兰裔移民在19世纪40年代为78万人，50年代为91.4万人，在随后几十年，平均为10年还不到50万人。德裔移民在19世纪50年代为95.1万人，随后两个10年期间分别为767468人和718182人，到19世纪80年代有过回升，但随后又下降，每10年不到50万人。总的说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移民浪潮于19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在19世纪90年代又下跌，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经济衰退。进入20世纪之初移民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移民中断。战后又有回升，但1924年的移民法使移民入境人数锐减。

这次锐减对同化产生了有力影响。理查德·阿尔巴和维克托·尼指出，1924年以后，大规模移民中断了40年，“几乎确保了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文化渐渐弱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个人和家庭在社会地位变化后迁出这些社区，使这些群体、尤其是在原籍出生的人，人数日益减少，其文化也变得无力。而后来者又很稀少，慢慢地，第一代移民让位给第二代，然后再由第三代接替。”可是现今持续不断的高水平移民却与以往不同，“将会造成与欧洲裔移民根本不同的状况，这些新的移民群体很可能会保持其庞大，其文化始终有活力，其体制保持丰满。”道格拉斯·马西也指出，在现今条件下，“不断有新人从国外移入，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移民通过世代交替形成新文化、社会地位变迁及与他族通婚的速度。结果，现今对美国少数民族性质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已是移民的不断入境，而不是移民的代代接替，其民族特性就更多地表现为其原有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

现今的移民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合法入境的移民达到平均每年约40万人，比1965年以前增加约10万人。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后期，这一平均数升至60万人，在1989年更跃升

到100万人以上。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为330万人，80年代则为700万人，90年代为900万人。国外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5.4%，而在2002年已翻番到11.5%。移民情况年年不一样，但在21世纪之初仍毫无减退迹象。因此，美国看来正面对着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即移民持续保持高水平。

历史上前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因为战争和马铃薯歉收而停止，第二次停止则是由于战争和反移民立法。今后，一场持续的重大战争也许会起相似的作用，美国若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则会降低移民入境的诱因并加大限制移民的压力。反恐战争、美国经济呈现走弱以及减少签证申请待办数量已经产生影响，使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总数从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的240万人，降到2001年3月至2002年3月的120万人。但一位分析家于2002年11月得出结论说：“没有迹象表明，2000年开始的经济减速或2001年的恐怖袭击导致移民入境速率的大幅度下降。”假若美国参与的战争在强度、规模或次数上不出现重大跃升，今后每年入境的移民人数很可能仍将在100万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同化虽仍将进行，但将比从前两波移民的同化慢，也不会那么全面。

战争。从前，在美国出生但受到排斥的人，只要参加了美国的战争，就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正式公民的身份。在19世纪20年代，没有土地的白人男子要求得到选举权，因为他们“为保卫国家而英勇流血，不亚于任何人”。美国内战中，第54马萨诸塞步兵团中的黑人英勇参加了强攻瓦格纳堡垒的战斗，共有20万黑人加入北军为联盟而战，所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宣称：“黑人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应当得到选举权，他们协助击败了叛军，英勇战斗，或以各种方式支援联邦军队……既然他们知道怎样扛枪打仗，怎样为国旗而战，他们当然也知道怎样选举。”黑人士兵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力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争取废除种族隔离和争取民权的运动。

同样，战争也促进了移民的同化。战争不但使移民人数下降，而且还让他们有机会和有劲头来展现自己对美国的忠诚。为美国而战，必要时为国捐躯，这就证明了自己的爱国之心，使那些反对移民的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难于再反对移民成为正式的美国社会成员。有一位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与几个犹太朋友一起志愿参军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后来说过：“我们都证明了自己，证明了我们比盎格鲁人更加是美国人。”归附者希望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

然而，他们也可能人在这边而心还在那边。在对墨西哥战争中，有一些爱尔兰裔移民从美军叛逃，跟另一些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一起组成了墨西哥军队中的圣帕特西奥营。内战期间，爱尔兰裔移民对黑人怀有敌意，不少人站到了南军一边。他们还是1863年反征兵暴乱的主力。尽管如此，在北军服役的爱尔兰裔移民仍多达15万人左右。著名的爱尔兰旅战功卓著，其中包括第69步兵团奋不顾身冲上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山坡直闯南军炮兵阵地的壮举，彻底驳倒了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一无所知党”的反爱尔兰移民谰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意志裔美国人造成了痛苦创伤。他们曾强烈主张美国保持中立，与亲英的美国精英人士相敌对。从1914年到1917年，美国日益高涨的反德激情令他们痛苦，他们企图避免表态，可是德国政府却逼迫他们表态，使他们陷于更加难过的境地。到1917年，德裔美国人群体的著名人士终于表态，说他们仍希望和平，但他们“百分之百是美国人”。在德国出生的德裔移民纷纷申请美国国籍，应征入伍。战争迫使德裔移民作出选择，使他们明白不再可能脚踏两只船，于是他们完全成了美国人，得到了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442步兵团由日本裔美国人组成的战斗队战功累累，成为“美国战史上受勋最多的分队”，他们的表现使另一些美国人对于将日本裔移民关进拘留营的做法感到内疚，并导致了美国政府取消对亚洲裔移民的限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宣传界都一直强调这是包括所有人种、民族和背景的全体美国人抗御强敌、捍卫自己国家

及其价值观的战争。

约翰·米勒提醒我们说，1918年7月4日在纽约城里举行过一次盛大阅兵式，更确切地说，是一次盛装游行。在几十万观众的面前，7万多人的游行队伍走过了第五大道，其中既有地道的美国人，也有各个盟国的代表（包括一支英军部队，这是英国军人头一次参加美国独立日庆典）。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40多个移民群体的代表团。他们人数有多有少，最小的代表团是来自海地的18人，最大的是意大利裔10000人和犹太人10000人，他们是从要求参加游行的35000意大利裔人和50000犹太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德裔美国人代表团打出的标语是“美国是我们的祖国”和“生于美国，成于美国”。还有希腊裔、匈牙利裔、爱尔兰裔、塞尔维亚裔、克罗地亚裔、斯洛文尼亚裔、波兰裔和立陶宛裔代表团，立陶宛裔人的标语是“山姆大叔是我们的大叔”。俄罗斯裔代表团身着红、白、蓝三色上装，委内瑞拉裔代表团吹奏美国国歌，华裔代表团突出表现为一支棒球队。《纽约时报》记者评论说：“在这一次万花筒式的盛装游行中，服饰绚丽夺目，百姓队伍漫长，精神庄严抖擞，让观众清楚看到诸多民族编织成充满斗志的美国图景，这是血统多样，理想统一。”

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所有各族移民，包括阿拉伯裔和穆斯林，都宣布自己忠于美国，悬挂国旗。参军的移民达到武装部队总人数的5%，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斗伤亡者当中有不少人是拉美裔移民。然而，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战争要求普遍动员和长期作战，现今的移民将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像从前的移民一样，来确认自己对美国的认同和忠诚。

美国社会：美国化成了非美活动

1963年，格莱泽和莫伊尼汉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美国，向

什么同化？”在1900年时，答案很明确：同化就意味着美国化。而在2000年，诸多答案复杂、含糊而且自相矛盾。美国有不少精英人士已不再相信自己主流文化的优越性，转而宣扬文化多样性和美国所有各种文化平等的理论。玛丽·沃特斯在1994年说：“移民进入的这个社会并没有清一色的单一的美国文化，相反，这是一个自觉多元的社会，其中并存着各种不同的亚文化和种族特性。”既然美国已成为多文化的社会，移民就可以在自己遇到的各种亚文化中作出选择，或是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他们可以不吸收美国核心文化就融入美国社会。同化和美国化不再是同一回事情。

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量移民涌入时，美国各级政府、企业和慈善组织曾经为他们的美国化付出了何等巨大的努力。20世纪后期的移民浪潮却没有激起同样的热情。只有众议员芭芭拉·乔丹以及她主持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主张制定“移民政策”以促进美国化，但该委员会1997年提出的温和建议大体上受到冷遇。总的气氛与20世纪之初完全不同。首先，移民问题上的辩论几乎完全集中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利弊及其对政府财政的影响。以往人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移民若无美国化，会对美国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同一性造成什么后果，如今人们却对此不大关心。

第二，人们往往暗示说同化多多少少会自动发生。移民既然人在美国，就会成为美国人，因此，没有必要为促进美国化费劲。第三，有人认为美国化不可取。这是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一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提出他的论点说：“激进的美国化计划将实际上是非美的，美国并没有单一的国民命运。”另一位学者认为美国化“含有种族主义、歧视女性、阶级统治、宗教排斥异己和人种纯洁性的意味”。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1989年就下结论说：“今天已没有人再主张让新的移民‘美国化’，那已是恶劣的老种族中心主义的过去。”在政界，除了芭芭拉·乔丹以外，也几乎没有哪位头面人物要求对最新的移民实行美国化措施。

由于不重视移民美国化，2000年有2100万移民说他们英语不行，政府却拿不出什么计划和经费来满足他们学英语的需要。2002年，马萨诸塞州有46万人说不好英语，这数字占全州人口的7.7%，而在该州两个城市，这比例高达30%，还有几个城市中为15%以上。这表明该州提供英语教学及其他社会服务的能力很成问题。报名参加英语学习班的人排长队，要等候两三年。

企业所起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也不同于20世纪之初。在20世纪后期这一“进步时代”，企业觉得有必要帮助它们的员工特别是那些跟顾客和客户打交道的员工学英语。在它们的成人教育活动中，很多人是学英语的移民，许多企业为雇员英语教学提供了经费。然而，总的说来，企业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在规模上仍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企业让员工学英语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眼前的需要，而不是着眼于更广泛的美国化，不是把它当做更广泛的美国化运动的一部分。企业对广泛的美国化缺乏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反映出一个个事实，即它们日益参与国际商务，它们的领导人具有跨国和全球的身份。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曾带头促进美国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福特已相当明确地将自己界定为一家跨国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2002年，它的最高层领导人当中有好几个是英国人。

从前，企业关心的事主要是让移民成为自己产品的有效生产者，而不是让移民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但是，在百年之后的这个消费社会中，移民人数增多，其购买力也提高，这个日益增长的市场对企业有吸引力。据估计，移民和少数种族群体的购买力在20世纪90年代高达每年一万亿美元，他们又“渴望得到自己文化遗产标志物”，商界为了向他们推销产品而花费的“广告费每年接近20亿美元”。能表明种族独特之处的产品以及种族特性“如今受到了我们主流商界文化的大力促进”。企业还利用外语向移民推销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量的私立非赢利性组织参与美国化活动。1965年以后，还有许多这样的组织给移民提供帮助，但促进移民

美国化已远非过去那样重要的目标。与特定移民群体有关系的组织更是强调发扬种族特性，而不是强调增进美国国民的同一性。拉美裔组织和非白人组织鼓励其种族群体的成员将自己定为少数种族，从而有资格享受政府对少数种族的照顾。有些组织，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保护基金会，是由福特基金会出钱创办的，没有任何会员，其宗旨就是保持移民群体特性，提倡移民群体意识，维护移民群体的权利。正如彼得·斯科里所指出，如今的政治动力趋向于让墨西哥裔美国人脱离其他的社会群体。迈克尔·琼斯—科里亚也谈到纽约的一个民主党机构不大欢迎别的拉丁语移民进入它的俱乐部。实际上，就移民而言，少数群体的政治已取代了政党政治。

在20世纪初，联邦、州、县各级政府竞相大力促进新移民的美国化。到20世纪后期就不一样了，各级政府促进美国化的活动较弱，而且往往还走向相反的方面。美国政府还鼓励移民保持其原籍语言、文化和民族特性。这种气氛以及照顾少数群体的赞助性行动计划，使得拉美裔和亚洲裔移民保持其种族特性反而有利可图。20世纪90年代有大约85%的移民被定为“弱势群体”，2000年有大约75%的在国外出生的人被定为“弱势群体”，尽管他们不可能经历过美国的种族歧视历史，却照样有资格享受赞助性行动。正如约翰·米勒所说：“群体权利崇拜依然是对移民美国化的最大威胁。”政府这样做，是让新来者比土生土长者享有更大特权。斯科里还谈到美国政府的另一个做法，就是不按正式公民的人数，而是按照包括合法居民与非法居民在内的总人数，来划分国会议员选区，其后果就是听任“霉烂市区”蔓延。这种选区有选举权的公民比别的选区少得多。此外，还专门要划拉美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从而在体制上保障移民群体的利益，而不是鼓励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与其他群体的利益一致起来。

历史上，公立学校对促进国民同一性起过重要作用。可是在20世纪后期，这些学校却是促进多样性，没有努力给移民灌输美国文化、传统、习俗和信念。有时，美国的教育反而起到促使学生脱离美国国

民身份的效果。据20世纪90年代初圣迭戈市中学的一项调查，在3年中学教育以后，将自己身份定为“美国人”的学生比例下降了50%，自定为归化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的学生比例下降了30%，自定为外国人（绝大部分是墨西哥人）的学生比例上升了52%。这一调查的结果表明了“种族意识的迅速上升”。这一调研报告的著者鲁本·朗鲍特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不是走向同化的主流身份（美国人或归化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而是回复到最大群体的移民身份。”如果在中学时期还没有脱离美国国籍，那么在高校中仍有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和移民学生“叙述他们在中学时曾高度同化到盎格鲁环境之中，所以他们不曾认为自己是少数群体的成员”。可是，在伯克利，这些学生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而形成自己的种族身份。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说他是“在伯克利再生了”。既然社会珍视种族多样性，移民自然就有强烈的诱因来保持和重申自己的祖籍。

双重国籍和双重公民身份

1795年，美国国会要求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宣誓，庄严宣布自己拥护美国宪法，完全彻底放弃对原籍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忠诚，坚决保卫美国的宪法和法律而反对内外一切敌人对它们的侵犯，并按照法律的要求拿起武器捍卫美国，或按照法律的要求在美国武装力量中担负非战斗性勤务，或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平民指导下从事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200年后，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但联邦行政机构于2003年发起一场运动，想要修改和削弱1795年规定的誓词。原誓词体现着有关公民身份的两点中心思想：第一，公民身份是排他性的。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公民身份，但一个时候只能有一国的公民身份。第二，公民身份是一国政府授予的一种独特的身份，其权利与义务使公民不同于非公

民。

在20世纪后期，大规模的移民和解构主义运动加在一起，使公民身份的上述两条理念受到了损害。损害排他性原则的，是鼓吹双重忠诚、双重国籍和双重公民身份的强大政治势力的崛起。而损害公民身份独特性的，则是公民的权利和特权被延伸给非公民，同时还有一种说法，说公民身份不是一国政府授予个人的，而是个人的一种跨国权利，他住在哪里就把这身份带到了哪里。在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由于美国的特点，这种趋势在美国的影响比在其他西方社会更严重。最近几十年，移民当中成了美国公民的人数比例大幅度下降，而既归化入美国国籍而又保留一外国国籍的人数比例则大幅度上升。这些趋势表明美国公民身份的价值大大降低了。

现今的移民当中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前共产党国家的人，可归入归附者一类。另有一类属于旅居者，其比例比过去低一点。但有大量的人——究竟多少是没法说的——属于脚踩两只船者。其中一人说：“我们这样的人在两个世界里坐收其利。我们有两个国家，两个故乡。要把我们算做这一国人或那一国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两者都是。这并不矛盾，这是一个人类的事实。”这种人被学者们称做“终身两靠者”“来来去去者”“跨国者”或“漂移者”，但既不是入境移民又不是出境移民，因为他们不是一国人身份转变为另一国人身份，他们是“脚踏两个世界”。由于地理原因，这种人绝大部分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他们利用一个周末就可以跑一个来回，随时可以给亲友通电话。“时间和距离对于昔日的欧洲移民而言是大问题，而对现今的拉美移民而言却不在话下……自由女神像是欧洲移民心目中的象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终点。对拉美移民来说，终点是不存在了的。”

这些来来去去的人占原籍国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这就让他们日子更好过了。许多西半球国家都是如此。据1990年统计，现住美国的人占下列原住国人口的比例是：

牙买加	23.0%
萨尔瓦多	16.8%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16.0%
古巴	11.3%
墨西哥	9.4%
巴巴多斯	9.2%
多米尼加共和国	8.5%

一国人口当中有如此之多的人住在美国，他们与原籍国政府就有更加多得多的机会和更加大得多的诱因来彼此保持联系。

在历史上，从甲国一地迁出的移民通常到了乙国也是聚在一地。现在，这两地的人可能都是一个跨国群体的一部分。原籍的群体等于是复制于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有一个4000人的村庄叫米拉弗洛尔斯，该村不少人移民到了美国波士顿，控制了波士顿的牙买加平原区的一个街区，据佩吉·莱维特报道，这些移民在那个街区尽一切可能重现他们在原籍的生活，连住宅的装饰都相似。这等于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米拉弗洛尔斯。南北之间往来频繁，联系不断。“两地之间总有人来来去去，物资、信息和新闻的交流是持续不断的。某个人病了，夫妻之间因第三者插足而吵翻了，或某人终于领到了签证，两地的人们几乎都会一样快地听到消息。”相类似的是，墨西哥的一个小镇契南特拉一半人还在原地，一半人到了纽约城。“契南特拉人认为两地仍是一家，2500人在这里，2500人在那里。”墨西哥一个小镇卡萨布兰卡5800人，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半迁移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以至于人们怀疑卡萨布兰卡小镇是否还能维持下去。1985年，萨尔瓦多的因蒂普卡镇有20%的人移民到了美国华盛顿市的亚当斯—摩根街区。美国艾奥瓦州的马歇尔镇有3万居民，镇内最大的企业是斯威夫特公司肉类食品包装厂，共雇工1600人，其中900人来自墨西哥的一个15000人的丘阿托镇。瑞安·里珀尔指出：“对于这些墨西哥工人来说，艾奥瓦州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居住地，不如说是一个遥远的

打工之处。”而马歇尔镇的“肉类食品包装业”对丘阿托镇的经济活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跨国村镇两头之间通过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保持联系，特别重要的是在寄居国成立的负责援助原籍家乡的组织。居住于波士顿的米拉弗洛尔斯人就成立了“米拉弗洛尔斯开发委员会”，援助自己的老乡们。该委员会从1992年到1994年筹集到7万美元，给家乡的一个相对应的委员会使用。在这方面，跨国的墨西哥群体更加活跃，这类的组织大约2000多个，会员约几十万人。正如罗伯特·利肯所说，这些组织既为它们在美国的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又使他们得以与家乡的人保持联系，与原籍的文化、习俗、语言和传统保持联系。从某些方面看，在美国各地的这些墨西哥人群体有点像19世纪中期移居美国的德意志人群体。但二者的重大差别在于，当年那些德意志人跟他们的德国老家没有联系，是真正的移居者，自称为“在美国的德意志人”；现今的拉美人却是脚踩两只船，在美国和在老家都有根。

像这样有两种语言和两个家，可能还有双重忠诚的人日益增多，因此出现了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人。过去几十年来，既有美国公民身份又有另一国公民身份的人迅速增多，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批准或容忍多重国籍的国家多了。1996年，17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7个国家允许公民双重国籍。2000年，这数字增加到14个。斯坦利·伦肖恩估计，正式或非正式多多少少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在2000年已经大约有93个之多。

第二，来到美国的移民中，大量的人是来自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1994年至1998年期间向美国移民最多的20个国家中，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多达17个（不允许双重国籍的3个国家是中国、古巴和韩国）。这5年中，从这20个国家到美国的合法移民超过260万人，其中有220万（86%）是来自那17国。来自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的人更有可能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们无后顾之忧，不必担心丢掉原国籍。此外，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双重国籍者约有50万人，因为按照血缘

原则，父母中有一人为一国公民，其子女不论出生于何地，均有该国公民身份。

双重公民身份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脚踩两只船的人要求其原籍政府保留其原籍公民身份。来自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尤其如此。他们希望避免在两国公民身份中作选择，希望具有双重公民身份，从而能够合法地参与两国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第二方面的动力，按照迈克尔·琼斯—科里亚的说法，是自上而下，即原籍的政府希望其出境的移民保留原籍公民身份，与原籍社会保持联系，特别是给原籍的亲友汇款。这些国家的政府又鼓励移居美国的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从而能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促进原籍国的利益。2001年报道过，“驻美国各地的墨西哥领事馆鼓励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归化入美国国籍而同时又保留墨西哥国籍。”在巴西、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巴拿马和秘鲁，政府都这样做。

既然这些国家允许其公民具有双重公民身份，其出境到美国的移民在美国的归化率已成倍上升，移民自身希望这样做的，归化率就更高。他们申请美国公民身份时也走宣誓的过场，说要放弃对原籍的忠诚，但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他们这样做能够成功，也是因为美国实际上已放弃了公民宣誓中的排他性原则。这一变化，如同赞助性行动和双语教育一样，首先是非民选的法官和行政官员干起来，然后得到了国会的承认。

美国究竟有多少人具有双重公民身份，几乎不可能得出精确的数字。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有100万人具有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而在整个西欧这种双重国籍的人估计有300万到400万。如此看来，内森·格莱泽估计在美国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能达750万人，似乎是可信的。那么，在美国2000年1060万出生于外国的公民当中，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人占了几乎3/4。

在美国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原籍国的政治活动，因国家而异。某些情况下，例如巴西和哥伦比亚，允许他们到本国驻美国的领事馆参加投票。另有几个国家只允许他们回国参加投票。而墨西哥却不允许这样的人参加投票，只在别的方面承认其墨西哥公民身份。即使是允许参加投票的情况下，实际参加投票的人也不一定很多。例如在纽约，哥伦比亚人多达20万，但在1990年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前往领事馆参加投票的只有3000人，而在1998年哥伦比亚议会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更少。在马萨诸塞州有俄罗斯选举权的俄罗斯人约22000人，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选举，参加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的人更少。但在多米尼亚共和国2000年总统选举中，有好几千人从美国飞回去参加了投票。

比投票更重要的活动，是为原籍政党和候选人捐款。墨西哥、多米尼亚共和国等国的政客经常到美国开展募捐活动。琼斯—科里亚指出：“拉丁美洲各国全国甚至地方性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都把洛杉矶、纽约和迈阿密当做募捐的大站。”据估计，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竞选经费约有15%来自国外。1996年，该国一重要政党的官员声称该党募捐而来的经费有75%来自海外的捐款。“在多米尼加选举期间，政治家们在纽约募捐而得的钱多达数十万美元，其中很多钱来自纽约几个市区内举办的150美元一客的聚餐会。”住在美国的双重国籍者还可能回原籍竞选公职。安德烈斯·贝穆德斯本来是墨西哥人，1973年非法移居美国，在美国成了企业家发了财，2001年回原籍当选为县长。1997年，新泽西州哈肯塞克市的一个市议员回哥伦比亚竞选参议员，他宣布如果当选了，两头的公职都要干，一身二任，结果未当选。

这些行动表明，双重公民身份对个人及其原籍是有利的，但对美国是否也有利，就难说了。这一现象的存在说明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和处理办法已有重大变化。从传统上看，在欧洲，一个人对君主的臣属关系既是排他性（只一不二）的，又是永久性的，即英格兰谚语所说“一日为臣民终生为臣民”，只能一辈子忠诚于一国之君。美国独立

时，在这一点上抛弃了永久性原则，但保留了排他性原则。独立意味着美国人集体终止了对英王的忠诚。1795年的归化法律明确了排他性，言外之意抛弃了永久性。既然肯定了别国的国民有权归化为美国公民，也就很难剥夺本国的国民变为外国国民的权利。美国1776年独立时，组成合众国的各殖民地曾声明拥有脱离合众国的权利，但在内战时期，联邦政府不承认南方各州有权集体脱离合众国另行成立邦联。而在内战以后，国会觉得有必要明确肯定个人脱离美国而改换国籍的权利，因此于1868年通过相应的立法。美国是头一个明文规定个人放弃国籍为“基本人权”的国家，后来不少国家（但不是所有的国家）也这样做了。

正式否定永久性丝毫也不意味着正式否定排他性。事实上，直到20世纪，“国际法律和惯例都不赞成双重公民身份”。20世纪前半期，国会和国务院还曾“多方劝阻和防止双重公民身份”。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开始限制和否定这些努力，国会则于1978年取消了“要求公民在双重国籍中只能选择其一”的若干法律条文。但国会并未取消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者应宣读的誓词。

实际上，美国政府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消一个美国人的公民身份，个人几乎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公民身份又成了永久性的，不可剥夺和不可放弃。正如斯坦利·伦肖恩所说：“现在没有一个美国公民能因为在别的一国或多国承担公民责任而失去其美国公民身份。即使他在外国所承担的责任包括加入别国国籍，向别国宣誓效忠，参加别国选举，在别国军队服役乃至作战……竞选公职和担任公职，都是一样。”伦肖恩说据他所知，“世界上只有美国允许它的公民做所有这些事情。”因此，在公民身份这一点上，美国本来是抛弃了永久性而采纳了排他性，现在却变成采纳永久性而抛弃了排他性。

对公民身份问题，人们也作了各种譬喻。有人说，双重公民身份就好比是双重父母和双重子女。但有人拿婚姻作了更贴切的譬喻。从前在西方社会，婚姻关系既是永久性的又是排他性的，一夫一妻，至

死不变。后来允许离婚了，但一夫一妻制仍未变。而允许双重公民身份就好比是允许重婚制。

双重公民身份使得双重国籍和双重效忠都变得合法化了。一个人只有一国公民身份，这身份就有重要的意义。而一个人有两国或多国公民身份时，这身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只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利用一国公民身份，为了某些别的目的而在别的情况下利用另一国公民身份。脚踩两只船的人正是为了如此利用公民身份，才变为双重公民身份的人。

这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移民要成为美国公民，必须宣誓放弃对其原籍国的忠诚，而只忠诚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可是出现双重公民身份后，美国的公民身份就不再具有特殊意义了。双重身份的人还每年给原籍的亲友、企业和开发项目汇去数百亿美元的款项，本来应该用于美国的这些钱就这样流失了。

双重公民身份是违背美国宪法的。按照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美国公民只能在他所居住的州参加选举。现在许多美国人在两个州都有住房，但他只能在一个州投票或竞选公职。可是双重公民身份的人却能在两个国家投票或竞选公职。

公民与非公民

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可以回溯到千百年以前，而双重公民身份却使公民身份的独特性消退。远在古雅典，公民与非公民是不一样的，非公民，即metics，是为了“寻求经济机会”而来到雅典，他们有义务协防这一城邦，但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其子女亦继承其非公民地位。亚里士多德是metic，但他赞成这一制度，认为公民制度有其优点，人们不能“仅仅靠居住于一地”就获得公民地位。在罗马共和国，

公民与非公民也是有区别的，但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公民身份延伸得越来越广，逐渐失去其独特性。在欧洲中世纪初期，公民这一概念也暗淡无光了。出现民族国家后，人们成为君主统治者的臣民。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用公民身份取代了臣民身份，随着民主化的进展，公民制度具有了它的现代形式。正如彼得·舒克所说：“公民身份的意义在于，它是指一个多多少少具有政治特色的政治群体的成员身份，这特色表现为该群体的成员们所共有的一套治理与法律方面的公共价值观。”

公民身份使个人的身份与国家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国家的政府确定公民身份的资格标准（例如根据血统和根据出生地）以及获取公民身份的程序。然而在20世纪后期，国家公民的概念受了攻击，获取公民身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遭到削弱，公民与非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区别严重萎缩了。这种种情形出现，是因为一些人声称现今已有普遍人权的国际协议，公民身份不是靠国家授予，而是人人人生而有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断了，正如亚塞明·索伊萨尔所说，这损害了“公民身份的国家制”。

在美国，移民申请归化入美国国籍时，应符合几条有限的和明确的标准。简单说来，这标准就是：

- 一、在美国合法居留五年；
- 二、品行端正，无犯罪记录；
- 三、能说、读、写普通英语（八年级水平）；
- 四、对美国政治体制和历史有一般了解，“公民测验”及格。

有人批评这标准太严，但其中有一位批评者仍承认：“比较而言，美国对归化的要求还算是相对适中的。”关键的两条是对英语以及美国的历史和政治要有基本的了解。它们体现出美国国家特性尚存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英语文化遗产以及“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

在多数西方国家，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在20世纪后期都遭到削弱。“瑞典、荷兰、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都越来越多地将民事、社会乃至政治上的权利扩展给居住在它们领土上的非本国公民。”类似的过程也出现于美国，带头的是法院。“一系列的司法裁决禁止政府，特别是州政府，根据有无公民身份分配法律权利和经济利益，从而显著降低了公民身份的政治和经济价值。”

有三类权利和优惠对美国的人们有重要意义：一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二是经济权利、优惠和政府提供的福利；三是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权利。对于公民和非公民来说，仅在最后一类权利上面待遇有重大差别。

宪法规定的权利是授予“人”的，而不问其有无公民身份。因此，至少在2001年“9·11”以前，完全可以说非公民跟公民一样，“保障有正常的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享有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有权在刑事审判请律师作辩护，有权不因自诉其罪而定罪，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9·11”以后，由于安全的需要，这方面的待遇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有了某些重要的差别，从长期看，有可能使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差别消失的总趋势有所减缓或扭转。

在经济权利、福利和机会方面，一些州将某些特定的职业或经济福利局限于公民范围之内的法律已普遍遭到法院的否定。在1971年著名的“格雷厄姆诉理查森”（403 U.S. 365）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将部分居民身份定为“外侨”是不符合宪法的。在20世纪90年代，有两次试图限制外侨经济福利的举措均未达到其目的。一次是1994年加利福尼亚经由公民投票，以59%对41%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公民提案，规定非法移民及其子女不得享受医疗、教育和生活方面的福利。但最高法院早在1982年就裁定得克萨斯州试图将非法移民子女排除于公立学校之外的措施为无效，因此加州的上述公民提案也无法实施。这一公民提案还被认为是侵犯了国会负责管制移民的法案的权限。另一次是1996年国会禁止给合法外侨发放福利救济金和廉价食品券，但

随后几年中这一禁令即名存实亡，仅适用于未来的移民。1996年国会通过的这项法律居然也遭到阉割，连批评这一法律的彼得·斯皮罗也说这是“令人震惊的”。他认为这可能“只是公民与非公民的差别继续缩小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另一位权威人士亚历山大·阿雷尼科夫将2000年情况总结如下：

定居下来的移民生活状况大体上跟多数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他们不能参加选举，也可能没有资格到某些政府部门就业，但他们工作，拥有财产，能到法院打官司，可以从事大多数的职业，并行使宪法规定的多数权利，其条件与本地出生的公民和已归化的公民是相同的。

政治和政府工作是公民与非公民之间还有重大区别的一个领域。非公民不得担任政府需要经过保密审查的职务，通常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参加陪审团。这些限制是重要的，但也受到攻击。在19世纪，美国许多州曾允许外侨参加选举，但到20世纪20年代，选举权被限制在公民范围以内。但在许多欧洲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还有瑞士的几个州，非公民有权参加地方选举。美国许多地方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要求，有的县已批准外侨参加当地的投票。墨西哥裔美国人群体尤其积极要求让外侨（包括非法入境的外侨）得到选举权，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在就任墨西哥外交部长以前也提出过这一主张。洛杉矶地方学校董事会一位负责人就说过：“从前只有白人男子有选举权。我认为现在该跨越公民身份这条界线了。”

放宽了申请公民身份的条件，照理说应该使申请公民身份的人数增多。但另一方面，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在权利和优惠方面的差别减少，照理说又会降低外侨申请公民身份的动机。这两种趋势中，哪一个更有劲呢？总的说来，在欧洲和美国，归化率在20世纪后期都是低的。美国的归化率还低于加拿大的归化率。归化率低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来到美国的移民显然缺乏期望归化的热情。美国外侨归化率已

从1970年的63.6%下降到2000年的37.4%，其中，在美国已居住20年以上的外侨的归化率也从1970年的89.6%下降到2000年的71.1%。既然有可能获取双重公民身份，应该有更多的人要求归化，可是越来越多的移民不想这样做。

只有当移民感到归化入美国国籍才能保持美国政府提供的经济福利时，才会出现归化率上升的例外情况。有两件事至少曾暂时促进归化率上升。从1994年到1995年，申请公民身份的人数一度上升了75%。从1995年到1996年，批准的申请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未获批准的申请也从1995年的46076件增加到1996年的229842件。出现如此剧烈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根据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有大约300万非法移民在1994年获得了申请归化的资格。二是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公民投票通过了关于非法移民不得享受福利待遇的公民提案，它激起的辩论最后导致国会1996年通过了《福利改革法》，这让外侨感到政府福利可能保不住了，所以纷纷申请公民身份。这一时期归化率的猛升据说是史无前例的。1996年归化的移民都不隐讳自己的动机。一位墨西哥裔移民活动分子就说过，加利福尼亚州那项公民提案“像是一阵钟声，敲醒了沉睡的巨人”。这么多人涌出来申请公民身份，并不是由于自己作出了选择，用琼斯—科里亚的话来说，这是“胁迫之下的归化”。1997年后，申请数和批准数又下降了，不过仍高于1995年以前的水平。

“9·11”事件使许多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对美国有了较深的认同，而政府随后对非美国公民的外侨进行审查和驱逐其中一些人出境，更促使大批的人申请公民身份。据国土安全部报道，从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这一个年度中，提出公民身份申请者共700649人，比上一年度的501646人增多了将近20万人，即增长40%，但获批准的人数反而减少6%，这大概是因为审核更细致了。

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受到削弱，归化率总的说来趋向下降，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归化率一度蹿升，这一切都说明，移民是否决定

申请公民身份，政府的物质福利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申请公民身份，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美国文化和信念的吸引，而是因为他们受到政府的社会福利和赞助性行动计划的吸引。如果这些福利待遇也提供给非公民，申请公民身份的劲头就小了。用彼得·斯皮罗的话来说，公民身份正在成为又一种普遍可得的“联邦社会福利”。假如没有公民身份也可以享受福利，那么公民身份就成为多余之物。正如彼得·舒克和罗杰斯·史密斯所说：“日益起作用的，不是公民身份，而是福利国家成员的身份……与政治社会成员不同，福利国家成员身份具有关键的和日益增长的意义；对于完全依赖社会福利的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真正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约瑟夫·卡伦斯问：“忠诚和认同于国家以及爱国之心，又如何呢？”他回答说：“作为一种规范，我们不应该将这种期望强加于他们。”在公民身份问题上，这种观点在知识界、学术界很流行。就是说：“作为一种规范”，不应期待移民爱国和为国效忠，认同和归附于美国。既然如此贬低公民身份，这就表明，在做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上，观点有了剧烈的和象征性的变化。否定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也就是否定美国作为文化与政治社会的意义。

替代美国化的是什么

到20世纪末，同化已不再仅仅意味着美国化。有别的做法能够替代美国化，事实上这些现象也已经发生。

某些移民的做法是分割式的同化，不是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而是同化于美国社会中的某一亚民族的、往往是位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尤其是来自海地的移民受到这方面的压力。例如，在纽约市、迈阿密和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来自海地的移民与美国黑人在

同化问题上关系紧张。来自海地的第一代移民认为自己作为移民黑人，比美国黑人高一等，瞧不起他们，如同玛丽·沃特斯所说，认为美国黑人“懒惰，散漫，老是想种族冷落和障碍，对家庭和子女教养采取凌乱的、自由放任的态度”。然而，海地裔移民的子女如今受到同代人的压力，要他们采纳美国黑人的亚文化，“与其说是成为美国人，不如说是成为‘非洲裔美国人’。”

替代美国化的第二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不同化，要让移民自己带来的文化和社会体制在美国永久存在下去。19世纪的德意志移民也曾企图这样做，但那时他们是聚集在农村，而现在采取这种做法的移民却是大量集中于成片地区，例如古巴人集中于南佛罗里达，墨西哥人集中于西南地区。

第三种做法则是脚踩两只船，利用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保持双重国籍、双重公民身份和双重忠诚。结果是出现跨越国界的跨国文化群落。

下面几章将对这些做法作进一步探讨。

第九章 墨西哥裔移民 及拉美裔化

墨西哥/拉美裔挑战

到20世纪中期，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拥有将多种亚文化包含于其中的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以及植根于这一主流文化的共同政治信念。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一些事态，它们若继续下去，将可能使美国变成一个分成两权的、通行两种全国性语言的盎格鲁—拉美社会。出现这一趋势，部分原因在于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盛行于知识界和政界精英人士中间，也在于这些理论所促进和认可的政府双语教育政策和赞助性行动政策。然而，文化分权趋势背后的驱动力，是来自拉美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

墨西哥人向美国西南部的移民，使得美国人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墨西哥夺取的这些地区，如今走向墨西哥人口上的“复地运动”，使之墨西哥化，其方式与南佛罗里达的古巴化相似（尽管二者并不相同）。它还使得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疆界变得模糊起来，引进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同时在某些地方促进一种半美利坚半墨西哥的混合型社会和文化的出现。这一事态，再加上其他拉美国家向美国的移民，正在推动美国各地的拉美裔化，在社会、语言和经济活动方面引起一些只适用于一种盎格鲁—拉美混合型社会的做法。

墨西哥裔移民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具有一些特点，不同于过去和现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还因为由墨西哥移民而来的人及其后裔不同于以往来到美国的移民以及现今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的移民，没有同化于美国社会之中。

为什么墨西哥裔移民不一般

当今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现象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以往处理移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无助于理解这一现象的动力及其后果。墨西哥移民不同于以往的移民以及现今来自多数其他国家的移民，是由于以下6个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

相邻。美国一想到外来的移民，就会想到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以及肯尼迪航空港，那是移民越过几千海里的大洋抵达美国的地方。美国人对待移民的态度和美国的移民政策至今仍在颇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形象的影响。可是这对于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却是毫不相干。现在大量的人从这个与美国相邻的穷国涌进来，它的人口多达美国人口的1/3，与美国有着长达2000英里的边界，这边界的标志不过是地面上的一条线和一条浅浅的河流。

这种情形对美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除美国以外，没有一个别的第一世界国家跟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陆地毗邻，更谈不上长达2000英里的边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岛国，加拿大只与美国相邻，而与第三世界国家相距最近的西欧国家，一个是西班牙隔着直布罗陀海峡与摩洛哥相望，再一个是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之间隔着奥特朗托海峡。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是长长的陆地边界，而两国经济又相差悬殊。斯坦福的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指

出：“美国与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上任何两个相邻国家之间是绝无仅有的。”人们不需要漂洋过海，只要跨过相对开放的2000英里之长的陆地边界，就可以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来回迁移，这就给边界巡逻和移民管制带来巨大困难。而跨边界的群体日益增多更使边界变得模糊，给美国西南部的社会、人口、文化和经济以致给美国全国带来严重后果。

人数。墨西哥人移居美国，一方面是本国的人口、经济和政治因素起作用，一方面是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有吸引力。两国相邻，移民的费用和风险比别的人小得多，而且很容易来回走动以及与留在国内的亲友保持联系。由于这些缘故，由墨西哥来美国的移民1965年以后不断增多，合法移民人数在20世纪70年代约64万人，80年代约165.6万人，90年代约224.9万人，分别占美国全部合法入境移民的14%、23%和25%。除此以外，每年还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

据统计，1960年，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人，按其原籍而言，最多的是来自以下5国：

意大利	1257000人
德国	990000人
加拿大	953000人
英国	833000人
波兰	748000人

2000年，这前5国则是：

墨西哥	7841000人
中国	1391000人
菲律宾	1222000人

印度	1007000人
古巴	952000人

可见，这40年间，在美国之外出生的人大大增多，居前五位的，由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变成了亚洲人和拉美人，而其中墨西哥人又占压倒多数。他们在2000年全部国外出生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高达27.6%，而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中国和菲律宾人只分别占4.9%和4.3%。

1970年至2000年，拉美裔移民占美国大陆全部外来移民的大约一半。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拉美裔移民的半数以上是来自墨西哥。拉美裔人在2000年占美国总人口的12%，其中墨西哥裔占2/3。从2000年到2002年，拉美裔人又增加了将近10%，其人数已超过了黑人。据估计，到2040年，拉美裔人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5%。对这种变化起推动作用的，不只是移民入境，而且还有生育率。据估计2002年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生育率为1.8，黑人为2.1，拉美裔人为3。《经济学家》周刊评论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随着大批拉美裔人在一二十年内进入育龄高峰，拉美裔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猛升。”

在19世纪中期，移民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说英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次移民高峰中，新来的人语言多种多样，包括意大利语、波兰语、俄语、意第绪语、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等等。而1965年以后的移民与前两次移民潮均有所不同，因为其中将近半数都是讲一种非英语。正如马克·克里科里安所说：“西班牙语在移民潮中居如此优势地位，这种现象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非法 。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在1965年以后，主要是墨西哥人。美国制定宪法后头100年，几乎不可能出现非法移民，因为当

时没有全国性的限制或禁止移民入境的法律，只有几个州对此略有限制。在此后90年期间，非法移民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移民需要乘船入境，检查方便，而且埃利斯岛的检查站把大量手续不全的人挡了回去。但1965年的移民法、多种多样的交通手段以及促进墨西哥人向美国移民的势力加紧活动，这三者加在一起，使情况剧变。美国边境巡逻队捉住的企图非法入境的人数，20世纪60年代有160万人，80年代增加到1190万人，90年代为1290万人。至于成功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据一个墨美双边委员会估计每年有10.5万人，而据美国移民与归化局估计每年有35万人。有人估计，1975年以后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大约有2/3是非法入境的。

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所包含的一些条款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现有的非法移民能取得合法身份，二是通过雇工单位的审查和另一些手段减少未来的非法移民。头一个目的达到了，约有31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90%是来自墨西哥——得到了“绿卡”，成为美国的合法居民。第二个目的则没有达到：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总数，据估计1995年为400万人，1998年增加到600万人，2003年进一步增加到800万至1000万人。在全部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于1990年占58%，到2000年上升到69%，估计约480万人。2003年，非法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比人数之多居第二位的萨尔瓦多人多25倍。因此非法移民基本上是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造成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1993年宣布有组织地把人员偷运到美国境内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更是对美国社会安全的威胁。制造这一威胁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是庞大的，而且至今仍在加紧活动。这种局面是美国以前从未有过的。

地区分布集中。上文中已谈到，开国先辈们曾指出移民分散有利于同化。过去正是这样做的，现今的非拉美裔移民大多仍是分散于各

地。但拉美裔移民却一般是集中于某一地区：墨西哥人集中于南加利福尼亚，古巴人集中于迈阿密，多米尼加人和波多黎各人（后者严格来说不算移民）集中于纽约市。在拉美裔人最集中的这些地区，他们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于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裔人还在别处建立据点。在这一类地方，绝对数字一般不算大，但增速很高。从1990年到2000年，增幅最高的7个州从高到低依次是北卡罗来纳（增长449%）、阿肯色、佐治亚、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内华达和亚拉巴马（增长222%）。这些说西班牙语的人还在其他地区的个别城镇中集聚。例如，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拉美裔人（主要是波多黎各人）2003年已占全市人口的48%，高出该市黑人的比例38%，“除了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科罗拉多和佛罗里达这4个州的城市以外，哈特福德就是拉美裔人最集中的城市了”。该市第一次选出的拉美裔市长宣称：“哈特福德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拉丁城市，它是正在来到的事情的一个标志。”即西班牙语正日益成为商用和官用语言。

但拉美裔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在西南部，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2000年，墨西哥裔移民将近2/3住在西南部，将近一半住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地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移民，例如有一个很别致的韩国镇，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越南人群体，还有一个亚洲裔人口占总人口多数的小市镇，即蒙特里帕克（据说这在美国本土还是头一回）。在整个加州，国外出生的移民来自许多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而其中的墨西哥人之多又超过了所有欧洲和亚洲国家来的移民的总和。例如在洛杉矶，拉美裔人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在2000年占洛杉矶总人口的46.5%，而非拉丁裔的白人加在一起只占29.7%。在拉美裔人口中，墨西哥人又占64%。据估计，到2010年，拉美裔人在洛杉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高达60%。

大部分移民群体的生育率高于本地人，所以移民的影响在学校很突出。纽约市的移民来自许多国家，一个学校的学生在家里说的语言

可能有20种之多，所以老师很辛苦。而西南部许多城市则是另一种情景：学生大部分是墨西哥及其他拉美裔的孩子。卡特琳娜·伯吉斯和亚伯拉罕·洛温撒尔1993年在有关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来自一个外国即墨西哥的学生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洛杉矶的学校，这一现象是美国别的大城市都不曾有过的，“洛杉矶的学校成了墨西哥学校”。到2002年，洛杉矶联合学区内各学校的学生有71.9%是拉美裔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墨西哥人，这一比例还在日益上升之中，而非拉美裔的白人学生仅占9.4%。200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新生儿中，拉美裔的占多数，这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头一次。

戴维·肯尼迪指出，在过去，移民来源地多种多样，到美国后又住地分散，这就有利于同化。“现今却是大量移民源源来自一个单一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来源地，即墨西哥，又是流入同一个地区……现今西南部发生的情况，是美国从来不曾受过的，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样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移民愈是高度集中于一个地区，其同化就愈慢、愈不彻底。

持续不断。我们上文中已谈到，过去的移民浪潮过一段时间就减退了，从各个国家来的移民所占的比例也是高一阵低一阵，起伏很大。可是现今的移民浪潮却毫无退潮的迹象，其中又是墨西哥人占大部分，除非发生重大战争或严重经济衰退，现今这种状况大概还会持续下去。

从长远看，当墨西哥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相接近时，墨西哥人来美国的移民就可能减退。到2003年，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9至1/10。若两国这一差距消除了，哪怕是缩小到1/3，墨西哥人移居美国的经济动机就会锐减。然而，想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做到这一点，墨西哥就需要以极快的、大大超过美国的速度发展经济。即使出现了这一情况，经济发展本身也不一定会降低人们向外迁

移的愿望。19世纪，欧洲迅速工业化，人均收入增长很快，但仍有5000万欧洲人移民到了美洲、亚洲和非洲。但墨西哥若能迅速发展经济和实现城市化，其生育率可能降低，因而向北面迁移的人也就减少。墨西哥的生育率近年来有所下降，1970—1975年为6.5，到1995—2000年已降至2.8。但墨西哥政府的人口委员会于2001年估计，生育率降低还不会对移民产生多大影响，该委员会预计直到2030年为止，每年向外移民的人数仍将高达40万至51.5万人。到那时，高水平的向美国移民将已持续半个多世纪，会显著改变美国的人口状况以及墨美两国的人口关系。

持续的高水平移民有3个方面的重要后果。第一，移民自身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多。迈伦·韦纳指出过：“如果说移民现象自身有一个‘法则’，那就是移民潮一旦启动，就自身形成不停的潮流。已定居在外的人会给自己老家的亲友提供有关移民的信息，供应迁移的费用，协助在新地方安家和找工作。”结果是形成“链式搬迁”，一波比一波来得更容易。

第二，移民持续得越久，从政治上来看，就越是难以让它停下来。移民个人一旦安了家，会关门谢客，但移民组织的积极分子却不然。他们会迅速建立移民协会之类的组织，进行政治游说以争取扩大移民的权利和福利，为此，他们就会设法招来更多的移民，扩大自己的队伍。移民成了选民，有了选举权的人越多，政治家们就越是难以反对移民组织头头们提出的要求。各地的移民群体会联合起来，积极争取那些出于经济原因、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考虑而同情移民的人们支持。移民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通过立法谋取福利，这自然最有利于最大的移民群体，即墨西哥人。

第三，持续的高水平移民会阻滞同化，甚至挡住同化。巴里·埃德蒙斯顿和杰弗里·帕瑟尔指出：“新来的移民源源不断，特别是聚集在移民占人口多数的街区，会让移民及其子女保持其原有语言不变。”结果，正如马克·福尔科弗所说：“讲西班牙语的人不断得到新来

者的补充，补充的速度比同化的速度更高。”使西班牙语在美国流行起来，这已成为“无法改变、甚至从长期看也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在上文中已谈到，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因美国内战而大幅度减少，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在1924年后也骤减，这些情形促进了他们的同化。可是现今墨西哥人高水平移民若持续下去，就无法指望他们会同样得到同化，美国使移民同化的伟大故事恐怕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得到重演了。

历史渊源。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移民群体能对美国提出领土要求，但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却能够这样做，还真有人这样做了。原来，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这几个州的土地几乎完全曾经属于墨西哥，直到1835—1836年的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以及1846—1848年的墨美战争后，墨西哥才失去了这一大片土地。墨西哥是唯一这样的国家：曾遭美军入侵，首都被占领，皇宫住进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然后一半领土被美国吞并。墨西哥人不会忘记这些事件，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些地区该有特别的权利，完全可以理解。彼得·斯科里指出：“与其他移民不同，墨西哥人是来自一个曾被美军打败了的邻国，他们移居美国，主要是分布于从前曾是他们国土的地区……墨西哥裔移民有一种重返故土的感觉，这是别的移民所没有的。”不但有“故土”，还有“故人”，即新墨西哥州北部和格兰德河畔的25个墨西哥人村镇，那里的墨西哥人早在美国征服这片土地以前就住在当地。这些村镇成为美国的土地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但那里的人口仍有90%以上是拉美裔人，这些拉美裔人口中，又有90%以上的人至今仍在家里说西班牙语。“拉美裔文化和人口的优势保持至今，同化薄弱。”

有时，有的学者认为西南部可以成为美国的“魁北克”。魁北克人是法国人后裔，被英国人征服后，至今仍说法语、信天主教。美国西南部的拉美裔人也信天主教。但魁北克跟法国相距3000余海里，每年

也没有几十万法国人要合法或非法地进入魁北克。美国西南部的处境却与魁北克大不相同。历史表明，若一国人对邻国一片地区有争议，以领主自居，要求拥有特殊的权利，那么两国之间就有发生严重冲突的潜在危险。

上面所说的相邻、人数、非法性、地区分布集中、持续不断和历史渊源这6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裔移民不同于别的移民，使得他们如何同化而融入美国社会成为问题。

墨西哥裔人的同化滞后

对个人、群体或一代人的同化，其衡量尺度包括语言、教育、职业、收入、公民身份、通婚以及对美国的认同。用这些尺度来衡量，墨西哥裔人的同化几乎全都落后于现今其他移民和以往的移民。

语言。语言上的同化一向有以下情形，即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其第一代绝大部分人不会熟练用英语，第二代，包括婴幼儿进入美国的人和出生于美国的人，能相对熟练地使用英语及其母语两种语言，第三代人则能完全熟练地使用英语，而对其祖辈的母语却知之甚少甚至完全无知，因而与祖辈交流有困难，但对祖辈母语仍有怀旧式的兴趣和学习愿望。

在21世纪之初，墨西哥裔人在语言同化方面是否会遵循上述模式，还很难说。他们大量移居美国还不久，所以第三代人还相当少。他们对英语掌握得怎样，以及对西班牙语保留得如何，也缺乏充分的和明确的统计资料。据报道，在2000年，有2600万人在家里说西班牙

牙语（5岁以上人口的10.5%），其中约有1370万人能说英语但不熟练，这一数字比1990年增长了约65.5%。而据人口统计局调查，1990年的情况是，出生于墨西哥的移民中，约95%的人在家说西班牙语，其中73.6%的人英语说得不熟练，有43%的人“在语言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出生于美国的第二代人情况有所不同：只说西班牙语或主要说西班牙语的人只有11.6%，而25%的人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并用，32.7%的人是以英语为主，30.1%的人只说英语。出生于美国的墨西哥裔人，则有90%以上英语流利。

那么，在英语方面，第一代和第二代墨西哥人似乎也遵循了一般模式。然而还是有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代墨西哥裔移民对于学习和使用英语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可以设想，随着墨西哥裔移民群体迅速扩大，他们学习和熟练使用英语的劲头，在2000年已不如1970年那样大了。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的第三代是否会遵循通常的模式，变得英语熟练应用而西班牙语全然不会或基本上不会，抑或是出现另一种情况，即变得像他们父母（第二代）一样能流利说两种语言？一般的第二代移民都瞧不起其父母辈的母语，看到父母不能熟练使用英语与人交流，都会感到难堪。这种态度会对第三代产生深刻影响。可是，如果第二代墨西哥裔移民并不抛弃西班牙语，而是将其与英语并用，那么第三代很可能也是双语并用，这种状况会在墨西哥裔群体中长期传下去，更何况年年还有只会说西班牙语的新移民来到他们的中间。

据调查，绝大多数（66%至85%）的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移民都强调他们的子女必须保持西班牙语熟练应用。这与别的移民群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有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在自己的子女是否需要保持母语的问题上，亚洲裔与拉美裔移民的态度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无疑在于拉美裔群体人数众多，所以有保持西班牙语熟练应用的动力。有些第二代和第三代墨西哥裔移民小时候只会说英语，但长大后还要再学习西班牙语，并敦促其子女学

西班牙语。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F. C. 加西亚就说过：“每一个拉美裔人都以能够熟练应用西班牙语而自豪，要保护和倡导这一能力。”

教育。墨西哥裔移民在教育水平上明显偏低。2000年的调查表明，出生于美国的成年人当中，中学毕业生占86.6%。在美国之外出生的成年人当中，中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高低不等，欧洲裔者有81.3%，亚洲裔者有83.8%，非洲裔者有94.9%，而拉美裔者只有49.6%，其中墨西哥裔者最低，只有33.8%。在1990年，墨西哥裔者当中的中学毕业比例仅为整个国外出生者比例的一半。据1986年和1988年调查，男性墨西哥裔移民平均上学的年数为7.4年，而古巴裔者为11.2年，亚洲裔者为13.7年，非拉美裔白人为13.1年。弗兰克·比恩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的结论是，墨西哥裔移民上学的时间平均比非拉美裔移民或国内出生者少5年。从墨西哥来的移民的教育水平近年来有没有提高，还说不准。弗兰克·比恩的调查结果是，从1960年到1988年，“晚来者教育水平低于早来者。”然而，皮尤拉美裔研究中心调查的结论是，从1970年到2000年，拉美裔移民（包括墨西哥裔移民在内）的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只是“尚未赶上美国国内出生者的水平”。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墨西哥裔移民的后代在教育水平方面继续滞后。可以从3个方面作比较。第一，詹姆斯·史密斯的调查表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生的墨西哥裔移民，其第三代人受教育的时间比第二代平均多4年。但20世纪后期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第三代受教育时间（平均12.29年）虽然比第一代（6.22年）多出近一倍，但比第二代（11.61年）仅多几个月。第二，鲁道夫·德拉加尔萨等人调查了1989—1990年墨西哥裔美国人四代人的教育水平（见表9.1），结果表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差别很大，但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进步就不那么显著，甚至有所倒退。

表9.1 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全美国人教育水平

		墨西哥裔美国人（四代人外的全美国人）		除墨西哥裔美国人	
		1989—1990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1990	
中学未毕业	69.9%	51.5%	33.0%	41.0%	23.5%
中学毕业	24.7%	39.2%	58.5%	49.4%	30.4%
中学后进修	5.4%	9.3%	8.5%	9.6%	45.1%
大学毕业	3.5%	19.9%			

资料来源：

Rodolfo O.de la Garza, Angelo Falcon, P.Chris Garcia, John Garcia, “Mexican Immigrants, Mexican American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Barry
Edmonston
and Jeffrey
S. Passell,
eds.,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The
Integration
of
America's
Newest
Arrivals*
(Washington:
Urban
Institute
Press,
1994) ,
pp.
232-34;
U.S.
Census
Bureau,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Persons of

第三，表9.1表明，第四代人的教育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全美国人1990年的水平。另一些调研材料也突出表明了这一差距。1998年，全国拉腊萨协会（美国一个著名的拉美裔人组织）发现，拉美裔中学生退学率为3/10，而黑人退学率为1/8，白人退学率为1/14。2000年18—24岁人口中，中学毕业以上水平者白人为82.4%，黑人为77%，拉美裔人为59.6%。弗兰克·比恩等人的调查指出：“第二代和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平均教育水平低于非拉美裔白人，中学生退学率高得多，大学生比例则低得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从1990年到2000年，中学生退学率在42个州有所下降，但在8个州有所上升，其中除阿拉斯加以外，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拉美裔人口有大幅度增多”。此外，据比恩等人报道，“拉美裔中学毕业生当中，上大学的人所占的比例，在1990年比1973年更低得多。”

总之，到21世纪之初，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教育同化方面仍无甚进展。

职业与收入。墨西哥裔移民的经济状况与他们的教育情况相似。2000年，在美国国内出生的就业者有30.9%的人是担任专业职务和经营管理职务。其中，担任这些职务者在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就业者当中的比例相差悬殊。

加拿大裔	46.3%
亚洲裔	38.7%

欧洲裔	38.1%
非洲裔	36.5%
拉美裔	12.1%
墨西哥裔	6.3%

在南佛罗里达和南加利福尼亚对移民儿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出类似的结果。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移民家庭，即担任餐馆杂工、门房工友、苦力工之类职业者的家庭在移民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又是墨西哥裔最高。

孩子上私立学校的古巴人	7.7%
尼加拉瓜人	23.8%
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古巴人	25.5%
海地人	31.0%
越南人	45.3%
墨西哥人	66.9%

墨西哥裔移民当中，自我立业者很少。据1990年一项调查，亚美尼亚裔、希腊裔、以色列裔、俄罗斯裔（大都为犹太人）和韩裔男性工作者当中，自我立业者均占20%以上。相比之下，墨西哥裔移民中的这一比例仅为6.7%，他们在一共60个不同族群中，仅略高于菲律宾裔、中美洲裔、老挝裔和黑人移民。

处于贫困状态而依靠救济为生者当中，墨西哥裔移民占的比例很高。1998年，7个最大移民群体的贫困率中，他们居于首位。

墨西哥裔	31%
古巴裔	24%
萨尔瓦多裔	21%
越南裔	15%
华裔	10%

菲律宾裔	6%
印度裔	6%

1998年，美国本土出生者家庭接受福利救济的有15.4%。来自其他国家者家庭接受福利救济的比例，以难民多的族群最高：老挝裔59.1%，柬埔寨裔49.9%，苏联公民37.1%，古巴裔30.7%，越南裔28.7%。至于没有难民的族群，除了多米尼加裔者（54.9%）以外，就数墨西哥裔者比例高：34%，超过了来自其他18国的移民。2001年一项关于使用福利救济金的12类移民情况的调查表明，墨西哥裔移民家庭使用福利救济金的比例最高，达34.1%，而全部移民家庭中的这一比例只为22.7%，出生于美国本土者家庭中的这一比例则为14.6%。

总之，墨西哥裔移民处于经济阶梯的底层。下几代人会怎样呢？资料太缺。墨西哥裔美国人地区分布集中，这虽然不利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同化，但同族人聚在一处形成较大的飞地，照理说有利于自己兴办企业，建立飞地经济，提供就业和富裕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犹太移民及其后裔，还有日本裔及另一些亚洲裔移民，以及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移民，都通过这一途径在经济上取得一些成功，但这是他们原籍经济成功的反映。可是，墨西哥裔移民在墨西哥取得经济成功的人微乎其微，所以能在美国取得经济成功的人大概也不会多。此外，经济地位要得到改善，就离不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可是教育水平低的墨西哥人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困难就更大了。乔尔·佩尔曼和罗杰·沃尔丁格对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经济前景仍感到悲观：

来到美国的新移民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墨西哥，他们在技能阶梯上是处于最底层。在移民的第二代人身上看得更清楚。除了墨西哥人以外，今天的移民第二代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都跟其他的美国人差不多……然而墨西哥人这一个人数最多的群体却在技能上远远落后于别人，这是今天的第二代与过去的第二代一大区别。

这些结论在詹姆斯·史密斯以及鲁道夫·德拉加尔萨等人的分析中也得到了证实。史密斯的分析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工资水平一直落后。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墨西哥移民第三代后裔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白人工资水平的74.5%。出生于1910年至1920年期间的墨西哥移民，其第三代后裔的工资水平也只是相当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白人工资水平的80%左右。史密斯根据他掌握的数据，还计算出以下两个年龄段的墨西哥移民及其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工资水平（均按上述百分比表示）。

移民出生年份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1910—1914	65.3%	81.2%	79.2%
1915—1919	65.3%	83.8%	83.2%

这就与教育水平的情形一样：第二代比第一代有显著改善，但第三代又停滞不前了。德拉加尔萨等人的分析是利用拉美裔全国政治调查的资料，发现在大部分社会经济指数上，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人都比在墨西哥出生的来美国的移民有所改善。但他们也发现，第四代墨西哥裔人按多数尺度衡量，并未比第二代强多少，而且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平均水平。此外，利用福利救济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第二代比第一代有所减少，但到第三代又回升到31%。他们的报告指出：“在美国出生的下几代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未显著改善。例如，第四代墨西哥裔美国人仍然远不如非拉美裔白人。”

表9.2 墨西哥裔美国人与全美国人社会经济状况对照

墨西哥裔美国人（四代人）	全美国人 1990
--------------	-----------

	1989— 1990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拥有房产者	30.6%	58.6%	55.1%	40.3%	64.1%*
管理或专业工作者	4.7%	7.0%	8.7%	11.6%	27.1%**
家庭收入\$10,000以上者	7.1%	10.5%	11.2%	10.7%	24.8%**
*包括墨西哥裔美国人 **不包括墨裔美国人。Figures calculated by James Perry from census data. 资料来源：de la Garza et al, "Mexican Immigrants, Mexican American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pp. 232-34;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March 1990, and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i>Persons of Hispanic Origin in the United States</i> . pp. 115-19, 153-57.					

公民身份。移民是否归化入美国国籍而成为美国公民，这是衡量同化程度的最重要的政治尺度。归化率高低不一，通常起作用的因素包括职业与收入、教育水平、移居美国时的年龄、在美国居留时间的长短以及原籍国家或地区的远近。在20世纪后期，墨西哥人归化率居于最低者之列。例如，据1990年资料，1980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的归化率为32.4%，居倒数第二位（最低者为萨尔瓦多人，31.3%）。而归化率高的人系来自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苏联（86.3%）、爱尔兰（81.6%）、波兰（81.6%）、菲律宾（80.9%）、台湾（80.5%）和希腊（78.3%）。1965年以前以及1965—1974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最多的，其原籍包括15个地方，

而墨西哥人归化率居于末位。在1975—1984年进入美国的所有各国人当中，墨西哥人归化率居于倒数第五位。利昂·布维尔根据统计资料列出的移民人数最多（不分何年进入美国）的15个群体，其归化率如下：

菲律宾人	76.2%
韩国人	71.2%
华人	68.5%
越南人	67.7%
波兰人	61.3%
印度人	58.7%
意大利人	58.3%
牙买加人	57.5%
德意志人	51.8%
古巴人	49.9%
英国人	44.1%
多米尼加人	42.0%
加拿大人	40.0%
萨尔瓦多人	37.0%
墨西哥人	32.6%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2003年拉美裔移民的归化率为23%，而非拉美裔移民的归化率为69%。皮尤拉美裔研究中心主任罗伯托·苏罗认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距，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据他估计，拉美裔移民中有35%至45%的人是非法进入美国的。

通婚。墨西哥裔移民与异族的通婚率，统计数字暂缺。但下面是亚洲裔和拉美裔移民已婚妇女中，与异族通婚者1994年的比例数字。

	亚洲裔	拉美裔
第一代	18.6%	8.4%
第二代	29.2%	26.4%
第三代	41.5%	33.2%

墨西哥裔移民占拉美裔移民的63%，其通婚率与整个拉美裔通婚率应差别不大，只会更低一些。本族移民若人数少或分散于各地，则与异族通婚者会多些。相反，同族的人既多又集中且地位低下，则很可能是在同族之间结婚。墨西哥裔移民即是如此，生育率高又源源不断有新的人加入进来，他们与异族通婚的机会和诱因不会很多，本族人的婚姻会更多。情况看来还是这样。1977年，拉美裔人的婚姻有31%是异族通婚。1994年，异族通婚只占25.5%，1998年只占28%。正如加里·桑德弗尔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2001年一项调研报告中所指出：“与黑人和白人不同，拉美裔人的异族通婚率从1970年没有什么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只是降低了。”理查德·艾尔巴也指出：“拉美裔人总的异族通婚率低，主要是因为人数最多的拉美裔群体，即墨西哥人，族内婚姻率高。”墨西哥人跟墨西哥人结婚。

过去，新来的移民及其后裔跟美国本地的白人通婚，从而加快了同化过程，使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但拉美裔美国学者指出，现今拉美裔人与非拉美裔白人结婚，其后果却有变化。威廉·佛罗里斯和里纳·邦马约尔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同化事实上是逆向的，也就是说，配偶中的非拉美裔一方（白人或非白人）及子女往往自称为拉美裔人，甚至不懂西班牙语的人也这样。”这种现象跟其他移民群体的同化模式真是大相径庭了。

对美国的认同。同化的最终标准是外来移民对美国的认同，是否接受“美国信念”，采纳美国的文化，从而放弃对其原籍国家及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忠诚。这方面的现有资料是有限的，有的还是自相矛盾

的。拉美裔移民同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无疑是他们皈依福音派新教。与这一现象相平行而且相关联的是，福音派新教徒在许多拉美国家也增多了。美国究竟有多少拉美裔新教徒，尚缺具体数字，但罗恩·温斯说：“约有1/4甚至更多的拉美裔美国人已经从他们传统的天主教信仰转变到新教福音派教会，宗教信仰上的这一转变的速度之快是空前的，显然与他们融入美国社会有关联。”这就对天主教会提出了挑战，促使天主教会努力将拉美裔移民吸收到美国的天主教会之中，从而同化入美国社会。这一竞争有力促进了美国化。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墨西哥裔移民对美国的认同仍是乏力的。1992年在南加利福尼亚和南佛罗里达对移民儿童进行的一次调研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说你是哪国人？”这些拉美裔儿童按其原籍分成8个组。结果，除墨西哥以外的拉美各国出生的孩子，有1.9%至9.3%回答自己是“美国人”，可是，出生于墨西哥的孩子虽人数最多，却没有一个人回答自己是“美国人”。他们当中41.2%的说自己是“拉美裔人”，32.6%的人说自己是“墨西哥人”。至于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墨西哥裔的只有3.9%说自己是“美国人”，而其他各组作同样回答的人有28.5%到50%。墨西哥裔的孩子，不论是出生于墨西哥还是出生于美国，基本上都没有认同于美国而自称为美国人。

1989—1990年的拉美裔全国政治调查则发现，墨西哥裔美国人并不是第三代人比祖辈、父辈更加认同于美国。这次调查的主持人分析了调查结果后指出，墨西哥裔人“在美国生活得越久，就越是较少认为人人都应该学英语”，还指出“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反而比墨西哥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更少赞成美国的核心价值”。这些主持人认为调查的结果不能证明墨西哥的文化“阻碍他们支持美国的信念”。但这些调查结果却说明墨西哥裔美国人两三代下来仍未能进一步认同于美国的价值观。

1994年，墨西哥裔美国人坚决反对加利福尼亚州关于限制非法移民子女福利的公民提案，曾在洛杉矶大街上游行，挥舞墨西哥国旗，

并且把美国国旗倒过来拎着。上文中还谈过，1998年洛杉矶一场足球赛中，观众席上的大量墨西哥裔美国人只给墨西哥队加油，对美国队喝倒彩，向美国球员身上扔东西，还殴打一个挥舞美国国旗的观众。现有的资料虽有限，但足以说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当中，仍认同于墨西哥而拒不认同于美国的人，绝不仅限于极端派少数人。许多墨西哥裔移民及其后裔身在美国，却心不在美国。他们恰如罗宾·福克斯在鲁特杰斯的一名拉美裔学生所说“Uncle Sam no es mi tío”（西班牙语“山姆大叔不是我的大叔”——译注）。1990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美国公众认为在爱国心这一点上，拉美裔美国人不如犹太人、黑人、亚洲裔人和南方白人，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总结。美国移民和同化问题中，墨西哥居于中心地位。不妨设想一下，其他移民都一切照常，但从墨西哥来的移民却陡然停止，会出现什么情况：合法移民将会减少到一年16万人左右，比较接近于乔丹委员会所建议的水平。非法入境者将会大大减少，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总数也会渐渐降下来。西南部的农业等行业会受打击，但低收入的美籍人的工资将会得到提高。关于美国人是否该用西班牙语以及是否应规定英语为州政府和全国政府官方语言的辩论将会平息。双语教育及其引起的争论将会逐渐减退。关于移民福利待遇的辩论也会慢慢退下去。移民将肯定不再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包袱。来到美国的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和技能将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移民的来源地将会重新多样化，从而会促使他们更努力学习英语和吸收美国文化。美国分裂成西班牙语区和英语区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美国的文化统一和政治统一将不再受到潜在的重大威胁。想想这些，墨西哥问题的严重性就显而易见了。

个人同化与移民飞地

过去，移民一般是聚集在一些小的街区，从事的职业也比较集中。到了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员就逐渐分散，住地、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出现多样化，异族通婚也会慢慢增多。同化的性质和程度因人而异。有的人社会地位上升得快，早早脱离了移民飞地，同化程度深。有的人则继续留在飞地，从事前代人的职业。人与人的家庭、环境、能力和动力不一样，因而际遇不一。说到底，同化是发生在个人身上，而不是在整个群体。

各种不同的个人因素以及经济和社会考虑促进着同化，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力量也促进着移民群体的稳固和扩大。移民群体的大小和位置对它有无凝聚力有很大影响。孤立的、农村的小群体有可能将自己的凝聚力保持几代人之久。20世纪初期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中的犹太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群体则相反，只有两三代人时间里就融化掉了。

个人同化的过程和群体巩固的过程是复杂的，往往包含着固有的矛盾，最后会引起冲突。但它们又可能共存并以特定方式相互助力。一个大的、经济多样化的移民群体，会让它的成员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融入美国中产阶级。然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也往往会鼓励群体意识而拒绝主流文化。低层黑人一般继续怀有“美国梦”，而中产阶级黑人却更有可能抛弃它。墨西哥裔美国人若在自己群体之内上升到了中产阶级地位，就有可能更加拒绝美国文化，坚持和鼓吹墨西哥文化。

此外，归化入美国国籍和出生于美国而成为美国公民，就可以更方便地来往于美国和原籍国家之间，从而与原籍的人保持联系，保持对原籍国家的认同。有了公民身份，就可以比合法常住居民更方便地把亲戚弄进美国，从而扩大移民群体。当然，公民还可以参加选举被选举而担任公职，从而更有效得多地促进本族的利益。

过去，个人同化的过程通常都最后胜过了移民飞地的巩固过程。

尽管族群成员之间仍会保持联系，后裔也会设法重振族群意识，但住地日益分散，职业和收入日趋分化，异族通婚增多，这就使同化日益加深。这些因素也很可能会对墨西哥裔美国人起作用，可是墨裔人的特殊性却使人们无法这样说。戴维·肯尼迪这位斯坦福历史学家就指出：“墨西哥裔美国人能做到以往的移民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凝聚力，在一定地区保持足够多的人，因此，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独特文化无限期地保存下去。他们最终还有可能做到以往的移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向现有的文化、政治、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提出挑战，不仅要求根本改变语言，还要根本改变体制。”

1983年，杰出的社会学家莫里斯·雅诺威茨就已经看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指出“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强烈抵制同化”，说“墨西哥人更是独特的移民群体，长久保持强有力的族群纽带”，因此：

墨西哥人，连同其他的说西班牙语的人，正在制造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权，几乎接近于民族分裂……

墨西哥与美国接壤，墨西哥文化模式又强劲有力，这就意味着墨裔移民的“自然历史”一直不同于其他的移民群体。如果说西南部某些地方正在出现文化上和社会上的“收复失地”现象——美国的某些地方已实际上墨西哥化，因而会起政治争议——那么这样说也并不算是为时过早。

还有一些人也谈过类似的看法。墨裔美国人则声称美国的西南部本来是在19世纪40年代通过军事侵略从墨西哥手里夺走的，该是“收复失地”的时候了。从人口、社会和文化上来看，这已在进行之中。

可以设想，这有可能导致这些地区重新并入墨西哥的举措。这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查尔斯·特鲁克西洛预言，到2080年，美国西南部几个州和墨西哥北部几个州将走到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北方共和国”。这样一种事态的基础在于大量墨西哥人北迁，边界两边社会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9·11”事件以后，边界又

更像是边界了，但越境势力继续存在，而且强大。学者们和观察家们形容这条边界“正在融化”，“变得模糊”，“正在北移”，“形同虚线”。这使得一些人把美国西南部——有时还捎带着墨西哥北部——叫做“墨美”“美西哥”和“墨西福尼亚”（“MexAmerica”，“Amexica”，and “Mexifornia”）。罗伯特·卡普兰在1997年评论这一趋势后说，在美墨两国边境的东段，“孤星州（得克萨斯州的别称——译注）与墨西哥东北部的统一，是正在悄悄地和令人厌烦地进行之中的历史”。而在西段，民意调查和学术调研表明，加利福尼亚正迅速变成一个具有拉美裔即墨西哥人特性的地方。《经济学家》报道，在这段边界美国一侧的12个重要城市中，拉美裔人占全市人口比例在90%以上的有6个，80%以上的有3个，70%以上的有1个，只有2个（圣迭戈和尤马）在50%以内。厄尔帕索县（75%人口为拉美裔）的一位前专员在2001年就宣称，“在这一山谷中，我们全是墨西哥人。”

这一趋势若继续下去，就有可能使墨西哥裔人占多数的这些地区结成美国之内的一个自治的、有独特文化和语言、经济上自立的集团。格雷厄姆·富勒告诫说：“鉴于特定地区拉美裔人口居多数，同时又出现了多文化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可能会弄出一个堵塞大熔炉的东西：一个少数民族高度集中的地区和集团，它将没有愿望也没有必要同化到美国的多民族讲英语的生活主流之中。”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原型存在于迈阿密。

迈阿密的拉美裔化

迈阿密是美国50州之中拉美裔色彩最浓的大城市。30年来，说西班牙语的人，主要是古巴人，已经在该市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占据优势，根本改变了它的人口种族构成以及它的文化、政治和语言。在美国大城市之中，迈阿密的拉美裔化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一些不愿生活在卡斯特罗统治之下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古巴人来到了迈阿密。在卡斯特罗取得胜利之后的十来年，有26万古巴人出逃到南佛罗里达，因为这里在历史上一向是古巴政治流亡者的避难之地，其中包括两位古巴总统葬在该地。来到美国古巴移民在20世纪70年代有26.5万人，80年代有14万人，90年代有17万人。美国政府将他们的身份定为难民，给他们提供特殊福利，曾引起其他移民群体的怨气。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政权允许甚至是鼓励了12.5万古巴人从古巴的马列尔港渡海到佛罗里达。这些“马列尔人”一般都比较贫穷，教育水平低，与早先的古巴移民相比，年轻人和黑人较多。他们是在卡斯特罗政权统治之下长大的，是该政权文化的产物。卡斯特罗还在他们中间插进了一些犯罪分子和弱智者。

与此同时，在早先的古巴移民带动之下，迈阿密经济增长，成了吸引其他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移民的吸铁石。到2000年，在迈阿密的国外出生的人口中，96%的人是来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除了海地人和牙买加人以外，全都说西班牙语。迈阿密2/3的人为拉美裔，半数以上是古巴人及其后裔。2000年，迈阿密居民中有75.2%的人在家里说的不是英语（同类比例在洛杉矶为55.7%，在纽约为47.6%）。迈阿密在家里不说英语的人当中，89.3%是说西班牙语。2000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占迈阿密居民的59.5%（同类比例在洛杉矶为40.9%，在旧金山为36.8%，在纽约为35.9%。其余大城市中，这一比例均在20%以下）。2000年，自称英语流利的迈阿密成年人只有31.1%，而这一数字在洛杉矶为39.0%，在旧金山为42.5%，在纽约为46.5%。

古巴人大量迁入迈阿密，而且在那里占据支配地位，使迈阿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的迈阿密是一个宁静而生气不太旺的地方，依靠的是退休老人和有限的旅游业。20世纪60年代，古巴社会精英和企业界人士逃亡到这里，使迈阿密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古巴人无法把钱送

回国，所以就投资于迈阿密。迈阿密的个人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在70年代达到11.5%，在80年代仍保持在7.7%。迈阿密—戴德县的工资水平1995年等于1970年的3倍。古巴人带来的经济活力使迈阿密成了一台国际经济动力机，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迅速。国际旅游业到90年代已超过国内旅游业，使迈阿密成为游轮业的一大中心。美国的一些制造业、电信业和生产消费品的大公司把它们拉美业务总部从其他美国城市和拉美城市迁到了迈阿密。西班牙语文艺团体和娱乐业很活跃。古巴人有理由像达米安·费尔南德斯教授那样宣称：“是我们建设了现代的迈阿密。”使它的经济超过了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

这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迈阿密与拉丁美洲经济联系的扩张。巴西人、阿根廷人、智利人、哥伦比亚人和委内瑞拉人纷纷把钱带到迈阿密。到1993年，已有250亿美元从外国，主要是从拉美存入了迈阿密的各家银行。与投资、贸易、文化、娱乐、度假及毒品走私活动有关的拉美人越来越多地聚向迈阿密。人们常说迈阿密真正成了“拉美首都”。

迈阿密如此重大的发展，自然使它从一个通常的美国城市转变成为一个以古巴人牵头的拉美裔城市。到2000年，西班牙语不但是多数家庭的语言，而且是商界和政界的首要语言。媒体和电信业日益拉美裔化。1998年，一家西班牙语电视台成为迈阿密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外语电视台在美国大城市成了老大，这在美国还是头一次。《迈阿密先驱报》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报纸之一，曾多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由于迈阿密人口和语言上的变化，该报大吃苦头。它最初试图保持英文为主，只增出了西班牙文副刊，但这一招失败了。1960年，迈阿密80%的家庭订阅该报，到1989年，订户只有40%。该报曾得罪古巴人的一些头目，受到有力报复。最终，该报不得不另出一种西班牙文的日报，叫《El Nuevo Herald》（西文《新先驱报》——译注）。

古巴人在迈阿密不是按照传统模式建立飞地式的移民街区，而是

弄出了一个飞地式的城市，有它自己的文化和经济，同化和美国化成为不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受欢迎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巴人已经在迈阿密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银行、企业和选民集团”，控制了经济和政治，让非拉美裔人受到排斥。一个得势的拉美裔人说“他们成了局外人”，另一人则吹嘘说“在这里我们是权力结构的成员”。

迈阿密的拉美裔人感觉不到有什么必要同化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一位出生于古巴的社会学家指出：“迈阿密这里没有促使你成为美国人的压力。在人人都说西班牙语的飞地，日子可以过得很开心。”到1987年，琼·迪迪恩指出：“一个企业家完全不会说英语，在迈阿密照样可以做买卖、进行谈判、举债经营、发行证券，只要愿意，还可以一周两次系着黑领带出席盛宴。”到1999年，迈阿密最大的银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头目都是在古巴出生的人或者他们的后裔。古巴人还掌握了政界控制地位。到1999年，迈阿密的市长和迈阿密—戴德县的县长、警察局长和检察长，以及从迈阿密选出的国会议员的2/3和州议员的将近半数，都是古巴裔人。在发生了埃利安·冈萨雷斯事件⁷以后，迈阿密市的非拉美裔市政执行官和警察局长都被古巴人取而代之。

古巴人及其他拉美裔人对迈阿密的控制，使得非拉美裔的白人和黑人都成了少数派局外人，其意见往往遭到忽视。由于不能跟政府官员沟通，买东西时也受到店员歧视，非拉美裔白人感触很深，正如其中一人所说：“我的上帝呀，可尝到当少数民族的滋味了。”他们可以有3种选择。一是可以忍受“局外人”的从属地位。二是可以采用拉美裔人的习俗和语言，同化入拉美裔群体中去，也就是两位学者亚历杭德罗·波特斯和亚历克斯·斯特皮克所说的“逆向同化”。三是他们可以离开迈阿密，从1983年到1993年已经有14万人这样做了，他们的出走已经引出了许多汽车后杠上一条标语：“最后一名美国人离开时，请降旗再走。”

在迈阿密古巴化的同时，犯罪现象也升高了。从1985年到1993年，迈阿密都是全国犯罪率最高的3个大城市（人口25万以上）之一。这与毒品交易有很大关系，但也牵涉古巴移民内部的政治斗争。据米米·斯沃茨报道，到20世纪80年代，“反卡斯特罗的政治派别、种族骚乱和毒品交易闹得迈阿密动荡不宁，往往成为危险的地方。抗议活动和爆炸事件频繁，彼此争斗的流亡集团之间还不时有暗杀活动。”1992年，《迈阿密先驱报》的新发行人戴维·劳伦斯得罪了右翼古巴人集团的头目豪尔赫·马斯·卡诺萨。斯沃茨报道说：“劳伦斯因此而突然陷于恐怖之中。”从打砸行为到匿名死亡恐吓，接连不断。2000年，在埃利安·冈萨雷斯案件中，几乎所有的迈阿密古巴裔高层政治领导人都不理睬联邦政府提出的要求，拒不合作。戴维·里夫说，迈阿密此时已颇似“一个失控的香蕉共和国”。

2000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谈到迈阿密—戴德县“几乎已脱离美国”，当地政客以古巴居民的名义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埃利安·冈萨雷斯事件加剧了“几乎脱离美国”的谈论。当时60%的美国公众都认为这个小男孩的生父应当享有监护权，应该采取强制行动把孩子交还他的父亲，可是迈阿密的流亡古巴人绝大多数都反对把小男孩埃利安再送回古巴。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的决定，大批人游行抗议，挥舞他们的旗子而焚烧星条旗。一名古巴裔学者公开说“这个城市是单独的，我们有自己的对外政策”。

西南部的拉美裔化

迈阿密的现在会是洛杉矶和西南部的未来吗？最终结果有可能相似：出现人口众多、习俗独特、流行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保持自己的拉美裔特性，而且能给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施加重大影响。但出现这种事态的过程会有所不同。迈阿密的拉美裔化进程迅速、明显，由经济带动，自上而下。西南部的拉美裔化则

进展较慢，一点一滴，靠政治上驱动，自下而上。古巴人向佛罗里达的流动是时断时续，在很大程度上受古巴政府的政策影响。那里还有一个补充因素：拉美裔文化与美国的繁荣相结合，使迈阿密不断吸引拉美其他各地的人。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则是持续不断的，至今毫无减退迹象，而且包括大量非法移民。南加利福尼亚的拉美裔即墨西哥裔人口，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迈阿密的拉美裔人，但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低于后者，虽然它在逐渐上升之中。

第二个区别在于古巴移民和墨西哥移民与各自原籍国的关系不一样。古巴移民一致反对卡斯特罗政权，力图惩罚和推翻那一政权。墨西哥移民对墨西哥政府的态度却不那么明显，比较微妙。墨西哥政府既鼓励人们移居美国，又鼓励这些移民继续保持与墨西哥的联系，保持墨西哥国籍，当然还欢迎他们把钱汇回墨西哥。几十年来，古巴政府一直想要羞辱、遏制、抗衡和削弱佛罗里达南部的古巴移民的政治势力。墨西哥政府却是希望移居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越多越好，希望他们既有钱又有政治势力。

第三，最初来美国古巴移民大多是中上阶级人士，有钱，教育水平高，能力强，因而能在短短几十年就建立他们在迈阿密经济、文化和政治中的控制地位。后来的古巴移民则层次较低。在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则绝大多数贫穷，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看来他们的后裔也差不多。因此，南佛罗里达的拉美裔化压力是自上而下，而这一压力在西南部则是自下而上。琼·迪迪恩注意到，在洛杉矶，西班牙语可闻于社会底层，“说西班牙语的人有洗车工人、修剪草木的工人以及餐馆抹桌子的工人。而在迈阿密，说西班牙语的人则有餐馆的就餐者以及汽车和草木的主人。从语言看社会地位，两地大不相同。”从政治和经济权力来看，两地自然也不相同。然而，从长远看，人数即是权力，在多文化的社会，在民主政治和消费者经济中，更是人多势众。

墨西哥裔移民人多，而且越来越多，现在不再感到自己势单力薄

而非要同化到美国主流文化中去不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更加自信，不但不再尽力缩小自己的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别，反而以这一文化差别为荣。在1995年，美国一个重要的拉美裔组织全国拉腊萨协会的主席就说过：“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文化冲突，我们的价值观与美国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接着，他大谈了拉美裔价值观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与此相类似的是，得克萨斯州一位成功的墨西哥裔企业家利昂内尔·索萨在1998年欢呼正在出现一个拉美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阶层，说他们外表很像美国原有的白人，“但价值观却依然大不相同”。

墨西哥裔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更喜欢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墨西哥和美国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深刻差别仍然影响着墨西哥裔美国人，一些很有头脑的墨西哥人和墨裔美国人都论述过这些差别。1997年，墨西哥著名的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以托克维尔式的雄辩笔法，阐释了墨西哥的文化是西班牙—印第安文化遗产与天主教相结合，不同于美国的“源于马丁·路德”的新教文化。1994年，墨西哥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安德烈斯·罗森塔尔断言：“我们两国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差异，这就是墨西哥的文化比美国更源远流长。”1999年，墨西哥哲学家阿曼多·辛托拉解释墨裔美国人教育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缺陷时，引用他们三句谚语说明他们的态度：“谁关心呢？挺好”；“明天会好”；“没有真正值得学的东西”。1995年，豪尔赫·卡斯塔涅塔，即后来的墨西哥外交部长，谈到了墨美两国的“巨大差别”，其中包括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上的差别，减少不平等现象的体制上的差别，关于事态不可预测性的信念，表现为“明天综合征”的时间观念，迅速把事情弄成的能力，对待历史的态度（“墨西哥人迷恋于历史，美国人迷恋于未来”）。利昂内尔·索萨谈到拉美裔人的“拖我们后腿”的缺点：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缺乏主动性、自立和抱负；对教育重视不够；认为贫穷是为了升天堂所必需的美德。罗伯特·卡普兰引用过图森市一名第三代墨裔美国人亚历克斯·比拉的话，比拉说，据他所知，南图森的墨裔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教育加勤奋”是致富之路。阿曼多·辛托拉

说，墨西哥需要一场“文化革命”才能跟上当今世界。尽管福音派新教的传播促进了墨西哥人价值观的演变，但这场革命不大可能迅速完成。而现时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仍源源不断，使墨裔美国人的老价值观更难以改变，这些老价值观正是他们在教育上和经济上进展缓慢、迟迟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的主要原因。

墨裔美国人的数量日增，也就日益满足于自己的文化，往往还瞧不起美国的文化。他们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文化以及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历史特性，他们号召人们重视和颂扬自己的拉美裔和墨西哥的历史。1999年有一篇报道指出，墨裔美国人数量增多的结果是“促使许多拉美裔人‘拉丁化’，使他们更易于确认自己的文化遗产……他们感到人多势众，年轻的一代又一代成长时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拉丁文化的影响开始渗透于娱乐、广告和政治等各个领域”。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未来：1998年，“何塞”（西班牙语常见人名——译注）已取代“迈克尔”（英语常见人名——译注）成为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两州新生儿取得最多的名字。

与美国一般人相比，墨裔美国人穷，今后若干年内大概仍将如此。然而，随着更多的拉美裔人士进入中产阶级，拉美裔人总的经济状况也在慢慢改善。尽管只有一部分拉美裔获得了选举权，但3800万拉美裔人全部都是消费者。他们的年度购买力在2000年估计达4400亿美元之多。此外，美国经济正在形成高度分割的市场，产品销售着眼于特定人群的特殊口味和爱好。这两方面的趋势强有力地刺激着美国的商号把目标之一瞄向拉美裔人的市场，这包括专门为拉美裔人设计的产品。最明显的例子是西班牙语的报纸、期刊、图书、广播和电视，还有种类繁多的商品，以迎合拉美裔人的口味，甚至更进一步，专门迎合墨西哥人、古巴人或波多黎各人等的口味。市场大，商家也就越来越多地用西班牙语做广告。正如利昂内尔·索萨所说，为了迎合特定民族的消费者和少数种族的市場，商家必须使用对这些消费者有感染力的语言。用索萨的话说，就是“El dinero habla”（西班牙语，

直译为“钱会讲话”——译注)。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件事最能说明拉美裔群体的崛起，这就是成立了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网络Univision。它在1996年宣称它可以从它的母公司、墨西哥最强大的跨国公司Televisa那里得到“无限的资源”。据报道，Univision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18岁至34岁晚间新闻观众中间的收视率，已相当于甚至超过了ABC、CBC、NBC、CNN和FOX这些老牌大户。

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移民继续不断地处于高水平，他们同化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水平又很低，这最终就有可能使美国变成一个两大民族、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国家。这不仅使美国起变化，对于拉美裔人也会产生深刻的后果。他们将人在美国，却不属于美国。利昂内尔·索萨在他的《The Americano Dream》一书（书名为《美国梦》，但Americano一词为西班牙文，因此其寓意为拉美裔人的美国梦——译注）的结尾对拉美裔企业家说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The Americano dream？是的，它的确存在，是现实的，让我们大家分享吧。”他说错了。不存在Americano dream，只有American dream（这里的“美国梦”全为英文——译注），它是由盎格鲁—新教社会创造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只有用英语才会在这个社会之中分享到它。

第十章 美国与世界会合

变化中的环境

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数十个国家转向民主制，再加上国际贸易、投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巨大扩张——即通常所说的全球化——这一切使美国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美国的特性至少产生了三大后果。

第一，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失败，使得美国不仅没有了敌人，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一个借以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在以往200多年，“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一直是美国特性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总是把这一点作为“美国例外论”的实质。可是如今例外成了普遍，民主制已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它是治理国家的唯一合理形式。再也没有另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像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样，向民主制提出挑战。

第二，美国的商界、学术界、各种专业界和政界以及传媒和非赢利组织的精英人士广泛参与国际活动，其国民身份的重要性降低，因而日益将自己视为跨国人士，从跨国和全球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事业。我们已经谈到，有些美国精英人士比一般美国公众更重视自己

的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还有许多精英人士比一般美国公众更重视自己的跨国身份。

第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就使得文化作为国家特性源泉变得更重要了。双重身份、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的人多了，同一国出来的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形成跨国的同文化移民社群。在美国社会中，从19世纪中期就出现过这样的移民社群。但如今的移民能够更方便地与原籍国的人们保持联系和交往，他们在国外聚在一起，更容易抱成一团。原籍国的政府现在也把这样的移民社群看做是一种财源以及其他支持的来源，还可以利用他们对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政府施加影响，因此也乐于促进其国外的移民社群的扩展、动员和体制化。

寻找敌人

1987年，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告诫美国人说：“我们正在做一件对你们来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我们正在让你们失去敌人。”他们真做了，正如阿尔巴托夫所强调的那样，这对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后果。苏联人让美国失去敌人，也就让他们自己失去了敌人，而几年后的事态证明，苏联对敌人的需要更比美国严重得多。苏联官员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国家界定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从事于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宏伟斗争。缺少了这一斗争，苏联就没有了特性，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很快就解体而分裂成了16个国家，其中每一个国家大体上都靠文化和历史来界定自己的国家特性。

美国失去敌人，其影响则有所不同。苏联是用革命的专政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特性强加于不同的民族。美国的意识形态特性则是由美国人多多少少地自由接受（只有革命时期的托利党人和内战前的南方人例外），而且是植根于他们共同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可是，苏联的

瓦解还是给美国的特性提出了问题。公元前84年，罗马打败了它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敌人米特拉达梯以后，苏拉⁸问道：“如今世上再也没有我们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会怎样呢？”1997年，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问道：“当一国的敌人均最终消失，使它的存在再也不受威胁从而没有外部力量再激发它的活力时，它的国家特性会怎样呢？”苏拉表示他的忧虑后不过几十年，古罗马共和国就垮了，出现了恺撒的专制独裁。美国大概不会遭到类似的命运。然而，长达40年期间，美国充当了“自由世界”反对“邪恶帝国”的领袖。“邪恶帝国”没有了，美国怎样给自己下定义呢？或者，如约翰·厄普代克所说：“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的意义何在呢？”

苏联的瓦解也影响到美国的盟国以及当年为应付苏联的威胁而成立的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约会议上发言的人常常引用诗人C. P. 卡瓦斐对埃及古城亚历山大写下的诗句：

我们还聚在集市上等什么？
野蛮人今天就要来啦……

这突如其来的不安
和这茫然神情意味着什么？
（脸色怎么如此严肃？）
为什么街道和广场一下子空空荡荡，
为什么人人回家都若有所失？
因为天黑了野蛮人还没来，
从边境回来的人带来消息，
说再也没有野蛮人了。

如今没有野蛮人，我们成了什么？

那些人曾经是一个答案啊。

“答案”何所指呢？对外战争有可能激起国内的争论和不团结，还可能其他的被广泛认为是负面的后果。然而，假如“野蛮人”从根本上威胁到国家的生存，或者人们认为有这样的威胁，那么，也可能出现正面的后果。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⁹说过：“正是战争使人们结成国家。”就美国而言，的确如此。独立战争使美利坚定居者成为美国人，内战则巩固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光辉显现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在应付重大威胁的重大战争中，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得到加强。当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全国的团结增强，而可能引起内部分裂的彼此敌对情绪则被压抑下去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分歧会减少。未遭摧毁的经济的生产效率会提高。正如罗伯特·普特南和西达·斯科克波尔所说，美国进行过的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起了公民献身精神，自愿为共同的事业服务，扩大了社会资本，增进了国民团结以及对国家的忠心：“同仇敌忾”。美国有两次重大战争带动了种族平等。冷战的紧迫形势促进了种族歧视和隔离的结束。

如果说战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能产生这样一些正面的结果，那么和平是否会相应导致一些负面后果呢？社会学理论和历史表明，没有外部敌人或对立立面，容易出现内部纷争。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随着冷战的缓和及结束，美国和别的许多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身份之外的身份更加感兴趣。没有重大的外部威胁，国家对强有力政府和国民团结的需要也就降低了。1994年，有两位学者告诫过，冷战的结束“将会损害全国的凝聚力，种族和地区之间的分歧会随之露头”，同时还会“加剧阶级对立，更难于实现国内社会公正和福祉”。1996年，保罗·彼得森教授也指出，冷战的结束导致的后果会是“国家利益感日益模糊”，“为国家作出牺牲的意愿降低”，“对政府的信任下降”，“道义感趋弱”，“需要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的想法会减少”。没有外敌，个人利益会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彼得森接着说：“当国家不再是抵御邪恶捍卫善良时，‘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问你能为

国家做什么’这样的话会显得是过时了，几乎有沙文主义的味道。”

美国人从种族角度加以描绘的最后一个重大敌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约翰·道尔指出：“日本人实际上是被套上了欧美人千百年来对非白种人所持有的种族成见……包括类人猿、矮子、原始人、小人、疯子等形象。”在太平洋作战的一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的话生动表达了许多人的态度：“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对手是德国人，他们毕竟是人，像我们……可是这些日本人像野兽。”撇开这种种族成见不说，美国在20世纪几场战争中的敌人，包括日本人在内，都属于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美国认为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对手都是反对“美国信念”的主要原则的人。戴维·肯尼迪说：“不论敌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恺撒主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或是冷战中的苏联集体共产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敌人这一定义的核心内容都是敌人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冷战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争。苏联这个敌人不仅被界定为共产主义；它的邪恶帝国以及它要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使它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敌人。

20世纪末，仍然存在着不少非民主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政权都没有在别国社会中推行非民主意识形态的企图。民主制度失去了有分量的世俗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失去了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竞争者。美国对外政策精英们因此而洋洋得意，骄傲自满——但又感到捉摸不定。失去了意识形态威胁，也就失去了目标。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冷战结束时说：“国家是需要敌人的。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自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自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这一辩论的参加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但直到20世纪末，没有任何一种赢得公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些对外政策专家警

告说，苏联的威胁会再现于一个重新振作起来的民族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俄罗斯，它拥有的人力物力、自然资源和核武器足以用来向美国崇奉的原则提出挑战，威胁美国的安全。然而，到20世纪末，俄罗斯依然经济停滞、人口下降、常规兵力受到削弱、贪污腐败成风、政治权威脆弱，因此，将俄罗斯视为美国可能的敌人或对立面的议论随之平息。

有的二流独裁者，例如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侯赛因，曾被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可是很难令人信服地把他们描绘成希特勒、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一流的人物，他们不足以对美国的原则和安全构成可怕的威胁。有些人常常谈论比较模糊的潜在敌人集团，例如“无赖国家”、恐怖分子或贩毒集团，或是谈论有威胁的过程，例如核扩散、网络恐怖活动和不对称战争。美国人按照自己的信念特性对别的国家进行分类，其标准是它们是否从事邪恶行为，例如压制人权、支持毒品交易、支持恐怖组织以及镇压宗教界人士。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经常公布它的敌人名单：恐怖组织（2003年列出了36个），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2003年列出了7个），“无赖国家”（比较非正式的范畴，数目多少不定，2000年曾称做“令人担忧的国家”），2003年又提出过“邪恶轴心”，有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国务院又添上了古巴、利比亚和叙利亚。

有一个似乎令人可信的潜在敌人是中国，它在理论上仍奉行共产主义（即使在经济实践上并非如此），显然实行专政而不尊重政治自由、民主或人权，经济富有活力，公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持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其军界和另一些精英群体明显以美国为敌，凡此种种使它成为东亚崛起中的一霸。20世纪中，美国有两次受到最大的威胁，一次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敌人于20世纪30—40年代结成轴心国，另一次是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共产主义敌人于20世纪50年代结成同盟。如果再出现类似的威胁，其核心将会是中国。然而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在近期内看来还不大可能。

有些美国人开始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或更笼统的政治伊斯兰集团视为敌人，其具体体现是伊拉克、伊朗、苏丹、利比亚、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另一些穆斯林国家，以及一些伊斯兰恐怖团体，例如哈马斯、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基地”网络。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包括对世界贸易中心、科巴尔兵营、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两座大使馆以及美国“科尔号”军舰的袭击，还有一些被成功挫败了的恐怖袭击，肯定构成了针对美国的一场时断时续的、低水平的战争。美国列出的7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和组织还威胁着被许多美国人视为亲密盟国的以色列。伊朗以及2003年战争以前的伊拉克对美国 and 世界的石油供应构成潜在威胁。巴基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掌握了核武器，好几次有消息分别报道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秘密藏有核武器以及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或计划。伊斯兰教与美国的基督教和盎格鲁—新教文化在文化上的差异加重了伊斯兰构成敌人的资格。2001年9月11日，本·拉丹结束了美国对敌人的搜寻。纽约和华盛顿受到的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还有比较笼统的“反恐战争”，使伊斯兰好战分子成为美国21世纪的第一个敌人。

死灵魂：精英非国籍化

1805年，苏格兰诗人司各特在《最后的吟游诗人之歌》中写道：

灵魂死了的那个人仍在呼吸
他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
“这是我的故乡，我生长的土地”
他到处流浪，周游四方
即使踏回到自己的乡土
他的心也从未温暖他的身体

像这样灵魂死了或垂死的人是少见的，但如今在美国商界、学界和各种专业的精英人士中间，却在逐渐增多。他们拥有司各特说到过的“头衔、权力和金钱”，而与美国的联系却日益减退。从异国他乡返回美国时，他们不会有“这是我生长的土地”的感情。这种态度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的爱国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爱国的不仅是欧裔美国人。有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就说过：“我喜欢访问我祖先的国家，但那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在这里。每次回到这里，我都要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美国’。”这就是美国公众的态度，跟那些日益非国籍化的精英人士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9·11”事件以后，意见分歧搁置到一旁，大家的爱国之心集合到了一起。然而，如果没有反复的外敌袭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力量作用之下，精英人士非国籍化的趋势就很可能还会继续。

全球化涉及：个人、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实体之间的国际交往大幅度扩展；在全球各地从事投资、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国际组织、规章和制度呈现倍增。这种事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人与人之间不同，国与国之间也不同。个人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几乎是直接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定，精英人士参与得比一般人更深。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精英人士、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组织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同类人士和组织的作用要更加重要得多。因此，美国有关人士对国民身份和国家利益所承担起的义务会相对弱一些。

全球化的事态让人回想起美国内战后出现的情况。内战后，工业化发展迅速，企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谋求它们为成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有抱负的个人纷纷到全国各地流动，追求事业和前程，而不再是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地区之内。全国性的公司和全国性的各种组织打破了州、县的范围，提倡全国的目光和全国的利益。全国性的法律和标准优先于州的法律和标准。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重于地区观念和州民身份。

现在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超国家主义虽然还处于初期，但多少有些相似。然而，有两点重大差别。第一，19世纪后期的技术发展促使美国精英人士加深国家意识和重视国民身份，而20世纪后期的技术发展却促使精英人士追求超国家身份和非国籍化。第二，19世纪后期由于有外部敌人存在，国家观念对地方观念的胜利得到了巩固。而超国家主义的敌人却恰恰是国家观念。

超国家主义的观点可分为三类：普世论的、经济的和道德论的。普世论的观点实际上是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的表现。按照这种观点，美国例外特殊，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已成为“普世的国家”：由于世界各国社会的人都到美国来，美国的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又被其他社会所接受，美国正在与世界相会合。由于美国胜利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与世界的区别正在消失。经济的超国家主义观点主要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超凡的力量，它打破国家的疆界，使各国经济会合成一个全球的整体，而且迅速地削弱国家政府的权威和功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一些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一些大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在全球范围活动的大型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一些掌握了全球用得着的高超技能、因而能跨国奔前程的个人。道德论的观点则是谴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是邪恶势力，认为国际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在道德上优越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爱人类之心应高于爱国之心。这种观点存在于一些学术界、新闻界等的知识分子之中。经济上的超国家主义来源于布尔乔亚，道德论的超国家主义则是来源于知识分子。

1953年，通用汽车公司的负责人被提名为国防部长时，曾宣称“对通用汽车公司好，就是对美国好”。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不该这么说，而应该说对美国好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好。但不论怎么说，都是认为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有一致之处。可是到了如今，大公司却往往认为它们的利益日益有别于美国的利益。一些在美国创立、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其业务日益向全球扩展，其美国特性也就逐渐减少。

本书第一章中谈到，当拉尔夫·纳德要求大公司用忠诚宣誓和升国旗表示爱国主义时，一些公司的主管人员予以拒绝，公然声称自己是跨国的公司。这让人想起19世纪60年代，当埃里铁路公司老板杰伊·古尔德被问及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时，他的回答是：“在共和党当政的州，我是共和党人；在民主党当政的州，我是民主党人；在独立人士当政的州，我是独立人士；但我总是埃里公司的。”现今一些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从全球各地招聘工作人员，直至最高层主管人，而不问其国籍如何。2000年，至少有6家这样的大公司——阿尔科（Alcoa）公司，贝克顿—迪金森（Becton, Dickinson）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福特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宝洁（Procter & Gamble）公司——其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不是美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官员1999年说，该局已不能像原先那样指望一些美国公司的合作，因为这些公司认为自己是跨国公司，可能帮助美国政府不一定合乎它们的利益。

亚当·斯密1776年说过：“土地所有者一定是他的财产所在之国的公民……股票的所有者则应是世界的公民，而不一定依附于其一特定国家。”全球化证明他这话是对的。当今的跨国企业家正是这样看自己的。詹姆斯·亨特和乔舒亚·耶茨采访了23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主管人以后总结说：“这些精英人士肯定是四海为家者：他们周游世界各地，他们的责任范围是全世界，他们自视为‘全球公民’。我们反复听到这些人说，与其说他们自己是碰巧在一个全球组织工作的美国公民，不如说他们自己是碰巧持有一个美国护照的‘世界公民’。他们具有四海为家者的一切特征。他们老于世故，温文尔雅，从全球看问题和论是非。”这些美国企业主管人与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精英”一起生活在一种“社会文化密室”之中，脱离具体国家的文化，彼此交流用的是一种社会科学型的英语，亨特和耶茨把这种英语称之为“全球行话”。

这些推行经济全球化的人像一个经济单位一样固定在世界上。他们的家就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他们故国的社会。正如亨特和耶茨所

说：“不仅仅是跨国公司，而且是所有推行全球化的组织，其活动的世界的定位因素都是‘扩大市场’，追求‘竞争优势’‘效益’‘成本进益比率’‘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最佳市场’‘赢利率’和‘底线’。他们声称自己全神贯注于此，是为了满足全球消费者的利益。全球顾客就是他们的选民。”阿切特—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的一位顾问说：“全球化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权力从政府向全球消费者转移。”随着全球市场取代一国社会，一国公民也就让位于全球消费者。

以经济超国家分子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球特等阶级。全球商务政策协会指出：“随着有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辩论不断深入，至少有一种效果已经显现出来。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已带出了一批新的全球精英分子。他们被称做‘达沃斯人’¹⁰ ‘金领工作者’或者……‘世界事务专家’，这一正在形成的阶级的实力就在于新的全球连成一片的观念。其成员包括学术界人士，国际公仆，全球性公司主管人，以及成功的高技术企业家。”这样的精英人士在2000年估计有2000万人，其中40%是美国人。他们的人数估计到2010年会翻一番。这样的人在美国人口中还不到4%，但他们是超国家主义者，不需要对国家有什么忠诚，认为国界是碍事的障碍（幸好是正在消失之中的障碍），认为国家的政府是历史的残留之物，其现今唯一有益功能就是为他们这些精英人士的全球活动提供方便。一位公司主管人挺有信心地预言说，过不了多少年，“将只会有政治家关心国家的疆界”。

参与跨国的机构、网络和各种活动，不但是全球精英人士的必备条件，而且对于人们在国内获取精英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忠诚、身份和活动范围仅限于本国的人，要想升到商界、学术界、传媒界等专业方面的高层，其机会就不如那些超出国界之外的人。除了政界以外，几乎都是停留在国内的人落在后面。冒尖的人都得从国际的角度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就说过：“精英是世界的，老百姓是本地的。”可是，加入这个超国家世界的机会却仅限于工业化国家中很少量的人以及发展中国家中一小撮人。

跨国的经济精英分子参与全球活动，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也随之减弱。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次调查表明，“人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愈高……其忠诚愈是有条件……他们比穷人和教育水平低的人更有可能说，如果出国能使他们的收入翻一番，他们就会出国去。”20世纪90年代初，后来担任过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得出过类似的结论：“美国收入最高的人……已经在逐渐脱离其他的国人。这一脱离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根源都在于正在出现的经济现实之中。这些美国人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依靠其他美国人的经济成就……他们跟全球企业网联系在一起，作为工程师、律师、管理顾问、投资银行家、科研工作者、公司主管人员及其他从事抽象分析的人员，他们直接为全球企业网创造增加值。”2001年，艾伦·沃尔夫教授也说过：“多文化主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挑战跟真正全球公司的建立相比就如同小巫见大巫了，这些公司对盈亏底线的忠诚更重于他们的爱国之心。”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艾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说：“这些世界事务专家日益脱离社会上其他的人。他们到外国上大学，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为拥有全球业务的单位干活。他们形成世界中的一个世界，通过各种各样的全球网络彼此相联系，却与本国社会大众相隔绝……他们宁愿花时间跟他们世界各地的同伙穷聊、通电话或电子函件，也不肯跟左邻右舍说说话。”

1927年，当欧洲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闹得热火朝天时，朱利安·本达曾激烈批评知识分子背叛对枯燥真理的追求而随波逐流。现今知识分子的“背叛”却是另一个样了。他们放弃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承担的义务，吹嘘他们对全人类的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癖性盛行于学术界。芝加哥大学的玛撒·努斯鲍姆教授指责“爱国自豪”在道义上是“危险的”，说世界主义在伦理上优越于爱国主义，要求人们献身于“世界人类”。普林斯顿大学的艾米·古特曼教授认为让学生“首先应做美国公民”的做法是“令人厌恶的”。她认为美国人的“首要忠诚对象”不应是“美国或某个政治主权团体”，而应是“民主人道主义”。纽约大学的理查德·森纳特教授谴责了“众人共一国民身份的邪恶”，认为国

家主权的削弱“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现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乔治·利普西茨教授说：“近年来，爱国主义成了种种歹徒的第一避难所。”美国大学的塞西莉亚·奥利里教授认为鼓吹爱国主义的行为是右翼的，军国主义的，男性的，白人的，盎格鲁派头的，压迫性的。佐治亚大学的贝蒂·简·克雷格教授也攻击爱国主义，说它是与炫耀武力相联系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彼得·斯皮罗教授以满意的心情得出结论说：“现今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难以使用‘我们’一词了。过去‘我们’一词通常指自己的国家，但现今在国际上，对国家的从属关系已不一定能界定个人的利益或忠心。”

道德主义的超国家论者否定国家主权的理念，或对之持高度批判的态度。这一理念可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¹¹ 从那时起，它在理论上一向受到确认，但在实践中，国家主权屡屡受到侵犯。道德主义者认为侵犯是应该的。他们赞成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观点，即国家主权应让位于“个人主权”，这样，国际社会就可以采取行动来预防或制止国家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大规模侵犯。这一原则将使联合国对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或其他形式的干涉，可是这种做法是联合国宪章明文禁止的。道德主义者还在更广泛的层次上主张国际法优先于国家的法律，认为通过国际程序作出的决定比通过国家程序作出的决定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主张扩大国际机构的权力。信奉道德主义的国际法律工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国际习惯法”，说它应优先于国家的法律。

在美国，使这一原则成为现实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联邦第二上诉法院1980年对1789年为保护美国驻外大使而制定的法律另作解释，而对“菲拉尔蒂加诉佩纳—伊腊拉”一案（630 F.2d 876）作出的裁决，认为居住在美国的巴拉圭公民有权在美国法庭对一名巴拉圭政府官员提出诉讼，因为他们指控那名巴拉圭官员在巴拉圭谋杀了一个巴拉圭人。这一裁决导致了向美国法院提出的好几起类似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如同一名西班牙法官判处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有罪一样，

一国的法院超越本国领土管辖范围，声称有权处理外国人被指控在外国侵犯了外国人的人权的案件。

信奉道德主义的国际法律工作者认为，国际习惯法的先例应优先于原先的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可是国际习惯法是不见诸文字的，不载于法规或条约，因此，正如康奈尔大学的杰里米·拉布金教授所说，专家们说服法官相信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因此，它会越来越深地卷入内政。“如果说国际习惯法的准则适用于种族歧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于性别歧视？那又为什么不可以用于公民身份或语言或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道德主义的国际法律工作者认为，美国法律必须符合国际的标准，必须允许外国的非民选法官像美国法官一样，有权按照国际准则，而不是按照美国的准则，来界定美国人的公民权利。道德主义的超国家论者认为美国应支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应遵守这样一个法庭以及国际法院、联合国大会等机构的裁决和决定。他们说国际社会在道义上优越于国内社会。

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反对爱国主义的态度，使得某些自由派担心这种态度将会带来的后果，不是给美国带来的后果，而是给美国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写道，多数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可是，“在高等学府中可以发现许多人是例外，这些学府成了左翼政治观点的温床。”他认为左翼分子“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是不要爱国主义的……他们否定国家特性，否定民族自豪感”。罗蒂强调，左翼若想要有影响，就必须承认“国家特性共识是公民身份的一个绝对必备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爱国主义，左翼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给美国提出的目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贝拉教授也指出：“自由派没有找出一个有效的方式来感染美国人爱国主义的优秀本能……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幸的，在策略上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要让公众愿意实现美国的民主变革，我们就必须设法深入地发掘我们的传统潜力。”总之，自由派必须利用爱国主

义，使之成为实现自由派目标的一个手段。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少人动脑筋论述过国家、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利弊，而表达反国家观点的学者则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些论述中，认真维护爱国主义和强调国家特性重要意义的观点是罕见的。对国家的存在表示怀疑的人，在政策负责人当中亦不乏其人。1992年，当时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以赞许的态度展望这样一个未来：“我们所知的国家地位将会过时，所有各国都承认一个全球管理机构的权威。”几个月之后，他就进入国务院，成为他希望将会过时的美国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顶层负责官员之一。可以说，在克林顿政府内还有一些人也持有塔尔博特这样的看法。克林顿政府与军方关系出现困难，除了克林顿对同性恋问题的政策以外，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军人以忠于国家为最高天职。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那些持超国家主义观点的精英人士却认为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国家特性是可疑的，爱国主义是陈腐的。

这与美国公众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爱国的公众

民族主义和爱国之心活生生地存在于世界大多数地方。不论精英人士是多么不喜欢，大多数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强烈认同于自己的国家。在爱国主义和忠于国家这一点上，美国人一向是出类拔萃的。但美国人对国家认同的程度，随种族和出生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明自己爱国，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1991年一次民意调查中，对于“你作为一个美国人有多么自豪？”的问

题，96%的美国人说“非常自豪”或“很自豪”。1994年，在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时，有86%的人说“非常自豪”和“极其自豪”。再一次是1996年，问题是：“对你来说，做一个美国人有多重要？0表示根本不重要，10表示对你的生命最重要。”接受调查的人，有45%选择了10，有38%的人的选择在6与9之间，选择0的为2%。爱国之心如此之高，所以即使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也不可能再有多大变化。2002年9月的一次调查中，对自己作为美国人“极其自豪”和“非常自豪”的人有91%。

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到20世纪后期看来还有所提高。有一项调查是让人们表示自己“首先”是属于什么地方——是县镇，还是州或地区，或是美国全国，或北美大陆，或是全世界。1981—1982年，选答“美国全国”的人占16.4%；1990—1991年，这一比例升到29.6%；1995—1997年，又升到39.3%。与前10年相比，升幅达22.9%。同样的调查在世界各国都进行过，各国总的平均升幅只为5.6%，各发达国家平均升幅只为3.4%。

如果别国的人也像美国人一样爱国，美国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就意义不大了。可是总的说来，情况并非如此。在1981—1982年、1990—1991年和1995—1996年3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所调查的41—65个国家中，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名列第一，有96%—98%的美国人表示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和“很自豪”。1998年在23个国家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人们对自己国家在文艺、体育运动、经济等10个方面的具体成就是否感到自豪，再问他们总的说来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如何。在具体成就方面，美国得分居第二，仅低于爱尔兰，总的方面亦居第二位，仅低于奥地利，两方面得分综合在一起，则是美国居首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英、法、西德四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对自己国家表示自豪者所占的比例，美国人为75%，英国人为54%，法国人为35%，西德人为20%。在青年人中间，这一比例分别为美国人97%，英国人58%，法国人80%，西德人65%。有一个问题

是问青年人是否愿意为国效力，答复情况是：

	愿意	不愿意
美国青年	81%	18%
英国青年	46%	42%
法国青年	55%	34%
西德青年	29%	40%

但在美国有些群体的爱国感低于全国总的水平。在1990—1991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98%的国内出生的美国人、移民、非拉美裔白人和黑人以及95%的拉美裔人，都说自己对美国感到非常自豪或很自豪。但是，当问到他们自己是否首先认同于美国时，差别就出现了：31%国内出生的人和非拉美裔白人说他们首先认同于美国，而黑人这一比例降到25%，拉美裔人为19%，移民为17%。当问到是否愿意为美国而战斗时，表示愿意的非拉美裔白人为81%，国内出生的美国人为79%，移民为75%，黑人为67%，拉美裔人则仅为52%。

这些数字表明，迁居美国不久的移民以及像黑人这样一些当初并非自愿纳入美国社会的人们，对待这一社会的态度不如最早定居者和早期移民的后裔那样坚决明确。在美国进行的一些战争中，黑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人也曾英勇作战。然而，认为自己爱国的黑人仍少于白人。例如，在1983年一次民意调查中，自己认为“非常爱国”者，白人有56%，黑人为31%。在1989年一次民意调查中，自己认为“非常爱国”或“比较爱国”者，白人有95%，黑人则为72%。在1998年对学生家长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对于“美国是比世界上多数其他国家都更好的国家”这一点表示完全同意或大体上同意的学生家长，白人占91%，拉美裔中占92%，移民中占91%，而非洲裔美国人中只占84%。在另一些调查中，对于作为美国人感到自豪者，黑人和白人之间差别小一些，可是，在2002年9月为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部和《华盛顿邮报》举办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对作为美国人感到“极其自豪”者，白人占74%，非白人占53%，二者之间的差

距大于其他社会经济类别之间的差距。

至于印第安人，美国人跟他们曾连续打仗200多年，现在法律承认印第安人部落为单独的附属民族，而且像对待波多黎各人一样，给他们明确划定了领地。因此，印第安人对于自己的部落身份、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这三者孰轻孰重，是难以把握的。有一位印第安历史学家在1993年就说过：“我们首先是纳拉干西特人¹²，在方便的时候，我们则是美国人。”有多少印第安人同意这一观点，尚不得而知。

但总的说来，美国人绝大多数是高度爱国的，尤其是与别国人相比更是如此。拉塞尔·多尔顿在研究了相关资料后指出：“在美国，民族自豪感特别高。‘USA! USA! USA!’这样的欢叫声不只限于奥林匹克赛场，它表达出美国人始终保持的一种感情。大多数欧洲人则是以比较温和的声调表达其民族自豪之情。”正如一次对比性调查的主持人的结论所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人”。

移民社群、外国政府及美国政治

移民社群（diasporas）是指民族属性和文化上跨国的社群，其成员认同于自己的祖国或已不存在的故国。犹太人是典型的移民社群，diaspora这个词即是源于《圣经》，曾长期专用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毁灭后流落四方的犹太人社群。它们是“受害者”移民社群的原型，当今世界上还有几个这一类型的移民社群。但今天diaspora更多是指自愿移居他国的移民社群，其成员虽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但却首先认同于自己的故乡。移民社群的心态清楚表达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95年的一句话：“犹太人虽然分散在各个地区，意识形态上也不尽相同，但依然的确是由历史、盟约和文化联结在一起的一个民族。我们必须共同行动铸造犹太人的命运。不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美国或者别的地方，任何人都别想在我们中间树立障碍。”因此，移民

社群的人有一种跨国的身份，而不同于具有双重国籍的脚踏两只船的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人往往交织在一起，其成员个人可以变来变去。

移民社群也不同于一国之内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在民族属性和文化上具有跨越国界的特性。少数民族是在一国之内活动，而移民群体却结成跨国的联盟，参与跨国的冲突。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自己的祖国，如果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再建立一个，以便能重归故土。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巴勒斯坦人正在这样做；库尔德人、锡克人和车臣人等则是希望这样做。如果祖国存在，移民社群就力图加强和改善这一祖国，并且在自己侨居的社会内努力促进祖国的利益。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国内少数民族也被变成跨国的移民社群，他们祖籍国的政府把他们视做自己国人的延伸，视做可加以利用的资产。移民社群与祖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合作，成了当今全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移民社群具有了新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穷国的大量移居富国，使富国内的移民社群人数增多、财富增大，对自己祖国及侨居国的影响均日渐上升。印度人散居各地的移民社群在1996年估计已达到1500万到2000万人，其净资产达到400亿至600亿美元，还有强大的“智力库”，即20万至30万名有高技能的“医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学者和科研工作者，跨国公司的经理及其他主管人员，高科技企业家以及高校研究生”。长期形成的各地华人社群有3000万至3500万人，他们在东亚各国兴办企业，除了日本和韩国以外，他们在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对大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社群人数迅速增多，已有2000万至2300万人，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对墨美两国都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菲律宾移民社群主要分布于中东和美国，也对菲律宾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第二，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通信和交通运输的改善，使移民社群有可能与自己祖国的社会和政府保持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此外，他们的祖国，例如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政府正在大力发展经济，让经济开放，日益参与全球经济，这就增加了移民社群对它们的重要性，使移民社群的利益与祖国的利益会合到一起。

由于这些事态发展，祖国政府与移民社群的关系有了以下3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这些政府日益将移民社群视为自己国家的重要资产，而不是包袱。第二，移民社群日益对自己祖国作出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贡献。第三，移民社群与祖国政府日益加强合作，共同促进祖国和祖国政府在侨居国的利益。

从历史上看，各国政府对待本国侨居国外的行为采取过不同的态度。某些国家曾设法防止国民外迁，另有一些国家则对此采取含糊的或消极的态度。可是在当今世界上，大批的人由穷国移居富国，其祖国政府又有了新的条件与移居国外的人保持联系，于是就认为移民社群是对自己有用的力量。这些政府现今鼓励人们移居国外，扩大其移民社群和动员移民社群的力量，从体制上保障移民社群与祖国的联系，从而促进自己国家在移民社群侨居国的利益。发达国家是通过对外输出资本、技术、经援和军事力量来影响世界事务，人口过多的穷国则通过向外输出人口来施加影响。

移民社群的祖国政府官员日益将这些国外的人当做自己国民的重要一部分。从1986年开始，菲律宾历届政府一直鼓励菲律宾人移居海外，将他们称做“海外菲律宾工作者”，截至2002年，已经有750万这样的“海外菲律宾工作者”。据约西·沙因报道，菲律宾的海外侨民过去基本上都是教育水平低的体力劳动者，如今却增添了“书香人家和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护士、医生、电脑分析员等等”。约西·沙因报道，海地前总统阿里斯蒂德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亡于美国时，曾经将海地移民社群称为海地的“第10个省”（海地设9个省），此举得到“移民社群的热烈响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色列政府对待海外犹太

人的态度也有重大变化。《犹太人的力量》一书著者J. J. 戈德堡指出，以色列政府原先的政策是希望海外犹太人回以色列，而不是加强海外的犹太人社群。1998年，内塔尼亚胡总理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担心世界范围的犹太文化和特性受到削弱，因而采取了新的做法，大力重振以色列国外的犹太文明。用戈德堡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成了“第一位致力于支持海外犹太人生活的以色列总理”。更能说明移民社群有了新的性质的一件事，是古巴政府对美国古巴移民社群政策的改变。这些古巴移民绝大部分人都是反对卡斯特罗的。苏珊·埃克斯坦报道说：“古巴政府意识到这些移民的敌对态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缓和了对待移民的决策，为移民与国内亲友的联系提供方便，而且比较公开地支持古巴人为了经济利益而移居海外。卡斯特罗过去把这些侨居国外的人轻蔑地称为可鄙的爬虫，如今却把他们正名为‘国外古巴社群’。”

墨西哥人，包括墨西哥政府官员，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也曾瞧不起那些移居于美国的同胞，把他们叫做“变色者”，奥克塔维奥·帕斯甚至把他们叫做“流氓”，说他们丧失了祖传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信念”。墨西哥官员曾将他们贬斥为祖国的叛徒。约西·沙因指出：“墨西哥曾用各种惩罚手段，警告它的公民不要冒险离开祖国和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去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但这一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剧变。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说：“墨西哥民族延伸到它的领土边界以外。移居国外的墨西哥人是墨西哥民族的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比森特·福克斯总统说他是1.23亿墨西哥人的总统，其中1亿人在墨西哥，2300万人在美国，而后一个数字包括了并非出生于墨西哥的墨裔美国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还对海外移民唱赞歌。伊朗的哈塔米总统在1998年9月对800名伊朗裔美国人说：“你们是英雄。”墨西哥的福克斯总统在2000年12月也说“我们要向这些英雄致敬”，因为他们来到美国“寻找他们在家乡找不到的工作和机会”。

现在，一些国家的政府鼓励人们移居国外，并为此创造有利条

件。福克斯当选墨西哥总统后，立即宣布他的长期目标是要开放墨美两国之间的边界，让人们能自由来去。他还要争取让几百万非法进入了美国的墨西哥人获得合法地位，说必须让“已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得到人道的工作条件”，并要求美国给那些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福利。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正式的章程或非正式的措施来支持其国外的移民，使移民与祖国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史密斯教授指出：“美国南面的一些国家极其热心于移民社群实验，墨西哥、哥伦比亚、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都力图扶植自己与一位墨西哥官员所说的‘全球民族’的关系，使之制度化。”2003年1月，印度政府和印度工商会联合会在新德里组织了“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侨胞的集会”。与会的2000名“非常住国内的印度人”来自63个国家，都是“政治家，学者，实业家和法学家”，其中包括毛里求斯的总理、斐济的前外交部长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400人来自美国，代表170万印度裔美国人，这170万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印度国民收入的10%。

在20世纪最后10年，墨西哥政府带头大力发展与墨裔移民社群的关系。1990年，萨利纳斯总统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在外交部内设立了国外墨西哥社群事务署。其使命正如罗伯特·莱肯所说，是“在墨西哥政府与美国的墨西哥人及墨裔美国人之间建起一座正式桥梁”。该署的活动很广泛，如支持墨裔美国人团体，促进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的利益，提高他们在墨西哥国内的地位，在各地成立文化中心，鼓励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按原籍组建同乡联谊会。为开展这些活动，政府大幅度扩大了设在美国各地的42个领事馆的编制和增大了它们的经费预算。塞迪略总统继续了这些活动。福克斯总统上任后，将一位著名的州长调进内阁，负责协调与墨美边界有关的事宜。6个月以后，他提出了为期6年的国家发展计划，其中有一项目标是保护美国境内的墨裔移民，并为此目的而设立一个专门的检察机关。

墨西哥领事馆的作用增强了，明显的例子是在洛杉矶。2003年，

墨西哥的洛杉矶总领事玛尔塔·拉腊宣称：“我拥有的选民比洛杉矶市长的选民更多。”从一个意义上说，她的话是正确的：在大洛杉矶地区共有470万墨裔美国人，而洛杉矶市区的人口只有360万人。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位总领事和她手下的70名工作人员“工作繁忙”，他们的活动“往往使拉腊女士更像是一位地方长官，而不像是一位外交官。她主持移民办的企业的揭幕仪式，给新生儿发放出生证，主持恋人的婚礼，给选美优胜者戴花冠”。然而，这些领事馆最有意义的“地方长官”活动是给非法的墨西哥移民发放美国居留证。

“9·11”事件使美国对美墨关系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美国政府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给几百万非法墨西哥移民办理“正常化”。墨西哥政府的反应则是推行它自己的“合法化”：由驻美国各地的领事馆给这些人发放登记卡，证明持卡人为美国居留者。这一证件在2002年发放了大约110万份。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各个部门都大力开展活动，争取这一证件得到普遍的承认。截至2003年8月，已承认该卡的单位有“100多个城市，900多个警察局，100多个金融机构，以及美国13个州”。

合法的移民用不着这种卡。持有这个卡，实际上是表明持卡人是非法进入美国的。美国的官方和私营机构承认该卡，就等于是承认非法移民享有合法地位以及通常只有合法居留者才能享有的福利，将这一权力转让给了墨西哥政府。这就是说让一个外国政府决定谁是一个美国人。墨西哥此举成功，促使危地马拉2002年也开始发放同类证件，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准备群起而效仿之。

第八章中已谈到一些脚踏两只船的人争取美国通过相关法律承认双重公民身份。一些在美国有移民的国家的政府也在争取美国正式承认双重国籍为合法。这会让他们与移民社群之间又多一层关系，并能鼓励移民社群在美国促进其原籍国的利益。1998年，在墨西哥开始生效的一项法律允许墨裔移民在成为美国公民时仍保留其墨西哥国籍。塞迪略总统告诉墨裔美国人说：“你们是墨西哥人，是住在国界以北

的墨西哥人。”到2002年，墨西哥领事馆四处活动，“鼓励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归化入美国国籍，同时又继续保持墨西哥国籍。”在墨西哥竞选公职的人常到美国开展活动，募集捐款，让移民劝说其国内亲友给自己投票，动员墨西哥公民回国投自己一票。福克斯总统一直支持墨裔美国公民，包括在美国出生的人，持有墨西哥公民身份，这将使他们可以参加墨西哥的选举投票。这些人将会构成墨西哥全部潜在选民的15%左右。倘若他们能在洛杉矶、芝加哥等地的墨西哥领事馆投票，那么墨西哥公职候选人在这些地方的竞选活动至少会跟美国的竞选活动一样热闹，也许还会更热闹。

移民社群得到祖国政府更大的重视，也就更热心于为祖国作贡献。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最明显的是大量往祖国汇款。历史上，移民向来都是给祖国的亲友汇款。到20世纪末，汇款数上升了，而且制度化了。汇款不只是为了帮助故乡的亲友，而且成为表达爱祖国之情的一种集体的努力。全球移民汇款（侨汇）总数在2000年达到630亿美元，超过当年的经援总额580亿美元；2001年更达到800亿美元，其中284亿美元是汇自美国。据报道，犹太裔美国人一年汇到以色列的钱在10亿美元以上。菲律宾移民往菲律宾汇款36亿美元。2000年，在美国的萨尔瓦多人往国内汇款15亿美元。据报道，越南的海外移民往国内汇款额一年在7亿美元至10亿美元之间。连美国的古巴人都大量往古巴汇款，2000年达7.2亿美元，2002年更超过了10亿美元。汇自美国的最多的钱，自然是汇往墨西哥，其数额增长迅速，墨西哥政府估计这一汇款额在2001年增长35%，超过90亿美元，很可能已取代旅游业，成为墨西哥仅次于石油出口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对2002年和2003年的估计均超过100亿美元。

移民社群对祖国经济的贡献，不但表现为移民个人给国内亲友的小额汇款，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国内经济项目的大额投资。中国政府一直鼓励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这类投资。在美国，一些来自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移民企业家取得成功，

他们祖国的政府就千方百计硬要他们向国内投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已有大约25000名理工科高校优秀毕业生离开印度到美国工作，其中许多人成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仅在加州硅谷就办了750多家科技公司”。他们已积极响应印度政府的要求，为印度的教育、科研和生产设施投资。2002年一项调研报告表明，硅谷的半数以上在外国出生的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家（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在自己原籍国内建立了合资企业或子公司，或承担了承包项目及其他经营项目”。来自墨西哥及其他国家的成功企业家和专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些国家的政府竭力将这些投资引向它们认为很重要的项目。

移民社群也为自己祖国作出了非经济方面的贡献。在东欧共产党政权完结以后，东欧各国的海外移民社群已提供过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的总统、南斯拉夫的一位总理，另外还有两位外交部长，一位国防部副部长（后改任立陶宛总参谋长），以及许多职位较低的官员。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有人要拥戴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当总统，但两人均已表示无此意愿。布热津斯基还说，此事迫使他思索自己的身份，结论是，虽然从历史上和文化上来看他是波兰人，但政治上他却是美国人。约西·沙因认为，居住于美国的移民社群有时还试图向他们的祖国“推销美国信念”，包括公民自由权、民主制和自由企业等价值观。这样的情况确实有过，但德拉加尔萨在评论沙因的观点时指出，此说并不能令人信服地适用于美国的三个最重要的移民社群，即墨西哥裔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他们的行动“恰恰相反”。不过，到2000年，墨裔美国人绝大多数都赞成墨西哥结束长达70年的一党独掌政权。

移民社群对祖国的对外政策也往往表态。当祖国或祖国的一些集团和别国或另一些集团发生领土控制权纠纷时，移民社群往往（但不是完全）支持祖国内激进派的观点。失去祖国的移民社群，例如车臣人、科索沃人、锡克人、巴勒斯坦人、摩洛人和泰米尔人，则是给他们那些为创建独立国家而战斗的同胞提供钱款、武器、兵员以及外交

和政治上的支持。倘若没有海外移民的支持，这样一些武装斗争是维持不下去的。

移民社群重要性提高的第三个方面，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意义最深远的方面，就是他们祖国的政府能够动员他们的力量，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合作，在他们侨居的国家内争取促进其祖国的利益。这一点在美国格外明显。首先，美国是当今全球政治中最强大的角色，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事态都能有所影响，因此，别国政府特别需要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也有所影响。第二，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在20世纪后期又开放门户接纳了几千万新的移民，容纳的移民社群既多又大。它显然是世界上的头号移民社群东道国。第三，美国实力既强大又多样化，外国政府通过常规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只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多地依靠其移民社群。第四，美国实行了三权分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力分散，政府机构往往有高度自主权，因此，如同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一样，外国政府和移民社群也可以利用多种接触点来对美国施加影响，促进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和阻挡对自己不利的政策。美国的两党激烈竞争的制度，使处于关键地位的移民社群有机会来影响一个选区产生一名众议员的选举，有时还有机会来影响一个州产生两名参议员的选举。另外，美国现今出现了多文化主义的气氛，许多人认为移民社群应该保持自己祖传下来的文化和特性，这样一种美国独有的社会和政治气氛十分有利于移民社群施加影响。

第五，在冷战期间，正如托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从共产党国家逃出来的人所组成的移民社群，其利益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大体上相符的。来自东欧的移民社群设法促进他们的祖国从苏联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俄国人、华人和古巴人移民社群则支持美国争取削弱或结束共产党对他们祖国的统治。然而，冷战结束以后，除了古巴以外，意识形态上反对祖国政府的努力让位于重新燃起的爱国之情以及对祖国及其政府的支持，可是这些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的国家

利益相吻合。

第六，在冷战结束与反恐怖战争开始这二者之间的10年里，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而压倒一切的目标，这就让移民社群和国内的经济利益集团有了更大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余地。“9·11”事件急剧削弱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集团的活动能量和地位，而且对一般移民的态度也产生了几分疑问。然而，假如没有更多的重大袭击，这一状况能持续多久，是很难说的，因为经济全球化依然在政治、社会和学术界起重大作用，而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性质又继续使美国成为移民社群及其祖国政府施加影响的肥沃土壤。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20世纪末，外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它们影响美国政策的活动。这包括扩大它们的游说和公关活动，给美国各个思想库和媒体提供支持，以及发动它们的移民社群为美国公职竞选活动捐款和提供工作人员，对国会各个委员会和政府部门开展游说。外国政府及其支持者也更加精明了，更懂得美国政府的运行机制，更善于运用各种手段以通达各个权力中心。墨西哥的活动规模和手法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每年用于游说华盛顿的经费还不到7万美元，当时的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曾经难过地谈到，他要他手下的外交官不仅跟美国国务院正式打交道，还要争取跟那些实际有权影响墨美关系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建立密切关系，是多么困难。到1991年，在萨利纳斯总统（也是肯尼迪行政学院校友）手下，墨西哥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官增加了一倍，新闻专员和国会联络官增加得更多。1993年，墨西哥在华盛顿开展游说活动的经费达到了1600万美元，萨利纳斯还领导了长达数年的一项活动，争取美国国会批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经费为3500万美元。上文中已谈到，墨西哥政治官员和领事官员还大力动员和组织墨裔移民促进墨西哥在美国的利益。1995年，塞迪略总统明确要求墨裔美国人学习犹太人卓有成效地在美国促进以色列利益的榜

样，有效地促进墨西哥的利益。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深有感触地说：“墨西哥人过去在这里见不着，如今遍地皆是。”

外国政府加强活动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并发动其移民社群投入这一方面的活动，墨西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此类似的还有加拿大政府、沙特阿拉伯政府、韩国政府、日本政府、以色列政府、德国政府、菲律宾政府和中国政府。其中许多政府每年为此花费的钱都有几千万美元，个别的很可能超过1亿美元。

移民祖国政府利用移民有几种方式。一是从移民中物色间谍和说客。金钱的欲望促使一国的人为外国政府效劳，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这样一些人为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服务。间谍还有别的动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苏联当间谍的人包括一些美国官员、核技术专家和剑桥出身的一个外交官小圈子，就不是为了钱，而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今日世界上，文化和种族属性代替了意识形态。移民首先忠于美国，就可以在美国对外关系中为美国服务，包括当间谍。但是如果移民是心系祖国，就可能受祖国政府利用。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过：“间谍活动几乎总是与移民社群政治相联系。”国防部1996年曾向国会报告说：“许多外国情报机构都企图利用美国的外来移民与祖国的种族联系和宗教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已成功破获过多起移民（俄罗斯人、华人、古巴人、韩人和犹太人）为其祖国当间谍的案件。

比间谍活动更重要得多、涉及面也广泛得多的，是移民为其祖国利益而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在托尼·史密斯、约西·沙因和加布里埃尔·谢弗等人的著作中以及关于各移民社群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均有详细记载。近二三十年来，移民对美国政策起了重要作用的事例，包括美国对希腊与土耳其关系的政策、对高加索形势的政策、对马其顿的承认、对克罗地亚的支持、对南非的制裁、对非洲的援助、对海地的干涉、北约东扩、北爱尔兰纠纷，以及以色列与邻国

的关系。移民所影响的政策有时与美国更广泛的利益相吻合，可以说北约东扩即是如此；但有时也会违背美国更广泛的利益以及美国与盟国的长远关系。当移民完全认同于祖国时，他自然只会照顾祖国的利益。例如犹太人伊利·威瑟尔就公开宣称：“我支持以色列——句号。我认同于以色列——句号。我不在以色列时绝不攻击、绝不批评以色列……犹太人就该跟我们的人民在一起。”托尼·史密斯指出，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移民社群的“有组织的领导集团都受到外国政府的强烈影响，所采取的立场可能违背美国的政策或有关地区的利益”，而且“在涉及与他们有关的地区的问题上，除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以外，他们不愿承认任何别的声音有权威性”。有些移民认为自己有权利左右美国对其祖国所在地区的政策，因为他们断定其祖国利益与美国利益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冲突，例如已定罪的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拉德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连一秒钟都不曾想过以色列之所得竟会是美国之所失。怎么可能呢？”

移民社群能在美国国会有影响，因为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他们能出钱出力支持他们认为是友好的候选人，同时激烈反对他们所不喜欢的候选人。人们认为正是由于犹太移民社群的政治行动，众议员保罗·芬德利（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在1982年竞选连任失败了，因为他作为众院外交委员会中东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犹太移民社群还造成了参议员查尔斯·珀西（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1984年竞选连任失败，因为珀西作为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支持过向沙特阿拉伯出售F—15战斗机。2002年，众议员厄尔·希利亚德（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和辛西娅·麦金尼（佐治亚州民主党人）竞选连任时在预选中失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们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的事业，因而遭到了犹太移民社群的反对。美国亚美尼亚裔全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两名众议员1996年的失败，他们是吉姆·布恩（俄勒冈州共和党人）和格雷格·劳克林（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在国会中被认为是最亲土耳其的议员。击败了布恩的达林·胡利称赞过亚美尼亚裔全国委员会“为支持我竞选而发动了全国

范围的运动”。

有些国家，例如以色列、亚美尼亚、希腊、波兰和印度，其在美国的移民社群大多是人数并不多，但地位高，富裕而且善于表达意见，他们的活动显然使他们的祖国受益，而与他们祖国作对的国家则往往因此而吃亏。但来到美国的移民日益增多和多样化，这就使美国国内的移民社群成倍增加，他们的实际的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也成倍增大。结果是美国国外的各国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反映为美国国内各移民社群之间的冲突。一位阿拉伯裔美国人社群的领导人曾形容2002年的佐治亚州众议员竞选是“一场小型中东代理人战争”。美国国内的各移民社群之间在政治上进行这种“代理人战争”，这说明了美国有实力去影响这些移民社群的祖国之间的实际战争，但同时也证明移民社群及其祖国相信他们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针。随着移民社群增大和多样化，代理人战争也增多和渗透到更多方面。

1996年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竞选就是一场特别激烈的竞争。它既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又是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之争。印度裔美国人为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竞选连任捐款达15万美元，因为这位参议员赞成美国限制对巴基斯坦的武器销售。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则大力支持普雷斯勒的对手。最后普雷斯勒失败了，伊斯兰堡感到欣慰而新德里情绪沮丧。2003年，印度裔美国人鲍比·金达尔竞选路易斯安那州长时，又发生了同样的两军对垒，结果金达尔失败了。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美国人日益增多，对美国的政治也插足日深，这使得犹太移民社群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受到了挑战。2002年佐治亚州民主党预选中，竞选连任的美国众议员辛西娅·麦金尼由于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得到美国各地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捐款”，捐款人当中有“受尊敬的律师、医生和商人”，也有“由于可能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而受到联邦调查局审查的人”。麦金尼的对手丹尼斯·马杰特则得到“佐治亚以外的犹太人捐款”的帮助，募款达到了110万美元，几乎比麦金尼筹募到的钱多一倍。麦金尼还遇到另一些问题，

结果只获42%的选票，败给了得票58%的马杰特。但正如《经济学家》两年前评论阿拉伯裔美国人政治作用的日渐增长时所说：“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比它的推定的对手组织严密得多，财力雄厚得多。可是如今毕竟有一个推定的对手了，这已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变化。”

美国政治日益成为各移民社群及其祖国政府较量的舞台，他们都想影响美国政策而服务于各自祖国的利益。他们彼此战斗，既在国会上战斗，也在美国各地的选区战斗。这里面有一种必然的动力在起作用。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实力愈强，它也就愈加成为世界政治的舞台，外国政府及其移民社群也就愈企图影响美国的政策，而当美国的利益与那些向美国输出人口的国家利益并不吻合时，美国要界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愈加困难了。

1 他加禄语（Tagalog）是菲律宾国语，与西班牙语和英语并列菲律宾官方语言。——译注

2 塔布曼（Harriet Tubman, 1820? ~ 1913），原为女黑奴，后为废奴运动领导人。——译注

3 帕克斯（Rosa Parks, 1913年生），原为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而受罚，从而触发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先驱。——译注

4 原文如此。——译注

5 拉扎勒斯（Emma Lazarus, 1849—1887），美国著名诗人。——译注

6 埃利斯岛是纽约曼哈顿西南的一个小岛，当时是美国入境移民的主要检查站。——译注

7 指一个流亡的古巴小男孩被送回其古巴生父身边一事，本节末段有所论述。——译注

8 苏拉（Sulla，公元前138—78），古罗马统帅。——译注

9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普鲁士历史学家。——译注

10 显系源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译注

11 指欧洲经历几十年战乱后于1648年达成的和平协议，民族国家的主权得到了确认。——译注

12 纳拉干西特人（Narragansett），原居住于罗得岛的印第安人一支。——译注

第四部分 重振美国特 性

第十一章 新老断层起影响的趋势

美国特性的未来实质和重要性正在受到美国社会中以下四个趋势的重大影响：

- 作为美国白人特性之源泉的民族属性近于消失；
- 人种区别在慢慢模糊，人种特性的重要性在减退；
- 拉美裔群体人数增多，影响加大，出现了美国走向双语、双文化社会的趋势；
- 对于许多精英人士以及广大公众来说，国家特性的分量不相同，二者之间出现差距。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趋势有可能引起一种排斥外来移民的本地文化保护主义的反应、尖锐的两极分化以及美国人彼此之间的创伤性的分裂。

美国新近认识到自己易受外来攻击，同时美国与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国人民的交往日益密切，这两点也会对美国的特性起决定性影响。这种外来的影响有可能激起美国人重新发现自己历史性的宗教特性和盎格鲁—新教文化，并使之重新振作。

民族属性终结

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日益从种族属性上作自我界定。这一点对于黑人和亚洲人表现得最明显，但美国白人也认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移民是与自己不同的种族。随着一代人又一代人时间过去，同化日深，这些移民的后裔终于被承认为美国白人。这一过程表现于一些书的书名，例如《爱尔兰人如何成为白人》《犹太人怎样成为白人》《另一种颜色的白：欧洲移民与种族炼金术》等。为了变“白”，这些新来的“非白人”不得不接受美国当时流行的种族观念，赞成排斥亚洲人和奴役黑人。

种族同化之后是民族属性差异。移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最初所依靠的，是跟自己同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和彼此合作。但到了第二代，尤其是到了第三代，结构性同化也有了进展。年轻人离开本族人聚居区，到多民族的中小学和大学学习，到多民族员工的大公司就业，搬迁到多民族杂居的郊区。就这样，民族隔离和分等级的现象逐渐成为历史。到1990年，在未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爱尔兰裔人当中，只有不到6%的人仍然居住于纽约市区爱尔兰裔人口占40%以上的老街区。雷金纳德·拜伦教授指出：“爱尔兰裔人正融入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欧洲裔美国人的范畴之中，不再具有与祖籍国背景相联系的明显民族特征。”

教育、职业和居住地点这些方面的结构性同化，导致了婚姻上的同化。威尔·赫伯格在他很有影响的著作中指出，1956年时，民族间的通婚仍是普遍的趋势，但局限于同一宗教信仰的社群之间。他认为美国白人当时正形成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大熔炉。英裔和挪威裔新教徒通婚，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通婚，从德国来的犹太人和从俄国来的犹太人通婚，如此等等。移民第三代对祖籍民族属性已只有模糊的、象征性的体验，但按照“汉森定律”，第三代往往力图回忆第二代想要忘却的东西，所以日益从宗教方面寻求认同。这一过程

更由于下述事实而得到加深：同化入美国社会，需要放弃对祖籍国的认同和忠诚，但不需要改变宗教信仰。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最初主要是在同一宗教之内。但新教和天主教信徒之间的通婚渐渐增多，到20世纪80年代已“急剧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意大利裔美国人，50%是与非天主教徒（大部分为新教徒）结婚。

犹太人既是一个民族群体，又是一个宗教（犹太教）群体，人数不多。20世纪初，犹太人与他族通婚率在欧洲裔移民当中是最低的，到20世纪50年代也仍然只有6%。但此后犹太人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提高很快，与异族人的通婚也随之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已增加到53%至58%。一位犹太观察家说：“当年，艾伦·德肖维茨听他儿子说要跟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女孩结婚时，气得休克，但如今这样的事年年都屡见不鲜。”犹太人与异族通婚不至于使犹太人减少，因为非犹太人配偶可能皈依犹太教，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皈依犹太教的人约占美国犹太人总数的3%。此外，异族通婚所生的孩子也可能算做犹太人。

美国白人当中，异族之间通婚率在20世纪后期升高很快。据理查德·阿尔巴对20世纪90年代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白人的婚姻中，56%都是祖先不同民族的，还有25%是只有部分相同，例如“一个德意志—爱尔兰混血儿与一个爱尔兰—意大利混血儿结婚”。同族婚姻仅约占20%。在1956—1965年出生的人当中，完全同族的婚姻率极低：波兰裔的仅7.6%，苏格兰—爱尔兰裔的仅7.0%，法兰西裔的12.1%，意大利裔的15.0%，爱尔兰裔的12.7%。

不同人种之间的通婚率比白人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率低，但亚洲裔人例外。亚洲裔移民包括日本裔、华裔、韩裔、越南裔、菲律宾裔和印度裔等，他们并不彼此认同，亚洲裔美国人很少与另一个亚洲裔美国人结婚。1990年统计，25—34岁之间的亚洲裔美国人当中，男

人50%和女人55%是与非亚洲裔人结婚。在25岁以下的人当中，这一比例更高，男人占54%，女人占66%。

与早先的欧洲裔美国人同化过程相比，亚洲裔美国人“变白”更显著，这倒不是说皮肤变白，而是说他们带来的价值观强调工作、纪律、学习、节俭和家庭稳定，菲律宾人和印度人本来就已经会说英语。他们的价值观与美国人价值观类似，同时他们一般说来教育水平和职业水平较高，因而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

以前曾有人认为各白民族属性是“熔化不了”的，但却仍然熔在美国白人“大熔炉”之中。那么，祖籍对于他们个人的身份还有什么意义呢？试考虑以下两个例子，在A家庭中，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与一韩裔女子结婚，他们的儿子又与一个100%伊朗裔女子结婚，他们的孩子是1/4犹太血统、1/4韩国人血统、1/2伊朗人血统。在B家庭中，一个纯亚美尼亚裔与一个纯爱尔兰裔女子结婚，他们的女儿则是与一个100%埃及裔男子结婚，其孩子是1/4亚美尼亚人血统，1/4爱尔兰人血统，1/2埃及人血统。这两家的第三代都有三个不同民族的血统，再结婚而生孩子，第四代就是1/4伊朗人血统、1/4埃及人血统、1/8亚美尼亚人血统、1/8爱尔兰人血统、1/8犹太人血统、1/8韩国人血统。

像这样的通婚就从两个方面根本影响了美国白人的性质。第一，“大熔炉”是在起作用，但只是作用于个人，而不是作用于社会。移民潮不会产生出“新美国人”，而是产生出无数的民族属性不相同的人。美国白人社会原先是一个多民族社会，有十来个民族，现在正变成一个无民族属性的社会，有千百万多民族属性的个人。从理论上讲，异族通婚持续下去，其最后结果将会是，除了同胞兄弟姐妹以外，任何两个人都不会有相同的民族血统。第二，随着个人身上继承有越来越多的血统，个人的民族属性成为一个任由个人主观选择的对象。例如，上一段中说到的那两个家庭所产生的第四代人可以选择爱尔兰裔属性，参加爱尔兰裔人俱乐部，但他也可以作出多种选择之中

的任何一种。他也可以不作选择，根本不再想自己的民族属性是什么。

亚洲裔美国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一位亚洲裔人士指出，亚洲裔美国人的异族通婚率高达50%，那么，

当下一代人多数都是异族通婚的父母的产儿时，“亚洲裔美国人”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是什么决定一个人的种族属性，是遗传还是遗产？是染色体还是文化？抑或是任由自己选择？或者，有人说只要有一滴黑人的血就是黑人，那么是不是有一滴亚洲人的血就是亚洲人？谁会转为白人——谁想转为白人？

一代又一代人异族通婚日益增多，要在一个“美国人”前面添一个字标示民族属性已日益困难，要个人作出选择，也很可能带有任意性和随意性。阿尔巴对1980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分析表明，人们对民族属性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示例的各民族属性排列顺序的影响。1980年，“英裔”在示例表上列于首位，选择者有4960万人。1990年，示例表中未列“英裔”一项，选择“英裔”者遂降到3270万人。1980年，“德裔”和“意大利裔”列位靠后，而1990年它们列于头两位，结果选择此两项者比头一次增加了20%。阿尔巴在1990年认为，在美国国内出生的白人当中，有1 / 5的人“坚持自己有一民族属性”。现在坚持这一点的人无疑更少了。

美国白人失去民族属性，如何界定自己呢？阿尔巴建议从祖先共同的移民经历中寻找自己的属性。然而他们已越来越少想到民族属性问题，未必还肯从历史上的日益遥远的祖先经历中去寻找那抽象的答案。有些学者建议采用“欧洲裔美国人”，阿尔巴就根据从欧洲来北美的共同经历提出这一方案，约翰·斯克伦特尼、戴维·霍林格和奥兰多·帕特森也建议用这一方案，与“非洲裔美国人”相对应。这一名称概括了美国的大部分非拉美裔白人的祖籍，也突出显示了美国的欧洲文化遗产。定居者和移民的后裔皆可包括在内。现今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

移民及其后裔统称“拉美裔美国人”，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提倡采用“欧洲裔美国人”这一统称看来已为时过晚了。1995年5月，人口普查局征求非拉美裔美国人的意见，选择“欧洲裔美国人”这一名称者仅有2.35%。

既然文化是一重要断层，那么似乎可以按照文化特性给欧洲裔美国人定一统称。拉美裔美国人已经这样做了，将非拉美裔和非非洲裔美国人统称为“Anglos”Anglos音译为“盎格鲁人”，在美国主要指非拉美裔白人。此词亦有“英裔人”“英国佬”“操英语的人”等讲法。——译注。作为文化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此词未尝不可用，它肯定了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英语和英国政治、法律、社会体制为美国特性的中心内容。可是，1995年5月那次调查表明，非拉美裔美国白人中，选择这一称呼的还不到1%。

既非拉美裔亦非黑人的美国人最有可能采用的统称是“白人”。在1995年那次调查中，选择这一称呼者高达61.7%，另外还有16.5%的人选择了“高加索种人”。这表明有3/4的美国白人是从人种角度考虑自己的特性。然而这可能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后果。正如卡伦·布罗德金所说，任何表明特性的称呼都会有一个对立面，以“白人”自称，则会视“黑人”为对立面。在某些情况下，这等于是号召白人联合起来与非白人为敌。

但是，还有另一个可用的称呼，它囊括了所有的人，这就是“美国人”（Americans）。1800年以前的定居者的后裔就采用这一称呼，用以概括英格兰裔美国人、苏格兰裔美国人、德意志裔美国人等。此外，正如利伯森所指出的那样，1971、1972和1973年连续3年的当今人口调查表明，黑人、拉美裔人、意大利裔人和东欧裔人绝大多数认定自己的祖籍，而从西北欧过来的那些人的后裔，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已到第四代，他们基本上都不再提及自己是哪国人的后裔了。总之，到第四代，祖籍已迅速淡化。现今，第五代又成熟了。

不提祖籍的人增多，只自称为“美国人”的人也增多了。在1980年人口普查中，人口普查局明确要求人们表明祖籍，不希望只称自己为“美国人”。尽管如此，仍然有1330万人，即6%的人口自称“美国人”，另外还有大约2300万人，即人口的10%未填报民族属性。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这一现象继续发展，与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填报英格兰裔者减少了26%，填报爱尔兰裔者减少了21%，填报德意志裔者减少了27%。而只填报“美国人”者增加了55%，达到约2000万人。这一变化在南方更明显，例如在肯塔基州，自报“美国人”者达25%。

美国白人用什么来替代自己淡忘的祖籍民族属性，这对于美国的未来是大有关系的。如果他们自称为“欧洲裔美国人”或“Anglo”，以对应拉美裔人的挑战，那就可能导致美国文化分野的正式成形。如果他们主要自称为“白人”以区别于黑人等有色人种，那么历史性的种族断层又可能复活。然而，有一种办法可以加强国民同一性和国民团结，那就是响应本书第一章中就谈到的沃德·康纳利的号召，不分祖籍如何，都自称“美国人”。

这样，我们就接着谈人种问题。

人种：恒久、模糊、淡化

人与人身体各异。按照生物学特征，人类又区分成不同的群体。这些特征涉及皮肤颜色、眼形、头发和脸型。千百年来，人们按照这些特征，将人类不同的群体称做不同的人种。身体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按照特征划分为各个人种，是人们的认知的结果；对人种区别赋予何种意义，则是人们的判断的结果。

人们高矮不同，这一差别比肤色和脸型差别更明显。然而，尽管

身高也可能有社会经济后果，但除了侏儒以外，人们并不按照高矮排队分类。除了打篮球以外，人们通常并不认为身高有多么重要。但人们却重视肤色，以至于种族主义成为一种现实。个人和群体自己从人种上区分归类，也被别人如此区分归类，因此，人种既是一个客观现实，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人种还可能是一种政治建构。一些国家的政府将人民按人种分类，分别规定其权利、责任和义务。南非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各自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曾经是这样做，南非将人分为3种，美国则将人分为3种到15种。南非已停止这种做法，美国政府则是列出了人种清单，现在仍要求人们按照这一清单对号入座。在南非和美国，人种区分都曾是政府在政策上对人们区别对待的根据；在美国现今依然如此。

在21世纪初，美国的人种和人种身份的演变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人种之间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仍基本上是恒久的，尽管在某些地区略有缩小。在这方面，美国依然是人种分裂的社会。第二，由于异族通婚，人种从生物特征上来看正出现缓慢的模糊化过程，同时从象征性意义和人们的态度来看亦是如此，多种族个人和睦相处正在成为比较公认的准则。美国人赞成自己的国家从多人种群体构成的多人种社会转变为多人种个人构成的不分人种的社会。第三，与人们身份的其他因素相比，人种属性总的重要性看来正在下降。因此，虽然人种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依然存在，但同时也在出现人种的模糊化和淡化。然而，这后两种过程可能也促使一些白人形成新的人种意识，觉得美国正在日益变成非白人化。（见下文《白人文化排外主义》一节）

人种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上的重大差别，在美国一向存在而且继续存在。这些差别表现于财富、收入、教育水平、权利、住所、就业、保健、犯罪率和受害率以及阶级和地位的其他各种标志上。从上述的多数方面来看，在20世纪的最后40年当中，黑人状况的

绝对水平有重大改善，拉美裔人状况的绝对水平也有相当改善。但这种改善不一定使他们与白人和亚洲裔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多少。许多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这反映在家庭收入水平30年来依然不同。

与美国这种情形相类似的人种群体之间的差别，在历史上一向是人类社会处处可见的现象，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全球可见。近代史上，白人几乎一向优裕于别的人种，东亚人一般优裕于棕种人和黑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历史际遇、文化、压迫程度、社会体制、地理位置、气候、遗传因素、创造财富和武力以扩大地位优势的能力强弱等。美国人种处境之间的差距虽缩小幅度不大，但大概仍然大于其他多数社会同样的缩小幅度。缓慢的进展无疑会继续下去，但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体制之中的这种种差距的任何重大缩减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种之间的某些社会经济差别恐怕会跟人种的存在一样长久。

人种将继续存在，但在程度上和重要性上不一定会跟以往一样保持不变。白人各族之间通婚率高，使其民族属性趋向消失。美国几个最大人种群体之间的通婚率则要低得多，但就亚洲裔人而言还是高的，就黑人而言也在逐渐上升。黑人与异族的通婚率在历史上一向极低，对美国黑白人口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基数低，但近些年来仍有明显升高。据报道，“1960年，在所有涉及黑人的新婚姻中，仅1.7%是异族通婚。但到1993年，所有涉及黑人的新婚姻中，有12.1%是与白人通婚。”人种间通婚率与群体大小和收入高低成正比，与年龄成反比。

通婚使人种间界线模糊，尽管涉及程度尚低，但相关人数在逐渐增多。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人们思想中，人种和人种区别的意义在降低。20世纪60年代中期，19个州尚有禁止人种间通婚的法律。1967年，最高法院已宣布此类法律违反宪法。此后几十年间，美国人对人种间通婚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每一人种之中的多数人都赞成通婚。据皮尤中心1999年举行的民意调查，接受调查者中，63%的人赞成人

种间通婚，认为它“有助于打破种族障碍”；反对的人占26%，认为它“会降低每一人种特有的智慧或才干”。另有几次民意调查也表明各种族的多数人都反对种族之间通婚。正如一位社会学教授所说：“人种间的通婚在迅速增多，持赞成态度的人也在迅速增多。如果你还有什么顾虑，就快丢开吧。列车已经出站了。”

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个人以赞许的态度表示自己是多种族的人。美国人长期以来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两个或多个个人种组成的多人种社会。现在人们日益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多人种的个人组成的无人种界线的社会。例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01年发起的一次民意测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更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多人种的，而不是只属于一个人种”，是好事还是坏事？结果，64%的人说是好事，24%的人说是坏事。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自报属于两个人种的，亚洲裔人有14%，拉美裔人有6%，黑人有5%，白人有2.5%，加在一起，共计将近700万人，占全国人口2%。人口学家估计，到2050年，会有大约20%的美国人自报为多人种者。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流行的口号说“黑的是美的”。到20世纪90年代，相应的口号该是“双人种（或多人种）的是美的”。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个例子很能表明态度的变化：1993年《时代》周刊谈“美国新面孔”的一期特刊，其封面是一个由电脑制作的多人种的美女。

《时代》周刊说这就是21世纪美国的“新面孔”。贝蒂·克罗克公司的广告画面过去是一个白皮肤、金黄头发的女郎，到1996年度成了黄褐色皮肤、深棕色头发的女郎。“老虎”伍兹¹在1997年有句名言，说他所属的种族是“Cablinasian”——Caucasian（高加索种人）、black（黑人）、Indian（印第安人）和Thai（泰人）混合而成的种族。另有一些名人也开始炫耀自己是多种族的后裔。在21世纪初，个人多种族状态成了一种有意义的时尚。

美国人还进一步认识到，许多人过去就已经是多种族的个人，只

是过去人们拒不承认这一事实。现在，学者们估计，也许75%的美国黑人有过非黑人的祖先。有一位学者1970年指出，22%的美国白人有过非白人的祖先。美国人主观上的自我形象一向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可是这并不符合客观现实。到20世纪末，美国人已经使自己的主观形象与客观现实比较相符一些了。

随着黑白二分法走向模糊，一些黑人领袖在1988年表示他们赞成用“非洲裔美国人”一词代替“黑人”一词，“以便不强调人种，而聚焦于文化和民族属性”。“非洲裔美国人”不致造成人种两极化，而与“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或“日本裔美国人”等相当。杰西·杰克逊就说：“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这在文化上是公平的。”这一名词很快就用开了。1995年人口普查局的民意调查表明，44.2%的黑人仍愿被称为黑人，40.2%的黑人则选择了非洲裔美国人的称呼。在1990年，最愿自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男性，受过教育，来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中心”。美国人习惯于用单音节的词而不爱用多音节的词，可是African-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这一个七音节的词居然以这么快的速度为这么多人所接受，这的确是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意义深远的。

多种族性得到更多人的承认，而且确实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这表现在很多人要求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取消“人种”项目，或者多提供一项“多种族”。1997年民意调查表明，56%的美国人说人口普查不应当再问人们属于哪一人种，而36%的人主张继续保留这一项目。大量美国人赞成增添一个“多种族”项目，1995年，有49%的黑人和36%的白人赞成这样做。混合种族的美国人以及有了混合种族子女美国人成立了一些组织来促进这一事业，1996年7月，还在华盛顿举行了多种族团结游行。另一方面，各黑人利益集团则强烈反对变革，4个这样的集团，即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全国城区联盟、争取法定民权律师委员会和联合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联名要求政府“不要急于设立‘多种族’项目，因为这显然有对美国黑人增大种族隔离、歧视和侮辱的潜在

可能性”。迫于这一压力，人口普查局没有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增设“多种族”项目，但允许人们在6个标准人种项目中选择两项打钩。结果，这样做的美国人有700万人，比“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多出2倍，比“太平洋岛民”多出16倍。我们知道，人口普查的列项会让同项的人彼此认同，如果列出“多种族”一项，其后果无疑会让黑人利益集团害怕，怕黑人会合法地被确认为多种族后裔。

种族观念和种族偏见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美国生活中的事实。然而，在人们的看法和态度上，种族的重要性显然正在降低。科林·鲍威尔曾说：“我从内心和灵魂深处热爱美国，可是在美国，你要是长得像我，你就是黑人。”不错，人们看科林·鲍威尔的长相，会觉得是看见一个黑人，然而他们看见的也是一位国务卿、一位退役四星上将、一位指挥过一场短促而胜利的战争的美军领导人，如果看的人了解国际事务，还会看到他是布什政府中主张多边主义对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与鲍威尔的这些身份相比，他的皮肤颜色就显得无关紧要了。1982年，当布赖恩特·冈贝尔成为美国第一位大电视网黑人主持人时，他的肤色是重要的。但此后20多年，电视上已来来回回出现过各个人种的节目主持人、记者和评论员，如今谁还会注意他们的肤色呢？在杰基·罗宾逊成为棒球明星以后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如今美国人看到棒球场各个人种的运动员时，注意的是他们的肤色，还是他们的击球率呢？

如果多种族主义趋势继续下去，到了一定时候，正如乔尔·珀尔曼和罗杰·沃尔丁格所说，政府将人们按人种分类的做法将会显得是“古怪过时”。到那个时候，人口普查表上取消人种登记项目，将标志着美国人向全体国民同一性迈进一大步。现时，人种在美国仍然起作用，但在越来越多的国民生活领域中，它的作用已日益缩小，只有那些担心美国白人地位受威胁的人是例外。

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

1993年，戴维·盖茨在《新闻周刊》上评论过影片《跌落》（Falling Down）。在这部影片，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在一家军工企业工作过的白人雇员，他认为一个多民族、多人种、多文化的社会使他蒙受了种种损失、失败、烦恼和羞辱。戴维·盖茨说：“这种种忧愁和威胁是白人烦恼心理的一个剖面图。从一开始，影片就让道格拉斯显出一副过时的一本正经的派头，身着白衬衫，系领带，戴眼镜，宇航员式发型，面对着七色彩虹般的洛杉矶人联盟。这是在多文化的美国陷于困境的白人男子的一种卡通形象。”

可是，仅仅是卡通吗？不妨想想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1999年评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克林顿总统一事进行表决的情况时说过的话：“赞成弹劾的共和党一方，是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几乎全都是来自南方，除一人外全部是男性。反对弹劾的民主党一方，有天主教徒、犹太人、黑人、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来自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男性白人。从这种激情中难道看不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男性因感到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业已降低而发起的造反吗？”

这一“造反”及其理由应该是不难看出的。在美国的人口构成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没有引起各种反应，那倒是怪事。一个貌似非常有理的反应，就是可能出现排外的社会政治运动，其成员大多是男性白人，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对人口变化提出抗议并企图予以扭转。不论他们的感觉正确与否，他们反正是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降低了，自己的职业被移民和外国人抢走了，自己的文化被扭曲、语言被替代，自己国家的特性被损害甚至消失殆尽了，觉得这一切必须加以扭转。这种排外运动既有种族方面的动力，也有文化方面的动力，目标可能是反对拉美裔人、反对黑人以及反对外来移民。以前在美国特性的形成过程中也有人种方面和国籍方面的

排外运动，现今可能发生的运动可以说是以往这类运动的承续。这当中有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政治集团、学术流派和各方人士，他们彼此之间会有种种分歧，然而仍有足够的共同之处，可以一言以蔽之，叫做“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

这里所说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它的成员会一律是白人而没有别的种族的人，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目标会完全集中于种族问题。它只是意味着它的成员绝大多数会是白人，以保存或恢复他们心目中的“白人美国”作为中心目标之一。这里用“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并不是意味着要绝对保持“本土”文化纯洁性而反对一切外来影响。约翰·海厄姆在他研究这一问题的经典著作中，对“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这一词作了比较中性的解释，即“因国内的少数民族有外国的（即非美的）联系而予以强烈反对”。我们这里用这一名词，也是取其中性意义，但有两点说明。第一，尽管黑人没有“外国的联系”，但仍遭到反对，被认为并不是美国社会的真正一部分。第二，其中所说的“国内的少数民族”之一被认为是正要变成多数。

这里所说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也不应与一些极端偏激集团相混淆。在20世纪90年代密歇根和若干西部州一度流行过“民兵”运动，另外还有继承三K党衣钵的反犹太人和反黑人的“仇恨集团”，均属于过激分子。“民兵”集团1996年曾多达858个，到2000年已减少到194个。据《纽约时报》报道，2001年4月，密歇根州一个“民兵”组织宣布解散，其头目解释说是因为“成员急剧减少，已没有受过足够军事训练的人来领导林中的操练”。这些人有一些类似于妄想症的想法，例如“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占领了美国政府”或者“联合国阴谋集团接管了美国”，过于荒诞而与现实不沾边。

我们所说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完全不同于上述那些极端分子，它是针对美国社会的新的现实而可能作出的反应。这一运动的许多成员会是卡罗尔·斯温所说的“新白人民族主义者”，“他们有文化，有知识，往往还是出身于美国名牌大学而拥有可观的学位，完全不像

那些一心追随意意的政客和老三K党徒”。这些新白人民族主义者并不是鼓吹白人至上。他们主张“种族自决和自存”，只是认为“美国正迅速变成由非白人统治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他们像霍勒斯·卡伦一样，认为国家特性非此即彼，把种族和文化捆绑在一起。他们认为种族是文化的源泉，人的种族属性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文化也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美国种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文化对比的变化。他们认为白人文化使美国伟大，而黑人和褐人文化在知识上和道义上均劣于白人文化，可是现今却可能将白人文化取而代之。他们认为这是国家衰落之路；要使美国继续成为美国，就必须使其保持为白人的美国。

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运动的成员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在种族人口对比、“白人”文化、外来移民以及语言等问题上，见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担心美国种族人口对比的变化，最重要的是非拉美裔白人比例的下降。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75.6%，而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它已降到69.1%。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加利福尼亚，也像在夏威夷、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特区一样，非拉美裔白人已成为少数。这一下降在城市中尤其明显。在全国100个最大城市中，非拉美裔白人1990年占总人口的52%，在其中30个城市中居于少数。到2000年，他们在总人口的比例降到了44%，在其中48个城市中居于少数。1970年时，非拉美裔白人曾占美国人口的83%，居压倒多数，而人口学家们预言他们到2040年时将降到成为少数。

这种人口构成上的变化，还由于白人民族属性的逐渐消失而产生更深的影 响。此外，近几十年来，一些利益集团和非民选 的政府官员一直推进少数种族优惠、赞助性行动、扶 助少数种族语言和文化等政策，这些做法违背“美国信念”而有利于黑人和非白人移民。商界精英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就业机会向海外转移，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和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有些白人认为自由派的媒体在报道针对黑人、同性恋者和妇女的犯罪活动时是采用一种标准，而在报道针对男性白人的犯罪活动时，却是采用另一种标准。拉美裔人 大量地、源源

不断地涌入美国，威胁到白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首要地位和英语作为全国唯一语言的地位。这些趋势有可能引起的一种反应，就是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运动。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和困难，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运动极有可能发生。之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任何一个民族、人种、社会或经济群体，如果其实力、地位和人数实际下降而且看来会继续下降，那么几乎都会设法阻止或扭转这种下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人口中1961年为塞族占43%，穆斯林占26%，而到了1991年变成塞族占31%，穆斯林占44%。塞族人的反应是实行种族清洗。在加利福尼亚人口中，1990年为白人占57%，拉美裔人占26%。到2040年，预计将变为白人占31%，拉美裔人占48%。加利福尼亚白人像波黑塞族人那样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会是零，但完全无所反应的可能性也会是零。事实上，反应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加州通过公民投票，以压倒多数票反对给非法移民提供福利以及反对赞助性行动和双语教育，一些白人迁出了加州。随着种族人口比例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更多的拉美裔人成为公民和积极开展政治活动，白人可能会寻求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20世纪90年代，有几个西欧国家中出现了反对外来移民的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政党，它们往往在选举中赢得了1/5的选票，在奥地利和荷兰还参加过执政联盟。在美国，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大概不会表现为成立新的政党，而可能表现为开展新的政治运动，争取影响两大党的候选人选择和政策。19世纪后期的工业化使美国农民蒙受损失，他们就成立了一系列组织开展抗议运动。在今后岁月中，白人也有可能成立类似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经济学家》周刊在2000年报道说：“加利福尼亚的白人曾经对新来者十分慷慨大度，现在却开始表现得像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种族。”从全国来看，白人大概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我们已经看到，白人的民族属性走向终结，呈现出真空，填补这

一真空的，是一个广泛的白种人的属性。在20世纪80年代，各种少数民族分别联合起来，使各自的人种身份得到了合法地位，白人作为一个人种也可能会得到合法地位。主张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白人会问：既然黑人和拉美裔人组织起来，争取政府实施的种种优惠，为什么白人不这样做呢？既然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和全国拉腊萨协会是合法组织，为什么不可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来促进白人的利益？

白人精英把持着美国所有各大机构，但千百万非精英白人的态度却与精英白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对自己的处境缺乏信心 and 安全感，觉得自己在与其他种族的竞争中吃了大亏，因为后者受到精英人士的照顾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他们所感受到的损失不一定是客观现实，但只要他们有这样的感受，就会对那些族群产生恐惧和仇恨。例如，在1997年一次全国性白人民意调查中，15%的白人估计黑人占美国人口40%以上，20%的白人估计黑人占美国人口31%—40%，25%的白人估计黑人占美国人口21%—30%。这就是说，60%的白人以为黑人占全国人口2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当时实际上是12.8%。同样，43%的白人估计拉美裔人占全国人口15%以上，而实际上只是10.5%。多数白人还认为自己穷而黑人富，也不符合实际。正如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加拉格尔教授所说：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白人反正都觉得自己处于少数地位，摆出了受害者的姿态。他们大多感到自己没有真正的民族文化。他们也许有过一个意大利裔的祖母和一个法兰西裔的祖父，可是如今他们成了杂交品种，没有了任何民族属性。

当人们同化时，民族属性曾填补过真空。如今填补空白的，只有受害感。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有过一个动向，即主张白人要有白人意识，以便理解别的种族。其中一位就说过：“我们要使白人人种化。如果种族之一是白人而又不自认为是一个种族，那么还怎么能建

立一个多种族社会呢？”白人不再代表美国，因此白人应该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又一个种族而已，跟别的种族一样。当时从事“白人研究”的人大多是激烈反白人的。其中一人就说：“背叛白人就是忠于人类。”他们的观点当然不会传到许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白人的耳朵里，但毕竟会有些人听到这些观点，这样一来，不少白人更加感到美国本来是白人的国家，而如今白人在美国却成了受害的少数。

在美国，严重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运动和激烈种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卡罗尔·斯温也许是把这种可能性说得过了头，但她那雄辩的告诫是值得认真思索的。她指出：“现今有好些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同时起作用，其中包括人口结构上的变化、种族优惠政策的继续实施、少数种族期望值的上升、政府继续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人们日益担心全球化带来失业，有些人要求奉行多文化主义。因特网让见解相似的人更易于彼此认同，形成共同的意见和谋略，来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这些因素只会有利于“养成白人种族意识和白人民族主义，这将是美国的身分政治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结果，美国“日益处于我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种族冲突的风险之中”。

但最能激起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因素大概会是白人看到的美国社会中的拉美裔人在人口构成上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上的膨胀，对白人语言、文化和力量所带来的威胁。

两权化：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

拉美裔人的人数和影响持续不断的增加，让拉美裔人利益的维护者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防止拉美裔人被同化而融入美国的盎格鲁—新教社会和文化之中，为此，要在美国土地上建立巨大的、自治的、永久性的、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社会与文化社群。有些维护者，例如威廉·弗洛雷斯和里纳·邦马约尔，否定“全国—社群”概念，攻

击“文化同质化”，将提倡使用英语的努力谴责为“仇外和傲慢”的表现。他们说拉美裔人不应具有美国人身份，而应当具备“正在出现的拉美人身身份及其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应当获取一种单独的“文化公民身份”，包括“这个国家内的专供拉美人用的社会空间”。

由这第一个目标引申出第二个目标，就是要使整个美国变成一个双语和双文化社会。美国不应当再像三个世纪以来那样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其他种族文化作为亚文化。相反，美国应当有两种文化，即拉美裔文化和盎格鲁文化，最明显的是应有两种语言，即西班牙语和英语。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埃尔·多夫曼宣称，美国今后必须作出选择：“是说两种语言还是只说一种语言？”他的答案自然是两种语言。这正在日益成为现实，不只是在迈阿密和西南部如此。弗洛雷斯和邦马约尔说：“纽约已是一个双语城市，西班牙语天天流行于街道生活之中，流行于商务、公务、学校以及家庭。”伊兰·斯塔凡斯教授说：“你用不着用英语说一个字，就可以在美国开一个银行账户、办医疗补助、看肥皂剧、缴纳税款、谈恋爱和办丧事。总之，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语言特性正在起变化。”这种拉美化背后的驱动力是墨西哥人方兴未艾的涌入。

2000年7月2日，在相对说来自由的和竞争性的选举中，比森特·福克斯成为墨西哥第一个由反对党候选人而当选的总统。美国人欢呼这是南边邻国的民主的胜利。2000年7月4日，福克斯作为当选总统，几乎是在他的第一次讲话中，就主张取消对墨西哥人向北边邻国移民的控制。他说：“墨西哥的目标一向是打开一个放气阀门，每年让35万年轻人越过边界，自己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美国的目标则是：“竖起围墙，派警察和士兵抓捕移民。这不能奏效。”因此，他认为两国必须采取措施开放边界，允许钱款、货物和人员不受限制地流动。他没有说的是，取消边界控制以后，货物会是双向流动，钱会是向南流动，人会是向北流动。10年前，当时的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曾周游美国，呼吁让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说减少贸易壁垒

后，移民就会减少：“你们必须要我们的货，或是要我们的人。”福克斯则是说：“你们必须二者都要。”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在担任福克斯政府的外交部长以前说过：“移民是墨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然而它又是其他更严重问题的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这些更严重的问题自然是墨西哥的问题。所以卡斯塔涅达说：“迫使墨西哥制止其公民向外移民……将使得墨西哥无法维持其城乡的社会安宁。”在他看来，墨西哥倒是不应该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要把问题输出到国外。

倘若墨西哥每年派100万军队侵袭美国，其中15万多人侵入美国境内，安营扎寨，然后墨西哥政府要求美国承认这种入侵为合法，那么，美国人一定会愤怒，会动员一切必要的手段驱逐入侵者，恢复边界的尊严。可是，每年差不多都有这么多墨西哥非法移民侵入美国，墨西哥总统要求让这种行为合法化，而美国政界领导人——至少在“9·11”以前——对此不闻不问，甚或暗示在将来可以取消边界。

过去，美国人采取过一些措施，使自己国家的特性大受影响，却对此毫无自觉。例如，1964年的民权法明明是要消除种族优惠和配额，可是联邦政府官员却把它执行得适得其反。1965年的移民法的本意并不是要招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批移民，结果却是如此。这样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人们对可能的后果考虑不周，官僚衙门傲慢专横和敷衍塞责，还有政治机会主义。在拉美裔化问题上，情况又有些类似。没有经过全国辩论和自觉决策，美国就可能变得面目全非。

美国人谈论移民和同化问题时，往往都是笼而统之，对不同的移民未作不同的对待。因此，他们就不去注意拉美裔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的特殊性质、挑战和问题。至少到2004年为止，他们避开墨裔移民的具体问题，对待这一邻邦如同对待其他国家一样，似乎毫无区别，这样也就回避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是否还要继续保持一种统一的语言和一种共同的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然而，回避这一问题也就等于

是回答了这一问题，默认了美国最终演变成两种人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

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就不再是3亿人同操一种语言，而是分裂成两部分，大量的人只会说英语，完全不懂或基本上不懂西班牙语，因而只能活动于美国的英语天地，较少的人则是只会说西班牙语，完全不懂或基本上不懂英语，只能在拉美裔社群中活动。只有人数不定的人能流利说两种语言，能比单语言的人更自在地来往于全国各地。300年来，要在美国往前走，说英语是一个先决条件。将来，要想在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尤其是在政界有所成就，就日益需要既精通英语又精通西班牙语。

美国看来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经历着一个缓慢双语化的过程。2002年6月，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3880万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了9.8%，而美国全部人口这期间增长了2.5%。这2年又4个月时间里，美国人口增长量的一半是拉美裔人。新的拉美裔移民继续大量涌来，他们的人口繁殖率又高，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数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继续上升。在2000年，美国5岁以上人口中有18%，即4700万人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2810万人是说西班牙语。全国5岁以上人口中，英语“说得不好”的人所占比例在1980年为4.8%，到2000年已升到8.1%。

拉美裔人的组织一直积极倡导西班牙语。杰克·西特林等人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美裔活动分子就提出了语言权利的理念，说这是按照宪法应得的权利。”他们对政府部门和法院施加压力，说依据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应该让孩子们用自己父母的语言接受教育。双语教育成了西班牙语教育，在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西班牙语流利的教师供不应求，不得不从西班牙和波多黎各招聘。有关语言权利的诉讼案件大多是拉美裔人当原告。

拉美裔人的组织积极游说，说服了国会批准双语教育计划，但实

行该计划的结果是他们的孩子久久进不了主流班。据报道，1999年在纽约，“90%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班的学生无法按照双语教育计划所规定的3年期限之后进入主流班学习。”许多学生在这种双语班（实际上是西班牙语班）一直待了9年。早先来美国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就已然熟练使用英语，在英语环境中工作。但现在大量拉美裔人流入纽约、迈阿密和洛杉矶等地，他们即使不懂英语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纽约市接受双语教育的孩子，65%是说西班牙语的，他们在学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使用英语。据《纽约时报》报道：“讲西班牙语的学生家长普遍乐意让自己的孩子待在双语教育班，而华裔和俄裔学生家长则对此有抵触。”詹姆斯·特劳布报道：

在纽约，可以生活在全讲西班牙语的世界之中。中学教师何塞·加西亚说：“我总是告诉学生们，至少看看英语电视。可是这些孩子们回家还是只讲西班牙语，看西班牙语电视，听西班牙语的歌。他们有病找医生，医生说西班牙语。甚至到华人开的水果店买水果，华人也跟你讲西班牙语。”这样，孩子们可以让自己封闭在西班牙语的世界之中。纽约有好几所中学几乎全是西班牙语，还有一座双语社区学院。学生们只有到了离开学校、到社会上自己谋生时，才会发现自己英语水平太低，应付不了人才市场的要求。

现在，非拉美裔移民的孩子大多能够较快地学好英语，融入美国社会，而拉美裔学生却困难得多，在这一点上，双语教育显然对他们起了负作用。

拉美裔人的领袖们鼓吹美国人应当除了英语之外，至少再熟练地掌握另一种语言，他们指的自然是西班牙语。在当今日益变小的世界上，的确有必要再懂得至少一门外语，例如汉语、日语、印地语、俄语、阿拉伯语、马来语、法语、德语以及西班牙语等，为的是能理解另一种文化，与另一国的人打交道。但是主张美国人在自己国内与自己同胞打交道时也要使用英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这就是另一码事

了。可是鼓吹西班牙语的人硬是这样想的。西班牙语美国人反歧视同盟（SALAD）的主席奥斯瓦尔多·索托就说：“英语是不够的。我们不要单一语言的社会。”拉美裔人组织和另一些组织1987年联合成立的“英语加其他语言信息交流中心”宣称，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精通英语加上第二种或多种语言”。

现在还有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学习计划，让学生交替地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其目的在于让西班牙语在美国社会与英语平起平坐。这种学习计划，据它的两个拥护者说：“是让说英语的孩子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不说英语的孩子则学习英语。他们学语言，同时也了解相关的两种文化。这样，所有的孩子都掌握另一种语言，遇到同样的问题。这可以将少数民族的自卑感减少到最低限度。”2000年3月，美国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在一篇题为《共同卓越》的讲演中，称赞了这种双语教育，并且预言，到2050年，将会有1/4的美国人说西班牙语，年轻人当中的比例会更高。

推动双语化的，不只是拉美裔人群体，还有一些自由派组织和民权组织，以及一些教会领导人，尤其是天主教领导人，他们看到自己的教友队伍在日益壮大。此外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他们注意到拉美裔移民日益众多，其归化率在慢慢上升。目光盯住拉美裔人市场的工商企业也起着重要作用。反对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有Univision这家西班牙语电视网络公司，因为“如果学生们都学英语，它的观众就会减少”；同时还有“拥有西班牙语广播公司”的Hallmark公司，它自然担心自己的非英语顾客人数降低。

企业把目光瞄向拉美裔消费者，因此它们日益需要双语的雇员。这就是迈阿密之所以在1980年就是否规定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一事举行公民投票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卡斯特罗所说：

人口种族变化最引人怨恨的后果，大概就是迈阿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要求具有双语能力。对于非拉美裔的迈阿密人来说，

双语化已不仅有象征性意义，而且已产生现实的后果。过去人们总是期待新来者适应本地居统治地位的语言和文化，如今双语化象征着这一趋势被扭转了。更糟的是它还让外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了有利地位，其基础恰恰在于这些移民的存在所创造的需求。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于佐治亚州的小镇多拉维尔，那里涌入了大量拉美裔人，使得当地超级市场的老板不得不更换他的商品、招牌、广告和语言，还改变了雇工标准，宣布“我们只雇用双语员工”。后来发现很难找到足够的双语人才，他就说“我们决定宁可雇用那些只说西班牙语的人”。双语化还影响到收入。在菲尼克斯（凤凰城）、拉斯维加斯（赌城）等西南部城市中，会双语的警察和消防队员挣的工资均高于那些只会说英语的人。在迈阿密，据调查，只会说西班牙语的家庭平均收入18000美元，只会说英语的家庭平均收入32000美元，而双语家庭平均收入50376美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自己国家里由于只会对同胞说英语，而得不到自己本来可以得到的职位或工资，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²

在有关语言政策的辩论中，参议员S. I. 早川透彻地说明了只有拉美裔人反对英语：

为什么没有菲律宾裔和韩裔的人反对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日本裔的人肯定不反对。越南裔的人当然也没有反对，他们在美国非常快乐。他们尽力争取早日学好英语，在各地的拼单词比赛中常常获胜。可是只有拉美裔的人坚持说有问题的。已有相当多的动向表明，他们是想要使西班牙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

西班牙语作为美国第二语言的传播，可能继续下去，也可能不会继续下去。倘若继续下去，那么到一定时候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在许多州，想担任公职的人也许就不得不学会流利地说两种语言。双语的总统候选人和公职竞争者会比只说英语的人占便宜。如果双语即英语

和西班牙语并重的教育普及到各个中小学，教师就该也是双语的。政府公文都得是两种文字的。国会辩论和听证会可能变成双语并用，政府公务亦是如此。大多数以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大概都会流利地说英语，那么，只会英语而西班牙语不流利的人，在职位、晋升和合同的竞争中，都会吃亏。

西奥多·罗斯福在1917年说过：“我们只能有一种国旗。我们也只能有一种语言，这就是独立宣言、华盛顿告别演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所使用的语言。”2000年6月14日，克林顿总统说：“我非常希望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不会说西班牙语的总统。”2001年5月5日，布什总统庆祝墨西哥的辛科·德马约国家节日，在发表总统每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2002年3月1日，在民主党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提名竞选中，两名竞争者托尼·桑切斯和维克托·莫拉莱斯用西班牙语进行了正式公开辩论。2003年9月4日，进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人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进行了辩论。不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西班牙语正在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语言一起充当美国的语言。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拉美裔人和非拉美裔白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将会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歧，而成为美国社会最严重的分歧。美国将分成两权，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这将使得三个世纪以来一种语言和一种核心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变得面目全非。

非代表性民主：精英对公众

在国家特性问题上，公众的观点与许多精英人士的观点大不相同。本书第十章中已谈过，公众对国家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献身精神，而一些精英人士却表现出非国籍化，喜爱跨国身份和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这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总的说来，公众关心的是社会安

全，这包括在可接受的演变的条件下，保持语言、文化、结社、宗教以及国家特性和风俗习惯的传统模式。对于许多精英人士来说，公众关心的这些事情却退居次要地位，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参与全球经济、支持国际贸易和人口流动、加强国际体制、促进美国人参与国外事务、鼓励少数群体的特性和文化。

除了“爱国的公众”和“非国籍化的精英人士”的区别以外，在价值观和哲学上也有区别。在涉及国家特性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各种大机构的领导人与公众之间的日益增大的分歧，形成了横跨各种阶级、教派、地区和种族区别的一条重大文化断层线。美国公私机构的权势人物已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日益脱离美国人民。从政治上说，美国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重要公职官员都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产生的。然而，在许多方面，美国的民主已成为非代表性的民主，因为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涉及国家特性的问题上，美国领导人都不顾美国人民的观点而通过法律和执行政策。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民已日益被疏远于政治和政府。

总的说来，美国精英人士不但爱国精神少了，而且也比美国公众更自由派了。从1974年到2000年的20次民意调查说明这一点，调查的问题是让人们表明自己是自由派，还是温和派，或是保守派。这么多次调查的结果一直是，公众自认为是自由派的约有1/4，自认为是保守派的约有1/3，自认为是温和派的为35%至40%。对于同样的问题，精英人士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了。1979年到1985年对十来个不同职业的精英人士就同一问题进行了多次调查，这些群体中的精英人士自认为系自由派者所占的比例，以及1980年调查中公众作同一选择者所占的比例，见下表。

公共利益集团	91%
电视界	75%
工会	73%
电影界	67%

宗教	59%
政府机关	56%
媒体	55%
司法界	54%
国会议员助手	52%
律师	47%
公众	25%
商界	14%
军界	9%

除了商界和军界以外，其他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自认为系自由派者所占的比例，都比公众中同一比例高出一两倍。另一项调查也发现，在道德问题上，各界领导人士与普通美国人相比，“总是更加自由派一些”。政界、非赢利性组织和通信传播业的精英人士尤其是绝大多数持自由派观点。学术界亦是如此。1969年一次调查表明，名校教师中7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自由派，而一般学校教师中的这一比例只有45%。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于2001年到2002年对32000名全职高校教师作了调查，其中48%的人说自己属“自由派”或“很左”，18%的人说自己属“保守派”或“很右”。正如斯坦利·罗思曼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激进派大学生后来成了终身任职教授，执教于名校。“名校的社会科学教师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派、世界主义派或左派，只要向他们谈公民应当忠诚爱国，就被认为是观点反动。”

自由派倾向往往与不信教倾向相伴而行。西摩尔·马丁·利普塞特和埃弗里特·拉德1969年的一项调研中，对高校教师对待宗教的态度按照“虔诚信教”“一般对待宗教”和“基本上反对宗教”三类作了统计，其中，自认为属于自由派者在每一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下：

表11.1 高校教师

中的自由派与宗教			
对待宗教的态度	宗教背景		
犹太教徒	天主教徒	新教徒	
虔诚信教	48%	33%	31%
一般对待宗教	75%	56%	50%
基本上反对宗教	82%	73%	71%

意识形态、宗教和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的上述差别，在涉及国家特性的内外政策上亦有所表现。本书第七章已谈及精英人士与公众对待美国特性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信念”和英语这两个问题的态度差异。杰克·西特林指出：“精英人士鼓吹多文化主义，而公众却固执地认为应同化于共同的国家特性，二者之间存在着—道鸿沟。”民族主义精神强的公众和倾向于世界主义的精英人士之间的差距，也极其明显地影响到美国特性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正如西特林和他的同事们在1994年的研究报告中所说：“以往大家对于美国的国际作用有过意见的一致，如今却分歧日增，其根源在于人们对于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见解不一。”

在许多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公众与精英人士仍有相似的观点，然而，在涉及美国特性以及美国国际作用的一些问题上，却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关于公众和对外政策领导人的观点，一个很有价值的资讯来源是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1974年起每4年一次的民意调查报告。下文中的数据除注明其他来源者外，均取自这些报告。公众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国内经济以及主权。对外政策精英人士比公众更多地关心如何促进国际的安全、和平、全球化以及外国的经济发展。1998年，在34个重大对外政策问题上，公众与精英人士的分歧幅度高达22%至42%。公众的观点也不如精英人士那样乐观。1998年，有58%的公众认为21世纪会比20世纪有更多的暴力事件，而持同样观点的精英人士只有23%；相反，认为21世纪暴力事

件会少于20世纪的精英人士有40%，持同样观点的公众只有19%。在2001年“9·11”事件前3年，84%的公众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而当时持同样观点的精英人士只有61%。

公众首先关心本国的事，精英人士更多地关注于国际的事，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所表现。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1978年至1998年的6次调查表明，96%到98%的精英人士主张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持同样观点的公众只有59%至65%。精英人士主张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别的国家和地区对抗入侵，而公众这方面的热情就低得多。例如，1998年的调查表明，对于假设的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人入侵以色列、朝鲜入侵韩国、俄国入侵波兰这些事态，美国是否要使用军事力量作出反应，表示赞成的公众比例为27%至46%，精英人士比例则为51%至79%。另一方面，公众却更加关心邻近地区的动态。1998年假设古巴人民要推翻卡斯特罗，美国是否应出兵支持，表示支持的公众比例为38%，精英人士比例仅为18%；1990年，假设墨西哥受到革命威胁，美国是否应出兵干预，表示支持的公众比例为54%，精英人士比例则为20%。在发生国际危机时，72%的公众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没有盟国支持情况下单独采取行动，持同样态度的精英人士比例则为48%。公众支持国际合作行动，还表现在57%的公众赞成美国参加“联合国对世界动乱地区派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

对于美国参与世界经济，公众远不如精英人士热心。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认为它对美国来说主要是好事的，精英人士有87%，公众有54%；认为它主要是坏事或好坏参半的，精英人士有12%，公众有35%。1974至1998年的7次调查中，赞成向外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公众一直低于53%，持同样态度的精英人士则一直在86%以上。1980至1998年的4次调查中，赞成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公众有50%至64%，精英人士则为18%至32%。1998年，82%的精英人士认为美国应与别国一起“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更多的钱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持同一观点的公众只有25%。反对这样做的公众有51%，精英

人士只有15%。

美国精英人士和政府主张减少国际贸易障碍，而公众却坚持保护主义态度。1986年，有66%的公众认为关税是必要的，持同一态度的精英人士只有31%。1994年，同意取消关税的精英人士有79%，公众却只有40%。1998年，认为低工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公众比例为40%，精英人士的比例为16%。在1986、1994和1998年这3次调查中，79%至84%的公众认为保护美国就业机会应是美国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目标”，持同样观点的精英人士比例则为44%到51%。1998年在22个国家同时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在重视贸易保护这一点上，美国公众名列第八，有56%的人认为保护主义十分有利于美国经济，而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只有37%。2000年4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认为国际贸易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美国人有48%，认为有利者则只有34%。在这些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当政时都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反映精英人士的主张，而有悖于多数或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意愿。

尽管美国人喜欢说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但在美国历史上，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多数美国人赞成扩大外来移民。自从20世纪30年代有了民意调查的资讯以来，情况一直如此。在1938年和1939年3次民意测验中，分别有68%、71%和83%的美国人反对修改当时的移民法以便接纳更多的欧洲难民。在随后的岁月中，公众对外来移民的情绪随国内经济状况和移民来源的不同而有过一些高低的不同，但总的说来从来不曾欢迎过大量移民入境。从1954年到2002年的19次民意测验中，赞成增加外来移民者的比例从来不曾高于14%，其中有14次低于10%。希望减少外来移民者的比例从来不曾低于3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两次升至65%和66%，在2002年的一次跌至49%。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公众将大量外来移民与核扩散并列为美国面临的“重大威胁”，紧随其后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在1995至199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62.3%的美国人希望禁止或严格限制移民入

境，比例之高在4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五。这个“移民之国”的民众竟然比大多数别国的人更加反对外来移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商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往往也反对外来移民，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21年和1924年的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但到20世纪后期，他们反对外来移民的程度明显降低。像朱利安·西蒙和《华尔街日报》这样主张新自由派经济学的学者和媒体认为，对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来说，人员的自由流动是与物资、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同等的重要。商界精英人士欢迎外来移民对国内工人的工资和工会权力起抑制作用。一些著名自由派人物出于人道主义理由而支持外来移民，同时认为外来移民有助于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对任何一个特定民族的移民施加限制都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错误，而全国限制移民的做法则被怀疑为种族主义行径，是企图在美国保持白人的统治地位。到2000年，连原先一贯坚决反对外来移民的劳联—产联领导人也修改了自己的立场。

精英人士这一态度变化，使得他们与公众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而政府的政策自然又是反映精英的立场而不顾公众的意见。在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1994年和1998年两次民意调查中，认为大量外来移民对美国是一“重大威胁”的公众分别有74%和57%，持同样观点的对外政策精英人士的比例分别为31%和18%。两次调查中，分别有73%和55%的公众认为减少非法移民应是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目标”，持同样观点的精英人士比例分别为28%和21%。1997年有一次民意测验要求人们评估美国政府在16项政策目标上的成就高低，“控制非法移民”这一项得分居倒数第二位，仅居于“减少吸毒”之前，72%的公众认为政府做得很不成功或非常不成功。

一些人反对外来移民，表现出一种关门的态度：“我们进来了，很好；再让人进来，不行。”1993年，《新闻周刊》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当问到外来移民“在过去对我们国家是好事还是坏事”时，59%的人说是好事，31%的人说是坏事。当问到外来移民“现在对我们国

家是好事还是坏事”时，29%的人说是好事，60%的人说是坏事。这表明美国公众几乎是分成3个相等的部分：1/3的人赞成过去的和现在的移民入境，1/3的人则是既反对过去的又反对现在的，还有1/3的人赞成过去的但对现在的移民采取关门态度。移民往往也对别人采取关门态度。1992年的一次拉美裔全国政治调查发现，65%的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和古巴裔的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认为“这个国家里的移民太多了”，德拉加尔萨1984年对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进行的调查又发现了类似的怀疑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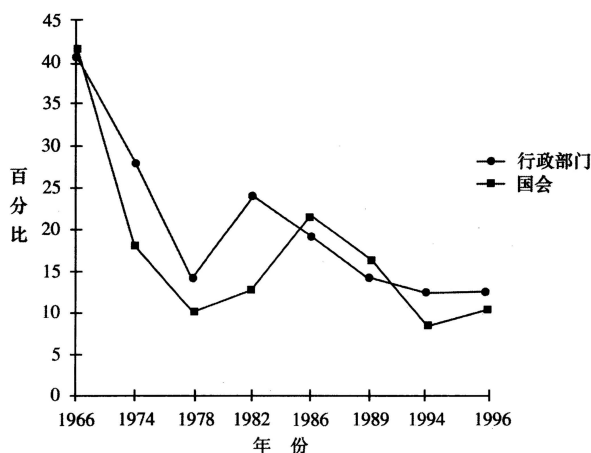
精英与公众之间的观点分歧，导致公众意见与法律所体现的政策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有一项调研报告指出，公众意见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吻合程度逐渐降低：这一吻合度在20世纪70年代为75%，1984至1987年为67%，1989至1992年为40%，1993至1994年为37%。这一调研报告的作者指出：“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听取公众意见的程度一直不高，有时还下降，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头两年更是如此。”因此，认为克林顿或别的政界领导人“迎合公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另一项调研报告表明，政府政策与多数公众意见相符的程度，在1960至1979年间为63%，到1980至1993年间降到55%。从另一角度看，芝加哥对外关系协会的报告指出，在它列出的对外政策问题当中，精英与公众意见分歧比例在30%以上的问题，1982年有9项，1986年有6项，1990年增至27项，1994年有14项，1998年有15项。意见分歧比例在20%以上的问题，1994年有26项，1998年增至34项。对这些调查结果进行了研究的一位分析家指出：“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起什么作用，普通美国人与负责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在观点上出现令人不安的日益增大的差距。”在20世纪末，政府政策日益偏离美国公众的意愿。

政治领导人没有“迎合”公众意愿，其可以预见的后果有三。在重要问题上，政府政策严重脱离公众观点时，可以料到，公众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会降低对政治的兴趣和参与，还会转而采取政界精英所

控制不了的手段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三种后果在20世纪后期均已出现过。三种趋势有许多原因，社会科学家们对此作过周密探讨。其中一种，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在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均有所表现。然而，至少就美国而言，政府政策日益脱离公众意愿，是出现这三种趋势的一大原因。

第一，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公众对政府及非官方重要机构的信任明显降低。公众对政府信任降低，见图11.1。正如罗伯特·普特南、苏珊·法尔和拉塞尔·多尔顿所说，在涉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的种种问题上，表示信任政府的公众从20世纪60年代的2/3左右降低到90年代的1/3左右。例如，“在1966年4月，当越南战争正酣而克利夫兰、芝加哥和亚特兰大发生了种族动乱的时候，66%的美国人表示不同意说‘管理国事的人并不真正关心大家的境况’。而到了1997年12月，在经历了两代人已久的和平与繁荣时期的时候，却有57%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上述观点。”另一来源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公众对公私机构的信任下降。1973年起，每年或每隔一年调查一次公众对各方面公私机构领导人的信任，分为“非常信任”、“有些信任”和“不大信任”三等。从“非常信任”的答案数减去“不大信任”的答案数，其余数即用做概略的信任指数。1973年，工会领导人和电视界领导人的信任指数分别为-10和-3，其余均为正数，从报界领导人的+8直到医药界领导人的+48。到2000年，所有各方面的信任指数当中，除两个未降外，其余都下降了，大多数是大幅度下降，负数增至5项。国会的信任指数从+9下降到-16，降25点；政府行政部门的指数从+11下降到-20，降31点。未降的两项是：最高法院从+16升到+19，军队从+16升到+28。

图11.1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对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表示“非常信任”者百分比)



资料来源：Louis Harris Poll, 1996.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Joseph S. Nye, Jr., Philip D. Zelikow, David C. King,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97), p. 207.

第二，许多调研材料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公众对国家政治以及非官方机构社会活动的参与和兴趣相当持续地下降了。例如，成年人投票率1960年为63%，而1996年只有49%，2000年也只有51%。此外，正如托马斯·帕特森所说：“1960年以来，公众对几乎所有的选举活动的参与都减少了。从竞选活动的志愿工作者人数，直到收看电视实况转播候选人辩论的观众人数，莫不如此。美国的人口1960年比2000年少1亿，尽管如此，收看总统候选人10月电视辩论的人数，1960年仍是多于2000年。”在20世纪70年代，有1/3的纳税人从自己缴纳的税款中为国会设立的支援政治竞选基金捐献了1美元；2000年，这样做的纳税人只有1/8。

精英人士与公众的意见分歧产生的第三种后果，是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包括涉及国家特性的一些问题上，公众更多地利用公民立法提案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公民立法提案在当时的进步改革中就起过作用。当时在每两年一次的选举轮回期间约有公民立法提案50起，但后来逐渐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初只有20起。由于立法机构日益忽视选民的意见，公民立法提案又呈上升之势，起点是1978年6

月，加利福尼亚州65%的选民投票赞成急剧限制增税的第13号公民提案，尽管加州的政界、商界和媒体几乎一致反对，这项提案还是通过了。由此开始，公民立法提案到1998年达到了61项，等于70年代水平的3倍。1998年公民投票表决的提案共55项，2000年为69项，2002年为49项。我们在上文中已谈到，在种族优惠和双语教育等问题上，当权者的做法受到了公民立法提案的有力挑战。戴维·布罗德研究了有关记载后得出结论说：“代议制政府的基础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但这一信任如今已经严重减弱了。”

在20世纪结束时，对于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这样一些问题上，美国精英与公众之间存在着重大意见差距。相当多的精英人士日益脱离了民众，美国公众对政府感到了日益失望。

第十二章 21世纪的美 国：易受攻击、宗教信 仰及国家特性

易受攻击时代的“美国信念”

随着新的世纪到来，美国的特性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它的重要性和实质起作用的因素，一是美国遇到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形势，一是美国出现了朝向宗教信仰的新转折，这是与宗教信仰在世界多数地方的再兴相平行的美国的一次伟大觉醒。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力量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居于支配性的领先地位。但是“9·11”事件证明，美国也比将近200年来的任何时候更易于遭受外来的攻击。从前，在美国本土发生的类似于“9·11”的最后一次事件是1814年8月25日英军火烧白宫。而1815年以后，美国人慢慢形成一种观念，觉得安全和不受攻击是自己国土的一个固有的和持久的特点。20世纪的几次战争都是在远隔重洋的万里之外进行的，美国人在自己国内既安全又自由。在地理环境安全的背景之下，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缺少了忧患意识。

“9·11”事件让美国人猛醒，明白了距离不再提供安全这一新的现

实。美国人发现自己是在许多战线上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战线就在自己国内。“9·11”后，布什总统说“我们拒绝生活于恐惧之中”。可是这一新的世界是一个恐惧的世界，如果说美国人不要生活于恐惧之中，那么也还是不得不与恐惧生活在一起。要应付这些新的威胁，美国人不能不作出困难的交易：要放弃某些已习以为常的自由，来换取自己原先以为是不成问题的最重要的自由，即确保在国内的安全，防止外敌对自己生命、财产和制度的暴力袭击。

在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中，现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易受攻击的新局面。过去，美国人谈到“祖国”时通常是指其祖籍，即自己的祖辈所来自之国。现今美国易受攻击的形势，正如本书第一章引用的雷切尔·纽曼的话所指出的，使美国人明白了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保障这一祖国的安全就是政府首要职责之所在。国家易受攻击，使国家特性有了新的的重要性，但仅此一点仍不足以结束此前半个世纪以来的趋势和冲突。

因此，在20世纪结束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信念”是国家特性的主要泉源。有两个因素增强了它的重要性。第一，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盎格鲁—新教文化又受到严重攻击，在美国特性的历史性四大组成部分中，只有“美国信念”是唯一未受挑战的幸存者。第二，与独立战争时相比，“美国信念”由于从意识形态上使美国在20世纪区别于它的德国、日本和苏联敌人，因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可以是多种族的，可以没有任何文化核心，只要有“美国信念”界定其特性，就可以依然是一个有紧凑聚合力的国家。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一个国家仅靠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立住吗？

从几个方面考虑，答案都是否定的。仅靠信念是无法立国的。

从历史上看，除了“美国信念”以外，美国特性有另外3个重要组

成部分。如果仅以信念这一条界定美国特性，那将是严重背离历史。此外，没有什么国家能仅靠意识形态或一套政治原则立国。当代最明显的例子是共产党国家，它们用意识形态把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人联合在一起，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均是如此；或者，它们用意识形态把同一民族的人分隔开来，东德和朝鲜即是如此。当共产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消退，冷战结束使这些国家维系其实体的刺激力亦随之结束时，除了朝鲜以外，上述的国家均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按照民族和文化立国的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减弱了，但对中国未形成威胁，因为中国有几千年之久的汉文化作为核心维持团结，它已激起了新的中国民族主义。法国也有一套政治原则构成国家特性的组成部分，但绝非唯一的组成部分。法国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常说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他们的国家特性还包含宗教组成部分，它通过历史上的历次法英战争而得以巩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是法国大革命时才产生的，法国人自己对此还曾经争论不休，一直吵到了20世纪。

人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难。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变成了狂热反共分子；有一些民主自由派人士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则可能奉行资本主义。以德国的德累斯顿为例，那里有一些现今80多岁的老人在年轻时曾笃信纳粹主义，中年时曾笃信共产主义，1989年以后又变成了真诚的民主派。在一些前共产党国家，不少共产主义精英人士到了20世纪90年代变成了自由派民主人士、自由市场人士或狂热民族主义分子。可是他们依然是匈牙利人、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等，这一点没有变。一个国家若仅靠政治意识形态立国，那会是脆弱的。

“美国信念”的原则——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是如何组建一个社会的标志，但它们并不能界定这个社会的范围、疆界或成分。有些强调美国靠信念立国的人就说这些政治原则从理论上说适用于任何地方。若果真如此，那就不可能以它们作为基础

来区分美国人和别的人。民主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推广到许多国家，而别的原则并未成为重要的世俗意识形态。俄国人、华人、印度人和印尼人可以接受信念的原则，与美国人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成为美国人。只有当他们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的生活，学习美国的语言、历史和习俗，吸收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主要认同于美国而不再是认同于原籍之国，他们才会成为美国人。

政治原则大概不会像亲缘和亲情、血缘和族情、文化和民族属性那样，在人们心中激起那么深厚的感情。人们认同于亲缘、血缘、民族属性等，产生归属感，也许不一定真有什么根据，但却会在情感上得到满足。说“我们都是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信仰者”恐怕不会满足感情上同样的需求。欧内斯特·勒南说：“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天天在举行公民投票。”这公民投票的问题就是现有的继承物是否值得保存。这继承物就是勒南所说的“人们长期以来所付出的努力、牺牲和忠心的结晶”。如果没有这样的继承物，任何国家都不会生存；如果“公民投票”拒绝了这一继承物，国家就宣告完结。美国是“一个有着教会灵魂的国家”，但这教会灵魂不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在于教会的教义，而是在于教会的仪式、赞美诗、习俗、戒律、祈祷书、先知和圣人以及善与恶。所以一个国家，恰如美国，可以有自己一套信念，但其灵魂则是界定于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英雄与恶人以及胜败荣辱，这一切都是珍藏于“神秘的记忆心弦”。

“美国信念”是独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之人的产物。虽然别国的人也采纳了这一信念的某些成分，但“信念”本身，正如米达尔所说，是18世纪定居者的英国传统、持异议的新教及启蒙运动思想形成的结果。托克维尔说过：“正是合众国的这些美利坚人的习俗，使得他们成为美洲唯一的能支持一个民主政体的民族。”他们的民主体制是来源于“美国人的实际经历、习惯和见解，总之是他们的习俗”。我们美国人当年必须先有共同的民族和种族属性、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才能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美国信念”植根于盎格鲁—新教文

化，如果美国人放弃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信念”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若出现多文化的美国，到时候就会出现多信念的美国，不同文化的群体会宣扬他们植根于自己特有文化的独特政治价值观和原则。

“9·11”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在这一环境中，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特性的宗教组成部分具有新的意义。

美国人转向宗教

1984年，理查德·约翰·纽豪斯牧师出版了《裸露的公众广场：宗教和民主在美国》一书，书中强烈批评了美国公众生活中缺乏宗教的影响、观点和群体。10年后，这一广场迅速人满了。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的思想、观念、问题、群体和讲道有了引人注目的复兴，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这一世纪先前的水平。帕特里克·格林指出：“20世纪末美国生活中最惊人和出乎意料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教情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一重大力量的再现。”到20世纪末，宗教的复兴已相当广泛，使得那些原以为历史是在自己一边的世俗主义者感到惊恐。一个世俗人道主义团体的主席在2002年就诉说：“宗教正在闯入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领域。”

这一事态发展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主张“因信称义”的福音派新教徒和自称为“再生基督教徒”的美国人，其人数和比例在20世纪末期有大幅度增加，福音派组织的数量和活动也显著增多了。第二，大量美国人觉得美国社会中的价值观、道德和各种标准在衰落，

对此感到关切，也开始感到了个人对信仰和归属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世俗意识形态和体制所无法满足的。基督教保守派教会具有让人转变信仰的动力，而大量美国人又有精神上的需求和道义上的关切，这二者的互动就使得宗教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使基督教重新成为美国特性的一个中心特点。

保守基督教上升。1990年至2000年，教友增加得最快的教派是后期圣徒教会（Mormons，教友增加19.3%）、保守福音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会（the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es and Churches of Christ，教友增加18.6%）和上帝会（Assemblies of God，教友增加18.5%），其次是天主教（教友增加16.2%）。南方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教友在1973至1985年间增加了17%，而传统新教教派的教友却减少了。长老会教友减少11.6%，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教友减少了14.8%。福音派“因信称义”运动在教友增多的同时，还成立了大量的教会外组织，使这一个对30%或更多的美国人有吸引力的亚文化具有了机构形式和实力。第一个这类组织是杰里·福尔韦尔于1979年创建的“道义多数会”（Moral Majority）。它于20世纪80年代末衰落，被帕特·罗伯逊1989年成立的“基督教联合会”（Christian Coalition）取代，后者到1995年据称已有会员约170万人。其他福音派组织包括：“聚焦家庭会”（Focus on Family），有200万名支持者；“美国家庭联合会”，有会员60万人；“守信会”（Promise Keepers），有会员几十万人；“美国忧思妇女会”（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有会员60万人，据称是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基督教媒体倍增，其出版物发行量亦倍增。到1995年，约有130家出版单位出版基督教图书，另有45家集中出版教科书及其他教材。基督教图书零售商有7000家，其销售额1995年达到30亿美元，为1980年的3倍。基督教小说畅销，其中，蒂姆·拉艾和杰里·詹金斯创作的《落在后面》系列

到2001年已售出1700万册。弗兰克·帕雷蒂的3种宗教小说到1995年已售出500万册。至1995年，已有13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和163家宗教电视台。至20世纪90年代末，销售各种基督教主题产品的零售商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年销售额达几十亿美元。至2002年，教友2000人至2万人的600余家最大教堂当中，多数为福音派。

在20世纪90年代，福音派组织，最主要的是“基督教联合会”，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政治和选举。它们着力于组织基层民众，关注地方问题，从大量支持者募集小额捐款。福音派在南方人多，过去一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1976年，51%的福音派教徒投了吉米·卡特的票。但随着政治意识增强，对两大党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变，1980年大量投了罗纳德·里根的票，到1988年成了共和党的有力支持者。2000年，经常到教堂做礼拜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当中，84%的人投了乔治·沃克·布什的票，布什所得的全部选票中，约40%来自福音派新教徒。福音派新教徒成了共和党内一支重要力量。

“基督教联合会”等组织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不那么成功。他们力促弹劾克林顿总统的活动在参议院遭到失败，也未得美国公众赞同。他们力促禁止人工流产以及另一些不符合中间派民意的政策主张，亦未奏效。他们积极参与了1998年的国会竞选活动，仅“基督教联合会”就散发了4500万份选民指南，但却没有收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那次选举以后，有些保守基督教徒打算放弃政治活动，集中精力倡导个人和社群价值观。安德鲁·科胡特和他的同事们在2000年得出结论说：“保守基督教徒的政治动员停顿了。”两年后，有消息报道说，许多保守基督教徒“对恺撒的世界感到幻灭”，基督教联合会只“剩下一个影子了”。

基督教保守派在某些政治主张上成就有限，可是在响应美国人心理需求和道义需求方面却成就斐然。他们令人信服地提出，道德和价值观归根结底是源于信仰，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衰落，必须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重新树立起来。正如戴维·施里布曼1999年

所说，在影响美国人思想这一点上，“宗教保守派运动”的作用可与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相提并论。“宗教保守派改变了美国人的谈话，改变了谈话的参加者，改变了谈话中提出的论据，改变了谈话的腔调，改变了谈话的内容。他们还可能最终改变谈话的结论。”一个反对基督教右翼的组织“美国方式维护者”的主席卡罗尔·希尔兹也无可奈何地对此表示同意：“他们改变了规则。坏的成了好的，好的成了坏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改变着我们对民主的看法。”

公众与宗教。宗教保守派之所以能使宗教回到公众的广场，正是因为大量的美国人迫切欢迎宗教回来。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和全神贯注地注意到一些可以说明道德败坏的问题：原先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性行为如今得到容忍，十来岁的少女就会怀孕，单亲家庭日增，离婚率上升，犯罪率居高不下，吸毒成风，色情和暴力充斥于传媒，还有许多人依靠辛劳工作的纳税人提供的福利金不劳而获。更广泛地看，人们似乎感觉到，第一，比较有意义的社群和文明社会的形式消失了，正如罗伯特·普特南所论证的，美国人是在单人划船而不是齐心协力；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起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价值观或道德原则，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学校中的教育和行为准则受到损害，美国恰似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所说，是在“下调犯罪行为的界线”，除了明显的犯罪以外，一切形式的信念和行为都是可以容忍的。

在这些挑战的面前，美国人日益转向宗教和宗教理念，来满足迈克尔·桑德尔所指出的“一种模糊但却处处可见的渴望更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心理”。2000年关于美国宗教生活的民意调查的主持人指出：“一个明确又响亮的信息是：美国人强有力地、将宗教与个人伦理和行为等同起来，认为宗教是对他们今天在我国所看到的道德败坏现象的解毒剂。美国人认为，如果人们更多地信仰宗教，那么，犯罪、贪婪、为人父母而不承担责任、唯利是图等问题就会得到缓解。至于是

哪一宗教，多数公民认为不是问题。”科胡特和他的同事们证明，从1987年到1997年，有以下信仰的人在比例上增多了10%：“坚信”上帝无疑存在，“坚信”人们到了最后审判日都必不可免地要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罪过负责，“坚信”上帝在今日世界上造出奇迹，“坚信”祈祷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坚信”区分善恶的明确指针适用于一切地方一切人。这种信仰上的增长出现于福音派教会、传统教会、黑人新教徒和天主教会，甚至出现于世俗人群。在美国遭受袭击之后，2002年，59%的美国人相信圣经《启示录》的天启预言将会实现。

美国人需要从宗教得到道德保证和心理安全，这还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对天使的狂热信仰席卷全国。1993年，69%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有天使，这促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播《受天使感动》电视节目，它到1998年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观众达1800万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主管人准确地指出这个节目“触动了美国迫切需要的一根心弦”。福音传教士和作家们也迎合了这一需要。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指出：“聚焦家庭”组织的负责人詹姆斯·多布森和另一些福音派传教士的畅销著作就是“扣人心弦地”将现代心理学与传统的布道结合在一起。“他们力图让心理学为我所用，使心理疗法服从于布道。心理学所提供的手段，其本身在神学上和道义上是中性的，但可用来与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

转向宗教，在商界也有所表现。1998年有消息报道说：“白领工作者想要寻求生活意义，不满足于加薪和晋升，如今也踊跃地参加早餐祈祷会和会议室与大学俱乐部中的午餐时间圣经学习。”据报道，从1987年到1997年，工作场所的基督教学习小组增加一倍，达到了1万个。同时，在美国商界估计还有1000个犹太教学习小组和200个穆斯林学习小组。据报道，这种学习有助于缓解商界“野心膨胀、残酷竞争和贪得无厌的压力”。

一些大教派也倾向于恢复或采用较传统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即拥有1600万教友的南方浸礼会转向保

守，宣布赞成“圣经绝对正确”，即相信圣经都是上帝的话，完全没有错。在随后几年，它声明反对人工流产和同性恋，还赞成妇女服从自己的丈夫，这最后一点使它失去了它最著名的教友之一，吉米·卡特。1999年，犹太教改革派通过表决以绝大多数票决定采用犹太教正宗派的许多仪式和做法，包括戴亚莫克圆顶无边小帽和扩大希伯来文使用范围。在20世纪90年代，天主教会中，允许用拉丁语或拉丁语加英语做弥撒的教区，由6个增加到131个，占教区总数的70%。

到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中起更大作用。在1991年一次调查中，接受调查者中有78%的人赞成允许孩子们在校园内做祷告，参加圣经志愿学习班，举行基督教志愿联谊会会议；约67%的人赞成在政府设施中展示耶稣诞生图或大烛台；约73%的人赞成运动会前做祷告；74%反对公职宣誓的誓词中一律删去“上帝”字样。在同一次调查中，55%的人认为宗教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不够，30%的人认为作用正好，11%的人认为作用过分（与自称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比例大致相等）。在20世纪60年代，有53%的美国人认为教会不应参与政治，40%的人认为教会参政可以接受。到90年代中期，这一对比颠倒过来了，54%的人认为教会应该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43%的人认为不应该。

政治中的宗教。宗教保守派的活动和公众的情绪已经使宗教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温和的堪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比尔·格雷夫斯对宗教保守派谈话时说：“你们10年前是90%的时间谈经济问题，10%的时间谈他们的一些事情。现在你们是50%的时间谈他们的问题，50%的时间谈我的一些问题。”继基督教保守派和共和党人之后，民主党人及其他群体也参加了对价值观，特别是对“家庭价值观”的十字军东征。乔尔·科特金在《新民主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民主党不谈宗教给自己造成了空前的伤害。它说自己反对宗教的教条，却采纳了道德相对论的教条，而许多美国人发现后者既

浅薄又无聊。”一位民主党议员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这些问题不应该是只让共和党人去谈论。民主党人不能无视这些事情。”他们不再忽视了。从1988年起，两大党的刊物谈论价值观和文化问题的篇幅都显著增加（虽然仍不到总篇幅的10%）。民主党人在1988年和1996年论述这些问题的篇幅比共和党人多一倍。1999年，副总统戈尔宣称在政府支持宗教这一点上，“华盛顿该跟上美国其他各地的步伐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流行的看法是宪法要求政教完全分离，政府不应支持任何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不得允许宗教团体利用公共设施。联邦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仪式中提到上帝、在课堂做祷告以及在校内读圣经，都是非法的。政府处心积虑避开与宗教的任何接触。教会实际上被排除于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外。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宗教复兴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教会受排斥的状况，国会和行政部门，最重要的是法院，开始作出正面的反应。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任命一批联邦法官以后，法院开始比较容忍宗教进入公共生活。这一转变的象征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1985年说：“政教隔离之墙是根据坏的历史作出的一个比喻，它应被坦率地和明确地予以废弃。”这道墙虽未废弃，但肯定还是慢慢地打开了缺口。肯尼思·沃尔德根据约瑟夫·科比尔卡的分析又作了精心分析后指出，1943年至1980年，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涉及政教关系的23起案件中，其宣判结果有13起是贯彻政教分离主义的，有8起是妥协迁就的，有2起是折中的。而从1981年到1993年，形势大变，在33起案件中，宣判结果为坚决分离的有12起，妥协迁就的有20起，折中的1起。教会与世俗团体在不少问题上争论激烈，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宗教团体举办的教育活动和慈善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及其他支持？许多非官方团体，包括部分宗教团体，认为教会及其他宗教组织特别适于应付内城区流行的犯罪、吸毒、少女怀孕和单亲家庭问题。国会于1996年为此通过了一项福利

改革法令并经克林顿签署颁布实施，其中有一项“慈善选择”条款，授权各州与宗教组织合作提供福利和社区开发计划。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其他社会活动，政府官僚机构又进行抵制，实际提供给宗教组织的经费是很有限的。乔治·沃克·布什在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曾积极促进“慈善选择”，促进政府支持宗教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包括基督教会得对得克萨斯监狱在押者的服务。依靠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成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主题。199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也赞成这一事业，他说：“如果你们选我当总统，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组织的声音将是我的政府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对救世军说：“我们必须敢于采纳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意见，以促进我们美国人的共同目的。”

布什总统就职后10天，就提出了联邦政府支持宗教团体提供社会服务的措施，其中包括在白宫成立“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和社区的首创性举措办公室”³，同时在内阁5个部门成立了推进这些措施的中心。国会没有通过实施这些措施的法案，于是布什总统于2002年12月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规定联邦政府机构不得将宗教团体排斥于社区开发和社会服务经费的接受单位之外，他指出歧视宗教团体的日子该结束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布什这一声明“充满了对宗教信仰的强调，其中心思想是，宗教能够而且应该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中占有一个中心位置”。

政府支持宗教的最大步骤，是美国最高法院于2002年6月以5比4的表决结果裁决，学生家长可以用政府发的票券支持其子女在教会学校的学费。支持和反对这一裁决的人都认为这是最高法院自从裁决学校强制性祷告为非法之后，40年来在政教关系方面所作出的一项最重要的裁决。由这项裁决以及另几项裁决引申出来的普遍看法是，政府可以援助宗教组织，像利用其他非政府组织一样地利用宗教组织来促进公认的公共目标和社会目标，但对各宗教组织不得有亲疏之分。

意见冲突和变化的第二个领域，涉及宗教团体利用政府财产或设

施，尤其是学校，或是将它们用于宗教目的。1962年，最高法院禁止了学校里的强制性祷告，这项禁令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挑战，但人们一直在探讨政府设施中是否可以允许其他的宗教活动。1983年，国会通过了《平等准入法》，规定学校要像对待世俗组织一样平等对待宗教组织，让它们利用学校的设施。最高法院1990年裁定此法合乎宪法，此后在南方和西部出现了许多学生宗教俱乐部和祈祷小组。1995年，克林顿政府规定学校负责人不得阻止学生在校内做祷告或讨论宗教。克林顿说：“宪法并不要求孩子们一进校门就离开宗教。”两年后，亚当·迈耶森报道，克林顿政府又制定了一些规则，规定在联邦工作场所内，“政府负责官员应尊重联邦雇员个人对其宗教信仰的表达。基督教徒可以在办公桌上摆放圣经。穆斯林妇女可以戴头巾。犹太教的工作人员要请假参加其宗教节日活动时，应尽量予以照顾。任何人都不得阻止联邦工作人员在工间喝咖啡休息时间或午餐时间谈论宗教”。由于这些举措，对克林顿持批判态度的一位保守派人士说，克林顿留下的“最大遗产”可能就是“他带头减少了民主党和自由派许多人几十年来对宗教的偏见”。

政教关系方面有争议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政府对宗教活动的限制。过去，禁止多配偶制的法律得到了坚持，没有允许后期圣徒教会破例，但基于宗教理由反对强迫兵役制的权利却得到了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国会曾采取行动减少政府对宗教的另一些限制。1993年，国会几乎是一致通过了《恢复宗教自由法》，推翻政府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仪式中不得使用佩奥特仙人掌的禁令。但最高法院裁决这种对州政府权力的限制是违宪的。2000年，国会通过了《关于宗教使用土地和被收容人员的法令》（又是几乎一致通过），防止城市分区规划委员会禁止在居民区建教堂，并要求监狱允许被收容人员参加宗教礼拜活动。

宗教与选举 。宗教是2000年总统选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重

要性很可能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一次选举。它在四个方面的作用特别重要。

第一，这次选举选出的总统及其司法部长和整个行政班子决心要强调宗教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大力加强政府对宗教组织为有益社会目的而开展的活动的支持。在白宫成立“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和慈善的首创性举措办公室”⁴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这在以前历届政府中是不可想象的。宗教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成为联邦政府职能的一个合法因素。

第二，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兴旺，严重的外来威胁又已消失，道德问题得以在选举之前的政治战中起重要作用。在1998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9%的公众说美国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另有41%的公众说道德的衰退是一个重大问题。1999年2月的一次调查中，当问到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二者之中哪一个更令人担心时，58%的美国人选择了道德问题，38%的人选择了经济问题。2000年，14%的选民认为堕胎是头号问题；也有人把学校祷告、政府对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慈善活动的支持以及同性恋权利问题列上了日程。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与1992年不一样，“不再是经济了，笨蛋。”对道德的关切导致了宗教受重视。在选举之后立即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69%的美国人说“更多的宗教活动是加强家庭价值观和美国人道德行为的最好办法”，70%的人说他们希望宗教在美国有更大的影响。

第三，人们相信宗教有助于阻止道德的衰落，因此，宗教观点和立场自然影响到他们如何投票。教派与党派倾向一向有联系。在20世纪中期，传统教派的新教徒一般是投共和党的票，而南方白人新教徒，主要是福音派教徒，大多数犹太教徒，还有相当多的天主教徒，通常是投民主党的票。在20世纪末期，白人福音派新教徒绝大多数转到了共和党一边，黑人新教徒绝大多数投民主党的票，传统教派的新教徒往往转向民主党，而非拉美裔天主教徒则转向共和党。2000年的投票情况证实了这些转变。

然而，从信教的虔诚程度来看，两大党选民亦有区别。从20世纪70年代起，两大党在宗教和文化问题上的区别明显增大。据杰弗里·莱曼统计，从1972年到1992年，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每周到教堂一次以上者从未超过40%，到1992年降到了不足30%。说宗教对自己生活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民主党代表从未超过30%，到1992年为25%。相比之下，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经常到教堂者1972年约占43%，在1992年占50%，在首次当代表者中占55%。说宗教对自己生活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共和党代表1976年占35%，1992年占44%，在首次当代表者中占49%。总之，民主党积极分子宗教虔诚程度一直较低，而共和党积极分子在这方面20年内有明显提高，宗教方面出现了“巨大分野”。莱曼的结论是：“主要基督教教派，尤其是福音教派中的宗教保守派，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民主党则在太大程度上依靠各大教派中的宗教自由派以及不信教人士的支持。”

表12.1 2000年总统选

举投票者情况

参加宗教仪式频率	布什	戈尔
每周两次以上者	63%	36%
每周一次者	57%	40%
每月一次者	46%	51%
很少参加者	42%	54%
从不参加者	32%	61%

资料来源：Exit poll
by Voter News Service
reported by CNN at
[http://www.cnn.com/
ELECTION/2000/
epolls/US/P000.html](http://www.cnn.com/ELECTION/2000/epolls/US/P000.html).

这些倾向在2000年选民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阶级地位一样，参加教堂活动频繁与否也成为投票行为的一个预测因素（见表12.1）。各大教派内部都有教友虔诚程度高低之分。按天主教、白人传统新教教派、白人福音派新教教派三大类统计，布什在虔诚度较高者和虔诚度较低者当中，获票的比例如下：

	虔诚度较高者	虔诚度较低者
天主教	57%	41%
白人新教传统教派	66%	57%
白人新教福音教派	84%	55%

与宗教方面的以上区别相吻合的，还有两大党积极分子在堕胎、平等权利修正案、枪支管制和同性恋权利等文化问题上的态度差别。1996年两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主张政府进一步倡导传统价值观者，在共和党方面占56%，在民主党方面占27%；赞成学校做祷告者，在共和党方面占57%，在民主党方面占20%。

第四，2000年的选举还证明，竞选全国公职的候选人对宗教信念的谈论增至一个全新的水平。像别的趋势一样，这一点在过去20多年中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年约翰·肯尼迪曾力图把他的宗教信仰跟他的政治角色脱钩，说他赞成“总统将自己的宗教观点当做他个人的私事”。吉米·卡特带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做法，公开明确阐述他的宗教信念，以后的总统候选人除了老布什以外都这么做。威廉·麦克雷在2000年写道：“自从1976年吉米·卡特的竞选运动以来，美国政治领导人避免谈宗教信仰的禁忌已逐渐打破，到了今年这次总统竞选时，各位候选人都大谈上帝和耶稣基督，其频率之高，是自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⁵以来从未有过的。”除了比尔·布拉德利一人以外，2000年所有其他各位总统候选人都以空前热情的方式大谈自己的宗教信念，以迎合公众对宗教的关心和重视。最突出的一位大概是约瑟夫·利伯曼，他经常标榜自己信教信上帝，引用圣经《旧约全书》，宣称“宗教必须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作为一国人民，我们需要重申我

们的信仰，重新表明我们民族和我们自己对上帝和上帝宗旨的忠诚。”

其他各位候选人的有关言论也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不是像以前的政治领导人那样泛泛提到美元货币上印的那位抽象的上帝，而是明确指出了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基督。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参选的人“都在全国电视上亮相，宣布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乔治·沃克·布什在被问到谁是他最景仰的政治哲学家时明确回答：“基督，因为他改变了我的心……当你将心和生命交给基督，承认基督是你的救星时，那就会改变你的心，会改变你的一生。这就是我的感受。”斯蒂夫·福布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星。我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奥林·哈奇和加里·鲍尔都像布什一样，说基督是他们最崇拜的历史人物。艾伦·凯斯更进一步，宣称：“我崇拜基督。我赞美基督。他是永生的上帝的永生之子。”在民主党方面，阿尔·戈尔公开讲述了他如何在神学院学习一年，探讨“一些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生活的目的，什么是我们与造物主的关系，什么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精神义务”，而他的结论是：“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上帝争光。我将我的信仰作为我赖以处置一生中所有重要问题的基石。”他说他面临困难抉择时总要问问自己“耶稣会怎么做？”

这是头一次有一位犹太人参选的总统选举，但除他以外，所有其他的候选人都从泛泛谈上帝进到具体谈基督，从笼统表白虔信宗教进到明确自己是基督教信徒。这意味着他们跟大多数公众一样承认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些言论标志着美国出现宗教信仰的高潮，宗教回到了公众的广场。至于这种状况能否保持，还很难说。假如到了选举的时候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不是道德而是经济，候选人们最急于表白的大概就不会是对基督的信仰，而是对就业机会的信仰。然而，鉴于美国人总的宗教信仰，竞选国家公职的人大概谁都不想表白自己不信教。此外，国外的强大势力也促使美国人更重视宗教在美国特性中的重要性，美国人大概会继续认识到自己是信教的人，是基督教的民

族。

宗教的全球复兴

将近3个世纪期间，宗教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曾不断降低。17世纪，在欧洲经历了100多年的血腥宗教战争以后，参加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力图减弱和限制宗教在政治中所起的影响。在随后百年中，启蒙运动思想家强调了理智作为人类知识的源泉的作用，使它的地位超过了宗教信仰。在19世纪，人们进一步相信科学会把宗教赶下台。许多人相信人类正在进入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新阶段。弗洛伊德在《一个幻想的未来》中说宗教信念“经不起检验……与我们已发现的世界现实完全不相容”，总之，它们是“谬见”。

现代化和现代事物似乎都在拆宗教的台，宗教被说成是过去时代的阴暗遗留物。在美国之外，西方世界中参加宗教仪式的人越来越少，教堂日益显得空空荡荡，宗教信念和宗教机构在多数西方社会中只起着很小的和边缘的作用。在公共舞台上，宗教让位给意识形态。人们、政府和社会运动都定性于某种主要的世俗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组合主义，民主主义。这些意识形态控制了政治辩论，左右了国内和国际的结盟和冲突，提供了各国如何组织其政治和经济的模式。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内，向世俗主义的进军被扭转了。出现了几乎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它表现在世界各地——只有西欧例外。在世界其他各地，宗教政治运动赢得了支持者。在这些国家，最信教的不是老人，而是年轻人，不是贫穷的农民，而是社会地位上升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白领工作者和专业人员。典型的一例是土耳其的医学院女学生，她们不顾世俗政府的禁令，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课。

两大传教性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世界范围竞相吸收皈依者，而且吸收到信徒，最明显的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运动和福音派基督教新教，后者在拉丁美洲已很有影响，现在它的影响还扩及非洲、亚洲和前苏欧地区。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研究中心2003年8月发表的一项报告对20世纪后期全球宗教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定量分析，明确指出：“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多数国家都处于宗教复兴之中。这一复兴最强有力地涉及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亚、高加索地区，还有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中国和东南亚……（相比之下）在发达世界，宗教在多数国家似乎仍在衰落，但最明显的例外是美国。”宗教复兴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出版的书就有《上帝的复仇》《对世俗国家的置疑》和《世俗主义在退却中》等等。⁶

21世纪是作为宗教的时代而开始的。西方世俗国家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和替代。在伊朗，国王想要建立一个实行现代化的、世俗的、西方式的国家的努力失败了，被伊朗革命推翻了。在俄罗斯，列宁的世俗的、反宗教的苏维埃国家已让位于东正教对“俄罗斯精神与文化的确立和发展”起中心作用的俄罗斯国家。在土耳其，基马尔的西方化世俗国家受到了日益强大的伊斯兰政治运动的挑战，2002年，一个以宗教精神给自己定位的政党赢得选举胜利而执政。尼赫鲁所设想的世俗的、社会主义的、议会制的印度国家理念受到了几个宗教性政治运动的攻击，它们组成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而控制了政府。本—古里安将以色列设想为一个世俗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制国家，这一形象遇到了正统犹太教集团的批驳。在阿拉伯世界，基伦·乔杜里指出那里“新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将纳赛尔时代的老对抗性民族主义与现今日益强大的政治伊斯兰潮流结合在一起。在21世纪来临的前后，阿拉伯世界凡是举行选举的地方，伊斯兰政党几乎都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正如马克·于尔根斯迈尔所言，政治领导人都在“致力于以宗教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国家秩序形式”。在填补裸露的公共广场这一点上，美国并不是独此一家。

宗教对于国家和民族特性的重要性增强，也意味着宗教与世界许多地方的冲突的联系增多了。这些冲突往往有着政治的或经济的根源，涉及领土或资源上的争端。但政治家们发现利用和强化宗教情绪是有利可图的。冲突一旦聚焦于宗教问题，就往往造成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难以达成妥协：在印度的阿约提亚，要么建庙，要么建清真寺；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要么由犹太人控制，要么由穆斯林控制。这一类争端都是无法将两头摆平的。乔纳森·萨克斯，英联邦联合希伯来公理公首席拉比，在2000年指出：“宗教往往处于冲突的核心。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车臣、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另一些地方，北爱尔兰、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一些地点，这样一些冲突地区，宗教问题尤其尖锐。”而在这之后的一年，美国也成了一个冲突地区。

伊斯兰好斗分子与美国

奥萨马·本·拉丹发动“9·11”对美国的袭击而杀死了几千人，他同时也就做了另外两件事。一是他填补了戈尔巴乔夫造成的真空，使美国有了明确无误的危险的敌人；二是他点明了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特性。早自20世80年代起，“基地”组织和另一些好斗组织就针对美国人及另一些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的袭击，“9·11”只是其中杀伤最重的一次。本·拉丹在1998年2月发表了正式宣战书，号召“对犹太人和基督教十字军发动圣战”，宣布“消灭美国人及其盟友，包括军人和平民，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义务，凡是在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要这样做”。美国被认定为敌人，因为它强大，因为它是基督教国家，因为它在伊斯兰圣地部署了军队而且支持腐败的沙特政权，那个政权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分支或代理人”而已。

美国人并不认为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或伊斯兰文明是美国的敌人。伊斯兰好斗分子，包括信教者和非信教者，却将美国、美国

国人、美国的宗教以及美国的文明视为敌人，美国只得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伊斯兰好斗分子。伊斯兰好斗分子与美国之间的这场新的战争跟冷战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像冷战促使美国人从政治上和信念上确认自己的特性一样，穆斯林的敌对促使美国人从宗教上和文化上确认自己的特性。乔治·凯南1946年描述苏联威胁的一段话也很可以用来描述新的伊斯兰敌人：

我们面对的这股政治势力狂热地坚信，他们与美国不可能有任何长久的妥协。他们认为可取的和必要的是，让我们社会内部的和睦被打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被摧毁掉。

如同共产国际以前的做法一样，好斗的穆斯林集团也有一个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分支网络。像共产党人一样，他们也组织和平抗议和游行示威，还有伊斯兰政党参与竞选。他们赞助一些组织从事合法的宗教、慈善和民事活动，再从这些组织的成员中招募一些人从事比较暴力性的活动。西欧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社群提供了一个无威胁的而且往往抱同情态度的环境，类似于以前的左翼苏联同情者给苏联提供的环境。清真寺可以充当基地和掩护所，穆斯林温和派和好斗派为控制清真寺而进行的斗争，颇像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工会中的亲共派和反共派之间的斗争。里根总统曾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恰如布什总统将两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和伊朗，加上朝鲜，称做“邪恶轴心”。美国与好斗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战的言辞，已转用于现今与伊斯兰好斗分子的宗教战和文化战。

然而，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现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第一，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一个大国支持。支持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却是各种不同的彼此竞争的国家、宗教组织和个人，而且伊斯兰政党和恐怖主义集团各自有着许多不同的、往往还是彼此有冲突的目的。第二，共产党人想要发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人士的群众运动，以便根本改变西方社会的民主政

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之变成共产主义制度。伊斯兰好斗集团却并不打算把欧洲和美国变成伊斯兰社会。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变欧美社会，而是要让它们蒙受严重损失。他们的活动分子不会走进工会要求工人罢工，而是转入地下，策划对人员、建筑物和机构的暴力恐怖袭击。

近几十年，穆斯林跟基督教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以及印度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和中国汉人都打过仗。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车臣、克什米尔、中国新疆、巴勒斯坦和菲律宾，穆斯林为摆脱非穆斯林统治而战。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苏丹，则是东正教徒和西方基督教徒为反对穆斯林统治而战的。凌驾于这些局部战争之上的，是一场更广泛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伊朗和苏丹的伊斯兰教政府、好斗的非伊斯兰教政府（伊拉克，利比亚）和穆斯林恐怖主义组织，最主要的是“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冲突的另一方则是美国、以色列，有时还有英国和另一些西方国家。这一系列的冲突逐步升级，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准战争，进到2001年“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再进到2003年对伊拉克的一场全盘常规战争。这一形势日益加剧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美国人眼中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在穆斯林看来却是对伊斯兰的战争。

穆斯林对美国的不满和敌意在20世纪90年代加深，到“9·11”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对“9·11”那一天发生的事，穆斯林普遍感到震惊和同情，但许多人很快就赞同另一些说法，例如说这一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或者说它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组织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美国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以及为“基地”组织提供了根据地的塔利班政权的战争。2001年12月至2002年1月在9个穆斯林国家对1万人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他们认为美国是“残酷无情的，侵略性的，傲慢的，专横的，易怒的，对外政策中有偏见的”。2002年，皮尤研究中心在埃及、约旦、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塞内加尔、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56%至85%的人反对美

国的反恐战争。在土耳其和黎巴嫩，多数人“不大赞成和很不赞成”美国的做法。在埃及、约旦和巴基斯坦，则是多数人持“很不赞成”态度。在调查过的穆斯林国家中，对美国持不赞成态度者未超过半数的国家，只有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

穆斯林对美国有敌对情绪，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支持以色列。更深的原则则在于对美国的实力感到恐惧，妒忌美国的富有，怨恨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盛气凌人和剥削他人，敌视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将其视为穆斯林文化的对立面。这样一些态度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学院和其他学校中得到传播，而且得到沙特政府和另一些穆斯林国家政府以及从东南亚到北非的一些个人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据《经济学家》杂志报道，2003年2月麦加朝觐时，200多万穆斯林听到的布道都是发出“文明的冲突”的回响。穆斯林日益视美国为敌。如果这是美国人无法避免的命运，那么美国人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接受这一命运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近代史让人想到，美国在今后岁月里很有可能被卷入与穆斯林国家和集团、可能还有别的国家和集团发生的各种军事冲突。这些战争是会使美国团结起来，还是会使美国分裂？根据亚瑟·斯坦的令人信服的分析，美国英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战争所造成的团结或分裂的程度，及其对国家特性所产生的影响，大体上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敌人造成的威胁越大，国家会越是团结。第二，为进行战争而必须对人力物力进行的动员越深，可能出现的不团结也会越深，因为这会要求人们作出程度不等的牺牲。就美国近几十年进行过的战争来说，这意味着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形：

感受到的 威胁水平	动员的水平	
	低	
高	A. 最初团结，逐渐出现不团结（第二次世界	
高	D. 持续团结（反恐战争）	

	大战)	
低	B. 始终不团结 (越南战争)	C. 慢慢出现不团结 (第一次海湾战争)

威胁水平高的战争 (如A栏) 一开始会促成高度的团结, 但若需要高水平地动员人力、物力、生产力和赋税, 那么在战争过程中会逐渐出现不团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情形。威胁水平低而又需要相当高水平动员的战争 (如B栏) 会从一开始就引起相当大的不团结, 这时政府为减少不团结可能会降低动员水平, 例如尼克松政府曾减少派驻越南的兵力和取消征兵制。战争的威胁水平低, 要求的动员水平也低 (如C栏), 会引起低度的不团结, 但若战争拖延很久, 不团结状况很可能会加深。最后, 威胁水平高而动员水平低的战争 (如D栏) 会让国家保持相当团结, “9-11”后的“反恐战争”属于这种情形。飞机闯进世贸中心塔楼和塔楼随之坍塌的恐怖情景在美国人心中留下深刻的、难忘的威胁感。布什政府随后最大限度地增强了国民的团结, 而且没有要求人民更多地纳税和忍受物资短缺, 只不过忍受一些小的不方便, 这就使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也达到最大限度。这政府有敏锐的政治感觉, 没有要求公众作出多大牺牲, 从而保持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 而有些人认为它本该要求作出牺牲, 才能使这战争成为“真正”战争。

美国反复遭受恐怖袭击而又不需高水平动员, 大概就会保持国家特性的重要地位以及相当高水平的国民团结。如果对一个或几个并未直接进攻美国的国家进行持续长时间的、要求高水平动员的战争, 那就可能引起不团结和反对。在2003年, 布什政府力图让美国公众相信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 属于D栏: 伊拉克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而美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有效的和经济的。批评者的意见实际上是认为这场战争属于B栏: 伊拉克没有进攻美国, 没有对美国或美国切身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而这场战争需要的人力物力在逐步升级, 钱要得多了 (国会已于2003年11月批准拨款870亿美

元），兵员也要得多了（延长了在伊拉克值勤期，征召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而且天天有士兵阵亡。

世界上的美国：是世界主义的，还是帝国性质的，抑或是民族性质的？

美国人怎样界定自己的特性，将决定美国在世界上起什么样的作用，而世界怎样看待这一作用，也会影响到美国的特性。在现今这一新阶段，美国与世界各地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可以有3种总的方案。美国人可以拥抱世界，也就是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自己的国家；或者，美国人可以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或者，美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

第一个方案，也就是世界主义的方案，牵涉到恢复“9·11”以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欢迎世界，欢迎世界各地的思想和东西，最重要的，是欢迎世界各地的人。理想的局面是开放社会，开放边界，鼓励国民层次以下的民族、人种和文化身份，鼓励双重公民身份和移民社群。起领头作用的精英人士则是日益将自己定性于全球机构、准则和规矩，而脱离本国的特性。美国将应该是多民族、多人种和多文化的社会。多样性即使不是最主要的价值观，也应是最主要的价值观之一。给美国带来不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的人越多，美国才越成其为美国。中产阶级美国人将日益认同于他们为之工作的全球公司，而不是认同于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以及那些由于职业或本领不足而只好被拴在这社会之中的人们。美国人的活动将越来越多地不再听命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而是听命于国际权威制定的规则，例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法院制定的规则，以及国际习惯法和全球性条约及制度。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将逊于其他的特性和身份。

在这世界主义的方案中，是世界给美国定形。在帝国性质的方案中，则是美国改造世界。冷战结束，共产主义不再成为决定美国世界角色的最大因素。这使得自由派可以推行其对外政策目标，无须担心别人指责这些目标有损于国家安全，从而促进别人的建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把对外政策当做社会工作”。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美国保守派也产生了影响。冷战期间，美国的敌人指责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今在新千年伊始之际，保守派接受而且赞许美利坚帝国的概念，主张使用美国的力量，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

帝国念头受两点信念支撑，一是以为美国力量至高无上，一是以为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据说美国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因此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创立秩序，对付邪恶。认为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则是以为其他社会的人有着基本上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如果说他们还没有，他们也是希望有；如果说他们还不希望有，那只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什么对他们的社会有好处，美国人有责任去说服他们或诱导他们采纳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观。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美国就会失去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性，而成为一个跨国大帝国的居支配地位的组成部分。

至高无上和普遍适用的观点都没有准确反映21世纪初世界的实况。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还有另一些大国：从全球水平看有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日本，从地区看还有巴西、印度、尼日利亚、南非、印度尼西亚。没有这些国家之中至少某些国家的合作，美国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实现任何有意义的目标。其他社会各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传统和体制，这些特性与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这些社会的做法往往也是不相容的。它们的人民通常是深深忠诚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体制，因而激烈抵制属于异己文化的外人来改变这些东西的做法。此外，不论美国精英人士目标如何，美国公众一向不把对外推广民主制当做优先的对外政策目标。“民主制悖论”认为，在

别的社会中，实行民主制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反美势力上台当权，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导致民族主义民粹派运动当权，在穆斯林国家导致原教旨主义运动当权。

世界主义的方案和帝国的方案都是企图减少或消除美国与别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别。民族性质的方案则是承认美国不同于别国社会，而保持自己的特性。美国若成为世界就不可能仍然是美国。别国的人若成为美国人就不可能仍然是他们自己。美国是不同于别国的，这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和宗教信仰。与世界主义方案和帝国方案不同，民族性质方案就是要保持并加强美国自立国以来所独具的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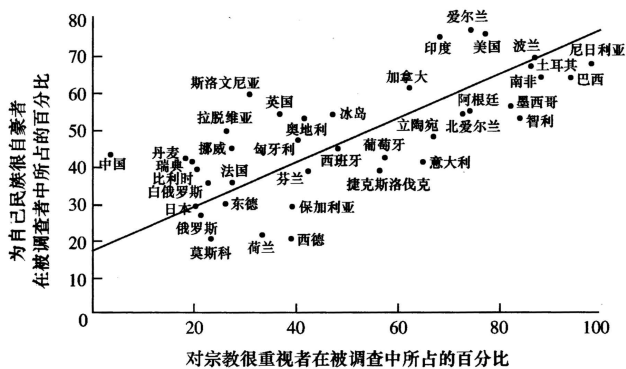
美国人宗教信仰深，这使得美国不同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美国人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这使得美国人不同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宗教信仰使得美国人比别人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从善恶角度看世界。外国领导人往往感到美国人宗教信仰深这一点不但很特别，而且美国人因此而老是用善恶观点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令他们心烦。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与民族主义一向是携手前进的。艾德里安·黑斯廷斯指出过，前者往往界定了后者的内容：“每一个民族均在很大程度上由宗教所形成，正如同由语言所形成一样……（在欧洲）基督教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在20世纪末，宗教与民族主义二者的联系依然明显。宗教信仰较深的国家，往往也是民族主义精神较强。在4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一国社会中对宗教很重视者愈多，为自己民族很自豪者亦愈多（见图12.1）。

在各国内部，宗教信仰愈深者，其民族主义精神往往也愈强。1983年一项调查发现，在15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为欧洲国家和地区）中，“凡表示不信教者，对自己国家感到自豪的可能性亦愈低”，这二者之间的出入率为11%。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信教率低，民族自

豪心亦低。两方面均高居榜首的国家则是美国和爱尔兰及波兰。爱尔兰和波兰的国家特性以天主教为重要标志，美国的国家特性则以基督教的新教为中心。绝大部分美国人既信教又爱国，这二者不可分割。在世界各大洲，宗教都影响到人们的忠心和敌友关系，因此，如果美国人重新回头从宗教发现自己的国家特性和国家的目的，那是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的。

图12.1 民族自豪心与宗教信仰



资料来源：1990—1991 World Values Survey, Ronald Inglehart and Marita Carballo, “Does Latin America Exist? (And Is There a Confucian Culture?) : A Global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 30 (March 1997), p. 38.

现今美国精英人士中有不少人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另有一些精英人士希望美国充当帝国角色。绝大多数美国人则是赞成美国保持和加强自己已有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民族和国家特性。美国成为世界吗？或是世界成为美国？还是美国依然保持为美国？要世界主义？或是要帝国？还是要自己民族？美国人作出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本国的未来，也会影响到世界的未来。

1 “老虎”伍兹（Tiger Woods），美国著名高尔夫球星。——译注

2 双语化进程到一定时候，不会双语的人还会受到处罚。据《纽约时报》2003年4月3日A8版报道，加拿大政府宣布，有200名资深公务员由于不能流利地说英、法两种语言，而被撤职、降级或调走。

3 原文为“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译注

4 原文为“Office for Faith-Based and Charitable Initiatives”，与上文中的“Office for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不一致。——译注

5 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美国政治家，曾3次竞选总统，均失败，后任国务卿（1913—1915）。——译注

6 这里第一本书的书名为法文，后两本的书名为英文。——译注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文化的重要作

价值观如何影响

[美] 塞缪尔·亨廷顿 主编
劳伦斯·哈里森



版权信息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 (美) 亨廷顿, 哈里森
主编; 程克雄译, —2版——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11-9052-2

I. ①文... II. ①亨... ②哈... ③程...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542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749号

Culture Matters

Copyright 2000 by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Xinhua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文化的作用

绪论 文化为什么重要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第一章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第二章 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

第三章 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

第四章 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

第五章 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

第六章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第二部分 文化与政治发展

第七章 文化与民主

第八章 社会资本

第九章 腐败、文化及市场

第三部分 人类学家的辩论

第十章 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有一些比另一些好？

第十一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儿童及进步

第十二章 道义地图、“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及新福音传道者

第四部分 文化与性别

第十三章 文化、性别和人权

第十四章 拉丁美洲的文化、制度与男女不平等

第五部分 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

第十五章 认真对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

第十六章 解构文化

第六部分 亚洲危机

第十七章 法律、家族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

第十八章 “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157]到多米诺？

第十九章 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

第二十章 改变国民的心态：致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第二十一章 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第二十二章 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

译后记

前言 文化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

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拥有一些跨国公司，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也取得长足进展。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即社会科学界重新对文化大感兴趣。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当时有关的学者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戴维·麦克莱兰、爱德华·班菲尔德、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尔巴、卢西恩·派伊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等人。这批学者著述甚丰。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量的兴趣开始回升。此时，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劳伦斯·哈里森——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案例》，1985年由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出版。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

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场抗议风暴。可是，几年之后，这几个方面的人士大都开始看到他的论断有道理。

这时，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对抗。为本书撰文的学者当中，多数人都在一文化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取得了成就，而引起的反应之一是出现了贬低文化作用的反动向，它象征性地和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2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弗朗西斯·福山、劳伦斯·哈里森、罗伯特·卡普兰、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罗伯特·普特兰、托马斯·索厄尔以及鄙人的近著。就这样，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有些政治学家主张“理性选择”论，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主张新现实主义。读者会发现本书中也包含若干此类观点，因为本书有意要容纳与书名主旨不同的意见。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为了探讨莫伊尼汉所说的这两条真理的正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在劳伦斯·哈里森的主持下，组织了这一研究课题，本书即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成果。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社会进步？

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界定我们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本书副题中的“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

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为或其他行为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创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但有一个儒学社会，即新加坡，却是与丹麦、瑞典、芬兰和新西兰一样，并列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轻的国家。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李光耀决心使新加坡成为尽可能无腐败的国家，而且成功了。这正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但是现在的问

题是，在李光耀不再当政以后，无腐败的新加坡能保持多久？政治能永远使社会“免于沉沦”吗？政治行为和社会行动如何能使文化变得更有利于进步，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的中心问题。

“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课题以及本书首先应归功于劳伦斯·哈里森，是他的想法、毅力和献身精神的成果。他构思了这一课题，列出了要涵盖的题材，延聘了各专题小组的成员，编辑了他们的文稿，并为了做到这一切而筹措了经费。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很高兴地参加这一活动并充当它的主办单位。因为这一活动与该学会的业务直接相关。该学会自从1986年成立以来，已经为相当大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让他们把自己在本学科的出色学识与他们对某一个非西方大国或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状况、体制和政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该学会的一些学友如今已任教于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负责该学会工作的，是哈佛大学一些资深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外国问题的一流专家。三年前，该学会决定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从研究各单个社会和文化，进而研究世界各主要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同异及相互作用。1997年，该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探讨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精英对世界政治潮流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特点的见解。本书探讨各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该学会的第二个研究成果。

1992年，在研究文化与发展二者关系的一部著作中，罗伯特·克利加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文化如此重要，人们研究文化又已百年有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没有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本书以及我们这些人希望进一步开展的工作的中心目的，正是要逐步建立这样的理论，推敲出这样的指导方针，推动学者与实干家之间的这种联系，从而促使文化状况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绪论 文化为什么重要

劳伦斯·哈里森

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当初，西欧马歇尔计划的惊人成功和日本从战败后的瓦砾中迅速复兴，曾引起一片乐观主义。人们认为发展是必然的，特别是在殖民枷锁消失以后。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那本影响非常大的书《经济增长的舞台》曾预测说，推动人类进步的辩证法是会加速的。

殖民枷锁的确消失了。菲律宾于1946年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于1947年。英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对中东实行的托管，在战后不久就取消了。东南亚、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基本上完成。

约翰·肯尼迪针对古巴革命而发起的争取进步同盟，曾博得一片称赞。人们说，它将再现马歇尔计划的成就，不出十年，拉丁美洲就会朝着不可阻挡的繁荣和民主迈出大步。

可是，当我们走进新世纪的时候，乐观情绪已经被挫折和悲观所代替。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葡萄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沿着罗斯托描述的轨迹跨到第一世界。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在许多国家中，人民的物质状况甚至比半个世纪前并无改善。在当今全球约60亿人口当中，生活在发达民主国家的人还不到10亿。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超过40亿的人生活在“低收入”或“低中收入”的国家。

那些国家的生活质量是可悲的，尤其是在半个世纪的发展援助之后依然如此，就更是令人失望了：[\[1\]](#)

·23个国家的成年人有半数或半数以上是文盲。它们多数在非洲，非洲以外的有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还有一个甚至是在西半球——海地。

·35个国家的妇女有半数或半数以上是文盲。其中除了上述的23国以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及、危地马拉、印度、老挝、摩洛哥、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

·45个国家中，人们的预期寿命低于60岁。它们大多在非洲，此外还有阿富汗、柬埔寨、海地、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预期寿命低于50岁的有18个国家，全部在非洲。在塞拉利昂共和国，预期寿命仅为37岁。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超过100‰的，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多数在非洲，非洲之外的有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海地、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和也门。

·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1%，为高收入国家人口年增长率的3倍。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高得惊人：阿曼为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4.9%，约旦为4.8%，沙特阿拉伯和土库曼斯坦为3.4%。

在向世界银行提供人口收入比例数据的国家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提供这种数据），贫富最悬殊的是一些较穷的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巴西，最富裕的10%人口占总收入的将近48%；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仅略低一点。在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巴拉圭，最富的10%人口约占总收入的46%；在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共和国约占43%。对比一下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况：贫富最悬殊的富国之一是美国，那里最富的10%人口占总收入的28.5%。

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其余一些国家，民主体制普遍薄弱或者根本阙如。在拉丁美洲，过去15年来民主兴旺，然而民主实验仍然脆弱，秘鲁、巴拉圭、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近年来的事态均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沉重的问题依然存在：拉丁美洲作为西方的

延伸，为什么在各国独立150余年之后，还未能巩固民主的体制？

总之，在20世纪末，世界仍比20世纪中期多数人的预期要穷得多，不公平得多，集权得多。

在美国，在提出“伟大社会”的设想和“向贫穷宣战”口号的那些令人振奋的岁月之后，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贫穷却依然存在。拉美裔美国人有30%仍处于贫困线之下，已取代黑人而成为最穷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某些印第安人居留地，失业率在70%以上。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状况有了可观的进步。但仍有27%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要知道这一切是存在于美国经济已有几乎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和低失业率之后。

那些曾经乐观地在国内外为消除贫穷而奋斗的人们，如今已感到疲惫，甚至是悲观。

解释失败的原因：殖民主义、依附论和种族主义

当人们看出，解决不发达问题之难超出了发展问题专家们当初的料想时，有两种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开始在穷国的大学和政府以及富国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论和依附论。列宁曾断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晚期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他认为这反映出日趋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为它们的产品和资本找到国内的市场。

有些国家曾是列强的殖民地、领地或托管地，曾经受到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大的殖民强国或者荷兰、葡萄牙、美国和日本的统治，直到不久以前才获得独立。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现实，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在非洲尤其如此，那里的国界往往是由列强任意划分的，而没有顾及文化的同一性或部落的整体性。

有些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独立一百年来而仍被称作“第三世界”。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是造成它们对列强的“依

附”——这种“依附”论认为“周边”的穷国受到“中心”的资本主义富国的欺压，那些富国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基本商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其跨国公司靠损害穷国利益而赚取额外的利润。

不论是殖民主义论还是依附论，今天都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在许多人的眼中，其中包括一些非洲人看来，用殖民主义解释不发达原因的说法早已失去追诉时效了。更何况有四个前殖民地——其中两个由英国统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个由日本统治（韩国和中国台湾）——如今已跃入第一世界。依附论今天已很少有人提及了，甚至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很少再有人说了，而仅在若干年以前，依附论还在那些学府里被奉为常识，容不得半点异议。这种变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转变为常规的、日益趋向自由市场的集权主义；古巴的经济在俄罗斯停止了前苏联提供的大量补助之后陷于困境；东亚“四小龙”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在1990年选举中遭到惨败；墨西哥主动与加拿大和美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依附论，戴维·兰德斯为本书撰写的一章作了精辟论述。）

就这样，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出现了解释上的空白。多年来，各个发展援助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社区开发、规划，将精力集中于最贫穷者，满足基本的吃穿住需要，引进合适的技术，让妇女参与开发，实行私有化，权力下放，还有现今的“可持续发展”。顺便提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创举还动用了发展援助机构中的人类学家，来设法使援助项目适应于各地现有的文化现实。这种种举措，更不用说对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强调，都是有益的，收效大小不等。但是从单项来看以及累积来看，它们都未能在第三世界产生广泛的经济迅速增长、民主和社会公正。

在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地位低下，原因容易理解。它显然是由于不让黑人得到均等的机会——在教育方面、在就业方面、在选举方面，都是如此——黑人作为少数种族，从来没有被邀请加入融合的熔炉，《人权法案》确实没有运用到他们头上。但过去五十年来，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一场种族革命，不仅表现在撤掉了通往机会的路障，而

且表现在白人方面对待种族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改变。这场革命已经使大批黑人进入中产阶级，黑人白人之间的教育差距已大幅度缩小，不少黑人参政，黑人白人通婚现象日益增加。但是，在高等教育、收入和财富方面，种族差距依然存在，27%的黑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多数黑人儿童出生于单身母亲家庭，黑人贫民区的问题仍然相当普遍。

尽管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继续存在，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再用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来解释黑人的成就不足，已经说不过去了。这一点还可以得到旁证：今天，拉美裔美国人成就不足的问题比黑人更大。30%的拉美裔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之下，他们的中学生辍学率也在30%左右，比黑人中学生辍学率高一倍。拉美裔移民受到歧视，但其程度肯定低于黑人移民，大概也不会高于华人和日本人移民。而后两类移民如今在教育、收入和财富方面均已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里还顺便指出，在拉丁美洲，贫穷率更高——将近50%；中学生辍学率也更高——约70%。 [2]

文化范式：哈佛学会研讨会

如果说殖民主义和依附论两种因素不足以解释海外各地的贫穷和集权政治（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因素不足以解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位低下），如果说地理/气候因素的解释无法解释太多的例外（例如热带的新加坡、香港、巴巴多斯和哥斯达黎加；详见下文），那么，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争取繁荣和政治多元化的进步不能令人满意，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实际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从学识上看，他们继承了三位于前辈的学说，其中一位是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他断定，美国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文化适宜于民主；另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他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第三位是爱德华·班菲尔，他说明了意大利南部贫穷和专制的文化根源，这一见解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研究文化问题和重视文化的作用，曾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后来，这方面的兴趣降低了。然而在过去15年中，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

1998年夏季，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决定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主要考虑穷国的问题，但也注意到美国少数民族成就不足的问题。我们很幸运，得以吸收近年来为文化研究的复兴出过力的很大一部分学者，还有持对立观点的另一些学者，参加我们的工作。1999年4月23—25日，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3] 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行了“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界的杰出人士。

研讨会的分组和参加人员

研讨会按议题分为八个组。头两天当中，每天举行四个组的讨论，最后为半天的综述。

第一组由哈佛的豪尔赫·多明格斯主持，讨论政治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协调人——发言指出，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表现——及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弗朗西斯·福山论述了社会资本在促进民主体制方面的关键作用。西摩·马丁·利普塞特追溯了文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

有两个组讨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第一个组由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德穆思主持。戴维·兰德斯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的“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的结论。[4] 迈克尔·波特承认文化能影响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但强调说全球化包括着文化传播，其趋势会使文化均质化，使各国较易于克服文化和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杰弗里·萨克斯则争辩说，文化因素并不如地理和气候那样重要。

讨论同一题目的第二个组，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哈里特·巴比特主持，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讲述了他对有利于发展和阻碍发展的各种

文化的分类，其基础主要在于他研究过阿根廷有哪些抵制发展的因素阻碍了进步。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说明了同一拉丁美洲文化如何影响了精英群体的行为，而损害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论述了非洲的发展和竞争力所遇到的文化障碍。

头一天的第四个组由哈佛的霍华德·加德纳主持。发言人有三位人类学家：头一位是罗伯特·埃杰顿，他认为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有利于人民；另一位是理查德·施韦德，他自称是一位文化多元论者，主张容忍和尊重所有的文化；还有一位是托马斯·韦斯纳，他集中谈了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童年时期的传播。

第二天，哈佛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持了讨论亚洲危机的小组，参加者包括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和汉学家杜维明。珀金斯和派伊的发言内容有些相近，两人都强调指出，在东亚一些国家中，一向是传统的个人亲朋关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且政府领导人在私营经济部门起突出的作用，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杜维明则对比了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对待发展的态度。

另一组讨论性别与文化，由世界银行的菲利斯·波梅兰茨主持，首先发言的是《纽约时报》的芭芭拉·克罗西特，她谈了文化相对主义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之间的冲突。她的结论与理查德·施韦德的结论形成了尖锐的对比。玛拉·赫滕论述了拉丁美洲性别关系方面的变化，指出有一些文化上的障碍及其他障碍不利于这些变化的完成。鲁比·沃森谈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上的势力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状况。我们在这里顺便说一下，遗憾的是她不同意把她的发言编入本书。

前科罗拉多州长理查德·拉姆主持了讨论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小组。奥兰多·帕特森首先发言，强调文化与少数民族问题的联系，分析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婚姻制度的影响，指出哪些经历影响到现今黑人单身母亲家庭的高发生率。理查德·埃斯特拉达由于有病而临时取消了与会的计划。^[5]哈佛的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代替他发言，谈人口趋势。内森·格莱泽在发言中谈到了人们对民族群体各种不同表现的文化分析所激起的政治问题和情感问题。

最后一组由兰德公司的罗伯特·克利加德主持，讨论了现在为促进积极的价值观和态度而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我发言谈到研究不发达状态与文化二者关系的文献正日益增多，其中有许多作者是第三世界的，还叙述了拉丁美洲当地人为促进文化变革而主动采取的若干做法。斯特斯·林赛和迈克尔·费尔班克斯介绍了博德公司 [6] ——设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家咨询公司——为“改变国民心态”而作的努力。

每一组在发言人讲完后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到了最后的半天会议时，在是否应促进文化变革的问题上，正反两面意见作了激烈辩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以及与会者的不同见解，大家也没有期待意见一致，但是多数与会者都认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是人类进步中的一个重要的而过去却被忽视的因素。此外，即使是在怀疑者中间，也承认有必要更好地理解本绪论最后谈到的一些问题。

主要问题

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主要是围绕以下五个问题，这里我列举这些问题，而且谈谈自己的看法：

- 价值观与进步之间的联系
- 价值观的普遍性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 地理与文化
- 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 文化变革
- 文化变革

价值观与进步之间的联系

对于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之间的联系，持怀疑态度者主要是来

自两个方面：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言而喻的是，相应的经济政策只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不论文化如何。这里的问题是有些国家存在着多种文化，其中各民族群体都是按照同样的经济信号行动，可是有些民族群体却比另一些做得更好。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美国的华人，巴西和美国的日本裔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巴斯克人，^[7]以及移居各地的犹太人，都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是一个经济传统派——只是谈到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状况时才变了腔调。他首先断定人人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者，说共产主义崩溃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自由市场的企业制度”。他断定资本主义是“人的本性”。可是他谈到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时，又说这“根本不是本性，而是文化”。^[8]

格林斯潘此言等于是有力地赞同了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和结论，不用说还有至少从托克维尔以来一系列学者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及其与进步的联系问题的真知灼见。然而事实依然是多数经济学者不愿意跟文化打交道，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牵涉到定义问题，难以定量，而且作用于非常复杂的心理、体制、政治、地理等因素的背景之下。

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建议读者注意马里亚诺·格龙多纳为本书撰写的那一章。它对促进发展和阻碍发展的各种文化作了分类。虽然他的分类主要着眼于阿根廷和拉丁美洲，但我相信它也适用于更广的范围。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的一章也相当重要：它说明阻碍发展的文化如何影响精英群体的行为。

许多人类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另一些社会科学家——的首要问题，是近百年来主导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文化相对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拒绝评估另一社会的价值观和习俗。

内森·格莱泽的文章（第16章）很有水平然而是很勉强地谈了文化在解释美国各民族群体广泛成就方面的作用，其中的因素之一就在于

上述的传统。而与格莱泽在同一组发言的奥兰多·帕特森则提出了要正视文化的极具说服力的理由，认为在解释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时，核心的因素就是文化（见第15章）。

有些人讨厌对别人的文化说三道四，在他们看来，本书的书名就可能成问题。许多人认为，文化按其定义来说就是和谐的和有适应性的，而冲突和苦难则是外力侵犯的结果。然而，有些人类学家对文化持有很不同的看法，其中突出的一位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参加者罗伯特·埃杰顿，他有一段话尤其与这次研讨会的主旨密切相关：

不同社会里的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够有同情心，慈善心，甚至是爱心。他们有时还能以惊人的毅力驾驭他们所处的环境所提出的挑战。可是他们在处理自己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别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所保持的一些信念、价值观和社会体制，也可能是源自于毫无意义的残酷、无谓的虐待以及十足的愚蠢。 [9]

价值观的普遍性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进步”的概念在那些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看来是可疑的，因为他们认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和伦理，不能以另一种文化的目标和伦理为尺度加以评价。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西方企图把进步的概念强加于别人的文化。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和文化多元论者甚至会争辩说，西方人无权批评别人的毁伤妇女生殖器、殉夫自焚（印度教徒的一种习惯：丈夫死后，遗孀不论是否愿意，均须与其夫尸体俱焚）直至奴隶制等制度。

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播革命以后，西方所理解的进步已几乎成为普遍的愿望。进步的概念——生活得长寿一些，健康一些，负担轻一点，更满足一点——并非局限于西方，而且也清楚表现在儒家学说以及一些非西方、非儒学的高成就的少数民族（如印度的锡克教徒）的信念之中。我并不是说进步就是富裕的消费社会，然而脱离贫困显然是一个普遍的目标，而这就必然意味着提高消费水平。普遍愿望的模式还要更广泛，它表现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些

条文之中：

人人享有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人们应享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得到无任何歧视的同等保护……人人有权直接地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自己国家的治理……人人有权得到相当的生活水平，以保证其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祉，包括食、衣、住房和医疗照顾及必需的社会服务……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1947年，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不赞成这一宣言，认为它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文件。他们的主张姑且不论，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

活比死好。

健康比疾病好。

自由比受奴役好。

富裕比贫穷好。

教育比无知好。

正义比非正义好。

理查德·施韦德同意美国人数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他认为我们这次研讨会（假如允许我引用他写的那一章标题中的说法）是“新福音传道者”提倡的一场“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

可是参加研讨会的学者当中，有三位是来自第三世界，他们是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和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他们分别指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专制和非正义的根源在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这就与施韦德的观点直接针锋相对。施韦德在他写的那一章的尾注中反驳了这三位，说他们代表不了自己的社会，而是“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旅行计划如今比祖宗更重

要”，“眼睛向上瞅着美国乞求学识和道义指导及物质援助”。

埃通加—曼格尔、格龙多纳和蒙塔内尔三人对施韦德的这一尾注作了答复，附于施韦德那一章尾注之后。然后，施韦德又作了评论。这场交锋使人纳闷，有些人类学家是不是在从事一种人类学的帝国主义，要把文化封在永久冻土层里面？施韦德也许认识到这一危险，他说：“我认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是那种经得住外来批评的生活方式”。（来自内部的批评大概该是更有说服力的。）既然说有“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那么大概也有不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这也许表明施韦德事实上同意罗伯特·埃杰顿的观点。

如此说来，理查德·施韦德也许并不是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什么“奋兴布道会上的异教徒”。

地理与文化

杰弗里·萨克斯在他的那一章中强调，解释经济增长快慢的决定因素是地理位置和气候。在他的观点的影响下，贾雷德·戴蒙德最近写出了一本书《枪炮、细菌和钢铁》，其结论是“各大洲各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别，不是由于这些民族内在的不同，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10]

显然，地理位置（包括天然资源）和气候是解释国家穷富的重要因素。几乎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是在温带，而穷国大多是在热带。可是例外的情形也值得注意：俄罗斯就跟高度繁荣和民主的北欧国家及加拿大位于相同的纬度上。（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按照透明度国际的统计，北欧国家和加拿大属于腐败最轻的前十国之列，俄罗斯则列入腐败最严重的十国之列。这也让我们想起格林斯潘的评论。）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半个台湾地区都在热带。它们的成就堪与日本媲美，说明儒学文化的作用胜过地理条件。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境内的华人少数民族，还有热带秘鲁、巴西境内的日本裔少数民族，亦是如此。

地理条件不足以解释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为什么相差那么明显。与此相似的，还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四国与哥斯达黎加的对比。另一个例子是海地与巴巴多斯的对比：海地曾是最富的奴隶甘蔗园殖民地，如今却陷入绝望境地，而巴巴多斯亦曾为奴隶甘蔗园殖民地，如今则是民主繁荣。我们还可以指出，拉丁美洲的三个温带国家——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至今仍未享受到第一世界的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们还都经历过军事独裁统治。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了文化的潜力：

文化的因素和影响……显得不小……世界各地文化特征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各地有一些文化因素与环境无关，它们可能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小的文化因素可能起源于当地的小事、暂时性的事情，然后固定下来，预定了一个社会走向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它们的意义如何是一个有待于回答的重要问题。 [11]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应重申的是：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气候，政治以及历史的变幻无常等。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说：“文化是制度之母。”从长远看，这当然正确。就短期而言，制度上的变更——往往是由政治促成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恰如莫伊尼汉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在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方面实行权力下放，就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这样的作用。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曾记载过这一情形。 [12] 虽然帕特南的中心结论是说意大利南北迥异的根源在于文化，但他也指出，那一次的权力下放在南方促成了一定程度的信任、缓和及妥协，而当地原先那种近乎病态的文化现象，在爱德华·班菲尔德的《一个落后社会的精神基础》一书中有过深刻的描述。

道格拉斯·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反复谈到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他的主题是制度而不是文化，但是他对二者关系的提法使人感到，他也许是同意埃通加—曼格尔的意见。他谈到制度的演变受到一些“非正式的限制”，它们来自“社会传播的信息，而这种信息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一部分……表现为以语言为基础的记载和解释传感器官传递给大脑的那些信息的一种概念架构”。^[13] 诺思随后谈到了美洲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不同演变：

在前英国殖民地，形成了一种制度架构，它允许人们之间的交往不以个人关系为转移，这种复杂的交往是政治稳定所必需的，而且能抓住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前西班牙殖民地，个人关系仍是许多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的关键。这种关系源自一种不断演变的制度架构，这架构既产生不了政治稳定，也不允许始终如一地实现现代技术的潜力。^[14]

豪尔赫·多明格斯在主持了关于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小组讨论后，曾对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提出疑问，因为他指出拉丁美洲各国，除了古巴以外，都在过去15年内成了民主国家。可是今天拉美各国民主实验的脆弱性表明，诺思的见解仍是有道理的。在哥伦比亚，民主政府面临着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左翼革命势力的严重威胁。在与之相邻的厄瓜多尔，民主制度存在着被经济混乱推翻的危险。秘鲁的总统往往表现得像是一个独裁者。阿根廷的总统梅内姆不顾该国的宪法，一再暗示他有意于三连任。而委内瑞拉不久前当选的总统，曾是两次企图搞政变的军官，观察家们不禁怀疑他是否尊重民主规范。

1999年12月，我曾访问危地马拉，就文化与民主的关系作了演讲。随后，危地马拉社会学家贝尔纳多·阿雷瓦洛讲了一句贴切的话：“我们有民主的硬件，而软件却是集权主义。”^[15]

早先我曾经在诺思意见的激发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尤其是鉴于拉丁美洲是西方的旁系，更要问一个为什么——拉丁美洲要经过150多年之久才回头实行民主？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许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至少直到几十年前是如此。

文化的变革

所有在研讨会发言的人及其他与会者都一致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会变化的，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变化缓慢。（态度会变得快一些，西班牙人从集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态度转变即是一例。）研讨会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后一天综述会议上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在多大程度上把文化变革的因素结合进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构想、策划、安排和规划之中。研讨会表明，当文化变革的倡议是来自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议。

人类学家在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之类的发展机构中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中，他们所作的努力都是力争让有关的决策者了解，什么样的文化现实应反映在政策与规划的设计和执行之中。几乎不曾有人费心去设法倡导文化的改变。实际上，倡导改变文化的整个概念成了一个禁忌。

当谈到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美国一些民族群体成就不足的问题时，也存在着类似的禁忌。讨论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小组主持人理查德·拉姆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辩论。他问道：“在科罗拉多州和西部多数其他的州，拉美裔中学生几乎有半数辍学。科罗拉多州可以或者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文化上的因素？”

倘若理查德·埃斯特拉达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几乎肯定也会表达出同样的关切。他在世时，是美国移民改革委员会的成员。由芭芭拉·乔丹担任主席的这一委员会曾建议大幅度减少移民入境。埃斯特拉达特别担心从拉丁美洲来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有碍于各民族的融合。

内森·格莱泽指出，要避免正面提出文化因素的理由之一在于，倘若那样提，就会意味着认为某些文化优越于别的文化，至少是说它们更有利于促进人类福祉，这就会触及高度敏感的民族、种族和个人自尊心的神经。格莱泽认为，至少在美国，追求文化上的解释会有风险，弊大于利，这特别是因为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社会倾向于淡化各族人民起始的差别。然而，理查德·拉姆提出的问题一定会令他深思。

拉姆和格莱泽的辩论突出表明一个问题，即研讨会应引导向何方——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如果说某些文化价值观确实是妨碍进步的根本障碍——如果说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第三世界许多地方的贫穷和非正义难以解决——那么，除了倡导文化上的变革以外，就别无他途。并不需要、的确也不应该把这一点看做是西方要强加于人。并不是只有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马利亚诺·格龙多纳和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这三个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得出结论说文化重要。至少在拉丁美洲已有各界的许多人士得出结论说文化上的变革必不可少，而且正在采取步骤，在学校，在教堂，在工作场所以及在政界，倡导这样的变革。他们要更好地理解，在他们的文化中，有哪些东西阻碍他们实现让生活变得更公正、更繁荣、更富足和更有尊严的愿望——同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来促进其改变。

奥兰多·帕特森在《整合的磨难》一书中写道：“当我们力求理解为什么存在着技能差距、能力差距和工资差距，以及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美国人陷入病态心理的社会深渊时，一定可以从文化中找到答案。”^[16]在那本书中以及在它的续篇《血的仪式：美国两百年中的奴隶制后果》一书中，他都指出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制的经历：

在这个国家中，非洲裔美国人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奴隶制中度过……这种恶毒的剥削制度严重阻碍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它损害了家庭和婚姻关系等这样一些根本的社会制度，它将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之外，同时在这一过程之中，使他们得不到机会去学习为了在新出现的工业社会中求生存而非掌握不可的行为模式。^[17]

因此，当美国试图解决黑人和拉美裔人成就不足的问题时，还能忽视文化因素么？

在最后一天综述会议上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存在着普遍的文化因素，即在任何地理、政治或人种背景下都起作用或都不起作用的价值观。有些与会者反对用“黑匣子”或“细目清单”的一

律方式对待文化变化，而主张一种可以称作“人种志”的方式，即就事论事，区别对待每一种文化，而对别处的情形只作有限的参考。但我认为，有些价值观范式是跨越地理界限的，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下都会产生相似的后果。例如，职业道德、教育、业绩、勤俭等价值观，在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亚都是共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像罗伯特·克利加德所说的那样，拥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我们就必须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更加深刻得多的了解。

将价值观和态度的变革纳入发展之中：一项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规划

人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进步幅度是令人失望的，而且，除了东亚、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裔美国人以外，进步之小甚至是令人心寒的。一个重大原因，依我看来，就在于各国政府和发展机构未能考虑到文化可以阻滞或促进进步的力量。举例而言，马歇尔计划成功而争取进步同盟却遭到了失败，我想，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欧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反差。

从政治和情感两方面来看，文化问题处理起来都是困难的。它在学术上也难以处理，因为涉及定义和衡量上的问题，而且文化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其他变量可以是互为因果的。

我们这次研讨会达成了一点重要的共识：应当制订一项综合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规划，以便做到将价值观和态度的变革纳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以及纳入美国的反贫困计划。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应是争取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指导方针，包括切实可行的举措，以便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项研究的日程包括以下六个基本部分：

一、价值观和态度的分类：目的是（1）确认哪些价值观和态度

能促进社会进步，并评估其轻重缓急，同时确认哪些价值观和态度会阻碍社会进步；（2）列出对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演变起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价值观和态度，划分其等级。

二、文化与发展关系：目的是（1）在面临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情况下，有哪些因素能促进发展，对这一问题取得在实际操作上有用的认识；（2）查明当这些因素起作用而出现了发展时，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将受到什么影响；（3）探讨一个问题：如果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并无重大改变，民主制度能否巩固，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能否持续下去。

三、价值观和态度与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目的是（1）评估政策和制度是在多大程度上如同托克维尔和埃通加—曼格尔所说的那样，反映出价值观和态度；（2）更好地理解，当价值观和态度与政策和制度不相适应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3）判明政策和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价值观和态度起变化。

四、文化的传播：目的是理解价值观和态度在传播方面的一些主要因素，例如育婴方式、学校、教会、媒体、同侪交往、工作场所以及移民向自己原籍国家的“社会反馈”等，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知道（1）在这些因素中，普遍而言以及就世界不同地理和文化环境而言，哪些因素现今作用最大；（2）每一因素能如何有助于形成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3）在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方面，政府能起什么作用。

五、价值观和态度的衡量：目的是结合上述第一项任务的成果，扩大在国际上衡量价值观和态度变化幅度的体系。这将包括（1）确认现有的衡量价值观和态度的工具（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2）使这些工具适用于支持价值观和态度变革的举措。

六、评估已在实行之中的促进文化变革的举措：至少在拉丁美洲，已有一些由当地学者发起的促进文化变革的举措，例如秘鲁的“人力发展研究所”已在几个拉美国家的教育系统中倡导“发展十诫”。另一些举措，例如财产所有权凭证计划，也可能在促进文化变

革方面收到重要的效果，尽管这不是它们目标之所在。这些举措应加以评估，将它们的成果转化为政府和发展机构可以遵循的指导方针。

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社会进步，也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我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民族群体过去50年来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第一章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戴维·兰德斯

本章系摘自戴维·兰德斯著《国富国穷》一书（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1998）。

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是对的：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兴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等等。可是，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因此而令学者们害怕。它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在沉思的时刻，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承认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欢迎文化向好的方向变化，叹息它向坏的一面变化。但是欢迎也好，叹息也好，都表明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去左右人及事物。做技术工作的人则宁愿实干，改变利率和汇率，放开贸易限制，修改政治体制，实施管理。此外，对文化提批评是会得罪人的，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外界的人提批评意见，不论多么策略和间接，也都会带有教训别人的味道。善心的改良派学会了绕道而行。

可是，如果说文化起这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经济学家，还有另一些人，提出过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譬如说华人——在海外办企业那么出色，在自己国内却长期效率低下？如果说文化起作用，为什么它没有使中国变化？（我们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有了鼓励而不是压抑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消失，中国现在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推动儒学文化的这条“龙”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18]

对于上面提到的——如今大概已经过时的——这一反常现象，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也是一位主张政治经济学疗法的大师）所作出的回答是根本否认文化与经济发展有联系。他说，文化并不能让他预测经济结果。我不同意。如果考虑到文化，本应能够预见到日本和德国的战后经济成就。韩国与土耳其相比，印度尼西亚与尼日利亚相比，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经济分析喜欢维持一种假象，似乎一条好的理由就足够了，可是复杂过程的决定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彼此相联系。单条理由是说不通的。同样的价值观可能在国内因政策不好而受阻，却在别处得到机会而施展，上面谈到的华人即是一例。所以，移居国外的人往往办企业特别成功。古希腊人把外来人称作metics，说他们在鄙视金钱和手工艺的社会里是急功近利的酵母（因而出现在了一个希腊语词根的贬义词banausic——实利主义的）。于是，外来人经商赚了钱。

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在泰国，所有正经的年轻男子从前都要用几年时间出家当和尚，修身养性。这有益于精神和灵魂，也适应于当时经济活动和办事的慢吞吞的节奏。现今不一样了，泰国生活节奏加快，商贸兴旺，企业要人。年轻人修身养性缩短成几个星期，刚够学会一些念经礼仪，就返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人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的相对价值变了。这一变化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除非来一场革命。而泰国人自觉自愿调整了他们的轻重缓急。（这里要顺便指出，是泰国的华人少数民族带了头。）

泰国的这个故事表明，文化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反应。反过来也有可能——文化可能会阻滞经济发展。以俄国为例，那里的人们受了75年的反市场、反利润的教育，只有权贵能享受特权，于是人们形成了反企业的态度。甚至在那一政权垮台以后，人们还是担心市场变幻无常，怀念以往受雇于国家时那种保险的单调日子。或者说，他们是怀念贫穷中的平等，这一心态是世界各地的农民文化所共有的。俄国人有个笑话说，农民伊凡妒忌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头山羊。一

位仙女降临，向伊凡说可以帮他满足一个愿望。伊凡的愿望是什么呢？原来是赶快让鲍里斯的山羊死掉。

幸好，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这样想。马克思主义的清规戒律取消以后，企业活动蜂拥而起。高明的人搞知情人交易，有的人搞犯罪，有许多人是俄罗斯人之外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酵母有了，这往往就足够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经营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老的习惯依然存在，腐败和犯罪活动猖獗，文化战在激烈进行之中——选举受这些问题左右，这种局面的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依附论、阿根廷及卡多佐的转变

对于不发达状态的原因，用依附论来代替文化上的解释，是挺方便的。拉丁美洲的学者和同情拉美的旁观者一直把拉丁美洲发展上的失败——尤其是与北美相比更显出了这一失败——归咎于强国、富国的种种不端行径。处于依附地位而易受伤害，意味着处于一种劣势，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受制于别人。这些别人自然是利用他们的优势从依附经济国家榨取产品，做法跟先前的殖民统治者差不多。帝国的抽水泵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抽水泵。

然而，要同化独立的主权国家，光搞掠夺是不行的，还需要贷款和投资。阿根廷即是一例，它自己没有存下什么钱，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资本。（依附论的首要设计师劳尔·普雷维什就是一位阿根廷经济学家。）有些经济学家争论说，外国资本有损于经济增长；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说它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如国内投资有效。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使用这些钱。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人打算因为效率问题而拒绝外国人的钱。政客们想要这些钱，让那些依附论理论家干着急。

阿根廷有些人很有钱，然而“由于始终不明白的缘故……这些人一向依赖外资，因而听命于贷款国，严重损害本国治理自己事务的能力”。^[19] 英国人在阿根廷修建铁路——1871年还不到1000公里，20

来年后超过了12000公里——但那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可是，建起这样一个铁路网怎么没有促进国内市场繁荣呢？说是没有促进，那么，过错何在？本国的企业家精神哪里去了呢？多数阿根廷人并不自问这类问题。责怪别人总是容易的。结果是出现了仇外的反帝国主义和自灭志气的委屈情绪。

在19世纪，一位杰出的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曾经为自己同胞的企业家精神不足而担忧。他在1850年写了以下一段话，韦伯在50年之后也深有同感：

要尊重每一种信仰。西班牙属下的美洲却是独尊天主教而排斥任何别的宗教，像是一座孤单冷寂的女修道院……在南美洲排斥不同的信仰，也就是排斥英吉利人、德意志人、瑞士人和北美人，即南美洲最需要的人。让他们来而不许他们带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不许带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自己的原动力。 [20]

有的人把阿根廷的低储蓄率归因于人口的高增长率和高移民率——我还要补充一点：爱摆阔气的不良消费习惯。不管怎样，外资的流入量既取决于国外资金来源，也取决于阿根廷所能提供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需要钱，不得不清理他们在国外的资产。他们尽管仍是阿根廷的最大债权人，但不再像此前几十年那样发挥促进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作用。美国多少填补了一点空白，但又是美国的政治和商业周期起决定性影响。结果，阿根廷在外国投资额和贷款额两方面都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陷于困境。这些情况激化了阿根廷与债权人的冲突，反过来又导致反应性的孤立主义，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只会加重资金短缺和依附性。阿根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谴责这些确实存在的和想当然的问题和恶劣行径，只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人们合乎逻辑地把依附论者称作“茧派经济学家”，他们确实帮助了阿根廷和别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免遭大萧条的最糟影响。这正是“茧”的作用。但这也使它们被割断了与竞争、刺激和增长机会的联系。

依附论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且传播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随那些新解放的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意识而引起共鸣。冷嘲热讽的人也许可以把依附论说成是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出口产品。然而它对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和士气起消极作用。它养成光埋怨别人而无自责的不健康习性，加剧经济上的无能。即使它是有理的，也最好是把它收起来。

今天看来，拉丁美洲正是这样做的。西半球所有的国家，包括古巴在内，现今都欢迎外国投资。在这一转变中，阿根廷是一个带头人。依附论所建议的国家主权主义已瓦解于一片私有化浪潮之中。墨西哥曾经是一些最坚定的依附论者的据点，现在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民共识，其象征是参加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上与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相连，认为这最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羔羊跳进了狮子的嘴中，看来已从这样的遭遇中得益。

多年内，依附论学派的一位领头人物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卡多佐作为社会学家，曾就这一课题写作和主编了二十多本书，其中有一些成为造就一代学者的标准读本。最有名的一本也许就是《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在该书的英文版本中，结束语是一句冗长的、并不那样带鼓动性的格言：

实际的战斗……是展开于技术官僚治国论与大众工业社会形成过程的理想之间，这一理想能提供具有特定民族性的得人心的内容，能成功地将人们对于较发达的经济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需求转化为这样一种状态：它能表达真正民众力量的活力，能寻求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 [21]

1993年，卡多佐出任巴西财政部长。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翻滚于高达7000%的年通货膨胀率之中。当时，政府对通货膨胀这一货币麻醉剂已经习以为常，老百姓也纷纷采取别出心裁的对策（例如出租汽车的计费器可以按照物价指数自作调整，也许还可以因人而异）。所以，连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宁愿对这种动荡局面加以轻描淡写，居然说通货膨胀的肯定性就是稳定性的一种形式。

对于能采取预防措施的巴西人来说，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可是

通货膨胀有害于巴西的国际信用，而巴西是需要借债的。它还需要跟别的国家做生意，尤其是要跟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资本主义富国打交道。因此，卡多佐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以至于观察家们称赞他是一位务实派。反殖民主义激情消失了；也不再敌视巴西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其中包含的依附意味。卡多佐说，巴西没有别的选择。假如巴西不愿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那就“无法竞争……这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22]

善有善报。两年之后，卡多佐当选为巴西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使巴西多年来头一次有了自己坚挺的货币。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依附论相对立的事例

伯纳德·刘易斯说过：“当人们认识到出了错误时，他们可能提出两种问题。一种是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另一种是问‘这是什么人搞的？’后者使他们琢磨是谁在搞阴谋，导致偏执狂。前者则会引出另一种思索：‘我们怎样来纠正？’”^[23] 在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选择了阴谋论和偏执狂。在19世纪后半期，日本却是自问“我们怎样来纠正？”

日本在1867—1868年间发生了一场革命。封建的幕府统治被推翻——实际上是崩溃——政权回到了居住在日本的天皇手中。这样就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65年的统治。但是日本人不将这一巨变称作革命，而宁愿称它为维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回归到国家正常状态。此外，革命是中国的事。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朝代，而日本始终只有一个皇族。

国家统一的象征是现成的；民族自豪感的理想明确。这省却了不少动荡。革命就像内战一样，会打乱国家的秩序和安定。明治维新期间也出现过不满和不同政见，往往还表现为暴力。旧体制的最后几年和新体制的最初几年沾染过暗杀、农民暴动和反动势力叛乱的血迹。尽管如此，日本的过渡仍比法国和俄国的政治变革顺利得多。其原因有二：新政权在道义上站得很稳；反对维新的人虽然感到失落和权益

受侵犯，也还是有所顾忌，怕给外敌入侵提供由头和机会。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国内分裂就会招致他们的干涉。不妨参看一下帝国主义在别的地方的行径：印度正是因为国内互相争斗和彼此玩弄阴谋诡计，才真正将欧洲势力招引了进去；同样，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就陷入了屈辱境地。

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受外人的，一些西方人留驻日本，引来了不少麻烦。日本有一些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衅，袭击他们，想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谁是主人呢？面对西方列强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辞，敷衍了事。这样，不论在外国人面前还是在日本爱国者的心目中，都丢了脸。

欧美列强一而再地耀武扬威，激起了日本民愤。日本人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日本最南端和最西部两个藩 [24] 的藩主，他们曾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反对幕府。他们胜利了；他们也失败了。这就是这场维新运动的又一自相矛盾之处。这些藩主以为他们是在复古，结果却是被拖进了明天，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因为这是通向打败蛮夷的唯一道路。你们西方人有枪炮，好吧，有一天我们也会有的。

日本人以他们特有的毅力和体制着手现代化。他们作好了准备——治理有效的传统，百姓的高识字率，紧密的家庭结构，职业道德和自律精神，民族认同感和固有的民族优越感。

这是核心之所在：日本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能够认识到别人的优越性。他们一方面沿用德川幕府时期的做法聘用西方专家和技术人员，同时又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出国，让他们带回在欧美时的所见所闻。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使他们得以对比各家的长短优劣，择其精粹。例如，他们最初学习的军事榜样是法国军队，但是法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被普鲁士打败以后，日本人就相信从德国军队那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在法规的制订和实施方面，他们学习的对象也是由法国转到德国。

日本没有放过任何学习机会。1871年10月，日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其中包括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到美国和欧洲，参观工厂和炼铁厂，造船厂和兵工厂，铁路和运河。差不多两年以后，他们于1873年9月回国，满载着学到的知识和要求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25]

日本这些领导人的亲身经历把一切都改变了。在英国的时候，大久保坐在火车上陷于痛苦的沉思，他说在离开日本之前，他本以为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到了：天皇收回了帝国权力，封建割据已由中央政府所代替。现在他才明白还有艰巨的任务在前头。日本跟“世界上更先进的强国”无法相比。尤其是英国给他上了自强的一课。它曾经与日本一样是个小岛国，但是它系统地实施了自强的政策。在英国商船队逐渐壮大而称霸全球方面，航海法起了关键的作用。英国曾坚持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转而主张自由贸易。（分析得不坏。亚当·斯密若地下有知，也不会不同意的。）

诚然，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贸的自主权。但是德国的榜样更有意义。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可是瞧它走得有多远！大久保遇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勤劳、节俭、“朴实”，就像日本的平民。他还发现德国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回日本后，就把德国的经验当做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

日本政府从一些日常的任务着手：建立邮政，实行新历法和新时制，普及义务教育（先是男生，随后也包括女生），实施义务兵役制。普及教育就普及了知识，这正是教育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它也灌输了纪律、服从、守时和忠君观念。要超越幕府时代养成的各地自奉其主的狭隘地方观念，而形成全体国民统一的民族特征，上述的做法是必不可少的。陆海军的建设则完成了这一使命。在统一的着装和纪律熏陶之下，普遍兵役制消除了阶级和地方的区别。它增强了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使男子暴烈阳刚之气大众化，而结束了武士对武器的

垄断。

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着手“殖产兴业”：怎样用机器制造产品，怎样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造出更多的产品，怎样运输货物，怎样与外国厂商竞争。不容易啊。欧洲工业国家已经发展了上百年。日本要急起直追。

首先，日本着力于已经熟悉的产业——尤其是丝、棉纺织业，还有不会被外国模仿的食品加工业，例如日本清酒、日本豆面酱和酱油。从1877年到1900年——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代——工业产值的增长额中，食品业占40%，纺织业占35%。总之，日本人努力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重工业。工厂大多是小规模的，例如棉纺厂只有2000纱锭，而西欧的厂一般在10000锭以上。他们使用木制水车，比欧洲技术落后好几代。日本煤矿的井巷崎岖蜿蜒，使用人工铲斗，相比之下，英国早年那些恶名远扬的老矿井竟然像是海滨宽敞大道。

人们常说后来者有优势，可采用最新技术，而日本后来者一开始的做法却显得反常。对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通常的解释是资金匮乏：私人财力单薄，又没有投资银行。其实，日本当时有些商人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政府也愿意建设工厂并提供补贴。它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者要追上先行者，这一长途跋涉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人才——这些人才要富有想象力和首创精神，要懂得规模经济，要不仅知道生产方法和机器，而且还通晓生产的组织以及我们现今所说的软件知识。有了这些，资本就会跟上来，成长壮大。

日本人还决心由消费品生产再往前进。要建立自己的现代经济，就不能不做好费力的工作：制造机械设备，造船和造机车，修建铁路、港口和船坞。政府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资助出国考察人员，聘请外国专家，建设厂房设施，补贴商业企业。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爱国志士的才干和决心。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不惜改行而放弃原有的前程。还有日本工人的素质，尤其是那些工匠们早就在手工作坊中经受了紧密协作和严格监督的磨练，练出了一身技能和敬业精神。

日本尽管搞工业经验不多，却轻快地进入了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日本成功和迅速的工业化，一般评价都很高，使这一评价有所降低的因素，只是人们不喜欢日本伴随着工业化而迸发出来的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那种无情的追求使得人们对于发展进程有了认识和紧迫感。日本是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它至今仍为后进国家起榜样作用。别的国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但不见他们返回；日本的学成人员却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引进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当教师，日本人却大体上是自己教自己。别的国家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就尽量使用，日本人却是用心仿造，加以改进，造出自己更好的机器。有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喜欢日本人（又有多少拉丁美洲人喜欢来自英语国家的“外国佬”？），但是他们还是羡慕和敬佩日本人的成就。

日本人成功，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负责的精神。一个工人若好逸恶劳、吊儿郎当，就不仅会损害自己，而且还伤害全家人的声誉。还有国家——不要忘了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人很少会有国家意识，因此多数日本工人和农民在维新后初期还想不到国家。这成了新帝国的首要任务：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将它贯彻到工作中去。学校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仪的国家里，学校成了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1930年的一本教科书中写道：“体现爱国主义的最便捷途径，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律己，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26] 还要节俭，反对浪费。

这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日本版本。在政府倡导现代化和民众集体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才成为可能。要认真理解日本的成就，就必须看到这种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

关于韦伯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最初是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了一位精通多门社会科学的奇才。1904—1905年，他发

表了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议最多的论著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主题是：新教教义——更具体说是加尔文教派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即他从自己的祖国德国所了解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盛。他说，新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减轻或废除罗马天主教那些阻碍或抑制自由经济活动的条规（例如禁止高利贷），也不是由于它鼓励人们追求财富（更不是它发明这种追求），而是在于它确定和支持了日常行为的伦理而促进了经济上的成功。

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派教义做到这一点，最初是因为它确认了得救预定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为而得救；能否得救是从每个人出世之初就预定了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样一种信念很容易鼓励宿命论的态度。既然行为和信仰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不纵欲寻欢呢？又何苦还要为善？这是因为按照加尔文派教义，善是上帝可能选择的迹象。人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出他们心灵的品质和命运的性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的思想 and 行为。死硬的预定得救论的信念只持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教条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终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

所有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商业和资本积累。但韦伯强调，好的加尔文派教徒不以财富为目的。（但他也许不难相信，诚实致富是上帝恩宠的一个标志。）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就早有希望致富的人。韦伯的见解是，新教教义造就了新型实业家，他们致力于按一定方式生活和工作。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财富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副产品而已。很久以后，新教伦理才蜕化为一套物质成就的格言以及关于财富价值的自鸣得意、虚情假意的说教。

韦伯的论点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驳。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由韦伯论点衍生出来的论点，即认为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韦伯的论点站不住脚，不可接受：它时兴过一时，但已

成为过去。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从经验的层面上看，不能同意，因为记录表明，新教生意人和制造商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方面都起过领先者的作用。从理论层面上看，也不能同意。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造就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品德在以前不是没有过，但恐怕并不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

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反映出并证实着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调教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读《圣经》的副产品。好的新教徒应能自己读《圣经》。（相形之下，天主教徒当时以教理问答的方式传教，但不一定要自己读经，教会明显地不鼓励人们自己去读。）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高，一代又一代有文化。母亲有文化是重要的。

其二是时间观念强。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社会学家所谓的“不引人注目的证据”：钟表的制造和购置。即使是在法国和巴伐利亚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部分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而在英国和荷兰，钟表的使用及其向农村的普及在当时也比天主教国家先行了一大步。没有什么能比时间观念更加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还意味着价值观和品位的传播。

这并不是说，韦伯所谈的资本家“理想类型”只能存在于加尔文教派以及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各种宗教信仰和不信教的人都可以成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也不一定是商人。在各行各业，人们都可能展现出这些品质并从中获益。在我看来，韦伯的论点在于，在16—18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原先曾是少有的、冒风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历史告诉我们，最成功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本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是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并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正如非洲人一句谚语所说，“接人东西

的手总是在给人东西的手的下方。”这不行。还得靠自己工作，节俭，诚实，耐心，顽强。贫困潦倒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要求做不到，而自暴自弃。但是，归根结底，真正有效的办法只能是自强。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和学校里听父母和老师讲过的那一番道理。现今人们不爱听这些话，认为这是陈词滥调。可是，明智之言怎么会过时呢？诚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蜜饯时代。我们希望件件东西都是甜的。我们之中，太多的人是工作为了生活，生活则要幸福。这倒是没错，只是不会催人提高效率。你想要高效率吗？那就应该是生活为了工作，而幸福则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不容易。生活为了工作的人是少数，但却是幸运的精华。凡是自己下决心、积极肯干的人，都可以加入到这精华的行列之中。在这世界上，能办成事的人是乐观者，这不是因为他们一贯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积极肯干。甚至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仍坚持实干，从而纠正错误，不断改进，直至成功。明达事理，视野开阔的乐观主义者会有成就；悲观主义只能说自己不犯错误而提供空洞无物的安慰。

第二章 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

迈克尔·波特

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有时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它们在人类行为和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作用。我在一些处于很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州邦、地区、城市和公司工作过，对此有所体会。问题不在于文化是否起作用，而在于如何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作用。已经有大量的文献从各种视角探讨文化与人类进步的联系。我在本章中所探讨的，则是这一广袤领域的一个局部，即可以称之为“经济文化”的那些因素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文化在经济进步中起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怎样做到在兼顾其他有影响的因素的情况下，来诠释文化的作用，而且把文化的影响单独提出来，却相当不容易。人们在谈论文化在经济繁荣中的作用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被认为是可取的一般性文化属性，例如勤奋，主动性，重视教育，以及来自宏观经济学的因素，例如储蓄和投资的习惯。它们当然与繁荣有关联，但是这些一般性的属性当中，没有哪一项是明确无误地与经济进步相关。工作勤奋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勤奋工作所遵循的指针和方向。主动性是重要的，可是并非所有的主动性都是有成效的。教育是关键性的，但同样关键性的是看追求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将教育用于什么样的目的。储蓄固然好，但要看储蓄的钱是否得到有经济效益的配置。

实际上，同样的文化属性，在不同的社会中，甚至是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中，对于经济进步而言，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以节俭为例，它在日本起了好作用，然而是在到近年的持续衰退为止；如今它却构成了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只要调查一下经济成功的一大批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意大利、香港、新加坡、智利、哥斯达黎加等的实例，就会看出，它们各自的有助于改善经济状况的文化因素有许多差别，错综而微妙，这进一步证明文化与繁荣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关系。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经济文化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复杂联系。这里主要是以国家或者邦、州为地理单位来看繁荣的水平。我一般是谈各个国家的情形，然而，相关的经济单位往往也可能是更小一些。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各个邦、州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其原因有时也可能归结到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在思考一些跨地理单位的群体——例如各地的华人——的经济繁荣程度时，也可能应用许多同样的因素。

下面，我将首先概略谈谈人们近年来对当今全球经济中繁荣源泉的认识。接着，我将就这些源泉与有助于繁荣的各类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二者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无助于生产率的文化为什么会存在，并持续存

在？我将从近百年来流行的经济思想和状况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最后，我将谈谈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差异的存在有多大的余地，以及在市场全球化引起的经济趋同的情况下，文化的影响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繁荣的源泉：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

一国的繁荣，或生活的水平，取决于它利用其人力资源、资本及自然资源所实现的生产率。生产率决定着可持续的工资及资本赢利率的水平，而后二者决定着一国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因此，生产率是“竞争力”的基础。它取决于一国的企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价值，例如来自品质和独特性以及生产率的价值。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迅速而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创造条件。

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生产率所依赖的，主要不是一国企业在哪些产业从事竞争，而是它们如何竞争，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它们的战略如何。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几乎任何一个产业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运用更成熟的战略，投资于现代技术，而提高其生产率。在各行各业，例如在农业、小包裹递送或半导体生产这样一些极不相同的领域，现代技术都为升级换代提供着重大的机会。同样，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采用更先进的战略的余地，其中包括区分不同的顾客对象，产品和服务作适当的差异化，按照顾客的特定需求安排有效的产品递送链。

因此，政府挑选有制胜能力的产业而给予优惠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在新的“生产率范式”中，谈不上哪个产业好哪个产业不好，而是要看企业能否采取最好的方法，集合最优秀的人才，利用最好的技术，来尽可能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一国经济是不是农业经济，或服务业经济，或制造业经济，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有能力围绕着生产率决定国民生活水平这一前提，把自己组织得有效率。

在生产率范式中，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传统区别亦将失去其意义。一国经济是否繁荣，是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该国所作所为

的反映。本国企业若采用落后的办法生产低质产品，就会拖该国生产率的后腿，而外资企业若带进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就会促进该国生产率和职工工资的提高。地方产业和外贸产业二者之间的传统区分，以及只关注后一类产业的倾向，也是成问题的。地方产业关系到公民的生活费用以及外贸产业的交易成本。像日本的情况那样，忽视地方产业，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

作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的生产率范式，对于以往的财富源泉的理念而言，是一大转变。100年前，甚至是50年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一国繁荣与否，来源于该国是否拥有土地、矿产等方面的自然资源以及充足的劳动力后备，从而比那些资源较少的国家占有比较优势。然而，在现代全球经济中，企业可以廉价地和有效地从任何地方获取资源，这就使资源本身的价值不那么高了。资源的实际价值在下降，过去百年来一些基本商品的实际价格逐渐降低，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廉价劳动力无处不有，劳动力的拥有也不再自然而然地构成一项优势。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费用迅速下降，靠近市场或贸易线路的有利地理位置这一点的重要性现今也不如从前了。位于香港或智利的企业尽管距离欧美市场遥远，也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或者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

作为财富的基础，比较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表现为能以优越的生产率，调集资源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知识、投资、睿智和创新，一国的企业只要能开发出更成熟的竞争优势源泉，就可以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样的国家就能提高其生活水平。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在决定一家企业是否比别的企业有更高竞争力和生产率方面，本地的因素正变得日益重要和日益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贸易、资本和信息流动迅速，企业靠外地的投入而建立的优势会被抵消。如果说一国的企业是从德国买机器设备，它的竞争者也可以同样买。如果说企业是从国外吸取资本，它的竞争者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说企业是从澳大利亚进口原料，它的竞争者也能照样进口。这种种举措可能都是必要的，然而

它们实质上已构不成现今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剩下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则日益具有本地性，其中包括是否拥有特殊的供应商或顾客/客户关系，能否在本地顾客/客户和合伙人的启发下对市场需求获得独到的真知灼见，或者能否利用附近的供应商而取得生产上的灵活性。

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

一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许多外部源泉如今被经济全球化抵消了，因此，一个国家想要提高自己的经济的地位并为自己的公民创造经济繁荣，就不能不用心培植潜在的内部优势源泉。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宏观经济上、政治上和法制上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宏观经济条件固然是必要的，可是要确保经济繁荣，仅靠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实际上，人们较少斟酌微观经济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若不完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惩罚。

繁荣归根到底有赖于改善竞争的微观经济基础。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基础，在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公司运作和战略的成熟，以及微观经济的工商环境质量。在一国运营的公司必须达到较高生产率，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较高的生产率。而公司竞争所能达到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所在国家的工商环境质量的影响。工商环境对于公司所能实行的战略以及企业运作的效率，起着很大的作用。例如，倘若规章制度方面繁文缛节、拖拖拉拉，后勤不可靠，或者企业不能及时得到所需要的生产设备零部件的供应或高质量的服务，那么企业就无法做到有效率的运行。

要弄懂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工商环境的性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地区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 [27] 中，我把地区对竞争的影响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产要素（投入）条件；企业战略和竞争的地区背景；当地的需求条件；各相关的和后援的产业实力。它们构成微观经济的工商环境，一国的企业即是在这种环境中从事竞争，并从这种环境中吸取竞争优势的源泉。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这一系列的相互依存的微观经济能力和动力，以支持更先进形式的竞

争。

生产要素条件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能够吸取的各种投入因素的性质和规模。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道路、机场及其他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个系列，从基本的要素（例如廉价的劳动力和基本的道路），直到高级的要素（例如多模式的交通运输系统，高速的资讯通联设施，有高等学历的专业人才，等等）。就这些投入因素而言，质量和专业化要比数量重要得多。例如，如果一国的基础设施适用于该国从事竞争的领域，那么生产率就会提高。同样，重要的是要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技能，能够生产各类专门的产品，掌握更先进和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流程，这要比拥有未受训练的后备劳动力更加有价值得多。总之，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国的投入因素的质量和专业化程度方面实现持续的改善。

当地的需求的质量，是一国微观经济竞争力的第二个关键的决定因素。顾客/客户要求严格，能有力地促进生产率提高。当地顾客/客户施压于一家企业、一个产业以及当地产业竞争的性质，会促使它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提高生产率，这些产品在出口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顾客/客户的要求能迫使当地企业懂得怎样去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之更新换代，从而让顾客/客户直接受益，虽付出更高价格但获得更大的价值。反之，若当地的需求疲软无力，企业只不过是仿造别地研制出的产品，那么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受损失。

顾客要求高，其重要性从意大利的制鞋业可见一斑。意大利妇女在买一双鞋之前，会先试二三十双鞋，仔细查看皮革质量、做工、鞋跟的式样和高低大小，穿起来是否舒服，合不合时尚，如此等等。这就等于在当地开了一座实验室，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制鞋商，就能有信心，既然，自己的鞋能在意大利畅销，那么出口到世界各地大概也错不了。

企业战略和竞争的背景，是指当地的竞争的类型与强度所要遵循

的规定、动力和准则。欠发达的经济通常在本地没有竞争。要向发达经济前进，就必须在本地发展强劲有力的竞争，从尽量降低成本和减少仿造，到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最后达到创新和差异化。本地企业之间的健康的竞争，是迅速提高生产率的根本。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在国内竞争，它在国外市场也竞争不了。 [28] 如果在国内没有激烈的竞争，企业就永远不会锻炼得身手灵巧并不断创新。国家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促进本地的健康竞争，制定反垄断的法律，实行鼓励兴业精神及扶植新企业的政策，就是这一类的措施。

一国微观经济方面的工商环境的最后一个决定因素，是本地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中等的和高等的发达水平均有赖于企业集群的形成。集群就是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同一产业相互竞争的企业及其众多相关产业和后援机构所形成的网络。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都是强大集群的例子。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及几乎在每一种产业，都有与硅谷和好莱坞相似的情形。集群其实早已有之，只是如今显得日益重要。相互竞争的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和后援机构集中于一地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并长久存在，是因为它有助于促进生产率，比那些需要从远方吸取生产要素和新思想的企业运作得更好，而且有助于更好的改进和创新。

跟其他的竞争力范式相比，在生产率范式中，政府的作用有所不同，而且比较间接。政府的责任首先是在宏观经济、政治和法制方面创造一个稳定的和可预见的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长期经营的战略上，作出为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抉择。此外，政府必须确保企业能得到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例如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以及可靠有效的基础设施；制订能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的竞争规则和鼓励措施；为企业集群的形成提供方便和鼓励；制订并实施一套积极的、有特色的和长期的经济升级规划，以动员政府、企业、各种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方面的潜力。政府以及高等院校、标准计量单位等机构和各产业群体应共同努力，保证工商环境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在生产率范式中，促进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双方均应努力承担的一项日益重要的任务。这与从前的做法大不相

同。过去，是政府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实行对它们有利的产业政策。那种产业政策只照顾本国的公司，政府通过保护主义的政策对企业竞争实行干预，还采用产业倡导和价格补贴等手段。决策高度集中于全国层次，颇像中央计划体制。

企业集群的理念则与此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的企业集群都能为国家的繁荣作贡献；本国公司和外资公司都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跨产业的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是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源泉，应予鼓励。从前的产业政策是力图扭曲竞争，使之对本国有利；鼓励集群的政策则是力图加强竞争，因为它促进竞争的各方面的形成，并消除生产率和提高生产力的努力所受到的种种限制。集群方针在决策方面也是比较分散的，鼓励邦、州和地、县各层次发挥积极性。

经济政策与发展过程

经济进步是一个连续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国工商环境的种种要素均逐步演变，以支持日益成熟和有效的竞争方式。从工商环境的角度来看，必备的条件是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运动而有所变化。在早期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的要求是争取摆脱那种状态。脱离贫困以后，国家就必须使自己企业的生产要素、运作机制和生产技能升级，以便能进行较成熟的竞争，从而提高生产率。这就要求使人力资本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对贸易和外商投资开放，保护知识产权，提高规章制度标准以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环境保护，并扩大地区的整合。

一国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就必须日益注重改善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国内需求的水平，奠定科技基础，保障本地的竞争，并建立先进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政府应与私营企业、高等院校及其他机构协力建立强大的企业集群。要再达到先进的经济水平，就必须发展在世界技术前沿领域创新的能力，企业在此基础上可以创造出新颖独特的商品和服务，而这样就能保障公民的高工资。这方面的步骤包括增加基础科研的投资，扩大科技人才队伍，增大企业获取风险资本的机会。

建造繁荣：信念、态度和行为的涵义

在讨论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基础时，我们看到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有助于繁荣和促进繁荣。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繁荣的基础所普遍持有的信念。个人和企业对自己取胜之道的见解，强有力地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经济行为。能支持成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信念，大概就是相信繁荣是取决于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资源控制、经济规模、政府优惠或军事力量；相信生产率范式对社会有益。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人们就会想方设法谋取租金和垄断地位，这样的病态心理现今仍在影响着许多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有助于繁荣的基本信念，是相信财富的潜力是无限制的，因为财富立足于思想和睿智，它们不因资源不足而陷于停顿。许多人只要能提高生产率就可以扩大财富。这一信念促使社会中各行各业都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步骤，从而扩大财富总额。相反，有些人认为财富是固定的，就那么多，努力不努力都一样，因此人人勾心斗角，只想从现有财富总额中多占一份，这样一来，几乎必定导致生产率下降。这种认为一方之所得即另一方之所失的零和世界观，是全球皆可见的农民文化的核心。^[29]

生产率范式引出了整整一系列有助益的态度和价值观：创新是好的，竞争是好的，责任制是好的，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是好的，能力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必不可少，雇员是资产，企业集群成员的地位是一项竞争优势，与供应商和顾客/客户的合作是有益的，联系和网络是必需的，教育和技能是工作有成效的必备条件，只有生产率提高才能升工资，等等。与这形成对照的，则是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态度和价值观，例如：垄断是好的，权力决定报酬，僵硬的等级制是保持控制的必要条件，生意上的合伙关系取决于封闭的家族关系，等等。

在任何国家中，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信念和态度上都会有所不同。大家还会看到，在一国的经济文化中，既有促进生产率的一面，又有损害生产率的一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两方面的拉锯战所形成的。分量特别重的，是政府领导人和

企业界精英的信念和态度。强有力的政府可以硬性推行一种有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至少推行一段时间，然而这必须被企业界利益集团所接受，否则，经济进步就会是缓慢的和可能逆转的。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做到使那些有助于生产率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伸展到工人中间，伸展到教会、院校等机构，最终伸展到整个文明社会。否则，有助于生产率的政策若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得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

我通过调研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要加强国家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有助于竞争力的政策和行为是什么，现在已较好地为人所知，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接受它们。因此，在经济发展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在于教育，让人们理解现代经济，看清自己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并了解社会中其他群体的行为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因为许多公民，甚至还有他们的领导人，缺乏这些认识。正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便得以阻碍一些广泛有利于国家繁荣的变革。

为什么一些国家中存在着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

对于繁荣的决定因素以及能促进经济进步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人们已经有越来越大的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见到一些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为什么它们能在某些社会中持续存在？难道那些个人和群体是明知故犯，存心与自己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来看，都很值得探讨。显然，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利益是可能不相吻合的。同时，人们可能只看见近期利益，因而作出的抉择和行为违背其长远利益。在这里，请让我谈几点较一般的看法。首先，在一国流行的经济思想或范式，对经济文化有强烈的影响。百年来，对于经济繁荣出现过众多的各不相同的理论，例如中央计划经济，进口替代论，生产要素积累论，等等。在一些社会中，这样一些主张通过教育系统、知识分子和政府领导人的倡导以及无数的其他途径，已深深扎根。与此同时，一般的人乃至一些政治领导人对国际经济的状况及其

运作，常常是无知的。无知造就出真空，从而让那些老的想法保持不变。

人们对于怎样才能富裕繁荣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他们的行为。信念会反映在态度和价值观之中。而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之所以出现，主要不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性，而是由于无知，或者是因为他们不幸受到了有缺陷的理论的引导。而人们接受有缺陷的理论，有时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但有时则是为了统治者便于利用这种理论来维持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政治控制。例如，军政权往往喜欢实行进口替代和自给自足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对公民的控制。有些国家由于种种缘故得以避免有缺陷的理论，因而在经济繁荣方面受益。

第二，经济文化看来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往和现今的微观经济背景。的确，个人的行动可能有损于社会的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可是根据我的了解，个人很少会明知故犯，违背自己或集体的利益。因此，文化属性很难脱离总的工商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影响。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行动的方式，与该社会经济制度所给予的信号和诱因，有很大关系。

举例来说吧。常常有人抱怨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职业道德差。可是既然勤奋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得不到提升，人们还能怎样呢？看待一国国民的职业道德，离不开该国总的经济的激励制度。同样，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机会主义，不是从长远着眼安排计划。可是，在政府政策多变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这种短期行为也许倒是合理的。公司谋取分外的经济收益，也往往是政治体制促成的。

可见，归结为文化的国民特性往往是有其经济根源的。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及高储蓄率就是明显的例子。终身雇用制远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规范，它是在那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为控制工潮而实行起来的。按照人们普遍的看法，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人总记得战时及战后的艰难岁月，再加上退休年龄较早，退休金制度欠

完备，住房花费昂贵，他们不得不尽力攒钱。

因此，源于文化的行为，与经济体制所促成或强化的行为，是很难分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包括“太平盛世”和“艰难岁月”的经历，都给经济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记。文化有赖于境遇，有些穷国的人移居另一种经济体制的地方后取得了成功，就是证明。这样的事例很多，移居美国的一些萨尔瓦多人事业有成，即是其中一例。

第三，社会政策的取舍可以对经济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政策影响到经济背景。社会保障网方面的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方面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态度、储蓄行为以及自己投资于教育的意愿，还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政策的其他方方面面。实际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彼此紧密相交织着的。

所以，经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由经济所形成的。也有例外，其中包括一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根本不是源于经济利益或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源于纯粹社会或道义上的抉择。社会/道义上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例子，有对待老年人的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的准则和宗教信仰上的教义等，它们会间接地影响到经济文化。它们对一国社会政策的轻重取舍也起很大的作用。然而，即使是社会/道义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可能带有以往经济境遇和经济学识的印记。对于有利于或者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宗教和哲学都很可能有重大影响。

综合以上几点看法来考虑，我们就不要輕易地因为文化上的问题而贬低一国经济，譬如说：“某某国家工人懒惰，公司腐败，经济就是不行。”可是，倘若那个社会学习了不同的经济信念，实行了不同的经济体制，情况又会如何？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人们都可以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若用地理环境、气候、宗教等某一方面的因素来断定一国的贫富，那同样也是危险的。

总之，经济文化是执著的，不易改变，但又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成不变。尤其是那些妨碍生产率提高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一旦它们不再受到流行的信念的支持，或是它们所造成的现实迫

使公民和企业感到非变不可时，它们就有可能改变。当然，在放弃已有观念之前，总会出现无知、怀疑或者惰性。然而最近十来年的实际情况表明，一旦时机成熟，一些国家是可以让经济文化迅速转变的。

[30] 有理由预测，潜在的转变步伐正在加快，下文中将谈到这一点。

围绕着生产率文化的全球趋同

从历史上看，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提供了经济文化广泛变化的余地。如上文中所说，世界上有过很不一样的多种经济模式，有的国家追求某种模式达数十年之久。这些不同的模式给经济行为人打下了印记，它们之所以持续那么久，正是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在20世纪头七八十年，国际经济远不如现今这样全球化，所以各国经济受到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较小。许多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更加剧了各国经济的相互隔离。有些国家即使生产力低下，得不到改善，也依然可以在数十年之间我行我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扭曲了贸易格局，在经济繁荣程度方面发出了较虚假的信息。发展中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反过来又使一些穷国感到它们只好向欧洲和美国出售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没有努力更新自己的经济。冷战形成的全球政治进一步阻碍了一些国家着手于它们所需要的经济变革。大量的外援流入一些发展中国家，支撑了那些无能的领导人，却模糊了他们的经济政策的灾难性。

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长时期存在，还因为许多知识受限制，穷国改善经济的能力受限制。一些公民往往处于被隔绝状态，接触不到别的行为准则。技术变化的步骤相当慢，技术落后或采用新技术迟缓所付出的代价，还不是像今天这样触目，于是不好的政策便得以持续下去。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的扩散相对缓慢，对国外的投资也比现在少得多。企业知识的国际传播费用高昂，也不如现今有效。经济成就的跨国衡量和评比还是罕见的。关于繁荣程度、经济政策和企业管理的那些有缺陷的老观念得以存在，在某些场合还受到积极鼓励。在许多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存的情况下，人们选择什么态度，一国能有多大成就，都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

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的经济环境已大不一样了。人们不再自满自足，不再容忍慢吞吞的发展，而且迫切地争取符合全球经济的要求。与生产率范式不相符的那些发展理论已失去信誉，无法应付公开竞争，无法应付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高速进步。对于什么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什么是适当的政策抉择，人们的意见分歧正在缩小。在什么是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这一问题上，知识正在迅速传播。公民们已经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成功的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在如何做到经济繁荣这一问题上，全球各地的意见正日渐趋同。

生产率范式方面的见解日益趋同，使那些未能实际遵循这一范式的国家受到强大的压力。经济政策和行为日益受到跨国的衡量和比较。政策不健全的国家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不能提供有利的工商环境的国家面临着外商投资枯竭；缺乏良好职业道德的员工就会失业。政治领导人即使不对本国公民负责，也日益被迫向更广泛的经济力量负责。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使得那些不接受国际惯例的人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从而加重了他们承受到的上述种种压力。

结果是，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尽管成就高低不等。以中美洲为例。那里多数的国家几百年都曾坚持民族主义的、内向的政策，如今却已投身于开放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例如协调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协调关税准则等中美洲各国都在逐步采纳竞争和生产率范式。全球化的力量已促使这些小国把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放到一边，大踏步改变它们以往长期的一些做法。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率，全球化是奖惩分明的；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能推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引来空前大量的资本、投资、技术和经济机会。国家愿意接受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就会使它能够以惊人的速率进步。获得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将空前增多。现代技术使得商品能有效率地远程输送，贸易可以在气候不同的地区之间有效率地进行。从前当人们的眼界局限于比较优势时，一些国家的发展受到自然资源限制。而当生产率、主动性和学识成为繁荣的决定因素时，发展中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就空前增多。

新经济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各国是否愿意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率的老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自愿地接受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或是最终被迫转变？问题已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和变得快慢如何，而不在于是否愿意变。尽管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往往抵制这种转变，可是较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一代管理人员往往受过新经济文化训练，其中不少人在国际商学院学习过。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界精英的内部也存在着要求变革的力量。

现代经济正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接受生产率范式所要求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这种形势之下，文化是否依然与过去经济体制不同的时候一样，在经济领域起着同等的作用？在历史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有关文化属性影响社会及其经济发展道路的大量论述，这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各社会的文化属性曾长期存在，对社会经济形态确有颇大影响。然而，经济观念的趋同以及全球市场的压力可以说是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影响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的余地。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情形，从许多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出现，它跨越各种传统文化的界限，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有。对经济起作用的一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将成为共同性的，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的促进之下，逐渐消失。在经济繁荣方面，文化的重要作用将依然存在，但这很可能是一种更加正面的作用。各个社会仍会有一些独特的需要、技能、价值观和工作模式，这些将构成经济文化的一些各自不同的方面。这些有利于生产率的文化特色，例如哥斯达黎加对生态的热心，美国对于方便的迷恋，日本对于游戏和卡通的爱好，会成为别人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造成国际专业化的新格局，因为各国人民会日益发挥他们的文化给予他们的独特优势，生产相关的产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可见，虽然围绕着生产率范式的全球趋同与日俱进，但文化上的差别肯定仍将存在。全球化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消灭文化。但是

文化上的差别将不再使人们受隔绝而陷于经济劣势，相反，它们将能促进重要的专业化优势，从而使各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增进繁荣。在全球经济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不难从任何地方获取，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独特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差别应当是更值得庆贺的。

第三章 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

杰弗里·萨克斯

引言：经济增长之谜

最费解的经济发展之谜，就是为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此难以实现。1820年以前，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据安格斯·麦迪逊1995年估计，从1500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04%。到1820年，西欧及其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已经走到了其他地区的前面，可是西欧与世界最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之间的差距，据麦迪逊估计，仍仅为3：1。

182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人均收入均有所上升，从1820年到1992年，世界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21%，但增长是不平衡的。1820年时已经领先的两类国家，即西欧各国和麦迪逊所说的西方后裔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往前走得更远了，它们今天构成了发达世界成员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世界上最富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上述两类国家和地区占了21个。5个在亚洲：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其余的4个是两个小产油国（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和智利。这30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16%。到20世纪90年代，最富地区（西方后裔国）和最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之间的差距扩大到大约20：1。

以下三点总的说明，也许有助于解释这一发展之谜。

·地理位置：世界某些地方具有地理环境上的有利条件，其中可能包括拥有重要的自然资源，濒临海洋并且有通海的内河航

道，邻近另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自然条件宜于农业，有利于人的健康。

·社会制度：有些社会制度有助于现代经济发展，另一些则不然。立足于农奴制、奴隶制、不可分割的土地占有制等前资本主义制度通常均阻碍现代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看，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试验证明也不是很成功。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统治也通常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反馈：正反馈过程扩大了早期工业化的优势，从而加宽了贫富差距。首先，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剥削了落后地区。在富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下，许多落后的社会崩溃了。第二，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常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大，而不是缩小。技术创新像是一种连锁反应，现时的创新为未来的创新提供燃料。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回答不了经济增长之谜，因为它无视于地理位置、社会体制和正反馈机制的作用。它甚至对创新的动力机制也研究不足，直到不久前才有所改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发展实际上谈不上是多大的挑战。市场体制被认为是既定的。各国都被认为会储蓄和积累资本，而技术和资本则被认为会方便地跨国界流动。既然资本的边际产值在资本不足的国家高于资本充裕的国家，既然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进口富国的技术，穷国就被认为会比富国经济增长得更快。

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而对经济趋同的前景深感乐观，相信穷国会比富国增长得更快，收入水平的差距会缩小。当然，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有缺陷的经济体制会妨碍增长，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体制竞争或公众选择会使有缺陷的经济体制遭到抛弃，所以他们保持乐观。

新古典经济学肯定有助于解释当代一些重要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插曲。东亚一些地方近几十年的增长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以市场为基础而资本不足的情形下迅速积累了资本和技术。同样，北欧

和南欧之间的差距在战后时期缩小，明显地与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趋同机制有关，同时也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很适用于西欧的环境。然而，主要的问题是，这些趋同机制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得到应用，而没有构成普遍的进程。

本章将为理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提供一个范围较广的社会学框架。我要强调指出，一种适当的理论必定要论述地理条件，以及社会体制的演变，在这两方面都要论及社会内部的变化以及各社会跨国界的相互作用。

地理位置的作用

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多花点时间看看地图，就会看到在经济发展方面呈现着突出的地理格局。基本格局有二：第一，世界温带地区比热带地区发达得多。（在30个最富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两个，即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在热带，而它们的人口在30个最富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第二，地理位置上偏僻的地区——远离海岸或通航河流或者深居于崇山峻岭之中，国内和国际交通运输费用高昂的国家——比沿海平原或通航河流两岸的社会在发展水平上也差得多。内陆国一般说来问题最严重。它们远离海岸，至少要经过一道国界才通到国际商路。欧洲固然有几个富的内陆国（尤其是奥地利、卢森堡和瑞士），但它们享有一大有利条件，即周围都是富裕的沿海国家。在别的几大洲，内陆国几乎全是穷国。

热带地方普遍穷，原因是复杂的，但这现象却随处可见，世界各大洲均如此。世界上经济发展的分野实际上不在南北，而在于温带与热带。

热带持续贫穷，也许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解释：农业因素，健康因素，以及与科技资源的动员相关的因素。热带农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导致多年生植物以及特别是粮食作物生产率低，这些问题包括：热带雨林条件下土壤贫瘠，侵蚀和流失严重；水资源难调控，在雨季旱季交替的情况下还存在旱灾的风险；农业和畜牧业病虫害发生率高；

食品易腐烂难贮存；在夜间气温高的地方纯光合潜能率降低。结果似乎是许多热带地区粮食生产率受到固有的限制。例外的情形包括冲积土和火山土地地区，例如尼罗河三角洲和爪哇，还有夜间气温较低的山间谷地。热带人口稠密的地区包括中美洲，安第斯山区，东非大湖和大裂谷区，以及喜马拉雅山麓。

传染病的负担，热带也重于温带。在温带，多数传染病是直接人与人之间传播（例如肺结核，流感，肺炎，性病等）。在热带，则另外还有一些由传病媒介传播的大病（如疟疾，黄热病，血吸虫病，锥虫病，*ochocerciasis*，恰加斯病，丝虫病，等等）。在炎热气候下繁殖的昆虫和动物，如苍蝇、蚊子和一些软体动物，是这些疾病的重要传染媒介，充当寄生物的中间寄主。

农业生产率低，加上传染病发病率高，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务农人口比例高（农民生产不出剩余农产品）；城市化水平低；大量人口集中于偏僻高原地区（如安第斯高原和东非大湖区），为的是尽量躲避更热的平原地区的种种问题；人的预期寿命短以及人力资本增益较低。

热带地区还可能有第三种不利因素。至少2000年来，温带地区人口一直多于热带。根据麦克埃夫迪和琼斯1978年的统计资料，在过去两千年，热带人口大约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3。如果说生产率的增长与人口规模成正比，如果说一种生态区的生产率进步不容易推广到另一种生态区，那么温带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大概就构成一种优势。以上两点假设看来是符合实际的。社会需求量大，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社会的潜在创新者多，又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同样，温带地区在农业、保健、建筑等领域的生产率进步，恐怕难以直接应用到很不相同的热带生态环境。因此，较高的温带生产率不易扩展到热带。

说到这里，需要专门谈谈香港和新加坡。它们从地理位置来说在热带，但从生态上说只有新加坡位于生态热带。的确，它们经济发达，不同一般。但它们属于小岛城市之邦，经济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

业，并不需要应付农业生产率和传染病中介之类的令人头疼的问题。

地理位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矿产资源，尤其是能源和黄金、钻石等贵重矿产。在19世纪，交通运输费用比现在高许多，煤在当时成为重工业的必备条件。缺煤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南欧、北非和中东在重工业方面处境不利，而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波兰、俄国等位于产煤地带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得天独厚。当时，缺煤的地区可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却无法发展冶金、交通运输和化学工业。到了20世纪，石油、天然气、水电等能源逐渐广泛采用，交通运输的费用下降，上述的局限才得以缓解。

地理因素无疑只是发展之谜的一个部分。温带的一些地区发展得并不快，至少是不如西欧、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所谓的西方后裔国。温带中的滞后地区包括北非和中东，南半球若干地方（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南非），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以及不久前还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前苏联。为了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谈谈社会制度问题。

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

从实际经验看，经济增长一向是与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相关联，尤其是紧密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其特点是国家实行法治，文化有利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度流动性，经济制度以市场为基础，保持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分工。能表现出这种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是很少的。历史还表明，社会通过内部演化来建立这些制度的强烈趋势，是并不存在的。

实际上，社会演变的阻力是很强大的，因此根本性的制度变革通常不是来自内部进化，而是要靠外力推动。过去两百年来，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先进的社会与经济落后的社会彼此之间动荡不安的交往。这些交往引起落后社会中深刻的社会动荡，而打破其内部的社会平衡。这样的动荡可能促使社会制度改换方向，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结果也往往是经济崩溃，甚至是国家丧失主权。

杰出的韦伯社会学第一次适当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韦伯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作了区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政权是传统的和专制的，不受法制约束。社会规范是支持等级制的。不存在大市场，只有小市场，而小市场也不受社会或法律准则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国家接受法治，社会地位流动性高，经济上的交往受到市场机制有力的调节。

韦伯的社会学著作是写于20世纪初。他考察的领域是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出现于旧大陆的其他地方。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初，韦伯社会学的内容应该有所更新，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有所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不平衡？

韦伯对社会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答案，然而他不曾充分论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是相对固定的，而没有论述它们的社会演变的指导原则。第二，他没有充分论述各种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制度上的模仿或扬弃、殖民统治以及军事冲突。第三，他只集中谈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社会学地图不曾扩大到至少三大类社会组织：殖民统治，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崩溃的社会。请允许我简短地描述一下它们。

在殖民地社会中，国家机器掌握在殖民列强手中，政治的实质是独家排他的统治，主要目标是维持秩序。传统的文化制度受到系统的破坏，以利于保障经济剥削。经济体制则要保证殖民者强加的贸易条件。殖民统治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好的“流派”。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受到一党制控制。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受到压制，所有的私人市场活动和私人财富积累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在苏联瓦解之后再作回顾，可以清楚看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也不是很成功，也许只有苏联内部一些得到大量补贴的偏远地区是例外。

还有一种常常出现的社会状况，我们也许可以将它称为“社会崩

溃”，即原有社会制度停止起作用，社会陷入霍布斯描述过的人人彼此为敌的状况。在社会内部崩溃以后，重建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很困难。由于发展中世界已多处经历了这种社会崩溃，我们不妨对它的主要特点再多说几句。

在政治上，国家权威不复存在或极其有限，并且往往伴随着暴力横行。社会信任的文化机制和经济的市场机制均告瓦解。黑市随之出现，利用货币进行的交易被以货易货所取代。

韦伯社会学的一大目的，就是要解释社会在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崩溃的社会这几类状态之间的运动。为什么有些地方比较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而另一些地方却沦为殖民地，还有一些社会陷入崩溃？殖民地的经历在什么情况下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作了准备，而在什么情况下却使这种过渡无法实行，甚至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仍行不通？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回答这些问题，下一节中，我们只是简括地谈一点假设性的看法。

资本主义扩散的格局

在理解西欧新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正确地预测，资本主义依靠其经济生产率上的优势，将最终扩展到全球。

资产阶级依靠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联络手段的大发展，吸引着各国进入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的商品价格低廉，成为它摧城拔寨的重炮，并迫使“野蛮人”投降。它强迫各国若不愿灭亡就得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强迫它们引进“文明”，即自己也成为资本主义。它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

然而，这一过程决不是迅速的和顺利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一漫长的、往往是痛苦的、常常还充满暴力的过程，我们就需要在体制变革问题上有一套更好的社会学理论。可是我们并没有一套全面的社会演化理论，在资本主义如何从西欧扩散到了别的地方以及如何未能扩散到另外一些地方这一问题上，也没有完整的图谱，因此我认为最有

效的办法是提出若干假想性的看法，或者至少是有根据的推测。

·由于资本主义意味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加剧，资本主义制度通常受到各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精英的抵制。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社会中，统治精英几乎总是力图挫败或限制法治、社会地位流通性准则和市场机制的实施。

·在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例如19世纪的俄国或奥斯曼帝国），资本主义改革最难以取得进展，因为社会精英处于有利的地位来抵制变革。

·当统治精英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时，他们会尤其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改革。例如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是一个合法性很成问题的外来异族（满族）王朝，这就无疑使国内的制度变革遇到阻碍。

·许多地方的内部改革因殖民统治而中断。殖民列强通常都不曾在它们统治的殖民地社会实行市场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会增强当地居民的地位而危及殖民者的统治。因此，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自己中断了资本主义向殖民地的传播，往往使之推迟了一百多年。

·一些受到威胁的社会往往是发生社会崩溃，而不是实行改革，这主要是因为外来的威胁导致金融危机从而导致政权崩溃，或者是外来的威胁使当地的政治统治者丧失其合法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社会的崩溃可能引起形形色色的后果，其中包括长期的混乱（例如海地）。沙皇俄国的政权在1917年发生金融崩溃和政治崩溃以后，列宁尽管尚未得到民众的广泛政治支持，却仍然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使之巩固下来。随后，苏维埃制度通过武力扩展到了东欧和中欧各地。

·以下几种地理条件十分有利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是沿海国家而不是内陆国家；

——邻近别的资本主义国家；

——位于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上的国家；

——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因而有利于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通过文化的联系（例如居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或犹太人之类的散居各国的少数民族群体）而与世界市场相通的社会，更易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活跃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数百年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于北大西洋各国社会，尤其是英格兰和荷兰。它很自然地传播到北美的新移民定居地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地区有不少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跟英国一样位于温带生态环境，当地原有居民稀少，在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几次大流行之后，人口就更少了。至于西欧，拿破仑的远征、1848年革命以及英国工业化的榜样，使资本主义体制逐步东延。到1850年，现代资本主义已存在于西欧及西方后裔国。

关于美洲其他各地，需要专门说一下。加勒比海诸岛当时成了奴隶社会，大多从事甘蔗种植业。除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这些岛屿仍然是殖民地，有的是到19世纪末为止（如古巴），有的是到20世纪中期为止（如小安的列斯群岛和牙买加）。它们大多是白人长期统治贫穷的百姓（先前的奴隶），而且热带的土地被开发过度，环境恶化。

西班牙的各处殖民地，情况有很大差别。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位于南半球温带，与北美和大洋洲相似。土著人口稀少。气候与西班牙差不多。它们在独立后头50年（大致是1820年至1870年）政局不稳，但是到1870年时，它们已具有正式的民主结构，或多或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在土地分配上极不平等。在热带的中美洲各国和安

第斯山区各国，形势大不一样。它们的土著印第安人口多得多。社会不平等，欧洲白人后裔与土著以及从外面运进来的奴隶形成高低不等的阶层。这些社会抵制资本主义体制更长久得多，无疑是由社会的极端不平等造成的。

在经济改革问题上，19世纪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几个大帝国（中国，日本，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上文中所谈到的一般性原则在这里似乎是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证明，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三个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改革的势力都很强大，甚至在帝国受到西欧列强蚕食的根本威胁时仍然坚持老的体制。只有日本在1868年一次政变后出现了一场迅猛的“资本主义革命”。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有利条件在于，它原先已有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文化在全国是均一的；它四面环海，可以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还有它煤藏丰富，可以早早实现工业化。而在另外三国，社会中的一系列政治障碍和文化障碍结合在一起，挫败了改革的尝试。政治和文化向同一方向起作用：社会精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威胁到他们在千百年来老制度中所享有的特权。

至于世界其余地区——基本上是在欧亚非旧大陆热带地区——几乎全都沦为殖民地。非洲尤其是如此。在奎宁的推广使欧洲殖民者得以战胜疟疾而长驱直入撒哈拉以南各地以后，没有一个社会幸免于这种遭遇。北非、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也陷于欧洲列强的统治。朝鲜半岛和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亚则被俄罗斯帝国吞并。

到1900年，有一个虽然粗略但却清楚的统计：资本主义盛行于西欧和西方后裔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于南美锥形区（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还有日本。它们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将近1/5。新大陆热带地区（加勒比海诸岛、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大都是白人统治的、高度分化的社会，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得不到自由、教育及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旧大陆热带地区和印度次大陆处于欧洲列强殖民统治之下。三个大帝国——奥斯曼、俄罗斯和中国清朝——在欧洲列强欺凌之下摇摇欲坠，在国内日益不得人心而失去其合法性，同时在外部压力下财力日虚，捉襟见肘。

请允许我跳过65年——越过布尔什维克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等事件——到1965年，社会主义扩展到许多地方。非殖民化的进程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在非洲亦在进展之中。我要强调指出，直至此时，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地方仍不多。世界格局大致如下：

·资本主义世界：西欧，西方后裔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占世界人口的21%）；

·社会主义世界：苏联，中欧和东欧，朝鲜，中国，古巴（占世界人口的32%）；

·高度中央集权制、部分兼有社会主义一党统治的国家：阿根廷，智利，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墨西哥，土耳其（占世界人口的23%）；

·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混合型的社会（国民极不平等）：热带美洲，南非，罗得西亚（占世界人口的6%）；

·其他：殖民地社会，传统社会等（占世界人口的18%）。

总之，在当代历史中，世界多数人生活于非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社会改革的进程受到的阻力来自四个方面：旧大陆传统社会（主要是俄国、中国和奥斯曼三大帝国）；殖民统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崩溃。迟至1965年，世界上仍只有大约1/5的人可以说是生活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中。

与生产规模成比例的经济收益日益增多：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另一原因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技术创新，具有使经济收益的增长与生产规模的扩大成比例这样一个特点。按照事物生长源于其内部的理论，技术创新依靠的是社会内部积累的已有技术“蓝图”。思想产生思想。技术创新

的动力在于它能使经济收益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长，是由已有的创新思想激发的一种连锁反应。已积累有丰富技术思想的社会，有可能使经济腾飞而进入自我持续的发展，而缺乏这种思想的社会则可能陷入经济的持久停滞。既然已有的技术创新思想是新思想的来源，富者就会更富。

这种看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在世界上，科学的分布比财富的分布更加不平衡。高收入的地区（西欧，北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大洋洲）在世界人口中占16%，在世界国内总产值中占58%，而在世界科技出版物中占的比例高达87%左右，在欧洲和美国登记的专利中占的比例更是惊人，高达99%。

关于经济发展源泉的若干计量经济学数据

世界上，半数以上人口居住于温带、少量人口居住于寒带的国家，共有61个。其中，24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多半时间内是社会主义国家。非社会主义的温带/寒带国家为37个，其中有6个（莱索托，马拉维，尼泊尔，巴拉圭、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是西欧以外的内陆国。既非社会主义国家亦非西欧以外内陆国的国家，共31个。

在这31国当中，按1995年经济购买力平价法作调整后的人均收入1万美元为界限，只有7个国家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4国在北非和中东（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3国在南半球（阿根廷，南非和乌拉圭）。从地理位置看，这七个国家是例外。为什么它们没有实现经济发达？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三者当中，哪一个罪魁祸首？

喜欢从文化角度看问题的人认为，北非和中东发展滞后，证明文化因素起重要作用。如果撇开气候和地理位置因素，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更深的内部障碍？请注意文化障碍可以是内部的（例如从社会内部出现的市场体制遭到反对），也可以是外部强加的（例如欧洲国家在贸易政策上歧视该地区）。即使

假定二者或者其中之一是实际正确的，要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孤立突出这种说法，也是不可能的。

要从文化因素上解释另外三国的情况，更是可疑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大体上是移民国，在文化规范上主要与南欧相同。然而它们在经济上比南欧落后得多，所以我们不禁要怀疑，这种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在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因素。再看看以下一个事实就更清楚了：直到1929年，阿根廷人均收入水平仍比意大利领先不少（据麦迪逊统计，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美元计算，阿根廷1929年人均收入是4367美元，而意大利是3026美元）。可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阿根廷落后了，这显然是由于庇隆执政时期及其以后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变化。乌拉圭的经济发展则是步阿根廷这个大邻邦之后尘。最后，对于南非，则应主要着眼于殖民政策和种族政策，而不是文化。

那么，热带的经济成功例子又如何呢？可惜，这样的事例微乎其微。在经济发达的头30名当中，热带国家只有一个新加坡，再一个是原为殖民地、如今成为中国一地区的香港。不妨再看看比较成功的例子，即1995年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热带国家和地区：除新加坡和香港以外，还有8个（总数是46个），它们按人均收入高低排列，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加蓬，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泰国，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无疑是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有利，而不是政府好或文化优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加蓬这两国主要是靠石油收入。比较有意思的倒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以及泰国。我们还是应该问一问：它们经济比较成功，其决定因素何在，是文化还是政治？

泰国和马来西亚过去30年来主要得益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的生长，这些产业又异常高度集中于它们的华人群体，而这些华人群体又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者建立了联系。一般说来，亚洲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及大中华圈（香港，台湾和大陆）华人群体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很可能被用以证明文化因素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在这里，对于文化可能起的作用，照样存在

一点重要的疑问：起作用的，究竟是华人群体信念体系内部固有的因素，还是这种关系提供的一个受信任的经济联系网络？）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韦伯社会学在说明基督教新教的文化规范促进经济发展时，曾经把中国作为一个实例，来证明文化阻碍了发展。半个世纪来的实际情况，包括中国自己1978年后对市场力量的开放，却有力地表明，中国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发展滞后，原因是在于政治因素和糟糕的经济体制，而不在于文化本身。

综上所述，国家贫富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地理和政治（尤其是战后是否奉行社会主义）。如果说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与更广泛的地理和政治/经济因素相比，它看来是起辅助的作用。有些迹象固然表明文化起调节作用，最明显的现象有二：北非和中东一些伊斯兰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快；热带某些华人群体集中的国家经济强劲有力。但更深一层来看，这二者都还有一个问题要探索：这种文化上的信号究竟是关系到有关国家社会内部的信念，还是关系到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因而还有国际贸易）？

由于篇幅上的限制，这里无法细述1999年就上述假设性意见所作的回归分析。结论：基本变数如所预料——经济政策影响到经济增长率，温带/寒带国家经济增长快于热带国家，瘴疠流行的地区发展慢于无瘴疠地区，内陆国经济增长慢于沿海国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社会的经济发展快慢方面，系数小，在统计上无意义。简而言之，撇开经济政策变数或地理变数，没有证据能说明印度教或伊斯兰教民族的经济增长速度慢。

同样的方法可用来说明，1965年以前曾是殖民地而以后独立了的国家，其1965—199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前殖民地时期的强烈剩余影响。殖民地时期大概阻滞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但看不出对国家独立后仍有长远的不利后果。不过，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还需要作更仔细的研究。

总结与结论

本章讨论了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包括文化体制在经济增长快慢方面可能起什么作用。本章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体制及有利的地理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这两大类经济增长原因之外，只有些微小的证据表明宗教信仰还起些作用。从长期看，北非和中东的一些伊斯兰国家虽地理条件有利（位于温带，尤其是有地中海气候，而且临海），但经济发展不够快。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发展滞后的现象持续到1965年以后，至少在过去10年中，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快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有助益的，尤其是可以用来说明19世纪资本主义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但是在作这种解释的时候，必须看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地理，政治，经济体制）的作用。若不看到这些变数，那么文化发挥重要独立作用的余地就会大大缩小。更广泛地说，现在仍需要作大量的历史研究，来建立一个健全的框架，以衡量和探索社会体制的演化，以及政治、文化、经济诸因素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好地认识国际因素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至少两百年来，这种因素对社会变革所具有的分量就极大，而在今后，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压力下，这一分量将会更大。

参考文献

Kornai, Ja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ndes, Davi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 Norton.

Maddison, Ang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 1820-1992*. Paris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cEvedy, Colin, and Richard Jones. 1978.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New York : Penguin.

Weder, Max. 1979.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oung, Crawford. 1995. *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第四章 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

马利亚诺·格龙多纳

当一个国家从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达到一个转折关头。在此关头会出现各种诱惑。如果该国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它就会实现发展；否则，它就只会繁荣一时。

从投入劳动力开始而以再投资为终点的生产周期产生了一些成果，人们因而感到更富裕一些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倾向于今后少劳累一些。另一方面，消费可能快速上升而减少了盈余，从而使发展变成市面繁荣。此外，即使盈余有所增长，人们也可能决定不再把它用于生产性投资。相反，人们可能经不住诱惑而把它花费到自以为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例如为领导人树纪念碑性质的工程，为振国威而进行的战争，追求福利的乌托邦计划，或者干脆搞享乐腐败。他们还可能企图保留自己的发展阶段，其手段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战略或政策，而挫伤兴业精神和投资的积极性。

每当一种关键的诱惑出现时，一个国家不是克服它就是陷进去。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界定为这样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不论何时出现诱惑，都予以抵制而作出有利于投资、竞争和创新的决策。

一个国家必须能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度过诱惑的关头。如果有一定的价值观占上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价值观”可视作一常规象征体系之中的一因子，它能充作一准绳，人们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中，作出自

己的抉择。 [31] 国家必须具备那种有利于抵制诱惑而作出正确决策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实现持续的、迅速的发展。

价值观有两大类：一类是内在的，一类是工具主义的。内在的价值观是指我们不计个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例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要求人们作出牺牲，有时就个人得失而言，它是“不利的”。然而自古以来，千百万人都为捍卫祖国而献出了生命。

相形之下，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是指那种因为它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价值观。假定一国致力于经济增长，为此而强调努力工作、提高生产率和进行投资。倘若有利于发展的决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工具主义价值观，例如要发财致富，那么人们富到一定程度时，努力就会减退。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起来了，仍然像它穷的时候一样努力？当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竞争、投资和创新，甚至当他们不再需要如此努力就可以过上富日子的时候，也继续照样努力干，这时经济发展的革命就会发生。只有当人们所追求的有助于繁荣的价值观在繁荣出现以后仍不会消失，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占上风的能导致经济持久发展的价值观，必须是内在的，而不是工具主义的。工具主义的价值观按自身定义来说就是暂时性的，只有内在的价值观才能无穷尽。任何工具在完成了它的用途以后就不再有用，而内在的价值观却永远召唤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所有的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的。我们需要钱，是用以达到某种非货币的目的，例如追求福利，幸福，自由，安全，宗教信仰，或慈善事业，等等。因此，要使发展不停顿，积累的过程就决不能被它自身的成就所窒息。这就是说，推动人们不停顿投资的价值观，不能是经济性的，否则，一旦取得经济成就，价值观即会随之消失。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以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某种东西”应是非经济性的，也许是维护生存和安全，也许是拯济受难者，或者是追求卓越和威望，甚至是建造帝国，总之是永不满足的价值观。

然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性的，却决不能是反经济的。它们应既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

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决不可仅仅托付于经济价值观。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属于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叫做“伦理”。一个人本着原已自愿接受的一种内在价值观，或者后来认识到应当如此而加以遵循的一种内在价值观，所表现出的行为，叫做“道德”的行为。按内在价值观为人处世的人，即是有道德的人。当一个国家遵从非经济而又亲经济的价值观实现经济发展时，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经济发展是一个有道德的现象。如果没有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价值观，诱惑就会占上风。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的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满足眼前的利益。

在《不发达是一种心态》一书 [32] 中，劳伦斯·哈里森集中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发展。为了阐明自己的论点，他作了一系列双方的对比：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巴巴多斯与海地，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美国与拉丁美洲。在每一对比中，作者都以文化因素说明了发展的差距。他还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西班牙与通行西班牙语拉美诸国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及其后果。

我读了哈里森的这本书以后，禁不住想尝试一下再进一步，在双方对比之外，对两种类型的价值观体系作一文化分类，其中一类是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另一类则是完全阻碍经济发展的。在这一理论分类的框架之下，从哈里森的分析可以看到相关的实例。

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可以按照相容的格局予以归类，这就是“价值观体系”。实际的价值观体系是复杂的，而纯价值观体系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即理想的类型。有可能构建两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一种只包括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另一种只包括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前一种的国家，就属于现代国家；尽量靠近后一种的，则属于传统国家。这两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地属于其中哪一种。然而，有些国家比较靠近前一个极端，另一些国家则比较靠近后一个极端。

现实的价值观体系是处在运动之中，而且优劣兼备。如果它们是朝向有利的价值观体系运动，它们就会改善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如果它们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那就会使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缩小。

这一分类包含着20种因素，对于这些因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在看法上是大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异与两种相对立的文化的经济成就是密切相关联的。在两类理想价值观之中，人们选择靠近哪一种的价值观体系，实际上就表明他们宁愿要哪一种经济，结果也就会是那样的经济。这就引出一个人们有争议的结论：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达或者不发达，并不是外界所强加，而是社会自身所选择的。

看法上相对立的20种文化因素

宗教

从古至今，宗教信仰一向是最丰富的价值观源泉。当然，正是马克思·韦伯把基督教的新教，首先是它的加尔文教派，认定为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启动经济发展，靠的是一场宗教革命，其关键是如何看待生活中的胜利者（富人）和失败者（穷人）。韦伯将倾向于穷人的宗教潮流（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称之为“承办式的”（publican），将倾向于富人即成功者的宗教潮流（主要是新教）称之为“遵守教义的”（pharisaic）。

在承办式的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经济难以发展，因为穷人认

为自己守穷是正当的，而富人却感到难受，觉得自己有罪过。相比之下，在遵守教义的地方，富人為自己庆贺，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受了上帝的恩典，而穷人则认为穷是上帝的谴责。不论贫富，人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通过积累和投资，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按照这样的分类，承办式宗教倡导的是抵制经济发展的价值观，遵守教义的宗教则是倡导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

对个人的信任

经济发展的首要引擎是个人的工作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去作出努力和投资的，则是一种自由的气氛，能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个人感到他们是由别的人来负责，他们的劲头就会降低。如果个人的思想和信念都是听命于别的人，其结果就会是个人丧失原动力和创造性，或者是在服从和造反二者之间作一选择。然而，不论是服从或造反都不会产生发展。服从会使社会失去创新者，造反则使精力从建设性工作转向反抗，引出障碍和破坏。

相信个人，对个人有信心，是有益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的要素之一。相比之下，不信任个人，表现为监督和控制个人，是阻碍发展的社会的典型现象。相信个人的社会还应愿意接受一种风险，即个人作出的选择也许不符合政府的意愿。如果不接受这样的风险，让个人步步受到监控网的控制，社会就会失去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人人都要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和思考，表现出自己的本色，努力使自己卓越超群。倘若没有个人，只有“人民”和“群众”，就不会有发展。那时，人们不是唯唯诺诺，就是起而反抗。

道德规范

道德有三个基本层次。最高的层次是利他主义和无私无我——这是圣人和殉道者的道德。最低的层次是犯罪，不顾他人的权利和无视法律。中间的层次则是雷蒙德·阿伦所说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个人的行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犯罪，而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和遵守法律的范围之内，合理地谋求自己的利益。

马克思提出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及罗马天主教坚持的教士无欲操守，就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两者均与人性不符。

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人们广泛地遵守法律和行为规范，这些法律和准则并不过分苛求，因而是现实可行的。道德方面的法律与社会现实是实际上相吻合的。而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则是存在着彼此不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最高标准的崇高世界，另一个是鲜廉寡耻、普遍伪善的现实世界。法律是遥远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只不过是表达了人们在理论上抱有的向往，而现实的世界却全然与法律无涉，通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充斥着披羊皮的狐狸和豺狼。

两种财富观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财富首先是指已有的东西，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财富则首先是指尚不存在的东西。在不发达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土地以及能从土地获取之物。在发达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有成功希望的创新过程。^[33]以计算机为例：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看重的是今天的计算机，而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注意力集中于计算机的下一代。

在当年的英属北美殖民地，那些无人居住的土地是谁开垦就属于谁。而在南面的西属和葡属殖民地，却是一切土地归王室所有。从一开头，财富就属于有权势者。所以，财富不是来自创业，而是来自博取和保持国王恩宠的本事。

两种竞争观

要想得到财富和卓越地位，就必须竞争，这是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中，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其他方面。企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各行业专业人士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竞争。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竞争却受到谴责，被说成一种敌对行为。他们主张用团结、忠诚和合作来取代竞争。代替企业竞争的，是社团主义。政治是围着领袖人物转，知识界不得不按照既定的教条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只有体育运动接受竞争。

阻碍发展的社会对竞争持否定的看法，这反映出他们使妒忌合法化，追求乌托邦式的平等。这种社会虽然批评竞争而赞扬合作，但实际上的合作往往还不如“竞争性”社会中那样常见。我们可以争辩说，正如体育运动所表明的那样，竞争事实上也是一种合作，因为竞争双方都不得不尽力而为，从而共同受益。竞争培育着民主、资本主义以及不同政见。

两种公平观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分配上的公平涉及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强调的是现在，还反映出更重视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有利于发展的社会在考虑分配上的公平时很可能还考虑到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在这种社会中，更重视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

工作价值观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工作并不受到很高评价，这样的哲学思潮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代。商人是不受信任的，但体力劳动者稍许好一点，因为他们必须工作才能生存。社会上受尊敬而地位高的人，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宗教领袖以及军队将帅。在基督教社会，在宗教改革之前，情形亦与此相似。但是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派的教义，把社会地位的高低排列扭转过来了，使职业道德神圣化。这一扭转了的价值观体系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了西欧和北美——还有东亚——为什么繁荣，而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为什么相对贫穷。

离经叛道的作用

当年在教条主义一统基督教天下时，马丁·路德以他的《论纲》对圣经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成为宗教界知识多元化的先驱。在那个时代，离经叛道被视为异端邪说，是不可饶恕的大罪。然而，只有在思想上能提出疑问，才会造就创新，而创新正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正统社会，包括前苏联，都压制创新。前苏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而不容许离经叛道，这是它瓦解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教育不是洗脑

我们看到，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所培育的人，敢于创新和提出异议。培育人才的主要工具是教育，但这种教育必须有助于受教育的个人去探求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强制灌输什么是真理。在阻碍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中，教育却是灌输教条的过程，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实用性的重要

发达世界避开无法核实的理论，宁愿探索实际上可核实和有用的理论。拉丁美洲的知识传统却偏重于大的宇宙观，使它在发展上处于不利境地。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在他1900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埃里厄尔》一书中，借用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两个人名，突出展现了这一区别，以潇洒、精明的埃里厄尔代表拉丁美洲，以丑陋、斤斤计较的卡利班代表美国。然而，开辟了经济发展道路的，却是北美人，而不是拉丁美洲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不能搞功利主义，因为它有严重缺陷，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就是可怕的例证。

较轻的美德

发达社会还尊重一系列较轻的美德，如办事稳妥，整洁有条理，讲礼貌，准时。它们既有助于效率，又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它们在传统文化中几乎不受重视。因为它们有碍个人的自持，还因为人们只重视一些大的传统美德，如爱，正义，勇敢和崇高气概。上述较轻的美德却是发达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更尊重他人的需要。

时间上的重点

时间有四个范畴：过去，现在，最近的未来，以及直到来世的遥远未来。发达社会在时间上的重点是力所能及的未来，它是唯一能够掌握或加以计划安排的时间框架。传统文化的特点却是为过去自鸣得

意。至于他们看重的未来，则是遥远的、人类最终命运的未来。

理性

现代世界的特点是强调理性。理性的人是在有所成就后才在一天的末尾感到自慰，进步则是大量的小成就的结果。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宏伟的项目，例如金字塔，阿斯旺水坝，革命。阻碍进步的国家处处都有未完工的纪念碑，道路，厂房和宾馆。没关系。明天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

权力

在理性社会，权力在于法律。法律的最高权威确立之后，社会就按照近代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归结为宇宙—自然法则的理性来运转。在阻碍发展的社会，君主、元首或国家机器的权力就像是一个喜怒无常、不可预测的上帝。无法指望人们让自己适应于已知的、合乎逻辑的、始终如一的法律要求；相反，他们不得不力图神化当权者的专制意志，所以这种社会必然存在着不稳定。

世界观

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世界被看做是行动的舞台。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有所作为以改变它。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庞大的实体，其中各种不可抗拒的势力在表现它们自己。这些势力名目繁多，诸如神，鬼，强大的国际阴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主要操心的事是拯救自己，往往采取乌托邦式的举动。因此，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往往是动摇于狂热和悲观怀疑之间。

生命观

在进步的文化中，生命被视为操之在我，我是主体。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一切是命中注定，我只能听天由命。

救己与救世

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人们的目标是拯救自己，让自己从这个世界得到超度。按照传统的天主教的说法，现世界是尘世“泪谷”。拯救自己的办法是抵制各种诱惑，争取超度到死后的另一世界。但是在新教徒看来，在那另一世界的超度取决于个人努力转变这一个世界的成就。天主教观念的象征是僧侣，新教观念的象征是企业家。

乌托邦

有利于进步的文化和阻碍进步的文化，都有自己憧憬的乌托邦，即理想境界。在进步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世界是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和努力而慢慢向遥远的乌托邦前进。在抵制进步的文化中，个人却是寻求早日进入一个实际上达不到的乌托邦，结果又是摇摆于狂热和悲观怀疑之间。后一种观念就体现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印度的访问，他在那里坚持说，所有的印度人都有权摆脱贫困过好日子，而同时又拒绝节制生育。

不同的乐观主义

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乐观主义表现为人们盼望交好运，得到上天或强者的恩惠。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乐观主义则是表现为人们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保证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命运，相信起作用的是自己的行动。

两种民主观

阻碍发展的文化是专制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即使它采取了卢梭主张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也依然是如此。它不承认法律的限制和体制上的监督。按照这种观念，国王对人民享有绝对权力。在进步的文化中，民主观的特点在于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和阿根廷学者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所主张的那种开明的、按宪法实行的民主，政治权力分散到几个不同的部门，法律至高无上。

最后的几点想法

以上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与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通过20种文化因素的对比。这一清单并不是结论性的。它可以通过更多的对比加以扩充，也可以压缩而只列出最重要的区别。我的标准是实际可用，即通过这20种因素，足以对两种价值观体系彼此相对立的观念，有所了解。

应当提醒的是，不论是这种“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还是“阻碍发展的文化”都不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现象。借用韦伯的话来说，它们是“理想的类型”，或“心灵上的构念”，展现的是两个极端，有助于作分析，能帮助我们对某一具体社会加以定位和给予评价。一个社会愈是接近于有利的理想一端，它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大。反之，靠近不利一端的社会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较小。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一条想象的直线，现实的社会可以定位于该线上的某一点。然而，这种定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价值观体系是静止不变的。它们总是沿两极之间的直线朝向这一极或那一极不断运动，尽管是缓慢地运动。两种理想类型就像是相反方向上两个照明的港口，召唤船舶的领航员向它们靠拢。这就让人们可以判断某一个国家是朝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还是相反，朝脱离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其运动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倘若它已靠近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一端，那就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它的价值观体系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争取改善发展的前景。同时，还有可能判断，是不是有一些价值观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发展，但却体现着一个社会的特性，只要它们不阻碍发展，就应该保留。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真正的经济发展在17世纪之前还不曾出现。欧洲和中国、印度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均是如此。全球各地当时都处于低生产率水平，因为都还是农业社会。年景时好时坏，主要看气候，尤其是降水量如何。但是没有持续的经济的发展。原因在文化。着眼于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鼓励资本积累的价值观，尚不存在。那时的价值观体系是反经济的，它们重视的是另一

些东西，例如，怎样超度埃及法老的灵魂，研究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罗马帝国的法制和军制，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学，以及中世纪欧洲人弃绝尘世和寻求永远的超度，其手段往往是征战。

最先在北欧和北美造就了经济发展的，是产生了新教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前，在欧洲居领先地位的角色，是法国，西班牙（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结盟），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以及梵蒂冈。新教的文化革命使形势大变，原先的二流邦国——荷兰，瑞士，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普鲁士，还有原英属北美殖民地——跃居领先地位。表现为工业革命的经济的发展，给新的领先者带来了财富、威望和军事力量。非新教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它们实现不了经济发展，就得受新教国家主宰。它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是承认新教霸权，还是坚持它们固有的价值观。

非新教国家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个极端是波多黎各，它出卖了自己的拉丁灵魂以换取一杯羹的实利。另一个极端是坚持宗教激进主义的伊朗，它坚决拒绝西方式的发展，认为那会威胁到自己祖先传下来的特性，它的当权者都以保存这一特色为己任。

另一些国家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运动。中国的帝国统治者蔑视西方的力量，最后却被迫屈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可以被看做是中国顺应西方潮流的真正第一步，虽然它选择的是西方的一种异端思潮，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又向西方再迈出了一步，向资本主义开放了门户，虽然保持着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

日本人在1853年美国军舰强行驶入东京湾以后，认识到他们已抵挡不住西方。明治时代的新领导集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受西方技术，而又不接受西方文化。随后，日本建立了相当的战争机器，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了自己。屈辱之后被迫民主化，这民主化生了根，日本人将重点从打仗转向了办工商业，结果惊人。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块原日本殖民地也走了相似的路。

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接受了经济发展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尤其如此。新教国家的经济速率如今降低了，部分的原因在于早先的宗教动力有所减退；与此同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则已经跨越了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界线。

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会走上同样的发展之路吗？在20世纪80年代——那“失掉了的十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它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拉丁美洲能否攀登上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高度，还有待于观察。

第五章 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

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

长期来，拉丁美洲在政治观念方面苦于躁狂抑郁症的周期。有时它处于兴奋状态，媒体宣称这片大陆终于成熟了。我们听到人们说，哥伦比亚是一只新的“亚洲虎”；哥斯达黎加是拉丁美洲心脏中一处令人惊叹的硅谷；巴西将对美国称霸西半球的地位提出挑战。然后，却又降临体制性的灾难：政变和未遂政变；极度通货膨胀；稳定化计划失败；资本外流。我们陷入阴郁的不景气，外国投资者开始逃离这里。随后，抑郁变成绝望，我们认输，下结论说“无路可走啦！”或许我们该开始议论一下是不是有一种兴奋和压抑交替的文化。

当20世纪终结时，我们正处于这一周期的抑郁阶段。诚然，如今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美国家的政府都是产生于自由的选举，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可是人们不无理由地担心，我们的民主是不是比我们所估计的要更脆弱一些。委内瑞拉那位信奉集权主义的中校乌戈·查韦斯在1992年曾企图夺权而未果，留下了400来人的死亡，可是这同一位查韦斯如今却在那个国家当政，还颇得民心。厄瓜多尔的议会曾指责一位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发疯”而把他赶下台，如今那个国家正陷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谁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巴西的货币在三周之内购买力跌落一半，伴随着这场通货贬值，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的威望也猛跌了。墨西哥有时看来是在朝向现代民主前进，有时又是背道而驰。哥伦比亚变成了彼此隔绝的一系列城市孤岛，它们

只有靠飞机维持不可靠的联系。那里至少有三支军队各自为政，一支是中央政府军，一支是共产党游击队，还有一支是准军事集团的部队。在同一时候，这三支军队又深浅不一地被第四支力量所渗透，那就是毒品贩子，他们用钱收买武器和人们的良心，手下掌握有成百上千的雇佣杀手。在巴拉圭，副总统路易斯·马丽亚·阿加尼亚与总统劳尔·库瓦斯为敌，遭对手暗杀，而库瓦斯也随即被赶下台，跟鼓吹政变的将军奥维多一起逃跑。但是何必还多费笔墨呢？简单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抑郁的周期之中。

无休止的讨论

拉丁美洲为什么未能像加拿大和美国那样取得发展成就，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一直是拉美知识界反复呈现的一个焦点。说法五花八门，人们可以各取所需。19世纪初，人们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遗留下的影响及其缺乏容忍心的天主教教义。19世纪中期，种种缺陷又归因于土著居民似乎好逸恶劳，反对进步。到20世纪初，尤其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后，人们说贫困和不发达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公平，首先是农民得不到土地。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愈益激烈地谴责“剥削成性的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佬帝国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出来一种看法，说拉丁美洲的虚弱是由于拉美各国政府虚弱，纠正的办法只能是将这些政府变成“经济的发动机”，让公务员变成企业家式的人物。

到了80年代——“失掉了的十年”——这种种诊断和主张都达到了危急关头，实际情况证明，尽管这些说法都各有一点道理，但全都说明不了问题。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这几个在50年代还低于拉美平均水平的穷地方在几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了，这证明拉丁美洲根本错误理解了繁荣的关键。于是我们又必然回到了那个老问题：过错在谁？

一个虽然只是局部但却可能站得住的答案是：过错在于“精英”，即那些领导和主管社会各主要公私部门的群体，他们的行动体现出一定的价值观、态度和意识形态，而这些东西就拉丁美洲而言并不是有

利于集体的进步。罪过并不在于哪一个人；应该为持久贫穷负责的，是那些在公私机构占据领导岗位的一大批人，即那些人中间的大多数。

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态度是进步的一大障碍这样一种看法，已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这些价值观和态度是怎样表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本章中，我想谈谈它们如何表现于六大类精英的行为，这六大类是：政治家，军人，企业家，教会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左翼人士。我希望一开头就说明白，把罪责仅仅加在精英身上是不公平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更广泛的社会反映。假如他们的行为全然背离广大社会的准则，他们就会遭到抛弃。此外，在精英人士内部，也有例外：有一些人是在努力，争取让那些把我们带到今天这般田地的传统行为模式有所改变。

政治家

让我们从政治家说起，因为他们是最抛头露面的。如今在拉丁美洲，政治家的名声相当不佳，所以人们一旦当选公职，都要表白一番，声明自己根本不是政客，而是别的什么：是军官，是技术专家，是选美王后，等等。总之，不是玩政治的。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公职官员当中存在着腐败而又不受惩罚，这已成为拉丁美洲处处可见的正常现象。它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典型的形式，即政府官员让某人赢得一个工程项目，或者听任某人违规牟利，就得到“佣金”和贿赂。

二是间接的形式，即腐败是让某个与自己结盟的人获利，而自己本人也许还是清白的。这样的例子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华金·巴拉格尔和厄瓜多尔的何塞·马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

三是收买人心的形式，它也是代价最高昂的一种，即耗费公款收买大量的选民。

如今，政治家仿佛不是当选后应奉公守法的公仆，而是相反，倒

像是胡作非为的专制君王，衡量他们的威望有多高，就要看他们违法乱纪的本事有多大。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本事，成了拉丁美洲的真正权力的定义。

事实在于，在拉丁美洲存在一种现象，即个人的忠诚应得到报偿，而是非曲直倒可以撇到一边。很大一部分拉丁美洲人要么是自己培育这种关系，要么是对此予以容忍。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中，忠诚很少超出亲朋的圈子。因此，公职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信任，公益观念很淡薄。由此而不可避免的就是，能报答盟友和同情者的政治家就是最成功的政治家。

诚然，这些丑恶行径并不是拉丁美洲所独有的。可是，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在这片地区发生得如此频繁，如此强烈。更令人担忧的是，对于这类行径以及干了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现象，人们竟然熟视无睹。拉丁美洲人似乎不明白，公职人员的腐败和无能是本地区贫穷的一个多么重大的原因，而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是人民自己。

军人

对于拉丁美洲的问题，军人差不多负有同样的责任。在先进民主国家，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在拉丁美洲，军人却常常自己承担起一项任务，即在政治家失败的时候挺身而出，救国救民，要么用武力行使军队式的社会正义，要么干脆自己执政，维持公共秩序。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都像是自己国土上的一支占领军。

一直有人说，拉美军人的行为反映出老宗主国西班牙的影响。可是历史事实是，当拉美各共和国于1810年至1821年间先后独立的时候，西班牙的政变还是个别情况，而且谈不上什么成功。后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造反事件是与拉美类似事件发生于同一时期，而不是在拉美事件之前。拉美军方领导人在19世纪挑起过数不清的内战，在20世纪又多次实行过长期的军事独裁，这实际上是一种拉美历史现象，它是与那种既不尊重法律又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集权主义心态相联系的。

自从19世纪初期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军事独裁就屡见不鲜，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赫图利奥·瓦加斯 [34] 领导下的巴西以及胡安·多明各·庇隆领导下的阿根廷，军人又自认为承上天旨意应该完成新的使命：促进由国家驱动经济发展，包括任命高级军官为国营企业的经理。实际上从未奏效的基本论点是：既然拉美国家机构软弱、混乱，只有军队凭借其庞大规模、传统和纪律，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现代工业，从而能够在20世纪的复杂工业世界上参与竞争。

军人参与国有企业，使拉丁美洲付出了惨重代价。像政治家一样，军官也变得腐败。他们保护下的企业扭曲了市场，而且往往过于膨胀，人浮于事。结果是效率低下，设备老化。

拉丁美洲虽然有过几位文人出身的国家元首（caudillos），例如阿根廷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和巴拿马的阿努尔富·阿里亚斯，然而绝大多数的元首是军人。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胡安·多明各·庇隆，阿纳斯塔西奥·索莫查，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菲德尔·卡斯特罗，均是如此。元首不单是一个靠武力执政的独裁者，许多的公民，实际上还有整个权力结构，都把镇压工具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完全交给了他。其结果不仅是有悖于民主的发展，而且从经济上看也是代价极其高昂，而且必然造成公私财产的混乱。

企业家

拉丁美洲政治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之一，就是人们常常把50%的居民生活于简陋棚屋艰难度日的贫困归咎于“野蛮的资本主义”。真正的悲剧却在于，拉美资本有限，而这有限资本之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掌握在肯冒风险、勇于创新的真正企业家手里，而是属于那些谨慎怕事的投机分子，他们宁愿投资于房地产，指望他们国家的经济如同植物般的增长将会使他们的房地产升值。他们不是现代的资本家，倒像是封建传统下的地主。

然而更糟的是，这些唯利是图的（mercantilist）企业家不是参与

市场竞争，而是与政客相勾结，指望靠政治庇护发财。^[35] 他们让腐败的政客分享利润，形成恶性循环，利润增长的同时，腐败也日益加深。他们收买海关寻求保护，结果引起物价上扬，消费者得到的商品和服务质量低劣。他们可以借口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规模经济，而买通官员取得垄断地位。他们还可以花钱买到减税免税、国家补贴、优惠利率、无需偿还的贷款以及低价套购外汇。

奸商与贪官朋比为奸的关系，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按基本汇率套购外汇，进口生产资料再卖给本国厂矿。在一些国家，美元有三种不同的汇率，只要买通了官员，就可以按基本汇率买进美元，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秘密地高价倒手卖出去，而进口物资时又是另一种汇率。这样一倒腾，利润就魔术般地翻番。他们越富，腐败也越严重。

这类官商勾结营私的行径，别处也有，可是在拉丁美洲出现得十分频繁和严重，而且干了坏事可以不受惩罚，人们对此听之任之，这种状况真令人心忧。人们似乎没有看到，奸商勾结贪官而获取的那些钱，归根结底是直接或间接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出去的，而且这类非法行径增高了总的交易成本，使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而使穷者愈穷。

事实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拉丁美洲还不曾经历过与政治民主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了解西方富国以及东亚越来越多的地方是以什么方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宗教界人士

在谈到应当为民众的不幸负责的精英时，不得不把宗教界人士也包括进来，这是令人痛心的。痛心，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宗教界人士都有过错，应当负责的只是那些通过布道反对市场经济而且为反民主行径辩护的人。痛心，还因为后一类宗教界人士这样做并非出自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为自己是主持社会正义，事实上只会让穷人永世受穷。这真是善心办坏事，引导人们走上通向地狱之路。

大致说来，天主教会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失去了它原有的大部

分财产，只剩下学校、医院和若干大众传媒。它原先曾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地主，如今却早已在经济领域不占重要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尤其是道义上的影响，也缩小了。它仍然可以让某些价值观和态度显得合情合理，也可以让它们变得无立足之地，从而对人们的贫富产生深刻影响。

当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或者“解放派神学家”或耶稣会教士们谴责“野蛮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他们是在宣扬谬误。^[36]他们所攻击的“新自由主义”其实不过是旨在缓解拉美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如削减政府开支，削减国有单位工薪总额，国有企业私有化，争取预算收支平衡，谨慎控制货币发行量——在拉丁美洲的干涉主义经济模式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广泛改善人民生活而遭到失败之后，采取这些措施应是纯属常识。受到宗教界强烈批评的这些措施，实际上与欧洲富国为了发行欧元而彼此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不同。这纯粹是为了实行一种明智的经济政策。

更糟的是，那些主教们，尤其是解放派神学家们，还谴责赢利动机、竞争和消费主义。他们为穷人的贫穷而悲叹，但与此同时却又宣扬拥有财产的念头是有罪过的，靠勤奋、节约和创新而取得经济成就的行为也是有罪过的。他们所宣扬的态度是与成功心理学背道而驰的。

在某些解放派神学家看来，只要存在着富国尤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贫穷就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出路是武装暴力——解放派神学领导人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就提出这种主张，而且从来没有公开收回这一主张。^[37]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抛头露面的程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也许这是来自法国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法国也是如此：一位作家或画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所有问题上的专家，可以评论任何事情，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试管婴儿受精的是与非，以及国

有企业私有化引起的灾难，等等。

我们拉美文化的这一特点本来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是它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我们的知识分子热情得很，对他们缺乏知识的每件事情都毫不谦虚地说三道四，吵吵嚷嚷，其代价是，他们反复说的话会成为形成拉美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因素。拉美知识分子当中的许多人是反西方、反美和反市场的，因而后果是严重的。不管他们的言论是如何地违反我们地球上20个最发达、最繁荣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仍然是深刻的。这些言论造成的后果，是削弱民主，妨碍人们对未来建立合情合理的信心。如果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可怕的革命前景，那么我们会毫不奇怪地看到资本外逃，人们会感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长久不了。

此外，知识分子在报刊和书本、电台和电视中发表的言论，会在拉美多数高等院校中得到响应。拉美公立大学中的大多数以及私立大学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古老储存所。他们至今仍在强调跨国投资的危险性，全球化的危险性，以及让市场力量去处理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所包含的邪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年青的大学生在大学里听了课，竟然又去联系一些从事颠覆活动的团体，例如秘鲁的“光辉道路”分子，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分子，委内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哥伦比亚的M—19运动，或者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些青年带进丛林、山区和城市街道的武器所用的弹药，正是来自大学的课堂。

在拉丁美洲，高尚体面的高等学府不多，一般的大学都不是办成独立的教学科研中心，而是无休止地重复一些陈腐、有害的理论。更令人心寒的是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严重脱节。这些学府似乎是存心向它们讨厌的社会模式造反，全然不考虑如何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去为真正的进步作贡献。尤其不像话的是，这些大学的经费由国库提供，花纳税人的钱，可是80%或90%的大学生却是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就是说，从钱少的人的口袋里掏钱，供钱多的人去花销。这些钱所维持的却是一些荒谬理论，它们只会让穷人永远穷下去。

左翼人士

这最后的一类精英，包括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工会人士，以及拉丁美洲特有的一些革命派。

诚然，拉丁美洲也有一些负责的工会，致力于工人的合法权益。可惜它们通常不占主导地位。在拉美社会处处可见的工会，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这些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亏本，提供劣质低效的商品和服务。有些教师工会闹罢工，只因为它们反对教师执行标准的能力测试办法。有些腐败的工会贵族把持职工退休基金和健康保险金，损公肥私。

有些工会不懂得现代企业必须灵活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有竞争力。它们坚持僵硬的劳资合同，使企业难于增减职工，或者一裁员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使企业失去竞争力，而且不愿雇用新人，导致失业增多。

至于那些革命派，是指这样一些激进分子：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任意胡作非为的特许证，能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违背法律。有些人只宣传革命，自己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推进革命。另有一些人则奉切·格瓦拉为守护神，认为自己从事政治暴力是天经地义，而不顾及自己的行动给别人造成什么后果。在他们看来，政府倒是非法的，该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打击。他们的手段有：学生罢课，街头暴乱，怠工，绑架，爆炸，以及游击战。

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派的行动给拉美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呢？这损失是无法计量的，但可以说，他们是拉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现有的财富造成了破坏，而且还因为他们打乱了拉美国家储蓄、投资、营利和再投资于生产财富这样一个漫长而又脆弱的过程。

总之，以上列出的这些精英群体，显然还不能涵盖所有的各种各样使拉丁美洲继续沦于贫穷和非正义状态的人。但以上这几类精英是很突出的。我的希望是：通过描述是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造就了

这些人，突出这些人的行为，批驳他们的论据，我也许可以为拉丁美洲的转变出一份力，使这些精英变成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首先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让拉丁美洲失去了希望的人们能够对自由、尊严、正义和繁荣的生活抱有合理的希望。

第六章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

非洲的苦境是触目惊心的：

·人们的预期寿命，在28国低于60岁，在18国低于50岁，在塞拉利昂仅为37岁。

·在撒哈拉以南的6亿多人口中，约有半数生活于贫穷之中。

·至少13国的半数以上成年人是文盲。

·至少18国的半数以上妇女是文盲。

·至少在28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00‰以上，而在塞拉利昂高达335‰。

·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2.7%，几乎是高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的4倍。

·在向世界银行提供收入分配统计数字的国家当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提供这类数据），有一些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是在非洲。在肯尼亚、南非和津巴布韦，最富的10%人口占有收入的47%左右；在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这一比重在43%左右。 [38]

·在整个非洲，民主体制显然是普遍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

尽管非洲人蒙受着这种种苦难，我还是要引用一位非洲政府部长

的一句名言：“在我们当政的时候，国家是在地狱的边缘；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我引述这番话，原因之一是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现状归咎于殖民列强。我们实际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了。然而今天非洲却更加依赖于富国；别人一只手给你一点东西，另一只手又拿走东西，对于这种花招，非洲无可奈何，在这一点上比任何其他大陆都不如。世界银行通常是经费和忠告的一大来源，如今也一筹莫展。只是一个结构调整计划（其效果如何尚有待证明），此外是一片沉寂。

显然有必要问问非洲的文化怎样了。非洲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这一文化是否适合人们个人和国家在21世纪之初所面临的需要？如果不适合，该怎样调整文化的方向，从而做到在国际大协奏中，我们不再走调？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我们是什么

一个人要评论自己，暴露自己的灵魂，从来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暴露非洲的灵魂就更不容易。因为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有许多，各不相同。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危险。一是把自己理想化和美化，以便显得更有分量一些。二是不说任何一句话，来揭开各种文化的人都给自己罩上的神秘光环。三是什么人有资格来代表我们大家说话呢？非洲有句谚语说得好：从井底看天的人只能瞧见天的一小片。

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可是它们不能阻止我们照照镜子。尽管认识自己是困难的，我们是不是敢于正视自己呢？

50个非洲，单一的文化？

我们早已习惯于把非洲看做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鉴于非洲像巴尔干半岛一样四分五裂，人们看到有的书的标题是《45个非洲》^[39]或《50个非洲》^[40]时，谁也不会感到惊奇。正如基—泽博在后一本书的引言中所说，“非洲是触摸得到的。那里也是有利可图的。”

只要描写一下非洲的多样性，就足以让奥林匹克滑冰冠军也头晕目眩。有人不同意，往往强调非洲不过是分为一个白非洲和一个黑非洲，前者在撒哈拉以北，后者在撒哈拉以南。可是南非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又如何呢？它们都有白人，虽居少数，却很有权势。在人种之分的屏幕后面，人们会迅速发现一个重大得多的多样性源泉：语言。有通行阿拉伯语的非洲，通行英语的非洲，通行法语的非洲，通行葡萄牙语的非洲，通行西班牙语的非洲，更不用说还有非洲原有的、与欧洲殖民者无关的好几十种语言。

我们不妨再跨越现今的国界，看看当年殖民者肢解非洲，把约鲁巴人、豪萨人、皮乌尔人、马林克人等一大批民族分割到了几个不同的国家，又会作何感想呢？如果我们按照表皮肤色和语言来看非洲的多样性，就会说这里有几千个非洲！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学家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说非洲有多少个部落，就有多少种文化？文化种类的数目是不是和殖民者划分的国家数目相符？从总的方面谈整体上的非洲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存在着多样性——大量的亚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从根本上看，仍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体制，它们将撒哈拉以南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还将撒哈拉以北的各国人民也联系在一起。这有些类似于英国的情形：尽管那里存在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亚文化，但没有人会怀疑还存在着一个英国文化。

非洲文化的这一共同基础的存在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人类学家们也怀疑从外面传入的宗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否真的影响了非洲自古以来的一些信念，或者是否让非洲人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有所改变。非洲的现代政权往往带有传统宗教礼仪的特点；占卜和巫术至今流行于宫廷。在非洲各地，宗教与社会之间的联结依然强劲。正如象牙海岸已故的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伊所说（他是一位天主教徒，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从非洲大主教到最平凡的天主教徒，从大巫医到最平凡的穆斯林，从本堂牧师到最平凡的新教徒，我们人人都有一段信奉泛灵论的过去。”^[41]

非洲文化是不容易领悟的。它不接受包装，也不让人将它加以系统化。下面的分类论述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有助于我们对非洲文化的现实有所理解。

等级距离

按照D·博林格和G·霍弗斯特德的看法，等级距离——社会的垂直度——在热带和地中海气候区通常是巨大的，群体的生存和增长受人为干涉的程度低于寒带温带国家。^[42]在等级距离大的国家，社会一般是静止的，在政治上则是中央集权。国民财富少，集中于精英手中。人们的心态世代变化微小。等级距离小的国家则相反。群体需要技术进步，因为技术更新快；政治体制上是权力分散的，以代议制为基础；国民财富雄厚，分配的范围广；孩子们能学习到他们的父辈从来不知道的东西。

在比较呈水平状态的文化中，部属认为他们的上级是跟他们相同的人；人人权利平等；法律高于权力。这导致人们相信改变社会体制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分配权力。在比较呈垂直状态的社会——非洲属于这样的社会——部属认为他们的上级是与众不同的，有权享有特权。权大于法，所以改变社会体制的最好办法是推翻当权者。

等级距离涵盖社会的许多方面（例如政治体制，宗教规矩，企业组织），所以它实际上足以解释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发达。然而，正如博林格和霍弗斯特德所指出的，法国、意大利（尤其是南部）和日本也是等级距离大的国家。

对未来的掌握

在某些社会，社会成员被迫认定未来是无法掌握的，过一天算一天。谈不上什么工作热情。人们容忍别人的行为和意见，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维持现状倒比较安全。

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受到的文化熏陶却是要征服未来。这导致人们焦虑不安，工作热情，积极进取。社会制度因而倾向于改变现状，

同时减少风险。

非洲除了最南一角以外，看来都是属于前一类社会，人们对未来的掌握很弱。要建立安全的社会，需要三个杠杆：技术，法律，以及宗教。我们也许会说非洲各国社会是有力掌握未来的社会，但可惜这一掌握仅仅是通过宗教。归根结底，如果说非洲人埋头于现在而对明天不大关心，那么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周围的社会结构安全，而是在于人们听天由命。

回头看宗教的根源，非洲人认为只有天神能改变永恒世界的逻辑。世界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由天意注定的，这天意早在神秘的过去授给了我们的开山祖宗，他们的智慧至今照亮着我们的人生准则。非洲人仍然是环境的奴隶，大自然是他的主人，决定着他的命运。

非洲人认为茫茫宇宙万物都是上天安排的，这一观念使非洲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观念。

不饶人的时间

非洲人将空间和时间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尼日利亚人说：“钟表并不曾发明人。”非洲人向来有自己的时间观，为此常常受到批评。例如，让—雅克·塞文—施赖伯写道：

在非洲，时间既有象征价值又有文化价值，怎样度过时间和感受到时间，非常重要。坦率地说，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说优点，是因为每个人以自己的韵律生活一段时间，是令人满足的，他们决不愿意放弃。可是这又是缺点，因为非洲人是处于与外国人的竞争之中，这些外国人工作方式却不同，在生产率水平上的竞争正是表现为更合理地利用时间。 [43]

塞文—施赖伯说得对。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人们通过讲故事和寓言赞颂祖先的光荣的过去，却不努力为未来作准备。非洲人扎根于祖先传下来的文化，深信过去只会自我重复，对未来却马马虎虎很少操心。然而，对未来没有一种活力强劲的时间观念，就没有计划，没有

预见，没有方案的制订；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项涉及未来事态进程的政策方针。人们不可能歌唱未来，因为我们的文化并没有教导我们对未来提出问题，反复思索，使未来服从我们的意志。可是在现代社会，人人都必须对未来作准备。否则，就会像塞文—施赖伯提醒我们的那样，坐不上前进的列车，到月底没有钱花，到晚饭时冰箱里没有可吃的东西，在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粮仓变得空空的。 [44] 总之，这关系到非洲的日常生活啊！

权力不可分

两三千年来，西方社会逐渐演变，已大体脱离了宗教的影响，导致政教分离，尘世上的事与精神世界上的事分开了。这一演变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出现，它当然仍有精神的一面，但不再受超自然力的干预。但是，在非洲，宗教的力量继续沉重地影响着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非洲领导人往往宣称他们具有神奇的力量。

非洲人畏惧身穿酋长衣袍的神，这一点恐怕是非洲人消极被动的一大原因。假如一位国王或总统遭遇袭击（即使是一次模拟的袭击）而安然脱险，全体国民就会推断说他有神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将权力与神力等同起来的习性，不仅适用于“国父”式的人物，而且适用于一般的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只要他一旦手里有点权，就会如此。随便找一个非洲人，给他一点权力，他大概就会变得自以为了不起，傲慢专横，不容人，唯恐失去他的特权。他时时刻刻提防别人，嫉贤妒能（能力不是选神的标准），残酷无情，直到有一天一道讨厌的命令任命了别的人来接替他为止。他结束自己的仕途生涯，会完全遵奉平庸做人的哲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我们的一些共和国里，你只要指出某一位政客或技术官僚如何卓尔不群，就足以永远断送他的仕途。）

非洲人不愿接受社会地位的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永远各居其位，所以阶级划分的变化往往受到谴责。人们常埋怨在我们的国家里兴办私人企业是多么困难。这种困难的根源在于，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因素是妒忌，这种心理与其说是想要得到别人拥有的东

西，不如说是想要防止社会地位的变更。

在非洲，你必须一出生下来就是统治者，否则你就没有当权的权利，除非是你搞政变。整个社会承认向当权的强人俯首听命是天经地义。有人争辩说，不发达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领导人。这说法既对也不对。如果非洲各国人民并不是不发达（就是说并不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和胆小懦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接受不发达的领导人？别忘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与之相称的领导人。

群体主宰个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列出非洲文化的一个特征，那么，个人服从于群体这一点肯定是值得记取的。非洲思想拒绝承认个人是一个自主的、负责的生物。从垂直方向看，非洲人植根于家庭，植根于老祖宗，即使说还追溯不到天神；从水平方向看，则是与自己所在的集体相连，与社会相连，与天地相连。非洲人是家庭的个人，社会的个人，一切与宇宙相连，只能通过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求得发展和兴旺。

我们怎样才能让个人恢复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使个人能够确立为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行为体，而同时又保存非洲人作为其生存实质的社会性呢？压制个人，是确保传统社会平等的根本办法，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最终的市场价格随假定的购买者购买力而定——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的传播是由口述的传统所垄断。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非洲人是不是故意避免使用文字，以确保压制个人主义。非洲思想还避免人们的怀疑主义，不让个人传播怀疑这一病毒。因此，既定的信念体系就保持其绝对地位。一旦祖宗传下来的信念受到了威胁，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要么恢复原有秩序，要么一团混乱。

在我们极其集中化的传统结构中，根本不存在个人责任的概念。在喀麦隆，“负责”一词译过去就意味着“头目”。假如对农民说他们应为一个集体举措负责，那就等于告诉他们全都是“头目”，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无休止的人际冲突。

个人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消失，这不但可以说明为什么像加纳总统杰里·罗林斯那样的人可以爬上去而民众却保持沉默，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瞧不起那些在等级制阶梯中居于中间的人。例如，在政府的一个部门中，人们都知道只有部长一人能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平常的小问题也得由他拍板。他手下的层层官员则都只是摆样子的。我们的部长对此毫无怨言。他们懂得不宜将权力分派给手下的人，那样做有危险，会鼓励一颗政治新星诞生，那新星最终可能成为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我们非洲国家，部落宗族主义盛行，既是因为个人作用遭否定，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法规而使个人处境很不牢靠。难道我们可以继续蹦蹦唱唱，集体滑向地狱，以维护一种假想的万众一心？或是相反，该让个人得到应有的种种权利？

过分的欢乐气氛和回避公开冲突

非洲人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人们爱好彼此宴请，吃吃喝喝，以显示社会的气氛欢乐。家里生了孩子，给孩子做洗礼，结婚，过生日，晋升，当选公职，长短旅行归来，办丧事，议会开会和休会，过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以及诸如此类的每件事，都是欢宴的借口。不论自己收入是多是少，不论家里粮仓是满还是空，宴席都要办得漂漂亮亮，客人越多越好。

请客的人要花钱，被请的客人也得花一份钱，才能踏踏实实地分享主人的快乐或悲伤。社交是人人的一大美德；的确，非洲人把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要等到事实证明情况是相反时才改变。友谊重于公务或商务；在业务会谈中，若开门见山谈问题的实质，是不礼貌的。非洲人需要无穷尽的彼此沟通交流，视人际亲和重于内容。非洲办事机构效率低下，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人们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时，都是想方设法直接与有关的负责官员面谈，避免冷冰冰的信函往返。

在别的地方，解决意见分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在非洲，人们却回避分歧，以维持表面上的社会团结。非洲人总想在脆弱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和平，因而设法避免冲突——可是非洲却总也摆脱不了冲突。在某些非洲地方，避免冲突意味着司法部门不能在白天工作。在喀麦隆西部一些巴米累克人村落，正式的公安和司法单位都是秘密的，只在夜间开会。它们的工作人员都戴面具，以防止别人认出他们是谁。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冲突。可是我们却想把冲突扫到地毯下面掩盖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又做得十分不成功。

效率低下的经济人

在非洲，人品高低是看他内在的价值和出身。如果说非洲人不大节俭，那就是因为他在世界观上不重视——太不重视——生活的财经性一面。除了喀麦隆的巴米累克人或肯尼亚的坎巴人等几个群体以外，非洲人作为经济人是很差劲的。衡量一个人的尺度，不是看他“有”什么，而是看他“是”什么。此外，由于上文中谈到的时间观念，非洲人优先考虑的是眼下怎样消费，而不是如何为未来储蓄。有定期薪金收入的人想攒钱也难，他不能不出钱供自己的弟兄们、堂弟表弟们、侄儿侄女们上学，安排新来者食宿，以及参与那充满社会生活的大量请客送礼活动。

毫不奇怪的是，城市精英阶层也欣赏这种奢侈传统，表现得如同暴发户。他们当然有办法大把捞钱，主要是从国库捞钱，而大把花钱的习惯不仅让亲戚朋友得到实惠，还让瑞士、卢森堡和巴哈马的银行得到好处。非洲国家的政府在理财方面显然不比非洲的个人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非理性主义的高昂代价

今天，魔术和巫术盛行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笼罩在紧张、恐惧和道义混乱的气氛下。非洲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讲究调理冲突和维持现状，而在这方面以妖术作为机制，是代价高昂的。因此，是

否可以说巫术是反映我们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这一点的表现是很多的。巫术既是实行社会强制的一个工具（用以维持甚至强化个人对氏族的忠诚），又是一种很方便的政治工具，用来消灭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抗。对于我们来说，巫术是一种心理庇护所，我们的种种无知都从它找到答案，我们最离奇的幻想都由它变成现实。

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基督教传入以后，远远没有结束非洲的巫术，反而使巫术显得更加有理了。圣经和白人神父承认撒旦的存在，这就肯定了巫士和其他旁门左道的说法。

教派在非洲很流行，它们通常以其头目或先知的魔力为基础。贝宁是宗教势力特别强的地方，也是海地和巴西的伏都教的摇篮。1981年至1986年，贝宁就冒出了58个新的教派，使该国教派总数达到了92个。在肯尼亚，教派大概多达1200个，某些农村地区里教堂比学校还多。某些教派的先知在街道上设有“殿堂”，生活富裕，他们自称能识别恶鬼。另一些人能保佑人们免病消灾。还有一些教派头目能帮助你保住职业和增加收入。

我常常谈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卡车运输队的老板科姆博，他的卡车在象牙海岸和布基纳法索跑买卖。科姆博认为除了欧洲式的预防措施，即车辆定期检修以外，还必须采取非洲式的预防措施。什么措施呢？原来，他的巫师给他刺鲀粉，让他把刺鲀粉撒进车胎以防止被戳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刺鲀这种鱼受到攻击时，身体就会膨胀一倍。所以巫师说刺鲀粉对于保持车胎气压大有好处。

巫术的势力还延及政府。非洲的总统们身边常有一群巫师。政治上不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总统都会求教于巫师。他们是神秘的高参，要确保当局平安，及时发现和消灭可能出现的手。他们的权力之大，连最有影响的西方政府顾问也会自叹弗如。巫师们往往会敛财，有时还直接出任官职，行使权力。

足球是非洲人的兴奋剂，它跟政治一样，也受巫术影响。曾流传一时的一个故事说，在一次非洲杯足球赛中，阿比让的雄狮队输给了埃及队，因为雄狮队的队长在上半场快完时突然失去了他的魔力。全

队努力找，到底也没有找回来。大家都相信，是埃及人发现了这一魔力，设法使它消失了。埃及人靠这一骗术赢了球，2：1。

在21世纪之初依然浸沉于非理性主义的，当然不只是非洲人，可是我们至今仍将解决问题的责任托付给妖士巫师，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让—弗朗索瓦·雷维尔就问道：“不用理智指导自己的人，能是理智的人吗？”^[45]在我看来，非洲人并非不理智，只是对自己的理智用得最少——只要乐于听天由命过日子就行。非洲拒绝将知识与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真正文化特性起作用，就表现为雷维尔说的：“给我们以津贴为形式的发展吧，这样我们就不必费劲去有效地面对现实了。”^[46]正是由于同样的文化，我们就可以有权利从事低效率生产，有权利搞腐败，有权利藐视基本的人权。

相互残杀的和极权主义的社会

非洲人彼此之间干了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种族灭绝，血腥内战，暴力犯罪泛滥，表明非洲社会从各个社会层次来看，都是程度不等的食人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和负责执行法律的人，恰恰是践踏法律的人。例如，在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从独立之后的一天起，都颁布了吸引外国投资的投资法规，可是非洲的有钱人却争先恐后把钱存到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银行，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产品毫无信心。他们的表现就是用自己的手拆毁自己所建设的东西。

真相很快就明白了。从内部来看，非洲社会就像是这样的一支球队：队员们彼此作对，缺乏团队精神，一个人不给另一个人传球，因为怕那另一个人破门得分。我们还怎么能指望胜利呢？在我们的一些共和国，各部族自成“水门汀”（其实再仔细看看，这些“水门汀”也是有許多孔隙的），“水门汀”之外的人彼此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所以国家竟然还能存在，简直是一个奇迹——能有这一奇迹，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还想要利用这个国家的存在谋取私利。人们很难指望一个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若有人发挥主动性努力干，会受到谴责，说他是想要自己发财。巫士们主张的是大家守穷的平等。有人盖了一幢房

子，别人就叫他别住进去；有人开始建设，别人就叫他停工，否则性命难保。像这样的事例多得很。

非洲的极权主义是随独立而来的吗？当然不是！它早已存在，镌刻于我们部落文化的基石之上。极权主义渗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宗教。它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面对着这样一种强大的、僵硬的文化，我们怎样才能改变非洲的命运？我们要么求变，要么灭亡，别无他途。

文化与变革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保存非洲文化，这一现存的最富人情味的文化之一。但是它必须得到新生，要从它内部发动这一过程，让非洲人既保持为非洲人，而又同时跟上时代。我们必须保留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观，例如：不分老幼、不分贵贱的团结；社会交往；不分肤色的睦邻友好；保护环境，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内部那些阻碍我们掌握未来的东西，而我们的未来应是富裕和公正的，应是人人参政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文化是制度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体制有赖于我们文化的变革。

我们必须引导的四场革命

我们需要在教育、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四个方面进行和平的文化革命。

教育。非洲儿童接受的传统教育，是为了培养他们纳入自己的部落群体。给孩子们灌输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年龄和性别惯常的习惯，而且有作为他们所属的群体文化基础的种种价值观和信念。教育首先被当作一种社会化工具，按照传统，孩子们是接受整个群体的教育。问题在于，这种制度提供不了什么动力来促使孩子们自强、创新和力争胜过自己的父母。

这种教育制度受到保守文化的强力束缚，又苦于基础设施和教学设备的不足（例如，一个教室里挤着的学生往往多达125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改革这种制度呢？办法很简单，就是要确立教育绝对优先的地位，不允许宗教设施和宫殿的建设挤掉学校的建设，同时修改教学内容，不但要突出科技教育，而且尤其要让学生明白非洲社会必须有什么变革。这意味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倡跨部落的地区团结和非洲团结，合理地开发动手和动脑筋的能力，而且全面地培养进步心、想象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发挥创造性、掌握专业知识和本领、富有责任感以及乐于完成任务等素质。

非洲学校应当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将来能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只得到一个学位就去担任闲职。从小学时候起，就应该让非洲的青少年养成办事讲效率的时间观念，将来不仅抓紧生产，还及时安排基础设施和设备的保养维修。与那些强调一党制有利于国民团结以及“国父”英明伟大的课程相比，技术保养课程显然更加重要。

还要作更多的变革。非洲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也必须改变。现在妇女无权在银行存款、贷款或拥有财产。她们没有发言权。尽管妇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力，她们却基本上受不到农业教育，得不到农业信贷和技术指导，等等。

像别的地方一样，妇女的解放是衡量非洲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最佳尺度。如果非洲的妇女不自由，无法担负责任，那么非洲的男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独立站起来。

政治。一旦教育改革了，非洲的政治体制就会随之改变。新型的公民将会出现，个人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有价值的社会行为主体，能适应自己所处的体制环境，满足群体进步的要求。非洲民族的多样性，应扩展到政治上的多元性。他们应养成容忍心，强调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应以非洲的团结取代民族主义。

经济。为了使经济文化发生革命性转变，我们必须懂得不能依赖那种实际上将我们排除在外的世界市场，而应当建立我们自己的联合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利润是发展的引擎。我们必须承认个人首创精神

是必不可少的，个人应当有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应懂得，没有充分就业，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经济增长。所有非洲人都应该有工作可做。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失业后当个好公民。在缺少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尤其如此。

社会生活。如果非洲人的行为没有质的改变，就不会有非洲的文明社会。这改变首先是在非洲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同时也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不再自卑。我们应增强自信心，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致力于进步而让人人受益。我们需要更严格地系统地制订发展战略，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加以贯彻实施。

结 论

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非洲已经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应当促使我们猛省，必须行动起来，不再延误。我们必须透彻审视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习俗，铲除那些妨碍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污垢。我们必须自己努力进行这样的思想革命，否则就不可能有技术转移。我们必须把赌注押在我们的智慧上面，因为非洲人如果有了能干的领导人，完全能够努力摆脱妒忌心，摆脱自己对非理性主义的盲从，摆脱消极无为的心理。欧洲只是地球的一角，人口占世界人类的很小一部分，却能够站稳脚跟，控制世界，利用世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只是因为它建起了一种严格办事、努力进取和求胜的文化，摆脱了那些幽冥势力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第二部分 文化与政治发展

第七章 文化与民主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根据韦伯学说的传统，弗朗西斯·福山（1995）、劳伦斯·哈里森（1985、1992和1997）、塞缪尔·亨廷顿（1996）和罗伯特·帕特南（1993）认为，文化传统是持久的，影响着今天各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而现代化理论家，从卡尔·马克思直到丹尼尔·贝尔（1973、1976），还有本文作者（1977、1990、1997），则认为工业社会的兴起是与文化脱离传统价值观体系的连贯的转变相联系的。^[47] 本文将论证两种论点都是正确的：

·发展是与一系列可预见的从绝对社会准则转向日益理性、宽容、信任和后现代的价值观的转变相联系的。

·但文化是轨道所依赖的一个因素。从社会和历史上看，有基督教新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儒学社会等，由于这一事实而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区域，有着非常不相同的价值观体系，当我们对照经济发展的作用时，这些价值观体系始终存在。

不同的文化区域的存在，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助于形成从人口出生率直到经济行为的种种重要现象；本章还将表明，它们影响到民主体制的形成。对于民主而言，各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一些重要方面尤其起重要作用。我们将看到，各社会的一大区别在于有的社会强调“生存价值观”，有的则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强调后者的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强调前者的社会。

经济发展似乎能促进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因此较富的社会更有可能民主化。我们从下文将会看到，生存价

价值观或自我表现价值观与民主之间的关联是相当强劲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容忍，以及参与决策）是否能促进民主？抑或是民主体制引起这种价值观的出现？要判断这一因果关系总是不容易的。但有迹象表明，主要是文化影响民主，而不是相反。

现代化与文化区域

亨廷顿（1993，1996）认为，世界分成八九个主要的文明，其基础是持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文化差别。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将发生在这些文明分界的断层线上。

这些文明大体上是由宗教信仰传统形成，这种传统今天仍然是强大有力的，尽管存在着现代化的力量。主要的文化区域有西方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区域，以及儒学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区域。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结束，政治冲突将主要发生于这些文化的分界线上，而不在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分界线上。

与此相关的论点有：帕特南（1993）声称，在意大利，民主体制今天发挥作用最成功的地方，是文明社会几百年前就已经相当发达的地区。哈里森（1985，1992，1997）认为，发展受到社会基本文化价值观的强烈影响。福山（1995）说，社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决定于社会信任：“低信任”社会处于不利境地，因为它们在发展大的、复杂的社会体制方面效率较低。以上这些分析都反映出一种见解，即各种当代社会的特点在于以往长期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些特性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表现有重要的影响。

这种见解有多大的准确性呢？

另有一批重要文献提出了一种似乎与此不相容的观点。现代化理论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认为世界是以侵蚀传统价值观的方式在变化。经济发展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宗教、狭隘地方观念和文化差异的衰退。

本文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这是一批学者成立的一个组织，已调查过65个社会，涉及世界75%的人口——三批调查的资料，证明上述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经济发展是与一系列可预见的从绝对社会准则转向日益理性、宽容、信任和后现代的价值观的转变相联系的。但文化是轨道所依赖的一个因素。各社会从历史上看，有基督教新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儒学社会等，由于这一事实而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区域，有着非常不相同的价值观体系，当我们对照经济发展的作用时，这些价值观体系始终存在。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与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我们将集中谈其中的一个现象：它们与社会能实行政主体系的程度有非常强劲的联系，关于这一程度，“自由之家”对许多社会1972至1997年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状况作过评估。在论证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尽管经济发展往往会带来系统的文化变革，但持久的各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传统价值观与理性—法制价值观；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各文化间差异的两个关键层面

要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对比各种文化，就需要作大量的数据简化工作。“世界价值观调查”已衡量数百个价值观（可以设想将会调查的会达到数千个），若要一个个挑出来，供八九种文明作对比，那将会是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有意义的数据简化过程，需要用一种比较简单的结构来表明各文化间的差异。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结构是现成的。幸好，我们似乎还可以找到这样的结构。

本文作者在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第三章中，分析过“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1991年对43个社会所作的调查之中的国家层次上的综合数据，发现了各文化间大量的和一贯的文化差异。富裕社会人们的世界观系统地不同于低收入社会人们的世界观，这涉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准则和信念。因子分析显示出有两个主要的层面，它们连接了大量的变量，说明了半数以上的各文化间差异。这两个层面反映各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是对待权力的传统态度

与世俗—理性态度之分，一是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之分。按照这两个层面，就有可能在全球文化地图上给每一个社会定位。

本文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可用以衡量各文化间差异的可比尺度，它们能运用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所有三批调查资料，而且适用于个人层次和国家层次。这使我们能够沿着上述的两个层面审视一段时期的变化。本作者早先的分析（1997）采用过以1990—1991年调查中的22个变量为基础的因子分数。我们挑选了一套包括10个变量的子集，它不仅在这两个层面上有很大分量，而且按同样的格式应用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所有三批调查之中。这一子集是用来最大限度缩小数据不全的问题（若一国缺少一变量，该国就完全不纳入我们的分析）。

按照项目缩小了的这一子集而分析得出的因子分数，与早先用22个项目分析得出的因子分数（见英格尔哈特，1997）高度相吻合。我们在这里采用的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层面，与11个变量基础上的可比较层面所得出的因子分数，几乎是完美地相吻合；生存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层面亦是如此。我们接触到文化间差异的一个健全的方面。

这两个层面各自连接到涉及几十个基本价值观和观念上的文化间差异的主轴线。传统/世俗—理性的层面首先反映出宗教居重要地位的社会与宗教不居重要地位的社会二者的对比，但它还接触到许多的其他事项。其中重要的主题是强调家族联系的重要性和服从权力当局（包括相对而言接受军政府统治），还有避免政治冲突，强调意见一致重于对抗。处于传统一端的社会强调宗教、绝对标准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主张维持大家庭；否定离婚；反对人工流产、安乐死和自杀。他们重视的是社会整合，而不是个人成就；赞成意见一致而不赞成公开的政治冲突；主张顺从权力当局；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主义观念。居于世俗—理性价值观一端的社会则在这些事情上均持相反看法。

在我们审视的60多个社会中，上述的倾向性都很明显。尽管我们

有意挑选了范围广泛的事项，情况依然如此。我们本来可以只挑选与宗教有关的5个项目，那样就会出现更紧密的相关簇，然而我们的目标是衡量文化间差异的广泛的方方面面。

遵从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在客观世界中产生重要的后果。例如，强调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在人口出生率方面就比强调理性—法制价值观的社会高得多。

生存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这一层面，涉及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一些题目。它的主要成分之一是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两极对比。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对比关系到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变化，从强调经济安全和物质安全转向日益强调自我表现、主观康乐和生活质量。（见英格尔哈特1977，1990和1997）这种文化转变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皆有所见，它出现在那些已经不为生存操心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较年轻人的身上。自我表现的价值观关系到人们日益强调环境保护、妇女运动以及日益要求参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决策。过去25年来，这些价值观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工业国都日益普遍，这一过程具有大量的时间序列证据。然而这还只是更广泛的文化差异层面的一部分。

强调生存价值观的社会表现出个人主观康乐处于相对低水平，人们健康状况较差，人际信任程度低，对外人容忍性较差，对男女平等的支持不力，强调物质主义价值观，高度相信科学技术，环保积极性较低，比较赞成集权主义政府。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的社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均态度相反。社会是强调生存价值观还是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会产生重要的客观效果。我们将会看到，与强调生存价值观的社会相比，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的社会成为稳定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全球文化地图：1995-1998年

现在让我们看看，根据我们刚刚谈到的由因子分析产生的两个层

面，我们调查的65个社会定位在什么地方。这里的全球文化地图（见图7.1），纵轴线标示从传统的权力观一极到世俗理性权力观的一极，横轴线则标示从生存价值观一极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一极。图中各类国家之间的界线是参照亨廷顿（1993，1996）提出的文化区域而标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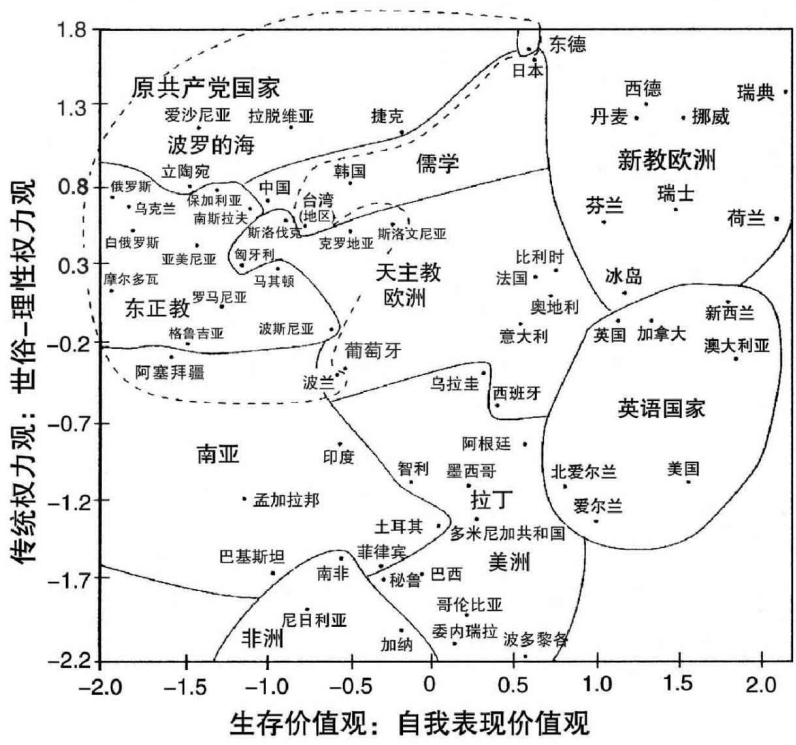


图7.1 65个社会在文化间差异两层面上的位置

注：每一轴线上的标度表明各社会在相应层面上的因子分数。

资料来源：以下50个社会资料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5—1998年的调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土耳其，孟加拉邦，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英国，东德，西德，瑞士，挪威，瑞典，芬兰，西班牙，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波兰，保加利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地亚，南斯拉夫，马其顿，尼日利亚，南非，加纳，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秘鲁，波多黎各，乌拉圭，委内瑞拉。而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比利时，丹麦，冰岛，北爱尔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资料则是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的调查。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数据不全，其图上位置系估计而定。

这一地图与我们根据1990—1991年的调查所绘出的地图（英格尔哈特，1997）颇为相似。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拉丁美洲、儒学、非洲和东正教这几个各不相同的文化区域，反映出每一种文化区域内的各个社会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里的调查只包括很少几个伊斯兰教社会，它们一般都位于此地图的西南角。

正如韦伯、亨廷顿及另一些学者所言，宗教传统对这65个社会的当代价值观体系有持久的影响。但宗教不是形成文化区域的唯一因素。一个社会的文化反映出它的全部历史遗产。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一个共产主义帝国的兴衰。这一帝国一度统治了世界上1/3的人口，给这些人的价值观体系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东德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40余年，它在文化上仍然跟西德差不多，然而在价值观体系上却向共产主义区域靠拢。中国是儒学文化区域的一员，但又属于广泛的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区域。阿塞拜疆亦与此相似，它虽是伊斯兰教区域的一部分，但受共产主义文化区域控制了数十年。

殖民地经历的影响在原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拉丁美洲文化区域表现得很明显。同样的因素还能说明为什么存在着一个英语区域，它包括英国和其他讲英语的社会。本文谈到的所有七个讲英语的社会在文化上均有相似的特征。我们在1995—1998年之前不曾调查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价值观体系，但本文作者曾在1990—1991年资料中指出它们属于英语文化区域。从地理位置看，它们远在半个地球之外，但在文化上，它们却是与英国和加拿大相毗邻。

曾是殖民地的社会若有大量人口是从原宗主国社会移民而来的，后者在文化上对前者的影响就尤其强烈。在上面的文化地图上，西班

牙和意大利属于天主教区域，乌拉圭和阿根廷属于拉丁美洲区域，但它们的位置在这一地图上靠得很近，尽管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相距遥远。这就是因为乌拉圭和阿根廷的人口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同样，托姆·赖斯和简·费尔德曼（1997）指出过，美国一些少数民族群体虽然已经移居美国两三代人之久，但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与他们祖先所在的社会相近。

文化区域有多么真实？

在图7.1中，每一社会的位置是客观的，是根据价值观调查资料的因子分析而确定的。但图上标示的区域界线是主观的，是参照了亨廷顿对世界文化区域的划分。这些文化区域有多么“真实”呢？这些界线本来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画法，因为这些社会受到了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有些界线有互相重叠之处，例如，原共产党国家区域就与新教、天主教、儒学、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这几个文化区域有若干重叠。又例如，英国是位于英语区域和新教欧洲区域交界之处。调查资料表明，英国与五个英语社会相近，所以我们把它划入这一区域。但若对资料稍作修改，英国就可以划入新教欧洲区域，因为它在文化上也与那些社会相近。现实是复杂的。英国既是新教社会，也是英语社会，调查所得的实证资料对现实的这两个方面均有反映。

同样，我们在所有拉丁美洲社会的周围画上了一道界线，因为按照亨廷顿的推论，它们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从全球角度看，拉美的十个社会确实表现出相似的价值观。但是，若稍作修改，我们就可以划出一个西班牙语文化区域，把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包括在内，因为从实证资料看，它们也与拉美社会比较相近。或者，我们还可以划出一个更广的天主教文化区域，把拉丁美洲、天主教欧洲以及菲律宾和爱尔兰都包括在内。以上几种区域划分从概念上和实证上看，都可以说是合理的。

图7.1是根据基本价值观的相近或相远而制作的，但它也反映出这些社会在其他许多层面上的远近，这些层面包括宗教、殖民影响、共产党执政影响、社会结构和经济水平等。图7.1可以说是相当好地

综合反映了许多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影响。然而这种种因素并不总是贴切地相吻合，所以图上出现了若干明显的反常现象。例如，日本和东德在图上的位置彼此靠近。当然，它们都是高度世俗的社会，比较富裕，产业工人占很高的人口比例，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位置相近是合适的。可是日本社会受儒学遗产影响，东德社会则是受新教影响，从这一点看，它们位置相近就显得不合适了。（不过，哈里森〔1992年〕曾指出，儒学文化和新教文化二者之间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

尽管有若干明显反常现象，但具有共同文化遗产的社会总的说来还是出现在共同族群。然而，它们的位置也反映出它们的经济水平、职业结构、宗教以及其他的重大历史影响。它们在这张两层面图上的位置反映出多层面的现实。这些不同层面的状况相当协调，这看来表明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它的整个经济和历史遗产所形成的，而文化又对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发展看来对文化价值观有强烈影响。富国的价值观体系系统地不同于穷国的价值观体系。图7.1的总体布局反映出从低收入社会（靠近该图左下角）到高收入社会（靠近该图右上角）的逐渐上升梯度。

图7.2展示了这一点。它是在图7.1基础上加工绘制的，将图上的65个社会划分成4个不同的经济区域。有19个社会，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5000美元以上，它们从两个层面看，都分数比较高，在图中右上方形成一个区域。这一经济区域跨越了新教社会、原共产党国家、儒学社会、天主教社会和英语社会这5个文化区域的界线。相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以下的社会，全集中于图中的左下方，这一经济区域与非洲、南亚、原共产党国家和东正教这4个文化区域相交。有迹象表明，不论各社会文化遗产如何，经济发展一般说来都是推动它们向共同的方向前进。然而，在工业革命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各文化区域依然有着自己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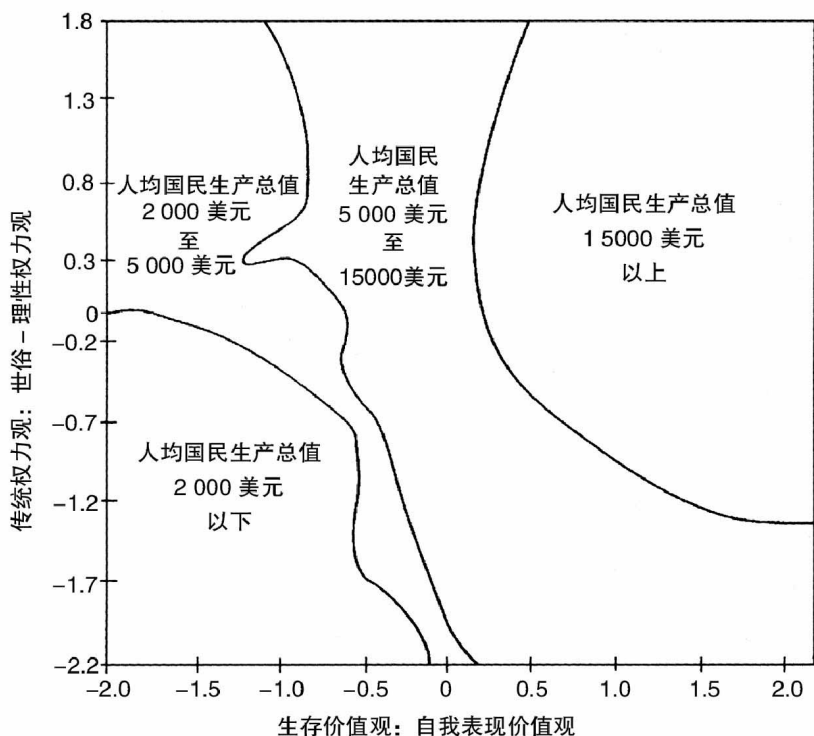


图7.2 在图7.1基础上叠制的65个社会经济水平

注：图7.1所示的65个社会中，除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其余64个的位置均符合于本图划分的经济区域。

资料来源：经济水平是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折算的；见该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第214—215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马克思指出过，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是现代史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进一步看，从劳动力性质的变化，可以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贝尔1973，1976）这样，对图7.1和图7.2中的界线，又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农业劳动力比例高的社会，位置偏向于下方，工业劳动力比例高的社会偏向于上方，而服务业比例高的社会则靠向右手一边。

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当社会在经济上发展时，其文化通常会朝着可预测方向转变。我们的调查资料是与这一预言的涵义相吻合的。经济上的差别与文化上大量的、普遍的差别相联系。然而我们还是看到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了长期形成的文化区域的存在。我们利用最近调查每个社会所得到的数据，设立了一些哑变量，对照图7.1中的每一族群，来反映某一具体社会是否主要属于英语社会、原共产党社会等。对这些变量所作的实证分析表明，各社会的文化位置排列远远不是杂乱无章的。图7.1中9个文化区域中，有8个从统计上看至少是与该图两主要层面中的一个有重大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天主教欧洲族群；它本身是相当连贯的，但在两主要层面上均居于中性位置）。

这些文化族群是否简单地反映经济上的差别？比方说，新教欧洲的那些社会是否单纯地因为它们富，所以才有类似的价值观？答案是：否。当我们通过多重回归分析对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力结构时，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英格尔哈特和贝克，2000）

为了看看这些族群有多大的连贯性，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论述文化间差异的文献中谈到的关键变量之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这一层面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詹姆斯·科尔曼（1988，1990）、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尔巴（1963）、帕特南（1993）以及福山（1995）都认为，要建立民主体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以及作为大型经济企业的基础的复杂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图7.3表明，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历史上属新教的社会，得分均高于历史上属天主教的社会。即使对照经济发展水平时，情况依然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二者之间有很大连带关系，然而，即便是富裕的天主教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一点上，也不如同等富裕的历史上属新教的社会。

共产党统治的经历也对这一变量有影响。几乎所有的原共产党社会均得分较低。像东德和拉脱维亚这样的社会，历史上原属新教社会，后来经历了共产党统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变低了。信任度

较高，即35%以上的公众信任大多数其他人的社会共19个，其中14个是历史上属新教的，3个是受儒学影响的，1个是以印度教为主的，而历史上属天主教的只有1个（爱尔兰）。在图7.3中位置最低的10个社会中，8个历史上属天主教，而历史上属新教的一个也没有。

在这里顺便指出，这些调查结果，与S.M.利普塞特和G.S.伦兹为本书撰写的第九章谈到的透明度国际的调查结果“腐败感指数”有着显著的吻合。

在各社会内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上是相等的。这种信任度不是个人的人品问题，关键在于各民族的共同历史经历。正如帕特南（1993）所指出的，地位平行的、受当地分散监控的组织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大型的、等级森严、集中控制的机构则似乎会损害这种信任。从历史上看，罗马天主教会是等级制、集中控制的机构的典型，而新教教会则是相对说来权力分散的，较多地接受当地的监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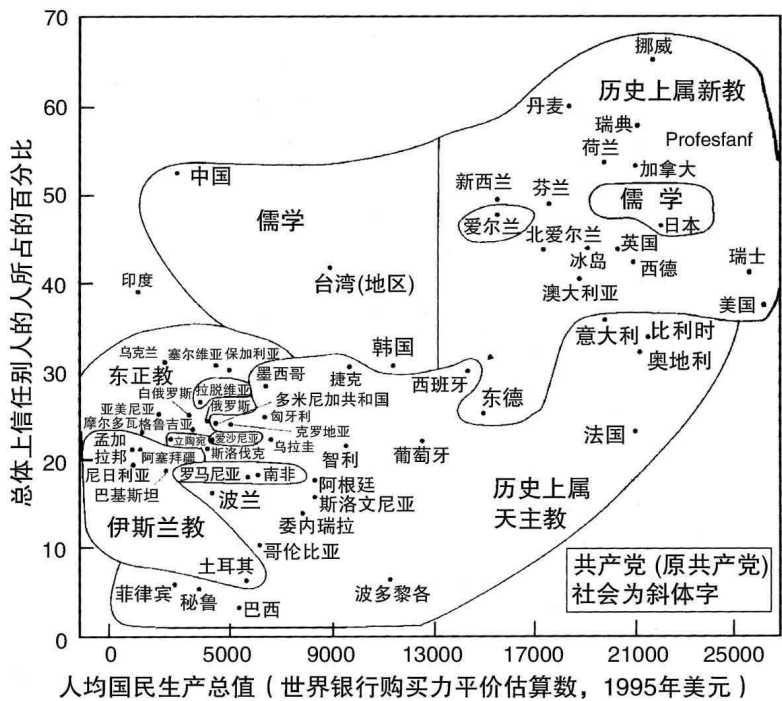


图7.3 按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传统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信任： $r = .60$ $p < .000$

是受当地监控，还是受控于一个遥远的统治机构，这一区别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有着重要的长远的后果。显然，这种文化间的差别并不反映有关教会在现今的影响。近数十年来，天主教会已有很大改变。此外，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新教国家，已经只有很小一部分居民还经常上教堂做礼拜。大部分人今天与教会很少联系或全无联系。然而，在历史上受到天主教或新教强烈影响的社会的生活，仍然会有这种历史的印记。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不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或是非基督教徒，都会受到这一社会文化的影响。

新教社会和天主教社会今天展现出不同的价值观，主要是由于相关教会对整个社会的历史影响，而不是由于教会现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德国、瑞士和荷兰列为历史上属新教的社会，即它们的社会在历史上是受新教的影响，尽管在今天由于人口的迁徙以及新教徒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较高的世俗化率，它们国内现有的天主教徒可能多于新教徒。

文化与民主

在阿尔蒙德和维尔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于1963年出版以后，关于政治文化与民主二者有联系的观点曾产生巨大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在70年代又不再风行了。政治文化的论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实证问题：各个具体的社会是否具有能促进民主的政治文化？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种论点带有“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味道，因为它声称某些文化比别的文化更有助于民主。正确的理论应当是坚持所有的社会均同等地有可能成为民主社会。让一种理论适应一特定意识形态的需要，就可能造成一种不符合现实的理论；因此而作出的预言最终就会出错；对于那些在现实世界中试图解决民主化问题的人而言，这样的理论会产生误导。

到90年代，从拉丁美洲到东欧直到东亚的一些观察家发现，在他

们遇到的民主化问题中，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仅仅制定出一部民主的宪法是不够的。

关于民主的大多数实证分析中，都省略了文化因素，其部分的原因在于，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可靠的衡量尺度来测定文化因素在较多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当有的学者，如本文作者英格尔哈特（1990）和帕特南（1997），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时，文化因素看来是起重大作用的。

经济发展能导致两类有助于民主的变革：

·经济发展会转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带来城市化、民众教育、职业专业化、日益增多的组织网络和较广泛的收入平等，还有各种相关的事态发展，它们都会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日益升高的专业化和教育水平会使劳动力具有独立感，专业技能还使工人们有较大的讨价还价力量来对付精英阶层。

·经济发展还会促进一些有助于稳定民主体制的文化变革。它会促使人们养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容忍，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推广而使人们高度重视其自我表现和参与决策的权利。由于经济发展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就会使政府当局具有合法性，从而在困难时期也能坚持住民主体制。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政体都需要的一种资产。而对民主政体来说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压迫性的专制政权即使缺乏民众支持也仍然可能维持下去，但民主政权非有民众支持不可，否则就会在选举中败北下台。

一种政治体制的成功可以使民众支持在职的领导人。就短期而言，这种支持的依据是“你近来为我做了些什么？”但是，如果一种政体的政绩从长期来看是好的，它就会得到“漫射性支持”（伊斯顿，1963），即民众普遍认为这一政治体制本质上是好的，而不论其当前表现如何。这样的支持能熬过困难时期。

我们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就有可能从世界范围检验一下这一命题。图7.4的横轴线显示各社会在生存价值观/自我表

现价值观这一层面上的位置，纵轴线显示“自由之家”1972年至1998年对各社会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状况的评分，由此图可以明显看出相关价值观指数与民主水平的相互关联。这一关联是很强劲的。它显然不是方法学上的玩弄花招或巧合。因为这两个变量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衡量而来，而且它们的来源也完全不同。几乎所有的在生存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层面上得分高的社会都是稳定的民主社会；而在该层面上得分低的社会，则几乎全都有集权的政府。在本章中，我们打算阐释这中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当我们参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时，图7.4所表明的强劲关联也依然存在。让我们看看几种主要的可能的解释。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民主体制引起了自我表现的价值观的发展，二者关系密切。换句话说，民主使得人们健康，快活，有容忍心和信任心，而且注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至少是在年轻一代当中）。这一解释对人们极有吸引力。它为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而且言外之意是我们可以迅速解决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采用民主体制，从此就生活幸福。

可惜，这种解释对于原先在苏联统治下的那些社会就说不通。自从他们1991年后剧烈转向民主制以来，人们并没有变得更健康，更快活，更有容忍心和信任心，或者有更多的后物质主义。对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来说，情况倒是恰恰相反。拉丁美洲的民主宪政不稳定的境况，又是一个例子。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发展会逐渐导致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这些改变会使民主体制日益有可能得以生存和繁荣。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大众民主制直到不久以前才出现，而且它即使是在如今为什么最有可能出现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视自我表现价值观重于生存价值观的地方。

这后一种解释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沮丧。不幸的是，民主这种东西并不是只要制订了合适的法律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得以繁荣，否则就难。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这样一些地方，现有的文化条件似乎还比较不利于民主。

好的消息则是，过去几百年来的长期趋势是走向经济发展，这一过程在过去几十年期间还有了加速和扩展。此外，经济发展还倾向于引出有利于民主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制日益有可能出现和存在下去。如果说前苏联范围内的许多地方尚前景不佳，那么从图7.4可以看出，有一些社会已相当接近于民主，其程度高于一般的估计。例如，墨西哥转向民主的条件似已成熟，它在后现代价值观轴线上的位置已大致相当于阿根廷、西班牙或意大利。还有另一些社会也位于这一过渡地带，其中包括土耳其、菲律宾、斯洛文尼亚、韩国、波兰、秘鲁、南非和克罗地亚。

至于中国，虽然它在这一层面上的位置很靠后，但是它正在经历迅速的经济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经济增长看来正带来朝向自我表现的价值观的转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精英显然决心保持一党制，只要他们继续掌握着军队，他们当可按自己的心意干下去。但是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朝向民主的禀性，这与“自由之家”给中国的很低评分是不相符的。

从长期看来，现代化倾向于促进民主体制的传播。某些亚洲社会的集权统治者争辩说，这些社会有着特别的“亚洲价值观”，这使得它们不适合于民主制。（李光耀，1994）“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调查资料并不能支持这样的解释，更不用说还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向民主制演变的实例了。上述调查表明，儒学社会可能比一般人的看法更易于实行民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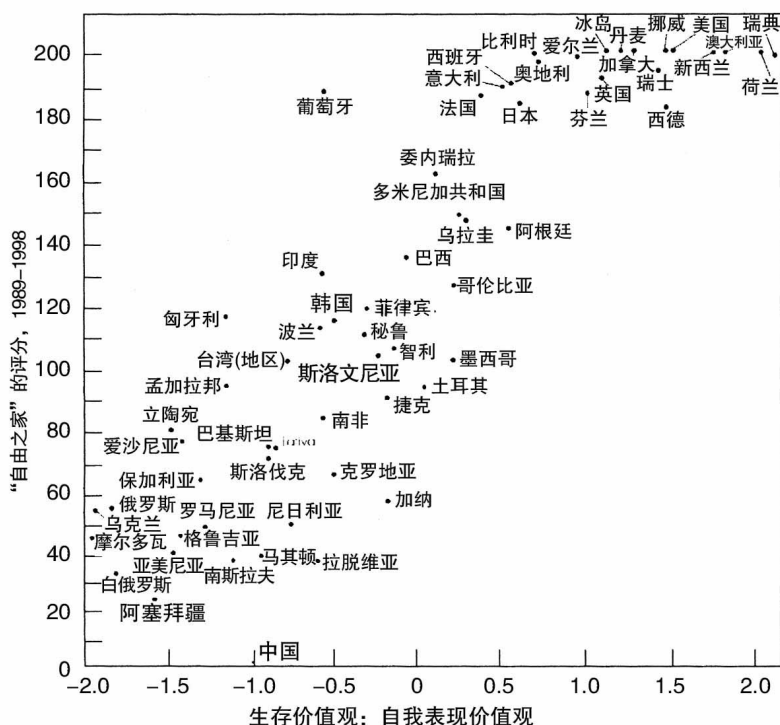


图7.4 自我表现价值观与民主体制

注：纵轴线是“自由之家”对各社会1981—1998年公民自由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的评分。该评分的分数起点高，我们在此图中相应地减去236（原来给中国社会评分为235，此图中改为1，其余依此类推）。横轴线则如同前面的图7.1和图7.2一样，标示各社会在生存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层面的位置，它涉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信任、容忍、政治活动及主观上的康乐。

$$r = .88 \quad N = 63 \quad P = .0000$$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的调查结果见各年版本的《世界上的自由》；横轴线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和1995年的调查。

结论

看来，经济发展会带来文化上的逐渐改变，这些变化会使得公众

日益可能要求民主体制，而在已有民主体制的情况下会使它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一转变并不是容易的或自然而然的。掌握着军警的统治精英可以抵制民主化的压力。但经济发展会使公众有更大的信任心和容忍心，并促进他们日益重视自己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包括在政治领域中的独立自主和自我表现，而要压制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就会变得困难，要付出高昂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出现有利于民主的文化格局，使公众更有可能要求民主，而且更善于得到民主。

富的社会比穷的社会实行民主制的可能性大得多，但财富本身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倘若真会带来民主，科威特和利比亚早就会是民主的典范了。但是，现代化过程从趋势上看会带来有利于民主的文化变化。就长期趋势而言，要避免公众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上升，唯一的办法是拒绝工业化。恐怕没有什么社会的统治精英会愿意这样做。有些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的轨道前进，它们很可能会面临渐渐增长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

有迹象表明，在实行民主制方面，文化所起的作用，要比以往20年来的文献的看法更加重要得多。在生存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这一层面上所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容忍、生活水平及参与决策的权利等价值观，其综合的作用尤其关键。仅仅作些体制上的修改或者在精英层次上玩弄花招，是终究实现不了民主的。要保护民主制，同样也得依靠普通公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

参考文献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0.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_____.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Basic.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95-121.

_____.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Larry, ed. 1993.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 Lynne Rienner.

Diamond, Larry, with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95.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 Lynne Rienner.

Easton, David.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 Wiley.

Fukuyama (福山) , Francis. 1995. *Trust :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 Free Press.

Gibson, James L. , and Raymond M. Duch. 1992. "The Origins of a Democratic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 The Acquisition of Democratic Valu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Gibson, James L. , with Raymond M. Duch. 1994. "Post materialism and the Emerging Soviet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 , no. 1 : 5-39.

Harrison, Lawrence E. 1985.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The Latin American Case*. Cambridge : Harva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 Lanham, Md. : Madison Books.

_____. 1992. *Who Prospers ?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 New York : Basic.

_____. 1997. *The Pan-American Dream : Do Latin America's Cultural Values Discourage True Partnership ?* New York : Basic.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 *Foreign Affairs* 72 , no.3.

_____.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Schuster.

Ingel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Forty-Three Societie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and Wayn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ebruary.

Lee Kuan Yew and Fareed Zakaria. 1994. "Culture Is Destiny :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 no.2 : 109-126.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0.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affirmed." *Tocqueville Review* 10.

_____.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 Norton.

Putnam, Robert.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ce, Tom W. , and JanL. Feldman. 1997.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from Europe to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59 , no.4 :

1143-1172.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World Population Profile : 1996. Washington, D.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Scribner's.

Welzel, Christian, and Ronald Inglehart. Forthcoming. "Analyzing Democratic Change and Stability : A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of Democracy."

第八章 社会资本

弗朗西斯·福山

社会资本的定義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便得以彼此合作。如果这个群体的成员能期待其他成员的行为可靠和诚实，他们就能彼此信任对方。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

共同遵守一些价值观和规范，这本身并不会产生社会资本，因为价值观也可能是坏的。例如，在意大利南方，尽管也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规范，但人们几乎一致认为那是世界上一个有名的缺乏社会资本和普遍信任的地方。社会学家迪耶戈·甘伯塔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退休了的黑手党头目回忆说，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父亲，一名黑手党人，叫他爬上一堵墙，然后又叫他跳下来，答应说会接住他。他一开始不肯跳，但在他父亲坚持下，他终于跳了，结果跌得嘴啃泥。他父亲这样做，是为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你必须学会不信任别人，连你的爹娘也别信任。” [48]

黑手党以强有力的内部行为规范而著称，其中一条就是“拒绝作证”；他们将自己的党徒称作“正派人”。可是他们的规范仅仅适用于黑手党的小圈子，决不对外。至于西西里社会其余的人，普遍流行的规范可以描述为：“趁每一个机会利用你家庭直系亲属以外的人，否则他们就会先利用你。”而甘伯塔举的例子说明，即便是自己的亲属也不一定那么可靠。这样的行为规范显然无助于社会合作，它们对于好的政府以及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只会造成负面的后果，其事例在文献中比比皆是。^[49] 南意大利是西欧最穷的地方之一，而且向来是意大利政界腐败瘟疫的来源。

相比之下，能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并不奇怪的是，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价值观相重叠，而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教徒价值观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所有各个社会都有自己一定的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别，可以称之为“信任半径”。这就是说，诚实、互惠等有利于合作的规范，能应用于多大的有限的范围，而不应用于同一社会中的其他人。家庭显然到处都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源泉。

然而，家庭亲属纽带的强度在各个社会有所不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义务而言，它的强度也有变化。在某些情况下，信任和互惠的纽带在家族内部和外部似乎适成反比：一个强，另一个往往就弱。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家族关系是强的，有凝聚力，可是对外人就很难信任，公共生活中的诚实度和合作水平要低得多，一个后果就是任人唯亲和官场腐败。韦伯之所以重视基督教的新教改革，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它提倡企业家个人诚实、互惠和节俭，而是在于它头一次使这些美德广泛实行于家庭亲属之外。

在没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正式的协调机制，如合同契约、等级制、宪法和法律等，也完全有可能建立成功的群体。但是非正式的规范可以大大降低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用于正式协

议的监督、立约、裁定和强制执行等事务上的费用。在一定的形势之下，社会资本还可以促进更高程度的创新和群体适应。

社会资本的益处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它对于建立健康的文明社会，包括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层层群体和联合体，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明社会是柏林墙倒塌以后一些原共产党国家内相当关注的焦点，被认为是民主制成功的关键。社会资本能使一个复杂社会内的各个不同的群体联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防范这些利益受到强大国家机器的漠视。 [50]

虽然社会资本和文明社会被广泛赞扬为好东西，可是也需要指出，它们并不总是有益的。所有的社会活动，不论好的或坏的，都必定有协调。黑手党和三K党都存在于美国文明社会之内，它们都有自己的社会资本，但二者对更广泛的社会而言都是有害的。在经济生活中，一种生产形式需要群体的协调，可是一旦技术或市场变了，就可能出现不同的一批群体成员，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协调。这时，原先有利于生产的社会互信互惠纽带会成为生产的障碍，日本的许多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再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一社会资本在这时可以说是陈旧了，需要在社会的资本账上予以折旧。

社会资本有时可能用于破坏性目的，或者有时可能陈旧，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许多人的共同看法，即社会资本总的说来是社会需要的好东西。更何况钱物之类的有形资本也并不总是好的东西；它可能陈旧，还可能用于生产冲锋枪、萨立多胺中枢镇静剂、索然无味的娱乐片等一系列的社会“坏东西”。但是各个社会都有法律来禁止生产最恶劣的坏东西，包括用有形资本或社会资本生产的这类坏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从社会角度来说，社会资本的多数用途会是好的，不会次于有形资本所生产的东西。

凡是采用过“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人，大多持这种看法。“社会资本”这一术语已知的最早出现，是莱达·贾德森·哈尼范1916年用它来描写乡村学校社区中心。 [51] 简·雅各布斯在她的经典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也使用了这一名词，她在书中谈到较老的市区街

坊中存在的紧密社会网络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它有助于公共安全。

[52] 经济学家格伦·洛里，还有社会学家伊凡·莱特，在20世纪70年代都使用过这一名词来分析美国城市中心少数民族居住区的经济发展：亚洲裔美国人和另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在各自的社区中保持有信任的纽带和社会联系，而非洲裔美国人却缺少这些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黑人小企业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发展。[53] 到80年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和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更广泛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名词。[54] 由于帕特南的看法，学术界还就社会资本和文明社会在意大利和美国所起的作用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我们怎样衡量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不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感到不高兴。社会学家觉得这是经济学侵入社会学领域的又一表现；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一概念含糊不清，即使不是不可衡量，也是难以衡量。的确，要把建立在诚实和互惠准则基础之上的合作性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本，衡量其总量大小，绝非易事。

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谈到，意大利各个不同地区的治理质量，是与社会资本相关联的，而在美国，这一社会资本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呈衰落之势。该书谈到了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些困难，为了这种衡量，帕特南采用了两个类型的统计数据。其一是关于各种群体——从体育运动俱乐部和合唱团直到利益集团和政党组织——及其成员数目的信息，还有参政指数（如投票率）和报纸读者人数。此外，还有较详细的时间安排调查以及另一些表明人们从起床到就寝是如何实际支配时间的数据。其二是一些调查研究资料，如对美国的“全面社会调查”以及对世界六十余国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这些调查就价值观和信念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帕特南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在过去两代人时间内呈下降趋势的论点，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些学者指出资料有自相矛盾之处，如美国各种群体及群体成员在过去一代人时间内实际上是在增多；另一些学者指出，在像美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现有数据根本说明不了群体生活

的现实。 [55]

群体及群体成员数目是否能得到全面统计，这是一个问题。除此以外，这种衡量方法至少还有三个问题。首先，社会资本有一个重要的质量层面。保龄球联合会或园艺俱乐部固然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可以培养合作和公共精神，但是就它们培养的集体行动的性质而言，它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或摩门教显然大不相同。一个保龄球联合会起码是不能冲击一片滩头阵地。要充分衡量社会资本，就需要考虑一个群体所能担负的集体行动的性质——它固有的难度，该群体出品的价值，它能否在不利的形势下采取行动，等等。

第二个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也许可以称之为群体成员的“正外差因素”，或者，我们可将其称作“正信任半径”。虽然所有的群体都需要有社会资本才能运作，但有些群体将信任的纽带（因而还有社会资本）架设到自己的成员之外。例如，正像韦伯指出的那样，清教徒精神要求不仅对自己的教友要诚实，而且对所有的人都应该诚实。另一方面，互惠的准则却只能在一个群体的成员中的一小部分人中间所共享。有的群体很庞大，例如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就有会员三千多万人，很难设想其中的任何两个会员仅仅因为每年都向同一个组织交会费，就会彼此信任或联合行动。

第三个问题涉及“负外差因素”。某些群体鼓吹对自己群体以外的人采取不容忍和仇视的态度，甚至采取暴力行动。三K党、“伊斯兰国”和“密歇根民兵”等组织都有其社会资本，可是一个社会若尽是这类群体，那恐怕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不再成其为民主社会。这类群体彼此难以合作，它们的联结纽带只适用于自己人的小圈子，防范自己成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因而适应性差。

看来，在像美国这样的庞大、复杂的社会中，想要根据群体人口调查，用一个可信的数字来表现社会资本的多寡，应当说是几乎不可能。对于实际存在的众多群体，我们只能对其中的一部分取得实证数据，这些数据的可靠性也高低不一，而且任何统计数据都表达不出质量上的差异。 [56]

也许可以考虑，不是用一个正数表达社会资本的多少，而是用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通过社会机能障碍的一些传统衡量尺寸，例如犯罪率、家庭破裂率、吸毒率、诉讼率、自杀率、逃税率等，来衡量一个社会缺乏社会资本时会出现的情形。这想法就是：既然社会资本是反映合作准则的存在，那么，社会偏差事实上就是反映社会资本的不足。社会机能障碍的种种指数虽然难说是没有问题，但总比群体成员数据充足得多，而且可用于比较。美国的全国公民复兴委员会就采用这种办法衡量公民背离义务的程度。

利用社会机能障碍数据，作为从负面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尺度，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表现不出分布的情形。正像通常的有形资本在社会内部分布不平衡（财富和收入高低不等）一样，社会资本的分布也大概是不平衡的——一些人高度社会化和自我组织化，而另一些人却处于极端割裂和社会病态之中。

道德规范谱系

社会资本并非像某些人有时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稀有的文化财产，代代相传，一旦失去即不可复得。相反，它是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自发创造的。传统社会中创造过社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和企业则是在日常活动的基础上，创造着社会资本。

社会秩序，因而还有社会资本，是怎样能以自发和分散的方式出现，对此，学术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学术发展之一。领头的是经济学家——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是市场，而市场本身就是自发秩序的首要范例。正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规划了如何研究他所说的“人类合作的广泛秩序”，即允许个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起工作的所有规则、规范、价值观和共有的行为的总和。 [57]

谁也不会否认，社会秩序往往是按等级制形成的。但应该看到，秩序可以有一系列来源，其中包括从等级制和集中制类型的权力当局，直到完全分散的和自发的个人交往。图8.1展示了这一连续体。

等级制的秩序可以有多种形式，从先验式的（例如摩西从西奈山带来《十诫》），直到世俗式的，例如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宣布新的有关处理顾客关系的“公司精神”。自发的秩序也有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从自然力的无形交互作用，直到律师们就地下水权利进行的有严密结构的谈判。一般说来，自发产生的规范往往是非正式的，也就是说，不是书面的和颁布的，而按等级制产生的规范和规则往往是书面的，如法律，宪法，条例，圣书，或机构编制图表，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自发形成的秩序和按等级制产生的秩序二者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例如，在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习惯法是通过无数的法官和律师交互作用而逐渐自发形成的，但又被正式的司法系统所承认，具有约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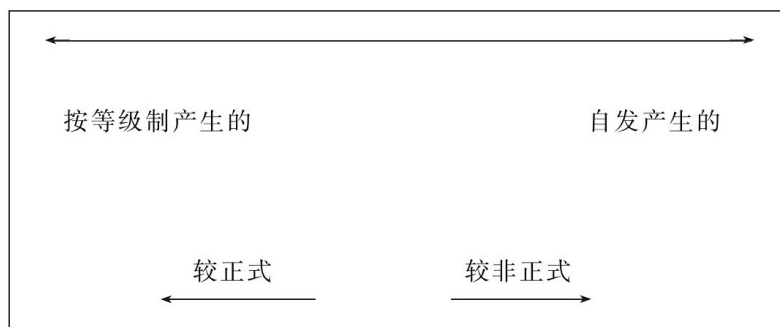


图8.1 规范连续体

除了图8.1所示的从按等级制产生的规范到自发产生的规范这一社会规范连续体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该图基础之上，再展示另一个规范连续体，其中一类规范是理性选择的产品，另一类规范来源于社会继承和非理性选择。将两轴线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四象限的矩阵，见图8.2。这里的“理性”一词的意思只是说人们事先有意识地讨论过若干方案，作过对比。显然，理性的讨论结果不一定是好的选择。人们也许会作出并不真正符合他们利益的坏选择，而非理性的规范则可能是很起作用的，例如有些宗教信念有助于社会秩序或经济增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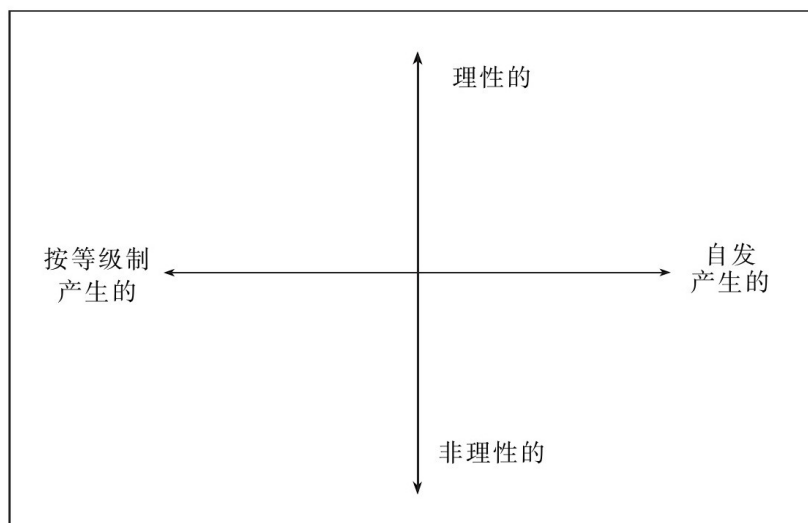


图8.2 规范全域（一）

从许多方面来看，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别，跟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线是相符的。社会学归根结底是一门研究社会规范的学科。社会学家认为，随着人们生长和成熟，他们就社会化为整整一系列的身份和角色，如天主教徒、工人、离经叛道者、母亲、官吏等，被一系列的复杂规范和规则所界定。这些规范将群体联结在一起，为他们所强制执行，严格地限制着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所能作出的选择。

经济学家的见解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经济学家们日益注意规范和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罗纳德·海纳指出，作为有理性的人，我们其实并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作出理性的决定。倘若我们想要那样做，我们的行为就会变得不可预测，而且可能陷于瘫痪，因为我们要时刻不停地计算是不是该给侍者小费，是不是应该扣减出租汽车的车费，或者是不是每个月该在自己的养老金账户上储存一笔不同的金额。^[58]事实上，理性的做法倒是人们简化自己行为的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并不能每一次都让我们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决策本身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往往需要必要的信息，可是这些信息也许一时得不到，也许是错误的。

经济学有一门分支叫做“新制度经济学”，它研究的中心就是观察规则和规范对于理性经济行为的关键意义。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说，“制度”就是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范或规则，它指导着人们的社会交往。^[59]他指出。为降低交易成本，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举例来说，假若我们没有尊重产权的规范，那么每一次就都要就所有权的规则先谈判一番，这不利于市场交易和投资，也无助于经济增长。

在强调规范的重要性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自省的说明规范的来源的能力。大体说来，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最擅长的是描述社会规范，而不是解释它们何以成为规范。许多社会学著作对人类社会描绘出一幅非常静止的图画，例如，谈到纽约意大利裔居民区的下层小伙子们的社会化时，说他们是受到“同辈群体压力”而加入团伙的。

可是这种说法只会叫人纳闷：那些同辈群体的规范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回溯一代或两代，可是最终仍然对它们的更遥远的来源感到迷茫。曾经有过一个“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派，它试图对一些最奇特的社会规则找出理性的实利主义的理由。例如，印度教徒禁止吃牛肉，据说是因为牛能用于耕田和供奶，是应予保护的资源。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印度的穆斯林处于同样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之下，却很爱吃牛肉，或者，当新德里的麦当劳快餐店可以任意从澳大利亚或阿根廷进口牛肉时，印度教徒仍然禁食牛肉。

经济学家走进了这一空当，他们近几年来毫不犹豫地运用他们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巨大的而且很发达的分支，叫博弈论，它试图解释社会规范和规则是怎么来的。如上所述，经济学家不否认人类的活动受到种种规则和规范的约束。但他们认为人类如何形成这些规范，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因而是可以解释的。

简要地说，经济学博弈论的出发点是：我们大家生到这世界上，都是作为孤立的个人，各有一堆自私的愿望，而并没有许多的社会联

系及彼此间的义务。然而，在许多场合下，如果我们与别人合作，并因此而议定合作的规范以指导社会交往，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愿望。按照这种说法，人们可以采取利他主义的行动，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在某种层次上盘算过利他主义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大概是因为那样一来别人也会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博弈论背后的数学就在于试图以正式的方式理解人们按照什么样的谋略可以从自我利益进到彼此合作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在图8.2的四象限矩阵上给不同类型的规范定位，我们得出的就会大致如图8.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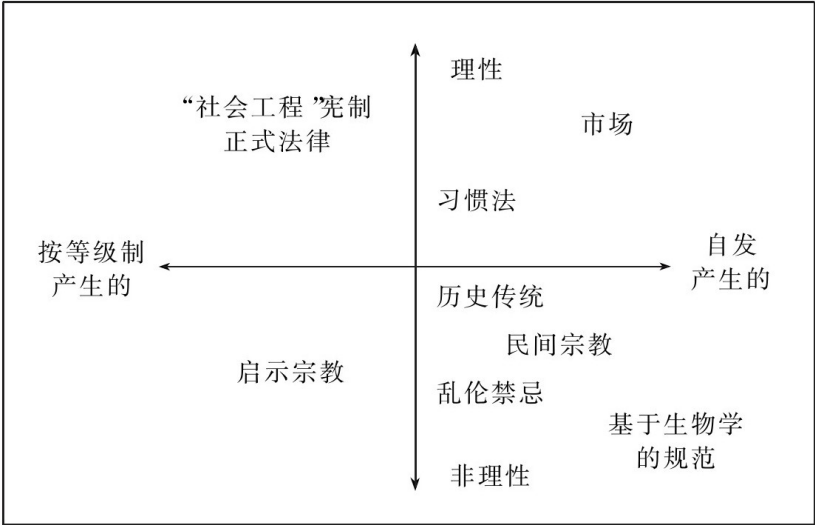


图8.3 规范全域（二）

举例来说，几个有自备汽车的人轮流共乘其中一辆车的合伙用车的规则，属于理性、自发产生的规范象限。这就是说，有关的规则是他们自发、分散形成的，但可以设想是经过了一定的讨论，而且经过一番试验，合伙者都满意了，才实行起来。正式的法律，不论是独裁政权颁布还是民主政权颁布的，都属于理性的、按等级制产生的规范象限；宪法文书、社会工程及所有由上头采取的指导群体行为的措施，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习惯法与合伙用车规则一样，属于自发的、理性的象限。有组织的启示宗教通常来自有统治权的来源——最

高的权威是上帝——这种宗教的规矩也不是理性讨论的结果。有些民间宗教（如东亚的道教和神道教）及准宗教性的文化习俗则可能是分散地、非理性地形成的。因此，前一类宗教的规范属于左下象限，后一类宗教的规范属于右下象限。最后，某些基于生物学的规范属于非理性的、自发的象限。乱伦禁忌属于这一范畴。最近有些学者经研究认为，乱伦禁忌虽系约定俗成，其基础却在于人类对近亲性交持有自然而然的反感。

可以假定，正如许多人已经认为的那样，随着社会趋于现代化，属于左下和右下象限的规范的形成会趋于减少，属于两个上方象限，尤其是左上象限（即由政府当局制定）的规范则趋于增多。亨利·梅恩、马克斯·韦伯、艾米尔·涂尔干、费迪南德·特尼斯等理论家就社会现代化提出的一些经典性论点，如理性化，政府机构化，从地位向契约的转变，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等等，全都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往往是赋予国家机器的正式的、理性的法律权力正在成为秩序的首要来源。然而，凡是在当代美国工作场所或学校试图艰难闯过那些盘根错节的性别歧视方面的不成文规矩的人，都会明白，非正式的规范并没有从现代生活中消失，今后大概也不会消失。

人们一般都比较重视权力当局发布的规范，而较少意识到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广泛秩序”所形成的规范，因此，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图8.2右方的两个象限，争取理解自发秩序的范围和限度，也许是有益的。“自行组合”如今成了一个时髦字眼，不但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爱用它，而且信息技术大师们、管理学顾问们和商业院校的教授们也对此高谈阔论。然而，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自行组合”才会出现，而且它也不是实现群体协调的一个万能的公式。

共享公共资源的规则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内，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著述，最大量地来自经济学界及其相关领域，如法律与经济学，公共选择论，等等。这方面的许多早期作品都谈到与产权有关的规范的来源。^[60] 一些所谓的公共资源——如牧场，渔场，森林，地下水和空

气——属于群体共享，但在合作方面遇到格外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们受到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共地悲剧”。^[61] 哈丁认为，公共地悲剧导致了社会灾难，如海洋捕鱼过量，牧场放牧过度。在他看来，如何共享公共资源的问题，只有靠权力当局才能得到解决，很可能要由国家采取强制措施，甚至要依靠超自然力的调节。

与这种主张按等级制产生规范的见解不同，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采取比较自发的办法。整个法经济学的源头，是人们常常引用的罗纳德·科斯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该文指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正式责任规则的改变将对资源的分配不产生影响。^[62] 在实际应用科斯这一定理时，当然会遇到一个问题，即交易成本几乎从来不会为零。个人之间要达成合适的协议，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一方比另一方更富或更有势力时，尤其是如此。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交易成本是相当低的，因此，经济学家得以指出相当不少的令人感兴趣的自行组合事例，此时社会规范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形成的。罗伯特·萨格登叙述过英格兰海滩上分享漂流木的规则：先来先得，但只能取一定的数量。^[63] 罗伯特·埃利克森谈到过自发的经济规则的许多例子。比方说，19世纪的美国猎鲸者往往遇到有可能引起冲突的情况：一艘船叉到了一头鲸，可是它挣脱了，而另一艘船不费时不费力就捕住这头鲸把它卖掉。于是，猎鲸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规则来处置这种情况，做到平等分利。^[64]

谈到自发秩序的著作往往只是摆事例、讲故事，而没有从道理上透彻阐述新规范是如何以分散的方式自发形成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书则是一个例外，她为研究公共资源问题收集了5000多个事例，这就足以使她有条件针对这一现象作出有实证根据的归纳。^[65] 她的总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找出过种种的办法来解决公共地的悲剧，这类事例之多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想象。解决这类问题的许多办法既不涉及公共资源的私有化（那是许多经济学家的主张），也不涉及由国家制定条例章程（那是经济学界之外许多人的主张）。相反，许多地方的人们想出了合理的非正式的规则，有时还形成正式的规则，来分享公共资源，做到既公平，又不会导致这些

资源的过早贫化或枯竭。他们运用了数学上所谓的叠代法，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补充，使解决办法渐臻完善。既然人们知道他们必须继续在有限的群体范围内生活在一起，而继续合作是对大家有利的，他们就有维护自己名誉的愿望，同时彼此监督，惩罚那些违反群体规则的行为。

从奥斯特罗姆和另一些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自发的秩序才能形成，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秩序失败了，未能实现，或是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奥斯特罗姆谈到，人们为分享公共资源而建立规范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她指出了自我组合所必备的一些条件，从中可以看出，有几个范畴的原因说明为什么社会并不总是能够形成自发秩序的解决办法。

规模 .曼卡尔·奥尔森提出，群体规模越大，某些人不出力而白占便宜的问题就越严重，因为监督个人行为会变得愈加困难。在一家小诊所或律师事务所，如果有哪个人不尽力尽职，同事们大概都会看见；而在万人的工厂，就不一定了。在比这更大的群体内，问题就更多，监督系统会出故障。有人做坏事也不怕丢面子，别人认不出来；监督和奖惩的实施要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因为规模经济要求指派相当多的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界线 .谁是群体的成员，必须有明确的界线，才能形成自发的秩序。假如人们可以随意进入和退出这个群体，假如谁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因而有权分享公共资源的好处）并不明确，那么个人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名誉操心，而无所顾忌。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人员流动性高的街区，例如正经历迅速经济变化或靠近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的地方，往往犯罪率较高，社会资本水平较低。

经常交往 .奥斯特罗姆研究过的那些成功解决了共享公共资源问题的社区，有许多是传统的村落，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与外界也很少接触，成员都是山民、稻农、渔民等。人们知道他们今后还得长期彼此交往，所以小心维护自己的名誉。

先前的规范已成为共同的文化 .建立合作规范，往往有一个前

提，即群体的成员先前已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范。这种共同的文化不仅让人们有共同的词汇，而且有共同的手势、面部表情和个人习惯，彼此易于沟通。文化有助于人们识别真假，认出谁是合作者谁是骗子，以及传递行为规则，使得群体内部的行动易于预测。对于破坏自己文化规则的人，人们更愿施以惩罚，而对别人的是非就不一定那样关心。反过来说，要想在几种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新的合作规范，会困难得多。

权势与公正 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常有可能反映出，一部分人凭借其财富、权势、文化能量、智力，或直接凭借暴力和威吓，而统治另一部分人。有的社会规范尽管被有关的人自愿接受，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奴隶制和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就是这样的例子。

坏的选择也可能长期维持 尽管不公正的、低效率的或者起反作用的规范也存在过，人们可以争辩说这样的规范会自发地消失，因为它们不符合有关群体的利益。在法律和经济学著作中，常常见到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因此从长期来看，社会是“朝着效率的方向进化”，然而，由于传统、社会化和礼俗的势力，坏的、低效率的或者起反作用的规范也可能在一种社会制度中代代相传，保持相当长久。

自发产生的社会资本可出现于较小的、稳定的群体，其成员只是几百人，在某些地方也会有几千人。但在已有政府和法治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资本也可能出现于范围更大的人群中间，这实际上是法治的一个重要后果。可是，若自发群体过于庞大，就会有各种涉及公共地的问题（例如，由谁来谈判议定规则、监督违规行为、强制执行规范，等等）无法解决。奥斯特罗姆列举的那些共享公共资源的规则只构成小范围的文化，而构不成大的文化体系。文献谈及的自发秩序都够不上国家、人种—语种群体或文明区域等大规模群体的秩序。大范围的文化，如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儒学文化或基督教文化，都不是自发形成的。

图8.2所示的四象限矩阵，只是为我们开始思考当代社会中的社

会资本究竟来自何方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一个分类的框架。合作规范应来自何方，人们各有自己的看法，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传统的保守派认为它们应来自宗教以及左下方象限内的其他非理性等级制来源。自由派人士担心“无拘束的市场”的作用，主张这些规范来自左上方的象限（即由国家机构颁布法规）。左翼和右翼的自由意志论者则希望这些规范是自发产生，来源于右上象限或右下象限。然而应当明白，在当代社会中，每一象限都包含着众多的情况，社会资本的这四方面的来源互相起作用，其方式则是错综复杂的。

正式的法律对非正式规范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民权法律即是一个例证。非正式的规范又会有助于或有碍于一定政治体制的形成。宗教仍然是文化规则的一个重要来源，即使在明显世俗的社会亦是如此；然而，由于宗教规则与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相互作用，这些规则也会自发地演变。如何理解这些关系，就实际文化规则的各个来源提供一个经得住实证的图谱，这是今后的一个课题。

第九章 腐败、文化及市场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

人们广泛地关心民主和经济发展所必要的社会条件，因而在腐败的程度、来源和后果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著述。本章试图将腐败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综合在一起。在首先结合各种文化和历史谈谈腐败以后，本章将报道若干实证调研成果。然后，本章试图将这些成果和若干有独创性的研究结合进两个理论框架：罗伯特·默顿提出的手段—目的模式，以及来自爱德华·班菲尔德的特殊恩宠论观点。

什么是腐败？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定义。正像阿诺尔德·海登海默在《政治腐败》一书中所指出的，“腐败”一词“从历史上看，其意义和内涵之繁多是罕见的”。^[66] 政治学家和哲

学家强调的是政治或行政中的腐败：力图以非法手段攫取财富或权力——损公肥私。

从古埃及、古以色列、古罗马和古希腊直到现在，腐败一直不断。独裁政权和民主政权，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以及各种宗教机构，全都经历过腐败，只是在程度上轻重不一而已。腐败现象无所不在，始终存在，而且反复出现，这就表明，不能把它看作是通过人们目标明确的行动即可消除的一种机能障碍。调查研究应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文化背景下，腐败有多有少。

直到不久前为止，这一领域的实际研究还主要是个案调研。然而，为了满足跨国公司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一些咨询机构设计了一批反映各国腐败情况的指数，从而使腐败问题的研究发生转变，而且使社会科学家得以对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提出各种假设并加以检验。

采用得最普遍的政治腐败指数之一，是“透明度国际”组织的“腐败感指数”（CP1）。表9.1是按照1998年该指数排列的89个 [67] 国家和地区的名单，顺序为由轻到重。

表9.1 1998年腐败感指数

1. 丹麦	23. 博茨瓦纳	46. 巴西	69. 玻利维亚
2. 芬兰	24. 西班牙	47. 白俄罗斯	70. 乌克兰
3. 瑞典	25. 日本	48. 斯洛伐克	71. 拉脱维亚
4. 新西兰	26. 爱沙尼亚	49. 牙买加	72. 巴基斯坦
5. 冰岛	27. 哥斯达黎加	50. 摩洛哥	73. 乌干达
6. 加拿大	28. 比利时	51. 萨尔瓦多	74. 肯尼亚
7. 新加坡	29. 马来西亚	52. 中国	75. 越南
8. 荷兰	30. 纳米比亚	53. 赞比亚	76. 俄罗斯
9. 挪威	31. 中国台湾（地区）	54. 土耳其	77. 厄瓜多尔
10. 瑞士	32. 南非	55. 加纳	78. 委内瑞拉
11. 澳大利亚	33. 匈牙利	56. 墨西哥	79. 哥伦比亚
12. 卢森堡	34. 毛里求斯	57. 菲律宾	80. 印度尼西亚
13. 英国	35. 突尼斯	58. 塞内加尔	81. 尼日利亚
14. 爱尔兰	36. 希腊	59. 科特迪瓦	82. 坦桑尼亚
15. 德国	37. 捷克	60. 危地马拉	83. 洪都拉斯
16. 中国香港（地区）	38. 约旦	61. 阿根廷	84. 巴拉圭
17. 奥地利	39. 意大利	62. 尼加拉瓜	85. 喀麦隆
18. 美国	40. 波兰	63. 罗马尼亚	
19. 以色列	41. 秘鲁	64. 泰国	
20. 智利	42. 乌拉圭	65. 南斯拉夫	
21. 法国	43. 韩国	66. 保加利亚	
22. 葡萄牙	44. 津巴布韦	67. 埃及	
	45. 马拉维	68. 印度	

腐败感指数是“民意测验的民意测验”，它的依据是“以不同方式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一般公众有关当地腐败程度的看法进行的多次调查的结果”。^[68]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民意测验至少有3次，在某些情况下达到12次之多，然后将这些可信的调查结果加以归纳。每次调查时，对腐败所下的定义均相仿，指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调查中尽量将政治腐败和行政腐败加以区别，然后综合其结果，反映出对腐败程度的总的看法。这一指数不涉及是否公正的问题，不涉及各种社会之间和各种文化之间的腐败的同异。它也不包括私营企业的腐败，如知情人内幕交易。

有些人对腐败感指数所采用的方法有争议，说它只调查了国际经理人员对腐败的看法。然而，它实际上也包括了对一般公众的抽样调查。对于有关的国家和地区，至少作过一次公众调查。无论如何，经理人员和专家调查的结果与公众调查的结果是高度相关联的。腐败感

指数的最后评分为0（腐败最轻）到10（腐败最重）。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过，“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95年的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询问对腐败程度的看法，结果与腐败感指数的评分非常吻合。

本章主要谈价值观与腐败二者的关系。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缺乏各国的定量数据，因而长期妨碍了人们作比较研究。但“世界价值观调查”于1981—1982年、1990—1993年和1995—1996年先后三批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态度和价值观作了调查，使社会科学家们掌握了这样的数据。1995—1996年对6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其数据将会很快整理出来，但可惜眼下还无法利用。本章的分析是以1990—1993年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那次调查了43个国家和地区，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按人均年收入计算，低的只有399美元，高的达到30000美元。调查中的抽样在质量上也很不一致。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原苏联辖区内的一些国家，被调查的人绝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和有文化的居民，他们的看法往往与工业国家相近。 [69] 因此，对于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最后的估计可能偏低。

经济与腐败

确凿的证据表明，腐败从许多方面损害经济发展。从调研成果可以看出，较高的腐败水平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 [70] 腐败影响经济增长，其原因之一看来是投资水平降低，因为腐败使投资者估算的风险增大。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腐败使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减少。腐败指数每低2.38（1个标准离差），政府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就高0.5%左右。 [71]

为什么腐败会影响教育？研究表明，腐败的政府把相对而言较多的钱用到官员易于贪赃枉法的项目上。 [72] 他们可能把本该用于教育的公款转移到别的方面，便于自己收取贿赂。机场、公路之类的大项目难于管理，好玩猫腻。而教育方面的开支及其成果相对而言是明摆

着的，搞腐败比较难。

另一些研究涉及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二者之间的联系。对各国数据作对比，就看出腐败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很明显。腐败愈严重，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就愈高。腐败指数每高出0.78，穷人年均收入增长率就低7.8%之多。 [73]

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与腐败关系最明显的一个变量是人均收入。 [74] 最富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政治腐败也最轻。从“透明度国际”1998年的腐败感指数（见表9.1）看，腐败指数最低的头20个国家，其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在17000美元以上，而腐败最严重的20个国家人均收入都在4000美元以下，它们大都是欠发达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欧国家当中，只有6国是在头20名以外。

有几种见解似乎能解释腐败与收入的关系。官员收入高，腐败所能获取的金钱收益的边际价值看来会降低，动机结构有变化，腐败就可能减少。同时，收入愈高，腐败所招致的惩罚——监禁、犯罪纪录、丢失脸面、今后难找工作等——其代价也愈高。

经济发展还会对民主产生重要的、正面的影响，从而使腐败减少。 [75] 此外，经济发展会使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从而可能减少滥用职权的现象。 [76] 一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愈深——国际贸易愈发达——腐败亦应愈低。融入全球社会后，国家机关和公民就会更多地接触到经济发达社会的个人及市场行为规范，受其约束。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都规定其成员国必须接受这些规范。

文化与制度

对于文化变量和政治变量如何影响到腐败的潜势，学者们系统地进行多国对比的研究，这大体上还是一个较新的现象。有定量的数据表明，社会多样性、人种语种的分散状态以及一国居民中遵奉不同宗教传统的人口比例，均与腐败有联系。丹尼尔·特雷斯曼通过复杂的比较研究明确看到，有一些文化上和制度上的因素降低了腐败的水平。

在研究影响民主化的因素的同时，他的分析表明，有两个因素，即基督教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高和曾经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均为与低腐败水平相联系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性仅低于国民生产总值。

新教教义影响经济行为的可能机制，将在下文中论及。至于英国殖民地历史，特雷斯曼认为它给人们灌输了一种持久的意识，即强调程序重于强调权力。用哈里·埃克斯坦的话来说，“在英国人看来，程序不仅仅是程序，而是必须照章办事的神圣规矩。”^[77]法官和政府官员都遵守这一规矩，即使自己权力地位受到威胁也要坚持，这看来就增大了腐败被暴露的可能性。英国这一传统对民主有正面影响，这也会减少腐败。

有两个社会学模式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化与腐败的关系。第一个来源于社会学创始人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又经过罗伯特·默顿的扩充完善而正式形成。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手段—目的模式，它能说明种种违规行为的变异。^[78]第二个模式关系到家族。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提出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分析，谈到像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那样的强烈家族定向有助于解释腐败严重的问题。^[79]基本的理论源于柏拉图，他曾指出，家族成员之间固有的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促使他们偏爱和偏袒自家人，即裙带风。班菲尔德指出，家族价值观包括强烈的义务感，这种价值观的强弱与腐败有关系。

手段—目的模式

默顿的理论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同时社会又有大家赞许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体制化的规范）。用默顿的话来说，凡是力图以社会赞许的手段去达到这些目的的人，就是奉公守法的人。然而，有许多人由于种族、民族、缺乏技能、缺钱缺物等原因，难以接近社会的机会结构，而社会却仍然迫使他们去设法实现公认的目的，如发财或得到社会地位。社会上的成就市场之中，有许多

市场从本质上说就是供小于求，需求大而供应（手段）有限。因此，许多人很早认识到自己没有什么机会，就拒绝公认的游戏规则，试图以非常规的手段（创新，或犯罪）来取得成功。默顿指出了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以及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偏常行为方面存在着差异，丹尼尔·贝尔曾对此作过概括。

[80]

默顿的理论认为，有一些文化强调经济成就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又使人们获得经济成就的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腐败会比较严重。这一假设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1990—1993年多国调查数据得到了印证，那项调查还证明了由默顿的理论推论出来的假设论点，即按照“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项目构成的尺度来衡量的经济成就动机的高低，与腐败的轻重有关系。两极端的事例与这一分析框架相符。富裕程度较低而经济成就动机高的国家往往腐败最严重。例如，按照上述尺度衡量，俄罗斯、韩国和土耳其的经济成就动机处于最高水平，它们也是腐败较重的国家。

相反，按照默顿的分析框架，经济成就动机较低而获取相应手段的机会较多的国家，应是腐败程度较低。丹麦、瑞典和挪威最符合这一条。按我们的尺度衡量，它们在经济成就动机方面得分最低，同时它们又腐败最轻。这大概是因为在这几个国家中，手段—目的的压力很弱。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一模式，是由经济成就动机与结构上形成级差的成就机会多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经济成就动机的强弱与人均收入的高低成反比。这就提出了一道难题：国家愈富，经济成就动机的水平愈低。这一结果似乎违反了韦伯的文化理论。然而，韦伯在论述宗教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也预见到，一旦高生产率已经体制化，新教教义的正面作用会减弱。可以认为，今天的富国当年在经济发达以前，也曾经属于经济成就动机水平最高的国家行列，只是如今已经富裕了的公民恰如约翰·亚当斯所预见到的那样，转而追求不是与工作相关的目标，如音乐、艺术和文学，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术语来说，就是成了后物质主义者。 [81] 而另一方面，一些欠发

达国家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则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地位较低，可能受到激发而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经济成就动机。

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作了一项多重回归分析，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1990年数据与作为因变量的腐败感指数相联系。上面已指出，默顿的理论分析认为，经济成就动机水平高而获取相应手段的机会水平低的国家，会苦于严重的腐败。实际的关系是相当牢固的，在常见水平上有统计意义。各国的经济成就动机指数（1到5）每变化1.1（一标准离差），它们的腐败感分数就相应变化近0.5。这一模式适用性高，可以解释腐败方面的许多变异。当对照其他关键因素时，上述二变量之间的联系仍然很显著。

在衡量经济资源和经济自由方面，学者们设计了各种指数。我们主要使用《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公布的1997年经济自由指数。该指数从1（无自由）到5（完全自由），用以衡量政府对自由市场的支持。它包括的因素有：拥有财产的自由，挣钱谋生的自由，经营企业的自由，投资的自由，国际贸易的自由，以及参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在回归分析中，经济自由指数每变化0.75（一标准离差），腐败感分数就几乎变化1.5。

像经济自由指数一样，人均收入数字也是一国经济资源的衡量尺度，还能衡量出一国人口的大多数在经济上的满意程度。人均收入与腐败关系密切，这进一步证明，若实现目的的手段已经体制化，腐败的程度会降低，表明默顿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将1997年经济自由指数与人均收入二者结合到一起，这一模式能说明腐败方面的许多问题。在对照与腐败有关的各种变量，如人均收入、新教徒人口比例、有无英国人照章办事意识等因素时，经济成就动机与腐败的关系始终牢固，这说明经济成就动机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道德的家族主义

第二个重要的文化框架来源于柏拉图，再由班菲尔德予以发展，它表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恩宠论的一个表现，即感到自己有义

务帮助和施惠于自己负有个人义务的人，首先是家族成员，但也包括朋友和同伙。任人唯亲是最明显的表现。对某个人的忠心也是一种特殊恩宠论的义务感，它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表现得很强烈。正如韦伯所说，忠心和市场是彼此对立的。特殊恩宠论的对立面是普世论，即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市场规范表现出普世论；因此，纯资本主义体现这些价值观，并因之而得以维持。

柏拉图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说过，家族联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体制化的社会阶级和归属关系的首要基础势力。^[82]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这种联系——包括家庭本身——必须废除。孩子们一出生就该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为谁。当然，柏拉图不会相信一个社会能没有亲子关系，但是他看出了家庭具有的社会力量。

为理解资本主义为何最先在新教文化地区兴起，韦伯指出，工业化以前的天主教社会规范是社群主义的，首先要求社会、家庭和统治阶层帮助不幸者。他认为这种价值观阻碍了理性驱动的市场经济的出现。相反，强调个人主义和关心自己，比较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加尔文教派和新教其他教派的教义促进了这样的行为。这些教派的人相信，上帝只帮助那些自救的人。韦伯指出，“新教的强调伦理和苦行的教派……的伟大成就，就是打碎了亲属关系（扩大的家庭）的枷锁。”^[83]正如劳伦斯·哈里森所说，“事实证明，扩大的家庭是生存的有效体制，但却是发展的障碍。”^[84]只团结亲朋好友，而敌视自己家庭、村庄或部族之外的人，就可能造就出自私自利的文化。

爱德华·班菲尔德研究了意大利南方的情况以后，进一步分析了“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这种文化在实行社群主义价值观方面有缺陷，只促进家族联系。他写道：“在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者的社会，谁也不想增进群体或社区的利益，除非那样做符合他的私利。”^[85]对于更大一点的群体没有什么忠诚可言，人们也不接受那种要求支援他人的行为规范。因此，家族主义是不道德的，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任何事情都得有利于本人和自己的家族。黑手党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班菲尔德实际上认

为，意大利南方以及与之相似的一些传统社会中的腐败，正是黑手党赖以维系的那种力量及与之相似的力量的一种表现。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1990年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数字，使我们得以定出一个衡量家族主义的尺度。它的第一个项目是无条件尊重父母，即不论自己父母品质如何，有何过失，都必须永远爱他们和尊重他们；要统计持这种态度的人占总人口中多大的百分比。第二个项目是百分之多少的人反对离婚，认为离婚无理。第三个项目是平均每一名妇女的孩子数目，它取自世界银行。

按这一尺度衡量，得分高的国家往往也是腐败较严重的。重视家族联系的多数亚洲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得分最低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也是人们认为腐败最轻的国家。回归分析也证实了二者的关系。但对照人均收入时，上述关系仍很明显。将家族主义尺度、经济成就动机尺度和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都包括在内的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腐败感指数的变化。

总之，这一分析证实了不道德家族主义的命题。在另一模式中，我们又加上一个变量，即新教徒所占的人口比例。特雷斯曼已说明这一尺度与腐败感指数的密切关系。这一结果使人想到，家族主义是宗教与腐败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换句话说，新教能减少腐败，部分原因在于它强调个人的、非家族主义的关系。

宗教、文化与腐败

我们在上文中已说过，文化变量有助于说明和预见腐败的程度。然而，什么说明文化呢？这个问题很复杂，远非本章文字所能说得清的。然而，社会科学界一致认为，宗教是较大的世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新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方，腐败较轻。新教教义较有助于遵守规范的行为。新教，尤其是曾被视为异端的教派的教徒，认为个人应对自己避免罪孽负责，而其他基督教教派，尤其是天主教会，却较多强调人固有的弱点、人无法避免罪过和错误以及教会应对人采取原谅和保护态度。天主教、

圣公会和东正教都比较乐于承认人有弱点，因为神职人员有权减轻个人的一些责任感。既然对“罪过”的可能性采取较宽容的态度，那么自然的后果就是承认人有脆弱性，承认谁也不可能是圣人。

新教一些教派和福音会的教徒气质却更有可能促使人们遵循绝对的价值观，特别是在道德方面。它们鼓励信徒去努力得到美德并使之体制化，而且，即使不能摧毁也要减少恶人和坏体制坏习俗的影响。在政治上，它们倾向于将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看作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交战，几乎毫无妥协的余地。

新教徒保留了当初路德派新教会的一些重要成分。大多数教派都期待孩子们达到成年时自觉自愿决定接受信仰疗法。有的教派要求举行皈依仪式（再生），作为真诚信仰的一个象征。这些教派要求其信徒生活正派，遵守戒律，而戒律有时是很具体的。有的国家中，新教的一些主张禁欲的教派支持禁酒或限制含酒精饮料以及宣布赌博为非法。

新教与腐败感二者之间关系很明显。当对照人均收入时，二者关系仍有意义，但明显度有所减弱。这表明，新教与腐败感的关系中，约有多达1/4的成分是与新教徒的较高收入或较发达经济水平相联系的。另一方面，这一研究成果也表明，新教与腐败的关系中，多达75%的成分可能是源于文化因素。

在分析了经济成就动机与新教徒占人口比例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后，看出那种认为新教徒经济成就动机已有所降低的说法是有理的。虽然韦伯强调过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或其他保守派更倾向于争取经济成就，但如今可能不再是这样了。现在多数新教国家已经富了，有迹象表明人们已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焦点。一国的经济成就动机与新教徒人口比例成反比，新教徒越多，经济成就动机的水平愈低。这倒让我们更有理由估计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腐败轻。

由于新教国家平均说来较富，根据默顿的逻辑，较富社会中致富的手段已体制化，因而也意味着新教国家腐败较轻。此外，天主教国家的政府比较倾向于对经济实行干预，限制经济自由，而新教国家的

经济更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只有局部的例外（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样，经济自由指数与新教成正比，新教徒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高，经济自由越大。

最后，班菲尔德的不道德家族主义命题，使我们有一个更基本的依据来解释为什么天主教国家可能比新教国家腐败更重。天主教国家偏重于社群主义和家族主义，而新教国家偏重于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这是常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能证实这一看法。家族主义与新教的关系适成反比。正如上文中已经谈过的那样，家族主义，或者说没有家族主义，这是新教与腐败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中间变量。

民主与腐败

除了提高生产率和加速现代化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减少腐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看韦伯是怎样论述政治公开的社会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会收到的效果——更多的民主，个人自由，以及法治。民主包括政治上的反对党，新闻出版自由，以及独立司法，它能促进有潜在威力的减少腐败的机制。反对党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就热心于揭露执政党的腐败。执政党若不锐意变革，就可能在选举中失败而下台。另一方面，一党制的国家却缺乏这样的激励机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当政时，至少曾两次公开表示过他担心一党制所固有的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然并不主张多党制，而只是要求苏联报界和知识分子起反对党的作用，揭露违法乱纪行为。

1999年，欧洲联盟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们受到了行为不端、用人不当和管理不善的指责，而被迫辞职，这件事突出表明了民主制潜在的净化作用。欧洲议会是由各国、各地区、各党各派代表凑成的大杂烩，然而民主选举产生的，它向并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委员会发起攻击，揭露其“源于天主教色彩较重的南欧的地中海腐败行径”。^[86] 这一个代议制机构的胜利“标志着权力从非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向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的一次重大转移”。^[87]

对于腐败与民主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大体上证实了以上的假设。民主方面的数据来自“自由之家”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的年度调查报告，^[88] 其指数从1（最自由）到7（最少自由），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政治权利，调查的问题是：国家元首和立法机关代表是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出来的吗？公民是否有权成立竞争性的政党或其他组织？反对党有没有相当有意义的表决权，或有没有现实的机会来增进选民对自己的支持？第二部分为公民自由权，包括衡量媒体有多大的自由和独立，有无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是否独立和无歧视，能否防范政治恐怖、无理监禁等。

这次调查所针对的时期为1972—1998年，上述两部分的指数的平均数作为综合指数。结果与腐败感指数高度吻合（逆向相关）。在回归分析中，当对照购买力评价人均收入时，这一综合指数仍然有意义。然而，非标准化系数失去其值约一半左右，而当其他关键因素进入这一方程式时，它就变得毫无意义。这表明，民主与腐败之间的负相关，约有一半是由于民主国家通常均较富裕（即致富机会较多）。

虽然“自由之家”综合指数与腐败的关系不很牢靠，但特雷斯曼发现，一国实行民主制的连续年数与腐败的关系即使对照各种关键因素时，也仍然有意义。因此，民主是估计一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有迹象表明，公民自由权指数，尤其是司法独立而加强了法治，比政治权利指数更为重要。

结 论

强调理性、小规模家庭、成就、社会地位流动性和普世主义的态度，促进了发达经济的出现，这些因素正是不同于传统主义的现代性的特点。从理想的情况看，它们的标志还表现在家族主义的衰落，那些支持特殊恩宠论式互助体系的价值观的衰落，因为那些价值观是与市场经济所需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在强调义务和忠心的封建式社会分层制度瓦解之后，才出现了支持和表现市场逻辑的价值观。

在亚洲国家，人们十分强调群体义务，尤其是对家族的义务，家族观念在不久前还是封建社会的日本比在欧美要强烈得多，而这一点恰恰意味着亚洲国家高度的腐败。“透明度国际”的评估表明，多数亚洲大国腐败较严重，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当然，日本似乎是一个重大的例外。它的犯罪率极低。那里犯法违规现象较少，对此的解释是，那样做会给自己家庭及亲朋好友丢脸，使自己蒙受耻辱。然而，高层商界和政界的腐败却层出不穷。在“透明度国际”1998年腐败感指数中，日本名列第25，尚低于智利、葡萄牙、博茨瓦纳和西班牙，仅略高于哥斯达黎加、比利时、马来西亚、纳米比亚、中国台湾和突尼斯。

原共产党国家除了匈牙利和捷克以外，均低于平均水平。它们程度不等地具有家族主义、中央集权的社群主义、等级制的宗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以及政党的特殊恩宠论，这些东西在共产党当政时期造成了高度的腐败，它们大部分还是穷国。

我们已集中谈了解释腐败现象的两个模式，即默顿的手段—目的模式和班菲尔德所强调的家族主义。默顿和班菲尔德所指出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手段达到自己规定的目的，以及家族关系所固有的特殊恩宠论规范——将继续影响一些民族的行为。在欠发达国家和原共产党国家中，如果理性导向的经济价值观和法治能占主导地位，如果它们促进经济发展，那么腐败的程度应当降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三个华人社会如今已比较富裕，以市场为导向，而且相对说来建立了法治，它们的腐败程度就已有所降低。

第三部分 人类学家的辩论

第十章 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有一些比另一些好？

罗伯特·埃杰顿

我们天天看到和听到的报刊和电视新闻都在报道团伙暴力、环境污染、无家可归、虐待儿童、毒品泛滥、艾滋病和政党勾心斗角，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某些人干的事情是在害人害己，大概是不会有争议的。越来越多的调查报告在给美国各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评比排名，同样也评比外国的情形。

政治制度也受到评估。如果有人持相对主义立场，硬说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政治制度对于它们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与挪威、加拿大或瑞士等国的政治制度一样好，许多人听了一定会感到不安。如果有的人类学家断言，一个社会的习俗，如宰人祭神、种族灭绝或酷刑审案等，只能由当地的人自己去评价，别的人对此作评估则没有科学根据，那么，多数人也会感到这种说法难以置信。然而，这恰恰是不少宣扬文化相对主义和适应主义的人所提出的论断，而文化相对主义和适应主义仍继续为一些人所坚持，在人类学界尤其如此。

这些论点的根源在于一种信念，即认为“原始”社会比“现代”社会和谐得多。不幸、恐惧、孤独、痛苦、疾病和短命等现象在美国城市贫民区和无家可归者当中是司空见惯的；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南非的黑人乡镇、苏丹的饥馑村庄、巴西的贫民窟以及遭受过“民族清洗”的巴尔干半岛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被认为是各种社会、文化和环境压力的不幸受害者，而这些压力当中包括了政府的冷漠失职，种族主义，腐败，民族、宗教和政治上的争斗，以及经济剥削。

但是，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一些著名学者认为，上述的种种不幸

并不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现象。他们认为，在一些较小的、人种较单一的“乡间”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一向和谐得多，幸福得多。许多小社会今天依然如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比当今社会和谐、认为“野蛮人”更“高尚”、认为从前的生活比今天的生活更富有田园诗意、认为人们昔日共享的社群感如今已丧失殆尽的看法，不仅反映在我们的流行文化的电影和小说之中，而且还根深蒂固地表现在学术论著之中。

快乐的野蛮人

按照上述观点，人类的不幸，是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化、多种多样的宗教、阶级冲突或者使大社会——尤其是民族国家——苦恼不堪的利益竞争。另一方面，较小和较简单的社会却是根据稳定的环境的要求来发展他们的文化，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必定给他们的居民带来大得多的和谐和幸福。例如，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就生动描写过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环境，当时的人是猎取大猎物的猎手，在那种环境中，“作为一个物种而发展起来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暴力，以及我们的理智和感情，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而这种和谐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福克斯，1990）当人们现在发现一个缺乏这种和谐的小社会时，社会科学家往往得出结论说，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文化接触，尤其是经济变化和城市化，所起的瓦解作用。像文化相对主义一样，这种观念在西方思想界也牢固存在数百年了。（尼斯比特，1973；肖，1985）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以人类学的权威支持这种认为古代社会优越的论点，于1947年发表论文，提出了如今已广为人知的乡间社会与城市社会这种分类法。（雷德菲尔德，1947）这种观点认为城市充满了犯罪、无秩序和种种人间苦难，而乡间社会却是和谐的社群，它可以回溯到阿里斯托芬、塔西佗和《圣经·旧约》。在19世纪，通过特尼斯、梅恩、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涂尔干和韦伯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这种观点又得到了支持。另一些人 also 附和制造一种共识，认为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都是乡间社会的特点，而在人们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城市中则到处是社会分化瓦解和病态个性。

在20世纪，乡间“社群”和城市“社会”两者之间的反差，成为西方思想界最基本的观念之一，其持有者包括社会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神学家、小说家、诗人以及受过教育的一般公众。一个例子是：基尔帕特里克·塞尔在他的书《征服天堂》（谈欧洲人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征服）受人批评以后，公开在报纸上回答说，在美洲被征服以前，那里的“原始社群”就是跟欧洲的文化不一样，远比欧洲“和谐，宁静，善良和知足”。（塞尔，1991）

有些乡间社会是和谐的，有一些却不是。人类学家当中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一地民间的传统信念和习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一定对他们的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流传下来。因此，常有人写道，食人肉、酷刑、杀婴、世仇争斗、巫术、毁伤妇女性器官、将强奸妇女当做仪式、割取敌人头颅等习俗虽令外人憎恶，但对于当地的社会一定起到有益的作用。看到生物进化论用适应环境来解释动物为什么会有保护色和飞行用的羽毛，多数人类学者就提出了文化进化论，说这一进化也遵循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只有适合人们需要的信念和习俗才会成为传统保留下来。因此，当人们见到一个社会看来缺少有益的信念体系或体制时，他们就说这一定是因为别的人——殖民者的官员、军人、传教士或商人——对这一社会起了恶劣影响。反正那些人几乎总是比人类学家先到场。

适应不良的特性在小规模社会中会有多少，是根本无从知晓的，因为人种志的记载极少谈到有哪些信念和习俗是有可能适应不良的。如果随便浏览一下一大堆人种志专著，就会发现，对某种信念或习俗的适应不良后果有所分析的专著，是微乎其微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即便是它们提到了某些看来稀奇古怪、非理性、无效率或者危险的信念和习俗，通常也是说这些东西具有适应性，似乎是为了达到某种有用的目的。例如，谈到最极端的毁伤生殖器的行为——割开阴茎，用粗糙的草或其他植物做的杆子鞭打阴茎，毁伤或者缝闭龟头——这些人种志专著（如果说不是精神病学专著）也通常不说这是非理性的、非适应性的或适应不良的习俗，而是说它起到了积极的社会后果、文化后果或心理后果。（考特，贾嘎马拉和巴雷特，1966；法瓦扎，1987）

将适应性理性化

相对主义和适应主义论断所累积起来的效果，是好几代的人种志学者相信，一种长期存在的信念或习俗必定有它的好的社会理由或文化理由。既然它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它一定是具有适应性的——在我们所知道的论述小传统社会人们生活状况的著作中，多数都是或明或暗持这种观点。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见解。例如，有些注重生态的人种志学者在谈到一定社会的信念或体制时，很认真地评估它们能有多少适应性。沃尔特·戈德施米特论述乌干达的塞贝社会的人种志专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分析了塞贝人在他们的近代史上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比较积极的社会和文化举措之后，他又叙述了他所说的“失衡和适应不良”，尤其是塞贝人“未能建立足以保持他们疆界的社会秩序，未能养成遵循一套适当的道义原则的心态”。（1976）他接着具体分析了导致这些“失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与此相似的是，克劳斯—弗里德里希·科赫写到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查亚地区的查莱人，他们在尚未受到外来影响而同化之前，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生活在偏僻的东部“雪山”地区。科赫在结论中指出，他们的内部争端和杀戮那么频繁，是因为他们处理冲突的方法“很少而且很缺乏效力”。（1974）还有一些人，特别是C.R.霍尔派克，也谈到另一些社会的适应不良的习俗。（1972，1986）然而，即使是注重生态的人种志学者通常也很少注意到适应不良的问题。他们所强调的是各种经济活动与环境相适应的一面。

大部分的人种志专著在谈到某种信念或体制化的习俗的利弊得失时，结果总是往乐观的好的一面去说。例如，在承认巫术之类的信念可能给某地的居民造成损失之后，又马上断言它仍是利大于弊。克莱德·克拉克洪和多萝西娅·莱顿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纳瓦霍人》一书中，分析了纳瓦霍人的一种传统信念，即巫鬼存在于他们自己中间，指出这一信念造成了恐惧，引起了暴力，有时还导致无辜的人“悲惨”遭殃。尽管如此，这两位学者又硬说纳瓦霍人的这种信念“保持了

社会的核心实实在在”，因为它使人们将自己对亲友的敌意转移到巫鬼身上去。不仅如此，这一信念还防止了富人和担任司仪的人享有过多的权力，而且总的说来，有利于防止社会分裂行动。（克拉克洪和莱顿，1962）可是，这两位学者没有考虑，既然别的社会找到了更好的办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什么纳瓦霍人却需要这样的弄神弄鬼的信念，而忍受恐惧、暴力和无辜者遭殃。

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是孤立的。大多数人种志学者好像都同意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强调适应性的观点：传统的信念或习俗，不论它看起来多么“古怪”，只要理解了它，就会看出它具有“适应意义”。（坎贝尔，1975）还有一些人同意马文·哈里斯的说法：根本没有必要去声称信念或习俗有适应性，因为社会文化体系“即使不是完全，也是大体上”由适应性特征所组成。（哈里斯，1960）说文化必定具有适应性也好，说文化是完全或大体上由适应性特征所组成也好，这些说法都是悍然不顾相反的大量证据。除了经济习俗这一局部以外，并没有证据能显示出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埃杰顿，1992）

这一问题不只是限于人类学界，不是一只奇怪、“原始”茶杯里的风暴。凡是希望理解为什么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运转不尽如人意的人，都会重视人种志的著述。的确，有些乡间社会比较和谐，有一些至今仍然如此，但较小和较简单的社会中的生活也未必摆脱了人间烦恼和苦难。这里受篇幅限制无法细说，只能指出，有些小社会无力对付其环境的压力，有些则是生活在冷漠、冲突、恐惧、饥饿和绝望之中。还有一些陷入世仇而不能自拔，走向毁灭。尽管如此，有人还是坚持说，小规模社会在适应生态环境方面比我们强。有一些也许是，但肯定另有一些并不是。

不同社会里的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有同情心，慈善心，甚至是爱心，他们有时还能以惊人的毅力应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提出的挑战。可是他们在处理他们自己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所保持的一些信念、价值观和社会体制，也可能是源自于毫无意义的残酷、无谓的虐待以及十足的愚蠢。人们并不总是聪明的，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和文化也不都是理想的适应机制而能

完善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像许多学者那样，坚持说一种传统的信念或习俗既然多年沿袭下来，就一定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起到有益的作用，那是错误的。传统的信念和习俗可能是有用的，甚至可能充当重要的适应机制，然而它们也可能是无用的，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和反面价值

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并不是没有历史价值的。它有助于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它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手段，来矫正那种认为所有社会都应经过同样的“进步”阶段直至最后达到近似于某种西欧“文明”为止的单系分阶段进化论。此外，相对主义者坚持应尊重别人的价值观，这一立场虽有害于科学，但更重要的却是它有益于人的尊严和人权。即使是所谓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者的一些过激的说法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能提醒那些对各种文化评头品足的人：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体系都是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其意义须结合其背景加以理解，而且应尽可能设身处地，从它自身成员的角度去理解。（斯皮罗，1990）他们还争辩说，某些见解和情感是某一文化所特有的，某些习俗的意义和功能也许是外人所永远理解不了的，这一看法也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认识论相对主义者不仅说每个社会都是完全独特的——无法比较和大体上不可理解——他们还断言每个社会里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能力。在丹·斯珀伯所说的“认识隔离”和欧内斯特·盖尔·纳所说的“认知无政府状态”中，一些后现代相对主义者和解释主义者假定了各种文化之间在认知过程上存在的种种根本区别，包括逻辑、因果推论和信息处理方面的根本区别。 （盖尔·纳，1982；斯珀伯，1982）这种根本的认知力区别是否存在，尚有待于证明；如果说人的认知力和主观间沟通能力的研究史可资借鉴，那么我们可以预言，那种种区别是不会得到证明的。

文化相对主义或适应主义的历史更值得注意。有一些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类学家早先都曾经支持过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但最后却公开表示反对用相对主义评估各地的乡间社会。例如，美国人类学泰

斗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就在1948年抛弃了相对主义，而且宣称当社会由简单向较复杂“进步”时，它们也更具“人情味”；还说了一句肯定会令当今的一些人类学家怒发冲冠的话：“现代先进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不健全的人却往往附和古代社会和落后社会中那些健全而有权势的人”。（1948）他接着指出，“进步”——指文化进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包括放弃一些陋习，如礼仪性的嫖娼，将临产期或月经期的妇女加以隔离，酷刑，宰人祭神，信仰魔术或迷信。两年以后，^[89]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他掌握的世界人种志知识大概超过当时所有在世的人——写道，普遍的道德伦理标准是可以存在的；而三年以后，已经不再坚持相对主义的克莱德·克拉克洪表示他赞成这一立场。（克拉克洪，1955；林顿，1952）

由于提出乡间社会和城市社会对比而闻名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1953年表示同意克罗伯的观点，提出原始社会不如较先进的文明社会“高雅”和“有人情味”：“整个说来，人类已发展出更多的高雅和有人情味的善意——伦理学上的判断已有转变，使我们不再把未开化的人看做与我们同等的人，而是把他们看做处于人类经历的不同层次上的人”。（1953）

1965年，乔治·彼得·默多克，当时世界上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头人物，在谈到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信念只能从它自身背景去理解这一相对主义观点，以及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硬说所有的文化应享有同等的尊严和尊敬这一观点时，指出它们“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感情用事的无稽之谈”。（1965）他补充说，如果硬要让食人肉、蓄奴、靠魔术治病以及杀掉老人的习俗跟养老保险、科学医术和金属制品同样享有“尊严”和“尊敬”，那就是“荒谬”。默多克坚持说，人人都会喜欢西方技术，而且都愿能养育孩子和赡养老人，而不是把他们杀死。（1965）可是，除了少数人例外，人类学家们并没有接受这些反对相对主义的观点，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坚持认为文化是而且必定是适应性的。

适应不良

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某些传统信念和习俗可能变得适应不良。环境变化是一个原因。别的理由则比较复杂，涉及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如何。例如，在许多社会中，人们对自己坚持的某些信念或习俗提不出任何理性的道理，他们的某些最重要的决定——何处狩猎，何时出征，何时捕鱼，种什么庄稼——都是以所谓先知的预言、圆梦、占卜等迷信现象为根据。在非洲南部一个王国，当权者听从先知的预言，把牛全宰掉，停止耕种，说是千禧即将来临。结果是人们挨饿，王国覆灭。（佩雷斯，1989）

即使人们试图作出理性的决策，他们也往往失策。原因之一在于，当人们，尤其是较原始社会的人们，需要就自己的环境、邻里邻邦甚或自己的社会体制作出决策时，不可能掌握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相关知识以确保决策万无一失。此外，关于人们在实验的条件下或者在自然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决策，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人的决策往往是并不周全的；而在需要解决新问题或者需要周密盘算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时，更是如此。正是这类的问题向人们的适应力提出最严峻的挑战。

多数人不大擅长于估计风险，应付新的威胁尤其难，而且往往对战争和技术变化或经济变化的未来后果估计不足。甚至一些反复发生的灾害，如旱灾、水灾、风灾或火山爆发等，人们也对其后果估计不准。（道格拉斯和怀尔戴夫斯基，1982；拉姆斯登和威尔逊，1981）人们也不都是善于开发新技术，即使环境的压力迫切要求技术有所变化时，也不一定跟得上。（考吉尔，1975）西方经济学家谈到人们获得、储存、提取和加工信息的能力有限时，采用了“有限”这一概念，经济决策理论就考虑到这些局限。由于认知力有限，对环境的知识又不完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作出一些不尽妥当的决策。（库兰，1988）

人往往是不理性的，丹·斯珀伯就生动地指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是文化的信念，相当值得注意。它们稍稍偏离常识，或稍稍超出于证据所允许的范围之外，也不会显得是非理性的。它们倒是显得是对常识理性的挑衅。（1985）正如斯珀伯等人所指出的，许多乡间社会

的人相信，人或动物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可以变成另一种生物或者变成隐身的，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念让物质世界起各种变化。他们还会有迷信念头，至少有时会有。事实上，感应巫术的原则很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人的思想是按这类想法逐渐演变过来的。（罗津和内梅罗夫，1990）

此外，现有的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尤其是乡间社会的人们，常常采用启发式方法作出决策，这种方法促使他们形成固定的意见，即便这种意见的根据不足或有误。这种启发式方法还促使人们固执己见，即便有相当多的迹象表明应该改变原先的意见。正如R.A.施韦德所说，人的思想“在其科学程序上受限制，在抽象推理上不完备，对经验证据有些傲慢无礼”。（1980）

理性与非理性

应该说上述的种种现象都并不奇怪，因为即便是亚里士多德这么理性的一位思想家，也相信北风劲吹时怀孕就会生男孩；而经过多少代的世俗教育之后，当代的美国人仍然不是很理性。多次调查表明，当代美国人当中，80%的人仍相信上帝会创造奇迹，50%的人相信有天使，1/3以上的人相信有鬼。（盖洛普和卡斯特利，1989；格里利，1989；威尔斯，1990）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我们识别自己环境中的风险的能力是有限的。玛丽·道格拉斯和阿隆·怀尔德夫斯基指出，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是集中注意他们面临的几种危险，而忽视其余的危险，其中包括一些明显的危险。例如，扎伊尔的勒勒人面临过许多的严重危险，其中包括一些有致命危险的疾病。然而他们集中注意的危险只有三种，即支气管炎、不孕症和雷击，尽管支气管炎远不如那里也流行的肺炎严重，雷击的危险更不如他们常常染上的肺结核病普遍。（道格拉斯和怀尔德夫斯基，1982）美国环保局科学顾问委员会指出过，美国人也差不多：对于环境受到的威胁，他们最担心的往往是相对说来不很重要的危险，而可能更加严重得多的危险却大都受到忽视。

托马斯·吉洛维奇谈到过，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也往往持

有一些显然谬误的信念。调查表明，美国大学生中，多达58%的人相信占星术的预言灵验；50%的人认为埃及金字塔是外星人帮忙建造的。吉洛维奇举出这样一些事例后指出，当代美国人曲解现实，是因为他们重视一些偶然的現象，往往只记住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事例，而忘记那些与自己信念不相符的事实。（吉洛维奇，1991）

还有不少事例说明，我们当中那些被认为是最理性的人，诸如工程师、医师、科学家、教育家等，也有一些愚蠢的信念。既然当代美国人并不是那么理性，那么对于那些文化世俗程度还不及美国的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期待他们以更大的理性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我并不是说乡间社会中的人们就一定比工业化的社会中的人们更缺少理性或者在信念上更适应不良。

C·R·霍尔派克等人认为，小规模社会中的人们从思想过程来看，无法理解西方科学中运用的一些概念，如因果关系、时间观、空间观、现实主义、内省和抽象化，等等。（霍尔派克，1972）所谓的原始思想是不是较少抽象，较多魔幻，或者较少有能力评估边缘概率，这是一个仍然有待于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与我要提出的观念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要说的是，所有社会中的多数人，包括一些最熟悉西方科学的人，有时都会犯带来潜在损害的錯誤，而且常常坚持錯誤。小规模社会中的人们也许会犯较多的这种錯誤，但是适应不良的决策是所有社会中都有的。

识别问题

人们要想使自己的信念和习俗的适应性达到最佳，就不仅要理性地思索，而且还必须能够识别所要解决的问题。这往往是困难的。有的问题，例如气候和土壤侵蚀方面的变化，是逐渐形成的，等到它们可被识别时，人们已无法作出有效的反应。另有一些问题，例如疾病的逐渐入侵或饮食变化的危险，可能根本不被认为是问题。人类受害于疟疾达数千年之久，最后直到19世纪晚期才认识到，它是由蚊子传播的。许多地方的居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那里流行的致命疾病是怎么来的。另外一些现象可能被认识到是问题，但却解决不了，因为社

会分裂成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和利益集团。人们愿意投入多大的精力来增加食品供应？人们是否愿意放弃美味但却不利于健康的饮食，而改用营养较丰富但却不那么香甜可口的饮食？领导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若干特权而造福于整个社会吗？男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若干特权而造福于妇女吗？年长者愿意让出他们的若干权利给年轻人吗？

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里的人们不他们认为是一问题的事情操心。拥有公认的领导人、议事机构和办事机构的社会，往往都会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出决策。当年夏威夷的僧侣和贵族认识到食品禁忌制度是一个问题，就把它废除了。波尼人的一位酋长也曾作出努力废除杀人祭神的习俗。在乌干达的塞贝人当中，一位名叫马图伊的先知创立了一种新的仪式，翻译过来是“通过法律”的意思，在这种仪式上，每个教区的所有男人集合在一起，宣誓不做某些事。（戈德施米特，1976）马图伊的创举大概是适应塞贝人的社会需要的，因为它减少了部落氏族之间的暴力。可是，像这样有远见的领导人在人类历史上一定是不常见的。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领导人的决策明智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他们的决策很少达到理想的结果。相反，恰如芭芭拉·塔奇曼在《愚蠢者进军》一书中所指出的，许许多多的决策都收到反面效果，令人心寒。（塔奇曼，1984）马文·哈里斯曾长期认为几乎所有的传统信念和习俗都是有适应性的，但不久前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文化进化中的所有重大步骤在其发生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人自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还补充说，“20世纪看起来真正是充满了非预谋的、非预料中的和非想象的变化”。（哈里斯，1989）

在小社会中，理性的、经过仔细斟酌的、旨在解决民众问题的决策，是很罕见的。人们怎样狩猎、捕鱼和耕种，怎样举行仪式、控制子女和安排休闲，这些事情通常是不予讨论的，至少，不会讨论怎样使这些活动更有效或更令人愉快。人们对自己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怨言不断。他们有时也会尝试某种新事物，但传统信念或习俗的根本改变是极其罕见的。如果发生大的变化，那通常是由于外力所迫，例如遇到了外敌入侵、流行病或天灾。否则，人们一般都是沿袭过时的老办法勉强凑合。多数人都是穷将就，不作理性的周密思考去寻求最佳方

案。例如，乡下人种庄稼通常都是用老一套办法，只要活得下去就行，即使有人推荐提高产量的新办法，他们也不乐意采用，不愿意冒风险。

这种不愿改变的态度导致一些人类学家将人们的经济上的老办法形容为“最低风险”和“最少麻烦”。信念和习俗能长期保持，往往不是因为它们是最佳的，而是因为它们通常是刚刚顶用，改变它们的必要性还远不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我们知道在现代国家中，“理性”的计划制定者往往也作出糟糕透顶的判断，那就不难想见，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较小、较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不大可能作出适应性最佳的决策，即使他们想做到这一点，恐怕也不行。此外，即使他们想出了一个几乎完善的适应于环境的方案，也不一定能长期坚持。

我并不是说传统的信念和习俗永远都是适应不良的，永远都无助于改善当地人们的生活。我也不是说人们永远不会足够理性地思考问题，作出有效的决策，以应付环境的挑战。我也不认为，人们的行为只受生物禀性中坏的一面，例如妄想狂和自私等恶性一面的驱使。人们常常会表现出贪婪、私欲、妒忌等违背公益的毛病。但人们也会合作，助人，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成全他人。（埃杰顿1978，1985）

然而，如果说适应不良的信念和习俗是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普遍，那么，它们的存在就是对现今流行的适应主义范式构成了挑战。一个社会的居民要生存，就必定使他们维持生计的活动具有相当的效率，可是这些活动不需要是最佳的（即在时间和精力上以最低的耗费，得到最多的营养）。恐怕从来没有哪个社会的人们做到过最佳的经济适应；实际上也根本看不出有哪个社会的人曾试图做到这一点。社会组织和文化受到一个社会所能掌握的技术及其经济活动的影响，但是社会体制或文化信念系统从未普遍导致最大限度适应环境的境地。它们也从未始终如一地提高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

从来还没有哪个社会的居民设计出最佳或完美的手段来利用环境，因此，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一致同意如何去最佳地利用

环境，那恐怕也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的居民宣布过所有成员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所有的社会，包括人们最健康、幸福和长寿的社会，都仍有改进的余地，都可以再增进健康和安全，进一步提高生活的满意度。现在还没有完美的社会，没有理想的适应——只有欠完善程度的高低之分。人们都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求生活得更好，但是谁也没有创造出最佳社会。人们不仅会犯错误以及在应付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往往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别人的利益，往往宁愿保持老的习惯而不肯弃旧图新。文化可以有适应性的，但永远也不会在这一点上尽善尽美。

因此，尽管常常有人说，一个社会只要生存下去，它的传统信念或习俗就必定是有适应性的，但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相反，应当说，任何一种信念或习俗都会在适应性价值的连续线的某一点上失误。它可能是中性的或可容忍的；也可能是有利于社会中的一些人而有害于另一些人。有时，它还可能是有害于大家。

最后，让我引用英国人类学家罗伊·埃伦的一句话：“文化的适应很少是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中的最好一种，而且永远不会是完全理性的”。（1982）

参考文献

Camrbell, D. T.1975.“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 and Between Pstchology and Moral Tradi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 1103-1126.

Cawte, J. , N. Djagamara, and M.G.Barrett.1966.“The Meaning of subincision of the Urethrato Aboriginal Australians.”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39 : 245-253.

Cowgill, G. L.1975.“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Population Changes.”American Anthro Rologist 77 : 505-525.

Douglas, M. , and A. Wildavsky.1982.Risk and Culture :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dgerton, R. B.1978.“The Study of Deviance—Marginal Man or Every-man ? ”In The Making of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G.D.Spindler, p.444-476.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_____. 1985.Rules, Exceptions, and Social Order.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_____. 1992.Sick Societies :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Primitive Harmony.New York : Free Press.

Ellen, R. 1982.Environment, Subsistence, and System : The Ecology of Small-Scale Social Formation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vazza, A. R. , with B.Favazza.1987.Bodies Under Siege : Self-Mutilation in Culture and Psychiatry.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x, R. 1990.The Violent Imagination.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Gallup, G. , Jr. , and J. Castelli.1989.The People's Religion : American Faith in the Nineties.New York : Macmillan.

Gellner, E. 1982.“Relativism and Universals.”In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edited by M.Hollis and S.Lukes, p.181-256.Oxford : Basil Blackwell.

Cilovich, T. 1991.How We Know What Isn't So : The Fallibility of Human Reason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 : Free Press.

Goldschmidt, W. R. 1976. *The Cul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Sebei*.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eeley, A. 1989. *Religious Change in Americ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0. *The Human Career*. Cambridge : Blackwell.

Hallpike, C. R. 1972. *The Konso of Ethiopia : A Study of the Values of a Cushitic Society*. Oxford : Clarendon.

_____. 1986.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Oxford : Clarendon.

Harris, M. 1960. "Adaptation i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Sc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23 : 59-65.

_____. 1989. *Our Kind : Who We A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New York : Harper & Row.

Kluckhohn, C. 1955. "Ethical Relativity : Sicet N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2 : 663-677.

Kluckhohn, C. , and D. Leighton. 1962. *The Navaho*. Rev. ed.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Koch, K. F. 1974. *War and Peace in Jalemo : The 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Highland New Guine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roeber, A. L. 1948. *Anthropology*.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Kuran, T. 1988. "The Tenacious Past : Theories of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0 : 143-171.

Linton, R. 1952.“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s : An Anthropological View.”In *Moral Principles of Action : Man's Ethical Imperative*, edited by R.N.Anshen. New York : Harper.

Lumsden, C. J. , and E.O.Wilson.1981.*Genes, Mind, and Culture*.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urdock, G. P.1965.*Culture and Society*. Pittsburgh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Nisbet, R.1973.*The Social Philosophers : 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 Crowell.

Peires, J. B.1989.*The Dead Will Arise : Nongqawuse and the Great Xhosa Cattle-Killing Movement of 1856-6*. London : Curry.

Redfield, R. 1947.“The Folk Socie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 293-308.

_____. 1953.*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R. , R. A. Calvert, and G.L.Seligmann.1982.*Chicano : The Evolution of a People*. Malabar, Fla. : Krieger.

Rozin, P. , and C. Nemeroff.1990.“The Laws of Sympathetic Magic :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imilarity and Contagion.”In *Cultural Psychology :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edited by J.W.Stigler, R.A.Shweder, and G.Herdt, p.205-232.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le, Kirkpatrick. 1991.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 25 July.

Shaw, P. 1985.“Civilization and Its Malcontents : Responses to

Typee.”New Criterion, January, p.23-33.

Shweder, R. A.1980.“Rethinking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heory, Part 3 , From Genesis and Typology to Hermeneutics and Dynamice.”Ethos 8 : 60-94.

Sperber, D. 1982.“Apparently Irrational Beliefs.”In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edited by M. Hollis and S. Lukes, p.149-180.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_____. 1985.“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 Towards 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Man 20 : 73-89.

Spiro, M. E.1990.“On the Strange and Familiar in Recent Anthropological Thought.”In Cultural Psychology :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edited by J.W. Stigler, R.A. Shweder, and G. Herdt, p.47-61.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chman, B. 1984. The March of Folly. New York : Knopf.

Wills, G. 1990. Under God :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第十一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儿童及进步

托马斯·韦斯纳

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包含有芸芸众生，他们实践着各自的文化生涯，把自己的目标、动机、能力和当地的文化模式带进经济生活。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在想象和努力引导儿童进入美好的和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涯，希望造就出他们所珍视的人才。文化生涯开始于我们出世之前而且预兆于儿童成长过程之中。欠发达世界中的儿童文化生活是不是严重阻碍经济市场活动或阻碍新形式的文明社会？假如真是这样，

那么，父母管教子女的方式和儿童的生活是不是应该成为旨在鼓励经济进步变革的一个焦点？

我在本章中集中谈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是一片常被列为“除外”的大陆（罗伊，1999），似乎是世界上经济最差而且距离多元政体理想最远的地方。但我认为，在今日非洲的父母管教子女和照顾儿童的方式这一方面，并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问题而妨碍经济按某种市场模式发展，或妨碍社会按当地某种模式向多元化社会前进。非洲家庭生活和照顾儿童方面的许多价值观和习俗至少是与经济发展和政治多元化相容的。这包括家庭与社会共同承担照顾儿童的责任；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家长希望把孩子培养得既聪明又听大人的话；社会网络能在城乡之间起有效调节作用。

此外，家长们还积极讨论怎样养育子女，尝试各种新的做法和家庭生活的安排。因此，从儿童和家庭来看，已为各种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作好了潜在的准备。当前的任务，是要使这些活动和体制就位，而不是根本改变非洲家长和家庭的价值观和习俗。一旦这些活动就位了，那里的儿童和青年就会投入进去。

最后，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化和价值观是相当不灵活的特性，它们早早养成，成为民族文化“性格”的一部分，但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不对的。文化信念和习俗是适应环境的工具，而不是对体制起决定作用的固定模式。文化是一个混合体，包括人们共有的价值观和信念，日常生活中有组织的活动，以及具有情感意义的交往经历。文化对儿童的培养往往会给他们造成一些问题，等他们长大成人后还得重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的儿童被教导说他们可以成为各式各样的人物，可以期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他们可以有各种选择，还可以通过谈判自定规矩。长大后到了工作岗位，他们却可能要费劲学会妥协，在社会群体中好好工作，而且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完美地实现自己童年时的每一个梦想。

非洲的儿童在受教育时是学习如何互相依靠，共享资源，在家庭和群体的权威系统之内生活，顶多只能暗自提出疑问。长大后，他们

却可能要费劲摆脱这些信念，学会独立自主，培养好奇心，寻找新的同盟。信念、价值观、活动和经历从来都不会完满地从童年到人生路上各个发展阶段一贯到底。

儿童获取文化知识，主要是经由非语言渠道，即参与和模仿——口头教诲是重要的，但决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些非语言渠道并不一定提供始终连贯的信息，而在变化时期，这些层次的文化体验和获取知识的模式可以是十分不连贯的。孩子们对学习的文化或父母的灌输总有模棱两可的体会，充满混合信息，还常常采取抵制态度。文化可以有一个明显的中心倾向和模式，但未必是整齐无缝和千篇一律的。

东非的家长、儿童和变化

在非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中，确实有一些条件阻碍着经济的增长。穷国的种种弊病在非洲是加倍地更加严重。（兰德斯，1998；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2；韦斯纳，1994）经济发展和变革可以说是传遍世界大片大片地区，“非洲除外”。（罗伊，1999）在世界多数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有所降低，大概非洲又是除外——不过在非洲不少地方，人口出生率已在起变化。（布雷德利，1997；罗宾逊，1992）经济增长的典范在世界各大洲均有所见，又是非洲除外（不过非洲也有若干）。罗伊在他的《非洲除外》一书中，将“非洲除外”这一附加语变为表述用的主要词语，表明经济发展的反面。他还提出一些肯定的“反词语”，集中表述当地情况的多样性、意外性、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

但是对“词语”的关切还未必能反映出非洲面临的深刻而又严重的问题。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在本书第六章谈了非洲的问题，我同意他的许多看法。对于那些阻碍非洲亿万民众变革和进步愿望的问题，他有亲身的体会。他认为文化是非洲不良体制的原因：“文化是制度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制度有赖于我们文化的修改。”

在非洲，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可能是压迫性的和破坏性的。我同意埃通加—曼格尔说非洲一些文化模式有害的看法，很多人

对此有体会，而且千千万万非洲人希望有所改变。但是我认为，他说文化重于以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上的和政治—经济上的因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因素都是在一个综合体之内彼此松散相连接的。

就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儿童的发展这方面的信念和习俗而言，非洲并不属于“除外”的情况，恐怕不能把儿童教养方面的做法列入阻碍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我们应该首先注意的是当地生态方面的局限性，以及那些引导或限制非洲儿童和青年潜力的各地区、各国和国际的体制，而不是建议改变儿童教养方式以及家长对孩子所持的价值观和目标。

我并不是无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明显贫困和诸多问题而盲目乐观，也不是说文化对于理解非洲各社会的过去以及影响其未来的进步不起作用。家庭和社群没有条件为自己组织可持续的日常生活，这才是阻碍儿童和家庭提高其经济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人类学研究所要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韦斯纳，1997a）在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千千万万的儿童和父母没有健康、安全和稳定的最基本条件；他们也没有机会去读书识字和掌握各种技能，以便让自己有条件去参与广泛的公民政治活动和争取重大的经济进步。同埃通加—曼格尔一样，我也深信非洲的儿童应当享有这些基本的物质和社会福利，并且有机会在自己的社会中找到相应的活动和体制，以便能参加进去，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

有些人认为非洲不具备这些基本的物质和社会福利，其原因在于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和习俗，因此建议改变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可是在研究非洲的家庭和儿童状况之后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已在进行之中，至少达两代人之久，而且在非洲一些社会内部已有充分的多样性和不均一性，来提供为变化作好准备的个人。给儿童提供基本的保障，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适应于变化，包括转向新的儿童养育价值观和实际做法。

然而，有些人会争辩说，文化内部的价值观和习俗的明显变化虽然有意思，但对于文化与经济进步二者之间关系如何这一更大的争论

来说，却无关宏旨，因为如此之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表现出经济发展迟缓甚至下降，同时民主社会的出现仍然缓慢或不见踪影。当然，在这些比较性的差异方面，经济状况、文化状况和历史状况都起一定的作用，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顶多也只是松散相联结的。要理解非洲社会内部家庭和儿童中间的现状，就必须了解当地的文化变化和可变性。否则，我们怎么知道该怎么办——是否要干预，如何干预，在什么层次和什么群体干预呢？只有研究当今真实的文化情况，才能回答这一问题。我觉得这一研究计划应得到最优先的考虑。

发达世界的儿童养育、家长目标及经济进步

儿童家长的核心信念和养育儿童的做法，在发达世界也与经济进步有关系。在西方，这些信念和做法不一定是经济进步的原因，但常与经济进步相联系。有一个开发智力的“教育”模式（莱文等人，1994）强调刺激和反应能培养大胆、探索精神、语言技巧和文化水平。它关注对儿童个人的刺激，让他与别人交往，锻炼探索行为，积极识别智慧的认知信号和语言信号，参与语言交流和问答练习。

儿童的个人表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我表现也受到鼓励。父母期盼孩子早熟，公开夸奖早熟的表现，或者在别人谈起这种早熟时得意洋洋。对孩子会有不断的赞扬和鼓励：“干得好！”“大胆往前走！”“试试吧！”“你定能成功！”“你真聪明/真健壮/真漂亮！”父母把子女典型的智力发展里程碑看做是智慧或非凡能力的象征。例如，世界各地的婴儿都在出生后三个月左右开始向周围的人微笑。非洲的许多家长认为这是身体健康的表现，西方家长则认为这是理解力和智力的一个早期象征。

西方父母除了盼孩子早早成熟以外，还可能担心孩子在稳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是否有足够的和可靠的信心、情感稳定和足够的“自尊”。这种信念在北美和欧洲各地有程度上的差异，培养这种理想类型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哈克尼斯和萨珀，1996）然而，上述的模式被公认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可取的做法，没有遇到过质疑和争议。对于它的可行性和正常性，人们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非洲的父母当然也盼望孩子有所成就，抱有类似的希望和目标。但是他们主要不是夸奖孩子个人，而更可能是强调孩子要融入大家庭，为这样的融合提供机会，提供食物和其他物品，给予年幼孩子关爱和接触。家长鼓励孩子通过观察以及与他人合作来进行学习，而不是大人给孩子积极刺激。他们鼓励孩子学会与他人互相依靠，而不是鼓励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罗伯特·塞普尔把这种做法叫做儿童社会化的社会分布模式。（1993）

非洲的许多父母和孩子今天实际上所做的，是一个混杂得多的模式，把教育学上以独立自主为中心的和以社会化为中心的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此外，儿童在个人气质和能力禀性上各不相同，家庭与家庭也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教养模式上的多样性，这样一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的特性，有一些会与教育模式的目标相符，也会有一些不相符。

我并不要掩饰非洲各地在文化上和家庭方面的明显多种多样的状况，但是以上一些概括性的模式对于说明问题还是有用的。这些模式肯定符合，至少是部分地符合非洲许多地区的儿童生活实际，构成中心趋势，而围绕着这种中心趋势又有大量的变异和差别。我同意埃通加—曼格爾的看法：非洲情况自然是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看，仍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体制，它们将撒哈拉以南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还将撒哈拉以北的各国人民也联系在一起”。

[90] 围绕着中心趋势而在各地出现的多样性，恰好能支持我的论点：非洲各地已有一些儿童和家庭作好了参与新形式的市场活动和公民生活的准备。

经济问题有若干连续性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非洲有过一些有活力的和扩张性的政治经济实体。东非文化曾不断向新的地区扩展，与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开展了积极的贸易（还包括非洲内部各地区间的贸易），并与邻邦互通有无。那个时代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需要有智慧和雄心才能取得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成就，在现代也依然如此。

非洲各社会的父母和儿童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现今也依然存在。艾伦·约翰逊和蒂莫西·厄尔把这些普遍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归纳为四类，即生产风险，战乱（安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资源不足。（1987）这些问题今天仍普遍存在。在市场全球化、经济区域化、信息急剧增多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当今世界上，非洲各社会面临着寻找其他解决办法的任务。这任务是要设法将过去有用的养育和照顾儿童的办法同需要在儿童照顾和家长目标方面有所创新的新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从头开始认识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儿童教养和家庭生活中看来已经在努力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此外，社会需要给儿童培养多种多样的才能，而不只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所界定的狭隘经济技巧。当我们考虑经济进步的需要、父母对子女期待的目标以及儿童社会化这几个方面的结合时，要重视的不仅是办企业的经营才干、会读会算的文化水平及身体的健康。要应付安全、风险和低效率的问题，就需要让个人不但一心一意为经济创新作好准备以及保持广泛的、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社会网络，而且必须掌握多种多样的才能以及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内的社会化经验。

市场定价是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的一条普遍原则

市场定价很可能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所有儿童都多多少少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少数几条普遍原则之一。（菲斯克，1991，1992）艾伦·菲斯克提出的社会关系普遍原则有四条：群体共享（群体内的团结），权威等级（地位，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平等配合（同等者之间的平等同济关系），以及市场定价（由市场定价或用途确定的交换关系）。这些基本的关系结构不仅是社会组织的普遍属性，也是人们思想的普遍属性。

既然这四条是思想和社会的普遍属性，所有的人从童年起就要学会用其中的一条或几条评价他人并与之相处。市场定价这一条在思想上和社会上也许不是像关心经济进步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突出，但是所有社会中的人们似乎都懂得怎样求得这四种社会关系的平衡。在这方面，对于关心经济发展的人来说，问题仍不在于如何在儿童和家长

心目中从头开始建立市场思想和社会关系意识，而是在于如何发展和延伸已有的意识。

文化价值观并不界定文化或变革潜力

文化价值观往往被看做是妨碍经济进步的关键障碍，可是它们并不界定文化，文化不是由它们组成。人类学研究价值观的创始人是克莱德·克拉克洪，他曾经用抽象的名词形容价值观是“可取事物的观念”，即人们对于好的事物共同持有的概念。（邓德拉德，1995）克拉克洪确实认为文化是与“生活”相对立以及与适应相对立，他并不认为价值观体系是决定性因素。（埃德蒙森，1973；亦见克拉克洪和斯特罗德贝克，1961）

克拉克洪认为生活实质上是无秩序的和混乱的。文化是强加于生活的秩序，对于人类生活延续而言，是必要的……他很明确地认为，文化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健康和幸福；从长期看，文化并未确保所有社会的发展或生存；成功的社会并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之改变。（费希尔和沃格特，1973）

巴思（1993）争辩说，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价值观的制式表述而使之物化，而是应该集中注意它们在社会化中的作用。然而，当文化价值观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时，确实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文化价值观是强有力的，在制度和社会行动两个层面上，均应予以认真对待。但它们是适应的工具，会受到讨论和变化；它们并不能决定文化或构成文化。

价值观重要，在于它们如何引导社会行动。它们起这种作用的方式，是让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现状，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其中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指引人们的注意力评估过程（例如判断我们应当照料的是什么？）；给人们的行动提供社会认可的理由，可以按照大家共有的价值观向自己和旁人证明行动是有理的；还给人们提供一种社会认同的依据——例如，相信我自己是有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则不是。（邓德拉德，1991）

价值观对不同的人起不同的作用。尊重权威和长者，可以帮助孩子们知道该照顾什么人，但无助于解释当代变化中的世界的性质，也无助于基本的社会认同。按照尊重权威的价值观，妇女会知道该照顾什么人，但对于这一价值观所意味着的道理和社会认同，妇女与男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就儿童而言评价文化的普遍标准；保障儿童康乐、基本扶持从而导致可持续的文化生活

对文化作评价时，应看它能否给儿童和家庭提供康乐、基本的扶持以及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对于儿童生活的这些特点，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对于社会中与我们持有相同的有意义的目标和文化习俗的人，我们当然可以提供我们的忠告并结为朋友。但是，对于以上三个条件如何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通往什么样的文化目标，我们只能听任社会内部的变化和辩论的机制去起作用。

让儿童享有康乐，就是让他们能参与社会认为可取的活动，从而得到正面的心理经历。韧力和变化的潜力有赖于儿童及其家庭的这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共同文明社会的参与有赖于这种文化康乐，其依赖程度甚于各种具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韦斯纳，1997b），尽管信念的深浅自然也很重要。

儿童和父母也需要基本的扶持。如何扶持儿童，世界各地有一定的共识。这包括关爱，保证身体健康，共同解决问题，提供食品及其他资源，防范暴力伤害，在道义上和文化上明白谁能提供和应当提供扶持，以及提供扶持的相应方式。（韦斯纳，1994）

各种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基本扶持，其意义不尽相同。在评价各种文化时，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儿童是否得到文化上始终如一的、可以合理预测的扶持。在非洲和别的地方，都有千千万万的儿童及其父母得不到这种基本水平的扶持。

康乐和基本的扶持结合起来，就可为儿童提供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可持续的日常家庭生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于父母

和儿童的目标具有意义和价值，能尽量减少或平衡家庭和社群内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分歧，并且与家庭所能得到的资源有足够的配合。如果父母和儿女能建立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就会具备适应变化、掌握新能力及创新的文化基础。若缺乏这一条，任何干预都将无济于事。

（韦斯纳，1997a）

东非变化中的父母养育和儿童社会化方式

非洲家庭和养育孩子的习俗，在侧重点上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家庭的目标和习俗，但是它们与各种市场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变革并不是不相容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社会分布的儿童养育做法、关于家庭资源和权威的灵活而且不断变化的道义辩论、强调儿童养成独立与尊重他人相结合的气质以及扩大家庭的更多与现代性相联系而较少压力的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康乐和可持续的家庭生活。

社会分布的儿童养育和照顾

分担管理责任的家庭体系得到社会分布的支持，这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均有所见。（韦斯纳，1997a）这一文化特质复合体的特点包括：

- 对儿童的照顾往往成为间接的支持链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儿童协助另一个儿童，那个儿童又协助第三个儿童。支持往往是间接的和延迟的，不一定是围绕父母与子女的直系关系而组织。

- 儿童期待其他儿童的支持，如同期待大人支持一样，甚至在程度上超过后者。

- 女孩子照顾儿童和负担家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男孩子。男孩子显然也向其他儿童提供支持和照顾，但在他们长到十来岁时就比较不经常了。

- 当母亲的妇女支持和抚育孩子，同时还保证别的人也经常参与，如同她们自己直接做一样。共同抚育是常见的。

·对儿童的照顾常常伴随着儿童做另一些家务事。

·同一个人会既支持和抚育儿童，同时又欺凌、戏弄和支配儿童；这种支配随年龄增长而增长。

·食品和别的一些东西是有力的文化关切手段，用于威胁、控制、安抚和抚育。

·对儿童的支持和抚育很少伴随有语言交流和问答对话；儿童与主要抚育者之间讨论权利和特权的情形是少见的。

·判断儿童智力和社交能力，要看儿童能否料理家务，能否表现出适当的社会行为，会不会照顾别的儿童以及支持别人，当然还要看学习成绩。

·在这一系统内，儿童的社会化要经过学徒式的学习，担负自己的家庭角色和责任。

非洲的这种生活格局能促进儿童对哥哥姐姐和成年人的尊敬，训练社交能力和照顾他人的能力，也会形成对自己所在群体的人们的妒忌和怨气，还有对群体之外的人们的不信任。

文化特质复合体包括一系列相互连接、互为补充的生态情况、信念和习俗，而上面所说的社会分布的支持系统是这一文化特质复合体的一部分。一种文化的特质几乎总是持久、固执和难以改变的，因为它们深深嵌入文化特质复合体之中，而这一复合体是在情感上逐渐形成、有着高度共识和默认的文化模式。社会分布的支持与以下一些特质有松散的联系：高人口出生率；关心儿童的健康和死亡率；扩大的、延伸的或联合的家庭格局；母亲的大工作量；扩散的情感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多重感情模式。分析整个的、背景化的文化特质复合体是很必要的。仅仅指出文化特质复合体的某一个部分，期盼它发生变化，那是不大可能出现变化的。

社会分布的儿童照顾方式的确有可能抑制个人主义和独立自主精神的发展，因为它扩散个人的情感纽带，促进个人养成“以社会为中

心”的自我意识。儿童早早就参加家庭的劳动，有可能妨碍他们上学、游戏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儿童的活动受到控制，有可能妨碍他们的独立自主以及对新的工作和学习方式的探索。

以上这些特点是有关联的，但这种关联是松散的，因情况而异，家庭与家庭以及儿童个人与个人各不相同。例如，有些分担家务的孩子反而学习得更好一点。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参加社会分布的儿童照顾，其学习能力并不降低。抚育儿童的任务也有好的影响，或好坏影响兼有。它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影响究竟如何，决定因素之一是要看孩子参与这一任务是应母亲的请求，还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卡斯尔，1995）

关于父母与子女的问题，已有变化了的、复杂的道义性讨论

如果文化价值观和习俗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默然接受而无法加以辩论，那么，文化上的变化就困难得多。然而，这样的辩论在非洲是相当开放的。卡罗琳·爱德华兹在她的《丹尼尔和学费》一文（1997）中就讲了一个有趣的关于分担儿童养育责任的辩论事例。给她提供信息的人在谈到家庭有关“尊重”价值观的决定时，既谈到基本的“合理性”，也谈到灵活性。

在她说到的这个事例中，丹尼尔靠哥哥帮忙交学费，得以念完中学。然后，他在内罗毕做工挣工资，他的妻子和孩子仍住在乡下。八年后，他的儿子要开始上学，需要交学费。恰好在这时，他的父母来了，告诉他那位曾帮他交学费的哥哥在一次事故中死了，哥哥的儿子上学要交学费，父母说丹尼尔该付这笔钱。可是丹尼尔的钱只够供一个孩子上学。丹尼尔的妻子认为应首先供自己的儿子读书。丹尼尔左右为难。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呢？理由是什么？

爱德华兹带着这个问题到了肯尼亚的两个农村，阿巴卢伊亚和基普西吉斯，去听取人们的意见。人们公认那两个地方的人是诚实、负责任的，而且愿意给别人提出明智的忠告。她采访的成年人当中，一半上过中学，一半没有念过书。她还采访了一些年轻的中学生。从采

访的结果看：

所有的人，年轻的和年长的，已婚的和未婚的，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和道义上的冲突时，都使用共同的词汇，畅谈各自的看法。尊重人、和睦、相互依靠和团结这些价值观在他们的言谈中体现得生动活泼，并作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美德，受到再三强调……在阿巴卢伊亚人的谈话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应当求得思想和行为上的是否“合理”，而基普西吉斯人强调的则似乎是怎样保持“可尊敬的”关系。（爱德华兹，1997）

在道义推理方面，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之间，显然有所不同。例如，受到较多教育的中学生在评论道义问题时，就较少考虑权威标准。阿巴卢伊亚那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较多，而且受过基督教贵格会传教士的影响，那里的人就较多地提到怎样做“合理”。

尽管人们对学费问题该怎样处理，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有着足够的共同词汇，足以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这一共同的框架意味着，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意见，人人都能理解。辩论表现出灵活性，有多重表达形式，而且人们愿意开诚布公，用各种价值观理由说明丹尼尔或别的人为什么应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在经济方针或家庭资源在子女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辩论。（萨珀和哈克尼斯，1997）

在肯尼亚各地天天都可以听到有关儿童养育问题的辩论。在这类辩论中，对于什么是“正确”，怎样做才算“最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乃至矛盾的意见。在如何组织家庭生活和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上，文化信念和道义理想并不是以僵硬的价值观为基础。

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所期望的目标

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应具备什么样的特性，这方面的想法也在变化之中。比阿特丽斯·惠廷在肯尼亚中部约基库尤采访了一些当母亲的妇女，了解她们希望自己子女在性格上有哪些特点。她将采访结果归纳为八点。头四点是：有信心，爱钻研，聪明，勇敢，这些被认为是

学习上取得成功应具备的好素质（在市场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恐怕亦是如此）。另四点是：心地善良，尊重大人，服从，慷慨大方，这些在农村和市郊的等级制的父系社会中，被认为是处好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品格。

这两组特性都被认为至少是可取的。考虑的范围偏重于怎样做到学习好，而不是全面的文化素质。此外，这些目标对男孩和女孩都一样适用。这些家长希望孩子兼具这些特性。由于兄弟姐妹当中已经可以估计到有气质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差异，同时各个家庭现代意识高低不一，许多孩子很可能是这一特点或那一特点比较突出，也有些孩子可能发展得相当全面。

惠廷问过这些家长，哪些特性更有可能是天生的和遗传的，哪些是他们可以培养孩子培养出来的。这些家长像世界各地的父母一样，懂得先天因素和后天抚育都对孩子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孩子们在日常活动表现出来的特点——那些通过“有引导的参与”正式或非正式学到的特点——更有可能因父母的影响而改变。

多数家长认为，好奇心、良好工作习惯、勤奋、服从、尊重大人，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理由呢？让孩子在家里干活，或送到别处工作，就可以学到这些。基库尤的家长说，他们肯定愿意让孩子提问题，通过答案学知识。他们还让孩子通过日常的活动养成好奇心。但是聪明、勇敢、慷慨和善良这些特性是天生的，是核心个性的一部分。（惠廷，1996）

惠廷还设计了一套现代意识综合指数，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母亲的斯瓦希里语和（或）英语知识，家中有无收音机，是不是基督教徒，等等。具备这些特点的父母较多重视孩子的自信心、爱钻研、聪明、勇敢等素质，而较少重视孩子是否慷慨大方、顺从和尊重大人。然而，多数父母仍希望孩子全部具备这两类特性。

现代性是与更多的社会联系和新群体相联系

最后，与乡村和城市社群都有联系的家庭，其现代性高于仅与其

中一方有联系的家庭。1970年起，我曾长期观察肯尼亚西部的一些家庭，他们为了获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好处而在城乡两头安家。（韦斯纳，1997a）与主要住在内罗毕的家庭相比，带着孩子在城乡两头流动而且跟几个地方的亲戚有来往的家庭，其感受到的心理生理压力要小一些，而总的现代性水平相仿。与乡村的或城乡两头住的儿童相比，城市里的孩子比较好斗，与大人或别的孩子发生冲突更多一些，交友和照顾婴儿的能力则比较弱一些。父母安排子女和其他亲人的生活及维护其安全的做法各不相同。在城乡两头流动而且几代人参与照顾儿童的家庭，跟只生活于一地的家庭做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

结 论

试让世界各地的父母和儿童来决定如何更新和试验他们的文化习俗。假如有条件这样做的人能提供相应的活动和新的制度背景，来鼓励市场积累或多元化政治生活，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家庭和儿童会参与这些活动。假如这些新的制度和群体活动的安排是着眼于当地的文化理解（克利特加德，1994），他们就能够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所。如果能提供市场经济活动以及新的、比较积极的公民政治生活，当代非洲就会有許多父母和儿童相当适应地参与这些新的活动。

当然，如同所有的文化生活方式一样，社会分布的社会化对于个人及经济发展是既有利也有弊。例如，限制男孩和女孩文化生活的性别隔离会继续起不利的作用，对邻邦邻族和其他文化群体的人已经制度化的妒忌和惧怕亦是如此。虽然父母常说男孩女孩可以有平等的发展（随着教育进一步普及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父母更加会这样说），但男孩和女孩的文化生活会继续使性别隔离表现得很突出，只是范围会逐渐缩小，逐渐向平等方向转变。地方性的信念会使得家庭财富的平等分配困难重重，难以干预。（霍华德和米勒德，1997）

非洲千百万的父母和儿童已为变革作好准备，日益具有世界眼光，或者至少意识到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而且正在创造性地改变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儿童养育的方式。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抵制变革。父母们和群体的想法自然是有矛盾的。他们有“捍卫生活的可预测性

的本能.....这是人类心理的一条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马里斯，1975）养育和照顾儿童的做法正在改变，可是显然有一些强有力的、涉及情感的文化模式使得这方面的变革既有可能，又困难不小。

考虑到文化的重要性、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儿童养育方面的矛盾心理状态，为什么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改变非洲家庭既想捍卫又在努力改变的那些儿童文化生涯价值观和习俗呢？的确，我感到纳闷，为什么那些对经济进步和新式公民生活感兴趣的人，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集中注意父母应怎样养育自己孩子的细节。

要帮助这些家庭，更容易得多的办法，是提供必要的手段以建立基本的和普遍期待的社会保障，从而得到必要的资金来实现有意义的家庭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根据去给他们规定一些干预措施和新价值导向，要求家庭系统之内的父母对子女的目标和养育孩子的做法作出什么具体的改变，因为有迹象表明变化已在广泛出现，而且就个人而言，儿童发育过程本来就有内在的可变性。可是，肯定有理由提供一个基础，让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能力为儿童提供康乐，这基础就是安全、稳定、健康和资源等方面的基本社会保障，能允许这些家庭在自己社会内为子女们实现可持续的日常生活，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就是进步。

参考文献

Barth, F. 1993. "Are Values Real ? The Enigma of Naturalism in the Anthropological Imputation of Values." In *The Origin of Values*, edited by Michael Hechter, Lynn Nadel, and Richard E. Michod, p.31-46. New York : Aldine de Gruyter

Bradley, C. , and T. S. Weisner. 1997. "Introduction : Crisis in the African Family." In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T.S. Weisner, C. Bradley, and P. Kilbride, p. xix-xxxii.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Bergin & Garvey.

Bradley, C. 1997. "Why Fertility Is Going Down in Maragoli." In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T.S. Weisner, C. Bradley, and P. Kilbride, p.227-252.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Bergin&Garvey.

Castle, S. E. 1995. "Child Fostering and Children's Nutritional Outcomes in Rural Mali : The Role of Female Status in Directing Child Transfer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0 , no.5 : 679-693.

D'Andrade, R. 1991. Afterword to *Human Motives and Cultural Models*, edited by R. D'Andrade and C. Strauss, p.225-232.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monson, M. S. 1973. "The Anthropology of Values." In *Culture and Life : Essays in Memory of Clyde Kluckhohn*, edited by W. Taylor, J.L. Fischer, and E.Z. Vogt, p.157-197. Carbondale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C. C. 1997. "Morality and Change : Family Unity and Paternal Authority Among Kipsigis and Abaluyia Elders and Students." In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T.S. Weisner, C. Bradley, and P. Kilbride, p.45-85.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Bergin&Garvey.

Fischer, J. L. , and E.Z. Vogt. 1973.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and Life : Essays in Memory of Clyde Kluckhohn*, edited by W. Taylor, J.L. Fischer, and E.Z. Vogt, p.1-13. Carbondale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Fiske, A. P. 1991.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 Free Press.

_____. 1992.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ity :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99 : 689-723.

Goldschmidt, W. 1990. *The Human Career*. London : Routledge&Kegan Paul.

Harkness, S. , C. M. Super, and R. New, eds. 1996. *Parents' Cultural Belief Systems*. New York : Guilford.

Howard, M. , and A. V. Millard. 1997. *Hunger and Shame : Poverty and Child Malnutrition on Mount Kilimanjaro*. New York : Routledge.

Johnson, A. W. , and T. Earle. 1987.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litgaard, R. 1994. "Taking Culture into Account : From 'Let's' to 'How.'" I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edited by I. Serageldin and J. Taboroff, p. 75-120.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luckhohn, F. R. , and F. L. Strodtbeck. 1961.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Evanston, Ill. : Row, Peterson.

Lancy, D. 1996. *Playing on the Mother-Ground : Cultural Routines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New York : Guilford.

Landes, 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 Norton.

LeVine, R. 1973. "Patterns of Personality in Africa." *Ethos* 1 , no. 2 : 123-152.

LeVine, R. , S. Dixon, S. LeVine, A. Richman, P. H. Leiderman, C. H. Keefer, and T. B. Brazelton. 1994. *Child Care and Culture : Lessons from Afric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ris, P. 1975. *Loss and Change*. New York : Double day Anchor.

Robinson, W. C. 1992. "Kenya Enters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Studies* 46 : 445-457.

Roe, E. 1999. *Except-Africa : Remaking Development, Rethinking Power*.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Serpell, R. 1993. *The Significance of Schooling : Life-Journeys in an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er, C. M. , and S. Harkness. 1997. "Modernization, Family Life,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 Kokwet." In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T.S. Weisner, C. Bradley, and P. Kilbride, p.341-353.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Bergin&Garvey.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 1992. New York : UNICEF.

Weisner, T. S. 1984.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Ecocultural Niches of Middle Childhood."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edited by Andrew Collins, p.335-369. Washington, D.C. : National Academy Press.

_____. 1994. "The Crisi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in Africa : Change and Shared Social Support for Children." *Health Matrix : Journal of Law-Medicine* 4 , no.1 : 1-29.

_____. 1997a. "Support for Children and the African Family Crisis." In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T.S. Weisner, C. Bradley, and P. Kilbride, p.20-44.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Bergin&Garvey.

____. 1997b. "The Ecocultural Project of Human Development : Why Ethnography and Its Findings Matter." *Ethos* 25 , no.2 : 177-190.

Weiser, T. S. , with C. Bradley and P. Kilbride, eds. 1997. *African Families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Change*.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Bergin & Garvey.

Whiting, B. B. 1996. "The Effect of Social Change on Concepts of the Good Child and Good Mothering : A Study of Families in Kenya." *Ethos* 24 , no.1 : 3-35.

Wildavsky, A. 1994. "How Cultural Theory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I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edited by I. Serageldin and J. Taboroff, p.137-164.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at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1994.

第十二章 道义地图、“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及新福音传道者

理查德·施韦德

经济学家的脑子：2.39美元一磅！

吃人肉，有营养价值吗？抑或不过是又一种美味而已？这是人类学家庄严辩论的一个问题。可是众所周知，这帮人类学家在盛大典礼的场合也是爱说俏皮话的。作为一名人类学工作者，我想不妨在本章的开头以一种古怪的新形式讲讲一个老笑话，说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脑子市场。

话说一个来自“第一世界”的家伙蹑蹑跚跚，走进了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一家美食店。他来到肉食餐厅，见到了“供各类西方人士”浏览的菜单。它将宾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福音传道者（包括神职的和世俗的人士），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就是要以他们的道义之光使这个世界变得光明美好；另一类是浪漫的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道理，都说OK，点头称是。厅内的不少佳肴，排列得整整齐齐。

第一盘标明是“来自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的脑子：\$ 2.39—磅！”盘上的标签写的是：“这些人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给我们许多贷款（我们自然是决不会偿还的），条件是我们办事要更像他们在西方办事那个样子。他们要我们按正规格式签合同，建立独立的司法机关，而且禁止优先雇用本民族的人员。此为头道菜。”

第二盘标明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学家的脑子：\$ 2.42—磅”。标签写着：“这些人要我们改变我们的工作习惯以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法。他们要我们停止浪费时间去祭祖宗。他们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给我们许多贷款（我们自然是决不会偿还的），条件是我们对事物的想法要跟他们西方人（至少是西方的北部人）的想法一样。西方的北部人相信除了非人格化的工作追求以外，所有的事物都是邪恶的；相信只有富人能够得救。他们告诉我们说，接受新教价值观的当今代码是‘可持续增长’。他们认为上帝会保佑那些有物质财富的人，尤其是处心积虑聚财的人。他们要我们得救。他们要救我们。”

第三盘标明是“单文化女权主义者的脑子：\$ 2.49—磅”。标签上说：“这些人要我们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男女关系和生殖习俗。他们要求将子宫贬值，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跟多子女大家庭、繁重家务和男女分工等‘坏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要我们将阴蒂升值（他们认为那是跟妇女独立、平等和自我刺激求得快感等‘好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说那是女性的生物精华，是妇女解放的象征和工具。倘若我们不答应加入全国妇女组织和女选民同盟，他们就要请北约派一支‘人道’部队入侵这里。”

最后一盘则标明是“人类学家的脑子：\$ 15.00—磅”。标签上写

的是：“这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拿了钱就跑！”

我们这位来客看到这里真是惊愕不已，气冲冲向掌柜的人走去质问道：“这是怎么啦！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西方的道义优越性（至少是西方北部的道义优越性）？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第一世界’）比你们（‘第三世界’）强，就是因为我们是人道主义者，赞成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难道你不知道人的脑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难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有富有穷（‘人力资本’有差异），主要是因为地球南边的人是在穷文化（‘贫穷的文化’）当中长大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适应不了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快车道上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值得信任，腐败，无纪律，无本领，贫穷。OK，经济学家的脑子、基督教新教伦理学家的脑子和单文化女权主者的脑子，价钱有一点差别，我可以理解。可是人类学家的脑子怎么要15美元一磅？真是荒唐！毫无逻辑！太不公道！毫无‘透明度’可言！”

那个掌柜的人回答道：“你可知道人类学家没有什么脑子，我得宰掉他们多少个才凑得上一磅？”

因此，我承认，现在为这本书撰稿，我是感到有点没脑子，因为此书的撰稿人包括这么多的杰出学者和福音传道者，来自我的专业之外的各个学科。主编劳伦斯·哈里森要我也来凑个数，以他特有的坦率告诉我，要我以一名怀疑论者和批评者的身份写文章，因为他认为我相信“文化”而不相信“进步”。他说他还打算邀请另一些怀疑者和批评者，例如那些相信“进步”而不相信“文化”的人。

其实我是相信进步的，至少在有限的意义上是如此。而我相信文化，其确切意义对于在这里主张“文化重要”的诸公而言，却未必是很有帮助的，甚至未必是可理解的。 [91]

说“文化重要”，是什么意思呢？这要看说话的是什么人。
这本书的主题是要表达一种学术立场，叫做“文化发展论”。文化发展论者说“文化重要”，那意思就是说某一些文化是贫困的或落后的，而另一些文化则是丰富的或先进的。这意味着，生活中有一些好东西（例如健康，太平，公正，物质繁荣，自我刺激的快感，以及人

口少的小家庭)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求和应该得到的,可是他们的文化却让他们无法要求和(或)无法得到。

假如你是一位文化发展论者,请看看你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你愿意用一个伦理显微镜巡视全球,绘出世界“道义地图”吗?或者,大体上做同样的事,构建一套“生活质量”指数,用来给各种文化、文明和宗教从优到劣排排队,好吗?假如你是一位文化发展论者,你大概就会对各种“陈旧”的生活方式和“迷信”的信念体系的持久力和得民心的状况深深感到忧郁不安,因为你认为它们相对说来没有真理,没有善,没有美,或者没有实际效用。你大概就要去给那些“黑暗大陆”的居住者“启蒙开导”。你大概就要使劲帮他们脱离错误、愚昧、坏习惯、停滞和卑劣,把他们改造得比较进步,比较民主,比较科学,比较有文明意识,比较勤奋,比较有创业精神,比较可靠,比较理性,以及比较像我们(理想的人)。

文化在我看来也是重要的,但看法颇不相同:倘若我有朝一日也谈“贫穷的文化”,我大概是用这个名词来形容那些苦行、禁欲的群体,他们将摈弃财富和拒绝尘世名利视为一种客观美德。而且,按照我对文化起作用这一点的确切理解,我甚至可能会努力找出他们这种道德观念的若干长处。

虽说“贫穷的文化”并不是一种矛盾形容词的说法,它在我自己的实地调研中几乎完全无用。更糟的是,我对“文化”这一概念的信念是来源于我对其他各种文化的兴趣,把它们当作启示的源泉。(施韦德 1991, 1993, 1996a, 1996b, 1997; 施韦德等, 1998)我从来不曾看重某些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对其他文化感兴趣的一个好理由在于那些文化阻碍了某些人所想象的一种境界的实现,即所有的人都普遍希望变得更像是北欧人。我虽然肯定地相信我们的生活方式重要而且在道义上有其正当性,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在道义上优越于所有其他的人。 [92]

所以我并不认为北欧人对人类进步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我并不认为认识上的、精神上的、伦理上的、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物质上

的进步是齐头并进的。掌握了巨大物质财富和权势的社会，在精神上、伦理上、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却可能是有缺陷的。有许多重要的、学识上成熟的和值得称赞的文化——那里的哲学家是住在泥巴墙的房屋里面——是在技术原始、物质财富匮乏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或“他们”是实现了唯一可信的生活好的表现方式。

显然，我是这一次会议的异教徒之一，感觉不是非常好。所以，请让我在下文中先作两点自供，这样，我被召来充当怀疑论者角色的焦虑不安也许会有所减轻。

自供一：我是一个人类学工作者

当然，我的第一点自供是：我是一个人类学工作者。不幸的是，人类学这一专业如今也是动荡得很，所以这一点自供不是很说明问题。现在跟五十年甚或二十年前不一样了，这一自供还不足以表明，我对文化这一概念是怎样想的，我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它是使我笑还是让我哭。 [93]

为了准确地描述人类学的现状，请让我指出，从前，在人类学界，如果使用“原始”、“野蛮”、“未开化”甚至“不发达”这一类字眼时，都是给它们打上引号的。从前，要是有人说只有一条路，即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才能通向道义上正当和合理的生活，人类学家老实说就会认为这种说法是卑鄙下流的。

可是情势变了。单文化的女权主义使得人类学之中简单明了的相对主义宣告终结，而且使“政治正确”这一概念有了新的含义。于是，与国际人权运动以及促进西方式全球化的各种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也许甚至包括北约在内）一起，如今也有不少的人类学家把别人的文化当做鄙薄的对象。这么一条口号：“这是非文化的，是〔填空：犯罪的，不道德的，腐败的，无效率的，野蛮的〕”（或者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是〔填空：犯罪的，不道德的，腐败的，无效率的，野蛮的〕”），已成为形形色色的文化发展论

者、西方干预主义者以及文化人类学某些流派的汇聚点。

我对事态的这种具有嘲讽意味的转变感到遗憾。文化人类学这一门学科曾经是明确地反对民族优越感和道义上的傲慢，同时还反对殖民主义而为别人的生活方式辩护，人类学曾以此为自豪。可是这已成为历史了。

如今有不少的人类学家（后文化主义者）想要与文化这一概念脱离关系。他们觉得“文化”这个词被滥用了，被用来为集权主义社会制度辩护，让独裁者可以杀人而逍遥法外，不受谴责。的确，文化人类学理论界的这种变化似乎令人感到“故态复萌”。尽管人类学多元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背景主义者，诸如弗朗茨·博厄斯、鲁思·本尼迪克特、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罗伯特·莱文、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一代代人类学家，百余年来大声疾呼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可是一种与19世纪后期“白人的包袱”相似的学术立场，即文化发展论，又回来了。某些型号的西方自由主义那种沾沾自喜的、超脱野蛮状态的主题（包括那种轰动性的指责，说非洲的母亲是坏母亲，侵犯人权，毁伤女儿性器官，云云），又流行于人类学的舞台上，至少是流行于那些自以为政治上最正确的人类学家当中。^[94]

人类学界的现状是够复杂的（而且是有悖常理的），有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文化”概念属他们所有，不许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去碰一碰。我不是这种人。不论文化概念是让我笑还是让我哭，我都很喜欢它。我摔不掉它。我觉得我们不能单靠普世教会主义过日子。对于个人特性和个人幸福来说，身为某一特定意义传统的一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在我看来，“浓厚民族性”和文化多样性二者皆有其地位，都是事物自然秩序和道义秩序的组成部分。我不认为大自然母亲要让所有的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

我说“文化”是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各群体特定的真、善、美和有效率的概念。要成为“文化”的成分，这些真、善、美、有效率的概念就必须是社会继承而来的和通用的；它们还必须不同生活方式的构成因素。

换句话说，文化指的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目标，价值观和心目中的世界图景”，它们表现为各个自我监控的群体的言谈、法律和日常习俗之中。

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不是我在一章篇幅之内说得清的。常言道行动胜于言语，“实际做法”是文化分析的核心依据。由于这一原因和别的原因，我并不很喜欢就价值观问题列表调查的做法，对于那些根据官方信条分析作调查或者根据人们对一些抽象、独立的命题表示赞成与否的调查结果作研究的做法，我也很难感到热心。 [95]

此外，“文化”肯定与“国民性格”无关。关于“国民性格”，我不想多谈。这方面的研究大约四十年前就不再时兴了，很有道理。它们不再时兴，是因为对于人的行为和动机，按照理性选择论者或明白事理的经济学家的方式去思考，要比按照性格论者的方式去思考好得多。理性选择论者认为人的行动来自“使然作用”，也就是说，在分析行动时，应将它视为“意愿”（包括目标、价值观和各种各样的“目的”）和“约束因素”（包括各种各样的“手段”，例如有关因果关系的信念、信息、技能以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二者的共同产物，这二者均由理性的人的意志加以调节。这一见解与性格论者的想法适成对照。性格论者认为行动是“强制而来的”。他们企图将行动解释为两类向量的共同产物，其中一类向量发自“内部”，即“人”（解释为一般化的动机和“执著”的全面特性），另一类向量发自“外部”，即“形势”。

事实已经证明，把探索人的类型作为解释文化习俗的途径，是不大有用的。如果从性格或一般化动机的角度看个人的特点，那就会发现“同一文化内部的个人与个人的差别比他们与其他文化的个人的差别还要大”。（卡普兰，1954）还会发现，如果说真有什么模态类型的话（例如“专制性格类型”，或者“需要取得成就”的性格类型），那么具有这些典型性格的人不会超过人口的三分之一。心理人类学家和文化心理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不同性格类型可能与相同社会制度相联系，而相同性格类型又可能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联系”。（梅尔福德·斯皮罗，1961）试图用性格类型来解释文化习俗的差别，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参见施韦德，1991）

自供二：我是一个多元论者

我的第二点自供是：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的这一种文化多元论的出发点是一条普遍真理，我将它称作“混乱主义”原则。“混乱主义者”认为，对于可知的世界，若从任何一个观察位置看去，它是不完整的；若同时从所有观察位置看去，它是不连贯的；若“不从任何特定位置”看去，它是空虚的。既然要在不完整、不连贯和空虚之间作一选择，我选择不完整，同时保持移动，不断变换观看和评价世界的方式。

这一种文化多元论与普世主义并不对立。文化理论工作者并不是只有两种，一种认为任何事物都行（“激进相对主义者”），一种认为只有一种事物行（“清一色普世主义者”）。我坚信“普世主义”，但是我相信的这种普世主义是“去掉清一色的普世主义”，正是它使我成为一名多元论者。换句话说，我相信存在着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只是太多了（例如公正，行善，自主，牺牲，自由，忠诚，虔诚，责任等）。我相信这些客观上有价值的生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非均质的，不能简化到几个公分母，例如“有用”或“高兴”，而且它们在本性上是彼此有冲突的。我相信生活中的好东西不可能全都同时达到最大限度。我相信当各种真实的价值观付诸实行时，总会有所取舍，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传统（即文化），而且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能说一切都好。 [96]

文化多元论还有别的一些涵义，其中有的是很刺激人的。例如，它公开宣称，美国人类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1947年认为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的文件，决定不赞成这一宣言，是做得对，做了一件勇敢的事。在1947年的时候，人类学家们还曾经为自己反对殖民主义、为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辩护的立场而感到自豪。（见施韦德，1996b）

进步与多元论：二者能否共存？

多元论并不意味着是拒绝进步和衰退的概念。进步的意思是拥有

越来越多的“可取”的事物（因为是“好事”而想要得到的事物）。衰退则意味着这样的事物日见减少。具体说一件“好事”（例如赡养老年父母，消灭传染病），可以依照它客观判断有无进步。若将婴儿出生后头九个月的存活率作为判断成就的尺度，那么美国客观上就比非洲和印度先进。若将怀孕后胎儿在子宫头九个月的存活率作为衡量尺度，那么非洲和印度客观上就比美国先进（前者的流产率较低，后者的流产率较高）。

要具体说究竟什么是“好事”并据此绘制世界道义地图，这当中自然有不少任意性（即并不取决于逻辑或证据）。例如，进化生物学家对社会成就的一个评估标准是“生殖体质”，即人数多寡，一个部族或一个家族的繁殖程度高低。倘若采用这一尺度，那么对第一世界高科技社会的一些事物，如避孕药、人工流产合法化和家庭规模缩小，该如何评价呢？难道说那是衰退？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对于预期寿命，即出生以后可预期活到多大岁数，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又该怎么讲呢？一个社会的人们活得越久，出现慢性病和机能损伤的频率就越高，因此该社会人们忍受的总痛苦量（一个实在的质量尺度）就越大。好事与好事（例如长寿和身体无病痛）并不总是可以兼备。长寿不见得就是幸福，对吧？再说，倘若长寿可以是社会成就的一个尺度，那么人口众多为什么不可以也是社会成就的一个尺度？那样，中国和印度就该名列世界第一和第二了。

还有，预期寿命为什么从婴儿诞生算起？是哪一条逻辑或归纳科学准则规定必须以此作为标准，来绘制世界道义地图和评估文化进步？为什么不是从40岁算起，或是从怀孕时算起？为什么不从更完整的生命过程着眼，从胎儿算起？上文中已说过，若考虑子宫内的胎儿安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社会要比第一世界和原第二世界强得多。美国 and 加拿大的流产率高达20%至25%，俄罗斯的流产率更在50%以上，相比之下，印度、突尼斯和“不发达世界”另一些地方的流产率只有2%到10%。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维护生命权还是维护选择权（我个人是维护选择权的）。问题是：在绘制道义地图和评价自由程度时，把谁的理想挑选出来当作美好生活的金规则，这是有任意性的一面的。社会在技术上发达起来以后，流产率往往随之上升，这样，从怀孕时算起的预期寿命就降低了。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往往是那些珍视多子多孙和大家庭的地方，幼儿期是人生中相对危险的时期。在另一些地方，往往是科技发达、人们珍视小家庭的地方，子宫不再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人生的真正危险期来得更早，假如大人不想要你这个孩子，子宫对于你的健康来说就是危险的地方了。

一旦对于“好”和“坏”选定了具体标准，就可以对进步与衰退作客观评估。但是，如果认定某种文化传统最优越，以这种得胜进步论的形式依照特定的价值观作评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同样的事物可以显得是好或者是坏，就看你选择什么价值观作标准了。文化多元论者在评论生活中种种潜在的好事物时，认为大多数长期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都各有其利弊。（见施韦德等，1997）至于谈到进步问题，文化多元论者认为，由谁来说谁好一些谁差一些，这里面有任意性（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很大余地。

依照特定的价值观评判进步不进步，还可能出现一种情形，就是不明白总的说来今胜于昔，或者说多数的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变。这样评判进步不进步，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新古董”而不承认世界只是在不久的过去才醒过来，摆脱黑暗，这在北欧是三百年前。“新古董”不认为新是进步的一个尺度，乐于以进步的名义重新高度评价遥远过去和遥远地方来的东西。

多元论者是作批判性的评价的。事实上，在我的文化分析框架中，重要的一条是“能证明有理的立场”；我认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是那种经得住外来批评的生活方式。多元论是试图为“别人”辩护，而不仅仅是要纠正种种型号的当代民族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偏见和夸张（包括宣称西方比别的人都好的说法），尽管这也是相当重要的理由。如今，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兴盛，包括我们的因特网的膨胀，我们西方人真是踌躇

满志。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妨记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并不曾说过新教比天主教优越或者北方比南方优越。他是一位批判多元论者，警告我们要提防现代化的“铁笼”，要提防国家官僚机构的非人性统治——它居然将我们对亲友的道义贬为一种“腐败”；要提防毫无拘束的经济理性的危险性。

纵观历史，凡是最富和技术上最先进的人都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最顺乎自然的，是受到上帝恩赐的，是灵魂得救的最可靠手段，至少是世上通向幸福的快车道。在16世纪，到中国去的葡萄牙传教士以为他们非常引以为骄傲的钟表这一发明，不可抗拒地证明了天主教优越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兰德斯，1998）据我所知，他们的机械计时器大概还被用来证明他们的专制君主国制度有理。如今，我们被CNN、IBM，汉堡包、牛仔裤、避孕药、信用卡等当代发明和玩具弄得晕头转向，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挺惬意，很可能也产生类似的幻觉和同样的自吹自擂。

千禧预言：“新世界秩序”的三种形象

如今是令人困惑的时代，特别是当人们试图想象一种什么样的“新世界秩序”将会取代老的“三个世界”格局时，更是把人弄得糊里糊涂。

困惑的一个原因在于，曾一度自鸣得意的、来源于“启蒙论”的、预言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科学将得势的那种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挨了闷棍，如今在21世纪之初再用它来预言变化的方向，已不那么有用了。30年前，许多社会科学家就曾预言，在现代世界，宗教将会消失，而被科学所取代；部族将消失，而被个人所取代。他们说错了。无论从全球看还是从各地区看，他们预言的事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多种文化并存是活生生的事实。原先是一统天下的第二世界如今成了许多小天地。全球制度的发展和各地区本土伦理或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看来是在齐头并进。在极端情况下，文化上的少数群体实行政治上的更替还可以领到奖赏。潜在的奖赏包括各种权力中心提供的财政援助和军事保护，也许还能在联合国得到发言权。

此外，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如今所在的民族国家，正如约瑟夫·拉兹所说，是“由习俗和信念各不相同的一些群体所组成。其中有些群体的信念还是彼此不相容的”。我们将继续处于这种状态，这至少是由于全球人口迁徙的现实，还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性和神性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只有承认它们才能换来个人的身份及人类进步。当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可能是危险的；对于生活在多文化国家中的外来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可能有危险的；对于身陷地缘政治冲突之中的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的人来说，亦是如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希望不仅是文化起作用，而且还有多元论的文化观念也起作用，因为有一个正确的文化观念，就可以用来尽量减少文化“差别”和多文化生活所具有的风险。

说现今是令人困惑的时代，还有另一个缘故。各个民族、文化或国家为什么有的穷有的富，如果有一条总的原因能解释清楚，那当然很好。可是我们没有。英国19世纪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指出过“原因”是指种种必要的条件结合在一起，才足以造成一种结果；如果我们照此理解“原因”，那就应该承认我们实际上还不知道经济增长的原因何在。比方说15世纪的西西里，16世纪的荷兰，今天的日本，或者别的哪一个民族、文化或国家，社会科学家都可以就他们的经济成败讲出若干方面的理由。但这绝不是什么一条总的理由。不妨读一读戴维·兰德斯论述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世界经济史巨著《国富国穷》（1998年），看看他谈到的穷富原因共有多少条。试问其中单有哪一条就足以造成经济增长吗？答案是，没有。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了枪炮是一条。有了犹太人又是一条。在这里是移民政策起了作用，在那里是奎宁解决了大问题。一处是解放了农奴，另一处是拥有了煤或石油。这里是气候适宜，那里是乐于开展外贸。殖民者的作用有好有坏，消费需求高自然重要。好的运气到处都管用。新加坡不是自由民主制，可是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然而穷。瑞典在18世纪是人口稀少的民主国家，当时也是穷，以后才富起来。不信基督教也不信“男女平等”的人（例如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犹太人）也能富。完全世俗化和信奉平等的社会（例如东欧的原共产党国家）在经济上富不起来。在1950年，日本有“儒

学价值观”（它在当时并不曾显得很像“西方”），当时比巴西还穷。到了1990年，日本仍旧有“儒学价值观”，这东西突然显得是颇与“基督教新教相似”，因为这时日本已经超过巴西了。假如我是一个怀疑派，我就会说我们大多数能干的经济史学家真了不起，把一些并非必要的条件凑在一起，说它们造就了某某地方的财富。少持一点怀疑态度，我就会感到，尽管许多学者回顾历史时对各地经济增长的条件作了很不错的叙述，但是按照穆勒对“原因”的解释，究竟经济成就的总的原因是什么，人们真有些困惑不解。

那么，对于现今“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该作何理解呢？“全球化”（世界各地经济相联系）、“西方化”（采用西方的观念、理想、规范、体制及产品）和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关系如何呢？假如你把耳朵紧贴地面，你就会听到有关“新世界秩序”的不少预言或者推测。我愿在本章末尾提及其中的三种。

预言一：西方是最好的，将成为全球的新秩序（或者说西方至少应努力接管世界）

这一预言是说，由于全球化，西方式的愿望将喷发出来或者释放出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相伴而来的产物。西方式的愿望包括希望有自由民主，权力分散，自由企业，私有财产，个人权利，性别平等，等等。大概还有喜爱西方产品的口味。对于“全球化”、“西方化”和“经济增长”这三者的关系，这一预言想象的是互为因果，四面开花。从根本上说，这是将西方“启蒙论”加以普遍化和投射到未来。

预言二：别的人会“分到一杯羹”而同时保持其独特的文化

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一位苏丹学生做博士论文，利用有关信念和价值观的答问调查方式，分析非洲学生对现代化的态度。通过调查，他发现“物质主义”因素是与“个人主义”因素成垂直相交状态；人们可以重视物质财富而又不必放弃部族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一信息大受沙特阿拉伯人欢迎。他们雇请他到沙特阿拉伯的大学去教书。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亨廷顿1996年发表的文章说西方的文明是独特的

但不是普遍的；其他的文明并不是需要变得和我们一样，才能分享现代世界技术的好处，这一说法在非西方世界很得人心。这种预言所看到的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很深的西方文化渗透。各种文化和文明可以保持各自的不同而人人都可以分享一块蛋糕。 [97]

预言三：一种开明奥斯曼帝国式的世界，人员分两“等”（全球性的自由派和地方性的非自由派）

我将第一种预言联系到福山（1992），将第二种预言联系到亨廷顿（1996）。现在，让我最后说说我自己卜的卦。试设想一种经典意义上开明的世界秩序。它的领导者们对实质性的文化问题采取“中立立场”。他们并不要求各个地方改变其性别理想、权力形式、亲戚关系结构或人们的成年仪式，不以此作为援助和保护的条件。他们并不试图告诉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互敬互爱，或者必须具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审美理想和宗教信仰。他们并不试图告诉人们怎样过自己的私生活或者必须有自己的私生活。试设想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奖惩机制，使得大家有可能实行最低限度的文明规则：出境签证随时可得；决不允许越境侵略。试设想这样一种世界制度将支持文化问题上的分散管理，因而促进地方文化繁荣。这样一种“新世界秩序”看上去也许像是一种后现代形式的奥斯曼帝国“米勒特制度” [98] 普及于全球。

我设想这一制度将是两层，在两个层面，即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上运作。我设想它的工作人员将分为两“等”。一“等”是全球性的自由派，要学会在价值观事务上持中立态度并正确对待文化的多样性，负责全球性机构的工作。另一“等”是地方性的非自由派，负责各地有浓厚民族特性的事务，让各民族在文化上彼此有所区别，从而在世界上保持多样性，足以让负责全球事务的自由派人士去操心维护。后者，即全球性精英，当然是来自所有各民族。在这种世界制度的全球性层次上流行的，是新的全球性文化，在这一文化中，你的祖籍和肤色远远不如你的受教育水平、价值观和旅行计划重要。在后现代的国际大都会环境中已存在这样的情形，你不必是生长在西方的西方人，正如同你不必是生长在世界南方的南方人，人们不一定要具有某一地方的

观点。最后，我设想在这一“新世界秩序”中，个人可以在两层次和两“等”之间往返流动，一生当中可能在全球性自由主义和地方性非自由主义之间来来回回。

至于全球化、西方化和经济增长，我不揣冒昧，试提出如下猜想。倘若仅仅依靠西方社会浅薄表面的东西（例如武器，信息技术，Visa信用卡等）即可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即使各种文化的人富起来了，这些文化也不会趋同。倘若经济增长有赖于接受西方文化深厚层次的东西（例如个人主义，女权理想，平等主义，《人权法案》等），那么其他的各种文化也不会与之趋同，而且不会在经济上发展起来，因为他们的文化特性会重于物质财富上的愿望。

参考文献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 Free Press.

Harrison, Lawrence E. 1992. *Who Prospers ?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 New York : Basic.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75 : 28-45.

Kaplan, B. 1954. *A Study of Rorschach Responses in Four Culture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 42 : 2.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ndes, David S.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Are So Poor*. New York : Norton.

Obermeyer, C. M. 1999. "Female Genital Surgeries : The Known, the Unknown, and the Unknowabl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3 : 79-106.

Obiora, L. A. 1997. "Rethinking Polemics and Intransigence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Female Circumcision."Case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 47 : 275.

Shweder, Richard A. 1991.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3."Cultural Psychology : Who Needs It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4 : 497-523.

_____. 1996a."True Ethnography : The Lore, the Law and the Lure."In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 Context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R.Jessor, A.Colby, and R.A.Shweder.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_____. 1996b."The View from Manywheres."Anthropology Newsletter 37 , no.9 : Shweder, Richard A. , ed.1998.Welcome to MiddleAge ! (and Other Cultural Fiction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weder, Richard A. , with M. Mahapatra and J.G.Miller.1990."Culture and Moral Development."In Cultural Psychology : Essays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edited by J.S.Stigler, R.A.Shweder, and G.Herdt.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weder, Richard A. , with N. C.Much, M.Mahapatra, and L.Park.1997."The'Big Three' of Morality (Autonomy, Community, Di-vinity) and the'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In Morality and Health, edited by P.Rozin and A.Br and t.New York : Routledge.

Spiro, M. 1961."Social Systems, Personalit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In Studying Personality Cross-Culturally, edited by

B.Kaplan.New York : Harper&Row.

Stolzenberg, N. M.1997.“A Tale of Two Villages (or, Legal Realism Comes to Town) .”In Ethnicity and Group Rights-Nomos XXXIX, edited by I.Shapiro and W.Kymlicka.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和
马利亚诺·格龙多纳对本章第一条注释的评论以及理查德·施韦
德对评论的答复

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

理查德·施韦德说有“几位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扮演了对现状不满的‘内部人’角色”，典型地表现出他把拉丁美洲人的意见看做第三世界的反应。他根本不懂得拉丁美洲是西方的延伸。我不明白，为什么施韦德认为我们应该听天由命接受集权主义政府的统治，并忍受现有的经济模式使我们半数人民陷于苦难，而全世界——从日本人开始——却认为日本模仿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是值得称赞的。也许施韦德觉得巴西那些favelas（棚户区，贫民窟）景色如画，可是我知道那里苦难深重，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应该予以消除，让那里的人们有机会选择较好的像样的生活。

我怎么知道拉丁美洲人想要什么？很简单：看看人口迁徙的趋势。调查表明，墨西哥、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的人有一半或半数以上愿意背井离乡迁居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可以给他们提供他们在自己国内得不到的东西。

施韦德说“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扮演对现状不满的‘内部人’角色”，这话也可以用到一些美国人身上，因为他们也对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贫民窟的悲惨状况感到关切，希望改善那些人的生活。如果施韦德始终不想批判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和态度，那么对于西西里黑手党徒立誓拒绝对同党作证的做法，他也该感到毫无问题了。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

作为一名非洲的“对现状不满的内部人”和“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感谢给我机会对理查德·施韦德的注释发表意见。只是我感到有点胆怯，因为他毕竟是一位西方学者，自称他比我更能反映“当地”的意见，因为他“在……或亚洲乡下作了多年现场考察，因而理解和明白了那些‘别人’传统之中含有的价值”。

我不得不供认我没有从哈佛研讨会得到所期待的“学识和道义指导及物质援助”，所以我得讲老实话：我们非洲人真的喜欢住在贫民窟中，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医疗，让我们的孩子上不了学。而且，我们腐败的酋长统治的政治制度真是了不起，让蒙博托的扎伊尔之类的国家为我们非洲人争了气，赢得了国际威望和尊敬。

此外，倘若非洲各地都组织自由、民主的选举，那岂不是乏味之至。那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真正的非洲了，而且，一旦丧失了我们的特性——我们的专制集权，我们的血腥内战，我们的文盲遍地，我们的45岁预期寿命——我们就会不仅让我们自己失望，而且会叫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失望，须知他们是怀着多么深厚的同情之心研究着我们非洲人，而且理解我们，知道他们不能期望我们像别的人一样在第三个千年即将来临之际寻求做人的尊严。我们是非洲，保持我们的特性可重要啦！

这些西方学者明智而又勇敢地承认我们非洲人是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让我们在这些学者的全力支持下，为保持我们的特性而奋斗吧。

马利亚诺·格龙多纳

在理查德·施韦德与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及本人这样的拉丁美洲人之间，从方法学上说，存在着差别。施韦德若集中研究拉丁美洲，他的目标就是理解拉丁美洲。我们则是要改变拉丁美洲。人类学家需要让他们研究的社会保持相对稳定和可以预测，就像昆虫学家研究蜜蜂和蚂蚁一样。蒙塔内尔和我却是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

它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热爱它。正因为我们献身于它，我们希望它前进到新的水平，让人们的生活接近于发达世界的水平。

必须问一声，究竟是谁更能代表拉丁美洲，是施韦德及其他外国社会科学家，还是蒙塔内尔和我本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地区。我们感受到它。如今有成百万的拉美人“用自己的脚投票”而迁徙到发达国家，而在拉美各地的选举中，绝大多数的选民都投票支持进步的政府，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我们的观点和见解是广大民众所共有的。

不错，我们是来回旅行于拉丁美洲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我们疏远于拉丁美洲。相反，这使得我们更加关心拉丁美洲的现状，尤其是拉美穷人的现状，而且使我们更专心思考应当怎样做来改变这现状。像我们绝大多数的同胞一样，我们希望拉美各国得到民主的稳定、正义、进步的机会和繁荣，如同我们在先进国家中所见到的一样。

理查德·施韦德对蒙塔内尔、埃通加—曼格尔和格龙多纳意见的答复

我能说明的只是，在我的第一条注释（或是在我那一章之中）我根本没有建议要保留集权统治或生活贫困，或者让人们早逝。在集权制度下，当权者只顾为自己谋利而且无人能制止他们。我想，这个世界上若没有这种制度，将会是美好得多。我也根本没有说过，对于任何文化传统——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内——所表现出来的观念、态度和习俗，都不得批判或应全盘接受。我在自己那一章中指出过，“多元论者是作批判性的评价的。事实上，在我的文化分析方式中，重要的一条是‘能证明有理的立场’；我认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是那种经得住外来批评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若真想对一种文化传统作出某种评价，通常就必须以参与者的身份作观察，投入同情理解的过程。最初他会试图排除一切民族中心主义的反应，努力发现“别人”的观念、态度和习俗中有哪些真、善、美或有效用的东西。并不能保证会得出评价。并不能保证什么都

是OK，都是“真正的”。能证明是假、恶、丑或无效用的那些观念、态度和习俗应加以批判，甚至加以改变。关于激进相对主义的胡扯和唬人的鬼话，就说到这里。我的文章实际上是既批判激进相对主义（“凡是存在的都是OK”），也批判民族中心论的唯我独尊（“只有一条路通向有道德、有理性 and 令人们得到满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路”），只是据我所知，在哈佛的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许多的激进相对主义者。

过一会儿我就会答复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和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提出的一两点意见。不过，我首先要明确一下我在那条注释中实际上所讲的意思，这就是：在当今这个后现代世界上，若单凭国籍（或民族属性）就说有权代表那“当地”的声音，那是不免叫人生疑心的。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泰戈尔是近代印度最杰出的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位发言人，也是印度古典梵文文学的一位赞美者、翻译者和文学受惠者。1877年，泰戈尔第一次来到英格兰，时年16岁，到英国学法律。威廉·哈尔布法斯在《印度与欧洲》一书中引述了泰戈尔初访英国时的印象：

我原以为英格兰是一个小岛，居住在岛上的人都用功学习，所以在我登临该岛之前，我以为从英国这一头到那一头都反复回响着丁尼生诗歌的朗诵声；我还以为不论我在这小岛上走到哪里，都听得见格莱斯顿的演讲，听得见马克斯·米勒对吠陀经典的解释，听得见廷德尔的科学真理、卡莱尔的高见和贝恩的哲理。我以为我所到之处都会看到老人和年轻人沉醉于“知识”的享受。可是在这方面我失望得很。

对不列颠诸岛来说，年轻的泰戈尔是一个“外来者”，可是他在英国文化涵养上显然远远超过了多数英国人，对英国语言的掌握也比他们强。他提到了马克斯·米勒，这一点对于我的注释尤其有意义，因为这位马克斯·米勒是一位德国人，语文学家和“东方学家”，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当时印度的印度教僧侣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梵文

和印度自己的古典文学传统。

这里，“外部人”和“内部人”位置掉了个儿，彼此掌握对方的宝贵文化遗产，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在当代世界上更是如此。在当今世界上，一些非洲裔加勒比海学者正在将古希腊文典籍译成现代文字；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学者写出了很有见地的评介美国的书；马克斯·米勒式的角色多处可见。例如，肯尼亚的一些古西族知识分子已是研究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专家，又研读罗伯特·莱文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著作，从中了解他们古西族民俗和规范的意义、价值和历史。说这些，意思很简单：对于肯定或否定一种文化传统的意见，不能只根据族谱、国籍或民族属性，就以权威自居，别人也不应承认其权威。

我的第一条注释不过是一段旁白，是我对会议的组织安排有所感而附带发表的一点意见。这次会议安排巧妙，让来自“第三世界”的发言人都一次会上发言，而且大致上用一种声音讲话，表示赞成说“西方文明”比别人都优越。当然，这种说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并不是不受欢迎的。它在一些西方的、西方化了的或正在西方化的精英人士当中尤其受欢迎，因为他们认为非西方民族甚至是他们自己同胞的信念、态度和日常习俗是愚昧的，迷信的，巫魔术士的，集权专制的，腐败的，或是从其他方面看来毫无价值的，或令人难堪的。然而，这种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承认它优越于各种非西方“传统性”的说法，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北方”或是“南方”、“发达世界”或者“不发达世界”，都从来不是千家万户的唯一声音。在这次会上倘若也有不同的声音，倘若有“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表示为自己“本土”的观念、态度和习俗感到自豪，那岂不是大煞风景。那样，我也就不至于纳闷为什么要用“第三世界”的“内部人”来作证，证明基督教新教“第一世界”实在是高明。

蒙塔内尔和格龙多纳都对人口迁徙格局有深刻印象，说到“成百万的拉美人‘用脚投票’”表示赞成“发达”国家。我第一次听到“用脚投票”的说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一位著名的保守派人士用这一说法来形容迁入南非的黑人远远超过了迁出南非的黑人，说这证明了非

洲黑人“用脚投票”支持南非当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认为南非比别的非洲国家好！我猜想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投票或者表达他们的道义立场和文化愿望，而只不过是想去多挣一点工资而已。

埃通加—曼格尔的话外之音似乎是：有尊严的生活和有非洲特点的生活，二者不可兼得。我在文章中已表示过，我不喜欢将文化群体按照“拉丁美洲的”或“非洲的”这样笼统的范畴作分类——巴西东部的巴伊亚州就与圣保罗市大不一样，非洲的约鲁巴人和马萨伊人也很不相同。我赞成爱德华·萨皮尔的看法：“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各有特点的世界，而不是人们贴上标签所称作的同一世界。”在多元论者看来，“特点”或“区别”并不是贬词。

对于我的这三位批评者的真诚，我从来没有怀疑；能与他们共同与会和交谈，令我深感欣慰；他们的证词和论点令我入迷。在向他们表达我充分敬意的同时，我要十分坦率地承认，我拒绝以下这样一种观点：若想过上有尊严的、高尚的、理性的和完全有人情味的生活，唯一的或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像北美人或北欧人一样地生活。

第四部分 文化与性别

第十三章 文化、性别和人权

芭芭拉·克罗西特

在美国和加拿大，过去十来年人们在文化特性和人权问题上发生了全面而重大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在报界、学术界、民族社群和主要宗教团体中间，都可以感觉到北美文明在起变化。这一点有时受到欢迎，但又常常引起担忧。

人们感到疑虑，是并不奇怪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像美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自愿改变了自己的种族/民族形象。我们只需要看看早期的好莱坞影片和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节目，就能看出当年的精神面貌只体现为一个词，即“美国的”。在全国多半地区基本上只有两种面庞，一种是欧洲人的，一种是非洲人的，而他们心目中好歹共有的主流文化都主要是“美国的”，而并非是他们各自的祖先的。然而，如今到了21世纪初，从美国人的面孔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族群，而且许多人心目中还决心不要失去——或者，必要的话，还要重新唤回——自己祖先的文化。这是在使我们分裂吗？抑或是在使我们成为头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质的国家？

不论怎样，我们这种不断变化中的混杂状态使我们更频繁地听到人们在辩论人权的更广泛定义是什么，以及人权与文化底线关系如何。这一新环境还应该使我们更有见地、更清醒和更审慎地考虑国外的人权问题。然而，正如同我们祖先的语言多样性没有使我们成为一个多语言的国家一样，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也没有使我们（包括我们的传媒）更好地去判断远方的各种习俗、传统或事业，尽管在我们海岸上的移民行李上就可以看见这些。要拯救核心的美国文化，又要给不同的生活模式让路，对这些生活模式又不总是具有必要的知识，这两

个方面的必要性就起冲突。因此，我们对各种文化行为的反应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就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对于非洲和阿富汗的事情，我们就缺乏始终一贯的态度。

当我们在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国外又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情况，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引起了带有破坏性的民族意识（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更是对它火上浇油），在非洲、巴尔干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这类事例。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国家都感受到深远社会变化的影响。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对社会传统习俗的影响将是长远的。世界穷国人口过多，这一沉重压力，使得食品、水和空气等生活必需品的紧张形势逐年加剧。

世界迟迟才发现妇女与自然资源不是没有关系的。在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妇女掌握较大权力后，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人们要求受到更多的教育，改善农耕技术，向土地和农村作更多的投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它的《1999年度世界儿童状况》的报告中指出，非洲的母亲们正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办好学校，认为这对于她们的孩子来说是改善生活的关键，对于她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如此。在布基纳法索——那里15岁以上的妇女只有9%的人识字——妇女们已组成23个学生母亲联合会，来监督学校招收和培训女生的工作。在巴基斯坦和埃及，一些地方已设法为乡村学校培养师资。

结果是迅速可见的：“小学女生每增加10%，婴儿死亡率即可下降4.1‰；中学女生每增加10%，婴儿死亡率即可再下降5.6‰。以巴基斯坦为例，这具体意味着让1000名女孩子多上一年学，最后大约可防止60名婴儿死亡。”然而在不少的传统社会中，仍需要在文化上跨出一大步，才会听取妇女的意见。

由于世界处于社会动荡之中，学术界关于文化和人权的争论近年来变得更频繁了，当涉及国际问题时，尤其是如此。有些国际人权组织曾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视为偏激团体，但他们的调查工作和法律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赢得声誉。他们把一些早已被人淡忘的国际文件重新推到国际辩论的中心，成功地开展游说活动以争取成立常设的机

构（例如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外交政策界普遍产生影响。现在，美国国务院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大学邀请他们设立研究中心，外交协会请他们作报告。可是这些人权问题专家大多是训练有素的律师，按其性格来说几乎都是纯粹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不愿放弃原则去迁就文化上的复杂情况。此外，他们往往坚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高于一切，这就与那些优先强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人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对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在安排轻重缓急和制定原则时坚持遵循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除了世界范围内有关权利和文化的争论方兴未艾之外，那些认为自己文化特殊、与国际人权模式无关的人，现在也受到他们自己社会内部的异议分子的攻击。例如在东南亚，一些著名的“亚洲世界观”鼓吹者与他们国内的改革派公开争斗，这在几年之前还不是很多人料想得到的。经济困难使那些异议分子更来劲和激愤，说所谓亚洲价值观带来了腐败和任人唯亲，阻遏了政治进步，再也无法忍受了。在以好斗著称的伊斯兰世界，从北非到中东和南亚直到太平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谁能代表伊斯兰教说话？多元论的主张已有人提出，异议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妇女的关键作用

现今一些最积极努力重新思索宗教、权利和文化三者关系的人，正是穆斯林妇女。但是她们不是孤立的。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前的几个月当中，在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各地，妇女们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为在北京召开的正式大会和同时举行的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大会作准备。从这些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区背景下向大会提交的充满激情的发言稿和文字稿中，人们看到有些目标是惊人地相似。在1994年的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基础上，妇女们又澄清和界定了对她们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权利。

她们提出的要求遍及老概念中的各个领域，使学究们关于要公民权利还是要经济权利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她们很实在地谈到妇女应当有权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应当有权创办企业，而且需要有法律来

保障她们的这些活动——这是一项经济要求，它同时又与一项政治要求相结合，即应当有更多的妇女参与立法。她们争取修改有关家庭的法律，让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配偶或父母公婆平等。她们要求有权对不想要的孩子或不想要的性交说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成了大家熟悉的一句口号。在北京，有一位尼泊尔家庭主妇耗尽自己的一点积蓄，旅行来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得以会见坦桑尼亚的女农民、德黑兰的女作家以及美国各种职业的内城区居民。背景各不相同的这些妇女大都发现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比预料的还要多。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回国以后，依靠新建立的联络网开展活动，对她们周围的文化观念有了新的见解。

对于妇女来说，社会流行的文化或风气对她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决不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尽管许多地方已有巨大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世界各地的妇女仍然大有理由对于文化的影响保持敏感的态度。的确，对于大多数的妇女来说，文化上的敏感性并不需要通过研讨班的老师来开导。文化上的变化和政治上利用传统习俗的做法可能造成妇女难以忍受的形势，即使还不是威胁到她们生命的那种程度。过去二十来年当中，伊朗、阿富汗和阿尔及利亚的中产阶级妇女都体会到，一旦风云突变，她们的生活就一下子被打得底朝天，她们的权利就会丧失殆尽。

男人的统治

在许多社会中，文化规则是由男人制定的，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这些男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在妇女身上做文章，以展现他们的信念或政策。领导人或政策一变，文化也会变。妇女该怎样穿衣戴帽，什么地方可以去或什么地方不许去，该怎样生活，都得听吩咐。虽然男人也受到一些约束，例如伊朗男人表示伊斯兰虔诚的制服是无领衬衫（不许系领带），阿富汗的塔利班规定了男人留胡须的长度，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逊尼派——衣食住行最受限制的仍然是妇女。沙特阿拉伯也属于这一类国家，那里男人地位有多么神圣，就看妇女身体有多少部位不得外露；妇女连开汽车之类的微不足道的希望也不可能实现。

这种现象并不是仅限于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和严紧教派家庭中的女孩子至今仍被告诫说只许穿裙子而不许穿长裤，尽管遵守这一禁令的女孩不多，也很少有人由于不听这一套而肉体受摧残。在老挝，曾多年规定妇女到政府机关上班时，必须穿纱笼。1997年，当推翻蒙博托的叛军攻进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时，他们命令妇女不得穿牛仔裤上街，否则就向她们挥刺刀，至少一连好几天是这样。游击队也好，各种牌号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也好，甚至还有服装设计师，都爱在妇女着装问题上做政治文章或社会文章，告诉她们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

妇女能参与制定宗教规范或社会规范，是很罕见的；她们往往是被迫投入一种文化，从最广义上理解，这种文化包括宗教，经济，文艺，法律，休闲，以及往往定义含混的社会行为规范（涉及公共生活、家庭关系、孩子的地位等）。总之，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妇女天天忙碌于工作和家务之间、事业和家庭之间，所能享有的天地在大部分国家中均小于男人。

此外，任何一种文化环境都可能给妇女造成无法预测的、悖理的结果。政治上自由的社会不一定意味着妇女能生活得好一些。例如，在印度就有一亿以上的妇女无法逃脱种姓制度的文化隔离，生活贫穷，文盲，往往还遭受欺压蹂躏。在比较宽容的、甚至平等的文化环境之中，妇女也不一定非得解放。例如，在泰国——那里的妇女已经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不少进展——以及柬埔寨之类的一些国家，自由放纵的气氛使妇女和女孩很容易沦为性奴隶，因为那里满足各种需求的大规模卖淫嫖娼并不令人惊奇。

无论在全球南方较穷的国家或者较富的北方若干尚不发达的地区，当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们不再只是注重工程项目，而是转向以人为本时，各种文化环境之下的妇女生活的复杂问题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忽视妇女生活的国家会付出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代价。

印度立志要跻身于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然而印度自己的发展事

务专家已看到，他们的国家在妇女问题上处于困境。印度人口已接近10亿，很可能在21世纪上半期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仍很浩大。全国人口中近半数是无文化，这是走向发达国家的途中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不会读和写的妇女几乎占妇女总数的2/3。将近半数的新生儿未作登记，这使得千千万万的孩子成了“黑户口”，官方未承认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也得不到基本的服务。不仅如此，据一些研究发展问题的报告指出，从一些更广泛的社会指标来看，印度正跌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平或者低于那里的水平。

在印度北部，问题最尖锐。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在贫穷的比哈尔邦，许多村庄里竟然没有一个妇女不是无文化。从全国看，半数印度儿童营养不良，将近五分之一的儿童达到发育不良的地步，这方面又是北部问题最突出。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20%过瘦，体重远在标准以下。能够讲卫生——有各种厕所，包括茅厕——的人口还不到30%；20%的人口没有干净的水。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另一些机构的调研材料来看，印度若不能让妇女参与各地区的开发，该国大力宣扬的中产阶级就会是架在现今已是数以亿计而且将越来越多的穷人的头顶之上。随着生活水平差距日益增大而资源趋于缩小，社会动荡就可能变得无法避免。

妇女割礼/毁伤女性器官

将妇女置于中心地位的新发展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妇女问题在界定各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时起中心作用，还比较难以确定。现今不论是女权主义还是人权运动都还提不出世界各地均适用的准则，尚未构成全球统一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考察任何一种文化习俗，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相对主义态度。此外，妇女和男人看待自己的文化时不一定眼光相同，在本已复杂的局面上再添上妇女问题，只会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男人控制文化的手段还很可能是控制权力，包括从乡村治安警察直到国家政府，他们往往以维护传统的名义置妇女的申诉于不顾。在许多场合，只有当身居要职的男人——村长、最高法院法官、总统之类的人物——改变想法时，妇女地位才会有所进步。

这种复杂局面就反映在学术界有关一种社会习俗的争论之中，有人把这一习俗叫做“妇女割礼”，另一些人则叫它“毁伤妇女性器官”，叫法的区别也表现出人们的立场有所不同。据埃及一位计划生育专家、埃及防止对妇女和儿童有害习俗协会的创建人之一阿齐扎·侯赛因的论述，这种割妇女阴蒂的做法的由来大致如下：

首先，这一习俗向来是为男人服务的，可以使他们娶来的妻子对性交无兴趣，对别的男人没有吸引力也无法接近，从而成为一件可以放心留在家中的财产，尽管是受到一点损伤的财产。其次，女孩子和成年妇女也养成一种信念，即未割阴蒂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这就把它合理化了，形成了妇女自身的群体压力，强迫女孩子接受它，使它成为特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侯赛因指出，这一点并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这种做法是为男人服务，多数妇女接受它是迫不得已，倘若她们有选择权，就会宁愿拒绝它。开罗一家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曾对我说，“为了消灭妇女性欲而毁伤性器官，是毫无道理的，更不用说这还是残酷的和危险的。”她补充说，“所有的冲动，包括性冲动，是起源于大脑”。

割阴蒂通常是环割阴蒂周围的一整块肌体，造成终身不愈的感染和小便失禁，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可是，有的人为它辩护，说这一传统既然得到人们支持，就一定有它的价值。试问是什么人支持？我们该听谁的声音？侯赛因大夫指出，文化上的理由到一定时候也是站不住的，社会该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其根据应是科学，医学，也许还有对于人类性行为的现代认识，因为剥夺妇女性兴奋和性高潮的可能性，就是剥夺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埃及的公立医院在1996年决定禁止做割阴蒂的手术。1997年12月，埃及最高法院决定支持这一禁令，反驳了某些伊斯兰学者声称这一传统有宗教依据的说法，指出“女孩割阴蒂并不是伊斯兰教法之中规定的一项个人权利。古兰经没有批准这一做法”。看来，要从法律上结束这一做法，还只是刚刚起步。

在伊斯兰世界妇女人权问题上，西方的反应有时是自相矛盾的。

例如，某些很有影响的学者和文化事务专家认为非洲的割阴蒂习俗一定有其合理性，可是，当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宣布禁止妇女上学和就业时，他们又坚决反对，寸步不让。在妇女能否上学和就业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也坚决表态，几乎可以说美国的对阿富汗政策完全以此为转移。这里的问题又是：我们该听什么人的声音？这一次答案是明确的，听取的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城市中产阶级妇女的声音，不是男人的声音。但农村妇女的声音还是没有人去听。

在这里，我们的文化敏感性何在呢？希拉里·克林顿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宣布，塔利班必须在妇女教育和就业权利方面让步，否则就不会有外交承认或援助。这种女权绝对主义排除了阿富汗妇女的生活逐渐改善的前景。有几位国际官员（包括欧盟代表埃玛·博尼诺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卡罗尔·贝拉米）向塔利班当面陈述了西方的意见以后，塔利班企图证明他们有理由得到援助，因为他们要改建阿富汗的教育系统，使之符合伊斯兰教义和他们的保守型穆斯林文化。他们需要新的师范学校，实行男生女生分校，学校将是一式两份。在某些地方，塔利班已允许办女生家庭学校，很少或根本不加干涉。在某些农村，女孩子受基本教育的机会已多于从前，因为早先是一批圣战者同盟统治国家，吵吵闹闹，打内战将近10年之久。那些圣战者游击队曾打败前苏联军队，曾得到过美国和欧洲的支援。

不丹的情况

在文化与人权的辩论中，不丹的情况是最隐晦难懂然而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之一。不丹是一个佛教小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为藏传佛教密宗文化传统，以前与它相伴为伍的有拉达克、锡金和西藏，如今这样的王国只剩下不丹自己。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情报网搞垮了锡金佛教王国并将它并入了印度；到8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跟搞垮锡金的那种活动相类似的、大多为印度教徒的尼泊尔族第五纵队，似乎要对不丹采取同样的行动。在这十来年当中，信奉佛教的不丹精英陷入了惶恐不安。他们无力把守自己与印度的漫长陆地边界，尼泊尔族的人就从那时大量涌进来，作为非法移民，使当地作为少数民族的尼泊尔族人口迅速

膨胀。

不丹当局企图实行文化上的强制政策。谁想当不丹国民，就必须穿规定的民族服装，住房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样式，并接受不丹王国政府的领导，而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并不是一个不容人的人。不丹境内的尼泊尔族人自然感到忧虑，可是他们还没有与旺楚克国王和解，就卷进了当时在尼泊尔国内风起云涌的要求民主的运动。在亚洲各地激进大学生的煽动下，不丹的许多尼泊尔族人参加了反对不丹王国的暴乱。他们失败后，逃离不丹，途经印度（印度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动乱），进入尼泊尔境内的难民营，开展公关活动攻击不丹，使不丹处境十分为难，至今仍是如此。“自由之家”之类的一些人权组织主要是依据尼泊尔人士提出的并不可靠的资料，对不丹的公民权利和人权状况始终评价很低，尽管联合国一些机构认为不丹在人权方面优于它的多数邻邦。

西方人权组织曾一度相信不丹正在实行民族清洗。由于印度坚持掌管不丹的外交，不丹被孤立起来，西方国家没有代表驻不丹，只能依靠驻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的消息来源又多半是尼泊尔人权组织或者在尼泊尔设有分支机构的外国组织。目光短浅的不丹政府往往禁止这些外国组织入境，这些组织则将不丹的局势描绘为民主力量反对专制暴政的斗争。

不丹人自己认为他们的文化已危在旦夕，要为挽救这一文化作拼死斗争。经过好多年之后，国际人权组织才认识到，不丹国王的话比较接近于事实，而他的那些敌人散布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却不大可信。那些人把不丹看做是喜马拉雅山麓一大片人烟稀少的肥沃土地，适合于让尼泊尔过剩的人口迁居。不可理解的是，西方许多人乐于为西藏的达赖喇嘛摇旗呐喊，而对有人企图消灭不丹文化的行径却沉默不语。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许多不丹人为此愤怒和忧心忡忡。有一次，我向一位不丹官员问及他管辖地区内听说有些尼泊尔族人受到暴力袭击一事，他向我大声喊道：“你们到底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问得好。

泰米尔问题、东帝汶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

文化价值观和人权交互起作用的地区，往往隐藏着地雷。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是以改善人权作为其主要目标，但却善于片面宣传他们的事业，利用各国媒体和议会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在当今信息过多过滥的时代，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是否真实，不见得总会受到人们的细心核查。

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能说会道的对外宣传描绘他们正遭到种族灭绝式的迫害，这使得以僧伽罗人为首的、佛教徒居主导地位的斯里兰卡政府处于被动守势的地位。一些泰米尔人，包括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外国得到了避难权，据斯里兰卡政府说，那些人的目的就是在国外为泰米尔猛虎组织筹款和买武器。泰米尔猛虎组织特别残忍，其目的是想把斯里兰卡东北部的泰米尔伊拉姆地区分裂出去。由于历史和种姓的原因，泰米尔人并不是都一样，有些泰米尔人在中部山区经营茶场，他们不支持猛虎组织。最后，泰米尔猛虎的暴行终于被世界认识，已被联合国列为一个恐怖组织。但是，尽管报界对此作了大量报道，一些西方人仍然对斯里兰卡的事态一无所知，对该国文化的看法往往离奇古怪，或者仅仅反映部分的实情。

这种错误的看法曾受到印度的鼓励，因为印度曾多年帮助泰米尔游击队，给他们提供武器和训练，支持他们反对斯里兰卡政府，直到后来，当拉吉夫·甘地总理向陷于内战困境的斯里兰卡岛国派进了多达5万人的印度维持和平部队时，猛虎组织企图扭转印度政府的方针，掉转枪口打印度维和部队，最后暗杀了拉吉夫·甘地总理（至少新德里相信是他们干的），印度才停止了对他们的支持。著名的泰米尔温和派人士、有国际声誉的宪政主义者尼伦·蒂鲁切尔夫姆曾策划泰米尔人地区实行自治的方案，猛虎组织嫌他不够激进，无情地把他杀害了。被他们杀害的还有另一些著名斯里兰卡人士。

不论过去或现在，斯里兰卡国内的冲突都主要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冲突，甚至还有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是严格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然而，在东帝汶和克什米尔，文化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东帝

汶，即使没有政治煽动的暴力，根本的问题也是宗教和民族的分歧，分歧的一方是葡萄牙在东帝汶扶植起来的天主教势力和当地的土著民族，另一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人，爪哇人占主导地位的印尼政府和军队，以及迁居东帝汶的其他民族移民，尤其是来自南苏拉威西的布吉人。

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自从1947年以来就一直为它打仗，当地居民也分为不同的民族，说不一样的语言，而且对印、巴两国都不是很满意。克什米尔人是穆斯林，但又不同于印度的穆斯林，也不同于巴基斯坦许多地区的穆斯林。印、巴两方几十年打仗基本上是在克什米尔谷地，而那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宗教，而在于文化和政治。

东帝汶和克什米尔都被联合国列为有争议地区。但是东帝汶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得到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过去支持过其他葡属殖民地（尤其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革命团体的一些欧洲组织也支持东帝汶独立。印度尼西亚则备受谴责，可是当年印度把军队开进葡属果阿，不经任何民主手续就将它兼并时，却没有人大声抗议。

结 论

文化检验标准的作用如何，有时是可辩论的，不久前关于危地马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戈韦塔·门丘的生平的一场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些学者和从事调查的记者现在说，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虽然肯定是艰辛的，但并不像原先描述的那样充满了不幸和悲剧。看来是文化刻板模式起了很大作用，才创作出一个贫穷的危地马拉印第安女孩子在毫无心肝的“欧洲人”军事独裁统治下受尽煎熬的令人心碎的故事。这一形象使得她——也利用了她——成为代表拉美各地土著民族的一个文化偶像。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争论说，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化象征主义比单纯的事实更加重要。

学术研究、新闻报道、人权事业——还有历史——所要求的，却是更高的标准。美国人对待国外的复杂民族冲突（或者披着民族外衣的政治冲突）的态度似乎往往表明，我们的文化敏感性是走到水边就

止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具有最良好意愿的行动实施起来却是浅薄的或信息不灵通的，而且往往带有其领导人的政治动机，这一点在我们美国恰恰跟那些遥远社会的情形一样。

说到底，在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包括我们对于诚实以及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真实的重视——和我们的对外政策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有意义的联系。更何况这一价值观体系植根于西方和东方文化的核心成分已经通过联合国人权宣言而具有了普遍性。

第十四章 拉丁美洲的文化、制度与男女不平等

玛拉·赫滕

性别歧视向来是世界上多数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妇女到处都是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法律上处于劣势地位。男女不平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各国文化都各不相同，因此，要在性别歧视和文化态度二者之间找出简单的联系，是困难的。重要的问题倒是：文化属性是否能促使性别关系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并保持这种变化，以及什么样的文化属性能起这样的作用。

本章将分析文化在当代拉丁美洲妇女地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从许多方面来说，文化影响着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其传统模式是有说服力的，可是这些传统模式却解释不了在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中，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性别关系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盎格鲁—基督教新教的文化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可是从历史上看，在这种文化中也有过系统的性别歧视。在美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男女平等方面有重大进步，但主要原因不在于文化，而是在于经济的转型、妇女运动以及最高法院裁判规程上的改变。相形之下，在拉丁美洲，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不利于私人资本积累和自由民主制。然而这一文化遗产并没有阻碍拉丁美洲过去20年来在男女平等方面迈出大的步伐。

本文第二部分将从两个方面探讨文化属性对于推动和保持性别关

系变化的作用。第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能说明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对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看法有所不同。第二，与国家体制办事效率相关的文化属性，会影响到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能否保持。拉丁美洲广泛存在的一个特点就是政策与实际做法之间有很大差距，这一问题若不解决，妇女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方面的进步就可能长久不了。

南北美洲文化和性别关系对比

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包括从托克维尔和韦伯直到本书的许多杰出撰稿人，都认为文化对一国人民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决定性影响。霍华德·韦亚达和劳伦斯·哈里森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文化特点能说明为什么拉美地区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表现为集权主义统治周期和公然的社会不平等。相形之下，盎格鲁—基督教新教的价值观则被认为是英美社会能创造财富和支持稳定的民主体制的原因。哈里森就指出：“我相信，西半球北面和南面的演变之所以形成尖锐对照，唯一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在于文化——显然不同的价值观、态度和体制——它们来源不同，一个是盎格鲁—基督教新教的传统，一个是伊比利亚—天主教的传统。”^[99]

对于这种认为文化决定了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差异的见解，我不想加以评价。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若用文化的论据来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在性别关系方面的差别，应当慎重小心。盎格鲁—基督教新教文化强调努力工作，鼓励节约，要求切实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切也许促进了资本主义和民主，但从历史上看，它也容忍了严重歧视妇女的法律和政策。妇女地位只是不久前才有了重大变化。请想想那种将已婚妇女置于丈夫庇护之下的制度。美国在建国之后曾长期继续保留这种制度，让丈夫在法律上代表他的妻子，对妻子的人身和财产握有绝对控制权。到19世纪中期和末期，才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使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男人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特权仍一直保持到20世纪的很长时间。1992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计划父母身份与凯西”（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一案的裁决指出“妇女并不因结婚而失去其受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已婚妇女由丈夫庇护的制度才最终完全废除。^[100]

一二百年间，美国的盎格鲁—基督教新教文化容忍了对妇女就业和工资方面的歧视以及将妇女排除在一些职业之外的做法，司法界也宽容了这一切。在许多的州以及联邦机构中，曾普遍存在着歧视妇女的法规和条例，直到1963年颁布了《平等工资法》和1964年颁布了《公民权利法第七章》，才结束了这一情况。这两项法律的实施大大扩大了妇女的就业机会，然而，由于一些法庭办案马马虎虎，许多事实上歧视妇女的做法仍得以维持。

行政机构在性生活和生育问题上干预个人和夫妻的隐私，看来也是违背了自由价值观。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夫妻生活隐私属于宪法权利，才制止了一些州将夫妻使用避孕药具宣布为非法的行径。

国家迟迟才采取行动的另一个领域是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规定联邦政府惩治对妇女行使暴力的罪行以及为各州预防和处置这类暴力的计划提供经费的法律，即《惩治针对妇女暴力法》，在1994年才颁布实施。保障男女经济平等、承认妇女控制生育的权利和政府谴责对妇女施加暴力，这几项进步并不是盎格鲁—基督教新教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是社会变化和女权运动不久之前才带来的结果。

强调文化影响发展的学者们认为，与盎格鲁—基督教新教文化相比，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不那么有助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韦亚达就说过：

拉丁美洲的经济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重商主义和国家指导的，而不是资本主义和个人指导的；它的社会结构是二阶级的，而不是多阶级和多元的；它的政治体制是等级制和集权主义的，而不是民主的；它的文化和宗教是正统的，绝对论的，充满天主教—托马斯主义的教规，而与北美殖民地的不墨守成规和多元的新教教义适成对比。

[101]

从罗马天主教传统的重男轻女和世俗社会中流行的大男子主义来看，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的集权主义和等级制的特性似乎格外不利于妇女地位的上升。一位学者说过，拉丁美洲的性别关系是“严峻的

父权制，其根深蒂固只有阿拉伯世界堪与之相比”。^[102] 有些资料表明，拉丁美洲的文化价值观长时期来是连贯的和稳定的，^[103] 但是拉美性别关系和妇女地位近年来的变化却是显著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社会、法律和政策上，变化之大不亚于美国。有些情况说明，在文化遗产不相同的一些国家中，妇女的地位正在趋同，而在文化遗产相同的一些国家中，妇女地位却存在着差异。

从政治、经济、教育和法律方面来看，拉丁美洲性别关系的变化是不小的。在整个拉美地区，妇女在国家议员中所占的比例的平均数现在是15.4%，这在世界各大区域当中占第二位，而且高于美国的13%（世界平均数也是13%）。在某些拉美国家中，这一比例很高，例如，在阿根廷和古巴为28%，哥斯达黎加为19%，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墨西哥为17%，多米尼加共和国为16%。在经济方面，妇女的参与急剧上升。从整个拉美地区看，妇女占劳动力的比例1970年时为20%；到1995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5%（在美国为45%）。

男女工资差距仍然相当大，但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工资比男人低20%至40%。但从较年轻的妇女来看，差距小得多。根据一项调研材料，25—34岁女工的工资相当于同年龄组男工工资的80%至90%。在教育方面，进步是可观的。妇女文盲率已大幅下降，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女生已差不多占半数。有几个国家的大学生中，女生超过了半数。在美国，则是女生占中学生的50%和大学学生的55%。^[104]

在改革法律而让妇女享有正式平等方面，拉丁美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国家的宪法承认妇女与男人权利平等：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和巴拉圭的宪法均将男女平等列为一条基本原则。法典中原有的夫权制度取消了，改为夫妻在共同财产、家务和儿女抚养方面权利平等。

至少已有12个拉美国家针对惩治家庭暴力问题制定了新的法律条款，而且扩大了司法部门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权。数以百计的警察局配备了专门处置家庭暴力问题的女警官，整个拉美地区对性犯罪

均有明文规定。已有19个拉美国家批准了联合国《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的公约》，阿根廷还把该公约纳入了宪法。在美国国会通过《惩治针对妇女暴力法》的同一年，美洲国家组织也通过了《泛美惩治针对妇女暴力公约》，至少已有26个成员国批准了该公约。^[105]

然而，在妇女参政规模、经济机会、教育和法律地位等方面，拉丁美洲各国仍表现出颇大差异。在阿根廷，妇女占国会席位的比例为28%，而这一比例在巴西仅为6%，在巴拉圭仅为3%。妇女在乌拉圭占劳动力的41%，而在厄瓜多尔只占26%。在土著民族占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秘鲁，农村妇女文盲率比男人高得多。例如，秘鲁农村妇女文盲占46%，农村男人文盲则只占10%。妇女健康状况差异很大。例如，在哥斯达黎加，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次生育中占60名，而这一比例在玻利维亚高达650名。乌拉圭在1946年司法改革中明文规定已婚妇女享有充分的法律行为人格和夫权平等，可是智利迟至1999年仍保留着老的夫权制度，在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全由丈夫负责。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分别于1886年和1904年从法律上使离婚合法化，而做到这一点的时间在巴西是1977年，在阿根廷是1987年。在每个国家中，不同社会阶级和不同肤色之间，妇女地位也有巨大差异。

由以上事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总体说来，就妇女对经济、教育和政治的参与而言，拉丁美洲的妇女地位和美国的妇女地位正在趋同。尽管两地文化不同，但妇女地位在结构上日益相似。第二，拉美各国虽然文化遗产相似，但妇女地位始终有明显差别。文化和妇女地位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关系。对于性别关系的变化来说，文化属性看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文化上稳定形成男女平等的观念，看来是性别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性别关系变化时，文化就相应前进。

文化框架与妇女地位上升的持久性

虽然文化不能定位为性别关系重大变化的一个原因，但是文化因素却深刻影响到妇女地位所得到的改善具有何种性质以及能否持久。

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为人们对性别关系的变化的理解提供框架，并决定着不同社会对实现男女平等这一点的认识。在美国，妇女权利的进步带有我们的价值观的明显标志。例如，有关家庭、离婚和流产的法律都强烈反映出个人主义的文化气质，其程度远远超出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的法律。美国的法庭认定个人自由和自决权是应予保护的最高价值观，而欧洲大陆的法官和议员们则是“更深地从道德上议论流产、离婚和依附关系”，而且在斟酌个人权利时更有可能“注意社会背景和个人责任”。^[106] 美国已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夫妻任何一方均可自由决定终止婚姻关系；认为在胎儿有生命力之前是否流产属于个人隐私，可以自决；明确夫妻性生活隐私属于宪法保护的权利。在这几个方面，美国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走得更远。

拉丁美洲的文化遗产不同于美国，因此，妇女权利的变化也比较少带有自由个人主义色彩和拒绝国家干预的原则。一方面，这使得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争取放宽现有流产禁令的努力遇到了障碍。除了古巴以外，所有的拉美国家都认为流产是犯罪，其中多数国家规定，只有在产妇或孕妇的生命受威胁或者因被强奸而怀孕的情况下才可以作流产。私下的流产在拉美很普遍，可是争取流产合法化的活动却得不到广泛的公众支持。显然，天主教会的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是阻碍流产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拉丁美洲缺乏维护隐私权和自决权的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家保证让妇女参与公共决策的措施在拉丁美洲很普遍，这样的政策措施在美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20世纪90年代，有九个拉美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及委内瑞拉——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政党在大选时提出的议员候选人中，妇女必须占一定的比例（20%到40%）。在颁布实施这样的法律后，妇女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席位在阿根廷由5%升至28%，在玻利维亚由7%升至12%，在哥斯达黎加由16%升至19%，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从10%升至16%，拉丁美洲有着从托马斯主义和历代教皇通谕承袭下来的社团主义传统，这就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化环境，便于推进妇女作为群体参政的权利。由此可见，不同社会的文化属性以不同的方式调节其走向男女平等的行

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形成不同的看法，使国民有关妇女权利的辩论具有不同的调门。

法律与行为之间的差距

各种综合统计数字以及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变化，从重要的方面显示出走向男女平等的运动，可是它们还不能说明整个的问题。民主选出的代表们批准有关的法律，在一个层次上表明了赞成男女平等的文化态度。法律和政策的措辞变化和象征性变化向整个社会传递了平等的信息。然而，制定好的政策是一回事，而政策的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的矛盾在拉美各国社会中是常见的。这一问题不仅限于妇女权利一个方面，因为贪污腐败、侵犯人权、偷税漏税和任意执行的趋势使得国家机构许多方面的效能都受到削弱。

在与性别有关的法律方面，法律与行为之间的差距至少跟其他方面一样严重，这就使得妇女权利近年来的进步能否保持下去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早已废除的法律仍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巴西，仍可根据“正当捍卫名誉”而让那些由于妻子与他人通奸而谋杀了妻子的男子无罪释放。另一方面，新近通过的某些法律，例如多数拉美国家近年来针对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所作的改革，并未得到实行。要缩小法律与行为之间的差距，不仅需要司法机构内部作深刻的变革，而且也需要在文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巴西的“正当捍卫名誉”

在20世纪80年代，一名男子谋杀了与他疏远的妻子及其情人，这个案子经巴西南部的帕拉纳州的一个法庭审理后，陪审团表决的结果是该人有“正当捍卫名誉”的权利，应宣布无罪释放。在上诉过程中，该州的上诉法院决定维持原判，但巴西最高民事和刑事法院于1991年撤销了原判，下令重审。同一年内，帕拉纳州重审过程中，另一个陪审团仍坚持“正当捍卫名誉”的理由而宣布被告无罪释放。这一裁决在国内外激起了愤怒，“人权观察”组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巴西，调查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正当捍卫名誉”的论点在巴西法律中并没有明文的依据。在殖民地时期，“腓力法规”（Phillipine Ordinances）曾允许男人杀死被发现通奸行为的妻子及其男伴。后来，1830年，通过的巴西帝国刑法典、1890年的第一共和国刑法典和1940年通过的现行刑法典都明确排除了以杀人的办法来解决通奸罪。然而，1940年刑法典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一个人受到无理侵犯以致其基本权利遇到危险，有权作正当防卫，而某些法律理论将“名誉”列为一项基本利益或基本权利。既然法律上允许正当防卫，人们又默认名誉是一项合法的利益，司法界就出现了允许男人杀死其与别人通奸的妻子而宣布其无罪的做法。

法律重视名誉，是因为名誉在社会交往中很重要。一位著名人士解释刑法时说过：

人的名誉极其重要，构成其地位和社会效率的基础。好人只与名誉好的人交往。一个人若名声不好，朋友和熟人都会不理他，他将不再为好的社交圈子所接受。他将失去有身份的人在社会上享有的信任和威信。此外，一个人若名声不好，就不可能得到或成功担负有价值、有影响和负责任的职位，因为没有好名誉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

[107]

一个男人若自己妻子与别人通奸，在巴西俚语中就叫做Corno（相当于“王八”的意思），必将失去自己的名誉、社会地位和机会。辩护律师以“正当捍卫名誉”作辩护，而陪审团也承认这一辩护，是因为人们认为男人在名誉受威胁的情况下杀人，是可以理解的。陪审团的行为表明，人们认为男人和整个家庭的名誉有赖于女人的贞操，而杀死奸妇及其奸夫，则可以使男人在社会公众面前恢复名誉。

早在1955年，巴西的高等法院就开始推倒下级法院以“正当捍卫名誉”为理由而宣判杀人者无罪的判决。然而，在巴西司法系统中，高等法院的裁决并不构成对下级法院有正式约束力的判例。因此，受理上诉的法院无权纠正下级法院涉及名誉辩护的审理。此外，初审法庭的法官虽然享有特权，就法律所允许的推理和辩护是什么，向陪审

团作指示，可是他们有时并不行使这一特权，而宁愿尊重陪审团的自主权，即使陪审团的推理没有正式法律依据也不予批驳。陪审团能利用“捍卫名誉”的论据，这就表明在巴西文化中，对妇女性行为问题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在巴西法律制度中，对于“名誉”的地位以及正当防卫范围的意见也存在着矛盾。

性暴力和家庭暴力

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都对刑法作了修改，重新规定了强奸罪的性质，而且制定了惩处和预防家庭暴力的新法律。人们以前只认为强奸是一种伤风败俗和有失体面的罪行，现在则明确它是一种侵犯个人性自由和尊严的犯罪。夫妻间的强奸也受到惩罚。拉美各地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妇女警察局，受理妇女有关暴力的申诉。上文中已指出，至少有12个国家制定了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使法官和执法人员有了新的解决暴力问题的权限。这些新的法律和政策成了推动文化转变的催化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针对妇女和家庭成员的暴力是侵犯人权，因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家庭不再是在国家和正式法律的权限之外。然而，一些公民和执法人员的行为仍然不符合新法律的精神。

首先，性暴力报案率低。在墨西哥和秘鲁，估计只有10%至20%的遭强奸妇女向警察报了案。第二，对施暴者的调查、起诉和判处的比率也低得令人不安。在巴西的圣保罗州，有材料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暴力事件受到了警察调查，而且几乎没有几次调查最终导致起诉或定罪。在墨西哥一次强奸案抽样调查中看出，只有15%的罪犯被判刑。厄瓜多尔的材料表明，在报了案的性暴力案件中，只有1%最后作了宣判。^[108] 一方面是性暴力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如此不积极，另一方面则是其他各种刑事案件的起诉热心得过分，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性暴力案件起诉和判决率低，是由于执法人员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心，往往以为遭强奸的妇女是咎由自取或心甘情愿。对法庭审理情况的分析表明，法官比较重视的是处女遭强奸，他们还往往责备受害者，说她们的挑逗引起了强奸。许多法官和检察官对受害者施加压

力，要她们与施暴者和解，而不是力促施暴者认罪。强奸受害者还抱怨说，对她们作医学检查的人员往往对她们的性生活史寻根究底，问个没完。 [109]

另一方面，有些受害者自己不能配合调查，或者放弃起诉。有的人甘心与施暴者和解而认为没有必要再追究。还有的人屈从了亲朋的压力。1997年在秘鲁的一起轮奸案中，受害者在家人的压力下与轮奸者之一结婚，以维护家庭的名誉，申诉随之撤销了。（秘鲁的刑法原先有漏洞，强奸者若与受害者结婚即可免予惩罚，这一点受到了国内外非议，于1997年4月取消了。）

成立妇女警察局，原本是想要解决上面提到的某些问题，但是它们财力物力不足，缺乏标准的办案程序，而且往往不在交通方便的地点。在妇女警察局工作，往往在警察队伍内部被人瞧不起。总之，对于拉丁美洲主张维护妇女权益的人们来说，现有法律如何才能得到适当的贯彻执行，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结 论

对于理解拉丁美洲争取男女平等的进步及其前景来说，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但只有文化的理念又是不够的。单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说明不了性别问题所发生的变化及这些变化的持续性。在拉丁美洲尽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歧视妇女的文化偏见，但最近几十年来，妇女的能力以及相对于男人而言的机会仍有不小的改善。各国情况仍有颇大差异，但是一些国家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和议会确已制定出一批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策，这反映出文化上也日益承认男女应有机会平等。然而，在法律和行为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这证明重男轻女的习俗仍很顽固。拉美妇女地位的新近进步并不是文化上的变化所促成的，但是必须有文化上的变化，才能保障这些进步得到实施和持久。

要解决这一难题，能靠什么样的政策方针呢？促进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总统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有关性别问题的最重大法律和政策变化都离不开总统及其政

党的热心支持。总统的支持还促进了法律 and 政策的实施。例如，阿根廷制定了议员候选人中妇女比例的法律以后，若没有总统行政命令的敦促，议会中的女议员就不会由5%升至28%。从制度和规范方面看，总统的权力是很起作用的，尽管总统对男女平等的想法不一定是人人都同意的，但行使总统的权威，就可以有效保证性别方面的变化得以实行。然而，为了在21世纪让拉丁美洲各地都朝向男女平等迈出更大步伐，所有位于政治权力顶峰的人都需要不仅在言辞上，而且也在行动上作出努力，促进广泛的进步。

第五部分 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

第十五章 认真对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

奥尔兰多·帕特森

对待文化的矛盾态度

在如何使用文化理念的问题上，现今存在着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人们非常热心地辩论它，严肃地思考它，其盛况是文化这一理念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学术界，文化研究成了较新的一个学科，繁荣兴旺。在美国公众舞台上，所谓的文化战恰如亨特所说，成了“别具一格的现实……公共生活的分界力量”。^[110]然而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在一批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以及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中间，又有一种强烈的意见，反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人类行为的任何方面。^[111]

在人文学科及一般的自由派人士中间现在流行着一种正统的观点，它可以概括如下：文化是一个应予以诠释、理解、讨论、界定、尊重和礼赞的象征体系，是特定人群的独特产物，与其他这类产物有着相等的价值。但是决不应利用它来解释它所由产生的那些人的任何事情。从人文学科角度来看，文化往往被比作一篇供人阅读和诠释的课文。对这课文作解释，是允许的，但任何这样的解释都不能宣称是客观的。对文化的理解完全是主观的，既反映被诠释的对象，也同样反映诠释者自己。

在社会学界，文化所占的地位正如马贝尔·贝雷津所说，是“一片有裂缝的地形”，学者们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不同意见”，“有些学者强调解释的可能性……另一些学者强调只能作诠释或注释”。^[112]然而即使是赞成作解释的学者通常也避而不谈文化还能构成其他事物

的原因。恰如所谓的文化生产学派的想法那样，典型的看法是认为文化是因变量，要由组织上、经济上及其他的“过硬”自变量来加以描述，或谨慎小心地加以解释。若有人想把这一解释方程式颠倒过来，将文化或文化的某些因素视为自变量，那就必定会遭到怀疑。奇怪的是，这种状态恰好与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观点相反，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帕森斯学派的理论，它将价值观视作行动的目的和规范调节因素。可是，正如安·斯威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学家们普遍否定了帕森斯的见解以后，他们“对于文化作为原因的意义就提不出另一种见解，因而要么是避开原因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后门承认价值观范式”。^[113] 斯威德勒提出了她自己的见解，将文化称作“工具包”，说人们可以从这个“工具包”里挑选适合自己目的的行动谋略。她的这一提法颇受欢迎，是向正确方向迈步的一个开始，但是它仍然过于不明确，过于随意，不足以提供真实的解释力。文化分析被减缩成理性选择论的一点补充。

反对从文化上作解释的态度，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学者们对非洲裔美国人及其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研究之中。这当中的原因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止，有关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论著过分依赖一种简单化的或经不起推敲的文化论，生硬地把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问题都归结到文化上去。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被看做是他们的过去种种经历堆积而成的硬化了的冲积层，使它成为一种固定的、有解释力的黑匣子，被用来解释有关这一群体的每一件和任何一件事情。那种把文化视作某种“风俗糕饼”的19世纪文化观尽管已经过时，却仍滞留在许多著述之中。帕森斯学派那种过分强调文化决定作用的功能主义和价值观框架也未必更受欢迎。还有一个“贫困的文化”学派，其代表人物，如奥斯卡·刘易斯等人，是比较成熟的。如今一些外行的人津津乐道指责这一学派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其实大多是莫须有的；然而这一学派对非洲裔美国人文化问题的论述往往过于兜圈子、简单化和固定化。

不幸的是，过去出现过而现在仍然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反动的分析家和公职人士利用从文化解释问题的这一论据，把穷人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归咎于他们的“价值观”，从而把政府和纳税人扶贫

济困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看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都是些自由派——之所以回避文化解释论，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他们不屑于与那些反动分析家或头脑简单的公职人士为伍。用文化来解释贫穷的论点如今在学术界遭到冷遇，原因之一竟在于避免共犯。

这最后一点是这些学者们摈弃文化解释的一条最糟糕的理由。另一条这样的理由，是自由派学者经常念的一本经，就是说谁要用文化因素解释一个群体的问题，那就等于是指摘受害人。这显然是毫无道理，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能说明问题：我们常常见到有的人小时候受过性摧残，被人糟蹋过，因而长大以后缺乏自尊，行为上表现出自暴自弃。有的人出于同情之心，会给有上述表现的人指出她或他的心理问题，要求她或他求医治病。如果说这样做等于是指摘受害人，岂不荒谬。可是，有的人出于同情之心，哪怕只是暗示说非洲裔美国人的某些问题可能是他们以往受虐待的经历所造成的可悲后果，就被认为是在指摘受害人。

反对从文化上解释非洲裔美国人某些问题，还有一个不好的原因，即民族主义和所谓的黑人自尊心。为了纠正几百年受欺辱的影响，民族自尊曾经是必要的，可是它如今被强化成为民族颂扬和非洲中心主义，二者都正式出现在多文化的学术研究之中。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坚持说非洲裔美国人有着“有用的过去”和值得自豪的、无问题的文化，它可以在美国多文化主义的大会演中炫耀自己；如果有人想从历史上、文化上解释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问题，就会被看做是居心不良，存心抹黑。

对于文化解释持怀疑态度，还另有一个原因，即有些人，特别是有些政策专家和负责纠正社会弊病的人，误认为人们对文化是无能为力的。这一误解起源于一种文化观，即认为文化是不可改变的。与此相关的是一种信念，即认为从文化上作解释就是种族主义。在这一信念的背后，有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当代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白自己是反种族主义的，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在弗朗兹·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这一立场更加明显。在20世纪上半期，人类发展史中的生物学并不曾应用于文化。可是文化相

对主义却居然无事生非，堕落成实质主义。我在批判美国民族奋兴派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辩护士于20世纪70年代利用文化相对主义的做法时，就指出过这一点。^[114]不久前，沃尔特·本·迈克尔斯对美国最新一轮民族颂扬活动作了同样的批判，明白指出当代的多文化主义的文化理念和民族特性理念已纯粹变成了种族主义的代用品。^[115]迈克尔斯等人从普世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多文化主义时，指出多文化主义者对文化理念的利用，是种族主义；而许多多文化主义者谴责从文化角度解释社会问题的做法时，也用了同样激烈的言辞，说它是种族主义。他们对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参议员及其报告的长篇累牍的攻击就表明了这一点。在1970年，自由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布劳纳就把那些强调非洲裔美国人的下层而未强调他们生活的民族特点的学者称为“新种族主义者”。^[116]由此可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文化理念变成了咒骂的对象，普世主义者和持相对主义立场的多文化主义者在他们的彼此争论中，都骂对方的文化理念是种族主义的。

一个更具有嘲讽意味的事实是，有些人拒绝从文化角度解释社会问题，攻击说那是种族主义的表现，可是却又悄悄地从后门作了一次破例。这次破例发生在环境论者和遗传论者之间的论战之中。自由派环境论者的主要论点之一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智商测验分数的单标准离差的一贯差别，应主要从社会经济方面加以解释。几年前，在最近一轮的智商论战，即所谓的《贝尔曲线》之战中，主张遗传论的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虽在论战中吃败仗，却使环境论者的上述基本论点受到重创。他们引证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说明这一论点再也站不住了。对智商差别的结构性解释往往由于亚瑟·詹森所说的“社会学推理谬误”而失去说服力，这谬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用以解释智商作用的所谓结构性自变量，有一部分其实是自我智商的作用。

我无意在这里重新挑起智商争论，只想指出一点：当尘埃落定时，有一个情况已变得清清楚楚，它可以从负面看，也可以从正面看。从负面来看，这就是：虽然遗传因素只能解释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之间在社会和经济结果方面的种种差别之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标准的社会经济变量，例如家庭收入，也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这一点是重要的，而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几乎被人遗忘了，只是在最近因为一些研究成果而得到肯定，其中尤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登载在一本比《贝尔曲线》学术价值高得多的书中，即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和梅雷迪思·菲利普斯共同主编的《黑白测验分数差距》一书之中。这一批学者的总的结论是：第一，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之间的测验分数差距的确是重要的，能用以解释他们后来的职业地位和收入的高低，然而这种差距所衡量的对象与其说是天生的智力，不如说是后天学到的认知技巧和受教育技巧。第二，这一测验分数差距之所以形成，只能部分地用学生们的阶级或社会背景来解释。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之间的收入差别仍然很大，但这充其量只能解释学生智商测验分数重大差距之中的大约一分。即使是把所有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如财富和职业等，全都考虑进去，能加以解释的也不会超过差距分数的1/3，这差不多与赫恩斯坦和默里的估计相同。 [117]

如果说答案既不在于智商上的遗传负荷，又不在于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那么答案何在呢？这就要从正面来看《贝尔曲线》论战所表明的情況：答案概括地说，就在于文化。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批判《贝尔曲线》的文章中写道：“文化信念和习俗影响孩子，至少是从孩子出生之时开始，也许还开始得更早，甚至是父母对尚未出世的孩子的期望以及他们发现孩子性别时的反应都会有影响。家庭、教师以及文化中的其他影响源都不断地让成长中的孩子明白什么是重要的，这些信息既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 [118]

有意思的是，梅雷迪思·菲利普斯和她的合作者发现，孩子测验分数所受到的很大的影响来自其父母的习俗，这一点在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测验分数差距中所占的比重在3.5分以上，他们的调研还有力地表明，这些习俗完全是环境性因素。

心理学研究证实了这些结论。值得指出的是，几乎早在《贝尔曲线》出版之前五年，亚瑟·詹森，这位无疑是遗传论最老练捍卫者的学者，就承认过“遗传的论点还是一种假设，在目前还看不出会在多久的时期之内，很可能一直到现今的科学家们谢世之后，它仍不会得到任何可接受的强有力的检验”， [119] 这就很接近于自己认输了。心理

学家内森·布罗迪在透彻地评论这方面现有的知识之后，得出结论说，“这些差别的原因很可能是在于黑人在美国的独特文化经历。”

[120] 另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对赫恩斯坦和默里的观点作出反应时，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他指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从摇篮时起，与社会的接触交往就有系统的差别”，这时评述了几个研究材料，其中之一谈到黑人与白人通婚所生育的孩子：

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儿童智力发育来说，母亲比父亲更加重要，而且白人的社会接触交往有利于儿童掌握技巧，因而在智商测验中得高分。按照这种看法，母亲是白人而父亲是黑人所生的孩子，其智商应高于母亲是黑人而父亲是白人所生的孩子。实际情况正是这样。黑人白人通婚所生的孩子，其母亲为白人者，智商测验的分数平均高出9分。 [121]

抽样调查当然总存在着一个选择调查对象问题，但选择会是有的偏向这一头，有的偏向那一头，二者会彼此抵消。尼斯比特相当合情合理地得出结论：“母亲为白人的孩子智商较高，不能不主要归因于社会交往。” [122]

怎样看待和使用上面谈到的这一类调研结果，存在着十分自相矛盾的现象。当使用于智商争论以维护自由派环境论立场时，它们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热烈欢迎。但若在任何别的场合使用同样的调研结果，就会激起愤怒。为什么？就因为像这样的调研结果会伤害民族自尊心、特性政治以及自由派学术界流行的相对主义，因而会受到诅咒。在任何别的场合，要是像菲利普斯和她的合作者那样说“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测验得高分，而中产阶级父母习俗看来起作用”，或者说“父母习俗方面的种族差别看来也是重要的”，以及像尼斯比特那样声称欧洲裔美国人母亲的文化习俗比非洲裔美国人母亲的文化习俗更有效，那么在美国任何一座校园中准会受到谴责，被说成是铁杆种族主义者和死不回头的文化沙文主义者。

这种状况是荒谬可笑的。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学术界支持者不能两头都占。既然文化因素在智商论战中被赋予首要的起解释作用的地

位，那么多文化主义者和自由派社会学评论家们就不能把文化因素贬低到玛格丽特·阿切尔所说的“消极附属的地位”。^[123] 对文化因素一会儿使用、一会儿又不准使用的态度，已经扭曲了人们对非洲裔美国社会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研究。

其实，把文化作为原因来使用，以及把文化当作纯粹描写性的或附属的因素，这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有冲突。只要懂得人们是在使用不同的文化概念，把文化作为原因加以研究以及把它作为象征性或描写性因素加以研究，这二者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分析层次，那么，冲突通常就可以得到解决。此外，用文化原因解释问题，并不排斥非文化性的社会原因。在分析各种问题时，最有意义和有用的做法往往是识别和分清各种文化因素和非文化因素各自起解释作用的复杂相互影响，在这种相互影响中，两组因素在各自的因果模式中都既可以是自变量，又可以是因变量。最要紧的是应当懂得，起解释作用不等于起决定作用。正如古德诺弗明智地指出的那样，“生物学有助于解释人的行为，但不是决定人的行为。同样，文化也是有助于解释人的行为，而不是决定人的行为。”^[124]

文化理念

我理解的文化是指社会老一代向下一代传播的和同代人之内产生的关于怎样生活和怎样作判断的全套观念，既为泛指的也为针对特定生活领域的这类观念。它是具有不同特定性层面的信息体系：在一个层面上，它可以是广阔的，例如有关公共自我表现方式的一套观念；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可以是微观信息体系，例如规定如何最佳地制作硬面包圈、咖喱鹰嘴豆或牙买加猪肉干。关于这一信息体系，古德诺弗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有创见地指出，它是“人们为了在社会群体成员相互交往的活动中能够以群体成员的身份按照可接受的方式从事活动而必须知悉的”，^[125] 但又不止于此。首先，如尤金·胡恩所说，“文化理念应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有什么是从礼仪上看是恰当的，而且还有什么是从生态上看是行之有效的。”因此，“文化是一个人为了在自己环境中有效行动而必须知晓的事情。”^[126] 其次，文化有时还包含传播而来的反社会行为，而不只是一个群体可接受的行为。^[127] 这一点

对于研究非洲裔美国人经历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所要理解的文化过程往往恰恰是偏常的，对于更广泛的欧洲裔美国人社会和非洲裔美国人群体来说都不是可接受的。我们不能把文化的东西仅仅局限于规范的东西。

我接受罗杰·基辛的很明智的建议，即最好“缩小‘文化’这一理念，让它包括的内容少一点而说明的问题多一点”。^[128] 例如，罗伊·邓德拉德就谈到“一种特别的文化理论，它的内容是文化的‘片段’、它们的组合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129]

文化是人们作为个人所得到或学到的；它是他们所知晓的。然而，这并不排除文化还有集体的或共有的一面。从个人角度来看不在的文化观，与作为群体共有现象的文化概念，这二者怎样得到调和呢？这就要通过文化模式的概念，而文化模式正如基辛所说“既是文化的又是公共的，恰如历史积累起来的有关一个民族的知识 and 一种语言的体现，还有认知力，如理解世界所依据的范式”。^[130]

然而，这些模式不只是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在她那篇常被人引用的论文^[131]中所说到的“工具包”。她的观点强调了行为体在文化分析中的作用，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是可贵的，但它忽略了文化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如果不制造什么东西或不做什么事情，工具包就没有用了。而文化要素向来首先是生活的计划，思维、判断和做事的蓝图。如果没有使用工具的知识或技能，工具包也就没有用了。而文化模式正是实现文化计划的规划。

这些规则从何而来，人们是有争议的。看来，指导我们掌握语言的那种规则制作能力，大概也指导我们掌握某些文化模式，尤其是社会行为模式。虽然有些规则是由一个人内在的规则制作能力推断而来，但也有一些规则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还有一些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的组合。

多萝茜·霍兰和内奥米·奎因反对某些人所主张的将文化模式分成“内有模式”和“外用模式”的分类法，而提出他们的见解：

同样的一些基本文化模式——有时是同一个基本模式——被用来完成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任务：有时是用来确定行动目标，有时是计划如何达到这些目标，有时是指导这些目标的实现，有时是理解别人的行动和探测别人的目标，有时是形成能在上述各个方面以及在事后诠释已发生的事态方面起不同作用的言辞表达。 [132]

换句话说，社会学上的文化模式相当于生物学上的干细胞。

这些模式是怎样得来的？方式有二。它们是通过社会接触交往而从前辈继承下来，同时它们是在一代人之内通过模仿和教学从同辈人或其他有身份的人学习而来，以及从媒体或名人间接学来。我同意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里彻森的意见，即社会学习是“稳定行为习性的传播”，而“稳定”意味着“基本上不受环境偶然性事件的影响”。 [133] 我在下文中还会提及博伊德和里彻森的文化理论，但我有一点看法与他们不一致，这就是我认为，人们作为个人在他们对自己与别人或者环境或结构性力量的相互作用作出反应时，通过“尝试—错误”式的反复摸索而学到的行为模式，也应包括在文化领域之中。

在这里还要指出两点：第一，文化模式不应与行为相混淆。博伊德和里彻森指出，“文化习性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行为可能完全不同。” [134] 第二，在文化理论中，文化的变化以及引起差异和不稳定性的力量，与导致稳定模式传播的力量一样重要。

文化与结构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非洲裔美国人的实例

现在让我谈谈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以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作为例证。文化模式和结构因素或环境因素都对个人引起文化上和行为上的后果，构成由以下四个方面形成的因果矩阵：A.从前辈继承而来的文化模式；B.更改了的文化模式，它们是由于继承的模式在教学和模仿中出现误差而有所改变，以及为应付环境而反复摸索新谋略作出调整，所产生的结果；C.现时的环境因素，尤其是结构性因素及偶然因素；D.我们所要解释的行为结果。图15.1所示即为以上四个方面的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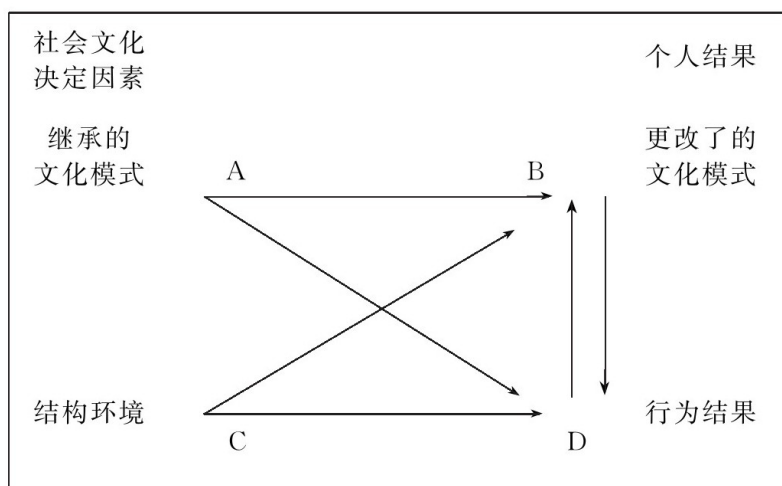


图15.1文化模式、结构环境和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

让我们以很高比例的为人之父的男性非洲裔美国人抛弃自己的孩子这一点为例，来解释图15.1的（D）行为结果。现今，60%的非洲裔美国人孩子得不到父亲的关心，这是非洲裔美国人这一群体的最大问题，也是其他一些严重问题的根源。这一行为问题的因果关系如何呢？

当代非洲裔美国人所继承的文化模式（A）起源于早期的奴隶制环境（约1640—1865年），以后又适应于第二个环境，即佃农收益分成制（约1880—1940年）并经过它传播至今。当年被贩运到美洲当奴隶的非洲人，本来有他们自己明确的家庭观念， 可是沦为奴隶以后，原有的模式多半被毁掉了，尤其是身为丈夫和父亲的黑人失去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和权益。男人对妻子和孩子均无监护权。然而，原先的西非模式中两点，即人口高繁殖力以及按生殖力高低衡量男人气概和地位的观念，却迎合了奴隶制的需要。奴隶主关心的大事是奴隶人口的增长，在奴隶买卖于1807年被废除以后就更是如此。因此，庄园主鼓励奴隶结成稳定的繁殖单位。结果是这样一种行为模式：有2/3的单位包括一男、一女及其子女，另有三分之一为无男伴的妇女，在亲戚帮助下单身带孩子。 [135]

在《血泪仪式》一书中，我指出过，把奴隶男女的这种结合称作“婚姻”，把他们构成的单位称作“稳定的核心家庭”，是对社会学的嘲弄。修正主义学者集中强调男女奴隶组合的这种结构形式，却不去注意它们的功能、关系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模式。在当时，多数的男人并不经常跟女伴生活在一起。在稳定的组合单位中，半数男人是住在别的庄园，又有1/3的人有孩子却没有稳定的伴侣。因此，即使是根据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自己的数字，至少有2/3的有孩子的成年男子不是跟自己的女伴和孩子住在一起，往往还不在同一庄园。此外，每个庄园都还有一批没有孩子的单身男子，约占男性总数的10%至15%，他们的性欲不论如何总得满足。所以，在奴隶制时期，至少有3/4的男人大部分是独处，不是跟孩子一起生活。这也包括所谓稳定组合单位中的许多男人。再进一步看，不论这种组合的性质如何，奴隶们也很少有时间与自己的孩子相处。奴隶制的整个特点正在于奴隶就是奴隶，得不停地干活。

经过了两个半世纪的奴隶制以后，相应出现了若干文化模式。模式之一就是补偿性的性生活。男人在广大社会毫无地位可言，对女伴或子女也毫无合法的权益，只有更起劲地发挥男性生殖力和高繁殖率这一个从西非继承过来的模式，以此作为男性自豪和地位的象征。与此密切相关的模式是男女伴侣关系不固定。美洲不是非洲，得适应于奴隶制度。奴隶主负责奴隶子女的吃穿，鼓励成年奴隶尽可能多生孩子。有些人甚至还精心策划奴隶人口的繁殖。^[136] 他们希望拥有男奴隶生殖力的成果，所以鼓励男奴隶与自己庄园的女奴隶配对。这样一来，奴隶有了稳定的繁殖组合，逃跑的可能性减少，控制劳动力的成本也随之下降了。尽管如此，正如上面已谈到过的那样，有稳定组合而与女伴和孩子住在同一种植园的男奴隶仍然只有一半左右。

与上述两个模式相辅相成的，还有另一些模式。其中之一就是以母亲为中心，母子关系重于父子关系。另一模式是女性有独立地位，这是从西非祖先继承过来的，在奴隶制环境下稍有更改。西非传统社会中，女性就一向参与经济活动，享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奴隶制度下，妇女更是与男人平等地劳动，从经济上说，性别不具什么意义。由于庄园主需要更多的奴隶，妇女的生育能力更受到重视。尽管男女

奴隶的生殖活动都受到鼓励，但奴隶子女在法律上的归属取决于其母亲一方。事实上，有些奴隶主大力扶植以母子关系为主线的家属联系，奴隶中的母女、姊妹都留下来，而奴隶中的儿子、兄弟则可以卖掉。^[137]

最后，还有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一般的男人对妇女享有支配地位，主要是依靠他们对财产的控制权，而奴隶中的男人却毫无财产控制权可言。

上述的与妇女相关的这些模式大大增强了与男性相关的两个模式：男奴隶的补偿性的性生活，以及为人之父的地位无保证和无力维持。在奴隶制期间，奴隶们还学到了另一些文化模式。北美的奴隶必然受到其欧洲裔奴隶主文化模式的强烈影响。他们接受了而且又多少变更了奴隶主所使用的那种语言、宗教和音乐（即音乐的某些成分），自然还有奴隶主的性别关系模式、婚姻及家庭模式。有些模式，例如稳定合法的婚姻、家庭和夫权制，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因而只能留在心中作为理想）。然而，美国南方许多欧洲裔奴隶主男人的对待性关系的双重标准和掠夺式的性行为，却是男奴隶很容易学到手的，这就有力地增强了他们正在形成的补偿性性生活模式。

在奴隶制之后，是佃农收益分成制，这一时期应特别指出的有两点。第一，虽然从法律上说奴隶主对奴隶人身的所有制于1865年废除了，可是奴隶制的文化显然尚未废除。事实上，在1865—1877年的重建期结束之后，它反而变本加厉，非洲裔美国人当中的男人得不到男性的尊严和名誉。南方白人为做到这一点而采取的典型办法就是种族私刑，我在原先的著述中已说明过，这种私刑是一种仪式化的人祭行为，对非洲裔美国人当中的男人实行象征性的和实际的阉割。

第二点也是重要的：非洲裔美国男人虽然得不到多数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也得不到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只要他们同意佃农收益分成的安排，他们还是好歹有一点土地供他们耕种。这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托尔内谈到：

通常人们以为，在农业经济中安家不易，结婚成家会被迫推迟，

作出个人“牺牲”，可是对于农村黑人来说却并非如此。黑人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就业机会相对有限，而且总的说来，内战之后存在着敌视黑人的氛围，因此他们很难有别的经济机会。 [138]

这种环境强有力地促进了早婚和多育。一个男人的唯一出路是把尽可能多的劳动力投入他所能佃来的土地，而劳动力的唯一来源是他的妻子和子女。因此，奴隶制之后的行为趋势是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早婚和多子女。在奴隶制之后的城镇中，当时人数尚不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终于能实现体面结婚和组建父权制家庭的文化理想，可是广大的农村佃农却谈不上这一切。

贫穷的佃农从表面上看是早婚和建立多子女的大家庭，可是在这一表面现象之下情况又如何呢？可悲的是，在奴隶制时期形成的两种男性模式变本加厉了。首先，为人之父的地位更加不确定了。生孩子之前，男人不需要为养家糊口操心。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是现成的。缺的只是人手——一个身强力壮的老婆和尽可能多的子女。子女从小时候起就得劳动，为赡养他们的父亲出力，而不是父亲抚养子女。（当子女的劳力能利用得最充分时，一家的日子就最好过。）由于孩子们要劳动，他们连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也往往得不到。

其次，占统治地位的欧洲裔美国人把男性非洲裔美国人当作虐待和恶毒嘲弄的对象，就使得广大的非洲裔美国男性穷人更加需要得到男人性补偿。他们得不到任何机会在较广泛的社会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被局限于半农奴式的环境之中，在白人扮演黑人的讽刺剧和美国北方流行的说唱演出中受到百般挖苦，在美国南方公开忍受凌辱和仪式般的阉割。在这种状态下，贫穷的非洲裔美国男人唯一能表现自己男子汉气概的方式就是发挥男性生殖力和控制自己的女人。然而他们企图控制的女人并不是随便任人欺负的软骨头。两个半世纪之久的男女不分轻重的奴隶制造就了这些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性格。她们深深厌恶男人的性补偿行为，尤其是对妻子不忠的行为。不幸的是，她们也和男人一样没有机会到别处就业，大都只好呆在佃田的农庄里。她们只能从女性亲戚那里得到支持和安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据安妮塔·华盛顿指出，“人们已注意到黑人母亲及其子女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

联系，黑人妇女高度珍视她们作为母亲的作用，将这一作用置于她们作为妻子和工人的作用之上，这一切就都很容易理解了。” [139]

可见，在人口普查中登记的双亲家庭表面平安无事的假象之下，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片面文章之下，实际上进一步酝酿了非洲裔美国人男女之间的可悲冲突，还有奴隶制时期形成的男性文化模式，这一切在经历了向北方大迁徙之后，又传播到现在的大城市。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现在。

图15.1中的C所表示的，是社会科学家强调的主要属于结构性的行为原因。最明显的例子包括失业，低收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街坊邻里影响，以及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此外还包括政府的一些扶贫措施，如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低收入税额减免，等等。在环境方面，还有一点对非洲裔美国人具有特别意义，这就是体育运动形成一重要产业，给人数不多但十分重要的运动明星提供了机会。以上种种因素在最终的解释中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对于D（行为结果）而言只能说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许多人认为，城市中年轻的非洲裔美国男人结婚率低，非婚生率较高，原因在于贫穷而且经济前景暗淡； [140] 另一些人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妇女就业地位。 [141] 这也许是对的，诚如凯瑟琳·纽曼所言，“没有本钱当一个好父亲的男人，通常也就不是一个好父亲。” [142] 然而，事实依然是：在美国的几乎所有民族群体当中，包括比非洲裔美国人更穷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当中，而且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当中，包括印度大批在贫穷和失业中挣扎的城市人群当中，贫穷并没导致大量当父亲的人抛弃自己的孩子。事实上，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统计资料也没有表明在就业与结婚率高低二者之间有多少关联。 [143]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不久前争辩说，婚姻能解释的大量社会结果当中，有一项是男人在劳动中的活动状况。已婚的男人“有较高工资，更有可能留在劳动力队伍之中，较少可能因弃职而失业，失业率较低，更有可能干全日制工作，较少可能打零工和季节工”。 [144] 阿克洛夫认为，变化中的社会因素（他的

意思主要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模式)能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结婚率急剧降低,而这一降低据他估计是犯罪率和其他社会问题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阿克洛夫并未试图说明这些文化上的变化是什么。他排除经济变数的做法也可能是欠周到的。本文中通过图15.1展现的相互作用模式应能更好地解释,文化因素是怎样与结构因素相互作用而造成不理想的后果。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继承的文化模式(A)直接产生后果(D)。对于怎样为人之父,非洲裔美国男人当中有很少数的人纯粹是仿效他们的先辈,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认为这种由A到D的直接作用如同由C(结构环境)直接到D的作用一样,是次要的。首先,模式不等于行为。事实上,受到过这一模式影响的非洲裔美国男人,又接受了其他模式的影响,在行为上与先辈有所不同。有一点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的,这就是:60%的非洲裔美国儿童成了无父的孩子,决不意味着同样比例的非洲裔美国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绝大多数当了父亲的非洲裔美国男人在行为上是对子女负责任的。表现出抛弃子女行为的人只是非常穷而又受教育有限的少数人。但这些人生育率高,结果就造成了下一代的孩子多数无父的问题。如果根据这少数人的行为就笼统地责怪所有为人之父的非洲裔美国男人,那就跟低估这少数人的行为给整个群体造成的后果一样,是严重的错误。

所以,就这一问题而言,对于行为结果D的主要解释,应当是由A经过B再到D(ABD),以及由C经过B再到D(CBD),还有更复杂的因果螺旋曲线CDBD。

首先考虑CBD.李·雷恩沃特多年前就对此作过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好的分析。^[145] 下层阶级的文化,据他指出,“体现出他们按照社会对平均功能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能掌握的资源,而作出的适应。”^[146] 在遵从主流规范的同时,下层阶级男女养成了“在被剥夺应有权利的世界中生存的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存技能逐渐具有寻求替代办法的特点,形成他们自己的行为指导规则。但是……他们这些行为规则很难持久地做到符合更广大的社会那些指导人际关系及婚姻、父子和母子关系等基本社会地位的规

范。”^[147]相反地，“相对于常规文化而言，下层阶级的亚文化逐渐具有一种功能上的有限独立性，正如同下层阶级的生活不同于社会其他阶级的生活而具有一种功能上的有限独立性一样。”不幸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尤其是妇女，坚持遵从主流文化的家长行为模式，而有些男人做不到这一点，这就导致婚姻瓦解和男人抛弃子女的行为结果。男人喜欢那些能容忍他们恣意玩弄的女人。但下层阶级的非洲裔美国妇女却拒绝忍受男人的这种行为，宁可作为单身母亲抚育孩子，也不愿放弃她们珍视的正派的（实际上就是主流文化的）婚姻和家长行为模式。从C到B这条线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当代的城市环境头一回给妇女提供了较好的经济机会，还有国家提供的福利补助。因此，现在跟佃农时代不同了，她们不再被迫忍受男人的行为，可以维护自己的文化模式和独立自主。这就是CBD的情形。

请注意这一解释不仅考虑到男人的文化模式和行为，而且也考虑到妇女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经济状况。它不是简单地沿CD这一条线从男人状况说明行为结果。

AB这一条线是指继承的文化模式在环境的压力（C）下，同时在上面谈到的适应策略的影响之下，而有所变更。我们如今看到，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情况，男人为人之父的地位不牢靠和寻求补偿性的性生活这两种模式都变本加厉了。这两种模式融合成一种新模式，它有时带有找女人撒气的味道。有些下层阶级的男人文化水平低，原先却有高得脱离实际的保留工资，但在如今已出现的后工业社会再也混不下去了。更糟的是，1965年以后有大批大批低技能的移民涌进美国，在许多大城市中，雇主们宁愿雇用那些新移民。^[148]黑人自豪感和高期望值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异化。继承而来的补偿性性生活模式具有了更大的迫切性。由于妇女现在多少有条件予以抵制，男人发泄性欲一旦得手，就更加感到满足。男人的自豪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表现在能让多少女人怀孕。雷恩沃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调查时，大多数调查答卷“表明小伙子们对他们的女友是否怀孕毫无顾忌，满不在乎，而且异常频繁地表明，他们为自己能让女孩子怀孕感到骄傲，因为这证明自己是男子汉！”^[149]在那次调查之后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埃莱贾·安德森等人又发现了同样的文化模式，说明它

已经传播成为一个体系。 [150]

环境方面（C）还有一个新的特点，它直接影响到上述两种继承模式的加强和变更。这就是体育运动产业取消了运动员肤色的限制，使得相当一批非洲裔美国运动员成为超级明星，他们大多出身于黑人聚居区底层。这些新暴发成富豪的明星的实际人数跟广大的低层阶级黑人相比，当然还是少得微不足道，可是他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了许多人的榜样，使得更多的人纵欲玩弄女人和为人之父而不负责任。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就是嬉蹦音乐文化的兴起，它也让许多人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超级明星。这种文化公然露骨地促进了上述的两种模式，许多人通过“冈斯特说唱音乐”而自鸣得意。现在可以合情合理地下结论说，在大量的城市非洲裔美国人低层阶级的年轻男人中间，这两种模式已成为充分规范性的模式，他们只要有可能就会这样做。

由此可见，从A和C到B，引起了一代人之内和两代人之间的变体，这两种变体在年轻男人中间导致一种熔合的经过变更的模式，再到D表现为行为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他们对主流社会和工作的对立态度（CB）和影响到黑人聚居区的生活方式，这又增强了经过变更的补偿性兼掠夺式的性生活和为人之父不负责任的模式。在这种与主流规范相对立的背景之下，最后实现于D的结果就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结 论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化理念重新作为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应用于对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研究，而又不重蹈以前许多著述在方法、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覆辙。我指出过，这一任务现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社会学该提供的最佳见解已经使我们走到了纯粹从结构方面解释这些问题的极限。

我在本文开头部分谈到过，许多社会学家不愿认真考虑文化与各种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文化是停滞不前的，这其

实是一个老掉牙的谬见。我在本章已强调，文化虽有其连续性，但人们不是文化的奴隶。人们利用文化，而一旦人们真想要改变文化时，他们也可以改变它。

文化模式往往可以比结构因素改变得更快一些，更有效一些。指出文化所起的作用，决不是让自己墨守现状。社会学在解释大部分事情时最爱提到的原因是阶级，其实这是够有嘲讽味道的。试问还有什么比阶级更难改变呢？

不妨看看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美国阶级体系在20世纪后半期的状况。在此期间，美国的整个种族歧视文化——以前三个半世纪积累起来的、法定的和文化认可的公开在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的隔离和歧视的一套体系——已被实际废除了。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形成的男尊女卑文化模式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阶级呢，社会学家十分喜爱（而且总以为到了该变的时候）的一个阶级变数，是美国人的经济不平等，可是它在20世纪后半期却更加增大了，其增长幅度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我们是不是该开始谈论阶级蛋糕的分享了？

第十六章 解构文化

内森·格莱泽

文化与美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的社会和经济轨迹关系如何，这—问题是嵌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即文化在各国盛衰荣辱之中起什么作用。为这个大的背景定调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戴维·兰德斯、劳伦斯·哈里森和弗朗西斯·福山等这样一批学者有关国际冲突和各国贫富原因的充满刺激性的论述，以及有关亚洲价值观的持续辩论。我们在这一大主题讨论中所涉及的范畴，远远大于美国各少数民族群体，而这些少数民族群体大多是作为来自更大得多的社会、国家和文明的零星分子而开始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然后经过适应和同化的过

程，很快融入美国社会。就这些群体中的多数而言，随着各民族间的通婚、生活方式的趋同和特性的改变，把他们与其他人分隔开的界线会逐渐消退。他们会成为美国的大社会和文明的一部分，这时他们还会保留多少文化特点，是可疑的。

在本书大的框架中，我们谈论的是世界各种宗教，世界各种哲学，世界各种文化，不仅涉及各国和各个社会，还涉及世界各大洲的范围。我们考虑的是国际冲突和国富国穷的原因。而在较小主题的讨论中，我们议论的是一些不那么宏大的问题，例如各少数民族群体在教育上和经济上成就的大小。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历史大多不长，要追溯到两三代以上就往往不容易。

美国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的成就和失败，跟世界文明、世界宗教和世界文化等大的范畴，有什么关系呢？大主题的讨论和小主题的讨论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不论人们能用什么原因来解释各国和各大洲的命运，它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的命运吗？

举例而言，美国少数民族群体当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他们往往集中于经济活动的一隅，这跟他们祖籍的大的文明有什么关系？在纽约市，报摊成了印度人的领域，而在加利福尼亚，卖炸面圈的尽是柬埔寨人。印度人在纽约集中从事的行业跟印度教文明有什么联系吗？（我们还可以提到印度人集中的另一些行业，如医药和科学，若就那些行业提问题，也许不会显得那么荒唐可笑。）柬埔寨人集中在炸面圈的店铺，跟高棉文明又有什么联系？不论我们想到高棉文化——想到古老的吴哥或是现今很不相同的形势时，我们脑子里有什么印象，要把它跟美国的卖炸面圈的柬埔寨人联系在一起，都未免显得太牵强附会了。

印度教文明有3千年历史，受它熏陶的人口现今达10亿之多，它的影响还遍及亚洲大片大片的地区，而移居美国的印度人不过一百万左右，要把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点跟那庞然大物印度教文明扯到一起，实在令人伤脑筋。这倒叫我们认识到，不论我们说的文明或文化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考虑它对印度的命运起什么作用以及它对美

国的印度人群体的经济进步起什么作用时，我们所想到的，不能不是很不相同的东西。我在本章中将谈谈这一大一小之间的对比，并试图较仔细地考察一下，当我们用“文化”这一范畴来解释各种问题时，我们所想到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20世纪的“文化”

我首先就过去百年来用文化解释各种问题的做法的变化，谈一点初步的意见。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今天要依靠文化这一原因来解释各国和各民族群体在经济进步和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之前，我们都宁愿找别的原因。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化是比较不受欢迎的解释范畴之一。最不受欢迎的，当然是种族因素——遗传特征——用它来解释各种现象的做法在20世纪前半期曾长期大行其道，其邪恶后果已是人所共知，而它至今仍不时露头。我们今天都不想再提到它或利用它，然而在种族和文化之间却似乎有一点联系，也许只是偶然的联系。世界各大种族均有不同的文化作标志，而文化与种族的这一联系是我们对于用文化解释问题感到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在解释各种差别方面，文化因素显得比种族因素温和得多。请回想一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它在20世纪30年代一出版后即备受尊重，到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国各院校都有众多读者，因为它是从非遗传、非种族的角度解释各群体的差别。从种族角度出发的解释向来是保守的，或者说比保守更糟。它似乎不允许有改变。进步的人类学家反对用种族的范畴来解释社会。相形之下，文化的解释曾显得是开明的，乐观的。人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但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

如今，作为一个起解释作用的变量，文化不再是那么温和的了。首先，我已经说过，文化与种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是逻辑上的联系，而是事实上的联系。第二，用文化来解释一个群体或一国为什么没有富起来，是招人反感的。既然我们都承认经济发展是可取的，那么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就必定有些东西是不可取的。其实，在当代人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倾向在文化上受欢迎（例如反对经济发展给环

境带来不良后果，或反对全球化带来文化上的副作用），却不利于经济的进展。然而，人们的思想却不顾这些。我想，用地理因素作解释比较得人心。它不需要依靠种族或文化，就可以说明问题，例如说非洲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不像希腊或欧洲，沿海没有多少天然良港，因而对内对外贸易都受到限制。

政治上的左翼人士喜欢从武力和剥削的角度来解释各国和各大洲之间的差别。激进派，还有自由派，都对文化解释表示怀疑，认为那是“指摘受害者”。

因此，现在与弗朗兹·博厄斯、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的时代不同了，文化解释失去了昔日的开明、进步的光环。原先人们认为种族是不能变的，而文化能变。今天，我们发现文化几乎是同种族一样抵制改变。既然我们需要依靠两三千年前形成的世界各大宗教和古老文明，来解释当今各种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各种文化改变其基本特征呢？就美国少数民族这一小范围而言，如果我们要从文化上解释一些群体为什么落后，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一变落后为进步呢？

如今在我们看来，文化几乎是像种族一样，不肯改变。当年的进步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可变的；今天我们却不敢这么想。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要小心，别轻易去干预别人的文化让它改变其特点，似乎我们知道该怎么变。既然我们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同样值得尊敬，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进行干预——公开干预或私下干预——让别人改变据我们认为是限制经济发展的文化特点呢？谁授权我们去干预？此外，我们也并不是很有把握，知道怎样去进行干预，叫别人去如何改变文化，或是文化的哪些方面需要改变。文化是一个海绵似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太多了——原先人类学上的文化定义就包含了一个群体之有别于其他群体的、除了遗传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东西——所以我们会弄不清楚一种文化中阻碍经济进步的，究竟是什么？是家庭，还是宗教或工作态度，抑或是教育？更何况在这些范畴之下还有众多的亚范畴，有些人会觉得某些亚范畴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该利用文化这一因素来理解问题。但他们要明白，这样做是有危险的。把文化当作起解释作用的变量，会引起政治问题，差不多跟利用种族因素引起的问题一样严重。然而，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即我们可以怎样地把文化用作一个起解释作用的变量。

文化作为分析工具

在我们从世界各大洲、各大宗教和世界各国的大范围转移到美国少数民族这一小范围的时候，我们需要作两项大的调整。在作过这两项调整以后，我们也许会感到，需要用文化（如果指的是大概念的文化）来解释的事物就很少了。

第一道调整

美国的少数民族群体并不是从他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随机任意抽出来的。在美国的约一百万华人代表不了比他们多一千倍的全中国人。在美国的印度人也代表不了全体印度人。美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都是如此。即使他们在美国繁衍至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他们祖辈所在国的人口——美国的爱尔兰裔人口就多于爱尔兰全国人口——亦不例外。访问爱尔兰的人会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情况跟美国波士顿的爱尔兰裔居民大不相同。原因呢？是因为当年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只是来自爱尔兰的某些地区或阶级，还是因为美国的文明或文化对世世代代的爱尔兰裔人口产生了影响？

移民的确是来自原先各个社会的特定的地区、阶级和亚群体，那些地区和亚群体往往有着向外移民的传统。最早一批人出去了，跟着出去的是他们家里的人，他们向国内亲戚朋友通报侨居地的情况，又可能带动更多的人出去，这个地方的人就可能持续地向外移民。他们在侨居的外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而这些人的原籍很可能只是同一个或几个很小的地区。例如，英国的孟加拉裔移民即是如此。有些移民，例如美国的印度裔移民，可能是来自原籍社会的上层精英；有一些，例如黎巴嫩裔和叙利亚裔移民，可能是出自原籍社会

的工商界人士。而另一些人，例如早期移居美国的华人、日本人和锡克人，则可能是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多半是代表原籍的穷人（尽管也许是较有事业心的穷人），而不是代表上层人士。

那么，试问这些人如何能体现或代表他们原籍的“文化”呢？当然，人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大概念的文化，例如儒学文化、佛教文化或道教文化，那么，那些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连中国的“官话”（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贫苦农民，能让我们看到这些文化的什么东西呢？那些来自意大利南方、没有受过教育的意大利穷人，又能让我们对意大利文化了解多少？能说他体现的是天主教欧洲、地中海沿岸、农民生活的文化和文明吗？从文化解释的角度看，这些范畴都太大、太广阔了。马克斯·韦伯等学者当年曾对比过天主教欧洲和新教欧洲，以解释欧洲经济发展的情况，如今从天主教欧洲移民到美国最多的两个国家是意大利和爱尔兰，试问从这些移民身上能看出意大利天主教文化和爱尔兰天主教文化的什么联系，或者说他们共同的天主教文化能解释他们身上的多少事情？

既然到美国来的移民是来自他们祖辈那个大文化所属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亚群体，关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项调整，我的意见就是，大的文化必须分解到很具体的各种变体，以分别体现我们的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两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米尔顿·辛格提出过一种见解，即我们所说的文化既有一个大的传统，又有若干小的传统。大的传统指它的经书、仪式、宗教僧侣身份和大的历史传统，它们对于各有各的“小传统”的乡下人或新兴市民可能并没有多大意义。大传统的部分内容会传播到他们身上，但会经过更改或变形，在乡村会跟那些土生土长而与大传统没有什么关系的当地小传统混杂在一起，而在城市则跟大众传媒带来的普遍文化相掺和。当这些乡下人或城里人移居到美国时，我们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看做是那大传统的代表。我想，如果我们重温一下这些学者的著述和观点，对于文化与美国各移民群体的不同命运的关系，就会受到很大启发。我们会懂得，不论大传统特点如何，它都可能对小传统没有多少影响。

我们还会明白重要的一点，即大传统的上层体现者是极少出现在移民中间的。犹太移民的经历并非不典型，从大批犹太人17世纪离开西班牙，到19世纪离开德国，再到19世纪后期离开东欧，在每一次移民浪潮中，都没有什么学者和犹太教拉比，没有什么犹太大传统的体现者，在这些移民身上看不到我们心目中的那种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典型的传统。近半个多世纪来，犹太移民中间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极高，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门学问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有人将这一切归功于犹太治学传统，我看到这种说法总是感到很奇怪。传统的犹太学问跟当今犹太人作出杰出成就的现代教育和学问其实是大相径庭的。犹太“大传统”对几乎所有的现代学问都是持怀疑和厌恶态度。当年并没有什么传统犹太学问的代表人物随移民一同来美国。当然，他们后来也来了，力图在美国传播拉比式的希伯来语和《塔木德经》教义，而且有所成就。可是他们这一套东西跟犹太人在当代理论物理学、法学、医学等学科的成就，恐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或许是特别适合于看到有些人直接用犹太传统解释当今犹太人学术成就这样一种做法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这一代人当中学有所成的人，都是出身于像我的家庭一样的清贫家庭，父母都没有上过正规的西方学校，也完全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受过犹太传统教育，是文盲，或者最多不过是会念祈祷书。如果要用犹太人的大传统来解释这些从东欧来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在20世纪上半期在高等教育方面所起的杰出作用，那真得挖空心思费一番心机。

因此，一个大传统和作为它的各种变体的小传统也许只有很遥远的联系，要从大的那一头走到小的这一头，一路上是有许多坑坑洼洼的。对于那些距离大传统如此遥远的人的命运，大传统究竟能解释多少呢？

新加坡经济学家约翰·王（John Wong）曾以怀疑的态度谈到儒家学说在亚洲和新加坡经济成就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样的怀疑言论并不多见，所以它更加令人感兴趣。）王写道，对于用儒学传统解释经济成就的说法，经济学家们不会认真看待，除非：

这一假设经得起检验。仅仅一般地说儒家伦理有助于增加个人储蓄，因而有助于更高的资本形成，是不够的。还必须扎扎实实和具体地证明，这种储蓄究竟是有效地投入工商业，还是花销于非经济性的开支，例如尽个人的一些义务，它毕竟也是儒家价值观体系的一部分。还必须证明，儒家价值观是怎样地实际引起有效的人力开发，促使人们提高技能，而不是仅仅鼓励人们修身养性或追求文字上的自我满足。一个古代典型的儒学夫子是公开鄙视低贱劳动的。 [151]

王以怀疑态度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把儒学的大传统用来解释一些社会的成就，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是否能用它来解释世界各地能与它挂上钩的民族群体的成就。关于犹太人传统与当代犹太人在科学和各门学术中的出色成就二者之间如何联系，我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大传统一下子跳到可谓与之有历史渊源的群体和个人的身上，是再容易不过了。人们在那大传统的当代子孙后裔中间是看不见它的多少真实面目的。

对于儒学传统或儒学文化是否有益于经济发展持怀疑态度的，不只是约翰·王一个人。孙中山和另一些改良派和革命派人士不但对儒学传统的价值有怀疑，还指摘它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难道他们错了？难道儒学会变，所以在一个时期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发展，而在另一个时期又促进了这一发展？对于华人或犹太人成就的解释，我们是不是有点马后炮的味道？儒学与美籍华人学术成就和经济成就到底有多少关系？

当然，尽管一些人只注意大的传统、大的宗教、基督教新教伦理以及世界各地与之相当的伦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按照各种小的文化传统，例如某些地方的人善于经商的独特文化，或者辛勤劳动安心务农的独特文化，来很好地解释文化在美国少数民族群体经济成就中的作用。在成功的少数民族群体当中，经商和务农的文化背景都有，有些人还有其他的背景。然而，不论文化背景如何，在将文化与经济成就相联系的时候，都还要作第二项调整，这就是要考虑移民到达美国时的处境、经济状况、所能得到的机会、定居地点的特点，等等。

当代社会科学家在探索一种变量的作用大小时，都要让别的因素处于相等的水平。例如，在解释黑人收入较低现象时，如果要探索种族偏见或者文化的作用，就要作调整，让对比的群体为相同的年龄、相同的教育水平和来自相同的地区。因为就工资水平而言，地区与地区不同，农村和城市也不同，如此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减出一个差别，或者说“解释”一个差别。如果减的结果有一个剩余数，我们就可能找出种族歧视的作用或者文化的作用。有时可能没有剩余数，差别就完全被解释掉了。但是不论有无剩余数，怎样把文化作为与种族歧视相对照的因子计入算式，总还是一个问題。

第二道调整

问题出在怎样建立起解释模式。我们怎样把文化与另一些能解释差别的非文化因素区分开来？例如在上面谈到的这个例子中，能解释黑人白人收入差别的种种因素都与文化混杂在一起。为了解释收入差别，我们让年龄保持为一个常数。可是一个群体在年龄上低于另一个群体，或者有更多的孩子，这样的事实不是也带有文化的特点吗？我们让地理位置保持为一个常数——在城市比在乡村好一些，在美国北方和西部比在南方好一些。可是人口的迁徙和迁往何地的选择不也有文化因素吗？我们在对比中让家庭结构保持为一个常数，注意到黑人当中以母亲为家长的单亲家庭比例较高，从而使平均收入降低。可是家庭结构不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特征吗？

用这类模式分析差别，是为了解释差别。可是它们也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后果。不论一个群体的状况是优于平均水平还是劣于平均水平，它通常都反对别人对它作文化上的解释。如果它比别人强，它会担心别人说它骄傲自大。它担心让别人注意它那被说成是优越的文化，会招致嫉恨、愤怒和更坏的反应。如果一个群体状况比别人差，它会担心遭人蔑视和鄙薄。每个群体都会觉得最好是被人看做是受害者，而不是高人一头。

举例来说，几十年前就已经看出，亚洲裔美国人家收入与白人一样高，照此说来，歧视的问题该不再提起了。但是仍有人指出，如

果把教育因素考虑进来，亚洲裔美国人的收入还是低于同样教育水平的白人。一直有人努力说明犹太人收入高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犹太人生活在城市中，城市里收入总是高一些；他们平均年龄较高，收入是随年龄一起上升的；他们比较集中于高收入的职业；他们受教育于较好的高等院校；他们家庭人口较少，等等。考虑到这种种因素之后，犹太人收入高该不成其为问题。可是照样有人要对此作出文化的解释，莫名其妙地把种种能解释差别的现象都混杂在一起。

犹太人通常不愿意听到别人谈论他们的收入。人口普查不涉及宗教，所以在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中没有单列出犹太人。由于这一点和另外一些原因，犹太人律师组织通常都反对在人口普查中提出任何有关宗教的问题。亚洲裔美国人在人口普查中是列为少数民族，他们通常都力图对那些能表明他们经济成就的统计数据加以解释，消除人们觉得他们有成就的印象，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保持受害者的地位，从而有可能享受某些优惠。（现在亚洲裔美国人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已无照顾，但是在与政府订立合同时，他们仍被列为需要给予照顾的少数民族。）还有些人希望继续留在有色人种“彩虹同盟”之中，而倘若他们的处境已优于平均水平，他们留在这一同盟之中的资格就成问题了。

尽管亚洲裔美国人现今的收入和职业地位都不坏，他们仍声称自己严重受歧视，力图保持受害者的待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努力达到扭曲的地步。例如，我们可以看到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约翰·郭·维·成（John Kuo Wei Chen）的一篇文章。^[152] 他先告诉我们，他每年见到“威斯汀豪斯科学人才搜索竞赛”公布的优胜者名单都很高兴，因为里面有许多的亚洲裔学生。“然而当我读到报刊的有关报道和公布的有关讨论时，我日益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这些学生的优异成绩的看法有些不和谐的声音，把亚洲裔美国人说成是‘模范少数民族’，尽管有不少扎实的事实证明不能作过分的概括。”他对这些人的成就感到骄傲，可是又反对说他们是“模范少数民族”。

他为什么对这一名声感到不安，是难以猜测的。他接着写道，《纽约时报》在报道威斯汀豪斯竞赛以后，又报道了纽约市昆士区卡

多佐中学一个学校就出了11名半决赛选手，全是亚洲裔学生。该报随后在专栏版发表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主编斯蒂芬·格劳巴德的一篇文章。郭以不赞成的口吻写道，格劳巴德把亚洲裔学生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稳定的单亲家庭，“他本着社会福利计划的精神猜测，对于几十万并非生活在这种稳定环境中的孩子该怎么办……格劳巴德推测是稳定的单亲家庭邻里街坊为成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郭为什么反对这种似乎无可辩驳的和普通的解释，我们不清楚。再看下文也许能得到一点暗示：他以赞许的口吻引述了卡多佐中学的优胜学生为反驳格劳巴德而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这些学生反对用任何概括的说法来解释他们的成就。他们指责格劳巴德的解释表现出“用固定的框框看人……这种看法的最极端形式就是偏见的根源，而偏见病是科学永远也治不好的。”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学习持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从不闻不问到积极过问，什么样的都有；他们参加威斯汀豪斯竞赛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是个人的决定。郭得出结论说，像格劳巴德这样的对亚洲裔学生成就的提法是“把一个复杂的现象变成了简单化的和历史的（或许他说的是非历史的意思？）亚洲文化不变性的展现”。郭这番话只是他的论文的前奏，那论文研究的主题是19世纪纽约市的反华偏见。看来这是要让人相信19世纪的反华偏见与今天的“模范少数民族”神话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教育的关键作用

我已经指出，要科学地确定文化因素在民族群体经济成败中的作用，是不容易的；坚持说文化因素在民族群体经济成败中起作用，这在政治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认为，即便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最佳方法和途径，也难以明确下定论说一个民族群体的经济成败是决定于它的文化特点。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我们所能做到的，是确定有哪些因素经常与民族群体的经济兴衰有联系。这样研究后看到，最突出的因素是教育，它也是

衡量人力资本的合适尺度。它与后期表现出来的较高声望的职业和较高收入关系最密切。

各民族群体在教育 and 职业方面的成就大小相差悬殊，这似乎为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提供了一条明确的理由，因为对受教育的爱好似乎首先就是一个文化事实。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对受教育的爱好，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就，随阶级而异。我们是不是要把阶级也包括在文化之中？是可以那样做，可是导致成就的，不是民族群体的文化——各民族群体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此外，我在上文中已谈到过，当我们试图把人们对受教育的爱好归结到某一群体的高文化（例如犹太教文化）时，这种联系会提出一些问题。当然，对一种学问的追求可能转变为对另一种很不同的学问的追求，犹太人也许就是这样的。印度的婆罗门种族的人也许是放弃梵文而追求科学；中国人也许是放弃儒学经典而追求物理学。凡此种种都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目前的了解是不足的。

日本农民的孩子和越南船民的孩子也都在学习方面表现得出色。人们也许会想，这两种人的社会大传统大不一样，他们学习的成功是什么原因，也有待于考察。

教育上的成就是衡量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人们之所以要考察教育成就方面可能有哪些文化因素起作用，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斯蒂芬·格劳巴德专栏版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从这些成功事例学习，以便指导人们去干预那些不大成功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是有可能的，我只是怀疑，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甚至是由于科学的原因，我们是否愿意把学到的任何东西称之为某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许多人经研究后相信，给孩子朗读，有助于孩子学会自己朗读。这是通用的经验，并不是某一民族群体所特有的。最好是提倡这种做法本身，而不必说它是华人或越南人教孩子的办法。（事实上，尽管这做法可能有用，但对于美国犹太人、华人或日本人的第二代就可能用处不大，因为他们的父母多数不会用英语朗读。）

无疑，父母大力支持孩子求学，比不支持要好一些。（但上面谈到的卡多佐中学的优秀华人学生时，有的父母对他们的学习是“不闻不问”的。）可是调研材料经常表明，非洲裔美国学生的家长强烈要求他们的孩子认真学习，敦促他们重视学习。凡此种种可能有助于教育成就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文化因素，但是我们还必须很深入地对它们进行探索，才能明白为什么乍一看来是相同或相似的做法会在不同群体中产生如此不同的效果。

我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可是以上的事例表明，要弄清楚是文化之中的什么因素起作用，并不容易。不论那因素是什么，我想它都是比较精细微妙的，而不是一种文化的大传统的泛泛特点，因为在同一种大传统之下，不同的时期会有太不相同的结果。它们都有过盛衰荣辱，有过大屠杀也有过慈悲为怀，有学者也有武夫，有过学术上的辉煌也有过愚昧无知，或者更糟。倒不如将它们设想为一座座仓库，所有的人都可以从里面找到合适的和有用的做法。无论如何，它们已经有过如此之多的变化，所以有人以为只要我们同意它们的教导，就可以到处加以应用，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美国各民族和种族群体各自的一些特定的做法若加以同情的探讨，也许还能让我们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第六部分 亚洲危机

第十七章 法律、家族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

德怀特·珀金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随后波及亚洲之外不少地区，在此期间，许多人谈到了亚洲存在的商界和政界的密切合作关系。最常听到的名词是“任人唯亲”，言下之意是说这就是危机的直接原因。人们明说或者暗示说，倘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经济走了另外一条路，以法治为基础，政企分隔保持一定距离，这场危机就决不至于发生。

现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和性质，已有许多研究报告，它们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即亚洲政企关系的性质的确对危机负有一定责任。^[153]在泰国和韩国先后出现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善触发了典型的金融恐慌，随即使两国经济呈螺旋形下滑，但衰退的深度与两国体制中的弱点有重大关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锐降与政企关系性质的联系更大。

然而，“任人唯亲”真的是这四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原因吗？抑或只是某种更深层问题的一种征候？本章的主要论点是：政企关系密切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一种表现，这现象即是依靠个人关系来给商业交易提供担保，而商业交易的担保本是任何一种成功的商业制度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我封闭的农村社会或自治的封建庄园社会不需要为经济交易的担保太多操心。村长头人或封建领主可以任意实施他们喜欢的规则。但在远距离交易时，一个地方的当权者就不再能够保证交易的完成会符合自己既定的规则。一个商人可以为自己安排担保，用自己控制的船运货，坚持要收货人立即用金银付款。他还可以花钱请一支雇佣军一路来回保护他的货和收到的金银，防止土匪海盗或贪婪的外地豪强

拦路抢劫。可是这样安排的生意要承受高昂的交易成本，只有当他的货物单位价值极高时，才能盈利。早期到亚洲贩运香料和丝绸的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船就是这样做的，它们自身的行径就往往与海盗没有多大差别。

对于价值较低的普通商品来说，必须设法降低交易成本。应当由一个总的权力当局负责沿路的安全，而不是让商人自己去操心。此外，还必须找到一种可行的付款办法，避免来回携带沉重的金银和铜币。贸易、运输和财务由专人各司其职，比什么事都全由一个人办，会效率更高，但他们彼此之间需要相互信任，而信任必须有可靠的基础。

在欧洲和北美，这种必要的担保是靠法律来提供，有一套司法机构来执法，而司法系统逐渐与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分开，具有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这种以独立司法支持的法治的建立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到18世纪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本章的主题是要说明，在东亚和东南亚没有出现类似的法律制度。可是在亚洲内部各地以及与世界其他各地之间也开展了远距离的贸易，这种贸易需要有法治的某种替代办法。这一替代办法所依靠的，是东亚文化的强项之一，即以家族联系和由家族延伸的联系为基础的密切的个人关系。

东亚经商方式的历史渊源

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核心作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时代，这里需要略加说明。孔子创始的儒学体系规定了明确的等级关系，在家庭内部如此，从家庭到更高的各治理层次直到至高无上的皇帝，亦是如此。这一体制至今仍是中国、韩国和日本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东南亚商界原先也多为华人，所以同样的价值观在东南亚也起一种核心作用。

关于儒学的家庭世界观与经济的关系，早期的研究著作认为这种价值观严重阻碍了大型成功企业的成长。^[154] 这种见解实质上是认为密切的家族联系导致裙带风，而裙带风与现代法人团体式经济是

不相容的。这种论点受到中国学者广泛驳斥，但提出这一论点的著述可以看做是当代论述任人唯亲危害性的先声。

中国在历史上自然是一直有法律的。东南亚过去也有法律，大多是由殖民当局制定的。中国的法律是由县官执行的，县官又是中央行政系统的基层官员，因此权限很广，从赋税到治安直到排解纠纷，都由他办理。有的县官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当地的商贾，但这并不是一条规范。商人们很少为契据纠纷打官司，因为法律不是用来保护商契的。在多数情况下，打官司会闹到倾家荡产。

因此，为了寻求商业担保、惩治违约行为，中国商人想出了他们的一套办法。他们成立了行会，行会既按行业系统，也按地区原则来组建。例如，上海的宁波商人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直到19世纪末控制中国票号钱庄的山西商人也有自己的行会。这些行会很大，远远超出了家族范围，但他们所依赖的同乡关系也遵循儒学的人际关系准则。由于是同乡，彼此就相识，或者认识对方的亲友，了解对方的信誉。

但他们所依靠的不只是个人的信誉。在中国，家族对其成员的行为是集体负责。就山西票号而言，当一个人受委托负责办理他人财务时，他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就为他的行为充当了人质。倘若这个人携款潜逃，他就回不了家。虽然他可以到一个远方城市躲藏起来，但他不敢再与自己家庭联系，只好隐姓埋名，变得没头没脸。因此，山西票号能够相对安全可靠地将大笔款项从一地转到另一地。

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商界关系与中国的传统商界关系相似。英国、荷兰和法国殖民当局在东南亚建立了他们那一套法律制度，但是华人只要能避开那一套制度就避开。那一套制度所用的文字是许多华人所不认识的，殖民当局的法官所依据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是海外华人所不理解的。海外华人大多是在他们自己当地社团和地区行会内部解决纠纷。地区行会有福建帮、广东帮或客家帮等社团，在一个行会之内解决纠纷，通常比不同行会之间解决纠纷要容易一些。因此，商界关系受原籍很大影响。

这些办法随时间而演变，有些海外华人也学会了按照殖民当局法

律制度办事。香港今日的法治很说明问题。那里的法律制度最初是由港英当局制定，为它服务，现已逐渐变成了由当地居民掌管，为当地居民服务。然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早在当地人民开始珍视原殖民法律制度，使它变成为自己社会利益服务的制度以前，殖民制度就宣告结束了。

1945年以后的制度变化

不论中国传统的商界关系和法律制度以及殖民时期的这些方面的制度有什么长短利弊，当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及殖民统治在东南亚、朝鲜半岛和台湾结束时，这些制度都有了变化。

中国的变化最激进。共产党当权的政府最初引进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包括苏联的许多法规。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期间走极端，废除了大部分法律和所有的律师。任何人没有什么安全保障，企业界人士更是如此，尽管那是国有的企业。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这一激进实验结束，中国基本上是从头开始建立新的法律制度，编纂和正式通过大量的商用法律相对说来并不困难。但是建立一套能有效、公正执法的法律制度，却是另一回事。

在东南亚，法律制度的变化不像中国那样激进，甚至连韩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尤其是与商业有关的法律，大多保留在案。然而，执法的责任转移到了新独立的国家政府手中。有的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新政府管事的人对于殖民时期法律体制有较多经验，他们当权后，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在处理商业事务方面仍然按照原先法律制度的精神和文字办事。

在另一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新政府官员对老法律制度没有什么经验，国家独立后，法律制度迅速恶化。印度尼西亚经过数十年的编纂法律和培训律师之后，到20世纪末，法律制度仍然受到金钱和政治权力的轻易操纵。在东南亚另一些地方，法律制度的演变趋势是它日益受到政治领导人的权力的摆布。

商业法律在东南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经历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商

界人士，尤其是华裔人士，不得不继续靠自己设法为交易安排担保。虽然他们继续依靠彼此之间和行会的联系，但他们也日益努力打开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殖民地时期不大现实，因为殖民当局当时有意跟当地商界尤其是当地华人商界保持距离。

商界与政界关系的亲疏，因地而异，部分地取决于当地商界文化与政界文化和利益是否相通。在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商界政界人士同宗同族，甚至是同校出身。事实上，官商界线有时都不易分清。在泰国，政界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曾起劲排华，但后来方针有变，充分吸纳当地华人进入泰国社会。

相形之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的政界与商界之间距离大，在20世纪后半期一直是如此。但与此同时，政府又奉行积极干预工商事务的政策，例如控制着许可证的发放和资本的流通，所以商界人士要发财就不能不打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不能建立在儒学式的家族忠诚和地域忠诚的基础之上，因为马来文化和华人文化之间存在着鸿沟。由于长期存在着民族和教族暴力，要建立相互信任就更难了。

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当地华人与政界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华人往往经商有方，政界头目可以从华人手里弄到钱，供自己的政党或个人花销。例如，印尼有几位华人就是先弄到采伐热带森林的许可证，靠此起家成为亿万富翁，然后靠钱财跟苏哈托总统的一些家族成员建立了密切的生意关系。在马来西亚，早期参加联合执政的各党派大多从华人商界弄钱维持本党活动。但是控制政府的马来人后来站稳脚跟，一步一步扶助马来人拥有的企业，如今，这些马来人的企业已成为主要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的主要财源。

新古典派的经济纯粹主义者也许会说，儒学式的家族关系也好，海外华商与当地政界领导人结成的同盟关系也好，都是以预期的经济回报为基础。但是，即使多数人的动机都是归结到钱财，儒学社会的家族联系也仍然比跨民族的个人交情更牢固，大概也更持久。

由这些价值观造成的制度

靠家庭联系或其他个人间联系寻求担保的做法，在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所造成的商业制度，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企业通常由一个家庭拥有和掌握。即使是在当地股市上市的一些责任有限公司也是由家族控制的。占少数地位的股东对企业的经营没有什么发言权，其权利也得不到什么保护；非家族成员的股东即便占了多数，也依然是如此。

只要有可能，企业的控制权总是由创办人传给自己的儿子，有时也传给女儿或女婿。华商公司这种代代相传的做法常常危及公司的兴旺，因为创办人的后代往往能力弱一些，或者下一代的兄弟姊妹之间合不来。在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地私营企业还差不多都是一代传一代。把企业经营管理权移交给非家族成员专业人才的现象是十分罕见的。

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也有许多企业是由专业经理人管理，但它们是由欧美和日本投资者控制的企业。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甚至在新加坡，政府都曾掌握一批国有企业，以保证当权的群体握有一部分经济实力。马来西亚的土著马来人从国有企业及其随后的私有化中捞到了好处。在中国台湾，控制国有企业的，是1949年从大陆过来的人，而私营企业大多掌握在台湾本土出生的人的手中。在新加坡，强有力的文官系统和政界精英掌握国有企业，而私营企业是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控制之下。

家族联系和地区联系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各个企业内部的关系也有很大影响。然而，对于东南亚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海外华人中间起重大作用的家族联系和地区联系网络，学术研究著作尚属罕见。^[155]由于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其环境又往往被视为敌对性的，因此也许永远不可能充分理解这种关系网的性质和规模。

在尚不存在这种关系网的地方，华人企业总是费时费力去建立关系网，甚至是跨民族界限的关系网。关于在中国做生意，一个标准的

说法是：欧美商人总是带着自己的律师去谈判，准备签订周详的正式合同，而中国企业家却宁愿花上几年功夫来回拜访，招待，跟外国人厮混熟了，才准备坐下来作实际交易，有时签正式合同，有时也没有正式合同。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因地而异，上文中已谈到其中的一些模式。就许多模式而言，根本的一条是当地缺乏法治，而政府又积极参与指导经济，所以企业不能不寻求担保。例如，在中国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80%以上是来自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其中多数又是投资于广东省，因为广东是多数海外华商的祖籍。

到1997年，法律制度已在中国沿海城市起着日益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然而即使到这时，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外商直接投资总共还只有84亿美元。相比之下，来自香港一地的直接投资就有215.5亿美元，来自台湾的直接投资的正式数字是33亿美元，而实际上要比这多得多，来自小小的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有26.1亿美元。[\[156\]](#)

华人企业知道在合同往往得不到履行的环境中该怎么办。他们跟地方政府建立了有效的关系，必要时可以请地方政府帮忙。这种密切的关系至少可以保证地方政府不来干涉企业的运作。而欧美商人却没有这样的关系，只能求助于尚不完备的法律制度。

当政府官员与企业界人士的个人关系是建立在家族、同学、同乡等关系基础之上时，政企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东京大学的毕业生自然可以到日本政府的经济部门担任要职，然后在相对说来还年轻的时候就退休，到原先由他们管理的公司中取得待遇优厚的职位。韩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可以方便地转到法人思想库或者担任企业行会的领导职务。

在马来西亚，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造就一个当地马来人的亿万富豪阶层，政府的投资和许可证发放业务都为这一目标服务。上面已经说过，政府期待这一富豪阶层反过来为领导政府的政客们提供资金。泰国的许多政客是军人出身，他们身兼公私企业董事会的董事，这不是什么秘密，一点也不遮遮掩掩，至少在社会上层这被公认

为正常的经商之道。

当统治精英与商界之间存在着民族鸿沟时，则如上文所述，政企关系的基础主要是权钱交易。这种交易被公众及交易者自己视为非法贿赂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这些关系对经济运作的影响

上述的经商方式三十多年来为亚洲服务得挺不错。东亚和东南亚不必等到商业法律体系完备，就做到了经济加速增长。在多数国家和地区，投资不断增多，上升到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而且，除了若干值得注意的事例以外，这些投资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也是使用得有效的。假若投资者担心当地政府贪得无厌和竞争对手狡诈无耻而导致自己的投资白白丧失，投资率就决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假若安全没有保障，投资者就会像他们的同行在拉丁美洲采取的做法一样，把自己的钱转移到纽约和苏黎世的银行，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就会慢得多。他们也可能只谋取短期利润，而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长期投资就无人问津了。然而，这种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投资者依然把钱投入到当地的工厂和基础设施。

但是另有一点也是事实：这种经商方式所形成的体制并不是总能经受得起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逆境风险。在一个企业之内或几个企业之间依靠个人的关系，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个别的公司如果因为创办者的继承人无能或者因为依靠长期的个人关系而为某个低效率的供应商所拖累，是可以垮掉的，但这时会有别的公司取而代之。使整个经济受到威胁的问题，是出在企业与奉行干预政策的强权政府之间的关系上面。

由于政府与企业关系很密切，企业认为它们一旦遇到麻烦，政府自然会鼎力相助。既然政府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起着无所不包的作用，企业家无疑会以为政府有力量扶助某一企业或整个的商界。政府也会愿意进行干预，因为要帮助的人是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因此，企业有信心去冒巨大风险，实行自己的投资方针。这有好的一面，促

进了高投资率，推动了许多成功的工程项目。不好的一面则在于，在某些情况下，风险过大，以致威胁到整个经济。

正是政企关系的这不好的一面，即“道德风险”的一面，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起了作用。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处境格外脆弱。亚洲的许多银行是直接由国家开办的，它们当然指望国家会拯救它们摆脱危机。另有许多私营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例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许多这类银行和金融机构，是由政治强人控制的，它们也觉得可以依赖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政府确实也试图帮忙。

泰国金融机构大量从国外贷款，一旦泰铢严重贬值，它们以铢计量的债务就会增大到难以承受，因此，泰国当局决定保持汇率不变。其原因之一是想要帮助这些金融机构，但后来却几乎耗尽了外汇储备。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总统玩弄汇价牌，原因之一大概也是想要帮助他的朋友们逃脱他们投机于美元、日元外债所造成的后果。马来西亚决定停止其货币林吉特的兑换，原因之一大概同样也是想要帮助马来富豪们避免因他们的金融花招而垮掉。

关于以上三国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动机的这种看法，是有争议的，也无法得到证实。这些决策的许多当事人无疑会否认他们有如此动机，而声称他们的动机是维护全社会的利益。有些外界分析家也许认为那三国政府的干预措施不过是判断失误。无疑，当时还有许多别的考虑，可是，根据我们对这三国许多政治领导人举举动机的了解来看，上面谈到的动机至少是有可能的。

道德风险显然与金融机构的冒险投资行为和虚弱有很大关系。而这种行为又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经历的经济衰退的深度有很大关系。同样几乎无疑的是，当时存在的道德风险是源于政府与商界的密切关系。可是，将这一切说成是“任人唯亲”的结果，那就意味着让人相信祸根在于政府的腐败，似乎亚洲的经商方式就某种普遍意义而言就是腐败的。

我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一是法治，但是在不具备这一前提的环境之下，形成了亚洲的经商方式和政企关系，它们

是商界和政界为了适应上述环境而采取的做法，在一段长时期内曾是行之有效的。虽然这一体制为人人几乎都会称之为腐败的现象造成了许多机会，但这一体制本身并不是生来就是腐败的，至少从20世纪后半期在东亚和东南亚流行的价值观点来看，不能这样说。这一体制还造成了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则导致了某些过于冒险和欠明智的投资行为。许多种类的保险业务也造成道德风险形势，但我们不会因此而下结论说应当废除这些保险业务。

对于未来的涵义

建立在家族关系和其他关系基础之上的商界人际关系，在20世纪后半期曾相当不错地为东亚和东南亚服务了三十多年，但在最后三年却弄糟了。为经济发展而建立的这一套金融制度可能要经过许多年才会变得健全起来，但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很可能会快得多——实际上在1999年夏季看来已在恢复。那么，是否可以说亚洲的这种经商方式和政企关系不过是半路上摔了一跤，只要爬起来再蹬自行车，就可以继续前进？

本章的主要论点并不是说建立在家族式关系基础之上的个人联系优越于其他的为经济交易提供担保的方式。这种个人联系在一定时期之内可以代替多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为达到同样目的而采取的方式。然而，至少有两点理由可以认为，这种通过个人联系提供担保的做法在今后大概不会很符合东亚和东南亚的利益。

第一点理由是，亚洲危机已充分暴露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金融制度的弱点。问题之一至少是，这种金融制度一旦打开了，就显得太弱，无法承受或缓解国际经济制度所特有的各种资本流动。它们一下子崩溃了，把经济也拖了下去。

现在人们作了广泛的努力，写了越来越多的文章，谈论亚洲国家该怎样修正它们的金融制度。建议很多，例如要建立可靠的会计标准，加强审慎的调控，借助声誉卓著的国际银行从事竞争，等等。但是，任务并不在于简单地采取狭隘技术性的举措，如改写法律和培训

银行工作人员。举例来说，多年来，哈佛国际开发研究所就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这样的工作。法律改写了，银行工作人员培训了，私营银行得到批准而且开始迅速发展，商业银行被赋予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再事事听命于中央银行。然而，到1999年时，所有的印尼银行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都破产了。

恐怕任何一个银行体系都经受不起本国货币贬值80%。但是印尼银行界的问题也在于，许多银行在十来年期间一直充当了统治集团的玩物，若没有政府的支持，它们连一次不大的危机也经受不住。而1998年的麻烦是，政府当时也无法再提供支持了。要防止类似的危机今后重演，银行就不能再受政府高级官员的任意干预去资助他们宠爱的项目。只要政府直接大量干预银行业务，让银行保障政府倡导的具体工商项目，银行就始终是脆弱的，连日本的银行也在20世纪90年代出过这样的问题。要想让政府官员不作这样的干预，就必须有某种制度来强行保证这一点。这种制度在大多数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就是司法独立所实行的法治。

政企间的个人关系今后不会再那么管用，还有第二点理由，这就是国际经济制度本身也变了。新制度的规则，正如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所表明的那样，是着眼于各国经济制度均以法治为基础。也许国际经济制度可以设计得有所不同，但它不会为了接纳发展中国家而作根本改变。小而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以不加入这一制度，也可能作为例外情况予以对待。然而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不小，也不再是穷国。它们当中已有许多是世界重要贸易国。它们想要也需要进入欧洲和北美的市场。不论公平或不公平，这就要求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加强它们的经济受透明的法律制约的程度，不能再让政府官员任意采取不透明的行动。

亚洲价值观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期间内为经济发展服务得不错。今后它们大概不会服务得同样好。如今的挑战，是要完成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强大现代化经济的过程。

第十八章 “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 [157] 到多米诺？

卢西恩·派伊

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经济的盛衰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人们对亚洲国家基本文化因素所广泛持有的看法，竟然在大约40年之内两次翻了跟头。先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经济“奇迹”，尤其是出现了“四小龙”，人们原先长期认为亚洲文化缺乏造就经济增长的能量这样一种看法，剧烈粉碎了。然后，更加突然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危机和崩溃。首先是日本经济没劲了，即使说不是萧条，也该说是严重衰退，迄今已持续整十年了。接着是东南亚和韩国的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导致更根本性的挫折。说了十年的“亚洲价值观”如何优越的大话一下子泄气了。

[158]

亚洲经济在连续十年保持10%年增长率之后，在1998年缩减了15%，他们股票市场的股值损失了一半以上，货币贬值30%到70%。在1996年，流入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五国的资本约为960亿美元，可是在1997年流出的资本超过了1500亿美元。在一年之内，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038美元降到了600美元左右。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亚洲失业人数约达1000万。 [159]

因此，在一年工夫里，亚洲经济的未来变得很不明朗，宣扬亚洲方式伟大的吹鼓手们哑然无声了。然而，不应该因为“奇迹”垮了，就停止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而是应该更冷静和批判性地分析价值观在造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的重要性。现在需要的，不是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关亚洲价值观的那种“辩论”中的有点伤感情的民族主义责难，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同样的一套文化价值观居然既造就了狄纳莫式的动力，又造就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亚洲经济先是从停滞走向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然后又走向了崩溃，像这样走极端的事实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即根据文化因素来解释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否还正确有理。要知道基本的文化在这期间并未改变。

为了探讨这一重大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揭开所谓亚洲价值观优越性的夸张言辞，争取比较现实地理解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

我们还需要在理论上澄清有关亚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包括回顾一下马克斯·韦伯对儒学及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

然后，我将提出两点假设，它们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文化价值观会造成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点是：同样的价值观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时，可能而且往往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是说，亚洲文化的价值观仍是原样的价值观，但环境变了，因此原先的正面结果变成了负面的结果。

第二点假设是，文化价值观总是成簇的价值观，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方式的组合，因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是一个微妙的论点，要小心对待，防止有人利用它来争辩说不论发生了什么，总是有可能找到某种文化上的“解释”。有效的解释必须有适当提出的文化变量，以及准确的因果联系。

关于“奇迹经济”只要事实，不要夸大其辞

对于亚洲价值观辩论中出现的许多夸张词藻，人们会认为那不过是亚洲取得成就之后的得意洋洋情绪的一种表现，因为当时西方正因为赢得冷战胜利而得意洋洋，喧喧嚷嚷，亚洲想要盖过那种嘈杂，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因此，不难对这些夸张辞藻置之不理。然而，“四小龙”出现了，中国也显出了即将成为一个潜在的新超级大国的势头，它们都是程度不等地模仿日本的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这些就为亚洲声称自己有特殊性提供了依据。经济成就与集权统治的结合显然让人想到亚洲国家真是发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亚洲价值观的概念迅速成为对经济成就的一种简洁解释，以及对集权政府做法的一种辩护。

亚洲价值观的辩论还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亚洲经济“奇迹”和西方衰落的景象，不仅吸引了亚洲人，而且也吸引了西方人的注意力。关于亚洲成就究竟有

多么特别，出现了一些夸张的说法。因此，有必要从适当的角度看看实际的情形。

首先，某些人有一种奇怪的倾向，把日本这一个亚洲经济奇迹的领头者说成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强国。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工业化，那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来，美国开始工业化大约是与与此同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已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它还利用了欧洲经济被战争打乱的机会，先在亚非，然后在欧美，挤占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的市场。

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拥有了世界上第三大海军，商船队也居同样地位。到30年代后期，它的经济居世界第三位或第四位（差别在于它在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投资是否包括在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的汽车工业已与欧洲大体相当，当然，它还制造出一种很了不起的军用飞机，即零式战斗机。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才看到强大日本崛起的人，往往忘记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构成何等的挑战。

关于亚洲另一些地方原先的落后状况，也有一些言过其实。中国的乾隆皇帝当年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傲慢地表示中国不稀罕英国的小巧装置，不需要英国的工业制品。人们现在谈起此事，总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滑稽小丑，其实他在位时，中国经济的确大于英国经济。当世界经济尚未受工业革命改造而仍然以农业为主时，整个亚洲的产值在18世纪末占世界经济产值的37%。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亚洲经济奇迹被吹得神乎其神，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31%。在亚洲经济尚未遭危机打击之前，亚洲经济据估计也要到2010年才能重新达到原先的37%的水平。

最近二三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亚洲经济有10%的增长率，而西方经济增长率还不到3%，相比之下，亚洲人曾令人敬畏。可是人人只注意百分比，而没注意净增长值的绝对数字。中国经济保持“十年的10%年增长率”，这确实令人兴奋。但事实依然是：在这十年当中，中国经济没有任何一年的净增长值能与美

国经济同年的净增长值相比。因此，在这十年增长期间，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不是在赶上美国，而是落后得更远了。简单明了的算术是：6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10%是净增600亿美元，75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2.5%是净增1875亿美元，前者尚不到后者的1/3。这个道理就是，只注意增长百分之几，而不考虑基数，是可能产生严重错误印象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贬低亚洲人的成就，而只是反对把他们说成那样神奇。高增长率确实给亚洲人千家万户带来实惠，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中国人为例，在1985年时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100美元，1998年时已增至360美元，这意味着：彩色电视机原先平均每5户还不到1台，现在平均每1户已有1台以上，拥有冰箱的家庭原先还仅占总户数的7%，现在已达到73%。^[160] 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确有显著改善，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孩子的未来会更光明。

马克斯·韦伯实际说过些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事实以后，我现在想探讨怎样从理论上分析亚洲文化价值观与经济的关系。但首先我要回顾一下马克斯·韦伯对这个题目是怎样说的。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方面，韦伯当然是最大的匠师，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众所周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在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可是他的论述被后人通俗化以后，不幸变成了几句陈词滥调，跟童子军的誓词差不多：勤奋，奉献，诚实，节俭，可靠，不自满，重教育。其实，韦伯对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看法要复杂得多。他尤其对两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感兴趣。

第一个现象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僧侣们全身心修来世，在隐修院中过着苦行僧生活，但他们却建立了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赚取今世的利润。第二个现象是，在建造资本主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角色，是那些相信得救预定论的加尔文派教徒，而不是那些相信善有善报的其他基督教徒。韦伯认识到，以会计账簿方式对待善报恶报，太容易使人陶醉或灰心，而相信只有上帝预先挑选的人才能灵魂得救，就会有一种深刻的心灵不安全感，因而会努力抓住每一个可能证明自己属

于“蒙上帝挑选者”的迹象。关键的动力是心灵的焦虑。

韦伯细心分析过中国的文化，在对比儒学和基督教清教教义时，强调儒学很重视君子要“修身养性以适应外界，适应世情”。^[161] 儒学文化的理想是达到心灵和谐，没有强烈的内心紧张或心灵不安全感，没有“神经”问题，而韦伯指出欧洲人的“神经”却有问题——即弗洛伊德所分析过的那些问题。

韦伯详细描述过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是经过良好的调节，有“无限的耐心”和“有节制的礼貌”，“不在乎单调”而且“能不间断地努力工作”。但是韦伯认为这些品质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与此同时，韦伯又以相当大的先见之明指出，中国人的这些品质有助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他写道，“十有八九，中国人将会很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将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162]

由此可见，有人批评说儒学国家近二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就推翻了韦伯的理论，这是错误理解韦伯的理论。事实上，韦伯预见到中国早晚会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从许多方面看，韦伯都像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对中国持正面的看法，而历史的事实依然是，亚洲国家取得成就，是由于它们进入世界经济，而不是由于内在的、自主的发展。

儒学价值观与经济行为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

在考虑儒学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同化时，我们碰到了若干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与韦伯对僧侣和加尔文教派信徒的经济行为的论述相似。例如，儒学将商人这一行业几乎列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其社会地位甚至在农民之下。中国商人不得不忍受这种窘况，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高明地赚钱。当然，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读书，通过一道道考试而当官。但这样一来，自己辛苦创办成功的事业就只能保持一代人时间。若想代代传下去，就只有留在儒学官吏和学者所鄙视的这一行成为精明高手。他们的处境是在社会的边缘，跟封建欧洲中的犹太人多么相似。

第二个现象是儒学鄙视辛劳和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美国人从小就读熟了霍瑞肖·阿尔杰写的那些故事，把艰苦工作看做是由穷变富的必经之路，所以对儒学的这一现象感到难以理解。儒学君子的理想是坐享清福，他们把手指甲蓄得长长的，以证明自己不必用手操劳。道教提倡“无为”，把它提到最高哲学原则的境界，主张以最少的力气将事情办成，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辛劳的鄙视。在中国的军事思想中，最理想的制胜之路是避免大动干戈，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我所知，在世界上各种文化中，像中国人这样崇尚无为而鄙视艰辛体力劳动的看法，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人看来，希腊神话中所说的暴君西西弗斯死后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永无休止，只是一个逗乐的笑话而已。肯定地说，在中国文化中，辛劳本身不是重大美德，而只是迫于环境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人不崇尚辛劳，但强调“好运”的重要性，认为举止端庄得体可以增加交好运的可能性。在这方面，道教又起了作用，它讲究“道”，即自然和历史的力量的，这就从哲学上支持了中国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生的许多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外界力量所决定的。有的人比较善于顺应潮流，能交好运。有的人却是愚蠢地逆潮流而动，注定要失败。然而，强调好运，并不等于对生活采取宿命论的态度，人们总可以做一些事情增大交好运的机会。而一旦境遇恶化，那只是碰上厄运，但愿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

强调运气的作用，使人们对生活采取外向的、高度面对现实的态度，而不是内向的态度。人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要抓住每一个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的机会。他们认识到外界力量的头等重要性，因而对于客观形势、地形走向和行动时机都极其敏感。决策的焦点在于判断情况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因此，强调运气，乍一看来是强调超自然的东西，可是实际的结果却是生动地关注客观现实。这一倾向使得中国人很重视市场的特点和结构。在中国人看来，市场不是理论上的抽象事物，而是生动的和充满活力的现实。

中国人愿意从显然概念化的角度思考市场，这一点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资本主义是技术驱动的——你造出了一种更好的捕鼠器，人们就会登门向你订货。但中国资本主义的驱动力向来是查明谁需要什么，相应地去满足市场那一需求。西方企业总是设法改善它们的产品，加强它们的组织结构，努力使自己的品牌得到人们的承认。中国企业家则是努力实现多样化，避免被人说成是只生产一种主要产品，总愿按照市场的需要改变自己的生产。美国人知道市场上有大量的中国台湾和大陆造的消费品，但却不知道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公司的名称。

儒学文化虽然看不起劳力的人，鄙视辛劳工作，但却重视自我改善，因而尊重成就动机。中国这一重要的文化价值观用麦克莱兰的话说，就是“取得成就的需要”。麦克莱兰证明，凡是有成功发展的国家，按儿童读物中教导的行为动机来衡量，在“取得成就的需要”这一点上也都是得分高。不论用什么办法衡量中国人“取得成就的需要”，都能证实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印象，即中国人争取有所成就的劲头是高的。中国儿童所受到的教导都强调要有成就，否则就愧对自己的爹娘。

然而，看似自相矛盾的是，中国文化也强调依靠别人的好处，这一心理导向是与霍瑞肖·阿尔杰小说中倡导的个人自力更生的理想格格不入的。要有成就，又要依靠别人，这二者看来像是矛盾的结合，正是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守规矩，善与人同，这是保障安全的最佳途径，而“与众不同”是有危险的。结果是从正面接受依靠的态度。

成就与依靠二者的结合，使得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目标：为了满足成就的需要，就要勤勉地履行自己在家庭中分担的一份责任，从而做到应有的依靠。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家庭规范大不一样。在中国，成就会在家庭内部受到奖赏，儒学文化所规定的儿子对父亲的义务以及兄弟间彼此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所以他们的传统是向内的，怀疑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种基本的本能。 [163] 但在日本，武士和商人家庭的成就主要看他们对外干得如何。日本人

家族传宗接代是以长子为家族之长，但是小儿子可以自己出去闯，有了成就，就可以自己成为一家族之首，当“祖宗”。^[164]

既要取得成就，又强调依靠，这两头保持平衡，就需要相互信任和保持个人关系的活力，从而有可能形成社会网络。就中国文化而言，家庭的纽带向外延伸到家族，再向外延伸到社会，形成“guanxi”（“关系”），即兴味相投、休戚与共的个人关系网。“关系”在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只要有“关系”将一些人联系在一起，即使个人之间彼此并不认识，也可以期待对方承担共同的义务。只要是老同学，同乡，或曾在同一部队服役的战友，或是有别的什么共同背景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就行。因此，“关系”的基础是彼此都能承认的客观考虑，而主要不在于有关方面的主观感情。

日本人也讲Kankei（“关系”），但其中主观因素多得多，重视是否对自己有恩和有利。两个中国人只要有某种共同背景就可以有“关系”，而日本人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个人之间的交往。

经济行为中的文化因素

上文已说过，本章提出的主要假设命题就是：同样的价值观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些关键的价值观，如依靠社会关系网，采取长期观点，争取市场份额重于争取利润，提倡先苦后甜而防止过早满足，为了未来积极储蓄等，都依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而造成不同的结果。

信赖家庭成员和依靠“关系”意味着，在发展早期和政治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华人的企业大都局限于家庭运营。由于对外人缺乏信任，家族企业的扩张能有多少个分支，取决于老板有几个儿子去分头经营。^[165]然而，随着东亚和东南亚政治环境逐渐趋于稳定，企业也沿着“关系”的线索迅速扩展。这些地方的银行业务尤其具有个人关系链的特点。丹尼·昂格尔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论点，即海外华人按关系网开展业务的做法，使他们具有了一种“社会资本”，这不是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那种构成民主基础的社会资本，而是构成经济发展基础的

社会资本。昂格尔集中研究了泰国的情况，指出那里的华人依靠他们的关系促进了资本的流动，从而使泰国出现经济“奇迹”。^[166]

海外华人在中国沿海的投资增长之快是惊人的，在这里面也是“关系”起了根本作用。在邓小平使中国对外开放以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人纷纷返回他们的祖籍探亲访友，立刻受到接待，被鼓励投资于当地经济。香港人到广东，台湾人到福建，还有一些人到上海，去建立合资企业，合作的对方往往是当地的政治领导人，制造的产品向外销。结果，乡镇企业高速增多。合作的交易以高度个人化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海外华人投资者争取了种种优惠，从多年安排的减免税，到固定的低工资，名目不少。

就这样，一段时期之内，依靠非正式关系办事的传统造成了奇迹，资本迅速流进中国，建立新企业，其速度要比依照法律谈判签约的办法快得多。甚至连一些外国银行家也迷上了他们所理解的亚洲价值观的精神，愿意根据中国官员的点头眨眼提供贷款。然而，企业缺乏透明度或法律文书，早晚必然导致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和广泛的腐败。商业交易缺乏法律基础，这在好光景时也许能加快交易，但一旦情况恶化，就没有明确的程序来处置破产。

在日本，关系网的传统促成了企业家、官吏和政客结成紧密非正式联系的模式，这种局面被人称作“日本合股公司”。他们相互承担义务和保持特殊恩宠的联系，彼此之间可以有巨额信贷的流动，极少需要作正式的审计或审查项目是否合理。有一段时期，人们曾认为，只要国家的指导“使价格正确”，就基本上不需要担心知情人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可是后来受到了冲击：日本的社会精英并不像原先说的那样正派。在政企密切合作的情况下，当需要由国家金融机构作更加强有力的调控时，国家却显得无力对付它先前的伙伴。

依靠关系网的做法还促使人们形成一种观念，即没有必要对企业赢利与否作短期的检查，最好是采取“长期观点”，力争挤占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他们认为从长远着眼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文化习性是先苦后甜，不急功近利，宁可眼前吃点亏，坚韧不拔，以换取日后更大

的报偿。一段时期之内，当各国经济都在上升时，这种做法得到了收益，日本人的成功曾使许多西方人相信，日本人找到了一种优越的创造财富的战略。因此，日本之外的许多亚洲地方都想模仿日本人的模式，不急于担心是否赢利，而力争更大的市场份额。

然而，到了一定时候，这种做法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因为债台高筑，而强迫性地力争扩大市场份额的态度导致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银行贷款缺乏透明度和法律规范，而企业又不现实地指望扩大生产会带来好处，所以贷款急剧膨胀。人们终于看出，由于他们采取这种做法，资本是否得到合理配置，就得不到有效的监控。一个产业又一个产业都形成了生产能力过剩。1995年，韩国一家巨头得意洋洋地宣布要投资25亿美元建造一套新的炼钢设备时，人们居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真是怪事，因为当时全世界的钢已经是多得用不了。

西方的会计制度是每个季度都向经理人员和投资者提供盈亏报表，对资本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提出批判性反馈信息，从而构成一套导向机制，去引导市场无形的手。而一心只想扩大市场份额，只从长远着眼，认为先苦后甜是英勇表现——凡此种种的亚洲价值观——在经济发展初期鼓励了经济上有用的行为，可是到一定时候就造成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和泡沫经济。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有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在日本，房地产价格之高达到了荒唐的地步，据说东京的皇宫一个大院的价格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还要贵。不只是消息不灵通的人相信这种说法，据说许多严肃的日本银行家也相信它。在上海，浦东区到处是起重机忙着转，盖摩天大楼——有些中国人说俏皮话，将这些起重机称为中国的“国鸟”。^[167] 可是那里1997年建成的大楼只有15%的入住率，1998年入住率更低。建筑物仍在一幢幢往上盖，因为投资者觉得他们必须有长期观点，要勇敢大胆先苦后甜。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一种文化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能起有益作用，然后又会成为灾难的根源，这就是储蓄的习性。中国人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民族之一，近年来储蓄率在30%左右，这在改革之

初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随着人们的收入逐渐增多，储蓄款项不断流入国有银行，受到这些银行欢迎，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有钱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可是国有企业现在成了好看而不中用的大白象，国有银行再也不能指望收回那些“贷款”。银行系统继续运转，现在靠的就是公民们的储蓄习性。正像国有企业无法还债一样，银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所有的存款人兑现。然而，既然老百姓的钱没有别处可存，只有存入银行，本来会破产的银行系统就可以运转下去。

在日本，同样的储蓄习性原先曾是一种美德，为战后的经济恢复提供了资金。但这一习性如今却使日本难以摆脱持久的衰退。日本政府官员曾指望国内消费需求上升以拉动经济脱离停滞，可是他们发现太难了，令人灰心，因为日本老百姓有些农民意识，觉得既然日子不好过，就该推迟消费，增加储蓄。尽管财政货币政策让更多的钱进了他们的口袋，他们还是不肯增加开销，宁愿再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艰难时日。

文化分析要看清背景

本章要讲的事情太复杂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亚洲经济的起伏使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们遇到了难题。然而，这些事态演变并不影响人们对于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解。问题是出在有些人企图从概括的文化特点一下子跳到经济的结果，而没有考虑到各种中间变数和背景情况。因此，想开出一张清单，笼统说什么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发展有利，什么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发展不利，这是不科学的。在某种情况下有利的，到另一种情况下又可能变得完全相反。

此外，我们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解开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许多奥秘。我们的理论尚未提供出足够明确的因果关系，来给各种特定的文化变数赋予明确的分量。除了地理、气候、矿藏、政府能力及其公共政策明智与否等这样一些一般性的考虑以外，经济行为这一总的范畴仍然太广阔，使我们无法精确地评价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的意义。有的行为限于个人的作为，例如兴办企业所必需的首创性即是如此，而另一些行为却是集体的，界定着一个社会的特性和构成。在论

述文化价值观的具体分量如何时，我们必须谦虚一些。我们知道它们重要，但在某一特定时候它们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却很难判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云团，而不是钟表，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精确的因果关系。 [168]

因此，当我们把这些分析的线索收拢时，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们对于亚洲经济奇迹和西方的无可救药都说过了头。然而，亚洲当然还会继续现代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产生出独特的样式和做法。这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作为现代化的领先者也不曾产生清一色的文化——西方各主要社会之间存在着活生生的差别。文化差别将持续下去，企图说什么文化优越、什么文化低劣，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是在不同的领域，涉及不同的做法。经济发展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因此所有各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许多的起起伏伏。一种技术状态下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到了新技术出现后又可能变成包袱。

说到这里，应当指出，有些东亚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其速度之快超出了许多人的估计，这一恢复无疑也部分地反映出那些前二三十年曾促进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文化因素。

第十九章 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

杜维明

现代性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理念架构。多重现代性的概念，是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论断：传统作为在界定现代化过程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是持续存在的；非西方文明涉及现代西方的自我认识；地区的知识具有全球性意义。

在考察日本和“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文化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儒学传统对东亚现代性的持续存在的意义受到了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这几个地理区域差别很大，各学科（哲学、宗教、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又

极其复杂，它们的相互作用更使得画面朦胧不清。然而这几个地理区域被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这表明，为理解工业东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结构，关键的一条是认识儒学精英的关联以及受儒学价值观影响的思维习惯。 [169]

“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一词是用以代替“西方化”（“西化”）的，因为人们承认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意义。现代化过程虽是起源于西欧，但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其余各地，因此表达这一过程的概念不能局限于地理上的“西方”，而应当比它更广阔。“现代化”概念具有时态上的一层意思，表明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全球趋势，而不只是某一地区的变化动力。

在学术界，现代化这一概念是比较新的。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于北美由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最先提出的。帕森斯认为，高度发达社会中释放出的力量，如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最终席卷全球。虽然这些力量可以定义为“西方化”或“美国化”，但从普世大联合的精神来看，更恰当而且在科学上也许属于中性的名词应是“现代化”。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大概是受到日本学术讨论的影响，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就中国发展方针问题组织了一系列辩论。三次大辩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要赶上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日本），是应以农业为重还是应以工业为重，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实行资本主义，是以中学为主还是以西学为主。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一页。 [170] 此外，集中考察中国的情况还有助于判定现代化概念对于非西方社会的适用性。

然而，说东亚现代性有益于当代西方自我认识，是基于这样一条推断性的理由：如果说现代化过程可以具有实质上不同于西欧和北美文化的文化形式，那就可以明显看出，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说法都不足以表示现代化过程这一现象的特性。此外，东亚现代化形式还可能有

助于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更多样和更细致地认识当代西方，把它看做是具有巨大可能性的复杂混合体，而不是仅含有单条轨道的单一实体。

如果我们开始从多文明角度看待现代化，那么，那种认为当代西方的经历应在世界其余各地予以重复的说法，就不再可信了。实际上只要仔细一看，就可看出当代西方远远不是一个统一连贯的发展模式，而是表现出一些彼此有冲突、有矛盾的发展方向。欧洲和美国对待广义的现代化的态度就不相同，这足以证明西方内部存在着多样性。西方现代性的英、法、德三个范例在现代化过程的一些突出特点上也彼此不同，其差别之大足以证明实际上三地的知识都是不能加以普遍化的。这却丝毫没有损害人们的强烈印象，即几乎所有各种能够加以普遍化（即使不是普世化）的地方知识都是源于西方的。

尽管如此，我们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超越三种流行的但却又过时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传统与现代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以及地方和全球之分。我们超越这些二分法的深远意义在于要成熟地理解全球化和地方化二者之间的有活力的相互作用。东亚的事例对于这种探索十分有意义。我将集中注意作为东亚政治经济基本价值观体系的儒学人文主义。

有人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它将儒学以及非西方世界另一些精神传统归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拂晓阶段。不论这种说法对或不对，中国文化界通常将儒学伦理标准界定为“封建”的做法，就是基于黑格尔理论中也包含的那种强烈的历史必然性论点。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整个启蒙运动正如康德划时代的问题“什么是启蒙？”所点明的那样，实际上是肯定了在西方之外，尤其是在儒学的中国，文化传统早已在未曾借助于天启式宗教的情况下建起了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等现代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在19世纪，现代西方的动力使世界卷入了无休止地奔向物质进步，这时所发生的事情，肯定不是启蒙运动直接产生的结果。相反，人们所认识的启蒙运

动的理性轨道被解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彻底毁掉了，后者象征着毫无节制地寻求摆脱过去和征服自然。要求摆脱权威和教条的一切束缚也许仍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个特征，对大自然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也是启蒙运动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世界其余各地来说，启蒙运动心态所启发出来的现代西方则是表现为征服，霸权，奴役，还有人间繁华的一些模式。

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都觉得现代西方尽管有其种种缺陷，仍然是世界其他各地可以学习的唯一地方。“精神”的展开，历史必然性的过程，或者现代性的“铁笼”，实质上都是欧洲要解决的问题。儒学的东亚、伊斯兰教的中东、印度教的印度以及佛教的东南亚都处于这一过程的接受一端。最后，现代化作为同质化，会使文化多样性即使不是变得毫无意义，也会起不了什么作用。无法想象儒学或是任何别的非西方文化传统能对现代化过程起什么大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的。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曾认定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却被证明是短视的。在世界各地，肯定也包括西欧和北美在内，预期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明确转变并未发生。传统照常继续存在，作为积极起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现代化的各种特殊形式，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本身继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形式。在18世纪，人们曾承认激进另类观点对自我认识有意义，而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内，人们却对于现代西方心态的任何挑战都不屑一顾。可是在现今的全球形势下，前者竟看来比后者更适用一些。在21世纪，18世纪的开放性可能会比19和20世纪的排他性更适用于指导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

现今“历史的终结”^[171]和“文明的冲突”^[172]之间的辩论只涉及我想要探讨的“问题”的表面。资本主义得胜了，许多人以为自由民主制将被全球普遍接受，因此曾产生过欢欣鼓舞，可是这种欢乐好景不长，是短命的。“全球村”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景象，它的出现实际上象征着区别、差异和公然的歧视。人们希望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结果或者所带来的机会将会造成平等，这是想得太简单了。从财富

和权力的分配以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条件来看，世界的分裂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从家庭到民族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分解，成为世界各地的严重问题。自由民主制即使说作为一种理想已被世界其余各地许多人接受，但是硬说它将自然而然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主导潮流，那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文明的冲突”立论的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文化多元性将是全球一个持续存在的特点，然而它的根源仍在于西方与世界其余各地相抗衡这样一个过时的观念。它的前提是只有西方式的地方知识才是可普遍化的（即便说不是普世化的话），为西方特殊论辩护。如果说“文明的冲突”是为提高作者钟爱的西方价值观的说服力献策，那么它的目标归根结底仍是跟“历史的终结”差不多，只不过它提醒人们，这一过程的起始阶段是会让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鼓吹者们心烦的。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不论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都没有抓住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深刻关切的问题。尽管启蒙运动有种种暧昧不明之处，但是为了人类的繁荣，启蒙运动的继续仍是必要的和可取的。这一努力的最令人抱有希望的迹象，也许就是人们所期待的哈贝马斯主张的交际理性和约翰·罗尔斯主张的政治自由主义二者之间富有成果的对话。这一类思想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为后现代主义，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是这里不是细谈这些事情的地方。现在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够了：环境意识、女权敏感性、宗教多元论以及社群伦理，都强有力地表明自然和灵性在人类本能反应中的核心地位。我们那些当代启蒙思想家未能认真对待人与自然的最终关切及和谐，未能将它们作为自己哲理论述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他们要对后现代批判作出创造性回答的主要原因。幕后的则是社群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从全球角度对待人类现状，这取决于我们从全球社群思考问题的意愿。

法国革命提出的启蒙运动价值观之一是博爱，从功能上说它相当于社群观念，可是它几乎没有受到现代政治理论家们的注意。自从洛克发表了他的《政府论》的专著以来，学术界一直专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当然不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全部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社群问题，特别是家庭问题，一直遭到冷遇，在西方政治学主流

中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黑格尔热衷于家庭之外、国家之下的“文明社会”，主要是受到中产阶级社会秩序动力的推动，而中产阶级社会秩序是威胁到所有传统社群的一种独特的城市现象。黑格尔对“文明社会”的论述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见性的凝视，而不是对社群价值的批判性分析。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曾被认为是社会与其过去的一大决裂，所以韦伯曾指出“普世兄弟之情”是过时的中世纪神话，在不再抱幻想的现代世俗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说，世界民族大家庭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超越出自我利益词藻之上，重获世界相互依靠的精神。

近几十年来，在北美内部，人们对社群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其起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了危机感，认识到社会的分解对共和国的福祉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因种族/民族冲突和语言冲突激起的那种地区不安宁，在整个高度工业化的（即使不是后现代的）第一世界也是处处可见。一方面是贸易、金融、信息、人口迁徙和疾病等的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种族/民族、语言、土地、阶级、年龄和信仰等根源造成的地方特性，这两方面的冲突是不容易解决的。世界上既有粗暴的对抗，也有令人鼓舞的和解，这就迫使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按照色彩和人生的多样性去认识想象中的全球社群。从儒学观点看东亚现代性，会有助于我们养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儒学人文精神

儒家学说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经商伦理、家庭价值观或者作为抗议精神，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东亚各工业地区、稍后又在东亚社会主义地区得到复兴，这是许多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尽管依然存在着根源于原始纽带（特别是民族、语言、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以及人生观）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但是东亚总的格局是建立在与现代西方启蒙运动心理状况很不相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整合。

东亚知识分子热心研究西学，已有一百多年。在日本，武士和官吏们先是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后来又从美国人那里

学习了西方科学、技术、工业制造业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同样，中国、朝鲜和越南的知识分子也向西方学知识来建设他们自己的现代社会。他们认真地学，还把第一手体验作为最好的学习方法，再按照他们的体会，致力于大规模的、综合的甚至是全盘的西方化，以便彻底改造他们的经济、政体和社会。

他们认同于西方，积极参与按照西方模式根本改造自己的世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东亚为了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而有意将自己丰富的精神资源置于次要地位，然而这使得他们更加有必要寻求本民族的模式以重塑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种创造性应用的模式帮助他们处于战略性有利地位，来形成一种新的合成方式。

儒学传统曾被看作是遥远的以往封建时代的回声而置于边缘，被永远切断了它的帝制基础，可是它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以及以新的形式展现的家长式政体中，仍然保持了它的根基。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中都起了作用。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越南的政治过程中也有明确表现。当东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界线开始变得模糊时，贯穿这一大片地区的文化形式从性质上看显然就是儒学。

东亚和各地华人的经济文化、家庭价值观和经商伦理也表现出儒学特征。把这些现象解释为一种后现代的辩解，是太表面了。即使我们同意说以儒学表达它们是一种事后的思考，但是在表述东亚经济一些突出特点时所用的一些名词，例如网络资本主义、软性集权主义、群体精神、共识形成和人际关系等名词的流行，至少也表明了儒学传统在东亚现代性中起改造作用的潜力。

具体说来，儒学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现代性表示出一种连贯的治理观和领导观：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领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取的。有人认为政府是一个不得不有的坏东西，认为市场本身可以提供“无形的手”来维持社会秩序，可是西方或东方的现代经历却是

与这种理论相反。对公众需求能作出反应、对人民福祉尽心尽职、对广大社会负责的政府，在建立和维持秩序方面，是极其重要的。

·虽然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起码的必备条件，但“有机的团结”只能是人们保持仁爱之心以礼相待的结果。文明的行为模式是决不可能靠强制手段传播的。榜样的教育作用作为鼓舞人心的标准会促使人们自觉参与。单靠法律不可能产生羞恶之心以引导文明的行为。礼节的行动能促使人们不辜负自己的愿望。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使最核心的价值观得以传播的源泉。家庭之中人们的双向关系随年龄、性别、权威、地位和等级而有所区别，这就为学习做人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然的环境。人际双向交往的互惠原则界定着家庭内部的所有各种关系。人类基本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差距之中，大概就包括年龄和性别，这二者在家庭中被纳入持续不断的亲切关怀之情的交流。

·文明社会并不是因为它是家之上、国之外的一个自立的舞台而茂盛。它的内在力量在于它是在家和国之间起着有活力的相互作用。家作为国的缩影，国则被认为是家的扩大，这表明家的稳定对于国体至关重要，国的一个极重要功能则是确保家的有机团结。文明社会提供着多种多样的起调节作用的文化机制，使家与国之间保持富有成效的连接。公与私之间有活力的相互作用使文明社会得以提供各种不同的和丰富的资源以促进人类繁荣。

·教育应成为社会的文明之教。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人格养成。学校应致力于培养全面的人，德育和智育并重。学校应使学生学会通过交流而积累“社会资本”的艺术。除了掌握知识和技能以外，通过学习还应同时培养文化素质和领会精神价值观。

·修身是立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所以特定社会的生活质量有赖于社会成员修身的水平。社会鼓励修身，将此作为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珍视以美德为中心的政治领

导，将互勉作为共同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重视家庭作为学习做人的适当场所的价值，将文明作为人际交往的规范，重视教育以养成人格。

儒学与现代化

如果说上述这些社会理想在东亚得到完全实现，那就与实际脱离得太远了。事实上，东亚各社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态度往往与儒学现代性的特点恰好相反。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欺凌数十年之后，东亚现在至少在表面上露骨地显现出现代西方一些最负面的东西：剥削，重商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贪婪，自我主义，以及粗野竞争。尽管如此，作为第一个现代化的非西方地区，“儒学”东亚的崛起仍然在文化上具有深远的涵义。

受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现代西方为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变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推动西欧和北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原因并不一定是现代性的结构组成部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例如工具主义理性，自由，权利意识，重视法制，保护隐私，发挥个人作用等，都是可普遍适用的现代价值观。但儒学事例表明，一些“亚洲价值观”，例如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也是可普遍适用的现代价值观。^[173]正如前者应纳入亚洲现代性一样，后者也可供美国生活方式作批判性的和适时的参考。

如果说儒学现代性肯定能驳倒许多人声称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说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预示一个太平洋世纪来临的东亚的崛起就象征着一个新的范式将取代老的范式？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有人以为应该是逆向趋同，即西欧和北美现在该向东亚寻求指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明应当不仅是教训别人，而且也显然需要自我转变而向别人学习，但东亚现代性的意义是在于多样性，而不是搞另一个一元论。

儒学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方化的情况下充分现代化，这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自己的

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亚化。儒学的东亚使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受到鼓舞去实行现代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佛教和伊斯兰教形式的现代性，不言而喻还有印度教形式的现代性，不仅是有可能，而且是可能性很大的。没有理由怀疑拉丁美洲、中亚、非洲以及世界各地固有的传统都有转变的潜力，发展出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

然而，由于相信多元论而干净利落地做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过早了。说这很有可能发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都会带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但是我们不必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就会承认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如果第一世界坚持过度发展的权利，如果工业化的东亚继续向前加速发展，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惜一切代价投身于“四个现代化”，那么，从现在起再过50年，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东亚现代性究竟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现象，还是一个梦魇？人们只好猜测。

尽管目前出现金融危机，儒学东亚近40年来的发展仍然是世界上空前活力旺盛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涵义。日本从美国教导下的一个听话的学生变成了美国经济霸权的最强大挑战者，这一点使我们不得不考察这一地区特定知识的全球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推动它成为一个发展的巨人。

虽然柏林墙的倒塌和原苏联的瓦解标志了国际共产主义这一极权主义实验的完结，但是社会主义东亚（中国，朝鲜，从文化上说还有越南）似乎正在重新改造自己的过程之中，即使在名义上并非如此，实际上仍是如此。数以千计的持不同政见者到了西方，还有一个支持西藏独立的网络在世界各地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另类激进性被美国大众传媒广泛视为一种威胁。似乎不言自明的是，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西方欺凌了100多年，复仇可能是中国争取重建世界秩序的首要动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区和朝鲜战争的记忆，不用说还有越南战争的记忆，使得黄祸的神话被一些人所相信。一些富有的华人从东南亚、台湾和香港移居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一步加重了一些人的危机感，觉得中国人是在阴谋重新安排全球的强权关系。

“儒学”东亚——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越南，可能还有朝鲜——的崛起表明，尽管全球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但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影响。虽然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东亚的现代化已具有大大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文化形式，这就使我们从实证上不能不考虑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其他形式。然而，这并不是说西方现代性受到东亚现代性侵蚀，更不是被后者取而代之。有人说亚洲价值观比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更适合于亚洲现状，言下之意还是更适合于21世纪新兴的全球群体，这种说法即便不是全然错误，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现在世界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展开全球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是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前提。人们觉察到的文明的冲突使得这种对话的必要性变得十分迫切。

因此，看似悖论的是，我们要愿意而且有勇气去理解与我们不同的激进另类现代性，这是我们走向自我理解的必要一步。如果西方能认真了解东亚现代性，那么西方就会更敏锐地看到自己的模式对于世界其他各地所具有的长处和短处。现代西方加强自我反省，就能认识到，根源于具体社群的原始联系是怎样地促成了现代社会经历的各种不同形式。

这将是西方和其他地区朝向真正的交流迈出的一大步，而倘若没有这样的交流，各种文明之间就决不可能有基本的信任和有效的合作。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按照西方和非西方的界限将世界一分为二，是既不必要又不可取的。它在实证上也是站不住的。西方作为霸权的一方一直企图用强制手段主宰其他地方，而其他地方又通过劳工、资本、人才和宗教等多方面的迁徙移动而全面渗透西方。现在是时候了，各种文明之间该本着相互依存的精神开展对话了。

第二十章 改变国民的心态：致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迈克尔·费尔班克斯

引言：繁荣不起来怨牛不好

博德公司（Monitor Company）曾受哥伦比亚政府和私营企业委托，研究哥伦比亚这个安第斯山区国家的皮革制造商怎样才能扩大向美国的出口，并提供相关建议。我们首先在纽约市采访了产自世界各地的皮革手提包的买主，还采访了美国各地大约两千家零售商。我们收集到的资讯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信息却简单明了：哥伦比亚的手提包定价太高，质量太低。

我们回过头来，到哥伦比亚的皮革制品制造商那边去了解他们的产品质低价高原因何在。他们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说这都怨那些向他们供货的鞣皮厂。哥伦比亚政府却保护这些鞣皮厂，对进口皮革征收15%关税，从而使阿根廷向哥伦比亚出口的皮革变得太贵，难以与国内厂商竞争。

我们再去哥伦比亚农村采访那些鞣皮厂的主人。这些鞣皮厂采用劣质化学制剂，造成了附近土壤和水的污染。厂主们很高兴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解释说，“这都怨那些屠宰场。他们向我们提供的生牛皮太次了，因为他们一心只想多卖些牛肉，既省劲又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们把牛皮弄破了却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转到南美草原去采访屠宰场的赶牛工、屠宰工和挥动着秒表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回答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都怨那些牧场主。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他们为了防止那些跟毒梟狼狈为奸的游击队偷牛，就往牛身上打了太多的烙印。”烙印多，皮弄毁了。

我们最后奔赴远离省城的牧场。牧场主们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既快又不好懂。他们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都怨牛不好。”他们解释说，这些牛太蠢了，为了驱赶叮在它们身上的虻蝇和挠痒，老往铁丝网上蹭，把皮都蹭破了。蠢牛不会说话，我们没有谁再好采访，调查到此结束。

我们长途跋涉，行车在搓衣板似的路上，还得在车上不断敲点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鞣皮厂的化学污水和一路的泥泞把我们的鞋都毁

了。我们最后得知，哥伦比亚的牛皮手提包难以打进有吸引力的美国市场，原来是因为他们的牛太蠢了。

对问题的多种解释

对于我们的哥伦比亚朋友所面临的问题，人们会作出许多不同的解释。“怨牛不好”的这件事该怎么办，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会建议取消关税保护，“让市场找到新的平衡”。非政府组织（NGO）会争取让那些牧场更换铁丝网栅栏，而工商管理学者也许会研究怎样切分消费市场。社会学家可能说当地的“人际信任度”太低。人类学家也许会说那里的人们不过是处于“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该让他们自然地进步。

对于我们在哥伦比亚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就表明，对于创造繁荣的路上遇到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说到底，要给繁荣下定义也不容易。正像许多人对牛的故事会有不同的见解一样，对于什么是繁荣和如何创造繁荣，也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将分解一下繁荣大体上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说明繁荣为什么重要，以及创造繁荣的变革过程中有哪些因素。

什么是繁荣？

繁荣是指个人、群体或一国国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各种物资需求方面均能过上好日子的能力，^[174]至于什么样的生活算是好日子，则依人们当时当地的定义而定。繁荣有助于人们在心灵上开拓出空间，按照自己的爱好发展健康的情感和精神生活，不必为日常生存的物质需要而忧虑。

我们可以从流通和贮存两方面考虑繁荣状态。许多经济学家将它视为收入的流动：人们购买一批商品或分享他人创造的价值的能力。我们采用一种更新了的收入概念，叫做“购买力”。^[175]例如，罗马尼亚人均收入约合1350美元，但其购买力约近3500美元，因为许多东西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

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176] 这里，我列出以下七种资财，或资本，其中后四种构成社会资本：

1. 自然资源，如地理位置，矿藏，森林，海滩，气候；

2. 一国金融资源，如储蓄额，外汇储备；

3. 人造资本，如建筑物，桥梁，道路，电信设施；

4. 制度资本，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效率高的政府办事机构，能最大限度使股票增值并保障职工薪资和培训的企业；

5. 知识资源，如国际专利权，大学容量和思想库能量；

6. 人力资本，如技能，智力，能力；

7. 文化资本，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

不将繁荣概念化为人均收入的流通，我们就可以考虑到在一种更丰富和更有能量的“高效”环境中的一种更广泛的体系和投资的决策。^[177]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尔蒂亚·森指出，“资财的观点的好处在于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国在未来生产财富的能力”。^[178]

为什么繁荣重要？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个人购买力高低相差悬殊，各国拥有的财富贮存大小也不成比例。托马斯·索厄尔指出，“我们必须面对最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史上已存在千百年之久的事实，即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率相差悬殊，这种差别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和其他后果也相差悬殊。”

^[179]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报告表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还因生产率下降而受到威胁。

贫困与营养不良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肌肉劳损，发育不

良，更易受传染病感染，儿童认知力受破坏。世界上的儿童有84%生活在贫困之中，当地人均收入每日不足2美元。世界上的婴儿绝大部分出生于贫困状况之中。预期寿命、识字率、饮用水和婴儿死亡率均与一国的生产率和繁荣度成正比。1990年产妇死亡率在低收入国家为607/100000，在经济发达国家仅为11/100000。[180]

可是贫困的危害超过了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程度。贫困能损害人的志向、希望和幸福。在这方面，贫困的影响无法衡量，却感受得到。大量的文献表明了较高的收入有助于积极进取，宽厚待人，支持公民自由权，对外国人持开放态度，对下属持正面关系，养成自尊心，对个人能力有信心，愿意参与社群活动和国家事务，保持人际信任，以及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例如，参加了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就曾写道，较高的主客观福祉自我报道率，是与较高的国家繁荣度成正比的。[181]

我们应如何谈论信念与繁荣？

对于什么是繁荣和怎样创造繁荣，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的信念。承认和理解这一点，是创造变革的基础。斯特斯·林赛和我在《劈波斩浪——在发展中世界培育潜在的增长源》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模式的若干原则：[182]

·心理模式系由第一人称的、具体的和特定的信念、推论和目标所组成。它是反映世界运转情况的心理图景。[183]

·信念和态度，有些是有利于创新并为繁荣创造条件，有些则是反创新的。[184] 这些信念构成心理模式。

·心理模式可以围绕一个特定的、明确的目的予以界定、说明和检验。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人们利用“心理模式……和制度”以“影响经济的运作”。[185]

·最后，心理模式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文化涉及意义的代代相传，[186] 但这不大可能是一种遗传过程。[187]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着行动和信念的普遍趋同。他指出，“世界各国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势，即日益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以机械动力为基础，进而依靠现代技术和应用科学。”他指出这些“新的生产安排”造就了新的制度格局和个人所起的新的作用，而且“引出……新的态度和价值观”。^[188]

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写道，“发展表明社会的一种转变，从传统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对待健康和教育的方式和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向现代方式的一种运动。”^[189]

既然这些杰出人士都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行动日程上却如此缺乏心理模式研究呢？为什么各国或各地区如此缺少改变人们心态的正式变革过程呢？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机构在这一点上持何种立场？他们无所作为是由于缺乏认识，或没有发达的手段，或内部共识不够，或政治上受制于股东和报界，或治理无方，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心态？连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克鲁格曼也承认，“在思考个人及其动机方面，经济学的明显特点是粗陋得惊人……对于人们的思维和感受，经济学家们显然是不感兴趣。”^[190]

心理模式的研究往往是慢得令人失望，但毕竟发展了五十年来了，能为理解和争取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最好的途径。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劳伦斯·哈里森指出过，这方面的变革将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有能力对于那些触及最敏感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问题的内在因素进行客观的反省和定性。”^[191] 英克尔斯也认为反省是重要的。“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就在于它强调持续不断作自我分析的过程……〔现代国家〕能作自我矫正。”^[192]

有些国家要求我们帮忙出主意以改善它们的经济，而我们作为实干的人，经常在思索这样的国家能否建立更大的自我矫正能力。变革的过程有许多步骤，我们在向这些要求作出反应时，必须首先采取一个步骤，就是问问它们创造繁荣的模式是什么？

变革过程的因素

变革是一个无固定节奏的过程，永远不会按照一个能轻易描述的序列步步进行。尽管如此，想要构建自己经济变革的人们除了要具备范围广泛的技能和涉及众多领域的真知灼见以外，还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赞成的纲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为促进变革所必需的组成因素。

一些国家的公私部门领导人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改善经济， 特别是提高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十几年来，我们已认识到，北美和欧洲政界和学术界所设计的宏观经济疗法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方法学是复杂的，是从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吸取灵感，但是我愿将它们归结为十项关键因素，而且用我们在若干国家工作的实例加以说明。在本章，我将着重谈其中的前五条，因为它们为理解后五条创造条件。 [193]

解读现行的致富战略

未能高速创造财富的国家，在做法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形，它们都过分依靠自然资源，包括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而且单纯相信气候、地理位置和政府扶助的好处。 [194] 因此，它们往往不去努力生产那些能创造更大价值的差异化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那些要求高而又愿意多付钱的消费者的需求。

它们只看重那些易于模仿的有利条件，只看重那些较低级形式的资本，因而只能在价格的基础上从事竞争，从而往往压低工资。靠低工资竞争，就是比赛看哪个国家能保持得最穷最久。这是贫穷基础上的出口，不是创造财富基础上的出口。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同时为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者既创造以价格表现的价值，又创造非价格表现的价值，才能提高生产率，从而臻于繁荣。 [195]

被认为是自然资源富庶的国家，往往实际上并不富。以委内瑞拉为例，这个国家面积与得克萨斯州相当，拥有丰富的森林、石油和美丽的海滩，人口既包括土著民族，又有来自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

中东的群体。许多人认为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潜在的最富国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它的人均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它1997年以石油为基础的利润相当于140亿美元，除以它的2100万人口，就可以看出石油收入平均到每个公民头上一天还不到两美元，更何况这些利润的分配从来不是公平的：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上升幅度是最高的。该国的出口90%以上是未加工的自然资源。我们的调研表明，一国出口品中的自然资源比重愈大，它为本国百姓创造的繁荣就愈低。

从本章上文中列出的七种形式的资本可以看出，委内瑞拉自然资源丰富，当相关商品价格高时，它暂时收入高。然而，它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日趋退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质量逐渐降低；政府机构无能和腐败；高等院校与私营企业关系疏远，不利于创造知识资本。至于人力资本，委内瑞拉初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属于南美洲最低之列。最后，委内瑞拉的某些价值观和态度是不利于创新和进步的。例如，国家领导人所受到的信任和尊重，在我们衡量过的各国中是最低的。委内瑞拉吃亏于它的虚假成就、自然资源过于丰富以及它未能学会如何作出艰难抉择而努力创新。

形成紧迫感

有些国家时刻准备变革，有些国家却不然。在一定条件下，有些人能形成高度紧迫感，另一些人却形不成足够的紧迫感。当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时，就会形成紧迫感。期望成形于心目之中，靠的是对外界事态的了解及自己的使命感。

我知道的一个非洲国家本来需要变革，但却不那么乐意实行变革。它是世界上人均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自1991年以来，它得到的赠款和贷款达80亿美元，而在同一期间，它的人均生活水平却每年降低4%。每10人中有3人HIV（艾滋病病毒）抗体化验呈阳性。由于投资不足，消费需求降低和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出口产业破败不堪。70%的人日均收入在1美元以下。

我曾经跟他们讨论过他们的艾滋病预防计划经费不足的问题，问他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艾滋病蔓延，他们的一位政府内阁成员回答说，“我们正在告诉人们停止性交。”当我建议是否参考一下乌干达的措施时，他们对我说，他们对乌干达不感兴趣，因为25年前生活水平在非洲名列第三的是他们，“不是乌干达。”他们说他们的内阁有律师和会计师，“不需要再回到学校去学习”别的国家在做什么。他们在报刊中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外界事态，例如种族隔离的遗留影响和安哥拉的内战。他们的计划是转向出口玉米，因为在玉米方面他们有“自然优越条件”，同时继续从世界银行贷款。他们今年得到的将近4亿美元的贷款中，一多半要用于老债的还本付息。

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行为归因于宿命论，怀念昔日好时光，盲目自尊，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肯虚心学习和创新。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国家注定会蒙受更多的失败，直到有朝一日它的人口增长危机会迫使他们反思一下，是哪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妨碍了他们提高生产率。

理解战略选择的范围并加以适当分析

企业和政府所能作出的众多选择，可以归结为下列范畴：

微观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是一整套选择，其目的在于合情合理而又及时地实现一系列特定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少见到企业战略是以周全调研为依据，明明白白，构成公司领导者的共识。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我们见到过以下七种不利于竞争的行为模式：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对国外消费者的购买爱好缺乏了解；对竞争对手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企业间合作不足；缺乏积极向前融入全球市场的精神；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家长制关系；政府、私营企业、工会和媒体持守势态度。

在老百姓生活水平偏低又不上升的国家里，以上七种模式在企业界是普遍可见的。其结果是在要求越来越高的市场上，只能出口简单的商品，靠低价格竞争，收益变小，并压低国内的工资。

要减少这些行为模式，就需要在企业层次上作出新的选择，其中心是构建新的学习和决策模式。这样就会有创造繁荣。

宏观选择。这第二种选择，就是政府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支持私营企业。有的人说政府应更多地扶助私营企业，有的人则说政府应完全放手不闻不问。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么，在经典社会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在古巴，政府包揽了老百姓的福利，负责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娱乐和新闻。所有权属于国家，通过集体经办，伴之以中央集中计划，采用定量指标和行政价格。收入分配相对均匀，而经济增长相当慢。

货币主义的做法则是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保持一种简略然而严格的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是说政府将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私营企业则创造经济增长。它强调稳定市场，放开工资和汇率，允许市场发展。它看来会造成较多人的贫困和较大的贫富差距，在短期内尤其如此。它没有认识到政府创新过程中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进口替代政策）失败以后所作出的过分反应。

我们的意见跟上述两种战略均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政府应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私营企业成功，只是不要妨碍竞争。这意味着政府投资于或是帮助私营企业投资于创造较高级形式的资本。穷国政府需要做的事应多于富国政府，关系应随特定情况而定，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公私两部门各自能力而定。

形成高瞻远瞩的眼光

远大的眼光有助于形成使命感，鼓励人们去改变他们的行动。根据我们与乌干达领导人一起工作的体会，一个好的心理模式应包括以下八点核心因素：

- 1.所有乌干达人应有高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

2.认识到世界已在迅猛变化：通信、交通和学习费用在迅速降低。

3.承认乌干达是过分依靠矿藏、气候、政府扶助和廉价劳动力等这样一些基本的、极易被模仿的有利条件。

4.认识到财富是立足于真知灼见、成熟的人力资本以及聚焦于竞争的态度，后者作为一种力量能促进创新和推动人们发挥首创性，努力学习，建立人际信任和合作。

5.认识到乌干达的战略并不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是使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平等，反之亦然。我们在人的方面投入愈多，公司和国家发展的机会就愈佳。

6.认识到生产率不只在依靠乌干达拥有的自然资源作竞争。竞争力即是生产率，而生产率涉及我们要在哪些产品门类作竞争，我们选择在何处作竞争，以及我们选择如何竞争。

7.承认乌干达政府应尽自己力所能及帮助私营企业，只是不要妨碍竞争。它应投资于人力、各种专用基础设施和教学机构，与私营部门、反对党、工会和别的国家进行非守势的对话。

8.认识到乌干达私营企业应投入更多的力量去了解消费者的爱好、竞争对手的活动和新的销售渠道，并投资于自己员工的培训和产品的改进。

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自己的水平，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就应具有这样的眼光，考虑到以上这些核心因素。

建立新的关系网络

萨尔瓦多人在经历了12年内战之后，如今正致力于全国性的变革，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国内生产者和国外消费者之间，以及在他们自己与移居美国的萨尔瓦多同胞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网络。观赏植物生产商出差到佛罗里达和荷兰，会见那里的销售商，了解销售渠道

的情况。蜂蜜生产商调查研究了德国消费者的想法。咖啡是萨尔瓦多最老的出口商品，咖啡生产商原先也是最因循守旧的，可是他们现在也有尝试新事物的表现，开始栽培对环境无害的咖啡，而且与其他产业一起试验开辟新的市场，例如颇具创新性的咖啡旅游业。

萨尔瓦多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全国竞争力计划”，培训了一批工作人员去辅导中小出口商制定其经营战略。政府正投资于教育网络，在农村建立互联网，派一批优秀大学生到印度接受软件培训。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会议和互联网与移居美国的富有的萨尔瓦多人建立联系，邀请他们做生意合伙人，帮助开辟市场和获得知识、技术和资金。

萨尔瓦多领导人懂得，在农村地区和首都之间、生产企业与国外消费者之间、国内与侨胞之间建立联系，可以沟通信息，加快信息的流通，为提高竞争力和增进繁荣打下基础。

传播新思想

为促进国民心态转变，应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例如电子传媒和印刷传媒，广告，领导人演讲，会议，讲习班，数据库，互联网网址。新的思维方式将按照可预见的程序得到传播和采用。

我们注意到，创新者往往并不是主要的变革行为人。事实上，最早采用新思想的人往往只是给多数国民充当示范的角色。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注意发现那些乐于接受新思想、能领会有关竞争力、生产率 and 繁荣的新观念并身体力行的人，让他们当带头人。我们发现，在这传播过程之初最起作用的人通常不是地位高的领导人，但是他们掌握了竞争力和创新的观念以后，就能把它们传播开去。在萨尔瓦多，我们先找到一位咖啡种植者，经过培训，他就去说服他那一行业思想保守的上层人物了。在百慕大，出租汽车行业四分五裂，我们先找到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他再向他的同行做工作，创建一个新的出租车导游团体。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现“创新精神”。

建立富有成效的联合

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实行变革能促进新的心理模式的形成。因此，我们发起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周会，请大家交流战略意见。我们请本章一开头说到的“怨牛不好”一事的有关单位在一起开研讨会，以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增进人际信任，寻求共同的战略眼光。我们通过“有成效推理”的办法，为他们今后解决有争议的难题创造了一定条件。 [196]

我们安排过一个地方的旅馆行业的经理们和雇员工会代表们坐到一起，集中商讨如何为新类型的顾客服务。我们约请过收买国有企业的买主和零售商们一起开会，共同研究怎样改善前者的战略计划。我们还让一国政府的部长们与农业生产者坐到一起，激烈辩论该国的宏观经济日程。这种“有成效推理”的实验已导致有关各方拟定出一些试点计划，目标明确，而且经过周密推敲提出了一些衡量计划成就的标准。

及时通报近期成功的事例

当人们看到了成功的事例时，他们就更有可能改变自己原先的态度和行为。政治家们很懂得这一点，在办事过程中充分利用近期取得的成就。在任何争取变革的努力中，我们都要注意发现新的眼光带来了什么好的东西。开发一种新产品，找到海外新顾客而完成一笔大的出口生意，或是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准备投资于职工培训或改善劳动条件等，都可以是这样的事例。近期的成就不一定很大，但它是按新的思维和办事方式取得的，就这一点应让大家都知晓。

使变革制度化

诺思指出，制度就是规范。 [197] 变革需要构成新的行为规范。我们注意的不是建立新的制度，而是让那些由于当今的全球化、创建繁荣的方式变更以及由于世界范围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而已经达到自己能力极限的现有制度，得到更新。这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从加强法治和建立民主制，直到改善学校、私营企业和公民组织，这都是需要努力的。

例如，我们曾帮助一个行业联合会实现自身的转变，它原先是一个从事院外游说活动的团体，后来则从事企业管理教育，促进新产品研发，向小企业提供资讯，支持对国外消费者市场的研究。

评估和确认变革

最后，我们还需要建立各国反思和自我矫正的空间。我们要建立全国高峰会议和别的活动形式，让公、私、民、学各界领导人聚在一起。这类活动可以让这些领导人讨论本国正在出现的经济结果和社会结果，以及造成了这些结果的战略方针、体制机制和心理模式。议程可以包括一些具体问题，如采用什么样的量化标准？非量化目标有哪些？可以改进什么样的工具以进行自我评估？哪些变革可较快完成，哪些变革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国家实行变革和创造繁荣的战略，要经得起实际行动的检测。它应使过去和未来求得平衡，应是明确的共识，经受过分析，立足于整套的选择，能帮助人们成为自己所想要成为的人。

结 论

多数人都相信繁荣是好事。他们也知道实现繁荣不容易。在世界上将近两百个国家中，已经做到大多数公民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即使如何由穷变富的信息是简单明了的，各国人民怎样去做，也不能靠外人告诉他们。对于外人的水平如何，有何道义权威以及有何意图，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198]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关心而且了解这些事情，有义务向各国领导人证明“繁荣是一种选择”，^[199]而且说明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何利弊得失。

在大家注重经济发展已达半个世纪之后，现在是时候了，该摆脱简单的规范框架、自上而下地发指示、把繁荣狭隘概念化以及几乎完全用国家数量指标衡量经济成就的做法了。现在该把国家和区域的积极性协调起来，改变心理模式。现在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扩展“创新精神”。

霍华德·加德纳在他的著作中，曾将组织机构和民众的直接领导者和创造学术、左右舆论的间接领导者加以区分。 [200] 在我们这次“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有一位领导成员是来自世界银行，一位地区问题小组主持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副署长，他们是根据经济发展问题调拨大量财力物力的领导人。同时，我们又有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他们就人际交往、企业层次的竞争力、男女平等、童年时期的发展等这样一些不相同而又相关的问题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通过每天川流不息经过我们的书桌和电脑屏幕的大量社会指标和经济指标以及其他的种种抽象化了的资料，我们看见了贫困。可是你也会遇见这样的贫困：眼见一个聪明伶俐但却是低贱种姓出身的印度小男孩，因为穷而上不了学，这令你感到心酸。在内罗华的街巷里，你也许会碰到这样的贫困：突然一把砍刀架到了你的脖子上，令你胆战心惊。你还会瞅见这样的贫困：在波哥大的街上，一个少女没有手指和脚趾，因为她一出世就被抛弃到一条古老潮湿的阴沟里，手指脚趾被饥饿的老鼠给啃掉了，见到这般情景，你会非常难受。

如此这般的一些情景一直萦回于我们心头，而本书诸位撰稿人的论述又使我们深受启发，我们不禁琢磨，像东非中非大湖区或巴尔干半岛这样一些地方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不是都跟贫富问题有关系。我们在想，对这些地区来说，怎样才能有一个整体的变革过程来补充现有的政治和军事解决办法之不足，甚至是由前者来取代后者。

本书的每一位撰稿人都愿意让世界各地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在发表意见时，观点都强烈受制于我们的学术专业和职业特征，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理模式。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多少是像“怨牛不好”那个故事里所说到的那样，如何全盘考虑综合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把一批见解和另一批见解结合到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当地所适合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应经过周密整合、稳妥引导和卓有成效的讨论，从而开始让各国和各族人民走上日臻繁荣的道路。迄今为止，世界还没有见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第二十一章 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斯特斯·林赛

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本章的论点是，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

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为世界各地创造繁荣提供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对世界各地的千百年文化传统构成潜在的威胁。下面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不久前，我在加纳向一批政企领导人发表演讲，谈了经济竞争力以后，一个年轻人找我，问我的演讲是否意味着他的国家若想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就需要改变自己的文化。他指出，在他的民族，文化传统要求十分尊敬长者，而他那个乡村的许多长者都希望年轻的领导人不要太多卷入商贸事务。

他的疑问表明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不是需要改变他们的文化遗产，才能更有意义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个地区是否有可能既保留自己的历史和特性完整无损而且尊重自己的文化，同时又具有全球竞争力？

这样的问题，本书许多撰稿人都提出过，可是没有明白的答案。本书两大主题是文化和人类进步，要理解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容易。要理解它们二者而且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了。

戴维·兰德斯、迈克尔·波特和杰弗里·萨克斯这三位撰稿人谈到了另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如政府政策、地理和疾病等，就它们的作用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另一些人谈到了文化在形成人们对待工作、信任和权威的态度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人类进步。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仍有待于回答：在发展中世界怎样才能促进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变革？此外，正如理查德·施韦德所问到的，这样做，会不会威胁到当地文化的完整性？它会不会限制我们

让其他文化照亮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

我们博德公司的同仁和我本人给一些地方的商界和政府领导人当过顾问，费了不小力气考虑如何创造较有竞争力的经济，提供相关建议。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遗产和制度。一次又一次，我们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指出需要改变某些特定的政策、谋略、行动或人际交流模式。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荣幸地为之出主意的那些领导人都承认我们的看法有道理。然而，我们也明白了，对于怎样发展经济的紧迫问题提供了好的答案，并不足以引出必要的变革而扭转经济运转不灵的势头。人们往往是接受了有理的意见，懂得了他们需要变革，表示决心要变革，可是随后又回头走老路。这种回头走老路的倾向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化特征，而是表明，那些希望促进一种不同的、较繁荣的前途的人们，面临了更深刻的挑战。

经济进步有赖于人们改变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改变领导者在作出那些导致经济运转不灵的决策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信念和见解。霍华德·加德纳在谈话中提到，研究认识论的学者们都力图理解人们用以认识世界的心理表象。若要开创持久的变革，就得从这里变起。彼得·森吉等人将这种表象称为“心理模式”，森吉给“心理模式”下的定义是“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和如何采取行动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见解、泛化概念、直至图像或形象”。^[201]

本书的许多撰稿人谈到，分析文化价值观和经济进步关系时，“分析单位”不明确。它应是一批具有相似宗教信仰遗产的国家，还是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的单个国家，抑或是国家内部由共同信念联结在一起的各不同社群？罗伯特·埃杰顿就指出，可能存在着经济单一而文化多样的情形。

根据广泛的宗教信仰或其他广泛的文化特性来解释经济表现的优劣，并不能帮助我们就文化问题进行有成效的对话。正如马利亚诺·格龙多纳所说，学者们曾经用儒学来解释亚洲的失败，以后又用它解释亚洲的成功，然后还是用它解释亚洲的危机。在基督教方面，对比天主教和新教的职业道德观念，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看法，但这些分

析仍然太抽象了，不足以引起变革。何况总有例外情况：在不利于进步的文化之内，有些天主教徒干得卓有成效，很成功，而在有利于进步的文化之内，有些新教徒干得很糟糕。因此，我们需要把分析方式弄得比较明确一些。

在理解文化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时，将心理模式用作过滤器，是有助益的。心理模式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基本信念。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宏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则是微观层次上的变量。心理模式适用于个人和人群，而且是可识别的和可变的。文化反映的是个人心理模式的总和，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人所具有的心理模式的类型。二者相连系于一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之中。

开创变革的真正着力点很可能在于帮助改变个人层次上的心理模式，首先是改变个人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心理模式与繁荣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一定强行带来全球文化的均质化。为了理解这一关系，不妨先简要综述一下国家繁荣所面临的挑战。

国家繁荣的挑战

经济增长的引擎

本书总的目的是探讨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在下文中，我们的第一点论断是，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根本。要共同认识到，发展中国的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他形式的人类进步（例如保健、教育、基础设施等的进步）均有赖于成效好的经济活动。于是，问题就在于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是怎样运作的，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促成卓有成效地利用一国的资源，为人类进步创造机会。

这就引出第二点诊断。我认为成功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正是在各个企业的层次上创造着财富。产品制造出来，服务提供出来，生产率得到提高，财富就得以产生。没有成功的企业就不会有经济进步，而没有经济进步就不会有人类进步。这些诊断就导致以下的三段论：

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广义的人类进步

成功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因此成功的企业是人类进步的必要前提。

在作出这些诊断以后，我们讨论的重点马上就转入到企业成功靠什么，如何促进这样的企业。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杰弗里·萨克斯和博德公司对世界各地不少国家经济情况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运作往往不如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202]虽然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拥有独特比较优势的国家应当专门发挥它们的优势，可是，自然资源丰富而集中向全球市场销售这些资源的国家，按其人均收入计算，往往是最穷的国家。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运作较差，其原因一般在于，自然资源产品通常是大宗商品，其生产者对这些商品的价格没有什么控制权。事实上，过去25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在逐渐下跌。结果，许多国家是出口更大量的货物，实际挣来的钱却更少。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不会保证经济繁荣。

有的国家想发挥它们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其结果也是一样。靠低劳动力成本从事出口，就必然需要保持低工资。如果提高工资，产品就失去竞争力。这样就陷于由穷到穷的循环。一旦产品失去竞争力，企业只有改行，或是转到工资更低的邻国去。

依靠自然资源和依靠低工资的战略都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能创造高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取得成功，显然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机构办事的透明度和效率，充足的基础设施，有文化的劳动大军，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等等。这些主题都得

到了大量的分析，然而，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层次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如何，却研究得相对不足。

在过去20年，迈克尔·波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企业、地区和国家这些层次上的竞争优势，他的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地考察影响经济成就的微观经济变量。在《199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他提出了用以衡量一国竞争力环境品质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他指出：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包括政府稳妥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的政府开支，政府在经济中起有限的作用，以及向国际市场开放，能促进国家繁荣。然而，要确保繁荣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虽是必要的，却仍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或许还是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其根基在于企业的运作方式和谋略，以及企业的投入，基础设施，还有构成一国企业竞争环境的制度和政策。除非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有适当的改善，否则政治上和宏观经济上的改革是不会结出果实的。 [203]

既然越来越多的人对宏观经济管理基础达成了共识，人们也开始对微观经济的竞争力基础有了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表现欠佳的国家中，为什么实现变革如此困难？是不是必须先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健全的经济和扎实的微观经济基础，然后才能有长足进展？显然，具备那些条件，是理想的。然而，经济发展这种现象往往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商界领导人会争辩说，如果政府没有把事情安排就绪，他们是无法筹划更好的谋略的，而政府领导人则争辩说，如果商界没有竞争的愿望而老是指望政府的保护，政府是无法采取什么重大步骤的。

繁荣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也要求人们具有“竞争心态”以促进国民经济中的创新和生产率。

需要有竞争心态

根据我们给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当顾问的体会，对他们面临的谋略

问题找答案并不难，即使是在政府政策不高明和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找答案也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办事的想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老一套的比较优势思想，在体制、法律和政策中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表现。这老一套的想法使得领导人很难作出别的选择。

下面，我们把自己在发展中世界观察到的各种思想模式，简明概括起来，列表加以对照。按照格龙多纳和哈里森的分类，左边是企业层次上的“抵制进步的特点”，右边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利于进步的特点”。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抵制进步的特点	有利于进步的特点
市场受保护	全球化和竞争
注重宏观经济	注重微观经济
有事找领导人	企业层次上提高生产率
注重物力/财力资本	注重人力/知识资本
按等级制刻板办事	精英领导灵活管理
规模经济	生产灵活

依靠外资合伙人

实行迁徙战略

消极被动

积极主动

政府说了算

协商合作

财富再分配

创造财富

家长式管理

创新

再说一遍，企业要改变竞争方式，还会遇到许许多多实际存在的政治障碍和物质障碍，例如国家经济运转不灵，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工人不足，等等。然而，时不待人，企业领导人已不能等到全国基础设施改善了，再改变自己的竞争想法和经营谋略。如果他们不能本着创新的精神解决自己的经营问题，全国经济也不会有改善。最好是政企双方协商合作，共同改进，搞活经济。

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竞争模式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企业竞争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得它们陷于大宗商品交易，很难赚取高额利润。可是，没有高利润，它们就无力为人力资本作重大投资；不对人力资本作重大投资，它们就建立不了较深的创新源泉。

然而，也有另一种做法，能在可持续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企业发挥首创性，开发较复杂的商品和制定较成熟的经营谋略。这样就可以建立高利润率的企业，有条件为人力资本作更大投资。职工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就会促进较高的创新率；创新率提高了，就有能力提供日益复杂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看世界，就有可能设想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取代那老一套的比较优势。

虽然凭直觉也能看出这一模式有道理，但是要说服企业和政府领

领导人改变他们现有的竞争模式却相当困难。迈克尔·费尔班克斯和我过去十年来花了很大功夫去鼓励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采取新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放弃那种虚幻的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种基本因素去竞争的想法，转而设法建立竞争优势。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看到，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经常是沉溺于以下一些谋略模式和行为模式，因而难以创建较复杂的竞争优势源泉而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的成就：

谋略模式

行为模式

过分依赖基本因素

缺乏合作

对顾客缺乏了解

被动守势

对相对地位缺乏了解

家长式作风

缺乏垂直整合

我们在世界各国为改变这些行为模式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深信这些微观经济上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有效的经营实践及努力的学习，上述的谋略模式应是可以改变的，可是要看到、认识和改变上述的行为模式，却困难得多。

这些模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在全球经济中不具有竞争力。然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的各个国家，这些模式竟然都会出现，这是为什么，还不清楚。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变量大不一样，可是微观经济模式却惊人地相似。

这些情况表明了文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人们对企业、经济或竞争的想法，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战略选择的质量。

理解领导人的想法

要理解企业领导人为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组织他们的企业和

采取他们的谋略，有一个办法，就是理解他们对自己日常紧急问题是怎么想的，怎样采取对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试图理解一国的各个不同群体对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想的。

全国调查。从1992年起，我们博德公司派出一个小组到各个发展中国家，逐一研究如何提高它们各种产业的竞争力，向企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相关建议。我们起先研究的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谋略。可是我们认识到，现有的政策环境和现用的谋略与其说是我们观察到的模式的原因，还不如说是那些人对如何创造财富的想法的结果。于是我们安排了一系列调查，了解各关键群体对怎样创造财富的想法。我们在哥伦比亚开始这项工作，调查对象为政界商界领导者近四百人。调查内容是他们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想法。我们的目的是要看出，在哪些关键问题上可以促成广泛的共识。

我们的调研从衡量他们在关键的全国性问题上的态度差异开始。我们设计的一套调查表格是为了看出他们在哪些问题上看法相同，在哪些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结果，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在许多人认为并不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双边贸易协议和促进出口等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而在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汇率和控制通货膨胀等问题上，却共识程度很低。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还看不出该从何着手变革。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有利于促进变革，我们决定把按问题分类改为按部门行业分类，以便能利用分析结果激励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变革。

我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有高度防范心理，所以我们推论，需要得出明确的分析结果才好推动全国性的辩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看出在哪些关键领域意见不一致，我们就可以设法促使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形成共识，共同努力提高哥伦比亚的竞争力。

例如，我们发现，反走私对于纺织行业来说很重要，他们正在努力反对大量纺织品的非法进口，但是对于别的行业和政府官员来说，这一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控制通货膨胀对于花卉行业极其重要，但是皮革行业不那样重视它。随后，我们按部门行业请这些领导人参加

一些研讨会，尽力让他们明白，他们信念中普遍存在的比较优势观念实际上严重阻碍了他们提高竞争力。

以上的这些努力使我们较好地认识到，是哪些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妨碍大家形成共识。但是，看出人们在政治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虽然重要，却仍然无法解释企业层次上的行为。

然而，我们发现，不但政企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而且不同城市的领导人之间意见也有明显差别。于是，我们对哥伦比亚五个大城市的经济表现作了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它们在观念、作风、工作方式以及经济成就方面，均各有特色。

地区调查。我们调查的五个城市是巴兰基利亚，布卡拉曼加，卡利，卡塔赫纳和麦德林。它们的领导人对于自己城市竞争力靠的是什么，见解很不一样。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城市是麦德林，它的领导人认为该市优势在于文化和人力资源，即现在人们所说的社会资本。五市当中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是巴兰基利亚和卡塔赫纳，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优势在于自然资源。这就有力表明了一个地区人们的心态与经济成就高低的关系。每个城市的人总的说来对于本市竞争优势的源泉的看法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可变性。竞争心态最佳的城市麦德林则创造了哥伦比亚全国最高的生活水平。

心理模式与变革的努力

我们在哥伦比亚五个城市对领导人作调查的结果使我们确信，一个地区所作出的选择，质量高低不一，其中有影响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该地区领导人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认识。这就是他们在创造财富、社会资本和行动方针这几个层面上的信念的总和。总之，我们发现的这些城市的差别是由于它们领导人心态的不同。

注重比较优势的心态，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创造财富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形成的结果。它是一种抵制变革的心态。倡导变革的人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他们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他们那里的民众并不都很理解的。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得出的明智见解

应当足以启发人们去变革。可是，我发现的情形跟彼得·森吉下面的看法是一致的：

新的见解未能付诸实施，因为它们与我们内心深处固有的事物运作图景相冲突，那些图景把我们限制在我们所熟悉的想法和做法上面。正因为如此，处置心理模式的学科——研究如何展现、检验和改善我们内心深处的事物运作图景的学科——有希望成为建立学习机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204]

改变心理模式将是一大突破，有助于领导人把自己的国家变得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首要的任务在于突破那些妨碍人们建立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建立竞争心态的心理模式。文化上的变化必然会随之而来，但是任务不是要改变文化。任务在于为创建有竞争力的企业创造条件，因为这样的企业将是支持人类进步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我们在国家层次上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所作的调研，使我们识别了是哪些全国性的问题妨碍了建立全国共识。我们在地区层次上所作的调研则使我们识别了地区经济繁荣所面临的挑战。可是，当我们开始试图变革现状时，我们认识到应当着手于一个更有活力的干预层次，这就是识别各种想法相似的人群。

为了创始有意义的变革，就有必要识别什么样的人将从变革受益。笼统地区分一个人是否属于“政府”或是否属于某一城市，是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做法是识别人们对于怎样创造财富所持有的想法，而不问他们是属于哪个部门或地区。

当我们在委内瑞拉工作时，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而想出了一套调查方法，以后在世界各地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单是看当前有哪些问题使人们产生分歧，而且还很仔细地分析各类人对竞争问题有何看法。这样，不是按机构部门或地区作区分，而是按信念体系作区分。例如，在委内瑞拉，我们发现有五类人各自对关键问题持有与其他四类人不同的看法。这“五种委内瑞拉人”不是按所属单位或地区，而是按照他们对影响经济的各个变量所持有的信念，来加以界定。

1997年，凯亚·米勒和博德公司小组在萨尔瓦多对该国近四百名领导人作过调查，证明就变革因素而言，最有意义的分类标准是心理模式。他们在调查中运用了几十个变量作衡量，这些变量再归结为十一类因素，看出这些人对萨尔瓦多竞争潜力的看法可分为五大类。

[205]

人数最多的一类被称作“失望者”。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对政府和私营经济均感失望。至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其境况，这类人没有什么强烈的意见，但他们十有八九认为萨尔瓦多正处于危机之中。

人数占第二位的是“中央集权论者”。他们认为萨尔瓦多克服现今困难的唯一办法是由很少几位政府决策人来处理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第三类人是“奋斗者”，他们与“中央集权论者”见解相反，认为应依靠的是老百姓。他们相信，在政府适当支持之下，老百姓能为萨尔瓦多创造较美好的未来。

人数最少的一类是“保护主义者”。虽然几乎各类人都多多少少赞成政府对经贸实行保护，但保护主义者的这一主张最强烈。他们公开主张采取的政策包括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以及其他各种政府保护主义措施，认为萨尔瓦多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中成功地竞争。

与以上四类人显著不同的是“经济开放论者”。这类人认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贸易、教育交流等方式建立国际联系。他们觉得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支持不够，但是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他们也决心努力前进，争取成功。

应当指出，这次调查的对象包括商界、政界、学术界、劳工界等各方面的领导人。调查的地区也广，包括圣萨尔瓦多、松索纳特、圣安娜、圣米格尔等城市。调查结果按职业和地区加以分类，都能看出一些问题，这一点与五年前哥伦比亚那次调查相似。然而，按心理模式作出的上述分类中，每一类都包括了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的人。换

句话说，在这个国家，人们之间的真正分野不在于他们是生活在什么地方或从事什么职业，而是在于，对如何创造财富这一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基本信念、见解和态度。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又饱受长期内战之苦，它有自己的历史，显然有它自己的民族文化。在那里，我们既与担任过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领导职务的人们交谈过，也与民族主义共和联盟这一保守政党的领导人交谈过，从这些谈话中，我们看出，即便是在这个饱经战难的国家，只要对人们作正确的分类，仍可看到人们的共识。从政治、经济、职业或地区上分类，还不足以看出人们对其现实的想法。另一方面，从心理模式上分类，才能突出表明人们态度和信念上的分歧，看出是哪些态度和信念妨碍着创造财富的进程。

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们在委内瑞拉向一批领导人说明我们调查心理模式看出有“五种委内瑞拉人”以后，听众中有一个人举手，问我们怎样使他们“再成为一种委内瑞拉人”。他头一次明白，在心理模式基础上创造共识，就有可能实现变革。

结束语

文化重要。但是要在文化的层次中行动起来，那是十分艰难的。本章的论点在于，人们作出自己的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心理模式，才是开创变革的真正着力点。再回头看看本章开头时谈到的那位加纳人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改变文化才能适应全球经济？无疑，文化会起变化。但是，这里应当讨论的，不是文化本身如何，而是人们对待相应变革层次有哪些信念体系。着力看出有哪些心理模式限制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并加以理解，这就是朝着人类进步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我提出以下五点看法，作为本章结束语。

成功的、逐步增长的企业是进步的必要前提，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要进步，就必须能够创造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虽然政治

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在继续帮助我们加深理解一定的政策架构或治理方式是怎样影响着经济进步，但如今日益重要的是要理解，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必须花更大力气帮助企业提高其竞争力。

有些谋略比另一些谋略更能成功。有一些企业比别的企业更能成功。它们找到了可持续的经营谋略，投资于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 and 创建竞争优势。每个企业都有潜力这样做，但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却很少。

竞争心态（心理模式）影响谋略。良好经营谋略的限制因素不是教育水平，不是政府政策，也不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良好的经营谋略要求具有竞争心态，即指导着人们如何看待竞争和创造财富的一套信念、态度和见解。

心理模式分布在各类职业和各地区的人群中间。缺乏竞争心态，不能怪国家政策不好，也不能归咎于总的文化或某一组织机构。我们就心理模式进行调研后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各种心理模式都广泛分布于各地和各行业的人们中间。有某些心理模式——笼统地说，是比较优势心态——限制着企业成功的能力。

为促使企业成功，需要调整心理模式。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进步，凡影响到人们对待风险、信任、竞争、权力及其他重要变量态度的基本心理模式，均须得到适当调整。

最后，改变心理模式可能会引起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明显变化。但是为改变文化而努力，并不会改变一国经济的优劣。适当的分析层次应是个人和企业这一层次。应当努力去认识是哪些心理模式驱动着人们作出他们的战略选择，然后将这些心理模式作为变革的焦点。

第二十二章 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

劳伦斯·哈里森

美国学术界大体上未曾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一种新的范式：一种内向的聚焦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理论——正在逐渐填补拉丁美洲曾流行一时的依附论垮掉以后所留下的理论真空。拉丁美洲近来已经带头阐明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范式，并且致力于将它化作行动，不仅要加速经济的增长，而且要巩固民主体制和促进社会正义。这一文化范式在非洲和亚洲也得到响应。

当然，过去30年来研究过东亚经济奇迹的许多分析家曾得出过结论，说“儒学”价值观——如强调面向未来，强调工作和成就，强调教育和美德及节俭——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相似的价值观，不仅来源于儒家学说，而且也来源于祭祖传统和道教等信仰体系。）东亚在世界市场上的成就与拉丁美洲流行的依附论是格格不入的，曾长期没有受到拉美学界和政界的重视，人们从文化角度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直到最近几年，拉丁美洲才大体上接受了东亚的经济政策教训，如今正在思索一个问题：既然依附论和帝国主义论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欠发达、政治上依然存在着集权主义传统以及社会上极其缺乏正义，那么这一切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问题，是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出来的，该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了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本，书名直译过来是《从高贵的野蛮人到高贵的革命者》，以后又出了英文版本，书名是《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的恩恩怨怨》。^[206] 兰赫尔认为，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功”而言的拉丁美洲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拉美的传统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反映这些价值观和态度而又反过来加强了它们的制度。兰赫尔并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第一个拉美人。作过类似结论的人，包括曾给玻利瓦尔当过助手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于18世纪末），玻利瓦尔本人（19世纪20年代），杰出的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和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及智利人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于19世纪后半期）以及尼加拉瓜学者萨尔瓦多·门迭塔（于20世纪初）。

西班牙人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费尔南多·迪亚斯·普拉亚、米

格尔·德乌纳穆诺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也作过类似的分析，他们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西班牙现代化迟缓（最近几十年有变化），但其见解显然也适用于拉丁美洲。

让·弗朗索瓦·雷维尔为兰赫尔的书写的前言中强调了拉丁美洲缺乏自我批评。兰赫尔此书使他受到了拉美多数知识分子的敌视，北美和欧洲的拉美问题专家大多也置此书于不顾。然而，事实证明此书意义重大。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解释北美和拉美的对比时说：“一个，是讲英语的，继承的是那个创建了现代世界的传统，即宗教改革，连同其社会和政治后果，民主和资本主义。另一个，是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继承的是普世天主教君主制和反宗教改革。”^[207]

兰赫尔的观点在克劳迪奥·贝利斯1994年出版的《哥特狐的新世界》一书^[208]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响应。该书对比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盎格鲁—新教和伊比利亚—天主教两种不同的文化遗产。贝利斯在阐述新范式时，引用了著名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言论。略萨断言，拉丁美洲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教育和司法改革是实现不了的，

除非在这些改革之前或与它们同时，也改革我们的习俗和观念，我们整套的习惯、知识、形象和仪式，即我们所说的“文化”。我们现今在拉丁美洲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文化，既不是自由开明的，也不是完全民主的。我们有民主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性反应和我们的心态却远不是民主的。它们仍然是民粹主义的和寡头政治的，或者专制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或教条式的，夹杂着社会和种族偏见，完全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对手，一心想搞最坏的垄断，即垄断真理。^[209]

拉丁美洲最近有一本书十分畅销，书名是《拉丁美洲十足白痴指南》，^[210]它的三位著者是哥伦比亚的普利尼奥·阿普列约·门多萨，秘鲁的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老作家略萨的儿子）和古巴逃亡者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他们在该书内封上写明此书是献给兰赫

尔和雷维尔的。此书批评了20世纪一些拉美人士散布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受害者的观点。这些人士包括乌拉圭学者、畅销书《拉丁美洲开放的血管》^[211] 著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前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以及解放神学的创建人古斯塔沃·古铁雷斯。门多萨、蒙塔内尔和巴尔加斯·略萨有力地说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真正原因在于拉美人的心态。

在此书的续集《苦难的制造者》一书^[212]中，这三位著者进一步阐述了传统文化对政治家、军人、企业家、教会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六类精英阶层人士的不利影响（请参阅本书第5章）。

蒙塔内尔最近的一本书《让我们别再失去21世纪》^[213]着重分析了拉丁美洲在文化上和政策上迄今未认真汲取先进民主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付出的代价。阿根廷媒体名人马里亚诺·格龙多纳1999年的新书《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214]分析和对比了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和阻碍发展的文化（如拉丁美洲的文化）。

诚然，拉丁美洲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正在起变化，过去15年来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就表明了这一点。有几种力量在促进这一变化，其中包括这里所说到的知识界新思潮，通信传播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福音派/五旬节派新教势力的上升（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在危地马拉已超过30%，在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占20%左右）。^[215]

论述新范式的书以及蒙塔内尔的每周专栏文章（在西班牙语地区，他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专栏作家）在拉丁美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却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这些地方的一代拉美问题专家一向受到依附论的熏陶，或是持一种不那么极端的观点，认为拉美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美国以更加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拉丁美洲，因此，他们听到有人说应从拉美文化找原因时，觉得简直无法理解。在几次不同的研讨会上，我听到美国一位著名的拉美问题专家说强调文化原因是企图“转移视听”，另一位断言文化与拉美发展毫不相干，还有一位争辩说委内瑞拉令人头疼的政治史根本与文化无关。我想，玻利瓦尔假如尚在人世，也不会同意他们的看法。

我特别重视兰赫尔的那本书。倘若我没有读过它，我就不会写出我的第一本书《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实例》，^[216]该书是1985年出版的。我最近的一本书《泛美梦》^[217]于1999年出了西班牙文版本，也是献给兰赫尔的。

文化如何影响进步

在《泛美梦》一书中，我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于停滞文化的十点价值观、态度或心态。这一提法与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本书第四章中所作的分类是密切相关的。

1.时间取向：进步文化强调未来；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面向未来，意味着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影响自己的命运，让美德在今生得到回报，主张双赢的经济学。

2.工作：它在进步文化中是美好生活的关键，而在停滞文化中却是一种负担。在进步文化中，工作构成日常的生活；勤奋、创造性和成就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而且带来安慰和自尊。

3.节省：它在进步文化中是投资之母，也是财政保障之母；它在停滞文化中却被视为对“平等”现状的威胁，人们往往认为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

4.教育：在进步文化中是进步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却只对精英阶层重要。

5.在进步文化中，功绩是地位上升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地位上升是靠关系和家族。

6.社群：在进步文化中，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任半径超出家族范围而达到广大社会。在停滞文化中，家族局限着社群。认同和信任半径狭小的社会较易出现腐败、偷税漏税和任人唯亲，较难推广慈善活动。

7.在进步文化中，道德准则一般比较严格。在透明度国际

的“腐败感指数”中，发达民主社会（除了比利时、台湾、意大利和韩国以外）均名列前25位之内，而前25位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有智利和博茨瓦纳。

8.在进步文化中，人们普遍期待得到正义和公平待遇，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在停滞文化中，公正待遇跟地位上升一样，往往取决于你认识什么人和付得起多少钱。

9.权力：在进步文化中趋向平行和分散，在停滞文化中则趋向垂直和集中。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意大利南北差别的分析是很说明问题的。 [218]

10.世俗生活：宗教机构对公民世俗生活的影响，在进步文化中不大，而在停滞文化中往往很大。进步文化中，宗教等方面的不同意见受鼓励，而在停滞文化中受鼓励的是思想正统和顺从。

以上这十条显然是经过概括和理想化的提法，实际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不同颜色彼此渗透。如果按这十条评分，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得满分，也没有谁得零分。然而，几乎所有的发达民主社会——还有一些成就高的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如摩门教徒，犹太人，锡克教信徒，巴斯克人，居住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东亚移民——总的说来得分会大大高于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

有人会针对这一结论推断说，真正起作用的是发展，而不是文化。对于透明度国际的腐败指数，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文化与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但文化的力量是明显可见的。有些国家中，某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成就上远远超过当地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即是一例，这就可以看出文化的作用。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它的经济属于第三世界水平，但民主体制已很发达。帕特南指出，意大利千百年来演变证明，文化价值观比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格龙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得出结论说，文化的力量大于经济或政治。

我提出的十条，并不是定论。格龙多纳对于促进发展和阻碍发展的文化作分类时，列出了20个因素，其中有许多与我列的十个因素相互重叠。但是这十条至少表明，在“文化”这一辽阔领域内有些东西是会影响社会的演变的。此外，拉丁美洲的新范式著述的作者们（至少还另有非洲的一位作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现代化进展缓慢的原因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到了这样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态度。他们的观点令人回想起冈纳·默达尔对南亚的分析以及伯纳德·刘易斯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更不用说还有托克维尔、韦伯和班菲尔德等这样一些文化大师的论述。

欧洲人夸大地理对民主制度持久力的影响。太重视法律而太不重视民德……假如在本书中我迄今尚未能让读者感受到我是何等重视美国人的实际经验，重视他们的习惯和见解，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视他们的民德在维持他们的法律方面的作用，那么我就是未能达到此书的主要目的。 [219]

另一些地区的文化诠释

1968年，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在研究南亚问题10年之后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 [220] 他得出结论说，受宗教深刻影响的文化因素是南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文化因素不但干扰企业活动，而且渗透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使它们变得僵硬，而受这种文化左右。缪尔达尔指出，种姓制度“趋向于使现有的不平等变得格外僵化和顽固”，而且“加强了人们普遍轻视和厌恶体力劳动的态度”。 [221] 他认为，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半径有限，助长着腐败和任人唯亲。

缪尔达尔批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提供一种有更广泛基础的理论和理念体系，而这种体系却是科学地研究发展问题所必需的”，但是他承认“态度，体制，生活方式和水平，总起来说就是文化……要对它们作出系统的分析，那要比分析所谓的经济因素困难得多”。 [222] 他最后呼吁文化变革，由政府带头，尤其是要通过教育系统作这样的变革。

多数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步伐迟缓。许多国家中文盲率，尤其是妇女文盲率，仍然很高，儿童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也高。撇开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和宗教激进主义异议分子的压制不谈，土耳其是唯一的接近于现代多党统治方式的伊斯兰国家——当然它是实行了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相对说来较富，但它的经济成就成比例地反映出它的华人少数民族（占人口32%）的经济开创性。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等国虽富裕，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很传统，例如沙特妇女半数以上是文盲，就证明了这一点。 [223]

伊斯兰教自从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建之后数百年期间曾是进步的力量，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曾是一大强国，可是伊斯兰世界近几百年来却进步缓慢，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有些人将伊斯兰教势力的下降归因于文化因素，伯纳德·刘易斯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强调指出，自从伊斯兰教学者于9世纪至11世纪之间关闭了“伊智提哈德”（Ijtihad）之门（不再允许人们作独立分析）以后，事事皆须合正统，这造成了一些后果。刘易斯认为这种后果包括压制兴业、实验和独创精神，加重了宿命论的世界观。 [224]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分析了非洲文化（见本书第六章），指出非洲的贫穷、集权主义和缺乏社会公正主要归因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例如：

- 权力高度集中和垂直的传统

- 注重过去和现在，而不是注重未来

- 不抓紧时间

- 不爱工作（“非洲人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 [225]

- 压制个人首创性、成就感和节约（必然带来的是妒忌别人的成功）

- 信巫术，养成非理性和宿命论

埃通加—曼格尔有一句话很有见地，令人回想起托克维尔，这就是：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些人，特别是国际开发机构中的一些人，认为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办法在于“制度建设”，他们最好对埃通加—曼格尔这句话深思一番。

10年前，萨尔瓦托尔·特雷西——欧洲工商管理研究所创建人之一——着手调查西西里岛政界商界情况，其目的首先是要更好地了解该岛不发达的原因。调查的结果与爱德华·班菲尔德1958年对意大利南方村庄调查的结果惊人相似：西西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令人气愤的”个人主义、对人不信任和怀疑心。^[226] 与埃通加—曼格尔对非洲文化的分析相似，西西里的价值观体系压制合作，但又不鼓励竞争，把竞争视为“侵犯”。取代合作和竞争的是相互勾结，特别是官商相互勾结，与埃尔南多·德索托在《另一条路》一书中对拉丁美洲“重商主义”的描述差不多。^[227]

这一调查发现的另一些文化因素也是我们听来耳熟的：只注重眼前，很难有战略策划，缺乏创业心，集权主义的尊卑关系。这次调查的结果令西西里精英阶层受到震动，导致了一项后续计划，其目的是改变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加强管理、策划、协调和兴业精神。

改变传统文化

在拉丁美洲和别的地方，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行动起来，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文化态度，这部分地是由于新范式作者们的影响，但有些人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奥克塔维奥·马维拉在秘鲁经销本田牌汽车达30年之久。他是靠自己奋斗立业，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曾多次去过日本。大约十年前，他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和秘鲁的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区别在于，日本的儿童学习了进步价值观，而秘鲁的儿童却没有。1990年，他在利马成立了“人力发展研究所”，倡导他所说的“发展十诫”：秩序，整洁，准时，负责，成就，诚实，尊重他人权利，遵守法律，职业道德，以及节俭。十年来，这个研究所动用了自己在秘鲁的几乎全部人力物力，

让两百多万名秘鲁学生参加了它安排的学习班。

“发展十诫”在秘鲁境外也得到提倡。在尼加拉瓜两届政府中担任过教育部长的温贝托·贝利将这“十诫”列入他的教育改革计划核心内容。墨西哥声名卓著的蒙特雷理工学院的蒙特雷院本部的院长拉蒙·德拉培尼亚提倡在该学院各个系统都宣扬这“十诫”。

对文化变革采用讲道的方式，收效还是有限的。正如加拉加斯天主教大学校长、耶稣会教士路易斯·乌加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孩子们在学校学了进步伦理，可是出了校门以后就发现这些伦理与己无关，那么伦理教育就没有什么收效了。乌尔加德深信价值观和态度是重要的，他号召政界、商界以及各行各业都开展反腐倡廉的活动。

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与它相关的因素包括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的半径有限，这又表现为社群感有限和道德准则不牢靠。这一结论从利普塞特和伦兹在本书第九章中的分析得到了证实。在拉丁美洲，腐败问题已很突出。美洲国家组织于1998年3月3日通过了泛美反腐败公约，长达14页的这一文件到1998年底已为13个国家批准。人们并不指望这一文件本身会大大减少腐败行径。批准国中就包括透明度国际列出的10个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中的5个拉美国家之中的4个：巴拉圭，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第五个是哥伦比亚，它尚未批准该公约）。然而，人们显然已经比过去更加注意腐败问题，例如，世界银行和另一些开发援助机构也日益注意到这一点。

性别（男女平等）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提出了挑战，玛拉·赫滕在本书第十四章中谈到了这一点。拉丁美洲的妇女日益意识到世界上尤其是第一世界国家中近几十年来的男女平等趋势，她们也日益组织起来，争取纠正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不少国家都在父母对子女监护权、财产权和离婚问题等方面制定了尊重妇女的法律，还有九个拉美国家规定了议员候选人中妇女应占的比例。这些选举法并不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它们毕竟表明改变传统价值观、实行男女平等的革命已来到拉丁美洲。

近些年来，在拉丁美洲还自发成立了一些组织，它们至少将进步文化变革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例如：

·墨西哥的一个妇女组织“相会于社群”（ENLACE），虽经费很少但会员广泛，致力于公立学校教学改革，提倡家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在教学中强调价值观和品格、家庭稳定、力争向上和重视教育。

·委内瑞拉的巴基西梅托地区中央合作组织，它的领导人深信，若不改变传统的小农价值观和态度，委内瑞拉乡村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都出现了倡导慈善活动的组织。拉丁美洲向来缺少慈善活动，反映出人们之间认同和信任半径小，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阿根廷的一批以律师为主的专业人士成立了“公民力量”组织，其主要宗旨是倡导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以及反腐败。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致力于文化变革。哥斯达黎加的精神病专家路易斯·迭戈·埃雷拉提醒人们注意童年时期的人格形成和文化传播。一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调查人们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其中有墨西哥学者巴萨内斯，他是美国重要民意测验机构之一“市场与民意调查国际”（MORI）的总裁，还有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的阿根廷办事处主任马里塔·卡瓦略。

倡导文化变革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当中，不少人——包括蒙塔内尔、格龙多纳、乌加尔德等人——彼此都认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参加了两次讨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在拉丁美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研讨会，一次是1996年在哥斯达黎加的中美洲工商管理学院举行的，另一次是1998年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举行的。1999年哈佛研讨会——本书即由此而产生——的与会人士中，就有些人参加过上述的两次研讨会或其中之一，他们是：蒙塔内尔，格龙多纳，埃通加—曼格尔，费尔班克斯，英格尔哈特，林赛以及我本人。

迈克尔·波特1983年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成立了一家咨询机构，即博德公司。它成长迅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提供竞争力方面的建议，影响日著。博德公司的“国家竞争力策划活动”是费尔班克斯和林赛二人创始的。他们分别是本书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的作者，二人还在1997年合著了一本书《劈风斩浪》。^[228]这一书名取自玻利瓦尔1830年的遗嘱，玻利瓦尔当时指出谁想要在拉丁美洲发动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革命，就得有“劈风斩浪”的精神。

费尔班克斯和林赛都有在第三世界工作的实际经验——费尔班克斯是在非洲，林赛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在咨询活动中很快意识到，以传统的态度对待竞争力，即强调市场分析、合适定位、提高生产率和加强管理，还不足以保证第三世界具有成功的竞争力。他们得出结论说，首要的障碍是一些植根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无形”因素，因此他们在咨询活动中注意到“心理模式”。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传统的心理模式，因为它们妨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效率。

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利昂内尔·索萨也主张改变心理模式，不过他研究的对象是移居美国的拉丁美洲人。他针对这些人而于1998年出版的《美国梦》一书^[229]指出，有一系列价值观和态度障碍了这些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以实现地位上升。它们听起来都是人们所熟悉的：

·认穷：“穷可升天堂，富要入地狱，今生受苦是好事，来世可得永久回报。”^[230]

·不重视教育。“女孩子其实不需要上学——她们早晚得嫁人。男孩子呢？最好是去工作，帮助养家。”^[231]这里我愿补充一点：美国拉美裔中学生辍学率在30%左右，远远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

·宿命论：“既然抱着‘我们不能违背上帝意志’的态度，就谈不上什么发挥个人首创性、争取有所成就、自力更生、远大抱负和积极进取……在美国取得事业成功所必备的美德，在拉丁美洲教会看来却是罪恶。”^[232]这就令人想到，拉美裔美国人的自我立

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信任家族之外的人，这也是拉美裔美国人的企业规模通常都小的一个原因。

索萨接着提出了“拉美裔成功经验十二条”^[233]，它们的主旨与奥克塔维奥·马维拉的“发展十诫”相似。

结束语

一种注重文化和文化变革的重要而且令人抱有希望的思潮正涌动于世界各地，它关系到穷国，也关系到富国中的贫穷少数民族群体。它其实并不新。它的源泉可以回溯到班菲尔德，韦伯，托克维尔，至少再追溯到孟德斯鸠。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的境遇优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巩固民主体制和社会正义方面亦是如此。这些经验教训正日益得到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得到实际应用，将会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尚未得到繁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人民照亮进步之路。

译后记

译完此书，总的感觉是：此书值得一读。

先看书名：《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当然重要，自不待言。但此书所说的文化，是指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因此有了副题：《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引出此书的主旨。撰稿人中的许多人——但远非全部——声称当今人类的进步，即“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实有赖于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的文化价值观；有人进一步解释，是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或再进一步，说是“盎格鲁—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据这些人说，舍此类文化价值观即无“进步”可言；即使有的地方，如东亚，一度呈现“经济奇迹”，到头来也还得陷入“危机”。亚、非、拉美，直至东欧、南欧，概莫能外。谁不按西方模式实现文化变革，谁就得落后，贫穷。

如此说来，此书似乎不过是兜售西方价值观的那一套陈词滥调，或者，如书中一位唱反调的撰稿人所言，不过是“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有。请首先看看此书撰稿人的名单：差不多全是当今的学术名流，例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著者亨廷顿，《国富国穷》一书的著者兰德斯，“竞争优势”理论的首创者波特，在苏联刚解体后就迫不及待推出了一部《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籍日本人福山，以及一大批治学严谨或者不那么严谨的作家和教授。除了个别文章像是卖弄学问、存心不让一般读者看懂以外，绝大部分的文章还是写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他们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文章并不浅薄，某些文章甚至还是可供思考的。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22篇文章，加上前言和绪论，绝非同一腔调。原来，此书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1999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文稿汇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哈里森虽然给会议

——随后也为此书——定了基调，但仍有意邀请了一些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与会。从这本书中就可以听到，有高调，也有低调，还有变调直至反调，挺热闹。例如，说“文化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有人说，当今世界上有贫富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用帝国主义论、殖民主义论、“依附论”等都说不通了，“唯一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在于文化；也有人——其中包括本书两主编之一的亨廷顿——说文化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人说比文化更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制度。有人含蓄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声称，只有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地区才最发达，最“民主”，最“自由”，似乎还最少腐败；也有人说各种文化皆有优劣，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对人类进步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有人说必须有稳定的西方式的“民主化”才能有持续的经济的发展；但也有人说必须从经济发展入手，才会有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文化上的全球趋同，甚至说“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但也有人认为各种文化会彼此交融，但特点不会消失，华裔教授杜维明就专文论证了“现代性”的“多样性”。如此这般的意见分歧，大大小小或明或暗，不一而足。人类学家施韦德与三位“第三世界”名流打笔仗，一直打到了文末的注释之中。这不就有点看头？

书中有些文章颇有分量。比如说，工商管理学泰斗波特专论经济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进步，而不谈政治。他一如既往，强调繁荣的源泉在于竞争优势，竞争力之本在于生产率，创造竞争优势不仅要靠宏观经济条件，更需具备必要的微观经济因素。他早在1983年就创办了国际咨询机构“博德公司”（Monitor Company），该公司两员干将费尔班克斯和林赛在此书中分别撰文，生动介绍了他们在拉美和非洲的活动，论述了如何转变心态以创造财富，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矫正，自立兴业和创新。书中有的文章学术性强而显得有点枯涩难懂，但细读之后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社会学家格莱泽的《解构文化》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对各种文化的特点作具体分析，反对泛泛评论。

再说说此书的头一篇文章：它是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一书若干段落的摘录。读过该书原文版或者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的

读者都知道，兰德斯分析世界各国500年来的荣辱盛衰时，谈到了从“大自然的不平等”和历史机遇直到民族心态和习俗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这里为适应全书的主题，他只说文化的作用，但仍指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经济与文化相互有影响，强调脱贫致富归根结底靠振奋精神，自强，实干。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这里的文章第二段谈到中国时，添加了原书中所没有的话，说中国现今的快速经济发展正在把这条“龙”从第三世界“推向第一世界”。

此书之中，谈到中国之处尚有不少。尽管有一些已经让我们听得耳朵起老茧子的攻击之词，如“集权主义”、“一党专政”等，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谁也无法否认。在谈论“亚洲危机”时，有人对于以中国“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大发议论，简直把这说成是“危机”、“衰退”的祸根。可是，为什么中国昂然挺胸度过了“亚洲危机”，而且在如今“第一世界”也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依然生机盎然，继续保持着充沛旺盛的活力？不是早就有人宣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已告“终结”吗？为什么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却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新历史篇章？对于这样的问题，此书中无人回答，看来也无人能回答。

其实，即使不谈什么“儒学文化”的优劣长短，看看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历经苦难之中的思索和觉醒以及再思索和再觉醒，看看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再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光辉旗帜的出现，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展现出不断解放思想、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壮丽画卷。当前，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继续认清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在此时，我们要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本论述“文化与人类进步”的书，多多少少，从正面或反面，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并非故作谦虚状的大实话：译者才疏学浅，尽管费

了牛劲，也难译出好文章。译文中肯定有一些错谬之处，祈多指正。

程克雄

[1] The following data are drawn from the World Bank, "Selecte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1993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社会概况》(The 1993 edition of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报道说“每5名城市居民中有2人是贫民,在农村每5人中3人是贫民”(p.35)。这说明1990年拉美人口中46%是在贫困线以下,22%为赤贫。中学生70%辍学率这一估计数字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表7。

[3] 美国的坎布里奇市亦译“剑桥”。——译注

[4]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1998), p.516.

[5] 我们悲痛地获悉,理查德·埃斯特拉达已于1999年10月29日去世,享年49岁。

[6] 博德公司英文原名是Monitor Company,是著名经济学家波特1983年成立的一家国际咨询机构。——译注

[7] For an early account of Basque success in what would become Venezuela, see Francois Depons, Viaje a la parte oriental de la tierra firme en la América meridional (1806; reprint, Caracas: Banco Central de Venezuela, 1960).

[8] The Greenspan quotes appear in William Pfaff, "Economists Hatch a Disaster," Boston Globe, 30 August 1999, p.A17.

[9] See Chapter 10 of this book.

[10]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New York: Norton, 1997), p.405.

[11] Ibid., p.417-419.

[12]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7.

[14] Ibid., p.117.

[15] Quoted in the Guatemalan newspaper La Prensa Libre, 14 December 1999.

[16] Orlando Patterson, The Ordeal of Integration: Progress and Resentment in

America's "Ra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 Perseus Counterpoint , 1997) , p.213.

[17] Ibid. , p.109.

[18] 兰德斯这一章基本上是摘自他1998年出版的《国富国穷》一书的有关章节，但这里括弧内的话是原书所没有的。可对照《国富国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3页。——译注

[19] Nicholas Shumway, The Invention of Argent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1) , p.156n.3.

[20] Juan Bautista Alberdi, Bases e puntos de partida para la organiza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1852) , cited by Shumway, Invention of Argentina, p.149.

[21]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9) , p.216. In all fairness, the text may read better in Spanish.

[22] Matt Moffett , "Foreign Investors Help Brazil's Leader Tame Its Raging Inflation , " Wall Street Journal , 15 December 1995 , p.A1.

[23] "The West and the Middle East ,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7 , p.121.

[24] 即九州岛上的长州藩和萨摩藩。——译注

[25] Sidney D. Brown , "Okubo Toshimichi :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Early Meiji Japan ,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1-1962) : 183-197.

[26] Haruhiro Fukui , "The Japanes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 Profile of a Nationalist-Paternalist Capitalist State , " in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ed. Richard P. Apple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 1992) , p.205

[27]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90) .

[28] See, for example, Michael E. Porter and Mariko Sakakibara , "Competing at Home to Win Abroad : Evidence from Japanese Industry ,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99-036 , September 1998.

[29] See, for example, Jack M. Potter, May N. Diaz, and George M. Foster, eds. , Peasant Society-A Reader (Boston : Little, Brown , 1967) .

[30] A good example is the case of Chile in Anil Hira, *Ideas in Economic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 Regional, N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ase Studies* (Westport, Conn. : Praeger , 1998) .

[31]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59) , chap.1.

[32] Lawrence E.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Cambridge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1985) .

[33] This definition of the view of wealth in poor countries is close to the zero-sum worldview that George Foster and others have emphasized as central to “universal peasant culture.”

[34] 瓦加斯 (vargas , 1883—1954) , 巴西总统 (1930—1945 ; 1951—1954) , 亦译巴尔加斯。——译注

[35] The term “mercantilist”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used here was popularized by Hernando de Soto in *The Other Path* (Lima : Instituto Libertad y Democracia , 1986) .

[36] “Neoliberalism” is the pejorative term used by critics, most of them ex-adherents of various forms of socialism, to describe free market capitalism.

[37] Gutiérrez’s best-known book is *Una 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 (Lima : CEP , 1971) .

[38] All data are from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39] Hervé Bourges and Claude Wauthier, *Les 45 Afriques* (Paris : Le Seuil , 1979) .

[40] Frank Tenaille, *Les 50 Afriques* (Paris : Petite Collection Maspéro , 1979) .

[41] Cited by Alassane Ndaw, *La Pensée Africaine-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s of Negro-African Thought* (Paris :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 , 1983) , p.233.

[42] D.Bollinger and G.Hofstede, *Les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dans le management* (Paris : Les Editions Organisation , 1987) .

[43] 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 *L’art du temps* (Paris : Fayard , 1985) .

[44] Ibid.

[45] Jean-Francois Revel, *La connaissance inutile* (Paris : Grasset , 1988) , p.99.

[46] Ibid.

[47] 作者姓名后括号内的年份，为有关著作出版、发表的年份，可依此线索查阅文末所附的《参考文献》。下同。——译注

[48] Diego Gambetta, *The Sicilian Mafia :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35.

[49] See, for example, Edward C.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ll. : FreePress , 1958) ; and Robert D.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50] See the discussion of civil society in Larry Diamond ,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 : 4-17.

[51] Lyda Judson Hanifan ,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 ”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7 (1916) : 130-138.

[52]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 Vintage , 1961) , p.138.

[53] Glenn Loury ,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 ” in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ed.p.A.Wallace and A.LeMund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Books , 1977) ; Ivan H.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2) .

[54] James S.Coleman ,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94 (1988) : S95-S120 ; Coleman ,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 Implications for the Law , ”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3 (1988) : 375-404 ;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 1993 ; Robert Putnam , “Bowling Alone :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 ”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 65-78.

[55] Everett C.Ladd ,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Social Capital , ” *Public Perspective* (1996) : 4-22 ; Michael Schudson , “What If Civic Life Didn’t Die?” *American Prospect* (1996) : 17-20 ; John Clark , “Shifting Engagements : Lessons from the ‘Bowling Alone’ Debate , ” *Hudson Briefing Papers*, no.196 , October 1996.

[56] How, then, can we get a handle on whether a given society’s stock of social capital i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 One solution is to rely more heavily on the

second of the two data sources—survey data on trust and values.

[57] Friedrich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5; see also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58] Ronald A. Heiner,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1983): 560-595; and Heiner,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Further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391-396.

[59]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0] For an overview, see Karl-Dieter Opp, “Emergence and Effects of Social Norms—Confrontation of Some Hypotheses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Kyklos* 32 (1979): 775-801.

[61]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1248.

[62] Strictly speaking, Coase himself did not postulate a “Coase theorem.”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960): 1-44. This article is the single most commonly cited article in the legal literature today.

[63] Robert Sugden, “Spontaneous Ord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1989): 85-97; Sugden,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64] Ellickson’s own detailed field research shows that ranchers and farmers in Shasta County, California, have in fact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informal norms to protect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just as Coase predicted they would. Robert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3ff., 192.)

[65]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6] Arnold J. Heidenheimer, *Political Corruption: Reading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78), p. 3.

[67] 原文如此。——译注

- [68]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 “TI Press Release : 1998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 ”Berlin , 22September 1998.
- [69] World Values Study Group , “World Values Survey Code Book , ”ICPSR 6160 (Ann Arbor, Mich. , August 1994) .
- [70] Paolo Mauro ,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Growth,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 ”in *Corrup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d.Kimberly Ann Elliot (Washington, D.C.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7) , p.91.Seealso Paolo Mauro , “Corruption and Growth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 no.3 (1995)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ee Alberto Ades and Rafael Di Tella ,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 ”*IDS Bulletin* 27 , no.2 (1996) : 6-10.
- [71] Mauro , “Effects , ”p.94.
- [72]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 , “Corruption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 no.3 (1993) : 599-617.
- [73] Sanjeev Gupta, Hamid Davoodi, Rosa Alonso-Terme , “Does Corruption Affect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 ”*IMF Working Papers* 98/76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1998) .
- [74] Daniel Treisman,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 A Cross-National Study* (forthcoming , 1998) , p.22-23.
- [75] For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 1960) ; and Treisman, *Causes of corruption*.
- [76] Treisman, *Causes of Corruption*, p.6.
- [77] Harry Ekstein, *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Democracy : Study of Norwa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6) , p.265.
- [78] Robert K.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1957 ; reprint,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68) , p.246-248.
- [79] 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Chicago : Free Press , 1958) .
- [80] Daniel Bell , “Crime As an American Way of Life , ”*Antioch Review*, Summer 1953 , p.131-154.

[81]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7) ; an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7)

[82] Plato *Republic* (trans.G.M.Grube, rev.C.D.C.Reeve[Indianapolis : Hackett , 1992] , chap.5) .

[83]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 Macmillan , 1951) , p.237.

[84] Lawrence E.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Cambridge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1985) , p.7.

[85] Banfield, *Moral Basis*, p.85.

[86] “A Message for Europe , ”*Economist* , 20March1999 , p.15.The Economist expressed hope that in reform, the European Union will“exploit the Union’s more northern balance and mores.”

[87] “Earthquake in Europe , ”*Financial Times* , 20 March1999 , p.10.

[88]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 1996-1997 (New York : Freedom House , 1997) .

[89] 原文如此。——译注

[90] 埃通加—曼格尔为了说明他的论点，有意强调了非洲的一些负面价值观。请参看他为本书撰写的第六章。我指出过，童年时期有一些价值观，例如社会上彼此支持和关心；相对而言的男女隔离；强调要成名成家而不自吹自擂；扩大情感联系。

[91] 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了许多精彩言论，其中有几位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当地”意见的证词。这几位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扮演了对现状不满的“内部人”角色，来证明他们自己本乡本土的文化是多么贫困，国内情况是多么糟。在如今这个后现代世界上，里里外外全翻了个儿，外面的东西翻进来了，里面的东西往外翻得到处都是（不妨想想CNN的电视新闻，VISA信用卡，麦当劳的“巨无霸”），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扮演的角色已变得日益复杂，甚至是暧昧不明。对于多数的周游全球的办事者——其中包括从“第三世界”出来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旅行计划如今比祖宗更重要。因此，若单凭国籍（或民族属性）就说有权代表那“当地”的声音，那是不免叫人生疑的。毕竟，是谁的声音更能代表“当地”？是那些从达喀尔或德里出来到西方“受教育”，就再也瞧不起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而眼睛向上瞅着美国乞求学识和道义指导及物质援助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或Ph.D（博士）？还是在非洲或亚洲乡下作了多年现场考察，因而理解和明白了那些“别人”传统之中含有的价值的“西方”学者？

我在会上听到的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而且令我惊讶的）言论，是全面地将善美和进步等同于基督教新教的教义，而且明白地暗示成功的新教传道可以加速经济的增长（皈依的人越多越好）。

[92] 正像我们这些世界北边的人一样，世界南边也有许多人持有他们自己形形色色的民族优越感。他们往往不理解我们，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想法，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觉得我们生活方式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小家庭生活习惯和性观念，从他们的道德观点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对我们的道德和理性无知，恰如他们对我们的道德和理性无知一样。

[93] 关于人类学界现状的这一消息，显然要很晚才能传到学术圈子之外。人们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总以为人类学家大多是激进的相对主义者。“报界”又热衷于散布这种看法。

[94] 奥伯梅耶（1999）和奥比奥拉（1997）详细叙述过医学界对妇女性器官手术给健康带来什么后果所作的研究。奥伯梅耶得出结论说，“有些大力宣扬这种习俗必然会造成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必定会毁掉妇女的性交快感，其实是证据不足的”。（1999）

[95] 如何给“自我监控的群体”下定义，也是一个问题。例如，一个民族并不一定是一个适当的在文化上自我监控的群体。一种文明也不一定是。适合于文化分析的群体很可能并非相应于政治上的或行政上的或人口普查上的范畴，如“亚洲人”或“拉美裔”或“黑人”或“印第安人”等。从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法治”角度看，有一些特殊文化群体（如门诺教派的严紧派Amish或撒特马尔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Satmar Hasidim）的非正式规范如果得不到正式的法律界定和保护，是否还能存在下去，也是一个有待于回答的问题。（见斯托尔曾伯格，1997）

[96] 一个人可以是多元论者而同时又承认确实存在着真实的和普遍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以及无可辩驳的道义原则，例如“残酷是坏的”，“对相同事物同样对待，对不同事物不同对待”，等等。然而，多元论者的一个看法是，价值观和原则只有当它们保持完全抽象而不涉及什么内容时，才会是完全客观的。与此相关的一个看法是，在具体的道义争论中，任何抽象的价值观或原则其本身均不能提供明确的指导。换句话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个人都是有道德和有理性的人，但彼此相遇而瞧见对方的习俗时，会不以为然地说“呸！”我把这称作“互呸”反应。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互呸”事例屡见不鲜。例如，行割礼和不行割礼的人几乎总是彼此看不顺眼。“互呸”反应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客观的价值观本身不能确定一桩婚姻的安排是对是错；屠宰牛羊之类大型哺乳动物祭天祭祖是好是坏；将年迈父母安顿在敬老院是恭敬还是不恭敬；保持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是善还是恶；人工流产是道德还是不道德；让男孩女孩到一定年龄通过包括修整性器官在内的仪式，与上帝立约或正式成为自己社会的成员，是值得称赞还是应受蔑视。有道德和安全理性的人对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完全可能出现意见分歧，尽管他们有一大堆的共同的客观价值观。

[97] 我还不是完全清楚，这一种预言所设想的全球化是仅为一种有限的形式（例如边境自由贸易），还是把西方的银行金融业务、投资方式、合同制等都深深渗入别的社会。当然，假如全球化的概念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包括社会、政治、伦理、信仰等其他领域，那么全球化就必定是与西方化齐头并进了。

[98] “米勒特”（millet）：指奥斯曼帝国内1856年以前享有自治权的非伊斯兰宗教群体。——译注

[99] Lawrenc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 (New York : Basic , 1997) , p.18.

[100] Linda Kerber, *No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Ladies :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 Hill & Wang , 1998) , p.307n.6.

[101] Howard Wiarda , “Introduction :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tin American Tradition , ”in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 Still a Distinct Tradition ?* (Boulder : Westview , 1992) , p.14.

[102] Elsa Chaney, *Supermadre : Women in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Austin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79) , p.32.

[103] Ronald Inglehart and Marita Carballo , “Does Latin America Exist ? A Global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 ”*PS :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0 , no.1 (1997) ; see also Inglehart’s chapter in this volume.

[104] Data on women in government can be found at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 [http : //www.ipu.org/wmn-e/classif.htm](http://www.ipu.org/wmn-e/classif.htm) > ; and the U.N.Women Watch < [http : //www.un.org/Womenwatch](http://www.un.org/Womenwatch) > .For other aggregate data, see FLACSO, *Mujeres Latinoamericanas en Cifras* (Santiago : FLACSO , 1995) ; Statistical Division of the U.N.Secretaria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 [http : //www.un.org/Depts/unsd/gender](http://www.un.org/Depts/unsd/gender) > ; andthe U.N.Development Program < [ht-tp : //www.undp.org/hdro/child.htm](http://www.undp.org/hdro/child.htm) > .The statistics used in this chapter all come from the sesources.

[105] Mala Htun , “Women in Latin America : unequal Progress Toward E-quality , ”*Current History* 98 , no.626 (1999) ; Htun , “Women’s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ummit of the Americas*, ed.R.E.Feinberg and R.L.Rosenberg (Miami : North-South Center Press , 1999) .

[106] Mary Ann Glendon, *Abortion and Divorce in Western Law*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 Glend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Law : State, Law, and the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 .

[107] Jacqueline Hermann and Leila Linhares Barsted, *O Judiciário e a Violência contra a Mulher : A Ordem Legal e a (Des) ordem Familiar* (Rio de Janeiro : CEPIA , 1995) , P.63.

[108] Giulia Tamayo León , “Delegaciones Policiales de Mujeres y Secciones Especializadas , ” *Acceso a la Justicia* (Lima : Poder Judicial , 1996) ; Centro Legal Para Derechos Reproductivos y Políticas Públicas y Grupo de Información en Reproducción Elegida (CRLP/GIRE) , *Derechos Reproductivos de la Mujer en México : Un Reporte Sombra*, December 1997 ; Sara Nelson , “Constructing and Negotiating Gender in Women’s Police Stations in Brazil , ”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3 , no.1 (1996) ; OAS/IACHR , “Report of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Americas , ” *Annual Re-port 1997* (Washington, D.C. :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

[109] U.S.Department of State, *Peru Country Report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1997*.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 30 January 1998.

[110] On which see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 Basic , 1991) , p.291.

[111] For recent reviews of the study of cultur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ee Diana Crane, ed. ,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 Emerg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 Blackwell , 1994) ; Jeffrey Alexander and Steven Seidman, eds. , *Culture and Society : Contemporary Debate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Richard Munch and Neil J.Smelser, eds. , *Theory of Cultur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 pt.1 ; Robert Wuthnow and Marsha Witten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1988) : 49-67 ; and Adam Kuper, *Culture :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112] Mabel Berezin , “Fissured Terrain : Culture and Politics , ” in *Sociology of Culture*, p.94.

[113] Ann Swidler , “Culture in Action : Symbols and Strategies ,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1986) : 273-286.

[114] Orlando Patterson, *Ethnic Chauvinism : The Reactionary Impulse* (Briarcliff Manor, N.Y. : Stein & Day , 1977) , p.177-185. Adam Kuper also emphasized this point in his *Culture*, p.xii-xiv.

[115] Walter Benn Michaels, *Our America : Nativism, Modernism, and Pluralism*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15. Cited in Kuper,

Culture, p.240-241.

[116] Robert Blauner , “Black Culture : Myth or Reality ? ”in Afro-American Anthropology :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Norman E.WhittenJr.and John F.Szwed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70) , p.347-366.

[117] Meredith Phillips et al. , “Family Background,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the Black-White Test Score Gap , ”inp.The Black-White Test Score Gapp. , ed.Christopher Jencks and Meredith Phillips (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1998) , chap.4.

[118] Howard Gardner , “Cracking Open the IQ Box , ”in The Bell Curve Wars :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ed.Steven Fraser (New York : Basic , 1995) , p.30-31.

[119] Arthur R.Jensen ,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 Towards Consensus , ”in Arthur Jensen :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ed.S.Modgil and C.Modgil (New York : Falmer , 1987) , p.376.Cited in Nathan Brody, Intelligence (San Diego : Academic Press , 1992) , p.297.

[120] Brody, Intelligence, p.309.

[121] Ibid. , p.41.

[122] Ibid.

[123] Margaret Archer, Culture and Agency : The Place of Culture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p.1.

[124] Ward Goodenough , “Culture : Concept and Phenomenon , ”in The Relevance of Culture, ed.Morris Freilich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 1989) , p.97.

[125] Ibid, p.94-95.

[126] Eugene Hunn , “Ethnoecology : The Relevance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for Human Ecology , ”in Relevance of Culture, p.145.

[127] Robert Boyd and Peter Richerson,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 p.33-37.

[128] RogerKeesing , “Theories of Culture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1974) : 73-97.

[129] Roy D’Andrade,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247.

[130] Roger Keesing, "Models, 'Folk' and 'Cultural': Paragigms Regained," in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ed. Dorothy Holland and Naomi Qui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69-393.

[131] Ann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1986): 273-288.

[132] Naomi Quinn and Dorothy Holland, "Culture and Cognition," in *Cultural Models*, p.6-7.

[133] Boyd and Richerson, *Culture*, p.40. They admit that these models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ir conception of culture, but they confine the cultural to stable social transmission because only such transmission "gives it an evolutionary dynamic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learning and its analogs" (p.34).

[134] *Ibid.*, p.36. Cf. David Lewontin, S. Rose, and L.J. Kamin, *Not in Our Genes* (New York: Pantheon, 1984), chap.5.

[135] For detailed references and a review of the historiography on this subject as well as an anti-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 see Orlando 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Consequences of Slavery in Two American Centur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p.25-53.

[136] Richard Sutch, "The Breeding of Slaves for Sale and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Slavery, 1850-1860," in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ed. Stanley Engerman and Eugene Genove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73-210.

[137] Cheryl Ann Cody, "Naming, Kinship, and Estate Dispersal: Notes on Slave Family Life on a South Carolina Plantation, 1786 to 1833,"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series 3, 39 (1982): 192-211.

[138] Stewart Tolnay, "Black Family Formation and Tenancy in the Farm South, 190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1984): 310.

[139] Anita Washington,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Pregnancy-Related Activity Among U.S. Teenagers,"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9, no.1 (1982): 16.

[140] See, for examp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 *The "Flip Side" of Black Families Headed by Wome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Black Me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 1984); William Julius Wilson and Kathryn M. Neckerman, "Poverty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 "in Fighting Poverty :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ed.S.H.Danziger and Daniel H.Weinberg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p.232-259.

[141] See especially NeilG.Bennett, DavidBloom, and Patricia Craig , "The Divergence of Black and White Marriage Pattern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 no.3 (1989) : 692-722.

[142] Katherine S.Newman, No Shamein My Game :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 Knopf , 1999) , p.198-203.

[143] Christopher Jencks, Rethinking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R.G.Wood , "Marriage Rates and Marriageable Men : A Test of the Wilson Hypothesis ,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0 (1995) : 163-193.

[144] George A.Akerlof , "Men Without Children ,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98 , p.287-309.

[145] Lee Rainwater , "The Problem of Lower-Class Culture and Poverty-War Strategy ,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ed.DanielP.Moynihan (New York : Basic , 1969) , 229-259.

[146] Ibid. , p.248.

[147] Ibid. , p.247.

[148] See Roger Waldinger, Still the Promised City ? Afro-Americans and New Immigrants in Post-Industrial New York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149] Rainwater , "Lower-Class Culture , "p.234-235.

[150] Anderson, Streetwise, chap.5.Seealso Richard Majors and JanetBill-son, CoolPose (Lexington, Mass. : Heath , 1992) , Chaps.2-3 ; CarlNightin-gale, OntheEdge : A Historyof Poor Black Children and Their American Dreams (New York : Basic , 1993) .

[151] John Wong , "Promoting Confucianism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Case of Singapore , "in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ed.Tu Wei-ming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281.

[152] John Kuo Wei Chen , "Pluralism and Hierarchy : 'WhizKids , "the Chinese Question , 'and Relations of Power in New York City , "in Beyond Plu-ralism : The

Conception of Groups and Group Identities in America, ed. Wend F. Katkin, Ned L. and sman, and Andrea Tyree (Champaig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98) , p.126-129.

[153] There are by now a great many studies of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1999. See, for exampl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1998-99 : Beyond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 1998) , esp. chap.2.

[154] The best-known work in the 1950s was written by the sociologist Marion Levy. See Marion J. Levy and Kuo-heng Shih,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 Two Introductory Essays (New York :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1949) .

[155] An exception is the early work of G. William Skinner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Thailand :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ailand , 2 vols.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59 , 1961) . Volume 2 focuses on the nature of the networks linking different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Bangkok Chinese community.

[156]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8 (Beijing : Statistics Press , 1988) , p.634-641.

[157] 狄纳莫的意思是发电机，电动机。此处原文中的dynamos和dominoes谐音，故此处皆用音译。——译注

[158] 不用说，在亚洲经济危机的起因方面，还有许多别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错误，以及一些西方投资者的行动。但鉴于本章的主旨，我们在这里将只谈到文化因素。

[159] The number came from Nayan Chanda , “Surges of Depression ,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31 December 1998 , p.22.

[160] Economist , 2 January 1999 , p.56.

[161] Max Webe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 in 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Glencoe : Free Press , 1951) , p.235.

[162] Ibid. , p.248. Contrary to Weber, Robert Bellah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Japanese do have some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 match the Protestant ethic. See his Tokugawa Religion :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 1957) .

[163]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关键在于中国人对家族以外的人缺乏信任，这恰与日本形成对照，日本人懂得他们必须与家族之外的人打交道。见

Fukuyama, Trust :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95) .

[164] For a comparison of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patterns on East Asian developments, see Lucian W.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chap.3.

[165] 欧洲的大银行集团罗思柴尔德家族也是这样，老罗思柴尔德（1743—1812）有五个儿子，这五兄弟就分别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了五个点，见Niall Ferguson, The World's Banker (London : Weidenfeld & Nicolson , 1998) .

[166] Danny Unger,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in Thailan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esp.chap.1.

[167] 在英语中，这里的crane既作起重机讲，又作鹤、鹭讲。——译注

[168] 10.For a sophisticated examina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Peter Berger and Hsia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Model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 1988) .

[169] See Tu Wei-ming, ed. ,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States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170] Lo Rongqu, ed. , Xihua yu xiandaihua (West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eijing :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17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 Free Press , 1992) .

[172]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96) .

[173]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see William T.deBary,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174] Debra J.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9.

[175] Ibid, p.12.

[176] Amartya Sen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tock and flow in “The Concept

of Wealth ,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Th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Denelopment*, ed.Ramon Myers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1996) .

[177] For the best practical example of this view of prosperity, look at James Wolfensohn’s internal but now widely accessble memorandum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 (CDF) , spring 1999.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Bank has begun to implement a “holistic”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round the concept of a“social balance sheet.”

[178] Sen , “Concept of Wealth , ”p.7.

[179] Thomas Sowell, *Conquests and Cultures* (New York : Basic , 1998) , p.329.

[180] Alex Inkeles, *One World Emerging* (Boulder : Westview , 1998) , p.316.

[18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Forty-Three Societie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chap.1.

[182] Michael Fairbanks and Stace Lindsay, *Plowing the Sea-Nurturing the Hidden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oston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1997) .

[183] We adapted thisconcept from the domai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first coined in 1948 by Kenneth Craik, to enrich our se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ols.See also Chris Argyris, *Reasoning, Learning, and Action :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San Francisco : Jossey-Bass , 1982) ; and Peter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New York : Doubleday Currency , 1990) , chap.10 , “Mental Models.”

[184] Symposium participants Mariano Grondona and Lawrence Harrison have developed this rich concept of pro-and anti-innovation value systems.

[185] Douglass North ,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Change ,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12 , The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February 1998.

[186]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 Basic , 1973) , p.89.

[187] EdwardO.Wilson , “From Genes to Culture , ”*Consilience* (NewYork : Knopf , 1998) , chap.7.

[188] Inkeles, *One World Emerging*, P.24 ; italics added.

[189] Joseph Stiglitz ,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he Prebisch Lecture at UNCTAD, Geneva , 18 October 1998) .

[190] Paul Krugman , “Does Third World Growth Hurt First World Prosperity ?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August 1994 , p.113-121.

[191] Lawrenc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 (New York : Basic , 1997) , p.261.

[192] Inkeles, One World Emerging, P.83.

[193] This schema for change was inspired by the work primarily of Roger Martin, a director of Monitor Company and dean of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by John Kotter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he schema has been practiced, shaped, and improved by Monitor country competitiveness advisers Joe Babieac in Bermuda, Jim Vesterman in Colombia, Kaia Millerin El Salvador, Jeff Glueck in Venezuela, Ethan Berg in 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 Randall Kempner in Peru, Matt Eyring in Bolivia, and Josh Ruxin in Uganda.

[194] This conclusion is shared by 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 See thei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5398 , December 1995.

[195] See Paul Krugman , “Does Third World Growth Hurt First World prosperity ?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August 1994 , p.113-121.

[196] The founder and leader in this field is Chris Argyr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Harvard and director of the Monitor Company. His flagship book on this subject is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Defenses (New York : Prentice-Hall , 1990) .

[197]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 Norton , 1981) , p.201.

[198] The debate on cultural relativism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chapter but will be developed in detail in our book-length format. For now, look at both sides of the argument in Daniel Boorstin, The Seekers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98) , p.195 , and symposium participant Richard Shweder’s chapter in this volume , “Moral Maps , ‘First World’ Conceits, and the New Evangelists.”

[199] The phrase “prosperity is a choice” is language shared with me by Michael Porter.

[200] Howard Gardner, Leading Minds :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 (New York :

Basic , 1995) , p.293

[201] Peter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New York : Doubleday , 1990) , p.8.

[202] See 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tr ,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 Working Paper 5398 , December 1995 ; see also Michael Fairbanks and Stace Lindsay, *Plowing the Sea : Nurturing the Hidden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oston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1997) , chap.1.

[203] Michael Porter ,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Competitiveness , ”in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eneva : World Economic Forum , 1999) .

[204] Senge, *Fifth Discipline*, p.174.

[205] Special thanks to Jonathan Donner, who both designed the survey and performed the analysis to generate this data.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can be found in his forthcoming article , “Making Mental Models Explicit :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for Encouraging Change.”

[206] Carlos Rangel, *The Latin Americans-Their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77) .The French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76 by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 Paris.

[207] Octavio Paz, *El Ogro Filantrópico* (Mexico City : Joaquín Mortiz , 1979) , p.55.

[208] Claudio Véliz, *The New World of the Gothic Fox-Culture and Economy in English and Spanish Americ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 .

[209] Ibid. , p.190-191.

[210] Plinio Apuleyo Mendoza, Carlos Alberto Montaner, and Alvaro Vargas Llosa, *Manual del Perfecto Idiota Latinoamericano* (Barcelona : Plazay Janés Editores , 1996) .Madison Books is planning to publish the English edition in 2000.

[211] Eduardo Galeano,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 Siglo XXI Editores , 1979) .This is the twenty-sixth edition.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71.

[212] Plinio Apuleyo Mendoza, Carlos Alberto Montaner, and Alvaro Vargas Llosa, *Fabricantes de Miseria* (Barcelona : Plazay Janés Editores , 1998) .

[213] Carlos Alberto Montaner, *No Perdamos También el Siglo XXI* (Barcelona :

Plazay Janés Editores , 1997) .

[214] Mariano Grondona, Las Condiciones Culturales d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Buenos Aires : Editorial Planeta/Ariel , 1999) .

[215] For an analysis of the Protestantization phenomenon, see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London : Basil Blackwell , 1990) .

[216] Lawrence E. Harriso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The Latin American Case (Cambridge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1985) .

[217] Lawrence 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 (New York : Basic , 1997) .

[218]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21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1966 ; reprint, New York : Doubleday Anchor , 1969) , p.308-309.

[220] 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 Pantheon , 1968) .

[221] Ibid. , p.104.

[222] Ibid. , p.27-28.

[22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224] See, for example, Bernard Lewis , "The West and the Middle East , " Foreign Affairs 76 (January-February 1997) .

[225] Ibid. , p.45.

[226]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 1958) .

[227] Hernando de Soto, El Otro Sendero (Lima : Instituto Libertad y Democracia , 1986) .

[228] Michael Fairbanks and Stacey Lindsay, Plowing the Sea-Nurturing the Hidden Sources of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ambridge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1997) .

[229] Lionel Sosa, The Americano Dream-How Latinos Can Achieve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Life (New York : Penguin , 1998) .

[230] Ibid. , p.2.

[231] Ibid. , p.2

[232] Ibid. , P.7.

[233] Ibid. , titleofchap.4 , p.47-68.



ТРАТ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 (俄) 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 修订本.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011-9154-3

I. ①大... II. ①雷... ②徐... III. ①政治事件 - 研究 - 苏联 - 1991 ②政治 - 概况 - 俄罗斯 IV. ①D751.25 ②D7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6078号

目录

中文版前言

序言：真相与后果

第一章 乱自何来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国内政策：“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对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民族关系：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苏联解体：审判何时开始

第二章 阿拉木图：不妥当的任命引起严重后果

不妥当的任命

失乐园

复乐园的努力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

第三章 第比利斯：颠倒黑白的审判

民族主义狂热

恐怖之夜的真相

颠倒黑白的审判

政客得势的代价

第四章 费尔干纳的黑色六月

第五章 巴库：谁是罪人？

第六章 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

民族主义运动坐大

“萨尤基斯”：从口号到应验

不想听到的回答

悲惨星期日

第七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罗斯人成了弃儿

铲除俄语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政治犬儒主义

第八章 后果：可耻的审判

政治审讯：政敌

可耻审判：卫国战争老战士

第九章 “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

叶利钦的别洛韦日“礼物”

俄语与乌克兰语

第十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同反法西斯人士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独立国家须有独立教会”

橙色噩梦

第十一章 苏联：从改革到解体

党内局势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第十二章 政权处于弥留时刻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蒙之晨

夜幕笼罩大地

后记

雷日科夫小传

译后记

中文版前言

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影响至巨的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如今，苏联的兴亡史、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及其后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理论工作者研究社会主义前景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我们是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赴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来华访问，我也曾当过翻译。我结交了很多苏联朋友，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苏共和苏联的逝去，这些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因为这层关系，我对苏联解体之谜格外关注，对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格外留心。

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对彼时的真实景况和内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意义。雷日科夫这些年写过不少书，但他对此书特别重视。他说：“这本书我写了十多年。”书的主题是苏联解体——这是对他震撼至烈的人生经历。书中除了叙述苏联发生在1989至1991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后果的反思。起初作者只是备忘，把一些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可是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他和整个俄罗斯思想界一样，开始了对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他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此书。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

回答我心灵和理智的呼唤。”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拉开时间距离的观照可能更为客观、冷静、清明和超脱。痛定思痛之余，15年来，雷日科夫几乎没有一天放松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研究。他曾同数以千计的本国和国外思想精英交换看法，促膝长谈；也曾无数次深入底层，倾听普通人的意见；他还曾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此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全面回顾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清晰地梳理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很多，以致许多资深的研究者也感到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但由于雷日科夫当时身处最高决策层，因此对于历史关节点的把握就非常准确，对于此起彼伏的各种事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叙述得更合乎逻辑，也更为清楚。这种系统、明晰、中肯、准确、全面并具有独特视角的叙述，对所有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都将是莫大的帮助。

雷日科夫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和以所谓“民主派”为代表的社会上的反对派是如何同流合污，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条则是苏共领导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是如何一步步丧失领导权，而苏联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解体垮台的。其间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各种社会力量的起伏动荡，各种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阐述十分深刻细致，值得深思，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这本书虽属宏观叙事，但却始终保持了明白晓畅的语言叙事风格，结合了大量历史细节，以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和关于某些问题的悬案，可谓做到了有根有据，深入浅出。而且事事讲来心平气和，有睿智的长者之风，读起来引人入胜，发人警醒。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大国悲剧”。前苏联7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蕴藏丰厚的研究资源。在当前我国思想舆论界掀起一轮“大国

研究热”的当口，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样一部解剖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崩溃的著作，无疑很有意义。我相信，此书的翻译出版，定能引起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定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苏联研究以及其他内容广泛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是为序。

阎明复

2007年11月

（前言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序言：真相与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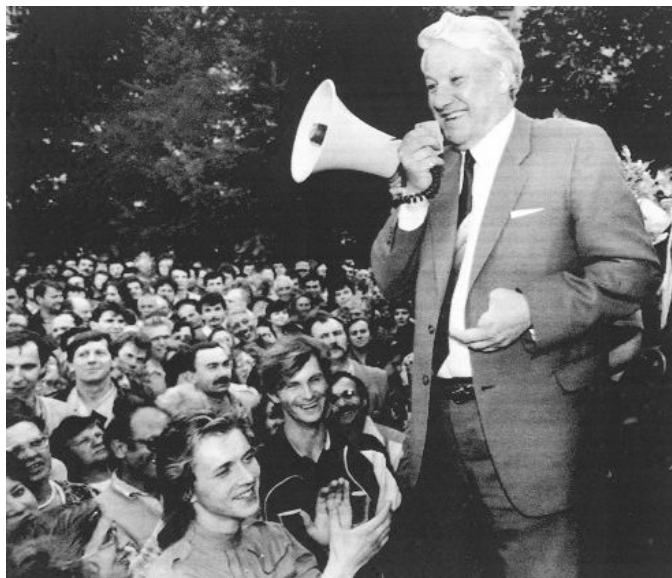
瓦连京·拉斯普京

事情的真相如何，产生的后果又如何？——这就是本书的内容以及意义之所在。它详细讲述了发生于1989—1991年间导致一个强大国家解体的各种事件；它还讲述了各共和国分裂出去后，这些事件对千百万人民造成的后果。这本书读起来太沉重。特别是对于老一代：他们既是这些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参与者。他们不由自主会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苦和歉疚。

自从1991年12月苏联彻底瓦解以来，15年过去了。15年来，出现了俄罗斯的新一代。对于他们，这些事件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遥远得就像1917年的革命，或者17世纪初波兰的入侵。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了70余年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三色旗取代。这是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飘动。（新华社稿）



在1989年5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落选的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5月29日递补鄂木斯克大学副教授卡赞尼克主动放弃的席位，出人意料地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图为叶利钦事后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向集会群众发表讲话。（新华社稿）

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改革”高潮时期，叶利钦从莫斯科四郊的科学城搬来十多万支持者，拉到练马场 ¹ 去搞大游行。那可都是些有教养的成年人啊，而且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把《真理报》上转载的一篇由意大利记者撰写的关于叶利钦在美国耍酒疯的文章撕烂了，扔在练马场的地上，使出吃奶的力气又是踩又是踩。那可是事关他们包装着民主之父外衣的偶像，是他们的旗帜，是被他们刚刚拥戴起来的领袖啊！那些人已经不可能接受任何别的形象，也不可能听得进任何别的道理了。几天之后，报纸的总编被解职了。直到现在，我的耳中依然回响着那些发言者的叫喊，回响着那充满火药味的、本能的、振振有词的宣泄和咆哮。

我之所以回忆起这个场景，只是为了展示那些“可诅咒的”日子究

竟有着什么样的环境和心理氛围。没错，上帝要惩罚谁，就一定要先把他变成个丧失理智的人。

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里对那些年人民代表大会在事件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说得很谨慎。作为一名“人民当政机构”的代表，历次代表大会，甚至每一次会议，我都从来没有缺席过，因此有权多说几句：那真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把已经白热化的氛围炒作得更加炽热了。不过，这种白热化氛围当时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边疆地区，而1989年5—6月间对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星期转播，却把仇恨的种子撒遍了每一个角落。“革命者”对此作了精心策划，并有精确分工。不排除大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正好安排在这个时间。否则怎么会这么巧，恰好给肆无忌惮地向联盟政权展开进攻提供炮弹呢？这一来全国都可以看到当局有多么软弱，它正在退让。代表大会开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闭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发生了血洗费尔干纳事件。1990年1月，巴库再次出现更恐怖的血腥屠杀。而且，紧随从“人民监狱”里跑出来的自发暴徒之后，维尔纽斯又发生了电视塔挑衅事件，还动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难道是偶然吗？如果……谁都知道，血总是越搅越腥的。

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出现的野蛮行径简直难以名状。为了让非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仅要求不讲道德，不知羞耻，还要不顾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讨论！那些家伙像划分战斗队似的按地区划分小组，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在国内外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的支持下，经常用打冲锋的办法来抢话筒，对与会代表横加谩骂，而且讲的话常常根本不是冲着人去的，而是冲着电视镜头，更不许别人开口。只要见到谁对他们构成威胁，谁能阻挡他们的那种破坏的杀气，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罗季奥诺夫上将等，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刻意罗织罪名，提供伪证，以最无耻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势。

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

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

再后来到了1993年。在炮打白宫之后，这批新主子汇集到克里姆林宫，想再次庆祝选举胜利，但胜利却没有出现。其中的一个，作家卡里亚金，一个最疯狂的家伙，对着镜头喊：“俄罗斯呀，你疯了！”

而一贫如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只不过是强加给它的全国规模的疯狂中刚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苏醒。

本书作者雷日科夫并不是旧制度、旧体制的卫道士。那些东西驾着已经破损的轮子，如今显然是难以前进了。他主张的是一种逐步的、没有痛苦的向现代经营管理的转变。如果能够接受雷日科夫政府制定的纲领，在6—8年期间，而不是像冒险分子所主张的那样在500天之内，把经济转到市场轨道，那么，巨大而沉重的国家大厦就不会垮塌，也不会在自己的废墟中埋进千百万条生命。

雷日科夫最有权来写这部令人悲痛回忆录。他不仅有权写，而且生活赋予他责任，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对于发生的一切，他没有任何应该自责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装好人左右逢源；谢瓦尔德纳泽是暗地里，而雅科夫列夫则是公然地同情和帮助拆毁大厦的人；利加乔夫只能被迫对无耻的法西斯指控左推右挡，有一段时间还剥夺了他起积极作用的权利；只有雷日科夫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讲坛，召唤理智，希望能够制止解体。

每当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现场。在白热化的费尔干纳，他把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从死神手中抢夺出来，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俄罗斯；他以最快的方式调派空运和陆运工具，从巴库运送抢救出来的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在本书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悲惨事件以完整的逻辑展现出来。苏联解

体，没有赢家，无论高加索，还是波罗的海沿岸，无论乌克兰，还是亚细亚“腹地”，哪里都没有和平，没有幸福。有些人妄自尊大，自我吹嘘，但伴之而来的必然是软弱无力；有些人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自贬为无足轻重的臣属之国，前头的苦头还有得吃；还有一种人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除了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到处都在清除俄语，就像是俄语也成了俄罗斯不讨人喜欢的代理人。这些人原本是在俄罗斯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但却说什么也消停不下来，说什么也舍不得停止吹胡子瞪眼睛：“哼！怎么会有股俄国味儿？”——而且，这股劲头在俄罗斯本土居然也非常盛行。

于是，雷日科夫又像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这回是冲过去保卫俄语，保卫由于肢解派的意愿而流落“异国他乡”的千百万我们的同胞。不过，有些人还是不愿接受真理。但是，愿意也罢，不愿也罢，该说的他照样要说。缩头缩脑躲进掩体的事他永远做不来。

（序言作者为俄罗斯著名作家）

1 紧靠着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广场，位于亚历山大花园和无名烈士墓旁边。现该广场地下又建有新的购物中心。——译者

第一章 乱自何来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诞生和发展常使我想起一条河。人类生活的变化就跟一条河一样，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还有先后流入主河道的各条支流。它们把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杂质。生活之流也像这条河一样，它逐渐积蓄着力量，临到末了，则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为人们带来欢乐，或是由于引发彻底毁灭而为人们带来悲哀。

苏联人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自从统一国家毁灭以来，15年间发表了无数回忆录，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拥有着自己的解释。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抄写历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统治者。但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

动笔之始，我还得提起一个现在说来已经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入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在布拉格签署议定书，宣布1955年签订的华约有效期结束，华约不复存在。（新华社稿）

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而且，许多人很自然地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苏联时代——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劳动、休息、教育、医疗服务、必要的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

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冷战”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

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

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们的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提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在这群虚伪的家伙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看到这种改革已不可逆转时，他们这才公开地大声宣扬，说他们再清楚不过，要是照他们的脚本演下去，会对大多数人民和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他们——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之后，人民觉醒了。到了今天，所谓的“500天计划”就很难赢得掌声和欢呼了。

但这个计划的制订者亚夫林斯基、布尔布利斯、费奥多罗夫、扎多尔诺夫等人还是会记得的。他们记得，但他们在想办法让人民忘记。亚夫林斯基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叫“亚布卢”党。他

连续十年宣扬自己的思想，可是却从来没有敢提自己的这个产儿——500天。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现在，盖达尔这个经济激进主义的跟屁虫及其同伙居然还有脸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上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末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

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会上他就说过：“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

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看看他后来离职后的所作所为，看看他那些公开否定党的言论，不由得要对他的真诚，对他的信念，还有他是否正派的问题，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1989年5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是他在会上发言。（新华社稿）

1991年8月23日，当蒙羞的苏联总统在72小时软禁后由福罗斯送回来，跑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耻辱讲坛”发表演说时，他还能说一些他信奉社会主义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党之类的话。可是时间仅仅过了一天，他却……放弃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再就这个问题发表宣言时，他竟然颠三倒四地说，他的责任是像保护国家公民那样保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免受无根据的法律追究，同时还宣布党自行解散。

圈圈终于圆上了。这种情况迟早总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同党分道扬镳了。但为什么他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看是潜意识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東西起了作用，总相信党的领袖总书记的一切行动不会有错。

那些日子可是胜利者趾高气扬的日子。趾高气扬的还有一帮立马就倒向他们，倒向权力的人，哪还管这权力究竟是什么权力！见风使舵的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信念。看来那些抢到了政权并自称国内唯一民主派的人们，如果他们真是民主派的话，就应该委托同样是“民主”的检察机关，对那些他们认为是70年来把国家搞到丧权辱国一贫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诉才是。难道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诩为把我国建成真正法治国家而奋斗的最高尚的战士吗？

不过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有些人昨天也是共产党员，而且远不是什么党内的小角色，可他们又起过什么作用，该负什么责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这么一个绝对违反法律，违反民主原则的解散苏共的法令呢？1500万共产党员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来，当时真没有几家报纸能忍得住不挖苦说，这个命令是叶利钦在过节的时候给倒台的共产党送的一份厚礼。不过他们“忘记”了，几十年来，这个日子可一直是整个国家的节日，是全民族的节日啊！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十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到了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而且还号召进行报复。在有些发言中，可以感到发言人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政治家，都还

不够成熟。他们表示，希望能对摆脱了“苏共压迫”的这个国家有所帮助；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则是完全自觉的、专为破坏党的威信而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是通过历史发展而成就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它同国家组织已经水乳交融地连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为解体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党的威信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那些导演这一切的人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

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1991年3月10日莫斯科练马场的群众大会。（马蒙托夫摄）

对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1989年4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图为戈尔巴乔夫和撒切尔夫人会谈前在首相府合影。（新华社稿）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

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1991年7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会见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
（新华社稿）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15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

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现在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钱，那就去买纸，就去印刷，如果没有，那你就关门。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评过去以及批评当时的“停滞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闻报》和以柯罗季奇为首的《星火杂志》表现尤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罗季奇任命为《星火杂志》主编的那段往事。在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乌克兰。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柯罗季奇很了解，反对把他调到莫斯科来。但利加乔夫作了最后的决定。他以特有的固执一心一意要提拔这个人，认为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改革者。利加乔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书中有一本未来《星火杂志》主编的书——《仇恨的面孔》，是讲他的美国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后来，等到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又跑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其实是躲到那边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和老师又知不知道，这位教授过去是怎样写他们国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乔夫和他的战友们却读过这么一部作品，而它无疑对总编的任命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和良心变得有多快。



1991年，十月的红场上，来自苏联各地的人们在列宁墓外排起长队，等待瞻仰列宁遗体。（新华社稿）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它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对他们再狠点！”“扭断他们的脖子！”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这是我后来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无数次会见才得知的结论）。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雷日科夫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上。（作者提供）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国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

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¹

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

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它们的责任就在于保证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制订可以为大家都接受的多样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们国家，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众所周知，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为例，那里的沙文主义者为了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或者简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罗斯族从当地排挤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哪！而当那些国家存在于苏联内部的时候，这些俄罗斯人又为国家的发展作过多少贡献啊！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实际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

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相对立的东西。何况，在上世纪90年代，反爱国主义简直都已经成了叶利钦政权的招牌。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把脏水往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头上泼，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为的就是要把这些概念彻底消灭，尤其是在年青一代的眼里。当局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也不放过。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弹，不过当然是畸形的反弹，那就是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极端主义组织。

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样的概念同爱国主义的概念之间，人的意识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很清楚地划出一条界线，更何况年轻人。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不能的！

最近几年来，我国这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在前线和后方参与过斗争的老战士又开始受到尊敬，人们对自己国家不寻常的历史开始比较尊重。不过，事情总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些昨天还在践踏我们历史和伟大胜利的人开始搞起了爱国主义运动。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们所说的这些人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全人类价值”。我也想就此谈一点看法。1987年戈尔巴乔夫把这么个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库，为的是想要“淡化”党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起初，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含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后来，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经济方面，等等。总书记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

的反响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吹。而党和经济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则对之充满了疑虑。

国内生活中我们原来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两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财富，却把大多数老百姓搞得一贫如洗；我们祖国的伟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货的排挤，文化变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等等。这就是最近15年来为我们造成的境况。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不过这个过程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生。

这种把“泛人类价值”向俄罗斯土壤不加考虑地、片面地、机械地移植的结果，无疑对实现在美国倡导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苏联解体：审判何时开始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

治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雕塑家涅依兹韦斯内在给赫鲁晓夫竖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现了赫鲁晓夫的行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两部分（由黑白两种大理石做成），以此来强调这个人思想行为的矛盾性。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他放松了对文化活动家们创作的监控，另一方面，他又捣毁了练马场大厅的雕塑展，其中就有这个涅依兹韦斯内的作品。他批准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时又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给予重创，对苏军给予沉重打击。

考虑到这种无法一以贯之的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解冻”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伴随着融雪的温暖的天气呢，还是制造泥泞，制造污泥浊水，制造阴雨连绵或者制造雾气弥漫的天气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确定：一切都取决于究竟从什么立场来看这个现象。

坐上国家的高位之后，戈尔巴乔夫起初对军人是很尊重的。他心里很明白，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军队始终是社会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过不久，他就开始向军队发起攻击，甚至动用了一批“分析家”，他们对人民反复宣称，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为大量经费用到了军队身上。

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小伙计——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他帮了不少忙。众所周知，这个人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灾难性的痕迹。这位外交官居然宣称，我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19%。后来戈尔巴乔夫拿过来凑了个整数，于是又变成了20%。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国防开支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12%，而且从来也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因此，戈尔巴乔夫在破坏苏军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鲁晓夫的老路。

这样一来，在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年代，我国军事政治阵地和国防阵地就目标明确地、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装。读者可能会问，那么国家的其他领导成员又到哪里去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读者们也看看今天的情况。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是否了解总统外交谈判和外交决策的情况呢？显然并不了解。苏联那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虽然是内阁成员，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一手操办的。

从1945年起，战后年代世界上形成了两极政治体制：一极是苏联，而另一极则是美国。这种体制为维护和平，避免总体上的武装冲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证，尽管当时一直在搞所谓的“冷战”。由于世界上两个主导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对地缘均势还能得到保持，这样才能在出现问题时求得最终的政治解决。越南的情况是这样，阿富汗的问题是这样，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

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国侵略的因素。两极世界垮台了。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也讲了不少建立多极世界的话，但至今也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政治力量配置，对于仅余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梦想着在世界上起领袖作用，如今目的终于达到，他们的手脚放开了。

后果马上显现出来。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就是南斯拉夫。经过十年动乱，一个受到全世界承认的统一国家，被肢解成六个部分，现在又要分裂出来第七个“主权独立”国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国也找到了把联军开进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却不断要求苏联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后来，它甚至不顾联合国的反对，纠集了一些国家，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在当地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统治。结果把这

个国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来将会是黎巴嫩、伊朗、朝鲜和其他所有在某一点上不合乎美国标准的主权国家。

今天发生的种种，实际上同1938年在欧洲出现的问题并无二致：当年的英法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说得确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搞了妥协。西方以这一行动为法西斯德国奴役欧洲各国、向苏联开战亮起了绿灯。今天，西欧以自己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支持，亲手为它统治世界扫清了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输一种观念，似乎只存在一种文明，那就是美国和西欧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继承人（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即希腊罗马的，而且还继承了东方的，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似乎只有这种西方的价值观体系——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价值观体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价值观体系。

不过这种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论的炮制者，其虚伪无知也实在惊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一基本的、“无可争议”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没有中国、伊朗、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地位。甚至就连日本和中国以及今天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所展示的科学、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飞跃，也无法动摇拥戴这一理论的许许多多西方政客。

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俄国虽自身的麻烦和问题不少，但也还是积极努力地在保持与自己伟大历史相称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一复兴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丧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贵特色、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危险。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伟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无数其他民族无数个世纪以来友好合作基础上的产物。它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点，它是一条连接欧亚的陆地通道。

俄罗斯广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气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长期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一方面

要有超前的思维，要善于同面临的危险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以解决国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较倾向于仁爱，又倾向于崇拜领导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这些民族自觉意识中的特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们同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大国地位意识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东西，一个巨大的国家就不可能复兴，人民的统一就得不到保证。

东正教是俄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许多个世纪之前，正是它，作为一种建设强大国家的思想，促进了俄国社会分散力量的团结，促进了我国国家思想的形成。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一支同东正教一支之间的思想冲突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它决定了东西方之间斗争的本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对立，是抑制西方思想扩张的形式之一，隐藏在这种东西背后的，首先是领土利益。本书在后面还要讲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以及乌克兰的教会斗争的问题以及它的后果。

我们国家在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决定付诸实施之前，一定要考虑到本国人民的思想情绪，它的深层的精神缘由。东正教是俄国人民的国教，唯有它才能比较全面地符合俄国人民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也要求国家对其他宗教信仰给予同样的重视和尊重。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佛教或者犹太教。不过，在尊重我国的这些传统宗教的同时，我想在本章中谈谈东正教问题。



1991年3月17日，一位莫斯科市民到投票站参加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投票，决定苏联是否保留。（新华社稿）

今天，我们越来越经常听到有人说，东正教价值体系不太适合市场经济。暗地里针对东正教也正在开展一场攻击。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

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

在消灭俄国文化的行动中，根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独特传统的努力，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比方说，美国对这个目标就毫不掩饰。近年来，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文化侵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毁灭俄国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公开性诅咒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有的盲目，有的自觉，他们疯狂顶礼膜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

在我们国家的那些“思想统治者”的支持下，这场进攻战的结果，就是由美国通过它在我国的代理人，实际掌控了俄国电视这一对百姓影响最大的信息媒体。传统价值观念遭到清洗，“美国生活方式”的原则和风格被强加到人民头上。头脑健全的人们和社会活动家力图抗御这种局面，但遭到俄国电视实际主子的激烈反对。

行政和立法当局实际上是在同这种情况妥协。而且，我国文化就整体而言目前已被阴暗、迷信、反科学的观点所淹没。从电视屏幕和“黄色”报刊汹涌而来的蒙昧主义之流是那么的浓稠，以至星星点点的健康思想、端正行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文明之间的边界又回到了历史上原来应有的老地方，划出了与我们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西方为了促使苏联垮台，树立了一个把欧洲文明分水岭向东推移的目标。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这里指的是他们再次力图消灭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战略老对手——俄国，首先是俄罗斯族——的独特文化的企图。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实际上所有在苏联垮台后感到手足无措的斯拉夫民族，都无情地陷入了从属于西方的境况。他们通过北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机制，跟西方拴到了一起。唯有南斯

拉夫是一个例外。之所以会选中它来作为侵略和破坏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同时也爆出了自己就广义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间接地证实了一种猜测，这就是文明的分裂将首先发生在西方—俄罗斯一线。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无论西方如何在我国内外竭尽全力，但依然难以淹没并同化俄罗斯的和俄国的文化。历史表明，我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文化所吞并过，反因此而增强了表现自我鲜明独特文化个性的条件。

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导致祖国文化的完善，而是导致它遭到破坏。更何况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罗斯拥入自己的怀抱。

有些接近叶利钦的学者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中止了我国文化的欧化，剥夺了它彻底变革自己的良机。这些学者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毕竟还讨论讨论俄国文化。可是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文化这个概念。

毕竟，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对话，才能为人类赢得未来。联合国的活动保障了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归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创建联合国的倡议者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是当今美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对这位先驱者的理想是一种直接的背叛。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苏联解体之后）某些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信任度遭到破坏。今天，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我们遇到了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深刻危机。

素有民族和国家命运主宰之称的北约不顾一切地东移，该军政联盟各成员国脱离联合国监督的实际状况，联合国威望的灾难性丧失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以这些国际组织目前的状况，是再也不可能客观地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他们统统都处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沦为美国的工具。他们已无力成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胁面前，人类能找到维护世界平衡机制基础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不过，在21世纪，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胁就是那些越积越多的全球文化问题。

“我想，”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多夫尼奇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差异的事实，并安排好它们之间的对话。掀起人类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世界异常丰富多彩，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相信，当这种对话的机制逐渐消亡的时候，当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趋于结束的时候，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定将不复存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宽容。应该找出一些线索，一些头绪，虽说十分复杂，也要力求作出一些决定来，解开这团问题的乱麻。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

本书试图探讨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如果读者在其中能找到有关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哪怕是部分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的回答，笔者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1 本节参考了哲学博士M.C.朱努索夫教授的理论著作。

第二章 阿拉木图：不妥当的任命引起严重后果

不妥当的任命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创纪录的短会。与会者只用18分钟，便一致同意解除领导哈萨克斯坦几近30年的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又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提名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党组织领导人盖纳季·瓦西里耶维奇·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

当时正值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实施第20个月。随着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出现了变动：许多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多年的老领导理应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那些对新思想和新活动形式更为敏感的新人。

严格说来，明显的干部更换在安德罗波夫领导时便已开始。在契尔年科当政时范围继续扩大。到了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情况表明，从1983年开始，几年内有90%的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被替换。市委和区委书记在80年代后期的轮换，把这一级别

党的干部更新了2—3次。

第一阶段——即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干部更换，为他掌权扫清了道路。很明显，如果被勃列日涅夫的干部包围，戈尔巴乔夫就很难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交椅。第二阶段即挑选干部来实现改革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戈尔巴乔夫登上国内最高职位——苏共中央总书记，才得以首先针对党内高层领导着手“清洗”。

在1985年7月党中央全会上，罗曼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责令其退休。他在中央书记处的职位及相关职责——监管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工作——由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扎依科夫接替。

又过了不多时，在同年的12月，首都党组织领导人格里申也被责令退休，此前不久任中央委员会建设部主任、而后成为苏共中央书记的叶利钦接替了他的职务。

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却是利加乔夫。正是他把叶利钦这个他未来最凶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召到了莫斯科。利加乔夫成为中央书记后，分管党的干部工作，在访问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喜欢上了这位精力充沛的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归来后，他固执地、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开始证明，叶利钦这种类型的领导人正是改革所需要的。当然，利加乔夫首先是说服了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同我以及中央其他书记商量过。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是利加乔夫成了建议把叶利钦调进莫斯科的人，把他推上了影响全苏联的道路？我想，应该是他们的性格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吧。但是，他们两个是同类电荷，所以迟早要互相排斥，事实果然如此。

有两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党的领导人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班子，他们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他们是党内极有威信的人物，不仅进入了勃列日涅夫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私人

朋友。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在因契尔年科逝世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既不见库纳耶夫，也不见谢尔比茨基。二人没有来得及参加会议，当时一个在阿拉木图，另一个在美国。考虑到他们的缺席，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22日星期一全会召开前，又重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补充一句，这次会议谢尔比茨基也没有赶上。随后几年，关于这件事曾有过不少议论。我不认为这是事先策划好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谢尔比茨基参加了，公开表示反对，也不会改变局势。

如上所述，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库纳耶夫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不仅是一位加盟共和国的，而且也是全苏的著名政治活动家。

库纳耶夫是哈萨克人，莫斯科有色金属和黄金学院毕业，当过钳床工、技师和车间主任，巴尔喀什炼铜厂所属科乌布拉达矿矿长和总工程师，里捷尔斯克矿矿长和列宁诺戈尔矿井管理处主任。作为一个生产的天才组织者和精通业务的专家，他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副主席，后来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论文答辩通过后，他成为技术科学博士、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而后又成为该科学院院长。八枚列宁勋章和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表明他对加盟共和国、对全苏功勋卓著。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哈萨克斯坦，在该共和国他的名字老幼皆知。

上世纪80年代我同库纳耶夫交往甚密。我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担任苏共中央分管经济的书记时，以及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经常同他见面，一起研究过哈萨克斯坦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库纳耶夫是一位聪明、有教养的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他在生产、科研和政治活动中的修养。他所具有的那种沉静、坚定、朴实和交往中的随和，使他明显地优于国内党的某些高层领导人。

这位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86年12月14日飞到莫斯科，同往常一样下榻在哈萨克常设代表团的宾馆。早晨去了苏共中央，几分钟后得知他已不再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也知道了

谁是他的接班人。

库纳耶夫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很明白，是到了该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了。他已经上了年纪，现在的领导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套，再加上莫斯科新政权的歧视目光，这些都不能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一丝信心和乐观情绪。

后来在一次记者访问中他坦诚地说：“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作出的决定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有功也有过。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不能长期连续当‘头头’，否则会变得麻木，免不了会有过失，尤其是干部政策。包围自己的不应该是崇拜者，而应该是聪明人，能更新思想观念的聪明人。”

苏共中央内部有些人认为，库纳耶夫曾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朋友，戈尔巴乔夫和同他亲近的党内人士对库纳耶夫反感就是由此而来。可他们自己也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过。在他们看来，这位哈萨克斯坦的领导者是“停滞”时代的人，通过多年工作，他在共和国中造就了一个领导帮派，这个帮派具有典型的负面表现——信奉的原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当然，在库纳耶夫周围也难免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会卷入丑闻之中。有人也曾想方设法把腐败的罪名扣到他头上，但最后不了了之。他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但他的无私精神值得许多人学习，而且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尽管库纳耶夫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些作出解除他职务决定的人也要考虑到，这个为共和国做了许多好事谋了不少利益的人，在共和国是享有良好声誉的。此事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既定干部更换政策，要求具有十分审慎细致的态度，可是从种种迹象看来，苏共中央领导根本就没有很好考虑过。

更糟糕的是，莫斯科又决定，在该共和国形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人应该是一个原则性强的、铁面无私的

人——对这一点倒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可不知为什么，又规定必须是俄罗斯人。就这样，选择落到了科尔宾身上。

我同科尔宾早就认识，对他的劳动生涯了解得很清楚。他的工人生活是从在下塔吉尔——就其规模和重要性而言是中乌拉尔的第二大城市——的一个工厂当制模学徒工开始的。他在那里一直干到副总工程师和厂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和下塔吉尔市委书记。在随后几年又升为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苏共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苏共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任上结束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家许多奖励和表彰。

我们二人的生活道路在许多方面是相符和交叉的。把我和科尔宾联系在一起的是“老乡”的情谊，我们年龄相仿，都在乌拉尔工业部门工作过，那时我们经常在正式场合和私下见面。

在他担任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正在乌拉尔机器厂任总工程师，我厂同实力雄厚的下塔吉尔冶金联合企业有密切合作，他们的设备基本上由我厂提供。

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家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它的名字并没有反映它的全貌，它确实为国家铁路生产了大量车厢，但工厂的第二部分生产的却是坦克。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便是这样，当时生产过传奇坦克T—34，战后阶段也没有停止。在战争期间，乌拉尔机器厂为乌拉尔车辆机械厂提供坦克炮和坦克外壳。战后则为生产各种类型的现代坦克提供坦克炮。有件事说起来很令人痛心：1993年炮打“白宫”，用的就是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和乌拉尔机器厂生产的坦克和大炮。

科尔宾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时候，我也被任命为乌拉尔机器总厂的厂长。大家知道，当时的党组织事实上管理着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也不例外。所以，我同监管工业的科尔

宾接触很频繁。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勒紧我们嘴里的嚼子”。他对生产业务很懂行，是一个讲原则的、要求严格的领导者，了解工业企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而受到厂内职工的尊敬。

巧合的是，我和科尔宾几乎是同时离开乌拉尔，只差一个月。他被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我则当上了重型机械和交通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这之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科尔宾经常向我们提出一些有关我们部门在格鲁吉亚的企业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发展共和国机械制造业的建议。

我在苏联计委工作和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时，他在国内各地区任职，在中央代表地区的利益。当时我们也经常来往。科尔宾清楚地看到了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的某种片面性，并尽全力促进共和国全方位发展。他为此做了很多事情。由于他精通业务，有工作能力，精力充沛，同人们打交道作风民主，所以在格鲁吉亚享有极高的威信。

我也忘不了他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活动，包括创建现被称做“阿维阿斯塔尔”的规模宏大的航空综合体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一综合体可说是生产高质量飞机的规模最宏大的现代化工厂。全国都为它的创建出过力。可惜的是，它现在的境况非常艰难。还有就是乌里扬诺夫斯克至今仍在建设中的横跨伏尔加的大桥。州委第一书记抓大桥建设抓得非常紧，逼得大家团团转，也多亏他，大桥工程才能上马。这个对该州、对全国都很重要的大工程至今没有竣工，可不是科尔宾的错。

然后，就是哈萨克斯坦了……两年半过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推选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提到过科尔宾的政绩，而且说这个决定通过得非常及时，他说：“科尔宾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和党的工作经验，考虑到他的政治、道德品质，推荐他担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可是，在最高苏维埃批准科尔宾担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时，有人却又提出了1986年12月的问题。反对科尔宾的谎言劈头盖脸袭来，开始对他目标明确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我不想摘引那些信口雌黄的言论。它们会不由得令人想到福音书中的话：“顽石也会喊叫。”福音书的这句话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怒到了不仅人，就连不会说话的石头也要发出愤怒呼喊的程度。

讲完我对科尔宾的态度，我还想说，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思想的体现者，他受的就是那样的教育，只能那样生活。这里没有他的任何过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党的理想信念接受教育的。当然，我们对党的某些行为也会抱有怀疑，但在战略方面我们还是忠于它的。科尔宾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正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开始着手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后来又使这些变革毁于一旦。这也正是那一代人的伟大和悲剧所在。

尽管我对科尔宾个人和他的工作经历十分敬重，但过去和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利哈乔夫和当时政治局对他的这次任命，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派往加盟共和国任最高职务的竟是一位俄罗斯人，一位在哈萨克斯坦实际无人知晓的人。科尔宾和库纳耶夫不同，他只是在工作过的地区才有名气和威望，虽说他也是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而在此前，作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斯坦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是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这对于该党不仅具有道德心理意义，而且有极为重要的组织政治意义。很自然，这一措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

不过，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对党的领导，其主要的和非常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宣称的新条件下，工作中所采取的，却完全是干部政策的老套套，这套办法在当时不能不引起众怒，尤其是在民族共和国。

事实上中央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已将近两年，千方百计地鼓励意见的多元化等等，而自己用的却是非常官僚主义的陈旧的方法。他根本没同共和国的领导、共和国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讨论过，更没有同人民商量过。

大家是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全会上才知道，共和国要换新领导了：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宣布库纳耶夫辞职——当然是“本人申请”，并代表党的领导人和党中央委员会推荐科尔宾任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与会者当然也就遵守党的纪律，唯命是从地投票通过了推荐的人选。但是，正是我在这一章开头提到的完成这一程序的18分钟，破坏了哈萨克斯坦的安定局面，推动了类似事件后来在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发生。

阿拉木图事件的发生发展非常突然而迅速。请注意，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86年12月16日，而17日一早七八点钟，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便出现了第一批青年人，主要是首府高校的学生，约两三百人，打着反对中央全会决定的标语，对选举科尔宾表示不满。



宣传画“大棒挥舞”。（克罗波夫斯基摄）

11时30分游行示威者离开广场，奔向城市各街道。13时30分青年队伍突破卡车筑成的路障，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游行队伍已增至5000人。没有参加环城游行的好奇的路人也开始在广场聚集，很快又出现了“援军”：一大队青年从和平街方向向广场涌来，从哈萨克大学也来了约600人。他们一字一顿地喊：“阿乌耶利别科夫，纳扎尔巴耶夫！”游行举着标语牌：“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许多人原以为这是支持改革的例行群众集会，但是另外的标语——比方说“库纳耶夫在哪里？”——推翻了最初的想法。游行要求库纳耶夫出来见他们，就艰苦的生活条件、住房困难、使用本族语

言范围受限等问题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在用哈萨克语和俄语书写的口号中：“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游行的人们手无寸铁，他们举着列宁像，唱着民歌。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攻击；没有号召推翻国家制度，也没有出现流氓行为。

但是却接到了封锁广场的命令，不准进出。新来的游行队伍企图冲破封锁，进入广场，于是发生了小冲突。广场内的人帮助新来的队伍冲破封锁，紧张的局势便出现了。内务部长沃拉索夫下令将全国八个城市的内务部特种部队派往阿拉木图。部队来到广场，装备是防弹背心、钢盔、盾牌、警棍。两辆专用车上还有专用装备——烟幕弹、信号弹、催泪瓦斯“稠李树”。同军人一起的还有一组执勤犬。从15时到17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执行局的成员卡马利坚诺夫、缅恩德巴耶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一直都站在广场观礼台上。他们呼吁集会群众解散，但回应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雪球和冰块飞上观礼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会群众讲话，他说游行群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号召大家解散。

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集会者侮辱保卫观礼台的士兵和军校学员，抢他们的帽子。民警从人群中抓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群众又企图把他们抢回去，于是便开始了肢体冲突。士兵接到命令把人群赶出广场，但群众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灰泥块。有人受伤了。

此时，观礼台上的卡马利坚诺夫、叶利米索夫、巴萨罗夫一个接一个地呼吁集会者散去，警告说不然将使用武力。一些著名的文化活动家也发表了讲话。但这一切全没奏效。人群谁的话也不听，只坚持一点——赶走科尔宾。所有要求的实质归于一点——让哈萨克人取代俄国人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有人呼吁让库纳耶夫回来，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卡马利坚诺夫进共和国领导班子。

集会群众同护法机关的冲突渐渐地演变成残酷的恶斗。而后在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大喊大叫地开始冲击党中央大楼，企图冲垮士兵、民警、边防战士的横队。殴斗愈演愈烈。木棒、钢筋、石块全派上了用场。士兵被迫使用皮带和警棍。疯狂的暴徒烧了几辆汽车，捣毁了两个商店的橱窗。打砸抢的人在增加。安抚人群的企图没有奏效。双方都有人受伤。也没能避免死人：纠察队员萨维茨基——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野蛮地殴打致死。16岁的俄罗斯男孩在远离广场的公共汽车上被刺。他对乘务员说了句粗鲁话，站在旁边的人就向他心脏捅了一刀。三天后一位在广场殴斗中受伤的哈萨克人死亡。

关于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官方报告作了最好的说明：

21时—22时，运载专用装备赶赴广场的军车遭到石块袭击，卫兵逃散，专用装备落到广场人群手中。

22时，市内务局局长接到命令用消防车驱散游行群众，20辆消防车冲向人群，架起水炮向人群喷射。人群向消防车投掷石块，30辆消防车受损。

23时30分—24时，发动了新一轮驱散游行示威的行动，这次动用了工兵铲、警棍和警犬。行动后仍留在柏油马路上的人被集中起来用车运走。广场肃清了。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继续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检察院等机关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急飞阿拉木图。组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博勃科夫是小组成员，他回忆道：

我们飞抵前，广场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目睹了这一骚乱的后果。哈萨克斯坦首都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尤其是坐落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的勃列日涅夫中心广场。在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仍可见有几辆汽车火焰在燃烧，到处是成堆的玻璃碎

片、石块、棍棒、铁条——发生在这里的流血斗殴的遗留物。一进党中央大楼，便感到了形势紧张。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明显地焦躁不安。根据科尔宾的说明，发生这一切主要应归罪于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米罗什尼克，他没有足够重视库纳耶夫追随者们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甚至有人怀疑，米罗什尼克有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要搞动乱的情报。

大家群起谴责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拒绝号召广场上的群众支持选科尔宾。此外，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一致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策划的。索洛缅采夫要求揭露群众骚乱的组织者。

但是，事件过去三年后，库纳耶夫在记者采访时澄清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为了洗清自己，极力混淆问题。库纳耶夫说：

12月17日11时左右，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米罗什欣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中央委员会。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退休了！”他回答说：“广场上有一批青年人集会。他们要求解释昨晚中央全会的决定。最好是你向集会者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表示同意，我问：“科尔宾同意吗？”米罗什欣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之后我马上来到中央，进入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在那里已经集合了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在讨论如何应对广场集会的问题。科尔宾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坚诺夫向青年人讲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我在科尔宾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有谈到要我讲话的事。然后科尔宾开始同莫斯科通话，为了怕影响他，我和其他委员们，除了米罗什欣，全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宾召集全体中央局委员，也邀请了我。他对我说：“您没事了，可以休息了，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恢复秩序。”临走时，我问米罗什欣，为什么把我找来，却又没让我

讲话。他回答说：“我们商量后，决定不让你去广场，也不用讲话了。”1987年6月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开会期间，米罗什欣又一次肯定说，当时没有允许我去广场讲话。

.....共和国领导者谁也没有向青年人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残酷镇压集会者。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我被定为“阿拉木图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虽然我同它毫无关系。科尔宾不止一次说，我拒绝向广场青年讲话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件事，而且共和国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消极现象，都同我的名字、我的活动联系上了。他们忘记了，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信任我，把大工业企业、科研所、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委托给我。我总是努力履行党员的职责，忠实地做人。

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曾同库纳耶夫谈话。那时我正在总书记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因受到来自阿拉木图片面情报的影响，他语调严厉地要求库纳耶夫制止混乱，毫不含糊地认为正是库纳耶夫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库纳耶夫坚决否认加给自己的罪名。他公开声称，他同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12月18日，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空荡荡，只有数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内街道上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巡逻车投掷石块。

主要的骚乱已经过去，但人民没有安定下来。有议论说骚乱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要求共和国拥有主权，说这是一次成熟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群众性公开表现。我认为，在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阿拉木图事件不论其内幕如何，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果然，几年之后，卡拉巴赫和苏穆加伊特、费尔干纳、第比

利斯和巴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出事了。最后是苏联的瓦解。“催化剂”虽与哈萨克斯坦事件中的不一样，但它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中都含有作为国家、社会、人民统一之大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

失乐园

哈萨克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成员有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不同民族。哈萨克作为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民族，已有500多年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后半叶。在此之前，存在着几个民族联合体，即哈萨克的三个玉兹——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

历史上哈萨克国家的第一个形态是汗国（15—17世纪）。大汗的权力之争、放牧地之争以及其他原因，严重阻碍了哈萨克斯坦土地上统一国家的建立。俄罗斯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运用了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外交手段，把它们纳入了俄罗斯版图。哈萨克玉兹并入俄罗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乎用了100年，从1730年到1824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个玉兹的汗都相继向沙皇政权提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罗斯臣民。这样看来，哈萨克人归附俄罗斯的历史，一部分已有两个世纪，另外一部分也已将近一个世纪。

同俄罗斯合并之后，哈萨克族取得了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使自己这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得到维护。汗国之间经年不断的战事停止了。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成了哈萨克社会相当重要的精神进步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都发生了值得肯定的变化。

同时，哈萨克土地中的一部分被收为国家资源，得以把其中的部

分分给中央俄罗斯缺少耕地地区的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之所以来到哈萨克斯坦，正是因为无地可种和生活困难。当然，这也伤害了哈萨克本土居民的利益。但是不要忽视，移民们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生息劳作，也使它成为了宜于居住的地方（通常这个目的也许要经过几百年才能达到），为游牧地区带来了农业文明和定居的生活方式。

我的家族的命运也同这一东迁垦荒运动有联系。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矿工。曾祖父是农民，因为无地可种，于19世纪后半叶携家带口来到这广阔的东方土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一个名叫“乌拉尔军”的哥萨克屯安家定居了。

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特殊的边区。乌拉尔哥萨克不承认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全部土地归村社所有。科罗连科在自己的著名的随笔中写道：“……整片土地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村社土地分配制度……”

乌拉尔（1775年前称作雅依克）哥萨克——是一批复杂的矛盾的人。他们的那种特殊性格多半是由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外来威胁的氛围中。

在他们的深层关系中，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当。自然的经济问题中掺杂着民族问题：外来者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哈萨克人则又是哥萨克人生活环境中的“另类”。对于哥萨克来说，所有从俄罗斯迁来的人都是“俄罗斯人”……

我的曾祖父一家就是生活在这种矛盾的条件下。多年过去了，他的孩子们，包括我的爷爷，娶了土生土长的哥萨克女人。我的民族属性也由此而生——是世居俄罗斯中部地带的俄罗斯人同热爱自由的乌拉尔军哥萨克人的融合。

多年以后，我的爷爷奶奶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了顿巴斯。先是当

农民，而后成了矿工。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愿意互做邻居。哈萨克斯坦有不少俄罗斯名称的村镇和城市。1837年建立了一个哥萨克军事要塞，叫做维尔诺耶（忠诚）。选用这个名称是把它作为一种坚定不移、对俄罗斯国籍忠贞不贰的象征。这之前那里是一个哈萨克居民点，叫阿拉马特。到苏维埃政权时代，城市改称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成了俄国的一部分，对这一事实乃至它的后果，哈萨克斯坦各社会政治阶层的评价远远不同。一部分人——该地区的传统精英分子——常常把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破坏，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看做是对“祖辈神圣精神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期盼俄罗斯民主力量能促进哈萨克人民启蒙思想的发展。

从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斯坦确立之日起，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新阶段。1920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最初的名称），其中包括若干由哈萨克族人居住的州。到了1924年，中亚地区按民族重新划界，所有的哈萨克族土地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国家，1925年又更改了国名，使之符合历史，开始称为哈萨克共和国。

哈萨克人约占共和国居民的61%。当时便有人建议，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但这种改革1936年才得以实现。

上世纪2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居民状况的措施。比如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分到了耕地和草场，建设了新的工厂，甚至出现了完整的工业部门。当时即便该地区也未能避免政治上的极端主义。那个因1918年在乌拉尔积极参与枪杀沙皇一家而出了名的戈洛谢金，从1925年起领导了俄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整整8年，在共和国内

也留下了关于他的血腥记忆。由于推行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强制定居的极左的行动，共和国的居民消失了几近1/5。

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共和国经济迅速发展，先是工业，而后是农业。1937年在哈萨克斯坦大工业企业达到2000多家便是明证。1940—1975年间，从事工业生产人数的增长速度等于俄罗斯的2.7倍。当然，这种速度也是受到军事局势的影响，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实行的关注民族共和国全面迅速发展的政策。发展首先涉及经济。经济的建立靠的是全国的资金，同时又靠动员地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矿产正是哈萨克斯坦所富有的。比如，大家知道，仅煤矿就有400多处，铜矿、铁矿、铅锌矿、金铜矿、磷钙土矿、石油、天然气等几十处。在这个有着各种原料的基地，不仅采掘工业，而且冶金业、铝业、化学工业等部门都得到迅速发展。哈萨克斯坦生产50余种有色、稀有、贵金属、稀土及其他金属。遗憾的是金属加工业、重型机械和拖拉机制造业尚欠发达。好在各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同其他共和国的广泛合作联系，补偿了上述这一不足。

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经济潜力。我在1987年曾访问该共和国，在埃基巴斯图兹走访了2号地区国营发电站，而后又参观了东方露天采煤场。两个工程规模大得惊人，更令人惊羡的是高端技术装备。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铅锌联合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生产铝和锌这种国民经济急需的有色金属，又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污染，这需要具有多么尖端的技术啊！坐落在市郊的村镇中漂亮的个人住房星罗棋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来，这是我国大城市中第一批真正由个人兴建的独门独院的住宅。

在参观卡拉干达冶金联合工厂时，我一直觉得我是置身于故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这里的许多车间，其装备都是由当初我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那时我曾工厂的总工程师和总厂长。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伟大国家高效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的有目共睹的成就。

哈萨克斯坦大约有1/5有经济作为能力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里，畜牧业的专业化是人们一直认真关注的。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帮助下完成处女地垦荒任务后，哈萨克斯坦成了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如果说1940年全苏联粮食每38吨中只有一吨是哈萨克斯坦所生产，到了1986年，每7吨中就有一吨是来自哈萨克斯坦。

总的说来，很明显，哈萨克斯坦需要加快发展加工工业，深加工工业，但是，可惜，进行这种重要的结构改造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哈萨克斯坦在精神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中普遍的文盲现象已经消除，形成了一支科学的、艺术的、工程技术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了广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网。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共和国发展成为文明的现代国家。它的发展在当时成为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成效卓著的光辉范例。

历史不容抹黑，也不容美化，尤其是当我们从制订和实现民族政策这一角度研究历史的时候。民族政策直接影响到非常敏感的、隶属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就我的看法，不能说这里的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过去时代遗留的东西，以及屡屡未能克服的不顾客观情况超前行动的愿望，都对事业造成了根本的伤害。比方说，认为我国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发展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实际过程的研究，就常常被简单的口号代替。

学者、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们明显过早地强调了民族的融合。而那些谈到每个民族全面发展具有首要意义，应该小心谨慎对待民族传统和习俗的人，则被斥为民族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各级管理机关在作出有关大民族和小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领域的实际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异。

不愿抛弃陈规陋习，不善于更广泛、深入、慎重地思考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政策问题，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酿成悲剧。

最近15年证明，不管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后苏联时期一点也不比苏联时期小。更何况现在这一问题有时还具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形式和特点。

我想，大家还记得，早在1988年末，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已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宣言。这种做法的特别危险之处还在于，它宣示了爱沙尼亚法律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部分竟然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体——这种事情看似荒谬，但坏榜样却具有传染性。到了1990年，这种部分超越整体的论题具有了实际的毁灭性力量。

问题在于，正是这一年，全国刮起了当时被称做“主权大展示”之风。争独立的不仅仅有加盟共和国，还有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民族区，甚至某些原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在这一刮“主权风”的过程中，对国家统一打击最严重的是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宣言，它是由俄罗斯最高司法机关宣布的凌驾于联盟之上的法律。正是这次行动，意味着全苏权力和管理中心将不可避免地消亡。这样一来，也就为消灭统一国家创造了一切条件。

各方传来的清醒的呼声，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比方说，为了努力保存苏联，哈萨克斯坦议会曾呼吁那些并不高明的“改革者”要“表现出政治智慧、毅力和民主性，尽一切可能制止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伟大国家的解体”。他们的话是具有预见性的，也适合于哈萨克斯坦：“联盟的解体必将导致全面崩溃——共和国经济的崩溃，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急剧下降，将会使我们倒退几十年，将给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除了在平等的主权共和国之间签订联盟条约，以此为基础革新联盟，别无他途……”

1991年12月1日进行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全民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当选。

纳扎尔巴耶夫上世纪80年代是苏联哈萨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就其职位，他也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我当时领导苏联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联系。那时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头脑的人，性格坚定、目标明确，虽然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显得年轻些。在苏联政府的季度扩大会议上，他通常都要积极发言。当然，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哈萨克斯坦。他的视野、思维的范围也很广阔。后来他成了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后来在苏联和独联体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远在哈萨克斯坦境外地区都拥有威信。

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这之前，12月8日，在籍籍无名的坐落于离波兰边境30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的白俄罗斯村庄维斯库利，就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件：苏联不复存在了。后来才知道，在有关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恕我直言，他们并不是祖国历史上的什么杰出的人物，却把毁灭伟大国家的罪责揽到了自己头上。是的，甚至他们亲身体验的那种掺和着酒劲儿的政治快感，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明白，他们所干的事其实就是搞政变。对此，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只有我国）表示赞许。这些犯罪分子们宣称，似乎他们只是确认了苏联政治上的死亡。这种骗人的手法有点像一群医生蓄意把患者搞得病入膏肓，然后又弄出个“三人小组”来宣布这个活着的患者已经辞世，并把他送入太平间。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家伙的真正作用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在东哈萨克斯坦，雷日科夫（中）身旁是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作者提供）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参加这可耻的别洛韦日事件，政治远见使他没有堕入彀中。但是正如常言所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更因为12月8日已经宣布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其成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所以其他的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只好自己决定未来的命运。结果是1991年12月21日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11个独立国家的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宣言。我想，当时这样的文件还是必要的，因为独联体的创立消除了苏联混乱无序崩溃的危险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可惜15年前宣言规定的许多东西，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在独联体各国内部以及在其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已变得日益尖锐的缘故。

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想，答案应该到1991年我国历史突变这一事实中寻找。在那之前，我们都生活在被称为多民族的，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国际主义的国家里，因为这个说法更准确地指明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事实也是如此，当乌兹别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了具有悲剧性后果的地震时，全国不是都伸出了援手吗？有些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他们把话剧、展览这些东西送到莫斯科来（也送到其他

城市去），可是在这些各共和国代表的心目中，莫斯科不就是他们亲爱的家园吗？而那些科学、文化、艺术活动家们，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所受到的，不也都是全国人民的承认和爱戴吗？我讲的这些，只不过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各民族真正统一过程中的一鳞半爪。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隶属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

可是当我们的共同家园被毁之后，一切就坍塌了。于是大家只好星散，各回各的民族老家。其间出现了政治投机分子、企图攫取政权的冒险家，他们又吹燃了本来已渐趋熄灭的民族主义炭火。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学者们开始连篇累牍地炮制与过去方向完全相悖的文章和课本，政治家们则立刻忘记了他们借以受教育的俄语，发疯似的学习怎样才能用本民族共和国的语言发音正确地喊出有关他们民族利益的新口号。新滋生的“实业人士”掌握了“美丽的”外来语词——“比兹涅斯”、“巴克瑟”、“马尼”等等。对这一切本可以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新思潮东一处西一处很快都化成了反俄罗斯族的、反俄国的声明和行动。它们的性质显而易见：共和国的事业越糟，领导者越是无能克服困难摆脱危机环境，他们就越想讨好来自大洋彼岸的木偶操纵者，这些在本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人，就越是想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武器，找到妨碍他们实现国内外既定目标的敌人。当然，要想“发明”比俄罗斯更合适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目标显著，而且就在身边。当然不可能把它打倒在地，但是却可以用它来装出一副为本国人民幸福竭尽全力搏斗的样子……

这是一群投向根本就不存在的火焰的政治飞蛾（但他们迟早会烧毁自己的翅膀），遗憾的是各共和国都有部分居民被他们引入歧途。这些人的名字不值得一提：他们在空中飞不了多久，而且他们捞到的荣誉也实在太多。但是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还有一大堆更严重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时也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国家中俄罗斯居民、操俄语的居民的状况问题，就是他们

如何迁回祖国母亲怀抱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由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得确切些，由那些在新国家内与之利害攸关的人煽动起来的局势。还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复乐园的努力

可以说，现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关系是良好的。共同的经济利益、对外政治任务、科学和文化联系，使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然而，苏联解体之后，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内，它的俄罗斯居民也不得不经受（现在也是）不少困难，许多人被迫从该共和国迁出。在苏联时代，俄国人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俄罗斯人是该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占70%，这一点就是明证。但是，到了1991—1992年，俄罗斯居民们却突然成了“大国沙文主义者”、“占领者”和“殖民者”。讲俄语的学校减少了，共和国用俄语讲授的课程也减少了。可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但凡有一点可能，俄国人都会想方设法到境外，最好是到俄罗斯，去找工作。人们纷纷抛弃一切，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间的移民过程涉及大批群众，其规模堪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迁移”相比。从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迁移的结果，仅1990—1999年间哈萨克斯坦就流失了将近140万人。这一移民潮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超过76万人。在俄罗斯移民总数中，哈萨克斯坦移民所占比重约为40%，约占最近十年间由独联体各国移居俄罗斯总人数的1/4。有一点很有意思，据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俄罗斯居住着63.6万哈萨克族人，其中在十年过程中离开我们国家的只有6000人。当前哈萨克斯坦居民中大约只有40%是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大约也占到40%，其他民族占20%。

近年来各种事件的发展，令我们有某些理由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历史前景持乐观态度。当前面临的局势对共和国本身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就促使共和国领导对国家内外方针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发表正式声明，采取行动，同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在我国开设领事馆，等等。从一切迹象看来，比较露骨的、较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哈萨克斯坦已成为过去，民族政策基本踏上正常轨道。虽然这些还不足以提供俄罗斯居民在共和国稳定居住的充分保证，但总算是可以让俄罗斯人在一个长期阶段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期去适应，并形成保卫自己未来利益的机制。

不仅历史经验，而且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相互关系的实践也证明，要想消除肆无忌惮的、其实质为破坏性的民族主义毒素，最好的药方就是国家间、人民间的全面合作，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体化。可惜的是独联体各国未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协作，至今仍令人颇感失望。这就提醒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要寻求更有效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体化形式。

建立这种新联盟的倡议者之一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4年正式访问莫斯科时，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提出成立欧亚大陆联盟的必要性。许多俄罗斯的以及一系列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对此设想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之间现有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具形式，双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保证遗留的和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同年的9月，根据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科学—实践大会《欧亚大陆：国际潜力及其开发》。

苏联解体过去了3年。这期间有一个想法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这个伟大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步是什么在等待着我們？还有没有办法把过去的加盟共和国、现今的主权国家重新团结成一个一体化的建构？

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参加这次大会的邀请之后，对这个问题应持什么立场、观点，我想了许多。当然也是在准备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这次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3年没有机会就这一重要问题阐述我作为公民的观点了。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对经济政策有不同意见，我才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请允许我在这里摘录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几段讲话：

在这里，在哈萨克斯坦土地上召开这次大会的事实本身，几乎是具有象征性的。最近，正是从这里，发出了后苏维埃广阔土地一体化的倡议。欧亚大陆联盟的主张就是其中之一……

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立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这种立场的吸引力、对这种立场的理解，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现实，反映了苏联国家重组的过程和在这片领土上成立的新国家的改革过程。

新的边境和海关，许多居民阶层的无权和贫困，分崩离析的经济联系，难民潮，雪崩一样的犯罪和贪腐，地区冲突，不断加深的互不信任——这些就是我们一度强大的国家崩溃的后果。

今日在我们词汇里出现的许多说法，如“近邻外国和远邻外国”、“移民”、“签字国”、“难民”等等，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标志。

中央对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失控过程演变成为经济的分裂。在几十年漫长时光中一直由互代和互补这样的基本原则起作用的全苏劳动分工体系瓦解了。

物质生产的经济条件，各共和国之间早已确立的经贸交流实质内容，尤其是合作关系，雪崩般地崩溃了。由于这个原因，独联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30%到50%……

独联体国家把对外经济联系从独联体内部转向其他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之间互相供货减少的同时，燃料、金属及其他原料资源源源转向了世界市场。

把现今独立国家一体化的必要性硬是同苏联解体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一体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的经济，在于利用昔日苏联积累起来的强大潜力。这种潜力一定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克服向市场过渡产生的休克现象……

严格地讲，“国家一体化”这一概念不完全实用于我们的独联体。在世界实践中这一概念通常是用在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国家，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因而也是多样化的经济调整模式，有对结合条件（主要是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和国防能力）的广阔选择余地。（还是以欧共体为例……）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又一次一体化。这些直接相邻的国家不仅位于欧亚大陆，而且从前苏联统一经济的存在中，继承了全面的依赖关系和相互关联的合作生产，往往具有垄断水平高而技术水平落后的特点。许多企业的产品由于竞争能力低下，应该承认基本上只能在相互贸易的市场上找到销路。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考虑到任何范围中的一体化，都要首先立足于独联体各国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我又强调说：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早已存在的经济关系轨道之上。问题只在于这些关系将是混乱无序的，还是应该让我们把它引入协调的经济体系轨道。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每一个个体，都只能置于共同关系中加以考察……”

我一直是主张开放经济的，但一定要遵循伙伴关系和互利原则。如果不把我们当做地位平等的伙伴，在制定对外关系战略时，我们就应对此加以考虑。目前，类似的“游戏”还在继续。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定，即使将来有西方资本投入，主要也是投向原料部门和生态方面不利于西方的部门。首先是投向燃料能源综合体，这是他们今天和明天都需要的。看不到这一点，就

等于促使我们更加依赖西方，促使我们已经严重扭曲的经济长期停滞，使许多经济部门落后于时代。（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些话是我1994年说的！）。

现在，世界上明显地划分出三个强大的经济发展中心：美国、欧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它们有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也有日益深化的合作。这是时代的要求。任务是要在这个“三角”中找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将之变成为自己谋取经济福利的源泉。

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学会正确支配自己的巨大潜能，克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时，才能完成。我们具有一切条件，可以成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附庸。为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再结成一体，汇集我们所有的努力，为每个成员谋取幸福……

在苏联这个框架内，俄罗斯的作用虽然显著，但并不是我们“死乞白赖”非起这种作用不可。它在同某些共和国打交道时，充当的是输血者，它在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中，满足了这些国家不少需求。很遗憾，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并没有被注意到……

在新的组合结构中，像过去那种由俄罗斯输血的状况不会再有了。新国家以不少代价争取到的独立和主权，在客观上就决定了它们必须遵守伙伴关系和互利关系的原则……

这就是我在12年前讲话的部分内容。

从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想法那一刻起，许多年过去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首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怕在某些方面失去主权的担心，促使他们不敢和任何有效的一体化沾边，即便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生活本身坚持要求创建一个新的组合形式，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地区性联盟。而欧亚大陆联盟的构想，不管怎样，并没有寿终正寝，只是在俄罗斯换了首脑后，这一构想才得到正式承认：2000年10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总统在阿斯坦市签署了关于

建立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的声明及相关条约，2001年5月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批准。

200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第一届经济论坛。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加深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体化本身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民族机构的建立，使我们这些国家有可能比此前在独联体框架中更广泛地提高多方面合作的效率。正如预想的那样，共同体所带来的一个附带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恰恰就是民族间，首先是国家关系方面矛盾摩擦的明显缓和。实践证明，一体化是民族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同这种邪恶作斗争的有效工具。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

现在，当本章的叙述完成之时，我还想回顾一下早已成为往事的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并就它的实质提出某些结论性看法。上面已经提到，关于12月事件和动乱，派到阿拉木图的莫斯科委员会不失时机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动乱期间委员会掌握了领导权，对有关动乱的种种说法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存在一个组织群众（请注意：基本是青年学生）搞示威游行的专门指挥部，走上街头的有吸毒者、酒鬼和无业游民。但委员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动乱。

然而仔细的调查表明，吸毒者和酒鬼作乱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共和国卫生部资料，经医学检测，被拘留者当中没有一个吸毒者，也没有一个酒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指挥部，这一点也已搞清。还有一个说法：库纳耶夫身边的人有不少都同可疑事件有关联。他们利用了青年人的好冲动，是调唆破坏法制的人。有个普通工人就说：“应该恢复共和国的秩序，大家在这里相处得就像兄弟，谁同谁

都没有个人恩怨，这些暴行都是黑社会、刑事犯罪分子、贪污分子、受贿官员干的，他们害怕科尔宾上任后共和国形势会发生变化，那些藏在库纳耶夫背后的既得利益者，要为这一切负责。”

可以说，在阿拉木图事件中，某些大学中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确实起到很大的挑拨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动乱并没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几十年来朝夕相处在一个大家庭中，此时这种影响还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是这样写的：“我认为，促使莫斯科的代表把我们完全排除在监控广场事件之外的主要原因，是怀疑我们会利用群众的情绪牟取私利。尤其使他们不安的是游行群众纷纷递上条子，建议推举阿乌耶利别科夫、杰米坚科、米罗什欣、莫罗佐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等人为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可以说，单就这一列出的名单，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青年人根本没有反对俄罗斯族的人当共和国领导的意思。虽然如此，臭名昭著的‘哈萨克民族主义’这张牌还是打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领导人都是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有辱人自尊心的命令的腔调来同我谈话。”

在我看来，正是莫斯科领导人同地方干部交往中的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成为先是学潮、而后转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中央那种不仅对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对共和国居民说一不二的作风，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利加乔夫简直是粗暴生硬的工作，还有那位遇事完全听他指挥的总书记的愚蠢——正是所有这一切，激起了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相信国内社会关系体制真正改革的人们愤怒的浪潮。他们觉得这是往他们心灵上吐了一口浓痰！关于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民代表、著名诗人奥尔扎斯·苏列依诺夫说得对：“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的青年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政府法令的这种宣言……说起话来满嘴新词，干起事来还是老一套，这种言行不一，尤其令相信改革的青年人、学生和年轻工人极度愤慨。”

可是来到阿拉木图的那些中央代表，莫斯科那些提议和组织实施共和国第一书记任命工作的人，能承认自己智能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吗？当然不能，因为强制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他们就又犯了一个不亚于前一个错误的错误：搬出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来吓人。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调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

第三章 第比利斯：颠倒黑白的审判

民族主义狂热

1989年4月7日，戈尔巴乔夫深夜从英国飞回。陪同他访问的有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按当时的规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在伏努科沃机场迎接总书记。总书记只是出国访问时才有这种欢迎仪式，国内访问时，中央书记不参加迎接。

也是按照传统，大家聚集在机场大楼，由戈尔巴乔夫简略地讲了讲出访的成果，同时询问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在他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后那段时间有什么非常事件发生？

真的，就在此前，共青团员号潜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附近沉没。全世界都在议论纷纷。亚佐夫和巴克兰诺夫依次报告了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调查委员会。戈尔巴乔夫简短地做了结论：“你率领这个委员会，”他对巴克兰诺夫说。“物色人选，马上去现场。”

我向总书记讲了一件非常事情。在诺里尔斯克发生了矿工的第一次大罢工。他们在矿井里已静坐多日，不肯升到地面，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没有关于罢工的法律，政府不想在黑暗的巷道里，而是要在桌面上讨论这些要求。奥列格·舍宁，当时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下到矿井，但是没有说服矿工。他们至死不让步。我同工会领袖沙拉耶夫拟定了一个致矿工的电文——可以说，是很强硬的。我给戈尔巴乔夫读了，他总体同意，只是做了些不大的修改。

然后，利加乔夫谈了第比利斯动乱的情况，告诉大家他在中央召集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只是在机场时才得知召集会议之事。看来是不认为有必要邀请我参加会议。我说明一下：据我的总理地位，只有总书记有权邀请我参加任何中央会议，但如果他不在，政治局召开的正式会议我则必须参加。但利加乔夫没有召集政治局，只召集了部分人开会。而他在那次著名的发言中说到政治局关于第比利斯问题的会议，而且要求我作证。如果真开过这样的会，那就是4月7日晚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的会议，可那不叫“政治局会议”，而是“迎接总书记从伦敦归来”。



1989年4月10日，部署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一条大街上的装甲车。4月8日发生了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冲突后这里实行了戒严。（新华社稿）

戈尔巴乔夫马上说：

“应该飞到格鲁吉亚去。”

他提议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周六晨起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星期六8点，我同往常一样，开始工作，注意观察诺里尔斯克局势：矿工们在看到我和沙拉耶夫的电报后，立刻升到地面。我为一个

什么问题打电话给苏共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助理回答：

“他正在开会。”

“是什么会议？”我想知道。

“讨论格鲁吉亚事件。”

“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不是要飞到那边去吗？”我奇怪了。“现在讨论是不是早了点？没有出什么事吗？”

“什么事也没发生，”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安慰我。“帕季阿什维利（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控制着局势，谁也没去格鲁吉亚，没有必要……”

那次会议上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其详。但我认为总书记不可能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履行他的委托。我不理解两位有多年领导资历的党的工作者怎么就这样破坏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我想，在谢瓦尔德纳泽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他恐怕未必忘得了游行示威者，但也未必会急于去纠正局势，更何况帕季阿什维利正在“控制着”局势。他是怎么控制的，我第二天才知道。我接待室的值班员往别墅来了电话，激动地给我读了关于第比利斯深夜事件的密码电报。我只问了一句：

“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不知道，”值班员小心地回答。“没来电话，没有邀请……”

4月9日事件不是一次自发的、随意之间发生的行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

还是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说起。在格鲁吉亚，仿佛是随着

魔棒的一挥，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团体就纷纷出笼了。如果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到地区经济核算和自我管理原则时还是相当注意使用外交辞令的话，在格鲁吉亚一切都是立刻摆到政治层面上来谈了。出现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等口号，紧接着又出现了“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领袖人物。实质是格鲁吉亚成了操练反苏活动的演兵场。西方“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

1987年末成立了“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在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多个“领袖”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圣伊里亚真理会，领导人为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自由主义者协会，领导人为奇亥伊泽、马穆利亚、恰夫恰瓦泽；

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领导人为尚格拉亚等人。

同时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掌握了面向青年人的报刊和电视。在改革口号的掩盖下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格鲁吉亚历史，揭露俄罗斯“帝国”的政策等等。

1988年这些团体的领袖们开始积极活动，发起和发展了共和国内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现存制度的政治运动。他们把重点放在青年大学生身上，大学生的群众集会他们眼中是人民积极性和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还把重点放到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和科研知识分子身上，这些人在当时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乱中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迷惑。



1989年4月第比利斯，政府大楼前。（施拉莫夫摄）

格鲁吉亚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部分接近谢瓦尔德纳泽、在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任期内同他合作过的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宣称，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他们在所谓的权利捍卫者和起劲反对格鲁吉亚苏维埃制度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以求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一部分人中就包括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

我不可能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政治鉴定。我只想谈谈当时反对派中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后来的命运同这个人有关。加姆萨胡尔季阿为1939年生人，毕业于西欧语言系，语文科学副博士，是卢斯塔维里研究所的研究员。1956年因组织非法的旨在争取格鲁吉亚独立的戈尔戈斯拉维利协会而第一次被捕。

这个人之所以有名是沾了他父亲——格鲁吉亚文学经典作家老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光。儿子赢得了维权运动受难者的光环。无限的虚荣心强烈地控制了这个人的一生。他比别人更有权力欲，甚至企图赢得大选……成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大牧首。1979年他再次被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完全认罪，并就此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被判三年流放，由于共和国领导说情，服刑地点定在高加索阿尔卑斯山牧场。刑满归来后，他实际上与积极的政治生活隔绝，直到80年代末才又重新登台。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群众集会、会议、游行。

1988年11月，共和国首都形势趋于紧张，当时在政府大楼（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大楼）前连续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高呼口号，要求立即给格鲁吉亚以完全独立，退出苏联——人们把苏联称之为“继承了罗曼诺夫王朝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苏维埃俄罗斯帝国”。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们把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从政府大楼楼顶扯了下来。运动领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的”共和国现政权。

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通过格鲁吉亚电视台讲话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发出呼吁后，从11月末起，未经批准的集会停止了，所谓的“杂牌军”的领袖们在格鲁吉亚其他城市组织群众集会的企图，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下面我引用一段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关于共和国1988年12月事件的表述：

.....极端主义组织的领袖们，尤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等人的活动，其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已经暴露无遗，但我们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消除他们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

.....十月的日子证明，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护法机关的表现也不佳。因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指示，不知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该如何作为，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立场。这就破坏了劳动群众对法律威严的信任。与此同时，极端分子和教唆者却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加相信他们的违法活动和行为不会受到惩罚。

.....所有这一切没有成为共和国党组织深入全面分析的课题，没有对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工作作出相应的修正，结果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些事件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存在一种说法，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本可以在10月使格鲁吉亚紧张局势缓和。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同那些“杂牌军”领袖们谈判了些什么，但这之后却有命令“不许触动‘杂牌军’成员”！而他们的政治分量日益加重——这却是事实！

为数众多的关于4月9日的文件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在格鲁吉亚形成的社会政治形势。在改革的“设计者”之一谢瓦尔德纳泽领导时期，格鲁吉亚贪腐现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切都可以出卖——从官职到司法判决。甚至每个下级机关都按月有“贡金”上缴给上级机关。人

们并不避讳地公开谈论这种事，而且如果有人没有凑足这笔“贡金”，还可以借给他钱，以表同情。

谢瓦尔德纳泽之后，掌权的是帕季阿什维里——一个诚实的、正派的人，国际主义者，他决定同这种现象开展斗争：逮捕了一大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其中有谢瓦尔德纳泽的左右手、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这些人的供词很值得玩味。

共和国检察长巴拉巴泽在中央委员会大院内自己的汽车里开枪自杀了。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阿斯拉尼卡什维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也开枪自杀了。两个人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起来的干部和亲密战友。据南奥塞梯州党委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切霍耶夫掌握的材料，案子越来越不简单：谢瓦尔德纳泽的名字已经相当公开地被人提起——形象一点说，再跨出一步，铐子也可能戴上他的双手。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已经管不了帕季阿什维里。事情明摆着：如果他当时停下来，案子一刹车，他自己也就难逃戴上手铐的下场。

不过莫斯科也得以采取了一些措施，责令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伊纳乌里退休，争取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取代他位置的是意志薄弱的官迷古姆巴里泽。（有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他在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以索布恰克为首的4月9日事件调查委员会汇报时说，关于强力部门准备采取的行动，他只是在开始前15分钟才得知！这就是——中央局委员，克格勃主席！）

格鲁吉亚党中央发生的事，戈尔巴乔夫当然是知道的。对他来说，失去谢瓦尔德纳泽不仅是失去指挥部的一个成员、一个他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还意味着大大损害改革方针的信誉。党内反戈尔巴乔夫的情绪日益强烈，一旦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被关进大牢，他个人的命运又将怎样，实难预料。

如上所说，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

1989年2月末，抗议活动又连续发生。人民阵线指挥部已经开始发挥经常职能。正是从这里控制了大众传媒和共和国电视，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人员也跑到这里来表明自己拥护格鲁吉亚独立的决心。当时民族关系的局势对人民阵线来说也是天赐良机。格鲁吉亚人总是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民族主义经常存在于格鲁吉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干部政策中。

在这个550万人口中只有300万是格鲁吉亚人的共和国内，中央机关、各部、各局实际上95%是单一民族。所以民族问题很容易被挑动，也很容易把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吸引到“杂牌军”的旗下。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发出金牌，宣布必须根本改革民族关系。

居住在东格鲁吉亚的阿塞拜疆人和贾瓦赫季的亚美尼亚人率先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但巴库和埃里温的强硬立场向那些发热的头脑泼了冷水。紧接着发动了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有计划的长期攻击。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们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称为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各部、局都向这些自治共和国发出了把公文译成格鲁吉亚语的指示。克万奇拉什维里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加露骨，实际上竟然建议所有非格鲁吉亚人绝育。格鲁吉亚教堂也为“民族关系改革”增添了一份贡献：它的首领伊里阿二世在自己的呼吁中承诺，杀害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人将遭诅咒。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在讨论局势时，更经常地提到了武装对抗的危险。需要采取非常措施。但莫斯科却仿佛被催眠了，只是一个劲地说：要忍耐、要对话。放纵恣意妄为使这些人得其所哉——在那些日

子里就差没把中央第一书记从群众大会上一脚踹出去了。

掀起新一轮群众运动的借口和造成格鲁吉亚局势紧张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阿布哈兹问题”。

1989年3月18日，共和国古达乌茨克区雷赫内村的3万阿布哈兹族人经批准集会，通过了致阿布哈兹公众的呼吁书，内称：“请求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恢复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宣布成立时所具有的地位。”

通过这一决议的理由，正如呼吁书中所说，是“阿布哈兹民族问题被逼进了死胡同。自治共和国土生土长的居民正处于民族大灾难的边缘，他们正在被强迫迁出……阿布哈兹语言、阿布哈兹文化和历史、共和国的民族国家地位、自古便有的地理名称、阿布哈兹文字……一切都在遭受迫害。沙文主义者撤销了阿布哈兹学校，用格鲁吉亚语授课……”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民族关系中的禁区暴露无遗。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更加积极的活动。比如，在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某些城市，展开了公开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人们打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旗帜，要求把共和国内的非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化：“在格鲁吉亚不应有任何非格鲁吉亚事物存在……”

杂牌军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阿布哈兹问题”，煽起了民族主义之火，一步步改变了他们在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的标语口号和要求的性质。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的“分立主义”政策，转向了公然诋毁苏联共产党，诋毁全苏政府，号召消灭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和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情况日趋严重。3月27日在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大楼前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组织者之一采列捷利看准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在会上

竟宣布成立一个新党——“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党”。党纲的基本内容当场宣布出来，其中包括废除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退出苏联、从共和国领土上撤出苏联军队、引进外国军队。大会宣读了格鲁吉亚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它应拥有本民族军队，使用格鲁吉亚货币，建立国家银行。而且这个新成立的党的要求还不止于此：它还要求归还“苏维埃化”之后被兼并，然后又转划给土耳其、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格鲁吉亚土地。集会上讲话的加姆萨胡尔季阿则号召撤销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

1989年4月4日，集会群众赶走民警，擅自占领了政府大楼和电视广播委员会的广场。从这一时刻起，在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便不断举行未经批准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大会明显具有反苏联的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性质。为了吸引更多人们的注意，他们在广场上安装了扩音设备和话筒。

政府大楼前参加集会的基本上是科研所、出版社、制片厂的职工，各机关、团体、工业企业的职员，高校学生和普通中学高年级学生。

集会的参加者，包括中学生，都宣誓要积极抵抗，“不怕流血”，决不向法律秩序的保卫者们让步，要留在广场，直到他们提出的那些实质是反宪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昌图里亚以及该党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向集会群众讲话，号召人民举行全国政治大罢工和绝食抗议，建立“人民运动统一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鼓动群众不服从合法当选的政权机关，建立“临时政府”，在工业、交通企业、学校和机关组织纠察队。他们的目的是要组织一支青年队伍，控制公共交通，在群众集会地附近街道构筑街垒，组织对法律秩序保卫者的积极抵抗，“直到流血”。

这些政治“活动家”们煽动与会群众大搞民族迫害，先是4月9日在苏胡米市对阿布哈兹人，后又对奥塞梯族人。大多数演讲者的讲话除谈及“阿布哈兹问题”，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共和国党政机关施压（政治罢工、群众大会、向其他国家政府呼吁），目的是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脱离苏联。为了保证这些反宪法要求得以实现，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采列捷利及杂牌军的其他头头们，以“格鲁吉亚人民”的名义，向一些外国政府呼吁协作，请求它们给予相应的帮助，邀请联合国部队进驻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土。

从4月5日清晨起，政府大楼和电视广播委员会大楼前的群众集会继续举行，人数达到五六千人。4月5日晨近5点时集会结束。会后约30个年轻人宣布在政府大楼前绝食，直到“格鲁吉亚成为独立的国家”。随后几天人数增加到约150人。

群众大会的气氛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性质。集会群众中间首次出现了杂牌军头头们事先准备好的反宪法的极端主义口号标语牌。在举行群众集会的地点，公共交通全部瘫痪。

在苏胡米，格鲁吉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罢课在继续，机务段的包机组没有上班，导致客运和货运列车有一段时间停止运行。在加格雷市，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也在举行。

加姆萨胡尔季阿鼓动第比利斯集会群众和格鲁吉亚居民继续开展反社会行动，而且宣称：“阿布哈兹民族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些部落懂事，我们还可以平等待之，但得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恢复历史的公正，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安家落户……他们同格鲁吉亚人和格鲁吉亚展开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变成俄罗斯人。他们的目的是俄罗斯化，而不是民族自决。他们并没有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愿望，只不过是想要归附俄罗斯，在俄罗斯找到一席之地而已……”

“格鲁吉亚人要在共同的民族斗争中团结起来。第比利斯开始的罢工是全国民族大罢工的开端。我们宣布，要同苏胡米和阿布哈兹罢工的格鲁吉亚人团结一致，那里的交通部门、学校、许多企业都在罢工。昨天和今天都在继续，第比利斯也应该如此……我们号召格鲁吉亚人民参加到全国大罢工中来……”

杂牌军头头和活跃分子们试图让首都工人阶级倒向自己一方，为此向市里的工业企业派出了一批宣传员。由于杂牌军成员的努力，那些日子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和以季米特洛夫命名的航空生产公司的部分工人，国立第比利斯大学和工业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大多数学生和教师附和了集会者，他们的代表有组织地来到政府大楼前的广场。

4月6日在政府大楼前的群众集会上，宣读了致美国总统、国会和北约成员国的呼吁书，请求帮助格鲁吉亚脱离苏联；把联合国的一次会议日期定为主权的格鲁吉亚日，把1921年2月25日宣布为“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势力占领格鲁吉亚日”。

格鲁吉亚领袖谢瓦尔德纳泽的手法我们怎么会不熟悉呢？他又想投入北约怀抱，又想撤除俄罗斯军事基地，又想把美国部队请进来，可就是忘记了他早已不是伟大国家的外交部长，却是促成苏联崩溃的主要黑手之一。现在他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首脑，西方国家要想在地图上找到他，还真得费点力气才行。更何况格鲁吉亚还要靠向俄罗斯借债度日。

那一天在群众大会上采列捷利发表讲话，宣布成立中央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杂牌军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

当天下午，英雄广场聚集了约三四千人，傍晚向共和国电视广播委员会大楼进发。示威游行人群要求电视广播委员会领导在电视上直播政府大楼广场上的群众集会。

4月6日召开了中央局会议，通过决议，在当天格鲁吉亚最高苏维

埃会议上讨论形势问题。但是非常遗憾，帕季阿什维里的讲话没有人支持。干脆就没有人发言。这也不难理解——政府大楼处于几千人大会包围中，会上公开提出要推翻现政权，脱离苏联，宣布独立和向西方请求援助和支持。就在当天，中央委员会召集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开会，谈话更为具体：形势具有爆炸性，中央委员会应该行动！这时对高加索军区部队司令罗吉奥诺夫曾发出呼吁，要他立刻派军队进驻第比利斯，但将军明确表示，这不在军队权限之内，应该让内务部和内务部队解决问题。

4月7日整天市内形势仍很紧张。政府大楼前集合的群众人数已达到1万到1.5万人，电视广播大楼前和其他地方的集会上，民族主义的、反苏的声音越来越高。参加游行示威的中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代表和来自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代表越来越多。鼓动工业企业集体参加罢工的宣传攻势加强了，造成了机床厂、航空工厂和车辆修理厂部分停工。

4月7日帕季阿什维里的广播电视讲话在政府大楼广场直播，他表示愿意同杂牌军代表对话，并警告说“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会造成灾难”，但讲话没有取得良好效果。杂牌军头头们拒绝同政府谈判，号召不信任领导，宣称将“代表自由的格鲁吉亚只同克里姆林宫对话”。

采列捷利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纲领：

.....亲爱的同胞们！我代表格鲁吉亚统一民族运动向你们讲话。你们每个人刚才都听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的讲话。朋友们，我要向你们宣布，所谓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着进步的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同他们并列的却是一个腐朽的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有的，但不存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因为它不反映、不保卫格鲁吉亚的利益。帕季阿什维里认为不可能脱离苏联，然而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而且完全可以解决。

我们不应该留在被称做苏联的这个共产主义帝国联盟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帝国崩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帝国根基动摇了；而经过第三次战争，它就会完全崩溃。这个帝国必然崩溃，这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的崩溃，人类可以因之完全松一口气了……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的主权国家，但它受到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帝国的奴役。我们要求立刻退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帝国苏联。脱离苏联之后，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应立即从格鲁吉亚撤出，要立即废除格鲁吉亚傀儡政府的权力。联合国部队应进驻格鲁吉亚，以便暂时保卫我们的安全……而后，格鲁吉亚应作为军事盟友加入北约。这是格鲁吉亚所有非官方组织的立场。美国是和平、保卫人权和民主的象征。独立的格鲁吉亚应该以美国为发展方向……格鲁吉亚人将拥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这一时刻正日益临近。我们应该为之奋起斗争。世界舆论会支持我们，我们能够摆脱帝国……

我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格鲁吉亚的解放斗争到底。我号召所有的格鲁吉亚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举行全民大罢工……

由于形势的复杂，共和国领导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长向联盟机关求助。

1989年4月7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通过了“必要时应宣布第比利斯进入紧急状态”的决议，并致电苏共中央，评估了急剧恶化的形势，同时告知了中央局通过的决议。为了付诸实施，要求内务部和高加索军区补充一部分力量。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积极要求在格鲁吉亚实行强制性决定的，首先是谢瓦尔德纳泽的人，这些人在领导岗位上为数甚多。

最后通过决议，4月8日至9日的夜晚，把集会群众赶出卢斯塔维里广场。届时谢瓦尔德纳泽应乘飞机到来。但此刻却从莫斯科来了一

道命令：第比利斯从22时起开始宵禁，高加索军区司令被任命为卫戍司令。

罗吉奥诺夫离开党中央大楼，去电视台宣布对自己的任命和宵禁令，心中嘀咕：“.....你们以后会把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令人不解的是罗吉奥诺夫的讲话19时30分便已录毕，但播出时间却是23时。

同一天，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吉奥诺夫上将向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发出密码电报，通报了事件的情况和杂牌军的违法行为：

.....所有正在举行的群众集会都未经批准，共和国领导没有采取措施驱散他们。对集会的领导者（组织者）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内务部队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共和国领导试图借助部队的积极行动稳定局势，但这样做又会激化已存在的对军队的负面态度。攻击、殴打、侮辱军人和硬闯他们住宅的情况已有发生。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眼中，军队的作用只是履行民警职能。

由于格鲁吉亚政治形势恶化，共和国领导向全苏强力机构寻求援助，1989年4月7日苏共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麦德韦杰夫、斯柳思科夫、切勃里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还有苏联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特鲁申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得出结论，必须给予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苏联内务部、国防部的兵力和装备维护法律秩序，为此建议上述各部领导研究这一问题，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同时特别强调，共和国领导必须尽力采取一切措施，用政治手段恢复局势正常化。在利用两部拨出的兵力和装备时，必须极端谨慎。并建议：在

目前状况下，在第比利斯不宜宣布宵禁。

同一天，根据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希洛夫和苏联国防部参谋总长莫伊谢耶夫的指示，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和指示，将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地区。

除此之外，遵照苏联国防部的命令，1989年4月7日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切托夫大将也随同罗吉奥诺夫上将由列尼纳坎来到第比利斯，副部长的任务是弄清目前局势，必要时协助罗吉奥诺夫将军。

在此期间首都第比利斯的形势已经接近危急关头。4月8日清晨，游行示威者的队伍开始向政府大厦，国家电视广播大楼，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师范学院进发。普通学校的中、高年级学生在教师陪同下，有组织地向政府大厦进发。集会的组织者向与会者发出号召：“各校的老师校长们！不要阻止学生参加罢工和示威，不要在他们面前威信扫地。”

这一天还有过一次试图不借助非常手段影响事件危机性发展的努力，以制止集会群众和他们的头头继续从事违法活动。依据决定，4月8日清晨两个军用直升机航空大队在城市上低空盘旋。而后12时许，三列军车按不同路线从第比利斯大街上驶过，其中两列要驶过卢斯塔维里大街。

关于把军车示威作为警告集会者手段之一的问题，事先于4月7日在共产党中央局讨论过，对此帕季阿什维里、尼科尔斯基和马哈拉什维里（第比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都做过解释。

在一个由10辆步兵战车组成的纵队在大街上行驶时，集会群众向它们投掷石块、金属罐及其他东西，有人还跳上战车，遮住驾驶员的瞭望孔。在卢斯塔维里影院旁，一组肆无忌惮的年轻人抢下一辆交警的田野牌巡逻车，把它推倒，横在行驶中的步兵战车正前方的通道上，挑逗战车轧碾这辆“田野”车，而巡逻车司机——民警中士马加尔

达泽被殴打之后还被迫躺在了步兵战车下。

由于集会者的流氓行为致使7名军人受伤，包括多处挫伤、皮肉伤和淤痕。两辆伴随纵队前进的汽车被损，交警队的巡逻车则完全报废。

此外，政府大厦前参加集会的人群中，一群流氓分子还对多名交警进行辱骂和殴打，指责他们没有阻挡战车从大街驶过。还有人撕扯民警的肩章、制帽，企图殴打他们，交警大队的许多工作人员不得不赶紧逃跑。

第二装甲车纵队未能完成穿越大街的行动，因为大街入口处的通道被来自共和国广场的游行示威者占据，不许战车前进。

就这样，1989年4月8日尝试以军车示威稳定第比利斯局势的办法，未能达到警示的目的。

第比利斯和整个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形势，4月8日白天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而且还在升级。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性质更加露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越来越常见，也更具挑衅性。这就证明，在共和国首都和阿布哈兹，实质上正在酝酿着一场未来可能引发后果难以逆料的反社会大行动。

政府大厦前集会的人数已达到2.5万—3万人。卢斯塔维里大街艺术家之家大楼前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被集会者示威性地扯下践踏，升起了一面格鲁吉亚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统治时期的旗子。人数为三四千的许多群众集会依然在国家电视广播大楼前，在一些学院和市里其他地方继续举行。

有约3000妇女参加了示威游行以及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楼前的静坐罢工，要求把苏联内务部队撤出首都。政府大楼前绝食的大学生和高年级中学生已达400人。在第比利斯其他地方，也组织

了青年绝食。

由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和采列捷利建立的机动宣传小组继续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煽风点火，制造舆论，组织“自发的”群众集会和绝食，在工业、交通企业、机关、学校建立纠察队，拼命煽动这些单位的工人停止工作，参加集会群众队伍。高校、中学、普教学校都没有复课。又有一批工厂、机关和团体的工作人员参加罢工。青年小组强制迫使一批通信枢纽的职工也参加到罢工中来。

劳动集体的代表同鼓动小组的冲突时有发生，侮辱、威胁和攻击民警和军人的事件也未有间断。宣传员积极散发反苏传单。

但是到头来杂牌军的头头们也并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对他们反社会行动的全力支持。首都大部分企业和机关依然照常工作，虽然工作负荷不满。

不过，共和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罢工代表团有组织的队伍仍在向政府大楼汇集，集会群众人数达到数千人。

在这种形势下，4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第比利斯形势和“政治组织措施紧急计划”，其中包括恢复秩序的措施。然后，召开了共和国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计划得到了会议的赞同。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中央局会议继续进行。考虑到当时一触即发的爆炸形势，会议通过决议，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部队”，采取这一行动时，由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吉奥诺夫上将指挥。

应当指出，苏联国防部并没有下达任何委任罗吉奥诺夫为行动指挥的命令，但是按苏联武装力量卫戍勤务条例要求，罗吉奥诺夫上将当时的情况下，理应担任为恢复城市秩序分拨出来的所有的军队、兵力和装备的指挥官。

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批准实施的条例，在苏军部队、苏联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内务部队协同配置担任卫戍任务时，它们均应服从由军区部队司令任命的卫戍司令的指挥。

因此，作为高加索军区的司令的罗吉奥诺夫上将，其军衔最高，理应拥有卫戍司令的全部权力，担任这次行动的领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就这一问题的决定是完全合法的。

那一天的17时30分，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成员由帕季阿什维里、尼科尔斯基、切尔凯济亚、奇赫伊泽、古姆巴里泽），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指挥部的代表（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诺维科夫）和护法机关的领导（戈尔戈泽、卡兰纳泽、沙拉舍尼泽、绍舍阿什维里），会上一致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极端尖锐，“已濒临灾难边缘”。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又一次一致表示，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迅速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共和国的正常生活和活动”。当时规定了开始行动的大致时间——1989年4月8日深夜。这是因为考虑到之前几日这个时间逗留在政府大厦广场的人较少。会上建议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草拟和发布相应的决议，作为内务机关和调来的部队整顿秩序行动的法律依据。

依照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颁布的命令，共和国内务部“派出内务部队和苏军军人”，奉命采取维护社会秩序的补充措施——从政府大厦广场上驱散集会人群，关闭公民前往政府大厦的通道。对那些“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采取既定的法律措施”。在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毗邻地域，必要时，亦可在城市其他地方，奉命采取同样措施。

作为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实行保卫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措施；同样根据宪法，其决议和命令，也必须在共和国领土上付诸实施。

苏联内务部的机动部队和苏军各部队由相应的全苏各部派遣，帮助共和国政府维护社会秩序。至于如何使用它们的问题，已同苏联内务部和军事指挥部代表专门协商过。

在这一段时间里，一批年轻人在市内开始抢夺装碎石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大卡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把它们开到卢斯塔维里大街，封锁了列宁广场和共和国广场通向各条街道的出口，同时也封锁了由毗邻各街道通往广场的入口，作为街垒。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利用大量的交通工具，而且在抢夺时还威胁司机。交通警察想把卢斯塔维里大街和毗邻街道上的汽车清除，但却遭到集会群众阻止，这些人嚣张地对抗民警，对之进行威胁和侮辱。

对军人耍流氓，肆无忌惮地以武力抢夺国家的汽车，反抗民警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再次证明局势有爆炸危险。

傍晚，集会群众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醉态。后来在事件调查中有许多人证明，当时曾向群众大会大量供应酒精饮料，会上有为数众多的醉鬼。

1989年4月8日深夜，第比利斯附近一个共和国重工业中心卢斯塔维市的局势也紧张起来了。这里跟第比利斯一样，也举行了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也是杂牌军的代表们组织的，内容和倾向也和第比利斯一样。

4月8日下午，杂牌军组织的几千群众（主要是青年）向卢斯塔维冶金厂进发。此前他们曾在市中心集会。在厂行政大楼广场集会又继续进行。演讲者讲话中除要求格鲁吉亚独立和脱离苏联外，还出现了要求工厂停工，工人放下工作参加集会的呼声。听到了这样的叫喊：“你们炼钢献给俄罗斯，而俄罗斯用它来造武器消灭你们。”随后有人提议冲击工厂，在马丁炉车间举行集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工厂工作人员和前来的民警呼吁要理智，建议集会解散，但是都

没有奏效。

将近24时，行政大楼广场上的形势恶化了，一大批人高喊：“不要听他们的！冲破炼钢厂防线！”涌向正门，想强行冲入厂区。当时为了对付胡作非为的人群，工厂开来了消防车，堵住了正门。水龙头喷射的水流让攻击者清醒了一下，可是很快储水用完，对大门的冲击又加强了。在这紧急关头，厂保卫部副主任向天空放了5枪，阻止了集会群众进一步深入厂区的企图。他们逐渐离开大门，回到行政大楼广场，夜里3点才离开。

在卢斯塔维冶金厂举行集会，目的是想鼓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工人，把他们拉过去。第比利斯特使们的标语和口号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工人们没有允许集会者进入厂区破坏生产，在城市造成无法控制的局势，引起混乱和恐慌。

恐怖之夜的真相

依照已作出的决定，罗吉奥诺夫上将作为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这一行动的指挥，责成少将叶菲莫夫（苏联内务部军事作战组的首长）协同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中将戈尔戈泽拟订行动计划，并于4月8日24时许经上将正式批准。可惜的是那些作出决定的人没有在文件上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于是罗吉奥诺夫将军便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此刻便独自成了第比利斯事件中的“极端分子”。

取缔政府大楼前群众大会的行动预定在1989年4月9日4时开始。

根据当时的标准，内务部队的装备如下：钢盔、防弹衣、警棍、塑料和金属盾牌，军官们配备个人武器。按编制配属的伞兵分队配备有钢盔、防弹衣、小型步兵铲，军官和准尉们配备有编制规定的武器。

参加行动的除民警人员外，共2300人，另6辆装甲运输车、8辆步兵战车、2辆救护车和4辆消防车。行动计划还规定必要时可以喷射消防水龙对付集会群众，但后来决定只是在行动中遇有焚烧车辆或发生火灾时，才使用消防手段。

3时许，戈文察泽中校依照戈尔戈泽中将的命令，在政府大楼前向集会群众讲话，建议他们离开广场，并警告说，未经批准的集会不得继续进行，为此将动用军队。但是集会群众对这一警告未予理睬。接着，3时16分，应中校请求，格鲁吉亚最高主教伊利亚二世向集会群众讲话，请求他们停止集会，并警告他们存在确实的危险，“只差几分钟了”。

听到这一呼吁，集会组织者之一，身在艺术家之家医疗站屋内的采列捷利，大喊“是谁给他的权利命令人们？”跑到广场，夺过麦克风，开始鼓动人们不要离开广场，要忠于誓言。

在多次警告将动用武力之后，眼看着部队和军车就要沿大街向政府大厦进发时，3时50分，广场的扩音器响起音乐、歌声，大街有些地方人数不多的游行示威者跳起了舞。

舞曲录音带是专门准备的，一些地方同时开始跳舞是事先定好的——在面临危险的时刻，这种娱乐是不自然的，显然是装给人看的，这一切都是杂牌军头头们事先排练好的一出戏，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集会、游行是和平的、无可指责的。

1989年4月9日4时，按计划规定，第4摩托化步兵团分队缓慢地向政府大厦开进。

实际上从部队移动的最初几分钟起，空降部队的官兵就已受到集会群众的攻击。战斗部队还没有同集会参加者接触，就已有6名空降兵因集会参加者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东西而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放过战车后，在装甲运兵车行进时，集会群众又重新聚集到一起。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散兵线走走停停。中校巴克拉诺夫通过扩音喇叭呼吁集会参加者离开大街，否则将使用武力。4时零6分，摩托化步兵团在政府大厦右侧地区接触会众，试图在盾牌的帮助下沿大街把他们挤出去。

经查明，集会组织者于4月8日即已做好准备，对维护法律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反抗。为此，他们成立了由掌握格斗技巧的运动员、身体强壮的男人组成的许多小组。这些人在行动开始前就站在集会群众的最前列直面对部队，在同内务部队军人冲突前，先下手投掷瓶子、石块等物，然后使用木棍、金属器件、刀子、标枪等等，开始进行猛烈顽强的抵抗。

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军人克服了会众的顽强抵抗，继续缓慢地沿着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大街把集会者挤出去。可能引起人员伤亡急剧增加和导致行动中断的危急形势，以及内务部后备力量的缺少，迫使罗吉奥诺夫上将应叶菲莫夫少将的请求派出59人空降兵连，支援执行挤压任务的部队。

空降兵连人员同集会群众发生了短暂的（没超过10分钟）肢体接触。他们按计划规定只履行保卫任务，没有进一步参加往外挤压群众的工作。

军人沿通往共和国广场的大街继续缓慢地往外挤压人群。会众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下面是工学院四年级一个在场学生的叙述：“……我当时正站在政府大厦正门附近的麦克风旁……士兵们很快地靠近，约4时许开始清除人群……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激怒得发狂，拼命殴打士兵。我们的手中是棍棒。我把第一中学旁的长椅拆毁，拿着长椅的木方去痛打士兵的脑袋。可惜，他们却戴着钢盔，要不然我定会送他几个上西天……部分士兵被我们格鲁吉亚小伙子围住了，其中有练空手道、柔道、拳击的运动员，这些人很快就把士兵制服了。殴斗是你

死我活的，流了不少血——有我们的，也有士兵的。我也加入这一伙。我练自由式摔跤有10年了。小伙子们夺警棍，砸盾牌，士兵成堆地倒下……”

这些怀有极端主义情绪的部分集会群众，不但有事先准备好的进攻性武器钢筋、标枪、刀子等，还有射击武器。

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官兵继续克服肆无忌惮的人群的顽强抵抗，约在4时30分前终于将广场人群完全挤了出去。此刻在台阶上，在平台上和政府大厦入口前的草坪上——大楼左侧正面发生过挤轧的地方——发现16人死亡，伤者无数，受伤者即刻得到了民警、军人和应召前来的急救人员的救护。

清理政府大厦广场的任务完成以后，内务部队继续完成既定任务，逼近焦尔德日阿什维里和列霞·乌克兰英卡街的交汇处。在这一地区他们又遭到一大群游行示威男子（从1000人到几千人）有组织的、激烈的反抗。他们除了向部队的战斗队形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杂物外，还对军人使用标枪、刀子、金属管截头、燃烧瓶，从窗口、阳台和屋顶向士兵投掷各种重物。结果部队横队的行进不得不停止，士兵为防御大量飞来的重物，不得不集中起来，用盾牌遮住自己。不少于40名军人身体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这军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实实在在威胁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更加严重的后果，叶菲莫夫少将完全依据内务部队战斗勤务条例，下达了使用特殊制剂“稠李树”的命令。

巴克兰诺夫中校通过大喇叭呼吁集会群众停止抵抗，并警告他们说，否则将使用催泪瓦斯。但是毫无用处。这之后经精心计算，使用了16个单位的“稠李树—6”，才把胡作非为的人群驱散。

在卢斯塔维里大街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和恰夫恰瓦泽两街地区，形势也大同小异。经叶菲莫夫少将和巴克兰诺夫中校的决定，使用了3

个单位的“稠李树—4”和7个单位的“稠李树—5”。

进入共和国广场时，又遭到集会群众的猛烈反抗。他们凭依大卡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构筑的街垒，躲在街垒后面向军人们投掷石块，金属和木制物品。用了两个单位的“稠李树—4”竟然也不起作用。于是巴克兰诺夫中校下令使用特殊化学制剂“K—51”，人群才散去。

5时10分，把集会者挤出卢斯塔维里大街的任务终于完成。因集会者有组织的违法行动而受伤的军人达187名。

后来查明，集会群众中的挤轧现象是在广场出现第四摩托化步兵团战斗队形那一刻发生的，后来由于恐慌，越来越严重。

集会群众前列的积极抵抗，使后面广场上的人难以通过战斗队形中特设的通道离开广场。

大部分集会群众（尤其是政府大厦台阶旁的）想要经由共和国广场方向的大街离开也很困难，因为有一大批集会群众正从那里涌来。再者，政府大厦的台阶上坐着和躺着一些人，他们响应集会组织者鼓动，决不离开广场，于是在拥挤时便有人跌倒在他们身上。正是在这里发生的挤轧，使游行示威者有了伤亡。

政府大厦前和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前的群众集会被取缔之后，4月9日一整天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紧张。城里传说死了很多，极端主义分子号召“复仇”和惩罚军人，妄图对抗部队和民警机关恢复秩序的措施。

为了稳定局势，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主席团的命令，当日在第比利斯实行了宵禁。

中央采取了奇怪的，不一贯的立场。政治局，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要求共和国局势正常化——同时又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先

是帕季阿什维里，而后是古姆巴里泽）把事情搞得过分紧张。

顺便说一句，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

总书记有一句最爱说的话：“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紧张。”这句话捆住了领导者的手脚，无法自行采取决定，而大众媒体，实际上就是苏共中央的喉舌，却害怕披露事件的真相。结果人们得到的是明显具有倾向性的报道，看到的是虚假的一面，相信小道传闻。

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的这种作风，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特色。他不参与不得人心的决策，尤其是涉及恢复秩序问题的时候。结果地方政权瘫痪了，对驾驭事件无能为力。戈尔巴乔夫喜欢说：“过程开始了。”这句话可以做各种解释。针对上面描述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过程到底开始朝什么方向发展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朝着伟大国家解体和现存制度灭亡的方向发展。

莫斯科总是说不要造成对抗局面，不要为“过程”灭火，同时下令让军队待命，要制止抢劫和占领政府机关的现象发生。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当时正在英国，同莫斯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完全了解情况的进展。给第比利斯下达的命令，没有一条没同他商量过。

直到现在还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按戈尔巴乔夫指示在4月8日飞往第比利斯？是谁为什么取消了4月7日晚间作出的这一决定？很难相信取消这一决定是应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请求。就是现在，也未必有谁能弄清那些悲剧日子里的真实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是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玩的把戏。谢瓦尔德纳泽不愿深陷事件之中，一到那边，他总会愿意不愿意地作出一些决定。戈尔巴乔夫让自己这位朋友从“事件”中脱身，实际上就是让格鲁吉亚领导独自面对问题，同时还可以把他不喜欢又

有点惧怕的军队搅到这档子事里头去。

4月9日，第一个到达第比利斯的是克格勃副主席博勃科夫。4月9日12时应召开中央局会议，然后再开扩大的中央全会。切霍耶夫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我按时出发了。当汽车驶上通往第比利斯的大路时，在车中又接到通知说一切取消了，应该回去。不过我想进入市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街道上有军人巡逻，但市内很安静，所有企业和组织都在上班，而且在中央委员会有人告诉我，各单位开了群众大会，承认当局的行动是正确的，对于逮捕杂牌军领导，制止暴徒胡作非为和最终开始重整秩序表示满意。”

“根据莫斯科的建议，中央局和中央全会改于谢瓦尔德纳泽和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到达之后，定于4月10日召开。这一改期在后来具有重要意义。”

4月10日傍晚，中央委员会代表来了，但是很快就搞清，原来他们是另有任务。第一，请求帕季阿什维里不要到机场去迎接；第二，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先不到中央委员会，而是直接前往民主分子的牺牲地，代表莫斯科献花圈，屈膝下跪点燃蜡烛为亡灵祷告；然后，蜻蜓点水般到中央委员会逗留了一会儿，又去了大学——“民主分子”的巢穴，去会见知识分子。于是“丑剧”开始上演了：谢瓦尔德纳泽说，他为中央委员会（他特别强调了机构，却没提政府）、内务部、军队考虑不周的残酷行为表示遗憾，说他此番前来，是为了弄清事实，惩办罪犯！他明确地说，军队是奉帕季阿什维里之命，在夜里4时冲击和平跳舞的男女青年，用工兵铲砍伤他们，并当即根据社会舆论的要求发出指示，立刻释放被捕者。

夜晚召开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会议，决定揭露真正的挑拨者们所扮演的角色，查清是什么人召集人群，组织他们进行非法活动。

这是夜里谈论的内容，可是到了早晨，对事件的解释就完全不同

了。整个矛头对准了军队。罗吉奥诺夫将军，一个大好人，一个精通业务的职业军人，一个忠诚履行职责的人，却成了替罪羊。大家闭口不谈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同谋的责任。他们很快获释，甚至被允许竞选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到头来各方面有错的倒成了莫斯科、军队和帕季阿什维里。

结果是“人民阵线战士”的威信得到了难以置信的增长。这回他们的活动受到保护，有民警陪同。而且他们居然召集共和国领导人前来汇报（！），还能左右中央新领导，决定任免事项。

谢瓦尔德纳泽被捧为英明地为第比利斯带来安定的伟大和平缔造者，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以自豪的口气谈到此事。罗吉奥诺夫将军是一个守纪律的军人，当时他对总书记在这一段历史中所起的真正作用有口难言。戈尔巴乔夫却装作对一切毫不知情。这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双重人格”的唯一事例。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又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要整顿秩序。行动吧，我支持你们。”他是如何支持军队、支持格鲁吉亚和莫斯科领导的呢？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梭布恰克委员会”的材料讨论第比利斯事件时，我们就会看到。在会上将会揭露伪造事件经过、利用当天夜晚的死者投机的那些家伙的真面目，说明工兵铲和毒气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颠倒黑白的审判

众所周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1989年5月25日开幕的。那天上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两千多人民代表。

代表大会开幕当日，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导演、人民代表尚格拉亚提出了4月9日第比利斯事件的问题，建议看一看反映这一悲剧事件的电视片。最后他把这一切责任推到了罗吉奥诺夫将军身上：“还有

最后一点。由于这一军事讨伐行动——恕我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截至今日已死亡21人，4000多人就医，3000余人中毒，伤残者数以百计。领导这次行动的便是罗吉奥诺夫将军。我认为，在我们队伍中有这样的人民代表，有损代表大会的体面。这就是我要声明的。”

这就是当天对事件的解释。没有格鲁吉亚当局什么事。只有残酷的罗吉奥诺夫将军！

最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第比利斯事件。31日的会议上，代表大会开始组建这一委员会。

气氛异常紧张。一些人说代表大会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苏联最高苏维埃调查委员会，而且一切情况都已调查清楚。另外一些人（哈萨克代表团）坚持让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任调查委员会主席。

人民代表波尔托拉宁是《消息报》通讯社的政治评论员，叶利钦当时的密友，建议选纳扎尔巴耶夫当委员会主席。当时，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对事件做出了明确的、考虑周到的评价。

为了说明当时进行讨论的气氛，我想引用一段大会速记：

人民代表（没有自报姓名）：我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我同杀人犯合作。（大厅哗然）。所以只要罗吉奥诺夫将军在我们中间，我就拒绝履行自己的人民代表权能。（大厅哗然）

结果是批准建立调查委员会，但主席由委员会成员选举。就这样，第一次浪潮中涌现的“民主主义者”、令人难忘的索布恰克，便成了委员会的头头。这个巧舌如簧的人招惹了不少祸事。历史已经对他作出了判决。

在讨论第比利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并对之作出评价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相互关系的历史。

我们在思考上一个世纪80—90年代格鲁吉亚发生的事情时，不由自主会出现一个问题：格鲁吉亚是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一员，而后又成为苏联一员的？在什么条件下，经过哪些征服性战争，格鲁吉亚才并入俄罗斯版图的？

俄罗斯高加索政策的战略目标，也同样得到了高加索众多民族的响应，这些民族也希望从北方的邻居那里得到庇护，以避免伊朗和土耳其封建主的觊觎。

早在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时代，有些格鲁吉亚公国就已经开始了并入俄罗斯的运动。

彼得大帝的活动给俄罗斯接近高加索各民族带来了新的动力。同格鲁吉亚封建主的一系列谈判，向外高加索派遣部队等行动，迫使伊朗沙赫作出让步。

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命令，在莫兹多克领地安置受洗改宗基督教的奥塞梯人。在这一带开始修建城堡，派驻俄罗斯军队。哥萨克从顿河和伏尔加河开始向这一地区迁徙，而后印古什人和卡巴尔达人也向莫兹多克地区迁移。这一切反映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亲俄罗斯情绪。

1782年12月，卡尔特利—卡赫齐国王赫拉克利乌斯二世和伊梅列季亚国王所罗门一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请求，希望他们的领地得到俄罗斯庇护。1783年初，在北高加索的乔治城堡签订条约，确立了俄罗斯对东格鲁吉亚的保护关系。乔治堡条约长期有效。东格鲁吉亚的君王们许诺保护俄罗斯国民在其领土上的利益，并愿为俄罗斯利益提供契约关系的服务，包括给予俄罗斯管理权和贸易优惠。

18世纪末伊朗沙赫入侵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诸王国的生存成了问题。俄罗斯的保护未能成为安全的可靠保障。

1800年，赫拉克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乔治十二世向彼得堡请求合并入俄罗斯。1801年1月18日，沙皇保罗一世签署了格鲁吉亚归并入俄罗斯的宣言。

杰出的格鲁吉亚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恰夫恰瓦泽是这样述及俄罗斯军队进驻格鲁吉亚一事的：

信仰相同的伟大人民的庇护，永远驱散了对顽固不化的敌人的恐惧。这个早已不知安宁为何物的疲惫不堪的国家终于安静下来，喘了一口气，避免了破坏和毁灭，避免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争斗。敌人高举在我国和我们家庭头上的利剑的阴森的闪光已经消失。焚烧了我们的房屋和我们祖先的财产的烈火已经熄灭，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可怕回忆的强盗的袭击也永远成为过去。新时代开始了。被钉上十字架的，面色惨白的格鲁吉亚过上安全、安宁日子时代开始了。

5年以后，在俄—土战争中，依据圣斯忒法诺和约，俄罗斯赢得了阿扎尔和西亚美尼亚。这样，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边界便最终形成。

1983年，我任苏共中央书记时，曾目睹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是如何坚持要在国内大张旗鼓地搞一次“乔治堡条约”周年纪念活动的。他的理由是无可争辩的——200年前格鲁吉亚自愿并入俄罗斯，从那时起开始了在苏联各民族友爱大家庭中的生活。

到了2003年，不知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已经只字不提举行220周年纪念活动的事了！这时他正忙于别的事情：在自己的峡谷里卵翼着恐怖主义者，同美国将军拥抱，头也不回地投向北约。这就是他所谓的“永恒的友谊”。

1917年的革命、内战、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激起了国家建设中急剧的离心力。分别成立了许多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国家体制的主权国

家。

但是国内战争一结束，又开始了国家体制重组的艰难过程。1922年12月30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宣告了这一过程的完成。

1921年3月12日，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大会“根据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宣布民族自决权，承认签约各方的独立和主权，认识到为了国防、经济建设的利益，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兹决定从现在起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一个紧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

1921年11月，组建外高加索联邦的运动宣告完成。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一致同意成立联邦。1922年2月，党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权会议。

会议于1922年11—12月在梯弗里斯召开。会议通过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和阐述联邦意义的致各国劳动群众书。

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存在到1937年2月。众所周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宣言。

在那些年代里，党的领导对外高加索国家建设问题的特别态度值得关注。它完全不同于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部就这一问题实行的政策。

在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列宁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论述如

下：

在对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民方面，应该更加宽容，更加谨慎，更多地让步。在租赁政策和商品交易政策中，应该从经济上积极地、千方百计地抓紧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应该想方设法广泛地、坚决地、巧妙地、周密地做到这一点，以改善工人和农民的境况，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

慢一点，谨慎一点，一步步地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在高加索各共和国可能和必须做到的，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我们应当明白并善于实现这一目标，了解与我们策略的不同之处。

同年3月，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他表述了同样的立场：

在对待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和小商贩方面，必须采取特殊的让步政策。应该明白，不仅不应该把他们国有化，还一定要作出某些牺牲让步，以改善他们的状况，给他们留出进行小规模贸易的机会……

请大家记住，格鲁吉亚的内外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不要运用俄罗斯的教条，而要巧妙、灵活地创造独特的策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成分作出更大让步。

大家知道，1922年后半年俄共（布）中央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发言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格共中央的委员们则坚持民族地区应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并要求直接加入未来的苏联，而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辩论双方采取了粗暴方式，互相扣大帽子，出言不逊侮辱对方。结果是奥尔忠尼启则对卡巴希泽大打出手，后者也辱骂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一头驴”。

众所周知，列宁对奥尔忠尼启则“俄罗斯式的动手动脚”，以及对

调查此事的捷尔任斯基的宽容十分生气。列宁要求“保护俄罗斯异教徒，免受那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者，实质为卑鄙暴虐之徒的典型俄罗斯官僚的侵犯”。

在时称“格鲁吉亚事件”的强烈影响下，列宁于1922年12月发表了一封信——《关于民族问题或关于“自动化”》。他对自己对俄罗斯民族应有的国际主义理解，做了简洁的如下说明：

……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

在对待第二种民族主义时，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有过错的几乎总是我们大民族的人——我们对小民族施以无数暴力，有时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就施加了无数暴力和凌辱。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是因自己的暴力而伟大，像强迫命令的粗暴警察般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该不仅仅是遵守形式上的平等，还应有一种不平等，即压迫民族、大民族给予补偿的不平等，这是生活实际所形成的不平等。

我在这里大段摘引列宁的文章，是因为在民族问题上，政治活动家们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这篇文章为指导的。

1923年4月召开了俄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对国际主义的阐释得到了完全的支持。“甚至以民族平等的观点来对待这一问题也是不妥的……”布哈林肯定地说。“正相反……我们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国民族，应该摒弃民族追求，将自己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应该对民族潮流作出更大的让步……只有摒弃追求，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即只有将自己人为地置于比别人更低的地位并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才能赢得以前受压迫民族对我们真正的信任。”

列宁作出的对“被压迫”民族的倾斜，把“压迫”民族即俄罗斯民族放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

列宁的路线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处境比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更差。俄罗斯生产了多于需求的物质财富。多余的财富用到了提高民族“边区”这件事上。可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作出评价的呢？我们可以从第比利斯事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声中得出结论。

我专门从有关所谓俄罗斯帝国“占领”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共和国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资料。时间将表明，格鲁吉亚将来会“依靠”到哪一个岸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24位人民代表成员，选出了索布恰克为主席，同样出名的斯坦凯维奇为执行书记。真是难以置信，后来，两人在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一个在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莫斯科，都开了小差：一个逃到法国，一个逃到波兰。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年，他们还都是推翻现存制度的带头人。

6月末委员会奔赴第比利斯开始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拟就了全体成员签字的结论和索布恰克向人民代表大会呈交的报告。

没有必要全部引证这两个文件。我只想谈谈文件中的某些论点，用我所掌握的结论对之加以评说。应当指出，调查委员会正式文件中的某些论点，有同索布恰克的发言提纲不相符合之处。比如，1989年12月24日在向代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他说，应把事件置于目前正在国内展开的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过程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就这样，他把进行挑衅活动的民族主义者说成了几乎是“改革”的英雄。

委员会理应客观评价这些“和平游行”的实质和方法，游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以及委员会成员尚格拉亚的作用。怎么解释儿童、少年，学生跟自己的教师一起有组织地参加群众集会这一现

象呢？难道用钢筋、刀子、削尖了的棍棒等武装起来的人们是在追求和平？

可是委员会却完全同情和姑息这些人。它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行为，也没有事实证明有人企图夺取政权、使用暴力或出于政治原因蓄意伤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任何一种民主也不否认，为了维护秩序，必须有一个强力机构。但所有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人民代表到最高检察院代表，都是在谈论解决这种问题绝不可使用军队。5年之后，1993年，那位主要的民主派人士叶利钦，却为炮打俄罗斯议会而召来了正规军队。

委员会得出结论，政治责任和造成悲剧的责任应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在当时已是前书记了）帕季阿什维里和尼科尔斯基承担。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叶菲莫夫将军也要负违反纪律和行为过失的责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的职责是保证城市的秩序和安宁，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被责备了几句。为了体面，也提到了群众骚乱的主谋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等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认真的评价。在当时，尤其是到了许多年之后的现在，事情看得很清楚，委员会完全是站在偏袒一方的立场上。

索布恰克报告后，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卡图谢夫讲话。他在某些观点上不同意委员会的结论，并对之做了自己的说明。也许就是因此代表大会才决定不公开发表他的讲话。“索布恰克委员会”、格鲁吉亚领导、军队领导、总检察院及大量报道之间的最大分歧是在使用工兵铲、使用毒剂问题上，以及当天为何有人伤亡的问题上。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事实。

关于工兵铲的神话。大家知道，当天夜间形成的局势，要求空降兵营采取行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59人的连队同人群总共只有十来分钟的接触。指挥部下令不发给士兵步枪和刺刀。工兵铲是防身的

唯一工具。

空降兵营指挥员下令用工兵铲防挡飞来的硬物。说空降兵追捕卢斯塔维里大街上四散奔跑的人们，用工兵铲殴打他们，这纯属捏造。挨打的只能是那些攻击空降兵的暴徒。而且经医生鉴定，发现遭工兵铲击打的只有7人。但空降兵中却有3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大部分证人提供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证词，即：俄罗斯或中亚民族的士兵无缘无故地用工兵铲殴打姑娘，殴打试图用自己身体掩护妇女的男孩（或小伙）。所有证人的证言后来都进行了核查，上述事实没有一件得到确认。同其他证据放到一起进行分析后，调查人员认定证人在这方面的证词是不可信的伪证。

说军人用工兵铲残酷无情地砍打广场群众，这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是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包括某些全苏的媒体）广为散播的不实之词。这一关于工兵铲的神话直到现在还在报刊上以讹传讹，被政客们有心无意地利用着。这个神话至今不泯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想以此表明俄罗斯人民和苏联军队的残酷无情。这一类宣传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行动，其目的是破坏苏联武装力量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关于毒剂。第比利斯的医生在最初几天就已在医疗证明中指出，有12人死亡是由于窒息（由于挤压）。与此相反，根据病理解剖学家杰卡诺西泽的结论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似乎死亡的原因是化学物质的毒害。由于结论明显不科学，调查人员便询问了杰卡诺西泽。还好，她有勇气承认自己在写死亡报告时听信了一些传闻，在写结论时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高科技鉴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她结论的虚假。调查人员严格依照法律从死者脏器上取得检验标本以及死者腹中的食物，一一标注送鉴定机关。鉴定人员完全否定了中毒的说法。

但是这一年的11月，经代表大会调查委员会，又有一批标本送到

了检察院，宣称这些没有登记的标本是保存在那个杰卡诺西泽手上的。据委员会主席讲，专家在分析这些标本后，不排除中毒可能。于是再次进行鉴定。鉴定员再次报告，中毒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面已经说过，在遇到激烈的反抗后，军队领导决定使用化学专用制剂“稠李树”和“K—51”。关于这一点，事先曾用大喇叭向集会群众警告过，连续多次呼吁他们解散。但是警告未被理睬。

后来，巴克拉诺夫上校在解释为什么决定使用特殊制剂时说，暴怒的人群向我们投来冰雹般的石块、瓶子、钢筋头，向装甲运输车投掷长椅，捣毁了所有的车灯、轮廓灯。人员中30%的盾牌被捣毁……有一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伤者，无法无天的集会群众打碎了公共汽车和救护车的玻璃。我把这种情况向叶菲莫夫将军做了报告，根据他的命令，我给马斯洛夫少校下达任务，动用特殊制剂“稠李树”。

与传得纷纷扬扬的关于部队戴防毒面具使用毒气的传闻相反，部队根本没有使用毒气，也没有戴防毒面具。至于说到“稠李树”和“K—51”，它们并不是毒气，内务部部队有权使用这种特殊制剂，以“平息群众骚乱、集体破坏社会秩序和其他反社会活动”。

我们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是用来对付违法分子的。根据关于战时禁用有毒和窒息性气体的日内瓦议定书和联合国文件，这些制剂不属于化学武器。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电视屏幕上看见过许多国家如何广泛使用这种“警用瓦斯”以平息群众性骚乱的面面。

据有联合国代表参加工作的专门司法—化学鉴定结论，4月9日使用的特殊制剂并未对集会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威胁。专家们没有发现“稠李树”和“K—51”达到危险浓度，更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毒剂。

关于对人身伤害和某些死亡原因的评估。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

部的资料，在行动期间和之后，第比利斯医院共收治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据苏联总检察院资料，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悲剧性的结果是16名参加者死在事件现场，3人在医院不治身亡。

围绕这些死者，就像围绕工兵铲一样，出现了许多臆测和借题发挥。其实是有一部分集会者响应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号召，坐到政府大楼前的柏油路上、阶梯台阶上，发生恐惧推挤时，这些人没有办法站起来，结果遭到人群践踏。

将目击者的叙述和军人的证词加以比较，就可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引起人员伤亡的推挤不是由于士兵采取行动，而是由于挑衅和越来越厉害的恐慌以及集会组织者及其身边的打手们乱成一团造成的。

死亡和人身伤害的原因被一些人充分地加以利用，他们企图操控人的感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教唆者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次可耻的审判发生在1989年的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想读者会明白，那是一次对国家现政权的审判，是破坏局势稳定的政治手段。第一次浪潮中急于夺权的“民主分子”们竭尽利用格鲁吉亚悲剧事件之能事。当时他们毫无顾忌地从“杜松子”酒瓶里放出了极端民族主义，使之成为统一国家解体的主要根源之一。领导政策多变，罢工者和暴徒得不到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明白地昭示，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

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丑剧日夜在电视上转播，就给老百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可怜的和无辜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受到苏联“大叔”的欺侮。为了说明“讨论”这一问题的荒谬，我想再举一些民选代表的行为为例。

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发言后回到自己座位时，“民主派”的部分代表向他起哄，但当他们开始一字一顿地叫

喊“杀人犯！”“可耻！”“恶棍！”时，帕季阿什维里突然停下，一个转身又朝讲台走去！此时应该注意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表情。前者面色苍白地靠在椅背上，后者双臂拄着桌子，微微抬起身子，充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帕季阿什维里。但是瞬间的情绪一闪而过，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帕季阿什维里只好一挥手，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政客得势的代价

1989年4月9日的第比利斯悲剧事件已经过去不少年。许多俄罗斯政治家认为，第比利斯就好比是一个一心想破坏中央和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涣散部队军心的人们制定策略的演练场。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格鲁吉亚发生了政治剧变。谢瓦尔德纳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推翻加姆萨胡尔季阿后，他成了国家总统。看来他是打算依靠他的外国朋友——那些著名的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支持了。那些人是非常非常感激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他原以为金元会滚滚流入格鲁吉亚，把它造就成为一方“繁荣兴旺”的乐土。但直到现在共和国的人民还在为自己领袖的政策付出代价。为了让加姆萨胡尔季阿掌权，格鲁吉亚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由于谢瓦尔德纳泽的执政，付出的代价更惨重。我有充分根据认为，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有色”革命，还会让普通老百姓付出代价。

我认识谢瓦尔德纳泽已有25年多了。这些年里我仔细观察过这个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的不寻常之处不是表现在才干、知识的渊博、政见的卓越上。他是一只“白狐狸”——媒体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不可思议地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对上级领导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他隐蔽了真面目成功地适应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又同样轻而易举地像变色龙一样换了一身资产

阶级的外皮。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没受过专门教育，没有国际政治领域的工作经验，一门外语也不懂，却把苏联外交部门的最高职务弄到了手。

戈尔巴乔夫十分赏识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这个人倍加宠爱——天知道。但在苏联崩溃和苏共解体后，在接受采访时，他们才流露出了真心话：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格鲁吉亚第一把手时，他们就已经促膝交谈，公开表示了对现存制度的厌恶。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坚持要把这位志同道合者拉到自己身边，拉进中央，这绝非偶然。

为了印证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我想回顾一下1981年2月末3月初举行的苏共第26届代表大会。我是大会的代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我想说一说某些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干部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后一届党代会上行为（勃列日涅夫在会后一年余去世）。时过不久，许多领导人就开始发表与他们此前的信仰完全对立的言论了。

斯大林时代我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了几年。我那时还年轻，政治修养不足，耳闻目睹的全是对斯大林的赞扬。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发言在开头、中间和结尾都要歌颂领袖。

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也是伟大强国解体的许许多多原因中的一条：对领导者、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的赤裸裸的阿谀逢迎。喋喋不休的空话引起了人民、也包括苏共党员的反感。这也是促成我党悲剧的一连串现象中的一环。

在准备材料时，我读了谢瓦尔德纳泽在这次苏共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稿。在这次发言中，他13次颂扬了勃列日涅夫！

也巧，谢瓦尔德纳泽讲话后的第二天，他便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直接在代表大会上被隆重地授予金星勋章。

我想，现在已无须我再说，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崩溃、格鲁吉

亚同俄罗斯分裂、格鲁吉亚人民陷入赤贫、向北约投怀送抱等一系列事件中，谢瓦尔德纳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当代的“邪恶天才”还会干出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事情。现在很难说清他什么时候说的话是谎话——是早已成为过去的80年代，还是10年以后当他背弃自己信仰和行动的时候。

格鲁吉亚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严重。

长期以来，这个共和国始终寄希望于西方投资，但实际毫无成效。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格鲁吉亚的“民主派”领导们个人却能从美利坚合众国领取美金！格鲁吉亚领导人这种对主权国家说来史无前例的行为并未受到惩罚（但愿这只是时候未到）。我常常想，假如1989年4月第比利斯群众集会上有人揭露帕季阿什维利和共和国其他领导人从外国领钱，那会是个什么情况？他们一定会被人撕成碎片！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肯定会因此而展开。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难道还不应该向历史上的邻国——首先是俄罗斯——去寻求相互理解，去发展同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但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如果说谢瓦尔德纳泽用的是看风使舵、狡猾欺骗、溜须拍马的伎俩，那新的领袖萨卡什维利就是挥舞板斧了。

在政治方面，格鲁吉亚新领导的行为是极具挑衅性和无法预料的。2005年夏天，俄罗斯军队开始从格鲁吉亚的基地撤出，计划于2008年完成。非常明显，格鲁吉亚在不久的将来会接纳北约的大兵，然后就加入这一组织。

在“颜色革命”中交下朋友的两个人——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正在进行由乌克兰取代俄罗斯，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去维和的非正式谈判。格鲁吉亚领导人在调整国内政治状况方面，采取的政策非常僵化。在革命的狂热中，阿扎里亚的问题倒是很快就解决了，但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进行的“闪电战”却失败了。

如果用一句政治语言来说，现在的格鲁吉亚是在对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搞“冷战”。大家知道，在这种战争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尽量把对手描绘成凶神恶煞。今日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大搞军备，当然少不了要有欧洲新朋友和大洋彼岸朋友的公开支持。

第比利斯事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但这些事件也为格鲁吉亚自身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这片土地上多年没有和平，一直在流血，而格鲁吉亚人民则陷入暗无天日的贫困之中。

不由得想起圣经上的一句格言：“播种风的人，必遭风暴之灾。”

第四章 费尔干纳的黑色六月

第比利斯悲剧发生后，毁灭国家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在费尔干纳挑起事端。这些事件引起的反响要小得多，但其残酷性却远远超过第比利斯。

起初当地政权希望把流血冲突看成是共同居住在费尔干纳河谷的乌兹别克人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之间由于日常小事而发生的冲突。然而过了没几天，事件的那种真正可怕的规模便开始显现出来。

1989年6月6日，时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拉菲克·尼沙诺维奇·尼沙诺夫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该议案在提交审议时，有过一次对话，从中不难得出结论：

主席（戈尔巴乔夫）：尼沙诺夫同志，请讲。

尼沙诺夫：首先我要说，最近这些天来发展成为具有全民族性质的事件，起初是从小的生活冲突开始的。说到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费尔干纳河谷生活的历史，我想强调的是，在45年前乌兹别克人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接纳了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为他们创造了一切生活福利条件和劳动条件以及受教育的条件。

主席：住在那里的有多少人？

尼沙诺夫：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6

万。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的有1.2万。他们全都有相应的工作，受到关照，还参加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工作，其中有各级党委成员，还有地方苏维埃代表。一切情况都不错。

可是近些年来，大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提出，要求把他们送回故乡。最近几年由于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不过冲突的产生完全始于市场上买卖农产品时发生的日常生活矛盾。有一个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由于嫌价格高，对待卖自产蔬菜的女贩子就有些粗暴。结果顾客把装麝香草莓的秤盘子给打翻了，当时在场的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就动起手来。后来打架被制止了，可过了一会儿，一群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袭击了当地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被殴致死。经过工作，局势总算控制住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出乎当地公安机关预料，也出乎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和乌兹别克人的预料，一大批年龄在十五六岁和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也可能是服用了兴奋剂，手里拿着钢筋之类的东西，开始袭击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住宅。与此同时，闹事的乌兹别克青年拿着铁链子、斧头、棍棒，见人就打，还纵火焚烧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房子。种种野蛮表现酿成了悲剧。

根据我们的资料，到今天为止，死亡大约50人，其中有35人，也许还要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0人为乌兹别克人，1人为塔吉克人，1人为俄罗斯人——他是维持秩序的，遇难情况很偶然。在失去控制的那段时间，烧了几座房子。由于全苏和地方执法机构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加之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内务部门介入，现在局势已得到彻底控制。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现在都进入了他们的永久居住区，有些人还被我们撤进了军事防区，安置在兵营里。相应的生活条件和安全都有了保障。发生冲突的所有地区，都由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实行戒严。应有的秩序得到了保证。

昨天和今天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一直在控制之下。我们希望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和政府部门能够把局面控制在地方范围之

内。我到那边去过，既会见了在聚居区居住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也会见了安置进军事防区的那部分人。我以党组织和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谴责了乌兹别克青年人的野蛮行径，并向我们的兄弟姐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歉意。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贯彻到底，为他们建立一切必要的条件。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人民——所有居住在共和国土地上的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卡拉巴赫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他们都是好客的、热爱劳动的、谦虚的人。我认为，这次发生的野蛮行径已经引起了大家共同的谴责，同时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主席：请继续提问吧。

场内：尼沙诺夫同志，请您谈谈，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发生过民族冲突的情况吗？您是怎么调整这些关系的呢？

尼沙诺夫：过去发生的冲突都是个别的，完全都是因为生活小事。这类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事件从来没有过。在民族关系上出现问题这是第一次。

实际上这次由于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并不是一桩酒后斗殴引起流氓闹事的普通小事，它是在库瓦塞城爆发的那场可怕事件的发端。但有些人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像这只不过是乌兹别克青年和土耳其族青年为了鸡毛蒜皮吵了一架而已。

费尔干纳州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用摄像机把5月23日发生在这座城里的事件详细记录下来。向人群发表演讲的有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州检察长、州党委第一书记。而且，当天下午广场上挤满了一群群乌兹别克青年，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有的还服用了毒品。他们不断叫嚷：“土耳其人懂个屁，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他们走向乌兹别克人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混合居住的地区，投掷石块，挥舞铁棒、尖刀，还用上了炸药包。直到午夜两点人群才被驱散。

第二天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好事之徒开着车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煽动百姓说，土耳其人在库瓦塞占据了经济贸易方面的主要职位，处处排挤乌兹别克人（实际上土耳其人主要在水泥厂当工人，在建筑业和果园工作），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

骚乱的浪潮波及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杂居的许多居民点。

煽动者全都汇聚到塔什拉克区。他们逢人便讲土耳其族人在库瓦塞的“兽行”。6月3日一早，愤怒的人群开始聚集。在这些具有敌对情绪的青年人中很少有塔什拉克人。外来人号召人群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实施报复。暴徒们冲上街头，一路上又打又砸。土耳其族人的房屋烧着了，妇女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从费尔干纳派来的民警试图阻止愤怒的年轻人，但暴徒越聚越多，最后达到3000人左右。他们在四郊东突西闯，晚上回到塔什拉克。打砸抢在继续发展。先是土耳其族人的家遭到抢劫，搞得人人担惊受怕，后来又发展到把燃烧的火把和燃烧瓶扔进窗户里。当局紧急把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撤进区党委大楼。几百名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在区党委会议大厅找到了临时避难所。

第二天人群开始对区党委大楼发起真正的冲击，要求把土耳其族人交出来。区委第一书记和区执委会主席发现守住区委大楼已不可能，为了拖延时间，便提议由自己充当人质。区领导能够作出这种行动，很需要一点勇气——人质受尽侮辱，受到拳脚交加的待遇。人群威胁要把他们撕碎，要烧死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区民警分局。冲击一直进行了4个小时，15名民警都伤势严重，其中一位很快就死去。这些天烧毁的房屋有43处，遭到抢劫的170处，烧毁汽车10辆。

先说点后事。我要告诉大家，后来受到法律惩处的共12人。他们

被控于1989年6月4日在塔什拉克区犯有谋杀罪。现在仅举出一桩野蛮事例。

6月3日至4日夜晩，这群年轻暴徒拦下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四名从骚乱的奥拉奇村出逃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其中还有一位妇女。他们先是把这四人暴打一顿，然后放火烧汽车。对四个人的恣意凌辱持续达数小时之久，然后又把打得半死的人拖到野地里，捆绑起来，扔下不管。第二天早晨杀人凶手又跑了回去，给土耳其族人浇上汽油，把他们活生生烧死。

组织集体凶杀的头头被判处极刑——枪毙。

6月4日莫斯科得知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已经由地区行动发展为大规模骚乱。它席卷了该州好多个区。局势已经失控，变得难于掌握。暴乱有好几个发源地。暴徒们的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先是肆无忌惮地给人们“洗脑”，为此聚集起500—1000的人群，然后是袭击土耳其族的住宅，抢劫、纵火、杀人。

由6月3日到4日的夜晩，苏联内务部的内务部队为维持秩序开始陆续抵达费尔干纳州。部队一到，就被投入杀人放火等暴行最为严重的地区。领导各小分队行动的是苏联内务部队首长沙塔林上将。

我不想再详细叙述当时别的区，各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情况，但是请相信我，它太可怕了。我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但愿别人永生永世也不要看见。

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中世纪时，许多国家都曾有土耳其军队驻扎过，当时他们是残酷的占领者。但他们的后代早已完全是和平居民。这样的后代在梅斯赫蒂最多，那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州，与土耳其接壤。

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阿哈尔奇赫区，一共有

220个土耳其族村庄，居民成分主要是土耳其族，但也有叶梅尼亚族、格鲁吉亚族。生活大体上过得还不错，从事农业，种果园，编织地毯——这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手工艺。



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暴行期间对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实施保护。（索洛维约夫摄）

20年代对这个族群开始施加压力。1926年之前，各村小学教的都是土耳其语，可是到了1937年，教学改成了格鲁吉亚语，而大部分土耳其族人并不懂这种语言。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剥夺格鲁吉亚居民中穆斯林族群的民族认同感问题。土耳其族人，还有别的穆斯林，都被迫改换格鲁吉亚姓氏，改换族属。

土耳其族参加卫国战争的有4万多人，其中约有2.6万人牺牲在各个战场。8位土耳其族同胞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有可能同土耳其爆发战争的危险，以及土耳其国境的近在咫尺（大约60—70公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把土耳其族从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带强迁出去的客观理由。1944年11月14日深夜，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梅斯赫蒂地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共迁走了10多万穆斯林信仰的居民。

列车一直朝东开。到了12月中旬，头几批土耳其族人开始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移民们主要安置在费尔干纳及其郊区——科坎德、塔什拉克、库瓦塞和马尔基兰。一般都是成建制地安置。在城里的人都进工厂、到基建上工作，主要是当工人。农村地区主要是种棉花，搞畜牧，种果园。大部分土耳其族都是农民。受高等教育的很少。塔什拉克区的50名土耳其人中，只有8人上过大学，18人上过中专。

孩子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学校学习。日常讲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但既不懂土耳其标准语，也不懂土耳其的科学语言。就连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也逐渐被遗忘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土耳其族的惊惶不安，他们害怕被同化之后作为一个民族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他们梦想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解放自己已经放弃了40多年的家园的想法。他们并不希望给格鲁吉亚造成混乱。

总之，战时的民族迁移成了民族冲突的一个因素，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到了和平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又爆发出来。

很遗憾，这样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6月4日以后，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冲突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应该到当地去把问题搞清楚，去解决那些在内务部队和民警的保护下栖身军营的人们的命运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卡德罗夫早就在6月3日从全会上直飞费尔干纳，他不时给我打电话，对着听筒喊：

“应该有所行动才行！他们随时都可能从这里动身，所有的1.5万人同时走，要回去，回到费尔干纳去。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莫斯科的梅斯赫蒂人代表也找到我，看样子都是些常驻首都

的，自称是“返乡委员会”的，要求我不必急于一时，也不必十万火急，但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得彻底：

“请把梅斯赫蒂人送回梅斯赫蒂去。那是我们的土地，不是格鲁吉亚人的土地……我们明白，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迁过去，那就先从一小批开始好了。而且应该立即解决民族自治的问题。”

卡德罗夫在电话那头发火：

“哪来的委员会！我们这儿也有个委员会！就在军营里。您过来吧，跟他们见个面。他们非常明白，回格鲁吉亚是将来的事，忙不着。现在他们要求的是能过上人过的日子。这里可都是些孩子、老人……”

“那你就把他们弄出来，”我对卡德罗夫说，“把时间告诉我。马上给你派飞机。”

当时俄罗斯有好几个州已经做好了安置难民的准备。这个问题联邦领导解决得倒挺快。

“不行，”卡德罗夫挺固执，“他们不同意。他们希望能跟哪个国家领导人谈谈。他们希望了解以后的安排。”

一群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6月9日正式找到我，提出了请求和建议：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考虑到您生性仁慈，务祈飞临费尔干纳。相信大驾临幸之日，当为人民平静之时。受损的社会经济正立待恢复。”签名的是14位代表。

最后作出决定：6月12日一早飞往费尔干纳。跟我一块儿去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现已去世的切尔比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当时还没有从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记职务上退下来的尼沙诺夫。

说来也许是个巧合，当费尔干纳悲惨事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总书记又跑到国外去了，这一次是到波恩。我的手头现在还保存着1989年6月15日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东方真理报》，头版刊登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微笑的戈尔巴乔夫在波恩市政厅阳台上向德国人招手，还有一幅则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为眼前的悲哀所震惊，站在费尔干纳梅斯赫蒂人被烧毁的房子前面……

我们眼前的费尔干纳酷暑难当，一片寂静，街头是无数岗哨，梅斯赫蒂人的房屋被烧毁了，坍塌了，它们原本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房子……

在我公布的照片里，死亡和血腥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但我还是不能不说，那些被打死的人，那些被兽性折磨致死的人，他们的尸体都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才好不容易找到的，而且直到我们走了以后还在搜寻之中。仇恨再次把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代价是多么高昂啊！

晚上到达市里之后，我提议立即前往难民营，可是卡德罗夫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当天正是埋葬死难者的日子。聚集在现场的人——那可是好几千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哪——坚决要求开棺。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和烧焦的尸体，使整个难民营处于极度激愤之中。据传来的消息，在这种局势下，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地谈任何问题，而且，安全也大成问题。

但是我非常明白，不到难民营，不同他们的委员会见面，我这一趟费尔干纳就算白来。我向共和国领导宣布，明天上午9点我到难民营去。

整个一晚上卡德罗夫都在同难民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他们作出共同决定，我们的会见明天上午在难民营进行。委员会为代表团创造谈判条件和保证代表团安全。

一大早我们乘大客车出发了。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震惊了：这里怎么能生活？完全是一片焦土，一片不毛之地，没有一棵树，营房到处是露着天的窟窿，架着军队的帐篷，水是用罐车送来的，晒得几乎到了快要沸腾的程度……

我下了大客车，走上了一道由许多壮小伙子挽着胳膊组成的特别长廊。别的男男女女、老人，还有无处不在的孩子们，都挤在他们身后。周围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嚎声。两名妇女立刻走上前来抓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人廊，朝营房走去。那边正在等着我们。那就是卡德罗夫所说的委员会。还有就是老人们、长者、议事代表。

谈判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讲话的是一个妇女，就是把我从大客车接过来的两位妇女之一。谈话进行得很生硬，但很安静，任何人只要想要叫喊，或是表露出一点点胸中澎湃的感情，都立刻被她严厉地喝止。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乌兹别克人的坏话，没有翻老账。相反却说：

“当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他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我们……”

然后又说：

“可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大学的人有多少？您知道吗？他们当中梅斯赫蒂人又占多少？这就是问题嘛！我们，是干活的牛马。我们只能在黄土地上打磨磨。这就是人们指给我们的路，不是直截了当，但却是毫不含糊。我们再也不愿意这样活着了。我们要回格鲁吉亚。不一定要明天，或者后天，我们明白，那边已经有别的人把我们的土地占了。但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做个原则性的决定……”

谈判中作出紧急决定，用军用飞机把难民营的人运送到俄罗斯腹地。早在我起程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可以在俄罗斯联邦的8个州安置他们，而军用运输机也在费尔干纳机场做好

了准备。

不过谈判结束后并没有让我们立刻就走。还是同样的一套办法：由壮小伙子组成的人廊，由两名妇女挽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胳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人，需要由妇女们来挽着胳膊。后来才听有人对我说，他们有个风俗，就是如果一个男人跟妇女在一起，那么谁都不许动他。所以她们才从两面夹起来保护我。

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讲台，1.5万群众——老人坐在晒得滚烫的土地上，妇女们穿着黑袍，还有孩子。下边一片嗡嗡声。不是交谈声。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痛苦的呻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还是后来。仿佛是那晒得焦烫的土地发出的悲痛欲绝的心声。难怪这片靶场的名字叫做“仇恨和悲哀之营”。

一个与我同行的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宣布让我讲话。全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讲话很短。宣布了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号召他们赶紧迁移到新住地去。这时从前排站起一位白胡子长老对我说：

“在接受您的建议之前，请您回答我们，雷日科夫同志：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在40多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是他们的错吗？”

“不，”我回答。“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党已经有了相应的评价。”

又问：“在这次野蛮的大屠杀中，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错吗？”

“不，”我回答，“不过乌兹别克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错。40年前他们收留了你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你们。有罪的是那些挑起民族纷争，肆意打砸抢和凶杀的人。”

我当场下了保证，同时也在共和国的其他场合下了保证，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对那些匪

徒和暴徒绝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其中包括幕后的黑手。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视察了难民营之后，我又同共和国以及中央机构的领导人商量了一些问题，听取了他们对局势以及刑事案件侦查情况的详细汇报，然后前往安吉让、纳曼冈等地，视察了一批国营农场和工厂，出席了多次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乌兹别克人的会见。

后来查明，参加暴行的甚至有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就使得事件具有了另外一种色彩。下面引用一段共和国报纸上的报道：

.....据雷日科夫称：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各种情况。这需要时间。不过即使在今天，有一些情况也还是清楚地显现出来。比方说，卷入暴行的居然有个别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我要把那些向暴徒提供汽油、运输工具，用酒把青少年灌醉的人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要迫使他们对那些无辜的人们作出回答。我这一辈子见过的事情不算少，可是要跟昨天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难民营里的所见所闻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杀人犯和强奸犯可以按罪量刑，依照法律严惩不贷，可是那些玷污了党的威望、乌兹别克人民美好名声的共产党员呢？他们应该受到特别的惩罚！.....

帮助暴徒作恶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是极个别分子。他们受到了最严厉无情的惩罚。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想办法制止这次野蛮的暴行。至于塔什拉克区那两位领导人的功绩，前面我已经提到。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骨干分子大会之前，我们请了一些几十年在一起比邻而居的人过来，事先对这次残酷至极的民族冲突作了一次“总结”。

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其中43具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2具为阿塞拜疆人，35具为乌兹别克人，5具为俄罗斯人。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有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这就是费尔干纳事件的可怕后果。

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其中1.6万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

当我在民族仇恨野蛮暴行肆虐的几个区视察时，并没有急于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下结论。我的任务在于立即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制止互相残杀，深入研究事件的真正根源。这一立场可以从我在乌兹别克电视台答记者问中得到证实：

我们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目的是就地搞清近来此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是从视察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栖身的难民营开始的。那些梅斯赫蒂人丧失了自己的栖身之所、住宅，或者干脆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来到部队的打靶场避难。我们跟委员会的成员们谈了话，他们是人民选出来跟我们对话的。对话进行得很艰难。

现在看来还很难下最后的结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应该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应该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我们这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出这样的事？为什么突然之间，简直就是在几天之内，从5月23日到今天，在国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产生了如此悲惨的后果？的确是悲惨的后果，别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为什么对45年来一直跟乌兹别克民族并肩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突然表现出如此的深仇大恨？

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尽管悲剧已经发生，尽管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精神压力很沉重，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但照我的观察，他们依然珍视乌兹别克人民长期以来为他们所做的一

切。

他们至今依然在说，我们不责怪乌兹别克人民，他们不该负责任。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起作用。我们请政府，请我们的党要彻底搞个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实际上对我们下狠手的是谁，搞得我们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对今天共和国国内局势，评价应该是这样的：它很紧张。尽管在费尔干纳州，以及在我们所处的科坎德，并没有出现6月7—8号那种事件，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还是存在。他们害怕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民族身上。

以我的看法，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不能没有互信。大家比邻而居数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对方：你是什么民族。我们跟人们谈心，到过两个工厂。那里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来不问谁是乌兹别克人，谁是俄罗斯人，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谁是土耳其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但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得出的结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把最优秀的检察人员派过来办案，他们已开始着手认真细致地调查分析每一个事件。

我们要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当然，对每个人都要按罪量刑。但最主要之点在于，这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对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一群半大小子，哪怕汇集起来的有好几百号人，但若要在好几个州都造成这种简直是恐怖的态势，那是不可能的。以我们的看法，问题恐怕还有更深的根。

我想，共产国的党组织，将要召开的骨干会议，最终将会对事件作出正确评价。我相信，共产党人一定能查出在乌兹别克斯坦造成这类事件的原因。我绝不会放过共和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定有深刻的根源，没有根出不了这样的事。

问：现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迁徙工作开始了。昨天我在报道中说，他们是热爱劳动的人。不论他们迁到哪里，他们都会

把农业搞起来，把村庄建起来。我不敢说他们到了那边就要定居。借此机会我想问一下，梅斯赫蒂人是不是临时迁居呢？请问，这个民族迁回格鲁吉亚故乡的事究竟将如何解决呢？

雷日科夫：情况是这样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要求迁回45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迁回格鲁吉亚的某些区。我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原因有很多，而且格鲁吉亚也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局势。因此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咱们把这些人迁回去吧。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同格鲁吉亚领导人磋商。



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视察费尔干纳州暴行发生的地点（1989年6月）。（列先科·尤素波夫摄）

最高苏维埃打算在民族院建立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由它同有关加盟共和国一道来负责开展这项工作。

当然，这就需要时间。我们绝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急不来的，但它会得到解决。

明摆着，把这1.5万人继续留在难民营，天气热得这么可怕，住帐篷，没有任何生活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局势的发展使得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互信遭到破坏。我还要再重复一遍，发生这样的

事，不能责怪乌兹别克人民。

俄罗斯联邦有8个州同意接纳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但提出的申请是把他们分送三个州，同其他民族一道混居。现在把这些入送到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理解，迁徙到永久居住地的要求还会提出来，所以我们再次声明，不但在同委员会会见的时候，而且在会见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们都一再确认：这是个临时措施。只要问题一解决，人就迁走。眼前我们还看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孩子们应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委员会和全体人民的支持。

我还要重申：要深入分析发生的一切，要建立信任，要心平气和。乌兹别克斯坦有许多民族，可是今天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摩擦。走到这一步自觉不自觉都是由缺乏互信引起的。我看，这件事需要时间。只要有了巨大的信任，只要有了相互尊重，看来事情就会有前途。我们坚信这一条。

自然，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以及对各加盟共和国政治领导来说，首先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就是：这次野蛮的冲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回答。还有部分回答后来是靠补充分析才得出了结论。

总结了大量形形色色的说法，以及护法机关对事件侦察的结果后，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非常明显，费尔干纳事件绝不是什么部分居民搞起来的自发事件。领头闹事的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

自1988年秋季起，该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开始露头。费尔干纳政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大会上居然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俄语，那些外来户早就让我们腻歪死了。”对此竟然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有人专门散布谣言，说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把非穆斯林赶出去。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在许多城市，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口号：“把鞑靼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统统赶出乌兹别克斯坦”。

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突然有人举起了标语牌：“俄罗斯人滚回自己的俄罗斯去，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快滚回克里米亚去！”当时在安吉让还有人散发传单，上头有这样的话：“……不要对俄罗斯人让步……他们忘记了在困难年月跑到这边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不上……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他们的地方！”1989年2月在塔什干，气势汹汹的流氓歹徒对电车上的乘客大打出手，嘴里喊：“杀死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让乌兹别克斯坦腻歪透了！应该把他们吊到电线杆子上！”

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挑起乌兹别克人同俄罗斯人的对立。不过正如俗话所说，“小曲离不开词儿”，而且，这也不是乌兹别克人民的看法。他们知道俄罗斯人并没有压迫他们，也没有搞殖民主义，相反却倾其所有来提高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

这就是对该共和国人民有计划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情况。再往后就是准备和发动各种事端了。早在198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迪罗连科在《塔什干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曾透露过一些令人发指的事实。根据他的材料，仅最后3年，该共和国内务部门就破获了700个犯罪团伙，其人数几可组建一个整编师团。1988年，在马吉兰几乎是公开招募将来愿意参加骚乱的“志愿者”。12月份这些人又接到通知：“等待信号！”

在科坎德举行了宗教会议，参加的几乎有乌兹别克斯坦所有各州的人民代表。会上公开讨论了成立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在这个城市，武装群众亮出了口号：“掐死土耳其佬！掐死列宁的孝子贤孙俄国佬！伊斯兰旗帜、穆斯林信仰和先知霍梅尼万

岁！”

费尔干纳州从2月起就几乎已经是在公开制造武器——用钢筋打造长矛，还有自制炸弹，燃烧瓶。

难道共和国领导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吗？难以想象。

参与闹事的有许多年轻人，有大量刑满释放分子和无业人员。他们常常喝得醉眼迷蒙，或者是吸食了毒品。

不仅有人要问：“怎么会如残忍和暴虐呢？真是难以想象！这难道是乌兹别克人的民族特点吗？”不，不是的。全世界都了解，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化的民族。没有恶劣的人民，只有恶劣的个人。残忍的行动是隐藏在地下的指挥中心一手操办的。正是这个中心挑选了一批打手，在1989年6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

我和一些发言人在6月14日塔什干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所发生的一切作了评估和分析。许多问题都同现在说的这些有联系。我还试图把闹事同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局势联系起来。

最近5年来，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低，它落在了居民人口快速增长的后头。居民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大大低于全苏平均水平，而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又进展得非常不尽如人意。

生产发展落后，它向单一棉花作物的倾斜，造成每5个成年劳动力就有1人不能参加社会生产。正如所知，居民的其他就业形式当时还不存在。这样，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犯罪群体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资源。

对共和国领导层也进行了政治评估。

相当有意思的是国际上的反应。作为例子，我想引用BBC的消息。它对事件以及苏联政府当时的态度，作了比较全面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向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梅斯赫蒂人保证，对其想要回归历史故乡格鲁吉亚的要求将正式予以审议。二战期间被斯大林强行由格鲁吉亚撤迁的梅斯赫蒂人，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土著居民袭击的对象。然而把梅斯赫蒂人迁回格鲁吉亚之举是否可行呢？请看BBC驻俄记者的报道。

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强行迁徙的大部分民族，在50年代末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之后，又获准迁回故乡。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所有这些人又在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南方草原地区恢复了自己的自治区。

但在通例之中却有四个特例，那就是苏联远东的朝鲜人、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蒂人。这些民族虽随着时间推移摘掉了叛徒的帽子，但却未获准返回故乡。官方从来没有解释过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原因，而且，在勃列日涅夫年代，强迁少数民族的问题一直在禁止讨论之列。但实际上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被驱赶民族故土的地方当局坚决反对他们回归。因为经过这段时间，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已经变得人口稠密，而当地居民同被强迁的民族在宗教信仰和民族归属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如果把梅斯赫蒂人迁回原地区，最大的困难在于生存空间。梅斯赫蒂地区位于格鲁吉亚西南部，是一个高山深谷地区，耕地极少。战后大批格鲁吉亚人被强行迁入梅斯赫蒂地区。这样一来，在那里已繁衍了两代的农民，将竭力反对大批梅斯赫蒂人的归来。

然而也不排除另一种立场，就是从格鲁吉亚居民的整体来考虑民族归属问题。有些梅斯赫蒂人讲格鲁吉亚语，自称格鲁吉亚人。他们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于18—19世纪占领梅斯赫蒂时期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

格鲁吉亚知识分子宣称，可以把这批梅斯赫蒂人接受下来，让他们在格鲁吉亚人当中同化。格鲁吉亚当局大概是同意这种想法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梅斯赫蒂人讲土耳其语，认为自己

是土耳其人。在70年代，其中一些领袖人物提出要求，如果不许他们回到梅斯赫蒂，就批准他们到土耳其侨居。今天他们希望能在格鲁吉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民族自治州。

这些操土耳其语的梅斯赫蒂人大批返回格鲁吉亚，以及可能在当地建立异族实体的前景，已经引起格鲁吉亚公众的惶恐不安。应该看到，当局对待这种情绪特别敏感，因为他们知道，对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任何潜在威胁都可能多么迅速地引发群众的不满。

去年在格鲁吉亚东部发生的骚乱，起因就是有消息说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在那边收购土地。4月在第比利斯发生过示威游行，后被军队驱散，最初的原因也是抗议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裂出去的要求。

格鲁吉亚人同时也会把梅斯赫蒂人迁回一事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许多回归格鲁吉亚的家庭已经遭到袭击。苏联政府最终恐怕还是会要求强迁出去的民族留在目前的居留地，以避免再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同时，在文化领域，将给这些民族以更大的自治权。

我作了保证：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要求将正式得到审议。说老实话，我的确是打算跟格鲁吉亚领导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是否有可能让部分梅斯赫蒂人回去。其中就包括那些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他们同化起来比较简单。但大部分梅斯赫蒂人讲的是土耳其语，他们是穆斯林，格鲁吉亚未必能同意“异体”民族进入本国。还记得那个口号吗？“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我还记得。我想向读者介绍我在那些日子收到的已封存在我个人档案里的格鲁吉亚来电：

尊敬的主席：

我知道您博学，也知道您善思。然而您于6月4日在电视台发表的谈话还是使我感到惊讶。难道您没有发现，把一个民族称之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不严肃么？为什么您也要跟别人犯同样的

错误呢？您应该知道，有土耳其人，也有梅斯赫蒂人，亦即格鲁吉亚人。您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民族。还有：两个起源相近，有同一信仰的民族，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可为什么要把他们塞给我们呢？您难道不觉得您作出的让步，会推动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中亚地区的人和别的什么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把同样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也就是把我们这些加盟共和国土地上慷慨地住满了的外族人都驱赶出去吗？

主席同志，您要小心！您点燃了民族之间的火焰，您将会招来风暴。顺致深深的敬意。

《阿扎尔日报》记者帕特伊什维利于巴统

近年来，当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格鲁吉亚北部的时候，这位记者不知又有何感觉？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不是还没有迁到那边去吗？

招来风暴的不是我们，我们是同风暴作斗争的人。为什么现在又要把俄罗斯的青年士兵请到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中间地带去设立边防哨所呢？南奥塞梯的情况又怎样了呢？我看，我就不必再提醒尊敬的记者先生，他的故乡阿扎尔出了哪些事吧？

那么，我还能对什么抱有希望呢？我想起我坐在难民营的木头长凳上聆听那些人倾诉的情景。他们是那样的疲惫，就连哭泣的力气也丧失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的那些格鲁吉亚同事们，他们不希望相信，但还是不得不相信！其实，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梅斯赫蒂人一迁回去，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他们看做对自身完整性的威胁。当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张嘴说希望分离出去的时候，不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吗？其实，已经出现过梅斯赫蒂人自发迁徙到格鲁吉亚去的事例，可是，唉，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格鲁吉亚人的表现，说得客气点，真没有一点好客的风度……这些我了解得都很清楚，所以才不敢坚决下保证。

上帝可以作证，后来，我曾多次为此作出努力……当我彻底明白，格鲁吉亚绝不会给予梅斯赫蒂人以栖身之地的时候，我曾向我国立法部门的领导提出过一个特别的妥协办法：希望我们能选举哪怕一名梅斯赫蒂人的代表当苏联人民代表，并参加最高苏维埃。最好是能选两名或三名。日耳曼人也应该选。不是有代表出缺了吗？例如阿巴尔金就当了我的副手，可以补他空出的名额。也可以补别人空出的名额。这些人进了最高苏维埃后，可以代表自己的同胞说话。

此外，我还建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政府下面正式设几个不具有区域自治权的民族的代表处。我要说，这实际不过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尔巴乔夫彬彬有礼地点头回答。但什么下文都没有。他没有到过费尔干纳的难民营。

现在梅斯赫蒂人在哪儿？有的回乌兹别克斯坦了。有的还生活在俄罗斯。

遇到重要节日，他们就到莫斯科聚会，到练马场站着。还是那个要求：还我故乡！他们的故乡在哪里？唉！太遥远了！现在，那个故乡格鲁吉亚可是没工夫理什么梅斯赫蒂人的事了。而且，格鲁吉亚独立后就立刻开始迫害那些哪怕有一点点跟它意见不一致的人——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

现在那里的政权更迭了。不过，难道就比过去的强了吗？

“颜色革命”时过不久。人们不仅没有找到民族和谐的道路，反而响起了武器的碰撞声，弥漫着沙文主义的焦臭，人们沉迷在无边的权力欲之中。同俄罗斯的关系遭到不遗余力的轻率破坏，原来的历史、原来的经济联系都被遗忘了，几十万格鲁吉亚人生活在我们国家，并养活故土家人的事实也被遗忘了……现在哪有闲心去管什么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事呢？

我经常会在国内旅行，特别是在中部的几个州。旅行中常遇到“高加索民族”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就是那些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黑色的1989年6月，由于我的提议而被军用运输机送到了俄罗斯腹地。现在跟邻居们相处得很正常。不过眼睛里却流露出忧郁……他们这可已经是在第三故乡了……

这一章的内容血腥气太浓，有着太多的残酷和兽性。一切都实在是难以忘怀。似乎本该引以为鉴的东西，可是……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会想到一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报应终于来了，遗憾的是报得还不够狠。

第五章 巴库：谁是罪人？

我现在要讲的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事件，不应该看成是局部事件。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利用出民族牌和民族冲突来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已经好几年燃个不停的熊熊烈火，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注入了营养。在这股浪潮中，带有民族色彩的两地政治势力都力图夺取政权。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一句话，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在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斗争中，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命就几乎一钱不值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90年1月20日晨颁布命令，宣布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市进入紧急状态。图为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巴库街头巡逻。（新华社稿）

本章所述事件，主要发生在阿塞拜疆。当时有关的各种版本在媒体上相当多，不过各自的结论却完全不同。现有的材料强调的重点主要是：中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是反对肢解“帝国”，反对民族自决。然而暴行和破坏却被淡忘了——“小事一段”，何必大惊小怪！

有关当时的事件，出现了大量谣言和神话，它们逐渐掩盖了正式的说法。任何一个神话背后，总是能看出事实的影子，但同实情况究竟有几分相似，那可就不准了。凡是资料不足的地方，谣言和想象就会成为消息的来源。可是搞得不好，对历史的歪曲就会成为对未来的打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巴库的一月事件说个明白，这样做大有好处。我不想像准确的记录似的一件一件地去说细节，那是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的任务是把我我国领导人当时的作为曝曝光，说出有关他们的真相。

1989年的岁末和1990年的年初，阿塞拜疆的局势开始越来越紧张。人们的互相指责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口舌之争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武装冲突，演变成正式文件往来，有的还涉及阿塞拜疆的主权问题。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分裂主义运动加强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比官方的立场更为激进。土壤已经有了，行动很快也就会跟上。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公民有意抗法的行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显然，阿塞拜疆正酝酿着一系列严重的事件，人民阵线不会善罢甘休。

就在1989年的最后几天传来消息说，在同伊朗交界的国境上有一段大约200公里的工程建筑被毁。根据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报告，参加骚乱的数千人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这是那些不择手段要把和平居民推向同边防军人发生血腥冲突的势力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就蠢到家了。在边境担任防务的基本是俄罗斯小伙子，他们没有使用武器，这说明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可是为什么

现在那些发表文章的人却羞羞答答，有意不提觊觎政权的人民阵线分子驱赶妇女儿童，给边境设施破坏分子打前阵呢？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绝不允许流血事件发生。要找出骚乱原因，严惩骚乱组织者。

可是组织边境暴行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在其后的三个星期中，首次出现的公民抗法行动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国家边界在人们意识中始终是守土卫国的象征，而12月份对国境的破坏行动则是苏联存在数十年来的破天荒头一回，但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不断报道有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事件。数十名年轻的俄国士兵在那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正是那个时期的后遗症吗？当时，为了对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就容忍了对高加索地区国境的无理挑衅，这样一来，别的国家还会把我们的国境当回事吗？有些玩弄他人思想的人是多么善于迅速见机行事啊。他们当时居然说：“一个极权国家，还用得着跟它谈什么边境吗？就连帝国本身，对我们来说不也是无足轻重吗？”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冠有地缘政治概念模糊不清的“独联体”称呼的国家，还有什么可值得保卫的呢？让我们再回头来说说阿塞拜疆。1990年1月初，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比方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得到批准，巴库方面就立即作出了反应。所有这一切使得居民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乃至后来的反俄情绪逐步升级，并为反对该共和国官方政权的政治斗争所利用。集会时愤怒的人群发出号召，要找军人算账，要找亚美尼亚人以及别的民族的代表算账：“阿塞拜疆是阿塞拜疆人的阿塞拜疆！”

破坏局势稳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强行解散连科兰区和扎里拉巴德区的政权机关。武装暴徒力图制造混乱，赶走了那里的官员。虽说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可莫斯科还是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但第比利斯综合征、议会委员会主席、口若悬河的人民代表、律师索布恰克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人，我们

军队的威信遭到媒体的肆意践踏。

在这些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又跑到国外什么地方去了。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民族土壤上的尖锐冲突，他一般总是会置身国外。当第比利斯事件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他是在英国。当人们在费尔干纳为民族屠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巴库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子，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麦德韦杰夫惹出来的人，就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那些人也常常陪他到国外去跑。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这样的事件岂是几天之内就能够组织得起来并实现得了的！它们都是前面的因种下的果，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更何况总书记以及后来的总统（部长会议主席也一样）每时每刻都是同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保持着联系的。

我把海军将军切尔纳文——一位阿塞拜疆的人民代表——派往政权失控地区，要他同当地共和国领导一道调查所有问题，并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同当地政府以及运动领导人的谈判，以及每晚所作的态度客观的报告，证实了局势的确十分严峻，整个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可以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事件和夺权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戈尔巴乔夫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也把情况向我汇报。当时在巴库和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重点还在于对两个共和国之间以及两国内部爆发的冲突实行政治调解。问题的焦点就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维吉罗夫始终坚持民族友好立场。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地方。毫无疑问，在那些日子里，如果能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采取根本性的果断措施，那将是唯一能使人清醒的行之有效的行动。但我国和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如身陷沼泽，越陷越深。话讲了一大堆，决议作了不老少，结果却是个零。

1月12日是星期五，维吉罗夫报告说，星期六巴库要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对这次集会感到忧心忡忡。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外地废除政权之风会刮到巴库来，会波及共和国的中央机构。13号星期六上午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据克格勃和内务部收到的消息，群众大会召开了，但结果还不清楚。大约下午3点，维吉罗夫打电话向我报告，群众大会开完了，经过采取措施，人散了。心这才稍微放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这回可以从总体上仔细衡量，就稳定局势作出决定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小时，维吉罗夫的电话铃又响了。听声音他非常激动，紧张得不得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市里开始发生大规模打砸抢。主要针对亚美尼亚人，不过受害者也有其他民族。正在采取措施，但暴行正波及整个巴库。”

显然，反对势力决定采用极端手段了。

关于巴库的这次暴乱，存在着许多想象和猜测。有些媒体说，行动是刑事犯罪分子和逃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难民搞起来的。还有人说那是中央的刻意挑衅，似乎挑起卡拉巴赫冲突对它有利。

我能够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在刑事犯罪分子和由亚美尼亚逃出的阿塞拜疆难民背后，有共和国内部的某些力量在撑腰，正是他们导演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难民。根据当时的材料，巴库难民总数约为8万人，也就是整个从亚美尼亚逃出人数的1/3。这些人主要来自农村，很不容易适应一个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这还不是现成的破坏法制行动的温床嘛！

从这一刻开始，对于这场撕裂共和国的斗争是否能以和平方式收场，是否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已经再也没有信心了。人倒下去了，巴库陷入了罕见的暴乱之中。每个小时都有消息传过来——传到内务

部（巴卡京），传到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当然，那些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也都收到了要控制局面，要对加盟共和国护法部门给予最大支持的指示。接着，又传来了对居民残酷施暴情况的更为详尽的报告。有个正在往自己的集装箱里放东西的亚美尼亚人竟被关进集装箱活活烧死。一名男子当着他妻子的面，被从五楼的窗子里扔了出来，后来妻子也被扔了出来。这些事现在就连写起来也觉得沉重。越往后双方斗殴的惨景变得越是可怕。现在，请不要再把这打砸抢分子说成是民族英雄了。不论披上什么外衣，这些人都是刑事犯。



1988年苏穆加伊特，从暴行中死里逃生的人。（作者提供）

显然，仅靠加盟共和国自己是难以平息暴乱的。我们还记得苏穆加伊特，那里也有30多人被残酷杀害。当时所有的人都指责中央政府，说它的行动晚了一昼夜。看来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在评估苏穆加伊特地方局势时，稍有犹豫不决，行动略一迟缓，便导致了无法无天制造新一轮杀人惨案的机会。护法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只有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才可能制止暴行。而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的决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作出。

正如以上所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

国外，必须等他回国。1月13日星期六晚间，全体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到机场迎接他。他已经接到巴库发生变故的报告，了解到血腥屠杀正越演越烈，需要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商讨这一问题。于是当场决定，星期一，即1月15日，召开主席团会议。此外，按照通常的做法，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直飞巴库。参加工作组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普里马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基连科。他们于1月16日抵达巴库。

然而那边的局势已经恶化。死亡人数已上升到数十人。受伤的人不多。全是因殴致死。暴徒的血腥行动发动后，立刻出现了逃亡，主要是亚美尼亚人。13日星期六有90人乘飞机离开，但暴徒们控制了机场和火车站，再没有允许一个人从这里撤走。人们在最严重的生死关头，在面对死神的时刻，作出了最不寻常的决定：第二天难民潮涌向渡船，仅当天渡过亚速海前往克拉斯诺沃德斯科的即达650人。

我星期天接到消息，得知大批难民开始逃亡，当晚找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副手多古日耶夫，委托他紧急飞往巴库，组织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撤离的人逃脱。从15日起，这股难民潮开始多少进入了一点有组织的轨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5日晚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团成员们得知了过去的两三周该加盟共和国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两昼夜发生的情况。有人提出意见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当局将完全无法控制局势，那时相比之下，苏穆加伊特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建议在巴库和该共和国其他几个地区实行非常状态。但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法罗娃对此坚决反对。然而当大家问她，共和国的领导能否保证公民安全，维护市内秩序时，她却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看来她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有关巴库事件的大量报道都特别强调，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全苏领导没有采纳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意见。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

回答：1990年1月15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请求苏联国防部、护法机构及其他执行机构按苏联宪法第81条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当天深夜，尽管卡法罗娃激烈反对，而戈尔巴乔夫又总是两面讨好，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是通过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不过不是在到处发生流血惨案的巴库，而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还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这回我们俄罗斯人的“说不定”又在起作用了。说不定会过去呢？说不定那些暴徒和背后调唆的人会害怕了呢？可是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相反，坚信他们不会遭到惩罚。我很明白这个道理，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说得好听点是莫名其妙的决定的反感态度。讨论的是巴库问题，可通过的决议却是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我认为，如果主席团通过的是另外一个决议，那么就不会发生1月19日到1月20日夜晚的那场惨剧。和平居民就不会死，士兵们也不会死。参加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难道不明白，正是他们纵容了暴徒？纯粹的政治上的两面见光，压倒了在国家大事上的理智行事。重要的是谁说了些什么，而不是将会发生些什么。苏穆加伊特并没有能让人们得到教训。当权者又做了事件的尾巴。

通过这么个半吊子决定，可以想见对任何事件的发展都难以起遏止作用。打砸抢在继续，匪徒们组成一支支队伍，开始封锁道路、机场。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把共和国一步步拖向混乱。莫斯科派去的人——普里马科夫和基连科——连同阿塞拜疆的领导一道展开防暴工作，试图同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对话、和谐和耐心的召唤，变成了消逝在荒漠中的凄苦的呼喊。更有甚者，暴徒们开始袭击军人核武器仓库。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那些日子里，难民潮成了标示压力的压力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管这件事情的在巴库是多古日耶夫，在莫斯科是

部长会议主席。后者的副手经常把此事置于监控之下。我保留了撤离人数记录。巴库的撤离是有组织的。我要强调“有组织”这个字眼。15日——1200人；16日——2100人；17日——500人；18日——1600人；19日、20日——各1500人。有多少人是靠自己从城里撤离的，这只能估计了……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用飞机撤离的有250人，用海军舰艇撤到马哈奇卡拉的有700人，用火车撤到罗斯托夫的大约有500人。抛弃家园的总人数大约为两万人。

从市里奔涌而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股难民潮。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作“民主派”的人，正一步步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我们这个时代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副面具。如果换到从前，这种人难道能被冠以如此高尚的头衔吗？在21世纪初叶的时候，这些家伙肯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们就是匪徒。

最近这些年来，无数的出版物把这些“民主分子”捧成了英雄，说他们是在为反抗可恨的集权制度而斗争，而对于难民的问题不是缄口不言，就是将其归罪于所谓的集权制度。苏联政府当时不得不直接插手拯救被扔进水里的人。为什么不说说许多人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故乡城市的事实真相呢？为了替所谓的“民主分子”辩解么？难道今天这些“辩护士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民主就是禁止和纵容之间所划的一道界线”的话，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岂不完全是纵容的结果吗？

只有那个世界闻名的象棋棋手、现在则在搞政治的卡斯帕罗夫，才能带着全家和他的亲戚舒舒服服飞离巴库，然而就是这个人却比别人更加起劲地朝拯救了他宝贵生命的当局大泼脏水。其他的人就只能穿着长袍、睡衣、背心和拖鞋逃离自己的家园了。大批难民聚集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没有食物、衣服，缺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那些高尚的“民主分子”们后来在两年之内却把共和国拖入内战，当人们一个个急得发疯的时候，他们却不许飞机和火车正常地把这些人运送出

去。

许多分析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分析家，都把基调定在中央政权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完整而斗争。我们并不隐讳我们反对它的解体，但斗争首先是指向搞血腥屠杀的暴徒，指向他们身后的势力。

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为用飞机撤出居民做好了有组织的安排。局面之悲惨真是难以想象。大约有半数飞往亚美尼亚，1000余人则投亲靠友分散到我国各个城市。那些混合婚姻的家庭，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结婚的，结合时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现在都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他们离开了阿塞拜疆，可是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吧，对于夫妇中的一方实际上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民族仇恨的鸿沟不仅出现在不同民族之间，而且还波及许多家庭。混合婚姻家庭主要都跑到了莫斯科。

15日以后的第二波难民潮是由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组成的，这都是些军人家属。又出现了一些听风就是雨的猜测，说他们都是部队领导强迫撤出加盟共和国的。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的人，要么是一点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军队有病态仇恨。有哪个军官希望把自己的妻儿老小从巴库的住宅里撤出来，送到某个军区小镇的兵营里去呢？

再来先说点后事。我还要说，第二波的难民潮（第一波是1988年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来的）造成的问题真是不计其数。在什么地方住？靠什么为生？莫斯科郊区的休假基地、寄宿学校、各部委办的少先队夏令营全被临时征用了。这一“临时决定”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苏联政府的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紧急制订了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到了1月末，终于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也被拉进了这档子事里来。应该说句公道话，它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成效，对人们的悲惨处境它也非常理解。努力把

难民分散到俄罗斯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一切并不尽如人意，但当局的态度跟俄罗斯人的性格还是一致的。不过，后来也有一位俄国总统的顾问——斯坦凯维奇先生声称：“他们”什么事都办得不对劲。应该修建专门的城市。当然喽，这位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低级研究人员，是一位经过早期“民主”时代搞恶意宣传锻炼的人物，又在并非不知名的原莫斯科市统治者波波夫的副职上“学习”过，定是具有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的：他曾保证要把莫斯科的街道铺设得光光荡荡，平平坦坦，可在他当权的时代，却变得简直没有了街道的模样，只是还保持着一定的“走向”而已了……

就在巴库出事的那些日子，准确地说，就是1月18日、19日，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召开了全苏工农工程技术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口号是：“把事业的活力注入改革”。仿佛改革就不是事业似的！

不过，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原定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应该听听物质生产领域干部的意见，确保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所有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按照惯例，做报告的是总书记。当时他还不是国家总统，仅仅兼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笔者在本书中没有必要详述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我谈的是巴库问题，有关系的地方只在于时间的重合。

会议进行过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不断递条子，要求允许他们发言谈谈两个共和国的复杂局势。于是决定18号会议结束后跟这两个代表团会面。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留了下来参加会见。于是这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又纷纷对全苏政权机构提出指责：“为什么破坏和屠杀发生在巴库，而非非常状态却跑到亚美尼亚的几个区去实行？为什么中央没有制止暴行？”回答冗长而空洞无物。

19日上午，在第二天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聚在主席团休息室里讨论昨晚收到的有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消息。局势仍然很复杂，但

还存在着好转的希望。可是到了10点整，这种希望破灭了。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一分都不差地走向会议厅。这时，政府专用电话铃响了，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他，是普里马科夫从巴库打来的，请求跟他通话。

“要开会了，推迟开会不大好，”戈尔巴乔夫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跟他谈谈吧，问问他那边的情况，然后再告诉我。这不，我们正要开会嘛。”

大家都走了。电话听筒放在那里。普里马科夫还在等着说话。一听他说，我就明白了，巴库发生了悲剧——共和国的政权没有了。早晨，武装暴徒包围了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党中央大楼。情况非常危急，局势已无法控制。需要采取措施。

跟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普里马科夫的通话情况大体就是如此。我又核对了几个问题后对他说，现在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请他不要离开政府专线电话。然后走进大会主席团，非常简要地把谈话内容告知了总书记，请他立即与普里马科夫通话。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有人把我叫到主席团休息室，戈尔巴乔夫比较详细地把巴库发生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其中包括18日晚间人民阵线宣布当地实行非常状态。市内建起了街垒，老百姓的逃亡加剧了，暴行还在继续。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实际上已经不再能控制局势。戈还说，他已邀请了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巴卡京到这里来。就在他传达电话内容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应邀到来了。

戈尔巴乔夫向他们通报了巴库的情况，建议他们立即飞往该处。克留奇科夫当时就说，他没有必要去，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他的副主席。巴卡京则说，要想恢复市内秩序，就一定要通过实行非常状态的决议，也就是1月15日没有通过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场向助手们保

证，要把他的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找来。两座楼都在克里姆林宫内，彼此离得很近，也就是过了十来分钟，卢基扬诺夫就到了。又向他说了一遍巴库的情况，并告知现在亚佐夫和巴卡京都要飞到那边去，以防止发生后果难以逆料的混乱和群众骚乱。戈尔巴乔夫委托卢基扬诺夫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下达命令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卢基扬诺夫对立即通过决议的可能表示质疑，结果得到了一句回答：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过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局势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再等了。”

至于一切到底是怎么办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主席团会议没有请我参加，一整天也没有人再跟我谈下令的问题。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下令的事终于还是通过了：从1月20日零时起，巴库进入非常状态。有一个问题一直对我是个谜，就是命令签署后，为什么没有交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电台电视台播出。问题在于媒体工作不是由政府领导，而是由党中央和它的某些部领导。我想，那些日子的事件中存在的这个空白，迟早总会曝光的。这难道是通过和签署命令的人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保持沉默？也许回答已包含在侦讯材料中。

深夜11时左右我驱车回到家里。不等进屋，政府专用电话的铃声就响了。打电话来的是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阿亚兹·穆塔利波夫。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原先他在共和国计委任主任，我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声嘶力竭叫喊说，部队正向市里开进，正在交火，他还请求停止派遣部队进入。我要他过半小时再打电话来，给我点时间了解真实情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需要从不同来源了解信息。我当即又用电话要了普里马科夫和亚佐夫。是亚佐夫接的电话。我向他转述了穆塔利波夫打来的电话，请他说说当前市里的情况。国防部长以军人的干脆利落告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命令，部队和内务部队正向市内开进，以便在宣布非常状态（1月20日零时）之前占据市内指定地点，维持社会秩序，制止群众性骚乱。他

们是按计划行动的。但他报告说，在部队前进过程中，遇有卡车和公共汽车筑成的路障拦住道路。武装暴徒从墙脚和屋顶猛烈开火。部队已有伤亡。只有朝我们开火，我们才予以还击。

他报告以后过了不几分钟，穆塔利波夫又把电话打进来。我把亚佐夫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要他对人民阵线的头头及其国防军事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施加影响，要他们停止对部队开火，避免无谓的流血。在结束这次沉重的谈话时，我坚定不移地对穆塔利波夫说，考虑到共和国，特别是巴库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会停止派遣部队进驻市内。

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巴库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有关内容写得太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个事件免不了立场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装暴徒，还有无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国的大众传媒，还有中央的某些媒体，把俄罗斯士兵说成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具有兽性的人。人民阵线非常善于操纵大众的社会意识，他们自诩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处处都要与中央作对，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为敌。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政治煽动分子这回又捞到了一个打击军队的机会。他们所攻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东西：军队、军事工业部门、航天等。他们领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当回顾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不由会把那些事件拿来同后来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发生的一些情况相比。过了不久，城市和乡村又冒出了烈火浓烟，有那么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布纳哈切万为独立的共和国，说来也巧，首都还是选在连科兰。那位“合法总统”在他那山村故乡只是抖搂抖搂胡子，于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员、我的副手盖达尔·阿利耶夫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挽救局面。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无论事情发生在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还是俄罗斯人身上，

又怎么能怪罪于人民，怪罪于普通百姓呢？如果这样，就确实是对所有那些自1988年以来高加索冲突中所有死难者的一种侮辱和亵渎，其中也包括1990年1月的死难者。任何罪恶行径的阴影都不应该落到人民头上，不管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还是巴库。有头脑的人总是会把兽性的人群同总体的人民相区隔的。极端分子和坏蛋只是其中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

笔者在本书中谴责的，不是阿塞拜疆人民，而是阿人阵的那帮政客，是它的那些头头们。正是那些家伙，在那已经成为过去的1990年1月，把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深渊。在那次可怕的冲突中，他们，唯有他们才是罪人。他们为了攫取政权，难道还会考虑什么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吗？

有个民主派撰稿人，大名叫努伊金，他在1991年年末毕生头一次来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而且在那边的候机大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他在刊登于民主派报纸上的文章中，把这两个民族一个称为牺牲品，另一个称为刽子手。请问，这么一篇文章，能起什么作用呢？民族之间的纷争，无论是一次冲突，还是一场内战，总是会具有残酷和难以调和的特点。难道可以因此而归罪于某一个民族吗？被割掉的耳朵，当着亲人的面进行严刑拷打，号召俄罗斯同亚美尼亚人一起打一场反对阿塞拜疆人的战争——这些还远不是这位民主派撰稿人先生捏造出来的所有罪名。不过，难道他只是唯一曾经试图而且现在依然念念不忘想要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推向冲突的人吗？还有一些类似的政客，他们总是企图把民族悲剧中宪兵的角色强加到自己人民——俄罗斯人民头上，难道这不是对俄罗斯人民怀有病态的仇恨吗？

下面就是前不久一个当天到过巴库的记者在中央报纸上写的一则报道：

.....也就是在事件发动前的几个小时，我得以访问了位于施

密特中尉工厂文化宫的人民阵线国防委员会的参谋部。当汽车驶近大楼时，扑入眼帘的是无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一群群年轻人站在那里，奇怪的是他们都身穿苏军制服，好像是一些海员。一群彪形大汉，身穿保护色军上衣，臂戴阿塞拜疆人阵的臂章，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的队伍里有大约十多万民兵战士，”委员会参谋长努拉丁·阿卜杜拉耶夫滔滔不绝对我说，“他们有的在巴库，有的分散在共和国各居民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卫队从一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我们完全有能力予以反击，或者使用必要的手段……”

果然，可怕的“反击”很快就出现了：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天空飞舞着流星般的弹道。据亚佐夫报告，武装暴徒共有大约4万人。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手里拿的全是玩具枪炮不成？这样的“游戏”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玩，而受到这些千方百计只想夺权的坏蛋影响的，则是一批批跟政治根本不沾边的普通百姓。



1990年1月巴库，悲剧事件的死难者。（索洛维约夫摄）

国防部长把消息一告诉我我就明白，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是决不会住手的了。夜间传来的全面报告也证实了这种判断。疖子终于出头了。

沉重无比的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几个钟头里，我不断跟巴库的亚佐夫和普里马科夫以及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保持着联系。午夜时我又有两三次跟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他可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同他谈话使我得出结论，想要就当夜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他的

准确指示或了解他的明确立场，那纯粹是徒劳。最后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叫什么话？是张皇失措呢，还是逃避做决定呢？正如在所有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老“原则”又占了上风：事不关己……

20日上午，经过多轮电话磋商，决定当日中午共和国领导人乘飞机到莫斯科来。下午在苏共中央大楼，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所在地，在会议厅举行了戈尔巴乔夫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局成员穆塔利波夫、加萨诺夫、马麦多夫以及已故的波利亚尼奇科的会见。莫斯科这方面除了戈尔巴乔夫，参加会见的还有7人，其中也有我。会谈紧张复杂，情绪激烈。气氛也不可能轻松——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目前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共和国领导问题。我们问，如果部队撤出，他们是否能保证市内恢复秩序？回答是断然的：不能。这样，紧急状态在市内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8月，也就是一年半还多。

讨论还涉及巴库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为此将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宁飞往阿塞拜疆，而多古日耶夫则在莫斯科负责难民问题，就这个问题起草政府决定。至于第二个问题——共和国领导的问题，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应该离职，所以要作出决定，由谁来继任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家同意提名由穆利塔耶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一致同意推荐加萨诺夫担任。他在观点上与反对派相近，这样，共和国领导班子就能显示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民族和谐。晚上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就巴库问题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

嗣后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恢复局势的稳定，不过亚美尼亚人没有再返回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也没有再返回他们在亚美尼亚的家乡。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

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总共居住着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异族通婚的妇女。

民族主义恶魔还在继续肆虐，制造牺牲品。难道不该想想这件事吗？应该。谁在脑袋里想着现在和未来，而在心里保存着现在和过去，谁就是智者。这段过往的恩怨主宰着两个民族已经超过15年之久，目前还看不出有化解之道。紧接着格鲁吉亚又开始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进行镇压，而“全民普选的”总统竟遭到了“民主派”的炮击。然而下一任总统，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民主之父”谢瓦尔德纳泽，竟非常可耻地被颜色革命掀下了他如此钟爱的权力宝座。

当我一次次分析全苏当局、共和国当局、许多苏联人民代表以及广大社会公众当时的所作所为时，我不由得会问自己：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认真地、老老实实在地解决民族冲突，特别是外高加索的民族冲突的话，如果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等地的问题，阿塞拜疆各区的夺权问题，伊朗边境设施遭到破坏的问题没有被委员会里无数夸夸其谈的废话空话所淹没的话，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在这些问题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立刻着手解决它们——既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用行政手段。

至于说到公众，特别是外高加索的公众，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很冷淡，有的则显然支持武装暴徒。而且有的加盟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也并没有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例如，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于当年2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就1990年1月19日、20日巴库事件所作的调查发表过一个声明，现引一段如下：

……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样的局势，于1月13日在巴库策动

打砸抢和骚乱，导致大批人员死亡，主要受害者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民和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对罪行加以愤怒谴责，要求对组织者和肇事者给予严惩。

然而巴库以及共和国全国出现的复杂局势，不应评估为强行夺权的图谋.....

居然是这样看。没有强行夺权的图谋。那是什么？是朋友们气氛和谐的约会？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明白，那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废物，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者。意图夺取政权的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大发作的时候，同他们所仇恨的中央展开了斗争，因为阿塞拜疆的国家地位正是中央赋予的。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就会想起，老百姓说的话真是充满了智慧：发动战争的是肮脏的政客和残忍的冒险分子，遭罪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当笔者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俄罗斯电视上正在播放巴库事件。护法机关的强大队伍正在平息人群的愤怒。这是阿利耶夫总统在现实地行使他的权力，制止国内出现混乱和破坏法制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统治者都关怀他治下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完整。

我们为了认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外高加索的熊熊烈火不能不影响到国家整体上的稳定。多年冲突造成的裂痕延伸到苏联所有的共和国。立志破坏国家的人们希望苏联衰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希望搞得它道德扫地。人们讲起充当宪兵角色的苏联军队和它的将军来，一个个义愤填膺，说一定要把军队非政治化，决不允许利用它来消除国内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所谓“激进民主分子”口号中的内容。他们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帮助下攫取了政

权，然后又唱起了别的调调儿。在经过了第比利斯和巴库这两次事件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亚佐夫元帅和罗季奥诺夫将军剁成泥，而“民主派”的将军格拉乔夫呢，他在北高加索视察的那些部队，虽说已经换成了俄罗斯部队，可完成的不还是同样的任务吗？就在不久之前，车臣牺牲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改换颜色”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进入“民主”俄罗斯掌权后，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俄国军队起着“稳定国内局势的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宪兵”的概念又该怎么办呢？在一次俄联邦武装部队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叶利钦令人印象深刻地声称：

“今天的部队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它还具有保障稳定、保障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的天职。”

这些说过的话全忘了。这位“宪法保障”在他的讲话中，居然也公然号召要用军队来保障经济政治改革了。在人民和祖国最艰苦的那些年月，难道不正是他和自己的那伙人，在恶毒地诅咒苏联当局和军队领导的行动吗？

国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体。特别是在一个具有联邦体制的多民族国家，经常会出现各种特殊状态——翻起分裂主义的浊浪，出现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为了消除这种局面，当局有义务充分利用护法机关，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还可以动用军队。我们都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也这么做，为此，却遭到了一些人的疯狂攻击。可是，几年之后，这些人却让公众明白了：必须得这么干，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却是为了一己之利。所有这些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别的定义我实在找不到。

1990年悲剧过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已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来临，只是多亏盖达尔·阿利耶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人民又要求他出来工作。国家的管理走上了正轨，国家的前途又变得可以预料。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的才华和意志帮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

我非常了解阿利耶夫。我们是1982年11月的同一天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中央的经济工作书记。三年后，当我领导苏联部长会议时，他成了我的第一副主席。而且，工作非常出色。

现在阿利耶夫已经去世。但我们相信，他对阿塞拜疆的领导政策将由他的儿子继承下去。

本书叙述的1990年1月发生的巴库事件，只是其中的某些场景。我想，研究者一定会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全面真实地再现出来，并对其影响巴库的后果作出评估。而且，人民迟早会把一切恢复本来面目。无论人们怎么说，所有事件之间都是直接有联系的。不过，应该记住一位诗人的话：“时代对历史学家越是有趣，当代人就觉得它越是悲惨。”

第六章 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

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而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对策上的平庸无能，却向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表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其组织者实际上都不必承担什么后果。

我要阐述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凭着道听途说得知的。

这些政治势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掀起了猛烈的风暴。其最终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八九月间签署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命令。



维尔纽斯大教堂广场上的群众大会。俄文标语写着：“俄罗斯受蒙古鞑靼人的压迫，立陶宛也受俄罗斯苏联占领的压迫！”立陶宛文标语写：“还立陶宛以自由和独立！”（克罗波夫斯基摄）

民族主义运动坐大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国内积累的问题已经相当不少。因此苏共中央总书记倡导改革，实行对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开展革新的方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赞同。于是，涌现出不少支持这一方针的社会运动。显然，运动的参加者对当时的国家形势各有各的看法，而且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地方领导人，特别是各州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得出结论，认为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改革派与“保守”派正在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为这种结论的产生提供了口实。我想，许多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他去视察西伯利亚时发出的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自下而上”的压力当然就要触及苏共。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

导施压。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谈到在萨哈林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总书记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的第二天我对他说：这样的行动可能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有问题，包括党内问题，应当用别的办法解决。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已经动手干起来了！”

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确实是激发了不说上百，至少也有几十个反对现存制度的派别，包括党内和人民代表内部的小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别。对于“左派”和“右派”，他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来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对于那些要求他要有明确具体行动纲领的人，总书记总是愤怒地进行驳斥。他没有，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有这样的纲领。他是一个即兴做事的人，可以说这种即兴的办事作风过于经常地支配着他的行动。

以我看，改革年代（1985—1991）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着手进行必要的民主革新，对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放松硬性控制，实行公开化等等的阶段。

第二阶段我认为应该从1989年年中算起。它的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夺权斗争的展开。这一阶段的“开篇”之作，是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指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种“民族主义”的癫狂相对于全苏整体来，开始得更早，即从1988年年中就开始了。当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正在开始实施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正为头顶上的荣誉光环而得意洋洋。1986年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宣布说：“如今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以及我们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改革是一个大容量的字眼儿。我们将推动改革……大踏步前进。”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了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陶醉了，他忘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考虑到最主要的东西——我国的特点。请注意，苏联有近三亿人口，民族和信仰的构成都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之所以不简单，还在于它虽强大而富饶，但相当一部分人民对此却毫无知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者必须得一步一个脚窝，无论是方向、规模、速度还是时机，都要找得特别准。也就是说，行动必须要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纲领。但总书记却没有纲领。

戈尔巴乔夫着急了。现在很难判断，当时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不知是出于性格，还是受到谁不断催促：时间不等人哪！我看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那些“改革”的策划者们利用总书记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推行他们自己的路线，以更快地动摇国本，消灭他们所仇恨的社会制度。当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牵着总书记的鼻子走到对国家已构成危机的第二阶段时，总书记束手无策了。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我想，他掉进什么圈套，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就开始乱套了，权力也丢了，改革初期建立的威信也丧失了。这恰好应验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从爱到恨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一阶段，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进反对派转入进攻，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支持蜕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其代表性例证，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立陶宛的“萨尤基斯”，以及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正是它们引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的“进军”：最初是要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独立经济核算，而后就是退出苏联。

最具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是“萨尤基斯”。它在夺取政权和争取立陶宛退出苏联的斗争中，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其实，“萨尤基斯”通过由它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在该共和国攀上政治巅峰之后，却并不善于解决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就遭遇了覆灭的下场。甚至连立陶宛取得独立也难以挽救它的危亡。类似情

况实际上发生在所有民族主义社会运动身上。特别明显的是到了90年代，他们的领头人如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彼得罗相等人纷纷淡出政治舞台。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他们的活动都留下了否定的评价。

当然，客观地讲，“萨尤基斯”之类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产生的基础，都是广大居民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领导作为的不满，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现的偏差。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为此需要时间，并应采用深思熟虑的方法。

“萨尤基斯”于1988年夏季开始举行一次次群众大会，其决议中提出了要求更多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对上级党任命的干部说不，要断了他们捞油水的路子！”）、恢复“历史真相”之类的口号。不过后来才明白，像“萨尤基斯”这样的运动，虽然提的是在各共和国开展改革的口号，但要达到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它们想要破坏现行社会制度，并夺取政权。

正是由于当时有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克格勃高层领导的参与，“萨尤基斯”才相当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实体。该组织近95%的成员是立陶宛人，其行动特点是效率高，组织性强，战术步骤周密。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财政问题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错。

运动迅速积蓄了力量。1988年6月初，它还是一个刚组建的只有36名成员的自发组织，仅过了10天，就掀起了一项政治行动：对1941年驱逐200人出境的决定提出抗议。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前夕，它在格底米纳斯广场举行了一次两万人的集会，为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送行，并以新运动拥护者的名义向他们提交委托书。7月9日，又有好几万人前来迎接这些代表归来。“萨尤基斯”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这样的姿态完成了在公众面前的亮相。1988年8月23日于维尔纽

斯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在组织上开始成形，这一天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署条约的纪念日。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首次宣布了“萨尤基斯”的纲领性宗旨。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他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点使得“萨尤基斯”不仅与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渐行渐远，而且也包括同一部分立陶宛人疏远。但激进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人民大众对于改革的结果很失望，为“萨尤基斯”在相对短暂时间内掌握群众造就了合适的土壤。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端摇摆不定的行动，也助长了“萨尤基斯”威信的提高及其民族主义性质的增强。实际上，党中央已经不再参与群众的事，开始退避，结果它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具有两重性。例如，中央委员会书记布拉扎乌斯卡斯和舍佩季斯开始公开参与“萨尤基斯”的事务，并声称支持它的活动。

上面提到1988年8月“萨尤基斯”组织了一次集会，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来到立陶宛，会见了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领导。当他了解到后者主要目的是脱离苏联时，便耍了一个两面派手法。他一面发表演说，高谈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又向他的“学生们”详细说明，为达到主要目标须采取什么方略和战术。

后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站在苏共立场上的新领导得出的结论是：雅科夫列夫实际上为把该共和国引向1991年1月维尔纽斯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长”，是中央的最高层政治活动家当中最先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倾向的人。这次到访之后，“萨尤基斯”开始觉得自己被委以担当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标则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锤，以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于是广泛开展了“萨尤基斯”思想的公开宣传。事变席卷全共和国，局势失去了控制。立陶宛领导层中不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的部分人士于1988年9月28日在维尔纽斯做了一次笨拙的尝试：用强力手段去制止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示威性地出动了民警和特种部队。维持秩序的人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被“萨尤基斯”在宣传中巧妙地加以利用。手持橡皮警棍的士兵的形象被大量印制在宣传画上，引起立陶宛社会的巨大反弹。当局的行动被称为是“对改革派对人民显示民主意志的镇压”。

接踵而来的便是共和国的政权危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党的领导人松盖拉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下来，接替他的是经苏共中央同意和批准的布拉扎乌斯卡斯。当时他赢得“萨尤基斯”很多积极分子的好感。局势部分得到缓解。

1988年10月22—23日召开了“萨尤基斯”成立大会。这一活动的广泛群众性引人注目：在4500名参加者中，有1122人为大会代表。以嘉宾身份到会的有各侨民中心的活动家、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

立陶宛人民诗人马尔钦基亚维丘斯宣布大会开幕。与会者当中有一位当时“萨尤基斯”领导人的父亲、90岁的兰德斯别尔基斯—扎姆卡里尼斯。他曾叛变附敌，担任过亲德国法西斯的政府部长，在向希特勒效忠书上赫然列有他的签名。那份效忠书是在1941年6月25日，即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发出的，名曰《立陶宛独立临时政府告人民书》。其中有这样的话：“……立陶宛临时政府感谢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德国总理、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无畏的军队解放了立陶宛的领土”。



“萨尤基斯”在维尔纽斯纳戈尔内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代表团打出标语牌。（克罗波夫斯基摄）

耐人寻味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举动。他委托布拉扎乌斯卡斯以他的名义向成立大会转达“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并且强调说，他从“萨尤基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加提高苏维埃立陶宛的声望”。这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了？是认不清这个滑向民族主义立场的运动的真面目，抑或是一位憧憬着权力但又正在失去权力的领导人的巧妙应对？我认为是后者。而且，在这种地方，雅科夫列夫手法的痕迹谁都能看明白。

“萨尤基斯”也没有欠下人情债。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给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您根据我们的具体行动作出评价，并在苏联自主的各族人民大家庭中，为立陶宛取得民族自决权起促进作用。我们信任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把您的话写在宣传板上。我们的运动不会离开党指引的路线，不会离开在生活中实现建设性深刻变革的道路。”

同时又向莫斯科发了一通表示感谢的致敬电，其中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说到和想到俄罗斯人民时，当我们谈到‘国际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像您一样的人。您的一切活动，您不久前对立陶宛的访问，都使我们相信并证明您的这些话绝非空谈。”电报是发给谁的呢？当然是发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的！这封信刊登在

共和国各家报纸上，并通过广播和电视播出。

这条新闻不仅立即为立陶宛全国民众和密切关注这一行动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知晓，而且事实上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因为400名与会记者中，有103人来自全世界各家通讯社，代表了17个国家的大型报刊。对于“萨尤基斯”来说，这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持，反对的不仅是地方“保守主义者”，而且也包括莫斯科。

会众全体起立，对中央政策的讨论和支持共和国主权思想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字一顿的欢呼。反俄的、反苏的发言，“俄国人是占领者”、“从立陶宛撤走占领军”等口号，也同样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和“立—陶—宛！立—陶—宛！”的欢呼声。苏联国家元首对之表示敬意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成立大会巩固了“萨尤基斯”作为共和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选举了领导机关：代表大会由220人组成，其理事会由35人组成。兰德斯别尔基斯教授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此前，该运动争取到获准出版自己的报纸《阿特基米马斯》（《复兴报》），印数20万份，用立陶宛文和俄文出版。至此，“萨尤基斯”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应当指出，大会所作的决定和通过的30个决议，在很多地方都违反了该国当时的法律和宪法。

“萨尤基斯”运动领导人兰德斯别尔基斯是何许人也？我想援引他过去的战友、著名的立陶宛作家佩特克亚维丘斯的话来做一个说明。这位作家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名叫《傻瓜的航船》，其中有这么一段：

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谚语：教授要是当家，百姓就要倒霉……我们的教授本想当一个钢琴家，跟德瓦里奥纳斯学过琴，三年级时老师给他下了个评语：“年轻人，别再折磨自己，也别

再折磨我了。您成不了钢琴家。”于是年轻人成了个研究音乐的学者。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丘尔立奥尼斯艺术特色的书。但他既不是音乐家，又不是音乐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搞阴谋他可是高手……他常说：“哎呀，缺了我多糟糕！”可他却憎恶自己的人民，什么狠毒的话都说过：下流胚、赤色坏蛋，等等，现在又骂他们是野蛮人……

克格勃少将施罗宁写了一本《克格勃——中情局——改革的隐蔽动机》的书，让我们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为他的肖像再加上几笔吧：

为了给这个小兰德斯别尔基斯做一个全面评价，有必要提一提他与原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克格勃的接触。我在该共和国的同事们对我说，他曾主动找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提供克格勃机关感兴趣的情报。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准许他出国探望那边的父亲。当然，肃反人员是没有白吃干饭的。直到获得关于立陶宛侨民组织的有价值的情报、并在克格勃机关收到感兴趣的一系列人员的具体材料之后，他们才为小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出国开了绿灯。无疑，有一种想法一直萦绕在这位活动家的心头，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主动接触克格勃的真相掩盖起来。所以当他步入政坛之后，就对同他保持工作联系的那位工作人员下了手。

但兰德斯别尔基斯想掩盖痕迹的企图未能得逞。1997年9月，立陶宛议会下设的调查议员与国外特工机关联系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议会议长兰德斯别尔基斯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克格勃合作的问题。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严酷的苏维埃年代，即在立陶宛被称为“苏维埃占领”的时期，兰德斯别尔基斯也不仅能够前往德国探望父亲，而且还可以到奥地利去，同在当地做生意的哥哥会面……

兰德斯别尔基斯作出的第一批国务决定当中，就有整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的决定。他还要求把缴获的和查找出来的有关被强制押解到德国去的人员的文件上缴，似乎这些文件对

于恢复名誉的委员会开展工作必不可少。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亲自率领苏联克格勃代表团就以上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恢复名誉是非常重要的但又很敏感的事情。因此，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交给了立陶宛方面。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些文件并没有用于指定的用途。经确认得知，与兰德斯别尔基斯家庭和亲属有关的文档已从这些文件中被清除掉了。

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文件？该书作者说出了缘由：

此外，另有300多名立陶宛公民，他们都参与了在法西斯占领立陶宛期间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涉及他们的文件于移交立陶宛方面后也不知下落。但是可以想象，再想找到它们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维尔纽斯当局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行动的参与者提起过什么公诉。众所周知，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正是在对待犹太居民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残酷。被消灭的犹太人，其数量与立陶宛国内人口之比，在欧洲是占头一位的！当地居民充当法西斯帮凶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实例，数量也是占第一位的。

当然，立陶宛大屠杀的真实规模至今也搞不清楚，因为希特勒在这里消灭的犹太人，有从法国、意大利、挪威、丹麦驱赶过来的。此外，战争一开始，就有犹太人从波兰逃到这里来。这些人都被关进了老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杀害了……

人们相信的是一些多么阴森可怕的人物啊！究竟何时才能不再被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呢？遗憾的是直到过了这么多年，有人才闹明白自己是被人骗惨了。立陶宛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苏联的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也是这样。

“萨尤基斯”：从口号到应验

“萨尤基斯”的成立大会使得立陶宛共和国本来就复杂的局势更加动荡，民族对立更加突出。反对“外来移民”的行动展开了。不耐烦的情绪在政治斗争中开始占上风，敌人也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这场政治歇斯底里中，外国广播电台、各种媒体以及数不清的顾问和密使，都一齐掺和进来。

当时立陶宛共产党和该共和国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1988年的10月，他们就下令从党员和团员交纳的党团费中扣出几个百分点去支援“萨尤基斯”。共和国境内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指令。靠着这些，到1988年12月，“萨尤基斯”的领导人掌握的可支配资金已达数十万卢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些钱让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得以大展拳脚，发动宣传攻势。

成立大会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先是1988年11月在维尔纽斯，然后又在整个共和国，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的工人集体中，开始形成国际主义者运动。后来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当局为该运动注册的名称是“争取立陶宛改革社会主义运动Vienybė-Единство-Jedność”(“统一”一词的立陶宛语、俄语和波兰语)。对这一事实，至今民族分离主义的媒体都坚决避而不谈。该运动号召民族平等，主张使用两种官方语言（具体地说，就是俄语和立陶宛语，而波兰语可在两族混居地区作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使用），实行社会平等，争取立陶宛未来的经济与民主发展等，但不主张共和国脱离苏联。该运动领导人明白，只有苏联才能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保障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

其实，他们本应首先得到以布拉扎乌斯卡斯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舍佩季斯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起码的支持。但“统一运动”的国际主义者多次向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呼吁，却得不到任何理解。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不仅拒绝了这个运动，更糟的是开始迫害和诋毁它的成员。

在实际上得不到回应和帮助的情况下，反对瓦解苏联的该运动领导人这时便直接找了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一事实更加有理由使人相信，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完全是自觉的和目的明确的。

新一轮政治对决出现在1989年的年初，当时围绕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首先是1989年2月12日在维尔纽斯体育宫附近，“Vienybė-Единство-Jedność”运动领导人伊万诺夫发动该运动支持者，召开了10万人大会，要求保障立陶宛所有当地族群的平等，坚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萨尤基斯”领导人深为左翼力量的成功所震慑，开始丧失他们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得到的支持。在随后召开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对共和国政治形势给出了明确的评价。会上对共和国领导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上的疏漏进行了分析，试图制订出一个具体行动纲领，并且明确宣告，共和国党组织未来的活动只能在苏共组织内部进行，而共和国切合实际的主权也只能存在于苏联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萨尤基斯”领导人开始孤注一掷了。他们专门发表了《声明》，号召抵制全会决议。该《声明》实际上成了他们大选中的思想指南。人民代表选举前夕，“萨尤基斯”在所有选区都提出了候选人。依靠巨额经费支持，加之国家媒体也在为他们宣传，在全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分配的41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基斯”有34人当选。

接着就开始了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对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活动纲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由于自己人数较少，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机会不多，所以就在工作重点放到了各委员会和小组会上。就这几个代表团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都事先做了安排，优先照顾那些持民族主义态度，同时在工作中又具有权威地位的人。对于代表的一般文化水

平、交往能力、演讲能力、是否善于说服他人，甚至外貌等条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果不是为达到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目的，这一切本都正常，甚至做得很好。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议员会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共同给代表大会定下了辩论的调子。他们在跨地区议员小组积极开展活动，而该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正如所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帕尔姆进入了这个组合的领导机构。由于对大会的一切情况都进行电视转播，所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就能够对本国代表的原则性、积极性和政治倾向性作出判断。

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代表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力图使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每个议题只要稍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便马上加以利用。这样一来，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三国代表的帮助。我身处冲突漩涡的中心，常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干吗要忍受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政客的侮辱？我虽然明白，他们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我意识在特定条件下会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依然无法想象后来的一切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脱离苏联。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他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中的秘密议定书特别感兴趣。他们首先加以利用的正是这份文件。它成了摧毁苏联的某种政治杠杆，成了把苏联归入“占领者”一类的一个借口。

分析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及其多数领导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如群众大会、“圆桌会议”、游行、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等等），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即要求对苏德之间的这份条约，特别是对其附加秘密议定书给出政治和法律评价。

苏联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在这方面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讲坛。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在入骨三分的电视摄像机面前，完全合法地把条约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电视正日夜不停地向全国转播那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好运道真是千载难逢。在叶利钦的“民主”时期乃至后来，社会活动家们（不论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什么候选人）的电视讲话都是按时间分配的。想要延长出镜的时间吗？掏钱吧，而且还不是小钱。可当时一切都很简单。到了1989年6月1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利普玛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建议针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成立一个法律评估委员会。得到推荐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最激进的代表，也有莫斯科的，乌克兰的，摩尔多瓦的，以及亚美尼亚等地的代表。

围绕这一提案展开了辩论。头脑清醒的意见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例如议员伊·亚罗威和塔林市一家企业的经理就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从他们的共和国开展清理本土居民工作一年半的结果来看，非爱沙尼亚的那一部分人居然成了“占领者”和“殖民者”。持类似意见的是科学院院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阿尔菲洛夫。他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该条约对双方均已失效。可是发言赞成设立委员会的有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莫斯科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科学界代表，以及以活跃著称的俄罗斯代表们。而如今，这些人也都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行为感到极大愤慨。

戈尔巴乔夫要求讲话。他的发言总是那么颠三倒四：他告诉大会，无论在我们这边还是在德国，都找不到秘密议定书的原件。而且还援引了与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接下来他却……又支持设立调查文件的委员会，可是据他讲，文件的原件并不存在，但他还是推荐了雅科夫列夫进入委员会！一天后，决议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反对6票，弃权7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应该指出，与秘密议定书相关的情况可不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不止一次问戈尔巴乔夫，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秘密议定书文本是否存在，也问到卡特诺事件。回答斩钉截铁：我们手上没有这个文件。大部分政治局委员认为，既然原件不存在，那么对议定书的法律评估就无从谈起。雅科夫列夫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有副本就足够了，因为从1948年美国国务院公布《1939—1941年间苏联与纳粹的关系》文件汇编之日起，这个情况就清楚了。其中就有1939年苏德条约的附件——所谓的秘密议定书。

我本人不止一次问过戈尔巴乔夫：是否真的没有原件？有一次他叫人把一张画在高级绘图纸上的地图送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画着1939年军事行动之后的疆土边界。地图上有两个签名：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除此之外，上面还有斯大林用红铅笔做的几处有利于我方的改动以及他的铅笔签字。在这张“地图”上，恰恰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国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再没有见过任何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几年之后才知道，戈尔巴乔夫竟然欺骗了中央政治局的战友，欺骗了苏联人民代表，欺骗了我国的所有社会公众。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时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的卢基扬诺夫根据当时形势，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在一个专门的处里，保存着一些严格保密的文件袋。大约一年后，新任综合部部长博尔金也向总书记报告说：在政治局的特别档案室里存有一些文件，装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

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也有关于卡特诺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尔金的说法，他将这些未启封的文件袋交到总书记那里。虽然按条例规定，做启封之类事情的应该是中央综合部部长，但戈尔巴乔夫亲手拆开了这几个文件袋，里面就有条约文本和上面我提到的地图。就这样，包括我在内，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包括雅科夫列夫，从秘密文件袋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图。博尔金请示，要不要让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了解一下这些文件，或在会上向政治局通报一下。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不用，还补充说，必要时他会亲自拿给有关的人看。总书记亲自将几个文件袋封固后，退还给中央综合部下属的政治局特别档案室保存。顺便说一下，有消息说，在50年代以前，这些文件曾存放在外交部，后来才转到苏共中央。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文件，博尔金也知道。但前者有意识地隐瞒了这个消息，而后者则按总书记的要求，也没有扩散消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民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雅科夫列夫也不知情，他只是见过那张地图，并报告了大会。

苏联解体和苏共被取缔后，包括政治局档案在内的所有档案，都归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管辖。这时，文件被公开了，某些文件甚至还转给了其他国家，如波兰。

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秘密文件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从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会利用秘密条约或协定来保护或满足本国的利益。这永远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订有双边秘密协定。1917年11月列宁公布了协约国的《秘密条约》，其中明确规定英法两国将会得到什么。答应划给俄罗斯的是奥匈、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等国的部

分领土。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立陶宛代表团为脱离苏联而展开活动时，总是以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和约》为依据，说其中规定给予它主权。可就是这个条约，其中也含有一个秘密协定！其中规定了立陶宛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农政府俄罗斯军队”对抗波兰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允许使用立陶宛领土，同时规定该国须保持中立。这一协定保证从波兰撤出的红军得以经由立陶宛领土通行无阻地回到俄罗斯。立陶宛遵守协定的行动也得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相应的回报。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虽饱受战争折磨，正处于饥饿之中，但仍于1920年10月16日向立陶宛政府划拨了相当于300万卢布的黄金。此前于1920年8月14日，红军统帅部依照《莫斯科和约》，已将维尔诺市及其相邻地区移交给立陶宛军队。对于这些事实，如今的当权者却全都忘记了，反而肆无忌惮地利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秘密议定书大做文章。

各种各样的秘密条约和协定在现代史上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大约也就在苏联同当时的德国签订和约的同时，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两周之前，即1941年5月10日，希特勒的代表、纳粹党“老党卫军”的缔造者鲁道夫·赫斯乘飞机飞往大不列颠。英国人给赫斯一案规定了60年的保密期，可是接近到期的时候，又把它延长了60年。看来我们二战中的盟友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还不能公开这些档案。

让我们再回来谈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及其秘密议定书的问题。这其中没有任何有关苏联进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或以其他方式对它们施加影响的意图。今天，每个人在文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内容。而且，议定书的第一条就说，立陶宛在维尔诺州的利益为双方所承认。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38年3月，也就是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在首都考纳斯作出了对波兰有利的决定，从法律上放弃对维尔诺和维尔诺州主权要求的一年半之前。

这些文件所提到的划分“利益范围”的问题，既不是瓜分主权国家，也不是达成侵占它们协议。事实上这是谈判双方为军事和政治活动划定分界线的协定。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条分界线，那么，由于西方国家的默许，早在1939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就被德国占领了。那么，世界也早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现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主权国的政治家们又向谁去质询这个条约的问题呢？也许只有去问希特勒了？他们敢这么做吗？苏联挽救了这些国家，挽救了它们的人民免遭德国纳粹真正的军事占领之苦，然后又尽其可能帮助被它解放了的波罗的海三国加速发展。没有良心的人咒骂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苏联和红军是“占领者”，而这些国家人民的子弟，他们的父兄，却同苏联各族人民一道，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而并肩战斗过。

我深信，总有一天，客观的历史学家会对二战前夕欧洲的态势，以及那时斯大林的作用作出评判。很多人是从本世纪初和上世纪末而不是1939年的立场观点去审视苏联领导人所采取的步骤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发动的战争已经逼近我国大门，我们迫切地需要赢得哪怕是几年的和平时间，以便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极其残酷的搏斗。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被希特勒安排了极其悲惨命运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乃至对全世界来说，如果苏联的疆界没有向西推移，那么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将更加惨烈。这也就意味着二战的过程将会更长，更加血腥，更具破坏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按他的话说（《记忆的漩涡》一书），工作枯燥而沉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持极端立场，积极支持他们的是苏联人民代表尤利·阿法纳希耶夫。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个人的观点耐人寻味，他说：“其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很多意见和要求都是可以赞同的，但若要对苏联提出指控性的决议，大会终归还是不会通过。”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避而不谈，1989年7月委员会的建议并不是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而是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他在附函中谈到了人民代表包括苏共党员坚持不让步的情况。为了赋予自己在与“好斗的波罗的海分子”进行斗争中以坚定的“党性立场”，雅科夫列夫向政治局汇报说，他成功地拿掉了阿法纳希耶夫及其同伙提出的“谴责同法西斯签订协议”的要求，否定了秘密议定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940年加入苏联有直接关系的看法，等等。

在雅科夫列夫的附函中，就这位或那位人民代表持什么立场，提供了大量消息。但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他在附函中这样说：

“本可以作出努力，以求在委员会结论的草案中加进这样的观点，即欧洲领土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因此应该以既成事实为准，而不是以1939年与德国的协议为准。如果能达致这种共识，那么，主张恢复三共和国‘独立’的人士，就只好改变自己的战术了。”

道理的确如此，但接着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雅科夫列夫在附函中使用的字眼儿那么谨慎，像“作出努力”，为什么用“本可以”，而不用“应该”？况且他清楚地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承认不承认议定书的存在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该议定书并未包括在条约批准程序之内，而且就纯法律的角度而言，该议定书也无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再有，整个这份“友好”条约，正如前面所说，经过1941年6月22日的一把战火，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因此，附函的作者只不过重复了一个公认的道理，即战后欧洲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这就是它要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1975年赫尔辛基全欧会议结论性文件所规定的国际法准则。

1989年12月24日，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雅科夫列夫就委员会工作做了总结报告。同一天，大会就此问题通过决议。下面让我引用其中的一条：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约束力。

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

表决这项决议的结果是：1435票赞成，517票反对和弃权。

虽然措辞模棱两可，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凭借这样的决议，还是从法律上肯定了波罗的海人的胜利。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种情况恰好与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20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相呼应。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的建立，加之人民代表大会对历史上立陶宛据以加入苏联的文件提出正式谴责，这一切仿佛汇成了一股越来越汹涌澎湃的潮流，把主张立陶宛脱离苏联的人引上了一条直通目的地的道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工作迟缓，促使围绕该问题出现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在对有关议定书的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应在该议定书签署50周年时，即1989年8月23日之前，向大会作出答复。提出要求的同时，还通过了许多威胁性的决议案，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甚至出现了多次绝食行动。可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委员会主席却跑去休假去了。这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方面再次蓄意逃避回答实质问题。紧接着就有了反应：1989年8月23日，发生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稍后将加以说明）。根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断定，雅科夫列夫拖延委员会的工作是有预谋的，其目的就是在此期间为进一步加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破坏性力量打好基础。

本章笔者将对此人在苏联解体前最后几年中的活动给予更多关

注。不久前雅科夫列夫去了黄泉世界。民间有句话：人死了，要么只能说个“好”，要么说声“还可以”。看来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如果活着的时候做了太多的坏事，那么你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为你在人世上造的孽接受上帝的惩罚。

雅科夫列夫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他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因此，还有必要在我们这个罪孽的人间，对他的所作所为再作一点评判。许多活在纪元前的和其后两千多年间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是都在受到人们的评判吗？关于个人在历史上地位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平息过——像拿破仑和希特勒，列宁和斯大林，还有伟大国家的破坏者叶利钦，统统都在被评判之列。

关于雅科夫列夫的情况，最近20年来已经谈得很多，但是依我的看法，还有不少“画外音”没有收进来。比方说，人们只能凭猜测来确定他在把戈尔巴乔夫推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是从1983年开始的，当时雅科夫列夫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对到加拿大正式访问的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

与此相关，我想起了自己在苏共中央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当我与安德罗波夫单独会见后，有人向他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等在接待室，应约来见他。我收拾起文件打算离开，可安德罗波夫请我留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详细向总书记汇报他出访加拿大的情况。他肯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技术、肥料、储存和农产品加工。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取汇报后，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加拿大的农业，就想一切办法把咱们的也搞成那样吧。

戈尔巴乔夫见总书记心情很好，于是决定向他建议，意思是我们的外交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经待了10年，在那里待够了，也许该把他召回莫斯科了？我并不认识雅科夫列夫，但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

没少听到关于他的事。他曾在《文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这才成为把他派到加拿大的因由。那篇东西我是在乌拉尔看到的。因此我自然有兴趣知道，安德罗波夫对这个人是什么看法。安德罗波夫突然严肃起来，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就这样，戈尔巴乔夫想要把雅科夫列夫从“流放”中——后来这个人常这么说——召回的意图也就落空了。愿上帝保佑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流放”的机会！不久安德罗波夫死了，雅科夫列夫也就回到了莫斯科。

此人对自己国家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个帝国，其中的加盟共和国似乎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他的思想、主张、全部活动，表明他对养育他的俄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没有一丝的尊敬。本章已经详细谈到了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事变中扮演的反面角色。在高加索的时候，他也助长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事态的白热化，实际上煽起了亚美尼亚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火。他把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完全视为异己。大家都清楚，与阿富汗的边界对于我国的安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可是他却认为，跟阿富汗的关系仅仅是那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事。

我们追踪雅科夫列夫的生平和活动，不能不看到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伪善。对他来说，我国历史的整个苏维埃时期就是一团漆黑。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当直言不讳成为时尚的时候，雅科夫列夫才开始讲真话：他彻底否定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他混迹苏共达数十年，爬到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对待苏共却完全抱仇视态度，全然看不见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1991年8月之后，他公开和示威性地谈论自己在把党赶下政治舞台过程中个人的功劳。

自诩为“改革”创始人的他（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强烈地仇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谈到集体农庄时总是怒火冲天，毫不掩饰自己对国家所有制所持的绝对否定态度。关于这一点，斯塔罗杜布采夫曾对我说起过——当年他在加拿大旅行时，有过机会与雅科夫

列夫大使一对一地交谈过好几个小时。

但是令所有人特别震惊的是他对我国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所持的无耻态度。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本人就是那场战争的参加者，并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这个人为诋毁反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那场战争中，人类，首先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我们现实中的一对凶狠的家伙，他们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他们一个是改革的“设计师”，还有一个是改革的“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行上，都是狼狈为奸，互为补充。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正是党指引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这两个政客全都背叛了自己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历史已给予他们以符合实际的应有评价。而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年代离我们越是久远，社会就越是能够深刻而客观地评估我们祖国的这两个“该隐”的所作所为。

1989年夏末立陶宛形成的局势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恐慌。加之，如前所述，8月23日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签署50周年的日子，“萨尤基斯”搞起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行动。其规模之巨大，政治情绪之炽热，很大程度上都同前述雅科夫列夫主持的委员会对1939年德苏条约定性工作的拖沓有关。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众灌输，委员会在有意拖延时间，目的是掩盖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夕几年间的真实意图。

“波罗的海之路”在维尔纽斯的行动是从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始的。这一行动由立陶宛独立联盟发起组织，参加者有共和国各地区人民阵线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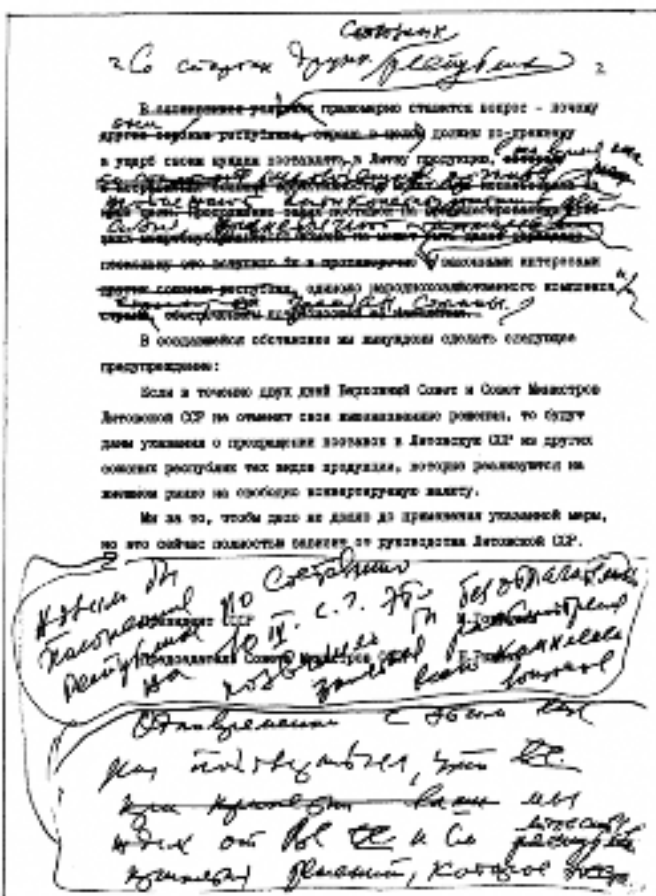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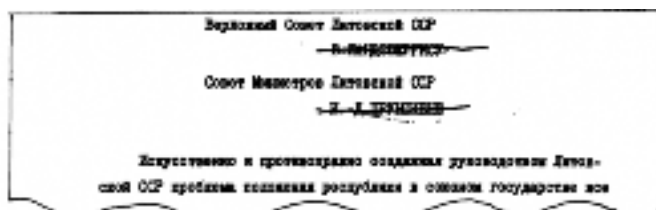
游行手持标语牌，上写：“戈尔巴乔夫，从立陶宛撤走红

军”，“俄国占领者，回家去”，“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团结起来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发言的人都声言立陶宛受到“占领”，号召立陶宛退出苏联，等等。演说者当中有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和莫斯科“民主联盟”的代表。当天，全国性的联盟“青年立陶宛”在一些区的中心，在维尔纽斯市和帕涅韦日斯市，号召青年人公开退缴了军役证。

一个叫做“手牵手”的行动达到了空前规模。几万人手牵手组成人链，沿维尔纽斯到塔林的公路排开，蜿蜒好几百公里。在这一行动中，动用了大量大客车和多达3万辆的私人小轿车。群众集会沿着整条公路展开。而且大众传媒，包括外国媒体，对之做了大力宣传，共和国的广播电视对之进行了直播。种种情况表明，这一切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民众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要发动这样的行动，必须有大量时间进行准备，如果认为莫斯科对此毫无知晓，那就太天真了。但总书记那几天正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处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事务的专门委员会主席梅德维杰夫也跑到南方疗养去了。而代表大会上对苏德条约作法律与政治鉴定的委员会的主席，也跑到瓦尔代疗养去了。

当身在克里米亚的总书记从电视上看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后，立即指示苏共中央紧急准备一份声明。很快这个声明的全文就通过媒体传达到全国居民。文件的署名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罗的海人开始核对，苏共中央全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结果发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的苏共中央委员没有人与会——这是当然，因为这个会根本没有开过。而且负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事务的梅德维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只是在报纸上才见到了这份声明。现在真相大白，原来这份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起草的。他们只靠几个人的力量，就把中央委员会的紧急委托搞定了。



戈尔巴乔夫亲手修改的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及部长会议的信件。（作者提供）

声明在全国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很多共和国和州的民众，由于搞不清楚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把对这些事件作出的惊恐反应，误认为是一种应得到全社会支持的行动。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人们的情绪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分离主义圈子里的人由于自

己那些不体面的事情被直接点名而出现短暂的休克之后，开始群起而破坏这份声明的声誉。立陶宛共和国的很多社会团体，包括立陶宛共青团中央、文艺界各协会、妇女联合会、某些全国性文化团体，均对它采取指责的立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媒体也加入了诋毁声明的大合唱。在声明发表后的仅仅几天时间里，“美国之音”广播节目就提到它39次，BBC25次，“德意志之声”27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1次，加拿大广播电台8次，瑞典广播电台4次。

这些消息都不是由通讯机构的记者发布的，被发表出来的全是议员、社会活动家及其他知名人士的发言。在此期间“萨尤基斯”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共和国报》，为此兰德斯别尔基斯从美国运来了最新的印刷设备。报纸用立陶宛文、俄文、波兰文、英文出版，后来又出了德文版和法文版。

这里应该提一下，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是如何评估他个人在这些复杂而矛盾，并对后世全国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他写道：“抛开我在制定该文件（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时所起的作用不谈，应当承认，我对事件采取了过于情绪化的反应。”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文字游戏：“抛开……不谈”。离开政治舞台后，他有义务诚实面对历史，承认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与他直接有关。他可不是一名旁观者，或者口中念念有词但不知说些什么的布道者，而是一个大国的一把手。

与此同时，反对军队的宣传也高涨起来。在考纳斯等城市发生了试图袭击部队仓库的事件，出现了抵制秋季征兵的号召书，在共和国的主要城市继续开展退还军人证和征兵通知的运动。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要求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撤军的号召书上签了名。民主党和“立陶宛自由同盟”在克莱佩达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提议组建民族军以“抗击俄国坦克”。要求以“背叛人民利益”罪审判支持《声明》和发言反对分离主义的人。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声明》的效果“同预想南辕北辙”，他援引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维亚里亚萨的一句话，后者在与戈尔巴乔夫电话交谈时说，爱沙尼亚人对文件基调的领会非常不正常，很多人为了表示抗议而交回了党证。“在爱沙尼亚，”他说，“除了极端主义者，从来没有任何人提过退出苏联的要求”。

不想听到的回答

随着1990年1月的到来，出现了令人惶恐不安的新情况。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例会上，将通过一项关于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正式决议。梅德维杰夫、马斯留科夫、斯留尼克夫、雅科夫列夫、卢基扬诺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受总书记的委托，准备了一份提请苏共中央审议的建议：《针对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可能作出该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所应采取的对策》。文件中规定了应优先采取政治和法律手段，排除使用武力。但与此同时也讲到驻扎该共和国的部队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可靠地保护公民，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还提出了发挥经济影响力的建议，预定了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回应可能对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损失的单方面行动，其中包括限制向立陶宛供应紧缺的能源、原料等一系列产品。又明确规定，不得向共和国移交联盟所属的企业和单位；也不排除提出苏联当年向立陶宛移交的领土的归属问题，包括克莱佩达、维尔诺州和白俄罗斯的几个区。施加影响的办法还有：支持在共和国建立几个波兰民族区的要求。

然而，中央研究制定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再次采取了一个对事件施加影响的绝望的尝试。他预定于1990年1月初前往维尔纽斯。但事先又派出了一个以梅德维

杰夫为首的庞大队伍。其中有政治局委员、人民代表、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沃罗格达州和维捷布斯克州党的领导人。

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赖莎抵达立陶宛。他们尽量展开多方接触，其中包括同市民会见。戈尔巴乔夫原抱着一腔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在报业大厦同立陶宛知识分子会见时，遭到了严重打击。戈尔巴乔夫面对听众提出一个问题：“立陶宛真的想脱离苏联么？”得到的是众口一声的坚决回答：“是”。他在立陶宛各地巡视时听到的调子虽有所不同，但决定都是一样的。在他访问的末尾，在共和国党中央大楼的见面会上听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次访问之后，总书记终于明白，必须考虑该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机制了。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因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场，而遭到立陶宛“民主”新政权以参加1991年1月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的莫须有罪名判处8年监禁。他说：

1990年1月当戈尔巴乔夫来访会见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的委员们时我就明白，对这一套搞垮苏联的机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越往后越让我确信，他是在谨慎行事，避免妨碍这些机制的运行。加之他本人也是按着国外势力操纵下的国际上反动的反共逻辑在行事的。整个这套把戏我们在立陶宛的人看得特别清楚。就仿佛在看木偶戏表演：演员和导演在大洋彼岸牵线，而我们的木偶则在自己家里按照他们搞垮这个国家的意图行事。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在形势风云变幻的发展过程中，看不到共和国党组织表现出一点点正面立场，起一点点实际的作用。可当时苏共还是全国，特别是每个地区生活的主导力量。以我的看法，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急剧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而当民族主义运动全速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好无所作为，退居一旁。自然，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里，他们也就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其次，中央，特别是苏共中央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无能的行动、拙劣的声明、加上几名书记的言论和两面派手法，将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客观地说，苏共中央没有完成遏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民族主义行动的任务。

前面已经说过，立陶宛更换了党的领导。第一书记由布拉扎乌斯卡斯担任，后来，在前面提到的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又发生了分裂。原来统一的共和国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由以布拉扎乌斯卡斯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在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公开迈出了脱离苏共的步子，这完全是由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造成的。立陶宛共产党中的少数派主张留在苏共内部，他们的带头人是历史学博士布罗基亚维丘斯教授。结果，他因为忠实于苏共而尝到了12年严酷的铁窗风味。

在苏联政权的最后几年，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是鲁比克斯，他也因自己的坚持，在“民主的”立陶宛坐了6年多的牢。

在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是维亚利亚斯，他是爱沙尼亚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凯宾培养的干部。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维亚利亚斯从尼加拉瓜被召回，他当时正担任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讲到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讲到与俄罗斯在一起的统一才是爱沙尼亚的正确道路。他将自己的意见递交给会议主席团，结果却发现这些建议中早就明确地包含着将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的路线。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新一届代表的选举还在进行，可是却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要举行第一次全

会。这种急促的原因，是由于3月12日要在莫斯科提前召开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设立国家总统职位的法律草案，并对苏联宪法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以当选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为首的立陶宛新领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的决议提交本届大会讨论。与此相关的还有1990年3月11日深夜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匆忙作出的关于国家独立和退出苏联的决定。结局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底部已形成穿孔，任你用什么办法也难以修补了。通过了共和国新国家名称和新国徽的法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或立陶宛，国徽上有一个白马骑士的形象。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法令：共和国所有原来的国家管理机关、原有的部、委和主管部门，只隶属于立陶宛共和国。普伦斯克涅当选为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通过了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信，特别要求将该信视为双边谈判的正式建议。信中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表示，希望在双方缔结双边条约之前，仍保持现有的经济联系。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上午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通报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定。他提请大家注意，立陶宛人，还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也附和他们，提出关于谈判的建议。他说：“我认为谈不上什么谈判，我们只同外国谈判。”这是那天上午他发言中的原话。

第二天，即1990年3月15日，代表大会专门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作出决定，认为该文件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力。该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负责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在该加盟共和国领土上维护苏联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加快出台新的法令。在立陶宛共和国境内废止了有关义务兵役制的苏联法令，同时又停止了兵役委员会的工作。立陶宛内务部甚至紧急定制了带有民族特征的制服。运动员们也急急忙忙采取措施，拒绝参加苏联举办的正式赛事。几天后还通过决定，组织实施立陶宛商品外运的控制工作。为此决定设立37个边境检查站。

当选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的声明一天比一天强硬和无礼。有人问：应如何对待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决议？他回答说，这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之不承担任何义务。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任命了参加立陶宛与苏联两国间谈判的全权代表。几天后，兰德斯别尔基斯致信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日决议的态度。信中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该共和国居民的公民权利问题，一切将按国际标准和规则办理。那么，这个声明——不仅在立陶宛，也包括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其他主权国家——又信守得如何呢？后面我还要讲。该共和国的领导实际上是拒绝了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

立陶宛新领导在该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行动愈演愈烈。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消息。1990年3月，任命了立陶宛银行行长，决定该行有国家货币发行权。在一个具有统一经济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行动。为走出这一步，立陶宛早在上述种种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就开始作准备。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领导人签订了三国经济独立后银行业务与货币体系协定。可悲的是这个文件竟然由苏联外经银行和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签了字。此事不仅使两家有名望的全苏金融机构声誉蒙污，同时也是我的政府犯下了过错。政府未能否决该文件，也没有追究银行领导的行政责任。在立陶宛境内有150多家苏联国有直属企业。这一年3

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了它们的新地位。这些企业改变了法定归属地位，被纳入由立陶宛共和国控制的序列。这一来，它们的经理厂长将不再由全苏任命，而是改由该共和国的相应机关任命了。

将企业由全苏辖属转变为由共和国当局管辖的“宝贵经验”带有传染性。1990年夏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掌权之后，立即也如法炮制。更有甚者，他居然免除了企业的税负。不过，看来似乎都是跟一个师傅学出来的，那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人。

现在可以再说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一般说来，这些人都是些业务修养很差的贪婪无耻之徒，民族主义的情绪很严重。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正派人格，很快就忘记了大家曾共同生活在一个使他们摆脱了贫困的多民族大家庭，曾围坐在一张桌旁吃喝，同在一起学习，同在一道发展文化等等。俄罗斯与他们平等分享各种资源，有时甚至还要让那些身处遥远腹地的俄罗斯人吃点儿亏。

最令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曾经为这片土地而战，无数自己的战友长眠在这里，可是现在，这些人却忽然变成了“侵略者”。上了年纪的人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战后他们在废墟上建成了一座座共和国的城市，亲手建造了工厂，可如今又怎么会变成了“占领者”？很多的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也包括居住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些主权国家的日子将不会过得很滋润，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表示自己持客观态度，曾经支持了这些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

然而，立陶宛的局势正在继续白热化。看到立陶宛社会的骚动和对立后，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了《立陶宛人要和睦相处》的呼吁书。这个文件很有意思，但生活表明它说的全是假话。它劝人们忘掉旧恨，宽恕所有的人，“甚至那些说谎犯罪，不能自拔的人和做过奸细的人”，尽管“复兴之路”并不是他们的希望。这位议会首脑号召

说：“独立不是进行严酷审判的日子，并不想进行盲目的报复。把自己的亲人按档案分成‘好人’和‘坏人’，或按党派民族来划杠，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过了10天，1990年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这项命令授权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护法机关和地方政权保障苏联公民在立陶宛境内的安全和权利，而边防部门、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要保证外国公民在进入该共和国和在该共和国居住时遵守秩序。从那时起许多年已经过去，现在重读这份文件，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里面说了那么多关于猎枪的问题，但却一点没有提到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比如“统一”运动成员在该国受到的迫害？

立陶宛对这个命令根本不予理会。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试图阻止他们作出反苏决定，但都或是遭到坚决抵制，或是干脆置之不理。

苏联领导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又是下命令，又是作决定，得到的回应不是直接反对，就是公然遭到藐视。到了4月，中央总算彻底明白：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让那些胆大妄为的政客们有所感觉才行。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立陶宛共和国领导提出严重警告。

为此，准备了一封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信。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上出现过一些报道，说这封严厉的信出自“保守分子”雷日科夫和马斯留科夫之手，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他们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才签署的。不错，文件是我和马斯留科夫起草的，但戈尔巴乔夫也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而且只是经他最后定稿之后，才于1990年4月14—15日在报上发表。我手中还保存着信件的底稿，上面有总统亲自作出的重大修改。考虑到这份文件不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应，我将它的全文引述如下：

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者以违法手段人为制造的共和国局势，在联盟国家已成为越来越无法解开的死结，正走向政治死胡同的绝路。尽管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已采取了建设性的和周密权衡的措施，以设法将加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纳入宪法轨道，但该共和国领导仍不断采取新的法律行动，通过决议，致使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苏联整体处于对立的地位。例如，4月5日颁布了《立陶宛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法》，对愿意遵守苏联宪法和法规生活和工作的苏联公民加以歧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在该共和国停止招募公民服兵役的决定，是一起严重违反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的事件。该共和国当局还违抗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苏联共产党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财产的办法》的决定，试图以违法手段侵吞上述财产。

类似的行动不胜枚举，今后决不能容忍。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定，破坏我国正在开展的民主进程，对苏联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其他加盟共和国方面会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当立陶宛领导机构继续不断违反宪法，藐视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全国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像以前一样，不顾自己的需求向立陶宛供应产品？

局势既已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提出以下警告：

如果两天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不撤销上列决定，将下令停止由其他加盟共和国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销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的产品。

我们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采取上述措施的地步，但现在一切完全取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

同时还要再次强调，我们等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以恢复1990年3月10日以前共和国的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立即着手处理其他一切问题。

1990年4月1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签署了这份文件。

在那些年以及嗣后的许多年，人们在指责我们时总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一步？现在我的回答和当年的回答一样：是由于立陶宛当局不负责任的举动，才导致把这些无可避免的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可能会给立陶宛居民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困难。我国领导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进行劝诫和呼吁，出于对苏联各族人民未来的担心，也是为了保护其他加盟共和国免受立陶宛政治和经济混乱后果的影响。一切都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背景，即立陶宛居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明显高于苏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成千上万到立陶宛暂住、工作或移居立陶宛的苏联公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共和国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它从“共同的大馅饼”中分得的份额，比它所贡献的要多得多。由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作出了成绩，该共和国有相当一部分能源、机器制造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供应都是作为奖励按优惠价格取得的。但这种同其他共和国经济关系上的有利于立陶宛的不平衡状态，被维尔纽斯的新领导人蓄意歪曲了。

在整个战后时期，立陶宛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得很顺利。它促进了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在立陶宛境内出现了许多全苏的和跨地区的建设项目。

上面提到，1990年3月，在“萨尤基斯”领导人的影响下，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改变了全苏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所属企业、机构和单位的地位。无疑，这种单方面的决定不仅违反苏联宪法和所有制方面的法律，而且也破坏了起码的规矩和逻辑。如果立陶宛领导出于利己主义的意图，无视本国以及全苏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苏联政府绝不能与他们的这种立场妥协。

立陶宛当局宣称，他们之所以这样行动，是为了争取独立，并且

还要加速行动，不必顾及对本国人民会产生什么后果。特别是他们觉得，根本用不着去问问老百姓他们是否愿意，是否准备付出沉重代价以换取其结果为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的虚幻自由。其实，同该共和国居民已经享有的或在不久的将来因国家在民主方面的改进和苏联法律的完善而进一步获得的权利相比，立陶宛领导人又能向民众许诺多少自由和权利呢？关于这些问题，立陶宛领导人认为，还是避而不谈的好。

在那段时间，立陶宛居民对于越来越沉重的困难刚刚开始有所感觉。苏联政权中央机关对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决定和措施所表现的容忍，使立陶宛领导人有可能宣称：共和国的局势是平静的，独立宣言并未引发任何严重的动荡。

至于谈到当局对保持以前经济联系表达了肯定意愿的问题，那么所说的经济联系，具有非常虚伪的性质，实际上这意味着是要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条件来建立立陶宛的出口优势。这种情况全苏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即以立陶宛共和国所应承担的外债份额为例，它大致相当于6亿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外币（当时还没有美元结算制度）。而在国内债务总额中，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应占58亿卢布。



“萨尤基斯”在维尔纽斯文吉斯公园举行的反对“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密约”的反苏群众大会。1989年8月23日。台上是俄罗斯“民主”派领袖阿法纳西耶夫、立陶宛科学院院士“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奥佐拉斯。（克罗波夫斯基摄）

全苏总统和部长会议主席致信立陶宛领导提出要求，对他们的理智和愿意关心共和国居民需求的态度寄予希望。这个要求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说，立陶宛领导人要对他们错误行动的严重后果负责。

那些日子，越来越频繁地从立陶宛当局口中听到：他们指望得到国外的支持和帮助。头脑健全的人未必相信，西方政治家和垄断集团会去填补空白，向立陶宛供应它从各加盟共和国得到的东西。因为立陶宛所需产品的27%是从其他加盟共和国输入的。1988年立陶宛调进了1670万吨煤炭、1300万吨以上的石油，得到49亿立方米天然气。除此之外，还向立陶宛提供了78万吨轧材，82.4万吨纸浆用材，49.6万吨矿物质肥料，270万吨粮田种子。如果这样的经济联系一旦断开，那么立陶宛“相对幸福的”生活也就走到了头。因为它的产品在外贸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生活保障储备需要大笔外汇资金，但立陶宛无从取得它们。在经济前景问题上欺骗民众，将使立陶宛经受严重的考验。

西方迅速作出了反应。我们十分清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毫不迟疑地利用苏联领导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立陶宛发出警告的机会，在政治上掀起一阵吵嚷，以便再次向它所仇视的苏联踹上一脚。我当时就已经明白，这些非常“民主的”国家是按照双重标准行事的：只要对他们有利或需要，他们就会实施禁运。可不是像我们这样口头上威胁威胁而已，而是真的会那么做！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吗？还有南斯拉夫、伊拉克……还需要数下去么？可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哪怕是威胁威胁自己的一个共和国，也会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总统老布什立刻对此事作出反应，而国务卿贝克尔则警告我们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说，对立陶宛采取严厉措施即使不流血也会破坏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甚至日本、法国、芬兰等国也没有袖手旁观。

立陶宛方面很快也给我们送来了回信。1990年4月18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对全苏领导答称：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认真阅读和研究了你们的来函，其中提出了可能实行经济制裁的警告。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回函，其中附上了事先即已拟定的建议。遗憾的是昨天在接到有关制裁的具体通知后，我们对1990年4月16日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声明已无法再做什么补充，剩下的似乎只有对苏联的做法和立场表示遗憾了。我们一如既往，愿意讨论任何问题，并愿意考虑苏联的合法利益，首先是它的公民的利益以及战略利益。

如果议会之间的事先磋商能在1990年5月1日之前举行，在此期间我们将不再出台新的政治性法律行动。

为举行磋商，我们将组成议员代表团于近期赴莫斯科，希望能与你们的全权代表会晤。

此信附有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发展立陶宛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系的决议》，由兰德斯别尔基斯签署。

兰德斯别尔基斯来信之前两天，还收到一封给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内容和调子都相似的电报，是由已经批准上任的立陶宛共和国总理普伦斯克涅发来的。

苏联政府等待的是对苏联总统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信中所提建议的具体答复。因为他们在信中以最坦率直接的方式，谈到了苏联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但立陶宛当局却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作出答复。这种对话的确有点各说各话的感觉。

由于立陶宛共和国领导在信中规定的期限内，并没有废止涉及苏联财产、向立陶宛公民发放身份证件以及苏联义务兵役法效力等问题的非法文件，国家下达了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减少天然气输送量的指示，将其减至只能满足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事业所需的数量。

我们对立陶宛领导人的行动导致对该共和国产品供应受限表示遗憾。希望这些措施将具有临时性。破坏立陶宛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不符合立陶宛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眼下还抱有一线希望，但愿能在立陶宛共和国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以及与苏联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恢复善意的精神和健全的理智。

在此期间事态也急速在另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发展。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他们也采取了争取独立的步骤，尽管比立陶宛走得慢些。爱沙尼亚领导人已经受到警告：只要他们还认为共和国法律高于全苏法律，莫斯科就不会与塔林进行任何对话。顺便提一下，这一情况发生的时候，离叶利钦宣布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类似的决定还有两个月。叶利钦是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的。于是再次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相同的“顾问”？我想，是的！

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拉脱维亚议会主席戈尔布诺夫。会见后后者对新闻界说，他被告知：“如果拉脱维亚想要脱离苏联，那么就应该依全苏的法律办”。我要提醒大家，1990年4月曾通过一项法律，各加盟共和国只有在全民公决中得到该国2/3公民的同意，方可退出苏联。

这段时间立陶宛领导人对记者发表谈话、出访各国，解释共和国出现的局势并寻求帮助。兰德斯别尔基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说，立陶宛人有能力渡过难关；又对法国电视台“透露一个秘密”说，立陶宛没有天然气和石油也能活一百年。在同一时间，普伦斯克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试图与一些石油公司商谈签订合同。挪威政府就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燃料一事向苏联提出抗议，它的总理说，挪威将在商业框架内与立陶宛建立贸易关系。瑞典政府也采取了相仿的立场。

与此同时兰德斯别尔基斯还采取了外交行动。他请求老布什总统承认立陶宛新政府。类似的请求他还向波兰部长会议主席马佐夫舍提出。挪威打算率先承认立陶宛独立。兰德斯别尔基斯还邀请罗马教皇访问立陶宛，以便借助他的力量压莫斯科作出政治上的让步。

缩减供应当然给立陶宛企业的生产带来打击。上面我提到，立陶宛总理试图通过其他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但正如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朋友归朋友，烟还是各抽各的。”这里也是一样：政治上可以支持，可是供给你的原料要全额付费。

普伦斯克涅在斯堪的纳维亚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开了个账户，为救援立陶宛基金筹集款项。根据兰德斯别尔基斯提供的情况，世界各地进账的善款，总共也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而实际上仅石油和天然气立陶宛每天就需要付出500万美元。这样一来，立陶宛新政权指望西方资助它独立的打算也就完全落空了。

立陶宛领导人开始与莫斯科、列宁格勒乃至个别企业直接谈判。这期间在立陶宛共和国发生了抗议行动，人们指责立陶宛领导人将老百姓置于困难的境地。于是在4月末，维尔纽斯汽车运输企业的司机举行了两小时的警告罢工。此事发生后，已经宣称是“民主的”共和国的交通部长立即指示，开除发起这次行动的“统一行动”组织的成员。

当然，对立陶宛限制供应，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工人——不管是立陶宛人、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但对此应承担责任的却是该共和国领导人，是他们违反了生活已达几十年的国家的法律和宪法。尽管如此，他们还继续推行自己的路线，向国外社会寻求同情和帮助。我真想看看，要是美国有一个州，譬如加利福尼亚，作出类似举动的话，它会怎样做。我相信当局肯定会采取迅速而严厉的行动，即如今常说的——相应的行动。

平心而论，立陶宛议会也有清醒的声音。政府的反封锁措施委员

会提出，应当首先寻求相应的政治解决。也有过切合实际的建议，例如立陶宛驻莫斯科的新任全权代表比奇卡乌斯卡斯就提出了“谈判期间暂缓作出决定”的建议。但激进和好斗的共和国议会没有采纳。

1990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立陶宛总理普伦斯克涅。她向我们递交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许多使形势正常化的合理建议。但这些建议未能解决主要问题——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并没有撤销。这个情况普伦斯克涅是知道的。我们再次强调，要撤销这个决议，或者最起码也要停止执行该决议，否则就不能讨论正在使立陶宛焦急不安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苏联社会和全世界严重关切的焦点。总理普伦斯克涅答应将所说内容转达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经过一个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后，普伦斯克涅在立陶宛常驻代表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她相当谨慎地评价了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然后，又准确地转述了我们对于当时使对方最为痛苦之点的态度：“雷日科夫认为，不存在任何经济封锁，只存在个别项目的供应不足”。我很想知道，现在普伦斯克涅对我们的立场又作何评价呢？如今，世界已经经历了对南斯拉夫的10年禁运、对伊拉克的多年封锁，在那些地方，成千上万的儿童因缺少食物和药品而死亡。也许她现在才明白，我们当时真的没想以任何方式去惩罚立陶宛人民。

长期以来，在立陶宛政治家们的声明中一直有一种调子，说苏联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走向了谈判，而且说既然苏联总统与立陶宛在进行对话，那就意味着他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普伦斯克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不是谈判，只是交换意见。可见立陶宛领导人以前就很懂得怎样拿捏分寸，但他们却有一种愿望，就是在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公众的眼里，要显得比较重要，这远比实实在在的东西更重要。

不久，应立陶宛领导人的请求，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同兰德斯

别尔基斯、普伦斯克涅及三名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一开头兰德斯别尔基斯就申明，他认为此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立陶宛和苏联谈判的问题。他的说法就是必须解决主要议题——确定谈判主体，而且强调说，这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就是立陶宛。“我们不想把苏联视为敌国。我们视它为友好的国家”。他还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与立陶宛单独谈判，还是立刻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一起谈判？

戈尔巴乔夫和我都坚决表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是一个违反宪法的文件。至于同波罗的海沿岸三共和国同时谈判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晤最后确定：未来可能进行的谈判，在其预备阶段应为进行磋商、交换意见、制定“一揽子思路”。

同一点儿也不友好的人进行的“友好”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与立陶宛讨论相互之间的一系列问题，苏联领导人于1990年7月9日组成了代表团。立陶宛代表团的组建则晚了许多，所以第一次会谈拖到10月2日才得以举行，差不多耽搁了一个半月。众所周知，针对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行动而采取的一切经济限制，在立陶宛共和国宣布暂缓出台新的政治决定的当天即已取消。10月谈判中全苏派出的代表团，其代表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斯留科夫。第一次会议表明，双方都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谈判涉及程序问题、名词术语问题，甚至双方使用的语言问题。苏联代表团坚决贯彻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是敲定讨论的问题清单，包括礼仪问题、工作小组组成问题等等。会谈确定了工作小组数量，共设9个小组。

1990年10月20日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我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参加会议。现在手头还保存了一家中央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答记者问。

虽然是星期六，但仍是一个几乎满负荷的工作日——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与由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率领的立陶宛代表团之间的第二次会议于10月20日11时至18时举行。会谈结束后，苏联政府首脑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讲到会谈的一些结果。

实质上这是一场真正的谈判，尽管立陶宛方面宁愿称之为磋商。看来，立陶宛共和国的新领导非常想保持一种形式，按国际礼仪将双方作为高端谈判的代表来对待。雷日科夫对记者提问所作的回答表明，对于另一方——苏联政府领导来说，会谈的实际结果更为重要。

结果已经有了。在许多至今尚存争论的问题当中，有一项已得到了解决。这就是现居住在立陶宛的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将享受与苏联居民同样的优惠待遇。立陶宛代表团对此作了保证。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暂无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征召立陶宛公民加入苏联武装力量问题。立陶宛方面提出，从今秋征兵开始，共和国全境实际上已经实行自愿兵役制，对于拒绝入伍的青年不采取任何措施。苏联政府的回答是：立陶宛共和国仍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苏联有宪法和全民义务兵役法。据雷日科夫称，苏联政府可以稍作让步：比方说，考虑让立陶宛的应征青年就近在立陶宛共和国服役。但最主要的是不能破坏基本原则。

就此问题将继续进行谈判。

对1991年苏联与立陶宛的经济关系问题，双方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雷日科夫认为，立陶宛领导人虽多次谈及共和国明年的经济状况令他们担忧，但实际上对解决问题却并未提出任何措施。此次立陶宛被告知：它或是留在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之内，由苏联国家计委和其他中央经济主管部门来解决；或是提出不加入，然后独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正如雷日科夫所说，立陶宛方面提出的意向是仅仅要绕过同12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除外）的“横向联系”，

并在与联盟直接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运作。但它又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保证这种直接联系的可靠性？这遭到了拒绝。结果是：近日立陶宛代表将来到莫斯科，协调该共和国与苏联经济联系的一切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是眼前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最主要之点：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将如何发展？按雷日科夫的话说，有近十个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协调利益。其中包括财产、边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因此苏联政府关心的是尽快进行内容充实的谈判。但莫斯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说此前维尔纽斯非常着急，那么现在立陶宛方面却在以各种借口拖延。

不过，在今天的会谈中，双方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立陶宛与苏联的正式谈判将在11月下旬举行。

当然，双方还面临着要就议定书达成一致的问题，而且这里同样会产生复杂的情况。其中，莫斯科会坚持谈判时要有立陶宛各界代表作为无表决权的观察员出席，其中应包括各社会运动、各少数民族群、国营企业劳动集体的代表。但却遭到维尔纽斯的断然拒绝。

“我们不明白，立陶宛方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强硬立场，”雷日科夫说，“为什么不可以有三四个人作为观察员参加？他们可以没有表决权，但至少可以听一听都在说些什么，还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而采纳或不采纳这些建议，则是正式代表团的事。”

记者被告知，苏联政府认为立陶宛这种强硬的立场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苏联政府领导人指出，按照他的看法，议会所确定的《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向》，可能成为加强苏联各共和国之间联系的要素。现实生活表明，政治上的狂妄自大只要一碰上现实的经济问题，就会无法立足。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早已一体化，单独生存将非常困难。《基本方向》确定的原则适合于所有加盟共和国，也包括立陶宛。

但是，当谈到有消息说立陶宛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时，雷日科夫说：“如果那样，则立陶宛的经济就不能与我国同存于一个经济空间之内。如果他们实行自己的货币单位，那么他们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全苏的关系，将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关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在当前局势下，无论立陶宛、其他加盟共和国还是全苏，都需要哪怕是稍许的稳定，需要一点喘息的时间，以便改革经济，向市场进行切合实际的过渡。

谈判的消息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报道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收到很多来信，对我个人在这种复杂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同时还就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应当如何应对分离主义提出建议。让我仅引用其中的一封如下：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什文乔尼斯区的居民（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及其他族群的先进部分）被您的关怀和厚意所深深打动，也感佩您为保全苏联而流露出的关切。

我们以极为关注和赞许的心情，看到您就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第二次会谈的结果向苏联记者组发表的谈话，并拥护您在谈判中的坚定立场。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游击运动战士衷心感谢您在困难时刻没有忘记他们，并要求立陶宛代表团答应居住在立陶宛的战争参加者享有苏联法律所规定的优惠待遇。

本地区居民热烈支持您的要求，立陶宛代表团应包括各种不同成分的立陶宛居民作为观察员参加。

我们也热情称赞苏联代表团在征募立陶宛青年加入苏联军队问题上的明确立场。这样的立场将有助于青年人，使之不致玷污自己的荣誉和自尊。

您判断立陶宛领导人不想进行正式谈判的意见已得到证实。他们在等待苏联的瓦解。（看得多么准！——雷日科夫）还有一

点也是事实，那就是立陶宛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忙于无尽无休地发布法令，目的是让一小撮冒险分子篡夺政权，侵犯立陶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立陶宛的货币正在国外印制已是事实。立陶宛银行董事会主席维留斯·巴尔基希斯面对《基姆塔西斯克拉什塔斯》周刊第42期的记者采访时说：“是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具体情况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商业秘密，也是国家机密。什么时候做，怎样做（指立陶宛币取代卢布），同样也都是秘密。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方案，但这将由最高苏维埃来决定，会出台法律。”

立陶宛人民正在清醒起来，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陶宛政府、已改组的立陶宛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党派的领导人并不清醒。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祝愿您身体健康，祝您在苏联同立陶宛共和国的谈判中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保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取得成功。

受立陶宛共和国什文乔尼斯区公民委员会委托

拉甫连尼约夫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会谈造成的沉重的感觉，特别是同代表团团长兰德斯别尔基斯的交谈。这个人连一点点有关经济和国家体制的知识都不懂，给人留下的是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面对他坐着，心中不免要冒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把他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当民族主义的狂热过后，这个国家能期待他什么，又会怎样看待他？

不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国内发生的事件，以及同事件组织者个人的接触，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譬如，叶利钦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天起，特别是在成立跨地区代表小组之后，就一直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代表的分裂行动。我想，这些共和国闹独立的斗争，对支持他个人实现掌控俄罗斯政权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他未必会把这些国家取得主权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这些东西对

他来说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情！

1990年8月他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休假（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势激烈动荡，疗养的事还是少不了！），接受了一家日本报纸的采访。这里仅引用他对有关维护国家完整问题所作的回答：

问：您是否有意今后在联邦体制改革方面向戈尔巴乔夫总统靠拢？

答：俄罗斯共和国有意朝着同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每一个都缔结双边协议的方向前进。我们与总统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协议，但是在联盟条约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我们所坚持的是应在更高的层面上享有充分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之间，才能达成协议。总的来说，没有俄罗斯共和国的同意，总统大概也做不了什么。

这就是说，1990年叶利钦的目标已经不是要各加盟共和国在不脱离苏联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独立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苏联政府，早在1987年就先提出了问题。叶利钦的目标是破坏统一的国家和他的中央政权。他行动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此。为个人的权力而进行斗争，付出的代价是骇人听闻的：它导致了一个伟大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

悲惨星期日

1991年1月，发生了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事件，将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另外两个共和国甚至全苏已经酝酿成熟的问题，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悲剧发生时，我正躺在医院。1990年12月底，正值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心脏

禁不起两年来无所顾忌的折腾。如今很难想象，正常人会以这种虐待狂的办法来折磨国家领导人。但那些人向权力冲刺的时候，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发病前一周，我最后一次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分析了这些年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自己作为政府首脑所起的作用，力图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作出评价和结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最后一次发言。实际上也是我为后人留下的遗言。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时间，冷静地研究这些过去的年代，并给这个时代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客观的评价。

1991年1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戈尔巴乔夫来到我的病榻前。他肩负着一个不愉快的使命来见我：必须得到我个人同意，让我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1990年12月初我就告诉他，在代表大会之后我要退休。我无法同意他的许多有关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观点，它们将最终断送苏联。现在，我在病房里再次向戈尔巴乔夫重申我将退休，和一个多月前表示的一样。

我向他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不是现在交权，而是大约10天以后，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寄希望于那时我能够摆脱病魔的纠缠。我天真地以为，解除一位身卧床榻的病人的职务，总统会觉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于应该受到这种对待。第二个请求是，在我恢复健康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当然不在政府里，免得我闲待着没事干。戈尔巴乔夫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此告别。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护士们无意中说漏了嘴，说是已经任命我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巴甫洛夫为全苏政府首脑，但此前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完成了”我的第一个请求。第二个请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给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结果在过去一个副手那里找了个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但是1月13

日更为重要，那天发生了好多事件，最终推动立陶宛然后其他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维尔纽斯的反苏群众大会。（克罗波夫斯基摄）

有关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的事件，出版过好多书，发表过好多研究著作。对各方行动的分析已经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但是，当我阅读了大量出版物之后，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方也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因为，给任何重大事件写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这样干？以我的观点，这既是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需要，还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们特工部门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领导对此的利益攸关之处究竟在哪里？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决议之后，他们的行为变得无理而蛮横。他们对于国家总统向他们提出的呼吁、总统的指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加理睬，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毫不在意。他们还成立了国土保卫局，行使国防部的职能，并担负侦寻所谓“不可靠分子”的任务。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接壤的边境设立了武装的海关检查站。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征召青年入伍，以代替他们应服的苏联兵役。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非本地居民、军人及其家属的公民权利。事实上苏联共产

党的活动已被列为非法，共产党员开始遭到迫害，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属性。

1991年1月初，为了保证执行1990年12月1日发布的苏联总统令和与之相应的苏联国防部命令，为帮助各级军事委员会完成青年的现役征召工作，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增派了部队。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利用这一事实，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在居民中煽动歇斯底里和狂热情绪，号召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开展有组织的抵制和武力反抗，以对抗法律秩序，似乎“苏联正在准备对独立的立陶宛国进行武装入侵”。而且声称：“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作为另一个国家的立陶宛来说毫无意义”，“我们不承认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国的效力”。

1991年1月7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共和国电视台讲话时说，增派部队是要“挑起冲突，进行威胁恐吓，实行军事管制和专政”。

1991年1月8日，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发布一项决定，成倍提高食品和工业品等商品的价格，高达4—6倍。这当然引起共和国劳动群众的愤怒，并造成社会更加紧张的形势。

出现了成千上万次的集会、抗议游行和罢工，维尔纽斯、斯涅奇库斯、考纳斯等城市的劳动群众要求普伦斯克涅政府下台，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还提出：要在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签订联盟条约，恢复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从1月8日起，兰德斯别尔基斯在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多次向立陶宛共和国居民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头上悬着利剑，它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斩落下来”。他号召立陶宛人支持立陶宛当局。

按照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国土保卫局的人员会同“萨尤基斯”和“立

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使用武力镇压了劳动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其代表和领导者遭到毒打。

1月8日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前，聚集了维尔纽斯各工厂企业的劳动群众3万来人，他们的标语上写着要求立即将食品价格降到原来水平，政府立刻辞职，解散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因为它通过了非法的分离主义决议。大楼警卫将入口的大门从合叶上卸下来（免得它成为障碍，因为工人纠察队员从外面将他关起来了——这一切从录像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并开始用冷水喷射集会群众。

1月9—12日期间，议会大厦前也发生了对抗和多次小型武斗。对抗和冲突的一方是由“统一”组织、拥护苏联共产党的共产党组织、工会等组成的6—8万参加集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是拥护兰德斯别尔基斯的人士、“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联合组织。通向立陶宛议会大厦的路口全被“萨尤基斯”派封锁了。

戈尔巴乔夫1月10日提出的呼吁书被立陶宛议会拒绝，并被称之为最后通牒，因为苏联总统呼吁的对象“似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拒绝他的一切指责”。按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命令，由共和国城乡各地不断有“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派武装人员以有组织的形式涌入维尔纽斯。

为回应他们的行动，劳动群众宣布政治罢工。到1月10日的工作日结束时，在维尔纽斯市有22家企业罢工。1月11日上午，劳动群众排着队走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举行抗议集会。警察中队、国土保卫局的支队、“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试图包围集会群众。冲突的危机一触即发。这一天，所有大型企业和维尔纽斯铁路机务段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它们要求共和国内务部保障居民安全，避免发生激烈冲突。1月11日，内卫部队和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些部队将报业大厦和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保护起来。

按照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建议，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挑衅性的呼吁书和声明，号召居民和所有拥护他们的人尽快前往维尔纽斯去保卫政府大楼。1月12日共和国议会通过《关于保卫立陶宛共和国的措施》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向共和国各部门包括国土保卫局下达了命令：“如果发生袭击重要国家目标的行为，无论袭击者是谁，都要给予反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特卡宣布，立陶宛共和国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并号召同胞积极保卫共和国。

1月12日晚劳动群众代表试图向立陶宛领导人递交要求政府辞职的信件，遭到守卫最高苏维埃大楼的国土保卫局人员和武装人员蛮横粗野的对待。结果劳动群众代表遭到毒打。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共和国的电台和电视却竭力推波助澜，昼夜不停地号召居民中的立陶宛人去武装抗击保卫法制和社会安全的力量，号召他们同“占领者、俄国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萨尤基斯”的领导人公开要求“用人们的鲜血祭奠民族自由的圣坛！”

军队人员、他们的家属、持不同政见的人和非本土居民遭到各种威胁。诽谤性的反苏和反军谣言四起。

为响应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的号召，向广播电视委员会和电视中心的大楼十万火急地调来了武装人员，其中有携带冲锋枪和手枪的人，有国土保卫局人员、“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以及从周遭城乡各地开来的拥护他们的青年人。

在1月10—13日期间，集中组织了大量公共汽车，从共和国其他城市免费向维尔纽斯的“战略目标”运送居民，有的车上还装满了免费的食物和热饮料。汽车还拉来了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和各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大楼内的武装保卫也加强了，建筑物周围用卡车构筑了路障，阻挡了通向它的道路。

1月12日晚立陶宛拯救民族委员会散发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

共和国部长会议、共和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传单，建议停止播放“挑动骨肉相残的节目”。但是这个呼吁书并未能送达，因为在议会中工作的工人们，只要手持呼吁书，就会遭到毒打，还有一部分则被“萨尤基斯”武装人员拘禁。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这些行动，引起工人和志愿队员的极大愤慨，他们于1月13日后半夜回到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大楼，然后又从该地奔向电视塔，武装的分离主义分子正在那边不断煽动群众的激昂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防止大规模冲突，解除武装分子武装，以保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员，同时也为了制止电视节目煽动居民发生流血冲突，苏联内务部所属内卫部队指挥部和维尔纽斯卫戍司令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了两支队伍。每支队伍由190名军人、14辆装甲运兵车和将近50名志愿队员组成。

事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大家都清楚，其中也包括苏联总检察院的一批材料。在分析了立陶宛当局一月悲剧事件发生前最后几天的举动后，可以再次得出结论：这样的血腥场面正是他们渴求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当时共和国内抗议的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兰德斯别尔基斯和他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失去支持。因而需要采用一切手段以挽救自己，挽回正在丧失的威信，将那些不再相信他们和动摇的人再拉回来，哪怕是能拉回其中的一部分也好。于是他们便选择了流血的道路。同时，他们还必须让我们的国家难堪，要造成民主在这里正受到暴力压制的局面。以我的看法，这正是他们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的利益所在。

第二个需要使用强力手段、但又不想流血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从1989年夏天起，特别是当俄罗斯的领导权落到叶利钦掌握之中后，就看得特别明显，苏联总统的权力正迅速地离他而去，就像沙子从指缝间漏出一样。于是他开始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一会儿要求苏

联最高苏维埃给他增加权力，一会儿又有道理没道理地到处发表演说；又是修改宪法，又是建立总统委员会。结果是8个月后他被搞下台了。有爱说俏皮话的人挖苦说：总统委员会是个早产儿。到了1990年末，戈尔巴乔夫撤销了作为国家主要管理和执行机构的苏联部长会议，代之以苏联内阁，即总统的办事机构，同时还设了个副总统的职位。

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而在1990年3月11日之后，立陶宛实际上也已不再从属于中央。考虑到该共和国局势已经失控，而政治上的说教又丝毫不起作用，所以在该国必须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制。我相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同意这样做。代表们看到国家局面如此危险，便毫无阻力地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提议。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应当对立陶宛的事态负全部责任了，但他却不想负责。一旦出现尖锐的局势，比方像在第比利斯那样，戈尔巴乔夫就总想躲到一旁。

关于总统直属管理的建议不仅来自莫斯科，也来自立陶宛。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见证说：

我要揭露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在维尔纽斯发生“流血的星期天”之前三天，就是1990年1月10日，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到莫斯科去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是他亲自安排的。由于我们未能按时赶到，戈尔巴乔夫派尼沙诺夫接待我们。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在立陶宛临时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我们相信，只要戈尔巴乔夫和兰德斯别尔基斯直接对话，对立双方的激烈情绪就会平息下来，灾难性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的危险就会远离人们。尼沙诺夫说，总统知道立陶宛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然后他告诉我们，遵照总统的指示，已经起草了关于实施总统直属管理的命令。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而兰德斯别尔基斯身边由美国的和德国蜂拥而至的“顾问”们，准确地说就是一帮职业间谍，他们通过媒体，将局势炒得热到极点。“萨尤基斯”分子很渴

望流血。遗憾的是流血终于发生了。

1991年1月10日，悲剧发生的前三天，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说，实际上局势已进入死胡同，他特别注意到苏联各机构收到成千上万来信，要求在共和国恢复宪法秩序，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接着又是一通说服、劝诫和警告，要求立陶宛当局要懂得它在共和国人民面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月12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召开了联邦委员会的会议，研究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形势问题。会议强调，首先要采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会议采纳了总统的建议：向立陶宛共和国派出联邦委员会代表，弄清当地形势，并研究提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记者，试图说明自己的立陶宛政策。他强调说，他一直努力想以政治手段将事态的发展拉回宪法轨道，但受到巨大压力，包括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压力。同时还宣称，他不想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决定采用虽很严厉，但仅限于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提出警告的做法。总之一句话：“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

1月17日，星期四，所有中央一级报纸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件的声明。声明对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正面评价。声明还说，立陶宛共和国的广播电视本应促进建设性对话，但相反却是在不断使形势激化，宣称立陶宛与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并把苏军视为占领军。政治局文件最后再次呼吁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评估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时应表现出慎重的态度，等等。

1月18日，星期五，《真理报》头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波斯湾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而立陶

宛只占了版面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这样，伊拉克似乎成了比自己内部最最迫切的问题更为敏感的焦点。当天《真理报》的头版还发表了一篇在那些日子似乎“轰动一时的”材料——“咪咪猫和朱朱狗”。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待1月13日立陶宛事件的态度表明，他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回避类似的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个旁观者，对一切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我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的。我在撰写本章时读到许多有关事件的报道和材料。那些捍卫立陶宛宪法制度的人，还有那些卖力破坏它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一切情况。有些人还证实说，戈尔巴乔夫曾与分离主义者有勾结。这一点虽难以相信，但这个说法却始终阴魂不散。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局势，被西方及其特工部门所利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早就在政治牌局中玩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张牌了。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冷战”年代，他们找到各种原因和借口向苏联施压，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反对极权政治等问题。我看，那边有些政治家甚至未必知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位于何处，但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给世界各国端出来的一道现成的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民族主义运动雏形方显的时候，外国特工机关就立刻把手伸了进来。他们在立陶宛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狂热的活动。

现已确知，正是西方特工机关操纵了兰德斯别尔基斯的行动。也真应该佩服他们，把整个行动从策划到实施都干得非常漂亮。正如前面所说，他们把公众对立陶宛新领导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怒，成功地引向了对莫斯科的抗议。他们把指向内部经济问题的矛头，成功地对准了中央，让一切都在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运行。

那些外国特工机关具有在世界各国推翻政府的多年丰富经验，它们私下指点说，要想在立陶宛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制造特殊的非常

事件，最好还要流点血，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事件把政治情绪和民族主义疯狂的乱麻团缠得更紧。

专家们也有结论，认为事情是如此复杂而紧迫，单靠西方特工机关，也是难以奏效的。至于说到兰德斯别尔基斯及其同伙，他们的作用很清楚。不过按照我国特工部门的看法，这种事情没有莫斯科的参与也做不到。需要对所有的行动做精确的协调，才能在欧洲中心部位的立陶宛造成流血事件。为此，我要再次引用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的话：

这次的挑衅行动策划和实施得非常成功。说它是事先策划好的，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当形势非常紧张，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的时候，即1月13日悲剧发生前的两三天，维尔纽斯有大批外国代表和记者云集。他们甚至进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有些人在交谈中甚至天真地问：“为什么计划还不实行？”看来，这是指在国外早就导演好的一月事件说的。我们无法预防悲剧的发生，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给部队下达了任务，而“萨尤基斯”又把群众煽动起来了。双方一接触，挑衅者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前面说过，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特工人员都涌入了立陶宛。例如，立陶宛出身的公民艾维·安德留斯，就担任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游击战斗队及恐怖行动顾问。此人是在苏军驻防区和家属区实施一系列爆炸的策划者，他亲自领导了武装人员同苏军冲突的行动。在一月事件期间，安德留斯在议会担任军事顾问，经常就留宿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里。

立陶宛新政权在与西方特工机关密切联系的同时，对克格勃的活动表现出拆台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指示和决定，捆住行动人员的手脚，目标明确地干扰肃反人员阻止外国特工破坏的行动。

这样一分析，这场悲剧中行动各方的力量就很清楚了。但1991年1月13日之夜就真的已经真相大白了么？是谁开的枪？从哪里开的枪？为什么从一名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会是从早就不在苏军部队中使用的莫辛式步枪里射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所有致命的子弹都是由上往下穿过死者的身体，而死因又归咎于正在路面上行动的军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打死了人群中唯一的一名军人——克格勃中尉沙特斯基赫，而且是在背后从下朝上开的枪？还有好多军人和其他目击者证实，有人把一名年轻妇女故意从人群中推到坦克履带下，然后还照了相。这一类问题太多了。

我要再次援引立陶宛著名作家、曾经是“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的佩特克雅维丘斯的说法。他证实，立陶宛国防部第一部长佩特克雅维丘斯调来了18名“自己的”边防军人，叫他们换上便装，把他们安排进了电视塔，他们就是从那里用军用子弹开的枪。众所周知，当夜有13名公民被打死，据他说，运进停尸房的是18具尸体。医生“排除了”其中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的五具。他们是谁，怎么死的？

如果不经苏联总检察院会同立陶宛共和国检察院按照一切规定进行调查，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报告称，该共和国当局多方阻挠苏联总检察院专家的工作。总检察院的调查人员被禁止参加尸体解剖工作和伤员鉴定工作，为他们参与对生还的受害者和事件目击者的询问而设置障碍。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采取应有的措施自己单独进行工作时，立陶宛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又拒绝同他们合作。

有一句圣经上的话不禁浮上心头：“没有永不暴露的秘密；藏起来的东西也不会永远不见天日。”我想，总有一天，这“藏起来的东西”是会见天日的。

策动1月13日电视塔悲惨星期日事件的罪犯，至今还逍遥法外，并且在立陶宛占据着高位。为了让恐怖之夜的真凶免遭打击，立陶宛

当局对无辜的人进行了审判。其实，按当时的职务，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部队下达任何指令。可是1999年，在经过长达6年的监禁和调查之后，6名立陶宛共产党员还是被法庭认定有罪。罪名是“阴谋推翻合法政权，参与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布罗基亚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几位教授的案子就这样在不公正的审判中收场了。

再要说的是，在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悲剧事件一案中，还有45人受到审判，其中有原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元帅亚佐夫、原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等知名人士。

就这样，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共和国主权而展开的战斗，实际上于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电视塔以分离主义的胜利而收场了。最后的法律手续则是在当年的8—9月间完成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刚当上仓促成立的国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不提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苏联的决定。

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厄运当头的1991年，苏联不复存在了。

第七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罗斯人成了弃儿

1991年八九月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无条件的方式，退出了苏联；同年12月，这个伟大强国在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凯维奇的“帮助”下，轰然解体。这样，就在1991年的一天，我国有2500万同胞早晨一觉醒来时，竟发现自己已是身处异国。身居祖国边界以外的不仅有1800万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700万公民。

统一国家遭到破坏之后，在后苏联许多国家的地域内，掀起了一阵敌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狂潮。这样就引发了向俄罗斯迁徙的移民行动——基本都是高等级工人和工程技术干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大小的工厂如今没有了专家，而俄罗斯人在这些地区科学文化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正如人们所说，绝非无足轻重。

处境最艰难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俄罗斯居民。

谈到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国家的处境，我首先要讲一讲他们在拉脱维亚的地位。拉脱维亚的种族歧视已经达到了最可怕的规模——尽管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有类似情况。可是，要知道，

1990年初这三个共和国曾一致通过独立宣言。那么，宣言里究竟包括了哪些承诺呢？

我面前摆着一份1990年5月4日由亚·戈尔布诺夫先生签署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宣布恢复独立的公报。为了使读者能独立作出结论，现把其中的一款逐字援引如下：

保证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以及长期居住在拉脱维亚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享有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并享有符合公认的国际人权标准的政治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同样完全适用于表示愿意居住在拉脱维亚，但不申请取得其国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



1991年12月，莫斯科特韦尔斯卡亚街的一家食品店外，等待购买食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新华社稿）

类似的承诺也发表在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公报中。1990年2月2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塔林通过决议：

.....在宣布爱沙尼亚国家的理想之际，我们知道有几十万非爱沙尼亚人也在支持爱沙尼亚独立的思想。在我们争取恢复独立

的爱沙尼亚国家，人权和各族群权利将在共和国传统和民族宽容原则的基础上受到尊重。少数民族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在意见和方法上的分歧，在爱沙尼亚亦应受到法律保护。

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于1991年3月11日在有关立陶宛恢复国家独立的法令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最为简短而明确。他有预见地避开了人文的具体性：

立陶宛国家……保证人权、公民权利和族群权利。

宣言发布过一年半以后，这些共和国变成了拥有自己对内政策的独立国家。这里不由得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到底是在退出苏联之后才滋生了不可调和的反俄情绪，还是这种恶劣态度由来已久，只是一时间暗怀于心，非等到一定时机不肯浮出水面？

某些研究波罗的海问题的专家试图解释这种罕见的稀奇事，他们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夹在大国中间，或者处于文明边缘，它们的人民被迫与比较强大的民族（瑞典人、丹麦人、波兰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比邻而居。专家们正是试图用这一点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一直在为争取主权而斗争——先是为争取经济主权，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开始为争取政治主权而斗争。

不过，有些问题至今还是没有答案。日耳曼人用火和剑征服波罗的海各族人民，强制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二战期间，为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居民不仅支持纳粹占领者政权，而且很多人还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参与推行反俄、反犹、反其他民族的惩罚行动呢？

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俄罗斯人成了被仇视的民族？也许是因为波罗的海人习惯了德国人那种坚硬的铁拳，而我们俄罗斯人信奉的则是东正教的心灵主义，力求建立各民族兄弟情谊，并以俄罗斯本土力量来

提高周边的福祉？看来还有一个情况也产生了影响：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土地在13世纪初就被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所征服，几个世纪过程中它们始终处于日耳曼人的强大影响之下。日穆德人是性格犷强、身体健壮的民族，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反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可以认为，日耳曼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宗教信仰接近——这种宗教信仰的基础就是以教会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新教教义。宗教信仰的接近成了思想纲领。正是这种纲领，使得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能够组建起纳粹的“党卫军”部队（但在立陶宛不行，因为那里主要信仰天主教）。

毫无疑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在其宣言中宣布的为维护它们境内所有族群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至多不过是一种欺世的“烟幕”而已。早在这些宣言发布之前，一切有良知的人就已经知道，“改革中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正在展开大规模反“外来移民”的运动。

媒体以“外来移民”和“占领者”这样的标题，毒化了很多人的意识。1989年7月，在考纳斯空军基地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竟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剖开军官老婆的肚皮，不许她们生下占领者！”这样的话竟然出自那些自认为文化高出俄罗斯人一大截的人之口。难道能够想象，俄罗斯人会这样对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乃至其他地方的妇女吗？！耶鲁大学的斯拉夫学教授、原维尔纽斯大学教师托马斯·文茨洛夫的“贡献”，就在于他能为“俄罗斯败类”绘制肖像：“俄罗斯人被看成是宪兵、酒鬼、冷酷的野蛮人、色鬼，乃至杀人犯。跑到立陶宛来的那些殖民者，尤其是行政官员，多少都能与这些词沾得上边，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除了俄罗斯是“外来移民”这个话题之外，社会意识还被灌输了“图代人”的观念。“图代人”是施虐狂们对生活在该共和国境内的波兰人的蔑称。媒体对人们灌输说，他们根本就不是波兰人，而是波兰化了的立陶宛人。这样，自然就出现了“波兰问题”——波兰居

民问题也成了个现实问题了。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的头25年，在最初几次民族战争期间，斯拉夫族的克里维奇人曾被称做“图代人”。克里维奇人从史前时期就在此居住，生活在现在立陶宛领土的东南部，还在当地建起了一座城市——克列沃—维尔努—维尔纽斯城。这座城市的名称首次见于1129年的编年史。波兰人迁入信仰东正教的维尔努时间较晚：部分是在克列沃联合¹（1385年）以后，还有一部则是在卢布林合并²（1569年）以后。

在“波兰人”居住的各区和各村，所有的社会指标都是共和国内最低的：在立陶宛工作的每1000人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立陶宛人为197人，俄罗斯人为123人，白俄罗斯人为56人，而波兰人则仅为32人。在“波兰”区内，人均住房面积、学龄前儿童设施、学校等，数量都要低些。在丰富多彩、品种众多的出版物当中，专为20万波兰人出版的只有一份《红旗报》，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化教育刊物。

遗憾得很，时至今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仍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当地几个共和国已明晰可辨地显露出改革口号向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转化的倾向，“纳粹”意识形态在扩散。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莫斯科却以其行动主张的前后不一和态度的模棱两可使人震惊。我们的意识形态领袖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等人却给政治局和国家总统吃宽心丸，断言“过程”正确无误，言称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仅为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而已。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些活动家发出比任何人都更为高分贝的呼喊：他们叫嚷苏联“破坏人权”。可是正是这些人，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不仅最粗暴地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践踏俄罗斯居民的人权，而且还制定种族隔离制度。几十万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亲手在当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可是转瞬之间，他们的政治权利却丧失殆尽，其原因仅在于他们的母语

是俄语，而他们的祖根在俄罗斯。

如前所说，在践踏俄语居民权利方面起带头作用的，乃是拉脱维亚。由此产生了好多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这种事竟发生在俄罗斯人在居民中占50%的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知道过去拉脱维亚领导人为了讨好莫斯科，一向表现得非常恭顺，总是唯命是从。里加被非正式认定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首府，由此它也占尽了便宜。

可是在拉脱维亚，却通过了最歧视俄罗斯人的法律，特别是在解决取得公民权的问题上。例如，非公民必须从自己极其微薄的收入中拿出50美元来，这仅仅是缴纳手续费，接踵而来的花费还要多出5倍。

规定还必须通过考试，科目是：国语——包括书面叙述；历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例如，按照这部历史，对于拉脱维亚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1991年；还有拉脱维亚宪法。此外，必须宣誓，以表忠诚。主持考试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官员，不能指望他们会发善心。

人们会理所当然想到一个问题：干吗要接受一些科目的考试？在这里显然出现了概念的偷换：对待新入籍的人是一回事；而对待长期居民，在这片领土上生活多年的人，是另一回事。对于后者，全世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当国家出现分裂或合并时，长期居民就自动成为在这片领土上确立了法权的国家的公民。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瓦解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两德联合时，都是这个办法。

难道当初拉脱维亚加入苏联时，拉脱维亚人被迫参加俄语和苏联历史考试了吗？当然没有：掌握俄语的程度如何，乃是每个人的私事。苏联公民护照无须任何条件就应发放给所有的人。可是，他们对待俄罗斯人，持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态度。

在拉脱维亚没有少数民族的定义。在这里有三类居住在该国的法

人：公民、外国公民和非公民。根据1995年颁布的公民地位法，属非公民一类的就是原苏联公民，他们是没有取得公民权法律依据的拉脱维亚长期居民。依法可以取得公民权的，必须符合两个原则：继承原则（如果你是战前的拉脱维亚公民的直系后裔）和按普通归化过程走的原则。如前所说，归化必须先通过拉脱维亚语、历史和宪法等科目的考试，而且还要经由议会批准。

非公民在大选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权在国家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有权但没有义务在军队服役和在警察局任职。非公民在购买土地作为私产时，手续极为复杂烦琐。

自然，许多俄罗斯人对自己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在拉脱维亚的命运都不能无动于衷，他们在问：这是什么——报复吗？

为什么报复？为了俄罗斯人拯救拉脱维亚人免遭日耳曼化和完全丧失民族文化？为了在1918年向拉脱维亚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提供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为了在1940年事先向他们发出德国法西斯即将入侵的警告？为了在1945年解放了他们，并为此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土地上牺牲了14万红军官兵？为了战后倾全苏之努力和资金，在拉脱维亚造起几十座、几百座工厂和桥梁，建起了成千上万栋设备一应俱全的住宅楼，各种医院、疗养院、学校、幼儿园？实际上在所谓的“占领”期间，是重新又建起了一个拉脱维亚。

在这里理应提醒，在苏维埃年代，拉脱维亚人从来不曾受过任何歧视。不仅如此，而且他们甚至还被提拔到苏联最有威望、最重要的岗位上——执行监察职能，指挥强力机关的岗位（在众多的人当中，我只想提两个名字——阿·佩尔谢和鲍·普戈）。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一直非常尊重拉脱维亚民族传统、风俗和习惯。看来，俄罗斯人似乎应该有权希望拉脱维亚人同样回报吧？

拉脱维亚的非公民，人人都有一份奇怪的证件，他们的地位就被

这份证件固定下来。在这份证件上，他们被定为“外来族群”，就像是一种具有节肢的外星人，一类硕大无朋的蜘蛛，应该被消灭……

该国的某些代表证实了这种意图，他们宣称：必须尽快清除非公民。怎么清除？难道还要建一个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俄罗斯人是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把他人的尊重看得比物质福利还要重，因此，卑微的地位使他们极其难过。尽管他们不会因为痛苦而到处去大喊大叫，但他们痛在心上。不过，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所想很难猜测。有一句很好的谚语，叫做“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人们之间，各族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至少要做到平等、忍让。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政治活动家们应该永远记住。但是，遗憾得很，拉脱维亚当局在对待我们的同胞方面，却绝对无视这个道理。

我不禁要把“民主的”拉脱维亚同不久以前还是不民主的南非共和国作一个比较。迄今为止，拉脱维亚的长期居民中，有1/3（约为70万人）没有被承认为该国公民，尽管他们从前与该国其他居民处于同等地位。俄罗斯人从1666年开始，就大批定居拉脱维亚，因为当时在俄罗斯发生了教会分裂，在拉脱维亚有许多古老的信徒派教徒定居。及至18世纪，整个拉脱维亚纳入俄罗斯版图，所以俄语在那里得到了广泛普及。

1991年拉脱维亚议会作出决议，只承认1947年6月17日以前拥有拉脱维亚国籍的居民及其后裔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公民。40—50年代出生于拉脱维亚和终生居住在拉脱维亚的“非公民”，有权申请授予只到2000年为止的公民权。

这样，拉脱维亚长期居民中，有1/3的人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进入国家职能部门工作的可能——确而言之，和1994年以前南非共和国的黑肤色居民一样。

被剥夺拉脱维亚居民登记权的人（即所谓“圆戳人”——他们首先是少数民族代表），同时也被剥夺了一系列自然的和生活必需的权利，如劳动就业、获得各种社会补贴——包括儿童补贴——的权利。

由于短时间离开过拉脱维亚，成千上万的人不能重新取得在该国内定居的合法权利。他们成了必须驱逐出境的“非法人士”，尽管其中往往有出生于拉脱维亚和在当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状况就是1996年发生众所周知的拉维里·雅古金在陶格夫匹尔斯自焚事件的原因。

政府当局拒绝给由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社会团体注册登记。拉脱维亚的公民与非公民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别，举凡由法律及受法律约束的法令所规定的，就有68条之多。这些条款直接禁止非公民从事多种职业，也是从前南非共和国推行过的《工位备用法》（只为白人备用）一类种族隔离法的翻版。

例如，非公民无权经营药店（难道政府当局担心可怕的俄罗斯人毒害可怜的拉脱维亚人？），禁止充当消防员，不许做私家侦探、武装警卫、律师及助理律师、国家官吏，不准经营和维修飞机等等。除了这些职业禁令之外，还须加上由法律和受法律约束的法令所支配的对非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伤害。至于土地私有权、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歧视非拉脱维亚人的基本手段，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就是掌握（或不掌握）拉脱维亚语。对掌握语言、历史知识和该国基本法律知识的要求提高了，这就构成了获得公民权以及获得相应的政治和其他权利的主要障碍。我不认为1918—1922年内战期间在俄罗斯占有特殊地位的拉脱维亚人会精通俄语。据历史学家谢·彼·梅利古诺夫的资料，在莫斯科全俄契卡机关的2000人中，有3/4是拉脱维亚人。

根据拉脱维亚内阁的决议，能够获得失业者地位（有获得生活补

助和社会援助的相应权利)的,只有受过拉脱维亚语教育或拥有掌握拉脱维亚语证明的人。

俄罗斯国家杜马不止一次研究过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地位问题,向该国发出过声明和呼吁,甚至讨论过对这个国家实行经济制裁的法案。俄联邦政府不支持这一法案,因为不希望与邻居产生龃龉不和。然而拉脱维亚政府当局却把俄罗斯国家杜马发去的呼吁和声明,像对待讨厌的苍蝇一样丢到一边。

2005年5月,拉脱维亚议会紧急批准了欧洲委员会的《关于保护少数族群》的框架公约。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把这次批准行动,称之为庸俗的亵渎行为。全部问题在于拉脱维亚政府提出的两点修正意见:不许在街道名称标牌上和地图上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不许在国家和市政机构工作中使用少数族群语言。尽管在框架公约第10和11款中,清楚指明少数民族有这些权利。

此外,拉脱维亚议会批准了含有“少数族群”这个术语概念的解释性宣言。在拉脱维亚,他们甚至把在该国生活了几代人的那些公民,也归入少数族群之列。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什尼亚科夫在莫斯科“圆桌会议”上发言,在评价上述批准公约的闹剧时说,拉脱维亚当局行事时所遵循的,“不是历史复仇的想法——要为纯洁主体民族而斗争,就是地方利益”。

在爱沙尼亚,俄语居民实际上究竟生活得怎样呢?

1991年爱沙尼亚获得独立后,它在内政和国家建设方面毫无疑问的优先任务,就是建立单一民族社会,从国内把俄语居民“挤出去”。而对于那些尽管挤压和歧视也不肯从爱沙尼亚迁出,把爱沙尼亚当成自己祖国的俄语居民,则要实行同化。

当前，在人口总数为147万人的爱沙尼亚，生活着大约60万俄语公民。其中只有不足8万名俄罗斯人获得了爱沙尼亚国籍，11.5万人是俄罗斯联邦公民。剩余的30多万人根本没有国籍。

1995年1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国籍法，实质上获得国籍的条件变得更加严格，甚至比爱沙尼亚在1992—1995年间施行的法律更加严苛。根据这个法令，爱沙尼亚长期居民，只有凭临时户口居住3到5年，凭长期户口居住5年之后，才能有权申请国籍。只有在此之后，提出的国籍申请才会得到受理和审议，而且仍要办理极其复杂的归化手续，其形式是通过语言和宪法知识考试。就连同爱沙尼亚公民（女公民）有婚姻关系，在共和国领土上工作和置有不动产等条件，如今在获取国籍一事上都没有任何照顾。实际上，这一法令的实施剥夺了相当大一部分爱沙尼亚居民恢复所丧失国籍的可能，封住了他们参与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道路。

这样，爱沙尼亚就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歧视性法律体系，根据这套法律，有1/3的长期居民被粗暴地剥夺了公民权，被宣布为自己国家的外国人，他们最基本的政治、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遭到了践踏。根据爱沙尼亚法律规定，国内公民和非公民在权利方面的原则差异，多达40条以上。

针对长期居住爱沙尼亚的非公民，1993年7月通过了一个外国人法，该法令规定了所谓的“外国人”身份证明的发放办法。这种身份证明发给申请居住证明的人。领到这种身份证明的人，其所享有的权利范围，不仅比爱沙尼亚公民要小了许多，就连跟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也远远不如。在外国人身份证明上，按规定要注明一个专门的名称：“原苏联公民”，这就把身份证明持有者归入到不存在国家的公民一类，从而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包括在任何一个外国领土上受法律保护 and 领事保护的權利。外国人身份证明不是没有期限的，按要求，该证明应与户籍同时延长有效期限，这就给它的使用造成了困难。

然而，即使这样对待长期居住在该国的居民，发放外国人身份证明的过程到1996年7月12日还没有完成（这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规定的期限）。在申请外国人身份证明的11万多人当中，得到的仅有约两万人。可是据事先估计，需要证明的不下于20万人。

审批临时户口的截止日期为1996年7月12日。这导致爱沙尼亚30多万居民自身法律地位的改变。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这些人获得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合法居留的权利，但这样一来，他们却由长期居民又变成了临时居民，从而被剥夺了一系列权利。例如，其中就包括这样的权利：根据1993年颁布的私有化法，有权把当时占有的住房面积私有化的只是共和国的长期居民。能获得住房长期使用权的，也只能是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人。按照1994年颁布的失业人员社会保障法，只有长期居民才有利用劳动介绍所和领取失业补贴的资格。

爱沙尼亚当局拖延落实俄爱协定中关于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很多条款。爱沙尼亚当局给这类人员发放的，是为期2—5年的，甚至仅6个月的居住证，从而破坏了该协定，况且办理这种证件的手续极为繁复，而此类人员全都年事已高，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拒绝和拖延发放居住证的根据，可能是借口这些退休军人过去所从事的活动，其中包括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安局（格别乌），甚至在边防军服过役。

尽管对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法作过修订，但其中仍保留着很多歧视条款。对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非公民，其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受到一些人为的限制。例如，只有那些个人亲自提出申请参选的人，才能作为选举人向专门设立的网点进行登记，而且登记期限极其短暂。如果是爱沙尼亚的公民，就完全不需要通过类似的手续。

我想在此提醒读者，爱沙尼亚曾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但其领导

人却一有机会就大喊大叫，说该国处于“帝国占领之下”，它的人民遭受俄罗斯人的压迫。这居然引起了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大同情。我们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听到这样的论调时，竟惊奇地翻着白眼，为他人如此评价俄罗斯同胞在一个社会环境最安全、福利条件最好的加盟共和国所起的作用而发出满意的尖叫声。但是，为现代爱沙尼亚人受教育创造机会、给予他们荣誉称号的，难道不是俄罗斯？为爱沙尼亚人开辟道路走向世界的，难道不是俄罗斯？如果没有苏联绝对权威的保护，有些爱沙尼亚人和该国公民，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不久之前，爱沙尼亚内政成了联合国讨论的议题：在爱沙尼亚，至今仍然毫无道理地保留着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差异。爱沙尼亚方面在报告中企图证明，这一讨论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爱沙尼亚上层人士认为，他们国家在这方面完全井然有序。可是，联合国种族歧视委员会对这种论断不赞同，驳斥了爱沙尼亚方面误导国际社会舆论的企图。委员会对爱沙尼亚方面提出的关于履行消灭一切形式歧视的国际公约的报告，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其中表明对爱沙尼亚处理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的情况给予负面评价，尤其是对爱沙尼亚当局甚至意欲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限制他们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的做法表示反对。此外，委员会对于1993年爱沙尼亚颁发的民族文化自治法只适用于国内公民这一点表示担心，认为它“缩小了爱沙尼亚大肆宣扬的一体化纲领的范围，从而也证实了委员会的结论”。

俄罗斯外交部针对这次讨论作出结论说：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及其提出的总结文件再次证实，爱沙尼亚在保障非主体族群权利方面——而这主要涉及俄罗斯民族，局势引起了不具成见的观察家们的严重担心。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在其专门声明中指责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托马斯·伊里维斯，认为他在对莫斯科关系中所执行的路线带有调唆性

质。应该说，托马斯·伊里维斯以前发表的几次声明，都没有能给这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带来良好声誉，反而给俄爱关系造成了伤害。这位外交部长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长期生活在美国，完全忘记了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所拥有的共同历史。而这一历史，不管他个人如何希望，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一些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意识中抹掉，因为这些人 与他完全不同，并不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是“苏联占领时期”，他们记得当代俄罗斯在重建爱沙尼亚国家体制中所起的作用。

爱沙尼亚政治活动家的言论超越了理智的起码要求。他们病态地仇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甚至准备为恐怖主义罪行辩护，包括为车臣匪徒辩护。譬如说，下面我就要引用一段致杜达耶夫先生的慰问信中的文字：

值此萨勒曼·拉杜耶夫将军遇害之际，爱沙尼亚国会的支持车臣小组特向车臣人民和您本人表示深切同情。这位杰出的自由斗士惨遭杀害，使我们深感震惊。爱沙尼亚议会的支持车臣小组与车臣人民一道为萨勒曼·拉杜耶夫表示哀悼。

在这份信件上签名的有爱沙尼亚共和国议会的63位代表（代表总数为101人）。只有疯狂的反俄政策才能允许作出这种声明，它乃是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内政的粗暴干涉，是激进反俄情绪的表露，而这种情绪已构成爱沙尼亚内外政策的主要路线。同时，这份信件也是对国际社会舆论的卑鄙无耻的挑衅，因为国际社会舆论认为，政治恐怖主义是极其危险的现象，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共同体应该一致努力。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由于天主教不容忍异族人的那种心灵主义，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当代立陶宛成了种族单一的共和国。

1991年，当苏联解体时，立陶宛人在立陶宛占居民总数的81.6%，而与此同时，爱沙尼亚人占爱沙尼亚居民总数的63.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仅稍许超过居民总数的一半——占51.8%。而实际促成这种情况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立陶宛当局通过的一项专门决定：只准许在共和国的某些城市建设企业，而在许多居民点都不许建设。这一决定断然限制了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进入立陶宛工业企业。

乍看上去，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处境比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要好得多。但这不过是最初印象。实际上，同化俄语居民是立陶宛政府推行的既定政策。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当地整体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占极小比重的俄立两国关系条约。而且，当问题涉及俄罗斯同胞，特别是涉及俄罗斯公民时，就会看到法律运用过程中相当独特的实践操作。

有关外国人在立陶宛法律地位的法律条文，对于俄罗斯公民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对文字上的某些粗糙之处忽略不计（因为这可以解释为立法者经验不足），那么，对这项法律的严格法律评估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一方面它对外国人实行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宣布外国人在立陶宛享有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该国宪法、此项法律及其他法律和国际条约，又全都另有补充说明。

当谈到此项法律各条应如何适用于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公民如何行使立陶宛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时，却遭到了官员们的断然拒绝。尽管并没有限制外国人行使这些权利（包括参与米尔大会、参加社会团体的权利）的禁令，但官员们的实际做法就是这样。

有关少数民族群的法律也使人惶惑不解。这项在相当程度上是装点门面的失败的法律，从来也没有实施过。不久前又试图用族群村社法来取代它。族群村社法的草案曾在报刊上公布过，这就让我们有可能对它的反动性质予以评说。法案的起草人对如何向少数民族群社会生活施加更多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可是许多立陶宛议员觉得这个法律

草案还不够劲，因此又草拟了一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族群特性”的法律草案以供选择。这个草案就连最起码的脸面也置之不顾了。

再者，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不允许长期居住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在该国领土上购置和拥有土地。当前，立陶宛议会正在审查宪法修正案，目的在于允许外国公民购买土地，但这一点不适用于俄罗斯公民，因为预定这种权力只赋予北约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公民。在国家基本法层面上如此提出问题，是绝对带有歧视性的和不可容忍的。

还应该特殊研究一下我们的同胞建立和利用社会团体的问题。依我看，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法律的和社团内部的。

立陶宛司法部长断言，不允许俄罗斯公民在该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组织，因为立陶宛宪法规定：“保障公民享有……”，但这句话似乎又排除了该条款适用于非立陶宛共和国公民的可能。公开抗议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可能被消除了，因为该国有关解释表明，立陶宛的集会法甚至连外国人纯和平目的的集会行动都在禁止之列。

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如何联合起来，建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外社团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当前，立陶宛存在着近20个俄罗斯社团。可是这些社团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只能听任当地政治力量随意摆布，已全被解散，丧失了他们在当地俄罗斯基本群众中的广泛影响。

在维尔纽斯成立的俄罗斯信息文化中心，为解决俄罗斯同胞团结的问题带来了希望。俄罗斯公民应占多数这一条得到了硬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俄罗斯社区的成员本可以积极参与该中心的活动，可是遗憾得很，尽管俄罗斯和立陶宛政府就这个问题已经签有协议，但离实际解决问题还有一段距离。

几年之前，立陶宛总统瓦里达斯·亚当库斯曾就选举新议会一事向该国公民发表讲话。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演说。讲话涉及共和国内部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甚至提到了每个公民的福祉权利。但他一

个字也没有说到俄罗斯人的权利，而俄罗斯人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看来，同爱沙尼亚一样，在立陶宛也没有俄罗斯问题！

众所周知，立陶宛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主权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审讯持不同政见者和二战老战士的浪潮。瞧，这就是“民主”立陶宛的自由！凡此种种，跟不久之前在篝火上焚烧书籍的那个年代何其相似乃尔！

此外，我们有根据怀疑立陶宛司法的独立性，证据俯拾即是。据报刊报道，兰茨别尔基斯当时宣称，布罗克亚维丘斯和他的同志们受审，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政治信念，而是具体因为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谋杀，据说他们是作为最普通意义的刑事犯受审的。这至少引起了迷惑不解：怎么能在开庭之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呢？

可就在当时，当年维尔纽斯的法西斯警察总监列莱基斯，却能够自由自在地待在立陶宛。他可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大批杀害犹太人和本国其他民族爱国者的罪行，而被美国驱逐出境的。

这一切同在俄罗斯审判国家非常委员会一案的初始阶段何其相似。什么样的罪名没有往受审者身上加，什么样的帽子没有往他们头上扣啊！当时的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甚至要求不经调查和审讯就将他们立即正法。可是，最终那批人全都获得了大赦，而瓦连尼科夫大将不肯接受大赦，争取到把审讯进行到底。正如所知，法庭最终宣布他无罪。

立陶宛当局，特别是它的议会，直到今天还不肯善罢甘休，以令人羡慕的充沛精力挖地三尺，搜寻“敌人”。例如，前不久通过了“评估苏联克格勃（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及该组织骨干人员现实活动的法令”。根据该法令，这一世界知名的专门组织连同它在立陶宛的分支机构被宣布为“罪恶”组织。自该

法令生效之日起，原克格勃骨干工作人员在10年之内不得“在立陶宛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在政府管理机构、自治机构、边区保卫机构、国家安全部门、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外事部门、海关、国家监察机关以及国家监督和检察机关工作；不得担任律师、公证员职务；不得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这不禁使人想起一部老片子，那里有个年轻的革命者马克西姆，他被禁止在任何省份居住，除了……萨哈林岛。立陶宛也是如此：看来只允许这些人当个挖土工，或者干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体力活了。

与此同时，政府又承诺：此法令生效三个月内，“凡前往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门登记，交代此前所有工作秘密及同事和特务等关系者”，可以“安心”生活。

就其结构系统而言，苏联的所有机构中均设有克格勃。该组织解体后多年来，任何一个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也不曾通过立法程序，把原苏联的克格勃和共产党宣布为“犯罪”组织。立陶宛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文明世界遵守一个普遍的规则：凡宣布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为罪犯，一定要通过法庭。其他所有“判决”都没有法律效力，不得执行。应该提醒一句，1945年底1946年初，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除了对个人作出判决以外，也判定法西斯德国的一些机构为犯罪组织。

上面提到的关于克格勃的法案，出自立陶宛议会议长兰茨别尔基斯的手笔。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呼吁议会“对犯有战争罪行、在被苏联占领的立陶宛领土上杀害平民，从事过镇压活动、恐怖活动、政治迫害的组织，作出法律评估。”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兰茨别尔基斯不是个法学家。他是个音乐人和政客，大概正因如此，他所领导的议会作出的决定，才散发出一股外行和政棍的气味。同时，议会也完全无视立陶宛总统瓦·亚当库斯的否定态度。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民主”共和国的特工部门，又是如何以高度彬彬有礼的方式行动的呢？不久前立陶宛总统亚当库斯责成检察院调查一项举报，据称，内务部领导人员保卫局议会处的工作人员似乎在秘密跟踪高级领导人，甚至跟踪总统本人。而所获情报最终似乎都送到了议长兰茨别尔基斯手上。引起这次调查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前总统布拉扎乌斯卡斯宣称，他的私人谈话内容竟然被其他官方人士得知。可是，这些破坏立陶宛宪法的法律又是由谁来通过的呢？



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军人公墓中的苏军解放纪念像被砍掉了脑袋。（克罗波夫斯基摄）

铲除俄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很快就获得了国际语言的性质。这无疑是苏联威信的标志之一。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国际联合会，团结了世界上76个国家的6万多位俄罗斯语文研究者。2003年召开了该国际联合会第10次会议。现在，在任何国家，总能遇到或多或少掌握俄语的人。然而，有的国家却在起劲地排挤俄语。尽管俄语在全世界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

家还是要这样做！众所周知，联合国已经宣布，俄语是世界性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在民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俄语却被推上了政治问题的风口浪尖。目前正有两种倾向愈演愈烈。第一种倾向——人们希望提高本民族语言的地位，提高它在建立国家、形成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而这恰恰与第一种倾向相反：增长了“语言的不可兼容性”。这一在改革中出现的罕见现象，成了民族关系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使之蒙上了一层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色彩。语言因素开始被用来确定一个人是“公民”还是“移民”，是“原住民”抑或不是。在获得完整主权之后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这种现象是现实存在。语言问题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波及了儿童的心灵。

当前，俄语在后苏联时代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大多数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白俄罗斯以外，都通过了有关语言的法令，宣布只有“主体”民族的语言才能作为国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可以当做官方语言，与国语平等使用。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俄语或者被归入外语，或者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或者简单地作为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在很多国家，俄语被排除在官方公文用语和社会生活以外。正如我们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例所看到的那样，没有掌握当地语言的居民，只好自动丧失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利。

某些国家大批关闭了俄罗斯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在用俄语教学的高等院校里削减了班级、系和分院。现在，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难以企及的，不仅是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甚至还包括普通教育，因为实际上教学已经全面转为使用“主体”民族语言了。

教科书对大多数历史事件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令人深感不

安。这些评价往往带有公开的反俄倾向。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在如今这些主权国家的发展上所起过的作用遭到贬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心目中对自己精神文化的根源出现了扭曲的认识。俄罗斯剧院和图书馆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回到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已经开始施行强制同化非主体族群的计划。议会讨论了旨在排除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教育法。可是俄语乃至其他语言，乃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母语。非拉脱维亚的国立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到以非拉脱维亚语授课的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绝不可能。即使在私立学校，政府当局也要求一部分课程只用国语教授。这样一来，建立在双语原则基础上的教育体系遭到了破坏。现在推行的教学制度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制度。应该指出，这些歧视措施得到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的发展规划的支持。

国语法把俄语宣布为外语，规定在劳动、公共信息等领域，以及在任何国家机关办事，只能用拉脱维亚语。

自从2004年4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来，这一领域的事态每况愈下，因为该修正案排除了在各级立法和政府机关、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关，其中也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使用俄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正在对非拉脱维亚居民施行强制同化。

我想提醒读者，在与拉脱维亚毗邻的芬兰，就存在着两种国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尽管瑞典人只占该国总人口的8%。

2004年2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对1999年6月颁布的教育法的修正案。把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本来就是该教育法的宗旨。而修正案则更进了一步：完全消灭俄语——2月修正案实际上就是在学

校里彻底清除俄语。

从2004年9月1日起，根据修正后的教育法，在俄罗斯学校确定了“按60%比40%”的比例安排课程，即60%的课程用拉脱维亚语讲授，剩下的40%用俄语。属于用拉脱维亚语讲授的科目有数学、地理、经济学基础，甚至还有体育课。与此同时，一年级用于讲授俄语和文学的课时，每周只有4小时。用4个小时怎能教会7岁孩子读和写？

拉脱维亚当局的政策旨在根除俄语，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2003—2004年在共和国内一次次爆发“学校暴动”。几万名中学生、家长和教师涌上里加和其他城市的广场，要求为他们保留母语——俄语。“斩断伸向俄罗斯学校的魔爪！”“大家在一起就是力量！”“拉脱维亚是欧洲的耻辱！”“改革完蛋了！”诸如此类的口号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看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已经被折磨得忍无可忍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回忆起1976年在南非共和国发生的最强大的起义——索埃托“中学生起义”吗？而起因不就是剥夺了黑人受中等教育时选择语言的权利吗？

2005年8月，议会的20名反对派议员向拉脱维亚宪法法院起诉，控告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同年5月，宪法法院驳回了这次起诉。

拉脱维亚当局企图把这些反对学校改革的抗议行动说成是某种外来势力反对该国的阴谋。在里加，当局担心，以推迟改革的形式向抗议者让步将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直到今天仍能左右拉脱维亚的政局。然而当局拒绝就改革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根本与此无关。问题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手中没有推行这种改革的有力的理由。拉脱维亚人承认，改革的主要理由就是为“占领”拉脱维亚而向俄罗斯人报复。其他的理由看来更加苍白无力。

里加杜马安全和法制委员会意欲向议会呼吁修改刑法。据该委员会的意见，因举行社会活动而破坏法制，其组织者应受到严厉惩罚——监禁，刑期可定在10年以下。该委员会领导人维勒克斯向记者宣称，是俄罗斯中学生的群众抗议行动促使议员们通过了这一决定。一位保卫俄罗斯学校运动积极分子说，局势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原来拉脱维亚的教育改革早已划归内务部掌管了。

为了消灭“俄罗斯精神”，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走得更远。近几天拉脱维亚内务部煞有介事地宣布，说欧洲人权法院驳回了国内那些试图对自己姓氏“拉脱维亚化”表示异议的居民提出的起诉。类似的案例在拉脱维亚真是举不胜举。俄国诗人普希金在拉脱维亚被改称为“普斯金斯”。可是，要知道，俄国人是绝不会，比方说，把莱蒙德·保尔斯³改名为“保尔索夫”，把莱姆·瓦伊库勒改名为“瓦伊库列夫”……

顺便说一句，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凯—弗列别尔加宣称，她的共和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不希望继续使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个带有“苏联”烙印的说法。据她说，这散发着1939年的气味，那一年“苏联威胁我们，要求建立他们的基地”。

拉脱维亚肆无忌惮地疯狂攻击俄语，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明天俄语在这里消失，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拉脱维亚语也会在地球上消失，而生活在现在所谓拉脱维亚共和国领土上的居民，将会说上一口支离破碎的当地样式的英语。到那时将不会有人挺身保护拉脱维亚文学——谁也不会再想起它来。

禁止孩子们学习父母的语言——这是对国际法准则最粗暴的破坏，拉脱维亚向建立种族隔离制又迈进了一步。在南非共和国消灭了这一被联合国宣布为“可耻的反人类罪行和可憎的体制”以后，全世界都以为这种体制似乎再也不会复活了。然而在欧盟的默许之下，种族隔离制却正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生长发展。

还有一个决定足以说明拉脱维亚当局对待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的态度。众所周知，在里加有一座彼得大帝的行宫。这座行宫是在拉脱维亚加入俄罗斯之后，由该市赠送给沙皇的。彼得大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于访问该市时曾不止一次在该处驻跸。在较晚时期对这个建筑进行改建时，伟大的拉斯特雷利⁴也曾参与过这项工作。

从1991年到1998年，占据这座宫殿的是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社团。当时计划把宫殿作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的历史博物馆使用。然而，宫殿被拍卖了，社团和图书馆被赶到了街头。这样一座历史古迹被改造成了居民住宅大楼：在里加老城区住宅是很值钱的。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国的数十万同胞成了按种族特征受到歧视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俄罗斯本身受到贬损——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向拉脱维亚议会发出不要迈出这一步的呼吁之后，这个反俄的法令竟立即出笼了。在北约武力保护伞下，在欧盟政治庇护下，拉脱维亚沙文主义者厚颜无耻地拒绝了莫斯科的呼吁。俄罗斯议会挨了拉脱维亚“同行”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气焰嚣张的反俄分子实行劝说政策只会徒然助长他们的放肆无礼。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一个拉脱维亚政客公开把我国数十万同胞称之为“白痴”，他侮辱的不只是我们在拉脱维亚的同胞，而且是整个俄罗斯。

立陶宛 该共和国人口总数约为350万，其中立陶宛人占80%，俄罗斯人占8%，波兰人8%，白俄罗斯人1.5%，此外，当地还有一些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非立陶宛居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南部，日常使用俄语和波兰语。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独立，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实现国语地位限期的决议”。从1995

年1月起，该国全体居民必须转而使用国语（即立陶宛语）。然而，行政当局并没有承担任何向居民教授立陶宛语的义务，而是把此事完全承包给一些首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 and 商业机构。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发生在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时期！

1992年4月，立陶宛共和国政府通过决定，其中划定了在国家机关担任这种或那种职位所需掌握立陶宛语的三个级别。由于这个决定，实际上所有非主体民族都只能被迫放弃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原因就是他们的立陶宛语掌握得不够好。

用主体民族语言教学的时间和质量、立陶宛语语法的复杂性（这是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使得在极短的限期内掌握它成为不可能。尽管这一决议首先涉及的是俄语公民，但国语委员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立陶宛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母语的高级别考试。

毕业于非立陶宛人学校的考生必须先通过立陶宛语面试，为此还要交纳费用。只有经过这道手续，他们才有权把证件交到学校。这种行动，除了评价为按照民族特征搞公开歧视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

1995年立陶宛颁布的国语法规定，任何反对国语地位的活动都是不允许的。为了监督这一法令的执行，建立了一个拥有极大特权的专门机关——直属议会的立陶宛共和国国语监察局。

俄语被彻底排除在官方公文应用和社会生活之外，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开展活动的国家机关、商务机构及其他机构一律不得使用俄语。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少数民族社团举办的活动中，才不禁止使用俄语。在立陶宛，对违法者要广泛课以行政处罚，其方式为向相关领导人和负责人处以罚金。

对使用国语的硬性要求导致的后果是，甚至在俄罗斯学校，连各

办公室的标牌、直观教具、教学文件、教学日志、学生日记，都一概要用立陶宛语书写。此外，还必须以立陶宛的方式书写学生姓名。这自然引起家长的愤慨。

在立陶宛允许用俄语教学的，实际上只限于普通中学。如想受到用俄语教学的高等教育，只能到师范大学的斯拉夫语文系，可那里总共只有一个班，容纳20个学生（仅仅20个人啊！），而在其他高等院校根本不用俄语教学。

可以预见，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人的学龄前和适龄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性设施，数量将急剧缩减。在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受过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将不会有俄语居民的代表。

在保障我国同胞的信息空间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政府通过媒体提供的俄语信息，极其贫乏而片面。该国电视台用俄语播放的节目，只有每天一次的“新闻”（每次10—15分钟）。民族广播电台给俄语的广播时间也只剩下一小时。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一家播送节目。不错，那些较比富有的人，拥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人，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所有主要电视频道。但基本的俄罗斯群众却很少能有人充分就业，即使能有活儿干，也是辅助工作，因此他们对看这类节目连想也不敢想。

俄文报刊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最容易读到的便是《Etybotac》、《立陶宛信使报》、《述评》、《共和国报》等几份周刊，但它们出版的数量不多。可是，第一，这些报道谈的不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语讲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个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罗斯报刊文摘。在报刊亭里花费商业高价可以买到个别的俄罗斯出版物，可是它们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

由此观之，立陶宛当局的政策从不考虑俄语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

历史条件，他们学习立陶宛语的困难，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立陶宛当局实际上是在推行对这些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罗斯学校中俄罗斯文学课时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教学大纲中，除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讲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断然说，为学习国语创设了良好条件。但却只字不提这种为居民开设的短训班是收费的。

在与邻国拉脱维亚对比的情况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罗斯学校和俄语教学等问题，状况要好得多。可实际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态进程——其中包括俄罗斯学校的“改组”——同样令人担忧。

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个人对不民主的国语法随意加以解释，在执行中随意性也很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空间遭到急剧压缩；加之他们所执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非主体民族”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已无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转入立陶宛学校。社会学抽样调查表明，在10所维尔纽斯立陶宛学校的低年级，有25%—30%是非立陶宛学生。俄罗斯学校的生源已经呈现萎缩倾向，人数大为减少，学校的最后关闭指日可待。

据生活在立陶宛的专家的看法，必须通过一项比较民主的国语法，扩大立陶宛非主体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间，制定少数民族学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数民族的民族同一性，和谐地达致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从道德和政治的观点来看，立陶宛既不应该允许以损害某些族群学校的利益来解决另一些族群学校的问题，也不应该允许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在解决这类微妙敏感的问题时，作为出发点的设想应该有足够的根据。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应

以其他文明国家为榜样，必须放弃在熔炉中“熔化”立陶宛少数民族群的思想。只有每个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机团结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现。

爱沙尼亚 在爱沙尼亚，俄语的处境同其两个南部邻国一样令人担忧。看来，对发展爱沙尼亚文化和爱沙尼亚语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会持有异议。但是，这不应该靠伤害俄语族群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根据护照封皮和族属来随意“理解”国际法和人的自由权利。

必须特别强调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传媒手段的景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拉脱维亚尽管要通过有线电视，但总算还能看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话，那么在爱沙尼亚，全共和国规模的俄语电视节目就根本没有。这种节目只能靠几个现有的爱沙尼亚频道来转播。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居民有1/3是俄罗斯人的国家里！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主要定位在宣传鼓动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对非本土居民开展同化的意识形态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拉脱维亚出现了一个新词——“阿特莫达”，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觉醒”——当然是民族的觉醒。如果“阿特莫达”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来不会去注意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居民同拉脱维亚人一道参加“觉醒”群众大会，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现在自由了。可是，接着就出现了最初的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并肩战斗过，而现在我们却成了二等公民？”“你们根本连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们说。于是，不得不与这种新生活妥协。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又成了“占领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战士还要受到审判，在他们的个人护照上还要注明是“非公民”。

随着北约一道，又来了一些身着军装、佩戴星条小旗的先生。他

们到此并不是为了欣赏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风琴，也不打算把里加电影制片厂变成一个新的好莱坞，更没有在寒冷、荒凉的沿海地区为他们建造创作之家，没有把安·乌皮特⁵、雅·莱尼斯⁶的作品翻译成“莎士比亚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说过的“觉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样招致冷落。这些新来的先生蔑视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开张一些麦当劳嘛，他们倒是会感到需要的。

在结束评论我们的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民主”国家的遭遇、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语言问题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遗憾的是在这些年里，问题的状况已经变得“稳定”了。俄罗斯强国被人吐了满身口水，可是这个强国却装模作样，说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据说，今后还要表现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们”成熟起来，等待他们学会国际上的礼貌。等着瞧吧，一旦它们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会罚他们站在墙角反省的，因为他们侮辱了最可敬最可爱的伙伴俄罗斯，要知道，这个伙伴已经是“八国”成员之一，是与北大西洋公约、欧盟等合作的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约和欧盟暗中是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对俄语的排斥的。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波罗的海的家伙揍个鼻青脸肿了。只需欧盟的主要和平缔造者索拉纳（下令轰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扬，那里的一切就都会得到调整。

如果把各种“开心事”（如俄罗斯加入了“文明国家”俱乐部，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无数的伙伴和合作条约等等）抛在一边，那么欧盟和北约不顾俄罗斯外交部的抗议、说服和痛苦呻吟，执意东扩，便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的余波了。我们这些亲爱的伙伴连续不断地强化苏联解体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迫使俄罗斯为了民族利益从彼得大

帝时期就占领的阵地撤出，向东方后退。

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北约和欧盟，这为改变欧洲政治领土地图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有意识迈出的，具有挑衅性。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未敢迈出这一步，直到确实认定，不必把我国对北约集团提出的不得越过“红线”的警告认真对待，才有了这个动作。

说到这儿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分界线”呢！难道北约和俄罗斯地理上划定的“红线”，不就是1939年划过的那条线吗？为什么如今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主权国家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呢？答案很简单，今天的新主子——欧盟和美国使他们称心如意。可是历史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变，这不会吓退新伙伴吗？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这些国家今天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其实，所有这一切，世界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都经历过！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来说，为了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政治领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进一步的稳定性，一个要素就是从这些国家排挤出当地俄语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强制同化剩余部分。这一政策具有长期、整体的性质，绝非无足轻重。这里讲的是针对受歧视的非主体族群采取的极其广泛的措施。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当大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原住民，实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民族歧视。

如果认为北约和欧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励赞许，不过又在一旁监视，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在国内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事态不至发展到严重过火的程度。时至今日，这种严重过火的行动还没有发生，于是，大规模歧视俄语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是这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东正教一直处于与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触和斗争之中。无疑，这不能不在整体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

当地许多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与此同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系统地向日耳曼骑士团和西方宗教在该地区历史上起到的丑恶作用进行辩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为了使这些民族驯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师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长剑。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企图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历史，证明东正教的学说在各个时代都是主张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强制和恐怖手段强加于人。东正教宗教促进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随天主教和新教来到该地区的奴役者。

近年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获得主权以后，采取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国内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实际情景，千方百计在信仰东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写作本节的材料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东正教，无论其起源还是生存发展，都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是政治家们用任何

办法也无法破坏的。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单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70%，东正教教徒——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40%，东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中，态势对东正教最不利的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对东正教的势不两立看来有其历史根源。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3世纪该地区就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深，不过这种影响却远非时时都能起促进作用。

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调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

在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成了东正教最热的“热点”。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苏联解体以后民族主义崛起的苦果。1999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写给爱沙尼亚教区委员会的致敬信里说：“从民族联系和民族文化联系的观点来看，获得独立的过程和爱沙尼亚公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并非时时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爱沙尼亚政府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制止对俄语居民——几万名东正教耶稣信徒——信仰自由的伤害。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受到压力，他们被要求自发地切断由教规所规定的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联系。

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彻底分裂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单一民族、非单一宗教信仰的爱沙尼亚社会内部出现严重不和。但有一个事实却很引人注目，就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没

有遭遇分裂的悲惨命运，因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爱沙尼亚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东正教一样，在苏联时期有着平行的国外教会。

为了让读者对各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世俗国家不应介入这一冲突的宪法规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爱沙尼亚教会冲突的历史。

1992年4月，按照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决定，科尔尼里大主教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报告，要求恢复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于1920年由大牧首吉洪授予的独立地位（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合乎教规的从属关系。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科尔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定，其中重申了1920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爱沙尼亚东正教独立地位的决定。该决定认定，爱沙尼亚东正教是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展活动。这一决定还任命科尔尼里主教为教区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爱沙尼亚”主教衔。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议在爱沙尼亚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响不一：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慨。爱沙尼亚东正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反映出与会各方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

1993年4月，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召开了地区宗教大会。会议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大会的总结文件中反映了教会对继承权问题的意见：“大会认为，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是爱沙尼亚东正教遗产的继承者”。

与地区宗教大会同时，在塔林的主显圣容大教堂，也召开了一个与之唱对台戏的会议，名叫“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宗教事务管理局扩大会议”。1993年4月29日，该会议向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

特罗缪发出呼吁书，把自己称为“爱沙尼亚共和国公民东正教教会教区信徒会”。正如所见，取得这种信徒资格的标准，乃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国籍。

合法的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代表虽经多次向政府当局呼吁，但他们获得继承权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国外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爱沙尼亚的追随者掀起宣传攻势，宣布合法教会组织为“占领者的教会”、“第五纵队”、“莫斯科的爪牙”。而所谓“流亡”机构反倒成了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区的合法代表。

通过媒体发动的凶狠攻势，超出了伦理道德所允许的范围。谎言连篇累牍，给科尔尼里主教和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画了一些下流的漫画，而阿列克西二世是一位出生在爱沙尼亚，为这个国家东正教教会服务近40年的长者。

以科尔尼里主教为首的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教区力争进行合法注册，但始终没有结果。1995年10月5日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会议表示，决不同意爱沙尼亚政府针对当地依法成立的东正教教会教区所阐明的立场，并为此深表悲哀，因为这一立场破坏了基本人权，与全欧信仰自由的标准相悖。宗教事务管理局人员决定，要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希望对“流亡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拥有审判权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上司能作出英明决定，以防爱沙尼亚东正教教会遭到毁灭。

1995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访问芬兰，在此期间他对邻国爱沙尼亚的“亲爱的孩子们”发出呼吁。在呼吁书中大牧首号召信徒们“尽快复兴爱沙尼亚自治的东正教教会，直接与普世大牧首教区发生关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阐释这一想法时写道：“……即使将来能把对苏联时期的记忆从头脑中抹去，我们仍清楚地知道，俄国巨人的块头和力量依旧会使爱沙尼亚感到威胁。因此我们理解某些担心：如果你们这些信奉东正教的爱沙尼亚人继续受到俄罗斯大牧首教

区的制约，你们就会被认为是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危险邻国的帮手”。

呼吁书里有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直接攻讦，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的存在称作“斯大林暴政的最后残余”。给人留下格外不快印象的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竟然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散布敌意和不信任，把俄罗斯称作是爱沙尼亚的“危险邻国”，认为爱沙尼亚居民把不愿改变俄罗斯教区管辖关系的爱沙尼亚东正教公民看成“与爱沙尼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

这个步骤使国内宗教生活中的对抗更加尖锐。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多次规劝对于大牧首巴特罗缪不起丝毫作用。不能不指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有一种明显不符合东正教大会精神的倾向，就是把在当地有教民的各教区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独断专行地解决教会问题。

莫斯科大牧首意识到业已形成的危险局势在威胁着宗教界，于是三次派正式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去谈判，同时又在莫斯科接待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的代表团。

尽管如此，1996年2月20日，君士坦丁堡依然秘密决定，成立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管辖下的爱沙尼亚东正教主教教区。俄国教会只是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媒体上，才得知了这一消息。

在1996年2月22日会议上，俄国东正教大牧首教区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通过决议：“认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区针对爱沙尼亚东正教社团所策划的行动，乃是反教规的举动，它可能导致我们两个教会中断圣餐祈祷仪式的交往……”在拍发给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罗缪的紧急电报中，会议对类似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在俄罗斯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交往中断后不久，东正教教会的许多首领和宗教活动家纷纷向两教会领导人提出请求，希望尽快停止

这种分裂行动。

1996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达成协议，两个东正教教会都可以在爱沙尼亚继续开展活动，并各自分属自己的大牧首教区。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共有84个东正教教堂，其中有54个隶属君士坦丁堡，6个动摇不定，其余的隶属莫斯科。

1996年8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各派代表团进行新一轮谈判。三天谈判的结果，两位大牧首达成协议。他们宣布意欲同爱沙尼亚执政者谈判，公开决定下属各教堂的合法地位及财产问题。

1996年末，东正教教会历史上这场被媒体多次称为“分裂”的最严重的冲突，终于通过妥协得到部分解决。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一致认为，分属两大牧首教区管辖的各个教堂在爱沙尼亚领土上都可以存在。严格说来，这种决定既不符合宗教法规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并不公正。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教会财产的所有权应该属于谁？过去几年，莫斯科大牧首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不止一次会晤商谈，“共同努力调解财产问题”，但都无果而终。

莫斯科大牧首教会不得不与爱沙尼亚政府当局达成妥协。例如，塔林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曾获准进行民事注册。该教堂获得了法人权，并得到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的特殊庇护，成为直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即直属莫斯科大牧首管辖的大教堂。该教堂合乎教规地成为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的具有自治权（独立权）的一部分。

直到2002年4月，在爱沙尼亚新总统阿·吕特尔就职以后，在爱沙尼亚议员和商人们的压力之下，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才按

章得以注册，在长达9年的过程中，该教会居然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

在获准注册以后，前面提及的财产问题就突出到了第一位。爱沙尼亚内务部向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教会提议，要该教会租赁18幢教会用房，为期50年，每月象征性付租金一克朗（合50美分）。莫斯科大牧首教区一直不同意租赁这些它认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合法私产，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在2002年10月，都主教科尔尼里和爱沙尼亚内务部部长签订了相应的文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爱沙尼亚就没有任何人想到让路德派新教教区租赁房屋呢？

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就爱沙尼亚教会一事产生的争论，乃是两个大牧首教区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典型插曲。在几乎整个20世纪期间，君士坦丁堡教区受到敌视苏联以及后来敌视俄罗斯的一些国家支持，一直不断企图削弱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地位，并且在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推行这一政策。

其结果便是，东正教教会在爱沙尼亚陷入严重分裂：拥有7000教民的50个教区选择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30个教区和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教民总计约5万名到10万名，依然忠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爱沙尼亚发生的这些戏剧性事件，既反映了东正教教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就今日而言，显然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乃是原苏联领土上唯一不曾解体的机构，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团结俄罗斯社会，而且能够团结生活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其次，必须指出，与俄罗斯有着共同边界的爱沙尼亚，所处乃俄联邦最直接的利益范围以内，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取向之一。考虑到这两个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爱沙尼亚推行的扩张政策，不可能不受到敌视俄罗斯的政治集团的强

有力的支持。

2005年1月，如前所述，爱沙尼亚总统阿·吕特尔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得以成行，全靠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从中斡旋。是他邀请爱沙尼亚元首前来参加颁发“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国际基金会奖金的隆重仪式。受阿列克西二世庇护的基金会授予吕特尔“巩固东正教各族人民团结杰出贡献”最高勋章。

正如俄罗斯报刊报道的那样，大牧首对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所表现的关切之情，还有其纯人性的一面。要知道，后来成为大牧首的阿列克西二世1929年2月23日生于塔林，成长在爱沙尼亚。他在当地作为教区神甫开始担任神职，后来又担任过莫斯科大牧首教区塔林主教区的主教。

1990年阿列克西二世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首脑，是俄罗斯最有威信的人物之一。这位大牧首过去和现在都在尽他的一切努力，以求调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因为最近15年来，两国关系相当复杂。

阿列克西二世积极参与莫斯科和塔林之间的对话。这种参与巩固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是影响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内宗教政治态度，促使俄爱两国接近的重要因素。

在结束这段有关东正教在当代非常“民主”的爱沙尼亚的状况的文字时，我想引用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一段话：“只有同母亲——俄罗斯教会团结一致，东正教在爱沙尼亚才能获得安定、繁荣和精神上的成长。东正教在爱沙尼亚的全部历史，以及我在爱沙尼亚主教教区担任都主教职务近30年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犬儒主义

近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局，以及它们的西方庇护者，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可以称之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在2005年5月的节庆日子里，当莫斯科纪念这一对于我们和全世界都堪称神圣的日子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却表现得格外地露骨无耻。

我已经提到过，布什此行是这样安排的：在到莫斯科访问之前，先在拉脱维亚着陆，向那里刚刚诞生的民主致以应有的敬意。据他说，那种民主可以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羡慕不已。他甚至许诺，一旦遇到有“大国”威胁，美国将提供帮助：不必心明眼亮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里指的是俄罗斯。

此次出行前夕，布什曾接受立陶宛电视台记者专访。他感谢立陶宛总统为向邻国扩大民主所作的努力（这里指的是在乌克兰发生所谓“橙色革命”时，亚当库斯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他对白俄罗斯内政的经常干涉）。记者向布什问道：立陶宛人在这个地区里还能做些什么？

布什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我真心感谢总统在乌克兰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认为，当立陶宛领导人号召全世界注意乌克兰的自由运动时，这是个重要的时刻。的确，第二轮选举，在自由运动中是重要关头。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总统。

立陶宛是一个经过多年暴力后能够达到目的的极好范例，立陶宛人现在自由了，能够表明他们正在提高经济，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且，解放以后社会变得活跃了。有一段时间很困难。从共产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度是困难的。因此，立陶宛政府要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经历过同样遭遇的其他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我为立陶宛骄傲，把立陶宛称为友好国家。

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您打算与普京会晤。您会向他重复自己

说过的话，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占领吗？”布什是这样回答的，他的回答说出了心里话：

是的，当然要说。我在斯洛伐克对他说过，据我的看法，他必须明白：我的朋友们，波罗的海各国的元首，心里很悲伤。他们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值得庆祝的重大理由。这一点有其原因。当时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这些话。

你们的总统决定不到莫斯科去。为这个决定，我尊敬他。波罗的海的每位国家元首都应该采取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也是困难的。我尊重所有这三位领导人的决定。我也是这样对普京总统说的：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极大的不安。人们不认为这是解放的时刻。我希望他能与波罗的海国家合作。如果周边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国境周边的民主越多，国家就越是和平。因此对于很多出身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天既甜蜜，又苦涩。顺便说一句，许多立陶宛出身的美国人一方面对于美国战胜纳粹感到满意，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祖国沦入了搞迫害的共产主义制度之手。

这次答记者问再次清楚表明，在当今世界，不论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新独立的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到处都在把自己的民主概念强加于人。例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是第一批对伊拉克大选表示欢迎的领导人。而这次大选，却是在外国军队的枪口下进行的，其中美国军队竟有10多万。美国军队与自己的盟军一道，完全是由于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和军事占领，才到了那个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领导人承认1940年他们三国在一定数量红军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具有合法性，而红军当时却是经过这些国家政府同意，才在那里驻防的。总而言之，这些领导人行事的原则，完全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

看到这样一些声明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面

对一系列重大的新事件。尽管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领导人曾对克里姆林宫下过保证，但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北约基地正在猖狂活动，它们武装的毒矛正直接指向俄罗斯的心脏。如果俄罗斯在经济上虽得到了加强，但与此同时它的敌人却由于世界观的愚蠢和政治野心失控而把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地搞得血流成河，那俄罗斯人的这种行为是得不到宽恕的。

最近时期反俄行动愈演愈烈了。抓住任何因由——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国家通过一个什么必要的法令，或者车臣出了什么事，都会导致到处发表声明，而世界上相当有影响的一些媒体，则立即会来一个仇视力量总动员，展开全线出击。

2006年1月27日在斯特拉斯堡（法国）召开了欧盟议会全会的例会。尽管俄罗斯代表团和一些欧洲国家提出反对，全会还是将“关于对极权共产主义制度所犯罪行进行国际谴责的必要性”问题列入了议程。

当这个问题在斯特拉斯堡进行审议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抗议欧盟议会反共行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约有二十几个欧洲共产党和左派工人党来到欧洲宫墙下，高举“不要麦卡锡主义，不许反共”的口号。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和希腊共产党的代表以世界上73个共产党、左派工人党的名义，向欧盟议会的代表荷兰人列奈·林丹递交了正式抗议书，表示反对审议反共的决议草案。

在平静、祥和的斯特拉斯堡出现几百名高举红旗的人包围欧洲宫，这一事实本身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休克效应。近15年来，欧洲报刊，当然也包括俄罗斯报刊，是那样地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要埋葬共产主义，故而斯特拉斯堡的一月事件才会搞得欧洲时至今日仍不能从惊恐中苏醒过来。

事态的发展后来是这样的。在就瑞典议员约·林德布拉德的报告进行辩论之前，俄罗斯代表团和欧盟议会的“联合左派”小组建议把问题退回去进一步加以研究。70名议员支持了这个倡议。但建议却被大会以微弱多数（81票）冻结了。

不过这一事实表明，在欧盟议会决定这个问题时，意见并不一致。该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赤裸裸的挑衅性质，他们希望把问题向后拖。

但是，操纵这场可耻闹剧的幕后木偶提线者却坚决要把计划进行到底。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草案，而且开始了辩论。报名发言者多达60人。可是远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发言的机会。欧盟议会主席的辩论安排，使得反对决议的人们不能畅所欲言。报告人歇斯底里地向听众灌输一种思想：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地球上的剧毒”。

主张通过这一决议的人当中，积极性最高的是我们的东欧邻居。尤其热心的是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格鲁吉亚和保加利亚的欧盟议会成员。这种热心永远是“新信徒”——皈依新信仰者——所固有的。他们拼命想要证明自己对新主子的忠诚，宣示自己与过去的决裂。他们的话语里根本听不到任何能听得明白的论据，只有仇恨、狂妄和蛊惑宣传的混合物。

然而，问题在于今天谁是他们的主子。“老牌”西欧表现得相当克制。那些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主义荼毒的或者曾经比较积极参加过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国家，它们的代表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辩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欧盟议会成员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

有些议员来自曾经加入过希特勒同盟的国家，这些国家曾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过党卫军军团或者别的惩罚部队（还是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国家）。这些议员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目前在国际分裂问题上所处的位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们

是美国公开的傀儡，对于让他们在欧洲的不稳定状态中扮演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十分满意。要知道，美国并不需要一个稳定的、顺利发展的，因而独立的欧洲。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新的东欧附庸国正在极尽其力地起着瓦解稳定的作用。

这样，欧盟议会中的东欧成员在不遗余力地鼓动，而西欧成员却一声不吭，然而也不阻止。因此，表决这个反共文件时，共有99名欧盟议会成员同意，而反对者为42名。不过，紧接着却要让这些右派和俄罗斯的敌人大失所望了，因为他们提出的提案——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具体措施，却未能得到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通过。当该提议付诸表决时，有85位代表支持，50位反对，11位弃权。同意者少于规定投票总数的2/3。

不难发现，在这件事情里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财政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被精心遮掩着。事情在于对“极权共产主义”的谴责，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向“制度的牺牲者”赔偿的问题。欧盟议会主席坚持说，赔偿问题只能以个案的程序提出。

实际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早已准备停当，要对我国提出超出限度的要求，让我国支付“占领”赔偿金。务实的爱沙尼亚人甚至已经想好了偿付的机制。他们都是谦谦君子，可以不要现金，建议只要把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交给他们，让他们砍伐10年即可。在此之后，他们就不会对俄罗斯再有任何要求。当然，新西伯利亚州的森林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看来，我们的东欧邻国之所以下力气，完全有着物质的诱因。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国家也提出赔偿要求。他们会说，把我们从法西斯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不对，赔钱吧。相应的要求在欧洲议会初期的决议草案中已经露出过苗头了。当时，这些要求之所以被删除掉，是因为俄罗斯的强硬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顽固的波罗的海人不想在最近的未来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意味着再次试图对俄罗斯提出审判。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庆祝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原来事隔60年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在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竟不是胜利者，而蒙受了无与伦比的最大牺牲的，竟也不是苏联人民。恰恰是现在，当伟大卫国战争中硕果仅存的老战士们即将辞世之际，居然往他们头上泼开了脏水；同时又在往青年人脑袋里灌输：苏联可不是胜利者，而是罪恶的极权国家，它一度占领过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欧盟议会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审判。但共产主义思想是无法禁止的，它不会死亡。它可以被驱赶到地下，它的拥护者可以受到迫害，但是它却不可能被杀灭。谁的思想同人民的希望离得更近，谁就能取得胜利。而执行者的所作所为，既可能使思想变得更崇高，也可能使思想遭到贬低。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对法制的破坏，已经在党的20大上遭到了谴责。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居然又要来审判我们，而且与此同时还要作出非常出格的结论。如果苏联是一个罪恶的极权制国家，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参与创建联合国，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呢？

通过我国共产党走过来的人有4000万。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方面军的司令，是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是著名作家、演员和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从林丹、林德布拉德之流人物的口中，是不可能得到客观答案的。但即使没有他们的答案也清楚：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俄罗斯，为此才必须彻底败坏它的声誉，把它妖魔化，在它的前身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画上等号。当戈尔巴乔夫说，是他同里根一道在雷克雅未克和马尔他埋葬了“冷战”时，他大错特错了。冷战，今天仍在继续，只不过用的已经是别的方法、别的手段。

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欧洲政治地图遭到了无情的随意更改。西

方在上个世纪中叶曾受到过严重的教训，对此切不可忘记。而西方的朋友——美国——还没有真正尝到过战争的全部可怕的滋味，所以应该制止它，不许它发疯。还有一点：如果受到委屈就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突然蜂拥而起，纷纷互提要求，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重新瓜分欧洲的局面。而历史教导我们，只要出现这种重新瓜分的局面，世界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1 克列沃联合——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结成联盟的协定（于1385年8月14日签署于今白俄罗斯境内的克列沃城堡）。两国王室联姻，成为统一的波兰立陶宛国家。——译者注

2 卢布林合并——关于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联合为一个国家的协定（1569年6月28日签署于波兰境内的卢布林城）。规定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译者注

3 莱沃·保尔斯（1936—？），立陶宛作曲家，乐队指挥。作品有芭蕾舞曲、音乐会乐曲和爵士乐等。——译者注

4 瓦·瓦·拉斯特雷利（1700 - 1771），俄国建筑师，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代表人物。斯摩尔尼宫、冬宫、彼得戈夫大宫殿等都是他的代表作。——译者注

5 安·马·乌皮特（1877—1970），拉脱维亚作家、拉脱维亚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代表作为三部曲《罗别日尼耶克一家》等。——译者

6 雅·莱尼斯（1865—1929），拉脱维亚诗人、社会活动家。代表作为诗集《暴风雨的播种》，《那些不会忘记的人》，《太阳，万岁》等。——译者

第八章 后果：可耻的审判

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了8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其中还担任了4年“人民政权”议会党团的领袖。

国家杜马在从事立法活动的同时，还非常关注国内外政治问题。自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形势也的确让议员们忧心忡忡。

原因有几个：对我国同胞的排斥；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卫国战争参加者的迫害；对苏联及其合法继承人——当代俄罗斯的公然敌视。尤其让议员和国内大多数公众感到气愤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年为从苏联分离出去而指控苏联如何如何残害生命，并提出许多民主口号，可是转眼之间，这些东西都被它们自己践踏在脚下。我看，他们在对待政敌和“非国民”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简直可以与南非曾经实行过的种族隔离政策相媲美了。

在观察近10—15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的法庭诉讼情况并对之进行分析时，我不由想起了耶稣基督的话：“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洁净了杯盘的里面，那外面自然也洁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读书人法利赛人有祸事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种种污秽。”（马太福音第23章第26—27节）这句引自新约的话用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审判是再准确不过了，它正

在当地事实上是在对那些不合政府心意的人实行灭绝政策的背景上展开，被灭绝的主要是那些无地位的民族。不过正如常言所说，这也必将祸及“自己人”。

政治审讯：政敌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宣布独立以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通缉那些与取得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法不一致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然后再对政敌发动可耻的审判。下一步就是迫害那些曾经同反希特勒的同盟国一起战斗，并参与消灭希特勒军队撤退后的残余法西斯间谍机构的老军人。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人民代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尔弗雷德·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首当其冲地被这个渴望立刻变得“民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列入了政治犯名单。

1991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被捕。我想提醒读者，拉脱维亚是1991年9月6日被承认独立的。所以说，鲁比克斯被捕时，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苏联统一国家的成员，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还没有失效。

但是，当时急于掌权的民族主义激进势力非常强大，他们置共和国和全苏的法律以及国际法准则于不顾，连简单做人的体面都不讲，就开始行动了。

鲁比克斯成了这种无原则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他的政敌利用中央的束手无策，戈尔巴乔夫对捍卫全苏利益的无所作为，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彻底垮台局面明朗化之际，立即向他发起了攻击。

再说，怎么能不利用这种局势呢？8月23日正是叶利钦以轻蔑的态度公开羞辱苏联总统兼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个“福罗斯囚徒”的时候。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趾高气扬地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第二天，就承认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一个直观的榜样，也可以说是为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新的统治者很想表现得文明一点，哪怕是表面上，也要搞得有点合法性才行。但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一点了——革命的必要性成了他们的借口。只有得到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才能对全苏和共和国议会代表鲁比克斯实行逮捕。但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导者示威似的根本就不去请示莫斯科。

鲁比克斯被指控有阴谋参与旨在夺取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的嫌疑。很难想象这种指控有多么荒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控夺取自己的政权，同时还要夺全国的权。苏联的政权体制是统一的，鲁比克斯是其官方代表。毫无疑问，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阴谋。

然而，独立后的拉脱维亚的检察长，未来的总检察长，曾经获得过共和国最高奖励“三星”勋章的斯克罗斯金施，居然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说，“鲁比克斯的反苏罪状（！？）已全部得到证实。”

原来，当时就为……莫斯科准备好了所有的侦查材料。不过，这些怪事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先把鲁比克斯列入“参与叛乱分子”，再把他投进“水兵寂静”监狱，然后再说！政治对手也铲除了，手也洗得干干净净，就跟本丢·彼拉多一样！但苏联领导人却并不稀罕这样的爱国者：总统也不回答，最高苏维埃也不吭声，连问都不问——当时他们实在顾不上这么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

了，能保住自己就好！

这种状态并没有让拉脱维亚新当局感到窘困：他们决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狠狠打击自己的主要政敌。他们用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即苏联加盟共和国刑法中的颠覆罪条款，把鲁比克斯定个枪毙的罪，再回避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千方百计坚持把拉脱维亚说成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办法”找到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和法律来解决。为此，1991年8月22日，也就是逮捕鲁比克斯的前一天，他们把拉脱维亚共和国通过的新法律——“颠覆罪”条款的生效时间向前追溯——即从1990年5月4日宣布通过独立那天算起。这样一来，法律获得了追溯效力，这种做法是同国际通行的所有法律规定都抵触的。

用了这种法律上作弊的办法之后，案件进展就“顺畅”起来。仅鲁比克斯刑事诉讼一案，就投入50多名检察官，还不算调查人员和参加庭审的其他人员，其中也包括那些曾几何时宣誓忠于党，可后来又“改换门庭”，致使前后判若两人的前苏共党员，他们都打着“民主”的口号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前代表们表现得尤为积极，其中一些人还是前苏共党员。前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戈尔布诺夫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了他们，此人是前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的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再后来成了议会主席。我记得在1989—1990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的各种场合中总是在向大家游说，拉脱维亚必须发生民主变革。这个两面派以后的下场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相信当叛徒的人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迟早的事。

正如以上所说，法庭判处鲁比克斯8年监禁。他获此漫长刑期是由于思想信仰坚定，因为是他发出了警告：国家将出现空前的社会不公正。而时间证明，这一切都发生了。

立案侦查时，一号囚犯——记者们在其报道中这样称呼——鲁比克斯仍被选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第五届议会议员。我想告诉读者的是，第一届至第四届的议会选举是在1922—1931年期间进行的，在乌尔马尼斯独裁统治时期没有进行过选举，而1940年选举的议会被今天的当局视为非法，就像后来的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一样。就这样，一位由人民选举的议会议员，在其履职期间却从未在议会大厅出席过会议，而是坐到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大厅里。

1996年5月，囚徒鲁比克斯表示同意作为“拉脱维亚社会党”和“权利平等”运动的候选人，参加国家总统竞选。国家宪法对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限制，除了年龄不应该小于40岁而外。这样说来，鲁比克斯完全有权竞选这个职务。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鲁比克斯的这一步棋在执政当局和议会的极右派议员中引起了恐慌，必须紧急制定关于国家总统选举的法案。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坚持迅速审议并立即实施该法案。在他们提交的法案中，明显针对鲁比克斯进行了限制。其中竟可以看到“在监狱服刑”以及“1990年1月13日以后在苏联共产党和拉脱维亚共产党内的作用”等字样。法案送交议会主席团时，立刻被称做“反鲁比克斯法”。带着这些字眼的法律于1996年6月13日得以通过。

鲁比克斯在监狱服刑期间，尤其在组建总统竞选班子阶段，为他请求赦免的信件纷至沓来。1996年3月2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向拉脱维亚总统发出呼吁。过了两天，即3月24日，欧盟议会的议员们也向拉脱维亚总统发来信函。在致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乌尔马尼斯呼吁书上签字的有乌克兰（奥连尼克等人）、俄罗斯（格洛托夫、扎索霍夫、阿卜杜拉季波夫、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以及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法国的欧盟议会成员。

赦免问题一直拖了很久，被专门设置的障碍卡住了。那些决定一号政治犯命运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决不能在选举之前把他放出来。

我想引用鲁比克斯本人在《用鲜花投票.....》一书中的话告诉大家：

拉脱维亚总统贡吉斯·乌里马尼斯根本没有对赦免拉脱维亚共产党领袖阿尔弗雷德·鲁比克斯的问题进行过审议.....

赦免部门不会向总统提交审议鲁比克斯的材料，因为犯人本人拒绝赦免。

虽然鲁比克斯本人没有提交过请求赦免的申请，可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媒体对此也有过报道.....

赦免部门共收到7份请求赦免鲁比克斯的申请。他的母亲、拉脱维亚议会的9名议员、欧盟议会的议员、里加杜马议员小组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都曾请求过赦免鲁比克斯。

还收到过一份由32名普通百姓联署的申请。拉脱维亚议会前议员拉里莎·拉维娜和菲利普·斯特罗加诺夫也提交了申请。

1997年11月12日，国家杜马中散发了鲁比克斯给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呼吁书。我想引用其中的几句话：

我坚信，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对我命运的关心才促使我获得假释，让我在狱中度过了6年2个月零12天之后获得了自由。

祝愿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祝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幸福安康。顺致敬意。前政治犯鲁比克斯。

鲁比克斯虽然坐过牢，但并没有被打垮。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不怕，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就是鲁比克斯事件的整个经过。

1999年2月16日，里加市区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塔吉亚娜·阿尔卡基耶夫娜·日达诺克的里加杜马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日达诺克是一位人权保护者，政治组织“法律平等”的领袖，不仅在拉脱维亚，而且在国外也广为人知。法院满足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要

求，认定日达诺克由于在1990年1月13日以后仍然是该共和国的共产党党员，因此针对原先该党党员所作的政治限制仍适用于她。

1997年里加杜马选举前夕，日达诺克发表声明指出，她是1991年9月10日以前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当时党的活动已被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下令停止。但在当时的司法审查中，并没有对她的里加杜马议员的被选举权提出过异议。

针对“法律平等”政治组织的里加杜马议员日达诺克受到拉脱维亚司法迫害一事，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声明说：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对她的迫害，与她所从事的首先旨在反对侵犯以拉脱维亚为定居点的俄罗斯同胞的政治、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人权保护活动直接相关。这种活动正是由于拉脱维亚当局不断加剧语言、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政策，企图对二战的结论翻案而引起的。1998年末至1999年初，日达诺克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定居在立陶宛境内操本族语言的俄罗斯居民的合法权利而发表演说，此后不久就遭到了司法迫害。

国家杜马对日达诺克的判决根据表示怀疑，指出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选举法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矛盾。该公约规定，不得无端限制每个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护法机构还破坏了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保护公约。国家杜马呼吁国际社会在日达诺克的问题上，不要忽视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破坏与人权有关的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要求拉脱维亚领导者立即停止对里加杜马议员、“法律平等”政治组织领导人的司法迫害。

1999年12月15日，拉脱维亚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不顾舆论反对，批准了里加区级法院当年2月16日的判决。2000年2月拉脱维亚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驳回了相关的上诉。这样一来，该案件的国内审理程序全部结束。日达诺克不仅被剥夺了代表权，还被没收了所有财产。

拉脱维亚人权委员会准备向欧洲法庭上诉。该社会组织认为，这是对著名人权保护者日达诺克的迫害，是当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所代表的政府机构清除政敌的危险事例。2000年2月23日，日达诺克一案的材料被提交给欧洲议会安全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斯图鲁。

为了强调拉脱维亚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敌的态度，以及它如何利用法庭达到反民主目的的手段，我想援引出生并生活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诺夫几年前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的一篇报道，标题叫做《我曾蹲过拉脱维亚四座监狱》。

1992年初，在斯米尔诺夫倡议下，成立了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其任务非常明确——维护拉脱维亚境内俄罗斯人的权利。拉脱维亚当局强烈反对该社会团体，指控其成员是沙文主义者，“莫斯科的爪牙”。俄罗斯公民联合会曾为俄罗斯在拉脱维亚开设大使馆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一天，”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兰尼赫终于来到了拉脱维亚。可他却回避我们，好像在躲避惹人厌恶的苍蝇。他更愿意骑骑马，参加啤酒狂欢节，过上流社会的生活。我们这些俄罗斯公民甚至不得不在里加的俄罗斯大使馆设纠察线，才能堵到他（真可耻！）。这引起了拉脱维亚报纸的幸灾乐祸。”

1995年斯米尔诺夫由于一场事先安排的挑衅而被捕——喝醉酒的警察侮辱他的妻子，把她的手臂扭脱了臼，还给她戴上手铐。斯米尔诺夫像任何正常的丈夫一样，开始保护自己的妻子，他扑向施暴者，把他们赶跑，然后自己躲了起来。过了四个月，斯米尔诺夫在父亲的葬礼上被捕。他由于袭击警察而被判处3年监禁。

斯米尔诺夫在拉脱维亚的四座监狱里受尽了精神折磨，但保全了生命。他给总检察长写申请，要求把他这个俄罗斯公民引渡到俄罗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97年12月，他被专人押解到普斯科

夫。

斯米尔诺夫被问及：俄罗斯护法机构是否也会这样干？他回答：

我想不会。这是拉脱维亚的特点。1991年8月事件时，他们已经用过这种手段。当时他们侮辱里加特警队军官的妻子，也是用这种手段挑起了冲突。

我想，俄罗斯的护法机构与他们完全不同，也干不出这种卑鄙的勾当。不仅俄罗斯不会，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都不会这样做。只有拉脱维亚才干得出来。因为那里仇视人类的思想体系已经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

采访结束时，向他提了个问题：“难道俄罗斯这种腐败还少吗？”他给了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

非常多。但是，首先，俄罗斯没有国家级的民族主义，这可是一个火药桶；其次，俄罗斯是一个大海洋，大海洋能够稀释污水。而拉脱维亚只是一个小水塘，小水塘很快就会变成臭水坑。

我在本书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章中提到过两位优秀人士的命运。1994年1月，在苏联的毁灭者之一舒什凯维奇和西方特工的协助下，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科拉斯·布罗卡维丘斯和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部长尤奥扎斯·叶尔马拉维丘斯从明斯克被强行带走。1月15日，他们被送进卢基什克隔离审查。审查持续了约3年，直到1996年10月才开庭。调查材料共计350卷，登记的受害者达数百人。对他们提起的公诉要求长期剥夺他们的自由，甚至要处以“极刑”。在对他们进行评价之前，应该看看主要问题——指控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于1991年1月在立陶宛阴谋夺权的罪名是否成立。

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在其行动中依据的是“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经成为独立国家”这一虚构的前提条件，而不是1991年9月6日戈尔

巴乔夫代表政府签署的允许立陶宛共和国独立的文件。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在共和国全境废除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之后，读者还会记得，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的苏联总统令，宣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有与苏联宪法相抵触的单方决议法律上一律无效。

1990年—1991年上半年，苏联公民护照在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还是有效的，所有持该护照的人都是法律地位平等的苏联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在审查期间，无论是布罗卡维丘斯，还是上述“案件”的其他被告人，都不能对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出现的政治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承担个人责任。

对布罗卡维丘斯提起公诉的依据，是立陶宛共和国刑法中的一系列条款，而且主要是“建立反国家组织并积极参与其活动”的条款。“反国家组织”的说法居然还适用于1991年8月22日前作为苏联共产党下属组织进行合法活动的立陶宛共产党。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切岂不是荒唐！不但如此，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对立陶宛共和国刑法进行修正和补充的专项法律，换句话说，在此期间通过的法律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的，因为当时在全国境内，包括在当时加入苏联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有法律效力的是《国务罪刑事责任法》。单独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无权对这部全苏刑法规定进行修正、补充或取消其效力。

1996年，即在庭审开始那年的12月，俄罗斯媒体上刊登了一份俄联邦法学界针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被立陶宛共和国法庭追究刑事责任一案的“起诉书结论”提出的意见书。

我应该向读者表示歉意，因为我要用较大篇幅来引用此文件中的一个部分。但这是个原则问题：立陶宛当局究竟有没有权审判这些

人？请看：

多卷本起诉书的目的是要让舆论界相信，立陶宛共产党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而从事破坏活动的组织，所以其领袖理应受到指控。为此，起诉书引用了几十个“证据”，主要是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呼吁书。

既然这样，按照起诉书结论的逻辑，布拉扎乌斯卡斯总统也应该被认定是外国间谍，因为他也曾领导过共和国的党组织。

当局无视政治党派的宪法地位，将党派成员当成罪犯起诉，本身就是对共和国宪法的破坏。

刑法不具追溯效力，不允许加重处罚，或另外规定新的处罚，这些原则都是举世公认的原则。但立陶宛当局却拒不接受这些原则，对从前合法履行职能的人员进行迫害，这是对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的破坏。因为按照该条款，根据行为发生期间的国内法或国际法，并不能认定此种作为或不作为是犯罪，也不构成刑事犯罪。

起诉书结论强调，在该结论所指涉的事件和事实发生期间，立陶宛和苏联曾经互为外国。这不仅与客观现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当时实行的联盟法、共和国法和国际法（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起诉书结论中所描述的事件与事实，是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单方通过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法令的结果。按照当时的法律，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是苏联公民，都有义务履行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这一事实不容怀疑，因为当时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恢复独立的法令，而通过这样的法令是在当时苏联和共和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之外发生的。

按照所有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公平的原则，只有在国家获得了独立，国家制度形成之后，才有可能对反对国家独立的行为提出诉讼……

但是，起诉书结论中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的所有指控，都发生于此前的阶段，所以不应受到追究。我们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状况，追究以上人士的刑事责任，是与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相抵触的。

尽管俄罗斯法学家们都说，这一可耻的审判本属无权作为之列，但判决书还是被宣布了。笔者作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向俄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俄罗斯的一家报纸上：

据我所悉，今年8月23日维尔纽斯将对人们所熟知的布罗卡维丘斯等人的案件进行宣判。毫无疑问，这个诉讼带有政治色彩，因此，尽管法庭缺少证明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有罪的证据，他们所有人显然仍将被宣判有罪。俄联邦公民斯塔尼斯拉夫·米茨凯维奇就是此案中的被告之一。

国家杜马在三年过程中曾多次对这场政治审判表示谴责，向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向欧盟议会发出呼吁。这对立陶宛当局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他们对被告人进行公开迫害。

遗憾的是，近期发生在立陶宛的类似政治案件表明，立陶宛法庭实际已沦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因此就无法指望其立场能具有客观性。

本人认为，目前，当该案庭审的决定性阶段到来之际，需要一股特别强大的势力来阻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作出严厉判决，因为这些人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立陶宛的亲俄罗斯力量。

被告中的两个人——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没有加入立陶宛国籍。为此，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在对他们的保护方面，显然应该承担某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希望俄联邦外交部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8月16日在国家杜马演讲时表明的保护我国境外同胞的政治路线，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防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被告进行司法迫害。

后来的事件证明，立陶宛政府不顾任何请求，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请求，于1999年8月26日在维尔纽斯公布了对所谓“阴谋推翻合法政府”案件的判决，立陶宛共产党前第一书记布罗卡维丘斯被判处移居管教营12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叶尔马拉维丘斯被判8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奥利亚利斯被判6年；“苏维埃立陶宛”广播电台总编米茨凯维奇被判4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社长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判处3年。



1994年2月，对反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的审判。立陶宛共和国最高法院大楼的铁栅中最前面是华沙大学历史学硕士瓦·伊万诺夫。（克罗波夫斯基摄）

审判从1996年10月起进行了将近3年。其实，从立案的第一天起，没有这场司法闹剧，6名被告照样可以被成功地送进监狱。判决书早就写好了。

至于起诉的实质——这6人都被控似乎在1991年1月维尔纽斯尽人皆知的事件中操纵过苏军的行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早在此案结案前一年就曾对新闻界宣称，是他领导了准备实施紧急情况行动，那些日子维尔纽斯军队的行动也

是他指挥的。有人直截了当地问：“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知晓军事计划，是否参与了军事计划的实施？”阿恰洛夫上将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笔者是一个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对党的机关，包括地方党的机关，同部队领导以及苏联高层政治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有清楚了解的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无论是国防部长还是副部长或其他高级军事将领，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执行过地方党领导人的指示。甚至苏联国防部长也不能对维尔纽斯这样的事件独立作出决定。在苏联，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是最高统帅，只有他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怎么做的，以何种形式——应该由他本人诚实地说出来。因为他的党内战友受到了审判，而这些人在1985年信任了他，先是把党内最高职位，稍后又把国家最高职位托付给了他。可他却反过来一个一个把这些人全出卖了，就比如1989年在第比利斯，1990年在巴库；再后来到了1991年8月，又把整个党都出卖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最可悲的、被立陶宛当局及其俄罗斯媒体朋友大肆炒作的“案件”吧。在1991年1月13日夜维尔纽斯电视塔附近发生的事件中，13个受害者全都是立陶宛人。可是在那里被害的“阿尔法”小组的克格勃中尉沙茨基却从来不见有人提起，似乎他不是人。显然，杀死他的只能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某个武装暴徒。

有充分根据推测：部分“遇难者”是当天夜间死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而且是死于车祸。无论如何，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苏联军队杀人，不由得令人想起1989年索布恰克委员会的结论，说什么士兵们在第比利斯用工兵锹砍死了无辜少女。后来查明，原来这些不幸的少女是被格鲁吉亚的“勇士们”踩死的。维尔纽斯发生的情况也有些类似。苏联的检察机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文件表明，没有一个人是被士兵杀害的。

早在1991年9月，立陶宛当局就收到了苏联总检察院对此案的调查结果。如果哪怕有一点点可能证明是军人行凶，全世界立刻就会哗然：准会要求俄罗斯赔礼道歉，还要对死者家属给予赔偿。可是也不知为何，至今仍无法确定究竟谁是杀人凶手……

现有调查材料表明，我过去也说过，子弹不是从前面或后面，而是从上往下把人击中的，是从房顶和距离电视塔不远处的楼房窗口射出来的。起诉书中指出，死者中有一人是被1891年样式的步枪打死的。这岂不等于说苏联军队的士兵使用莫辛式步枪开的枪？更为可信的事实，倒是哪个死里逃生的“森林兄弟”从秘密的地方弄到了一把枪管被截短了的老套筒，于是决定把那把老古董拿出来亮相。众所周知，从1991年秋天起，在西方情报机关的帮助下，“萨尤基斯”已经建立起了武装力量。

立陶宛当局借口案件调查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无法得到阿恰洛夫和其他军人的证词。

维尔纽斯悲惨之夜已经过去了15年，可时至今日，立陶宛当局仍在严密封锁死者的被害真相。为了转移对真正罪犯的怀疑，这些年来一直在对一些跟那次诡谲行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提起诉讼。应该说，迟早我们会搞清谁是真凶：世界舆论也会对维尔纽斯事件给予正确评价。我坚信，这种评价肯定不会对立陶宛极端民族主义分离分子有利——其中有些人目前还盘踞在欧洲议会的坐席上。

真相眼下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开始涌现：奥德留斯·布特卡维丘斯，曾在1991年当过立陶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几年前开口说了真话。他说，1991年1月，不知是谁从维尔纽斯电视塔上向平民开枪。有必要指出，这位先生曾在英国的军事科学院和美国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实习过，1990年任该共和国国防总局局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后来立陶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准备工作。当一切发生时，离苏联政府对立陶宛退出苏联作出决定还差半年。

当阿·皮亚特卡维丘斯同自己的战友兰德斯别尔基斯发生龃龉，开始公开讲述自己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的“功绩”时，1997年夏，布特卡维丘斯便立即因“蓄意诈骗”而遭到起诉，被判处5年半监禁。他明白了这种“暗示”，从此便不再开口。

在他之后，立陶宛还有一个十分了解内情的人，上面也提到过，就是立陶宛著名作家维·皮亚特卡维丘斯，也开口说了话。有意思的是此人现在也正在受审。兰德斯别尔基斯对他提出了起诉，根据是作家在其轰动一时的《傻瓜船》一书中“侮辱”了当今极端民族分离主义领袖的老爷子。作家告诉读者，老兰德斯别尔基斯不仅同盖世太保，而且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过。维·皮亚特卡维丘斯在1994—1998年曾领导过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解很多秘密，为维尔纽斯惨案提供了新鲜有趣的证据。我要再次引用他书里的话。他写道：

1月13日之夜的遇难者应该归罪于兰德斯别尔基斯和布特卡维丘斯，因为是一个人出的点子，而另一个人下的命令，然后，几十个边防兵奉命换上便装，进入了电视塔。从上往下对人群射击的就是他们……我亲眼见到当时子弹碰到脚下的柏油路反弹起来。

直到今天，这份证言也未能够迫使立陶宛共和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根据作家公开说出的真相，去向司法部门询问1991年1月维尔纽斯惨案中立陶宛人的死因。

立陶宛的上诉审判也过去了——维持原判。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的迫害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引发了抗议浪潮。俄罗斯国家杜马各委员会、个别议员都多次向立陶宛领导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发发善心，释放这些老人和病人。

事实上立陶宛又是如何做的呢？请看摘自2000年当地传媒中的一段话：“‘萨尤基斯’武装力量前领导人、政治犯布特卡维丘斯正在立陶

宛监狱中慢慢死去，就连他的政敌都坚持他无罪。”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由于庭审过程已经拖了5个月，在“维尔纽斯1月13日案”中被立陶宛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应该是第一位活不到立陶宛上诉法庭作出决定的人了。这段时间一直是法警抬着他出庭。

在法庭上要求对受审者施以人道，让他死在家中，死在妻儿的看护下的申请干脆未予理睬。眼下巴尔塔什亚维丘斯还在监狱医院，实际上神智已经丧失。按照医生及其亲属的话说，他已经毫无希望了。尽管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已生命垂危，他还是没有同意和“司法机关”签协议，用认错来换取赦免。“请转告同志们，我走了，虽然力已衰竭，但意志并没有垮。”他在最后一次出庭的前一天对妻子说。

俄罗斯社会公众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遭受可耻审判并没有冷眼旁观，无论是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还是在判决之后，许多国家和社会活动家都请求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客观考量当时的局势。从立陶宛当局的正式书面答复中可以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处于政治上隔离的状态。

让我引用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对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回答：

尊敬的主席先生！

今天，1998年7月24日，我收到了您寄给我的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呼吁书和6月28日由您签署的国家杜马对此事件的决定。

我们理解杜马对所有前苏联公民的关心，尽管并不适用于我国公民，因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已经通过决定，指出1940年用武力强加于本地区亦即原住居民的“苏联国籍”不具合法性。至于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两位公民，一方面，他们的罪责由于人命关天而加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人都为

恢复苏联侵略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审判程序实际上也拖得太久。俄罗斯的司法机构在这里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帮助，完全不愿遵守也不同意俄—立两国之间现有协议中的条款。例如，杜马提到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就从未对1991年1月的维尔纽斯事件出具过任何证词。我们由衷地欢迎国家杜马采取一切有利于立陶宛和俄罗斯司法机构友善合作的行动。

关于赦免或更改强制处罚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立陶宛共和国议会统统无权处理。首先，这是属于国家总统的权限，而且赦免的决定只能由法庭宣布；其次，这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主席先生，请您相信，立陶宛共和国议会力求与俄联邦国家杜马达成完全的相互谅解，并将此视为发展两国关系、维护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保障。

向国际组织提出的呼吁也没有得到重视，或者只是回一份公函敷衍了事。2004年末在斯特拉斯堡召开欧洲议会全体会员国大会，就在一月份会议即将落下帷幕时，有290位议员对“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历史学博士布罗卡维丘斯被囚案”发表了声明。该议会机构成员提醒欧洲人权保护组织，由于捏造的罪名，“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立陶宛共产党领袖、历史学博士米科拉斯·马尔吉诺维奇·布罗卡维丘斯教授正作为政治犯在立陶宛监狱受到长达11年之久的折磨。”

欧盟各国议会签署了由乌克兰著名诗人和欧盟议会成员鲍里斯·奥列伊尼克发起通过的文件。签名的有荷兰、希腊、塞浦路斯、波兰、俄罗斯，甚至还有瑞典的代表。在该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家、波兰共和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亚斯科尔尼亚，政见极其保守的右翼分子波兰议长韦廖维斯基。

文件中写道：“乌克兰等国家的议会，以及欧洲议会成员曾多次请求立陶宛领导人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把这位勇敢的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时，欧洲议会还指出，“不能空口无凭地指控囚徒犯有

叛国罪。一个自始至终忠实于本国宪法、忠于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苏联公民，不可能是当时还不被人所承认的立陶宛共和国的叛徒。同时，从具体事实来看，法院指控他参与杀人的判决在法律上毫无根据，证据也不充足。”

应该公正地说，我们的呼吁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里总能找到共鸣。这里援引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贵方发来的请求援助俄联邦公民米茨凯维奇公民的呼吁书一事，我想就白俄罗斯的安排指出以下几点。

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事件中的人质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身陷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与您同样感到忧虑。

白俄罗斯共和国正在尽一切可能，以便使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对这些人作出人道主义的决定。

1999年2月，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大会众议院议员小组向立陶宛议会议员发出呼吁，请他们协助制止对一月事件参与者的司法迫害，把他们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今年5月末得知，布罗卡维丘斯的健康每况愈下，必须立即实施心脏手术，我就布罗卡维丘斯到白俄罗斯进行治疗的问题亲自致函立陶宛共和国总统亚当库斯。

重要的是，国家杜马和俄联邦政府都参与了此项工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使这些人的境况得以改善。

我还想强调说，按照白俄罗斯的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可以生活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

2006年1月13日，布罗卡维丘斯在被监禁12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勇敢战胜不公——这就是他最近15年命运的写照。事实上，他在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所有同事都成功地完成了“前滚翻”，坐到了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的总统宝座上。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中，只有鲁比克斯和布罗卡维丘斯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上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

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们的迫害始于1991年8月22日，当时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领袖和立陶宛议会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决定禁止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于是逮捕浪潮立刻席卷了整个共和国。那些不愿苏联被肢解——认为苏联是所有加盟共和国发展的保障，苏维埃政权是人道主义最高成就的人，都被投入监狱。

布罗卡维丘斯不顺从，不肯像他的战友，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那样去为新主子效劳，而且当上总理后又成了万事亨通的商人。布罗卡维丘斯转入了地下。但是1994年1月15日，正如前面所说，他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一起，在明斯克被立陶宛特工（以总检察长、当今的立陶宛议会主席保劳斯卡斯为首）绑架，带回了维尔纽斯。那次绑架是在白俄罗斯的“民主派”领袖们，主要是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凯维奇（他仍旧披着“民主”的外衣）的鼎力协助下进行的。

当时的白俄罗斯“民主派”拒绝了立陶宛共产党员要求政治避难的司法权力。自然，那天正在明斯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会对这起“国际主义恐怖行动”进行谴责。如今，白俄罗斯的反对党在指责卢卡申科不民主时，宁愿忘记自己领袖的犯罪行为。

新立陶宛当局以捏造的罪名，把昨天的同志关进牢房以后，再从其北约主子那里得到免罪符和在立陶宛执掌政权的“封诰”。欧洲的这些国家，虽然个个都宣称自己“文明”，“讲理”，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种以暴力侵犯真理的行为是犯罪。没有一个国家的或国际的维权组织站出来保护这些无辜的人。时至今日，斯特拉斯堡法庭依然还没有审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就现今立陶宛当局起诉法律根据不足所提出的上诉。

布罗卡维丘斯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坚定，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对自己的荒谬指控。他在狱中表现得也是这样百折不回。但他已是78岁高龄，还动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过他虽年事已高，关押期仍得不到缩

短，尽管在立陶宛有多少无可救药的刑事犯罪分子都可以获得“宽恕”而提前出狱。非但如此，在他动过复杂的手术之后，却仿佛要竭力掩盖什么，或干脆想将他毁灭，总是经常拉着他从普通医院转到监狱医院，再由监狱医院转到普通医院，或者是由传染病院转到监狱医院这么来回转院。在来回折腾的时候，教授的腿突然发炎，险些丧命。

今天立陶宛的“社会精英”不敢把共产党的领袖布罗卡维丘斯从监狱中放出来！他勇敢地忍受了12年的牢狱之灾，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仍旧坚持自己的公民立场。

为了证实我所言非虚，我想请读者看一看1999年11月布罗卡维丘斯从狱中寄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寄来的书籍——《大动荡的十年》（1995年）和《重返政坛》（1998年），我非常愉快地读完了这些书。您的这些书使我感到非常充实。您在这些书中阐述的丰富思想将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和国家发展复杂进程的实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像您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拥护者。我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社会公平。由于我参加了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据说还因为我似乎怂恿了苏联领导人在立陶宛实施武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庭判处我12年监禁，对立陶宛共产党其他政治活动家判处的刑期各有不同。我和我的同志们对维尔纽斯区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和俄罗斯国家杜马其他议员坚持真理和生活的真谛，感谢你们在我和我的同志们一生最艰难的日子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立陶宛人民的社会主义未来，相信立陶宛将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感谢您寄来的纪念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节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节日祝贺。祝愿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将到来的2000年新年快乐，祝您生活万事如意。

谢谢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谢您为保护我做的一切。谢谢您的善良之心。

2006年1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了原立陶宛的监狱囚徒布罗卡维丘斯的一封信。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同志们！我虽因病无法出席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理事会全体会议，但能向你们作书面发言，感到非常高兴。我由于从事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而被长期监禁。但立陶宛资产阶级当局达不到目的，他们无法摧毁我的信念。我仍旧坚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为社会平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立场。在狱中我经受住了复杂的心脏手术，它并没有把我搞垮。我仍旧很乐观，并坚信共产党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活动是正确的。

不久前，一些患有反共狂躁综合征的立陶宛议会议员向俄联邦国家杜马发出倡议，请求恢复对据说应为维尔纽斯悲惨之夜的死难者负责的俄罗斯公民的追捕，其目的就是要再次让俄罗斯感到难堪，重新玩弄自己同胞的民族感情。何况，根据不久前发表的统计数字，已有超过60%的立陶宛人公开表示：“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更好！”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当局还在寻找各种理由，改换方式，使不合他们心意的、有不同看法的人受到经常性的迫害。瓦列里·伊万诺夫的命运就是个例子。

瓦·伊万诺夫生于立陶宛的考纳斯市，受过高等教育，历史学硕士（毕业于华沙大学）。儿子由他抚育，他既当妈，又当爸，因为妻子在儿子两岁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衰老多病的母亲和他的儿子。

1991年11月27日早晨，他在送儿子上幼儿园（当时小孩儿只有5岁零10个月）时被捕，被投进维尔纽斯市预审监狱。当时的立陶宛总检察长保劳卡斯称，理由是“躲避审讯”，逃避对1991年1月13日维尔

纽斯事件的调查。瓦·伊万诺夫以日记的形式，在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监狱里的伙食条件、调查程序、护法机构对被侦讯人的态度、调查期限等等。

“伊万诺夫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在伊万诺夫被捕后过了271天才开始进行——他们竭力寻找用于起诉的条款。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公民如此长时间被关进监狱，既不审讯，也没有结论的事实，并没有让俄罗斯和西方的任何一个护法机构感到不安，新闻媒体上甚至连个声明都没有。俄罗斯司法机构的代表也没有出庭监督诉讼进程。

最终，根据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对伊万诺夫成立反国家组织并参与其中的活动进行起诉。硬给他安上了在1月13日维尔纽斯悲惨之夜杀害一名“立陶宛爱国者”的罪名。但是，由于这起诉讼案过于荒诞，连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国家公诉人都拒绝了这种司法迫害。向法庭提交的所谓建立反国家组织的起诉书也同样荒谬，因为瓦·伊万诺夫是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从1989年起由立陶宛当局正式批准登记注册的组织。

“统一”组织没有任何军事化组织机构，甚至没有工人纠察队队员。该组织只是利用大家都熟悉的政治资源进行活动：罢工、纠察线、示威游行、报纸、传单、群众游行等等。案件材料里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在维尔纽斯惨案中起了组织作用。为了以某种方式公开诋毁“统一”组织的领袖，立陶宛总检察院耍了个花招：把“伊万诺夫案件”和另一起针对苏联爱国者的案件绑到了一起。青年无线电爱好者被指控在1991年11月7日想通过电台向立陶宛居民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4周年纪念日，还差点儿被跟踪到森林里的立陶宛警察打死，因为其中一个“无线电播音员”在实施逮捕时进行了抵抗。警察还以奇怪的方式在“无线电播音员”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支属于1991年7月30日米亚季宁海关检查站某被害人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正如早就料定的那样，法院既无法查明瓦·伊万诺夫和“无线电播音员”小组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他和该案其他被告有联系。此例充分证

明，是立陶宛总检察长帕乌拉乌斯卡斯，以前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捏造了这起案件。

经过76次庭审，控方顽固地要证明瓦·伊万诺夫及其“同案犯”——“无线电播音员”扎戈耶夫、奥尔洛夫、斯莫特金、绍罗霍夫，特警队员博贝廖夫、维尔纽斯市党委书记纳戈尔内和民兵队长康德拉绍夫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犯有罪行，实际上这个共和国当时还根本不存在。

为了对法院审理的那套作风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瓦·伊万诺夫的日记，它登载在前面提到过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

1994年4月19日，星期二，第73次开庭：

今天法庭上演了一出由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导演策划，可称之为《纳粹在谴责！》的闹剧，全长1小时25分。这段时间，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们面前，在我们所坐的笼子对面，出现了41名所谓的社会公诉人，其中有16人要求把我们枪决，其他人要求“根据法律判决”或“赔偿物质损失”。只有一位叫瓦廖尼克的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由于目睹了一月之夜电视塔旁发生的一切，所以说：“如果他们有罪，上帝会审判他们的。我豁免他们。”

对于那16个要求对我们处以极刑的人来说，我们都不是人。按照推理，所有这些“社会公诉人”都支持立陶宛当局的规则：“谁反对立陶宛共和国独立，谁就是‘劣等人’，应该在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好熟悉的动机。在法西斯德国，对政敌持有这种态度，就可以加官晋爵。这不由得又一次让人们想起1990—1991年间发生的事情，想起立陶宛领导人反对苏联的讲演、号召和行动，当时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有义务服从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那些宪法还没有被废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可从未想过要因为他们的讲演和

号召而把他们都投进监狱，对他们立案侦查等等。

1994年4月29日的第76次开庭，对瓦·伊万诺夫作出了判决，认定他违反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被判监禁3年零6个月，在强制劳改营服刑。扣除预押的时间，瓦·伊万诺夫还要在监狱里熬上7个月零21天。和此案相关的其他同志也被处以不同刑期的监禁。

判决宣布几天后，瓦·伊万诺夫被押送到普拉维尼什斯克强制服役，1994年10月6日被释放。

就这样，被判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犯有反国家罪的瓦·伊万诺夫在立陶宛监狱中服满了规定的刑期。

在狱中，瓦·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大使谢尔盖·扎格里亚德斯基的帮助下接受了俄罗斯国籍。获释后不久，他就在自己的出生地立陶宛履行了法律手续。同所有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一样，他也需要居民身份证。

出狱后不久，瓦·伊万诺夫在当地报纸上对记者发表了几次谈话，谈话中表达了自己对立陶宛政治局势的看法。不知是瓦·伊万诺夫在狱中和诉讼中的“同案犯”，还是他这个人让立陶宛当局感到害怕。他们决定摆脱这个“不合心意的分子”。各位一定记得那句著名的警句：“没有人，就没有问题！”

他们建议瓦·伊万诺夫在30天内离开立陶宛共和国，要求他在1995年1月22日之前执行，否则就面临被驱逐出立陶宛，5年内无权再返回该国的危险。这是市移民处亲手交给他的命令。还有五位与“伊万诺夫案件”相关的人，也被驱逐了，他们是康德拉绍夫、奥尔洛夫和肖罗霍夫，以及另外两个已经“被发配”到俄罗斯的人。

立陶宛的媒体当时刊登了共和国著名政治家就伊万诺夫被驱逐到俄罗斯发表的观点。

“瓦·伊万诺夫早就应该从立陶宛被赶出去，并把这个问题忘掉。最好能把他和拖延驱逐出境的内务部长罗马西斯·瓦伊特亚库纳斯一同赶出去。”立陶宛自由联盟主席维塔乌塔斯·舒斯塔乌斯卡斯如是说。

独立党领导人瓦立扬基纳斯·沙帕拉斯声称：“伊万诺夫在我国无事可做，再说，他也不想停止自己的反宪法活动。”

“1月13日进行过犯罪活动，而且还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人怎么能生活在我们的国家。”议会中右翼报业的代表拉斯·拉斯塔乌斯科内的观点也是如此。

1995年1月，前“统一”组织的几位领袖伊万诺夫及其同志向立陶宛内务部长递交了对市移民处决定的申诉，并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

1996年5月，伊万诺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出版社为其《立陶宛的监狱》一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该书在国家杜马送给了议员和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伊万诺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有对维尔纽斯1991年一月事件的亲眼所见，表达了他在1991—1994年整个调查和审判期间所持的观点。在参观国家杜马期间，瓦·伊万诺夫会见了“人民政权”议员党团领导人雷日科夫，杜马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及其他议员。

瓦·伊万诺夫很快便感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反响。6月中旬，立陶宛总检察长弗·尼基吉纳斯通过媒体宣布：“目前总检察院正在进行认真调查，其间将对瓦·伊万诺夫在杜马的讲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将决定追究伊万诺夫责任的问题。”

1997年7月，维尔纽斯法院“以诽谤罪”判处瓦·伊万诺夫强制劳役一年，并向1991年1月13日的7位死难者家属偿付民事诉讼费7万立特（约两万美元），因为这些家属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像法庭“查明”的那样，伊万诺夫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那个悲惨的夜里死于苏军之手。判决宣布后，法庭立刻给伊万诺夫戴上了手铐，就像对待

罪恶的杀人犯那样，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1997年9月维尔纽斯的上诉法庭举行二审，仍旧维持原判。这次庭审为伊万诺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大·克里格曼，莫斯科州律师委员会成员。他在发言中对判决书援引的1996年5月21日伊万诺夫发言速记稿表示异议。对该文件进行的研究表明，杜马没有这份东西。那里只有一份新闻发布会的简报。编辑、整理这份简报的人是谁，他转达被告的意见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这一点只不过是表面问题。1997年10月由《立陶宛信使报》刊登的克里格曼律师的演讲才道出了对伊万诺夫的原则态度：

今天谁也无法明确说出那些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丧生的。情况只能根据每个死者死亡情况的详细事实，经法庭依法判决后方能生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判决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根据个人观察和文件来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我援引一个著名的司法案例说，尽管沃伦委员会确定了肯尼迪总统死亡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最近20多年来各种各样人物对其死因的种种说法。1991年1月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一定也会是这样，它将成为历史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司法界人士关注的目标。

判决书中写道，伊万诺夫“做这一切的动机是出于对立陶宛国家的仇恨”。这不符合事实，我的当事人也坚决否认有这种动机。况且，在追究被告责任的命令中和应该详细列举被告人违反法律的起诉书中，也并没有对仇恨立陶宛共和国动机的证明。法庭把这点写入判决书，超出了公诉范围，是文明诉讼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判决书中还断言，伊万诺夫知道立陶宛共和国对所述事件的官方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指伊万诺夫无权对事件作出不同于国家的评价。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这是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的最粗暴的践踏，也违反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

.....上述各点导致的结论是，瓦·伊万诺夫的诉讼案是政治案。作出的判决残酷无情，显然是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

上诉法院批准了对伊万诺夫的判决，它的这一决定是它固执己见的铁证。

1997年9月，伊万诺夫被发配到阿利图斯强制劳动营，当月末，伊万诺夫的母亲收到儿子的来信说可以探视，并可转交食品。10月4日，伊万诺夫的母亲带着小孙子和食品前往探视，但被拒之门外，代交的食品也不接收，因为伊万诺夫不服管教，正在接受惩罚，不许他进入会见刑事犯营区。

的确，伊万诺夫自到劳动营后，并没有进入刑事犯的监管营，因为，正如所知，该营中有300多名刑事犯都感染了艾滋病。此外，作为一名政治犯和外国公民，他又要求当地监狱行政管理部门按立陶宛现行关押囚犯规则把他安置到另一个地区。可是他不但没有得到照顾，反而被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即强制区，半年内失去了所有应得的待遇——他没有暖和的被子、暖和的外衣，不能听收音机，不能收探视带来的物品，不能与母亲和儿子会面。“秋天，牢房里只有15度，阴冷潮湿，每隔10分钟就要走一走，暖和一下——这是中世纪的刑法。”他为此写道。该牢房的面积只有 0.78×2 米这么点大！

让我把瓦·伊万诺夫写给他母亲的信引在下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解释，太恐怖了。

立陶宛、阿利图斯，监狱11号牢房（来自坟墓的信件）

最亲，最爱的妈妈，你好！

这已经是我在这可怕的牢房中写的第二封信了。从面积来看，这就是一座坟墓，差别仅在于这里不是地下，入口处——门旁边有一个臭“马桶”（进门要跨过“马桶”）。这就是我在法庭的抗议中提到的那间牢房。在这间没有取暖设施的墓室里（有一组

暖气片，但它是冷的），有一张可以从墙边放下来摆在地上的板床，它根本不是人睡的床，而是摆放棺材或尸体的停尸台，太压抑了。一股霉味，不见天光，夜间老鼠不停地乱窜——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名字就叫做墓穴。

上次出庭回来后，我在这里又过了5天。我尽量把这里整理得像个人待的地方。想到在这座活人墓里还有别人也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我的心又振奋起来。人毕竟是一种群体动物。甚至进了坟墓，只要一想到旁边还有人待在这活人墓里，一样也在忍受，也在故意跟那些折磨自己的人对着干，只要一想到我在这里离他们不太远，同样也是躺在这么一张灵台上，还活着，还没有被打垮，其实是为了讲原则才把这么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扛到自己肩上，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看守们总是很难过地对我说：“伊万诺夫，转到刑事犯的监禁营去算了。”怎么跟他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说呢？我只能沉默，无言地接受从牲口槽里打出来的那份口粮，等待着每天唯一的乐趣——30分钟的放风时间。那时我就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用力做操，让全身的血液都奔流起来，让心脏、肌肉都紧张起来……谢谢你很快就寄来的这个邮包，有报纸，有油笔芯，还有纸。东西全部收到，看报真是一种享受。

紧紧地拥抱你，吻你。你的儿子瓦列里。

1997年12月28日

按照“文明的”立陶宛政治家的意图，这个人权保护者本该死在那里。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他的命运极其关注，致使他们无从下手。

总之，正如所见，在如此“民主”、如此“文明”的当代立陶宛，只要你向往真理，只要你敢对官方的规定产生怀疑，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不仅你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威胁，就连生命也极其危险。布罗克亚维丘斯对瓦·伊万诺夫的评语非常简短，但含义深刻：“够格的人！”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崇高的评价。

在法院和监狱的通力合作下，一度被视为波罗的海沿岸最强大的左翼反对党目前在立陶宛遭到了彻底镇压。眼下，立陶宛当局没有新的敌人可找，为了清算那些不合心意的人——便开始在自己人当中找上了旧日的克格勃人员。

像外交部长瓦廖尼斯这种昔日立陶宛“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大亨”，如今也列入了被怀疑者的名单，此外还有议会副主席皮基亚柳纳斯、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局长波秋斯（他不久前才就任这个职务），也紧随成功地把帕克萨斯总统“赶下台”的劳林库斯之后上了名单。据立陶宛新闻界公布，仅1989年的克格勃名单上就有324个男子的姓名，其中波秋斯名列第218位；瓦廖尼斯居第289位。预计整个“克格勃后备干部”的名单都将被公布出来。为了认真调查立陶宛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在劳动党成员帕别金斯卡斯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议会委员会。立陶宛共和国的“猎魔行动”开始了！

爱沙尼亚当局和拉脱维亚一样，首先开始对居住在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动手，不仅对他们的社团歧视，而且对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社会活动家进行迫害。为证明此事，我举1992年1月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会长奥列格·莫罗佐夫“案件”为例。

从出生起一直居住在爱沙尼亚的莫罗佐夫（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塔林）拒绝承认爱沙尼亚当局有权根据1992年通过的法律而剥夺他的权利。为此，他和其他数万人一样，被宣布为不合法的人。

1996年，安全警察人员穆鲁来到“少先队员”工厂干部处，之后，莫罗佐夫就被解雇了。他被指控在强制迁出俄罗斯公民沙乌姆亚诺夫多子女家庭时反抗警察，这一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从1996年一直继续到1997年。一桩表面上的日常民事小案子，居然有好几个政治警察的侦查员介入进行调查。莫罗佐夫后来被法庭宣告无罪，因为他只不过

是保护了被警察毒打的少年。

从1997年到2000年，对莫罗佐夫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刑事指控——说他挑起政治纷争，其表现就是莫罗佐夫在参加退休人员纠察线活动时，举的牌子是“打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种族隔离”。这个案子又是由政治警察提出指控的。法庭再次宣告莫罗佐夫无罪。

国籍和移民局于1999年和2000年曾两次向莫罗佐夫发出让他从爱沙尼亚离境的正式命令。1999年8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非法逗留”）的法令，并经行政法院判决，莫罗佐夫入狱20天。其间他一直以绝食表示抗议。过了一年，2000年7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的法令，行政法院又把他送进监狱蹲了5天。他再次以绝食抗争。

在马特维延科与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会见前夕，我作为国家杜马议员，向俄爱政府间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致信，请她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

下面是俄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古萨罗夫给我的回信：

鉴于您向俄联邦政府副总理马特维延科提出关于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主席莫罗佐夫被捕一事，现通报如下。

马特维延科在同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于今年7月4日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爱政府间经贸、科技、社会、人文、文化合作委员会两主席会谈框架内，郑重地提出了莫罗佐夫的问题。她强调说，爱沙尼亚当局的官方行为，其中包括监禁这位俄罗斯公民的行为，带有对俄罗斯不友善的色彩，对俄爱双边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政治和社会组织、我国的个别公民都曾多次致信为莫罗佐夫进行辩护，外交部也发表过尽人皆知的声明。马特维延科呼吁拉尔在决定莫罗佐夫的命运时，体现出友好的意愿。

拉尔确认，在力争使莫罗佐夫得到爱沙尼亚居民身份证的同

时，爱沙尼亚当局还要履行现行的法律要求。从爱沙尼亚方的陈述可以得出结论，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集团对围绕莫罗佐夫发生的矛盾根本不感兴趣。

俄罗斯外交部将根据现有的原则决定，考虑到我国公民和同胞在爱沙尼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调整与爱沙尼亚的关系。

在马特维延科对拉尔强硬地提出停止迫害莫罗佐夫家庭的问题之后，曾经“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地方当局就决定施加经济压力。开始，出于政治考虑把莫罗佐夫在学校里教俄罗斯语文的妻子裁掉了。

莫罗佐娃是学校中最有能力的教师之一，她的学生在俄语和文学奥林匹克竞赛中经常获奖。但是有人却给学校领导打报告，说她教的班级对爱沙尼亚国家不忠诚。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失去了最后一点生活来源。

由于莫罗佐夫不可能找到正式工作，所以家里欠下了数目不小的房费。国家房产局在一年半时间内曾三次约莫罗佐夫谈话，在莫罗佐夫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的申请被拒绝后，又曾三次对他课以罚款，每次的罚款额都是6000克朗。因为莫罗佐夫没有缴纳这些罚金，国家房产局于是把文件转交法庭强制执行。房产部门的官员宣布将把莫罗佐夫的住宅卖掉抵债。

莫罗佐夫一家居住的集体楼房管委会主任收到当局有关部门的建议后，决定通过法院来索债，实际上就是要把住宅廉价卖掉（为了抵债），把一个拉家带口的家庭赶到大街上去。

爱沙尼亚当局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推行将不合心意的俄罗斯人从国内“迁出去”的政策。莫罗佐夫的凄凉事件就是例子。他既没有亲属，也没有住房，更没有生活来源，他甚至从没有跨越过俄爱边境，他真诚地相信，他完全有合法的理由居住在这个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

的国度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额外的奢求。

发生在莫罗佐夫身上的这一事件，就是爱沙尼亚的所谓“非法居留”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它涉及数万人，这些人既不可能，也不情愿按当局的规定来履行所谓的国内居民合法化的要求。爱沙尼亚当局对莫罗佐夫境况的态度将导致一个极端危险的案例，他所触及的是一大批所谓“非法外国人”的命运，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说俄语的少数民族。

对于安全警察来说，爱沙尼亚的抓捕季节还在继续。1999年12月份，塔林逮捕了一位有名的人权保护者，他就是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彼得·罗若克。他曾先后15次被投入监狱。

应该说，彼·罗若克生来就是个为公平而奋斗的战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他在揭露塔林当局的住宅骗局时，就受到过迫害。现在，爱沙尼亚的两面派把苏共党证换成了爱沙尼亚的议会代表证，又在继续折磨他。

1991年以后，罗若克由于经常为遭到野蛮歧视的俄罗斯人打抱不平而多次被投进监狱。1994年他甚至被强行带到精神病院检查。秘密警察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敢同爱沙尼亚国家的镇压机器斗。算他有幸，爱沙尼亚的神经病理学家认定罗若克完全健康。

1995年3月，罗若克曾被强行逐出爱沙尼亚，但是，在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大力帮助下，法院被迫撤销了此项非法决定，使他得以回到家人中间。此外，他还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当局为他支付了补偿金。

然而，卡博（我提醒一下，就是爱沙尼亚的安全警察）并没有停止行动。半年前罗若克又被指控酒后驾车冲向警察的汽车。不过后来才搞清，原来当天晚上他根本没坐在车里，医学鉴定也证明他的血液不含酒精。现在，又有人指控他敲诈勒索。那是个多次用以对付

爱沙尼亚俄罗斯组织的证人。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实际上全靠挑衅者的供词支撑的案件。但问题实际上却比乍一看来要严重得多。促使狠狠整治罗若克的不单单是警察的报复心理，而且还有长期的战略意图。最初的计划是把俄罗斯的这些社会团体隔离起来，可是后来又打算彻底摧毁它们，并以听从秘密警察控制的傀儡机构取而代之。对罗若克这样一个坚韧不拔、意志坚定、无法收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与当局做交易的人进行迫害——这只是镇压措施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经常粗暴践踏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政治犯的人数也在上升，还产生和培养了一批对德国法西斯有好感的人，谁反对他们，他们就跟谁斗。然而，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不但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反而利用这一点煽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反俄情绪，使这些国家变成仇俄地带，沿我国边界建立一条新的“隔离警戒线”。他们一方面经常严格要求俄罗斯遵守“人权”，例如在对车臣匪徒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却又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其实这些国家正在逐渐演变为极权制度，一种看似全新的，实际上被整个人类所谴责的，臭名远扬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些复杂的诉讼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似乎只是对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领袖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彼得·罗若克出身于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和战斗传统的家庭，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的儿子，是这两个民族的化身。他一个，莫罗佐夫一个，还有他们在这三个共和国中的同志们，上面讲到的这些人，都在为说俄语的居民的权力而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们正在为反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和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而战斗。

可耻审判：卫国战争老战士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当局在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迫害，判处其中一些人长期监禁之后，又发动了一场针对过去的老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机构老战士的审讯。

人们很自然会问：这些高龄老人眼下还能构成什么威胁？答案非常清楚：我要重申再重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正在竭尽全力证明，似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被苏联“侵占”的：入侵者就应该受到惩罚，其继承者应该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虽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怀有仇恨，但由于他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其领导人未必敢冒险独自迈出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再次说明，他们是在唱别人给的词儿，都是曲意逢迎欧洲和大洋彼岸朋友们意志的操刀手。因此他们才会闹出一场又一场对卫国战争老战士可耻的审判来。

这种主要针对前苏联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局老战士的诉讼，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都展开了。拉脱维亚开始于1995年，立陶宛开始于1997年，而爱沙尼亚的第一桩诉讼案始于2001年。

我想着重分析一个最著名的诉讼案。1998年8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护法机构逮捕了75岁的退休上校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诺诺夫，因为此人在二战期间曾是游击队指挥官，同拉脱维亚境内的法西斯打过仗。

1944年5月，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处于希特勒警察局监督之下的拉脱维亚卢德金区小巴特村村民把一小队游击队员诱进村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交给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把这些人全部杀害。游击队决定为自己的战友向法西斯帮凶报仇雪恨。当游击队开进居民区时，迎接他们的是农庄主猛烈的炮火。战斗开始了，打死了9人，据说是平民。是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放了用以“自卫”的武器。众所周知，德国人是不会把卡宾枪发给普通农民的，只发给辅助警察。

2000年1月，里加的区级法院宣布二战老战士、前游击队员克诺诺夫是“战犯”，判处他6年监禁。

对鲁比克斯进行的政治审判也是一样，即使是国际法准则遭到明显破坏，拉脱维亚当局也依然要为其所欲为。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讲，法庭根据1993年拉脱维亚刑法条款认定科诺诺夫有罪的行为，在1944年5月27日根本就不应受到刑法的追究。

拉脱维亚当局，特别是司法界人士都很清楚，根据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共同宣言，“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拉脱维亚在退出苏联之后接受了上述宣言，把国际法准则纳入本国法律，并以此确认，此前此项国际法准则在拉脱维亚刑法中缺失。亦即承认：拉脱维亚刑法中规定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只能发生在1993年对该法典作出相应补充之后。因此，依据拉脱维亚1993年通过的“战争罪行”条款对科诺诺夫进行判决，是对人权共同宣言的粗暴践踏，因为该条款对1944年是无效的。

里加法院的判决使许多国家的老战士和群众团体异常激愤。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英雄进行迫害在俄罗斯引发了特殊反响。这项法院判决不仅使老战士，还使各国家权力部门首先是国家杜马感到震惊。国家杜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国家杜马不止一次发表声明和呼吁，指出拉脱维亚当局的犯罪企图是要对国际社会所遵守的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原则加以修正，实际上是企图对二战结论翻案，为法西斯主义辩护。

国家杜马曾多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拉脱维亚的亲法西斯极右势力持续不断的活跃行动，正在把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拉脱维亚当局对俄联邦外交部就拉脱维亚审判反法西斯老战士科诺诺夫所作的声明的反应，证实了拉脱维亚正在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治制度。

国家杜马要求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同任何企图为法西斯主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翻案的行为划清界限，坚持尽快重新审理科诺诺夫案件。

拉脱维亚高级法院就前游击队员科诺诺夫上诉一事认定，该案起诉理由不充分且证据不足。老战士获得了释放。

200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审查并满足了瓦西里·科诺诺夫的申请，给予他俄罗斯国籍。俄罗斯总统指出，这不仅是对个人申请的回答，而是对为战胜法西斯作出重要贡献的军人应有的尊重。

2003年4月，拉脱维亚总检察院再次对科诺诺夫一案进行审理。在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市，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开始再次审理对瓦西里·科诺诺夫的刑事诉讼。科诺诺夫仿佛是在受到命运痛苦的嘲弄，他出生于离这座小镇不远的地方，在那里成长，从那里出发参加游击战，成为游击队优秀的爆破手，颠覆过约20辆法西斯的军车。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竟又在那里作为战犯坐在了被告席上。

2003年，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对经受了诸多磨难的80岁的卫国战争老战士、俄罗斯公民瓦西里·科诺诺夫的案件作出判决。这一次法院复审把对前红色游击队员的战犯起诉改为……“抢劫”起诉，“由于时间过久”，科诺诺夫没有为此受到惩罚。

在讲述这个对现代拉脱维亚来说很典型的科诺诺夫“案件”时，最后我要引用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的话，他曾多次发言为这位老游击队员进行辩护：

对于这位把青春贡献给反法西斯斗争的老人，还要把他折磨到什么程度呢？！里加居然卑鄙到了试图修改纽伦堡结论的地步。可是俄罗斯呢，身为这个过程的参加者之一，却一言不发。难道上一次战争中的英雄已经被人遗忘了？难道我们为了西欧国家的自由而大量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浇灌这些国家土地的事实

全都被遗忘了吗？！还有一件事也非常奇怪：一个迫害解放者老战士，为刽子手帮凶洗刷罪名的国家，西方居然要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对它的恶行无动于衷。或许，在富足的，温情脉脉的欧洲，奥拉杜尔、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贝格别森这些集中营，都已经被遗忘了？！也许对于欧洲来说，苏联、英国、美国解放者国家的士兵的功绩已经成了远古的历史了？也许他们觉得往日党卫军拉脱维亚特种兵团的人今天搞的阅兵式只是化装游行，对他们不必在意？不，任何人都无权忘记这一切，无论再过多少年也无权忘记。

当然，如今的时代要人道得多了——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年轻的游击队员科诺诺夫要是落到法西斯手上，还不得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不经审判就得上绞架？现如今在“民主的”拉脱维亚，对残疾老军人“充其量”不过是在法庭上迫害迫害而已。

我想提醒一下，科诺诺夫是俄罗斯公民！我曾多次呼吁我国领导人对那些侵害我国同胞权利，通过法庭对我国老战士进行迫害的国家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包括经济制裁。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居住在独联体和独联体国家以外的成千上万名我国公民应该相信，俄罗斯没有忘记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否则，那些活着的人不会原谅我们，牺牲的英雄们也会诅咒我们。



2000年5月，三国总统普京、库奇马和卢卡申科视察普罗霍洛夫卡纪念建筑群。陪同视察者为雷日科夫和萨夫琴科。（基利曼摄）

另一位名叫瓦西里·基尔萨诺夫的85岁的前游击队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拉脱维亚接受审讯时心脏病发作了。在法庭看来，这位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和前线战士被指控战后参与了非法把该共和国居民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瓦西里·基尔萨诺夫案件始于1999年11月，他当时就遭到逮捕，并一直到死都在押。尽管他重病缠身，但拉脱维亚司法机关仍然不肯放过老人。直到这位前线战士去世，才为这起“案件”画上了句号。

还有一起针对83岁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古拉·拉里奥诺夫的审判。起诉的罪名是种族灭绝，由于他参与了1949年把500人从拉脱维亚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被判处5年监禁（检察长要求判8年）。战争年代，拉里奥诺夫在拉脱维亚步兵师同法西斯分子厮杀，负了伤，还荣立了战功，这些对拉脱维亚法庭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实上是，迁徙出境的决定并不是拉里奥诺夫，而是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和检察院作出的。

受到司法判决人员的名单很长。有该共和国前国家安全部长阿里冯斯·诺维克斯，1908年生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死在狱中。有米哈伊尔·法尔布图赫，也是前肃反工作人员，残疾人，服满了两年的刑期。有叶夫盖尼·萨温科，被判处拘役1年零3个月。有尼古拉·泰斯、

雅尼斯·基尔施泰因斯和特洛菲姆·雅库绍诺夫，他们都在等待法院审理。

在拉脱维亚，“猎魔行动”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执行军务和公务的人。但该国的法西斯刽子手却仍旧逍遥法外。难道拉脱维亚当局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战争期间屠杀了几十万平民和战俘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战争期间参与屠杀3万平民的纳粹战犯卡雷斯，是拉脱维亚法西斯分子阿莱斯手下的保安处拉脱维亚警协队的刽子手吗？

为了纪念加入“文明欧洲”这一重大事件，拉脱维亚在列斯滕这个小地方为党卫军兵团修建了一个纪念性建筑物，开工典礼时还伴有军乐队和男声合唱队的演出，并通过电台和电视进行现场直播，拉脱维亚文化部长也公然出席。他们就是这样，以示威和挑衅的方式对纽伦堡法庭所明确认定的党卫军是犯罪组织的历史决议进行修改。

欧洲却在沉默！

为了让历史事实服从于自己的需要，单方面先入为主地评价史实，2002年6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关于爱沙尼亚占领制度违法行为”的文件，其中苏联强力机构在共和国的所有活动都被认定为违法。

根据这个文件，共和国护法机构从2002年9月起开始对年迈的肃反工作人员老战士提起刑事追诉，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一样，宣布他们犯有“反人类罪”。

第一个坐在审判席的是爱沙尼亚前肃反工作人员，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老战士，77岁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稍后，以同样罪名被起诉的是尤里·卡尔波夫，也是俄罗斯人；

第三个——还是俄罗斯公民，斯捷潘·尼科耶夫。在爱沙尼亚法律面前，他们三个人都要为参加1941—1949年的迁徙出境行动和与武装匪徒和法西斯帮凶“森林兄弟”作斗争的行动受到惩罚。

从母系来看，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是俄罗斯人，在独立的爱沙尼亚执政者眼里，他的“罪行”又加一等。1953年他担任民警局长时，曾下达过消灭抢劫当地商店，以恐怖手段恐吓百姓的匪徒的命令。如今的爱沙尼亚却以他下达过消灭这三名今天被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恐怖分子和“森林兄弟”的命令而对他提起公诉，并威胁要判他8—15年。目前别纳尔特得了中风，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无法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在正式声明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爱沙尼亚，“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国内各种事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主观评价”占有统治地位。

或许，有人能见到或听到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西方监护人中，会有人出面也就这种状况说点类似的公道话？我想，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我再就这个题目，简要地提一下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1999年6月，法院对刑事案“人民保卫者”一案作出判决，判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巴尔托谢维奇、库拉金、苏里宁、沙卡里斯监禁，因为战后年代他们曾同武装匪徒“森林兄弟”进行过战斗，保卫了立陶宛苏维埃人的和平劳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死在了立陶宛的监狱里。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检察长克列姆波夫斯基，以及前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一些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在开庭前就已经故去。

在为本章的叙述进行总结时，我想再次强调说明：上世纪90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初都是些打着民主旗号为主权而斗争的人，后来他们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开始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行

迫害，对他们提起政治诉讼。90年代下半叶，他们开始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老战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加盟共和国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大肆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控告。与此同时，却对德国法西斯帮凶们“平反昭雪”，对他们的“功绩”予以肯定。在此期间，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不断壮大力量，他们在新一代和国际社会的面前，给苏联拯救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事实抹黑，竭力否定这些国家在加入苏联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水平的事实，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入侵者”。

不，谁要是不想学习历史，也不善于学习历史，就无法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遗憾的是，为此受到惩罚的总是普通百姓，而那些入，却以人民的名义掩盖个人利益，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解。

这些先生忘记了哲人在圣经中说的话：“你们怎样议论人，也必怎样被议论。你们怎样度量人，人也怎样度量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1—2）

第九章 “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¹

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乌克兰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共和国由全国公认比较得力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领导，日子比较好过，并没有率先大肆宣告变革开始。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首先必须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当成熟的必要性，在实行起来时居然会成为威胁到苏联存在的整个政治基础的一颗地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关于“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不过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睐的西方在努力表现一下自己罢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号下追求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反苏目的的运动、阵线，长期以来在乌克兰未得到广泛支持（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拉木图、费尔干纳、杜尚别）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当“教师爷”的密使们的定期来访，使当时还不敢公开发表言论的“独立斗士”们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这些运动还都披着拥护改革的外衣。

甚至当时已经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鲁赫”（乌克兰人民改

革运动)在其纲领中也声称,它是“全民赞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创造性的党所发动的改革的体现”,是“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新形式”等等。

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大多数州,“鲁赫”都没得到官方承认:人们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给“鲁赫”发放通行证的正是那位改革的总头头。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解除谢尔比茨基中央第一书记的全会(1989年9月份)之后,在街上与“鲁赫”领导人相遇,这些人向他告状,说不许他们登记注册。鲁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说是如何如何爱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建议”不要为自己这批新冒出来的拥护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站在一旁的谢尔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对谢尔比茨基深有了解。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央书记,我喜欢这个稳健的、具有不屈不挠性格和坚定信念的人。

关于这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但我只想谈其中的两件。1986年5月份,当政治局讨论反酗酒政策决议草案时,他所持有的是相当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草案的害处要比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他和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笔者,都是属于少数派,“不理解时代的呼唤”。

他不喜欢廉价的民众主义——领导人搞所谓“深入民间”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出色。正如所见,正是他把通行证发给了那些毁灭乌克兰的人。有一个事实为例:谢尔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罗马尼亚举行的一次党代会。当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起立达60次,向报告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我们同机回国时,谢尔比茨基在飞机上对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参加过这次代

表大会后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觉得离开他往回飞的时候，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才叹气。

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那就是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路线。



“鲁赫”成员在基辅群众大会上。（索洛维约夫摄）

“鲁赫”正式登记之后，各式各样的政党和运动有如魔鬼，纷纷出笼，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不过，当时它们还只是刚刚在基辅知识界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诞生。

虽然“鲁赫”也极力想在国内的工业区和农业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对冶金工人、矿工，还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们的许多口号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鲁赫分子决定对“莫斯科佬”的堡垒进行“改造”。成千上万“自由”“独立”的“鼓动家”打着纪念扎波罗什哥萨克500周年的口号，乘坐火车和汽车，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什州、赫尔松州的城市和乡村，为首的便是“鲁赫”领导

人。

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的班杰拉、舒赫维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着民族主义赞歌，闹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吗跑到这里来？闹到最后，群众大会也好，“结盟会见”也好，所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人更干脆，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全赶跑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人似乎对西部人说的话听不太懂：这种话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语，可就是里头有不少词，不少短语和重音，都是乌克兰西部被奥匈帝国和贵族制波兰占领的一百来年中从国外传入的。顺便说一句，当你看乌克兰电视时便会发现，现在的乌克兰语同斯科沃达、舍甫琴科、科秋宾斯基、贡恰尔、特奇纳、奥列伊尼克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巨匠的语言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还不得不承认，在东部，“班杰拉分子”一词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由当地向西部地区派出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去建立村苏维埃、集体农庄、民警机构，去当教师和医生。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受尽折磨，躺在棺材里被运回了自己原来的城市或乡村。从那时开始，乌克兰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现了公开或不公开的反抗的影子。

遗憾的是，煽起反目、号召从莫斯科“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脱离苏联（请看，这一切不是都被戈尔巴乔夫自作多情、引以为荣的多元论证实了吗？），先取得经济独立，继而是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均未被苏联宪法、已经通过的各项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级党委警告说，局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却认为这是对改革怠工，是危言耸听，等等。

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

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中央广场上和体育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个要求州委下台的群众大会，这股风席卷了乌克兰的许多州。那些由于仇恨变得野兽般凶狠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听众如醉如狂。如果有人发表几句正确看法，疯狂的群众便会有节奏地高喊“格季！”（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耻！可耻！可耻！）。请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

共和国内出现的局势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可还有更加火上浇油的事：中央各报的特派记者接到指示，凡有状告州委书记的材料，都作为急件处理，发在头版头条。材料只要一发表，再辩解也是白搭。看来谢尔比茨基算是看透了这种“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苏共中央在选举前夕为“鲁赫分子”提供了一张有力的王牌——通过决定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工资，甚至还公布了新的工资额。顺便说一句，我是政治局里少数反对提高工资的委员之一。尽管提出要政府也这样做，但我拒绝给苏联部长会议下属机关涨工资。

这样，在短时间内，党的干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琐细的工作，放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泡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

会上，为解决罢工问题而烦心。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头一次以差额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反共的候选人不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还为乌克兰印制了“揭露”党政干部们的宣传画、标语口号、传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境外民族主义中心得到源源不断涌入的物资。

在乌克兰各民族主义机构团体组织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促进乌克兰脱离苏联。比如，1990年，多伦多成立了“援助乌克兰慈善基金会”、乌克兰—加拿大“救助乌克兰”基金会，著名的“鲁赫”领导人乔尔诺维尔、戈伦、卢基扬年科等都是理事会成员。在艾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艺术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挂靠了一个所谓的“援助乌克兰科学发展永久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乌克兰新一代领导人”进修提供资金。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加拿大“人民运动（鲁赫）拥护者协会”，下设13个分部。

民族主义报纸《胜利之路》1990年12月份报道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组织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前乌克兰起义军军人……对乌克兰主张独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还列举了这一“援助”的某些数字：“仅1989年，便为乌克兰各种事件和斗争的需要拨出近40万美元，其中为采购必需的技术手段拨出5万余美元，为同乌克兰爱国主义人士保持定期联系拨出15万余美元……为直接帮助乌克兰个别活动家和组织拨出近5万美元。”

为数众多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都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经费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国乌克兰侨民中央代表处”简报（1990年第2期）就报道过为乌克兰个别“护法人员”筹集“捐款”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人对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谓的“救

助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加拿大基金会在《新路》报上（1990年11月3日）便报道过“捐款”的消息，从1千到100万美元都有，在结尾处又补充道：“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共和国出现的这一局势，使我们可以公开从事旨在使我们祖国摆脱莫斯科，获得经济、文化、政治独立的活动”。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的内务部，还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类粗暴干涉内政的活动。

获得这些组织和美国类似组织资助的，主要是“鲁赫”、乌克兰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反对运动，以及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些地方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节目，对那些最卖力气的“斗士”——人民代表候选人——提供支持。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在当选为代表之后，都参加了“跨地区代表组合”，成为瓦解“帝国”的热心领路人。不论是在全苏电视台，还是在共和国电视台，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欢迎，给大家出主意，教大家如何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为自己“扬名”，利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在大家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不过他们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的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在1990年3月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位置，几乎被“鲁赫”和其他反对派运动的代表囊括一空。

直到此时，“鲁赫”也没有成为向戈尔巴乔夫下过保证的“改革派”同盟者，而是明确宣布了它的反共方针，弹起了乌克兰必须退出苏联的调调。

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也许是因为还记得总书记“建议”的缘故吧，竟作出决定，将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交到了反对派代表的手里。这大大加强了他们进行宣传、把自己

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

就在就苏联命运于1991年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的筹备期间，假面具被揭下来了。这一天，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提议，决定对共和国居民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您是否同意在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基础上，乌克兰应留在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内？”这个措辞本身就“有点那个”。但更重要的当然是公决和测验的结果。

这时，已经出现的15个政党和运动，公开展开宣传活动，反对保留苏联，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与他们对抗的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一个党。共和国城乡充斥着抨击苏联、要求乌克兰退出苏联的材料，似乎乌克兰正在遭到“帝国主义中心”的掠夺。这些材料的作者引用了一些数字，证明共和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甚至同欧洲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试图以此使人民相信，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跟欧洲一样的生活”。

反俄的火焰在燃烧，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口边挂着白沫力图证明，“莫斯科佬”会吃掉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所有人耳朵里都可听到一种断言，每年中央从乌克兰经济中抢去数额高达1000亿—1200亿卢布，出产的粮食有一半都要被运走。

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该共和国科学院学者进行了相应的计算，证明上面提到的“掠夺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被“掠夺”的东西竟高出该共和国实际资源3—4倍。实际上这些资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共和国自身。同时学者们还指出，共和国若单凭自己的资源，石油只能满足本身需求的8%，天然气只能满足22%，林业资源只能满足38%，等等。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石油的年需求量为6000万吨（即超过共和国产量10倍）。如果在外部市场购买石油，按国际价格，乌克兰须支付

80亿美元。至于居民所需商品，共和国的全部缝纫机，40%多的收音机，1/3的摩托车，1/4的洗衣机、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全靠输入。乌克兰只能生产所需纺织品的一半，但为了生产纺织品，所利用的原料（棉、毛）有99%要靠运入。如果说1989年输入的商品（考虑到对外经济联系）按内部价格计算为540.5亿卢布，那么输出的为480亿卢布，或者说，比输入少65亿。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为了分析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又以世界价格重新计算了一遍，结果逆差，即输入超过输出的部分，达50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却没人去谈，只有拥护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的那些人才利用这些数字，借以证明乌克兰“被掠夺”的谎言。

尽管民族主义分子不断发起心理进攻，但仍有2200万公民，或者58.6%的公民，对全苏公决中保存苏联的问题持肯定态度；有2520万人即约66.9%的人对共和国是否应留在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

同时也要指出，在基辅有53%的投票人，在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利沃夫等州，大约有80%的投票人均表示反对保留苏联。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有超过45%的人，在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有超过60%的人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表决结果成了“东部人”和“西部人”相互对立的又一理由。

面前始终摆着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各式各样的建议和论据出现的还真不少。试看以下几个：把加里西亚分出去吧，让它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在克里米亚，人们开始议论把克里米亚州变成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矿工和冶金工人的边区人们在想，1918年不是有过一个顿涅茨—第聂伯河沿岸工业边区吗？西方也在不断刺激分裂主义。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幅名为“2000年的欧洲”的地图，西乌克兰在图上已经以“半独立地位”从乌克兰分裂出去了。

由于经济发生困难，有利于分裂主义的情绪不断加剧。局势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乌克兰的国民经济结构，乌克兰历史上就是全苏重工业的基础，有2/3以上是动力和冶金、采矿业、重型机械制造业。几千万人口还算富裕的生活，许多区的命运，都同这些部门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工作若被打乱，便要加剧社会的紧张。再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又出了事，搞得真是雪上加霜。

极端主义势力不可能不利用这一切。利沃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基辅各大学在“鲁赫”的悉心保护下举行抗议的大学生，在基辅市中心架起帐篷，安营扎寨。在一片“格季”（打倒）的口号声中，已经再也听不到要求克拉夫丘克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下台的呼喊了。而马索尔从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不仅未能使民族主义者的冲击稍有平息，而且更鼓舞了他们要求当局作出进一步让步。群众大会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前面的公园变成了不断举办活动的露天营地，忽而是新出现的民主派在这里宿营，忽而是主张乌克兰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留在苏联的那些人在这过夜。

电视和广播完全实现了“民主化”——它们竭力歪曲乌克兰的历史，不仅给十月革命抹黑，而且也给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抹黑。民族分裂主义者为了30年代的大饥荒和1937—1938年的镇压，要求共产党人悔过，一个劲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涂脂抹粉，特别是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年代的罪恶涂脂抹粉，号召要跟共产党算账——“把共产党吊上绞架！”

拥护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多次向苏联总统、苏共中央呼吁，反对向可能导致乌克兰脱离苏联的局势提供信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的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公开声称，没有乌克兰参加，苏联就倒不了），不断向检察机关、内务部提出维护宪法标准和法制的要求，然而回答却是：“不必惊慌失措”。在西部各州和首都基辅，内务部和检察部门各机关要么

纪律涣散，无力整顿秩序，要么转到民族主义改革派一边，只服从他们，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局势的稳定。

围绕联盟条约展开的斗争，促使政治形势变得尖锐，其结果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取得全苏全民公决授权，将苏联变革为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之后，并未立即着手制止进一步搞垮苏联的企图，其中也包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方面的企图，后者从一开始便对公布的联盟条约草案持否定立场。原来，乌克兰的几位代表根本没参加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时对公众解释说，在推举拥有全权起草法案的候选人时，“法定人数不足”。后来，这使克拉夫丘克有可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这样一个条约对乌克兰不合适。

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众所周知，鱼从头上先烂），之后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9月通过决议称，应该认为签订联盟条约“为时尚早”。

党的各级委员会、乌克兰社会公众对通过的决议进行谴责，但却未能改变局势。

反对派开始组织群众集会，搞示威游行，打出了“不要联盟条约”的口号，煽动罢工，以支持最高苏维埃的决定。西部各州派出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东部各州，喊出“打倒联盟条约——乌克兰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等口号。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制造的这类行动，使劳动集体、共和国许多州的城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甚至乌克兰的苏联人民代表十分愤慨，纷纷发言要求废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针对联盟条约所作的决议，因为它与人民利益、全苏全民公决结果背道而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均被共和国立法当局最高机关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

跟苏联分离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开始显露出来。俄罗斯联邦领导和叶利钦本人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以及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全苏各权力机关的支支吾吾，前后不一，行动迟缓，又促进了这种局势的发展。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某些法令，它赞同脱离全苏经济体系向市场过渡的特殊观点（而这是在自己缺石油、汽油、柴油、煤气、有色金属、木材的情况下提出的！），都在导致苏联倒台。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

1990年7月16日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仅在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一章中，才保留了“苏联”这一名称的缩略语。

经济发展被宣告为“经济独立性”，乌克兰既与全苏，也与个别共和国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却要求“在全苏财富中，尤其在全苏钻石和外汇基金、黄金储备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不仅如此，新出现的乌克兰“民主派”经过向美国的苏联通不厌其烦地咨询，在他们向市场过渡的概念性方案中，加进了可能向俄国提出对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把生产设备从乌克兰疏散到国家东部地区一事提出相关经济要求的暗示。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对乌克兰，对战争的整个进程而言，最好是把共和国的生产潜力留下来给德国使用，以便同苏联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这种情况：当西欧一些国家被法西斯分子占领后，这些国家就开始为自己的占领者干活。

没有人对乌克兰领导层的实际状况下过什么结论。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共同行动纲领上签字的不是乌克兰总理福金或者他的副手。那是一个在国家经济向市场过渡条件下摆脱危机的纲要，是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而在该纲要上签名的，却只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全苏政府的常任代表塔鲁什金。

主权宣言断了其他任何做法的退路，宣言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克拉夫丘克同戈尔巴乔夫为签订联盟条约“讨价还价”的行为基础：“乌克兰主权宣言的原则适用于签订联盟条约”。须知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朗——1991年8月份签署不了联盟条约。这期间克拉夫丘克认准了叶利钦是“称职”的伙伴：叶利钦声称，没有乌克兰他就不签这份条约。而克拉夫丘克也根本没打算将来把条约拿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去讨论！在没有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商量的情况下（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他急急忙忙给议会放了暑假（放到9月份）。中央想反对也不可能，因为宪法第6条已被废除。这样便向后来在维斯库利的勾结又迈出了一步。

这时乌克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91年过了仅半年，国家收入便下降了9.3%，工业生产下降了11%。

生产如此衰退，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民经济资源保障恶化，众多企业因缺乏原材料纷纷停工，合作销售渠道中断，以及不断罢工造成的。

煤炭工业状况尤其严重。到春天，249个矿有58个在罢工。矿工们减少供应煤炭几达1200万吨。共和国煤炭产量降低到1958年水平。仅上半年就有13000名工人离开这一部门，与他们配套的人数则超过78000人。

煤炭工业的生产衰退，使乌克兰国民经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如黑色冶金和电力部门的工作变得不稳定。焦炭不足，废金属供应中断，使整个冶金系统发生混乱。生铁减产3100万吨，钢减产3200万吨，成品轧材减产200万吨，钢管减产26.6万吨。

向发电站供应的煤炭减少近300万吨，致使10—15个大型发电机组停产。

社会领域也受到损失，住宅、医院和门诊部、学前教育机构、俱

乐部和文化宫的投入使用数量急剧减少。居民和住房公用事业系统的燃料供应情况变得紧张。

向消费市场投放商品数量仅食品一项便减少50亿卢布，大量削减了耐用消费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量。价格普遍上涨1.5—2倍，通货膨胀加剧，影子经济繁荣。

反对签订同盟条约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济和消费市场情况恶化，才找到开展破坏活动的土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媒体掌握在并不高明的要搞垮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指出，消极现象跟苏联的存在并没有关系，相反却是同乌克兰“民主派”上下其手的苏联解体，同苏联统一遭到削弱有关。

1991年8月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大多数居民想留在苏联、想同俄罗斯统一的愿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991年8月19日共和国领导人是以在最高苏维埃同苏联国防部代表步兵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会见开始的。双方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建立后发表致人民书并作出种种决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交换了意见。内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协调各项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全，保障经济活力和居民正常生活，防止出现非常局势。

围绕乌克兰共产党展开了主要政治阴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于8月19日早晨向各州党委发出一份密码电报，其中除了传达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签署的密码电报内容外，还提了一些别的建议，其中有这样两句话：“由于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党委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须遵循苏联宪法和法律，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各种文件。”虽然中央书记处当天便从各州委召回了这份密电，并发出另外

几份已经不含有这些规定的电报取代了它，但正是这头一份密码电报成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根据。所有州委均把密码电报送回中央，只有利沃夫州委除外，而这份密电就在这里落到了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手里，并立即将其转交克拉夫丘克。

那些日子，该共和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成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解散各单位党委和党的区委，进占州委，同时一群群极端主义分子号召要“打死”共产党，“绞死”共产党。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乌克兰检察机关按“叛国”罪对中央各位书记和各州委第一书记提出刑事诉讼。

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月25日他曾参加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对政治局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作了修改，但后来却声称他已于8月19日退党。正是这个人不懈努力地促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尽快禁止共产党活动，尽管共和国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苏维埃立法和法制委员会主席以及许多法学家均声称这一行为是非法的。不经法院裁决，便禁止一个政党活动（该党是经由司法部登记的），是一种违宪行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克拉夫丘克也明白。但乌克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却另有打算：乌克兰共产党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障碍，于是他便铤而走险，破坏宪法原则。

这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延续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是一段陷害无辜的时间。1993年8月，案件终因“乌克兰共产党负责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终止。但这时在最高苏维埃当家做主的那些“英雄好汉”们，却依然坚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指示，不肯善罢甘休。

直到2001年12月，乌克兰宪法法院才裁定，乌克兰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关于停止和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指令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宣布其无效。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无可置辩的事实为证。据党的敖德萨州委前第一书记克留奇科夫证实，1991年8月23日，他本人飞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鲍里斯波尔”机场代表候机室的登记簿上，查到叛乱前夕，即8月17日，叶利钦的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来到基辅的记录。他飞来又飞去任何地方均未见披露，迎送的只有克拉夫丘克的几个亲信。显而易见，“兄弟俩”要谈的事连在电话上都不敢谈。

再往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的所有行动，目的都在于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蓝色理想”——搞垮苏联，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

往后又出了几件事，其一是乌克兰就是否“独立”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二是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12月1日全民公决胜利及其个人历史作用的鼓舞下，跑到了别洛韦日森林去。正是这个人，成了别洛韦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那可是一份能够使一个统一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能不能签得成，就完全取决于他了。这个字一签下去，定能使他扬名百世。

15年过去了。那个混乱时代的见证人正在一个个进入另一世界。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但新一代对那些悲惨的时日并不了解，而且对许多内容，媒体要么缄口不语，要么就歪曲真相。

在我同各类人士进行众多会见和座谈时，人们常常问我：“克拉夫丘克何许人也？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时代他都任过哪些官职？在乌克兰领导过哪些企业或者州？”

原来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列奥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从童年起便幻想让乌克兰脱离苏联。1993年，当他当上独立的乌克兰总统

时，他才在哈佛大学乌克兰民族中心把这件事昭告世界。克拉夫丘克因为手头没有自己早期搞分离主义的证明，便公开以谄媚的语调向与会者说，他还保留着一份从战时占领者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说一个叫克拉夫丘克的小男孩一家挨一家给占领乌克兰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唱圣诞颂歌。他用这种办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义中心的听众证明，早在8岁他便对那些为赶走“共产恶棍”而来到乌克兰的人怀有一份热乎乎的感情。顺便说一句，后来他居然也对“共产恶棍”效忠了许多年。为了更有说服力，总统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像保护眼珠一样保存着这份报纸。诚然，他没说是怎样保存的，是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还是夹在自己撰写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里？对于他为在乌克兰共产党各级机关多年活动所进行的这种辩解，甚至在关怀“独立运动”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基辅大学毕业后，克拉夫丘克被分配到切尔诺夫策，但他没有把时间用在中等技术学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上，党的机关工作使他钟情。作为政治教官的顾问和主讲，他工作勤奋，很快便当上了党的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克拉夫丘克对州里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受到了基辅乌克兰党中央的青睐。他又善于博得旁人的信任，为他当上中央书记的助手添了助力。由于坐上了这个位置，他的情况为中央领导所知悉，致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光辉”思想塞进意识形态战线。因他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亲爱的党”的事业效劳时勤勉有加，他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得以在声誉卓著的党办学校——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毕业。这所学院可是特别优秀的机关干部方能资格学习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严肃的理论准备。同时，社会科学院的毕业证书也预示着更高的职务。

他的“才华”在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撰写讲话稿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里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准确性，要有党评价资产阶级宣传、民族主义表现的

原则性，还一定要全面强化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等。



1990年9月30日“鲁赫”派在基辅召开的群众大会。（作者提供）

不过，克拉夫丘克的许多个人品质却使谢尔比茨基有所警觉。作为经验丰富的共和国领导人，他清楚地看出，说得客气点，此人的个人品质有多面性。克拉夫丘克在展示出政治原则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领导人投其所好的能力，他善于讨好领导，善于在恰当的時刻准备好最有用的文件，等等。诚然，改革以后克拉夫丘克确实也痛骂过自己“可恨的过去”。但那时他珍藏心底的理想已经实现。不过他在官场上的直线上升只是在伊瓦什科当上了乌克兰党同时又是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之后。“意识形态战线”干部调换是他采取的头几个步骤中的

一步。克拉夫丘克于是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当伊瓦什科几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坐上苏共副总书记的交椅之后，他在最高苏维埃的位置由克拉夫丘克接任了。

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局就这些变动发表声明称：

“对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的辞职声明，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个考虑不周而且不负责任的举措，它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加剧，削弱共和国议会的结构潜力”。这席话不仅是对退出乌克兰政治舞台的伊瓦什科说的，听起来也像是因为克拉夫丘克调任新职而引发的。

未来的乌克兰总统后来的观点还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也很有趣。1989年时，他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派运动，首先是“鲁赫”，给予了激烈的负面评价。克拉夫丘克在其《意识形态工作风格》一书中，坚定地遵循国际主义立场，谴责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共和国此起彼伏的民族纠纷使他感到不安。

但是，党的那些勤勤恳恳的机关干部大批涌入真心实意希望革新社会生活的人的改革队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对于这些机关干部来说，世界观立场只不过是一种纯粹实用的手段。到了这时候，这些人的真实嘴脸便显露出来了。克拉夫丘克在意识形态上来了个彻底的改弦易辙……这样便出现了克拉夫丘克—“鲁赫”分子联盟。没有这个联盟他也无法坐上梦寐以求的乌克兰总统宝座。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对政治上垮了台的戈尔巴乔夫所抱的十分负面的态度，在这里也帮了他的忙。

乌克兰总统就这样出现了，他许诺让乌克兰人民享受繁荣与和平。但他选前的种种许诺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乌克兰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不见天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深渊。

第二次大选之前，克拉夫丘克竭尽了疯狂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

英雄色彩的努力，以求连任总统。但不管是司法手段还是听话的媒体，甚至是不干净的舞弊手段，在选举中都未能帮上他的忙。这时候人民已经恍然大悟。这个人于1991年12月在别洛韦日签订协议时所起的作用，以及1991—1994年期间他在乌克兰总统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雄辩地说明这个善于更换意识形态外衣的专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到克拉夫丘克的经历和他的蜕化历程后，人们不禁会把他跟戈尔巴乔夫相比。共青团和党组织对他们难道不是一直在悉心呵护大力培养吗？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未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过一天便爬到权力巅峰的道路。我觉得像这样选拔干部，是苏共领导所犯的最大错误。他们过于重视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于是便把一些别的不会，只会乱嚼舌头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进到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头以后，也还是老样子不改。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为此可付出了代价。

叶利钦的别洛韦日“礼物”

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森林，在那漆黑悲惨的夜晚，叶利钦在给苏联签署判决书的时候，像是把沙皇身上的皮袍脱下来赐给克拉夫丘克一样，把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也送给了乌克兰，同时还做了一个1954年赫鲁晓夫也做过的不十分清醒的手势。大家知道，克拉夫丘克一伙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如此的转机，他们早就认命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肯定是要还给俄罗斯联邦的。可是，突然之间，却收到了这样一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中的一粒不和的种子。有鉴如此，我要谈一下历史事实，不谈历史事实，读者会难于形成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识。

从18世纪末，根据1768—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于1774年签订的库丘克—凯纳尔吉条约，克里米亚便成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条约是彼得·鲁米扬采夫伯爵对土耳其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库丘克—凯纳尔吉村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和库班独立，让出金布恩、叶尼卡列、亚速和刻赤。此外，它还向俄国船只提供自由通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并支付450万卢布赔款。条约为俄国外交提供了对克里米亚事务施加影响的机会，其结果便是1783年发布了由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的将克里米亚半岛、塔曼半岛和整个库班地方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宣言，克里米亚鞑靼诸汗宣誓向俄国效忠。

1791年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雅西条约，批准克里米亚并入俄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领土的国家主权由土耳其转到了俄国手中。而此前的137年，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时期（1654年），根据一个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具有国际条约一切特点的协议，乌克兰早已“以其整个领土”并入了俄国。

1784年，开始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和港口的建设。1804年它被宣布为黑海舰队的主要军港和特别行政区，由圣彼得堡直接任命的海军行政机关进行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苏联1936年宪法和俄罗斯联邦1937年宪法，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进入俄罗斯联邦版图，而塞瓦斯托波尔市保留着行政经济中心和黑海舰队主要海军基地的地位。1945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

赫鲁晓夫当政之后，提出将克里米亚转给乌克兰的问题，尽管有人反对，说克里米亚历来是俄国土地，俄国无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这个武断的决定依然得到通过。然而1954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虽作出把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联邦划出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改

变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常明确的地位。

有人主张把塞瓦斯托波尔转给克里米亚州，相应地也把它划转给乌克兰管理，关于这个问题在法理上是否能够成立，至今争论不休。我想，今后还要争论许多年。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痛处。对于已经煮成的这锅熟饭，俄罗斯人民也未必就同意安然接受。

“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市”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相应边界的确定，对分析因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而产生的局势，具有关键意义。从建立那一刻起，塞瓦斯托波尔便是俄国南方的海军要塞。

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用途，苏联时期没有作过任何修改。1944年5月10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命令形式宣布，我国军队“……已占领黑海上的要塞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由此可见，苏联最高当局也确认了塞瓦斯托波尔作为要塞和海军主要基地的地位。

1948年，我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恢复塞瓦斯托波尔市和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决议，确定该市拥有以前的市行政边界，以及相应的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区边界。决议要求加速恢复塞瓦斯托波尔为“头等海军要塞”，享有特殊地位，并下令“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共和国直辖市”。因此，作为主要基地的军事行政单位，其市级民事行政机构由当时起也划归莫斯科直接管理。

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8年10月29日通过，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独立经济行政中心，预算单列。实际上，从这时起，克里米亚州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便管不到塞瓦斯托波尔这片地方了。

塞瓦斯托波尔市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单位都间接地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各部委。统计工作也是单列的。比如有报道说：“1951年第一季

度克里米亚州工业生产完成计划104.3%，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完成100.6%”。

如果从苏维埃这条线来看，塞瓦斯托波尔市同克里米亚州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有特殊的户籍管理和准入制度，那么从市的党组织这条线来看，根据苏联共产党按地区和生产部门建构的原则，该市归克里米亚州党组织管辖。这是国内所有地区通行的原则。军队也好，对外不开放的城市也好，特殊单位也好，不管隶属于谁，党的系统均归地方党组织统一进行政治管理。

1954年克里米亚州移交乌克兰后，党的克里米亚州委（相应的还有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均改属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管理。这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军事行政机构也要单方面改变没有法律根据的系统归属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苏共在历史上形成的作用，党的许多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取代了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机构。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这位克拉夫丘克和“鲁赫”分子声嘶力竭地予以揭露的状况！

然而，乌克兰虽在塞瓦斯托波尔确立了事实上的市政管理，但却并不意味该市居民自动失去俄国国籍，根据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他们应该拥有俄国国籍。

根据苏联宪法，国防功能是苏联及其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专有的特殊权力。因此，塞瓦斯托波尔这个黑海舰队主要基地从属全苏的特殊地位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该基地始终应受苏联管辖。有关塞瓦斯托波尔国防生产发展的一切决定，均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对发展市区经济和住宅建设，均按苏联各部系统，首先是国防部系统，实现基本拨款。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为文件所证实，它从未交付给乌克兰，而苏联的继承人则是俄罗斯联邦。因此，有一切根据可以证实，俄国对以1991年塞瓦斯托

波尔市占有土地状况为界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拥有主权。试图人为地把“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两个概念分开，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1995年以前，俄国同乌克兰谈判时总是坚持“俄国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准确说法。然而在1995年6月9日索契协议中，却出现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说法，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使乌克兰对文件作出有损于俄罗斯联邦的解释。

这便是有关当前这一迫切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证明，此前作出的种种决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已经干过的事情，从历史上是抹不掉的。总不能从历史上抹掉别洛韦日之夜干下的那些勾当吧！既然干了，那历史名城塞瓦斯托波尔的问题和黑海舰队的问题，便是那个夜晚造成的悲惨结果之一。

但是应该记住，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也承认过必须建立对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留统一监控权。而且“战略力量”这个术语还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个具体情况下，黑海舰队是全苏海军的一个战略性行动分支，它应从南方海域保卫独联体。必须强调一点，管理和生活保障基础设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战略性行动单位。任何试图分割舰队的做法就意味着将舰队消灭。

远在1992年，俄国海军领导便提议帮助乌克兰建立自己的舰队，甚至简要提出了乌克兰建立这支舰队应解决的一些任务。但这些想法只作了预先讨论，后来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在我看来，促使乌克兰领导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便是克里米亚。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亚实行全民公

决，问题是：“您赞成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作为苏联主体之一和同盟条约参加者的地位吗？”有82%居民参加全民公决，其中93%的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占有投票权的克里米亚人的3/4。

全民公决的结果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所认可，它颁布了“关于恢复克里米亚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由此可见，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与当时构成统一国家苏联的其他主体一样，也拥有独立加入国家法律关系，签订条约加入同盟的权利。

1991年3月17日全苏全民公决时，半岛居民中有87%的人表示赞成保留苏联，以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联邦。

1991年9月4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克里米亚国家主权宣言”，但乌克兰于1992年4月29日通过的“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的法律，却大大限制了它的权利。

1992年5月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该宪法引起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抨击，同时亦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

同年5月末，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俄国立法当局，听取了专门委员会就1954年的决定进行法律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完全根据现行国际法准则，以维也纳公约为依据，起草并通过决议，认为将克里米亚州由俄联邦转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违反宪法，应予废除。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在俄国完全放弃谈判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长期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8月份作出了“关于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民族问题的措施”的决定。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危机状态，而这种危机又因为以前被驱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后代回迁克里米亚而造成半岛上的危机状况大大加剧。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决

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克服经济困难，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军”。因为所谓“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后移居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伊姆人、克里米亚犹太人；而所谓“非原住”居民，则是指俄罗斯人等其他入。

此外，作出这些决定，是希望从立法层面上巩固克里米亚鞑靼人国民会议在乌克兰的特殊地位，使其进入乌克兰的政治法律范围。乌克兰政府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被驱逐出境的民族，首先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进入行政机构，即明显地表示，希望能在多民族地区按多民族原则建立政府。

这样，基辅力图改变半岛的族群政治格局，希望在未来历史上把克里米亚共和国变成乌克兰版图内的克里米亚鞑靼国。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前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行动对乌克兰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可能造成的后果。

乌克兰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的政策，清楚地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东西所证实。我有意使用“不应该”一词，是因为有些题目的确不该受到国家鼓励。其中首先包括那些可以挑起民族仇恨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我不能无根据地杜撰，何况我对乌克兰人民还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有许多乌克兰朋友，同他们一起，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

《克里米亚之声》报是乌克兰议会出版的报纸《乌克兰之声报》的附录。1997年《克里米亚之声》刊登了历史科学博士沃兹格林的系列文章。这些东西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使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因此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其中特别指出：

……该文同沃兹格林前所发表有关克里米亚的文章一样，其特点为公开仇视斯拉夫，反对俄罗斯，缺乏科学态度，刻意歪曲和直接篡改事实，充满事实错误，表述极为不准确。

.....沃兹格林继纳粹空想家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罗森堡等人之后，鼓吹某些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恶劣品质，认为是由这些品质决定了这些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也决定了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人物和某些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沃兹格林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不同，他并不认为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而是把许许多多“源于民族内心深处的”恶劣品质强加到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头上。他的文章着重论证一种思想，认为斯拉夫民族具有无端发动侵略、性喜扩张、力图压倒和消灭其他民族等危险和恶劣的品质。作者一贯鼓吹斯拉夫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的思想，鼓吹他们的文化在克里米亚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克里米亚议会领导致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呼吁书中写道：“鉴于此类能够挑起民族纷争，挑起对俄罗斯人民以及居住在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仇恨的行为，不仅可能发生在沃兹格林身上，而且可能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其他科学工作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故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向各位呼吁，要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科学机构和科学工作者旨在挑起民族不和，并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其他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挑起反斯拉夫、反俄情绪的活动加以分析。”

这种“科学”分析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而且，这样的“理论”基础还要加上基辅当局的政策。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怀着狂喜的心情欢迎首批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遣送回国的场景仍记忆犹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乔尔诺维尔说：“这是一股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俄国人赶出自治区的力量。”

一年年过去，现在可以说，他是对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代表团在乌克兰总统身边设有代表，它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积极鼓吹分裂主义政策。任务明确而又公开：建立克里米亚鞑靼国，接受土耳其庇

护，脱离乌克兰。

口号是：“这是我们先人的土地，我们是它的主人，而你们现在是外来户。”这一口号正在被坚定不移地强行加以推行。肆意强占土地，制造大规模混乱，殴打具有斯拉夫体貌的人，包围政府大楼。当局表现出（我认为是故意的）无能为力。只有少量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法院审理。极有可能是出于对俄国人盲目仇恨，乌克兰当局同意将克里米亚交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在那里建立一个对乌克兰“友好”的国家。

看到克里米亚发生的种种事件，看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好斗的立场及乌克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使人不由得要去翻阅我国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为自身安全，不得不按族群隔离与敌对国家民族同种族的人员。英国对日耳曼人，美国对日本人都是这么做的。苏联的日耳曼人从国家欧洲部分被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在红军解放了一度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之后，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有北高加索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几个民族，因为一度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被迁徙。

后来，苏联的政治领导对斯大林的行为做了评价，谴责了他的这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惩罚的是整个族群，而不是犯罪的具体罪犯。被强制迁徙的民族获准迁回自己的原居住区。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做出这种事是庸人自扰。比如，我手头有一部多卷本《20世纪世界战争》，第4卷中有一份1944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致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报告称：

经调查和由情报途径得知，并通过当地居民声明获悉，克里米亚鞑靼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积极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并进行反对苏联当局的斗争……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由德国和土耳其回国的白卫军穆斯林侨民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所谓“鞑靼民族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该委员会在克里米亚所有鞑靼地区均设有分部。

“鞑靼民族委员会”广泛协助德国人利用逃兵和鞑靼青年，组建鞑靼军队、讨伐队和警察部队，开展反对红军部队和苏联游击队的行动。在充任讨伐队员和警察时，鞑靼人表现得特别残酷。

在克里米亚地区，德国侦察机关在鞑靼人积极参与配合下，在准备和向红军后方投放特务及破坏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鞑靼民族委员会”同德国警方一道，积极参与组织并为德国掳掠了5万余苏联公民，在居民中为德军募集资金和物资，对当地非鞑靼居民进行大规模告密活动，千方百计欺压非鞑靼居民。

“鞑靼民族委员会”的活动得到鞑靼居民支持，德国占领当局向鞑靼居民提供各种优惠和奖励。

现在时代变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乌克兰人的斗争同60年前不一样了。但应该知道历史，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历史不能加以报复，不能像目前在克里米亚做的那样。否则我们会走得太远，钻进死胡同。

同俄罗斯对峙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追求可对欧洲政策产生影响的大国地位。这件事暂时既无经济条件，亦无政治条件。现在乌克兰正试图宣布自己为海洋大国，虽然在退出苏联之前从未拥有过一支舰队。

这样一来便决定了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军事政治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黑海沿岸有6个独立国家（土耳其、格鲁吉亚、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国为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

1991年以后，俄罗斯将自己的舰队调离地中海。虽说美国在那里

已没有实际对手，即我国军舰，但第六舰队仍以意大利为基地，掌控着地中海的整个军事政治形势。由黑海经由海峡的出口实际上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但为了对黑海地区各国施加影响，美国还必须对经由海峡进入黑海的入口进行掌控。

因此，作为我国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海上占有极为优越的位置。根据战略计算，塞瓦斯托波尔通向各方的距离都相等，驻在这里的海上军事力量可以控制整个黑海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第6舰队舰只曾不止一次试图在黑海上展示其旗帜，但由于黑海舰队的积极对抗，终使此事受阻。现在，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海军将领声称，黑海是美国的生存利益地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想方设法吸引前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不能忘记土耳其不断增长的海上军事潜力，而且它的身后还有美国第6舰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几支舰队做后盾。

黑海战略方向的作用与地位可用历史上的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土联军在海上刚刚取得优势，而俄军指挥部门对舰队在冲突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估计不足，于是战争就打输了。尽管在锡诺普和卡尔斯都打了胜仗，尽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进行得很英勇，但战争还是输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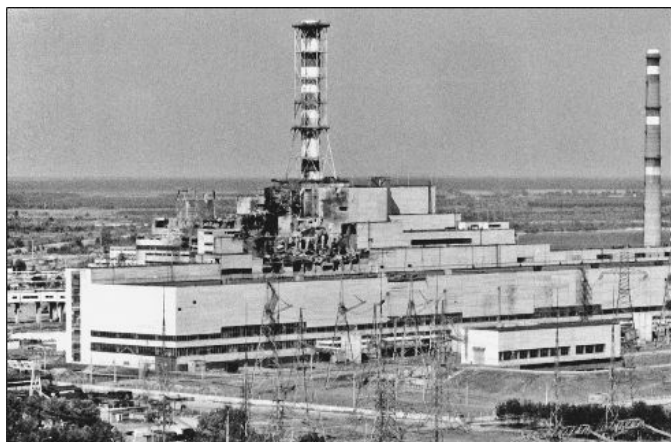
第二个例子：18世纪俄国为了保卫南部疆界，打通出海口，与土耳其曾进行无尽无休的战争。比如，1768—1774年战争期间，步兵在鲁米扬采夫指挥下采取打击土耳其行动的同时，还大规模展开了一次大胆策划的机动行动，其创意者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一个向希腊群岛地区派出一支海上考察队，从南方向奥斯曼帝国领地发起进攻的想法。俄国舰队的几支分舰队在那边取

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包括切什梅胜利，实现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包围，保证了对俄国有利的库丘克—凯纳尔吉和约的签署。

这是历史，这段历史说明，在任何条件下俄国政府均不能低估黑海战略方向对国家民族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杜马代表、独联体事务及与同胞联系委员会成员的倡议，经过首届国家杜马向主要军事专家咨询，结论认为在塞瓦斯托波尔水域，俄罗斯黑海舰队不可能与乌克兰海军共用一个基地，并于1995年4月通过联邦《暂停单方面削减黑海舰队法》，但于1995年5月份被联邦院否决。

同年10月，国家杜马通过《关于暂停单方面削减和黑海舰队保障供给法》，也被联邦院否决。1996年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克服了联邦院的否决，但法案被总统退回，未予审理。国家杜马坚持必须通过这部法案，并多次指出，黑海地区对保证俄国在南方的地缘政治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毁的第四区（1986）。（作者提供）

1996年4月，在总统大选选战正烈之际，俄联邦总统下令，暂停分割黑海舰队，因为乌克兰方面试图把一个不能被接受的表述强加给俄罗斯，即把港区同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基础设施分割

开。看来，是有人提醒叶利钦，他是宪法的“保障”，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因此，有责任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

我认为，由俄联邦总统和乌克兰总统签署的关于分割黑海舰队的索契协议，规定这两个国家的海军拥有单独的基地，但协议为乌克兰单方面破坏。尽管乌克兰方面在敖德萨、奥恰科夫和其他地方拥有很不错的海军基地，它依然坚持要让自己的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拥有基地。两国海军在同一塞瓦斯托波尔湾拥有基地，从军事观点来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乌克兰海军随时可将我国舰队包围起来，削弱其生活保障体系，削弱俄罗斯武装力量战略行动统一体的活动能力。

从1992年1月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就分割黑海舰队问题共签署了8个协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索契协议，但其中任何一个均未提交议会批准。

这种做法是与联邦法律相抵触的。根据联邦法律，凡涉及俄联邦国防能力以及武装监督问题的条约，均必须得到批准。

1997年5月末，签署了一个“大条约”，即俄罗斯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我已经谈过，签订这项条约的谈判延续多年，原因是困难不小。

这个“大条约”签订了，可两国都得到了什么？有必要把作为条约基础的三个基本问题开列出来，这就是：分割舰队的问题，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赁条件的问题，交付给俄国的舰只的偿款支付方式和基地租金的支付条件问题。

第一个问题：乌克兰分得了略少于20%的舰队，而俄罗斯回购其余的舰只大致要花5亿美元。此数将从乌克兰欠俄国的债款中扣除。第二个问题：俄国租赁塞瓦斯托波尔湾、卡拉奇亚湾和卡兰京湾，租期20年。第三个问题：莫斯科应支付这些基地20年的租金，共25亿美元。支付的办法是乌克兰用由俄罗斯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抵债。

乌克兰违背了1995年的索契协议，拒绝接受两支舰队分别拥有基地的原则，不承认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舰队的基本基地。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引发市内和港口水域的经常性冲突。但这个条约对乌克兰、对它亲西方的精英人物十分有利，因为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条约可加强乌克兰现今边界的地位，巩固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归属于乌克兰的事实。签订这样的条约，留下不少未决的军事和社会问题。

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成了两国之间复杂的政治问题中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制约因素。2005年末，当掀起了一场“天然气”战争——俄国决定提高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时，乌克兰当局立即对此发表声明，提出将重新审议俄国黑海舰队租用基地的经济条件。有的人还不喜欢我国水兵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的某些行为，于是便开始抢占俄国灯塔，等等。

我想，不能认为这个条约确实解决了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在某些方面，这个条约甚至还加重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只能在两国开始由旨在恢复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的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方能得到解决。只有到那时，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所有凭空臆造的问题方能消失。

就整体而言，俄国不仅必须坚定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且还应当考虑到黑海地带出现的崭新军事政治形势。通过土耳其和乌克兰，西方和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把俄国从黑海地区实际上挤出去的目标。同时，北约在该地区海上的军事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利用空军对海上交通线实行控制，派空降部队在海岸登陆。这不仅仅是演习，也是深入侦察：对该战略地区开展研究，搜集雷达设备的情报，揭示观察防御系统的“盲区”，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俄国南方直接与北约擅自划分的责任地带相毗连，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对俄国极为不利，使欧洲裁减军备的成果化为乌有。同时还要考虑到，没有黑海舰

队及其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密切配合，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步兵军团便无法保证俄国国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卫。

控制黑海区域可以保证俄国的经济安全，因为黑海起着把能源由亚洲向欧洲出口的世界交通要道的作用。俄国地位在这一地区的削弱，可使国际恐怖组织积极利用该地区运输武器、毒品，在国内挑起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

我看，这些就是制定俄国黑海地区政策时应考虑的基本因素。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复杂问题，俄国和乌克兰的民族关系问题，都不应该使这两个兄弟民族不睦。大家本是同根生，从历史角度来看，应当同舟共济。统治者来了又走，而人民却永世长存。

乌克兰人民开始觉悟了。“橙色”革命引起的狂喜，已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人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又一次上当受骗了。

2006年夏季克里米亚发生的一些事件，最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根据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决定，2006年6月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将举行一次有北约参加的在“和平伙伴”框架内的演习。但是北约官方代表詹姆斯·阿帕图罗伊声称，这次演习同正在克里米亚进行的代号为“C伯里塞—2006”的演习以及美军和美国物资运抵半岛均无任何关系。

克里米亚因此以费奥多西亚为中心爆发了严重的反北约和反美活动。纠察队无限期地封锁了费奥多西亚港口。美国军舰将装备和武器运到这里之后，老百姓不让他们从港口往外运，因为他们认为，同美国共同举行的以及北约许多国家计划于当年夏季举行的军事演习是非法的。即使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演习，克里米亚人也不愿看到明显不友好的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土地。当时还流传着一种关于演习的神话，说这些“维和部队”登陆，是来消除半岛上“分离主义者叛乱”的，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愤怒。

10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卢什塔市国防部“友谊”疗养院过了两天才离开。这两天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当地居民包围在大楼里，老百姓要美国军人滚出他们的城市。疗养院服务人员拒绝为美国佬做饭，拒绝为他们收拾房间。而且，在不速之客入住当地的第二天给他们断了电，堵死了下水道。美国佬离开阿卢什塔的时候更像落荒而逃，市民们报以高声欢呼，还补充说，“只要全部军人和军用物资不运出克里米亚，抗议活动便不会结束”。

为了躲避抗议和纠察线，海军陆战队员通过“秘密小道”被运送到费奥多西亚，在当地他们还有将近150名同事处于被围困状态。疗养院成了外国军人驻扎的地方，有人试图借助警方把围困疗养院的纠察队员驱走。但抗议者中间的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制止了冲突的升级。

疗养院工作人员告诉大家，美国人自闭在自己的楼层，安排了岗哨，不许当地人员进入他们的“驻地”，靠吃干巴巴的口粮度日。

抗议行动席卷克里米亚其他城市，参加抗议活动的成千上万公民不仅来自克里米亚，而且来自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扎波罗什。

美国人终于大失所望，只好登上一艘租来的货轮，向不明方向驶去。他们终于离开了冷眼向客的克里米亚海岸，离开了这些不愿在自己这片被俄国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见到外国军队的执拗的人民。

当我们回头再看取得“独立”的种种途径时，可以坚定地得出结论：除了白俄罗斯，在乌克兰也好，还是其他各苏维埃共和国也好，都是因为发生了政变：当时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被摧毁了，社会政治制度被彻底改变了，这些都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多年的苦难。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别洛韦日交易的“恶根”，当然源于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力图攫取个人权力的图谋。其实，这一协议

对于一个国家及其3亿人民的命运可能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可能却丝毫也未能对他们起阻挡作用。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造成的恶果！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利用权力来办各种各样的事之外，一定还要用它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分支机构，以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清除国家奥林匹亚之山可能作出的任何一个忘乎所以的行为的道理。

俄语与乌克兰语

我想从一则真实的笑话开始这一节。在独立后的乌克兰首都召开的一次高级会议上，会议主席向出席者提问：“大厅里有没有莫斯科佬呀？”回答：“没有。”“那就转用俄语吧。”

这则笑话显示出俄语在乌克兰的实际状况。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今天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对立，在各种政治主张方面存在着对抗，而且还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其中包括语言问题上，也存在着对抗。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管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在乌克兰，关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问题，一直被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用来作为武器。他们千方百计强调，乌克兰语的主导地位是乌克兰民族自觉的基础，是乌克兰人的精神基础。与此同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种不能容忍俄语的偏执态度，进而更发展成为一场针对俄语的真正的“语言战”。所有这一切又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卷起风暴，化为激化民族关系的根源，为激化民族关系提供营养。因而语言在乌克兰生活中也就成了一个政治杠杆。

我在前几章中已详细谈到这一问题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情况。但要把这些国家在俄语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局势完全搬到乌克兰来

当然不恰当。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由于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和进入苏联后在移民过程中出现的。

谈到乌克兰的俄语和乌克兰语问题，我认为必须回顾一下我们的共同历史。否则对这个问题就很难评说。由于民族主义政客一伙的兴风作浪，这个问题便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人文科学问题。

俄国的西南部是罗斯国家的摇篮。这一地区的居民当时便自称为罗斯人。13世纪鞑靼人入侵后，统一的罗斯分成两部分，被称为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拜占庭希腊人首先用起了“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这两个名称。为了延续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区分这样两个部分。根据当时的概念，“小”的意思是指“自古以来”、“最初”的意思，这个民族最初便住在这里，诞生了自己的文明。“大”是指这个民族进一步扩展的地区，是该民族领地的进一步拓展。

众所周知，小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外族统治之下，但这个民族坚定地维护和捍卫了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直至1917年，小俄罗斯人民始终认为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民族中的一支。

小俄罗斯初次试图用有别于俄语标准语的语言书写，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一股用人民习惯的、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出版图书，以推动民间启蒙的普遍潮流涌入当地。

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农村“口语”也于15—17世纪在波兰人占领的西南罗斯逐渐形成，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罗斯农奴开始使用这种口语。为了适应地主——波兰领主——的语言，他们在同这些人及其家奴交往时，逐渐转向使用一种俄语和波兰语混杂的特殊口语，这种语言以后便被称为乌克兰语。上面已经谈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这种“混杂的特殊口语”得到完善，演变成标准语。

乌克兰语的诞生和进一步存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被用于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比如奥匈帝国在它的帮助下，使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

民发生对抗，相互分离。波兰领主也有类似的目的。19—20世纪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者利用乌克兰语，试图建立一个脱离俄国的“独立的”乌克兰。

改革时期“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把共同的思想遗产全都抛到了一边。如今的乌克兰当局开展了一场针对俄语的最残酷的斗争，把俄语同“国”语对立起来。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其目的都是一个——把俄国作为乌克兰的敌人，却把西方作为它的朋友。

这些把语言问题用到“乌克兰非俄罗斯化”上头的活动家，同纳粹著名思想家、东部占领区总监罗森堡何其相似乃尔。后者在其肢解苏联的计划书中，对激起与俄罗斯历史、文化、语言相敌对的乌克兰“民族自觉”赋予重大意义。为了这个目的，在他主持的占领区政府的领导下，编写了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允许乌克兰人在学校用乌克兰语上课。罗森堡甚至提议在基辅开办一所大学，在乌克兰全境建立一个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大网络。而在说俄语的各州，城市只准许开办七年制普教学校，而农村则是四年制小学。希特勒不同意在基辅办大学。众所周知，罗森堡以上绞架结束了他的一生……

谈到狂妄的民族主义同语言问题的关系，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白俄罗斯就没有发生这种消灭俄语的畸形过程呢？那里不是跟乌克兰一样，也生活着连理同枝亲如兄弟的人民吗？回答相当简单：现在的这个主权国家中，没有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即使有，也是一个不大的阶层，它的思想尚未被绝大多数居民接受。

乌克兰语同俄语对抗、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对抗，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这颗定时炸弹，被有意识地安放在乌克兰现行宪法中。俄语被列为少数民族语，而这竟发生在一个俄罗斯族人多达1200万的国家！这个国家有近30%的居民认为俄语是本族语，而其中又有15%是乌克兰族人。

根据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和“民主创新”基金进行的研究，在日常交往中，有38%的乌克兰公民使用俄语，而使用乌克兰语的只有34%。根据具体情况，说两种语言的乌克兰人占27%。工作中使用语言的情况与此类似——只说俄语的公民占1/3，只说乌克兰语的占30%，有22%的劳动者在岗位上交替使用两种语言。

应该认为，后苏联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和尤先科——已经得到本国专家报告，世界上有些国家，为支持和平与稳定，实行两种和多种国家语言制度：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虽然说法语的不过14%；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虽然瑞典族人在国内只占6%。印度有两种国家语言——印地语和英语，虽然现在那里根本看不到英国人；瑞士共有四种语言拥有平等权利。

完全可以看得清楚，乌克兰在“橙色分子”取得胜利后，依然保持着就前景而言应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方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许多政治家认为，现今乌克兰内部因语言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可能导致统一国家受到破坏。如果赋予俄语以第二国语地位，人民可以按语言原则团结起来，而这将给基辅带来很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该国大多数居民与政治家不同，并不认为通过立法使俄语拥有它曾经拥有的地位有什么不好。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根据战略规划中心交付的委托，曾就这一题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乌克兰人同意俄语在乌克兰应具有国语地位，不同意者为37%。诚然，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受访的乌克兰人分配得很不平衡。如果说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主张俄语应具有国语地位的人占受访者90%的话，那么在国家西部地区有近80%的人坚决反对这样做。

在乌克兰的许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看来，通过一项关于俄语地位的专门法律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即使这项法律获得通过，也很难期待现今的议会能够批准，会有50名最高拉达代表将这项法律提交宪法法院，时间已经表明，宪法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收到了足够多的

告诉。

唯有改变宪法，具体的是第10条，方能使俄语在乌克兰拥有充分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法律保障。为了使俄语具有宪法地位，需要举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全民公决。这时重要的不是启动咨询性全民公决，而是启动完全合乎要求的、对修改乌克兰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全民公决。其他行动无论努力规模有多大，花费有多多，都没有意义。

有人建议，全民公决问题的表述应该是：“您是否同意对宪法第10条进行修改，将该条头一部分表述为：‘乌克兰的国语是乌克兰语和俄语’？”

就终极而言，这里所谈的不仅是保留以数千年精神和文化成就为基础的强大的民族历史因素——这本身就已经弥足珍贵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是否能沿着建成一个让每个公民都享有他不可剥夺的语言权利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前进。

过去的和当今的乌克兰当局，对为数众多的赋予俄语以国语地位的要求，一成不变地引用剧院、学校和图书的数量作为回答，似乎只要有了这些剧院、学校和图书，就完全可以保证俄语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地位了。当局试图对问题采取捂盖子的态度，但问题却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出来，而且会同前几次总统大选时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也更尖锐。现在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使俄语在乌克兰宪法中具有国语地位呢？哪怕就是为了不使国家统一受到打击也好。

遗憾的是，基辅当局却另有打算。总统尤先科声称：“乌克兰不存在俄语问题。”按他的话说，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具有“纯政治的”和“投机的”性质。那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充满民族主义倾向的战友、社会活动家、各种研究所和中心的领导人，都对他随声附和。

2006年乌克兰国家议会春季选举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众多的联盟和集团经过长期对抗、建立又解体之后，亚努科维

奇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政府首脑。俄罗斯清楚地记得他的基本政治纲领之一——赋予俄语以国语地位。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由于这一许诺，选举时投票赞成他的党。

时间在前进。我们清楚理解，亚努科维奇的党和他的党团在议会不占宪法多数。但它毕竟还是就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发出了明确的强硬声明。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需要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否则再次让乌克兰和俄国的俄罗斯人失望，将是不可避免的。

排挤俄语不可避免地要对乌克兰的民族、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对乌克兰在当今世界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同时，在这些领域发生的种种过程，对国家，对百姓，均孕育着重大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乌克兰教育领域实际上正发生着什么？现在，主要的打击落在了俄语居民身上。乌克兰的俄语学校眼看着在消失。这一过程产生了雪崩效应。近十年来，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一直在等待。它们等待两种结局：要么像大多数俄语学校那样也不幸被关闭，要么当局对它们格外开恩。

根据官方统计材料，从1992年起，用俄语教学的普教学校数量缩小了一半以上。1992年为3364所（占总数的16%），而2004年仅为1411所，或者只占6%。如果说到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1990年占普通学校总人数的48%，而在2004年则为22%。

所引用的材料是就乌克兰整体而言的。在个别地区状况要坏得多，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甚至基辅也是如此，1990年初还有150所俄语学校，而今只剩下了8所。比如，在乌克兰西部，在八个州里，18万说俄语的居民只有15所学校，而在某些州，如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赫梅利尼茨基州，连一所俄语学校都没有留下。这几个州也没有民族幼儿园。所有的俄罗斯剧院几乎全被关闭，整个地区只有一座位于利沃夫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它的房舍定期遭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抢劫和焚烧。

某些州的当局走得就更远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一向禁止学校用俄语。代表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表示他们对乌克兰语发展的关心。他们坚信，乌克兰语只有在俄语被连根拔除时，方能开出繁茂的花朵，因为俄语是一棵杂草，它遮住他们唯一值得使用的语言的阳光。他们通过的教学大纲要求孩子们只能用乌克兰语交流。这时受折磨的不仅是说俄语的学生，还有用本族语教学的那些班级的波兰学生。这些要求还扩大到喀尔巴阡山附近的斯捷法尼克民族大学语文学院。他们还挖空心思出了一套通过古老的“良好”告密传统进行监控的体系，为此又建立了一个吸收各社会组织参加的“社会语言监督特别委员会”。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还公布了一些电话号码，让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居民通过电话向该委员会提供“语言破坏行为”的信息。

俄语学校每年关闭的数量近130所。关闭的程式全都是同样的：如果学校拒绝改用乌克兰语，警告之后便一关了之。在这种背景下，俄语即使能在一个学校作为补充学科保存下来，也应被视为一种奇迹。

至于谈到高等教育，现在乌克兰没有一座正式使用俄语的高等学校。

不过，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是有协议的，那就是乌克兰的俄语学校，数量应与该地区俄罗斯人的数量相适应。俄罗斯的乌克兰语学校的情况也应与此相同。但这一比例早被破坏。例如，1990年初，利沃夫的俄罗斯人大致为16万人（全部居民为80万人），俄语学校为25所，乌克兰语学校为75所。现在那里的俄语学校一共只有5所。就乌克兰全国而言，乌克兰共生活着1200万以上俄罗斯族人，现在共有近1500所俄语学校。当然，乌克兰方面经常反驳说，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有600万人，但拥有的学校数量却达不到乌克兰为俄罗斯人开设的学校数量的一半。说得对，但俄方代表认为，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对学习本族语的要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俄罗斯首都虽然没有一所

完全的乌克兰语学校，却有8所带有乌克兰语分部的普通学校。这首先与这样一点有关，即住在这里的乌克兰人都明白：他们的孩子只有用流利的俄语掌握全部教育课程，方能在俄罗斯具有竞争能力。

在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说，在秋明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却有完全的乌克兰语学校。不仅如此，与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不同，没有人想关闭这些乌克兰语学校。对这个题目的争论可以没完没了，不过应该特别考虑到，乌克兰的语言问题，与其说是个教育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问题。应该坐在谈判桌旁，以冷静的头脑来解决发生的种种问题。

克里米亚出现的语言形势则颇具戏剧性。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阿纳托利·马特维延科是尤利娅·季莫申科的战友和她亲自安插的人，他把这个问题给搞得尖锐化了。基辅右翼党“索博尔（会议）”的领导人只用乌克兰语进行交谈。克里米亚议会成立那一天，这位新总理用俄语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说俄语了，但行动起来还是离不开俄语，当然是破坏性的行动。这位总理威胁克里米亚政府的114名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短期内学不会乌克兰语，便要解雇。这位总理声称，五年内克里米亚人要在潜意识里也转换为用乌克兰语思维。

马特维延科的战友们说，“五年之后，克里米亚的青年人要把说乌克兰语当成时尚。毋庸讳言，用乌克兰语进行交际，对于年轻的新一代来说，将会成为自然。但对那些50岁出头的人，却未必能做到”。

为了培养这最“新一代”，克里米亚便关闭俄语学校。正如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亚历山大·格卢兹曼所宣布的那样，近期内将改造“用乌克兰语和俄语教学的”25所学校。这些学校将逐渐改为完全用乌克兰语教学。克里米亚现有600所学校用俄语教学，14所用克里米亚鞑靼语教学，只有6所用乌克兰语教学。在所有“俄语”学校中都学习乌

克兰语言和文学。请注意：俄罗斯人占克里米亚人口的58%；在克里米亚人中，认为俄语是母语的占77%；而认为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仅为10%。

2005年，共青团镇居民得知，不久前镇上建成一所学校，一切课程均用乌克兰语教授。俄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将成为选修课。二年级学生的家长首先表示愤慨，后来其他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寄往克里米亚共和国教育部的抗议信上，签字的有800人，150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愿意用乌克兰语上课。学校共有1000个座位。教育部的头一个反应是搞个折中解决方案——学校里成立几个乌克兰语班和几个俄语班。但这个解决方案立即遭到拒绝，因为自治区总理马特维延科继续坚持己见，声称用于这项胡子工程——建设共青团镇学校——的预算外资金是他亲自搞到的，他想把这所学校建成一所乌克兰民族镇样板学校。

半岛还有15所俄语学校应从2005年9月1日起转为乌克兰语教学。乌克兰教育部紧急为那些将在这些学校授课的老师开办语言速成班。

几年前，乌克兰教育部一下子关闭了数十所克里米亚的私人高等学校，将一万名左右大学生撵出校门。自治区只有44所高等学校能在基辅完成教育部规定的复杂的资格认证手续。

基辅官员常引证乌克兰政府签署的里斯本宪章，该宪章要求国家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从原则上讲，这个要求是正确的。不过结果是，在克里米亚土地上得到资格认证的，只有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几所高等学校。

甚至连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塞瓦斯托波尔分校至今也未得到乌克兰教育部的认可。难道莫斯科大学的培养水平也不符合乌克兰的要求？这些莫斯科教授若要在座“俄罗斯光荣之城”继续工作，很

可能就不得不说乌克兰语了。

一些学校被关闭，另一些却热火朝天地开办起来，虽然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利沃夫民族大学在克里米亚开设了新闻系的一个分系，虽然整个半岛只出版一份乌克兰文报纸，而且没有读者，发行量很小，全靠经常的预算拨款维持。然而在克里米亚政府的支持下，利沃夫的一些教师已被派到辛菲罗波尔去培养乌克兰语记者了。

乌克兰本来，正如常言所说，应该把自己的韧劲用在别的地方，但是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着一条彻底否定俄罗斯历史形象的路线。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是在拉帮结派，相互敌对，无法为本国学生提供一个俄罗斯帝国为何物的明确概念。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几个最原则阶段作出的完全对立的评价。比如，由伊·约诺夫编写的臭名昭著的“索罗斯”教科书《俄罗斯文明及其危机的起源》中，竟将俄罗斯帝国说成是“各民族大监狱”，而“沙皇政府对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差异视而不见，把他们全部列入‘俄罗斯人’一类，不重视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存在”。在博哈诺夫编写的19—20世纪初俄国史教科书中，下的断语却完全相反：“俄国没有民族或种族特征方面的歧视（差别）”。

这种多元论只有在俄罗斯才能有。在美国，学生们是从来听不到，也不会听到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或谴责19世纪中叶侵占墨西哥的得克萨斯这些说法的。在法国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对拿破仑侵略战争的否定评价。

乌克兰历史学家与俄罗斯历史学家不同，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改革后的15年里一直在对骂，而乌克兰历史学家却很好地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用本民族历史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服务的经验。从5年级起，乌克兰的学生就要熟知“伊万·马泽帕力图使乌克兰变成一个强盛的欧洲大国，从莫斯科沙皇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彼得一世则对乌克

兰特别“仇视”，把它看成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无权拥有自己的语言，无权拥有文化，更无权拥有自由”。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大胆断言，当今乌克兰这种全面否定俄国历史形象的做法，一定最合上面提到的罗森堡等纳粹分子的心意。他们想方设法，不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离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关系吗？由于把俄罗斯当成乌克兰自古以来的主要敌人，现代乌克兰人从童稚时期起，便成为不仅对俄罗斯历史，而且也是对自己“母亲”的历史进行无耻歪曲的牺牲品。

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成长的一代，将处于其相互历史观念之错误、负面和歪曲程度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情况主宰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是赢家。说得准确点，只有那些不断希望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从历史文化上完全分开的人才是赢家。对乌克兰历史推行了10—12年的非俄罗斯化，这段时间并没有白白过去。俄罗斯的学术精英也好，政治精英也好，对这一状况均严重估计不足。

局势既然这样，俄罗斯的立场又如何呢？2005年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长富尔先科访问基辅。同当局会见之后，他发表声明：“乌克兰正在十分严肃地审议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个层级。人们能自由选择教育的语言，这一点十分重要。”对第二句话不能不同意，而对第一句话，要想同意它，只有把它改成“十分严肃地排挤俄语”。

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关心把本族语扩展到境外的问题。以英联邦为例，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清楚。英联邦包括大不列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几十个国家。上世纪30年代初，成立了不列颠理事会，向全球110个国家提供学习英语和文化的服务。对俄罗斯亦不例外：英国人在北高加索，首先是在车臣，相当活跃地普及学习英语的地区性教学法纲要。

语言训练班引起对语言体现者——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兴趣，引起

对该人民的尊敬，宣传该人民的理想。世界语言之战是争夺智慧之战，哪个国家的语言弄明白了，智慧就会朝哪个国家流。开展争取智力资源斗争的不仅有英联邦理事会，还有德国的歌德学院和法语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法国政府甚至设置了一个专门的职位——合作、发展和法语国家集团部部长。目前又正在筹建一个伊比利亚联盟——西班牙语国家联盟。

对俄罗斯而言，建立一个类似的在境外传播语言文化的协会，乃是迫切的需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参加一个社会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俄罗斯语文教师国际联合会。但是在新条件下，国家必须直接作出在全球传播俄语的努力。1989年以前，在东欧各学校俄语是必修课。今天，不仅这些国家，而且独联体某些共和国也都把俄语忘记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格鲁吉亚、土库曼，在东欧各国，以前所有的孩子在学校都学俄语，现在只要经过一代人，就会把俄语忘记！

俄语是世界5种大语言之一。就说俄语的人数而言，俄语排在汉语、英语、印地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地球上说汉语的几乎达到15亿人，说英语的人超过10亿，说西班牙语的为4亿人，说俄语的大约有3亿人。

在具有“共同血缘”的乌克兰，俄语教学情况前面已经谈过。在独联体其他国家，这一问题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教育出版社资料，阿塞拜疆还剩下29所俄语学校，格鲁吉亚59所，吉尔吉斯138所，塔吉克3所，土库曼在几年以前关闭了最后1所俄语学校。而这种事竟发生在俄语依然是前苏联各民族之间主要的、实际上是唯一交流手段的时候。

俄语在世界上的主要竞争者是英语。近20年来，世界各国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教学体系中，愿意掌握英语的人数始终在增长。与此同

时，愿意学习俄语、德语或法语的人，在减少。在中国境外，学习汉语的学校数量在缓慢地增长，但在增长。

俄联邦外交部奉俄联邦政府之命完成的报告《俄语在世界各国》称，再过10年，独联体各国掌握俄语的人数将减少一半多。当前说俄语的3亿人，100%住在独联体。如果扣除每年减少的100万居民，可以看出，再过几十年俄语将可能不再被列入世界语言之列。

上面已经谈到，乌克兰的俄语问题已有20年始终未离开政治生活议程。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之所以能在1991年执政，其中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和多次许诺使国家“乌克兰化”。

1994年他在大选中败给了库奇马，库奇马许诺把俄语变成乌克兰第二国语。但只见许诺而未见行动。然而1999年他又打起这张语言牌，第二次当选。2004年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再次拿起语言问题做武器。众所周知，他输掉了，但他并未放弃使俄语具有第二国语地位的想法，把这一点作为他的党参加2006年国家议会选举并取得胜利的纲领中的一个关键点。

2003年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区域语言或区域少数民族语言欧洲宪章。应该认为，乌克兰当局之所以批准这个文件，其首选目标是与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看来，它并未考虑少数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族群语言的真实境况。

“橙色”联盟建立之后，由于看到由国家当局承认俄语的问题解决无望，乌克兰许多俄语居民占优势的城市和区域从2006年3月起，利用欧洲语言宪章，开始作出赋予俄语以区域地位的决定。比如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雅尔塔和卢甘斯克、尼古拉耶夫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各州当局机关也开始采取类似决定，例如卢甘斯克州于当年4月

由州苏维埃代表在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也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的地位。顿涅茨克州苏维埃于5月份决定，在该州辖区内，俄语可以同国语，即乌克兰语一样，“在案件审理、文件、居民相互关系、国家机关、社会机构、企业、机关团体以及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用作工作语言”。州苏维埃还决定向最高拉达提交赋予俄语与乌克兰语同样的国语地位的建议。2006年5月30日尼古拉耶夫州也同意赋予俄语以这一地位。

然而共和国司法部奉尤先科之命，认定这些行动与国家宪法不符。乌克兰司法部长在评述自己这一丢脸的结论时声称，决定语言地位的权利仅属于乌克兰人民，并经由全民公决来实现。按照他的意见，乌克兰各种语言的地位已为乌克兰宪法第10条明确规定，根据该条文，乌克兰语为国语，而俄语是少数民族语。他声称，卢甘斯克州苏维埃以及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及其他几个城市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的地位，已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位部长还说，争取扩大俄语法律空间的斗士们虽抬出欧洲宪章作为依据，但欧洲宪章的宗旨不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保护那些处于消亡边缘的语言。据他讲，在乌克兰，属于这些语言的是卡拉伊姆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亚达利亚语、意第绪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在他看来，这份清单中还应该加上克里米亚的乌克兰语。

不过乌克兰宪法第10条规定：“乌克兰保障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自由发展、自由使用并受到保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在“独立的”乌克兰，除了俄罗斯族人说俄语外，说俄语和用俄语思维，并认为俄语是本族语的乌克兰人还有几百万。如果几乎占居民1/4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是少数族群，那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可就未必能列入这个范畴了。

为了同俄语的拥护者进行斗争，还动用了检察和审判机制。比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关于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地位的决定，被控诉到法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检察长向州经济法院提

起诉讼，认为市苏维埃的决定属违法行为。正如检察长在其起诉书中强调的那样，该语言地位的决定与乌克兰宪法要求和现行法令相悖。关于赋予俄语地域语言地位的决定，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检察长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起，在该市辖区停止适用。尼古拉耶夫市苏维埃全会经多数票通过，否决了检察长对赋予俄语地域语言地位的抗议。

俄语反对者的最“有分量的”论据是拿出“侨居”的理由来，说什么如果到法国或德国去，就得学会当地的语言。但他们闭眼不见乌克兰说俄语的公民并不是从外地到来的，他们住在当地已经有几十年、几百年。不仅如此，全民公决投票赞成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后，他们之中许多人至今一直还是认为，对他们来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祖国。而在祖国，一切的安排都应该让生活过得美好，因此他们便要求赋予俄语一种可保证他们享有文化语言自由的地位。

看来，尤先科总统知道，起码能从他的助手、顾问、秘书那里了解到，就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保护俄语地位和保护俄语教学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哈萨克、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克兰和其他几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学者、国家议会和教育部的代表），学者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俄语正在逐步“消亡”。我以为，俄语的类似状况正鼓舞着“独立的”乌克兰派同俄语进行斗争。

的确如此。尤先科已经公开介入了这一问题。2006年年初，他发表声明，确认某些州和市苏维埃给予俄语以区域语言地位的做法为非法。他对记者说：“这是对宪法的粗暴破坏。”

照他的话说，类似的决定只有最高拉达以议会成员的宪法多数方能通过。尤先科表示相信，宪法法院“将会对这一事件迅速而轻松地作出评价”。

“俄语还用得着防备什么别的语言吗？”乌克兰总统提出了一个设问性的问题，又总结性地来了一句：“俄罗斯终结的地方，俄语也就

终结了。”

请读者注意这个政治宏论中的第二句话。为了让俄罗斯终结，必须近期内在乌克兰让俄语终结。读着这些“内心直白”，不由得发人深省：总统说这席话时是处于何种状态呢？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首脑，其中俄罗斯族按数量占第二位，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那些相信他在“橙色革命”时期甜言蜜语的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呢？

欧洲议会代表的立场也是那么厚颜无耻，欧洲宪章便是在欧洲议会酝酿制定的。他们赞同乌克兰中央当局阻挠赋予俄语特殊地位的行动。照欧洲议会乌克兰局局长的话说，宪章里没有“国际语言”的单独概念，所谈论的是“区域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位先生有一个乌克兰的姓氏，看来此人还是读过他代表欧洲议会所驻国家的宪法的。

对俄语的攻击不仅出现在教育、案件审理、官方文件等领域。进攻的规模十分广泛，套用一句军事术语，可以说是全线进攻，而且蓄谋已久。远在1996年，由库奇马总统出钱，在基辅曾召开过一个“圆桌会”，议题是“投向乌克兰广阔信息空间的国语”。会议的成果便是“推荐书”。

文件的几名起草人对乌克兰语言局势的评估结论是：“不正常”。他们把局势称之为“帝国的沉重遗产”。只有通过“建立国语的完整功能，并有针对性地消灭非国语”，方能匡正这一局势。不难猜到，“非国语”是指俄语。他们建议：把在电视广播中使用俄语、用俄语出版报刊视为这样一种行为，其否定后果会对乌克兰安全构成不亚于宣传强暴、卖淫以及各种形式反乌克兰宣传的威胁。

几天之后，库奇马就“审核乌克兰语言法执行程序问题结果”一事，向多名国务活动家下达了委托任务。任务的实质是保证对“推荐书”拨款，提供行政支持！总理收到建议，要审核保证以优惠条件向国语书刊、教科书和教学文献资料的出版销售拨款的问题，须“在司

法文件、国家管理机关公文往来，乌克兰各地区社会生活各领域使用国语乌克兰语，并加强对使用情况的监督”。该国其他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任务。

当时便有许多人指出，自从加里西亚人库利克当上乌克兰电视台领导后，电视台的语调就从温和反俄变成了公开仇俄，变化太强烈了。使用俄语的电视公司比如说要想在克里米亚和外喀尔巴阡山地区取得广播许可，准会碰上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官员们的公开反对。如今把俄语从电视广播中排挤出去的做法，在全乌克兰范围都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尤先科总统更加剧了广播电视领域内同俄语的斗争。乌克兰文化部长、尤先科家的女友比洛季尔猛抓广播电视的工作，她保证“尽一切努力，使广播电视只说乌克兰语”。这使大多数用俄语广播和转播俄语歌曲的乌克兰电台的存在受到威胁。

受到威胁的还有全国性的“乌克兰”电视台，因为它用俄语广播，被认为是持有反对立场的频道。民族主义分子要求关闭这个频道，因为它用俄语转播足球消息。政治家们声称，“根据乌克兰足球协会的法规，足球报道的语言是乌克兰语”。显然，使用俄语是对国家完整性的威胁，是分离主义的表现？！

总结俄语在乌克兰媒体中的地位，可以得出结论，“独立国家”当局追逐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它从广阔的信息空间赶出去！”

乌克兰议会代表深信，关于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12个法案，没有一个能被最高拉达通过。拉达前发言人科特温的声明便可证明这一点。他也曾相信，俄语对乌克兰是个威胁。不过他现在到了乌克兰科学院，不知会采取何种立场？乌克兰科学院在历史上同苏联科学院，现在同俄罗斯科学院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乌克兰当局并未停止把俄语从信息空间赶出去的行动。驱赶行动

采取了最丑陋的形式！当你读到俄文歌在乌克兰也开始受到迫害时，你会感到惊讶。在利沃夫，市苏维埃作出决定，禁止在街头、广场和公用交通工具里演唱俄文歌曲。违反者处以罚款，数额为50格里夫纳。不妨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利沃夫某饭店正举行婚礼，客人们正在一位俄罗斯人演奏的歌曲声中跳舞，突然警察“光临”，把人带到派出所，罚款50格里夫纳。利沃夫这种时常发生的仇俄行动，俄国人多半会忍气吞声地咽下去，就像咽下乌克兰纳粹党的歹徒在这个城市殴打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拆除侦察英雄库兹涅佐夫的纪念碑、把莱蒙托夫大街改成杜达耶夫街等事件一样。

乌克兰电视台也播放苏联电影和俄罗斯电影。但当人们听到电影里的俄语被翻译成乌克兰语时，是多么吃惊吧！俄罗斯人坐在电视机旁，做着反向翻译——再译成俄语。你很难想象当局这些行动是多么荒谬，可这些人还大声谈论乌克兰各族人民的友谊、尊重住在乌克兰的所有民族，但却干出这种蠢事。

在“独立的”乌克兰，仇俄的怪异行动并未就此打住。我们在俄罗斯便是见证，发现在最高拉达选举期间，有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区域领导人，在选举人名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就其愚蠢、卑鄙、下流而言，真是非同凡响。人们被强行剥夺了他们家族姓氏的根源、同祖先的联系，更不必说明显的歧视和法律上的混乱了。

请自己判断一下吧：选举前夕，当局决定将选举人名单译成乌克兰语。机器认真负责地把姓名改成乌克兰语。有一个人护照上印的是梅利尼科夫，现在变成米罗什尼科夫。梅利尼科夫找自己的名字，没找到。但这还算不了什么。梅利尼科夫和米罗什尼科夫按字母表总还是从同一个字母开始的。可是姓捷列金的人得怎么办呢？按照习惯，你得从字母т找自己名字吧。可万万猜不到现在得从字母“6”开始找了，因为现在的捷列金按乌克兰方式叫做布雷奇金。

有的人很不走运，因为顷刻之间不仅姓氏变了，名字也变了。有

一个人叫尼古拉·斯克沃尔佐夫，现在变成梅科拉·什帕克。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叫菲利普·霍赫洛夫，现在他成了佩鲁普·丘比耶夫。库兹涅佐夫变成了科瓦廖夫，杜比宁变成了德留科夫，克留科夫变成了加科夫，而波尔特诺夫则成为克拉夫佐夫。

人们看到这些新名单，纷纷向选举总部及其地区委员会发起进攻，抱怨计算机无知。比如，由于自动翻译的结果，宗季科娃变成了帕拉斯利金娜，普戈夫金变成了古德济科夫。地址的变化更令人吃惊：沃罗夫街变成克拉季日街，泽姆利亚尼奇内村变成波卢内奇内村……真是疯人说梦话。

这些事如果不是可悲，也实在是可笑。作为一个出生在乌克兰顿巴斯的人，笔者在写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消灭俄语的可耻行径时，心里很悲伤。我们俄罗斯人一直同乌克兰人比肩过着普普通通的劳动生活，我们相互理解，我姓什么姓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我喜欢他们那犹如唱歌般悠扬动听的说话声，喜欢乌克兰的幽默，喜欢那亲切的歌声。我有许多乌克兰人朋友，我珍视他们的友谊，总是为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现在在“独立的”乌克兰感觉如何？

政治家先生们，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你们干这些事是为了什么？你们是否以为你们这么干将来都能逍遥法外？你们唆使亲兄弟反目成仇，难道不怕早晚得负责任？

我想用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伟大作家果戈理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章：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究竟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只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认为小俄罗斯人比俄罗斯人优越，或者俄罗斯人比小俄罗斯人优越。上帝对这两个天然造物所赐予的实在太慷慨了，而且就像故意似的，让他们互相拥有对方缺少的某种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说明他们应该相互补

充。为此，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历史本身也是互不相似的，而这正是为了造就他们不同的力量和性格，以便后来再结为一体时，能为人类构造出某种最完美的东西。

1 本节中使用了Г.П.哈尔琴科向笔者提供的材料，特此致谢。

第十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近来对“独立的”乌克兰国内的局势，出现了许多分析文献和报刊文章。但它们对那里的事件，经常有着简直是针锋相对的解读。可以理解，有些作者由于特定原因，对乌克兰人民身受的痛苦抱着恶狠狠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另一些作者则不知羞耻地为这个国家所有阴暗的东西涂脂抹粉。

我不想再把乌克兰社会生活中一切负面的东西拿出来仔细描述一番了，说实在的，再揭这些烂疮疤也没有什么意思。前一章里我力图说明，人们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是怎么越变越糊涂的，也揭露了某些人利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道德面貌。我无法绕过俄语这个现实的题目，因为我本身，上面已经谈过，就是顿巴斯生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的一些亲人，他们的先人几百年来就在那里说俄语，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

对于我们这些身在俄罗斯的人来说，班杰拉分子在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举行的那一次次亵渎苏维埃祖国爱国者坟墓和纪念碑的游行示威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人们力图搞垮乌克兰大地上的正教、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动进攻的见证人。

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乌克兰依然不平静。议会在沸腾，政党联盟同“橙色革命”的拥护者正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战争，国家总统、议会和执政当局正在搞权力再分配。老百姓在尽过自己的义务，对所信任的政党投了票之后，结果还是只好听凭灾难和痛苦来折磨自己。上层的斗争还在继续。

不管是按民族特征、宗教特征，还是按意识形态原则，人民都统一不起来。有共同的领土，但却没有统一的社会。国家实际上是由两部分，即由东部和西部组成，因此我把本章的题目叫做“二合一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最残酷、流血最多的战争，它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人们尽管政治追求不同，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但所有的人都受到同一种热情的鼓舞，那是一个英雄主义无远弗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

但事情总是这样，在高高的浪尖上，总会有肮脏的泡沫在漂浮，更何况是在这么一场世界性的大震荡之中。在这场战争中，这肮脏的泡沫就特别表现在民族主义分子的部队同法西斯德国的合作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专门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暴行进行了审理，并作出结论。自纽伦堡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国际审判以来，已经过去了60年。7名法官，英、美、法各出2名，苏联出1名，代表国际军事法庭对具体人员作出宣判，对那些同法西斯主义有这样那样联系的组织进行了罪责认定。

现在，联合国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对待纳粹主义方面不仅继续坚

持当时采纳的观点，而且在这方面更有了相当的进步。

苏联严格遵守国际军事法庭的立场。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决定，对那些经指认与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具有反本国居民罪行污名的人员和组织，无论其犯罪事实发生时间多么久远，均予以审理。

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公民牺牲的人数以千万计，遗憾的是，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却跟法西斯德国合作。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外高加索、北高加索、中亚也有人参与其中。但表现得最卖力气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即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黑色的一页，最悲惨的一点是，这一页出现在我们祖国最危急的关头——出现在一个被称为是伟大卫国战争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以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处置了这些存活下来的附敌分子，断然拒绝了任何对这些叛徒进行辩护的企图。搜寻罪犯的工作，一直继续到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尽管犯罪事实发生在很早以前，但所有被查找到的罪犯仍要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些可耻的事实似乎已永远成为往事。但统一的国家苏联被破坏之后，在战争期间第三帝国军队曾经活动过的某些国家和前加盟共和国，那些跟法西斯分子合作过的民族主义分子部队的参加者又抬起了头。给他们恢复名誉，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国家把他们作为二战参加者发给他们津贴，甚至鼓励这些“老战士”聚会。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那里会发生这种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争取主权的斗争和乌克兰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一切都可以拿过来作为武器，其中也包括跟法西斯德国肩并肩同自己国家厮杀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国家当局和部分社会公众对这些行动的公开支持，使我们有

理由认为，这不是什么简单的过往时代的“历史回声”，而是他们的一条目标明确的政治路线。

时至今日，在取得独立之后，有些地方仍在对这件事进行辩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3个共和国需要向世界显示，它们不仅在改革时期，而且在很早以前，便已经为主权而战了。这些国家的新当局对权力大位觊觎已久，他们很需要那些同德国侵略者携手跟本国人民作战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于是被征召起来。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同苏联进行斗争时，把部分赌注押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反共势力身上。在某些国家，种族民族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直接为那些曾同纳粹分子合作过的人辩解的理由之一。

为附敌分子恢复名誉的这条主要路线，表现为尽力把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同跟法西斯德国合作说成是两码事，或者把在附属于法西斯军队的民族军事部队中服役说成是为解放本民族而进行斗争。

不过这可以说只是一种最一般的情况。而为了分析产生的种种原因，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有所说明，必须对上个世纪的近现代史做些题外说明。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内战时期。当时在解体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领土上，一下子诞生了两个乌克兰国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十月革命以后，中央拉达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它规定了自己政权的新边界，在前盖特曼政权的辖区内确立了乌克兰自治。可是根据什么原则把诺沃俄罗斯和今哈尔科夫州、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等历史上大俄罗斯居民居住的地方也划了进去，就弄不清楚了。后来，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取代拉达，并把塔夫里亚也并了进来，塔夫里亚现在是赫尔松州辖区的基本部分。

1920年，苏维埃乌克兰占领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和一部分右岸地区。人口数量达3250万。波兰获得了一块面积占第二位的土地——加里西亚和沃伦，俗称西乌克兰，人口为1020万。罗马尼亚分得北布科维纳以及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沿岸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则把外喀尔巴阡地区并入版图，正式名称叫喀尔巴阡罗斯。

为了保住新政权，苏维埃乌克兰在文化领域获得了充分自由，而政治活动自由则受到了不大的限制。

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虽说是保加利亚犹太人出身，但却是乌克兰历史上最狂热的主张乌克兰化的人。在共和国俄罗斯人居住地区推行所谓的乌克兰化，实行最残酷的社会文化压迫，其实并非始于1991年，而是始于1919年。那时，甚至把“乌克兰精神”之父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也从侨居地请了回来，并立即把他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的院长，两年之后他还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院士。

1939年，苏维埃乌克兰同加里西亚合并，这为乌克兰化提供了强劲的新动力。加里西亚的干部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45年，外喀尔巴阡地区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当地有一个俄罗斯人区域，至今仍顽固地拒绝使用乌克兰名称。

给乌克兰的第二份礼物是赫鲁晓夫于1954年送的，到了1991年经叶利钦在别洛韦日森林默许，于是全苏直属的俄罗斯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实际上竟被兼并。

后来的“独立的”乌克兰，“形成”史的基本环节便是如此。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规模相当大。它始于1920年布拉格的一个不大的民族主义分子小组，由乌克兰军官构成。那个在当地成立的组织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乌克兰军事组织，构成其基础的是乌克兰人民军和乌克兰加里西亚军原来的几个军官。乌克兰军事组织在1928年共有近2000人。该组织领导人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上校叶夫盖尼·科

涅瓦列茨。在西乌克兰，乌克兰军事组织分部由安德烈·梅利尼科夫上校领导。

乌克兰军事组织宣传乌克兰独立思想，但其基点放在恐怖活动上。该组织为了在反波兰和反苏活动中获得同盟者，远在1921—1922年便同德国军事谍报机关建立了联系。他们用有关德国这些敌人的情报换来经费和在德国自由活动的权利。1928年，波兰人掌握了乌克兰军事组织和德国特工机关有联系的证据，提出了外交抗议，德方才停止向乌克兰军事组织拨款。

1929年，在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后称首届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会议）上，乌克兰军事组织更名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为一个非法恐怖机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希望建立的独立的乌克兰，西部从桑河起，东部到北高加索止，这一事实值得人们注意。在东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居住着许多几乎俄罗斯化了的乌克兰人，远在18世纪他们便已移居该地。除此之外，按他们的意见，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接壤的某些领土亦应并入乌克兰。

1938年乌克兰军事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头领科诺瓦列茨被打死之后，1939年8月2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在罗马召开了第二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大会，安德烈·梅利尼克上校当选为该组织首脑。

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西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其中有斯捷潘·班杰拉，从监狱和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他们都是1934年由于杀害波兰内政部长布罗尼斯拉夫·波列茨基而在那里服刑的。

班杰拉出狱之后，便把一些不满于梅利尼克领导的人汇集到自己旗下。从这时起，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少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组织（多数），即梅利尼克分子和班杰拉分子，便开始相互仇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相同的，差别仅在于梅利尼克分子同意跟德国纳粹更进一步妥协；而班杰拉分子虽也同德国人积极合作，但却提出在活动中也可以依靠其他国家。

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打响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部队立即积极活动起来，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动员起近一万人的民族主义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立即被投入战斗，开展破坏活动，切断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向后方、司令部和部队进攻。

维尔纽斯的犹太人伊利亚·约涅斯于1941年6月住在利沃夫，他作证说：“我们多次试图随撤退的俄军离开城市，但都没有成功。在利沃夫以东的郊区和农村，有人埋伏在那边向逃跑的军队开枪射击。牺牲的人很多。开枪的是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匪帮，他们很快便组织起来，从秘密的地方取出武器，给俄国士兵和随他们逃跑的犹太人制造困难。”

根据某些专家的资料，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部队在战争头几周在这里损失了近2100名官兵，他们均死于民族主义者之手，还有900名伤员。在武装反苏过程中，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得以在26个地区的土地上掀起暴动，涉及现今的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和罗夫诺州。

1941年6月30日德国人占领利沃夫后，班杰拉小组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国成立。班杰拉分子雅罗斯拉夫·斯捷茨科被任命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虽然宣布乌克兰独立并没有征得占领者的同意，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多数）始终明确抱定附敌方针。下面就是乌克兰独立宣言的几个段落：

乌克兰国恢复后，将与伟大的纳粹德国相互密切合作。伟大的德国在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

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

在乌克兰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乌克兰民族革命军，今后将同德国同盟军一道反对莫斯科占领，为主权的、独立的乌克兰国，为全世界的新秩序共同斗争。

为了彻底搞清新炮制的“独立”乌克兰领导人的真实目的，还是再来引用两段斯捷茨科致元首的话吧：

我们满怀真心的感激之情，为阁下在战场上厮杀的英雄军队，在同欧洲最大的敌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又取得新的荣誉而感到惊讶。在此谨代表乌克兰人民及其在解放了的利沃夫建立起来的政府，向阁下，伟大的元首，致以衷心的祝愿，愿这场斗争以彻底胜利而结束。

德军的胜利将使阁下有可能实现阁下提出的建设新欧洲的计划，并将其扩大到东部地区。这样一来，阁下便可以使乌克兰人民作为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成员之一，在自己的享有主权的乌克兰国，实现这一伟大的计划。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者的宗旨不仅在于获得独立，而且在于参加和确立新的法西斯“秩序”。“总理”斯捷茨科还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和“独立的”克罗地亚也发出类似的致敬信。

尽管发表了这些忠心耿耿的声明，但德国当局仍然认为，宣布乌克兰独立是不能允许的。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小兄弟”，他们需要听话的奴隶。

1941年7月，班杰拉和他的几名同伙被逮捕，送到柏林被软禁起来，后来又送到集中营。尽管不断遭到逮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既包括班杰拉分子，也包括梅利尼克分子，仍继续指望德国人发善心，还在宣传德国人的“解放使命”思想。

在1942—1943年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是一些人数众多的分散的部队，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相互为敌，常举行谈判，签署备忘录和声明。

乌克兰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军事运动也需要交代几句。这里指的是乌克兰起义军。这支部队的人数大约有两万。乌克兰的一部分警察进入该军，使它得到补充，因为德国当局把乌克兰警察换成了波兰警察。乌克兰起义军的安全部门还积极消灭政治敌人和论敌。

必须指出，曾经存在过两支同一名称的军队。先有的一支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塔拉斯·博罗韦茨（化名塔拉斯·布利巴）的军队。虽然此人就政治信仰而言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并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39—1941年间，博罗韦茨—布利巴在寻找同盟者期间，同德国军事谍报机构阿伯韦尔建立了联系，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返回苏联。

在战争头些日子，“布利巴分子”在罗夫诺州同红军撤退部队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作战。后来他们又同红军被打散的残部进行斗争，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投敌分子一起，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消灭红色游击队，并把他们从所谓“森林边缘地带的盆地”驱赶出去。

1943年2月和3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多数）就队伍加入乌克兰起义军一事作出决定。班杰拉分子从1943年4月份起开始利用乌帕（乌克兰起义军）这个缩写词。为了避免混乱，博罗韦茨—布利巴于1943年7月将乌克兰起义军更名为乌克兰人民革命军。但就在1943年8月，乌克兰人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部队便被强制解除武装，其士兵转入乌克兰起义军。博罗韦茨战后住在美国，1981年死于该国。

博罗韦茨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具有代表性。1941年同法西斯分子合作，从1941年到1943年又同他们进行斗争，从1944年末起，当德国人不得不改变其“东方政策”时，又同他们

合作。

班杰拉分子于1944年2—3月间建立乌克兰起义军的原因是，1942年和1943年之交西乌克兰大地上出现大量红色游击队，当时他们完全控制了该地区森林中的局面。班杰拉分子配合德国法西斯同游击队进行斗争。乌克兰起义军的领导人之一是这样说明他们同法西斯的关系的：“他们给我们枪支，我们给他们黄油。”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意见，乌克兰起义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由自主才成为德国人在前线的直接同盟军的。德国谍报机关在评价西喀尔巴阡乌克兰起义军的行动时指出，这部分人控制了西喀尔巴阡山和东贝斯基迪山的山口，为防止苏联人在这个区段翻越喀尔巴阡山作出很大贡献。乌克兰起义军也帮助了某些撤退的德国部队。

随着科夫帕克领导的苏联游击队运动在乌克兰的发展，也由于德国警察和护卫部队的不足，根据党卫军总队长、加里西亚军事卫戍司令韦赫捷尔的提议，成立了一个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党卫军师。在反共斗争旗帜下开展的宣传运动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在招募点上有成千上万人报名加入党卫军。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条件挑选14000人组成一个师，并用剩余的人组成几个警察团。1943年利沃夫开始组建党卫军师，由西乌克兰人充任该师的列兵和士官。

1944年6月以前，该师的名称是“加里西亚”党卫军志愿师，而从6月27日起，改名为“党卫军第14掷弹兵师”。部队驻扎在德国领土的教练营地，全体指挥人员均在党卫军军官学校受训。党卫军总队长弗里茨·弗赖格被任命为师长。

1943年，所有在乌克兰德国部队服役的人员，均被宣布为乌克兰解放军士兵。纳粹分子还使用了一种宣传伎俩：军队没有自己的指挥机关。乌克兰党卫军分子直接向德意志帝国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1944年6月，“加里西亚”等8个德国师在布罗德被苏军粉碎。“加里西亚”的14000名官兵中只有3000人突出包围，被派往斯洛伐克休整和补充。后来该师得到补充后，又参加了欧洲东部和中部的警察行动。“加里西亚”师（“巴耶尔斯多尔夫”战斗小组）还在波兰、利沃夫地区、捷尔诺波尔地区、斯洛伐克（同季尔列万格尔旅一道）以及南斯拉夫针对和平居民进行过讨伐行动。

德国投降后，该师大部分（近一万人）突围到奥地利，向英国人投降，有4700名士兵和军官被苏军俘虏。

这些自称加里西亚人的部队使盟国感到为难，地位问题使其中许多人逃脱被强行遣返苏联的命运。尽管他们在党卫军干过，波兰将军安杰尔斯却认为最好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决定饶恕他们的过去，又考虑到他们都是真正的反共分子，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便支持他们的声明，说他们似乎是波兰人。

总之，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法西斯占领者的相互关系，不能说是始终如一，但却始终存在。他们之间有过爱，也有过冷淡，然后又投入彼此的怀抱。乌克兰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不能不知道德国人对乌克兰人民的态度，但他们标榜他们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毫无疑问，他们非常明白法西斯分子的真实目的，但却向人们隐瞒，对人们只是灌输一种思想：最主要的是乌克兰的“独立”。

不久前公布了一封帝国国务秘书马丁·博尔曼于1942年7月27日致罗森堡的信。他在信中把元首对德国在东部占领区的政策意见转告罗森堡。下面引用几段，从中可以看出，法西斯德国最高当局的指示有多么“英明”，因为它影响到乌克兰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站在民族主义分子领袖旗下的人们的命运：

……东部占领区的各州居民比以往繁殖更快的危险非常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应采取必要措施遏制非日耳曼居民的繁殖。所

以决不要把德国式的服务运用在东部占领区各州居民身上。

比如，在任何条件下不许为非日耳曼居民施行接种和其他保健措施。决不许让当地居民受到更高的教育。如果我们犯了这个过错，我们便会造就未来对抗我们的力量。因此，根据元首的指示，只要教会当地居民，其中包括所谓的乌克兰人，读和写就足够了。

我们决不可以任何措施发展当地居民的优越感！一定要做恰恰相反的事情！将来，学校里应教拉丁字母，以取代现在的拼写。

……元首强调，在帝国本土，经由法律规范的东西太多了。在东部占领区各州决不可这样做。对当地居民不要颁布过多法律：只需限于最必要的内容即可。

决不可在总委员会甚或在帝国委员会层面上成立统一的乌克兰管理机构。

1944年，苏军从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了乌克兰。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继续在苏联的乌克兰领土上进行活动。总面积不小于1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0万的广阔领土成了对抗的场所。

乌克兰起义军还在波兰的东南部地区积极进行颠覆活动。苏波边界确定之后，乌克兰起义军建立起代号为“桑”的第6军区，该军区掌管乌克兰起义军活动的“波兰”地区。同波兰政府军的斗争持续到1948年。

这一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还建立起非法机构以对抗苏联当局。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下人员和乌克兰起义军部队进行活动的几乎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权。在西乌克兰某些地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然而从1947年起，乌克兰起义军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就已经停止

了。恐怖组织个别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极其困难。这时乌克兰起义军转向小规模破坏活动，直到1953年，战斗活动还时有发生。直到1955年，乌克兰起义军的活动实际上才完全停止。最后几个小的抵抗巢穴于1956年被消灭。有证据表明，乌克兰起义军同苏联政权进行斗争的部队，于50年代初穿过斯洛伐克和捷克山区，进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奥地利。

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活动的东西写过许许多多。那时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年代。为了说明当时的真实情景，让我来引用一段雅·加兰写于1945年的特写《莫可名状》：

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一见到肉心里就无法平静。当人们当着她的面准备炸肉饼时，她便面色苍白，颤抖得像一片山杨叶子。

几个月前，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几个武装匪徒来到距萨尔纳市不远的农舍，用刀子捅死了主人。小女孩吓得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双亲临死前的抽搐。

一个匪徒把刀刃架到孩子的喉咙上，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新“想法”。

“为斯捷潘·班杰拉的光荣，你活着吧！为了不让你饿死，我们给你留点食物。喂，小伙子们，给她砍些猪肉吧！……”

“小伙子们”很喜欢这个提议。他们从碗橱里拿出一些盘子和盆盆，几分钟后，在吓得发傻的小女孩面前，从她父母还流着血的遗体上砍下的肉像小山一样，越堆越高……

这些自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败类——班杰拉分子、布利巴分子、梅利尼克分子——竟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最近几年的活动，是数不完的野蛮兽行，是骇人听闻的为所欲为和无以复加的烧杀抢掠……

2006年7月是杰出的苏联乌克兰作家和政论家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兰诞生100周年。今天，在乌克兰文学教科书上看不到他的名字，在广播电视中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雅罗斯拉夫·加兰生于西

乌克兰，一生为反对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而斗争。那是一种丑恶的运动，其流毒起初遍及加里西亚大地，而后，在戈尔巴乔夫年代，毒根又伸到整个兄弟的乌克兰。

加兰以自己的笔，以他那了不起的犀利的文章和特写，同我们伟大祖国的叛徒展开了战斗。这些叛徒用斧头把他直接砍死在写字台旁。此事发生在1949年。读完特写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特写中描写的那些“人”会杀害加兰。

战后反对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的斗争，非常艰难而又残酷地一直进行到50年代中期。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统计，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的恐怖活动，共牺牲党的区委书记30名、区执委会主席和副主席32名、共青团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37名、州苏维埃、区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代表数百名、正教神甫50名、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3万名。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7个州对苏联政权进行的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引起苏联政权方面更为坚决的回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根据195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到的材料，“从1944年到1952年，在乌克兰西部各州遭到各种形式惩罚的约为50万人，其中逮捕13.4万余人，处以死刑的15.3万余人，永远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为20.3万余人”。

同反法西斯人士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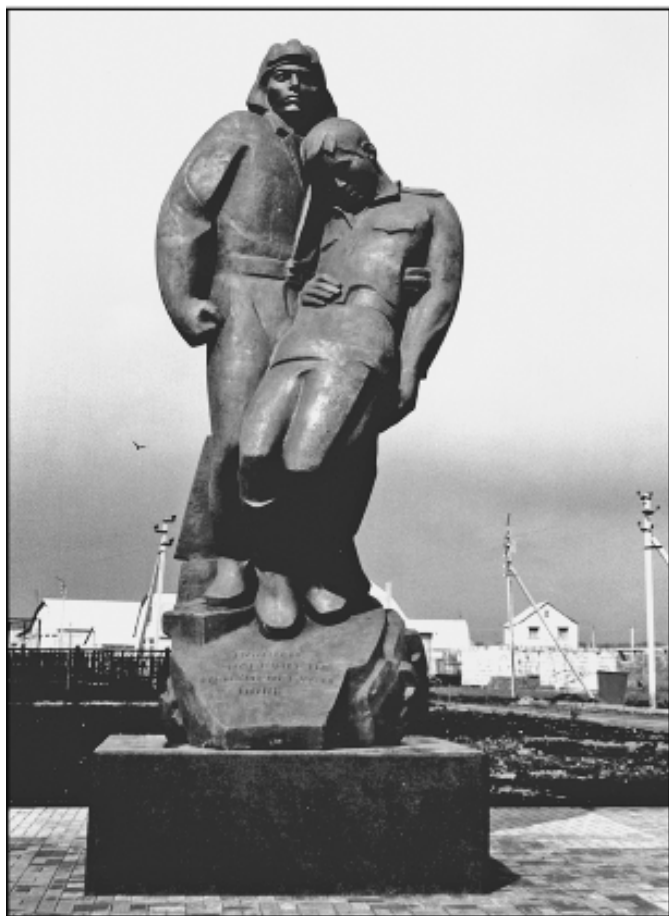
上面已经谈到，近来，在前苏联某些共和国内，正积极试图为民族主义运动在二战年代所起的作用翻案。

比如，在乌克兰可以听到要求在国家一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和其他民族主义政治军事组织恢复名誉的声音，而且声音还越来越高。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战时和战后代曾在苏联和几个邻国领土上进行活动。这件事还涉及德国党卫军部队“加利西亚”师的军人。

例如，1993年8月，基辅召开乌克兰民族军第一乌克兰师建立50周年的纪念会，会上有一个提议称：“考虑到前该师人员在独立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考虑到他们在战争中有利于乌克兰的积极活动，兹向最高拉达提议，承认该师军人享有与二战其他参战者同等的权利。”

2002年，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通过为前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士兵恢复名誉的决定。地方自治机关的决议把他们等同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该加利西亚党卫军师并非为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国而战，而是为乌克兰的独立同苏联作战”。

1944年7月27日是利沃夫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下获得解放的日子，却被宣布为“莫斯科极权制度开始统治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日子”。现在，同希特勒军队共同保卫利沃夫，抵抗苏军进攻的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师的建师纪念日便定在这一天。



1943年7月普罗霍洛夫卡战场参战人员纪念碑。（索戈扬摄）

2002年夏季，乌克兰政府声称，必须追认乌克兰起义军战士为争取国家自由独立的战士。这就是说：应把班杰拉分子宣布为英雄，地位与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相等！还提出一个说法，认为从1939年9月起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民族军抵抗运动时期，“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团结和建立统一的乌克兰”。

2004年末，随着以尤先科为首的人取得政权，试图为曾与法西斯合作过的民族主义组织恢复名誉便越来越是常事。2005年4月9日，由10名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组向尤先科总统、季莫申科总

理和最高拉达首脑利特温公开致信，请求协助制定二战以乌克兰为中心的思想。建议承认苏联的胜利意味着“对乌克兰的重新占领”。相应的建议就是不要庆祝胜利节，因为这“不是乌克兰人的节日”。又建议，红军老战士不应被认为是新乌克兰的主要英雄，那些附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起义运动的参加者才是主要英雄。最高苏维埃发言人利特温正式声明，议会会有意通过专门法律，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恢复名誉。

2005年，为那些曾同法西斯德国合作过的人员和组织恢复名誉的过程开始活跃起来。2005年5月11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责成总理季莫申科，为研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活动，组建一个委员会。总统在其号召书中指出，从事该活动的战士“视自由的乌克兰如同自己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可能，为自由的乌克兰而斗争”。

2006年5月6日，尤先科在每周广播词中说，“国家至今未在官方层面上承认那些曾为乌克兰的自由和独立进行过战斗的人，深感遗憾”。

“本总统对新议会寄予厚望。本总统希望议会能就所有参加战斗人员的地位问题作出决定。最高拉达应向所有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致敬，并投票通过法律，承认乌克兰起义军成员为二战老战士。”

乌克兰总统再次号召苏军和乌克兰起义军的老战士们“为了未来而讲和”。“本人以你们子女一代的名义向你们呼吁：尊敬的父母，不要再把这个问题传给我们。为了乌克兰，为了你们的子子孙孙，相互握起手来，相互谅解吧。乌克兰民族将会对你们迈出的这一步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向广播听众这样保证。

乌克兰起义军曾同现称为卫国战争老兵的战士们作过战。他们对这些战士开展游击战，像对“占领军”一样枪杀他们，结果共消灭官兵

3000余名。现在国家居然决定为这些“英雄”恢复名誉？被班杰拉分子杀害的这些人的子女还应当“为了未来同他们讲和”？！

首批恢复名誉的工作是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开始的。但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工作在那边没有能进行下去，因为未能得到基辅的支持。而“加利西亚党卫军”在利沃夫未能恢复名誉则是前市苏维埃代表的功劳。

当局和历史学家坚持为乌克兰起义军恢复名誉，理由是这支部队的战士已所剩无几，都是些“干不了坏事的老爷爷”。但左派——共产党和社会党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即便时间过去已经久远，也不能为搞自相残杀的人辩解。

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话题在拉达选前总要被提起。这回的情况是计划之外的：议会运动已经结束，到总统大选几乎还得再过两年。正如代表们所说，政府为乌克兰起义军说话的目的，是要讨好最高拉达及其右翼。

现在乌克兰有几个组织一直在致力于平反的问题。这是一个经过注册的社会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其中比较积极的一翼被称为“班杰拉之翼”，它于1993年成立了一个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该党认为自己是50年代被粉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法理继承人，是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集团的成员，该党代表人物通过集团可以进入乌克兰议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头头亚历山大·伊夫琴科（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12月份声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可以在各级政权机构，从最高拉达到地方苏维埃，以及在行政机构中，代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我党成员。本党第一次对当局不采取反对立场，第一次拥有掌权的现实机会”。

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了给附敌分子及其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

所作所为翻案，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苏联英雄的纪念碑和坟墓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为民族主义分子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他们还为广场和街道更名，等等。

几年前我偶然得到一本书，其中刊载着为罗曼·舒赫维奇纪念榜照的两幅照片。希姆莱曾任命这个人为乌克兰起义军的总司令，即“丘·普林卡将军”，纪念榜立在他死掉的地方，而他的纪念碑立在利沃夫城郊的别尔戈罗什镇。利沃夫原来有一条普希金大街，现在改成了他的名字。不久前，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马尔科夫发表回忆录，他曾在苏联内务部队81师步兵团服役。当进入“锅底”的德军遭到歼灭性打击时，他们也正在为消灭班杰拉匪徒而斗争。回忆录这样说：

.....我还记得，利沃夫的居民对我们说过，1941年夏天，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入城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人员也进来了。他们是根据班杰拉提议，被合并到“纳赫季加利”营的，归刽子手和杀人犯罗曼·舒赫维奇指挥。班杰拉在送别这些为统一不可分的乌克兰进行斗争的武装分子时说：“我们的政权应该是令人可怕的政权.....凡反对这一制度的人都应被消灭.....”

1945年3月份，有一次我们连搜索利沃夫城郊的雅诺夫森林，我们碰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消灭的上千名战俘和平民的葬礼。班杰拉分子连妇女和儿童都没有放过。比如，从1944年2月到1945年10月，匪徒们在沃伦州（在罗夫诺）杀害了1932名居民，其中313名儿童，615名妇女，365名老人。从1944年夏季到1946年5月，他们在利沃夫州折磨致死达5088人。其中有3000人是农民。已经在胜利后，当地人通知我们，“橡树”（这是舒赫维奇的绰号）手下的匪徒正在洛佐维和库利奇基村行凶.....我们冲入洛佐维村，展开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有5名士兵牺牲，而匪徒被打死50多人。在村中我们得知，班杰拉分子在这次战斗前夜进行了一次可怕的屠杀，杀害了100余名居民。他们在乌克兰妇女德拉贡家，野兽般用斧头砍死女主人和她的3个孩

子。

稍后，我们在利沃夫城下的森林中捕获了这一匪帮的残余分子。而如今，为了纪念这个匪徒，德罗戈贝奇市居然还有一条街叫他的名字……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统帅”瓦西里·西多尔（也就是舍列斯特）现在正被捧为乌克兰英雄。他是被我们在斯坦尼斯拉夫城外的森林中抓获的。他不肯投降，于是额头吃了一颗子弹。

我们接到消息说，米哈伊尔·杜德（也就是格里戈里·济诺维）正藏在楚曼斯基森林，米哈伊尔·费德卡（也就是布里利·斯米尔内）藏在罗夫诺森林，德米特里·格里察拉（佩列贝诺斯）藏在科罗斯坚森林。为了把这些匪徒列为英雄，得有多么细心地把他们身上的血腥和污秽洗掉，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才能做到啊？！记得当天夜里我们细细地搜索过一座难以通行的密林后，来到了古斯维采村和沃尔科维亚村，村里有几座农舍还在燃着熊熊火焰，周围一片哭声。原来是匪徒们刚刚“血洗”了这片地方。他们把一批男男女女、孩子、老人赶到一起，活活烧死在一处仓房里。年轻女人遭他们强奸，为了显示他们的“恩典”，才把她们枪毙了。而在沃尔科维亚村，几个男人被绑到长板凳上，活活锯成两半。

班杰拉在乌克兰早已恶名昭著，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利沃夫在未来要安放纪念碑的地方已经竖起了一块奠基石。这座城市还在恢复乌克兰国、建立以班杰拉为首的政府时宣读文件的建筑物的墙上，安放了一块纪念牌。这个“历史性”文件，其中的几段话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了。

1991年11月份，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利沃夫动手拆除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的纪念碑。据一位乌克兰“历史学家”说，似乎是根据当地劳动者的多次请求才这样做的。“但是没有炸掉。而是充满敬意地将其运到这位侦察员的家乡叶卡捷琳

堡”。看哪，亲爱的读者，原来是“充满敬意地”拆除。当时，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尼·伊·库兹涅佐夫遭谋害”的节目，大家也都看到是如何“充满敬意”的：用绳索系住头，把英雄的半身雕像吊起来，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扔到地上。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复仇的愉快和幸灾乐祸的心情做的。他真该从坟墓中站起来，看一眼这些人，他可是为了这些人的自由献出自己生命的啊！下几个镜头显示，大街上摘掉了带有库兹涅佐夫名字的路牌，又匆忙地钉上了带有……班杰拉名字的路牌。

对我来说，尼·伊·库兹涅佐夫不只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乌拉尔人怀着神圣的感情，怀念俄罗斯大地上这位爱国者的名字。此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在我亲爱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当设计师。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的人都深深以他为荣。为纪念库兹涅佐夫，在他曾工作过的一度是厂设计处的房间里，办起了一个以他命名的纪念室。厂部入口处挂着一块光荣牌，上写尼·伊·库兹涅佐夫曾在此工作过。我在厂里工作时，还遇到过当年曾同设计师库兹涅佐夫一道工作的人员。我们都怀着亲热的感情对待他的亲弟弟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他像两滴水一样酷似自己的亲哥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一些战友多夫戈尔、斯特鲁京斯基等人都是工厂的常客。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在部队传奇指挥官梅德韦杰夫见面时，到场的人真是人山人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1911年7月27日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塔利茨基区济良卡村。

远在学校学习年代，他便表现出学习外语的非凡才能。今天，一说起库兹涅佐夫对语言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某些怀疑主义者就气不打一处来，把这位侦察员的经历说成是苏联神话。但他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实。

30年代初，尼·库兹涅佐夫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设计处工作，同时又在工学院夜校部德语班学习。20年

后，我也毕业于这座学院。他在厂子里常与德国专家交流，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个良好的会话实践，而且有可能研究德国工人和工程师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心理、习惯。学院毕业后，库兹涅佐夫被派往莫斯科，进入对外情报机关。

伟大卫国战争头几天，库兹涅佐夫便呈递报告，请求“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前线或在侵入我国土地的德军后方”使用他的能力。他连打了两份报告，愿望才得到满足。据这位侦察员的一些战友谈，“库兹涅佐夫被空投到被占领的乌克兰土地上，只带一把手枪和一颗手榴弹，就这些武器！但法西斯分子脚下的土地却燃烧起来……”

1942年夏天，尼·库兹涅佐夫被派到代号为“胜利者”，由梅德韦杰夫指挥的特工队。后来在70年代，梅德韦杰夫写了几部讲述这位侦察员功勋的著名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扮成德国军官，在罗夫诺市中心活动，消灭了乌克兰帝国委员会帝国顾问格利和他的秘书温特尔。一个月后，又重伤了帝国委员会副专员达尔格尔将军。稍后，还绑架了乌克兰讨伐军司令冯·伊尔根将军。之后不久，又击毙了乌克兰敌占区最高法院院长丰克。

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还有针对性地搜集对中央十分重要的情报。1943年春天，他获得十分珍贵的情报：敌人正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使用“虎”型和“豹”型新式坦克，展开大规模进攻。他还得知希特勒在文尼察城下设立野战大本营的具体地址。正是库兹涅佐夫首先报告了准备在德黑兰历史性会见时对“三大国”政府首脑进行暗杀的消息。

1943年12月末，库兹涅佐夫得到一项新任务——在利沃夫开展侦察工作。他完成了复仇行动，消灭了加里西亚副省长奥托·鲍尔。

1944年3月8日至9日夜晩，他的小组在利沃夫州博拉京镇遭到伏击，在同乌克兰起义军士兵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全部牺牲。库兹涅佐夫

见自己已陷入绝境，便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周围的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1944年11月5日，由于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时，表现得特别坚毅勇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死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尼·伊·库兹涅佐夫的功勋写成了许多书籍和剧本，文章和特写，拍了好几部故事片（《侦察员的功勋》、《果敢坚强》、连续剧《特别任务》）和文献纪录片（《天才侦察员》等）。

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是库兹涅佐夫的战友，于2003年去世。他曾在库兹涅佐夫化身为“济别尔特”时担任他的司机，参加过他的所有战斗行动，生前很关心库兹涅佐夫的坟墓。他用了好多年时间，去考证这位传奇战友经历中各种事件的真实情况。斯特鲁京斯基本人也得到过不少崇高的战功褒奖，他说：

库兹涅佐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为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如今有人却要宣布他为乌克兰的敌人。下面仅举几个我亲自可以见证的事实。当我们消灭了乌克兰大枢密官阿尔弗雷德·丰克将军后，定在罗夫诺近郊的久季科维奇镇为他下葬。那里有一条小河。我们决定炸毁木桥，炸死应该跟在灵车后面的那些将军。一切已准备就绪，但在最后一刻，库兹涅佐夫取消了这次行动：他担心德国人会因此而把整个村子杀光。我们反对撤销这次行动，但库兹涅佐夫却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事实。在抓到加安伯爵和揭露了“韦尔沃尔弗计划”的秘密之后，我们返回自己的部队。在斯卢奇河上遭到阿塔曼布利巴手下的伏击，但进入战斗后，抓到13名俘虏。库兹涅佐夫看了一眼他们的穿戴——脚上的树皮鞋，身上的破烂衣衫。他把他们排成一列，对我说：“科利亚，我们不枪毙他们。这是些被骗的人，是农民……”对他们说：“我们是同德国人作战，而不是同乌克兰作战。我们放了你们，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再也不许拿起武

器。”他们起誓发愿，就被放走了。在战争中这是罕见的事。这种事还有。

.....他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乌克兰的儿子。独立的乌克兰国应承认他是自己的英雄。他不是为荣誉而战，捍卫的不是哪个政权，他是同法西斯瘟疫战斗，为乌克兰人民牺牲的。最后，总应该还他个公道吧。

在这位传奇侦察员诞生95周年的那一年，乌拉尔人发现这位声威远播的老乡的坟墓状况很不能令人满意，便积极倡议迁葬库兹涅佐夫的遗骸。遗骸将被迁移到叶卡捷琳堡。现已选好几个重新安葬的地点，有公社社员广场、国防广场和希罗科列琴斯克纪念坛。

库兹涅佐夫是为乌克兰的自由而牺牲的，今天乌克兰又对此作何感想呢？回答已昭然若揭：那里现在正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正在跟那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只能被视为对民族野蛮主义的一种鼓励。事实上他们斗争的对象并非纪念碑，而是人民的历史记忆，讨好的则是那些家生土长的叛徒。

我们从媒体中得知，在“独立”的乌克兰也有某些公民出来反对国内的这些行动。他们封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分子的集会游行，反对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和拥护者，但可惜的是他们人数太少。

乌克兰人应该学习克里米亚人。妇女，主要是成年妇女，使美国海军陆战队蒙受耻辱，把他们那些集装箱船统统赶了出去。

乌克兰人民需要觉醒，远离那些客里空的“橙色”革命领导人，要头脑冷静地想想，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现在的当局在消灭人民记忆的同时，正力图为他们坚定的亲西方、远离俄罗斯、远离“莫斯科佬”的路线辩解。



坦克战场上的纪念碑——钟楼。雕塑作者克雷科夫。（作者提供）

“独立国家须有独立教会”¹

上个世纪80—90年代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部分是由宗教关系决定的。虽然表面看来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因为世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听从精神引领者的教导的。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之前，西乌克兰已有合并教会在活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是在1596年由布列斯特合并派教会成立的。它服从罗马教皇，在保留正教仪式的条件下，承认天主教教义，为波兰当局利益效力，后来又为奥匈帝国效力。它持有反苏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同希特勒分子合作，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46年，由于布列斯特合并教派废除，它也自行瓦解。

80年代末，乌克兰西部各州民族主义情绪掀起浪涛。从一开始，这一过程便带有公开的政治性质，是加里西亚知识界素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教会土壤上的反映。

在西乌克兰首先表露出这种情绪的是希腊天主教徒。早在1988—1989年间，他们便走出地下状态。从1989年下半年起，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代表转向直接的积极行动。转至1989年秋季，他们开始大规模侵占正教庙堂。到了10月份，利沃夫的主圣容大教堂成为合并教会教徒的第一个牺牲品。

当时提出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口号：按1939年时的状况把所有庙堂和财产归还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及至1989年年末，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获得合法地位。梵蒂冈的外交介入和约翰·保罗二世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1日就此达成的协议，对促成此事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990年初，民族“民主主义者”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开始在乌克兰西部各州执政。合并教派从此得到当局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支持，对俄罗斯和正教的全面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选后，其成员中出现了大量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从此，独立派有了议会讲台，同苏联当局的对抗进行得更加激烈。在政治狂热有增无减的背景下，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一派侵占庙宇的运动达到更大规模。其间对可以影响事件进程的人士，包括约翰·保罗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提出多次呼

吁，均未产生任何作用。

有亲天主教情绪的当局在小城市和村镇行事的办法都有个固定的程式：不管正教教徒和合并派教徒在该居民点的人数比例如何，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作出决定（1990年各地各级苏维埃均由“鲁赫”分子把持），把庙堂移交给希腊天主教徒。如果正教教徒拒绝交出庙堂，便发起冲击，其结果往往总是大量人员受伤，庙堂本身受损。常常圣地蒙污，甚至纵狗进入教堂追咬正教徒，而神职人员则被武装暴徒强行逐出祭坛。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西乌克兰由合并派教会发动的抢占庙堂的局势便是如此。这一切都是拜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克拉夫丘克所支持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鲁赫”分子所赐。

种种事件在约翰·保罗二世正式访问乌克兰期间达到了高潮。这次访问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对于库奇马摇摇欲坠的地位而言，贵客莅临不啻是收到了一份厚礼。

在基辅机场，大祭司鲍里斯波尔受到库奇马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小伙子 and 姑娘们身穿民族服装，高喊“贵族老爷万岁！”

一看到约翰·保罗二世踏上乌克兰土地的这架势，便明白他是要充分利用这次访问，不仅向天主教教徒，而且向整个乌克兰进行布道宣传，其中提到“政治势力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对教徒的迫害”（当然是指希腊天主教教徒），但却只字未提希特勒分子杀害东部斯拉夫人的种种罪行，未提成百上千的被枪杀、活埋、烧死、投入矿井的苏联公民。

教皇到了巴比雅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放过霍洛科斯特（大屠杀）这个话题。后来又访问了贝科夫连斯基森林，因为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苏联时期被镇压的牺牲者。他在长篇布道宣讲中错

落有致地安排了一些重点：对纳粹一带而过，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则大张挞伐。这次的访问行程图当然不会让他访问特地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可怕的达尔尼茨基集中营。

总结是2001年6月27日在利沃夫做的。这场弥撒有29名希腊天主教徒被列为圣者，其中只有一人是死于马伊达涅克之手。其余的人，据报道，均“牺牲于布尔什维克之手”。筹备这次访问的年代，以及这位大祭司访问乌克兰的内容本身，都直接导致后来把班杰拉、斯捷茨科以及他们手下的武装匪徒尊为英雄。

这次访问本身，以及伴随访问发生的种种事件，被认为是公平彻底消除1946年利沃夫“斯大林”教区事件后果的一次胜利。这个教区曾经经历过多么复杂的局面，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受到何等愤怒的群情激昂的声讨，这一切全都被遗忘了。要知道，以安德烈·舍普季茨基都主教为首的绝大多数僧侣，都不仅公开支持法西斯德国，而且还同占领当局合作，所以才对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法西斯罪行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舍普季茨基曾亲自为攻占“第聂伯河畔的金顶城市”，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且，在基辅陷落之前，这位都主教便发表了牧师文告，支持斯捷茨科1941年6月30日宣布成立的“政府”。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首脑号召同“纳粹主义大德意志国密切合作，因为大德意志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帮助它同“德国同盟军”一道，进行反对这种占领的斗争。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持续一周的骇人听闻的利沃夫大屠杀，它成了这种“亲密合作”的第一个尝试。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但苏维埃政权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疑为同情莫斯科的人士和普普通通的无辜人士都成了屠杀对象。波兰知识分子也遭受了许多苦难。尽管如此，约翰·保罗二世却向利沃夫市民保证，

在“圣贤名单的首页”看到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名字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当然更不会提到合并派教徒于90年代侵占正教教堂的问题，要知道希腊天主教教徒只不过是收回“斯大林分子”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而已。

合并派教会在西乌克兰“复活”的最终结果便是如此。民族主义分子同该教会齐心合力，在乌克兰社会制造紧张局势已将近20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的对抗一天也没有平息过。所有这一切，对国家的完整孕育着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基辅罗斯接受洗礼开始，乌克兰的基本宗教是正教。然而在乌克兰正教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建立不从属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自主教会的尝试。每次这种建立“乌克兰独立教会”的图谋，都是以具有分离主义情绪的部分乌克兰居民为基础。1919年，在西蒙·佩特留拉（旧译彼得留拉）“当政”时期，这一目的始终未能达到。但是直到1920—1921年间，建立人数上占第一位的所谓“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方成为可能，这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内部分化了统一的俄罗斯正教的缘故。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授意人们在俄罗斯从事新的教会分裂运动，并在乌克兰建立自主教会。

由于俄罗斯教会高级僧侣中无人支持分裂派教徒，自主教会的冒险主义行动就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下场，教会分裂运动的头头们史无前例地踏上了公开践踏正教教规教义的道路：1921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都主教瓦西里·利普基夫斯基和其他伪主教不是由主教来举行“按手礼”，而是由神甫和俗家人举行“按手礼”。利普基夫斯基的分裂自主派人士由此得到了另一个名称，叫做“自封圣职人员”。这个伪教会存在时间不长，因为它没有能够满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期望，这种同正教斗争的手段没有收到效果，所以不得不在1930年自行消灭。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2月，平斯克召开了“乌克兰自主教会

主教会议”，成员有波利卡尔普（西科尔斯基）和亚历山大（伊诺泽姆采夫），他们又为三名“高级僧侣”举行“按手礼”。“会议”宣布接受1921年“自封圣职人员”等级的伪神甫为新自主教会的人。

1942年5月，德国占领当局承认了新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占领当局为了提高自己在居民中的声望，在乌克兰占领区开设正教教堂，同时又害怕俄罗斯正教教会的威望增长。德国人在分裂自主派教徒的帮助下，希望“分而治之”的乌克兰政策原则能够得以实行。新“教会”在占领早期（1943年之前）得到了德国占领者的广泛支持。但具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共同思想的弟兄们，即班杰拉分子、梅利尼克分子和其他匪徒组织起了更大的作用。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成了主要是反对本国人民的作恶多端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思想鼓舞者。在沃伦，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帮助下，自主教派对遵守教规的乌克兰正教大搞恐怖活动。许多不愿皈依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教士和俗家人成为恐怖行为的牺牲品。弗拉基米尔—沃伦主教马努伊尔（塔尔纳夫斯基）被班杰拉分子绞死，几十名拒绝同分裂教派合作的正教神甫受到了兽行的折磨。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领导之间的联盟十分巩固，结果又影响到德国当局对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态度。这之后，到了1943年，班杰拉分子终于明白，希特勒分子实际上根本不想建立什么“独立的”乌克兰国，于是分离主义者开始对德国占领军展开行动。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的德国当局只好停止以前向分裂自主教派提供的全力支持。

1943—1944年间红军向乌克兰顺利进军，将乌克兰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使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在罗斯正教会合乎教规的领地上彻底覆没。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几名“主教”逃往国外，乌克兰领土上所有的分裂运动教区无一能继续存在，全部归入罗斯正教会的管辖之下。

二战以后，乌克兰西部领土上建立起一些主教辖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辖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科洛梅亚辖区和乌日哥罗德—穆卡切沃辖区。这些辖区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赫鲁晓夫的迫害虽触及乌克兰西部某些主教辖区，但程度并没有其他辖区那么严重。甚至赫鲁晓夫在全苏掀起关闭教堂的浪潮之后，1960—1980年期间，仅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一个主教辖区（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最大的主教辖区）仍然还有两千左右个祈祷所，超过了俄罗斯教会社团总数的1/4。

这些祈祷所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上面已经谈到，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被宗教镇压活动所触及。这首先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乌克兰西部各州于1939年才归入苏联，很快便发生了伟大卫国战争。所以苏联只能在战后才开始在加里西亚进行改革，这是很自然的事。战后反宗教宣传曾一度偃旗息鼓，关闭教堂的运动也停止了。因此，当地的宗教生活并未遭遇到战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那种毁灭性的破坏。合并派教会于1946年在利沃夫大教堂的自行解散，对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自主教会派第三代的出现，也同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有关，在时间上则与教会合并运动的复兴相吻合。据搞起这一新的分裂运动的人当年解释，他们必须为希腊天主教派设立屏障。据他们讲，自主教派的思想剥夺了对教会合并派有利的最有分量的论据，即乌克兰教会的“民族”性质。不过很快便弄明白了，合并派也好，自主教会派也好，都是同一现象，即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产物。不错，他们针对的是居民中的不同阶层。不管是那些世代承认在乌克兰西部已有300年历史的合并教派、主张把它作为民族宗教的人也好，还是那些认为正教是父辈信仰的人也好，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上了民族主义的当，而绝不是有什么在教义方面、神学方面、信仰方面乃至仪式方面出现争论和分歧的问题。

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人民鲁赫运动”的纲领中，有一章专谈宗教问题，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必须为“斯大林势力所破坏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即1989—1990年间被称为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法律地位正常化而斗争”。而且，加里西亚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复兴的前景，比教会合并运动复苏的前景更为诱人：自主分裂运动对乌克兰东部具有潜在的输出能力，现象的发生指日可待，因为那里居民传统上都是正教徒，合并教派的主张得不到明显的响应。

加里西亚教会分离运动与右派政治家联系密切，正是这一运动使乌克兰正教自主教会1921年的思想得以复活。新的分裂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独特的口号：“罗马不是我们的父亲，莫斯科也不是我们的母亲”，“独立的国家须有独立的教会”。

1989年2月份，在“鲁赫”的积极支持下，恢复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创始委员会开始在基辅活动，该委员会确认同1921年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有继承关系，并号召乌克兰教区脱离莫斯科大牧首管辖。1989年8月，利沃夫彼得保罗教堂主持、大祭司弗拉基米尔·亚列马宣布他的教区脱离罗斯正教会管辖，嗣后分裂活动开始壮大。活动决定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俄罗斯教会主教中寻找一位“反水”的高级僧正，同时跟侨民圈子和境外保留的“教会”建立接触。

但是，“圣弗拉基米尔教会两大分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经常这样来称呼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和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特殊合作关系并没有能够出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起初对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十分反感，觉得它在垄断民族主义思想方面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为了提高威信，分裂派教会非常需要一名高级僧正。没有高级僧正，即使连合乎教会法规的假象也难以造成，更不可能扩大队伍。结果这个反水的高级僧正找到了，他就是前日托米尔和奥夫鲁奇主教约安（博德纳尔丘克），他曾受到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很大的委屈。这使

他同意附和分裂运动。

11月份，博德纳尔丘克通电声明自己脱离俄罗斯教会主教团。有人对他进行过说服工作，但未能收效。1989年11月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邀请约安出席会议，但他两次通电拒绝前往莫斯科出席自己的案件审理。这之后，约安因分裂活动，被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剥夺其高级僧正教职和僧侣资格。

尽管如此，博德纳尔丘克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参加分裂运动。自主教会分子同教会合并派分子一样，由于得到民族主义思想狂热分子的广泛支持，在加里西亚人中逐渐赢得声望。这使分裂运动分子很快便开始强行侵占罗斯正教会的庙堂，希腊天主教派早就是这样干的。

1990年1月30—31日莫斯科召开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对乌克兰西部教会间对抗问题给予严重关切。会议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致电，呼吁“立即制止”教会合并派和分裂运动极端派的“强暴和非法行为”。会议对分裂运动和教会合并运动给予同样的评价，认为它们并非宗教现象，而是政治现象。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西部各主教辖区除了公开拥护乌克兰民族主义之外，还有不少教士一方面是真诚的正教徒，一方面又认为，授予罗斯正教会乌克兰督主教辖区以合乎教规的自主教会地位，可防止乌克兰教会合并派和分裂派的进攻。

乌克兰西部各主教区的教士纷纷致函神圣大牧首皮缅和当时的基辅都主教、乌克兰督主教菲拉列特（杰尼先科），呼吁授予督主教辖区以自主教会权。1990年1月30—31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对此的回答是：授予乌克兰督主教辖区和白俄罗斯督主教辖区以更大的自主权。

督主教辖区的新状况，要求在罗斯正教会允许的范围内，向该辖区提供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它们仍然是俄罗斯正教教会的组成部分。

督主教辖区除新名称之外，还获得自主建立正教院的权利，该正教院拥有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教会执行权。督主教辖区还拥有巨大的独立财权，在分裂派分子总是断言说似乎乌克兰教区的经费全被莫斯科掏空的情况下，这是个十分重要之举。就实质而言，各督主教辖区成为大牧首辖区范围内的自治教会。

与此同时，加里西亚的宗教战争却越演越烈。到1990年年中，捷尔诺波尔没有一座庙堂还留在罗斯正教会管辖之下：庙堂全部落入教会合并派手中，其中包括建于布列斯特教会合并派出现以前——1540年的一座教堂。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神圣大牧首皮缅（伊兹韦科夫）辞世。这位至圣于80高龄辞世。自主教会人士大概害怕俄罗斯教会的新教首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将同分裂运动的扩散开展有效对抗，于是决定趁莫斯科大牧首位子空缺之机，立即展开活动。

1990年6月份，分裂运动分子集聚在基辅，举行所谓“全乌克兰自主正教大会”。他们在会上表现出十足的目无教规，竟然决定不仅要宣布成立自主教会，而且还要选举“基辅大牧首”。美洲自主教会首脑、年迈的姆斯季斯拉夫·斯克里普尼克当上了这名大牧首。分裂派分子当时把他树为分裂运动的一面旗帜。由于他当时身在美国，未能亲临会议，所以是缺席当选。约安（博德纳尔丘克）成为“大牧首宝座护法”。

苏维埃乌克兰当局对分裂派分子的活动没有起任何劝阻作用，有这样一个事实可资证明，即他们首开先例，向分裂派“大会”的参加者提供罗斯正教会的圣地——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以作举行亵渎神明的“祈祷仪式”之用。须知，圣索菲亚大教堂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博物馆。

乌克兰发生的教会骚乱，是促使罗斯正教会不得不在牧首皮缅逝

世未过40天之际便紧急进行新教首选举的原因之一。

各教区主教联席会在其决定中谈到了乌克兰十分复杂的宗教局势。会议指出，教会合并问题使罗斯正教会同梵蒂冈的相互关系紧张到极点，破坏了正教和天主教继续顺利对话的希望。

会议还谴责了破坏乌克兰西部教会和平的乌克兰分裂自主教派的行动，指出，乌克兰正教会“实行自我治理的公正意图，未能在保留教会统一教规的框架下实现，而是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极其有害的后果”。各教区主教会议强调指出，乌克兰正教会在获得广泛独立的同时，不仅仍然处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之内，而且同各教区所有正教教会的关系也必须合乎教规的规定。

选举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新牧首，对自主教会分裂运动以后的命运也有间接关系。大牧首皮缅逝世后，基辅和加里西亚都主教、具有牧首地位的乌克兰督主教菲拉列特于1990年5月3日就成为遴选大牧首期间牧首宝座的临时监护人。就地位而言，基辅督主教是罗斯正教会大牧首以下的第二位高级僧正，是神圣正教院常任成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传统，都认为临时监护人最有可能当上未来的大牧首。

然而报刊上却越来越经常地不断出现一些消息，说菲拉列特督主教的道德面貌远非无可指责。许多人，特别是乌克兰的神职人员，都不喜欢这位主教对督主教辖区的管理作风；说他好发号施令，很粗鲁，具有目光短浅的世俗长官身上的官气，缺少一位高级僧正所应有的修养。许多倾向于分裂派的人士也证实，他们之所以倾向于分裂教派，就是因为要脱离菲拉列特都主教在乌克兰教会中所造成的那种令人窒闷的气氛。

然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想当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的意图却很明显。在1990年各教区主教会议上，这位乌克兰督主教在选票上占第一名。选举大牧首时，投他票的有66人。然而罗斯正教会的新任大牧首

不是菲拉列特，而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西（里迪格尔）。可想而知，这一情况也影响到菲拉列特都主教的下一步活动。

在乌克兰正教会生活中，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1990年8月6日对乌克兰的访问具有巨大意义。这次访问给予乌克兰正教民众以巨大的道德支持，因为这时乌克兰正教民众正遭受来自教会合并派和自主教会派的侵犯。这位至圣登位不久便访问乌克兰，证明消弭乌克兰宗教冲突乃是莫斯科大牧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纪念罗斯洗礼日当天，在基辅大教堂为等同于使徒的圣弗拉基米尔公爵举行祈祷仪式后，大牧首阿列克西说：“所谓的自主教会的传播，实质是教会分裂运动的扩散，使吾等不能不感到担忧。本牧首此次访问乌克兰，足可证明我们同乌克兰正教会的主教团，同全体教士和教众欢乐和悲伤与共。”

尽管罗斯正教会采取了一切措施，教会冲突的政治化却日益严重。

1990年7月9日，乌克兰督主教辖区主教团在基辅召开会议，通过“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和管理自主呼吁书”，还一致推选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都主教为乌克兰教会教首。

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于1990年7月20日开会审议了乌克兰教会正教院要求扩大自治的决议。鉴于乌克兰宗教政治局势异常复杂，乌克兰高级僧正团请求授予督主教辖区以更为广泛的自主权。罗斯正教会鉴于该问题意义重大，决定在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大会上予以审议，会议定于1990年10月25—27日召开。

应该指出的是，乌克兰中央地区各州和东部各州的绝大多数正教信众，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独立”，主张在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同罗斯正教会保持紧密团结。

1990年10月25—27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圣丹

尼洛夫修道院召开。在提交高级僧正大会审核的议事日程上，主要就是授予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和管理自主权的问题。

10月28日，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抵达基辅，以便隆重宣布乌克兰教会独立，其目的在于克服分裂运动，建立教会和平。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于抵达当天便在基辅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祈祷仪式。仪式开始之前，至圣将乌克兰教会独立证书赐予菲拉列特都主教。

至此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获得了实际上的完全独立，只同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保持教规上的统一。17世纪末以前，基辅都主教辖区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辖区内也拥有类似地位。而且有意思的是，自主教会派在谈到乌克兰教会史上莫斯科以前这一段时期时，称其为独立时期；但在评价1990年赐予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后的乌克兰正教会状况时，却少不了一定指出，这是一种假象，乌克兰正教会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

乌克兰许多人完全真诚地认为，获得独立的乌克兰正教会，现在能对自主教会派和教会合并派给予应有的回击。统计资料亦可证实乌克兰正教会的力量优势：到1991年夏天，乌克兰共有5000个以上合乎教规的祈祷所，而教会合并派只有1800个祈祷所，分裂派只有1100个祈祷所，当时还有许多祈祷所都是虚设的。

由于乌克兰正教会获得独立和自主管理地位，乌克兰正教会正教院特决定召开乌克兰正教会主教大会，会议于1990年11月22—23日在基辅召开。

与此同时，大会被迫再次讨论同自主教派和教会合并派相对抗的问题。大会参加者遗憾地断定，破坏性的力量以宗教口号为掩护，追求的是非宗教性的目标。有人曾指出，乌克兰的宗教分裂运动从一开始便公开带有政治性质，是乌克兰政治中分离主义方针的一部分。

会议还指出，乌克兰西部僧侣对合乎教规的自主教会十分向往，但又必须顾及乌克兰正教会东部主教辖区教徒的情绪，因为当地对自主教会抱有强烈的否定态度。

1991年，乌克兰政治力量的配置发生严重变化。1990年6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之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乌克兰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倾向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这种条件下，大部分党的干部为了保住自己在条件变化情况下的影响力，决定同民族主义分子勾结，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分离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加里西亚持不同政见的代表的主张，而且成为基辅的官方政策。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很快乌克兰便单方面宣布退出苏联，党的干部及时改变了自己政治方向，同加里西亚民族主义者瓜分了权力。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菲拉列特都主教紧跟民族主义潮流，从毫不妥协地反对乌克兰自主教会派的立场，转而成为热心推动自主教会的人。特别是他转而认为，1990年各教区主教大会的结局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基辅和莫斯科各报刊发表的那些有关他私生活的文章，也起了不小作用。作者们断言，菲拉列特都主教有妻子和孩子，盗窃教会财产，与克格勃有牵连。乌克兰高级神职人员指责他应对加里西亚教会合并派的成功负责，对前日托米尔主教造成的分裂运动负责。应该认为，日托米尔主教归入自主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个人对菲拉列特都主教怀有敌意造成的。

在菲拉列特都主教施压的情况下，1991年11月初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致书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和罗斯正教会主教大会，请求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教规所规定的完全的自由”。会议认为，这“将有助于巩固乌克兰正教统一，有利于消弭业已出现的自主教会分裂运动，抵抗教会合并派和天主教的扩张，促进当今敌对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并建立和睦，促进乌克兰各民族团结。考虑到基辅都主教辖区的千年历史，拥有3500万教民的乌克兰正教会

是其直接的合法继承人，会议请求罗斯正教会于赐予乌克兰正教会完全独立之后，推动东部各主教和地区教会首脑共同建立基辅大牧首辖区”。

1991年12月25—27日召开了神圣正教院会议，会议由神圣大牧首任主席，有都主教菲拉列特参加，决定将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和决定分发给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让他们详细研究这一十分重大的问题，以便下一步在全体高级僧正大会上把该问题列为讨论重点。乌克兰教会代表大会的决定使乌克兰相当一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感到担忧，各教区纷纷向莫斯科大牧首辖区致电，请求将本教区留在莫斯科管辖之内。文尼察主教区的60余个祈祷所甚至把会议记录都寄来了，在每份记录上都列有上百到数千个签名。与此同时，菲拉列特都主教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竭力加速教会的自主化进程，向各主教区发出通令，要求召开僧侣大会，以支持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授予该正教会以独立的决定。

1992年1月22日，基辅召开了乌克兰教会的主教会议。会议通过致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神圣正教院和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的一份新的呼吁书，指责罗斯正教会神圣大牧首故意拖延正面解决自主教会问题：“一定的势力，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的势力，正在个别州的修士、僧侣和俗家人中间散布混乱情绪，从而实际上是在反对乌克兰正教……莫斯科某些媒体针对乌克兰正教会首领展开诽谤运动，企图用肮脏的诽谤手法，搅乱不知情者的头脑和心灵”。

由各教区、宗教学校、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发往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信件和电报有如雪片飞来，纷纷请求制止罗斯正教会分裂，保留乌克兰教会现有的地位。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局势深感忧虑，向菲拉列特都主教致电称，鉴于宗教事件的发展呈危险态势，建议在神圣正教院召开会议之前，乌克兰某些州“应采取克制态度，不以教规作任何威胁”。2月17日菲拉列特都主教向神圣大牧首发来两封电报，第一封请求正教院“不要作出”任何涉及乌克兰正教会内部生活

的决议，第二封声称他因病不能出席正教院会议。在神圣正教院会议之前，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接到乌克兰内阁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该委员会在信中坚持要求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教会自主权。

1992年2月18—19日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会议召开，通过一份致基辅都主教菲拉列特和乌克兰教会主教团的呼吁书，要求“乌克兰正教院立即重新审议1月23日决定，以便抚慰高级僧正团和如今正以悲恸的心情恳请教会主持公道的教民的心灵。如此方可使我等能保持教会的和平和乌克兰正教的统一……一旦此合乎教规的唯一正确原则遭到破坏，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此事，所有忠于正教的教徒亦将获得我等合乎教规的领牧，不会听由其任凭恶势力摆布而沉沦”。

1992年3月31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大会一直持续到4月5日。高级僧正大会从4月1日到4日讨论了乌克兰高级僧正团关于授予乌克兰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的申请。

首先由菲拉列特都主教作报告，然后开始辩论，大多数高级僧正均参加了辩论。来自乌克兰不同主教区的众多教徒代表团均对自主教会一事提出抗议，这对讨论乌克兰教会的地位问题，不能不有所影响。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的土地上，有打着宣传条幅的纠察队，条幅上写道：“我们号召会议参加者维护教会的统一”，“自主教会是通往合并教派之路”，“乌克兰需要纯正的正教”，“菲拉列特大主教！为了教会的福祉，您最好还是下台吧！”甚至“把离经叛道的菲拉列特革出教门”。

相当多数高级僧正在会上发言时谈到乌克兰教会自主化不合时宜，主要根据是如果乌克兰正教完全独立，面对合并教派的侵犯将处于一对一的局面，而分裂运动派是绝不会中止自己的破坏活动的。某些发言者提醒道，以往，乌克兰教会的一切自主化企图，都给教会带来了灾难。

乌克兰主教团某些当政的高级僧正发言，反对授予乌克兰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马加丹主教阿尔卡季（阿福宁）的提议成为辩论中的转折点，他提议审议一下更换乌克兰教会首脑的问题，“因为菲拉列特大主教不符合要求，不能把乌克兰全体神职人员和俗家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马加丹主教的提议得到文尼察都主教阿加凡格尔、乌拉尔主教安东尼（莫斯卡连科）和某些其他高级僧正的支持。有人指出，菲拉列特都主教只应服从乌克兰主教大会，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大主教谢尔盖（福明）完全合理地反驳道：“乌克兰正教会暂时还不是自主教会，它不能超越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权限，保有其不能干预的不公开的内部问题。”

高级僧正大会主席、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这次辩论作总结时说：

“有人叫我们相信，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权便可解决一切问题，正如以前有人叫我们相信，管理上必须独立，必须赐予菲拉列特都主教以至圣头衔。但至圣头衔并不能拯救这一状况，授予独立亦未能产生效果。那些并入破坏教规的自主教会的祈祷所并未归还，分裂运动越闹越厉害。我们能否为分裂承担责任？我们能否确信这样做会给神圣教会带来福祉？……要想谈论自主教会，需要一种安静的环境。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经济、民族、人类联系遭到破坏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对抗的时代，所有这些使人民感到厌倦。保持教会统一的愿望乃是上帝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对乌克兰目前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但对乌克兰教会的首脑主教还有个特殊要求。我们请求菲拉列特大主教，为乌克兰正教的福祉，为了我们的统一，为拯救乌克兰教会，离开自己的职位，以便乌克兰各位主教有可能选出一位新的首脑主教”。

菲拉列特都主教发表声明，这个声明不能有另外理解，只是表明他已准备好放弃乌克兰教会首脑的职位，服从高级僧正大会的意志，听从乌克兰大多数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的呼声，他说：“我觉得需

要约安这样的先知，我准备做这样的先知。但我请求，不要因抛弃这位约安而使乌克兰掀起狂暴的浪潮，因此我请求向乌克兰主教区提供条件，到基辅去选举乌克兰正教会的新教首。我以大牧师的名义保证，这个大会一定会召开，绝不会受到任何压力。新教首将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颁旨批准。乌克兰正教会应全面实现1990年高级僧正大会赋予它的权利。我还请求让我继续在上帝座前效力，不要让我退休”。

神圣大牧首对菲拉列特都主教准备卸下乌克兰教会教首的职务表示感谢，希望他能在乌克兰的一个主教讲坛上继续从事大牧师的工作。根据对乌克兰教会地位辩论的结果，高级僧正大会作出决定：“高级僧正大会接受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至圣的菲拉列特的声明，为了教会的和平，他在即将召开的乌克兰正教高级僧正大会上将请求解除自己乌克兰正教会教首一职。高级僧正大会对至圣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立场表示理解，对他在基辅主教任上多年担任大牧师的辛劳表示感谢，为他在乌克兰正教会另一主教职位上尽主教之力表示祝福”。

菲拉列特都主教同意从乌克兰教会首脑岗位上退下来，眼看着教会危机可以顺利解决，但到了基辅之后，事情却转变了方向：基辅都主教欺骗了一众大牧师弟兄和自己的教民。回到基辅后，他于4月1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高级僧正大会向他施压，声称他在大会上就如同身处髑髅地一样，“被钉上了十字架”，而且通报说，他答应从乌克兰教会教首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出于外交考虑，他将领导乌克兰教会至生命终结。

5月6日和7日，莫斯科召开神圣正教院扩大会议，但作为正教院常任成员的菲拉列特都主教却未出席会议。正教院断然谴责都主教的声明。鉴于乌克兰正教会出现的非常情况，在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召开之前，禁止菲拉列特都主教履行教首的职责，即：“召开正教院会议、为高级僧正举行按手礼、发布涉及乌克兰正教会的教令和

呼吁书。但可以召开接受他退休和选举乌克兰正教会新教首的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如果对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决议和本决议拒不执行，着即将菲拉列特都主教交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审判”。

但神圣正教院的这一决议亦未被菲拉列特都主教理睬。5月21日，正教院讨论乌克兰的教会形势，但危机的过失一方仍未出席，他根本不想与会。正教院委托乌克兰教会中接受按手仪式时间最早的大牧师、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鲁斯纳克）在圣三一节之前召开高级僧正大会，接受菲拉列特都主教退休，选举乌克兰教会新教首。临时履行第一主教职责的任务，落在尼科季姆都主教肩上。接到神圣正教院决议的通知后，菲拉列特都主教声称，他认为正教院的决定“毫无道理而且……无效”。

5月26日，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致电菲拉列特都主教，呼吁他拿出大牧师和基督徒的良心来，恳求他为了教会的福祉，服从教规所规定的上下级制度。

同一天，菲拉列特都主教召集自己的拥护者在基辅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几名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但没有一名高级僧正。会议拒绝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的决议：“莫斯科正教院关于乌克兰正教会的所有决定均无效，因为这些决定违反了有关乌克兰正教会的独立和管理自主的现行规章制度。”“我们承认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是目前由教规所规定的教首的同时，”会议决议接着说，“声明有意通过合乎教规的途径，获得乌克兰正教会的完全独立。在这方面，我们一致支持我们的合乎教规的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菲拉列特。”

5月27日，尼科季姆都主教在哈尔科夫召开高级僧正大会，与会者有17名大牧师，但菲拉列特都主教缺席，他不想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次高级僧正大会对菲拉列特都主教表示不信任，要解除他的基辅主教职务。这之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乌克兰教会的新教首。第

二轮投票前，哈尔科夫的尼科季姆自动放弃候选资格。弗拉基米尔都主教当选乌克兰教会首脑。

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在5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批准了乌克兰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决定，指定6月11日召开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审理前都主教菲拉列特一案。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根据1990年10月高级僧正大会通过的“关于乌克兰正教会”的决定，祝福新当选的基辅都主教作为乌克兰教会首脑履职。菲拉列特都主教三次接到神圣大牧首发出的参加高级僧正大会的邀请，但他拒不出席。这之后，根据教规，会议可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审理案件。

1992年6月11日，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高级僧正大会，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召开此次会议是专门为了审理指控前菲拉列特都主教反教会活动一案。有14位高级僧正因为各种理由缺席会议，5名是乌克兰的，而其中的两名就是菲拉列特都主教和波恰耶夫主教亚科夫。当时他们还发表了个声明，说他们不服从这次大会。一开始先听取了乌克兰教会16位主教的声明，对菲拉列特都主教的分裂活动给以详尽无遗的说明，并多处引用教规，加以有力的诠释，指出由于这些分裂活动，他应被剥夺教职。一系列发言均证实，乌克兰众主教对他提出的指控是公正的。但是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私生活却几乎完全未予触及。当时，这个话题正为莫斯科和基辅的报纸所广泛讨论。

前基辅都主教和波恰耶夫主教亚科夫二人被控犯有严重违犯教规的罪行，最高僧正大会详细审理该案全部内容后作出决定：“因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都主教对下属神职人员态度冷峻傲慢，作风强横，敲诈勒索，行为不端，私生活不检点，致使信徒亦受到恶劣影响，他还背叛誓言，公开对高级僧正大会诽谤辱骂，在遭到禁止的情况下犹举行宗教仪式，包括行按手礼，制造教会分裂。着将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去都主教之职，剥夺其各级圣衔以及教士的一切权利。”

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这一决定，要传达到各地区正教会首

脑，以备周知。

高级僧正大会致乌克兰正教会牧师和教民的公开信对法庭的这一判决作了说明，它指出：“菲拉列特和亚科夫被解除教职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对教会犯下的罪行，其表现为有意粗暴破坏神圣教规。至于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合乎教规的完全独立问题，我们坚定相信：这个问题应通过召开各教区主教大会以合法的合乎教规的途径予以解决，并将大会决定同各兄弟教区的意愿协调一致。否则我们面临的只能是给教会生活带来毁灭的新的分裂运动”。

菲拉列特前都主教和亚科夫前主教不服从高级僧正大会的各项决定，同以安东尼（马先季奇）为首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主教们进行谈判。谈判在乌克兰总统和政府庇护下在基辅举行，并于1992年6月25日以决定召开一次被禁止的神职人员和主张分裂的俗家人的会议，并把这次会议宣布为全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这次非法的大会决定脱离正统乌克兰正教会的菲拉列特都主教及其拥护者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联合起来，认为“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是乌克兰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合法继承人……会议声明，大牧首姆斯基斯拉夫是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的首脑。鉴于必须立即加强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的领导，考虑到姆斯季斯拉夫大牧首身在乌克兰境外，更考虑到他的94岁高龄——所有这些都使得教会领导工作出现一定的困难，特设立副牧首一职。批准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圣菲拉列特为副牧首。”

此时，1995年6月14日，恰逢乌克兰正教会轮值首脑、伪大牧首弗拉基米尔（罗马纽克）去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同一些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其中也有穿袈裟戴十字架的神甫，利用他的葬礼搞了一次政治示威，最后造成了同警察的流血冲突。肢体冲突是由一名自主教会的“神甫”挑起的，他用十字架撞击一个警察的脸部。示威者意图违反政府的禁令，要把弗拉基米尔葬在索菲亚大教堂。他们想把伪牧首的遗体抬入大教堂，但未能得逞，便把遗体埋到了大教堂

前面的沥青马路底下。11月份，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大牧首辖区）又选出一个新的“大牧首”，这已经是第三位了。这次菲拉列特终于当上了。

1996年12月15日，在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召开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37名主教中有1名因病未能参加。开会之前，乌克兰教会中就自主教会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高级僧正大会一致（只有一票反对）通过声明，出于对教会福祉的关心，须明智地拒绝请求即将召开的罗斯正教会各教区主教大会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的地位。

1997年2月18日，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3名大牧师，其中114名为各主教辖区主教，17名为助理主教，1名为退休人员，12名高级僧正未能到会。

会议进程中，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利沃夫主教奥古斯丁、敖德萨都主教阿加凡格尔提出，要把被剥夺教职并亵渎神明地自封“大牧首”的菲拉列特修士革出教门。

圣高级僧正大会将修士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出了教门，并警告修士亚科夫（潘丘克）和修士安德烈（戈拉克），如不知忏悔，亦将被革出。

2000年8月举行的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纪念大会对讨论乌克兰问题相当重视，乌克兰的几乎所有注册高级僧正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不仅如此，会议还通过专门决定，对世界各地正教会承认基辅都主教圣弗拉基米尔所领导的乌克兰正教会为乌克兰唯一合法正教会一事给予确认，并认为它具有管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就为把乌克兰正教全面团结在它周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目前，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下的乌克兰正教会共拥有3500万教徒。

分裂派的菲拉列特的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基本上只是在乌克兰西部教徒中有影响，即在历史上划归波兰立陶宛王国、奥匈帝国、波兰版图的加里西亚和沃伦有影响。到2002年初，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仅有近2000个祈祷所，80%位于乌克兰西部各州。

乌克兰自主教会正教会：目前，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梅福季（库德里亚科夫）是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首脑。据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资料（2001），它拥有11个主教区，5661个祈祷所和404个高级神职人员。80%以上的教民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三个州（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和捷尔诺波尔州）。

2004年尤先科总统选举获胜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会见乌克兰哥萨克时，对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的命运表示担心。大牧首声称：“在那些积极支持由总统指定的反对派候选人的人士中，有分裂派教徒和教会合并派教徒，因此，正统的乌克兰正教会在新条件下将经受一定的困难，它的存在不能不遇到麻烦，这种情况令人忧心忡忡。”罗斯正教会首脑对哥萨克代表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保护了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和波恰耶夫修道院，这些都是乌克兰正教的圣地。“我想，现在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迫切。鉴于最近时期乌克兰形成的复杂政治局势，有人可能会针对正统的正教会组织挑衅和进攻。”阿列克西二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当然，民族主义势力以后也可能利用俗家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乌克兰有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正教会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行动早晚会被大部分乌克兰人民所唾弃。

橙色噩梦

乌克兰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早在库奇马总统下台之前很久便形

成了。

1999年在他竞选连任总统期间，“橙色革命”未来的“带头人”和“领袖”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库奇马同共产党人西蒙年科展开竞争的情况下，无保留地支持库奇马。

根据选前达成的协议，库奇马连任乌克兰总统后，把尤先科提起来当了总理，由季莫申科任副总理，主管燃料动力部门，实际上把整个经济工作的管理抓到了手中。这样一来，未来“橙色革命”的两个领导人便开始积极落实库奇马的竞选纲领，后来又为反对这个纲领建立了反对派。

分裂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因为对乌克兰原总理拉扎连科提出刑事指控。拉扎连科是季莫申科“乌克兰统一动力系统”这家巨型公司的商业伙伴，是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垄断者。这场官司不可能不涉及她这位公司首脑。2001年4月季莫申科被迫离职，遭到逮捕。出狱后成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这一政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这时传出记者贡加杰遇害的消息，加之总统以前的卫士梅利尼琴科少校偷录库奇马的谈话被揭露出来，这些事弄得群情激昂。在最高拉达会议上所放的录音证明，库奇马总统与记者的消失有关，其效果就像一枚引爆的炸弹。这些录音成为指控库奇马篡夺权力的根据。后来又公布了库奇马家族贪赃的大量事实，他们参与非法占有国家财产，遂为公众所知。

社会党人首领莫罗兹是“要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和“乌克兰站起来！”这些行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他声称，运动的想法不仅是要剥夺某个具体人的权力，而且还要改变造成乌克兰所有不幸的根子——权力制度。运动在乌克兰大多数地区展开，这样一来，在2004年年末为总统权力而斗争期间，这些活动便成为“橙色”群众集会的序曲。

尤先科、库奇马和最高拉达主席普柳希在轰动一时的“三巨头公

开信”中谴责这些活动违法，称其参加者为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但这种做法却使反对派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对抗总统一伙。

2001年4月，尤先科被迫辞职，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同季莫申科以重新掌权为目的的政治合作。

上面提到的乌克兰的这些事件，严重破坏了库奇马在欧盟和美国当局眼中的威信。但是，正如下面一些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总统不仅不打算在宪法规定期限内下台，而且还想在2004年大选后连任乌克兰首脑。为了这个目的，2003年他提议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意味着向议会总统制模式过渡，议会由两院构成，下院由普选制产生，最高拉达可以选举国家总统。

众所周知，反对派未能允许库奇马实现这些意图。他的政府被迫同意反对派提出的国家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份修正案也考虑到由议会选举总统的问题，而这一点符合库奇马的利益。但2004年2月3日召开的最高拉达非常会议却保留了当年仍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

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直到最后一刻，库奇马仍未放弃掌权的希望，这对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竞选对阵期间出现群众性对抗（“橙色”和“蓝色”）愈演愈烈的情况，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反对派的形成、精英们的冲突、反对派有声望的领袖的作用、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天鹅绒革命”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大选近在眼前的局势，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

大多数政治学家早就预见到乌克兰总统“竞赛”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尽管想当总统的人很多，但形势越来越明朗，总统宝座之争最后必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展开。

尤先科—季莫申科反对派联盟的所有重要人士都预言，现任总统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并断言，只有行政因素方能从他手中“窃得”胜

利，即伪造投票结果。为推举尤先科登上大位，选择了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的斗争方式，即由街上和广场上的人群向现政权施压。

乌克兰“橙色革命”的进程定期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得到说明。规模如此宏大且又相当持久的行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活动资金来源和外部干预程度又如何呢？

乌克兰的历史表明，在所有重大事件中，东南部和西部（加里西亚）地缘政治对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利益攸关的势力组织大量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员来到基辅时，这种对抗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的情况亦然。成千上万来自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罗夫诺州和西部其他各州的人，在宣布第一轮选举结果那一天，有组织地聚集到基辅，打出的口号是：“尤先科是我们的总统！”

不仅如此，乌克兰的“民主”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苏维埃、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和文尼察市苏维埃不等宣布投票结果，便声明不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承认尤先科为国家总统。许多人都知道，这次活动是蓄谋已久的。正如最高拉达的一位代表所言，在宣布投票结果那天夜里，正是基辅当局，批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五月广场上集会……而且是大选前两个月就开始了。

基辅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都停课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穿上橙色衣衫，聚集在五月广场。他们的努力实际早已使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的活动瘫痪，许多街道上交通断绝。训练有素的人士指挥了全部活动，这一点从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亦能看得十分明显。

治安机关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说得轻一点，很难判断，因为内务部和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早向五月广场集会的人群声明，他们严守中立，保证绝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

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扎波罗什、辛菲罗波尔和东南部乌克兰其他城市，开始举行群众集会，作为对“橙色人士”压力的抗议，他们在选举中支持亚努科维奇。一旦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取胜，但他作为国家总统的地位得不到承认，而“橙色人士”还继续对当局施压，这些地区的地方自治代表在北顿涅茨克的代表大会上已通过决议，就要在2004年12月12日就建立乌克兰东南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在此之前，最高拉达作出决定，宣布第二轮选举结果无效。

今天，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一个事实，即乌克兰的“橙色”行动大选使用了舞弊的手法。每个人都明白，成千上万顶帐篷、睡袋、橙色衣物等等，都是事先早就备好，运入基辅的。成千上万的人要吃，要看病，每昼夜要领“工资”。每个人都清楚，行动的资金来源，不是尤先科那点极为有限的竞选基金，而是“外援”。早在大选之前，美国便拨出数百万美元，以供欧洲驻乌克兰安全和合作组织协调员在各地区开设25个分部之需。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奇韦尔斯于2005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仅就题目而言，就显得意味深长：《乌克兰间谍部门的高官是如何改变国家道路的》。文中详细描写了他们旨在阻挠亚努科维奇当选的种种活动。顺便说一下，意大利邮报的著名观察员、欧洲议会代表凯扎声称，美国对第比利斯事件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现在还弄清楚了，什么事都少不了的别列佐夫斯基，对这些事件也没有袖手旁观。他要求尤先科的幕僚向他报告“为民主目的”拨出的数百万美元的花销情况。众所周知，别列佐夫斯基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干事的人。季莫申科同这位叶利钦“家族”成员的电话交谈，暴露了他同“橙色人士”的广泛联系，以及对五月广场事件的直接影响。

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对尤先科的胜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欧洲议会甚至作了个专门决议，呼吁乌克兰当局宣布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

无效，不承认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为胜利者的决定。

那些日子，以波兰总统克瓦斯涅夫斯基为首的欧洲议会使者以“调停人”的身份两度访问基辅。“橙色革命”使他欣喜若狂，他声称：“没有乌克兰的俄国比有乌克兰更好”。现在看来，这位波兰前总统、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已经忘记，俄国的相当一部分历史，就是由无数次反对波兰侵略的斗争构成的。波兰侵占过罗斯南部诸公国，还侵占过“罗斯城市之母”基辅，造成了1605—1612年间的大混乱，波兰军队还随同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入侵。还可以提醒克瓦斯涅夫斯基先生记住，他国家的政府在现代史上曾经做过许许多多不甚怀有好意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解放波兰，有60万苏联军人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谁能让他们复活呢？

俄国已为斯大林统治时期在卡廷地区造成数千名波兰军官死亡的事件道过歉，波兰为1919—1920年间发生在波兰集中营的俄国战俘的可怕悲剧道过歉吗？牺牲在这些波兰集中营的战俘共有8万人哪！不管是俄国，还是国际社会，也并没有为了博爱而敦促波兰高层认罪，要求为折磨致死的俄国军人修建纪念碑，以便亲人们能像波兰人到卡廷那样，好为纪念亲人而鞠躬志哀吧。

俄国政治家不可能对乌克兰境内境外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2004年11月23日，国家杜马为乌克兰局势专门通过一项声明，代表们“对乌克兰反对派激进分子的违法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西方各国不要干涉该国选举局势的发展。

然而政治家的这份声明对大选结果已回天无力。

青年是“橙色分子”的积极部分。在群众出动前夜，按照格鲁吉亚“克赫马拉”模式组建起来的大学生组织“到时候了！”，在训练有素的领导人带领下，巧妙地操纵着大批群众。所以“橙色分子”在五月广场才能做到组织严密，服从统一指挥。而“蓝色人士”则没有这种组

织。一列列由顿巴斯开往基辅的矿工列车，以及莫斯科大牧首辖区教会打着“尤先科是魔鬼！”的旗帜，举着十字架游行的教众，看来简直像是被“橙色分子”的巨大人群“吞没”了。像400家企业同时拉响汽笛，为支持亚努科维奇而罢工这样的行动，亦未能有助于“蓝色人士”。

为了支持“橙色人士”的“革命热情”，媒体编造出毒害总统候选人尤先科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甚至点出了一些投毒者的姓名。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在电视上发表的正式声明，原来并没有发生任何下毒事件。根据报纸消息判断，原来只是搞了一次美容治疗，想把脸变得年轻点，但搞得不成功而已。

尤先科选举获胜后，主要问题是形成“权力树”的问题：谁在哪个枝上，占个什么位置。首先是谁当国家总理。从“橙色革命”的准备和进程来看，有希望得到这一职务的基本上应该是这一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季莫申科。但尤先科的亲信中有不少也是处于掌权地位的，也希望得到这一位置。比如，尤先科的干亲家波罗申科就是。反对季莫申科的还有接近未来总统的幕僚，于是这权力结构中的二把手的问题便迟迟定不下来。

关于总理宝座的决定在最后一刻即尤先科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才定下来，尤先科签署命令，任命季莫申科为乌克兰总理。也许，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他们选前的协议，还有“橙色”运动中发生的分裂——季莫申科的拥护者这期间把政府大楼团团围住，公开声称如果季莫申科不是第一个进楼，任何人不许进去。

政权瘫痪使乌克兰经济陷入凄惨状态，尽管如此，摆在首位的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开始迫害积极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人了。解雇浪潮滚滚而来——各部和各部门所有领导、东南各州的所有州长统统被撤了下去。某些州苏维埃的领导受到了刑事迫害。一些代表甚至向最高拉达提交了“秘密检控”法草案。据报道，该项法案规定，甚至幼儿园

和中小学校的领导人也要报告，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支持的是谁。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供资料，被剥夺工作的有1.8万人。

然而颜色革命，亦称“天鹅绒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般来说，可以把它列入革命的科学概念，即“从一个质的状态向另一个质的状态的飞跃式的迅速过渡，是自然界、社会、思维的辩证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性之一的表现”吗？

政治学家意见不一。一些人说，乌克兰、格鲁吉亚重复了俄国1991年的“天鹅绒革命”；另一些人坚持说，必须把革命的经典概念同“天鹅绒革命”概念区分开，天鹅绒革命实质上并不是革命。某些人称这些“革命”是代用品，从欧·亨利时代起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叫做“香蕉革命”，香蕉革命是由特工机关端出来的、按需要的“口味”建立政权的一道名菜。

尽管意见纷纭，但其中的主要之点和共同之点却可以剥离出来。在苏联空间，发生“颜色革命”的各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国体上并未出现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只是统治精英在变。乌克兰则更是如此：把这些人推上台执政的不是别人，还是库奇马。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支持库奇马的。

乌克兰“橙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权有势的精英代表（库奇马本人，内务部、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人，最高拉达议会党团“劳动的乌克兰”的代表）的行动。

五月广场上看似坚如磐石的尤先科—季莫申科联盟，实际上从一开始走向执政，便有可能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所瓦解。季莫申科准确认定，她的主要敌人就埋伏在总统身边，绝不会放过她的任何一点过失。

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和国情咨文中多次保证，要使经济摆脱阴影，要消灭腐败，要对非法获得并国有化的财产进行二次私有化。起初谈

的是3000家企业，后来谈的是300家，最后企业数字减少到29家。“克里沃罗格钢厂”，特别是尼科波尔的几家铁合金厂似乎是在向世人显示，正在研究的不是要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问题，而是在总理和总统的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对财产进行简单的再分配的问题。

季莫申科的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危机爆发——肉、糖、汽油都陷于危机之中。

许多人都开始对政府政策表示不满，但季莫申科本人把一切都推到自己的政敌——“总统亲信”的身上。2005年4月，她作为“父辈遗产”联盟的首领，对这些亲信——点了名——有波罗申科、别兹斯梅尔特内、特列季亚科夫、日瓦尼亚、马丁年科等等。指控他们破坏“橙色阵营”统一，谋划在2005年7—8月份撤她的职。五月广场上两个获胜的集团开始对抗起来。

尼科波尔铁合金厂是世界上最大的铁合金生产企业，该厂发生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家企业的主人是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最高法院根据政府的命令，认定该厂私有化为非法，而平丘克所得到的50+1%的股份为无效协议。当时真是整个乌克兰都感到“欢欣鼓舞”了；但波尔塔瓦、尼科波尔、费奥多西亚法院立刻介入该案，作出对立的判决。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在电视上看着：这场游戏怎么收场？2005年9月1日，警方特勤分队强行冲进工厂，保着符合另一集团利益的新领导科洛莫伊斯基进入厂内。平丘克的拥护者派出该厂数千工人纠察队与警方对抗。

尤先科迫不得已介入此案，他声称，在尼科波尔工厂一案中，季莫申科政府未能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未能防止对立家族双方的挑衅行为。乌克兰媒体极力渲染一种说法，宣扬季莫申科在此事中参与游说科洛莫伊斯基集团的利益，恐怕会惹上很大的麻烦。

事件开始急剧发展。

总理的亲密战友决定抢先发动打击：2005年9月1日，总理季莫申科的顾问布罗茨基在第5频道直播节目中指名道姓地指控尤先科的亲信重新分配乌克兰的财产，为己谋私。总理本人又火上浇油，在9月3日内阁会议上声称，似乎俄国企业家阿布拉莫夫亲自给她打电话向她报告，他向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和议会党团“我们的乌克兰”的首脑马丁年科行贿5千万美元。阿布拉莫夫立即驳斥季莫申科的说法。

这一天，总统新闻局传出国务秘书津琴科辞职的消息，同时所有通讯社都发布消息说，他将于9月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国务秘书指控尤先科的亲信贪污受贿的发言，成为所有媒体包括境外媒体的头条消息。

2005年9月7日晚，总统尤先科举行一次小范围会议，参加者有他的几名助手、政府首脑季莫申科和她的两名副手，会上讨论了局势。尤先科的亲信就出现的丑闻向季莫申科发难，要求乌克兰政府集体辞职。季莫申科则打算对圣像起誓：对她的所有指控都不是事实。

经过辩论，总统最后作出决定，命令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乌克兰安全委员会主席图尔奇诺夫、总检察长皮斯昆、副总理托緬科、经济部长捷廖欣辞职。

然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乌克兰统治阶层大丑闻的序曲。正如乌克兰第1、2、3届人民代表乔比特在《伪善者，或对乌克兰的不宣之战》这本小册子中对后续事件所描写的那样，季莫申科在总统那里开过会之后，当夜即把自己的几名亲密战友和朋友叫到别墅开会。他们甚至谈到了利用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对尤先科大选进行资助的银行文件进一步加剧局势，直至对总统提出弹劾案。

在大家讨论得正热乎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对这

一切会作何反应？国防部长格里岑科建议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通电话，由于能流畅掌握英语的只有格里岑科（他在美国军事学院没有白学！），所以委托他完成这一使命。

大使在半夜两点被叫了起来。这群人把自己跑到总理别墅里聚会的意图作了长时间交代之后，他们听到了这位美国外交官的回答：国际社会会把这种事称之为阴谋，而且赫布斯特还表示了他个人对这次“秘密晚餐”的愤怒。

总检察长和国防部长立刻急急忙忙离开了别墅，否认与会上讨论的意图有任何牵连。他们一清早便给总统打电话，报告夜里出的这些事。但关于聚会的信息尤先科已早一步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

9月8日早晨，季莫申科紧急求见总统，她指定11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如季莫申科本人证实那样，她把他的手攥在自己手里，请求说：“不要破坏我们革命的威信。让我们现在一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对他们说，只要我们在一起，乌克兰的稳定便有保证。”

此时此刻季莫申科的亲密战友副总理托緬科正在开记者招待会，表示完全同意国务秘书津琴科的发言，同请求辞职的他站到了一起。有人向总统报告，季莫申科的议会党团一致投票主张剥夺波罗申科的代表权，当时波罗申科已经撤回了自己放弃代表权的声明。所以，尤先科打断季莫申科说：“不要再说了。”

也许，读者以为按时间顺序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和描写五月广场主要人物周围个别人物的作用是多余之举。但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就是揭露一下“橙色人士”的头头们喊出的口号是何等虚伪，他们曾许诺向乌克兰人民提供和平、安宁、幸福，而在瓜分抢到手的馅饼时，却互相咬了起来。

在他们当政的年代，乌克兰人民所看到的是贪婪的权力欲和对财产的重新瓜分。尤先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实

际上每天都得介入发生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国务秘书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之间、政府与最高拉达之间的冲突。总之一句话，这些冲突已经成了当局的主要工作。8个月来，乌克兰总统一直是这些乱事的调停人。这些我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不正是对互相倾轧的人所宣读的判决词吗？

这期间乌克兰的经济降低了增长速度（2005年国内总产量增长2%，2006年预期为1.2%），由于各经济部门工业生产下滑，预算收入亦缩减。

在五月广场宣誓就职那天，尤先科喊出他的蓝色梦想：“我的目标是带领乌克兰进入统一的欧洲！”这个幻想正渐行渐远，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据国际金融机构的统计，要想成为欧盟的候选人，乌克兰至少需要连续5—6年每年经济增长率为5%—6%才行。

政治不稳定在继续。2006年3月选举之后，最高拉达有5个月中断了工作。自从天然气危机以来，叶哈努罗夫政府根据季莫申科的提议集体辞职，至今在“代行职务”。从各种情况判断，新政府近期难以诞生。国内宪法法院也停止了运作。

季莫申科谋求政府最高职位——总理职务——的活动，实际上其实是数月来在最高拉达内一直为组成橙色多数而展开行动的原因。人们虽然一次次举行胜利狂欢，已达数十次之多，但绝对无人相信这个新的“橙色”联盟真能存在。

地区党首领亚努科维奇身边的幕僚认为，今天之所以能上演这部叫做“2号橙色噩梦”的电视连续剧，完全是强加给乌克兰的。有些政治学家甚至预言，议会极有可能提前大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立场就简直令人吃惊了。

既然对季莫申科本人，对她所领导的政府所作所为以及对她个人的品质评价极坏，而且对于她在最高拉达大选期间对自己的党所表现

的强硬立场感受良深，那么依然再次提议她担任总理，就变得有点匪夷所思，极不正常，也有损个人尊严了。特别是在为建立议会多数而“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仍把2005年发生“橙色”伙伴联盟对抗并导致其瓦解，导致季莫申科下台以前的那帮人又拉了进来，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但后来才从媒体上得知，原来急着要当乌克兰总理的季莫申科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并于2006年7月1日得到美国驻基辅大使泰勒的支持。他声称，必须在近期立即重新审议乌俄天然气协议。这位外交官的声明在乌克兰把人们鼓动得群情激昂，因为这话正说在7月1日，也就是人们正以为俄罗斯天然气要涨价的时候。但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不会涨价。季莫申科的拥护者响应美国大使的号召，把它像未来的行动旗帜一样高高举起，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是在干涉乌克兰内政。结果还是老规矩——谁花钱谁是大爷。

恢复议会中“橙色”多数的意图又落空了。地区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盟，负责组建议会领导机关，任命总理，成立政府。时间将显示这个拥有240票的联盟能挺多久，能干成多少事。

许多人，其中包括颜色革命的积极拥护者，都看出乌克兰人民已经被橙色胡作非为弄得疲惫不堪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人民不会为出现一个新“政权”而上街庆祝了，那些前途光明之类的蛊惑人心的讲演，已经让百姓听腻了。

在当今政治对抗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精英们对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是一个颇为特别的问题。问题不新鲜，从宣布乌克兰独立时起便始终存在。克拉夫丘克也好，库奇马也好，总是反反复复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占有优先地位。他们的怀里总是揣着这块石头，凡有什么事若要俄罗斯让步，总要把这块石头

掏出来。尽管1990年6月16日的国家主权宣言说，乌克兰是个中立的国家，它不结盟，实行无核化，而且斩钉截铁地说，“宣言是乌克兰新宪法和法律的基础，在缔结国际条约时决定共和国的立场”，但库奇马总统1998年11月4日还是发布指令，批准了“乌克兰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的国家纲领”……

该纲领第一句话便把主权宣言有关中立和不结盟的内容抛到了九霄云外：“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是同欧洲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一体化，是享有全权地加入欧洲安全体系”。

除了政治领域、政治军事关系领域、军事领域、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北约组织安排下参加维和行动（指在伊拉克）等章节外，还规定了在武装领域进行合作的条款，其中包括：同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研制和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向北约组织标准过渡，在军火领域交换军事科学研究结果，等等。

这样一来，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前，乌克兰领导便已经承担起正式成员的义务。

如果在尤先科担任总统之前，合作还宣布为在乌克兰—北约组织委员会框架内进行的话，那么这个人掌权之后，便出现了一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具体时限问题，首先是美国人提出了许诺，要加快这个进程。

正如2006年1月代理国防部长格里岑科所声明的那样，“乌克兰已进入实施获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地位计划的积极阶段”。国家预算正计划为此拨出一笔相当大的经费。

美国总统布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0周年前夕公开扬言，他希望在总统卸任之前看到乌克兰成为“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家庭”中享有全权的一员。北约秘书长索绪尔保证说，通向2008年北约下一波扩大的大门对乌克兰一直是敞开的。那么，“亲爱的朋友

们”（尤先科喜欢这样称呼乌克兰人）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尽管乌克兰鼓吹加入北约的人往往把追求加入北约的理由说成是凡加入北约的国家生活都好，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加入，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起来，可是有61.4%的居民不相信他们，反对乌克兰结盟。早在2006年2月份，中央选举委员会便收到450余万公民的签名，支持就加入北约进行全民公决。费奥多西亚事件表明了普通人对尤先科之流的美国朋友进入乌克兰的态度，那一次克里米亚居民在乌克兰东南部各城镇居民的大力支持下，到底也没有让美国人进来跟乌克兰搞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人登陆之后，又被赶出了克里米亚。

不过依我看来，问题还不会是那么简单，即使全民公决得以举行，北约的反对者得以获胜，问题也未必能得到彻底解决。加里西亚和沃伦还是不会同意，他们已习惯用讹诈来达到目的，他们会再次把人们拉进五月广场的“橙色”帐篷。克里米亚和东南各地区的人民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回答呢？

问题的答案很快就出现了。2006年12月16日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举行了一次“乌克兰全民公决”，投票站（共1200个）设在人口最多的地方，参加投票的近90万人，为克里米亚选民的57%强。结果令人震惊：反对加入北约的为98.7%，而“同意”的仅有1%。

不管怎么说，“乌克兰全民公决”是情绪对立的两极的一次对抗，它还将使东西方关系的裂痕进一步扩大。2006年夏天亚努科维奇发表了严肃的政治声明，声称目前乌克兰还不可能加入北约，这一步唯有留待全民公决之后方有现实意义。

俄罗斯唯有特别留意跟踪事件进程，并尽力对其施加影响。乌克兰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家们所需要，这一点对谁其实都不是什么秘密，它首先并且主要是可以作为反对我国的跳板。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一旦加入北约，北约空军的歼击机立刻就可以以保卫

这些国家免遭来自强大的东方邻居的进攻为借口，沿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边界进行空中巡逻。

在北约新成员国——波兰、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国土上，很快就会设立反导弹系统，目标很可笑，为了防止可能来自……伊朗的核打击，尽管没有这些反导弹德国、土耳其等北约国家本身的“遏制性武器”就够多的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约潜在成员国乌克兰的地图吧。从可能出现的核导弹打击来看，从哈尔科夫、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各州领土上向莫斯科和中央俄罗斯各大城市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飞行时间仅仅只要几分钟。要是想跟踪和拦截由俄罗斯腹地发射的导弹，这显然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位置了。

所有这一切比我们乍看起来要严重得多，也危险得多。基辅一家有影响力的周刊《2000》报道说，不久前美国举行一次参谋部指挥推演，推演过程中详细制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后俄乌发生武装冲突时对俄罗斯进行核弹攻击的脚本。报道的来源我不清楚，但如果有过这次推演，我们的总参谋部不可能不知道。根据1993年俄联邦军事条例规定，当俄罗斯遭到攻击时，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的打击将不可避免。正如常言所说，这种设想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目前，我国抵御北约处处向我边境进逼的政策还很难说是有结果的。在这些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的态度还缺乏一贯性。比如在俄罗斯领导人知情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们完成了一次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横贯全国的旅行，而且到处对青年大学生讲，这个组织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组织，加入北约大家庭是“莫大的幸福”。

似乎在华沙条约解体之后，人们就应该认为北约的进攻行动是无

可避免的了。无论是谁想出什么理由来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辩解，都将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巨大失败。

乌克兰政治势力的残酷对抗正在发展，后果很难预料。显而易见，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推行的武装政策，绝不会给乌克兰及其优秀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

只有清醒的政治家掌握政权，消除现任领导培育和制造的各种矛盾，兄弟的乌克兰方能出现和平。可以预见，对大多数乌克兰人民而言，这15年的噩梦早晚会变得无可忍受。

1 本章此节所用材料，是莫斯科大牧首辖区教会联络处提供给笔者的，特此致谢。

第十一章 苏联：从改革到解体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

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首次全民公决，由全体公民决定是否保留苏联。据报道，赞成保存的占投票人总数的76%。3月17日，戈尔巴乔夫投票后向早已等候在投票站的各国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应当由人民自己来决定”。（新华社稿）

党内局势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

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里加。在群众大会上。标语牌上的口号是：“叶利钦是政治娼妓！”（克罗波夫斯基摄）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剽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白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

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格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

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了。”

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决定。我只好说：“我没法说服你们。走这一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吃后悔药可就晚了！”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过去没有写过这次谈话的事，不过后来倒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了公道话，他在电视上承认，想当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唯一反对任命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人是雷日科夫。不过我们没听他的话。

有时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正如所说，坚持把自己最凶狠、最不肯调和的政敌调入莫斯科的恰恰是利加乔夫。现在，当我们回首往事，评估同叶利钦有关的种种决定，包括怎样把他调入莫斯科市委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古希腊人充满睿智的话语：上帝如果要惩罚谁，定会先让他丧失理智。

社会大震荡和国家发生的破坏性巨变往往会促使许多人思考个人及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问自己和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有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当上全党领导的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改革会不会有如此毁灭性的后果呢？如果叶利钦还待在乌拉尔，那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著作还真不少，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法国启蒙派，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到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作者。照我看来，整个20世纪，也许只是我国最后15—20年的历史，就能为这些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提供相当鲜明的资料。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具体事实吧。十月全会的8个月后，到了1988年的6月，19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列在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审议苏共27届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执行情况。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5000名大会代表。

作报告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的报告分析了改革以来几年间取得的成绩，有一部分是讲激进经济改革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3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代表大会按不同问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以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首的民族关系问题委员会。

现在，当我翻阅会议速记时，我发现政权的各个分支，其中也包括党组织，都发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烈呼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闸门被冲毁了，自我鞭笞的洪流滚滚而来，不可阻挡。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多年来所有的发言都是严格程式化的，只能照本宣科，发言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可现在却突然对你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东西也就全浮到了表面。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自虐狂的味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最近15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些竭尽全力发起攻击的人，当他们掌权之后，本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情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再重演。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难道叶利钦——下面我还要谈到他的发言——在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对他原来批评的东西有丝毫改进吗？相反，过去的成绩全被抛弃了，缺点毛病却全复活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内形势越是恶劣，叶利钦及其一伙就越是对老百姓说形势大好。回想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年代，作报告的任何发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要尽量少谈，问题和任务要尽量多谈。看来这和一党制有关。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运动的情况下，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揭露缺点的。

现在，一切都翻过来了。

在苏联以后的15年议会工作——8年国家杜马、3年联邦院——中，我不止一次听取过我国政府成员的报告和发言。他们滔滔不绝谈论子虚乌有的“成就”，却对缺点错误缄口不言。这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反感，但随着立法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倒向政府，能听到他们讲真话的希望日趋渺茫，直到最后完全破灭……

不过，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以我之见再次犯下了一个对苏共、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彻底推向了正在迅速形成的反对派阵营，不久，他就成了这一派的首领。为了能把当时面临的局势说得更明白，我想引几段叶利钦以及他主要的反对者——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

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党内非正式的二把手。当时的这个人就是利加乔夫。叶利钦在当时已从首都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但还是中央委员，因为选举他的是党代表大会，只有党代表大会才能把中央委员撤下来。

在党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得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如果单就他的发言分析，抛开最后十来年对这个人形成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不说，这个发言的确是极具批判性，也相当尖锐的。虽说发言的词句不是那么华丽，但这一次同上一次著名的全会不同，他谈的问题颇为言之有物。

“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叶利钦宣称，“是党内的民主化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正在逐步变得越来越糟。当然，也要讨论当前的热点问题：改革的整体问题和社会的根本性革新的问题。会议的筹备阶段本身，就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为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重新带来了希望。改革使人民感到振奋。而且，看来改革也正是应该由党内开始。然后，党才能像过去一样，带

领人民前进。若要从改革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党落后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次会议，早就应该召开。”

不能不承认，他讲的这些话有的地方很有道理，特别是关于党内问题的说法。可是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个有20年党龄的党的活动家，对待党的重大缺点所抱的态度，却仿佛是一个路人。其实，多年来他不也正是处于产生和制造这些缺点的人之列吗？因此也就不由得会产生想法：这个人不真诚，他非常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谋取个人利益。

实践证实了我所有的疑虑：要对一个人下断语，只能观其行。看看“后期”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用一句圣经上的名言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原形毕露了”。再看看他发言中的另外一段话，就更能得出结论。

我碰巧就知道莫斯科市和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组织要把多少个百万卢布划拨到中央。可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除了那些合理的开支之外，还建起了许多豪华住宅、别墅……疗养院的规模搞得那么大，当别的党的代表们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叫人简直是不好意思。难道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在物质上支持一下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其中也包括给基层干部发工资吗？然后我们又会对一些党的大干部陷于贪腐感到惊讶，惊讶于他们受贿，谎报成绩，行为不正派，道德败坏，不谦虚谨慎，破坏党内团结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上层腐败波及许多地区，对这一点不应估计不足，简单对待。腐败的程度看来要比有些人估计的更深，根据我在莫斯科工作的经验，黑社会肯定也存在。

还有个社会公正问题。当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引起人们愤怒，降低党的威信，对改革的速度产生致命的影响。

我的意见——应该这样办：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的东西短缺，那这种短缺就要让所有的人在同样程度上分担，不应有例外……

发言人的最后这句话显然说过头了，陷入了煽动的狂热。也许他特别害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是好多东西都短缺的人，于是很快他就一头栽进了过去那些恣意妄为的敌人的怀抱，然后又领导了从整体上消灭我们的制度和国家的行动，开始放手复辟被人民推翻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由社会不公和人剥削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这位“热爱真理”的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战士”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一伙，争取到了应有尽有的一切，而所有这些，正是他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所愤怒地谴责的内容。而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他所带来的则是工业和农业的毁灭，是在国际舞台上把俄罗斯搞成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是把老百姓分化为畸形的社会经济阶层，是把他们逐步引向衰亡，是把科学和文化引向退化。

难怪美国人说：赢得大选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忘掉竞选时的承诺。看来，我们的这位令人难忘的叶利钦先生在他的“历史性”出访中也学会了这一招。

上世纪90年代，恰恰是在叶利钦统治俄罗斯的时候，腐败、贪污、刑事犯罪，其中包括有组织犯罪统统大行其道，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慷慨地为土匪强盗大开方便之门，创建温室条件。当局的亲信和当时同总统过从密切的人士大肆搜刮人民的财产。当叶利钦在最高层当权的时候，人民目睹了，聆听了，也领教了他究竟有多么正派，多么道德高尚，多么谦虚谨慎。

不过，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为了那些容易消火的健忘之士，我还是想提上一笔。他早就把到区立医院治病和特意坐着哗啦哗啦作响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进克里姆林宫的事忘记了……

在他那本“忏悔录”里，党的领导人生活中许多具体事件受到很大关注。说实话，对于当时那些制度规矩，我也有好多看不惯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讲过话，写过东西。可是，为什么当他成为俄国元首之后，却不仅把受批判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而且还变本加厉，加以发展呢？而他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简直更是厚颜无耻，完全是挑衅式的，搞的那一套排场，既毫无品位，又极尽张扬。当老人们半年半年地领不到养老金——那可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来源啊——几乎要饿死的时候，他却大修克里姆林宫的厅堂和自家的官邸，搞得那么豪华，以至法美两国总统见了都惊讶得简直下巴都要掉下来。

可以预料，总有一天，会把账目公布出来，为了装修这些厅堂，那座郊区的官邸，还有买那些昂贵的家具，修那些防备自己人民的坚固围墙，我们国家究竟得花多少钱。

在全国，在那些“最最民主”的政府办公室里，贪贿成风，腐败盛行，一切都公然大行其道。共产党跟他们怎么能比！以前不管怎么说还有人怕党委，也畏惧自己的良心，可现在简直是为所欲为，连闸都刹不住了……

在这位总统的面前出现的，有一座座宫殿般的别墅，有一排排属于“生活新主人们”的最昂贵的轿车，有多架专机和多艘专用游艇，这些都是遵照叶利钦本人的命令装备和修建起来的。直至今日，当他把一个强大国家彻底捣毁，转入“荣休”之后，还能乘着这些专机飞来飞去，飞到巴黎去出席网球公开赛……还能弄到钱（当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租一套私家别墅，等等。这就是“民主”的实际代价，而我们轻信的人民居然就上钩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可是在1988年的夏天，叶利钦还是想回到党和国家政权的上层，他向第19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申请说：

代表同志们：提一个不太得体的问题。我想提的要求，就是

恢复我在中央十月全会后的政治上的名誉。（会场出现议论声）
如果你们认为时间不够，那我就不说了。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说吧，大家请你说呢。（掌声）
同志们，我看，关于叶利钦的问题用不着再保守秘密了。就请叶利钦同志把他想说的话都说一说吧。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请吧，叶利钦同志。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过50年再恢复政治名誉现在简直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社会的康复当然有好处。不过我还是要请求生前恢复政治名誉。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在报告中和大家的发言中都谈到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等等，我觉得这样提也是得体的。

大家知道，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可是全会上问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提出，党员们也这样提出。这些天来，这些问题其实也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和发言中再次提起。我认为，我发言中唯一的错误在于我的发言不是时候——我不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提出来。

看来我们大家全都应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

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以及我的发言中，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1987年）所谈的那些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痛心，请求代表会议撤销中央全会就此所作的决议。如果认为可以撤销，此举将可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为我恢复名誉。这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将符合改革精神，符合民主精神，而且，以我的感觉，这将对改革有所帮助，为人们增添信心。

是的，社会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哪怕进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们走的也只能是这条路。

（掌声）

不过，大多数后来发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总书记及其亲信的示意，还是以惯常的战斗激情，继续狠批叶利钦，最后他的恢复名誉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也许，让我来谈同叶利钦同志发言有关的事情，要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更难。这倒不是由于事情也牵扯到我。不过，也该是厘清事情真相的时候了……

不应该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叶利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看来，他所拥有的不是创造力，而是破坏力。他对改革过程，对党所认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评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责备中央书记处的内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为。我想指出一点，作为市委书记，他本人却从来不参加书记会议。我还要说，有一点让人很难相信，那就是他身为政治局成员，应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一开就是八九个、十来个小时，而叶利钦却几乎总是从不参加讨论那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从不参与那些全国人民等待着的决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这是事实。难道这就意味着党内同志式的态度？中央书记的工作，中央机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不就在于帮助地方做好工作吗？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叶利钦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变得更灿烂了。过了不多时间，尽管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了愚蠢透顶的阻挠，但他还是以巨大差额胜出自己的选举对手，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会议真的为他“恢复了名誉”，那也许就不会出现新一轮酝酿破坏事件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失宠”反倒帮他赢得了选举。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上层”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其实这里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这种策略愚蠢到家。遗憾的是叶利钦本人同当时他的“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在自己的书里甚至还写道：“我

是这个制度培育出来的。”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跟欺侮过自己的人算了一笔总账，把党给查禁了。他不过是个我们土生土长的罗宾汉，他的斗争对象就是党的高层，因为他当众受到了对方的鞭笞。他赢了。于是他怀着一种痛快的心情把对手侮辱了一番。至于他同时也把1900万共产党员推进了污泥塘，那就无所谓了！至于法律受到了践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了俄罗斯的大老板，成了“沙皇鲍里斯”，他对此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

20年一直待在党的机关——这会使性格产生严重扭曲。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如果我还相信叶利钦是“真诚地入党”（这是他的话）的话，那么，1990年，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种故作姿态的退党，其真诚性就很引起我怀疑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上，在党死亡之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掌权之后，情况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要说好的变化，那可是绝对谈不上。

19次党代表会议表明，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认识，虽说当时还不太成形，稍后不久，这种认识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表述出来，那就是：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必然也要求进行变革。这一点使我们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工作的干部特别感到不安。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经济管理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会集中到党的领导手里。但与此同时，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实际上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在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把党的机构所制订的决议草案赋予法律法规的形式。选举机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各级苏维埃的威望也越来越不显著，尽管就

其本质和潜力而言，它们实际应该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条件。

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苏联共产党，在19次代表会议上最早宣布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就像过去那样，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第15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进行总结，并对党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进行讨论。第二个问题则是党内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的都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讲的话很对：“今天应该有勇气承认，如果政治体制僵化，没有变革，那我们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

接着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七项原则一样，又列举了政治改革的七项原则。不过，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天平明显地向立法倾斜。

就在总书记到代表会议作报告之前，政治局按惯例进行了讨论。我又没有沉默：

“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行政部门的削弱。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让我们按照经典的三权分立的办法来明确划分它们的功能吧。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种权力的作用范围。如果要把全部权力——我再说一遍：是全部！——都划归苏维埃的话，那依我的看法这样是不正确的。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受到了责备。又是老一套：我总是护着部长会议啦，我不懂时代的要求啦。于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说出了自己对这些听起来吓人的所谓“时代要求”的看法。它们完全是同基本的、

经典的三权划分相矛盾，同最起码的有头脑的意见相左的。那一次的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不过，政治局中通常总是那样，遗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数。总书记明白，把苏维埃端出来起作用的想法，准会在老百姓当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支持，至于细节问题嘛，可以在干起来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我在这里谈自己对预定把全部权力交付苏维埃这一问题的立场时，我要强调一点：我绝不反对给予苏维埃以实际权力，但我那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当我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厂长的时候，我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了。当代表的那些年里，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可要比苏联宪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级苏维埃情况也是相仿佛。

这种局面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的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把党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应的社会组织功能中解放出来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如何使三权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提高国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简单地把自己的交椅从老广场搬进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要保留所有原来的权力，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他复活70年前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

在把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的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党应该从管理职能中退出来，只充当政治力量，但同时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锋队”角色。相反，他还特别强调，“没有党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而且，他还确信，一定要把相应的党委第一书记放到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顺便说一句，恰好是这个观点，在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党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摆脱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日

常领导，包括经济工作领导，那其实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换言之，表面上虽不像过去那样，但实际上苏维埃依然处于党组织毫无限制的、绝对的、说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无法确切地肯定，这种方案是否专为戈尔巴乔夫量身订制，让他将来既能领导最高苏维埃，又能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人就就此跟我讨论过。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这项提案好像只是根据必须保留党对经济工作影响力的意见提出来的，而实际上主要目的却是要把总书记和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个职位合二而一，然后，如上所说，再把“全部政权”都交给他。

问题的“理论面”已经考虑周全了。在实际做法上，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体制以及代表选举制度，也都已经提交给代表会议，并对之做了讨论。会议之后接着还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任期还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们还将对把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研究它。现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会议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在许多夸夸其谈，对改革表示支持的发言，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发言中，也响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评调子。其中比较鲜明的一个发言，表达了对局势的极大不安，就是前线老战士、杰出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发言。我想，过一段时间，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篇发言全文发表出来。现在，我想提纲挈领地复述一下，并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发言出自作家笔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说，在谈到改革产生的破坏作用时，他将之与圣经中巴比伦塔的毁灭相比，说那是一个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人类的未能实现的友爱的象征：“我们不需要在毁灭自己过去的同时再搭上自己的未来。我们反对把我们的理智变成潜意识，而把疑虑变成狂热。”

关于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这一点，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评论：

如果说4月这个充满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采

取行动，那么现在已经是对于无可抗拒的发展规律的历史逻辑进行深思的时候了。

能不能把我们的改革比成一架飞机，当它起飞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终点是否有一个飞机场？尽管关于民主，关于扩大公开性，清理垃圾场的辩论和争论进行得沸沸扬扬，但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于改革的道德目标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为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团结。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场地。团结一致是唯一的选择。

他以极度的不安和痛苦，谈到了道德，谈到了作家、记者、媒体对社会精神生活所负的责任：

缺乏道德的书刊不可能教育别人有道德。意识形态中的反道德主义会腐蚀人的精神。也许，并不是所有坐在报刊总编办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到或者想认识，公开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纪律约束，而不是恣意妄为；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掌声）¹的哲学，改革的革命情感产生于道德信仰，而不是产生于用以代替康复手段的毒药……

那些把我们生活的过去，把我们民族的圣土，把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牺牲，把文化传统统统倒进脏水坑，也就是把记忆、信仰和希望从人们意识中抹去的出版物，它们正在为我们一切的思想失误，为我们思想上的、纯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罗斯特拉特²建造一座丑陋的纪念碑，意识形态史定会以羞愧的心情和诅咒来回忆这座纪念碑的诞生……

遗憾的是邦达列夫的这种忧心忡忡后来被局势的发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终结以及“独立自主”的俄罗斯现实所证实。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们早了许多，他能对未来看得很远很远。也许，他的发言是改革诞生三年后敲响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钟。那是一个转折的关头，从那时起，破坏倾向以及其

他的力量就日益压过了创造的力量。

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机关中，匆匆忙忙展开了起草选举法、修改苏联宪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苏维埃制度有关的。可惜事情到此并未止步不前。篡改宪法的工作刚一登场，这个“满含创意”的过程就变得难以掌控了。宪法被看成比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废纸还不如。它受到任意践踏，最后终于寿终正寝。

当然，对于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生活，是生活发展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当那些修改对国家有好处的时候。我反对的只是那种匆忙从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当时的做法。我反对对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对别的法律态度也会如此的。

以美国宪法为例。众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过的。200年来对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处！再说沙皇俄国，它倒是没有宪法，但却有个所谓的基本国家法。1905年的革命对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几条，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中，先后通过了四部宪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们都有着相应的名称：列宁宪法、斯大林宪法（这个名称广泛使用于官方宣传）和勃列日涅夫宪法。到了1988年，开始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但在我国只管了一年时间。到了1990年，宪法已经又改过了两次。最初是为了引入总统制和一些新的国家机构：总统委员会、联邦院；后来又为了要废除苏联部长会议这个主要的国家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为了废除总统委员会，设立副总统职位等等。1991年的宪法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进了故纸堆。有一个并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对这种对待国家根本大法的轻率态度好有一比，他说：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

对待俄罗斯宪法的态度就更是肆无忌惮和不知羞耻。起初，是千方百计地操纵它，不久之后，对它就简直是肆意糟蹋。不过，一旦踏上欺诈和叛卖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来呢？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竟逐渐演变成为标准。1997年10月，叶利钦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后来又当着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对宪法和法律横加践踏，在1993年他炮轰议会，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宪法强加给社会。按急就篇搞出来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宪法的老百姓究竟占多大百分比？总之，严格地说，它究竟算不算通过？就连在斯大林时期宪法草案的讨论也要搞几乎将近半年，结果还出现了200万条左右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对1977年的宪法，全国人民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我想，读者已经得出结论，我对叶利钦1993年的宪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却属于那些不支持在改变我国基本法问题上过于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喊：应该修改宪法！生活告诉我：自打1988年一动这个根本大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终于搞得宪法也没有了，国家也寿终正寝了。可是，想当年围绕着修改宪法和制订新选举法的事有过多少争论！部长会议对这些事虽都没有参加，但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一份不落地阅读了所有的文件，出席会议时也不能不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问题，乃至有些反驳意见提得匆忙草率，实在是对提案考虑得不够周全，未能同了解情况的人交换意见所致。那么当时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收到文件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开会之前。有时候不仅找不到时间跟人商量，就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记得曾产生过许多疑问，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疑问。

首先，我不太明白，干吗要设这么个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得含糊不清。他说，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之所以

必要，是因为“它将强有力地、直接地表达社会意愿”。我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问问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讲台上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在于实质。戈尔巴乔夫只是简单地把列宁关于代表大会是“广泛的人民会议”的思想来了个文字转换。换句话说，那就是百姓讲坛——在那儿老百姓什么话都可以说。至于所有的具体事，还是得上最高苏维埃会上去解决。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太明白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代表名额一定要2250人？这么一个奇怪的还带着零头的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广泛的人民会议”，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很简单的道理，准备开会用的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不就有5000个座位吗……

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发现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权机构破坏作用极大，便问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国内搞这么个有组织的群众大会是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都面带羞涩地谢绝了这份首创专利的荣誉。那么，首创者究竟是谁呢？戈尔巴乔夫？他可未必能够一个人就想出这么个高招。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作为人民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我是不是过于挑剔了？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我要指出，这样的机构只是存在于苏联和俄罗斯，而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却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这么一个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它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却没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一个宪法决议，解散国名为苏联的国家呢？

我虽对苏联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的合理性抱怀疑态度，但对最高苏维埃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欢，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我于1990年10月实际离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岗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同议会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而那

种状态则既不算十分和谐，架吵得也不算厉害。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过在我看来，最高苏维埃和政府毕竟还能够互相尊重，他们逐渐也学会了如何在一起工作，虽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还算是找到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我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们把讨论和决定所有问题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有立法问题，也有经济管理问题，经常把行政权，有时甚至是司法权都抓了过去。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要把苏共中央的那套组织机构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都几乎照单全收，完全照搬过来，而它们的责任却要交由各委员会去承担？以前的工作不是远比党的机关干部做得更顺手吗？况且，他们也远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哪。

春天日益临近，选举定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法的修改同宪法一样，也是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然后通过。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开展的斗争搞得非同小可。但参选人的处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看，操弄出选举法来的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奋斗了半天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民主。他们从立法上就规定了未来代表构成的两重性：其中的一部分当选者——1500人——必须通过按地区原则选举的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则可以很轻易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代表大会，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听命于当局的社会团体选出的。

自然，所有这些组织，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艺术联合会，首先会把自己的领导人选出来，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代表。还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经过一阵阵拼死拼活的厮杀才战胜对手当上代表的人，自然也会相当敌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代表的同行。

我不敢说立刻就发现了这种体制的错误所在。我从来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证，说是这样一来，社会团体就可以获得直接对政权机构施加

影响的补充管道——这只不过是在不大体面的辩论中又抓到手的一个论据罢了。起初我有点天真地认为，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这种社团代表制将会使得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议会代表构成变得更为多样，将扩大议会的社会基础。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天真就破灭了。

早在拟订750人名单的阶段，所遵循的原则就已经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来自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100名来自有2600万团员的共青团，而还有100名却来自几乎有两亿成员的工会……谁又愿意挺身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恰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30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绝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遭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象力。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和毁灭。

读者有权问：作者是不是反对一切反对力量呢？绝对不是！我坚信，一个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没有反对派的。这无疑也适用于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不过我反对这样的反对派：它仇恨自己的国家，仇恨本国人民，苏联的垮台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它也会兴高采烈地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药方来把俄国整垮。我正是把这种反对派归结为破坏者，也就是说，客观地讲，也可以把它们归结为祖国的叛徒一伙。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的一些变化在这些负面现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它的影响在苏联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

批评意见，包括严重指控，乃至号召“复仇”，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惟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机之所以日益发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次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新结构形式。党到了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彻底改造的时候了。严格地说，这种事甚至本应该早点做，应该提前让它做好应对新条件下工作的准备——新的组织条件、理论条件、意识形态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惊惶不安，它们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建议在全会上一定要讨论新条件下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自身要作出什么改变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党活动的新战略路线及策略，那么对百姓来说，整个改革就会是一场空前的失败。

我的这次发言没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对待叶利钦那样，也没有再搞什么名堂：时间不一样了。

不过，党为什么就不能及时，或者哪怕是迟一点也行，进行一番变革，为新条件下的工作做好准备呢？这是谁的错？我可以引用“改

革的教父”、已故的雅科夫列夫当年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作为回答。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他相当明确地表述了党内和苏联破坏分子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我想，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在苏联发生暴风骤雨般政治动荡的条件下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真是卑鄙到了极点：这些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掀起的反共浪潮越来越高，这浪潮在推进中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第三届人民代表特别大会选举了戈尔巴乔夫当国家总统，在一片喧嚣声和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条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1990年7月初，苏共的最后一届——28届——代表大会开幕了。

党内实际上出现了分裂，队伍的划分标准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为一方，以地方党组织为另一方，出现了党内的对立。这种情况逐月变得越来越严重。毫不奇怪，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

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个苏共最高机构通过热烈争论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政治局内出现了好几个小帮派，斗得不可开交。一帮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另一帮是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恩科夫、扎伊科夫。当然，还有“沼泽派”。在个别问题上，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相互关系，危害到共同事业。

虽然从1990年开始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但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它还是开了一次会。会议是在诺沃奥加廖沃举行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那边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我的战友、同事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局也没有按惯例对这个文件进行认真审议。

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书记处未来构成人选的问题。有与会者对已确定的候选人又提出补充，建议我和卢基扬诺夫进入政治局。我们俩都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给党带来危害。国家总统是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员，这可能为苏共的敌人提供加强攻击的借口，指控它大权独揽，把国家所有最高职位统统集中到一党手中。我跟卢基扬诺夫只好一再说服在场的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合理的。不过我们认为，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还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会还选我们。我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有些出版物，特别是在纪念改革20周年的时候，居然说我跟卢基扬诺夫千方百计想钻进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苏共距离被查禁的日子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了……

我竟然成了最后一代共产党员中入党最早的党员。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顿巴斯矿上工作。后来我那已经过世的弟弟叶夫盖尼也在那个矿上工作，不过掌子面已经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处。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劳动，并不是为了捞个什么党员的称号。这首先是因为他们

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矿山是一个劳动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常常还非常危险，在那里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坚强。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杂质就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矿工的劳动又好比是一种日常平凡的英雄行为，他们很知道自己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一回当我假期回家探亲的时候，弟弟见我的手提箱里有一本《星火》杂志，是以戴矿工头盔的赫鲁晓夫像为封面的，便很严肃地问：

“这么一副嘴脸，怎么还戴上咱们矿工的头盔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全家人里头，只有我成了苏共党员。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当有人提议要她入党时，她却这样回答：我家已经有一个党员，这就够了。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作了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简短发言，他对中央委员们说，现在需要对经济给予特别关注，政治局以为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管经济的书记的职位。接着，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会赞同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

全会过后，我立刻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部部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全会，它使我的生命之流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河道。没有那次全会，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接下来我收到了许多口头和书面祝贺。我还保存着我父母发来的电报，两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亲爱的尼古拉，祝贺你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孩子，你的肩头现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你要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祝你身体健康，工作上获得巨大成绩。亲吻你，拥抱你。

矿区的普通劳动者距离高层领导和大政治非常遥远，他们表达的是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应该为之活

着和工作的人。

这一生我始终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负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苏共被出卖了，因此我发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党。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

正如所知，首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而今天，苏联没有了，代表大会没有了，最高苏维埃也没有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们把自己当代表的徽章收进了装那些手头用不着的东西的匣子——留给孙子们作纪念吧。不过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解散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是1991年8月以后“民主派”破坏俄国政权的一系列行动的先声。这件事的执行者是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那个仅仅过了两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击下解散的机构……



1989年3月20日，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开幕的苏联消费合作社第12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戈尔巴乔夫（右）和利加乔夫（左）交谈。中为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新华社稿）

关于代表大会有两个不算太愉快的回忆：第一个回忆——就是萨

哈罗夫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议——要听一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候选人对自己立场的表述——没有得到支持。虽然精神可嘉，但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后来才知道，候选人总共只有一个，而这个人却认为他应该先当选，然后才作报告。尽管选举之前克里姆林宫会堂的讲坛上已经对这两个职位合二为一的合理性响起了质疑声，但代表们对这样的发言并不支持。不过有这样的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尔巴乔夫外别无选择。所以著名作家，深孚众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玛托夫，才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选举他当主席肯定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所以当奥波连斯基代表毛遂自荐地出来竞选时，才引起了满堂哄笑。阿帕提特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居民，极地地质研究所试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竟想跟改革的创始人来一番较量……不过，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他不过是想用自己真诚的公民行动来加强刚刚诞生的民主。我想重复一下他说过的话：“其实我非常清楚，跟戈尔巴乔夫同志竞争，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只希望在我国历史上，在我们大家的实践中，终于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选举。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选择的基础，但毕竟是一次选举。”

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列入选票。我们这些代表并不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不善于理解，民主一旦诞生，一旦通过这件事宣布了自身的存在，自然就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提出证实它自我存在的要求。甚至是这些细节。特别是这些细节！如果谈到出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觉得最好还是对此事表示沉默。我不打算猜测他沉默的原因，不过我想，他也未必能正确评估奥波连斯基行动的意义。

第二个回忆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代表布尔布利斯为了讨好自己的同乡战友叶利钦，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叶利钦对这个建议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回答，倒也十分耐人寻

味：

“由于本人从昨天开始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本来是可以同意这样一个提议，认真工作，承认改革的。不过现在我选择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叶利钦取得政权后，没有忘记这位“忠诚到不肯谄媚”的人物的功绩，把他任命到一个至今人们也搞不大明白、根本不需要的职位上——当上了国务秘书。这真是投桃报李。

看来还有个不愉快的回忆，那就是在那真正可称为是永志难忘的日子里，良心受到的钻心般的刺痛。那些日子对我特别难忘：6月7日上午，在苏联新一届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后来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并被批准为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这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当天我在台上站了很久，报告以后政府活动的纲领，并回答了无数提问。

我成了苏联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政府主席。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是一段依样画葫芦的历史。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一切都是破题儿第一遭。错误是从来没犯过的，快乐也是从来没尝到过的。还想说一句，后来，在最高苏维埃任命由我提名的政府成员时，代表们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脾气——犟得很，而且还不大讲理。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反对派组织正在会上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干部队伍”、政治方向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手段，同时还看出社会制度正在改变。这个问题我要具体地谈，因为有好多事情在社会的记忆中已经蒙上了一层时间的薄雾，至于年轻人就更是毫不知情了。

好了，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按照宪法规定，它仍同过去一样由两院组成，即联盟院和民族

院。这个问题的讨论搞得非常冗长，简直催人欲睡：就拟订名单程序、各加盟共和国额度、提名办法、投票等内容发言的达数十人之多。最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讨论一遍，才把提出的名单提交无记名投票。俄联邦民族院的选票中列出了12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叶利钦。投他的票的代表当中，有1185人赞成，964人反对。其他各位候选人得到的反对票比他都要少得多。就俄联邦代表进行投票时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每个共和国出一个名额，应该是11个名额，但选票上的候选人却有12人。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没有能够进入最高苏维埃。

在组成联盟院的过程中，许多事件也令人难忘。有些人民代表表现得蛮不讲理，破坏议事规程，占着讲坛不下台，抓住话筒不放，对什么问题都评头论足。对他们的投票情况就更是说明问题：比如扎斯拉夫斯卡亚院士，她是“农村无前途论”的提出者，同意她的仅为591票，而反对她的则达到了1558票。支持扎斯拉夫斯基的为829票，反对的为1320票。后来这个人在莫斯科的卡卢加镇由于做生意搞诈骗，大大地出过一回风头，然后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样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落选的有波波夫，后来在首都当上了不走运的市长，他的不走运的副手斯坦凯维奇，以及著名的农业问题评论家切尔尼琴科——这个人在批评我们的农民的同时，又在自己的口袋里揣着一枚由他创立的，说来惭愧，几乎没有党员的农业党的图章。

总之，根据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大多数人民代表不支持当时正在出现的反对派，他们隐约地明白或者感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国家的危险。

几天之后，一个当选为民族院人民代表的鄂木斯克国立大学劳动法、环境法和农业法副教授卡赞尼克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不经过投票的情况下由叶利钦取代本人进入民族院……同志们，我担心如果再投一次票，叶利钦同志还是通不过，而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发生。”

提议被通过了。叶利钦就以这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当上了苏联最高

苏维埃的委员乃至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感谢这一行动，叶利钦在当上俄罗斯总统后，随即任命卡赞尼克为国家总检察长。不过这位天真的，看来也正派的人，还是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什么人堆里，于是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鄂木斯克。

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在否定国内现存一切事物的积极分子们为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开展的选战遭遇一败涂地之后，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发言了。阿法纳西耶夫是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院长，而波波夫则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发言中公开站在当局和大多数的对立面。假面具终于摘下来了！

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宣称，代表大会成立的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选出来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责难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听话的打手”，阻碍了代表大会任用进步人士。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后来就成为“民主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会议工作期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波波夫是未来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他对代表大会开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数代表说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组织的旨意行事。不过闹不明白这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国家组织呢，还是党组织或议会组织？根据这位波波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缺乏智慧的群氓”，为的就是形成一个听话的机构——最高苏维埃，然后再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继续对国家领导中的“进步一翼”施加压力。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样来变更立场了。首先，莫斯科地区代表中的科研机构 and 文艺团体小组认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团。他建议考虑成立一个跨地区的独立的代表小组，并号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参加这个小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

组合代表会议。选出了组合的联合主席，他们是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为历史学家，一度人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曾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帕尔姆不详；波波夫为经济学家，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主席；萨哈罗夫，核物理学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译者。跨地区代表会议得到了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介绍。还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凯维奇、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这样一些人索布恰克于1991-1996年间任列宁格勒市（后圣彼得堡市）市长；特拉夫金后创立俄国民主党，任该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一度任俄联邦司法部部长；斯坦凯维奇不详；波尔托拉宁原为莫斯科真理报主编，先后任俄联邦出版信息部部长、联邦政府副总理、国家杜马信息政治通讯联络委员会主席；布尔布利斯先后任俄联邦国务秘书、俄联邦总统委员会国务秘书等职。——译者。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希望他们的组合成员身份不要正式登记。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许多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团结起来，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坏活动的组织者，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起初，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组合的领导宣布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即对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他们的文件说：组合将准备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代表大会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问题，“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苏维埃对立起来，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苏维埃激进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彻底转变成表达人民要求的机构”。

又过了不多久，情况变得明朗化了：跨地区代表组合虽说是一个议会党团，但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议会活动上。它越来越觊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组合的头几次会议开始，就可以

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当局的地方机构，以及同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都发生了对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数人民代表团结起来的组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成为与“尸位素餐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的实际力量。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成员宣布，他们同与会大多数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受跨地区代表组合的委托，阿法纳西耶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了推动组合走向反对立场的具体分歧。

其实，跨地区代表组合这时已经采取了反苏和反联盟的立场（它把苏联叫做“帝国”），并开始对民族分裂分子的领袖表示支持。从他们形形色色的要求当中，可以分析出两大主要要求，后来在摧毁伟大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这就是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以及罢工合法化的内容。组合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后来又宣布苏维埃是党内官僚的避难所，到了1993年1月则干脆消灭了苏维埃。

不久，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阿法纳西耶夫凌驾于组合之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个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里把被称为“北方领土”的我国的几个岛屿“奉送”给了日本。而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俄罗斯当今的领导坚决不同意把这些岛屿移交给日本。可是在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却引得右翼势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几乎全国都非常不满。

阿法纳西耶夫最出风头的时间要数他在第一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后来虽然他还是跨地区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会活动却变得暗淡了，他热衷于出国访问，答记者问，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上担任主席。而且，据我所知，对于自己的代表职责履行起来也是马马虎虎。总之，他已经不再工作，而是头顶着侥幸得来的光环睡

大觉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阿法纳西耶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我国的一个少年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以社会主义精神、热爱党和祖国来教育孩子们。正是这样一些双重道德的人物，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年代里，开创了叛卖行为的先河。

在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学院里，有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那里学习。但后来这些下一代竟欢天喜地地把他们的父辈通过斗争得来的一切踩到了脚下。再往后，在取得学院领导和教育部同意之后，学院又被金融寡头涅夫兹林出价一亿美元收购，涅夫兹林也就成了这所学院的头头，虽说跟学院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的“领导”倒也没能持续多久。现在他正从“神圣的”以色列土地眺望着我们祖国，而阿法纳西耶夫则在不久前离开了学院，临走还重重地摔响了身后的门。

阿法纳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学院，事物肯定会这样发展，而且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他一定尝到了失望的苦涩。

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

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磨了积极性，它没有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对第二届（1989年12月）也是同样，它也没能制订出现实的行动纲领。不过它却成为一个核心，把各种各样反对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

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它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

当时国外媒体对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建立和活动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之星》写道：“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时报》指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杂烩……他们所说的一切，同任何实用主义态度都少有共同之处，看来这个组合相互联系太少，以至难以收到足够的效果”。

英国《每日电讯》指出，组合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改革。新组合的信心由于矿工罢工获得成功而有所增强，这次罢工迫使党和政府屈服。罢工行动明确地告诉激进派，他们的目标同工人相吻合。组合的建立证实了党内的两极分化”。



1989年12月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在会间讨论问题。中为阿法纳西耶夫，其对面为叶利钦。（丘米切夫摄）

不过，前面我曾保证过，要回到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问题上来，并

从另一个侧面，即从民主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是该履行诺言的时候了。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达得比较完整，我先要请读者原谅可能出现的重复。前面说过，跨地区代表组合在最初阶段曾拾起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武装自己。我想，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苏维埃”一词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过去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分子之后，才会在将近20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把苏维埃政权骂得狗血喷头。

遗憾的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逐渐把苏维埃的政权功能搞得越来越成为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功能都渐渐集中到了党的领导机构手上。所以当改革导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实在在地归还给我国社会的任务出现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实实在在的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国政治生活中又重新响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口号所表示的内容同20世纪初革命前的内容有所不同，意味着要把权力由苏共中央的手中转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当然，“一切”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环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总体而言，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在苏维埃的面前正展现出一个新生命。从1989年开始，苏维埃逐渐摆脱了历史形成的弱点和缺点，克服了浴火再生和发展的困难，正在成为一种比较现实、比较有效率的政权。

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点面前的苏维埃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想起人民代表萨哈罗夫院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口齿又不清，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但同时却又把苏维埃的作用讲得那么明白，他说苏维埃应该在各共和国、各州、区、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位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萨哈罗夫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认识他，但并没有什么私交，而且我们的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也并不一致。就是这位献身科学的人，氢弹制造者之一，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会上起着显著的、重要的作用。他号称“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苏维埃国家制度形式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宪法草案中为这一点备了案。我还保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头有作者的批注。这位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挂了好大好大的牌，上头大字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那些一直以萨哈罗夫的名义发誓，而掉过头来又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呢？……

我要提醒一句：苏维埃政权是在我们国家诞生，并成为我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权组织的。它是从千百年来人民集体议事的传统中一再自然不过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是一直高于“我”的。正是苏维埃制度大大巩固了苏联和苏联这块领土上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公民心理的这个特点。

现在，统治阶层在我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可是这种东西是违反我国传统的，它必然要把每一个人意识中的“我”摆放到首位，而且还要以怪异的方式将这个“我”放大，把它与“我们”对立起来，并把“我们”排斥到角落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完全可以说，苏维埃已经成了我国野蛮资本主义狂热崇拜者最近阶段的一个牺牲品。

我们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无日无时不在经受着摧残，这究竟会把我们国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听听一个人说的话——那可是一个最难以归入共产主义信徒乃至对苏维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尔仁尼琴。他说：“我走遍了俄罗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万封来信，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我国民众已成为茫然无助的一群。底层的百姓实际上已经没有活路。我国发生的一切，全同他

们没有关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或者俯首帖耳贫贱度日，或者另寻出路，比如说，从事非法行业；要不就欺骗国家，要不就互相欺骗。”

萨哈罗夫在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几个人于12月18日参加了在科学院主席团大楼前举行的人民代表同这位科学家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我觉得，如果他还能活着，那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许多情况将会改观。在他去世之后，反对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领袖。构建正常运转的议会体制的机会丧失了。在跨地区议会代表组合中，极端倾向占了上风。不过组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权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还是阿法纳西耶夫，都无法担当这个角色，于是这份“殊荣”就落到了叶利钦头上。

首先是以跨地区议员组合为代表的反对派接过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用以同党和国家进行斗争，改变社会制度。不过，当它把管理国家的控制阀一旦抓到手上时，议程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同前一个口号完全相反的口号：“打倒苏维埃政权！”

.....1993年9月和10月到来了。俄罗斯总统把手置于其上宣誓就职的那部宪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脚下。代表政权的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被解散了。为“民主派”治理国家扫清道路的口号，如今被扔进了污水坑。

我经常想：如果萨哈罗夫还活着，那反对派会怎样行动？国家究竟是会以渐进的方式还是激进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再.....当我回顾国内由公开性和“多元化”搅动起来的局势时，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数人民当时是不可能接受渐进的。这一点我从切身体验上就可以感觉到。我曾就把经济转为市场关系，同时为居民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市场实行国家调控多次提出建

议，但却遭到坚决反对：一切马上就要实现，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内，而不是6—8年才实现！

看来，这是人们对望眼欲穿的人间福利的一种相当自然的反应。多少年来，在改革还没有开始之前，党就一直在宣扬这些福利。而且，总书记和总统戈尔巴乔夫又一再许愿，结果把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搞得荡然无存。这也是老百姓欢迎和支持向他们推荐的那个既颇有拿破仑派头，又带着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领袖叶利钦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们也曾一度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希望。

说到叶利钦，我只想提几件所谓他那个时代的事情：大多数人还对他位居国家总统期间出尽丑态、所谓国家元首“家族”贪赃枉法，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国民经济遭到破坏记忆犹新。偷盗抢劫横行，百姓一贫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领域不断蜕化，犯罪现象泛滥，乃至百姓生活于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让人民“分清良莠”，恐怕还真得有个几年。为了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1989年叶利钦完成了美国之行。

既然千百万人经过痛苦的切身体验已经确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动，都不外乎是出于乡下草台班子一个无师自通、敝帚自珍的戏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态构成的愚蠢透顶的粗野的杂耍洋相，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或者是不知羞耻的谎话连篇、信口雌黄。我只想引用意大利记者祖科尼文章中的几小段不大为我国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国之夜散发着威士忌和美元的气味，被聚光灯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叶利钦，这个专给戈尔巴乔夫念倒霉咒，专给公开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犹如旋风般在美国上空掠过。他说过的话语在旋转回荡。他在身后留下的痕迹是关于灾难的预言、

疯狂的花销、答记者问和著名的黑标签杰克·达尼埃尔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别的气味。他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之邀来到巴尔的摩，住进酒店之后一晚上独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装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车来接他到大学的会场，不禁吓傻了。叶利钦送了他一个醉醺醺的沾满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递到他手上。“为自由干杯！”叶利钦在清晨六点半向他提出了建议，手里挥动着倒满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只通常在浴室里放刷牙牙膏的杯子。只不过他是自己把酒干了……

还有一件事就远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了，那是为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做协调工作的哈利逊在回忆录中写道的：

飞机着陆了。叶利钦走下舷梯。不过他没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团致意，却沿着起降区走向飞机尾部，背转身去，开始冲着飞机后轮撒尿。我们大为震惊，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叶利钦走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同官员们一一握手，从一名年轻妇女手上接过一束鲜花，坐进了等候他的高级轿车。

说实在话，在引用报刊上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位在大洋彼岸解开裤带的我国同胞，他的事迹读起来实在叫人恶心：这是个受到生物本能驱动的人，可是两年之后，竟“经全民选举”，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在翻阅那些日子的国外出版物时，人们会注意到我们未来的总统讲到自己国家时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谅。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那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回家去谈。

还记得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人问了他一个有关他政治对手科尔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简短，而且斩钉截铁：“我到莫斯科不是来谈论科尔先生的。这件事我会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当年的《真理报》副主编，在自己的《总统，或者俄

国版水门事件》一书中相当鲜明地描述了读者和公众的反应：“这种事不可能，这是对一个好人的污蔑。”等等。电视台回放了叶利钦在美国期间的纪录片，掀起了一片叫喊声，都说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恶意造假，是通过合成的办法把单词拉长了等等。而且说，要把他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讲的讲台拍摄得很正常，而把讲台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说得好听点，拍得脚跟有点不大稳，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术。而且苏联最高苏维埃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举行多次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国家领导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亲爱的人民卫士鲍里斯·叶利钦。

是的，当时很难说服人们。他们期待着叶利钦这样的正义斗士，而且转瞬之间不假思索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偶像。任何有关叶利钦的负面消息都会立刻被他们否定。套在麻袋里洗澡的事儿人们不相信——那是污蔑；在飞机上睡过了头没能跟爱尔兰总统在香农见面——那是撒谎；到别墅“批阅文件”——那是因为时时想着文件，想着国家。不过，当他在德国喝得醉醺醺地指挥乐队，而一切又通过电视播放出来时，许多人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然而这些事都是后来发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众大会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那些大会都是由“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组织的。顷刻之间，这个组织就把本身作为人民代表的性质抛到了九霄云外，得出结论说，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选取了一条夺取国内政权的比较激进的道路——把群众大会、罢工、破坏百姓生活保障系统等作为有效手段来运用。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货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车站停着装运食品和日用品的货柜，可是却有人把钱塞给那些想参加卸货的人，把他们打发回家去。铁路线上出现堵塞，国内的铁路大动脉实际上全被切断。粮食和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烂在果园里。各种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关系恶化、罢工等各种情况一下子在全国各地都冒了出来。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

全面瓦解。最后，政权瘫痪了。

这一切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那些为了破坏国家政权威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对那些一心想夺取政权的人。自打那时起，在15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反过来证明“民主派”夺取政权有理，电视台一个劲地播放同样的画面：空荡荡的食品柜台。不过现在的那些“独立”媒体的大老板们却羞答答地不愿说出，为什么商店会变得空空荡荡。

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叶利钦当权的时候，甚至发生在当今政权之下，那会怎么样？为了让这些人的头脑清醒清醒，会把他们弄进去待上多少年？我说，年头不会少了！这么处理是对的——可不能拿国家人民的命运开玩笑！

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可实际上又做不出任何决定。庶民政治把国内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谁在早就极端复杂、极端严重的局势上再火上浇油？是谁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它作为破坏管理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手段？请看名单吧——他们都是把人民命运拨弄于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传单，上头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练马场开群众大会：“参加者有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凯维奇、雅库宁。叶利钦将应邀出席。”不过，当这些先生掌权之后，他们很快便把练马场翻修了，搞得丑陋不堪，说得好听点，是搞了个没有品味的商贸中心，目的则是让人没法在“民主时代”再在这里开群众大会。

有些名字（以及他们本人）已经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不应该：正是他们构成了第一梯队，完成了连希特勒也无法完成的“伟业”——让这个国家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说几句。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有一次声称，消灭苏联共产党的人正是他。他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他在这一

毁灭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后来他对自己竭力推举的叶利钦颇为失望，但在此之前他当过一段时间的莫斯科市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职位为自己捞好处：他征用了党和国家财产中的一块“大肥肉”，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以他为首的私立学校——国际大学。我经常在中央一级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发现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现在他成了个具有国家观念的活动家、捍卫俄国人民利益的斗士。不过，人的本性是迟早都会暴露的：前不久他出了一本小破书，里头利用各种资料，收集了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切“恶行”，讲述了某些士兵和军官在德国的不良行为，但却对希特勒暴徒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缄口不言。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次会议上，常有一个外表整洁相貌端正的年轻人参加辩论，他就是人民代表斯坦凯维奇。他跟他的同事索布恰克一样，自动宣布自己是新民主的“浪漫派”。斯坦凯维奇利用这一“高尚的形象”和莫斯科副市长的职位大肆中饱私囊。这位“民主浪漫派”有许多“本事”，比如同刑事犯罪组织有着动人的关系，贪贿成性，把前苏联部长帕托利切夫的住宅据为己有等等。所以并不奇怪，早在担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期间，执法机关就对他提出过收受贿赂的指控。只是代表们没有同意剥夺他的豁免权。不过，正如所知，这只馋猫也知道是偷吃了谁家的肉，于是这位“浪漫派”便在代表特权到期之前拿着外交护照偷偷地溜出了国。他先后在美国、德国混了一阵，最后又跑到波兰，国际刑警组织终于探听到他的踪迹。这时“自由派”媒体又是一阵叫嚣，说什么“黑暗势力”开始了对第一批民主浪漫派人士的迫害。

凡是掌过权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几乎都有这么一些内容可供谈说。能够经得起权力诱惑的人，说来惭愧，真是少之又少。而且他们那所谓“民主”信仰本身，也只不过是一层政治外壳而已。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所谓“专制”条件下，群众大会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一个理由就举行的，甚至哪怕跑到卢日尼基去举行也可以。可是

到了“民主政权”时期，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硬性限制和行政禁令，使用暴力，挑起护法机关工作人员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不久法庭对39名年轻人开庭审判，他们一个个铐着双手被带上法庭。他们受到指控，在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公众接待室组织骚乱，其中8人被判处监禁1年半至3年半不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当年“民主派”的行动规模和接待室骚乱之间的差别！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了。根据宪法规定，宣布大会开幕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卡扎科夫。迄至代表大会开幕日止，当选代表数为1059人，有9个席位空缺。卡扎科夫宣布，出席大会的有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总统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

围绕着代表大会日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们公开分裂成极端敌对的两个阵营：一部分以苏共为导向，另一部分则以有文化有知识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力量集团为归属。这一届代表大会还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成了一场马拉松。直到5月29日，在最少必须获得531票的情况下，叶利钦获得535票当选。4票，这仅仅是大会代表人数的大约0.5%，最终却决定了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命运！

有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政治局就讨论过多次。依我的看法，政治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推荐的都是一些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显然通不过的候选人——弗拉索夫、博罗兹科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同志都不错，可是代表大会不会支持他们。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个位置

让给叶利钦，他一点也不想掩盖要成为共和国当时最高政权机关首脑的意图，而这个共和国则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在发言中我说，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个全苏领导人到俄罗斯最高岗位上——雷日科夫也行，利加乔夫也行，或者别的哪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行。可是，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形成什么决议。

代表大会开幕后，立即出现了一个俄罗斯联邦主权的问题。讨论进行得很热烈，连续讨论了三天——1990年5月22日、23日、24日。现在，当我检视当时的讨论速记稿时，想要指出一点：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都是一些个别性质的问题或条文表述方式。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原则问题上对这一步骤提出过一次反对意见。正是这样一个步骤，成了苏联历史上致命的一步，因为正是它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土壤。参加讨论的有40个代表，后来又有一个编辑委员会工作了两周半。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的各色各样方案和无数修正案，其中还包括该共和国法律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方案，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提交讨论和表决。总表决是在6月12日举行的。同意宣言的票数为907，反对票为13，弃权为9票。共产党员们也都表现得政治上盲目短见，不能预见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当时做总结的已经是当选为主席的叶利钦：

“决议通过。”（暴风雨般经久不歇的掌声。响起了欢呼声：乌拉！乌拉！）

“祝贺全体人民代表和俄联邦各族人民。”（掌声）

就这样，俄国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破坏伟大国家的主要力量，而1990年6月12日这个被“民主派”宣布为伟大节日的日子，则成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日子。

俄国代表们又是出于什么想法才通过这项决议的呢？他们不可能

不知道，主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宣布自己独立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也就是说，它拒绝承担结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这一条，就注定了苏联要垮台。不错，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也好，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也好，本来就都是主权国家。而在实际上，它们都把自己的部分功能交给了将它们团结起来的中央政权。宣言炮制者用表面看来完全“高尚”的理由掩盖了真实用意，说是要保障俄罗斯公民“能够体面地生活，享受自由发展，并使用本民族语言”，仿佛这些原则在全苏宪法中不存在，国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不关心所有这些条件的实现似的。

政治就是这样，话说得很一般，但话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利益。利益是各种各样的，不过依我来看，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摆脱中央权力——其中既包括党，也包括国家——的“关照”。所有那些在精神上鼓舞了和行动上导演了这一事件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俄罗斯同全苏中央对立起来，把苏联“帝国”搞垮。刚刚成立了一个“新”党——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们，都害怕触犯主权思想，害怕失去情绪狂热但方向不明的选民的支持，他们可能不理解俄罗斯的独立，也没有采取反对独立的立场。此外，这个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实际上拥有“主权”地位，即使是为了不受到责难，不承担主动执行苏共中央决定和指示的恶名也好。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这几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还有记名投票结果的名册。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投了赞成票。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向其中有些人提问：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支持俄罗斯主权宣言？唯一的回答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它会让苏联垮台。

不过，要想使俄罗斯主权起到消灭苏联及其现行制度的作用，还得赋予这样一个思想以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它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得益于一个从正常逻辑来看有点像白痴的论点：俄罗斯法律高于全苏法律。换言之，“部分”被宣布高于“整体”。这意味着所有组织机构资源及其附属的物资资源、财经资源等，将统统脱离全国中央的管理，这

样一来，中央的存在实际上已毫无意义。请想想，在表决之前、表决当时和表决之后，这样一点难道还搞不明白吗？

1990年6月13日一大早，我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机场。当时她正在莫斯科访问，准备乘飞机到毁于地震的列宁纳堪（在亚美尼亚）参加英国帮助建设的一所学校的落成典礼。

一坐进汽车她就说：

“雷日科夫先生，昨天晚上我从你们的电视上看到，俄罗斯议会通过有关主权的法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邦法律。您了解情况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了解，”我这样回答。“‘主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俄罗斯拥有的权利实际上少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但若对主权再做其他补充，就无论如何也不对了，特别是共和国的法律高过全苏法律这一条。这将是统一国家瓦解的开始。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将无法起作用，而且，紧随俄罗斯之后，其他共和国立刻也会照此办理。”

这部法律通过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次谈话。就连她这个局外人也很清楚，对于一个统一国家来说，出现这种事情是不能容许的。她拿这个事件同自己国家做了比照，说了些我看是十分正确的想法。这里我想说一个小插曲，它更像一个政治笑话：三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当时她已经是政府首脑——又来到俄罗斯，为了加快改革，她所提出的建议不是别的，恰恰是……解散我们的议会。如果是我，比方说，跑到英国去——我俩的地位可是同样的，都是前首相——提出建议要立即解散他们的议会，有意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样，实际上直接统一国家的问题便画上了句号。我再说一遍，苏联的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瓦解伟大国家的罪魁祸首，俄罗斯的新领导在这里则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伟大的国家由伟

人所缔造，但却为卑劣的宵小所毁——这话真说得一点不错。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街上认出了我，看来是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为了让蒙在人们眼睛上、心灵上、思想上的那层纱帘最终能揭下去，让人们本能地听到和意识到提请他们注意的、向他们提出过警示的那些东西，还真得需要经过几个困难苦涩的年头。想当年向人们提出呼唤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遥远的过去。

在我多年来主要从事的国民经济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有过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少缺点。我曾不止一次说，近年来，在许多方面，经济都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起初，当改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那时经济的运行还是照原来的样子，遵循指令计划模式，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断花样翻新的思想，国内经济生活变得忽冷忽热。他常到全国各地去东走西走，到处许愿。今天加速发展，明天科技进步，后天又是农村问题，冶金行业、电子工业等等。

我们也曾试图让他放郑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问题堆成堆，经济势必受到损害。可是不行：“你们不明白，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确有期待，他们渴望国内发生严肃的、根本性的变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过经济这个东西是有惯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调整，就需要时间，不停地折腾它只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了三四年，老百姓对改革失望了，于是当局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事情办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经济模式当年曾解决过许多全球性

的、国家的和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过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挖光了。然而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解决它们却需要时间。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政府逐渐由主张进步的类型“蜕化”成了保守类型。

需要找出一种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不会引起激烈的震荡。经过好多个月的探讨和细致研究，我们这一届政府于1990年5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经济在必要的国家调控机制下向社会导向的市场关系过渡的纲领。我们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新经济模式。

其中两种，是作为参考信息制订出来的，指出它们可以存在，但却不是我们所推荐的，因为他们过于激进，为此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便提一句，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模式，过了半年却被叶利钦和盖达尔拿去作为武器，并于1992年1月开始搞他们的激进经济改革。至于后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犹然感受在身。

我们向议会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渐进式的，计划花费6年到8年时间向市场关系过渡。此外，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种决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在动摇对国家的治理。在弱势政权之下开展激进改革，照我看来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基本同意了我们的纲领，并委托政府在秋季全会之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日子里，我已经说过，为争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政府主席的位置，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有好几个候选人，而且其中的两位是出自我们的“队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罗宁和西拉耶夫。跟过去一样，充当风向标的是俄罗斯原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区布托夫斯基砖厂厂长波恰罗夫是个在选举中为支持叶利钦当选代表出过大力的人，这会儿远远地跑到了前头。不过他也似乎明白，一个

共和国的总理，说得不好听点，水平上总该比一个小砖厂的厂长要高一点才是，所以大家也并不急着让他尝到这个甜头。于是波恰罗夫给自己准备了一张重要的王牌——他宣称：他有一个自己的、在500天之内向市场过渡的纲领。



又站到了话筒旁……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年。（作者提供）

波恰罗夫提请代表大会裁决的这种“超级革命”的新发明我早就领教过。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尔金的小组就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制订过一份向社会导向的市场过渡的政府建议，与此同时我还研究过大量其他方案，要么是由一个单位或团体提出的，要么是由个别学者提出的。有两位年轻经济学家，一个叫扎多尔诺夫，一个叫米哈伊洛

夫，他们搞了一份供讨论用的纲要，标题就叫《400天》。目的是为这年3月将选出的国家总统提出一个激进行动计划。

有一天晚上，当对许多经济改革原则问题进行例行讨论之后，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份文件存在。我对此并没有给予注意，建议不要对一些枝节问题浪费精力。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份纲要落到了波恰罗夫手上。这个人又加进了他的“创造性贡献”：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个阶段上各增加了几天，然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独创方案端了出来。他还把事情做得更绝，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个西伯利亚的出版社印了出来。几乎是在同时，这份纲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两位经济学家，还有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过标题是《400天》。亚夫林斯基当时在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尔金院士。

总之，剽窃行为昭然若揭。亚夫林斯基甚至不得不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恰罗夫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的“500天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全苏纲要策划的……”

不过，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窃以及围在亚夫林斯基身边低声下气地奔走忙碌，并没有能帮得了波恰罗夫，最后他还是没能当上总理。亚夫林斯基后来反而在沙塔林院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现实的、纯属空想的经济理论，赢得了响亮的名声。正是在那次答记者问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经验的学者区隔开来：“至于说到拥护“500天纲要”的人当中将会有一些反对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像阿巴尔金、沙塔林、亚辛等，我看是一桩好事。”不过亚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亚辛看错了，他们选择了倒向速战速决的“500天纲要”，而沙塔林居然还同他分享了原创者的荣誉：这个纲要被称做“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当时已经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纲

要”而闻名遐迩的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访问。他从那边带回了一个苏联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要想完成艰苦异常的向市场的冲击，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而且提出了一个跟我们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过，报刊媒体就仿佛是听了统一指挥似的为这“500天”纲要猛吹不已，它们完全忘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提案，并委托政府再把提案补充一下，做一些修订。我对我国的这个“第四权力机构”可以说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个代人受过之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个“替罪羊”，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政策的所有错误都推到它头上。再说得清楚点，不是报刊媒体需要这么个替罪羊，而是戈尔巴乔夫需要，因为这个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对于我国科学界的总体而言，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进了许多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早已发现的、早已验证过的东西来为自己捞取学位和职称，甚至全靠这一手。搞阴谋诡计的本事得到的评价永远不会比发现新事物的本事来得低。我这一辈子当中，有许多年是跟生产一线和经济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学者有好几百，我很看重他们，他们是事业的推进者。如果说他们有许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现了不了了之的现象，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国悲剧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简直就把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全苏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它首先打击的是事业，是经济，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把经济推向市场原则的这份政府纲要的立场，而在5月份的总统办公会上，他也早已表示过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8月份却透露出来，原来在苏联和俄罗斯两位领导人之间背着我又达成了一项协议。

什么协议呢？8月3日播出的叶利钦电视访谈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次电视谈话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即国家总统早在当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可饶恕的妥协之路，并在后来导致国家毁灭。

现在我不加任何改动，一字不易地将这部分访谈内容引用如下：

问：……您曾经在我们的访谈中提起过，您打算建议中央接受俄罗斯的纲领。您还提到，无论中央是否接受这一纲领，您也还是会坚持俄罗斯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纲领。请告诉我，如果，比方说，中央不接受您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中央是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今天《消息报》上登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签订了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协定的东西，打算以俄罗斯的纲要为思想基础，建立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将以俄罗斯的纲要为基础，搞一个全苏的纲领。也就是说，不是政府搞的那个现在受到批评的全苏纲要。我想，要通过的当然不会是那个纲要，是吧？这将导致全苏政府退位，而纲要将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那个纲要，一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我跟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署这样一个文件的。那时候我也在这儿。（指叶利钦也在那儿休假。——作者）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然后就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个书面建议给他，指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建议按俄罗斯纲要来搞，要避免让我们再搞一套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因为如果苏联不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俄罗斯内部来实施这个纲要，我们将使用自己的货币单位。那我们将不得不走这一步。

好多媒体，特别是《消息报》，立刻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说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联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帝国的独裁中央”将淘汰出局，正在制订的纲要将成为联盟条约经济部分的核心，这一协议将促进各主权共和国的实际团结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变。我跟我的战友们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极端主义将毁

掉这个国家，改变社会制度。我们无法同意这一点。我们明白，就实质而言，这事不仅关系到是否能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

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

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

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经过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制订大家都可以接

受的决定的态度的分析，又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展咨询，直接开展同各共和国代表制订市场过渡纲要的工作，并召开有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苏联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述种种使我们明确，如果不订立一个全苏条约，如果我们对今后将在怎样的国家体制条件下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都只能是空话，都不能实现。不过，很难预期全苏条约能够得以在近期内订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可能拖得很长。

不过，我们却无法使国家的生活止步不前，使制订1991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停顿下来，我们不能停止执行已经通过的重大社会纲要，为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踩紧刹车，让新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从最初的实际步骤中再倒退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细致全面地研究局势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形势下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新的全苏条约签订之前，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先签订一份经济协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编制1991年计划的工作。这份协议应该包括经相互协商确定的企业计划组织原则，税收体制的实施，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接受的新价格政策，物质技术保障体制，企业、共和国和全苏外汇基金的构成，乃至其他许多原则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了这些原则问题，来年每一个共和国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才有可能存活。这就是政府主席团希望在这次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

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发言涉及的大致也是这些问题，只不过列举了更多的细节，更加具体。

这就是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我们对国家真实局势的看法。我们意识到在国家头上高悬着关乎生死的危险。我想，读者对于这种局势的深刻戏剧性会有所评价：明明看出国家正在被推向毁灭，而且也提出了挽救它的现实道路，但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对祖国命运反应迟钝的无动于衷，或者说就是对祖国的直接叛卖。

8月30日，根据我们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结果，在苏联最高苏维

埃会议厅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各部部长、人民代表和无数应邀出席者的会议。头一天接近深夜，总统办公厅完全出人意料地下发了一份18页的材料，要求会议审议。材料是由沙塔林小组准备的，是一个“500天”方案的压缩版之类的东西。那里头没有一句话讲到建议来年按什么原则生活。只讲了一些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最一般的意见，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作用和地位。

现在完全清楚了，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引导会议丢开具体问题不去解决，也根本不管几个月之后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想把各加盟共和国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在它们的支持下走向“全苏舞台”。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已经作古的沙塔林，当年是否曾考虑过自己采取的步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想，他只不过是更被更有经验的政客利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无论我们之间的私交多么好，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毁灭国家的过程中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会开了两天。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他们全是按照指挥棒行事，谈的根本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这18页东西跟政府建议对立起来。叶利钦是最先发言的人之一：

“雷日科夫的政府应该立刻辞职！”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福明也毫不掩饰对全苏政府的敌视。这个人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没有发现能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将来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计后果。经验丰富的总理马索尔已经无法让乌克兰的领导层满意了。

就连以谢尔巴科夫为首的官方工会也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往政府头上没有少泼脏水。有意思，现在，当物价像火箭似的往上飙涨，而老百姓，也就是工会会员们的贫苦日甚一日的时候，这个工会

领袖上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一声不吭了？

第二天的发言更加强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获得了聚集成团的机会。经济协议的问题被抛到了一边。很少有人再提起它。会议临了又把我弄到台上。这一回我没有准备什么提纲。斗争十分激烈。要求人们保持理智的呼吁简直像是对着荒原在呼喊。神经受到的刺激到了极限。我在台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对那些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政客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如果不是因为对人民负有责任，”最后我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天也不想多干。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这么做。”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带着副主席们离开了会议厅。大家都很有压抑，我是更不用说：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智得出共同结论：现在还不能走。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失败的问题。应该斗争。

1990年9月，代表们假期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恢复了工作。联盟院就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像5月里决定的那样，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纲要”也是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对前期讨论作总结时明确地说，正是这个纲要，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此表态。说心里话，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想到了自己辞职已不可避免，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了这个意思：

“如果通过的决定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那政府就无法执行它……只有当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会产生危害，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参与的。”

不过当时最高苏维埃和总统都还没有作出决定。中间休息之后，布尔布利斯代表——读者还记得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正是他推举叶利钦

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白宫”飞驰而来，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下午两点通过了“500天纲要”。“俄罗斯联邦已经作出了决定，”他骄傲地宣布，以此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好了，反正俄罗斯会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底下是一阵吵嚷，一阵喊叫，大厅里人们又跑去抢话筒。最后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说是会议“注意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认为审议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并“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又把卢基扬诺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些天克里姆林宫里也在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争论、斗争。我们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的立场。下面引用一段在这种同记者会见场合的速记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社会意识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卫自身立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为了制订新建议，我们邀请了科学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议考虑了议会的建议，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又对将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拟试验，对所有的优缺点都作了数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对向市场过渡的方案有两种考虑：一套是激进方案，不少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都主张这个方案；另一套则是温和方案，政府建议的正是后者。

头一套方案的模型（几乎是立即放开价格，实际上完全取消国家订货）表明，头几年生产规模、就业率、生活水平将会急剧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会出现下降，但会是一种比较平稳，比较和缓的下降。从总体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第一套方案要小。因而经济趋向健康的速度也会稍缓慢一些。

风雨大作的1990年秋天到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喋喋不休的辩论

令人生厌，要求“穷人政府”下台的群众大会不断举行，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下台（反对票1票，弃权票16票），媒体上的批评犹如狂风暴雨不断袭来。

在向我国政府发起总攻的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抗，首先是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变得越来越尖锐。全苏政权很快便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分歧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经济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的解体过程。我们陷入了一个罪恶的怪圈。但所有冲破怪圈的努力都遇到了疯狂的抵制。

离开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为什么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后才下台？为什么我没有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过之后，或者后来在那次令人感到无比沉痛的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下台？为什么当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当那些跟我并肩走过漫长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时，我还在忍耐？难道我没有自尊心？难道总理的交椅对我就那么宝贵？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责任感支撑着我。最高苏维埃11月全会过后，我就已经作出了辞职的决定。而将它宣布则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届大会开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过是使一切提前了一两个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页答记者问的记录，已经记不清是回答谁的问题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国报纸的提问。那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著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

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那些靠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过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会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调节因素，人们是否能经受住市场自发势力的打击。有人以此作为赌注，竟说政府无法摆脱保守思维。不对！政府为了有助于摆脱危机，愿意敞开大门。不过，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如果有人责难政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他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说得客气点，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认为政府的行动有损于社会的利益，那就请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好了。

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显然，我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要把事业进行到底，决不投降，不被困难所折服，要尽一切可能，哪怕最后是下台的下场。我也要说一句，就是在我向记者们宣告有可能辞职的那些日子里，部长会议收到了无数电报，要求我们不要屈服。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仅有我的同龄人，最使我感到高兴，并让人对光辉未来充满希望的，是还有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他们说：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废……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走。还是逼得我们非走不可。

12月初，应我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单独会见了。会见时我告诉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辞去国家政府首脑的职务。他听到之后表现得相当平静，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他跟我一样，对这次不太轻松的谈话早有准备。他请我谈谈关于接任者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想法。

会见临了，我对戈尔巴乔夫说：

“请记住我的话。现在，有人强迫您拿掉政府。这只是许多牺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然后是您自己。请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现在还有点时间……”

他从来就是不顺心的话不爱听，最善于对有些问题装聋作哑……

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做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战斗时保持了尊严，它并没有被打倒，依然怀着对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在1990年宣布主权独立的日子）宣布，将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国、各劳动集体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家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同意参选俄罗斯总统。同各地方各单位的代表会见，最后也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绝的权力，因为我有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过一场大病。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一辈子都会因为自己甚至没有打算参加战斗而责备自己。

那是一个对于全国来说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视着当天如暴风骤雨般发展着的事件的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和苏联各权力部门之间对立的高潮正在到来。如果叶利钦在大选中胜出，那么国家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另一个人胜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么灾难还有避免的可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国家将不会被破坏，局势将得到稳定。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由于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没有好感，由于叶利钦的反对活动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极度混乱，要想胜出也不那么容易。人民将会不知所措。许多人心存幻想，期待着当第501天到来的时候

能见到天堂，认为叶利钦才是祖国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们能听到我警示的声音。

我不想详述竞选活动中的一波三折。什么都有了：有诬蔑造谣，有脏水淋头，也有含血喷人。总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常常把我的名字同戈尔巴乔夫连在一起。我做了很大努力向人们解释，说实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早已分道扬镳，说 he 已背叛了改革的理想，背叛了那些曾跟他一同创业共事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进去。人们投票不仅是为了选叶利钦，而且还是为了反戈尔巴乔夫。而且，我的反对者在把我跟他“捆在一起”这件事上也没有少下工夫。

为了能对那个时代和当时出现的局势有一个概念，让我来引用一段《苏维埃俄罗斯报》在大选两星期前发表的访问记。我通过这份很有权威的出版物于国内旅行期间回答了该报记者别兰所提的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采访的标题《我建议走另外一条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他怎么敢把自己放到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将选举叶利钦。”“您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呢还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愿参选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当了5年的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我亲身体验了什么叫掌权。我尝够了掌权的滋味，知道掌权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但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危机四伏。我不相信叶利钦现在提出的这个纲领能使局面好转。情况将更为恶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局势发展。这就是我的原因……

现在再来谈谈向市场过渡的纲要问题。去年（1990）夏天，你们还记得，曾经有过两个纲要，一个是政府提出的，还有一个就是“500天”纲要。后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休克疗法”纲要。

我对这个纲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信，经济必须转上新轨道，而且我还最早提出：硬性计划分配系统潜力已经到头，再按老办法将无法继续前进，需要转向比较有弹性的经济关系形式了。但我们提出的模式是可控的市场，是逐步平稳过渡。当旧的东西倒下去的时候，当时就应该有新的东西建立起来，就应该仔细衡量，预测、而不是挥动板斧，速战速决。

我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种办法。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几个月之内就要过渡到新经济关系的做法，将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了向自由市场过渡，就应该建立相应的结构。如果非要像现在这样说：好了，从新的年度开始就废止国家订货了，你们就自谋出路吧，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眼下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但如果从新的一年开始干脆就不要调控，那大批企业将无法工作。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因为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还有一条：我赞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应该找到一种形式，让人真正成为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至于说到小企业，什么手工作坊、快餐店、商业店铺等等，那我们这里还可能出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那些本身就在小企业工作的人有优先权，让他们首先能够得到这些企业。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必通过交易市场、拍卖市场，因为在那种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赚大钱的人。

至于说到大型企业，可以有股份制，有集体所有制，比方说，每一个工作的集体成员都可分得生产资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润，这就叫全民企业。就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在农业中我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反对把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自由买卖。

（我要说明：我说的是“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当然不是指宅旁地，园田地和别墅用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在土地上劳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想当农庄主吗？请吧；想留在集体农庄吗？随便。我还主张

租赁的土地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不过是不是可以买卖呢？……

“对于那些不盈利的企业，您怎么看待它们的私有化问题？”“您是个保守派，您反对住房改革。那就是说，您想把我们拖回停滞时期。”

——我决不同意那些提出号召要在新年之前跟亏损企业“做个了断”和强行把它们私有化，也就是把它们拍卖的人。这样匆忙从事是非常危险的。

就拿煤炭工业来说，它欠了国家230亿卢布的债。可是如果我们土生土长的或者是外国的商人们把这些矿山买下来，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谁去为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着想呢？因此我理解，企业亏损的确是我们的不幸，这是我国经济脖子上的铅坠。但是要提出强制私有化的口号看来还早。今天，我们25%的农场都亏损，那怎么办，难道把集体化再做回去？也许，是否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经济重新站起来？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来谈谈住宅私有化的问题。一年前这个问题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上讨论过。有人建议建立住宅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住宅。为了加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人建议大幅提高房租，特别是对超过标准的面积。听起来似乎很动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不经深入研究和计算就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今天，比方说，我们苏联有6000万退休职工。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其中3000万人有超过标准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还有的更多。有的因为孩子走了，有的因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说要把这些老人从窝里赶出去？一个家可不仅仅是四堵墙。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品德问题。同时也是个物质问题：想一想，如果为超标的住宅他们要付所说的那种高价，那什么养老金也剩不下。

难道那些年轻人，那些困难家庭能买得起住宅吗？房子会跑到谁手里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个保守分子，过去是，现在还是。

“雷日科夫主张提高价格。”“辞职的时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议要提高价格。”

——是的，我们经常讲，价格组成问题上有落后的地方。应该调整价格，不过1988年就应该做。那时做损失会比现在小得多。

根据计算，1990年提高价格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600亿卢布，而且其中有许多产品完全需要补贴，儿童用品还几乎没有涉及。可是由于“手段不普及”，我受够了攻击，尽管需要控制价格的事是国内几乎所有领导人、所有主要经济学家都同意的。（这里我想先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从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们的建议为基数，叶利钦和盖达尔实际上把价格提高了两倍，许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这些价格就飞快地往上涨，从几百倍涨到几千倍，把千百万人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那些轰轰烈烈的声明呢？叶利钦不是说一旦涨价他就要卧轨吗？这些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而这一切给人民的打击是多么痛苦。）

“您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您跟他有分歧吗？”“如果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您会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吗？”“您干吗要辞职？”

——现在我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是顾问。

从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歧。你们可能还记得，改革当时进展很快，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阶

段。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也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立场。我觉得，原则性的意见还是有可能表达的，即使我在政治局处于少数。你们可能还记得那次反酒精饮料运动。对于建议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对的。

最近，特别是1988—1990年以来，我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些分歧，当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比如关于住房私有化的问题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过渡的纲要。政府纲要曾两次提交总统委员会审议。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评，然后又是补充，最后说：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吧。我知道批评会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不过，1988年的每一个文件不是都说，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务必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吗？我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老老实实都说了。让所有的火力都冲我来吧……

在立场问题上我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责的就是应该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提前一年说出来。改革已经不是原来1985年预想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说到我下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个星期我通知了戈尔巴乔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辞职。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把我们国家引向“休克疗法”，这将对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比方说，根据波兰的情况，我们对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错，现在那边柜台上倒是应有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以降低需求的这种方式来保证市场的丰足，是无须乎什么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做到：把价格一抬高，商店里不就什么都有了！但我赞成用别的办法：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买得起。

“你先把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又打算当俄罗斯总统。”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年来国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觉得，头三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战，又是罢工运动，又是条约关系遭到破坏……

是的，从总体来说，国家的发展并不十分如愿，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愿。不过，正如所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认识。一切都走着瞧吧，如果叶利钦胜出的话……

“您怎么看叶利钦？”

——我早就认识这个人，我跟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过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厂。

我不同意他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我也不理解他的行为和行动方式。他在苏共党内得到了提拔重用，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可后来却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来一直在党的纪律协助下宣传推广的一切，放到脚下践踏。这叫什么立场？他还掀起了一场反对中央的“战争”！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觉得有人跟他作对。

最后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我会为俄罗斯而斗争，捍卫它的利益。但同时我也要实行一条保全苏联的路线。

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说的。读者可以对我当时对叶利钦胜选后的预见性予以评说。有些东西我还是可能估计不足，但就总体而言我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还是实现了。在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我在6名候选人中赢得了第二的位置。对于未来总统的竞选班子而言，

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们的战略考虑：可不能给时间让老百姓多思考。于是，任务就这样解决了……

1991年的8月到来了。这个月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苏联垮台过程中的转折点。分析当时的事件可以得出结论：“暴乱分子”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在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政治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通过任何文件，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促。8月20日大约有2/3的中央委员在莫斯科，但书记处却拒绝召集中央全会。8月以后曾立案对党的许多地区领导人和某些书记处成员进行侦查，但统统因为这些组织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而宣告侦结。人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到这些事件中去，这说明他们相信，这只是小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

但胜利的一方立即向苏共发起了致命的打击。叶利钦的最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个条子：

“苏共中央内部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下达命令，立即停止苏共中央大楼内的行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他手上拥有执行苏联总统和总书记命令的力量。布尔布利斯”字条上有一条8月23日写的批语：“同意。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被叫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受到叶利钦难以名状的羞辱。这位昔日的党内战友对待他的态度，就像是训斥一个淘气的学生。就在全会进行期间，在顷刻间全都变成了反共先锋的代表们的一片哄闹声中，叶利钦签署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

电视和广播都对这幕闹剧进行了直播。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已不复存在，他只剩下了一具躯壳。他在这场对全国致命的赌博中大败亏输。六年前在进军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的改革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当天，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苏共中央应该通过一个艰难

的，但诚实的决议——自动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各自自行决定。”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认可了对党下达的禁令，卸下了总书记的权力，号召党中央自动解散。这样他就埋葬了党——这是他青年时代就加入的党，党指引他走过了一生，引领他登上了国家最高职位。而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

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开幕。受苏联总统及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委托，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一份特殊的《宣言》。其中建议制订一份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由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签署，立即建立经济同盟，以利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根据各加盟共和国代表权平等的原则，筹建人民代表苏维埃以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务委员会，吸收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参加。为了协调国民经济管理，协商推进经济改革有关事宜，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为了保存统一的武装力量，预计还要在国防领域缔结集体安全协议。宣言还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支持各加盟共和国要求联合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予以承认，并审议它们在这个组织中的会员国地位问题。

在这个时刻，代表们全都已经心知肚明，苏联的存在事实上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架构，之所以还被人提出来，是因为多少还希望能保存一点统一国家的基础。

我跟不少代表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就是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并非如那些堕落到只知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所言，是一届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却反而应该是一届战败者的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了，国家正在加速走下坡路，而代表们正以自己的活动从各方面推动这一进

程。大多数代表情绪都非常低沉，我甚至可以说他们非常压抑。看来我们好像是在出席一次集体葬礼。

在这一届非同寻常的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后来在别洛韦日拆散苏联的三个人之一）实际上就支持了经济联盟的思想，他提出建议：为了防止经济混乱，应立即成立跨加盟共和国的跨国组织、理事会或委员会，授予全权，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民生需求。不过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提起，正好在一年前，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台上，就号召过各加盟共和国签署这样一个1991年的经济协议，可是，如果读者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提议却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克拉夫丘克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领导尝到了他们自己在1991年前夕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破坏性苦果。

会上还响起了一些其他的清醒的意见，比方像南乌拉尔的奥尔洛夫就说：作为一名工业区的代表，他支持建立跨共和国机构，以调节跨国经济关系。他说：“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此项建议，那就要请某一个共和国承担起这种调节任务来。否则各共和国将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一定清楚。各共和国在最近的10—15年内是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

就总体而言，代表大会的气氛还是处于对社会命运的担忧之中。国家正在受到民族灾难日益加剧的威胁，但又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建议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我还记得，比方说，白俄罗斯的茹拉夫廖夫是这样说的：“从联盟条约草案所建议的框架来看，联盟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它将国非国，邦非邦……联盟条约草案中提出的所谓国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顿涅茨州代表萨乌宁警告说：“公民们为苏联的解体、未来对它

的瓜分、国境的设立、难民潮的涌现感到不安（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这些情况将伴随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制造新的民族冲突，甚至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我在准备这份材料的时候，再次仔细研究了该次代表大会的速记稿。我想提醒：超过80%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却只有一两个发言的人提到了苏共的问题。我想引用一段新西伯利亚工程建筑学院院长亚岑科说的话：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他的领导居然搞得个别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了暴乱……如果一个领导人对谁同你志同道合，谁支持你都既不了解也没有感觉，那还算个什么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您可是党的总书记，是它的“船长”，可是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逃离了“舰桥”，任凭党和普通党员听凭命运摆布。

苏联和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千方百计想让大家相信，《宣言》中的建议都是时代潮流，它们表达了国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

叶利钦在这次非常党代会上的发言是一个胜利者的发言，他被胜利陶醉了。他宣布，作为俄罗斯总统，他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究竟干得怎么样，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最为复杂。他还要想办法保全面子，为国家非常委员会、苏共和苏联的解体，为国内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出现而辩解。看得出来，对于苏联将要变成一个较为模糊不定因而也更为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一点，他是早就已经妥协了：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候，我要表示我最深刻的信念：我确信目前最中心、最首先要求立即明确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别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

问题，科学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也都无法解决。这一点我是确信的。全民公决时人们表达了保全苏联并予以彻底革新的意愿。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形式，就是主权国家联盟，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再思考。就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问题吧！”

响应他的都是些应声虫，例如西拉耶夫，后来当上了俄罗斯政府首脑。8月事件和他担当的新角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提出了不经审判和侦查就枪毙国家非常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这个政坛新手在发言中颇为得意地宣称：“是的，过去那个统一的苏联死亡了。我们应该对那些为了‘泱泱大国’向隅而泣的人说一句：想要让帝国的僵尸复活么？这不等于是给死人做热敷吗？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思想了！”

价值观的确是大不一样了……值钱的东西从老百姓和国家的口袋里放进了当代布尔乔亚私人的保险柜里。旧思想的确也被新思想排挤掉了，这新思想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金钱决定一切。



1994年初，雷日科夫拜访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圣彼得保罗大教堂的设计方案表示赞同。（作者提供）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总主教阿列克谢的发言真是发人深省。我真想把他的整篇发言都引用在这里，但由于篇幅的缘故，只能引用几段：

尊敬的兄弟姐妹们，人民代表们：我们这次非常代表大会的责任真是无比重大。我呼吁各位要深刻感受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当代同胞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先辈的责任，还是对那些并非在随意空想的沙滩上，并非在蛊惑煽动、贪恋权势、自私自利、嫉妒横生的基础上，而是在信仰、忠诚、充满牺牲的爱的基础上建造了共同家园的人们的责任。我们的同胞正在等待我们这些代表说话，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希望能在众生迷茫的心灵中唤起乐观情绪，唤起公正解决我国面临各种问题的希望。正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无数儿女用自己的功勋、生命、才华和能力，才造就了我们祖国的真正光荣。

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我们言行的评判。未来的基础是在过去奠定的。而过去，则是我们历史的共同。它是我们民族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否定的。如果对这些事物不屑一顾，如果想否定它，抛弃它，在面临混乱变革的今天，这就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无数因忘记历史而产生的悲惨事例，以及遗忘造成的悲惨后果。

我想用我国东正教精神领袖的这番教导来结束我对非常代表大会的叙述。它竟然成了为一个统一大国的覆灭而敲响的丧钟。而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大国，我们的祖先曾付出过数百年日复一日胼手胝足的劳作。

三个月后，这个大国就不复存在。虽然当代有许多伟人对此发出过警告。当我结束这一令人心情沉痛的章节时，我想援引我国一位同胞，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位俄罗斯大地上的爱国者——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段话。他的遗骸前不久才回到他的祖国俄罗斯。话是这样说的：

俄罗斯是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统一。谁要是想把它分开，谁就是个最可悲的人！……这种可悲之处在于这种盲目而荒谬的做法

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些后果将表现在经济上、战略上、国家体制上和民族精神上。而且，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连别的民族，也一定不会忘记统一的俄罗斯，将会在自己身上尝到蓄意肢解它的恶果的滋味。

1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译者

2 赫罗斯特拉特是古希腊的一个人，他为了在历史上留名，于公元前356年竟纵火焚烧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珍品——阿泰密斯神庙。——译者

第十二章 政权处于弥留时刻

2006年12月8日，是苏联在世界地图上停止存在的15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别洛韦日森林的影片，里面记录了三个领导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文件，破坏苏联的场面。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拒绝到场参加拍摄，但在《俄罗斯报》发表了一个长篇访谈。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被停止履行总统职务，全部国家权力移交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重新控制局势。此后，苏共被停止活动，联盟濒于解体。图为“8-19事件”当天，苏军坦克受命进驻红场。（新华社稿）

这篇《自白》，还是当年为自己行为辩解的那些老套子理由。

一个正常的、有思维能力的人，就不能看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所谓苏联解体不可避免，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和粗鄙无理的诽谤。对这15年里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也不想搞明白。

就让这本书对我们伟大国家的主要破坏者蓄意不言的许多问题作一个回答吧。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对着我们国家的躯体去杀，去砍，毫不顾及它是自己的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他们竟敢嘲弄自己的母亲，毫不在乎他们的罪孽将永生永世得不到宽恕。

苏联的解体无疑有着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苏联，消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抗衡的力量，而后者正在为独霸世界作出不择手段的努力。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回忆一下整个过程。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

前面有一章我已经谈到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改革国家政权的决议。正是这些决议，成为实际摧毁苏联

作为统一国家的运作机制的开端，对中央的攻击开始具有公开的性质。各加盟共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

国内出现了最后两三年间瓦解国家的力量一直想要达成的局面。不能说这一切都是突然间自发出现的。特别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职，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局势、是那种政治和经济改革路线的产物，而那条路线则最终选择了由时代所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我预见到国内局势发展的严重危害和悲惨后果，便于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离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一个经过痛苦的思考而作的发言，它已成为我的政治遗嘱。

由我领导的全苏政府清楚地见到国内出现的局势危害严重，我们的任务在于再次提出警示：灾难正日益临近。但给我的印象是，我这些话说了根本没人听。一部分代表收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频道”，而大多数则已经被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战精神吓得避让犹恐不及。

听众席上传来了呼喊声：“你干吗要吓唬我们？”“你要提高粮价！”等等。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我甚至要说是相当邪恶的、充满敌意的代表大会上，我最后的话是：“今天你们向我叫喊，因为我建议在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粮价提高几戈比，可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你们却不愿作任何的考量。”

在离开讲台之前我向听众扔过一句：

“你们还会想起这一届政府的！……”

当人们尝够了叶利钦“天堂般生活”的苦难之后，的确又不止一次

地回想起这次发言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国总统联名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国内发生颠覆国家活动而提出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国意愿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关系新体制的形成时期”——的出现。

通过了一项就当时局势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标准——《拒绝加入新联盟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全民公决，或由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还要求一条：同苏联就实施这一国家行为有关的所有各项问题举行谈判。

在苏联方面，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宣布为最高苏维埃，同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有很大差别。它由两院组成：共和国院和联盟院。共和国院由各加盟共和国选出苏联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构成。为了保证参加该院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每个共和国只有一票。联盟院按现有名额经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后由苏联人民代表组成。

我国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第五届特别代表大会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在各自国家领土上中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效力的权力。该法规具有明显的全联邦性质。

还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联盟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它由苏联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士构成。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

为了协调全国经济，协调开展经济改革，按均等原则成立了跨共

和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该委员会是苏联国民经济管理运作委员会的接续者，是根据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布的命令组建的。主席为西拉耶夫，副主席为沃利斯基，委员为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

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又得以恢复了过去冻结的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但这次的讨论有别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而苏联总统则被迫采取防御态势。正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中所说：“.....他开始让步，而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中，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打击。先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诺沃奥加廖沃会议上，气氛也跟暴乱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不敢跟苏联总统争论，而且有时候还责备我‘过于极端’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争相批驳戈尔巴乔夫，甚至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1991年11月25日，在诺沃奥加廖沃召开了新一轮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准备草签条约。但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穆塔利波夫由于不赞成而没有与会。

叶利钦的《总统手记》写道：“关于草签条约的声明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文本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这主要涉及如何把中央剩余的权力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苏联总统先是温和地说服，然后就开始生气、发火了。他说的那些根本不起作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顽固地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独立。不管戈尔巴乔夫来软的还是硬的，也不管他如何坚持，都无法使各加盟共和国尝到了自由甜头的领导人改变主意。当戈尔巴乔夫再次试图坚持自己的表述方式时，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似的立刻都起来反对他，他实在忍不住了，竟从桌旁跳了起来，径直跑出了会议厅。就在这个时候，会议厅里出现了短暂而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大家突然全明白了：这是我

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诺沃奥加廖沃史诗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不会有任何动作了。应该想出点什么新主意来才是。”

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一家俄罗斯报纸上是这样阐述当年的事件的：“在诺沃奥加廖沃，出现了联邦问题。我站起来说：在此之前，我跟你们一致；如果再往前走，走到反对联盟国家，那我就离开你们走人，由你们自己去决定想要个什么样的联盟，由你们自己负全部责任。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又跑来找我——来的是叶利钦和舒什凯维奇。这样，才出现了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方案，但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联盟国家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保存国家的保证。”

结果到了1991年的11月末，出现了一个更为和解的联盟条约草案稿——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在该方案中都被称为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民主国家，其权力仅限于该条约参加国自愿授予它的权力范围”。以下的文字就更荒谬了：主权国家联盟依然是国家，它拥有领土、国籍、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但主权的宣示仅为在国际关系场合。

在这份草案中，还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比如草案说，主权国家联盟不具有自己的财产，它的权力是各加盟共和国授予的，联盟机关的拨款程序要经由特别协商，等等。有的还完全违背了逻辑：拟议中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自己的根本大法……

现在很难想象，其实我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某些领导人当年十分清楚，他们在炮制条约的一个又一个方案时，早已心知肚明他们是在目标明确地为毁掉自己的国家而创造条件。这些只是掩盖他们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他们实在太希望在自己的共和国中成为握有全权的主宰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已事实上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们未来国家的内部。说来也巧，这种情况正好就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也就是在叶利钦说过“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好了！”之后。为了能使地方“吞食主权”的胃口消减，真是耗费了不少年月，好不容易才使得俄罗斯免了解体之危。时间已过了15年，可是至今仍然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出大笔大笔经费来给某些俄联邦的共和国，以求摆脱被他们“吞食”主权。

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能够同意走这条对于国家来说致命的妥协之路呢？现在他到处讲，他曾为一切形式的国家统一而斗争过。我想，这是他在耍滑头。他绝不是这么一个天真的政客，以为只要建立一个虚幻的联盟，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了。而且，具有类似政权结构形式和各共和国间相互关系形式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时我国的这位领导人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呢？是希望哪怕是名义上保留国家元首的地位？或者并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而是真的有什么政治动机和打算？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管什么动机，最终结果是国家政权垮掉了。各级政府领导一齐动手摧毁了国家，他们在争夺自己大位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局势极度动荡，国家已完全失控。

在这种局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3日向我国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同意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他写道：

这份文件是经过全面考虑和非常认真的分析，并有各主权共和国代表参加，进行长期谈判和认真修改后的产物。各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单独或共同讨论过这份文件。审议时也曾多次作出以扩大联邦特色和民主性为目的的彻底修改。

我的立场很明确。我主张新的联盟，即主权国家联盟——这将是一个联邦制的主权国家。我希望在你们作出决定之前，大家

都能很好地了解我的这个立场。不能再继续拖延了。丧失时间将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时间已经丧失了。当时，离别洛韦日森林会见只剩下了5天……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蒙之晨

1991年12月8日，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离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的一个基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维斯库利不远的地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决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字国（下称高层谈判方），”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样说，“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



1990年，雷日科夫同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巴尔金一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

（作者提供）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弥天大罪。那么，此前发生了什么？是谁干下了这件事？又是怎么干的？

为了备足炸毁苏联的爆炸物，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跟恐怖分子一样，早就开始做工作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叶利钦。他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这种恨很快又演变为对整个苏联中央的仇恨。因为，要想解除他心头之恨，只有扳倒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也就一定要搞垮国家本身。从叶利钦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品来

讲，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手软的。以叶利钦为首的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在1990年的9—10月间提交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件事能发生在苏联被消灭之前的一年多，当然绝非偶然。

提起这件事，我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同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以及我原来的副手西拉耶夫正式会见的情景。后来，生活把这次会见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仅分散到不同的方向，而且送进了彼此敌对的阵营。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下午约好要同俄罗斯的领导人见面，先是跟叶利钦单独谈话，然后再有其他人参加。当时从戈尔巴乔夫电话中感觉这种会见的组织方式，是一种为两个独立国家领导人接触作准备的外交程序。我不反对这样的会见，因为我觉得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想方设法同这些活动家找到共同语言。我还存有一线希望：他们总不至于为了个人政治目的而毁掉国家统一的经济，置必然会出现的最严重后果于不顾吧……

会见预定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厦三楼国家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还有政治局会议室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几个房间，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装修的。

5点钟时我上到三楼。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和布尔布利斯已经在总统接待室里等着了。我跟布尔布利斯其实并不熟悉。我只知道他也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是叶利钦特别信任的人物。我曾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见过这个人。这一回是我头一次直接同他发生冲突，在我的眼中，他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简直是致命的。总会有一天，会出来一个好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他一定会给这个人画一幅肖像。现在，在我的面前站着的，不，准确地说是不停地旋转着的这个人，两只眼睛也在骨碌骨碌地翻动着。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会在接待室里，在接受邀请参加会见的人员中并没有他。

总统的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经过一夏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代的公务办公室里的传统家具被撤下去了，换了很时髦的新家具。墙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苏联合国徽，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插着国旗。在一张单独摆放在一旁的更适合于喝茶用的桌子旁，一边坐着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另一边坐着戈尔巴乔夫和我。卢基扬诺夫由于有急事，没有出席。

戈尔巴乔夫向进来的人通报了他同叶利钦一同讨论如何保持国家完整、推进中央改革、自治共和国分裂行动带给俄罗斯的危险、加盟共和国如何参与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经济问题的情况。这一系列问题我是按习惯在记事本中记录下来的。

这次会议的气氛我也忘不了。与会者在解决国家任务方面的思想步调并不一致，他们是一些无论观点还是目标都无法取得一致的人。叶利钦说话的调门提得很高，满是一副胜利者同战败者谈话的派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手势、表情和行为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并没有想要利用这次会见，来寻求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同中央之间的共同语言的意思，而只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中央。哈斯布拉托夫的立场比较中立，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自己的领袖提出的要求有多么荒谬。西拉耶夫则以谄媚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新老板，只要老板说什么，就同意什么。

讨论从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和税率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坚持所谓的单渠道制，即全部税入都由各加盟共和国征收，然后再把一小部分上缴中央，以满足全苏财政需要。至于究竟是些什么需要，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先提前说一句，后来，过了不长时间，俄罗斯下面的那些共和国也学着把这个对任何联邦都起破坏作用的原则拿过来当武器。叶利钦那伙人对此表示反对的时候，那可真是义愤填膺哪！可是在当时，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则是毁掉苏联。至于今后俄罗斯联邦该怎么办，他们还真的不太介意。

我提出理由说，在现存的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下，这样的财政关系根本不现实，而且还会引发国家管理中的混乱，所以不应被采纳。

后来就更有意思了。提出要把所有外经活动收入全部留在各加盟共和国，而且还要由中央划拨50吨黄金交给俄罗斯支配，授予俄罗斯颁发出口原材料及其他产品许可证的权力，等等。对于像是否应该由中央统一为各加盟共和国采购食品、粮食、某些原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由谁来偿付到期的外债等问题，则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求这些问题应该在签署新的联盟协议并重新界定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功能时加以审议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

我提出建议，要停止各银行之间的斗争，停止破坏国家的统一金融系统。但回答完全停留在口号水平：说什么俄罗斯已经宣布是主权国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它的新地位完全一致，等等。

又讨论了几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最后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成立了一个由苏联和俄罗斯部长会议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分割财产，组织税务和银行系统，从事外经活动。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十分沉重的印象。在决定来年即1991年国家生活的许多主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原则分歧。显然，我们的谈判对手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引爆苏联，引发人民对中央政权的更大不满，并通过这个浪潮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越来越尖锐。国家灾难性地飞速成为一个虚幻的、不稳定的存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也希望能稍稍稳定一下局面，但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公然怠工，施加直接影响瓦解了这些努力。几乎整个1991年都在这种状况下度过。

最后，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

夫、舒什凯维奇在1991年12月9日会见，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决定同希望加入联盟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签约的日期和顺序。

根据我的看法，这个关于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用列宁评价另一个条约——布勒斯特条约——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卑鄙下流”之作。而签约的“威胁”则是最后为彻底解决苏联垮台问题扣动扳机。起初看来一切还相当像模像样。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政府首脑凯比奇的建议下，邀请俄罗斯总统正式访问该共和国（同时还非正式地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打猎），目的是要说服叶利钦供给明斯克更多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因为冬天快到了。

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叶利钦临行之前，同后者有过一次谈话：

……我问叶利钦，到白俄罗斯打算谈什么？他回答说：“我跟白俄罗斯有些共同的问题。我想解决一下。顺便再跟乌克兰人谈谈。克拉夫丘克不愿意到这边来，我却同意到那边去。”

我提醒他：“我们不是星期一要见面吗？把克拉夫丘克请过来就是了。”他回答说：“想跟白俄罗斯人谈谈，听听克拉夫丘克说什么。”于是我说：“那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先说好，到白俄罗斯您谈的东西可不能超越联盟条约的范围。”叶利钦回答说：“克拉夫丘克可不一定会同意这个条约，他现在可是独立的。”“那您可以建议他成为一个非正式成员，”我这样说。“那他也不一定同意。”“那就让我们星期一在莫斯科决定一切好了，”我最后说。

当时的谈话就是充满了这种信任的气氛，就连叶利钦也没有拒绝。

应该指出，当时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克拉夫丘克。我们伟大国家的命运正是系于此人之身。几个月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说，乌克兰将签署联盟条约，那叶利钦也会签。”不

过在维斯库利，民族主义的气焰和虚荣的狂妄自大，以及以“独立”乌克兰首位总统载入史册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破坏的意图方面一拍即合，对苏联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别洛韦日森林的会见在严守秘密中进行，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后来才公之于世。

飞机载着一群苏联的破坏分子于12月7日17时40分向明斯克飞去。到达维斯库利时已经是晚上了。克拉夫丘克已先期抵达，不等叶利钦到，就带着随从打猎去了。叶利钦到达后，举行了一次小宴。三位领导被别洛韦日的酒精搞得酒酣耳热之余，联袂出猎。然后，阴谋家们向下属交代了任务：要在一夜之间“搞出”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政治文件来。

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我，可以说目睹了这些年代有意识消灭我国经济的事实。这帮家伙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迫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求达到唆使人民起来对中央造反的目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搞得越糟越好。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家伙才能为自己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梦寐以求的政权。从这三个国贼的声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各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和领导人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并没有参加任何破坏活动。而他们所宣称的共和国法律凌驾于全苏法律之上的说法，禁止把货物运出各加盟共和国的禁令，以及对物价进行的分别调整等等，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其实，正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分裂主义的决定，才把统一的经济空间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加盟共和国，对比方说讲俄语的人口权利，就根本未予顾及。国家的外债问题也被忽略了，当时的外债大约有700亿美元。叶利钦把这么个沉重的包袱加到了元气大伤的俄罗斯一个国家肩上，尽管借来的债款在使用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沾了光。再说，关于克里米亚问题，若是对之视而不见，那要么是醉生梦死，要

么就是脑子里缺了根弦。

听听克拉夫丘克在苏联垮台8年之后，为了在别洛韦日“替乌克兰捍卫了克里米亚”而获得奖励时都说了些什么吧。他说，坚持把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手中“并不难，因为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把戈尔巴乔夫整垮，何止克里米亚，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都拱手交出来”。现在清楚了，当乌克兰代表团起程去别洛韦日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俄国人是打算把塞瓦斯托波尔留在自己的版图内了。他们甚至都打算同意让克里米亚划归俄国了。不过，当叶利钦竟连提都没有提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这两个字眼时，你说他们该有多惊讶！至于这个问题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会有多尖锐，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总之，在一个历经无数世纪而构成的国家，及其由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形成的特点趋于毁灭时，出现的问题真是无可胜数。

这样，国家的覆灭终成事实。

别洛韦日事件4天之后，1991年12月12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文件合法性的角度，对三国元首解散苏联的声明作出了反应。指出，根据1922年的联盟条约，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都只是苏联创立国中的一分子，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权力。从那时起，在苏联宪法中，一直是各加盟共和国权力一律平等的原则在起作用。因此，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三国没有权力决定涉及所有加盟苏联的共和国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更何况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乃是绝对多数。委员会作出结论：这样的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委员会强调，别洛韦日协议所通过的条款可能导致法律遭到破坏，社会无法管理，产生无政府主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种文件只能看成是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估，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无论是这些理由，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此发出的多次声

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破坏统一国家的进程仍在继续发展，不久就“胜利”完成。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还不足以合法地把消灭苏联及其所有相应政治法理后果的事实确定下来。首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国家权力中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未经批准这些文件就不具有政治效力。在忙乱之中协议的炮制者和签字人甚至没有觉察有必要提交批准，也没有搞明白这批准程序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一切都要取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审议应该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是作为苏联三个缔约主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条约来审议呢，还是作为已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同联盟主体为另一方，其中当时还包括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或者是作为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来审议呢？

乌克兰领导人首先发难，要求批准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10日，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把批准协议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大早开始，这个问题便一个一个小时地向后推迟，因为各委员会的常任代表都就文本提出了大量意见。这些问题必须要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商议才行。直到议会的晚间会议上，克拉夫丘克才得以把问题都协调清楚。

他的发言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责难中央使国家解体，以达到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目的。“有人想要教训我们，”克拉夫丘克说，“以为对我们民族的关怀胜过我们自己。”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未经讨论就在228票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协议，但有所保留。保留的地方有12条，对文件的许多条款都提出了修正。例如，“开放边境”一条就遭到异议，并决定放到以后再说。别洛韦日协议（也叫明斯克协议）被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协调活动”，而在基辅公布的文本则被看成只是“对外政策领域的一次咨询活动”。在有关武装力量的表述中出现了重要补充。乌克兰议会加上的词句

是：“独联体各成员国对驻扎在它们领土上的原苏联武装力量各部进行改造，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共同合作，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这样一来，话题就转到了武装力量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上。克拉夫丘克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区和黑海舰队，留给中央的仅仅是一些直辖的战略武装力量。

白俄罗斯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方面从法律地位上来讲稍微有些复杂。问题在于它同乌克兰不同，没有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样从法律角度来讲共和国的地位就远不是那么无懈可击。12月10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会。在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简短地介绍了3国首脑在别洛韦日森林工作的结果之后，议会里的“左派”和“右派”突然都对是否应该批准独联体协议表示怀疑，当然原因多种多样。左派害怕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以他们的意见准会把独联体又引向原来的那种一元化的国家。而右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独联体将意味着苏联的彻底垮台，将会引起国内极度混乱。有些代表则认定舒什凯维奇签署文件是越权行为。不过，尽管起初的问题只不过是应不应该同意成立独联体，但许多代表还是要求立即批准明斯克协议。这个立场在263名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反对的只有1票，弃权的2票。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发表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通过了与此相关的程序处理法案。

俄罗斯联邦在批准协议的问题上处于最复杂的法律地位。它的当局并不具备任何基础从立法层面上来批准由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在维斯库利签署的这份文件。唯一的一个拥有权力就协议和废除联盟条约作出合法决定的机构，就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构。而且，为此还必须通过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但这种方案对于想消灭苏联的一方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在具有专业素养人士中并不占有大

多数。因此他们把别洛韦日协议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提了出来，这样，根据宪法，废除它就属于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范围了。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把1922年的联盟条约也提了出来，并达到了宣布废除它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1991年12月1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

当天叶利钦作了个报告。他把白俄罗斯谈判说成是“近期来不断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早在两年前他就说过，显然，“联盟制度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更新。相反，指挥系统把自己最后一点活力都投向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以致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对草拟的联盟条约各稿都不断地挑鼻子挑眼。“在这些方案里，”他总是这样说，“搞出来的模式其实还是那种强势中央联盟。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装饰品……只有4月在诺沃奥加廖沃才终于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各共和国才同意达成一致，签署联盟条约……8月以后，苏联解体进入最后阶段，开始了它的弥留期……这个阶段我们简直是陷入了无尽无休的谈判和协商、大大小小的讨论、交换意见……所有这一切似乎具有了一种恶劣的规律的性质……苏联的3个创始国制止了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解体过程……找到了一种在新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谁在其中也无法独立的国家。”

叶利钦批评一种说法，就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消灭了苏联”。他说：“苏联对自己过去的成员已经无法起到任何正面作用了。国际社会都认为他是个破产者……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保证千百年来形成的，而现在已几乎完全丧失殆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保全……达至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联盟中央——走向了终结，因为它没有能力从过去制度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把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在手中，就是束缚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

在大会上很少能听见批评协议的声音。会场笼罩在一种似乎已经

拥有了无限主权的喜悦之中。批准明斯克协议的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同意188票，反对6票，弃权为7票。当投票结果宣布后，大会速记稿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这次颠覆国家的行动以及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破坏行动就这样得到了“合法化”。

当然，对叶利钦的发言完全可以进行逐条批驳，但是，生活本身对他的言论，更主要的是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他的同案犯和帮凶们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最好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苏联被消灭后，各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混乱。千百万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罪行，为自己政治上的盲从和轻信，付出了而且现在仍在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1996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一次例会的议事日程上，出现了审议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提案。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的是俄联邦共产党，以及“人民政权党”和“农业党”这两个党的议会党团。

在讨论议事日程的时候，正如所料，几年前支持叶利钦及其破坏行动的那些人都起来反对审议这个问题。其中有“亚布卢”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有亲政府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领导人别洛夫、斯塔罗沃伊托夫和尤申科。而且，投票赞成把这个问题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的代表居然还占到代表总数的57%。

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决议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过，赞成票为252票，占国家杜马代表总人数的56%。请记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了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混进政权机构的祖国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叶利钦为首的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执行我国议会的这一决定的。

议会为废除别洛韦日协议而斗争的历史，把我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

次帶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说发生了国家非常委员会事件，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闭幕之后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完全被破坏，正如前面所说，出现了政权的瘫痪的话，那么到了12月，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期。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局面时，不由自主寻找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总统，在别洛韦日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采取战斗的原则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完整统一而战斗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下面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这时我就给沙波什尼科夫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跟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看来，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了。于是舒什凯维奇给我打电话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是代表大家给你打电话。”我就问：“那为什么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打的。叶利钦跟布什通过话了：向布什汇报了，又让我给您打电话。”我说：“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却绕过了苏联总统，背着我去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儿？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编……

而且我要指出，他们头一个就给美国总统打电话，这不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报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总统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在接获这样的情报之后，他应该立即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据苏联最高苏维埃原主席卢基扬诺夫说，别洛韦日会上的参加者——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将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关乎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关乎3亿人民命运的问题，关乎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把情况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通报，并声讨别洛韦日协议。在代表大会面前，他应该以最断然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决定，是我们自行解散，还是保存苏联。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坏殆尽，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国际法，用有的人的话说，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老百姓的法。

作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过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一国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失败了，在历史上他依然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的完整而斗争到底的领导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现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发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新闻发布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好听点，很平静。他甚至在别洛韦日协议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苏联的这位国家元首也能料到，这份协议对我国人民和整个国

际社会利益的触动会有多么深，这就要求对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评估。

“我深深地确信，在现在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必须既对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也对明斯克签订的协议进行讨论。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体制形式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所以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在末尾又说，“我也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忘记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亲手埋葬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务权力机构，并把这一权力转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上。苏联人民代表由于并不是最高苏维埃成员，只是有权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而已。

尽管如此，许多人民代表还是无法接受国家遭到毁灭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了为召开第六届苏联人民代表特别会议征集签名的活动。我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人民代表斯马林打了个电话。斯马林当我们的面告诉国家总统，已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可以召开大会。然后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签名册，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总数超过500人的签名和来电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并得到总统亲口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消息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意图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这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原来的机关报，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从总体上它们都采取了公开亲叶利钦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作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

决定，这一点我不清楚。很难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许是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是想加入到新的权力结构中去，也许就是很简单的胆怯，也许是想要把自己的叛卖进行到逻辑的终结……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的建议下召开的。

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创始国”。从阿什哈巴德声明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并不认为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必须协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而且“应该保证原苏联各主体国在制定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组成独联体的国家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创始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创建独联体的问题“应该提交到各主权国首脑会议上予以审议”。也就是说，别洛韦日谈判的结果只是被看成未来由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展开创建独联体步骤的一个平台。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召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总统参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了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议（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余全参加了）。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联邦的建议。不过一提起这一点，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抵制。他声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决不参加任何联邦联盟之类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组织。看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声明中才写进了一条，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为各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不断带来巨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头一次的3国领导人在内，大家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件，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有关苏联前途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准确了：“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的事实。各独立国家首脑在信中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值得肯定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什么希望。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他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夜幕笼罩大地

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刺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

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在俄罗斯，整个这段时期的局势都显得异常复杂，难以逆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则尤为艰难。于是，在1998年经国家杜马的一群代表动议，共218名代表，其中也包括笔者，提议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弹劾），准备把他赶下台。

提出这一指控的法律根据就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其中说，国家总统可以由联邦委员会免去职务，不过一定要在国家杜马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基础上。¹

国家杜马为了审查叶利钦的这些罪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形成了五点指控：

第一：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制定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最终消灭了苏联，犯下了叛国罪；

第二：1993年9—10月期间，叶利钦总统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了颠覆国家的活动，违犯了俄联邦的刑法条款；

第三：1994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颁布了2137号命令——《关于在车臣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恢复行使宪法和法制的办法》，下令在车臣共和国开始军事行动，犯下罪行；

第四：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叶利钦总统在履行职务期间给俄联邦国防力量和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叶利钦及其同谋的政策基础是“改革”，它将俄罗斯引入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使国家安全丧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居民人口萎缩。

大批代表和专家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听取了许多官员的证词。

委员会的会议在十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不仅充分听取了弹劾方的意见，而且还听取了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委员会已掌握了完全客观阐明国内局势的与苏联解体相关的以及解体以后的基础资料。

因此，在国家杜马的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以所获得的材料为根据。

我也要利用它们，以求足够翔实地把我国当代历史上这一并非不重要的事件作一个具体叙述。² 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实际材料和对国内局势的分析都是锁定在1998年，我决不把它们说成是今天的事情，也决不把它们套到今天头上，因为它们就像是在给叶利钦的统治作一个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照我看，它们还真具有不小的历史价值。

无疑，所有这五条指控都是对破坏国家罪的直接指控。

好了，前面已经说过，在订立别洛韦日协议以及协议订立后的那段日子里，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家都出来维护叶利钦。他们总是在说叶利钦和别洛韦日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并没有去毁灭苏联，他们只不过记录了它的瓦解，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既然批准了协议，那自然也就完全洗清了叶利钦身上的一切罪过。可是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则根据这一指控内容的原则条款，非常明确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雷日科夫在国家杜马。前排为涅斯捷连科、戈沃鲁欣。（穆萨艾利扬摄）

第一点：认为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这一点是完全违法的。这个条约先是由6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联邦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签署，后来又有9个共和国加入，这样就组成了苏联。而且，条约的基本条款又成为苏联1924年宪法的一部分。后来，它的基本条款实际上完整地写进了苏联1936和1937年的宪法和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比如俄罗斯联邦1925、1937和1977年的宪法）。

1922年的联盟条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宪法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有废除一说，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创始性质的文件。它不是什么国际条约，而是创始性质的条约。创建的是一个新国家。条约中以及后来的宪法中保留了每一个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权力。退出的程序在1990年4月3日的苏联法律中有规定。只有履行了与这个法律相一致的全部程序之后，某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才能最终由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第二点：别洛韦日协议炮制者们犯下的罪行（我看是最大的重罪）实际上是取消全苏全民公决结果的罪。我要指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就是否应该保存革新后的苏联的问题在全国举行全民公决。在1亿8560万有投票权的苏联公民中，实际参加投票人数为1亿4850万，占80%。其中有1亿1350万或76.4%的人投票赞成保留苏联。根据全民公决法，这个决定在整个苏联版图上具有强制力，要取消它只有再举行全民公决。法律责成所有国家机关、团体和所有官员都责无旁贷地要履行这一决定。

第三点：叶利钦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同时，也破坏了俄联邦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当时有效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宪法，苏维埃俄罗斯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全苏联的公民。有70%以上的俄联邦公民于3月17日再次表示，愿意做苏联公民。别洛韦日协议却破坏了个人法律地位的最主要基础之一——国籍制度。2500万在自己土地上的俄罗斯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外国人。

15年过去了，可是国籍问题、难民问题、如何在新居留地安置他们的问题依然还是那么尖锐。由于统一国家解体，各主权国家推行了一种剥夺俄罗斯人公民权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他们被迫又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来侨居。

由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迁来的移民，在过去10年中的头5年，每年就达到100多万，而在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为38万。对于每个移民来说，这样的迁移其实就是生活中一次根本性的大变故，会带来无数异常复杂的问题，说得好听点，这些都是巨大的困难。

不过在那酒气熏天的别洛韦日之夜，签署文件的那帮家伙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一定要达到主要目标——瓦解统一国家，夺取梦寐以求的权力。

叶利钦和他的同案犯做到了许多国家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想做的事：瓦解、消灭我们的国家。至于谁能够从中渔利，这一点不难猜测。例如，1991年12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自己的声明中强调：“美国欢迎和支持新的独联体国家所作出的倾向于自由的历史性选择……这些事件虽有可能造成不稳定和混乱，但它们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

早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前，叶利钦身边的人就在大洋彼岸朋友们的授意下，制定出肢解苏联的计划。这些人经过长期工作，影响了叶利钦政策的形成，这些无疑对1991年12月8日通过的决定都产生了影响。例如，由波波夫提出，并经“民主俄罗斯党”同意的计划，包含以下内容：把俄罗斯联邦分成7个部分，把乌克兰分成3部分，总之，在苏联留下的废墟上，要建立起17个主权国家。这个哈里托诺夫竟超过了希特勒和罗森伯格，这两个家伙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制定的计划，“总共”也只不过想要在我们国家成立10个辖下的帝国领地而已。

还有一个计划则是涉及当前的俄罗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建议把俄国分解成8个独立国家。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他们将有可能在哪个国家生活，我把它们连同首都全部引在下面：

俄罗斯共和国（莫斯科）；

西北共和国（圣彼得堡）；

伏尔加共和国（萨拉托夫）；

哥萨克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

乌拉尔共和国（叶卡捷琳堡）；

西西伯利亚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萨哈民主共和国（雅库茨克）；

远东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

恶劣的榜样具有感染性，特别是当境外那些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朋友”们喜欢这样做，而且现在也想这样做的时候。每天媒体上都会出现一些材料，提出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学“科学”论证和号召：“俄罗斯干吗需要高加索呢？”“我们的男孩干吗要为高加索送命呢？”等等。根据叶利钦犯罪活动的某些同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类似人物的意见，俄罗斯由于拥有无边无垠的广袤土地，是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所以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就应该分解成无数独立的“公国”。那些“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活动家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也不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希望把科利半岛北部的俄罗斯领土奉送给芬兰。我们这些家生家养的“爱国者”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有一天条件成熟，允许俄罗斯把千岛群岛转让给日本，然后，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还要把加里宁格勒交给德国。他们思考的方式大致是：既然叶利钦把克里米亚连同塞瓦斯托波尔送给了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把俄国领土连同纳尔瓦送给了爱沙尼亚，那么……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又会怎么办？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假如小布什把阿拉斯加归还了俄罗斯，而在良心发现的时候又把得克萨斯还给了那片土地的旧主墨西哥，或者干脆把美国拆开，让大家散伙，让每个州都成为主权国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或者，比方说，法国总统突然决定要满足民族极端分子的要求，把主权交付给诺曼底，而大不列颠的首相则向阿根廷道歉，并归还马尔维纳斯群岛，最后又宣布爱尔兰独立。或者加拿大、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争先恐后宣布魁北克和巴斯克人的居住地独立。那他们会闹个什么结果？于是，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有在西方具有健康思维的人绝不允许的事，从这帮俄国帮闲的立场来看，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就是他们“爱国主义”的真正价值。

1991年12月，叶利钦完成了针对苏联的重大叛国行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现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再重复一遍，情况都是1998年发生的。

在经济方面。

起初，叶利钦的战友们所提出的、他们翻来覆去重复的目标和任务，在人民的眼里看来都相当高尚：原打算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然而——现在这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宣布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人们的生存条件反倒是恶化了好几倍。为了破坏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被迫日日夜夜为了基本生存条件而挣扎。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它占有地球上10%的领土，但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2.4%。它拥有极为丰富极为多样化的原料储量，巨大的智力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就其居民的生存条件而言，它具有跻身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生活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且还在越变越深。

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俄国同美国相比，或者同离得比较近的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许多国情指标都灾难性地恶化了。比方说，1998年俄国国家预算开支按居民人均计算要比美国少34倍，比芬兰少43倍。

俄国在30年代曾经是欧洲的第二大强国，到了20世纪中叶，他同美国一道并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现在却跌进了工业发展边缘化

的低谷。改革期间全国工业总产量缩小了一半以上。有些经济领域出现了雪崩式的灾难性的生产下滑。机械制造业产品产量缩小了60%多。轻工和纺织工业的生产下滑了80%多。许多部门企业的产品产量缩小了5倍。个别企业，其中包括那些构成城市骨干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它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则丧失了生存的手段。

有些经济部门整个地被消灭了，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建筑机械生产、农机生产、电子工业和工具制造行业，还有许多国防工业联合体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俄罗斯又怎能谈得上对西方的独立呢？

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这段时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我在这里还没有谈到学校、医疗机构、俱乐部、图书馆、少先队活动基地、幼儿园……这些后面我还要详谈），简直就是一场反工业化运动。说明这种情况的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指标：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代生产容量已变得非常小，大多数经济行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技术领域中的储备能力已经变得无可挽回地老化，而它们的损耗也达到了60%—80%的程度。

俄罗斯的出口以燃料和原料为主的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出口了国内铝业生产的78%，镍产量的82%，铜产量的71%，无机肥的78%，天然气的30%，石油的40%，大量稀土元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没有探明一处甚至是中等规模的矿藏。地质工作陷于低谷，完全被摧毁了。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存底过日子。

仅在不远的过去苏联还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国家之一，具有较大的科技潜力。20世纪1/3的重大科技发现都是原苏联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今天，我们国家迅速地衰退成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它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1%。这样就使得过去在科技发展方面所占优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国内有80%以上的新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

用。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被迫改行。国家在丧失科技潜力的同时也失去未来，失去了为自己的人民建设应有生活的条件。俄罗斯对科学的拨款日趋萎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且，这点儿可怜的钱也到不了科学家的手上。

农业也遭到了重创。农业各部门的总产量下降了35%还多。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肉类生产也下降了一半，奶类30%以上。大牲畜、羊只和家禽的饲养量缩减了两倍或两倍以上。为了让它们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恐怕需要许多年才成。俄罗斯的耕地缩小了2000多万公顷，恢复起来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给人的印象是，为了讨好西方生产者，正在对我国农业进行有目的的破坏。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实践表明，30%的食品进口就已经公认是进入危机状态了，然后就要出现对供应国产生战略依赖的情况。俄罗斯本来一直都可以供应自己高质量的而且便宜的食品，现在却要采购几乎45%的食品以供消费，而且最大的几个城市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竟然达到了70%—80%。

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这个数字波动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大约为具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10。实际上如果说到精确数字，1998年的失业人口要超过25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得到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不是经常。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为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俄罗斯推行了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结果1998年在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庭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根据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的看法，价格的自由化，公民收入和储

蓄的严重缩水，完全都是总统和政府的蓄意所为，其目的非常明确。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小撮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绝大多数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达到暴富的目的。俄罗斯人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几乎250万亿卢布（按旧币值）的存款，而这些钱是构成他们生计的来源之一，是全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保命钱”。困境来临了，可是千百万人却只能两手空空攥紧拳头来面对它。

其实，百姓被金融金字塔的组织者掠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总统和政府：一个本不具备牢靠法律基础的政权，却批准了许多显然犯罪或者半犯罪的组织去行动，它们在这段时间从俄罗斯人手中又把国家劫余的一切来了个一扫而光。

叶利钦和盖达尔从1992年1月2日起，彻底“放开了”物价。他们保证，物价仅仅“只会”上涨3倍，然后呢，就会稳定下来，再然后就要下降了。结果是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对叶利钦、盖达尔神话故事里的情节我们都有过切身感受，而叶利钦、亚夫林斯基的“500天”狂想曲也都让我们遭过大罪。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大大打了折扣。总统和政府广泛利用这种害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以同通货膨胀斗争为借口，有意识地缩减了生产领域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样就立刻引发了支付危机，使生产停摆，犯罪经济横行，工资急剧缩减，也引发了国家巨大的内外债务。然后政府又力图以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储蓄款作为抵偿债务的手段，而且还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发放债券和各种有价代用票证的机器都全速行动起来，用它们来代替流通货币，强加给人民。社会开支的不断紧缩，对老百姓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各种津贴。

众所周知，工资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如此，但为了一小撮亲信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成为政权社会支柱的贪腐官员的进一步发家致富，总统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工资和各

种津贴，实际上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同胞送入了忍受饥饿和半饥饿煎熬的境地。好多部门的职工竟成年累月地领不到工资。由于吃不饱饭，人们忍饥挨饿，许多人，甚至上学的孩子，都有被饿昏过去的情况。

为了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一个新阶级——私有主，叶利钦蓄意使俄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一方面死亡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这就必然引起人口的巨大损失。结果导致国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许多改变他所推行的社会经济路线的建议，但都遭到他一一否决。

委员会的这一结论，遭到国家杜马两个代表的反对，这两个代表刚巧也是对所有指控统统表示反对的人。他们的道理还是老一套的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说的道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绝妙：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俄国人口总数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下降，但他们以为原因既不在于俄国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不在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或者工资和养老金过低造成的贫困；既不在于人们的日常开支入不敷出，也不在于大多数居民付不起医疗费。近年来我国居民人数的下降，按照他们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我隔绝的条件之下（所谓“铁幕”），这就使“俄罗斯族群丧失了免疫功能，丧失了身处外族包围和具有攻击性环境下的活力”。不过作出这种“发现”的人，却在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人民不仅陷入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环境，而且陷入了一个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环境！有意思的是叶利钦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捍卫者帮了倒忙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俄国居民中，减少速度最快的部分是斯拉夫人。伊柳亨代表甚至发表声明说，国家总统实

行的政策同德国纳粹扫清苏联经济区、灭绝斯拉夫人，以接纳雅利安“优等人种”的手法如出一辙。

正是别洛韦日协议撕裂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语言的，破坏了千百年来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全体居民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每一个民族（种族）又保持着独立的人口再生产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本身。因此不难理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缩减、民族消亡的危机。有什么样的生命体能不衰亡呢？更何况这种繁衍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受到攻击的环境之下呢！近几年来，男人的平均寿命竟降到了57岁，而女人则不到70岁。³

死亡率的确大大提高了，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死者当中有1/3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的人。而且在这类居民中男子的死亡率高过女子4倍。这常常是因为意外事故、受伤、暴力、被杀、自杀、酗酒、吸毒等等。老年人死亡的速度加快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最直接的生理上的断代现象。而这种传承性本应是社会财富、智慧知识和人类所累积的生活经验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



多年后战友再相逢。雷日科夫、多尔基赫、切尔诺梅尔金。（作者提供）

目前死亡人数高过出生人数1.5—1.7倍。在叶利钦、盖达尔推行激进改革政策的年代里，结婚人数降低了30%，出生率降低了37%。

我国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这个数字比保持一代一代简单更迭所必需的数字低了40%。这首先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在许多方面同一个事实有着联系，就是每一千例正常分娩就伴随有200—215例堕胎。再有，有什么办法，到哪儿去养孩子呢？因为正如俗话说，住宅问题卡住了千百万家庭的喉咙。要知道在建造供免费分配的住宅这个问题上，在叶利钦“在位”的这年中，我们欠账实在太多了。再说一句，自打2005年通过一系列有关住宅的方案以来，免费分房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建房的总体速度已经下降了2.4倍，房价变得很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俄罗斯总体上的人口损失，加上死亡和由于极度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出生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万。也就是说，在叶利钦统治的七年间⁴，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的数量几乎为100万。而且，这还是在这种可怕的损失部分得到由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入人口补充的情况下。这岂不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局完全可以在不动枪炮，只用经济手段的条件下，“顺利地”发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吗？

负面人口变化有许多地方都是同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分不开的。前面已经部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要说的是，在1992年到1998年，局势简直就成了灾难性的。让我再来引用一些委员会的材料。

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动向可以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社会组合人群中显示出来，实际上各种疾病的统计资料无不如此。心血管疾病、肿瘤、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的规模急剧增长。传染病的状况十分堪忧，特别是结核病、肝炎、肠道病、寄生虫病，还有性病、艾滋病。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梅毒的传播率扩大了64倍，而且性病的发展现在还波及儿童和少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托马斯·曼有一句说得很形象的话：“病就是穷人的路。”这句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现在具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戏剧性的含义。现在很多人都买不起那些每天每时都在涨价的药，付不起专家诊费或者手术费。普通百姓根本就去不起疗养院，因为他们的工资或者养老金还不够买一张单程的车票。

70%的居民经常处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神经和情绪由于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极度亢奋。因此功能性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求解脱。不能不指出，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病患者，现在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现象，他们由于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由于他们所有生存条件都在恶化，看不到摆脱全面危机的明确而现实的道路，因而深陷堕落之中。

所有的一切不能不在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层面上对下一代有所影响。2005年6月的国际儿童节俄联邦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声称，俄国有200万儿童没有父母，有600万居住在社会不良环境中，还有400万酗酒和吸毒。国内流浪儿总数达到87万。这还只是公开的数字，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大大被降低了的。可是有一个数字是没有被降低的：每个儿童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70卢布！这还是在国内根本不缺钱的时候！

国内贩卖儿童的罪行公然盛行。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把发育完全正常的儿童诊断成弱智儿童，为把他们销售，特别是销售到大洋彼岸赢利而创造条件。

看来只有请捷尔任斯基复活，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流浪儿童的问题了。想当年内战和卫国战争之后，这个社会问题一度那么严重，不是也解决了吗！

这就是我国人民的可以说完全垮掉的、可怜的生活水平的大致情

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濒死状况和商业化。在苏维埃时代，它曾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制度。到了1998年，它却成了国家的整个服务体系完全垮掉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这完全是由于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及其一伙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催出的恶果。

除此之外，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类似的材料之后，认为应该也必须控诉叶利钦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在国际法中，“种族灭绝”概念最初是经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引入和确立的。苏联加入这个条约的时间是1954年，因此它也适用于作为苏联法权承继人的俄罗斯联邦。该公约第二条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以完全或部分消灭某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人群为目的的行动，其手段为：杀害该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成员实行严重身体伤害，蓄意伤害成员身体器官，蓄意为某个人群营造以完全或部分对其实施肉体消灭为目的的生活条件，在该人群中实施以防止生育为目的的手段，强制儿童由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转移。无疑，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质而言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条款。

叶利钦的追随者如祖拉波夫、库德琳之流，对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炮制的反人类的122号法令，把最后遗留的那点好处也都搜刮得一干二净。杜马兴高采烈地通过了这个法令，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它，国家总统也签署了它。干这桩事的代表们应该想想，上一届代表仅仅在7年前还曾经指控叶利钦对本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在谈到俄罗斯儿童的处境时，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涉及儿童的问题，这就是学校伙食状况。大家都明白，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如果营养摄入不足，将会对身体发育、发病状况、学习成绩等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代谢障碍，形成慢性疾病。

中小学学生——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700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普教机构中度过的。在这些地方，卫生条例规定要为他们准备热食——早餐，为全日制的孩子们准备两餐——早餐和午餐，而为在校时间更长的还要准备下午茶。根据俄罗斯卫生保健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在俄罗斯各行政主体，校餐的价格每天是在0卢布至12—15卢布之间浮动。学生在校就食热餐的比例在俄罗斯是由小学到中学到中学高年级逐步递减，大约各占82%、64%和51%以下。至于说到校餐的质量，根据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资料，学生在校所能摄取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每日饮食标准的3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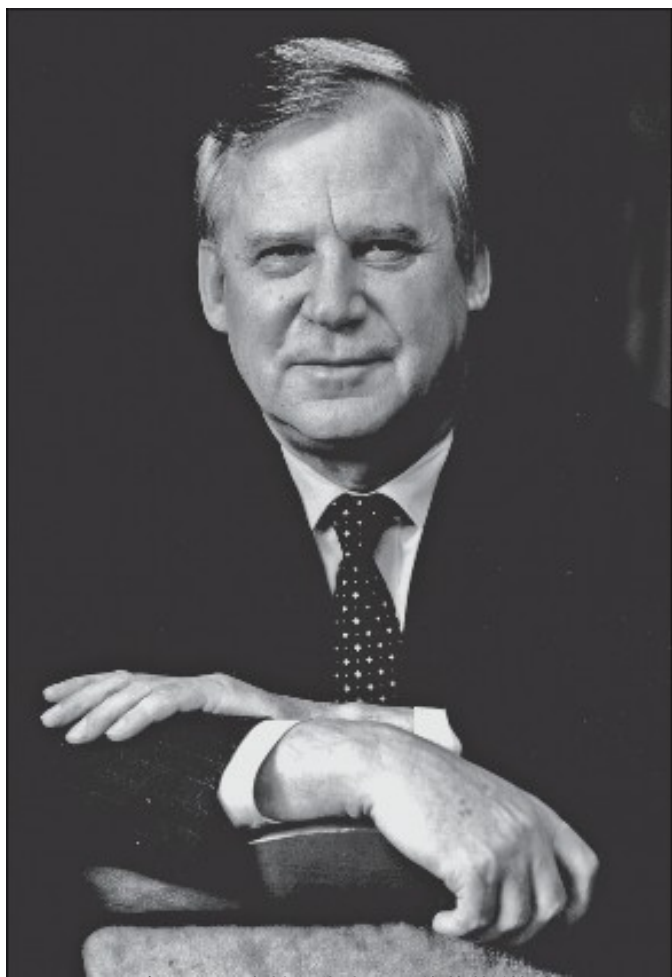
农村学校状况的麻烦就更大了：仅一条就说明问题——近65%的学校没有合格的饮用水。

当然，儿童问题在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而它的源头出现得要早得多。因为大约有70%的妇女健康上多少都有些问题。孕妇中能够正常分娩的不过40%。过半数的新生儿健康也有问题。大约15%—20%的学龄前儿童患有慢性病。到中学毕业时完全健康的青少年仅占10%。在儿童身体和心理发育方面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出现障碍的情况，即出现晚熟现象，而不是像苏联时期出现早熟现象。结果年轻人中由于健康状况而不适合服兵役和从事有效的创造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例如，根据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国家杜马答询时的发言，2005年秋季应征的人员中，大约10%体重不足，因此这批青年本应在入伍后立刻进入军事训练，但却不得不送去“增肥”。而且，由于体重不达标，兵役局还免除了多达9万名17岁青年的兵役。

总之，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得出明确结论：在我国推行所谓“改

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主要责任应该由总统叶利钦来负，因为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他是国家元首，由他来组织政府，领导政府活动，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方向。他在某些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选择不作为，以此造成对国家和俄国人民利益的损害；他实际上把国家杜马排除在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上，他的行为常常同当年对待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态度一样。



1996年，任国家杜马代表。（穆萨艾利扬摄）

正是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浓浓的黑雾笼罩了我国大地。自然会有人问：一个国家元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不错，他的确不是内行，这一点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可是他不是有一大群专家学者、生产第一线的第一流专家供他差遣吗？但他却根本不想利用这些人的潜力。作为一个了解他性格的人，我可以说，他就好像是在向自己的人民进行报复，只是说不清为了什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俄罗斯人民，1991年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投票要他上台的人民，简直就是一堆粪土。他要的是权，眼睛里只有权，为了权他可以炮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他可以消灭人民代表苏维埃。他权欲熏天，权力就是他生命的终极意义，对此他毫不讳言。

无疑，叶利钦对他的西方“朋友”，是承担着一定的义务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就是他置我国科学界的抗议于不顾，执意推行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危害极深的经济改革路线，并拒绝对之进行任何修改。国外的一群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给他写过类似的论据充分的信，揭示出这种改革对俄罗斯有多深的危害。但结果也是一样。

叶利钦改革俄罗斯的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这个目标就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这个苏联的继承者，进一步巩固在一个大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正如比尔·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所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毁掉的国家。如果是那样，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今天的领导人继承的俄罗斯，是一个被毁掉的俄罗斯，其中有许

多可以想见和难以想见的灾难。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正面进展，但面临的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希望现在这段黑暗的日子过去后将会出现曙光，我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将享受盼望已久的灿烂光明！我们绝不该失去希望！

50年前俄国杰出的哲学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当时他身处流放之中，在《我们的任务》一书中就曾以预言家的敏锐写道：

俄罗斯绝不是一块块领土、一个个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个个“州”人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它是不能被随意肢解的。这个机体在地理学上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在经济上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精神、语言和文化上也是一个整体，历史地把俄罗斯民族同它的民族小兄弟团结在一起，在精神上也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它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它还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洲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对它的肢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冒险，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将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影响。

1 为免除犯下重罪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职务而提出的议案，有一个简短的法律结论，刊载在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文件资料集中。

2 本章的这个部分就是以俄联邦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的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其中有罗季奥诺夫、伊柳亨、维涅季克托夫等人的证词和发言，还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希波夫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库兹涅佐夫的研究资料。

3 这部分使用了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维涅季克托夫向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4 这是指到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开会的日期为止。

后记

这本书写了足足有十多年。起初只是为了备忘，把发生在改革年代的那些零散的、比较重要的、后来又对瓦解这个强大统一国家苏联起着多方面作用的事件记录下来。但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那些悲惨年头逐渐远去，我跟我的许多同龄人，由于曾经身处我国生活这一最艰苦年代各种事件的旋涡之中，便萌生了想要更深入探讨其前因后果的要求。但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这种心灵和理智的呼唤。现在，当这项工作行将结束之际，笔者想对这些基本的看法，再作一个简短明确的表述，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繁言赘语，因为它们跟本书基本内容密切相关。

其实，笔者并没有把分析我国解体的所有原因和事实列为本书的任务。我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能完成。本书中所涉及的，只是导致这一大悲剧发生的某些情况。本书的名称也清楚地说明了我本人对这一具有世界意义事件的态度。



少年雷日科夫与父亲合影。（作者提供）

俄联邦总统普京在他的多次演说中，也对我国15年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作出了评价，并把它称之为世纪悲剧和灾难。作为历史事实来说，这是正确的。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非常深远，远远超出了时间的甚或领土的范围，具有全球性质，并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世界政治地图经过一定历史阶段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化，因为它要反映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二战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三个战胜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和波茨坦开会，后来又通过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把它的结果固定下来。而这些结果的出发点，便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以及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原子弹，使我们得以在没有大的全球冲突，没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要知道，一战和二战之间相隔了只不过是短短的20年。可是现在，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欧洲，其中也包括原来的苏联，竟出现了24个新国家。而且这个过程也未必就此会打住。现在，眼下就至少有科索沃、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沿岸地区共和国在等着。

苏联垮掉之后，国际力量平衡也被破坏了，强烈的地区震荡的冲击波扩散到全世界。其中既包括南斯拉夫的覆灭，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朝鲜和伊朗也正在受到威胁。此外，不是还有近东各国之间由于多国利益而发生的多年流血冲突吗？

关于这个强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关于出现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近15年来发表过许多论著：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有些近乎科学的东西，还有某些对个别事件主观性极强的描述和回忆录等等。不过，每种著作所涉及的，也仅仅只能是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已。看来，对历史进行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争议的记述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想，最终一定会有人出来，我国领导人也会表现出政治魄力，把客观评价这一灾难的全部复杂原因，把对那股策划并实现了这一灾难的力量进行分析，确立为自己的任务，并完成该任务。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某一个帮派的利益，或是出于向苏联和苏联人民自1917至1991年走过的道路泼脏水的个人想法——现在的“民主派”就喜欢干这种事。为了我国的未来，为了我国人民的未来，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导致1991年各种事件的原因相当多。起作用的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谈到过外部对我国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引述了杜勒斯在1945年讲过的一些话。究其本质而言，这些话里包含了同我国进行长期斗争的全部指导思想。

西方，特别是美国，许多地方都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来行动的。他们千方百计在我国特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为自己寻找“朋友”。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把这些人称之为“影响的代理人”。应该说，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很卖力气。

那场“冷战”的展开也不是偶然的。几十年中，它可把苏联拖苦

了，把大量国家资源吸引到军备竞赛中去，而它们本来是可以用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这一点对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没有影响。苏联同社会主义联合体的盟友，在经济上较之于美国 and 它的欧洲仆从要弱一些，因此，为了保持基本军事均势而出现的国防开支，就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产生了比对方更为容易感知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资源，苏联也作为援助给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现在几乎所有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不过，关于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现在看来并没有最终彻底解决的、直接导致我国出现悲剧的原因，我在本书中倒是讲得相当详细和具体。这就是改革年代后期我国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而言，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自久远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

基辅罗斯解体后，古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这就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几个族群具有同一个根，所以可以认为，15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不过随着第一个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国，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加之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归附，俄罗斯遂成就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传统和文化，产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极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俄罗斯的中央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架构和方法。波兰、芬兰、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它们符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特别的法制体系。国家机制在体制设置上的多样性以及工作的弹性，使得民族关系不可能碰撞出过大的火花。

当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建立统一多民族新国家的问题曾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战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正如所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它们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统一国家的特权。应该看到，当时列宁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立即完成统一国家的架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苏联有过民族问题的纲领，而且也一直在实施之中。对中亚各发展缓慢的共和国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共和国的经济援助问题被提到国策的高度。实际上除了白俄罗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罗斯联邦提供的补贴。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主要的联邦制共和国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会指标上落后于其他共和国的现象。这一切为的都是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友谊。



雷日科夫夫妇的照片，背后有题词：“年华如飞逝去……”（作者提供）

应该指出，苏共在民族问题领域内的活动是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正面解决的。这些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联邦内部某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构建出一种各加盟共和国参加国家管理、参加议会、参加国家科学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关系的牢不可破曾经经受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考验。各民族苏维埃联合体的生命力和威力是胜利的一大重要源泉。无疑，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在最艰苦的考验年代之所以能团结一致，还有一个事实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国当时正面临被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所奴役的危险。

苏维埃联合体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在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有时也出现过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致使难以充分发挥这一政策的潜力。

后来开始了“改革”，苏联领导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点和负面现象，目的就是要动员力量，引导国内状况朝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由于苏共及其对苏联社会影响的日渐衰微，以及各种“运动”和“战线”的出现，在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都成了同中央权力进行斗争的一张牌。

在这些究其本质基本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它们的领袖人物动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各共和国人民如果脱离苏联而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主权，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实际状况被有意歪曲了，这些地区不同程度都靠经常性的输血维持的事实被有意缄口不语。也就是说，其实全苏的资源再分配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被导入了误区，而真正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意图却被一些用以引发对中央不满的负面口号掩盖起来。逐渐，这些运动也好，党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这才看出他们的活动已经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糟糕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已经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极端有害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

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能够保全并彻底革新统一国家的机会已经错失，当时我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致使上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废于一旦。现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过。



雷日科夫家的三代人：父亲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母亲亚历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妻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女玛丽娜。（作者提供）

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

当时依然在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职责——捍卫苏联宪法，而以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就把克里米亚会议、波茨坦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抛到了一边，迫不及待地以对成立15个国家来取代一个国家表示欢

迎。

叶利钦在取得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后，表现出了自己的治国“才干”。当时他也许是出于有意，也许是没有考虑周全，并没有注意有人对他提醒，他对苏联的政策也可能会在他的俄联邦政治中起作用。为了追求选票和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义的手法宣称，这些单位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主权。

国家首脑的这些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不能不对国内总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此外，叶利钦的行为远不是那么前后一贯。最后，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烂摊子，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说得客气点，远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国之栋梁。他们就像苍蝇围着粪堆飞来飞去似的，围在这位“主子”身边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联邦政权是如此的不堪，便也开始各自寻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开始修改本共和国、本边疆区、本州的宪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一些州则走得更远，他们开始准备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国，比如乌拉尔共和国。

叶利钦身边的人见到国家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个办法：在联邦政权和联邦主体之间签订协议。于是各处一哄而上：几年之内，签订了大约50个左右的协议。而这一切竟是在当时国内宪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废除这些协议，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两个共和国，即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直到现在在国家预算中还列入了大笔“为他们失去的机会”而要求补偿的经费。

叶利钦的国家被各种矛盾所撕裂，贪污受贿处处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毁灭。八年过去，叶利钦身后留下了

一个衰败、虚弱、管理不善的国家。国名还在，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国家却只不过虚有其表。新上任的总统要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真正国家，真是要花费不少心力。

最后这5到7年时间，是一段“整合”俄罗斯的时期。每过一年，它就变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一点。采取的一些步骤，比如强化纵向权力和国防力量，比如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明确立场，比如在某些社会结构方面作出各种决定以确立基本法规……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自由主义一翼，引起愤怒的风暴。“警察国家”是那些西方应声虫和西方帮闲所给予今日俄罗斯的最温和的评语。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诠释文字在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批评风暴和多么难听的阵阵叫嚣啊。劈头盖脸的脏水也泼到了第10届世界俄罗斯全民大会的头上。大会的主报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说，世界上当然存在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原则、人际关系标准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它同样也有存在的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国家曾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面临崩溃边缘。但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俄罗斯重又站立起来，不仅找到了复兴的勇气和力量，更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勇气和力量。

1613年大混乱时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其后100年间，俄国的新土地开拓者走过了自乌拉尔至太平洋的遥远历程，甚至开发了部分美洲大陆。中亚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300年后，俄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强国。

到了1917年，新的震荡出现了：两次革命，破坏，内战，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国家的经济潜力也遭到破坏。看来，俄罗斯帝国残留

的几个部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联合起来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国。然而，建立苏联的政治决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艰难困苦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以及其他种种重大改革之后，我国又跻身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列了。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科技潜力，我国人民面对受奴役的危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终使我国得以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

二战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灾难。想当年那场无比惨烈的战争过后，我国处境之艰难现在真是难以名状。人民当中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牺牲了，我国欧洲领土直到伏尔加河的一大片，上头的国民经济全被摧毁了。外国专家们“给了”我们40年到100年的恢复期。可是，经济却在5到7年内全部恢复了。只不过上千万人的牺牲至今却依然有所感觉。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它实际上已经恢复了1917年革命后丢失的领土。苏联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统一国家被肢解成为15个部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本书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我国正在一步步站立起来，尽管许多东西都被破坏，被掠夺，被践踏，但它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

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奋起创造，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更要保持并发展我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雷日科夫

2006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雷日科夫小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29年9月28日生于顿涅茨州捷尔任斯基区捷列耶夫卡村（现捷尔任斯基市）一个矿工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顿巴斯度过。

受过高等教育：1959年毕业于基洛夫乌拉尔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1950年在顿涅茨州克拉玛托尔机械制造学校毕业后任技师。

1950年起在奥尔忠尼启泽乌拉尔重机厂，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先后任班组技师、班组长、车间主任。1959年起任总电焊师、副厂长。1965—1970年任厂总工程师。1970年起任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总经理。

雷日科夫是乌拉尔机械制造工厂改造和发展的倡导者。他为乌拉尔机械制造生产集团建立了好几个分部。在他领导工厂和集团期间，主要致力于冶金工业和采矿业最新设备制造、石油天然气钻探技术装备、国防工业订货、军事技术装备的制造和生产。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开展了先进机器设备的设计，制定了最新工艺流程，最大的生产联合体现代化管理体制。

1975—1979年雷日科夫任苏联重型和交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主要负责与科技进步相一致的部门的发展。他把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冶金、采矿等行业的装备，国防、航天部门的装备生产以及铁路运输装备的生产上。

1979—1982年雷日科夫担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部长级，负责制定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实现投资和科技纲要，财经和地区发展政策。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机制的基础得以建立。

1956年加入共产党，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苏共中央经济工作部。1985—1990年任政治局委员。

受苏共中央总书记委托，他同其他几位书记一道，完成了国家现行社会经济政策分析。他还在主要学者专家的协助下，制定了国家新经济政策纲要。1985年该纲要成为向新经济模型过渡的基础。

1985—199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从1990年3月起，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1月退休。

1986年领导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总部的工作。

1988年12月领导了亚美尼亚大地震救援工作。为了感谢他为亚美尼亚人民建立的功勋，斯皮塔克市为雷日科夫建立了一座胸像，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发布命令，颁发给他一枚最高勋章。

1989年领导了制止费尔干纳（乌兹别克）民族冲突的工作。

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9、10、11届代表；1986—1990年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

1993年起任“普罗霍罗夫场”慈善监护委员会主席，发起在俄罗斯第三战场——坦克大会战战场修建纪念建筑群。这里建起了“警钟长鸣”纪念碑、彼得保罗大教堂、卫国战争老战士之家、文化历史中心、普罗霍洛夫战场上的雷日科夫图书馆等。

1994年10月起，任“欧亚”国际社会联合体主席，莫斯科思想文化

及企业界精英俱乐部（俗称莫斯科名人俱乐部）主席。

1995年12月至1999年12月任俄联邦第二届国家杜马联邦会议代表、“民权”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国家杜马主席团成员。

1999年12月—2003年10月任俄联邦第三届联邦会议代表，任救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克服北约侵略后果委员会主席。任俄联邦议会同亚美尼亚民族会议关系协调人。

2003年9月起任俄联邦联邦院联邦会议的别尔哥罗德州代表，地方自治问题委员会委员，自然资源垄断问题委员会委员。

1998年2月领导国产商品企业协调委员会，现更名为俄罗斯制造商协会和俄罗斯制造商国际协会。

两次荣膺列宁勋章；荣膺十月革命勋章、两次劳动红旗勋章、四级祖国功勋勋章以及国内外其他许多勋章。

1969、1979两次获得国家奖金。

为了表彰雷日科夫对俄国同胞及俄国青少年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俄国东正教教会授予他多枚俄国东正教教会勋章。

为了表彰雷日科夫发展各国间兄弟关系的重大贡献，他被授予多枚外国勋章：亚美尼亚的梅斯洛普·玛什托茨勋章、吉尔吉斯的达纳克尔勋章、哈萨克斯坦的友谊勋章、乌克兰的亚罗斯拉夫·穆德雷大公五世勋章、白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友谊勋章。

为了表彰雷日科夫的特殊功勋，他被授予贝尔格莱德州荣誉公民称号、亚美尼亚斯皮塔克市和古木里市荣誉市民称号、乌克兰顿巴斯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捷尔任斯克市荣誉市民称号。



2004年，当雷日科夫75岁生日之际，在他所获得的许多勋章当中又添了一枚一级彼得大帝勋章。（作者提供）

雷日科夫是国内外多所科学院的院士、6项发明专利拥有者。发表过两部专著，200余篇机械制造、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论文和文章。出版过7部时政方面的书：《改革：叛卖的历史》（1992）、《我的党叫做俄罗斯》（1995）、《大动荡的十年》（1996）、《重返政坛》（1998）、《南斯拉夫的骷髅地》（2000）、《被钉上十字架的南斯拉夫》（2003）、《辩护证人的发言》（关于米洛舍维奇的审判）（2005）。

译后记

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苏联情结。因此，当2007年春节过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米尔诺夫博士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雷日科夫有一本关于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新作已经杀青，希望能翻译成中文出版。斯米尔诺夫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这项工作，我的心动了。当时，由于我手头正有别的工作，不便当场表示同意。但他那迫切的口气使我不得不改变初衷，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斯米尔诺夫先生曾两度同我有过密切的文字之交，而且后来又承蒙他撰文在莫斯科报纸上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工作加以谬赞。这次他是应邀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社会大学副校长、莫斯科名人俱乐部执行主席、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科京先生一同到哈尔滨来参加2007年冰雪节的。为雷日科夫的新作寻找译者并安排在中国的出版事宜，是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他见我应允了此事，便邀我到宾馆同科京先生面谈。

科京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大致状况，答应回国后立刻把该书的电子版文字和图片设法传递给我；而我则向他保证一定努力忠实地传达原文，并帮助他们物色到一家合适的中国出版社来做这项工作，以不辜负作者的期望。这样，这件事便定了下来。

科京回国之后，很快便通过特快专递发来雷日科夫亲笔签字的版权委托，又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该书全文；再后来，又通过本书译者中

在莫斯科工作的徐明稼带回图片光盘。而我，则把此事向所在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做了汇报。院长曲伟先生和院老年科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表示积极支持，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对国内几家重要出版社的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还是请新华出版社支持这项工作为好，于是便把全书的简介寄到了新华出版社。

很快，新华出版社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合作。于是我们邀请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资深翻译家高文凤、宋嗣喜和年轻的翻译家李蓉，资深翻译家、黑龙江大学的王育伦教授、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的王琳德教授参加翻译，并邀请在莫斯科常驻的徐明稼小姐担任译者同作者之间的“联络员”，并参加部分章节翻译，承担了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这样，就出现了译者的如下分工（按章节顺序排列）：徐昌翰：前言，第1、4、5、12章；王育伦：第2、3章；王琳德：第6章；高文凤：第7章；李蓉：第8、9章；宋嗣喜：第10、11章；徐明稼：后记、作者小传、图片说明。最后，全书由徐昌翰作了统一校订。

在此，我愿代表全体译者，向所有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鼓励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假如这本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将是对我们的劳动，也是对这些朋友最好的回报。

徐昌翰

2007年11月



THE WEALTH AND PO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
SOME SO POOR

国富国穷

[美] 戴维·S·兰德斯 著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国富国穷

[美] 戴维·S·兰德斯 著

DAVID S. LANDES

门洪华 安增才 董素华 孙春霞 译

程克雄 译校



新华出版社

版权信息

国富国穷/ (美) 兰德斯 (Landes, D.S.) 著; 门洪华等译.-3版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11-9037-9

I. ①国... II. ①兰.....②门...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2424号

目录

版权信息

再版说明

引言

第1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

第2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

第3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

第4章 发明的发明

第5章 地理大发现

第6章 东进喽！

第7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

第8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

第9章 东方的帝国

第10章 为了爱财之心

第11章 大财源

第12章 胜利者与失败者：帝国之资产负债表

第13章 工业革命的性质

第14章 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在那时？

第15章 英国和别的国家

第16章 追赶英格兰

第17章 要有钱才能赚钱

第18章 知识的财富

第19章 边远地区

第20章 南美洲的道路

第21章 天朝帝国：停滞与倒退

第22章 日本：后来者应居上

第23章 明治维新

第24章 历史出错了？

第25章 帝国与帝国之后

第26章 失去领先地位

第27章 赢家和.....

第28章 输家

第29章 我们怎样来到这里？我们正走向何方？

译后记

再版说明

人类历史自诞生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着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巨大鸿沟，为破解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内在原因，许多专家学者、智者精英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试图寻找出深蕴其中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课题，令人着迷而又困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言：“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美国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先生横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他身兼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著述完成的《国富国穷》一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称得上卓有成效。他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的兴衰贫富演变作了精湛而深刻的分析，旁征博引，见解精辟，甫经问世就被西方学界称誉为划时代的《新国富论》，堪与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著《国富论》相媲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认为：“戴维·兰德斯针对世界经济史上成功和失败的重大事例写出了一部精湛的通鉴。他饱含激情、视野开阔、坦陈己见、笔锋犀利。有人以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兴衰与精神文化因素无关，读此书后显然会再思一番。”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说：“戴维·兰德斯对现今世界各国贫富分布的由来，作出了新的历史性的研究，展示出一幅辽阔画卷，（该书）充满真知灼见。历史事件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书会让读者通过各国种种际遇反复体会到一个主题思想，看出欧洲为何在经济上领先。难以置信的渊博学问体现在一种轻快有力的散文式叙述之中，它将使读者手不释卷。”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称赞说：“真精彩。此书无疑将证明戴维·兰德斯在他的领域和时代是杰出的。”

尤其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是，兰德斯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当中的位置，用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为什么在清朝后期迅速从繁荣坠入困顿，从虚无的“天朝幻想”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而陷于欺侮掠夺之中。

该书由我社翻译出版后，很快多次重印，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对该书宏大的主题、深邃的思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读书》、《参考消息》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多篇书评以及对原作者的访谈文章。此次再版，我社请校译者对译文的字句做了更为准确的修订，并重新设计了封面和版式。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并牵动着世人的目光。虽然国际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不同声音的解读，但对于每一个致力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应该以更宽阔的胸怀来面对世界，用世界性的目光来面对历史。相信本书总结出的国家兴衰更替的内在规律、国家富裕贫困的深层原因，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借鉴和深刻启迪。

新华出版社

引言

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新的解释。

——保罗·萨缪尔森1976 (1)

1836年6月，内森·罗斯柴尔德 [1] 从伦敦动身，到法兰克福去参加他的儿子莱昂内尔与其表妹夏洛特的婚礼，并与罗氏兄弟讨论自己的子女进入家族企业的事情。内森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至少在流动资产上是如此。不消说，只要愿意，他付得起任何钱。

是年内森59岁，略显肥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性格不屈不挠。然而，在离开伦敦时，他正遭受着背部（靠近脊柱底端）炎症的折磨（一位德国医生诊断为疖子，但或许是脓疮）。² 尽管经过了医治，痛处仍然化了脓，并越发疼痛。然而，内森坚持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了教堂里的婚礼。如果他卧病在床，那么婚礼只好在旅馆举行了。内森还忍着疼痛，继续处理商业事务，他的妻子做着记录。同时，著名的特拉弗斯医生被从伦敦请来，当特拉弗斯表示无法医治时，一位大名鼎鼎的德国外科医生被请来，或许准备开刀清洗创口。一切都是徒劳，病毒的扩散无法抑制。1836年7月28日，内森与世长辞。罗斯希尔德家的信鸽将一个不幸消息带回伦敦：内森去世了。

内森·罗斯柴尔德或许死于葡萄球菌或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习惯称之为血毒症。由于缺乏更详尽的资料，我们不能确知他是死于疖（脓肿）还是死于医生手术刀引起的继发感染。此时，细菌理论尚未问世，人们对消毒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没有杀菌剂，更别说抗生素了。这位买得起任何物什的富翁就这样死于一种普普通通的感染。而在今天，随便到哪一个医院，找哪一个医生，甚至到任何一家药店买药，都可以轻松治愈它。

自从内森·罗斯柴尔德的时代以来，医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更好、更有效的药物——治愈疾病与创伤——只是整个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则是由于疾病预防和生活清洁，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水质清洁，污物的迅速处理，加上个人卫生的提高，使一切得以改观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肠胃感染是最大的杀手，它的传染渠道是：污物→手→食物→消化道。只要这种看不见的致命敌人出现，就会时不时地为霍乱弧菌等传染性病菌所推动，致人于死命。公共厕所是最主要的传染途径。由于缺少清洁用纸和可洗内衣，在那里接触污物是极容易的。穿着脏兮兮的毛织品——毛织品难以洗干净——人们不由得搔痒。手上并不洁净，但人们犯的一个大错误是饭前不洗手。而讲卫生正是那些规定沐浴的宗教群体——如犹太人、穆斯林等——发病率和死亡率低的原因。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优势因素。人们极易被说服相信，如果犹太人死得太少，那是因为他们向基督徒水井里投了毒。

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人们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变，而是在于工业上的发明创新。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的主要代表产品是廉价的可洗棉布，随之，从植物油提炼出来的肥皂得以大批量生产。普通民众第一次买得起内衣裤——它由可洗纤维做成，富人常贴身而穿，故又称为“贴身衣裤”。人们可以用肥皂洗衣，甚至洗澡。当然，洗澡太多则意味着身体太脏。为什么爱清洁的人沐浴如此之勤？其实，这无伤大雅。人们的卫生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普通民众常常比一个世纪前的国王、王后的生活更清洁卫生。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的第三个因素是人们的营养更好。这源于食品供应的增加，更源于交通的便捷，迅速。地方供应匮乏引起的饥饿现象变得少见，饮食趋于多样化，食物中所含的动物蛋白质越加丰富。这些变化与其他因素一起，使人类体格更高大强壮。当然，与以上因素所导致的医疗和卫生受益不同，营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习惯、口味和收入状况。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遭遇英国远征军的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吃牛排、羊肉长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与英国磨坊、城镇里长大的矮小青年身材之高下迥然不同。任何关注从穷国迁往富国的移民状况的人都会

发现，移民的后代比他们的父母高大、健壮了。

由于以上进步，人的寿命大大延长，而且贫富之间差别缩小了。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感染（特别是胃肠感染），而是老年人的各种消耗性疾病。富有的工业国家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障，因而收效最为显著，甚至某些较贫穷的国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然而，从科学基础的现实来看，这些幻想不过是富人和幸运儿的梦想。知识收益的分布未达均衡，即使富国内部也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与这些差别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病率和寿命长短方面的巨大差异。富国居民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往往为年老神衰而发愁，他们健身以保持体型，与胆固醇作斗争，通过电视、电话和游戏消磨时光，用诸如“金色年华”或“人生第三黄金年代”的隽语安慰着自己。“年轻”是美好的，而“年老”成为不受欢迎和成问题的字眼。与此同时，穷国的居民却在挣扎中求生。他们无需为胆固醇或肥胖担忧，部分由于衣食无着，部分由于早年夭亡。他们力求安度晚年，如果他们活得到老年之际，子孙们会孝敬老人。

过去，世界分为两大权力集团：“东方”和“西方”。现在，这种划分已不复存在。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但一个更精确的划分是“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因为这一划分标准也是历史性的。这正是在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和危险。与之相关的唯一迫在眉睫的忧虑是环境的恶化。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财富不仅带动消费，也带来污染；不仅促进生产，也引起破坏。随着产出

和收入的增长，污染和破坏也急剧增加，正是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概言之，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瑞士）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而在250年之前，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约为1.5：1或2：1。（3）

今天，这一差距仍在增大吗？就贫富两极而言，确然如此。有的国家不仅是“不增长”，而是相对甚或绝对地更贫穷了；有的国家不过仅能维持现状；有的则奋起直追。为了我们和他国的利益，我们富国的任务是帮助穷国人民变得富有和健康。如果我们做不到，他们仍会企求得到他们制造不了的东西，而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商品获益，他们就会输出人口。简言之，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贫穷者应如何着手？我们如何提供帮助？这正是本书力图为答案作出贡献的问题。我着重于“贡献”一词。没有人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所有包治百病的建议不过等同于千年之梦想。

我计划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些问题。这是因为，我从专业和气质上来说是一个历史学者。而研究这样的难题，从自己确知、自己能做得最好的角度出发，是最明智之举。同时，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穷？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历史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确保提供一种答案。另一些人思考过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多种解释。他们大多分属两个学派。一派把西方的富有和支配地位看做是善对恶的胜利，他们认为欧洲人举止优雅，组织良好，勤苦劳作，而别的人则疏忽大意，夜郎自大，懒怠成性，愚昧落后，迷信不智。另一派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欧洲人侵略成性，冷酷无情，贪婪，寡廉鲜耻，伪善；别的人则快乐无邪、天真而

虚弱；他们无奈地面对侵略，终成牺牲品。我们认为，这两种善恶绝对分明的看法都含有真理的因子，但都有意识形态上的虚妄。真实情形往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第三种流派则认为，“西方—其他”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他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

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认为，欧洲中心论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对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

注释

1 .“Illogic of Neo-Marxian Doctrine”一文，第107页。

2 .Wilson , *Rothschild* 一书，第102页。

3 .此处主要参阅Paul Bairoch , “Ecart s internationaux des niveaux de vie avant la Revolution industrielle”一文，载于 *Annales :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34 , 1 (Jan.-Feb.1979) , 145-171 , 并略作删改。如按实际标准（“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80：1。参见 Ram , “Trop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 P.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1996。

第1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地理学处境艰难。在小学读书时，我就要阅读和观察地图，甚至凭借记忆把它们描绘出来。早在“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就通过学习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触过的民族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同时，在更高得多的层次上，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派林立。在法国，任何人在研究地区历史以前，必须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以备研究之用（1）。在美国，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及其门徒研究了地理特别是气候影响人类发展的途径。

尽管亨廷顿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却使地理学得到了坏名声。（2）他走得太远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响乃至文化影响都归因于地理。最终，他按照气候的差别划分文明的高下，并且将最佳文明——即他认为是最好的文明——归因于有利的气候。亨廷顿在耶鲁大学任教，所以他认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2] 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这并非巧合。真是幸运儿。他认为，自此以下，境况逐渐下降，而有色人种所在地区则接近于最底层或处于最底层。然而，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亨廷顿不过是在回应着伦理地理学的传统。哲学家很容易把自然环境与人类气质联系起来（以及冷热之间、冷静沉思和热情洋溢之间的明显对比）。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与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3）今天看来，事情有时却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国人的神话制造者认为“太阳人”是快乐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而“冰人”则是冷酷和没有人性。

在喜欢用人种学的观点确定行为与性格的知识界，这种自得的分析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理智、并反对令人讨厌的群体对比时，这种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誉，不再被人们接受。地理学也跟着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时，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4) 随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样也未遭遇严重抗议。

以上做法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史无前例的，确实反映了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弱点：缺乏理论根基，包罗万象的机会主义（婉转而言是普遍的开放主义），人文地理学特有的“轻易”。然而，这些批评背后，隐含着对某些结果的不满。地理学沾上了种族主义的痕迹，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种族主义”意味着个人行为举止与群体——特别是某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成员身份的好坏联系，那么，没有任何学科或课题比地理学更少有种族主义特色。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一学科是研究环境的影响，并不探讨群体引起的特征。气温、降水量及其时间分布或者地形，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应有人因之而受到赞扬或谴责。

尽管如此，地理学仍然散发着异端邪说的气味。这是为什么？其他学科也曾经传播胡言蜚语，或夸大其词，但并未受到如此的藐视和毁谤，也许那仅仅源于疏忽！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然而，在地理学中，这种字眼俯拾皆是。(5)

简言之，地理学带给人们的是坏消息，而人人都知道，报坏消息者会有什么遭遇。正如一位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所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研究者要为结果负责。就像有人希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到海滩

上去，天气预报员若没有准确预报太阳是否出现，即应负责一样。”

(6)

然而，我们并非否定一切的智者。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所说，“（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英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暂。”(7) 保罗·斯特里滕简略提到人们直觉地反对坏消息的态度：

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新近的著书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们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8)

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学者还抱怨技术和发展了技术的富国，谴责说：正是技术和富国发明了适合温带的方法，导致富有潜力的热带沃土处于休耕状态。另一些学者则谴责殖民列强使赤道社会陷入混乱，从而丧失了对环境的控制。例如，奴隶贸易导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区荒无人烟，回复为丛林，从而导致采采蝇 [3] 泛滥和锥虫病（睡眠症）流行。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宁愿采取沉默姿态。

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历史学家不能为了取悦当今而抹杀或改写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9) 在当今热带医学和高科技的年代，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虽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我们将先谈环境简单而直接的影响，而后论述较为复杂和间接的联系。

首先从气候谈起。世界的温度和湿度模式多种多样，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阳光倾斜度的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了所有生物的活动规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许多动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热、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则在岩石或地表下纳凉（这正是许多沙漠动物是爬虫的原因：爬虫可以爬行）。人类倾向于避免极端。他们经过沙漠但并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无人区”。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总体而言，炎热带来的不适大于寒冷。 [4] 我们都知道关于太阳和风的寓言。为对付寒冷，人们穿上衣服，建立或寻找住所，生火取暖。这些技艺可追溯到几万年以前，说明了人类从非洲发源地散布到气候较寒冷地区的最初状况。热则是另一番情景。人体肌肉活动产生能量，其中的3/4以热能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像机器或马达一样，人体必须把热释放出来，才能保持适宜的温度。遗憾的是，人类少有这样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发的时候。潮湿、“汗湿”的气候减少了出汗的降温效果——除非有仆人或奴隶在一旁给你扇风，加快蒸发速度。自己扇风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体运动产生的热量降低了实际的清凉效果。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术术语称之为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

减少这种浪费的最简便方法是不产生热量，或者说静止不动。故而，人类有一种社会化适应方式：午睡，即让人们在中午的热度下不活动。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有这样一句谚语：只有疯狗和英国人在中午的骄阳下外出。当地人明白得多。

奴隶制可以使他人从事繁重的工作。从历史上讲，奴隶制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相关并非意外的巧合。 [5] 按照性别分工也是一样：特别在温带地区，妇女在农田干活、操持家务；男子则专事狩猎和战争，在现代则喝咖啡、玩纸牌、开车兜风。其目标是将工作和痛苦转嫁给不能说不的人。

对炎热的最终解决办法是空调。但是，空调出现得非常之晚，实

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在这之前，空调只安装在美国的影院、医疗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楼的要员）的办公处。空调使美国南方各州的经济繁荣得以实现。没有它，亚特兰大、休斯敦、新奥尔良等城市也许还是昏昏欲睡的小镇。

然而，空气冷却法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技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负担不起。而且，它不过是把热量从幸运者那里转嫁给不幸的人罢了。这需要能量的消耗，在生产和使用中产生热量（有所得必有所失），从而提高了未能冷却的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只要走近空调的废气出口，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并不曾有空调，它不过是新近的产物。因此，热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应地下降了。^[6]

以上就气候的直接影响做了论述。热，特别是全年炎热，有着更有害的后果：它鼓励与人为敌的生命形式的散布。温度升高则害虫云集，昆虫体内寄生虫的成熟和繁殖更为迅速。结果，疾病传播更为迅捷，对抗相应防治措施的免疫力随之提高。繁殖速率是流行疾病危险的关键因素：速率1意味着疾病是稳定的——一种新疾病取代一种旧病。像腮腺炎和白喉这样的传染疾病，其最大传播速率为8；疟疾的最大传播速率为90。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10）。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热带国家——除去较高纬度的以外——不知霜冻为何物；最寒冷月份的平均温度高于摄氏18度。结果，热带成为生物活动的蜂房，其中许多生物对人类非常有害。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南面的地区威胁着所有在那儿生活的和经过那里的人们。新国家的出现及其征募军队的新兵体格检查，才使我们开始了解问题的范围。比如，我们现今知道，许多人体内潜伏着多种而不是一种寄生虫；所以有人病得不能工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以下举一两个例证，以表明现状如何严峻。

非洲和亚洲的温暖水域里，不管是运河、水塘还是溪流，都生活

着许多蜗牛，其体内附着裂体吸虫（血吸虫），可在水里繁殖数以千计的微小幼虫，通过咬、抓等方式撕破哺乳动物的皮肤而进入其体内。一旦幼虫舒适地寄居在哺乳动物的血脉里，它就会长大成虫并进行交配，母虫排泄数千个带刺的卵——这些刺保证虫卵不被排出体外。这些虫卵会随血液流向肝脏和肠，并破坏所到之处的组织。他们对器官的影响可想而知：它们损毁肝脏，导致肠出血，造成致癌损害，妨碍消化和排泄。受害者经常发寒发烧、忽冷忽热，浑身疼痛，无法工作，并且身体虚弱，容易受到其他寄生虫的袭击或感染其他疾病。所以，常常难以确诊是哪一种疾病要了他的命。

我们将该瘟疫称为蜗牛热，肝蛭，或按医学术语称之为血吸虫病，或比尔哈茨亚病，因1852年内科医生比尔哈茨亚发现该病源于血吸虫而得名。该疾病在非洲热带地区尤为流行，并殃及整个非洲大陆，以及亚洲和南美洲亚热带地区。它对在水中干活的人——如种植水稻的人危害尤甚。（11）

最近几十年来，医学提出了一些可以部分地防治此病的办法，可是这些杀虫剂的破坏性极大，使得防治几乎和疾病一样糟糕。用化学杀剂杀死蜗牛的办法也是如此：灭螺剂杀死了蜗牛，但也杀死了水中的鱼。一年的所得被随后的损失所抵消：血吸虫病依然缠着我们。并且，它曾一度变得更为致命。

更为人知的另一类疾病是锥虫病——包括那加那病（牲畜锥虫病）、昏睡症和南美洲发现的恰加斯氏病等。这些疾病由锥体虫所致。锥体虫是一种寄生性原生物，因其体形似锥而得名，该虫钻孔打洞，危害性极大。锥体虫同样是“一种狡诈的野兽，有改变自身抗原的特异功能”。（12）我们已知有百余种锥体虫，实际也许有千余种。有时你看得见它，有时你根本看不见。由于无法发现它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抵抗这些疾病的唯一希望是，药剂——尚处于实验阶段——和向传病媒介开战。

非洲锥虫病的传病媒介是采采蝇，一种肮脏的小飞虫，如果不能吸食哺乳动物的鲜血，它将干瘪而死。即使在今天，尽管已经有了有

效的药剂，这种飞虫仍然大量繁殖，使得牲畜无法在非洲热带的大片地区生存。人类生存也很艰难。在热带医学和药理学出现以前，整个地区的经济曾被这种灾害所破坏：家畜养殖和运输都不可能；只有价值高、体积小的货物才可运输，而且只能人工搬运。不消说，没有人自愿做这种工作。人们在奴隶制度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而奴隶制本身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瘟疫，使得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陷入无休无止的掠夺和动荡中。所有这些因素阻碍了部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使得依靠外来食物的城市生活几乎无法维系下去。能够促进文化和技术进步的交流因而姗姗来迟 [7] （表1.1列举出关于热带和亚热带疾病的资料）。

表1.1 1990年热带疾病的影响范围及后果

疾病	影响的国家	感染人数 (1000)	危及人数 (1000000)
疟疾	103	270000	2100
血吸虫病	76	200000	600
淋巴丝虫病	76	90000	900
蠕尾线虫病	34	17000	90
恰加斯氏病	21	16000-18000	90
利什曼病	80	12000	350
麻风病	121	10000—12000	1600
非洲昏睡症	36	25	50

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Special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 , 1990 , 引用于Omar Sattaur , “WHO to Speed Up Work on Drugs for Tropical Diseases” , 第17页。

显然，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医学的作用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开始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之时。当然，在早期的年代里，医生尽管心存善意，但由于无知，造成的危害大于好作用。但是，他们确实使人们免除了痛苦。直到19世纪下半叶，病菌学说才为指导性研究、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疾病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医生依靠臆测、经验和想象诊断疾病。所幸的是，这些方法并非偶然得来。它们侧重于观察和现实的原则——只要你见到了我所看到的，

你就可以相信你所见到的——补偿了因不理解而可能造成的失误。

我们以全球最大的人类杀手疟疾为例。在发现病菌之前，医生把发烧归因于沼泽瘴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从近似的现象推断出来并非全无道理。所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被疾病带来的损失吓坏了，他们组织人排干沼泽，祛除瘴气（疟疾）。这些措施也许对空气清洁有些益处，或许没有一点作用，但却驱杀了蚊子。从1846-1848年和1862-1866年两个时期的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军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1%；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发病率下降的幅度更大。

(13) 而且，这些措施产生了有益的副作用。我们并未得到有关平民的统计资料，但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法国殖民者，他们的健康状况肯定有了改善。不论你如何评价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确实使得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寿命得以延长，生活得更健康（某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许会回答说，抽干沼泽给欧洲殖民者增加了可用的土地）。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表明，改善环境是有所收益的：预防得病与得病后进行治疗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百年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一起，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热带和贫穷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与那些自然条件良好、富裕的国家逐渐趋同。1992年，一个出生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共计10亿人口以上）的婴儿可以活到56岁，而一个出生在富国（人口8.28亿）的婴儿可望活到77岁。这个差距（37.5%）并不小，但与以前相比却小得多，而且会更小，因为穷国将变得较富，而富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会达到生物学限度，富裕也带来了环境疾病。(14) 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是婴幼儿（1周岁以下）的看护：最贫穷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从1965年的146‰（中国和印度为114‰），下降至1992年的91‰（印度为79‰，中国为31‰）。该数字与富国的差距依然是明显的：同一时期，富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从25‰降至7‰。(15) 但是，富国的婴儿死亡率不会再有大幅度的下降了。

以上这些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就此心满意足了。现代医学可以保证婴儿存活、人类长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身体健康。确实，

从统计数字上看，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矛盾的。死人并不总是统计为病人。一位调查美国烟草行业的专家满脸严肃地争论道，如果从烟民预期寿命缩短这一点出发，对吸烟严重危害健康的估计应降低。当他这样争辩时，他也暗示了这一点。反之，对热带地区来说，抗生素、预防注射和接种疫苗拯救了人们的生命，但却使他们在病中挣扎求生。热带医学这一专门学科的存在，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性质。该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科研人员、当地病人和各种帝国主义者中间，其代价也是高昂的。（16）

此外，疾病预防花费巨大，治疗则需要长期的药物控制，当地没有相应的设备，病人在使用方面也比较困难。1990年，大多数热带疾病患者生活在人均年收入400美元以下的国家，他们政府在卫生保健上的开支人均不足4美元。据说，制药公司每开发一种药剂或疫苗并将之投入市场，需要耗资一亿美元。显然，制药公司并不愿意迎合这类穷消费者的需要。（17）即使在富国，医疗的费用也可能超过病人自身的负担能力和医疗保险的承受限度。例如，最近对艾滋病的治疗要每年花费10000到15000美元，直到寿终为止——对第三世界的病人来说，这是一笔不敢想象的花费。（18）

最后，地方习惯和风俗可能会促进疾病的蔓延，并阻挠医疗。疾病差不多是由人类行为的方式所造成的，治疗疾病不仅需要医疗，而且需要习惯的转变。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打针吃药容易，改变生活方式难。看一下非洲的艾滋病吧。跟其他地方形成对照的是，这种疾病在非洲的传染对男女一视同仁，多由异性接触滋生。传染病专家仍在寻找答案，已经被提到的因素有：男性杂交的传播；把肛交作为控制生育的技术手段；女性割阴蒂以防止性交欲望和快感，却造成长期创伤。严格来讲，这些问题都非医学所能解决，所以医生所做的不过是减少患者的痛苦、延缓死亡的到来。考虑到这些社会的贫穷，他们能做的并不多。

除物质条件的限制外，现代医学还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阻碍——这种阻碍随处可见，但贫穷、技术落后的社会尤甚。人们宁愿相信江湖秘方和祈祷神灵保佑，也不愿接受外国的、不信神灵的治

疗。信奉科学的西方人将这些做法一概斥为迷信和无知。然而，这些做法也许会带来身心的解脱，而且土产药剂或许不那么纯净和浓缩，有时却真管用。现代科学家和医药公司不惜花费重金研究奇特药品的价值，其原因正在于此。

土著医学的经验主义疗法有时成功，加上人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恨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感情（更不消说旧派医生的特权利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引起对热带（现代）医学的政治和人类学上的批判，以及——且不管如何谨慎——对“替代”疗法的维护。（19）这一派观点认为，热带医学对非洲过分傲慢，蔑视当地人的医疗方法，所作所为少于他们应该做到的。而且，欧洲划定的边界和欧洲式的商业化农业毁灭了阻碍疾病传播媒介（臭虫、寄生虫等）的传统屏障。即使公共卫生“完美理智的”方法也会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体格检查和预防或许被认为是损尊严和盘剥。（20）

水是另一个问题。总体而言，热带地区降水充足，但降水时间往往没有规律、无法预测，且大雨倾盆，雨落如注，多为暴雨。平均计算降水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降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每年、每季乃至每天都有所不同。（21）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90%的降水是时速25毫米的暴风雨，一个小时的降水（25毫米）等于伦敦郊区皇家植物园平均半个月的降水。爪哇的降雨更为急迫，全年降水1/4的时速为60毫米。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丛林和雨林杂生，种植颇为不易：这些物种多样的宝库滋养着各种生物，却偏偏不利于人及其有限的农作物。结果，人和自然都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人们试图砍伐价值连城的树木，从而导致乱砍乱伐和大量浪费。而且，丛林枝繁叶茂对种植极为不利。砍了丛林种植农作物，炙热的阳光直射而下，因为都没有枝叶的阻隔，倾盆大雨冲走了土壤的营养成分，造成新的荒芜。如果土质是黏质，富含铁铝氧化物，暴雨和阳光将在地表烘焙出铁甲般的硬层。这些土地种植两三年后，将被迫永久休耕。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很快就荒芜了，不久滕蔓和卷须爬满了住宅和寺院，窒息了一切。城镇也因此不能兴盛，因为它依赖周围地区的食品供应。现在，非洲的城

城市化经常杂乱无章，严重依赖国外的食品进口。

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干渴的土地变为沙漠，沙漠的沙尘成为难以平息的侵略者，吞噬着沙漠边缘的肥土沃地。1970年前后，撒哈拉沙漠以每小时18英尺（地理学上称为——“驰”）的速度向萨赫勒地区推进。（22）荒野的扩张是所有半干燥气候存在的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平原（记得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俄亥俄流动农工吗？）、以色列的内盖夫以及约旦河东岸、西西伯利亚都有所体现。由于降水较少，这里的农作物死于缺水，表土被风吹走。在温带地区，当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农作物又活了过来；但热带和亚热带沙漠就没有这样宽厚了。

解决降水不规律的办法在于水的储存和浇灌，但这在蒸发速度极高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印度的阿格拉地区，一年之中，降水超过农业当时需要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而这两个月中存留在泥土里的水仅仅三周就会蒸发殆尽。

人类聚居区和文明沿江河而布，并非偶然，因为江河集中了全流域的流水和每年沉积的沃土：如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是最早的营养聚居地——尽管《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埃及人也为饥荒而担忧，并非所有的流域都这么慷慨无私。西非的沃尔特河 [8] 流域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是大不列颠的一半——但在低水位时，在近入海口处竟成了涓涓细流，流量仅为每秒28立方米，与巅峰水位时的每秒3500——9800立方米形成鲜明对照。沃尔特盆地的旱季处在一年最热、风最大的季节，流水蒸发量之高，实令人沮丧。（23）

再就是灾难——这就是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每10年一两次的风灾和旱灾。1961至1970年，22个处在“气候恶劣地区”（易淹、易旱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因飓风、台风、干旱和其他类似的自然灾害损失几达1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同期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贷款总额，它们几乎根本没有剩余资金用于发展。孟加拉国土地与海平面差不多齐平，容易被水淹没。1970年的飓风使50万孟加拉居民丧命，100万

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印度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粮食生产年增长率2%—3%的目标，但是一个恶劣的种植季节就会导致减产15%。（24）甚至对富国而言，这种偶尔突发灾难的代价也是极高的。美国1992年安德鲁飓风以及1993年和1997年中西部的洪水泛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证明了这一点。对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而言，其后果更是残酷无情。如果有摄像机拍摄现场，我们对这些会有所了解；如果没有，谁会听见或看到数百万人被淹和饥饿待毙？如果没有人听见或看到他们的惨象，又有谁会关心呢？

恶劣气候下的生活充满了危险、沮丧和残酷。人类所犯的错误，即使出于善心，也会加重大自然的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善无善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地区依然贫穷；许多甚至比以前更穷了；许多广泛宣传的发展项目遭到了惨败（人们早先听说了许多项目，但它们失败后就没有什么回音了）；人们身体健康的提高被新病的出现和旧病的复发所抵消。

非洲国家与这些灾难的斗争尤为艰苦。尽管它们取得了重大进步，有关死亡率和寿命长短的资料表明，非洲的发病率依然很高，人们营养不足，饥荒连着饥荒，劳动生产率很低。人们一度能够填饱肚子，现今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外国援助大多是粮援。那里的人民只开发了部分潜力，政府也无能为力。就非洲沉重的自然负担而言，非洲人民做到像现在这样，已经是令人惊奇了。

然而，认为地理决定了一切是错误的。其重要性可以降低或规避，尽管要付出代价。科学和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所知越多，就越能够预防疾病、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显然，我们今天可做的多于昨天，对热带地区的预测也好于以前。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方面的进步还需要警觉和关注。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必须取下玫瑰色眼镜，忽视或将问题排除在外，不能消除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裨益。

“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

因为人与人不同，个人经验可能会产生误导。一个人的痛苦是另

一个人的幸福。然而，热量消耗定律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在炎热、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干劲十足。以下是一名孟加拉外交官回忆他本人和他的同胞访问温带地区时的感受：

“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加纳这样的国家，我总是稍一用力或用脑就感到四肢乏力，而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不管长时间坐在案前，还是短途旅行，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据我所知，所有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看到数百个从温带来到热带的人不在空调室的时候，活力荡然无存、筋疲力尽的样子。”

“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热带国家，农民、工人、实际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机关工作者工作节奏非常之慢，经常休息很长时间。而在温带，同样的人的工作节奏非常之快，并且他们浑身充满了活力，很少休息。我从个人和其他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的经历认识到，热带和温带的工作精力与效率存在着如此奇特的差别，绝非全部或主要因为营养水准的不同。” (25)

注释

1 .法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非常自信。埃德蒙·德默林在世纪之交时曾说，“如果人类历史重新开始，而地球表面未曾发生变化，广义而言，它不过是自我重复罢了。”参见*Comment la route cree le type social* (Paris, n.d.), 1, ix.欲了解对地理学中欧洲利益所持的怀疑观点——诋毁之为“培训殖民主义”，可参见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第45页, n.3。

2 .Andrew Kamarck, *The 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3 .参见Arnold Guyot, *The Earth and Man* 一书 (1849; reprinted in 1897), 第251页; Livingstone, “The Moral Discourse of Climate”一文, 第414页。

4 .了解这个故事，可参见Smith, “Academic War”, 第155,

162页S.B.Cohen, “Reflections on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第148页。

5. 所以, 对非洲农业的探讨限定在现有环境下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更容易些, 无疑也更现实些。参见R.P.,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欲了解绝对平等主义者对地理学的看法(没有人比他人的景况好, 因为他不应如此), 参见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一书。

6. David Smith, “Climate, Agricultur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第1-2页。史密斯进一步论证说, 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愿意接受同僚的嘲弄甚至排斥”。

7.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33 (November 1951), 693. 被引用于一本非常有价值、不该被忽略的著作: Andrew Kamarack, *The 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4页。

8. “How Poor Are the Poor Countries?” in Seers and Joy eds, *Development in a Divided World*, 第78页拉蒂·拉姆对赤道地区收入减少和生命缩短的研究“数据确凿, 非常有价值”。参见Rati Ram, “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10页。

9. L. Don Lambert, “The Role of Climate”, 第339页 and n.1. 他把经济学家的片面方法与医生关注好人、给病人开药方时嘱咐要像好人一样生活作了对比, “相关的问题不只一个: 什么原因导致发展? 还有另一个: 什么原因导致停滞?”

10. “The Deadly Hitch-hikers”, *The Economist*, 31 October 1992, 第87页。

11.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一书, 第186页, 其中提到, 中国1264年的大事记中曾描述血吸虫病和其他寄生虫感染的状况, 引自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第6页。

12 .*The Economist* , 27 July 1991 , 第74-75页 , 亦见 Giblin , “Trypanosomiasis Control”一文。

13 .了解军队医院的发病率资料 , 可参见Bone—Curtin , *Death by Migration* , 第65-66页。

14 .以上资料来自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 Table 1 , 第162-163页。

15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 Table 28 , 第258-259页 , and 1994 , Table 27 , 第214-215页。理查德·伊斯特林称这些收益为“死亡率革命”——一个尚在进行的革命。

16 .尽管现代实验技术和安全预防取得了重大进步 , 其代价依然很高。在与致命病毒的斗争中 , 我们发现大多数病毒源于热带。参见 Altman , “Research’s Infection”。

17 .Sattaur , “WHO to Speed Up Work on Drugs for Tropical Diseases” , 第17页有人再次表示异议。参见Blaut , *The Colonizer’s Model* 。布劳特争论说 , 直到最近 , 中纬度气候 (他避免使用“温带”一词) 像热带一样疾病肆虐 , 热带的居民有着针对病菌和寄生虫的适合的免疫功能。“难道这表明 , 热带天生 (固有的 ?) 不健康吗 ? 或许答案是不。”

18 .*New York Times* , 16 February 1997 , o. 1.

19 .就西方科学医学与土著医学的冲突 , 参见Verma , “Western Medicine”一文 , 该文作者认为 , 西方人保留着自己的秘密。西方人是带着医疗方法和印刷书籍到非洲的 , 当地的医师没有书籍 , 只有经验和秘方。西方人希望帮助他们 , 特别是普及种痘。但是 , 西方人教会当地人的比教给他们自己的国民少 , 因为相同的教育将损害他们的权威 (第134页) 。

20 .参见Gwyn Prins , “But What Was the Disease?”第1 64页。普林斯告诉我们 , “健康女神被许多非洲人看做是殖民主义者的娼

妓”。这篇文章并不令人喜欢，它留意到了殖民医学的失败和错误，对传统治疗方法充满同情。作者在科学和某种不同的“知识”之间摇摆：“为什么那些广泛接受的解释假定为普遍不适用呢？”（第178页）然而，从生物学上讲，非洲人与众不同吗？

21 .参见Paul Harrison，“The Curse of the Tropics”，第602页，这些变动事关重大。参见Sah，“Priorities”，第339-340页。该文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人在坦噶尼喀的花生悲剧。由于未估计到降水量的波动，英国人种植的花生颗粒无收（本书第28章将叙及此事）。

22 .Wade，“Sahelian Drought”一文，第234-237页。

23 .Kamarck，*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书，第16页。

24 .引自Raaj Sah，“Prior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一文，第337页。

25 .Bandyopadhyaya，*Climate and World Order* 一本，第6页。

第2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

自然是不平衡的，它使国家或地区有了一种天然差别。故而出现了热带地区不幸的图景，在宜人的温带地区欧洲是最好的，特别是西欧。中国的发展最为早熟，发达的农业文明、人口增长、朝代更迭，自然环境却受到破坏。

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热带的不幸图景和温带远为宜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温带地区以欧洲的自然条件为最佳；在欧洲内部，西欧则独占鳌头。

以气候为例。欧洲确实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虫的大量繁殖。欧洲东部属大陆性气候，越向东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较为温和的冬季也抵御了恼人的疾病发生。这里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热带的疾病一样致命或致人残疾。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是一个例外。有人因此认为，这表明，欧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袭：他们经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险不多，因而未能增强抵抗力。

即使在冬天，西欧的气温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温度划线（等温线），就会发现欧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温线最弯向北部。挪威海岸位于北纬58°到北纬71°，其冬季的平均气温高于相比低20纬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结果，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农作物。

这里的降水相对四季均匀，极少暴雨，“就像来自天堂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是全球最为奇特的降水样式。整个欧亚大陆夏季的降水较为充足，而冬雨却非如此。冬季，来自大西洋的雨水到达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平原时就减弱了，而亚洲的大草原为陆地所包围，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滩”。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为来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国的东南部为墨西哥湾的雨水所救。

欧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这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与古时盛

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粮食的大权落到那些拥有河流和运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现了，因为控制粮食者就是万民之王（《圣经》关于约瑟和法老的记载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这一过程。为了得到食物，饥饿的埃及人把他们的金钱、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献给法老〔《创世纪》47：13-22〕）。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欧洲。

欧洲优越的气候是墨西哥湾暖流的恩赐。这一暖流起源于非洲的热带水域，而后流向西方，越过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后沿东北方向再次横越大西洋。这种顺时针旋转产生于地球自转和暖流水势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则是沿逆时针方向流动。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东流向西方，带着赤道的热量与丰富的海洋生物。

从理论上讲，南北赤道的水流量应该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质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这就是：南美洲大陆板块断裂开来，美洲与非洲大陆剥离，特别是美洲最东部的巴西凸了出来（与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东部凹了进去）。巴西的凸出，拦腰斩断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将其中约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从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团，最终流向爱尔兰和挪威的海岸。这种地质上的幸运，使西欧一年四季和风细雨，蒸发缓慢，欧洲因之农业丰富，牛肥羊壮，阔叶林广布。

当然，欧洲气候也并非整齐划一。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为均匀，潮湿的西风使土地非常湿润。而到东部的波兰和俄罗斯大平原，气候逐渐具有“大陆性”，湿度和温度差别极大。地中海沿岸的陆地也是如此：温度适宜，但降水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意大利和希腊的农作物产量不高，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的所得大于种植粮食，畜牧业的收益大于农业。有人据此认为，相对于北欧而言，南欧这些恶劣的地理特点导致贫穷，甚至工业停滞⁽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该问题，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

果真如此，为什么欧洲发展得那么晚，比埃及和苏美尔晚了几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阔叶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对比印度人

和英国人时说得非常之好：“当我们还生活在森林里时……他们作为开化的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民族已经千百年了。”⁽²⁾直到公元前1000年，欧洲人有了铁制工具之后，他们才能开垦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原本丰饶的平原。并非偶然的是，这些早年的欧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们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这里并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无冶铁技术的条件下，这里无疑是最适合的。之后，欧洲才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有多余的粮食供应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还是保留了下来；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的人口减少了，森林面积反而有所扩大。有许多民间传奇故事流传下来，如《小红帽》、《汉塞尔和格雷特儿》、《拇指人汤姆》，还有其他近似的有关森林、野狼、巫师和危险的传说故事。

这些传说故事表明，若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如抒情诗般美妙，是错误的。欧洲也曾忍受过饥荒和疾病，经历过长期的寒冷和温热，遭受过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农民可以经受一季或两季坏收成，此后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时，森林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供给人们浆果、于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稳定的降水也意味着农业并非在边缘挣扎，一段干旱之后，等雨季一到，庄稼再次茁壮成长。人们不妨看看那些干燥地区，那里的农田种植是一场赌博，沃土有变为沙漠的危险——不仅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阿拉伯沙漠北部边缘的约旦河东岸，还有西经100°以西的美国大平原、赫鲁晓夫企图种植小麦的西伯利亚草原、贝加尔湖周围的棉田——就会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么狭窄。

有利的环境使欧洲人可以让许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饲养家畜时无须到远方找寻牧场。这里饲养的家畜比别处的健壮、高大。曾蹂躏大草原的蒙古马，比欧洲的战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马匹也是这样。由于气候条件，印度的很多地区不能饲养马匹。当然，动物大小各有其优越之处。蒙古和鞑靼马在空旷如海的内陆行动迅速，可以用来迅捷而沉重地袭击周围定居的民族。而欧洲马驮着身披铠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发动进攻时威风八面，不可抵抗。

这两种战术的冲突引起了人类历史上几场最伟大的交战。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宫廷总管查理·马泰尔带领一队骑士在图尔附近与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战，从而为似乎无敌的穆斯林扩张设下了一道西部路障。^[9] 约450多年之后，在1187年的海廷战役中，萨拉丁率领的穆斯林军队让欧洲骑士冲击他们的阵地，在最后一刻闪开一条通道让骑士们冲过去。这时，十字军的战马已驮着骑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驰了一整天，疲惫不堪。穆斯林军队再逼近过来，切断了欧洲骑士们的退路。于是，十字军在圣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权就全部崩溃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胜利属于欧洲人。大动物在从事繁重劳动和交通方面具有优势。挽马可用于北部大平原黏质土的耕种（马比牛力量大，行动更迅速，可以在较少的时间干完更多的活），并将新鲜农作物运送到城镇集市上。过后，它们还可以将野战炮运往战场，投入战斗。欧洲的牲畜体大，能够产生大量的粪肥（东亚农田多用人类粪便）。这使农田趋于集约耕种，农作物收成更好，从而形成螺旋上升趋势。结果，欧洲人的饮食富含奶制品、肉和动物蛋白，他们长得更为健硕，而且相对而言，较少受到肆虐于中国、印度的那种虫害的袭击^[10]（几年之前，1/5接受过输血的中国人得了肝炎，这是因为献血者的肝脏为寄生虫所蹂躏，而血液筛分不完善⁽³⁾）。欧洲人身体更健康，寿命更长，更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潜力。^{[11] (4)}

这并不是说，当年欧洲农田的平均单位产量或人均产出高于温带灌溉地区。家畜粪便、耕地（将地下的营养翻上来）和休耕的益处，都不能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并论，甚至不能与黄河和长江的冲积平原相比，由于常年高温，那些地方每年可种植数季。^[12] 另一方面，由于水量或缺或多，以及敌对势力对灌溉系统的破坏行动，河边的农田耕种不时被打断，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多雨气候地区的旱季或湿季。^[13] 平均数是有欺骗性的。季风雨季是非常慷慨的，但每一季节、每年都有所变化。洪水和干旱是正常现象。在中国和印度，灾后的修修补补是紧迫大事。即使没有自然灾害的发生，雨季耕作和湿季收获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单位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比非洲高30倍，比欧洲高40倍，比美国

高100倍。(5) 所以，不管物质条件如何，人们都早婚和几乎人人都结婚。[14]

与之相对照，基督教徒特别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则接受了文身、晚婚（直到自己能负担得起时才结婚）观念，孩子年龄也相差较大。中世纪时，物资短缺，欧洲人视孩子为潜在的负担。我们不由回想起《汉塞尔和格雷特尔》和《拇指人汤姆》——孩子被遗弃在森林里死去，父母走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河流流域文化的人口数量最多，而欧洲人多是小家庭，继承权和家庭联系不分割。

所以，单单是数字说明不了问题。有人或许说，如果将健康和畜力考虑在内，与人口远为众多的亚洲相比，欧洲投入农业（每耕种单位）的能量更多。众生芸芸，亚洲的统治者热衷于修造外观宏大的建筑物，驱使许多劳动力为其卖命。这些终成欧洲游客为之惊诧不已的人间奇迹和丑闻——旅游胜地，而其国内极端奢华和赤贫如洗的鲜明对比更为人所惊叹。“亚洲宫廷、寺庙、陵墓和水利工程之壮丽，以及奢侈豪华和巧夺天工之作，似乎只能证明，如果石头多的话，这种政治组织会从石头中榨出血来”。[15]

欧洲人不曾需要建金字塔。[16] 欧洲，特别是西欧，非常幸运。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国。(6)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7)

大约2000年前，中国华北的人口约为6000万——对这块土地而言，人口太太多了。在随后的1000年里，中国的人口变动不大。但从10世纪到13世纪初，其人口近12000万，几乎翻了一番。此后，主要是由于瘟疫肆虐（瘟疫也曾侵袭过欧洲和中东），中国的人口回落，14世纪初降至6500-8000万。1650年，中国人口又升至10000-15000万，1750年20000-25000万，18世纪末超过30000万，1850年约为

40000万，1950年65000万。今天，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00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这种惊人的增长是长期以来（直至今日）的生育观念之结果：早婚，几乎人人都结婚、多子多孙。人口多，要求产粮多；产粮多，又要求劳力多。单调重复的游戏。

这种观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那时，亚洲平原东疆的某些游牧民族放弃牧人生活，定居而从事产出更多的农业。从一开始，他们的酋长就看到了人口数量、粮食和权力的联系。酋长们的政治智慧大概是由以下三点推断而来：（1）人口增长意味着可动员的潜在耕种者增多，可指派（种植）耕地；（2）储存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用；（3）粮食供应集中于固定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帐篷）。

据史书记载，公元200年前后，曹操曾说，“国家的建立需要勇士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秦人极其重视农业，由此建立了帝国。汉武帝利用军队屯田荡平西部边境。此前代所用之良方”。是年，曹操召集民众屯田许都（河南中部），获粮万担。而后，他以此为基地，向四方推广屯田，而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结果，他荡平草寇（竞争对手的军队），四海升平。半个世纪之后，“统治者为了荡平‘草寇’，期望扩展农业种植区，积蓄粮食供应”。为此，“还需要开掘运河，发展农业灌溉，给军队提供大批的粮食供应，并作为政府运输粮草的通道”。他们计算“六七年间将在淮水囤积3000万担粮食，足够10万人5年之用。因之，吴国将被征服，而魏军无往不胜”。事态的发展确如所料。（8）

地无人耕，人无粮供。这种反复无常的波动，必然导致有些时期和有些地方出现贫困，乃至饥荒。家畜饲养更无发展余地。约公元300年前后，曾有史官抱怨：

“三魏状况尤为恶劣，猪、羊和马的牧地却非常广阔。所有这些都应宰杀，以供无地或少地者填饱肚子……所有牧畜都应迁走，而让马、牛、猪和羊到空地上吃草，而四处流浪寻找生计的人们可由国家授予土地。”（9）

显然，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有足够迅猛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追求

新土地和高产出，役使人民，以求养活人民。在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统治期间，政府不再冒任何风险。没有牛的农民被迫出卖劳动，以换取借牛犁田。家庭都要登记，清查人数，并将应负劳役登记在册。“人们的名字都登记在负劳役的账本上，以区分他们劳动的好坏。他们被禁止喝酒、看戏，或弃农去酿酒和经商。”^[10]

那时，人们没有时间去娱乐和挣钱，只有种田和生养后代一条生活途径了。

长远观之，这一单调乏味的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 中国人——他们自称为汉人——起源于亚洲北部大平原不毛之地边缘上的树林之中。他们筚路蓝缕，开垦荒地；然而，由于降水不规律，树木不茂盛，因而水土流失严重，收成很低。西部的开阔地带不能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所以他们随后南迁到黄河上游，在黄土上开垦农业。^[17]

2. 黄土种植属于用水和灌溉技术的农业。它为开垦更湿润、更富饶、也更具不确定性的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河谷环境作了准备。^[18]人们在这里种稻——一种卡路里含量更高的农作物，当然，传统的粮食作物——粟、高粱、大麦——仍然重要。小麦是以后才出现的粮食作物。到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人已学会很多农业技术：通过人工手段和安排来改善供水和用水；使用驮兽（包括水牛）犁地；精密除草；将动物粪便和人粪用作肥料。所有这些都需要繁重的劳动，但回报甚丰。产量高达每公顷1000升，有相当多的余粮来供给那些不事稼穡的人。中国的能源系统进入良性循环。

3. 公元8-13世纪，农业发生第二次革命。汉族人不断南移，进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将那些刀耕火种、无固定住所当地土著赶到一旁，让他们最后在深山或不适宜精细耕作的地方安家。现在，他们仍生活在那里，是人口最多的一些少数民族。

这里气候更湿润温暖，冬季气候温和，夏季漫长，每年可以种植两季。例如，冬小麦在5月收割，可以在6月种植夏季稻，10月或11

月收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水田中种稻。在选用快熟品种后，每年可收获三季甚至更多。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收集和捡拾每一粒粪便和排泄物；经常除草；培育秧苗（密度非常高），而后移植秧苗（需要更多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田地。用经济学术语讲，他们用劳动代替了土地，中国每种植一公顷稻田需要60-80个农民（而美国只需要一人），其产量比相当不错的旱田种植要高出2-3倍——达每公顷2700升。最高极限是，每平方公里农田产出的粮食可供养1000人。“13世纪，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复杂、高级的农业，唯有印度可与之相提并论。”^{（11）} 这些并未给牲畜繁殖留下多少空间。当然，耕田驮物的牲畜和战马除外。猪——富人餐桌上肉的来源，以废物为食——也是一个例外。但是，牛羊不多：中国的饮食中少有牛奶制品和动物蛋白，羊毛织成的衣服更鲜为人知。当英国人试图将羊毛出售给中国人时，他们被告知，对习惯穿棉织品和丝制品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衣服太痒人了。确实如此。

4.此后的发现略微扩充了中国粮仓。在17和18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地方引进了新的农作物——花生、土豆、红薯和山药。这些农作物在干燥的高地生长得非常好，但归根到底，它们不过是在稻米供应不足时做补充之用。^{〔19〕}

5.绝大部分食物依赖水稻产生了好坏兼而有之的后果。水稻的某些营养成分（特别是磷酸盐和碳酸钾）低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每英亩水稻所包含的热量大于小麦、黑麦和荞麦等温带粮食作物；但其蛋白质含量仅相当于以上农作物的一半。^{（12）} 水稻是一种生长力强的作物，可在各种地方种植，也是唯一一种只要水分充足在贫瘠土壤里也能高产的粮食作物。另一方面，由于人在水田中劳作，人粪被用做肥料，劳动者极易受到血吸虫和其他肮脏的寄生虫的袭击，从而导致劳动力损失，增加劳动需求。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种劳动密集型、水利集中型能源模式影响深远。一方面，劳动依赖当地人民，这意味着中国永远不会让外国奴隶加入到中国的劳动大军里来（当然，尽管许多中国人不是私人奴隶，但也曾有劳役在身，不得解脱）。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绝对增加

了。对分布较稀、组织较松和技术不那么发达的族群而言，要想阻挡汉人向外开拓是极其困难的。

同时，对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区的权力，从而增强了帝国权威。欧洲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与权力的这一联系，孟德斯鸠曾言及此事，为黑格尔所重复、马克思所效仿。此后，一位名叫卡尔·韦特福格尔的学者就此问题作了最详细的分析，他把这种以水为基础的统治，以及它所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称为东方专制（13）（另一些人 also 提出类似的看法，但谨慎地避免提及这些不祥的文化和社会内涵）。（14）

一代西方中国专家热衷于政治的正确（认为毛主义及其晚年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很快为中国对实行民主的承诺作辩护。他们把水利命题批判得体无完肤。韦特福格尔是他们选中的靶子。一位学者从他的命题中看到了新帝国主义的一丝伪装：“显然，该理论所传达的行动信息是，建议实行干涉并为干涉正名。”（15）这些表示忠心的言论所想要说服的，恐怕不是西方读者，而是中国读者，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对韦特福格尔水利论提出批评的人，都想要得到一个对水利论感到生气的政权的好感，从那个政权得到去那里访问的邀请。

事实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反对水利论者指出，中国早年的人口聚居地并不严重依赖灌溉。那时甚至以后，用水大多来自水井，而不是从远方引水来用；而且，用水的管理常常由当地人设计和资助——似乎这些活动能多多少少驳倒以下事实，即水利方面，尤其是修建大堤、大坝、运河、防汛、灾后修复和赈济等重大任务所需劳力的征召和调遣，其最终责任都在于上级政府。这种干预非地方政府所能承办。赌注太高了。一方面，改变自然越是胆大，失败或灾难的范围及代价也越大。（16）另一方面，只有粮食盈余才能保证政府的运转机制。

这就是现实。一批学者在驳斥韦特福格尔的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可灌溉的土地、充足的社会领导权和国家控制，等等。”（17）信哉斯言。

注释：

1 .Tortell , “Patterns of Economic Retardation and Recovery in South-Western Europe”一文。

2 .Edmund Burke , “Speech on Mr.Fox's East India Bill” , 1 December 1783.

3 .Charlene L.Fu , “China Paper Details Risk of Hepatitis in Transfusions” , Boston Globe , 30 June 1993 , 第2页。

4 .关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对经济状况的影响, 参见Alan Berg , “Malnutri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 第126-129页。

5 .Oshima , *Economic Growth* 一书 , 第21页。

6 .Lattimore , *Inner Asian Frontiers* 一书 , 第23页。

7 .Leeming , *Changing Geography* 一书 , 第11-12页。中国约65%的领土是山脉、丘陵和高原。

8 .转引自Elvin ,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一书 , 第37页。

9 .转引自Elvin , 同上 , 第39页。

10 .转引自Elvin , 同上 , 第45页。

11 .Jones , *European Miracle* .

12 .转引自Chang , “Agricultural Potential” , 第338页。又见Debeir, et al. , *In the Servitude of Power* , 第47页 , 该书提到 , 另一方面 , 稻谷 (未脱粒的水稻) 蛋白质质量高 , 富含氨基酸 , 因而优于小麦和玉米。

13 .Karl A.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

14 .参见Chi Ch'ao-ting ,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 作者指出粮食和权力的联系：谁控制了大产粮区，谁就握有通往王国的钥匙。

15 .March , *The Idea of China* , 第94-95页。

16 .参见Stevens , “The High Risks of Denying Rivers Their Flood Plains”。

17 .Debeir et al. , *In the Servitude of Power* , 第50页。

第3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

1000年前的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500年后欧洲却完全有可能主宰世界。欧洲也曾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和痛苦，但欧洲是幸运的，好运气在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随后的虚弱和分裂，也在于尘世与宗教的分离。

欧洲是幸运的，但幸运不过是一个开端。1000年前的人绝对意识不到，欧亚大陆西端的这块凸出部分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用今天经济历史学家流行的术语来说，那时，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然而，500年之后，这种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欧洲曾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直到10世纪，才从中解脱出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称北欧海盗，曾驾驶着轻快帆船，穿过汹涌的海浪，驶进浅河，深入到内地抢劫掠夺，袭击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触角远至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部分人则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为那里的新统治阶级（称罗斯人〔Rus〕，俄罗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来，他们统治那块忧伤的土地近700年之久），最终几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们手段之残酷如此令人发指（他们将婴儿抛向空中，而后用长矛接住；或将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来取乐），以至于当地人听到海盗要来的消息，就吓得拔腿跑散，他们的领袖、包括精神领袖，则带着细软匆忙逃亡。当地的神父们确实撰写了新的祷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坛并非理想的避难所，因为海盗知道战利品在何处隐藏，他们上岸之后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来自海上的强盗还有撒拉逊人（摩尔人），他们穿越地中海，在阿尔卑斯山脉和蓝岸地区安营扎寨，抢劫南欧和北欧之间的商路。他们行动快捷，难以靠近；他们驻地与他们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连，难以征服。民间传说，时至今日，阿尔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肤色和

外表还带有马格里布人的特征。

最后，行动迅捷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从东方的陆路入侵。他们讲乌拉尔阿尔泰语（突厥语一旁支），这些亚洲异教徒一再入侵，一旦听到欧洲内部冲突或王朝争夺的消息，他们就选定侵略目标，从多瑙河边的营地出发，曾一鼓作气侵入到法兰西东部或意大利山脚下。他们与北欧海盗不同：北欧海盗为了搜寻和掠夺更多的财物，往往在驻扎营地经营数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为英格兰部分地区、诺曼底（以他们的称呼命名）、西西里的统治者。而匈牙利人则在抢劫后用货车和驮兽将战利品和奴隶拉走，并不定居下来。

没有人会永远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欧洲人学会了对抗入侵者的袭击，有时在领导人的指挥下，有时并无领导人的帮助，因为后者经常背着当地农民与入侵者达成某种交易。村民们并非在村外抵抗海盗，而是引他们入村，诱捕或从四面八方伏击他们。^[20] 匈牙利人进村极快，当地人来不及对付，但他们出村庄就慢了。这些傲慢而又包袱过重的侵略者遭到过几次伏击之后，终于感到有必要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逊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像在他们的穆斯林老家一样，用军队护送将骡子和货车（大篷车）撤走。简言之，欧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受到敌人总部所犯错误的协助。历经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来，并逐步驯化了。王国的宫廷代替了游牧者的帐篷，他们的统治者也对那些昂首阔步、自视甚高的“将领”失望了。这些将领豢养着私人部队，胆大妄为，四处掠夺战利品；飞扬跋扈，威胁着和平。国王们不需要再豢养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险与奖赏并存的生涯，也使这些流氓和海盗明白了，做国内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国外杀羊的军阀获利更多。

据称，正是外来危险的消失才促使欧洲走上进步和发展之路。经典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机遇和安全条件具备，增长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碍，就自然会发展。其他人则争辩说，免除入侵之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企业进取精神，但企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且，中世纪的欧洲不乏对这种进取

心的阻碍。

要了解这一进程的主要特征，就必须把中世纪看做地中海——希腊、而后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欧洲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近代欧洲之间的桥梁。在中世纪的年代里，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社会诞生了，并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确实，欧洲一直自视与东方的社会不同。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1）据称，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尽管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和禁止妇女参与政治（当然并未禁止她们在公共场合出现），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大打折扣。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确实，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的代表，与其臣民显然不同，只要高兴，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荣辱。统治者的观点就是臣仆的观点。军事贵族拥有武器的垄断权，一般民众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们、激起他们的贪心甚至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看他们一眼，就属无礼，将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2）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除增加统治者的欢乐以外，普通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能让老百姓自行其是。巴尔赫（中亚）人民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在他们的统治者离国与印度人作战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利

用这个机会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居民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拼死保卫统治者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回来并重新夺回了城市。当他听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迹时，他斥责了他们。他训斥说，战争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责任是臣服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并交税纳粮。民众领袖乖乖道歉，并发誓不再胆大妄为。（3）

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至压榨过重，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古希腊人将自由民与非自由民截然分开，并非仅着眼于物质所得的标准（他们将经贸与希腊城里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和其他下民相联系，并不特别看重经济实力），甚至也并非仅从他们制度的优势着眼，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制度错误，将其视为暴政。然而，希腊人也曾屈从于专制，尤其在亚历山大所创建的及其亚洲、埃及继任者所统治的帝国的时代；其后的罗马人也同样非常轻易地滑向了专制暴政。最终，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与东方文明有些相像——一个专制君主为首，领着一小撮由随从、仆人和奴隶包围着的权贵。但不过相像罢了。持不同政见者知道这是错误的，大声疾呼，撰文讨伐，并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惩罚。共和的理想就这样死去了。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产权的概念尚有待于重新挖掘和认定。该时代——我们称为中世纪——是一个过渡时代，是古典遗产、日耳曼部落法律和习俗以及今天我们所称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混合物。所有这些都支持私有财产制度。日耳曼习俗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习俗，每一个武士只有不多的财产——以利于经常搬动。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和有价值的东西足以引出所有权问题或引出权势野心。[21]

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获取政治权力的动机，或者说，这些游牧民族的状况是不变的。在他们流浪和征服的进程中，这些问题确实出现了。法文学校的学生都听说过苏瓦松花瓶的故事。这个漂亮的花瓶是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作战时从教堂抢劫来的。首领克洛维为了赢得一个基督教女人的欢心，准备将之归还教堂。那个获得花瓶（或在分赃时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绝了。为证明花瓶属于他，该士兵当着克洛维的面摔碎了花瓶。而且，他告诉首领，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下一次部队列队时，克洛维在这个士兵前停下，问他的草鞋出了什么毛病，当士兵弯腰看鞋时，克洛维用战斧劈开了他的头颅。确实，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是属于我的。 [22]

可见，有些紧张与暧昧。但是，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分裂和总体不安定造成的压抑。罗马帝国终结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尚鞭长莫及。从原则上讲，权力来自一个群体或群体内精英阶层一致同意的忠顺，因而是有限的。确实，选举的传统屈服于世袭统治（日耳曼人受罗马典范甚或原则的影响很深）。但是，昔日的习俗与现象已荡然无存，甚至是生来就被指定的统治者，在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属于尘世，是人而非神。他的权力也如此。

的确有人寻求恢复昔日的帝国。罗马重生的梦想从未泯灭。（4）如果他们真成功了，就会有独裁的再现。然而，由于通讯不便、交通不畅、法治的挑战以及地方统治权的存在，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现实战胜了想象。其间，私有财产得以拥有和维护。有时，私有财产被武力掠夺，就像今天有人被勒死或抢劫一样。然而，这一原则从未死去：财产是一种权利，没收并不能改变它，更不用说抢劫了。

产权的概念可追溯到《圣经》所述的年代，并为基督教义所传承和完善。希伯来人厌恶独裁，甚至自己的独裁也不例外，这一思想形成于埃及和沙漠地区。还有比这更顽强的民族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中对民众创造力的反应与所有权的神圣直接相关。神甫可拉在沙漠里领导了反抗摩西的暴动，指控摩西擅自专权，摩西自我辩护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民数记》16章15节）。同样，当以色列人在圣地建国，并要求国王统治

时，先知撒母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警告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他说，国王并不像他一样。“我拿了谁的牛？我拿了谁的羊呢？”（《撒母耳记》12章第3节）。

这一传统使犹太人与周围王国的臣民有所不同，确实招致了那些统治者的愤恨。谁需要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呢？当共同的信念形成教会，特别是当教会成为专制帝国官方的、拥有特权的宗教时，该传统就被淹没在基督教之中了。教会不能忘恩负义。而且，这些文字未曾出版发行，因为教会早就规定，只有合格的人，比如说某些神职人员，才能知道《圣经》。《圣经》宣扬平等主义规则和道义，先知们曾驳斥权势、赞扬卑微，故而招致信民的混乱以及对尘世权威的误解。只有经过审查和去恶之后，才能传授于俗从。所以，直到华尔多教派（华尔多，约1175年）、洛拉德教派（威克利夫，约1376年）、路德教派（1519年起）、加尔文教派（16世纪中叶）等异端邪说——这些教派重视个人宗教信仰以及将《圣经》翻译为白话——出现之后，这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才为欧洲的政治意识所明确采纳，提醒统治者，他们只有行为端正才能拥有上帝赋予的财产和权力。烦人的教义。

然而，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真开始斥责尘世统治者的权利——当然，是斥责比罗马皇帝小一些的一般君主（东正教从未斥责拜占庭的罗马皇帝 [23] ）。

它暗含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教会自己宣布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这一古老的犹太教原则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尘世代理人这一基督教新原则得以强调。尘世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甚至是教会——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也不能蔑视权利，随心所欲。信民捐赠财产的转让带来详尽的文书工作，证明了这一行动的良好效应和程序的适当。

所有这一切导致欧洲与周围文明迥然不同。

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政府并不依赖良好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个人美德。公元前3世纪时，

中国某位道德家告诉一位诸侯，统治并不依靠能否赢得臣民的爱戴，而取决于能否确保臣民的顺从。国君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帝国广布耳目。“尽管他身居深宫，但什么都逃不过他，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一切。”（5）该系统依赖活耳目的诚实和能力。统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属掌握之中，因为后者瞒天过海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万幸！

有一位学者不喜欢婉转辞令，径直称该系统为“极权”：

没有个人行为或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能够逃过官方的管理。在最高层是一系列的国家垄断……但是，莫洛克神 [24] 国家的触角、官僚体系的无穷能量远远超过这些。这种福利国家监督其臣民从生到死的最细微的举动。（6）

专制同样盛行于欧洲。但是，法律、领土瓜分、国内中央领主（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的程度。（7）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关心好的臣民。如果对他们不友好，他们就可能迁移到异国。

统一的帝国并不惧怕老百姓逃走。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帝国，自视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园，国土之外皆是蛮荒。帝国臣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象征性的边界也就足够，例如从长城到大海的一道矮墙，即“柳条边”，将中国与北方蒙古——鞑靼草原分割开来。清朝的乾隆皇帝曾赋诗言及此事。（8）

欧洲各地社会的权力纷争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组织形式称为Commune）这一欧洲特有现象的出现。城市当然随处可见——农业产出的盈余可以维持统治者、士兵、工匠和其他非农业人口的生存时，就会有城市出现。许多城市在市场等方面具有了相当大的重要性，更不消说它们作为行政中心的作用。但是类似Commune的组织从未出现在西欧之外的国家里。（9）

首先，Commune的本质源自其经济功能：这些单位是“商人治、商人有、商人享”。（10）其次，其本质在于本身独特的民事权力：能

赋予居民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对经商和免除外来干预至关重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重于一切，因为当时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口仍然由于对当地贵族的人身依附，或者由于土地租契，而受到奴役。城市却因此变成通往自由之路，像是在覆盖农村的囚幕中捅开的洞。中世纪出现的一句名言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真有这么一个故事：佛兰德伯爵在布鲁日城内的市场上发现了一个逃跑掉的农奴，要把他抓回去，可是城里的中产阶级却把伯爵和他的爪牙们都赶出了城。

整个社会都感受到城市这一功能带来的后果。由于拥有这一特许权，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避难者的家园和城乡交换的聚集地。迁移到城市居住提高了迁居者及其留在乡村的亲人的收入和地位（但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未改善。城市肮脏，拥挤，易于传染疾病，所以只有靠不断有人迁人才能维持和增加人口数目）。西欧的农奴解放，是直接由于获得公民权的农村和城市社区接二连三地出现，而且密集和彼此靠近。在那些城镇不多和不自由的地区，如东欧，农奴制继续存在，其状况还有所恶化。

为什么统治者赋予乡民和城镇居民这些权利，实际上放弃（转让）了他们自己的若干权力？原因有二：其一，新的土地、新的农作物、贸易和市场带来了税收，而税收带来了权力（11）（还有享乐）。其二，矛盾的是，统治者希望增加王室在国内的权力，而自由农（注意：我没有使用“农民”一词）和城镇居民（中产阶级）是土地贵族的天敌，会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室和其他君主。

请进一步注意：欧洲统治者和力图有所作为的领主为寻求增加税收，不得不利用参政权、自由权和特权——简言之，讨价还价——以吸引参与者。他们必须说服人们参加纳税人的行列（12）（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将成千成万的人驱赶到田地里，让他们种植作物）。而且，免除物质负担和赋予经济特权，常常导致政治让步和自治。在这里，创造性来自下面，这恰是欧洲模式的本质特征。其中暗含的是权利和契约意识——谈判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自由与经济活动安全的获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的好运气在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随后的虚弱与分裂（数代古典学派和拉丁教师曾为之神伤不已）。罗马帝国的统一、权威和秩序的梦想（“罗马治下的和平”）依然存在，实际上延续至今。毕竟，分裂一直被认为是大灾难和冲突的根源。今日欧洲的联合被视为治愈昨日战争创伤的良药，并非偶然。然而，在古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中世纪，分裂是恣意妄为的暴戾行为的急刹车。政治敌对和退出权起了重大作用。（13）

另一项分离——尘世与宗教的分离也起了推动作用。在穆斯林社会，宗教在原则上至高无上，是圣人统治的理想政府。与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渴望帝国宽容，很早就将上帝和凯撒区分开来，各得其所。这并未阻止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双重最高权威是最不稳定的，其中之一必将有所付出。最终，教会屈服了，将属于凯撒的归还了凯撒，并让出相当大部分原属于上帝的权利。其中包括放弃了大一统的正统地位：权威分立，导致异议纷纷出现。这也许不利于保持确定性和一致性，但却肯定有利于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

在此，分裂再次起了作用。教会在某些国家——南欧那些国家更明显——仍成功地维护着政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因而，欧洲有些地区发展出一种潜在的自由思想。它以后在宗教改革中表现出来。但在此之前，欧洲就已经免除了思想控制。

至于中国，那里没有稳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宗教信仰方面异常宽容，但帝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吏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窒息了技术上的创新。这是一个在文化和学术上保持原状稳定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很少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不可能阻遏一切变化）；但是当变化威胁现状时，国家就会介入，以恢复秩序。正是这种固有的道德准则、伦理的统一与成熟以及完全感和优越感使得中国厌恶外来知识与方法，即使有用者亦不例外。

分裂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由于权威非集中化，欧洲得以免于一击即溃。各帝国历史中不乏这样的突变：战败一两次，整个帝国就土崩

瓦解。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和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后的波斯；阿拉里克 [25] 掠夺（公元410年）后的罗马帝国；卡迪西亚战役（公元637年）和内哈万德战役（公元642年）后的萨珊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王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等，莫不如此。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并未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26] 13世纪，来自亚洲草原的蒙古入侵者迅速摧毁了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各斯拉夫人和哈扎尔人的王国。但他们在与罗马帝国解体后建立的诸国遭遇以前，还不得不首先闯过中欧诸国，包括早期入侵者——如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建立的新王国。如果不是国内出现纷争转移了蒙古人的视线，他们会一路所向披靡。但是，他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森林地区。此后不久，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亚为大本营，向欧洲大举入侵，占领了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河谷，两次攻抵日耳曼东疆首府维也纳城墙之下。在侵略进程中，他们征服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内部纷争不断的民族。然而，他们的侵略就到此为止，当他们抵达维也纳城墙时，他们的资源供应已达极限。 [27]

当然，这些帝国脆弱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剥削成性，贪得无厌，而且臣民对统治者的冷漠：一个专制君主与下一个专制君主并无二致；外来的统治家族都是傲慢无比、掠夺成性。为什么波斯的居民要关心亚历山大攻击下的大流士命运如何？或900年之后受制于阿拉伯人的萨珊王室又怎样了？为什么罗马帝国末期，劳累、受尽压迫的罗马“公民”要关心帝国是否会崩溃？或者说，为什么墨西哥的臣属部落要关心蒙提祖马的命运？古希腊人（公元5世纪之前的希腊人）自视为反对亚洲暴政的自由卫士，将亚洲人这种冷漠作为他们的秘密武器：

有国王的地方，就有最胆小的懦夫。因为人的心灵被奴役，拒绝冒险，不愿为他人增加权势去卖命。但是，独立的人民是为自己冒险，不是为了他人，愿意并渴望冒险并享受胜利的果实。 (14)

一旦欧洲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相当安全而无外患之忧（自11世纪始），他们就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非其他地方所拥有的机遇。当然，欧洲内部的暴力事件从未停息过。10世纪和11世纪，土匪豪强横行霸道，最终激起公愤，在教会支持下，公众纷纷举行“和平”集会，缓和了紧张局势，较强的中央政府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起来，自上至下镇压了动乱。（15）秩序赢得了时间，带来了金钱。所以，争斗转向边疆之外（如十字军东征）。经济学家指出，一旦外来震荡结束，一个系统就会照看内部的麻烦制造者。

迄至14世纪中叶的较长一段时期，欧洲人口增多，经济得到发展。此后，欧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袭。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导致欧洲1/3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后遗症造成的损失，人口死了一半。这是一次严重挫折，但它并未终结欧洲的发展。其后的150年里，欧洲得以重建，技术更显进步，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这一二百年间欧洲文明进一步扩展，已胜过周围地区，从而开始了海外探险和征服。

欧洲几个世纪的成熟（公元1000-1500年）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经历了生产、收获和开支的整个过程的转变，系新石器革命以来所未有。新石器革命（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完成历经数千年，其重点是农业的发明和野生动物的驯养，二者极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都将重心放在能量供应上，这会保障和改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这一转变将人们从狩猎和采集中解脱出来，极大地促进了营养的供应，使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镇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文化技术的交流和丰富。

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同样建立在能量生产和应用的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应上，这是种植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发明”，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轮式深耕铁铧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带来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丰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纪，这种铁犁已在罗亚尔河 [28] 以北的欧洲大陆推广使用，犁开了丰饶的河谷，开垦林地，围

海造田。过去罗马木犁只能用于地中海沿岸砂砾土壤，而对黏质土壤无能为力，但到这时，黏土也被开垦为良田了。

使用轮式铁铧犁耕种黏土，需要相配的畜力。我们曾提到，这里的耕牛健壮，在厩中喂养，与别处的不同；这里的驮马也许不比耕牛壮，但力气更大。这些活的发动机为土地广阔、劳动力缺乏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为时间也是不足的，农业生产有播种、收获的高峰期，人们必须抓住好天气，尽快播种或收割。欧洲的社区农业尤为如此，因为这里土地分散和交错，田野开阔，使得许多人要来回忙忙碌碌，一个耕农忙导致所有邻居忙。强壮而行动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观，农民集中财力共同饲养家畜。

更集约的耕种方式，特别是从双田轮作制（一半田地耕种，另一半则休耕一年）向三田轮作制（ $1/3$ 冬种， $1/3$ 春播，其余 $1/3$ 休耕）的转化，既是先进技术的应用结果，也是先进技术得以进步的原因。这种耕作方式使得农田产出率增加 $1/3$ （所有可耕地的 $1/6$ ，却是过去双田制时耕种地的 $1/3$ ），同时也对提高家畜饲养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应，促进了农业产出，形成了良性循环。由于土地分配和畜力集体共用的特征，这一变化呼唤强有力的社区领导与合作，因为有示范和结果而易于推行。

很难说，人口压力的反应和增加产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显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来已不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这几百年期间，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毁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坝、排水、抽水的办法变水域或沼泽为农田。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金，它们的成功不仅证明个人和集体发挥了创造性，而且证明当时的社会巧妙地学习用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别是，发明并使用了忠实而不知疲倦的风车，这是在沼泽和低地成功排水的关键。正是风车造就了荷兰。

历史学家强调土地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人们被迫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于养活自己。然而这些进步实质上都是当时社会所能允许的。而技术上、知识

上和政治上的种种转变的种子和秘密，却主要掌握在市镇少数人的手中。诚然，市镇本来是由农村塑造的：从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习惯和态度，这些东西在乡下比较有用，可是对市镇活动却形成了束缚。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组成行会，画地为牢，采取零和游戏态度，认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鉴于城镇的环境，他们认为有必要定量配给空间和时间，着眼点仍是阻止自我膨胀。所以买卖有规定的钟点，不得抢先或推后；不得有价格竞争；不得降低品质和质地以换取廉价；不得低价买进（俗称“杀价”——坏习惯总是属于别人的）再高价卖出；总之，不得有市场竞争。凡是干了活的人都应过好日子。这值得赞扬，可是没有活力。目标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正义，但结果却严重限制了进取心和经济成长——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安全网。

这就是当时的原则。人们总该想到，古往今来制定规则，就是为了被打破。买卖人跟谈恋爱的人一样，都嘲笑锁匠。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那里的行会控制趋势既是旧日道德观的表现，也是对自由买卖作出的反应。城镇蓬勃成长，雄心勃勃；在法兰西、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统治者都鼓励城镇，慷慨授予种种特权。但是，维持地方垄断的企图被郊区的成长挫败了，因为城区的规则管不了郊区。郊区有外来户和犹太人来定居，还有把生意扩展到了市外的老板们雇用的零工。限制市场的条条框框在这里失灵了。于是，汉堡和郊外的阿尔托纳结成对子，纽伦堡和郊外的菲尔特结成对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财富新财富成双，礼仪与无序并存，严控进出和自由出入相呼应。

贸易活跃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们按质量高低选择商品。这违背了平等（最终利益平等）的原则，但是硬要产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确实比别人做得好，于是顾客盈门，应接不暇。与此同时，硬想限制竞争，不让买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会造成人才浪费。高明的业主与雇工很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由于当局往往不允许雇工在业主的市内车间干活（限制规模），雇工们就接活在家里干或者在郊区干。这样就开始出现分包（发包）和分工，劳动生产率大有提高。

工业生产扩展到乡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闭。农活有季节性，忙闲不一，这就提供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市区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规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农村能提供的劳动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领的工资格外低，利用他们的劳力更是低成本高产出。早先（13世纪），商人就已开始雇用农村工人做一些单调乏味而又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在当时最重要的行业，即纺织业中，农村的妇女在家中承包纺纱的任务：商人将原材料——原毛和亚麻，后来还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后收回纺好的纱。

这种向城外发包的做法最初没有遇到城内工人的什么反对；但是当商人们开始把纱线再发包给农村工人去织布时，这就冒犯了当时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即市镇的纺织工行会。这一下子就闯大祸了。在意大利，对周围农村握有政治控制权的自治城市把这种“不公平”竞争给大体上摧毁了。在中世纪另一重大纺织业中心，即低地国家，市镇纺织工人进军农村，砸了乡下的织布机；尽管农村织工有所反抗，但向乡下分包纺织活计的做法被遏制了几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拦的唯一国家是英格兰，那里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国政府难以支持行会要求的垄断权，行会迅速沦为礼仪性的联谊会。到15世纪时，全国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农村纺织的。这样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国外竞争者占有优势，所以到16世纪时，这个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内的初级产品的国家，已经在朝着欧洲头号制造业大国的方向大步迈进了。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扩展是由一系列组织上的创新和改进所推动，它们多半由下层创始，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渐推广。统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领主，纷纷行动起来争取不落伍，显示自己和蔼可亲，保证有劳动力可用，吸引企业及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同时，商界发明了一些新的联合、缔约和交流的形式，以确保投资安全和付款方便。在这几个世纪内，一套全新的商业文书得到采用；商业规范得以制定和实施；人们还想出了各种合伙安排方式，以鼓励贷款者与实于者结盟，资金和商品提供者与长途奔波的推销者和采购者结盟。这场“商业革命”几乎全部来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时绕开这一个或那一个城市或国家的规则，创立和临时安排一些新的洽谈与交易场所，如

港口和外港、市郊、地方集市和国际博览会，总之，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仿佛是在当时邦国林立、错综复杂的镶嵌画之上盖了一幅罩布。

就这样，他们大大增进了经营安全，显著降低了经商成本（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论述的世界，它成形于他出生500年之前。

注释

1 .参见Kautsky ,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 ; Richard Landes , “While God Tarried” (即将出版)。

2 .Edmund Burbe , *Tract on the Popery Laws* .

3 .Michael Cook , “Islam : A Comment” , in Baechler et al. ,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第134页。

4 .参见Crone ,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 第161-162页。该书作者强调，许多蛮族进攻并打败了西方帝国，导致政治单位（我认为应该加上文化和语言单位）的多元化。唯一的统一实体是教会，它或多或少使用相同的语言，而教皇并不希望有一个尘世的对手。

5 .引自Lcvi , *Le Grand Empereur* , 第187页。这是一本小说，但经常被人引用，有的现代文献甚至逐字引用它。

6 .Balazs , *La bureaucratie celeste* , 第22-23页；Cf. John Fairbank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第47页，费正清说，“东方社会在中央垄断政府的组织之下，其官僚体系在几乎所有大型的行政、军事、宗教和经济活动中都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对私有企业的支持从来未曾建立起来。”注意“东方”一词的使用，此时尚未引起任何不悦之感。

7 .参见Crone ,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 第157-158页。该书作者在谈到法律和正义对中世纪政权的意义时，强调该特征对王室税收的

贡献。但是，不合人意的后果是：那些靠法律维持统治的人不得不遵从法律。

8.引自Edmonds , *Northern Frontiers* , 第55页。

9 .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参见Rowe, *Hankow :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 Perdue , *Exhausting the Earth* , 第263页，n.6。这些争论忽视了欧洲Communes明显的政治自治和特权地位。

10 .Robert Lopez , 曾引用于Pounds , *Economic History* , 第104页。

11 .农村特权及与之相连的土地开垦和种植扩大项目，可追溯到11世纪。参见Bryce Ly-on , “Medieval Real Estate Developments and Freedom” ,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 63 (1957) , 第47-61页。

12 .参见Bartlett , *The Making of Europe :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

13 .“欧洲远非被帝国政府所愚弄，而是为各组成部分的不断竞争所推动。”而且，帝国乐园的失落反而使欧洲得到了拯救：“欧洲失败了。如果欧洲当年成功了，它仍将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引自Crone ,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 第161 , 172页。

14 .Hippocrates , *Air Waters Places* , 引用于March, *Idea of China* , 第29页。马奇认为，亚洲的观点确实是一个谜——与欧洲的定义截然不同。他感到，这一观点反映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我们的现代‘亚洲’并非因科学而永恒，而是代表了那些关心西方文明理想的维护而且从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积极保卫自由的神话中受益的社会阶层。”（第35页）这些并未使对比必然失去意义。

15 .10世纪末11世纪初的“上帝的和平”运动采取了教会人员、贵族和民众相结合的形式，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契约。参见Head&Landes,

eds. , *The Peace of God : Social Violence and Religious Response* 。这些契约并非都得到遵守，但其原则意义是重大的。而且，这种公共创造性和表达力的表现是欧洲特有的。

第4章 发明的发明

亚当·斯密指出，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这确实是中世纪欧洲所发生的事实。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

在18世纪，亚当·斯密论述这些事情时曾指出，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这确实是中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事实。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也许有人感到惊奇：长期以来，中世纪一直被视为罗马帝国的宏伟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之间的幕间休场，被称为“黑暗时代”。就技术问题而言，这种陈词滥调是站不住的。（1）

谨举例如下：

1.水车 罗马人已经知道水车，在帝国末期曾用水车作一些有意义的事。斯时，征服已经结束了，奴隶来源锐减，几乎没有新奴隶供应。但那时已经太晚了，秩序和商业都被破坏殆尽。水车流传下来，成为教会的财产，它将神职人员解放出来，专事祈祷。水车在10世纪和11世纪得以复兴，在雨水充足和水流普遍的地区，水车的应用成倍增长。公元1086年的“英格兰土地勘察记录”标明，在英格兰这个欧洲外围的落后岛屿上共有5600部水车；欧洲大陆水车数量更多。

水力运用技术的提高更为显著。机械师通过建设堤坝、池塘的方式提高水压和效率，将水车排成一列，利用逐步减少的水能完成各项任务，需要能量最大的任务放在开始部位，而后逐步递减。同时，附属设备——曲柄、齿轮的发明或改进，使得利用远处的能量、更改方向、将旋转运动改变为往复运动成为可能，并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各种新工作之中：不仅用于谷粒粉碎；还用于布匹蒸洗，从而促成羊毛纺织业的转型；用于金属锤打、金属板的辗轧和拔丝；用于磨碎酒花酿制啤酒以及将碎布捣成浆来制纸等。“纸由中国人发明，并为

阿拉伯人传承，千年来一直是人工制造；13世纪时，欧洲出现了机械造纸……纸虽然已经在全球一半的地方使用，但当时还没有其他文化或文明曾试图用机械的方法造纸。”（2）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以动力为基础的文明。

2.眼镜 眼镜看起来是琐事一桩，因为它太普通了，好像不值一提。然而，眼镜的发明却使技术工匠，特别是从事精细工作的人，如抄写者（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尤为重要）和读书人、工具仪表生产者、精细的织布工、金属制造工等等的劳动生涯延长了一倍以上。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眼睛不能聚焦于眼前的实物。然而，40岁的中世纪工匠有理由期望再工作20年，那是他工作生涯的黄金年代……如果他的视力没有出现问题。眼镜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第一副眼镜出现于何时何地。粗制的放大镜和水晶玻璃发现较早，并用于阅读。（3）关键在于要发明一种装置，可减少失真。而且可以将一副镜片戴在双眼上，而不再需要手来拿着镜片。显然，这种眼镜于13世纪末首先出现在比萨，一个曾见过发明者的证人（公元1306年）这样谈道：

并非所有的艺术（在艺术和工艺的意义上）都被发现了，我们永远不能看到尽头，每天都会发现新的艺术形式……眼镜制作的艺术还不到20年，这种艺术帮助我们看清一切，是世界上最好、最必要的艺术之一。这项前所未有的新艺术的发明不过很短时间……我本人就见过发明和使用眼镜的人，并与他交谈过。（4）

这些凸镜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具有现今我们所说的验光质量。但是，尽管中世纪的光学技术非常原始，但要解决的困难不算大：矫正远视的眼镜并不需要极其精确。其基本功能是放大，也许放大质量好坏不一，但它们对使用者都有所帮助。人们会偶尔在餐馆借一副眼镜来看清菜单，廉价物品商店可以出售眼镜，其原因也在于此。购买者试戴几副后，就能选出最合适的。但近视者就不能这样

做。

眼镜制作就这样开始了。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已制作眼镜达成千上万副之多，既有凹透镜又有凸透镜，既有近视镜又有远视镜。并且，至少佛罗伦萨人（也许还有其他人）已经了解，视力随着年龄递减，凸透镜每5年更换一副，凹透镜每2年更换一副。这样，使用者可以批量购买，随着时间更换。

眼镜的发明使精细劳动和精细工具的使用成为可能。但反过来，它也鼓励着精细工具的发明，从而把欧洲推向别处所不知的境地。穆斯林知道了星盘，仅此而已。而欧洲却随之发明了计量器、测微计和精细的齿轮切割器等等一系列与精密测量和控制有关的器具。他们的发明，为组合机械提供了适合的零件，奠定了机械组合的基础。

精密操作：在中世纪，欧洲以外的地方也有精密操作，但人们所依靠的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技巧在于手工，而不在眼力和工具。他们取得过很不错的成果，但作品没有两件是完全一样的。欧洲却向复制技术迈进，先是小批生产，然后是大批量生产。此外，透镜的知识还培育出后来的光学进步，而且不仅是在意大利。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1600年左右发明于低地国家，从那里迅速传播到其他的地方。

欧洲垄断矫正眼镜技术达300至400年之久。实际上，它使能工巧匠增多了一倍，如果将经验的价值考虑在内，又何止一倍。（5）

3.机械钟 机械钟看起来也是一项小发明，普通得似乎不值一提。但刘易斯·芒福德正确地称之为“关键性机械”。（6）

时钟发明之前，人们通过太阳的影子（日晷）和水钟来判断时间早晚。日晷只能在晴天计时，而天寒时节水温向冰点下降，水钟因而计时不准确，更不用说长时间沉淀和阻塞造成的偏差了。在阳光普照的气候里，这两种装置计时较好，但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有时连续数周看不到太阳，温度每季节甚至每昼夜之间都有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认识到时间准确性的重要性。首先，教会每

周组织7次祷告，其中的晨祷其实是一种夜间的宗教仪式，需要在拂晓前叫醒神职人员（因而有我们的轮唱儿歌《教友雅克》：教友雅克睡过了头，未能按时敲响晨祷的钟）^[29]。随后，新城镇设立了临时报时制度。由于空间狭小，为了组织集体劳动、分配空间，人们需要知道和安排时间。他们规定了起床、上班、开市、闭市、下班回家、最后熄灯（“鸣钟熄灯”）安歇的时间。

当只有一种权威的计时时，这一切与旧装置是相容的；然而，随着城市的增长，出现多种时间信号，带来了混乱和冲突。社会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时间衡量仪器。这就是发明机械钟的背景。

我们不知道机械钟由何人在何地发明。它好像是在13世纪的后25年出现于意大利和英国（也许是两国同时发明的）。一旦为人所知，机械钟得以迅速传播并淘汰了水钟，但日晷保留了下来，作为检验新时钟效果的最后手段。早期的机械钟尚处在初期阶段，不精确且易于出故障——所以，最好是在购买机械钟的同时购买一位制钟工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机械钟趋于损害教会的权威。尽管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衰落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仪式使得人们保留了对计时的兴趣，但教会时间是大自然的时间，白天黑夜不均分，除春分秋分白天黑夜相等以外，自然时间的长短随季节而变化。然而，机械钟将时间分为均等的小时，隐含着一种全新的计时方法。教会抵制和不采用这种计时方法达一世纪之久。然而一开始，城镇就把时间均分作为它们的标准，公共时钟安放在市政厅或市场广场的钟楼上，作为新的、世俗的权威的象征。每一城镇都要有一座时钟，征服者们把掠夺的时钟作为特别珍贵的战利品；游客观看和倾听钟声，就像祭拜圣徒遗物的朝圣者一样。新时间，新风俗。

时钟是中世纪所有机械发明中最伟大的成就。这是观念上的革命，其根本性的创新意义是时钟制造者不能体味的。与模拟式设备相比，它是数字式设备的第一个范例：它由一系列有规律的、重复而独立的运动组成（钟摆的摆动），而不是跟踪规律性的、循环不停的移动，如日晷的影子和水钟水的流动。今天，我们知道，这种重复频率

比任何持续现象都规律得多，而今天几乎所有高精确度的设备都以数字化原则为基础。这并非13世纪的人所能明白的，他们认为时间是持续的，所以应当用其他的持续标准来加以跟踪和衡量。

机械钟必须接受地球和太阳的严格标准的检验，无法忽视或隐瞒自己的失败。结果，机械钟的制造技术和设计的提高受到无情的压力。每一个阶梯，钟表制造者都是走向精确的榜样：小型化，误差的检测和纠正，以及对更新更好的追求。他们成为机械工程的先锋——其他分支的典范和教师。

最后，时钟带来了集体与个人的秩序和控制。时钟的公开显示和私人所有奠定了掌握时间上的自治的基础：人们不需要来自上峰的命令，可以自行协调来来去去的安排（与之不同，军队中只有指挥官需要掌握时间）。时钟为集体活动提供了准时的标准，使得个人可以确定自己（以及其他入）的任务安排，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一旦把个人完成任务情况与单一的时间单位联系在一起，工作就不一样了。人们就从农民的任务型时间意识（只要时光允许，任务一项接一项）和家奴的满负荷时间意识（总有事要做）向单位时间产品数量最大化的努力（时间就是金钱）转化。机械钟的发明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分析效果预备了佐证：国家财富的增长直接源于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

机械钟为欧洲（西方）垄断达300年之久，就高精度而言，甚至可以说，直到20世纪相当一段时期，它都是欧洲的垄断物。其他文明对时钟仰慕不已，更精确地说，其统治者和精英尤为如此。然而他们从未达到欧洲的标准。

中国在唐宋时代曾建立过几座天文水钟——非常复杂的艺术品，这些水钟在初期报时精确，但以后就阻塞了（由于沉淀作用，使用时间较长后，水钟报时就不准确了）。这些纪念性设施是皇家之物，为皇帝及其占星家使用和保有。中国人把时间和时间的知识看做统治权的机密组成部分，不得与普通民众分享。这种垄断涉及日时和年时。在城市，鼓或其他报时器械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小时）敲响

一次，而皇历规定全国各地的季节和民众的活动。皇历也不是统一的、客观的资料。每一代皇帝都制定自己的皇历，确定下来后通行全国。私人的历法没有任何意义。

大城市的间隔报时并未取代持续增长的知识与认识。而且，钟声并非数字报时，每一时辰都有自己的名称而非数字，它证明了计时学知识的匮乏。由于中国缺乏大众消费的基础，时钟不能到市场上交易，导致测时技术的退步和停滞。中国时钟发展的水平从未超出水钟的使用。中国知道了西方的机械钟，但未能掌握和复制。中国不乏对机械钟的兴趣：中国的宫廷和富有的精英人士莫不为之着迷，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欧洲技术的先进，就把机械钟贬为玩具。大错特错！

穆斯林曾试图拥有和复制机械钟，但目的无非是确定祈祷的时间。像中国一样，穆斯林的测时专家在欧洲之前制造出了水钟。传说，公元800年前后，哈龙—阿尔—拉希德曾将水钟作为礼物赠送给查理曼大帝，但法兰克宫廷的人对该物所知甚少，由于无知和忽视，水钟不见了。像中国一样，穆斯林非常喜欢欧洲的钟表，力图千方百计通过购买和接受进贡的方法得到时钟。但是，他们用时钟来确定祈祷时间，从未用以创造一种公共时间意识。我们的证据是，神圣罗马帝国派驻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吉谢林·德·比斯贝克在1560年的一封信中说，“……他们认为，如果竖立公共时钟，那么报呼祈祷时间的权威和古代的仪式就会衰微了。”（7）那会是亵渎神圣！

4.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公元9世纪的发明（纸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在10世纪时得以广泛使用。由于中国文字是表意字（不是字母），不容易用活字排版，这一成就因而更显得有意义。文字的这一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中文印刷在当时主要是满版木刻，为什么中国古书那么多图画。如果需要刻制木版，画图比雕刻许多汉字要容易得多。而且，表意文字难读：有的人孩提时代也许学过汉字，但长时间搁置不用后，也就忘记怎样阅读了，但图画会帮助识别它们。

雕版印刷限制了印刷的范围和传播。它适合于古典经书、佛家经

文以及类似典籍的传播，但是，它使印刷新著作的成本和风险增大，印数较少。有的中国印刷家使用活字印刷，但由于文字量大和投资需求高，活字印刷技术从未像在西方那样流行。实际上，活字印刷术也像中国的其他发明一样，一段时间内很可能被人抛在脑后，以后又重新引进来。（8）

总体而言，印刷术在中国确实有助于知识的保存和传播，但从未像在欧洲一样“爆炸”。多数印刷依赖政府的倡议，儒家官僚不鼓励异议和新思想的出现，甚至证明传统知识有误的证据也遭到排斥。（9）结果是，知识活动以个人和地域划线，而科学成就表现出令人惊奇的不连贯。“伟大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北方求学成材，后迁往南方的扬州，在那里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但找不到门生。结果，他较复杂的研究成就不为后几代人所理解。然而，他的基础课本却成为各地的公共财产。”（10）基础课本是一种标准典籍，但这远远不够；更糟糕的是，它们还可能束缚人们的思想。

欧洲在中国之后进入印刷时代。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印刷术出现后才有了书、发明了阅读。恰恰相反，中世纪时对书面文字的兴趣迅速增加，特别是官僚体系和城镇的兴起促使记录、文件的需求增长。政府依靠文件而存。这些冗长的文件多用当地习惯语写就，从而打破了虽已死去但仍被人奉为神明的语言（拉丁语）的僧侣垄断，为广泛阅读和异议文字的出现打开了大门。

结果，抄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人们想过种种办法，以种种安排形式增加阅读资料的数量。原稿分为数册，由几人分头抄写，数人可同时阅读该书。就像中国一样，雕版印刷早于活字印刷，印刷的活页多于书本，而且有许多图画。谷登堡在1452-1455年间用活字印刷了《圣经》——这是西方第一本活字印刷的著作，也是当时最精致的印刷品，他将新技术带给了一个因书面作品数量大幅增加而渴求印刷术的社会。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刷术由莱茵兰流行到整个西欧。早期著作（1501年前出版的图书）的数量估计超过数百万册——仅意大利就有200万册。

尽管印刷术有明显的优势，但并非世界各地都接受它。由于宗教原因，伊斯兰国家长期反对印刷术：印刷《可兰经》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坦布尔设有印刷厂，但穆斯林没有开设印刷厂。印度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初期才设立了第一家印刷厂。在欧洲，却没有人能阻止新技术的应用。政治权威四分五裂。教会曾试图阻止《圣经》白话文译本的出现，禁止经典和非经典书本的传播。然而到这时，印刷术确实已经势不可挡了。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异端的魔鬼已经飘出瓶外，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将它们收回瓶中再也不可能了。

5.火药 大约在13世纪末，更可能是在14世纪初，欧洲从中国得到了火药。中国11世纪时已经知道火药，并制成用于烟花和战争的管状燃烧器具。以后，中国又将火药用作发射药，最初用于低效率的抛石炮和火箭，后来又用于火炮（13世纪末）。这些装备的威力从它们的名称中可见一斑：“八面威风惊风震火炮”或“九箭穿心毒火雷”。

(11) 显然，它们因响声和杀伤力而备受赏识。实用主义者由此看到技术破坏性的比喻意义或修辞幻象能震撼敌人。

或许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或许由于与侵犯中国的游牧民族作战不需要攻城战，中国继续依赖燃烧火药而非爆炸火药。^[30] 中国16世纪的兵书谈到的火器有数百种之多：例如，“飞天弩”，显然由500年前的火矛发展而来，用以向敌帆喷射火药和燃纸屑；“火药桶”和“火砖”；是浸毒纸充填的火药弹；另有一些装有化学药品与人粪的武器，用以恐吓、蒙蔽或恶心敌人；装有金属弹丸和爆炸物的手榴弹，可以致人非命。**(12)** 这些武器有的是手掷的，有的由弓箭射出。战争就像开药方一样，真让人大开眼界。

如火药这一名称所示，中国人使用粉状火药，由于粉粒细小，点火缓慢，武器的威力不大。而欧洲人在16世纪时学会了制作小颗粒状或卵石片状火药，点火快，由于火药成分混合彻底，所以爆炸充分，威力极大。人们集中于弹丸的射程与重量，而不再关注音响、视觉与嗅觉效果。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13）

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在地理大发现（15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 [31] “为什么这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我们从失败和成功中均获益良多。我们无法考察欧洲之外所有的文明，但有两个文明值得探究。

首先，伊斯兰文明最初吸收和发展了被占领地区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之间，它统治着从地中海西端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而在此之前的公元750年到1100年，伊斯兰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欧洲。欧洲需要恢复历史传统，从某些方面上讲，要通过与伊斯兰的联系（其渠道是欧洲人与穆斯林当年曾彼此接触的地区，如西班牙）。伊斯兰是欧洲的先声。

其后，事情的发展出了问题。伊斯兰科学被宗教狂热分子贬斥为异端邪说，陷于宗教精神服从的压力之下（对思想家和研究者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好战的伊斯兰看来，真理已经揭示了；回溯真理是允许的、有用的；而其余都是错误和欺骗。（14）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是宗教上的保守派，但仍为穆斯林对科学的敌视而沮丧：

当穆斯林占领波斯（公元637-642年）时，他们获取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和科学著作。赛义德·阿拜·瓦基斯写信给奥马尔·宾·哈塔布，要求允许他将书籍带回，作为战利品分发给穆斯林。奥马尔回信说，“将它们统统扔进水里。如果书籍中有正确的启示，真主已经给我们的启示更正确。如果书籍有误，真主已经保佑我们击败了它”。（15）

我们应记得，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那样区分教会人员和世俗人员，二者合而为一，理想的国家形式是神权统治。如果缺乏这种形式，那么好的统治者就将精神和心理问题（从最宽泛意义上）交给阿訇处理。这对科学家而言就难堪有加了。

伊斯兰人士懂得技术的变化与进步：从纸的引进，新的农作物如咖啡和甘蔗的引进和传播，以及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迅速学会使用（而不是制造）火炮和时钟等事实，可见一斑。然而，这些大多从国外引进，并且继续依赖国外供应。国内的发明火花似乎熄灭了。即使在其黄金时代（公元750-1100年），理论与实践也是脱节的：“近500年间，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用阿拉伯数字写作，然而科学的繁荣对伊斯兰缓慢的技术进步没有任何推动作用。”（16）

曾经有可能超越欧洲成就的唯一文明是中国。至少，历史记载似乎反映了这一点。看一看中国发明的长名单就够了：独轮推车、马镫、硬马轭（预防窒息）、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陶瓷。然而，在技术和科学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谜——尽管已故世的李约瑟和其他人作了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来澄清这个问题。例如，这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工业比欧洲要早得多；在纺织业上，中国在12世纪时已经用水力驱动的机械纺麻纤维，比英国工业革命知道水力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早500年；（17）而在冶铁方面，我们被告知，中国早就懂得使用煤块和焦炭作为燃料，在风炉里熔解铁块，到11世纪末中国已年产125000吨生铁——700年之后英国才达到这个标准。（18）

谜在于中国未能实现其潜力。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学识是逐步积累的：很显然，一旦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我们看到了中国计时技术的后退；同样，纺麻纤维的机械并未用于棉纺，后者从未达到机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铁也随着整个冶铁业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

当前所有常规解释都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中缺乏技术进步呢？历史学家认为对西北欧工业革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几乎都在中国出现过，甚至社会阶级关系的革命至少在农村出现过，但它对生产技术并无重要影响。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未曾出现罢了。但在短期看来，这无甚大用。如果中国人拥有和发展了像17世纪欧洲那样的对实验和开发的狂热，他们很容易在原始机械的基础上设计出高效的纺织机械……蒸汽机的发明并

不容易，但对在宋朝就发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响”的中国来说，这并非不可逾越的困难。关键在于，中国没有人进行尝试。在大多数领域里，农业是个重要的例外，早在科学知识的匮乏成为严重障碍之前，中国的技术发展就停步不前了。（19）

为什么呢？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部分的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

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其中的一个打击目标是海洋贸易，在天朝的宫廷看来，这是一种分离性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等的源泉，更糟糕的是，它鼓励移民国外。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时，国家试图禁止海外贸易，禁海达到顶峰。禁止导致逃税和走私，走私引起腐败（保护费）、没收、暴力和惩治。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与中国妇女显著不同的是，欧洲和日本妇女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在外工作，攒得嫁妆或增加家庭收入。（20）

3.杰出的匈牙利—德国—法国汉学家艾蒂安·包拉日强调大环境的不同。他认为中国技术未能得到发展是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后果之一。他没有从水利工程导致中央集权的角度解释这一大环境，但是他看到了一些因素：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他的分析值得我们复述：

.....如果人们理解，极权主义就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和官吏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毫无例外的全盘控制，那么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哪一个私人的首创性、没有哪一项公共生活的活动能逃脱官方的监控。首先是整整一系列的国家垄断，大众消费品，如盐、铁、茶叶和酒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教

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垄断起来。实际上还有文字的垄断，或者说出版的垄断：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经审查，就没有什么希望传到公众的手中。可是国家的可怖权势、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所影响到的范围还更加广泛得多。人们穿什么衣服有规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房屋大小）有规定；服装是什么颜色、听什么音乐、怎样过节日——全都有规定。有出生和安葬的规定，天佑的政权明察臣民从生到死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个文牍和骚扰的制度：无穷尽的文牍，无穷尽的骚扰。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给人类作出过那么多的贡献——丝绸、茶叶、陶瓷、造纸、印刷等等。倘若没有那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这样的聪明才智无疑会使中国更富裕，也许早已使它迈进到现代工业的门槛。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21）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不管这些因素如何混合，结果却是出现了孤立的首创精神和西西弗斯 [32] 似的间断二者并存的奇异模式——上升，上升，上升，而后下降——社会仿佛是被悬挂于丝绸的顶棚。结果——如果不是目标的话，是不变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不变。创新只被允许（只能）走那么远，不得再多走一步。

欧洲人遭遇的这类干涉要少得多。相反，在这几个世纪，欧洲人进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创新和竞争的世界，它向既得利益提出挑战，令保守主义势力震撼。变化积少成多；新事物传播迅速；新的进步意识代替了陈旧的、对权威的尊敬。这种对自由的陶醉触及（传染）各个角落。这是教会的“异端之年”，公众的创新为宗教改革做着准备。在这个时代，新的表现形式和集体行动挑战着旧的艺术形式，质疑着社会结构，并对其他体制构成威胁；工作和制造的新方法使得新颖成

为美德和欢乐的源泉。这是乌托邦的时代，人们想象着美好的未来而不必回想失去的乐园。

重要的是，教会是知识的管理者和技师的训练所。人们本来会把教会想象为另一种情形：组织精神活动，专注祈祷与冥想，对技术无甚兴趣。确实，既然教会把劳动看做是对原罪的惩罚，本来是不会寻求缓解这一判断的。然而，世事万物多走向反面：将神职人员从耗时费力的世俗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导致了动力机械的引进和广泛使用，而且从西多会修士开始，还雇用世俗人员（平信徒）担负杂役。雇佣鼓励了对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关注。以上因素导致修道院财产中动力机械的大量集中——通过一系列工业作业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分配可利用的水力资源的综合后果。对12世纪中叶克莱尔沃大教堂的描述赞扬了丰富多姿的工作安排：“烹调、过滤、混合、摹拓、清洗、传送（动力）、磨制、弯曲。”作者显然为这些成就而自豪，他进一步告诉读者，他可以自由地开玩笑：漂槌好像免除了对漂布者罪过的惩罚；这些设备能够缓和人的压迫性劳动和牲畜的劳役，真得感谢上帝。（22）

这种欧洲独有的创新乐趣从何而来？这种对新事物、更好事物的乐趣从何而来？这种对发明的栽培——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发明的发明”——从何而来？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通常均与宗教价值观有关：

1.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尊重手工劳动，这一点概括于圣经中的一系列训谕。例如，当上帝警告诺亚说洪水将至，他将获救时，并非上帝救他。“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座方舟”，上帝说。诺亚按照上帝的神示建造了方舟。

2.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泛灵论认为树木和溪流都有神灵（因而有泉神和树神）。今天的生态学家也许更喜欢这种泛灵学说，而不是取代它的信仰。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没有人倾听异教徒的大自然崇拜。

3.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

4.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欧洲的企业是自由的。发明能见效并得到应有的报酬，统治者和既得利益势力阻碍创新的能力受到限制。成功孕育了模仿和竞争；力量的意识从长远看将会使人几乎达到神的水平。昔日的传说依旧——人被逐出伊甸园，伊卡罗斯 [33] 飞得太高了，普罗米修斯被铁链所缚——警告人不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无边的傲慢——的概念是用来检验某些人的自负及他人抑制这种自负的努力的）。

然而，当时的实践者并未对此加以关注。

注释

1 .这是以下文章的核心部分：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 15 (1940) : 第141-159页。

2 .Jean Gimpel , *The Medieval Machine* , 第14页，参见White ,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 第226-227页。怀特又指出，穆斯林生产（非机械制造）的纸没有水印，这种商标13世纪80年代出现在意大利，是商业的标志。

3 .了解眼镜出现以前视镜的状况，参见：Zecchin , *Vetro e vetrai di murauo* （Venice 1989）, cited by Ilardi , “Renaissance Florence” , 第4页。

4 .此谈话人是比萨的多明我会教士焦尔达诺，他是1306年在佛罗伦萨圣玛丽亚新教堂布道时说这番话的。引自White, “Cultural Climates”, 第174页或1978年重印本221页。怀特引用的是意大利原文，我在译为英语时作了风格上的小改动。又参见Rosen, “Invention

of Eyeglasses”；Ilardi, *Occhiiali* 一书及“Renaissance Florence”一文。

5. 有人指出，工作寿命的延长鼓励了人力资源的投资，人们更愿意到新的地方从事新工作。参见Moses Abramovitz, “Manpowe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第55页。

6. “时钟不仅仅是记录时间的器具，同样也使人们的行动得以同步。时钟，而非蒸汽机，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性机械……它发明于现代技术刚刚萌芽的时期，预示着精确的自动机械的出现……在与能源的可查明储量、标准化、自动化及其本身特殊产品，即准确计时器的关系方面，时钟是现代技术最重要的机械产品，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处于榜样地位。它的完善为其他机械所追求的完善提供了一个范例。见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 第14-15页。”

7. 引自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 第233页。

8. Sivin, “Science and Medicine”, 第165页。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活字印刷术才取代过去的印刷方法。

9. 参见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 第49页。

10.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第180页。

11. Needham, “The Guns of Khaifeng-fu”, 第40页。

12.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 第102页。

13. 早在16世纪，作战胜利的军队的正式要求是掳获占领地区所有的钟或最好的钟：“钟的权力”。参见Cipolla, *Guns, Sails and Empires* , 第30页, n.1。

14. 公元885年，巴格达的所有职业誊写者被要求发誓不誊写哲学著作。关于穆斯林科学与伊斯兰教义的冲突，参见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 尤其是该书第9章和第10章。

15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 :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8) , 第373页, 引用于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 第103—104页。欧洲基督教徒也有类似臭名昭著的狂热行动。法国“十字军”被派去镇压贝济耶(法国南部城市)的异教徒时, 曾被允许(命令)血腥屠杀当地居民。在回答如何区分恭顺的基督教徒与异教徒时, 指挥官说, “上帝自己知道谁是。”

16 .White ,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 第227页。

17 .Elvin ,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第184页。

18 .Elvin ,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第85页。该作者认为该数字在35000-40000吨到125000吨之间, 不过他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该数字来自一位日本专家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此后的一篇文章也提出了较高的数字, 见Robert Hartwell ,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第34页。在另一篇文章中, 该数字成了“至少125000吨”, 见Hall , *Powers and Liberties* , 第46页。这就是历史数字的命运——它们可以增长。

19 .Elvin ,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第297-298页。

20 .参见Goldstone , “Gender, Work and Culture”。

21 .Balazs , *La Bureaucratic Celeste* , 第22-23页。

22 .转引自White ,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 第245-246页。

第5章 地理大发现

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历史事件。即使那些对历史没有偏好的人也知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种人所共知的事实表明，尽管新大陆的发现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它抓住了欧洲和美洲人的感情，成为尘世上的最著名事件。

——F·A·柯可克帕特里克《西班牙征服者》

不久前，当世界准备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时，各群体争先恐后地赞美哥伦布及其伟大成就。在美国，有的人甚至愿意称美国为“哥伦比亚”（意为哥伦布的国度），有70来个城镇以及许多博览会和互助组织以这位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意大利血统的人与西班牙裔人竞相称这个拥有功绩与荣誉的发现者为自己的同胞（由于血统或归化）。人们有理由期望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1892年）时盛大场面的重现：世界博览会（哥伦布展览会），各种纪念品，翌年发行丰富多彩的纪念邮票。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对纪念哥伦布感到喜气洋洋，期望1992年的庆祝更宏大、更美好（500周年自然应该强于400周年）；但是，有些事甚至所有事都出了差错。哥伦布从历史成就的象征和新大陆的助产士变为政治上的一个困惑。逐渐明朗的是——其实多年来就有一种隐隐的异议——许多人并不把这位海军舰队总司令看做英雄，不把欧洲人到达新大陆看做一个发现，不把这一事件的周年看做值得纪念的事情。（1）

相反，哥伦布现在被描画为卑鄙之徒；欧洲人被视为入侵者；当地的土著被视为无辜的、快乐的居民，他们被掠夺成性、身带病菌的欧洲白人降为奴隶，最终被赶尽杀绝。（2）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是分离主义者的大本营，其市政厅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向来以不虔敬（或虔敬方式不同）而著称，这个市政厅将“哥伦布日”更名为“土著人

日”，并提供了一部歌剧的两场演出，剧名为《再一次迷路的哥伦布》，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作曲家怀特·克劳德·伍弗豪克的作品。（3）两年后，为了证实自己的选择，墨西哥决定发行纪念币，纪念阿兹特克人 [34] 和“一种在艺术、科学和文化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达文明”。（4）没有对征服者的任何赞誉之辞。

现在，抹杀或扭转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计划撤离和回归欧洲，哥伦布要寻退路已经太晚。但是，反哥伦布的情绪高涨，特别是标榜政治正确的组织尤其卖力，他们使庆祝活动显得不恰当，像醒来就跳捷格舞 [35] 一样。所以，没有化装游行，没有纪念品，没有T恤衫当然没有印着标语的T恤，没有厂商赞助，没有法律的重新制定（谁会同意呢？），没有赞颂，没有纪念邮票，没有纪念币，没有奖品。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5）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就像多数破除偶像推翻传统的做法一样，对哥伦布——更确切地说，对哥伦布到美洲后发生的一切——所进行的攻击，包含着一些事实，一些谬误，还有些不切题的议论。

事实在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土著居民的悲惨命运。除很少、很小或不起作用的例外，他们遭受了蔑视、暴力和残暴虐待。欧洲人不知不觉带给他们的病菌和病毒几乎夺去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他们的土地、文化和尊严丧失殆尽。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了。

谬误在于，对发现一词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哥伦布如何能发现新大陆？这大陆本来就在那里。当地人知道这块土地，他们早就发现了它 [36]（我们不会有新的哥伦布纪念邮票，但是1992年美国邮政署迅速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纪念美国印第安人的祖先、数万年前抵达北美洲的亚洲人，这在政治上也无可非议）。而且，哥伦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公元1492年，是印第安土著发现了哥伦布。

当然他们发现了哥伦布，就像哥伦布发现了他们。相见本是双向的。提到双方，并不能证明甩掉其中一方是有理的。（6）

这种很有意思的吹毛求疵，也是数学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数学家发现、揭示了新的定理和证据。他称这些为“真理”。是他发现了它们？或创造了它们？或者，它们本来就在那里等待发现——就像保罗·厄尔多斯所说的，是圣经上刻着的永恒？或它们仅仅由于被发现才存在呢？这些都无关宏旨。数学家发现或创造了它们，数学思想和想象力因而改变。（7）哥伦布的发现也如此：一旦消息传了回来，人们对世界及世界上各民族的想法——人类的想象力——就永远改变了。

不切题的议论在于，有些人认为，强调哥伦布的发现，就把世界交往和交流的进程欧洲化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会轻易引出欧洲必胜信念，使历史学家只看重虚假的积极一面（地理发现的伟大时代），而忽略真实的消极一面（入侵的灾难性后果）。

有些抱怨是对的，但好的历史学家应保持自己的平衡。新大陆（对欧洲而言是新的）的开放是一个交流，但并不对称。欧洲神灵式的显现是问题的核心。正是欧洲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进程，响应了大发现，确定了进一步开发的日程安排。在操作层面上讲——谁对谁做了什么——这是单向的。

从这些事件的伟大之处着眼，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力图从中获得声誉。一旦杜撰出来，神话就不易戳穿。然而，英勇的“大发现”的神话并未得到学者的赞同——当然没有得到专业研究方面的赞同。卡尔·索尔、伍德罗·博拉和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地理学派宣布，从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欧洲白人及他们携带的病菌（天花、流感等）的到来，导致2500万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达9/10。自那以后，没有人再能用自得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了。[37]

这些定名性的异议是一种赎罪和政治动员的形式。其目标是打破权威，而不是阐明观点。其打击对象是欧洲（西方）主导地位及其所得。其意愿是：归咎于犯罪者，引起良知，为补偿正名。了解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新的启示。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并非偶然事件。欧洲在武器杀伤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欧洲可以把武器送到船能抵达的任何地方；由于新的航海技术，欧洲的船只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下，对这种不平等的更广的涵义加以考虑。我要提出一个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法则，即三个因素是不可能共存的：（1）权力的显著悬殊；（2）私人掌握权力工具的可能；（3）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当一个群体强大到能对其他群体作威作福并从中获利时，它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即使国家不主张侵略，公司和个人也不会坐等许可。他们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拖挟着其他群体，包括国家，向前走。

这就是帝国主义（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控制）为什么与我们相提并论的原因。 [38] 这是人类深层动力的表现。还有一种更为优秀的情感：利他的动力、团结的理想和为人准则 [39]。然而，尽管这些高贵的理想为组织起来的宗教所认可和宣传，却很少付诸实施，而常遭违反。确实，这些高尚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都曾在入侵中被祈求过。只有政治权威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决定，不仅不采取恃强凌弱的行动，而且阻止群体成员参与，才能挡住这种动机。

中世纪的欧洲缺乏中央权威来做出这样的决策。相反，多主权体之间的竞争给予个人参战的广阔机会，而个人联系——封建义务和忠诚——促使武士参与掠夺。所以，欧洲在经受外来入侵者数世纪的压榨与剥削之后，从11世纪起开始向外进攻。十字军东征（1096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这种对外扩张的明显象征。提倡十字军东征，部分地是为了让自相残杀的暴力得到升华而将暴力转向外敌。这是一个好斗的社会。

真是精心选择的对手！十字军使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信仰对信仰的战争复活了，并推进到敌营的中心。从理论上讲，没有比这更神圣的动机了，但是在现实中，像往常一样，理想主义的目标掩盖了臭名昭著的暴行和贪婪。十字军使信奉希腊正教的君士坦丁堡遭到整整三天的劫掠和杀戮，还一路上屠杀犹太教徒和基督

教东正教徒（他们质问东正教徒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吗？），换来的只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屠城，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和穆斯林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岌岌可危的小王国所带来的慰藉。 [40]

十字军的入侵并未持久，穆斯林将侵略者赶走，并将胜利归于真主的决定。但是，反对穆斯林的战争仍在别处进行，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持续数世纪之久（最后的胜利发生在1492年的格拉纳达 [41] ），基督教王国逐渐打败了贪婪的各阿拉伯酋长国。摩尔人占领过的安达卢西亚成为一片废墟：“每一个有影响的人都带领一批追随者，退守某个城堡，自命为苏丹并擅用君主的徽章标志。” (8)

在断断续续的战争中，穆斯林依赖从北非雇佣来的柏柏尔士兵，而雇佣军缺少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忠诚，因而不利。从欧洲方面讲，卡斯蒂利亚王国 [42] 的国王接受教会可以理解的劝告，发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贵族和恶霸牺牲农民和教士的利益，将他们送到战场上。这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进军圣地的动机相同：与其让我们去打仗，不如让他们去拼命。双方都错误百出，是战争持续如此长久的原因。然而，在后勤和人口数量方面，基督教徒好于对方。“基督教世界在逐步向南推进，其过程缓慢如同滴注而非洪水滔天。” (9)

最终，文明屈服了，而野蛮取得了胜利。曾是欧洲最伟大的学术中心的科尔多瓦于1236年陷落。安达卢西亚的经济大都市塞维利亚于1248年陷落。卡斯蒂利亚军队是心不在焉地攻占了这两座城市，因为他们的国王费迪南三世实际上不曾想到他在当时就能横扫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的摩尔人。摩尔人的埃米尔求和，向费迪南称臣，退守格拉纳达的小小山区据点，为维持自己地位而小心伺候卡斯蒂利亚人，而对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同胞的命运则漠不关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格拉纳达遭围攻时（1490-1492年），它求援的呼声无人理睬。于是，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任摩尔人统治者通过谈判要到一大笔钱就退位逃离西班牙，连他自己的母亲都鄙视他，说她知道什么是懦夫了。

“复地运动”的胜利者，一个是葡萄牙，它到14世纪中期已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再一个就是卡斯蒂利亚，它是一个不断扩

张疆域的国度，有着西班牙骑士式的牧场主（相当于我们美国的牛仔吧）以及贪财的恶棍和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摩尔人建造的南方城市，拥有大理石的王宫、冷泉、绿色的花园和知识中心，自然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10）

“复地运动”完成之后又怎样呢？当然，土地被攫取和重新安置居民，庄园被划界和开垦，农民（特别是摩尔农民）被迫为新的地主干活。王国也必须成为基督教国家，因为伊莎贝拉女王是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在宣称基督教为真正信仰的情况下，不论当局与格拉纳达投降者谈判中向伊斯兰教作过什么让步，这种承诺都不可能持久。教会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忙碌，更不用说教会在老百姓中布置的密探及告密者了。由犹太教皈依过来的人大多并非心甘情愿，因此不可靠，需要严密监视。由伊斯兰教皈依过来的人也是一样。卡斯蒂利亚社会为虔诚的精神湿疹这种疥癣所苦。

然而，所有这些仍给进一步的征战和冒险留下了活力。遣散那些只知道剑与马、战争友谊、杀人的刺激、掠夺的欢乐的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在将最后一批摩尔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开始在海外进行试探和发动攻击。第一批目标是地中海诸岛屿和北非海岸。阿拉贡王国 [43] 的国王海梅一世在1229-1235年攫取了巴利阿里群岛，自夸为“近百年来人类所做的最好的事”。葡萄牙于1415年攫取了休达；1463年攫取了卡萨布兰卡；1471年攫取了丹吉尔。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海洋探险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绩，海梅一世说：“占领一个上帝愿意设立在海洋上的王国，比占领三个陆地王国的价值更大。”该世纪（15世纪）末，国王的记事官夸口说，没有国王的允许，任何鱼不得游水。（11）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有些贵族——某个历史学家称之为“贵族流氓”——带着统治

者的祝福（有时还有他的金钱）带领一队战士出发了，他的船队由远近的商人提供，然后去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财富。他所拿到和拥有的东西，除去掠夺的分赃、对士兵的奖赏、给予支持者的红利以及对君主表示支持和忠诚的开销以外，就都归他所有。

目标的选择并非漫无边际。舰队自最近、最能接近的地方开始侵略。经济学家也许会说，它们的参与成本低。而且，这些地方多由异教徒占有，因此冒险也被神圣化了。穆斯林将非伊斯兰世界称为“剑房”，认为他们的占领是公平决斗的结果。基督教没有近似的说法，但其作为无异。

掠夺近处的这些牺牲品之后，远方不尽的诱惑在向他们招手：骆驼驮着黄金从无人所知的地方走来，穿越非洲沙漠；香料从印度洋运出，通过红海和波斯湾，然后经陆路运抵黎凡特 [44] 港口，由于中间转手数次，每一次交易都使价格攀升；旅行队从中国带来梦幻般的丝绸。所有这些珍奇之物都成为穆斯林商人把持下的赎金。如果能发现绕过这些异教中间商的道路，那就会在上帝的佑护下致富。

这些仅仅是人类已知的东方财富，人们可以把握的东西。谣言和传说告诉人们更大的奇迹和梦想：在非洲的另一端，有一个被伊斯兰包围着的基督教王国，那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王国；附近就是失乐园；向东是如田园诗般的入画美景，向西则是不为人知的国度。许多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从理论上讲，人们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然而，对于习惯内海航行的人来说，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太汹涌了些。即使海边长大的人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骇人的空旷。像“天涯海角”和“地尽头”这样的地名并不仅仅是地貌事实的陈述。

当人们对某些事物一无所知时，想象就大行其道了。西边的海洋是圣岛、波浪之下神秘的亚特兰提斯 [45] ——一个由鬼怪、漩涡和龙卷风守护的神秘王国——所有现实和意象的危险都在其中了。海洋探险需要巨大的勇气，远远超越中世纪航海图的标记和确信由陆地到海边的线路。北欧海盗的航行路线是向西、向北再向西，证实了他们航海技术的高超和勇气可嘉，他们对海水（海水的颜色、脾性、深度及

其水底）和海洋生物（鱼与鸟）的稔知，使得他们在看到陆地以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故而可以沿着大西洋的顶端越岛前进。热那亚人和其他意大利人随后而来，他们绕过伊比利亚，航行到英格兰。到14世纪，在葡萄牙人和巴斯克人的陪伴下，他们发现了附近的一些大西洋岛屿：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12），加那利群岛——其中除了靠近非洲大陆的加那利群岛以外，都无人居住 [46]（直到15世纪中叶，欧洲人才发现位于北纬15度、博哈多尔角以南的佛得角群岛；直到15世纪90年代，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才成为殖民地）。

对今天而言，这些小岛意义不大。它们已经降到前哨站的地位，只有游客和那些从大陆工作或学习回来的居民偶尔光顾。然而，在被发现后的年代里，它们代表着欧洲领土的海外延伸。其实，古代罗马人早就从毛里塔尼亚国王那里知道了加那利群岛。它们未并入罗马的版图。将发现变为机会需要知识、手段和需求的结合。

这些都发生于15世纪。南方诸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尤其适于种植甘蔗，而甘蔗注定成为欧洲财富之源。欧洲人是在中东首先接触到甘蔗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印度接触到甘蔗，而后传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马格里布。返回来的十字军将甘蔗引入欧洲——希腊，西西里，以及葡萄牙的阿尔加维。

糖极易上瘾，爽口开胃，对人的心理有安抚作用。起初，糖价格昂贵，只用于治疗。在药房买糖，大多数欧洲人则是从水果和蜂蜜中吸收糖分。当然，这不是第一种能同时引起病人和身体健康者兴趣的药品。由于甘蔗的广泛种植，其价格下降，最后在杂货店里也能有蔗糖出售了。此时，糖被用作食物的佐料。德国谚语说，没有任何食物的味道会被糖败坏（德国人就是这样做饭的）。同样，由于食物容易腐坏，糖也用作一种有效的防腐剂和掩饰佐料。在15和16世纪时，糖还是一种奢侈品，女主人将糖锁在仆人拿不到的高架上。但它逐渐成为一种必需品，从上流社会传至民间。

尽管地中海的种植业非常成功，但仍不能与大西洋诸岛相提并论，这是气候和社会因素造成的。甘蔗最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栽

种，需要定期浇水和恒热——赤道附近的大雨信风带地区是最适合的。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奴隶制度早就因不受欢迎而被推翻，再设立该制度不容易。奴隶制早为农奴制代替，一则由于基督教徒不能作为奴隶（另外奴婢地位也与婚姻的神圣相矛盾）；一则异教徒或不信教的奴隶供应量太小，而且不稳定——一旦皈依基督教就取消奴隶身份。黑人确实可以作为例外。人们可以怀疑他们是否有灵魂、能否成为基督教徒。我们知道，葡萄牙并不谴责输入黑人做家奴或在海岸甘蔗田里劳动；16世纪中期，里斯本人口约10%是黑人。（13）然而许多（多少呢？）黑奴最后被解放了，成为自由人口。除偶尔有“黑鬼”油漆房间以外，欧洲再也没有出现黑奴制度。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大西洋诸群岛就在远方。这里纯净得像一张白纸，可以自由进行社会制度安排。可以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而进步。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最初由欧洲移民或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罪犯、妓女、宗教迫害的牺牲品和孤儿——居住。〔47〕佛得角群岛则远离冈比亚海湾，是进行奴隶贸易的理想去处——短暂停留后将黑人船运到里斯本或其他岛屿。

当非洲的奴隶主发现，欧洲白人为黄金和香料而来时，对这种活人商品也感兴趣，他们欣然从命。哥伦布出生前的1/4世纪里，佛得角群岛以及随后的马德拉群岛成为奴隶种植甘蔗的试验地，16世纪圣多美岛也加入进来。这些种植者为了致富，要训练和压榨黑奴，还要克服困难和气候的不适；意大利的商船主也是这样。而葡萄牙王室以许可证、蔗糖契约和税收等方式获取毛收入的1/3或更多。甘蔗种植成为模式，以后在新大陆获益更多。

大西洋诸岛极大地扩展了欧洲的视野。欧洲的船员向西、向南航

行几百海里就到达这些岛屿，建立了航海基地，从那里出发到无人所知的远方，并迎接归航者。它们是海洋沙漠上的绿洲：减轻远航者的痛苦，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哥伦布在出发前到达加那利群岛，进入了东风带的轨道，这是幸运还是先见之明使然？不管如何，他自己走在赤道季风的林阴大道上，和煦、稳定的风力在一个月里将哥伦布送过大西洋。

真巧。但是在1492年，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无事不成。哥伦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要向西航行到达亚洲，而葡萄牙对此不感兴趣。但西班牙认为这一计划有意义，因为西班牙已经同意与葡萄牙瓜分世界，并承认葡萄牙拥有东部（非洲）航线——这再一次证明这两个王国的过度自信。对西班牙来说，向西进发就是一切，否则就一无所得。碰巧哥伦布低估了自己任务的艰巨性，他以为世界要小得多。但这并非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海洋事实上要比他想象的狭窄。

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直到死时，他都不相信这一点，仍然以为那是中国和日本周围的群岛。他不知道，在那些岛屿之外还有两片大陆，即以后所称的南美洲和北美洲。他发现裸体或基本裸体的土著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用手抓住西班牙人的剑刃而被割掉了自己的手。（14）他把一些土著人作为标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送回西班牙。

哥伦布确实没有发现黄金、丝绸、香料和其他可以与东方相联系的宝藏。他首先需要黄金，这主要不是为自己（他要的是官位和荣誉），而是为了给西班牙君主。他明白，没有别的东西更能保持王室的兴趣和支持。

没有黄金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形势，确信这些岛屿拥有丰富的奴隶资源；他从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了解到，这些奴隶显然适用于甘蔗种植。他们也可以从事畜牧业，如此等等。自从白人来到之后，加勒比海的历史大体上就是牛代替了人，尔后黑奴来到这里定居，从事甘蔗种植。

大屠杀、野蛮残酷和深深的绝望加速了人口的锐减。当地人自

杀，禁绝性生活，堕胎，杀死自己的婴儿。由旧世界 [48] 带来的病菌（天花、流感）导致土著居民成千上万地死去。西班牙为他们遇到的野人有无灵魂、是否是人争论不休。但历史记载明确指明他们住在那里。当哥伦布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时，他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友谊；西班牙人得不到金银，遂兽性大发，其所作所为乃野兽所不耻：

他们的骑兵手执铁剑长矛，大肆蹂躏屠杀……他们碾过城市乡村，不分男女老幼，对有孕在身的妇女也不放过，撕破她们的肚子，将婴儿挑出来砍碎。他们常常打赌，看一看谁能灵巧地将人从中间劈开……他们常常提着孩子的脚，将孩子的头撞向岩石，当孩子落水时，残忍地嘲弄他们，名之曰“请他们游泳”……他们竖立了许多吊架……在每一个吊架上吊着13个人，亵渎神灵地宣称这样做是以救世主及其圣徒的名义行事，尔后在下面点火，活活烧死那些无辜的贫民。那些获准赦免的人，双手被砍断一半，只连着一点皮肉。（15）

不需要再举出更多的例证了。读者会被这些血腥屠杀和罪恶吓倒。这里血债累累：自发、放纵的兽性表演，随便、轻松、连想都不想的屠杀，将人折磨致死的善意比赛，挖空心思的让人痛苦，无缘无故的集体杀人狂热，对生命的仇恨。

令人惊异的是，这里缺乏理性，即使对待有价值的劳动力也如此。早在殖民之初，一群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曾致信西班牙国王，抱怨太多的矿工被迫从一个矿井向另一个矿井转移途中饥饿而死，以至于后去的矿工不需要向导了（民间传说中的拇指人汤姆用丢石子的方法在路上作标记；而西班牙人用尸体作标记）。信中还提到，一艘满载800多印第安人的船只抵达普拉特港（银港），等了两天才靠岸。出了什么情况？没有细节描述，但是据说船上约600人死亡，尸体被抛出船外，像浮板一样在波浪之上漂浮。非洲奴隶的存活率也许比这还高一点。（16）

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可以与此相提并论。数十年间，土著阿拉瓦克人（泰诺人）和加勒比人大体上灭绝了。

当然，征服加勒比只是故事的开始。西班牙对黄金和财宝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结党营私谋反之事也层出不穷。西班牙王室派驻当地的使团领导人发现，处置反抗者和造反者的最好办法是用船把这些捣乱分子送到陌生的海岸，让他们去寻找“青春泉”吧；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就会在寻找过程之中死去。这种探险的孤寂无望和艰难困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见，西班牙征服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其倒霉的航行和徒劳的进军是传奇，然而也被人遗忘。当然也有幸运的征服，如墨西哥和秘鲁。一次发现，甚至一份报告就能激起和证明十来次的远征。这正是帝国的组成部分：权力、贪婪和使团，掺和着轻信、暴怒和疯狂。

非洲的黄金（17）

黄金在非洲某个地方发现，然后运到地中海沿岸。欧洲商人甘心受其驱使。他们到突尼斯等地，用银子、武器、纺织品、皮革、大米、无花果、坚果和酒（可能再出口）交换粮食、草料、石油、油、粗面粉、蜂蜜以及——为维持收支平衡——黄金：金屑、金锭、金币（摩尔货币）。不仅这些金黄色的金属几乎引起催眠的诱惑，现存汇率也使这些交易获利极丰。在14世纪上半叶突尼斯金银的兑换率是1：10，而同时在巴伦西亚 [50] 的比率是1比13。这种差距不会持续太久，活跃的贸易活动形成了流动的市场，市场造成价格的近似。到14世纪中期，那不勒斯的比率是1：10.5，佛罗伦萨市场的比率是1：11。从非洲流出的黄金影响很大，使得西地中海一带的许多货币都转向了金本位，这在西西里、马霍卡、撒丁（1339年）和阿拉贡（1346年）的新币制中均有所体现。

回溯到13世纪中叶，那时的文字和图表记载表明，拉丁人被黄金及其不为人知的主矿脉销魂夺魄。黄金的供应者千方百计隐藏黄金的来源——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猜测到，这些基督教教徒会为了黄金大动干戈，烧杀抢掠。现在，我们知道，黄金产自西非内地的深处，大约沿尼日尔河上游地段，在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源头附近。据传说，开采黄金的黑人矿工采用“哑巴式”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买者将交易用的货物留在某一指定的地点然后离开；矿工拿走货

物并留下他认为等值的黄金。不用说，这种神话传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有人说，那里的黄金像胡萝卜一样生长；有人证实黄金由勤劳而恭顺的蚂蚁从地下挖掘出来；有人说黄金由住在洞穴的裸体之人开采出来。

不论怎样，这种贵重的金属要从其源头穿过非洲传奇式的王国马里。该王国控制着廷巴克图镇和穿过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商路的进出权，是地中海商人所知的最“上游”源头。黄金商向当地的经纪人和统治者（称为“曼萨”）交纳大量的贡赋。传说称，马里王国留下了天然金块，把金屑交给商人们（磨制和削制天然金块的作坊应该是手工制作）。有时，曼萨及其下属试图强迫矿工挖掘出更多的黄金，增加岁入。但这些努力因矿工的消极抵抗（停止开采金矿）归于失败。

同时，曼萨发放许可证，大发横财。一位名叫穆萨（阿拉伯语中的摩西）的曼萨在1324年到麦加朝圣。该旅行长达1年之久，曼萨决定大肆铺张。他在埃及住了3个月，关于他访问的情景传扬了数百年。他给苏丹50000第纳尔，苏丹绝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厚礼。他给朝拜的圣地以及迎接和保护他的官员数千根金条。据称，当他离开时，埃及的金价下跌了10%到25%。

尽管曼萨带着大量的资金来朝圣——80到100只骆驼，每只骆驼驮有300磅黄金（共值1.1亿至1.35亿美元！），但朝圣结束时，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他不得不借钱回国。他的债主得到了丰厚的补偿，每借300第纳尔，他归还700第纳尔。

财富确实令人动心。阿拉伯的作家伊本·阿米尔·哈吉布和伊本·巴图塔对马里国王及其王国作了详尽的描述。他们告诉后人，曼萨受到的爱戴远胜其他地方的君主。他是神圣的活化身——从他的举止可见一斑；臣子们非常谦卑，跪倒在他面前，以首触地，对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用惊叹表示喝彩。衣着不整的人是不能走到他面前的；没有人在他面前打喷嚏。这种无礼会招致杀身之祸。

关于曼萨如何伟大的传说是通过二手材料传到欧洲的。地图，特别是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 [51] 地图集表明，曼萨的加冕如同欧洲君

主，头戴王冠，手持宝珠和权杖。“他的国家富有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君主”，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如是说。这种仰慕并没有持续多久。黄金贸易式微了，马里也衰落了。14世纪末，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黄金海岸”侵入冈比亚时，穆萨曼萨的继承者看起来就像粗浅而虚饰的原型。尘世的荣华富贵就这样消失殆尽。

掩盖的重要性

裸体并非无足轻重：据推断，起初它是伊甸园式的天真无邪的表现。例如，哥伦布起初曾着迷过。（18）“他们赤身裸体如同初生之时”，他写道，“男女都这样”。他还写道，“我们基督徒认为他们非常漂亮，男女都这样”；以及“这种漂亮不仅体现在形体上，也体现在道德上……他们是最友善、最和平的民族”。

与美丽相伴的是天真无邪。“司令说他不相信怎能有人会遇到如此善良、慷慨和羞怯的人，因为他们一见到我们基督徒，就倾其所有给了我们。”而且，“你给他们东西进行交换，不管你的物品多么微不足道，他们都会立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你”；“他们并不垂涎于他人的东西……不论你要他的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拒绝。相反，他们要你随便拿，他们的爱心真叫人感动”；“他们非常温和，从来不知邪恶为何物。他们对杀死他人一无所知。”（19）

但是，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特别是，他们并不准备慷慨地把他们的女人赠送给别人。然而，这些西班牙好色之徒在海上漂流了数月，他们需要女人甚于黄金。而且，这些慷慨的倾其所有赠人的土著设想西班牙人也应该同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拿走了西班牙人的东西，而后者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偷窃。正是在刚刚到达时还心存狂想的同一个哥伦布，不久就为自己的信任后悔，向属下提出可行的忠告：“在驶向锡瓦奥的途中，如果印第安人偷什么东西，你必须割下他的鼻子或砍下他的手，以示惩罚，因为这是他们不能隐藏的身体部分。”

于是，这些高贵的土著成了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他们还能是什么别的呢？在一些最残酷无情的歹徒向本来毫无怀疑之心的受

受害者横施暴虐的情况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表现得像是神话式的圣人。帕斯卡尔·布鲁克纳令人信服地指出，印第安人“从一开始就倒霉，因为他们曾被宣称为尽善尽美”。而野蛮人这一新的形象倒是让白人觉得更来劲。加深这一形象的因素，还有印第安文化的另一些方面，特别是据说他们有食人生番习性。有的学者否认吃人这种做法的存在，至少加勒比的印第安人不是这样（好像墨西哥或中美洲如此）。这种否认的可信性多大，有待商榷；毕竟很难提出反证，但显然人类学家有一种动机，需要把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遇看做是黑白交恶，一方是邪恶无比，另一方则纯洁无瑕。（20）

有时辩护是间接的。社会人类学家戴维·梅伯瑞一路易斯引用过1557年出版的汉斯·施塔登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美洲新大陆野蛮、裸体和吃人历史的真实历史》，接着指出，曾俘虏过施塔登的图皮南巴印第安人“定期进行仪式吃掉俘虏”，他说，“这被看做是英勇的死，被俘虏的战士也许与俘虏他的人一同生活了多年，并娶妻生子。在决斗仪式上，他被牵出来，棒击致死。之后，所有公众吃掉他，分享他的英雄之躯。”（21）

梅伯瑞一路易斯指出，图皮南巴的人却对欧洲人经常在审讯和惩罚中拷打犯人和实行奴隶制的残暴感到震惊；他还对欧洲人的判断和政策的片面性感到可悲。当然，要求我们“像别人看待我们那样看待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因此欣赏相对主义——同情的力量——它特别是人种学的一种美德。但是，我们不必期望相对主义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在16世纪的欧洲，只有几个教会神职人员持相对主义的观点。在平静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的论点尤其为人所赏识。

历史与传奇

关于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的暴行和罪恶的故事如此骇人听闻，一回顾起来，就有一种窘迫和羞耻涌上心头。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如此凶残和奸诈？如上文所述，答案在于社会选择和历史。一方面，发现新大陆的冒险吸引着西班牙最大胆、最贪婪和奸诈的社会成员，他们大多是流氓无赖、亡命之徒，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另一方

面，西班牙与国内（宗教迫害）、国外（征服）敌人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导致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灭绝了情理和人性的感情。茨维坦·托多罗夫还加上了距离的因素：西班牙人在遥远的地方采取行动，对陌生人行使权力和发泄暴怒，这些人被认为低人一等，甚至不适用对待敌人的规则，或应该使用更低等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无需任何限制。所以，他们竞赛作恶，导致集体狂乱的爆发。托多罗夫还说，“西班牙人的‘野蛮’并非是回归原始，它完全是人类的行为，并宣布现时代的到来。”（22）

将极度的非道德和征服机会结合在一起，将柔弱的民族交到贪婪、愤怒、无情和极度残暴的人手里，这真是不幸。

为缓和（如果不是宽恕）西班牙邪恶的记录，辩护者——许多是当年的征服者的后裔——提出了两类论据。一类是说这些指控是神话传说和夸大其词，全不可信。他们求助于“黑色传说”一词：黑色意味着过分夸大（有完全黑色的东西吗？）；况且是传说而不是历史。其目的就是拒绝承认而不是提出反证，因为反证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技巧和术语也曾用于否认西班牙国内的偏执和狂热。这种偏执和宗教狂热，以种族纯正的狂妄为顶点，甚至到人迹罕见之所追捕异教徒，从而损伤了国家学术研究和学习的能力。对坏消息不予考虑要比进行反驳容易得多）。

第二类论据是指出其他殖民者的恶行，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北美新教徒）的罪行。后者的征服战略不同，而且牺牲较少，但是他们残暴和伪善的能力想必是相似的。^[52]好像他人的恶行能够用来免除自己所犯的罪愆似的。这种论点与日后的强权和帝国主义政治不是没有关联的。对许多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来说，强调征服美洲的英国佬的恶行是最要紧的一条。最好是，将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幸归咎于他们，即使是暗示亦可。（23）

注释

1 .Schama, “They All Laughed”, 第30页。文章说，甚至在1892年，抗议者就反对庆祝，使庆祝活动推迟了一年之久。

2 .参见“The Invasion of the Nina, the Pinta and the Santa Maria”, *New York Times* , 2 June 1991 , 以及Teresa de Balmaseda Millam对该文章的愤慨反驳 , *ibid* . , 4 July , 1991。

3 .James Barron , “He’s the Explorer/Exploiter You Just Have to Love/Hate” , *New Yorks Times* , 12 October 1992 , 第B7页 , 又见Sam Dillon , “Schools Grow Harsher in Scrutiny of Columbus” , *ibid* . , 第A1页。尽管对西半球最原始的（最早的）居民的后裔而言, “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是已经被接受和可以接受的称呼, 但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人”是欧洲人发明的叫法, 其所指不确切, 因而拒绝这种称呼。人们应该说“当地人”。然而, 同一半球的其他民族怎么办? 难道他们不是当地人? 显然, 有的当地人相比而言更是本地人。

4 .Joel Sable , “Maxico Hails Aztecs with Multiple Issues” , *Boston Globe* , 3 April 1994 , 第B34页。

5 .Schama , “They All Laughed” ; 那本图文并茂的目录 : Levenson, ed. , *Circa 1492 : 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

6 .参见Vitorino Magalhaes Godinho , “Role du Portugal” , 第58页。作者正确地阐述了这种“非发现命题”的荒谬, 称之为“幼稚的陷阱”。

7 .参见King , *Art of Mathematics* , 第41-46页。

8 .Ibn Khaldun , *The Muqaddimah* , 引用于Fernandez-Armesto , *Before Columbus* , 第50页。

9 .Fernandez-Armesto , *Before Columbus* , 第49页。

10 .Fernandez-Armesto , *Before Columbus* , 第84-85页。

11 .Fernandez-Armesto , *Before Columbus* , 第12页。

12 .葡萄牙人第一次与马德拉接触是在公元1419年。参见

Huygue , *Coueurs d'epices* , 第119页。

13 .Bennassar和Bennassar , 1492 , 第252页。

14 .Axtell , *After Columbus* , 第168页。

15 .Bartolome de Las Casas , *Brief Relation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 引用于Jose-phy , *Indian Heritage* , 第287页。

16 .这些材料源自1516年一批多明我会教士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大臣的信，引用于Todorov , *Laconquête de L'Amérique* , 第146页。该信列举了其他的暴行，其中包括，一个贫穷的母亲在喂孩子奶时，一群西班牙人过来了，因为他们的狗饿了，这位母亲的悲剧就发生了。夸大其词吗？我们从其他的证词那里知道以上所言非虚。

17 .以下内容大多引自Fernandez-Armesto , *Before Columbus* , 第143-147页。

18 .Bruckner , *The Tears of the White Man* , 第10页。该书作者认为哥伦布曾读过一本书（Pierre d'Ailly , *Imago Mundi* , 写于1410 , 出版于1480）, 并据此相信，伊甸园位于赤道另一侧的温带陆地上。然而，新大陆确实气候温暖，但并不在赤道的另一侧。但是，在我看来，对哥伦布影响甚大的是这些人的裸体和天真无邪。阿伊（Ailly）怎能知道伊甸园在赤道哪一侧？

19 .以上内容引自Bruckner , *The Tears of the White Man* , 引文系从哥伦布的游记的法文本翻译而来，见Christophe Colomb , *La decouverte de L'Amérique* , 2 vols. (Paris : Maspero , 1979)。

20 .参见Henley , “Spanish Stew” , 第5页对Boucher , *Cannibal Encounter* 的评论：“鲍彻对专家们当前的争论加以评述，作出吃人的证据是微不足道的结论。如果有，也是在极偶然的宗教仪式的场合下，吃已经被杀死的敌人的肉。当然，他们从未将人在锅里煮来吃。”

又见：Wright, “The Two Cultures”, 第3页。作者认为，欧洲人的记录值得怀疑。“认为墨西哥人吃人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西班牙人的报告远不是偶然的笔误。”作者指出，在围攻墨西哥期间，有大量死尸，但守卫者还是因饿而死。但这也许意味着，吃人有一定的仪式，不允许随便吃死尸。例如，希伯莱禁止吃死的动物（即不是经过一定仪式而杀死的），即使洁净也不可以。

21 .Maybury-Lewis, “Societies On the Brink”, 第56页。

22 .Todorov, *La Conquete de L'Amerique*, 第50页。

23 .请参阅Stern, *Peru's Indian Peoples*, 第xli-xlii页。斯特恩强烈呼吁政治正确，他承认西班牙人的罪行，但提到“简单化”和“反西班牙偏见”，对辩护者做出让步。他还提到“其他欧洲殖民者同样残暴的种族残杀和剥削的历史”。我认为，他的论点有可批评之处：他哀悼反传说命题“将征服降至欧洲恶棍与英雄的故事的境地”。美洲印第安人呢？他们有什么反应？他问道。如斯特恩所说，人种学家不再接受土著居民是无助的牺牲品这种观点，“他们不仅仅在等待罪恶加于其身”。够公平的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呢？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他们也犯罪作恶，他们也推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是欧洲或者西方人的专利品。正统的拉丁美洲的历史对这些置若罔闻。这个问题本就是道德判断的雷区。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同是牺牲品和牺牲制造者的后裔，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尴尬。他们的同情心在哪一方呢？

第6章 东进喽！

近代世界史的重大事件中，欧洲人15世纪、16世纪所进行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确实在挑战上天的安排……这些事件的功绩和辉煌无疑应首先和主要地归于葡萄牙人……必须承认，是葡萄牙人首先发起了海洋航行，并将发现遥远地区的观念输入到其他国家。

——托马斯·阿斯特利《航海与旅行》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以越岛寻宝为开始。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力图最终绕过穆斯林进入印度洋。他们顺着信风南下，首班航程容易至极。然而，他们返回里斯本的航程却倍感艰辛。他们灵机一动，不是逆风而行，而是绕道向西、向北，通过亚速尔群岛返回里斯本。

然而，在穿过加那利群岛再南行时却遇到了麻烦。这里海风和海浪方向逆转，向南航行极其困难。麻烦开始于北纬27度的博哈多尔角，这里波涛汹涌，大海像烧开了的锅，是创造与混乱的象征性分界线。10年（1424-1434）的探索都被这一无形的障碍化为泡影。（1）

然而葡萄牙人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尝试，一次又一次，一里格[53] 又一里格。起初，他们认为这些不毛之地无人居住，但不久他们遇到了几个土著居民，逮捕了几个俘虏，获悉了奴隶制，从而发现了获利的新机遇。因为获利是问题的核心，正如亨利王子的传记作家苏拉拉所说，“……很显然，（没有水手或商人）愿意到不能挣钱的地方。”（2）

南大西洋与其他海洋截然不同。在非洲一侧没有便于停泊的大陆架；海流、海风与南下的船相逆而行，海岸线寸草不生，一片凄凉。一旦越过佛得角，在佛得角和几内亚之间几乎找不到停泊和休息的港湾。沿岸而行的航海技术由来已久，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

中国海域畅行无阻，但在这里却无用武之地。这是公海航行。（3）

这里，葡萄牙人早年利用信风返回家园的经验得到了报偿，但其方向却有别于以往。经过数十年迎风或逆风南行，他们大张船帆，大胆西行，跨海到达巴西，然后折向西南。这增添了数百里格的航程，需要数周时间，甚至意味着在海上漂流数月而不见陆地，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缩短了航行的时间，使得他们能够绕过非洲的海角进入远为平和的海域。

我们不应将此仅仅视之为幸运，因为葡萄牙人学会了如何确定纬度，他们才做到了这一点。在北大西洋，水手们可以利用北极星的高度确知自己的南北方位。然而，他们驶抵赤道之后，由于北极星在空中的位置太低了，他们只得求助于太阳来确定自己在哪里。由于太阳在天空位置的变化，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欧洲，夏季太阳位置靠北，因而较高；冬季则靠南。这种位置的变化称为赤纬，如果把太阳的高度作为纬度的测算标准，就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伊比利亚半岛作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先锋和桥梁而得到了报偿。在14世纪和15世纪，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家（其中亚伯拉罕·扎库特是一个关键人物）已制作了航海所用的便利的太阳赤纬换算表。（4）

一旦海洋和陆地的纬度可以确定，人们就有了航海的钥匙：这样，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南北位置，如果也知道目的地的纬度，那么人们在到达同一纬度后，可以平行航行到达（一个偶尔存在的问题是：向东还是向西航行？）。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从远航（1488年）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非洲南端的坐标。知道了它，葡萄牙人就可以在北大西洋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路。

这些探索使得葡萄牙在整整一个世纪内无所匹敌。这些成就，一部分应归功于葡萄牙王室和热心、忠诚的王子（据称他以童男之身逝世）航海者亨利，他在葡萄牙西南角上的萨格里什俯视海洋的海角上建立了海洋研究站，指导公海航行的科技探索达数十年之久；一部分应归功于私人船主和水手，他们看到了在船首斜桅尽头的财富。这一切都依赖于造船技术的进步：有了比载货方帆船更长更漂亮的轻快

多桅帆船；船尾方向舵；方帆和大三角帆的混合；大西洋和地中海技术的嫁接。当迪亚士从非洲南端返回家园时，他还带回了造船的新理念。不久这种轻快帆船得到改造，10年之后为瓦斯科·达·伽马所用。此后10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每一次航行都带来经验，刺激着技术的革新。

海洋航行进一步依靠仪表的使用：指示方向的罗经；测量天体高度的星盘和天体仰角测量仪；背向太阳的观测调整装置；计算时间和估算速度的沙漏。还有，我们不能忘记，水手们的顽强拼搏和不屈不挠才使航行得以完成。这些奇怪的人，他们本有很多机会毁约。由于常年航行，他们常常病倒和死于海上，念叨着圣母和圣徒，嘴上喊着数不清的“万福玛利亚”，重复着祈祷文，盼望自己迷信的手势能求得大海的风平浪静。一旦踏上陆地，他们就纵情声色，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再一次让自己经不起诱惑。这就是海员的生活（而且，那些诱惑他们去做水手的人随时准备从他们身上再捞一把）。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心理障碍使得某些步伐的迈出特别困难，如博哈多尔角；还有风暴角，以后更名为“好望角”（象征意义是重要的）。逐渐地，恐惧让位于理智和解决的方法。先向西航行几乎到达南美洲海岸然后再回头向东，就是葡萄牙人作出的最大胆、最具创造力的决定，表明了对自己能力的巨大自信心（相比而言，哥伦布不过是偶然有所得罢了）。张帆前进好于逆风而行或停滞不前。不会永远顺风，也不会永远张满帆。

如果没有瓦斯科·达·伽马这样从小就是水手、头脑冷静、技艺娴熟的人，葡萄牙人抵达印度群岛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伽马所知不多，但他在到达印度群岛前发生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性格。那是在1492年，当时伽马约30岁。一艘葡萄牙帆船满载黄金从厄尔曼那（非洲西海岸一个地方）返家的途中，被法国私掠船截获。这时，两国之间并不处于交战状态。怎么办？葡萄牙国王的顾问建议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派遣使者恳求法国放还船只和黄金。国王约翰不喜欢这种

方式，“我不想派一个使者去接受不公正待遇或在接待室等候法王的召唤。对我来说，这比丢失黄金还难堪。”

所以国王派伽马处理此事，他是“国王信任的人，曾在舰队服役多年并熟悉海洋事务”。海洋当时是葡萄牙的大学校，不仅仅学得到航海本领。第二天，伽马和一队紧急召集的武装人员抵达塞图巴尔码头，那里停泊着10艘满载贵重货物的法国轮船。这些船都被捕获了，其货物被盖印查封；其船员被带到岸上。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法国轮船的船主向法王求情，法王将帆船和黄金送回，一盎司都不少。葡萄牙国王将法船及其货物放还，一厄尔 [54]、一桶都不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震惊了葡萄牙人。就像苏联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人一样。葡萄牙人本来可以收留他但却拒绝了他。经过数十年的艰难和耗资巨大的探索，葡萄牙人绕过了非洲之角。然而，西班牙人第一次试航就发现了新大陆（也许是亚洲）。太不公平了，是出发的时候了。继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初航失败后，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一支四艘船组成的小舰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之角，找寻印度。该航程长达27000英里，历时两年多，170名船员之中只有54名生还。

这次耗资巨大的探索并没有带来商业的成功。伽马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印度遇到的商人是穆斯林，他们不想跟信基督的异教徒做生意；更糟的是，他随船带去想出售或做易货交易的东西是一些玻璃珠、廉价首饰和衬衫，这些东西很受加勒比人欢迎，但在印度几乎一文不值，因为印度人能分辨什么有价值或无价值，而且他们生产的纺织品比欧洲好得多。所以，伽马几乎是两手空空回到了葡萄牙。他所带回的是一点战利品。在愤怒和失望的情绪下，他袭击并捕获了一艘装满香料的穆斯林小船。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自此以后，葡萄牙人依靠武力而不是市场竞争来树立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伽马带回了消息——两种消息。其一，欧洲人船坚炮利，强于当地土著；其二，尽管他未能做成交易，但发现那里香料丰富、价格低廉，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在卡利卡特，100磅胡椒价

值3个金币。经过六七个人转手、一路向国王、酋长和官员交纳应付费用和贿赂之后，威尼斯的市场价格是80个金币。面对如此高额利润，装备一支舰队的费用算得了什么？海员的生命又值几何？

葡萄牙可以进行报复了。国王曼努埃尔写信告诉西班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最尊贵的国君和女国君，最伟大的国王和女王陛下！”），他发现了有“大城市、高楼大厦、大江大河、人口众多”和没有裸体蛮人的地方，并向他们吹嘘香料、宝石和“金矿”如何富足。至于坏血病和死亡，还有穆斯林商人和商业上的失望，则只字不提。这正是哥伦布试图寻找却未能找到的好地方。西班牙人该受不了了吧！

1500年早春，伽马胜利返航不到6个月，葡萄牙派出了第二支远征印度的舰队——该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由13艘船组成，包括士兵在内共有1200人。葡萄牙派他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麻烦，但是，如果有敌船意图加害，他不应让敌船靠近，而应予以拦截，将它击沉。

优越感表露无遗。众所周知，拥有更强大的武器装备的一方可以从一定距离之外杀死敌人，而自己一无伤亡；而弱者只有在近处、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力气才可能赢得胜利。卡布拉尔的命令标志着新的世界力量对比。人口比葡萄牙多得多、更富有、从某些方面讲也更文明的亚洲人却无法理解这一切，甚至无法想象这些事情的发生。然而事实上正是如此：欧洲人此时已能立足于海军大炮射程可及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 [55]

葡萄牙人执行任务时有条不紊，这一点大概温暖了亨利王子的心。好奇心和胃口已经理性化了，这从1508年给迪奥戈·洛佩斯·德·塞凯拉探索马达加斯加的指令中可见一斑：

- 1.舰队应沿该岛屿周围前进，特别注意西海岸（面对非洲的一侧）；进入每一个港口进行观察，勘察进出航道，探测停泊的可能性，包括风、海流和水底的性质等，将这些都记录在案。

- 2.首先与当地土著联系：将一些物品和金属（香料、蜡、铜等）

给他们看，注意岛上的人是否知道这些物品；如果有，问清楚如何得到或换取。了解他们希望交换什么物品。

3.了解是否有其他船只到达这些港口。它们从何而来？船上载有什么？他们是在不同的岛屿上换取的，还是到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物品？这些商人和船员从何而来？他们是穆斯林还是信仰别的宗教的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衣着怎样？是否有武器在身？

4.这些船只大还是小？哪一类？他们什么季节来、什么季节离开？节奏如何（一年一次、还是更经常）？他们的航海方法怎样？

5.岛屿上自己有船只吗？如果有，他们到哪里去？载运什么货物？他们寻觅什么货物？

6.岛上生产什么？土著用它来换什么？这些物品贵重还是轻贱？

7.政治结构：什么样的国王或领主？穆斯林或别的宗教信徒？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司法？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拥有珍宝吗？什么样的国家和国家尊严，如何维护之？军队和武器装备如何：大象、马匹、武器、火器、火炮如何？士兵胆小还是勇武好战？

8.穆斯林的统治形式是政教合一还是分开；他们承认异教统治者吗？

9.人口是穆斯林教徒还是别的宗教信徒？如果是别的教徒，穆斯林如何与他们相处？是否像印度一样有基督教徒？^[56] 他们知道圣托马斯^[57] 吗？

10.当地风俗如何？是否至少部分上与马拉巴尔海岸的风俗相似？

11.有特别重要的城镇或村庄吗？设防了吗？岛屿上的人怎样居住？

12.钱呢？是否有标准钱币，还是像马尼坎果（非洲？）一样只

有“用作钱币的物品”？如是，他们是否将铜像商品一样交换，它是怎样做成的？特别是，是否用于制造枪炮？如果是，什么样的枪炮？而且，他们怎样制造火药？

葡萄牙政府对探索马六甲（马来半岛）的类似指令增加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详细问题，因为中国人也在此经商：船只和航海技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贸易、商人、商栈、商品、价格、政权、衣着和风俗？中国的面积和形状？（6）

这些系统的探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425年葡萄牙开始探索加那利群岛的时候。1537年，国王若昂三世的宇宙志作家佩德罗·努内斯在回忆录中吹嘘道，“海岸、岛屿和大陆的发现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相反，我们的水手在出发探索时胸有成竹，配备有天文和几何探测的仪器和规尺。”（7）这与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6世纪最后25年之前，西班牙人还没有采取这种系统的方法。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没有竞争、航行简单），或是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传统和习惯方式。葡萄牙人将某一地方的纬度标在地图上，宣布发现并占有该地；而西班牙人则造成既成事实后宣布某地归其所有。他们安放十字架，使土著居民“皈依基督”，建立基督教大厦，设置法庭和监狱。从目的而言，西班牙人的目标是财宝；葡萄牙人则追求贸易的获利。这是两种不同的帝国观念。

欧洲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扩张到印度洋和东亚的历史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假如当初不曾是那样又会怎样。假如亚洲在16世纪不是陷于政治混乱，假如印度当时不曾沦于各土邦与土库曼入侵者之间的战争，假如中国当时不曾奉行孤立主义，假如亚洲在16世纪不是处于那样一个低潮，从而让自己暴露于欧洲入侵者无情攻击的面前，那么又会是什么情形？中国的“缺席”这一点尤其事关重大。

从公元1405年至1431年，中国人至少进行了7次重要的航海活动，探索印度尼西亚水域（南洋）和印度洋。这些航行的目的在于宣扬中国的赫赫威名，将天朝圣国的渊博学识赐予蛮夷，接受崇敬与进贡，并为中国的皇帝收集国内见不到的奇珍异玩。特别是，这些船只

带回了国外的珍稀动物——长颈鹿、斑马、鸵鸟，以及珍宝和有疗效的动物、蔬菜和矿物，以丰富中国的药典。

这些航行与贸易的关系并不完全清楚。这些船只带着宝贵的商品（丝绸、瓷器），目的在于交换，但是交换显然不是在自由市场进行的；而是通过礼物赠送的方式进行：蛮夷进贡；中国恩赐。另一方面，出航的目的显然也在于开辟正常贸易的渠道，商人们也确实跟随而至，做了生意，出现了独立的贸易航行，从中国威望增长中获益。但如果贸易是目的之一，那这样做成本就太高了。实际上，中国人向那些组织珠宝船队和倡导私人贸易的官员提供收益额之高，使这些航行的负担超过帝国财力。（8）

这些船队在气势上远远超过后来者葡萄牙的小舰队。它们的船差不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多甲板的大帆船（但这是一个用词不当的字眼）如同漂浮的营帐；每艘船都有数百水手和士兵，证明中国在造船、航海和海军组织方面技艺高超。（9）最大的船约400英尺长、160英尺宽（哥伦布的“圣母玛利亚号”不过宽85英尺），有9支交错排列的桅杆和12个红绸做成的方帆。这些被称为宝船，为奢侈而建，装备有大舱位和带窗的厅堂，适合天子使臣或陪伴他们回国的外国贵人居住。其他船只满足另外的各种要求：8桅杆的“马船”将马运往南亚，因为那里的气候不适合饲养马匹；船上还载有建筑和维修材料；7桅杆的补给船，主要运输食品；6桅杆的军运船；5桅杆的海战船；与海盗周旋的快船。船队还包括运水船，以保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淡水供应。

第一支船队是1405年明朝大太监郑和率领的，它由317条船组成，共有2800人。（10）自1404年到1407年，中国的造船业和船只装修业蓬勃发展。沿海各省全都投入了这一巨大努力，内陆各地也纷纷伐林取木。一道圣旨，成百成百的木匠、铁匠、缝帆工、编绳工、捻缝工、马车夫、甚至更夫就整编成队，集中起来，居住在工作场所旁边的院子里。由于造船工及其徒弟多不懂文化，往往都是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使用手工模子，无需铁钉，各部分就吻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细节能够逃过造船的筹划：重叠的厚板、多层板、厚板接合处

由黄麻填隙并覆以经过筛选的石灰和桐油，铁钉密封起来以防生锈，每一特殊用处都用特殊木材，甚至在船头绘上大“龙眼”，以使船能够“看见”自己前面走的路。这些眼睛，加上平衡用的尾舵和沉重的压仓石，都是航海经验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正是它们将船只从一个港口导航到另一个港口。船是在扬子江上巨大的干船坞建造完工的（中国的造船技术这时领先于欧洲数百年）。这样，中国在3年期间建造或装修了约1681艘船只。对中世纪的欧洲而言，这样庞大的船队是不可想象的。（11）

然而，中国向大海和全世界开放的这一番努力最终化为乌有，实际上是故意把它化为乌有。[58] 15世纪30年代，一位新皇帝在北京即位，他“不知约瑟夫为何物”。一批新的儒家士大夫为权势而竞争，他们重农轻商，对商业抱鄙视和怀疑态度，认为农业才是唯一真正的财富源泉，他们憎恨那些筹划和实施出洋远航的宦官。这两派之间争权夺利达数十年之久，有时这派得势，有时那派占上风。但国家的财政状况和传统道德观念却是站在儒家士大夫一边。航海的浩繁费用使帝国财政捉襟见肘，而且不得民心，因为赋税和徭役已榨尽老百姓的血汗。

15世纪初迁都北京的决定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在北京建造新城墙和九千多间房的新皇宫，农民本来是说服役30天，实际上却是一千就几年。皇室从南京搬到大约800英里之外的北京，单是这一项搬迁费就使赋税扶摇直上。（12）有几位正直的官员仗义执言，朝廷却用严罚重辱把他们的进谏压了下去。一位地方官反对额外征发徭役，竟被囚于笼车，受尽屈辱，运往京城听候皇帝发落。尽忠尽职却如此下场。而与此同时，西北边境又不断受到各游牧民族侵扰，使帝国不得安宁，消耗人力财力，不得不时刻防范，不敢懈怠。

在这种背景下，航海问题上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互有胜负，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几十年之后，帝国做出决定：不仅停止海洋航行，而且抹去过去的任何记忆，以免后代受到诱惑而恢复蠢行。自1436年始，选派新工匠造船的请求遭到拒绝，外国要求恢复习惯性恩赐的要求也被驳回，或许这是由于经济原因。由于缺少船只建造和修理，官

家和私人的船队都衰微了。未被守卫的海岸海盗猖獗（倭寇尤为猖狂），中国更进一步依赖内河运输。1500年，建造两桅以上的帆船者有可能被处死。1525年，沿海管理当局命令销毁所有出海船只，逮捕船主。最后，在1551年，乘多桅船到海上从事贸易也是犯罪。（13）

放弃海外航行，是实行闭关政策、从海洋冒险或诱惑后退的组成部分。这种人为的内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样做恰值最糟糕的时机：面对欧洲新兴的强权，中国不但自行解除了武装，而且自我满足和顽固，认为欧洲人带来的教训和创新不屑一顾。

为什么？为何中国没有再多做一点努力去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为什么在欧洲来访者到达中国海面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仍然没有中国的船只抵达欧洲港口（第一艘到达欧洲港口的中国船是一艘外交船，参加1851年伦敦的大博览会）？

像通常一样，原因是多方面的。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一结果是多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人当年缺乏足够的眼力和目标，特别是缺乏好奇心。他们的航海活动是为了炫耀天威，而不是开眼界和学习；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留驻；他们接受尊敬与进贡，而不是去采购。他们依然故我，无需变更。他们已拥有自己所拥有之物，而无需再去获取和制造。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并不为贪心和激情所推动。欧洲人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印度人的财富。他们不得不绕过非洲之角，这是航海的必经之路。而中国人却不需要。他们在印度洋所需要的东西，他们都找得到；而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尔尔，不是餐前的开胃品，而是餐后的小点心。（14）

同时，慑服他人的欲望意味着，成本远远大于所得。这种航海弥漫着奢侈之气。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中国的航海活动是官办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脆弱性——今天还在执行，明天就可能被停止。在欧洲，即使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等皇家项目也有个人倡议的缘故，这是参与集资和确保理性的源泉。在中国，这些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奉行儒家学说的政府憎恶商业成功。而且，出洋远航导致防卫海盗的巨大花费：航船愈活跃，海盗愈受到刺激、越发猖獗。^[59]对中国政府来说，商人们所做的是“搭便车”行为，靠皇家的花费致富。

这些就是中国决定从海洋转向的原因。1477年，明朝一位有权有势的太监、秘密警察头目汪直^[60]要求查看历次航海的日志，力图恢复海洋探险的兴趣。而当时的兵部侍郎却没收了这些文件，将之藏匿或烧毁。为掩饰这些文件的神秘失踪，他诋毁这些资料为“未经耳目验证怪事的欺人之谈”——所以，并不可信。至于那些被宝船带回的货物，“槟榔、竹竿、葡萄酒、石榴、鸵鸟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显然对中国毫无作用。这些下西洋的活动浪费了“无数的钱粮”，更不消说“无数”的生命了。结果自然是再也不干了。

问题尚未解决：假设中国没有放弃贸易与探险，假设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却发现了统治海洋的中国巨船，那会是怎样？或者，假设中国没有在到达莫桑比克海峡后停止探险，而是绕过非洲之角进入大西洋，从而打开了与西非和欧洲的海上通道，那又会是怎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与事实相左的想象非常着迷，这倒不是因为谁能知道答案，而是因为这些问题能发人深思。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例如，若考虑当年中国继续进行海洋扩张的可能性，就必须考虑到暴力冲突以及最终取决于武力竞争的可能性。表面上讲，中国无比强大和富有。谁能与之争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早于欧洲人知道火药的秘密，但是欧洲人的枪炮更好，火力更强，远射更是如此。中国的舰船体积大，但欧洲水手的技艺更高超。比较1400年左右的中国与欧洲，中国也许会占上风，至少在印度洋或南中国海是这样

（即使是猛兽要斗败自己家门口的弱兽，也会有困难）。然而，50年之后，即使是在亚洲海域，欧洲人也能轻易打败中国的舰船。当然，中国人也许会吸取教训，最终与欧洲的坚船利炮一竞短长。然而这是高度假设性的问题，这种问题是不会有定论的，愈是猜测就愈是没有把握。

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呼噜噜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

注释

1 .博哈多尔角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可参见Randles，“La Signification”。

2.引自Huyghe，*Coueurs d'épices*，第121页。

3 .关于南大西洋独特的航海问题，参见Landes，“Finding the Point at Sea”，in Andrews, ed., *The Oquest for Longitude ; Seed,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ch.4：“A New Sky and New Stars”，后一篇文章对葡萄牙航海和发现的科学基础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4 .扎库特曾写过一本书：*Zacut, Almanach Perpetuum*（1478）。该书研究了每一纬度上太阳每一天的位置。该书为天文学家而作，它被扎库特的教友约翰·维津霍简化，制成一张航海用的换算表。参见Jones，*Sail the Indian Sea*，第37-38页。

5.（原文缺注释5。——译注）

6 .以上内容引自一篇价值颇高的文章：Godinho，“Role du Portugal”，第81-83页。

7 .Introduction to his *Tratado im defensam da carta de marear*，引用于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第126页。

8 .参见李约瑟，“China, Europe and the Seas Between”，这是作者向1966年贝鲁特国际海洋史大会提交的论文，载于李约瑟，*Clerks and Craftsmen*，第40-70页。对这些航行最丰富、最吸引人的细节描写和覆盖面最广的，应是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Louise 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9 .“宋朝时，中国的造船技艺已经非常高超。船由铁钉铆合，涂桐油防水，其自然保护性能良好。船的设备包括水密舱板，浮舱，沿吃水线的竹护板，防船在风暴中摇摆的浮锚，代替导向桨的轴向舵，舷外铁架和下风板设施，风平浪静时所用的桨，海底取样用的铲斗，测量深度的响索，航行用的火箭。”引自Elvin，*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37页。这一传统在元朝保留下来：忽必烈汗（马可·波罗所描写的皇帝）的航船拥有10多个风帆，可载千人。最大的湖船，长达450英尺，“航行时极其平稳，乘客感到如履平地”，引自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81页。当然，湖水可不像海水那样波涛汹涌。

10 .李约瑟认为船队有73艘船。（李约瑟的数字显然是指船队的主体，即“宝船”的数量，而不含其他各类船舶。——译注）

11 .以上资料主要来自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73页。

12 .Huang，*China*，第155-157页。

13 .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174-175页。

14 .利瓦塞斯强调，贸易冷漠一方面与儒家传统、另一方面与王朝法制相联系。寻求贸易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外来的货物，而这种需求的表达与龙座的威严是不相符的。参见*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180页。

第7章 从地理大发现到帝国的建立

在领先者以及紧随其后或急速追赶的追随者，是排成长队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东亚相比，其余的国家仿佛是在研究慢动作，甚或是进一步，退两步。

借助印刷机的威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得以迅速传播。

[61] 最为雄辩有力的莫过于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激动与惊奇。世界打开了一叶窗，欧洲人的自我意识随之改变。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神学家和伦理学家纷纷探索，这些远方土，地上的“野蛮人”的性质是什么，与他们打交道的恰当方式是什么。对艺术家来说，不仅新大陆本身，而且新大陆作为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和主题。对制图者而言，地图变得短命，由于新的信息迭出，不得不再重新绘制。地图上海怪和其他装饰性的图像不见了，新大陆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新大陆刺激着冒险行动。西班牙统治者看到并抓住了建立大帝国的契机。这与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并无直接联系，但却无疑被视为上帝保佑和教皇认可的十字军东征的延伸。甚至挫折也化作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尚有宝藏等待挖掘。哥伦布这只糊涂虫不过是不知到哪里寻宝罢了。在创业初期，行动最迅速者将得到奖赏。商业冒险家们购买、改装旧船，或建造新船，从100里格之遥的地方雇佣海员。遇到了麻烦吗？那就重新再干，再接再厉。士兵、自由绅士、恶棍、无赖和流氓自愿跨海寻找财富，重塑人生。这些人珍爱那些“骑士浪漫”的传说和神话——那个时代的喜剧故事——亚马孙女武士、无头或犬首的妖怪、或者金人的传说故事。亚马孙女武士的传奇尤为他们喜爱，因为这些传奇的主题是女性和男性豪杰的结合。人们传说那边处处有女武士，总是说她们就在下一道山脉之外，或在相距数日航程的海岛之上。有一个故事说她们上万人到西班牙受孕，因为“我国勇士雄武的名声已经传遍五湖四海”。[62] 这些传说的夸张和许诺有

助于让人相信它们。在那些遥远的地方，任何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二三十年间，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航行，探索南北大陆，他们总以为再一次登陆就会发现金银珠宝，但始终为没有得到期盼已久的东西而失望。他们临时用奴隶、奇花异草、异国他乡的动物、以及暗示从主矿脉而来的些许小块黄金安慰自己。信使带着珠宝和天然金块返回西班牙，以诱使皇室提供援兵、驮兽和武器。同时，占领者自己安营扎寨，树立起旗帜和十字架，按照欧洲的法律传统建立“城市”，并以神、圣人和各种圣物的名称命名它们。他们用五彩玻璃珠换取金块；参与当地土著的敌对行动，并挑动一个部落攻击另一个部落。他们攻击、恐吓、刑讯和杀害土著；占有他们的妻子、女儿和西班牙人造成的寡妇；往往在杀害许多异教徒的同时，超度他们的灵魂。而且，他们不断地索取黄金。他们的固执充分表现出他们的贪得无厌……还有他们的愚蠢：亚当·斯密曾将这种“神圣的渴望”称为“也许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1）

努力找寻，你就会有所发现。16世纪第二个10年间，西班牙人沿着尤卡坦半岛的海岸航行，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印第安人。他们身着棉布服装，住在石头砌成的小城镇里。他们对硬金属一无所知，不曾见过铜和铁，但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投石、毒标、带有锋利的黑曜石尖头的棍棒——杀死他们或胁迫他们，可不如对付岛民那样容易。所以，西班牙人温和地与他们谈话，与他们进行物物交换，并加以甘言诱惑。西班牙人从他们那里得知，越过山脉，向西有一片土地，由一个富有金银珠宝的国王统治着。他们接触的每一个印第安人都证实了这个传言，因为那位对陌生人一无所知的国王命令用厚礼满足外来人，以使他们离开。无疑，这是一个大错误。

此后，一队接一队的西班牙人沿着墨西哥海岸向北方和西方航行。恰巧，具有决定性的探险舰队的首领名叫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他早年曾在萨拉曼卡上学，年纪轻轻的，就不学好，过早地成为一个浪荡哥儿，一大弱点就是爱勾引最危险的女人——别人的老婆。所以他离开西班牙而浪迹天涯，是完全有道理的。此人仪表堂堂，挺拔刚

劲，富有魅力，鬼点子多，又善办外交。是一个甘愿为手下献身、而属下甘愿跟随他下地狱的天生领袖。正是他招募了几百人，并将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并率领他们（加上后续援军）征服了北美大陆最强大的政权。

即使如此，科尔特斯的作为也不过是故事的开端。历史不是野蛮的简单史诗。人是重要因素，但阿兹特克帝国 [63] 的崩溃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由藩邦拼凑而成的帝国，不同于王国和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庞杂，缺乏举国一心的凝聚力。人们看到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区分。而不是同胞与外人的区分。维系上下左右联系的力量必然表现为赤裸裸的权势，谈不上赤胆忠心，谈不上现实的合法性，谁不听话就叫谁过不去，靠横征暴敛攫取财富。因而，这种帝国表面上强大，这不过是外在表象，老百姓欢迎一群恶霸被另一群恶棍所替代，因为他们在绝望之中依然期望这种更替会减缓对他们的压迫。事实上，这些帝国的辉煌不过是瞬间闪烁，它们表面的坚强只不过是一层易碎的外壳。

这就是阿兹特克人（又名墨西哥人）的状况。他们原是一个小群落，是由北部的原始荒野（现为美国西南部地区）迁移到南方定居区域的粗野的游牧民族。他们并不受欢迎，曾一度给墨西哥山谷湖畔（该湖早已枯竭，今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墨西哥城所处不稳定的陆沉地带）较文明的民族当奴隶。奴隶制是战争与强权的熔炉。获得自由的阿兹特克人逃到芦苇密布的僻静地带定居，随之人口增多，力量增强。最初他们走出来是因为需要饮用水，他们使用诡计和武力，最重要的是利用恐怖活动扰乱敌人，使敌人在被打败以前就屈服，这样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2）

阿兹特克人的恐怖活动的表现形式，是把杀人祭神变成了一门产业。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地的人类学家和理论家如果不能为这种行为辩解的话，就宁愿规避或忽略它。但是，如果不探讨这些引起憎恨的昔日经历，就无法理解阿兹特克帝国的强弱兴亡。因宗教原因而导致人们死亡在该地区（包括南方玛雅人地区）司空见惯，它反映了这样一种信仰：太阳神需要人类血液的滋养。如果未进食，他就不能

升起。其他神也需要献祭：例如，献祭婴儿和孩子，以确保庄稼丰收和雨水充足；牺牲者的泪水是供水的保证。（3）

这种象征性姿态（可以理解为一体的滋养行动）仅需要几个祭祀的牺牲者。成人的鲜血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牺牲者被告知应把自己看做是为崇高事业而献身的：我们生来就该如此。有的学者指出，那些心与血的捐赠者本人并不这样想。应该注意到，这些人在被说服愿意爬着陡峭的台阶走上祭坛之前，需要服用一剂镇静剂。

阿兹特克人在杀人祭神方面的创新，则是出自一位皇室成员特拉卡莱尔之手。他心肠狠毒，废立过几个皇帝，权倾一时。他让人们祭祀阿兹特克部落之神——浑身尽是翅膀和爪子的状如南美蜂鸟的嗜血之神，想要用这个神取代别的较温和的神，在它那些扑打的翅膀的背后，险恶用心就是把此神祭献仪式变成威吓旁人的武器。原先祭神只牺牲几个人，特拉卡莱尔却使祭祀仪式变成纵情杀人的狂欢，持续数日之久，送上祭坛的牺牲品达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之多。他们的心被剝出后依然在跳动，他们的鲜血喷溅到偶像身上，他们的尸体滚下祭坛，被烹饪制成精美的食物，供阿兹特克贵族享用。

这种极端的行动使那些力图保持正确政治立场的人种学家显得非常尴尬，他们认为这类食人生番行径的描述是外国人为自己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所作的辩护（4）（就西班牙征服者而言当然是那样，当他们的墨西哥主人在他们眼前用献祭者的鲜血来调和款待客人的食物，以表示友好时，这确实是令人厌恶的）。有人试图争辩说，所有吃人的故事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是西班牙人捏造出来的。另一些人准备承认食人习性的事实，但指出了西班牙人所犯的几个错误——似乎绝望中的拼死斗争可以与制度化的行为相提并论。（5）有的人甚至争辩说，这是阿兹特克人（或至少那些对人肉有一定垄断权的贵族）在他们日常饮食中获取足够蛋白质的唯一方法。对于这种说法，尤其是就阿兹特克社会特权阶级而言，最好也只能说它表明了丰富的想象力。

[64]

（深具讽刺意义的是，欧洲人过后发现，他们自己被中国人指控

为有食人习性，因为中国人认为外国人都是野蛮人。（6）在中国，这些谣言的作用是阻碍当地人与外国人交往。在食人故事广为流传的非洲，葡萄牙人警告当地人，英国人嗜吃人肉，希望借土著人之手撵走英国干涉者或作出对英国人更不利的事情。而自视优越于所有番邦的中国人则称葡萄牙人亦有食人习性。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阿兹特克人的大规模祭祀牺牲正是收到了特拉卡莱尔那位奸相所热望的效果：它们大幅度降低了阿兹特克的敌人进行抵抗的意愿。当然，失利者会怀恨在心。阿兹特克的仪式也产生了一个供应的问题：哪里能得到这么多祭祀牺牲者？来自战争？但那意味着战火连绵。来自监禁和奴隶？但那意味着压迫的加剧和潜在的动乱。在盟国或属国的统治者的默许下掠夺它们的人？那就是精心设计的所谓的“花战”，他国的贵族同谋者躲在用花做的屏风后面，似乎借以遮住他们的眼睛，在此情况下观看阿兹特克人上演的模拟战争游戏和比武，从而产生作为祭品的囚徒。

阿兹特克帝国表面上强盛、辉煌，实际上不过是羽毛糊起来的大厦。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由于人们对暴政的憎恶和纷争导致的分裂，帝国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正是人们的这种仇恨使得科尔特斯在找寻同盟者方面毫不困难，他们向科尔特斯提供了价值不菲的信息而且在运输方面给了他珍贵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他也许永远不能将他的小分队带上海岸，带着武器辎重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墨西哥谷地。

一旦到达那里，这些入侵者就享有了巨大的优势。他们有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最重要的还不是枪炮，尽管枪炮最初很吓人，科尔特斯不失时机地用枪炮齐射令阿兹特克人胆寒——更有用的武器是钢刀钢剑。阿兹特克人的武器是棍棒、投石器和装有黑曜石尖头的木棒，伤害作用大于杀戮，而这也是他们被期望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伤残和逮捕，最好能获得献祭品。按照阿兹特克人的评判标准，西班牙人的作战方式是不公平的：他们刺戮躯体而不是四肢，因为对手腹部受伤即使不是立即死去，也会停止战斗。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阿兹特克聚集众人、利用人多势众来遏止敌人的作战方法却使他们自己损

失惨重：西班牙人每一挥剑都有所斩获。在冲杀之际，西班牙的长矛轻骑兵和骑马的剑士行动迅捷、杀戮凶狠，对阿兹特克人而言，简直是噩梦降临。开始，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是长着一个身子、两个脑袋的怪物。 [65]

这些有效地证明了冶铁技术的根本性优势。武器也不过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完全依赖铲、凿、斧、锤、砧等诸如此类的铁器。他们要做马掌并给马钉掌，修理武器，更换已破坏的装备。每一只铁钉、每一块铁片都珍贵无比，因为它只能从西班牙运来。马掌价值30比索，而100只铁钉价值80比索。许多骑马的人发现，给马装上黄金马掌也许更便宜些。（7）

阿兹特克的领导人对西班牙人心里没底，决策犹豫不定，加剧了自己的举措失误。皇帝蒙提祖马二世听说，这些陌生人乘大船而来，他们有的头发金黄、白皮肤、脸留胡须，身穿闪闪发光的服装，不知道他们是人还是神。墨西哥传说中，羽蛇神是众神之首，但是因为长期沉溺于饮酒而被造反的神灵放逐，他将在某一天从东方的海上归来：难道这就是所说的回归吗？

蒙提祖马二世的密探报告说，这些陌生人的举止更像人，而非神。其中之一是，他们嗜吃。这可做两种解释：其一，由于他们并不分享鲜血和人肉，这与羽蛇神的人性特征和反对活人祭祀的传说相吻合；其二，他们对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非常喜爱。神喜欢或需要肉欲吗？难说。当然，该问题对欧洲人而言却不难解释。如果阿兹特克人知道希腊神话，他们就会承认性欲是神的标示之一。蒙提祖马二世既想迎战，又想送客，在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最后试图邀请科尔特斯进入他的王国首都，借此贿赂他离开。

此时，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处境危急。他们要呆在那里：科尔特斯烧毁了自己的船只，告诉手下人他们已经无路可退。或战或死，他们别无选择。或者比死亡更悲惨：阿兹特克人已经使西班牙人知道墨西哥囚徒的命运，剥了皮的血淋淋的尸体被悬挂在城墙之上。这是阿兹特克战术的另一个失误，它使西班牙人看到唯有决然勇敢前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虽然有援兵（起初是来逮捕科尔特斯的）和肉搏战的一些胜利，但由于人数相对太少，他们仍然损失惨重。蒙特祖马二世也许犹豫不决，但其他阿兹特克人却是天生或曾经训练过的武士，当看到一小撮傲慢的入侵者，他们无意向敌人低头屈服。西班牙人进入阿兹特克的首都以后又被赶走，他们狼狈不堪地从堤道的水中逃遁（阿兹特克人早已将桥砍断），四面都是敌人。许多西班牙人身上带的黄金太多，又不舍得丢弃，自己因而沉入水底。西班牙入侵者的死亡人数达一半到3/4。

西班牙人称之为“悲惨的夜晚”，但他们的逃逸仍可称为奇迹。墨西哥人没能乘胜追击，一举消灭他们，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还有一个最微妙和秘密的武器使得墨西哥人损伤惨重，这是入侵者自己所未曾意识到的。这就是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病原体，不知不觉将死亡带给那些对这些疾病一无所知的人们。它们已经肆虐过加勒比海岸，给那里带去惨重的损失。现在，它们又使数以百计的阿兹特克武士在胜利到来之际惨然倒下。

科尔特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几个月过去，新舰队到来，带来了新力量。他的印第安盟友帮助修建船只，带领他们穿过群山进入墨西哥谷地，他们就在那里聚结，对阿兹特克首都这座湖中岛城发动攻击。这一次，战争局势完全扭转了：阿兹特克帝国被打败，他们的庙宇被摧毁，偶像被推翻在地。这并不令人惊奇：阿兹特克人对被征服城市的标志就是一座燃烧着的庙宇。胜利者的神主宰了一切。

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与这极其相似：它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多部落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依靠才智管理国家：帝国内部同样存在着纷争与宿怨，印加人不仅与附属部落相敌对，而且相互之间也有冲突；况且，欧洲的疾病再一次成为欧洲征服者无声的帮手。当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战斗小分队抵达时，印加内战已经进行了7年（印加人显然死于天花），因而元气大伤。

在这里，最初的接触同样是诱人的：海边的小小村落似乎满地黄金。同样，印加人的错误的意向导致西班牙人的冒险。印加人并没有

把西班牙人错认为神灵，但完全低估了这只小分队的能量，他们对海岸边生活的人们的蔑视，自古有之。这些人如何能战胜来自高原的更勇敢的武士呢？西班牙人得知他们的内部纷争，再一次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他们到达高原城镇卡哈马卡，与印加皇帝相会，皮萨罗极力向他郑重地保证，将像朋友和兄弟那样对待他。然后，他们大多躲藏起来，等待时机。印加人把这些当做他们害怕的表示。确实，不夸张地说，许多西班牙人尿湿了裤子。

成千上万的印加士兵到达这里，站满了广场。他们衣着华丽，但并无武器在手。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乘着轿到来，帝国最显赫的贵族充当着轿夫。一位西班牙神父走向前，将圣经献给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打开圣经，看了看，将它扔在地上。这就足够了。神父往回跑向皮萨罗，喊到：“出来吧！出来吧，基督徒！出来惩治这些拒绝上帝圣物的怀有敌意的狗！”杀戮使约7000印加人当场倒在血泊中，伤者无以数计。西班牙骑士乘胜追击，随意斩杀，那些衣着显赫的人或许是领导者，更成为追杀对象。“如果不是黑夜降临，40000名印第安军人将不会有几个可以活着。”

阿塔瓦尔帕沦为阶下囚，全身裸露但未受到伤害。西班牙人要求并且得到的赎金是任何欧洲君主所承担不起的——黄金足可以装满一间大房子，从地面到屋顶无一空隙。印第安人付足了赎金，西班牙人不得不释放人质，交易就是交易，不能丧失信誉。但他们很快以背叛西班牙王室的名义又逮捕了他（竟然如此！）；作了最后的仪式（首先超度），然后形象生动、名副其实地将印加帝国皇帝斩首。 [66]

这是一个血腥的故事，充满了残忍与欺诈、屈尊与伪善；但是人们不能用善、恶、丑的标准评判这些事件，他们双方是彼此彼此。皮萨罗到来之前，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父亲瓦伊纳·卡帕克已经确立了对战败者的惩罚标准：他将造反部落的人斩首，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湖里，“现在，你们不过是一群小孩儿！”（8）据记载，牺牲者有2000多，“这也许是西班牙征服新大陆之前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

（9）该地今天被称为“血湖”。（10）

生物学家兼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曾作过透彻的分析，他问道，为什么印加人表现得如此天真——按照我们的标准，如此愚蠢。他的解释是：开化民族与未开化民族之间在奸诈与经验方面存在着区别。西班牙人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丰富知识的继承者”；而印加人则“没有对付海外入侵者的实际经验……以前从未听说（或阅读）过其他人、其他地方、任何时候遭受的类似的威胁。”（11）

但是，印加人本来应当有自知之明。

秘鲁印第安人的抵抗与墨西哥印第安人相比更为顽强，持续时间也长得多；实际上，有人认为他们的叛乱迄今从未停止过。1532年，皮萨罗活捉了阿塔瓦尔帕，但是直到1539年恰尔卡斯率领的印加军队才投降，曼科·印加到比尔卡班巴山避难，西班牙的控制才算稳固。即使那时，印加的流亡政府也曾在山区掀起起义的浪潮，直到1572年，弗兰朗斯科·德·托莱多总督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印加的顽强不屈部分反映了欧洲人的疾病对秘鲁人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因尚不清楚，但墨西哥人口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锐减90%，从大约2500万人降到100至200万人；而秘鲁的人口只减少了1/5。（12）

印加人尽管有暂时的成功，但他们企图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努力终归于失败。西班牙人有技术，受过训练，有组织，作战经验丰富，使得当地土著看起来就像业余军人。他们有当地同谋的帮助，其中有相当多的人皈依基督教，教会可以容忍这些人嗜嗜血性的异教徒习惯，但在忠于西班牙统治这一点上却毫无妥协的余地。（13）西班牙人有自己远方强大帝国人力物力的支持，还有似乎源源不断来寻求财富的军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明智地利用原有的印加帝国权力机构来为他们服务。印加统治者的继承者们成为世袭的、无所事事的贵族阶层，与西班牙要人通婚者逐渐增多，他们的后人构成现今秘鲁首都利马和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上流社会，其中有些人活跃于商界和政界。原先的部落头人（酋长）继续管理着地方事务。他们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免除了劳役和赋税；自1619年始，他们的子女在特设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有的孩子成为怀旧的编年史作者，通过悔恨和同情的泪水透视旧制度；有的孩子成为替被剥削大众说话的雄辩的代

言人（关于已消失世界的回忆录，在欧洲人中引起的共鸣多于大部分不识字的土著人民）。残存的抗议往往采取请愿的形式，适时地屈服于西班牙权势的统治和等级结构。印加帝国已成为历史。（14）

“他一览无余”：皮萨罗之前的印加人

印加人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们不知道书写。我们只得依靠考古的遗迹（由于西班牙人疯狂挖掘金银，没有多少历史遗迹幸免）、笔录被征服者口述的或其后代撰写的传奇故事、或早年西班牙游客撰写的某些文字材料。（15）总的来说，这些资料实质上是相吻合的。

印加是新大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北起现在的哥伦比亚（北纬2度），南至今天的智利圣地亚哥附近（南纬35度），绵延4000多公里；西起大西洋海岸，东到安第斯山脉分水岭东侧和现在的玻利维亚高原。如同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一样，印加帝国所受到的限制，一部分来自大自然——印加人从来不适应茂密森林中的生活——一部分来自阿劳干人等倔强部落的顽抗。阿劳干人也曾长期抵抗西班牙人，令西班牙人丢脸，直到19世纪才屈服于连发武器之下。（16）

从陆路旅行和交通的障碍来看，印加帝国规模愈发惊人。南美洲的一道道峡谷和丘陵从山脉一直延伸到海洋，截断了南北通道。由于缺少轮车（靠马和人力进行搬运）和发展沿海船运的失败 [67]，这些自然阻碍变得更难逾越。印加帝国的诀窍在于用长跑信差和役夫维持通信联络。在印加帝国的所有道路上，每隔1.5西班牙里格（约为4.5英里），在道路两旁各有一座为信差搭起的临时营房。每一个信差只关注一个方向，将任何时间接到的信息和包裹传递到下一站营房。信差从小就训练做这种工作，可以昼夜跑步前进，平均每天跑50里格（大约150英里）。编年史作者贝纳伯·科沃告诉我们，从利马到库斯科（秘鲁一城市名）约140里格，路况不佳。而信差们约用3天的时间。（17）一个世纪之后，西班牙骑马的邮差要用12到13天。[68] 18世纪时，从纽约到波士顿约200英里的平地，乘马车需要一周的时间（当然，马车比驮兽和搬运工运载的东西要多得多）。

这样，印加皇帝可以与帝国最遥远的地方保持紧密而迅捷的联系，对高度多样化的社会实施独裁统治。他被视为神。原则上讲，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他，他慷慨地把土地租借给社区民众，这些民众以实物和劳务，也即“赋税和劳役”向皇帝纳贡。这些强制性的劳役有修路和修水利，在军队和信差队服役，搬运货物，修建官方建筑（从皇宫到仓库），收租和分发恩赐物。所有的服装都是印加当局发放的。普通百姓在结婚时，可获得一套日常穿的衣服、一套节日穿的衣服和严冬天气工作时用的披肩一条。当衣服穿破之后，他可以去更换。除去服劳役外，人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印加社会像一座蚁冢：每个人都要工作，孩子从5岁开始就要干活。妇女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捻线，传说印加道路修建得这样平整是为了防止她们跌倒；她们太忙了，根本无暇顾及脚下。除当地易货交易之外，贸易为官府所控制

有的学者称这种制度为“社会主义”，因为这么多社会产品呈交中央政府进行最后的重新分配，这也许是一个恰当的称呼；但是该制度在形式和实质上与那些流行的贵族专制并无区别，贵族专制的“主要的划分”在于将小范围的精英阶层与庞大的、相对无甚差别的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印加社会也有与此性质相同的方面：民众生活都艰苦而卑微，每个人在吃饭和等待时都弯腰哈背。统治者在衣着、起居和饮食上均与众不同，此外还有“享受”咀嚼古柯叶的权利。显然，普通百姓也能够得到这种作物，因为没有古柯，他们就无法完成辛劳的工作。然而，单纯的享受是不存在的。告密者和侦探密布全国，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探测各家各户、甚至人家的瓶瓶罐罐，强行维护那种特权的排他性。如果每个人都能享受，那还叫什么特权呢？

印加帝王的眼线无处不在。总督一词被称为图克里库克（Tukrikuk），意为“他一览元余”。

印加帝国在它存在的短短世纪里将各民族统一在它的领导之下，并创立了一种通用语言，即盖丘亚语（Guechua），现仍为安第斯山脉的居民使用着——格瓦拉在用西班牙语动员他们从事革命事业时，曾学过这种语言。然而，在这种印加“和平”的幌子之下，并不存在秩序与和谐。印第安人似乎容忍和顺从，但求助于酒和毒品的现象是一

种不好的征兆。有人甚至斥责他们在哺育儿童方面毫无爱心：孩子从未被抱过，更不用说养育了。不论怎样，这种文化都剥夺了普通民众的创造性、自治和个性。

注释

1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Book IV , ch.7 , Part I : “其实，这就是人们对于自身的幸运所怀抱的那种不合理的信念，认为只要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就会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自行流入此种用途。”（该译文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下卷134页。）

2 .关于阿兹特克人为自己军事胜利而自豪的论述，参见 Fernandez-Armesto , *Millennium* , 第211-220页。

3 .见 Stuart , *The Mighty Aztecs* , 第73页。印第安人权利的著名维护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最终赞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而不是仪式本身。他在《自辩书》中写道：“人们可以明确地证明，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上帝并不完全憎恶活人献祭。”他又说，“在宗教狂热方面，（阿兹特克人）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因为最笃信宗教的民族会为了民族利益而献祭自己孩子。”引自：Todorov , *La conquete de L’Amerique* , 第194 , 196页。

4 .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们在“全球价值”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痛苦挣扎——我们能否从更高的角度看待其他文化？——参见 Fleuhr-Lobban ,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Human Rights”。

5 .这种“你也不例外”的辩解至少可追溯到拉斯·卡萨斯，见 Todorov , *La conquete de l’Amerique* , 第194页。

6 .Sahlins ,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 第19页 , n.24。该文章以1793年英国乔治·马嘎尔尼的访华过程为例。可怜的马嘎尔尼，他力图用自己高贵的举止让中国人相信，英国是一个开化的国度。然而他保持自己尊严亦即建立与中国主人平等的关系的种种努力，只能

使中国人相信，在被认可为文明民族之前，他还有许多要学习的。

7 .此言出自编年史学家佩德罗·阿瓜多之口，引自Gomez , *L'invention* , 第171页。参见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 ch.7 , part 2。

8 .Kirkpatrick , *Les Conquistadors espagnols* , 第147页。

9 .Fernandez-Armesto , *Millennium* , 第224页。

10 .Bernand , *The Incas* , 第28页。

11 .Diamond , *Guns, Germs, and Steel* , 第80页。

12 .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统计充满了矛盾与想象。关于对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计差距极大，罗森布拉特认为有1300万人（参见A.Rosenblatt , *La poblacion de America* , 1971）；而伯克利学派认为有1亿人。参见Woodrow Borah, Sherburne Cook, L.B.Simpson , *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 , 1971。后者估计的数字异常夸张，使得大多数学者为之吃惊。现在看来，墨西哥和秘鲁的以玉米为主要食物地区的人口为5000到7000万人是较为合情合理的估计。这种夸大包含着某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夸大人口灾难将加重欧洲的罪恶——似乎它还不够大。难道南美洲西海岸的印第安人包含特殊的遗传因子，特别容易感染这些病原体？参见以下推测：Dickinson和Mahn-Lot , 1492-1992 , 第93-94页。

13 .不止一次，造反计划在教堂忏悔室泄露，并报告给当局。参见Rowe , “The Incas” , (1957) , 第158页；Chklovski , *Voyage of Marco Polo* , 第162页，谈到这类似中国蒙古皇帝忽必烈的解梦者所担当的角色。这些解梦者肯定没有义务保守秘密。

14 .“已成为历史”似乎是说可以不再予以考虑。然而，历史却有自己的义务。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争论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按照公认的历史记录，应当恢复那些非洲和美洲国家过去的帝国荣耀的应有地位……没有‘扩张年代’扩张和集权行动的宏大画

卷，本千年下半季由欧洲倡议而塑造的世界性质就不会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把握，也不能现实主义地正视其成就之幅度。”引自Fernandez-Armesto, *Millennium* , 第225页。

15 .其中最重要的有：（1）Father Bernabe Cobo, *History of the Inca Empire : An Account of the Indians Customs and Their Origin Together With a Treatise on Inca Legends, Histor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 该著作完成于1653年，罗弗认为科沃神甫此书“仍然是现存的对印加文化最优秀、最完整的描述”（Rowe, “Inca Culture”）；（2） Garcilaso de la Vega El Inca, *Royal Commentary of the Incas and General History of Peru* 。该著作完成于1616年。作者的母亲出自印加帝国皇族，他父亲是西班牙占领者。关于维加对印加征服过程的美化性描述的评论，参见：Bernand, *The Incas* , 第28页。

16 .这里说“令西班牙人丢脸”，是确有其事。在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中，阿劳干人曾经向西班牙人展示他们俘虏的西班牙妇女，当着她们原配偶的面撩起她们的裙子，让人看出她们已有身孕——见 Padden, “Cultural Change and Military Resistance”。

17 .见Bernabe Cobo, *History of the Inca Empire : An Account of the Indians Customs and Their Origin Together With a Treatise on Inca Legends, Histor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 第228—230页。印加帝国的道路修建得非常出色，宽阔、平直的一些路段给西班牙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西班牙本土的道路并不足为范例。印加有两条南北方向的主路，一条沿着海岸线，一条沿着高原山岭；还有东西横断的主道和地方道路为补充。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道路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实用性：它们从未达到应有的标准。在比较难走的地形上，也许只用石头修建了一条一码（3英尺）宽的小路，为就近翻山而铺成阶梯。它们是为防止岩石崩塌而修建，但行人要小心防止摔倒。每隔一段距离的沿路小镇上，印加人为旅客修建了客棧和库房。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有公务在身。印加当局阻止私人经商，对长途贸易实行垄断。参见Rowe, “Inca Culture”，第229-233页。

第8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

平静而宜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最终成为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法传承下去，而逐步成为甘蔗种植园和殖民大农场。苦难的岛屿也是黑人奴隶的劳作地，它们衰落了、贫穷了。

当西班牙征服者发现拥有珠宝和人民的陆地帝国之后，他们对加勒比海诸岛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在这些岛屿上停留的时间够长了，已经掠夺走了装饰物或砂矿碎石中的所有黄金，同时也杀掉了大多数土著居民。他们需要食物，但发现当地的淀粉食品木薯粉有毒，不可食用。^[69]他们从未想过种植农作物：印第安人需要用来开矿，而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不是做农民的。所以，他们从欧洲进口粮食——其价格非常昂贵——并将牛群带到这个曾是渔猎的地方饲养。早期，这些征服者经常饥肠辘辘，“在饥荒的边缘”，皮埃尔·肖尼这样说。其后，他们成为历史上吃肉最多的人。^[70]

西班牙人在一些小的要塞安营扎寨，并且维持着保证将珠宝从大陆经由诸岛运向欧洲的海军兵站。但除在古巴、圣多明各、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大安的列斯群岛）留有一些行政官员外，他们多在大陆定居，像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一样生活。此后，他们并未对这块阳光普照的乐园的经济可能性有所思考。引用肖尼的话说，“西班牙人的殖民开拓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预先确立了。”阿拉瓦克人^[71]被杀戮殆尽，加勒比人不愿意屈服，多么无用的岛屿！（1）

回顾来看，西班牙人对黄金的追求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岛屿等待使用，而西班牙的失误是欧洲的机会。哥伦布早就明白这一点。当他没有发现自己渴望的黄金时，他写信告诉他的君主，这些岛屿可以用来种植甘蔗。当时，他试图让君主继续对新大陆保持兴趣，为自己的航行辩护。无疑，他是正确的。哥伦布从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

里学会了种植甘蔗。实际上他是建议继续推行种植移民，农业随之迁移。这种情形早在几世纪前曾出现于南亚，既是受消费需求驱动，也是受到土地耗尽这种压力的推动。

甘蔗从非洲一大西洋群岛大量移植到新大陆，并非随西班牙人而来，而与葡萄牙人密切相关。葡萄牙人早在巴西种植甘蔗，而荷兰人则成为经营巴西这种农作物的商人、炼糖者（2）和资本家。荷兰人在葡萄牙—西班牙联盟期间的某些年代（1630-1643年）曾占据过巴西东北海岸（伯尔南布哥），了解了土质和甘蔗种植；他们在被驱逐之前，就开始寻找新的甘蔗地。寻找甘蔗地将他们引向北方靠近敌人防守最空虚的地方：小安的列斯群岛。在那里他们占领了几个岛屿（阿鲁巴、圣马丁、库拉索、圣卢西亚岛），“不过是几个小岛而已”。荷兰人也在南美洲大陆上（苏里南）自己种植甘蔗，并在这块处女地上建立了几个种植园。但是，他们耕作得不好。与自己种植甘蔗或使用奴隶相比，荷兰人在运送甘蔗和奴隶方面作得更好。

同时，英国人也参与竞争，1624年占领了圣克里斯托弗岛（圣基茨岛）；1628年占领了尼维斯岛和其他小岛。早期最重要的成就是1627年占领巴巴多斯，因为该岛以前基本上未曾有人居住——他们可以取为己用，自行安排。英国人乘船逆风而行，直抵安的列斯群岛的东部，这里极少为加勒比人或西班牙人光顾。1655年，英国人占领了比其他岛屿大得多的牙买加岛，它曾由西班牙王室移交给8家贵族家庭管理，他们既不愿意分割，也无力开发该岛；当英国人占领该岛时，岛上黑人、白人一共不过3000人。（3）实际上，牙买加是沙蝇、蚋、蟑螂和传播疟疾的蚊子横行的混乱之地；但是，那时的加勒比诸岛到处都是虫子，它们有的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小得人都看不见。即使最小的虫子的叫声也令人发狂，毒性大，人被咬后痛苦不堪。上流人士将桌子腿和床腿放在水盆里，以免爬虫爬上去。（4）

起初，英国人将加勒比诸岛视为能够定居的殖民地，如同北美洲的东海岸一样。拥有农庄的那些人为这里便宜而丰饶的土地所吸引，蜂拥而至。他们到这里来种植烟草、靛蓝植物和棉花（这里生产的烟草质量极差，在伦敦市场上价格最低）。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契约仆

役，这些人准备为其他人劳作几年，然后逐步获得自己的土地耕种。到1640年，英国人到达这里10年多一点，据说巴巴多斯的人口已经超过30000人，相当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人口之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00人。（5）

继他们而来的是甘蔗种植者，他们受到荷兰人种植方式的鼓舞甚或部分有荷兰人的财政支持；甘蔗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没有其他经济作物收入更高，也没有其他经济作物花费财力更多：购买挤榨汁机、炼炉、槽和蒸馏器（制造甜酒之用）要花费巨额资金，并需要拥有大的种植园。花费最大的项目是牲畜（也许可以自行繁衍）和奴隶（显然不能繁衍）。只有持续的进口才能保证加勒比地区奴隶的人口数量。

甘蔗种植的成功导致小型和中等烟草和棉花农场的毁坏。因此，土地集中占有，使得仆役契约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如果人们不能在契约到期后拥有家园，那么多年的劳动还有何用？况且，种植甘蔗和制糖要求很高，人们也不愿接受；种植园主又往往把奴仆当做下流杂种看待，常常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仆役拒绝履行契约并逃离该岛，到别的岛屿上试试运气或沦落为海盗。许多人“因饥饿和苦难而死”。（6）

法国人紧随英国人而来。他们首先集中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1635年）。这两个岛屿对英国人没有吸引力，因为那里住着肮脏的加勒比人，他们设置埋伏和使用有毒的箭。与阿兹特克人不同，加勒比人试图杀死他们的敌人。法国人为他们的冒失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终得到了小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岛上有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港口，它们至今仍为法国所有，属海外部管辖（有时，有的小岛屿被几国分享，如圣马丁岛。也要给我生存的空间吧。即使互为夙敌的英法两国有时也共处一岛，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西班牙人的进攻）。

像英国得到牙买加一样，法国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端（法国人称之为圣多明各，现为海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

半部仍为西班牙所有。该岛屿自己的地形特征导致了这种划分：该岛两端由高山屏障隔开。多年来圣多明各是海盗和逃跑的奴隶所钟爱的藏身之所。他们的出现是一个可恶的先例，他们掠夺成性——肖尼称他们为“源于法国的国际犯罪联盟”——西班牙人多次进行惩罚性征剿，却徒劳无功（他们可以卷土重来）（7）。法国人与这些麻烦制造者结盟，在他们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该岛的西半部分，西班牙人离得远远的。

圣多明各是最后一个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岛屿，也是土地最肥沃、获利最丰厚的地方。甘蔗种植给法国本土和该岛屿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高水平生活，美丽的庄园和马车，衣着华丽的黑人奴仆（尽管往往赤着脚，法国的农民也往往赤脚）。这里的种植业获利颇丰，对英属西印度群岛所知更多的亚当·斯密曾把它作为法国优势的一个例证：“……他们政府的特质，”他写道，“使他们对于黑人奴隶，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8）他大错特错了。1790年，圣多明各的黑人奴隶为法国的革命宣言所鼓舞，发动起义并建立了新大陆上第二个新国家。法国人重新占领该地的企图失败了，他们更多的是被疾病而不是子弹击败的。等到战事平息时，从卧病在床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海地的白人都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除外。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劳动，砍倒、压榨，而后炼制糖汁：一群劳动者在酷热的太阳下劳动，危险，匆忙而整天劳作，烧煮，但必须在甘蔗腐烂以前完成。在田地里，男男女女像牲畜般地劳动。没有犁耙，工具很少，大多是手工劳动。其理念是让这些人干活、让手不闲着，因为安逸将引来麻烦。在糖厂，工人们将甘蔗秆送进滚轴粉碎机里，稍有不慎，轧着手或手指头，整个人就会跟进去，轧成肉酱。煮锅同样是一个小地狱，必须小心搅动：一点糖浆溅到身上，就会痛苦万分。“如果搅动的人沾上一点滚烫的糖浆，它就像胶水或沾鸟剂一样，四肢或性命就难保了。”（9）

甘蔗种植园主想雇佣白人，但白人是自由的，他们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至少他们要求的工资是种植园主所负担不起的。西班牙人强迫印第安人从事这种劳动，但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人都跑光了。秘

鲁和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受到监护者 [72] 的约束，无法到公开市场上雇佣。他们被强迫劳动时，殖民者首先希望他们去开矿。即使如此，有些印第安人还是被迫到维拉克鲁斯 [73] 的种植园中劳动。他们做得并不好。印第安人即使不是因病而死，也会被主人压榨至死。

解决诸岛和新大陆对劳动力需求的办法是，引进数以万计的非洲奴隶。对此，即使人道主义教士的典范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也将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他在鼓励白人移民的同时还要求保护土著的利益。印第安人已经大批死亡，他认为自己对他们有特殊的责任：他要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因为他们有灵魂。他显然并不肯定黑人有灵魂。他建议应允许每一个殖民者带来一打黑人奴隶，这样印第安人就可以免受苦难了。 (10) 不消说，这个“温和”的建议不久就证明是不对的。其原因在于，非洲人也同样死于疾病和非人待遇。

有多少非洲人运送到新大陆？为加重殖民者的罪恶感，估计数字多年来一直在增多。但是，300年间共有1000万左右的非洲人被迫作为奴隶的估计，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这些人是经过悲惨的运输而幸存下来的。一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猜测从黑奴在非洲内地被抓捕或贩卖，到他们被押送到登船的港口，这一路上尽是死者留下的尸骨和镣铐，估计死亡的人约达半数。 (11) 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在海岸上，他们被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中，即使最强壮的体格也经受不住它的损害。因为奴隶贩子需要时间来选择足够的大批健壮的奴隶，许多奴隶被关在船舱里，未等开航就死去了。这所谓的“中途航线” [74]，充满了不透气的污物、黏液、呕吐物和人类粪便，它无疑是跨洋者的“杀手”。然而，奴隶贩子不敢让他的货物离开恶臭的船舱到甲板上透气，害怕他们跳海逃走。损失1/7被认为是正常的；损失1/3或1/4就太高了，但还是可以谅解的。

每天的航行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有的奴隶运输船只都有鲨鱼尾随。所以，奴隶贩子喜欢在东部诸岛登陆和出售他们的货物——越快越好，在大安的列斯群岛实行优惠价。运奴船一来，在顺风方向上几英里外的地方都能闻到它们的恶臭，即使奴隶们下了船，即使船只从贸易市场离开，船上的这种恶息也不会消除。幸存的奴隶抵达

时，生病、羸弱、受惊和沮丧（“综合忧郁症”）——黑人们确信白人要吃掉他们——许多人在“适应”过程开始不久之后就死去了。

只有商业利益才能保护奴隶：奴隶贩子不想失去其有价值的资本。船员与奴隶的死亡率几乎一样高，他们有许多理由（首先是为了嗅觉）保持船舱的井井有条和整洁。我们曾听说有的船只航行期间无任何人失去生命，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我们还听说有的国家船运好于他国。据说荷兰的船只最好：特制的船只，甲板下的空间大，甚至还装有流通新鲜空气的通风设备。有的奴隶贩子带的奴隶挤满船舱，尽管他们知道许多会死去，但是依然尽量多装；有的奴隶贩子的运奴船船舱较为松快，他们打的算盘是：贩运的奴隶虽然少一些，但到港后能交货的会多一些，还是划算的。不过很难和气对待这些奴隶，因为奴隶船上弥漫着恐惧和仇恨的气氛，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一旦到达，奴隶们就会被卖掉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开始劳动。“适应”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身体羸弱的奴隶将被淘汰，桀骜不驯的奴隶将被驯服。固执的造反者将会被鞭打、强迫劳动并充当反面教材。逃亡者常常被自己的同伙追捕和扭送回来，否则，他们就必须补偿逃亡者造成的劳动损失，而与奴隶主合作会得到好处。像其他压迫制度一样，奴隶制在某些方面依赖受害者的合作。

奴隶劳动本身是辛苦而乏味的，是为追求效率（群组劳力之间的协调），也是为单调和愚笨而设计。其目标不是使得他们的头脑和四肢更灵活，而是要保持这些“动物”的迟钝和顺从。当需要加快劳动的时候，比如收获季节，这些奴隶被鞭打着工作。主人和监工认为黑人并不比牲口好多少，对他们随心所欲地鞭打棒喝，有时甚至任意使他们致残或致死。十足为了经济的原因，怀孕的女人直到生孩子为止被免除棒打；生了孩子以后，妇女就得背着婴儿在田地里劳动。法律规定，打死奴隶要处以罚金；当然，打死别人的奴隶交纳的罚金要比打死自己奴隶更高。但是，由于惩戒奴隶是合法的，凶残的主人逃脱惩罚是不难的。

因而，奴隶们不断地遭受着折磨与羞辱。偶尔也有仁慈的主人，但他们数量极少，而且被他人视为社会和财富的威胁。而且，好主人也无法持续当下去：他们会死，会搬走，主人一变换，可忍受的环境就会变得无法忍受。奴隶社会不可能鼓励宽厚和仁慈。在巴巴多斯，一些白人公谊会教徒由于把黑人带进自己的教堂而被处以重金罚款，据说是因为他们那样做会让黑人萌发一定程度的人性感觉和不该有的过礼拜天的观念。休息？只有不需要干活的人才配享受休息。

人口统计很说明问题。加勒比奴隶的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甘蔗种植对大西洋（洲际）经济和欧洲工业化发展的意义如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从最简单的层面讲，有的人——主要以埃里克·威廉斯 [75] 为代表——争辩说奴隶贸易的利润和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浇灌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花园，或用另一个比喻，“使国家的整个生产体系肥沃多产”。（12）从比较复杂的层面上讲，则是亚当·斯密式的推论：“以奴隶制为基石的大西洋体系为英国提供了劳动分工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机会。”（13）

威廉斯的论点既受到抨击，也受到赞赏，理由好坏都有。起初的反应大都是负面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近年来，这种几乎一致的反对意见因新的研究、分析和阐释而遭到挑战”。有的反响体现了“由反殖民主义的高涨、新国家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以及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辛酸回忆所引发的理智和道德观念的演变”。（14）其目的则如同威廉斯本人的想法一样，是要提醒那些洋洋自得、为大英帝国自豪的英国佬，叫他们别忘了自己对非洲欠下的债。如果说英国得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国”，那也是建立在挨鞭打的黑奴脊背之上的。（15）

对埃里克·威廉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对他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信念表示反感：他们说，威廉斯将一切都归结到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16）说得不错；可是说到底，种植园主所要的东西本来就是钱。比较中肯的，倒是威廉斯的经验主义批评：有的历史学家试图计算奴隶贸易的收益，发现它远非财源茂盛。有的人贩运一趟的确赚

了大钱，另一些人却赔了老本，连船都赔进去了。有一个估算数字是奴隶买卖的赢利率跟别的买卖差不多，平均不到10%，而变异（风险）却更大，这大概既令人受鼓励，也令人气馁。（17）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说法。一位批评者认为，10%这一数字估低了，因为它所统计的被运送奴隶太少，而且其价格低估了1/4。（18）尽管如此，这些利润在总数上就不大，更不用说其中只会有一部分通过贸易和工业去影响英国发展的道路。同一位批评者也认可这一点。

然而，奴隶贸易不过是一个大综合体（人所共知的三角贸易，现被称为大西洋体系）的一部分。奴隶劳动使得高强度的甘蔗种植和提炼成为可能。蔗糖（还有甜酒和糖蜜等副产品）产生利润，滋养着种植园主和商人，商人们出售蔗糖，付款给种植园主，并向他们提供茶叶、咖啡以及其他可叫人上瘾的含有咖啡因的物品。（19）种植园主则买食品供自己及其奴隶食用（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甘蔗田种植粮食作物）。有的食品来自欧洲；但越来越多来自于北美洲的殖民地。他们还购买工业制成品：廉价的棉纺织品和最新样式的丝织品；铜制的煮锅和蒸馏器；铁器、铁钉和枪炮；工厂的机械及其零部件。同时，英国的生产者还制造商品，用来交换非洲的奴隶。这是一个整体，而奴隶制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它刺激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英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提高了劳动分工，并促进省力设备的发明。（20）

从这种全面的观点来看，没必要将争论（奴隶制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依据于利润（不像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大）和那些买卖和使用奴隶的人的开支。确实，大笔资金流到英国，有一些资金间接转移到制造业。但是，它确实只是工业资本的一项小的补充。在外地的种植园主往往把他们的资金注入土地、社会地位和乡村生活中（由于他们远离生产和管理，因而收入也大受损失）。商人是另一回事，他们有的确实投资于工业；但他们在商人中属于例外，在工业资本家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市场范围的增大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只谈规模，不谈利润）。非洲人和美洲人需要欧洲供应以重复性技术制造的产品，这种需求促进了欧洲一些工业部门的机械化。以棉纺织业为

例。在18世纪初，英国棉纺织业还是新生的产业，为了与印度棉布竞争而采用了平纹布印花术，从而在无意之中使自己受到了保护。到18世纪中叶，它虽然仍然远远落后于毛纺织业，但发明家们开始致力于纺棉工艺的机械化，因而规模比原先大得多，发展迅速，其中一部分推动力就来自棉布向美洲种植园的销售。所以，当毛纺织业机械化遇到困难时，发明家们就转向棉纺织业，他们成功了。

问题依然是：在促进工业革命方面，大西洋体系是否起了决定性作用？或者用现今经济史学界流行的反问方式来说，倘若没有大西洋体系，工业革命是否还会发生？我想，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它仍会发生。能源（煤炭和蒸汽机）和冶金术（焦炭炼铁）的关键性变化大体上没有依赖于大西洋体系，羊毛纺织机械化的最初努力也是如此。

但是，没有奴隶制，工业的发展会缓慢一些。这一说法本身不大有力。也许可以说是需求增加的缘故：多总好于少。实际问题是，慢多少？这里，我们应把工业出口看做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大西洋出口看做是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静态地分析，那是一系列的静态图片，出口市场大大小于国内市场；供出口的美洲市场，更是大大小于国内市场加上传统的欧洲大陆出口市场之和。然而动态地分析，就像活动的图片，出口的增长快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大西洋出口的增长比欧洲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快得多。它们是重要的因素，用巴巴拉·索洛和斯坦利·恩格耳曼的话说，“很难宣称（种植园利润导致的市场扩大）对工业革命是必要或充足的因素；同样很难否认（它）影响其规模和快慢……如果迁往西半球的人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英国的经济及其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将会缓慢一些。”（21）

问题仍是，其发展将缓慢多少？但是以上已说得差不多了。

（当然，问题尚未结束，因为其他的意识形态观点仍然在这个历史性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同情者想要增大对富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指控状，最好是既谴责了它们的罪责又能获得赔偿。对于富国、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出于荣誉感和自尊心，需要否认那些指控。对奴隶制影响的争论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无疑没有现实的解

决办法，它又是其他问题的一个替身。）

作为大农场的甘蔗种植（22）

西班牙人从来不是蔗糖业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有更快的致富方式，当他们转向甘蔗种植时，他们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他们从未像英国种植园主那样理解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将甘蔗种植园作为生产单位融进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优势。

甘蔗很早就传入新西班牙。1524年，即在占领阿兹特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和推翻阿兹特克政权刚刚几年后，科尔特斯就开始在那里种植甘蔗，并在韦拉克鲁斯附近建立了炼糖厂。（在那个略高于海平面闷热的平原上，小麦和玉米极难生长，西班牙人不久就意识到种植亚热带作物的潜力）。其他人也效仿，不久印第安人开始种植甘蔗，并将甘蔗卖给炼糖厂。1550年，西班牙王室认识到种植甘蔗的可能性，命令新西班牙的总督将土地拨给那些种植甘蔗和开设炼糖厂的人。1600年时，当地已经设有40家炼糖厂，表明了相当巨大的工业和农业投资。这些炼糖厂是小单位，使用畜力甚至人力；较大的则使用水力，水力炼糖厂占产值的最大部分。最大的炼糖厂之一是位于哈拉帕的圣特立尼达炼糖厂，有7个煮锅和两间清洗房，使用200多名非洲奴隶，价值700000比索，年净收入40000比索。

开始，甘蔗种植园主想使用印第安劳动力，而某些印第安人在自己土地上种植甘蔗的事实似乎表明，印第安人并不讨厌甘蔗这种作物；结果却是相反。种植归种植，但种植园经济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长时间和地狱般的劳动节奏，使劳动者筋疲力尽，而最大限度地获取产出。有一段时间，印第安人和黑人共同在田地中和炼糖厂劳动。但实践证明，非洲人耐力强、劳动效率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一个非洲黑人相当于4个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无声无息就倒下去世了。由于印第安人死亡太多，西班牙王室于1596年和1599年两次发布法令，禁止炼糖厂雇佣印第安人。这在收获季节引发了种种问题，种植园主请求在紧急时刻能强制垂死的印第安人帮助劳动，但是1601年11月，菲利普三世下令禁止在任何种植园中使用印第安人。从那时

起，墨西哥的蔗糖业就是奴隶产业了。

这些种植园和炼糖厂对黑奴的残忍暴行只能这样解释：黑人被看做还不如无生命的机械，需要的话可以用尽和更换，或者像燃料一样投入火中燃烧。他们在农忙季节通宵达旦地干活。监工迫使他们没完没了地劳动，成年男子每天工作20个小时。食物一般是由主人提供的，但有的主人却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喂饱他们。有的主人在星期天给奴隶一天的自由时间，让他们耕作自己的小块地并想办法解决一周的食物；有的主人干脆叫奴隶自己养活自己。总的来说，主人们对牲畜的关心胜过对奴隶的关心，需要的时候让牲畜休息——并非出于爱护牲畜，而是牲畜累了就停下来；而奴隶还有头脑和意识，害怕自己一停下来会处境更糟糕，所以就继续劳动下去。

不用说，如此的虐待引起了反抗，有消极反抗（自杀、流产、杀婴）。也有积极反抗（蓄意破坏、谋杀、逃跑当土匪）。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最常用的是吃污物来代替进食。白人把多数的蓄意破坏当做偶然事故，他们认为黑人太迟钝了，不会想到这样的方法。主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过犯错误的奴隶，而是惩罚他们，或许还有别的人，让他们付出血肉的代价。不如此，又怎样教训这些野人今后小心一些呢？与此同时，那些逃亡了的奴隶也变得凶猛残忍，恰如他们原先的白人主子教会了他们的那样，同时他们明白一旦被白人抓回去会受到什么惩罚，所以他们成了亡命之徒，令白人胆战心惊。吃亏的是产业。

西班牙一些最大的种植园是自给自足的领地，颇像中世纪的采邑。他们种植粮食作物，饲养家畜，建立礼拜堂以培养虔诚和拯救灵魂，有时还为奴隶和佃户缝制衣服。主人及其全家过着奢华的生活，用丝绸和花边窗帘遮挡着他们周围的痛苦和悲惨。与之相对照，英国占领的岛屿只种植甘蔗，实行单一的专业化，只留有极少的土地种植食物，所以不得不从北美大陆甚至欧洲进口食品。纺织业更不可能出现。到18世纪，大多数英国种植园主最不愿意做的就是种植园生活。那是代理人和管家的事。他们自己则住在英国，享受着英国的生活。可以称之为分工吧，但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分工。

同时，代理人和管家变富了，但他们的生命也变得短一些。

注释

1 .1600年前后，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诸岛帝国的人口约为75000到80000人，其中西班牙人占1/10，其余为黑人和混血人。没有多少当地土著的行迹。所以人口密度为每5平方公里1人，每一位西班牙“殖民者”占有50平方公里。参见：Pierre Chaunu, *L'Amerique* , 第112页。

2 .1622年，仅阿姆斯特丹一地就有炼糖厂25家。见Rich, “Colonial Settlement”, 第334页。

3 .Wood, *Spanish Main* , 第125页，认为其人数少于5000人。

4 .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虫子，参见Starkey, *Economic Geography* , 第60页；关于牲畜害虫，参见Watts, *The West Indies* , 第195页。不用说，气候、害虫和病菌相结合，导致该地区的高死亡率，牲畜的死亡率甚至高于人类的死亡率。（感谢斯坦利·恩格尔曼允以引用。）

5 .引自Parry, *Age of Reconnaissance* , 第276页。邓恩认为该数字“不可能”，参见Dunn, *Sugar and Slaves* , 第55页。通过研究回收的人头税，邓恩估计1640年巴巴多斯的人口约为10000人，与马萨诸塞或弗吉尼亚的人口相当。

6 .Parry, *Age of Reconnaissance* , 第276页。

7 .Chaunu, *L'Amerique* , 第113页。

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Book IV, ch.7, part 2.

9 .Littleton, *Groans of the Plantations* , 第20页，引自Dunn, *Sugar and Slaves* , 第194页。

10 .Rich, “Colonial Settlement”, 第332页。

11 .引自米勒对安哥拉奴隶贸易的论述，见Josephh Miller , *Way of Death* 。

12 .Sheridan , “Eric Williams” , 第326页。引自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 第VII页 , 第52页 , 第105页。谢里登在书中（第327页）写到，威廉斯的著作“拉开了西印度群岛现代正史的序幕”。

13 .Inikori , “Sla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 第101页。

14 .Sheridan , “Eric Williams” , 第327页。

15 .奥克萨尔说，“威廉斯攻击了与英国人所理解的与昔日奴隶制度相联系着的道德自满感。”他将威廉斯（以及詹姆斯）描述为“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知识分子，个人的经历使他意识到隐藏在大国对待殖民地虔诚的自得之后的虚伪。”引自：Oxaal , *Black Intellectual* , 第75-76页。

16 .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威尔逊·吉批评威廉斯夸大了奴隶制的作用，“宣称它几乎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基石”。引自Sheridan , “Eric Williams” , 第320页。

17 .见Anstey , “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文及*Atlantic Slave Trade* 一书。安斯蒂估计奴隶贸易的利润占英国资本构成的0.11%——“可笑”。亦参见Stanley Engerman , “The Slavery Trade and British Capital Formation”。恩格尔曼嘲弄那些“难以置信的估计数字”，他根据明显偏高的估计，认为1688-1770年间该数字在2.4%到10.8%之间，他说，“那些认为工业革命期间奴隶贸易对工业资本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还将“奴隶贸易产出总值”与英国国内收入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约占后者的1%左右，1770年达到1.7%。该数字太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建议说，应该将奴隶贸易的贡献与种植园体系的贡献合在一起加以考虑，二者将在动态的联系情境中看得比较清楚。

18 .Inikori , “Market Structure” , 第761页 , n.52。他估计该利润率应达50% , 当然各年有高有低 , 但多年积累下来应是如此。该数字基于投资数额 , 并没有将购买货物引起的债务计算在内 : “奴隶贩子个人实际投入的资金 (实际现金支出) 往往少于表面总投资的50%” (另见第775页) 。

19 .关于种植园主的利润 , 参见Sheridan , “The Wealth of Jamaica”和Ward , “The Profitability of Sugar Planting”二文。有的学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驳斥谢里登的观点 , R.P.Thomas , “The Sugar Colonies”一文以斯密式的观点看待帝国的经常开支以及英国食糖的受保护的、垄断的市场之下英国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当然 , 这是老皇历了 : 利润私有化 , 开支社会化。除去纯利 , 人们会发现宏观的效果与部分后果确实不同。

20 .参见Zahedieh , “London and the Colonial Consumer”。

21 .Solow and Engerman, eds. , *British Capitalism* , 第10-11页。

22 .以下关于墨西哥甘蔗种植的资料大多取材自 : Cardoso , *Negro Slavery in the Sugar Plantations* 。

第9章 东方的帝国

葡萄牙人凭着他们的进取心和坚强性格，以及使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在东方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也成就了一个帝国。但这样的帝国是一种超越常理的非理性的跳跃。葡萄牙人对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使他们在与英、法等国在东方的较量中失败了。

葡萄牙是一个中等富裕程度的小国。在15世纪时，它的人口总数约100万，其主要产品和出口货物是葡萄酒（最初是波尔图红葡萄酒，后来还有逐渐增多的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种度数很高的烈性酒），另外蔗糖生产和出口飞速增长。倘若那个时代的葡萄牙人就能预见到后来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对于比较优势的分析——这种分析如今已成为经典——他们也许就会通情达理地继续沿着那条路走下来，埋头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用他们的特产交换别国的工业品。然而与此相反，他们竟跳跃了理性的轨迹，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跳板。葡萄牙的辽阔操纵网络曾长达地球一圈的3/4，从西半球的巴西一直伸展到了远东的香料群岛和日本。

这样一种超越常理的跳跃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们随后还会看到几个例子。实际上，正是这种超常理的事态发展使得历史呈现出不确定性，使预言失灵。但葡萄牙的扩张的确是特别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它人口不多，物产也不丰富。葡萄牙所拥有的总人口实在是太少了，是不可能大批派人去海外的；葡萄牙那么急切而又迅速地从中美洲进口奴隶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匮乏。另外，葡萄牙的物力资源，尤其是制造和装备远洋船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轻量级拳击手迎战重量级选手。

葡萄牙人的成就，证明了他们所具有的进取心和坚强性格，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和激情，以及他们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运用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没有愚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首先体现出实用主

义。他们引入外来者以利用他们的财富、知识和劳动力；让奴隶作为劳动者，偶尔也充当士兵；与各民族的妇女通婚，而且一人还不止一个。他们是不携带本民族妇女远航的，倒是有时会运送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上船。同男人一样，在遍地都是瘟疫的地区，那些白人妇女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生孩子就往往意味着对母亲和孩子的死刑判决。种族间通婚的情况就好一些：男人们可以享用花钱买来的成打的有色女奴——似乎要由他们的孩子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

葡萄牙人的一项情感支出是虔诚。他们不论到哪儿，任何一艘船上都带着神职人员和修士，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灵魂的拯救（靠祈祷和圣礼的力量）；也为了在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中间布道；同时还为了让自己良心上得到一点安慰。这些教士使他们的贪婪得到了合法化和净化。

宗教信仰对商业造成严重而不利的影响：它给那些本来应该比较顺利的、可以使双方都获益匪浅的接触中加入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葡萄牙人认为，穆斯林是异教徒，也是他们的信仰的敌人，对穆斯林采取任何残忍手段都不为过分。所有的穆斯林船只都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被看成是他们的敌人。瓦斯科·达伽马在1502年的第二次远航中，在抵达卡利卡特（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泽科德的旧称）之前，曾截获穆斯林小船队，他下令将大约800名“摩尔人”的鼻子、耳朵和手都割去，又将他们送归当地统治者，以公开表示在宗教上对他们的轻视。他手下的一位军官，也就是他的亲舅舅文森特·索德，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坎纳诺尔鞭笞一位穆斯林商人头子，直到这个商人昏迷不醒，然后又将粪便灌进他的嘴巴，并拿一大块猪肉盖在上面，硬逼他咽下最脏的东西。（1）

这些恶劣的行径在印度洋沿岸引发了许多战争：包括东非、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印度很多地方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16世纪的一篇文章《在印度的非凡而又自豪的军旅生涯》中写道：“根本就不必有什么怀疑，因为我们是所有不信基督教者的公开的敌人，所以他们对以牙还牙也就毫不奇怪了……在这些地方生活，我们不得不随身携带着武器，只有在我们自己军队的守护下，才能与当地

人进行贸易。” (2)

难道有过别的新来者比这些葡萄牙人更起劲地给自己制造麻烦吗？

然而，葡萄牙人也是迫不得已而采用了与机会主义的西班牙征服者大不相同的政治谋略。首先，在他们来到的这些地方，人口比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和南美洲印加帝国稠密得多，这些当地人掌握了金属兵器，骁勇善战，是难以对付的敌手。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抵御葡萄牙人带来的疾病。相反，葡萄牙人却害怕当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结果葡萄牙人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葡萄牙人着眼于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和重要的交通枢纽——非洲海岸的蒙巴萨和马林迪（航行到印度的中转点），位于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位于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之间，连接印度洋和锡兰湾与南中国海、香料群岛的海峡），珠江口附近的澳门（中国东南部的人口）。他们还想占据亚丁（红海的入口），但一直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所有这些地方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果阿——马拉巴尔海岸一颗璀璨的明珠，胡椒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将阿拉伯马匹运往南印度的重要港口（印度南部的气候是不适于养马的），它一面有海洋作天然的屏障，在陆地这边则有一条充斥着鳄鱼的运河作保护。

最后，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在葡萄牙占领了这些飞地以后，终于学会了跟葡萄牙人共处和做生意，就像他们自古以来跟别的外来者打交道一样。他们有时也袭击欧洲人，但这时挫败他们的往往是他们本地区的敌人。葡萄牙人极其巧妙地在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玩弄平衡，这一手不止一次地拯救了他们自己。

然而更危险的敌人却正在到来。一旦荷兰人和英国人进入这个地区，一切就都变了。1605年，荷兰人占领了安波那岛（安汶岛）并将葡萄牙的势力驱逐出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1622年，因为波斯有英国这一强大的后盾提供船只和武器，葡萄牙又被波斯夺去霍尔木兹海峡。1638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去埃尔米纳（Elmina），它原是葡萄牙在几内亚湾沿岸建立的第一座城堡，是葡萄牙航海先驱和贩卖

非洲黄金和奴隶的象征。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在1665—1667年间，又占领了望加锡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在这一过程中，荷兰人干脆将葡萄牙人赶出了香料群岛这一起始的争夺目标。葡萄牙好景不长，但葡萄牙人的自豪感在逆境中依然旺盛，尽可能抓住他们尚能抓住的地方不放。例如，他们在果阿一直坚持到1961年（尽管它早已失去其财富和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此时已经强大得多的印度政府无需任何挑衅和借口，就长驱直入收复了果阿。没有一个自尊而独立的国家能允许在其国土上存在这样一块殖民地。

葡萄牙在东方最初的商业目的是获得胡椒和其他香料，他们不走传统的贸易路线，即自东向西穿过亚洲，到东地中海才转为海运，而是绕开这条路线上层层叠叠的中间商，将香料装船经印度洋绕非洲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接运到欧洲。^[76] 葡萄牙人获取香料的办法，一是采购，一是用武力克服穆斯林商人给他们设置的障碍，没收其货物。在最初几十年，这些措施使他们占有了香料贸易的巨大份额。在最高峰时，欧洲进口的胡椒约有4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当时依靠地中海航运的威尼斯人直叫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贸易路线重新振作起来。葡萄牙直接航运的份额降到20%左右，虽然仍很重要，但已不再居支配地位。1570年，葡萄牙王室放弃了它对里斯本和东方（果阿）之间的香料贸易的垄断，国王不再做商人，而是出售这一贸易的特许权，往往是出售给外国商人。1586年，德意志商人韦尔瑟家族独家租得了在东印度群岛采购胡椒的专有权。这笔交易标志着葡萄牙香料贸易的衰落，卖得两手空空了。^{（3）}

（这些关于市场份额的数据只是个近似值。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精确的数据统计。^{（4）}但我们确实知道，依靠亚洲陆运再经过地中海海运的威尼斯，在16世纪后半期再次成为欧洲胡椒交易的中心。当1595年由荷兰人豪特曼率领的船队第一次顺利地远航东印度的消息传来之时，威尼斯以及葡萄牙马上就意识到，原有的香料贸易格局即将被荷兰人“彻底推翻”。^{（5）}到1625年，威尼斯海关已将香料列为“西方商品”，因为香料这时已是来自大西洋，而不是来自近东。）

为了弥补香料贸易上所受的损失，葡萄牙人开始介入亚洲内部的贸易。在欧洲人还未到达之前，亚洲内部的贸易已非常兴隆：古吉拉特人、爪哇人以及中国商人贩运胡椒和别的香料，交换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及中国瓷器；阿拉伯商人从非洲贩运黑奴，经陆路和水路把他们卖到各伊斯兰国家；还有来往于各地的船舶装运着柚木、檀香木等优质木材，象牙，被视为珍贵壮阳剂的犀牛角，以及珍稀的或不太珍稀的动物，包括猴子、老虎，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战争中或庆祝仪式中派上用场的大象和马；每一位商人都带着贵金属以进行交易（来自新大陆及印度和中国的银子，来自东非和日本的黄金）。这种亚洲贸易大体上是自发而随意的——恰似一种不规则的布朗运动。人随货走，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看做是不定期货船的一种贸易方式；这是些没有固定航线的帆船。（6）

由这种贸易引出的一种变化，就是有人企图从别人的贸易活动中谋利，经济学家也许会称这种做法为谋取经济收益。葡萄牙人仗势欺人，尤其凶恶。他们成为印度洋上的强盗巨头。所有的过往商船都必须向葡萄牙人购买交易许可证。那些没有许可证的商船可能被没收。葡萄牙人转向当地的贸易和敲诈勒索，得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从欧洲派到亚洲的船舶比原先少多了。他们改用印度人制造的船只。在印度，到处都可以找到优质、坚硬的木头，木匠们很快掌握了欧洲的造船技术——报酬却低得多。船员也大都是当地人。有时除了有15或20个欧洲（或欧亚混血儿）士兵、炮手和军官外，剩下的则全都是亚洲人或非洲奴隶了。印度洋那么辽阔，有人也许会想，葡萄牙人要让别人服从他们的管制，就需要没完没了地派出舰船，四处巡逻。然而印度洋的地形帮了忙：那里能走商船的航线和通道狭窄，便于监视。除此之外，无需四处查看，几次象征性的强行登船和没收就起作用了。

麻烦的是，更多的国家都可以玩这种“游戏”。新来的欧洲人战斗力更强、航海技术更好。有关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抵达这些地方的远航（17世纪初期）的记载详尽讲述了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和潜伏隐藏，如何设置圈套和背信弃义，如何攻击货船和掳掠财物。在一方看来是无赖的人，在另一方看来却是英雄。英国有一位胆大而又

足智多谋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兰开斯特，在第二次（1601年）远航东印度群岛时，生意不大成功。怎么办呢？没有问题。两年后返回英格兰时，他率领的船队满载而归，带回了他们缴获的大量战利品。英王詹姆斯一世因此而封他为爵士。印度洋的水面如同其水底世界一样，也是一幅弱肉强食的图景。所有这一切等于是合法化了的海盗行径，而对于荷兰和英国来说，当时它们与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王国于1580年有了一个共同的国王而联合在一起，葡萄牙也就陷于对荷兰和英国的战争状态，因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印度洋劫掠葡萄牙货船，也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径获利甚丰，所以，尽管葡萄牙在1640年跟西班牙脱离了关系，荷兰人和英国人仍然在印度洋继续袭击葡萄牙人，不愿讲和。须知：

自古以来的好规矩，明白又简单：

谁有实力就该谁拿，

谁有本事就该谁占。（7）

对于欧洲人彼此之间的这种争斗，东印度陆上诸国的态度是冷眼旁观，敬而远之。他们乐意与欧洲某一国分享垄断贸易的利润，甚至还勾结欧洲人去打他们自己的亚洲敌人。此外，亚洲人在当时大都不关注海权和海军实力——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邻居、古吉拉特邦的统治者巴哈都尔沙就说过：“海战乃商贾之事，与君王威望无关。”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态度相去不远。又一个可悲的错误。

就这样，葡萄牙的势力萎缩了。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他们的海上优势的上层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松脆的”。（8）他还可以补充说，他们的基础结构是沙质的。没过多久，昔日的辉煌就只留在记忆之中，铭记于卡蒙斯 [77] 的长篇史诗《卢西塔尼亚人之歌》，他在诗中歌颂了葡萄牙人横越“自古无人航行过的大洋”而留下的无形的足迹。（9）的确令人自豪。1737年，英国驻孟买总督则评论说：“葡萄牙王室长期以来维持着它在印度占有的领地，每年都得有一笔不小的开销；看来，这纯粹是着眼于荣誉和宗教上的意义。”（10）

生活中的香料

现今的人也许想不明白，为什么胡椒和其他一些辛辣佐料在当年会令欧洲人感到那么珍贵？原因在于，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要设法解决食品的保藏问题。在那时，粮食勉强够吃，而到了漫长的冬季，除了饲养种畜、役畜和马匹以外，就不可能再拨出大量的谷物喂别的牲口。所以，人们在秋天屠宰牲口就成了传统。在没有人工制冷的情况下，要把这么一些肉保存一年，度过寒冬和暑夏，人们只好用烟熏、盐腌和涂抹香料等办法；等到烹饪的时候，还用浓浓的佐料调味，把肉的腐味掩盖起来。有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气候炎热的地方，吃的荤菜通常比寒冷地区更辣，道理就在于他们需要更多的掩盖。

辛辣佐料还有一层好处，尽管从前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一点。这就是它们能够杀死或减少那些促使食物腐烂的细菌和病毒。例如，一些辣的沙司（塔巴斯科等等）能让人们食用受感染的牡蛎时更安全一些；至少，它们确实能在试管中杀死微生物。由此可见，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香料不只是一种奢侈品，而且也是一种必需品，它们的市场价值证明了这一点。

“欧洲的卡菲尔” (11)

要了解帝国的兴与衰，那就必须既考察它在殖民地的情况，同时也考察它自己国内各种势力的消长和环境的变迁。在葡萄牙人征服南大西洋时，他们在航海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乐于从外国学者（其中许多是犹太人）那里学习，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知识。西班牙在1492年下令，规定本国的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就离开西班牙，这些犹太人中有很多都逃难至葡萄牙境内，在那里尽管也有反犹太情绪，但相对而言还是宽松一些。但是1497年，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向葡萄牙国王施压，让他放弃这种对异教徒的容忍。大约有7万犹太人被迫接受了形式上的、但从礼仪上看还是有效的洗礼。1506年，里斯本进行了第一次血腥大屠杀，有2000多名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丧生（西班牙像这样做了将近200年）。从此以后，葡萄牙的精神生

活和科技事业停滞不前，陷入了盲从、狂热和讲究血统纯净的境地。

[78]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逐步的。葡萄牙到16世纪40年代才建立宗教裁判所，它于1543年第一次对异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是直到16世纪80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于腓力二世的统治之下后，才真正变得残忍恐怖。这个时候，隐蔽着的犹太教徒，包括亚伯拉罕·扎库特等天文学家在内，都纷纷逃离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而且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无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主导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

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从不容异说这方面来看，宗教迫害者们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打击。正是这种自我缩小的过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仅仅是持续一时或一代人的时间，而是持续几代人和几个世纪。到1513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学家；到16世纪20年代，科学界的领头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试图建立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学和数学传统，但失败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学家大都被怀疑是犹太教徒（12）（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医生们的猜疑颇为相似）。

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人竭尽全力地将自己与外界的和被视为异端的影响隔离开来。教育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课程注重于语法、修辞以及经院哲学，突出的内容是自我表现手法和一些繁文缛节（例如，要背诵拉丁文名词语法的247条韵文规则）。高等学校中，学科学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医学系。即使在那里，也几乎没有哪位教师愿意放弃盖仑的经验医学而接受哈维的实验医学新理论，更没有人敢冒险讲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耶稣会迟至1746年还下令禁止传播他们的学说。（13）

此时，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学生出国留学，书籍的进口也处在那些由宗教裁判所派来的督察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到港口去检查船只，到书店和图书馆检查藏书。1547年就首次列出了禁书目录；随后

又多次予以扩充，直到1624年搞成了一个庞大的清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灵魂。

在葡萄牙国内和海外殖民地，都设置了三道审查关卡来严格控制书刊的出版，阻挡创新。批准成立的印刷厂（在果阿有，在巴西则根本没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们将出版物仅限于词典和宗教读物。^[79]从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这些安全的读物也必须预先送到葡萄牙审定。

在这种环境中，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都陷于衰退，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权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1720年成立的皇家历史学院的那些贵族和教士——在学术上全是门外汉——获准进口一些禁书，但这些人觉得，写文章给王室歌功颂德，更省事一些。

当然，葡萄牙跟欧洲各国有关交往，而且建立了殖民帝国，它不可能与外界隔绝。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带回了一种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进，而葡萄牙却停滞不前。这些人得到一个贬损性的绰号：“异化分子”，受到人们的严重怀疑，被认为是思想受了污染。葡萄牙人的自尊心必然使这些人的意见得不到考虑。真是极其不幸。其实，这些人是看到了别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会正在吞噬国家的财富；政府不致力于扶助农业和工业，已经使葡萄牙沦为“英国的一块最好和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14）}（英国的经典经济学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图就把葡萄牙选作追求比较优势而从贸易获益的例子。）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为人们的一个话柄，例如，迪奥戈·多库托在1603年谈到过“我们葡萄牙民族思想浅薄，缺乏好奇心”；英国驻里斯本使节弗朗西斯·帕里在1670年指出过“这里的人们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关己就不闻不问”；在18世纪访问过葡萄牙的英国人玛丽·布里尔利则评论说“（葡萄牙）大多数人都不愿独立思考，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不肯动脑筋对他们学到的东西问一问为什么”。^{（15）}

由于如此自我封闭，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们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

些领域，也落后了。他们“在航海理论和实践中曾一路领先，如今却成为落伍的蹒跚者”。⁽¹⁶⁾到17世纪末，航行于对印度贸易的几艘船居然用外国人当领航员。航海图保持绝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荷兰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图。当国王约翰五世（在位1706-1750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师说服，下令更新数学、军事工程学和天文学的教学内容时，所需的仪表器械不得不采用外国货。

到1600年，尤其是到1700年，葡萄牙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弱国。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师都逃走了；没有敢持异议的人来接替他们。1736年，多姆·路易斯·达·库尼亚叹息说，可惜葡萄牙没有改革派（加尔文教派）那样的人。他指出，法国人正是由于天主教会受到了胡格诺教派的挑战，才得以避免落到他们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惨”田地。话很刺耳，但一语破的。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注释

1 .William Hunter ,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 第一卷, 第109页, Masselman曾在《殖民主义的摇篮》一书中引用过, 见该书第218页。Masselman写道: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 都是蓄意推行的旨在控制印度的恐吓政策的产物。”像割鼻砍手之类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举动——参见本书第五章叙及的西班牙政策。

2 .引自Boxer ,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 第297页。

3 .Lang , *Portuguese Brazil* , 第34页。

4 .Boxer ,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 第59页。

5 .出自*The Letter-Book of William Clarke, Merchant in Aleppo* , 引用于Domenico Sella ,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etian Trade”一文, 载于Pullan, ed. ,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一书, 第97页。

6 .关于所有这些，见K.N.Chaudhuri的著作：*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及*Asia Before Europe*。

7 .摘自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第115页。关于葡萄牙人相对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弱点，见Meilink-Roelofs, *Asian Trade*，第116-135页。

8 .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57页。

9 .见卡蒙斯的《卢西塔尼亚人之歌》。这是一部多年写成、最后于1572年出版的著名史诗。

10 .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147页。

11 .这是Antonio Vieira, S.J.神父（1608-1697）的表述，引自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340页（“卡菲尔”是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注）。

12 .Seed,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第135-137页及注133。

13 .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350页。

14 .Dom Luis da Cunha之言，引自Boxer,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356页。这自然是暗指1703年签订的梅休因条约，按照该条约，葡萄牙同意免税进口英国的羊毛和毛纺织品，而英国则按大大压低的汇率购买葡萄牙的波尔图红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

15 .同上，第340-342页。

16 .同上，第350页。

17 .同上，第344页。

第10章 为了爱财之心（1）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远航.....利润指引着我们过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约斯特·范·登·冯德尔

作为国家，荷兰是小的——大致和葡萄牙差不多，这样的小国是很难成为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的。1500年，荷兰的人口约100万；150年以后，人数翻了一番。虽然人少地狭，但它却颇具实力：荷兰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在17世纪，约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比例高于欧洲任何国家。同时它还非常活跃：一位学者在1627年就提到荷兰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拥挤状况，“就是在罗马也没有这么多满载着旅客的马车，还有大大小小的无数船只在全国各地纵横交错的运河上航行着。”（2）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大大小小的港口，都熙熙攘攘地聚集着许多船舶。到16世纪60年代，荷兰就拥有1800多艘海船——是威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鼎盛时期的6倍。其中，阿姆斯特丹就拥有500多艘。但对于荷兰的交通来说，整个海船队还只是一个方面：专门从事鲱鱼贸易的就有500多艘船，大多停在各地的小港口，如霍伦、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等等。如今，这些小港口早已经被遗忘了。

（3）

又一个欧洲小国超越了自己，这一成果不仅体现了荷兰内在的能力，也反映了它作为欧洲国家特有的强烈竞争意识。荷兰人的成功，集中反映了他们在工作和经商过程中所具有的、在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中乌龟所体现的精神。丰厚的战利品和奖赏当然好，但以长远目光来看（千万不要忽视长期效益），最重要的还是从那些不起眼的、风险较低的小宗生意中获取的利润，它们会积少成多，而且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4）

我们所说的荷兰，在当年是荷兰人所称的尼德兰联省（共和

国)。它是一个邦联，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国和公国曾经是北欧最有生气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区，后来却成为封建诸侯讨价还价和联姻买卖中的抵押品和奖品。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通过他父亲腓力与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的婚姻关系，而当上西班牙国王。^[80]查理的头衔很多，其中包括勃艮第公国的君主（另一桩幸运联盟所带来的果实）。而勃艮第当时统治着低地国家。低地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当时是欧洲最富庶和最少民族偏见的地区之一，是工业、商业和思想交流的一个枢纽，早就摆脱了封建庄园主的奴役，习惯于经济、学术和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可是由于上述的统治者曲曲折折的变迁，这时却受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严紧束缚。西班牙统治者出于本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决不能容忍自己的领地内存在着公开的新教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根源。（5）

荷兰人竟然跟西班牙人交战，这是历史的嘲弄。低地国家（包括南北）本来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这些强悍的中产阶级市民、海员、渔民和农民当时已充当着北欧商业的中间人。他们进口和再出口北海、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的初级产品，如粮食、木材、鱼、油脂、焦油和毛皮。他们制造毛纺织品和混纺织品，而且是商业信贷和国际金融的能手。些耳德河^[81]上的巨港安特卫普当时控制着新兴的海洋贸易。它内联欧洲广大的腹地，外联大西洋及其以外各地，超过了威尼斯、热那亚之类的老商贸中心，成为新大陆及其他海外地区货物的终极目的地。这些海船也许会先停靠里斯本和塞维利亚，但最终驶至尼德兰卸货，这些货物在那里被吸收和加工处理，然后再转售至世界各地。

另一方面，当时却正是西班牙于世界称霸之时。殖民地大量财富的流入，使西班牙王室实力空前殷实。西班牙成了欧洲最大强国，不能让任何东西阻碍它的主张和野心。因此，当低地国家的那些身披羊毛衣衫的、令人心烦的荷兰人胆敢跟西班牙身着丝绸的官员作对时，西班牙把他们看做是一批劣等无赖，要不惜财力和人力教训他们，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

那是财富和枪炮说话的世界。但在信仰方面，有两件事激化了那

一地区的冲突并影响到该地区的命运。第一件事是宗教狂热和不容异己的态度在西班牙得势，导致了1492年驱逐犹太人（稍后又同样驱逐穆斯林）。许多犹太人逃到了以容忍著称的低地国家，寻求和平及尊严。

宗教上的第二件大事，则是基督教的新教崛起，形成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信仰体系。异端邪说的故事古已有之，但在1517年，当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贝格的教堂大门上时，他就迈出了与天主教分离的第一步。基督教走向分裂。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好几个国家的新教徒（继英国的罗拉德派教徒之后）把圣经翻译成本国的语言。人们自己读圣经，开始独立思考，一些未受神职的一般信徒也跟教士们一起参加造反。不少地区迅速接受了新教规，其中就包括低地国家，尤其是北部诸省，那里的对天主教会持异议的人们早就在探索自己的良知。

所以，当西班牙行政官员和教士来到北方时，他们见到了在西班牙早已根除了的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和无政府状态。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他们的反应是不顾民众的愤怒和不听许多人的善意劝告，而实行惩罚和镇压。无论如何，对的就是对的，不能崇拜什么别的偶像而牺牲上帝（当然殖民地例外）。于是，西班牙人带来了间谍密探、思想警察和军队，建立了低地国家的人从未听说过的宗教裁判所（1522-1523年），下令处决了一批人以示警戒，从而激起了民愤和反抗。

不可避免的造反，是由北部诸省的加尔文派教徒（即所谓的海克）领导的。南部诸省因绝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还比较顺从。然而，即使是在南方，军事管制和无孔不入的监视也使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受到损害。1576年，南部诸省与北方的新教同胞联合起来，对西班牙入侵者作战。入侵者则占领了安特卫普和根特等重要城市，按照16世纪的传统战争模式洗劫它们。几年之间，西班牙人就毁掉了安特卫普的繁华，引起了新一轮逃亡。商人、织匠（他们把很有价值的“新摺饰”秘密带到了英国）、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纷纷出走。天主教徒也相继离开，因为他们明白了，在西班牙骑士横行和天主教托

钵修会修士四处窥探的环境下，即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没有什么商业前途。

低地国家的南部屈服了，而北部诸省却坚持斗争，到1609年已事实上赢得了独立。加尔文派教徒在人口中并不占多数，但领导起义的却正是新教徒。在他们开始造反时，西班牙人就用刀剑和大炮镇压这些敢于反抗的民众。可是当时的荷兰人是用坚韧的金属制成的，他们即使被压弯了，也不会断裂。他们学习了战争艺术。如同中世纪时库特赖战役中的佛兰芒市民，莫尔加滕、森帕赫、缪拉特、多纳赫等战役中的瑞士农民，阿让库尔战役中的英格兰弓箭手以及反抗萨摩武士的日本农民一样，这些荷兰人也给恃强凌弱者上了一课，即弱小百姓也能打胜仗。

在这场斗争中，殿后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谨慎小心，对占领者采取合作态度。直到起义者已经打赢了，它才站到争取独立者的一边。靠了它的谨慎，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谨慎，它径直成为独立的邦联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它在道义上不足，却靠常识得到了弥补。有时，没有原则倒得了便宜。

在殖民扩张中，也是如此。起初，荷兰人乐意让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去流血厮杀和博取荣誉，自己则充当中间商、代理商、加工者和推销商。但是，西班牙事实上兼并了葡萄牙之后，于1585年禁止荷兰船舶驶进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港口，这就迫使荷兰人这些精明的商人变成在国外海洋上拼搏的斗士。

荷兰人用间谍手段学习了知识。两位关键的人物是海员、船长科尔涅利斯·德·豪特曼，和办事员、旅行家兼地理学家耶恩·休根·范·林索登。两人都在葡萄牙有关部门工作了多年，因为葡萄牙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却没有想到荷兰人会从他们那里搞情报。当这两位背井离乡者回到荷兰时，他们带回了有关东方陆地和海洋的宝贵信息，其中介绍了海岸、岩石和暗礁；岛屿和港口；航线、风向和潮流；季节性风暴和无风期；纬度和罗盘方位；预示陆地临近的飞鸟；友情和敌情；以及葡萄牙人的强弱虚实。

于是荷兰人出海远航了。头一批有六七艘船，返航时一些载了货物，一些是空的。但主要的一点是，这证明他们可以远航了。先成立了6家公司，后来又成立了4家，它们都决心要弄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和财宝。但是小公司显然力不从心。于是它们经过说服而联合起来。如同他们的联合省形成邦联一样，团结起来有力量。就这样，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即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宣告成立。

荷兰人原本是想靠商业赚钱，但却发现在那个世界上贸易也是跟武力绑在一起的。不经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恩准，有钱也买不到香料，而那代理人也为他自己捞钱而操心。没有一笔生意是牢靠的，因为当地的统治者可能把同一批货卖给两家。当地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错综复杂而且多变——穆斯林与异教徒相斗，保皇党与造反派相斗，其中一些人的政治立场变来变去，小的首领也会变成国王或苏丹。这一切又由于其他欧洲人的行动而进一步复杂化和恶化。已经插足于当地的葡萄牙人不惜采用贿赂、说谎、偷盗甚至杀戮等手段，来阻挡荷兰人。从菲律宾后门挤进来的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还有接踵而至的英国人，他们的人数还太少，难以竞争市场或地盘，但他们航海术和枪炮技术高超，足以弥补人数的不足。

在这些东方海域中，大家都是半人半匪，其中包括当地的海上劫匪，他们伏击过往的小船，直到现今还袭击手无寸铁的难民。但最厉害的是英国人，称得上海盗之中的海盗。不论多大的船都敢拦劫。如果你不能经商赚钱，那就从经商赚钱的人们手里抢钱，这真是不错的谋略。在这些各色人等之间来往穿梭的，则是当地的商人：印度的古吉拉特商人，红海和海湾的阿拉伯人，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尤其是华人。华人在他们自己国内受到政府干涉和贪污腐败的束缚，但一到海外就放开了手脚，其经商精神远远高出于其竞争对手。

在这种形势下，荷兰人学习了战斗。他们的海员在从特塞尔岛进入公海时，也许还只是“旱鸭子”，但是在驶往东印度群岛的几个月航行途中，他们天天操练，擦洗甲板，拖舰炮就位，搬运炮弹，练习打靶，装卸枪炮，在海上保持战备。如果它们要幸运地克服当时长途航海中通常都会遇到的种种危险，他们掌握这些技能就是必不可少的。

在阿姆斯特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可是不喜欢这些风险和付出这些代价，因为它们吞噬了进货价和出货价之间的价差的一多半。以香料为例，当时在欧洲的售价是他们在东印度群岛采购价的10倍到12倍，可是扣除间接成本以后，利润就降到100%以下，尽管仍相当可观，但却远远低于预期的奇迹水平。

进货价与出货价之间的巨额价差，当然是由于市场所受到的限制。如果有一个自由的、高效的市场，单位商品的平均利润额会降低，而总的资本回收率却会升高。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不喜欢那种局面。它想要做的，是排除竞争者，使得东印度群岛的采购价格由它一家说了算，从而保持进货出货之间的巨幅价差。这样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不是做生意，而是弄权，仗势欺人，谋取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收益。

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些人是实用主义者。荷兰与西班牙经过长约80年的冷战和热战之后，终于在1609年出现了和平的前景，这令他们感到欢欣。和平协议要求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划分势力范围，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要先下手改变现状。为了抢在西班牙向它驻菲律宾的人员传达信息之前，公司董事会派了一艘快船到东印度群岛，向它的代理人下达指令：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开设工厂和代理处，以便能提出所有权的要求。这种积极进取抢占地盘的做法必定会引起冲突，但如今不是胆小怕事的时候。公司的首要目标是香料群岛，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豆蔻、肉豆蔻干皮和丁香的来源地。一运到印度，这些香料就带来10倍到15倍的利润。“班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强烈建议你们把这些岛屿挂到公司名下，如果用条约不行，就用武力！”（6）

这是在早期，相当于婴儿时期。一等到公司地位巩固以后，公司董事会就不赞成再动武。但公司派驻当地的代理人纷纷提醒董事会正视亚洲的生活现实，至少是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例如，公司派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年轻有为、手腕强悍的总督伊恩·彼得森·科恩——正是他建立了巴达维亚城，作为公司驻东印度群岛（荷属东印度）的总部，并用以控制巽他海峡这一条通往摩鹿加群岛的狭窄水道——

就致函公司董事会说：

诸位董事阁下想必从以往经验中得知，亚洲的贸易须在公司自己的武器的保护和威力之下始得以驱动和维持，而购置武器的费用又须以贸易之利润支付；故贸易不可无作战，作战亦不可无贸易。（7）

20来年后，又出现相同的争议。公司的代尔夫特股东会议批评了当时在攻占马六甲和锡兰的两次战役中付出的人力财力代价太重，指出：“商人更荣耀的业绩是发挥聪明才智，把丰盛的货物从亚洲运回荷兰，而不是以高昂代价征服土地，因为征战之举更适宜于君王霸主，而非牟利商人之事。”此时的公司东印度总督安东尼奥·范迪门则答复说：“一般与特殊之间、一种贸易与另一种贸易之间，大有区别。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8）

多年来，派驻殖民地的人都像君王一样独立行事，国内的市民则苦恼无奈。董事会怎么能做决定呢？从阿姆斯特丹往东印度群岛发指示，再收到答复，通常要经过两三年。到这个时候，生米早做成熟饭了。海外帝国的历史大体上都是一部既成事实的历史，不单是荷兰如此。

荷兰人的这类既成事实太多了，诸如进攻葡萄牙人（往往是与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相勾结而发动这些进攻），侵袭西班牙的地盘，跟英国人交战，追捕海盗和自为海盗（一国之海盗即为对付另一国之警察），对当地统治者实施惩罚性讨伐和先发制人的打击，作出种种承诺和签署种种协议，欺骗和叛卖，如此等等，难以逐一细叙。重要的一点是：荷兰人终于“拥有”了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和爪哇，同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其余岛屿建立了有效的势力范围。他们还占领了锡兰和“福摩萨”（台湾），并且在印度东海岸（南起科罗曼德尔，北至孟加拉）建了一系列工厂。他们在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却不那么成功——靠葡萄牙人太近了，而葡萄牙人仍能捍卫他们的那片地盘。荷兰人还曾试图占领澳门，但未成功，不过最终获准在广州（与其他外国人一起）进行对华贸易；在日本，他们是获准经商的唯一一

国欧洲人，条件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长崎港的一个小岛，并忍受相应屈辱。利润重于自尊嘛。

荷兰人从他们经历的这些战斗和商贸活动中，吸取了他们的如下教训：对任何人都不可信赖，即使是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人也靠不住（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明白这一点）；一般说来，亚洲人都是说谎和偷盗成性的坏蛋，穆斯林尤其如此。反过来，其他欧洲人则将荷兰人视作道貌岸然而贪得无厌的伪君子；穆斯林和别的当地人出于他们的信仰、恐惧以及跟荷兰人打交道的体会，则深信为对付荷兰人这样的异教徒，任何手段都不为过分。这些看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在当时的东印度群岛生活和工作，是无法展现出人性善的一面的。此外，亚洲人当时恐怕不曾见过优秀的荷兰人，尽管他们不可能了解到这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下层人员是来自荷兰语和德语社会的渣滓，而公司的高层人员则是贪婪者之中的最贪婪者。巴达维亚是谋杀案层出不穷的地方，臭名远扬；这些岛上还疫病流行，去了就难生还。因此，有点生存本能的人都不敢久留。他们不能不想设法迅速发财。

怎样驯服这种可以理解的贪婪？公司想靠吝啬的办法培养俭朴的习惯，给员工只发少得可怜的工资。不用说，这被证明是一种坏策略。贪婪引出贪婪，公司董事会的吝啬引发出公司员工最丑恶的一面。到头来，他们操心得最多的，是自己如何致富，而不是为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主子效劳。如果有一位精明的律师为他们作辩护，他就会指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想点子赚钱；必要的话，他们还不得不偷盗。

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最大量的生意，并不是来往于群岛和荷兰之间的公司货运，而是所谓的地区贸易，把货物贩运于亚洲各地之间：把棉花从印度的科罗曼德尔运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把丝绸从中国、东京 [82]、印度和波斯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转运到新西班牙（墨西哥）；贩运日本出产的金银以及从菲律宾转口的墨西哥金银；中国出产的茶叶和黄金；穆哈的咖啡，后来还有爪哇的咖啡；以及从布敦、巴厘和缅甸若开邦贩来的奴隶，等等。一批

批大大小小的船舶，其中包括十分忙碌的华人驾驶的帆船，奔波于东方海上，按照供求的指引，穿梭于各个港口间。除了这些货物以外，公私船舶上还有水手个人采购和偷窃来的财宝，他们把这些东西装在衣柜中或者悬挂在舷缘外。这些低贱的人生活得像狗一样，被当做狗一般对待（奴隶受到的待遇都比他们强一点，因为奴隶是可以卖钱的）。(9) 所以他们也做点买卖。船上人人都是做生意的，船长和货舱押运员不能不留心守住他们的舱位，防止被私人货物侵占。他们也有自己要搬运的货。

规章制度如果需要不断地重申和强化，就不成其为规章制度，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一条明明白白的道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情形即是如此：它不断地明确规定可以免税运回荷兰的货物的质量和数量，企图靠这种办法为公司保留住最有价值的商品。但收效微乎其微。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类似的规章制度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奇特安排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即便凭一只不大的兔子的智力也会预见出来。”(10) 尽管贩运私货偶尔也有被没收和受惩罚的，可是人人依然干这种非法交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干这个。

贩运私货，大人物比小人物更来劲——他们在船上的柜子更大。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检查员，只要对私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挣到多得多的钱。公司派驻海外的总督，正式的月薪是700弗罗林，可是他回国时捞到的财富可能价值1000万弗罗林。一个小商人愿向公司人事局交3500个弗罗林，买一个月薪40弗罗林的职位，因为他利用这个职位赚回的钱会是4万弗罗林。最后，公司开始按照估算的职员个人收入，对他们征税，这一举措只是促使他们更热心于他们自己的买卖。难怪在公司寿终正寝以后，人们把公司名称的缩写VOC解释为“Vergaan onder Corruptie”（“因腐败而亡”）。(11)

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赚了钱。从它成立之时算起，它付给股东的年息平均达18%。它的收益大部分来自它对农产品的垄断；首先是香料群岛的香料；其次是爪哇的大米，因为他们不能让香料群岛的宝贵土地浪费在粮食作物的种植；随后还有公司引进到爪哇的咖啡和蔗糖

（咖啡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穆哈地区，但荷兰人成功地在爪哇种植咖啡，使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饮料）。别的利润来自公开市场上的采购：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印度的丝绸和棉花，等等。然而在这方面公司不得不与别的贩卖者竞争。无怪乎公司董事会更乐意于实行垄断。

可是从长期来看，垄断是不牢靠的。要防止本地人和外人打破垄断，就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是要耗费大量财力的，只有拥有税收权的主权国家才负担得起。（12）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必要用它自己的统治来取代当地王公的统治。这样一来，公司就增添了非商业性的开销，这种开销是没有尽头的，而且是无法预料的；它们并不上账，因为很容易把它们分摊在别的项目上。因此，这种开销在不知不觉之间日益增长，等到察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与当代国家头痛的预算赤字恐怕有些相似之处）。

此外，这种统治还导致公司在当地实行指令经济。用J.S.弗尼瓦尔的话来说，“这一大片群岛变成了一片大地产，可以说是一片大种植园。”（13）这种做法也许曾一度增加了公司的直接收入，但却损害了当地种植者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税收。所以从长期来看，如果保持自由市场，公司赚的钱也许会更多一些。（14）

长远看来：使用武力要花钱，而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不听使唤。到一定时候，他们宁愿闲呆着，或者铤而走险去“犯罪”。

以丁香为例。丁香树成熟时可达40英尺，原先仅见于安汶岛（安波那岛）和几个较小的岛屿。荷兰人为了实行垄断，硬把别的岛屿上的居民都迁到安汶岛，而且事先就把他们原有的树都砍掉了，以便对他们加强控制，防止他们将丁香卖给非荷兰籍的买主。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话来说，只有安汶岛的居民才享有种植丁香的“特权”。

这一特权包括了一项义务，即在需求降低时要砍倒一些树，同时居民的食品都必须按照公司规定的价格（自然是高价了）从公司购买。公司方面可以任意规定丁香的收购价，其目的自然是尽可能少付

钱，只要岛民不至于罢种就行。公司出于其贪婪本性，付钱不足，这自在意料之中，于是“享受特权”的安汶岛人对这一特权也就失去了兴趣。1656年，荷兰人发现丁香供不应求，就命令岛民多种树。到1667年，又禁止再种树。1692年和1697年，他们两次下令砍树。18世纪中期，需求再次上升，公司又命令扩大种植，几年之后自然又是强迫砍树。到这个时候，安汶岛上的丁香种植者已贫困不堪，厌烦极了，岛上人口下降了1/3。与此同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开始在他们的领地上种植丁香，荷兰的垄断宣告崩溃，香料总的说来也不再是原先那样珍贵的商品了。（15）

咖啡是另一个更奇特的例子，表明了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完全全具有破坏性的体制”。（16）咖啡首次输入荷兰是在1661年，1696年起，荷兰人开始尝试在爪哇种植咖啡树。最初的收购价是每磅10个斯忒弗，所以当地人种植这种新作物挺热心。总想省钱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把收购价降到了每磅2.5个斯忒弗，这样一来，当地人就开始砍咖啡树，即使公司以惩罚相威胁，也止不住。于是公司采取了强迫种植措施，硬性规定交售指标，同时提高了收购价。但后来胡椒涨价，公司就让当地人砍掉咖啡树，改种胡椒。1738年，公司决定把咖啡种植面积减少一半，次年又规定公司的收购限额为270万磅。但后来获悉仅荷兰一国就需要咖啡600万磅，公司就把收购限额升到400万磅——总是宁缺毋滥。然而它付给爪哇种植者的报酬太低了，人们不愿种咖啡，结果，公司在1751年所能收到的咖啡还不到100万磅。咖啡树长成结实需要4年时间，而一会儿种树一会儿砍树的穷折腾，是不可能对需求的升降作出灵活的、合理的反应的。

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量下降（香料跌价），利润随之减少，但它却继续给股东慷慨分红，甚至不惜为此贷款。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迹象。它当时仍在赚钱吗？我们所能看到的档案不全，而且他们的记账方式也使别人很难算清楚。例如，管理部门的盈亏没有列入公司商业盈亏的总账之中，实际上找不到有关数据。费尔南德·布劳德尔尽管有一大批研究人员作助手，也仍然查不清这些账目，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努力，指出：“……这一套记账的制度使人们无法列出总的资产负债表，因而无法准确计算实际的利润。”（17）谁能说公司董事

会的17人理事会就了解实情呢？我们一般都以为大企业是有理性的，理性就要求了解情况。然而，企业史表明，有许多决策都是瞎蒙和心血来潮。否则，这些企业怎么会给它们自己捅出大窟窿呢？（18）

到18世纪末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情况变得复杂了许多。1781-1784年，荷兰陷入了与英国的战争，荷兰东印度公司难以在低地国家和东印度群岛之间运输货物。它不得不要求延期还旧债，同时再借新债。这时，荷兰政府成了公司的唯一贷款人（银行家更现实一些，不再给它贷款了），公司的命运与联省共和国的命运绑在了一起。接下来，法国大革命促使荷兰政治激化，荷兰出现傀儡政权，即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它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大公司的利益就没有那么多的同情了。随后，荷兰重新陷入与英国的战争，公司的贸易量陡降2/3，它的最终结局已无可避免。荷兰政府接管了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包括它的资产、债务以及它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
[83]

这一帝国依然存在；事实上，1814年重建的荷兰王国在19世纪把它管理得不错。管理的费用来自于政府对特定的种植园作物（咖啡、茶叶、甘蔗）所规定的上交定额，以及对盐和鸦片贸易的能赚大钱的垄断。从1870年起，荷兰人放弃了种植园那一套“文化体系”，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自由市场会运作得更好，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强迫劳动的做法感到内疚。这一开明转变得以顺利实现，也是多亏东印度群岛有了两种新的、产量增长得很快产品：一是1883年从巴西移植过来的橡胶，一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发现和开采的石油（1890年成立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弥补早年的过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荷兰的这些领地。日本的占领仅持续几年，但影响已绰绰有余。统治制度的变化滋养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它让印度尼西亚人看到，亚洲人可以打败欧洲人，欧洲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投降，这些岛屿归还荷兰，但没有保持多久。1949年，荷兰让印度尼西亚独立了，荷兰人业已经历几代人的悔过自责，因而乐意放弃他们的统治。新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它也是一个帝国，宣

称它对荷兰人交过来的所有土地都享有主权，此外还再加上东帝汶等几块地方，而不顾当地居民的特性和愿望。对印尼统治不满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到荷兰寻求避难，在那里会处境好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亏有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方帝国主义，苏门答腊和爪哇往昔那些苏丹的梦想，终于由“人民民主”的新苏丹实现了。

注释

1 .Joost von den Vondel, *Werken* , 第三卷 , 第628-629页 ; 英译文见Keene , *The Japaneese Discovery of Europe* , 第3页 ,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研究的著作。

2 .选自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 第三卷 : *Le temps du monde* , 第149页。

3 .Israel , *Dutch Primacy* , 第24页。

4 .Peyrefitte ; *Du "miracle"* , 第146-147页。

5 .Israel , *The Dutch Republic* , 第183-184页。

6 .1608年3月29日 , 公司董事会给商船队长Pieter Verhoef所下的指示 , 引自Mas-selman , *Cradle of Colonialism* 一书 , 第257-258页。预定的最后期限是1609年9月1日。关于香料收益的详情见Prakash ,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一文 , 第189页和注6。

7 .J.P.Coen于1614年12月27日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17人理事会的信 , 选自Boxer , *Dutch Seaborne Empire* , 第107页。关于Coen的生平 , 见Masselman , *Cradle of Co-lonialism* 。

8 .同上 , 第107页。

9 .C.P.Thunberg , *Travels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 1770-1779 , 第一卷 , 第277页 , 引自Boxer , *Dutch Seaborne Empire* , 第238-239页。

10 .Hannay , *The Great Chartered Companies* , 引自Boxer , *Dutch Seadorne Empire* , 第225-226页。

11 .Furnivall , *Netherlands India* , 第49页。

12 .早在17世纪20年代, 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意与英国分享它在香料群岛的垄断权, 但条件是, 英国同时也要与它分担当地驻防的费用。英国觉得费用太高, 也就放弃了。见Prakash ,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 第188页。

13 .Furnivall , *Netherlands India* , 第39页。

14 .亚当·斯密谈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时, 曾推论说, 航海条例所造成的垄断地位使得利润率高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利润水平, 见*Wealth of Nations* , Book IV , ch.7 , Part 3。但他没有考虑到殖民地的收益及其带给英国的税收。倘若他考虑到这些因素, 他也许就有进一步的理由来反对这种垄断行径。

15 .Furnivall , *Netherlands India* , 第39页; Vlekke , *Nusantara* , 第203-204页。

16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II , ch.7 , Part 3。

17 .Brandel ,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 第三卷: *Le temps du monde* , 第191页。

18 .同上, Braudel提到Johannes Hudde, 即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期的董事长, 他在当时就已了解到了记账体制的缺点并曾试图加以改进。但他没能成功。“这其中有成千上万条理由和非常棘手的困难。但很可能也因为公司的董事们并不愿意公布内容清晰得一览无余的账本。”不透明也有它的好处。这种情况在现代商业运作中也没有销声匿迹, 如果在所有人、董事和经理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话, 情况还会更严重。

第11章 大财源

英国人就像波涛汹涌的潮水一样，他们是那样地锲而不舍、充满活力，并且不可抗拒。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得到想要的东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荷兰人聪明能干，好静并颇有耐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通过劝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尽量不动用武力。爪哇很可能会有天被英国人征服。

——爪哇王子约1780年

罗马人有这样一句话，*Pecunia non olet*——钱无气味。人们也许不喜欢钱的样子或是制造钱的人，但他们喜欢钱，并且想办法去得到它。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钱又是有气味的，而且很强烈，会把远近的人们都吸引到它身边。 [84]

1592年，英格兰跟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交战状态，当时葡萄牙是由于王室联姻和继承问题上的把戏而与西班牙联合在一起。在这之前约4年，英格兰人已击退了西班牙的一次海上入侵，摧毁了它自封为“无敌”的舰队。而到了这个时候，英格兰有一个海军中队游弋于亚速尔群岛附近，其任务是截击和俘获那些来自新大陆、很可能载有墨西哥或秘鲁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舶。有一次来了一艘葡萄牙武装商船，它叫“圣母号”，是由东印度向里斯本返航。 [85] 此船之大，为英国人所从未见过：它长165英尺，宽达47英尺，重1600吨，等于英国最大船只的三倍；有7层甲板，32门火炮，外加其他武器，上层结构富丽堂皇，舱内装满财宝。

这真是梦寐以求的货物：舱柜里尽是宝石珍珠，金币银币，比英格兰还古老的琥珀，成匹的精美织品，适于一座宫殿用的挂毯，425吨胡椒，45吨丁香，35吨肉桂，3吨肉豆蔻种衣，3吨肉豆蔻，2.5吨

安息香胶（用于制作香水或药剂的一种芳香度很高的天然树脂），25吨胭脂虫红（用亚热带的雌胭脂虫干体制成的红色染料）和15吨乌木。英国海军中队长还没有把战利品清点完毕，他手下的那些肆无忌惮的水兵就往自己腰包里塞东西，能拿走什么就拿什么。

当“圣母号”载着这些东西驶抵达特茅思港时，它高高耸立于其他船舶和码头一带矮房屋之上。商人、经纪人、扒手和小偷蜂拥而至，来自周围数英里以及来自伦敦和更远的地方，像蜜蜂采蜜一样，来参观这艘巨船（当地的渔民驾小船运送他们于岸船之间，不停地往返，收取高费），还在酒馆和赌场里寻找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水兵，设法从他们那里套购、偷盗和倒卖赃物。按照英格兰的法律，这批捕获物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女王所有；伊丽莎白女王得悉情况后，派沃尔特·雷利爵士到现场，取回她的钱财和惩办劫掠者。这位雄赳赳的爵士发誓说，“我一定要把他们剥得精光，因为他们劫走了女王陛下应有的大部分珍贵物品。”

等到雷利控制住局势时，原先估计价值约50万英镑的财富——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库钱款的一半——已减少到了14万英镑左右。尽管如此，还是用了10艘船才把这些财宝沿海岸运到泰晤士河口，再溯河而上运到伦敦。继西班牙向秘鲁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索取的巨额赎金之后，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捕获了。它也像那笔赎金一样，成为一剂极其强烈的开胃剂。这笔钱财让英国人尝到了东方财富的一点甜头，激发了他们对遥远东方土地的兴趣，从而将英国（以及世界）推上了一个新的航向。

英国人从“圣母号”那里还学到了另一课。当几年之后，又一艘满载战利品的船驶入泰晤士河卸货时，那些搬运工人所得到的工装是“用帆布做的无口袋的紧身背心”。（1）

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16世纪末来到了印度洋。他们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与其说他们是在做贸易，还不如说是在抢劫。只是后来他们才谨慎小心地转而经商了。

荷兰人将他们的一些独立的公司合并而组成了他们的东印度公

司，大规模地向印度洋调集船舰和武器装备，力图将葡萄牙人和其他的觊觎者赶出印度尼西亚群岛。相比之下，英国人的行动是零敲碎打，把每一次航行当做一次单独的冒险，要求参与行动的商人每一次都重新聚集资本。在这早期阶段，英国人和荷兰人发生过冲突，英国人也打赢过几次，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向荷兰人提出真正的挑战。因此，他们寻找别的贸易机会，转向北面的印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幸运的一举。

像荷兰人一样，英国人也宁愿避开葡萄牙人。在印度东面，他们首先登上东南部的科罗曼德爾海岸，远离东南角的马拉巴尔海岸。在印度西面，他们跳过果阿，在西北岸的苏拉特取得了贸易特权，而苏拉特是莫卧儿帝国的主要港口，是通往印度内地富庶地区的门户，是与波斯和阿拉伯世界贸易通道的一个起点。随后（1661年），他们获准在孟买落脚，孟买当时还是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小岛。与果阿相比，孟买比较安全，不易遭受来自大陆的侵袭。英国人把它建成一个工业基地以及西海岸的主要商业中心。

在半岛的东面，英国人在马德拉斯站稳脚跟以后，往北进入了孟加拉湾和胡格利河谷。从1690年起，他们在当时的一个小村庄加尔各答建起了他们自己的商业城。关键的一步是他们在1698年花钱买到了当地的一种“封建”特权（田赋征收权）。对欧洲人的打扰感到恼恨的地方当局，本来是瞧不起这种权利的，但是随着印度的商人和官员变得日益依赖英国人的贸易、援助和善意，这种权利也日益受到人们尊重了。（2）

所有这种种游戏的主题，就是花钱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友谊与合作。首先是印度大商人和莫卧儿帝国的廷臣。接下来的是地方官吏和采邑领主。他们指望着英国人的馈赠（贿赂）和津贴，用英国的船运输他们的出口货物，有时甚至投资于英国人的生意。英国派驻莫卧儿帝国的大使托马斯·罗伊曾明确阐述过这一任务：“让我们大家都接受这样一条规则，那就是：如果你想发财，就在海上打主意，作悄悄的贸易，因为若想在印度驻军和进行陆地战争，那无疑是错误。”

（3）

荷兰人也曾想在印度玩这种游戏，但不如英国人成功。在荷兰人看来，印度尼西亚是当务之急，剩下的精力和人力物力才用到印度。在印尼那些岛屿上，荷兰的火力驱逐了竞争者，以力服人比较容易。他们一开始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而科恩之流的一些总督的咄咄逼人的脾气更影响到荷兰人的行为方式。荷兰人更重视印度尼西亚，还有物质上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在印度尼西亚垄断一切，而置当地人的利益于不顾。这在印度却是办不到的，因为印度本国的统治者比较强大，那里还有别的欧洲人已经取得立足点，彼此争夺市场。

然而，所有的商人都宁愿要垄断而不要竞争。英国人一旦实力增强了，也就动用起武力：他们以海军封锁相威胁，这种封锁会打击印度的对外贸易并阻拦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他们开始修筑要塞并派部队驻防；他们劫掠印度船舶和索要赎金。167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苏拉特总裁兼孟买总督杰拉尔德·盎吉尔给该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们写信，详细描述了新出现的业务形势。他建议采取“严厉而且有力”的方针：“为了正义，为了你们财产的需要，现在该用你们手中的剑来管理你们的全盘生意了。”这一建议在伦敦受到赞许，乔赛亚·柴尔德主持了公司董事会，决定要制服印度政局的乖张变异。1687年，马德拉斯城外的圣乔治要塞接到了指令：使用武力以保证丰厚而持久的收入，从而为“英国今后永久在印度取得宏大的、有雄厚根基的、牢靠的支配权奠定基础”。^{〔4〕}这就为插手印度政治和行政管理开了通行证。这时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的征兆已隐约显露，印度那些图谋篡权的人蠢蠢欲动，想要从外国公司中间寻找同盟军。

与此同时，王位世袭制度既能产生治国贤君，也能产生出傻瓜。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错误地认为像英国人这样的商人只能屈服听命于帖木儿和巴伯尔^{〔86〕}的战士。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按照由来已久的方式压榨勒索英国商人——对海绵不挤不压，还要它干什么？

有一段时期，英国人没有吭声，逆来顺受。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商人。印度当局的横征暴敛促使这些闯进来的英国人考虑以暴力还击。1752年，一名恼怒的英国人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对克莱武^{〔87〕}说：“该收拾收拾这条老狗〔指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

了……公司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否则在孟加拉做生意还不够填他们的胃口。”（5）克莱武果真认真考虑了。

在印度，英国人知道了在亚洲的贸易远远不止是香料。比如，印度生产着当时世界上最优质的棉纱和布匹，而英国就很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赶在了其他竞争者之前。葡萄牙人对此项贸易兴趣不大，就连荷兰人也很晚才觉察到。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下定决心要推动棉制品的发展并努力开发市场：“东方棉布是一个其用处还未被人们完全了解的商品，我们必须打开销路，将这种商品运往各个港口试销。”（6）

这一产品的传统销路在于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的商人们，他们用香料或其他本地特产换取印度棉布。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最初也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因此，印度的棉制品就成了他们支付货款的主要来源。（在那样一个需要凉爽而不是温暖的气候环境中，英国的毛纺织品几乎就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然而东印度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措施就是将这些棉制品介绍到欧洲：1619-1621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向尼德兰运去了1.2万匹棉布；英属东印度公司到1625年运回的棉布达到22.15万匹。在经过了短暂的消化和回缩后，到17世纪末，此项贸易呈直线上升趋势：年销售量在17世纪60年代末是20万匹；70年代是57.8万匹；而到了80年代，则增至70.7万匹。荷兰商人虽然也采取同样方式，但他们的贸易总量只是英国人的一半，甚至更少。（7）

印度的棉制品改变了欧洲人的装束以及他们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命运。棉制品不仅比毛纺织品轻，而且又便宜，更宜于修饰（通过染色和印花），易于清洗和更换，一个充满棉制品的新世界展开了。即使是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棉制内衣的普及也改变了传统的洁净、舒适和卫生的概念。在美洲的种植园里，这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就像一些牙买加商人所说的（1704年）：“……在这样一个地处热带的岛上，大部分居民的衣服都是漂染过的棉布料，这种布穿着舒适而且物美价廉，同时又经得起频繁的换洗，这对于保持衣服的整洁和促进人们身体的健康有很大帮助。”（8）这是一种遍及范围很广、需求量巨

大的商品，它足以带动一场工业革命。

就这样，英国人贩运棉制品，再加上数量较少的生丝（产自孟加拉）、靛蓝染料和硝石 [88]，还有胡椒，而其他更珍贵的香料的生意则只好让与荷兰人了。胡椒曾是吸引欧洲人探险和扩张的耀眼明星，但到这时已地位下降了。由于开辟了一些新的胡椒种植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胡椒价格大跌，这种当年那么高贵的香料此时在通往欧洲的某些航线上居然充当了压舱物。 [89]

印度引出了中国。欧洲人进入印度洋后，发现亚洲从东到西有一片繁华的贸易网，它东起中国、日本和菲律宾，西至东地中海沿岸和东非的车队驿站和港口。欧洲人也挤了进来。在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货的胃口激增。这包括瓷器（欧洲人在18世纪20年代以前还不知道瓷器是怎样制作的），生丝；以及茶叶（它能让人上瘾，又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相得益彰）。

采购中国货，就有一个偿付的问题。欧洲人倒是愿意用他们自己的工业制品来偿付，可是中国人不想要他们生产的几乎任何东西（只有钟表是一大例外）。于是欧洲人偿付金银和硬币。但这只是转移了问题的方向：他们拿什么东西去换取西班牙人的银子以及日本人或巴西人的黄金呢？这并不容易。

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找出中国人所想要的东西。最后找到的就是鸦片，它生长于孟加拉，它让人上瘾，能打开市场。在这方面，英国人比荷兰人占有优势。原则上说，两国商人对这种商品都有竞争的权利，但是英国人利用他们在孟加拉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把荷兰人挤了出去——这对荷兰人来说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就这样，英国人最初是跟荷兰人同时动手，到这时却远远超过了他们。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发现自己占尽天时地利，他们渗入和掠夺的地方要比印度尼西亚富庶得多。除中国以外，印度是亚洲人口最众多的国家。我们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但据估计，16世纪末期的印度人口总数大约是1亿，而且这可能还是个偏低的数字。（9）印度拥有广袤的良田沃野，尤其是北部平原著名的河谷——印度河、恒河

和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域——而且人口居住又不密集。一位印度学者将之称作土地过剩，并且指出印度在17世纪仍旧可以将农业局限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也包括受惠于大片的草原和荒地而得以养殖大批牲畜的牧业。（10）（从另一方面说，印度从它的牧业上所获取的利润远不及它所应该得到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获，这都是由于宗教上的禁忌。）印度还有人数远远多于印度尼西亚的技术熟练的工业大军，他们的产品遍及各地。这样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印度经济有了相当可观的盈余，这也就助长了统治者神话般的奢侈：

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658-1701年）在位期间，每年的收入据说合4.5亿美元，是与他同时期的路易十四的10倍以上。根据1638年的估计，莫卧儿帝国朝廷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有15亿美元之多。（11）

印度宫殿和庙宇的富丽堂皇与奢侈远近闻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尤其是突厥游牧部落，这些骑士经常从中亚平原出击，掠夺周围定居民族的财富。印度的最后几代突厥统治者是莫卧儿人，他们的创始人巴伯尔是那个视人如牛马、杀人不计其数的帖木儿的后裔，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英国人初来印度时，在位的莫卧儿皇帝是巴伯尔的孙子阿克巴（在位1556-1605年）和重孙贾汗季（在位1605-1627年）。

莫卧儿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西邻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对印度国内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一般采取宽容态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们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气质，而与南方形成差异。当然，莫卧儿人是以专制占领者的身分统治印度，得不到印度原有各民族的忠诚。本地的印度教各邦多次向莫卧儿人的统治提出挑战，各地常常发生叛乱，宫廷阴谋活动也接二连三地闹个没完。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还有儿子杀父亲和父亲杀儿子。在人人为争夺合法地位而勾心斗角的这种环境中，对陌生人固然不可信任，但对自己的亲属就更加不敢信任了。（12）

莫卧儿统治者的暴政，与印度教的专制统治相比，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它所造成的问题却由于它采取的预防叛逆的措施，而变得更加严重。防叛逆是独裁政治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即想方设法防止臣僚自树一帜而形成敌对的权力中心。在中世纪的欧洲，君主赐予各领主的采邑最初只是给个人，不可以世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上的领主一般都是割据一方，将领地传给自己的继承人，与当地士绅拉帮结派，形成权力分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封建主义。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像在别的突厥国家一样，统治者派驻各地的代理人都是调来调去，保持流动。这种做法限制了地方的权力，但却使得那些官员没有心思建设自己管辖的地区。他们只想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为自己牟利，而不为社会公益花钱。（13）只有攫取而没有付出。在那些依赖水利灌溉的地区，公共设施年久失修，就会带来灾难，印度饥荒频仍的历史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同样的原因，农民（实际上是所有臣民）不想花力气改善土地，这土地是否归他使用都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弗朗索瓦·伯尼埃，17世纪曾在印度工作过10来年的法国医生，曾经写道，在印度谈不上“你的和我的”，也就是说，人们没有财产权或产业观念。没有人敢于露富，因为害怕敲诈勒索和没收。没有人留心于改善生产方式或生产工具。伯尼埃指出，只有极少数人富贵奢靡，而多数人贫苦，房屋破旧，民众蒙屈受辱，没有学习和自我改善的劲头，这贫富两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这种情况下，信贷以及信贷所能提供的商业机会也受到严重的限制。人们用不少笔墨形容过印度洋的商贸在欧洲人到达以前就很热闹；（14）还形容过印度高利贷者的富有，农民和商人都受他们高利盘剥。可是高利率意味着高风险。借钱的人能提供多大的安全保障？在人们需要隐瞒资产、因而信息量减少的情况下，贷款的人又能贷出多少？（15）印度当时的商业活动远远低于它的潜力。

然而，印度那些商人、银行家以及高利贷者是怎么致富的？答案是，他们在下金蛋。他们做买卖、行贿受贿，聚敛和分红；当他们去世时，家族已隐藏了尽可能多的财富。下面是一位英国人在1689年的

评述：

他们（商人）的财富只有两种形式，那就是现金和珠宝，在印度，分不清个人财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区别，他们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财产，以防莫卧儿帝国国库抢走他们的财富。这克制了他们的消费，也使他们在贸易中一直都保守着自己的秘密……（16）

紧张状态无所不在——对于统治者来说，既要對老百姓巧取豪奪，又要對他們适度照應；對於老百姓來說，既要隱藏自己的錢財，又要設法過好日子。但歸根結底，還是專制君主及其代理人控制着黎民百姓。在這方面，來印度的歐洲人享有很大優勢。他們不會受到那樣的虐待，他們甚至還能將當地的商人和工人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長此以往，這就構成了侵占主權。有人也許會說這是篡權，可是在專制社會中，所有的權力轉移都可稱為篡權。

社會最底層的佃農和賤民怎樣呢？他們所能依賴的就是自己的忍耐、頑強和韌力，即被壓迫者所能採取的對應方式。他們在忍受不了虐待時也常常逃亡，儘管當時印度的村莊仍是公社式的社會，而且逃到另一個村莊也不見得會好過一點，但逃亡現象之多仍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在中世紀的歐洲，逃亡或以逃亡相威脅，可以起到遏制虐待的作用，在城市化地區和邊疆地區尤其如此，出逃有收效。而在印度，逃亡大概只是從一個不幸陷入另一個不幸。儘管這樣，它還是可以促進和緩，因為任何一個捕獵者都不希望失去他的獵物。

在印度仍然有財富可撈——據一位學者估計，印度的盈餘約相當於農業產值的一半。有這麼多的財富可以攫取，這就必然促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從商業活動轉向政治活動，因為通過拉政治關係可以比做生意撈到更多的錢。此外，印度各地衝突和暴力蔓延，促使（迫使）東印度公司動員軍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有了軍事力量，就樂於干預當地的一些爭端。

來自倫敦的賢明告誡，未能阻止東印度公司駐在印度的人們沿著這條光滑的斜坡走下去。公司派駐印度的總督們以荷蘭人為榜樣來訓導他們手下的人，並且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作辯護。最後他們的主張占

了上风，伦敦方面作了让步。1689年，公司在印度的活动按三大“管区”改组，伦敦的公司董事会依照荷兰人的形象，通过了一项决议来重新明确公司的使命：

增加收入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如同我们的贸易是为了增加收入一样；在20来起事件就会打断我们的生意的情况下，有必要保持我们的武力；我们必须成为印度国中之国；否则我们就不过是凭国王陛下特许状而联合起来的一大群商贩，只能跑贸易，而掌权的人谁也想不到该照顾我们的利益……

使命拓宽了，但目的还不是像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那样搞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并不打算阻止别国商人进入印度市场——大概只有法国人除外，因为法国人决心在政治上向英国人提出挑战。然而，在印度这片貌似平坦的商场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和特权，而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公司的雇员们及时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但自己做买卖，还把自己的牌子和名声贷给为他们效劳的印度办事员和生意合伙人，谁为此付钱就贷给谁。

在人们满怀穆斯林自豪和仇外心理的这样一个世界里，英国人如此专横，使印度上上下下，从海关的收税员直到宫殿里的王公，莫不感到屈辱。异教徒敢于如此我行我素，损害了当地总督衙门的尊严和合法地位，导致了孟加拉总督（地方行政长官）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争斗，而争斗总是积下愤懑和仇恨。因此，年轻的总督西拉吉·乌德·多拉决心给英国人一个教训，在1756年派兵攻占了英国人的加尔各答要塞，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接着，他犯下“大罪，其无比残暴令人难忘，它们受到的重大报复亦令人难忘”。（17） 这罪行是指“黑洞”大屠杀：孟加拉总督的士兵把146名俘虏——其中既有军人也有平民，还有几名妇女——硬塞进一间只有18英尺长、15英尺宽的狭小牢房，牢房只有两个小窗，还被堵塞住。那是6月间一个闷热酷暑的夜晚，牢房里的人呼喊哀求和抗议。可是总督大人安寝了，不得打搅。呼喊声渐渐微弱了。到第二天清早，俘虏中只剩下23个活人。

这一罪行激起了报复，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的代表们自然十分乐意

放手大干一场。（18）他们很快就装备起一支舰队，载着由英国军人和印度雇佣兵组成的一支分遣队，在罗伯特·克莱武的指挥下，由马德拉斯启航。克莱武本是公司的一名年轻的职员，但富有军事才干。由于逆风行驶，舰队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孟加拉湾，进入胡格利河口。英国人轻而易举地收复了加尔各答，逼西拉吉·乌德·多拉付出一大笔赔款，还迫使他恢复了公司的全部特权。对那位地方行政长官来说，那一夜安眠的代价可真不小。

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英法两国在欧洲打仗，也在孟加拉引起回响。西拉吉·乌德·多拉向法国人献殷勤，他这样做当然很有道理——要报仇，还想争取赖掉他向英国人赔款的义务。可是这一次又打错了算盘。英国人获悉这些花招，就由克莱武率兵攻打和占领了法国人在孟加拉的商站金德讷格尔，打掉了这个商业竞争对手，拔除了眼中钉。西拉吉·乌德·多拉咽不下这口气：这些英国商人怎敢在他的领地之内对别国商人动武？此外，他像埃及法老一样，也悔恨自己太软弱，觉得自己可以来个第二次，干得漂亮一些；毕竟他的军队比英军占压倒优势。

这一次，英国人决心要搞掉西拉吉·乌德·多拉。他们设法从印度当局内部找出怀有贰心的官员作同盟军——“如果有一个效忠于东印度公司的人来当总督，该多么美好啊！”——他们找到了米尔·伽法，这个人是西拉吉·乌德·多拉的内叔，是孟加拉的一位司令官。（19）当地有的是可以收买、用来牵线搭桥的官员和商人。英国人利用了一个名叫阿明·昌德的精明印度教商人做中介，买通了米尔·伽法，许诺事成之后让他当孟加拉总督。米尔·伽法则答应在他升官之后以重金酬谢英国人。

最后，1757年6月23日，战斗打响，地点在加尔各答以北90英里的一个村庄普拉西。英国人和他们收买的同盟军为一方，西拉吉·乌德·多拉和他的僚属为另一方。英国人打赢了，这一个胜仗改写了印度的历史。大英帝国的诗人们歌颂克莱武这位公司职员出身的将军如何英勇善战，善于策反，还描述一些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例如在雨季怎样遮盖大炮，等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崇拜偶像的文人则对此嗤之

以鼻，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事迹（人人都是勇敢的），还叹惜那些印度大小官员对国不忠，轻易让人收买。（20）

然而，这最后一点当然是莫卧儿之类专制帝国的致命弱点。有什么忠心可言？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是：那位孟加拉总督手下有大军50000人，而英军方面不过3000人。总督的50000人当中，实际为他打仗的只有12000人，而这些人也是一触即溃，刚刚伤亡500人就赶紧撤退了。英军方面的损失是仅仅阵亡4名欧洲人和14名印度雇佣兵。这就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交战之一。（21）

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清点胜利果实。公司所获得的战争赔款总数最后达到1000万卢比（按照7.14285卢比等于1英镑的汇率折算，相当于140万英镑）；给居住在加尔各答的商人做出赔偿（英国人500万卢比；亚美尼亚人200万；印度人100万）；赔偿英国海军中队和陆战部队500万卢比；再加上给公司理事会成员的私人赔偿，按规定是每人25万卢比。

这所有的总合起来达234万英镑，是“圣母号”船所载战利品的5倍——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1亿英镑以上。 [90] 米尔·伽法才不在乎呢。反正钱又不是从他的口袋掏出的。但是，以孟加拉的财政状况，它是不可能满足这一庞大的开支的。最后，约一半的赔偿金是以金银硬币或珠宝支付的。剩下的则被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而伴随着每一次的推迟，公司都获得了某些特权、土地和其他收入等形式的补偿。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理事会成员们却得到了全部赔款——要体现轻重缓急嘛。 [91]

这些敲诈勒索还附带有一笔相当可观的额外财富：公司被赋予加尔各答周围很大一片土地的田赋征收权。这些土地每年向地方行政长官所缴纳的代役税是2.3万英镑，而它每年实收田赋却是5.3万英镑——净剩3万英镑，多么可观的数字。随着加尔各答的日渐繁荣，它周围土地的租金也水涨船高，没过几年，租金已涨至14.6万英镑。而且自从任命了克莱武为公司孟加拉居留地的总督后，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就把他的征收代役税的权力转让给克莱武，这样一来，雇员倒变

成了雇主的地主。克莱武还获得了一项特权，即指挥莫卧儿帝国军队中6000名步兵和5000匹战马的权力。公司的这种政治与商业的混淆使它的代理人也具有了双重身分。

在印度，如同在印度尼西亚一样，权即是钱，钱即是权。印度国民生产的盈余原先被刮到莫卧儿国库和藩臣账下，此时则转移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职员和代理人的手中。商人和公务员都乐意到公司领取并不丰厚的薪金，以此为私下拉买卖和公开贪污受贿打掩护。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花钱买公司的职位。英国议员及其他有权势的人想方设法把亲朋好友安插到公司，以各自的方式为此而付钱。公司总部成了“一座彩票房，诱惑每个人去碰运气，让幸运的少数人……发大财”。（22）但显而易见的是，幸运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要知道，印度当时是一个疫病蔓延的地方。许多发了财的新贵是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到英国。即使是健康存活下来的人如何把他们的资产变成现金，也是一个问题；而死去的人就只得依靠代理人，代理人会为自己牟利，往往还变成无人负责。就这样，从印度这张大餐桌上纷纷掉下一些面包屑，养肥一批经纪人、律师、掮客、珠宝商、证券中间人、走私者、骗子和投机商。

克莱武——他此时已受封为爱尔兰勋爵，而且有望得到英国爵位——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比一般人更大，因为他要弄回去的钱财比别人多得多。他将18万英镑汇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然后经过打折扣，再用来买英镑汇单。有4万多英镑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转回去，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额是通过私商走不知名的账户。他还将大笔钱投资于珠宝——仅在马德拉斯一地采购的钻石就价值2.5万英镑——再把珠宝弄回英国倒卖。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写道：“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无论在哪个行业，再也没有一个别的英国人能白手起家，刚到34岁的时候就拥有这么多的财富。”（23）

克莱武回英国后，把他的财富用于“体面的”项目。他把大笔的钱送给了他的姐妹们、别的亲戚以及一些贫穷的朋友；给他的父母安排了每年800英镑——相当于现今的40万美元——的收入，同时坚持他

们要有一辆马车；给“收入菲薄”的一位军队老上司安排了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在如此慷慨地花掉大约5万英镑之后，他为自己以及他的一小批帮手购置地产，以确保在英国下议院拥有席位。他还买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把它们分摊给那些为他打掩护的人，以便形成一个在公司拉选票的小集团。在当时，所谓的有产者理事会的会议都是“人多，争论激烈，迹近骚乱……有人大规模地操纵虚假的选票”。罗伯特·克莱武是应对此负责的一个。

从短期影响来看，像这样将财富和政治权力从神秘的东方转移到英国各郡县和议会大厅，令人难以忍受——太快了，也太新鲜。这些在印度发了大财的“总督老爷”是什么人，怎能购置大片地产，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败坏英国的政治？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此进行官方调查和议会质询的呼声，结果导出了沃伦·黑斯廷斯唱主角的臭名昭著的审讯，促成了东印度公司章程的重大修改。这些新的安排加强了国家对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经营运作的监督，使得“发脏财”比较困难了，然而在印度混几年捞到的钱，仍有可能超过在英国干一辈子的收入。

从长远来看，英国人在印度攫取了帝国的权力，就在政治谋略和伦理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东印度公司把它的收获视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会有多久”（1766）。因此，它要“保护和珍爱居民……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们关注的首要事情”——这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庄园，庄园的佃户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24）

很明智，也很合英国典型；但做起来并不简单。即使是在改革以后，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由于英国人为稳妥起见不去轻易变动印度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发展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随着新技术，尤其是铁路，从国外传入印度，印度的经济有所改变和增长。然而，除了充当棉花原料供应者以外，印度经济对工业革命的反应是迟缓的。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印度棉纺织业，已日益萎缩，几乎消失。印度历史学家将这种情形归罪于殖民压迫者，指责英国人不仅取消了印度的保护性关税（自由贸易万岁），而且对印度出口产品课

税，使它们与英国的棉纱棉布价格拉平。可是问题并不在此。印度企业家和英国企业家都可以在印度自由地兴办现代制造业，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如果说他们不曾更早地这样做，那一定是自有缘故。

我们怎么知道？

历史文献的性质

关于印度历史的某些最重要的著述，是由印度学者完成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著述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以欧洲人的记载和报道为依据。从印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文献流传下来。举例而言，关于16至18世纪的印度洋贸易，尤其是当时的纺织业，我们所知道的情形几乎完全是来自欧洲各特许贸易公司及其本国政府的档案，还有欧洲旅行者的报道及其来往信函。（25）因此，这些记载只反映出事情的外在一面。然而，它们内容丰富，能说明问题——其中还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本地材料——足以为相当不错的历史研究提供依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对称，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印度人是有文化的（尽管他们在当时缺乏印刷术），而莫卧儿这样的帝国，若没有文件和通信，是不可能运转的。印度商人也一样，若没有备忘记录 and 信函，他们也不可能活跃于国际贸易之中。是不是在文件保存方面出了问题？如果是那样，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文件怎么又保存了下来？是不是在商业组织形式上有重大差异？欧洲各特许公司是依赖于一整套官僚机构，有官僚机构就有文牍。也许，问题是在于连续性和文件保管制度。印度的政治单位当时都是短命的，它们的文件也就一起湮没了。也许，它们本来应该把事情记载在黏土板或石板上面。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个时候的欧洲人已经热心于作记载。要注意到当时各社会之间的一大差别：有的是只有社会上等人才有文化，有的则是一般人均识字通文。欧洲当时尽管还有不少文盲，但却属于后一范畴。中等以上的人都能阅读，还能写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不但官员如此，老百姓亦如此。在欧洲人以外的社会中，最与欧洲人相近

的就只有日本人和犹太人了。欧洲人还对其他民族和社会抱有热心的好奇心：当时的游记当中，绝大部分是欧洲人写给欧洲人看的。

这种好奇心是欧洲人对外扩张和占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应是二者兼有），它为对外侦察和开拓指引了道路。近年来，反殖民主义的评论家就西方人好奇心的所谓的恶劣作用大做文章，把学者、间谍和外交官全看做一丘之貉。在这方面攻击最为详尽的，莫过于爱德华·赛义德那一部备受关注的著作《东方学》

（1978）。（本书在第24章中将更多地述及赛义德这部影响力很大的著作。）这位评论家认为只有一个社会内部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社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根据这一论点而贬斥学术对手的研究成果，是很成问题和反科学的。然而该书指出信息很有价值和很有力量，能起很大作用——不论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这一点却是十分中肯的。

饮食、收入和生活水准

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前，其“民众”境况如何？欧洲旅行者和访问者报道了那里的普遍贫穷，甚至是悲惨，而印度对话者也表示同意。为什么印度南方有那么多庙宇？“……那里土地肥沃无比，而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却十分少。”英国一位旅行者拜见当地一位王公时，那王公把他管辖下的农民说成是“赤身裸体、忍饥挨饿的群氓”。他们的需求呢？“钱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的，让他们有饭可吃有屎可拉，就够了。”（26）

某些历史学家会争辩说，这些外来者所见所闻并不全面，或者说他们是有意给印度抹黑以抬高欧洲人。有人甚至断言，按照食品摄入量的估算数字计算，当时印度佃农的生活水准还高于英国农场的劳工。（27）

鉴于欧洲和亚洲当时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我觉得这种对比卡路里的计量历史学结论是不足信的。我也不相信某些人把20世纪收入对比的估计数字推回到18世纪的做法。（28）这种计算结果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即使是一点小的误差伸展到两百年前就会

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

在这类推测性的计算中，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而历史背景，就印度而言，是财产权利受限制，技术落后；就西欧而言，则是正在大步迈向工业革命，发明和改进各种精巧的、节省劳力的装置，尤其是用人力以及用动力驱动的机械。它当时已远远超过了亚洲。更有效的技术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阿明·昌德怎么啦？

英国人和米尔·伽法之间的谈判是由两个代理人来进行的，其中一个就是孟加拉商人阿明·昌德，他为接受东印度公司保护的好处而居住于加尔各答，因此在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攻打和占领加尔各答时蒙受了巨大损失。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这样坦率地评价阿明·昌德：他没有政治上的是非概念，只是凭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经验周旋于英国人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他的民族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身上具备着印度人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力、手腕圆通、机智灵活、坚韧不拔的性格。也不乏印度人的缺点：贪婪、奴性和叛逆。”

欺骗和安抚地方行政长官是阿明·昌德的工作。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多亏他的胡编乱造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但这走得越远，事情的成败就越发依赖于阿明·昌德的举动。他随便的一句话都可能摧毁整个计划。恰恰就在此刻，克莱武开始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说阿明·昌德准备背叛英国人，除非英国人能给他以巨额报酬。多大呢？他要求30万英镑（也就相当于如今的1.5亿美元），另外，他还要求把这个承诺写进保证米尔·伽法担任孟加拉行政长官的协议里。

克莱武气极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也太贪婪了。克莱武决定以牙还牙，准备了两份协议——一份是真的，写在白纸上，压根就没有提及阿明·昌德；另一份是假的，写在红纸上，其中有满足那位商人要求的条款。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甘心参与这一骗局。海军代表沃森将军拒绝在红纸协议上签字。白纸协议的这一缺漏若被阿明·昌德看到，他肯定会起疑心。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克莱武就伪造了沃森

的签名。

行动的时刻到了。自负的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西拉吉·乌德·多拉起兵进攻。克莱武指挥他的英军部队——按照他的说法，都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在普拉西大获全胜（1757）。西拉吉·乌德·多拉落荒而逃，地方行政长官的宝座也就丢了。胜利者聚会分享胜利果实。阿明·昌德满怀期望地到会，因为克莱武始终对他体贴备至，直到最后一分钟。这时宣读了白纸协议。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阿明·昌德。他问克莱武这是怎么一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那红纸协议是个圈套。你一无所获。”这个可怜的人当即昏厥过去，虽然又苏醒过来了，但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理智。他逐渐变得思维混乱和行动呆滞。他原先是那样一个机智敏捷而又衣着俭朴的人，这时却变得身穿布满珠宝饰物的华丽服装，漫无目的地四处逛游。没出几个月他就死了。

总的说来对克莱武持同情态度的麦考利，写这场骗局时说：“……这个人在他一生的其他时期是一位可尊敬的英国绅士和军人，可是一遇到一个印度阴谋家要加以对付，就自己也变成一个印度式的阴谋家，肆无忌惮地堕落到假仁假义，调换文件，冒充别人的笔迹。”（29）然而，麦考利的落脚点不在谴责。在指出克莱武道义上的瑕疵以后，麦考利又为他辩解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马基雅弗利也许同样会采用这种手法”。

关键在于克莱武的行为“不单是犯罪，而且是大错特错”。麦考利指出，个人可以背信弃义而致富，国家却不行。办公事时，诚实的信誉比勇敢和智慧更重要。而在一个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尤其是这样。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以如此小的代价维持其帝国，靠的就是无条件的诚实，而不是别的；之所以能把印度人明里暗里贮藏的财富都弄出来，靠的也不是别的任何东西。麦考利说，东方最强有力的君主也不能说服他们的臣民把财富交出来放高利贷，可是英国人以4%的利率相许诺，就让印度人拿出了几千万卢比。

这是麦考利的见解。他有他的道理。可是，克莱武的后继者们是比克莱武更顾及道义吗？抑或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政治家不过是

学会了撒谎更高明一些？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撒谎，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不撒谎？是在钱的事情上守信用，其余的则见鬼去吧？那就会是一种嘲讽。事实是：即使是在麦考利那个讲正义的时代，诚实也是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甚至在钱的事情上——应该说尤其在钱的事情上，亦是如此。的确，印度投资者相信了英国的承诺，购买了利率为4%的英国政府债券，英国也从未让他们失望……直到20世纪为止，这时战争和财政赤字破坏了英镑的购买力，毁了金本位。通货膨胀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谎言吗？

注释

1 .见Sainsbury主编的*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East Indies* , 第321节，转引自Mas-selman , *Cradle of Colonialism* , 第281页。

2 .英国人依靠莫卧儿帝国的一道敕令得以免除关税，遂将各类商人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发卖通行证，同时还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内向孟加拉地方行政长官的代表和代理人征税，就连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和婚姻也要交税。结果是：孟加拉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呼声，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Edwardes , *Battle of Plassey* , 第23-24页。

3 .引自Bhattacharya , *East India Company* , 第19页。

4 .同上，第22页。

5 .Edwardes , *Battle of Plassey* , 第24页。

6 .Chaudhuri , *Trading World of Asia* , 第195页。

7 .所有这些，见Steensgaard , “Trade of England” , 第123-126页，他列表展示了欧洲在1651-1760年间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印度（包括部分中国）纺织品的估算数量。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是在普拉西之战以前，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实力已居于其对手之上。Steensgaard认为，原因之一在于英国公司的权力下放以及能够充分发挥驻印度当地的公司职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8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 1704年2月14日, 第14篇, 第336页, 转引自Chaudhuri, *Trading World of Asia* , 第277页。

9 .Moreland, *India at the Death of Akbar* , 第9-22页; 转引自Habib: “Potentialities”, 第54页, 注释4。

10 .Habib, “Population”, 第167页提出了牲畜的一个大致数字, “在1600年将近1.5亿头”。Habib, “Potentialities”, 第34-35页, 拿1600年与1900年相比, Habib说道, 权衡早期过剩的土地资源(比较肥沃)与后期的社会资本的投入(英国投资建设水利灌溉和公路等设施), 再加上其间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 可以推断出印度早期人均农业产值至少也是和后期相当。他还认为, 莫卧儿帝国的人均产值“不可能低于那些同时代的国家, 其中也包括西欧”。我对此看法不同。有关类似的评论见Parthasarathi, “Rethinking Wages”。

11 .Kautsky, *Politics* , 第188页, 引自Lyby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 第295页。同时Kautsky还指出, 因为这些数据都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元比价来统计的, 所以要把它乘以10才等于1981年的价格。我认为要乘以20或25才等于1994年的价格。

12 .Lybyer, *Government* , 第293页, 引用Alexander Dow, *The History of Hindostan* , 第3卷(伦敦, 1770-1772): 在莫卧儿帝国“生为王子”可谓是“陷入最大不幸和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如果不是死于宽厚仁慈, 那就是双手沾满其亲人鲜血, 来保证自己和帝国的安全。”转引自Kautsky, *Politics* , 第240页。

13 .关于莫卧儿帝国统治阶级的巨额个人财富以及他们系统地存贮钱财所造成的结果, 见Raychaudhuri, “The Mughal Empire”, 第183页。最终的受益者是英国, 除了用一笔年金打发当地统治者以外, 还剩有许多钱留给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和当权的英国人自己。

14 .Chaudhury, “Trade, Bullion and Conquest”。别的一些著作中也谈到这一点。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个地区本来已经很繁

荣，欧洲人来，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谁需要他们？

15 .参阅Root , “Le marche des droits de propriete” , 第299页。

16 .J.Ovington , *A Voyage to Surat in the Year 1689* , ed.H.G.Rawlinson (伦敦 , 1929年) , 转引自Raychaudhuri , “The Mughal Empire” , 第185页。

17 .Macaulay , “Lord Clive” , 第222页。

18 .关于公司和职员商业利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参与了私人企业）, 以及英国人很希望让当地政府落人友好人士之手的想法, 见Chaudhury , “Trade, Bullion and Conquest” , 第27-30页。

19 .出自1757年4月9日Luke Scrafton写给“克莱武的心腹”John Walsh的一封信——Chaudhury , “Trade, Bullion and Conquest” , 第28页。

20 .Adas , “High Imperialism and the'New History'” , 第9-10页 ; 亦见Edwards , *Battle of Plassey* 。

21 .Keay , *Honourable company* , 第318-319页。

22 .Macaulay , “Clive” , 第253页。

23 .同上 , 第250页。

24 .Marshall , *Problems of Empire* , 第60页。

25 .Pearson ,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 第72页 : “关于16世纪 , 我们很无奈地依赖于欧洲的信息资源。”

26 .Habib , *Agrarian System* , 第90页 , 350页 , 390页。后一句话源自John Fryer , *A New Account of East India and Persia being Nine Years' Travels , 1672-1681* 。这些都转引自Kautsky ,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 , 第103页, 注释14。

27 .例如, Andre Wink声称“在工业革命初始阶段, 亚洲许多地方的人均收入可能要高于欧洲”——Wink, *Al Hind* , 第65页。Bairoch, “Ecart international”和“The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第7页, 亦见Parthasarathi, “Rethinking Wages”。

28 .Alam, “How Rich Were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 1760 After all?”.

29 .Macaulay, “Clive”, 第228页。

第12章 胜利者与失败者：帝国之资产负债表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世纪末既是结束又是开始。斯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停业清理；英国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但奴隶制并未结束）；^[92] 蔗糖富源从盛到衰（包括圣多明各^[93] 革命运动及种植业和种植人口衰落）；法国旧制度终结；旧帝国时代终结。新时代伊始，欧洲丧失了对海外一些领土的正式控制权（西班牙损失巨大），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经济主导权。欧洲强行进入原本遥不可及和无缘接触的地方（中国、日本），同时在其他地方（印度、印度尼西亚）创立了独特的统治形式。

这一巨大变迁的转折点即工业革命，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随后为全世界所仿效。工业革命使得一些国家更加富有而其他国家（相对）更为贫穷；或更确切地说，有的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变得更加富有；有的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则依旧贫穷。这一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对某些国家来说，比如西班牙，地理大发现招致财富、腐化和矫饰——这依然是旧方式的延续，但规模更为宏大。对英国、荷兰等另几个国家而言，却意味着用新方式处理新事物，抓住技术进步潮流的机会。对其余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马尼亚人来说，它是大灾变，是外部强加的悲惨命运。

地理大发现首先带来了两个生物圈生命形式的交换——所谓哥伦

布式的交换。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新民族、新动物，尤其是新的种植物——一些食物（玉米、可可、土豆、白薯），某些引人上瘾和有害的种植物（烟草、古柯），某些有利于工业的种植物（新硬木、橡胶）。这些产品被引入旧大陆，有的引进早些，有的则晚些（橡胶直到19世纪才显示出其重要性）。

新食物改变全世界的饮食。例如，玉米成为意大利和巴尔干的一种主要食物（作玉蜀黍粥）；土豆成为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欧洲地区的主要淀粉类食物，在某些地区（爱尔兰、弗兰德斯）甚至代替了面包。土豆如此重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视之为19世纪欧洲人口“爆炸”的根源和秘密。^{〔1〕}并非仅仅欧洲如此。生长在贫瘠丘陵地的土豆，与花生、白薯和山药一起，给18世纪中国人提供的饮食营养已经超过了稻米。

同时，欧洲给新大陆带去了种植物——甘蔗、谷物，也带去了动物——马、带角的牛、绵羊、新品种的狗。其中，有的成为征服的武器；有的如牛群和绵羊占据了当地居民的大片土地。更为恶劣的是，欧洲人以及他们从非洲带来的黑奴给新大陆带来了肮脏而微小的行李：天花、麻疹、黄热病的病毒，疟疾的原生物寄生虫，白喉杆菌，斑疹伤寒的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雅司病螺旋体，肺结核细菌。对于这些病原体，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人已接触过千百年，能生存下来的人们已有了程度高低不一的抵抗力。然而美洲印第安人却在这些疫病的袭击下大量死去，有的地方人都死光了，结果是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人群幸运地获得了抵抗力才存活了下来。

为什么欧亚大陆生物圈远比美洲生物圈毒性大？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人口密度更大和传染频率更高？病原体的机遇分布？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哪里？他们只有一种疾病传染给我们——这就是梅毒，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德国人称之为法国病，如此等等。该病从海港传布到欧洲其他地区。^{〔94〕}

然而，入侵者也有自己的弱点。到墨西哥的美国游客把旅游者的腹泻称为“蒙提祖马^{〔95〕}的报复”；那些到印度的人称之为“德里腹

痛”。这些译名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早期移居这些陌生地区的欧洲人很容易成为当地病原体和传染病的受害者，“像苍蝇一样”死掉了。（2）这种事情的发生依地区而定。气候与卫生条件——粪便和废物处理的方式、供水和排水、个人习惯、社会风俗——可以改变一切。例如，印度洋地区的传染率是温带地区的3到4倍；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则达10倍以上；而西非则是通往死亡之门的单行道，死亡率高出50倍之多。（3）在这些地区的内部，人口密度越高，传染率越大：如印度的孟买、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 [96]。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的三部曲（《物质文明》等）描述了在印度果阿的一个富有的葡萄牙家庭如何进餐的情景：房间为水环绕，桌子在水里，他们将脚伸在水里。显然，这样可以防止与爬虫一同进餐，但却会邀来水中的游虫，还有苍蝇。

那时在海洋上的人口流动，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的（奴隶），都给世界带来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大的悲伤，但也给欧洲人带来了财富和机会，不论他们留下来还是离去。这是市场社会的人口流动之法则：人们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这样会给留下的人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或攫取财富（食物、木材、矿物或制成品），并将它们运回或带回祖国。

这些受益是缓慢实现的，直到19世纪，由于交通的发展，美国中西部才开始出现商品农业。同样的进展使得移民便宜、容易，正是这种发展才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增长。但即使早期人口流动不大，在殖民地种植园及其母国的粮食供应方面，北美洲仍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其余的进展则前景在望。欧洲18和19世纪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既有限制又有痛苦；但是任何大陆的现代化都不如欧洲那样顺当。欧洲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新大陆——是踏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和契约仆役的脊背上实现的。

如果西班牙没有钱、没有金银，那是因为它拥有这些；如果西班牙贫穷，那是因为它富有……有人也许想使这一共和国着了魔的人民生活在自然法则之外。

在农业和制造业之前是抢劫与掠夺。哥伦布式的交换重新分配了财富以及动物群和植物群——从旧富转变为新富一步到位。然而，海外财富的注入促成了初期的经济繁荣，其影响却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致富之后只知道消费，而有的则储蓄和用于投资。国家也是这样：有的国家最后只比起初富裕一点；而有的国家擅用新财富，获利更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致富最早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成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毕竟，各种增长模式都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资本的力量——即资本可作为劳工的替代，使信贷易于得到，使项目受损后不致慌神，可以赎回错误，给大企业提供第二次机会，是经济繁荣的主要营养。资本可以带动一切。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建立了帝国，所以他们不乏资本。

西班牙尤其如此。西班牙的新财富自然而然，可以投资或消费。西班牙选择了消费一途——用于奢华与战争。战争耗费最大：它毁灭而非建设；没有理由也无限制；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与资源的匮乏导致残酷的非理性，增加开支势在必行。西班牙使用资金更为随便，因为这是意外之财，不是劳动所得。花掉横财总是一件容易事。

谁得到了钱？无论如何，不事储蓄的话，钱总会用掉的，随手而来，随手而去。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弗兰德斯战场上耗费了自己的大量财富。西班牙要支付军人和武器费用，包括从间歇性敌人英国进口铁炮的费用；支付供应品的费用，其中有许多是从间歇性敌人荷兰和佛兰德斯进口的；还要支付马匹和船只的费用。

同时，西印度群岛财富对西班牙工业的意义越来越小，因为西班牙人不再需要制造什么了，他们可以购买。(5) 1545年，西班牙制造商已积压了新大陆长达6年之久的未交货订单。那时，从原则上讲，要求海外帝国用户只能购买西班牙自己生产的商品。但是，顾客和利润唾手可得，西班牙商人转向国外供应商，购买他们的商品，然后用自己的名号打掩护，倒卖出去。这就是原则。美洲的财宝也没有

促进西班牙的农业；西班牙可以购买食物。正如一位西班牙人在1675年所说，整个世界在为我们工作：

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生产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让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生产它们的亚麻布吧，我们的资本会满足他们的。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的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工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需为任何人服务。（6）

即使今天，我们还会听到这种在比较优势和新经典贸易理论幌子下的蠢话。我曾听认真的学者说，美国无需为巨大的对日贸易逆差而担心。毕竟，日本人提供给我们有用的物品，不过是来换取印着华盛顿头像的纸片。这听起来不错，但却是非常有害的。财富不会比工作好，富裕莫过于劳动所得。摩洛哥1690年至1691年驻马德里的大使清楚地认识到问题之所在：

.....今天，在基督教诸国中，西班牙人财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对奢华的热衷和文明的舒适征服了他们。你很少发现西班牙人像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那样为从事商业奔走海外。类似地，这个国家蔑视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从事的手工艺行业，它自视比其他基督教国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从事手工业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寻找工作的法国人.....（而且）很短时间就发了大财。（7）

依靠外来者，这证明无力推动技术和企业的进步。

换句话说，因为西班牙有了太多的钱，它变得贫穷，或者说保持了贫穷。那些从事工作的民族学到和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寻求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的新方法。而西班牙人却沉溺于社会地位、休闲和娱乐的嗜好之中——卡洛-西波拉称之为“普遍存在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心理状态”。他们并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各地，绅士生活被称誉，而手工劳动者遭受白眼；但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部分因为一个处于欧洲边缘而又好斗的国度不会教导人民容忍和勤劳；部分因为工业的工艺和劳动长期以来是与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如犹太人和穆斯林

相联系。正如编年史学者贝纳尔德斯在描述15世纪末的犹太人时所说的：

.....他们都是商人、经纪人、税款包收入，他们是贵族的管家和熟练的剪羊毛工人，他们是裁缝、鞋匠、制革工人、编带工、编织工、杂货商、小贩、丝织工、铁匠、金匠，或从事类似的职业。他们从不种地，也不做农场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们都寻求轻松的行业或寻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

剩下来受诅咒的就是贱民；贱民从事的行当都受诅咒。（8）贫穷和失业倒是更好一些。西班牙的穷人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让富人有机会出钱济贫，而帮助他们求得灵魂的拯救。（9）

到17世纪中叶，大批金条的流入终止了，西班牙王室债台高筑，经历了1557年、1575年、1597年数次破产。国家进入长期衰落。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引出的寓意是：意外之财对人有害无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将导致立即发生畸变，以后更会悔恨不已。[97]

北欧诸国也许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因地理大发现而繁荣。他们捕鱼，提取和精炼鲸油，种植、购买和转卖粮食，织布，锻铸铁器，伐木和开采煤矿。（10）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帝国，但幸运的是他们并未轻易捞到金银。机会允许，他们就进行掠夺。但是，这些帝国确实主要建立在可更新的收获和持续的产业（包括奴隶产业，但那是消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依赖终会枯竭的矿物。它们建立在工作之上。

欧洲经济重心北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令西班牙蒙羞的残败。昔日意大利伟大的商业和工业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也都如黄花败落。意大利曾是欧洲中世纪商业革命的先驱，率先从闭关自守走向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迟至16世纪，意大利还是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制造业繁荣，在向西班牙和北欧诸国提供商业和银行服务方面成就卓越。然而，意大利从未抓住地理大发现提供的机遇：意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现于印度洋或横渡大西洋。意大利只关注于地中海。意大利同样受制于旧式结构：行会控制束缚着工业，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因为制造业主要限于城市作坊，劳动力成本依旧高，这些作坊雇

佣的是成年的男工匠，他们从学徒时就在这里工作。（11）

北欧比南欧发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世纪，观察家已经从心理学角度评论二者的不同。他们称，北方人顽强、鲁钝、勤奋，他们勤劳工作，成绩卓著，但不会享受生活；相比而言，南方人性情愉悦，热情而善于观察，热衷休闲而非工作。这种对照与地理和气候有关：阴雨连绵与阳光普照；寒冷与温暖。有人甚至发现了各国内部的类似区别：伦巴第人与那不勒斯人之间；加泰罗尼亚人与卡斯蒂利亚人之间；佛兰芒人与法国南方人之间；苏格兰人与肯特郡人之间，等等。

这种思维定式有若干真理的成分，但绝大多数是思维惰性的表现。驳倒它们非常容易。但仍有未解决的问题存在：为什么有的人从财产万贯而败落，有的人却从一贫如洗而振兴？西班牙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相似：它提供了一个成功与失败的令人迷惑的问题，学者从不厌倦地探讨它。

也许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解释了。韦伯起初研究古代世界历史，以后逐渐成为精通多样化的社会科学的奇才，在1904-1905年出版了他影响最大和引起争论最多的论文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主题是，新教教义——更确切地说，加尔文教派教义——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盛，即他从自己的祖国德国了解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盛。他说，新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通过减轻或祛除罗马信仰中那些阻止或妨碍自由经济活动的条规（例如，禁止高利贷等），也不是通过鼓励、更不用说创造对财富的追求。新教是通过确定和支持日常行为的伦理促进商业成功的。

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派教义之所以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确认了得救预定论。这一论点认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为而得救；这个问题在起初就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定了，人不能更改自己的命运。

这样一种信念似乎容易鼓励宿命论的态度。如果行为和信仰不能改变什么，为什么不纵欲求欢呢？为什么要为善？这是因为，按照加

尔文教派，善是似乎可能的上帝选择的迹象。每一个人都可能被选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数被选中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心灵的质量和他们命运的本质。这种含蓄的确认有力地鼓励了恰当思想和行为。1689年，一位英国妇人伊丽莎白·沃克尔写信给她的孙子，提到上帝恩惠的一个不那么重要却又比较重要的迹象：“爱清洁的人不全都是善人，但善人几乎没有不爱清洁的。”⁽¹²⁾死硬的得救预定论信念只持续了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教条不会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终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98]“时间苦短”，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劝告说，“而工作却长。”⁽¹³⁾

所有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商业和资本积累，但韦伯强调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不以致富为目的。（然而，他也许容易相信，诚实致富是上帝恩赐的标志。）欧洲无须等待新教改革来发现要求致富的人。韦伯的观点是，新教教义产生了一种新型商人，一种不同的人，其目标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和工作。这种方式非常重要，而财富充其量不过是副产品。

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也许会说西班牙错误之所在：轻易得来的财富，不劳而获的财富。比较一下16世纪左右新教与天主教对赌博的态度。二者都谴责赌博，但天主教徒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失败而谴责赌博，理智的人不应赌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徒则是因为一个人也许会赢而谴责赌博，因为这样对人性有害。很久以后，新教伦理才蜕化为一套物质成功的准则和关于财富价值的自满而一味讨好的布道。

韦伯的论点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驳。罗马天主教徒不知道是应该作为赞扬而接受它，还是作为批判而谴责它。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否认抽象的概念——例如价值观和态度，更不用说宗教激起的信念——能促进和塑造生产模式。由于韦伯在这一点上试图明确、不敬地反驳马克思，唯物主义者对韦伯的驳斥就更加强烈。有些人争辩说，不应本末倒置：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造就了新教；或者说，觉得新教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商人，工匠——本来就已经有了促使他们勤奋工作和争取

事业成功的个人价值观。（14）

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哈利”）·托尼在他影响颇大的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认为，新教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说，英国经济在16世纪起飞，是在宗教影响减弱并被世俗态度代替后才出现的。不过他承认那些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伦理起了一种作用：它保护了商人和制造商以抵挡那些歧视他们的上流社会士绅的明枪暗箭。在当时反商业偏见盛行的环境中，这一伦理使他们得以保持尊严和正义感，等于披上了盔甲。这样，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不受奢华享受的诱惑，一代代坚持自己的任务，一路上积累着财富和经验。（15）

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的衍生论点，即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引起了同样的争论。其实，默顿并不是提出这一论点的第一个人。在19世纪，出生于日内瓦一个胡格诺派教徒家庭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作过如下统计：1666年至1866年期间，入选法国科学院的92名外籍院士中，有71人是新教徒，16人是天主教徒，另5人是犹太教徒或宗教倾向不明者。这些外籍院士所属的外国的人口，则为天主教徒1.07亿人，新教徒6800万人。还有一个类似的统计：1829年和1869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人数相等，但他们所属的外国人口中，天主教徒却比新教徒多两倍以上。（16）

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情况，即天主教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更容易从事一些较老的自由职业或从政，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教育。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教会上层对自然科学感到恐惧，讨厌那些否定了宗教教义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范式。正如英国化学家和“一位论”派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里所说，教皇对科学摆出恩主的姿态时，“是在抚摸一个化了装的敌人”，因为他“有理由一看见气泵或电动机就发抖”。（17）

一位学者反对这些说法，明确断言这些所谓的联系没有经验上的基础；（18）认为韦伯关于19-20世纪之交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教育

差别的数据（新教徒更倾向于商业和科学科目）计算不周；认为天主教徒和非加尔文派教徒商人的工作与韦伯理想的加尔文派教徒一样出色；认为我们可以用地理和人种因素来解释南北欧的区别；认为韦伯就像为中国皇帝作新衣的裁缝，他强调新教为无事自扰。

实际上，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韦伯的论点站不住脚，不可接受：它曾经轰动一时，但那已成过去。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即使从经验水准来看，也不能同意，记录表明，新教商人和制造商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
(19) 在法国和西德的制造业中心，雇主通常是新教徒，而天主教徒多是雇员。在瑞士，新教州当时是出口商品（钟表，机械和纺织品）制造业中心，而天主教州当时主要是农业区。英格兰到16世纪末时绝大多数人口已是新教徒，其中的不信国教者（意即加尔文派教徒）在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中格外活跃，在工厂和锻铁工场尤有影响。

从理论上讲，也不能同意。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塑造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是不存在，但未必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过程，韦伯其实并没有对它起什么作用，起作用的是群体的压力和相互监督，以确保取得成绩——人人都彼此相观察，相关注。

新教徒的两个特点反映出并证实着这一联系。其一是强调教育和文化水平，对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读《圣经》的副产品。好的新教徒应能自己阅读《圣经》。（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当时以教理问答的方式传教，但不一定要自己阅读，教会明显地不鼓励他们读《圣经》。）结果是：新教徒识字率较高，而且有较多的人进一步受教育；这一点还较能保证文化代代相传。有文化的母亲是重要的。

其二是重视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社会学家所谓的不引人注目的证据：时钟和手表的制造和购买。即使在法国和巴伐利亚这样的天主教地区，大多数钟表制造者也是新教徒；从这种时间测量仪器的使用和向农村地区的推广上看，英国和荷兰远比天主教国家先进得

多。（20）没有比时间的敏感性更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城市化”了，它包含着价值观和品位的迅速传播。

这并不是说，韦伯的资本家“理想类型”只能存在于加尔文教派或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民族的人，不论有无宗教信仰，都可以成长为理性、勤奋、有条理、讲实效、整洁和严肃的人。他们也并不一定是商人。他们在从事各种工作中都会展现这些品德并因此获益。在我看来，韦伯的观点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16和17世纪的北欧），宗教鼓励了以前曾是少有的、冒险的这类人的大量出现；这类人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型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这一生产方式带来了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设备和厂房）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使得持续性成为关键，因为必须有持续的维修和改进，必须持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在这一点上，制造业企业大大不同于商业企业，因为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往往是专为一桩生意而动员资本和劳力，完成一段贩运或投机，然后就散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早期就是这样运作的，尽管它不久就看出了持续动员的必要性。）

对这种新型经济的需求而言，韦伯式企业家的气质和习惯尤为适合；而托尼强调自尊与持续性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恰当的。并非偶然的是，法国王室一直准备和愿意给予有社会野心的布尔乔亚（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贵族头衔的荣誉——当然要有代价，而从17世纪开始，又允许贵族从事批发（与零售相对）贸易；18世纪将持续条件强加于工业界人士。新封为贵族的批发商和制造商被要求留在“本行业”——一个曾一度被视为显然不体面的条件，与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不相符合。（21）就像一个真正的加尔文派教徒意识到的，问题在于，贵族头衔和虚荣与账房、工厂的人士不相适宜。他们工作勤苦，业绩卓著，但却身穿黑色呢绒服，没有丝织品、花边和假发。

这种新型实业人才的扩散尽管重要，但毕竟只是经济力量和财富由南向北转移的一个方面。移动的不只是钱，还有知识；而正是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支配了经济的可能性。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

年期间，南欧曾是学术和知识探索的中心。它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它们位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前缘，而且受惠于犹太人的中介；还包括意大利，它也有自己的联系。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就衰落了，因为宗教激情和军事征伐赶走了外来者（犹太教徒，接着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改宗者”），挫伤了人们对新奇思想和可能被视为异端的思想的追求；可是意大利继续造就了一些在欧洲领先的数学家和科学家。第一座科学院成立于意大利（即1603年成立于罗马的猗猗科学院）^[99]，这并非偶然。

然而，导致新教出现的宗教改革，使规则改变。它有力地促进了识字率，孕育出不同政见和异端主张，推动了怀疑论和否认权威的潮流，这恰是科学奋进的核心。天主教国家没有迎接这一挑战，而是相反地作出了封闭和非难的反应。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片领地，包括低地国家在内，在马丁·路德受谴责之后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由于那里还有一些马拉诺难民（即那些在西班牙被迫皈依基督教而后又逃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对这些人又怕又恨，把他们看做是真正教会的敌人，指责他们蓄意传播新教信条，歇斯底里的气氛进一步恶化。

随后（从1521年起），各国当局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不仅禁止出版任何文字的异端著述，而且还禁止阅读它们。西班牙当局，包括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对路德宗教徒（当时所有的新教徒均被视为路德宗成员）的态度表现为，不是把他们看做基督教内部的异议者，而是把他们看做非基督教徒，如同基督教的敌人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样。（22）任何关于结束宗教裁判的想法都被束之高阁，教会和民政当局联合起来控制思想、知识和信念。1558年的法令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外国图书和印刷未经审定的出版物者，处以死刑。大学的作用沦为充当灌输中心。非正统的和有危险性的图书被列入《禁书目录》（在罗马为1557年，在西班牙为1559年），而安全的图书在出版时均标有官方“准予印刷”的字样。在西班牙的禁书清单中，有一些是科学著作，仅仅因为其作者是新教徒而遭到查禁。尽管还有人冒险走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新思想的传播减慢成涓涓细流。（不妨回想一下《堂吉珂德》刚出版时所遇到的书评和清洗。问题不只是出在这

部小说中的奇情异想，还有荒唐的理由——在一个受幻想支配、知识贫乏的社会里，那些零碎琐事也带来了危险。）

西班牙人还被禁止出国留学，以免受到颠覆性学说的影响。在颁布《禁书目录》的同一年（1559年），王国政府规定，除了罗马、博洛尼亚和那不勒斯这几个安全的学术中心以外，禁止到其他外国大学念书。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之前的很长时期中，西班牙学生都到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学医，而在这之后，却几乎停止了——从1510年到1559年，去那里学医的有248人，而从1560年到1599年，就只有12人了。（23）（人们倒是奇怪这12个人怎么会自行其是。）有颠覆性见解的科学家被压制得沉默了，还被迫谴责自己。力图控制思想和强行维持正统的当局是从来不会满足于禁令和惩罚的。被认定有过错的人必须坦白认罪和忏悔——既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拯救他人。

宗教迫害导致没完没了的“抓坏人”，还引起一些人为了拿钱而告密，邻里间窥探，还有种族主义的血统狂。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只要被告密者发现以下迹象，表明他们仍保持犹太教摩西律法的习惯，就会被抓住，这些迹象是：不吃猪肉，星期五穿干净的亚麻布衬衣，被偷听到作祈祷，到教堂不经常以及说错话。爱干净尤其会遭到怀疑，洗澡被视为叛教的证据，对于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来说都是如此。“宗教法庭记录中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据悉被告洗澡……’”（24）当时的见解是：肮脏是遗传的，而干净的人不需要洗澡。凡此种种恰恰是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贬损了自己的人格，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容不得异教而进行迫害，可以使迫害者受到的损害更甚于受害者的损失。

就这样，伊比利亚半岛，事实上还有整个地中海沿岸欧洲地区，错过了所谓的科学革命的列车。在17世纪80年代，巴伦西亚的一位医生胡安·德·卡夫里亚达曾试图说服马德里的大夫们接受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原理而放弃古希腊学者盖伦创始的肝脏造血论，他为此而进行了长期论战，仍徒劳无功。他不禁发问：西班牙到底怎么啦？在学习新知识方面，“似乎我们成了印第安人，总要拖到最后”。（25）

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认为，决定南欧此后300年命运的，与其说是新教，不如说是上面所谈到的这种反动的、反新教的强烈反应。 (26) 这样的倒退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教义所要求的。但是，以真理保管人和卫道士自居的教会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很难再承认错误，改弦易辙。有多难呢？直到如今，我们才听说罗马教廷终于在将近400年之后勉强给伽利略恢复了名誉。 [100] 难到了如此地步。

对伽利略的谴责

伽利略不是圣徒，但却是佛罗伦萨、意大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才和瑰宝。他是实验科学的先驱，敏锐的观察家（适宜作为猗猗科学院的院士）和思想家、雄辩家。然而，1633年，罗马教会却谴责他为蔑视权威和异端：“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动的，这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形式上是异端邪说，因为它明确违反《圣经》。”

（伽利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1600年2月罗马教会烧死布鲁诺，此事虽然不大为人所记，却同样重要。布鲁诺是前多明我会修士、哲学家，他想象到的宇宙概念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更接近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无垠的空间，闪烁着数以亿计的星星，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物质由原子组成，等等。所有这些都视为异端邪说，是与神秘和魔术有关。实际上，罗马教会烧死布鲁诺，宣布了控制科学和想象力、将它们束缚在罗马淫威之下的意图。 (27) 但是，当伽利略工作和发表演讲时，尚有自由活动的余地。）

这就是对伽利略的判决。他本人认错的忏悔大约比这长14倍。问题的关键不在宣扬教义，而是谴责异端和极其详尽地承认自己的罪行，认可和接受圣教的权威，真诚地宣誓忏悔，并保证不再重犯。这是一贯正确的体系进行思想控制的本质：他们的目标不在使罪犯认罪，而在于要让他和体系内的其他人信服。

为什么教会坚持地球中心说，仍然是一个未揭开的谜。《圣经》上似乎并未要求这样的信仰。诚然，《圣经》中谈到太阳穿行于天空

或停止运行的形象，但不难将它们解释为地球上人眼所见情景的表述，有时还是譬喻性的表述。罗马教廷本来可以不理睬这方面的问题，不必撕破信仰和顺从的面纱。然而任何教会都想要把自己的权威建立于教义和信条之上，因为教义和信条是统治的标志和工具，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而伽利略出于他的秉性和学者人品，喜欢争论。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辩论家，容忍不了蠢人，而他发现教会里蠢人多得是。可是，这在罗马那样一个环境中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教廷权力几乎无限，人们勾心斗角，诽谤和叛卖成风。罗马堪称台伯河畔的一座拜占庭：那些争权夺利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教皇的早亡，因为教皇的每一次更替都会带来权力与地位的重新组合。今天在，明天就不在；此刻是朋友，不久后就是仇敌。伽利略靠不了任何一个人。

更糟的一点也许就是，当有人向伽利略暗示和警告说教廷不赞成他的言行时，他作出的反应竟然是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用意大利文而不是用拉丁文出版自己的著作。这样就超越了内部人小圈子，而诉诸广大公众。这就等于是把他的异端邪说加以通俗化，当局是无法容忍的。 [101]

所以，伽利略认罪了；据说他作了最后一次顽强的抗辩（“不管怎么说，它在运动”），但教廷还是判他软禁，使他失去活动能力，结束了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不断创新的科学家的生涯。当这位伟人从事工作和旺盛创造的时候，意大利的科学曾勇敢地站起来，与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包含的种种限制作抗争；伽利略科学创造生涯的结束，使意大利科学蒙受了灾难性的损失。

别国的科学境况如何呢？教廷对伽利略的谴责在新教国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证实了新教造反派反对教廷权威、蔑视罗马迷信，是正确的。法国科学家、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教授、杰出的天文现象观察家伽桑狄神甫于1632年到荷兰后，给他的法国同事写信时谈到荷兰人对哥白尼，定律的态度，指出“所有的人都赞同它”。（28）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抓住了荷兰与法国学

术界态度形成的对照。荷兰、英格兰以及其他新教国家当时是有另一种心态。

在法国，学者们摇摆于理智和情感、正直与服从之间。就是那个伽桑狄曾写信给伽利略，恳请他跟罗马讲和，同时也求得良心的安宁：“我极其担心您面临的命运。您是本世纪的伟大荣耀！如果教廷作出了反对您的见解的决定，请以一位智者应有的风度忍受吧。您只要确信您所寻求的仅仅是真理，即足以问心无愧而坦然处之。”（29）

仅仅是真理。但什么是真理？哥白尼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知识有限，还留下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哥白尼一开普勒范式更有助于观察，可是它证明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吗？比较好也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坚持做实验而不问为什么。这就是继续观察而否认后果，这种躲躲闪闪的做法受到了法国当时某些居领先地位的科学家的欢迎。

[102] 例如，当时为欧洲各国学者之间保持通信联络作出了首要贡献的法国学者梅森，曾于1634年写道，所有人关于地球运动的说法都尚未得到证实，所以他放弃了写作一本书论述日心论的计划。伽桑狄的态度也是一样。笛卡尔也一样。伟大的笛卡尔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说法：天体的运动并不是受控于某种引力，即无形的、神奇的吸引力，而是受控于一路支承它们的力的漩涡。吸引力带有迷信的味道，而力漩涡怎么说来是科学的。笛卡尔说，地球就是由它的力场载运的，好比是乘客坐船行进。船在运动，乘客并不运动。所以地球不动。证讫。

尽管笛卡尔如此聪明，仍感到很难生活在法国的诡秘狡诈的气氛之中。他迁居荷兰，除了梅森以外，他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留下转信地址。这时，法国人慢慢地、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宇宙论，而一旦接受了，他们就坚持笛卡尔体系，而拒绝牛顿的运动和万有引力理论。推比拉好。何况牛顿是英国人。法国人在当时也跟现在一样，觉得很难向别人学习，而英国人是宿敌，有百年战争期间1346年克雷西战役和1415年阿让库尔战役的旧仇，就更难向他们学习了。这种知识上的沙文主义的一个令人气愤的事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血库中发现有污染，可是法国卫生当局坚持给医院分发有污染的血，而不肯购买美国的检测和消除污染的设备。（美国如今代替英国，成了高卢人

厌恶的对象，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帮助过法国，而变得更糟。）就这样，法国当局使得成百的人，也许是成千的人，不幸罹致艾滋病和死亡。

当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牛顿数学和物理学时，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有的是才华和天赋。可是他们却因为骄傲而失去了几代人的时间。

不容异说和偏见的固执（30）

15世纪的西西里不幸效忠于卡斯蒂利亚王室。所以，当1492年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下令驱逐或强迫归化西班牙的犹太人时，西西里只得唯命是从。早期一些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表明，该岛不乏反犹情绪。但是，犹太人数世纪以来居住在这里，在西西里的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用说，在医生和药剂师方面，他们占了绝大多数。西西里的总督犹豫不决，不愿意发布这个影响重大的法令；但是发布了一系列准备性的命令：禁止犹太人出售资产，强迫他们偿还所有的欠款，而最具有征兆性质的是禁止他们拥有武器。

不需要再详加叙述了。西西里岛上的犹太人赢得了短暂的迟延时间；他们被仁慈地允许带走自己的衣服、一床床垫、一件羊毛或哗叽毛毯、一床被单、一些零钱，加上路上用的食物。据说，许多西西里人对犹太人离开感到遗憾。这是有理由的。犹太人走后，西西里的商业衰微几尽；一些房子甚至一些街区都无人居住；我们能估计到，当时一定有人感到羞愧。

很久以后，在17世纪末，许多西西里人要求国王促进贸易的发展。查理二世赋予墨西拿以自由港的特权，并授权犹太人那里经商——条件是他们必须睡在城外，并且穿着带有醒目标志的衣服。这种模棱两可的邀请未能鼓励犹太人回来。所以，1728年，犹太人被授权可以在岛上任何地方从事贸易，住在墨西拿，可以建立犹太教堂和墓地，并有权拥有和处置财产。这也没有多大作用。所以，1740年，国王明确邀请犹太人回来。一些犹太家庭接受了邀请，但是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有偏见的民众的歧视。碰巧王后未能生育王子来继承王位，教会人士向国王夫妇进谗言说，只要他们允许犹太人居住就不能生儿

子。所以，7年之后，出现了再一次驱逐。

不容异说，迷信，无知——这些都容易养成，却难以根除。很久以前外国（西班牙）统治者犯下的罪过，直到今天仍是促成西西里落后的一个原因。

注释

1 .Salaman ,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 Langer , “Europe's Initial Population Explo-sion”.

2 .这种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早期。参见S.K.Coll , “Anti-Malaria Drugs Post Hard Choice for Parents” , *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 , 1996年10月18日 , 第11页。

3 .Curtin , “Epidemiology and the Slave Trade” , Table 1 , 第203页 , 引自Sheridan , *Doctorsand Slaves* , 第12页。这些数字以英国1817年到1836年派驻世界各地的白人和黑人军人的死亡率为基础。据某些研究的判断 , 该死亡率大概低于17和18世纪。

4 .引自Edwy Plenel , “Le Conquerant Oublie” , *Le Monde* , 1991年9月1-2日 , 第2页。我们可以看到 , 20世纪下半叶石油生产国出现类似的毁灭性自我放纵。

5 .西班牙工业落后于意大利或西北欧洲国家 , 但在16世纪时 , 西班牙工业并非微不足道。参见Peyfitte , *Societe* , 第134页。关于17世纪西班牙工业的衰微 , 参见Lynch , *His-panic World* , 第210页及其后诸页。

6 .Alfonso Nunez de Castro , 引用于Cipolla ,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251页。

7 .引自Lewis , *Muslim Discovery* , 第197页。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对此评述甚多 , 参见Guicciardini , *Relazione di Spagna* , 第131页 , 引用于Cipolla , *Be 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250页。

8 .Bernaldez , 第257页, 引用于Bernand and Gruzinski , *Histoire du nouveau monde* , 第1页, 第78-79页, 第643页。注意: 在一些民族的文化中, 制革和皮革生意传统上被视为肮脏和低下的, 遭受蔑视。所以日本将这些工人划为“秽多”——即贱民阶级, 殡仪员和掘墓人也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则是一个像西班牙一样从事艺术与战争的社会, 工业技艺主要掌握在宗教上占少数的民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手里。

9 .参见Peyrefitte , *Societe* , 第141-142页。

10 .关于北大西洋的财富和贸易, 参见Axtell , “At the Water’s Edge : Trad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in his *After Columbus* , 第144-181页。关于鲸油, 作者写道(第146页) , 鲸油“利润高, 如同液体黄金”(但海盗对它无大兴趣) , 因为“鲸油点亮了欧洲的灯, 被用来制造肥皂和熬汤, 润滑煎锅、钟表等各种物什。由于鲸在当时被划分为鱼类, 可以充当大斋期间的肉食, 而大斋期间是禁止吃兽肉的”。

11 .关于意大利纺织业的衰落(不再是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 , 参见Cipolla ,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253-263页。要了解在小城镇和乡村发展起来的新工业, 参阅Ciriacono , “The Venetian Economy” and “Venise et la Venetie”。但是, 旧城市中心好像运用经济和政治权力将新工业控制在较低下的地位。见Sella , *Crisis and Continuity* ; Moioli , “De-industrialization in Lombardy”。

12 . [Anthony Walker] , *The Holy life of Mrs. Elizabeth Walke* (1690) , 引用于Thomas , “Cleaniness and Godliness” , 第56页。托马斯在该著作出版前惠允引用。

13 .Baxter , “Of Redeeming Time” , *Practical Works* , 第228页。再次感谢托马斯惠予引用。

14 .参见H.M.Robertson ,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

15 .关于上流社会陈旧的防范性的伦理，参见以下重要文章：Arthur Livingston , “Gen-tleman, Theory of the” ,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Kautsky ,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 , 第177-197页。

16 .Candolle ,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有人认为，康多尔的统计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开始于17世纪60年代，那时科学革命已经开始了。参见Smith , *Scienceand So-ciety* , 第48页。这种异议当然不能排除对更早时期做类似的调查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其隐含意义是这样做不会得出类似的结论。问题在于，康多尔统计的是科学院成立后的数据。如果仅仅因为在那一时期新教的科学领先地位已成事实，就说康多尔的统计没有意义，那似乎是毫无道理。至于如何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是将它归因于新教，还是归因于天主教对新科学的敌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则是另一个问题。

17 .引自Mason , “Scientific Revolution”。

18 .这是瑞典历史学家库尔特·萨穆埃尔松在一篇较短的专题文章中说的话，该文章名为《宗教与经济行动》。

19 .例如，萨穆埃尔松对韦伯关于巴登的数据之统计意义上的批评是没有说服力的，尽管他指出新教徒更喜欢在城市生活，因为技术学校都集中于城市，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也并非偶然。

20 .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 第92-93页。请参阅Vries , *Dutch Rural Economy* , 第219页，关于家庭财产的基础，吕伐登地区钟表的拥有率从1677-1686年的2%升至1711-1750年的70.5%。当然，这些家庭非常富有，在主人死后可以制作家庭财产目录。

21 .参阅Michaud , “Orleans au XIII Siecle” , 第11页。尽管如

此，有些骑士勋章禁止授予这些新人，这种做法是与褒奖商业成功背道而驰的。为提高这些不被欣赏的成功人士的社会地位，有人甚至提议为他们设立新的勋章。这些主张并非空洞无力，但它告诉我们，别的人并未同意。

22 .Bennassar , *L'Inquisition espagnole* , “Refus de la Reforme” , 第289-290页。西班牙的反应是决不妥协的宗教服从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狂热的长期历史造就的，对自己也无好处。参阅 Goodman , “Scientific Revolution” , 第163-164页。古德曼说，16世纪西班牙老式天主教医生的匮乏反映了许多西班牙人推想的犹太人与医药之间的种族（天生的）联系，人们害怕当好医生会被怀疑有犹太血统。

23 .参见 Goodman ,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Spain and Portugal” in Porter and Teich, eds. , *Scientific Revolution* , 第172页。有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试图维护自己——尽管这是无法维护的——争论说外国的大学太贫穷和墨守成规了，西班牙学生并不留恋那里。也许是这样；尽管新教大学——如英国和荷兰的大学好得多。但是，汲引异教的泉水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参阅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Book V, ch.i, Part 3 , Article 3d , 关于天主教国家大学教学人才流失到教会的论述。

24 .Crow, Spain : *The Root and the Flower* , 第149页。

25 .见 Madrid, Carta filosofica medico-chymica , 1687 , 引用于 Goodman , “Scientific Revolution” , 第173页。

26 .Trevor-Roper ,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 该论文最初提交1961年在爱尔兰戈尔韦召开的第五届爱尔兰历史学家会议，它使许多听众感到不安。

27 .关于布鲁诺和教会控制科学的运动，参见 Minois , *L'Eglise et la science* , I, ch.ix : “Contre-Reforme et reprise en main de sciences”。关于布鲁诺“科学”的起源，参见 Yates , *Giordano Bruno* —

书以及Copenhaver, “Natural Magic”一文中的论述。

28 .Greenet , *Passion des astres* , 第87页。

29 .同上 , 第79页。

30 .主要参见La Lumia , *Histoire de l'expulsion des Juifs de Sicile*

。

第13章 工业革命的性质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在18世纪，一系列发明使英国的棉纺织业得以改观，并促成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工厂体系的出现。^[103]同时，其他工业部门也取得了类似的、往往是相关的进步，它们一起进步，相辅相成，推动工业前沿的不断扩展。这些发明丰富且种类繁多，无从细述，但大多属于以下三类：（1）迅速、常规、精确而不知疲倦的机器代替了人工技术和努力；（2）无生命的动力资源代替了有生命的动力资源，特别是发动机的发明将热转化为功，敞开了动力几乎无限制的供应；（3）新的、远为丰富的原材料，尤其是矿产资源，最终还有人造材料，代替了动植物资源。

这些替代造就了工业革命，它们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及随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而且，这些增长是可以自我持续的。过去，生活水平的提高常常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长最终抵消了经济的增长。到此时，经济与知识的增长之快，促成了不断提高的洪流，是为人类历史之空前。马尔萨斯所说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以及停滞论者说“科学乏力”的预测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希望与期盼的时代到来了。工业革命也改变了国家内、国家间、文明间政治权力的平衡；使社会秩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而且大幅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革命”一词含义甚多，它令人想到迅速的、甚至是残酷或暴力的变化。它也可以意味着根本或深层的转变。对一些人而言，革命有进步的含义（从政治意义上讲）：革命是好的，反革命即倒转时针，恰是与之相抵触的。另一些人则认为，革命是从本质上破坏事物的价

值，因而是坏的。

凡此种含义都源于“revolution”一词，而它的最初字面含义不过是“旋转”。因此，让我明确一下我在这里使用这一词时，是什么意思。我是取它最古老的譬喻意义，指“事情或某一特定事物发生的重大变化或改变”——这一词义始于15世纪，比急剧政治变化的词义早一个半世纪。^{〔1〕}对工业革命确有研究的学者，都是从这一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另一些人谈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或17世纪的“科学革命”，或20世纪的“性革命”时，亦是如此。

由此可见，强调的重点在于深，而不在于快。工业大革命的非凡技术进步不是成就于一夜之间，这不会令任何人感到奇怪。没有什么发明是一跳出来就很成熟。相反，需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改进，才能使一个想法转化成为一项技术。

以蒸汽动力为例。第一台利用蒸汽造成真空以推动水泵的装置，是托马斯·萨弗里发明的，于1698年获得专利。第一台严格意义上的蒸汽机（带有活塞）则是由托马斯·纽科门发明，于1705年获得专利。纽科门的机器只依靠大气压力，故称气压机，它严重浪费能源，因为汽缸会冷却，在活塞完成每一冲程后，汽缸均需再加热。因此，这种机器最适用于从煤井往外泵水，因为在煤矿，燃料几乎不花一文钱。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约60年——詹姆斯·瓦特才在1768年发明了带有分体凝汽室的蒸汽机，它的燃料消耗量大大降低，使蒸汽机得以运用于远离煤矿的新兴工业城市。又过了15年，这机器得到改进而能推动旋转，这才驱动了工业的车轮前进。而在这期间，工程师和机械师们还不得不费心尽力，解决制造和保养方面的大小数不清的问题。例如，汽缸横截面必须做成平滑的圆环形，使活塞紧贴着它来回运动，而且不让空气漏进真空的一端，这项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创造力。^{〔104〕}在燃料消耗方面，每一个缺点都会造成损失，而改进是没有尽头的。

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要探索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怎样制造出

更坚实精致、能用来驱动船舶和陆上车辆的高压蒸汽机（压力要高于大气压）。完成这一任务又费了1/4个世纪。这样的一些用途又进一步促使人们设法节约燃料：车船的空间有限，人们要求腾出地方装货，而不是装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设计出复合式发动机——利用高压蒸汽依次驱动两个或者更多的活塞；蒸汽在一个高压汽缸中做功以后，再膨胀到一个较大而压力较低的汽缸。这一原理与中世纪利用落水的势能驱动一系列的水轮是一样的。复合式设计方案起源于J.C.霍恩布洛尔（1781）和阿瑟·伍尔夫（1804），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得到广泛应用，用作海轮发动机，有力地促进了远洋贸易。

这还不是结束。蒸汽机的体积和能量受限于活塞的惯性。活塞前后来回，这种往复运动需要大量动能。1884年，查尔斯·A.帕森斯找到的解决办法是，用蒸汽涡轮代替了活塞，从而将往复运动转化为转动。这种方法在19世纪末才应用于主要发电厂；此后不久用于轮船。一言以蔽之，蒸汽机的研制总共用了200年的时间。 [105]

与此同时，水力机械也得到了很大改进（18世纪50年代约翰·斯米顿发明的中射式水轮和1827年伯努瓦·富尔内隆发明的涡轮）。自中世纪以来，水力机械一直是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类似的情况是，第一次成功的焦炭炼铁，可追溯到1709年，由亚伯拉罕·达比完成于科尔布鲁克代尔。（我曾经到过科尔布鲁克代尔，参观那座早已废弃的鼓风炉，置身于炉膛内那些坑坑洼洼的壁砖之间，回想当年炉火燃烧、矿石熔解的情景，我感到自己好像是置身于那孕育过工业革命的子宫之中。如今，该炉是一座工业博物馆的一部分，好奇的游客只能从炉外瞻仰了。）这一成就虽然事先也经过了精心研究和准备，但实际上也有碰巧的好运气：达比用的煤炭恰好是适于冶炼的。 (3) 另一些人就不那么走运了，而且他们跟达比一样，只能将焦炭炼出的生铁用于浇铸。人们用了大约40年的时间才克服了困难，到18世纪中期，焦炭冶炼才得以顺利起飞。

此外，铸铁技术有严重的局限。铸铁适于制作锅、壶、炉壁、铁管等等不受力的器件，但不能用于制造机器。机器的活动部件要求具

有锻铁（或钢）的韧性和弹性，其造型（锻造或机械加工）必须比浇铸更精确。^[106]经过半个世纪的多次实验，制铁商终于使焦炭炼出的生铁适于进一步的精炼，精炼者掌握了处理焦炭炼出的生铁的技术（亨利·科特1783年和1784年获专利）。再经过70余年，出现了廉价钢（亨利·贝塞麦1856年获专利）。廉价钢改变了工业和交通。钢原先是昂贵的金属，使用的范围很窄——制作兵器、剃刀、弹簧、锉刀——有了廉价钢以后，才用它造船和造钢轨。钢轨比铁轨使用寿命长，承受的重量更高；钢船则船壳更薄，载重量大。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还可以把这些技术的源头追溯到16世纪英国工业率先依靠煤炭，把它作为燃料和原料，用于制玻璃、酿酒、染色、制砖瓦、锻铁器和冶金。英国由使用植物燃料转向使用矿物燃料，比别的欧洲国家早得多，一位学者将这一转变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4）}

下面再谈动力机械，就是设计出一种装置来带动工具（一台或多台），以代替人工劳动。它的目的可以是促使工具——例如印刷机、钻床、纺车等等——加大运转的力度和速度；也可以是引导其机件作单一的、重复的运动，如钟表；还可以是使一组工具彼此相校准，使一次动作作多种的功。机械由人工运转时，要排除那些不可避免的大小故障是相当容易的，工人只要停止转动曲柄或猛拉杠杆，机械就停住了。动力驱动机械，就大不一样了。^[107]

我们知道，中世纪就已经用多种多样的机械，用来碾谷或碾麦芽，给金属器皿造型，纺纱，漂布，擦洗织物，给炉子送风等等。许多机械是动力驱动的，一般是用水轮。公元1500年之后的几百年中，随着力学原理的广泛应用，动力装置品种迅速增多。在纺织方面，重要的发明有编织机、“荷兰”或“引擎”织布机、绒带织机以及捻丝机。然而，恰如常见的情形一样，最有力的进步正是以下几点最基本的进步：

——采用踏脚板来驱动纺车，从而使操作者的手得到解放，来操纵纱线和处理绕纱；而在操作织机时，用手在掷梭的同时将经线穿过

综眼；

——发明了锭翼（萨克森轮），从而能在纱线转动纱锭的同时绕纱加捻，但速度不一；

——实现了单向、连续的纺纱和捻纱。

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使纺纱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四倍多。（5）

下一步是以机械大体上重复手工纺纱的动作，使纺纱机械化。这需要分解纺纱动作以达到简单化，把任务分解成一系列可重复动作的流程。这看来很合逻辑，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直到发明者把他们的装置应用到棉花这一种坚韧的植物纤维时，问题才得到顺利解决。这中间经历了30来年的反复试验，从18世纪30年代直到18世纪60年代。一旦棉纺实现了机械化，就带动了整个工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冶金业，巨大的进展来自旋转代替往复式运动：制作金属板用辊轧而不用敲击；打孔用钻机而不用凿子；制造金属线采取拉丝的办法，让它穿过一系列逐渐缩小的孔眼；刨削修整用车床而不用凿子和榔头。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地采用精密测量和定位。在这方面，钟表和仪表制造者起了领头作用。他们从事微小零件加工，能采用分轮仪和锉齿仪之类的特制工具，使产品达到高精确度的标准。这些工具以及机械师设计的其他类似工具自然可以放大尺码，用到别处。因此，棉纺织行业登广告征聘钟表工匠为他们制造和维修机器，而且这些机器的轮系被称作“钟齿轮”，这绝非偶然。这些机器的重复动作还使人想到，可以大量制造那些可替换零部件来装配各种物品（如钟表，枪炮，炮架，滑轮组，锁，五金器皿和家具等等），因而出现了第一批的批量生产实验。

凡此种进步，加上制造机器的机器的发明，一齐出现在18世纪的最后30来年，形成一个创新力急速蔓延、异彩纷呈的时代。创新潮流如此汇合，其中的某些成分也许是一次幸运的丰收。但又不是。创新之所以有感染力，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所依据的原理，也可以表现为别的许多形式，找到多种用途。钻孔技术既然用于火炮，也就可以用

于蒸汽机的汽缸。既然可以用滚筒给纺织品印花（代替慢得多的平板印花），那就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墙纸印花，还可以印刷文字，比一上一下的平台印刷机快得多，因而可以成千成万份（册）地印出廉价报纸和小说。同样地，一台机械化的棉纺机经过改造就可以用于纺毛和纺亚麻。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就指出过，正是棉纺织业的机械化迫使其他纺织行业也实现机械化：

……倘若不是哈格里夫斯和阿克赖特的天才发明完全改变了梳棉和纺棉的方式，毛纺织业大概直到今日仍保持在几百年前的状态……也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保持原样会更好，我们倒是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在已发现了改进棉纺业的方法之后，这已经是不可能了。
(6)

就这样一步一步，世界勇敢地以及不那么勇敢地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境界：人们收入逐渐提高，商品变得比较价廉，出现了闻所未闻的设备和材料，胃口变得贪得无厌。新，新，新。钱，钱，钱。正像目光比自己同时代人看得更远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108] 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得按新的方式办理了”。(7) 世界漂离了自身的系泊处。

这场工业革命的起讫日期能指明吗？不容易，因为一项创新在出现之前会经历过几十年的实验，而在出现之后又会有漫长的改进过程。头在哪儿，尾又在哪儿？然而，这个大的过程——工业实现机械化以及采用工厂体制——有一个核心，即纺织业的发展演变。[109] 它的迅速变化开始于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詹妮（多锭）纺纱机（约1766年），接着是托马斯·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走锭纺纱机是结合了詹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二者的优点而研制出来的，因而称为“骡机”（mule）。用这种纺机，既可以纺粗支纱也可以纺细支纱，比任何手动纺机纺得更好，产品价格也更低。然后，1787年，埃德蒙·卡特赖特制造了第一台成功的动力织布机，这种织机使织布过程逐渐转变，首先是织粗纱，粗纱更经得起机梭的来回穿梭，随后也能织细纱。1830年，理查德·罗伯茨，一位有经验的机械师，应雇主的要求

求，设计出一种“自动的”走锭纺纱机，使棉纺不再依赖于那些不服管教的技工贵族的力量和特殊技能。（自动的机器采用了，但技工贵族依然存在。）

上述的这一系列发明用了大约60年的时间，就完全压倒老技术——蒸汽机则不同，它与水力机械共存了很长时期。^[110] 新技术使棉纺织业的成本和产品价格急剧降低，产量迅速上升，消费量大增。

（8）根据这一情况，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持续约100年左右，大约是1770年到1870年，“在这整个期间，正是从旧秩序转变到建立新秩序之下工业各部门之间的相当稳定的关系”。^{（9）}

另有一些专家作了稍有不同的分期。^{（10）} 不管怎样，我们谈的都是一个持续了百年之久的过程，前后出入不过20来年。把这一过程称作革命，似乎是显得慢了些，但是经济上的时间比政治上的时间慢一些。在这之前的几次经济大革命持续的时间更加长得多。

我们即使是考虑到那些自称“新经济史”学派的人士所提供的数据，也仍然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趋势在1760-1770年之间出现一次突变，增长率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而最重要的是生产模式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关键在技术。总体数字表明了这一点，基本逻辑也清楚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以18世纪后半期经济增长的最低估算数字作依据，往前倒退回去作推断，就会很快感到以前的收入水平居然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情况肯定是有了变化。

问题倒是：当时的总体增长为什么不是更快一些。这是一个时代错误的问题，它反映出人们拿较近时代经济发展更快、发明创造更有潜力、后进者可以跳跃式地追赶先进的标准，去衡量工业革命那个时期。尽管如此，提出这个问题仍是有意义的。答案在于：工业革命的影响是不平衡的，而且是持久性的；它在某些产业先开花结果，在另一些产业则晚见动静；它在建立新行业的同时，撇下了甚至摧毁了一些老的行业；它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取代原有的技术，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如今威力强大的电脑也没有让打字机销声匿迹，更不用说纸和笔了。）^{（11）} 正因为如此，用什么样的砝码来衡量那些岁

月的增长速率，就变得非常敏感：把棉纺织和冶铁的分量看得重一些，增长就显得快一些；把它们看得轻一些，速率就慢下来了。对于早先研究技术变化的学者，如A.P.厄谢尔和J.H.克拉彭来说，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明明白白的。而“新经济史学家”强调连续性主题，实际上是使那些前辈的研究工作再显活力，但却从来不引用他们的原话，也许还对他们一无所知。 [111]

许多反对提“工业革命”的人还犯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错误。他们强调连续性，是很有道理的。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 (12) 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一位对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历史学深信不疑的学者指出，英国人均收入在1780年和1860年之间翻了一番，然后，在1860年和1990年之间增长了6倍；在这一点上，他承认变化并不只是原有趋势的连续：“头80年的增长是惊人的，但还不过是一个前奏而已。” (13) 我愿再添一句：在这后130年的漫长时期中，英国的成就还不算是最激动人心的。

上述这些进展的后果，是现代工业国家与落后工家、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先说欧洲内部：1750年，西欧（不含英国）与东欧人均收入的差距是大约15%；1800年，为略高于20%。到1860年，这一差距上升到64%；到20世纪，几乎是80%。 (14) 在欧洲和后来人们称作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之间，同样出现两极分化，只是更加尖锐得多——原因的一部分在于，现代工厂工业吞噬了国内外的老式工业对手。

自相矛盾的现象：工业革命使世界靠得更紧密，变小了，比以往同质化。可是这同一个革命又分裂了全球，使胜利者和失败者相疏远。它使一个世界分成了几个世界。

一场革命在什么时候不算是革命了？

早先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都是依靠各特定行业的产值和产品价格

数据，这反映了当时统计学的局限性：他们所掌握而且知道加以应用的，就是那些数据。那些数据不曾令他们失望。它们所表明的，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收益，而当历史学家不得不采用替代测度时（例如那些不产棉花的国家的原棉进口量应替代一部分棉纱产值），这些数据仍是很好地和相当稳定地表明了一种狭窄界定的、不含糊的现实。

(15)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数字观念强的一些经济史学家着手制定一些测量尺度，来估算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的总的经济增长率。这是他们从历史角度研究了数据较充分也比较可靠的19世纪后期以来各时期的国民收入以后，很自然地把工作向更早的时期作延伸。

[112] 可是，在各国政府机构系统收集数字以前，就倒退到更早期作如此再构，这真是付出了英雄般的想象力和智慧：需要使用和融合人们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估算或收集到的各式各样的数字；需要采用人们根据自己对经济性质所作出的往往是任意的而且有时并未言明的判断，提出种种替代办法折算数据；需要指定从其他背景和其他时期借用的各种权数；遇到成堆的指数问题；使用惯例价格或名义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作没完没了的内推和外推，从而抚平和模糊发展趋势中的突变。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再构的结果因人而异，前后变动；最新的估算不一定比早先的估算更准确（估算者当然不会同意这一点）；数字貌似精确，却不一定站得住脚和经得起长久推敲。 [113]

貌似精确的数字也不能表达出明确的意义。即便相信它们，仍然有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理论经济学家们早就认识到这一困难。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惊人的坦率谈到这一点：“早先的经济学家们不曾淹没于统计数字之中。他们免除了统计证明的负担。他们依靠历史和个人观察。如今我们却是信任过硬的数据，假定它们是理论所认可的。” (16) 从这条原则来看，人们最难指望经济史学家们做到的一点，就是假定他们所信任的“过硬数据”（即数字）是历史证据所认可的。他们在判断上的跳跃常常是缺乏可信性的。

这方面意见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某些人把一场革命说成了非革命

（进化）。不论英国在1760-1860这百年间某些生产部门的增长是怎样显著，从某些人近年来摆弄数字的结果来看，英国这一期间总的经济增长（或工业增长）似乎是很有有限：工业年均增长率不过是很少的几个百分点，经济总产值的增长就更小了。如果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考虑进去，从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值来看，年增长率就降到1%或2%。

（17） 鉴于这种统计固有的误差率，这一结果也许还有点意义，也可能什么都不是。

然而，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估算数字？因为它们是较新的统计？因为它们的著者向我们担保数字可靠？他们采用的方法就不够令人信服。这就是先定出一个总的构念（意念），再把各相关组成部分硬塞进去。一位著者在近年来的一次估算中发现，把英国的棉纺织、钢铁、交通运输和农业这几个主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数字相加以后，总的数字就满了，别的生产部门——毛纺麻纺、陶瓷、造纸、五金器皿、机器制造、钟表业——的增长已没有容纳的余地。怎么办呢？很简单。这位著者就断定英国大部分工业“劳动生产率处于低水平，生产率增长缓慢，在1780-1860年期间可能是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18） 这种历史研究是先有车后有马，先有结果后有数据，先有想象后有经历。它也是错误的。

此外，这种估算的一个立足点，是假定物质在不同时间保持同质性——铁就是铁，棉就是棉——因而不可避免地低估了质量改进和新产品所包含的进步。如果只计算钢的吨数，那么像坩埚钢这样一种新的钢——它可用来制造优良的钟表以及机器零件精加工用的优质锉刀——所具有的意义，还怎么能衡量呢？怎样评价轮转印刷机使报纸价格由一先令变成一便士？铁船比木船使用年限长，载货多得多，其价值又怎样衡量呢？如果只计算生产了多少灯，而不算它们发出多大的光，又怎样统计灯光产值？最近有人计算过，那种只算灯不算光通量的总统计数字造成了多大的低估，按照灯光流明量价格计算出来的实际产值，与原有估算数字相比，200年间竟相差1000倍。（19）

尽管如此，那些新的计量经济史学家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原有的学说已被摧毁了。一位经济史学家四方呼吁放弃“工业革命”这个使

用不当的名词，另一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这段历史时，开始避免使用这个令人畏惧的名词，因为它对著者和研究者来说均有诸多不便。（20）某些人是在经济史与其他历史搭界的领域或者根本是在史学领域之外著书立说，也武断地下结论说大家错误领会了英国的那一段故事。他们要我们相信，英国当时绝不是一个工业国（不论工业国意味着什么，都不是）；英国18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是在农业和金融业，而工业的作用却被夸大，其实它是居于从属地位。（21）有的人力图论证说，英国在那些所谓革命的年代并没有什么变化（100年的编史工作都白费了）；另有一些人承认那一段增长较快，但强调连续性大于变化。他们的提法是“趋势增长”或“趋势加速”，断言在国民产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中谈不上有任何“奇异转折”。而当某些学者拒绝接受他们这种新教规时，一位历史学家将反对者斥之为“还不愿完全躺倒的死马”。（22）

谁说学术界的象牙之塔是一块清静的地方？

旋转的优势

与往复式运动相比，旋转的巨大优势在于能效：它不需要运动机件改变方向来完成每一冲程，而是持续转动（它当然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受离心力的影响，这一点也受同样的运动定律的支配）。具体的运用则视质量和速度而定：若设备轻，运动又不快，往复式运动的发动机就足以完成任务，尽管要付出一定代价。若设备大又速度高，往复式运动就不行了。

轮船蒸汽机由往复式改为旋转式，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原理。不论是商业航运还是海军，都要求设计和建造出更大更快的船只。英国这个当年的世界头号海军强国是在1905年建造第一艘巨炮战列舰“无畏号”时，断然决定采用旋转式发动机的新技术。皇家海军要求这艘新的主力舰航速达到21节 [114]，往复式发动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之前，船只设计速度达到过18或19节，但如此航速只能保持很短时间；即使是用14节航速行驶8个小时，发动机的轴承就开始发烫出

故障。硬要这么快，就得进港修整10天——这是战备所不能接受的。

海军有些军官害怕新技术冒险。在驱逐舰上试用涡轮发动机是一回事，可是把它用在皇家海军最大、威力最强的军舰上，会怎样呢！？倘若创新者出了错怎么办？海军造船署署长菲利普·瓦茨指出，若按老办法造“无畏号”，它在5年之内就得报废，因此决心用新技术。

结果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好。“无畏号”的舰长雷金纳德·培根原先指挥过“无敌号”（皇家海军喜欢用夸张的舰名），他比较了二者，惊喜地说：

〔涡轮〕没有噪音。当“无畏号”以17节航速行驶时，我常常视察轮机舱，简直感觉不到轮机是不是在转。当全速前进时，“无畏号”和“无敌号”轮机舱的区别更是格外明显。“无畏号”的轮机舱没有噪音，看不到蒸汽，没有水和油污溅出，军官和水兵衣着整洁，整个船只就像停泊在港湾，涡轮似乎停止了转动。而在“无敌号”的轮机舱里，噪音震耳欲聋，讲话无法听明白，电话没有任何用场，甲板上油污和水四溅，走路很难不滑倒。有的压盖（阀门）被吹开一角，空气朦胧，弥漫着蒸汽。轮机轴承上放着一根或数根消防水管，以防危险。人们不停地在轮机周围工作，摸摸轴承看是冷还是烫；军官穿着扣子紧扣的外衣或油布衣裤，脸是黑的，衣服上溅满了油和水，湿乎乎的。（23）

下一步则是采用液体燃料，它燃烧更旺，产生的压力更大，使得机轴和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老煤箱占用了太大的空间，加煤铲吞噬了大量的食物——人的发动机也是需要燃料的。当煤堆变矮后，就要召集更多的人从远处的煤仓把煤运到轮机附近：数以百计的人为添煤服务却从来看不到煤炭的火光。相对而言，加油意味着只需把胶管连接上和泵油几个小时，常常在海上就可以完成。而加煤炭时，船只需要在港口停泊几天。

有许多这一类的改进往往不会在常规的产值和生产率尺度上表现出来。它们计入新设备的成本，却没有列入工作质量的变化。

注释

1 .*OED* , s. v.Revolution , III , 6 , b。

2 .关于中射式水轮，参见Makyr , *Lever of Riches* , 第90-92页。关于水力机械和蒸汽机的对比，参见Tunzelmann , *Steam Power ; Greenberg* , “Reassessing the Power Patterns”。

3 .这是一个传统的解释，参见Ashton , *Iron and Steel* 。海德在《技术变化》一书第40页争辩说，这不是原因：达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用沙土而不是烂砂铸造薄壁的铁容器，这样可以节约一半的金属，比较容易地从焦炼铸铁中炼制出这样的容器。参见Hyde , *Techno-logical Change* , 第40页。

4 .John U.Nef ,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对矿物燃料和蒸汽动力重要性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来自一位名叫里格利的学者，参见E.A.Wrigley ,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 和“The Classical Econoimists, the Stationary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31页。亚当·斯密指出，英国工业往往集中于煤矿附近。参见Adam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Book V, ch.2 , Art.4。他把这归结为廉价燃料对工资（可以更低）和那些大量耗热的工业如玻璃和冶铁成本的影响。他并没有提到煤炭作为发动机和机械的燃料；在此方面，他也没有提到蒸汽机，对机械也说得很少。亚当·斯密也有看问题不全面的时候。

5 .该估计数字来自A.P.Usher ,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

6 .A.Rees , *the Cyclopaedia* , Vol.38 (London , 1819) , 引用于Ransall , *Before the Luddites* , 第13页。

7 .引自Kindleberg , *World Economic Primacy* , viii 6。

8 .研究技术与工业联系的前驱A.P.厄谢尔正是据此追寻工业革命的进步和时机。参见A.P.Usher , *Industrial History* , 第304-313页。

9.同上，第306页。

10.参见T.S.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作者在这本既经典而又“时髦”的小书提出，英国工业革命的分期是1760年至1830年。

11.可参照克里斯多弗·弗里曼对20世纪70和80年代发达工业国家生产率增速减慢所作的类似分析，见Christopher Freeman, *The Economics of Hope*，第86-89页。

12.参见Landes,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13.McCloskey, “Statics, Dynamics, and Persuasion”。

14.Aldcroft, “Europe's Third World?”，第2页。贝罗奇提供了该历史比较的开拓性资料，参见Paul Bairoch,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15.然而，即使在这些看来非常直接的问题上，人们也会犯惊人的错误。参见对克拉夫茨和尼克·哈利在计算英国工业增长时的棉布价格的讨论：J.Cuenca Esteban, “British Textile Prices”。后者意图在于表明在工业革命期间棉花价格的增长或稳定。不幸的是，对该意图而言，这些数据选用不佳（其中的一点是，这些指数来自合同而不是市场价格），显然部分是因为方便和容易得到。而且，没有任何警钟敲响。数字可以说明问题，每一个准备相信水力纺纱机、走锭纺纱机和动力织机发明之后棉纱或棉布价格会静止不动或上扬的人是准备相信任何事情的。关于相信数字的庸俗化危险，参见Landes,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16.Theodore W.Schultz, “On Investing in Specialized Human Capital”，第343页。

17.威廉姆森认为是0.3%。见Jeffrey Williamson, “New Views on the Impact”，第1页。

18 .Crafts ,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 第425页。关于整个工业增长和收益的可靠、验证性的分析, 见Temin , “Two Views”。

19 .见“The Price of Light” , *The Economist* , 22 october 1994 , 第84页。

20 .早期就有人主张避免使用该词 , 参见Youngson ,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Progress* , ch.Viii ,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 in Great Britain , 1750—1800”。特别在117页提到 , “.....从整个经济来讲, 既不能证明什么, 也不能反证什么。”扬逊断言“进步从来不是恒定的”, 不同部分的各自贡献是处在变化之中的。结果是树木繁多, 但不能成林。

21 .Ward ,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mperialism” , 第58页 , 对Cain and Hopkins , “Gentlemanly Capitalism” , 第510-512页的评论。我认为凯恩和霍普金斯并没有这样说过。

22 .Eric Jones in *Growth Recurring* , 第19页。参见Landes , “The Fable of the Dead Horse”。

23 .引自Massie, *Dreadnought* , 第475页。

第14章 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在那时？

假如我们预言：到1930年，不列颠列岛上将分布着5000万人口，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比我们现在的英国人要好；苏塞克斯和亨廷顿郡会比约克郡西区现在最富庶的地方还要富庶……家家户户都会有按照现今尚未发现的原理建造的机器……那么，许多人都会以为我们是神智癫狂。

——麦考利《骚塞论社会》（1830）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那个地区、那个时期？这确实是个双重的问題。其一，一个国家为什么又怎么样冲破习惯和常规知识的甲壳而达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呢？毕竟，历史也展现过别样的例证，说明机械化和无生命动力的应用并没有产生一场工业的革命。在这一方面，大家可以想想宋代的中国（麻纺、冶铁），想想中世纪的欧洲（水力和风车技术），想想现代早期的意大利（捻丝、造船），想想“黄金时代”的荷兰。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后却发生在18世纪呢？

其二，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呢？

这两个问题是一体的。回答其中之一则需要回答其中的另一个。这就是历史之道。

针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我想着重说明聚集（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以及突破（即达到并且通过阈限）。我们已经说明了穆斯林和中国人的学识和技术进步所受到的阻碍。那不仅是改进的迟滞，而且是停顿的制度化。而在欧洲，情况却截然不同：我们具有连续不断的积累。诚然，在欧洲，如同在别的地方，由于政治的变故和个人的禀赋，科学和技术也有其坎坎坷坷，或强或弱的领域以及重心的转移。但是，如果必须指出关键的、富有欧洲特征的成功根源，那么，我想强调以下三点思考意见：

(1) 越来越大的进行学识探求的自主权；

(2) 以一种共同的、具有含蓄对抗性的方法的形式，在不统一
中发展统一，亦即创造一种论证的语言，使其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得
以确认、使用和理解；

(3) 发明的发明，亦即研究的常规化 及其传播。

自主权：争取学识自主的斗争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围绕传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所发生的冲突。当时，主宰欧洲的是罗马教会的观点，是由圣经规定的、由古人的智慧加以调和而不是加以修正的自然观。这种观念庞大多数定义表现在经院哲学中，因为这种哲学体系（包括自然哲学）造成了一种具有全权和权威的意识。

新的概念必然地以一种傲世的和潜在颠覆性的力量进入这个封闭的世界，一如它进入伊斯兰世界一样。但是在欧洲，由于新思想能得到实际应用，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受到了企图利用新颖事物使自己优于对手的统治者的保护。因此，并非偶然，欧洲逐渐培养起对新生事物的崇尚和争取进步的意识。这是一种信念，它同崇尚先前优雅的怀古情节（《失乐园》）相反，相信“黄金时代”（即乌托邦）真实地摆在面前，相信当今的人们比过去更富裕、更聪明、更能干。正如1306年乔达诺教士在比萨的一次布道中所说（我们都应当永远怀念）：“但并非所有的（技艺）都已经被发现；我们将永远看不到寻求它们的尽头……而新的技艺总是随时被发现。”⁽²⁾

当然，陈旧的看法依然阴魂不散。（历史运动的一条法则认为，一切思想和实践的革新都会引发相对应的反作用，即使不总是对等的反作用。）但是在欧洲，教会的影响范围却受到了世俗当局的对抗性要求（凯撒对上帝）以及来自下层的在宗教信仰上持有异议的人所酝酿和聚集的火焰的限制。这些异议教派或许在学识和科学方面还没有摆脱偏见，但是他们却破坏了僵死教条的一致性，从而暗地里促进了事物的新生。

对权威性最具摧毁力的是个人经验的扩展。例如，古人认为没有

人能够居住在热带地区，因为那里太热。葡萄牙的航海者很快就证实了这种偏见的谬误。他们疾呼不要迷信古人，说“我们发现事情正好相反”。加西亚·多尔塔的父母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本人是个忠诚的但当然是隐瞒身份的犹太教徒。他曾在萨拉曼卡和里斯本学习医学和自然哲学，接着在1534年乘船到了果阿。在果阿，他充当葡萄牙总督的医生。在欧洲时，他曾经受到教师们的恫吓，从来不敢怀疑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权威性。而现在，在葡属印度那种非经院气氛的环境中，他感到可以自由地睁开自己的眼睛了。他写道：“对于我来说，一位目击者的证词，比起所有医生以及所有写出虚假信息的医学大师的言词更有价值，”并且还写道，“人们现在一天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比罗马人经过100年所知道的还要多。”（3）

方法：仅仅观察是不够的。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必须理解并且作出并非幻术的解释。没有见过的事物，不能予以信任。因此，独角兽、蛇怪和火蛇就难以信其有。对于当年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用事物的“根本”性质去解释的现象（天体按圆周运动；地体则向上或向下移动），新的哲学都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事物存在（或运动）于自然之中。而且，从很早开始，这些探求者就渐渐认识到数学对于详细说明和系统表述观察结果具有巨大的价值。为此，罗杰·培根曾于13世纪在牛津说：“一切范畴均决定于量的知识，而量的问题是由数学探讨的。因此，逻辑的全部力量取决于数学。”（4）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

这样一种方法开辟了通向有目的的实验的道路。不再是等待观望事物的发生，而是促使事物的发生。这要求一种学识的飞跃，而迄今某些人还争辩说正是魔术信仰的复活和扩散（甚至连艾萨克·牛顿都相信炼金术和物质变幻的可能性），使得科学界认为自然是某种既可观察又可施加外力作用的事物。（5）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同自然哲学家形成了鲜明对照，魔术师竟然摆布起了大自然。”（6）

哦，起码他作了尝试。但是，我对这种把个人的糊涂看法同更大

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怀疑的。从观察到实验、从被动到主动的飞跃曾经是十分艰巨的，而魔术的诱惑，这个“充满利欲享乐、充满权力、充满荣耀、无所不能的世界”的诱惑只是构成了牵制和障碍。不妨说，魔术的世界曾是一出模仿现实的滑稽戏，是无知沉淀的渣滓，是学识的一种反物质。魔术偶尔的成功是戏法咒语奇缘巧遇的副产品。魔术从业者即使不被看做鬼怪的代理人，也容易被看做怪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总是言行乖张，偶尔还有犯罪行为。^[115] 这种行业亘古有之，而今依然，并且永远存在。这是因为我们和玩彩票的人一样，甘愿去相信。因此，在新知识涌现的时候，在揭开诸多秘密的时候，在许多神秘事物被曝光的时候，这种行业又复活并繁荣起来，这就不足为奇了。与本源相比，魔术是反应，而且就其曾起到的作用而言，它的刺激作用比变态反应的作用要小。（7）

请注意，某些人为此而懊悔，正像为自作自受的贫困而懊悔一样：“……新的定量和机械性方法最终建立起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不承认自然中存在着本体、灵性、希望或是目的，从而使魔术成为某种‘非现实的’或者从现代意义上讲是超自然的东西。”^{（8）} 但是不必惋惜：通向真理和进步的道路就是从那里走过来的。正如17世纪初期的自然科学普及工作者戴维·甘斯所说，人们之所以知道魔术和占星术并非科学，是因为魔术和占星术的从业者彼此并不争论。没有争议，就没有对知识和真理的严肃认真的追求。^{（9）}

新的方法是感知同计量、实证及数字化推理的有力的结合，这种新方法是获取新知识的关键。其实质的成就保证了不管后果如何它都会受到保护和鼓励。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像它一样获得发展。^{（10）}

如何进行实验则是另一个问题。人们首先必须创造研究策略以及观察和计量的仪器。等到这种方法在17世纪得到洋洋大观的进展而结出果实的时候，已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的时间。这并非意味着知识发展的停滞。这种新方法起初应用于天文和航海、机械和战法以及光学和测量等领域——它们都是一些实用事物。但是到了16世纪末叶，从伽利略开始，实验才变为一个系统。这不仅需要进行重复的和可重复

的观察，而且需要深思熟虑的简化作为观察复杂事物的窗口。想要发现坠落物体的时间、速度和覆盖距离之间的关系吗？那就把这些物体从一个倾斜的平面上慢慢地滚动下来吧。

科学家必须进行更好的观察，而望远镜和显微镜一经发明（约在1600年），他们就能做到了，从而开辟了新的境界，其奇异和强大能够同早些时候的地理新发现相比。科学家们还需要更精确的计量，因为就一个指针来说，最小的移动都会造成天壤之别。因此，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天文学和数学教授佩德罗·努涅斯在16世纪初叶，为了给航海和天文的读数提供一度的分数，发明了游标（noni-us，此词来自努涅斯的拉丁化姓氏）。这种游标后来改进为游标卡尺（vernier scale，发明人是皮埃尔·韦尼埃，1580-1637），随后又有千分尺的发明（最先由盖斯科因发明于1639年，但长期被忽略；艾德里安·奥佐特再发明于1666年）。这种测微仪采用细金属丝进行判读，用螺杆（而不是滑尺）来达到精密控制。其结果是测量数据达到一毫米的1/10弱，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天文学精确度。（11）（请注意：学习制造精密螺旋就是一项重大成就；而且注意，这些仪器的效益如何，部分地依赖于眼镜和放大镜。）

追求精密的同样努力还显示出时间计量的发展。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需要把事件的时间测定到分和秒，因此克里斯琴·惠更斯在1657年发明了摆式钟表，又在1675年发明了平衡游丝，使其成为可能。科学家还需要计算得更好更快，而在这方面，约翰·纳皮尔发明的对数在当时的重要性就如同早先发明的算盘，或者如同后来发明的计算器和电脑。（12）此外，他们还需要效率更高的数学分析工具；他们从笛卡儿的分析几何学中，而且还进一步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中获得了这种工具。这些新的数学学科对实验和分析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常规化：西方科学的第三个机制性支柱是科学发现的常规化，即发明的发明。西方广泛分布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工作在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却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

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1588—1648）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最早的学术团体出现在意大利，即1603年罗马的猗猗科学院和1653年佛罗伦萨短暂的奇门托科学院。但是，从长远看，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北方学术团体：166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1635年成立的巴黎学院以及其后继者成立于1666年的科学院。甚至在此之前，非正式但却是定期在咖啡馆和沙龙里的聚会就曾经把人们和问题汇集在一起。正如梅森在1634年所说，“各学科彼此发誓要保证不可侵犯的友谊。”（13）

当时，那是合作，但却由争夺威信和荣誉中的剧烈对抗而得到极大的加强。在16世纪那种学术团体的环境中，这种对抗常常采取的形式是隐匿不报、半露半含、拒绝发表、把精彩部分留作辩论和反驳。（14）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期，依然有罗伯特·胡克这样古怪的人物。他是皇家学会的积极会员，他的座右铭或许就是“那是我首先想到的”。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他曾经把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发明创造放在他书橱的抽屉里，唯一的目的是当别的什么人带着类似的设计出现的时候，他再把它们拿出来。就这样，他曾经就手表平衡游丝的发明（1675年，是手携计时器在精确度方面的重大进步）向克里斯琴·惠更斯提出质疑。历史业已向惠更斯伸出了承认的手，不仅因为他的螺线游丝在手表里试验并且成功，而且因为他还在完成这项发明时马上公之于众。人们不能接受这种事后的无法证实的认证，即使它是发自像胡克这样极具天赋的机械学才子。（15）

一般说，声誉是对科学家的激励，而且即使在那个早期的年代，科学也曾经是一种领先的比赛。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的狂热爱好者，常常在环境优雅的沙龙里，展示并且宣讲自己的发明，变得如此重要；在座的女士和先生们于是成了这些成就的见证人。而且，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包括业余的和专业的，会如此急切地创办学报并且使注明日期的文章得到发表，并且还要重复试验，证实结果，作出修正、改进，更上一层楼。因此印刷机和活字的作用也变得至关重要；还有，

拉丁文本来曾是各国专家学者中间进行国际交流的非常宝贵的手段，到了这时也改成能被更多公众理解的各国语言。再者，这样的传播工作和设施，没有一件能够在当时欧洲以外的地方出现。

科学的方法和知识在应用之中获得了收益，最重要的是在动力技术方面。在那几个世纪里，较老的动力装置，即风车和水轮，继续受到注意，效益有所提高；但是，伟大发明却是借助蒸汽把热能转换为功率。没有别的任何技术比这更加依靠实验了。对真空和气压的探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开始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才通过几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结出果实，他们是居里克（1602-1686）、托里切利（1608-1647）、玻意耳（1627—1691）以及帕潘（1647-1712），分别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诚然，18世纪的科学家们没有能够说明蒸汽机为什么而且怎么样进行工作。做出这种说明尚需等待卡诺（1796-1832）和热力学定律的出现。然而，说蒸汽机成就于知识之前，并不是说这种机器的建造者没有吸收先前的科学探索成果，包括实质的成果和方法的成果。瓦特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院长和导师布莱克（1728-1799）并没有传授给他建造凝汽器的想法，但是跟布莱克一道工作却教会了他探索 and 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践和方法。（16）即使在凝汽器这一点上，瓦特这位英雄的发明家也不是一人独占全部功劳。他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些教授的朋友，是英格兰一些杰出的自然哲学家的朋友，还是国外一些科学家的朋友。他钻研了数学，做过系统的实验，计算过蒸汽机的热效能。总之，他改进蒸汽机技术，是依靠了当时已积累的知识 and 理念。（17）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

请让我举例说明。在14世纪的意大利，具有天赋的机械师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找到办法进行捻丝，就是利用机器梳纺整经，而且尤为感人的他们是利用水力来驱动这种装置。在这种技能的基础上，意大利的丝纺业繁荣了好几个世纪，引起别的国家的妒羨。法国人在1670年揭开了这个秘密，大约在同一时期荷兰人也学到了手。在1716年，托马斯·隆比经过数年耐心的侦察之后，终于把这种技术带到了英格兰并且建立起一座大型的水力厂房，雇用了数百人。

(18)

那是一座工厂，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能同后来的棉纺厂相比。说它“几乎”，是因为其差别在于：隆比在德比的丝纺厂，加上先于它而建立的手工捻丝作坊以及一些较小型的模仿机器作坊，在生产规模上超出了英国对于丝纱的需求。因为丝毕竟是一种昂贵的原料，丝制品所供应的只是少数富裕的顾客。所以，隆比的丝纺厂比18世纪70年代第一批棉纺厂早半个世纪建立，却没有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典型。人们未能从丝纺中获得某种工业革命。(19)

羊毛和棉花则另当别论。当时，羊毛打个喷嚏，整个欧洲就会患感冒；要是棉花打个喷嚏，全世界都会难受。羊毛在欧洲尤为重要，而棉花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从某些方面来说则属偶然。英国的两项“东方棉布法案”（1700年和1721年）禁止进口甚至禁止穿着印度生产的印花布和染色布，其目的在于保护本国的毛纺和麻纺制造商，但却无意中庇护了本国的依然稚嫩的棉纺业。棉纺是个朝气蓬勃的新生儿，它比起中世纪就建立起来的那些古老的毛纺和麻纺部门在规模上依然小得多。制造精纺机械的最初企图是以羊毛为目标的，因为羊毛精纺有利可图。但是，当羊毛纤维证明不易梳理而棉花却能随意摆布的时候，发明家们便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这种较容易驾驭的材料。

还有，羊毛手工业积习太深，其从业大军有着既得利益，这就妨碍了变革。而棉纺业成长迅速，录用新的人手，感到实行新的方式比较容易得心应手。技术革新过程总有这种情形：教新手学新招比起教老手练新把式要容易得多。[116]

为什么机械化有利可图呢？主要是因为纺织工业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劳动力的供应。^[117] 英格兰已经跃进到使用农村的手工制造力量，但是这种包工的活动很分散，要翻山越岭，分活再收活，把成本逼了上去。同时，雇主们为了竭力满足需求，提高了工资，就是说，他们增加了为自己的成品所付出的成本费用。但是，令他们沮丧的是，更高的收入只使得工人们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而提供的工作量却实际上减少了。制造商们感到自己在踏空车——白费劲。他们违心地希望食物价格上扬。生活费用的上涨或许能迫使纺纱工和织布工多卖力干活。^[118]

然而，工人们确实对市场刺激做出了反应。他们是工资劳动者，也是承包人。这种双重身份向他们提供了在损害作为发包人的手工业业主的情况下自我致富的机会。纺纱工和织布工往往从一个商人那里拿到原料，然后把制成的物品卖给竞争者，时而搪塞一人，进而搪塞另一人，把自己的契约玩耍得滴水不漏。他们还学会扣留出一些原材料供自己使用：由于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决不会出现反向的供应曲线。织布工为了尽力掩盖这种盗用行为，就减少织物的厚度，降低其质量，用假货或添加物加以充塞。而制造商则反过来严格检验每一件产品而且必要时“扣减”成品的价格，企图用这种办法来阻止这种盗窃行为。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雇主和雇员之间代价高昂的冷战。

制造商们吵吵嚷嚷，要求民事当局给予帮助。他们要求享有对怠工者和赖账者施加体罚的权利（对这些人罚款是无济于事的），享有未经准许进入织工庭院搜查被盗原料的权利。这些要求毫无结果，因为对一个英国人来说，家就是他的城堡，神圣之至。

因此，不足为奇，沮丧的制造商们转而考虑要建立大型的工场作坊，因为在那里，纺织工们必须准时到达，全天在监督下工作。这绝非区区小事。对于商人兼制造主来说，庭院手工业毕竟具有巨大的优点，特别是开办费低廉，一般管理费用低廉。借助这种生产方式，提供厂房和设备的是工人，而且一旦业务下降，发包人只需辞去订单就可以了。而另一方面，大型工场或作坊则需要注入大批资本：首先是土地和厂房，外加机器设备。

此外，发包式的手工生产受到每一个人的欢迎。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工作的节奏反映出这种自主性。典型的是织布工人，他们长时间歇着玩着，混上大半个礼拜，然后快到周末时，为了在礼拜六交货领取工资才最后努力工作。礼拜五，他们可以干通宵。礼拜六晚上是喝两杯的时间，而礼拜天则大喝各种啤酒。礼拜一（即所谓“神圣的礼拜一”，是很少工作的日子）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礼拜二需要从如此多的神圣中恢复过来。

产业内部的这种冲突——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称它为内部矛盾——必然导致工人们最终集合在一起，在监视和监督下劳动。不过，制造商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出钱来说服人们走出庭院进入工场。只要工场里的设备同家庭中的设备一样，工场生产的成本就要高。这条法则唯一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应用热力的各项工艺（如漂洗、酿造、玻璃制造、炼铁等等）。这些工艺集中供热（即由一个炉床替代多个炉床）所产生的节约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资金的花费。^[119]然而，在纺织业中为集中劳力所做的努力，虽然在英格兰可以上溯到16世纪，却一律失败了。在欧洲，情况则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各国政府资助劳力并将他们分配到大型的手工作坊——“制造工厂”或是“原始工厂”，企图用这种方法来促进工业发展。但是，这是一种人为的繁荣，政府的支持一经撤销就招致了破产。

工厂具有竞争力，是在使用动力机械之后。动力使得驱动更大型的、更有效能的机器成为可能，从而使产品价格以越来越大的幅度低于庭院产品。手工纺纱工迅速消失了；手工织布工消失得慢一些，但消失也是肯定无疑的。尽管工人工资高一些，但对于守旧派来说，工厂依然像是监狱。那么，早期的工厂主是从哪里寻求到他们的劳动力呢？除了从那些不能够说不的人中间以外，他们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找到工人呢？在英格兰，这就意味着往往是贫民院招募（买来）的儿童，还有妇女，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妇女。在欧洲大陆上，制造商们能够通过谈判利用囚犯劳力和军人。

这样就诞生了卡尔·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它是机器和动力结

合的果实，也是动力（力和能）和势力（政治上的力）结合的果实。

观察的头等要义：眼见为实

丹麦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546-1601）生活和工作在望远镜发明之前，但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认得他在天空中所能看到的一切恒星。这些恒星当时被认为是存在着的所有恒星。然而，在1572年11月的一个夜晚，他看到天上有某个新的东西，在仙后星座里有一点本不应在那里的亮光。这使他惴惴不安，于是就询问他的仆人们，他们是否也看到了他自己所看到的東西。仆人们回答说是的，他们也看到了。一开始，他感到满足，觉得起码还证明自己视力强。但是，接着他又开始担心他的仆人们不过是想让他放心，他们不愿意或是害怕否定自己的主人的话，因为他了解自己是一个高傲而有脾气的人。（他曾经在年轻时的一次决斗中失去了自己的鼻子，现在戴着一个铜的——有人说是银的——假鼻子。）于是，他就跑上大街，拦住了几位过往的农民，向他们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讲真话不会有什么得失，谁个也不会比农民更讲求实际。结果，农民们也說他们看到了那一点光亮。于是，第谷了解到天上存在着比他在自己的哲学中所想像的更多的事物。他把他的观察资料写进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关于新恒星》，于1573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成为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请注意：第谷虽然一贯坚持他“指给我看”式的经验论，却寻求在托勒密和哥白尼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以为太阳是被各行星环绕，围绕着地球运行。所以，搞好科学不仅需要好的观察，而且还需要好的归纳。

追求精密的大师们

对于变化和变化速度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计量消逝的时间。为

此，人们就需要一种标准的计量单位以及一种统计这种单位的仪器——我们把它称为钟表。在没有钟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用相近似的对等物来代替。15和16世纪的海员们为了计算一个漂浮物从船头到船尾所需要的时间从而估计出船的速度，可以使用一只沙漏。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沙漏，他们计数时就只能一个劲儿地高喊“圣母玛丽亚”或是别的什么常用的叠句。而今天，任何熟练的摄影师都会知道计秒的方法可以是念诵四音节的片语，如：一、一、一千；二、一、一千；三、一、一千……

无需说明，这种具有特殊风格的即席念诵应用于科学的目的是很难奏效的。为了科学的用途，人们很需要一种好的时钟，但是造出一台时钟却曾花了约400年。科学家毕竟是具有独创性的人，终于找到了办法来提升自己那些还不具备钟摆的、还不具备游丝的精确的计时器。一种方法是使用装有非常巨大轮盘的时钟，轮盘上有几百根甚至上千根的轮齿。第谷·布拉赫就曾用过。他并不是识别自己时钟上那个单一的时针（这种早期的机械钟不甚精确，还不能够保证分针的使用），而是计算轮盘转动过的轮齿的数目，因而更为接近已经消逝的确切时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跟踪星球运动并且确定这些天体在天文图上的位置（时间是两坐标之一）。伽利略为了研究加速度，则需要更加精细的计量。他向来是足智多谋，采用了小型的、手握的水钟而不是机械钟，他用手指在水流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打开和关闭外流的沿口，然后称一称释放出的水的重量，借以计量消逝的时间，因为在那个时代，天平是已知的最精确的计量仪器。

摆式时钟的发明改变了一切。它是第一台由一个摆动物以其自身固有频率控制的钟表装置。早期的钟采用的是控制器（摆动杆或环），其频率随着施加的力而变化。经过改进（一切发明都需要改进），一台好的摆式钟能够保持在每天只差几秒。怀表当时则不够精确，因为它无法借助钟摆工作。但是，游丝的发明使得有可能大大接近于固定速度，从一小时到一小时，从一日到一日，都稳定可靠。到了18世纪初期，一只好的怀表，镶嵌着宝石并装着不错的摆轮，能够把时间保持在每天只差一两分钟。破天荒头一回，值得给钟表加上分针甚至是秒针了。

这些进步大大加强了计时技术赋予欧洲的优越地位。这一知识曾经是长期的绝对垄断，也曾是对行为的有效垄断。别人谁也不能制造出这种仪器或者完成各种依赖精确计时的的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是海上经度的查明。

注释

1.转引自McCloskey, “1780-1860: A Survey”一文, 第243页。

2.转引自White, “Cultural Climate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一文, 载《中世纪的宗教和技艺》一书, 第221页注16。应当说明的是, 这次布道是用当地方言进行的。本人对怀特原文的翻译作了稍微修改。

3.载他本人著《关于印度的药草、麻醉剂和药典的对话》(1563年, 果阿), 转引自Goodman,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 第168-169页。

4.引自Smith, *Science and Society* 一书, 第51页。请比较现今对数学的依赖, 这次是在宇宙学领域里: “.....超强引力理论, 卡鲁扎-克雷恩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作用), 但是我们全然不知道怎样去解释其原因.....脉道场理论有了, 但它却奚落我们, 因为我们还不够聪明, 无法对其加以解决。问题在于21世纪的物理学偶然落进了20世纪, 而21世纪的数学却还没有创建。”见Michio Kaku, *Hyperspace* (纽约牛津出版社, 1993年版), 引自1994年3月20日《纽约时报》“书评”, 第21版。

5.有关这方面, 请参考Frances Yates, *Giordano Bruno* 一书和“The Hermetic Tradition”一文。耶茨提出科学的革命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个分为两步的过程: “第一期包括由魔术操纵的兽性宇宙, 第二期则包括由机械师操纵的数学宇宙”——见“The Hermetic Tradition”一文, 第273页。

6.见Hansen, “Science and Magic”一文, 第495页。

7. 请比较爱德华·罗森著“哥白尼曾经是位炼金术师吗？”一文，载于罗杰·H.斯图沃编《历史和哲学对于科学的观点》一书，第163-171页：“……魔术和占星术出自文艺复兴，不是现代科学，而是现代魔术和占星术。”——见Hansen, “Science and Magic”, 第505页注35。当然，如果人们把科学看做是派生的而不是自主性的，那么，人们就能痛惜“科学‘报答’自己所受恩惠的忘恩负义的方式，因其回报方式就是使魔术的形而上学破产”（同文，第497页）。

8. 同上。

9. 感谢诺亚·埃弗龙先生为我提供这段引述。他是希伯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准备一篇关于犹太学者对17世纪新科学的反应的论文。

10. 请比较Sarton, “Arabic Science”一文，第321页：“当西方人已经发现了实验科学的秘密并且正在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频率应用这种新方法的时候，穆斯林博士们却仍在重新阅读那些完全一样的书籍而进入毫无希望的怪圈。在前进着的人们身旁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倒退；东西方思想之间的距离逐步加大，西方人越来越远地走在前面，而穆斯林却原地不动，越来越远地掉在了后面。”

11. 见Dumas, *Scientific Instruments*, 第49-55页。

12. 萨尔顿提到的一位阿尔及利亚籍土耳其人Ibn Hamza al-Maghribi要求承认他是对数的发明人。见Sarton, “Arabic Science”一文，第305页注2。重要的问题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13. 引自R.Lenoble,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载Taton, ed.,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Science* 第 II卷《现代科学的开端》，第183页。

14. 据Dooley, “Processo a Galileo”, 英译本第8至9页。

15. 见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一书，第125-127页。这个问题部分地在于胡克希望能从这一点以及相关的钟表学方面的见解获

利，但他害怕如果泄露自己的秘密，就会失去发财的机会。所以，到头来落得一无所获。

16 .瓦特说过，“虽然布莱克博士关于潜热的理论并没有暗示出我改进蒸汽机的方案，但是他高兴地传授给我的各种课题的知识和进行推理的正确方式以及他为我树立了榜样的进行实验的正确方式，都无疑极大地帮助了我各项发明的进步……”见Fleming，“Latent Heat”一文，转引自John Robinson, *A System of Mechanical Philosophy*（爱丁堡1822年版），第 II卷，第ix页。

18 .关于工业间谍窥探1681年建于荷兰乌得勒支的一家捻丝厂的情况，请参考Davids，“Openness or Secrecy”一文，第338页。

19 .关于隆比和机械化捻丝，请参考Wadsworth和Mann, *Cotton Trade* 一书，第106-108页，以及Usher,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第275-176页。

第15章 英国和别的国家

英国的农业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基地，它是一种促进经济变革的力量：英国当时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超前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现代化”使人民越来越自由，但英国人对皇室的忠诚却使工业化更加安全。

工业革命是发生在欧洲，但为什么是在英国？为什么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呢？

从一方面说，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到18世纪初叶的时候，英国已经遥遥领先——在庭院制造业这一培育经济增长的苗床方面，在利用矿物燃料方面，在那些将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重要部门的技术，如纺织、钢铁、能源和动力的技术方面，均是如此。除此之外，还应提到英国商业化的农业和运输的效益。

在农业中，日益增高的效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粮食生产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把劳力解脱出来用于其他活动，如工业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等等。其次，这支新生的劳动大军需要越来越多的食物。如果这些食物不能从国内获得，那就只好将部分收入和财富拨付于食品的进口。（诚然，进口食物的必要性可以促进那些能够用于交换食物的出口品的开发，可以鼓励工业的发展；但是，必要性并不能保证可行性。世界上某些最贫困的国家从前曾是自己养活自己。而今天，他们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使得资源流失，负债累累，而一遇降水量的变化或贸易的阻碍就会招致灾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蹒跚着从一次饥荒走向另一次饥荒，每一次都遗留下孱弱、疾病和日益加重的依赖性。）

因此，农业进步对英国工业化所做的贡献是很难被说过头的。

(1) 这个过程开始于中世纪，始于农奴的超前解放以及种植业和销售业两者的商业化。市场园艺业（水果和蔬菜）16世纪在伦敦周围的普

及以及农牧业的结合（种植粮食同时放牧牲畜以及用粮食喂养牲畜），证明了地主和佃农共同的灵活善变。这种发展有助于使膳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使其含有特别高的动物蛋白比例。（2）进一步发挥效益的因素是采用了浇灌、施肥和作物轮种的新技术，其中不少是由低地国家的移民带来的。荷兰当时是欧洲农业发展的中心，是人们以艰辛努力和独创精神创造的（从大海中争来的）因而也倍加珍惜的一片土地。荷兰人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在传授耕作技术，直達斯拉夫人的边疆。在16和17世纪，英格兰人成了主要受益者之一。首创紧随着首创。在18世纪的英格兰，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圈地，也就是把对开阔田野的集体性束缚转变成集中的、用篱笆或灌木丛圈绕的园田的自由。历史学家们就圈地运动的贡献问题进行过辩论，但是合乎逻辑的是，既然付出了代价，必定曾经发挥过有益的作用。

因此，不同于多数的其他国家，英国的农业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基地。它是一种促进经济变革的力量，一如任何其他经济部门。农业有了收益，而且因为收益不错，它就变成了某种爱好，不仅对农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富有的、贵族式的地主也是这样，因为地主们也不惜让自己的靴子沾上泥巴，在牲口展销市上同任何人、一切人掺和在一块儿。不可避免，在这个金钱和市场意识浓重的社会里，农业社团就必然地出现了。在那里，“进步的”农民相聚并且互相学习，农学文献激增，更便于宣传最佳的实践经验。这种商业精神促进了物业管理的一体化方法：对所有资源进行统计，既包括地上的，也包括地下的；因为在英国，不同于在欧洲大陆国家，矿物资源属于该土地的主人所有，不属于皇家。这就为办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与此同时，英国人在水陆交通运输方面也有巨大进展。新的收费道路和运河，主要是为工业和采矿服务，开辟了通向宝贵资源的道路，把生产和市场连接起来，方便了劳动的分工。其他欧洲国家也在努力这样做，但是哪里的进展也绝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广泛而有效。其原因很简单：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道路和运河是统统靠私人企业来兴建，因而能关心是否需要（而不是威信和军事上的考虑）并且有利于用户。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农业学家兼旅行家亚瑟·扬对法国畅通平坦的道路感到惊讶，却又叹息很难找到食宿的设施。法国王室当时已经修

建了几条令人羡慕的公路，既为了促进贸易，也为了进行控制，而扬却发现这些公路都空空荡荡。英国的投资者出于最佳的商业理由，修建起了多得多的公路以及供用户食宿的旅店。

这些道路（以及运河）加速了发展和专业化的进程。或许，丹尼尔·笛福在他的杰作《穿越大不列颠全岛之行》（1724—1726）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各地区的农产品（啤酒花用于啤酒，羊群用于采集羊毛，家畜用于繁殖）以及地区特产（设菲尔德、伯明翰和黑区的金属制品；东英吉利和西区的毛织品；布雷德福周围的毛线；利兹周围的羊毛织品；曼彻斯特周围的棉制品；柴郡的陶瓷；等等，等等）。难怪亚当·斯密要强调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了：他自己的国家给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然而，上面所说仅仅表明是什么和怎么样，而没有表明为什么；是表述而不是解答。（3）这种带有改造性质的进步，这种革命，并非偶然之事，并非“各种事情不过凑合在了一起”。人们能够找到原因以及原因后面的原因。（在重大事物中，历史厌恶偶然性。）（4）英国在这些关键的部门中所取得的早期技术优势本身是一种成就，不是上帝赐予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精神的结果。

关键是英国具备了这些素质，但另一方面，英国又是造就了自己。为了理解这一点，不仅要考虑到物质上的有利条件（另有某些社会也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的天赋条件，却花了很多年来效法英国的这种首创精神），还要考虑到非物质的价值观（即文化）和体制。[120]

这种价值观和体制，我们太熟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其称为现代的），以致把它们认作是当然的。然而，它们却代表着一种对于先前准则的重大背离，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并在不同的地方，克服顽强的反抗以后，才被接受和采纳。即使到现在，先前的那种老秩序也绝没有完全消失。

让我们首先描绘一下那个理想的事例，即从理论上讲最适合追求物质进步和总体致富的社会。请记住这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较好

的”或“优越的”社会（要避免应用这些词汇），只不过是一个较适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社会。这种理想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型的社会该是：

1、它懂得如何操作、管理和制造生产工具，如何创造、调整并且掌握技术先进的新技艺。

2、它能够向年轻一代传授这种知识和技艺，不管是通过正规教育还是通过收徒传艺的方式。

3、它根据才干和相关优点为工作岗位遴选人才；根据实际表现提拔和降职。

4、它能为个人或集体发挥企业精神提供机会；鼓励首创、竞争和向别人学习。（5）

5、它允许人们享有并且使用自己劳动和创业的成果。

这些标准含有必然结果：男女平等（从而能够倍加凝聚人才）；不根据无关的标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而加以歧视；重视科学（手段目的）理性而不迷恋魔术和迷信（非理性）。[121]

这样一个社会同样也会具有有助于达到上述大目标的那种政治和社会体制。例如：

1、它保障私有财产，更能鼓励储蓄和投资。

2、它保障个人自由，即保障他们既不受暴政的虐待，也不受私人的骚扰（犯罪和腐败行为）。

3、它实施契约的权利，包括明确的和含蓄的。

4、它提供稳定的行政管理，不一定是民主的，但其本身是按公众既知的法规进行治理的（即法治而非人治）。如果是民主的，亦即建立在定期选举之上的，那么，多数获胜，但不侵犯失败者的权利；而失败者则接受自己的失败，着眼于下一轮的投票选举。

5、它提供顺应民意的行政管理，即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6、它提供正直廉洁的行政管理，因此经济角色不会产生邪念去寻求市场以内或以外的好处和特权。用经济术语说，不对庇护或地位谋取任何收益。

7、它提供稳健的、高效的、不贪赃的行政管理。其效应则是降低赋税、减少政府对社会公积金的索取并且避免产生特权。

这种理想的社会也会是很清廉的。这种清廉会受到法律的强化，但更为理想的是这种法律不再需要。人们会相信清廉是正当的（而且还能使人受益），而且会相应地按照它生活和行动。

还会有更多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具有地区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特征。人们会寻求机会而到处迁徙，会因为有所成就或无所作为而有升有降。这种社会重新生而轻陈旧，重青春而轻阅历，重变革和冒险而轻安全可靠。它不会是一个份额均等的社会，因为人的才智并不均等，但比起靠特权和恩赐所表现的分配来，它却会趋向于较公平的分配。它会有一个相对而言庞大的中产阶级。这种较大的平等会跨越阶级的界线而表现出较均质的外形以及较随和的习俗。

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社会达到过这种理想的境界。姑且撇开无知（人们怎么会知道谁个更好或更值得赞扬呢？）不说，上述的理想社会是一台效率为百分之百的机器，其设计同历史和命运以及人性激情等种种神秘莫测的变化毫无瓜葛。当今最有效率的、以发展为导向的那些社会，譬如东亚国家和西方的各工业国，却都被各种各样的腐败、政府无能和私下谋求酬金的现象所玷污。但是上述理想社会模式却强烈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些已经促进了经济和物质进步的效能。它们代表着显著地脱离了以前的社会和政治安排的一种趋势。所以，第一个工业国家曾经最早、最接近于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并非是一种巧合。

首先，英国早就具备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优越条件。我这么说，并非仅仅是指统治者的疆域，也并非只是指一个政府或政治实体，而是

指一个自觉的、自知的、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忠诚以及公民身份平等为特征的单位。(6) 这样的国家能够使社会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和积极性相调和，使集体的协同作用能增强行动的实绩。其整体大于各个局部的总和。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会较好地响应国家的鼓励和倡议；反过来，国家也同积极的社会势力一致，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更好。(7) 各个国家可以竞争。

此外，英国当时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当时是一个超前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请不要忘记这样一种社会的显著特征是进行自我改造及适应新事物和新方法的能力，所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内涵总是在变化的。变化的一个关键领域就在于人民越来越大的自由和安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今日，英国人依然称自己为皇室的“臣民”，虽然他们早已经——早于其他任何地方——成为公民。这一点最有力地促进了创业精神。亚当·斯密作如是说：

“每一位个人为改善自己境遇的正常努力，当着被容许自由地、安全地予以施行的时候，就会成为力量十分巨大的一项因果律，以致单单是其本身，而且无需任何帮助，不仅能够使该社会实现富裕和繁荣，而且能够逾越愚蠢的人类法律十分经常用以妨害其作用的成百个障碍；即使这种障碍总是或多或少要么侵犯其自由，要么破坏其安全，亦复如此。在大不列颠，工业是十分安全的，而且虽然它远不能说完全自由，但它却同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地区一样自由或说更为自由。”(8)

英国社会早熟的起源要回溯多远，这是历史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位学者曾追溯到中世纪（公元1500年以前）和他所谓的个人主义的兴起。英国的社会摆脱了农奴制负担，发展了耕种者而非小农的人口，把工业和贸易引进乡村，为利润而牺牲关税，为比较优势而牺牲传统。结果是有喜有忧。有些人发现自己贫穷了，但总的说来，收入增加了。不少人发现自己没有了土地，但流动性加强了，而且自觉意识扩大了。(9)

英国给了人们以活动余地。贵族们首先赢得的政治和民事自由权

（1215年的大宪章）由于战争、习惯法和法律而扩及普通人民。对于所有这些进展，人们可以提出一些例外情形而加以反对：英国当时远非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贫困人口（我们一直都有）——其人数远比富人为多。它享有自由，但也有滥用特权，有阶级和地位的差异，有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有偏爱和恩赐的表现。但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各国人民相比，英国人是自由和幸运的。

他们了解自己是何许人。他们在其他国度第一次获得的群众性生活体验来自在法国进行的百年战争（14至15世纪）。在那里，英国的自由民绰绰有余地对付了法国的精锐骑士。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人当中有一位是约翰·福蒂斯丘，即后来的约翰爵士和高等法院大法官。在15世纪70年代，他写了一本书，名为《论英格兰的治国之道》，其中他谈及法兰西的治理不当和苦难。他写道，法国国王为所欲为，使他的人民贫困不堪以致难以生活。他们喝的是白水（而不是啤酒）；吃的是苹果加黑面包（相对白面包而言）；他们没有肉吃，或许只有点肥油或下水，都是为了贵族和商人而宰杀的牲口身上剩下的零碎。他们没有毛料穿，尽穿些粗帆布的工装。他们穿着短裤，也是粗帆布做成，长不过膝盖，以致他们都光着腿走来走去。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打着赤脚。他们必须打更、劳作、掘地。他们“身躯变得佝偻，孱弱，既不能打仗，也不能保卫王国”。他们没有武器，也没有钱去购买武器。但他们却忠实地生活在极端的贫困和苦难之中，而他们却是居住在世界上最肥沃的国土之上。（10）

诚然，这是英国人的言谈（但其时间有多早啊！），人们或许会原谅他狂热地谈论着自己祖国的优越。这是民族主义使然，因为民族主义就是一种认同和优越的情感。当时，英格兰就是培育这种新情操的第一批国家之一（请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这种新的情绪鲜明地不同于中世纪的农奴，因为自己狭隘的佣金而怀有的地方性认同，或者就此而言，也不同于亚洲农民那种默默无言的驯服。（11）

然而，赞扬英国的不单单是英国人自己。到不列颠岛来的外国参观访问者曾异口同声地发出崇敬和赞美。对有些亚洲人来说，一切西方人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欧洲人却看出了他们自己的差别。到访

者对英格兰乡下人的生活水平之高甚为惊讶：砖建的村舍，红瓦屋顶，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吃的是白面包（人们能够按照是否吃白面包来追索当年正在工业化的欧洲收入增加的程度）。他们发现妇女们穿着印花棉布，戴着帽子；发现女仆们酷似她们的女主人，以致外国来的造访者敲门后不知如何称呼前来开门的女仆。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看见过穷人，但没看到“可怜的人”；没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看到过乞丐，但没有一个乞丐“没穿长衣和鞋袜”。（英国人似乎曾经为自己的乞丐而骄傲，因为他们把乞丐看成是一些人从事的一种职业。）（12）

除了下层阶级的购买力，除了下层阶级购买超出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以外，还必须提及庞大的英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就其出现时间之早来说，可谓卓越非凡，其中包括商人和店主、制造商和金融家、法律界和其他职业的人员。丹尼尔·笛福，作为极具想象力的小说作家而名声卓著，也曾写过妙趣横生的旅行见闻和清晰卓绝的经济性短文。他目睹了自己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他写到英国消费者的时候，他告知我们的比起任何一位无聊的官员还要多：

“基于这两类人，即制造业者（并非雇主，而是参加手工业劳动的那些人）和店主们，我才把自己提出的假设奉献给公众。正是靠了他们以自己过去或以自己职业中的勤奋所得的收益，并且靠着他们难以想像的人数之众，我们自己的产品以及从外国进口到这里的产品的国内消费，才变得如此特别巨大，以致我们的贸易才提高到了这样一种蔚为壮观的规模，正如我所发现的情况那样……

……是他们这些人提高了大家的消费总量；是这些人使得大家的市场在星期六开到很晚，因为他们通常很晚才领到自己每周的工资……他们的人数不是数以百计或千计，也不是数以十万计，而是多达几百万人。我看，正是由于他们人口众多，才使贸易的一切车轮都得以转动，包括制成的、加工的和适合国外市场的陆地和海洋制品和产物；正是由于他们的巨大收益，他们才得以供养自己；正是由于他们人口众多，整个国家才得以供养自己；靠着自己的工薪，他们才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而且由于他们那种奢华的、大方的、潇洒的生活

方式，国内消费，亦即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国外产品的消费，才取得如此大幅度的增长……”（13）

高消费对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打动了当代的人们，而英国的发展则使更多的人感动。不采取凯恩斯经济学方针，法国商人就体会到机械化导致了高工资，高工资导致了对制造品的更大需求，而有效需求导致了更大的繁荣。“因此，借助于一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制度的运作，英国人通过消费而变得富有。”（14）确实是自相矛盾：这种消费开支习惯有悖于倡导勤俭节约的群众智慧，符合法国农民情趣的勤俭节约习惯被迫让位于贪得无厌。其后果之一就是产品要瞄准庞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并且要侧重生产出价格适中的标准化商品——正是那种需要借助机器生产的商品。比安库尔侯爵写道：“英国人具有为其人民而不是只为富人进行创造的才华”，这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博大而坚实的习俗。（15）

这种习俗近期已经引起巨大的关注，不仅由于其自身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个橱窗，来展示技术变革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作为消费者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6）这种研究表明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市场，它销售各种各样的织物、服装、钟表、金属器具、钉针之类以及难以备述的小玩意——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指的是超越生活必需品、专门迎合美容和妇女小提包应用的那些个人小件附属品（梳子、松紧带、纽扣、饰物）。其中不少都曾经是半耐用品，在遗嘱中或是作为礼品而互相传送。它们的量的增加不止是反映了收入的增长，而且也反映了分配的加快和制造技术的更新（劳动分工、重复运转的机器、优良锉刀），从而降低了成本和价格。

无须说明，这种生产虽然大体上是针对国内需求的，但其产品也销往海外的种植园、殖民地和各王国。（价值高而小巧玲珑的物品最适合于走私。最好的例证是手表。）欧洲大陆上的小城镇和较为偏僻的市场，过去曾被留给了当地的手工艺人，此时却被不倦的小贩频频光顾，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了过来。有保守思想的人对这些闯入者很是反感，不仅因为他们带来了竞争和他们的奇风异俗（不少商贩是犹太人），而且还因为他们对秩序和道德构成了威胁。德国的道德学家

默泽尔在18世纪下半叶写书评介威斯特伐利亚北部的奥斯纳布吕克地区发展史的时候，斥责了这些行商的厚颜无耻。他们趁人家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这对家长权威真是可悲啊），来到村舍的门前，兜售头巾、梳子和小镜子一类无益而破费的玩意儿，来引诱主妇上当。白雪公主式的故事：狠毒的后妈变成了一名狡黠的商贩（这是她在故事中变成的），而公主虽是一个成年人，却像小孩子似的容易受糊弄。

(17)

有些善行终得善报

在准许外人入境问题上，英国大体上摆脱了当时紧紧缠绕多数欧洲社会的那些不合理的限制。其中最蠢的就是宗教方面的限制：[\[122\]](#)例如法国迫害新教徒，把他们驱逐出境（1685年撤销了亨利四世的“默许异教特赦令”）；又如许多地方都从各行各业中广泛地排斥犹太人，部分（心理方面）的原因是恐惧和仇恨，部分（制度方面）原因是行会具有基督教性质，此前的驱逐行动也有延续的影响。此外，宗教并非手工业行会和贸易行业接纳人员的唯一标准。例如，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只有“体面的父母在纯洁的情况下所生的”男子（日耳曼人更优越）才是合格的。[\(18\)](#)（有些学者力图无视这种歧视行为的经济后果，好像对于每一个被排挤的人，都有某个同样是品质优良或聪明能干或富有经验的人正等待予以替代，又好像这些偏见和仇恨的受害者对于热切的竞争者来说并不是知识和技术的可贵拥有者。

[\(19\)](#) 我们无需严肃地对待这种故作聪明的言论；它们在逻辑、在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一点上，英格兰却从别的国家自己造成的伤痛中受益匪浅。在16世纪，来自荷兰南部的织布工到英格兰寻求避难，带来了织造“新摺饰”的秘密，而荷兰农民则给英格兰引进了排水和进一步精耕细作的技术。在17世纪，犹太人和隐瞒身份的犹太人[\(20\)](#)，其中不少人是在西班牙等地受迫害的第三和第四期马兰诺，[\[123\]](#)把公私理财的经验带到了英格兰；而胡格诺派教徒，包括商人和手工艺人这些做

生意和理财的老手，把他们的宗教和家族关系一同带了过来。（21）

时间的价值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保留了原先的一些结构和制度，例如君主制、行会、种种仪式和服装样式，但在经过一个长时期以后，把它们降到了次要地位，使它们变为一些徒有其表的形式。就其保留权势和威严的作用而论，则是一种累赘。它为我们提供了简·奥斯丁那个时代的让人怀念的社会（我们的怀旧情结）：那是一个乡村上层和有闲阶层的社会，一个继承人、非继承人和卑鄙阴谋家的社会——那些觊觎非分之财的人的社会。那是一个拥有相当吸引力的社会，静待那些疲惫的、无能为力又精细的社会缝隙寻觅者进入平凡的天堂。

然而，行动却发生在别处；行动起来的是一些新人，弃旧图新的地主，由贵族变成的企业家，从外省和外国迁来的移民。这个社会的能量和忙碌不仅可用其物质成就来衡量，而且还能够用其价值观念加以衡量。在此，我想着重说明它对时间和节约时间的重视，因为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能更好地安排事情的轻重缓急。这里有两项“不显眼”的佐证：（1）对了解时间的热切兴趣；（2）对运输速度的强调。

英国人在18世纪，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世界领先的计时器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点十分不同于欧洲的其他社会）。他们所生产的计时器质地优良，价格昂贵，同时又批量生产、廉价销售，必要时则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加以促销。他们还偷盗计时器，然后再把它卖出去：如果你买不起一只新表，你可以从一名销赃者手中买上一只旧的。没钱的（而且正直的）但想拥有一只怀表的人，大家凑钱买一只，然后抽签决定谁有享用它的权利。

马车客运业对这种时间敏感性作出了反应：时间表精细到以分钟安排，大做广告；到站和转乘车次的时间精密计算；车夫是否遵守时间表受到密封的钟表的核查；重视速度胜过舒适；累死了许许多多的马匹。在这一点上，请注意同法国的明显差别：在法国，政府限制了

马车速度，而且为了保护道路，要求使用行驶起来沉重而又缓慢的宽缘车轮。乘客们显然不在乎。他们喜欢省钱甚于节省时间，而且十分正确地发现速度同舒适是矛盾的。但法国也是在变化中的。正如一家马车服务社在1834年（在进入铁路时代的前夕）所说，“更快的速度同某些基于方便有时是健康的原因而不可或缺的需要是不相容的。人们即使远离家园也不再中途停下来用餐；即使在换马驿站也不下车，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中途停车。那么，是不是过分了呢？“妇女、儿童、上了年纪的人受不了这种制度。”（22）

为什么不是印度？

为什么印度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毕竟，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候印度具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棉纺业，其质量、品种和成本都无与伦比。这种棉纺业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国内需求，而且把它产量的一半左右出口到整个印度洋区域并且间接出口到东南亚和中国。从17世纪开始，这个巨大的市场受到欧洲需求的刺激。它是一针强力兴奋剂，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旧的供应问题并且造成了新的供应问题。那么，为什么人们没有兴趣用资本（机器）来替代劳力的方法来减轻这种困难呢？

印度历史学家往往忽视或拒绝谈论这种缺憾。有些人，尤其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为此而责怪欧洲人，特别是责怪英国人：这些入侵者猛然跳上舞台，参与印度的政治并且煽动了冲突，而在他们这么做之前，印度本来是繁荣和富有财力的。某些这样的推测是一种幻想，是对这个问题的误导。例如，有一位历史学家着眼于17世纪印度的皇家作坊，一厢情愿地猜想它们本来会引起一场技术革命。他说，“人们禁不住要推测，设若（这些作坊）不曾因为英国对这个国家的征服而终结，它们会不会朝着机械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变成印度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样板工厂。”（23）在那些作坊能够随意购买或控制劳力的体制下，能有这种可能吗？

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方法是问一下“cui bono”，即谁能受

益？谁会从机械化和改造中得到好处呢？这涉及三个利益集团：工人（纺纱工和织布工）；中间商，他们照例是向织布工人预付资金以换取交货的承诺；欧洲贸易商和特许公司，他们要既为本国（亚洲内部）贸易也为欧洲的顾客而收购。

指望从第一个集团那里获得要使用资金的技术革新似乎是毫无道理的。工人们具有明显的利益来得到原料（对纺纱工来说是棉花纤维，对织布工来说是棉纱），但在这一方面他们只能依靠中间商人。他们既不具备控制的手段，也没有控制的习惯。一位著名的印度经济历史学家谈到1630年织布工为抗议英国对棉纱的竞争而发生的“暴乱”，认为那是一次例外的事件。他继而说道，“这种反抗的例证并不多见，而且必须同下述事实一道加以理解，即：商人们的奴仆使用马鞭子抽人已被多数工匠认可，把它视为一种生活中的正常现象。”

（24）

如果要采取技术变革的行动，那么，它只会是由印度的中间商采取，他们既有利可图，而且其中有些人也有手段；或者是由欧洲的特许公司来采取。然而，两者谁也没有动一动。

为什么他们不动呢？有些解释的根据是能量守恒的固有定律。劳力的供应有伸缩性，所以雇用额外工人比起探求技术革新更容易、更划算，例如可以从贱民和贫困妇女中间雇用纺纱工，从农业劳动者中雇用织布工。这很可能就是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25）此外，出现预料不到的需求的高涨时（需求当时是分割的，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纺织品），能够依靠市场之间调配商品来加以满足，例如从国内市场调往国外市场，从一个国外市场调往国外的另一个市场。

甚至有可能——虽然十分困难——使大批的工人“聚集一堂”（在一个地方），使他们在监督之下劳动。这正是外国贸易公司努力要干的那类事情，作为保证及时完成任务的办法。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使用燃料的行业或在造船等集体作业中，这种集中产生了规模经济和材料的节约，因此，技术变革以组织创新的形式出现，并不是不为人知。但是，这种企业依然是例外；“小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单位保

持了其首要的地位。”（26）

金属制品——工具、设备、机械——则当做另论。它们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而印度当时并不具备。“在印度，人们很少试图用机器去完成任何可以靠人力做成的事情。”（27）这种“普遍冷漠”的一个原因是：似乎谁也没有浓厚的兴趣来简化和减轻工作任务。工人和雇主都把繁重的劳动认为是工人的命运而且理应如此。此外，分割促进了这种冷漠，因为找寻、调集和送交原材料并不是棉布商人的任务，他们只预付资金，其余的工作都由织布工和纺纱工来完成。这种情况同欧洲实行的手工生产发包制有重大不同，在欧洲，商人参与生产的过程。

所以在印度，最终买主同补偿手段割裂开来。工人做着他一直所做的事情，商人也是一样。荷兰人的记载告诉我们，印度商人们把织布工们“拴在一条短皮条上”，束缚得很紧，让他们干完一天活才给发一天工资，以致工人们不能提前领钱就走掉，大概也不能携带货物逃跑。（28）有些商人雇用代理人来监视织布工，检查他们的进度。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总是把商人的预付资金在完成任务前用光的织布工把自己织成的布卖给别的买主。我们听说，代理人往往进入织布工的住宅，即使布还没有全部织完，也会把布从织机上割下来。因为如果晚一天，布就可能不见了；拿到一匹布的十之八九，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一些。

欧洲的公司则学会了适应这种不正常行为。销路有时不佳，但是印度人和欧洲人似乎都把这种损失看做是生活的真谛。就像贱年一样，这也会过去的。这种手工业似乎只是悠闲地信步前行，这并非不合理。（决定手段是否合理的是目的。）例如，在科罗曼德尔（东南沿海地区），原棉从内地运往沿岸及附近的纺纱和织布村庄靠的是成千成万的笨重的牛车，全部杂乱地排成密集的纵队，一边蹒跚前行一边喂食，一天只能前进几英里。由于这种艰苦跋涉需要跨越大概300多英里，交付货物得花去半年左右的时间。（29）

与此同时，欧洲各公司本身采购和装运的节奏也反映出海运和获

取资金的不规律性，更不用说供货中的起伏。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孟买装运纺织品的资料表明历年发货量有巨大的差异，从一年几千件（有一年为零）到接近一百万件。（30）这些欧洲公司的对策是保持大批存货，选择自己拍卖的时机，以对付欧洲需求中的起伏。（它们在印度的代理商和供应商同时竭尽全力来相应“截留”惯常以亚洲市场为目的的发货。）所有这一切都是代价昂贵的，但比起技术改造却要便宜一些。

此外，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对印度的棉纺业进行直接援助从政治上说是不明智的。英国的棉纺业会把这种做法看做一种卖国行为。接近17世纪末的时候，有位小册子的作者谴责商人们向印度输送“织布工、染布工、捻丝工以及丝绸”。他警告说，如果这么做，“我敢肯定我们将会足够的棉布和无赖足以使其成为一种时尚，也将会有足够的傻瓜去穿它。”东印度公司赶紧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31）东印度公司经常被当做硬币和条银的出口商而遭受攻击；它不想再被人说成是出口工作岗位而遭到额外的羞辱。

最后，印度关于机械化的思想能够从何处来呢？印度社会确实经历过技术变革；在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用转轮来代替绕线杆（但不是用于最细的薄纱纱线）。但是，革新是发生在常规的手工操作范围以内的，而机器和手工工具之间存在着重大的观念性和社会性差异。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区别通用工具和专用工具：印度的工匠不管技术多么熟练，还没有走上通往机器操作的道路。梅杰·伦内尔是孟加拉第一位总供应商。下面是他在1761年参观孟买造船厂时说的一段话：“……工作是由印度工匠来完成的。他们被监视着仅使用两种有用的工具，虽然他们的工作持久和整齐。”（32）一切功夫都在手上，而且更多的是用手摸而不是用眼看。这在一个不具备矫正视力的眼镜的社会中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尤有甚者，印度手工艺人不使用铁，而铁（以及钢）是精密工作不可或缺的。那是一个不含铁的社会。在这方面，有一位印度历史学家做了这样的对照：波斯的灌溉技术应用的是铁轮和铁齿轮装置，而印度的灌溉系统使用的却是木头、绳索和陶罐；他像一位可替

代论的忠实信徒，用经济学词汇解释了这种差别：“……一件效能低的工具也能够通过雇用廉价的技术熟练劳力而用来制造出同样的商品。”（33）他或许也曾经注意到印度没有螺旋工具，所以金属制造工无法割断较粗的铁丝；而且铁钉十分罕见。这些工具的缺乏就影响了造船业。欧洲的舰船用小铁钉铆，用大铁钉加固，而印度船只却用绳索把板材捆绑到船体上，并且开凿槽舌把木板头对头用胶粘合在一起。（34）

这种手工操作模式最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非欧洲的匠人不能制造像欧洲那样良好的钟表。他们有“无可比拟的灵巧”的双手，却没有工具。他们能做出非凡的成绩，例如在制造滑膛枪方面。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名叫哈吉·穆斯塔法的法国人曾经写道：“即使如今在1786年，一位法国人马丁上校在英军中服务长达20年期间功勋卓著，在勒克瑙拥有一家工厂，那里生产的手枪和燧发枪在枪机和枪管方面都优于来自欧洲的最精良的火器。”（35）然而，这些天才的匠人却把每一件产品都制造得各不相同，因为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利用器械进行工作。当上面提到的那位克劳德·马丁上校——他是东印度公司最富事业心的代理人之一——想为自己买一块手表的时候，他派人去了巴黎，从法国最优秀的计时器制造商路易·伯骚那里买了一块；而且他经常向奥德的客人及其他印度顾客出售钟表，也都是从欧洲进货。他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进货呢？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在这方面毫无作为。（36）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没有发展用机器生产的构想。这样一种飞跃所产生的结果会是改变人们自童年就受到培养的手工技巧，而手工技巧又牵扯到种姓身份以及按性别和年龄进行的劳动分工。这样做还会需要超出印度文化和学术经验以外的想像力。正如绍德赫里所说：“在18世纪的印度，进行工业革命的经验基础显然是缺乏的。许多世纪以来，在科学知识方面它没有显著的进步，而且对于继承下来的技巧进行扩散和系统记录的学术机制也是有严重缺陷的。”（37）

到了19世纪情况依然如此：从事印度铁路建筑的工程师们了解到，印度劳力虽然价格低廉，却是用手来搬运土和石头；但是他们却

想当然地认为印度人会使用手推车。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印度人习惯于把沉重物品用筐子盛上，顶在头上进行搬运，并且拒绝改变。我们甚至看到过一篇报道，说印度劳工把手推车顶在头上而不用轮子去推。可以想像，这种阻力反映出一种分散任务、增加就业的愿望，对妇女儿童来说尤其如此。（38）一如前述，欧洲的工人非常不同，他们若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获得更高的工资，会求之不得；更不用说还减轻劳动强度了。[124]

注释

1 .请参照Ohkawa and Rosovsky, “A Century of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以及Haya-mi and Ruttan, “Korean Rice, Taiwan Rice”两文中关于农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贡献所作的分析。

2 .关于市场园艺，请参考F.J.Fisher,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一文。

3 .一些历史学家往往强调那些物质上的限制。例如，里格利把煤炭强调为关键要素。他在《人民、城市和财富》一书第90-91页中说：“在（亚当·斯密的）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工业生产可能规模的一种极限。这一极限在于：多数工业原材料是有机物，在这种情况下以不变的或是下跌的价格扩大原料供应是困难的。当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极限就消失了。”关于把运输强调为关键要素的见解，请参考Szostak, *Role of Transportation* 一书。

4 .关于经济史中的偶然性和机遇的问题，请参看Landes,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一文。该文部分地是对尼克·克拉夫茨著名的、或许是蓄意挑起争论的文章的回应。克拉夫茨的文章“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是论述预期或然性的问题。

5 .对于这一点，有些人会提出很多问题。有些人——过去比现在多——争辩说最富成效的经济是由上面指导的经济。这样一种指令性经济意味着政府占有盈余资金，更有利于按照预先规划对其再投资。

也有人主张说政府能够比市场更好地完成某些事情。但讨论这些问题，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而且别的人已经写过了。请参照Kuttner, *Everything for Sale* 一书。

6 .在这方面，最好的讨论之一是Liah Greenfeld, “The Worth of Nations”一文第580页及其他若干处。请再回忆亚当·斯密根据国力为航海法所做的辩护——见*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2。

7 .请参照Berend and Ranki, *European Periphery* 一书第66页，关于东欧、东南欧各贫困和不发达社会中政府行为所受到的限制；以及Batou和David, “Nationalisme économique”一文第6页，关于在19世纪波兰缺乏足够广泛的“社会共识”。

8 .引自*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5, “关于谷物贸易的题外话”。

9 .见Macfarlane, “On Individualism”一文。乡村中的手工业：我们已经说明了向农村发包的做法把先前未利用的或未充分利用的劳力带人生产的重要意义。对制造商来说，这种劳力价格低廉而且可以获利；对于农村庭院手工劳动来说，这种新的工作机会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请参照Faujas de saint Fond, *Journey Through England*, 第I卷。1778年，有一位法国的工业制造品检查官反对把纺纱机械引进法国，因为它们会妨碍庭院手工业的普及；他对经济发展的关心不及对农村人口收入的关心。见Wadsworth和Mann, *Cotton Trade* 一书第504页注2。

10 .引自Fortescue, *Governance* 一书第114-115页。请比较约翰·艾尔默主教在一个世纪之后所表述的类似情怀，见于Fisher, 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第12-13页。

11 .关于这种情绪的重要意义，请参阅Greenfeld, “The Worth of Nations”一文。

12 .请参照Crouzet, *De la supériorité* 一书第5章所载“从18世纪

的法国看英国人致富的源泉”以及该书在第488页到493页所提供的其他资料来源。亦请参照Lacoste, *Voyage philosophique*, I, 93; Chantreau, *Voyage*, I, 7; 以及Moritz, *Travels* 第31页及其他。

13. 见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一书第76-77页。

14. 见Crouzet, *Dela Supériorité* 一书第115页引述J.迈耶著《18世纪下半叶的军备供应》(1968年巴黎版)第252页。另见Crouzet, “Les Français”一文第28页。这段话的日期是1792年。关于高消费和工业化(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请参考de Vries所写的重要文章:“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5. 关于比安库尔, 请见Crouzet, *Dela supériorité* 一书第115页。

16. 请参阅Mc Kendrick, Brewer和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Hopkins, *Birmingham*; Shammas,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Weatherill, *Consumer Behaviour*; Berg, ed., *Markets and Manufacture*; Berg, *Age of Manufactures* (2d ed.)。

17. 请参照Muller, “Justus Møser”一文第170—171页。

18. 关于哈布斯堡皇帝试图通过1731年的一项有争议的政令来纠正这种谬误的努力, 请见上述Muller一文第162-163页。

19. 例如见Warren Scoville, *The Persecution of Huguenots* 一书。

20. 关于这些顽强的却又经过了淡化、乐于迅速同化的犹太人, 请参阅Endelman, *Radi-cal Assimilation* 一书第9-33页。

21. 请对照Crouzet, “The Huguenots and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一文, 载于Higonnet et al., eds., *Favorites of Fortune* 一书第221-226页。

22. 见Studeney, *L'invention de la vitesse* 一书第184页。

23 .见Fukazawa ,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一文第314-315页。

24 .见Raychaudhuri ,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一文第286页。

25 .例如, 雷绍德赫里在上述同文第295页中写道: “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 那么, 就印度的情况来说, 其压力却是不明显的。”

26 .同上, 第286-287页。

27 .见F.Buchanan , *A Journey from Madras* (1807) , 引用于雷绍德赫里上述同一文章第291页。雷绍德赫里同意这一看法。

28 .见Brennig , “Textile Producers”一文第86页。引文是他的原话。

29 .关于这种班贾拉(一个游牧种姓) 车队, 请见Habib , *Agrarian System* 一书第62页以及Brennig , “Textile Producers”第68-69页。如同布伦尼格所写: “时间不受重视。”

30 .见Chaudhuri , *Trading World* 一书第540-541页附件5表C.20。

31 .见Wadsworth and Mann , *The Cotton Trade* 一书第117页。

32 .引自Spear , *The Nabobs* 一书第75页。请注意: 印度的造船商十分有名, 不仅为当地客户而且也为亚洲其他地区的客户建造船只。欧洲人几乎是完全依赖他们,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优良(柚木比栎木要好) 、成本较低, 而且是因为当欧洲建造的船只到达印度洋的时候已经处于用旧了的状态。

33 .引自Habib , “Potentialities”一文第63页。

34 .雷绍德赫里在“非农业生产”一文第292页中说印度的造船木工“铆接”(riveting) 木板并且说这种方法比欧洲的捻缝方法要优越。

这是对“槽舌接合法”（rabbeting）的误用吗？关于印度的造船技术，请参阅Barendse，“Shipbuilding”一文及Bhattacharya，“A Note on Shipbuilding”一文。在欧洲，用铁的做法由来已久。Gimpel，*Medieval Machine* 一书第65-66页中列举各地保存的铁钉的数目和种类：1390年加莱保存有50万枚；1327年约克城堡保存有十几种尺寸的数万枚（还列出各种铁钉的价钱）。按照用途对铁钉限定分类表明了这种技术的精致。

35 .见Kuppuram，“A Survey of Some Select Industries”一文第46页。

36 .Habib，“Potentialities”一文第62页及注4中援引J.Ovington，*A Voyage to Surat in the Year 1689*（伦敦1929年版）一书第166-167页。奥文顿说，印度工匠感到制造钟表很困难，因为灰尘总是塞满齿轮。此说难以置信。这可能曾经是个问题，但利用印度的技术不是无法解决的。至于中国当时的钟表，它们都是些欧洲产品，的低劣仿造品。克劳德·马丁遗留下的大批产业现今仍资助着在勒克瑙、加尔各答和里昂的一些以马丁命名的学校。有关他的情况，请参考Landes，*Revolution in Time* 和*L'heure qu'il est* 两书。

37 .引自Chaudhuri，*Trading World* 一书第273—274页。请参照Bernier，*Voyage dans les états* 一书第168页。

38 .见Kerr，“Coloni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一文第95—97页。克尔把印度的选择视为十分合理的，但合理性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的一种功能。

第16章 追赶英格兰

英格兰成为超级大国也许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对重商必要性的一致，政治制度的变革并没有影响其海外贸易。而散落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德意志、俄国……因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影响落在英格兰的后面，追赶中英格兰成为它们的头号敌人。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听说，人类是出自同一渊源的一个动物种群：今天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和身高如何，都衍生自一个大约几百万年之前从一个更大的人科种属中分裂出来的共同祖先。工业社会的分蘖也是如此。一切范型，不管多么不同，都是从英国这个共同的先行者那里衍生出来的。

英格兰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以及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于力量的原因，如果不是由于财富的原因，政治经济的目标和任务受到改变。于是，世界分作了一个领先者和一大批极不相同的追赶者。对于欧洲“追随者国家”中最快的国家来说，大约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追赶上（见表16.1）。

某些“新经济史”的从业人员为法国18世纪商业和工业增长幅度所迷惑并且对其虚夸的数字感到印象深刻。他们争辩说英国在工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具有某种偶然性，而且工业革命本来也可能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轻而易举地发生。因为法国毕竟是一个更大、人口更多的国家，总体上具有更大的生产规模，在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上同英国大体上相等。另有一些人则遵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优先论证的方法，争辩说英国在工业技术和生产率方面领先一步对于别的国家来说没有影响，因为每个国家毕竟能够而且愿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能够而且愿意按照最优惠的条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25]如此说来，如果英国能冶炼出质地更好、价格更低廉的钢铁，又怎样呢？人们可以用里昂的丝绸和波尔多的葡萄酒作交易，并且可以从这种交易中获得更

好的收益。 (1)

表16.1 一批国家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估算
（按1960年美元价格）

	1830	1860	1913	1929	1950	1960	1970
比利时	240	400	815	1020	1245	1520	2385
加拿大	280	405	1110	1220	1785	2205	3005
捷克斯洛伐克	—	—	500	650 *	810	1340	1980
丹麦	225	320	885	955	1320	1710	2555
法国	275	380	670	890	1055	1500	2535
西德	240	345	775	900	995	1790	2705
意大利	240	280	455	525	600	985	1670
日本	180	175	310	425	405	855	2130
荷兰	270	410	740	980	1115	1490	2385
挪威	225	325	615	845	1225	1640	2405
葡萄牙	250	290	335	380	440	550	985
俄国 / 苏联	180	200	345	350	600	925	1640
西班牙		325	400	520	430	640	1400
瑞典	235	300	705	875	1640	2155	2965
瑞士	240	415	895	1150	1590	2135	2785
英国	370	600	1070	1160	1400	1780	2225
美国	240	550	1350	1775	2415	2800	3605

资料来源：贝尔洛赫著《国民经济差异中的主要趋势》，载于贝尔洛赫和列维-利博伊合编《经济发展中的差异》一书第10页。

*已由贝尔洛赫教授校正。

这就是理论。当年掌握欧洲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们没有接触过这种逻辑；即使他们接触过，也不会放在心上。他们总是把产业进步同权

力联系在一起。

英格兰的物质和社会进步不可能不引起商业和政治对手们的注意：首先是西班牙，它曾企图入侵并且主宰英格兰这个生气勃勃的岛国，结果栽了跟头；其次是荷兰，它发现英国这个小小的觊觎者在贸易方面超过了自己并且在公海上打败了自己；最后而且一贯的是法国这个古老的敌人，它比英国更大、人口更多，觊觎着欧洲霸权，却连连在海军实力、财政力量和商业开拓方面输给了英国。有些法国人想给自己的政府树个榜样，以羡慕的口吻写到英格兰。法国地方法官兼经济学家布阿吉贝尔（1669-1714），在17世纪末写道，“不管在土地的数量还是在出产方面，英格兰都不足法国的1/4.....而英格兰却能够在过去的三四年里为奥兰治亲王 [126] 增加了8000万古银币（即300万英镑）的收入，而且这样做并没有使它的人民沦为乞丐或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2）

另外有些人则怀着恐惧写文章，不仅把英格兰视为他们国家的敌人，而且把它视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商业大国。因此，法国外交部首席秘书在为促成签订《乌德列支条约》（1713年）的谈判做准备时，警告他的上司不要让英格兰在太平洋获得立足点。譬如，假设有人容许他们在智利的近海获得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一个亘古冷僻的地方，曾吸引笛福而成了《鲁宾逊漂流记》的背景原地——那么，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今天它有多么荒凉.....一旦到了英国人手里，人们会看到不出几年那里就会有大批的居民和建成的海港，成为欧洲和亚洲制造业的最大的聚散中心，然后英国人会把制成品推销到秘鲁和墨西哥的王国.....从那些国家的矿产中收取价值6000万的金和银来作为他们工业的目标和回报。这个国家在贸易方面如此熟练，在船只方面如此力量雄厚，作出努力为自己从美洲取得这种巨大收益，有多么容易！.....而且，法国使自己的装饰品、自己的丝绸、自己的亚麻织品失去这样一个市场，将会是个多么重大的损失！因为，由于英国不制造这类物品，他们会从中国和东方购买它们，而且当这个岛国致富并且确实变成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法国就会变得衰落

了。(3)

背信弃义的英格兰怎能变成超级大国！时至今日，尽管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般的法国人仍然认为英国是他们国家在欧洲的头号对手和敌人。人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阿让库尔和圣女贞德。[127]

当然，法国人的这些谴责是对英国人的成功的无意识的礼赞。如同我们看到的，法国人看到英国人跑在前面，感到特别不是滋味。他们把经济成长和财富积累视为政治权力的关键，而且正确地把英国人在欧洲及海外的战斗中获得的一连串胜利同英国人能够动员的各种资源联系在一起：无数的舰船（他们有10万多艘，而法国只有2万艘），还有数不清的海员。有些法国人甚至想象英格兰是个没有内陆的海岛，尽是些海岸和港湾，是个没有农业种植者的国度，完全由水手和城市居民组成。另一些人，和布阿吉尔贝尔一样，震惊于英国的财富、皇家的岁入以及借用国内和国外资源的能力。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同贸易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伏尔泰以他所特有的超脱态度写道：

使英格兰变得强大的是下述事实，即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各方面已经就重商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那同一个国会正在忙于分配海外贸易的职位，仿佛任何事情也没发生。查理一世的鲜血还依然淌着，而这个几乎完全是由怪人组成的国会却通过了1650年的航海法。(4)

同法国的格言相反，理解并不一定就是原谅。英国的商业保护主义，甚至连英国更多的成功，都引起了更多的反感而不是敬慕。1698年，路易十四给他驻伦敦的大使下达指示说：“平等的守则对贸易来说十分公正而且必要，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英格兰那样受到藐视。”(5) 另一些法国人也有同感。有一个法国人甚至抱怨说，虽然英国人对公平竞争轻蔑到如此程度，但是他们还企图阻止外国人走私禁运物品。(6)

总的来说，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都谴责英国人的贪婪和实利主

义。大约在1800年，有一位德国旅行家写道：“荷兰人臭名昭著的贪婪在英国人的贪婪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就像灯前的阴影。”（7）还有一位法国来访者米拉博男爵说道，“英国人习惯于对一切都进行计算，甚至也计算起天赋和友谊……”

（直到今天，法国人都喜欢认为并且向别人佯称他们并不在乎金钱。他们并非独此一家：理想主义总是一些人故做的姿态，因为这种人感到自己所得的总比应得的少，在比自己富有的人面前就做作起来。18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陆的观察家把英国人视为十足的实利主义者。100年之后，美国人变成了新的羞辱目标，而英国人则在谩骂这些新暴发户的时候加入了昔日批评英国佬的那些人的行列。）

简言之，人们不能信任这些英国佬。（8）有些法国人比古讲今，聊以自慰：英国是“现代的迦太基”；法国则是罗马的传人。说到家，一个由没有根基的商人（店主）组成的岛国不可能以坚实的、陆上的王国形式支撑多久。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为权力和财富而竞争的欧洲社会中，英国从18世纪伊始就变成了竞争的主要对手。别的国家派出了使者和间谍去探明他们能够学到些什么样的英国技术。商人和工业家参观访问了这个岛国，借以察明他们能干什么。各国政府则竭尽全力使用一系列通常调动积极性的办法来激励企业：各种补贴、垄断特权、减免税收、分配劳力、贿赂等等。这种努力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部分的原因是这种鼓励本身由于其不公平性而阻止或延缓了技术的扩散；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后进的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学习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此外，正当大陆各国领悟到英国先进的程度而且正从重要的棉纺制造业获取到初步效益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政治动荡，中断了交流并且斗出了个“暂停”。当然，这也并不绝对：和平的间隙，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容许英国佬和大陆的竞争者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例如，荷兰南部（根特和韦尔维耶）以及法国北部引进了机器纺纱技术。然而，革新必然是星星点点的，而且这种工艺是已经过时的。直到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使战斗完全终止，欧洲才得以继续它追赶的进程。（正因为如此，在巴黎没有任何街道被命名为“滑铁卢”，也没有

任何街道被命名为“拿破仑”。)

卡尔·马克思把英国的经验视为合乎历史逻辑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有自身的规律：“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9)

此说法既对也不对。在较大的、比喻的层面上——亚当·斯密所说的“富裕的自然进步这一层面上”——马克思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变革的时机选择、构成和方向上——他是错误的。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它允许理智和市场居统治地位，那么，它的经济发展就会遵循能最大限度利用其手段的那种道路。因此，一个煤炭丰富的国家会发展燃料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并且采用一个贫煤国家所避免采用的技术。一个国家缺乏煤炭但富于水流，一有可能就会依靠水力而不是蒸汽机。

(诚然，这种物质限制的力量会因技术而有所不同：例如，如果本国缺煤，又由于运输成本高而难从外界输入燃料，就会受到更大得多的限制。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法国的冶铁工业由于矿物燃料成本过高而受到严重妨碍，直到建成了运河和铁路，这种限制才得到了缓解，起码是部分地得到了缓解。200年之后，韩国的炼钢厂家把炼焦煤从美国宾夕法尼亚西部运至大湖区，再装船沿圣劳伦斯河运至大西洋，然后再用船通过巴拿马运河横渡太平洋，费劲不小。时代不同，手段不同，可行性也不同。与此同时，距离炼焦煤产地仅有几英里之远的匹兹堡炼钢业却濒临灭绝。成功的工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廉价的原材料。)

因此，我们没有统一的顺序，没有单一的道路，没有发展的规律。每一个后起之秀的工业化了的国家，亦即所谓的“仿效国家”，不管它受到英国经验的多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启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震惊或恐吓——都拓展出它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是如此，今天就更是如此了。一切取决于时机。现代技术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变化，而仿效的任务和手段也随之变化。今天

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跳越当年英国人几十年才走过的阶段和过程：为什么它们要去重复它们不必要去重复的东西呢？（10）

上述这一切都并不是说英国人的经验无关宏旨。人们必须分清目标和过程。19世纪竭力要把自己的国家推向工业化的各国政治家们，都把英国的原型摆在面前，不管是作为榜样还是作为反面典型。为了明了他们和这个过程，人们必须知道其出发点及其目的地。当然，历史学家自有其特殊需要：只要人们不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一个理想的典型总是具有启发性价值的，即便是仅仅作为一个测量用的棍子和反例证。（11）

从采用机器的水平来看1815年的欧洲地图，应该给那些已经从事制造业而为更广泛的世界经济提供商品的国家和地区打最高分。我之所以用“地区”这个词，是因为这些工业区域中有一些是叠盖着国境线，其本身不是固定的和长期存在的，而且还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是不同成分组成的。 [128] 确实，这种暂时的差异（似乎它们是生存在不同的时代）构成了经济准备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在商品还是在观念方面，都长期生活在同交流的潮流相隔绝的状态之中，还大体上原封未动地保持着较古老的农业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结构。对这样的国家和地位，应给予最低分。

机器应用水平最高的社会，分布在欧洲大陆西北部的扇形地区：法国，低地国家，莱因兰，瑞士的新教行政区以及这一扇形地区之外的西班牙东北角（加泰罗尼亚）和波希米亚。可是自西往东，跨过易北河到东德意志、奥地利、波兰和俄罗斯，再向东南进入古老的奥斯曼帝国领地，向南到达地中海沿岸（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和那不勒斯王国），机器应用水平就下降，有些地方还是陡然降低。有一位经济历史学家谈到那是一个“发展的斜坡”，向下倾斜的陡坡，并且引用另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并不委婉的话说：“向东走就像逆时代而行，或说是逆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行；在东欧和俄罗斯，工业中心都是处于农民怠惰和官僚迟钝的大漠中的绿洲。”（12）

我们这位评论家在这里所指的，是我所称为的“中世纪的遗

风”——欧洲的（以区别于英国的或美国的）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封建主义”。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持续时间更久。换言之，这也就是“旧体制”。^[129]它是包括风俗、法律、行为、态度以及价值观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合成物，是数百年的积淀。但为了本书分析起见，有三个方面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农民的地位

在中世纪，多数农民沦落到（对于奴隶而言则是上升到）受奴役或农奴的境地。典型的情况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未经领主允许不能自由离开。农奴制有时还包含着农奴对农奴主的个人的、“肉体上的”依附。所以，领主可以到处调遣农民，而农民即使获准离开，也要继续承担贡赋。

在西欧，在中世纪的中晚期，这种依附关系松弛了，部分地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和地主对外国货越来越大的欲望使得他们把劳役换成货币租金，更多地则是因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退出领主制度的理由。到1500年，英格兰、法国、低地国家以及西德意志已经很少再有古老意义上的农奴。这种进程在英格兰前进得最远，因为在英格兰土地由自由民或者自由佃农耕种；农业劳动者本身常常只拥有不足以养活自己的小块土地，需要的时候就受雇于别人。法国和别的国家除了超越或附加在商业性租金之上的向领主交纳贡赋的地方残余和广泛存留之外，落后的距离并不太大。法国大革命一举在法国及其吞并的地区废除了这种残存。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停止付出；他们只不过是获得了新的领主，就是政府，而且他们的贡赋变作了税金。领主们的损失没有得到赔偿，这被看做司法过当。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农奴制的性质表现出差异。在易北河以西，它近似法国的做法：通常是货币租金加对领主的贡赋，极少或者没有劳役，而且有迁徙的自由。易北河以东则是庄园奴役和人身（肉体）苦役的领地，因此除非庄园主高兴或命令，农民不得迁徙。

政治事件加重了这种差异。莱茵河以西的领地曾经短时间（直至1815年）被并入革命的法兰西，实行并且保持了新的解放农奴的体

制，但是，在莱茵河以东，法国人来过又走了。他们留下外国压迫的记忆，成为后来重新实行农奴契约的合法依据。即使如此，战争以及对于权力的追求自有其本身的惊人逻辑。德意志在莱茵河以东最重要的政治单位是普鲁士王国。它是一个现代的斯巴达，是一个毫无浪漫理想的、过度军事化的王国。然而，普鲁士却在1809年解放了自己的农奴。这并非出自开明的态度，而是因为它曾经难以令人忍受地败在了法国军队手下，从而看清了农奴打起仗来不如自由人那么卖力和地道。

在德意志的其他各邦，对自由的尝试使人们即刻成瘾；反动派很少有人支持。为了能够皆大欢喜，解决办法就是让农民自由，用钱收买土地占有者；要克服顾虑和遗恨，任何东西也不如手里的现金。钱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土地的占有者一般都得到国债的赔偿，于是政府就把国债转作赋税分期分摊给农民。（在一个问题上，反动被认可甚至受欢迎，那就是关于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犹太人的无资格地位又恢复了，再过了几十年，当局才勉强同意让他们完全解放，即使这时，公开的受益也被私下的仇恨所损害。）

另一个妨碍在德意志各地迁徙的巨大障碍是社会被分割成各自保留其职位和特权的身份群体。领主拥有自己的土地，统治着自己的农奴和佃户，管理着高层或基层的司法，还指挥士兵进行战斗。商人则垄断着贸易，但不许可在农村拥有土地。手工业留给了城镇中的训练有素的工匠和师傅。乡间成了农民和领主的地盘。所有这一切同中世纪三等级（领主、农民、教士）概念有关系，但又加进了城市商人和工匠，读者是对此不会没有注意到的。 [130]

这种状况中的大部分到18世纪已经处于崩溃。不过，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还可以发现持续存在的痕迹，尤其是在德意志贵族可以对斯拉夫族农民作威作福的地区。在易北河以东，领主们大体上还继续为减少自己的麻烦而管理司法并且收取贡赋和罚金；正如常言所说，政府的权力在庄园门前吃闭门羹。无疑，对于国会式的民主外观确曾做出过某些让步，但这种让步大部分是虚假的。例如在普鲁士这个德意志最重要的邦国里，选举是在三方选举团中举行的，把重大的、不成

比例的靶心让给了财富。

再向东一点，在波兰和俄罗斯，旧的方式维持得更久，它们确实因商业化农业和比较优势的逻辑而得到了加强。从16世纪开始，易北河以东欧洲的开阔平原成了西方城市中心的粮仓和畜牧场。产品（谷物、皮革、动物脂肪）的出口刺激了土地的固定所有；但也有一个重大障碍：缺乏劳力。地广人稀。

100多年前，俄罗斯的农业学者们曾经指出，这种差异同庄园占有大量土地是不相符的；或者正如一位经济理论家在重新谈到这种传统的时候所说，三种事物不能并存：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力以及庞大的庄园。当农民们可以离开到边疆地区去耕种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签约或呆下来充当雇佣劳力呢？（13）

这意味着，在俄罗斯，想大规模地进行农牧生产的领主必须把自己的劳力固定在土地上。因此才有了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的现象。那是对农民义务一种渐进性的加强，使他们沦落到近似奴隶的地位。这种政策可以见之于一连串的法令，这些法令从16世纪到18世纪，每一个比前一个更加强硬。它们加深了西方和东方之间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距——一个坚定地走向更大的自由，另一个则走向僵化的奴役。俄国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而且除了1917年中的几个月以及从1990年以来的这几年以外，它一直是监狱。（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主实验能否持久，还有待观察。）

这样一种制度除非没有任何退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关键是缺乏具有规定自己居民地位权利的城市自治团体。这样的城镇比起西方来要稀疏得多，而且既不享有自由权利也不享有豁免权利。除犹太人和其他非俄罗斯族人以外，向国外移民是禁止的。与此同时，政府和贵族合作共同追捕并且归还逃亡的农奴。（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在18世纪，乌拉尔的采矿和冶金企业抓捕并且扣留任何它们能够插得上手的闲散的、喘气的男子。利他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一般来说，只要工业坐落在空旷地方——通常是为了减少运输费用（也同运河和道路等建设项目相关联）——唯一的办法就是输入强

迫劳力。这就是俄罗斯的废物利用学校，是劳改营的前身。甚至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居民区域，也可以用食物和酒招揽到游手好闲的人和街头漂泊的人，让他们从事装卸、赶车和拖运，所以稳定的工作需要给这种岗位分配奴隶般的劳力。往往属于国家所有的整个村庄，就是以这种方式迁移。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是失败的。不自由的劳动力不会卖力地或正直地工作。图拉兵工厂在1861年的一份报告中说：“看来有一个通常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只有自由人能正直地工作。一个从儿童时代就被强迫工作的男人，只要他的社会状况保持不变，他就不可能负起责任。”（14）

远比生产规模更加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早期的企业中有一些如此庞大，这是因为生产率如此低下，他们需要大批的人。最终找到了一种较好的办法，这就是“代役租”制度（obrok），即农奴向庄园主支付一定钱款，即“代役租”，就可以脱离庄园，到别处谋生。农奴交了“代役租”以后，多余的钱可以自己保存，这就使他们有了勤奋干活设法挣钱的积极性。有些人甚至变成了企业家，其中的佼佼者能变得十分富有。例如，其中的一人叶利谢耶夫发了财，他的家族办起了圣彼得堡最豪华的熟食店，该店被苏维埃当局没收以后改称“第一美食店”（Gastronom No.1）。家族中一位后人逃到了美国，成为哈佛大学的日本语言文学教授。这种成功的农奴中有许多人花钱购买自己和家人的自由，虽然狡黠的庄园常常把一两个孩子扣留下来，以防农奴变得更富有。

所以，正如私有工厂业的崛起所表明的，奴役制度并非没有权宜之计。到1860年，估计已经约有400万人为挣工资而工作，另外还有数字不详的农户季节性或非全天地从事工业生产。（15）实际上，工作岗位找到了工人，并且使他们屈从于任务，在某些情况下是屈从于鞭笞。至于工作岗位是否得到了所需要的技术，那就另当别论了。

俄罗斯1861-1866年对农奴的总体解放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方面的巨大分水岭。但是它对人力供应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不是很清楚。

然而它迫使企业雇用自由的挣工资的劳力（或是保持它们拥有的劳力），这就强制改善了劳力的待遇，使人员的录用更加仔细，并且为采用新工艺和更高标准开辟了道路。（16）之所以说“开辟”了道路，是因为道路曲折而且坎坷，特别是对那些长期以来由政府及其代理人经营的部门和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些地方，解放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和三心二意的。有些工人自由了；其他工人依旧受奴役。厂长们从幻觉中找到了安慰：如果最优秀的工人走掉了，反正他们年龄也太大了，对于创造和工作也不感兴趣了；如果最差劲的工人流失了，那好，能有什么损失呢？国家遭受着巨大的体制性后遗症的痛苦，受折磨于新旧之间，其二重性预示出20世纪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患的那种精神分裂症。

制造业的组织

中世纪的第二种遗风就是工业组织成行会或社团。它们是雇主和工匠的团体，组织起来或许是出于社会或友谊的缘故，但很快就变为行业联合会和集体性的垄断组织。

行会在全世界都有——不仅在欧洲有，而且在伊斯兰国家、印度、中国和日本也有。其经济目标是：控制人会权，典型的是通过契约性的学徒制和对师傅资格的限制来进行控制；维护质量标准（不接受任何业余人员或“粗笨之人”人会）；并且限制内部和外部的竞争，亦即对内限制作坊的规模和雇工数目，对外则在自己地盘内禁止非行会的制造行为并且排除一切舶来品。

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存在着一套道义原则，其本身都是从农村社会价值观派生出来而转换到城市环境中来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两种考虑：第一是在土地或顾客（市场需求）方面都有一种资源有限的意识，因而它是一种一方得益使另一方相应受损的“零和游戏”意识；第二是道德准则优先于商业准则。只要一个工匠自觉地完成工作并且达到了标准，他就有权挣钱活命。

然而，同这种良好工人伦理道德相对抗的却是贪婪与野心的驱动——市场和金钱的寓意。正如我们在讨论手工发包制生产时所看到

的，商人们学会了躲过行会限制而从农村中寻找工人；或者例如在钟表制造业中，当工作所要求的技术在庭院作坊中找不到的时候，就靠雇用满师学徒工（当过学徒，还不是师傅）来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或是在行会地盘以外的郊区进行工作。这就是那些社团垄断者巨大的弱点；他们受到大都市紧紧的束缚，设备简陋得不足以硬缠住一个变化着的绿洲。

并非他们不试图这么做。在意大利，工业中心总是兼并了周围的农村地区，而且行会的控制延伸到了城市的界限以远的地方。在低地国家（中世纪欧洲的另外一个庞大的制造中心），城市雇主及其亲信出击，闯入农村去破坏纺织机，对农村的竞争实行恐吓。这样的远征只是在乡村织布工们学会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保卫自己之前取得了成功，而从17世纪以后，农村的制造业如果不是受到认可也是受到了容忍。在德意志，政治疆界的复杂性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每一个排他性的中心都在隔壁有一个潜在的对手，那些对手十分欢迎无执照经营者、“粗笨之人”、犹太人以及类似的偷税逃费的不法之徒。

另一方面，在法国，各种行会都处境良好，足以保卫各自的利益，这是因为它们受到皇家的支持和保护，部分地出于财政的原因，部分地由于皇家把它们当做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皇家的令状传达到几乎每一个地方。^[131]即使这样，闹独立性的雇主们还是找到躲过限制的途径。例如，他们中间有些人联合打出旗号，妄称超出自己作坊能力的需求。所以他们才雇用别人来为他们作工而以自己的名字签署执照。这种专门对付行会的外购行为是严格禁止的，而且有时候行会的代表在法警的陪同下前来搜查，没收违禁物品，处被告人以罚金。然而每有一个雇主被告发被捉住了，就有几十个雇主逃脱了。

在“旧体制”将近结束的时候，1762年，法国政府正式承认现状，使农村制造业合法化，同时一批批的官员曾试图废除社团特权或者废除那些社团本身。他们是徒劳的；但是在这方面又是那场大革命完成了一个无能的君主政体所无法完成的使命。1791年，那个临时执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政府废除了贸易和行业社团——不仅是工人行的行会，而且还包括雇主们的联合会。这种政策完全是进步性的，非常公正，

但是在接下来的七八十年里，这项法律却更严格地应用于工会而不是雇主们的联合会。不足为奇：第一优先的是秩序，这就意味着使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和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各就各位。 [132]

在德意志，那里的行会早已经被雇主和无执照经营者所绕过，但在城市和若干个公国和王国中却依然具有实力，直到1870年成立帝国之后才甩掉了这个鬼魂。它们的合法性问题被列入了关于“工业自由”的一次大辩论之中。辩论的一方是自由派和大企业，他们认为只有让人们自由地工作、迁徙并且随心所欲地居留，德国才能不被现代竞争者击败。德国的海关联合会可以对货物放行而对人不放行，要它干什么呢？如果没有人手雇用，有权设立工厂又有何益呢？辩论的另一方是保守派及小商人和工匠，他们对新型企业诸如工厂和百货公司心怀忧惧。所以，现代人（其中包括犹太人）、自由市场、公开竞争、新的财富……这些都是敌人。

这种拖住历史发展的企图在一个仍在寻找着动力的德国注定会遭到失败。动力意味着引擎、机器、现代工艺以及伴之而来的规则，天平无情地朝着鼓吹变革的人们倾斜。在1848至1849年，行会人员曾经暂时地重振雄风，因为当时革命的骚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显示自己的地方实力。他们企图对人会和迁徙重新施加久已放弃或忽略的限制，但他们却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活动被认为是秩序的破坏。此外，正在崛起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不高兴返到中世纪去。

大堤的溃决首先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奥地利。商业部直截了当地说：“……奥地利的工业自从这种禁约性制度垮台以来不得不对外国竞争展开全方位的斗争。对它来说，准予迁徙的完全自由不再是一个关乎纯粹改良和更大福利的问题，而是关乎它的竞争能力的必要条件。” (17) 如果说政府依然对这个问题还抱有怀疑的话，那么，在意大利北部所遭受的军事失败则使改革的需要完全被人所理解。战争，尤其是失利的战争，能够凝聚人们的思想。1859年12月20日，一项皇家特许状在哈布斯堡所有领地确立了企业的自由。这一行动具有传染性。行会控制制度在德意志各邦开始崩溃。到1870年德国统一的时

候，整个战斗结束了。（18）

界线 and 障碍

中世纪限制贸易的第三种主要遗风是对运输和旅行的一套非常复杂的干涉：河道和港口通行费，道路收费，城市入口处的准入费（“牛和犹太人：每位4芬尼”）；由于政治界线（包括国内飞地和国外飞地）呈网眼针织状而造成的一个接一个的通关障碍；既得到遵守又同样遭违反的一套繁杂的豁免和特许规程，等等。

多数道路和河流通行费可以上溯到政治软弱和全局不安全的时代。那时候，高级政治当局无法阻止强盗诸侯和地方辖区对过往人员收取税费。既然存在，就难以破除：人人都尊重的一样东西就是既得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既得利益，或者想拥有既得利益。即使在更高当局说话算数、规定收费需经批准的地方，也可以见到仗权收钱的现象——不是作为对服务或设施所付的酬金，而是作为创收的另外一个来源，因此收费权成为人们孜孜以求或花钱买的肥差。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位巴拉丁伯爵的故事：他没有钱而硬想要钱，于1579年使出浑身解数吁请赐予收费权利，说：“上帝慈悲，帮帮本伯爵以及本伯爵那6个没受过教育的可怜的孩子，还有本伯爵那位挺着大肚子、怀着孩子的夫人吧！”（19）

因此，这种收费无益于改善和维持百姓生计，只不过是一种搜刮。它的收益，特别是在水路方面，是如此丰厚，以致货物托运人往往被迫改用陆运，不管陆上路况多差，速度多慢，甚至是运送每担价值低的大宗商品，也只好如此。同样代价高昂的还有关口检查以及有时货物转运时的拖延——表面上是创造工作岗位，实际上是进一步勒索的借口。

这些披着官员外衣的真土匪的拼命逐利的策略可以从他们的故意含混其词的政策中看得清楚。即使在规定了收费标准的地方，收费人也打定主意不予公开，反正一有机会就多收费。（20）（这种交易助长了狡黠并且把“机智的商人”和花言巧语的人同糊涂虫区分开来——它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整个的制度旨在鼓励贿赂，包括轮番

向勤杂人员奉送食品和饮料，但这无助于下一艘船只通行。

无需言明，享有这种收益的地方贵族和市政当局不愿意为了方便贸易、鼓励经商而放弃这种收益；与此相反，发展中的贸易是对增加关税的刺激。这种增加关税的做法引起一片抗议和痛苦的大声疾呼，但是谁也不准备去管一管，即使对小骗子也不管；一开始扔石头就会砸掉太多太多的玻璃房子。所以，工业发展的初始结果就是抬高这些障碍。

从17世纪往后，欧洲君主政体的集权趋势变得不利于上述种种胡作非为。新官僚机构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取消这些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干扰。它们不仅将这些做法视为对贸易的约束，因此而产生侵吞税收者，而且将其视为一种盗窃行为，是一种“大不敬罪”。在这些方面，英国人没有多少瓜葛：他们的地方性收费大体上到15世纪就不见了；结果，他们拥有欧洲最大的国内市场。法国人需要做的则多得多，伟大的大臣柯尔贝尔 [133] 发布命令一个又一个，禁止并且废除这种混乱的遗风；但成效却甚少。又一次，那场大革命在100年之后完成了这个使命，清除了一个破旧政权留下的废墟。

德意志的税费泛滥因其疯狂性而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它扫清道路就要慢得多，部分原因是这项任务规模十分巨大，部分原因是它疆域被搞得非同寻常的支离破碎：在1815年它有38个各自为政的关税系统，外加数千个地方自治体，直到一些小镇和地主庄园。只有强权政治——普鲁士的螺丝刀——和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此也很痛苦。必须让死脑筋们看到自行其是要比遵命改弦更张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紧随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条约和谈判使得莱茵河运输得到了自由，一系列逐渐扩大的海关联合终于形成了1834年的关税同盟，从而使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向相对来说无约束的贸易开放。我所以说“相对来说”，是因为即使到这时，还有许多事情有待完成。有些邦没有参加进来，拖着后腿，直到19世纪60年代和1870年才算解决。法兰克福和汉堡这两个历史悠久和骄傲的古老汉萨同盟城市痛苦地大声呼救，但是就这类事情而言，拉封丹的名言是适用的：力量造就权利。

有些人反对别人贸易，那股顽固劲头真叫人难以想象。以斯海尔德河为例。它发源于法国北部，沿途流经图尔奈、根特和安特卫普而入海，穿过世界上工业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安特卫普以下的一段距离，由于历史的变故，河口伸进了荷兰境内。按照1648年的明斯特条约，荷兰获得了对它关闭通航的权利。它也这样做了，历经200多年，目的在于维护鹿特丹的利益而扼杀安特卫普作为海港的地位。这件事非同小可。然而，有15年的时间，即从1815年到1830年，安特卫普和鹿特丹都是荷兰的组成部分，所以从理论上讲，这种权利本应该失效了。绝无此事：1830年，在比利时分离出去时，荷兰重申这一权利并促使其他相关各国接受它对国际贸易的这种征税。一直到1863年，比利时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得以买下这种可憎的征税权，每一个由此获益的国家都支付了自己的份额。

这种合理化和统一化进程中的唯一例外，是持续存在的城市入口处的通关障碍，法国人称之为“入市税”。这种障碍一直存在到进入20世纪以后；甚至连铁路也没有使它消失（人们总是能够在火车到达时检查行李）。终于使它消失的是汽车：由于汽车数量增多，不可能要它们在城市的边界停下来检查它们装载的东西；也不可能例如像在本世纪20年代那样强迫巴黎的汽车在离去和返回时用量油尺来计量油箱里的燃料。即使这样，迟至20世纪60年代，佛罗伦萨还有路标指示从周围农村进入该市的汽车驾驶人员来申报诸如葡萄酒和香烟一类的商品。就我亲眼所见，没有一辆汽车停下或被人停下；不过，我只是个短期访问者。

俄国则是另一码事儿。首先，运输很困难，而且税费不成为问题。自然条件才成为问题。在陆上，冬季搬运货物比夏季容易。雪和冰很滑；道路却不然。对于大批商品（粮食、木材）来说，水运较好。但是，俄罗斯的河流都是北南流向，而多数交通却是东西向运送。在这方面，严寒成为敌人：在南方，水道每年保持通航9个月；在北方，每年通航只有6个星期。错过时机，货物就会积压腐烂；机器就会生锈；无所事事就会化作湮没无闻。

制度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对于发展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充分表现在

欧洲边缘地区，即在西欧和中欧工业化核心地区以外边缘地区，以及在这个周边之内那些学会迎头赶上的国家同那些依旧落后的国家之间形成的对照。

先从北面说起。斯堪的纳维亚在18世纪的时候，穷得要命，但在智力和政治上却很富有。它是很晚才学习现代工业方式的，但是一经开始，就很快把它们学到了手。约略统计数字显示出工资和收入的含意（见表16.2）。

表16.2 欧洲国家集团1830-1913年间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数字（按1960年美元价格计算；每个集团所含均系未加权平均数）

	1830 年	1860 年	1913 年
工业核心地区	268	402	765
斯堪的纳维亚	219	297	682
不含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	228	315	735
周边其余地区	215	244	343

“工业核心地区”：奥地利（1830年不含）、法国、德意志、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

“周边其余地区”：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1860年不含）、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俄罗斯、塞尔维亚。其中1830年数字仅指葡萄牙和俄罗斯

资料来源：帕拉德著《欧洲边缘各国》一文，转引自贝尔洛赫著《国民经济差异中的主要趋势》一文。

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完全是由于文化上的水平。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欧洲的学识和科学社会中是平等的伙伴，享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并且能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提供一流的教育。[（21）](#) 它们还活动在一种政治稳定和保持公共秩序的氛围之中。北欧人曾经一度置身于欧洲最好战者行列之中——人们会想起中世纪的北欧海盗或是想起17世纪瑞典皇家的野心——可是他们现在同南边的各国人民相比却成了最

平和的，甚至显得有些冷漠。财产权利是有保障的；农民大体上是自由的；生活中充满了漫长的阴暗而艰辛的劳作，间或穿插着一场场群聚畅饮和季节性的日照。

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在18世纪，人们也可以看出后来创业精神的希望：瑞典波尔希姆的机器工厂和灵巧的设备；挪威的高钴矿提炼厂，它们向从韦奇伍德到迈森的欧洲玻璃和陶瓷厂供应鲜艳蓝色颜料。大部分的手工艺同南边的国家相比则粗糙而且过时，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却在工具、仪器和技术方面迅速地赶了上来。最好的线索莫过于钟表制造技术：到18世纪末的时候，丹麦和瑞典最优秀的钟表制造厂制造的机械钟可以同伦敦和日内瓦相匹敌；而且他们都是些当地能手，并非是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和北京的那种西欧的外来专家。

斯堪的纳维亚立足于自由创业的精神和快速的反应，立足于向更为先进的工业国家出口自己的大宗产品，立足于把这种收益向更加多样化的生产进行投资。大宗的出口商品是木材、黄铜，后来还有铁矿石；而就丹麦来说，则是农业产品。在所有情况中，发展的进程总是从原材料到加工品——从原木到板材，然后再到纸浆；从铁矿石到生铁再到熟铁；从生鱼到罐头或瓶装鱼；从鲜奶到乳脂、奶油及奶酪。这一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改善运输和金融机构而培育起来的，而且在这方面，本国的和外国的资本起了作用。但是从非常早的时期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就以自己向外国移民的形式一直在出口技术。例如它曾向沙皇俄国出口技术，在那里，艾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稚嫩的石油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俄罗斯政府早已断断续续地推进工业发展长达几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对其人民又是吓唬，又是吹捧，又是压榨；斯堪的纳维亚人灵活地加入了这一过程又悄悄地走开了。

请比较地中海沿岸欧洲各地，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晚期工业发展。它们的工业发展都受到了宗教和学识方面的偏执的伤害，而且都受到过政治不稳定的困扰。西班牙这时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的，但仍一如从前，被地区性自治体所分割，而且中央当局的软弱无力招致了外国的入侵和对王位的觊觎，伴之以周期性的革命和内

战。葡萄牙虽然比较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大体上与西班牙一样，例外的只是王室人员可以逃往巴西并且等待时机好转。意大利依然是分崩离析，而伦巴第直到1860年还依然在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手里，而且威尼斯也是如此，一直拖到1866年；而西西里（那不勒斯及南部）王国在1861年之前一直处于波旁王朝统治之下；罗马教皇各属国和罗马在1870年以前则归教会管辖。

这些国家都很穷，受到雨量稀少和分布十分不匀的妨害，因此农业产量大大低于降水充沛的北欧地区。西班牙条件最差。在湿润的北欧地区同干燥的南欧地区（年降水量在750毫米以上或以下）划一道象征线，大约会把葡萄牙和意大利各一分为二；但西班牙90%的面积处在干燥的一面，而且处于这条线以北的比较湿润的土地大部分是山区而不宜耕种。此外，西班牙的高平均海拔使温度两极化，因此这是一个不宜于谷物生产的地方。（22）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样的贫困地区也能像瑞士那样成为庭院手工业的良好候补者，但是伊比利亚半岛尤其缺乏创业精神和技能，包括阅读的能力。这些缺陷可以上溯到几百年之前——上溯到宗教狂热和反宗教改革者对无知愚昧的培育，而且排除了那种本可以补偿农业贫瘠和贫困的多种经营。（23）比较性的文盲率是不确切的，大部分原因在于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对文盲的界定和判断是不相同的。即使如此，地中海欧洲和北欧之间的反差无可否认是巨大的。例如，在1900年前后，英国只有3%的人口是文盲，而意大利的文盲则达48%，西班牙56%，葡萄牙78%。（24）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大屠杀、追捕、驱逐、强迫改教以及自我施加的学术封闭——被证明是一种原罪。其影响直到20世纪才消除……而且即使到20世纪消除得也不彻底。（25）

（无需言明，这种诉状不能迎合西班牙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们的口味。谁个也不喜欢被别人告知〔提醒〕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自身的弱点造成的，或者他自己感到骄傲的源泉不是美德而是罪愆。因此，西班牙和西班牙裔拉美籍学者才做出了持久的努力来驳斥这种指控，把它称为“黑色神话”——怀有邪恶信念的人进行的诽谤。然而，“衰微”的

事实却依然存在而且要求作出解释：300多年的落后确实在收入和成就方面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几个中心具有特殊的（即使是不很高的）适应性，躲过了上述的共同的遭际。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从其他地区中脱颖而出，早在18世纪就开始对纺织制造业实行了机械化。后来，矿产资源的开发，尤其是19世纪末叶对铁矿石的开发，为巴斯克地区吸引来了金钱和贸易。但是，这种矿石的绝大部分却运往国外的冶铁中心；西班牙工业很少加以利用。

意大利前进的速度比较快一些，尤其是在波河流域（伦巴第，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以及热那亚及其周边地区。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曾经是繁荣的工业和商业中心，当时则处于变作纯旅游胜地的过程之中，修起了一批批商店、旅馆和生动的博物馆。哪个旅行者也舍不得错过它们。（这种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而且威尼斯已经不得不限制入境人数。）意大利的统一（1870年）没有怎么改变早先的分工和财富分布状况。北部，特别是伦巴第和皮埃蒙特地区，是农业和工业、河谷低地和平原相混合。南部（“正午地带”）依旧是一片荒原，人们在那里荒凉的高地和广阔的庄园上从事着难以维持生计的刨地活路。不识字的农民大部分都是用谷物交租的佃农和没有土地的农工，要听命于当地的知名人物。这些人物是旧的和新的财主，培养骄傲（“尊敬”）以及一种令人回想起“旧体制”的生活格调。^[134]南部最大的出口品就是人：向新大陆移民，尤其是移向美国和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向本国北半部移民。甚至连北部也将它的儿童送到国外去，一般是送到阿尔卑斯山以北那些比较富庶的工业区去。例如，法国人严重地依赖意大利移民来开采那些新开辟的（19世纪80年代）铁矿和经营洛林的工场。

南方至今依然落后，尽管意大利政府给它拨了大量开发补贴，如今欧共体也给它补贴。那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闲置的工厂、未完工的住宅开发区以及通不了车的道路。这一片衰败和令人心寒的景象显示出种种深沉的缺陷：无知，偏见，缺乏社区感，却有着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正午地带”仍在为昔日的罪过还债。许多北方人感到十分厌

恶，以至于谈论起南北分离。该理解为驱逐。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等于是捷克人存心让斯洛伐克离去。

东欧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讲斯拉夫语的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农奴制以其最恶劣的形式顽固存在着。挥金如土的贵族手中掌握着如此巨大的财富，其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消费者对那些基本工业制造品的需求，而这种制造品本可以导致现代工业的出现。在普通情况下，政权专制的俄国可以只是从容不迫地效仿西方：人民习惯于贫困而且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俄罗斯是一个大国，有着巨大的领土野心。它很早很早（16世纪）就已经试图向西方学习了，只是唯一的目标是在诸如枪炮制造这种战略性的部门中获得自主。作为一个大国，它需要工业，所以沙皇政府恳求外国人帮忙，出钱请他们在俄国设立工厂或定居并工作。个别的一些土地占有者容许具有创业精神的农奴去从事贸易和工业，以金钱贡赋作为回报。其结果是一种不规则的、发育不全的工业化。

俄国的企业也不是在和西欧企业相同的天地里运行。它们向国内市场出售，而向国外出口很少或者说没有。它们简直就没有竞争性——在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特别在苏维埃年代里更没有。唯一售往苏联以外的制造品是发向卫星国和第三世界附属国。与此同时，生产数据成堆，而且许多人都相信。你是相信那些数字呢还是相信明摆着的证据呢？假若统计人员按照真实的市场价格和质量而将产量打折扣，他们也许会比较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比俄罗斯更贫困、更落后的是巴尔干诸国。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效率低下的奥斯曼帝国的枷锁下痛苦挣扎，那是一种比它们自己的社会更原始的社会的暴政。长期的沉寂之后，它们在18和19世纪感染了民族主义的病毒，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没完没了的斗争，先是同土耳其人斗，后又同其他的巴尔干民族斗。这可能是一种高尚的事业，但是由于它依赖于不肯妥协的宗教，所以很容易导致仇恨和不理智。对于商业或发展来说，都是无益的。

这些社会都不是能够从内部产生创业精神的社会。贸易和钱财都

是为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德国人准备的。这些外来人并不受欢迎，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靠做买卖（所以，不是靠艰苦工作）而发财致富并且让农民和地主吃亏，而且还因为这些人礼仪上、服饰上、外貌和宗教信仰上都不同。（这些外来人毫不留情地回敬了这种轻蔑。）当独立和现代政治来到这些巴尔干人身边的时候，当地人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外来人赶出去，也就是说，要把经济中最积极的成分驱逐出去。他们成功了，即使这些外来人自然很不愿意离开。（这种不友好、怀有敌意的地方曾提供了这么多的挣钱机遇。）

今天，巴尔干人依然很贫困。由于没有外来人，他们就彼此开战，并且把自己的苦难归罪于西欧那些经济比较富裕国家的剥削。这么想，他们心里觉得要好受一些。

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喜欢这样的解释。他们是根据核心和外缘的观念进行思维的，即富有的中心与周边的依附国家相对立。但是，这种比喻或形象并不确切：欧洲发展道路的斜坡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从受过教育的人到没有文化的人，从代议制的制度到专制的制度，从平等到等级，等等。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资源或金钱；也不是受到外来人的不公正的待遇。问题在于内在的原因——文化，价值观，首创精神。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渐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他们就是不晓得拿它去干些什么。

“刺刀才是好小伙儿”

在19世纪的上半叶，俄罗斯标准的步兵武器是一种滑膛的、前装的、燧发机的旧式步枪，很像上一个世纪使用的武器。（丹尼尔·布恩[135]的肯塔基式长来复枪也比这要优越一些。）俄罗斯1828年的制式步枪同以前的那些步枪一样，使用的是圆珠弹丸，200码以外就打不准。西欧各国陆军使用的后膛枪被认为不适合——太复杂而且用于野战不够牢固。而且，对于俄罗斯军械生产技术来说，也太难。

俄罗斯陆军从整体说来是甘心于这种落后局面的。首先，采购是

团队的事务，而军官们却更喜欢把钱花在食品和酒类上。（饮酒是测定军官大丈夫气概的受宠爱的方式，比战斗更加重要。）“团队力争尽可能为武器少花钱，而且团队的供给人员把定期去肮脏的政府军火库和去遥远的小兵工厂视为一种惩罚。”^{〔26〕}反过来，武器制造商向采购者供给他们想找的东西——马马虎虎许多件，好坏都有，反正无所谓。政府企图防止弄虚作假，派检查官去检查武器。成效甚微；检查官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会去咬伸出来喂自己食物的手。（在各式各样苏维埃五年计划之下，人们对生产的态度与此相似，花样繁多。完成计划，完成定额，花钱打发检查人员，鬼才会云管质量的问题。）

其结果是螺丝拧不紧，铆钉铆不牢，枪管安得不紧，枪托是烂木头，枪机零件不配套。1853年，就在克里米亚战争打响之前，沙皇陆军仅有额定旧式步枪数量的一半。而且，枪支不好，但俄国士兵却使它们变得更糟。就像土地上的农奴，或要服役25年的士兵——兵役是一种无期徒刑——对自己的工具毫不在乎。枪炮（“一种表演的机器”）为了检阅才进行擦拭，但士兵却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去买擦枪油；因此擦枪油就很少或干脆没有。子弹花费很大——它们不是俄罗斯能够大批生产的那路货——所以泥巴弹丸用来打靶而损坏了枪管。就连军官也不爱惜自己的随身武器，以致陆军部指示发放手枪而不发左轮枪。团一级的枪械师缺乏训练和合适的设备，不得不去钉马掌，修车轮，而且用同样一套凿子、榔头和锯来修理枪支。

规则出自实践。面对这样一些缺憾，俄罗斯军事战略家一向低估火力的价值。他们认为肉体比武器更重要——肉体 and “道义力量”——而且刺刀比枪支更受喜爱。苏沃洛夫元帅认为：“子弹是傻瓜，而刺刀才是好小伙儿。”^{〔136〕}刺刀更能把握，而依赖枪支只能使人的决心和战斗精神衰弱。因而，把前装枪换成后装枪就会成为一个错误。那样的话，士兵只会浪费很多弹药而且忘记怎样装火药。就在别国军队的火力突飞猛进之际，俄罗斯士兵却正接受节约的教育。团队的经济状况反映着更大的社会：被低效率拖住后腿；在辅助性劳动中浪费时间和劳力（农业、采集木材和打草、建筑、搬运）；惧怕变革。^{〔137〕}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是一场灾难。俄国人损失了他们最损失得起的东西——人，多达60万。更使将军们和沙皇心痛的却是领土方面一些微不足道的损失。有些俄国人依然使用着前装燧发枪，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付他们的却是射程远三到五倍的击发式步枪，就连俄国的将军们也成了容易被击中的靶子。这倒并非因为英法联军是具有杀人效率的楷模，他们自有其本身的毛病，在供给和卫生方面问题不少（最大的敌人是疾病），指挥方面也干了许多蠢事（在那时，英国陆军还依旧可以花钱买官职），这些事却在丁尼生的《轻骑旅的冲锋》一诗中被多情地奉为不朽。

然而，俄国人却更糟。

注释

1 .请参看Landes，“Fable”一文第163页注27中所谈到的麦克洛斯基的一段话。波拉德在他所著《和平的征服》一书中不认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是对英国挑战的一种强烈反应，而是根据市场确定的方针而发生的和谐的技术扩散。也许是……那样。请参阅Davis，“Industrialization in Britain and Europe”一文第54至55页。

2 .转引自Crouzet，*De la supériorité* 一书第105页。

3 .同上第107页。

4 .伏尔泰*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巴黎加尼尔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二章第695至697页。转引自Crouzet，“Les Français”一文第24页。英国第一部“航海法”的时间实际上是1651年，第二部是在1660年，就在王政复辟之后。

5 .Crouzet，*De la supériorité* 一书第110页。克劳塞说明（第489页注28）对英国贸易惯例的这种反感在雅克·萨瓦利的商业手册《完美的商人》（1675年第一版）已经可以发现了。另一方面，英国1711年的一份备忘录声称英国只是在法国开了先例之后才转而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而且英国人实际上比别的国家更为公平（高尚）地进行贸

易。人们应该把这种看法当做无非是一种感觉而已。

6 .所以，克劳塞才讽刺挖苦，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见De la supériorité，第490页，注31。

7 .见里姆的书，*Europeans Politische Lage und Staats-interesse*，IV，17。

8 .见Mirabeau，*Mirabeau's Letters*，第47页。

9 .见Karl Marx，*Capital*，序，第13页。这种相信规律的信念的一个后果是关于正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定义，它十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这是一种对冶金学的盲目崇拜。（所以，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把“斯大林”〔意为“钢”〕视为自己在党内的化名。）^[138]

10 .虽然对于经验的研究早已证明了国家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例如见克拉彭所著《经济发展》〔1923年版〕一书），但是，“以英国经验为依据的工业化单一的、多线的模式”的神话却依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稻草人，有待于被一种对于据称是常识的不断修正打倒。因此，才有了奥布赖恩和基得在《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成长》一书中那些了不起的（在不止一个方面）的发现，因为这本书以华丽的词藻宣称法国已经找到了“通往20世纪的道路”。如要寻找对这种传统观念的表现持批评而宽容的观点，请参见Davies，“Industrialization in Britain and Europe”一文第48页至54页。

11 .这是Jordi Nadal，*Fracaso de la Revolucion industrial en Espana* 一书中所表达的意义。他把这本书称为“限制西班牙试图采用经济发展的古典模式——即英国风格——的种种原因的分析”。

12 .见Good，*Economic Rise*，第11至12页；Kemp，*Industrialization*，第26至27页。如需参考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性偏见的正确政治抨击，请见Fabian，*Time and the Other* 一书。请比较Landes，“Time of Our Lives”一文，第719页注7。

13 .请参看Domar，“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一文。

14 .引自Bradley , *Guns for the Tsar* , 第132页。

15 .据Crisp , “Labou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Russia”一文 , 载于Mathias and Postan, eds. ,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一书第7卷第2章第330页。这个数字 (400万) 约占总人口的6.5%。虽然比例不大 , 但绝对数字却很大。

16 .有些学者常常强调这种解放的不完善 , 特别是集体性村庄契约的保留 , 以此为理由说明它的无效性——请对照Gerschenkron , “Die Vorbedingungen”一文第25页。一如上文所示 , 我更想强调自由对工业劳动力所发生的作用 , 即对已在位的和将要录用的工业劳动力发生的作用。

17 .据1859年春季报告 , 转引自Hamerow , *Social Foundations* 一书第120页。“禁约性制度”一词系指利用保护和促进本地幼小工业的方法 , 对某些工业制造品、特别是棉制品的进口所实行的种种禁约。

18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 , 参加德意志邦联的共有3400万人口的16个邦 , 已经开始执行新的规定 ; 有700万人口的7个邦正在过渡之中 ; 仅350万人口的12个邦 (大部分为农业地区) 还坚持旧的秩序——见Hamerow , *Social Foundations* 一书第121页。

19 .见Heckscher , *Mercantilism* 第1卷第64节。

20 .同上 , 第1卷第72节指出 , 最高官员默许这种秘密方法 ; 例如东普鲁士税务局长获准收取1644年关税 , 附有秘密指令不得将此事向任何人泄露。如果这种非法所得不是被层层瓜分 , 则是难理解这种策略。

21 .如需了解经济含意的例证 , 请见Koerner , “Linnaeus’Floral Transplants”。该文述及18世纪在瑞士气候中培植外国花卉的项目。林尼厄斯雄心勃勃 , 试图在北方种植茶树 , 没有成功 , 但他却继续干下去并且在这方面成为地理发现的知识方面的一个主要受益者。

22 .我所说的这种分析系取自Tortella , “Patterns of Economic Retardation”一文第8-9页。

23 .托提拉有不同的说法：瑞士在农业方面的比较劣势，他说，是大得多的。他援引了伯杰尔著《经济史》一书第106页和第179页，指出：自中世纪开始，瑞士一直进口了它食物的将近50%。但是，比较优势仅仅是相对的，而这正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瑞士工业收益较好，虽然政府对农业发放津贴。

24 .见Tortella , “Patterns of Economic Retardation”一文第11页。

25 .关于这一点，请见Tortella , “La pénurie d’entrepreneurs”一文第63-64页。

26 .引自Bradley , *Guns for the Tsar* 一书第45页。

第17章 要有钱才能赚钱

当英国经历了两代人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发展时，欧洲第一批效仿国家才开始起步，这种滞后现象是欧洲的政治纷争。此时，规模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也使后进国家的发展困难加大。

人们知道“第一个工业国家”是怎样成功的。缓慢而且从容。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训练了一支工厂劳动大军并且积累了资本。在早先那些岁月里，机器通常是小型的而且价格低廉。规模很小。古旧一些的建筑物可以转变为工业用途。总之，入门的要求不很严格。所以，英国人创业可以靠收入再投资、靠集中个人资财、靠向亲朋借贷、靠租赁设施而加以发展。金融中介机构，除了那些诸如代理人和贷款经纪人以外，所起的作用甚小。银行为了方便不动产业的交易，把自己局限于发放短期或即期贷款。其中有些是采用信贷额度的形式，每次体现之后即予展期。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信贷额度就相当于中期甚至是长期信贷。关键是经济繁荣。形势不好时，它们就会被收回或者期限被缩短。

随着年代的更迭，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机器变得大而沉重了，要求有适合它们尺寸的建筑物。规模经济和生产率随着运输设施的改进而增长了。英国人的企业依然富裕，足以从其自身内部支付这些开销，如果内部资金不足，人们通常就会吸收额外的伙伴。^[139]但是，甚至英国也不得不找到特殊的门路来支付诸如码头、运河及铁路等公益或准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紧随臭名昭著的南海公司投机破产而通过的“1720年泡沫法案”阻止了用可以自由转让的股票成立合股公司，因此，大型项目通常转归把资产赋予受托人管理的大合股公司。在一个对“最后一先令和一英亩地”都具有无限责任的商业社会里，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然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都没有再作重大的法律改变，这证实了这种做法的稳固性以及英国经济的总体活力。（在这方面，我设想，假使当时存在银行融资的需要，那么，

一个对商业利益如此敏感的社会本来会改变这些规则的。)

到19世纪，当办企业变得成本更高、风险更大的时候，集资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特许合股责任有限公司——所谓“特许”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只能由皇家或国会颁赐。这种大型的、半公益型的企业从来不怎么使用银行的长期融资，因为任何银行也没有这么大。英格兰银行章程规定任何其他银行不得有6个以上的合伙人。直到1826年，并且仅限于以伦敦为中心的65英里半径范围之外，才准成立合股银行；一直到1833年，不发行钞票的合股银行才获准在上述半径范围之内开业。然而，这些新的银行同私人银行在规模和政策上差别很小，就连修建铁路的商家也不需要它们的帮助。

以上就是英国的情况。当英国业已经历了两代人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发展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批效仿国家才开始起步（自1815年始）。这种滞后现象部分地是政治历史上的一次偶然事件，它以令人难以处置的方式干扰了拟定最佳的各种计划。从1789年到1815年的长达25年的革命和战争把欧洲大陆的资源从建设转向了破坏，给企业和贸易造成了浩劫，产生过某些发明却大大延迟了应用，鼓励了一些项目却接着又对它们实行了禁约。结果，对英国工业的仿效被推迟了又一代人的时间。

得失表上倒也并非一律是负数。动乱同时也促进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变革。特别是，法国人废除了“封建的”贡赋和契约，促使（迫使）其他国家照此办理，使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并且跨越陈腐的身份界线。对这种变革的经济上的报偿直到和平以后才到来。那时，追赶的任务变得更大了，但潜在的收益也大了。

以此为由，有些人争辩说晚了有好处：人们能够避免那些错误，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开始干起。^[140]但另一方面，滞后失去的时间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还是尽可能早动手为好。

因此，欧洲大陆的效仿国家感到它们既缺乏手段也缺乏时间来像英国过去那样发展成长。它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着竞争。为什么一定要等待50年到1815年才追赶呢？它们需要比英国当初需要的更

多的资本，而且它们马上就要得到它。它们想得到最新的工厂、机器、发动机。从大约1830年开始，它们想要铁路、运河、道路和桥梁了。它们到哪里去弄到这笔钱呢？

从四个地方：（1）个人投资；（2）金融中介机构及私人信贷；（3）政府援助；（4）国际资本流动。

首先，欧洲大陆有自己一定数量的富人。不幸的是，其中大多数都是藐视工商业不高雅行为的地主。的确，他们许多人甚至连农业也不喜爱（他们更喜欢通过马掌来触摸土地），并且雇用管家来管理自己的庄园。这些地主靠地租和农产品为生，有时候靠资本。管家们都大发其财。

但是，也有一些士绅和贵族确实受到工业的吸引，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希望赚钱，部分地是因为工业是农庄经营和贵族权利的合乎逻辑的副产品。他们的土地蕴藏着宝贵的矿物资源，或者拥有森林而可以给造船业、建筑业或采矿业供应木材。在中欧和东欧，由于他们控制着常住的农奴人口，可以为自己提供一支现成的工厂（或原始工厂）劳动大军。这些贵族人士中有一些实际上本身就变成了工业家和商人。人们由此会想起这样的家族，例如埃诺（后期属于比利时）的德桑德罗因和阿伦伯格家族、奥地利的弗斯顿贝格和施瓦岑贝格家族、洛林（1766年归属法国）的温得尔家族、俄罗斯的斯特罗加诺夫和杰米多夫家族；或者想起这样的统治者，如拿骚-萨尔布吕肯的威廉·海因里希亲王（1740-1768年执政）。^[141]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贵族企业家同资产阶级伙伴一道工作，后者在身份上和价值观上更适合去于那种肮脏的勾当——也就是，挣钱。（贵族人士更会花钱。）有时候，这些平民从商业关系中赚钱来为自己的门第牌号镀金。让我们以贵族联盟的守则为例。从理论上讲，贵族同贵族才联姻。但是如果一个平民非常富有，情况又如何呢？哦，那好，贵族也可以与之通婚；贵族的等级越高，这种不门当户对的结合就越自在。（小的贵族人家则必须对这类事情谨慎处理。）当施瓦岑贝格（此姓甚好）家族的一位年龄31岁的公子娶了已有82岁高龄的

一份商人财唯一女继承人的时候，那真可谓吉星高照。这位夫人不久之后就顺应天意而死去，但这位年轻公子也随之死去——当然是“后继无人”了。所以，财产就落入施瓦岑贝格家族的主要支脉之手。这个家族不仅通过选择联姻伙伴，而且通过开办工业企业，开垦土地，建立投资银行，继续证明了自己的创业精神。（1）

这种实例不管多么令人震惊，都构不成一次工业革命。那需要范围更广泛的多种来源，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在这方面，商业经验被证明是一份主要的资产。经过几个世纪的或多或少可以赢利的运作之后，一个私人银行网络到位了（个体银号或合伙银号）。就集体来说，它富有并且能够向工业作中长期投资，能够在选择客户中不注重价格和条件，而是更注重诚实、智谋，而且高于一切的是关系。这些集团通常依附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胡格诺—加尔文教派、西班牙系犹太人、日耳曼系犹太人、希腊正教的商业“家族”都只认自己的同类——该信任谁、该小心谁、该向谁咨询以及该同谁共事。（2）

这些小的银号的规模比看上去要大。正如在英国一样，欧洲大陆上的银行筹资也一般采取信贷额度的形式，扩大到支持不动产商业交易，用可贴现的商业票据支付。但是，我们也见到一些例子说明可提供直接长期资金以及参与公司的组成：例如，巴黎的罗思柴尔德银行曾经为法国的铁路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的矿业和锻造业提供资金；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银行曾促进哈布斯堡王朝领地内的铁路发展并且投资于炼铁厂和煤矿；巴黎的塞利埃尔银行在1836年曾联合布瓦格家族重建勒克勒佐炼铁厂。（3）

人们不应该低估这些古老商社的智谋。它们能够很好地嗅到利润之所在，并且依靠把握机会和灵活多变而积累起了自己的财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提到它们对可获利的联姻具有的鉴别力——这种联姻既能提供资金也能提供商业合同。（4）任何人试图理解在公共合股公司和股票交易所时代之前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都必须把家族和个人的关系考虑在内。

经济繁荣时，短期和即期贷款能够变作长期信贷；一旦经济不景气，贷款不能展期，就能够把一个处于绝境的公司推向破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权人的实力和忠诚，但是就连最信任他人的、最果断的债权人在别的银行开始收回自己贷款的时候也会被迫采取行动。这就是网络体系的麻烦：在它强劲时，它比各个部分之和还要强大；但是当它疲软时，这种疲软很容易从一个环节扩展到下一个环节。

这种集体性的风险以及对于长期投资的需要导致了一种新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创立，即合股投资银行，或如法国人所谓的“信贷社”。设立这种机构的最初启示既来自政府机关，也来自商界：甚至在1820年以前，巴伐利亚的官员和商人就要求建立专门的银行来促进工业发展。最早的运作范型是一些准公共机构——布鲁塞尔的“兴业联社”以及柏林的“海事商社”。这种新形式随着铁路的兴修而变得相当重要，因为铁路自身以及它所带动的大型工业企业成为空前的资金吞噬者。所以，到了19世纪30年代，原先大体上是个商业银行的兴业联社变成了一家开发银行；而且法国也生下了一堆“银号”——股份两合有限公司，旨在向工业提供中长期资金。^[142] 为什么叫“银号”呢？因为法兰西银行反对让这种具有内在风险的冒险事业使用“银行”一词。这也就是为什么佩里埃尔兄弟后来把自己的银行命名为“信贷兴业联社”的原因。如果人们不能把银行叫做银行，就必须想出别的同样是有滋有味的字眼来加以称呼。

有人曾经认为，这种新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诞生是由于克服了较老的私人银行的反对，因为私人银行有其自己的工业利益。事实上，私人银行是积极地促进了信贷社，自有其最好的缘由。长期投资使它们承受巨大风险，在1837-1839年和1848年商业危机中所遭受的亏空和破产使得它们相信小心即大勇。所以，才把风险转嫁给不同商号的股票持有人，而且如果可能就争取获准以有限责任制组成公司。

在1848-1849年的大恐慌之后，艾米尔·佩里埃尔和伊萨克·佩里埃尔兄弟的“信贷社”似乎成了一个新的起点，很快就遇到了一批效仿者。⁽⁵⁾ 它被当局认可，标志着对工业发展的公开鼓励；同时也是鼓励新人的到来。路易·拿破仑总统是伟大的拿破仑的侄子，不久就成为

拿破仑三世，别名“小拿破仑”。他想使自己名垂青史，又想对原有的社会最上层私人银行网络形成一种抗衡，因为那些私人银行当时称作“大银行”，曾经与前奥尔良王朝当局关系亲密。本着同样的精神，拿破仑三世的政权放松了原先那些有利于旧银行的限制。1867年，在对英国1856年普遍推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迟到的回应中，法国人也允许那些由公众持有股份的公司作常规注册了。（6）

法国的投资者之所以能够开设开发银行并为其提供资金，是因为该国已经拥有雄厚的私人资本。就此而言，事实上——即同历史神话相反——“信贷社”及其效仿者并不是十分需要的。最好的铁道线路早已经交给了早先的大财团；“信贷社”只得到一些残羹剩饭。法国的工业公司也没有求助于这种新的投资银行，因为它们更喜欢旧式商家的谨慎从事。依靠长期银行融资的公司，会受到其随之而来的监督和干涉，很可能陷入深深的麻烦之中。[143] 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这种新式的机构。1867年，巨大的“信贷社”破产了。

在德意志及其以东，开发银行盛行起来，它们创立并且资助工业，监督执行，促进革新。这些新的机构把投资、商业金融和储蓄业务结合在一起（因此被称作“万能银行”）。其中的佼佼者还收集技术情报并且充当咨询机构。这样一种功能混合就像违背圣经的行为似的，令英国的银行家震惊。人们怎么能够把短期的、甚至是即期的债务同长期的资金固定化二者安全地合并在一起呢？这准会带来灾难。

答案首先在于德意志经济自19世纪30年代往后的快速成长——这种事情使每个人看起来都不错；其次在于这些银行更喜欢“腰板硬的”客户。（金融业务成功的两项要领是：第一、收别人的钱；第二、向富人贷款。）（7）这些万能银行寻求有钱客户和抵消风险的能力变得神乎其神。最优秀的、最大的就是那几家著名的“D—银行”（如此称呼是因为这几家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达姆施塔特银行、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其中有两家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开始时设立在地区中心，后又迁往柏林；人们在英国和法国可以发现类似的迁址。这种迁移标志着地方企业和资金的实力。在从1870年到1913年期间，这些混合银行

资产的账面价值从大约6亿马克上升为175亿多马克——占工业资本股份总额的百分比从6%上升到20%强。（8）大多数股票都在重工业领域。较小的企业可以从别的地方寻求帮助；大银行的业务对象就是大企业。

但是，如果国家太穷，无法资助用来向工业提供资金的银行，那该怎么办呢？哦，那好，政府可以介入，或者是促进金融中介机构的建立，或是直接投资和参与。在这方面，欧洲那个由西向东的斜坡表现为政府干预逐渐加大。在一头，即在英国，企业从政府得不到任何资助；就连运河和铁路也是由私人投资兴建。在海峡对岸的法国，制造业企业在1830年以后不再得到政府任何直接的援助；至于铁路，一个厉行节俭的资产阶级政权——其象征是一位肥胖的路易·菲力普 [144] 和他那把寒酸的黑雨伞——拒绝回应创办人和银行发出的资助要求。政府指导和资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法国政府寻求私人创业修建铁路，并且拒绝购买股票。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同意支付土地和路基（包括隧道和桥梁）所需款项。这是巨大资助——约占1848年初总开支的18%——政府认为这笔开支合理的依据是：反正在特许期结束之后，这些铁路终归要回到政府手里。满打满算并且包括几项政府贷款，法国政府截止到1848年总共支付了各铁路线费用的25%稍强。

在德意志各邦，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形成了政策上的多种多样。有些政权继续对工业实行补贴，部分原因是出自工业在技术或战略方面的利益，部分原因是出自社会秩序的考虑；与此同时，铁路筹资则差异很大，从纯私人投资到政府购买股票，到公众建造、拥有和使用，应有尽有。在美国也是一样，地方治理意味着政策在州与州之间各不相同。只要个别的州想要鼓励公共事业，补贴就成为制度，往往是采取按照铁路通行权而拨付土地的形式。在俄罗斯，国家辅助金融业和工业，铁路均为国建、国有、国营。商业考虑和地形测量都见鬼去吧。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是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兴建，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大家请沙皇选择路线。他拿起一把尺子，在两个城市之间划了一道直线。可是一个指头尖顶了一下，结果笔直的铁路线建成后就有一道小弯弯。

直接的补贴和援助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政府还把手伸到了别的地方，甚至是并非直接看得见的地方。即使是在英国，政府也支持并且保护海外贸易：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为远洋的私人冒险事业和历险行为支付相关的保障费用。这种非直接补贴容易为人忽略，却是至关重要的。

依然是在英国，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对工业的扶助也采取抵御外来竞争的形式。英国承诺自由贸易以后的记录（从19世纪中叶前后直到1930年）往往抹杀早先的和时间长得多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不管是用保护关税的方法还是用歧视性海运规定（航海法）的方法。经济理论家们热烈地、甚至是激昂地争论说，对市场的这种干预伤害了每一个人。事实依然是：历史上的最坚强的自由贸易主张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在它们自己的成长阶段都曾是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者。它们叫别人不要做我过去做的事情，而要做我现在能做得起的事情。这样的劝告并不总是有用的。

在法国，旧君主政体帮助新的工业和技术——用补贴和俸给，用财政豁免和特权，或者用保持不还的所谓贷款。因为有了这些帮助，雄心勃勃的商人就有理由去巴结有势力的人，而王室，就像熟过了头的奶酪，招来了腐败。唯一真正的约束就是法国国库的日趋空虚；到18世纪80年代的时候，钱都花光了。与此同时，正如在英国那样，企业从关税保护中找到一个无言的同盟者，来抵御外部世界和王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商业壁垒反映出法国零碎疆土合生的历史。）这种长期政策到1786年为止一直未遭侵犯，而在那一年，一项官僚的条约做了一笔交易：法国的葡萄酒和丝绸可以比较容易地销往英国，条件是接受英国的棉织品、毛织品和铁进入法国。^[145] 这样一种开放，对于尚未准备好接受新的机器工艺的法国工业来说，本会产生巨大的后果。但是，1789年的革命和1792年同英国的战争终止了这一实验。

法国革命加强了国家的作用。权威性更强、更加独断；控制则更加集中。战争的需要使生产变成迫切的头等大事。然而，政府当局却缺乏资金（战争吞食金钱），而且军事定货单只是僵化了旧工艺。对工业的支援主要是财富的转让——例如，教会财产被好战的反宗教政

权没收，然后转让给或以优惠的条件出售给工业企业。

大革命之后（1789年以后），波拿巴主义的（后来是拿破仑一世的）政权采取了有节制的经济发展方针。财富（包括美术品）再一次转手，既在被征服的领地之内，也从被征服的国家转给法国。然而，对工业最大的贡献，不管是好是坏，就是采用一种帝国市场的伪装形式，对英国的进口品实行封闭。接下来，在1815年以后短暂的时期内，战败的法国转而采取了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不过，那仅仅是向战胜国英国的让步并且是对帝国独裁主义的反动。保护主义的壁垒坍塌了。但是，外国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的一阵冷雨非常迅速地使那种民族本能复苏了。法国制造商们大呼灾难临头，下院立即表决通过了一个比一个高的关税税率。对关键商品，诸如棉纱和棉布，干脆一律禁止进口。这种壁垒对法国工业是否有益，迄今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对法国的消费者来说，它抬高了价格，减少了需求并且保护了陈旧的技术。但它却为那些在这种价格外壳以内繁荣起来的效益较好的商行增加了利润率。[146] 养肥企业的不止是一条路。

与此同时，法国的经济学家受到他们英国同行的鼓励，为自由化的优点而辩护。随着1848年的革命，政治的钟摆又荡了回去，脱离了高保护及其奥尔良王朝的受益人。路易·拿破仑一上台，结束禁令和减轻关税的压力马上就增加了。经济学家们起码是不再害怕英国这个“大坏蛋”了。面对为自己的雇员哭眼抹泪的制造商的奋力反抗，新的皇家政权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壁垒，其手段先是颁布机会主义的政令，继则签订一项英法商业协议（即1860年的科布登—薛瓦利埃条约）。这个协议只是在签订之后才交付公众讨论。（当然，那是最佳时机。）证人的证词用大型四开本分七卷印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机会来了解法国分崩离析的“权势集团”的真相。由此终于结束了对主要工业产品（棉纺织品、船只）实行禁令的体制。此外，如果说法国经得起英国竞争，那么，它无疑也就能同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竞争了。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新的低关税制也根据最惠国原则扩展到其他国家（因此才有了1865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9）

俄罗斯，可怜的俄罗斯，是国家驱动发展的集大成者。从16世纪

开始，这种推动的目标就是采取西方的方法来赶上西方。这种推动是间歇性的，部分原因是它是由上层发动的，并非每一位沙皇都有这种爱好，部分原因是每一次努力都使人精疲力竭。谁来支付账单呢？是农奴——还能是另外的人吗？由上层发动的现代化是以强迫劳动为立足点的。但是，从长远看，账单是由整个国家来支付的。农奴制在上层培育了愚蠢的狂妄；在下层培育了贪婪和嫉妒、愤懑和恼怒。即使在解放农奴之后，这些品质依旧对俄国的发展构成了最重大的障碍。

正如德国的大银行更喜欢把自己的钱投入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一样，俄罗斯政府也同样把自己的支持首先提供给采矿和冶金业，鼓励组成大型企业，即对巨大畸形的妄自尊大的追求。据我们所知，俄罗斯的高炉比德国的高炉大（德国的一些高炉也不小），证明了对某些人来说是一条落后的定律：时间越晚，规模则越大、速度则越快。（今天的经济学家们谈到“蛙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关键用词和专门术语。）而且，一旦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取得足够的进展，积累起来的资金就用来资助在功能和策略方面可以同它们的德国先行者相比的投资银行。

效果是可观的，却又是脆弱的。从1885年到1900年期间，俄国的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5%到6%，在1909年到1912年期间，又取得了同样的增长。在1890年到1904年期间，铁路通车里程翻了一番；在1880年到1900年期间，铁和钢的产量增加了10倍。在1860年到1914年期间，俄国在世界工业大国中从第七位升到第五位。这是不小的成就，却长期被人遗忘，因为后来，在1917年的革命之后，共产党的代言人以及他们的外国谄媚者一方面沿着记忆的洞穴投下心爱的证词，一方面为了给沙皇政权抹黑，而改写了历史。

他们本来不需要如此卖力地进行中伤。沙皇俄国缺点本来就有许许多多。这个国家反差明显，矛盾重重，像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大部分是文盲，只有零星的才智和科学异彩的亮点；一个享有特权的、自我陶醉的贵族阶级轻蔑地反抗着现代化；一个狂怒激进的革命运动——貂皮大衣和褴褛的衣衫，佳酿白兰地和廉价的伏特加，军官食堂里破碎的水晶餐具和贫民窟里的破烂陶器，两相对

照。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唤醒了一个沉睡着的巨人，使它同更先进的国家有了接触，引进了奇异的、令人不安的技术，使它受到异国理想的感染。

这种理想比技术流行得更快，并且使这个国家步调紊乱。三次战争暴露出东西方的差距：一个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虚幻，一个实在，结果毁了俄国政权。第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它说明了公民军队和农奴军队之间的差异；其后不久就发生了农奴的解放。第二次战争是俄国蒙受羞辱的日俄战争（1904-1905），它使俄罗斯在它“向东方进军”中第一次领略了挫折。紧跟着就设立了国会（杜马）和民众选举制——在原则上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对专制政体来说却很糟糕。第三次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奉命投身于枪林弹雨之中。就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合法性，结果这个政权被推翻了。整个的过程就其方式而言重复了西班牙长期衰落的历史：一个工业化方面落后的大国对付不了装备较好的国家的要求和图谋。而且和西班牙一样，俄罗斯也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做出的反应却太少，太晚了。

我们所说的资金的四个来源中最后的一个是国际资本流动。在这方面，我们又一次看到那个东西向的斜坡在起作用。英格兰向法国的铁路投资；法国和比利时向普鲁士的铁厂和奥地利的银行投资；德国向意大利的银行和巴尔干的铁路投资；大伙儿都向俄罗斯的矿业和工业投资。总的说来，多多的钱跟着多多的机会跑，不会缺乏鼓吹人和穿杂色衣服的吹喇叭的人。

有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落后的现象的专家，试图以富国不愿意向穷国投资为由来解释发展迟缓的原因。这种指控在历史上或逻辑上都不能成立。商人们总是“为钱而来”，哪里能赚到钱就到哪里去。不错，他们是有自己的偏爱。他们向来都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祸，也总是喜欢友善的氛围而不喜欢不友善的氛围，喜欢临近的地方而不喜欢遥远的地方，喜欢熟悉的文化而不喜欢陌生的文化。

他们有时候也犯大的错误。虽有最大的谨慎和远谋，也不是每一项投资都有收益。但这不能阻止商人和投资者再次进行尝试。拖住发展的并不是缺钱。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缺乏知识和技术。换言之，就是缺乏使用钱财的能力。

勒克勒佐：商业历史能够讲述的故事

在1815年和平之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的冶铁工业进入了现代技术的领域。有三个因素具有决定意义：（1）已有一批技艺有待于学习，尤其是焦炭熔化和以煤为燃料的搅炼滚轧工艺，在这方面法国落后了半个世纪；（2）运输方面的改善，使得把煤炭运至铁矿或把铁矿石运至煤矿成为有利可图；（3）铁路建设对熟铁提出了巨大需求。

这些条件改变了勒克勒佐的机会，主要由于幸运的自然优势（煤炭和铁矿石可就地取材）以及皇家的支持，那里的企业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在法国首先应用焦炭熔化。但是，勒克勒佐也遇到了种种障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它不易接近用铁的制造商。^[147] 这些障碍，加上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和战争带来的动乱，把它拖了下来。1835年，它停工破产，大部分设备闲置生锈。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伙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商人合伙，应用知识、金钱和关系，买下了以前各家的废墟并且重新办起了企业。这伙人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商业的需要以及法国资产阶级的品格。

这项冒险事业中的关键人物是阿道夫·施奈德和欧仁·施奈德兄弟，他们身兼商人、银行家、技术人员和锻造工匠几种身份。他们的父亲安东尼·施奈德是一位公证人（同英国的律师差不多），是洛林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一个外甥是工科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并且在军队提升成为将军，曾经短期出任过陆军部长——这种经历很有利于表亲们从事冶炼和销售钢铁的行业。

在这两兄弟中，阿道夫娶了路易·布瓦格的继女瓦莱丽·艾尼昂为妻，而布瓦格是巴黎专门做冶金产品生意的富商——这又是一个极有用的工业关系。布瓦格早已向一些铸件厂和锻造厂投了资，最著名的是向位于富香博的一家大型工厂投资，该工厂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最先重新采用焦炭高炉冶炼法的厂家之一。^[148]布瓦格家族显然是加泰罗尼亚人的后裔，17世纪时定居于法国中部，在土地占有和策略联合中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他们的子女都同有钱的贵族联姻——这种贵族虽属新贵却因此而更有势力——他们都拥有男爵和伯爵的头衔或者至少在自己的姓氏的前面也冠以说明身份的词缀“de”。例如，路易·布瓦格的妹妹玛丽嫁给了伊波利特·若贝尔伯爵，而后者则是法兰西银行董事、有钱有势的弗朗索瓦·若贝尔伯爵的外甥、养子和继承人。

这家富香博铁工厂本身就是布瓦格的金钱和商业关系（路易·布瓦格不是个被动投资者）同“旧政体”时期一位铁器制造商的儿子乔治·迪福的技术知识二者联姻的产物。迪福是工科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之一，是新的以用煤为主的冶铁工艺的先驱。他经历过破产的烈火而重操旧业——这种本事在法国可不是儿戏，因为在法国破产几乎一律是一辈子的污点。他经营着一家拥有数百万法郎资本的企业。他在这项任务中的成功（更不用说他的个人关系）常常为他招来许多邀请，请他出任高级职务并且接管其他的商业企业，但所有这种邀请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感情和理智都交给了尼维尔内的那些锻造厂、铸造厂和机器工场了。

他的儿子阿希尔在他身后接管了这些企业，而他的女儿们则广结良缘：第一个女儿嫁给了乔治·克劳谢——他是英国最古老、最重要的铁器制造商世家的一位传人；第二个女儿嫁给了埃米尔·马丁——他是当之无愧的冶炼企业家，后来由于他为西门子—马丁平炉炼钢法做出的贡献而名垂青史。所有这一切在宝贵的知识和技术交流中都获益匪浅。当1826年乔治·迪福赴英国做他的一次考察旅行时（从富香博到伦敦他花了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但他可能曾在沿途巴黎等地做了逗留），他利用这个机会为马丁订购了一台蒸汽机和几只动力风箱；又为马丁录用了一位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并且参观了英国许多厂和公共工程（可以想像，克劳谢的介绍提供了帮助），结果把英国人（不

同于法国人）正在用金属制造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的样品带回到法国。迪福采购得如此卖力，以致不得不雇用一艘船来把他的战利品搬运到海峡的对岸。（10）

让我们再回头看勒克勒佐。1821年，阿道夫·施奈德年仅19岁，就进了塞埃银行。塞埃家族当初是羊毛织品的商人兼制造商，但同一些这样的生产者一样，他们还涉猎于有关的商业交易。他们由此进入了金融业，从他们祖居的洛林迁居到了巴黎。（11）在法国，同瑞士信奉新教者具有过硬关系的一些新教派商号控制着金融领域，而塞埃家族却是这个领域中为数极少的几个首要天主教家族之一。他们专门投资的行业中包括了铁器制造和冶金业。他们是自己的洛林同乡伊尼亚斯·弗朗索瓦·德·温德尔的坚强支持者。温德尔原是炮兵军官，但秉承温德尔家族传统，转业为铁器制造商，可能是“旧政体”时期法国采用以煤炼铁技术的最富创业精神和影响力的开拓者。在温德尔家族由于大革命的结果失去了他们的哈扬日锻工和铸造厂以后，弗洛朗坦·塞埃在1804年帮助他们买回了这座工厂，然后又于1811年帮助他们买回了穆瓦约夫勒附近的锻工厂。（12）

1830年，塞埃银行赢得合同，向法国派往阿尔及尔的远征部队（即法国在北非实行帝国主义的开端）供应装备。阿道夫·施奈德奉派充当其现场代理人并且接受了从商品总值中提取2%的有利的佣金。他大发其财，接着就在巴黎独自以棉布商人的身份开业。据我们所知，他正是以这种身份同当时勒克勒佐的业主们（两位业主都是移居国外的英国人）建立起业务关系并且成为他们的债权人。这使得他在其后不久这家企业倒闭时进行的投标中处于有利地位。

与此同时，弟弟欧仁也忙于自己的发迹。他起初在当时的羊毛织造中心兰斯当店员，从那里加入了他哥哥所在的塞埃银行。但是在1827年，此时他已经22岁，色当的古老新教羊毛世家即普帕尔家族的一位传人纽夫利兹男爵聘请他们为他们经营一座锻造厂。（大家会感到当时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投身于制铁业。）

欧仁经营这座锻造厂几乎长达10年。此时，阿道夫正在处理勒克

勒佐方面破产工厂的事务。1835年，这家工厂以185万法郎拍卖，卖给了索恩河畔沙隆的一个姓科斯特的铁制品商人。但是，阿道夫决心拥有它，结果利用他的关系（路易·布瓦格和弗朗索瓦·塞埃），又加上了100万法郎，买下了这家公司。对科斯特来说，这很不错。对于阿道夫·施奈德来说，也很不错。

阿道夫把弟弟招进来帮助自己：他自己处理贸易和财务；欧仁指导开发和生产。其后不久，欧仁就同出身马雷斯家族的康斯坦丝·勒穆瓦纳结婚，她是纽夫利兹男爵的孙女，财政税务官的女儿。（这些税吏在他们不得不把款项上缴国库之前，有相当长的时间把款项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利用它进行投资。这使这种人事上成为重要的私人银行家。）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知识，欧仁在巴黎的工艺学院进修了几门课程，而且秉承古老的法国传统访问了英国，借以弄清他的竞争对手们正在忙活些什么。这样，天主教的企业和金钱同新教的企业和金钱联姻，再依靠他们同政治权力的联系，使勒克勒佐成了铁轨和锻件的主要供应地，成了蒸汽机、机车、汽船、锅炉、压床的建造地，最终成为法国最大的兵工厂。

真是行善不图回报。1848年是吞食一切的危机的一年，富香博陷入重重的财政麻烦。温德尔家族（哈扬日）和施奈德家族（勒克勒佐）联合签订了一大笔银行贷款，从而拯救了它：我们铁器制造商必须抱成一团。一个世纪之后，莫里斯·德·温德尔有四个女儿要出嫁（他没有儿子），其中一个就嫁给了塞埃家族的人。

这一切绝非偶然，甚至也不是浪漫故事。

把滞后造就成美德

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在1951年，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撰写出他《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经济落后》的开拓性文章。其中，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从事工业化并且仿效其先行者需要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后来跟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需要些什么呢？格申克龙借助比喻回答说：需要的是跳越分开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知识和实践的鸿沟。格申克龙没有试图发问为什么一个国家就应该想要跳越这道鸿沟。其优点是明显的。更确切地说，他把这种鸿沟本身视为一种刺激，一种对努力的吸引——就像一种具有潜势的火花隙，当它足够大的时候，电就以火花的形式跨越过去（这是我的比喻，但它并非没有道理。格申克龙明确地谈及“潜势”同实势之间的“张力”）。

所以，在格申克龙的模式中，滞后是合算的。不是在跳越之前，而是在跳越之后（他没花力气来估算工业化之前相对贫困的代价，但他不必这么做。代价是高昂的）。鸿沟越宽，对于那些跨越它的国家来说收益就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有多得多的东西供学习——包括应避免的错误。结果，落后的国家比它们的先行者成长得更迅速。它们的成长都具有格申克龙所谓“进发”的特征，即一个时期（或多个时期）的超常增长率。

格申克龙说，滞后的成长还趋向于以“最现代、最高效的技术为基础”，因为这种技术效益最高，而且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同更先进的国家竞争。这种技术均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似乎对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并不合乎情理。^[149] 格申克龙承认这一点自相矛盾，但他对这个问题用劳动大军的素质加以解释。那很好，他说，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事实上很稀罕，比起更富有、更先进的国家尤为稀罕。所以，用资金代替劳力就合算了。

对于格申克龙来说，这只是全部事情的一半。事情的另一半则关系到“怎么样”：落后的国家缺乏资金和优秀的劳力，怎样成功地创建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呢？而且（虽然格申克龙很少涉及事情的这一方面），它们怎样才能获得知识和技术？最后，它怎样才能克服工业企业所遇到的社会性、文化性和体制性的障碍呢？它们怎样创设合适的安排和机制呢？它们怎样应变呢？

在他探索落后的条件和约束时，格申克龙特别强调了资金的筹集。他区分为三等：（1）一个国家具有大量的私人财富以及资金雄

厚的商业银行，能够用家庭资金、小额贷款以及利润再投资等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2）一个较为贫困的国家，具有数量较少、规模较小的私人财富，但如果能够开办（投资）银行来筹集这些分散的资金，则足以为工业融资；（3）一个更为贫困的国家，其私人财富不足，而只有国家靠资助投资银行或者靠直接补贴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英国显然属于第一类。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属于第二类。美国、比利时、瑞士和法国则介乎两者之间。俄罗斯属于第三等。

格申克龙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严重地依赖于前一代人的学术成就并且拒绝应用复杂的历史安排来适应规整的先验模式。所有新的系列的数字估算都要求在展望中加以调整。即使如此，格申克龙却一直继续影响着发展问题的研究工作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中心论点：后来者需要做出特殊的安排来补偿自己的落后以及其他方面的变革，而且只要有才智和意志，它们能够找到这样做的办法。（13）

注释

1 .见Freudenberger，“The Schwarzenberg Bank”一文第51页及其他多处。

2 .关于这个金融社会，请见Landes，“Vieille banque et banque nouvelle”一文及其所著*Bankers and Pashas*一书。

3 .关于罗思柴尔德银行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股权，请参考行将出版的尼尔·弗格森所写的关于该银行和家族的历史。

4 .请参看Barbier，*Finance et politique*一书第14章“福尔德背后的福尔德”，探讨福尔德金融家族同德国的海因银行及其他银行、同圣彼得堡的京兹堡家族（斯蒂格利茨的商业继承者；现同布隆夫曼家族有姻亲关系）、同法国的拉扎德家族和富塔杜家族的关系，外加同拥有葡萄园、马匹和控制议员选区的（封建的以及拿破仑王朝的）贵族世家的关系。

5 .除了布鲁塞尔的兴业联社之外，还有科隆的A.沙夫豪森银号。它是一家私人银行，在1848年的危机中遭受失败，接着转而采取这种公司形式。一般人关于佩里埃尔兄弟创立新形式的印象来自格申克龙在他《从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一书中反复提到的由普伦治写的“信贷社的初创和历史”一文。（该文的扉页标题系1951年所定。）

6 .德国人根据1870年6月11日的法令，也这么做了。焦点在于商人们能否事先不经政府许可即建立合股责任有限公司，能否根据王室特许或立法机构的法案即可建立这种公司。沙俄从来就没有试图制定这种常规注册的办法；根据1836年的一项法令，实际上直到1917年的革命（革命以后则根本谈不上了），任何这样的公司都必须经法律授权——见F.克劳塞在Moss and Jobert, eds., *Naissance et mort* 一书第201页中所说。在美国，州同州之间规则各异，虽然在内战之前有些州就早有股份有限公司常规注册法，但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合股公司。其中一个原因是，各银行更倾向于按无限责任发放安全性贷款。

7 .关于“向强者提供援助”，请参看R.Tilly, “German Banking, 1850-1914”一文。

8 .同上文第113页。是全部的工业资本呢？抑或是公共合股公司所拥有的资金呢？尚不清楚。

9 .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胜利，请参看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de 1789 à 1870*一书第 II卷第 VI册第5章。应当说明的是，这种朝向更自由的贸易的动向是短暂的。在紧接着一场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之后，各主要工业国家倒退回到了保护主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在1878-1879年；法国1892年颁布梅林关税法）。同时，美国正在实行比欧洲（不含俄罗斯）盛行的等级高得多的保护。只有英国对自由贸易保持忠贞不渝，虽然英国国内对保护的鼓噪也日趋增高。关于这一切，请参阅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一书第16-55页。他和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同，认为保护有其自身的回报。

10 .关于这一切，请参阅André Thuillier , *Economie et Société nivernaises* 一书第9和第10章。

11 .这种从贸易转到金融的现象所在多有，一般是通过商业证券的交易的积累。关于这种情况，请参阅Landes , *Bankers and Pashas* , 第1章。

12 .关于塞埃家族的情况以及洛林商人在大革命期间和在帝国统治下“高升”至巴黎等情形，请参阅Bergeron , *Banquiers* 一书第54-55页。关于塞埃在伊尼亚斯·温德尔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后来帮忙买回该家族铁工厂一事，外加后来购买穆瓦约夫勒的锻造厂等情况，均请参阅Woronoff , *L'industrie Sidérurgique* 一书第485页。

13 .有关这种论点的进一步的、有时不是一致的见解，请参阅Sylla and Toniolo, eds. , *Patterns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一书。

第18章 知识的财富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为获取英国最新技术的“秘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出考察者——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去观察、报告并且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因此，1718年到1720年期间，在移居国外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怂恿下，法国发起了一场寻求英国技术人员的有系统的活动，包括寻求钟表制造者、毛纺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制造者、造船工人，约有三三百人之多。这个运动使英国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某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移居国外。这是涵盖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这种措施中的第一个，它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多。（1）

但是，这种法规并没有构成一道封闭性的障碍。在一个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社会里，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对潜在的国际竞争抱有警惕。试以金属制造技术为例——因为这种技术同军备和机械有关而成了特殊的宠物。（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屠杀所以就进行屠杀。）在1764年到1765年期间，法国君主政权派遣加布里埃尔-让·雅尔参观了英格兰的采矿和冶金设施。英国人对这种情报的价值十分麻木，所以雅尔在设菲尔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的铸造厂和锻造厂受到了良好接待。后来发表的雅尔备忘录迄今依然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技艺的宝贵情报资料。[150] 英国在计时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一样：计时是航海优势的关键；1769年，航海部允许法国来访者打开并且察看约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时钟，其理由是这种时钟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哈里森晓得这件事以后，他大发脾气。）（2）

有些地方和行业对来客并不欢迎。在五金行业中心的伯明翰，每

一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窍门和把戏。那里的工匠把每一个陌生人都当做敌人，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们不仅对外国人如此，对英国同胞也一样。亚瑟·扬是一位不寻常的旅行家兼观察家，曾经写到过他在这个繁忙城市所受的敌对性的接待。他说：

我在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也没有比在伯明翰更加感到失望。在那里，由于制造商们过分小心，我没能获得即使是最普通性质的任何资讯。看起来，法国人带走了他们的几项诀窍，因此对这个城市伤害不小：这使得他们极为小心，什么东西也不让陌生人看到……（3）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伯明翰的制造商们从事自己的间谍活动。英国并不是拥有值得学习或盗窃的技术的唯一国家（虽然截止到当时，英国在这种潜在的窃取对象中占有最大的份额），而且英国的制造商们比起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对手们来说，同样是无所顾忌。此外，跳探戈需要两个人，而技术熟练的工匠们如同学者和艺术家一样，把整个欧洲当成自己的家。（4）例如，法国五金工人最宝贵的秘密之一就是通常在黄铜或青铜上面镀金——鲜艳、明亮、一派富丽堂皇，因此十分有利可图。马修·博尔顿因为同詹姆斯·瓦特合伙制造蒸汽机而赢得了声誉，但他最初的起家本领却是制造纽扣、带扣、表链、蜡台以及各种各样的五金制品。博尔顿为了把法国的这种技艺学到手，把钱和人派到四面八方；还勾引法国的工匠和能手，如果可能就连同他们的工具一起收买。最终，他取得了成功，认为自己不仅是聪明的商人，而且是爱国者。（5）与此同时，博尔顿自己也是别人多次试图勾引的目标。瑞典特别迫切，他甚至本可以从那里求得一笔酬金。

（6）

人们不可能总是分清好奇、探索和彻头彻尾的间谍活动之间的界线。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位著名研究者写道，“许多外国人……搜集有用的情报……从来不秘密地干任何事情。”（7）但他又说明，许多“来访者”本身就是铁器制造商、别的制造商、化学家、工业检查官或者是某种消息灵通的观察者。他们到英格兰来并非为了参观名胜古迹。例如，伊尼亚斯·德·温德尔名义上是炮兵军官，但更贴切地说，他是铁器制造商世家的后裔和法国政府挑选的工具。他以为自己有天赐的

鼻子、眼睛、舌头和手腕，并且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

.....我们发现详细查看英国的制造业没有任何困难，人们需要的是熟练掌握它的语言，不表现出任何好奇心，要等到喝了潘趣酒的时刻，才告诉自己可以博取制造商和他们的工头的信任，人们必须避免由大臣们或勋爵们作推荐，因为那没有什么用处.....完成这样一种使命，年轻人很不合适.....为了有益地仔细观察事物，应该对机器起码具有某种见解，因为人们总是看着机器采取每一个步骤，其中往往会浓缩着制造的工序。（8）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人才从英国流向大陆：如果能聘用到具有多年第一手经验的人，又何必硬要去浏览一番呢？只要有现成知识的人，就能把它传过来。即使在后来科学传播和透明的时代，即使有样品和设备，即使有蓝图和明确的说明书，某些技术仍然要凭经验才能学到手。 [151]（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火热，法国人丢失了自己几个主要的武器制造中心，而又急迫需要他们的75毫米野炮的补充。这是他们的一种关键的火炮，是他们武器的骄傲，其零部件设计如此精巧，以致开炮的时候，一杯放在炮车上的水也不会洒掉。他们违反自己一切的保密规定，把蓝图送到了美国——完全无用。直到一批工人到来向美国人手把手交代了其中的诀窍，他们才得以有了在火力和稳定性方面可媲美的补充火炮。）

但在这方面，18世纪的招募技术人员的代理人却碰到了英国工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劳动分工。任何一名工人也只是知道一小部分的生产工序。有一位名叫勒图克的法国代理人（在英国化名约翰逊）抱怨说：

任何工人都不能向你说明操作的全部环节，因为他长期被固定在只是一个很小的部件上；听他介绍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会充满谬误。但是，正是这种很少令人了解的分工促成了劳力的价廉、产品的完美以及制造厂商财产的更大的安全。（9）

虽然专业化使得招募任务更加艰巨、成本更高，但是这种做法还是很合算的。这种外来移民中有些人是请来的：外国政府花钱请他们

前来，并且帮助他们在企业中立足。但这些外流人员中有些人是出于情感原因而出走的——就像有位名叫约翰·霍尔克的人，他是一个对当局不满的詹姆斯党人，被法国商务局长丹尼尔·特鲁丹招募到了法国，成为毛纺织品和纺织机械的制造商，而且担任了外国制造品检查长。另一些则具有强烈的个人原因，像迈克尔·阿尔科克——他在1755至1756年期间携带情妇外加一点贪污的钱财出走，抛下妻子兼合伙人，让她来面对破产。这位妻子最后又同他团聚，可能她就是原先策划这个骗局的同谋。到后来，阿尔科克和他的两个女人显然设法做到了三人同居，住在卢瓦尔河上游的拉夏里。在那里，阿尔科克制造锻件和五金制品，并且尽力教给法国人一些关于精炼钢的知识。（10）

然而，大多数外流人员并没有迫切的原因定居国外。他们到国外是为了钱。试以科克里尔一家为例。父亲威廉·科克里尔原是一名机械师，在1800年前后被收买来到韦尔维耶（当时属于法国，现属比利时）。韦尔维耶是毛纺织业中心，收买威廉的是企图过渡到工厂工业的一家手工生产者组成的公司。按计划，科克里尔要向他们提供从纤维到纺纱的配套机器组件。（这一工作用机械完成时必须把任务分解成一连串工序。）威廉·科克里尔怀有自己的宏图大志，本来会愉快地供应整个的工业（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谈论当时的帝制的法国），但是他却受到同新雇主所签合同的约束。毫无关系。他的女婿从事机器制造业，当1807年威廉的合同到期的时候，他在冶金行业的古老中心列日开办了自己的工场。

1813年，威廉·科克里尔把他的企业交给了他最小的儿子约翰，而约翰则转而从多种经营，生产重工设备：水压机、蒸汽机、水泵等。这时候，比利时已经被并入荷兰，荷兰国王则把科克里尔公司看做是他王冠上的一颗宝石：“无所畏惧地把你们宏伟的企业继续办下去吧，请记住荷兰的国王始终有钱来为工业服务。”有了这种和其他的支持，有了更多的物质鼓励，约翰·科克里尔继续扩大了他的事业——冶铁，建造汽艇和机车，在亚琛（在附近的德意志境内）开设铁矿，在普鲁士开设多家毛纺厂，在巴塞罗那开设棉纺厂，在苏里南开设糖加工厂，在法国南部开设多家高炉，在遥远的俄罗斯开设商店、工厂、铁路工程。但是，这位全球企业家——有位法国人把他称

为“一位最好被说成是思想博大而无国籍的英裔列日人”——的麻烦在于他太眼高手低了。尽管有雄厚的银行支持，他却在1839-1840年的危机中破产了，不久之后去世。于是，公司改组，成了比青铜和它的创始人的生命更持久的一座纪念碑。（11）

多数英国的外流人员和科克里尔家族一样，但都是不出名的普通人，都是受高薪引诱的工人，其工薪比在国内要高出两倍。（英国的工薪通常可观地高于海峡对岸的工薪，但是这些熟练的工匠和机师在后进国家是稀有的商品。）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是由英国制造厂家和出口商派出执行任务，来护送机器并使其保持运行，后来才发现自己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珍重。更多的人则是受到老工友的劝诱，来应招的。

请记住，这种行为大部分是违反英国法律的。为了阻止外国的竞争，英国早已禁止了多数机器的出口（但不禁止蒸汽机出口）以及技术工匠向国外的移民。在这方面，英国是遵循着一条十分古老的传统。例如，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和威尼斯兵工厂的造船木工只有在遭受死亡的痛苦时才获准移居国外。这种约束延迟了知识的扩散，但在监视手段并不完备的社会里，却无法阻止知识的扩散。英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工匠移居国外，其中多数人都是自愿的，少数人是战争中被俘虏的。

英国人员外流并非独此一家。法国人引进了具有冶金技术的德国人；俄国人引进了荷兰人、德国人以及瑞典人。法国人抱怨德国人，说他们行为不检点、忘恩负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这些人那些离家出走、投奔新的工作岗位的人。）在这方面，有位镰刀制造商这样抱怨他的德国人，他说：尽管他们有种种优点，尽管待遇较为优厚，没有他们国内的那种军事纪律，但他们工作起来随心所欲，还得趁高兴劲儿，而且“一心想方设法争取被开除”。并非人人都是这样持否定态度。有一位工程师曾经指出，有外国工人在法国工作这一事实，对法国工匠具有一种有益的影响，完全根除了他们“独立自主的虚假观念。这种观念好长时期以来促使他们把自己当成给他们以生计

的那些人的主子”。（12）（这是一个经常讨论的主题。雇主们不喜欢依赖自己的工人，设法用资本替代劳力——因此才有了棉纺业的初始机械化和强迫建立工厂的做法——这往往不仅是受金钱考虑的驱动，而且也是受权力考虑的驱动。） [152]

但是，金钱也起作用。劳动的分工使移居国外的工人很难泄漏所有的秘密，但是资本的分工却使某些雇主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国外并且教会外国人如何使用它。尤其是出现了新的专门机器制造行业，他们尽其所能在一切地方寻找市场。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新发明的机器的英国用户喜欢对其保密，因此才有了对机械出口的总体禁令。（但是不包括蒸汽机的出口，因为最初蒸汽机不适用于制造业。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它们在纺纱厂中找到了用途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让博尔顿—瓦特公司接受出口禁令了。）这种机器促销活动在富足的英国当地生产厂家不乐意买而外国对手却乐意买的时候就事关重大了。于是，机器制造厂家就成了隐蔽的“颠覆分子”，促进国外的竞争而在第三市场上暗中损害自己的同胞：“（机器用户）在技术上的自力更生伴之以保守秘密，可能是一种无言的自杀默契……”（13）

关于知识扩散，就谈到这里。从长远来看，对于后进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学校。不管把标准定在中等还是高等的水平上，这类学校的目标都是培养更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并且为智力自主奠定基础。在这方面，法国人率先在1794年开办了“工科大学” [153]（原名为“中央土木工程学校”）。其最初设计是一所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工程兵和炮兵军官，因为工程兵和炮兵都是关系到技术知识的兵种。（任何一个勇敢的傻瓜都能挥舞一把骑兵的马刀。）但自从建校开始，革命政府就聘请了一批拔尖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前来任教，而这些人长期下来就使这所学校从军事课程和训练转变到灌输数学、基础科学和技术能力。这所学府的富有竞争性的特色——入学考试、公布名次、部分课业完成的名次、毕业的名次——吸引了法国最优秀、最聪颖的人才；所以，虽然这所学校继续向军队输送军官，但这些人并不是拔尖的学员。那些“X”佼佼者——法国人根据代数未知数符号这么称呼他们——都进入了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并且形成了法国工程和技术统治的精华。他们领导了法国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学习并

且应用了英国最新的冶金技术；指导了国外的公共建筑工程；而且到了20世纪，逐步领导起法国一些最大的高新技术公司。

工科大学的教学不妨说太高深、太理论化了。那些想进而投身工业的毕业生通常还要在矿业学校或是土木工程学校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两所学校都建立于“旧政体”统治时期。在那里，他们学的是应用科学和技术并且接受上岗培训。与此同时，法国企业界逐渐感到需要建立另外一所学校，同工科大学一样，但在开设课程方面要更加实用。这就是“中央工艺制造学校”。该校于1829年由私人创建，1856年并入国立学校系统，用作培养工程师和企业经理的基地。中央工艺制造学校的学生不及工科大学的“X”学生威信高，因为该校历史较短，其入学竞争不那样激烈；但是它那较大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在一些较新的部门中，诸如在汽车业和航空业中，它的毕业生要比“X”学生们干得更好。

除了这两所关键的、综合性的学府之外，各种地方学校纷纷建立：各种工艺职业学校以及往往由雇主创办的各类专业学校，其培训侧重于某些特殊部门：里昂的化学工业、贝桑松的钟表制造业和米卢兹的纺织业。这种培训中，有些目的在于弥补以往的徒工制度消失了的遗憾。最后，一些较古老的技术机构，如工艺学院——它最初是博物馆——也开始授课，往往是针对成年人，这些学员们已经超过正常学龄，但想使自己赶上最新的发展。

法国的这些创举成了更东边一些国家的指示灯。尤其是工科大学在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甚至远至莫斯科等地方激起了效仿的热潮。此外，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相关学校的组合。例如，德国人发展了培养中层技术管理人才的行业学校网络；而且建立起越来越多的一批技术高等学校——第一个1825年兴建于卡尔斯鲁厄——它们都按大学水平进行教学，造就了几代的化学家和工程师。最后，德国人在各个综合大学内推进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是实验和探求的利刃，而且教学实验室的创立（尤斯图斯·李比希于19世纪30年代首创）使教育制度臻于完善。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种教育制度变成了全世界的钦羡目标和楷模。

依靠正规教育传播技术和科学知识，产生了重大成果。首先，它几乎总是促使以抽象事物和理论为内容的教育转化为各种各样的新老应用方法。我想强调的是新的应用方法。其次是开辟了通向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新知识门类的道路。

请拿这种教育方式同英国的“通过实干来学习”的教育方针加以比较，因为后者曾经推动过工业革命。只要技术依然是各项改进的积累，只要发明依然是已知的各种技艺的重新组合，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就曾经是十分有成效的。（即使如此，人们也不能不对英国人进修的能力感到惊讶：它培育出大量适用的天资和人才，其中不少都是自学成才的。）但是，从18世纪末叶往后，由于技术可能性和探究的疆界外移，探索超越了感觉经验的种种教诲。

新的趋势在两个领域中，即在化学和电力领域中，找到了最大的回报——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成就都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先前的化学部门依然是一种工业烹调法：混合、加热、搅拌，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它们并非停滞不前。随着生产厂家追求规模经济，它们尤其从机械化中受益——采用了更大更快的窑炉、搅拌机、研磨机，等等。另一个进步的来源是废物利用的创新（例如，煤气用于照明），有些时候这样做是为了遵守惩治污染的法规。（利用废物总比受到控告或受到罚款要好。）但是，革命性的进步却发生在有机化学的新领域中，直接派生于关于碳基分子的研究。这些打开了通往多种应用的大门，首先是在染料方面（对纺织业至关重要），然后是在药品和摄影方面，最后在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是在人造物质方面——即我们泛泛称之为塑料的方面。

电早就为古人知晓，却未被理解，自18世纪以后，好奇的专家们拿它做游戏，几乎就像玩玩具。这种实验本来能够产生实用的结果，因此，本杰明·富兰克林才发明了避雷针。但是，系统地把电力用作一种能源并且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还必须等到19世纪，等到伏特、安培、法拉第等人进行研究之后。这些人的名字已成为科学术语，永垂不朽。第一批工业方面的应用虽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却规模很小：电池（电流的堆积），它可以驱动电报和时钟；电解技术，

可以专门用来电镀金属和刀具。这两项应用都是在1850年之前发明的。但是，随着发明发电机来生产大量电流以及建立配电系统，电力事业迎来了繁荣局面。最重大的刺激物就是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光照技术（1879）和电动马达。这证明了间接费用的投资是值得的。

在化工和电力两方面，学习和能力都依靠正规的教育。这些现象凭感性认识是难以理解的；解释这种现象需要图解和模式，而且其基本原理只有在课堂和实验室里才能最好地学到。在这方面，欧洲大陆依靠学校教学来发展和传授新技术，获益匪浅。追赶一跃成为领先，而英国则深陷在习惯的罗网中，落在了后面。

此外，在英国的电力事业中，地方自治加重了困难。有些地方，市立的煤气网成功地抵制了电气化；在另一些地方，英国建起了多层重复的电力网，每一个网都有自己的电压设计和硬设备。后来的改进措施只是加长了菜单。时至今日，英国的电器购买者还必须应付多种多样的插头和插座，而且顾客必须向店家点名要哪一种可以应用的现成设备。英国经济在这些新的部门中成长了，一如它曾经在那些旧的部门中成长——就像头朝下脚朝上。

科学和技艺的这种联姻开创了西蒙·库兹尼茨所谓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14）不仅是有一批非同寻常的发明使得第二次工业革命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括内燃机液体和气体燃料的应用，通过电流来分配能和力，物质的系统转换，改进了的通讯（电话和无线电），由新的动力源驱动的机器的发明（机动车辆和家用电器）。而且还有高于一切的正规传送知识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的联姻曾经以一些结合作为先导。人们可以把这种求爱上溯到中世纪，追溯到应用天文知识来改造航海技术（纬度的计算），追溯到把数学应用于弹道学，采用摆锤来建造更准确得多的计时器。而且还可以回溯到蒸汽机，那是一次科学经验主义的不朽胜利。但是直到19世纪的晚期科学才走到前面而成为技术的先导。这时，想要成为发明家和难题解决者的人感到开始自己的项目之前先阅读文献是有益的；或者就此而言，先读书再构思自己的目标——干什

么以及怎么干。

因此，被赶上并且被超过的是领先者——革新者。而且因此一切旧的优势——资源、财富、权力——都被贬值，而思想被认定优于物质。从此，未来的大门是向着一切具有这种品格、这种双手、这种头脑的人敞开着的。

工业烹调法的秘密

我们已经看到，在制造“白色兵器”（剑和匕首）、刀和剃刀、刃具和锉（对于精密零件的制造至关重要）方面，钢总是首选的金属。起初，钢是熔炉中熔炼出来的一种偶然副产品，因为熔炉温度不够高，不能够产生均匀的融体，而且是随同软硬不均的铁，生产出一些钢。后来，随着以更高的温度运行的高炉的发明，人们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从生铁中获得钢。一种方法是对金属重新加热，把其中的碳进行足够的氧化，使其含量降低到1.2%-1.5%。其结果并不均匀（在正确的时刻立即停止，很不容易），因此就有了当时不同用途的各种类型的钢。质量最好的应用于枪炮和精致刀剑，质量较差的应用于犁铧和镰刀。

另一种方法是去除碳来获得熟铁，然后再加碳来获得钢。完成加碳工序一律要把熟铁锭裹一层碳，加热使之浸透，然后再锤炼。目的是通过击打的方式使复合金属物所含的碳分布平衡并且使成品质地均匀——有点儿像揉面团。而且正像通过折合、挤压、再折合、再挤压揉出更为均质的面团一样，这种渗碳钢的最优产品也一样，要使其折合，再锤炼，反反复复多次才行。所以，成品就成了多层钢锭；其层数越多（亦即，折合和揉搓的次数越多），这种金属物就越柔韧坚实。这种产品最优秀的范例就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刀。这种刀500年之后依然保持锋利和闪光。欧洲的多层钢在17世纪初首创于纽伦堡（纽伦堡是一个工具和仪器制造业的古老中心），立即就被英国人学到了手。法国人直到1770年才学会了这项技艺。

但是，即使武士刀在均质性方面也无法同坩埚钢相比。所谓坩埚钢就是把钢加热成液体，使其碳添加剂完全熔合。坩埚钢发明于1740年，发明人是一位英国的钟表制造商，名叫本杰明·亨茨曼。他对获取质地较好的金属材料来制造弹簧和锉刀有兴趣，显然是出于职业上的利益。这项技艺被英国垄断了大约70多年——并非因为没有企图仿效的人。

尤其是法国人不惜花费巨资来了解这个秘密。法国在钢方面相对较弱，合乎情理地把这一点视为一种严重的政治缺陷。科学上的万能博士、因自己的温度计而名声卓著的勒内·安托万·德·列奥米尔（1683-1757）在18世纪初声称，他发现了他自己比作“炼金术士的点金石”的秘密，为了把铁转化成钢建立了一家“皇家工厂”，并且为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政府一笔慷慨的补助金。他失败了，因为他以为答案在于添加硫磺和正确的盐类。他从来没想到过碳的作用。他还以为，法国的铁用于炼钢完全合格，不像英国人那样为了炼钢还需要从瑞士进口质地更好的铁。（15）他本应环顾一下四周。

“这种分析上的谬误以及这种‘爱国的选择’将在法国长期被接受，将加剧民族工业的落后。”（16）随后，另有一些人也站出来大吹大擂，说他们已经制造出能够同英国和德国的产品相比的钢。根本就没有成功。最大的推进发生在加布里埃尔·雅尔1765年出访英国之后。雅尔本人打算生产渗碳钢，但是得到的却是低劣的成品，主要是因为他们像列奥米尔一样，使用的是法国铁。他在1769年去世，事业中断。另有一位姓杜亚美的机械师，是雅尔的旅伴而且是政府大臣杜尔哥的门徒。他被布罗伊伯爵雇用，而伯爵本人是一座锻造厂的厂主并且接受着一项大约15000里弗赫 [154] 的政府津贴，要从事类似的实验。15年之后，政府不得不承认杜亚美毫无进展。主动进行尝试的冶金业者更少了。毫无疑问，法国的确需要钢而且很了解怎样炼钢。

于是，那位英国人登台了，就是伯明翰的迈克尔·阿尔科克。关于此人，我们在上文里已提到过了。他告诉法国人说，此事没啥了不起：炼钢很容易；难的是要炼出好钢。于是就在商务局长特鲁丹·德·蒙蒂尼（就是曾经派雅尔和杜亚美去英国参观的那个人的儿子）的帮

助下，他开办起自己的一座工厂并生产出渗碳钢和坩埚钢的样品。他从未超出生产样品的阶段。

与此同时，阿尔科克的两位合伙人主动离去并且在卢瓦尔河上的昂布瓦斯（因其皇家城堡而更为有名）买下了一座小型的锉刀锻造厂。这个锻造厂吸引了舒瓦瑟尔公爵的兴趣，促使法国政府（又是在特鲁丹·德·蒙蒂尼的支持下）发起兴建一家生产优质钢的“皇家工厂”，并且每年向其补助两万里弗赫。但是，这种补贴却带来了祸因：必须使用法国炼制的熟铁。这家企业在设备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起6座大型高炉，40个动力锤，80座锻炉，而且从事了一个接一个的实验。毫无用处。它从来没炼出过坩埚钢，而且它的渗碳钢也没能让人信得过。

其他企业或多或少也具有良好的关系并抱有同样的决心，也都参加了这种竞赛，特别把目标定在制造良好的锉刀上，因为随着机械化的进展和金属品代替木料，锉刀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这种企业设在多菲内地区，获得了省长和奥尔良公爵财团的支持。首先，它从低处着眼：制造长柄大镰刀用的刃具和杂用五金制品。但后来却因贪污盗窃陷入困境。拿钱总是比挣钱要容易一些。

法国冶铁工业历史学家丹尼斯·沃龙诺夫作出了如下总结：在列奥米尔以后的60年中，法国的炼钢工业依然在“原地踏步”。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成功，却都证明是虚假的。这并非是因为那些政府检查官容易上当受骗或者好献殷勤，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强调这种金属的理论纯度而不是强调它的性能（硬度、锋棱等等）。在形不成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他们却被说服“接受”了关于规格重要性的观点。其结果就是报废、没有出路以及商业的失败。（17）

随后，发生了大革命及拿破仑上台。这就更加原地踏步了。只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多亏了一个叫詹姆斯·杰克逊的英国外流人员的帮助，才学会了炼制坩埚钢。德国人学会这种技艺比这早了大约10年，基本上是自己努力。一个名叫约翰·康拉德·菲谢尔的瑞士人是一位对外国企业具有敏锐观察力、孜孜不倦的徒步漫游参访者

——他的鼻子和眼睛无处不在。他学会冶炼坩埚钢大约是在1805年。

(18)

要把工业烹调法学到手，仅仅有配方、蓝图，乃至个人的见证，还是不够。

天赋之才不够用

在19世纪中叶，生物碱奎宁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在印度疟疾使平民和军人衰弱不堪甚至丧生。奎宁并不能治愈这种疾病，但它可以减轻症状。当时，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的，而金鸡纳树则是秘鲁的土生植物。英国政府通过世界著名的伦敦皇家植物园，作出巨大努力来从秘鲁获取金鸡纳树种子，培育它们发育成幼苗，然后把它们栽植在印度，但其结果却令人失望。印度依然依赖高价从爪哇进口，因为荷兰人已经在爪哇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移植。英国人本来会更喜欢他们自己的供应。

威廉·亨利·珀金1838年生于伦敦，是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同印度没有什么联系。他父亲希望他能当一名建筑师（社会地位上升），但从早年开始，他就想从事化学。1853年，他年仅15岁，就进了新兴办的皇家化学学院，其后接受一位德国科学家奥斯特·威尔海姆·霍夫曼的指导。这位德国科学家很喜欢这个男孩，聘用他当自己的助手。霍夫曼使珀金认识到了寻找方法合成奎宁的重要意义，而珀金把这个问题带回家去，带到他家的宅院中装置起来的一个小实验室里去。他没有找到制造奎宁的方法，但渐渐地他获得了发自石脑油的一种凝结物（煤焦油的一种成分），呈苯胺黑色，他接着从中取得了苯胺蓝或苯紫颜料。（化学向来都是一门奇缘巧遇的科学。）

珀金十分机敏地认识到自己的发现物的价值。他的蓝色着色物质能用作一种优质染料，所以当时只有19岁的珀金在申请专利之后，就利用他父亲和哥哥的资金兴办起制造这种染料的一家工厂。这样就结束了他在皇家学院的学习。从这第一次幸运成功到有意谋取的其他成

功中，珀金不久就变成了百万富翁。接着，他又来了一次急转弯：他回到了他最初的爱好，即实验和理论化学。此外，德国的化学工业正在把英国的化学工业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这第一种人造染料是理想的材料——是十分重要的煤焦油颜料工业的开端。一经珀金提供了暗示，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瑞士的化学家们就纷纷转向这一任务，人造颜料的彩虹出现了——紫红色（品红），洋红（原名为“马让塔”——magenta，系根据一场流血战斗的地名而命名），一系列的紫色，整个茜素属的各种红色、各种粉红色、各种橙色以及各种黄色，还有一种因为在汽灯下也不变蓝而引起轰动的绿色。^[155] 这些颜料反过来又刺激了对时新织物的需求，并且使欧洲富裕国家的妇女放弃了她们传统的经济 and 阴郁的黑色。（今天更加富裕了，她们中许多人又回到了穿黑的时尚，甚至在婚礼上也这样。）但是，从长远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导致更广泛的化学发展的新技艺分支：新的发光物，药品（阿司匹林、六〇六、各种巴比妥类药物、奴佛卡因以及另外的十几种药品），摄影材料，人造肥料以及顺延下来的塑料——所有这一切都通常具有预料不到的、偶然性发现物的成分。

由于珀金的贡献，英国领先于这一新的工业部门。英国具备了这样做的一切条件。首先，它拥有一个巨大的、从传统上说基础良好的重化学工业，当时生产着碱、酸和盐。其次，它拥有碳基制造业的一切成分；任何国家也不能生产比它更多的原料煤焦油，任何地方也没有它的煤焦油价格那样低廉。最后，它为纺织品染料提供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一工业却离开了英国的海岸，在德国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在法国和瑞士落了户。到1881年的时候，德国生产着全世界人工染料的一半；到了1900年，则达到80%到90%之间。主要的德国生产厂家对工厂、科研和设备进行大量投资，不论丰年歉年，都能够逐年支付20%以上的股息。这是历史上一卜最大、最迅速的工业转变之一。（19）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明显的违背比较优势和相依条件“规律”的现象呢？这是因为除了珀金和其他几位时髦人物之外，英

国并没有进行创造发明所需要的那些训练有素而且具有天赋的化学家。毫无疑问，它没有像在欧洲大陆上见到的那么多、那么训练有素的化学家。所以，当旅居英国的霍夫曼、卡罗和他们的德国同事被具有诱惑力的优越条件吸引回国的时候，英国的有机化学工业就萎缩下去了。形成对照的是，在德国，大型合伙公司崛起并且繁荣起来：赫希斯特公司、巴斯夫（BASF）公司、拜耳公司、爱格发公司等，都围绕着第一流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而建立起来，配有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大楼并且同高等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一种人才汇集合并创业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文化，其重要意义在人造靛蓝的史实中充分显露出来。其中曾经有一种供合成用的合乎逻辑的候选物种：一种主要颜料，碳化合物，以高昂的成本从外国植物（菰蓝和其他植物）获取。在1880年，A.拜耳教授合成了它并且把这种制作方法卖给了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两家公司认定值得合作。他们彼此都需要对方。用了17年的时间、获得152项专利、花了数百万马克之后，他们依然没有一种在商业方面可行的技术。有一条走不通的路，是采用一种不同的合成法，也是由拜耳进行的；但是它所需要的甲苯如此之多，以致煤焦油工业部门如果要供应这么多甲苯，就会让苯和萘之类的副产品把市场淹没。而报废产品是化学工业及其附近居民的灾祸。它们也是对开展新的研究的强有力刺激物。

（20）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转而求助于坐落在苏黎世的ETH大学（瑞士公民工科大学，又称综合工科大学）研究出来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以萘为起点，而萘在当时是几乎没有利用价值的煤焦油蒸馏副产品。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在实用和商业方面的难题，花了几年时间才解决。巴斯夫公司走了一条路；赫希斯特公司——它有权使用这种制造方法——却又一次根据苏黎世工科大学的研究，走了另一条路。巴斯夫公司投入生产的时间要早一些（于1897年，相对于后者的1904年而言），但赫希斯特公司的技艺证明要好一些。在化学界像在商界一样，做单杠后翻转不只是一种方法。

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许多事例中一样，新的技术给陈旧的方法

以及赖其为生计的人们招来灾难。在3年的时间之内，巴斯夫公司生产的靛蓝多得等于从25万英亩土地上收获的那么多。在这件事情上，大输家是印度人，因为他们培植并且出口天然靛蓝：从1895至1896年共达18.7万吨；从1913至1914年，下降到1.1万吨。这种染料的价格则下跌了一半。（21）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在现代化学领域中已经把世界其余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抛在后面如此之远，以致那场战争中的战胜国对德国工业专利权实行没收，也没有立即给德国的国外竞争者们带来好处。美国最大的公司虽然拥有最优秀的美国化学工程师，却也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些化学工业专利权或者如何使它们运转起来。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聘用了一批德国化学家。工业谍报被装上马鞍驮回家去了。

注释

1 .据Harris , “The First British Measures”和“Law, Espionage,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两文；Cellard , *John Law* 一书第180-181页。

2 .据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一书第161页。

3 .原载Young , *A Six Months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 (1771年第2版) , 转引自Musson and Robinson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书第216页注3。

4 .我们的确有例证说明爱国的情操胜过物质的优越。请参阅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第10章“法国的关系”。该章记述了国际上为船用计时器的发明而进行的竞争。

5 .关于博尔顿对技术熟练工匠不倦的寻求（他“对于法国在奢侈品行业方面的发明总是很警觉”），请参阅Musson and Robinson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书第218-221页。

6 .同上书，第225-227页。

7 .引自Harris, “Industrial Espiona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文, 载于Harris, *Es-says in Industry* 第164—165页。在“A French Industrial Spy”一文中, 哈里斯向我们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位窥探者。

8 .引自Harris, *Essays in Industry* 一书第170页。

9 .同上书第171页。哈里斯十分正确地指出, 这些间谍对英国情报的搜集“突出表明了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技术所居的中心地位, 并且以压倒之势证明了英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还说, “英国的技术进步是积累性的而且在经济增长起飞之前就已引起了关注”——引自同书第164页。

10 .有关阿尔科克的身世, 请参阅Harris, “Attempts to Transfer English Steel Tech-niques”和“Michael alcock and the Transfer of Birmingham Technology”两文。这两篇文章中的第二篇说明, 当阿尔科克的妻子到达拉夏里之后, 阿尔科克的姘头的父亲立即否认她是阿尔科克的情妇。但是, 他是不会不这么说的, 特别是因为阿尔科克的法国竞争者们正在利用私通的传言来破坏当局对他的信任。(从那时以来, 法国已经长大, 不再有这种内疚了, 而且对美军部队的清教徒式的狂热感到惊讶。)

11 .关于科克里尔家族, 请参阅Mokyr,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一书第2章; 另请参阅Demoulin, *Guillaume Ier* 和Henderson, *Britain and Industrial Europe*。以上引文转引自莫基尔引述尼萨德的一篇文章, 题为“列日当地的旅游纪念品”, 载《巴黎的幻想家》杂志第24期(1835)第130-146页。约翰·科克里尔有两个哥哥, 威廉和詹姆斯。两人均定居普鲁士, 威廉在普鲁士的古本建有一家毛纺厂, 詹姆斯在亚琛制造机器——均据Henderson,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一书第113页。

12 .据赫隆·德维尔弗塞1803年所说, 转引自Woronoff, *L'industrie sidérurgique* 一书第318页。所指可能是短暂的亚眠和约, 该和约为法国人提供了引进英国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机遇。

13 .引自MacLeod ,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一文第302页。

14 .库兹尼茨认为这种时代开始于17世纪。他确定年代过于匆忙。但是这种联系是正确的：正是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才造成了局势的这种差异。

15 .请参阅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对列奥米尔的判断和影响所作的全然否定的批评，原载Annales des Mines第9期（1846），转引自Harris , *Essays in Industry* 一书第109页“Attempts to Transfer English Steel Techniques”一文注18。关于列奥米尔，请参阅同书第84页。

16 .引自Woronoff , *L'industrie Sidérurgique* 一书第351页。

17 .同上书第352-353页。

18 .关于菲谢尔，请参阅Henderson , *J.C.Fisher* 一书。菲谢尔一直写十分宝贵的日记。这些日记已经由卡尔·希伯编辑出版。

19 .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请参阅Haber , *Chemical Industry* 一书第128-136页及169-198页；另请参阅Travis , *The Rainbow Makers* 一书第237-239页，他按技术名单重点说明了德国年轻化学家们的虚心好学精神。

20 .请参阅Haber , *Chemical Industry* 一书第84页。

21 .据Milward and Saul ,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书第230页。

第19章 边远地区

工业革命让世界进一步分化，欧洲的中心地位逐步确立，那些亚洲、拉美的殖民地也成为边远地区。殖民者破坏了边远地区的经济结构，尽管一定意义上推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但是人们看到并痛切地体会到不公。人不仅仅只为面包活着。

在1700年，墨西哥的人均产值大约为450美元（按1985年美元币值计算）；行将构成美国的那些殖民地，产值略高，约为490美元；而在生意红火的产糖的殖民地巴巴多斯，这个数字要高得多，达736美元。100年之后，墨西哥依然保持在450美元，而美国则为807美元。到1989年，美国已经遥遥领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墨西哥为3500美元；巴巴多斯为5350美元；而美国则为8300美元。（1）

工业革命发生在一个依然相对空荡的世界里——至少同我们今天所知的人口密度相比是这样。当然，在当时这个世界，各地人口密度也不尽相同。中国、印度以及欧洲西北部某些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而亚洲中部、澳大利亚以及美洲的大片地区，人口相对稀少。这种差异主要是地理和技术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人们往往到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又可以利用耕作技术挖掘自然潜能的地区定居、繁衍。另外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例如，18世纪早期，欧洲多瑙河平原——资源富饶但尚待开发的一块宝地——变得相当空旷。土耳其人在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败后（1685）突然撤离，结束了数百年的混乱统治。半个世纪后，俄罗斯人把自13世纪中期金帐汗国时期一直在广阔的乌克兰一带游荡，并将微弱地统治该地区的游牧民族赶走，打开了乌克兰这一“粮仓”。

然而，最广阔的边远疆域还在海外，最重要的当属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欧洲人到达时，这些地方并不是荒无人烟。处处可见当地人耕种土地、饲养牲畜，或只是狩猎、采集。但同样，人口密度

也因地制宜，从而决定了外人入侵的机会与条件。在美洲，有几个地区人口稠密，如墨西哥谷地，秘鲁山区以及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一般情况下，像在亚洲一样，这样的人口密度应该排除被征服的可能性，但当地美洲居民技术上的落后与政治上的弊端使这些地区易受攻击和侵害。剩下的就由进口病原体来完成了。在美洲其他地区，如在后来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北美，人烟稀少的地区屈服于占优势的武器和组织。对印第安人来说，白人正偷走他们的土地；对白人来说，眼前的土地是无边无际的、能带来滚滚财富的边疆地带，正等待他们处置。

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土地不仅仅包括表层土壤，而且包括地下资源。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边远地区最显著的特征是空间辽阔，土壤肥沃和原材料丰富。这些特征决定了发展的机会和限制：这些土地能够生产丰富的人均初级产品，但必须有必要的劳动力。他们需要人力，经常通过刺激移民来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通过赠送或廉价出卖土地给移民，而且也通过提供丰厚的工钱、高地位和政治权利。（这在中世纪欧洲是促进改善地位与土地占有权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自愿的劳动力，他们还强迫进口劳动力，雇佣奴隶贩子或招工贩子干这种肮脏的勾当。

一旦生产要素齐备，这些边远地区通常生产出远远超出本地居民需要的农作物和其他初级产品。这些盈余便成为可买卖的商品。通过生产可出口兑换成现金的农作物，这些地区挣的钱比单纯地一心为养家糊口种地挣的钱要多得多。因此，用收入的钱买食品对他们来说是合算的。（加勒比海上盛产食糖的岛屿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岛把每一平方英寸的土地都用来种甘蔗，不惜从遥远的欧洲进口粮食。）

不少地方尚待成熟的经济所采取的这种策略导致了一种“主要产品理论”或“出口创盈余”^[156] 观点。大意是：一种经济，首先从出口初级产品开始，提高国内收入，而更高的收入又进一步推动加工品市场，同时为工业部门的发展和较平衡的经济体系提供财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产品生产者之间收入的分配情况。分配愈是不平等，加工品的市场就愈小。这样，种植园经济就不会产生多大的工业需求：庄园主会为自己购买奢侈品，而在其奴隶的穿和住上，却最低

限度支出。)

主要产品模式最初由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用来解释加拿大在先后出口主要商品方面的经济活动：先是出口皮毛（17和18世纪），接着是木材（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最后是粮食（19世纪中后期）。同样的模式也已用来解释瑞典（木材，铜，铁）；美国（烟草和棉花，小麦）；澳大利亚（羊毛，肉类，小麦）；阿根廷（兽皮，牛脂，肉，谷物），明治时期的日本（丝绸），甚至还有中世纪的英格兰（羊毛）等地的经济方式。⁽²⁾人们也可能联想到当今石油生产国类似的经济状况。

然而，像大多数正确的经济理论一样，出口剩余产品模式也有同义重复的方面：在最适合解释的地方解释得最圆满。这是因为一种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挣钱的经济并不意味着它会充分利用所得的收入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是把钱用于投资呢还是消费掉？即使决定投资，谁会保证这钱会投资到应该投资的经济活动中？再者，哪些活动才算是该投资的？是继续投资在主要产品上从而保持最大限度的比较优势？还是以一种平衡发展为目标，即现在少拿钱以便以后多挣钱？

美洲边远地区经济史及其工业化成就是主要产品理论优势与弱点的一个案例研究。一方面，有美国和加拿大这些高收入的经济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是，也有古老的西班牙帝国解体后的支离破碎的地区以及前葡萄牙殖民地巴西。起初，南美的这些国家更富庶，人口也更多；时至今日，却远远落后了。尽管他们最终也开始了现代化，没有几个人会预言他们能很快与北美的共和国并驾齐驱，即使得益于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共同市场。

北美洲（原英国殖民地）与拉丁美洲（原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经济遭遇需要多种解释，但经济学家却并不总是如此看待。对他们来说，一个合理的理由就足够了，当谈及美洲时，最好的理由是资源。这些边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在新的工业技术背景下，作用大小不尽相同。此时美国脱颖而出：有辽阔富饶的

处女地；气候适宜于种植发展工业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即棉花；冶铁业所需的最重要矿藏丰富；有大量的木材和煤提供燃料，还有东海岸丰富的水力资源；石油丰富，自19世纪中期就为照明、润滑油，最重要的是为内燃机燃料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大量的铜矿，到19世纪末期，源源不断地满足了电力工业、汽车工业和传输业迅速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还有便利的交通条件：理想的海岸线上点缀着一流的港口，大江大河（最重要的是密西西比及其支流），广袤的平原。大西洋与落基山脉之间唯一严重的障碍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美国，许多山峡河谷地带开放成贸易地和旅游地，尤其是哈德逊河所冲击出的缺口以及绵延至五大湖的平坦地带。人们在这些地方，能够改造自然，正如通过伊利大运河和铁路实现了中西部对大西洋中部港口开放一样。

在上述方面，美国比新大陆的其他地区更受自然的宠爱。例如，没有一个周边国家拥有铁和煤；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可与之媲美的自然的交通运输网。相比之下，墨西哥境内山脉、高原和沙漠重重叠叠——并非一无佳地，但正如铁路工人所发现的，各种地形接合得不是地方。巴西的许多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致使今日进入颇令人敬畏的亚马孙河盆地时仍是困难重重。阿根廷在自然特征以及天然交通条件方面，是最可以与美国相比拟的；但长期以来，移民障碍重重，也缺乏最主要的工业原材料。

像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人们也可以争辩说：美国的优先发展是自然条件预先决定好的——就像抽签抽出来的好运气。然而，学者们近来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地理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把自然条件与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考虑。（3）这种观点认为：地理状况决定了农作物和耕作方式，从而决定了土地占有权的性质和财富的分配。而这些因素又对发展的速度和特征起关键作用。当一个社会分为少数有特权的土地所有者和多数贫困、依附于他人并且也许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两个阶层时——事实上，分为游手好闲的有闲阶层与绝望无靠的穷人阶层——哪里还有变革与改良的动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对别人的苦难不闻不问；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绝望之余只能仰天长叹。偶尔也爆发反抗，使所谓的社会精英及其士兵有机会

实用一下他们的武功；而宗教通过宣扬死后进天堂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抚慰。

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情况却不如此。这些地方的气候只适合种植谷物，而且起初生产的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几乎没有，说这也是一种优势，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规模经济微不足道，至少在机械技术发明之前是如此，因此，人们拥有的财产很少，经常勉强糊口，而且多多少少是平均分配。^[157]这种平等并不总是让那些有贵族倾向的人感觉舒服。1765年，一位去新英格兰旅游的英国人亚当·戈登勋爵就颇不以为然地写道：“这里到处盛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它占了上风。人人都有财产，而且人人都明明白白意识到这一点。”⁽⁴⁾

另外，准免费土地和劳动力缺乏导致工资居高不下，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都雇工困难，正如亚当·斯密评论道：

通常在新殖民地出现的大量土地与人口相对稀少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使土地所有者难以获得劳动力。因此，他不计较所付报酬，而是愿意不惜任何价格雇佣劳动力。劳动力价格高刺激了人口增长。大量便宜的肥沃土地促使人们改造自然，也使土地所有者能够付得起雇工的高工资。⁽⁵⁾

当然，农场工人的工资与土地价格为城市工人工资提供了底价——否则，如何留得住劳动力？——同时边远地区经济的增长又促使工资进一步提高。^[158]对此，斯密又评论道：

因此，不是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繁荣，或者说最迅速变富的国家，劳动力工资最高。当今时代，英格兰比北美洲任何一个地方都富，但是，北美劳动力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方都要高。⁽⁶⁾

美国小农场主与相对高工资的工人这一社会体制，是滋养民主与进取心的温床。平等使人产生自尊心和雄心，使人们愿意参与市场竞争，能激发个人主义精神和凡事争个是非曲直的精神。同时，小型农场也刺激技术上的自给自足以及一种杂活工式的、凡事修修补补自己解决的心态。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作坊和铁砧，自己的小农业机械以

及奇巧的改进办法。 [159] 他们的精巧发明不仅带来了舒适和收入，而且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心灵手巧的工人是四邻八舍所羡慕的对象，也是社区的英雄。同时，高工资加强了人们用资本代替劳动力、用机器代替人工的动力。

结果，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先在北美殖民地后又在美利坚合众国遇到了肥沃的土壤。甚至在此之前，在交通缓慢而又时断时续的年代，白给自足的需要已产生了当地的制造业。请看一下1681年的一份报告，描述当时在新大陆定居的贵格会教徒如何迅速地从事了工业活动：“……他们也有制桶匠、铁匠、砌砖工人，还有造轮子的、打制犁的、造磨坊的，还有造船木匠等其他职业，他们制造产品用的原材料就产自当地……在东泽西，人们已经建造了制铁作坊、大炼铁炉和锻铁厂。”另一份1698年的报告谈到了布匹制造：在伯灵顿和塞勒姆的贵格会教徒居住区，“布匹工人正制造着质量不错的哔叽布、粗毛织物、绉呢、长毛绒和其他羊毛衣料。整个家庭都从事这种制造业，用的是自己喂的羊产生的羊毛和自己种的麻产生的亚麻”。 (7)

新英格兰以及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等中部殖民地成为这一新生国“工业中心地带”。制铁业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马萨诸塞州林恩附近的索格斯镇的铁厂），发生在第一批清教徒移民在普利茅斯登陆仅20年后。 (8) 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上大约有200个造铁厂，年产铁约3万吨。超过它的只有英国本土、法国、瑞典和俄国。与冶铁同步发展的还有精炼、锻造、切割、纵切、轧制以及其他把铁制成工具和物体的活动。对英国本土冶金产品的需求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致使英国的制造商请求议会制定法律来禁止殖民地的制造业。这些法律仅仅让殖民地居民敏感地意识到其附属地位、没有自己代表参与的政府所带来的不公正，也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经济自主的重要性。正如宾夕法尼亚的医生及市民领袖本杰明·拉什1775年写道：“在衣食方面依附于外人的人，必然总是屈从外人的统治。” (9)

殖民地工业的一个结果是使英国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殖民地居民制造枪支——最初是火枪，后来是越来越多的步枪，这些武器加上

童年时就开始的狩猎活动，赋予他们枪法方面一种重要的优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边远地区的社会，枪支具有特殊的优点，以至于在某些殖民地，人们佩带武器成为一种义务，甚至可以带到教堂里。（在这一点上，人们又发现一种显著的、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这正与今天反对枪支管制的情绪相呼应。）

但是，需求并不能保证有充足的供应。文化很重要。南方以及边远落后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们，身上配备很多武器，但枪支却产自北方殖民地。原因很简单：北方有技术与工具。到1861年南方与联邦开战时，北方生产的火器超过南方邦联，比例为32：1。（10）

人们发现，在枪支厂里发生的一切，正暗示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武器的需求量如此之大，结果早在采用动力机床以前，工人们就分工越来越细，而提高了生产率。后来，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热心于批量生产可互换零件的枪支，其实这种做法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样，殖民地居民进口和仿造欧洲生产的各种装置和机器，有手艺的机械师和工匠应邀而来，或者自己前来，被北美的高薪所吸引。此时北美殖民地的英语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英国是欧洲最具发明力的国家，英国移民在一个操自己母语的地方感到如居家中。德国人也起了一定作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怂恿欧洲大陆上与自己有相同信仰的人也到新大陆来，这些移民（所谓的阿巴拉契亚的德国人）也带来了手工艺。相比之下，自以为贵族化的弗吉尼亚，对过去有怀旧情结，加上有大规模的种植园和订立契约的劳动力，难以吸引这些移民；奴隶制的进一步成形只会使事情更糟。

（内战结束后以及东北部原先由非本地人拥有并出资的制造业从东北部中心迁移到南方之后，南方在技术上的依赖性曾依然长期存在。这些企业，通常都是人均产值低，人均增加值低，大多是技术成分低的部门，如棉花和木材加工。对这种缓慢的转变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多涉及自然条件、廉价劳动力以及缺乏工会组织。有些学者把这一过程看做是经济殖民主义或依附性的表现，还有很多人用因袭奴隶社会的反工业价值观及文化的角度解释这一落后。对这

些观点，我还想补充一点：这种状况也跟缺乏创新活动和缺乏企业经营才能有关。）（11）

当1790年塞缪尔·斯莱特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安装第一台纺纱机器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还不久。许多人纷纷效仿他。新英格兰由于河流湍急，而成为棉花及羊毛加工业的主要中心。正如在欧洲大陆一样，在这个地方，从英国来的流亡者成为传播技术的最重要的媒介。（12）但是，接受技术的这一社会的性质更为重要。少数带来知识的人发现当地的弟子能迅速模仿，而且更重要的，能改进他们的知识。当1814年波士顿的弗兰西斯·洛厄尔引进动力织布机时，他发现现有现成的劳动力，是“新英格兰作坊里许多农场主兼机工的”子孙后代。（13）

因此说，有些机器从英国运到了美国，但数量很少，美国人很快使这些机器适应了国内市场的需要和口味。（他们也在发明新装置并出口到英国——这是技术独立的最好标志。）（14）例如，英国的棉花纺纱工人使用走锭纺纱机，需要技艺高超且膀大腰圆的男子作劳动力，并且主要生产细支棉纱，而美国人研制出翼锭精纺机（由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改进而来），使用半熟练的女工生产出粗糙些的棉纱，然后先是通过发明盖锭纺机，后又通过发明环锭纺机，而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美国在织布方面的技术创新（到19世纪20年代）使得沃尔萨姆型棉花加工厂“比其英国的竞争对手”在生产率方面至少高10%。（15）

数字能说明这一切。1788年，费城的独立日游行队伍展出了一台手动的梳棉机和一台80锭的走锭纺纱机（詹妮机）。这些是工业化以前的经济独立的标志。20年后，年轻的美国用动力开动着几乎10万台棉花纺纱机；1810年至1820年间，这个数目增加了2倍，在下个10年里，又增加了2倍多。因此，到1831年，这一工业共有120万纱锭和33500台织布机，大部分由从北向南流经新罕布什尔州和马里兰州的山麓溪流提供动力。（16）

最近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一项比较表明：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已

远远领先于英国。（17）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成就，它把有见识的并且经常明确表现出爱国的企业精神、知识和实际技能以及有聪明才智的劳动力诸因素结合到一起。有些工人是卢德派成员，在自己原先的国家反对使用机器，但在新大陆却欣然接受了；有些手织机工人还曾经拒绝进入工厂。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像老英格兰一样，新英格兰工人憎恶工厂严格的钟点制以及对个人的监督。但是，老英格兰最初能依靠非自愿的劳动力——贫民院的学徒，其妻子儿女，这些人别无选择，而新英格兰则必须找到办法使这些新的工作虽不诱人却可以接受。美国的工厂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并且给他们的妻子儿女提供住房以及俭朴的环境，从而使父母放心。[160] 洛厄尔棉花加工商的家庭作风一直受人称颂——有整洁的寄宿处，有她们自己的读物和钢琴，有女性自己的杂志（Lowell Offering），有高尚的住宿规矩。（18）

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人们注意表面现象下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情况。他们辩解说：这些情况必定存在，因为资本主义怎么会真的为雇主的利益花钱呢？无疑如此。这一制度有它自身的逻辑。生意时好时坏，艰难时期雇主会变得冷酷无情。不可避免地，尽管经济学家对我们讲竞争会起均化作用，仍有些雇主的表现很不能令人满意。（19）尽管如此，情况明显地比在老英格兰好得多。

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话来说，这种新旧对比“是善与恶的对比，是生存的阳光与最黑暗的阴影的对比”。（20）

再举一个技术自主的例子。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人也进口蒸汽机，起初是大气型蒸汽机。但接着他们选择了高压蒸汽机，当地人自己的发明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关键人物是奥利弗·埃文斯（1755-1819），一位卓有才华无所不通的人物，为梳毛机、面粉加工以及蒸汽动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埃文斯的机械装置可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但大量的应用从18—19世纪之交才开始。[161] 这些高压往复式发动机，通常体积较小，价格较便宜，与同样体积的大气—真空型蒸汽机相比，功率更大；因此它们不仅适用于工业，而且也适用于交通车，因为在交通业中，机器所占空间大小很重要。这些体积较小的机器使汽船和火车机车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高压发动机有

可能爆炸，这也是詹姆斯·瓦特以及英国很多蒸汽机制造商和使用商坚持使用大气型发动机的一个原因。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似乎愿意以死伤作代价获取便宜的动力和交通。

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具有美国特色的技术创新，并不表现在某一特定的装置上，不管这一装置如何重要，而是表现在一种生产方式上——这种方式后来逐渐被称作美国生产体系。这种体系是对下列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回应：（1）市场：当时的市场不存在地方优先权，也不存在欧洲盛行的阶级和地位的划分，因此欣然接受了标准化商品；（2）相对于原材料来说劳动力缺乏。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在劳动力缺乏的经济中，标准化是一种通过分工从而简化任务使之成为重复性劳动的途径，因此能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但高速生产容易浪费原材料，因为没有时间顾及在欧洲养成的保留下脚料和节约的习惯。在欧洲，甚至有钱的银行家也尽可能把纸写得满满的，然后把它翻过来继续写，以节省纸张。

例如早在殖民时代，北美的许多房屋建筑已从单纯靠木匠活转变到利用工厂的产品。门和窗都按标准尺寸组装起来；玻璃也依此预先切割好。（约1815年，一艘满载不同尺寸窗户玻璃的法国货船到达刚成立不久的美利坚共和国，惊讶地发现他们只能把大部分货物廉价处理掉。）加工门窗过程中的锯末可另作他用。（21）在19世纪30年代，轻捷骨架房屋的发明使建筑本身标准化和非技术化。传统的牲口棚和住房使用笨重的材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也不再使用旧建筑中里里外外的榫接头和灰泥墙。 [162] 人们使用预先切割好的2×4英寸的木头，把它们钉牢，然后给整个框架包皮，房屋正面既实用又悦目。这些结构并不漂亮，也不真正有地方特色，但却很便宜，用料来源充足，虽缺乏创意但很实用。除了木材缺乏的地区外，这种轻捷骨架房屋建筑技术广泛传播开来。（22）

全木结构这种建筑使人们配备一整套机器：动力锯、车床、铣床、刨床、钻孔机、插床、鸠榫接合机、开刃机、开槽机等。这些机器工作速度快——比加工金属的同类机器还要快——正因为如此，也浪费大量原材料。美国不吝惜木材，但却吝惜时间和人力。（23）

房屋和建筑只是标准化的开始。他们的构想是用这样的方法制造一切组装物件，从而使各个部件即使不能完全互换，也看起来一样。

(24) 这种外形相同的程度是原材料本身的性质以及容许偏差的大小两方面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部件装配是合适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却不行；木材比金属留给工人更多的改进余地。因此，木匠能再调整预先做的门窗；玻璃装配工也能通过抹上不多不少的腻子把窗玻璃上紧。装配一支滑膛枪的发射装置比造枪托需要更大的精确度，造一块表比造一座钟的容许公差要更少。同时，装配部件取决于最后一刻调整和配合时漂亮的锉刀工夫。除非是要求配件一开始就正好合适，不用再调试配合，这种情况需要更高的精确度。

这些工作需要用的精密仪器和工具能在每次重复使用时结果都不走样，且能够在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地点选择上得当，从而有效地收集、搬运、加工和组合原材料和元件——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硬件与软件。硬件经常是考虑的重点，因为为此发明的机床是技工的惊人成就。但在肉类加工场，工作布局与同步化更为重要，需要的不是组装，而是化整为零；在面粉加工厂和炼油厂，高生产率才能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

在上述所有生产领域，美国即使不是先锋，也是伟大的实践者。

[163] 例如从最初开始，在纺织业，美国采用了机器后，紧接着又创造了机器厂，维修和生产设备；这些厂子，就是装配技术和零部件互换技术的小天地，经常逐渐开始制造其他种类的机器：蒸汽机，炼铁炉和锅炉，机车，最重要的是机床。机床反过来又很有创意地满足了其他特殊的目的，运用于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不仅仅是工匠的子孙能接过上一辈的火炬进行接力赛；他们的机器也能迅速繁衍。

(25)

与欧洲不同，对于这种贬低熟练手艺而实现常规化的技术，美国几乎没有抵制情绪。在一个不断革命的国家里，旧的方式没有什么市场。且看1841年到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访问的一位官员的感慨：

几乎不需要造军火的熟练手艺人：他的“老本行已经不存在了”。

一个毛头小子同一个成年男子干得一样出色。的确，从体力更充沛这一点上说，小家伙干得更好。

难以找到好手艺的军火工匠的现象不复存在了；全国各地的机器厂里，这样的人多得是。仅仅从实践中练就的灵敏眼力和一双巧手，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技能；倘若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的每位工人都被解雇，那么一周内空缺很快会被有竞争力的人手填满。（26）

难怪，当取得诸多工业成就的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姗姗来迟地也想制造精良、便宜的军用滑膛枪时，他们派人去美国，学习他们的军火制造方法。（27）

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将老方法弃之不用了。了解并不等于行动。总的来说，欧洲人比美国人更难以接受无情的生产率逻辑。以“旁置成本”理论为例，这一理论认为：花出去的钱如同泼出去的水，淘汰掉了就是淘汰了；就因为机器会干活，这一点并不是要使用的理由。这种推理与欧洲人格格不入，但适应了正在开发的边远地带的人们的心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克莱·弗里克：当他们决定不再用贝塞麦转炉而使用平炉炼钢时，他们干脆把原先的工厂拆掉了。不过也请读者看一下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位棉花加工厂监工的记述：

这些走锭精纺机工人可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家伙。几年前，他们就在这工厂里添乱子，结果，有一个周六下午，这些工人都回家后，我们立刻行动，把满屋子的走锭精纺机用大锤子砸了个稀巴烂。等周一上午这些男人们再来上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已无事可干。屋子里摆满了由女工操作的环锭精纺机。（28）

“美国制度”为其他工业地区确立了生产率标准。每一项技术都成为通向其他技术的踏脚石。钟与枪为手表与缝纫机铺平了道路。割草机与收割机的发明进一步使人们制造出播种机（种植机和条播机）、捆机、脱粒机，最终发明了联合收割机。从自行车到汽车，从收款机到打字机再到计算器。某一种用途的机器很容易又用于其他用途：缝纫机既可用于布料又可用于皮革和帆布；既可用来做衣服，又可用来

做靴子、鞋、帆、帐篷。

农业也像工业一样，成为机械师大显身手的天地。1900年7月，《科学美国人》月刊登载的读者来信赞不绝口地写道：“确确实实，今天农场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由获得专利的机器来干个大概。”

(29) 因此，农业也变成了一种产业，有规模经济，有劳动力分工，还有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而且也注重土地产力，尽管程度上要小一些：地理上的偶然因素，西部新土地的性质——从未开垦的大草原，较深的土壤表层，农田用水以及宽阔的牲畜放牧区——这一切都保证了丰厚的收益，表明扩展边疆的每一行动都会为国民收入作出重要贡献。土地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占有，土地的授予和优惠销售均着眼于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可能面积很大，并随农业机械的增加以及专门的巡回机器操作队的出现而进一步扩展。

上述所有现象表明：由于新来的外地人贪婪地抢占土地，土著屡屡被迫背井离乡。印第安人反抗了，并且随着外来定居者的膨胀，他们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似乎是神圣的、天长地久的永恒的协约，这又进一步引起印第安人的反抗。白人可随心所欲地背信弃义，而土人却被辱骂成“印第安虚假馈赠者”。此时，技术很重要。白人拥有连发枪，可批量生产，其零件大都可以互换，因而白人即使数目少，火力也成倍增加，从而使印第安人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当然，很多美国人现在为此深感歉意，而欧洲人则邀请印第安部落首领到巴黎和苏黎世反复讲述他们的不幸遭遇，控告白人的种种劣迹。好莱坞电影原先充斥着牛仔打印第安人的老一套货色，现在却提醒世人注意白人入侵者的恶行。同时，美国政府也已经时断时续地试图对那些曾经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的后代作出赔偿，雇用经济史学家对当时被夺走的土人的土地进行估价；一些好心人为“土著美国”文化的保存和重新挖掘提供帮助。有些补偿已经证明能带来惊人的利润：例如印第安人刚刚得到了参与赌博生意的权利，通常是跟白人商人合伙经营。让卡西诺赌场复仇吧。

印第安人的悲剧是现代化更大困境的一个例子：不变革就会遭受

损失；既变革又有所损失。如果一个人赢得了世界却又丧失了灵魂，这个人发财又算得上什么？当今的新花样把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和古老文化弄得支离破碎。然而，美国人并不准备交出这一国家，回到他们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去。历史就像时间，有一支射出就无法回头的箭；但与时间不同的是，历史的步履不匀，它只能时断时续磕磕绊绊地前进。

因此，在18和19世纪开拓边疆地区时期，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美国的工业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别的国家可以效仿美国，有些国家确实用同样的方式作了突击。但这些古老的社会并不像美国当时那样是白板一块，也缺少美国那种乐观、开放的文化，而正是那种文化减轻了美国农场主与工厂主开拓事业的难度。这些社会有禁锢的土地占有权，农民（在美国没有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舍不得在设备上花钱，而大地主不是把土地看做资本，而更多地看做是地位和体面的基础，^[164]手工艺人把机械看做是一种对个人的贬低，一种对地位的冒犯，一种对自己饭碗的威胁。这些国家有砸机器的人，而美国则没有。

欧洲国家还存在一个消费问题。阶级构成以及不同阶层不同的审美趣味，使之更难以采用标准化产品。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强调供应而非需求，强调生产者的态度而非消费者的态度。当欧洲人磨磨蹭蹭地采用了批量生产的技术后，他们销售便宜商品并没多大困难。

要了解个中情由，不妨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迸发的工业热。这正呼应了早些时候美国的发展，并且间接证明了以前基于阶级的经济的失败。欧洲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原先受压抑，而银幕形象和身边的美国人激起他们的消费欲望。以前没有几个欧洲人想到几乎人人都可以渴望得到、甚至确实需要一部车或一部电话。^[165]直到20世纪70年代，很多法国人仍然去小餐馆或邮局（但只在营业时间内）打电话，或者因为他们在家装不起电话，或者因为他们要等上两三年才能安上一部。打电话的人可能花半个小时或更多时间，才能听到拨号音。人们仍然需要预订国际长途电话。商业受到损失，人们怨声载道，但徒劳无益，因为当局不着急，漠不关心。毕竟，电话当时是邮

政系统的一部分，而邮局视电话为一种奢侈品，是供有钱人玩的东西。写写信，买邮票不是挺好吗？ [166]

187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已最强，但其黄金时期尚在后面。到1913年，美国产值是英国或德国的2.5倍，是法国的4倍。就人均国内总产值来说，美国比英国高20%。比法国高77%，比德国高86%。

(30) 不管是好是糟，这种美国的生产体系已制造出一种永不满足的消费主义，受到那些为普通民众的灵魂和行为方式担忧的人的责难。世界长久以来已看惯了富人和有头有脸的人一掷千金，随心所欲；但现在，史无前例地，甚至平民百姓也可以拥有那些经久耐用的物品——钟表，自行车，电话，收音机，家用器件，尤其是汽车——这些东西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作极少数人应有的特权。营销上的革新为人们获得这些东西提供了便利，其中包括分期付款，消费信用，大大小小商品按目录销售，允许退换，等等。这些方式在欧洲并非闻所未闻，欧洲在有些方面还是先驱。然而各种因素的协同作用，才使美国生产力如此发达。批量消费使批量生产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反之亦然。

经济逻辑的缺陷

亚当·斯密注意到了英国对其北美殖民地实施的一系列专横禁令：不准建炼钢炉或切钢厂；不准制造铁和钢的成品，即使供自己消费的也不行。另外，英国还禁止殖民地之间进行皮帽和羊毛物品的交易。

.....这种规定有效地阻止了供远销的制造业的建立，将殖民地的工业局限于生产粗糙的家用物品，就像一个小家庭平常为自己或者为其同一省区的邻居制造的那些东西一样。 (31)

亚当·斯密意识到了这种现象的不公正，谴责这是“对人类最神圣权利的公然侵犯”。但考虑到当时殖民地的经济状况，他发现这些措施并非“十分有害”。“土地仍是这么便宜，劳动力对他们这么宝贵，因此他们可以从自己的祖国进口几乎所有比他们自己制造的更精致、更高级而且更便宜的产品。”这么说，这些禁令并不是多么重要。他认

为，甚至在实施这些禁令之前，

……他们为自己利益着想，大概也会不让自己这么做。在他们目前的发展状况下，那些禁令可能并未禁锢他们的工业，并未抑制他们的工业雇用那些会自愿前来的劳力，而只不过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奴隶制的不合适的标记，是他们祖国那些商人和工厂主出于没有道理的嫉妒而这样做。倘若他们已处于比较发达的状态，这些禁令也许就真有压迫性和令人无法容忍了。

“大概”，“可能”，“奴隶标记”。的确如此。亚当·斯密本该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如果英国人能生产并以更低的价格销售那些东西，他们就不需要发布禁令了，殖民地的居民也会找到更好的事去做。亚当·斯密说，这就是他们发现的道理。他没有讨论比较优势，便理解和倡导这一原则：即资源应该流向最有利可图的用途：

他们把几乎全部的资金都用于农业，这就是我们美洲殖民地居民迅速迈向财富和了不起的成就的主要原因。他们没有制造业，但家用产品和更粗糙产品例外，而这些产品是伴随农业的进步必然出现的，是每户家庭的妇女儿童的作品。（32）

殖民地居民的确有制造业，这对后来的美国是件幸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认识到今天的比较优势明天也许就没有了。

至于英国这些强加的限制尚可忍受，亚当·斯密本可以将这一点归因于英国人实施方面的无能。整个体系便是开了一个大玩笑。伦敦试图只用少量代理人强行限制殖民地贸易。这些人大部分在英国四处游荡，却在海外低价雇佣下手。他们随之发现，接受殖民地商人的贿赂比履行自己的义务油水更大。至于征税：英国政府每年支付给这些游手好闲的人8000英镑，他们一年只征税约2000英镑。（33）

因此，的确，这些禁令在钱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影响。（34）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禁令几乎没有影响。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新的行动主义大臣们发誓要整顿整顿，叫殖民地居民像懂事的殖民地居民应该做的那样，支付对他们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花费，这时殖民地居民所受的

震动使原本合理的措施变得不可忍受。（以往的忽视和容忍竟如此迅速地成为一既得权利，让人吃惊；对未来的展望如此迅速地超过了对过去的回顾，也同样令人吃惊：下一步你会拿我怎么办？）《波士顿报》表达出了人们的愤怒：“军舰，快艇，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海军陆战队，海事法庭的法官，收税员，巡警，检查员，海关港口稽查，海关税务检查员以及各式各样的坏蛋，派到这里，不是来保护我们的贸易，而是要把我们的贸易压垮。”（35）

亚当·斯密卓有见地的论文发表于1776年，在同一年，北美殖民地宣告独立。即使他的经济推理是正确的，人们看到的不公就是痛切体会到的不公。人不仅仅只为面包活着。

注释

1 .我使用这些数字的根据是Engerman和Sokoloff合写的“Factor Endowments”一文中的表4：请参阅该表引述的资料来源。不应忘记的是，这种估算，尤其是对较早年代的估算，是大胆推断和猜测的产物，姑且不说原始资料中的谬误和歪曲——请参照Randall, “Lies, Damn Lies, and Argentine GDP”一文。这个问题被不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而进行的脆弱的国际间比较，弄得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如果人们把1994年12月至1995年1月期间墨西哥比索的暴跌纳入其中，那么，墨西哥的成果会显得更糟。不管如何吧；反正美国经济增长较快这一总的景象还是可靠的。关于另外的一组根据转化为收入（毛算近似值）的财产资料作出的估算，请参阅Garcia, “Economic Growth”一文第53-54页。

2 .与此有关的种种著作中，请参阅Caves, “‘Vent for Surplus’ Models of Trade”以及“Export-Led Growth”；Baldw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Watkins, “A Stapl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Garcia, “Economic Growth and Stagnation”。

3 .这是Stanley Engerman和Kenneth Sokoloff讨论“Factor Endowments”的合著论文的主题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有独到见解

的分析。欲了解关于“内生”的原材料的开发和生产（美国不仅仅是幸运）的同类观点，请参阅，David and Wright，“Increasing Returns”一文。

4 .Fischer , *Albion's Seed* , 第174页。

5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BK.IV , ch.7 , Part2 : “Causes of the Prosperity of New Colonies”。

6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BK I, ch.8 : “Of the Wages of Labour”。

7 .两处引文都引自Fischer , *Albion's Seed* , 第560页。

8 .见Hartley , *Ironworks on the Saugus* 。

9 .引自Oliver , *History of American Technology* , 第89页。

10 .Fischer , *Albion's Seed* , 第860页。

11 .较新一代的经济史家对“知识贫瘠的文化基本论解释”很不满意，认为它“众所周知不可靠，难以把握”，他们主张用“清楚明白的、具体的、或广泛应用的标准”来分析社会以往的情形。见Carlton和Coclanis合著“The Uninventive South?”一文，第340页、326页。除了文化为什么该被认为“知识上贫瘠”或“属于基本论”（这可能难以量化，但其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化重要吗？）这一问题外，他们主张的分析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把所省略不谈的东西排除在外，具体化到一种留不下什么“尚未”解释的问题。在衡量明确化了的要素即假定可量化的经济变量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上，这种分析很有效，但在其他问题上，却毫无建树。

12 .Jeremy , *Transatlantic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254页。

13 .Gibb , *Saco-Lowell Shop* , 第10页。Oliver的*History of American Technology* 第158页引用了该文。另参见

Rosenberg,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该文指出尽管美国人付给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比英国人高, 美国人却能用更少的钱雇佣最优秀的人来造机器。

14 .关于这种反方向流动, 请参阅Musson和Robinson所著*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书, 第62-64页。他们引用了曼彻斯特机器制造商马修·柯蒂兹在1814年对一个议会委员会所说的话: “.....我意识到: 真正的新发明即全部新思想在利用新机器或以新方式完成某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源于国外, 尤其是美国。”

15 .Jeremy, *Transatlantic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253页。

16 .同上, 第252页。

17 .见Broadberry, “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一文。

18 .见Eisler主编的*The Lowell Offering* 一书。

19 .关于工厂劳动的消极方面, 参阅Dublin的*Women at Work*一书以及Zonderman的*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一书。

20 .Jeremy在其*Transatlantic Industrial Revolution* 一书第253页上引用了这句话。

21 .Rosenber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 第39至40页。

22 .关于轻捷骨架房屋的意义, 请参阅Giedion的*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 及Rosenberg的*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第38页。一直有人认为英国消费者所享受的物品(包括房屋)的多样性, 形成了一种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 这没有在标准收入或产品数量上表现出来, 但却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生活水准。——参阅Prais的“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ducation”一文第155页。但少数仍住在英国式砖石结构的房子——甚至8月份也觉得冷——的人, 会说美国的建筑, 不管样式多么沉闷单调, 多么实用主义, 就花的钱

而言，更令人宽敞、舒适。此外，轻捷骨架房屋的特征决定了可不费力地在墙上装管道和电线。这促使人们早早采用了这些便利设施，如冷热自来水和中央供暖。另一方面，欧洲的砖石结构和灰泥墙房在很大程度上更能防火，这可以造成生死之别。

23 .Rosenberg ,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 第42页。

24 .关于差异与互换性的标准，见Landes的*Revolution in Time* 一书第283至285页，以及第19章“Not One in Fifty Thousand”。

25 .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在*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第17页称这种现象为技术趋同性，因为他发现不同的部门汇聚到同一技术之源。但我宁愿把这称为技术的迅速繁殖或相互关联性，这一叫法能更好地突出技术在多个应用领域得以普及。

26 .这段话作者是乔治·塔尔科特（George Talcott），发表于S.V.Benet主编的*A Collection of Annual Reports.....Relating to the Ordinance Department* 一书第一部第295页，戈登（Gordon）在“Who Turned the Mechanical Ideal”一文第746页引用了这段话。

27 .参阅Rosenberg ,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 一书。

28 .Erickson , *American Industry* , 第132页。

29 .奥利佛（Oliver）在*History of American, Technology* 一书第375页引用了该段话。

30 .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和戴维（Daivid）合著：“Convergence and Deferred Catch-up”，第21页。这些数据采自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Explain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一文，表2-1（第22页）和表2—4（第28页），并且以购买力平价美元的标准衡量。

31 .这一段以及下面一段引文出自*Wealth of Nations* , Bk IV , ch.7 , Part2：“Causes of the Prosperity of New Colonies”。

32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BK II , ch.5 : “Of the Different Employment of Capitals”。

33 .Cook , *The Long Fuse* , 第58-59页。

34 .现代计量经济史家曾试图衡量这些法令对美国殖民地居民所带来的负担，认为这并不重要。其中的含义是，经济上的“理由”只是一个借口，殖民地居民有发动战争的其他动机，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不过是些忘恩负义的人。除去在计算这一负担时的错误以及如果没有航海法情况下想象出的违反事实这一问题，人们能量化所感受的委屈不满，并因此判断一场战争是否有正当理由，这一想法本身使我感到很幼稚。关于对此所发生的大量争论，见托马斯（Thomas）的“A Quantitative Approach”一文以及一篇反驳文章：Sawers的“The Navigation Acts Revisited”以及在该文引用的文章。

35 .库克（Cook）在*The Long Fuse* 第59页引用了这段话。

第20章 南美洲的道路

我们（圣多明各）的经济变成了西方型的，不是欧洲最发达的经济模式，而是西班牙模式。西班牙向我们传播了它的一切，但是我们无法从西班牙接受西方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技术、资本以及欧洲社会的观念，因为西班牙本身就不具备这些东西，我们了解福音书，但不是伊拉斯谟的版本。

——胡安·博什《多米尼加社会状况》

拉丁美洲的路子十分不同。刚开始时，例如说17世纪，它并不比北美更穷，正好相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侵者把他们的英国对手看做是命运的孤儿：北美的森林与原野，或者已资源竭尽或百无一利的小安的列斯群岛，怎能与新西班牙和秘鲁的金银，或者与巴西的染料木、金刚石、金子相比？英国人只能像狼一样躲在西班牙运金船队的侧翼，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苟且偷生。甚至在农业潜力方面，拉丁美洲也占优势，特别是在气候温和的地区。

但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的比较今天已成历史。现在金、银矿是会耗尽的资产。约200年后，当美洲的殖民地居民获得自由时，北美远远超过了南部——人均收入更高，财富分配更平均，人也更富。唯一的例外是种植赚钱的特产作物的小地区，确切地说就是加勒比海岛的产糖区。但甚至在那些地方，只要不把奴隶人口计算在内，情况也是更富有。

相对财富多少的变化有很深的根源。当英国人发现了一块人口稀疏的陆地并把土著人赶走以便让移民安家落户——长此以往导致了一种绝对的种族隔离时，西班牙人发现的却是新大陆人口最稠密的地带，并且与当地居民通婚。有些人把这种不同的做法看做是英国（或新教）奉行种族主义而西班牙人（或天主教）开明的例证。这也许有道理，尽管人口分布有它自身的逻辑。 [167] 英国人以家庭为单位移民

到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结果除60岁以上的人之外，年龄分布与英国本土居民的年龄分布相似，而西班牙并不鼓励举家移民，甚至也不鼓励女人到新大陆。

当土著人死于暴力、疲惫、绝望，尤其是死于疾病后，西班牙人从非洲贩运来黑奴。他们驱使这些黑奴种甘蔗、淘金等等，但这些人 在美洲大陆西班牙殖民地发挥的作用从未比得上他们在加勒比海岛以及美国南部发挥的作用。同时，又缺少从其他欧洲国家来的移民。在西班牙本土，当地人对于从外国来的非天主教的商人和手工艺人的竞争和派头怨声载道。但是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情况却不同：当局千方百计阻止外来者染指西班牙在新大陆的财富。这种排外行径使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的帝国失去了最迫切需要的技术和知识，更不用说失去了文化多元性的优势，以及那些爱争辩的新教徒的异端学说的优势，而正是那些异端学说激发了知识上的挑战，并使人们始终保持一种受教育的欲望。(1)而且，在西班牙殖民地各个角落，天主教宗教法庭都在追捕异教徒；有些隐瞒身份的犹太人原以为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就不会再有人刨他们的老根，但却继续受到迫害。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目的 是要完成清洗，造成像他们本土一样的封闭环境。所有这一切证明这对纯洁性有极大的作用，但对商业、知识以及实际技能的发展却极为不利（我们注意到西班牙并不对此烦恼。直到19世纪初期，西班牙人仍然认为西班牙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是信仰与美德的典范，认为不懂西班牙语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在新西班牙（墨西哥），男女移民的比例是10：1。(2) 异族通婚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在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占统治地位之前，有些西班牙征服者把美洲印第安女人纳为妾。拉丁美洲的混血儿成为一个中间性的民族群体，肤色越接近白人越好，这些混血儿数量虽少，但比克里奥耳人要多；在地位与作用上不如克里奥耳人，但比纯粹的土著要高得多。混血儿成为监工、工头、店主以及小官吏。印第安人则被指派在田间、矿区、马路上劳作或者当仆役。(3)

在这种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的环境中，完全没有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西班牙本身在这些方面就落后，原因

在于其精神上的同质性与顺从性，其财富和虚荣心。西班牙把自己的弱点又输出到海外。又怎么会是别样呢？那些西班牙人并非为了打破模式而到新大陆。他们一心想通过这种模式发财，甚至为了获得职位，实行贿赂；他们几年就学会这种手段。通往财富之路不是劳动，而是贪污和暴政。

经济潜力方面的这些对比与政治能力上的差别有关。北美殖民地居民来自一个有不同政见的社会，对外来人和新观念比较开放。我并不要暗示英格兰及其政治文化是一种开明浪漫传奇。毕竟，最早的一些殖民地居民本身是宗教避难者，却在自己的新家园继续折磨别人，使别人不得安宁。英国有一种“约翰牛”式的古板，有上层阶级的装腔作势与特权，并且对旧的枷锁顽固地继承，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排外行为以及反清教徒的势利行为。（4）

但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当我们把英国人的思想活跃和多样性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宗教改革的正统思想以及迷信狂热相比时，即北美思想和首创性的力量与西班牙葡萄牙辖区的不满相对照时，我们就能理解其政治结果。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居民自己创造了他们的革命。他们反复酝酿，明确问题，向统治者发出挑战，直面冲突，当他们获胜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英国人在欧洲的一些仇敌——他们已经具有了一种自我意识，具有了经济上的追求以及国家的目的。[168]

在拉丁美洲，独立并非源于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首创性，而是由于整个欧洲抗衡和争战这一背景下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国内的弊端和命运不济。当西班牙证明自己无力统治海外的殖民地时，新大陆的强人们利用了这一空隙，夺取了政权，其间只遭到了零零星星的抵抗。独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临了，令那些除了更换主人别无他求的尚未成熟、定型的实体颇感意外。（5）这种无政府的否定态度引来了穷兵黩武的军阀统治。难怪，19世纪的拉丁美洲史是阴谋、政变和反政变的恐怖史，这一切必然引起不安定、政府昏庸无能、腐败以及经济的停滞。

任何社会能否长期生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还是该在严肃的、持

续的基础之上谋发展？答案是：这些地区不是“现代”政治单元。它们没有方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民族象征；因此就没有衡量其表现优劣的尺度，也不存在期望带来的压力。不存在公民社会。在社会上层，是一小撮无赖，受其原先殖民主人的教唆，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在社会的底层，黎民百姓蹙缩一团，勉强糊口。可见，拉丁美洲的这些新的国家几乎无异于亚洲的专制主义，尽管有时候打着共和国的幌子。

在这种不稳定、不安全状态中，没有权威的法令能长期有效。在人口稀少的宽阔空旷地带，达官显要要在其农场和种植园里称霸一方，不仅发号施令，而且驱使人们干活，行使着私刑和警察权力。与此最接近的恐怕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无国法可言的统治。拉丁美洲的城市当时通常也是港口，国产货与进口货在这里交错，关税带来现金，达官贵人及其走狗就地分赃。

唯一可能重要的、行为一贯的机构——天主教会，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它拥有许多土地，其财富就像一只挂在树上引起人们羡慕和不和的苹果。当政府准备夺取这些财产时，教会没找到几个支持者。教会的教士，芸芸众生中唯一受过教育的人，牢牢抓住自封建时代以来便有的法律和民事特权。他们知道忏悔者心灵最隐秘之处，掌握着通向拯救之门的钥匙。这并不是得民心的好办法。可是除了酒、色和暴力之外，只有教会提供了唯一的安抚绝望之心的去处。问题是，它认为一切知识上与政治上的标新立异都是颠覆性的。少数几个开明分子相信一些好听的口号，试图把人民拽到现实中来，但这些人不得不把很多政治精力花在与教士打持久战上。

结果，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变化。像从前一样，关键的部门包括采矿业（金、银、铜）、农业、放牧业、林业。目的是生产剩余产品，能用来换取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对工业的发展几乎没创造什么条件，因此几乎无工业可言。正如任何高明的英国经典经济学家会建议的那样，这些粗制滥造的政治实体仍然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吃饭。更何况，制造业有潜在的反社会性。它们会争夺本已缺乏的劳动力，从而产生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因此，拉丁

美洲国家没有发展规划，没有经济发展的图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鼓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工业，与欧洲一比高低，而巴西的凯鲁子爵却“迷信地相信‘无形的手’，反复地念叨‘自由放任，自由通行，自由买卖’这几句话。”（6）

这样，南美国家在独立后，仍像以前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先进的工业国家；起初是英国；在19世纪末期是德国，因为考虑到德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收获；然后从20世纪开始，依附于美国。外国人修铁路，建港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运出内地的剩余产品（正如印度一样）。（7）外国人以高息贷款给没钱的政权及其政敌（倒霉的借钱人要偿还得更多）。外国人建造兵工厂以及其他工厂并且经营管理它们。自然而然地，人们便把南美国家经济的弊端归咎于外国人。这种逐渐怂恿起来的怨恨情绪，有一部分道理，但被教条地夸大，使事情变得更糟。它把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化，把实际事务变成原则性问题。

（具有讽刺意义——但并非毫无关系——的是，在殖民时期，西班牙人及其教士想方设法地排斥外国人。下面是1788年一位船上的官员访问马尼拉时的评论：“因为西班牙有法令禁止外国人入境，客栈、设施齐全的旅馆以及所有那些对于好客来说必不可少的便利设施，在当地绝对是闻所未闻。如果一个人只有钱而在当地没有一个亲戚朋友，那么他就不得不准备露宿街头。”）（8）

一种机械化了的工业——纺织业——确实有了立足点，但直到19世纪晚期才如此。在此行业中，巴西和墨西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棉纺织业中，原纤维经常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生产供大众消费的、质地粗糙的产品。墨西哥还有毛纺织业。这要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时的形式是手工作坊，但由于进口布料的涌入而消失了，后来又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在一些小工厂里重新出现，使用下等的美利奴羊毛，重新满足了大众需要。有钱人则从国外购买衣料。他们的皮肤更娇嫩。

南美洲的工业开端并未产生一场工业革命。甚至建筑铁路也对此无能为力。有些事情必须在国内办：例如，机器必须维修。但是那些维修作坊只管机器的保养，他们几乎从未进一步自己制造机器。自然

和社会环境同样也不利。燃料和原材料比在欧洲和美国的价格要高，技术缺乏。这一切都很合情合理：自身的比较优势使购买洋货更容易，也更便宜。

这种合理性的问题是：今天的明智也许到明天就成了错误。发展是长期的事情；而逻辑却是暂时有效的。经济理论是静态的，基于现状。经济发展过程却是，动态的，从今天的到明天的物质上的充裕。
[169] 如果一个人不尝试着促成一件事情发生，那么它永远不会发生。倘若当初德国人曾听从约翰·鲍令的建议……那位周游世界的英国经济学家曾叹息说德国人愚蠢，要制造钢铁，而不是坚持生产小麦和黑麦，从英国购买工业品。倘若当时的德国人听了他的话，他们就会使那些经济学家感到满意，并凭借自己的葡萄酒、软木以及橄榄油取代葡萄牙，成为合理性经济的完美模式。同时他们结果也会穷得多。

拉美各国机会最佳的是阿根廷，尽管在西班牙帝国兴盛时期，没有人觉察到这一点。在16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天之涯海之角。它位于人口稀疏、宽阔平坦的草原上，是位于今天玻利维亚境内安第斯山脉高处的银产地波托西与巴西东南部粮食出口地之间的一个中途站。葡萄牙商人控制着贸易。城内的无产阶级包括从巴西逃来的奴隶、混血儿逃兵以及其他衣不遮体的边远地区的穷人，他们蹒跚在郊区的茅屋里，靠别人的残羹剩饭生活，需要牛和马时便从周围野生的牛马中牵来（何乐而不为呢——反正这又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没有手艺人、工具以及工业，也缺乏勤奋——假若勤奋，就会在矿挖完后打起精神干点别的事情。在殖民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马蹄铁的价钱比一匹马的价钱高出好几倍；这不足为奇：马的数量超过了马蹄铁。在整个西班牙帝国，钉子是稀罕物，马车是用生牛皮扎到一起。买得起欧洲服装的有钱人只在特殊的场合穿这些衣服，平时大概就把它们藏起来了（9）（300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仍无改变。工业品依然要进口；工业家也得进口；当地工业的最大推动力不是来自国内需求的增长，而是靠战时的军需品供应）。

在殖民地时期，西班牙的目标是减少阿根廷的贸易。由于控制与税收方面的原因，西班牙帝国禁止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银，而试图

让波托西出产的银等矿产品全部沿安第斯—太平洋路线向外运（翻过安第斯山脉，到太平洋沿岸，再沿西海岸往北运至巴拿马地峡，穿过地峡入加勒比海，再运往欧洲）。但只取得部分的成功。阿根廷北部省份向坐落在海拔高达15843英尺的山区的波托西这座当年美洲最大城市之一（17世纪初人口达16万人）供应食品、牲畜、原棉和土布，再把赚来的银子用在大西洋港口，购买铁、武器、服装和其他欧洲产品。不用说，这种赚大钱的非法贸易招致了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它也促使西班牙官吏和业主榨取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所谓的保护当地人的好意，不过如此。

与西班牙的脱离（1816年）以及老西班牙帝国的瓦解结束了这种贸易。但阿根廷的自然恩泽并未消失。气候多样，包括中心地带的温带气候；宽阔平坦的无树大草原，是放牧牛羊的理想地区；土壤肥沃，适合种植谷物；有些地区适合种植亚热带农作物，如棉花和糖类作物。然而阿根廷几乎没有工业资源——没有铁、煤、木材、石油，没有矿产可言。在连绵的山脉东侧，有水力资源，却远离贸易路线和商人。几乎没有制造业，即使有，大部分也是家庭手工业遗留下来的。几乎所有这些活计都是女人干——纺纱织布，制陶，做肥皂，烹制食油，做蜡烛。（10）在一个价值观与西班牙一脉相承的大男子主义社会里，成年给男性带来了“完全的独立和游手好闲”。（11）

殖民地政府的临时性质加上西班牙统治料想不到的崩溃，使阿根廷这一后院的命运变得悬而未决。独立后的阿根廷很多政治活动就是中央集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各“省份”的松散的封建政权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直到1862年，阿根廷共和国才宣告成立；甚至此时的共和国仍尚未成熟。又经过一代人的政变和屠杀，才结束了叛乱和分裂。有些学者忽视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指出当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存在分裂症，直到1865年南方邦联溃败，国家的统一才得以保证。我不同意这种比较。在奴隶制问题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之前，美国还是一个有效的、正常运转的政治单位。阿根廷独立后有半个世纪之久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权。

阿根廷自古以来是牛羊的天堂，对农作物种植和人的了解却较

少。田园生活方式的胜利以及对农业的相对忽视，与土地和移民政策密切相关。外国观察家认为阿根廷对移民有一种潜在的磁铁般的吸引力。某些富有远见的本地人也这样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新移民，尤其是欧洲的新教徒移民。他们认为这些移民教育程度较高，工作较勤奋，且政治上成熟。当然，这就要求天主教会在其政策或者在其权力上有所改变，也要求人们改变某些根深蒂固的态度：

尊重每一种信仰的祭坛。那些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只信奉天主教，而排斥其他任何宗教，因而就像一座形单影只、静默无语的女修道院一样……南美洲排斥其他宗教，就意味着排斥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北美人，也就是说排斥南美洲最迫切需要的人。只要这些移民而不接受其宗教就等于不接受其动能，而缺少这一动能，这些移民就无法成为自身。（12）

这是中肯的建议，但却难以采纳。人们已经有固定的思想观念。他们在反对宗教改革的偏见和对强大的外来人的恐惧心理中成长起来，因此并不打算欢迎异教徒，教会也不会悄悄隐入幕后。（13）

同时，移民可以到其他地方。阿根廷的土地政策似乎旨在排斥外国人。大部分土地分成大片，霸占在官吏和实权派人物手中，经常是白送给他们，要不就廉价卖给他们。有时土地的授受和买卖也规定有安置居民和耕种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不可能得以实现。由于缺少资金和劳动力，土地拥有者发现让土地荒废或听任牛羊处置更省事。与此同时，通过驱赶印第安人，阿根廷国土进一步扩大，当局提前把新获得的土地卖掉，就支付了为夺取这些土地而花费的战争费用。这些行动带来了金钱，但也意味着把大量土地卖给投机者，这些人能通常经营大牧场而以最快速度又把钱赚了回来。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二者互为因果。阿根廷政府不时从海外招移民。尤其从意大利寻找自愿移民，意大利当时是培养移民的温床，这些移民追求的不是土地而是金钱——以便回老家后购置一处更好的住宅。19世纪80年代，一份同意大利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了阿根廷所需要的移民：“如果可能的话，提供野外工作的工人和手工匠，

单身，且从农村最年轻力壮、最能干的人中挑选。”^{〔14〕} 这些努力遇到了社会和政治现实方面的困难：土地的分配以及节省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如放牧）占统治地位；局势常常不稳定；宗教限制；当地的偏见。那些极少数需要密集劳动力的地区——例如，种植糖作物地区——依赖于师徒契约和强制性劳动力，从而失去了对自由移民的吸引力。

让我们比较一下北美殖民地及后来美国的土地政策。在北美的南方殖民地，大片土地需要奴隶充当劳动力。印第安土著数目很少，也不情愿为地主打工。因为土地充足，白人自由民可以自己成为土地主人，因而不愿受雇于人。于是黑奴从非洲源源不断运来，直到1807年禁止贩运黑奴为止。之后，只能通过自然繁衍维持黑奴的使用，这就必然使黑奴的营养标准和待遇高于加勒比海或南美洲盛行的标准。同时，美国人越来越憎恶奴隶制，随着合众国向西部扩展疆土，围绕是否扩展奴隶制和使美国得以维系的契约的性质问题，引发了诸多冲突。最后，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内战解决了这一问题。奴隶获得了自由，大面积的地产分解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地块。

在以前的自由州和新领土中，耕种面积的扩大有赖于抛弃东部已反复耕种过的土地而去寻找处女地的农场主，以及寻求更舒适的生活和自己的土地的欧洲移民的西进运动。与此同时，工业必须自己去找到工人。^{〔170〕} 一些部门和企业派招工人员到欧洲的穷乡僻壤搜罗、买进合同工。这一任务并不难：饥荒，生意危机，国家边界更改，以及迫害，使欧洲移民有充足的理由离井背乡。

情况本可能不如此。没有物质方面的原因迫使北美殖民地居民更喜欢家庭拥有一片土地而非经营大规模的农场。重要的是文化和社会目的方面的原因。例如，新英格兰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以家庭为单位分割土地，因为这些移民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由各个家庭组成的群体。在大西洋沿岸中部实行领主制的殖民地（纽约，宾夕法尼亚），存在面积更大的土地的买卖，但这些地方也存在一种倾向：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卖给单个家庭。尽管源于殖民地开始时期的特殊的保留地仍然存在，一些大宗土地买卖也出现过——这通常与内部买卖和贪污腐败有

关。例如18世纪90年代，马萨诸塞州以每英亩21美分的价格把它在缅因的300万英亩的土地卖给了当时的国防部长亨利·诺克斯和财政部助理部长威廉·杜尔。那还算是贵的。马萨诸塞州还把它在纽约西部一直保留着的600万英亩土地以1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奥利佛·费尔普斯和纳撒尼尔·戈勒姆，每英亩还不到2美分；不过这些土地在当时算是偏远地区吧。如此等等。¹⁵ 这些拥有土地的人也是把土地转卖给农场主，或是先卖给较小的投机商再由投机商转卖给农场主，从而既赚了钱，灵魂又获得了拯救。这些土地主的大话吹得没边儿：威廉·杜尔叫他在欧洲的代理商吹嘘这些新土地神话般的本事：每英亩可产60至80蒲式耳小麦；可以钓到80磅重的大鱼。他们向外国的投资者保证这些土地上的人口每25年就要翻一番（起初，几乎如此），每年有5万少壮人口西进。

一旦这些大片土地不复存在，边疆地区土地的主人变成了联邦政府，其政策是促进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发展。这方面最明确的证据莫过于占地者所造成的难题。因为拍卖这样一种销售土地的方式使人们获得土地不那么踏实稳定，人们宁愿先占地再买地。当局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因为它不仅违反了财产与程序的准则，还降低土地价格，阻挠了那些有钱的、渴望获得土地的人的买地意图。但徒劳无益：当那些先占地以图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农场主在拍卖会上集会，手持步枪时，只有愣头愣脑的家伙才会轻视他们的利益。因此183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那些先占地以获土地所有权的人的补偿法律，这只会更鼓动这种行为。后来到1841年，一项普通的“先买权”的法令使先占地再买地合法化，赋予土地占有者以最低价购买其占有土地的权利。（16）

为了鼓励修建铁路，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情况：授给负责新建铁路线的人沿铁路两边的土地，而这些人一般情况下设法把土地卖给独立经营的农场主。这些土地很受偏爱，不是因为土地本身更诱人，而是因为它们比大牧场能生产出更多的供火车运输的货物。最后，大自然有发言的机会：人往西走，降雨量逐渐减少，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的土地，用来饲养牲畜和放牧。同时，小镇实际上变成城市，城市不仅是作为市场和运输枢纽，而且是作为制造业中心而繁荣起来。辛辛那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南北战争前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是肉

类加工和油脂熔炼的中心，磁铁般吸引德国移民的地方，是拥有制造首饰、炉子以及乐器等等的小工厂的城市。（17）

这些政策和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到了移民数目上。在阿根廷，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移民速度才开始上升，这时小麦耕作面积也相应增加——在19世纪70年代，约有50万公顷耕地，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仍只有130万公顷，后来，数量激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约有2400万公顷。（18） 阿根廷一位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写道：“移民潮水般涌进”——在1871年和1914年之间，约500万移民到阿根廷，其中310万人留了下来，而阿根廷人口1869年只有170万（不含印第安人），到1914年，人口到了780万。（19） 移民的涌入速度并非年年一样，反映出移民原先所在国家的政治事件、商业条件以及人口压力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净移民数平均为2.86万人；在80年代，这个数目翻了两番，达到年平均8.65万人。这之后，涌入速度降了下来，到90年代，年平均4.06万人；后来到20世纪，尤其是从1904年到1913年，年均增加量又翻了两番，达到12.59万人。

诚然，净增数量并不能充分反映出移民在劳动力供应方面作出的贡献。这些移民中很多是季节性农业工人，也就是所谓的“燕子式”打工者，大多是从意大利南部招来的，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打工地点的往返路费不用自己支付。在1904-1913年这10年间，每年29万移民中几乎有一半打工完毕又回到老家——平均每年13.57万人。从阿根廷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省钱的安排：收获时节招来工人，干完活再把他们打发走。这对移民也很适合，他们正好利用赤道以南以北地区两个相反的收获季节。但它有一个严重的不利之处：它选择的是只有部分时间被雇佣的小农，几乎没有多少技术和文化，即使留在当地，对整个经济的潜在贡献也是有限的。

此外，数目本身并不能说明整个问题。留下来的欧洲人中，成为阿根廷公民的移民寥寥无几——1850年至1930年，不足5%的移民加入阿根廷国籍；除其他原因外，一个原因是作为公民，他们有义务到军中服役。 [171] 这是一块需要人手的土地，但同美国相比，它发现难以赢得外来人的心从而留住他们。无疑，部分原因是缺少经济机会。

但人的忠诚需要培养，而对百姓漠不关心，是那些偶然获得主权的国家的一个弱点。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什么？而谁又代表了他们呢？

(20)

与此相对照，在美国，移民流入的速度早就增大了，从19世纪20年代的平均每年1.43万人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的平均每年25.98万人。随着用蒸汽船航行的成功以及西部地区的开放，移民数目从19世纪70年代的平均每年28.1万人增加到80年代平均每年52.47万人，再到90年代降到每年36.88万人，直到20世纪头10年，达到高峰，平均每年87.95万人，其中有几年超过100万人。 [172] 从1821年到1914年，总计约3200万移民到达美国，此时美国的人口也从1000万人发展到9400万人——尽管移民在人口增幅中所占的比例不如阿根廷那么大，但总计起来比阿根廷的移民人口重要得多。(21)

移民本身的性质也存在重要差别。大多数去美国的新移民来自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北部，到19世纪末，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数量开始增加。他们当中有文化的人比文盲要多，很多人是训练有素的手工匠（统称为“有技术”的人）；直到19世纪40年代，多数移民是农场主而非单纯卖力气的体力劳动者。(22) 吸引移民的是将来能获得便宜的按家庭分配的土地以及高薪待遇，极少有人去了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同到拉丁美洲的移民相比，这些人带来了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到阿根廷的移民恐怕日后才会赶上他们 [173]（实际上他们从来没赶上过）。

美国的移民史家就不同时期被迫移民和主动移民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争论，当然这二者在不同时期都很重要。有些人把移民的潮水般涌入描绘成一场大规模的绑架行动（尤其是欧洲人，如此大规模人口外流事关声誉，不好解释）。这纯属无稽之谈。在大部分的新移民看来，美国是块充满希望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个人的原因起了作用。移民来美国是因为比他们早的人，对这片新大陆的生活，写回了尽管不全符合实际情况，但却洋溢着幸福之情的信。他们来是因为其亲戚、朋友和邻居早到一步；当他们到了美国后，便投奔那些早先到达的人，住在这些人家里，或住在附近。他们来到了一个在19世

纪对移民入境几乎不设置任何障碍的国家。很多人又打道回府了——大约有1/3。但大多数人留了下来（或回老家后又回到了美国），在他们的亲人身边找到了工作，体会着在旧大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自由。

让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它的经济起飞还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或甚至是最后1/3时期。当经济起飞开始时，它非常适合李嘉图经济学派的贸易模式。主要的经济增长部门是：畜牧业，它提供了制造皮革用的生皮以及兽毛（这两种产品经常是连在一起出口到脱毛中心，如法国的马扎默）、牛油，以及腌牛肉。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冷冻技术，使肉食贸易得到兴旺发展，尤其是在英国。起初，冷冻过程最适合于小羊肉和一般羊肉，但随着技术的改进，以及冷冻温度变得更稳定、精确，阿根廷开始出口冷冻牛肉，后来又出口味道美得多的其他冷冻肉类。

农业发展落后，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但牧场主的反对和300年后仍顽强抗击欧洲人的印第安人的暴力破坏，起了进一步的阻碍作用（正如美国西部或非洲一样，需要反复用武力粉碎土著人的反抗）。印第安人的敌意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是为自己的土地而战斗。但大牧场主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经营农场意味着竖立篱笆，这样一来毫无遮拦的牧场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让牲口踩农田、啃庄稼）。另外，正如美国西部那样，有刺的铁丝网也引进到阿根廷，这是人类设计出的最便宜的防止牲口吃庄稼的篱笆。 [174]

19世纪大部分时间，劳动力一直缺乏。并不是大草原上田园式的、半游牧性质的帐篷里需要许多男女劳动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当局不时围捕妓女并把她们发配到主要是男性人口的外省，可谓一箭多雕）。但极少有人愿去干艰苦的运输工作。像在美国一样，印第安人不肯为工钱受雇于人。1813年，印第安人的徭役劳动力至少原则上已经废除。奴隶贸易也已禁止，尽管已留在阿根廷的奴隶继续受到奴役，他们的后代却生为自由民；而且，从海外运来的奴隶一踏上阿根廷国土即获得自由。（23）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依靠移民。但在这一点上，也是昨天压迫了今天。西班牙人的排外规章使人们打消了进入阿根廷的想法；甚至在独立后，政治上的不稳定，筛选式的招工，以及缺少自由田，也让想移民的人心灰意冷。其中最后一个因素是殖民政权遗留下的最糟糕的东西：大片的土地已被送人，分给教会或有名望、有权势的人，剩下的地则在革命后的动乱中被霸占光了。我们知道，后来又扩大的疆土，也同样被分配了。例如，1879年与印第安人的战役爆发之前（阿根廷把这一战役冠冕堂皇地描述为“征服荒野”），首先进行了土地拍卖，以便筹集军费，将大约850万公顷土地卖给了381个买主。只要能买的土地，买主都要，因为再往南去，气候变得干燥，土地也变得贫瘠。在南方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能放牧的羊群大概仅相当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同样面积上的羊只数目的1/10。

直到19世纪最后30来年，移民的流入量才开始增加，其中约1/4来自传统的来源地西班牙，但此时有半数来自意大利，因为当时意大利的人口增长超过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南北农村。极少数来自北欧和东欧，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又动身去了美国。阿根廷当时成了地中海地区移民的聚集地。

数十年来，这些移民在这个自负却很落后、充满幻想和偏见但根本不友好的国家里过得并不舒服。他们大多数人留在具有半都市文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敏感的人绝望地感叹：“在这个国家，最迫切需要的转换不是金币兑换纸币或纸币兑换金币，而是把这块土地上的生于欧洲的居民，变成享有一个文明社会成员天生该具有的那些权利的人，即把外来的国民变成公民。”（24）

一旦阿根廷发展加速——部分原因是从国外引进了新技术（蒸汽船、铁路运输、农业机械、肉类冷冻），部分原因是欧洲的需求增加（人口增长、购买力提高）——其产品和收入大幅度增加，达到了可与正在工业化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的水平。然而，要注意到，阿根廷还是低于其他新开发地区的水平（见表20.1）。甚至在阿根廷光景好的年月里，只有农业，仍不能产生在一个平衡的经济制度下才能达到的生产率、收入及工资水平。（25）农场工人，尤其是给别人打工的

（移民）体力劳动者，挣的工资一般是工业工人工资的几分之一。

与此同时，农场主、牧场主、专业人员、官吏以及迎合他们口味的时装贸易都在赚钱。像其他地方一样，钟表是一个现代化的、有时间观念的社会的标志和工具。瑞士和美国的钟表制造商为这个新市场展开竞争，制造出了符合拉丁审美口味的、设计庄重高雅的计时工具。（26）19世纪末，阿根廷是依靠其大宗产品获得成功的最有前途的国家之一，乐观人士预计其未来会接近于（或几乎接近于）美国的未来。甚至在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谈及比较优势的好处时也会滔滔不绝地谈这个案例。

表20.1 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1820-1989年人均产值对比

（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美国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加拿大
1820	1219		1250	
1870	2244	1039	3143	1330
1890	3101	1515	3949	1846
1913	4846	2370	4553	3515
1950	8605	3112	5970	6112
1973	14093	4972	10369	11835
1989	18282	4080	13538	17236

资料来源：Maddison，“Explain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 1820-1989”，Table2-1。

然而，它是否令人乐观呢？这个国家有一些有钱人，然而“由于一些从未搞清楚的原因，它一直依赖于外国资本，看贷款国的眼色行事，由此严重损害了这个国家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27）英国人修造了阿根廷的铁路——1871年不到1000公里，20年后超过12000公里——但却是为了满足英国人自己的目的：把肉类和小麦运到港口。当地人说，根本不是为了发展阿根廷国内市场。但建了这样一个铁路网怎么不能培养国内市场呢？如果不能，又是谁的过错呢？这反映出

当地的企业精神如何呢？阿根廷人并不问这样的问题。指责别人总是更容易。结果，便产生了排外的反帝国主义以及自己给自己拆台的冤屈感。

尽管如此，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还是弥补了这种差别。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不仅在农业领域，而且也在刚刚兴起的工业领域。这种增长是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形式——尤其是在食品加工业的投资 [175] ——以及进口替换的形式出现，这主要是靠小型企业（多数由外国人拥有，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由犹太难民拥有），并且受到几次出现（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供不应求局面、一些保护性关税措施、与外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和外汇管制等因素的推动。（28）

人们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一后起的发育不良的工业领域。1914年，也就是农业和大量移民交织出现的25年之后，阿根廷进行的人口普查的资料表明，“工业”资本的一半以上是在采矿业，1/4是在公用事业，只有13.6%可以说是“基本上属于制造业”。（29）这种必然是缺乏独创性的工业生产，几乎没表现出什么发明或改造。利润率也不增长。它在原始的工作条件中存活下来，这些条件让人想起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时令人梦魇的工厂，但却更糟，因为政府漠不关心。雇主也不在乎，认为移民劳动力很容易替代工作中伤亡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生产领域的技术所知甚少，也没法指望他们会改善人力资本。一些有见识的人试图让这些思想原始的雇主明白，提高工人素质，改善工作条件，会对他们自己有利。但是这些人被斥之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分子，对工厂和工业一无所知。结果，工业陷于停顿落后的状态。（30）

每一种工业都有对健康带来的特殊的危险。在纺织、金属、火柴以及玻璃工厂里，空气中总充满了细细的灰尘，刺激肺部。在皮革厂里，皮子硫化过程需要用硫酸、硝酸、盐酸以及砷和氨。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挥发出有害气体，弥漫整个车间。在牲畜屠宰加工厂，工人们走在堆满凝固的血块、内脏以及动物粪便的臭味熏天的地板上，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把肉搬到冷库的工人不得不用破布片或旧报纸把手和脸包起来，小心翼翼地不让刚杀死的动物的血滴到衣服上，否则会凝

固到他们的身体上。风湿病很常见，没有几个屠宰工厂工人进厂后能连续工作5年以上。

这样说来，阿根廷的工业不是经济增长的司机，而是一个乘客。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困难时期时，这位乘客便下车了。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力，闷闷不乐，于是便开始运用意识形态万灵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无政府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庇隆主义——这些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们的报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把这种异化归因于经济落后和社会冷漠与政治早熟之间的矛盾。（31）人民想得到无论经济还是国家都无法给予的东西。

如今，阿根廷正在痛苦地探索一条出路，以摆脱政治压迫和残暴行径、军事冒险主义以及经济萧条，尤其是让那些被怀疑为激进分子的人“失踪”、更不用说那些报私仇的做法——往往是把被监禁者装进飞机运到海洋上空，再把他们推出飞机，然后，监禁和杀害了他们的这些人还要绑架和“收养”受害者的子女（这种残酷令人回想起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有这些都留下了一笔罪恶和恐怖的遗产。但矛盾的是，标语口号式的民粹主义促进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的开端，这从《埃娃·庇隆》一书不平凡的成功中可寻到证据。

当地的学者和同情拉美的旁观者，一直把拉丁美洲发展上的失败——尤其是与北美相比更显出了这种失败——归咎于强国和富国的种种不端行径。这种“易受伤害性”一直被称为“依附性”，暗示出它是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或听别人发号施令的低劣状态。毋庸置疑，这些别的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从依附经济国掠走产品，颇像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帝国的抽水泵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抽水泵。

然而要同化独立的、有主权的国家，需要贷款给它们并且投资；简单的劫掠不是一种选择。对阿根廷来说，情况也如此。它国库几乎没存多少钱，越来越多地利用外国资本。^[176]有些经济学家争论说外国资本损害经济增长，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外国资本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比不上国内投资。很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运用这些钱。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人愿意因为效率问题而拒绝外国人的

钱。政客们想得到这些钱，情愿让依附论经济学家为此悲哀失望。

有位经济学家把阿根廷的低储蓄率归因于人口高速增长以及高移民率——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爱出风头摆阔的不良的消费习惯。不管怎么样，外国资本的流量都是既取决于阿根廷所能提供的机会，也同样取决于国外的资金来源的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需要钱，不得不清理他们在国外的资产。尽管他们仍然是阿根廷的最大债权人，但不再像此前几十年那样发挥促进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作用。美国和另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隙，然而在这里仍然是国外的政治和商业周期起决定作用，结果阿根廷发现它在外国投资和信贷的数目和条件问题上，面临时断时续但又反复出现的困境。所有这一切激化了与债权人的冲突，这反过来又导致反应性的孤立主义——限制性措施却只会使信贷不足与依附性更加严重。当阿根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谴责外国商界确实存在的或想象出来的种种状况和不端行径时，他们只是让问题更复杂化。茧派经济学帮助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免于大萧条所带来的最糟影响。这也是茧的特征。但这也使他们与竞争、刺激以及增长机会隔绝开来。

依附论观点一直在拉美盛行。他们也曾流传到其他地方，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刚刚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意识引起共鸣。一些好冷嘲热讽的人甚至可能说依附论一直是拉丁美洲最成功的出口产品。然而它对人们的主观努力和士气来说是消极的。它培养光责备别人的不健康的倾向，加剧经济上的无能。即使它是有理的，也最好是把它收藏起来。

葡萄牙—巴西的路子

巴西学者吉尔伯托·弗雷里在他对巴西文明所作的经典研究著作《主与仆》一书中，把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作了区分。西班牙实行国籍和宗教两重限制，而葡萄牙人只在乎宗教。移民可来自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是罗马天主教徒就行。在某些时期，男修道士被派到进入巴西港口的每一只船上，检查和证实新来者的宗教信仰。别的

什么都不重要，因为这一宗教就是共同身份的标志。“只有当一个人自己身体特征相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种，而葡萄牙人忘记了种族概念，把与自己信奉同一宗教的人视作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神话，正如弗雷里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弗雷里把这些控制手段之温文尔雅与今天卫生检查员和警察局官员的粗声粗气的行为作了比较，对前者持赞许态度（尽管二者是半斤八两）。他最后总结道：

就天主教移民而言，他们害怕的是可能动摇或削弱团结的政治敌人，而在葡萄牙，这种团结已经与天主教逐渐演化成一体。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我们一直出色地维护了这种团结，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反对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属基督教新教的荷兰人，以及英国的新教派。这种团结到了很深的程度；事实上，很难把巴西与天主教割裂开来，天主教教义在现实中是我们统一的凝固剂。（32）

“我要与祖国一起死” [177]

在依据法令进行工业化、自上而下求发展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巴拉圭更令人心酸，更充满了堂吉珂德式人物的色彩。巴拉圭是隐设在南美距海边几百英里处一片丛林和森林中的一个僻静的共和国。有些学者，受它的经济实验——也就是他们中有人所说的经济“起飞”（33）——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把这一实验看成是欧洲帝国主义者及其当地走狗窒息当地人的魄力和追求的另一例证。（34）然而，这是对并非鲜见的为政治目的而早熟的发展模式的一种错误解释。

巴拉圭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国家，在南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瓜拉尼人）数目最多，因为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当地土著所遭受的折磨，在此地由于耶稣会教士从中调解而得以避免。这些印第安人被允许建立自治区。这些地区太远离财富和交通，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打扰。此外，西班牙需要这些瓜拉尼人：没有他们，西班牙不可能抵御住巴西的葡萄牙人的入侵而保住这一片地方。

独立之后，像大西班牙帝国遗留下的其他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

家一样，巴拉圭几乎马上落入独裁者的控制之下。法律说是共和，但实际上却是一人专政统治——这是一种好心好意的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暴政的杂烩。 [178] 这些独裁者中，第一位是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弗朗西亚博士（他就自称独裁者），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家伙。他是个雅各宾派理论家，像很多原来是法国佬的人一样，本来是做律师的。弗朗西亚献身于建立人人平等的共和国，而他自己充当平等者中间的第一名。他是唯一“有机的领导者”，是代表民意的精英。 (35) 他自己主动培养这种形象。当一位印第安村民来拜见他时，他最彬彬有礼地接待请愿者，坐在他旁边，拍拍他的背，举手投足间充分流露出对对方的兴趣，使对方感到热乎乎的。但要让弗朗西亚博士听一位地主或资产阶级人士说话，他往往叫对方耐着性子等上半天，急得手指咚咚敲桌子，最后就算进去见着了，也发现弗朗西亚博士对他居高临下，不正眼瞧他，不到三言两语便不耐烦地把他打出去。

这是阶级歧视（肯定性行为），但也是种族歧视，因为这二者在巴拉圭社会中是同一的分界线。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妄图依赖社会特殊的瓜拉尼性质，慑服原先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奥耳人中的显要人士。为达到这种目的，他禁止白人内部通婚，要求他们从印第安人、黑白混血儿以及黑人中选择配偶。 (36) 这一规定严格执行到何种程度，难以判断，但它表现出人们的种族意识，标志着人们有意识地努力避免因肤色不同而带来的种族隔离，而这种隔离在拉美其他社会很普遍。

弗朗西亚博士及其后继者洛佩斯父子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开化的斯巴达——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纪律严明，勇猛无敌。巴拉圭实行从7岁起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表现出一种英雄般的雄心壮志。尽管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一制度一开始的确招进来5000小学生，在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的领导下到1857年增加到17000人，1862年又到25000人——大致是适龄儿童的一半。“这可能是19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最高纪录！”一位对此深表钦佩的人这样赞叹道。 (37) 小学生们必须学习三“会”课程（即会读、写、算），加上礼貌的问答教学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了解自身并且知道所以然。同时，教师就像值勤的士兵一样，穿戴“政府发给的服装”：两件衬衫，两条裤子，一件披衣，一顶帽子，一块头巾。教学材料很难得到，因为不友善的

阿根廷人当时封锁河道，但前期巴拉圭确实弄到了5000支横笛——正好一个孩子一根。这使人联想到柏拉图对音乐的重视，把音乐作为理想教育的一部分；也使人联想到同一时期，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创办的学校里的音乐的作用（参阅下面第24章）。但穆罕默德·阿里从来没有争取实行通科教育。

理想化的、改良的巴拉圭国家所遇到的麻烦是：通过改良他们增强了实力，但接着又经不起诱惑。他们威胁、颠覆其邻国，打乱权力与现状之间的平衡。这样的行为招致反抗。因此，可以说，弹丸之地的巴拉圭的独裁者既野心勃勃，又对周围大国所带来的危险怀有恐惧感。一句话，他们是一种表面上理性而潜藏着非理性的妄想狂。（谁说妄想狂的人没有敌人？）最大的威胁来自阿根廷，它认为巴拉圭是一个叛乱出去的省份，企图吞并它。（38）但巴拉圭所有邻国都不怀好意地观望巴拉圭的革命试验。

因此，巴拉圭的领导者们决心发展经济并且获取保卫国土和对各方发动进攻所需的军备。为此，他们不仅需要武器，而且需要工业的工具和机器。这些东西只能从欧洲弄到。尽管巴拉圭受其印第安文化遗产影响，对欧洲的东西有一种反感，但海外的欧洲人总比觊觎其国土的邻国更有可能帮忙。

从卡洛斯·洛佩斯开始，巴拉圭政府与欧洲的供应商签订合同，购买汽船、蒸汽发动机，以及成套工业设备（最重要的是一个铸铁厂以及一个兵工厂）。这些东西是用少得可怜的土特产出口（主要是巴拉圭茶，一种类似于茶叶，使人轻度上瘾的草本植物）赚来的钱，以及伦敦一位造船商兼伙食供应官提供的数量有限的贷款购买的。巴拉圭还开始修筑一条铁路和建电报网，但结果铁路建设慢得让人厌烦，一年才修几公里，直到战争来临才使之加快了速度。当时雇佣了大约200名欧洲技术专家，但这些人谈不上是优秀的。毋庸置疑，这些早期设施的产品够不上出口质量，但它们在军队和当地印第安人中找到了市场，因为这些人一直与外国进口商品处于隔绝状态。（39）

与此同时，巴拉圭人还购买了欧洲的武器，一般是那些老式的、

小型的以及废弃的武器，并且修筑堡垒以防发生战争。尤其是修建在巴拉那河U形弯上的乌迈塔堡垒，可让巴拉圭人随心所欲切断邻国船只通过的水路，包括河道另一侧的阿根廷的船只所经过的水路（以牙还牙是光明正大的行为）。这些邻国受到言辞和真实事件的警告，开始武装自己。尤其是巴西人，开始购买装甲战船，目的是必要时强行通过巴拉那河道。

谁先动手，干了什么事，难以说清。这就是战争。（40）但可以确定的是，巴拉圭在打仗面前并没有畏缩不前。它也有交战的理由，而且这一地区的边界是有争议的。一些琐碎的手续，例如必须经过批准才能穿过中立地区（穿过阿根廷领土进击巴西和乌拉圭），被完全弃之于不顾。这成为最终导致三方结成联盟的因素：1864年5月，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方力量联合起来，要把巴拉圭这只讨厌的害虫捏个粉碎。巴拉圭由于实行全民皆兵以及预备役制度，实际上武装起来的士兵比那三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但三方联盟拥有大得多的兵员储备，更不用说优良的武器装备。时间越长，越对他们有利。

然而，3年中，乌迈塔的堡垒阻挡了三国盟军的进军，它有数千名官兵守卫，火炮如林，而且装备着自己的铸铁厂和锻造车间——“那是一个军事奇迹，是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是南方的塞瓦斯托波尔。”^[179]最后，巴西人调来了他们的装甲船，它们的铁甲是敌人的炮弹打不透的。它们的炮弹炸断了关闭河道的巨大铁链。巴拉圭人进行还击，派出载满欲强行登上敌舰的战士的船。这些人在从自己岸边大炮发射过来的不间断的火力掩护之下，勇猛地爬上敌船。他们到了甲板上，发现一切都关闭着，船舱口封住了，船上所有人员都在甲板下面。接着，巴西船用纵射火力扫射甲板，入侵者倒在了血泊中。

接着围攻开始了。巴西指挥官给巴拉圭的指挥官阿伦将军写信，表示如果阿伦交出堡垒，就给他一大笔贿赂（250万金比索），并保证他到盟军一边后有官可做。阿伦的回信值得我们回味：“将军”，他写道，“我没有那种钱给你，但如果你交出你的船队，我会送给你巴西的皇冠。”于是盟军继续不停地炮轰，堡垒被炸得只剩一堆瓦砾。

阿伦把自己损失惨重和军队即将崩溃的消息派人报告给最高统帅兼总统洛佩斯，但洛佩斯命令他继续抵抗。阿伦尽力而为，终于失败，绝望之中朝自己脑袋开枪自杀。这是了却一切的最简便办法。最后洛佩斯批准守军撤退。这时只剩下2500人，饿得已经皮包骨头，几天之后被4倍于己的敌军包围，被迫投降。暴怒之下，洛佩斯把当时接替阿伦的那位指挥官的夫人逮捕并囚禁起来。天知道？也许正是她怂恿丈夫临阵脱逃。洛佩斯折磨、抽打她一个星期。当确信她已毫无知觉时，命人把她枪毙了。

最终，凶残与勇敢——巴拉圭女人与男人一样顽强作战——都没能敌过人多势众和装备更精良的敌人：巴拉圭人只剩下白刃武器和滑膛枪，而敌军已用上了刻有来复线的火炮和加特林机关枪。洛佩斯率领一小撮装备可怜的幸存者组成的队伍逃进这一国家偏远的一块沼泽地里。弹药奇缺，以至于仍然任意随便的死刑，不得不用钢刀执行。当巴拉圭人用完子弹后，他们用石头和碎玻璃当子弹。洛佩斯战斗到最后的一息——直到他的牺牲，他的长子以及巴拉圭当时绝大多数男性公民的牺牲——据说全部死亡人数（男女都包括在内）约占全国人口的70%。（41）“我要与我的祖国一起死！”据说几乎每一个巴拉圭人都知道这句发自肺腑的呼喊。但是这句话的关键词是介词“与”：“我要与我的祖国一起死。”

为了庆祝胜利，巴西人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音乐会之一：有18架钢琴、650名乐手组成的管弦乐队，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营以及两门野战炮参加了演出。（42）

巴拉圭是一个小国。它的统治者的疯狂所引来的代价，是几十万人的死亡和数十年的贫困。20世纪还会出现更愚蠢的傻瓜、更堕落的恶棍以及远远更多的受害者。

注释

1 .参阅Humboldt著、Tulard编的*Relation Historique* 一书第252页。

2 .Fischer , *Albion's Seed* 第26页及第5条注释。在弗吉尼亚这块布满种植园和盛行劳动合同的地方，男女比例是4：1；在盛产食糖和奴隶的巴西，比例是100：1。

3 .发表在《每季评论》季刊第35期上的一篇文章（第537页）谈到了拉丁美洲社会中因肤色不同出现的社会分层：“不同阶级，随时间流逝，更多地通过社会的规则而非通过法律的影响，根据其与白人种族的亲疏程度，而享有各种不同的地位。”Rodney和Graham合著的*Reports of the Present State*第12页引用了该段话。

4 .参阅Fischer的*Albion's Seed* 一书第240至246页讨论英格兰南部社会等级价值观和制度的内容。

5 .“与其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追求独立，还不如说是独立如同扔在路中央供人捡的宝贝，得来全不费功夫”——Rodney和Graham合著的*Reports of the Present State* 第28页至29页。

6 .这种对比出现于Furtado,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一书第109页。

7 .参阅Faith , *The World the Railways Made* 一书第156页引用Ferns著作*Britain and Argentina* 中的一段话：“阿根廷的商界既不关心在国内投资，也不费神考虑如何控制这些企业，不管他们多么自由随便地在自己的报纸上、在国会大厅里批评这些企业的活动……土地投机买卖，贩卖牲畜和羊毛，实行交谷租种田，这些活动更有利可图。铁路先是开辟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场，继而开辟世界市场，大大刺激了这些商业活动的发展。”

8 .Mullet des Essards, *Voyage en Cochinchine* , 第95页。

9 .以上引自Rock的*Argentina* 第25页。关于钉子，请参阅E.A.J.Clemens的*The La Plata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1886）一书。Rock在“Featur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一文第8页，Mullet des Essards在*Voyage en Cochinchine* 一书第89页上都引用了相

关内容。

10 .Rock , “Featur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第7页。

11 .这是Sarmiento 19世纪40年代作品中的原话, 引自Rock , “Featur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一文。

12 .原话出自Juan Bautista Alberdi , *Bases e puntos de partida para la organizacion politica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1852) , Shumway在*Invention of Argentina* 第149页引用了该文。

13 .“时至今日, 仍有理由相信, 阿根廷宗教领导人在拉丁美洲如果说不是最反动, 也是最保守的。”——见Shumway , *Inventions of Argentina* , 第150页。

14 .Adelman , *Frontier Development* , 第105页。

15 .Krout和Fox合著*The Completion of Independence* , 第53-57页。

16 .Fish , *Rise of the Common Man* , 第130页。应注意到: 并不是所有人同意这种鼓励西去定居的一般办法。老一些的州反对这种做法, 理由是这样慷慨的条件会鼓励其居民移居, 实际上这确实也发生了。实行奴隶制的州为一项政策很不安: 这项政策并不特别考虑奴隶主的利益, 拨给他们的土地不应该比非奴隶主的土地面积大, 目的是促进家庭庄园, 而非大种植园。

17 .Fish , *Rise of the Common Man* , 第118页。

18 .R Cores Conde , “The Growth of the Argentine Economy” , 载于Bethell主编的*Argentina Since Independence* 一书第75页。

19 .Bethell主编的上述一书第55页。美国人的国民意识感与阿根廷的不同表现之一是: 美国从建国开始每隔10年便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而阿根廷直到1869年才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1895年才

进行第二次——同上，第54页。

20 .这些数字的基本来源是罗克（Rock）的*Argentina 1516-1987*一书第141-145页；第164-167页。

21 .这些数字取自*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A-C*。

22 .同上，C 115-132。

23 .Rock , *Argentina* , 1516-1987 , 第89页。

24 .Juan B. Justo , *Internacionalismo y patria*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 Cornblit在“European Immigrants”一文第233页引用了这段论述。

25 .甚至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以最高效率耕作的农场主也发现，由于价格下跌，他们的利润正化为乌有。受益的主要是消费者。埃里克·赖纳特（Erick Reinert）在“Symptoms and Causes of Poverty”一文中强调了由于技术变革带来收益的“古典”的分配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尤其是农业和分配的典型特征——和以关贸壁垒和日益增多的对知识的回报利润为特征的工业“共谋”模式之间的对比。他使用了“共谋”这个词是因为“在实际中，生产产品国的力量（资金、劳动力以及政府）——尽管不是一种阴谋力量——‘共谋’占取这些收益”。（第84页）

26 .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 第326页。

27 .Shumway , *Invention of Argentina* , 第156页第3条注释。

28 .Rock , *Argentina* , 1516-1987 , 第232页。

29 .Cortes Conde ; Cornblit , “European Immigrants” , 第230页。在早期的统计数字中，约1/10所谓的产业机构是我们所说的服务业：修鞋店、照相馆、裁缝店、理发店以及女子发廊——所有这些都

是城市生活必需的。1935年的统计中把这些都略去了——Lewis,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 , 第35页。

30 .Lewis , *Crisis* , 第6章：“Labour”。下面的引文出自第103页。

31 .同上，第492页。

32 .这段话的作者是Pedro de Azevedo. Freyer在*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一书第41页引用了该文。

33 .Batou , *Cent ans* , 第8章：“L’essor économique du Paraguay”。

34 .关于这一所谓的修正主义派，见Pastore的“State-led Industrialisation”一文。他引用了Whigham的“The Iron Works of Ybycui”；Vera Blinn Reber的“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 :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Paraguay , 1810-1870”（Shippensburg univ. , Carlisle, PA , 1990）；以及Batou, *Cent ans*一书。巴图把这一派看成是欧洲对“第三世界”积极性怀有敌意的又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例子。关于研究阿根廷历史时采纳的另一类似的修正主义角度，帕斯托（Pastore）引用了Tulio Halperin Donghi的*El revisionismo historico argentino*（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版）一书的内容。

35 .参阅巴图（Batou）*Cent ans* 一书第233页第13条注释，巴图认为这一概念来自葛兰西。

36 .Batou, *Cent ans*第232页，引自A.Garcia Mellid , *Proceso a los falsificadores de la historia d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年出版）。

37 .Batou , *Cent ans* 第260页。作为比较，巴图引用了以下数字：1865年阿根廷是10%，1870年之前哥伦比亚是10-15%，1873年墨西哥是18-20%。

38 .作为这场斗争的一部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统治者和商界反复关闭巴拉那河口，使“瓜拉尼共和国”与海路隔绝。见Batou, *Cent ans* 一书第241页上一表格列出的这些封锁。国际法规定封锁便是一战争行为，那么阿根廷从1827年到1852年便一直同巴拉圭处于战争状态。

39 .关于这些大多在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统治下在19世纪50年代创建起来的工业，请参阅Batou, *Cent ans*第8章；以及Pastore, “State-led Industrialisation”一文；和Whigham, “Iron Works of Ybycui”一文。

40 .亲巴拉圭的观点，见Batou, *Cent ans* , 第263-266页。

41 .参见Batou, *Cent ans* 第249页上的表格。按该表数字，1865年损失人口是75万人，1872年是23万人。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些伤亡数字，尽管这些数字长期以来已被认作是真实的。Reber在“The Demographics of Paraguay”一文中说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不是人口的一半及男性公民大多数，而是很可能只有战争之前的8.7%。另一些人认为这些修正主义的估计“基于非线性回归，自由度相当低”（见Pastore, “State-led Industrialisation”一文第29页第3条注释），因而是难以置信的。

42 .Batou, *Cent ans* , 第267页。

第21章 天朝帝国：停滞与倒退

16世纪的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它的成就是其他国家无法比较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

那些16世纪驶入印度洋再进到中国的欧洲人，受到了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恩赐般的接待，使他们极不习惯，深受震动。当时的天朝帝国——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一切——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政治实体中的老大——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经历最丰富，其文化成就以及道德、精神和知识方面的优越都是别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他们的光辉普照周围低等种族，这些低等种族向他们乞求光明，通过拜谒和进贡，而获得某种地位。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权力独一无二的、神一般的代表。极少数有幸谒见他的人都要向他三跪九叩，表示自己的敬畏。其他人则向任何经过皇帝之笔的东西叩头——如皇帝谕旨，御笔签名。他写过字的纸，他穿戴的衣服，他碰过的什么东西，都因他而沾上了神圣的气息。 [180]

那些代表皇帝为他管理各地的人，是通过科举这种竞争性考试选择出来，考试内容是儒学典籍和伦理道德。这些官员体现了较高层次的中国文化——其显赫、完整和崇高。他们的自负和傲慢在对待下级官员态度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而他们到了上级官员面前则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1）没有什么能比早朝更表现出他们如何比试谁更恭顺。成百位朝廷大臣从半夜起便陆续聚集在富院内，一直站到天亮，风雨无阻，等候皇帝的驾到，给皇帝行礼。他们并非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的时间是皇帝赐给的。没有一位大臣担当得起迟到的罪责，准时到算是不够勤快了；不按点而提前早到才是自己对皇帝

忠心的证明。(2)

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3) 实际上，哪有什么东西可学呢？正是由于自己傲慢，就更急于拒绝接受外国的东西。这就是优越感情结的矛盾：它天生就是不牢靠的、脆弱的。那些视优越感为宝贝的人需要这种情结，最害怕出现与之冲突的情况（当今的法国人大肆鼓吹自己语言的优越性，想到有可能出现的外来词便害怕，尤其如果是外来英语词）。中国的明朝也是如此——坚信自己优越，对西方技术的挑战恐惧得发抖。实际上，要想学的话，这种技术是现成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就是利用西方技术的奇迹而打通了他们进入中国的路。机械钟是打开国门的关键。我们知道，钟表是13世纪晚期欧洲人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不仅因为对纪律约束和生产率作出了贡献，而且因为给人们留下改进的余地，以及对仪器生产和操作、机械技术这些前沿领域发挥了作用。同它一比，水钟便成了傻瓜。

对中国16世纪的官员来说，机械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机器玩意，它不仅计时，还逗人乐。有些钟奏出音乐，有的上面安装着漂亮的小假人，每隔一段时间便有节奏地运动。时钟因此成为皇帝想观赏的一种东西。只要想赢得他青睐，就得把时钟献给他。急于讨得皇帝欢心的大臣必须抢在别人前面做到这一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懂行的人跟着这个神奇的装置一起去见皇帝。中国人的本能和一贯做法要求洋人必须停在一定距离之外，只局限于进入某些周边地区如澳门，极少允许进入中央地区。然而，16世纪的时钟需要其钟表匠伴随左右。

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人喜欢钟表。但是对于这些跟钟表同来的欧洲人，就不那么高兴了。这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以及事物、人、神性之间的联系。给中国人带来这些机器的天主教传教士是

一群特殊的推销商。他们试图把中国人改造成皈依罗马天主教唯一真神三位一体上帝的信徒，而钟表可用来达到双重目的：既充当门票又作为说明基督教优越性的证据。那些能制造这些东西的人，那些同时还拥有特殊的天文、地理知识的人，难道在更广泛的道德意义上，不是高人一等吗？难道他们的信仰不更合乎真理，不更富有智慧？

耶稣会教士们到中国时准备提出这一论点，同时也变通执行教会的规矩和仪式以适应形势（例如中国人拜祭祖宗用的字符也用于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欧洲的俗人也随之效仿。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写道：

当这些人（波斯人、中国人）看到你们制造出来的这种在任何特定时间代表宇宙的真正状态的奇妙机器时，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相信他们会承认，人的头脑有某种神性，这种神性尤其让基督教徒感应到。我这里指的是茫茫宇宙的秘密，地球的无边无际，以及时间的测量。（4）

这一论点偶尔也使人信服。天主教传教士获得小小的成功，尽管他们难以说服头脑开明的“皈依者”成为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本分的“专一信徒”（即除信仰“真主”外，不信奉任何别的）。但大多数中国人如实地把这些论调看成对中国人声称的道德优越感的攻击，是对中国自尊心的打击。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反应只能是排斥和贬低西方科学和技术。（5）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开明、好奇心最强的，仍谆谆教诲他的臣民说：“即使西方的某些方法与我们不同，甚至是对我们的方法的改进，却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一切数学原理都来自易经，西方的方法源于中国……”（6）

这是令中国人欣然的神话。因此可以说，中国人不肯放弃钟表，渴望得到钟表，但却轻描淡写地把这些东西说成是玩具，对许多人来说，也确实玩具；或者把它们看成是好看不中用的身份象征，是黎民百姓可欲不可求的东西。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

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结果，尽管朝廷建立了造钟表的作坊，并且叫耶稣会钟表匠训练一些当地有才能的人，这些中国的钟表匠从来没有比得上西方的同行——因为缺少最优秀的老师，而且也缺少商业竞争和那种一比高低的精神。封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钟表制造业。

同一种傲慢自大（或冷漠）也决定了中国对于欧洲武器的反应。这些东西可绝不是玩具。火炮和火枪是杀人工具，因而也是权力的工具。中国有一切理由渴望得到这些制品，因为17世纪时，明朝为避免灭亡而进行着战争，而且正败给北方的鞑靼人。在这几十年的战争中，欧洲发明的枪炮本来有可能改变力量的对比。

然而，中国人从未自己学会如何制造现代火器。更糟糕的是，早在13世纪，中国人便知道并使用了火炮，然而却让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悄无声息地失传了。他们的城墙和城门备有炮台，但没有火炮。谁需要这些东西呢？中国的敌国都没有火炮。^[181]但中国当时确实内外受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因为敌人的弱小而不使用武器。事关生死存亡时，欧洲人在武器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欧洲的技术也是增值性的：每一次收益导致更大的收益。中国的纪录却是前进一步，后退一步，表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过程。”^[182]

这就是为什么1621年，当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讨皇帝的欢心而送给皇帝4门火炮时，他们不得不随炮派去4名炮手。1630年，中国人花钱雇佣了一支由葡萄牙火枪手和炮手组成的特遣队为其作战。但尚未实施，便又放弃了计划。这可能是个英明的决定，因为外国雇佣兵曾使不只一个政权灭亡和被篡权。^[183]但明朝人的确曾让一些葡萄牙人教他们，后来又叫葡萄牙人中的耶稣会教士兼技工给他们建一座铸铁厂并铸造火炮。

这些由耶稣会教士制造的火炮似乎是属于中国曾用过的最高级的火炮。有些直到250年后即19世纪还在使用。然而，中国人用的炮大都服役时间很短便报废了，原因是这些炮众所周知常常走火，对炮手造成的危险比对敌人造成的危险更大（我们甚至听说中国的炮弹是用

干泥巴做成的，但这至少能使爆炸力从炮筒口发射出去）。总的说来，中国当局不赞成使用火器，也许因为他们怀疑臣民会因此不忠于朝廷。考虑到这种武器的不中用，人们倒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猜想可能是害怕使用火器而带来其他的改进。（7）

对于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使用一定手段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情况也不尽如此。目的和目的不一样。欧洲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杀敌制胜；而分布在幅员辽阔的疆土且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化名“穆复生”的人曾这样描述了中国朝廷的观点：

.....军事失败是获取西方知识的技术原因，但也是不该获取这些知识的心理原因。从本能上讲，中国人更愿意承认失败，因为胜败是可以转化的，而不喜欢进入一种心理危机状态。人们能忍受屈辱但不能忍受自我作践.....不考虑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朝廷官员们感觉到了中国文明所受的威胁，并试图不顾经济和政治危险而抵制这种威胁。在过去，中国人从未放弃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外族统治者总是采纳中国的文明。因此，没有历史可以借鉴，来引导他们渡过这一现代危机。（8）

在对西方技术冷漠的同时，也存在对欧洲科学的抵制。基督教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钟表，而且还有知识（有时是过时的知识）和观念。朝廷对有些知识感兴趣：尤其是天文学和天文观测的技术，对一个独自控制历法并运用对时间的掌握来控制整个社会的皇帝来说，很有价值。另外，耶稣会教士还训练了一批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有才华的学生：有学会使用对数和三角学的数学家，还有制定出新的星座表的天文学家。

但这些知识几乎仅仅局限于北京，并且这种新学术很快便遭到那些从古代的久被遗忘的著作中寻本探源的中国人的抵制。一位领导这次寻本探源的人物（Wen-Ting，1635-1721）^[184] 考证了宋朝（10-13世纪）的数学著作，然后宣称耶稣会教士并没有带来多少新颖的东西。后来，他的书稿由其孙子出版，书名为《赤河复珠》。

(9) 题目比作者的原意更意味深长：当时，许多中国的科学“探究”犹如睁大双眼从故纸堆里淘沙。

此时，欧洲的科学继续大踏步发展，相继到达中国的教士们带来了更先进的知识（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前沿知识）。不过，种种限制使他们的使命失败了。他们太强调科学与宗教真理的联系，结果任何对前者的修正都意味着对后者的否定。这样如何面对欧洲日新月异的科学呢？1710年，一位耶稣会天文学家试图采用基于哥白尼体系的行星图。他的上级不允许他这么做，担心“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非难我们的前人所辛辛苦苦确立起来的东西，并引发新的对基督教的指责”。(10)

这种知识探求方面的排外症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明白：学习这些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然而对西方的诅咒自始至终存在。在耶稣会教士贝尔1640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西’（Western）这个字很不受欢迎，皇帝在其布告中从来都是用‘新’字。实际上，只有那些想蔑视我们的人才用‘西’这个字。”(11)

这些人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推动者，但却受挫，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而且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既得利益者感到胆战心惊。不仅如此，对每一级的官员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上风。出一条妙计是给上级脸上增光，但一出差错挨骂的总是下级。对上级说些他想听的话更容易。(12)

这种明哲保身不求变革的态度，使当年访问过中国的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感到诧异。请听听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德（1655-1728）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最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我们（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只喜欢新事物。”(13) 马嘎尔尼勋爵来中国时的秘书乔治·斯当东，因为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改进他们运河的建议漠然置之而灰心丧气，痛心地感叹

道：“在这个国家，那些人认为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出类拔萃的。提出改进建议如果不是该受斥责，也是多此一举。”半个世纪后，传教士古伯察 [185] 致力于自己的使命苦苦布道，却劳而无功，他绝望地评论道：“任何一个有天才的人，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努力不会赢得奖赏而是换来惩罚，会立即无望地瘫倒。”（14）

（并非仅仅封建王朝的中国体现了这一点。扼杀外在的动力，鼓励人们弄虚作假，是大的官僚机构的典型弱点，不管是公共的官僚机构还是私有的商业公司官僚机构，均是如此。大家名义上是同僚，似乎应该同心同德，但实际上却是对手。他们在组织内部争名夺利，不是在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小圈子里竞争。身居高位的人占优势。）

中国拒绝外国技术之所以后果更加严重，是因为它自己早已滑入技术和科学的蛰伏状态，只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进，而且随着才华屈从于身份地位，越走越慢。中国毕竟是一个自我主宰的世界。为什么它没能产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当然也领先于欧洲。有些人会说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越性。为什么中国后来“失败”了呢？

有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可能通过委婉的措词减轻内心的痛苦：“中国社会，尽管稳定，但绝非静滞的、不变的……步伐变慢了……变化的幅度小了”（15）（不错。但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或者本来就不该提出这一问题。无法回答是因为据说人不可能解释一个反面问题（这在逻辑上当然是不正确的；解释大范围的成功和失败，不可避免是很复杂的，但这就是历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这个问题不该问，是因为哪里出现了失败？用“失败”这个词本身就是把非中国的标准和期望强加给中国（但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该期望中国对自然感到好奇并且想了解自然？期望中国积累起知识并且从一个发现走向另一个发现？期望中国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期望中国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更多的活？中国原先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使这些问题更有相关性）。（16）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否一方对另一方来说很重要？毕竟，科学最初并没有为欧洲工业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因为工业革命主要建立在实践者的经验性成果之上。那么，如果说到17世纪，科学在中国已缓慢到如同蜗牛爬动，科学对中国的技术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科学和技术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二者中任何一种新知识的反应都是相通的，一个社会对来自其中之一的新鲜事物视而不见，就是已经把自己同来自另一面的新鲜事物封闭开来。

此外，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机制——学校、学会、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诸如平等交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及进步意识——这些思想都很淡漠或根本不存在。这里又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形式上崇拜自己的知识祖先。1734年，皇帝下诏要求宫廷御医举行仪式，拜祭他们已作古的同行先人。（17）另一方面，他们听任每一代的新发现被世人不知不觉地遗忘，让后人大概再通过文物和考古研究重新予以发现。 [186]

可见，中国前进的历史，是由亮点组成的历史。这些亮点在时间、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没有通过复制和试验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上使用隐喻和故弄玄虚，而变得黯淡，并且光线散布范围也很有限（印刷技术远不如欧洲）——实际上只是短暂的闪亮。很多词汇是应时而造，很快便废而不用，以至于今天的学者要花费大量精力破译这些本来曾很熟悉的汉字符号。许多思想如同陷入形而上的怀疑论和主观推测的泥潭，仍然模糊一片。儒家学说，用一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对科学研究不屑一顾的语气说那些都是肤浅之举，有人居然说显微镜“徒见其表……而不究其里”。 [187]

这种缺乏交流和挑战，以及这种主观臆断，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学术成果不易得到确认，而且容易丧失动力。当时的中国专家和学者无法确知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这往往要靠后人的研究，主要是西方人的研究，来发现那些较有灵感的成就，追授以应有的荣誉。难怪，中国对从欧洲引进的东西如此反感。欧洲的知识不仅奇异，而且

无形中使中国人自愧不如，其所蕴含的热烈奔放激动的情感，其迫切性和竞争性，其对真理和效率的毫不留情、义不容辞的追求（耶稣会教士例外），都与中国人当时的气质格格不入。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几十年、几个世纪过去了。欧洲把中国远远甩在后边。中国人一开始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且不屑一顾，但逐渐开始焦虑不安，灰心失望。西方人的态度则是从请求和乞求变得不肯罢休，也不耐烦了。英国人获悉自己先后派出的两名使节都被轻蔑地打发出了中国。第三次，即在1839年，他们带着炮舰来了，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接着是明治维新（1868）后自称要称霸世界的日本人，和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一道争夺地盘。

即使如此，外人只不过是碰到了这个陶瓷王国的表皮：几个港口贸易城市；在内陆并不明确的势力范围；以及向中国出口鸦片、煤油和工业品的权利。这些只代表了中国市场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市场的潜在规模——人口如此众多——使中国成为19和20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想象中的黄金国。

透过这层脆弱的表皮，可以看见大清帝国动荡不安，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官吏们拉帮结派，统治者的位子岌岌可危。请记住清朝（1644-1912）最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大约只有100万人口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民族，夺取了亿万人的泱泱大国的政权，并且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当然，清王朝已采纳汉族文化并被汉族文化同化了，但在风俗、血统和特权方面的差别依然存在。特殊的标记（男性必须留长辫子）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别开来——也是中国人的肉中刺。尽管大部分行政官员必然是汉人，而且这些官员也不乏勤勉和忠诚，但由于血统上低人一等，说话分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为满族人效劳，也不可避免地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新王朝建立的头几年，情况有改善。天下重新太平，一切井然有序，粮食供应跟得上需求。粮食产量的增长是欧洲对这个自以为万事不缺的民族最了不起的礼物：新的作物（土豆、甘薯、花生）能种植在本来土壤贫瘠的山岭地区。但此时中国人口也急剧增长——这恰恰

符合传统的马尔萨斯理论——当粮食供应难以再升高时，饥荒、内乱便又出现了。康熙大帝（在位1662-1722）尸骨未寒，动乱就开始了，最初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但后来的动乱又如同积聚的暴风雨，越来越严重。

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洋人成为恐惧与憎恨的目标，成为艰难、压迫和屈辱的想当然的根源。这种指控很大一部分是有道理的：高人一等的强权不会显出人身上最优秀的东西。但从对本民族的问题转嫁责任来看，这种做法是一种自食其果的逃避主义。这些国内爆发的运动中，声势最浩大和代价最惨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这是一次由宗教信仰引发的起义，尽管它仍奉行排外主义，它部分地带有基督教至福千禧的性质。这次运动历经10余年才得以平息，死亡了2000万人。

所有这些愤怒的情绪都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例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归外国人，使铁路引进极大地复杂化。轮船被等同于炮舰——入侵和压迫的工具。由于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妇女不愿走出家门工作，机械化不受欢迎，被认为与别的洋货是一丘之貉。（18）结果，到19世纪末，工厂工业才勉强立足，爬进了外国享有治外法权的通商口岸租界，而那些租界被视为大清帝国的皮肤之上的毒瘤。因为中国无法通过关税抵制洋货——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禁止这样做——这些“殖民地”企业对中国的民族经济几乎没有什么示范性影响。中国仍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零零散散分布着手工业。

中国还是一个穷国。1839年至1851年到中国各地传教的古伯察的记录证实了当时中国人的悲惨生活：

老百姓生活在穷困、悲惨的深渊中，其深重程度除了在这个天朝帝国，别的国家无一能找到。年复一年，在中国的这一或那一地区总有惊人数量的人死于饥荒。那些只是苟延残喘的人就不计其数了。如果某一个省份的庄稼因为干旱、洪水或其他天灾人祸而歉收，那么2/3的人口马上就得挨饿。你会看见他们排成无数长队——真正称得上是乞丐大军——走在一起，男人、女人、孩子，去小镇和村庄乞讨

点东西填肚子……很多人晕倒在路旁，还没等到达他们指望得到帮助的地方便咽气了。你会看见田野里和路旁的尸骨，走过去也会不介意——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已经让人熟视无睹。（19）

“现代世界科学，对；西方科学，不对！”

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往昔的累累伤痕更使历史学家心灵不安了。当研究那些遭受命运虐待的国家和民族时，这种感受尤其深刻。他们曾经富裕过，但现在变穷了；他们曾经强大过，但现在衰弱了。这些失败者和受害者仍然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同时也怀着苦涩的经历所滋生出的悲愤。一个试图理解他们并让别人了解他们经历的历史学家，一个渴望了解并热爱他们的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战斗，为的是解释他们的过去，维护他们的尊严，抚慰他们的创伤。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使命。然而，这也会阻碍科学。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明显。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汉学家想保护中国不受残暴的外国人耻笑，他们的这一愿望引出了一批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他们通常知识渊博，并且就事实本身来说声势威严。他们意图美化中国当时的表现，纠正西方的批评。

在讨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所谓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人与欧洲接触的大背景下的所谓失败这一问题上，这种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声嘶力竭。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不乐意提及这种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西方人经常把这种失败看成是一种弱小的标志，是西方人高人一等的证明。在17、18世纪，甚至那些总的说来高度评价中国，尤其称赞中国的政治体制、哲学、建有城墙的城市、其方方正正的街道布局、其产品、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访华者，通常也责备和嘲笑中国的科学。这让中国人面子上很过不去。

其次，对新中国的人民和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西方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更让他们痛心的了。在过去，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土是“人类文明真正的中心”。（20）他们会怎样看待现在的境况——欧

洲列车末尾的挂车呢？如何解决追求西方科学与崇高的自尊心这一遗产之间的矛盾呢？答案是：强调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的世界性特征——如同一条长河——并且突出中国人对这一事业的贡献。“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1)

西方的汉学家已努力为中国辩护。一个策略是尽可能减少对比的重要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什么对东西方接触和冲突的问题像着了魔似的？这些学者争论说，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如果像欧洲驱动的挑战应战的木偶那样，单单从对抗的角度来看这一历史，那就是贬低这一历史，使它完全失去其实质意义。要更多地朝里看，而不是朝外看。

那些已作古的皇帝们可能会赞成这一观点。但这种论点对我们的理解几乎毫无裨益，因为它与中国为何倒退这一问题简直毫不相关。你不能假装说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不存在，叫人们另找问题，就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另一点近似的、主张对此问题不予考虑的观点认为：凭我们对中国科学了解的程度，不足以提出这一问题。提这一问题会是“纯粹浪费时间，而且使人分神……直到人们已从内部充分理解了中国传统的时候”（22）（直到何时？要对自己研究的题目作更多了解，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以搁置重要的、该回答的问题为代价。实际上，提出这番告诫的人，就是与李约瑟合作探索中国科学史的内森·席文；他有时也对自己的建议置若罔闻，在其他文章中又探讨这一问题）。

有些学者努力强调积极的方面，勾画出一幅世界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国科学成就的令人高兴的图画，这种做法较有道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文化的角度：知识是由许多大厦组成的大殿堂，各种不同的文明经由自己的道路到达自己的真理。至少在科学中，所有这些真理汇聚成共同的产品。席文就此评论道：

过去二三十年来的历史发现使那些旧的流行说法失去了根据。那

些流行说法认为：现代科学的祖先只源于欧洲；在现代之前，除非在欧洲影响之下，否则没有其他文明能够产生科学。我们已经逐渐理解到，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以及较小的文明国家，曾存在着在一些根本方面——技术、制度背景、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欧洲传统不同的科学传统。很明显，这些传统和西方的传统，绝不是相互隔开的河流，而是从一开始便在不同程度上连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直到它们都被自己参与创造的现代科学的本地形式所替代。

(23)

这就是新的流行说法，作为一种既定的道理而提出的。像其他流行说法一样，它的目的是按更高目标来形成真理，依据某种别的理由形成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法正确地指出：现代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文明所发现的知识；现代科学吸收并把这些知识和技能与欧洲的发现融合起来。然而，它暗示不同文明之间连续的、对称的相互作用，这却是错误的。

起初，当中国和别的国家领先于世界时，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即从欧洲之外传到欧洲。这是欧洲了不起的优点：与中国不同，欧洲是学习者，并且的确从早期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中受益匪浅。当然，后来，情况就变了：一旦欧洲创立了现代科学，知识之流掉头回流，但不是没遇到抵抗。在这一点上，上一种新说法暗示各种文明对共同财富所做的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贡献，这也是误导。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宣传上述新流行说法的人泄气，因为在这种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是自己的理想和需要的仆人。在这方面，从下面一段话可看出额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动因：

世界各地有文化的人，现在都愿意倾听有关中国科学传统的新揭示……这种增高了的兴趣表明：世人对中国的敬重有所增加，增加幅

度虽小但仍足以让人感受到。更恰当地说，它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日益致力于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有助于中国科学家充分地加入国际科学大家庭。（24）

仿佛直到现在他们还需要鼓励似的。（25）

注释

1 .引自Welsh , *A Borrowed Place* , 第16页，他的引文未注明出处。

2 .关于早朝仪式，见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 第51-52页，以及Huang , 1587 ,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3 .内森·席文（Nathan Sivin）谈到了“当传统的价值观和形式背后的创造性由于知识的正统观念而失去活力时，相当程度的社会稳定性和文化同质性使这些传统价值观和形式几乎没受到挑战”——“Science and Medicine”，发表于罗普（Ropp）主编的*Heritage of China* 一书第166页。

4 .这是一封致法国大臣柯尔贝尔的信，写于1675年但无具体日期——见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 第45页。

5 .关于详细情况，请参见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一书；以及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 第45页。

6 .Spence , *Emperor of China* , 第74页。

7 .关于这些，最好的资料来源仍是Cipolla的*Guns, Sails, and Empires* , 尤其是第116-119页。Cipolla不是个汉学家，因此只能依据欧洲的参考资料，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和旅游者的见证；但他的“全球眼界”使他具备了关键的见解，这在专家文献中是没有的。

8 .Mu , *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New York , 1963) , 第76-77页，Cipolla在*Guns, Sails, and Empires* 一书第120页

引用了这段话。

9 .Taton主编, *General History* , 第二部, 第592页。

10 .同上, 第590页。

11 .同上, 第589页注释1。

12 .这一见解是Alain Peyrefitte的书*L'empire immobile* 一书的主要贡献之一。因为佩雷菲特能接触到中国档案, 包括皇帝批阅的文件, 所以他能刻画出官僚模棱两可的措词微妙的内在含义。

13 .Cipolla, *Guns, Sails and Empires* , 第120页脚注。

14 .Peyrefitte, *L'empire immobile* , 第286页。斯当东的话引自其游记*Voyage en Chine et en Tartarie* (6卷本, 1804年巴黎出版) 的法文版第6卷。古伯察的话引自其*Souvenirs d'un voyage* 第4卷81页。埃克里-琼斯(Eric Jones)在其“The Real Question”一文第12-13页上对这些关于停滞的个人回忆很不以为然, 斥之为“快镜头印象”。我以为他错了。确实有这些目睹的情况; 他们记录了一种心态, 他们的见证同我们所知的中国技术变化是符合的。琼斯回忆战后英国出现的“类似的”保守现象(工人拒斥美国技术), 他说“英国很快接受了很多美国的做法”。这是个很不恰当的例子。

15 .费正清(Fairbank)和赖肖尔(Reischauer), *East Asia* , 第291页。他们引用了Os-hima所著*Economic Growth* 一书第34页上的内容。费正清和赖肖尔认为中国“稳定”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到13世纪达到的完美。这与处处动荡着不完美的欧洲的对照最为明显。试比较Cron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 第172-173页内容: “中国是成功文明的明星般的例子.....中国达到了在前工业条件下可能的经济发展水平, 然后停滞不前了; 没有证据显示有推动它朝不同方向前进的力量.....”

16 .参阅Jones, “The Real Question”, 第8-9页。他对这种探究思路所遭到的反对也大惑不解: “我不明白为什么。(汉学家)并未

受责备，就一个曾取得如此多成就而后许多个世纪辉煌不再的社会来说，这一问题似乎并不是有倾向性的。”

17 .Taton主编，*General History II*，第590页。

18 .参阅Goldstone，“Gender, Work and Culture”一文。他认为朝廷支持这些限制，朝廷认为其主要功能是“实现各安其分”（第25页）。中国在这一方面与欧洲和日本很不相同。

19 .Lippitt在“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一文第266-267页上引用了这段话。我为了纯粹的文体原因稍微修改了译文。

20 .Silvin，*Science and Medicine*，第195页。

21 .引自中国科学院致青少年读者的一篇文章——出处同上。有意思的是，该文译成英文时这番激励性的话被略去了，也许因为译者认为，非中国人对意识形态这一套不关心。

22 .Spence在*Chinese Roundabout*一书第148页引用了内森·席文这段话。斯彭斯对李约瑟学派为中国辩护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他欢迎对李约瑟学派首倡的探究思路作进一步研究。

23 .Silvin，*Science and Technology*，第164页。参阅李约瑟的“Poverties and Triumphs”一文，发表于Crombie主编的*Scientific Change*一书第149页：“现代世界科学，对；西方科学，不对！”

24 .同上，第196页。

25 .这种伸出援助之手的政策，与某些学者——诚然，人数要少得多——以及所谓的教育家倡导和维护新的非洲中心论的做法是相似的，这种理论认为西方文明是起源于非洲。请参阅Bernal，*Black Athena*一书以及众多的有关评论。

第22章 日本：后来者应居上

我们从来不认为，日本能成为一个富庶的国家：除气候条件之外，其自然资源及环境以及整个的好逸恶劳的本性，都使之难以实现。日本人是一个乐天派的民族，比较容易满足，成不了大事。

——《日本先驱报》1881年4月9日

欧洲人一旦来到中国，就一定会探访充满传奇色彩的Cipangu（即日本，为马可·波罗及中世纪地理学家所用。事实上，早在1543年，第一批欧洲人就因为遭风暴袭击而踏上日本国土）。他们听说过许多有关这些岛屿的令人惊叹的信息：有“取之不竭”的黄金，宫殿的篷壁由金子制成，桌子是由“相当厚”的纯金制成……金子，金子，金子。^[188]根本就不会提到节俭之类的名词。

但他们所见到的日本，却与传说中的情况大相径庭。这里是有黄金，但却不足以引发人们那么高昂的激情。像中国一样，日本人民处于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处于分裂状态，整个日本国土被划分为多个较小的邦国或属地（日本称之为“藩”），这些藩的领主们对他们的臣属享有绝对权力。各个藩领之间总是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的确，整个日本在16世纪下半叶一直就处于残酷的战争之中。

对于天性崇拜武力的欧洲人来说，日本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如同一位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所说，了解日本的人“将它列为东方国家的首位，而且从国土面积、城市数量以及民族的好战和文化等方面，将它与西方国家相比拟”。^{（2）}这种印象曾长久不散，甚至持续到日本人已停止互斗之后：

与那些亚洲国家相比，日本的民族特征显著。尤其是与它的近邻——中国相比较，二者差别甚大。与导致中国人成为专制暴政的牺牲品的那种温顺、驯良、循规蹈矩的性格不同，日本民族精力充沛，有

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荣誉感。(3)

欧洲人习惯于接受陌生的外来人；而日本人却不：

最初，日本人惊讶于那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的怪人，但随后便被他们的洋枪与火药的魔力所惊呆了。通过从遥远的热带岛屿以及中国所运来的珍禽异兽，华丽的丝绸与锦缎，日本人开始了解世界到底有多大……通过一定的认识和总结……日本人相信，在海的遥远那一边，一定存在着一个崭新的天地，他们非常渴望了解那个世界的文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孔夫子的那温和的儒家思想，而是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文明。那些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们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对于充满好奇心的日本人来说，就像是被染上了毒品，陷入了无止境的需求，甚至是一片玻璃或一棵树都具有市场价值……日本人不明白为什么外国贸易能给他们带来收益。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主旨便是，向葡萄牙人学习其富庶和强大，及其文明……

(4)

在这样的环境下，欧洲人在日本所受到的接待要比在中国热情得多。中国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排斥他们。而日本人，一旦认识到那些陌生人的强大力量——例如，他们能射下飞翔中的鸟——就立即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竞相窥探他们的秘密。日本人也试着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因为这些贸易收获颇丰。而以欧洲人来说，他们则看到了这个好客的国家所提供的机会，能使他们定居下来并获得更多的财富，都尽力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这些不可思议的日本人有着自己的可贸易的好东西，他们将欧洲的舶来商品定价很高，却愚蠢地压低自己商品的价格。两个世界彼此欣然接受，而且二者都认为自己幸运而另一方慷慨。

日本人好学是因为他们有无止境的野心与欲望。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他们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后代，他们的国土位于世界的中心。他们认为自己是精选出来的优等民族，武士领主对于整个东亚的占领是理所当然的。[189] 长期以来，他们曾在文化上依附于中国，是获取而不是给予，是学生而不是先生。他们的书写符号、书写工具以及很

大一部分词语都源自中国。 [190] 他们在丝绸、瓷器和印刷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家具和绘画风格，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他们的儒家思想——无一不来自中国。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向人学习就觉得矮人一头；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高中国人一等。（5）

同样，当他们遇见欧洲人时，他们又继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他们复制欧洲人的武器；他们仿造欧洲人的钟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而即便这样，仍旧是自以为优越。

信奉基督教的时尚几乎风行了整个日本。这种新的信仰在当地的统治者那里很受欢迎，而对于那些挣扎在生命线上的贫苦大众来说，则更具诱惑力了。这是一个阶级转化的战略：可以让领导者们从善再影响他们的属下；或是给予那些需要精神和物质帮助的人们以爱和所需营养。一些大名（藩的首领）和武士（武士贵族阶层的成员）都成了基督教徒。基督教提供了传统礼仪中所缺乏的安慰和脱俗境界。另一些人入教则是为了实际的目的：在冷峻的政治舞台上，基督教为日本人开展对欧贸易和获取技术援助提供了一个渠道。就连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织田信长（在位1568-1582）以及后来的丰臣秀吉（在位1586-1598）也一度利用这一方式。

但这一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老的宗教团体不满于这种对异教的宽容，极力对这些外来者的动机散布怀疑的种子。一些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相竞争的欧洲非天主教徒——当然是荷兰人——也把罗马天主教会传教活动描绘成是在为西葡两国政治和商业野心作准备，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当局的疑心。老实说，从葡萄牙，尤其是从西班牙来的那些船长和商人，在美洲、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厮混时就养成了恶劣习惯和刻薄语言，他们自吹自擂和动辄恶语伤人的行动，更加剧了日本人的疑惧。

一个例子：1597年，一艘满载着商品的西班牙大商船在日本沿海搁浅。日本人想扣留下他们的货物。船长拜见了“太阁”丰臣秀吉（战国领主中的最高首领），试图以腓力国王的威名对他进行威胁。他拿出随身带来的地球仪，指着西班牙所占领的范围，包括从美洲到菲律

宾群岛的大片大片领土。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能扩张到那么大？丰臣秀吉问道。哦，这位毫无戒备之心的船长回答道，他尊敬的国王陛下总是先派出天主教传教士，以所宣扬的教义去同化那里的人民，这种同化的方式是对西班牙武力征服手段的极大的帮助。正是因为这一提醒，丰臣秀吉当即拒绝交还货物，并且下令处死了26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17名日本人，剩下的则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和方济各会修士。 [191]

除此之外，在这些可怕的冲突和阴谋中，基督教徒所难以通过的一个考验就是那种绝对的忠诚。对于日本的统治者来说，没有哪项义务会高于个人对于领主的忠诚；没有哪个命令会比领主所发布的更具权威性——甚至是要他自己的命。有时一个自杀的暗示也都代表着死刑的判决。还有什么比接受这一暗示更能证实一个人的忠诚呢？日本的上级对部下的强大的支配力以及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运用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当战国“大名”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联盟时，织田信长得知德川家康的妻子和儿子（也是织田的女婿）阴谋策划反叛。他就要求德川家康将两人处死。后来德川家康果真就将他的妻子处死并令他儿子自杀。对于织田信长的要求或是德川家康的忠诚，很难说哪个行为更为残酷。但如果一个人产生这样的质疑，那就意味着他不具有武士道精神。

对于日本基督教徒们来说，他们所最忠诚的对象则应是上帝。他们的思想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样忠诚驯良。所以，当满腹狐疑的统治者考验这些基督教徒时，他们没能通过考验。而佛教徒、儒教信徒和恐外者们则又有了正当地位。这对于日本经济和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1612年，德川家康宣布禁止基督教。很难说清那时有多少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估计大约有30万信徒。有些估计数字则高达70万，而当时全国总人口是1800万。

日本用很残忍的手段对基督教进行斩草除根。其手段之残忍，就是连暴虐的罗马皇帝尼禄也自愧不如。基督教徒们被迫公开放弃信仰。那些拒绝放弃信仰或故态复萌的人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甚至被烧死或是砍头。那些曾帮助过传教士的人也是同样的下场。德川幕府

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继续执行他祖父和父亲的政策，还经常亲自加入这种残酷的游戏中去。那些抵抗者斩尽杀绝，甚至连怀抱中的婴儿也逃脱不了厄运。1637-1638年间，在九州岛原地区爆发了基督教徒起义。幕府出动10万之多的军队对付37000名基督教徒，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进行残酷镇压。大约13000名武士死于激烈战斗中。基督教徒无一求饶，也无一幸免。到1671年，德川幕府为保证不会再有基督教徒，规定从南部的九州岛到北部的北海道，必须对所有的新生儿都注册登记，而且还要在佛教徒或神道教徒的确认之下。(6) 这种程序持续了100多年。这是对西班牙中世纪宗教裁判的重演，只不过这次是针对基督教徒。

起初，这种斩草除根式的宗教迫害还未与贸易有太多联系，贸易所得还是很丰厚的。但时间一久，二者联系就紧密起来，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封闭孤立。再没有别的有效途径能制止基督教传教士及其教义的传播。1616年，日本下令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外国商船只能在长崎和平户两个港口停泊。外国人的居住地仅限于江户（后改名为东京）、京都和堺三处。到1624年，西班牙人被禁止入内；1639年，葡萄牙人也受到同等遭遇。英国人也断绝了来往。最后只剩下荷兰人。

自1633年起，日本商船要想离开本国就必须要有官方的批准；3年后，所有的日本船只都被限制在本国领海内。日本自1637年就没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离开本国。出去了就回不来，回来的判死刑。那些去海外做生意的数以万计的日本人纷纷流落于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地。至1639年，在对岛原的基督教徒起义（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岛原起义）的镇压之后，除了允许朝鲜人在本州岛以外的一个小岛上、荷兰人和中国人在长崎附近的出鸟人工岛屿上进行贸易之外，禁止其他外国人入境和经商。荷兰人除了应召以外，不得出户，形同软禁。他们的库房和办公室仅限于两条街道。他们的食物、饮料、仆人和泄欲用的女人，均由日本本州运过来。他们只知道酗酒、抽烟、玩扑克牌，整天昏昏沉沉而无所事事。日子不好过，而日本人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

所有这些，只是整个民族自我僵化的一小部分。日本已厌烦了什么发现和发明，受够了血与火。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冻结社会秩序，巩固社会和政治的森严等级制度，防止民众的不满和冲突。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严格的界限，而且世袭不变。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模式一样，各阶层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武士阶层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及附属的居民。他们从前是庄园领主，如今成了受薪俸者，成为领主服务的附属贵族；但不再打仗，因为日本国内不该再有战事了。这使武士们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但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武士们腰上佩带着一长一短的两把剑（其他人是不允许佩剑的），可以在平民百姓中耀武扬威。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靠薪俸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但却很自负地严格遵守着武士道精神，这种艰难的自律也许最后会带来好运。有一小部分效忠于藩领，也许某一天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会让他们转而将自己的忠心报效于祖国。有些较穷的武士甚至还拿起了锄头农耕劳作；因为武士也要吃饭，同那些欧洲骑士一样，对于在田间劳作，并不感到难为情。

在农民种植庄稼生产粮食的同时，商人们进行贸易和赢利；手工业者们则制造出各种各样实用而有价值的商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通婚是不允许的，就连武士阶层中的上等和下等武士之间也不能通婚。总之，社会等级秩序保持不变；“一般说来，祖先之法是不可违背的。新的措施是该禁止的。”这种保守主义态度在儒家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儒家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遵从祖宗之法而不变，则国永安，而违背祖宗之法标新立异，国必乱而亡。（7）

制订规章制度是一回事，而要它们切实运作起来则是另一回事。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日本的新朝廷决定扑灭一切起义的火花。当织田信长命令德川家康处死他的妻子和儿子时，他屈从了；而一旦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获胜并于1603年当上幕府将军后，他对自己的对手同样使用残忍的手段。丰臣家族几乎被斩尽杀绝，仅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丰臣家族数以千计的同盟者被抓获处死，并且将他们的头颅挑在长矛上以示对他人的警戒。

这是一个报复的时代。曾与德川家族作对的家族都失去了领地和

俸禄。幸免于死的人被流放到穷乡僻壤，靠小小封地苟延残喘。各地都流浪着失去了主人的武士（浪人），他们性格暴躁而好斗，总是惹是生非。这些武士中有许多人很令德川幕府伤脑筋。但是他们这样找麻烦，就等于表了态，而遭到捕杀。 [192] 当“大名”死后无嗣时，又再出现一批浪人。德川幕府曾一度利用这种机会没收无嗣“大名”的领地，把它转封给自己的同盟者和亲信，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浪人问题日益恶化，幕府只好在1651年决定承认领主临终收养嗣子为合法，让那些领地由家族世袭。 [193]

德川幕府为了保持帝国的安定，设计出一套人质抵押制度，即所谓的“参觐交代制度”，于1634~1635年实施。它要求所有大名除在各自领地以外，还都要在江户设定居点，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幕府的眼目之下以便监视。尽管领主们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地内居住或办事，但他们每年不得不在领地和江户的住所各住半年。同样，领主们在来往于江户和领地之间时总是随身带领大批的家臣扈从，因为把他们带在身边可以让人放心一些，而不至于留在领地里捣乱。如有紧急情况，领主们是可以向幕府请假返回自己的领地的。幕府还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检查来往行人，以确认他们旅行是否合法。那些领主主要两地居住，来来往往，倒是要耗费不少的资财。幕府的目的就是，不仅要密切监视这些潜在的隐患，而且还要使他们的资产耗费殆尽。

[194] 除了这种人身限制外，还对外来事物与科学技术知识一律排斥。欧洲的书籍当然也不例外，就连对日本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中国书籍也必须经过严密审查。因为经常会有人将基督教教义夹在中国书籍的封面内以便携带入境。

甚至连那些可能会很有用的物品也受到日本的排斥。欧洲精美的制品曾令日本人惊叹不已。这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枪炮了；但这也在被排斥之列。火枪曾帮助日本人结束了国内战争，所以日本人就潜心学习制造火枪，并且还在欧洲火枪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事实上，日本在16世纪末期所制造出的火枪总数可能多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8）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偃旗息鼓，整个日本统一完成，火枪不再是那么有用的东西。相反，它们变成了惹是生非的工具。而更麻烦的是火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社会的平衡器，有了它，即

使一位再平庸不过的人也可以杀死最出色的佩剑武士。这样一来，幕府自然就下令禁止枪支的输入了。 [195]（但枪炮的制造技术对整个机械制造业和金属工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诸如螺丝、机械钟以至后来的黄包车和自行车的制造均是如此。一位日本学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枪炮的制造是明治时代工业发展的根本。”（9））

欧洲的进口商品中还有另外两种重要的东西，就是眼镜和钟表。关于眼镜，我们除了知道日本人曾学习制造眼镜外，其余的相关情况就知之甚少。但对于钟表的情况了解的较多，因为许多钟表都保存下来了。在这一方面，日本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掌握外国的东西再自己来制造。与中国人不同，他们大规模制造钟表，不仅供王公贵人享用，而且供应给更多的顾客，同时使钟表外观带有鲜明的日本特色。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找不到像这样的钟表；在欧洲之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曾做到过如此成功地将欧洲发明的这种东西加以本地化。（10）日本继而又制造出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表，但中国却没能做到这一点。没过多久，欧洲的手表在日本就没有了市场。日本人也不像中国人那样成双成对地买钟，以期望其中能有一个准时；当然也不会同时戴两只手表以保证准时（谁知道哪一只准的？）。日本人还尽量地缩小表的体积以易于携带和佩戴（几乎到了表的体积的极限）。他们的这一工作完成得还不错。

我说“还不错”，是因为日本制造的钟表并不能真正地保证准时。原因是日本的计时方式不同于机械钟的原理，而他们又不愿改变自己的方式。日本的时辰制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白天和夜晚之间，以及季节之间。昼夜小时的长短只是在春分和秋分时能一致；这样一来，白昼的小时在夏季自然是要比冬季长一些了，夜间的小时则是冬长夏短。

而作为机械钟来说，就要保持一致的节奏——无论是白天黑夜，也不分冬夏；不管是否真能做到，起码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日本人试图通过发明一种能在白天和夜晚以不同节奏摆动的钟表来解决这个难题，或者是通过改变钟表的刻度以显示不同长短的小时，但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这些动机就不对。如此一来，钟表就每天都要校

对，但这也太麻烦了；所以就每两周校对一次——如果记得住的话。那么不可避免，最后的结果就是，钟表所能提供的时间只是个近似值。

不过可以肯定，这种近似的时间已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有着可以精确到秒的石英表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给自己的生活时间安排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论是出于对他人的礼节还是为了自己的方便。然而，日本人计时不精确，妨碍了他们将钟表用于科技探索。当日本在19世纪末期决定走向现代化时，首要步骤就是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计时法而采用一致的计时制（这方面倒有欧洲人做榜样——将教堂的计时法改成世俗的计时法）。

日本所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将自己完全与外界隔绝，它试图回到那种传统的社会，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环境中，这一点与中国的排外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日本的政策更为强硬和严密。但二者最后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经过了很多细节改革以及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但它的本质却保持不变；而日本尽管想守旧，却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没有西洋工业挑战的情况下，打开了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局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认识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1）日本国内要求变革的力量；（2）与外界接触所产生的影响。

先了解一下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将日本的德川时代大体上比作一个缩小了的欧洲中世纪。它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即幕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像是皇室或罗马教廷，但有更大的势力——又有很多藩邑。这些藩很像一个个单独的国家——只是没有自己的主权，但它们却在管理自己领地的社会经济秩序时，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而且还可以制订自己的法规。德川幕府时代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上层是一些没有土地的武士家臣，他们有固定的以实物禄米支付的薪俸；下层则是“新生的”商人阶层。在二者之间有以种植粮食为生的农民阶层，有以技术糊口的手工业者。社会的最底层则是一些从奈良时期就一直存在着的世代沿袭的“不可接触者”，尤其是贱民和部落民，因为他们

的工作总是与动物和人的尸体打交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武士们却以他们的屠宰工作为荣）。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们拥有自己的封邑，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表现为实物或劳役（种植谷物以创收）。但是，随着大批新城市的出现以及展现在眼前的新鲜事物的诱惑，庄园主和他们的家人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奢求。为实现这些欲望，庄园主们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实物收入转换成货币，以满足消费需求和享乐；这就在西欧形成了一种趋势——将庄园租改为货币租金（这是农奴摆脱领主束缚的关键）。

日本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财政是以实物（稻米）来算的，换句话说，以最主要的粮食来换算，这种方式是为了确保统治阶级的地位。藩领的收入占全部领地稻米收成的30%左右，其中大部分归自己留作家用，剩下的则作为薪俸发给他的武士侍从。与欧洲封建领主的家臣不同，这些侍从没有自己的田产。

这种制度使人们只注重自己的社会等级，好像再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但是自从认识到生活不仅仅只限于吃饭，同时对食品以外的消费胃口也随着社会地位而日益上升，领主和他的家臣们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年贡米或禄米以换得货币，以便能更好地享受五彩缤纷的生活。他们为此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曾备受歧视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当时本应保持平静而实际上却在冒发欲望气泡的经济中，起着越来越活跃的作用。人的追求享乐的天性加上社会政治地位，以及“参觐交代”制度所造成的两地居住和江户的社会环境，刺激并造成了贪图享乐和挥霍的风气。（11）

这转而又促使佩剑武士们更多地搜刮农民。就像一位财政官员说过的，“农民就像是芝麻籽，你挤得越狠，榨的就越多。”这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辟。但压榨得太狠，农民就会起来反抗，或者逃亡到城镇或别的藩邑（像中世纪欧洲的农奴一样，摆脱苛重赋税的压迫的最好的反抗形式就是逃亡）。历史学家估计，在1590年至1867年间，发生过将近3000次农民骚动，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以及在较富裕的地区，骚动更为频繁。骚动者最经常冲击的目标，是那些富裕农户、商人及

高利贷者的宅第和仓库。经济上巨大的变化动摇了原来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

借钱总是要比强取豪夺省事一些。大名和武士们知道那些商人中的许多人不仅在谷物贸易中非常活跃，而且已与政治挂上了钩。商人们也对他们的顾客有很直接的认识，知道拒绝他们借钱的请求是不可能的。^[196]简直可以肯定，这对贷款者来说是再冒险不过了：他的债务人的势力要远大于自己，是很有可能拒还欠款的。更有甚者，那些赖账者还经常得到更高当局的支持，而当权者自有他们的理由来谴责金钱的势力，还颁布一些普遍减债和取消债务的法令。^[197]

但是这样一来，不只是苦了债权人，也苦了借债的人：习惯性的借贷者和赊欠者总是需要再借钱（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债务国喜欢签订一系列的协约；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更多的钱）。他们可以拒绝还债，并不等于他们可以不再借债。可是赖债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不会有人再愿意贷款给赖债者。所以那些大名和武士们可以在商人不在场时骂娘，当着商人的面时却又笑脸相迎。在日本，无论是礼节或语言，都可以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差别，那些挥霍无度的大名和武士们学会了卑躬屈膝，学会了温和地说话，学会了送礼，商人被准许佩剑（但仅能佩戴一把剑），还批准他们拥有一些商业上的特权（这要比鞠躬、微笑和礼物实惠多了）。

于是商人还得给予借贷。许多商人富起来了。但也有大批的商人因为借出去的钱都收不回来而陷于破产。武士们甘心为主子献出生命，可是他们对别人说的话却一文不值，而且不只是对商人说话不算数。商人常常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给贷款或不给贷款都得到霉。淀屋家族的故事就是家喻户晓的典型：这个家族很能干而发大财，业绩之一是承包大阪的公共工程。大阪能成为日本商业中心，可以说淀屋家族出力最多。到了第五代淀屋辰五郎，已经富得太冒尖了。欠他的债的大名太多了，以至于当局认定出于国家利益和儒家道德观，该收拾他了。1705年，幕府没收了他的家产，取消了他的债权，其借口就是他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不符。^{（12）}这就是对他的报答。

（这要比尼古拉·富凯幸运一点。富凯自1653年开始出任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总监。他以金融投机发财，利用侵吞公款致富，简直到了穷奢极欲的地步。富凯邀请路易十四光临他新建的别墅，而且又给国王陛下以奢侈到几乎可以与皇室相媲美的隆重欢迎，这使路易十四从心底里感到嫉妒和不快。国王觉得，一名官吏除非是欺君罔上，否则是摆不起这样的阔气的。富凯被捕，经过一番走过场的审判和痛苦讯问，于1661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长期来看，日本的商人阶级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经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但仍日益富裕，受到有权势者追求，并且逐步摆脱了专制政府的许多束缚。这些商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懂得了自己的功能和重要性，还养成了一套谨慎为人处世的规则和灵巧的策略，以躲避那些佩着两把剑的武士们的骚扰。他们有专心致志的精神、天生的对他人所持的戒备心理、经济上的节俭等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节俭和聚财。“武士求名轻利，而商人则是趋利避义。他们敛金聚银。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目的。”（13）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不许有丝毫分心。三井家族的第三代当家人三井高房（1684-1748）即是一例（这个家族在300年之后的今天仍是日本豪门巨贾），请看他的名言：

千万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上。为商者若模仿武士，或以为神道、儒教或佛教可净心，而沉溺过深，则只会自毁家业。其他艺术和消遣之事更是如此！切记祖业不得有片刻懈怠。

（14）

在这一点上，日本又与欧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本当时并未有加尔文主义流传，但日本商人的职业道德观却与加尔文主义相近。关键在于献身工作，而非献身财富。日本禅宗名僧铃木正三（1579-1655）曾指出贪财之心有如精神中毒，而做工作则有所不同：“行行皆事佛；做事则可达佛境（超度）。”（15）看来人们不一定要信奉韦伯的学说，就可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如同一个韦伯派新教徒。

（日本学者指出过，这种职业道德观并不是始终如一或处处如一，然而江户时代后半期明显表现出高强度的劳动，宣扬勤奋工作的习惯，而一俟日本迈向现代工业，这种观念和习惯对经济大有好处。用他们的话来说，正是“勤奋革命”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198]

同时，日本的统治者们与西欧的统治者们一样，都懂得商业的兴旺繁荣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多，而收入的提高又可以让人有更强大的势力和过上更奢侈的生活。多国则多竞争，分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250多个藩邦，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在经济上充满竞争的社会，他们的欲望总是在不断增加着，其中有许多统治者想要钱想得要命。

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像攫取金钱的欲望这样更能令人焦心了。为了在实物薪俸（年贡米）之外有更多的收入，大名们着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措施（修筑公路、开凿运河、开垦荒地、改善灌溉设施、种植新的以及品种优良的植物），或是倡导可贸易商品的生产专业化，其中包括乡村工业产品的销售。（16）由于上面因素的支持以及个人的积极主动，无论是耕地面积还是收获量都有显著的增加。从1598年到1716-1736年间，耕地面积翻了一番；而谷物的实际产量也在1598年到1834年间增长了65%。（17）另一个统计数字是，从1600年到1867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0%到50%。（18）这些统计数字都是以稻米的收获量来代算的，但还有另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其他农业作物和专业生产：养蚕，各种非主食粮食作物，以及新品种，例如甘蔗和甘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各方面消费需求也增加了。正像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英国伦敦周围一样，日本城镇附近的农村都变成了它们的蔬菜花卉供应基地。（19）一些藩领为满足消费，也纷纷开采幕府所未索取的矿产品——先是铜矿，随后就是煤矿。 [199]

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唯一不良影响就是，给那些当权者创造了对某些产品进行垄断或恣意定价的机会。通常情况下，其他各藩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有助于恢复市场秩序。在欧洲，市场为政治、风俗习惯及高运输费用所分割；日本则不同，市场紧凑，商贸一体，这使得人们难以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然而还有别的因素使某些地区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例如萨摩的气候使它在食糖生产方面

得天独厚，使其他大多数藩邑无法与它竞争。（20）直到江户（德川）时代末期仍约有32个地区的“领域垄断”在起作用。这种垄断无疑让相关藩领、商人、农户或制造商得利。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消费者。

日本此时的一个重大变革是农村棉花加工业的兴起。同欧洲一样，棉花很晚才进入日本，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在日本传播，但它由于价格低廉、方便舒适而迅速赢得了市场，取代了麻类植物的地位。日本的棉加工业有好几种形式：一类是城市的手工业行会经营的工场；一类是由独立的工场主（由农民转变过来的工业企业家）所经营的农村作坊，雇用集中的和分散接活的纺织工；再一类是向农村发包，商人们给乡村的农民提供原材料以及工具，然后再买回成品和半成品。与中世纪的英国情况相同，日本城市的制造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竞争不过乡村工业。因为农村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城镇的问屋（行会）又有那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许多原来以农业为主的乡村都转变成了以加工棉制品为主的集体作坊。耕种已成为一种副业或被完全弃之于不顾，这种情况倒是令当地的统治者和贵族们大伤脑筋。（21）

这种工业作坊的超前发展到19世纪中叶，在日本门户开放后，面对西方的机械工业产品的挑战时，竟有所成功。纺纱业崩溃了，但织布业利用进口的棉纱还是抵住了进口布匹的竞争。与英国一样，棉纺织工业不久就成了日本工业革命的生力军，充分利用了先前存在的机械作坊网络和熟练技工。（22）

依旧同英国一样，地区工业的专业化也是依赖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及各领地之间。商人们到农村寻找劳动力和产品；那些成功的乡村企业家在城镇找到了落脚点；而很多町人（城市里的商人）又到农村居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参观交代制”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两地居住）。数百位大名率领大批的家臣和家属在自己的藩邑和江户两地之间来回转移，对经济的发展是个不小的刺激，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需要购买许多新的商品，带动了旅馆业的蓬勃发展，大笔资金的流动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同时还推动了手

工业、商业及服务业的发展。

江户，从16世纪的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到18世纪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全国2600万人口中的100万。就像英国的伦敦，江户已是日本全国的“心脏”，不停地输送和更新着经济命脉的血液，带动人们的流入流出，促进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需求、知识、技能的广泛扩散。（23）江户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武士们在这里的挥霍无度的消费恰恰使一大批手工业者和商人富了起来。这简直称得上是商人的天堂，它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批百货商店。但提到这一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更古老的贸易中心，即最初比江户还大的大阪—京都双城区，那里曾是大皇及其皇宫的所在地，也曾是日本的工业、金融业及贸易的中心。（24）

江户和大阪—京都这两个主要的社会中心与它们周围的省市的联系网络，刺激了新方式的购买（包括期货贸易）、销售（其中大部分商品都是由专用船舶沿海运输）和汇兑（使用汇票、可过户的栈单及票据转换）。颇像欧洲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商业革命的情形，只是更进一步，（25）也发展得更快。这个岛国的经济随着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深化、社会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地发展，与亚当·斯密的理论相符。但与欧洲相比，它有几个明显的优势：（1）在250多年间没有发生战争或是革命；（2）更廉价而又便利的水上运输；（3）统一的语言和文化；（4）取消了旧的贸易壁垒，又禁止了新的贸易壁垒；（5）形成了共同的商业道德规范。（26）

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乡村的这种超前的“城镇化”现象只有在欧洲的英国才能看到，此外荷兰也有类似的初步发展。在日本那些最边远的乡村地区也印上了商贩们的足迹，他们做着现金或是赊销交易。例如，所谓的富山药商们就把货先留给农民，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看农民已用了哪些，收取相应的货款。这就与日本人精明与守信不无密切关系了。（27）而在那些居住密集的地区，则有利于建立固定的销售点。早在1813年，乡村就出现了“杂货商店”。商品种类之多令人惊奇。从当时尚处于工业化之前的阶段的经济来看，有些商品是很独特的。例如，有许多五金制品、服装等商

品，这些东西原先都是农户自家制作的；在文盲尚不易扫除的乡村，也有文具纸张出售。（28）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商店除了可能在瑞士的钟表制造地区找到以外，在欧洲大陆的农村是不可能找到的。

在如此繁忙、运动和变化的社会，知识是禁锢不了的。尽管当局竭力限制和控制，欧洲的知识仍然渗透进来，其主要途径是日本人与长崎出岛上的荷兰人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日本人原先把这种知识称“蛮学”（bangaku），即“蛮族学问”，而到了18世纪中叶，已改称“兰学”（rangaku），意思是“荷兰学问”（日本人称Holland为Oranda, rangaku中的ran即由此演变而来）（29）。这一变化表明了一种新的态度。

这一觉醒的结果之一就是日本人开始对外邦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分，能够做到取长补短。基督教及其教义仍属于禁绝之列。但有些日本人心中已明白，日本的确应向西方学习那些非宗教性的、世俗的科学文化知识，会大有好处。

于是，1720年，第一个缺口打开了：幕府同意进口非基督教的书籍。尽管开的这个口子时松时紧，但少量日本人研究西学和发表有关西学的论著，毕竟是路子打开了。这一事态发展导致了西学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之间的冲突；新观念向正统观念挑战，总是如此。所谓的“兰学专家”最初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激起冲突以保护他们的成果；大槻玄泽，《通向荷兰文化的阶梯》（1783年）一书的作者这样说：“荷兰的文化并不完美，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取其精华，那它怎么会有害于我们呢？最可悲而可笑的莫过于拒绝汲取异邦文化的优点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30）

这种温和的言辞并不能熄灭儒学派的愤怒。日本的文化一向是从中国学来的，西学是对它的一个挑战（中国是唯一一个不被日本人称为蛮族的国家）[200]。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事态。例如，到18世纪末期，政府下令只能讲授儒家哲学，而且是仅限于儒学的一派。在随后几十年间，对西学的限制更趋严厉，达到公然迫害的地步。19世纪30年代，一名汉学家被任命为江户府尹，这是一个信号，

表明对荷兰学者的追查和搜捕加剧，甚至有人被投入监狱和被迫自杀。一时间，日本在摧残其学界精英。（31）

但是，在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过程中，许多“兰学”知识使那些旧学者自惭形秽；而“羞愧”在日本文化中是让人不可忍受的。例如欧洲的医学，有解剖学的证实——眼见为实——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极大的嘲讽。（32）同样，在东亚这样一个孤立而又骄傲自大的世界里，地理位置的确起着破坏作用。大槻玄泽还说过这么一句话：“思想偏狭顽固的儒教徒和围着磨药石转的医生们的脑袋对于外面的大千世界根本就没有概念。他们使自己沉浸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模仿中国的做法，对中国的一切都大加赞赏。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球体……”（33）不幸的是，中国人仍旧固执己见。而日本人却不同，他们有了新的见解：“日月同辉。”

要提示一句：说到日本人开始学习欧洲的一些科学技术，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已追赶上来。他们在某些方面接触了欧洲的知识，但这些内容还是零散的，并且其中大都已处于落后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德川时代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速度有了显著提高，使日本人在接受欧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方面，比任何别的非西方民族都处于更有准备的地位，但他们仍然远未理解和取得这样的进展。

要说当时日本与欧洲之间差距到底有多大，这谁也难说清楚，因为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日本孤立的外壳，有先发制人的机会。新的历史学不承认世界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它强调了非西方国家人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并不赞成过去那种把一切成果和进步都归功于帝国主义的挑战上的看法。对于日本，我同情这一观点，因为我相信——虽然没法得到证实——即使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的影响，日本迟早也会靠自身力量发展到这一步的。

藩

日本曾是一个由半独立的一些单位（藩）组成的集合体，这一形

象可由萨摩藩的经历得到印证。萨摩藩位于日本西南端，远离江户和幕府的控制。1825年，萨摩藩政府破产。藩领大名的家臣们的薪俸被拖欠了一年多；大名在江户的宅院内杂草丛生，无人照看；大阪的银行家们拒绝给他们再借一分钱。1831年，该藩的领导人断然拒绝清偿藩政府对当地商人的全部债务，并且将它对江户和大阪商人的债款偿还期推迟250年之久，实际上是赖掉了债务。（34）然而20年之后，萨摩藩又财源茂盛，商人们随即都争先恐后地给它贷款。

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归根结底是蔗糖。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使萨摩非常适宜于种植甘蔗。这个藩一认识到糖的价值，就立即下令在沿海地区禁止种植其他农作物，而大面积种植甘蔗。甘蔗的种植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农民交售的甘蔗质量不合格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由藩制定糖的价格，然后再以2-5倍的价格在大阪售出。没有哪个人敢冒着被判死刑的危险贩私糖。萨摩再也不需要向别人伸手借钱了。没用多久，萨摩的糖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35）

同时，萨摩在国际贸易中也占据特殊有利地位。原则上说，只有中国或荷兰的船舶才可以抵达日本的长崎进行贸易。但是萨摩实际上控制着名义上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这就为它躲避幕府的控制而进行走私活动提供了捷径。这样，又不再需要赊欠，商人们都踊跃地用现金购进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

不幸的是，恰恰又是这些进口货打击了日本国内的工业，其中包括萨摩自己的棉纺织业。“在西方的所有货物中，你最怕的是什么？”萨摩的大名岛津齐彬问他的幕僚。得到的回答是：“欧洲的枪炮和舰船。”“不对，”大名说，“是棉布，如果再不做准备的话，不久我们的穿衣就会完全依赖于西方了。”（36）为对付西方的挑战，藩内开始广泛散播优良的棉花种子，购买先进的纺具和织布机（还不是机械化的），在鹿儿岛附近建筑厂房，并派许多无业武士到那里工作。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棉制品的价格降至了先前的一半。

随着经济的发展，萨摩开始致力于军备和现代化。萨摩藩武士的

比例失调，三人中就有一个是武士，而全国的比例平均只是17：1。武士们无所事事，可以用于增强实力，也可以用于管理，还可以制造麻烦。岛津齐彬选择了前二者。他建立了一支军队，从国外购买军火和舰船，同时还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建立了一座研究中心，建立了配备有反射炉的钢铁厂（日本的首家），军工厂，还有造船厂。1855年，萨摩制造出的蒸汽船下水首航。1867年，第一家机械化的棉纺织厂建成。有路可走了！

这里面却又隐藏了极大的讽刺。萨摩积极进取，不但促进了自己的发展，而且也带动了整个日本的发展。但在后来它又转过来反对新的日本。正是萨摩的技术人才——大都选拔自武士的最低层（因而是真正的天才）——在明治维新的全国政府中担当了重任。然而也正是萨摩在1870年之后变成一个反动的据点，带头反对新秩序。那些武士们忍受不了平民出头露脸盖过自己，不甘心放弃老的服饰和派头，受不了1872年实行的普遍征兵制剥夺他们对军力的垄断。所以，到1878年，萨摩的武士们身穿华丽的战袍和威风凛凛的甲冑，挥舞着可以一刀将人劈成两半或将飘动的薄绸劈成两片的锋利刀剑，来到那些穿着制服、装备火枪、纪律严明而面无表情、冷酷严峻的农民军队队伍面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待到硝烟散尽，日本武士之花也就凋谢了。

注释

1 .引自Wilkinson , *Japan Versus the West* , 第121页。关于日本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在1915年也曾有过类似的轻蔑性言辞：“……看到你们的工人干活，让人感觉你们是一个把时间看得一钱不值的充满惰性的民族。’当我向那些工厂主提到这些时，他们告诉我说，要改变一个国家悠久的传统习惯是不可能的。”——Jagdish Bhaguati , 引自Meier和Seers主编的*Pioneers in Development* , 第53页。

2 .Gaspere Gonsalves , 1585年，见Fisher , “The Britain of the East?” , 第345-346页，引自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 第

一卷，第696页。

3 .Hugh Murray ,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伦敦1834年版) 第1102页，引自Fisher , “The Britain of the East?” , 第346页。

4 .Takekoshi , *Economic Aspect* , 第一卷，第291页。

5 .参阅Wilkinson, *Japan versus the West* , 第108页，引用的1812年时任爪哇总督的Stamford Raffles的报告。

6 .Oishi , “The Bakuhan System” , 第28页，这些记载至今仍保存在日本一些档案馆内。

7 .Hane , *Premodern Japan* , 第142-143页。

8 .Sakaiya , *What Is Japan?* , 第128-129页。其中提到日本在1600年拥有10万支枪，而当时法国军队只有1万支左右。日本的军火产量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亦见于Samuels ,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 第79-80页。

9 .引自Samuels ,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 第80页和358页注6。

10 .关于日本的钟表制造，参见Robertson , *Evolution of Clockwork* , 第190-287页。

11 .关于禄米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见Keisuke , “The VOC and Japanese Rice”。

12 .Sakudo , “Management Practices” , 第150-151页，154页。

13 .出自Monzaemon Chikamatsu (1653-1724) 于1718年所发表的一部戏剧。引自Yamamoto , “Capitalist Logic of the Samurai” , 第2页。

14 .Hane , *Premodern Japan* , 第150页。

15 .引自Yamamoto , “A Protestant Ethic” , 第2页。

16 .关于运河和垦荒, 参见Takekoshi , *Economic Aspects* , 第三卷, 第409-416页。

17 .Hane, Premodern Japan , 第194页; 亦见Miyamoto , “Emergence of National Market” , 第297页, 这上面的日期与Hane书中的日期有出入。这些数字表明日本人在那些较贫瘠的土地上耕种, 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增长,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新开发的土地的赋税要低于原来的那些地方。关于税收所产生的影响及劳力的招募, 参见Takekoshi, *Economic Aspects* , 第三卷, 第413-414页。

18 .引自Nakamura and Shimbo , “Why Was Economic Achievement?” , 第9页。

19 .Fisher ,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20 .Nakamura and Shimbo , “Why Was Economic Achievement?” , 第18页。

21 .见Satoru Nakamura的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 载于Nakane和Oishi所编*Tokugawa Japan* , 第81-90页。

22 .同上, 第96页。Cho , “The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s” , 第15页, 谈到从国外引进的新的工业生产形式之所以成功, 离不开国内原有的辅助网络, 否则“外国公司就不得不将它们的供应零件的分包商也带进来”。

23 .见Rozman , “Edo’s Importance”。关于伦敦对于英国发展所做的贡献, 见E.A.Wrigley , “A Simple Mode”。但二者有很大差异, 伦敦几乎与18世纪末期的东京差不多大, 而英国当时全国人口约900万人, 仅相当于日本人口总数的1/3。

24 .Nakamura and Shimbo , “Why Was Economic Achievement?” , 第7页。

25 .同上 , 第14页 , “日本这类机构的职能成熟程度在当时即使不是高于欧洲 , 也是水平相当。”参见Hauser ,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 。

26 .这些数据大都摘自Nakamura和Shimbo的文章 , 第14-15页。

27 .同上 , 第19页。类似于18世纪英国的流动商贩以及后来美国的小商人 , 他们在农村以分期收款的方式出售钟表。

28 .关于完整的所售商品的清单 , 见Crawcour , “Tokugawa Heritage” , 第41页。

29 .Keene ,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 第25页。

30 .同上 , 第25页。

31 .关于这次迫害 , 见Takekoshi , *Economic Aspects* , 第三卷 , 第233-235页。

32 .见Keene , *Japanese Discovery* , 第21-22页。

33 .同上 , 第26-27页。

34 .Totman, *Early Modern Japan* , 第519页。

35 .Craig , *Choshu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 第71页。

36 .Tsuru Shigeto ,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Business Cycles in Japan” (MS , 哈佛大学) , 引自Brown , “Okubo Toshimichi” , 第186页。

第23章 明治维新

穷则思变，日本在19世纪经历了一场变革，从而搭上工业化的列车，日本也成为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但由于日本的工业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故而对它的评价有所降低。

日本在1867-1868年间发生了一场革命。幕府被推翻——实际上是崩溃——政权又回到居住在京都的天皇手中。这样就结束了德川幕府的长达265年的统治。但是，日本人却不将这场运动称作革命，而宁愿把它称为维新，因为他们把这场运动看做是回归到国家的正常状态。此外，革命是中国的事，因为中国经历了许多朝代。日本始终只有一个皇族。

早在12世纪80年代，日本就开始由称作幕府将军（征夷大将军）的武士领袖取代天皇的统治权。虽然中间也曾有过间隔和空位期，但还是形成了这种由势力最强者来统治国家的格局。君主世袭的朝代总有这样的弱点：尽管有神授君权的祖宗的庇佑，一个朝代总是难以无限期地保持统治能力。而握有实权的强人，不论出身如何卑贱，却早晚会罢黜合法的君主而自己登位当政。

中世纪的法国就是这样，卡洛林王朝取代了墨洛温王朝，后又被篡权，由卡佩家族取而代之。但日本的做法却与之不同，天皇并没有被推翻或罢黜，只是被禁闭。天皇和皇室成员及侍臣都被禁锢在京都的宫殿和寺庙里——处在德川幕府的密切监视之下。日本的天皇整天只是吟诗作赋，象征性地做一些有宗教意义的工作（诸如主持每年的稻谷开播仪式），享受一点娱乐和侍候。被别人客客气气地加以隔离，神圣而又不幸，这就是当时日本虚拟皇权的处境。

然而，天皇毕竟是合法的统治者，理当位于实际的统治者之上。他的存在就让那些反对德川幕府的人有可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日

本社会最看重的莫过于个人的忠心，而那些对幕府心怀不满的人把天皇抬出来作为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威，使之高于自己的领主和领主头上的幕府将军，不可谓日不忠。他们可以掀起一场革命，而自己又可免去革命者的称号。

同时，革命就像国内战争一样，会打乱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发展。明治维新期间也出现过不满和不同政见，往往还有暴力行动。旧体制的最后几年和新体制的最初几年沾染过暗杀、农民暴动和反动势力叛乱的血迹。尽管如此，日本的过渡仍比法国和俄国的政治变革顺利得多。原因有二：新政权在道义上站得很稳；而反对维新的人虽然感到失落和权益受侵犯，也还是有所顾忌，怕给外敌人侵提供由头和机会。外国帝国主义者蠢蠢欲动，国内分裂就会招致他们的干涉。不妨参看一下帝国主义在其他地方的行径：印度正是因为国内的阴谋诡计和冲突，才真正地将欧洲势力引了进去。

早在19世纪中期以前，德川幕府的统治就在崩溃了。旧的有关社会地位和级别的制度受到公开嘲弄。贫困的武士与商人的继承者联姻。富农成为当地的显要人物，与豪门乡绅平起平坐。那种盲目顺从的年代已过去了。较富裕的藩（如本州岛的西部地区 and 九州岛的南部地区）采取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认为与那些粗野且傲慢无礼的蛮夷之族交往要比与幕府打交道好多了。他们雇佣外国的技术人员和幕僚，从国外购置军火，建立军工厂和造船场。有些藩甚至还从农民中征召士兵服军役，随后幕府也仿效这一征兵制。在这样一个本来禁止农民携带武器、而武士以其佩剑压制普通百姓的国度里，这一政策的实施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但不这样做又怎么打仗呢？武士们痛恨用火枪打仗，他们认为那简直是有辱自己的人格，是不光彩的。

此时，德川幕府的一代又一代将军在位时间短而且无能，继位问题常引起阴谋，形成一批批密谋小集团，向京都方面发出颠覆性的呼吁。同时，外界的压力使幕府一次又一次陷于难堪境地。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纳外人的，西方人留驻日本，引起了不少麻烦。日本的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那些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战，袭击他

们，这都是为了能让他们清楚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谁是主人？当然不是幕府。面对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词，敷衍了事，这不论在外国人还是在爱国者的心目中，都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那该怎么办呢？外国的势力知道自己更有实力，他们不会向暴力屈服。1862年9月，一队萨摩武士袭击了一些英国商人，其中还包括一名欧洲妇女；当证实了幕府不愿也不能让萨摩大名做出赔偿后，英国于1863年8月派出一队军舰，炮击了鹿儿岛城堡。这一课起了作用，萨摩从实际出发，与英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这就直接嘲弄了幕府对外交事务的传统垄断地位。长州藩的情况也是如此。1863年6月25日，是京都的帝国法庭宣布对外夷的“驱逐令”的日子，那些急不可待的长州爱国者们炮轰了驶经下关的美国船只。美日双方交涉了一年仍毫无结果；随后，英、美、法、荷四国为了报复而组成一支由17艘舰船和配备有305门大炮的舰队，于1864年9月驶进下关港，摧毁了所有的防御设施。长州藩屈服了，与萨摩藩一样，向对方求和，并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友好关系。长州藩和萨摩藩曾一向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摆脱幕府的统治。（1）

幕府的软弱无能使它声誉扫地。它1854年与美国代表汤森·哈里斯签约，1858年又与欧洲列强签约，这使它完全失去了信用和合法地位。在当时，日本人的信用不等于西方人的信用。他们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在另一个人那里就是谎言。闪烁其词，幕府也能做到这一点。它可以派下属出去谈判，下属会推托说需要上级的批准。它可以签署协议，但接着就会说这一协议没有得到天皇的认可。简而言之，就是它只是做出承诺却不保证实施；嘴巴上说是但却意指不。这很容易激化冲突。幕府最后只能是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同时还在说：你们西方人有枪，好的，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

（在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日本人和美国人对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看法：美国人认为那是一个“耻辱永远难消”的日子；而日本人却认为那只是时间安排上的不幸错误。据说日本本来应在袭击开始之前半个小时，通知美国说日本“断绝谈判”，可是美国人却是在袭击后才接到通

知。直到今天，日本人仍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若是事先发出了警告——不论它是多么简短和间接〔外交官们应能领会字里行间的意义〕——那么发动一场经过长期准备的突然袭击就是有理的。美国人则认为这样的通知即使事先发出过，也丝毫不会减轻突然袭击的卑鄙无耻。）

面对外邦人的无礼要求，日本人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自日本的最南端和最西部，即萨摩藩和长州藩，它们由原来的相互敌对转而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幕府。他们的胜利同时也是失败。这就是这场革命——维新运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这些领导人以为他们应该复古。但是结果却是发现自己被拖进了明天，卷入了现代化的潮流中，因为这是通向击败蛮夷唯一之路。

这时，真正的革命者取得了主导地位，他们是那些“兰学派”、技术专家以及能够朝前看的官吏。1868年日本首先开放了许多重要港口以进行外贸。4月6日，新天皇颁布“宪章誓文”，许诺要实行代议制和建立新的民主文明社会（最后证明，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姿态可能主要是摆给外国人看的，而不是针对日本国民）。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转移产生了以下后果：封建制度被取消，废藩置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各县的知事，中央收回原先由各藩收取的赋税收入。这时又是萨摩藩和长州藩牵头：这两个藩的大名在1869年3月主动“奉还版籍”于天皇，也就是交还给国家。其他藩的大名也都紧随其后，因为这一举动是正确的，也是效忠的表现（这一行动让人想起了法国封建贵族在1789年8月4日那个生死攸关的晚上主动放弃封地税收的情景）。这样一来，日本的农民就不再给他们的大名交税，而是直接向帝国政府交税。

日本是以特有的强度和体制着手实行现代化。他们对此有所准备——治理有效的传统，百姓的高识字率，紧密的家庭结构，职业道德和自律精神，民族同一感和固有的优越感。

这是核心之所在：日本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性，也就是因为他们了解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够认识到他人的优越性。日本人在沿用德川幕

府的做法招纳西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同时，向国外派遣日本专业人员，以带回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所见所闻。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为选择国外各方面精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个要学习的军事模型是法国军队，但是自法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被普鲁士军队打败后，日本就相信从德国那里可以学到更有用的经验。在有关法规的制订和实施方面，日本也做了类似的目标转移。

日本没放过任何学习机会。1871年10月，日本派遣了以岩仓具视为团长、包括有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革新派人物在内的一个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要求废除19世纪50年代强加于日本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日本最主要的要求是重新获得控制关税的大权，以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新兴”工业。他们碰了壁，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愿放弃好不容易才赢得的进入日本市场的权利。尽管如此，使团仍旧不耻下问，参观工厂和炼铁厂、造船厂、兵工厂、铁路和运河，直到两年以后，使团才于1873年9月满载着丰富知识以及要求改革的激情回到日本。

日本这些领导人的亲身经历把一切都改变了。坐在疾驶的英国火车上，看着外面的工业化景象，大久保利通悲哀地吐露道，在离开日本之前，本以为他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天皇收回了帝国权力、中央政府取代了封建旧制度。现在他才明白，前面并不是坦途，还有更为艰巨的工作。日本跟“世界上更先进的强国”无法相比。尤其是英国给他上了自强的一课，它曾经与日本一样是个小的岛国，但是它系统地实施了自强的政策。在英国商船队逐渐壮大而称霸全球方面，航海法起了关键的作用。英国曾坚决维护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放弃这一做法而主张贸易自由（分析得不坏。亚当·斯密是不会不赞同的）。

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业贸易的自主权。更令人苦恼的则是欧洲拒绝有关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可是在这一点上，德国起到了模范作用。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看它走得有多远！大久保利通见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感触极深。他发现德国人是那么的勤劳，节

俭，“朴实”——就像日本的老百姓。他还发现，德国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们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利通返回日本，就把德国的经验作为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2）

政府从一些日常的任务着手：建立邮政，实行新历法和时制，^[201]普及义务教育（先是男生，随后也包括女生），^[202]实施义务兵役制。^[203]后两项措施尤其成为新社会的标志。普及教育就普及了知识，这正是教育的使命。但与此同时它也灌输了纪律、服从、守时，以及对天皇的顶礼膜拜（忠君）。（3）这是一个关键，要超越狭隘地方观念和社会等级，养成全体日本国民有别于外国人的民族特性。日历仍用天皇年号，也是要培养对天皇的崇拜。每个学校都有天皇的画像，每到节日来临，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的对这一偶像的参拜仪式。

军队（包括海军）则完成这一使命。在统一的着装和纪律之下，普遍征兵制的实行消除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界限。这增强了国民的荣誉感，也使男子的暴烈阳刚之气大众化。在日本，这意味着参与战争的权利的普遍化与大众化，结束了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并不是所有的原来的平民都赞赏这一变革。战争和暴力冲突一直都是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为此而享受薪俸。许多由于年龄较大而未能上新平民学校受训的人都问，为什么现在要让他们做这一蠢事。但是他们不会去打仗的）。

在维新元老的心目中，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常备军是富国强兵的前提，而富国强兵则是明治维新的首要目的，有了实力才可以自由，才可以反击欧洲列强的欺凌，才可以用欧洲人对自己的方式去欺负他人。1871年9月，维新后的日本新政府与中国谈判签约。这个条约没有像中国对待西方列强那样给予日本治外法权和商业特权；而是以彼此平等的形式签署的。有了这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第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就会接踵而来。紧接着，日本于1874年入侵“福摩萨”（台湾），这一行动的后果就是确立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也为后来侵占台湾打下了基础。然后又于1876年，派海军到朝鲜，并

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这一带毒的礼物使朝鲜在后来遭受日本侵略时再也得不到中国的保护，而且使日本获得在朝鲜的治外法权和商业特权，这又刺激了它更进一步的欲望和野心。新兴的日本发展壮大起来，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大中国则满目疮痍，而它原先的那种妄自尊大却成为日本的进攻方向。

早在1873年11月，日本帝国内阁就有了分化，一部分和平的“鸽派”主张集中精力推进国内的建设和现代化，而一批“鹰派”却主张对朝鲜宣战。这场争论导致新寡头统治集团中的五名成员辞职，其中为首者是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他曾是推翻幕府统治的领导人之一。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些旧武士们把他们的私愤泄到国际舞台上，抗议签署于1876年的日中朝三国协议，虽然协议也是有利日本的。他们更愿意留驻朝鲜，这样可以做征服大陆的美梦。

在新政府对武士阶层利益进行的两次攻击后，武士们感到更加气愤。首先就是传统的薪俸改成了补助金，由中央政府统一拨款，政府所发给武士的不再是传统的禄米，取而代之的是公债券，公债券的价值则是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和日元的币值紧密相关。不久以后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些人不敷出的武士们不得不出去做工以求维持生计。其中一些人做得很好，另外一些人却陷入了苦难而不能自拔。还另有一些人通过转变自己的观念和社会地位以获得较好的工作，或与新贵联姻，这就是世界各地的地位低落的旧贵族们所要做的：将贵族血统、形象以及高贵的礼仪转化为金钱。

日本政府对武士们所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更使他们难以忍受，那就是取消了武士们携带双剑上街的特权。这些武器使平民们不寒而栗。大多数平民出于习惯仍旧害怕武士，但此时就连农民也可能会拥有枪支了。与此同时，许多官员开始追逐西洋化。他们身着正式的欧洲西装，这种服装更适于参加巴黎的婚宴，而不是料理在东京的日常事务。他们头顶滑稽可笑的高帽，无论是在雨中还是太阳下面，都撑着华丽的洋伞；他们出门以车代步；使用桌椅；在新建成的石头结构的房屋，而不是以纸和木头构成的传统的日本建筑里聚会。 [204]

武士们的不满激化而导致了政治暗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78年5月，日本新政府的主要建设者之一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在他身着西式盛装乘坐外国式马车去参加东京赤阪宫国务会议的路上，遭人暗杀。^[205] 在6名暗杀者中有5名是旧武士；他们为自己辩护说，这一举动完全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家在武士们极度贫困的时候却把宝贵的资金浪费在一些经济琐事之上的愤怒。这也与象征主义有关。许多年之后，当时曾居住在大久保家的比利时牧师的夫人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曾听说过关于大久保不受欢迎以及导致后来被谋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那极欧式化的房屋建筑。”⁽⁴⁾

无论是这些暗杀者们，还是一些造反斗争，所起的作用都微乎其微。新旧相撞，总是旧的输。

在此期间，政府和社会大兴“殖产兴业”：怎样动用机器进行生产；怎样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提高产量；怎样进行货物运输；怎样与外国厂商竞争。这一切做起来很难。欧洲的工业国家已发展了一个世纪。而日本才刚刚起步，必须加速前进。

最初，日本着重把力量放在那些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有所发展的产业部门上，尤其是丝和棉纺织工业，还有不会被外国模仿的一些食品加工业，诸如日本清酒、日本豆面酱、酱油等产品。从1877年到1900年——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代——工业产值的增长额中，食品业占40%，纺织业占35%。⁽⁵⁾ 简而言之，日本人充分地运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把目光集中在重工业上。它的工厂规模都不大，例如拥有两千纱锭的棉纺厂（西欧的棉纺织厂却拥有数以万计的纱锭）；木制水车的使用远远落后于欧洲的技术水平；^[206] 与日本那些崎岖蜿蜒的矿井和人工铲斗开采的煤矿相比，在英国早期的煤矿里行走简直像是在散步兜风。⁽⁶⁾

人们常说后来者有优势，可采用最新式技术，而日本这一后来者一开始却出现了倒退。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的解释是资金匮乏：私人财力单薄，又没有投资银行。其实，当时有些日本商人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国家也愿意建设工厂并给予补贴。它也这样做了。但是后

来者追上先行者的长途跋涉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人才——这些人才要富有想象力和首创精神，懂得规模经济，不仅知道生产方法和机器，而且还通晓生产的组织以及我们如今所说的软件知识。有了这些，资本就会跟上来，发展壮大。

在摸索中行进的前期也有不少失败之处。19世纪80年代，政府把它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家们。这一决定使政府声望大增：要知道官吏们是很难得承认错误或放弃权力的。官营工厂是低价转让，通常是卖给有交情和有关系的人——虽然不能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一措施的确扶持了资本家们，使他们走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大约就是在这期间，棉纺织工业从手工纺织发展到机器生产。 [207] 在1886-1894年间，共新建了33家棉纺厂，其中一半以上都位于大阪地区；棉纱的总产值在1886-1897年间增加约14倍，从1200万日元猛增至17600万日元。在1899年，日本的棉纺厂总产量大约是35500万磅棉纱；而到1913年就增至67200万磅。这一结果就是日本从棉纺的进口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在1886年，日本所需棉纱的62%都来自进口；1902年停止了棉纱进口，而到1913年，世界棉纱的出口量有1/4都出产于日本，日本在第三市场上已构成对英国的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印度而更甚于印度。（7）

棉花的纺织是一件重要的事，但要制造出能完成这一工作的机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相对来说，发展棉纺业是工业呈现现代面貌的一个捷径，卡塔卢尼亚、埃及和巴西有类似的经历。只需要买来机器，往往都是从英国制造商那里购买，他们就会派出技师来协助安装工作，需要的话，还会由技师们来操作机器的运转。这样一来，棉纺厂可以为家庭手工织布作坊提供大量棉纱。这同时也产生了工业革命假象。

然而日本人早就决心超出只生产消费品的经济模式。要建立自己的现代化经济，就不能不做好费力的工作，即制造机械设备，造船和造机车，修建铁路、港口和船坞。政府在这方面起了支柱性作用，资助出国考察人员，聘请外国专家，建设厂房设施，补贴商业企业；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爱国志士的才干和决心，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不惜放

弃原先的行当而弃旧图新；还有日本工人的素质，尤其是那些工匠们早就在手工作坊中经受了紧密协作和严格监督的磨炼，炼出了一身技能和敬业精神。

这些素质在迅速学习的过程中很见效。直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才在纺织工业上运用了水力。但是水力却从来没有起到像在英国和美国工业中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因为日本人这时已在不断前进。先是蒸汽机，随之则是电力。电力尤其适合于轻工业以及那些规模较小的分散的工房；再没有其他的能量可以按所需量的多少传输了。我们知道，电需要有大规模的发电和输电设施。这在城镇地区不成问题。而在那些远离电网的边远地区，则可以用内燃机来发电。

日本轻松地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掩饰了它在工业上的稚嫩和经验不足，它几乎在还没有完全习惯蒸汽机时就开始了发电和电的利用。 [208] 日本于1878年就首次点燃了弧光灯。参与这一试验的有藤冈市助，他是日本工部大学的教师。工部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877年的工科学校，后来并入东京大学。通过多年的钻研和实践，藤冈发觉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发电站，并寻求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他拜会的第一位企业家拒绝了他的请求后，他转而寻找一位当大官的同乡的支持。那位官员让他与一位敢冒风险的资本家合作，于是这二人就筹建起一个财团，它有64名投资者，其中包括旧贵族、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以及财大气粗的外省的商人们。就这样，东京电灯公司诞生了。最初它只为工厂、商行或造船厂制造发电和照明设备。从1887年开始，它为普通民众供电。也就在同一年内，大阪、京都以及神户都成立了这样的公司；两年后，在名古屋和横滨也相继建立——到1896年已成立了33家公司。到1920年，电动机已占日本工业动力设施的52.3%。美国这一数字在1919年是31.6%，1929年才达到53%。英国则更慢一些，在1924年也只占28.3%。 (8) 在能源和动力方面，日本已做到了后来居上。

对于日本成功的迅速的工业化，一般评价都很高；使这一评价有所降低的因素，只是人们不喜欢日本伴随着工业化而迸发出来的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那种无情的追求使得工业化的进程具有

了意义和紧迫性。日本是除西方国家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它至今也为那些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起着一个榜样作用。别的国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以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但却不见他们回返；而日本的学成人员都回国效力。别的国家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并倾尽全力来运作它；日本人则是对之进行仿制，改进，以造出自己的更先进机器。有许多国家也许会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讨厌日本人（有几个拉丁美洲人喜欢外国佬？）；但是他们的确羡慕和称赞日本的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个好的，颇具教育意义的故事。但是导致日本获得一系列成功的另一个方面，却没有吸引到那些著名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力：是劳动者的苦难才使之成为了可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记录，不可避免地与其艰苦的工作和菲薄的报酬相关联，更不用说还有剥削。我用“剥削”这个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工资低于产值的意思（要不然资本怎能得到它的回报？），而是出于另一种意思，即压迫那些不能说不的人们，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奴隶以及准奴隶（被迫订了契约的劳工）。^[209]举个例子，英国有关工业革命的文学作品中就充斥着这种对人进行摧残的故事，尤其是描写那些为还清债务而被送进纺织厂的学徒们的故事。但不仅仅是在纺织厂，煤矿也是一个让人备受煎熬的地方，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铁匠铺和乡间作坊。“当我才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把我送进了花边学校（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称为学校）并给了教师一个先令。她在教我的半小时内，打了我的头7次；还用支杆刮我的鼻子。”监工和父母们却纵容这种奴役方式：“6岁是最好的年龄段，你可以把他们教训出来。如果迟了，他们在街头混过，就会满脑子尽是街头的玩意儿。”对他们越严厉越好，在一首制花边工人的歌谣中唱道：

今天我只做了三支花边，

你知道我妈会怎么说，

当她知道我做这么少，

她会把我赶出门外，

永远不再让我入内。(9)

这些不幸少女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饿出了神经性胃炎。难怪有那么
多女工最后沦为性的牺牲品，流落为娼妓。这倒似乎成为一种解脱。

英国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这反映出这场不期而来的
社会变更带来了冲击，还反映出一种奇怪的观念，即以为工资和劳动
条件是经双方的自由代理人自愿达成了协议。直到英国人先是对童
工、然后对女工的苦境从这种幻觉苏醒过来以后，他们才开始介入工
厂的经营活动，开展劳动保护的立法工作。每做一件事，他们就将其
记录在案，所以社会历史学家们就拥有了一大批记录和证据在手。英
国的情况是像记载中所说的那样差吗？或者我们所拥有的记录全面
吗？

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紧随英国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有
它们自己的劳工问题和矛盾，虽然不是那么严峻，那大都是因为他们
受到了告诫，能够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颁布劳动保护法。相形之下，
日本则是匆忙奔入原始的、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乡村工业已
经呈现可耻的剥削景象，像英国一样，但又较之更甚。为什么我要
说“更甚”？因为日本的家庭工能够而且愿意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
那样单调乏味的艰苦劳动会让即使是很温顺的英国纺织工人和花边工
人也起来反抗。举个例子，日本人就没有休息日，没有安息日。他们
为什么需要休息？动物就没有什么休息日。由于工人视休闲重于收入
而在劳动力供应曲线上造成的下降，在日本不曾是一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没有？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的集团精神；一个好逸恶
劳、吊儿郎当的工人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造成对家人的伤害。还有
国家——不要忘了国家。大多数日本农民和工人最初都没有国家的概
念；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少会有国家意识。这就是维新后
的日本帝国所要做的首件大事：向日本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
将这种精神贯彻进工作中去。学校教育的一大部分时间用于培养学生的
伦理道德；在一个没有正规的宗教教育和礼俗的国家里，学校就是
进行道德品质和伦理教育的殿堂。1930年的教科书中写道：“体现爱

国主义精神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严格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保持家庭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10）当然，还有勤俭节约这一条。

这简直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翻版，而且更具影响力，因为它完全符合了旧时农民的价值准则。典型的旧时农民是尽一切可能节约，并且相应地安排生活和劳作。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工作，通过工作来增加自己的积蓄；这就是他们做人的目的（英国的家庭工过早地从土地和农业劳作中脱离出来，对于工业发展来说是一个促进，但就某些方面来说，在人们思想上则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些失去土地的工人认为，工作就是为了生活。当拥有足够的财产后，他就放弃工作而去追求享乐）。

日本人则将这种农民的心态推到了极限。在过去，社会贫穷，百姓节衣缩食。人们以稻米为生，在较寒冷地区则以黍米和大麦为生。1649年的鸡庵敕令禁止农民吃他们自己耕种的稻米，而命令他们以“黍、蔬菜及其他粗粮为生”。可以有一点动物蛋白——一些鸡肉或海产品。可以吃鱼的一部分（包括头、皮、骨头和尾巴），还有海洋里的藻类植物、浮游生物等。甚至到现在，日本人所体现出来的广泛口味，也可以证实旧时岁月食物的匮乏和穷凑合。

所有的事情都被算在计划上了。你要放松一下自己吗？那就回家去在自己的土地上倒空自己的饭碗。劳动的分工？时间和工作太宝贵了，当母亲的人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对婴儿的照料和对自己的保养上（甚至是刚生完孩子之后）。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照顾年幼的孩子；小孩们可以尽早地学会一门手艺。一小段丝线，甚至是一小块棉布，都可以拾回来以卖给收废品的人，可以换得几钱（1日元=100钱）。那些老得不能再劳动只留一张嘴吃饭的老人，最好是早些归天。这种家庭形式，其实是棉纺织厂的缩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们榨取利益的来源。

这里有一则有关这种劳苦人的纪实故事：[\[210\]](#)

一个孤儿，嫁给了一个想娶妻以逃避军役的农民。她没有任何嫁

妆，只带来了军役豁免权，还有能够从86英尺深的井里取水的力量，具有非同寻常的劳作的机敏，以及在凶恶的婆婆面前所持的圣人般的谦恭和忍耐力。她公公的生活就是干活：“我没有东张西望的欲望，也没有任何癖好娱乐。能让土地有更多的收成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乐趣。”^[211]

刚一嫁进门，婆婆就告诉她，要自食其力。“我可不想让自己辛苦地干活，而让你这个年轻的妇人轻松地生活。既然你已进了我们这个家门，我希望你能拼命地干活并和我一同勤俭节约。”这家人让她日夜在织布机前干活，织布卖给商人，她和她的三个小姑让织布梭从早到晚，甚至到深夜不停地飞舞。就这样一天天地干，无论严寒酷暑，没有安息日，没有休息天。甚至连打扫卫生的时间也没有，“这不是宫殿，也不是诊所，”脾气暴躁的老妇人常厉声申斥，“如果有时间打扫屋子，那就出去干活”，她们就再接着干。每天可以织成3匹普通棉布。没有哪个英国织工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当她们给其他农户织布时，她们可以把布拉长，多挤出一段布留给自己——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婆婆就连这样的“外快”也卖给商人，对少妇没有一点宽容。周围的邻居称这些年轻的纺织女工为家庭的聚宝盆。婆婆则掌握财政大权。

儿媳是家里手艺最高的织工，也是村里最出色的。虽然婆婆总是对她挑三拣四，指手画脚，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媳妇生孩子时没人照顾，只在床上躺了不到三天，每顿只是吃一点米饭。从来也没人对她说，她这样有多了不起，那好像就是做母亲的天职。年轻的妈妈每天只吃一顿饭，而当她照顾自己的小孩时，婆婆就会埋怨那是在浪费时间：“我讨厌看到年轻的妈妈们把时间耗费在喂养孩子上。她应该在织机前工作挣钱。”

媳妇干得越辛苦，越好，他们就越发变本加厉地压榨她，也就更加不让她自己有一点闲空。这样一来，也很自然，因为她创造的边际效益就越发增加了。“我们的小母亲在厕所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或者，“她浪费太多的时间喂孩子”；或者，“她这个蠢货，她又在洗了”。他们充分地让她利用时间干活，根本不在乎她是否洗澡或是洗

自己的衣服。日本人向来以喜欢清洁而著称，但对金钱的贪婪却让他们忘记了这一点。^[212]那么，要是她的内衣脏了怎么办？她的丈夫现在远离家乡，在朝鲜北部做守关士兵以挣得那一点菲薄的薪金，这可是穷苦农家所向往的事情。所以她也就没必要那么讲究清洁了。（丈夫从未告诉过她，要在外面呆多长时间。而这一走就是24年。）

就这样，农家攒小钱，商人包买主赚大钱，日本的棉纺工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终于有一天，这家人积攒了足够的钱以建造一幢大瓦房。还有什么比房子更重要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房子占据着重要地位，房子可以代表这家人的社会地位。”当你请医生时，医生给病人号脉，他会先看看你的房屋。当你为葬礼雇请和尚道士时，他会先看看房子然后再相应地给死者在阴间安排住处。这家人一向为房子发愁。他们总是被人瞧不起，周围的人们也不友善。好了，这下他们可以炫耀一番了。儿媳妇依旧织下去，现在已是孤军奋战了，因为她的几个小姑子都已出嫁；因为要干四个人的活而且又没时间吃饭，她变得越发消瘦。她那在朝鲜的丈夫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妻子，好在儿子已长大了，这对她来说倒是一个很好的慰藉。

可是不久男孩就要上学了，而做母亲的却从未能有时间看他参加体育运动或做其他游戏，因为那要让她离开织布机；当老师做家访时，婆婆会告诫她，让她躲在后面的屋子里，因为除了怎样织布外，她一无所知，如果让她与教师交谈，会扫了孩子的面子。直到孩子从学校毕业与其他小孩共唱“我们无比幸福！”时，她才第一次进学校，春天的校园里桃花盛开；自那以后，每当她再见到桃花盛开时就会想起孩子们唱的毕业歌，就会不由自主地暗自抽泣。

当妈妈的纺织，作商人的购买，当婆婆的攒钱，棉纺织业繁荣昌盛起来。当儿子的则按照他那时在朝鲜当上警官的父亲的愿望，离家升入了中学。做母亲的送他离家，儿子走后，她走出大门，把头俯在铁轨上倾听那逐渐消失的火车的声音。

丈夫仍旧未见回来。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盖起了新居，亲戚们都带来了贺礼，婆婆乐得合不拢嘴，拼命地奉承讨好那些带来很多贺礼

的人，而对别人，即使对自己的晚辈，连一句话也没有。当她的妹夫，一个富裕的牛贩子回来时带给她许多礼物，他找了个机会斥责家里的老祖母：“老太婆，你怎么还不死？”“你从来就没做过什么，”她对她说，“用你儿媳挣来的钱买来稻田，盖了房子。”老妇人笑着点点头，牛贩子又说道，“好在她是个聋子！”随后老太太把整个事情告诉了当织工的孙媳妇（还能说给谁听呢？）：“你听见他说什么了？这让我太受不了了。”孙媳妇就安慰她道：“奶奶，不要为这些烦心，没哪个人能比你再辛苦了。我之所以能不离开织机而不停地织布，全都是因为你帮我往纺锤上绕线。挣来的钱都用于盖新房了。你应该知道这些。千万不要为此而难过。”然后她握着老奶奶的手抽泣。老妇人说，“你的话让我好受多了。”不久以后，老奶奶就死了，她看上去像棵枯死的树。

终于，那穿着笔挺制服，架着金边眼镜，留着翘胡子的丈夫宇一回家了。他又增建了几间厢房。随后他就开始离家去城里住——谣传是与另外一个女人——而且离开的时间越来越久。传言是真的。做妻子的却不敢问，因为丈夫脾气暴躁、易怒。但那样的事情在小乡镇里早晚都会传开的。

丈夫宇一也不想隐瞒什么。他早在朝鲜就认识了那个女人。她是日本人，被送到朝鲜做“服务员”工作的。在那里，她给一个地位显赫的政府官员做情妇，所以就富了起来，同时也让她的家里富起来。而现在，她则成了宇一的情人，她那更换不迭、令人眼花缭乱的丝质和服，真丝床单，村里没有哪个人能比得上。宇一对他的妻子一点也没有耐心，经常动手打她，而他的父母则冷眼旁观，从来不去劝阻，他的父亲甚至以儿子的残暴为荣：“一个人要是没有那样的脾气，他就不可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做母亲的也随声附和：“他就是那样才吓住了朝鲜人，难怪他们怕他呢，他还真是很厉害的。”

后来有一天，宇一把他那身着奢侈华丽衣裙的情妇带回家，他母亲知道了他的打算后，就命令儿媳去收拾隔壁的新厢房。但当她刚开始打扫新榻榻米上的垫子时，宇一冲上前去把她踢出门外：“你这个畜生！你怎敢让你那生了冻疮的臭脚踩在我的榻榻米上！”当眩晕的

妇人蹒跚着走出门时，她大声呼唤她那远征中国的儿子：“御井！御井！你在哪儿呀？”婆婆把她赶出家门：“滚开，你这个疯女人，你现在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了。”没有用：他们不再需要靠织布机挣钱了。

邻居的妇女们都很明白：“他是在朝鲜为非作歹才升了官，发了财。”她们说这个人不会有好下场。但是，她们看到宇一的妻子伤心哭泣呻吟时，谁也没有表示同情和安慰。到了晚上，宇一的情妇带着她的仆人坐黄包车来到这个家。她穿着日本出产的真丝白袜。在那以后，宇一的妻子记得的一切，只是那紧闭的大门，以及从屋里传出来的笑声。

她点着了房子——日本的房屋燃烧得很快，火焰冲天。那情妇的箱子、梳妆台以及真丝和服都化为灰烬。有多少纸币随之而去呀？宇一的妻子接着就投了井，以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是众人发现后又把她救了上来。她被以纵火罪起诉，又因火焰的光亮破坏了战时的灯火管制，而加重了她的罪行。最后她被判入狱10年，后又因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而改为8年监禁。

没有人去监狱里探望她。她蜷缩在寒风中，哼唱着有关穿雪而出的大黄的嫩芽的歌来安慰自己——当她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曾采来大黄的嫩芽安慰病中的妈妈。她的儿子御井只给她写过一封信：在这样一个对女人残酷无情的家庭里，是不会培养出有人情味的男人的。是她的狱友，山代，听了她的诉说后写下了这篇故事。那时，这个孤儿出身的妈妈和妻子已成了55岁的老妇了。

落后的手工作坊已是过时的生产方式，新的机器化大生产的纺织厂当然要取而代之。日本工业革命的首要对象就是提高棉、丝的纺织水平，而要想提高产量，就必须要有新的劳动力。像在英国一样，早期的纺织厂工人大都是妇女。但二者也有不同的地方：英国早期的劳动大军中有许多儿童，他们大都从备受煎熬的学徒生涯开始做起。而在日本却不完全是这样，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实行普及的义务教育制度。原则上来说，儿童是不可能在工厂干活的。我说“原

则上”，是因为实际情况通常与之不符。日本有很多儿童都被虚报了年龄，也就是说，学生的入学率并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标准。（11）他们的父母们迫切地需要钱用，而上学不但不挣钱反而还要花钱。

说句公道话，农村的生活更艰苦，工厂的生活相形之下还是颇具吸引力的。农村里从水井打上来的水冰凉刺骨；而从工厂宿舍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有热水也有冷水。农庄里的只是粗糙、清淡无味而又不够充足的食物，简直与猪食没什么两样；而工厂里却每日三餐都是大米饭——无疑是外国大米，而不是日本人所喜欢的那种黏米。不过，别的国家的人喜欢这种米，可怜的日本女工们也发现这种米营养丰富，适合自己的口味，从而也就养成了吃这种米的习惯——如果今天日本向国外开放大米市场，无疑还会发现这种状况。

这些纺织厂支付给女工们的工资少得可怜；扣除食宿费用后（住处通常只是机器间搁放着一块木板，或是在拥挤的宿舍里只能有一点睡觉地方的榻榻米），女孩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还清她父亲在送她进厂时拿走的那笔预付金。1898年对62家棉纺厂的调查表明，女工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是4.05元，男工则是6.83元——男女平均为4.67日元。即使是印度工人也比他们挣得多一些，几乎有他们的一倍：对印度7家纺织厂的调查显示他们工人的工资一般相当于8.07到9.18日元。（12）

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工人工资微薄，而是在他们所创造的边际产值：日本的劳动力干得很出色。有人曾说，在新兴工业或是处在工业化前期的国家中，低工资代表着低生产率，但这在日本却不可能得到证实。只要有不断的农村人手涌向工业，工厂主们就会有更大的收益：既廉价而又勤劳肯干的劳动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群体和家庭尽心尽力。一位妇女回忆道：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在点了灯的工厂里干活，一直干到夜里10点钟。下工后，累得站都站不住。有时，当我们加夜班时，他们偶尔会给我们一块山药吃。每天晚上，等到我们梳洗完后已是深夜11点了。冬天里没有火炉，所以我们不得不拥在一块儿挤着睡

觉以御寒。有几个女孩子跑回家乡去了。据说，以前的女工更苦。第一年，我们领不到钱。第二年，我得到了35元，第三年是50元……女人的生活真是难以忍受、太可怕了。（13）

这一段引文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工资低，生活条件恶劣，人们喜好洁净，工资逐渐增长。还应该补充一点，即工作环境有害于健康：潮湿（防止静电），弥漫着絮花的空气（这导致了极高的结核病发病率），令人震耳欲聋的嘈杂和喧闹声。擅长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巴尔扎克这样写道：没有哪个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没用过肮脏的尿布。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一些年轻的妇女因不堪劳苦而逃跑；但大都会被迫捕的人抓回来，并在重新干活之前饱受这些爪牙们的凌辱和折磨。另外一些顺利逃跑的人最终也会返回来——因为她们的家人要她们回来，或者是因为她们在乡下的日子更苦，还不如工厂。

关键在于农村的活计和生活更苦，至少是在体力上。对家庭的忠诚也是一个因素。那些当年在谏访湖周围（该地如今是一个电子工业中心）的缫丝厂和棉纺厂做工的可怜的年轻女工们竭尽全力地积攒以奉养她们的父母。她们沿着危险的山路，踏着深以没膝的积雪步行回家，为防止掉进深渊，她们彼此之间都用绳索绑在一起。当多年之后再回顾这些可怕的岁月，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只回忆好的方面。这是幸存者们的很自然的反应——我们想忘掉那些痛苦；我们只想“强调肯定的方面”。埃涅阿斯 [213] 对他绝望而沮丧的战友说道：总有一天你会快乐地回忆起这些事情的。

男人们的境况则相对要好一些。他们的工资高一些；而且他们与工厂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大一些。在这方面，工业化时期的日本与欧洲的工人们没什么区别——也许境况还差些，至少是在最初阶段。工厂的工人们大都能吃苦耐劳，他们被看成是与部落民一样的天生的低等动物，实际上很可能就是部落民。 [214] 他们被隔离开来，“最底层”，“低等”，“卑贱”，“浪荡者”。那些做母亲的都把工厂工人当做怪物来吓唬自己的孩子，告诫自己的孩子千万要在学校用功读书，否则就会与这些社会渣滓为伍。

工人们为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没有什么能比尊严更重要了）而抗争。“不要轻视矿工”，这就是他们所打出的标语；“煤可不是种出来的。”^{〔14〕}当日本政府不再能让日本国民到矿井里干活时，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日本就征用中国人和朝鲜人来做苦力。这可不是偶然现象，据历史记载，矿工常常被当做奴隶。随着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的溃败，这些奴隶才得以从苦役中逃脱出来，而煤的月产量，即日本的最重要的能源，从先前的300-400万吨降至100万吨。不用说，它已很难再动员起日本人来做这种苦役了，日本人已习惯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他们更喜欢自由。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一样，通过把能源由煤转向石油才解决了这个矛盾。^{〔215〕}

在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下，正是日本人的这种工作精神，以及个人的人生价值准则，才使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实现成为了可能。好像全体国民都以昔日的武士价值观——陈腐的“武士道”精神为道德准则。当然，认为这种信念已完全普及是不对的，但是要真正理解日本人的表现，就必须对这种由文化决定的人力资本价值有所认识。正是靠了这样的国民性格，日本才得以卓有成效地采用西方技术，使经济由小到大，从民众身上索取到非凡的产值，而倘若是在别的社会，民众早就会忍受不了而出现大规模的怠工和逃亡。有些人不理解日本军人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还表现出那样的顽抗，将这一行径归因于军人的狂热和一时的自杀冲动，这没有说到正点上。这是一个崇尚“仁义忠孝”集体义务精神的国家，这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个人主义非常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在欧洲，像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也是如此。但是一旦日本人找到了他们所想走的路，他们的集体价值观就起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处于领先和疾驶地位的经济。日本经济的成功在于，它在德川幕府时期成功地反对了僵化和怀旧，而

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做到了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战略。

注释

1 .关于那些年间所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见Miyoshi , *As We Saw Them* , 第4章“Lives”。

2 .Brown , “Okubo Toshimichi” , 第190页。

3 .关于这些，见Shimada , “Social Time and Modernity in Japan”。

4 .见Brown , “Okubo Toshimichi” , 第191页，注27。大久保的敌人们利用他的住宅做文章来攻击他。他们甚至还拿一些新建公共设施的照片给萨摩藩领主看，说那就是大久保的遭人非议的豪宅；据说就是因为这些照片，西乡隆盛和大久保的关系破裂。

5 .Minami , *Economic Development* , 第99页。

6 .参见Samuels , *Business of the Japanese State* , 第3章，第76-79页。

7 .Hischmeier ,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 第99页；Hane ,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s* , 第173页；Ohkawa and Kohama , *Lectures on Developing Economies* , 第35页。

8 .Minami , *Power Revolution* , 第6章。

9 .Landes , “What Do Bosses Really Do?” , 第593页。

10 .Fukui , “Japanese State” , 第205页。

11 .同上，第204页；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入学登记了，但是正常上课的却不超过3/4。

12 .Hane , *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s* , 第177-178页。

13 .同上 , 第182页。

14 .以上是基于Thomas Smith , “The Right to Benevolence : Dignity and Japanese Workers , 1890-1920”一文 , 载于Smith , *Native Sources* , 第236-270页。

第24章 历史出错了？

阿拉伯男人有一腔傲气，但也有非常脆弱的一面。

——简·古德曼《荣誉的代价》

如果不深入了解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理解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的。“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真主），它属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比它更早出现的两个一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起源于沙漠地区。它具有非同寻常的鼓动性，使小群游牧部落通过战争迅速地扩张领地。在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62年（后来这一年被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从麦加出奔至麦地那之后100年内，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接受伊斯兰教这一新信仰的战士摧毁了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和帝国，并且向西横扫，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大西洋，穿过西班牙直入法兰西腹地。稍作休息和整顿之后紧接着就向东进发，直抵印度及其以东。当欧洲人于1498年通过水路进入印度洋时，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东到中国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南至非洲东海岸，北至欧洲东南部的多瑙河流域，以及中亚地区的主要商道。后来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收复了被占领的土地，扭转了似乎是上天安排的征服过程。

从西罗马帝国衰亡（传统上定为公元476年）到基督教的欧洲向海外扩张，在这中间的1000年间，伊斯兰教激情和献身精神的爆发，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从这种意义上讲，它预示了后来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巨大潜力，只是后者发展得更广更深入，并将它的历法通行全世界，从“耶稣纪元”发展到“公元”。

这两次实力进发的关键区别在于技术的地位有所不同。前者，即穆斯林，依靠的是老技术，然而他们是新战士，靠着急速奔驰的骑兵的战斗激情，这些人相信上帝和历史是在他们那一边。他们全凭自己的气势压倒那些专制帝国的坐享俸禄的官僚和不关心国事的百姓，

只是偶尔停下来消化一下征服的果实和战利品。后者，即欧洲人的扩张，则是依靠优势的火力，受利润驱动：战利品也是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获取的利润。（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我们就知道三个G：God〔上帝〕、Gold〔金子〕以及Glory〔荣誉〕。三者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子了，因为金子可以用来付账，可以装备舰队，可以诱惑和抚慰人的肉体）。

欧洲势力的潜力要更大一些，因为它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处在巅峰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敌。他们唯一真正的对手是其他欧洲人。但穆斯林的推进更加毫不妥协和不知满足。他们的英勇无畏再加上对宗教的虔诚预示着它天启式的两个方面的发展结果——胜利以及失望。

欧洲的扩张（帝国主义）不是天启的。它实质上是力量的显示。它用心计算力量的对比和机会而采取对策，富有成本意识，因而其进退都是机会主义的。的确，精神对于欧洲人来说作用很大，而在一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显得更重要些——就像对天主教徒所起的作用高于对新教徒一样（我们可以在亚洲的荷兰人身上看到这一点）。但是精神很难与利益和得失连在一起。威望也很重要，但威望和其他东西一样，有自己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帝国在其威势降低之后就消失的原因。当欧洲列强的势力遇上殖民地人民的抵抗，留驻当地所耗费用升高时，他们就收拾铺盖撤退（印度就是一则典型的例子），通常给当地新独立的人民造成沉重的损失。 [216]

伊斯兰教则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穆斯林战士所做的足真主的工作，他们的失败就是整个人类的挫折。所以，当基督教徒骑士从11世纪开始，先后在西班牙和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将穆斯林战士们打退而占领一度属于伊斯兰教的领土时，穆斯林们将这一失败看做是魔鬼的胜利。而当穆斯林军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把十字军骑士们驱逐到海里时，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胜利，而是真主安拉的胜利，是恢复了秩序和纠正了历史的偏差。他们把基督教十字军建立的王国都赶出了黎凡特地区，这被看做是一个范例，被当做是历久不衰的一个象征。差不多在千年之后，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攻占科威特、跟西方列强及其穆斯林随从者的联盟作一较量时，他还宣称他

这样做是追随当年率领穆斯林大军从异教徒手中收复了耶路撒冷的库尔德首领萨拉丁的榜样，是为了纪念萨拉丁。 [217]

自萨拉丁那一辉煌顶峰（1187年）之后，伊斯兰事业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变得无力，它依旧有所得，尤其是在那些信仰万物有灵论的人们之中。伊斯兰教的信息简明；皈依的过程也很容易。在三大一神教的信仰中，它对于新入教者所要求的最少，至少是在最初阶段。 [218] 但是由于伊斯兰教将其信仰与力量和领土联系在一起，它相对于异教徒社会而言的势力减弱是一件很让穆斯林失望和难过的事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下滑趋势所带来的问题，曾由于伊斯兰国家的继续独立、欧洲势力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散、伊斯兰力量的若干局部胜利（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及伊斯兰世界看来仍巍然屹立等情况，而被掩盖。可是从17世纪以来，凡是环顾四周的人都不会看不见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伊斯兰世界在经济上和科技知识上都落后了，历史出了毛病。

从较广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帝国的上述冲突，在两个地方尤为关键：一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正是在那里开始了对土地、财富以及国家主权的攫夺。二是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那里，苏丹的敕令不被放在眼里，他的土地被那些自命不凡的基督徒邻邦以及民族主义高涨的基督徒臣民所侵蚀。这两者都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少数的贵族阶层上等人，另一极则是可以任意欺骗和压榨的劳苦大众。贵族和官僚们掌握着几乎无限的特权。他们握有暴力，只是偶尔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血来潮而受到一点限制。这些社会不是没有正义感，一位历史学家甚至说道“在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社会里，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的存在不言自明”。（1）（读了一些当代人，包括从欧洲来的旅游者所写的见闻，我发现这一观点是乐观得出奇）。

在统治者之下，民众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安全感；有的只是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统治者的屈从。反抗是几乎不可能的。唯一能够摆脱残酷剥削和压榨的途径就是像鸟一样飞走或藏匿——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据说巴格达的一代哈里发说过：“生活最美好的人，就

是他有一幢宽敞的房子，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丰足的财产，他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2）这话说对了。在这样的社会，被权势认识或认识权势无疑都是招惹麻烦。当一位苏非派圣徒被要求接待国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房子有两扇门；如果苏丹从其中一个门进来，那我就从另一扇门逃走。”当然只有一个圣徒才可以那么说，也只有圣徒才能被问及。那么大众怎样才能被国王或国家所确认呢？充军入伍仅仅是一种束缚的形式，战士往往只是缺乏宗教激情和效忠精神的奴隶或者雇佣军。

当欧洲人来到印度时，莫卧儿帝国已呈现一幅支离破碎的状态；灭亡的趋势已成定局而不可能扭转。这个印度次大陆在宗教政体上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体，但实际上却从未联合起来。接连不断的入侵者从西北侵入，占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但是南方却一直游离在外，各地区在语言上和文化上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地方特色，像是压紧的弹簧。所以，国家没有统一：“国家看上去像一触即碎。”（3）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体系呢？为什么，“既然有了与欧洲相类似的彼此竞争的政治群体，却没有出现一批国家”？（4）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贵族专制政体，不论大小，都未能形成自己的能赢得人心的特性，从而足以将民众维系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甚至高人一等。宗教本来有可能起这一作用——穆斯林对印度教徒——不过直到20世纪，这才被作为划分国家的界线。如果欧洲人在17世纪没有侵入的话，印度就会长期陷于内部分裂和自相残杀，如同它以往1000年那样。

是英国人改变了这一切。他们所带来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得一小部分人就能统治比他们多成千上万倍的驯顺的民众。除了1857-1858年遭到无情镇压的印度兵变以及偶尔发生的一些宗教纠纷以外，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没有反抗。英国人的到来，还带来了贸易上的巨大好处。如同先前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在东西方贸易的这一接合中充当了积极的合伙者。是他们的船在往来穿梭，进进出出，是他们的商人驶入了亚洲的水域。（这一点与北大西洋的贸易交往和竞争的对称格局，形成了对照。）原有的亚洲商业网

络尽管拥有财力和经验，仍然把利润最丰厚的交易让给了外国商行。从18世纪末起，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大英帝国的政策，而不是印度本地的积极性。

英国的统治招来了愤怒谴责。白人老爷和太太们都认为自己比当地人文明得多——衣冠楚楚，风流潇洒，干净整洁，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印度人则直言不讳地对英国人进行反击和鄙视。孟加拉的一个民间神话中说，英国人是由魔鬼和母猴子结合而产生的后代。比较有涵养的印度人则不谈那样一个颇具想象力的家谱，但却宣称早在英国人还在丛林中穿梭的时候，印度人的祖先就已开始写诗，并且已知道了零的存在。亨利·梅恩爵士，19世纪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为印度人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怀旧情绪感到悲哀和遗憾，“印度人从我们欧洲人这里学会了现代构思技巧，通过一番捏造与虚构，从现实想象出一个过去……”接着又说：“对于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留下了太可怕的印记而使人难以将之搪塞或敷衍过去。”^[219]

今天，当然我们都这么做。我们认为这样很好，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多元性。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存在倒是比较长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它历经250年扩张（1300-1550年）之后，它的下滑趋势本应导致帝国在几十年内四分五裂直至灭亡。可是到19世纪，土耳其帝国依然存在，只是被公认为“欧洲病夫”，而实际上它的死亡过程早就从300年前开始了。这样一个全身腐烂的活着的尸体，其最终断气怎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始于13世纪末，当时一个突厥人氏族或部落，即奥斯曼土耳其人，远离他们祖先所在的平原和草地，渗入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很接近拜占庭帝国（希腊）的势力中心。这一尚武氏族行动敏捷，酷爱掠夺，非常危险。希腊人本应该明白这一点，将他们视为潜在的、不可避免的敌人。可是这些以古希腊人子孙自居的希腊人却聪明得过了头，以为他们可以把奥斯曼土耳其人当做工具和盟友。

所以，到了14世纪中叶，当拜占庭帝国陷入内战而不能自拔时，交战双方开始引入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后者也是入侵者）以求支援。与蛮人合作，让他们为自己助战，而不是与自己作战，这种做法几百年前就有过。然而引狼入室是很危险的。蛮人进来以后可能就舍不得走了。当塞尔维亚人野心勃勃地要取代希腊王朝之时，希腊人就再一次向土耳其人寻求援助，土耳其人给予了帮助。但在打败了塞尔维亚人之后，土耳其人于1354年占领加利波利，然后是色雷斯，并于1356年夺取阿德里安堡（为纪念罗马皇帝哈德良而命名的城市）^[220]作为他们的新首都，这里距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天的路程。

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牢固地将自己一只脚踏在欧洲，另一只脚踏在小亚细亚的土地上。拜占庭“帝国”已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基督教领地与穆斯林相比，只不过是海洋里的一些小岛；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先前的亚洲入侵者一样，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模仿希腊宫廷的浮华和奢侈。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彻底摧毁罗马帝国。这时候几千英里以外的宫廷和教堂中都敲响了丧钟、念起了祭文。在那一时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领了与在亚洲一样多的领土，它被看做是伊斯兰刺向基督教之剑的持剑者。土耳其人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新恶魔，总是与“残忍”或“野蛮”联系在一起，是带着包头巾留着大胡子的一帮狂野之徒，被称作“tetes de Turc。”^[221]学校里学生们所做的数学题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处理沉船里的土耳其乘客。

这样的敌意（恐惧）和断断续续的侵略造成了不得安宁的、不断变动的冲突的边疆。君士坦丁堡（后来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座伟大城市的陷落，构成了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之一，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500多年后的今天，仍起着作用。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波斯尼亚看到这种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所谓民族清洗的惨象。

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只不过是更加好战一些。统治者们收取各行各业的盈余，尽管最初他们对民众的压榨似乎比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轻一些，或者说效率低一些。^[222]也许这是因为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整天忙于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每年都会掀起战争，对邻国进行突袭。只要这些袭击成功，他们就可能将这些非穆斯林百姓视作牲畜，置于宽松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土耳其人极力鼓励那些由少数民族群体——基督教徒（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越来越多的黎凡特人）以及犹太人所经营的商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他们将社会建立在以民族不同来分工的基础上，这显示了他们自己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鄙视以及所具有的优越感。这种社会分割使企业有一点发展，但又阻碍了它的扩大。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有钱而没有势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说，资本积累在土耳其是一件颇具吸引力的麻烦事。它只能勾起统治者们贪婪的占有欲并刺激他们采取没收、查封的措施。

在一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横跨了整个中东穆斯林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整个北非（包括埃及、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尔），欧洲东南部的很大一块，再加上黑海周围的土地。对这些通过一次次战争所获得的领土，是不可能进行统一的管辖和治理的。一些严密统治地区按期上交税收；另一些则向统治者宣誓效忠和进贡。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则是随战争和外交的进退而进入和退出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范围。主权往往就是宗主权，权力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这就是说，奥斯曼宫廷的统治既有实在的一面，也有在受到挑战时尽力而为和相机行事的一面。

最初，这样的控制方式可能还比较有效，因为在那时奥斯曼帝国有一些能干的领导人。但长久下来，它的贵族体制就与所有的君主专制体制一样，或是更严重地在其本质上具有两个突出的弱点：遗传中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以及继位的问题；而且这两者紧密相连。第一个缺点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一个辉煌的家族总有一天也会倒退成平庸而普通的家庭。继位是由社会和政治的习俗和惯例来约定的。在伊斯兰国家，继位者一般都是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公民，可以是叔辈、侄子或长子。土耳其的皇位继承起初是由最出色的儿子继位，后来则改成长子继位了。

在这两种体制下，统治者的配偶以及成群的嫔妃和无数的子孙

（一个无聊的君主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呢？）产生了一大堆的法律问题。奥斯曼帝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勒死所有潜在的竞争者，确切地说，是用一根丝线。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预防性的谋杀，不光是谋杀竞争对手本人，而且也包括对方的母亲（被装进麻袋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或是将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小心地关在后宫以防止他人的袭击和伤害。这种徒劳而且荒谬可笑的隔离的结果，导致了皇位继承人在知识上苍白，在政治上无能。自17世纪以来，苏丹继承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足轻重的象征——一个供他人操纵的工具。

在这一傀儡周围，是一些廷臣勾心斗角，操纵着国家大权。随着奥斯曼帝国官僚机构日益增大，文牍增多与法规多样化，帝国开始逐渐依赖于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官员，这些人甚至还登上了最高级别。其中许多人是用名副其实的人头税来招募：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徒被勒令将自己的儿子献给国家，让他们接受穆斯林教育，然后再给予他们高低官位以在战争或和平年代为国家效力。（5）这一体制在旧的官僚贵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令他们嫉妒——“为什么那些掌权的高官显贵都是一些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但这的确体现了奥斯曼帝国能够接纳饱学之士，其中包括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叛教者，[\[223\]](#) 这已不再是土耳其人的帝国——实际上“土耳其”这个词曾隐含着一种无知和粗鲁的贬义——但这的确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混合体。但它并不是熔炉，土耳其人始终未能创造出一种奥斯曼的共性而享有它各个不同民族的忠诚。[\[224\]](#)

与此同时，老的土耳其战士们失去了战斗激情，也找不到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了。国家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奴隶士兵，尤其是土耳其禁卫军士兵。[\[225\]](#) 这些士兵最初是作为苏丹的侍从，充当他的右臂以及他的精兵队伍，但是给予了他们杀人的权力也就等于给了全权。在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称之为伊斯坦布尔），禁卫军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一支御林军多次发动宫廷政变，直到1826年苏丹征得宗教领袖的同意，决心消除这一窝麻烦制造者。苏丹首先建立了一支新军，并通知禁卫军说欢迎他们也加入新军——就是用合并的办法来消灭他们。他们拒绝了，发动叛乱。忠于苏丹的军队调来了火炮，炮轰禁卫

军兵营，然后收拾了禁卫军。结果是打死了6000到10000人，禁卫军不复存在，成为历史。

埃及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军团，被称为马穆鲁克军团，他们实际上作为贵族统治埃及，时间长达260年之久（1254-1517年），这改变了“马穆鲁克”一词的原意（阿拉伯语中的马穆鲁克就是奴隶）。甚至在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他们仍统治着埃及，一直到拿破仑率领下的法国入侵（1789年）以及随后的英国的入侵。继欧洲人入侵之后，来了一位阿尔巴尼亚冒险家。他自立为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和新的帕夏。这个时来运转的军人名叫穆罕默德·阿里，他再也忍受不了马穆鲁克寄生虫，决心消灭他们以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他在1811年邀请了马穆鲁克首领参加他举办的宴会。这些马穆鲁克贵族一个个身着华丽盛装，兴高采烈而且诚心诚意地坐在筵席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大门是紧闭的，居高临下的枪手们就像对付池塘里的鸭子一样射杀了他们。这样就结束了一段长达550余年的历史。

[226]

现在言归正传。自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失败之后，随着粗具规模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实体日益组建就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战争中接连受挫。其他的许多变化也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欧洲的军事工业技术日益增强，奥斯曼帝国试图跟上，但它只是模仿而不是改革更新。他们非常明白火炮尤其是攻城炮的价值，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基督教技师们去制造大炮。随着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枪炮差距的增大，土耳其士兵甚至都不知如何使用战斗中缴获来的枪支。（6）

海上的情况也一样：奥斯曼帝国更换的战舰依然是老样子，而基督教国家的海军装备却有了改进。听一听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西拉尼基·穆斯塔法·埃芬迪对1593年将第二任英国大使载送到奥斯曼帝国首都的那艘英国军舰的描述：“像这样奇特的船还从来没有在伊斯坦布尔港口见到过。它驶过3700海里的海路，装有83门炮，还有另一些武器。火炮的外形就像一头猪。”（7）这一联想无意中证实了他的无知：这些猪（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猪是基督徒的美食、穆

斯林的禁忌)就是海军的钢炮,制造于英国;其总量无人能比。那只船再加上几艘与它差不多的船,可以在奥斯曼帝国舰队靠近之前就将它们击沉。奥斯曼帝国试图通过进口大批的军用物资以跟上基督徒的步伐,这些舶来品中包括:火枪、火药、硝石、钢铁和刀剑。虽然教皇禁止向穆斯林销售武器,英国人仍然顶着教会的强烈谴责和被开除教籍的危险,向奥斯曼帝国卖出了大量的武器,同时也卖给西班牙。但是,从这些没有良心的异教徒身上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而且还不仅仅是武器,欧洲和黎凡特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从前,东方的手工艺者曾向欧洲提供精美的布料、毛毯、织锦以及彩陶器等等,以交换欧洲的金属(铜和锡)、奴隶和货币。自16世纪以来,欧洲就开始用自己的工业制品换取东方的干果、调味品、棉花和谷物。真丝也是这样:在中世纪时,是欧洲从拜占庭帝国购买丝织品;现在它则已开始进口生丝,土耳其的生产商们在生丝进口方面是难以与欧洲人竞争的。还有纸:这种写字材料的制作工艺是中东地区在8世纪从中国学来的;但是造纸用的植物纤维供不应求,兽皮稀缺,羊皮纸也不例外。新的造纸技术在欧洲扎根较慢,因为当地羊皮纸已够用了;可是一旦欧洲的制造商人掌握了纸的生产技术,他们很快就以更加精湛的技术远远超过了黎凡特人,而且随即就开始向东方销售大批的纸张。(8)即使是诸如咖啡、糖之类最初是从东方流入欧洲的商品,现在也改变了流动方向——比如经过一系列提纯和加工之后的砂糖。(9)

伊斯兰最大的失误是禁止印刷出版,印刷被看做是潜在的亵渎神灵和宣扬异端邪说的工具。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地切断了穆斯林与外界知识主流的联系呢?

这种对文化知识的隔离,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工业上的依赖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力量之间不再平衡,优势日益倒向了另一方。同时,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打消了他们盲目的优越感,也使他们丧失了反应的能力。少数有远见卓识的人曾试图告诫统治集团,极力倡导改革,但收效甚微。欧洲那些“魔鬼”的形象已经在宗教信条的基础之上固定化,而且在习惯势力的影响下灌输到人们的

心中。国家的官僚衙门真是拜占庭式的错综复杂，繁琐的规章条例和文牍主义叫人头晕眼花，办事更加困难。腐败——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成长。

这种自身所具有的缺点搞垮了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一台劫掠机器，它总是需要丰厚的战利品和广袤的土地来作为燃料、来为它铺平道路以及付给官僚薪俸。”^{〔10〕} 奥斯曼帝国最初占领了大片领土，一路掠夺，曾经是那么强大，而今却虚弱不堪。现在他们已没有能力从外面掠得什么了，本来应该设法从国内创造财富，鼓励有效益的产业投资。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却沿袭旧习，掠夺国内资财，压榨自己的臣民。没有什么东西，甚至是高级官员的财富能够逃脱这一厄运。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能加速自我毁灭了。在当时使帝国免于解体的唯一原因就是它的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列强对自己利益的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它的工业革命，就给奥斯曼帝国产业的棺材钉上了钉子。除了一些地方特产外，没有什么能与进口的由机器加工的廉价丝棉制品相抗衡。在19世纪，英国保护奥斯曼帝国以防止其敌人侵占其领土，同时也很轻快地扼杀了它的制造业。但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正是理当如此：英国的商品比较便宜，奥斯曼人是不可能与之竞争的。他们所知寥寥；他们没有资本；他们也没有安定的政局可以依靠。

但是，穿过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部分却另有想法。那就是埃及。马穆鲁克对埃及的腐朽统治曾使埃及陷入长期昏睡状态，人们甚至忘记了使用车轮——想当初，在法老统治下，埃及的弓箭手曾何等威风地驾驭战车，驱赶过努比亚人和出逃的希伯来人。^{〔227〕} 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多大变化，但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的入侵，真正地动摇了整个埃及。马穆鲁克军团只是被搁置一边，而波拿巴对公众所宣读的法国革命的口号却让老百姓不知所云。法国之后便是英国——令埃及在工业技术上更加惭愧——再随后就一批新的土耳其入侵者，试图提醒埃及对伊斯坦布尔的效忠。其中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过的穆罕默德·阿里。他利用马穆

鲁克的力量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并自命为开罗的首脑。面对这一现实，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任命阿里为埃及的总督。作为回报，穆罕默德·阿里后来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这也符合土耳其人的悠久传统。

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很有魄力和野心的领导者。但他与传统的军阀不同，他有很开阔的眼界以及更多的期望。他从来不把自己封闭在宫中。阿里从普通民众那里了解到奥斯曼帝国落后了多远，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去学习和掌握。因此，没有哪个有身份的参观埃及的人没被阿里召见过。阿里没有把埃及看做是一项被指派的职位陈设，而把它看做是一个等待开发的私人土地和资产。通常奥斯曼帝国总是不停地调动官员的职位，以防止他们打下太深的根基。阿里却在埃及实行了世袭的封建采邑制。

穆罕默德·阿里还将埃及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努力促进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新科技的应用，教育体制上的改革（经济学家会称之为人力资源的优化）；也不幸地进行了军事方面的改革以及向人们灌输好战尚武精神。为了能完成这些目标，他从外国引进技师，其中有一些人还脱离了基督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当时领导世界制造业的是英国，但他所聘请的大部分专家都是法国人，可能是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释放了这些能人智士，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失败使法国显得不那么可畏，也可能是因为穆罕默德·阿里理智地将英国看成是埃及工业发展的对手。

在所有的外国专家中，最突出的可能莫过于路易一亚历克西·尤梅尔，一位法国的擅长棉织机器的技师，后来成为一个农艺家。1822年，尤梅尔将他在波旁岛（后更名为留尼汪岛）发现的一种灌木移植到埃及，这种植物就是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埃及棉。（11）这个品种的棉绒很长，很细又很结实，适于用来纺绒以及织出最优质的布料。 [228] 在这个棉花加工已机械化的新时代里，尤梅尔棉自始就稳操胜券。穆罕默德·阿里占有了埃及大片最肥沃的良田，把这种棉花种植在自己的属地上。他的下属们也纷纷效仿。到1824年，埃及棉花出口量达1100万公斤，而到了184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550万公

斤。(12) 尤梅尔长绒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政府的商业机构以不合理的低价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通过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把它高价卖出（在1835年约占埃及总出口值的一半），这些收入被用于实施阿里的经济和军事改革计划，其中很大部分投入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工程。国家的其他收入来自同样由官方机构垄断销售的其他农作物。这的确是一条捷径，国家无需劳神征税，就为国库创收。这一套制度曾让外国商人无所适从。

从19世纪20年代起，国家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投入到教育和工业改革计划的实施当中，投入到了工业专科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工厂中。这些工厂的产品包括纺织品、金属、金属制品、化学品、绳索、武器、舰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替代进口以及给这个日益壮大的战争机器加油。穆罕默德·阿里这位埃及总督甚至还试图通过购进欧洲机器并在埃及对它进行模仿制造的途径，来争取埃及更坚定的独立。

不顾英国的出口禁令，埃及人在1826年得到准许，从曼彻斯特的盖勒韦公司进口了500台动力织布机。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赫斯基森以鄙视的口吻说，这不会有什么伤害的，6个月之内，“这些设备将被（埃及人）踢得粉碎”。(13)

有人说穆罕默德·阿里是在企图制造一部战争机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目标是在这样一个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掀起一场工业革命。[229] 这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大胆的设想，他敢于向欧洲的先进工业和贸易利益集团挑战：这是非西方的落后的社会要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第一次尝试，其方式是自上而下发指令。(14)

穆罕默德·阿里在执政期间所获得的成功的程度以及他最终的失败，一向都是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埃及的棉纺业有了显著的提高。1834年机器纺锭达40万个，这在世界占第九位，位居比利时之前，人均纱锭数在世界占第五或第六位。(15) 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年产印花棉布达120万匹。另一方面，到埃及的参观者们都惊讶于机械的粗劣，机器的年久失修和加工出来的产品的质量低

劣。尤梅尔长绒棉本来是该制成高质量产品的，但是埃及的棉纱实在是太粗糙了，而且又不结实。然而，有些外国观察家却发表了赞扬的看法，我们甚至见到有些报道说埃及的棉纺织品在当时出口到了印度这一古老棉纺织业的发源地。 [230]

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乐观的一派认为埃及的最后失败应归咎于西方人的阴谋。西方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长远规划是对欧洲工业霸权地位的一个威胁。埃及应该把重点放在棉花的种植业上，而让洋人们去纺纱织布（这样还可以占比较优势）。以英国打头阵的欧洲人抓住了第一个机会（1838年）剥夺了埃及在这方面的关税壁垒，使它失去了有利于维护新兴工业的市场限制。最后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冷酷而又阴险狡诈地扼杀了这个潜在的颇具危险性的竞争者。

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埃及从来就不具有竞争实力。穆罕默德·阿里的整个改革措施都是败笔，它之所以能持续那么久，是因为有国家所投入的大笔资金为支柱。即便在当时，如果没有外国技师和机器的帮助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还有，埃及的原料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国家制订，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出口物资的贫乏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失败。

怀疑论者（唯实证者）说，埃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社会和文化上的低能。本国的企业家很少，大部分企业家来自科普特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等少数民族，这些人很懂得自己的处境，只能谨慎小心。当地的制造业靠一些车间和乡镇作坊，厂主缺乏知识和资金，也缺乏转变为机械化生产的意愿。外国投资者不想费力办工厂，他们赚钱有更快更省劲的办法，贷款即是一例。总督自己可以想象埃及建工厂，他的办法是下命令。但是他能从哪里得到能源呢？埃及既没有木材也没有煤炭等燃料，而要想利用水力资源来产生动力，还必须先把它输到高处。所以，穆罕默德·阿里就开始使用畜力——用1000头牛来牵引25万个纱锭。英国人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用过这种办法，但这的确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尤其是在酷热的气候下。利用牲畜来间歇性地做农活或是搞运输是一回事，而用它们来驱动机器永无休止地转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还有，穆罕默德·阿里能从哪里找来工厂的经营管理者呢？他用高薪聘请了许多欧洲的专家技师，但他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仅仅是知识和技术，而不想让他们发号施令。对于领导者的人选，考虑到这会关系到工人们的情绪以及新兴工业的既得利益，穆罕默德·阿里选择了穆斯林，即由土耳其人或埃及人作主管。这些官员得到了荣誉、勋章以及丰厚的薪俸，但在他们中间却充斥着腐败现象。“他们被赋予对工厂开支的统筹规划、以及决定工人工资的权力，这样，他们就收受那些技术平庸的工匠的贿赂，然后再从政府的开支中照顾这些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令人难以察觉的欺诈行为。”（16）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局就指派巡视员，检查工厂的账目并制定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浪费和偷窃。可是这样一来，工厂的时间、产品质量和设备维修又让位于形式和秩序。

穆罕默德·阿里又从哪里觅得工人呢？以埃及的优良传统，他最先是使用奴隶（记着，在英格兰，最初是役使那些无法说“不”的妇女和儿童）。但是这些奴隶大批大批地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工作条件恶劣。[231] 于是，他转而强迫征集各家各户的劳力。这些工人吃不饱睡不暖，还备受监工们的残酷折磨（鞭挞算是家常便饭）。一些人甚至通过自残的方式来逃避征用。但是，大部分的工人都认为这样既痛苦又会危及生命；所以他们就转而摧残机器，使它不能正常运行。[232] 他们有时还使用纵火的手段。[233] 机器设备长期缺乏维修和保养，工厂里关于反盗窃措施之类的繁文缛节使得即使是简单地给机器上一下润滑油都成了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在埃及这样风沙很大的气候条件下，不对机器进行维修保养简直就等于是灾难。[234] 越来越多的机器因此而报废。标准的维修就只是拆取尚可利用的零件。“工厂里所拥有的机器寥寥无几，厂房空空荡荡。”（17）这样一来，产量自然而然地就降低了。

换句话说，英国没有理由害怕埃及制造业的竞争。尽管埃及的工资低得荒唐，埃及工厂的成本却很高，虽然它有最棒的原材料，但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但英国却被埃及困扰了一番，因为阿里实行对棉花出口的垄断，并设置层层关卡阻止外国棉制品进入埃及。所以，恰恰就是靠了总督自己的决策失误和过高的政治

野心的帮助，英国终于打开了埃及的自由贸易市场。

“进步”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就是这一步扼杀了埃及的工业革命，或者说至少是将埃及的工业化往后拖延了一个世纪。这一看法是认为工业化必须具有“关税保护、免税制、廉价的能源、运输费用的补贴、教育政策等等，而所有这些只有那种能在政治和财政上有很大大独立性的政府才能提供”。（18）

我自己则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准备好了进行工业革命吗？没有。当新的贸易协定付诸实施时，他的宏大计划已经搁浅而且奄奄一息了。我们知道，这位老帕夏一直继续往工厂里投资，直到1848年去世，但是那种战斗激情已一去不返了。他只是用大把的金钱换来一些得不偿失的东西。关税政策也不能起到太大作用。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一直就没有保护性关税。他们也不愿意这样。但他们总归还是繁荣昌盛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想以两种方式声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一会儿抱怨埃及不能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一会儿又鼓吹埃及的工业当时发展得有多么好，可以把他们的产品远销海外，以至让那些欧洲的竞争者们汗颜）。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历史。其中一部分再现了早些时候的热情：穆罕默德·阿里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开明而且颇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专制君主），是他将埃及从沉睡中唤醒。这一历史中的有些地方体现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对欧洲的意识倾向。然而，虽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虽然欧洲的殖民强盗们做下那么多的虚假伪善的事情，但是埃及自己的问题却更深重得多，甚至像阿里那样一个外来的神通广大的阿尔巴尼亚人也解决不了。

即使是现在，埃及的工业发展也不是很顺畅，其中的原因并非不同于阿里时代的问题。现今技术在不断转变，新的在经济上跟进的国家的范例告诉我们，发展晚的国家应该把握住一切机会，要有学习和借鉴的强烈动机，才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从那些对于人们的就业观

念和劲头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来看，埃及的社会和文化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埃及在当年没有做好准备。它现在准备好了吗？

其他中东国家的境况也不比这好多少。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世界银行在对这些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1960年，阿拉伯国家中的前7个经济巨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526美元，高于东亚的前7名——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1456美元。而到1991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只有3342美元，而东亚前7名则达到8000美元。今天，阿拉伯中东地区吸纳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3%；东亚则占58%。（19）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及17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即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付还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它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是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

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20）

的确如此，但为什么？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支情况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准非常高——有些年代甚至高过发达工业国家的水平。但是这种石油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不能持久，长远看来，它是会消失的。一方面，石油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的脆弱性吸引了许多投机商和掠夺者，其中有私人的，也有国有企业。这样一来，石油卡特尔协议常遭破坏，石油价格也就随之下跌；（21）还有一些贪婪的人，特别是那些统治者家族的成员，聚集起来吸吮石油贸易的油水，把它浪费到奢华的生活上；[235]再就是赤裸裸地掠夺土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即是一例[236]（当然，科威特只是一块踏脚石，从那里可以跳到海湾各酋长国，然后再进到沙特阿拉伯的巨大石油库）。

而且，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石油。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贫穷和富裕取决于它们是否有石油以及人口的多少。最富的国家油多人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最穷的则是人多油少（埃及）；介于二者之间则是那些有石油，但人口过多的国家（伊拉克，伊朗）。穷国号召团结一致，但富国有更迫切的担心。他们感到不安全，因为富有的背后有那么多贫困。因此他们就试图贿赂那些潜在的反抗者和敌人以换得安宁；或是从发达工业国家购买价值连城的军火，以期望得到这些国家的保护（22）（人们会愿意保护自己的主顾的）。与此同时，穷国（例如巴基斯坦）就是生孩子再尽可能把他们向外输出；或是把他们卖给那些富有的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家当佣人，做苦力，或是当做富人寻欢作乐的工具和对象。

这里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搞一些急救和修修补补。这些国家无论

贫穷还是富有，无一例外都实行专制统治。统治者不负责任，他的一举一动令人难以预料，对统治者的忠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所有事物，包括经济在内，都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因为一个事件而颠倒过来。阿拉伯领导人不是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且吹嘘要打败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挥动圣战者的血衣，许愿说要纠正历史的偏差。（23）我回想起1968年在安曼的一次谈话。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犹太人）试图说服当地的一批显贵，让他们相信和平会带来好处，他极力说明，知识与合作能使沙漠繁荣起来（这一直是开明犹太复国主义者谈论的一个主题）。然而他的说服工作是徒劳的；阿拉伯的与会者告诉他，还有更迫切、更重要的事情——首先就是打败以色列。那样国家的繁荣昌盛才会随即而来。

他们的经济至今仍未见起色，即使是“和平进程”成功了，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只有某些地区例外。因为他们真正的病症要远比阿以之间的冲突严重得多。

我认为，这主要在于文化传统，（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做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盲所占比例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女性文盲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性。这无疑表明了妇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低下。很明显，这与伊斯兰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社会中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这里要说明一个情况：许多中东专家都极力反对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诋毁和鄙视，强调说穆斯林异性之间的关系虽然与宗教教义有关，却又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的论据有以下几点：那些陈规陋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或是从一些非阿拉伯民族那里学过来的，或是与收入及社会地位有关（富人的妻子可以不用工作或去商店采购），或是作为对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威胁的反应，可以防止妇女遭受他人对其人身及家庭荣誉的攻击。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假若伊斯兰教翌日就会消失，阿拉伯男人仍旧还会一如既往地这么看待女

人。另外一些学者，有时还是原先这些人，强调西方学者们的不怀好意的举动：“东方学派”一词是鄙视和恶意，“本质主义者”是无知和愚蠢。使用这样的贬义词是为了表明他们对西方学者的论调是摒弃而不仅是驳斥。这倒是挺便利的。

这些习俗确实是源远流长，而且一旦经过神圣的特权的认可，它们就具有了权威性和严格性。然而即使是圣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穆斯林史中，《古兰经》中的训诫有过多次变动。”（24）而且实际上，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社会地位的确是不时地变来变去——一会儿较开明，一会儿又倒退回去。人们描写过一些杰出的人物：历史上有过曾经在位甚至治国有方的女性君主（还有当代的女政治家，例如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孟加拉国的卡莉达·齐亚，土耳其的坦苏·奇莱尔等）；或者写过一些“解放了”的女性，她们在西方生活过，然后把一些新的态度带回国，往往在她们那些比较守旧的同胞中间引起震动。甚至有人描写过一些王公老爷在自己后官的隐私中如何受到女眷们的嘲弄（否则还要隐私做什么？）；人们还能买到一种畅销的自传体的新式秘史，描述男人统治妇女的种种劣迹（可以听到女性的呼救，看到男性的丑恶）。（25）

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告诉我们，“穆斯林妇女们以坚定的步伐迈进公共社会，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在政坛中也颇有所作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26）在土耳其、埃及以及伊朗，妇女都拥有了选举权，即使是阿亚图拉·霍梅尼，这样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提出要取消妇女的选举权。（27）

我是抱怀疑态度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构成“重要角色”。我也无法预见到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会有很快的转变。阿拉伯社会学家兼小说家哈利姆·巴拉卡尔承认妇女仍处于从属地位，他告诉我们，“要解放妇女，就必须首先转变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消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支配”（28）（果真如此，那恐怕就得上千年）。我对选举权也不寄予多大期望：对于阿拉伯政治家，尤其是比较保守的政治家来说，妇女的选票不过是选举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牌。投票，可以；权力，不行。

在我看来，阿拉伯穆斯林男人，大都不为这些小变革和零星的抵制行动所动。一方面，许多（大部分？）妇女甘愿承受旧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态度模糊了人们的认识。^[237] 另一方面，性别上的特权是不会被取代的；要男人愿意放弃这些特权才行。是男人的思想和行为起作用（男人出尽风头），女权主义者偶然发起的挑战很难影响到男人们近乎全体一致的那种性别上的优越感。男人们是不会被贝鲁特的超短裙们所恐吓住的，那只是能使他们对女人的可怕的看法和她们魔鬼般的欲望感到更加愤慨和得到进一步证实。^[238]

社会的性别歧视给经济的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拒绝女性就等于减少了劳动力和人才，^[239] 但是——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男孩子和成年男子争取成就的动力将会减弱。^[240] 如果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就让其中的一半自以为在生理上优越于另一半，那么他们的抱负心和成就感就不可能不有所降低。把男孩子尊称为“帕夏”，或是像在伊朗那样，告诉他们生来拥有一根金阴茎，就必定会使他们感到自己并不那样迫切要去学习和干工作。²⁹ 当然，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有行业的分工和收入高低的不同，就都会有一些人事业有成。可是只依靠男人的社会，是无法与充分发掘人口中全部人才资源的社会相竞争的。

总的说来，了解一个国家进步与发展潜力的最好线索，就是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对于今天的穆斯林中东社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社会这一不利条件阻碍了它们走向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他社会也都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可以说无一例外。想一想拉丁美洲的大男子主义，或是日本的男性至尊以及没有父亲的家庭的惨景。

⁽³⁰⁾ 即使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是如果我们将各国的性别之间的关系从男女完全不平等到完全平等按顺序排列的话，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那肯定是排在最末的。女性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受歧视。人们这样说：她们的存在就是灾难，她们的身体就是罪孽。⁽³¹⁾ 男孩们都知道他们可以任意打骂自己的同胞姐妹，而不受任何惩罚。我曾在一个公共场合见过这样的情景，并且就在男孩那毫不表态的母亲面前，他的妹妹根本就沒做任何反抗。这对女孩来说是悲惨的，而对男孩来说也是可悲

的。

这种弱点是伊斯兰教所固有的吗？不。伊斯兰教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宗教。它遍及世界各地，囊括多种形式的社会和文化。它也有许多经文教义，其中有一些是自相矛盾的，几乎可以拿来为任何目的做解释。政治学家福阿德·阿雅米在他的书中谈到，当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跟以色列签订和约时，埃及政府马上就请开罗的权威的爱资哈尔大学出面，宣布这一条约与伊斯兰法律是相符的。（32）解释是可以随时间、地点和对象而变的。

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应轻视或排除普通化的因素。每当某些律法和制度被人们认为是并不“进步”时，感到难堪的穆斯林辩护士总是旁征博引，迅速引用种种例外和变异的事例。可是各地的穆斯林社会毕竟有着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共同特征。中东国家的当权派和反对派为自己的立场寻找理由和寻求支持时，都会仰仗伊斯兰教义，这就充分说明了宗教信仰的权威性。论据都得出自伊斯兰教，或前进或后退，概莫能外。

有人提出一种论点来否认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指出，穆斯林社会在从前的黄金时代，在经济上、精神上和知识上都对外开放的。这一论点就是说，既然从前他们能够这样做，那么现在他们也可以这样做。 [241] 对此不妨认可，但要指出两点：第一，如今的竞争规模及其所要求的表现水准，已大大超过往昔。“现代”一词的意义已大有变化，比伊斯兰教的变化大得多（其实这一论点就像是说，因为英国出过网球冠军，所以他们今天也应出现网球冠军）。 [242]

第二，未能跟上现代发展水平之后，这种状态就会产生它自己的免疫反应。在这方面，石油带来的巨额意外之财成为很大的不幸。（33）它使得统治者及其亲信和官员们陷于沉醉，在成堆的金钱上睡大觉，把钱浪费在大多毫无价值的项目上，开销之快居然超过了他们那看来是无限（实际并非无限）的资源开发速度。甚至连沙特阿拉伯都不能保持收支平衡。在这一过程之中，这些挥霍者激怒了穆斯林穷人，反过来，这些穷人就通过原教旨主义来发泄他们的愤恨。

这是整个故事最可悲的地方。伊斯兰教与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有其单纯而坚固的精髓和本质，在这样一个极度大男子主义的社会，这些因素的结合就会导致冲突。这样一来，就迅速地诉诸暴力，因为暴力是男性资格的完美体现。因此也就有了在叙利亚发生的对不同教派的屠杀；伊朗的革命和镇压；伊拉克和苏丹的独裁专制；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毒气战；苏丹南部黑人的种族灭绝；以及发生在巴基斯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一系列滥杀无辜以及有目标的谋杀活动。^[243] 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充分说明问题：那里所进行的，不是内战，而是对公民的战争。杀人者们最欣赏的方式是：割断对方的喉咙。那样既可以节省子弹，又可以让杀人者更接近天主。（34）持枪者因为年青女性拒绝“嫁”给革命英雄而杀掉她们。这些暴徒们将他们自己首先看做是男人，然后才是士兵。

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就是它的迅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时钟拨回了几个世纪。

“我就是奥齐曼迪亚斯，王中之王：

瞧瞧我的业绩，众神，你们就会绝望！”

周围一切均已荡然无存……空空荡荡

只有孤寂而平坦的沙漠伸展向远方。

东方学派和本质主义者

中东问题上的学术辩论情绪激昂。读者和听众预先就能知道答案。辩论往往是愤怒和阴郁的，叫它什么都行，就是谈不上是辩论。谁也没有准备在门口检查自己的枪；它也许是用得着的。交战的理由包括：阿以冲突；正式和非正式的欧洲经济帝国主义；西方对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尤其是对妇女所受到的待遇的批判（因而也就是诽谤）。

在这种形势之下，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给人起名称，贴标签，其目的（或效果）就是让对手变得无足轻重或被排除在外。他是一个……（作相应归类）。再就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在这些表示鄙视的攻击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招就是“Orientalism”（东方学）一词的发明。它是用来指这样一种罪恶：从外界，也就是从那种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子、心怀敌意和剥削性的西方人的观点出发，来著书立说论述亚洲尤其是中东的事情。西方人着迷于东方事情，曾经是受到尊敬的，可是后来却受到攻击，这种攻击最迟始于20世纪60年代。然而正是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出版了以“东方学”为书名的一本书，才使这一名词流行开来，并且使得西方人有关中东的大部分论著都受到质疑。（35）控诉书如下：

1.外界学者歪曲研究的主题，将人变成物。既然是物，就适于操纵和支配。赛义德认为，东方学这种体系就是“权力的说教，意识形态上的虚构——禁锢思想的镣铐”。

2.这些伪学者往往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一成不变。“东方”这一概念就是欧洲中心论者强加于人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千百年来都是同一个样子，这种本质上的同一性是源于“永远不变”的伊斯兰教。因此，在学术界出现了同属一类的疾病，即“本质主义”。从事“东方学”的人不容许探讨细节、细微差别和特征。

3.一成不变的看法导致种族主义和偏见。它使群体相隔离，促成一方的傲慢和另一方的愤恨。如果我们能摆脱“东方”、“东方人”的概念，那么我们会看到，“学者、评论家、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将认识到，种族、民族和国籍上的差别并不如促进人类共同体这一共同事业那么重要”。（36）

对于崇高的感情，是很难提出异议的，可是光有感情还不够。要清除“东方学派”、“本质主义”这些人为的疾病的努力，已成为对知识的攻击。首先，反“东方学派”的方法会排除学术探讨上必不可少的工具。任何一位好的比较法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差别正是理解的素材。反“东方学派”的人既反对探索特征上的差别，谴责那是“本质主义”，

而同时又号召理解群体之间的不同，可是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只有理解了差别，才能将多样性转化为共同的人类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到如此严厉谴责的那些“东方学派”——那些历史和比较语文学家，考古学家，旅行家，那些身着中东服装、在沙漠中艰难跋涉而风尘满面的西方人——本来是热爱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其中有些人曾竭力寻找那失去的天堂。请看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的卷首按语：“阿拉伯半岛的吸引力，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阿拉伯半岛的魔力，能让人染上想象症。”（37）今天，这些东方学者却被谴责为装腔作势的、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浪漫史就到此为止吧：没有任何一种善良的感情能不受惩罚。他们是真诚的吗？那又怎样？真诚不过是最廉价的品德。

其次，事物千差万别的现实并不排除对它们加以概括的普遍化的必要性。当然，任何事物都比它表面的样子更复杂。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其特殊性。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作出一定的努力将事物加以简化，找出共同的模式。否则，我们手中就只会有一麻袋互无关联的数据。

第三，坏消息不一定是错误的消息。大量实际的观察可能会看出不好的一面，可是对于这类材料应按照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加以评价，而不应预先就一概斥之为谬误。那种做法等于是自我书刊检查和放弃职责。对东方学派提出的批评，有许多都像是律师为被告作的辩护状。律师原本就是让人花钱请来做这种事的。学者则应承担起更高的义务。

在这方面，必须拒绝一种说法，即外界人就没有资格说话，似乎只有穆斯林才能理解伊斯兰世界，只有黑人才能理解黑人的历史，只有妇女才能理解妇女的话题，如此等等。那种说法只会导致内外相隔绝，如同聋子对话。它还会排斥外界人的真知灼见，它本身就导致种族主义。我认识的一位波士顿上流人士有一次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名出身于意大利人家庭的学生要研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我觉得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嘛”，就是那个学生的回答）。另一位这样的上流人

士见到一名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罗马史，就感到惊讶——仿佛他谈论罗马的资格要比那另一个人多一点似的。 [244]

此外，本着这种排斥规则而实行的歧视，还招来一种忠诚检验：某位学者是否站在正确的一面？这既适用于局外人也适用于局内人，局外人若思想正确则可以“赢得”认可，而局内人则要看是否表里一致。例如，一位非洲裔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或政治家如果不符合政治上正确的标准，就只能是一块黑皮白心的“奥丽奥”——裹着巧克力的奶酪夹心饼。

在中东反“东方学”阵营中，考验的关键在于是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的任何宽容都是错误或不能接受的，如果说不是更坏的话。因此，爱德华·赛义德及其追随者竭力排斥和贬责著名的中东问题权威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把他列为“东方学派”和“本质主义者”，而且指责他“太接近以色列的主张，因而不可能在看法上做到不偏不倚”。诚然，“刘易斯毫不示弱作了反驳。然而，赛义德的批评不仅得到伊斯兰学者和中东其他人的欣赏和响应，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得到一批人的支持”。 (38)

另一方面，有些外界学者在政治上与那些政治把关者意见一致，因而得到认可。所以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把少数西方学者列为例外，这些学者在观点上亲巴勒斯坦，亲阿拉伯，亲穆斯林，观点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赛义德认为他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动机胜过真理和事实。 (39)

这就是通过排斥和冷漠而实施的书报检查。失败的是学术和研究。

日本妇女用男高音说话 (40)

日本的情况似乎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外（人人都知道日本男人是多么大男子主义），为伊斯兰国家中妇女所受到的待遇，或者更

准确地说，为阿拉伯穆斯林文化辩护的人，总少不了拿日本的例子作辩解。这些人说，既然日本人在男尊女卑的情况下可以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要把穆斯林社会的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障碍呢？的确，日本妇女在传统上就一向接受较低下的地位，并带来直接的经济后果。她们在结婚后就放弃工作，极少有人升到能管辖男人的职位。她们的传统服装下摆狭小，使她们只能小步行走，据说那是为了保持她们的谦逊和突出她们的女性。她们的言辞另有讲究，添加一些音节以表示恭敬。她们的嗓门受到训练和调教，用短促清脆的女高音说话。她们的仪态被训练成漫画式的腼腆，谦卑谨慎（难怪日本男人要在浴室和别的地方寻找更“自然”一些的伙伴，以求得安慰）。

这种矫揉造作的女性谦卑，在日本的文学、舞台和武士电影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记，然而它主要是上层阶级的习俗，而远非国民的实践。这是贵族和地主士绅的生活方式，他们有钱雇用仆役来侍候他们，自己可以四体不勤。而对于几乎所有别的人，包括富有的商人家庭来说，妇女都有持家的责任。这不仅包括操持内务和养育儿女，还要负责勤俭持家，参与农工劳动，聚财致富。当然，这一基本任务涉及全家每一个人，从丈夫（可能还有丈夫的母亲）直到小孩。这一任务的具体内容自然随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持家兴家的这一共同事业与国家富强相联系，它使得妇女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人们根据那种简单化的礼仪观念所能想到的范围。

因此，尽管存在着男尊女卑的习俗，一般人还是以更大的实际利益为重。在明治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起），尽管存在着性别歧视，教育当局还是颁令实施不分男女的普及基础教育，女童的学习时间初为4年，后增至6年，扫盲绰绰有余。为什么女孩要上学？因为当时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争取与西方平等。这就要求妇女也能读、写、算，还能辅导孩子功课。由于工业的发展，当父亲的人往往到外地工作，政府和军队也把男子派出去做工和服役。他们留下的空白只能由当母亲的人填补。强迫女孩上学，最初曾遭到许多穷人家庭反对，因为他们的女孩不能再挣钱了，而上学还得花钱。有些人甚至造反放火烧学校。然而人们逐渐明白要发家致富、使家庭构成国家富强的积木

的道理，思想落后的人也转变过来了。在1890年，适龄女童的入学率只有30%；20年以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97.4%。（41）

与此同时，妇女的活动也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经济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在外就业，主要是在纺织厂等轻工业部门，其工人中60%至90%为女性。这些部门的产值在19世纪末占国民总产值的40%，占外汇收入的60%。（42）这些女工怎样生儿育女呢？答案是：结婚后就辞去工作，集中操持家务。当然，只有那些需要挣钱的人是例外（人数也不少）。关键在于孰先孰后：国事和家事是第一位，男女之别则在其次。由此可见，妇女的作用已不再是简单地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不再只是一件器皿。她已是劳动者，消费者，储蓄者和管理者。而且她有权利和有必要出入于公共场所（这一点就与阿拉伯穆斯林社会形成一个显著的和关键性的对照）。

日本妇女当时还没有的东西，是政治权利。她们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公职。日本男人振振有词地声称，政治天生就是男人的权利和义务，军事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日本军队却又乐于接受妇女当护士，因为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男子去冲锋杀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妇女才有了选举权——在这一点上，与法国妇女没有区别，比瑞士妇女还早一点。即使如此，日本妇女在政府部门所起的作用仍微乎其微，可是别的国家在这方面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讲求实用的、局部性的性别歧视，对男人影响如何呢？答案是好坏兼有。日本男子依然享有性特权和性优越感。这在人挤人的地铁列车上有时就流露出来，那里谁也不认识谁，欺负女人也没关系。（43）另一方面，在传统上属于妇女责任的事务上，日本男人会帮帮忙。下面是德川幕府早期（1610年）一位商人给他儿子的家训：

早炊晚炊，汝应亲手点燃炉火，炊后以水浇灭余烬……常至房后收拾大小杂物，小段绳索应剪碎掺入灰泥……零碎木竹即使长仅半寸者，亦应收拾干净，以备用于营火……首次购物……应自己出门购买。买最廉价者，并细心记下其价钱。如此……汝方知仆役购回之物

是否价钱过高……治家之事即可谓为柴米油盐……男子不论其行业如何，皆应亲自料理此般杂务，否则绝不可能持家有方。（44）

“不论其行业如何……”这是一般商人话语，表达出古老的基本品德。换句话说，日本男孩受到娇宠，但还没宠坏。

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已改变了生活的细节，但这种价值观依旧。学校教育如今富有高度竞争性；考场如战场。城市增大，上下班需长时间奔波。当父亲的人在家和照顾子女的时间更少了，这只会加大妇女的作用和责任。许多妇女对婚姻和家庭的所谓乐趣也降低了。现在女人和男人一样上大学，争取高等学位，谋求管理层的职业。她们仍然会碰到无形的社会压力的层层障碍，她们在男人面前仍然腼腆羞赧，甚至沉默寡言。但许多女性甘愿放弃家庭生活而投身于事业。在这个社会里，男性上班族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妻子和儿女，单身女性却不乏照顾。穆斯林会说，我早告诉过你会是这样。

我在1991年访问日本时，曾应邀到日本人家中进餐，女主人若是上了年岁的老太太，会拒绝与男人一同就餐，但会端菜送饭。女主人若是年轻一些的，就会跟我们一起吃饭，孩子们也在一起。而早几年在一位阿拉伯人家中进餐时，女主人做了烹饪，却不端菜，甚至不露面；接待客人和端菜上饭的全是男主人。这是两个世界。

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线相通：日本社会也有它的男性蛮劲以及对暴力的嗜好。在侵略和压迫的战争方面，日本有一部漫长的历史，凡此种种暴力行径都是以国家民族的需要作为理由。推动日本前进者，莫过于此。使日本倒退者，亦莫过于此。

注释

1 .Chaudhuri , *Asia before Europe* , 第71页。

2 .同上，第73页。

3 .这一生动的阐述出自Eric Jones , *European Miracle* , 第194页。该书的第九章“Islam and the Ottoman Empire (伊斯兰与奥斯曼

帝国)”可能是关于这方面最佳而又最简洁的文章了。

4 .同上，第194页。

5 .Lewis ,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 第190-191页。

6 .Jones , *European Miracle* , 第185页 , 摘引|Brauder : *La Mediterranee* 。

7 .Lewis , *Muslim Discovery* , 第161页。

8 .Jones , *European Miracle* , 第177页 ; Lewis, *Muslim Discovery* , 第199页。

9 .Lewis , *Muslim Discovery* , 第195-196页。

10 .Jones , *European Miracle* , 第185页。

11 .有关尤梅尔的详细情况，见Batout , *Cent ans de resistance* , 第96页。与许多他那种的人一样，他是到埃及发财去的，他为此倾注了所有的心血。

12 .Issawi , “Economic Development” , 第362页。所给出的数字分别是“20万qantars以上”和34.5万qantars。但他在518页说，qantar这一计量单位在1835年有所改变。我相应地把它们换算成公斤。

13 .Levy-Leboyer , *Les banques europeennes* , 第189页。

14 .最便于参阅的英文评论可能就是在Batou的“Muhammad Ali's Egypt”一文。Batou认为埃及的工业发展计划被低估和忽视了。说它的失败都是欧洲那些对手们，尤其是英国人，一手造成的。

15 .Batou , “Muhammad Ali's Egypt” , 第185页。

16 .Saint-John, *Egypt* , 第412页。

17 .同上，第417页。

18 .Issawi，“Economic Development”，第363页。

19 .Friedman，“Egypt Runs for the Train”。

20 .Mohammed Mannei，波斯湾的商业银行家，引自Jonathan Raban, *Arabia : A Journey Through the Labyrinth*，第63页。

21 .关于资源短缺和卡特尔市场的局限性二者之间的区别，见Dasgupta，“Natural Re-sources”，第112页。

22 .有关极端分子的赎金，见Goodwin, *Price of Honour*，第15-17页。

23 .参阅Friedman，“Egypt Runs for the Train”一文。

24 .Keddie，节选自Keddie和Baron主编的*Women in Middle Eastern History*，第5页。

25 .这种新的、传播丑闻的文学作品，在伊斯兰国家只能作为地下出版物出版，见Amy Dockser Morris，“These Potboilers Stir Widespread Interest in‘Islamic Affairs’”，*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12月22日，第1版。

26 .见Francis Hamilton评Lewis的*The Middle East*一书的文章，《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95年12月8日，第4页。还有Roy Mottahedeh，“The Islamic Movement”，第123页。后者提到了女性政治家在伊斯兰（但不包括阿拉伯）国家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还宣称“妇女政治权利的拥有是伊斯兰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什么是“令人信服”？在这些国家，甚至是在政教分开的土耳其，妇女的地位仍然受到伊斯兰教规和习俗的约束，所以我们在评价政治权利的解放力量时，仍需有所保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些社会中的地区分隔，城乡发展各不相同。例如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处于一个世界和时代，安纳托利亚则是生活在另一个

世界和时代，安纳托利亚的人使劲要挤进伊斯坦布尔。在文化上和时间内，土耳其城乡就是这样不一致。因此，在1995年末的选举中，伊斯兰党又赢得了相对多数席位。

27 .Mottahedeh , “Clash of Civilization” , 第11页。

28 .Barakat , *Arab World* , 第105页。

29 .Mosteshar , *Unveiled* , 第353页。

30 .关于拉丁美洲人，见Calvin Sims , “Justice in Peru : Rape Victim Is Pressed to Marry Attacker” , *N.Y.Times* , 1997年12月3日，第A1版。

31 .Makiya , *Cruelty and Silence* , 第298页。Goodwin, *Price of Honor* , 第4页。

32 .Ajami , *Arab Predicament* , 第233页。

33 .关于石油被看做是不幸的东西，见Ajami , *Arab Predicament* 。

34 .Fisk , “Sept journees” , 第7页，一篇重要的文章。

35 .见Landes , “Passionate Pilgrims”。

36 .Said , *Orientalism* , 第327页。

37 .出自Tidrick , *Heart Beguiling Araby* 一书，Albert Hourani所写的前言。

38 .引自Francis Robinson , “Through the Minefield” , 第3-4页。Robinson是伦敦大学教授，他总的说来赞同刘易斯的观点并敬仰他所作出的学术成就。他对学术界气氛的观察格外说明问题。

39 .赛义德在评论西方学者研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社会的作品

时，也表现出强调动机。他并不核对数据和命题，而是谴责这整个研究工作的动机在于“对抗和敌意”和“文化上的反感”。有关内容见他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报告“Comment l'Occident voit les Arabes”，载于《世界报》1996年12月3日，第16版。

40 .见Nicholas D.Kristof，“Japan's Feminine Falsetto Falls Right Out of Favor”，N.Y.Times，1995年12月13日，第A-1版。

41 .Nolte和Hastings合著的“Meiji State's Policy”，第157页。

42 .同上。

43 .见Sheryl WuDunn：“On Tokyo's Packed Trains, Molesters Are Brazen”，N.Y.Times，1995年12月17日，第A-3版。

44 .Shimai Soshitsu，引自Uno，“Women and Changes”，第33页。

第25章 帝国与帝国之后

500年来殖民主义的统治造就我们面前这个世界，一方面是繁荣发达和“光荣”，另一方面则是屈辱的血泪史——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它却不会被忘记。记忆是奋进的动力，失去的会有补偿，得到的可望保护，任务和机会就在面前。

早在15世纪，欧洲的海外殖民帝国就兴起于大西洋诸岛（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北非部分地区，直到大约20世纪后半期，这些帝国才大体结束殖民统治。500多年的统治，漫长的岁月。但尽管殖民主义带来无可计数的后果，这只是漫漫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一方面是繁荣发达和光荣，另一方面则是屈辱的血泪史——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它却不会被忘记，这般记忆将永远留存下来。失去的可以得到补偿；得到的可以予以保护；任务和机会就在面前。

帝国，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主义；这些词语需要定义。^[245]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一个国家对他国进行统治）所实行的体制（“制度或精神”）。帝国随着国家的崛起而崛起，一国强于另一国。考虑到这一漫长的起源与发展，将帝国和武力征服、外交、商业贸易、地位、权力以及财富联系起来看，“帝国”和“帝国主义”就是（曾经是）令人骄傲的字眼了。也就是源于此，英王乔治五世在1936年1月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帝国怎样了？”

帝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历史的开端，这也许会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随意的断言。举个例子，有些人坚信，在19世纪末左右处于巅峰的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或副产品——以列宁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基于这些，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生存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必需的（不可替代的）。这一看法的坚定性可以从无数著作中看得出，其中有人断言说帝国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物质利

益，即使为此而付出高昂代价和得而复失，其实质依然如此。（1）

历史证明，这种将帝国主义必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试想想那些古老的帝国，如埃及、中国、亚述、波斯、罗马等；或是现代的，最近解体而不被人怀念的苏联帝国。一些人在这方面花费了那么多的笔墨，无疑应了一个需要，那就是用鼓动抵抗和革命的方式，来败坏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名声。搞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就是为了钱，还能有比这更坏的吗？与此同时，坏的定义和解释自然导致坏的结论。

殖民主义是抹黑了的帝国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殖民主义代表着社会不平等，对人性的摧残、精神上的奴役，这些都会引发抵抗运动，以及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和争取解放的斗争。”（2）“殖民地”这个词最初的定义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在古代，它是指远方的定居地，例如腓尼基人的迦太基殖民地和希腊人在意大利建立的几处殖民地。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移民建定居地，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挤走当地原有的居民（空旷无人的土地太罕见了），因此也不可能是好事或善事，至少对于受害者而言不是好事。所以，建定居地形成一种制度（殖民主义）显然是坏的。在近年来的某些著述中，殖民主义的概念扩大到“任何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依附状态”，而不论这是否导致当地居民受排挤。（3）由于殖民主义一词转为如此贬义，当今对外国（西方）的支配地位持批判态度的人往往愿用“殖民主义”取代老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更难听一些。

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我在下文中会交替着用这两个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条顿骑士执行向东方扩张的政策，征服斯拉夫人的土地，再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和诺曼底，然后是英国人入侵爱尔兰，直到西班牙的收复失地。（4）上述的扩张有许多都表现为吸收和同化。征服者融入当地的居民之中，直到失去他们自己的本色，或者是征服者吞没了被征服者（关键在于通婚，语言以及姓名）。[246] 例如，诺曼人在1066年及其随后的几年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在这之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古罗马人赶出了不列颠岛，并征服了当地的布立吞人（即更古之时征服了岛上土人的凯尔特

民族），把那些操凯尔特语的人大量驱赶到了威尔士以及海峡南面的现今法国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区。直到如今，操布列塔尼方言的人还大体上听得懂威尔士语的广播。 [247]

换句话说，整个不列颠岛是经过多次成功的入侵和攫夺所形成的一个淀积层，其大部分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整体，虽然在那些被征服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中间仍有一部分人在梦想能获得先前那种自身的独立性。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地区（但是巴斯克人在法国要少一些），在卡塔卢尼亚和科西嘉，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昔日帝国的废墟上，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想法。波斯尼亚现在的苦难告诉我们，对于失败和征服的记忆依旧持续存在，或者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和加以操纵；生命短暂，但复仇之心却可以一代代传递下去。土耳其曾于1389年在科索沃地区打败塞尔维亚人；土耳其早已将此事忘却，可是塞尔维亚人却总在重复这次战败的记忆，并将之当做激励他们民族精神的手段。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环绕着世界各地接着讲下去。千百年间，中国的汉人向南方推进，征服并同化了那里的非汉族人民。日本人从阿伊努人手中征服了他们的“本”岛，并将残余的阿伊努人驱逐到遥远的北部地区。缅甸人从他们的蒙古老家迁入，并将其占领地冠以自己民族的名字，同时也同化了当地大部分土著居民，但也遗留了不少人，直到今天还在与他们进行着斗争。阿拉伯人冲出沙漠进入新月沃地（指西亚伊拉克两河流域连接叙利亚一带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弧形地区，因土地肥沃，形似新月，故名；为上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然后横扫北非，使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创建了伊斯兰国家，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成了这些民族的统一的特征（到1998年，在曾经讲法语的阿尔及利亚，唯一的官方语言就是阿拉伯语）。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欧洲中心论意义上的“中东”扩展至非洲的大西洋沿岸。

显而易见，那种普遍地将帝国主义看做是西方的发明创造以及是对非欧洲人的垄断统治的观点是错误的。 [248] 然而，确有大部分人是这么看的。在欧洲人漂洋过海或驰骋全球、利用先进的武器和科学技

术征服异邦民族的时候，情况的确有所不同。那些遥远的国度里的人们无论是在文化上、地理上还是生理特征上都与欧洲人相差甚远。欧洲范围之内的早期的征服近在咫尺，意味着吸收和同化，然而远方的这些陌生的土地却被看做是一笔意外之财、战利品，被看做是充满机遇的地方——但是没有把它看成是自己组成中的一分子，而只看做是附加的辖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呢？被看做是次等人种——有利用价值，也可以有所发展，但不可能趋同于欧洲人。殖民地的母国没有设想新旧之间的交融，虽然这有可能，而且的确也发生了，就像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和葡萄牙在新旧大陆的那些殖民地里发生的一样。虽然西班牙政府最初想方设法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隔离开来，但是入侵者与当地人（castas）的通婚不可避免，因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混血儿，加上病魔的侵袭使印第安人减少，混血儿几乎与纯印第安人的数量相等了。这些混血儿（mestizo和criollo）有意将自己与纯印第安人相区分，他们领导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参见Klor de Alva，“Postcolonization”一文。体育运动就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在1898年，一位英国总督在西非建立了两个板球训练场，一个是对欧洲人开放，另一个则供当地人使用。当这两个队开展比赛时，这一运动就成了种族间的较量；当非洲这一方开始有夺胜的趋势时，比赛就不得不被中断。（5）我们自那之后已走过一段漫长的旅程：殖民主义已不再是那么盲目自大，而多了一分担忧和苦恼。

殖民主义者对那些遥远国度的吞并和剥削采取了多种形式。对于西班牙来说，问题的实质在于财富。殖民地对于他们，就是一条条矿源，加上当地的劳动力、食物以及工业品供应线，还有返回欧洲的海运线，彼此相连接。另一方面，在亚洲的葡萄牙人，是在那些比他们大得多，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征服的民族的土地上工作生存。他们不得不建立像果阿那样的一些规模小的、便于防御的据点，然后再以此为中心四处活动，做买卖交易，以及从当地商人那里强行勒索保护款。 [249] 荷兰人和英国人所追求的是商业贸易中的利润，但商贸也常常导致干预当地的争斗和对土地的掠夺。对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维持治安，需要保持一批能战斗的武装人员，这是要花钱的。然而殖民者可以对这些地区享有特权和垄断，治理的费用则可以转嫁到宗主

国和殖民地民众的头上。此外，派驻殖民地的总督们也各有需完成的日程；并不是只有西班牙人才是征服者。

一旦安定下来，荷兰和英国殖民者的目标就放在种植业上。殖民地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殖民帝国就像是植物公司，将农作物传播到具有更适宜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起源于印度洋的甘蔗绕地球一周来到加勒比海诸岛；茶叶从中国移植至印度和锡兰；从巴西走私出来的橡胶籽种植到了马来亚；金鸡纳树（从中可以提取奎宁作药物）从南美移植到圣赫勒拿岛，再到爪哇岛；油橄榄从新大陆种到了西非；咖啡种在这里，可可种在那里。在伦敦泰晤士河沿岸有一处皇家植物园，最初是出于公主的嗜好而兴建的，后来则起到了一个先锋作用——是科学与商业相结合的模范。所有这些都要比掠夺和剥削更有益和更持久得多，尽管很显然，没有人会拒绝对财富的强取豪夺——几个世纪的掠夺，包括印度和南非的钻石，澳大利亚和非洲的金子，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

私人企业为获取利益所采取的方式都是比较理智和深谋远虑的。商人们一心追求的是商业贸易，而并不是领土。如果能有利润，他们甚至可以同魔鬼做交易。但是，他们不想让那些将外国商人看做是囊中猎物的当地商人和官员们敲诈勒索和欺侮。所以每当欧洲人遇上麻烦时，他们就会向自己的母国政府寻求帮助。殖民帝国政府通常都会插入进来。而他们的那些拘谨刻板、能力有限的代表们大多都是根据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不是以业绩为标准而选择出来的，他们大都是安逸享乐且拘泥礼节 [250]（读了这些妄自尊大的先生们的传记，会让人感觉奇怪，英帝国到底是怎样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但是只要有几位才华出众的官员就可以弥补一大批身居高位的禄虫的庸庸碌碌，更何况那些上流社会的宠臣巴不得把具体工作交给他们的部属去做）。那些出身高贵的官员们经常埋怨商人们粗俗和愚钝，贪婪和胡搅蛮缠，认为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商人们则宁愿绕过这些官员，“走外线”直接向伦敦或巴黎求助，到了那里有钱就能办事。

除此之外，官员们有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和升官之术。帝国吸引了这样的一些男人：他们不甘于将他们的生命耗费在做某些田园式的

乡村的地方行政官上，认为男子汉所需要的是权力和光荣。从当时的一些报道来看，他们有时是沉醉在道德沦丧、种族杂处的自由的世界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不是健康的气候，许多殖民官都过早死亡；他们拼命地酗酒，而酒精是会叫人中毒的。但是一些精力旺盛、天生无畏的先生们自以为他们是长生不老的。同时，他们也宣扬“责任”和“发展进步”——“呼唤”更高层次的事物。 (6)

高层次的事物包括征服，“统治棕榈和松柏之乡”。帝国首都主管殖民事务的贤哲们有时也想约束一下派驻海外的代理人，可是他们的指示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送达，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外面的那些人完全可以造成既成事实。1842年，查尔斯·内皮尔将军派驻印度时，违令攻占了信德。事后向伦敦的上司写报告，说了一句“我有罪”就敷衍了事。就这样，二百年下来，以英国为例，经过日积月累，最后发现自己已占有了无数块大大小小的殖民地：整个印度，大部分的缅甸，从大西洋岸一直到太平洋岸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再加上占领着主要商业线路上和大交易市场周围地区的水源和加煤加油站，战略要点以及避难所（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圣赫勒拿、开普敦、孟买、新加坡、香港、亚丁）。这些地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们被大英帝国像珍珠一样绕地球串在了一起。它们中的某一些是对帝国野心实现的奖赏；另一些则是商业上的利益。而最根本的是，所有这些都是优势国力的回报。 [251]

在过去，学习世界（或欧洲）历史的学生都知道有“新”“旧”帝国之分。旧帝国是指在1500-1800年间掠夺的领土：西班牙在美洲的占领地，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在印度洋的属地。后来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旧帝国”所占的所有美洲部分都与殖民帝国脱离出来。对于欧洲一些国家来说，这些损失证明了整个殖民计划的愚蠢：有那么一点收益而耗费巨大。我们从历史书了解到，结果就是人们对殖民地的胃口减退了。自1763年（英法之间签署巴黎和约）之后的一个世纪，帝国主义被说成是在原地踏步。

英国的国内政治为这种编年史的说法提供了实例：奉行实用主义的辉格党声称，整个殖民行径就是一个错误，把金钱浪费在一些不开

化的、忘恩负义的、不忠诚的臣民（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同伙）——“一帮狡猾、诡诈而不忠的家伙”的身上。（7）一些人甚至主张让那些并没有提出独立要求的殖民地获得自由。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很明显，权力的实施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工业革命的实现更增加了欧洲人的实力，并提高了他们在那些曾经无法生存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能力。帝国主义不但没有原地踏步，而且相反，在这几十年中忙碌得很，例如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1830），英国占领印度并入侵缅甸，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还有美国的向西扩张，等等，都是证明。可是历史学家对此视而不见，却教条地声称，帝国不得不等待着一个成熟（衰败？）的资本主义的召唤。

这个召唤，我们被告知说，就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新帝国主义”。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内的无产阶级越来越不听话，欧洲列强就把它们的贪婪的目光投向海外可剥削的工人的身上。尤其是非洲最为显著，同时还有亚洲和太平洋诸群岛的部分地区，都成了所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猎取目标。在这些国家当中，德国也为时已晚地认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海外殖民地，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权国家。尘埃落定过后，几乎整个非洲都陷入了欧洲各国政府魔掌之中。仅有的例外就是利比里亚，因为美国计划把黑人遣回他们自己的这一家园；还有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曾企图攫取但却惨遭失败。

这个“新帝国主义”不同于“老帝国主义”。虽然它也是以理性和物质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在那些后期占取的土地中，物质利益真正能得到实现的却很少。当然，其中一些殖民地的确蕴藏有大量的珍贵资源，但这些资源在被吞并时期大都还没有发掘出来。大多数对土地的掠夺都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试比较开罗和好望角），或只是想先发制人（归我总比归你强）。后来的一系列发现令人惊喜，并且有时会急剧改变人们的动机，以至于激发起新的争夺控制权的战斗。例如，南非的金矿招致一批鲁莽但尚于练的淘金者涌向德兰士瓦省，在引起与南非白人当局的争执后，英国政府也卷了进来，最终就导致了布尔战争（1899-1902）。

激进的怀疑观察家们指责这后期的土地掠夺行径是，第一，资本家贪婪的产物，其次，这也是出于他们的需求——保证欧洲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第一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贪婪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一定只是资本家的贪婪，而是单纯的人的贪婪。感谢那些能够连续发射的来福枪和机枪，让劫掠和杀人变得如此简单——简单到欧洲列强可以将屠杀土著居民看做是猎鸟游戏，并且还把这些受害者称作“鸟兽”（对于那些所谓的绅士来说，打猎是消除懦弱、强化残忍性格的学校，至今也是如此）。在预测即将来临的在喀土穆战役中牺牲的戈登将军报仇而掀起的恩图曼战役时，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写道：“……一个非常值得经历的时刻。当然，我们注定会赢。当然，我们会将他们铲平。”又写道：“像恩图曼之役这样的战事不会再有了。这是长期以来那些蔚为壮观的战争的最后的尾声，在那些战争中，那种激烈而庄重的残酷场面给战争平添了一份魅力。”然而土著人民很快就学会了怎样令征服者失望，那就是尽可能快地投降。这样一来，没有杀戮，也就没有了勋章，没有了升迁的机会。（8）

第二点看法，即那种将欧洲的殖民掠夺看做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的看法，则完全是无稽之谈。的确有一部分商人在遥远而陌生的殖民地上获取了丰厚利润，但更多的却一无所获。如果说欧洲各国经济曾经从那些异域外乡获利，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好的企业家懂得这一点。惟利是图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曾邀请德国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帮助他治理刚果那片广袤的殖民地，布莱希罗德婉言谢绝了。同其他优秀金融家一样，他对于能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很感兴趣，但他却能预感到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波折。几年以后（19世纪80年代初），俾斯麦想在遥远的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之中占领一些土地。布莱希罗德会帮忙吗？这次这位金融家不得不坦率一些了，因为俾斯麦可是他私人的老主顾和庇护人；即便如此，他也要求保证有最低限度的回报。

公众则完全就是两回事了。你可以偶尔地蒙骗一些商人；经常地蒙骗政客们；而对于选民，则可以不计时间和地点地进行欺骗了。听一听保罗·勒鲁瓦-博利厄对法国选民们的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个好事物的解释：“殖民地所起的最有用的功能……是可以供给母国一个现成的市场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还可以满足殖

民帝国居民的各种需求——无论是工业家、工人还是消费者——都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润、工资或商品。”这样一来，殖民地扩张一事就成了选民们日常闲谈的主题。在那些年代，人们对于政治的正确与否则没有完全明显的概念，也不大注意是否准确。今天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应该更懂得如何严肃地对待竞选诺言。

一定要占领一个国家才能把它当做市场吗？学者们在这方面也作了新的解释。历史学家们曾经描写过（正式的）帝国，而如今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非正式的统治。（9）拿欧洲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为例。这一地区曾有过奥斯曼帝国，它名义上独立自主，但在19世纪已日益屈从于欧洲列强的要求。埃及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实际上却已是欧洲的势力范围。埃及19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史若不论及欧洲非正式的、实际上的控制，就会是毫无意义。（10）波斯也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尽管从来不是殖民地，但它此时的独立也更多是存在于记忆之中，而非存在于现实。

欧洲在拉丁美洲领地的情况也是如此。整个拉丁美洲大陆曾大体上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时，除了几个小块地区和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以外，拉美各国均已先后正式宣布独立。此外，欧洲列强之所以未能在西半球攫取更多土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门罗主义。[252] 门罗摆出美洲共和国总统架势而单方面发表的宣言并没有把欧洲列强完全吓唬住。它们也许还能利用拉美头面人物作挡箭牌而避开它，法国人曾企图在墨西哥利用马克西米连，即是一例。[253] 然而它们这时毕竟要掂量美国干涉的威胁，帝国主义野心受到了遏制。这也没有什么，还可以通过做生意再赚钱：获取公共工程特许权、贷款合同和有利的市场安排。大多数关于附属国的文章都是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作品，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他们感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这一部分虽然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受到那些势力更强大的伙伴们的欺压和剥削，这有一些道理。

正式的帝国现在已很少见了。这里很大成分取决于其定义（波多黎各算是美国的殖民地吗？），但的确能发现一些零散的地方（如关岛、萨摩亚群岛、百慕大以及法国的“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处于某

某统治之下。百慕大、新喀里多尼亚或是波多黎各有时还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种附属地位是可以有所收获的。^[254] 巴拿马，像一首老歌曾唱过的那样，经过多年“为美元而工作”之后，也在反复考虑是否让美国离开巴拿马运河区的问题。但是大多数曾作为殖民地、附属国、保护国、自治领、宗主国的分支或是海外分部的土地，现在都重获自由。由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众所受到的欺压凌辱和对所受屈辱的愤怒，单纯物质上的好处是很难抵得住分裂趋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浪潮使世界上的国家增加了两倍多。这些新出现的国家不论多么小和多么不自然，都享有主权，并且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原先受剥削的国家如今自由了，应当有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在事情的另一面，原先靠压迫别人而致富、如今不得不自食其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当萎缩。正义该得到伸张。

事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那些曾是帝国的国家的经济现在空前兴旺发达。而大多数原殖民地国家却发现自己很难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轨。他们的殖民统治者们当初因为害怕他们刚开始形成的民族主义以及蔑视他们的能力，不曾教给他们多少本领——仅仅够得上完成政府的低级任务。白人统治者害怕受过教育的当地人：他们是一些已脱离了部落的、充满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欲望的人，以一位英国官员（1886）的话说，“是〔非洲〕西海岸的灾祸。”^{（11）} 英国完全依靠当地的上层人物，却排斥这些deracines（完全脱离了家乡环境的人），而不让他们在政府或贸易活动中承担重要责任。

因此，尽管殖民者们身后留下公路、港口、铁路以及厂房建筑等基础设施，但这些却没有得到必要的修护和管理。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遗产的忽视和破坏能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可以从旅游者那里得到证实（在那些东欧和中欧的行政系统不完善不称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看到此类景象）。^{（12）} 原殖民地臣民大都就读于殖民者开设的大中学校，这些学校教授的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促进的是革命而不是生产。也许这就是何者优先的问题：自由第一，经济次之，因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

自由后所显示的最初人均产值和收入的数字令人振奋，但可能有所误导。它们反映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质。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换趋向于商业化，产品更多地投向市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自给自足，这样一来，所产生的结果就显示在统计数据上，这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经济学界权威人士预测一些前殖民地国家会有光明远大的前程，像尼日利亚（石油），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可可），阿尔及利亚（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如此。

随即到来的却是失望，没有几个前殖民地国家能保持住稳定的人均产值增长，^[255] 他们对于那些变幻莫测的贸易（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依赖性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收入。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在1976年曾抱怨道，为什么他的国家要用两倍于前一年的剑麻才能购得同样数量的拖拉机？当然，他在早些年（1970-1974年）是不会有这样的满腹怨气的，当时剑麻的价格在4年之内就涨了4倍，^{（13）} 商品价格变化的反复无常已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在1925年到1928年期间，世界市场上橡胶的价格从每磅75美分降至22美分，后来的经济大萧条又使之降到了1932年的不到3美分一磅。^{（14）} 东南亚（马来亚，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半岛）的种植业受到了巨大打击。但从那以后，橡胶的价格就一直呈上升趋势，及至战争期间，战争又急需大量的橡胶轮胎，这极大地刺激了橡胶交易。

面对自由之后的失望，那种长久不衰的怪罪于人的方式又占了上风。那些习惯于将物质利益上的失败归罪于外国的人现在认定，外国的剥削只不过是改换了外表。原殖民地拥有的只是名义上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仍因为无形的不平等贸易和附属性而被剥削者所束缚；同时剥削者还通过给补贴和贿赂的方式换取政治上的忠诚和效忠。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有些批评这一新殖民主义的人甚至说道，发达工业国家和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所有交易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必然结论就是，穷国应该断绝一切与富国的商业往来。^{（15）} 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妙的守穷法子了。幸好，第三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还聪明，知道不该切断外贸和知识交流，还有借债、送礼和补贴等等。

有一个例外，就是缅甸，它自我强加的禁运使国内供应奇缺，人们要修车用的零件就得拆卸别的车；街上跑的车烧的油太低级，尽喷有毒的黑烟。幸亏车辆稀少，行人的肺才得以免于遭殃。

前殖民地国家多种多样，成分混杂，被我们统称为南方，或第三世界（有时还将穷国和极穷国再区分为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它们自从独立以来，成就有高有低，大相径庭。东亚有几处成绩突出，拉丁美洲高低兼有，在缅甸和非洲许多地方则是全然倒退。这一结果的多样性表明，殖民化本身，甚至是受奴役，也并不预定着失败。^[256]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失败并不等于崩溃，这是事物的本质。一些国家利用了殖民地的遗产；利用了遗留的社会管理资本、教育、思想；甚至是有效利用了他们对殖民帝国的愤怒、抵抗和自豪感。^[257]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有一些国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通常是因为殖民势力看不出在那里投资会有什么收益。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太穷了，甚至都勾不起列强的贪婪欲望。

尽管有少数几处前殖民地经济繁荣，遭受失败的大多数并不能得到安慰。对于他们来说，整个的经历是令人感到屈辱和愤怒的，而接下来的失望只是加重了他们的怨恨。他们的怨恨是有道理的。然而在吮吸怨恨滋味以后，他们最好是把它吐出去。这一切本来都与人们的善意或恶意无关。它是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争辩说，他们曾是尽力而为，照顾别人的利益。

以法国人为例。他们自诩为天下理智和美德的旗手，更不用说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最高成就了。他们很少教育自己殖民地的属民，所提供的一点教育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和无穷的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你也可以成为法国人。学校教育都是采用法语，这样就教出一批脱离了父母及祖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一位教师称之为“异化机器”。教学的内容是法国历史的陈词滥调——“Nos ancêtres les Gaulois（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如何如何……”还有诸如拉辛的《安德罗马克》和高乃依的《熙德》等古典文学。^{（16）}成绩卓越的学生可以赢得奖学金到法国上大学，学习法国共和精神的财富，这样只能令他们厌恶自己的

身份地位并将他们转变为造反的领袖。越南的胡志明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是典型的例证。

资产负债表，即最后的得失，究竟怎样？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是好还是坏？不妨让我试着列出以下若干见解：

（1）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以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代价牟取财富和劳动力。结果并不是都能如愿。另一方面，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者和弱者两边来看，几乎总是有少数一些人——精明强悍的商人、特许权获得者、官吏、中间人（买办）和当地的精英——发财致富。

（2）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给殖民地人民造成伤害；但也在有意无意中给殖民地带来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上的收益。其中一些收益是来自门户开放和对外贸易。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9世纪中叶就从英国和亚当·斯密学说的角度指出，“……市场每一次扩展所引起的趋势，就是改善生产过程。”（17）

贸易所产生的所有这些影响都取决于当地的殖民统治的性质。一些殖民统治者较富有，同时又有更高的欲望。他们通常在殖民地修建一些有用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设施、厂房、供水设施、废物处理设施等等。他们让当地人民以出劳力和纳税的方式支付这些改善的费用，但他们自己并不出钱。当地人民能从这方面得到的收益只是捎带性的，因为那些设施的改善主要是为了统治阶层的权威及其商业利益；他们总归是要把这些遥远的地方治理得好一些，以适于居住并有利可图，并且能在边界设防和维护社会秩序。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种收益。那些医疗设施的建设也是一样，最初是为统治者们服务的（但是要知道，公路和环境的清除也可能加快疾病的传播）。然而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机。没有谁能独占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同样，建筑师和医生们对社会也都有自己的责任感。

假设这些地方不曾沦为殖民地而在当年享有自由，会不会建起更多的这类设施呢？在当地原有的政治体制之下，恐怕不可能。即使现在，尽管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信念而且商界也乐于响应，那些摆脱

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在公共工程方面却往往依然无大起色，令人失望。更糟的是，有些现政权还听任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设施损坏下去。只有东亚和东南亚的几处曾是殖民地的社会——如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是重大的例外。当然，一些新的技术，例如机场和航空，还是带来了不可阻挡的进步。

但是在前殖民地，这样一些项目通常都是统治者们的炫耀性消费，他们宁愿把钱（别人的钱）浪费在新设施上，而不去维护旧有设施。前一代给我们留下了成堆的垃圾和废墟。考古学家发现的历代文明通常是一代建在另一代废墟之上的情景，正重现在未准备好的20世纪的社会里，并且将来可能会成为未来考古发掘者的乐事。在未来的废墟中有奢华的酒店，它们早已取代了老式旅馆以及那种在探险小说和电影里出现的客栈的位置。现今的商人和官员们希望在全世界各地都能享受同等待遇，其中也包括到处都可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和英国天空电视新闻公司的节目。

（3）殖民世界的地图是由欧洲人绘制的。他们划定的边界线并不能反映地方和居民的实况。非洲尤其是这样的（但还有印度和缅甸），一些部族硬是被切开，又有一些不同的部族（其中包括白人定居者和移民构成的新部族）又硬是被捏到一起，这为后来所掀起的领土收复主义和一系列冲突埋下了导火索。当自由来临时，这些不同的部族还没有做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准备。可是新的国家把这些人为的疆界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他们害怕重新划界会更糟。这种担心完全正确：前殖民地区域的领土纠纷向来会闹得鸡犬不宁，最后不论谁输谁赢，大家都受到沉重惩罚。（18）

（4）这些从殖民地解放出来的国家的能量、资源以及潜在的善心都在自我界定的过程中消耗殆尽。只有很少几个国家（韩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殖民统治到来时就已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抵抗，并在殖民者离开之后，可以再加以发扬。[258] 其他的国家则因缺乏明确的民族特性和合法性，而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19）与此同时，那些先进工业国装腔作势地表示怜悯，救援受难者，扶植暴政，制造新的受难者，

绞尽脑汁地插手，通常是以拙劣的手法进行干涉，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好坏兼有，而用来安慰自己的说法则是声称自己动机高尚，目标宏大，同时自认为道义上优越而感到满足（这正是这一套把戏的道理之所在）。那些饥饿的、满身苍蝇屎斑点的儿童的照片充斥着报刊和电视的画面。慈善事业名目繁多，超过了救济的款项。除了急救之外，实际上也没有提供什么。

（5）让我们试着看看违反事实的一种假设：假如那些经济水平落后的国家从来没接触过殖民主义的话，它们会发展和（在工业技术和生产率方面）进步得更快。赞成这种看法的论点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的：是假定这些地方的人们会摆脱国内及国外的欺诈和剥削，同样也能够学习，并改造自己的国家。反对这种看法的论点则是以历史为根据：帝国主义并不曾阻止某一些殖民地发展成为自治的中心，并且学习和自己创造工业经济的技术。（20）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俄罗斯帝国辖下的芬兰、瑞典统治下的挪威以及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均是例证。如此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例子是日本，它当时虽然保持了独立（这一点并非不重要），但却受到非正式帝国主义强加的关税限制。不过大家都知道，日本属于一个特别的情况。

历史表明，托管制度可以是一个学校。当然，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教师的水平。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比另一些国家的高明一些，它们的殖民地在独立后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对显著一些。如按照这一标准来评价的话，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可以说是最差的，荷兰和法国较次，而英国则比较好，因为他们向殖民地投入很大的精力和资本（例如印度的铁路），同时他们委托当地的行政官员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管理。在1900年，印度所拥有的铁路线长度是名义上独立的中国的35倍之多——这也是对英国统治权和所尽的责任的一个褒奖。

（21）（挑剔的人也许会说，殖民帝国修这些铁路的原意是将棉花及其他原材料运往港口，或是将士兵运到不安宁的内地。然而，在印度这样一个容易在局部地区闹饥荒的国家，各地市场的铁路联系毕竟有利于粮食的运送。而且有时正是因为一场饥荒而修建了一条铁路）。

按照这一标准，历史上最好的殖民统治者莫过于日本了，因为没有哪个前殖民地能做到像韩国和台湾那样，从1950年到1973年的人均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那些发达工业国家（日本除外）。在我看来，这一成就也反映了这两处社会的文化，即家庭结构、工作价值观和使命感（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并不重视文化的作用，认为它的作用无法加以衡量，而且只会阻碍一些好点子的实施，我还是坚持我以上的观点）。这些价值观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已存在，部分地说来是作为对日本统治的反应，每当日本统治者让当地的人有一定的工作余地时，当地人就会抓住机会牟利。（22）然而，在殖民地时期结束以后所取得的成功，仍证明殖民时期留下了有用的遗产，即日本行政管理所注重的经济合理性，当年日本人在这些殖民地就曾着手实行“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努力，即日本自己已实行了的那种努力”。（23）

诚然，韩国人和台湾人不会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记得日本人的暴政、酷刑和横行，他们的记忆还由于日本人公然拒绝认罪或悔恨，而变得更加苦涩。（24）悔恨什么呢？当年的制度是起了作用的。（25）此外，

（日本）在对待其殖民地人民的政策方面应当负责……正如同比利时在刚果、法国在印度支那、荷兰在东印度群岛或者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应当负责一样。平心而论，如果不是以某种理论上的乌托邦作衡量，而是与上述的其他那些殖民地相比较，那就可以说，日本在殖民地所作的努力是应当得到评价的。（26）

世界属于问心无愧的人，而日本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是问心无愧的。

韩国和中国台湾会说他们的成功完全与日本无关。日本当年曾迫使他们从事农业而脱离工业，驱使他们成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附庸。以朝鲜为例，日本人迫使他们改名换姓并将之视为二等公民，把他们送到日本人认为太危险而不愿去的地方出苦力（比如在日本本岛上采矿）。当获得自由时，朝鲜人都已将这苦难牢记心中。但他们没有让这些记忆干涉经济发展的进程。“不要生气，要冷静。”

韩国和台湾是例外。大多数战后出现的新国家和地区由于记忆太深刻而走上了歧路。他们以前的殖民统治者的经济制度成为受诅咒的对象：资本主义被看做是与腐败和不公正紧密相连的无能的事物。它们看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就以为社会主义加专政可以保证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最终目标的实现。他们这一步真是迈错了。

现在回顾一下，从帝国主义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现实之间一直是有冲突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不单纯是反殖民主义，而且还将反殖民主义置入经济史的更大的背景（解释）：殖民地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生存的支柱。按照这一理论模式的解释，帝国像是吸血鬼，靠殖民地供血，给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营养，或是将财富从穷国转移到富国。如果没有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会崩溃，换句话说，欧洲是无法放弃殖民地的。从相反方面来说，一旦被奴役民族得到解放，他们就会迅速地繁荣昌盛。

无法放弃……完全不是。在20世纪期间，帝国统治者遇到的反抗逐渐增长。事实说明，欧洲的自由和人权理想是有感染力的，殖民地人民从殖民地统治者那里学会了怎样反抗。与此同时，原先曾热情支持帝国的舆论，也变得对帝国深表遗憾。一些重大丑闻——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传出了种种酷刑和残害黑人的消息，1899-1902年的南非布尔战争中发生了种种暴行（包括集中营）——使那些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作家及政治家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论据。帝国曾是强者的骄傲，小国的安慰，因为它使小国变大，使大国变成巨人，可是到了这时却失去了它的合法性。 [26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最后的一击。西方国家丧失了不可战胜的声誉，不仅如此，它们的参战目的也使得它们对外国的统治站不住脚。此时，统治殖民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而使它们难以忍受。有的国家自尊心较强，仍勉强坚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是如此，在阿尔及利亚更是如此）。另一些国家（英国在印度和巴勒斯坦，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则是迫不及待地放手。它们做对了。这些前殖民帝国在失去这些殖民地以后，可以说是毫发无损。这真是叫那些反殖民主义理论家大失所

望。

事实证明第二个论点也是错误的。1961年，一位名叫苏伦德拉·帕特尔的印度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无可辩驳的数学计算结论宣称，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在大约30年之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法国，随后便会赶超美国。他并不是独树一帜；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罗曼蒂克式的预测。这反映了他们良好的愿望和顽强的信念；还有祖国的自豪感和一种报仇雪耻的心理。

记住容易忘却难

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最不好的影响之一，就是人们对前统治者和他们的代表的敌视——这种敌意主要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在需要用货币做交易的政府之间倒没有那么多的敌对。有些殖民地，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殖民地，当年曾是欧洲人向海外移居的地方，为那些希望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摆脱旧生活的西方人提供了机会。在这些迁居者中间，有些人对他们的新的家园渐渐产生热爱之情，热爱那里的土地、山川、风光、城镇、市场和集市；而且也爱那里的人，爱他们的依附，或者他们的神秘，爱他们的奇风异俗，或是他们的天真单纯。许多移居者觉得他们是发现了新的天堂，是在创建一个新的种族——不是通过种族的混合，而是通过新环境下的共处。大家不妨读读阿尔伯特·加缪在他的《第一个人》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对于他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的童年时光的回忆。他并不是有那种感情的唯一欧洲人，只不过是别人写得更好而已。

因此，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许多当地的人并没有回报以爱心，而是憎恨这些陌生人的入侵，恨他们霸占最好的土地，恨他们享受政治和社会特权，恨他们摆出那么一副不可避免又无可抗拒的以高等人自居的架子。

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这么看。但是随着民族独立运动逐渐激化和沸腾，随着民族意识觉醒，是很难保持中立的（“你站在哪一

边？”）。于是，当独立来临时，殖民者撤离了。多数人忍受不了丧失特权和不再受人尊敬的滋味；有些人尽管本来愿意留下来或想要留下来，但却受到辱骂和威胁，面对着暴力，他们当初夺来的产业又被夺走了，只好赶紧一走了之。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曾有100多万欧洲人，生活在10倍于己的当地人中间。这些移居殖民地的人不希望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要求法国留下来；的确，许多人还准备为继续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而战（法国人自己意见分歧，几乎爆发一场内战）。戴高乐的新政府最初曾打算作出让步以换取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同意继续与法国保持联合，但徒劳无功。最后法国政府认定这场游戏不会有好结果，就大事已定了。那些移居者被告知，他们只能靠自己了，法国要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有些死硬派还想斗下去，可是在这个已保证要让殖民主义完结的世界上，还有谁来帮助他们呢？两三年之内，所有的“黑脚”^[261]就都撤走了。这些欧洲人并不全是有钱人；有些人当初到那里时是穷人，而且往往一直是穷的。但有些是成功者，拥有最好的土地，种植供大宗出口的葡萄和小麦，掌管航运，经营银行，操纵经济的运行。

他们的离去并没有让阿尔及利亚一贫如洗。阿尔及利亚人收回了自己的土地；走的是基督徒（及犹太人）（他们还保持了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石油）。然而，那些人力资源的损失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随后多年期间，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缓慢，就连石油和天然气也未能扭转形势。阿尔及利亚开始向法国出口人，因为法国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所谓资本主义离不开殖民帝国，原来如此。

注释

1 .近些年来，有许多人多次试图检验那些曾有争议的正统观念：其中包括Davis和Hut-tenback所著的*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或是个别事例，见Kimura，“The Eco-nomic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Korea”，主要是在第568-570页。Michael Adas，“‘High’Imperialism”，第327-328页，指出这些想算最后总账

的企图是“过分简单化和最终徒劳”。这意思就是说，最后的总账并不符合那些坚持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解释帝国主义的学者们的愿望，因为利润不够多。

2. 见Klor de Alva , “Postcolonization” , 第242页。

3. 同上 , 第267页 , 参见Prakash , *Ater Colonialism* , 第3页。

4. 有关这方面 , 参阅Bartlett , *Making of Europe* 。

5. 见Hopkins , *Economic History* , 第256页。

6. 见Hyam ,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 第290页 , 引用“酒瓶、子弹和圣经”三方面的安慰（未标明出处）并提供了酒的消费量，不仅是文武官员的消费量，还有士兵、下级雇员的消费量。关于性生活，他在第291页引用驻南非代理领事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854-1925）的话：“性生活包括在国家大事之中，向来如此，永远如此。对它从来不作记载，因此历史将永远说不清楚。”但历史学家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在这种私生活问题上，我们所知道的零零星星的性关系不过是冰山一角。参见Hyam , *Empire and Sexuality* 一书。

7. Cook, *The Long Fuse* , 第227页 , 引自Charles Stuart于1775年在与北美反叛者进行邦克山战役后写给他的父亲比特伯爵的一封信。

8. 关于把殖民帝国看做是嗜血者，见Lindqvist , *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 , 第52页 , 我认为他的这一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9. Gallagher和Robinson ,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一文。

10. 关于非正式帝国主义的行径和利润，见Landes , *Bankers and Pashas* , 第3章。

11. 见Hyam ,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 第164页。

12 .参阅S.Erlanger , “Retired People Are Struggling in the New Russia” , *N.y.Times* , 1995年8月8日 , 第A—3版。

13 .Harrison , *Inside the Third World* , 第336页。

14 .Murray ,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ochina*

15 .关于“新殖民主义”一词的使用 , 见Stavrianos, *Global Rift* , 第177-178页。

16 .Harrison , *Inside the Third World* , 第17章 : “The Alienation Machine : The Uneducated and the Miseducated”。第325页 : “法国小孩不得不把他们的脑力浪费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和呆板的学业上 , 这的确是够坏的了。但拿这些教非洲小孩子 , 简直就称得上犯罪。” (我自己不知道。拉辛的《安德罗玛克》曾使我深受感动。)

17 .Mill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引自Meire , “Theoretical Issues” , 第42-43页。

18 .有关拉丁美洲的“损耗巨大而又没有任何益处的战争” , 见Harrison , *Inside the Third World* , 第384页。在他所列举的历次战争之外 , 还应补充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冲突 , 以及美国到英属加拿大的失败的入侵。至今在墨西哥许多地图上仍将得克萨斯和美国的西南部标为自己的领土 , 期待有朝一日能将之收回。

19 .Harrison在*Inside the Third World* 一书第388页引用了S.E.芬纳所统计的1962年至1975年间的104次政变 , 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1975年 , 联合国成员国1/4的统治者是通过政变上台的。

20 .Alan , “Colonialism, Decolonisation and Growth Rates”第325页及注释2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 , 在19世纪那些发展现代化制造业的地区都是“主权国家或自治国家” , 并由此推论出“国家自己

对经济政策的调控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必要环节。”

21 .印度23627英里；中国665英里——Kerr, “Coloni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第93-94页。关于英国对印度钢铁工业的为时已晚的援助, 见Bahl, “Emergence”以及她的*Making of the Indian Working Class*。

22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殖民地出口的工业品减少, 朝鲜人和台湾人趁机发展自己的制造业。见Ho,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载于Myers和Peattie主编的*Japanese Colonial Empire*一书, 第365页。

23 .引自Myers和Peattie主编的*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一书, Peattie的文章。关于朝鲜和台湾的发展数据和特殊原因, 以及日本的政策是出于它的军事战略和急需廉价粮食等情况来制定的这一情况, 见Alan, “Colonialism”, 第250-253页; 以及Hayami和Ruttan的“Korean Rice, Taiwan Rice”。

24 .关于日本人在朝鲜问题上不认罪反而自鸣得意, 见*N.Y. Times*, 1995年10月12日, 第A-5版; 及1995年11月14日, 第A-14版。关于朝鲜人对此的记忆和愤怒, 见Yoichi Serikawa, “Deux peuples empetres dans leur passe”, 载于《国际信使》周刊第211期(1994年11月17-25日), 第32页, 附有韩国独立纪念馆的蜡像展品照片, 展示出日本军队对朝鲜爱国志士所施的酷刑。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期间日本所进行的更大规模的侵略, 见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一书。最近一轮风波的起因, 是日本一名官员宣称“日本的确做了一些好事。日本在朝鲜各镇建立了学校, 提高了教育水平, 还修建了铁路和港口”。

25 .一名西方人表达了亲日观点, 说日本建立了“现代的和高效率的警察力量, 同时还聪明地利用了当地的社区控制体系”。见Myers和Peattie主编的*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一书, 第27页。

26 .同上, 第47页。

27 .Patel , "Rates of Industrial Growth".

第26章 失去领先地位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是不愉快的，而领先者却十分自豪；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穷，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

市场被视为平坦的战场，战斗通常以和平方式进行。并不是市场上的角色们希望它如此：倘若他们能为所欲为，他们会把一切好处占尽，而让后来者一无所获。集团、行业和一国经济也是一样，都想有得无失。幸好市场上存在着竞争者，使得人人都有奋斗的责任；从长远看，不奋斗就什么也没有。

国际经济竞争亦复如此。总有一些城市和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对于失败者来说，这一过程当然不是愉快的。不过人们的痛苦会由于有意的近视而大大减轻，更何况领先地位的丧失通常不至于带来绝对的衰落 [262]。相反，早先的成就常常会转化为财富而让拥有它的人们得到安慰；也会转化为人力和物力资本而继续引来收入和经济增长。然而，领先地位是会形成习惯和自豪的。谁也不喜欢失去这一地位。

妒忌标志着野心。当17世纪后期英国“政治算术家”将荷兰视为榜样和对手时，当18世纪法国作家注意到英国的商业和金融成就而发感叹时，他们都是在个立国和激烈民族竞争的时代流露出他们的羡慕、希望及不满足。这正是当年欧洲的形势，它大不同于天下一统的中国，也大不同于一盘散沙的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当时，欧洲包括一些大国和小国，各国均以其统治者的自尊心和利益为行动指针，但人们自我意识到的民族主义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家都在竞争。大家都知道金钱对于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性。

金钱为国力服务的至上意义，在经济思想上得到了表现。重商主

义应运而生，它并不是一门学说，也不是一套规则。它只是普遍采用的政治经济管理的处方。连亚当·斯密也有过重商主义的看法：他曾指出，航海法 [263] 也许有损于英国消费者的利益，但却为挫败荷兰的制海权起了奇妙的作用。

到亚当·斯密在世之日，荷兰称霸的时代已经完结。荷兰称霸，是百年之久的一个奇迹：这么一个小国竟然控制了海洋，拥有成千上万的船舶往返全球各地以运输大宗货物和珍稀商品，敢于跟一些人口比它众多的国家抗争而且打败它们，从而为一切理性思维和使命感树立了一个楷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1688年荷兰联合省都统，即奥伦治的威廉，率兵一举征服了英格兰。那是外国人对英格兰的最后一次成功的入侵，也是另一个威廉，即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征服英格兰以后，英格兰所受到的第一次入侵。诚然，英国人自己并不是这样写历史。辉格党人把英王詹姆斯二世之被推翻解释为一次“光荣的革命”，从而模糊了事件的性质。但事实上那是一次入侵，其目的在于接管英格兰的王位，并阻止英格兰联合法兰西反对荷兰。奥伦治的威廉在那一年9月集结起来的荷兰舰队，在规模上比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大3倍，它运载了荷兰陆军的最精锐部队，再加上一批外籍志愿兵、牲畜、装备和一支庞大的炮兵辎重队。“权衡种种因素——包括兵力、舰船、财政、后勤、外交、内政等等……可以说，这是早期的近代国家政府在组织人力物力方面所曾实现的最为壮观的业绩之一。” (1)

迟至1776年，亚当·斯密仍然认为荷兰比英格兰富裕。他怎样得知这一点呢？原来，他是对比了两国的利率，看到荷兰公债利率为2%，私人贷款利率为3%。英格兰的这两种利率都高出大约一个百分点；苏格兰的利率更高出两个百分点。他指出，这表明荷兰的资本更雄厚，利息较低。诚然，当时的荷兰企业家还叫穷，但亚当·斯密认为低利息是“繁荣的自然后果”，荷兰商人哭穷没有道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说那只是错觉。 (2)

亚当·斯密还指出“据说荷兰工资高于英格兰”，这也表明荷兰更富。也许是这样，但他还认为这表明荷兰经济增长也比英格兰快，这

就不对了。 [264]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当·斯密在对比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时，也谈到过高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北美还不如英格兰富裕，然而它更加兴旺得多，正在以更加快得多的速度去获取更多的财富。” (3)

亚当·斯密本应将他对比英国和北美的标准也运用于英荷两国的对比，也就是说，将财富与增长区分开，将富裕与兴旺区分开。那样，他也会注意到荷兰经济减速的迹象。 [265]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荷兰资本横溢，寻求向国外投资的出路。情况确实如此。在18世纪初，荷兰人就把大笔的钱投入英国和法国的基金，以及投入英格兰银行、东印度群岛和南海股票。他们自然会这样做，因为把钱投到英国和法国，收益较高；可是要害在于，收益较高，是因为英法两国国内需求较大，而供应较短缺，这一切又是因为经济增长得较快，至少在英国是如此。 [266]

此时，荷兰工业已于艰难时期下跌（亚当·斯密若去当地访问，就会看见这种情景）。莱顿的细布产量1700年是25000匹，到18世纪30年代末，年产量降到了8000匹。莱顿羽纱的年产量由1700年的37000件降到1750年的12600件，到1770年仅产3600件。哈勒姆的亚麻布漂染业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萎缩了。赞恩河一带著名的风车产业，包括由风车驱动的木材加工、制帆布、制绳和造船业，到18世纪50年代已急剧衰落，许多风车停止了转动。阿姆斯特丹的棉布印染业和烟草加工业在18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衰落。以1584年的工业产值指数为100，这一指数于1664年达到545的高峰，至1795年则下降到108。 (4) 与此同时，佛兰德、德意志莱茵河流域、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庭院工业却增长迅速，成为荷兰工业最激烈的竞争对手。 (5) 荷兰的商业也未得幸免：通往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地区和西属美洲的“富庶通商”逐渐缩小，欧洲内河的鲑鱼、盐、酒的大宗交易亦是如此。只有很小的几个产业部门，主要是糖、咖啡、烟草、茶叶和可可这样一些殖民地产品的进口、加工和再出口，尚能维持。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荷兰也相对衰落，尤其是落后于英国和法国。 (6)

经济上的萎缩影响到社会结构。随着有技术的工匠和小企业家不

断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更好的机会，大城市人口减少了。这一衰落不算很严重，但是另一些国家正出现持续不断的甚至是迅速的城市化，二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7) 荷兰城镇萎缩不很严重，是因为城镇地租和食品价格下降了，而且穷人能得到一些救济；它与其说是慈善事业，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治安。此外，荷兰的工资仍高于周围各国，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会抵制削减工资。工资高，就吸引来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与当地失业者相竞争。人们之间的敌意和冲突不断加剧，就爆发罢工，直到无工可罢为止。

这种情形有点像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美国。美国一些制造业部门由于外国的竞争而萎缩，企业纷纷裁员，或者搬迁到工资较低的地区。雇用新工人花的钱，低于留用老工人，航空公司就很懂得这一点。国外的穷人不断移民而来。工会举行罢工，罢工的结果有时只是加速工厂倒闭，或者促使定货单转移到要价较低的供货厂家（顺带说一句，现今在西欧也出现类似的情形）。

两百年前的荷兰就是如此。当时的联省共和国拆东墙补西墙以应付竞争，但它充其量也只能是原地踏步。许多实业家放弃战斗，退居乡村，靠消极投资为生。收入两极分化，一头是为数不多的富人，一头是大量的穷人，中间阶层日益缩小。税收资料表明，到18世纪末，最有钱的荷兰人是那些大地主、高级官吏或食利者。“黄金时代”的企业繁荣一去不复返，这时的雇主已仅限于中下阶层。

在这一过程之中，荷兰在商贸和制造业方面丧失了世界领先地位，进入后工业化态势。在那之前，意大利也走过同样的路。例如，在威尼斯，羊毛业在重税压力之下萎缩，一些重要的产业搬迁到别的成本较低的地区，实业家们把自己的钱转到了大陆上的农业。(8) 在热那亚，活跃的商人变成了向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放贷的银行家。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改换了角色，变成旅游胜地，靠古人留下的财富过日子。而荷兰总的说来，正如亚当·斯密的印象所表明的那样，当时仍然是富裕的，然而1750-1870年间的收入或人均产值的估计数字证明，它已今非昔比。它正被另一些更有活力的国家所超过。@自然不是绝对的衰落，而是一个漫长的停顿和渐衰过程。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困难的但重要的历史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荷兰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只停留于印度尼西亚和香料生意，而英国人，随后还有法国人，却把赌注押在印度和纺织品；或者说，荷兰人对他们与中国的商贸关系处理不当，因而在有利可图的茶叶生意中被斗败了；或者说，荷兰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在亚洲各地之间的商贸中失去了地盘。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则是赶超与趋同：纺织品和另一些工业制品本来是荷兰的出口和航运业的支柱，可是别的地方享有低工资的有利条件，学习了这些产品的制造，一旦学会了，就关闭了大门不再进口。在重商主义的相互竞争的世界，航海法和保护主义扼杀了老的工场和掮客。荷兰人转而出口资本，就不奇怪了，因为这些资本投到国外比投在国内更有利。

在19世纪，已经有了一些更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的榜样，这首先是英国，但也包括荷兰南部（从1815年起是荷兰王国的一部分，从1831年起才独立，成为比利时），可是这些榜样当初并没有促使荷兰人改弦易辙。这也许是因为工资一直较高而使得投资者不愿再从事制造业，至少在沿海各省是这样。（10）或者，也可能是因为荷兰人难以放弃根深蒂固的习惯而重新探寻机会。（11）

在这一点上，有些学者指出过荷兰人不喜欢现代化的东西，对风险很反感。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市镇里，人们都看到那些工厂主和商人宁愿放弃斗争而不再跟一个更有活力的邻邦竞争，也不愿采用新式机器动力以改变祖先遗留下来的老式生产工具。的确有许多人认为蒸汽机冒的烟是从地狱深处冒出的可怕烟气。（12）

另一位学者写道：

荷兰商人似乎是在原先积累的财富的软垫上睡大觉，而这个时期的工业领先者打到我们身上，仿佛我们是属于那个尊贵的大腹便便、动作缓慢的富商阶级，头脑患了精神松垂症，不敢冒险跳出传统的办事方式。（13）

这评语很尖刻，类似的评论还有不少。这种态度是否重要？有些经济学家和“新经济史学家”有怀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有无未必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精神并不具体，无法衡量，也无法根据它预测未来。有些工商业者也许是满不在乎或者懒惰，但他们会被别的人取而代之。可是说到底，如果说农人会对庄稼收成的多少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商人和工厂主本来应该对新技术作出何等更快得多的反应！（另一方面，工业上的利害得失通常更大，收益较慢，而错误的惩罚更重。）

这就是革新和首创精神的重要性：只有具备了它们，它们才起作用。人们要问，为什么那么久才具备它们，为什么在某些地方会比别的地方拖得更久？“后工业化”的荷兰当时并不缺乏资本，也不缺乏廉价劳动力或工业经验。它缺少的东西，也可以从国外进口。交通运输可能比别人好，那本来也可为企业所用。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些敢于冒险的人，他们的财富不是商业本领，而是技术知识以及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有一个人名叫杰拉德·莫里茨·伦琴，当过海军军官，在一次印度尼西亚远征失败后回国，受荷兰海军委托，寻找造船和冶铁的新技术。他作了努力，1825年在鹿特丹协助创建了荷兰的第一座汽船制造厂。（14）

然而，不同寻常的个人并未形成一个总的能自我持续的运动。有些冒险家到印度尼西亚去闯了，荷兰本身却在原地踏步，甘心于长期的停顿。这就是文化在起作用：文化决定了如何对待就业，如何对待机会，以及从何处得到满足。

诚然，文化是可以变的。在19世纪后期，荷兰回过头来，在国际竞争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工业。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它拥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受保护的市场。最初的进展是在纺织业，它是在内陆的较偏僻的特文特地区发展起来的，这决非偶然。但真正的起飞则有赖于电、内燃机、化工和人造纤维所带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有科学农业和园艺。荷兰人的收入本来就落后得不远，这时很快就与欧洲领先国家的水平趋同了。（15）

英国接替了荷兰。在17世纪时，英格兰抓住每一个机会跟荷兰斗，因而对粗纺呢绒的出口征税，并兴办奥尔德曼·科克因工程（1614-1617），企图把值钱的呢绒染色和精加工业从荷兰人手里夺回来（但未成功）；^[267] 制定了两项航海法，以损害荷兰人作为首要航运国和中介商的地位（这一点得逞了）；还打了两场海战，而取代荷兰人称霸于海洋，把荷兰人排挤出北美洲，并间接地导致荷兰人在印度受遏制。后来，荷兰人让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格兰王位（1688年），从那以后，英荷两国在平时和战时都结为伙伴，但荷兰人充当的是小伙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利用荷兰作为一道屏障，阻止法国在大陆扩张领土的野心。荷兰这一作用对英国来说很重要，因此，在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法国对荷兰的占领被打垮以后，英国于1815年把荷兰失去的殖民地交还给新成立的荷兰王国，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这一大片殖民地（但有一重大例外：南非的开普殖民地未交还）。这一交易还包括把现今为比利时的这一片土地——在当时包括奥属尼德兰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主教区和公国——也并入了荷兰王国。

道理在于，英国这时已不再害怕荷兰的经济竞争：凡是荷兰人做到过的事情，这时英国人都做得更大，更好。乔赛亚·柴尔德——伦敦商人，英国议员，政治算术家，后来当了东印度公司总督——早在他的《贸易新论》（1668年和1690年）一书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

荷兰的国内和对外贸易、财富以及航运量的惊人增长，在现今令人羡慕，在将来世代的人看来也可能是奇迹。然而他们取得如此成就的方法却是……其他多数国家都可仿效的，我们英格兰王国仿效就更容易。（16）

他说得完全正确。到柴尔德在世时，荷兰已是向英国输出资本，而英国则一路领先建立现代工业，并取代荷兰而成为世界首要商业与金融中心。

1815年以后，英国人已确信自己的霸权，开始废除原先本着重商

主义精神而实行的一些限制，例如禁止出口机器和禁止工匠外迁的规定，以及某些重大关税壁垒和航海法。与此同时，他们以无可指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互惠的理由，力图说服别的国家也照样做。他们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可惜的是，多数其他国家权衡利弊得失和考虑到经典学说，认为英国人这种做法是一种手段，企图让它们继续充当农业国。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理论与实践，而多数其他国家对此是浅尝辄止，发觉它于己不利。或者是认为它是英国的圈套：既然不讲信义的英国佬要这样做，那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17）

可是在缺乏低廉制造业的世界上，英国的工业兴旺起来了。假如欧洲国家不买这些产品，那么在世界其他各大洲也可以找到买主，更何况运输工具不断得到改进，降低了货运的成本。1851年，英国人举办了第一次万国技术与工业成就博览会，想以此庆祝自己的称雄于世界。诚然，他们也给别的实力不如英国的国家提供了展台和奖赏，但博览会的主题是：英国是世界的工场。而且还是通向未来的工场：试看那座水晶宫，即展览大厅，标志着建筑业告别砖石，迎来钢铁与玻璃的新时代，明亮宽敞，采用标准构件和机械化涂刷。这一变化相当于中世纪由笨重的罗马式建筑向穹顶哥特式建筑的转变。（这种大胆的变化也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现象。水晶宫又高又大，里面能种树；树木招引来鸟雀；鸟雀给下面的人群撒点小礼品。怎么办？开枪打鸟？打碎玻璃墙和玻璃房顶又怎么办？当年，威灵顿公爵曾向维多利亚女王解释说：“麻雀咳嗽啦，陛下。”）

尽管英国称雄于世，但也出现了一些小片乌云。有些潜在的竞争者展出的产品在品质和口味上都无可比拟，例如法国的丝绸，萨克森的瓷器或佳酿葡萄酒，就是如此。不过这些东西是早已如此，得益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巧或有利的自然条件，完全可以理解。更叫人心忧的是，在英国人自认为领先的领域，即机器制造业和机器制作的产品方面，也有些非英国展品显示出技术高超。最早的麻烦迹象，是美国的钟表和枪械，它们是批量生产，零件几乎都可以互换。（18）英国政府在1854年派了一个使团到美国去考察这一“美国制度”。考察的结论是，不错，英国人需要再学习。（19）

到临近19世纪末时，出现了真正令人不安的形势。它在于政治上起了变化，标志着力量对比要改变：德国突然在欧洲大陆崛起；1870年打败了法国，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它在非洲和太平洋表现出殖民野心；它大修铁路，而且与奥斯曼帝国通商，使英国人感到印度生命线受到威胁；谨慎睿智的俾斯麦下了台，沙文主义强烈的皇帝威廉二世当政，他威吓自己的政治顾问们，而且对他的英国表亲态度恶劣（家庭联系也不过如此而已）；最后，德国决定建立一支海军，明摆着就是要向大不列颠的天赐海洋霸权挑战。不但如此，所有这一切还是立足于巨大的经济成就：重工业（钢铁、化工）发展迅速；新技术（电力，有机化学，内燃机，油、气发动机）格外强劲；金融部门特别有力地支持工商业；教育系统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员、工程师和应用科学家。这真叫英国担忧了。

对于研究经济成败的学者来说，这种日益增长的担心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英国是在失败吗？英国是在衰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谁的过错？有什么补救的办法？这一辩论——信不信由你——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现在还在进行着。1993年4月，剑桥大学的巴里·萨普尔教授以会长身份向英国经济史学会致词，就谈了所谓英国“失败”的问题，他的看法是：那些忧愁的人们言过其实。 (20)

1995年9月，在法国的蒙彼利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谈了同一问题，结论亦相似。1997年5月，另一批人在英国温莎官附近开会，讨论国家“霸权”——有多少国家的学者与会，“霸权”这个词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读法。特别注意的话题是：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这块老骨头要我们操心到何时？

要操心到永远。有各种理由：

一、这场争论使用的词汇暴露出词义混淆或者对争论之点的误解——这就产生出没完没了的分歧。人们在言谈中和文字中都提到“衰落”。 [268] 可是从物质意义上说，英国显然没有衰落。它在今天比100年前更富裕。诚然，有一些部门整个萎缩了。它也受到相对的衰落：另一些本来较穷的国家已超过它，比它更富。可是，相对衰落 这样的名词显得咬文嚼字，需要解释，用起来不带劲。所以人们谈论衰

落和更糟的字眼。主张用这一名词的人，是利用它来攻击政府或企业家阶级，或同时攻击二者，有时是着眼于政治目的。批评这一名词的人把这一名词的使用谴责为“衰落主义”——显然是一个坏东西。这样做，他们就拆毁了一个稻草人，使辩论变得没有意义。（21）

二、经济与政治合流。相对经济实力的衰落（丧失市场份额，丧失某些产业部门）意味着政治力量减弱，这至少是因为武装力量是要花钱的。今日英国已远非1914-1918年的“大英帝国”，甚至也不如1939-1945年的英国。英国现今的力量来自它拥有核武器，以及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且不论这一关系有多大价值。现在，失去相对的富强是叫人难受的，但这并不是软弱无力的痛苦。（22）民族主义是个性的表现，而且通过个性表现出尊严和自尊。当自己的国家变小了时，自己的自我也会变小。一个人经历和享受过大不列颠的伟大，就难以接受退潮。

感受在起作用。有些学者要求把这种失落感看做一种错觉——就像是一趟停住的列车的乘客见到另一趟列车从身边驶过时，会以为自己的列车是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一样。（23）此外，这种失落感难道不是必然来自别的强国的成长吗？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技术和产业的扩散必定会引起新的、往往是更大的对手的崛起。（24）英国不能不在地位上有所失落。但是，这一点并不会使失落感变得好受一些。感受是主观的，学者的客观冷静就像是一般人眼中的高雅鱼子酱：好看不好吃。

有人告诫我们说，呼唤民族虚荣心，是政客们干的事，“而政客们总是误导我们。”说到底，只能有一个第一名。所以，“如果说不能居首位就是失败，那么英国就算是败在与许多富国为伍……”可是，丧失第一名的地位，也是一样吗？我们被告知，那些记得昔日好时光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回忆从前长期居人之上的往事时，会感到最尖锐的痛苦。见到美国更富更强了，是一回事。可是还有法国，意大利！英国足球迷从英格兰西北部和中部到意大利的米兰看球赛，却发现意大利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更现代化，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自然，这种痛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过不了多久，还记得往事的人就

不会在人世了。此外，这世界上充满着更穷得多的人们。在先进工业俱乐部里，英国的排名也许是靠后了，但是跟墨西哥或印度比一比，还不是很得多。（25）

三、这问题还有宗教式信仰的一面，而信仰问题是最有争议不过的。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经济上的信仰，即对于自由贸易的信仰。自由贸易当初是从哪里来的？可是，英国一感到竞争的热度，英国国内的生产厂商就要求恢复贸易保护了。他们说，当英国充当世界工场的时候，自由贸易也许不错，可是如今别的国家生产的东西即使质量不那么好，价钱却更便宜。而且这些国家不是公平竞争。它们对外国货的进口设置关税及其他壁垒，而英国却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它们给自己的产业提供补贴，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向外推销（倾销）产品，为提高市场份额而运用种种“不公平”经营手法。结果，英国制造业的一个又一个部门发现自己被逼入困境，被迫削减投资，关闭工厂。

然而，自由贸易已成为一种信仰——不但信仰贸易带来的收益，而且信仰物质进步和国际交流所具有的创造和平与爱的力量。这逻辑是经济上的，是相对利益的理性。而这感情却是道义上的。不妨听听那位为英国商业利益四处奔走的约翰·鲍令 [269] 在回忆他对圣地（再好不过的地方）的一次访问，以及大谈贸易、和平及爱的时候，说了什么：

一个人从西方到东方，发现一位古老德鲁兹教派的穆斯林身上穿的衣服是由我们勤劳的同胞织造的，心中该感到多大的欣慰。当你到圣城，在拿撒勒跟一个旅行车队停留在一起，看到那里有4000人，却几乎找不出一个人的身上没有我们祖国提供的舒适生活用品或装饰品，你会多么高兴！和平及工业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远不止这些；因为可以确信，我们的国家在传播祝福的时候，她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她所服务的那些人的心中激起了对她的情感，而商业则是好事物的传递，是祝福的施与，这些是以前从未享有过的。（26）

一种学说会不会因为它自称为科学，就不那么带有信仰的味道

呢？请看威廉·杰文斯，英国政治经济学所崇拜的偶像之一，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危机期间，狠狠敲打异端邪说时，讲过的一番话：

贸易自由可以被看做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欢迎认真地调查贸易状况以及我们现时萧条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调查改变我们对自由贸易的看法，正如同数学学会不会让一个复杂问题的调查导致欧几里得原理被否定一样。（27）

因此，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为英国失去工业领先地位而担心，因为这样的担心可能被用来，而且也确实被用来对他们奉为神圣的原则提出异议。

四、立足于出口的经济在当时正失掉某些出口市场。在工会和政界的压力之下，英国政府对英国的钢铁、棉纺、煤炭等保留产业提供补贴和实行社会化。可是仍不见增长。人们见到的只是就业不足，经营方式墨守成规，以及令人痛苦的衰落。

至于新技术和新制造产业，开创的就业岗位没有那么多。剑桥经济史学家J.H.克拉彭指出，这样的转变是正常的：既然一些产业部门关闭，人们就只好离开它们，转到“某些正在扩展的行业，例如制造巧克力或参加合唱团”。他说这话是在1942年，倘若他能预见未来，他就会再添上披头士乐队。麻烦在于，有些这类行业受特定文化的限制，走不远，至少不能传遍全球。比方说，有些人不喜欢英国的巧克力，嫌它奶味太浓，太甜。但是它适合英国人的口味，孩子们喜欢它，在美国超级市场也有销售。众口难调嘛……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行业在社会和经济价值上可能不如老的产业。这正是张伯伦的论据之所在。但是，巴里·萨普尔认为，不见得。他问道：“香烟或坦克的生产就必定比护士或小提琴手的供应更有用吗？”这里是故意挑选这一对比，让人回答“否”。若作别样的对比——例如汽车或电脑对比电影或萨克斯管吹奏者——也许就会引出“是”的答案，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28）许多这类新产品在技能、知识及高工资就业机会方面，其效益都不如高技术产品。这就引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否某些活动比别的活动更有效？在这一点上，

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有尖锐分歧。但新经典学派会坚持说，一个美元的汉堡包与一个美元的电脑芯片相等；用李嘉图的话说，就是价值一英镑的波尔图葡萄酒等于价值一英镑的机纺棉布。持不同意见的人则显得奇怪地胆小，在逻辑和本能二者之间挣扎，低声地说不。

五、“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否失败了？”——一个引人上钩的问题。有一篇文章以此为标题，它给失败下的定义是：实际做到的，不如理性的行为本来所许可的那么好。（29）英国企业家是否由于性格、知识或理性的不足，而失去了赚更多钱的机会？这位历史经济学家（“新经济史学家”）的答案是：否。如果说英国在煤炭、钢铁或棉纺等产业上做得不如某些别的国家，那只是因为它不可能做得更好。煤层不够厚；在原有的较贫的铁矿砂采尽之前，富矿的开采可以靠后；快速纺机对英国优质棉纱不适用。要对比，就该考虑到方方面面。

不错，外国竞争对手采用了更快、更好的机器，而且越来越多。但是新的东西不见得更便宜，至少对于先采用者来说是如此。不要低估老设备的经久耐用和灵巧，手工技巧起作用，而一旦自动化就用不上了。即使英国有些设备陈旧了，把它们换掉也不一定合算。老机器早已收回成本，如今是产生纯利，利润率也许高于新机器。新设备也许效率更高，可是还得逐渐收回成本。

此外，有些事不是企业家所能掌握的。例如，英国产品的外在成本（关系成本）较高，因为英国铁路是窄轨，货车较小，桥梁较矮，公路较窄而且弯弯曲曲。当年货运量小，建造它们是合算的。如今它们有碍于规模经济，妨碍大批量生产。同样的，英国原已在制造厂家和潜在顾客之间建立了一套经纪人和多级经销人的制度。（30）这种安排当初有利于分工，后来则有碍于大交易。有些英国企业想方设法绕开了这类瓶颈，但这样的企业太少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许多生产上的改变在1914年以前还被认为是非必要和无利可图，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却逐一实行了。但来得太晚了。[270]人们还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采取了一些为时

已晚的补救措施，会不禁认为英国病就在于行动迟缓，企业便秘。

那些为英国的表现作辩护的人——不妨将他们称为乐观派——却认为，“市场份额、经营规模、资本密集度、资本收益及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迹象并不表明“企业落后”。（31）迟缓也不能说明这一点。他们说，为什么要那么重视棉纺、钢铁、化工之类的老产业？这些产业生产的是中间产品。那么消费工业呢？重要吗？经济的使命是让人们幸福，而不是创造“统计业绩”。（32）

所以，乐观派不注重棉花消费量、钢铁产量、硫酸产量等数字。它们太叫人心烦了。相反，他们重视总产值和生产率这些统计概念，认为它们“无疑远远优于”杂七杂八“挑选出来的某些产业的数据”。（33）总产值和生产率方面的数字首先给经济史学家，其次也给所有认为应该承认其表面价值的一般历史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数字似乎非常精确（带小数点后一两位数），而且，据某些计量史学家说，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如此这般，那些较老的各个产业的数据是以各自的直接计量单位为基础的，要比综合统计概念准确得多，可靠得多。上述的那些计量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统计数字变得对他们不利以后，也承认这一点。这是因为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英国之失去领先地位，已经更加明显。然后，从20世纪来看，生产率的比较也像产业数据一样，都说明英国地位进一步下降。这时，乐观派突然告诫读者说，宏观经济估算数字是不可靠的——“计算有任意性”，“衡量有误差和欠精确”，“误差幅度很大”；他们告诫说，国家综合数据是一个“脆弱的基础”，不要根据它来评价英国经济的强弱。（34）一位著名的乐观派学者干脆不承认别的国家（如美国）生产率高于英国的计算结果，认为它无价值或不可信：这样大的差距怎么会存在和持续存在？（35）

可是，这差距当然存在。它们只是不会持续保持原样而已。竞争的逐年记载表明，英国有些产业是整个地落后和萎缩——不是指这个或那个企业，而是说整个的产业。[271] 有时，这些产业的最后一些企

业搬迁到别的地方，通常是劳动力较便宜的地方，这做法聪明而又简单，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企业精神。有时，英国有些企业家也像从前的荷兰企业家一样，转变为过轻松日子，靠利息、股息和房地产为生。这也是出于理性，而不是企业精神。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办企业既费劲又冒风险，何苦呢？

六、企业精神重要吗？有些人会认为它重要，但有赖于经济增长。按照这种推理，英国的企业精神就吃亏于缺乏机会和扩张余地。“由于英国已经有庞大的工业设施，许多部门的设备都足以满足80年代和90年代的需求，因此，安装新设备的诱因和试用新方法的机会都受到了限制。”（36）所以我们的改变迟缓：既然已经有出色的瓦斯照明供应，又为什么要急于架设供电线路呢（答案：电更好更安全，即使不那样罗曼蒂克；而且电的功能也更多）？如果市政当局已经把大笔资金投入瓦斯的生产和分配，就更是如此了（37）（牵涉到更多的关系成本和既得利益）。

但是英国并不是英国工业的唯一市场。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英国工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是出口到国外，而国外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需求，要由动作更快和更机灵的供应者来满足，总之人人都行。有一位学者研究英国在亚洲的退却后指出：“在1960年和1980年之间，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进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分别由11.3%降到4.9%以及由8.9%降到3.0%，而日本在这两地所占的份额则由16.1%升到23%以及由7.3%升到18.8%，这种现象其实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日本企业提供了这两地迅速增长的经济所需要的东西，英国企业却没有这样做。”（38）

“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可以想象，企业像人一样，患了动脉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会老化。管理权的交接是一个困难而又容易引起怨恨的过程，使局内人与局外人斗，局内人彼此斗，有血缘关系者与有才干者斗，有血缘关系者彼此斗，有才干者互相斗。谁掌权，关系到如何选择产品和生产方法。英国人在探索新领域和新方式这一方面动作迟迟，相反总是强调在现有设备和职位上边干边学。这种在职实习有它的长处，但最稳妥的做法往往是墨守成规而

错过创新的机会。

历史学家和实干家都指出过，这种技术上和科学上的缺陷是英国丧失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计量历史学家”的乐观派则加以反驳，为英国在棉纺和钢铁等老产业方面的表现辩护。这些老产业曾使英国成为世界的工场。可是新的制造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产业又如何呢？早在1965年，一位剑桥经济史学家就要求学者们把目光放到“生铁和棉袜”之外，更多地注意肥皂、专卖药品、批量生产的食品以及轻工程设计，注意“那些与前辈一样充满活力和独创精神的企业家的生产”。（39）

可是徒然。英国企业的捍卫者们并未重视这些成功企业家的故事，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企业既少又小。第二次工业革命被错过了。最令人惊讶的失败，是有机化工（染料、塑料、药品）这一前景广阔的产业的流产。在这方面，英国本来是先驱和领头人，而且得天独厚，有着丰富的关键原材料（煤焦油），需求强劲（纺织业雄厚），然而，由于知识不够和缺乏想象力及企业精神，竟然败给了德国和瑞士，甚至不如法国。（40）管理当局没有致力于系统研究。19和20世纪之交的一位实干的化学工业家R.J.弗里斯维尔在1905年就曾遗憾地指出，那些主管化学工业的人“把种种科学发现看做是孤立的、彼此毫无联系的事件……认为它们只是偶然侥幸的发现”。起过关键作用的只是一些外来移民和为寻找机会而迁移的企业，这就毫不奇怪了。1886年，伊凡·莱文斯坦，一位犹太移民，因而是一位局外人，曾悲叹当局忽视非主流的新产业，“不够重视化学工业……科学家和制造厂家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或交往”。（41）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英国退出领先地位的程度。各工业国是一起开始办这些新产业，这些新发明的科学含量高，确保了知识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英国的机遇不亚于别国，或者比别国更好。英国在科学方面也不落后——不比18世纪时的法国更落后。但是，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英国更多注重的是纯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42）困难的一部分在于英国的教育制度：欧洲大陆国家是从政策上着眼兴办科技院校，而英国却是让这种教育如野草一般自生

自长，把它们当做是“正规”学校和大学的穷亲戚来予以对待。 [272]

有些人用外在因素，主要是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缺陷。他们试图说明英国由称霸地位退下来，是因为反企业、反物质主义的态度占了上风，而且对就业观念产生了不利后果。 (43) 教师、诗人、作家和知识分子——那些为价值规定调子和吹吹唱唱的人——养成了人们对车间和写字楼的蔑视。其要害是超脱于物质层面之上。在那些发现自己被庸俗的新来者推推挤挤的老精英分子中间，当然也在那些想要摆脱自己庸俗面相的庸俗新来者中间，这种傲气尤其流行。 (44) 势利眼是对傲慢者的报复，是有野心者的矫揉掩饰。另一些人反对这一说法，指出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态度。德国肯定有过反布尔乔亚的偏见。欧洲各地都有过。英国受这些陈腐偏见的影响少于周围国家。然而，人们可以争辩说，英国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变得更容易受影响，由于失望，对这些偏见的抵抗力也减弱了。

20世纪的英国要与别国并驾齐驱，真正需要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在电子器材、化学药品、光学仪器和玻璃以及发动机等方面来一番革新，奋发图强。有若干企业在这方面已开始作出成就。例如，帝国化学公司 (ICI)、皮尔金顿公司、格拉克斯公司、考陶尔德公司和邓禄普公司，都证明了创新的商业威力。可是这些榜样的经验并未得到推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多年中，英国（还有美国）在先进工业国俱乐部中处于落后的地位（见表26.1）。

这种差别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2.8%的年增长意味着100年增长16倍，而8%的年增长会在100年增长2200倍。这就是复利的力量。当然，任何国家也不能把8%的增长率一直保持100年，总会遇到相关的限制、意外的逆转、周期性的下降、政体的变化、外国的竞争以及对成就起催眠作用的腐化。即使是日本也在房地产和金融业方面遇到挫折，而日元汇率的升高则减低了国外对日本工业制品的需求。相比之下，英国工业受到北海石油的支撑，改善了吸引外国投资的环境，加上撒切尔政府挫败了工会头目的气焰，情况自80年代以来已有所好转。 [273]

表26.1 日、德、英、美四国年平均增长率

(1950-1987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日本	7.9%	8.0%
德国	4.6%	4.3%
英国	2.5%	2.8%
美国	3.2%	2.6%

资料来源：Porter , *Competitive Advantage* , 第279-280页。

最后再说说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所有工业国都是一片废墟，在当时的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美国占了一大半。在德国和日本作了几年清理并且有一个新的开始以后，195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世界其他最先进国家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到1960年仍高出一倍。 (45)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这样悬殊的领先地位。那些在后面跟进的国家直接跳到最新技术，超比例地取得进展（这就是追赶）。从1950年起，这些模仿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50-1973年期间高出1.82个百分点，1973-1987年期间高出1.31个百分点。 (46)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国际对比有任意性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所以到1990年左右已看不清楚，美国的人均收入是第一位还是第三位，它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否还会持续存在，其他的增长更快的国家的经济，加上若干新来者，究竟是在与美国趋同，还是将会超过它。 [274] 这些问题在90年代初变得更加模糊，因为日本陷入减速的阵痛，而美国经济仍继续增长。也许日本人已走到他们的“奇迹”的尽头。 [275]

不要担忧。美国的统计数据类似于当年荷兰和英国的退却：制造业份额减少；某些制造业部门整个地荒废；服务业有新就业机会，但工资通常较低；收入两极分化。 (47) 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失业率

仍较低（低于欧洲国家，但不比日本低），而且继续在新产业，包括与电脑相联系的高技术产业（软件和硬件）方面居主导地位，这都使人有理由保持信心（希望）。一份新报告提出的看法是：美国人虽然储蓄率较低（占收入的15%，而在日本占33%），但储蓄金得到较好的利用；德国和日本的资本生产率据统计只及美国水平的2/3。所以“我们能够把较多的经常收入用于投资，而又不损害未来的生活标准”。（48）同样地，日本虽然在制造业方面表现出色，但总的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只及美国水平的55%），因为日本农业受溺爱；服务业人浮于事，高度分割，缺乏竞争力；整个体制是致力于制造和维护既得利益，对消费者很不利。同时日元定值过高，以汇率为基础的国际比较就严重地偏向日本一边。现实却很不一样，日本人的住宅很不结实，而且面积狭小，所以拆旧房盖新房往往比寻找较好的住房更容易，除非是愿意搬到远郊区，每天经受上下班长途跋涉的磨难。

由此可见，情况是喜忧参半。经济学家，更不用说那些自封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政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意见如此分歧，我们就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因为这种分歧使我们回想起英国人已吵了100年的辩论。这种落潮是否会带来遭摒弃？证据是不是太多，因而每一派都可以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整个领先地位问题如今已变得无关紧要？我们现今是否已进入一个新的全球企业时代，以至于国别已不再有意义？

恐怕未必。

英国汽车工业的兴衰

汽车的发明本来应该有力推动英国的工业。它的机器制造和工程设计传统比任何一国都长，它当时拥有的金属加工技术工人比任何一国都多，潜在的需求曾经良好。英国人的收入水平当时居全欧洲之首，而且帝国的版图和领地还提供了受保护的海外市场。可是英国汽车工业上得很慢，先是坐视法国领先，然后看着美国领头。1913年，在美英两国10大汽车厂家中，英国只有一家，即马克斯韦尔，排名第

六，年产17000辆，而福特的年产量是202667辆。（49）

英国公路窄，弯弯曲曲，汽车厂家本来可以集中生产小车。有些人这样做了，但是英国汽车工业很早就偏重于制造既大又贵的轿车，它们适合富人的口味（许多富人雇有司机），每辆车带来较大的利润。结果，英国这一产业以车型繁多而著称（1913年有198个型号），每一型号产量少，造价高，还需要作大量调整和装配。有些观察家认为汽车制造商对需求估计不足。《泰晤士报》在1912年指出过：“没有一家公司……有足够的企业家眼光，来建造一个足够大的工厂，制造足够多的小汽车，从而大大降低汽车的生产成本。”（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美国福特公司采用装配线技术的推动之下，英国汽车工业开始有变化。一些英国公司买来了能用于批量生产的机器设备，开始使自己生产的型号标准化，尽管只是试探性地这样做，仿佛把脚伸到水里试试水温似的。换生产设备倒是不难。可是他们发现很难学美国人的样子，普遍提高工资以买得工人的合作。但是工作节奏加快，新技术又带来工作岗位减少，这痛苦不花钱是减轻不了的。英国奥斯汀汽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奥斯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参观福特公司的工厂，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工人们忙忙碌碌，干劲十足。他认为这是因为福特公司“雇佣了多种族的工人”（种族之间竞争？），而且装配线的不停转动迫使工人非快干不可。“我看了著名的福特车间……我感到兴趣和惊讶的是，那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拼命干活。”（51）

英国的资方不愿全面提高工资，他们宁愿仅仅有选择地奖励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人。所以他们墨守成规，实行计件工资。这起了一些作用，但有一个严重的不利之处：它把工作节奏交给工人掌握。照道理说，计件工资会使工人们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有些人无疑这样做了。但它也让另一些人自己定进度，只要一个班组感到既能拿奖励而又轻松舒服就行，整个班组随最慢的工人的速度干活。

这真是一种讽刺！在18世纪，英国人发明了工厂监工制度，以对付享有独立身份的农村工人。而到了这时，他们实行的制度却又让工

人享有相似的独立性。

就这样，英国人不愿改变习惯和强调个性，因而牺牲了生产率，他们还自以为美。一个英国人嘲笑美国的做法是“赶牛群的办法”。英国的汽车制造厂在生产方法和工资安排上当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奖金制度是资方最省劲的办法（决不要低估老板们也爱悠闲安逸，这脾气丝毫不比工人差）。从长远看，可省不了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造的汽车入侵英国市场，这时资方指责工人不勤快和精力不集中，工人则指责老板不能干和精力不集中。他们说都对。（52）

在一份劳动效率对比表上，英国的制度最差，美国和德国的制度强得多，日本的制度差不多是最佳。在当今不断迅速革新和尖锐竞争的世界上，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招惹了冲突。每一次改变工序和进度都会引起意见分歧；每一次商定一个解决办法都会引起失望；每一次得益都会变成既得权利不可侵犯；每一次吃亏都得想办法弥补；斤斤计较，谁也饶不了谁。正式罢工的统计数字并不惊人，但这些数字没有包括那些日常的怠工和工作间断、发怒以及劳资间的怨恨。

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的汽车工业最终走向衰落。全国登记的小汽车1951年是250万辆，1966年是950多万辆，1980年是1500多万辆，但其中的大赢家却是外国厂商，他们在英国市场占有的份额是：1965年为5%，1970年为14%，1978年为49%，1982年为58%。

（53）有些跨国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在英国设有子公司，但它们并未设法利用这些子公司的出口潜力，它们从别处出口更省事。（54）相反，他们利用欧洲共同市场的方便，从别处向英国进口零部件。通用汽车公司在英国出产的汽车，其零部件在英国当地制造者所占的比例，从1973年的98%下降到1983年的22%；同一期间福特车的这一比例则是从88%降到22%。如果把进口的零部件折合为整车，这就等于进口了15万辆。再加上整车的进口，英国1984年汽车市场销售量的2/3都是进口货。

英国人自己办的汽车公司在外国没有子公司，较少进口国外的零

部件（1945年，莫里斯，即后来的纳菲尔德勋爵，本来有机会收购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从而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可是他未予考虑，这一事例是意味深长的）。^{（55）} 英国人的办法是在国内搞合并，目的在于提倡合理分工，但仍徒劳。一些工厂关闭了，解雇了工人。在英国银行停止向失败的汽车工业贷款以后，情况更惨。没有新的现金怎么设计新的型号，没有新的型号又怎么卖车呢？这时国家作干预，从1975年到1984年共拨款24亿英镑作为补贴。到保守党政府推行的自由放任政策达到高潮时，则是让汽车制造厂商自力更生，自谋出路。^{（56）} 毫无办法。

到1989年，英国汽车工业经过一代人时间（1936-1968年）的兼并还剩下的一家大企业，即英国雷兰汽车公司（改名为ROVER集团），尽管它已经吞并几乎所有的厂家，但在国内汽车销量中所占的份额仅为13.6%。倘若不是外国公司在英国设立子公司，其中包括把英国当做通往欧洲共同市场的跳板的那些日本公司在英国设厂，那么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当时就已是走向没落。实际上，它已是依赖于美国、法国尤其是日本的跨国公司的“资金、设计和生产技术、管理办法、工作习惯以及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57）}

对于这一可悲历程的原因，像通常一样，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西德尼·波拉德是这样说的：“〔除了政府的政策以外〕衰落的其他因素有：管理不善，自满自足，劳资关系不良，产业结构过于零碎，金融机构不肯帮忙，以及国内市场相对停滞。”^{（58）} 首先的一条，就是管理不善——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不足的另一个说法。

注释

1 .见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一书，第850页。像日本人爱用“神风”解释日本历史一样，荷兰人和英格兰人把这次入侵的成功归因于“新教之风”——当时的强劲东风，它使得荷兰舰队加速驶过北海，而英格兰舰队则困在泰晤士河内出不来。——见同书第851页。

2 .见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Book I, ch.IX:《股利》。

3 .同上，BookI，ch.VIII：《工资》。

4 .引自Wallerstein，“Dutch Hegemony”，第98页。这些数字看似精确，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总的趋势是肯定无疑的。

5 .Vandenbroebee，“Regional Economy”，第170页指出，这些低工资产业向英国提出了严重挑战，英国人为机械化付出了代价。但这一点也反过来说明荷兰人为何失败：未实行机械化。

6 .上述情形主要见Israel，*The Dutch Republic*，第998-1003页。亦见Wallerstein，“Dutch Hegemony”。

7 .见Israel，*The Dutch Republic*，第1011页。

8 .关于威尼斯毛纺业的衰落，见Rapp，*Industry and Economic Decline*，第140-141页，148页及注释24；亦见Sella，“Rise and Fall”。贸易政策看来起了很坏的作用。关于资本流向大陆，见Woolf，“Venice and Terraferma”；亦见Ciriaco，“Venetian Economy”和“Venise et la Venetie”。

9 .参见van Zanden，“The Dutch economy in the Very Long run”一文。

10 .参见Mokyr，*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其中有荷兰和比利时工资对比。但荷兰的工资只在沿海地区高于比利时，而在内地则同样低，而且总的说来低于英格兰。Griffiths在*Industrial Retardation*一书第3页和62-65页指出，荷兰工业落后另有原因，而比利时当时已有强大工业基础，现代化较容易。它煤炭资源丰富，有超前机械化的棉纺业和毛纺业，冶金业传统虽老但有活力，在列日地区已有机器制造业的发端。荷兰工业一度强大，但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难以开动。

11 .Mokyr，*Lever of Riches* 一书，第260页，谈到卢德派一直反对在荷兰采用棉纺机器。

12 .见H.J.Koenen , *Voorlezingen over de geschiedenis der nijverheid in Nederland* (Haarlem , 1956 ,) 第140页 , 引用于Griffiths , *Industrial Retardation* , 第41页。

13 .见Peter W.Klein , *Traditionele ondernemers en economische groei in Nederland* , 1850-1914 (Haarlem , 1996) , 第3页 , 引用于Griffiths , *Industrial Retardation* , 第42页。

14 .见Griffiths , *Industrial Retardation* , 第121页。

15 .关于这后一时期 , 参看Pollard, *Peaceful Conquest*一书 , 第237-238页。荷兰悄悄进入现代工业世界一事 , 在经济史中一般很少提及。

16 .见Chaudhuri , *Trading World of Asia* , 第5页 , 引自1693年一版本。

17 .关于法国人的敏感性 , 参看Ratcliffe , “Great Britain and Tariff Reform”一文 , 第102页。

18 .关于钟表和美国制造业 , 见Landes , *Revolution in Time* , 第310-313页。关于枪械 , 见Smith , *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 ; Uselding* , “Technical Pro-gress at the Springfield Armory”。

19 .关于这一醒觉呼吁 , 见Rosenberg ,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es* 。

20 .见Supple , “Fear of Failing”。他那篇讲话大体上是复述Clapham在*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第3卷 (1938年版) 第3章中所表达的看法。

21 .参看Tomlinson , “Inventing“Decline”” ; 亦参看Supple , “Fear of Failing” , 第442-443页。

22 .萨普尔该文第444页谈到“令人不安的心理与政治影响”。

23 .萨普尔该文第444页，注释9，引用W.A.P.Manser, *Britain in the Balance* (1971年版)第179页谈到的看法。

24 .参看Clapham,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第2卷,第113页,他在阴郁的1932年论及1885年贸易危机时写道:“机械与工业运动已一劳永逸地成为国际的运动,在前进中已没有什么梯次.....发动机对所有的人都不留情面。机械上或科学上的产业垄断都是短命的。”在当时,克拉彭还不知道“趋同”一词,但他理解这一现象。他在该书第3卷第112页写道:“半个大陆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比一个小岛产出更多的煤炭和钢.....”强国就这样倒下去!

25 .关于英国幸运跻身于富国之列,见同上书,第3卷,第554页;McCloskey, *If You're so smart* ,第48页;Supple, “Fear of Failing”,第443页:“.....英国与其他先进社会之间的差别,远远小于先进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也远远没有那样重要)”。麦克洛斯基还怒斥一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麻烦在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谁是第一位,觉得当第一名优于第二名或第十四名。

26 .转引自Burn, *Age of Equipoise* ,第64页。

27 .见W.S.Jevons, *Methods of Social Reform*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883年版),第181-182页。

28 .麦克洛斯基给同胞们如下清凉安慰:“当日本人在汽车制造方面‘打败’美国人时,美国人的日子更好过,因为他们可以做他们更擅长的事情——例如办金融,或种大豆——而让日本人去造汽车或电子消费用品。”见McCloskey, “1066 and a Wave of Gadgets”, in McCloskey and Dormois, eds.,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第21页。

29 .见McCloske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第2卷,第3页(1970年版)。

30 .参看Wilso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 ,第90-93页。人们本

来会期待这些暧昧的销售商把事情整理出头绪，将注意力集中于利润较高的品牌，或期待制造厂家建立他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网，如同美国人及稍后日本人的做法一样。

31 .见Peter H.Lindert and Keith Trace in McCloskey, ed. , *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 , 第242页。

32 .见Wilson , “Economy and Society” , 第185页和130页。

33 .引文见Dintenfass , “*Converging Accounts* ” , 第22页。乐观派同样无视于企业界关于表现不佳的陈述。见Edgerton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British Business History”和Science, Technology , 第11页。工商史方面的悲观派看法, 见Coleman and MacLeod , “Attitudes to New Techniques”。

34 .见Floud , “Britain” , in Floud and McCloskey, eds. , *Economic History* , 第1版 , 卷2 , 第23页。

35 .见McCloskey ,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 in McCloskey, ed. , *Essays on a Mature Economy* , 第286-287页。

36 .见Habakkuk ,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 第212页。

37 .参看Clapham , *Economic History* , 第3卷 , 第131页。

38 .见Davenport-Hines and Jones, eds. , *British Business in Asia* , 第21页。关于英国钢铁业 , 情况亦相似。在印度市场上 , 英国钢铁业占有天时地利 , 但销售份额却日益下降 : 1885/86年度英国销售额为98000英镑 , 比利时销售额仅8000英镑 , 而到1895/96年度 , 比利时销售额升至28万英镑 , 超过英国的274000英镑。见Saul ,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 第199页。

39 .见Charles Wilson , “Economy and Society” , 和Payne ,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40 .詹姆斯·福尔曼—佩克认为英国失去这一领先地位无关紧要，“不过是另一种国际专业化模式”。见Foreman-Peck, “The Balance of Technological Transfers 1870-1914” in Mc-Closkey and Dornois, eds., *British Industrial “Decline”*, 第11页。Pollard, *Britain’s Prime* 第3章中说染料不过是小玩意。

41 .弗里斯维尔和莱文斯坦的话，引自Haber, *Chemical Industry*, 第168页。（乐观派不喜欢这些实干家的意见，因而斥之为自私自利言论。）英国化工界最著名的犹太人是布鲁纳和蒙德，他们合伙办的公司是制碱业第一家，引进了索尔维氨碱法工艺，但未能带动该行业其他厂家改革其陈旧技术，仅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实行贸易限制。布鲁纳和蒙德公司则获取了垄断收益。

42 .Rubinstein, *Capitalism, Culture and Decline*, 第94-96页大谈英国在纯科学方面的贡献之大，及所获诺贝尔奖异常之多，但几乎不谈应用科学，只承认大部分科学成果在别国得到利用。电力工业中，工程技术至关重要，而Byatt在*British Electrical Industry* 一书第188-190页指出英国企业家不善于发挥工程师的作用。

43 .见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第5章；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第212页谈到：“英国人对职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习惯和惰性影响，这无疑地使英国许多有才干的人不去经商，而是从事别的事业。”另一方面，见Dintenfass, *Decline*, 第61-64页。

44 .参看Livingston, “Gentlemen, Theory of the”。崇尚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精神，也反映在许多英国人到美国旅行后所写的回忆录之中。

45 .见Abramovitz and David, “Convergence and Deferred Catch-up”, 第26-27页。作比较的16个先进工业国是欧洲12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外加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美国。

46 .同上，第27页，表1。

47 .见Steven A.Holmes，“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Poorest and Richest Rises”，*N.Y.Times*，1996年6月20日，A-1版；Keith Bradsher，“More Evidence：Rich Get Ric-her”，*N.Y.Times*，1996年6月22日，A-31版。Krugman在*Pop Internationalism* 一书中强调他反对那种将美国的后退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前进相联系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与过去一些国家之丧失领先地位，有相似之处。

48 .见Robert Samuelson，“Is There a Savings Gap?”，*Newsweek*，1996年6月17日，第56页。其中引述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一项研究报告。

49 .见Lewchuk，*American Technology*，第117页。

50 .同上，第117页。在战前三个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只有英国满足不了国内需求。当时法国汽车产量中一多半供出口，是世界首要汽车出口国。

51 .同上，第171-172页。

52 .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中管理不善的事例研究，见Church，“Deconstructing Nuffield”。关于贪图安逸的现象，丘奇提到（第572页），纳菲尔德每年都乘坐自己舒适的游轮，到澳大利亚，来回逛一个月，船速慢，在甲板上好玩掷环套桩游戏。

53 .见Pollard，*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第242-243页。

54 .Channon，*Strategy and Structure*，第109页指出：“他们的战略无助于英国汽车工业的长期发展。”

55 .见Church，“Deconstructing Nuffield”，第578页，注释127。

56 .见Pollard ,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 第400页。

57 .见Church, *Rise and Decline* , 第77、104、115等页 , 及“Effects of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58 .见Pollard ,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 第401页。

第27章 赢家和.....

殖民时代的竞争最终导致世界战争，战争实现了财富的重新分配，战争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在20世纪的后半叶，日本、德国的崛起标志着新一轮竞争开始。

20世纪有两个明显的转折点：1914年和1945年。第一个年份标志着所谓的大战——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冲突之一——的开始。那一场为期4年的战争造成了1000万人丧生，还有更多的人伤残或者发育不良。它还使一个繁荣向上的欧洲变得衰弱不堪。那场悲剧源于那些愚蠢的国王、政客和将军们，他们想要打仗又打得一塌糊涂；同时也是源于人们容易上当受骗的虚荣心，他们曾以为战争是一场聚会，可以展示五颜六色的漂亮军装、男人的勇敢、女人的赞美、盛大的阅兵式以及不朽青春的豪迈情怀。 [276]

殖民战争本来应该提供过警告，可是白人用自动的和能反复装弹的武器扫射“野蛮人”，使这些白人心满意足。英国人在南非打了一场布尔战争，自己也伤亡累累，本来应该让人们对战小心谨慎一些。可是丝毫也没有。10年之后，当机关枪在西欧佛兰德战场上扫射时，人们才似乎大吃一惊。感觉迟钝的指挥官们推断说，哪一支军队能有人挺到最后继续射击，它就会胜利，这真是毫无瑕疵的逻辑。通常都是骑在马背上的将军们得到了提升，荣誉和地位一应俱全。他们的士兵则倒毙在泥泞之中。

战争的损害因为和平的谬误而进一步加重了。这样说也许不公平，政治家和外交官们身上背着仇恨和复仇心的包袱，没有什么理智思考的余地。法国能对德国慷慨大度吗？1870年，德国入侵法国，自己没有死多少人，自己国土也没有受到损失，却利用它的胜利从法国勒索了一大笔赔偿。这一次又是德国入侵法国，杀死了一百好几十万法国人，蹂躏了法国最富庶的工业区，只是到了盟军快要攻入德国本

土时才匆忙撤出。法国能忍气吞声，善罢甘休吗？这笔损失账怎么算？恶人能没有恶报吗？倘若又是德国打赢了，那又会是怎样？

国内形势呢？德国人在1918年并不是投降，而是签了一项停战协定。他们打败了，但并未承认失败。心怀不满和沙文主义十足的德国人（以及奥国人）叫喊自己被叛卖了，是背后被人捅了一刀。坏蛋就在国内，首先是犹太人，还有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二者狼狈为奸。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崩溃了，先是打内战，然后是布尔什维克当权，这一政权在各国都挑起了是要革命还是要维持现状的日渐恶化的冲突。苏联统治者可能是暂时安于“一国革命”，但是在国外的代理人却与当地的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到处对财产、等级和秩序构成内在的威胁。

由此而出现的极端反应，就是法西斯主义，它包含多样的内容，主张建立一个独裁统治下的工团主义的、有地位意识的社会。当时的政界人士认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代表极左，法西斯主义代表极右，强调二者的区别。事实上，两个极端走到了一起，在蔑视民主、憎恶资产阶级价值观、自认为代表美德、强调国家指导经济而不是市场引导经济等方面，二者是彼此相似的。它们双方都否认彼此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有不少人由一个极端滑到了另一个极端，这证明它们有兼容性。

1945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胜利和失败、天启和毁灭、宽慰和绝望、欢乐和苦恼兼而有之的一年。在几年战争期间，人类经历了闻所未闻的残忍凶暴：5500万人阵亡了，3500万人负伤，300万人失踪，死亡的平民约达3000万人，其中包括600万欧洲犹太人。有些幸存者希望战争从此变成了不可设想的事情，以此安慰自己。另一些人怀有不可治愈的心灵创伤和怨愤。还有一些人决心为建立一个较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这些反应往往是融合在同一个人的心中，引发出各种不同的目标和手段。有一些大目标是相同的：经济恢复和修补，物质生活改善，和平与幸福。它们如同母爱一样，人人都赞成。尽管有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共识，1945年以后的世界却受到一种对立驱动，它以布尔乔亚

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一方，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为另一方。这一冲突在战争期间沉寂了，因为大家需要合作，来对付那个为追求种族“纯洁”和统治世界而发了狂的德国。

当初，人们对德国威胁的反应既迟缓，又不是心甘情愿。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乡怎么会变成兽性的渊藪而威胁所有的人？^[277]而且，在经历了一次愚蠢的大战之后，还能有什么理由再打一场大战？疲惫和恐惧造成了人们对邪恶的无条件容忍；只要受害的是别人，是远方的人，就容忍。只是到了人们已经看清德国的胃口越吃越大，而且苏德条约让德国再无后顾之忧而放手侵略西方时，民主国家的政府才面对现实而宣战。

它们干得不好；德国控制了几乎整个西欧大陆，然后又掉转头向东进攻苏联。苏联本来跟魔鬼睡觉，如今尝到魔鬼毒牙的厉害。这时，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西方向苏联倾注大量物资，播放俄国歌曲，美化“约瑟夫大叔”斯大林和红军的形象，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进行两条战线的战争。来自殖民地的士兵们竭力帮助他们的主人。苏联人伤亡最重：在将近两亿的人口之中，死伤者超过1/4（德国人也损失惨重，但那是他们企图统治世界的代价）。在此期间，西方盟国不自觉地成为苏联间谍——包括隐藏在内部的和从外部打进来的间谍——提供了掩护。军事合作并未消除根本的分歧，共产党政府决心利用同盟关系为战后的成功奠定基础。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两种制度之间的冷战就开始了，更准确地说，是又恢复了。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的市场经济把大萧条和战时的损失甩到了身后，进入了空前大增长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耽误已久的技术革新终于来临。以法国为例，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停顿以后，又遭到战争和沦陷的浩劫，到1948年，经济尚相当于1900年的水平，而且疲惫不堪。巴黎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车辆，不需要交通信号灯，也不需要单行线；汽车夜间都得锁在车库里；加油站用手柄泵油。许多人家的供电都低到3安培，只够用于一个电灯泡，一台收音机，或一把电熨斗；若负荷再大一点，保险丝就会烧断（没有现成的

保险丝接头，人们要自己买一定电阻的保险丝，回家来自己把它绕到接头上）。巴黎有些民宅没有电，公寓楼内通常只有公用厕所，幸运者（有钱者）的厕所在室内，其余的人要到天井去上厕所（试设想一下：每次急于大小便时，都得上上下下爬五段或六段楼梯。法国人说那对锻炼腿力有好处）。富人家里常常是一间室内厕所供自己用，仆人们用另一个室外的厕所；供热水的水龙头也是自己用，厨房里只供冷水。在洛泽尔省——一个公认的贫困地区——全省当时只有3个浴缸，据说一个在省长官邸，一个在“现代饭店”，第三个在哪儿，谁也说不清。许多地方有浴缸却不是用于洗澡，而是用来存放柴火或炉灰。电冰箱鲜为人知，人们一般只用放置冰块的食品柜或冷藏室。人们若不是一次采购几天用的食品，就用不着电冰箱，而要一次采购那么多食品，就需要有一个食品齐全的商场，而且要有自己的小汽车把东西运回家，要在楼内有电梯把大包小包和瓶瓶罐罐送上楼。膝盖骨连着胫骨，胫骨连着踝骨，踝骨连着脚骨，缺了哪一截都不行。当时的法国实际上还没有进入20世纪。

在那以后的30年——从1945到1975这30年在法国叫做光辉的30年——法国大踏步进入了20世纪。新的建设，新的工业设施，新的道路网——一切都是新的，这就有机会采用最新式的设备，实行电气化，机械化，摩托化。汽车和电话最说明问题。它们原先被看做是富人的奢侈品，如今成了大家的必需品。1953年，仅8%的法国工人拥有汽车；14年后，这一比例升到了50%。从1954年到1970年，拥有汽车的家庭由22.5%增加到56.8%。街道日日夜夜都塞满了汽车。直到战后仍然依靠马车运货的农庄，现在都用上了汽车。高峰时间的交通堵塞令人痛苦不堪；像巴黎这样的一些城市开始测量空气污染，警告市民们提防不可避免的有毒物质。可是谁也不在乎，汽车带来的行动自由压倒了一切。此外，能够吸高卢牌香烟的民族，吸什么都不在话下。

从前，人们要打长途电话，需要坐在咖啡店里排队等候几个钟头（同时还得喝点什么和玩玩牌，因为咖啡店老板也得挣钱过日子），而如今在自己家里就打电话了。可是装电话机曾经要等上一两年，巴黎等城市的电话交换站的线路全被挤满了，而兼管电话服务的邮电局

对装电话之难没有什么同情心。租房给外国人用的人家若有一部电话，都会大事张扬一番。然而，爱用电话的不只是外国人，打电话是会上瘾的，而法国人又最能侃。最后，邮电局把电话业务分出来，政府成立了法国电信公司专管此事，为这一行业的自主性、首创性以及对市场作为反应的灵活性迈出了必要的一步。

在这整个期间，法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都接受政府的指导和计划，其程度高于欧洲其他国家。这符合法国的传统：早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实行过柯尔贝尔的办法 [278]，而且优秀人才都出自官办的综合工科大学、矿冶大学、师范大学等名牌学校。战后又兴办了国立行政学校，其历届毕业生成为羽毛渐丰的行政官员和未来的当权派，因此由该校缩写ENA演化出一个名词énarques（国立行政学校出身而身居高位的官员）。

政府的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推行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其中有一部分还得到私营企业的合作。这涉及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和邮电以及住房和机器设备。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在高速铁路等领域，法国成了世界的领头人。这些举措是否全部赢利，并不清楚，因为国家明里暗里的补贴模糊了市场的现实。但是享受优惠的铁路旅客，尤其是有资格买减价票的旅客（例如国家雇员），乘坐着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在最平展的铁路上旅行，是何等惬意！法国从来不是标准化的工业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者。法国人通常在德国或意大利购买家用机器，在收入提高以后，较富裕的法国人往往从德国购买小汽车。可是法国货依然以品质取胜，在品位或口味以及美观方面出类拔萃。法国乡间依然是属于世界最美的地方，有天然美和人工美的结合，是旅游的天堂。到20世纪90年代，法国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收入水平比它的老对手英国高出1/4。老的大宗产品的产量下降了；法国也没有学会批量生产电脑时代的高技术产品。然而在酒和奶酪以及纺织品和时装方面，它仍然领先。

有一点既是法国人的长处又是他们的弱点，那就是他们的自豪感。他们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而且他们不像英国人，不甘心于失去权势。这一点妨碍了他们向外国人学习。他们坚持自己的做法。今

天，法国工人享有国家慷慨提供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极优厚的医疗补助和儿童补助，还有另一些有利的既得特权（长长的领工资休假，早早的退休年龄）。这一切，加上文化上的优良传统，使法国成为老年人安享天年的极佳国度。但是这一切也使得雇主们不愿多招工，因为每雇用一个人就添一份相关费用和潜在的义务。结果是失业率高，年轻人尤其吃亏。国家为社会安宁操心（卡车司机动不动就封住公路，跟他们还能怎样和平地讲理呢？），宁愿保持这些社会福利安排，不敢把它们降低，可是又希望让更多的人就业。相信自由市场价值和坚信适者生存原则的美国和另一些国家，向法国人提过大量建议。法国人的回答是：走开；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教训。尤其不要你们美国人的教训，瞧瞧你们自己的犯罪、种族对抗和不成功的同化吧。

德国的东山再起比法国更惊人。战争使德国满目疮痍，剩下的一点东西也大多被俄国人拿走了——俄国人满有理由让德国人赔偿他们在俄国造成的破坏和掠夺，只不过是拿走了德国机器和材料以后，有时不知道怎样用它们。德国公路旁堆了不少废旧钢铁，任它锈烂。别国的废料也比德国废料强。在1945年，德国人缺少热水和肥皂，只好不再洗澡。年轻妇女为了一包香烟就跟占领军的大兵睡觉。可以看见身穿西装扎着领带的绅士们捡马粪，搬回去作燃料。

德国人的日子如此艰难屈辱，却没有人同情他们。同盟国有些专家主张把德国田园化，不再让它有工业。另一些专家争辩说，要德国赔偿，就总得让它有点工业，可以限定为1938年产值水平的一半。然而，在冷战的需要面前，这类报复性计划都告吹了。西方需要德国。因此，这一次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种强制性的（往往是徒劳的）索赔，相反，战胜国向战败国提供了大量援助。苏联侵略的威胁压倒了一切。

但是，功劳应该首先归于德国人的干劲和勤劳。1945年，他们的货币分文不值。唯一管用的钱是美元，或是香烟，所以美国兵不论是否吸烟，都每人每星期发一条香烟 [279]（我本人就曾经用5条香烟买了一辆哈利牌小汽缸摩托车——那做法严格讲是犯规的）。在随后的几年，冬季寒冷，食品和燃料短缺，还得没完没了地清除瓦砾，还有

政治上的收拾，即使不算是政治报复也罢。1948年，发行了新货币，1个德意志马克兑换旧币10个帝国马克。物价管制放开了，囤积的东西拿出来卖了。随之经济起飞。（1）20年后，德意志马克就像瑞士法郎一样，成为欧洲最强劲的货币。新工厂四处崛起，德国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享有经久耐用和设计完美的无上信誉。

德国的“经济奇迹”蔚为壮观，而日本的“经济奇迹”就更了不起。战时美军的轰炸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和伤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人的民房容易燃烧。同时，从未战败过的日本民族当时倔强地拒绝承认他们大势已去。到战争末期，美军掌握了制空权，能任意轰炸。尽管这样，还是等到原子弹扔下去，才说服了天皇及其军政幕僚宣布投降（但直到最后仍有一些人不肯投降）。（2）

日本人像德国人一样，也是靠辛劳、教育和决心得以恢复。他们也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其目的如同在欧洲一样，是抵御想象中的俄国威胁。日本经济是在丧失帝国种种优势之后迅速发展，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战前，日本一直相信原料的控制权是国力与财富的必备先决条件，正是为了这一控制权而开战。战后，这一控制权丧失得干干净净，可是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了经济学家早就讲过的一条道理：只要有钱，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以具有竞争力的条件买到原料。日本在战前很难跟西方国家做生意，那是因为日本当时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引起别国的戒心和报复。而到了战后，日本人懂得了，买东西要比掠夺东西好得多。

日本人动作之快，令许多竞争对手惊讶。有些技术知识被他们掌握，是因为外国厂商让日本人承担来料加工，制造一些东西（如手表和汽车零件），再交回去贴上外国商标当外国货出售。日本人把西方的东西拆开，以反向设计的办法加以仿造，而且力争做得更好。他们还派代表团出访西方各国，谦卑地请教，观察，提问，照相和录音录像。“谦卑”是个关键字眼：日本人本来极其骄傲，但正是他们的自豪感把谦恭上升为一门艺术和一种美德。那些鞠躬弯腰、低声下气的使团，往往吃惊地发现他们的东道主坦率开放，在美国尤其是如此。可是为什么不开放呢？美国人当时以为他们用不着担心这些被打败了的

小日本人。（3）

日本人由模仿走向创新的本领，格外令人惊叹。参观日本商品陈列室是开眼界的：东西看上去面熟，但的确有创新。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汽车制造，这门产业对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要求五花八门，变化多端，它上去了，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大部分其他产业。此外，日本人还注意最先进和最苛求的高技术产品，例如光学器材，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机器人以及电子产品。战前，高品质照相机几乎是由德国人垄断的，莱卡和蔡司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名牌。到20世纪末期，莱卡还在，但价钱比品质相当的日本照相机贵两倍。对于有钱的人来说，贵不贵无所谓。但是大多数的顾客，包括职业摄影师在内，都会在莱卡面前望而却步。于是日本人占领了市场，别人只能有一小份。

所有这些成就还得力于一件事：世界上最有效的质量监督。战前，日本货被人瞧不起，蹩脚，华而不实，不可靠，只能交给廉价店去卖。当时经济萧条，需求受严格限制，这也是日本货卖不动的一个原因。战后，经济增长，百业兴旺，后来居上，日本造的小汽车、照相机、电视机和微计算器都成为高质量货。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部分地说来，他们是受启发于美国的榜样，尤其是遵从W.爱德华兹·戴明的质量监督理论，所以戴明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但仅有理论还不够。日本人是靠了集体负责的精神——谁都不让同事的努力白费——而造就了有效率的团结协作，劳资之间彼此沟通思想，一丝不苟以消灭差错（零误差）。

与日本竞争的老工业国迟迟才醒过来，人们开始找原因，指责别人，就是不责备自己。他们的第一个借口是，日本人不是公平竞争，进入了外国市场，自己的市场却不向外国人开放。这话不无道理，可是日本人也不过是学欧美国家早先的做法：保护自己，直到自己成长壮大不必再担心竞争为止。在德川和明治时期（自19世纪50年代到1900年），日本受条约限制而不得征收关税，那时对外国货的抵制，首先来自消费者根深蒂固的爱用国货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制定了一些规章条例来折磨进口商，门户开放时期让他们学会了贸易方面的非关税壁垒。一旦日本可以征税了，他们把关税率定得高高

的，以保护本国工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政策的风向变了。战前的30年代，各工业国关门闭户以邻为壑，结果都吃尽苦头，这一教训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好处，它不但有利于经济繁荣，还有利于国际和睦。这种看法自然远非大家一致，但在美国带头推动下，外交界和专家们敦促人人开放。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追随百年之前的英国先例：它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富、最强大的经济，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保护主义习性，尽管由于频繁的选举和政治交易，要完全消除不同的声音亦非易事（有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举止几近荒唐。战争期间，美国人学会了制造一种苦艾酒以替代法国货和意大利货。战后，外国正宗货又来了，美国这一幼稚产业发现难以竞争，就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要求保护，差一点得逞）。

日本跟从了这一放宽贸易限制的趋势，但树立了种种非关税壁垒，其高明无人能比。^[280]日本人别出心裁，无理刁难，成为奇谈。外国棒球拍运到时，要钻眼检查是否全为木制。新式高技术医疗设备通常允许进口，但是它们的使用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到日本人自己造出同样设备才解除禁令）。汽车来了，要拆卸里外检查，然后才能出售。有一次，日本人对法国滑雪板进口日增感到头痛，企图借口日本的雪有所不同而加以排除。法国人针锋相对，扬言法国的公路有所不同而要取消日本摩托车的进口。日本人无奈，只好放弃原计划。

这种种烦人的做法都表现出狡猾奸诈，无休无止的拖延、规避和多变，而且还总是显出彬彬有礼一本正经的样子。从长远看，更严重的是它们妨碍商业联系，妨碍采购较便宜的进口货。日本人并不认为市场是开阔的空间，而是把它分隔成一块一块，谁要是越界买了进口货，就会被警告说，一旦进口货无以为继，就别指望任何日本供应商来帮忙。

什么样的进口货能进呢？主要是外国特产的名牌，例如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比利时和瑞士巧克力，富伊顿行李箱，帕特克和劳力士手表，意大利设计师的服装，等等。这些东西不论是用来送礼

还是用以炫耀自己，都是响当当的。日本所有的大百货商店都有专门的柜台出售这些东西。愿意花100美元买一个系缎带的超级西瓜的人，摆得起这个阔气。可是，柯达胶卷进不来，日本人有自己的富士胶卷——而且日本的光线有所不同。

这种重商主义政策引起了贸易“伙伴”的愤怒，而且使一些经济学家迷惑不解。难道日本人不懂得这种政策是蓄意让自己的老百姓受穷，不让人们少花钱买东西？日本人尽管有时也犯错误，但绝非傻瓜。那么，他们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吗？他们不知道自由贸易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添财富吗？

对于这一类争论性问题，日本人的答复是：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低物价和折扣推销，而在于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工业和军事实力。^[281]生产者比消费者更重要。任何人都会买，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造。如果人们现在少花费，就会多储蓄（约占收入的1/3）。他们的孩子会更富，日本会更强。

按照某些尺度衡量，日本人现在也许是世界上的首富，而在他们的后面，又出现了“四小虎”（或称“四小龙”）。其中的两个原是日本的殖民地，即韩国和台湾。另外两个，新加坡和香港，可视为与中世纪后期意大利那些工商业中心相似的城邦。^{（4）}过去35年来，它们的经济增长之快及其持续之久，均属世所罕见。它们的首要财富都是勤劳，以低工资造出高产值；而且跟日本一样，它们都有格外灵巧的手工，那是由于用筷子吃饭而练就的本事，它在微装配作业中特别有用（我的同事们觉得我这一说法好笑，但是我坚持。现代装配作业有许多都靠小镊子完成，而从小用筷子吃饭，最能锻炼这一技巧）^[282]。

这四个地方都有高技巧、低工资的劳动力，因此，它们——加上尾随它们的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对外国先进企业，尤其是其本国货币定值过高的国家的企业，具有吸引力。^[283]日本人之所以愿意在国外制造产品，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元定值过高。资本的流动性之高，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工业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

长率，为世界贸易额增长率的5倍，世界产值增长率的10倍。资本流动在90年代有所放慢，但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增长。(5)

就这样，资金和技术不断从一国流往另一国，各地工资也相应上涨。韩国迈入了汽车制造业，是靠了美国公司的订货和技术援助，那些美国公司这样做，是为了应付日本竞争的沉重压力。瑞士人和日本人都在香港、然后还在马来西亚委托加工手表及其零件。日本电气公司和索尼公司、欧洲的飞利浦公司和罗莱公司、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和海门技术公司等跨国公司使新加坡成为世界的一个电子器材和摄影器材生产中心。香港过去有难民劳工，他们满足于低工资，夜里在机器之间铺个垫子就可以睡觉，而现在香港商人却忙于在内地建工厂和租借工程。新加坡已经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订购电话。

没有任何一国的经济先进到能免受渗透的程度。没有任何一道墙高到能挡住外资。到1996年末，已有30多家韩国公司在英国制造产品。由于外资，主要是亚洲的投资，威尔士庆幸自己经济得到“振兴”。当第一家韩国公司在威尔士设厂招工，300个职位，申请者多达5000余人。别的欧洲国家欢迎外资的热情低一些。在法国，韩国的大宇电器公司曾同意接管汤姆森多媒体公司的消费电器分部。该部生产的RCA商标电视机是名牌货。大宇若接管成功，就会超过索尼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者。可是，这笔交易半途夭折。韩国人对此很气愤。[284]

在选择投资目标地区时，工资高低显然是决定性因素，但也会考虑到别的因素，如打破市场壁垒，以及当地民众情绪。美国人对外投资时，发现在韩国找伙伴比在日本花钱少得多，而且也容易合作得多。日本人在韩国投资办厂时，则很快发现工资上涨，就撤走另找花钱少的地方，而韩国人大概也乐于见到日本人走开。

(马来西亚的情况呢？它人口仅1900万，劳动力，至少是非熟练工人，不易招募。但它有企业家，他们像磁铁一样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劳工。尽管政府大力防止非法移民，可是非法移民依然大量涌入，主

要来自印尼〔人口为19000万〕和孟加拉国〔人口为11500万〕。像别处一样，那里的人口贩运业很兴旺，偷运人口收入奇高。这些外来者从外表看来与当地入似乎无大差别，但当然有差别。当地人头疼的倒不是竞争就业，而是性混乱。马来西亚总理谈到过乡村领导人的诉苦：姑娘们逃出去交外国男朋友，有些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的姑娘被人抛弃，有些已婚妇女弃家私奔，因为跟外国入也许日子过得更好。

(6) 真叫人受不了。)

民族关系也起作用，海外华人之间尤其如此。这些华人在当地是少数民族，却是出类拔萃的经商者，是东南亚贸易的酵母和润滑剂，而且从东南亚遍及世界各地。他们的勤劳美德令信奉韦伯学说的加尔文派教徒也自叹弗如，而且这一美德还代代相传，贫富都一样。

(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头一次到香港时的一件事。一天晚上，我从旅馆外出，路过一家挤在楼梯底下的小照相器材店。我只是随便看了一眼，那店主马上问我要点什么。我原本不想买什么，经他一问，我想起我可能要用一个特殊的镜头。他失望地说店里没有，但又热心地说，如果我过一会儿回来，他会弄到一个给我。我告诉他，我是去参加一个晚宴，最早也要到午夜以后才能回来。“别担心，”他说，“你回来。我拿镜头等你。”过了半夜，我回到旅馆房间，想起镜头的事，但是我又困又累，心想那人也不会等了，何必再浪费时间。然而我又一转念不能说话不算话，就再去那个小店，果然发现店门还开着，那个人还在，把镜头交给了我。倘若店主是美国人或欧洲人，谁会这样做？)

从荷兰人统治印尼和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以及后来法国人统治印度支那的时候起，华人就在当地经济成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些国家独立以后，华人在当地的生意继续兴旺。(7) 各国的华人之间建立了跨国伙伴关系。他们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伸展到泰国。泰国的华人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社会，许多人起了泰人的姓名。^[285] 他们也延伸到马来西亚，成为那里的商贸骨干，但出于民族和睦的考虑，他们也得接纳马来人作伙伴。^[286] 泰国自豪地声称它能超越民族区别，其措施之一是强烈反对单独的华文教育。华人彬彬有

礼地微笑，公开表示赞成，然而往往在接受泰文教育之外，又出国补习华文。在这个社会里，“两三种人玩一个无形的跷跷板”，保持平衡。（8）在经济事务中，这意味着华人知道自己是谁，也能与人合作。

在马来西亚，民族区别要尖锐一些，怨气较大。那里也有暴力和种族骚乱，当然绝非像印尼那样糟糕，但也构成一个问题。因此大家都尽量压低民族分歧。在西北沿海的槟榔屿，那里出产世界上40%以上的磁盘驱动器，大部分的经理和工程师职务都是由华人担任。一位经理形容说，“他们更像是美国人，他们生活就是为了工作。”（9）这样，就像是一个贵族阶层，因为多数人是工作为了生活。

迎着经济增长的浪潮，世界各地的华人商人和企业家结成的网络日益壮大。由于这一大批海外华人的成就，人们就有理由把所谓的东亚和东南亚奇迹称之为民族的胜利，即文化的胜利。在印尼，华人占人口的4%，而在20世纪初 [287] 全国最大的25家实业集团中，有17家是掌握在华人手中。在泰国，华人占人口的10%，而90%以上的最富家庭是华人，他们在全国工商业财富中也占有同样的比例。他们没有把所有财富占尽，与其说是由于本地人的竞争，不如说是由于华人内部的政治家不希望把事情弄成那样子；他们已经建立了享有特权的的企业，希望别人也多多少少得一份好处。

如果把中国包括在内，但是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排除在外，华人控制的实业总产值有多少呢？据说在1990年为2.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2.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而增长速度比日本和美国都更加快。（10）有些人觉得日本领先的势头已成过去。（11）日本人的长处和短处二者皆在于他们的民族特殊感和优越感。这一点促使他们出色工作，但也使得他们难以与别人平等共事。[288] 不过，我个人的感觉是，日本人还会学习，一如既往。

怎样看待东亚的成就，还需注意两点。第一点涉及从种植园产业到自主企业的晋升。使用现代技术比发明现代技术容易得多。在浩瀚如海的工业专利权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家。

如今汹涌而来的新来者，其工业朝气蓬勃但尚幼稚，还没有达到独立自主的水平。还有一些最艰苦的工作在前头。

第二，经济增长愈快，带来的负面作用愈大，包括物质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欲速则不达）。要采取补救措施，就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与政治机制，能掌握问题和找出解决办法。而这样的机制可能尚不具备。时间在前进，补救措施总是跟不上。这里往往还有一个轻重缓急问题：赚钱是重要的；人口在增长；相关的补救开销可以等一等。

以泰国为例。曼谷市区既向外爆炸也向内爆炸。工商企业蜂拥而来，大批求职者尾随而至，家庭名义收入在20年内增加10倍。（12）高兴的建筑商填满了每一块空地和能够扩建的空间。连原先作为生命线大动脉的运河，如今也浇盖上水泥，作建筑工地。人们收入提高了，小汽车随之增多，商用车和私家车都多，引起了严重交通堵塞。我在1979年访问曼谷时，美国大使馆给我派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车上配有移动电话（老实说，当时我是头一次见到那东西），让我们堵车时好与使馆联系；使馆还告诉我每天只能外出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曼谷人口已达1000万（为1900年的20倍），而许多人又爱用宽大的小汽车。每天，从四面郊区和乡间都有大量汽车涌入。司机不但要配移动电话，还得携带一个尿盆。有权有势者出门就摆出车队，甚至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也摆车队的阵势，使成百上千的车辆更加堵塞得难以动弹。1979年，我很快就感觉到不能在白天上街行走，那空气坏得没法呼吸。今天，曼谷市交通警察一半人患有呼吸道疾病，1990年一项调查报告表明，那里的空气含铅量为欧美水平的3倍，其恶果是孩子到7岁时智商降低7分。（13）

总之，泰国城市居民变富了，又更穷了。不是收入少，而是生活质量变差了。[289] 曼谷居民只有2%的人能享用像样的下水设施。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市区位于空旷无树的湄南河三角洲，渐渐下沉，易受海潮倒灌。恶劣的生活条件已在妨碍进一步的发展。泰国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已差不多发展到了头，边界那一边还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可是泰国现在需要的是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就需要外国投资者和外籍技术人员，然而那些人不愿意来这里呼吸有毒的空

气。目前，泰国正在努力消除这些痼疾，用于反污染措施和装置、垃圾处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开支正在促使宏观经济统计数字上升，产值和收入均在增长。

“他们想要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

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工业

亨利·福特有过一句古怪的名言：买他的车的人想要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好了，反正他的车是黑色。他说那话是在他的T型车正处于最兴旺的时候。实际上，T型车在不同时期也有过不同的颜色，但每一时期都只用一种颜色。这是福特的批量生产哲学的实质：造的车全一个样，而且是一次造很多。售价低廉，让人人愿买。谁想要车型时髦和显示个性，就找别人买去，或是买一个T型车底盘，再单独订做车身。（14）

福特原则成为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另一些制造业的基础。美国汽车制造业则成为世界领头羊：产量最大，出口最多，开创时髦风尚和新口味，大量生产自由与爱之车。[290]

在日本，登记的汽车总数在1917年为3856辆，到1923年也只增加到13000辆，而且全是进口货。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仍是黄包车和马车，再加上电车和远程火车。[291] 可是像别处一样，日本人从战争中体会到汽车重要，军部开始筹建军用卡车制造厂。他们找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谈过此事，财阀均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只好找较小的厂家，因此日本的汽车工业大体上落入一批“新人”手中。

这时，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打入了日本这片待开垦的沃土，分别于1925年在横滨和1927年在大阪建汽车装配厂。对于这一情况，日本人看到的不是日本消费者得到的好处，而是日本自己的汽车工业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尚不熟悉批量生产技术。尽管他们工资低，但日本造的汽车，其成本比美国厂装配的或进口的车要贵50%。在

1926-1935年期间，日本登记的新车总数中，美国厂装配的和进口的车占到95%以上。（15）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正蓄谋侵略他国，将精力集中于军用汽车的生产，因此在1918年制定了军用汽车补助法，为特定规格汽车的生产提供大量补贴。^[292] 民用汽车则暂缓。但能缓到什么时候？10年之后，当私营企业仍不感兴趣时，有些政府官员开始发愁。1929年，通商产业省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建立汽车工业的政策》，接着，政府再次劝说大企业集团发展汽车工业。

为了作出榜样和激励私营企业，政府设计并于1931年开始制造一种45马力的小汽车，车速每小时40公里。这种慢车不受欢迎。1936年，在日本国内汽车产量中，两家美国公司仍占3/4左右。这时，日本军方建议干脆驱逐外国公司。战争就是战争，贸易也是战争嘛。但是政客们觉得这样做有点不策略，于是国会通过了由军方起草的一项法律，规定向日本汽车生产厂商提供巨额补贴，并要求大部分汽车公司须由日本公民拥有和管理。同时，政府对整车和装配用部件的进口征收重税。重税这一手奏效了：到1938年，日产、丰田和五十铃三家公司的产量上升到全国总产量的57%。美国人还想坚持下去，试图与日本公司合并。可是没有用：一切合并的计划或试图绕过歧视的计划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1939年，美国公司只好放弃其努力，撤走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重商主义演习，为日后的贸易战作了准备。

我们可以猜测，凡此种种措施会导致什么局面。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包括最周密的计划在内。1945年，厂房和设备变成废墟，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没有理由再为汽车工业操心。日本银行和运输省一些官员也同意这种看法。可是通商产业省认为汽车是整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焦点，为此而制订了一套刺激措施，包括低息贷款，减免税优惠，防范外国竞争。在税收方面，出口销售额不计入收入，工具和设备的进口免征关税^{（16）}（在随后的60年代，关税贸易总协定禁止这样的一些歧视做法，可是没有用。日本人的手腕比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努力更高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知道，要骗过国际官僚，是不患无

术的)。

这一回，以丰田和日产两家公司为首的日本汽车工业真干起来了。1950年，日本生产汽车32000辆，大约仅相当于美国一天半的产量。朝鲜战争这一年爆发，引来了火爆的订货，日本汽车工业为之一振；而美军的占领于1952年结束，让日本自由掌握其工业命运以后，汽车工业就更来劲了。它是一大出口产业，销售量愈大，则单位成本愈低，利润愈高。不仅如此。生产能力的扩大还增强了国力。日本头一次战败，备尝恶果。日本人明白，他们打败了，不是因为美国兵更高明或更勇敢，而是因为美国工业实力更强。

到1960年，汽车产量上升到482000辆，其中约8%，即39000辆是出口。再过10年，日本产车530万辆，其中110万辆卖到国外。而到1974年，日本进一步取代西德，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1980年，它出口汽车约600万辆，占总产量54%，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小汽车生产国。(17) 尤其重要的是，日本小汽车赢得市场份额，并不是靠廉价。实际上，日本车更贵，售价往往高于标价，而美国车售价通常低于标价。那么，靠的是什么呢？原来日本车毛病较少，更耐用，因而在旧车市场上能卖高价。

面对着富裕和地位牢固的竞争者，日本汽车工业竟能达到年均30-40%的增长率，这真给后人上了干劲、精明和企业精神的一课。亨利·福特在九泉之下一一定坐卧不宁。

美国人在寻找原因(口实)时，说日本人有国家补贴和保护主义。这两点是有作用，但它们造不起一个产业。造车的是人——工人，工程师，企业家。另一方面，美国的汽车制造者有惰性。他们曾经从胜利走向胜利，将自己的企业等同于国家，自以为美国消费者欠了他们的恩情，他们付给自己的薪水和奖金高得与利润不成比例。(18) 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上升真是全球规模的大逆不道。

日本人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们变困难为有利条件。他们的国内市场太小，不能像美国汽车工业的批量生产方法那样让机器长期运转，于是他们让产品多样化，以满足各种特别的需要和口味，

并且随需求的变化而改变车型。为此，他们学会了以较快速度完成新车型设计和试验，其周期为46个月，而在美国为60个月（170万人时：310万人时）；在采用新车型后，只需1.4个月即可回到正常质量，而在美国需要11个月。（19）这后一点很关键，质量起决定作用。美国车常常可以让顾客省钱，但随后却要把更多的钱用于修理。

[293]

日本掌握了快变的技术，就能先行一步，[294]并迅速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灵活生产，有人认为这技术应是未来的方向。（20）它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转向小规模生产；相反，大公司才有足够的人力财力运用这一技术，支付变化的费用，取得更好的效果。然而，这与亨利·福特的“反正是黑色”原则相比，肯定是一大改变。（21）

多样化需要相应多能的技术。战后，日本人需要新设备，因而有机会考虑怎样把新颖的工具和机器结合到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大部分是在美国订做的。日本人还因此而有机会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电脑化等最新成就应用于生产。这一重大改变使日本人由采用单用途机器改为采用多用途机器，这就需要培训工人，使他们掌握多种技能，能迅速从一种作业转到另一种作业。日本人成功地采用了新设备和训练了工人。在70年代，举例来说，日本人更换冲压模具只需用5分钟，而在美国工厂里要花8-24个小时。（22）这一战略对劳资关系也有深远影响。美国人强调单用途机器和工人硬性分工，结果是使工人非技术化，而且工会坚持职位分割，资方也接受它。

型号多样化，自然会使库存多样化，而库存会积压资金，增加仓储费用，引起延误。美国汽车厂商强调长线运转，很少转换，而且害怕生产中断（例如发生罢工），因而积存一批备用部件；日本人则是运用我们所知道的“刚好及时”的原则，把库存压缩到最低限度。[295]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原则其实是从美国学来的，但不是从美国汽车制造厂，而是从美国的超级市场。他们访问美国时留心观察，看到家庭主妇都是精打细算，要用多少就采购多少，而商品繁多的超级市场也是精打细算，能卖多少就进货多少。商品川流不息经过商场，而不需

要费劲推销。为什么汽车不可以照样做呢（美国汽车厂也是这样做，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大有改进）？日本人是靠了好奇心、观察力和联想而受到启发，总之，这证明了人的作用重要。（23）

日本人还努力消除误差，他们的目标是零次品，尽管实际上达不到。他们不是让汽车川流不息地驶下装配线，而是力图在一发生误差时就予以排除，必要时让装配线暂停。这可能要付出重大代价，但可以防止出次品，而不是事后修理次品。一个美国人参观日本汽车厂时问道：“质量检查员在哪儿？”他听到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质量检查员，工人们都检查质量。”

日本人这种种创新，使日本汽车厂商的名声为之一变：日本造的汽车战前被看做不值钱的蹩脚货，如今却成为质量领先者。美国汽车厂商接受不了这一新的现实，仍然墨守成规，死不回头。他们嘲笑小车，连Toyota（丰田）这个名字也受到他们讥讽。他们认为美国人爱的是大轿车，不爱也让你爱。在克莱斯勒公司，曾有人设计了一种低车身型号，他的上司讥笑说：“克莱斯勒造的车是让人坐的，不是让人朝它撒尿。”（24）

当日本小车在美国市场销量日增时，美国外贸部门给日本车进口数量规定了限额，这时日本人就提高汽车档次，先是中档车，然后是高档车，从而挫败了美国当局的限制。他们这样做还培养了顾客的忠诚，让顾客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升时用车档次也上升。（25）当日本人宣布他们要跟德国豪华轿车竞争时，人们觉得那是说笑话。过了一两年，奔驰公司和宝马公司不再笑了。它们作为高价车成功象征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如果以为日本人的这些成就只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技术，那就错了。关键在于人。访问过日本的人都受过交通堵塞的苦罪，一想起那些汽车拥挤不堪的成片市区和工业区都头疼，他们会感到纳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怎么能实现“刚好及时”的供货原则呢？怎么可能一叫就到？答案是：夙夜待命。送货的司机会把车停在厂门附近，在驾驶室内熬夜打盹。天一亮，货就到。

但是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一头合适不等于另一头也合适。实行“刚好及时”原则的母厂是节约了时间。很聪明。但供货者却得花费时间。日本的整个厂外订货制度是靠施压，母厂压供货商，供货商压他们的职工。可见日本产业天堂并非尽善尽美。然而，母厂并非不讲情理，它施加压力，但是也在设备、技术和经费方面给供货商帮忙。日本人向来等级森严，强硬，有韧性，但上下之间也相互保持强烈的义务感。

在汽车制造业中，这一切都是依赖于一种团结协作的态度，它把劳资双方联合在一起，不但力求有效完成任务，还要力求不断有所改进。工人不会反对革新，连节省劳工的革新也不会遭反对。（26）在大公司内，每名员工都感到有义务提出革新建议，而且是被推动提建议，或者节约工时，或是节约成本（即便是仅节约几个日元），建议成千上万（这样大量的建议，经理人员怎么处理得了，倒令人纳闷）。此外，生产线上的每个人都受过多种技能训练，一项工作中断时，工人不是乘机休息，而是再去做另一样工作（没有工作的生硬分割），没有人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所以能把不同行当的技能结合在一起。[296]在日本，工人感到自己有责任随时都做有益的工作。[297]

这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但做起来不容易，对于个人或集体来说也不轻松。它意味着个人严格服从于上级和团体。公司会有千种办法来奖励抱合作态度的工人，和惩罚不服从者。如果一个集体制造麻烦，结果就会是他们的任务被转交给另外一家供应商。像丰田这样的公司可以说是完全占有他们的雇员，公司有自己的日历，与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和周末无关（多数日本人不过宗教安息日）。把加班加点和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算上，工人每天离家在外的时间往往有11-12个小时，但干部和老板也一样。因此，日本人的妻子重担在身，要抚育子女，天天要先哄孩子睡觉，然后当父亲的才回家。该下班休息的时间仍可能在上班，制造业40%的雇员每月都加班一天以上，30%的人加班加点每月多达5天。他们大多数人每月至少有一个节假日参加公司举办的休闲活动，约1/3的人参加得更多。公司通常都是利用专有的娱乐设施组织活动，轻松愉快，组织者很热心。你要问一个日本工人是干什么工作，他总会说出他所在公司的名称。（27）

观察家们理所当然地指出，日本人这种团结协作精神，这种个人为团体作出牺牲及超强劳动的精神，与西方体现和维护劳工自尊的劳资对立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公司是多元的：老板、工人和股东们各有各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大家都忠于企业而联合在一起，但对这一忠诚的理解各不相同，得服从于彼此相竞争的利益。因此，关系总是隐隐约约地紧张，还不时地爆发冲突和摊牌。

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日本的公司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几乎总是得到满足，因为它们是预先与资方谈判过的。这种情况下，罢工往往是象征性的，一天而已。只是为了表明工人态度是认真的。 [298] 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劳资谈判是走形式，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实力的较量。有时由于估计错误，斗争的结果是公司或工厂倒闭，谁都吃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轮斗争结束时，双方伤了感情，留下怨气，再走向下一轮斗争。双方都宣称自己胜利了，但都要等到下一次再见分晓。

(28)

日本的这种无库存积压的生产、质量监督及劳资伙伴关系，能够出口吗？美国人能学习这些新的做法吗？我们从日本的本田、丰田、三菱等公司在美国——以及在英国——办的分厂，可以开始看到答案。日本人是为了突破贸易壁垒，而将工厂办在壁垒之内。这些工厂支付的工资水平与美国公司相当，但它们将工会拒之于厂门之外，不搞业务分割，不允许分权。它们大量采用进口的零部件，以至于人们怀疑它们的产品究竟算是哪国的货。可是全球性产业都是如此，哪里东西最便宜就从哪里采购。与美国人自己办的工厂相比，由日本移植来的这些工厂似乎显示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也较高，但还不及在日本的日本工厂。 (29)

这些结果告诉我们，美国工人可以从头开始学点东西。把工会排除在厂外的这些工厂，摆脱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世代代的斗争所遗留下来的猜疑和积怨。然而，美国工人与日本工人的有些区别，是从小养成的。不论有没有工会，人与人还是不同。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一位通情达理的人，在回答美国工人是否应该采取日本价值观和态度这一问题时，说他认为不行，首先是因

为性情不一样：“美国工人是有个性的，愿持不同的见解，不会向独裁式的指令俯首帖耳。”（30）“独裁”？这一个词就表明了差距有多大。

人们到处在埋怨。美国汽车工业在一个强劲对手竞争的面前已开始失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怨它自己——部分原因在劳工，他们从本性上不愿改变，也不肯让步。但资方责任更大。人们列出了长长的罪过清单：一，自满自足，自以为最优秀，向来是最优秀；二，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难道他们真以为在公路多半狭窄、汽车靠左边行驶的日本，人们会买他们推销的驾驶盘设在左边的大轿车？）；三，后遗症式地、两面派地依靠政府扶植（我们完全主张自由企业，可是日本汽车工业得到政府种种好处，叫我们怎么对付？）[299]；四，近视自私，当日本人的竞争出现暂缓时，美国汽车工业的资方就乘机提高车价和股息，而不是投资于改进技术。

可是美国人已经在学习，有所改进。汽车厂家渐渐地在这里或那里采用日本人的做法，只不过是他们自我赞叹和自我庆贺，仿佛是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举一个例子：福特公司决定在它的路易斯维尔卡车厂连接车身和底盘时，让装配线停一会儿，便于工人操作。这其实很简单，暂停一下，就可以连接得更准确，减少损坏，“把两个连接锁摆齐，往下一放就行了。”这个主意来自生产线上的工人。倘若在从前，资方对工人的建议会根本不予理睬。如今却能听意见了。（31）

所以，美国汽车工业现今是处于新老时光之间。大汽车厂正在比从前较多地依靠厂外的零部件供应商，包括本企业所属的和本企业之外的供应商，来完成汽车部件的许多装配工序，实际上是按照日本人的做法加快进度，又降低自身的工资开支。为减少库存，它们要求供应商送货“刚好及时”，有些间隔时间为20分钟。有些本企业所属的零件制造厂既为母公司装配厂供货，也为本企业之外的装配厂供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率。倘若母公司发生罢工，零件厂还继续生产给别人供货吗？这是一个难题。守旧派说不行，但另一些人说不不能面对痛苦的现实。他们警告说，假如劳工太难办事，汽车装配厂就会找别的比较好合作的人供货，在墨西哥就有这样的供应商（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万岁)。大厂绝不会让一个零件供应厂拖住自己的后腿。这一派看法已经占上风(事实上,由于厂家有可能转向别处,工会的讨价还价力量削弱了)。工会理论家们不高兴,骂“你们是想尝尝劳资勾结的滋味”。劳资同床。(32) 这能是爱吗?

与此同时,日本汽车工业还开始感觉到韩国等亚洲竞争对手在咬他们的脚后跟。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是不能休息,也不会有尽头的。

注释

1 .见Kindleberger, *Financial History*, 第407页:“我认为德国1948年的货币改革是古往今来的伟大社会工程业绩之一。”

2 .关于当时的情况,见Toland, *The Rising Sun*。

3 .关于这些讲礼仪的交往,参看Halberstam, *The Reckoning*, 第310页。

4 .“城邦”一词取自Murray and Perera, *Singapore* 一书。

5 .见“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Economist*, 1995年6月24日一期,第4页。

6 .见Richardson, “Malaysia Readies a Crackdown on Illegal Workers”, *Int.HeraldTribune*, 1996年10月7日,第4版。

7 .关于印度支那,参看Murray,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第619页,注345。默里引用了法国1910年出版的杜布鲁埃尔《印度支那华人状况及其经济作用》一书第71页的话:“当法国管治交趾支那时,发现华人对我们推行殖民化的帮助无比珍贵……为了让越南人改变他们的习惯和敌意,教育他们经商,让他们从自己瓦罐中掏出钱来维持我们的行政费用,我们需要中间人,这中间人是跟越南人生活在一起,会讲他们的语言,而且跟他们通婚。这中间人就是华人。华人灵活,能干,没有偏见,而且爱财。”

8 .见Pan ,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 第247页。该书第13章论述甚详。

9 .见Ohmae ,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 第179页。关于印尼重新出现的麻烦 , 见Int.Herald-Tribune , 1997年1月11-12日 , 第1版。

10 .此处及上文中的数字 , 见Rohwer, *Asia Rising* , 第228-229页。

11 .例如 , Naisbitt在Megatrends Asia第19页称 : “中国人正在来到。亚洲和世界不少地方今天正在由日本主宰转变为中国驱动。”如果奈斯比特说得对 , 那么日本的领先地位将是历史上为期最短者之一。但随后会怎样 ? 在全球企业的世界中 , 领导何在 ?

12 .见Achavanuntakul ,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 第9页。据世界银行数字 , 1970-1980年通货膨胀率为9.2% , 1980-1992年则为4.2%。

13 .凡此种种 , 见Thomas L.Friedman , “Bangkok Bog Down” , 见N.Y.Times , 1996年3月20日 , A-19版 ; 及Kaplan , *Ends of the Earth* 一书 , 第380-382页。因越来越多的人烧煤 , 而且大量烧褐煤 , 污染更加严重。关于用车队摆排场 , 见Int.Herald-Tribune , 1997年1月9日 , 第2版。

14 .关于T型车的多样性 , 见Flink , “Unplanned Obsolescence”一文。

15 .见Cusumano ,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 第7页。

16 .同上 , 第18-19页。楠间野 (Cusumano) 指出 , 不论某些人有何保留意见 , 在40年代后期 , 日本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给日产、丰田和五十铃三家公司提供了大笔贷款 , 使它们免于破产。倘若当时不是通产省意见占上风 , “战后日本 (及世界) 历史就会大不一样。” (第19页)

17 .同上，第4-5页。

18 .这方面最佳和最可读的书，是Halberstam的*The Reckoning* 一书，而不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的著作。哈伯斯塔姆了解这一产业，更了解这一行业中的人。亦可参看La-acey, Ford一书。

19 .见Womack et al. ,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第118页。

20 .见Friedman , “Beyond the Age of Ford”。参看Piore and Sabel ,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

21 .关于规模与灵活性二者的区别，见Landes , “Piccolo e bello.Ma e bello davvero?”

22 .见Dertouzos et al. , *Made in America* , 第180页。日本各公司的技术战略并非一律。例如，日产公司的战略与美国较相近，丰田公司则更强调生产灵活性。亦可参看Cusumano ,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

23 .Abernathy和Clark , “Notes on a Trip to Japan”, 第36页谈到日、美做法“惊人相似但最终又形成尖锐对照”。亦可参看楠间野（Cusumano）一书第5章关于丰田公司生产制度的评述。

24 .见Halberstam , *The Reckoning* , 第43页，第50页。

25 .参看Womack et al. ,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第109页关于本田公司Accord轿车的评述。

26 .见Johnson , *Japan* , 第31页。

27 .见Tabb , *The Postwar Japanese System* , 第160页。

28 .参看Keith Bradsher , “Cost-Cutting Strategy”一文，*N.Y.Times* , 1996年3月17日，A-1版。

29 .参看Stopford和Strange , *Rival States* , 第84-85页。

30 .见*N.Y.Times* , 1983年5月13日 , D-3版。

31 .见Holusha , “Detroit’s New Labor Strategy”。

32 .见Keith Bradsher , “New Union Tactics” , *N.Y.Times* , 1996年3月10日 , A-16版。

第28章 输家

地理大发现借助印刷机的威力得以迅速传播。世界打开了一叶窗，欧洲人的自我意识随之改变。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新大陆刺激着冒险行动，探险者变成了殖民者，土著开始了帝国时代。

在领先者以及紧随其后或急急追赶的追随者的背后，是排成长队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与东亚相比，其余的国家仿佛是在研究慢动作，甚或是进一步，退两步。中东本来很有些有利条件，尤其是拥有巨额石油收入（1973年之后的20年中约达20000亿美元），可是那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不能确保企业安全或促进自主的技术发展。此外，文化态度，首先是对妇女的歧视，也妨碍实业的兴办。结果是失业率高，就业不足率也高，而教育进一步加重了民情愤懑，因为上过学的人就有更高的期待。（1）

诚然，中东地区也有过一些本来用心良好的政府尝试过官办企业。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政府想起100年前穆罕默德·阿里办工业的先例，决定投资办棉纺厂。这想法似乎不会有错。埃及出产着世界上最优质的长纤维棉花，为什么不可以再作加工以获取增加值？可是糟糕的是，他们那些幼稚的纺纱厂纺不出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棉纱，而与此同时，外国的植棉者竭力提高他们的原棉等级，织布者也想设法用较次的棉花织出高质量的棉布。决不要低估别国优秀技术人员的智慧。埃及人还是没有翻过身来，就只好将次布用于国内市场，而且丧失了一部分原棉出口市场。不幸的是，工业流产的事例不止限于埃及。兴办企业而结果失望的情形，在非洲比比皆是。

失败使心肠变硬，眼睛变昏。直到今天，中东的输家企图从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军事上的侵略寻找补偿。在民众方面，祷告和信仰可以让虚弱者得到安慰，并怀有报应的希望。因此，不少穆斯林布道

都采用先知的口气，预言末日将带来矫正。与此同时，强有力者则诉诸武力。他们觉得抢夺别人的东西比自己制造东西来得容易。所以，伊拉克觉得与其费劲制造能卖得出去的商品，还不如到科威特攫取石油和劫掠财产，可以富得更快一些。买武器，不就是为了使用它们吗？

这样一些产生反效果的趋势会过去吗？简直没法说。一些国际专家拿钱就是为了教训人，头头是道地开出种种中庸的改善现状的处方。例如，世界银行就大谈“调整”，告诉我们说只要政策对头就会见效。什么政策对头呢？要有现实的、具有竞争力的汇率，要做到预算低赤字或无赤字，要降低或消灭贸易壁垒，要靠市场，市场，市场。

这样的“宏观经济框架的改善”当然会有帮助，它们能消除重大的扭曲和障碍，但它们不会轻易来到。当全国半数劳动力是效率低下地受雇于国家，而政治稳定又是与低效率联系在一起时，试问有什么办法来消灭预算赤字呢？（这种问题甚至也影响到富国。请看看欧洲，以及马斯特里赫条约为欧洲货币规定的那些标准。）

而这一点还仅仅是开始。建立相应结构和体制的真正工作还在后头。此外，当石油采完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300]

拉丁美洲在政治独立以后，已用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来争取经济独立。然而，它在经济上依然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地区，当地的首创性和企业精神不足，技术残缺不全。这一经济受阻滞的局面，反映了老的生活方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阻力。尤其是人们看来似乎合理地强调农业和畜牧业（比较优势万岁！），社会与政治特权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就孕育了对工业世界感到不自在和抱敌对态度的、强大而反动的社会精英。这样的社会断裂，与穷人太多的社会不满结合到一起，招致了尽管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但却是反民主的解决办法（专制独裁制度），它愈持久就愈可怕，而愈脆弱则愈具有破坏性。

因此，工业姗姗来迟。这不一定是坏事，晚一点也有它的有利之处。但一切有赖于企业的质量和社会的技术能力。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办工业都是以替代进口作掩护，因而实行了高关税、排外的法

律规章以及排斥进口的非关税壁垒。我们从19世纪美国和20世纪日本的经历得知，这样的措施可以奏效，但条件是有模仿赶超的活力，有严格的、世界水平的（出口能力的）标准以及国内的竞争。拉丁美洲却大体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某些产业很有生气，然而多数产业却相当落后，躺在保护墙后面慢慢地爬行。

人们为这种保护作辩解，其理由是国家利益，或反殖民主义的理论，那种理论若推进到它的逻辑结论，将意味着停止与较先进工业国的一切交流（拉丁美洲流行着非此即彼的看法：不是中心就是周边，不是新殖民主义者就是受害者，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幸好，这种极端推理没有出现。这类纯理性（或非理性）的论断较适用于学者的书斋，而不适用于政府办公厅。巴西的卡多佐总统——他曾经是反依附论学派的旗手——在从政以后就发现了这一点。

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因为人们不一定愿意看见明白的事理，或者说，人们不愿牺牲信念而尊重现实。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都一直企图既安抚老的利益集团又鼓励新的利益集团，既让外国人进来又不放外国人进来，其办法就是操纵贸易和货币：对进口设置壁垒和规定限额，对货币规定差别汇率，作出一整套被某些人称之为“内向模式”的限制——当然，还少不了从国外借款。（2）

这些措施可以提供暂时的缓解，但代价高昂：经济需不断调整，货币出现黑市，通货膨胀扶摇直上，交易成本升高，外国投资畏缩不前。尽管如此，某些拉美国家依然能够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私营商业银行获取贷款，其数额之大达到荒唐的地步。那些银行敢于贷款，是因为得到本国政府的鼓励，而且无疑有一个默契，即有一个安全网在一旦出事时担任救援。这些贷出的钱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转弯抹角回到美国、瑞士及其他安全可靠之处的秘密私人银行账户。

就这样，管理不善、挥霍浪费、贪污腐化及无休无止的借贷结合在一起，这种没有效率因素加以制约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样的结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因为人人都把心弦绷紧到极限，事事都相

互纠缠到一起。或早或晚，会有人担心起来；资产负债表失去平衡；国外贷款人不敢再贷款；借新债还旧债变得不再可能。一片恐慌！

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它的时机是再糟不过了（有人则会说那时机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在那之前，美国政府刚刚动用了一切政治筹码，并作出了成山的反经济优惠的承诺，好说歹说地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以成立。所以，美国政府不得不设法找出几百亿美元，来恢复市场信心，让投资者和货币盟友们有时间从火中取出他们的栗子。但这一次，它无法让一个不听话的、心胸狭隘的国会支持它迅速采取行动。莫慌：以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为首的一批金融专家发现一个账号上还悄悄躺有200亿左右的美元，那是半个世纪前在30年代因废弃黄金债务而实现的利润。这笔不义之财在当时是为了保护美元而搁置于一边……现在有理由动用它，因为人们可以说，倘若比索崩溃，美国人在墨西哥的股权和债券受清理，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元都会遭到可怕的损失……这200亿美元，加上从国际贷款组织拼凑的300亿美元，挽救了局面。此后，美国政府大肆宣扬墨西哥如何迅速还钱，而报界则有意少提或者根本不提如下事实：那钱是墨西哥借来的。新债顶旧债而已。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拉丁美洲需要不停地借钱，即便是仅仅为了支付旧债的利息，也不能不借钱。有一次，一位拉美学者向我诉苦，谈到旧债包袱沉重，而气量小的外国贷款者又总是烦人地坚持讨债。我告诉他：“你们可以不还，一个主权国家总可以废弃外债。”他回答说：“不错。可是那样一来，我们还能再从哪儿借钱呢？”问题就在这里。然而，如今银行都小心了，国际贷款组织则要求受援国必须实行金融和贸易改革，扩大开放。其代名词就是“调整”——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更加开放的市场会形成一股力量来促进理性和效率，促进各国向着取长补短的方向重新安排经济活动，而且会制约腐败和偏袒。提供援助的前景还会促进有关各国加强合作，来反对毒品交易——这一交易已达到何等规模，人们如今就只能猜测了。（3）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谁也不能担保。但是，向正确的方向推动，总会比恢复原样要好一些。

在当今破纪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时期，最惨的输家行列中，包括了苏欧集团各国：最差的是苏联，罗马尼亚和朝鲜也差不多一样糟，其他的一批卫星国则是竭力奋斗避免陷入泥沼。局面最好的大概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其次是东德和波兰。这些国家实行的指令经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制度和抱负是一回事，而实际表现却是另一回事，二者彼此相矛盾。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专家们制订计划，热心的人们会热情地竞赛，技术会驯服自然，劳动会带来自由，利益将归于大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最终将按需分配。 [301]

这一梦想，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及资本主义受害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它显得是一种完善的制度，总比别的制度好得多。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在先进工业国的激进派、自由派和进步派人士中间享有当然的声誉；而在世界穷国好斗的“反帝”领导人心中，这种经济更是备受称赞，其热情几近宗教。许多殖民地一旦获得独立，就如饥似渴地转向社会主义模式，其热情使他们无视于现实。（4）

这些偏爱的感情曾长期掩盖了指令经济的弱点。事实上，尽管国家能动员人力物力去完成一些特定的项目，但总的说来技术落后，表现拙劣。那些看来很了不起的生产统计数字本身就是有意夸大了的，其中有大量的宣传水分，还要考虑到商品质量低劣和库存积压（卖不出去）的因素（除了鱼子酱、伏特加酒和民间工艺品以外，俄国造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在世界市场具有竞争力）。公寓楼房在楼的周围挂上安全网，防止砖瓦掉下来砸伤行人。勤俭过日子的消费者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钱交出来买汽车，汽车既小又结构原始，而且交钱以后还得等几年才拿到货。有了车，又找不到维修备用零件。人们把车停在户外时，通常都把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卸下带回家，以防被盗走。居民供电时断时续，家用电器也就时转时停。国民收入统计数据不包括服务业，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要求只统计实在的产品。但事实上，服务业不谈倒是更好：处处都难有方便的服务。一个好的水管工是最受欢迎的朋友。而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则有他们专用的商店和俱乐部，能享用进口的外国货，大体上用不着为那些低劣商品发愁。

有人认为，这种流行病似的糟糕局面是他们那种体制的一个肮脏的秘密：统治者有意保持物资匮乏，以便于他们奖赏受宠信者，让野心者有所追求，让其余的人没完没了地排长队而意志消沉。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物质刺激，“你有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共产主义经济则是提供“美好的明天”。可是等待明天也是要花钱的，而明天总也等不来。排长队的人什么时候工作呢？有笑话说：他们是假装劳动过了，而国家则假装是付过酬了。

然而，这个制度最坏的一个方面，是无人留心当家理财，蔑视人的尊敬。繁荣不再，就够糟的了。那里的人们曾经创造过而且至今还保存了某些美丽的东西，可是新制度却是批量生产丑陋的货色：建筑物的墙壁和门窗歪歪斜斜；外表的水泥板不但脏，而且凸凹不平；设备老出故障，机器生锈，四处乱堆着破铜烂铁——总之，一副败家子景象。

这一制度对物如此，对人自然也一样。在布满垃圾的荒芜之地，在照例蔑视人性的这个世界，叫人怎么生活？他们用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货车，把人们运去从事无益的劳动，把这些人叫做“白煤”，任其湮没于荒野（在死亡列车和死亡行军方面，苏联比纳粹德国先走了一步）。幸免于难或未曾遭殃的一些人，在自己家里的小小房间内英雄般地保持了温馨文化的点点绿洲。更多的人则是将自己的失望和忧伤淹没于伏特加酒之中。

然而，还有大自然的恩赐。由于原先的经济发展得迟，革命政权继承下来的最巨大资产就是大片大片未受糟蹋的自然财富。可是它以草率莽撞的态度消耗这些财富，还将这种态度自封为美德。

有一个地方 和一个事件 很有代表性。这个地方就是咸海，它曾经是地球上第四个最大的淡水湖，^[302]如今成了一潭死水——面积缩小了一半，水量减少了2/3，因化学物注入而恶臭，鱼虾不存，空气热而且有毒。周围的儿童早夭，其中1/10活不到一周岁。苏联在那里实行鲁莽的计划，几十年下来，无滤毒设施的灌溉渠道让多少吨的除虫剂、除莠剂和化肥注入湖中，成果是生产了大量棉花（“白

金”），代价则是人的寿命缩短，环境恶化。（5）

咸海是最恶劣的事例，但绝非唯一的。一般说来，苏联在实施引水和改水工程以及在原先清洁的地方兴建工厂时，都不考虑环境后果。优先考虑的只是想当然的就业安排和经济增长，工程越大和代价越高，就越是受崇敬。西伯利亚更是被看做天赐的白板一块，苔原辽阔、广袤无垠，在那里干什么都行，于是河流被扭转倒流，北方的雪被融化成水浇灌南方的沙漠。造化得纠正：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反宗教和讲科学的，但却想变人为神。他们这些自大狂的计划中，有一些最宏伟的项目若是完成了，就会改变全球气候，但它们却被迫半途而废。幸好，普罗米修斯又被缚住了。

一个地方是咸海。一个事件则是1986年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原子反应堆熔塌，大火失控烧了5天，散布了50吨以上的放射性物质，其波及地域包括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分地区，面积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两次原子弹爆炸的总和。当时盛行风的风向是西北风，但在别的方向上，后来有些土耳其人死于血液病，从芬兰到亚得里亚海滨还有成千的孕妇发生了先兆流产，这些人是不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者，谁也不敢下定论。而那些奉命去灭火和清理现场的勇敢的人们则肯定是受害者。当局答应给他们发特殊补偿金，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领到了钱。救济费在经过层层地方官员的手时逐渐消失了。那些工人受放射性沾染的程度被有意低估，因此，他们执行任务所付出的代价是慢性死亡（他们当时能说不吗？）。然而，任务显然完成得很马虎，原子反应堆的堆芯并未完全封死，局面没有完全恢复稳定。[303]

那座核电站周围成了恐怖地区。恐惧有理吗？明确的答案也许要等到几十年以后，因为低度辐射是慢慢起作用的。有些科学家说要50年。到那时，所有的受害者都不在人世了。当地的居民选择了恐怖和谨慎小心，大多数人迁走了不再回来。可是也有些人始终没有离开，还有些人走了又返回，因为有空地好利用。有一位胆大的65岁的妇女相信自己依然健康。她有一套经验法则：种苹果树要把种子深埋于地下；吃蘑菇不要超过10公斤；“如果觉得辐射太多，就喝点伏特加”。

她的邻居相信眼见为实：“瞧这个地方。哪儿看得见辐射呢？要说不一样，就是这地方更好了，人少了。”有的人拿自己的苦境取乐，讲的一个笑话是：一个农夫卖苹果，插一块牌子，写上“切尔诺贝利的苹果”。旁人见了，说：“你准是疯了，谁也不会买切尔诺贝利的苹果。”那农夫说：“才会买哩！有的人买去送给丈母娘，有的人买去送给自己老婆。”（6）（大概还有人是买去送给自己丈夫吧。）

虽然别的事情和自然灾害可能使更多的人死亡——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漏大概就是一次——但是从国家声誉和威信所受的损失来看，切尔诺贝利事故当是首屈一指了。^[304]苏联官方竭力否认事实和说法自相矛盾的劲头，恰好与他们兴办工程时的技术傲慢和巨人狂成正比。（7）他们的指令经济蒙上的耻辱包括无能、轻信、愚蠢，以及不关心公众福祉，越是笨拙地企图掩盖真相，就越是如此。“现在可以看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政治反响加速了苏联帝国的崩溃。”（8）

与切尔诺贝利同属一个类型的核电站，还有十来座仍在运行之中。

装模作样和许愿，是经不住事实和经历的考验的。一旦幻梦消散，一旦人们知道了制度与制度之间有何不同，苏联的共产主义就站不住了。墙倒了，苏联瓦解了，不是由于革命，而是由于被抛弃。

关于非洲，巴兹尔·戴维森写道：“……从继承下来的生态环境看，处境是再困难不过的了。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驯服’这片土地时，面临着在其他各大洲并非常见的艰难困苦：土地贫瘠，降水量不匀，害虫和热病滋蔓，如此等等，人们难以生存。”（9）

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存在的种种弊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是成倍地更加严重，其中包括：治理不善，主权准备不足，技术和教育落后，气候恶劣，别人给他们出的主意即使并非居心不善也是笨拙低能，贫穷，饥饿，疫病，人口过多等等——真是灾难如山。在世界上所有的所谓发展中地区之中，非洲最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

率大概还不到1%，统计表上分布着许多负号，许多国家的收入现在比独立前还低。若与别的地方两相对比，景象之惨更令人心酸：在1965年，尼日利亚（石油出口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印尼（另一个石油出口国）；而在25年之后，尼日利亚的水平已仅及印尼水平的1/3。（10）

在经历了独立的最初欢欣之后，痛苦的现实伤人更甚。独立了，外国剥削的重担甩掉了，该是收获的时候了。最初的某些统计数字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有些地区，例如南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摩洛哥、加蓬和肯尼亚，显示出6%至11%的年增长率，属于世界最高水平。”（11）当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估计数字该除掉水分，因为刚向城市化迈进的国家总有上升趋势，货币化交易比重上升，因而可统计的交易额上升。当时也没有人停下来思索一下为什么殖民列强那么急于离开。人们希望非洲过上好日子。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62年写道：

非洲人总的说来是世上最有现代头脑的人……非洲领导人几乎无例外地……都有一种热情的愿望，就是要获取西方文明两千年来所创造的一切好东西。他们尤其希望掌握美国文明的技术成就，尽快予以实现。非洲人缺乏历史意识，这就使非洲领导人享有一大优势，有利于迅速奔向现代化的目标。（12）

然而……巴兹尔·戴维森，这位毫无疑问对非洲怀有同情心和善意的非洲问题专家，却在他的书中伤心地写到人们的幻灭，谈到非洲各地的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通向幸福和繁荣。（13）

专家们谈到非洲食品供应无保障，或者食品不能自给自足。事实上，非洲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足。有大量的而且不断增多的人口——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食不果腹，营养不良。他们缺乏购买力，或是分布在缺粮地区。城乡之间彼此为敌，其情景颇似罗马帝国末期的无政府状态。城里的新官吏企图压榨农村，压价收罗农产品。农民则拒售或放弃种植。城里人还养成了当地农业无法满足的洋口味。因此，即使是在太平年景，农村也生产不出足够的食品，或者是生产出的食品

不合城里人口味，因而还必须从国外进口，耗费越来越多的钱，日益影响国际收支。生存如此受制于人，这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地区所不及的。（14）

此外，非洲还有一点与其他贫困地区不同：食品供应不足的受害者不是城市中的购买者，而是苦苦种田和饲养牲畜的小农。自然因素——土质贫瘠和气候多变——起着恶劣的作用，丰年和歉收年摇摆不定，而且长远趋势是日益不利。从1960年到1984年这25年当中，食品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只是靠了迅速增加进口，才避免了普遍的饥饿。市场力量也鼓励进口，例如，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其价格1983年在拉戈斯只等于本地粮价的1/4。（15）从卡路里摄入量计算，进口食品在1969-1971年占6%，在1979-1981年占13%，对进口的这种依赖导致口味的改变，有钱人不吃本地粮食而改吃新品种，而且养成吃肉习惯。于是，越来越多的非洲粮食被用作牲畜饲料。非洲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居世界首位（年增长3%以上），这就迫使农民垦荒种田，田力迅速耗尽。有些农民被迫离乡，搬进城市中的贫民窟。（16）在那些政治机构脆弱低能的国家，治理不良的伤痕很难愈合，社会弊端丛生。

人们不应该因此而责怪非洲小农无知或无能。如同世界任何地方一样，非洲人的务农方法和再生殖行为也是既反映出老的价值观和习俗，又反映出人们适应物质环境的合理反应。非洲农民并不傻。由于缺水缺柴火，孩子们早早就得参加劳动，担水打柴。结果，人们为了添劳力而自然愿意多养孩子。大家庭还是男子生殖力壮的证明，可引以为自豪。（17）一般说来，妇女只能俯首听命，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地方更是如此。男人常常外出打工，回家就为所欲为，而且带来传染病的危险。艾滋病？别提安全套了，男人不喜欢那东西。妇女呢？“她们眼前就有操不完的心，哪里还能想到10年后才会要命的那个麻烦？”（18）

在殖民统治后期，有些政府和外国谋士曾企图弥补上述种种不足，尽管他们往往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以农业为例，某些殖民统治者曾试图纠正以往的错误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引进“现代”方法。这类计

划之“母”是英国人于1946-1954年期间在坦噶尼喀推广种植花生，“其目的在于显示……运用西方现代技术和专业知识，能取得何等业绩。”（19）这一想法最初来自联合非洲公司的董事长，而该公司是在利用花生油方面驰名于世的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的一个子公司。该计划在英国内阁一级得到审议和批准。当前目的是：利用殖民地花生，就可以不花美元而缓解英国战后的油脂短缺。当时的食品大臣约翰·斯特拉奇说：“烦恼的英国主妇们能不能在不远的未来得到更多的人造黄油、烹调油和肥皂，首先就在此一举。”（20）

这项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提高非洲农民的生活水平”，办法是展示现代技术的潜力。花生当然不是供饥饿的非洲人消费，但非洲农民会目睹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优越性，从而加以仿效。计划是全用机械：推土机，拖拉机，拔根机，播种机，以及联合收割机。

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推行这项计划，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显示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优越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所以还派了官员去教非洲雇员如何罢工以争取提高工资。这一利他主义举措的成果超乎意料之外。非洲人拿起长矛，拆坏拖拉机，设置路障切断公路铁路交通。当局只好派警察去镇压，逮捕当地工会头目。罢工失败了，可是当地人毕竟学到一点东西。（21）

那些计划工作者竟然毫无计划。他们见到一大片土地是空闲的就选择了它，却不知道它之所以空闲是因为无水。代表团的成员们承认自己“根本没有机械化农业的经验”，谁也不曾干过。关于当地降水量及其对农作物的影响，还有土壤，都缺乏资料。他们估计清除这片土地上的灌木丛的费用，是根据战时修建简易机场的经验。食品供应，是靠远从菲律宾运来的剩余军用物资，有的能吃，有的毫无用处，而且因保管不善而变质。代表团中没有工程专家。该团的一位会计说：“全是凭猜想。我们猜想得对不对，就跟任何别人的猜想一样。”

英国主妇和非洲农民都只好久久等待。其实，非洲有些地方的农民也种花生，他们——实际上通常是妇女——全靠手工，一步一个坑地艰难劳作。尽管如此，却依然比英国这些机器干得好一点。在非洲

气候条件下，这些机器老出故障，没有修理厂，没有替用零件，机器还能有什么用处？第一步，即清除灌木和拔树根，就成为一场噩梦。它的费用超过了预算10倍。等清理完毕，土地干旱得像砖头一般硬。
[305] 不久，这项计划只好缩小规模，部分地改种向日葵。仍不见效。老天拒绝合作，产量远远低于原先的估计。

这项计划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可悲的。英国雇主有钱雇用当地的人，当地人受雇就不再种粮食。于是粮食产量下降，不得不大量进口。饮料也进口了；还有娼妓，“其收费惊人，在5先令以上”；
(22) 还有盗贼——总之，由于意外之财而滋生的弊病和腐败现象样样俱全。同时，英国人还企图教当地人懂得工人阶级团结平等的重大意义，当地人则认为这是要颠覆秩序与道德。

到1950年，失败已不可避免，悔恨和清算的时候到了。花生不适于这样批量种植，而是需要精耕细作，才有合算的收获。在3万英亩巨大面积上机械化种花生，根本不切实际。处理遗留的机械和设施，又花了4年。英国人尽可能把它们移交给新独立的坦噶尼喀，而坦噶尼喀则感到这些倒霉的剩余物资与其说是资产，还不如说是麻烦。观察家们都不难看到，把钱用到别处会更有益一些。

不用说，这场闹剧损害了英国的威信，而且让别的“富有想象力的经济开发计划”泄气。那么，别的计划是否好一些呢？纪录并不令人鼓舞，只有那些不断更新的计划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觉得它们有意思。最终，英国人甩手走了。他们有别的事要操心，不再想非洲的花生了。

英国的花生计划并不是例外事件。殖民政府都容易动这类念头，觉得只要干好了就有利可图。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法国人在尼日尔河上游廷巴克图以上地区（在现今马里境内）试验过种植棉花。那也是为利用非洲满足欧洲的需要，因为法国的棉纺厂当时不得不用珍贵的美元进口美国棉花。为了保证原棉的供应以便能在世界市场竞争，法国殖民当局费尽心机来保护他们的非洲臣民。他们也要维护企业的自由。因此，按照完美无缺的法国式逻辑，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

方案：当地农民有从早到晚种棉花的“严格义务”，但也有出售棉花的完全自由。（23）然后，法国人让农民背井离乡，重新安置到指定的地区专门种棉花。如果农民制造麻烦，或交来的棉花不合格，就把他们送进监狱。有人会想那是一个宽松的监狱，但也要达到惩戒的目的。

人们也许以为，非洲国家独立以后，情况就大变了。但是新政府也有它们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工程计划，因为又有了新一代爱活动的热心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热心于花钱，热心于做好事，热心于行使权力。这些干将发挥想象力订计划，自然没有麻烦，计划越大越好。可是计划失败了，又怎样呢？

这都是西方的过错。西方告诉我们要建电站，修桥梁，办工厂、钢铁厂和磷矿。因为你们这么说，我们才造它们，办法也是你们告诉的。可是现在它们不能用，你们说我们必须付钱，付出我们的钱。这不公平。是你们告诉我们造它们的，该是你们付钱。我们当初并不曾要它们。（24）

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准备不足。刚结束殖民地时代之后的非洲人没有自治的经验，他们的统治者所享有的合法性，是靠了家族关系网和仆从们的忠心。突然之间，这些新国家被硬塞进代议制政府的紧身衣，他们自己的传统跟这种政体格格不入，原先的殖民者家长制的统治也不曾为这种政体作准备。在某些国家，过渡之前先有一段解放战争，它动员了民族激情和认同感。但结果是强人统治，民众意志体现为专制，民主遭到扼杀。政局的稳定有赖于一人的活力，当他衰弱或死亡（或被暗算）时，随之而来的是短命的军事政变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强人统治所产生的政府，实际上都是无能的，只在一点上例外，即掠夺财富。在非洲，最富的人是元首及其部长们。（25）政府机构膨胀，以便为亲信安排职位。经济则受到挤压，以榨取剩余价值。外援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流入了国外银行的私人账户。（26）这些盗窃国家财富的人到瑞士去住，靠近自己存钱的银行，可

以享福。不过，仅仅有钱也许还不够。

巴兹尔·戴维森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互不连贯的事例。第一个是扎伊尔（原比属刚果），它只有一个国家的架子。蒙博托·塞塞·塞科这位暴君在位时只统治了首都金沙萨和另外几个城市，以及外国公司采矿的几个地区。所有这些地方都向他进贡，他在瑞士的存款据说有几十亿美元。他实际控制的这些地点彼此之间的交通工具是飞机，因为地上的道路不是不能通行就是行车不安全。在比利时统治下，那里的通车公路在1960年有88000英里；到1985年，通车里程降到12000英里，其中仅1400英里铺有路面。然而，由于缺乏保养，铺有路面的公路坑坑洼洼，反而不如泥泞的土路。

几乎全国各地和整个社会都实际上不在这个虚假国度之内。在东部，外国入侵者经常追赶外国难民，把难民往死路上逼，而且支持反对金沙萨的叛军。在首都，在野党谴责叛军的计划，警告说要防止一个新的专制政体：“我们要甩掉一个强人，并不是为了让另一个强人取而代之。”叛军回答说，倘若在野党领袖想要“驾驶一艘下沉的船”，他最好先学会游泳。（27）西方代理人试图劝说蒙博托下野（或者保留他在职），同时想方设法对可能的随后上台者施加影响。西方关心的首要大事是继续把矿石运出来。法国人还希望让扎伊尔留在法语区轨道上，似乎这关系到法国的尊严（比利时人早已撒手不管了）。美国人呢？美国利益在哪里，都不清楚，也许只有跟法国人作对这一点例外。

在这一片无政府状态之中，国际救济机构力图帮助难民活下去，可是每一次入侵的强盗逼近时，救济难民的活动都只好中断。有一些救济物资运进去了，但给了谁？1997年4月，叛军攻占了扎伊尔的钻石都城，这预示着政权将会改变。蒙博托已无力发军饷，军队只好抢劫（当兵的也得过日子）；他也无法再博取大国的欢心，尽管他讲法语。在世界银行的国家名单上，扎伊尔此时业已消失。这倒有先见之明。叛军在6月把蒙博托赶出扎伊尔之后，又把国名改回为刚果（共和国）。

第二个事例是贝宁，原名达荷美。自1960年到1989年，这个国家的最大产品是马列主义宣传和政变。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出生产和贸易几乎都不存在。可是贝宁人种植和收获棕榈油及花生，只不过是不要将自己的产品交给当局或官方市场。差不多一切的交易都是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农民因此可以多赚点钱，对付庞大官僚机构的办法则是行贿。所以贝宁从官方纪录看是一个空壳，经济是负增长，国际收支是赤字，可是实际上它是一部走私机器。

从这两个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例可以看出，非洲并不是像它表面看来那般的糟糕，只是更加恶劣。你瞧瞧照片或电视屏幕，看看那些儿童一个个无精打采，满身苍蝇屎，瘦骨嶙峋，皮肤松垂，眼球和腹部鼓凸，这时怜悯之心会油然而生。你明白，当你看到这些可怜孩子的时候，他们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你再瞧瞧另一种场面，特别是欣赏一下《全国地理》杂志的彩页，那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风光，那些满脸欢笑和活力充沛的舞女和商人，又会令你诧异不已。非洲既显出绝望和毫无希望，又显出希望和勇气。境遇是可悲的，可是人们仍然有办法去对付，去生存、死亡和繁殖。

与此同时，那些国际机构中的禄虫和专家们唱着无辜和无经验的小调，时髦的字眼是“调整”：这儿来一点自由，那儿来一点市场和汇率现实主义，局面就会改观，甚至从此好运来临。经济学家们玩弄的游戏之一，可以叫做“统计数字错杂推论”。把不同国家多多少少可比较的数字加以比较，引出过去和未来的结论。拿非洲来说，我们在上文中已看到尼日利亚和印尼的对比。东亚国家起点比非洲还低，如今却比非洲强（在土耳其和韩国之间也可以作类似的令人反感的对比）。可是为什么不转过来说呢？既然印尼能做得这样好，尼日利亚又为什么不能呢？同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在悲叹非洲1965-1990年的状况时，又引用亚洲1965年的数字（“与非洲1990年状况相似”），来预测非洲下一个25年的增长前景。这些专家把不同时代的相等水平说成是状况相似。啊，不错，亚洲儿童就学率高一些，但非洲这一点不难弥补。除此之外，没有问题。文化和体制上的区别，算不了什么。

新闻：联合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下，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在今后10年内募集250亿美元（这超过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所以还得要大量私人款项），将这笔钱投资于非洲的改善。（28）当今世界上25个最穷国家中，有22个在非洲；非洲54%的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非洲还是预计今后10年内贫困会加剧的唯一地区。可是，250亿美元能有多大用场呢？非洲国家的外债1994年已达3130亿美元，所以250亿美元可以支付一年的利息。而在1995年第三世界得到的总共231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投在非洲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还不到1%。商人知道该把钱用到哪里。

不要紧：请多看积极一面。形势愈坏，改善的潜力也愈大。较好的政策（结构性调整）可以而且将会使非洲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非洲的问题远远不只是政策不好，而政策不好也绝非偶然。好的政府不是一请就到的。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得到它，为什么非洲应该在几十年内就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是在经受了殖民主义扭曲之后？没有政府又如何呢？比方说，索马里如今就是一片政治真空。即使人们想寄点援助，也不知道该寄到什么地址。“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寄封信给他们。”（29）

在一个脆弱的世界上，好的政策也会随时受命运摆布的。在非洲，如同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时钟既向前走，也向后走。

被打断的国度：阿尔及利亚

经济史上，最能教训人的事情之一，是回想昨日的专家预言，再看它们有多么虚妄。

在70年代，阿尔及利亚因石油收益突然膨胀而得意洋洋，而且它的工业基础在非洲除了南非之外就数第一，所以它的工业部长高兴地预言，阿尔及利亚将是“非洲的第一个、世界上的第二个日本”。预言从他嘴里飞进了上帝的耳朵。有了工厂和设备不一定就有产品，有了产品也不一定就有用和可销售。可是像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包

括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一样，阿尔及利亚着手兴建现代工业基础设施。它尤其着重于发展重工业，因为好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那是唯一可走的路。什么发挥比较优势，那是资产阶级理论，见鬼去吧。

这一套代价高昂的国有企业带来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非市场形成的价格，以及弄虚作假的账簿。几乎没有一样工业产品能出口；即使是在受控制的国内市场，许多东西也卖不出去，或者很快就损坏变质。工厂的生产很快走下坡路，开工不足，或者因缺乏维修保养而闲置起来。方便的办法是拆卸旧机器的零件修补别的机器，使设备提前报废。从1980年到1992年，制造业产值平均每年下降1.9%；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1970年为15%，1992年时降到10%。

(30)

全国人口在独立之后的30年里增加了近两倍（1960年为1000万人，1993年为2700万人），大批人移居欧洲，还不计在内。野心勃勃的革命政府鼓励多生孩子，以为人多就军力强，国际威望高。人口的繁殖成为唯一的高效率产业。可惜，孩子们要长大了才能干活，而现在一下子增加这么多——15岁以下者占人口将近一半——就至少在眼下成为沉重的负担。鼓励多生孩子，就该多投资于教育，可是1990年人口的文盲率达43%，妇女中的文盲占55%。还应该有足够的食品供应，可是全国耕地没有增多（与1910年时一样，仍只占全国面积的2.9%），集体农业又弄得一团糟，现在粮食不够自给。进口食品（粮、奶、糖、香蕉、烹调油）越来越多，国家给补贴后卖给百姓。

除此之外，政府也进口耐用消费品，再以优惠价卖给受宠的官员。这类商品的供货合同是外国供应商激烈竞争的对象。投标反投标的竞争应该使价格降低吧，可是没有，仅仅是使贿赂越来越高。然而这些贿赂钱只是化公肥私的庞大金额之中的很小一个部分。阿尔及利亚人说，国外银行秘密账户上的金额有260亿美元之多。(31)

出口额抵偿进口额的比例，在90年代初为3%至10%，出口收入几乎完全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这看来很小了，可是还要记住，石油和其他出口收入有2/3是用于支付外债利息（换言之，石油被抵押

了，而储量正在迅速减少）。（32）还有一句老话：阿尔及利亚像任何主权国家一样，可以把外债一笔勾销。但是它需要借更多的债。即使仅仅为了吃饭也必须借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照例建议它作“结构性调整”：我们给你钱，你得改变做法。阿尔及利亚政府欣然同意：我们会改变做法。此外，我们已经欠了这么多，再多一点也不要紧。

受过法语教育的阿尔及利亚观察家把他们的国家比作拉封丹寓言中的那只蟋蟀：

当天气还暖和的时候你都干什么啦？

.....

我唱啦，我希望你别在意。（33）

幸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像拉封丹寓言中的那只蚂蚁那般严厉和苛求，没有对阿尔及利亚说：“你唱啦，啊？我喜欢那个。好吧，现在跳舞吧。”

阿尔及利亚要变也难。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生产模式；它还是革命的象征和遗产，是写进了最初宪法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承诺”，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是一面旗帜，阿尔及利亚还是在这面旗帜之下在第三世界政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近几年，这个国家已摇摇晃晃，形势恶化。17岁到23岁的青年当中，有将近3/4的人失业。他们被叫做“墙人”，因为他们整天无事可做，尽靠着墙观看街上来往行人。他们对社会不满，孕育着愚昧幻想，充当炮灰。内战已使6万多人丧生。早死从来是叫人伤心的，而阿尔及利亚的叛军更是残酷得出奇，总是尽可能用割喉咙的办法置人于死地。这办法可节省子弹，据说还会让死者更靠近于上帝。（34）

许多人是被胡乱杀死的，他们常常是无辜的行人，很多死者是妇女和儿童。伊斯兰恐怖分子尤其爱杀害“不知羞耻的女人”以及法官律师、行政官员、外国技术人员和知识界的头面人物。他们这样做，是要扭转任何走向思想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进步。外国人格外危险，恐怖

分子认为杀害几个外国人就可以把其余的外国人吓跑（不妨对照一下外国旅游者在埃及遇害所产生的影响）。国家当局的对策也是使用暴力：酷刑逼供，奸淫烧杀。大概不久就会有一个结局吧，但结局是好是歹，谁也没法说。与此同时，不信教的、会说法语的人纷纷逃往法国。法国人不欢迎，原因之一是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把他们的斗争也带到了法国。法国已经发生过几次预示着阿尔及利亚恐怖的爆炸事件。

从左翼学者到巴西总统：现实主义的优越性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多年是拉丁美洲依附论学派的领头人物，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旗手。这一学派的理论最初是由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来的，他根据中心与周边的理论，认为欧美剥削着海外较弱国家的经济。在那些因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愤愤不平的国家里，这派学说引起了强有力的共鸣。在60年代和70年代，卡多佐作为社会学家，就这一课题写作和主编了20来本书，其中有些书成为造就一代学者的标准读本。最有名的一本也许就是《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在该书的英文版本中，结束语是一句冗长的、并不那样带鼓动性的格言：

实际的战斗……是展开于技术官僚治国论与大众工业社会形成过程的理想之间，这一理想能提供具有特定民族性的得人心的内容，能成功地将人们对于较发达的经济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需求转化为这样一种状态：它能表达真正民众力量的活力，能寻求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35）

1993年，卡多佐出任巴西财政部长。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翻滚于高达7000%的年通货膨胀率之中。当时，政府对通货膨胀这一通货麻醉剂已经习以为常，老百姓也纷纷采取别出心裁的对策（例如出租车的计费器可以按照物价指数作调整，也许还可以因人而异），所以，连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都愿意对这种动荡局面加以轻描淡写，居然说通货膨胀的肯定性是稳定性的一种形式。

对于能采取预防措施的巴西人来说，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可是通货膨胀有害于巴西的国际信誉，而巴西是需要借外债的。它还需要与别的国家做生意，尤其要跟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资本主义富国打交道。因此，卡多佐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以至于观察家们终于称赞他是一位务实派，“没有强烈意识形态成见”。（36）反殖民主义激情消失了，也不再敌视外国与巴西的联系及其包含的依附意味。卡多佐说，巴西没有别的选择。假如巴西不愿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那就“无法竞争”。“这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37）

善有善报。两年之后，卡多佐当选为巴西总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使巴西多年来头一次有了自己坚挺的货币：雷亚尔，其币值略高于1美元。雷亚尔站住了，比美元还值钱，这对民族自尊心是多大的鼓舞！

尾声：稳定的货币还不能包治百病。时至1996年年中，公共财政出现较大赤字；出口增速减慢；一季度实际产值下降；实际利率虽比原先低，但仍然高得让人不敢借贷；制造业的一些重要部门，如冶金、机械和纺织业，1995年出现生产率负增长。（38）

注释

1 .参看阿拉伯国家、伊朗及土耳其经济研究论坛通讯Forum，1995年7-8月一期，第1-5页，Ishac Diwan，“Hard Time for More Labor Economics”及N.Fergany，“Unemployment in Arab Countries”二文。

2 .见Bulmer-Thomas，*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第278页。

3 .*Financial Times* 1997年6月26日第4版报道，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计划发表的第一份世界毒品报告估计，全球非法毒品贸易额达400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据统计，毒品贸易收入约占玻利维亚出口收入的28-53%，占哥伦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

4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例）童话般经济的内幕，见Merkel和Mühlberg, eds. , *Wunderwirtschaft* 一书。

5 .见Feshbach和Friendly , *Ecocide in the USSR* , 第4章；Kaplan , *Ends of the Earth* , 第277页；David Filipov , “A Sea Dies, Mile by Mile” , *Boston Globe* , 1997年3月23日 , A-1版。

6 .见Filipov , “In Chernobyl Soil, Fatalism Thrives” , 载于 *Boston Globe* , 1996年4月21日 , 第17版。

7 .参看Josephson , “Projects of the Century” , 第546页等处。

8 .见Shcherbak , “Ten Years of the Chernobyl Era” , 第44页。亦见Marples , *Social Impact ; Medvedev, Truth about Chernobyl* ; Michael Specter , “Ten Years Later, Through Fear, Chernobyl Still Kills in Belarus” , *N.Y.Times* , 1996年3月31日 , A-1版。

9 .见Davidson , *Black Man's Burden* , 第216页。

10 .见World Bank, *Adjustment in Africa* , 第17页；该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对于这些数字，一个困难之处在于它们的误差幅度很大。一方面，非洲一些国家的当局编造所需的数字。另一方面，非官方的平行经济活动状况完全得不到统计。这两种偏向能相互拉平吗？

11 .见Kamarck , *Economics of African Development* , 第17页。

12 .见H.J.Spiro , *Politics in Africa* , 引用于卡马克上述一书第48页。

13 .见Davidson , *Black Man's Burden* . , 第197页。

14 .关于这种种情形，见Platteau , “Food Crisis in Africa”。

15 .同上，第451页。

16 .有些人欢迎这种早熟的城市化，认为它是现代化、民主化和企业的温床。见Le monde 1996年11月10-11日所载A.Frachon，“L’Afrique n’est plus rurale”一文。

17 .参看Dasgupta，“Population, Povert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18 .见J.C.McKinley, Jr.，“Anguish of Rwanda Echoed in a Baby’s Cry”，*N.Y.Times*，1996年2月21日，A-8版。

19 .见Havinden and Meredith, eds.,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第276页。

20 .同上，第278页。

21 .Evelyn Waugh，*Tourist in Africa* 一书第98页叙及此事。

22 .同上，第99页。

23 .见Roberts，“The Coercion of Free Markets”，第224页；Davidson，*Black Man’s Burden*，第217页。

24 .这是马里的一位受过教育、见多识广的警官的话，引用于Biddlecombe，*French Les-sons*，第247页。

25 .见George B.N.Ayittey，“The UN’s Shameful Record in Africa”，*Wall Street Journal* 1996年7月26日，A-12版。

26 .艾蒂在上述文中写道，联合国估计仅在1991年就有大约2000亿美元从非洲转入外国银行，相当于撒哈拉以南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90%。

27 .见H.W.French，“Personal Rivals Fight to Finish in War in Zaire”，*N.Y.Times*，1997年4月6日。

28 .见Barbara Crossette，“UN, World Bank and IMF Join\$25

Billion Drive for Africa”，载于N.Y.Times，1996年3月17日，A-6版。在纽约发行的《非洲观察家》谴责这一计划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为争取连任联合国秘书长而炮制的一场把戏。（若真如此，则目的没有达到。）

29 .见N.Y.Times，1996年3月17日，A-6版。

30 .这些数字摘自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31 .系1993年数字。Field，*Inside the Arab World*，第135页指出这一数字相当于阿尔及利亚当时的外债额，所以人们可以梦想，假如他们能掌握那笔钱的话，就会一分钱外债都不欠。

32 .这方面的情形，见Abdelaziz，“Une économie paralysée”。

33 .见Field，*Inside the Arab World*，第134页。

34 .见Fisk，“Sept journées ordinaires”，第7页。

35 .见Cardoso and Falett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第216页。

36 .见Mat Moffett，“Foreign Investors Help Brazil’s Leader Tame Its Raging Inflation”，*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12月15日，A-1版。

37 .同上。

38 .见Sebastian Edwards，“Why Brazil Is Not Mexico-Yet”，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1996年7月26日，A-13版。

第29章 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我们正走向何方？

全球化和趋同是否标志着国家奋斗的终结？国际经济竞争力是否不再有意义？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会说“是”，因为他认为那些主张建立国家经济的人“其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他们不能理解甚至最简单的事实和理念”。

千年的纪录似乎相当简单。原先的世界上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帝国和王国，它们在财富上和实力上多多少少大体相等，而如今的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其中的一些要比另一些富裕得多和强大得多。原先人口只有几亿，如今达到60亿，还在不断增添。原先是使用虽然精巧但却俭朴的工具和技巧，如今我们成为大机器和看不见的力量的主人。撇开魔术和迷信不谈，原先人们只是笨拙地以及聪明地进行观察，如今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而且不断增长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产生出源源不尽的有益的用途。 [306]

这些知识大多是有好处的，然而智力和物质力也往往被滥用于邪恶和破坏性的目的，或者无意之中在运用的时候造成罪恶后果。 (1) 我们吃亏于我们对大自然的知识与我们对人的知识二者不相对称，外在意识与自我无知二者不相对应。可是仍然不会有什么人愿意返回到原先的时代。有的人逃避富裕物质世界，隐居大自然以求精神更新。但是他们还得带上书本、眼镜和制成的衣被，有的还有光碟机，而且他们也知道有病求医。

请注意，我对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终极优势和利益所持有的看法，现今受到尖锐的攻击，甚至在学术界也受到攻击。这种反应往往表现为将“感”置于“知”之上，其理由则各种各样，从那种未见天堂的失望，直到凡人对不可知之知识的恐惧和愤怒，不一而足。 (3) 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一场天启式的革命就可以纠正谬误和实现大家

幸福，达到千禧理想社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虽然口头上说尊重科学，实际上却属于这一类。另一些人是怀旧派，希望回到没有国家、过公社生活的原始社会那种神秘安详的日子。第一类人表现出人的良好愿望的极限。第二类人是空想空谈。世界并不是走向那方。 [307]

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坏都有。这一传播部分地来自西方的支配地位，因为知识等于力量；部分地来自西方的传授；部分地来自模仿。散布是不均衡的，而且西方许多榜样遭到拒绝，被视为侵略。

今天，即使只讲一讲这一段故事，也会被某些人视为侵略。在谈论相对价值观和道义平等的世界，只要一提到以西方为中心（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史的想法，就会被谴责为傲慢和压迫性的言论。有人告诉我们，这种说法是企图“强调欧洲优越性从而为西方统治东方作辩护”。而我们应有的东西该是一部多文化的、全球主义的、讲平等的历史，它对每个人都谈点事情（最好是好的事情）。欧洲的贡献不过是发明和界定了现代事物，它应当被看做是偶然的，或者，用时髦的话说，是因一定条件而发生的。

近来在有关环球航海和发现的讨论中，就有这种恐欧症的例子。有人说发现美洲的可能是（应该是）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或非洲人。也许是那样。欧洲不过是有运气罢了。或者用一种愤怒的方式来说，欧洲人并不是幸运，而是可恶和狠毒。他们偷走了新大陆的银子，用这些银子在亚洲扩张帝国和进行贸易，打败更有教养的民族，然后自己夸耀自己的财富、技术成就、传播文明的使命和崇高精神。

这些全球主义者说，首先，我们不应当将欧洲的领先“实质化”，即不应将它与欧洲的体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用欧洲人的“有”对比非欧洲人的“没有”而加以解释。因此，有些辩护士在不知不觉之间证实，欧洲一贯对别人的文明和文化抱有好奇心，而那些“别人”相对说

来却对自己以外的文明和文化不大关心，但这些辩护士们否认这一对比值得重视。（4）某些全球主义者说，问题在于没有东西是要解释的。不论是欧洲历史或非欧洲历史，如果硬要将不曾发生过什么也包括进去，那都一样会成问题。不能说做成了的事和未成之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5）当然，把注意力放到未成之事上面，可以被指责为有偏见的否定论：谁说非欧洲人必须追求与欧洲人相同的目标。

反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想法是根本反理智的，而且也违背事实。可是它却很流行，尤其流行于那些据说是沙文主义的西方人中间。这些新全球主义者不喜欢一个信息，就想把送信人也杀掉——仿佛历史不曾发生过似的。然而，西方技术领先的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大家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因为了解这一个为什么，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6）

历史学家们喜欢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们力图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记载。经济学家也要了解过去，但认为他们对过去的了解只能达到符合于理论和逻辑的程度；同时，由于他们有基本原理作保证，他们也不那么反对预言由理性决定的未来。诚然，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偶然事件和非理性的可能性，但这些因素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把逻辑上必然的事推迟一些而已。理性终将胜利，因为理性有报偿。多多益善，而在选择目标时，物质成就是最好的依据。

所以，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而经济学家和生意人往往是乐观主义者。（7）乐观主义必须首先着眼于财富的增加，即亚当·斯密所说的“财富的自然进步”。甚至对于穷人来说：“几乎用你愿意采用的任何尺度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都在改善。”（8）他们也活得更久，预期寿命的统计资料就能说明问题。同样，穷人平均说来比过去富一些，日子好过一些。经济学家们现在的看法是：世界将继续变富，穷人将赶上富人，经济增长的星星点点岛屿将连成大陆，知识将能够解决问题和克服一路上的物质困难和社会困难。[308] 今后也会是这样。

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是一向持这种看法。[309] 亚当·斯密之后的

经济学家曾预言过停滞：马尔萨斯强调的是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谈过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担忧的则是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后来的进步减轻了人们的这些忧虑，不过有些人认为马尔萨斯预言的末日只不过是推迟了而已。^[310]与此同时，天启论骑士队又添了一个新的骑手：环境灾难。我们不再担心这一种或那一种资源耗尽，技术会找到替用品。⁽⁹⁾但是我们给环境造成严重的、日益加剧的、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损害，对此不能不引起注意。这一威胁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联系，因为财富和产品的增加带来更多的废弃物和污染，给环境造成更大的损害。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是富人在毒化地球。

诚然，富人，至少是某些富人，看到了这一危险，而他们的财富允许他们花钱去作清扫以及将废弃物卸到别处。^[311]他们还给新的工业化国家提出大量的好建议。但后者马上指出今天的富国在它们当初的发展时期造成了污染，为什么今天的后来者就该小心？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情愿付出环境代价：现在先要工资和财富，疾病和死亡是以后的事。当然，不曾有人作过民意测验，但这种态度看来是有的。发展中国家充满年轻人，而年轻人总以为他们会永远活下去。再说，谁又限制得住污染和疾病？尽管穷人不在乎，富人却吓坏了。富人会失去的东西多得多。

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不一样（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不妨看看那些移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企业精神——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散布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加尔文派教徒，等等。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和态度能引导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令学者们害怕。它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在沉思的时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承认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欢迎文化向好的方向变化，叹息它向坏的一面变化。但是欢迎也好，叹息也好，都表明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去左右人及事物。做技术工作的人却宁愿实干：改变利率和汇率，放开贸易限制，修改政治体制，实施管理。此处，对文化的批评是会得罪人的，

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外界的人提批评意见，不论多么策略和间接，也都带有教训别人的味道。善心的改良派已学会绕道而行。

再说，假若文化起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经济学家，还有另一些人，提出过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譬如华人，在海外很会办企业，在自己国内却长期效率低下。如果说文化起作用，为什么它没有使中国变化？（如今它是在变化。）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是主张政治经济学疗法的大师，他解答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否认文化与经济发展有任何联系。他说，文化并不能使他预测经济结果。我不同意。如果考虑到文化，本应能够预见日本和德国的战后经济成就。韩国与土耳其相比，印尼与尼日利亚相比，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经济分析喜欢维持一种假象，似乎一条好的理由就足够了，可是复杂过程的决定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彼此相联系。单条理由的解释行不通。同样的价值观，也许在国内因“坏政府”而受阻，在别处却得到施展。所以，移居国外的人办企业特别成功。古希腊人就把外来的人称作metics，说他们在瞧不起手艺和金钱的社会是急功近利的酵母（因而出现了贬义词：banausic——实利主义者）。外来的人于是经起商赚了钱。

同时，正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在泰国，所有正经的年轻男子从前都要用几年时间出家当和尚，修身养性。这对精神和灵魂有益，与当时经济活动慢吞吞的节奏也是相适应的。现今不同了，生活节奏加快了，商贸兴旺，企业要人。因此，年轻人修身养性缩短成几个星期，只够学会若干祷告文和礼仪，然后就返回现实物质世界。人人都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它的相对价值是会变的。除了革命以外，这一变化是无法强加于人的。泰国人是自觉自愿调整了他们的轻重缓急。

泰国的例子表明了文化对经济增长作出反应。相反，文化阻碍经济发展也是可能的。以俄国为例，那里的人们受了75年的反市场、反利润的教育，只有权贵能享受特权，于是形成了反企业的态度。甚至

在那一政权垮台以后，人们还是担心市场变化无常，怀念原先受国家雇用的那种冗长乏味但却保险的日子。或是怀念贫穷中的平等。俄国人有一个笑话说，农民伊凡妒忌邻居鲍里斯，因为鲍里斯有一头山羊。一天，一位仙女飞来，表示要帮助伊凡满足一条希望。伊凡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原来是赶快让鲍里斯的羊死掉。

幸好，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这样想。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清规戒律以后，经商活动蜂拥而起，高明的人搞知情人交易，也有的人搞犯罪，许多经商者是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等）。酵母有了，这往往就足够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经营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老的习惯依然存在，腐败和犯罪活动猖獗，文化战激烈进行着，选举受这些问题左右，这种局面会是什么结果，还不清楚。^[312]

趋同 是当今的时髦字眼，它的意思是说大家最终都会平等，繁荣、健康和幸福终将普及。这至少是经济理论的说法，其依据是生产要素的动力。

经验却是另一回事。一小批先进工业国的统计数字似乎是在趋同，可是各个国家不可能总是合群。日本会继续向前冒吗？英国会不会继续落后，或者，它最近10年的好消息预示着美好的明天？21世纪会是东亚的世纪吗？美国又会怎样呢？美国人应该记住英国人的教训，不要不正视自己的麻烦而让自己被乐观的预言所陶醉。未来学家们是不会站出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任的。即使他们那样做，到那时也不会有人注意他们，而他们自己则总是只记得自己猜对了什么（此外，别忘了还有一条基本法则：我说这话的当时是正确的）。

眼下，先进者与落后者、富国和穷国似乎并不是在靠近。乐观的数字咀嚼者列出了笼统的微型趋同，但他们是以亚洲作穷国一方，即使是东亚也只有特别的事例能产生这种微型趋同的光学幻景。非洲和中东仍然不见起色。拉丁美洲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说都是喜忧参半。前社会主义集团各国尚在过渡之中，有些国家干得不坏，另一些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则还在摇摆于高度不确定性之中。

出现突发事件和混乱局面，又会怎样呢？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战争，革命，天灾，坏政府，犯罪，反生产的意识形态，等等。而许多成功的事例也显得脆弱，有赖于保持政治现状。每天的报纸都带来若干令人产生希望的消息：印度正在起变化，开始鼓励外商投资了；和平与秩序在塞拉里昂“生根”；阿根廷经过多年的内斗之后开始好转；俄罗斯爆出新企业气象，百事可乐公司计划在那里增加投资。可是，能够把这些令人高兴的消息当做肯定无疑的转变吗？到第二天，同样的报纸又会警告说会有麻烦和逆转。

英国统治过的香港也许是最能说明情况摇摆不定的一个例子。它在1997年7月1日回归到中国。后果尚未显明。中国也许会珍惜它，但也可能迫使它纳入大陆经济的轨道。中国看来不大可能拿掉这一只会下这么多金蛋的鹅。可是香港的蛋对于整个中国又有多大的重要性呢？此外，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不理智行为的先例，而中国历史上更是多次为维护帝国的原则而牺牲贸易。眼下，香港商界人士采取了预防措施，作好留和走两手准备。许多人为寻找安全港而办理了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者约60万人）。^{（10）}同时，他们除了原先的广东话之外，也学习中国普通话，并且用中国人替换外籍经理人员。^{（11）}这是合理的“极大极小”策略：将潜在的极大损失减少到极小的限度。

全球化和趋同是否标志着国家奋斗的终结？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概念是否不再有意义？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会说“是”，因为他认为那些主张建立国家经济的人“其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他们不能理解甚至最简单的事实和理念”。^{（12）}

这话真是说得不容置辩和盛气凌人。然而主张国家干预的人并没有投降。这里涉及两个目标，即国力和财富；还涉及两个理想，即分配公平和非个人所能左右的效能。它们都是联在一起。每一个人又各有自己的道理、号召力和支持者。

甚至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部，意见也有分歧。新经典学派说不：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信号能比市场信号更可靠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步亚当·斯密大师的后尘：“大国从来不会被私人的花费弄穷。但

有时会因公共浪费和管理不善而变穷。在多数国家，全部的或几乎全部的公共收入都是用于供养非生产性的人手。”⁽¹³⁾ 亚当·斯密担心那些食俸禄者可能会把维持社会生产性成员所必需的产品也给耗费掉了（是有那样的国家）。

然而亚当·斯密也懂得，有些事情——防务，公安——政府可以（会）比私营企业做得更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消防工作由一些私营公司掌握。火警一响，它们都跑来，彼此竞争，在现场与失火房屋的主人谈判灭火的价钱。若讨价还价没有个完，火就烧大了，要救的东西也消失了。或者是火势蔓延，所以邻居也该出一份钱。若吝啬和贪婪彼此计较，一栋房子失火就往往变成大片的火灾。

在缺乏企业经验的国家，时不待人。世界在迅速变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时，社会还能等待私人办企业吗？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甚至在日本，都是政府出面激活、保护和引导名义上为自由市场的企业。对于政府发挥这种作用，主张维护自由市场的人会称之为珍珠港式的袭击。

由此可见，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是好坏兼有。就像是前额正中间有一缕鬃发的小女孩：当她好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之好；当她坏的时候，她就坏透了。

此外，在为企业服务方面，政府也可能是很有用的。官员们总是容易受到诱惑（贿赂），这是人的本性。在经济不断壮大的形势下，私营企业的薪俸和奖金日益提高，这就进一步加剧和加速了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的腐化。有钱的人可以收买有权的人。总统们和总理、首相们常充当巡回推销员，按照达成的交易和签订的合同的大小多少来判断出访的成就。英国人正谈论要用一艘更大的远洋游轮来代替现有的皇家游轮，供女王及其丈夫携宾客享用。这艘新船的造价将达数亿英镑，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想见，它的保养维修费将比造价更高，这尤其是因为既然有了这么一个豪华的玩具，就迫使人们去享用它（皇室是不会懂得什么叫旁置成本的）。没关系。主张造这艘船的人向英国纳税人保证说，它将会带来贸易。与此同时，理想常让位于

利益。中国表现不好？最好的纠正办法是什么也别说，只做生意。这似乎显得有点犬儒主义，但在医治专制行为方面，这会跟任何疗法一样有效。

选择的过程仍在继续。今天人们寻求廉价劳动力，使就业机会由富国转向穷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转向某些穷国。（14）某些人高兴，某些人吃亏。这种喜忧参半，正是经济变化的特色。经济学家和道德主义者认为这种转移是合乎理性的，反映了比较优势，因而是合理和可取的。为什么马来西亚人和墨西哥人的就业就该不如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就业呢？克鲁格曼又有高见：“人们也许会期待每个人都欢迎全球风景的这一变化，看到原先贫穷不堪的成亿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把这看做是进步——而且也是史无前例的生意机遇。”（15）

没有理由不欢迎，只是那些失去就业机会的人不高兴和生气，而在先进工业国，失业者也有选举权。他们还会游行示威和引起骚乱。有些观察家担心“战略”贸易政策失误，可能将注意力集中于风险和冲突带来的损失。但是冷静的经济学家会争辩说，各国之间并不是像各公司之间一样彼此竞争；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富国来说，失去一些出口市场和就业机会不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16）阻挡进口并不会促进国内的生产率或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有些不再享有“优势”的产业部门失掉就业机会，将会由于另一些领域创造另一些就业机会，而得到补偿。这样的道理和聪明见解却不会有助于那些因就业机会外流而受到威胁的工人和工会。有的人失业后不得不改行从事条件较差或工资较低的工作，还有的人已到了相当年纪，想要改行也不切实际，他们都不会从上述理论得到任何安慰。（17）还有一些粗暴简单的说法更加令人烦恼，例如告诉公众说，看到进口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更便宜，应该高兴，可是公众却再也买不起这些东西；或者建议人们改行去种大豆或者当银行办事员。请记住，这是重复英国人约翰·鲍令1840年给德意志联邦关税同盟各成员邦提过的建议：请种小麦吧！再卖出小麦以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这听起来是堂而皇之的道理，但是德意志诸邦若采纳了这一建议，就会更穷了，今天的比较优势到明天就不一定是优势。难道只有幼稚的新兴产业才该受保护？富国是否在道义上就有义务要避免发展中国家照例都采用的做法？反对穷国依附于富国的

理论家们长期以来都强调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贸易不平等，不公平。但不对称的贸易可以是双向的。

这些问题不会有简单的、明确的答案。鼓吹积极的政府政策是一回事；采取正确的措施并付诸实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明显的：现今的全球工业扩散的趋势对于较富的国家来说，会带来工资水平降低，贫富差距增大，和（或）高水平的（过渡性的？）失业。没有任何人废除供求法则。许多的——即使不是多数的——经济学家会表示不同意。他们坚信贸易会让人人受益。他们告诉我们说，国际竞争是一场正和游戏：人人皆有所得。

从长远说是这样吧。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议论在继续增多，会构成一座图书馆，因此想在这里用几页篇幅加以探讨，是不现实的。（18）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从历史记载看：

——贸易带来的收益是不平等的。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获益大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并不一样，而且有些活动比另一些活动效率更高，获利更丰（一个美元不等于一个美元又不等于一个美元）。在知识和技能方面，这些活动里里外外要求更高，产生的成果也更大。

——就业机会的出口和进口与商品贸易不是一回事。在理论上，这二者也许可以互相替换，但对人的影响却是很不相同。

——比较优势不是固定的，它可以增强，也可以减弱。

——关注市场并作出反应，总是有益的。然而，市场发出信号，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及时地或恰当地作出反应。有些人会比另一些人作得更好，而文化的不同会使局面大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拿东西比制造东西更容易和更轻松。所有的社会都存在这种倾向，只有道义上的教育和警惕能使它受到遏制。

然而，我不想提出任何特定的国家政策，这尤其是因为积极主动的干预既可能使局势有所改善，同样地也可能使局势变得更糟。对每

一个情况都必须具体加以判断，而政府跟那些企图影响和利用市场的企业家一样，可能犯很多错误，而且比企业家的错误更大（也可能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大限度追求的目标——是财富，还是平等，或是安全，拯救，或是自己发财）。（19）我只想说，现今的技术扩散和你追我赶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富国，尤其是经济重新组合中受害的个别富国，会有很沉重的压力，同时给某些穷国带来“好东西”和希望，给许多的另一些穷国带来失望、绝望和愤怒。

当然，富国、工业国可以保护自己（减轻痛苦，但不是消除痛苦），其办法是保持科研领先地位，转入新的、正在增长中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善于向别人学习，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提高能力和知识并加以运用。它们在调控航速和利用安全网方面还大有作为，可以帮助失业者学习新技能，从事新职业，或者干脆退休。许多事情将有赖于它们的进取心，自我意识和自尊，致力于公共福利的决心，以及将这些品质代代相传的能力。

那么，穷国，落后和失利的国家，又将如何呢？富国尽管受到新的竞争的巨大压力，毕竟日子好过得多，难以引起人们的关切和同情。它们虽然有自己的麻烦，但仍然对穷国负有义务，为自身利益着想是如此，道义上更是如此。它们会为了援助而援助吗？或是只是在能得到回报时才援助？或是像银行家一样，宁愿把援助给予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人？是硬心肠的爱，还是软心肠的爱，抑或是二者兼有？我提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知道答案（只有忠实信徒才声称自己知道答案），而是因为有必要看到动机各不相同，效果也会彼此矛盾，情形极其错综复杂。要通过这些急流险滩，就必须不断调整航速和纠正航向。由于政策受制于国内政局，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

穷国自己又怎样呢？历史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非洲人有句谚语说：“接人东西的手总是在给人东西的手的下方。”（20）这不行，还得靠自己工作，节俭，诚实，耐心，顽强。贫困潦倒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要求做不到，而自暴自弃。可是，归根结底，真正有效的办法只

能是自强。

这些话听起来也许像一堆老生常谈，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听父母、在学校内听老师讲过的那一番道理。现今人们不爱听这些话，认为这是陈词滥调。可是，明智之言怎么会过时呢？诚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蜜饯时代，希望件件东西都是甜的。我们之中，太多的人是工作为了生活，生活则要幸福。这倒是不错，只是不会催人提高效率。你想要高效率吗？那就应该是生活为了工作，而幸福则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不容易。生活为了工作的人是少数，但却是幸运的精华。凡是自己下决心、积极肯干的人，都可以加入到这精华的行列之中。在这世界上，能办成事情的人是乐观者，这不是因为他们一贯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积极肯干。甚至在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仍坚持实干，从而纠正错误，不断改进，直至胜利。明达事理、视野开阔的乐观主义会有成就；悲观主义只能说自己不犯错误而提供空洞无物的安慰。

由此而来的唯一教训，是必须不断努力。没有奇迹。没有尽善尽美。没有千禧。没有天启。我们必须养成一种持怀疑态度的信仰，避免教条，善于听和善于观察，努力明确目的并使之逐渐完善，选择更好的手段以促其实现。

.....我在你面前摆着生与死，福与祸；因此该选择生。

——《圣经·申命记》，30：19

注释

1.关于技术被滥用和技术的负面影响，见Salomon, *Le destin technologique*。

2.见Holton, *Einstein*, History。

3.见Islamoglu-Inan, “Introduction”, 第222页。

4.见Tavakoli-Targhi , “Orientalism’s Genesis Amnesia”。

5.见Islamoglu-Inan , “Introduction” , 第229页。

6.参看Hall , “A Theory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 第231页。

7.参看Ferdinand Mount , “No End in Sight” , 载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 1996年5月3日 , 第30版。

8.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比格斯的话。引用于Kaplan , *Ends of the Earth* , 第297页。

9.参看Dasgupta , “Natural Resources”。这里谈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几乎所有的有用的物资都可以有替代品，用之不竭。

10.参看Edward A.Gargan , “A Year from Chinese Rule, Dread Grows in Hong Kong” , *N.Y.Times* , 1996年7月1日 , A-1版；Peter Stein , “China Is Slow to Handle Issues on Hong Kong” , 载于同一日 *Wall Street Journal* , B7D版。

11.试对比一些俄国公司的预防措施：它们把总部设在塞浦路斯，以远离自己国内的犯罪活动和潜在的混乱。见Mark Nelson , “Economic Fugitives” , *Wall Street Journal* , 1996年5月9日 , 第1版。

12.见Krugman , *Pop Internationalism* , 第70页。

13.见Adam Smith , *Wealth of Nations* , 第2卷 , 第3章。

14.N.Y.Times 1996年6月19日D-5版报道，法国家用电器制造商Moulinex公司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搬迁了11家工厂中的4家，带走了公司11300个就业岗位中的2600个。该公司在1995年4月1日至1996年3月31日的一年中曾亏损7.02亿法郎，在那之前的一年中亏损了2.13亿法郎。

15.见Krugman , *Pop Internationalism* , 第50页。

16.克鲁格曼上述一书第112-113页说，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它给美国国民收入增添的份额也不会高于1%的1/15。这种政策所起的作用仅相当于联邦土地上牧场和矿山的政策。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政府能够促进竞争力，它就应该这样做，因为知识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是有感染力的。而政府出租联邦土地的价格低于市场地租，它就应该停止这样做，因为压低地租是坏习惯，也是有感染力的。反对政府干预的唯一真正理由，是政府往往把事情弄糟。它也是有感染力的。

17.参看Uchitelle，“Like Oil and Water”，*N.Y.Times*，1997年2月16日，第3版。该文从内容上和调门上对比了莱斯特·瑟罗和保罗·克鲁格曼两位经济学家的主张。

18.这方面的最近论述包括克鲁格曼《大众国际主义》一书中谴责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贸易管理措施的文章。克鲁格曼对于他在学术争论中的对手特别严厉，指责“大众国际主义”是“那些不肯严肃思考却想表现自己是深思熟虑的人所喜爱的花言巧语”。查尔斯·沃尔弗在*Wall Street Journal* 1996年6月1日A-12版的书评中曾引用此语。

19.关于市场效能及政府干预的有利之处的扼要论述，见Kuttner，*Everything for Sale* 一书。

20.见le Masson，*Faut-il encore aider* 一书，第145页。

译后记

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那么富，穷的那么穷？五六百年前，地球上为什么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这二者之间又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能够先后称霸于全球，而它们的帝国为什么又逐一衰落？美国、日本、德国为什么后来居上？时至20世纪后期，为什么又有东亚等地的一批国家能够急起直追，而另一些却陷于“穷者愈穷”的境地？强弱盛衰为什么变幻无常，人们能从中吸取的教训又是什么？这些就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作者兰德斯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教于哈佛大学。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本着理性的态度，避开单纯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框架，把地理、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和在一起，通过几百年来的大量实例，对世界各国的贫富兴衰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探讨“富国”与“穷国”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从书中可以看出，大自然是不平等的，福与祸有些是天然的；财富积累的规律是无情的；过去的600年乃至今天欧洲基本上是最富裕的地区，美国和日本是后来者，这些国家或地区差不多都处于温带而且属海洋性气候，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非洲、拉美地区贫困图景与热带气候有关。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较早地拥有富裕的殖民地，但是由于葡萄牙人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贸易的忽视，终使其不久就衰落了；而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极大提高，本着重商主义，建立了日不落帝国；随即美国开始崛起，开放的文化、无所顾忌的历史、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战争机遇，美国居于领先地位。天朝大国——中国，曾陶醉在自己灿烂的文化和迷人的历史里，对外来事物排斥，怠于学习，最终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为富国俱乐部的一员。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能搭上时代的列车，就可能分享财富，而落后者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国家的贫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文化、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反应往往是滞后的，它对经济的作用一般是“制约—适应—制约”的。国家贫富取决于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也受制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的提高。客观条件是现实的，但人们必须努力，趋利避害，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

此书的基本观点师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又有所批判和发展。有人将此书誉为“新国富论”，不无道理。当然，作者有其身份、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限制性，他主张“欧洲中心论”，对待事物的态度难免有时失之偏颇。对此，相信读者自会有所判断鉴识。

由于此书涉及范围遍及五大洲，上下五百年，作者又旁征博引，理性思辨，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我们虽作了努力，但译文中错讹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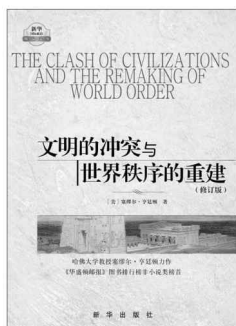
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献给这个政治无所不在的世界，写给所有人的14堂政治课。英文版突破300万册）

[美] 克里斯·马修斯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这里的政治是指“关系”——对每个人的成功都至关重要的各种人际关系。这本书正是一个懂得这种政治的人写给所有人的14堂“关系”谋略课。

作者克里斯·马修斯曾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演讲撰稿人，数十年生活在政坛高层的台前幕后，经历、目睹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沉浮成败。他从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政坛成败的潜在法则是人际关系的普遍真理，适用于在政坛、商界、职场锐意进取的每个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长期高居《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非小说类榜首，并被美国大学生列为必读图书）

[美] 塞缪尔·亨廷顿

一部具有深刻预见性和洞察力的论述人类文明冲突及其根源的经典力作，作者的观点开辟了一个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崭新视角，预言也一一得到验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也成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政治类经典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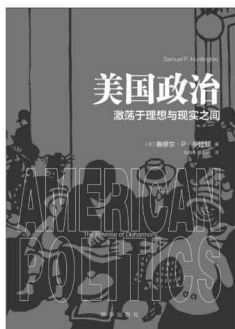
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美] 克里斯·马修斯

亨廷顿在书中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国家特性受到各方面挑战而呈现衰落迹象的担忧以及对于重振美国国家特性的殷切希望。

作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着力阐述了美国在 21 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与评论。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力作；了解美国
政治必读经典）

[美] 塞缪尔·亨廷顿

《美国政治》是作者塞缪尔·亨廷顿以美国为背景对政治观念和政
治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作答。作者考察了自由、平等的美国理想承诺
与美国政治真实表现之间的持续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人对权威
的敌视态度，解释了政府运作的真实机理，提出了改革运动形成的新
理论。本书旨在设定一条考察美国政治的路径，凸显那些经常被人忽
视的因素，提供一个研究视角，从某个角度解释美国何以既有如此之
广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
人类进步（入选亚洲文明十本好书）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等

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文化问题。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亨廷顿和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员哈里森，召集世界多方专家学者，在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办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探讨何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民主有什么样的联系？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分，应该承认一种文化比另一种好，还是要尊重所有文化？文化在男女平等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经济运作模式？对于文化变革，我们应如何面对，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措施呢？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修订版）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席
定思痛之作，还原大国悲剧的真相

**[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
日科夫**

本书所披露的内容，仅就其权威性而言，已绝非其他人物撰写的回忆录所能比拟。

拥有 70 年辉煌历史的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土崩瓦解，带给世界巨大的震撼与无尽的思考。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穿越时空的迷雾，详细、生动、全面地叙述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事件的全过程，以独特的视角深刻分析了事件的整体内在逻辑，揭示了与其相关的各种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展现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千百万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困窘和悲惨后果。



[1] 罗斯柴尔德，亦译罗思希尔德，该家族是欧洲著名银行世家，自19世纪初至今，其势力遍布英、德、法、意、奥等国。内森·罗斯柴尔德（1777-1836）是该家族第二代的一员。——译注

[2] 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

[3] 产于非洲的一种蝇科吸血昆虫，亦称舌蝇，传播非洲锥虫病等。——译注

[4] 这只是总体而言。如果有条件——适宜的衣着、住房，人们在冬季很容易过着温暖的生活。18世纪下半叶，法国旅行家福加德·圣福德评论到，在冬季，英国农民因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适；而法国农民则蜷缩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懒使他们愈加贫穷。

[5] “在欧洲人的殖民地内，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温带的欧洲人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见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7, Part 2（本译文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注）。

[6] 并不是所有的人赞同以上观点，参见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第70页。布劳特认为，显然，“许多情形包括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有时间适应热带环境，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在热带有效地工作。”布劳特反对自然利益分布不均的概念。

[7] 有的学者对这一历史后果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奴隶贸易不是非洲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因欧洲劳动力匮乏引入到非洲的。这一贸易“使锥虫病由一种地方病变为人、畜都受害的普遍性疾病，使基本在控制之中的疾病变得具有毁灭性。非洲原本人丁兴旺，但自上一世纪末以来，有的非洲地区已经禁止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参见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第79-80页。布劳特错误地引证Giblin, “Trypanosomiasis Control”，一文，但吉布林关注的不是16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影响，而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殖民统治的影响（见原文第73至74页），二人所表述的对象不同。即使最近以来，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参见Waller, “Tsetse fly”一文，第100页。需要关注的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早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非洲就有奴隶贸易，而且阿拉伯人曾为伊斯兰世界抓俘虏，亦曾使得奴隶贸易一度兴盛。参见Gordon, *Slavery*，第105-127页。另一方面，且不管这些早期例证的起源和影响如何，大西洋奴隶贸易确实加重了这种罪恶。参见Law, “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文和Lovejoy, “Impact”一文。即使在这方面，仍有异议存在。参见Elitis, *Economic Growth*，第77页。

[8] 沃尔特河源于布基纳法索（旧称上沃尔特），在加纳境内入海，全长约1600公里。——译注

[9] 参见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一书。吉本非常重视这场交战，他认为，倘若当年是阿拉伯人胜利了，所有的欧洲人如今都要读《可兰经》，所

有的欧洲男子都要割包皮。

[10] 参见Eric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第6-7页:“在中国,粪便排入水中,使之成为肺蛭、肝蛭、肠蛭和东方血吸虫的世界库,而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类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对农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虫传染是一种职业性危险。韩素音曾说,20世纪早期,北京儿童90%受到虫害,寄生虫在路边和楼旁随处可见……撇开反社会的习惯不谈,这是对人口稠密的温带气候地区开发灌溉农业时缺少肥料来源的惩罚。”在印度,人们没有卫生习惯,常常在公共场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这里又是清洗和饮水的地方,因而情况比中国还糟糕。

[11] 参见Jones, *European Miracle*, 转引Narain, *Indian Economic Life*, 第332-333页。纳拉因的资料取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欧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500年或1000年以前,也许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距较小。

[12] 长江的年淤积量大于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之和,而黄河的年淤积量是长江的3倍。参见Link, “A Harvest”一文,第6页。

[13] 由于对技巧的依赖,这些社会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例如有人说,14世纪帖木尔及其鞑靼游牧部落破坏了波斯的水槽和供水系统,此后就没有再修复过。曾经人丁兴旺、土地肥沃的地方就这样荒芜了。该地区的王国和民族从未恢复过来。

[14]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第5页。书中提到,一个辩护者说,其实,许多工程并没有耗费多少劳动力,因为这些工程耗时较多,由数代人完成,这些人也可能受宗教驱使而自愿劳动(第10页)。你要信以为真的话,当然相信就是了。实际上,这些工程的监工全副武装,劳工的死亡率特别高。中国修造大运河和万里长城死亡数以百万计,参见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第9页。

[15] 实际上,这种最大限度再生产的增长方式——包括备战草料和领土扩张的资源,促使政治权势增强。中国能威震人口较稀的邻邦,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16]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欧洲也有暴政。参观法国韦兹莱大教堂的游客也许会有兴趣听到,修建该教堂过程中,被征召的农奴曾三次起义反对教会权威。家畜也遭受磨难,例如,拉昂大教堂建于山上,其塔楼上有四头牛的雕塑,面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纪念将石头从下面平地运送上山的牲畜。这些牲畜的待遇比人好得多。这只不过是一种替代物而已。较近的例子,可看一下19世纪40年代从圣彼得堡修到莫斯科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灵魂。

[17] 黄土是一种松软的土壤,其土质介于黏土和沙土之间。如能充分灌溉则肥沃,适合种植农作物。它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但也足够肥沃。黄土之上未生参天大树,因而没有金属工具也可以开荒种田,这一优点使黄土比较适于种植农作物。中国华北西部的黄土深达250米,土壤细致,易于耕作。参见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第29-30页。他在书中还引用了韦特福格尔对埃及农业的论述。埃及农业并非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而是上游的孟斐斯故地。农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卡尔·索尔强调土地“对易

弯工具顺从”的重要性，注意到美洲印第安人首先在贫瘠但较容易开发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事实。

[18] 黄河上游水流湍急，水量大小变化很大，随流而下的黄土淤积在黄河东段弯曲部而迫使黄河在流经华北平时几次改道，因而得名“中国之患”。

[19] 如果才智和辛苦劳动已不能再增进水稻和其他谷物的产量，但增加这些杂粮的产量还是没问题的。参见Emily M.Berstein, “Ecologists Improve Production in Chinese Farming Village”, *New York Times*, 10 August 1993, C4版，谈到增加捕鱼量和节约肥料。

[20] 这正是电影《神奇七人组》（*The Magnificent Seven*）的主题，影片并非受到古人的启示。情境相似，就会有相似的战术。

[21] “获取有价值 and 广泛的财产确实需要建立国民政府。如果没有财产权，或者财产总额不超过两三天的劳动所得，那么国民政府就不那么必要了。”见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5, Ch.1, Part 2。亚当·斯密在这里思考的是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这些思考同样适用于权力的运用。

[22] 这个伪造的故事流传了多年（由于是民间传说，叙述自有所不同），法文教师不敢再问是谁打碎了苏瓦松花瓶，因为课堂上总有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否认它。参见Bonheur, *Qui a Casse* 一书，第77页。

[23] 这种东西欧的分裂不过是已有的严重冲突的一个表现而已。东欧的大多数居民知道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所以，“中”欧要扩至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历史渊源。

[24] 莫洛克神，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献祭品。这里泛指牺牲很多人命的恐怖事物。——译注

[25] 阿拉里克（公元370?-410年），西哥特人首领，410年攻陷罗马。——译注

[26] 在罗马帝国后期，日耳曼诸部落已经与帝国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萨利的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及其他部族，与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一起抗击阿提拉带领的匈奴入侵者，从而有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在特鲁瓦附近）。在欧洲传统中，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士兵是野蛮与凶残的本质象征。然而，今天的土耳其人却不这么认为，阿提拉是他们最喜爱的名字之一。

[27] 1683年，当土耳其人第二次攻抵维也纳时，他们发现面对的不仅仅是日耳曼人，还有索别斯基统率下的波兰人。欧洲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时，协作对敌。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前的最后一次喘息。在随后的16年里，他们从匈牙利撤出，退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从而将多瑙河河谷中段让与基督徒居住（卡尔洛维茨条约）。

[28] 位于现今法国南部。——译注

[29] 歌词的英德两种文本（也许还有其他文本）说，“晨钟在响”，这歪曲了原意。应当说晨钟没有响。

[30] 相比外敌侵犯而言，中国好像更害怕国内暴动。较现代武器有可能落入谋反者，包括某些将军们手中，参见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 第46-47页。

[31] 由于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历史观念和民间传说，一些学者最近试图说明，18世纪末之前，欧洲在技术方面落后于亚洲。当前最活跃分子是因特网上的H-World网。

[32] 西西弗斯（Sisiphus），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暴君，他死后坠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石头在接近山顶时又滚下来，于是再推，如此循环不止。比喻艰苦而无止境的往复活动。——译注

[33] 希腊神之一，用蜡与羽毛制成翼飞离克里特岛，因过分接近太阳，其蜡融化，他本人坠海而死。——译注

[34] 阿兹特克人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后遭到入侵者的屠杀和征服。——译注

[35] 一种急促轻快的舞蹈。——译注

[36] Jean Ziegler, *La Victoire des vaincus* , 第101页，引用Juryi Rychten, *Ajvanhu*（波兰译文1966年版）一书中的一段话：那是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前苏联小说，其中的西伯利亚主人公抱怨道，“我无法明白如何发现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如果我到达雅库茨克，然后宣布我发现了该城市，雅库茨克人不会为这高兴的。”（注意：这段话经过了几重翻译——从俄语到波兰语到法语到英语。但我感到原义并没有被歪曲。）

[37] 这种失望之情的一个例外是，基督教传播到异教横行、活人献祭和吃人的世界，人们为此感恩不已。我本人绝不维护那些旧形式。然而，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到那些自愿“超度”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38] 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世界由领土面积和实力不等的多种国家组成，我们不应认为强者总是控制和剥削弱者。这是正确的，但强国的克制大多取决于力量的均势。当有必要防止一国称霸时，各国会联合起来。因此，理性的计算会带来克制。然而这种计算是脆弱的，有可能错误估计形势。欧洲经历许多个世纪才形成均势，但这一均势在半世纪两度遭到挑战，结果都很悲惨。最近的海湾战争同样是这种计算错误（源于情报错误）的结果，它引起巨大反应的原因，则首先在于赌注（石油）事关重大，其次在于大家确信有必要确立人们通常所说的集体安全的原则。关于帝国主义的权力均势模式，参见Landes, “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及“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mperialism”。

[39] 指《圣经》中所说的“欲人施于己者，己必施于人”。——译注

[40] 公元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奸淫烧杀。而1187年萨拉丁为穆斯林重新夺回该城市时，他却手下留情。

[41] 今西班牙南部一城市，原为格拉纳达王国首府，是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根据地。——译注

[42] 西班牙中部当时一王国。——译注

[43] 位于西班牙东北部，15世纪末它与卡斯蒂利亚合并为西班牙王国。——译注

[44] 指地中海东部以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自希腊至埃及，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译注

[45] 传说的大西洋中的神秘岛屿，据称是最后沉入海底的。——译注

[46] 西班牙人在加那利群岛发现了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他们被称为关切人。在经历了与西班牙殖民者不愉快的共存后，他们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尽管武器非常低劣（用棍棒对抗铁枪），他们将侵略者赶出达一个世纪之久。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他们从未完全屈服。关切人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和精神性的问题：他们是人吗？他们有灵魂吗？他们是否按照法治生活？他们能被基督教化吗？提出这些离开本主题的道德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为征服和奴化的行径辩护。西班牙人需要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他们需要对自己事业的祝福，而他们总是能得到祝福的。

[47] 近来，阿根廷将“消失的”的政治反对派的子女（包括那些在监狱出生的婴儿）交给监狱看守、甚至杀害他们父母的警察，然后这些人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这种做法早有先例。1497年，葡萄牙将一批犹太人驱逐出境，而将他们“改信基督教”的孩子从他们手中夺下，一船送往佛得角群岛，因为没有人自愿到那里定居。参见，Fernandez-Armesto, *Before Columbus* , 第201页。白人曾到这些热带岛屿上定居，但很少能活下来。

[48] 指欧洲大陆。——译注

[49] 大屠杀的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在哥伦布到达时，加勒比诸岛屿的人口估计高达数百万，仅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的人口就达百万。该数字基于据认为是哥伦布的弟弟巴塞洛缪·哥伦布1496年的统计，它成为以后报告的权威数据，参见Sauer, *The Early Spanish Main*, 第65-67页。很难对该数字加以评论。在另一方面，索尔指出，1518年以前，没有对诸岛屿瘟疫和疾病的报道。而1518年时，伊斯帕尼奥拉岛土著人的人口已经降至11000人左右。那么，前后两个数字相差那么远，那些不见了的人是怎么灭绝的呢？当然，有野蛮屠杀、谋杀，金砂矿的强迫劳动，人口出生率骤降。然而，我们仍然难以理解，即使是虐待狂、屠夫和监工忙碌的殖民地怎么能这么快地消灭这么多人（超过100万）。参见：Sauer, *The Early Spanish Main*, 第204页。

[50] 西班牙东部城市名。——译注

[51] 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译注

[52] 是这样吗？北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确实也可以进行无情杀戮，但有没有折磨和酷刑？如果要问谁能衡量这些事情，我看确实存在运作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印第安人，我宁可死在英国人手上，也不愿意被西班牙人杀死。死就死了，但我愿意死得痛快，而且能保留全尸。

[53] 长度名，1里格约等于3海里。——译注

[54] 长度名，在英国相当于45英寸。——译注

[55] 对那些认为欧洲全球霸权是偶然造成的学者来说，1500年欧洲军备的决定性优势以及已经探讨过的其他技术优势，是不可接受的。一位反对传统看法的人士指出，“我的关于1400年至1800年的著作‘表明’，直至1800年前，亚洲走在欧洲前面，欧洲利用美洲的资金才加入或赶上了亚洲。1500年以来欧洲的‘扩张’及其优于亚洲的进步或优势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见多伦多大学安德烈·冈德尔·弗兰克1996年6月7日在因特网上H-World@msu.edu发表的文章。

[56] 最初到达印度的葡萄牙人被当地的偶像崇拜所误导，以为印度教是基督教在异国的一种表现形式。

[57] 圣托马斯（Aquinas, Saint Thomas, 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1323年谥为圣徒。——译注

[58] 他们也曾探索过亚洲东海岸，北至堪察加半岛，但也最终决定放弃（一旦你看到一块浮冰，你就把它们全看透了）。

[59] 中国的黄海和南海一向是孕育海盗的臭名昭著的温床。读者可注意近年来逃离越南的所谓船民的悲惨命运。

[60] 汪直的正式官职为西厂提督。——译注

[61] 哥伦布本人十分重视该消息的传布。他于1493年3月回到西班牙，此后他关于大发现的信印刷了13次——西班牙文一版、拉丁文九版、意大利文三版。见Gomez, *L'invention*，第95页。

[62] 这个故事不过是安慰那些不能到新世界探险、亲眼瞧瞧亚马孙女武士的人。引自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中北部城市——译注）官员马丁·德·萨利纳斯1533年致查理五世秘书的信笺——Gomez, *L'invention*，第120-121页。传说亚马孙女武士为生殖后代每年交媾两三次，而后将男婴送掉，只留下女婴。

[63] 阿兹特克帝国系阿兹特克人（今墨西哥境内的印第安人）约自公元1200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南部建立的帝国，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译注

[64] 然而，墨西哥人的饮食好像包罗万象、丰富至极。他们从狗、豚鼠、虫和其他动物中获得动物蛋白质。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虫子就是那些喜爱美洲烹调的人经常享用的一种食物，如果我们相信1990年美洲航空公司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的话。为表示善意，我不在此列出作者的姓名，该作者吹嘘说，他曾试着吃过活虫子，但不小心让虫子咬了他的舌头。

[65] 战犬同样是骇人的，它们撕裂和咬死敌人，令阿兹特克人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但是它们的顽强限定了损失。西班牙人主要用它们来进行侦察，对付俘虏和路人，作为恐吓和娱乐的工具。参见Todorov, *La conquete l'Amerique* , 第146页。

[66] 他们说服阿塔瓦尔帕皈依基督教。他们告诉阿塔瓦尔帕，如果死时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尸体不会被烧化，那么按照印加人的信仰，他还能回来领导他的臣民。

[67] 印加帝国的人民知道如何用轻木造船和木筏，以及靠充气的皮囊等物漂浮并由游泳的人推进的轻舟和木排。但是，不管这些大木筏如何不沉于水，它们还是很小、不稳定、容易漏水，故而不适合公海运输。“对秘鲁水运来说，真正的限制不是缺乏智慧和技巧，而是缺乏适用的木材”，引自Rowe, “Inca Culture”, 第240页。这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从山上砍伐木材？答案也许是，缺乏铁制或钢制的伐木工具而且交通不便。

[68] 的确，这些信差不会仅依靠他们自己的体液，还有古柯叶刺激和吸引着他们。实际上，他们常用需要多少古柯叶来衡量任务的轻重，就像中国人惯用需要吃几碗饭来衡量任务的轻重一样。

[69] 肖尼提到，“木薯粉是一种平凡而危险的淀粉，从传统的面包转到以木薯粉为食是一种灾难”。引自Chaunu, *L'Amerique* , 第86页。木薯粉含有一种能形成氰化物的糖分，当地人用磨碎、压揉和加温等复杂的程序祛除这种杂质。也许加勒比的印第安人没有告诉西班牙人该怎样处理它。

[70] Pierre Chaunu, *L'Amerique* , 第86页，许多牛在这里乱跑，成为私商和海盗轻易捕获的猎物。海盗buccaneer一词就是从烤架bocan一词演化而来，因为他们惯常用烤架熏烤牛肉，自己吃或卖给过路的船队（法语字典Le Robert 上说，该词意思是“烤肉”，由烤架一词引申而来）。但是，兽皮逐渐成为主要商品，一旦海盗开始提供兽皮，这些兽群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71] 南美印第安人，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各岛和巴西。——译注

[72] 专指西班牙统治拉美时期印第安人的监护者。——译注

[73] 墨西哥一州名。——译注

[74] 专指非洲与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跨大西洋贩运黑奴的航线。——译注

[75] 埃里克·威廉斯（1911-198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学家，首任总理（1962

—1981)。——译注

[76] 这样做所能赚到的利润是很可观的。当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时，最后幸存而回到欧洲的那一艘船，带回了26吨丁香，以高出成本价一万倍的价格售出，大约足以抵消这次远航的费用——见Humble, *The Explorers*, 第162页（请注意，如按一定重量衡量，丁香当时大概是最贵重的香料了，一名海员若得到一小袋丁香，那就是大大超过他的薪饷的一大笔奖赏）。当然，在别的一些供应来源也参与竞争之后，这种神话般的价差（利润）就很快缩小了。

[77] 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著名诗人，作家，曾周游亚非各地。——译注

[78] 葡萄牙的“老基督教徒”最后称他们自己为“纯教徒”。

[79] 直到1807年，当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时，才把印刷机带到巴西。政府衙门需要建立档案和印发政令、法规等文件，不能没有一个印刷厂。——见Lang, *Portuguese Brazil*, 第195页。

[80] 查理五世当上西班牙国王是在1516年，故此句开头的“17世纪”应为16世纪。——译注

[81] 亦译斯海尔德河、斯凯尔特河。——译注

[82] 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注

[83] 此事发生于1799年。——译注

[84] 此标题原文为Golconda。作者注释它的含义：（1）指印度安德拉邦西部一古城遗址，该城1512-1687年曾为一穆斯林王国首都。（2）指大财源，如Golconda附近的钻石矿。

[85] 由于西风带和墨西哥湾暖流东流的影响，亚速尔群岛当时成为由西印度和东印度返航的船舶皆必经之地。关于该群岛在美洲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见Landes, “Finding the Point at Sea”一文，及Broad, “Watery Grave of the Azores”一文。

[86] 巴伯尔（1483-1530），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帖木儿的后裔。——译注

[87] 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国军人，曾三度活动于印度。1757年率兵攻占孟加拉，出任英国首任孟加拉总督，1764年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译注

[88] 硝石（即硝酸钾， KNO_3 ）是火药必不可少的成分，因此这种原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价值。硝石的重要成分氮在当时是从含尿液的土壤中提取的，因为尿含有尿素〔 $\text{CO}(\text{NH}_2)_2$ 〕；而印度的人口与西欧相当，排尿量大，土壤条件又格外有利。氮化合物是各种爆炸物（如硝酸纤维和硝化甘油）都必不可少的；早在15世纪，英王亨利五世就曾下令未经许可不得出口火药。法国、德国等国曾试图建立硝石庄园

以促进大自然的氮产量。英国从印度获得硝石的大量供应，就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战略优势。

[89] 作为压舱物，胡椒使一些东印度的船舶要比其他长途航运船只的气味好闻多了，但它有一点不方便。它的浓郁的香气改变了其他货物的味道，尤其是咖啡。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得不调低他们的咖啡的价格。但他们又需要压舱物，只有这样才能在大风浪中保持船舶的平稳——见Chaudhuri, *Trading World of Asia* , 第313页。

[90] 这种折算是以当时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年50英镑）等价于现代工人工资的2.5万美元为基础的。在这类涉及长时期的折算法中，最好的比较标准就是劳动力价格。

[91] 克莱武所得到的现金报酬相当于现在的1.4亿美元。一些人认为这都是敲诈勒索得来的，但麦考利说克莱武可以很轻易地得到两倍于此的钱，“他得到了200万卢比，只要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使200万变成400万”——Macaulay, “Clive”, 第243页。这自然是克莱武让别人得到的印象。参阅Keay, *Honourable Company* , 第320页。麦考利的确提出了问题：对于英国人来说，从一个外国统治者那里接受巨额礼金是否合适呢。是的，这不违反法律；但他又问道，如果威灵顿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从法国的路易十八那里也得到相同的礼物，那人们又会怎么说？

[92] 在加勒比诸岛，当地奴隶不能靠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新的奴隶供应若被截断，就会扼杀旧的种植园体系。

[93] 即今日之海地。

[94] 有的疾病民族学者对梅毒发源于美洲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哥伦布以前的欧洲性病有相似的传染过程和后果。但是，相似不等于相同，梅毒在16世纪才成为一种传染疾病是确定无疑的。不妨比较一下艾滋病，它的出现也许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呈现出传染性疾病的迹象。

[95] 蒙提祖马二世（1466?-1520），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抗击西班牙入侵者，后被俘遇害。——译注

[96] 雅加达的旧称。——译注

[97]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用“荷兰病”一词来描述这种综合征，他们是从荷兰开发利用北海的天然气资源得到启示的。好像荷兰人不知道如何善为利用这些新资源似的。

[98] 对韦伯模式最好的分析仍是帕森斯的《社会行为的结构》。帕森斯评论该范式，将行为分为三种：理性行为（与结果相符）、非理性行为（与结果无关）和非理性行为（行为自成结果）。后一类最好的事例为：“父亲，我不能撒谎；是我砍倒了樱桃树。”韦伯的加尔文伦理属于非理性领域。

[99] 猓猓科学院原文为Accademia dei Lincei，科学院以猓猓命名，系取其目光锐利之

意。

[100] 罗马教廷于1983年承认宗教裁判所1633年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译注

[101] 可以比较一下意大利关于色情出版物的规定：只要这类图书价格昂贵而且印数有限，就可以通融；但不许出版廉价版本，因为当局担心那会腐蚀那些头脑简单、没有文化根基而抵挡不住诱惑和犯罪的普通老百姓。关于教会害怕用本国文字出版图书，可参阅贾姆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在16世纪80年代遇到的麻烦，见Eamon, “From the Secrets of Nature”，第361页，注41。

[102] 意大利亦是如此。那里有过一座短命的科学院，即托斯卡纳公爵利奥波德资助建立的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该科学院惟公爵之命是从，在公爵离开到罗马另谋高就不久，该科学院就解散了。没有学术自治：院士们汇报他们的实验，如此而已。——科学，换句话说，没有科学。

[103] “工厂”意指一种统一的生产单位（工人在监督下集中劳动），使用集中供应的、尤其是无生命的动力资源。没有这种动力资源，就不是工厂而是工场。

[104] 制造锅炉的技术（卷起铁片，焊接缝隙，覆盖上下）不适用于发动机汽缸的制造——泄漏量太大了。新技术是在坚硬铸件上钻孔，是约翰·威尔金森发明的，1776年获得专利。他是从炮筒钻孔（1774年获专利）得到启发的。一年之后，威尔金森使用蒸汽机提起60磅重的冲锤锻造五金器具。到1783年，冲压锤重量增至7.5吨。他不久就建立了锻压厂，铸造冲压机、制造金属线用的拉床以及其他重型机械。厄谢尔写到：“他是当之无愧的重金属贸易发展的先驱之一。然而，在大众看来，他脑子里充满了怪念头。这些讨厌、不吸引人的特点使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参见Usher,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第372页。其实，伏尔甘（又译武尔坎，罗马火和锻造之神，比喻铁匠。——译注）也不够灵巧。

[105] 19世纪下半叶，由于热力学的科学进步，蒸汽机得到了重大改进，在该领域，以前是技术领先于科学，这时却是科学的领先促成了蒸汽机的新生；从某些特定技术后果可能性的数理逻辑（S形）曲线上讲，实验准备阶段收益缓慢，而后迅速发展，可能性枯竭时将降慢速度。关于这一点，见Simon Kuzners的经典论文，“Retardation of Industrial Growth”。

[106] 铸铁含碳量高（超过4%）。铸铁坚硬，但易在震动下断裂。它不能机制，所以只有铸造，即放到铸模里冷却成型。锻铁可以被锤击、钻孔和通过其他方式处理。锻铁不会在震动下断裂，而且抗腐蚀性极强，所以是制造阳台栏杆和其他户外器具（比如埃菲尔铁塔）的理想用材。用铸铁冶炼锻铁，应烧尽大部分碳含量，只剩余1%左右。锻铁早已被钢所替代（碳含量1%到3%），钢融合了铸铁和锻铁的优点，既有韧性又极其坚硬；结果，锻铁今天几乎只能在废料中找到。早期焦炭炼铁的困难在于，在精炼时，易产生热脆的铁（热即发脆）。直到这一问题解决之后，才从烧炭铸铁中制造锻铁。

[107] 动力机械必然是工业事故的一个新源泉。关于糖厂当时出现的问题，以及手动或畜力设备更为安全，参见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 第143-144页。马比骡子和牛更危险：“……不幸奴隶的尖叫使得马奔走更快。”

[108] 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 英国诗人、评论家和辞典编纂家。
——译注

[109] 以下两位作者对过程核心的说法并不同意。见：John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 第147页；Carlo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第291页。希克斯将早期棉纺机器视为“旧工业进化的附属物”而不是新工业的开始。他认为，诸如此类的事已经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出现，那时水力机械已经出现（意大利确实有水力机械）。“即使没有克朗普顿和阿克赖特，仍然会有工业革命”。西波拉写到，“铁与煤炭而非棉花是引起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也许如此；按照影响和重要性给各项进步排队，并不容易。但是，我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是机械化，以及在监督与纪律下工作的组织（工厂体系）。

[110] 在这里必须区分棉纺业和织布业。在棉纺中，机械干脆淘汰了旧的手工技术。即使工资只是相当于英国人一小部分的印度棉纺工人，也不得不在机纺棉纱前投降。而在织布方面，动力织机用了数十年才能处理纤细的细支棉纱。所以，用手摇织布机的人尽管日益感到前途渺茫，生活水平逐渐降低，却依然在工厂之外坚持生产，直至死亡和衰老吞噬他们。19世纪下半叶，制造商即使有特殊原因想雇佣手摇织布机工人，也寻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种行将完结的行当。

[111] 经济学是一门可能成为科学的学科，正如大家知道的，科学在进步，所以前辈的专著和文章常被抛掷于脑后。因此，一个学科就会有这样的怪事：它在日新月异的时候，常常是重新发现昨日的发现——且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112] 这方面的模型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及其同事建立的。在分析美国的数据之后，从60年代开始，库兹涅茨帮助其他国家设计和资助类似的项目。关于英国工业产值数字分析的开拓性工作可追溯到更早的瓦尔特·霍夫曼，但是菲利斯·迪恩重新开始这一研究，在间隔一段时间后，查尔斯·范斯坦、尼克·克拉夫茨、尼克·哈利等人亦曾作出过努力。

[113] 关于这些精心构建的数字的弱点和陷阱，见Hoppit, “Coun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文。该文在第189页引证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译注）的话说，“不幸的是，这是一种数字的炼丹术，将最值得怀疑的资料变为似乎纯正和珍贵的东西；因此历史统计的价格永远值得警惕。”可见，19世纪中期的人们已经醒悟了。

[114] 1节=1海里/小时。——译注

[115] 因此法国才在17世纪80年代发生过“中毒丑闻事件”。这次事件导致数百名算命者、占星者及其顾客被捕并受到严酷审讯，大约有34人因同谋谋害罪而被处决。据格

里尼特在《天才的激情》一书的136页至159页上说，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这一事件更能消除广大公众和政治当局对占星术和魔术的信任了。科学家早已摒弃了这种荒唐。

[116] 关于羊毛业工人抵制机械化的问题，请具体参考Randall, *Before the Luddites*。兰德尔指出：这种反应也是一种组织职责和同甘共苦的问题。凡是工人身兼独立代理商者，如像在约克郡那样，他们在采用有利于自己的新方法时就没有什么麻烦；凡是工人依靠工资谋生者，如在英格兰西南各郡，他们就反对威胁他们就业的机器。

[117] 在精纺机系统中第一批奠定工厂制基础的是刘易斯·保罗和约翰·怀亚特于1738年发明的机器（以保罗的名字取得专利）。其主要的发明是应用以不同速度转动来抽出纤维的滚筒。这一特点其后变作装有铰翼或相等物的梳纺机的固定构件。据说，在当时，棉纺劳力的缺乏，其程度决不像其后年代所发生的；借用沃兹沃思和曼的话说，很难称得上是严重的——见《棉花贸易》一书第414页。但是，手工纺纱工纺出的纱线，包括单人纺成的和由一人传给另一人纺成的，粗细不匀。这就意味着织布工为了达到规定的质量，不得不购进比实际采用的多得多的纱线。而机器则有望结束这种状态——见该书第416页。

[118] 这种强制行为在消费需求增长的情况下更加令人烦恼。人们对事物越来越大的欲望本应增加劳力的供应，从长远来说，它确实如此。但在短时期内，需求超越了供应，而制造商们变得不耐烦。关于消费和手工业的联系，请参考de Vries,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文。

[119] 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试图家家后院大炼钢铁的做法失败后，也懂得了这一点。

[120] 诸如“价值观”、“文化”这样的术语并不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喜欢讨论可量化的（更确切地限定的）因素。但是，生活就是生活，我们必须讨论这种事物，因此我们才有沃尔特·罗斯托所说的“脾性”和摩西·阿布拉莫维茨所说的“社会能力”。玫瑰花不管有别的什么名称，毕竟还是玫瑰花。

[121] 在科学和理性时代，迷信和顽固性起初可能令人惊诧，但鉴于迷信的目的在于控制命运，它宣扬宿命论，并且成为不幸和无能的人们求福避灾的一种诉求，也是对没有保障的人们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因此，即使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人们依然求助于占星术的解释和算命。虽然如此，人们仍然不希望看到魔术被用作一种经营的工具，例如不希望看到18世纪人们沿法国北部边境（埃诺河）以及法国中部（热埃河）勘探煤炭储量时曾经信赖探矿魔杖而遭到误导和延迟。——见Gillet, *Les charbonnages* 一书，第29页。

[122] 英国人对于宗教上的外来者参与政治生活和进入各个大学也有自己的限制，但却自相矛盾地把这些“少数派”导入了商业并且使他们得以避开上流社会地位的引诱。

[123] 马兰诺（Marrano的音译），指在中世纪末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被迫情况下皈依基督教但暗地里仍坚持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译注

[124] 其答案部分地在于这种任务在亚洲是分配给妇女儿童完成的，也就是说，是分配给那些不能说不的人去完成的。人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类似的模式，例如在东南亚。在东南亚，妇女收割稻子用手指刀，一次割一茎，而不用镰刀。据说这是为了敬奉稻神，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常常用虔诚的神话来使妇女的劳作神圣化。假使由男人来割稻，一把飞舞的镰刀和一撮象征性的收获物也会使稻神受到敬奉的。关于用手指刀收割稻谷，见Reid, *Southeast A-sia* , 第1页，第5页。

[125] 关于“比较优势”一词，此处稍作解释，因为我们在其他场合还要使用它。同表面相反，它并非指能比某个其他生产商生产出成本更低的物品的能力，而是指做一件事比做另一件事能赚取更多的钱的能力。所以，一个国家要发挥其比较优势，就要制造最能对它赚钱的那些东西，而不只是销售起来比竞争者售价更低的任何东西。

[126] 即英王威廉三世。——译注

[127] 阿让库尔是法国北部位于加莱附近的一个村名。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414年，英军曾在此大胜法军。圣女贞德（1412?-1431）是法国著名女英雄，屡立战功，最后以身殉国。——译注

[128] 地区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重要性早已受到人们的注意。例如，请参考N.J.G.庞兹在50年代所写的专题文章；庞兹和帕克合著的《煤和钢》；里格利著的《工业成长》以及法国人在本世纪初写就的一系列人文地理的研究文章。但是，从这一点出发，就拒绝承认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益的、更不用说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那就无异于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其中的一方并不排除另一方。只要经济活动是由国家关注和政策而形成，只要国家是我们统计数字的主要来源和架构（向来如此，而且我对未来也看不出任何变化），国家的研究和比较就会是问题的核心。在这方面，请参照约翰·戴维斯关于波拉德著《和平的征服》一书的讨论，见Davis, “Industrialization in Britain and Europe”一文第55页。

[129] 在英美编史工作的习惯用法中，“封建的”（feudal）一词（源自“feudum”或“分封”），专用来指君主之间或君主同藩属之间的关系，即这一界线以上的各种规则和行为。领主和农民之间（跨越这一界线）的关系则一律称作“领主的”（seigneurial）或“庄园的”（manorial）。欧洲大陆的惯例是用“封建的”一词去指回溯到中世纪惯常的社会和经济的那些方面——实际上是指“旧体制”。

[130] 人们在印度可以发现类似的社会体制：僧侣、武士、商人、农民；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武士、农民、商人。这些都是试图保持社会功能的秩序和稳定，从而保护精英免受变革。法国人虽然并不设置职业上的障碍，却在1789年的前夕又依旧沿用这种区分来确定国会中的政治代表。英国人则有自己的政治花样，甚至更具有概括性，把国会分成了贵族院和平民院（上院和下院）。

[131] 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管辖区：阿尔萨斯，其大部系1648年获取（斯特拉斯堡于1681年获取）；勃艮第的弗朗什孔泰伯爵领地，1678年从西班牙夺得；洛林，1776年

兼并；弗兰德的近期征服地——它们都部分地服从它们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欧洲的民族国家当时依然处于形成之中。

[132] 满师学徒工的联谊会会被当做例外加以对待。他们许多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周游全国，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接待。这些被称为“伙计”的人起着联络的作用，彼此提供关于工作岗位和雇主的情况，但不怎么参与劳资冲突。他们的秘密见面礼以及他们徒步漫游、往往有读写能力的会员资格，使作家们受启发而写出不少浪漫的形象。但是，他们既不骚扰别人，也不被别人骚扰。

[133] 柯尔贝尔（1619-1683），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译注

[134] 最好的、当然也是最易得到的原始资料是一部小说，即兰普杜萨写的《豹》。

[135] 布恩（约1734-1820），美国传奇式英雄。——译注

[136] 请不要忘记葡萄牙人给自己的东印度群岛第二舰队所下的指令（见第四章）：远离岸边，诱使他们从水中出来。喜爱钢刀胜于喜爱枪炮，是技术劣势的标志。

[137] 请参看布雷德利著《沙皇的枪炮》一书。俄国人同日本人态度的相似性令人震惊。人们通常以为日本工业效率特别高，但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军械制造业却极不规整，陆军所发的步枪、手枪和弹药仍然不尽如人意。士兵们则从刺刀上寻求补偿；刺刀往往是一直安装在步枪上，并且成为培养白刃格斗中个人勇敢的秘方：“装刺刀不只是给步枪安装上钢制的利器，因为它还给装刺刀的士兵的灵魂注入了钢铁。”与此相同，军官们更多依赖的是军刀而不是手枪，一有可能就放弃手枪而使用武士刀。对勇武精神一种钟爱的测定：经常是拿战俘当靶子，一刀斩首或是劈成两半。参看M.and S.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一书第35章“吾刀即吾魂”。

[138] 马克思这段话的中译文引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第206页。——译注

[139] 某些工业公司建立起自己的银行，部分地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商业交易，部分也是为了从当地储蓄者那里融入资金。由于这种公司要固定保持一定的（投入的）资金以便能够应储户要求向他们支付本息，它们十分容易受到收缩和危机的伤害。不论怎样，这一首创精神的方向，从工业到金融业，证明了英国工业资源的富有。

[140] 对于相对要素成本来说，这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适合的。技术的选择是一个复杂问题。以设备为例：可能只有最新式的新机器才能购得，因为制造厂家正在制造的就是这种机器。但二手设备也可能产生重要的经济效益——对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并不这么简单；较陈旧的机器可能更难以维修；而且到哪里去弄替用零部件呢？——拆用旧机器零部件吗？

[141] 在这些家族中，有一些开始时是平民（杰米多夫曾是农奴），靠工业发财致富，由于自己的贡献而获得了贵族身份，继续从事工业，利用精心选择婚姻的方式加强了

自己的地位。例如，温得尔钢铁世家得到了头衔，虽然没有因联姻而成为高级贵族，却在家计不甚宽裕的非常古老的家族当中找到了大量储备的人才和荣誉。正如温得尔与之联姻的一位出身中世纪家族的贵妇人喜欢提醒听众那样（当然是面带笑容），她的家人都晓得她丈夫是那位大佬五金商。

[142] 法国公司法作如下区分：（1）普通合伙公司，即所有合伙人都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的个人责任；（2）有限合伙公司（两合公司），即无限责任合伙人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有限责任合伙人的责任仅限于自己的资本中的股份范围之内；（3）股份有限合伙公司，即有限责任合伙人拥有可转让的股份；（4）正式股份有限公司，即每个人都享有有限责任而且各个所有制部分均采取可转让股份的形式。在1867年采用普遍有限责任制以前，所有这些公司均需从立法机构获得特许。这种要求使得公司的组成花费大而且困难大（政治关系可以有帮助），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限责任违背商业道德和惯常做法（债权人被认为应享有较好的保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授予。

[143] 然而，即使到现在，不少文献依然回应着几乎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主题，继续强调“信贷社”的重大贡献。它确实曾经是典型，但那不是在法国，因为在法国不妨说它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144] 路易·菲力普，法国“七月王朝”（1830-1848）国王。——译注

[145] 欧洲的关税历史表明了一段大众性的、几乎是本能性的保护行径的史实，其间穿插了一些行政性的、杰出人物的朝着自由贸易方向的活动片段。所以才有了1786年的伊登条约、1860年的科布登—薛瓦利埃英法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同市场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种比赛在双方之间进行：一方为低品位的既得利益，另一方为高品位的经济论证。

[146] 从理论上讲，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即使存在着关税壁垒，本应会使价格（以及利润）下跌。但是，效率较高的生产厂家只会高兴（躲在暗处）让自己落后的竞争者来确定价格，并且享受垄断性的收益。请参看Guy Thuillier, *Aspects* 一书第225页：“那些（小型的、旧式的、烧木炭的）铁厂继续存在、经济环境的惯性以及对于既得利益的保护，保证了这些新锻炉的更大的经济收益；不仅是关税保护它们免受外国铁制品的竞争，而且由于小型的、老式的锻炉继续存在，把价格抬得非常高，新锻炉的技术收益更使关税保护收益翻了一番。”另见第249-250页，关于轧制而成的（以别于锤击形成的）枪管被延迟的优势：轧制枪管制造成本低得多，但制造商却要同其他枪管同样的价钱。其目标不是市场份额，而是利润率。但是，既然买方是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147] 勒克勒佐镇坐落在名叫尼维尔内的地区，在巴黎正南偏东方向370公里。

[148] 这家工厂就坐落在讷韦尔以北的卢瓦尔河畔，位于巴黎以南约230公里处。

[149] 这部分地是因为技术发展的方向——资本替代劳动；但也是因为格申克龙认为通

往快速增长和迎头赶上的道路是经过重工业。

这是他在德国和俄国所看到的情况，于是就把它归结成一种范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格申克龙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维遵从的是类似的方针。

[150] 雅尔还参观过奥地利的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列日区（现属比利时）和瑞典的冶金设施。虽然他最后一次出访法国东部和中部的铁厂（1768-1769）之后不久就去世，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发现亲自传达给了一些铁器制造商和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伊尼亚斯·德·温德尔。他的一部分报告是由他的一位也叫加布里埃尔的弟弟用《着眼于冶金学的旅行》（1774-1781）一书加以发表的。——均见Woronoff, *L'industrie Sidérurgique* 一书第16页。另见Harris, *Essays in Industry* 一书第87至88页。

[151] 这就是迈克尔·波拉尼所说的缄默知识。肯尼思·阿罗谈及通过实干来学。请参阅Polanyi, “*The Tacit Dimension*” ;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 J.Howells, “Tacit Knowledge”。

[152]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兰开夏一批棉纱商向理查德·罗伯茨提出的要求。罗伯茨是夏普—罗伯茨机器制造公司的合伙人，向他提出的要求是制造一种自动的走锭精纺机，要能把纺锤走车带回来，开始一轮新的伸拉卷绕的循环过程。这个主意的着眼点在于制服那些走锭精纺机的纺纱工，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中的劳工贵族——骄慢、动辄发脾气，而且在工资谈判中很难对付。可是后来出现了贸易收缩，再加上这项技术革新的威胁，那些工人变得老实一些了，这时，那批棉纱商终于决定他们不要这种新机器——用工人更便宜。罗伯茨花了10年的时间才从自己的发明中挣到钱。请参阅MacLeod,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一文，第291页。

[153] 亦译“综合工科大学”。——译注

[154] 里弗赫（liver），法国旧时货币单位，相当于一磅白银。——译注

[155] 茜素是从蒽——煤焦油的另一种成分——提取的。这种合成是1869年由珀金在英国以及由卡罗·格雷博和利伯曼在德国完成的。其市场效应极好：1870年从染料茜草中获取的天然茜素每千克价值90马克；合成茜素每千克则仅值8马克。茜草长期以来都是普罗旺斯一道有特色的风景，而从此以后却成了历史——见Milward and Saul,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书第229页。

[156] 这不该与经典的比较优势学说相混淆。那些学说本质上是静态的，对经济发展没有提供原因解释。相反，它们一开始便用来解释流行的国际分工问题。

[157] 这在新英格兰尤其如此。在大西洋沿岸中部殖民地——尤其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可发现更大的商业化农场，生产的产品供给遥远的市场。参见Fischer, *Albion's Seed* 一书，第174页，第377-378页，第567页。费希尔指出土地占有方面的差别与其说反映出地理状况，还不如说反映出定居者从旧大陆不同来源的状况，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意图。

[158] 在努力保护印第安人时，英国当局把西进扩展限制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为止。但没有成功：美洲大陆上的英国兵不会保卫那条新边疆，正如今天的美国似乎不可能关闭墨西哥边界。

[159] 关于杂活工文化，让人想起的最好的类似例子是瑞士汝拉山区的文化。在这个地方，村里的工人为世界最成功的钟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见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一书第16章，“Notwithstanding the Barrenness of the Soil”。

[160] 他们工作时间很长，但与同时期日本工厂的工作时间相比还是短。这随季节的变化有轻微的变化，但每天也长达约11-13小时。——见Montgomery, *Practical Detail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第173-177页。

[161] 埃文斯在1787年把他的机械平面图的副本寄到英格兰。当时在英格兰的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一位曾认为是负责该发明的工程师，据说曾在1794-1795年见过这些副本——*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 s.v.Evans, Oliver。这样说来，这是本土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持续争夺最早发明权问题的早期例子。当然，这一争执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美国技术进步的早熟性。

[162] Fischer在其一书*Albion's Seed* 第65页中提到，木头框架与木头包皮结合起来，在英格兰东南都是“司空见惯的”。在美国森林密布的地区，这种做法就更有道理。

[163] 从组织形式上看，这使人想起中世纪威尼斯的海军兵工厂；从生产技术来看，这使人想起1790-1791年亨利·莫兹利为约瑟夫·布喇马造锁的技术以及1803年左右马克·伊萨姆巴德·布律内尔在朴次茅斯造船厂生产他那著名的滑轮组的技术（用的机床是莫兹利设计的）。但锁与滑轮组远远不像枪支和钟表那样容不得半点差异。也请注意法国的武器生产先驱：旧政权末期格里博弗尔制造的炮架以及18世纪80、90年代勃朗的大规模生产滑膛枪的计划。后者的计划理智，合理，但从未得以实施。这就是想象与行动、逻辑与文化的差异。请参阅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第309页、459页，注释2；Cohen，“Inventivite”一文第54页及第2条注释。关于勃朗的“失败”，见Ken Alder，“Innovation and Amnesia”一文及*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 一书。奥尔德（Alder）的分析因为主要集中谈武器制造，有利有弊：他把工程利益看成是法国人追求统一性的动力——是力量与审美方面的综合考虑的结合，是“一种首先要把国家的安全与那些难使唤的满脑子想挣钱的手艺人与商人的活动相分离”的愿望。（见“Innovation”一文第310页。）这种由理论到计划再到实践的顺序正是法国的特色。它与美国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美国，金钱与市场驱动使人们追求零部件的互换性，进步出现在各种工业中。

[164] 也不该言过其实。把土地用来建公园、狩猎场也并非与生产力毫无关系。例如，在酿酒业中，甚至最富裕的地主也种植葡萄，直种到自家门口。

[165] 20世纪30年代德国“大众车”的设想是个例外。但是，直到战后，这一设想才得以成为现实。

[166] 法国邮局的小气是有名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航空信件连邮票在内重5克以上者，还要额外交费。这就要人们使用特别薄、价格贵的信纸写信——这对于文具业倒是件好事。尽管如此，邮局并不总是给你一张面值正好等于邮资的邮票，而是给你两 three 张小面值的邮票凑成邮费总额，多加的邮票张数会使天平略微抖动从而使信件超重。只有经历这些小的方面的专制，才能理解官僚体制对经济的滞碍影响。如今欧洲共同体已制订了新的标准，这对法国人真是一大幸事。

[167] 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在入侵而得的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独立以后的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种族意识纪录，也与开明的名声不相符。

[168] 并非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这样。试比较费希尔的 *Albion's Seed* 一书第252页脚注关于弗吉尼亚州自己颇感不快的怀旧情绪。这些保守分子中很多人打道回府，以迈步离去的形式投票反对独立，忠于原先的祖国。但这是退向政治死亡，是拒绝当时已弥漫于北美殖民地的革命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把高度不同的单元团结为一个单一的共和国。

[169] 当然，人也可能出错，计划不可靠。这正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和洛佩斯独裁下的巴拉圭发生的事情。——见下文。

[170] 这是H.J.哈巴库克的经典之作《19世纪美国和技术》一书的主题思想：美国的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高，迫使美国人追求技术创新；那么怎样解释人口的快速增长呢？答案是：外来的移民。

[171] 在这以前加入阿根廷国籍的人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1895年，只有0.16%；1914年1.4%——见Cornblit的“European Immigrants”一文第232页，表2。

[172] 移民数目多少受美国和社会状况影响很大，不仅仅受生意前景影响，而且受战争和革命的影响。因此，欧洲1830年及1848年革命的失败促使欧洲人向海外移民；美国的南北战争则使人们打消这一念头。

[173] 移民数目多少受美国和社会状况影响很大，不仅仅受生意前景影响，而且受战争和革命的影响。因此，欧洲1830年及1848年革命的失败促使欧洲人向海外移民；美国的南北战争则使人们打消这一念头。

[174] 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有刺铁丝网的进口量是每年20000吨左右。见Rock, *Argentina* 1516-1987一书第136页。

[175] 这多与新移民的需求和口味以及城市增长有关：城市居民需要加工过的食品。1895年至1913年，食品加工厂以每年20%、工人以221%、资金以8%的速度增长。这一时期末，这一部门占了全部工厂的约40%，工业劳动力的1/3，工业投资的43%。——Lewis,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32页。

[176] 阿根廷储蓄率等于或低于5%，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阿根廷的三倍。——

Taylor, “Three Phases”, 第28页, 表4。

[177] 这是巴拉圭共和国的最高统帅兼总统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临终时说的话。他是在1864-1870年间巴拉圭与巴西、乌拉圭、阿根廷三方联盟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中牺牲。

[178] 这先后三位独裁者的姓名及统治时期是：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弗朗西亚（1814-1840），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1840-1862），以及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1862-1870）。

[179] 在这一点上绝不可夸大其词；当时一位目击者说，能开火的炮不到1/3，有一两门炮还是从17世纪留下的老家伙——见迈耶（Meyer），*The River and the People*，第65至67页。迈耶在此依据的是当时观察家的出版物，其中包括理查德·F·伯顿所著的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Fields of Paraguay*（1870年于伦敦出版）；以及依据小说 *Humaita*, Manuel Galvez所著的“一部以小说创作形式写成的历史三部曲”的第二部，三部曲的名字是 *Escenas de la guerra del Paraguay*。（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半岛一城市，建有俄国和前苏联的著名军事要塞。——译注）

[180] 为避免人们认为中国人古怪，请与16世纪西班牙的一个规定相比较：在圣餐仪式上，当圣餐的饼和酒经过时，所有人都得下跪。

[181] 推翻明朝而建立清朝的女真鞑靼人（满人）曾经以弓箭击败汉人的火枪。然而那些火枪如此不中用，大概是因为装弹药太费时间，移动起来不容易，以至于与其说是个优势，还不如说是碍手碍脚的东西。见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I, 68。

[182] 研究中国科学和技术的人，最著名的是李约瑟及其研究小组，认为中国人在许多发现和发明方面早于其他国家，把重要的技术和装置最早出现的时间大大地向前推进，远远早于在欧洲出现的时间。他们比较正确地把这看成是卓越的创造性和超前发展的标志，但他们最好问一下，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倒退和失败。

[183] 当时实际上是广东商人向朝廷施加了压力。这些商人害怕他们的外贸垄断地位会因这些有用的外国人而丧失，便花钱贿赂朝廷大臣取消这一计划。——见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第1部第77页以及第148条注释。

[184] 此处原文为“Wen-Ting”，经查考，应是清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梅文鼎。他出生的年份应是1633，而不是1635。梅文鼎对中西数学均有深入研究，并无偏颇，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东西”，“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可见本书此处论述似有片面性。——译注

[185] 古伯察（Evariste Huc，1813-1860），法国天主教传教士，1839-1851年在华传教。——译注

[186] 尽管中国人当时已作了可观的努力通过百科全书的形式搜集知识，情况仍如此。

有项百科工程实际上是著作汇编，很有可能是曾创造出的同类书中规模最大的：共80万页。——见Spenc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第86页。但百科全书泛滥也是一个不好的标记：像静止的照片一样，它们的目的是把知识定格在一个时间点上。作为工具书，尤其是历史学家的工具书，它们是有用的。但它们也可能阻碍自由的探究。

[187] 引自19世纪早期一位内阁总理之子的一首诗。该人自身也是权高位重。塔顿（Taton）主编的*General History*一书第二卷593页上引用了该诗。当然，合适的时候，人们还会在孔子学说中找到支持其他观点的话。人们可以为各自的目的引经据典。这并不阻碍人们为了一些不好的目的而引经据典。

[188] 这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三卷中描述的情景。马可·波罗本人从未到过日本。

[189] 丰臣秀吉，这位“太政大臣”，日本1586年至1598年的实际统治者，曾设想不仅要征服朝鲜和中国，还要征服印度，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显然，日本人当时对这些地方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谁知道呢？几个世纪之后，一些日本人仍然认为征服这些地方是天经地义。1930年，*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一书的作者竹腰与三郎在第一卷482页中的描述就表达了他的失望：“最初是日本在西班牙之先占领了那些岛屿，因此也就有了优先居住权，按理说日本就应该拥有其主权，但最后却让西班牙夺走了。”难怪欧洲人喜欢日本人呢，想法相近哩。

[190] 日本文字大都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日本本国的，另一种则源自中国的汉字；因此有hara-kiri（腹切）和seppuku（切腹）之分。还有一些只有“汉字”的表达方式。中国汉字大量充斥在日本语言中，那些比较抽象的词汇尤其如此。

[191] 此事系据当时担任日本主教的马丁内斯神父的报道。马丁内斯在1602年的一封信中哀叹了西班牙人的好战和野心，指出他们“传教只是作为一种征服他人的工具……教会如今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均起源于那些从吕宋岛来的传教士”。——见Elisseeff的《丰臣秀吉》一书，第229页。

[192] 失去了主人的武士当中，有的人比较谨慎，当了剑术和武术教师，或儒学教师。还有一些人成为农奴武士。也有不少人为主人殉葬，殉葬之风日盛，当局遂于1663年明令禁止。

[193] 见Oishi，“The Bakuhan System”一文，第23页。这些浪人决心为主人申冤，如同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拼命报仇。最出名的是“四十七浪人”。他们巧用计谋报仇雪恨的故事（1702年）至今仍在流传。最后他们被政府以扰乱治安触犯刑律的罪名勒令切腹自尽，但仍被民间视为英雄。他们的墓地在东京，常受后人凭吊，日本人为他们的事迹摄制了几百部影片。

[194]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消费要花去一个藩总收入的一半。还有一种额外的消费就是火灾（木头和纸结构房屋的潜在的巨大威胁）过后重建家园。甚至有人对自己的房屋进行过16次修复。他们缺乏安全保险意识，本来应该汲取经验教训而采用其他建筑

方式。参阅Naka—mura and Shimbo, “Why Was Economic Achievement.....?”一文, 第8页。

[195] 一小部分枪炮封存在军火库里, 还有少数大炮架设在港口以防御外敌入侵。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参见Perrin, *Giving Up the Gun* 一书。

[196] 这种借贷一开始往往采取禄米收入的预支的形式, 转换为年利率10%至20%的长期贷款——见Miyamoto, “Emergence of National Market”, 第300-301页。

[197] 18世纪中前期, 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数次颁布法令: 如果稻米的价格跌, 就解除那些以禄米抵债的武士们的债务, 并且禁止有关债务方面的起诉。商人们就私下里到武士们的家里或在大街上拦截他们的坐轿或坐骑讨还债务。有的商人还在欠债者屋前或门上插纸旗以示抗议, 幕府1729年的法令指出这种做法“极其可恶”, 予以禁止。见Takekoshi, *Economic Aspects*, 第二卷, 第362-366页。

[198] 此语最早出于速水融教授, 在日本学术界流行甚广。

[199] 德川幕府已将那些原本归各藩领控制的金矿和银矿没收归公。

[200] 看来中国人也曾经被称为蛮族, 所以在荷兰学派与儒学派辩论时, 前者颇乐于指出这一点以贬低儒学。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说中国人不比别人强, 而是要说中国人更差。

[201] 即开始采用统一时差的小时制和格列高利历(公历)。即使如此, 日本仍旧保持着以天皇在位的年号来计年的传统, 这一传统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对于外国人来说, 这就需要突击学习一下日本的政治史。

[202] 起初最短的义务教育期限是4年, 从1907年起增为6年。由于日本文字比较难学, 所以通常需要3-4年的时间才能扫除文盲。

[203] 最初曾规定免除兵役的对象包括结了婚的男人和家中的独生子。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早婚盛行。

[204] 这些象征性的事物对日本那样一个在伦理道德方面颇具特殊性的国家引起很大冲击。因此也就有了1875年萨摩藩的原藩主岛津久光向天皇所递的请愿书, 请求天皇下令禁止日本人穿戴西式服装。这一请求被拒绝后, 岛津久光从东京愤而离去。见Brown, “Okubo Toshimichi”, 第189页, 注释2。

[205] 当时的日本内务省不仅负责警察和公安事务, 还通过它下辖的工业促进局, 主管经济的发展。

[206] 这些水车还是非常精巧的。但日本人不得不遵守特殊的限制用水制度, 尤其是不能侵犯农民的河岸权(指沿岸土地所有人利用河水或湖水灌溉田地的权利)。最后这些工厂主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水流中间设一个抛锚的船, 利用水车的力量转动船

上的纺织机——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漂浮工厂——见Minami, *Power Revolution*。

[207] 但日本手工纺织要比其他地方持续得更久。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日本妇女的勤劳和忍耐力（下文中还要谈到这一点）。另一个原因则是1876年由一位和尚辰致卧云所发明的管式纺纱技术。这一技术是指将棉花填进直径为1英寸、长6英寸的锡皮管内，然后转动管子，将棉花缠到纺轴上。这一技术将一个妇女的日产量提高15倍之多。虽然如此，手工纺织毕竟还是竞争不过水车，许多水车安装在纺织船上工作。手工纺纱的原始生产方式持续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部分是因为它的低成本和低工资，部分是因为织地毯、法兰绒和日本式厚底短袜等都需要粗糙的棉纱。

[208] 有一个例外：化工业还没有被看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但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当时的经济政策有那么完善。关于对日本政策的典型的过分乐观的评价，见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209] 在社会科学的词汇中，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术语是最容易导致误解和滥用的词汇之一。

[210] 这个故事出自日本女作家山代巴以半虚构形式写作的散文诗《泥塘大黄芽》。山代是左翼人士，主张土地改革，她的丈夫是马克思主义工会活动家。1940-1945年期间，山代因“怀有危险思想”而被投入监狱，她显然是狱中得悉她诗中所描述的那个苦命的老妇人的故事。此处则系转引自Hane的*Peasants, Rebels, and Outcasts*一书，第85页及其以后多页。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研究日本经济史的学者都不可忽视它。

[211] 鸡庵敕令规定：“农夫必须早起，先割草，再种田。晚上要搓草绳，做草袋……男耕女织。而且他们晚上还要不停地工作。”——见Leupp, *Servants, Shophands*一书，第7页。

[212] 关于清洁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访问日本的欧洲人了解这种习惯的必要性，见耶稣会教士Alessandro Valignano 1583年给他的传教士弟兄所提的建议——Valignano, *Les Jesuites au Japon*，第200页。

[213] 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特洛伊陷落后，背父携子逃出火城，经长期流浪，到达意大利，据说其后代就在那儿建立了罗马。——译注

[214] 部落民与其他日本人没有可以区分的明显特征，所以他们就尽力地流往大城市，当然，许多人仍继续居住在贫民窟以及犯罪活动滋生的街区。直到今天，一些日本人还雇用侦探和基因学者查究其未婚夫或未婚妻是否出身于部落民。为阻止这种做法，当局已封闭了某些官方档案。见N.D.Kristor, “Japan’s Invisible Minority”一文，载于《纽约时报》，1995年11月30日，A-18版。

[215] 见Reading, *Japan*一书，第51页。日本没有油，但它有钱去买。俄国有油，但它又没有钱去安装燃油炉，也无法付给矿工工资。到*1996年12月，工资就拖欠了7个月之久。

[216] 一些读者可能举出反证，即法国人很不情愿离开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确是的，法国人要比其他欧洲人具有更强烈的荣誉感。可是一旦大势已去，法国人和其他欧洲殖民者们就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撤离了阿尔及利亚。

[217] 参见Charnay, *Traumatismes Musulmans* , 第314页。海湾战争中基督教军队的行动被看做是当年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的仇恨的历史重演。

[218] 我作这一对比时，没有将强迫入教的现象包括在内。强迫入教显然对入教者的信仰和教养无所要求。

[219] 引自N.Chaudhuri, *Thy Hand* , 第674-676页，其中提到这种荣誉感大多数都是由那些浪漫的东方主义者所激励的。但是这样的鼓励是不需要的：傲慢自大的欧洲人面对历史悠久但却衰落的古老文明时，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Tewfik王子，埃及赫迪夫（1867-1914年间土耳其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伊斯梅尔的儿子，他在19世纪60年代被教导说，西方的科学技术——蒸汽机，火车铁路等——都是起源于伊斯兰和阿拉伯人。——见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 第325页。

[220]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为纪念哈德良（Hadrian）而命名。现名埃迪尔内，在土耳其欧洲部分西北部。——译注

[221] 这一措辞是个隐喻：a tete de Turc现在具有嘲讽的意味。

[222]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比较持赞同意见。例如Eric Jones的*European Miracle*一书就认为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对待民众是比较温和宽容的。他的根据主要是人口（寿命）记载资料。但这些资料并不完整。也许，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不像莫卧儿帝国百姓那样顺从，那样好压榨。无论如何，要说二者的压迫孰重孰轻是很难的。我认为较恶劣的是莫卧儿帝国，但也很可能是奥斯曼帝国。

[223] “叛教者”这个词出自Jones的*European Miracle* 一书，第180页。这是基督教徒的看法。对于穆斯林来说，皈依伊斯兰教是虔诚的标志。

[224] 这与普鲁士官僚机构从德意志各邦公开招贤纳士大不相同。德意志的民族共性源于其共同文化和荣誉感。政治上的壁垒则是次要的。奥斯曼帝国却是各种不同文化的聚合体，其中的分歧绝不是表面性的或次要的。

[225] 土耳其禁卫军士兵的来源最初是按照抽丁的方式从非土耳其民族的青年中征集，把他们教育成穆斯林。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战俘。后来，土耳其人也被允许加入队伍。在没有战争的期间，他们可以从事贸易活动或以警察身份来维护社会治安。

[226] 阿尔及尔的总督利用类似的方式铲除了他的敌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被邀请赴宴的人感到情面难却，所以这种手腕得以奏效。

[227] 在上文中谈论中国时，对于中国人怎么会忘记他们早先的优越技术，我表示过惊讶和怀疑。可是，这样的倒退显然是可能的。问题只在于倒退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

什么会发生。

[228] 在那个时候，仅有的较好的棉花是来自于北美佐治亚和卡罗来纳附近的几个小岛，即所谓的海岛棉。这种棉花产量不多（在1835年，埃及棉的产量相当于它的3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棉花的种植已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旅馆、海滨度假村等旅游业的开发。埃及棉花在质量上居于当今世界首位。关于尤梅尔早期历史，见Levy-Leboyer, *Les banques europeennes*，第199页。

[229] Issawi, “Economic Development”，第362页，谈到了这两种看法，但又将经济发展目标看做是也许无意识的，或是可能经斟酌而形成的。

[230] 但是Levy—Leboyer在*Les banques europeennes*一书第189页和注31中，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报告，说埃及的棉花只能在埃及境内销售，以及在被埃及征服的叙利亚一带销售。

[231] “最初在工厂里做工的只有从达尔福尔和科尔多凡贩卖过来的黑奴，他们头脑灵活，很快地就掌握了劳动技术，但因为长期生活在肮脏恶劣的环境中，他们逐渐死亡而队伍日益稀疏、因此帕夏不得不转而征用农工。”——Saint-John, *Egypt of Mohammed Ali*，第410-411页。

[232] 还有些人不顾当局封闭边境的规定而逃到国外。伊萨维在《埃及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将这种逃亡归因于国内生活困难和人们躲避兵役。但躲避当劳工大概是更重要的原因。

[233] “在埃及的23或24家棉纺厂中，没有哪家没有起过火，其中有意外的，但也有预谋的。”——Saint-John, *Egypt*一书，第413页。

[234] Saint-John, *Egypt*，第145页，讲到“灰尘中含有硅微粒，就是最严密的建筑以及装上玻璃的窗户都不能阻止住它的大量入侵”。

[235] 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城是中东地区豪门子弟心目中的麦加。名义上，他们是去上大学，还有什么更好的？实际上，他们的光顾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俱乐部、赌场、夜总会生意的兴旺。见Michele McPhee, “The Euro-Brats of Boston”一文，载于《波士顿环球报》，1995年9月20日，第77版。从内容来看，该文标题中的“欧洲顽童”当属用词不当，但它“政治上正确”。

[236]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掠夺性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阿拉伯和西方人士，为伊拉克申辩，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是被引诱进去的（Samir Amin），或“几乎是被邀请进的”（Edward Said）；或是认为对这一行为，应该站在阿拉伯统一的高度去看，或者说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打击（萨达姆被看做俾斯麦或萨拉丁）；或是含蓄地说，为了把国际分歧的问题提出来，那也并不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做法（Noam Chomsky）。诸如此类的论点充分说明了暴力在阿拉伯世界的吸引力和无所不在（即使没有以色列，他们也会彼此掐对方的脖子）——下文还会再谈到这一点。它们也

说明，出于民族主义以及反西方（反美）的目的，人们可以歪曲事实到何等田地。有关情况，见Makiya, *Cruelty and Silence* 一书，第8章“New Nationalist Myths”。

[237] 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93年10月1日第28版刊登的对Arlene E. MacLeod的 *Working Women, the New Veiling, and Change in Cairo*（纽约：哥伦比亚1993年版）这本书的简介，其中提到，面纱既是象征也是解决进退两难的办法：它对妇女丧失个性和身份表示抗议，同时又表明“妇女默认一种看法，即认为妇女是性可疑对象因而生来只适合呆在家里”。也就是说，它是抗议兼默认，是“通融性抗议”。如果开罗妇女果真有这样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想法和说法，那就真让人感到没有什么希望了。

[238] 他们也不会被另一些较开明穆斯林地区的女权主义政治宣传所吓倒。关于伊斯兰社会这方面的重新定义的活动，见Barbara Crossette的“Muslim Women’s Movement Is Gaining Strength”一文，载于《纽约时报》，1996年5月12日，第A-3版。关于伊斯兰内部的态度对比，见Ash Devare, “For Indonesian Families, Smaller Is Now Better”一文，载于《波士顿环球报》，1996年7月23日，第69版。

[239] 并不是人人都同意这一点。《纽约时报》1995年7月26日登载了一封信，作者署名为斯克兰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威廉·帕伦特，其中就驳斥阿拉伯国家的“妇女解放”，说她们“将会冲击阿拉伯的劳动力市场和造成进一步的工资下降”。

[240] 在人口结构上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妇女能上班挣钱，才能在家中有地位，在生育计划方面有发言权。否则，人口繁殖方面就会出现不利的影响。参见Dasgupta, “Population Problem”一文。因此，如果一个穆斯林的妻子（往往为非穆斯林血统）决定外出工作（甚或在未经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外出），就会被认为是对婚姻和睦以及对丈夫的尊严和名誉构成了威胁，并受到相应的对待。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参见Goodwin, *Price of Honor* 一书中的多处，以及Barakat, *Arab World*一书第101页。

[241] 历史学家、前突尼斯大学校长穆罕默德·塔尔比说，他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现在会这样做。他提醒我们说，尽管穆斯林曾在种种事情上表现过缺乏容忍，但是伊斯兰世界从来没有对异教徒干过“系统地强迫改变信仰，或任意加以隔离，或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大规模驱逐，或加以种族灭绝，或者还干过什么大屠杀”。见《费加罗报》，1997年3月27日B-27版。他的话说得有点太客气了，不过他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少数教派（指的是犹太教徒）的迫害作如此对比，是正确的。

[242] 英国网球冠军中的最后一个是弗雷德·珀里，他是20世纪30年代的冠军，人们为纪念他，特地在伦敦温布尔登体育场的入口处设置了他的雕像，表示对于那一美好时光的怀念和敬意。

[243] Jean-Paul Mari的一篇文章“Enquete sur le massacre d’un peuple : Algerie : au Dela de l’horreur”（载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5年3月23-29日一期第58页）指出：“阿尔及利亚人一向认为唯有通过暴力才能有所收获。”其他更多的相关内容，见

Miller, *God Has Ninety-nine Names* 一书,第168页。亦见Fisk,“Sept journees”一文。

[244] 在有关“东方学派”的议论中,我认为这种内外两分法是最不幸的,最违反学术的要求的。有意思的是,赛义德在为《东方学》一书的新版本所写的作为后记的一篇文章中,就若干问题作了自我解释,但对内外之分仍未置一词。相反,他集中谈到有人指责他的书有所谓的反西方主义,歪曲他的观点,硬说他认为东方学派对整个西方有象征意义,认为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责难是对一个“完美”制度的攻击,这样的指责是错误的。这真是有力的辩护,只可惜他选择的目标是稻草人。见Said,“East Isn't East”一文。

[245] Klor de Alva在“Postcolonization”一文中对这些名词以及它们由于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而出现的不同涵义,作了很好的论述。他比我更精细,尤其是对imperialism和colonial-ism两个词的使用,以及对postcolonialism和postcoloniality的区分,十分严谨。他的做法有其长处,而我则宁可粗一点,但求简明。

[246] 请参阅9世纪初巴黎郊外圣杰曼修道院所辖庄园的一次人口统计结果。有些人是法兰克人姓名,有些人是高卢—罗马人姓名。

[247] 丹麦人曾蚕食不列颠岛,于9世纪占领东英吉利很大一片地区,称为“丹麦法地区”。但这些丹麦人与当地人通婚,半个世纪之后,该地区被重新吸收入英格兰王国。

[248] 人们常说的帝国主义,除了欧洲以外,有时还包括近代的日本。然而,殖民地时期以前的非洲又怎样呢?那些谴责欧洲殖民主义的“进步”思想家居然又对祖鲁人和阿散蒂人的扩张感到骄傲。关于这种将恶魔般的白人与受害的有色人种相对立的世界历史二元论观点,请参阅Bruckner, *Tears of the White Man* 一书。

[249] 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殖民地,与他们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巴西)和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大不一样。在南美洲和非洲,他们碰到的地方人烟稀少,缺乏政治组织来发动像样的抵抗。所以他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其边界过了很久才定下来。

[250] 例如,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乔治·罗宾逊在伦敦时奴颜媚骨地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巴麦尊)讨好说:“我将以最崇敬的态度,毫不含糊地服从和贯彻执行我将荣幸地在每一事务上奉接的每项指示,对此,我想已毋庸再加任何保证。严格地毫不含糊地遵从我将接到的命令和指示……是我赖以立身处世的根本……”此后刚刚两年,这个马屁精就被提前免职了。他依然忍气吞声,表现得完全符合英国人彬彬有礼的传统。这与威廉·皮特对英王乔治三世大发雷霆的态度恰成鲜明对比。——见Cook, *The Long Fuse* 一书,第111页。

[251] 边境线是强者和弱者相交接的地方,因此也就是较量和冲突的地方。卡那封伯爵在1879年说到“边境的困难”:“一个挑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设的……就是一个抢占领土的动机”,这是殖民帝国的普遍特征——见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一书第283页。有关内容还见Landes的“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和“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mperialism”二文。

[252] 正式的门罗宣言是由门罗总统于1823年提出的，但事实上这个宣言是由J.Q.亚当斯撰写，并且有前总统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早先发表过的言论作指针。推动门罗宣言的直接动力在于那些前西班牙殖民地已造反成功，这时人们担心欧洲的干涉会导致社会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也担心俄国可能会在北美太平洋沿岸扩张领土。宣言从未经过国会的正式认可，但它却从颁布之日起就作为美国的国策。

[253] 法国人和马克西米连之所以得逞——尽管很短暂——其唯一原因就在于美国当时忙于自己的内战而无暇顾及。但是一俟美国人把注意力转向这些干涉者而援助墨西哥本国的抵抗运动，马克西米连就在劫难逃了。他的欧洲支持者撒手而去，让他面临被枪毙的命运——卖国者活该。

[254] 法国坚持在全球范围拥有领土，主要是出于威信和自尊心。维持这种虚荣是要付出代价的，如今欧盟敦促法国削减其预算赤字，在这一压力下，据说法国人正在重新考虑这一问题——见《华尔街日报》，1996年1月25日头版。但别指望它。

[255] 例如，科特迪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过顺利发展，但在随后10来年出现了负增长，从1980年到1992年平均每年人均产值增长率为——4.7%——见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表1。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状况与此相似，只是下降幅度小一些，从1980年到1992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和——0.4%。在这两个国家，内战对经济有灾难性影响，尼日利亚内战是在1967-1970年，阿尔及利亚则是现今正陷于战乱。

[256] 两个历史上的例子：从埃及出逃后的古以色列人又创造了璀璨的文化，阿兹特克人为逃避奴役而躲进沼泽地，然后又出来征服了周围的人们，于13世纪在现今墨西哥境内建立了他们的帝国。

[257] 抵抗运动和自豪感，是许多研究帝国主义史的新著作的主题——这就是Michael Adas在“High Imp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y”一文中所说的“热带地区白人英雄的结束”。原先的著述主要谈论欧洲征服者、总督们和企业们如何如何，对比欧洲的先进与当地的落后以及进步与停滞，而近年来强调的却是抵抗运动的形式和结果，不仅仅是反抗、暴乱和“叛乱”，同时还包括一般的破坏怠工活动和不合作态度。有关这些，见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一书。这种新的做法就是要说明那些消极的受害者也起了自觉的作用，说明当地的文化是动力和灵感的源泉。

[258] 在一些情况下，被征服的人们早在白人到来之前曾建立过他们自己的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和南美洲的印加人当然包括在其中；但还有印度支那的安南人；缅甸的缅甸人；非洲的祖鲁人；等等。自由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平等。平等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新的国家结构是建立在旧有的等级制度之上。

[259] 应指出，印度的铁路的技术程度很低，又是由印度的纳税人非自愿地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其形式为付给英国投资者以有保障的回报。（尽管有的印度人也有钱，但

印度人本来没有兴趣把资本投入到这些项目上)。有关这些复杂的事情,见 Headrick, *Tentacles of Progress* 一书第三章。

[260] 在强有力的反帝著述中,有一篇是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黑暗之心》。它是康拉德根据他在非洲心脏地带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以流畅而雄辩的文字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劣迹和西方的虚伪。有一句是“溯河而上,仿佛是重返混沌初开时的景象……”可是这篇小说后来却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东方学派”的作品,被排除出经典文学名单。有人说康拉德把非洲本地人描写得原始落后(把非洲写成黑暗之心),令人无法忍受。这篇小说本来被认为是表达同情心和人性的杰作,如今竟受到如此的攻击,造成了当今行话中所谓的一个“争斗场”。请参阅David Denby所写的文章:“Jungle Fever”。

[261] “黑脚”(pieds-noirs)指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系相对于当地人赤脚而言。

[262] “衰落”(decline)一词在许多文献中均默指相对的落后,而不是绝对的衰弱。这一点应讲明白。

[263] 指英国17-18世纪旨在促进本国航海业和海外贸易的一系列法律。——译注

[264] 他这里说得很简练,我们觉得他的对比不论是否准确,可能是指名义工资,而不是以购买力为基础的实际工资。

[265] “有些人声称,荷兰的贸易正在衰退,也许,某些特定部门的贸易真是如此。”

[266] 收益较高,也可能是因为英国实业不景气,风险较大,而且像1994年的墨西哥一样,盼望外来资金挽救危局。但当时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这样。价格取决于供求两个方面。在这里,斯密只看到荷兰的供应这一面,而忽视了需求一面。

[267] 据1614年的一项估算,呢绒染色和整理可使出口值增加50%至100%——见 Supple, *Crisis and Change* 一书,第33-51页。英格兰此计划失败,是因为粗呢绒出口商(商业冒险家公司)神通广大,资金雄厚。同时,荷兰人自然也反对进口精加工呢绒。

[268] “衰落”一词反复出现。略举数例:伊特维尔《不论发生了什么……衰落经济学》;波拉德《巩固的全盛时期和英国的衰落》;鲁宾斯坦《资本主义,文化及衰落》;埃尔鲍姆和拉佐尼克主编《英国经济的衰落》;科茨和希拉德主编《经济衰落》。洛伦兹《英国的经济衰落》论述了一特定领域。

[269] 约翰·鲍令(1792-1872),英国作家,外交官,鼓吹自由贸易,曾任香港总督(1854-1859)。——译注

[270] 例如,克拉彭谈到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时说:“很难相信,1925和1913年广泛采用的工艺若在1901年或更早时采用不会带来更大效益”(见 Clapham, *Economic History*, 第3卷,第148页)。

[27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造船业的1950年造船总吨位为130万吨，占全世界造船量一半以上。大家承认那是例外情况，因为几乎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的造船厂都毁于战火。在随后1/4个世纪中，出现了新型船舶（如巨型油轮），世界造船量迅速上升，英国造船量却原地踏步，而且在随后12年中（1975-1987年）猛跌96%。等于全军覆没。E.洛伦兹的《英国的经济衰落》第四章指出外国实行了保护主义和补贴，但也指出“英国造船业未能利用……高效率的技术”和较好的劳动组织方法，后者是由于“劳资双方缺乏信任”（该书第90-91页。亦参见D.托马斯《造船业》一文，载于Williams, *et al.*, *Why Are the British Bad?* 一书，第179-216页）。

[272] 英国这种半自发的、多元的科技教育的一个例子是夜校的出现，许多夜校学员是希望增长知识和提高技能的工人。这类学习班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扫盲班，其目的在于弥补正规教育制度的缺陷。有些人认为这些夜校尽管补偿不足，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们是由劳累的工人业余自愿参加的，它们代替不了全日制的、专业的、聚精会神的、有考试监督的系统的科技教学课程。

[273] 按照某些计算方式，好转甚至开始得更早。1950-1990年制造业平均每小时增加值的年增长率估算数字为日本7.4%，法国4.9%，德国4.5%，英国4.1%，美国2.6%（见Eaton and Kortum, “Engines of Growth”，第6页）。即使考虑到统计的误差，我们也显然不是在衰落，而是在趋同。

[274] 1960—1973年期间，美国总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即扣除资本和劳工增长因素之后的生产率增长率）为年均1.5%，日本为6.3%。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使日本1973-1979年间的这一数字降到1.5%，到1979-1988年期间回升到2%，而美国在1973-1979年间为负数，到1979-1988年回升到不足0.5%——见Hart, “Comparative Analysis”，第207页。

[275] 根据上一年度（或上一季度）的情况作预测，是最冒险不过的。日本1996年似乎情况较好，但《华尔街日报》1996年6月20日A-13版标题是：“尽管急剧增长，日本仍未驶入快车道。”

[276] 关于将军们的傲慢愚蠢，请参看Len Deighton, *Blood, Tears, and Folly* 一书中的评述。戴顿以写冒险小说和间谍故事而著称，但他也写纪实作品，而且写得真实可信。

[277] 其实，在纳粹分子掌权之前几十年，德国已有相当多的种族主义和集团仇恨事例，表明社会很有毛病。见Weiss, *Ideology of Death* 一书。

[278] 柯尔贝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曾任财政大臣等要职，主张国家兴办工业。——译注

[279] 可以当货币用的商品还有咖啡以及丝绸或尼龙袜，但它们显然不如香烟方便。参看Kindleberger, *Financial History* 一书，第403页。

[280] 关于这些做法，可参看Lincoln, *Japan's Unequal Trade* 一书。

[281] 关于日本人怎样看待工业发展与军事实力二者的联系，请参看Samue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一书。他的分析很值得参考，我只想补充一点：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有助于扩大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日本人从未忘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工业相对薄弱而在战略上吃亏的教训。

[282] 几乎所有论及亚洲这四地经济成就的著述都谈到工人的素质，但同样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Manuel Castells, “Four Asian Tigers”一文在第55页等处说它们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在于国家（政府）发挥作用，连香港也是这样。对这一点，我的唯一疑问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有国家干预，它有时聪明，有时愚蠢。国家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但要说国家作用就是好，恐不大容易。

[283] 世界银行将它们称为“高性能的亚洲经济”，看来有理，但世界银行又提供了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使得它列出的名单变得很成问题。在1960-1985年期间年均人均增长率头20名的名单中，怎么会列有埃及、希腊、叙利亚和葡萄牙，而且把博茨瓦纳（产钻石）列在首位？——见World Bank, *East Asian Miracle*，第3页。

[284] 关于威尔士，见《泰晤士报》，1997年1月6日，第40版。关于大宇，见《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10月18日，第20版；同年同月19-20日，第15版。大宇这笔交易是以象征性的一法郎硬币接管汤姆森的家用电器分部，但需清偿其债务（法国政府急于减少赤字，以便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但交易于1996年12月告吹，因为许多法国人反对，大喊大叫。韩国人谴责法国人是“种族主义”——如果是美国人来做这笔交易，准没问题。韩国政府说“法国不可信”，法国人仇外心理“令人担忧”。见《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12月6日，头版；同年同月9日，第13版；1997年1月15日，第11版。

[285] 我听说泰国华人虽用泰人姓名，但当地明眼人仍看得出哪些姓名的人是华人。

[286] 泰国人觉得他们比马来西亚人更能欢迎当地的华人少数民族在工商界起作用。见Kap-lan, *Ends of the Earth* 一书，第377页。

[287] 原文如此（“in the early 1900s”），疑为“20世纪90年代初”之误。——译注

[288] 另一方面，华人习惯于自己抱成团，又比当地占人口多数的民众富有，因而在某些地方成为当地人犯罪活动的目标。这使得他们不愿在当地投资——谁知道哪一天会被撵走呢？——参见Seth Mydas, “Kidnapping of Ethnic Chinese Rises in Philippines”一文，载于《纽约时报》1996年3月17日，第3版。

[289] 1995年，曼谷市民平均每户年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见Achavanuntakul,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一文，第9页。

[290] 装配线原则在当时适用于各种生产方法。亨利·福特强调长期运转，有的技术即使早已过时，他也不改。当他的看法正确时，他十分成功。当他失误时，别人就抢夺

市场份额。Flink, “Unplanned Obsolescence”一文指出T型车从一开始就有些过时。但它售价低廉, 1908年为825美元一辆, 到1927年为260美元一辆。1927年5月最后一批T型车驶下装配线, 前后累计生产了1500万辆。

[291] 人们很容易低估黄包车的贡献, 但当年它曾是日本城市中的关键交通工具, 1888年仅东京一地就有38000辆。Morris-Suzuki,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一书第97页指出, “黄包车对日本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啻于铁路。”她还指出, 黄包车是日本对外出口的第一种车辆, 它们打开的市场后来由自行车和汽车所接替。黄包车的生产还有一个特点, 即零部件由一批小供应商组成的网络提供, 这种方法早于汽车工业和其他装配产业。

[292] 当时日本尚无敌国, 这一举措只能看做是为帝国扩张作准备。关于1918年该法律, 见Morris-Suzuki,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一书, 第124页。

[293] 艾柯卡担任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时谈过, Aspen牌汽车经防锈处理, 每辆节省8美元, 但随后的修理费共1亿美元, 更严重的是丧失了消费者的信心。——见Holusha, “Detroit’s Push”一文。

[294] 1983年春季, 日本推出了三种新型小汽车(丰田的Camry, 本田的Prelude和马自达的626), 使得美国最新型的小汽车也显得过时。Nag和Simison发表于《华尔街日报》1983年3月17日第37版的“With Three New Cars”一文论及此事。

[295] 劳资冲突及其引起的生产中中断很有影响。福特公司在20世纪头20多年的5美元工资及家长式管理的兴盛时期, 曾做到了将库存周期由1903年的204天压缩到1922年的17天。Abernathy and Clark, “Notes on a Trip”, 第36页指出, 日本人在工序合理化方面的做法总的说来, 与当年福特公司的做法相去不远。

[296] 情况本来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在战后年代, 日本出现过好斗的工会, 往往是在好斗的共产党人领导之下, 它们与公司工会, 即公司内部组织的工会, 发生了几次激烈冲突, 才被迫放弃了好斗态度。美军占领当局起了作用: 最初使工会合法化, 为好斗者打开了大门, 后来则驯服工会, 削弱苏联的影响。

[297] 经济学家哈维·利本斯坦在《日本管理制度》(Leibenstein, “Japanese Management System”)第9页作过总的对比: “在西方, 人们对于自己与公司的关系是采取一种短期的合同观念, 而不是长期的归属观念。西方人的态度表现为一系列的合同……仅致力于某一特定技能或职业(甚至还有该职业的“产权”)。而没有对公司的总的忠诚。”第11页有1976年一次调查结果: 日本49%的工人说自己任务完成时应帮助他; 在美国工人中仅16%作此表示。

[298] 日本这样的劳资关系一直使专家们迷惑不解。没有冲突, 是否表明劳工已发展到不再成其为劳工? 抑或是反映出日本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和传统? 许多日本人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但Galenson和Odaka在“The Japanese Labor Market”一文中认为此说“陈腐”不一定可信。“陈腐”就不可信吗?

[299] 克莱斯勒公司曾对政府紧急财政援助感激不尽，但情况好转时，却又声称政府参股不应分享股利。公平何在？

[300] Field, *Inside the Arab World*一书第21页指出，按照90年代初的采掘速率计算，海湾石油尚可采130年（这自然是据已知储量计算。人们还在寻找油藏）。但这是海湾，中东其余产油区及北美采尽的时间更近。同时，日益加大的耗油量还促使人们探寻以新的技术开发新的能源。最终，石油可能像现今的煤炭一样，会大量留在地下而不再开采。

[301] 苏联有些做法是在德国之前，大概当了德国人的老师。30年代初，苏联利用劳改犯人挖掘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让他们用镐、锹和手推车在冰天雪地劳动，忍饥挨饿，死者成千上万——这种做法的理由，就是据说劳动可以改造人，使人民公敌变成好的社会主义者。口号是：“我们将改造自然，得到自由。”而纳粹死亡营大门口的标语则是：“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关于苏联的无情巨人狂，见Josephson, “Projects of the Century”一书。

[302] 原文如此。——译注

[303] 这些情况不同于苏联当局公布的说法，而且也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愿承认的。可参看Alexander R. Rich, “10 Years Later, Chernobyl’s True Story Is Hard to Nail Down”, *Boston Globe*, 1996年4月26日，第21版。

[304]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生命损失可能永远说不清。官员，包括医务人员，都受到巨大压力而尽量缩小损失。Feshback和Friendly, *Ecocide in the USSR* 一书第152页指出，当地医生走光了，因为害怕公众愤怒。大概更怕辐射。

[305] 关于砖红壤，请参看第一章。

[306] 有人提醒我说，迷信和魔术并未消亡，还有人认为宗教信仰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无疑，我们还是软弱的生灵，会在需要安慰的场合寻求安慰。连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不例外，因为科学和理性是很强硬的伴侣。尽管如此，各种幻觉、错觉和宗教信仰仍应在原则上和实践上排除于探寻和发现之外。

[307] 持这一怀旧态度的人有如人类学家处理其标本时所遇到的难题：要么用凝胶之类的东西把标本珍藏起来，要么对标本作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促使标本变样和消失。关于原始社会美德，见Diamond, *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 一书和Jordan, “Flight from Modernity”一文。

[308] 并不是人人都乐观。保罗·肯尼迪在《为21世纪作准备》一书中问道：“在贫穷的海洋中拥有繁华的岛屿，多惬意？”里夫金在《工作的终结》一书中对贫富悬殊亦感愤怒，认为长此以往，我们就会进到一个“后市场社会”。现在流行说后这个，后那个，也许不久就该说“后后”和“后后后”了。

[309] 亚当·斯密也相信财富的增长会有限度。在《国富论》第1卷第9章《论股利》中谈到，当一国已完全实现其土地和气候的性质及与其他国相对而言的形势所能允许的财富限度时，它可能就不会再往前进了。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遥远的前景，“也许”还从来无人经历过，而且他注意到，若有更好的“法律和体制”，就有超越这些限度的机会。

[310] 多谢植物学界研究创造出“奇迹稻”，世界稻米产量在1967-1992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印度有了“绿色革命”。国际水稻研究所许诺说，一种“超级稻”将使产量提高20-25%。见Seth Mydans, “Scientists Developing ‘Super Rice’ to Feed Asia”, 载于《纽约时报》，1997年4月6日，A-9版。那够吃吧？非洲又怎么办呢？

[311] 但有的行不通，因为谁都不要那些东西。1996年5月7日，德国爆发骚乱，愤怒的人群抗议德国放射性废料运往法国处理之后又运回德国贮存。政府花了大笔资金才让事态平息下去。因此，近来有一位经济学家建议富国把它们不要的废料运到非洲之类的穷地方，埋在沙漠里，而非洲人也需要钱。但这一建议从象征意义上说是不可接受的。

[312] 俄罗斯不是一个安全的做生意的地方。参看Remnick, *Lenin’s Tomb* 和 *Resurrection* 二书。乌克兰可能更糟。参看R.Bonner, “Ukraine Staggers on Path to the Free Market”, 载于《纽约时报》，1997年4月9日，A-3版。